甲骨文 oracode

/ ESSENTIAL /

德国史系列



VISIT…

总　目　录

条顿骑士团：一部军事史

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

德意志文化（1945～2000年）（全2册）

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德意志之魂



［美］威廉·厄本 | 著
陆大鹏 刘晓晖 | 译
条顿骑士团
William Urban
一部军事史
THE TEUTONIC KNIGHTS
A Military Histor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威廉·厄本（William Urban）著
陆大鹏 / 译
北京青年报
单向街书店
2018中国年度知道分子

The Teutonic Knights：A Military History

By William Urban

Copyright © Greenhill Books

Simplif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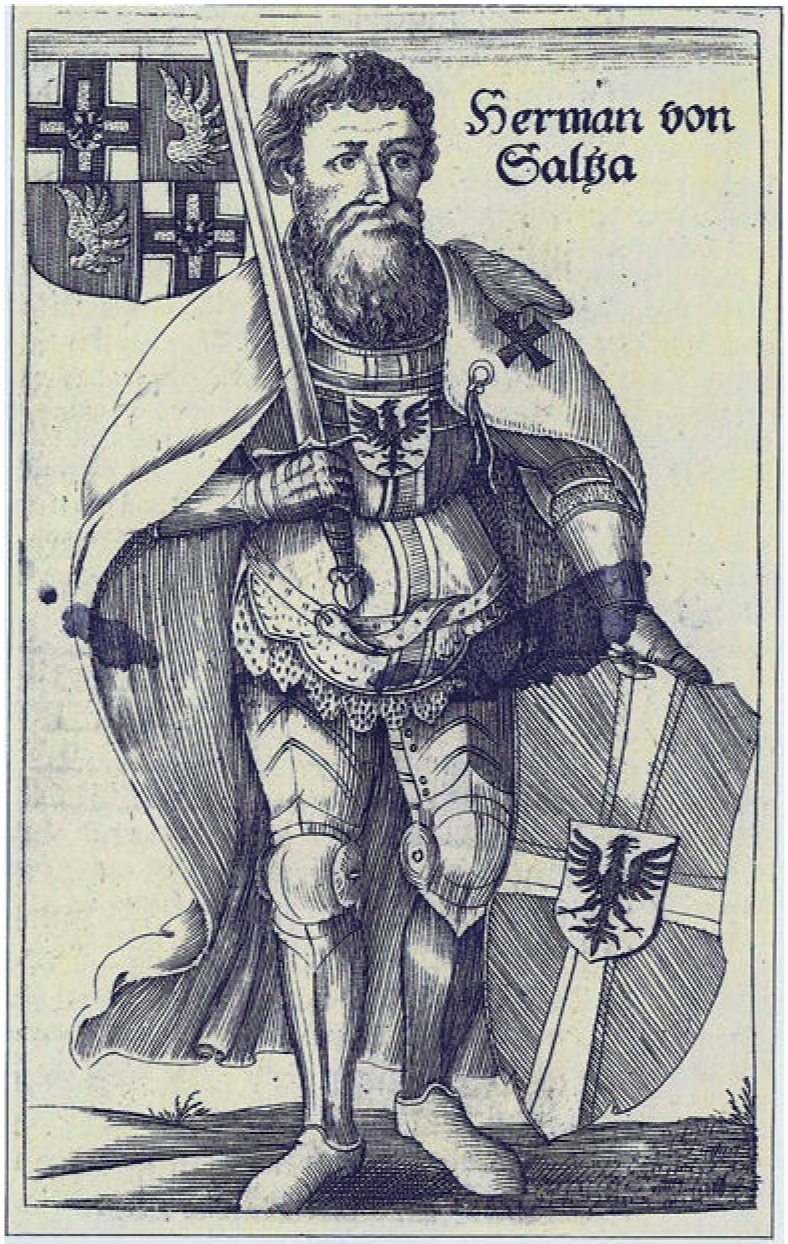

William Urban
〔美〕威廉·厄本 | 著
陆大鹏 刘晓晖 | 译
条顿骑士团
一部军事史
THE
TEUTONIC
KNIGHTS
A Military Histor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1189～**1191**年的阿卡围城战，条顿骑士团从这里起源。



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1194**～**1250**），条顿骑士团的重要庇护者。



17世纪木刻画中的赫尔曼·冯·萨尔察（**1165～1239**），条顿骑士团第四任大团长。在他的任上，骑士团开启了将主要资源从圣地向中东欧转移的过程，但他本人最大的心力仍倾注在十字军传统的近东战线上。



格涅兹诺大教堂的青铜大门上刻画了布拉格的圣道博被普鲁士人杀死的殉道场面。向信奉多神教的东欧原住民传播福音的天主教教士经常面临生命危险，这一情况为条顿骑士团这样的军事修会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1230～1278**），柯尼斯堡的建立者。



邀请条顿骑士团到波兰的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1187～1247**）。



今天的玛利亚堡，其波兰语的名字是马尔堡。



文登城堡的遗迹。这里曾是立窝尼亚团长的大本营。



立陶宛大公明道加斯（**1200～1263**）。他狡猾地周旋于天主教、东正教和多神教原住民势力之间，一度利用蒙古人入侵的机会染指罗斯，把松散弱小的立陶宛建设成东欧大国。

Бѣ бо тогда день суботныи. слнцу восходѧ
щю. и сътоупишасѧ обои полцы. нѣмцы
и чюдь пробишасѧ свиньею сквозѣ полки. и бы
тоу сѣча зла и велика. нѣмцем и чюди. и тру
ѿ копеи ломлениѥ. и звоук ѿ мечнаго сѣче
ниѧ. ꙗко же морю помрьзшю двигнутисѧ.
и не бѣ видѣти леду покрыло бо бѣ все кровью.





古代手稿中表现的**1242**年的冰湖战役。这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光辉时刻，但无论是战役的情节还是条顿骑士团的损失都没有后世传说得那么夸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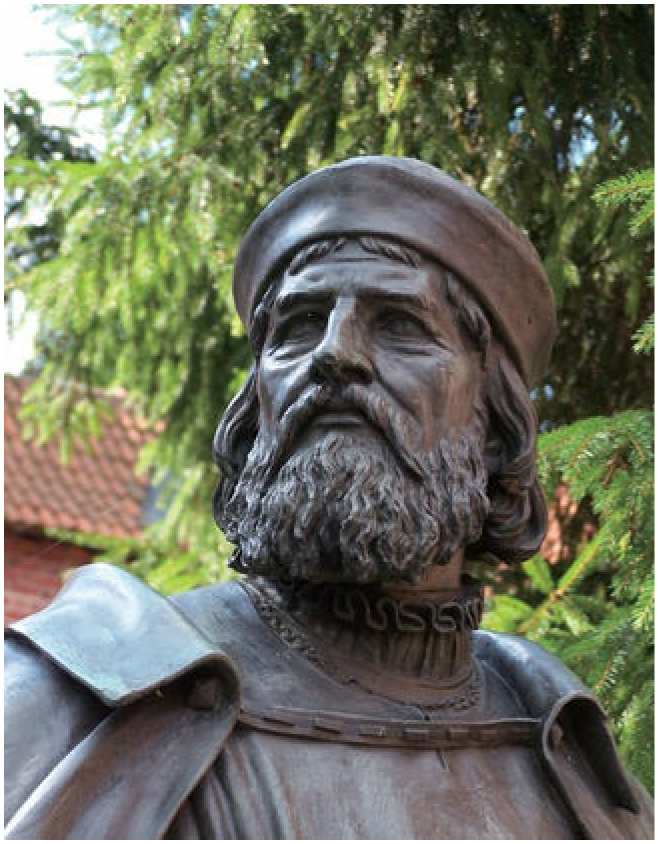
波兰的伟大君主卡齐米日（三世）大王（**1310**～**1370**）。他用精明的外交手段经营与包括条顿骑士团在内的周边势力的关系，但他的婚姻生活远不如外交事业顺利。



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1348～1434**），立陶宛大公、波兰的重要君主，曾在格伦瓦德之战后将条顿骑士团逼入绝境。



18世纪画家**Marcello Bacciarelli**笔下的拉约什大王（**1326**～**1382**），匈牙利和波兰君主。



玛利亚堡的条顿骑士团第**22**任大团长（**1351**～**1382**年在位）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的雕像。条顿骑士团在他领导下成为骑士文化的典范，声望与影响力达到顶峰。



立陶宛的民族英雄维陶塔斯，曾在**1401～1430**年统治立陶宛大公国。他在格伦瓦德之战中与波兰人并肩对抗条顿骑士。



在坦能堡战役中战败身死的大团长乌尔里希·冯·容金根。



与条顿骑士团打过很多交道的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后来的教宗庇护二世。



扬·马泰伊科的油画《格伦瓦德之战》。画面中间穿红袍高举宝剑者为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左侧骑白马有胡须者为战死沙场的条顿骑士团大团长容金根。

最后一位在普鲁士统治的大团长和第一任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



现代乌克兰画家**Артур Орльонов**笔下的坦能堡战役（格伦瓦德之战）。



最后一位在普鲁士统治的大团长和第一任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

伦。他将条顿骑士团普鲁士分支世俗化，并于**1525**年成为波兰国王的封臣。



海因里希·冯·普劳恩，**1410**～**1413**年任大团长。他英勇地从波兰和立陶宛军队手中挽救普鲁士，差一点就重振了骑士团的权力和威望。



1466年的《第二次托伦和约》。内忧外患的条顿骑士团接受了严苛的条件，成为波兰王国的封臣，彻底丧失了恢复曾经辉煌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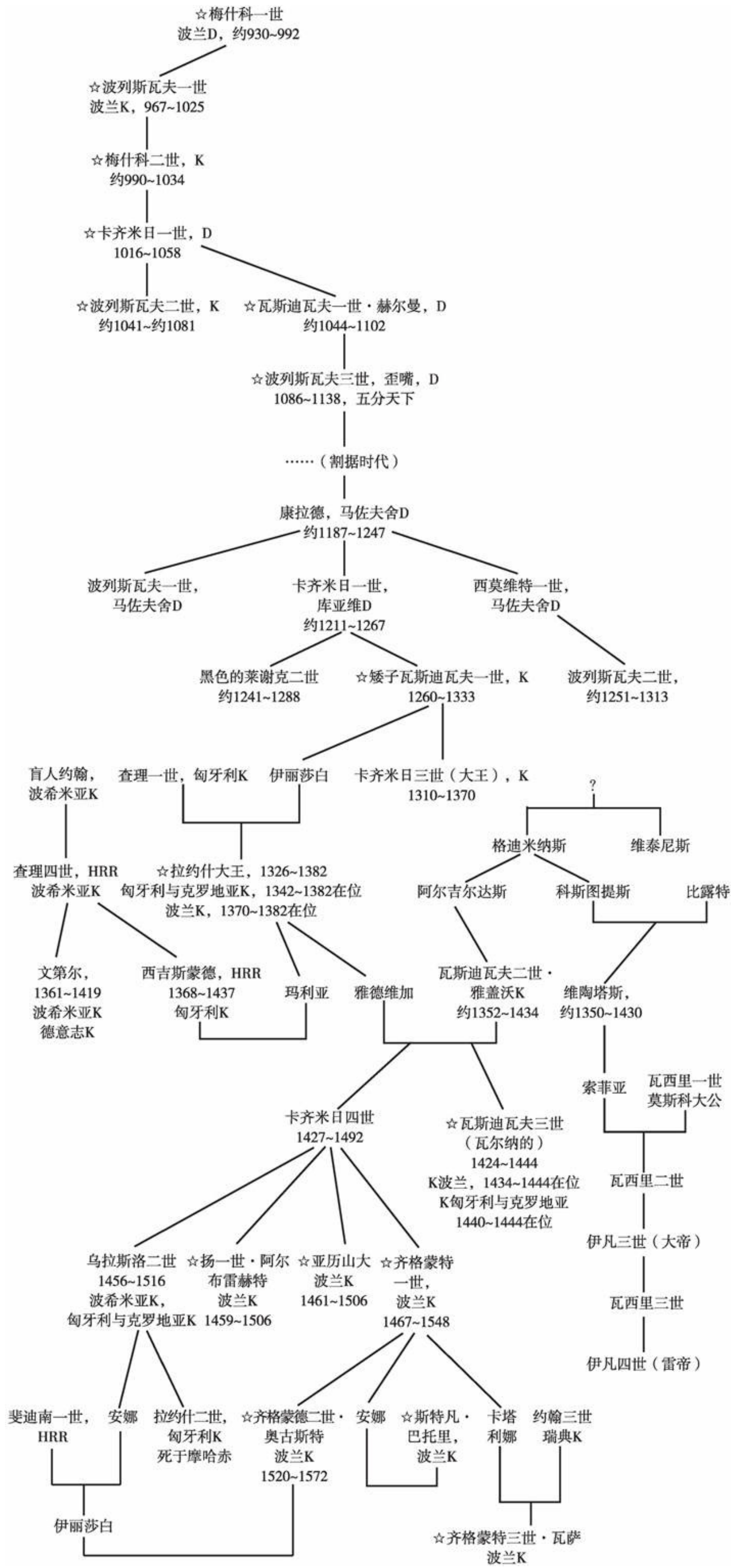
扬·马泰伊科的油画《普鲁士称臣》。画中表现的事件在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叙事中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立窝尼亚骑士团的最后一任团长和第一任库尔兰公爵戈特哈德·凯特勒。他在**1561**年将利窝尼亚骑士团世俗化，但无法阻止俄罗斯、波兰-立陶宛等周边强权争夺骑士团留下的袖珍帝国的残余部分。

波兰、立陶宛与匈牙利诸邦

说明：未特别说明的年份为生卒，☆为君主，K为国王，D为公爵，HRR为神圣罗马皇帝。


☆梅什科一世
波兰D，约930~992
☆波列斯瓦夫一世
波兰K，967~1025
☆梅什科二世，K
约990~1034
☆卡齐米日一世，D
1016~1058
☆波列斯瓦夫二世，K
约1041~约1081
☆瓦斯迪瓦夫一世·赫尔曼，D
约1044~1102
☆波列斯瓦夫三世，歪嘴，D
1086~1138，五分天下
……（割据时代）
康拉德，马佐夫舍D
约1187~1247
波列斯瓦夫一世，
马佐夫舍D
卡齐米日一世，
库亚维D
约1211~1267
西莫维特一世，
马佐夫舍D
黑色的莱谢克二世
约1241~1288
☆矮子瓦斯迪瓦夫一世，K
1260~1333
波列斯瓦夫二世，
约1251~1313
盲人约翰，
波希米亚K
查理一世，匈牙利K
伊丽莎白
卡齐米日三世（大王），K
1310~1370
?
格迪米纳斯
维泰尼斯
查理四世，HRR
波希米亚K
☆拉约什大王，1326~1382
匈牙利与克罗地亚K，1342~1382在位
波兰K，1370~1382在位
阿尔吉尔达斯
科斯图提斯
比露特
文第尔，
1361~1419
波希米亚K
德意志K
西吉斯蒙德，HRR
1368~1437
匈牙利K
玛利亚
雅德维加
瓦斯迪瓦夫二世·
雅盖沃K
约1352~1434
维陶塔斯，
约1350~1430
索菲亚
瓦西里一世
莫斯科大公
卡齐米日四世
1427~1492
☆瓦斯迪瓦夫三世
（瓦尔纳的）
1424~1444
K波兰，1434~1444在位
K匈牙利与克罗地亚
1440~1444在位
瓦西里二世
伊凡三世（大帝）
瓦西里三世
伊凡四世（雷帝）
乌拉斯洛二世
1456~1516
波希米亚K，
匈牙利与克罗地亚K
☆扬一世·阿尔
布雷赫特
波兰K
1459~1506
☆亚历山大
波兰K
1461~1506
☆齐格蒙特
一世，
波兰K
1467~1548
斐迪南一世，
HRR
安娜
拉约什二世，
匈牙利K
死于摩哈赤
☆齐格蒙德二世·
奥古斯特
波兰K
1520~1572
安娜
☆斯特凡·
巴托里，
波兰K
卡塔
利娜
约翰三世
瑞典K
伊丽莎白
☆齐格蒙特三世·瓦萨
波兰K

目录

- 一 军事修会
- 二 条顿骑士团的建立
- 三 圣地的战争
- 四 特兰西瓦尼亚的试验
- 五 在普鲁士反对异教的战争
- 六 立窝尼亚的十字军东征
- 七 与波兰争夺领土
- 八 立陶宛的挑战
- 九 立陶宛的皈依
- 十 坦能堡战役
- 十一 漫长的衰落和骑士团在波罗的海的末日
- 十二 骑士团在立窝尼亚的末日
- 十三 总结
- 附录一 条顿骑士团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 附录二 1525年之前的历任大团长（年份为任期）
- 参考书目
- 译名对照表

一 军事修会

传教士与武装传教

对于在世俗社会履行自己的各项使命时可否动用武力，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往往犹豫不决。首先，教义要求宽恕罪人，但同时不能忘了保护受害者。所以，宽恕悔罪的强盗是一回事，对强盗行为置之不理是另一回事。类似地，教会反对教士拿起武器，鼓励信徒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私人争端；但与此同时，教会必须支持世俗君主，因为君主负责保护教士及其信众，抵御外敌攻击和国内暴力的侵害。

中世纪社会绝不是太平安宁的社会，宗教虔诚与爱好和平也不是一回事。但男女修道院为人们逃避日常政治的动荡提供了道德慰藉和安全的避难所。绝大多数赞同用武力保卫国家、逮捕罪犯的罗马天主教徒也知道，《新约》反对杀人，反对暴力。这与斯堪的纳维亚原始异教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后者的核心就是对武力与狡诈的赤裸裸崇拜。维京人的萨迦传奇歌颂英雄业绩的方式是西方史诗无法比拟的。不过，即便最骁勇的维京海盗也渐渐通过《尼亚尔萨迦》[1]之类的故事明白了，异教不能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提供根基；除了适者生存、强者为先之外，政府还必须有别的思想支柱。

在大多数情况下，基督教传教士说服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各个区域性铁腕统治者，让他们相信为了他们的人民和他们自己的生存，必须结束以掳掠和战争为基础的旧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们首先要成为基督徒。这些新受洗的统治者成为挪威、丹麦和瑞典的国王之后，就有教士

为其出谋划策，建议他们如何征税，如何将其他强大的领主招募到自己麾下，如何强制执行自己的敕令，如何建立全国政府的基础。于是，维京海盗在北欧的恐怖统治便以令人意外的速度宣告结束。

西欧人对北欧海盗袭掠的军事回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欧海盗皈依基督教。不过程度有多高，取决于不同观察者的视角。封建制度的发展在西北欧创建了骑士阶层，他们比维京人更训练有素，装备更精良。农民为骑士提供资源，让骑士有能力购买武器和马匹、建造城堡和供养驻军。同时，一些维京领袖在占领西欧土地后，也要保卫自己的新财产，抵御他们那些仍然将法兰西、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民视为天然猎物的维京亲戚。

很多基督教传教士在没有武装护卫的情况下踏上异教徒的土地。他们一心求死，渴望成为殉道烈士。有些教士和僧侣的确欢迎为信仰而死的机会，渴望在天堂赢得显赫的位置。但当时受过训练的教士相对较少，西欧统治者更需要他们在国内服务，而不是到海外当烈士。所以，很多年前爱尔兰教士开始到异教徒德意志人那里传教的时候，法兰克统治者会派武装卫兵保护这些教士。就这样，派遣武艺娴熟的武士保护传教士的传统开始了，这最终导致了立窝尼亚[2]十字军东征。卫兵没能从弗里斯兰[3]刺客手中挽救圣博尼法斯[4]的生命。但对其他传教士来说，只要不像圣博尼法斯那样坚持要砍伐异教徒的圣树来建造基督教堂，身边的武装卫兵就足以警告异教徒，让后者明白他们不会容忍公开的抵抗。

基督教传教的策略是让传教士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传教，鼓励非基督徒统治者效仿成功的基督徒君主，并威胁动武。但这些策略对穆斯林没用。尽管我们对伊斯兰教徒入侵欧洲那段历史的记忆不多（这段历史不像北欧海盗入侵西欧那样令人刻骨铭心，并且穆斯林入侵者的船只是标准的地中海桨帆船，是基督徒熟悉的船型），但穆斯林实际上曾攻

入西班牙北部，洗劫了很多意大利城市，在阿尔卑斯山安营扎寨，并对法兰西南部虎视眈眈。

法兰克[5]志愿者到西班牙参加抵抗摩尔人[6]的战争，以及来自北非的伊斯兰战士到欧洲参战，这都发生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同样，虽然乌尔班二世教宗在1095年末呼吁法兰克人从基督教之敌手中收复圣地（这些基督教之敌正在圣地压迫基督徒，并阻止基督教朝圣者到耶路撒冷及其周边的圣地参拜），但在这之前就有一些西欧雇佣兵为拜占庭帝国效力，与突厥人作战。

仔细聆听教宗演讲的人们意识到，如果本地的地痞流氓能把精力和本领都投入到与基督教世界之敌的战争，而不是互相斗殴或为害乡里，这将是一件好事。教宗暗示，如果能把桀骜不驯的贵族及其追随者弄出国一段时间，国内就能太平了。人们经常忘记兵役还有这个方面的作用，但其实直到不久以前，西欧的司法机关在决定如何处置放浪不羁的年轻男子时，还会给他们两个选择，要么坐牢，要么当兵。司法机关希望，纪律、人生的目标感和成长，能让少年犯变成有用的公民。

修道会的作用之一就是找到一个让人们能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地方。但一辈子守贞、斋戒、读书和种地，对受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来说没有吸引力。他们觉得骏马和利剑比用拉丁语作漫长的祈祷和唱赞美诗更有意思。但教会圣师[7]下令组建的正是军事修会，甚至在没有十字军远征整装待发的年份里，军事修会仍在招募人员。

军事修会里的基督教骑士的职责不是传播福音，而是保护那些受过训练、以传播福音为使命的传教士。基督教骑士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不过也远远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无知蠢类），但他们通常相当虔诚，并且特别愿意为了基督教的事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也愿意把自己的金钱交给陌生人照管，以立下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的功绩。也许有人会说从东方能获得珍贵的商品，但比萨人用船运回欧洲的巴勒

斯坦泥土（来自他们位于近东的墓地）里究竟有多少财富，是现代人的思维无法理解的。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中世纪十字军战士的思维，不是我们这些后工业现代社会主流的人能理解的。当然我们能理解到一定程度，但这也必须是按照古人的方式来理解。

早期十字军东征的教训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1099）期间，法兰克人占领了耶路撒冷，这彰显了以下各方面因素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11世纪末西欧的宗教热情、军事技术与专业知识、人口增长与经济繁荣，以及世俗与教会精英新近获得的自信。大批武士从西欧出发时有如潮涌，但因为疾病、逃兵和死亡，抵达圣地时只剩涓涓细流。但即便这些少量幸存者仍然足以战胜那些新建不久且羸弱的突厥国家。这些突厥国家统治着心怀不满的阿拉伯人，其中有些还是基督徒。但接下来，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在十字军战士攻克耶路撒冷的使命完成后，大多数骑士和教士都想回家。留下的武士太少，不足以巩固征服的战果；后来从西欧赶来的援兵也太少，不足以守成。去耶路撒冷朝圣的大批农民在距离君士坦丁堡不远的地方惨遭屠戮，而起初因为东方市场开发而欢呼雀跃的意大利商人很快就为了争夺商业利益而互相争吵。十字军国家似乎摇摇欲坠，注定能够苟延残喘，直到突厥人找到一位英明领袖来组织当地资源，并为其追随者注入一种可以与西方人相比的宗教热忱。

随后几十年里，每当有突厥人领袖敢于攻击十字军王国，西方的反应都颇为迟缓，笨拙的大军抵达圣地时总是太晚，因此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家都清楚地感到了建立一种新型军事组织的必要性，它应当能为孤立的、处境危险的城堡提供经验丰富的骑士作为驻军；应当能在欧洲搜寻给养和财富并将其运输到圣地，从而为驻军提供给养和装备；应当熟悉当地情况，并能为新到的十字军战士提供讲解；并且不会被卷入圣地各个豪门世家野心勃勃的内讧之中。西欧人发现，最符合上述需求的组织就是军事修会。

第一个军事修会是圣殿骑士团，它的创始时间可能是1118年，由一

群到访圣地的法兰西骑士创立。他们对宗教充满热忱，想要脱离尘世，以祈祷和为教会服务为生。在严格意义上，最早的圣殿骑士团可能更接近俗世的兄弟会而不是修道会，它和在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世界里还能找到的一些组织类似，其宗旨是为社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服务。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将自己位于原先的圆顶清真寺的宫殿提供给圣殿骑士团作为住所。十字军战士相信这里就是所罗门圣殿的所在地，于是这个新组织被称为圣殿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原本可能只是众多默默无闻且短命的贵族兄弟会之一，但耶路撒冷宗主教请求他们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护送朝圣者通过从沿海到圣城这一段危险的路途。很多年里，圣殿骑士团的这项使命无人知晓，而且取得的成绩也一般，但他们对此颇感自豪。为了纪念骑士团早期的贫困，后来的圣殿骑士团大团长使用的印章上的图案就是两名骑士同乘一匹马（意思是他们买不起第二匹马）。渐渐地，他们的才干和对圣地的知识赢得了认可，他们对保卫圣地的贡献不仅没有被低估，反而在宣传中被夸大了。这有助于骑士团招募新的、更富裕的志愿者。到12世纪30年代，圣殿骑士团已经踏上了名望与繁荣之路。新成员纷至沓来，他们通常会把土地与金钱捐赠给骑士团。这些资源对供养在圣地的圣殿骑士至关重要。

圣约翰骑士团更有名的名字是医院骑士团，他们是第二个军事修会。但医院骑士团的建立比圣殿骑士团更早，可以追溯到约1080年，并且教廷对它的认可也更早，约为1113年。但他们直到12世纪30年代才开始具备军事职能。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原本的职能是为朝圣者和十字军战士提供医疗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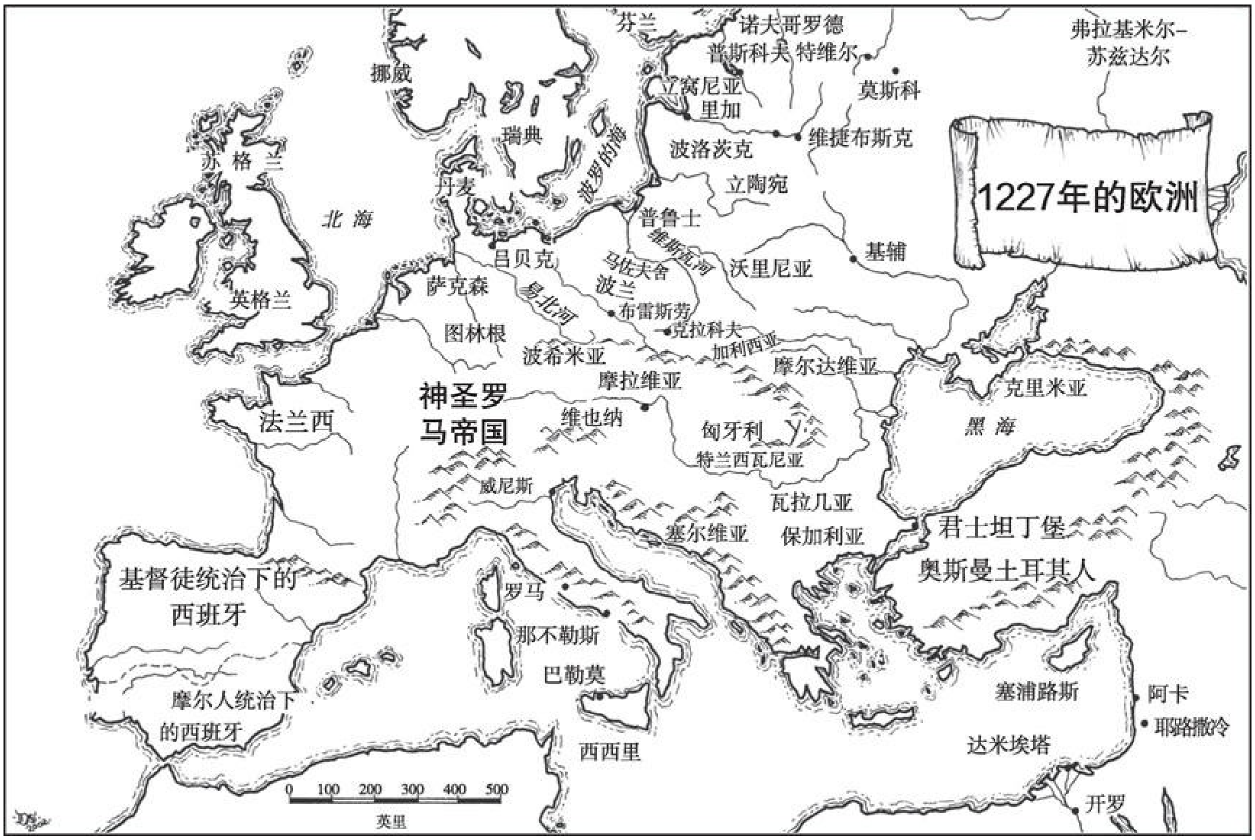
传统的教士对于可否允许教士参战抱有很大疑虑。军事修会的骑士仅仅是修道士而不是神父，但他们宣过誓，所以属于教士。基督教世界最古老的传统之一是在邪恶面前的不抵抗方针。每一位基督徒都很容易

想到，彼得曾在基督行将被捕并被送上十字架时准备拔剑保护他，但基督责备了彼得。而在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就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统领军队的先例，多位教宗也曾祝福与信仰之敌作战的军队。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1090～1153）是当时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在一本题为《赞美新的骑士团》（*De Laude Novae Militiae* ）的论著中为军事修会的终极存在理由作了辩护。他首先主张，圣地对冥思与启迪具有重要作用。他写道，圣地对朝圣者的救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朝圣者长途跋涉、经历千难万险去基督和圣徒生平重要的地点祈祷，为的就是求得救赎。圣伯纳德认为，圣墓（即基督之墓）具有特别显著的意义。所有朝圣者都渴望到那里祈祷。然后他指出，十字军战士保卫通往圣地之路的工作显然非常重要，因为突厥统治者当时就已经在阻挠基督徒朝圣者前往圣地了。当然，耶路撒冷王国内部的政治动荡对局势也有负面影响。耶路撒冷宗主教没有资源维持一支由骑士或雇佣兵组成的正规军队来保卫朝圣路线。就连圣伯纳德也没办法说服世俗统治者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期间联合起来。军事修会显然是完成圣伯纳德眼中的十字军战士使命——保卫海陆两路的朝圣路线的最好工具。

军事修会满足了实践、宗教和心理的需求，并且非常适合在几次大规模十字军远征活动之间漫长、沉闷而危险的时期为圣地的各座城堡提供驻防。埃里克·克里斯琴森在他那本特别值得赞美的佳作《北方十字军》的“武装僧侣：意识形态与效率”一章中总结了上述情况。[8] 统治者了解到，军事修会愿意在世俗骑士不能够或不愿意去的地方服役。军事修会也满足了人们深切感受到的一种需求，弥合了精神斗争和尘世间战争之间的矛盾。现在，基督徒面对大奸大恶时不必消极被动，也不必等待舆论转变或者出现一位伟大领袖来组建军队搭救他们。军事修会让十字军成为持续不断的行动，永不停歇，永不中止。

军事修会的武器装备始终大体遵循当时西欧和中欧流行的风格，只是在不同世代之间有微小的变革。总的来讲，每位武士都身穿链甲和胫

甲，戴头盔，手持长矛和盾牌，擅长使用重剑，并骑乘受过训练，能向敌方步骑兵发起冲锋的高头大马。唯一为了适应气候做的改变，是在链甲之外披一件轻质罩衣，以免链甲被晒得过热；并且避免在炎热时间旅行。当然，圣地的严酷气候对来自北欧的访客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们往往很快就会因为暑热和染病而倒下。所以军事修会的存在特别重要，他们可以为新来者提供建议和示范。如果新来的十字军战士虚心接受并认真学习，就能变成战斗力可观的武士，而不是病人或者轻易成为突厥式战术的牺牲品。



1227年的欧洲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西方骑士的蛮力与突厥和阿拉伯武士轻装急进、迅捷敏锐的高超战术之间的对比让十字军东征显得特别有趣。这段历史里从来没有过双方军队正面对垒、兵力更强的一方获胜的例子。实际发生的是战略与战术的复杂互动，双方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指挥官

在投入作战之前都要思前想后、精心算计。当然斟酌算计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因为大家都知道战争的特点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有一位将军，没有一支军队始终有能力向战场的混乱强加秩序。气候、地理、兵力、装备和给养在决定胜负时都会发生作用，但说到底个人和集体的意志也很重要。并且，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承认，兵家胜负取决于神的意志。

其他的十字军运动

到11世纪中叶，人们普遍认识到，圣地之外同样存在基督教之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很容易把他们与穆斯林敌人的长期斗争比拟为十字军运动，并且很快就说服教会，向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作战的基督徒志愿者提供与保卫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类似的精神福利。德意志人和丹麦人在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的启发下攻击了易北河以东的宿敌。1147年的文德十字军东征[9]摧毁了斯拉夫异教徒与海盗活动的一处堡垒，打开了向东迁徙和扩张的道路。

波兰人很快认识到，他们在向东方和北方扩张时也可以运用十字军远征的精神。但异教徒普鲁士人比文德人难对付多了，而且普鲁士人的领袖不像波罗的海南岸的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和波美雷利亚[10]公爵们那样，相信皈依基督教对他们有好处。波兰人对普鲁士人的攻击在13世纪初取得了一些胜利，尤其在维斯瓦河拐弯处的库尔姆[11]。但在普鲁士异教徒的反攻之下，波兰驻军仓皇逃跑。

严格地讲，波兰人对普鲁士的入侵不算十字军圣战，因为这些军事行动没有得到教宗授权，也没有在全欧洲得到教士的宣传鼓动。条顿骑士团将在后来纠正这个技术错误。13世纪20年代末，马佐夫舍[12]公爵康拉德及其亲戚邀请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赫尔曼·冯·萨尔察出兵协助防卫波兰土地，抵御普鲁士异教徒。当然，防卫只是说说而已。波兰人早就计划征服整个普鲁士。他们只需要一点点帮助。他们觉得请条顿骑士团帮忙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

---

[1] 《尼亚尔萨迦》是13世纪冰岛的萨迦传奇之一，也是最长和发展最完善的一部萨迦，讲述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代血仇。

[2] 立窝尼亚是一个历史地区，在波罗的海东岸，大致在今天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本书除了标明“作者注”之外，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

[3] 弗里斯兰是一个历史地区，在北海南岸，今天大部分在荷兰境内，小部分在德国境内。

[4] 圣博尼法斯（约675～754）出生于英格兰的韦塞克斯王国，是向德意志人传播基督教的主要人物之一，曾任美因茨大主教。他还改革法兰克帝国的教会，并帮助教廷与加洛林王朝结盟。他的一项著名事迹是在今天德国的黑森砍伐了德意志人信仰的雷神的橡树，却没有遭到雷击，从而促使当地人皈依基督教。他还在橡树林的原址建造了基督教堂。后来他在弗里斯兰传教时被武装土匪杀害。

[5] 中世纪所说的“法兰克人”指的是法兰西人，或泛指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西欧人。

[6] 在中世纪，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等地的穆斯林被欧洲基督徒称为“摩尔人”，他们并不一定是来自摩洛哥的穆斯林。摩尔人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等。“摩尔人”也被用来泛指穆斯林。

[7] 教会圣师，或称教会博士，是基督教会给予在神学或教义发展上有卓越成就的学者及圣人的一种头衔。天主教会有四大圣师：教宗格列高利一世、圣安波罗修、圣奥古斯丁和圣哲罗姆。东正教会有三大圣师：金口约翰、格列高利·纳齐安和恺撒利亚的巴西略。到2015年，天主教共有三十六位获得圣师头衔的圣人，其中有四位是女性。

[8] Eric Christensen，*The Northern Crusades*（Penguin，London and New York，1998）.克里斯琴森不仅是扎实的学者，而且他的精练评论往往十分风趣。（作者注）

[9] 文德人不是单一民族，而是日耳曼民族（斯堪的纳维亚人、德意志人等）对居住在他们附近的斯拉夫人的泛指，所以文德人包括多个民族和部落群体。对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说，文德人是波罗的海南岸的斯拉夫人。对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居民来说，文德人是奥得河以西的斯拉夫人。文德人不断与他们的邻居德意志人、丹麦人和波兰人发生冲突。1147年的文德十字军东征是北方十字军东征的一部分，有强迫异教徒文德人皈依基督教的因素，也有经济掠夺和攫取土地的因素。著名的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和第一代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大熊”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参加了此次东征。12～14世纪，德意志人不断向文德人的土地移民和扩张。大部分文德人被德意志人消灭或同化，今天只剩下一支文德人，即生活在德国东部的索布人。今天德国的一些地名和姓氏起源于文德人的语言，莱比锡和柏林这两个地名很可能源自文德人的语言。

[10] 波美雷利亚，也称东波美拉尼亚或格但斯克波美拉尼亚，是波兰北部的一个历史地区，在波罗的海南岸、维斯瓦河以西，最大城市是格但斯克（但泽）。10世纪，波美雷利亚被波兰人征服。

[11] 库尔姆是德语名字，今在波兰境内，波兰语名字是海乌姆诺。

[12] 马佐夫舍是一个历史地区，在今天波兰的东北部，主要城市有华沙和普沃茨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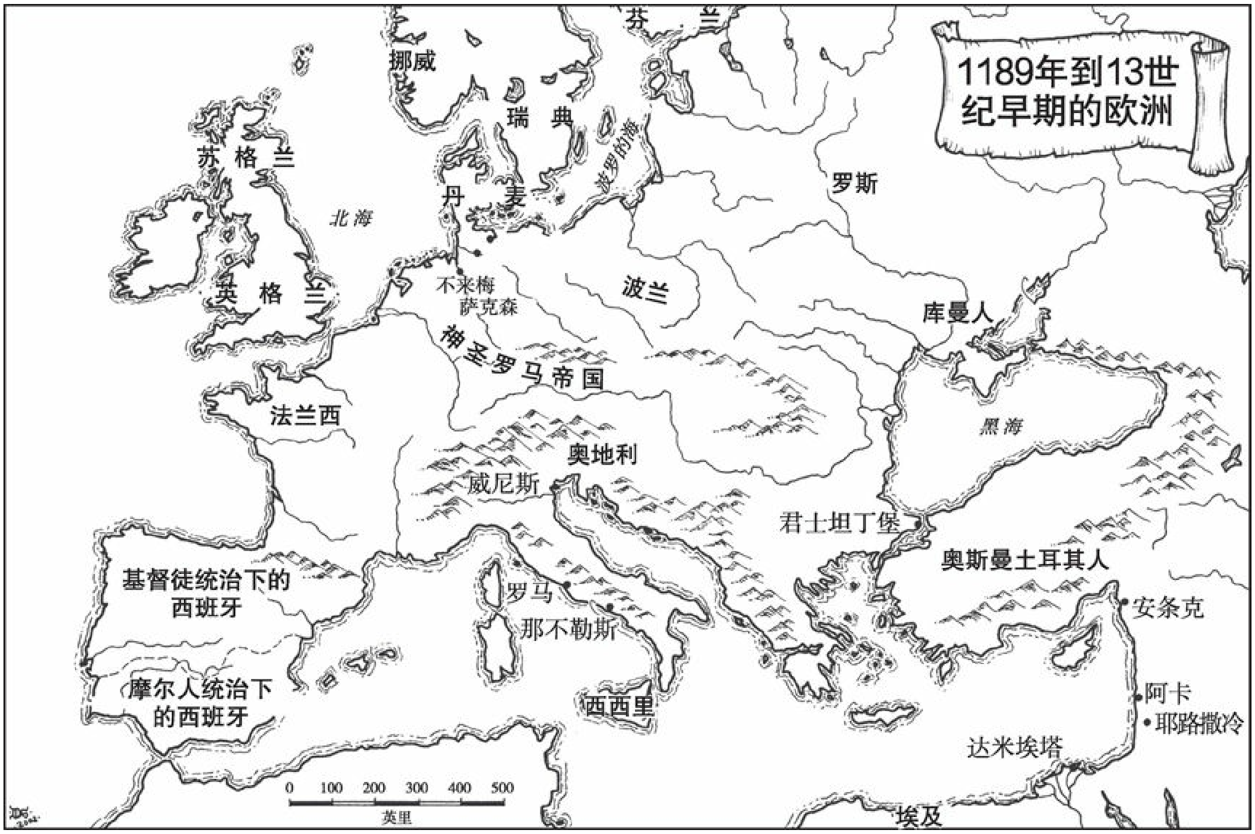
二 条顿骑士团的建立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德意志人对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寄予厚望，希望基督教力量能够取得最辉煌的胜利。霍亨施陶芬皇朝不屈不挠的红胡子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率领大军安然穿越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歼灭了阻断从君士坦丁堡往西去的陆路一个世纪之久的突厥军队，翻越艰险的奇里乞亚[1]山区隘道，进入叙利亚，从那里就可以轻松地进入圣地。按计划，他将在那里领导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和英格兰的联军，收复地中海沿岸之前丧失的港口，打通贸易与增援的海路，随后率领基督教大军解放耶路撒冷。然而，皇帝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一条山区小河里溺亡。他的封臣一哄而散，有的匆匆赶回德意志，因为他们需要参加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继承者、他的儿子亨利六世的加冕；也有人估计德意志国内会爆发内战，他们如果不回去就可能失去自己的土地。只有少数大贵族和高级教士信守诺言，继续前往阿卡城。此时法兰西和英格兰十字军正在攻打这座城市。

新到的德意志十字军因为阿卡的酷热和疫病流行而损失惨重，而他们在心理上受到的创伤至少与身体的痛苦等量齐观。狮心王理查（1189～1199年在位）此时正凭借英勇作战的功绩而赢得不朽的声誉。他憎恨霍亨施陶芬皇朝的封臣，因为几年前霍亨施陶芬皇朝流放了他的姐夫，韦尔夫家族的狮子亨利。所以狮心王理查抓住一切机会羞辱他的德意志盟友。最终他攻克了阿卡，但除此之外没有取得多少成绩。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1180～1223年在位）也多次遭到狮心王理查的侮

辱，愤然回国。大多数德意志人也走了，决心伺机报复狮心王理查。后来，奥地利公爵果然替德意志人报了仇，他俘获了狮心王理查，并将理查交给霍亨施陶芬皇朝的新皇帝换取赎金。



1189年到**13**世纪早期的欧洲

所有德意志贵族和高级教士回想起这次十字军东征，都满怀愤恨与失望。再想想当初出征时的踌躇满志，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所有人的背叛。英格兰人、拜占庭人、韦尔夫家族都背叛了德意志十字军，而且各国十字军之间互相背叛。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德意志人吃尽苦头，但只有一项拿得出手的成绩（或者说，他们后来是这么认为的）：建立了条顿骑士团。

草创之年，1190～1198

建立条顿骑士团其实是绝望之下的无奈之举。这种无奈不是因为缺少战斗人员，而是因为缺少有效的医疗措施。1190年攻打阿卡的十字军因为疾病而损失惨重。来自北欧的士兵不适应当地的酷热，水土不服，饮食不习惯，卫生条件也极差。他们没办法正常地安葬死者，于是将尸体和瓦砾一起投入“诅咒之塔”对面的壕沟。他们就是用瓦砾填平这道障碍的。军营中弥漫死尸的臭气。一旦染上热病，士兵就纷纷倒毙，围绕着病人或尸体嗡嗡叫的不计其数的苍蝇更让人不堪忍受。常规的医务单位疲于奔命，无法应付这么多病人。医院骑士团则优先收治自己的同胞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当时很少有人能区分这两个民族，因为狮心王理查自己就拥有法兰西的一半领土，还对剩下的一半垂涎三尺），患病的德意志人常常得不到救治。

这种情况令人无法忍受，并且似乎要无限期持续下去，因为围城战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也没有一位德意志君主亲临东方，要求既有的医院治疗他的臣民。于是，一些来自不来梅和吕贝克的中流阶级出身的十字军战士决定组建自己的医院修会，专门照料德意志病人。前线最显赫的德意志贵族，霍亨施陶芬家族的弗里德里希公爵[2]热烈响应这个计划。他写信给自己的兄长亨利六世，并得到了耶路撒冷宗主教、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支持。他们请求教宗塞莱斯廷三世批准这个新的修会，后者很快同意了。这个修会的成员将和医院骑士团一样从事医疗工作，并遵守圣殿骑士团的规章制度。新修会的名字是“耶路撒冷圣玛利亚医院德意志兄弟骑士团”。它的简称更为人熟悉，即德意志骑士团。这种简称暗示它与一个更古老的、当时实际上已经废止的医疗机构有联系。后来骑士团成员避免提起这种潜在的联系，免得他们落入医院骑士团的管辖范围，因为医院骑士团对最早的那家德意志人医院有监督权。

不过，如果有访客和十字军战士相信条顿骑士团与那家更古老的机构有联系，新修会的成员似乎也不会反驳。所有人都珍视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很多宗教机构会假装拥有比实际情况更显赫的起源，所以这个新的医院修会这么做也情有可原。

1197年，下一批德意志十字军抵达圣地时，医院已经欣欣向荣，为同胞提供价值不可估量的服务。修会成员不仅照料病员，还为新来者提供住宿，为手头拮据或遭过抢劫或在战斗中损失了全部财产的人提供金钱和食物。这批新十字军中有不少人来自不来梅，这是北海之滨一座繁荣发展的港口城市，后来是汉萨同盟的创始成员之一。这些市民慷慨解囊，为这家他们帮助创建的医院捐钱捐物。访客发现修会成员中有相当多的人受过骑士训练但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过上了宗教生活，于是他们提出这个医院修会可以像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一样承担军事职责。

圣地的十字军王国位于沿海的狭窄地带，由一系列城堡拱卫，但这些城堡的驻军力量很薄弱，所以基督徒领袖担心如果突厥人发动突然袭击，这些城堡在欧洲的援兵抵达之前就会陷落。当地拥有采邑的骑士太少，不足以组织有效的防御，而负责在海路巡逻以抵抗穆斯林海盗或封锁舰队的意大利商人（圣地唯一一群支持西方教会且人数较多的中产阶级居民）也无暇抽身，顶多能帮忙驻防海港。于是，王国的防务主要依赖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他们拥有残酷无情的武士和令人胆寒的声望，但在1187年战败（并导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领）[3] 之后已不足以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而且，这两个骑士团经常互相争斗。1197年来到阿卡的德意志人决定，他们的医院修会可以为一些前线城堡提供驻防，于是请求教宗塞莱斯廷三世批准将其改为军事修会。他同意了，并于1198年颁布了新的特许状。英语世界后来把这个德意志骑士团称为条顿骑士团。[4]

严格来说，这个新的军事修会的骑士是修士而不是僧侣。也就是

说，他们在俗人当中生活，而不是在修道院里与世隔绝。这只是个技术细节，在那个时代很重要，但对今人来说意义不大。重要的是，他们的组织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得到承认并受到尊重的部分，得到教宗的保护，很容易直接与教廷沟通。教廷在教宗监督下任命官员，主持涉及教会成员的一切争端的听证会，并指定特使去一线调查重要的危机。当然实际上教宗和教廷都十分繁忙，不可能非常细致地研究各个宗教修会的日常运作。虽然一旦某修会行为不合规矩的消息传到教宗和教廷耳边，他们可以迅速做出反应，但他们一般只是要求各个修会拟定自己的规章制度，并定期检查落实情况。

法规与习俗

条顿骑士团的特点反映在它的条令、制度、法规和被称为“习俗”的一整套法律当中，所以我们有必要详细研究一下这些文档。这些文档是用德语写的，以便让每一位成员都能轻松地理解，其行文也简洁明了，易于记忆。每一位成员都要宣誓坚守清贫、贞洁和服从的信条。骑士从以修道士的身份进入骑士团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拥有私人财产；所有财产都是共有的。理论上，骑士应当照料病人，这是条顿骑士团最早的存在理由。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军事职责和宗教活动相符合，但在有些时候，医务工作被交给骑士团的一个完全由非贵族成员组成的特殊分支。骑士不分白天黑夜，按时参加宗教礼拜。他们须穿“教士色彩”的服装，并披戴有黑十字纹样的白披风，所以有人给他们取了一个额外的绰号“十字骑士”。

虽然骑士团的成员中有神父、医院勤务人员和女护士，但耶路撒冷圣玛利亚医院德意志兄弟骑士团主要是一个军事修会，所以大多数成员仍是骑士，他们需要马匹、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些装备都由个人负责维护，以便让甲胄合身、剑的重量和长度合适、战马和骑手互相熟悉。为防止成员因为这些装备而骄傲，骑士团的规章特意禁止使用金银饰物或鲜艳的色彩。

每位条顿骑士都必须有自己的支援人员，通常一名骑士搭配十名披甲战士。这些披甲战士都是平民，往往是骑士团的较低级成员。他们被称为“半兄弟”或“灰披风”（因为他们的罩衣是灰色的），可以选择在骑士团服役较长的一段时间或终身服役。他们担任骑士侍从或军士，骑士侍从负责为战斗期间有需求的骑士提供备用马匹或新装备，军士则与骑士并肩作战。[5]

条顿骑士必须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随时应战。如果深居简出，就会影响战斗力。他们可以外出打猎，这是教廷专门授予他们的不寻常的特权。骑马打猎是传统的训练骑士的方法，并且还能帮助骑士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禁止狩猎是不切实际的，也会遭到德意志骑士的怨恨，因为他们从小生长在广袤森林里，那里仍然到处是危险的野兽和大量猎物。条顿骑士被允许猎杀狼、熊、野猪，也可以用猎犬来猎狮子（如果确实有必要，而不仅仅是为了消遣或娱乐的话），还可以不带猎犬去猎杀其他野兽。

法规要求条顿骑士与女性保持距离。如果大家生活在修道院，这倒不甚困难，但在旅行或作战时往往就很难严格执行。有时骑士不得不住在公共的旅馆或者接受别人的热情款待，如果拒绝女性奉上的啤酒或蜂蜜酒，便有失礼之虞。此外，在招募新人或者从事外交活动时，骑士常常住在东道主的城堡或别墅，因为专门到附近的修道院去住宿不切实际，而很多大事都是在非正式场合处理的。骑士的职责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所以法规仅仅警告他们要避开婚礼、游戏等世俗娱乐，因为在这些场合往往男女混杂，饮酒作乐的诱惑太大。法规还专门警告骑士不得单独与女性说话，尤其是不要单独和年轻女性说话。亲吻的礼节贵族阶层常用，而骑士被禁止哪怕与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亲吻。只有在专门采取措施防止了一切丑闻的可能之后，女护士才会被允许进入医院。

违反规章的骑士团成员受到的惩罚的严厉程度不一。受罚一年的人就只能和仆人睡在一个房间，穿没有任何标识的衣服，每周有三天只能吃面包和水，并且被剥夺与骑士兄弟团契[6]的特权。这算是很轻的惩罚。错误如果更严重，就要戴上手铐脚镣，被投入地牢。惩罚结束后，罪人有可能回到原岗位（但不得在骑士团担任官职）或者被开除。只有三种罪行是绝对不可能得到饶恕的：临阵脱逃、叛教和鸡奸。犯有前两种罪行的人会被开除，最后一种罪行的人会被终身监禁或处决。最常见

的罪行都是轻微的，惩罚手段是鞭笞和剥夺饮食。

官员制度

中世纪的组织机构，甚至国家，都没有庞大的官僚系统。条顿骑士团也不例外。主要的长官最初被称为团长（Meister），但在骑士团需要为德意志、普鲁士和立窝尼亚这三个地区分别设立长官的时候，就将这三位地区长官称为团长，而将比他们更高的长官称为大团长（Hochmeister）。其他军事修会的领导人一般也用这个头衔。这意味着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与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领导人平起平坐。此外，这也强调了条顿骑士团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圣地，这一职责凌驾于三个地区团长对骑士团资源的主张权之上。

条顿骑士团大团长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终身任职，除非自己辞职。选举过程很正式也很复杂：前一任大团长去世后，他的副手设定一个时间地点，让附近所有能暂时搁置自己其他职责的骑士赶来开会，并传唤较遥远地区的骑士代表。高级官员和代表聚齐后，前任大团长的副手推荐一名骑士担任第一选举人。如果大家都同意这个人选，那么第一选举人再提名第二选举人。大家要么同意这个人选，要么请第一选举人提名其他人，直到最后达成一致。第一和第二选举人再提名第三人，大家同意或者反对，直到最后确定一个由八名骑士、一名神父和四名下级成员代表组成的十三人选举团。选举团随后宣誓自己将不偏不倚、认真履行职责，选出最优秀的人填补大团长的空缺。接下来，选举团举行闭门会议，由第一选举人先提名。如果被提名人没有赢得多数票，那么其他选举人轮流提名，直到最后出现为选举团多数成员所接受的人为止。选举团向代表大会宣布自己的决定后，神父唱起《感恩赞》，并护送当选的新大团长到祭坛前宣誓就职。

大团长的身份主要是外交官和监督者。即便他出身较低，他的地位

在当选之后也会大大提升。他和骑士团活动的地区的重要贵族与教士会晤，并与更遥远地区的权贵与高级教士（包括皇帝和教宗）通信。大团长还要访问各地，视察骑士团下属的各家修道院，检查成员的纪律，并确保骑士团的资源得到妥善管理。

大团长任命若干官员，组成自己的内层议事会。骑士团金库的巨大钱箱有三把钥匙，分别由大团长、在圣地的武装力量总司令和总财务官掌控。这种分权表明骑士团对任何个人的授权都是有限的，不管他的官职多高。重要的决策都是集体做出的，决策者往往是大团长和他的几名重要下属官员，也常常包括代表大会的成员。

总财务官（Ordenstressler）负责财务。条顿骑士宣誓守贫，但若没有粮草、服装、兵器、骏马，以及工匠、马车夫和船长的服务（这些服务往往需要用钱购买），条顿骑士团当然无法生存。理论上只有主要官员有权知道骑士团的财政状况，但代表大会的成员也会得到充足的信息，这样他们才能拟定合适的计划去建造城堡、教堂和医院，并筹备军事行动。他们也会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其他骑士与教士。

总司令（Großkomtur）负责监督所有不是与战争直接相关的日常活动。他指挥各种下级职能官员，监督总财务官的收支，管理通信和档案。他的职责显然和大团长大致相同，只不过规模较小。另外，如果大团长不在，总司令还负责指挥在圣地的武装部队。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奥地利、弗兰肯等地）还有区域性司令以及各地的城堡司令，他们负责管理许多修道院与医院。

总军务官（Ordensmarschall）负责军事行动的筹备。他的头衔的本意是马厩总管，这表明骑兵的装备和训练对军事胜利是多么重要。他的各项职责中也以骑兵工作最为重要，耗费的时间最多。理论上，袍服总管（Ordenstrappier）和医院总管（Großspittler）是总军务官的下属，但实际上都是独立自主的官职。这些头衔其实更多是荣誉性的，而不是现

代官僚机构里相应的部门主管。上述官员组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内层议事会，大团长可以仰仗他们的建议与辅佐。

与骑士团的臣民、贸易伙伴和其他统治者打交道的工作，在类似帝王宫廷的气氛里进行。大团长聆听请求，听取大家的辩论，在决策之后给出回应。决策都得到认真记录和存档。骑士团档案最终包括了数十万份文档。最重要的文档由大团长的书记员保管，以便于查找；其他档案保存在各地修道院里。

骑士团成员大多没有理由对行政管理的细节产生兴趣。神父有自己的职责。军士（或披甲战士）只有威望很低的下级职责，比如管理小庄园和维护装备。很少有骑士足够聪明或者足够有经验，可以担任要职，也很少有骑士的出身能高贵到无须事先证明自己就可以承担重要职责。贵族出身差不多是晋升的核心条件。人们认为贵族有遗传的能力与才干，就像战马遗传了力量和勇气一样。而且贵族在宫廷有重要的亲戚，也有宫廷生活的经验，可以借此为骑士团赢得很多利益，这都是只凭个人才干与虔诚所无法达到的。贵族的“高贵”程度并不相同，普通骑士当中很少有真正的贵族。德意志骑士往往是市民、士绅或所谓“家臣”（ministeriales）的后代。骑士越来越重要，但他们在遥远过去的卑微出身还没有被遗忘。出自真正显赫之家族的骑士团成员始终很少，而且其中有些人之所以投身修道院，完全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修道院之外生存的能耐。

不过，出身家臣乃至市民家庭的羞耻，在加入骑士团的仪式中大体上就烟消云散了。加入骑士团需要做很大的牺牲，成员不仅要宣誓守贫和守贞，还要缴纳30到60马克的“嫁妆”，往往以土地的形式支付。这不是个小数目，但新成员的亲戚无疑愿意帮忙出钱，因为家族里有人加入条顿骑士团不仅会提升家族的威望，还很有可能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另外，如果某人财政破产的话，只要加入条顿骑士团，他的债务就

一笔勾销了。

骑士的日常活动都经过一丝不苟的计划，大致的方式与今天的绝大多数军队类似：让军人保持忙碌，免得他们惹麻烦。条顿骑士和现代军人的最大区别不在于武器装备，而在于条顿骑士全然服从双重的使命。一个条顿骑士既是修士，也是战士，不仅要在规定时间参加用时虽短但规律性很强的宗教仪式，还要忍受严苛的纪律。这种纪律是现代军人难以承受的，因为它是毕生的责任。这些有血有肉的人要做出真正的牺牲：清贫、贞洁和服从。

宗教生活

当一位骑士申请加入条顿骑士团的时候，骑士团就会向他强调，必须全身心投入宗教和军事生活。骑士通过初步考核之后，会被带到骑士会议前。有人会问他：

> 骑士团的兄弟们听说你申请加入，所以想知道，你是不是下面这些情况。首先，你有没有对其他修会宣过誓，有没有与女人订过婚，你是不是别人的农奴，你是否负债或者是否承担了可能会影响骑士团的义务，你是否身体健康。如果你有上述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并且你现在不承认，那么将来如果我们知道了，就有可能将你开除。

然后新人宣誓："我承诺坚守贞洁、清贫，服从上帝、圣母玛利亚和您，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及您的继任者。我承诺遵守骑士团的规章制度，至死不渝。"

有的历史学家说条顿骑士团是一个政治组织，没有宗教意义或很淡薄。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记住，条顿骑士团和其他很多不要求成员隐遁而要求他们努力帮助改良社会的宗教修会没有多少差别。如果说条顿骑士团是没有宗教意义的政治组织，那么教廷也只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组织。（尽管这一时期某些教宗的行为会让人如此联想，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条顿骑士团在宗教与世俗两方面的思想和利益水乳交融，很难分割，只取其一端必然是对条顿骑士团的一种脸谱化。条顿骑士团的《法规》虽然撰写时间稍晚，但里面的集体祷文能比一篇冗长的论文更好地表现这两种思想的交融：

> 兄弟们，恳求我主上帝，求他以他的恩典、他的太平慰藉神圣的基督教，并保护其不受一切邪恶的侵袭。为了我们的精神之父教宗，为了帝国和我们的所有世俗领袖和所有教会高级教士，向我主上帝祷告，请上帝允许他们侍奉他。为了所有教会和世俗法官祷告，让他们给神圣的基督教带来和平和公正，让上帝的审判不要降临到他们头

上。

为了我们的骑士团祷告。上帝把我们聚集到骑士团里。求上帝赐我们恩典、纯洁、属灵的生活，求他除去我们和其他修会身上不值得赞扬的，以及违背他的《十诫》的东西。

为我们的大团长和所有地区指挥官祷告。他们治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为我们骑士团内所有行使职权的兄弟祷告，让他们行使职权时履行上帝的公义。

为没有官职的兄弟祷告，让他们不要虚度光阴，让他们热忱地礼拜上帝。让那些有官职的和没官职的，都与人为善，都内心虔敬。

为那些犯了弥天大罪的人祷告，愿上帝佑助他们重回他的恩典，让他们逃离永恒的惩罚。

为毗邻异教徒的土地祷告，求上帝以他的智慧和力量救援它们，让对上帝的信仰与爱传播到那里，让它们抵御所有的敌人。

为骑士团的朋友和盟友祷告，也为那些行善事的人或想要行善事的人祷告，让上帝奖赏他们。

为那些给我们留下遗产或馈赠的人祷告，让他们无论生死都与上帝同行。尤其为施瓦本的弗里德里希公爵和他的兄长亨利六世皇帝祷告，为吕贝克和不来梅的光荣市民祷告，是他们创建了我们的骑士团。还要铭记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公爵、马佐夫舍的康拉德公爵、波美雷利亚的桑博尔公爵[7]……还要铭记我们死去的兄弟姐妹……让每个人铭记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的灵魂。为所有信徒祷告，求上帝给他们永恒的安宁。愿他们安息。阿门。

要理解条顿骑士团履行使命的方式，就必须理解它的宗教理想主义。对所有军事修会，宗教理想主义都很重要，如同激进新教之于克伦威尔的圆颅党[8]或圣餐之于捷克胡斯派的两个派系[9]。叙述性的史料没有强调这种宗教情怀，这不足为奇，因为没有一位作者能把无穷无尽的祈祷、冥思和集体崇拜仪式编织成有趣的作品。但骑士团的编年史家经常提到个人与修道院的虔诚，他们为了描写这种虔诚甚至扰乱了自己的叙述。我们不要忘记，中世纪历史学家也知道精彩的故事应当是什么样的，他们知道戏剧性的故事更能吸引听众。他们更喜欢《旧约》而不

是《新约》，这也许就是军事修会的宗教思想的关键所在。

个人完全沉浸于宗教生活的现象在今天已经不常见了，很多现代人难以理解古人居然真的视其为正常行为。所以有的现代人觉得极端虔诚的中世纪人是骗子或者伪君子。颇为讽刺的是，我们很容易接受自己行为的矛盾之处，却要求中世纪人的行为始终如一，认为他们要么是圣人要么是凶残的骗子。但1180～1500年出生的条顿骑士和神父既不是圣人，也不是骗子。他们有着复杂的个性，进入宗教生活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几乎所有人都肯定认为自己是一个神圣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计划给混沌赋予秩序，给他们的人生赋予理由。他们在尘世做的事情，与每个人注定在死去之后面对的漫长永恒相比，都意义不大。在他们看来，宗教之外的行为，尤其是任何忽视人的永恒灵魂之命运的行为，都是愚蠢和危险的。

条顿骑士坚信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于是遵循这条道路，确信命运没有给他们别的选择。成败荣辱都是偶然事件，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他们知道，如果自己因取得的成绩而骄傲，那么上帝的惩罚很快就会以战败的形式降临。但这丝毫不会对神圣的计划构成阻碍。条顿骑士的职责是接受和服从，而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神圣声音告诉他们的，一般也就是他们想听的。

武装僧侣

虽然如上所述，条顿骑士团有着强烈的宗教情怀，但修道院里的生活并非沉闷无聊。当然，北欧的冬季漫长而昏暗，如同圣地的夏季漫长而酷热，但他们要做的事情总是很多。如伏尔泰在《老实人》结尾所说，治疗贫穷、恶习和无聊的良药是劳动。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但条顿骑士团那些笃信天主教的神父和军官一定会同意他对人生的分析。

在骑士团下属的修道院里，骑士有自己的职责。各修道院领导人的头衔可以译为城堡总管或指挥官，他负责监督修道院内的其他所有军官。有些军官肩负要职，如总财务官，他自己可能未必懂财务工作，但他会负责监管出身市民阶层的懂财务的人。大多数官职都很低微，如负责监管田地和马匹的职务，但每个官职都能检验哪些骑士有责任心、易于合作，哪些骑士的判断力好，哪些人不适合升职。

骑士团成员每天都会喝很多酒，在瞻礼日和有客人时喝的就更多了。条顿骑士喜欢喝啤酒和葡萄酒，尤其是自己家乡出产的品种。另外，教会的斋戒日很多，而骑士团写信给教宗请求允许患病或年老的军官不必严守斋戒，这表明骑士团对斋戒的规矩是认真遵守的。

狩猎是贵族阶层的一大爱好，条顿骑士也不例外。后来，随着条顿骑士团在森林或荒野的边缘地带拥有了为数不少的城堡，他们也愿意与敌人达成条约，让猎人可以放心打猎，不必担心遭到埋伏或袭击。为了追逐鹿和野牛，他们豢养了成群的猎犬，并雇佣原住民武士在打仗时担任向导。因为一年中打仗的天数毕竟有限，这些向导大部分时间都作为猎人为骑士团服务。

条顿骑士学会了当地语言。他们的外语水平可能比不上现代学者，

但在立陶宛边疆服役的骑士完全可以理解从敌人手中逃跑的波兰女人的求救。与原住民民兵一起工作的骑士最好能用原住民语言发布基本的命令，尽管原住民应当也懂相应的德语词。旅行的骑士最好也要知道客栈、食物和啤酒用外语怎么说。那些生活在波罗的海原住民当中并操练其军队的骑士团军官[10]也特别需要掌握流利的外语。

大多数骑士在进入骑士团时都很年轻。他们通常是家中的次子或幼子，觉得在军事修会服役是一种有价值的、体面的生涯。即便没有赢得声望或高位，他们知道自己在负伤时或年迈以后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自己最终会得到圣母玛利亚和她的儿子，亦即他们的主基督的奖赏。在一些年里自我牺牲，就可以换来永恒的生命。就连那些没有严格遵守清贫、贞洁与服从誓言的人如果成为殉道烈士，也能获得永生。

并非所有骑士都是圣人，远非如此：有些条顿骑士甚至是洗心革面的罪犯。在中世纪社会，处置罪犯的方法要么是宽恕他们，要么处决他们，此外没有多少选择。对下层阶级的罪犯可以鞭笞，还可以将罪犯丢进井底，让他们挖掘土石，直到挖出地下水来，或者直到他们的刑期服满。但总的来讲，监禁囚犯是不切实际的。更好的办法是把悔过的罪犯送到修道院，让他们在祈祷、劳动和睡眠中了却残生。这样他们在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的同时，也许还能挽救自己的灵魂。接受罪犯服务的修会有很多，条顿骑士团只是其中一个。这些曾经的社会弃儿在骑士团不能获得很高的地位，也不能担任官职，但他们愿意在遥远而危险的边境作战，这就抹去了他们家族姓氏蒙受的污点。

条顿骑士团有点像现代的职业体育运动队。他们执着于良好的身体状态，献身于自己的使命，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有朴实的幽默感，在搞庆祝活动时喜欢放纵：这一切都把他们与普通人分隔开。总结来看，条顿骑士不是圣人，但也不是恶魔的化身。他们反映了他们所在时

代的贵族社会的特点。我们对他们研究越多，就越不会对他们脸谱化，越不会觉得他们特别傲慢或对土地贪得无厌，更不会觉得他们是邪恶的。

---

[1] 奇里乞亚在今天土耳其的东南部沿海地区。

[2] 施瓦本公爵弗里德里希六世（1167～1191），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皇帝的第三子，在皇帝死后率领德意志十字军的余部继续赶往阿卡，后在那里病逝。

[3] 即哈丁之战。1187年7月4日，阿拉伯人的著名统帅萨拉丁在此大破基督教军队，耶路撒冷国王和圣殿骑士团团长被俘。基督教军队作战时向来携带的圣物真十字架落入穆斯林手中。

[4] 为什么这样称呼，原因不明，不过可能和传统上英格兰岛民顽固地分不清Deutsch（德意志）与Dutch（荷兰）有关。更有可能是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势利，因为“条顿”听起来比“德意志”高雅。在英格兰人的想象中，德意志人都是些肥胖的老头，坐在昏暗的客栈里抽长烟斗、喝啤酒。（作者注）

[5] 作战时，十名骑马的武士组成一个单位，由一名骑士指挥。遵照传统，同一个单位的武士会追随骑士的旗帜，所以这个单位被称为“旗队”。有时武士身穿重甲，骑训练有素的战马，但在侦察和袭掠时，轻型装备更合适（也更便宜）。在圣地，这些轻装武士被称为土科波（字面意思：突厥人之子），穿适合炎热气候的服装，携带轻型武器，铠甲较少，使用的马也较快，就像他们的阿拉伯和突厥敌人一样。后来条顿骑士团的武士通常是德意志人，但与骑士不同，武士可能出生于普鲁士或立窝尼亚。武士晋升为骑士的例子极其罕见。武士在自己的兵营用餐和睡觉，但日常的宗教礼拜与骑士和教士相同。（作者注）

[6] 团契为基督教术语，这里指基督徒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聚会、交流等。

[7] 波美雷利亚公爵桑博尔二世（约1211/1212～1277/1278），他与自己的兄弟波美雷利亚公爵希维托佩尔克二世斗争，与条顿骑士团结盟，后来将自己的大部分土地都留给骑士团。于是骑士团得以在维斯瓦河左岸站稳脚跟。桑博尔二世的这个举动受到他的亲戚们的争议。他的女儿嫁给了丹麦国王克里斯托弗一世。

[8] 圆颅党是1642～1651年英国内战期间支持议会的派系，与支持君主专制的保王党（或者叫骑士党）对立。圆颅党主张议会完全控制行政机关，其中温和派主张君主立宪，以奥利弗·克伦威尔为代表的激进派后来则废除了君主制。

圆颅党得名自身为清教徒的议员将头发理短，由于没有长卷发或假发，头颅相较之下显得很圆，外貌与当时的权贵不同。

[9] 胡斯派是宗教改革之前的一场教会改革运动，得名自捷克改革家扬·胡斯。胡斯派主要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传播。1415年的康斯坦茨会议宣布胡斯派为异端，教廷后来敦促神圣罗马皇帝出兵镇压捷克胡斯派，即1419～1434年的胡斯战争。在捷克民族英雄扬·杰式卡的卓越领导以及波希米亚当地先进的兵器制造业支援下，胡斯派屡次击败帝国军。后来，胡斯派分裂为圣杯派和塔博尔派，也称温和派和激进派。前者主要为上层人士，后与天主教会合作，镇压了主要代表社会下层的塔博尔派。此后两个世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由圣杯派占主流，直到三十年战争初期神圣罗马皇帝重新在这些地区推行天主教。

[10] 即所谓“地方长官”，德文为Vogt。

三 圣地的战争

圣地

我们对条顿骑士团早期的几十年知之甚少。最重要的事件是1200年的一次土地交易，耶路撒冷国王埃莫里把阿卡以北的一小片土地卖给了骑士团。除了这片领土和在阿卡城内的医院，他们在雅法、亚实基伦和加沙沿海还有一些零散土地，在塞浦路斯岛也有几处庄园。直到后来，在得到了若斯兰[1]的遗产之后，条顿骑士团在圣地才有比较可观的领土。但为了若斯兰的遗产，骑士团打了二十四年官司。人们对已经根基稳固的军事修会的猜疑和嫉妒，再加上这些修会的威望与权力，让新的组织很难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

条顿骑士团起初的领地很小，他们在最初岁月里的军事成就也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们对最早三任大团长的了解仅限于他们的名字。他们在十字军战士当中一定赢得了不错的声誉，结交了一些有价值的朋友，因为赫尔曼·冯·萨尔察于1210年当选大团长之后，骑士团就得以迅速扩张。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但假如他的前任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也没法取得什么成就。最早的三任大团长留下了高效而颇受尊重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和大量骑士，其兵力超过了保卫阿卡周围骑士团领地的需求。

赫尔曼·冯·萨尔察

赫尔曼·冯·萨尔察是一位开拓伟业的雄主，很像亨利·福特或约翰·D.洛克菲勒：他能在别人只看见难处的地方发现机遇。他懂得如何在现存体制内工作，从而建造一种新类型的帝国，并利用别人的才干与资本去达成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目标。因为他的伟大成就，条顿骑士团的真正历史不是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开始，而是从1210年赫尔曼当选大团长开始的。

赫尔曼出身于图林根的一个家臣家族，也就是说，这家人算是骑士，但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好几代以前，他的一位平民祖先凭借勇气、才干与忠诚提升了自己的阶级，但他们家族的贵族气息还不够。在这个时代，俗世间的成功取决于有利的婚姻，或者有亲戚在教会担任要职，而赫尔曼的父母既不富裕也不高贵，所以如果追随父亲的脚步，继续当世俗骑士的话，他的人生前景并不广阔。对家臣来说，最美好的前景也就是再谋个一官半职，缔结一桩略微好一点的婚姻；或者选择宗教生活，成为小修道院的院长，也许还能当上较低级的主教或大修道院院长；或者移民到东欧，此时波兰公爵们正在欢迎能干的武士和行政管理者。赫尔曼把这几条道路结合在一起，为他的骑士团开辟了荣耀之路。他加入了条顿骑士团，于是将军事和宗教事业结合在一起，后来还把他的军事修会发展到中东欧。

赫尔曼选择加入一家较小的军事修会，这对他来说很幸运，因为在更古老和威望更高的修会里他不可能攀升到那么高的位置。虽然他和蔼可亲的个性和外交才干在任何地方都能让人肃然起敬，但光靠这些还不足以摆脱家臣出身的羁绊。在规模较小的条顿骑士团，他的才干很容易显得鹤立鸡群。他在相当年轻、可能只有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当选为大团

长。他有一种让人们迅速信任他的人品与才干的本领。他若没有正派的品格与才华，也不可能成为教宗与皇帝的密友，更不可能在貌似不共戴天的敌人之间斡旋调停了。

在赫尔曼的生涯早期，很少有迹象能预示他未来的飞黄腾达。他可能于1215年参加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2]，但肯定没有公开发言。他于1216年12月陪同年轻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了纽伦堡。他安排派遣一小队骑士去协助防御匈牙利王国的边境，抵挡库曼游牧部落[3]的袭掠。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默默无闻的赫尔曼一举成名。

赫尔曼参加了1217年从塞浦路斯岛远征达米埃塔的十字军东征。达米埃塔是埃及的港口城市，保护着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和通往开罗的道路。大家期待此次十字军东征成为多年以来十字军战士苦求而不得的决定性胜利。这部分是因为攻击目标埃及很脆弱，部分是因为参加远征的很多骑士来自各个军事修会。所以起初十字军能够就战略和战术达成共识，而在之前的几次东征中，十字军战士们很少能像这样团结一致，尤其是在命途多舛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他们甚至改变了攻击目标，将兵锋转向君士坦丁堡，给基督教世界造成了永久的损害和羞耻。即便如此，本次东征仍然缺乏一个拥有主宰地位的领导者，这是十字军的主要弱点。赫尔曼在几个军事修会的大团长当中地位突出，不是因为他的才干超出别人，也不是因为他直接指挥的骑士最多，而是因为德意志人为此次东征提供了最大份额的军费，而且很多人都期待得到赫尔曼的建议和领导。赫尔曼睿智地利用这个机会，为他的骑士团赢得了一些特权和捐赠。

赫尔曼亲自参加了在达米埃塔的作战。基督徒和穆斯林这两个世界在整整两年间拼死鏖战，双方都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调来援兵，以至于最后似乎再也找不到援兵了。最终十字军攻破了达米埃塔要塞，沿着尼罗河南下进逼开罗，然而这次攻势以失败告终。所有人都期待皇帝来援救

他们，但弗里德里希二世找借口推迟了自己的行程。敌对双方的谈判越拖越久，十字军战士陆续回国。虽然基督徒领袖完全可以用达米埃塔换取去耶路撒冷的通行权，但教宗特使固执地拒绝妥协，一定要达成完全的胜利。特使发现了关于神秘的大卫王与祭司王约翰的预言，再加上远方传来有一位伟大帝王在威胁穆斯林后方（可能是成吉思汗，他的大军正在占领蒙古周边的几个邻国）的消息，承诺十字军一定能轻松打败一盘散沙的埃及人，并以此说服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于1221年发动一场最后的总攻。然而十字军被困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水道，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灭，达米埃塔城也被穆斯林夺回。赫尔曼也在此期间被俘。没过多久他就被赎回，但他有理由相信，条顿骑士团的未来不只在于圣地。

很多人将此次灾难归罪于弗里德里希二世，因为他违背诺言没有率军赶到埃及。但赫尔曼·冯·萨尔察不会责怪皇帝。他是霍亨施陶芬皇朝的忠实追随者，至少在他对教会的职责所要求的范围内，他忠于皇帝。1223年和1224年，他为了帝国事务在德意志奔波，为了释放丹麦国王瓦尔德马二世[4]而进行谈判。当时什未林伯爵海因里希绑架了瓦尔德马二世，此事将北欧的所有国家都拖向内战。[5]赫尔曼无疑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就认识什未林伯爵，于是他帮助谈妥了国王的赎金。在最终达成的复杂协议中，丹麦国王被迫承诺将参加弗里德里希二世即将展开的作战。虽然在教宗恳求皇帝援救十字军的时候他没有率军去达米埃塔，但现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正在招募志愿者以准备一次远征，为之前的所有失败报仇雪恨。赫尔曼作为皇帝的显赫发言人，让公众都相信条顿骑士团是德意志十字军运动的主导力量。尽管此前他派遣了一些骑士前往通向匈牙利的喀尔巴阡山脉隘口抵御游牧民族的袭击，但他还不想被那里的阴谋诡计转移注意力，暂时也不想理睬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1187～1247）充满诱惑力的提议，即请赫尔曼派兵保护波兰北部边境，抵御普鲁士异教徒的攻击。

此时赫尔曼·冯·萨尔察心里的头等大事是全身心地、毫不犹豫地支持在圣地的十字军东征。第五次十字军对埃及的远征失败了。他明白，如果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在这个关键时刻去圣地，而把意大利留给他的众多敌人，这并不符合帝国的利益。现在西西里已经平定，而更重要的是，皇帝已经做了安排，要迎娶耶路撒冷王国的女继承人。只有他亲自去圣地，才能获得新娘的土地。皇帝宣布自己将于1226年或1227年履行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诺言。条顿骑士团意识到，如果他们为皇帝的此次东征提供大量骑士，一定会得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感激。[6] 在十字军东征的问题上，没有人比赫尔曼·冯·萨尔察更懂皇帝的心，因为他是皇帝的朋友和谋臣。他知道，弗里德里希二世慷慨大方，不仅会奖赏别人在过去对他的忠诚服务，还会奖励未来的贡献。于是赫尔曼向皇帝明确表示，条顿骑士团会全力配合他的东征。骑士团成员也在期待分享基督教世界战胜伊斯兰敌人的荣光，所以不愿意把重要的资源投向东欧。

圣地

1227年，神圣罗马帝国舰队从布林迪西起航，但没过多久就被迫返航，因为舰队里暴发瘟疫，图林根方伯[7]路德维希四世病死，另有其他许多十字军战士病倒。皇帝没有加紧赶往圣地，格列高利九世教宗为此对其施加绝罚，但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没有赶赴罗马寻求与教宗和解。因为他对年迈的教宗很熟悉，知道除非自己付出惨重代价，否则教宗不会收回成命。皇帝等士兵恢复健康之后立刻重新起航，尽管他知道既然教宗绝罚了他，那么圣地那些敌视皇帝的人就有借口拒绝为他提供支援。皇帝对此不以为意，但他这次还是失算了。因为没有解决与教宗的争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十字军东征很快遭到失败。不管走到哪里，他都遭到冷遇，圣地的几乎所有贵族和教士都拒绝参加由被绝罚者领导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弗里德里希二世与条顿骑士团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因为赫尔曼·冯·萨尔察的骑士团继续忠于皇帝并竭尽全力帮助他。在后来通过和约收复耶路撒冷之后，皇帝给予条顿骑士团特殊待遇，并将阿卡的关卡税收入交给他们。

皇帝只要带着军队待在圣地就可以自行其是，但他不能在圣地停留太久。赫尔曼大团长认识到这点，所以避免与当地贵族或其他军事修会发生矛盾。因此，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229年离开阿卡时遭到很多人投掷腐烂水果蔬菜，而条顿骑士团没有遭到报复。并且，尽管条顿骑士团因为支持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十字军东征而被绝罚，赫尔曼很快便设法让教宗回心转意。但圣地的局势仍不稳定——皇帝在某地的驻军如果兵力不强或者孤立无援，就会遭到基督徒贵族和高级教士的攻击。这些当地豪强对弗里德里希二世满腹怨气，因为他在过去没有帮助他们，他在西西里的政策也不合他们的心愿，他与教宗的争执更让他们感到愤怒。他们觉得皇帝只不过是个追名逐利的无神论者。

赫尔曼·冯·萨尔察陪同不幸的皇帝返回意大利，并帮助他与格列高利九世教宗和解。赫尔曼已经放弃了让他的骑士团永久待在圣地且仅仅待在圣地的希望。他很快派遣第一批骑士前往普鲁士。他对圣地局势的估计是正确的：到1231年，大部分帝国驻军被驱逐，仅仅十三年后，耶路撒冷就被穆斯林夺回。此后，圣地的基督徒转入守势，等待不可避免的最后攻击，那时基督徒将会丧失在圣地的最后立足点。

条顿骑士团并没有中断对地中海的兴趣。为了保卫阿卡，圣地比以往更需要他们的骑士。但阿卡是一座港口城市，炎热、潮湿、拥挤，不适合长期生活。条顿骑士在乡村过得比较舒适，那里的气候更健康，也有机会骑马打猎，有田野和草料供马匹之用。另外，骑士们也需要当地有可靠的粮食与葡萄酒供应。1220年，他们从亨内贝格家族手中买下了加利利的一座破败城堡，并用阿卡关卡税收入将其修复。他们将这座庞大要塞取名为孟福尔，它的名字和建筑风格可能都源自骑士团在特兰西瓦尼亚建造的一座城堡。它的德语名字是施塔肯贝格（字面意思：强山），选址巧妙，易守难攻。但与其他十字军城堡相比，孟福尔不算固若金汤的防御阵地，它的主要价值可能是那里漂亮的招待所和旖旎的风光（一侧可以俯瞰山林，一侧是阿卡平原），而不是对圣地防务的贡献。孟福尔周边的土地是加利利北部最肥沃的地带。骑士团于1234年和1249年收购了更多土地，但城堡距离田地太远，无法保护农民不受袭掠。1227年，十字军战士帮助扩建了防御工事，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在1228年为其注资。骑士团又在孟福尔以南三英里处建造了第二座城堡，该城雄踞于崎岖山岭之上。这两座城堡的建筑风格都是德意志式的，受周围其他城堡的影响很小：雄伟的主楼占据显要位置，坚固的幕墙将若干塔楼连接起来。

圣地的十字军城堡的真正弱点在于，它们无法保护周边为其提供粮食和劳动力的乡村。一旦穆斯林军队掳走或者杀掉当地居民并烧毁其房屋，城堡就成了荒原上的孤岛。没有草料或牧场，骑士们无法维持他们

的战马，而没有战马，他们就丧失了大部分战斗力。

尽管条顿骑士团于1271年失去了孟福尔，他们仍在阿卡保有相当强大的兵力，直到1291年所有军事修会的联军被驱逐出了最后的要塞。条顿骑士团大团长撤往威尼斯，在那里继续指挥针对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直到1309年，他才赶往普鲁士，彻底放弃了在东方的作战。

条顿骑士团内部的一个长期争议话题是，应当将骑士团的资源集中用来保卫圣地还是投入波罗的海地区，抑或休养生息，以便在神圣罗马帝国服务。在整个13世纪，在圣地的骑士拼命捍卫自己的显赫地位，谴责某些大团长在“海外”（指圣地之外）待的时间太久或者对效忠霍亨施陶芬皇朝的事业有动摇。没过多久，德意志团长、普鲁士团长和立窝尼亚团长就开始雄辩地为自己所在地区的利益摇旗呐喊。一位又一位大团长努力平衡不同地区的权力集团的不同要求，并避免分裂的丑闻，他们为此不得不忍受批评和挫折。脸皮薄或者性子急躁的人是当不了大团长的。

所以，条顿骑士团将注意力和资源从圣地转向波罗的海的新十字军东征的过程非常缓慢。在很长时间里，耶路撒冷是他们主要的事业，他们为之投入了大量精力与财力。直到1291年阿卡陷落，他们终于不情愿地、缓慢地放弃了收复圣城的全部希望。条顿骑士团的目标比土地或权力都更重要，但人们很难把不同的动机分得一清二楚。宗教理想主义、迷信、野心和责任感联合起来，以非常复杂的方式，让条顿骑士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东北欧对抗异教徒更有助于他们履行义务。

---

[1] 埃德萨伯爵若斯兰三世（1159～晚于1190年）是耶路撒冷王国的一位领主，他的姐姐艾格尼丝是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一世的第一任妻子，是后来的麻风国王鲍德温四世和女王西比拉的母亲。若斯兰三世后来担任过西比拉的儿子鲍德温五世的监护人。若斯兰三世参加过1187年著名的哈丁战役（十字军

惨败于萨拉丁）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阿卡攻防战。1220年，条顿骑士团获得了若斯兰三世的领地。

[2]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于1215年在教宗英诺森三世领导下在罗马拉特兰宫召开，主要决议包括接受圣餐礼的“化质说”为正统。化质说认为，圣餐的饼与酒经过祝圣确实变成基督的血与肉。会议还决定准备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1221），由教宗亲领出征。

[3] 库曼人是一个突厥游牧民族，主要活跃于10～13世纪，居住在黑海以北，是草原上凶悍的战士，后迁居黑海以西，对基辅罗斯、匈牙利、金帐汗国、高加索和拜占庭等国家与地区有很大冲击。库曼人一度与钦察人联合起来结成游牧邦联。

[4] 瓦尔德马二世（1170～1241）号称胜利者瓦尔德马或征服者瓦尔德马，1202～1241年为丹麦国王。他长期在北德作战，一度占据大片领土，不过后来又失去了这些土地。什未林伯爵海因里希绑架他的目的就是迫使他归还占领的德意志土地。瓦尔德马二世参加了对爱沙尼亚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建造了一座要塞，后来塔林城（今天爱沙尼亚的首都）就围绕它发展起来。塔林在爱沙尼亚语中有“丹麦人之城”的意思。瓦尔德马二世在丹麦创建封建制度，提升贵族的权力，削弱自由农民。他还是重要的立法者，他主持汇编的《日德兰法典》作为丹麦的法律一直被使用到17世纪。瓦尔德马二世驾崩后，丹麦陷入内乱，所以他在丹麦历史上享有极高声誉，常被认为是一个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君主。

[5] 什未林伯爵海因里希的土地被瓦尔德马二世强占，海因里希绑架了国王，后来又和盟友一起打败了丹麦军队，最终迫使瓦尔德马二世缴纳45000银马克的赎金、放弃他占领的绝大部分德意志土地、发誓不会报复，并交出三个儿子做人质。瓦尔德马二世获释后撕毁协议，企图夺回在德意志的土地，又被打败，最终放弃了在德意志的野心。海因里希去世后，他的遗孀仍然控制着三个丹麦王子为人质，索要了7000银马克才将他们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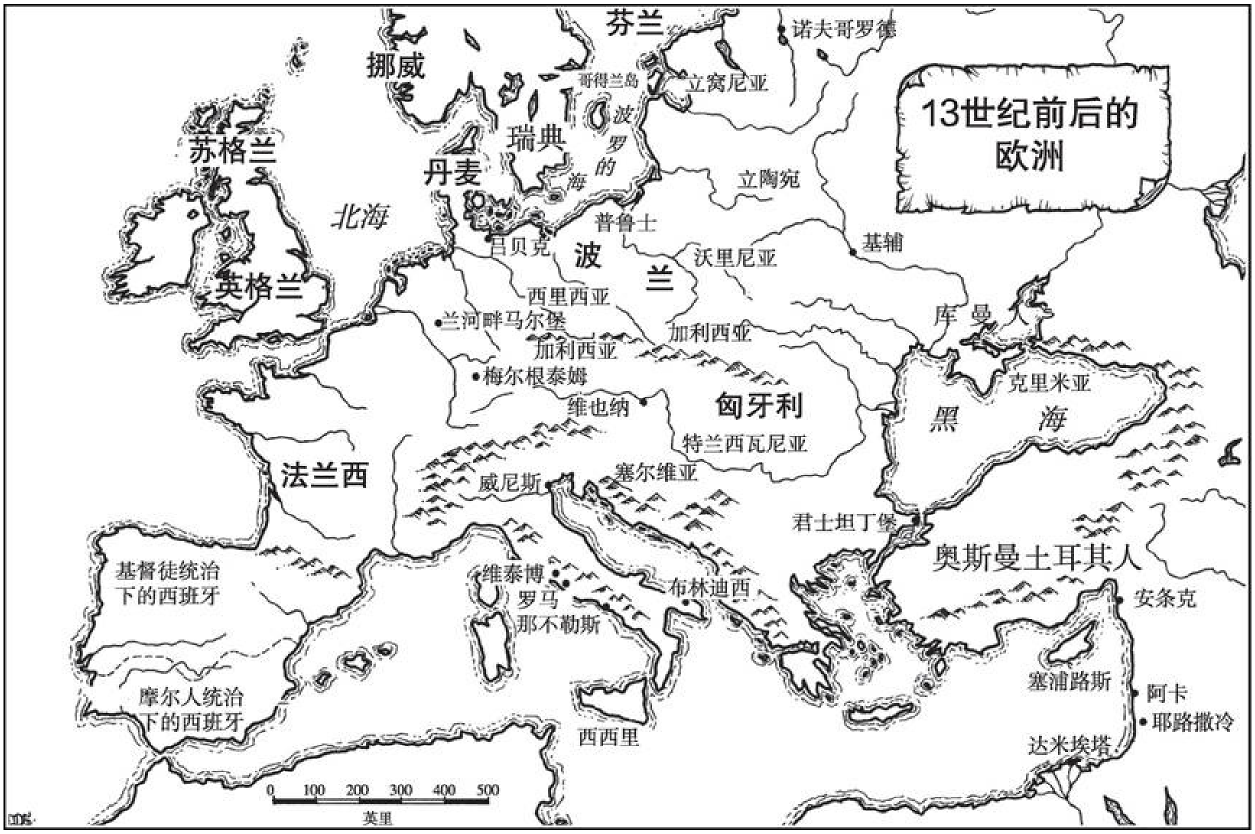
[6] 作为友谊的象征，皇帝于1226年发布了《里米尼金玺诏书》，规定如果条顿骑士团选择接受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的出兵邀请，就把普鲁士的大量土地和特权授予条顿骑士团。（作者注）

[7] 方伯（Landgraf）为德意志的一个贵族头衔，比伯爵（Graf）高，大致与公爵（Herzog）平级。

四 特兰西瓦尼亚的试验

保卫匈牙利，抵挡异教徒的攻击

正如偶然性会在人生中发挥很大作用一样，条顿骑士团之所以开始考虑改变自己的使命，最初也是出于偶然。一位熟人介绍赫尔曼·冯·萨尔察认识了匈牙利国王。没过多久，大团长就将骑士团投入他们在东欧的第一场大冒险。此次行动的核心人物是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他是萨尔察家族的宗主。萨尔察家族是图林根方伯的忠实附庸，他们之所以给赫尔曼·冯·萨尔察取这个名字，可能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强大恩主。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的辉煌宫廷闻名遐迩，他特别鼓励诗歌创作与骑士精神。方伯的祖先是著名的十字军战士，他的父亲参加过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他本人还见证了条顿骑士团从医院修会改为军事修会的过程。赫尔曼·冯·萨尔察很可能就是在与方伯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期间加入了条顿骑士团。赫尔曼方伯肯定饶有兴致地关注了赫尔曼·冯·萨尔察的生涯。赫尔曼·冯·萨尔察当选为条顿骑士团大团长的消息传到图林根宫廷时，赫尔曼方伯正在与匈牙利国王安德拉什二世（1205～1235年在位）谈判，希望将四岁的匈牙利公主伊丽莎白许配给他的儿子路德维希[1]。匈牙利国王早就考虑去圣地参加十字军东征，他和赫尔曼方伯一样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但他自己的王国正遭到异教徒库曼人越来越猛烈的攻击，所以他不能离开匈牙利。



13世纪前后的欧洲

匈牙利王国的疆域包括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的广袤平原，并越过多瑙河，延伸到塞尔维亚王国边境的山区。在匈牙利王国的东南部，险峻的群山变得略微平坦，演化成一片延绵不绝、林木繁茂的丘陵地带，即特兰西瓦尼亚（德语名为Siebenbürgen，意思是“七座城堡”）。匈牙利人还没有彻底平定这片蛮荒之地。他们自己是游牧民族的后代，所以更喜欢平原。特兰西瓦尼亚人口不多且分布零散，当地居民主要是古罗马达契亚行省定居者的后代。那里的山口隘道与其说是商路，更像是把库曼人从沿海平原引向匈牙利的通道。安德拉什二世国王曾试图在该地区安插一些封臣来遏制库曼人的入侵，但这些封臣要么缺乏足够多的武士来稳固地控制这片土地，要么更愿意在内地过安逸轻松的生活。安德拉什二世向赫尔曼方伯或其使者提到这个问题时，对方很可能告诉国王，条顿骑士团这样的军事修会有能力保护这片遇险的边疆，从而解除国王的后顾之忧，让他安心参加十字军东征。安德拉什二世也可能从其他途径

听说了赫尔曼·冯·萨尔察和他的骑士团，比如他的王后来自蒂罗尔，而骑士团有一处早期基地就在那里，但国王在与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签订婚约不久之后就邀请条顿骑士团去特兰西瓦尼亚，应当不是巧合。

国王承诺，这片危险地带的一些土地可以交给骑士团，他们的税负也可被免除；这意味着骑士团可以带定居者到特兰西瓦尼亚，并用这些定居者的地租和劳动力来维持骑士团的生计，而无需将早期辛苦得来的收入与国王分享。安德拉什二世给他们的土地是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叫作布尔岑兰。他保留了铸币权和当地可能发现的金银矿的一半收益，但放弃了赋税和关卡税，也放弃了在当地建立市场和司法的权力。这个提议貌似慷慨大方，而骑士团的军官对这种事情几乎没有经验，所以赫尔曼·冯·萨尔察相信国王会持续对骑士团抱有善意，于是接受了提议。

没过多久，一队条顿骑士以及他们招募的德意志农民志愿者来到这片动荡的土地，建造了一系列土木要塞。随后农民建立了自己的农场和村庄，用税金和劳动力来支持那些军事前沿阵地。宗教修会建立这样的定居点，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贵族和教士只要能从中获益，就不会对农民属于什么民族感到关心。农民很快获得丰收，这样就更容易吸引更多德意志农民移居到这里。直到这些工作完成，骑士团才意识到，国王开出的条件极为暧昧且含糊。但这时他们已无法为此做些什么，因为国王已经去参加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了。

安德拉什二世于1217年率领一支大军乘船来到圣地，赫尔曼·冯·萨尔察和条顿骑士团的一支部队也和他一道去了。国王和赫尔曼·冯·萨尔察发现十字军战士在塞浦路斯岛无所事事，且没有希望向耶路撒冷发动进攻，于是召集所有十字军领袖开会，提议攻打埃及。开罗的防备似乎很弱，如果他们能拿下开罗，就能拿它交换耶路撒冷及其周边的要塞。但要攻克开罗，就得先攻打达米埃塔。如前文所述，攻城战没有像他们

期望的那样迅速取胜，于是安德拉什二世国王走陆路回国了，并在途中与小亚细亚的突厥人达成停战协议，让他安全返回匈牙利。

与此同时，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条顿骑士并不满足于消极被动地防御边疆、老老实实地当封臣。他们雄心勃勃，磨刀霍霍，主动出击去攻打库曼人，因为那些游牧民没有固定的定居点以充作抵抗中心，骑士们很轻松地占领了一些新领土。到1220年，条顿骑士团已经建造了五座城堡（其中一些是石制的）并给它们取了名字，这些名字后来也被用于普鲁士的城堡。玛利亚堡 [2] 、施瓦岑堡、罗瑟瑙 [3] 和克罗伊茨堡 [4] 位于喀琅施塔特 [5] 周围，彼此间隔20英里。这些城堡成为扩张的前进基地，让骑士团向实际上无人居住的库曼人土地发起进攻。他们的扩张如此迅速，以至于此前对这些地区没兴趣的匈牙利贵族和教士开始心生嫉妒和猜疑。

如果再给条顿骑士团十年时间，他们说不定能沿着多瑙河流域继续推进，占领直到黑海岸边的全部土地。这就能减轻长期以来库曼游牧民族对匈牙利和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 [6] 造成的压力。骑士团随后可以在多瑙河下游盆地的城堡驻防，重新打通去君士坦丁堡的陆路。最近几十年里，这条路对十字军战士来说很不安全。但条顿骑士团的成功来得过于迅猛，令匈牙利贵族开始感到库曼人或许已不再是危险的敌人。他们记得这些狂野的骑手曾打败拜占庭和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甚至入侵匈牙利，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似乎只需一小群外国骑士就能赶走库曼人。匈牙利贵族不明白的是，条顿骑士团的胜利是因为它有特殊的组织和执着的精神，而这些都是匈牙利人没有的。然而，条顿骑士团无视当地主教的权利，并拒绝与一些曾对骑士团新征服的土地拥有主张权的匈牙利大贵族分享战果。

条顿骑士团的胜利果实是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花费的也是他们自己的金钱。此时他们需要每一块土地和每一处村庄，从而获得粮食、税

金和步兵，为将来进军黑海做准备。所以，他们不愿意与匈牙利人分享新征服的土地也情有可原。而且，他们的指挥官没有赫尔曼·冯·萨尔察那样的外交才华。赫尔曼懂得如何交朋友并缓和潜在敌人的猜忌，但他此时远在圣地和埃及，没有办法向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条顿骑士提供建议。所以，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条顿骑士的行动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而他们也在当地四面树敌。

最终，野心和嫉妒诱发了冲突。在匈牙利贵族看来，安德拉什二世国王错误地邀请来一群外人，他们在匈牙利的边疆领地上扎根下来，而且很快就连国王本人也无力控制他们了。匈牙利贵族指控骑士团僭越了保卫边疆的职责，企图裂土分疆。

就算赫尔曼·冯·萨尔察此时不在达米埃塔，可能也无济于事。如果教宗都没有办法劝说互相争吵的远方领主们团结起来支持十字军运动，那么仅掌管着一个小军事修会的小贵族能起什么作用呢？

安德拉什二世回国后，发现自己的王国因为他的十字军东征造成的损失和开销而愤恨不平。他的声誉遭到沉重打击，国家也因为缺少坚定的领导而蒙受严重损失。1222年，匈牙利贵族强迫他签署了一份名为《金玺诏书》的文件，这很像几年前英格兰诸侯强迫他们那位倒霉国王签订的《大宪章》。不过，当贵族要求安德拉什二世撤销对条顿骑士团的授权时，他拒绝了。他研究了贵族对条顿骑士团的怨言，认为骑士团确实僭越了自己的本分。他同意，必须修改对条顿骑士团的授权。但他给出的新授权范围比之前更为广泛。他允许条顿骑士团建造石制城堡；虽然禁止骑士团招募匈牙利或罗马尼亚定居者，但国王默许他们招募德意志农民。赫尔曼·冯·萨尔察无疑运用了自己对教宗霍诺里乌斯三世（1216～1227年在位）和图林根方伯路德维希四世（国王的女婿）的影响力，让国王加强了在此事上的决心，但赫尔曼没有办法影响匈牙利贵族的立场，也无法赢得站在贵族一边的王储贝拉的支持。他们继续对条

顿骑士团大发怨言，并支持当地主教，怂恿他强迫骑士团服从于自己的权威。

赫尔曼·冯·萨尔察推断，只要安德拉什二世国王还在世，骑士团就不会有麻烦，然而一旦贝拉王子登基，骑士团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如果骑士团与匈牙利王室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也许麻烦就能得到避免。赫尔曼在返回意大利之后与霍诺里乌斯三世谈到了这个问题，教宗随后将骑士团位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土地置于教廷保护之下。于是，布尔岑兰成了教廷的采邑。

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赫尔曼·冯·萨尔察不是在将来会遇到麻烦，而是马上就陷入了窘境。安德拉什二世命令条顿骑士团立刻离开匈牙利，毕竟就算他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一个宝贵省份被别人利用法律上的强词夺理夺走。教宗尽力干预，而赫尔曼·冯·萨尔察试图辩解说国王没有正确理解他的意图，但这一切徒劳无益。现在国王站到了匈牙利贵族那边，而条顿骑士团拒绝在没有召开听证会的情况下就离开，这又是另一个错误。贝拉王子奉命率领一支军队去讨伐骑士团，于是骑士团蒙受奇耻大辱，被从自己的土地和整个匈牙利王国驱逐出去。只有农民留了下来，他们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德意志人定居点，直到1945年他们的后代被罗马尼亚政府驱逐。

匈牙利人没有用充足的驻军取代条顿骑士团，也没有跟进他们的战绩继续攻击库曼人，于是这些草原武士得以恢复元气和自信。很快，库曼人将再次对匈牙利王国构成威胁。

在匈牙利的惨败严重撼动了条顿骑士团的自信。很多人为匈牙利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且骑士团费了很大力气才筹集到资金去建造那些保卫新定居点的防御工事，可如今这些努力都付之东流了。骑士团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不久前，皇帝和君主们曾给予骑士团许多馈赠，比如在巴里、巴勒莫和布拉格的庄园。具体有多少捐赠者在听到条顿骑

士团受辱的故事之后决定把善心发到别处，如今已无从得知，不过，蒂罗尔的朗慕斯伯爵的例子振奋人心。他在匈牙利争议期间加入了骑士团，还献上了自己的全部土地。这位骑士在阿尔卑斯高地长大，德意志骑士精神和诗歌在那个距离富裕繁荣的意大利诸城市不远的地区广为人知。但他也是条顿骑士团面临的问题的一个活生生例证。骑士团能在德意志地区顺利发展，从充满理想主义的贵族和市民那里获得新兵和捐赠，但它没有理由在德意志活动。条顿骑士团存在的理由是与异教徒作战，而只有非德意志国家的边疆才有异教徒。不幸的是，那些国家的贵族与人民通常与条顿骑士团成员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一旦危险消失，他们对十字军战士的天然态度就是敌意，而不是同情。

东方刮来的蒙古风暴

在将条顿骑士团从喀尔巴阡山脉的城堡驱逐出去的时候，匈牙利国王一定已经知晓了1223年罗斯[7]东南部迦勒迦河畔战役[8]的消息。但要再等十五年过去，国王的错误才会显得格外严重。蒙古人打赢迦勒迦河畔战役之后便回国了，但在1237～1239年，他们显然打算在罗斯长期待下去。[9]与此同时，波兰和匈牙利的国王在向加利西亚[10]和沃里尼亚[11]扩张，它们是最西边的两个罗斯国家。蒙古人将向波兰和匈牙利发动进攻的消息传播极快，部分是基于鞑靼人发出的警告，部分是因为大家推测大汗[12]决心统治整个罗斯和每一个草原部落。不管这消息多么不准确或者具有误导性，它都表明权力平衡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1235～1270年在位）[13]曾希望趁乱为自己捞得油水，但他的收获转瞬即逝。

大汗强迫库曼人纳贡并为蒙古军队提供兵员。在这一压力下，库曼人撤入匈牙利，并在13世纪的剩余时间里一直对匈牙利构成严重的困扰。库曼人是信仰异教的游牧民族，与多瑙河盆地的基督徒贵族和农民没有什么共同点。但他们很像蒙古人，所以蒙古人觉得他们是潜在竞争者，可能会与蒙古人争夺罗斯南部地区。于是大汗命令拔都（成吉思汗的孙子）消灭库曼人。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拔都需要先粉碎加利西亚罗斯人的抵抗，并且他估计在那里还可能遭遇波兰与匈牙利军队；然后他还要打通喀尔巴阡山脉那些设防的隘道。足智多谋的拔都汗设计了一项大胆的战略，把另外一支军队送到守卫隘道的匈牙利军队背后：他将派遣一支行动迅捷的骑兵横穿加利西亚和波兰，然后在克拉科夫以西的喀尔巴阡山脉缺口处通过，闪电般穿过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逆时针方向沿着喀尔巴阡山脚横扫，然后从西面攻入匈牙利。后来事实证明，这种佯攻并无必要，因为贝拉四世国王无法说服贵族听从他的命

令，所以匈牙利人在高山隘道的防备力量并不充足。鞑靼人于1241年夏季大败匈牙利国王军，把国王一直追赶到亚得里亚海之滨。[14]

我们无法从史料中确知贝拉四世有没有为了之前将条顿骑士团逐出喀尔巴阡山脉隘道而悔恨，但他很可能没有。贝拉四世无比自信，对自己的才干很少有疑虑，他一般会把自己的失败怪罪到别人头上。这一次他大可以怪罪波兰人没有好好守住加利西亚，不过这么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蒙古人于这年春季首次入侵加利西亚的时候，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率领波兰军队东进，在桑多梅日附近打了一场胜仗。虽然他的军队杀死了这支蒙古军队的统帅，但此次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波兰军队伤亡惨重，灰心丧气，没有继续追杀残敌，而是把成千上万的敌人放跑了。康拉德的部分军队甚至被鞑靼人击溃。波兰人肯定不愿意这么快就再度与蒙古入侵者交战，况且战士们这个季节的兵役期已经服满了。蒙古人的第二波入侵很可能由一支新的蒙古—突厥军队充当先锋，结果他们把马佐夫舍和沃里尼亚的公爵们打得措手不及。波兰人没办法在加利西亚与入侵者交战，甚至无力在边境拦截他们。每一位皮雅斯特[15]公爵都集中力量保卫自己祖传的土地，于是蒙古人得以继续进军克拉科夫，然后冲进西里西亚。在列格尼卡附近，鞑靼骑兵击溃了西里西亚公爵的军队（后者可能得到了条顿骑士团的支援）。随后鞑靼人转过身来，穿过摩拉维亚进入匈牙利，与打垮了贝拉四世军队的友军会师。

蒙古人对中东欧的影响

鞑靼人在中东欧没有待多久。1243年，拔都汗得知大汗驾崩，于是从匈牙利撤离，因为在新大汗选举中他需要每一位武士都支持自己。当中东欧的基督徒走出自己的藏身之地或者结束流亡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家园被夷为平地，却看不到敌人的身影。蒙古人如同《圣经》中的瘟疫一般，滚滚而来，又迅速消失，也许将来还会出人意料地再次出现，惩罚基督徒的罪孽。基督徒很少意识到，他们的主要罪孽是政治上的四分五裂，而即便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智者，也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纠正这个错误。

罗斯一蹶不振。只有一个罗斯国家诺夫哥罗德仍然独立，但它也前途未卜。熟悉谢尔盖·爱森斯坦精彩的默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16] 为其配乐）的人也许还记得在电影的开头，蒙古可汗访问诺夫哥罗德，收缴贡金和奴隶。在电影中，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危险的亚洲访客面前骄傲地挺身而出，而在真实历史中，他为鞑靼军队效力，并最终被可汗谋杀。[17]

波兰土地惨遭蹂躏。此后很多年里，波兰国王的权力微不足道。曾经强大的皮雅斯特公爵们没有一个能承担起领导国家的使命。这既令波兰几乎完全无力防御加利西亚、抵抗游牧民族的袭掠，也让马佐夫舍难以继续对普鲁士异教徒的讨伐。没过多久，异教徒就转为攻势，开始掳掠波兰人到东方的奴隶市场卖掉。

蒙古入侵对匈牙利的影响甚至更为深远。匈牙利农民大批死亡，以至于多个地区十室九空，只能靠吸引周边地区的移民来充实人口。虽然起初这些农民的民族身份并不重要，但大量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和德意志人定居到匈牙利平原，最终对匈牙利民族认同的形

成造成了严重障碍。

这种局势的最重要受益者是条顿骑士团。只有军事修会能够得到援兵、补给、可靠的农民与商人移民来源、志愿兵，以及信徒为抵抗基督教世界之敌做出的捐赠。另外，条顿骑士团可以牵制普鲁士人和立陶宛人，让他们不得不保卫自己的土地，以令匈牙利和波兰免遭他们的毁灭性袭掠。所以，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德意志十字军在普鲁士的存在都受到基督徒的欢迎。

教宗与皇帝的冲突

弗里德里希二世与教宗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直到皇帝于1250年驾崩。这场冲突的主要受害者是神圣罗马帝国，帝国最终因此四分五裂，在半个世纪里帝位空缺，并且受到了无可挽回的削弱。在这些拼死搏斗的岁月里，条顿骑士团内部也存在对立，有人主张效忠皇帝，有人要求效忠教宗。但最终骑士团避免了永久性地支持其中任何一方。在这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大团长们都是教宗的密友和同盟者；在下一个世纪里，他们倾向于支持皇帝，但那时的皇帝与教宗都已不再强势。教会的权力和声望逐渐衰败，而神圣罗马帝国则在查理四世统治下有所恢复。

条顿骑士团的自我定位也反映了这些更大范围的趋势：在13世纪，骑士团的主要目标是保卫圣地；而到了14世纪，骑士团的宗旨就是在普鲁士作战。

与此同时，德意志和波希米亚的一些家族成为条顿骑士团的重要支持者，为其奉献了一代又一代子弟和金钱。条顿骑士团得以建造许多医院、教堂和庄园，它们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还让很多骑士、教士与士兵加入骑士团，并为十字军东征事业招募志愿者。

---

[1] 就是前文讲到的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的军中病死的路德维希四世。伊丽莎白（1207～1231）十四岁结婚，二十岁守寡，随后用自己的嫁妆从事慈善事业，修建医院，亲自服侍病人，后英年早逝，1235年被天主教会封圣。

[2] 今天罗马尼亚的费尔迪瓦拉。

[3] 今天罗马尼亚的勒什诺夫。

[4] 今天罗马尼亚的皮亚特拉-尼亚姆茨。

[5] 今天罗马尼亚的布拉索夫。

[6]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拜占庭帝国灭亡。西欧的十字军瓜分拜占庭领土，建立起多个国家。拜占庭的八分之三被分给威尼斯，剩余的则是所谓“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1204～1261）。十字军领袖之一，佛兰德伯爵鲍德温九世被立为拉丁帝国的皇帝，称鲍德温一世，希望能够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统治东方。他的帝国控制希腊，分为若干个封建领地：萨洛尼卡王国、阿开亚亲王国、雅典和底比斯公国、群岛公国等。原拜占庭的很大一部分领土被三个拜占庭人的国家控制：尼西亚帝国、特拉布宗帝国和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它们都致力于赶走西欧人，恢复拜占庭，但有时也与拉丁帝国合作。拉丁帝国无法控制在原拜占庭领土上建立起来的其他势力，尤其无法对付威尼斯，因此在初期的一些军事胜利之后就持续衰败。1261年，尼西亚军队攻入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宣告灭亡。尼西亚统治者米海尔八世宣布恢复拜占庭帝国。他建立的帕里奥洛格斯皇朝是拜占庭的最后一个皇朝。

[7] 罗斯是西方历史学家对中世纪俄罗斯的称呼，它的中心在基辅，但权力非常分散。早期罗斯大公们的后代分享权力。我们用“罗斯”这个说法，是为了将其与16世纪兴起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区分。（作者注）

[8] 蒙古军队在名将哲别和速不台指挥下，从高加索向西进攻，打败库曼人，库曼可汗向其女婿加利奇的王公大胆的姆斯季斯拉夫求援，后者则联合了其他几位罗斯王公（包括基辅大公）和库曼人一起抵抗蒙古军。蒙古军佯败，吸引罗斯人深入，最后于1223年5月31日在迦勒迦河畔（在今天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州境内）大败罗斯人，随后蒙古军返回亚洲，与成吉思汗会合。

[9] 学者说的“蒙古人”一般指的是大汗的帝国，中心在今天的蒙古。蒙古帝国以那里为基地，展开了对中国、波斯和近东的战争。“鞑靼”指的是生活在西方，从突厥斯坦到喀山的那些较小的汗国。“金帐汗国”指的是生活在最西端的鞑靼人，他们的中心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有些鞑靼人生活在远至克里米亚半岛的西方。不过，上述几个名字常常混用。（作者注）

[10] 加利西亚是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区，一度属于奥地利帝国，现在分属乌克兰和波兰。主要城市有克拉科夫、利沃夫等。

[11] 历史上的沃里尼亚（或称沃伦）地区在今天波兰东南部、白俄罗斯西南部和乌克兰西部。

[12] 此时的蒙古大汗是窝阔台（1229～1241年在位）。

[13] 即前文讲到的贝拉王子，安德拉什二世的儿子。

[14] Nora Berend，*At the Gate of Christendom*：*Jews*，*Muslims and ‘Pagans’ in Medieval Hungary*，*c.1000-c.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Norman Davies，*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 （Columbia，New

York，1982）.

[15] 皮雅斯特王朝（960～1370）是波兰的第一个王朝，得名自传说中的波兰部族领袖车轮匠皮雅斯特。皮雅斯特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是公爵梅什科一世，他接受洗礼，从此波兰成为天主教国家。他的儿子波列斯瓦夫一世获得教宗加冕，成为第一位波兰国王。后来由于王权衰落、贵族割据以及王朝向神圣罗马帝国称臣，国王称号被取消。皮雅斯特王朝的成员以公爵、大公或国王的名义，断断续续地统治着波兰，直至1370年卡齐米日三世（大王）驾崩之后王朝绝嗣。1370年之后，皮雅斯特家族不再是国王，但仍然是马佐夫舍公爵、西里西亚公爵等，一直到1675年最后一位皮雅斯特家族的西里西亚公爵去世并绝嗣，该家族在东欧的统治才结束。
1138年，波列斯瓦夫三世（歪嘴）驾崩，在遗嘱里将国土分封给诸子。从此开始的将近两百年里，波兰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皮雅斯特王朝的诸多公爵互相厮杀和争夺王位。波列斯瓦夫三世将波兰分成五个公国（克拉科夫、马佐夫舍、小波兰-桑多梅日、西里西亚和大波兰），其中地位最高的是克拉科夫公国，由皮雅斯特王族的最年长成员担任克拉科夫大公（或称波兰大公）。理论上克拉科夫大公（非世袭）是皮雅斯特诸多公爵的宗主，负责边境防御，有权在其他公爵的领地驻军，掌管外交政策、对教会的管理权和铸币权，但实际上克拉科夫大公的控制力往往很弱。并且五个公国发生了更多的分裂。封建割据的局面从1138年一直持续到1320年瓦迪斯瓦夫一世（矮子）登基为王，恢复了波兰的统一。克拉科夫公国从此成为王室领地。

[16]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是俄国和苏联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著名作品有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灰姑娘》、交响童话《彼得与狼》、歌剧《三橘爱》《火天使》《战争与和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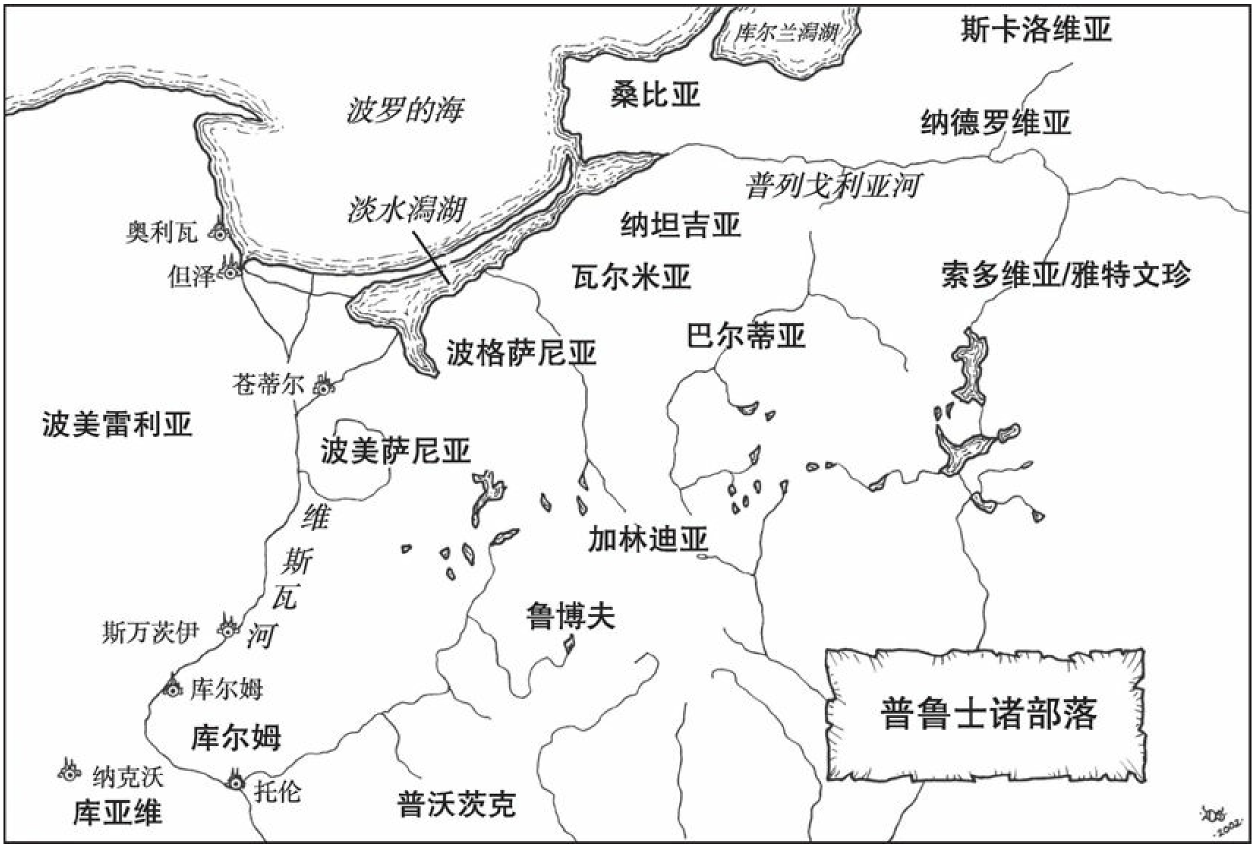
[17] 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1221～1263），诺夫哥罗德公爵、基辅大公和弗拉基米尔大公，是基辅罗斯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后来被东正教会封圣。他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次子，原本没有希望继承这个位置，后来诺夫哥罗德人民选举他为公爵，请他领导他们抵抗瑞典人和德意志人的侵略。1240年，他在涅瓦河口打败瑞典人，因此获得“涅夫斯基”的绰号（意即“涅瓦河的”）。但不久之后，因为与诺夫哥罗德贵族的矛盾，他被迫离开诺夫哥罗德。后来面对德意志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入侵，诺夫哥罗德人民又请他回来。1242年4月5日，他打赢了著名的冰湖战役。但面对蒙古人金帐汗国对罗斯人的侵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选择与蒙古人合作（历史学家对此的解释众说纷纭），扮演金帐汗国与罗斯各公国之间的调解人的角色，并借用蒙古代理人的身份镇压各地贵族与平民。1246年，金帐汗国封他为基辅大公；1252年，封他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取代了他的兄长安德烈·雅罗斯拉维奇。1263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从金帐汗国返回诺夫哥罗德途中去世。

五 在普鲁士反对异教的战争

异教徒统治下的普鲁士

普鲁士从来不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更不是它的一个省。不过最靠近波兰的普鲁士部落，也就是那些向西进入库尔姆的部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波兰文化的影响。也许只有丹麦人有权声称自己是一部分普鲁士人的合法宗主，但丹麦人的主张权也很弱。不过在13世纪初，瓦尔德马二世国王曾远征桑比亚和其他沿海地区，企图落实自己的主张权——桑比亚就是淡水潟湖（今称维斯瓦潟湖）和库尔兰潟湖之间那座突出的半岛。[1] 瓦尔德马二世于1223年被什未林伯爵海因里希绑架，于是丹麦人对普鲁士的宏图大略戛然而止。

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对普鲁士南部的边境地带有主张权，因为除了波美雷利亚公爵希维托佩尔克二世[2]（1212～1266年在位，领土在维斯瓦河西岸）之外，他是距离普鲁士最近的天主教领主。所以，康拉德和希维托佩尔克二世是复兴12世纪中叶波兰十字军远征的最合适人选，那几次军事行动未能征服普鲁士并让那里的异教徒皈依。尽管康拉德公爵试图沿着维斯瓦河东岸前进，但他顶多只能短暂占领库尔姆。库尔姆和他在上游的几个省份（普沃茨克和多布任）一样征战频仍，以至于有些地区荒无人烟。



普鲁士诸部落

普鲁士人的种族和语言都与波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罗斯人不同。普鲁士人既不是德意志人，也不是斯拉夫人。和他们东面的邻居立陶宛人与立窝尼亚的部分部落一样，普鲁士人属于波罗的海民族，是那些在民族大迁徙期间没有迁徙、语言与风俗数百年来变化甚微的印欧民族的后代。

普鲁士语和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以及好几个较小的民族（如雅特文珍人和斯米伽利亚人[3]）的语言同属一个语族。这个语族的分布范围一度从莫斯科延伸到波罗的海，但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来，新来的斯拉夫人的压力使得波罗的语族的分布范围急剧缩小。现代学者对波罗的语族做了研究，集中挖掘它保留的本土成分。尽管许多个世纪以来波罗的语族不断受到更大的语族的侵犯和影响，但还是保留了很多古老成分，从中可以看出这个语族的人在基督教以前的文化是什么样的。与

三种重要的经济活动——蜜蜂、马匹和大车相关联的词语表明，波罗的海文化远非原始（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因为人口少，普鲁士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有限，挖掘相关潜力的程度也有限）。但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表明，普鲁士社会在经济和政府发展方面落后于其邻居。普鲁士社会几乎完全没有与封建制度类似的机构，所以普鲁士人无法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也很难促进农业和商业发展，更难以分享更广泛地域内的欧洲文化。

普鲁士土地沿着波罗的海海岸线，从东北方的涅曼河（德语名字是梅梅尔河）延伸到西南方的维斯瓦河，与立陶宛、罗斯人的沃里尼亚、马佐夫舍和波美雷利亚毗邻。也就是说，普鲁士人的邻居说四种不同的语言。普鲁士分成十一个大区，各自代表一个主要部落：库尔姆、波美萨尼亚、波格萨尼亚、瓦尔米亚、纳坦吉亚、桑比亚、纳德罗维亚、斯卡洛维亚、索多维亚、加林迪亚和巴尔蒂亚。根据14世纪编年史家彼得·冯·杜斯堡[4]（条顿骑士团最渊博的作家之一）的记载，其中最强大的部落是桑比亚人，拥有4000骑兵和4万步兵；索多维亚的势力也很强大，有6000骑兵和“几乎不计其数的其他武士”。他估计其他部落平均每部有约2000骑兵和相应数量的步兵，但库尔姆和加林迪亚基本上无人居住，尤其是加林迪亚，那是个内陆地区，通常被人描述为一片荒野。加林迪亚地形崎岖，林木繁茂，分布着许多湖泊与河流，所有军队都避免经过此地。现代学者估计普鲁士人的总人口约17万，这比彼得·冯·杜斯堡的数字少很多。普鲁士人的人口虽然不如邻居立陶宛人或立窝尼亚人[5]，但分布更稠密，社会组织也更有序。他们有很多要塞，供人们在战时避难。这些要塞虽然不能与一流的西方城堡相比，但是也能有效地达成目的。

彼得·冯·杜斯堡如此描述普鲁士的宗教：

> 普鲁士人对上帝一无所知。他们很原始，所以无法通过理智来理解上帝。他们没有文字，所以无法通过阅读经文来学习。他们似乎极

> 其蒙昧，对人能通过书写来表达思想也感到大惊小怪。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存在，所以错误地把所有的造物都当成神，比如太阳、月亮和星辰、雷电、鸟儿、动物，甚至蛤蟆。他们有森林、田地和神圣水域，任何人都不能在这些神圣的地方伐木、耕作或捕鱼。在这个桀骜不驯的民族当中，在纳德罗维亚的一个叫洛姆瓦的地方（它的名字源自“罗马”一词），住着一个叫克列维的人。他们尊崇他，如同尊崇教宗。正如教宗统治着教会的所有信徒，克列维不仅统治这个民族，还统治立陶宛人与立窝尼亚的许多民族。他的权威遮天蔽日，不仅他自己和他的血亲，就连他的信使，只要拿着手杖或其他信物，在跨过这些异教徒民族的边界时也受到君王、贵族和平民的顶礼膜拜。根据古老的记载，克列维守卫着永恒圣火。普鲁士人相信死后的世界，但他们的观念是错的。他们相信，如果一个人在这辈子里高贵或低贱、富裕或贫穷、强大或弱小，那么他复活到来世之后还是原先的样子。所以贵族死后需要把武器、马匹、男女仆人、衣服、猎犬和猎鹰，以及一切属于武士的东西都带到冥界。地位较低的人死后，人们要烧掉与他们的劳作有关的东西。他们相信，这些烧掉的东西会在冥界供死者之用。一旦有人死去，就要上演这样的魔鬼把戏：死者的亲戚来找教宗克列维，问他在某天或某夜是否看见有人经过他的房子；克列维立刻毫不犹豫地描述死者的外貌、服装、武器、马匹和侍从，并预言死者在自己家中用长矛或其他工具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迹。每次打了胜仗，他们就给他们的诸神献祭，并把战利品的三分之一交给克列维。他则把这些战利品烧掉。[6]

彼得·冯·杜斯堡对异教教宗这种概念兴趣盎然，但从其他史料看，普鲁士宗教绝非基督教的翻版，也绝不是对黑暗之主撒旦及其同类的魔鬼崇拜。普鲁士宗教其实是从印欧人的自然崇拜中发展出来的一种产物，希腊、罗马、凯尔特和日耳曼神话里都有类似的自然崇拜，我们对此已经很熟悉了。普鲁士宗教里有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宗教思想的强烈影响，这可能是维京人对这些地区实行松散统治的年代产生的；普鲁士宗教中也有一些基督教元素，是近期从东正教的罗斯和罗马天主教的欧洲传来的。10世纪就有西方传教士造访普鲁士，不过他们没能让很多人皈依。

普鲁士人的风俗与他们的波罗的海邻居——立窝尼亚与立陶宛诸部落相似。普鲁士人的主宰阶层是武士贵族，他们以劫掠、狩猎和驱使奴

隶劳作为生。自由人靠狩猎和农业谋生，所以他们对使用武器有经验，也有部落领土意识。普鲁士人当中有少量神职人员，一些手工匠人和商人，以及农奴，各氏族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组建军队并主持司法。所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出身。

普鲁士人向来以热情好客闻名，但在近些年里，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波兰人对他们的攻击使得他们的好客风俗发生变化。类似地，过去简单的自然崇拜经历了演化，开始突出强大的人格化神祇（从这点看类似基督教），例如有一些武士之神特征的佩尔库纳斯。

与库尔兰人和爱沙尼亚人不同的是，普鲁士人似乎没有参与海盗活动。尽管他们缓慢地向西扩张、进军维斯瓦河流域，那个地区可能在他们抵达之前就因为维京人掳掠奴隶的袭击而大体上无人居住了。立窝尼亚人和立陶宛人经常袭击邻居，掳掠牛群和奴隶，但我们几乎找不到普鲁士人也这么做的证据。但话又说回来，对这些年月里普鲁士人的政治和战争活动，原本就几乎没有什么记载。[7] 索多维亚人肯定侵略成性，但他们的土地与立陶宛人毗邻，而立陶宛人甚至更为好战，所以索多维亚人学习军事技艺可能纯粹是为了自卫。这意味着索多维亚人的军事形势与普鲁士人的其他部落迥然不同。类似地，库尔姆和波格萨尼亚部落之所以好战，可能只是在应对来自波兰人和波美雷利亚人的压力。

不团结的普鲁士人

以氏族为基础的政府粗糙简陋，但足以正常运转，而对于希望获得“公道”的人来说，在纠纷中胜出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地位和权力，而不是在理与否。在这方面，普鲁士人可能并不比波兰人和德意志人落后，因为这两个民族的司法体制仍然依赖个人权力和亲戚与下属的支持。氏族通过威胁报复敌人来保护自己的成员，让他们免受伤害。如果一个氏族成员死于斗殴，那么他的亲戚会杀死凶手，或者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杀死凶手的一名亲戚。对于较轻的犯罪，受害者会要求赔偿。部落会议负责解决争端，而部落会议由氏族的长老组成，所以他们的决定一般能得到尊重。部落会议定期召开，讨论司法和集体行动，并庆祝宗教节日。部落会议有一定的权威去惩戒不服管教的氏族，但他们显然很少这么做。

普鲁士人的道德观念对描写它的基督徒来说非常怪异，正如基督徒的风俗习惯在普鲁士人眼里一定也很荒诞。对普鲁士人来说，酗酒是全民的消遣方式，他们的斯拉夫邻居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意志人亦是如此。普鲁士人每逢婚礼、葬礼、出生和宗教节日都要举行聚会，在欢迎访客时也要宴饮。东道主将盛满酒的碗在客人、女人和自己的子女，甚至仆人当中传递，直到所有人都酩酊大醉为止。这种行为体现了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他们的酒只有蜂蜜酒和马奶酒或牛奶酒。因为有杀死新生女婴的习惯，普鲁士人当中女人不多，父亲在安排女儿出嫁时可以讨要很高昂的彩礼。但他们施行一夫多妻制，显赫的贵族可以拥有多名妻妾。所以他们需要袭击邻居的土地，掳掠妇女。用金钱买新娘和掳掠女人的习俗可能使得普鲁士社会里女性的地位很低。而在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提升了本族妻子的地位。有证据表明，普鲁士女性有时在社会的各层级都发挥重要作用，只是不会把自己的重要性表现得很明

显。

普鲁士人的地方集市算不上商业中心，也算不上乡村集镇。但普鲁士人并非完全与商业世界隔绝。他们有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琥珀。琥珀在古罗马、巴比伦和古埃及都以光泽和光滑的质感著称，自上古时代便为外国商人所追求。不管外表粗糙还是光滑，这种化石化的树浆都可作为漂亮的首饰，而被困在闪闪发光的树浆里的木片或昆虫让它比普通首饰更为有趣。另外，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有天然琥珀，而波罗的海琥珀的质量最佳。所以，普鲁士琥珀以其稀有性、神秘性和高昂的价格极具吸引力。

关于普鲁士人的生活有大量趣闻轶事。普鲁士贵族定期在类似桑拿房的小屋里洗澡，但平民从不这么做。有些人相信白马不吉利，有人认为黑马不吉利。普鲁士人没有历法，他们想要开会的时候，就把一根木棍传递出去，木棍上的割痕表明距离开会还有多少天。德意志人注意到，普鲁士人的菜肴里不用香料，他们也没有软床。普鲁士人的房屋分散在树林里，周围是田地，距离木制要塞总是不远。这些要塞是他们的避难所。这是一种原始的文明，但他们绝不是所谓“高贵的野蛮人”。普鲁士人的个性原始而好战，再加上他们的森林和沼泽难以通行，所以在他们的波兰和罗斯邻居早已接受基督教并发展成伟大王国的时候，普鲁士人还维持着独立地位，坚守自己的独特风俗。

普鲁士人的领土单位是部落，部落的大小受制于以氏族为基础的政府为其成员提供保护的能力。主要塞是部落活动的中心，也是危急时刻的安全避难所。各个氏族的较小要塞足以庇护人民躲过小规模袭击，但除非迅速得到增援，肯定会被强敌攻陷。所以在高度危险的时候，他们会放弃这些小要塞，逃到森林里躲避。当然，抛下自己的房屋、庄稼和牲口是下下之策。如果某氏族的要塞距离其他氏族太远，得不到及时支援，该氏族就可能投降或者转移到更安全的地点。如果氏族的人口足够

多，可以自给自足，就会发展成新的部落。氏族似乎不要求成员一定要在本族群内或族群外结婚。氏族除了宗教和军事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功能。贵族和长老似乎并不受到氏族职责的很大约束。

普鲁士军事传统

普鲁士人惯于独来独往。早期旅行者易卜拉欣·伊本·雅各布[8]注意到，在打仗时，普鲁士武士不等朋友来帮忙，就自己冲进战场，他们挥剑鏖战，直到被敌人打倒。这种狂暴的勇气显然仅仅出现在贵族身上，因为一般的证据表明，普鲁士的普通士兵在遇到强敌时会溜进树林，丢下伙伴，但这样就能保证自己生存下来，将来再战。这符合基本的人性。

普通武士的武器装备极差，简直可以说是赤手空拳。普通民兵只有木棒和石块，这在伏击战或者保卫要塞时还算有用，但他没有信心与拥有战马、盔甲和利剑的强大敌人正面交锋。那是贵族的职责，他们是装备剑、矛、头盔和链甲的轻骑兵，这一套装备不如西方骑士，但很适合普鲁士本地的地形地貌。那里有很多沼泽、生长树木的洼地和崎岖不平、林木茂盛的丘陵，普鲁士贵族即便能够更容易地获取西方武器，恐怕也不会采用。

普鲁士贵族在很多方面都和其他地方的贵族很像。他们以狩猎、战争和驱使奴隶劳动为生。他们掳掠妇女儿童充当自己的仆人和小妾，但也经常把他们当作商品，送到地区性的奴隶市场出售。有证据表明存在一条从普鲁士向南穿过波兰的贸易路线。很多战俘被卖到罗斯的大河流域也不足为奇，因为那是传统的通往突厥土地和拜占庭的奴隶贸易路线。尽管向东的贸易已经处于衰落期，并且经常被游牧民族向罗斯南部的侵袭打断，但这种贸易仍然有利可图。男性奴隶若不能迅速转手就没什么价值，因为他们在狭小的林间空地上务农时很容易逃跑。儿童的价值更低，因为把儿童养大成人的花费很大。对原始农业来说，女性奴隶更合适，她们既能耕作，也可以在树林里搜集食物。

普鲁士贵族不从事劳动，他们的传统将他们与平民区分开来。德意志和波兰的贵族也不从事劳动，但他们不会榨取奴隶的劳动成果，也不会把战俘卖为奴隶牟利。掳掠奴隶的传统以及普鲁士社会与宗教制度背后的荣誉法则，恰恰是波兰和波美雷利亚的基督徒向普鲁士异教徒开战的主要理由。现代观察者也许会说，基督徒统治者扩张领土的贪欲或许比上述理由更重要，但不管怎么说，宗教本身并非维斯瓦河沿岸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战争的最重要原因。当然，后来，对各方来说，宗教都变得非常重要。普鲁士人受到挑衅之后，就不再满足于待在家乡安安静静地从事自己的宗教崇拜，而是在他们不断演化的习俗的驱使下，在已经报仇雪恨之后，仍然继续袭击他们的基督徒邻居。显然，正是普鲁士人这种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活动（不管最初是因为纯粹的嗜血好战，还是对波兰人入侵的回应）最终导致不仅波兰人和波美雷利亚人，还有来自遥远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赶来与普鲁士人作战。

向普鲁士传播基督教的努力

人们经常谈论的普鲁士独立性和所谓普鲁士人的自由，对13世纪的普鲁士武士和19世纪赞美他们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意义大不相同。在中世纪，这些都是伪命题，因为基督徒在普鲁士人面前别无选择，只能自卫；他们不可能与如此野蛮的制度共存。另外，现代的民族主义概念也不能套用在中世纪的种族认同之上。不过，这个问题还是经常在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语境下被人提起，而西方国家总是被指责为恶人。[9] 13世纪有些哲学家也探讨过今天让我们烦恼的那些问题。无疑，在传教士试图让普鲁士部落族民皈依基督教的时候，普鲁士氏族的长老和祭司与训练有素的基督教辩证学家之间一定有过非正式的辩论。在关于是否皈依基督教问题的辩论中，一方赞扬传统价值观和自由选择，赞扬武德和不必纳税的自由；另一方则谴责可恶的迷信、无知和野蛮的习俗。尊重思想与精神自由的基督教传教士竭力让朴实但精明的乡下人相信，基督教的文明和救赎值得让他们牺牲古老的好战的生活方式。然而传教士失败了。他们需要克服太多障碍：他们自己的思维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开放；他们带来的一些概念对农奴制有利；他们推行封建政府，这疏远了当地贵族；他们似乎是外国统治者的前驱；而且他们没有熟练掌握普鲁士语。但普鲁士原始宗教之所以能够生存，不仅仅是因为基督教传教士的失败。它的根源是一种繁盛的军事文化。

普鲁士人的军事胜利养成了一个残暴而野心勃勃的贵族群体，他们袭击基督徒土地并掳掠奴隶，获利甚巨。虽然和平的传教士努力劝阻他们，但他们拒不停止袭击基督徒土地，有时还会杀掉那些勇敢而拒绝妥协的传教士。在普鲁士贵族接受基督教之前，似乎有必要让他们认识到胜利之神青睐另一边；在那之后，传教士才能慢慢促成变革，打破支撑异教哲学的那些传统。

普鲁士人并非始终享有完全的独立。每一代普鲁士人都必须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维京人是最成功的外来侵略者，曾征服了普鲁士的部分地区，但维京人来得快走得也快，并且令普鲁士人把所有陌生人都视为敌人。最早到普鲁士的传教士——布拉格的圣道博[10]（卒于997年）和库埃尔富尔特的布伦[11]（卒于1009年）都成了殉道者；普鲁士人出于对基督徒的敌意发动的袭击也促使波兰大公波列斯瓦夫四世（1146～1173）对其发动了十字军远征。格涅兹诺[12]大主教推行对圣道博的崇拜，在格涅兹诺大教堂的青铜大门上刻画了他被普鲁士人杀死的壮烈殉道像。所以，邻近的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在文德十字军之后接受了基督教，只有普鲁士人和生活在他们东面与东北面的人群仍然固守旧宗教。即便在那些地区，基督徒也施加了很大影响：1194～1206年，库尔姆的很多居民皈依基督教，有的是被劝服，有的出自私利，有的是被强迫。波兰人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逼近异教徒，一些普鲁士异教徒肯定知道，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1206年，波兰温克诺的熙笃会修道院院长前往普鲁士之地谈判，要求当地人释放在近期的袭击中掳掠的俘虏。让他意外的是，普鲁士人对他以礼相待，让他觉得如果自己长期待在那里，就能让不计其数的异教徒皈依。他写信给教宗英诺森三世，请求允许他在波兰其他熙笃会修道院的支持下在普鲁士传教。教宗回信道：

> 我赞扬你的虔诚请求，允许你去向他们传播福音，担当基督的使者，呼吁上帝让他们皈依基督。而因为收获肯定会很大，一个人承担不了这样的重任。所以，我凭借使徒的权威允许你带领熙笃会修会的其他兄弟以及其他希望加入传教工作的人，一同去宣讲福音，并洗礼那些愿意接受上帝真言的人……

让修道院院长更加振奋的是，有僧侣带回了立窝尼亚的消息。这些僧侣曾与在那里成功传教的熙笃会僧人狄奥多里克谈话，那轮传教是里加主教组织的。如果狄奥多里克及其僧侣伙伴能够让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的异教徒皈依，那他为什么不能在普鲁士取得同样的成绩呢？

但波兰国王和公爵们经常性的扩张领土的企图给和平传教增加了变数。尽管波兰人的东扩运动往往取得成功，但这种扩张在普鲁士只是扰乱了传教工作并招致异教徒的报复而已。但基督徒统治者不会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皮雅斯特公爵们，尤其是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以及他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臣民被普鲁士人掳走，然后被当作奴隶卖给伊斯兰世界和东正教世界的奴隶贩子，他们必须采取行动。他们自己无力保卫边疆，于是向各个军事修会求助。条顿骑士团是其中一个愿意来谈条件的修会。[13]

条顿骑士团来到普鲁士

第一批抵达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小部队由康拉德·冯·兰茨贝格指挥。他出身于离这里不远的迈森，对波兰地理和风俗习惯耳熟能详。他这支小部队此行的目的是在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与克里斯蒂安主教[14]承诺给他们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立足点。大团长赫尔曼·冯·萨尔察为参加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十字军东征需要每一名骑士和武士的力量，但他明白自己也必须对康拉德公爵的邀请做出回应。他还清楚，自己的竞争对手——多布任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也可能向这个方向扩张；并且公爵可能会改变主意。中世纪的统治者和今天的统治者一样，他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常常出人意料、心血来潮地改变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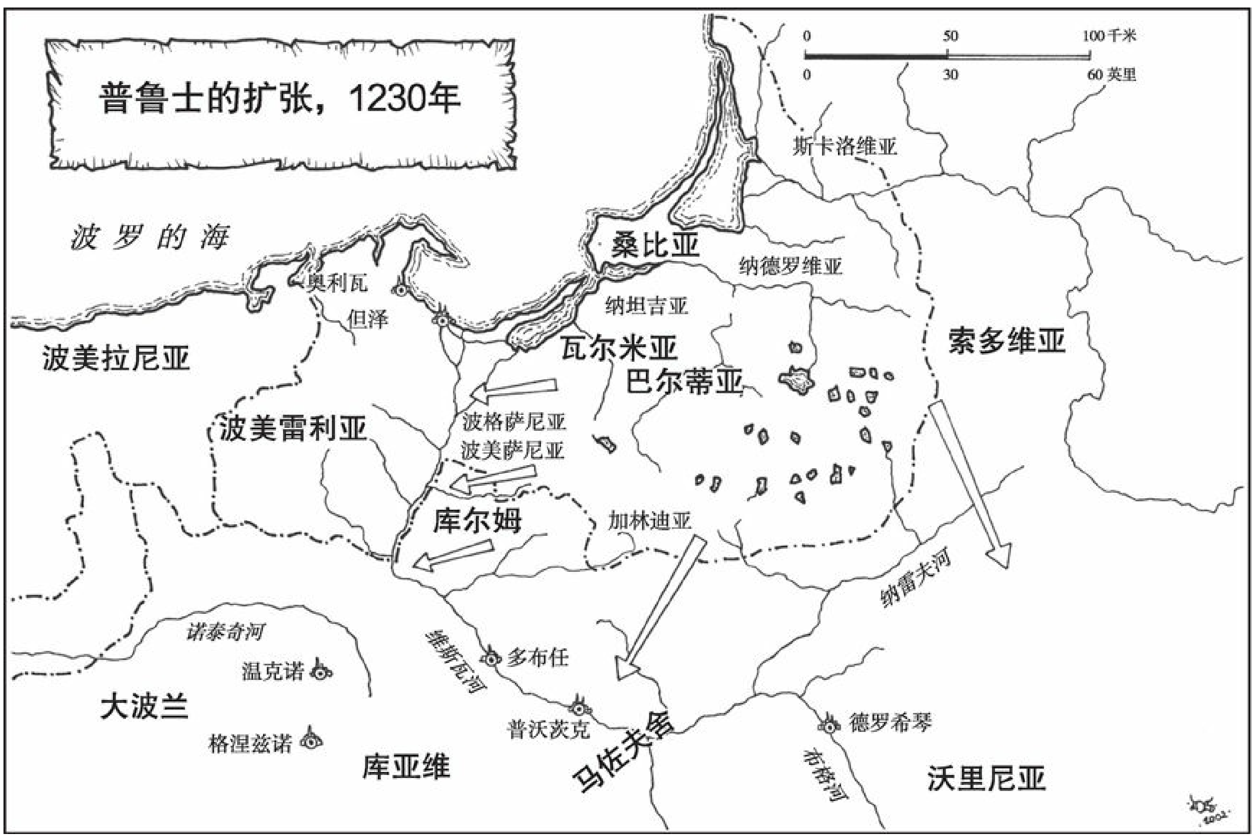
康拉德·冯·兰茨贝格很可能从德意志中部的若干修道院集合了一小批骑士，他们可能都是新人，也许还有一些不能与大团长一道启航前往圣地的伤病员。康拉德的队伍里只有7名骑士、70到100名侍从与军士，还有负责烤面包、造啤酒、洗衣和维护马匹与装备的仆人。因为骑士团部分是修道会，也是医院修会，所以队伍里也有神父和医生。队伍全部为男性，每天要做八次宗教礼拜，这就要花不少时间。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他们不是超人。从表面上看他们是普通的骑士；可在内心里，他们是虔诚的僧侣。

康拉德·冯·兰茨贝格不敢直接进入库尔姆（位于维斯瓦河的拐弯处，具有战略意义），而是停留在维斯瓦河南岸的马佐夫舍。康拉德公爵在那里的一座山上建造了一座小城堡，就在后来的托伦对面。德意志十字军给这座城堡取了个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名字“鸟鸣堡”。编年史家尼古拉斯·冯·叶罗欣[15]解释道：“很多伤员在那里歌唱，不是夜莺那种歌唱，而是天鹅死前的那种悲歌。”

条顿骑士团的这支小部队抵挡不住普鲁士人的大军，但拜波兰人在过去的入侵所赐，这一地区的一部分已经无人居住，而且有些原住民是基督徒，与康拉德公爵和克里斯蒂安主教有联系。所以库尔姆的异教徒不多，他们也没有理由觉得这些新来的武士对他们构成了严重威胁。但他们想错了。康拉德·冯·兰茨贝格在建成了他的城堡兼修道院之后，就派遣骑士渡过维斯瓦河，消灭最近的异教徒武士，烧毁他们的农田和村庄，摧毁他们的庄稼。直到对方愿意皈依基督教，他才肯与其讲和。

摩德纳的古列尔莫

此时，教宗特使、摩德纳主教古列尔莫正在普鲁士。这位意大利高级教士对波罗的海事务很熟悉，他此前曾在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工作。他刚从丹麦来，当时他与瓦尔德马二世国王谈到了立窝尼亚十字军东征的紊乱状况。随后他从丹麦乘船到了普鲁士，从1228年秋末（或1229年初春）一直待到1230年1月之前不久。他可能在意大利与赫尔曼·冯·萨尔察商议过。



普鲁士的扩张，**1230**年

关于教宗特使的活动，史料记载不多。他把一本语法书翻译成了普鲁士语，以帮助原住民学习阅读。他还帮助少量普鲁士人皈依基督教，

他们主要是来自库尔姆以北的波美萨尼亚人和波格萨尼亚人。1231年和1232年的一些教廷文件中提到的新皈依者（这些文件警告条顿骑士团不要骚扰他们）指的可能就是上述的普鲁士基督徒，而不是如某些现代历史学家推测的那样指立窝尼亚的十字军。摩德纳的古列尔莫始终高度关注新皈依者的福祉。他担心如果这些新皈依者受到虐待，他们就会相信所有基督徒都是伪善的暴君。而实际上，基督教除了提供精神慰藉和永恒生命之外，还能给人带来和平、正义和公平，这都是普鲁士此前没有的。

摩德纳的古列尔莫还决心把该地区的几支十字军力量协调起来，免得他们在展开圣战时互相拆台和妨碍，从而浪费时间与精力。就在这时，1230年1月，条顿骑士团从康拉德公爵和克里斯蒂安主教那里获得了（或者说重建或伪造了）文件，这让后人很难搞清楚康拉德公爵和克里斯蒂安主教对条顿骑士团的承诺究竟是什么，以及在何时做出了承诺。后人当然不可能从死去的古人那里得到真相，于是在做判断时只能依赖自己的本能，他们参考的更多是自己时代的政治利益，而不是追寻真相的决心。

不管摩德纳的古列尔莫取得了多少成功，这都没能阻止条顿骑士团继续攻击库尔姆的定居点。在此之前，条顿骑士团曾渡过大河袭击敌人，但没有试图在河对岸建立据点。这是武装侦察的时期，他们借此熟悉地形和当地人民。这一小批骑士与军士在学习对手的语言、风俗和战术，为增援部队赶到的那一天做准备。

赫尔曼·巴尔克

1230年，增援部队在赫尔曼·巴尔克团长指挥下抵达鸟鸣堡。巴尔克是一位精明强干的武士，他将在之后多年里领导对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十字军征服。他通情达理，在所有方面都倾向于和解，除了在与异教徒打交道的时候。他对异教徒没有一丝一毫的宽容、忍耐或仁慈。在各种各样的基督徒当中，无论德意志人、波兰人还是普鲁士人，他似乎都得到尊重和信任。他建立的传统在13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得到维护，包括他设计的团长印章图案：神圣家族逃往埃及[16]。也许是为了象征巴尔克的突出地位，其他团长的印章都是匿名的。

赫尔曼·冯·萨尔察能够派遣第二批骑士去普鲁士，是因为他终于摆脱了在圣地的特殊职责。虽然在皇帝的十字军东征之后他在圣地的职责更重，但因为圣地达成了停战协定，所以他暂时不需要在圣地维持那么多兵力。如果每年获取的新兵数量维持在现在的高水平，那么他就可以每年派遣更多部队去普鲁士而不至于削弱阿卡周围的驻防力量。另外，条顿骑士团仍有希望返回匈牙利，那样的话他们在普鲁士的活动就会受到限制。格列高利九世教宗写信给贝拉四世国王，请他归还之前没收条顿骑士团的土地。但赫尔曼·冯·萨尔察是个务实的人。他不指望能收回特兰西瓦尼亚的土地，但他知道上帝的行事方式神秘莫测：国王可能会改主意，可能会陷入意想不到的麻烦当中，还有可能死去。赫尔曼·冯·萨尔察要做好准备，如果上帝给他机会，他就会返回匈牙利。

而普鲁士就是另一回事了。它的潜力激动人心，但继续开拓的困难极大。在指望取得成绩之前，骑士团要做大量准备工作，他们需要辛勤耕耘、耐心等待。在于当地建立充足的补给线以供养军队，并建造更多城堡以保护和容纳军队之前，大团长只能向普鲁士派遣少量部队。赫尔

曼·冯·萨尔察在很多地方同时开展行动，比如圣地、亚美尼亚、意大利、德意志，而普鲁士是他的很多项目中重要性最低的一个；因为资源有限，他必须精心计算，巧妙运作，只在恰当的时间向普鲁士输送适当数量的人员，从而最大限度地运用他的资源。

赫尔曼·巴尔克首先处置的是那个困扰了骑士团领导层两年的难题：康拉德公爵授予他们土地以维持他们生计的文件。库尔姆仍然在敌人的控制之下，所以普鲁士团长巴尔克必须自己想办法为征服异教徒的军事行动筹措军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不能接受的是，占领库尔姆之后，它仍然属于克里斯蒂安主教和康拉德公爵。条顿骑士团占领库尔姆之后想必还要在那里驻防以抵御其他普鲁士人，那么条顿骑士团能捞到什么好处呢？于是巴尔克去找公爵和主教，他显然拿骑士团在匈牙利失败的例子与他们当面对质。赫尔曼·巴尔克带来了一支军队，愿意用它保护公爵和主教、他们的土地与臣民，但公爵和主教必须给骑士团提供酬劳。他（想必礼貌而坚定地）要求他们授予骑士团在新征服土地上的主权，这一条件与公爵和主教提出的条件相比更接近于皇帝在1226年《里米尼金玺诏书》中授予的条件。巴尔克从这次谈判中收获的成果为何一向是后世德意志与波兰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但不管这份文件的具体条款是什么，巴尔克、大团长和开会讨论此事的代表大会都对其感到满意。

没过多久，德意志人、波兰人、波美雷利亚人和原住民民兵组成的十字军就战胜了普鲁士西部的诸部落。1233年夏季有多达1万人参加了此次十字军远征（他们的动机之一可能是亲眼看看真十字架的一个碎片），并在波美萨尼亚中部，位于维斯瓦河一条支流岸边的马林韦尔德[17] 建造了要塞，位置约在托伦和大海间的中点。这年冬季，波美雷利亚公爵希维托佩尔克二世公爵和桑博尔二世与留在马林韦尔德的十字军战士会合，准备一起入侵波格萨尼亚。在冰封的杰日贡河上，异教徒组成方阵迎战十字军，波美雷利亚骑兵突然出现在异教徒方阵背后，于是

他们阵脚大乱，抱头鼠窜，惨遭屠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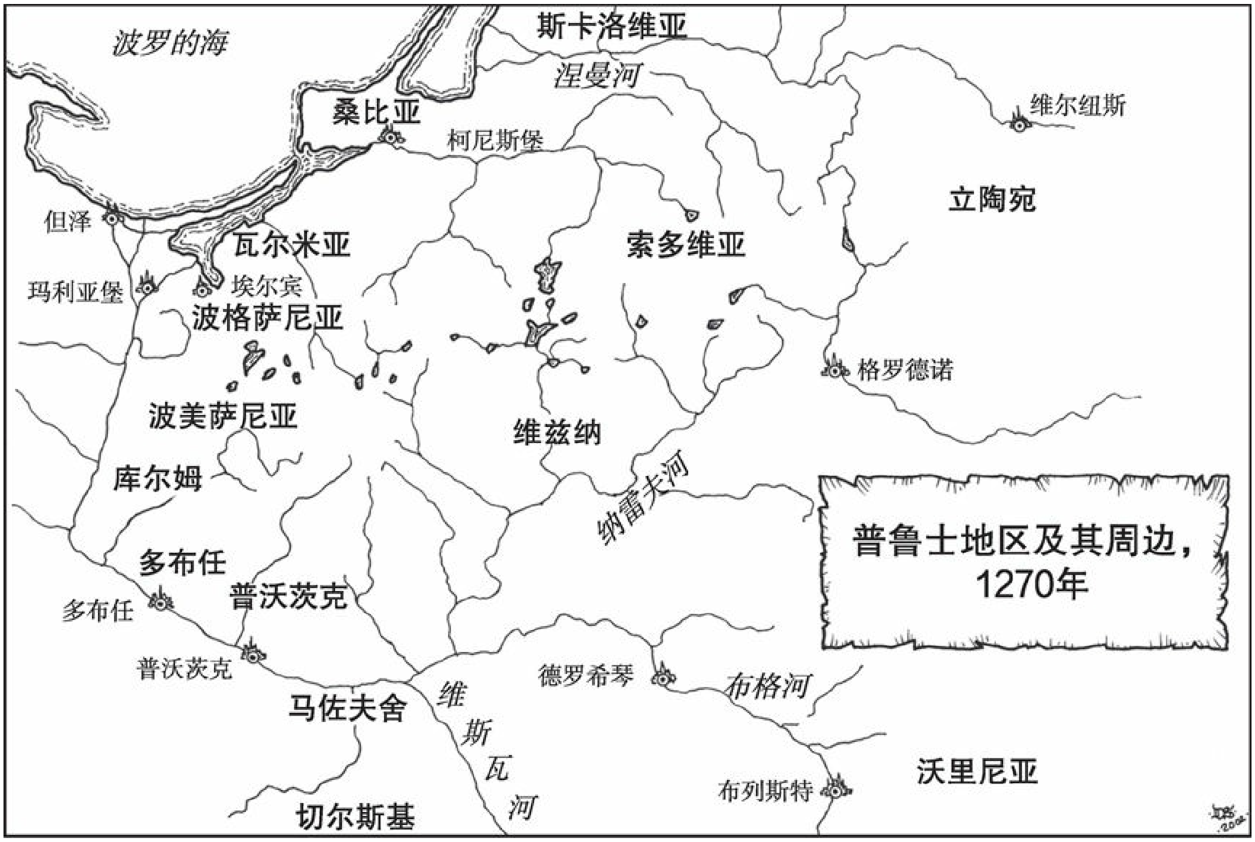
迈森伯爵在1236～1237年的大攻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建造了许多大型帆船，先击沉了前来挑战他的异教徒小船，然后将他的军队运到下游，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波格萨尼亚原住民民兵出来迎战，但他们在听见迈森伯爵吹响号角（可能在异教徒背后）后就逃窜了。普鲁士人显然不敢正面迎战十字军的重骑兵、弩弓齐射和训练有素的步兵。西方的作战方式让普鲁士人在平坦的战场上毫无还手之力。在夏季，十字军战士很难在树林和沼泽里找到异教徒，但在冬季（十字军擅长冬季作战）他们便很容易追踪异教徒，找到他们的巢穴。

每年都有小批十字军来到普鲁士，并收获同样的战果：骑士团的地盘继续扩张。十字军的很多志愿者是波兰人，所有参加这一波十字军东征的人都明白，如果没有皮雅斯特和波美雷利亚公爵们的坚定支持，来自德意志的志愿者除了为已经竣工的城堡提供驻防，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既然很大一部分作战是波兰人承担的，那么条顿骑士团为什么还那么重要呢？

答案是，波兰和波美雷利亚的十字军在战斗结束后就回家了，或者一直待在家乡。起初，他们仅仅在从秋季恶劣天气开始到短暂夏季开始（这期间白天较长）的时间里作战，但后来他们就不再积极参加作战了，因为康拉德公爵在其他边疆地带也遇到麻烦，而希维托佩尔克二世公爵则与他的兄弟们争执不断。最终波兰的所有皮雅斯特诸侯都陷入了厮杀。这些封建领主和他们的主教都没有资源维持一支长期的占领军，于是条顿骑士团承担起这个职责，就像他们在圣地时一样。宣誓守贫和服从的单身骑士愿意在潮湿季节和漫长而寒冷的冬夜坚持服役。世俗骑士则更喜欢热酒和女人的温暖怀抱（或者暖酒和女人的炽热怀抱），他们可不愿在森林里黑暗的小径巡逻，或者在孤寂的城墙上方的瞭望塔里忍受刺骨寒风。

为了协助控制新征服的领土，条顿骑士团把一些世俗骑士安置到库尔姆无人居住的土地，这些世俗骑士大多是从波兰招募来的。在这些早期岁月，骑士团还吸引了一些德意志市民来普鲁士，他们每年建造一座新城镇，并以《库尔姆宪章》（1233年）保障这些市民的权利。这些移民起初人数不多，不过到13世纪末就相当多了，到14世纪更多。但骑士团武装力量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普鲁士民兵和贵族组成的，前者是步兵，后者是骑兵并经常被称为“原住民骑士”，尽管这个说法不太准确。[18]

当有十字军参战的时候，已经对当地地形地貌和原住民风俗了如指掌的条顿骑士团就带领德意志和波兰骑士以及与他们结盟的普鲁士骑兵和民兵沿维斯瓦河和海岸线推进，夺取一座又一座要塞。不过也有其他方面的事务转移骑士团的注意力。1237年，条顿骑士团吸纳了当地的一个军事修会宝剑骑士团（见下章），于是在立窝尼亚有了额外职责，需要向北方调遣人员和物资。后来格列高利九世教宗绝罚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引发了一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斗争并分裂了德意志；蒙古人于1241～1242年的袭击对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匈牙利和波兰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得这几个强国暂时无力为十字军提供军事援助。13世纪40年代，波美雷利亚公爵希维托佩尔克二世与叛乱的普鲁士人联手，企图驱逐条顿骑士团并将其土地攫为己有。这次冲突即所谓第一次普鲁士叛乱，以骑士团险胜告终。最后希维托佩尔克二世被迫议和，并在后来再次被迫投降。此后，普鲁士诸部落以保留了高度的日常生活自主权为条件，向骑士团投降。



普鲁士地区及其周边，**1270**年

与此同时，条顿骑士团的立窝尼亚分支从里加向南推进，也取得了进展。1250年，骑士团处在一场大捷的边缘，这时立陶宛的酋长之一明道加斯接受基督教，于是骑士团失去了攻击他领土的理由。有些批评者说条顿骑士团只是一群对土地欲壑难填的强盗，但这一次，骑士团放弃了攫取更多领土的机会，而是选择将基督教世界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化为自己的强大盟友。[19] 不久之后，普鲁士人的抵抗也开始瓦解。1256年，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最强大的一位统治者——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率领一支大军来到桑比亚，让原住民很快意识到抵抗是徒劳的。不久之后的1257年，萨莫吉希亚[20] 人请求停战两年，以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十字军同意停战，相信他们的敌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也一定会正式接受真正的信仰。一时间，基督教世界似乎在波罗的海地区取得了全面胜利。

有些人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些现代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中世纪的人，或者相信德意志人在普鲁士的目的是消灭当地人口并引入德意志移民，但十字军对和平传教的热情足以驳斥上述观点。但条顿骑士团的表态和行为并非始终一致，因为他们和绝大多数人类组织一样，会在不同时间采取不同的行为。如果我们总是把十字军往最坏的方向想，而尽量美化他们的敌人，那么我们就会说十字军是邪恶的。很多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些把过去理解为20世纪之一部分的人，就是这样描述这些德意志战士的。

1259年，十字军东征的大好局面开始瓦解，因为此时萨莫吉希亚人决定为他们的异教信仰和传统习俗（包括袭击基督徒定居点）而战。他们重创了站在基督徒那边的普鲁士和立窝尼亚军队，强迫明道加斯叛离基督教，并说服北方和西方的原住民部族起兵反抗他们的德意志主子。很快，立陶宛军队深入立窝尼亚、普鲁士、沃里尼亚和波兰。异教徒的胜利似乎证明了他们的宗教是正确的。现在，东北欧的圣战真正变成了两种信仰的较量，而不仅仅是统治者之间的争霸。

这一次条顿骑士团多少可以说是孤立无援。前来参战的德意志和波兰十字军战士都不多，波希米亚君主和高级教士也没有参与进来。另外，圣地又一次成为十字军运动的中心，条顿骑士团也和其他的军事与宗教修会一样，把资源优先投入圣地。普鲁士的战争演变成了一系列的边境袭掠、要塞攻防和奇袭，骑士团需要在荒野巡哨，以防止东方的普鲁士人和立陶宛人穿过加林迪亚荒无人烟的森林和沼泽攻击孤立的定居点。波兰人和德意志人联手封堵缺口，最终沃里尼亚人也来支援，他们一同讨伐共同的敌人。

异教和东正教敌人

第二次普鲁士叛乱（1260～1275）是一段为时十五年的艰难岁月，如彼得·冯·杜斯堡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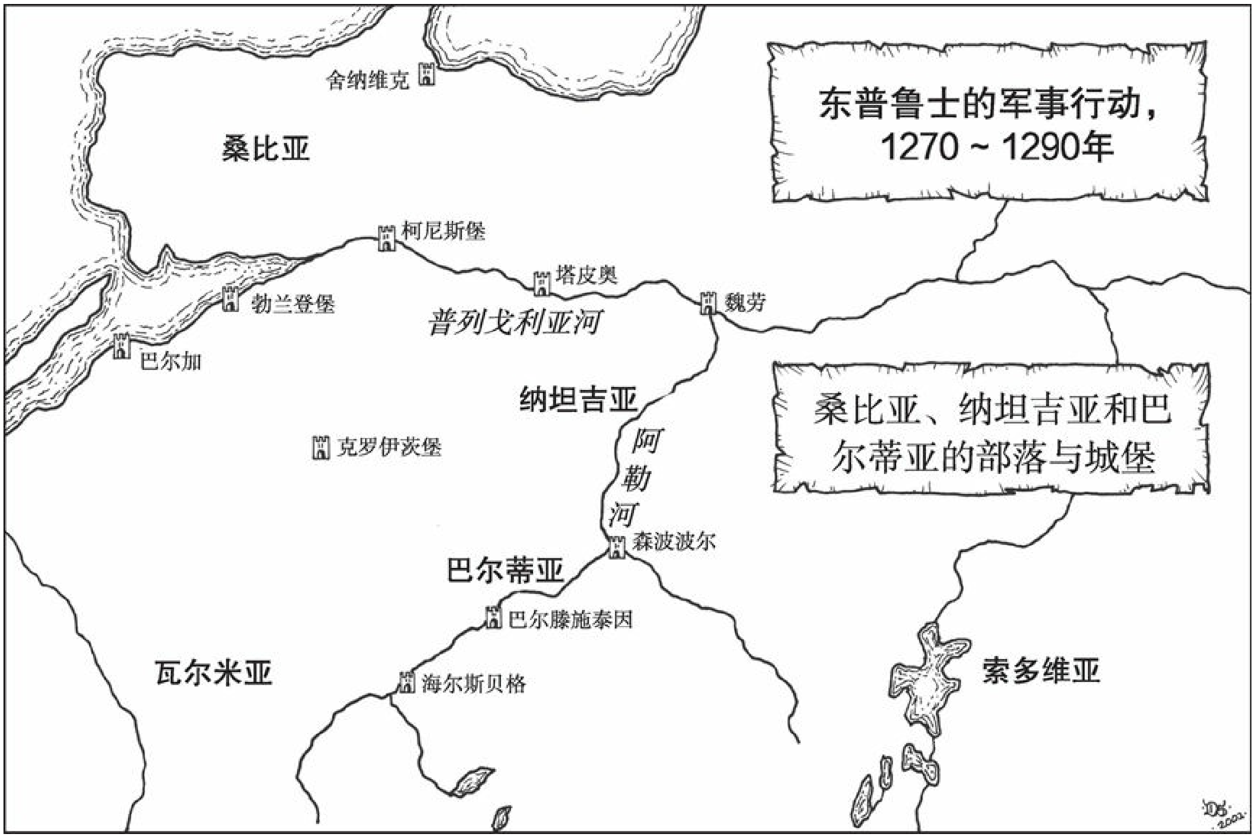
> 很少有面包够吃的时候。他们多次被迫骑马作战，驱赶敌人。当年犹太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重建耶路撒冷圣城，而骑士团就像那些犹太人一样，一半人劳作，另一半人负责警戒，从黎明到黄昏。他们一手劳作，一手持剑。

到1273年，此次叛乱最糟糕的岁月已经结束。这一年，奥尔米茨（捷克语名为奥洛穆茨）主教，一位对波兰、加利西亚和匈牙利情况非常了解的捷克高级教士，给教宗格列高利十世写了一份备忘录，提醒他整个东欧仍然受到异教徒、异端分子和教会分裂者（东正教会成员）的威胁：

> 这个地区有四个国度：匈牙利、罗斯、立陶宛和普鲁士。匈牙利王国的基督徒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首先因为库曼人袭击匈牙利，他们杀死幼儿和老人，掳走青年男女，教匈牙利人邪恶的仪式，且繁育极快。匈牙利及其周边土地都受到库曼人的严重威胁。匈牙利境内还有从其他土地逃来的异端分子和教会分裂者。匈牙利王后就是库曼人，她的父母曾经是、且现在还是异教徒。匈牙利国王的两个女儿嫁给了教会分裂者罗斯人……罗斯人是教会分裂者，是蒙古人的奴仆。立陶宛人和普鲁士人是异教徒，他们蹂躏了波兰的多个主教区。这些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敌人。

在并不遥远的地方同样危机四伏。纳坦吉亚人、瓦尔米亚人和巴尔蒂亚人的投降使得条顿骑士团必须承担保护这些新皈依者的责任；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更加深入剩余的异教徒（索多维亚人及其立陶宛盟友）的土地。另外，条顿骑士团不得不独自战斗。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正在与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作战，争夺奥地利和皇帝之位。在1278年的决定性战役之前，奥托卡二世需要支持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军事援

助。勃兰登堡、巴伐利亚、克拉科夫、西里西亚、图林根和迈森都派遣骑士去了波希米亚。这些统治者都是条顿骑士团的传统盟友，甚至亲身参加过十字军远征，但如今他们都深陷于帝国内部的争斗之中，无力在骑士团万分危急的关头向普鲁士增兵。



东普鲁士的军事行动，**1270～1290**年

边境战争

对十字军来说，索多维亚人是很难对付的劲敌。首先，索多维亚人是优秀的战士，且人数极多；其次，他们的土地在遥远的东方，位于几乎完全无法通行的沼泽与森林当中。搜索藏在树林里的索多维亚人比寻找原牛（此时在欧洲已经濒临灭绝）还要困难得多。索多维亚人的袭掠队伍在攻击孤立的基督徒定居点和驻军时也是神出鬼没。

在纳坦吉亚人和巴尔蒂亚人投降的同时，索多维亚人发动了第一轮进攻。索多维亚人袭击了正在重建巴尔滕施泰因[21]（在巴尔蒂亚中部，是阿勒河[22]畔的一个战略要地）的建筑工人，在把他们屠杀殆尽之后烧毁了未完工的建筑。这对条顿骑士团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他们原打算把巴尔滕施泰因当作面向荒野的防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而在这场袭击之后，索多维亚人在一位名叫斯克芒塔斯的勇敢领袖指挥下，得以恣意袭扰不久前还是他们盟友的若干凌乱而缺乏防备的部落。

但是，索多维亚人对纳坦吉亚人和巴尔蒂亚人的恐怖镇压促使这些部落投入条顿骑士团的怀抱，不论是否出于真心。这些部落民或许对索多维亚人心怀同情，但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人死在斯克芒塔斯令人胆寒的袭击中。条顿骑士团在那里没有城堡作为基地，也无法帮助他们，因此原住民必须设法自卫。起初，在反叛中幸存的武士缺乏自信和领导，他们在1274年之前大多只是在自己的要塞里躲藏。随后，一位坚强的母亲（前一次普鲁士人反叛中最著名的领袖赫尔库斯·蒙特[23]的亲戚）开始训斥自己的儿子们，她指责他们无力自卫，也保护不了族民。在这严厉批评的刺激下，他们从好几个要塞集结了一群武士，与索多维亚人针锋相对，杀死了2000名袭掠者。于是，边境上的大部分恶棍都被肃清了，条顿骑士团得以重建巴尔滕施泰因。在普鲁士原住民出于自身

利益开始用自己强悍的军事技能为条顿骑士团效力之后，战局就变得对基督徒有利起来。这也证明，纳坦吉亚人并没有被灭绝，人口也没有锐减。

现在骑士团有了新的领导者，他们也为骑士团带来了新的战略战术。大团长安诺·冯·桑格斯豪森于1266年从普鲁士去了圣地，在那里一直待到1272年与苏丹拜巴尔[24]议和为止。随后桑格斯豪森返回德意志，从图林根和迈森招募更多十字军战士，就是这些战士结束了纳坦吉亚的战争。桑格斯豪森从普鲁士返回德意志不久之后去世了。代表大会于1273年7月开会，选举哈特曼·冯·黑尔德隆根为新任大团长。他已经上了年纪，在年轻时曾认识大团长图林根方伯康拉德[25]。康拉德大团长见证了条顿骑士团与宝剑骑士团的合并，并于1255年访问普鲁士。大团长哈特曼遵循传统，先去了意大利并从那里乘船前往圣地。此时，在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条顿骑士仍然认为他们的主要职责在圣地，他们需要保卫阿卡，以等待新的十字军再度解放耶路撒冷。但哈特曼很快就返回了德意志。阿卡的骑士团修道院里没有足够的房间，无法容纳全部可以执勤的军官和骑士，所以其中一些人必须返回欧洲，但仍然随时可能被召回圣地。

这次代表大会还确认康拉德·冯·提尔贝格为普鲁士团长。康拉德是弗兰肯人，在普鲁士的大部分时间担任苍蒂尔和基督堡[26]的长官。这两座要塞位于普鲁士西北部。从1269年开始，他多次代理团长之职。现在他正式成为普鲁士团长，并指派自己的弟弟担任总军务官。因为他俩的姓名相同，大家称他们为大康拉德和小康拉德。

代表大会指示康拉德团长从柯尼斯堡顺着普列戈利亚河逆流而上，向东进攻，在索多维亚人和纳德罗维亚人之间打入一个楔子。骑士们希望这样能促成对纳德罗维亚人的征服，然后以他们的土地为基地，利用涅曼河打击萨莫吉希亚人的南翼。另外，普列戈利亚河上的新城堡可以

从水路轻松地获得补给，并保护通往阿勒河的交通线。并且，与不久前的情况相反，代表大会这次派遣了足够多的骑士和武士，志在必得。

康拉德团长在此役的第一个行动是派遣桑比亚的地方长官狄奥多里克和他的原住民民兵攻打普列戈利亚河上的两座大型木制要塞。桑比亚人占领了这两座要塞，缴获了大量马匹、牛和其他战利品，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把战利品全部运走，也没法把牲口都带回家。随后团长派遣狄奥多里克带领一队条顿骑士、150名军士和大量原住民步兵乘船去攻打另一座较远的城堡。地方长官狄奥多里克将弓箭手部署就位后，立刻指挥原住民民兵攀爬云梯进攻。纳德罗维亚人企图投降但已经太晚了，狄奥多里克的进攻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无法召回部队，于是城堡内的大部分武士都被屠杀。少量异教徒成功地表达了投降的意愿，被饶了一命，和妇孺一起被带走并安置到其他地方。但这样的人不多。随后胜利者烧毁要塞并离开了。

肃清了边境上的敌人要塞之后，康拉德团长率军进入纳德罗维亚腹地。他劫掠了附近的地区，然后对由200名全副武装的守军把守的主要塞发起进攻。他这次进攻与其他针对原住民的土木要塞的攻势差不多，结果也类似：激战之后，康拉德团长的部队攻克了要塞，杀死了大部分守军。不久之后，纳德罗维亚人投降了。骑士团的一位编年史家如此概括这次胜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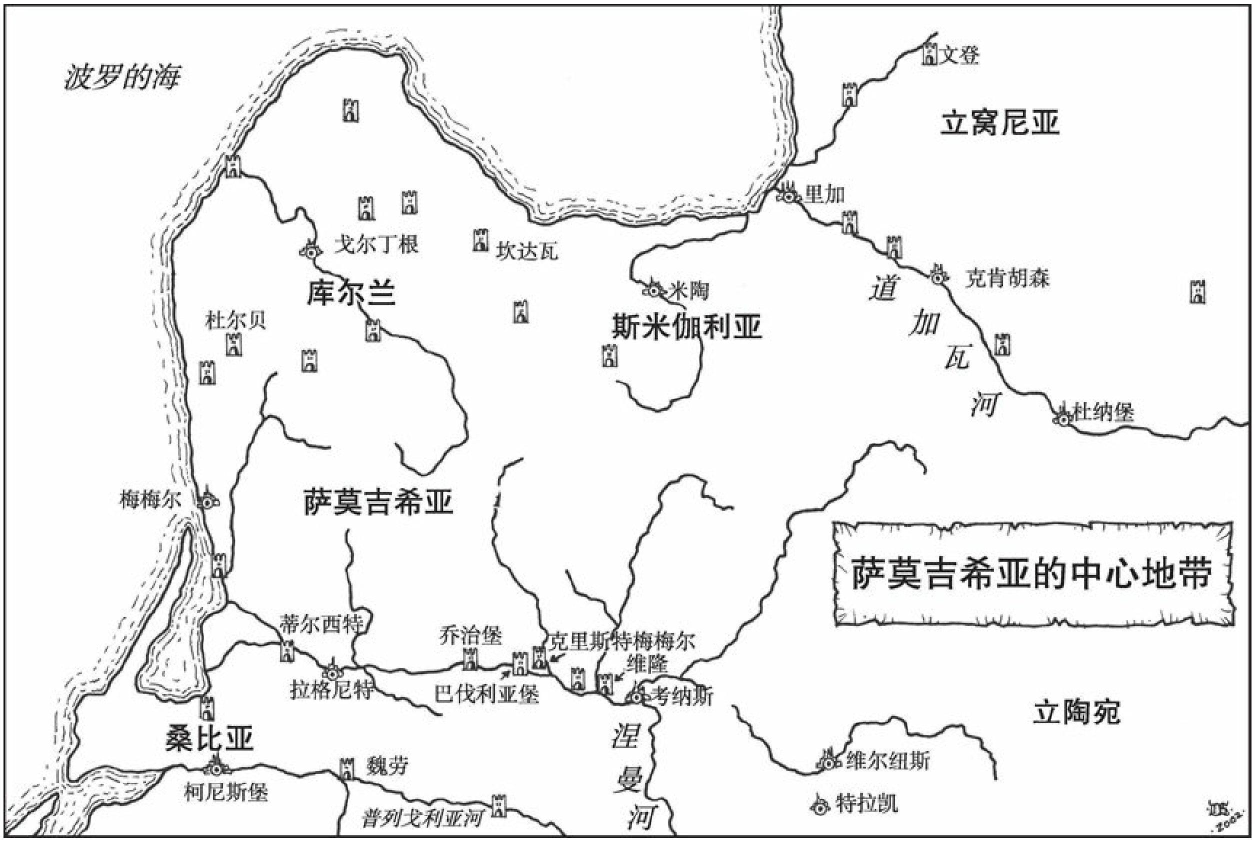
> 在针对纳德罗维亚人的战斗中有许多光荣壮举，本书都没有记载，因为对其逐个描写就显得沉闷无趣了。但纳德罗维亚人当时拥有一支庞大的劲旅和很多城堡。不过他们还是放下了恨意，向骑士团投降，只有少数人逃到了立陶宛。纳德罗维亚的这个部分至今仍是一片荒野。

根据多年前制订的计划，条顿骑士团继续向东北进军。他们以纳德罗维亚为基地，进攻涅曼河下游的斯卡洛维亚，更远方就是萨莫吉希亚。十字军东征的领袖早就渴望粉碎萨莫吉希亚人顽固而勇敢的抵抗，

因为萨莫吉希亚人对库尔兰的攻击阻碍了十字军与立窝尼亚的联络。现在普鲁士团长只能通过海路安全地输送信息、人员和给养，但海路只有夏天可以通行。他们的战略很清晰。正如普鲁士团长在攻入斯卡洛维亚之前必须消灭他侧翼的所有威胁，现在他也要消除当下自己的侧翼受到的危险，以最终控制库尔兰和立窝尼亚的边疆地区。正如纳德罗维亚人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十字军的辅助人员一样，斯卡洛维亚人很快也会协助十字军攻击萨莫吉希亚人。如果一切按计划顺利发展，萨莫吉希亚人最终也会成为十字军的盟友，帮助他们攻击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竭尽全力帮助边疆地带受到十字军威胁的部落。但尴尬的是，立陶宛人只有在普通武士不需要参与农活的时候才能提供增援，而所有武士都不喜欢沉闷无趣的防御工作。所以最符合逻辑的办法是用这些增援部队攻击立窝尼亚和普鲁士，牵制那里的基督徒军队，让他们不得不留在原地保卫自己难以防御的边境。不足为奇的是，条顿骑士团选择以同样的方式牵制异教徒军队。他们威胁在全年任何时间不加预警地入侵立陶宛高地，并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

为了削弱立陶宛人支援萨莫吉希亚人的能力，骑士团的立窝尼亚分支于1274年在杜纳堡[27]建造了一座大型城堡，有效地切断了从那里通往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的最直接道路。据说，立陶宛大公特莱德尼斯[28]曾表示，杜纳堡的城堡“建在了他的心脏上”。他攻打这座土木城堡长达四周之久，投入了他能调动的全部兵力和武器，却无法将其攻克，也无法阻挡那里的驻军发动的毁灭性袭击。没过多久，杜纳堡和高地之间就出现了一片庞大的无人区。



萨莫吉希亚的中心地带

这第一轮攻势打通了一条通往梅梅尔（克莱佩达）的安全的沿海路线。梅梅尔是库尔兰湾入海口处的十字军城堡，1252年在来自吕贝克的十字军帮助下建成。骑士团因此得以轻松地沿着海岸线骑马去库尔兰，或者从这个狭窄而多沙的半岛南下去普鲁士。为了拓宽这条沿海走廊并为直接袭击萨莫吉希亚中部做准备，康拉德团长没有选择从梅梅尔向东直接强攻，而是沿着涅曼河向北实施侧翼包抄。于是西方人得以利用他们在运输和攻城装备方面的技术优势，回避了在内陆大森林和沼泽地作战的难题。

第一个目标是位于拉格尼特[29]的斯卡洛维亚人要塞，它屹立于一座高山之上，俯瞰大河。这座要塞相当坚固，在几十年来成功抵挡住了多次进攻，包括一支罗斯劲旅的攻击。它的土木工事很难被强攻下来，而且城墙之内有池塘，在要塞被围的情况下也能为守军提供饮水和鱼。

原住民认为这座要塞无懈可击。

1275年，康拉德团长派桑比亚的狄奥多里克率领1000人乘船前往拉格尼特。狄奥多里克带领部队和装备登陆，然后上山。各就各位之后，他命令部队发起进攻。守军集中在城墙沿线阻挠进攻者用云梯爬城，这让他们成了十字军弓箭手眼中的活靶子。猛烈的箭雨迫使守军离开城墙顶端，这时十字军架设云梯，如潮水般涌上城头，开始了惯常的屠戮。胜利者纵火破坏要塞，将其彻底拆除。随后，狄奥多里克只多花了一天时间便又夺取了河对岸的罗米格要塞。

为了报复，斯卡洛维亚人乘船来到柯尼斯堡以北海湾处的拉比奥[30]，在一天凌晨时分趁哨兵睡觉的时候发动进攻，屠杀了城堡内的人并烧毁了城堡。康拉德团长感到必须以牙还牙，于是他召集自己的骑士和原住民部队袭击了最近的斯卡洛维亚土地。尼古拉斯·冯·叶罗欣写道：

> 他们杀死了大批异教徒，让他们溺亡在自己的鲜血里。他们俘虏了躲藏起来的男女，将其带回。他们在那里打算撤退的时候，斯卡洛维亚人酋长“石神”集结大批属民，追击骑士团的军队。团长得知此事后，派遣一支强大部队到道路一侧埋伏。斯卡洛维亚人赶来攻击团长的时候，埋伏的部队就一拥而出，杀死大批敌人，将剩余的敌人驱散。

此时，斯卡洛维亚贵族已经派使者去找条顿骑士团商谈投降的条件。即便对熟悉边境战争并懂得普鲁士语言和风俗的骑士团军官来说，他们也很难判断敌人的哪些提议是真诚的，又有哪些是用来诱骗和消灭小股十字军战士的诱饵。邻近的库尔兰人多次请求骑士团派兵驻防他们的边境城堡，然后伏击骑士团派出的士兵。现在斯卡洛维亚贵族提出了同样的请求，条顿骑士团的回应非常谨慎。

在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小规模战斗，就连骑士团的编年史家也觉得太千篇一律了，但对斯卡洛维亚用兵的结果和在纳德罗维亚一样：大多数

斯卡洛维亚人投降了，少数人背井离乡逃往立陶宛。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因为战乱而没有人烟的边境沿线，逐渐出现了大范围的荒野。但异教徒在斯克芒塔斯的索多维亚人领导下凶悍地反击，一直袭掠到库尔姆。他们甚至在1273年攻打了申塞主教的城堡。这样的进攻促使条顿骑士团把年久失修的木制要塞更换为有石墙的城堡。

有些普鲁士人逃去投奔特莱德尼斯，他提议将他们安顿到沃里尼亚边境，可能是在格罗德诺[31]。这引起了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爵的注意，他命令在卡梅涅茨河也就是布格河的一条支流岸边建造一个新的边境定居点，以保卫自己的土地不受来自格罗德诺的袭击，并巩固对贸易路线（在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北，从平斯克到布列斯特再到德罗希琴）的控制。

无疑，只要条件允许，康拉德团长随后就会进攻萨莫吉希亚。这片异教徒势力强劲的土地就在他的北面，他还可以与骑士团的立窝尼亚分支配合，联手发动袭击。但康拉德团长此时无法北上。他必须将注意力转向波格萨尼亚，因为第三次普鲁士叛乱开始了。

第三次普鲁士叛乱，1275～1283

这次叛乱似乎是斯克芒塔斯煽动的，他近期的袭掠造成了严重破坏，以至于骑士团在波格萨尼亚的主要城堡长官于1276年被免职，并被一位更勇敢的军官所取代。斯克芒塔斯的几支小规模袭击队伍在这一年遭受失败，这可能让他恼羞成怒，于是他向立陶宛人求援并得到了后者的同意。1277年，斯克芒塔斯率领立陶宛援军和他自己的4000部落族民穿过蛮荒之地，进入库尔姆，占领了奥萨河[32]上的一座小城堡，然后取道雷登、马林韦尔德、苍蒂尔和基督堡，烧毁了沿途所有村庄和小要塞。彼得·冯·杜斯堡描绘的景象十分凄惨，波兰编年史家德乌戈什[33]证实了他的说法：

> 他们带着不计其数的战利品和基督徒俘虏回家，这些俘虏注定要永远为奴。愿上帝怜悯他们！异教徒分配俘虏，可耻地对待他们。友人和亲人被迫分离，幼儿被从母亲怀中抢走，女儿被从母亲身边拉走。哀哭震天，这多么悲惨！哦，多么恐怖！他们的朋友看见他们的时候，是多么吓人的场面！任何人看了他们的惨状，都要落泪。

与此同时，立陶宛军队沿着荒野上的路线从格罗德诺南下到纳雷夫河，在进入马佐夫舍之后继续向西洗劫波兰村庄，并渡过维斯瓦河进入库亚维[34]。皮雅斯特公爵们无力保卫波兰的北部边疆，而恰恰就是这种局面让条顿骑士团来到了普鲁士。这次异教徒入侵的可怕之处还不只在于残暴的劫掠（很多异教徒可能本来就是因受条顿骑士近来的进军所害不得不迁往更安全地带的人），等待着被俘虏的波兰人的命运据说更是悲惨。

尽管基督徒的袭击在起初也非常恐怖，但基督徒和异教徒对待俘虏的态度有所不同。基督徒会把大多数俘虏安置到其他地方，让他们充当农场劳工，常常是作为农奴；简而言之，很多俘虏过的生活和他们自由

的时候差不多。基督徒会允许一些俘虏被赎回，并与敌人交换一些俘虏，但极少将俘虏卖到国际奴隶市场。异教徒的经济水平更落后，他们需要的农奴没有那么多，所以经常把俘虏卖到国外，或用俘虏作人祭，或将女性当作小妾和家奴。据十字军战士说，被野蛮人抓去的俘虏不再被当作人，而是牲口。我们知道，基督徒俘虏曾发起暴动。成群结队的俘虏在看押下缓缓前进时，条顿骑士团和民兵追击而来，异教徒不得不停止前进并前去迎战，此时手无寸铁的俘虏便趁机扑向敌人。情急之下，困兽犹斗。

双方可能都意识到他们的一些俘虏之前就被抓过，并承认这些俘虏是不情愿地落入敌手的，于是允许这些可怜人回到自己那边。在骑士团于战斗之前开会讨论战术和战利品分配的时候，效忠骑士团的原住民坚持要求，如果他们歼灭了异教徒的袭掠队伍，获释的俘虏不能算在他们那一份战利品里。

双方肯定都努力救援了袭掠行动的受害者，但即便条顿骑士团和主教们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为每一户丧失财产的人家提供新的居所和土地；他们同样没有相应的官僚机构来维持详细记录，以帮助失散的家人团聚，也没有办法建立身份、服役履历之类的档案。这些工作都只能依赖个人的知识和记忆，其中肯定会有很大缺陷。条顿骑士团经常把俘虏安置到村落里，允许他们的传统领导人继续领导村民，并且可以保留武器。这种政策经常成功地赢得许多原住民的支持，在战局对十字军有利的时候尤为有效。但如果十字军受挫，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些部落民仍有能力组织起来作战。而且既然贵族和平民都有理由起来反叛，他们只需要些微的鼓励和胜算就会揭竿而起。当斯克芒塔斯证明条顿骑士团甚至无力保护他们那些比较巩固的省份时，就连波格萨尼亚人也造反了。他们的土地在库尔姆以北，早已被十字军所平定，所以他们的反叛让普鲁士团长格外吃惊和恼火。

叛军出人意料地在当地迅速取得胜利。在一名巴尔蒂亚酋长指挥下，他们可能通过计谋俘获了埃尔宾[35]和基督堡的城堡长官。这个巴尔蒂亚酋长以远超其他叛军领袖的残忍闻名，他为恫吓俘虏绞死了一名神父并杀死一名骑士侍从。若不是一名忠诚的原住民解救了披枷带锁的被俘军官并帮助他们逃跑，巴尔蒂亚酋长可能还会杀死这些军官。

此次反叛未能星火燎原，部分是因为原住民对十字军的仇恨受到谨慎之心的约束，部分是因为桑比亚的地方长官狄奥多里克的努力。他在得知消息后迅速从德意志赶回。杜斯堡的记述可能有偏见，他这样写道：

> 桑比亚人热爱他，他把他们团结起来，对所有人讲话，让他们悬崖勒马，停止邪恶的错误。是恶魔的怂恿让他们有了反心。纳坦吉亚人和瓦尔米亚人得知此事后，就放弃了他们最初的恶行，庄严宣誓忠于骑士团。

只有一人被处决，这是个重婚的男人，他的妻子们举证反对他。条顿骑士团此时风声鹤唳，只要看到任何异教风俗，比如一夫多妻或者火葬死者，都觉得这是叛乱阴谋，所以当时一定有原住民公报私仇，检举自己的敌人为叛徒。但据我们所知，骑士团没有实施大规模迫害。也许他们在此刻的政策就是姑息原住民的罪孽。那个重婚者被处死，说明骑士团不会纵容公开的违逆行为，但团长也不会刻意去调查隐秘的罪孽（比如私下里养小妾或在发誓皈依之后仍然遵循异教风俗）。如果骑士团残酷镇压原住民，可能导致其他原住民贵族起来反叛，而团长肯定不希望看到其他部落加入波格萨尼亚人的叛乱。马基雅维利一定会赞同团长的政策。但另一方面，那些已经拿起武器的波格萨尼亚人让普鲁士团长不得不用武力加以镇压。康拉德·冯·提尔贝格于1277年夏季率军讨伐波格萨尼亚人并在秋季班师，他杀死、俘虏和强制迁移了大批波格萨尼亚人，以至于大片土地此后荒无人烟。很多波格萨尼亚人抛弃了家园并穿过加林迪亚和索多维亚逃亡，最后被立陶宛大公安置到格罗德诺附近，他们在那里继续抵抗条顿骑士团。大公把十字军的敌人安置到那个

危险的战略要地，表明他也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

康拉德团长可能将波格萨尼亚俘虏安置到了他的新城堡玛利亚堡[36]周边，以在那里更密切地监视他们。他建造这座城堡是为了让其取代维斯瓦河口的那座过时的旧要塞苍蒂尔，成为骑士团新的区域中心。随后一个世纪里，玛利亚堡成为大团长的官邸和世界上最宏伟也最美丽的城堡之一。但此时，它还只是一座普通要塞，与埃尔宾和基督堡构成一个三角，让骑士团能够更密切地监视从前的反叛者。与当时和后来建造的其他城堡一样，玛利亚堡也是砖砌而成。普鲁士沿海几乎找不到石料，而进口石料又太贵，顶多只能少量进口以用来制作建筑的过梁和柱头。在普鲁士发展出自己的烧砖行业之后，所有重要建筑，如城堡、教堂、仓库或宫殿，都用这种坚固耐用的材料建造。

第三次普鲁士叛乱之后，条顿骑士团更加重视索多维亚人的问题。虽然这个部落遭受条顿骑士团、沃里尼亚人、波兰人，近些年甚至还有纳坦吉亚人的重创，但索多维亚人显然还颇具威胁性，仍有能力深入骑士团领土。立陶宛人来支援索多维亚人之后，索多维亚人就显得更强悍了，但他们只有在进攻时才是这样，因为立陶宛太遥远，除非事先知道骑士团将于什么日子进攻，否则他们无法帮助索多维亚人进行防御——毕竟任何人都不能让自己的军队无所事事地坐等入侵者露面。但只靠索多维亚人自己是不足以打退德意志、罗斯和波兰军队的袭击的。

在针对索多维亚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袭掠中，十字军取得了惊人的战果，获得大批马匹、牛和俘虏。他们在撤退时设下埋伏，等待3000名愤怒的索多维亚人追击而来。基督徒以六人战死的轻微代价杀死了大批笨拙地闯入陷阱的异教徒武士，并将其余敌人击溃。

十字军有过胜利也有过失败，不过有些失败可以算是一种道德上的胜利。一位波兰编年史家在1279年写道：

这一年，条顿骑士团与立陶宛人交战。两名骑士被立陶宛人俘虏。其中一人被吊在一株大树上，他的战马被拴在他下方。立陶宛人点燃大火，企图将人和马都烧死。但在马被烧死的时候，天堂敞开大门，明亮的光束从天而降，落到这名十字军战士身上，扑灭了大火。然后光束带着十字军战士升上天堂，他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在周围观看的立陶宛人看见一名美少女升上天堂。他们相信这是魔法，不是女神的救援，于是将另一名十字军战士吊起来。这一次他们用木柴点燃熊熊大火。但上帝不会抛下他的骑士不管：天堂立刻敞开大门，一只巨大的白鸟飞到火焰当中，将骑士背起来飞向天堂。在周围观看的异教徒喊道：“基督徒的神真是强大，他就是这样保护自己的信徒。”

波兰和波美雷利亚的问题

在上述这些冲突中，波兰人为条顿骑士团提供了一些间接帮助，但因为波兰人内部并不团结，他们提供的帮助相对有限。皮雅斯特公爵们对神圣罗马帝国的风云变幻十分关注。在帝国境内，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一世于1278年在战争中杀死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随后，哈布斯堡皇帝[37]又与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奥托五世争夺在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影响力。皮雅斯特公爵们还互相嫉妒。许多年来，他们把波兰王国分割成许多越来越小的公国，分给他们的许多继承人。但在近期，波兰突然出现了一系列团结的迹象。好几位公爵去世时没有留下直系继承人，他们的亲戚为了遗产而陷入争执。库亚维被五兄弟分割，但其中三位到此时还没有子女，于是这个家族很快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西里西亚被分割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被外国人主宰，所以四个西里西亚公爵在自己的袖珍领地之外都没有影响力。在大波兰[38]的公爵虔诚的波列斯瓦夫（1226～1279）去世后，大家为了争夺他的公国展开了激烈斗争，库亚维公爵卡齐米日一世（1211～1267）[39]的长子“黑色”的莱谢克二世[40]（1240～1288）最终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立陶宛人和索多维亚人在1277年和1278年发动攻势，蹂躏了沃里尼亚的大片地区，直到1279年的可怕饥荒迫使异教徒向沃里尼亚乞求赈济。这批救援粮食在布格河上向南输送以及在纳雷夫河上向北输送的时候被马佐夫舍-切尔斯基的领主康拉德（以华沙为基地）设伏抢走，他还摧毁了运粮的船只。

莱谢克二世公爵十分看重自己保卫波兰东部边境的职责。虽然他没有做过像1273年入侵索多维亚、迫使诸部落纳贡那样戏剧性的大事，但他在1280年打败了蒙古人派往桑多梅日的一支罗斯和立陶宛军队，并亲

临前线，抵挡索多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对马佐夫舍的袭击。有一次，他追击普鲁士人穿过了纳雷夫河沼泽地，从犬吠中判断出了敌人的藏身之地（那些狗认出了自己的主人），于是不损一兵一卒便解救了那里的俘虏。但其他皮雅斯特公爵在互相监视对方有没有野心或患病的迹象之外就无所事事了。他们不肯离开自己的领地去对抗异教徒，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不在家期间领地会遭到攻击。“黑色”的莱谢克二世尽其所能地保卫自己的领地抵抗来自东方的袭击，但他在波兰西部几乎没有任何权威，而波兰的大部分人口和财富都集中在西部。

这种局势在波兰煽动了反德情绪。波兰爱国者觉得自己国家面对的重重困难应当归咎于外国人而不是他们自己。反德情绪主要针对波希米亚和勃兰登堡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企图利用波兰的困境来扩张，但皮雅斯特公爵们和他们的贵族与骑士对所有外国人都充满猜疑。他们固然不会觉得条顿骑士团是最危险的邻居，但也没有把它从危险邻居的名单中排除。紧张的政治局势造成了一种对一切外国事物都不信任的气氛，最终波兰人觉得自己四面受敌。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种自信的文化不会如此惧外和仇外，但此时的波兰虚弱不堪，且除了东部精力充沛的莱谢克二世之外，波兰没有一个像样的领导人。

在皮雅斯特王朝似乎逐渐走向灭绝的同时，波美雷利亚公爵的家系也奄奄一息。桑博尔二世公爵（1204～1278）和拉契波尔公爵（？～1275/1276）没有儿子，而且他们非常讨厌侄子梅斯特温二世[41]（1266～1294年担任公爵），想尽办法要剥夺他的继承权。拉契波尔公爵和桑博尔二世公爵都在遗嘱中将自己的大部分土地留给条顿骑士团和其他宗教团体。梅斯特温二世公爵攫取了拉契波尔的土地并保卫它，抵制勃兰登堡边疆伯爵的主张权，从而废止了拉契波尔的遗嘱。但桑博尔二世把格涅夫（维斯瓦河附近的一处战略要地）赠给了条顿骑士团，让他们得以在大河左岸扎下根来。这个地方比普鲁士安全，适合移民定居。后来格涅夫发展成一片很有价值的说德语的领地。

梅斯特温二世没有一个活到成年的儿子，并且宣誓守贞，于是波美雷利亚家族到他为止就绝嗣了。他能接受这个前景，但他还是想阻止波美雷利亚公国乃至格涅夫落入他的死敌条顿骑士团之手；他宁愿把波美雷利亚公国分给所有的皮雅斯特亲戚。他在1282年的遗嘱中就是这么规定的。

当条顿骑士们围坐在桌边用餐，互相商议并与很多访客交谈的时候，他们一定考虑过上述情况。但除了商谈之外，他们显然什么都没做。只有商谈和外交。他们的职责是十字军圣战，不是获取基督徒的土地。当然，如果有了更多资源，十字军圣战就能更顺利，但如果他们索要拉契波尔在遗嘱留给他们的土地，就有可能与波兰爆发战争。十字军不应当与基督徒交战（尽管圣地十字军的例子表明他们做得出来），但更重要的是，普鲁士团长不能与自己背后的势力交恶。他们暂时对波美雷利亚没有办法。条顿骑士团必须把力量倾注于东方的战争。

对索多维亚的战争主要是小股力量的交锋。1279年之后条顿骑士团缺乏兵力，不能开展大规模攻势，因为在立窝尼亚的一次大败迫使团长将预备队送往危机四伏的立窝尼亚前线。立窝尼亚团长阵亡了，康拉德·冯·提尔贝格也于同年晚些时候自然死亡，于是大团长哈特曼·冯·黑尔德隆根和代表大会在马尔堡开会，觉得可以趁机将普鲁士和立窝尼亚这两个战区合并，以便更好地协调对叛乱的斯米伽利亚和尚未征服的萨莫吉希亚的进攻。这些作战将再度获得最高的优先权，这意味着此后骑士团只对索多维亚人发动骚扰性袭击。新任普鲁士团长康拉德·冯·福伊希特万格匆匆赶到波罗的海地区，在圣地的经验让他坚信，骑士团的未来是与东北欧的异教徒作战，而不是对抗穆斯林。而且他清楚地看到，就连这种未来也受到了威胁。他的任务并不轻松：敌人似乎无处不在，行踪难测。只要找得到敌人，他就能将其消灭，但找到敌人并不容易。

普鲁士人在攻击埃尔宾的一座被当地人用于避难的磨坊时表现得毫

无信义，于是此后基督徒都不肯投降。福伊希特万格团长率领一支军队来到瓦尔米亚，占领了一座要塞，那里就是后来海尔斯贝格[42]的所在地。普鲁士人在库尔姆发起反击并夺取了一些城堡，烧毁了若干村庄。广大区域成了无人区，双方暂时都没有力量占领这些荒地并在上面定居。

另一方面，波兰人也帮不上什么忙，过去他们曾通过在沃里尼亚作战为骑士团提供了很大帮助，但沃里尼亚此时已陷入近乎完全无序的状态。立陶宛人开始觉得罗斯南部土地已经属于他们了，并在这场卷入了多方势力的争霸战争中投入了大量资源，所以没有派出多少人员去帮助索多维亚人。从1280年的战事中可以看出这场绝望的边境战争的复杂性：加利西亚的列夫一世[43]与鞑靼可汗达成协议，借草原武士之力进攻克拉科夫。波兰南部的皮雅斯特公爵们迎战入侵者，而莱谢克二世公爵和马佐夫舍公爵卡齐米日攻击了列夫一世的后方，率军进入沃里尼亚。此战的教训就是，波兰人必须先管好自己东南方的草原边境，才能将注意力转向东北边境。

当然，这条教训对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同样适用。他们最大的战利品在罗斯而不是在普鲁士的森林里。立陶宛野心勃勃想要占领沃里尼亚，导致最后一群独立的普鲁士异教徒（索多维亚人）处境脆弱，很容易遭到为条顿骑士团效力的普鲁士人的小规模袭击。这些年里十字军的攻击都规模不大，算不上大型攻势，但这些袭击把异教徒拖垮了。

游击战

康拉德·冯·福伊希特万格此前从来没有到过波罗的海地区，且在来了之后也不喜欢这个地方，更不喜欢这里的气候。不过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履行职责，他深思熟虑形成的用以打破军事僵局的计划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他从德意志带来的大批援兵也让骑士们感到满意，不过他没有让这些援兵立刻参战，这让骑士们感到困惑。他审时度势，请大家提意见，免得自己因为对当地情况无知而犯下大错。随后他在埃尔宾召开会议。在所有城堡长官到齐后，他解释了自己奉命执行的新战略：先结束立窝尼亚的叛乱，然后处置普鲁士人的问题。军官们起初对此表示怀疑，但最后他们也得出结论，普鲁士面临的危险并不严重。大会代表随后批准从陆路增援立窝尼亚。在更多部队抵达之前，康拉德团长将普鲁士的作战局限为游击战性质。

在与索多维亚人进行的边境战争中有一位重要人物是马丁·冯·葛林。就连基督徒编年史家也说他是“强盗”，尽管这个词一般只用来形容异教徒。但也有人说他是“好汉”和“大胆的强贼”。此时他年纪已经不小了：

> 这个马丁带着四个德意志人和十一个普鲁士人攻击了索多维亚的某个村庄，杀死或俘获那里的村民。在漫长归途中，他来到一个地方，与朋友坐下来吃饭休息，这时敌人向他们猛扑过来。他们杀死了他的四个德意志战友，其他人则逃跑了，丢下了全部武器和食物。索多维亚人为此感到很高兴。与此同时，马丁愤怒地在树林里搜寻，召回了他幸存的战友。因为他们丢光了武器，他趁敌人睡觉的时候溜过去，偷走了他们的剑、盾牌和长矛。然后他去找藏起来的战友，静悄悄地杀死了能找到的所有敌人。只有一名敌人企图逃跑，被马丁杀死。然后他们收回了原本的战利品和武器以及异教徒带来的东西回家了。

总军务官小康拉德指挥了几次大规模袭击，其中在1280年冬天的一

次袭击特别成功，他们在冰原上深入基督徒军队从没有到过的地方。此时普鲁士有了一位新团长曼戈尔德·冯·施特恩贝格。1280年初，康拉德·冯·福伊希特万格得出结论，把立窝尼亚和普鲁士两个战区合二为一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至少在他领导下不行。他恳求辞去这些职务，但被拒绝了，然后他把普鲁士的工作交给曼戈尔德团长，自己带领三十名骑士乘船去了立窝尼亚。在那里，他在斯米伽利亚指挥了一段时间的作战，然后以不适应北方生活为由再次请求辞职。这一次骑士团高层批准了他的辞呈，立窝尼亚的指挥权也暂时交给曼戈尔德团长。

起初，曼戈尔德和他的前任一样，在索多维亚战线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立陶宛人和索多维亚人大举入侵桑比亚，一连十天恣意劫掠，烧毁了城墙之外的所有定居点和农舍。即便如此，十字军还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尤其是在索多维亚境内的游击战中，他们令当地的原住民贵族接二连三地投降。曼戈尔德团长命令这些人及其家属接受洗礼，然后授予他们特许状，保障他们占有土地与农奴的权利和免税权。原住民普鲁士骑士也享有这些权利。

骑士团的战略显然渐渐把索多维亚人拖垮了。1281年2月，曼戈尔德深入斯克芒塔斯居住的要塞，杀死了150人，男女都有。这次行动不算完全成功，因为斯克芒塔斯伏击了一群落单的骑士团士兵并杀死了塔皮奥[44]的指挥官，这是骑士团中近乎传奇的一位武士。但局势依旧十分明了，条顿骑士团只要下决心投入资源，就没有他们拿不下的要塞，而普鲁士人只能控制森林。无论斯克芒塔斯在游击战中多么有勇有谋，他也无法在这样的状况下取得胜利。

我们对斯克芒塔斯的了解比对其他普鲁士酋长多，因为他曾俘虏了一名年轻骑士，此人后来幸存并讲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这是索多维亚人生活的少数目击者叙述之一。彼得·冯·杜斯堡转述了这个故事：

> 这位骑士名叫路易斯·冯·莱本蔡勒，出身贵族家庭，自幼习武……

> 他被俘后，被五花大绑地押到斯克芒塔斯面前。斯克芒塔斯说自己已经选择路易斯与一位武艺与他差不多的对手对战。这是一场娱乐性质的对决，斯克芒塔斯事后把路易斯留在了自己身边。一天，斯克芒塔斯饮酒作乐，索多维亚贵族照例都聚集在那里。斯克芒塔斯把路易斯带在身边，尽管后者是俘虏，斯克芒塔斯却对他颇为友好。在喝酒的时候，人们吵了起来，一名强大的索多维亚贵族出言不逊，激怒了路易斯。于是路易斯对斯克芒塔斯说："你带我来，就是为了让他这样辱骂我、威胁我吗？"斯克芒塔斯说："对于他这样烦扰你，我很抱歉。如果你有勇气为自己报仇，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站在你这边。"路易斯听到这话，就愤怒地拔剑，当着大家的面砍死了那个索多维亚人。后来斯克芒塔斯扈从中的一个年轻人偷偷放走了路易斯，带他回到骑士团。

不久之后，"黑色"的莱谢克二世率大军进入索多维亚和立陶宛。几周之内，他就将两支异教徒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以至于之后好几年里都无人敢威胁波兰边境。同一年，即1282年，斯克芒塔斯及其追随者放弃了祖先的家园，撤往立陶宛人占领下的罗斯，他们可能去了附近的黑罗斯[45]，但也有可能远行至平斯克或明斯克。

斯克芒塔斯撤离之后，索多维亚的战争就接近尾声了。可能就在这个时候，骑士团在普鲁士的指挥权交到了小康拉德·冯·提尔贝格手中。他在之前的漫长斗争期间担任总军务官。代表大会在阿卡召开，以选出哈特曼·冯·黑尔德隆根的继任者。他是主宰条顿骑士团的图林根"王朝"的最后一人。曼戈尔德团长乘船去圣地投票，但在返回途中死在海上。新任大团长是瑞士人布尔夏德·冯·施万登，他此前从未到过波罗的海地区，因此希望找一个有经验的人在普鲁士指挥，并询问大家的意见。由于大家对小康拉德·冯·提尔贝格的评价都不错，于是施万登向代表大会提名小康拉德，并得到了批准。

普鲁士十字军的终结

1283年夏季，普鲁士十字军落下大幕。小康拉德团长率领大军来到敌人腹地，只有少数索多维亚人进行了抵抗。路易斯·冯·莱本蔡勒安排来自曾对他友好的氏族的1600人向骑士团和平投降，此后这些“新皈依者”带着他们的财产被送往西方，获得了新的土地。次日，康拉德团长攻打了最后一座重要的要塞，迫使其守军投降。

康拉德团长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源去保护如此广袤的地域，并抵挡立陶宛人或罗斯人的进攻，而且他很快要投入兵力去攻打萨莫吉希亚人，于是他把剩余的索多维亚人从其家园转移到普鲁士的其他地方，有的去了波格萨尼亚，有的去了桑比亚。就连斯克芒塔斯也投降了。他现在年事已高，精疲力竭。他得到宽恕，在巴尔加[46]附近获得了一片土地。根据基督徒的见证，他几年之后以虔诚基督徒的身份死去。斯克芒塔斯在同时代人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同时为基督徒和异教徒所仰慕。斯克芒塔斯的英勇事迹主要通过条顿骑士团神父撰写的编年史才得以流传。历史固然由胜利者书写，但也并非总是片面的。

索多维亚从此被荒弃，无人居住。这个部族从历史中销声匿迹，再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实体。这片地区成了林木繁茂的荒原，成为将普鲁士、马佐夫舍、沃里尼亚北部和立陶宛分隔开的大荒原的一部分。这片荒原之前就存在，但四面八方的统治者在它的边缘修建木制要塞作为侦察兵和袭击队伍的基地，他们很快消灭了森林里曾有过的定居点，并侵蚀别人的城堡周边的定居地区。“大荒原”（Grosse Wildnis）变成了令人生畏的障碍。

条顿骑士团的资源不足以支持他们跨过这片荒原发动一场有效的圣战，而波兰和波美雷利亚的乱局也威胁到了骑士团通往德意志的生命

线，有可能让十字军无法在这条路线上安全通行。康拉德团长认为，保障后方比继续东进更重要。后来在1308年，当骑士团有机会占领但泽和波美雷利亚的时候，普鲁士团长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结果，骑士团与波兰发生了长达数十年的冲突，在这期间立陶宛大公巩固了对附近几个罗斯国家的控制，并向加利西亚-沃里尼亚提出主张权。等到骑士团再有机会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讨伐异教徒的时候，双方都变得比以往更强大，也更自信。

---

[1] 桑比亚半岛今天属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位于波罗的海东南沿岸。

[2] 希维托佩尔克二世（1190或1200～1266），波美雷利亚公爵，前文提到的波美雷利亚公爵桑博尔二世的哥哥。他利用皮雅斯特王朝的衰弱和分裂，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与两个弟弟（桑博尔二世和拉契波尔）发生冲突，两个弟弟与条顿骑士团结盟，于是希维托佩尔克二世与异教徒普鲁士人结盟，在普鲁士人的第一次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在教廷调解下议和，不再支持普鲁士异教徒。

[3] 斯米伽利亚是拉脱维亚的一个历史地区，在拉脱维亚南部，有时也包括今天立陶宛的一部分。斯米伽利亚地区的最大城市是叶尔加瓦。

[4] 彼得·冯·杜斯堡（？～晚于1326）是条顿骑士团的神父和编年史家，他的拉丁文作品《普鲁士编年史》描述了13世纪和14世纪初条顿骑士团和普鲁士人的活动。1331～1335年，编年史家尼古拉斯·冯·叶罗欣受大团长委托，将《普鲁士编年史》翻译为中古高地德语。

[5] 立窝尼亚人是一个芬兰-乌戈尔语系的民族，曾生活在今天的拉脱维亚北部和爱沙尼亚西南部，是当地的原住民。他们自己的语言立窝尼亚语于2013年灭绝。2011年，只有约250人自称是立窝尼亚人。

[6] 关于波罗的海原始宗教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比较新的著作有Marija Gimbutas，*The Balts*（Thames & Hudson，London，1963）和Algirdas Greimas，*Of Gods and Men*：*Studies in Lithuanian Mytholog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这两位作者认为波罗的海原始宗教有一系列神祇和精灵。Endre Bojtár，*Foreword to the Past*：*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altic People*（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Budapest，2000）则认为这些神祇和大多数波罗的海民间传说是19世纪的发明，也许可以和现在时髦的新异教和女神崇拜相比拟。对波罗的海原始宗教崇拜的最古老描述，都是原语言，见Wilhelm Mannhardt，*Letto-Prussische Götterlehre*（Lettisch-Literärische Gesellschaft，

Riga，1863）。（作者注）

[7] 虽说不能无中生有，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按照自己的心愿搭建空中楼阁。除了懂得该地区那些小语种的专家，谁能知道那些民族主义者的叙述究竟有多可靠？后来的几个世纪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因为那时波兰人、德意志人和教宗使节写了大量书信、报告和论著，编年史家也编写了质量高得惊人的作品。在19世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开始撰写这个时代的通史，并整理出版原始史料。但遗憾的是，有些政治史著作只不过是论战作品。但在20世纪末，学界开始克服那些最明显的政治偏见，至少能承认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讲述。（作者注）

[8] 易卜拉欣·伊本·雅各布（活跃于961～962）是来自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的犹太人（可能是穆斯林）旅行家，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外交官或间谍。他旅行到西欧和中欧，在罗马拜见过神圣罗马皇帝奥托一世。他的回忆录和其他作品没有完整保存下来，我们只能通过后世的摘录了解。不过他的作品是对波兰最早的可靠描述。他还提到了维京人和北德的一些城堡。另外，他是第一个在文字中提及布拉格及其犹太人社区的作家。

[9] 现代历史学家试图将条顿骑士团定性为中世纪“东进运动”（德意志人向东欧扩张）的先锋，或者德意志帝国扩张政策的先驱，或者纳粹的前身。在冷战时期，有人说整个西方都敌视所有斯拉夫人。事实上，中世纪这轮迁徙更多是德意志骑士与农民受到邀请，在东方土地和平定居（如哈默尔恩的花衣魔笛手的传奇所示）的过程。在欧洲各地，地主和教士都开放森林与沼泽，将其变为农业和畜牧用地。波兰农民和士绅向东迁徙；犹太人和德意志手工匠人与商人建立了一些新城镇。（作者注）

[10] 布拉格的圣道博（约956～997年），捷克语名字是沃伊捷赫，是波希米亚传教士和基督教圣徒。他担任过布拉格主教，并向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普鲁士人传教。他可能还是已知最早的捷克语赞美诗和最早的波兰语赞美诗的作者。他被誉为“第一位普鲁士使徒”，在普鲁士被异教徒杀害。传说波兰的波列斯瓦夫一世（皮雅斯特王朝的第二位公爵、第一位国王）用同等重量的黄金换回了他的遗体。

[11] 库埃尔富尔特的布伦（约974～1009）出生于今天德国的库埃尔富尔特，受到布拉格的圣道博的激励和启发，参加传教工作。他写过圣道博的传记。后来布伦在基辅罗斯和立陶宛边境附近传教时被杀。他被誉为“第二位普鲁士使徒”。

[12] 格涅兹诺在今天波兰的中西部。

[13] 康拉德创建了自己的军事修会：多布任骑士团。他希望能完全控制它。后来多布任骑士团在沃里尼亚作战时被全歼。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接

收了波美雷利亚和波兰的一些地产，但他们对后来东欧的军事远征的贡献微不足道。（作者注）

[14] 即奥利瓦的克里斯蒂安，或者叫普鲁士的克里斯蒂安（约1180～1245），普鲁士的第一位基督教主教。他出生于波美拉尼亚，受教宗委托向普鲁士异教徒传教，以维斯瓦河以西的奥利瓦修道院为基地，并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被任命为第一任普鲁士主教。他与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配合，向普鲁士人发动十字军东征，但失败了，所以向条顿骑士团求助。克里斯蒂安还创建了多布任骑士团，以帮助康拉德公爵保卫马佐夫舍、抵抗普鲁士人。多布任骑士团最初由15名德意志骑士组成，规则类似立窝尼亚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多布任骑士团战绩不佳，而且规模很小（最多时仅35名骑士），在1235年大部分人加入了条顿骑士团。

[15] 尼古拉斯·冯·叶罗欣（约1290～1341）是条顿骑士团的神父和编年史家，将一部拉丁文的布拉格的圣道博传记翻译成中古高地德语，还翻译和扩写了彼得·冯·杜斯堡的《普鲁士编年史》。

[16] 根据《马太福音》，天使告诉约瑟，希律王要杀死当地所有婴儿，于是约瑟带着玛利亚和婴儿耶稣逃往埃及。这个故事是很多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

[17] 今天在波兰北部的滨海省，波兰语名字是克维曾。

[18] 原住民贵族很少有充足的收入能让他们当全职军人和行政管理者。条顿骑士团也不想建立一个世俗骑士的阶级，因为那样会分散骑士团潜在的收入。大团长很少分封土地给别人，即便分封出去的土地面积也很小，那些封地主要在库尔姆，属于波兰骑士。大团长指派条顿骑士团成员训练和领导原住民部队。这些骑士团成员被称为地方长官，和原住民部队生活在一起，所以通常能讲流利的普鲁士语，也很熟悉普鲁士人的习俗。（作者注）

[19] 明道加斯承诺把萨莫吉希亚给立窝尼亚团长，但他这么做其实很轻松，因为萨莫吉希亚人并不承认明道加斯是他们的统治者。（作者注）

[20] 萨莫吉希亚（字面意思：低地）是立陶宛五大历史地区之一，位于立陶宛西北部，最大城市为希奥利艾。该地区有漫长且独立的文化史。

[21] 在今天波兰的东北部，波兰语名字是巴尔托希采。

[22] 波兰语名字是维纳河，流经波兰和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

[23] 赫尔库斯·蒙特是普鲁士人反抗条顿骑士团和北方十字军东征的最著名领袖。他幼年时被条顿骑士团劫持为人质，送到德意志受教育，所以熟悉德意

志人的军事。1260年他发动反叛，坚持到1274年，取得很多胜利，但最后被俘获并绞死。后来苏联统治下的立陶宛人把蒙特奉为自己的英雄和自由斗士。

[24] 拜巴尔（1223/1228～1277）是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伟大统治者和重要军事家。他原本是库曼突厥人出身的奴隶，后成为埃及的重要将领和苏丹。1249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入侵埃及。1250年，拜巴尔领导马穆鲁克军队打败并俘获路易九世。1260年，拜巴尔又在阿音札鲁特战役中打败西征的蒙古军队，终结了蒙古人在中东的扩张。他巩固了马穆鲁克王朝，并为彻底消灭中东的十字军国家铺平了道路。他的名字在突厥语中的意思是豹子。

[25] 图林根方伯康拉德（约1206～1240）是条顿骑士团的第五任大团长，也是第一位加入该骑士团的重要贵族。他是前文说到的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的儿子、路德维希四世的弟弟。

[26] 在今天的波兰北部，波兰语名字是杰日贡。

[27] 杜纳堡就是今天拉脱维亚的第二大城市陶格夫匹尔斯，与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接壤。

[28] 特莱德尼斯（？～1281或1282）是13世纪立陶宛重要性仅次于明道加斯的一位大公。明道加斯于1263年遇刺身亡后立陶宛陷入混乱，是特莱德尼斯巩固了立陶宛，让它作为异教徒国家又维持了一百年。特莱德尼斯是坚定的反德人士，多次打败立窝尼亚骑士团，杀死了三位立窝尼亚团长。他还是第一位自然死亡的立陶宛大公，他之前的立陶宛统治者都是遇刺或战死的。

[29] 拉格尼特是德语名字，它在今天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位于涅曼河畔，与立陶宛隔河相望，俄语名字是涅曼。

[30] 拉比奥是德语名字，它今天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中部，位于加里宁格勒湾以南，俄语名字是波列斯克。

[31] 格罗德诺今天在白俄罗斯境内，位于涅曼河畔，邻近波兰和立陶宛，是白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

[32] 今天叫奥索布拉哈河，流经捷克和波兰境内。

[33] 扬·德乌戈什（1415～1480）是波兰的神父、编年史家、外交官和军人，被誉为波兰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著有《波兰史》。他在克拉科夫大学受教育，曾受波兰国王委托出使罗马教廷、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等国，并在十三年战争（1454～1466）期间参与波兰国王与条顿骑士团的谈判。他还担任过王太子的教师。

[34] 库亚维地区在今天波兰的中北部，位于维斯瓦河左岸。

[35] 埃尔宾是德语名字，今天在波兰北部，波兰语名字是埃尔布隆格。

[36] 今天波兰语的名字是马尔堡，在波兰北部。

[37] 严格来讲，鲁道夫一世是德意志国王，未被加冕为帝，所以不是神圣罗马皇帝。

[38] 大波兰是位于今天波兰中西部的历史地区，首府为波兹南。它是中世纪早期波兰的核心，通常称为“波兰的摇篮”。与之相对的“小波兰”地区在今日波兰的东南部，主要城市为克拉科夫和利沃夫。

[39] 他是邀请条顿骑士团到普鲁士的那位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的次子。

[40] 他的绰号“黑色”可能是指他的头发颜色。

[41] 即希维托佩尔克二世的儿子。

[42] 海尔斯贝格是德语名字，即今天波兰的瓦尔米亚地区利兹巴克。

[43] 加利西亚的列夫一世（约1228～约1301）是基辅大公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国王。他的外祖父是前文讲到的大胆的姆斯季斯拉夫（在迦勒迦河畔战役败给蒙古人）。列夫一世的妻子是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的女儿。列夫一世的父亲亲西方，但他与蒙古人合作，入侵波兰，夺得一些领土。他死时，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国家达到巅峰状态。

[44] 这是德语名字，即今天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近卫军城。

[45] 黑罗斯，或称黑罗塞尼亚，是东欧的一个历史地区，大致在今天白俄罗斯的西部。

[46] 巴尔加是条顿骑士团的一座城堡，位于今天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境内，1239年开始建造。城堡所在的山曾是古普鲁士人一座山地要塞的原址，后成为条顿骑士团的重要据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这里沦为战场，城堡受到严重破坏。

六 立窝尼亚的十字军东征

异教与东正教

条顿骑士团最初抵达普鲁士之时，十字军运动已经在他们北方的波罗的海东岸进行了三十年。渐渐地，这场“立窝尼亚十字军”的重点从对抗异教变成了针对东正教的攻防战。这场冲突，或者说这一系列冲突，很好地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复杂性：个人和群体能够同时为多个目标奋斗，并不时地将其中一个目标置于更优先的地位，或者抛弃旧政策，为新的目标腾出空间。

1200年之前第一批入侵立窝尼亚的十字军当中有很多是来自哥得兰岛[1]的商人，他们希望消灭当地的海盗和强盗巢穴。但他们应当都没想到，这些小规模战事会将东正教势力卷入进来。不久前爱沙尼亚和库尔兰海盗对今天瑞典南部的袭掠，以及海盗对取道芬兰湾去诺夫哥罗德的商船的袭击，让哥得兰岛商人愤怒不已。一个世纪之后，这些商人仍然在为海路和陆路商贸的安全而担忧，不过此时海盗和强盗往往已经得到罗斯诸邦的保护，而这些国家又对西方商人的安全通行权做出了保证。到1300年，其中一些罗斯国家已经由立陶宛王公统治，他们对十字军的敌视在当地各城市的居民当中赢得了相当多的支持。

在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到立窝尼亚之前，亦即不到公元1200年的时候，东正教王公对那里的异教徒部落享有松散的主权，其中对沿海立窝尼亚人的主权尤其松散，因为他们太遥远，难以掌控；而对更遥远的库尔兰人和航海的爱沙尼亚人，东正教王公几乎没有任何控制

权。与之相比，东正教王公可以轻松地派兵向道加瓦河沿岸的拉脱维亚人、最靠近普斯科夫的爱沙尼亚人和芬兰湾东岸的楚德人[2]收缴贡税。但在收完税之后，东正教军队就迅速打道回府，没有在当地留下总督和教士来代表他们的权威，直到下一次来收税。东正教王公也很少试图向异教徒传教。显然，与基辅罗斯以北异教徒和草原异教徒打交道的惨痛经历让东正教统治者和教士都认为，强行传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且，他们似乎认为，即便和平传教，结果也不过是出现一种异化变质的基督教，这就会对罗斯本土的真正信徒构成威胁。

罗斯人觉得异教徒很坏，但罗马天主教徒更坏。他们相信教宗作为教会之首的教义是非常危险的异端思想，北方城市的罗斯王公和商人因此对西方教士的迫近感到惊恐。由于北方罗斯诸邦有世俗和神学的理由反对德意志人征服立窝尼亚的企图，他们不时致力于驱逐十字军。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波洛茨克[3]有时派遣军队，有时鼓励反叛者并为他们提供武装，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主要考虑的还是与德意志商人通商的实际需求。德意志人和罗斯人的关系既不是始终敌对，也不总是融洽友好。

立窝尼亚异教徒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独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利用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有时利用得十分巧妙——异教徒的部落长老绝不是那种坐视大难临头的角色。异教徒的第二个目标是运用大国的力量消灭或者重创自己的传统竞争对手。这很难做到，因为盟友很容易变成主宰者。所以，弱小群体与十字军结盟，目的主要是报复对手和方便自己扩张；而传统的强大部落敌对十字军则是为了维持现状。原住民部落在为古老的宿怨而厮杀的时候，遵循的是特别残暴的规则。

传教士与十字军

12世纪，除了在圣地、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展的十字军圣战以及西方不时与拜占庭发生的争执之外，罗马天主教世界还通过其他很多方式得到了扩张。天主教社会通常会向异教徒土地派遣传教士，如果传教士失败，就对其施加经济压力和武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发生战争，神学分歧只排到第四位的理由，位列有王朝争霸的野心、个人的贪婪和消灭异教徒海盗与强盗巢穴的需求之后。因此，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民众对圣战的支持程度取决于潜在志愿者和捐赠者对圣战目标的认识。封臣在受到领主召唤的时候必须为其效力。亲戚一般会帮助希望参加十字军的人，为其提供装备和路费，尤其是当总开销还算合理的时候；雇佣兵总是期盼工作，只要其内容看上去不会过于危险。另外，更愿意在圣地履行自己的圣战誓言的人会计算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受到的风险有多大，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以及当时有没有其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所以人们往往更愿意参加波罗的海地区的十字军。最后，有些德意志贵族参加十字军是为了避开不时爆发的内战；所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内乱有时不利于十字军的招募工作，有时却反而有利。

简而言之，参加十字军远征的动机五花八门，世俗的动机往往与理想主义和宗教热忱混合在一起。中世纪的公众和那些没有从十字军运动中捞到好处的贵族与教士像某些现代人一样，很擅长捕捉十字军的虚伪：即便在中世纪，人们也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相比之下，传教活动得到了更广泛的热烈支持。虽然支持传教的教士可能会被怀疑有追名逐利和扩张自己教区的企图，但传教得来的好处能为更广泛的人群所分享，风险也更小。捐钱给传教事业的人会得到尊崇，也许死后灵魂能得救，而那些去异教徒当中传教的人要么能获得名望和荣耀，要么能成为光荣的殉道者。

通常的观点认为，波罗的海地区的传教活动是由德意志人开展的，但当时也有瑞典和丹麦的传教士。实际上，斯堪的纳维亚教士在波罗的海的传教进展一直领先于德意志僧侣，直到12世纪末哥得兰岛上维斯比的商人社区开放了道加瓦河口的立窝尼亚市场。德意志商人在来到道加瓦河的时候也带了他们的教士随行。1180年，其中一位教士，奥斯定会修士迈因哈德留在了当地的立窝尼亚人（立窝尼亚地区因他们得名）部落中传教。

中世纪最优秀的编年史家之一立窝尼亚的海因里希[4]记载了迈因哈德的故事和随后五十年的传教历史。他的史书扣人心弦地讲述了传教士和十字军战胜异教徒的怀疑与抵抗的英雄故事。读者若是仔细看字里行间，会发现这位编年史家还批评了基督徒作为个人和群体的许多缺陷。[5]

迈因哈德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以至于教宗任命他为于克斯屈尔主教。于克斯屈尔是他的小教堂所在的岛屿。他的成功引起了异教祭司的愤怒，他们担心外国军队会紧跟着传教士而来，于是大肆阻挠迈因哈德的活动。祭司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立窝尼亚人及其在上游的邻居拉脱维亚人已经遇到了前来收税的罗斯官员，而且立窝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的民间传说里无疑有关于维京劫掠者和旅行者的故事。原始社会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方式往往迥异，他们有时既对外邦人热情好客，同时也怀疑外国人全都不怀好意。

迈因哈德建造了两座要塞以保护他的一小群信徒抵抗立窝尼亚人的袭击，并用雇佣兵在这些要塞驻防。德意志人之所以没有早点派志愿者来保护这个小小的传教团体，主要是因为韦尔夫家族和霍亨施陶芬家族争夺帝位的冲突。1198年亨利六世皇帝驾崩后，这种冲突愈演愈烈。正是在这种喧嚣混乱的局面中，立窝尼亚的传教活动演变成十字军冒险。许多骑士和教士后来到立窝尼亚参加十字军，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躲避德意志国内的混战，因为身为十字军战士，他们享有人身和财产免被侵占

的豁免权，不管当时主宰德意志的是哪一派。

于是，在来自德意志本土的有限帮助下，迈因哈德得到原住民缴纳什一税和纳贡的承诺，并建造了两座小型石制城堡。但在需要给工人和雇佣兵付钱的时候，很多原住民拒绝兑现承诺，并嘲笑囊中羞涩的主教竟然如此容易上当。迈因哈德似乎以基督徒的坚毅接受了这种局面，但他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他对此做何打算。但他的继任者就没有那么耐心和愿意宽恕了。

1197年，汉堡—不来梅大主教启程去圣地参加十字军东征之前，任命洛库姆[6]的熙笃会修道院院长贝特霍尔德为于克斯屈尔主教。贝特霍尔德是在易北河沿岸沼泽地殖民的一个家臣家族的幼子，对萨克森的很多贵族家族及当地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都很熟悉。

起初，贝特霍尔德努力与当地部落酋长结交，款待他们并向他们馈赠礼物，但一次为墓地祝圣的不愉快经历让他改变了策略。异教徒纵火焚烧他的教堂，并企图在他逃上船的时候杀死他，然后又在河上对他穷追不舍。贝特霍尔德逃到哥得兰岛，然后去了萨克森，写了一封详细的信给教宗，请求后者允许他率领一支军队去讨伐异教徒。教宗同意了他“为所有拿起武器讨伐奸诈的立窝尼亚人的战士赦免罪孽”的请求，于是贝特霍尔德在德意志北部的乡村来回穿梭，鼓动十字军圣战。

贝特霍尔德于1198年7月率领一支由萨克森人和哥得兰岛商人组成的军队返回立窝尼亚。立窝尼亚人集中力量对抗基督徒，他们虽然不愿意集体接受洗礼，但允许贝特霍尔德留下并强迫他的教民保持忠诚，不过他们只允许他说服别人信基督，而不准他用武力强迫别人接受新信仰。这对贝特霍尔德来说还不够。原住民拒绝按他的要求交出人质，还杀死了好几个出来搜粮的德意志人，于是贝特霍尔德命令进攻。他的军队规模不大，但装备精良，不仅有重骑兵（他们的高头大马可以轻易地撞开拦路的波罗的海本地矮种马），还有装备弩弓、长枪、钩刀和戟，

身穿铁甲和皮甲的步兵。而与十字军骑士相比，立窝尼亚民兵简直手无寸铁，他们的人数也不是很多，还拥有发现形势不对便扭头就跑的军事传统。如西方人的谚语所说，审慎算得上勇气的一大半。

很讽刺的是，基督徒那边差不多唯一一个丢掉性命的人就是贝特霍尔德自己。尽管他的萨克森骑士迅速击溃了异教徒，贝特霍尔德的坐骑却受到惊吓，带着他闯进了沙丘之间的敌群。救援者还没来得及赶过去，他便已被杀死。为报复贝特霍尔德之死，十字军战士大肆杀戮，在城堡留下了小股驻军，然后乘船回家了。但是十字军留下的驻军实在太少，于是异教徒故意当着他们的面在道加瓦河象征性地洗掉基督教洗礼留下的痕迹，然后围攻城堡，令僧侣无法下地干活。立窝尼亚人发出警告，扬言杀死所有在复活节后还留在当地的基督教教士，于是教士们胆战心惊地逃回了萨克森。

第三位主教阿尔伯特·冯·布克斯赫夫登从萨克森带来了一支大军，强迫立窝尼亚人成为基督徒，并在道加瓦河畔的里加建立了一座城市。几年后，他组织的十字军战胜了拉脱维亚人，深入北方和东方的爱沙尼亚土地，并占领了道加瓦河以南人烟稀少的地带和沿着海岸线往南的地区。

尽管几乎每年夏季都有数量充足的十字军战士前来保卫基督徒前哨，甚至发动攻势，但这些兵力显然还不足以征服腹地的异教徒。而在漫长的冬季里，这些十字军也不能留下来参与防御。阿尔伯特主教的第一个想法是把最显赫的原住民长老培养成一个骑士阶层。他在这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原住民长老当中很少有人拥有足够的收入来筹措适当的装备。考波[7]和另外几位长老在立窝尼亚很有地位，考波甚至去罗马拜见了教宗，“库尔兰诸王”在当地也长年占据显要地位。阿尔伯特的第二个计划是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分配税金。他允许这一小群德意志骑士分享主教区的收入，而不是指望他们依赖自己土地的产出。[8]有些德

意志人娶了原住民贵族女子。渐渐地，一些原住民被德意志人吸纳。但德意志骑士的数量很少，主教也不能把自己的更多税金分发出去，因为那样就会危及他自己和他的教士们的微薄收入。他的第三个计划是组建一个新的军事修会，即宝剑骑士团。宝剑骑士团提供驻防力量，在漫长冬季里守住之前征服的成果，他们的专业军事技能也提高了仅在夏天前来的十字军的战斗力。

所以，13世纪在立窝尼亚开展十字军圣战的军队由多股力量组成：宝剑骑士团、主教们的封臣、里加和其他城镇的民兵、原住民民兵，以及到访的十字军。原住民部队有时被组织成穿制服的步兵，在他们自己的旗帜下作战。这些原住民部队在边境城堡轮流守卫，警戒敌人的侵袭。在战斗中，他们通常在两翼作战，不同部落被分隔得很远，免得他们误以为对方是敌人，或者在激战正酣时突然决定向传统的竞争对手报复。在胜算很大的时候，原住民部队打得不错，而一旦战局不利，他们就匆匆逃走，把身披重甲的德意志人抛弃在战场上。原住民骑兵执行侦察和袭掠任务；他们受到的监管较少，比行动迟缓的骑士和步兵有更多机会烧杀抢掠。夏季从德意志来的很多志愿者属于市民阶级，他们有钱买装备，能够骑马作战。总的来讲，立窝尼亚十字军和圣地的十字军差别很大，甚至与普鲁士的十字军也不大一样。

在阿尔伯特主教将自己的教会迁往里加后，这座城市便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罗斯商人顺道加瓦河而下，到里加出售蜂蜡和毛皮，德意志人则溯流而上直到波洛茨克出售布匹和铁器。这给阿尔伯特的政策增加了更多变数。东正教会在罗斯北部人烟稀少的森林占据主宰地位，那些罗斯王公的实际财富虽远不及他们的头衔那样显赫，但他们的土地广袤，田地和森林富饶，几条大河沿岸的商业城市繁荣昌盛，而且他们骄傲地认为，正是他们的与世隔绝使他们避开了罗马天主教世界的诱惑和腐败。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和波洛茨克的罗斯大公们各自都曾试图以援助自己臣民的名义将阿尔伯特主教逐出立窝尼亚，在这些危机期间只

有宝剑骑士团能挽救主教，他们还曾在企图成为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之主的丹麦国王面前保住了主教的户地[9]。但宝剑骑士团自称直接效忠于教宗和皇帝，拒绝当主教的封臣。

后来阿尔伯特主教把新征服土地的三分之一给了宝剑骑士团，但他对此很不情愿，并曾多次试图掌控他们。当主教与宝剑骑士团的激烈争执开始威胁到十字军事业的时候，教宗派特使摩德纳的古列尔莫来解决纠纷。最后，主教不得不承认宝剑骑士团的独立性，把自己剩余土地的很大一部分封给了四名臣属于他的高级教士、两名修道院院长和其他教士们。等他向自己的亲戚都赠送了土地之后，他手头上剩余的资源便不足以维持一支成规模的主教军队了。阿尔伯特主教也不能完全依赖原住民民兵，尽管后者很愿意攻击他们的传统竞争对手。他需要地方长官，即懂得原住民语言和风俗的经验丰富的武士，以向民兵传授西方战术并领导他们作战，但只有宝剑骑士团拥有愿意在原住民当中生活的骑士，也只有宝剑骑士团愿意接受较低廉的酬劳来执行这项任务（对野心勃勃的世俗骑士来说，清贫、贞洁和服从几乎毫无吸引力）。于是宝剑骑士团成了立窝尼亚十字军的领导者，因为十字军不在场的时候他们的军队不可或缺，而且他们的骑士有办法把原住民军队组织起来。

宝剑骑士团有长处，也有短处。他们最大的短处在于，骑士团需要在德意志拥有更多修道院。他们在德意志缺少可作为据点的修道院，所以很难长时间地维持招募新人的行动，也很难从信徒那里获得捐赠。修道院及其土地也有助于缓解他们长期的财政危机。其次，宝剑骑士团在立窝尼亚获得的税金和他们自己土地的收入不足以招募足够的雇佣兵来增强他们由骑士与披甲战士组成的武装力量。长期的财政困难迫使宝剑骑士团扩张领土，冀此获得更多“新皈依者”，并让他们缴纳贡金以为骑士团提供所需的资源，从而维持能与敌人匹敌的军力。但这导致他们与丹麦国王为争夺爱沙尼亚发生了冲突。与此同时，他们还和南方最重要的异教徒立陶宛人，以及罗斯人尤其是诺夫哥罗德的罗斯人起了冲突。

宝剑骑士团的末日

宝剑骑士团于1236年遭受的军事灾难是始料未及的。近几年来，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人力不足以完成使命。他们不敢给原住民增加负担，因为原住民在征服战争期间已经损失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财产。所以，宝剑骑士团的军官相信，增加收入从而供养骑士、雇佣兵和神父的最好办法是在德意志获取地产，但他们当然没办法立刻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获得庄园和医院，并且为实现这一点他们肯定需要强大恩主的庇护。1231年，团长福尔克温[10]寻求将宝剑骑士团与条顿骑士团合并，从而解决面前的经济和政治难题。他希望掌握丰富资源的条顿骑士团能提供保卫立窝尼亚所需的人力和金钱，而条顿骑士团的纪律性也能复兴宝剑骑士团的修道院，至于条顿骑士团与教宗格列高利九世的良好关系还能帮助解决宝剑骑士团与里加主教的冲突。更重要的是，福尔克温与摩德纳的古列尔莫派来代理他的教会官员发生了严重矛盾，因为后者相信只要得到这个代理职位，他就能在教会飞黄腾达。

条顿骑士团的代表大会在马尔堡召开，他们决定暂不回应宝剑骑士团的合并提议，但合并的想法并非不切实际。条顿骑士团在教廷和皇帝宫廷经常与宝剑骑士团交流经验和想法，他们从中可能学到的比他们能教给对方的要多。宝剑骑士团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经验更丰富，因为他们在那里的活动比条顿骑士团首次派遣部队常驻该地区要早大约二十五年。

赫尔曼·冯·萨尔察派遣两名城堡长官从德意志去立窝尼亚实地考察。他们在那里度过了1235～1236年的冬天，并在年度例会上报告了自己的发现。这次例会的时间一定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与大团长参加在马尔堡为伊丽莎白[11]封圣的仪式不久之后。这份报告的结论非常负面，

以至于例会没有对其进行后续讨论。除了上文讲到的政治问题外，宝剑骑士团的修道院生活远远达不到条顿骑士团的标准，而且宝剑骑士团要求在合并之后的新骑士团里拥有自主权，所以条顿骑士团无法改革他们的修道院。

不久之后，宝剑骑士团的末日就降临了。有人在教宗面前指控他们贪婪且残酷，令教宗切断了他们生存所需的金钱和十字军战士来源。为了摆脱困局，福尔克温团长绝望地率军进入南方的异教徒地区。摩德纳的古列尔莫安排他与教宗和解，但为时已晚。

如果福尔克温团长避免进行不必要的冒险，宝剑骑士团或许还可以熬过财政危机。但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一群来自荷尔斯泰因的十字军战士于1236年夏季姗姗来迟，他们的人数不足以保证胜利，却还是要求参战。福尔克温团长不想让客人失望，于是勉强发动了对萨莫吉希亚的袭击。萨莫吉希亚是立陶宛的一部分，在立窝尼亚和普鲁士之间。也许他之前进入立陶宛的几次远征同样风险很大，但这一次厄运终于降临。福尔克温率领十字军渡过苏勒河（立陶宛语名字是希奥利艾河），攻击萨莫吉希亚人定居点。对方的抵抗很轻微，因为原住民武士选择放弃家园，并在十字军北上返回途中渡过苏勒河的时候伏击他们。当十字军在撤退过程中抵达渡口时，他们发现一小群斗志坚决的异教徒武士封锁了渡口。福尔克温命令十字军战士下马，蹚水过河。他警示道，若不赶紧过河，等异教徒得到增援的时候再一边战斗一边过河就会更加困难。但荷尔斯泰因骑士拒绝徒步作战。福尔克温没办法强制这些客人，于是十字军就地安营扎寨过夜。次日，十字军蹚水过河的时候，发现高地立陶宛人的主要酋长明道加斯亲自带领或者派遣了一大群武士前来增援萨莫吉希亚人。在随后的战斗中，福尔克温和宝剑骑士团的半数成员阵亡，大多数十字军也战死了。为骑士团效力的原住民民兵在战斗初期就作鸟兽散。他们没有沉重盔甲的拖累，大多渡过了河，趁着立陶宛人忙于屠戮宝剑骑士团的时候向北逃跑。

立陶宛

从事后回顾可以看出，占领毗邻立陶宛的边境地带的前景对宝剑骑士团的诱惑实在太大了。立陶宛人看上去和其他原住民民族大同小异，十字军战士可能没想到他们居然有能力团结起来组织抵抗。立陶宛人和普鲁士人一样有单独的语言和文化，分成可能多达二十个群体，由氏族长老领导。但把立陶宛人和普鲁士人相提并论很有误导性，原因如下。首先，立陶宛人实际上只有两个主要群体，高地人（奥克施泰提亚人）和涅曼河以北的低地人（萨莫吉希亚人）。其次，有一个家族，即明道加斯家族，已经在立陶宛高地取得了主宰地位，而他们获得这一地位的时间大约与战胜福尔克温同时。他很快开始采用令人垂涎的大公头衔。再次，立陶宛人经常联手向其邻人发动恐怖的袭击，这一传统可谓历史悠久。任何军阀都能把这种传统发扬光大，而明道加斯不是普通的军阀。他尽管很残忍，却是个才华横溢的暴发户。他懂得如何踩着其他垮台国家的废墟增强自身实力。

十字军和蒙古人给了立陶宛人一个教训：为了独立，民族必须团结。这是一个容易理解的概念，但只有明道加斯懂得从这里可以得出的推论是什么：只有通过“现代化”的专制统治，才能实现民族团结。没过多久，他就镇压了国内的反对派，并率领曾属于他对手的军队穿过立窝尼亚、罗斯、沃里尼亚和普沃茨克熊熊燃烧的村庄。我们可以说：“在一起祈祷的家庭，就能团结在一起。”

除了立陶宛人的军国主义倾向（不是只有异教才有这种思想）之外，立陶宛对东正教的罗斯和罗马天主教的波兰骑士都不构成威胁。立陶宛的异教祭司不主动传教，他们的信仰体系也很难说比同时代罗马天主教世界的基层社会更迷信。十字军战士也经常相信占星术、魔法和巫

术。西方的一些宗教崇拜形式其实基于基督教之前欧洲各地的原始宗教的元素，还有一些则得到了最睿智、受过最高水平教育的哲学家和教士的认可。（弗里德里希二世作为统治者，思想高度世俗化，以至于他的敌人斥责他是敌基督的工具，甚至是魔鬼。他喜欢和赞助占星术。）异教徒很少执行人祭，不过他们偶尔会把自己很重视的敌人俘虏活活烧死。一夫多妻在此时已经很罕见了。他们在战斗中的凶残表现和基督徒也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们更喜欢打了就跑的快速突袭，而不是在战场上正面对垒；各方都认为平民是正当的攻击目标。简而言之，立陶宛的王公和波雅尔[12]如果皈依基督教的话，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不需要做很多改变，所以传教士有理由相信，只要价钱合适，异教徒领袖也会愿意成为基督徒。

此刻，十字军在制订计划时几乎不用考虑立陶宛人。位于高地的原始立陶宛国家距离十字军很远，组织也很不完备，更何况等十字军再次接近立陶宛边境的时候，他们的国家说不定早已经瓦解了。但明道加斯将会证明，基督徒的这些算计是错误的。他会利用罗斯的政治危机，让自己的追随者攻击虚弱的罗斯国家从而发财致富。只要让武士阶层发财，他就配得上大公这个头衔了。几年之后，立陶宛就会成为得到公认的正式国家。

条顿骑士团从宝剑骑士团那里吸取的教训十分明确。教廷的权力很大，而且即便教廷犯了错误，人们也不能去挑战它。宝剑骑士团曾依赖皇帝的帮助，但皇帝辜负了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教宗和皇帝会再次发生争执，而在立窝尼亚继承了宝剑骑士团事业的条顿骑士团觉得，有必要在每一次教宗与皇帝发生纠纷的时候都重新分析和评估局势。这在条顿骑士团内部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是最后他们选择在教宗与皇帝之间尽量保持中立，对骑士团的恩主和领主都至少维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

第二个教训是条顿骑士团从文德十字军东征（1147年）之后的漫长战争中吸取到的：向异教徒民族传教的最好办法是借助原住民领主的帮助；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原住民领主，就扶植一个能干且愿意合作的人，帮助他成为封建领主，让他在外国军事力量和顾问建设的支持下统治新近成为基督徒的人民。原住民领主如果足够精明，就能运用基督教会来对付贪婪的邻居，让自己相对独立和强大。大多数基督徒都能接受这一方案，因为他们知道联姻能让人以比战争更稳妥、更廉价、更不具风险的方式得到土地。条顿骑士也完全可以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只要这不会让他们失去自己花费大量鲜血和金钱征服的土地。

条顿骑士团吸取到的第三个教训，至少在这一代人当中不会被遗忘：宝剑骑士团若不觊觎爱沙尼亚，就不会麻烦缠身。条顿骑士团尽可能避免与强大的基督徒邻居发生领土争端。这不是说当某位公爵向他们索要领土或者要求征收新税的时候他们会轻易妥协，但他们会请中立的第三方、特别是教宗特使来仲裁，并接受仲裁的结果，无论其对骑士团是否有利。他们就是这样避免了与基督徒之间的许多潜在的武装冲突。

条顿骑士团

当大团长赫尔曼·冯·萨尔察得知宝剑骑士团战败的噩耗时，他正在维也纳与皇帝在一起。但他有公务在身，必须南下去意大利，而不是北上去德意志的马尔堡，骑士团正在那里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如何回应宝剑骑士团的紧急求救。萨尔察让两名宝剑骑士团使者去找条顿骑士团的代表大会，后者正在讨论，但没能做出决策。最后，骑士团会议请求赫尔曼·冯·萨尔察在维也纳召开的下一次会议上裁决此事。这次会议一定很壮观，赫尔曼·冯·萨尔察和赫尔曼·巴尔克都在场，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在城里。代表大会此次仍然没有做出决议，于是他们派遣代表团去见格列高利九世。格列高利九世此时正在位于罗马北面山区的教宗疗养地维泰博，在那里，赫尔曼·冯·萨尔察和宝剑骑士团的使者向教宗呈送请愿书，请求允许将宝剑骑士团及其全部土地纳入条顿骑士团。教宗与大团长进行了密谈，随后召唤了两名宝剑骑士团使者和几名见证人。他命令两名宝剑骑士团使者跪下，解除了他们之前的所有誓言，简要解释了条顿骑士团的规矩，问他们是否愿意遵守。他们回答愿意，教宗的仆人帮他们脱掉了旧披风，给他们换上了白底黑十字的新披风。现在他们和他们的所有兄弟都隶属于条顿骑士团了。

两名使者对仪式之神速都感到震惊，赶紧向大团长询问宝剑骑士团与条顿骑士团合并的条件是什么。大团长说合并是无条件的，爱沙尼亚必须归还丹麦。两名使者对此颇为愤恨。虽然他们很失望，但他们还是遵守了服从的誓言。宣布两个骑士团合并的教廷诏书于1237年5月12日颁布：

> 因为我们最看重的是传播天主教信仰，我们希望宝剑骑士团团长及其兄弟的虔诚请求能够达成预期的效果，上帝能让条顿骑士团的兄弟在立窝尼亚找寻到勇敢的人……所以我们决定，宝剑骑士团团长及其兄弟以及他们的全部财产，从此与条顿骑士团合并。

次日，格列高利九世写信给他在波罗的海的特使摩德纳的古列尔莫，让他开启瓦尔德马二世国王与条顿骑士团之间的谈判，以解决关于爱沙尼亚的争端。6月，骑士团在马尔堡召开会议，与会代表投票决定派遣60名骑士（加上相应的军士等就是约650人）立刻前往立窝尼亚，并让赫尔曼·巴尔克负责该地区。赫尔曼从德意志北部的若干修道院集合了所需的骑士，他们都懂宝剑骑士团和立窝尼亚的大多数世俗骑士与市民说的低地德语。他用皇帝提供的500马克为部下提供装备，然后抢在冬季海路中断之前带领他们乘船从吕贝克航向里加。

这批援军挽救了立窝尼亚十字军。赫尔曼·巴尔克将骑士分配到各处城堡，让他们了解当地乡村、原住民和敌人的情况。1238年，在斯坦斯比[13]，他将爱沙尼亚还给瓦尔德马二世国王，于是国王成为条顿骑士团的盟友。

宝剑骑士团最重要的战果就这样被轻易拱手让出，这让宝剑骑士团幸存的骑士最害怕的噩梦成了现实，他们离开了立窝尼亚南部按照条顿骑士团规矩开展改革的修道院，来到罗斯边境的修道院。这给赫尔曼·巴尔克制造了很大麻烦。他乘船前往丹麦，然后匆匆赶往意大利，向赫尔曼·冯·萨尔察和格列高利九世报告了宝剑骑士不服从他管教的问题，但几乎未受理睬，因为此时皇帝与教宗的关系已极其恶劣，他们都没时间关心遥远而无足轻重的边疆的问题。不久之后，赫尔曼·冯·萨尔察在萨莱诺去世。这对教会和国家的温和派而言都是沉重的打击，他们仍心存侥幸，希望立窝尼亚的问题即便不能和平解决，至少也应尽可能搁置下去，不致公开冲突，那样也许有时间等待上帝创造奇迹，而赫尔曼·冯·萨尔察原本是少数在上帝启示下有机会创造奇迹的人之一。

与诺夫哥罗德的冲突

在赫尔曼·巴尔克抵达立窝尼亚之前，那里的十字军运动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一连串事件似乎使得整个东正教世界都有可能皈依天主教。

自11世纪后期突厥人突然入侵小亚细亚并击溃拜占庭军队以来，东正教就处于守势。之所以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因为拜占庭帝国濒临崩溃。尽管十字军重创了突厥军队，缓解了君士坦丁堡受到的直接压力，但他们随后就继续前往耶路撒冷，而不是留下来彻底消灭距离君士坦丁堡最近的穆斯林的威胁。突厥人后来恢复元气，甚至比之前更强大，而在同一时期，拜占庭人和西方人之间则猜忌日甚。这种互相之间的畏惧和怨恨最终又和拜占庭国家的内乱掺和在一起，导致第四次十字军没有前往埃及，而是攻下了君士坦丁堡。从1205年到1261年，君士坦丁堡被罗马天主教徒统治，拜占庭的好几个最重要的岛屿则被意大利诸城邦控制。

罗斯是下一个遭到东方游牧民冲击的东正教国家，这一次威胁来自成吉思汗派来的蒙古人。虽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突厥斯坦，但蒙古军的其中一部攻击了基辅罗斯以南的草原诸民族。1223年，罗斯王公们率领他们的乘骑步兵部队来到草原，被新敌人出乎意料的新战术打得落花流水：蒙古人善于突然冲锋和突然撤退、施放箭雨，最后进行毁灭性的围歼。对幸存的王公们来说幸运的是，蒙古军队最终像来的时候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撤回了东方。成吉思汗于1227年驾崩，这让有些罗斯王公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了，但他们对蒙古事务的消息并不灵通。新的大汗野心勃勃，蒙古人于1237年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在作战季节结束后没有回家；到1240年，他们已经征服了除诺夫哥罗德之外的所有罗斯国家，令

东正教遭受重创。罗斯人向他们西面的邻国波兰和匈牙利、向教宗、甚至向立陶宛的异教徒求救，只有立陶宛的明道加斯向他们伸出援手，并且附带了严格的条件：只要罗斯商人和波雅尔们给他丰厚的酬劳，他就会尊重东正教。他们支付了这一代价，立陶宛的大扩张就这样开始了，立陶宛大公国最终将成为欧洲最广大的国家之一。

就在此时，立窝尼亚的十字军向诺夫哥罗德发动进攻。这座城镇十分富裕，权势极大，以至于被称为“伟大的诺夫哥罗德”。与拜占庭和穆斯林世界的城市相比，诺夫哥罗德的繁荣被夸大了。对了解君士坦丁堡、撒马尔罕或甚至威尼斯的人来说，北方的所有城市都既小又穷，但在那些只见过吕贝克或基辅的人眼里，诺夫哥罗德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虽然爱森斯坦的精彩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把条顿骑士团置于此次攻势的中心位置，但实际上条顿骑士团与后来所谓的“冰湖战役”关系很小。进攻诺夫哥罗德的军队是由许多五花八门的势力组成的一支松散联军，其组织者是教宗特使摩德纳的古列尔莫。战斗打响之前，古列尔莫就返回西方了。他似乎相信，对诺夫哥罗德的十字军远征如果能成功，就能消灭东正教的最后一座罗斯堡垒，从而重新统一基督教世界；如果进攻失败，他也能除掉该地区一些心怀不满的分子。

所谓心怀不满的分子主要是德意志骑士，其中一些曾是宝剑骑士团成员，他们还不肯屈服于教宗为他们规定的命运；另一些是在之前另一位教宗特使邀请下来到爱沙尼亚定居的世俗骑士，还有一些既害怕瓦尔德马二世国王没收他们的产业，同时又觊觎更多土地的宝剑骑士团成员。瑞典国王埃里克十一世（1222～1250年在位）也参加了这场十字军远征，他的军队沿着芬兰湾北岸东进，征服了当地诸部落，企图将瑞典国王的权威扩张到这一地区全境（这里是欧洲最高档毛皮的出产地）。最后，还有一些十字军战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来自德意志北部城市，是了解诺夫哥罗德的市民阶级，他们希望对诺夫哥罗德施加更有利于德意志商人的贸易条件。

起初，这场攻势一切顺利。1240年初，瑞典人占领了涅瓦河河口。涅瓦河是一条从拉多加湖[14]流出的水道，船只可以从河口逆流而上，取道沃尔霍夫河到达诺夫哥罗德。与此同时，来自立窝尼亚的十字军渡过了纳尔瓦河；其他人则攻击普斯科夫。卡尔·比耶[15]和芬兰高级教士托马斯主教[16]率领的瑞典军队威胁要阻止罗斯人购买西方的粮食（只要罗斯南部还在蒙古人手中，诺夫哥罗德就得依赖西方的粮食供应）。吕贝克和维斯比的商人不肯为瑞典国王的利益主动牺牲自己的贸易，所以瑞典人封锁罗斯的唯一办法就是控制各条河流的入海口。诺夫哥罗德商人明白自己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召回了前不久离开这座争吵不休的城市的年轻公爵亚历山大，请求他赶走瑞典人，保卫连接诺夫哥罗德与西方的生命线。亚历山大压制住怒气，带领他那些技艺娴熟的弓箭手返回了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的一位罗斯编年史家记述了随后的事件：

> 瑞典人在他们的统治者和主教领导下来了，他们停在伊热拉的涅瓦河河口，企图占领拉多加湖，或者说占领诺夫哥罗德以及整个诺夫哥罗德省份。但最仁慈最善心的上帝，爱世人的上帝，又一次挽救和保护我们。外国人没有上帝的佑助，再怎么样都是徒劳。消息传到诺夫哥罗德，说瑞典人要去拉多加湖，亚历山大公爵率领诺夫哥罗德和拉多加湖的人们没有耽搁，立刻迎战，并凭借圣索菲亚的力量、圣母和童贞玛利亚的祈祷，于1240年7月15日战胜了瑞典人……杀死了许多瑞典人。[17]

涅瓦河上的这次战役让诺夫哥罗德躲过了瑞典的经济封锁。诺夫哥罗德公爵亚历山大因此次胜利获得了一个绰号：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托马斯主教于1245年辞职。他确信自己向芬兰人和卡累利阿人[18]传教的毕生使命已经失败。但他过于悲观了。四年后，卡尔·比耶率领瑞典人向今天的赫尔辛基周边地区发动了所谓“第二次瑞典十字军”。在随后的岁月里，瑞典向这片“新土地”输送的移民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永久性地改变了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后来还有一些瑞典渔民穿过芬兰湾来到爱沙尼亚，在沿海的一些小村庄扎下根来。

冰湖战役

对诺夫哥罗德来说，立窝尼亚人的威胁比瑞典人更严重。由形形色色的势力组成的联军从西方攻入诺夫哥罗德领土。这些势力包括：曾经的宝剑骑士团成员、来自爱沙尼亚的小骑士、两位丹麦王子卡努特和艾贝尔[19]率领的丹麦人、多尔帕特[20]主教赫尔曼·冯·布克斯赫夫登（阿尔伯特主教的兄弟）领导下的德意志人和雅罗斯拉夫公爵（从普斯科夫流亡）领导下的罗斯人。1240年9月，联军占领了伊兹博斯克[21]，并击溃了一支从普斯科夫来的敌方援军。在围攻普斯科夫一周之后，联军迫使守军有条件投降。十字军显然依赖了城内的盟友（可能是雅罗斯拉夫公爵的朋友，他们交出自己的孩子作为人质），因为他们只把两名骑士及其扈从作为驻军留在城堡内，总人数可能只有30到50人。十字军领导人在这年冬天一定梦想着在下一次作战时切断诺夫哥罗德的贸易路线，尤其是当他们听说亚历山大公爵在和主张与德意志人议和（可能因为他们相信与西方的贸易对诺夫哥罗德的生存至关重要）的诺夫哥罗德市民发生争执之后撤往远方由其父雅罗斯拉夫二世统治佩列亚斯拉夫[22]时。

丹麦国王瓦尔德马二世于这年3月驾崩，他的儿子们留在了丹麦国内，以防内战爆发。曾经属于宝剑骑士团的人觉得丹麦的继承危机不是让他们失去了一个盟友，而是给了他们一个夺回爱沙尼亚的机会。他们已经开始与爱沙尼亚境内愿意违反1238年的《斯坦斯比条约》并尝试征服诺夫哥罗德的丹麦封臣展开密谋。因为史料匮乏，我们不知道前宝剑骑士团在此次攻击诺夫哥罗德的行动（他们没有得到官方许可，没有得到条顿骑士团的金钱和增援）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是否提供了领导者和兵员，但过去那场强迫福尔克温团长占领爱沙尼亚的政变的其中一名主使，似乎就是这次入侵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1241年4月之前，由条顿骑士团、前宝剑骑士团成员、丹麦封臣和原住民爱沙尼亚人组成的军队占领了纳尔瓦以东卡累利阿人的土地。他们在科博尔建造了城堡，并以其为基地向东南方发动大胆的袭击，又一次打到了距离诺夫哥罗德不到20英里的地方。他们还掳走了大量马匹，导致诺夫哥罗德农民在来年无法犁地。

这些胜利让联军自信满满，于是他们派遣厄泽尔-维克[23]主教海因里希赶往罗马，请求格列高利九世教宗任命他为即将征服的地区的主教。他们的想法可能是为罗斯人提供西方军事援助以抵抗蒙古人，借此换取东正教会在罗马的领导下与天主教会合并。普斯科夫和其他城市的一些罗斯人肯定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正如加利西亚的罗斯王公们此刻做的那样（此时蒙古人正在席卷他们的土地）。显然也正是普斯科夫的军事支持让西方人对诺夫哥罗德的攻击如此凌厉，因为西方人单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武士来震慑诺夫哥罗德人。教宗同意了海因里希的请求，命令隆德[24]大主教及其下属主教召唤他们的人民，“如同摩西，佩上利剑……披挂上帝的铠甲”，去保护爱沙尼亚的新皈依者。

我们不知道1241年2月至1242年2月时，教宗特使摩德纳的古列尔莫究竟在哪里。1239年和1240年，他去了普鲁士、吕贝克和丹麦，试图促使各方达成和解，以免对十字军造成干扰。如果知道了1241年2月至1242年2月他身在何处，我们就能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古列尔莫是在爱沙尼亚组织针对诺夫哥罗德的攻势，还是在德意志、波希米亚和波兰致力于协调共同的防御策略，抵抗即将杀到的蒙古人？

我们也不能确定立窝尼亚团长迪特里希·冯·格吕宁根的去向。他是1234年与图林根方伯康拉德一同加入条顿骑士团的骑士之一，早在1237年就被提名为立窝尼亚团长，但领导层认为他还需要更多历练。他在随后几年里积累了丰富经验。1238年，他接替了赫尔曼·巴尔克，但在

1241年制订进攻诺夫哥罗德计划的关键月份里，他并不在现场。他在1242年的某个时刻返回，可能是在夏季海路畅通之后。1245～1246年他留在立窝尼亚临时代理德意志团长之职，后来又被任命为普鲁士团长。迪特里希不在的期间，由安德烈亚斯·冯·菲尔本代理他的职务。菲尔本后来攀升到了很高的位置，所以我们估计他在1241～1242年的表现不错，所以他的名字不大可能与在罗斯的失败有关联。

在普鲁士的条顿骑士肯定很担心蒙古人的威胁。尽管这则关于普鲁士团长博波的传说已经被反复证明是假的，但很多通俗历史学家还是认为他在列格尼卡战役中死于鞑靼人的箭雨。这个神话里有一点是真实的，即条顿骑士团的职责是保卫基督教世界，抵抗它的所有武装敌人。博波可能参加过列格尼卡战役并负了伤，但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博波确实死在列格尼卡并被安葬在那里，不过那已是很多年以后了，当时他正在访问他妻子的修道院。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安德烈亚斯不能拿立窝尼亚的骑士冒险，因为其他地方可能需要他们。安德烈亚斯还很清楚，最渴望进攻诺夫哥罗德的骑士是曾属于宝剑骑士团的反叛者，他们决心废除《斯坦斯比条约》，把条顿骑士团卷入与丹麦的战争。或许，因为安德烈亚斯仅仅是代理团长，他没有大胆决策的自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安德烈亚斯在1241年春季之后似乎并不愿意加入针对诺夫哥罗德的十字军远征。

更重要的是，与帮助十字军攻击诺夫哥罗德相比，安德烈亚斯·冯·菲尔本还有更紧急的问题要处置：他需要镇压厄泽尔的叛乱。这年冬天，他率军越过冰原，吓退了叛军。双方在这之后签署的和约保存至今，让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十字军对其臣民的要求。第一，任何执行异教仪式的人将被罚款和鞭笞。第二，农民必须用船将税金送到里加或主教那里。第三，杀婴者将被罚款，杀婴的母亲应在连续九个星期日里被带

到墓地，被剥光衣服鞭笞。第四，每年收税的时节，地方长官将在长老们的辅佐下主持司法。第五，杀害陌生人或同胞的凶手需缴付10马克的赔偿金，这是一笔巨款，需要得到氏族同胞的帮助才付得出来。简而言之，条约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宗教、财政和社会问题，且有可能并未被之前的条约所涉及。条约还表明厄泽尔的爱沙尼亚人绝不是无助的农奴。“爱沙尼亚的主要水手和其他许多人”（*Seniores de Estonibus Maritimae et alci quam plures* ）肯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否则团长签署的正式条约不会要求神父、修士、封臣、总军务官、大批骑士和“很多信众，有德意志人，有爱沙尼亚人”（*multorum aliorum fidelium* ，*Thewtonicorum et Estonum* ）出席。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公爵应邀返回诺夫哥罗德。低眉顺眼的市民确信仅凭自己无法与德意志和普斯科夫军队对抗，他们显然在之前的争议所涉及的所有问题上都妥协了。1241年末，亚历山大打败了纳尔瓦以东的德意志-丹麦驻军。很重要的一点是，他饶恕了西方人，允许他们赎回自己，但把爱沙尼亚人当作叛徒绞死了。这样一来他便表达了自己的有限目标：控制至关重要的边境地带，而不是把十字军赶下海；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蒙古人称王称霸的南方，而不是西方，他的意图仅仅是确保自己与鞑靼人交战的时候不会腹背受敌。一位德意志编年史家这样描写他于1242年3月5日进攻普斯科夫的西方驻军的情形：

> 他率领大队兵马进军普斯科夫。他带领由很多罗斯人组成的强大军队抵达那里，解放普斯科夫人，这些人欢欣鼓舞。他看到德意志人，没有犹豫很长时间。他们赶走了那两兄弟，将他们从自己的辖区赶走，击溃了他们的仆人。德意志人逃跑了……如果能守住普斯科夫，就能对基督教大有裨益，一直到世界末日。征服了一片富饶土地却不能好好守住它，是个错误……随后诺夫哥罗德国王班师回朝。[25]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相应的记述很简略：“亚历山大公爵占领了直到普斯科夫的所有道路，俘获了那里的德意志人和楚德人，把他们披枷带锁地囚禁在诺夫哥罗德。”

亚历山大率领一支相对较小的军队来到多尔帕特主教区，但赫尔曼主教的人马在一座桥梁处击溃了他的侦察兵，于是亚历山大撤退了。可能有一小队条顿骑士加入了对亚历山大军队的追击，这就让骑士团在此役中的贡献有所增加。东正教和天主教军队随后在楚德湖[26]遭遇，这就是著名的冰湖战役。双方兵力都不多。西方人可能有2000人，罗斯人可能有6000人，但十字军的武器装备更好。

此役后来闻名遐迩，但其实配不上这样的名气。20世纪的政治考量通过谢尔盖·爱森斯坦1938年的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扣人心弦的音乐赋予了这场战斗以其本不应有的重大意义。这部电影对战斗的某些方面的描绘相对准确，尤其是服装和战术，并让我们体会到中世纪战场的戏剧性，但电影的其他方面就纯粹是政治宣传了。今天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的祖先肯定不像电影说的那样都是侏儒，也不是农奴。安德烈亚斯团长其实身在里加，所以不可能被亚历山大俘虏并用肥皂作为赎金赎回。罗斯军队主要由职业军人组成，德意志人也不是原始版本的纳粹，不是把婴儿活活烧死的金发巨人，因此这一战并不是前列宁时代原始共产主义工农兵与德国装甲部队之前身间的对决。简而言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很多场景其实更多地描绘了希特勒入侵不久前的苏联，而不是中世纪的历史。不过，十字军可能确实拥有一台便携式管风琴。立窝尼亚的海因里希提及在之前的一次战斗中有人演奏乐器，使得两军都暂时停止了厮杀，出神地倾听。而在本世纪末的记载里也曾提到，立陶宛异教徒摧毁的基督教器物当中包括管风琴。楚德湖深处内陆，即便在寒冷季节的最后日子里，岸边水面上的冰层也有可能足够坚实，可以支撑骑兵的重量。

4月5日，春天还未降临。十字军穿过冰湖，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沿着湖边，迎战紧紧聚成一团的罗斯军队。可能有人在冰面上厮杀，但不大可能有大群骑兵冲到冰面上。身着重武装的西方骑士构成了攻击纵队的前锋，随后是冲向罗斯步兵阵列的轻骑兵和步兵。《立窝尼亚韵文编年

史》简洁地概括了这场战役：

> 罗斯人拥有很多弓箭手，战斗打响，他们勇敢地攻击丹麦国王的部队。骑士团的旗帜很快在弓箭手当中升起，可以听得见利剑劈碎头盔的声音。双方都有很多人倒在草地上死去。随后骑士团的军队被团团围住，因为罗斯人兵力极多，能用六十个人包围一个德意志骑士。条顿骑士打得非常出色，但他们还是被一个接一个地砍倒。来自多尔帕特的一些人逃离了战场，捡回了一条命。共有二十名骑士团成员阵亡，六人被俘。[27]

诚然，此役在立窝尼亚和罗斯边境地带之外也引起了震动：库尔兰和普鲁士爆发了叛乱，条顿骑士团四面受敌，分身乏术。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对消灭立窝尼亚的十字军国家并无兴趣。首先，曾经的宝剑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在此役中损失的骑士数量只有苏勒河之战阵亡人数的一半。团长可以迅速用预备队来补充兵力，所以条顿骑士团仍然是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并且，假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进攻十字军国家，十字军会在坚固的木制要塞里开展防御，而亚历山大没有攻城器械。另外，蒙古人对亚历山大的威胁迫在眉睫，他必须尽快应对。所以他向罗马天主教徒提出了慷慨的条件，十字军也立刻接受了：诺夫哥罗德人从普斯科夫和其他边境领土撤军，亚历山大释放战俘，德意志人释放人质。三年后，立陶宛人企图利用诺夫哥罗德的虚弱状态进犯，但被亚历山大打败。但最终，和其他罗斯王公一样，亚历山大也服从于金帐汗国的权威，为蒙古可汗效力。在随后的二十年里，罗斯人和德意志人和平相处。

西方人对诺夫哥罗德的进攻是诺夫哥罗德的一个危险时刻，但其危险程度可能没有某些人想的那么高。如果诺夫哥罗德被西方人占领，这个罗斯国家可能像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拜占庭一样在短时间内被外国人主宰，并可能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重创，以至于无力抵抗从东方来的更危险的敌人，但我们很难想象十字军能永久性地压制罗斯文化、东正教会和罗斯贵族。如果金帐汗国都做不到这些，那么实力比蒙古人弱

很多的西方人能做得到吗？冰湖战役的意义太容易被夸大了。从短期来看，此役对十字军的意义更大，因为他们向东方的武装传教结束了。从长期来看，罗斯人的记忆里有了一场战胜强敌的光荣胜利，这次胜利之所以特别突出，是因为胜利对他们来说实在太过稀罕。

如果此役是西方人获胜，那么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的局势会变得更加紧张。那些曾属于宝剑骑士团并全心全意支持这次进攻的条顿骑士可能会为自己招揽来新的责任，而条顿骑士团作为一个整体，就不得不加以接受。尽管宝剑骑士团的幸存成员继续抱怨他们没有得到恰当的支持（“主教……带来的人太少，骑士团的军队也太小”），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迪特里希·冯·格吕宁根团长。这些宝剑骑士当中只有一人后来出现在了立窝尼亚文献中，并且是在很多年后。至少一名宝剑骑士被送到圣地。1245年，有一些人在圣地脱离了条顿骑士团，转投圣殿骑士团门下，这些人就是曾属于宝剑骑士团的那些人吗？我们不知道。就连安德烈亚斯·冯·菲尔本也暂时离开了立窝尼亚，于1243年被调到了他的家乡尼德兰。战败似乎给了迪特里希团长一个机会来清理门户。他对此事处置得很好，并在1246年当选为普鲁士团长，又在八年后成为德意志团长。

多尔帕特和诺夫哥罗德

总的来说，13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十字军在波罗的海地区节节胜利的时期。最重要的是，十字军劝服了立陶宛的明道加斯，让他相信基督教的神比异教的神在军事上更强大。1252年，一位德意志主教在立窝尼亚团长的见证下将明道加斯加冕为立陶宛国王。尽管此后明道加斯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改变，而且他似乎不允许传教士在乡村传教，但西方人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催促他。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条顿骑士团是现实政治的冷酷实践者，他们更喜欢攫取土地和人民，而不是推行洗礼和移风易俗。但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条顿骑士团懂得在当前条件下应当谨慎行事，不允许宗教狂热分子扰乱原住民生活的传统节奏。1257年，来自立窝尼亚和普鲁士的十字军甚至强迫萨莫吉希亚人同意停战两年，以让传教士和商人在这期间可以到他们的领土活动。

尽管新任里加大主教阿尔伯特·聚尔比尔抓住一切机会骚扰他的敌人，条顿骑士团仍取得了上述的成绩。聚尔比尔的野心世人皆知，他相信十字军东征应当由教会来领导，而他是教会在当地的最合适代表。

和平传教的年代于1259年终止，萨莫吉希亚人的祭司在这一年说服其人民再次拿起武器发难。异教徒军队连续两次（并且间隔很短）歼灭了来自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十字军部队。随后立窝尼亚和普鲁士燃起叛乱，萨莫吉希亚军队入侵这两个地区以帮助叛军。接下来萨莫吉希亚人要求明道加斯加入他们，否则将对他兵戎相见。始终务实且精明的明道加斯于是宣布自己是异教战神的信徒，率军进入立窝尼亚。随后罗斯军队也入侵了爱沙尼亚，这是明道加斯的大战略的一部分。但对他来说不幸的是，通讯联络的困难让他没有办法协调两支相距甚远的军队：这两支军队都没有找到对方，于是相继快速撤退。条顿骑士团和主教们就这

样熬过了他们短暂历史中最危险的时刻。

如果明道加斯能活更长时间，十字军可能仍然难以维持自己的地位，但他于1263年在一次私人纠纷中被杀。他的儿子从修道院出来索要王位，令立陶宛陷入内战。密谋者之一道曼塔斯（俄语名字是多夫蒙特）逃往普斯科夫并自立为公爵，在1266～1267年两次进攻波洛茨克。[28] 这座罗斯城市位于从诺夫哥罗德到立陶宛和从里加到罗斯内陆的贸易路线上。每当道曼塔斯非常接近成功的时候，十字军就开始担心基督教在立陶宛能不能生存下去（不久之后立陶宛的基督教力量果然消亡了）。另外，道曼塔斯还袭击了爱沙尼亚。为了保护这个危险地带，立窝尼亚骑士团在爱沙尼亚的魏森施泰因 [29] 建造了一座大型城堡以作为耶尔瓦省的防务中心，并召唤十字军战士对普斯科夫发动攻击，以求彻底消除敌人的威胁。最终，奥托团长 [30] 为应对即将于1267年发生的入侵做好了准备。虽然入侵者一方的指挥官之间爆发了争执，几乎让他们的军队在漫无目的地瞎转悠了很长时间之后才短暂而徒劳地试图攻打魏森贝格（即拉克韦雷，丹麦人在1252年建造的要塞，用于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道路交叉口），但罗斯人显然还会卷土重来。而立窝尼亚团长没有想到的是，里加大主教阿尔伯特·聚尔比尔居然阴谋趁自己忙着防御边境的时候夺权。

1267年乘船去立窝尼亚的十字军当中有什未林伯爵贡策林三世，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危险分子，不过算不上强大的领主。他曾在自己的地区活跃地参与私战，但都没有成功。二十年里，他与邻居们纠纷不休，每一次结果都是自己吃亏。不过他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或才干，而是因为缺少金钱和军事资源。他参加过13世纪50年代的丹麦战争，卷入了一起与梅克伦堡继承问题有关的私战，还曾在60年代初的私战中站在韦尔夫家族那边。他忙活了这么半天，收获却很少。他的妻子是梅克伦堡家族的成员，帕尔希姆 [31] 的约翰公爵死后的混乱局面曾对他有利，但他最终被年轻的对手海因里希公爵打败。就在这时，贡策林三世来到立

窝尼亚参加十字军远征，也许是因为冒险和宗教的吸引力，也有可能是为了遵循家族的传统；但这还有可能是应了海因里希公爵的要求。十字军是海因里希公爵家族传统的一部分（他的一个兄弟博波就是前任普鲁士团长），但此时他有很多潜在敌人，所以他自己不愿意动身。

贡策林三世可能曾打算在东欧定居，毕竟什未林不是个历史悠久的邦国。在一个世纪多一点之前，基督教世界和异教世界还在进行漫长的边境冲突的时候，什未林尚属于异教地区。而如今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相安无事地在什未林杂居，贡策林三世自己的家族也与曾经主宰什未林的几个斯拉夫大家族交织起来，你中有我。所以他应当不会害怕生活在陌生民族当中，也不惧怕新的挑战。很多年来，贡策林三世伯爵一直在与各个修道会交换地产（一种中世纪的“农作物保险”）从而在立窝尼亚积攒土地，所以他对东欧的情况无疑很熟悉。另外，此刻他的土地被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占据了，而他还需要为好几个孩子准备遗产。简而言之，他在什未林看不到什么希望。

十字军可能于1267年夏季或秋季在立窝尼亚登陆，准备于冬季在诺夫哥罗德附近作战。奥托团长虽然忙于应对立陶宛人沿着道加瓦河的攻击，但他还是命令三十四名骑士从魏森施泰因、利胡拉[32]和菲林[33]前去支援主教在多尔帕特的军队。此外，他还可以调遣大批原住民民兵，那些丹麦封臣也愿意在这里作战，而不是在晚些时候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孤立作战。人数众多的十字军之中包括梅克伦堡伯爵海因里希和他的德意志与斯拉夫部队，但贡策林三世显然没有在爱沙尼亚待很久。

贡策林三世直接乘船到了里加，在那里见到了阿尔伯特·聚尔比尔。大主教曾在德意志北部待过很长时间，所以他俩可能之前就见过面。但这一次，他们发现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帮助。阿尔伯特怨恨条顿骑士团独立自主并没收了他的一些土地，甚至在他的教士当中制造了麻烦。而贡策林三世囊中羞涩，野心勃勃且好斗。他肯定记得他的祖父曾

大胆地绑架丹麦国王瓦尔德马二世，从而搞垮了丹麦的霸业。我们不知道两人当中是谁提出攻击条顿骑士团并瓜分其领地，但在1267年12月21日，贡策林三世和阿尔伯特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大主教任命伯爵为他所有土地的长官，负责重组他的产业并保护它免遭敌人侵害。大主教给了贡策林三世与大主教领地相关的所有权力、收入和职责。两人的协议是，如果伯爵成功地从条顿骑士团或异教徒部落那里夺取土地，那么大主教将慷慨地分封土地给他；但如果他失败被俘，大主教不会付钱赎他，也就是否认贡策林三世的行动与大主教有关。这对伯爵来说风险很大，但历代什未林伯爵从来不会被风险吓倒。

贡策林三世希望在斯米伽利亚、塞罗尼亚[34]和立陶宛边境地带的纳尔森北部成为大地主。他可能觉得这些位于道加瓦河以南的土地很容易得手，因为那里人口原本就不多，也未得到一位经验丰富且兵强马壮的领主的保护。贡策林三世在大主教的领地上进行了备战工作，他可能去拜访了大主教的封臣，视察了各城堡，并估算了他能召集多少原住民部队。在计算了需要多少雇佣兵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他就去哥得兰岛招募雇佣兵。与此同时，聚尔比尔大主教与条顿骑士团的所有潜在敌人取得了联系。如果他能在国外找到足够多的支持者，他在立窝尼亚推翻条顿骑士团的阴谋就很有可能得逞。

在贡策林三世推动这些计划的同时，一支罗斯大军在佩列亚斯拉夫公爵德米特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儿子）的率领下入侵了爱沙尼亚，但对于应首先通过波洛茨克入侵立陶宛，还是渡过纳尔瓦河去维鲁然后进军烈韦里[35]，或者是穿过沼泽地去多尔帕特，罗斯人并未拿定主意。西方军队兵力也很强（编年史家估计有3万人），他们集结在多尔帕特。1268年1月23日，两军在马霍尔姆[36]附近正面对阵，后又于2月28日在更东方的凯格拉河沿岸交锋。《立窝尼亚韵文编年史》概括道：

> 理应追随骑士团的人们抵达后，命令传来，将原住民部署在左

> 翼。战斗期间他们负责守住这一翼。一支由德意志出身的王室封臣组成的大军来到这里，负责右翼。然后他们光荣地发动冲锋。骑士团成员和他们的部下一起攻击。亚历山大主教阵亡。两队罗斯人向他们冲来，但被击溃了。在战场各处，罗斯军队不得不撤退……骑士团为自己长期以来在罗斯人手底下吃的苦头复仇。战场宽阔，纵深很大，罗斯人一败涂地……每个德意志人不得不抵挡六十个罗斯人……德米特里公爵是条好汉，带领五千罗斯精兵杀入战场。他的其他部队逃走了。现在听听发生了什么吧。骑士团的旗手们在一条很糟糕的溪流处，面对德米特里。他看到骑士团的军队在那里，有很多人马。那里骑士团有160人，他们必须面对德米特里的五千人。还有步兵，站在桥前，英勇厮杀。他们表现极佳，大约有80人。他们履行了自己对骑士团的职责，打退了罗斯人，让他们灰心丧气……战斗结束后，很多罗斯女人扑在自己丈夫的尸体上哭泣。罗斯人因为此战至今仍然仇恨骑士团。这种感情维持了很多年。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对此役的记述更为连贯：

> 他们抵达凯格拉河的时候看见一支德意志军队已经严阵以待，如同森林。仿佛全体德意志人都集合在那里。但诺夫哥罗德的人马没有耽搁，立刻渡河迎敌，开始排兵布阵。普斯科夫的人在右翼，德米特里和斯维亚托斯拉夫也在右翼；左翼是米哈伊尔。诺夫哥罗德的人面对敌人的铁甲部队，就在大楔子对面；他们就这样互相冲杀。两军短兵相接之时发出一声恐怖的战斗呐喊，父辈和祖辈都不曾见过这样的阵势……既然已经开始交锋，好多优秀的男人为了圣索菲亚而抛头颅洒热血，仁慈的上帝很快送来他的怜悯，不希望罪人全都死光；上帝惩罚了我们，又宽恕我们。他不再把怒火朝向我们，而是怜悯地注视我们；借助光荣十字架的力量，通过贞洁的圣母玛利亚的祷告和所有圣徒的祷告，上帝佑助德米特里公爵和诺夫哥罗德的人们……他们追击敌人，边走边战，一直打到城镇那里，在三条路上追击了好久。路上堆满死尸，就连骑马都无法通过。于是他们从城镇转身，看到另一支大军组成庞大的楔子阵型，冲进了诺夫哥罗德人的辎重队伍。诺夫哥罗德的人们希望去攻击他们，但其他人说：“天快黑了；我们如果乱了阵脚，自己挨打怎么办。”于是两军对峙，等待天亮。敌人，那些十字架的背叛者，没有一直等下去，逃走了。

这是两支大军之间的混战。显然，在战场的不同地段，双方各自取得了胜利。此后德意志人后撤，以保卫另一个渡口。双方都精疲力竭，于是罗斯军队撤回了自己的土地。

最终的胜利者是蒙古人，他们懂得对敌人分而治之，从而渔翁得利。1275年，蒙古人向所有罗斯土地征收第二批灶火税[37]，这一次他们没有遇到抵抗。这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蒙古帝国，它从罗斯延伸到巴格达、北京和河内。马可·波罗在1268年初次造访东方，并在帝国境内游历多年。

在此后许多年里，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矛盾不再重要。双方都明白，防守一方总是占上风，他们不仅有很多坚固要塞和致力于死守到底的守军，后勤的困难也让长期围城作战显得不切实际。在条顿骑士团服役的德意志人以及教士、世俗骑士和市民都决心为自己的财产而战，但原住民诸民族同样顽强抵抗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入侵，他们正是过去历次袭击的主要受害者。他们的格言似乎是“在两个魔鬼之间，我们宁愿选择比较熟悉的那一个”。

13世纪末的原住民生活

条顿骑士团在立窝尼亚与普鲁士的行动受到很多指责，其核心就是他们阻碍了传教。一方面，有一种源自13世纪末的观念（这一观念在19世纪末得到加强，并在20世纪末得到普遍接受）将西方人对原住民习俗的任何干涉都谴责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与此同时，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却谴责骑士团没有更广泛地在波罗的海诸民族当中传播基督教和教育，从而将他们提升到与德意志人一样的层次，仿佛传教和教育就不会严重影响原住民的传统习俗似的。骑士团的一些敌人相信，用低调手段借助原住民王公的力量传教会对原住民造成更大的影响，因为这样能更好地运用原住民的语言，而且会比让那些二流的外国人传教更符合道德。这种想法也许是正确的，但骑士团没有办法选择这种道路。宗教教育和聘用神父是大主教和主教的职责，不是骑士团团长和他的官员管得了的。如果骑士团的修士和骑士试图向原住民传授宗教知识，就会遭到教宗的严厉训斥。另外，劝说主教及其教士加入条顿骑士团的努力只遭到了愤怒的抗议。

很显然，在波罗的海诸民族当中传教的努力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另外，就连同时代的人也清楚地看到了传教失败的原因：教会犹豫不决，不肯信任异教祭司的儿子们，担心他们会对基督教做出异端诠释，危及信众的灵魂；守贞不是原住民的习惯，而附近地区的东正教神父可以结婚，这对原住民而言是一个危险的榜样；另外，从外国来的高级教士及其下属不懂爱沙尼亚语或拉脱维亚语，所以不能确定原住民神父在说什么、做什么。教会的资金不足以在乡村维持神职人员的存在，而教会从德意志聘请的神父往往在乡村待不了多久便回到城市，教会对此无力阻挡，因为在城里他们可以找到工作，或者至少能找别人和他们交谈；而在原住民乡村，他们只能和偶尔过路的商人、当地贵族和地方

长官交谈，但他们和这些人没什么共同点，话不投机。最后，接受了基督教的原住民很快就会把当地神话和古老习俗融入他们对新信仰的理解中。我们今天不会担心爱尔兰精灵和克罗地亚灵怪有害于基督教信仰；但中世纪教会对此非常介意，所以教会抵制将波罗的海异教信仰的元素（最重要的是与葬礼和缅怀死者有关的元素）纳入基督教每日礼拜和宗教节日的做法。

在立窝尼亚各地，原住民诸民族成功抵制了基督教的葬礼仪式。不过，我们拥有反映抵制葬礼的史料，却没有反映其他形式的抵制的史料，可能只是因为原住民的葬仪是比较容易被教会观察到的。相比之下，要调查原住民有没有违反斋戒规矩、有没有秘密执行异教仪式、是否还有与德意志人不同的迷信就困难多了。在原住民当中，女性比男性更为固执地抵抗变革，也许因为女性的生活不像男性那样容易受到新政权的影响。而且，条顿骑士和神父都不能与女性待在一起。

新皈依者对新宗教的理解似乎仅限于某些需要反复念诵的祷告、尊崇圣徒以及在他们原本就五花八门的信仰体系里增添一些新的迷信。基督教是一神教，却有三位一体之说，当时的人可能和今人一样很难理解这一概念，而且“基督徒”的道德准则有时似乎与普通德意志人的生活方式没什么关联。统治者可能不知道乡村的实际状况，军事修会的骑士对实情的了解可能最少，因为他们按照规矩应当待在修道院里祈祷而不是和原住民交往（与男性一起喝酒是可以接受的，但骑士不能参加有女性在场的娱乐活动）。原住民想要保存的东西都以音乐的形式在外国人听不懂的歌谣中保存下来。唱歌的传统在漫长岁月里得以延续，一直保存到我们的时代，不过那些古老歌曲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当波罗的海国家在1988～1991年再次获得独立的时候，他们达成目的的方式不是通过恐怖主义或暴力，而是通过“歌唱革命”[38]。

条顿骑士团的间接传教手段在普鲁士取得的成绩更为理想，那里有

大量德意志和波兰农民，加快了文化融合与普鲁士最终德意志化的过程。即便如此，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原住民的皈依究竟有多真诚。传教士的宣讲都是徒劳，因为他们人数太少，并且对原住民语言所知无几，不足以打动立窝尼亚人的心。直到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波及波罗的海地区，基督教才真正深入原住民社会。

与普遍的观点相反，新近被征服的诸民族并没有立刻成为农奴和奴隶。他们要交税和服劳役，要奉行一夫一妻制，还要正式承认对基督教的信奉，但在绝大多数方面，他们得以维持自己的传统习俗。长老们继续管理地方性事务；武士阶层渴望战争的机会以赢得战利品和威望；农民每年在领主（往往身在远方）土地上服劳役的天数可能不超过三天。世俗领主和教会领主无疑都努力扩张自己的地产，滥用司法特权，而且在收税时也贪得无厌。有些德意志封臣坚决捍卫自己的上述权利，认为这是他们从自己的爱沙尼亚或立窝尼亚人母亲或外祖母（在征服战争中死去的原住民贵族的寡妇或女儿）那里继承来的，此外也有冯·罗普家族那样与显赫的罗斯家族通婚的情况。

立窝尼亚的行政被分割为好几个部分，所以不同社区的体验可能大不相同。在骑士团领地定居的德意志人相对较少，在大主教领地定居的德意志人也只是略多一点。主要城堡或滨海城镇周围簇拥着一些小规模的德意志人社区，除此之外德意志人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爱沙尼亚，多尔帕特主教和厄泽尔-维克主教借助地主封臣来统治；在丹麦国王的土地上，德意志骑士、商人和手工匠人更多一些。

遗憾的是，只有这些为数不多的行政官员和商人撰写的档案和书信，这些就是今天我们了解该时期的最重要史料。我们读到《立窝尼亚韵文编年史》的最后几行时意识到作者就此搁笔，这让我们怅然若失，十分难过，在读到《立窝尼亚的海因里希编年史》末尾时也会有这种感觉。波罗的海十字军的世纪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之后爆发了一场大争

端，而我们对只能通过律师的状词和条顿骑士团的敌人在教宗特使主持的听证会上的声明了解它。但条顿骑士团抵制这些听证会，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故事的另一面。里加人不敢放弃与立陶宛异教徒的盟约，因为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向立窝尼亚团长投降。在三十年时间里，里加人继续为了自由而拼死奋战，但最后却还是落空。13世纪的十字军运动以内战的形式告终，这场内战会持续几十年，并将在15世纪末再次浮现。

---

[1] 哥得兰岛是瑞典及波罗的海最大的岛屿，主要城市为维斯比。

[2] 楚德人是俄国早期史书中提及的若干生活在今天爱沙尼亚、卡累利阿和俄罗斯西北部的芬兰语系民族。他们最早出现在约1100年僧侣聂斯托尔的著作《往年纪事》中，根据记录，1030年智者雅罗斯拉夫入侵楚德人的国家，并建立尤里耶夫城（今天爱沙尼亚的塔尔图）。

[3] 波洛茨克是今天白俄罗斯境内的一座城市，位于道加瓦河畔。它是东斯拉夫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始建于9世纪。10至12世纪，波洛茨克公国是今天白俄罗斯范围内的主要国家。14世纪初，波洛茨克被立陶宛大公国吞并。1773年波兰-立陶宛联邦第一次被瓜分，波洛茨克被俄国吞并，后来一度是耶稣会的重要据点。

[4] 立窝尼亚的海因里希（1188之前～1259之后），也称拉脱维亚的海因里希，是出生于马格德堡的德意志神父、传教士和历史学家。他的作品记载了基督教在立窝尼亚的传播。

[5] *The Chronicle of Henry of Livonia*（trans. James A. Brundag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Madison，1961）.这部生动而睿智的史书记载了1180～1227年的历史，是中世纪编年史当中较好的一部。这部书显然是写给1225年到里加的教宗特使摩德纳的古列尔莫看的，它比当时绝大多数著作都更细致，也更具思想性。（作者注）

[6] 洛库姆是德国汉诺威以北的一个村庄。1163年熙笃会在这里建立修道院。

[7] 图雷达的考波（？～1217）是立窝尼亚人的一位领袖，有时被称为“立窝尼亚之王”。他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洗礼的立窝尼亚重要人物，是里加主教阿尔伯特·冯·布克斯赫夫登的朋友，与他一起去过罗马，拜见了教宗英诺森三世。考波的臣民反叛阿尔伯特主教，于是考波帮助基督徒攻克并摧毁了他自己的城堡图雷达，后来又重建了一座城堡，保存至今。考波后来在针对仍然信异教的

爱沙尼亚人的十字军远征中阵亡。在现代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现存的少数立窝尼亚人心目中，考波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有人认为他是卖国贼和通敌者，有些人认为他是有远见的领袖。

[8] 在这些早期岁月，立窝尼亚没有农奴但有一些奴隶，他们都是袭击异教徒土地时抓获的俘虏。直到15世纪，农奴制才在立窝尼亚普及。（作者注）

[9] 户地（hide）指供一户家庭生活所需的土地。这一单位在不同地区的大小从60到240英亩不等；最常见的大小是120英亩。

[10] 福尔克温·冯·瑙姆堡·祖·温特施泰滕（？～1236）于1209～1236年担任宝剑骑士团的最后一任团长。

[11] 即前文讲到的匈牙利公主伊丽莎白，安德拉什二世之女，她嫁给了图林根方伯路德维希四世，但后者英年早逝。

[12] 波雅尔是10世纪至17世纪时保加利亚、基辅罗斯、莫斯科大公国、塞尔维亚、瓦拉几亚等国的贵族阶层。

[13] 斯坦斯比是丹麦南部西兰岛上的一个教区。

[14] 拉多加湖是位于俄罗斯西北部卡累利阿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的淡水湖，也是欧洲最大的湖泊和世界第15大湖泊。

[15] 卡尔·比耶（约1210～1266）是瑞典历史上重要的奠基人物，他领导了第二次瑞典十字军，确立了瑞典在芬兰的统治；传说他还建立了斯德哥尔摩城。他的头衔是瑞典公爵。

[16] 托马斯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位芬兰主教。

[17] *Chronicle of Novgorod*，*1016-1471* （trans. Robert Michell and Nevil Forbes，Camden Society 3rd series XV，London，1914）.这本书不容易读，但生动地展现了东正教信仰的风格。（作者注）

[18] 卡累利阿人是一个芬兰-乌戈尔语族的民族，生活在卡累利阿地区（今天分属俄罗斯和芬兰）。生活在两国的卡累利阿人在历史、文化、宗教与语言上有很大差别。

[19] 卡努特（1207～1260）是丹麦国王瓦尔德马二世的私生子。艾贝尔（1218～1252）是瓦尔德马二世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儿子，1250～1252年为丹麦国王。艾贝尔与其兄长埃里克四世冲突，卡努特支持艾贝尔。埃里克四世被谋杀，艾贝尔可能就是幕后指使。

[20] 多尔帕特，即今天的爱沙尼亚第二大城市塔尔图。

[21] 伊兹博斯克位于今天的俄罗斯普斯科夫州，在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边境附近。

[22] 佩列亚斯拉夫在今天乌克兰中部，位于基辅以南95公里处，今天的名字是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

[23] 厄泽尔就是今天爱沙尼亚的第一大岛萨雷马岛，维克就是今天爱沙尼亚的莱内县。

[24] 隆德是瑞典南部城市，一度是北欧基督教的重要中心。

[25] *The Livonian Rhymed Chronicle* （trans. Jerry C. Smith and William Urban，new and expanded second edition，Lithuanian Research and Studies Center，Chicago，2001）.这部编年史天真活泼，而且提供了很多信息。（作者注）

[26] 楚德湖在今天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边境上，爱沙尼亚语名字是佩普西湖。

[27] Quoted in David Nicolle，*Lake Peipus 1242*：*The Battle on the Ice*（Osprey，London，1996）.

[28] 道曼塔斯（约1240？～1299）原为立陶宛一个公国的统治者，是明道加斯的盟友，他们的妻子是姐妹。但道曼塔斯后来背叛了明道加斯，与他的侄子勾结，刺杀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随后道曼塔斯逃往普斯科夫，接受东正教，娶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一个孙女。道曼塔斯率领普斯科夫人多次打败立陶宛人，被选举为普斯科夫公爵。他受到普斯科夫人民的爱戴，后来被封圣。著名武士格罗德诺的大卫据说就是他的儿子。

[29] 魏森施泰因即今天爱沙尼亚的派德，是耶尔瓦省的首府。

[30] 奥托·冯·劳特贝格，1267～1270年任立窝尼亚团长。

[31] 帕尔希姆在今天德国东北部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境内。

[32] 利胡拉在今天爱沙尼亚西部。

[33] 菲林即今天爱沙尼亚中部的城市维尔扬迪。

[34] 塞罗尼亚是拉脱维亚的一个文化区域，也称“拉脱维亚高地”，相当于斯米伽利亚的东部。

[35] 烈韦里即今天的爱沙尼亚首都塔林。

[36] 马霍尔姆是德语名字，即今天爱沙尼亚北部的维鲁-尼古拉。

[37] 以灶台的数量，也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赋税。

[38] 歌唱革命是1987至1991年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从苏联获得独立。1988年6月10～11日，爱沙尼亚群众自发性地发动示威，并在塔林歌曲节上唱歌。此后发生了许多群众抗议和示威活动，包括集体演唱爱国歌曲和基督教赞美诗。

七 与波兰争夺领土

波美雷利亚和但泽

波美雷利亚（西普鲁士）[1] 的战略意义首先在于，它位于波罗的海南岸，在从吕贝克到普鲁士的最后一段海路沿线，所以波美雷利亚统治者能按照自己的心愿促成或阻挠海上贸易活动。其次，波美雷利亚为从神圣罗马帝国来的十字军提供了另一条陆路走廊。有些十字军走海路来，尤其是从英格兰和苏格兰来的十字军。乘船是最舒适的旅行方式，尽管比较昂贵，但要抵达立窝尼亚，十字军和商人就非走海路不可。而来到普鲁士的大部分十字军战士来自迈森、图林根和上萨克森。对他们来讲，去托伦、库尔姆和玛利亚堡的最直接路径要穿过大波兰，如果波兰国王封锁了这条道路，十字军就只能取道勃兰登堡、诺伊马克[2] 和波美雷利亚去普鲁士。

对波兰而言，如果获得了波美雷利亚，就能确保通往波罗的海的道路畅通。通过维斯瓦河运到国际市场上的粮食越来越多，所以出海口对波兰非常重要。另外，如果获得了波美雷利亚，波兰国王还可以在东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领地的背后驻扎军队，那里距离重要的骑士团城堡，如玛利亚堡和埃尔宾很近，可以随时发起打击。

相比之下，但泽城对双方的经济意义就不是那么明显了。条顿骑士团还可通过别的途径出口粮食和森林物产，而且但泽始终不肯驯顺地臣服于骑士团。之前但泽曾反叛骑士团，这导致其市民遭到屠杀，不过波兰国王大肆宣扬的死亡人数1万人是夸大其词了，因为这比但泽的总人

口还多。但泽是汉萨城市，富裕而自信的城市权贵主宰着这里的政坛，后来骑士团的军官不得不和这些权贵谈判，在镇压海盗时也得依赖但泽的战舰。波兰的皮雅斯特君主很珍惜自己在理论上对但泽的主权，尽管他们从但泽拿不到多少直接的军事或财政利益。波兰国王说但泽那些说德语的市民其实是波兰人，这是很有效的宣传且貌似有理，因为当时语言还不是政治归属的明确标志。

真正的问题当然是权力。如果条顿骑士团占据了波美雷利亚和但泽，就不必受制于波兰国王的心血来潮，他们可以安全地向普鲁士输送十字军战士，还可以在波美雷利亚招兵买马和收税，从而支持在东方边境的作战；如果波兰国王控制了波美雷利亚，就能迫使普鲁士臣服。条顿骑士团认为占据波美雷利亚对自己的生存至关重要，所以大团长们优先考虑此事。但对波兰国王来说，占据波美雷利亚的好处不多，那里的骑士和纳税人对他的权力与财富的贡献非常有限，这么做主要的好处就是迫使条顿骑士团屈服。所以他对这事并不着急。

如果在13世纪40年代没有被蒙古人打得奄奄一息，波兰王国可能早就占领波美雷利亚了，这不只是通过继承（条顿骑士因为宣誓守贞，所以无法借助联姻来获取领土），也是因为这样一来皮雅斯特公爵们就有足够的实力强迫条顿骑士团从一开始就分享圣战的果实，而不用等条顿骑士团在东普鲁士站稳脚跟。至少马佐夫舍公爵们会占领库尔姆，并安排对波兰友好的高级教士担任普鲁士四个主教区的主教；各国野心勃勃的大家族也会蠢蠢欲动，试图控制骑士团的其他土地。因为康拉德公爵及其继承人控制着马佐夫舍境内通往立陶宛和沃里尼亚的水道，他们致力于保卫这些土地抵抗异教徒的攻击。另外，如果马佐夫舍公爵们更早地干预普鲁士，波兰就可能在未来更深度地卷入与立陶宛的冲突。

但这不是波兰的命运。因为波兰王国屡战屡败，波兰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哀叹付诸东流的机遇。波兰爱国者能做的就是等待有一天王国觉

醒，国王、重要贵族、教士、骑士和士绅能再度为了王国的利益和基督教世界的福祉团结起来。13世纪中叶，这种美好前景似乎还很遥远，但到世纪末时，这一未来似乎已经近在咫尺。

波兰统一

波兰王国的统一非一日之功，也来之不易。实际上波兰的统一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结果，因为分布广泛的皮雅斯特王朝各个分支都逐渐绝嗣了。拥有克拉科夫公国和国王之位的分支于1279年随着虔诚的波列斯瓦夫去世而灭亡，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的孙子“黑色”的莱谢克二世成为国王。莱谢克二世打败了罗斯人，又在1282年击溃了索多维亚的普鲁士人，最后于1285年利用匈牙利和库曼武士之力夺取克拉科夫，证明了自己是一名有才干的领袖。他从1287年蒙古人的毁灭性入侵中幸存，但于次年驾崩，没有留下子嗣。复兴波兰力量与威望的愿景随着他一起破灭了。

西里西亚公爵亨里克四世迅速对克拉科夫提出主张权。虽然他的亲戚支持马佐夫舍公爵波列斯瓦夫二世[3]，但亨里克四世的军力更强且距离克拉科夫更近，所以他轻松地控制了王国的南部。但亨里克四世的统治不得人心。从文化上看，他不是波兰人，更接近德意志。他早年失去父母，为免受西里西亚亲戚的侵害请求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担任他的监护人。他在波希米亚宫廷长大，1278年奥托卡二世国王与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一世决战时，捷克军队中有三分之一是亨里克四世的人马。最终，奥托卡二世在此役中丧生，亨里克四世毫不犹豫地投奔此役的胜利者，向他宣誓效忠。返回西里西亚之后，他带来了更多德意志定居者，他的宫廷受到的德意志影响也比以往更强了。很多波兰人对此不满，担心在亨里克四世统治下波兰会变成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从亨里克四世的遗嘱来看，这种担忧似乎有些夸张。1290年亨里克四世在与教宗就他的加冕进行谈判的时候突然去世，他在遗嘱中将克拉科夫给了大波兰的公爵普热梅斯瓦夫二世，把西里西亚给了他的亲戚亨里克[4]，希望西里西亚有朝一日回到波兰王室手中。但不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

安排。库亚维公爵“矮子”瓦迪斯瓦夫（1261～1333）[5] 发出抗议。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二世[6] 也感到不满，他开始争夺波兰王位。这场斗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差不多二十年。

捷克国王的实力比其对手强得多。到1292年，瓦茨拉夫二世已经占领了整个波兰南部。波兰北部处在普热梅斯瓦夫二世的控制之下，他是波美雷利亚公爵梅斯特温二世的继承人，也是大波兰的公爵们的继承人。普热梅斯瓦夫二世于1295年让格涅兹诺大主教加冕他为国王，但他的统治很短暂，不到一年后他就被刺杀了：凶手可能原本打算绑架他，但失败了。此事的幕后主使始终未被查出，但很多人怀疑是意在占领波美雷利亚的勃兰登堡边疆伯爵。混乱稍微平息之后，矮子瓦迪斯瓦夫占据了已故普热梅斯瓦夫二世国王的土地，并继承了他的主张权。与此同时，波美雷利亚的封臣们成了当地事实上的统治者，其中最强大的是但泽和斯武普斯克[7] 的施维尔查与他的儿子彼得。

此时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波兰王国的统一指日可待，普鲁士团长们必须考虑这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与皮雅斯特公爵们的关系时好时坏，但总的来讲是友好互助的。而且，从很多角度看，对于波兰王国目前出现的有利变化，条顿骑士团是有功劳的。条顿骑士团保护了波兰边境，抵挡住了异教徒的进攻，这帮助稳定了波兰国内局势，让公爵们能集中精力开展急需的国内改革。条顿骑士团把源源不断的十字军战士带过西里西亚和大波兰，有助于刺激当地经济；这帮助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而这个阶级提供的税金与服务又鼓励了波兰国内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和桥梁得到改善，波兰各地的交通变得更便利、更可靠。

皮雅斯特公爵们效仿那些安排德意志人往西里西亚、波美雷利亚和普鲁士定居的教士，开始自行调动波兰农民和德意志农民进行内部移民。更重要的是，他们放松了限制农民人身自由的法律。新近获得自由的农民比农奴更勤劳，产出也更多，这改善了经济，从而增加了公爵们

的收入，也让数量众多的波兰骑士从中获益。但随着波兰骑士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他们的自信和野心越来越膨胀，并开始表露为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包括强烈的反德意识。这当然让条顿骑士团的领导人感到担忧，因为这样强烈的反德情绪肯定会影响骑士团与皮雅斯特公爵们的关系。

波兰有很多股力量都在向民族复苏的方向发展，任何幸运且有才能的人都能以多种方式利用这些力量，把国家统一起来，并自立为王。条顿骑士团不会乐见一个强大的德意志诸侯作邻居，但一个难以揣测、好斗的皮雅斯特家族成员登上波兰王位的可能性让骑士团尤感不安，尤其是假如“矮子”瓦迪斯瓦夫成为波兰国王的话。骑士团和瓦迪斯瓦夫彼此之间知根知底，双方互不信任，但都不想开始长期的争斗。

瓦迪斯瓦夫的个性反复无常，但政策一以贯之。他的粗暴性格往往对实现自己的目标不利，但他的坚忍不拔和好斗性格赢得了很多波兰骑士与士绅的爱戴。在很多年里，这对普鲁士团长不算大事，因为瓦迪斯瓦夫的野心让他把注意力转向南方而不是北方。他在多年里参与了很多阴谋诡计，在很长时期里与条顿骑士团没有打过交道。所以在普鲁士十字军远征的结果悬而未决的几十年里，他很少试图去阻挠。普鲁士团长考虑到这一点，并且考虑到瓦迪斯瓦夫的野心未必能实现，所以也克制自己不去掺和波兰事务，尽管条顿骑士团原本可以给瓦迪斯瓦夫的诸多敌人提供很多帮助。

瓦迪斯瓦夫实际上依赖普鲁士团长保护他那些最脆弱的领地。立陶宛人在看到瓦迪斯瓦夫把大波兰的骑士都调去西里西亚作战之后，就攻击了卡卢什[8]。这个地方位于波兰腹地，因此立陶宛人的袭击非常大胆。除非瓦迪斯瓦夫放弃对王位的觊觎，他将不得不依赖条顿骑士团阻挡下一次危险的入侵。类似地，瓦迪斯瓦夫也利用条顿骑士团来抵挡他的勃兰登堡敌人。

任人攫取的波美雷利亚

当“矮子”瓦迪斯瓦夫和西里西亚公爵亨里克四世在波兰南部争夺王位的时候，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再次进入波美雷利亚，企图占据这片土地。13世纪60年代末，梅斯特温二世公爵曾向勃兰登堡边疆伯爵求助以对抗他的兄弟和条顿骑士团，条件是梅斯特温二世成为野心勃勃的勃兰登堡边疆伯爵的封臣。但这段封建关系的双方很少能相安无事。1272年，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在一场与梅斯特温二世的纠纷中占领了波美雷利亚公国除但泽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最终以重新确认对梅斯特温二世之宗主权的条件与对方达成了和解。后来，梅斯特温二世在遗嘱里把自己的土地留给他的皮雅斯特亲戚，勃兰登堡边疆伯爵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占领这些土地。1295年，普热梅斯瓦夫二世曾短暂访问波美雷利亚，但梅斯特温二世与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封臣之间矛盾重重，留下许多敌意，普热梅斯瓦夫二世也只能解决其中的部分矛盾。普热梅斯瓦夫二世于次年去世，导致北方再次陷入混乱。他的女儿继承了对他的土地的主张权，后来嫁给了瓦茨拉夫二世。于是波希米亚国王成为波兰王位的有力竞争者，瓦茨拉夫二世立刻出兵占领了克拉科夫。与此同时，“黑色”的莱谢克二世和“矮子”瓦迪斯瓦夫各自对波美雷利亚提出主张，西里西亚公爵亨里克四世则试图夺取大波兰。就是在这一令人头晕目眩的状况下，施维尔查家族[9]崛起了。不足为奇的是，他们承认瓦茨拉夫二世为波兰国王，并与他的勃兰登堡支持者密切合作，正如他们后来在瓦茨拉夫三世短暂统治波兰期间（1305～1306）所做的那样。

施维尔查家族绝对没想到“矮子”瓦迪斯瓦夫会在1306年成为波兰国王[10]，也预料不到他在这一年对波美雷利亚的短暂访问对施维尔查家族而言竟是一场灾难。瓦迪斯瓦夫一世想要惩罚施维尔查家族的不忠（可能还想没收他们的土地以支付他自己的开销），下令以叛国罪将他

们逮捕。心惊胆战的贵族们向勃兰登堡求助，年迈的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很快占领了除但泽之外的整个波美雷利亚，而但泽也只剩城堡还在坚守。但泽城和城里的很多德意志商人未做抵抗就投降了。

勃兰登堡军队继续围攻但泽的城堡，忠于波兰王室的守军指挥官两次请求瓦迪斯瓦夫一世支援他，但瓦迪斯瓦夫一世表示自己爱莫能助，让他向条顿骑士团求援，于是指挥官向条顿骑士团求助。这次请求事关重大，它标志着普鲁士十字军第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异教的所有敌人一般都会合作。似乎没有人想到普鲁士团长和波兰国王的矛盾会延续那么久，但从后人的视角看来，这很符合逻辑，所以有些历史学家把这之后的事件理解为条顿骑士团有预谋的侵略。

骑士团领导层的变更也让人更加产生这种怀疑。康拉德·萨克于1306年初因健康不佳辞职，他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是冬季攻击格罗德诺，此战中他的部下在暴风雪掩护下爬上敌人的城墙，战胜了睡眼惺忪的守军，但没能夺取城堡的主楼。他的继任者、出身高贵的库尔姆的城堡长官西格哈德·冯·施瓦茨堡任职仅几个月就辞职了，随后大家选举海因里希·冯·普勒茨克。他是一位有名的武士，几个月前才奉大团长之命来到普鲁士。

西格哈德团长派遣一支部队去增援但泽城内遭受围攻的波美雷利亚人（他们支持波兰国王）。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当时的编年史家对这次行动及其后续的小规模作战都不以为意，以至于彼得·冯·杜斯堡和尼古拉斯·冯·叶罗欣都没有中断自己的叙述来提起此事。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从那以后，条顿骑士团就深深卷入了波美雷利亚和波兰事务。此后，海因里希·冯·普勒茨克对瓦迪斯瓦夫一世关于波美雷利亚的计划了解越多，就越不愿意把这个省份交给他。

条顿骑士团占领但泽和波美雷利亚

在瓦迪斯瓦夫一世的请求下，海因里希·冯·普勒茨克于1308年9月将勃兰登堡军队逐出了但泽。市民起初似乎欢迎新的占领军，但骑士团没有把但泽归还波兰王室的意思，于是市民变得十分焦躁。11月，但泽市民发起暴动并惨遭镇压，死了不少人。死者大多是德意志商人和手工匠人，就是他们在这座城市定居，并把这里变成比埃尔宾或托伦更重要的商业中心。

条顿骑士团在镇压此次暴动之后面临一个棘手的选择：到底是撤出这座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城市，并放弃为了之前的行动拿到酬劳的希望，还是继续占领下去，从而在将来与瓦迪斯瓦夫一世谈判时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海因里希选择了第二条路线。他占领了迪尔绍[11]和勃兰登堡人控制下的每一座要塞。不久之后，他向波兰王室开出了1万马克的要价。瓦迪斯瓦夫一世身材矮小，囊中羞涩且不懂策略，于是他拒绝付钱，并且似乎还期待骑士团随时听候他的调遣。瓦迪斯瓦夫一世拒绝付账的决定是个错误，这不但把波兰的统一推迟了好多年，还在波兰与条顿骑士团之间引发了命运攸关的对抗，这种对抗对他和他的继任者都意味着很大的麻烦。

也许是出于骄傲的缘故，瓦迪斯瓦夫一世显然没有吸取自1298年以来与条顿骑士团交战的里加的教训。瓦迪斯瓦夫一世可能无法想象骑士团竟然把他当作与里加大主教平级的人来对待，或许和许多成功人士一样，他也变得过于依赖自己的好运气和逃脱险境的本领。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可不是因为对强大的对手俯首称臣或者温顺地接受现状，与所有成功的皮雅斯特家族成员一样，瓦迪斯瓦夫一世的成就有赖于劝诱、个性、恫吓，最终还有武力。只要有一个阶段没有出现他希望的结果，他

就对敌人施加更大的压力。

海因里希团长宣布将在问题解决之前继续控制波美雷利亚，[12] 他的外交官则与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取得了联系。勃兰登堡边疆伯爵于1309年将自己对波美雷利亚的主张权卖给了条顿骑士团，价格是1万马克。这种主张权和绝大多数统治者对自己土地的主张权一样有效，毕竟当时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民族认同”，人民臣服于统治者，而统治者对自己的纳税人或附庸说什么语言、是什么民族漠不关心。当时的人们当然理解什么是民族身份，但阶级地位更重要。1307～1310年的危机促使条顿骑士团决心永久占据波美雷利亚。

面对统一的波兰王国对骑士团的威胁，普鲁士团长就是这样回应的。海因里希不允许瓦迪斯瓦夫一世滥用条顿骑士与他们的友谊，更不允许瓦迪斯瓦夫一世声称自己对骑士团拥有主权。骑士团要利用西普鲁士（英语世界一般这样称呼波美雷利亚）的资源和与勃兰登堡的盟约来对抗瓦迪斯瓦夫一世。在获取了西普鲁士的税金与兵员，并保障通往德意志的补给线畅通之后，条顿骑士团相信自己可以打败任何一支前来挑战的波兰军队。这在好几十年里确实如此。

条顿骑士团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且他们错得很严重，但只有后人才看得清这一点。在当时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里，条顿骑士团相信自己的处置很妥当，简直是天才之举。海因里希团长自认问心无愧，能够当着骑士团成员和最客观中立的欧洲贵族的面为自己的行动辩护。骑士团肯定是遵照法律文本行事的，这已经比很多力图扩张领土的统治者强多了。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法律文本比其精神更重要，民族的问题一般被认为无关紧要，因为同一个家族可能在不同国家进行统治，很多省份不断因战争或交易转手，从没有人考虑居民的感受。当时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骑士而不是其他群体身上。而在当时，西普鲁士骑士和士绅都认为“矮子”瓦迪斯瓦夫一世是压迫者。从所有得到普遍接受的标准来看，

条顿骑士团的举动都是负责任的、高尚的，但过不了多久，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条顿骑士团的举动就显得不是那么正当了。波兰骑士和贵族没有像条顿骑士团设想的那样默许骑士团的统治，而是站在瓦迪斯瓦夫一世及其后人那边，要求骑士团“归还”西普鲁士，尽管这个省份在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历史上的波兰王国的联系微乎其微。波兰民族感情让波美雷利亚成为考验波兰人爱国主义的试金石，条顿骑士团也成为当时普遍的反德情绪的核心目标。而在西普鲁士成为争夺焦点的同时，波兰王国和条顿骑士团都没有办法有效处置自己东部边境的问题。

波兰人的敌意使条顿骑士团无法在针对萨莫吉希亚人和立陶宛异教徒的十字军远征中获胜。但我们必须明白，即便条顿骑士团预见到了自己举动的长期后果，他们在当时面对瓦迪斯瓦夫一世的短期挑战也没有什么别的对策。另外，现在普鲁士变得比以往更加处于骑士团活动的中心。在阿卡被撒拉森人占领二十年后，条顿骑士团只得不情愿地承认重返圣地的希望十分渺茫，他们决定将资源集中用于支持针对波罗的海异教徒的长期十字军运动。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骑士团大团长西格弗里德·冯·福伊希特万格将他的官邸从威尼斯迁往玛利亚堡。首先，他承认，从普鲁士传出的长期怨言是有道理的。很多年里，在普鲁士的骑士感到身在远方的大团长忽视了他们的利益。在1303年埃尔宾的一次会议上，气氛一度十分紧张，骑士们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以普鲁士和立窝尼亚代表为一方，威尼斯和德意志代表为另一方，他们为了大团长戈特弗里德·冯·霍亨洛厄的辞职而争吵。骑士团几乎处于分裂状态，直到戈特弗里德于八年后去世。在那些年里，西格弗里德·冯·福伊希特万格甚至不敢越过阿尔卑斯山去视察或招募十字军战士，以免得罪那些期待去圣地的骑士。其次，意大利局势变得险象环生。1303年，法兰西国王派人绑架了教宗博尼法斯八世，下一任教宗则迁往他和法兰西国王都认为比较“安全”的阿维尼

翁。在法兰西国王的部下虐待博尼法斯八世的四年之后，他们又逮捕了法兰西境内的所有圣殿骑士团成员，并以异端罪审判他们。那些骑士供认了几乎不可能属实的荒诞罪行，后来很多人被处以火刑，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1308年初，英格兰国王如法炮制，也逮捕了英格兰境内的圣殿骑士团成员。

西格弗里德·冯·福伊希特万格从对这些事态的观察中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居住在更安全的地点才是谨慎之道。此时意大利和德意志都没有对条顿骑士团友好的统治者，而骑士团的财富对财政紧张的统治者们来说诱惑太大。另外，大团长与威尼斯没有历史联系。他居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样方便他观察地中海地区的政治。他觉得在今后的一些年里，基督教世界已没有希望组织规模足够大的十字军东征在圣地重新获得立足点，所以驻扎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骑士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如果发生了十字军重返圣地的奇迹，条顿骑士团就会加入他们，但在此之前，他们将集中力量对付波罗的海的异教徒。西格弗里德·冯·福伊希特万格于1309年在玛利亚堡设立了永久官邸，但直到下一任大团长卡尔·冯·特里尔任内，大团长才真正重新确立了对各个分支的掌控，再次成为全体条顿骑士的领导人。此时，条顿骑士团对自己的目标已经有了坚实的把握：消灭波罗的海地区敢于武装反抗的异教徒。

西格弗里德·冯·福伊希特万格任命了一些新军官，把之前在圣地用过的一些崇高头衔封给他们。他还向各个乡村地区指派地方长官，并在但泽建立了一家修道院。但泽恢复了繁荣，成为波罗的海沿岸的头号商业中心。显赫市民与手工匠人不再视条顿骑士团的统治为压迫性的暴政。

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一世

在1320年之前，条顿骑士团并不觉得瓦迪斯瓦夫一世是个严重的威胁，也没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军事天才或者特别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他们知道，不管瓦迪斯瓦夫一世出现在何方都会引发冲突，他经常制造连自己也难以收拾的军事乱局。骑士团一定乐见瓦迪斯瓦夫一世对他亲戚的攻击，因为这样一来，马佐夫舍公爵们几乎一定会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骑士团。

起初，波兰教士对是否承认瓦迪斯瓦夫一世为国王存在分歧，但在敌对瓦迪斯瓦夫一世的克拉科夫主教被流放后，局面就改变了。后来瓦迪斯瓦夫一世得到了波兰最主要的高级教士格涅兹诺大主教的支持，但直到1320年1月20日他才被加冕为王，加冕礼也没有事先得到教宗的祝福。这是德意志皇帝与阿维尼翁教宗之纠纷的一个令人尴尬的副产品，在短期给波兰王室造成了问题，但从长期来看却让波兰王室得以独立于教廷政治。这还标志着波兰王国在子承父业而非兄终弟及的基础上获得了重生。另外，出身波兰北部的瓦迪斯瓦夫一世希望占据波美雷利亚，而最具竞争力的皮雅斯特王公们的兴趣仅仅在于西里西亚。而瓦迪斯瓦夫一世还是个固执而睚眦必报的人，他不会忘记条顿骑士团对他的怠慢。

到1320年时，瓦迪斯瓦夫一世已经从他的许多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最重要的是，他终于明白了如果没有胜算就不要开启战端的道理。眼下他没有可能打败条顿骑士团，于是他集中力量用封建制度重组自己的国家。他向教宗发出的申诉也为他将来挑战条顿骑士团对西普鲁士、但泽和库尔姆的主权奠定了基础。

瓦迪斯瓦夫一世国王和异教徒

1323年，随着统治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罗斯王公去世，瓦迪斯瓦夫一世打算让马佐夫舍公爵波列斯瓦夫二世继承其领土，但立陶宛大公格迪米纳斯明确表示，若没有他的许可，瓦迪斯瓦夫便不能将他的西部和南部边境沿线的大块土地转交给一位皮雅斯特公爵。波兰和立陶宛在谈判过程中发现双方有很多共同利益，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草原上的鞑靼人，以及北方沿海的条顿骑士团。如果双方通力合作，就能更好地抵抗这些敌人。于是两国订立了盟约，格迪米纳斯把几个女儿许配给马佐夫舍公爵们，瓦迪斯瓦夫一世十五岁的儿子卡齐米日（1310～1370）则迎娶了美丽的立陶宛公主阿尔多娜。卡齐米日两个哥哥的去世让波兰宫廷陷入悲伤，而阿尔多娜让宫廷重新欢乐起来。她所到之处都带着一群美丽少女和乐师，她的年轻丈夫在一段时间里非常爱她。后来，当卡齐米日开始追求其他女人的时候，她就被抛在一边，在家中备受卡齐米日母亲的暴政压迫。

此时的瓦迪斯瓦夫一世已经成为一名狡黠的外交家。1326年初，他在与条顿骑士团签署的停战协定中似乎放弃了与立陶宛的盟约。大团长很可能不假思索地以为自己已成功地分化了骑士团的两个对手，并让波兰国王转移注意力去对付鞑靼人。瓦迪斯瓦夫一世前不久获得了教宗的许可，允许他“用战争保卫天主教信仰，无论在波兰王国境内，还是毗邻该王国的其他基督教土地，或邻近它的属于教会分裂者、鞑靼人或其他异教民族的土地”，但瓦迪斯瓦夫一世的真实目标是勃兰登堡，那里的统治者是十字军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春季，瓦迪斯瓦夫一世允许立陶宛异教徒穿过波兰，向德意志人的村庄城镇发起突然袭击，蹂躏了那些即便在13世纪的苦战期间也不曾受到异教徒威胁的地区。

教堂遭破坏，圣餐遭亵渎，神父被杀害，修道院被烧毁，男女俘虏都遭到酷刑折磨。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表达了十字军的愤怒。他说，就连那些与异教徒沆瀣一气的波兰人也被这些景象吓坏了。他描述的一些事件听起来很像目击者的一手叙述：异教徒武士为了一个美丽少女激烈地争吵，这时一名领袖走上前来，将她砍作两截，说：“现在她一钱不值了。你们愿意怎么分都行。”一名修女为避免失去贞洁而拼命求死，在祷告之后被一个愿意帮忙的异教徒砍死。条顿骑士团用这些故事来煽动群众对异教徒及其波兰盟友的仇恨。还有一则传闻说，立陶宛领导人格罗德诺的大卫被一名波兰骑士谋杀了。很多人不禁想，波兰与立陶宛的盟约会不会因为这次败局而破裂。

条顿骑士团没有等停战协定到期就对瓦迪斯瓦夫一世对其盟友勃兰登堡的攻击展开了报复。条顿骑士团与威胁到瓦迪斯瓦夫一世国王之位的皮雅斯特王公们结盟，先是西里西亚公爵亨里克，然后是沃里尼亚-加利西亚公爵波列斯瓦夫。第一份条约里有很多愤怒的激烈言辞谴责瓦迪斯瓦夫一世背弃和约、帮助异教徒蹂躏基督徒的土地，还说他是毫无人性的暴君。后来亨里克公爵及其兄弟成了条顿骑士团的在俗成员。

此时的大团长是维尔纳·冯·奥尔森，他曾担任拉格尼特城堡长官和骑士团总司令。虽然他热烈支持讨伐异教徒的战争，但在之后的三年里几乎没有战事发生。这不是因为瓦迪斯瓦夫一世的行动，而是因为当选的皇帝和教宗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所以骑士团无法从德意志招募十字军战士。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漫长历史上，皇帝和教宗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这个时期的皇帝—教宗斗争与之前不同，因为双方都没有足够的真实力量伤害对方。除了激烈詈骂和空洞的威胁之外，他们之间的宿怨很少诉诸实际行动。1326年，教宗对德意志颁布禁止圣事的命令，停止了一切教会礼拜。大团长召集代表在玛利亚堡开会商议。骑士和神父们投票决

定支持皇帝路德维希四世，他来自维特斯巴赫家族，原为巴伐利亚公爵。

这次会议上，代表们还投票表决通过了一些对骑士团规章制度的变更，其中主要的改动是修改了礼拜的形式，但后人对此次会议最重要的记忆是，后来的一封伪造文书让德意志团长获得授权，罢免了一位无能的大团长。

多线作战

大团长维尔纳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发生在1327年，旨在沿维斯瓦河两岸向南进攻。瓦迪斯瓦夫一世国王控制这片土地，目的是对他的马佐夫舍亲戚实施王权统治。维尔纳首先肃清了多布任和普沃茨克的波兰军队，然后进军库亚维。在对布列斯特的进攻失败后，维尔纳提议停战。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给了瓦迪斯瓦夫一世一个下马威，但如果是这样，他就错了。此次冲突仅仅是一场漫长战争的开端。瓦迪斯瓦夫一世接受了停战，但他只是在等待合适时机向对手发起猛烈反攻。

维尔纳没有意识到自己捅了马蜂窝，于是他继续执行自己的计划，即率军东进，攻入萨莫吉希亚。他用普鲁士骑士接替梅梅尔的立窝尼亚骑士驻军，于是立窝尼亚团长有了更多的兵力去攻打里加；这也让普鲁士总军务官更容易协调溯涅曼河而上的军事行动。维尔纳随后穿过荒野向格罗德诺推进，这座要塞控制着重要的水道（穿过沼泽地和湖泊向西延伸到纳雷夫河，然后通往布格河，这是从马佐夫舍和沃里尼亚去立陶宛的最便捷路线）。他运用聪明的策略诱骗敌人穷追不舍，然后出其不意地伏击异教徒。随后，条顿骑士团在格罗德诺周边方圆30英里的区域内纵火。一些相信格迪米纳斯再也无力保护他们，或者本身就与他敌对的立陶宛贵族带着妻儿来到普鲁士接受洗礼，并为十字军效力。

大约在这个时期，维尔纳丧失了在涅曼河上的前进基地克里斯特梅梅尔。据说一年前就有人观察到了灾祸临头的凶兆，有三名骑士看见水瓶座中有一颗星向东移动。当然，没有人能预想到克里斯特梅梅尔的防御工事会因山体滑坡而损毁。这座木制要塞的地基垮了，有些城墙坍塌了。大团长在视察克里斯特梅梅尔时认识到这座要塞短期内无法得到修复，于是在一次盛宴结束后，他下令烧毁克里斯特梅梅尔的残骸，暂时

放弃了这个据点。

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加入冲突

从任何角度看，波希米亚国王约翰（1296～1346）都是个非凡的人。他十四岁登基，游历甚广，南征北战，卷入的冲突不计其数，以至于同时代人说“没有一件事情没有约翰国王的参与”。他在三十出头的时候把波希米亚政府交给封臣管理，自己则集中力量用于海外冒险。他最坚持不懈的雄心是率领一支十字军去圣地。但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没有办法招募到一支足够强大的基督徒军队去挑战突厥人，于是他接受了远征萨莫吉希亚的冒险。1328～1329年冬季，他率领一支由波希米亚、德意志与波兰贵族和骑士组成的大军来到普鲁士，随行的法兰西游吟诗人纪尧姆·德·马肖[13]后来创作了一首诗来记载约翰的功绩。大团长维尔纳召集了约350名条顿骑士和18000名步兵。骑士团与约翰国王的联军极其强大，参战者都期待他们能对萨莫吉希亚人造成致命打击，就像13世纪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对异教徒的打击一样。约翰希望获得一场辉煌的胜利，让萨莫吉希亚的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就像柯尼斯堡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奥托卡二世一样。[14]

十字军跨过冰封的沼泽与河流，来到内陆的一座异教徒城堡。十字军展示了自己的强大武力，令守军深受震慑，请求投降。这导致十字军内部产生了分歧。维尔纳主张把这些异教徒守军迁往普鲁士；他说异教徒就像狼一样，很快就会逃回森林继续自己的邪恶生活。但是，极具骑士精神的波希米亚国王坚持要求给予这些异教徒光荣体面的洗礼，然后允许他们继续占有这座城堡。最终约翰胜出，于是神父们为6000名男女和儿童施洗。

如果十字军此后占领了整个萨莫吉希亚，这种慷慨的政策或许是睿智的，但他们没有机会占领整个萨莫吉希亚。这时有消息传来，瓦迪斯

瓦夫一世在十字军开入荒野的同一天入侵了库尔姆。信使骑马狂奔了五天，前来敦促大团长将军队调回去保卫普鲁士。维尔纳和约翰不情愿地返回库尔姆，但他们到得太晚，没能抓住瓦迪斯瓦夫一世。与此同时，新近受洗的萨莫吉希亚人也反叛了。

维尔纳和约翰相信，除非大团长先消灭瓦迪斯瓦夫一世国王对库尔姆的威胁，十字军将无法再次入侵萨莫吉希亚。另外，他们还为荣誉的问题担心，这和战略形势一样重要：他们必须先对瓦迪斯瓦夫一世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加以报复。他们还要惩罚马佐夫舍公爵瓦迪斯瓦夫（卒于1343年），因为他们视他为基督教事业的邪恶叛徒。1329年3月，维尔纳和约翰签署了正式盟约。约翰通过继承与婚姻对波兰王位提出主张权[15]，他的王后则将自己对西普鲁士的世袭主张权转让给大团长，这让约翰对波兰王位的主张更显重要。随后他们入侵马佐夫舍和库亚维，蹂躏了维斯瓦河两岸的大片土地，强迫瓦迪斯瓦夫一世再次请求停战。

在战事平息之前，约翰强迫马佐夫舍公爵瓦迪斯瓦夫成为他的附庸，条顿骑士团则占领了多布任，这个省份能够保护从南面通往库尔姆的道路。一年后，约翰把自己那份新征服的土地卖给了维尔纳。

教宗的干预

条顿骑士团与教廷的一个重大矛盾就是“彼得税”——一种由波兰和英格兰直接向教廷支付的税金。近些年里，教宗约翰二十二世曾试图让其他国家也缴纳这种税，但因为遭到了抵制，所以教宗需要一个表率。条顿骑士团似乎就是完美的表率：它理应服从教宗，且骑士团在西普鲁士的臣民已经在缴纳彼得税；并且骑士团富得流油。但条顿骑士团拒绝纳税，理由是它的很多地产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因此享有豁免权；另外，如果骑士团交税，那么波兰自称普鲁士宗主的说法就得到了支撑。约翰二十二世对这种争吵没有耐心，他鼓励骑士团的敌人们对其提起诉讼，并明确表示，他会非常理解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的特殊需求。1330年，教廷政策发生了变化，教宗提议，如果将来库尔姆和西普鲁士缴纳彼得税，他就免去骑士团在过去对教廷积欠的税负。骑士团在普鲁士的分支接受了这一提议，但大团长不肯接受。

随后，教宗命令大团长及其军官到阿维尼翁解释为什么抗命不遵，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来，就将取消他们的特权、并确认教宗特使对骑士团的绝罚，还要对条顿骑士团的军官进行缺席审判。然而军官们仍然不去阿维尼翁。教宗还命令条顿骑士团加入教廷对皇帝及其儿子勃兰登堡边疆伯爵路德维希一世[16]的军事进攻，骑士团对这个命令更是不予理睬。他们不愿冒险妥协：他们不仅相信皇帝及其儿子做得对，还害怕皇帝没收骑士团在德意志的财产，以及他的儿子路德维希二世边疆伯爵会在十字军战士经过勃兰登堡时骚扰他们。

如果骑士团对教宗愿意调停骑士团与波兰之争端的表态背后的诚意和善意怀有疑虑，那么现代历史学家也可以对教宗对条顿骑士团的批评产生怀疑。但是，教宗特使能够安然游走在各地家庭之间，而且各方都

承认，不管教宗的动机是什么，教宗毕竟是教宗；教会是基督教世界唯一的国际秩序。或许更重要的是，波兰国王和大团长都需要暂时停战，而这需要有人从中安排。所以，教廷在1330、1332和1334年安排停战的努力都成功了；但永久和平暂时还没有希望，因为各方立场差异太大，只有等时间流逝、主要人物去世之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才能消除。而停战只不过是暂时中止冲突而已。

在立窝尼亚的胜利

不过，波兰与条顿骑士团的停战确实让维尔纳·冯·奥尔森得以继续在萨莫吉希亚作战。1330年冬季，他迎来了一大批来自莱茵兰的十字军战士，并领导他们进入充满敌意的荒野，但他找不到一座可供攻打的敌方要塞。原住民早就得知十字军要来，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村庄躲进森林，所以维尔纳的远征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不过，十字军的此次攻势转移了立陶宛人的注意力，来自拉格尼特的骑士得以溜过敌人的前哨阵地，袭击位于立陶宛高地核心地带的维尔纽斯。他们发现哨兵在睡觉，于是洗劫并焚烧了这座城市的郊区。

这一年，立窝尼亚的战争结束了，里加向骑士团投降。市民们以为自己会遭到残暴的镇压，但出人意料的是骑士团给他们的条件很公平，于是双方冰释前嫌。随后几十年里，市民们不再干预外交政策，专注于贸易活动。立窝尼亚骑士前往维尔纽斯和考纳斯的立陶宛要塞的距离和普鲁士骑士一样近，还可以从杜纳堡出发去袭击之前从普鲁士去不了的地区。没过多久，立窝尼亚骑士就为萨莫吉希亚远征提供了一支重要的援军。

与瓦迪斯瓦夫一世的战争

在瓦迪斯瓦夫一世看来，局势已变得不堪忍受。十字军的进展太大了。马佐夫舍公爵瓦迪斯瓦夫催促瓦迪斯瓦夫一世收复多布任，于是他去向他的盟友、亦即立陶宛和匈牙利的统治者寻求帮助。格迪米纳斯急于重新打通前往波兰的交通线，于是他同意于夏末与瓦迪斯瓦夫一世共同发动一次作战；他将从维兹纳[17]穿过荒野，在多布任或库尔姆与瓦迪斯瓦夫一世的军队会合。瓦迪斯瓦夫一世手下有经验的骑士不多，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把卡齐米日王子送到匈牙利。卡齐米日的私人外交取得了胜利，他成功地说服了自己的姐夫查理·罗贝尔[18]于1331年春季派遣一些骑士去对抗共同的敌人——波希米亚国王约翰。

但在这些增援部队抵达之前，大团长派遣一支大军攻打了一座骚扰维斯瓦河航运的大型城堡。骑士团将投石机和攻城塔推到城堡前狂轰滥炸，三天后城堡几乎成了一片瓦砾堆。骑士团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强攻，并最终发动火攻烧死了很多守军，迫使幸存的守军冲了出来。条顿骑士团随后攻克了拱卫库亚维北部的城堡布列斯特和纳克沃。没有足够兵力施以救援的波兰国王陷入了绝望。

就在这时，卡齐米日带着匈牙利援军赶到了。十九岁的卡齐米日王子对匈牙利维谢格拉德宫[19]轻松随和而典雅的宫廷生活如痴如醉。在他姐姐的赞同和帮助下，这位金发王子与匈牙利王宫的女官克拉拉·扎奇结下了一段情缘。如果卡齐米日是个有资格求爱的单身汉，或者他对这段风流韵事低调保密，这个故事很可能会有个浪漫结局。但在4月17日，这位克罗地亚贵妇人的父亲挥舞着剑闯进了宫。他打伤了国王，砍掉了王后右手的四根手指，还差一点就杀掉了年轻的王子安德烈和拉约什[20]。王室迅速出手报复，行凶者被五尸，尸块被送到全国各地；他

的儿子被拴在一匹马上活活拖死，尸体之后被扔去喂狗；克拉拉则被四处驱赶。扎奇家族被从匈牙利驱逐出去。即便如此，卡齐米日还是得到告诫称他应尽快离开匈牙利，免遭扎奇家族报复。

在卡齐米日带来匈牙利援军之后，瓦迪斯瓦夫一世做好了出击准备。他现在有了大批骑士和雇佣兵，决定不浪费兵力去围攻戒备森严的城堡，而是入侵库尔姆，与格迪米纳斯合兵一处，然后要么强迫大团长与他正面交锋，要么征服那里的城市。他的军事行动开始得很顺利。9月，他入侵了西普鲁士，这是为了误导大团长；然后他聪明地渡河来到维斯瓦河东岸，只可惜时机不好，他到的太晚，没能与立陶宛人会合。格迪米纳斯大公知道自己的军队正被一小群条顿骑士追踪，而当他的侦察兵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找不到波兰军队时，他便谨慎地选择班师回朝。这让身处东普鲁士的瓦迪斯瓦夫一世无法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不能随意攻打城市。另外，大团长的军队就在咫尺之遥，他也不能派遣很多人去搜刮粮草，这让他的军队缺乏给养。国王不想这样灰溜溜地撤退，但也不能无限期留在库尔姆。维尔纳虽然有德意志团长和立窝尼亚团长在自己身边，也不愿意交战，但他同样不想让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继续蹂躏他最宝贵的领地。所以，当有人提议停战的时候，瓦迪斯瓦夫一世和维尔纳都愿意接受。维尔纳提议将库亚维的城市归还国王（但事先摧毁了这些城市的防御工事和城堡），并承诺将多布任归还马佐夫舍公爵瓦迪斯瓦夫。

维尔纳遇刺

不久之后，大团长维尔纳遇刺身亡。此事为我们了解条顿骑士团的司法制度提供了罕见的机会。刺客是一名来自梅梅尔修道院的骑士，曾因凶暴而不可预测的行为（最严重的事例是持刀威胁城堡长官）受到训斥。他来到玛利亚堡希望获得赦免，但仅仅被命令返回梅梅尔。骑士大失所望，离开了大团长的觐见厅，却没有离开城堡。他面临的前景非常黯淡：骑士团对轻罪的处罚为期一年，犯人在这期间被禁止与其他骑士交往，不得穿骑士团的服装，每周有三天只能吃面包喝水。而他犯的是重罪，可能面临佩戴镣铐并监禁的惩罚。他潜伏在走廊里，等维尔纳去做晚祷时突然走出来刺了他两刀，致其死亡。他显然没有逃跑的计划，当场被一名书记员抓获。

审讯刺客的军官得出的结论是他精神失常，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军官不能确定应如何量刑。根据骑士团的法规，叛教、临阵脱逃和鸡奸的惩罚是死刑，但没有提到谋杀。于是他们写信给教廷请求指示，后来服从了教宗的智慧，对他判处终身监禁。

路德·冯·不伦瑞克

维尔纳的继任者是路德·冯·不伦瑞克，此人是不伦瑞克公爵（伟大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的六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公爵另外两个最年轻的儿子分别加入了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路德当过条顿骑士团的袍服总管，还曾负责把德意志农民安顿到普鲁士。他在这方面很成功，从他的兄弟们的领地（所谓的下萨克森）之中招募到很多移民（现在异教徒很少能深入袭击普鲁士心脏地带了，这对吸引移民也有帮助）。他仔细地维持自己的家族关系，后来他有两个侄子也加入了条顿骑士团。

路德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大力赞助和鼓励与条顿骑士团有关的宗教与历史写作。路德本人的大部分作品没有保存下来，但他的《圣白芭蕾[21]传》留存至今，因为这位圣徒与骑士团征服普鲁士有很大关联，也因为路德的祖父参加了1242年的十字军东征，在那一次圣战中骑士们缴获了装有圣白芭蕾头颅的圣物盒，并将其安放在库尔姆。

路德把诗歌与在波兰和萨莫吉希亚的战争胜利联系起来，这在他的优雅与高尚品格之外又增添了一种特殊的光辉，而他的高贵出身又让这种光辉格外突出。他担任大团长仅四年，但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受人尊崇，尽管当时的大团长们既没有卓越的才华，也不怎么受人爱戴。

路德决心继续与瓦迪斯瓦夫一世对抗，哪怕这意味着要暂停十字军圣战。他打算狠狠打击波兰国王，让他再也不能对骑士团的后方构成威胁，所以他需要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帮他把瓦迪斯瓦夫一世牵制在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和瓦迪斯瓦夫一世都声称自己是西里西亚的宗主。虽然西里西亚被一些不重要的皮雅斯特小王公瓜分，瓦迪斯瓦夫一世也不会为了在北方作战而放弃西里西亚。如果他果真放弃西里西亚，那么约翰国王在西里西亚的胜利对条顿骑士团来说几乎就和条顿骑士团

自己在库亚维或大波兰取胜一样有利。单靠普鲁士的资源不足以支持对波兰的战争：波兰人是优秀的战士，装备精良，并且处在保卫家园的立场上，所以路德从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招募雇佣兵来加强自己的实力，接受一些波兰叛乱贵族的服务，并准备打一场大国规格的大战。当1331年7月作战开始的时候，一些英格兰十字军战士也匆匆赶来参战。对他们来说，打波兰人和打异教徒也差不多，而且在波兰能比在萨莫吉希亚获得更多战利品。

指挥雇佣兵的是奥托·冯·贝尔高，他是波希米亚总军务官的女婿，也是约翰国王的密友。他率领的500名骑士不仅领取丰厚的军饷，还享有十字军战士的宗教特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凡是参加圣战的人，罪孽均可得到赦免。不过，他们的行为以及普鲁士军队的行为远远谈不上圣洁。烧杀抢掠、绑架奸淫都是家常便饭。萨莫吉希亚战争那些最糟糕的方面，再加上雇佣兵的普遍恶习，在马佐夫舍北部和库亚维造成了严重破坏，条顿骑士团把雇佣兵伪装为十字军战士，这对骑士团来说更是宣传上的灾难。后来在教廷的听证会上，波兰人巧妙地利用了骑士团的这招臭棋。

瓦迪斯瓦夫一世没有认真抵抗。他让卡齐米日负责统率一支小部队，自己则带领大部分骑士等待波希米亚国王来犯。他的计划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十字军在库亚维的攻势没有取得什么重大军事成果，波兰国王并不关心房屋、教堂、磨坊遭摧毁，也不关心平民受苦受难。在以劫掠为目的的战争中，暴行司空见惯。重要的是城堡不能失守，而卡齐米日把城堡防守得很好。

普沃夫采战役，**1331**年

和当时所有的军事家一样，路德明白破坏财物是迫使固执的敌人出来迎战的有效手段。他命令部下尽可能多地对财物加以破坏，但他手下的雇佣兵、辅助士兵和骑士们将他的命令理解为可以随意威吓和抢劫波兰国王的纳税人。然而，他的军队没有取得什么拿得出手的战果。

约翰国王消灭敌人的企图也没有成功，他因此感到挫折，于是提议9月在卡卢什与大团长会面，并强迫波兰国王出来决战。路德同意了，并派遣总军务官迪特里希·冯·阿尔滕堡率领普鲁士军队与约翰国王会师。迪特里希穿过库亚维，分兵数路，沿途烧杀抢掠，但在卡卢什没能找到波希米亚人。这不是不寻常的事情。当时的通信条件很差，大多数联合行动都会失败，因为常有一方出乎意料地迟到，或者根本来不了。约翰其实刚刚从意大利远征归来，无法按时抵达。迪特里希看到波兰军队开始从四面八方赶来，而不知道约翰就在几天路程之外，于是开始缓慢撤退，沿途继续烧杀抢掠，结果距离约翰越来越远。而在得知迪特里希撤退后，约翰也调头回去了。迪特里希一撤，瓦迪斯瓦夫一世和卡齐米日便率领4万人追赶他。波兰王军人数众多，但装备不如十字军，所以国王不愿意正面对垒，但当迪特里希兵分三路的时候，瓦迪斯瓦夫一世就在普沃夫采[22]向其中最弱的一路人马扑去。

总军务官迪特里希不知道自己的兵力比敌人少那么多。过去几天里，他的波兰侦察兵向他提供的关于波兰王军兵力的情报是错误的，所以他以为自己面对的敌人不多，而现在浓雾也妨碍了侦察。迪特里希排兵布阵，将自己的兵马安排在五面军旗下，面对波兰王军。波兰国王也将自己的军队部署成五个单位。战斗非常激烈，这在那个大规模交战稀有且短暂的时代颇为罕见。随着承载总军务官军旗的马被长矛刺穿（系

十字军当中一名毫无预兆突然变节的波兰骑士所为），战局迎来决定性时刻，德意志人和波希米亚人当中爆发了严重的混乱。旗手将军旗钉在自己的马鞍上，而战马倒地后，他就无法将军旗举起。十字军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看不见自己的指挥官，而波兰骑士似乎无处不在。战斗因此很快结束，瓦迪斯瓦夫一世的士兵击溃了十字军的三支骑兵部队，俘虏了五十六名条顿骑士，将他们扔进一条壕沟里看押起来。国王抵达后，问他们是什么人。得知他们是条顿骑士之后，国王便命令将其中的普通骑士杀死，将军官留下换赎金。

瓦迪斯瓦夫一世这么做是因为他担心条顿骑士团的另外两路军要赶来支援了。事实上，库尔姆城堡长官确实在这天下午抵达，将精疲力竭的波兰骑士从战场赶走，并俘虏了600人。他看到总军务官迪特里希被锁在一辆大车上，就释放了他，然后骑马来到之前骑士团俘虏被杀的地点，只见赤身裸体的骑士尸体堆积得很高。他颤抖着下马，并哭泣着下令杀死全部俘虏。普鲁士原住民试图阻拦他，说他们想留着俘虏用来交换他们被俘的族民。迪特里希告诉他们不必担心，上帝在当天还会给他们很多俘虏，并亲眼观看部下将俘虏屠戮殆尽。他紧紧追击波兰王军，在夜色降临之前又俘虏了100人，但瓦迪斯瓦夫一世和卡齐米日走得比他快——他们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落入总军务官手中就惨了。瓦迪斯瓦夫一世和卡齐米日在这一天打得不错，他们的表现很勇敢，而他们的军队已经千疮百孔且疲惫不堪，继续战斗下去再无益处，所以在此时逃跑不算丢人。他们已经取胜，所以继续控制战场并不是很重要。

战斗结束后，唯一的工作就是掩埋死者。库亚维主教派人将尸体抛入集体墓穴，在这过程中他的工人清点出了4187具尸体。随后他命人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小礼拜堂，访客可以在这里为死者的灵魂祷告。这处战场成了波兰爱国者的朝圣地，对德意志人来说则是可耻的地方。一位十字军诗人撰写的史书到了这里戛然而止，没有继续描述战斗过程。

直到1332年复活节，路德才做好了报仇雪恨的准备，此时他的力量极其强大。他不仅有大量雇佣兵，还招募了十字军战士，其中有些从英格兰赶来参战。在两周的围攻之后，他占领了布列斯特，然后是伊诺弗罗茨瓦夫，最终占领了整个库亚维北部。瓦迪斯瓦夫一世于8月发起了反击但没有成功，随后他请求停战到1333年年中，那时瓦迪斯瓦夫一世已经驾崩。

和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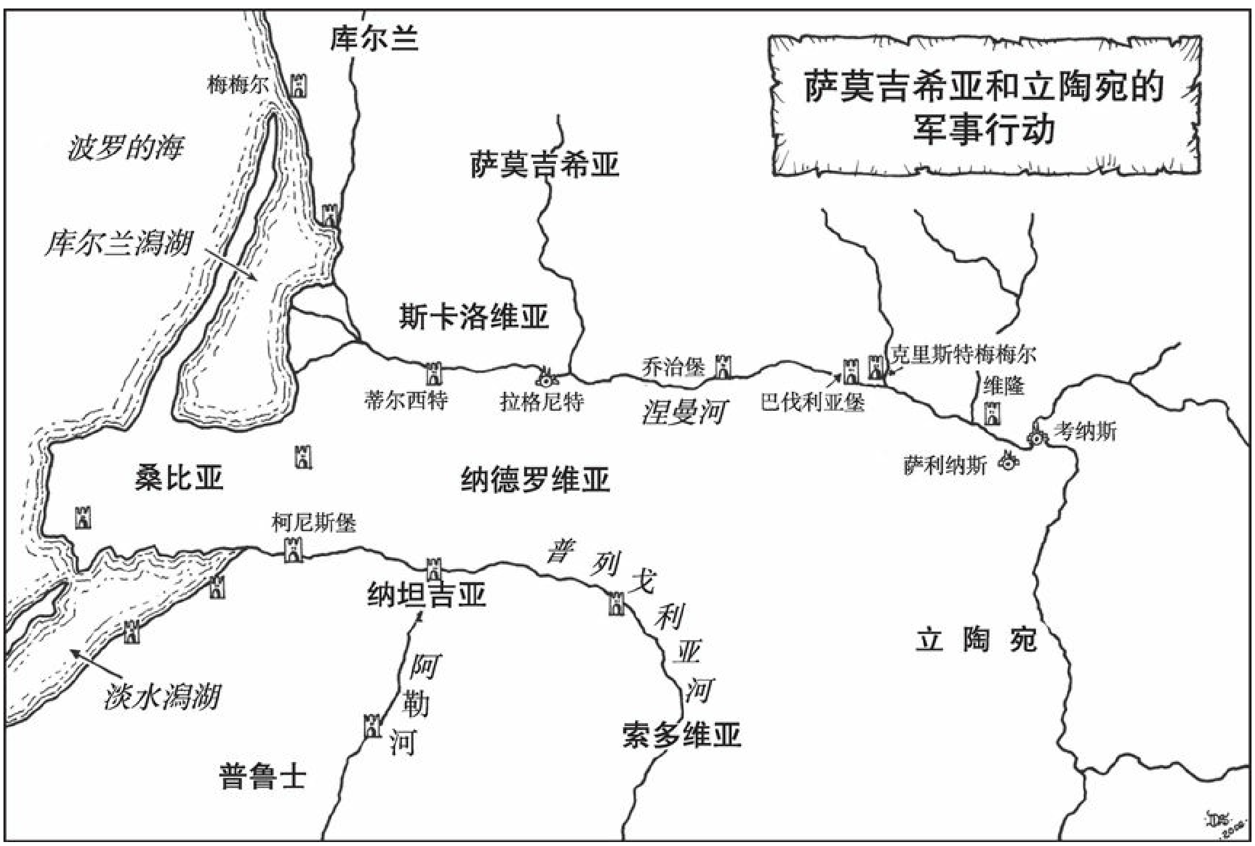
波兰人在格涅兹诺匆匆为卡齐米日加冕[23]，以免教宗提出反对意见。不过教宗本身倒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麻烦在于卡齐米日大王的母亲，她不愿意将身为王后的荣誉让给卡齐米日大王深得民心的立陶宛妻子阿尔多娜。但卡齐米日大王坚定地认为这是国王的特权。阿尔多娜和他一起接受加冕，他的母亲则进入一家修道院隐居。

鉴于瓦迪斯瓦夫一世不在人世，卡齐米日大王愿意接受和谈。他和大团长同意请匈牙利的查理·罗贝尔和波希米亚国王约翰来调停。查理·罗贝尔偏向波兰一方，约翰则支持骑士团。在这次和谈期间，卡齐米日大王将他的外交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才华为他赢得了“大王”的美名。首先，他精明地利用勃兰登堡的维特斯巴赫家族和波希米亚的卢森堡家族之间的嫉妒之心，承诺将自己的幼女许配给勃兰登堡边疆伯爵路德维希二世[24]。然后，他粉碎了国内对他“亲德”政策的抵制。他轻松地说服反复无常的波希米亚国王约翰结束了对西里西亚的战争，以投身于新的冒险。

1335年秋季，卡齐米日大王、约翰和查理·罗贝尔在匈牙利的维谢格拉德会晤，这是中世纪最著名的会议之一。维谢格拉德是一座俯瞰多瑙河的辉煌宫殿。一连几周，他们一边欣赏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一边讨价还价。11月，条顿骑士的代表团来到这里，要求卡齐米日大王放弃对西普鲁士的主张。路德·冯·不伦瑞克在去柯尼斯堡参加新大教堂开放典礼的途中去世，所以这个代表团是新任大团长迪特里希·冯·阿尔滕堡派来的。迪特里希出身萨克森高级贵族，家世几乎和路德一样显赫。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不得不在教会的各种职业路径当中做出选择，他最终选择了军事修会。他曾任拉格尼特城堡长官，然后担任过桑比亚地方

长官和总军务官。他是优秀的指挥官，在履历上只有一个污点，即普沃夫采战役。他想要为此复仇。

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让步都不大。条顿骑士团的代表愿意做出较大妥协，甚至超出了大团长给他们划定的范围，但调停者缺乏想象力：他们提议回到战前状态。约翰国王放弃了对波兰王位的主张，所以他将西普鲁士授予条顿骑士团的法令就失去了效力。卡齐米日大王希望北方恢复和平，让他能集中力量处理其他边境上的问题，于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也是绵里藏针的）让步：他提议将西普鲁士作为波兰王室的馈赠授予大团长，这暗示这块领土仍然是属于他的，所以他才有权将其馈赠出去。但这至少是往和解的方向走了一步。双方愿意停止战争，但成果仅仅是迪特里希承诺从库亚维撤军，且卡齐米日大王承诺让他的臣民同意放弃西普鲁士。



萨莫吉希亚和立陶宛的军事行动

然而，卡齐米日大王发现自己无法兑现承诺。首先，马佐夫舍公爵们主张拒绝接受和谈方案。接着，卡齐米日大王手下的贵族也拒绝批准和约。最后，教宗坚持要求国王尊重教宗特使的裁决，即西普鲁士和库尔姆应当属于波兰。大团长怀疑这都是因为卡齐米日大王在暗地里施加影响的缘故，于是他联系了正在对之前没有解决的一些西里西亚问题旧事重提的约翰国王。与此同时，迪特里希向库亚维的各城堡派遣驻军，但没有干预波兰的行政机关，因为他没有计划永久性占领库亚维。相反，他在多布任和普沃茨克城堡留下了更稳健的驻军力量，因为这是阻止波兰人袭击库尔姆的最好办法。

尽管1337年3月从普鲁士返回的十字军领主得到了卡齐米日大王的款待（这让约翰国王有机会提议结束战争），但是要直到1340年之后，当卡齐米日大王率军开往东南方向的基辅的计划最终成熟之时，他与骑士团的和谈才真正走上正轨。

萨莫吉希亚的作战

与此同时，萨莫吉希亚异教徒在北、东、南三面受敌。立窝尼亚骑士从梅梅尔、戈尔丁根[25]、米陶[26]、里加和杜纳堡出兵，越过荒野的障碍发动进攻。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没有任何心慈手软。

从距离考纳斯不远的一座小城堡的战事中，我们可以了解此次战役的残酷程度。1336年2月，路德维希·冯·维特斯巴赫[27]带领一支十字军从勃兰登堡开来，其中包括很多奥地利和法兰西骑士。这支军队十分雄壮，需要超过200艘船为其运送装备。路德维希预计攻打这座土木要塞的战斗会很短暂，要塞内的4000难民和他们的牲口与财产很快将归他所有。但异教徒看到十字军很快就要强攻城墙，就点燃大火，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投入火中，然后扼杀了自己的妻儿，将死尸也抛入大火。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去冥界（类似瓦尔哈拉）之后仍然能和自己的财产与家人在一起。基督徒起初不敢相信敌人居然会这么做，然后因得不到战利品而狂怒，没有事先在城墙上打洞就开始鲁莽地攻打防御工事。基督徒最后凭优势兵力获胜，但损失也很惨重。异教徒酋长是一个名叫马格尔的英雄人物，他杀死了很多十字军，在发现自己即将被俘的最后一刻逃进一处供妻子藏匿的地窖，挥剑将她砍成碎片，然后自尽。十字军抓到的能当农奴的俘虏极少。

路德维希·冯·维特斯巴赫随后开始在维隆附近的玛利亚堡岛上建造一座城堡，以为下一年更大规模的远征奠定基础。但他发现自己的给养不够，于是不等城堡竣工就烧毁了建筑工地，然后撤退。1337年冬季，约翰国王和巴伐利亚公爵海因里希率军抵达，他们的兵员来自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图林根、莱茵兰、荷兰乃至勃艮第。条顿骑士团也带领他们的纳坦吉亚和桑比亚民兵赶来了。当时天气

异常温暖，所以他们能在涅曼河上用船运送军队。在攻克维隆附近的两座要塞之后，他们在克里斯特梅梅尔废墟对面建造了一座土木城堡，将其命名为巴伐利亚堡，以纪念巴伐利亚公爵。巴伐利亚堡为袭掠行动和前往立陶宛中部或者北上去萨莫吉希亚的大规模远征充当了中转站。格迪米纳斯知道，他必须摧毁这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堡，否则十字军就能轻易袭击他。他于这年6月围攻巴伐利亚堡长达二十二天，但没能将其攻破。他蒙受了惨重损失，不得不撤退。这时守军冲杀出来，夺走了部分攻城武器，并将其安放在自己的城墙上。

约翰国王没有参加此次远征的收官阶段。他得了一场感冒，并进一步诱发了眼部感染。在回国途中他的眼病恶化。约翰在布雷斯劳（波兰语名为弗罗茨瓦夫）让一名法兰西医生为自己治病，但此人的操作很蹩脚，国王大怒之下命人将他溺死在奥得河里。在布拉格，他接受了一名阿拉伯医生的诊治，但也没能治好。感染蔓延到另一只眼，他从此双目失明，可他并没有因此垂头丧气，仍然野心勃勃地去参加新的大胆冒险。约翰的失明让他更加名声大噪。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外交中，失明都没有阻碍他。他在离开柯尼斯堡之前借了6000弗罗林以作为他与卡齐米日大王谈判期间的开销，而在眼病最重的时期，他一直在致力于谈判。

卡齐米日大王准备好接受和平了。阿尔多娜在长期患病之后于这年5月去世，没有留下儿子。尽管卡齐米日大王有过很多露水情缘，但这些都不能给他的王国以必需的男性继承人。因为战争，他一直没有机会为自己缔结重要的婚姻，所以他接受了与条顿骑士团的停战。卡齐米日大王的婚姻生活特别不幸。他原本希望娶约翰的女儿玛格丽特，但她在于布拉格举行婚礼前夜突然去世了。卡齐米日大王随后赶紧与相貌平平的黑森女继承人阿德尔海德结婚，然后迅速将她送到乡下，拒绝再见她。他无法从教宗那里获得离婚的许可，所以显然不会有合法的儿子了。

这些年里卡齐米日大王忙于自己的事情，但条顿骑士团未能利用这个机会向萨莫吉希亚发动大规模远征。只有少量十字军战士来到普鲁士，而且他们的行动常受到恶劣天气影响。例如，在1339年冬季，普法尔茨的一位伯爵率军进攻维隆，但在忍受四天的苦寒之后就回到了柯尼斯堡。一些立陶宛人投降并接受了在普鲁士的封地；更多的人可能相信十字军很快就要结束了，基督教将赢得胜利。

教宗的更多干预

1340年之后，大规模远征就变得罕见了，这既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局势，也是因为骑士团必须将大量兵力部署到波兰边境。大团长接受这种局面，觉得它虽然不愉快，但也不可避免。他不能对教宗让步，也不能向波兰君主妥协，尤其是当教宗和波兰国王似乎正在合作的时候。1338年教宗特使在华沙召开听证会，过程一如既往：波兰人带来一大群证人，而条顿骑士团则抵制听证会。和过去一样，大团长请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熙笃会的修士写信将条顿骑士团描述为“上帝之屋门前的壁垒”，并说条顿骑士团无比热忱地礼拜上帝、遵守良好习惯、友善待人且遵守纪律等等。但这些都没说到点子上，听证会讨论的内容才是正题。

大团长说，路德维希四世皇帝禁止他回复别人在教宗面前对骑士团的任何抱怨，但大团长的借口在德意志比在阿维尼翁更有力量：此时的阿维尼翁教宗曾是一名宗教裁判官。结果，1339年一名教宗特使命令条顿骑士团向波兰国王归还西普鲁士、库尔姆、库亚维、多布任和米歇劳，并赔偿波兰国王194500马克。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教宗召唤大团长到阿维尼翁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迪特里希则回信说自己必须待在东方抵挡鞑靼人迫在眉睫的进攻，这让教宗的态度有所松动。教宗敦促条顿骑士团继续致力于保卫基督教世界，赞扬了他们“保卫以色列之屋的功绩、宗教热忱、道德水准、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维护和平的努力”。此后教宗就能比较容易地做出更多让步了。与他的前任不同，现任教宗的目标在于改革各个修会，而不是消灭它们。他明白，如果执行之前教宗特使的裁决，条顿骑士团就会元气大伤；既然教宗致力于推动对异教徒的十字军圣战，他就不能让波罗的海最主要的

十字军群体遭到这样沉重的打击。于是他指派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去安排更多听证会，并敦促双方妥协。迪特里希·冯·阿尔滕堡于1342年去世后，骑士团和波兰国王就可以认真地展开谈判了。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死去之后，新的领导人才能为这场没有赢家的冲突寻求解决之道。

与卡齐米日大王议和

1342年6月，鲁道夫·科尼希当选大团长。关于鲁道夫早年生涯的信息相对较少，我们知道他来自下萨克森，曾驻扎在普鲁士（这很罕见，因为来自低地德语区的骑士一般会被派往立窝尼亚），当过袍服总管和总司令。他的政策是寻求与卡齐米日大王议和，这在一年之内就取得了成功。

1343年的《卡卢什条约》建立在三个提议的基础上：首先，马佐夫舍和库亚维的公爵们（如果卡齐米日大王生不出儿子，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放弃对西普鲁士的全部主张权；其次，波美拉尼亚公爵博古斯瓦夫五世，即卡齐米日大王的女婿和另一个潜在的继承人，承诺捍卫和约，不管谁继承了王位；第三，卡齐米日大王让波兰各城市和大贵族宣誓守护和平，认可和约的有效性。鲁道夫则承诺归还马佐夫舍和库亚维。

一场隆重而华丽的仪式宣告了二十年战争的结束。不久之后，一位编年史家写道："教宗终于解除了对普鲁士的禁止圣事法令。"《卡卢什条约》结束了东北欧两大罗马天主教势力之间的武装冲突。尽管和平不可能永久维持，但这已经非常具有决定性了。双方之间已经没有能让他们再起冲突的根本性理由。条顿骑士团希望向东北方攻击立陶宛人，而卡齐米日大王打算去东南方对抗鞑靼人。位于两者之间的马佐夫舍和库亚维仍然在皮雅斯特诸侯的控制下，通常他们多多少少都是中立的。

战争年代终于结束了。很多历史学家以为这个战争年代涵盖了整个世纪，但实际上只有二十年。条顿骑士团得以再次开始针对萨莫吉希亚人的十字军圣战。这一次，就连对异端和非基督教思想最为同情的修会——方济各会也不会干预他们。这是因为大约在与格迪米纳斯去世差不

多同时的1340～1341年，有两名方济各会修士在维尔纽斯殉教。从那时起直到1387年，方济各会似乎都没有去过立陶宛都城。

利用1337年巴伐利亚公爵参加十字军的机会，条顿骑士团向皇帝提出申请，获得了三块小的边境领地，这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8]。这些领地再加上1257年明道加斯国王的封授，似乎确认了骑士团有权征服萨莫吉希亚。现在，大团长只需要吸引足够数量的十字军战士来加强自己的兵力了。他发现，吸引人们前来参战的最好办法是利用人们对骑士精神的崇拜。

普鲁士的骑士崇拜

教宗克雷芒六世、英诺森四世和乌尔班五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公众对教会的尊重。他们放弃了关于皇帝选举问题的长期争端，大力整顿教会内部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他们还更加努力地支持十字军圣战，并停止在里加和但泽的问题上骚扰条顿骑士团。

没过多久，大量西方十字军战士便如潮水般涌入普鲁士，其人数比参加同时代其他地区十字军圣战的人数多得多。普鲁士的吸引力在于，十字军战士可以在这里参加盛大的宴饮和狩猎活动，同时打击基督之敌，并且开销合理，生活也相对舒适。1345年，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和他的儿子摩拉维亚的查理来到普鲁士，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一世、波旁公爵、荷兰伯爵、施瓦岑堡伯爵、荷尔斯泰因伯爵和纽伦堡伯爵（霍亨索伦家族）也来了。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么多显贵齐聚一堂。虽然严格来说，认为普鲁士已成为百无聊赖的欧洲骑士炫耀武力的场所有点夸张，但在1345～1390年，这个评判不算完全不公。

这些骑士代表了一群本质上与过去不同的人物。没过多久，荷兰伯爵威廉[29]和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就去世了。摩拉维亚的查理于1346年成为波希米亚国王，次年成为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但他没有时间继续参加十字军，拉约什一世也不会再离开他的匈牙利土地。简而言之，下一任大团长不能再指望招募到大贵族参加十字军，而只能吸引数量众多的小贵族来参加每年小规模的战事。他用骑士精神吸引他们到东方。

骑士的时代

从1310年到1350年的四十年里，条顿骑士团发生了很大变化。名望、财富以及与祖国的更多联系对他们的生活方式造成了深刻影响。恰在此时，骑士文化进入了一个空前穷奢极欲的时代，而条顿骑士们有充足的金钱过上贵族领主般的生活。另外，与波兰君主卡齐米日大王的竞争促使条顿骑士拉拢欧洲大贵族，而对萨莫吉希亚的十字军远征需要他们广泛招募小贵族。最终他们相信，达成十字军目标的最好办法是不再过分强调僧侣的价值观，而是更多强调骑士的价值观。这个时期的大团长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恰好就是一个有能力发展骑士文化的人。所以，1350～1400年的半个世纪成为波罗的海十字军的宗教和道德巅峰，但它的表现形式却是世俗的夸耀。

与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骑士排场不同，条顿骑士团的骑士活动专属于男性。条顿骑士团有一些女性成员，但那些修女都在医院工作，并且据我们所知都不是贵族。所以她们完全不适合参加宴饮娱乐。条顿骑士团的骑士活动颂扬的是与讨伐基督与圣母玛利亚之敌的圣战有关的美德。

对条顿骑士团而言，之前的几百年里发生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也从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而14世纪下半叶则是一个象征着胜利、获得公众赞许和在国际上威名大振的时代。这部分是由于其他十字军运动的失败（圣地陷落，突厥人占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以及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因为英法百年战争而放缓）而形成的对比：至少有一桩十字军圣战取得了成功，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圣战是骑士崇拜的一种表达，而正是这种崇拜给14世纪贵族社会赋予了意义。骑士精神和十字军圣战不是良好治理或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它们对骑士很重要，因为骑士在政府、经济生活乃至战争中的重要性都在下降。骑士精神是代价

昂贵且不切实际的，但这恰恰就是它的吸引力之一：新的职业阶层没有财力来追求骑士精神，他们必须抢在人到中年之前发财致富；小贵族没有财力做出奢华的姿态，市民则需要把金钱用于投资；教士则往往宣扬与骑士精神迥然不同的道德和社会价值观。但即便这些群体也受到强调慷慨、效劳、荣誉、礼貌和优雅生活的骑士准则的吸引。简而言之，所有人都相信社会需要理想，即便这理想不切实际。而且，即便批评骑士精神的人也认同保卫基督教世界并抵抗其敌人的必要性。他们相信，战争胜利能更好地保卫西方基督教世界。“立陶宛之旅”能够为人们提供发扬骑士精神的空间，也能带来胜利。对很多真正笃信宗教的人来说，教会还能提供丰富的精神报偿。

这也许都是对黑死病的回应。这种由跳蚤传播的恐怖瘟疫导致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很多家族因瘟疫而灭绝，继承人有更多的钱可花，他们也不太倾向于储蓄。“吃喝玩乐”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反应，更加笃信宗教则是另一种反应，而去普鲁士参加十字军使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虽然此时十字军战士的数量再也比不上之前几个世纪，但在欧洲的道路上还是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乔叟的读者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序言里读到下面的诗句的，不会感到意外：

有一位骑士，是一位高贵的人物，

自从他乘骑出行以来，

始终酷爱骑士精神，

以忠实为上，推崇正义，通晓礼仪。

为他的主子作战，他十分英勇，

参加过许多次战役，行迹比谁都辽远，

不论是在基督教国家境内或在异教区域，

到处受人尊敬。

亚历山大城被攻破之时他就在场；

在普鲁士，许多次他坐过首席，

位居他国武士之上；

他曾在立陶宛和俄罗斯参加战事，

与他同等级的基督徒都比不上他所参与的次数之多。

“荣誉之桌”是为时人所熟知的东西（毕竟英格兰是亚瑟王的故乡），而即使最强大的领主应邀前来，荣誉的尊位也并非仅按照出身来分配，而是取决于战斗中的勇气。英格兰人常常将十字军东征视为一种纪念圣母玛利亚和圣乔治的宗教朝圣。在法兰西和德意志也经常能看到朝圣的骑士。他们是一种特殊的朝圣者，因为他们不会赤足行走、严守清贫与谦卑，而是威风堂堂、大事张扬。他们不参加祈祷守夜和斋戒，而是享受宴饮与富丽堂皇的舞会。这轮十字军的参与者处于骑士精神、夸耀与盛大景观的巅峰。经验丰富的老兵前来参与宴饮与狩猎，并赢得宗教上的好处，洗去致命的罪孽。年轻的骑士侍从也蜂拥前往普鲁士，希望能被一位著名武士乃至国王或公爵册封为骑士。

普鲁士文学中的骑士精神

诗歌和散文中都有对这种骑士精神的赞颂。在普鲁士，它已经激发了丰富的文学创作活动，尤其是在1320～1345年，骑士和神父们创作出了质量较高、对当地意义重大的宗教与历史著作。在两位自己就是作家的大团长路德·冯·不伦瑞克和迪特里希·冯·阿尔滕堡的鼓励下，普鲁士作家撰写了圣徒传，翻译了《圣经》的部分章节，还编纂了北方十字军的史书。他们用自己的中古高地德语方言创作，虽然成果不一定优秀，但在文学上雄心勃勃。不过，没有受过正式修辞学训练的人有这样的缺点也不足为奇，他们的长处更多在于激情和勤奋，而不是高深的思考。我们也许可以对他们的诗歌成就不以为然，但在普鲁士这个地方能有文学活动存在就已经让人震惊了。战争通常与精致的文学品味不相容。照搬故乡的骑士文学和宗教文学肯定轻松得多，但条顿骑士团没有这么做，而是创造了符合自己需求的文学。

普鲁士的文学创作活动昙花一现。它在13世纪末集中爆发，在14世纪中叶之前成熟，然后迅速地衰败，于1410年的大事件之后消亡。从各家修道院和私人图书馆保存的图书清单来看，普鲁士文学的衰落是因为作者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军事修会的有限需求，而不是出于对文学本身的兴趣而写作。在鲜有大型图书馆的1394年，玛利亚堡收藏了41册拉丁文书籍和12册德文书籍，这在北欧已经算是一笔规模不俗的图书收藏了。

这些作家的一般目的是用诗歌鼓励读者和听众效仿前人的壮举。在组织有序的骑士团修道院里，通常的习惯是，大家聚在一起沉默地就餐，由一名神父为大家朗读圣徒传、《圣经》故事或骑士团历史。朗读的重点是《旧约》某些章节（犹滴传、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尼希米

记、大卫传、约伯记、马加比书和历史部分）的译本，与《新约》相比，这些篇章与骑士团的军事传统更为吻合。事实上，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中世纪人经常更喜欢《旧约》而不是《新约》，条顿骑士团尤其如此。摩西、所罗门和大卫是骑士能理解的人物，士师[30]的规矩则很像他们每天遵从的制度。他们能轻松地理解上帝选民与其诸多敌人之间战争的核心要素。

相比之下骑士们对《新约》不是那么关心。虽然他们对基督的故事，尤其是神迹、耶稣受难和最后审判感兴趣，但他们更容易设想自己身处哈米吉多顿[31]之中。普鲁士最早的翻译文本之一是《启示录》的一个散文版，这就显得颇为恰如其分。圣徒传奇，尤其是那些为了信仰而牺牲的殉道者的故事特别受欢迎。他们还纪念本地圣徒多罗特娅[32]（1394年卒于马林韦尔德），并记载她的神迹以教育后人。

在骑士团之外，几乎无人阅读和使用当地文学。教育是主教和教士的职责。神父们攻读神学硕士学位，是为了在教士的等级当中攀升，也许有朝一日能当上主教，骑士则聆听通俗的史诗和歌谣：人文主义教育还是未来的事情。人们学习文学是为了把它当作语法指南，然后便会尽快将其抛弃。即便如此，多年以来还是有成百上千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从普鲁士和立窝尼亚前往国外深造，其中大多数人去了意大利，那里的大学最出色，也最有名。博洛尼亚大学吸引的人最多，不过后来也有很多人去14世纪后半期建立的那些德意志大学。条顿骑士团曾考虑在库尔姆创办他们自己的大学，并于1386年获得了教宗许可，但最后没有落实。

我们顶多可以说，普鲁士这个偏僻的小地方也曾有过自己的经院文艺复兴，其雄心壮志和成绩既令人印象深刻，但也十分有限。

圣母玛利亚

普鲁士文学当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完全没有爱情诗歌。骑士们年轻时成长的宫廷恰恰是被爱情诗歌主宰的。爱情诗歌竟然能被完全压制，这足以证明条顿骑士团宗教习俗的严峻。

历史上，骑士团认为圣母玛利亚是理想的女性，并专门尊崇她，毕竟骑士团的全名就是耶路撒冷圣玛利亚医院德意志兄弟骑士团，所以骑士们自认为是圣母玛利亚的战士。一位现代文学史学家发现这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因此评论道："似乎任何信奉玛利亚的骑士在设想宗教文学作品的时候，都一定会把圣母玛利亚拉进去。"

我们很难完整地评估骑士团对圣母和一小群女性圣徒（圣白芭蕾、圣多罗特娅）的尊崇，但这无疑部分是为了将性冲动升华为宗教体验。骑士们始终要努力坚守贞洁。这些手段能帮助他们：经常狩猎和习武，保持体力活动；饮食简朴；规律的生活；日夜参加教堂礼拜；斋戒；守夜；并鼓励对圣母和其他圣人的崇拜，这些人物代表家庭、爱和死后的未来生活。另外，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也是传统浪漫诗歌自然而然的巅峰，这些诗歌把女性美德抬高到任何凡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这种对女性的理想化很容易转移到终极的母亲形象，即圣母身上。最后，圣母还具有一种纯粹的宗教意义，即她保护和拯救受苦受难的人类。条顿骑士团的战士们认为自己是为了她的缘故而自愿受苦，他们的苦难既包括日常生活的严酷，也包括战死沙场的可能性。

1389年，西方的十字军宣传作者菲利普·德·梅齐埃在对波罗的海地区圣战的描写中写到一场梦，梦中上帝指引他在真理女王和她的女官正义、和平与慈悲的陪同下游历世界。作为骑士文学，这部作品颇有可取之处，但它的灵感来源是法兰西，不是普鲁士。它只是间接反映了条顿

骑士团的骑士价值观。

条顿骑士团喜欢世俗文学，但尤其喜欢描写战争、英勇壮举、幽默插曲和简短冥思的史书，比如思考上帝的公正，以及人类的能力有限，所以不足以理解上帝为什么有时给他们胜利、有时却让他们失败的题材。关于萨莫吉希亚边境战争的故事非常详细和直白，其所提供的教训可在将来的作战中作为参考。

条顿骑士团慷慨大方地赞助诗人。总财务官在玛利亚堡的账目（1399～1409）存有多次付钱给游吟诗人、弄臣、歌手、演说家、乐师和艺人的记录。这些年里的大团长康拉德·冯·容金根本人就是艺术赞助者，他还需要艺人来招待访客与十字军战士。但总财务官的账目可能更多反映的是骑士团晚期更世俗化的宫廷生活，而不是五十年前的那个时期。这样的开销水准不一定能代表1350年的情况。

不计其数的诗歌提到了音乐、歌曲和舞蹈。骑士团的娱乐活动里没有女性，不过一位晚近得多的历史学家的通俗著作里讲到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引领一位贵妇去舞厅参加正式舞会。十字军战士在前往柯尼斯堡途中在各城市过夜的时候，世俗贵族和市民为其举办舞会作为娱乐。客人则经常带来游吟诗人。来自著名宫廷的十字军战士还会带来他们最优秀的乐师与歌手，在北方的漫长冬夜宴饮时让这些艺人歌颂他们的威望。驰名国际的法兰西诗人纪尧姆·德·马肖也去过普鲁士。条顿骑士团也有自己的鼓手、号手和笛手，他们在每一次作战时奏乐。每次军队开进荒野的时候都要演奏铜管音乐并击鼓，但这都是军乐，不是专业的娱乐项目。最后，在频繁的祈祷和弥撒期间也有音乐。在大修道院里有合唱队唱弥撒，骑士团的神父免费教市民的儿子们唱歌，条件是他们要参加宗教礼拜。

我们有必要记住，按照现代的标准，条顿骑士团是一个宗教组织。它将宗教虔诚与对政治谋划的热衷、好战与对狩猎、美食和娱乐的喜爱

结合在一起，这表明了人性的复杂，而不是单纯。如果有的时候从文献证据看，这种复杂人性的某一部分显得比其他部分更突出，我们必须对其审慎以待，因为什么东西被写下来成为文献证据并且保存至今，往往是由一时的偏好和机缘决定的。不过，留存至今的文献表明，骑士团成员有着深切的宗教感情。

同时，也有证据表明，骑士团越来越喜爱世俗的夸耀。这更多表现在建筑而不是文学作品中。条顿骑士团让同时代人为之震撼的最主要方面就是他们在建筑领域的成就。

城堡与骑士

1320年之后，普鲁士心脏地带遭到异教徒大规模袭击的危险几乎不复存在。在随后三十年里建造的城堡反映了军事需求的变化。早期那些简单的方形土木城堡被淘汰或得到了扩建（尤其是居住区），这令骑士团的修道院变得更舒适和方便，可供驻军和访客使用。中庭周围环绕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砖石建筑，包括宿舍、小礼拜堂、会议室、食堂，二层往往还有一个小的娱乐区。指挥官的私人住所一般也在二层。底层是工作区：啤酒作坊、面包房、办公室、装备仓库、修理作坊与火药库。地下室则有储藏区、厨房和中央供暖设施。

1320年之前建造的城堡主要是为了应对战争，所以它们的特点是城墙厚而坚实，有坚固的高塔。1350年之后，城堡的设计师（显然是学过建筑学的教士）开始强调舒适与美感。他们建造的塔楼高可达55米，柱顶有装饰，拱门有雕饰，窗户为哥特式，还有卫浴设施。

普鲁士建筑的巅峰之作是玛利亚堡。大约1320年，卡尔·冯·特里尔开始扩建这座方形小城堡，因为那里简朴的礼拜堂、食堂和宿舍不足以接待大批访客。他的建筑师参照的是最新的法兰西设计。后来的大团长们从阿维尼翁借鉴了一些设计，阿维尼翁教宗们建造的宫殿是当时的奇观。卡尔为玛利亚堡设计的格局是：一个中庭，周围是多层的红砖建筑。所谓“高城堡”边长52米，墙壁开有射孔，有哥特式窗户和门廊。北门十分雄伟，高14米，非常适合安排盛大的入城式，也依旧易守难攻。庭院周围是两层的走廊，有屋顶可抵挡风吹日晒，饰有石柱和哥特式的开口，审美效果颇为和谐。建筑高四层，屋顶铺瓦，间隔设计巧妙，远看去仿佛一座建筑摞在另一座上面，直冲云霄。城堡内外都成功地营造了宏伟的观感：一堵又一堵墙，一座又一座建筑，每一座都仿佛摞在前

一座的顶端，全都用暗红色砖砌成，整体设计风格协调统一。

带有宽大拱顶的低矮地下室提供了一些大房间，可用来储藏物资，或当作手工作坊、关押少量犯人的牢房、金库、厨房，也可容纳火炉。公共办公室在底层，这样访客和骑士都能轻松找到。

修道院在二层，它的北翼包含一座规模可观的玛利亚礼拜堂和会议室。礼拜堂的入口是装饰华美的“金门”，直到15世纪才完工。为了透过大型哥特式窗户获得更良好的采光，礼拜堂从城堡方方正正的轮廓上突露出来。礼拜堂长38米，宽10米，高超过14米，有一种新型的拱顶：从浮凸饰处伸出8根弯梁，伸向墙壁一半高度处的托臂，在天花板构成一种复杂而美观的星形图案。圣玛利亚礼拜堂下方是圣安娜礼拜堂，那是大团长们的安息之地。

在商议大事的会议室有另一种效果惊人的创新型拱顶，它以三根狭窄的中央栋梁为基础，弯梁构成一系列三角形，制造出一种宽敞舒适的感觉。它美观的比例（2×2.5）也有助于营造气氛，适于进行和谐的商讨或举办令人难忘的招待会。

建筑师扩建了东翼和南翼的宿舍，建造了休息室，并修建了通往墙外厕所的走廊。神父塔雄踞于城堞之上，能够俯瞰周边的平坦乡野与河流，视野极其开阔。

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开始了“中城堡”的建造，它的面积比“高城堡”大得多，但较低矮，有一个很大的庭院。访客走进主门便看到左侧的大食堂，还有大厨房、医院和客房。在右侧的河边是大团长的宫殿。径直向前则是“高城堡”的城墙和主门。大团长的宫殿高五层，是中世纪最壮观的宫殿之一。多座砖砌塔楼的窗户上有显眼的垂直线条，屋顶是尖的，塔楼上的哥特式装饰能一下子吸引每一位访客的注意力。城堡内部有美妙的拱顶，和城堡的外表一样美观。大房间优雅而舒适。朴素的

砖块和装饰的严峻风格制造出了一种简朴的气氛，与门窗周围的哥特式细节的富丽堂皇形成鲜明对比。其他地方也凸显了一种清教徒般的克制，把错综复杂的弯梁衬托得更为突出。

“中城堡”竣工之后，立刻又修建了“低城堡”。之所以修建这个，是为了将所有附属建筑都纳入防御体系。“高城堡”和“中城堡”可以分别独立防御，但将它们联合起来，城堡就更加易守难攻。城堡后方的城镇有自己的城墙和塔楼，而且整座城堡得到河流与复杂的护城河体系的保护。三座城堡的总占地面积超过18公顷。从河上接近的访客可以看到坚固的城墙延伸到狭窄河滩，而且城墙距离河岸足够远，让船上的人无法从桅杆跳到城墙上。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码头，但在船只靠岸的地点有一座坚固的设防水门。从陆路来的访客会经过连续多道防御工事，随着他们不断深入，工事的守备也越来越森严。

玛利亚堡的庞大规模和复杂程度令到访的十字军战士和外交官感到震撼。1410年玛利亚堡首次遭到攻击的时候，整个防御体系的有效性得到了证明：数千守军击退了兵力远远超过他们的波兰和立陶宛军队。

玛利亚堡的设计考虑了舒适性。城堡内有至少五座独立的澡堂，可供这里的八十名骑士、大团长、医院、仆人和访客使用。每座澡堂都有热水浴室、蒸汽浴室和浴缸。澡堂配有专业的仆人，他们懂得无痛放血和热敷的技法。在潮湿的北方气候下人们容易感冒，所以热敷治疗很重要。城堡内还有十九口石砌的水井以及多处厕所。根据现代人的测试，玛利亚堡的中央供暖系统能把室温维持在20摄氏度。14世纪的仆人也许还能把房间弄得更暖。所有建筑之间的走廊都有屋顶，所以骑士们不会淋雨，在站岗时也不会过于难受。

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作为这座要塞的建造者，为玛利亚堡赋予了自己的个性。这让他声名远播，甚至传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界以外。他的继任者改进了玛利亚堡的装饰和舒适性，并紧跟潮流，时刻采用最

新的改进手法。

骑士精神与装饰艺术

条顿骑士团宫殿、礼拜堂和大教堂的装饰没有亦步亦趋地照搬意大利和法兰西蓝本，而是根据普鲁士的气候条件和建材得到了调整。普鲁士缺乏石料，所以负责装饰祭坛、墙壁和门廊的雕刻师遇到了很大挑战。他们选择的解决方案五花八门：有的艺术家用粉饰灰泥，有的用赤陶；有的从哥得兰岛进口石灰岩；有的用椴木。遗憾的是，留存至今且状态良好的雕像不多。较高的湿度对木材和湿壁画的保存非常不利，粉饰灰泥和赤陶倒是能抵抗水汽的侵蚀。镶嵌画则是对墙壁和地板的有趣装饰。尽管严格的宗教限制不鼓励描绘动物、植物或任何现实物体，但砖铺地板仍既美观也易于清洁。

普鲁士各地的大教堂和普通修道院都强调壁画，骑士团的修道院里却没有这种装饰。这有点让人意外，因为普鲁士的四个主教区中的三个由骑士团提供神父，他们的艺术品位按理说应当与修道院礼拜堂的设计师相同。但这里存在一种重要的差别。大教堂的设计深受意大利、阿维尼翁和波希米亚的影响，主教和教士比骑士团的骑士与神父有更多机会去这些地方。他们显然在意大利、阿维尼翁和波希米亚对自己亲眼所见的奇观深感震撼，尤其是查理四世在位时期，曾有很多意大利艺术家在波希米亚活动。主教和教士想要的是对波希米亚三联画与湿壁画、祭坛与圣物箱的精妙复制。他们尽可能模仿了卡尔施泰因[33]的查理四世珠宝礼拜堂（以亚瑟王为主题）。他们还赞助来自科隆和其他德意志城市的艺术家。玛利亚堡的总财务官账目告诉我们，大团长乌尔里希·冯·容金根在雕塑、绘画和泥金装饰手稿上花费甚大。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普鲁士艺术品只有少数能留存至今，但如果我们能以这少量的艺术品为基础进行推断，那么中世纪普鲁士修道院和教堂收藏的艺术品一定很了不起。如果作品的质量不是很高，如柯尼斯堡附近一座小教堂内描绘骑

士的壁画，艺术家（或其恩主）便会写道："胆敢批评本画的人要受诅咒！"

条顿骑士团的绘画的重要性较低，其创新性也不如建筑，这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条顿骑士团的军官不像他们的主教那样对宗教艺术感兴趣。其次，骑士团对装饰艺术有着清教徒一般的态度。清贫是骑士团成员的第一个誓言，普鲁士的另外两个主要修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也宣誓守贫。波兰北部的主要修会熙笃会非常依赖在建筑中使用白石灰来赋予他们的教堂以一种朴素和严峻感。第三，大团长希望用"文化帝国主义"来震撼到访的十字军战士、邻国王公和敌方酋长，而实现这种目标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宏伟的城堡，而不是精美的绘画或优雅的雕塑（更不要说诗歌和音乐了）。在修道院的文化生活中，绘画和雕塑只能居于次要位置。

如果骑士团的规矩允许比武，这种对军事艺术的强调可能会更突出。虽然大团长们经常无视规章制度的字面约束，但他们不允许比武，因为比武是代价昂贵又费神费力的消遣。如果他们举行比武大会，就逃不过教宗的注意；他们也不能解释说比武是为了作战而训练；而且假如条顿骑士倒在法兰西、英格兰或波兰武士的长枪下，就会损害骑士团的声誉。

艺术与建筑的分期

普鲁士的艺术和建筑很容易分类。上文描述的是1300～1350年的作品。另一个显著的时代是1400～1450年，这对条顿骑士团来说是一个充斥着失败和经济困难的时代，这一时期对艺术的赞助主要来自城市。但泽成为整个普鲁士的文化中心，随后是托伦、玛利亚堡、埃尔宾和柯尼斯堡。第三个时代即1500～1550年则反映了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学者与宗教改革的主宰地位。在这个时期有很多哥特式艺术珍品被毁。放弃罗马天主教引发的暴乱导致14世纪的很多精美画作与雕塑毁于烈火。

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人恣意掳掠，普鲁士有更多文化珍品被毁。在弗里德里希大王和拿破仑的时代，又有一些艺术品消失。疏于保护对艺术品的破坏可能比战乱更严重。19世纪民族主义者对艺术品的修复往往很蹩脚，其结果反映的更多是他们自己的艺术品位，而不是中世纪的艺术品位。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很多城堡、教堂和城市造成了严重破坏。在战火中幸存的大批艺术品被从普鲁士运走，且始终没有归还。值得庆幸的是，波兰的艺术品修复工作者已经把现代的但泽（波兰语名为格但斯克）和玛利亚堡（波兰语名为马尔堡）变成了旅游中心。

表达骑士精神的钱币

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就任大团长期间，铸币艺术经历了第一次重大发展。尽管条顿骑士团在一个多世纪里奉行审慎的货币政策，但政策仅限于确保各个民间铸币厂生产统一的货币，1马克折合720芬尼。各城市流通很多外国钱币，骑士团则只是缓慢地开始自行生产大量薄片币（一种单薄的银币，由于压印图案的时候力度过猛，使图案都被压到了另一面）。尽管我们无法确定大部分薄片币的年代和产地，但我们知道在库尔姆、托伦、埃尔宾和其他一些城市有过铸币厂。图案为“盾牌上的条顿骑士团十字架”的薄片币可能是为了刻意宣传十字军运动而铸造的。这似乎是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的货币改革的一部分，他在约1350年发行了先令。先令是一种较大的钱币，正面有大团长的盾牌和姓名，反面是十字军的十字架。这种钱币很美观，1马克折合20先令。它成功地为骑士团提供了宣传效果，用视觉证据来宣扬国家的富庶。

奇怪的是，大团长们没有像立窝尼亚团长们那样将自己的私人纹章用作钱币图案。这可能是为了向回避炫耀与虚荣之罪孽的传统妥协，也有可能是为了强调钱币背面的箴言：每一枚钱币都是“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的货币”，因而是值得信赖的。

骑士精神的衰落

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生活的时代非常适合他在国际上扬名立威。在他的时代，许多英雄人物得到颂扬，如黑太子、贝特朗·杜·盖克兰[34]和约翰·钱多斯爵士[35]，他们都参加了英法百年战争。也许当时的人们如此尊崇这些骑士，是因为英雄已经所剩无几。在百年战争期间开始使用的新战术让骑士很难扬名了，因为弓箭手和火枪手能在很远的距离之外射倒那些想当英雄的人。战争变得非常讲求实际，敌人会杀死骑士，而不是俘虏他们换赎金；出身低贱的士兵渴望的是战利品，而不是荣耀。就连经常参加比武大会的专业人士也告诫业余爱好者不要参加。意大利的形势发展同样令人担忧。城镇和王公招募雇佣兵替他们打仗，很多高贵的骑士变成了兜售武艺和服务的雇佣兵；因为雇佣兵的目标是活下去领到军饷，所以他们避免正面交锋，并拒绝在防御力量不足的城堡死守。一掷千金、沉溺于欢歌宴饮、不顾个人安危就快快活活地奔赴战场、只要能赢得荣誉就不管明天如何的那些英雄好汉，如今在哪里呢？

快到1400年的时候，中世纪的骑士观念开始衰败。在骑士精神仍然繁盛的地方，它变得浮夸而不切实际，更多地反映了文学理想而不是真实生活。话又说回来，除了在少数国王和诗人的脑子里之外，骑士精神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但对尊重骑士精神之理想并对其寄予憧憬的贵族与平民来说，它就是真实的。那些人幻想着一次伟大的十字军圣战，他们的功业将消灭他们生活中一切粗陋和凡俗的东西，并让他们青史留名。

如今十字军战士能做的就是去西班牙或普鲁士武装朝圣，在那些地方至少还保存着十字军的精神。尽管这两个目标缺乏收复圣墓能够带来的情感冲击和宗教意义，但打击十字架之敌、保护遇险的基督徒使其免

受陌生强敌的侵害，至少能给十字军战士带来一些满足感。西班牙的十字军圣战有一个好处，就是意大利、法兰西和不列颠群岛的骑士比较容易抵达那里。但北方人不喜欢西班牙那种打了就跑的战术。苏格兰人带着罗伯特·德·布鲁斯的心脏去讨伐摩尔人的悲剧命运人尽皆知[36]：苏格兰人稳步推进，却发现自己被友军抛下了，于是被排山倒海的穆斯林轻骑兵包围。因此，很多人更愿意去普鲁士作战。

条顿骑士团很幸运，因为普鲁士的财富和贸易欣欣向荣。鼓励移民和贸易的政策收获了丰厚成果，骑士团可以获得大笔税金和廉价农产品。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有的是钱来建造恢宏城堡、为宴会厅添置家具和美食，以及雇佣艺人。他的访客有机会见到欧洲各地的伟人，甚至包括公爵和王储。年轻的骑士在这里可能结交到有价值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他在回家时带去的那些关于伟人和伟业的激动人心的故事，可以在随后几十年的漫长冬夜得到生动的传颂。袭击萨莫吉希亚的行动很像追捕犯人，只不过十字军战士追捕的是武艺高超、坚忍不拔的武装之敌。与这些勇敢而可敬的敌人作战并打败他们，是颇具荣耀的事情。最后，温里希还给年轻贵族提供了一条侍奉上帝的路，让他们保护基督徒，抵抗用死亡和奴役威胁德意志人和原住民新皈依者的野蛮敌人。旧的世界正在渐渐消失，一个新的、更务实的社会正在崛起。

骑士传统并非只有光辉的一面。骑士们屈服于世俗生活的诱惑，大团长们不断发出训示，禁止骑士穿着时髦服装、留长发、骑马在乡村转悠打猎或者经常去酒馆。不过，尽管有大团长的训示，尽管骑士团禁止拥有私人财产和金钱，个别骑士还是给自己添置了皮毛大衣、时髦的尖顶帽和带饰扣的鞋子。有些骑士甚至给自己的剑鞘添加装饰，并涂画自己的盾牌。骑士们在外表上都不能遵守修会的传统规矩，这反映了他们内心的缺陷。

另外，阶级传统让条顿骑士觉得自己比他们的臣民优越。他们傲慢

地对待自己的市民（贬低他们对十字军东征的贡献，向公民征收新税，就市民自治的程度与他们发生争执），渐渐地耗尽了自己的道德资本，在世人眼中留下了傲慢和野心勃勃的形象。但对信奉骑士传统的贵族来说，这些特点恰恰证明了他们的优越和价值。条顿骑士团更关心的是到访的贵族的意见，而不是臣民的意见，以及未来由市民阶层出身的历史学家会怎么描述他们。在他们眼里，勇气、力量和荣誉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国际十字军

从陆路和海路都很容易抵达普鲁士，但它又足够偏远，所以避开了西方权力斗争造成的动荡。英法百年战争、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衰浮沉、突厥人的步步紧逼和教廷的麻烦都没有影响到普鲁士，它是和平之地，只在一条战线（萨莫吉希亚）上还有战事，而且在源源不断从西方赶来的十字军的帮助下，它正在打赢这场战争。

这不再像13世纪中叶波兰骑士停止参加十字军时那样，是一支属于德意志人的十字军。有很多英格兰人赶来从军，还有一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奥尔西尼公爵和不计其数的法兰西王公。尽管波兰国王没有参加，但西里西亚和马佐夫舍的波兰人来了，还有波希米亚人、一些匈牙利人和少数苏格兰人。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国际十字军圣战。

这种十字军热情的核心是骑士的庆典仪式。每次进入萨莫吉希亚森林和沼泽的远征都给穷骑士侍从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光荣地、相对轻松地赢得骑士身份；富裕贵族则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热情好客和勇气。奥地利诗人彼得·冯·苏痕维尔特[37]描述了自己1377年寻求获得骑士身份的远征。他在叙述的末尾告诫读者：“我给贵族们一条建议：想成为优秀骑士的人，请把荣誉和圣乔治当作自己的伴侣。‘当骑士比当侍从好！’让他铭记这句话，凭借自己的意志和善行去奋斗；让他挑战别人的诽谤，他的威名就会与荣誉相伴。”

很多骑士侍从牢记这样的告诫。经验丰富的战士也是这样。14世纪，普鲁士成为展示骑士精神的主要场所。苏格兰、英格兰、法兰西和意大利的骑士都来到这里，他们曾见过每一位君王和每一位比武大会冠军。这样的骑士还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回到普鲁士参加十字军。

国际声誉

波兰人说条顿骑士团的图谋、行为和神学都是邪恶的，但这种指控最终于14世纪50年代中叶在主流教士和西方公众那里丧失了公信力。这部分是因为这个时代流行夸大其词，最轻微的错误也被放大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更重要的是，波兰人的指控与很多目击者的亲身体验相悖。去过普鲁士和萨莫吉希亚的骑士与高级教士亲眼看过圣战，在穿过德意志和波兰的旅行途中与当地教士和贵族会过面，因此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的裁决几乎全都倾向于十字军。

到15世纪初，情况就不同了。首先，从14世纪90年代开始，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立陶宛皈依了基督教，并与波兰王国关系紧密。条顿骑士团也占领了萨莫吉希亚。其次，突厥人在巴尔干半岛的进军使十字军的力量转移到那个方向；在抵抗突厥人的战争中，波兰有着潜在的重大意义。第三，力量平衡正在发生缓慢的变化，波兰虽然很难相信自己一盘散沙、羸弱不堪的漫长噩梦终于结束了，但还是在坦能堡战役（1410年）之后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势力。舆论总会尊重强者。

---

[1] 严格来讲，波美雷利亚（以但泽为中心）只是后来的所谓西普鲁士的一部分。

[2] 诺伊马克（德语的字面意思是“新边疆区”）在中世纪曾属于波兰，称为莱布斯领地，后成为德意志人的勃兰登堡边疆伯爵领地的一部分，在奥得河以东，今天大部分在波兰境内。

[3] 他是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的孙子，“黑色”的莱谢克二世的堂兄弟。

[4] 指的是格沃古夫公爵亨里克三世（1251/1260～1309）。

[5] 他是“黑色”的莱谢克二世的异母弟。

[6] 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二世（1271～1305）是奥托卡二世的独生子。波

兰的克拉科夫大公普热梅斯瓦夫二世于1291年将克拉科夫公国割让给瓦茨拉夫二世，而克拉科夫公国一般与波兰的宗主地位联系在一起。1295年，瓦茨拉夫二世加冕成为波兰国王。他还娶了普热梅斯瓦夫二世的女儿，他们的儿子后来获得匈牙利王位，与安茹的查理·罗贝尔争夺匈牙利统治权。瓦茨拉夫二世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捷克国王之一，他统治下的波希米亚王国是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多瑙河的大国，拥有富饶的银矿。但他死后，波希米亚王国就开始衰败。

[7] 斯武普斯克在今天波兰的北部，距离波罗的海不远，中世纪一度是汉萨同盟的盟友城市，1648年起属于勃兰登堡-普鲁士，二战后归属波兰。

[8] 卡卢什在今天的乌克兰西部。

[9] 施维尔查家族是13和14世纪在波美拉尼亚和波美雷利亚活动的一个著名的贵族家族，得名自施维尔查及其弟弟洛伦茨，他们原本是家臣（小贵族）和官僚，后来成为一方领主，在1295至1309年的波美雷利亚继承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以下称他为（矮子）瓦迪斯瓦夫一世。

[11] 迪尔绍是德语名字，即今天波兰北部维斯瓦河畔的的特切夫。

[12] 后来的历史证明，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解决方案，东西普鲁士的绝大多数德语人口，包括原始普鲁士人的绝大部分后裔，都被强行逐出。（作者注）

[13] 纪尧姆·德·马肖（约1300～1377）是中世纪法兰西的伟大诗人与作曲家，曾作为波希米亚国王约翰的秘书陪同他南征北战。马肖的作品以宫廷爱情主题的抒情诗为主，对乔叟、傅华萨等诗人有很大影响。

[14]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征服柯尼斯堡的苏联人将它更名为加里宁格勒，以纪念一个斯大林主义政客。柯尼斯堡的德意志元素即便在战争中幸存，也大多在战后被消灭。于是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和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的遗迹和条顿骑士团与普鲁士公爵们建造的纪念性建筑也全都销声匿迹。（作者注）

[15] 约翰国王的第一任妻子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1292～1330）是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二世的女儿。

[16] 指的是“勃兰登堡人”路德维希（1315～1361），勃兰登堡边疆伯爵（1323～1351，称路德维希一世）和巴伐利亚公爵（1347～1361）。他是神圣罗马皇帝路德维希四世的长子。路德维希四世皇帝将绝嗣的勃兰登堡封给自己的儿子路德维希。后来“勃兰登堡人”路德维希的异母弟“罗马人”路德维希继承

了勃兰登堡。

[17] 维兹纳在今天波兰的东北部。

[18] 即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国王查理一世（1288～1342）。他出身于那不勒斯王国的安茹王朝（起源于法兰西），祖母是匈牙利公主，所以对匈牙利王位有主张权。1301年匈牙利国王安德拉希三世驾崩，阿尔帕德王朝绝嗣，匈牙利陷入诸侯割据和混战，查理来到匈牙利，获得加冕，但没有获得所有权贵的支持。经过多年内战，查理一世终于平定匈牙利。他实施改革，加强中央王权，削弱贵族，开发金矿，发展经济，为他的儿子和继承者拉约什大王的治世奠定了基础。另外，查理一世和自己的姻兄弟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大王签订一份重大协议。该协议规定，查理一世的长子拉约什（卡西米尔大王的外甥）将在无嗣的卡齐米日大王死后继承波兰王位。于是后来波兰和匈牙利一度成为共主联邦。

[19] 维谢格拉德位于布达佩斯以北、多瑙河右岸。匈牙利国王匈雅提·马加什一世的夏宫在此地。

[20] 安德烈（1327～1345）为匈牙利国王查理一世的次子、拉约什大王的弟弟。安德烈娶了那不勒斯女王让娜一世（也属于安茹家族），获得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头衔。安德烈遭到谋杀，让娜一世可能是幕后指使。后来安德烈的哥哥匈牙利的拉约什大王多次入侵那不勒斯王国，不过失败了。后来他们的亲戚查理三世在匈牙利人帮助下打败并处死了让娜一世。
拉约什即后来的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波兰国王拉约什一世（大王）（1326～1382），匈牙利历史上最强大的君主，“其王国领土直达三片海洋”（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和黑海）。他没有儿子，将匈牙利和波兰分别传给两个女儿玛丽亚（及其丈夫西吉斯蒙德，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的儿子，后来自己也成为皇帝）和雅德维加（及其丈夫立陶宛大公雅盖沃）。

[21] 圣白芭蕾是基督教早期的圣徒和殉道者，可能生活在3世纪的黎巴嫩。她经常被刻画为带着锁链和一座塔，是军械匠、炮兵、工兵、数学家等的主保圣人。

[22] 普沃夫采在今天波兰的中北部。

[23] 作为波兰国王，他的称号是卡齐米日三世，也称卡齐米日大王。以下就称他为卡齐米日大王。

[24] 即“罗马人路德维希”（1328～1365），他是神圣罗马皇帝（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四世第二次婚姻的长子，后成为巴伐利亚公爵，称路德维希六世（1347～1365）和勃兰登堡边疆伯爵，称路德维希二世（1351～1365）。他娶了波兰的卡齐米日大王与阿尔多娜的女儿。

[25] 戈尔丁根是德语名字，即今天拉脱维亚西部的库尔迪加，曾为汉萨城市。

[26] 今天拉脱维亚的中部城市叶尔加瓦。

[27] 指的是“勃兰登堡人”路德维希。

[28] 有些历史学家对此文件的阐释是，皇帝将整个罗斯和立陶宛都赐给了条顿骑士团。这不大可能，因为条顿骑士团虽然野心勃勃，但也脚踏实地。（作者注）

[29] 即埃诺伯爵“勇敢的”威廉二世（1307～1345），作为荷兰伯爵的头衔是威廉四世。他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姻亲，所以在百年战争中与英格兰结盟。他三次去普鲁士参加十字军东征，还去过圣地。为了给这些远征筹资，他授予荷兰诸城市许多特权，所以荷兰城市有了很大发展。他没有子嗣，把领地传给了自己的长姐及其丈夫路德维希四世皇帝。

[30] 士师，或称民长，是古代以色列的一种军事和政治领袖的称谓。士师时期为约前1390年至约前1050年。据《旧约》中的《士师记》记载，以色列人在摩西和约书亚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强有力的领袖，因此以色列各部作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在出现危机时会特设一名士师作为领袖。它是一种既非选举制也非世袭制的职位，担任士师者被《圣经》描述为由耶和华选中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人。士师平时掌管民事诉讼，战时统领军队。撒母耳年老时立了两个儿子当士师，但他们不守撒母耳的道，以色列人就请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位王，士师时代结束。

[31] 哈米吉多顿是基督教《新约·启示录》所预言的末世末期善恶对决的最终战场。

[32] 圣多罗特娅（1347～1394）是德意志的著名隐士和圣徒。她出生于普鲁士的玛利亚堡附近，父亲是来自荷兰的富农。她年轻时曾看到幻象。她的九个儿女只有一人存活并加入本笃会。后来多罗特娅在马林韦尔德大教堂附近隐居，终生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鲽鱼》描写了她的生平，不过是从她丈夫的角度写的。

[33] 卡尔施泰因位于布拉格西南不远处，是一座大型哥特式城堡，1348年由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同时是波希米亚国王）下令兴建，1365年竣工。这里保管着帝国的皇室宝器、波希米亚王室珠宝、圣物等。

[34] 贝特朗·杜·盖克兰（约1320～1380），号称“布列塔尼之鹰”，是百年战争初期布列塔尼和法兰西的重要军事家，1370年至1380年担任法兰西总军务官。他对费边战略的灵活运用令法兰西在没有足够力量打败英格兰之前避免决

战，并成功拖垮了英军，同时让法兰西人夺回在战争初期失去的多数领地。在1364年的欧赖战役中，法军被约翰·钱多斯指挥的英军击溃，盖克兰被俘，法王查理五世用10万法郎巨款赎回了他。在卡斯蒂利亚（西班牙的一部分）的内战中，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和残酷的佩德罗这对同父异母兄弟争夺王位，英法各自支持一方，令西班牙成为英法百年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区，而盖克兰在那里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扶植恩里克为王。盖克兰最后病逝。因为他身为布列塔尼人而忠于法兰西，20世纪的布列塔尼民族主义者认为他是民族叛徒。

[35] 约翰·钱多斯（约1320～1369），科唐坦的圣索弗子爵，是出身英格兰德比郡的骑士。他是黑太子爱德华的好友，也是嘉德骑士团的创始成员之一。他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大败法军的几次著名胜利，如克雷西战役、普瓦捷战役和欧赖战役，都有钱多斯的很大功劳。最后他战死沙场，受到英法两国贵族的哀悼。钱多斯的传令官（姓名不详）写了一部《黑太子传》，是关于百年战争的重要史料。

[36] 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美国电影《勇敢的心》的主角之一）驾崩后，他的遗体接受了防腐处理，他的心脏被取出，装在一个银盒内。国王生前的忠实追随者和著名骑士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1289？～1330）将银盒拴上链子戴在自己的脖子上。道格拉斯等苏格兰骑士带着布鲁斯国王的心脏去伊比利亚半岛，参加卡斯蒂利亚对格拉纳达（伊斯兰国家）的十字军圣战，但在特瓦战役中遭到惨败，道格拉斯战死，不过布鲁斯国王的心脏被幸存者带回了苏格兰。

[37] 彼得·冯·苏痕维尔特（约1320～1395）是奥地利诗人和传令官，擅长写描绘贵族纹章的诗。1377年，他陪同奥地利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三世去普鲁士参加十字军东征。为了写诗，他到处寻访名人，并且擅长观察，所以他的诗歌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八 立陶宛的挑战

立陶宛的扩张

13世纪中叶，条顿骑士团说服他们的死敌明道加斯皈依基督教，并将他加冕为立陶宛的首任国王。条顿骑士团这么做是遵循在该地区的传统做法，力图让明道加斯相信，与十字军成为盟友而不是敌人对他有好处。在条顿骑士团的帮助下，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条顿骑士团停止从北方和西方袭击他的领土的情况下，明道加斯沿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弧线，将自己的国度扩张到受鞑靼人威胁的罗斯土地上。

对明道加斯来说，除了需要向自己的祭司和波雅尔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之外，皈依基督教的唯一不愉快之处，就是基督教神父要向他头上洒几滴水，以及他需要偶尔参加一些奇怪的仪式，听奇怪的音乐。他本身就奉行一夫一妻制，而且对任何宗教教义、不管是异教的还是基督教的都不感兴趣，所以他的行为方式与立场几乎没有变化。这对条顿骑士团不是好事，因为纯粹出于现实政治考虑的皈依没有扎实的根基。13世纪60年代初，明道加斯开始觉得当基督徒的坏处比好处多了，于是他就像当初接受天主教时那样轻易地重返异教，以安抚那些赞赏萨莫吉希亚异教徒打败十字军之行动的立陶宛贵族。然而这次回心转意仅仅在一小段时间内挽救了明道加斯，因为他的敌人将他刺杀了，不过他对罗马天主教的拒绝改变了波罗的海地区貌似注定要皈依天主教的历史进程。他的继任者在随后一个多世纪里仍然是异教徒，这主要因为他们的重要属臣相信原住民的神能给他们带来战争胜利，也因为他们的罗斯臣民更愿意容忍异教徒暂时统治他们，而不肯接受罗马天主教徒的帮助。格迪米

纳斯（生于1257年；1316～1341年为大公）是一位特别讲求实际的统治者，他的很多后代也是这样。也许欧洲其他地方找不到第二个家族能像这些才华横溢而足智多谋的立陶宛人那样纯粹根据私利采取行动。他们不会皈依罗马天主教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罗斯政策，但他们很愿意操纵西方基督徒对立陶宛的认识，让后者相信唯一阻碍立陶宛皈依的便是条顿骑士团的咄咄逼人。

立陶宛统治者的头衔是大公，他们的罗斯臣民很熟悉这个词，但理论上的头衔没有多大意义。大多数追随者和效劳者之所以忠于格迪米纳斯家族，是因为家庭关系以及官职与封赏的保证，而不是因为古老传统或宗教。很多立陶宛贵族为了抚慰他们担任统治者或驻军指挥官的城镇的罗斯臣民，接受了东正教洗礼；很多立陶宛贵族娶了基督徒女人，既有东正教徒也有天主教徒。也有贵族仍然是异教徒。异教无疑很有吸引力，尤其是考虑到它保证了立陶宛始终由立陶宛人统治。并且，如果要确保独立性很强的萨莫吉希亚人继续认可来自立陶宛中央山区的统治者，坚守异教是唯一的办法。萨莫吉希亚人会拒绝接受软弱的基督徒统治者，就像他们曾经拒绝强大的明道加斯一样。在萨莫吉希亚，异教并非奄奄一息。恰恰相反，异教徒对其宗教的热忱不逊于今天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之下目不识丁且没见过世面的原教旨主义者。

异教徒在重新掌权后烧毁了维尔纽斯的大教堂，用沙子覆盖其废墟，并在它上面建造了佩尔库纳斯神庙。这座雷神的神庙对异教徒的戏剧性震撼作用，可能和被它取代的基督教大教堂类似。按照传统，异教徒在圣林执行宗教仪式，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这座砖石神庙没有屋顶，而有十二级台阶通向巨大的祭坛。祭司可能在那里树立了木制神像，并维护着永恒圣火。这说明异教也在发展变化，它是一种动态的宗教，接受了竞争对手的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元素。

格迪米纳斯大公们在当时算是比较世俗化且宽容的，他们也以此为

豪。他们迷信，但并不想将自己的异教信仰强加于人，甚至也不愿和平传教。大公们允许方济各会修士在维尔纽斯维持一家礼拜堂供罗马天主教商人和使者之用，并且只有一次杀死了方济各会修士。大公们对东正教教士更宽容，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很多臣民是东正教徒。大公的一些鞑靼卫兵是穆斯林，他们居住在自己的社区并得到保护。因此大公们在名义上采取尊崇异教的政策，但对各种群体的传统很宽容。在东欧和中东欧，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政府与少数群体的领袖谈判，然后由这些领袖执行政府发布的法律与敕令。

但我们不要被这种务实精神误导。中世纪对群体的宽容和现代对个人选择的宽容不是一回事，和穆斯林的宽容也不同。穆斯林的宽容往往仅仅是允许其他宗教的信徒作为二等公民生活。这在当时已算慷慨，如此赞美当然恰如其分。

十字军重启圣战的努力

十字军内部的分歧导致13世纪末的一系列胜利戛然而止。在普鲁士团长控制了荒野（普鲁士与立陶宛和马佐夫舍的边境）、立窝尼亚团长征服了斯米伽利亚人之后，两地骑士团各自转入了守势。这是对当地局势的回应：波兰在重新统一；里加和里加大主教蠢蠢欲动；博尼法斯八世被绑架和教廷迁往阿维尼翁之后，教廷陷入动荡。神圣罗马帝国不够稳定，大团长无法像当初大团长与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那样与皇帝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聪明而强大的公爵和大主教们在领地之内静观其变，等待时局出现转机。

因此，条顿骑士团没办法像短短几年前那样构建足以取胜的联盟。里加人和大主教现在与骑士团为敌，立窝尼亚的德意志贵族和原住民部落更关注当地的内战。德意志和波兰的十字军战士已经多年不来普鲁士了。马佐夫舍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爵们曾在索多维亚战役中与条顿骑士同甘共苦，但如今他们已不愿意到涅曼河（梅梅尔河）以北作战。因为这些情况，条顿骑士团无法在萨莫吉希亚荒野展示武力，也无法压制那些支持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反叛的异教徒。

萨莫吉希亚人最终投靠了立陶宛的维泰尼斯公爵（1295～1316年在位）。他们做出任何决策前都要请祭司占卜，以咨询神意。维泰尼斯此前在蹂躏立窝尼亚。现在，异教徒联军攻击了斯米伽利亚、库尔兰和桑比亚那些皈依了基督教的原住民，条顿骑士团领导人几乎没有办法阻止他们的行动。这个问题变得十分严重，以至于1300年之后的每一位大团长都到北方来实地考察。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问题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将里加大主教及其臣民从敌人的联盟中分化出来。大团长们知道这最好是通过阿维尼翁而不是玛利亚堡来实现，于

是他们多次返回神圣罗马帝国，与政治和宗教界的要人商谈。

与此同时，骑士团在普鲁士边境巡逻，抵抗异教徒的侵袭。骑士团还越过荒野向敌人发动小规模袭击，迫使一些异教徒待在家乡保卫自己的村庄和田地。骑士团在普鲁士巡逻的主要基地是拉格尼特，它位于涅曼河左岸，距离河口约60英里，差不多在柯尼斯堡（普列戈利亚河畔）和梅梅尔城堡之间的中点，守卫着库尔兰湾入海口和通往立窝尼亚的沿海道路。这三个点大致构成一个三角形，代表着基督徒在河谷地带的势力范围。河流下游的蒂尔西特还有另一座颇具实力的城堡，在它的支援下，拉格尼特守军承担了边境战争的主要压力。在需要越过荒野进攻时，拉格尼特的城堡长官会动员桑比亚和纳坦吉亚的地方长官及其原住民民兵。他们的作战手段是掳掠敌人的牛群，烧毁房屋和庄稼，并劫持所有没有藏起来或者没有死于拘捕的人。按照当时的标准，这种作战手段并无不道德之处。当时的防御工事几乎坚不可摧，而领导者必须用战利品支付部队的酬劳，所以用上述手段拖垮敌人是唯一务实的策略。另外，十字军对自己和自己的臣民犯下的暴行的辩解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一个光辉的目标，即阻止异教徒袭击基督徒土地，并彻底消灭异教。

骑士团还以戈尔丁根、米陶、杜纳堡、雷泽克内、马林豪森和诺伊豪森为基地，发动类似的巡逻，监视立窝尼亚南部和东部边境。立窝尼亚团长曾将斯米伽利亚人安置在北方的米陶周边。他们原先的土地变成了森林和沼泽，非常荒凉，只有双方的侦察兵（他们都经验丰富、冷酷无情）会进入这个地区展开巡逻。立窝尼亚团长在冬季如果要与普鲁士联络，就必须派人穿过库尔兰，然后沿着海岸去梅梅尔。有很多船只从立窝尼亚各港口启航，但将书信交给这些船长的风险很大，因为里加此时正在反叛，而商人惯于抱团；此外，海路只有在夏天才会畅通。

多年来宣讲十字军圣战的人们告诉基督徒，十字架的敌人既是上帝之敌，也是人类之敌，所以异教徒、撒拉森人、教会分裂者和异端分子

不配生存。他们对基督教世界是一种危险，所以必须将他们消灭，就像必须杀死患病的羊以免它们把疾病传染给健康的羊一样。人们也许对这种理念怀有疑虑，但教会很久以前就已将其打消。教士宣称，基督徒针对异教徒的任何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是保护和扩张基督教世界的正当手段。他们引用圣奥古斯丁，宣称异教徒的整个人生不论行善还是作恶都是有罪的，因为他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没有懂得上帝的永恒真理。当然，基督徒也不能强迫异教徒接受基督教，而是应当像允许犹太人生存一样允许他们生存，并希望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有朝一日能最终皈依并得救；但在此之前，不能允许异教徒在社会上做任何可能引起基督徒仰慕的事，所以基督徒应当剥夺异教徒的财产和权力，消除他们的骄傲和威望，因此萨莫吉希亚异教徒无权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尤其是考虑到他们还在自己的国度迫害基督徒、阻挠传教。就是在这种论调的基础上，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于1226年颁布了《里米尼金玺诏书》，将普鲁士和其他异教徒土地封给条顿骑士团，亚历山大四世教宗（1254～1261年在位）也将骑士团征服的一切土地都封给他们。另外，因为异教徒是基督教世界的危险敌人，经常袭掠波兰、普鲁士和立窝尼亚，教宗们还批准了永久性的十字军圣战，皇帝们也敦促贵族和骑士参加十字军。所有地方的基督徒都有义务协助十字军打败危险的异教徒。多明我会修士是每一次十字军圣战的宣讲者，隶属于也是当时威望最高的修会，他们向潜在的志愿者保证，一旦十字军战士砍倒了上帝之敌，基督本人会将异教徒的灵魂丢进地狱之火。[1]

不过，宣讲十字军运动和招募十字军战士要比实际去杀戮萨莫吉希亚人要容易得多。立陶宛人的萨莫吉希亚分支从东方迁移到涅曼河以北的低地，但没有发展到沿海。他们生活在排水良好的内陆山区谷地，避开蚊虫密布的沼泽和茂密森林，这些蛮荒之地是他们周围的天然屏障。这片蛮荒之地几乎从来没有受过人类影响，这既是因为当地的宗教信仰崇拜森林诸神和精灵，也是因为萨莫吉希亚人害怕遭到危险邻居的攻击，所以砍倒了庞大的树木以封锁潜在的道路。十字军抵达之后，这片

野地上的林木变得更茂盛了。小规模的袭击队伍（往往由世代遭受立陶宛人袭击的原住民组成）会去消灭孤立的农庄，让当地的定居点锐减，等到十字军的大队兵马前来的时候，当地就没有多少能发出警报的异教徒定居者了。和中央高地的立陶宛人不同，萨莫吉希亚人缺乏有效的征税和兵役制度，所以无法维持零星的城堡作为侦察兵的基地。几年后，萨莫吉希亚西部的社区因为很容易遭到十字军从梅梅尔和库尔兰发起的攻击便被放弃了，部落民转而到更靠内陆的地方建立新的村庄。无人照料的田地很快变成了森林的一部分。后来，在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基督徒土地与萨莫吉希亚和立陶宛之间的每一条边境上，都出现了纵深达90英里的无人野地，只有几条小径可供通行。

立陶宛的维泰尼斯

到1309年，条顿骑士团再一次掌控了立窝尼亚的局势。他们未能打败里加人和维泰尼斯，但也不用担心吃败仗，普鲁士团长得以派兵到西普鲁士，首先驱逐了勃兰登堡边疆伯爵，然后赶走了波兰驻军。到1311年，普鲁士团长做好准备再次转向立陶宛并攻打格罗德诺，这是涅曼河上游的一个关键地点，守卫着通往沃里尼亚和马佐夫舍的最直接路线（无论水陆）和越过湖区去普鲁士的路线。

维泰尼斯现在是一位强大的领主。他的追随者和条顿骑士团的编年史家都称他为国王，但教宗和皇帝只承认他是大公，因为他们只承认基督徒君主为国王。维泰尼斯结束了立陶宛的暗杀和内战风波，凭借在立窝尼亚的胜利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是精明强干的统治者和狡黠的军事家，经常兵分几路，自己率领一支军队，然后用其他几路人马佯攻，让条顿骑士团难以弄清他的主攻方向；因为要防守的路线太多，骑士团经常猜错。维泰尼斯有一些基督徒盟友，如市民和里加大主教，他经常为了照顾与他们的关系假装寻求皈依。他在维尔纽斯和特拉凯[2]的宫廷里有一些方济各会修士，他们的说法让大家觉得维泰尼斯似乎真的对皈依天主教感兴趣。不过，尽管他给了自己的罗斯臣民和罗马天主教徒访客以信仰自由，他自己是虔诚的异教徒。他已经树敌很多，遭暗杀的风险也很大，一旦他表示要皈依，就更容易被暗杀，而萨莫吉希亚人也会坚决抵制他成为立陶宛全国领袖的企图。另外，他正是基督徒最害怕的那种异教徒：难以捉摸、危险、极其狡猾奸诈，这些品质在他身上肯定表现得淋漓尽致。若没有坚定的勇气和足以与他的死敌与挚友相匹敌的机智和残暴，他就不可能统治立陶宛。他是典型的异教徒野蛮人国王，既光辉又朴素，是十字军值得敬佩的对手。

条顿骑士团赞扬维泰尼斯的能力和勇气，但觉得自己比他更强，并对此引以为豪。1311年，骑士团得到了一个展示实力的机会。2月，维泰尼斯袭击桑比亚和纳坦吉亚，杀死许多普鲁士人，俘虏500人。十字军凭经验知道自己几乎无法事先阻止这样的进攻，他们顶多能组织一支警卫队专门提防此类袭击，向村民发出警报，让他们躲藏起来，并让民兵快速集中到预先约定的集结点。总军务官在得知袭击消息后就匆匆带领他的机动部队从柯尼斯堡赶来，集结民兵，追踪敌人。他知道，敌人的这种袭击队伍在分兵几路各自回家的时候最为脆弱。他趁着异教徒宴饮并瓜分战利品与俘虏的时候发起攻击他们，取得了这个时代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在大多数年份里，条顿骑士团每年都会发起至少一次冬季袭击。在冰封的河流与沼泽上，骑兵的效果很好，立陶宛人也不能像在夏天利用林木一样利用雪地来打埋伏。1311～1312年冬季，6名骑士率领400纳坦吉亚民兵穿过索多维亚荒野，来到格罗德诺，在号称无法通行的沼泽地绕路行进，迷路了两天。立陶宛人只是仔细地巡逻了所有的常规道路，于是他们对基督徒的突然袭击毫无防备。（骑士团领导下的）普鲁士人大开杀戒，烧杀抢掠、抓捕俘虏，杀死所有逃不掉的人，然后通过最快捷的道路撤退。他们为过去的苦难所做的恐怖报复让立陶宛人心中也燃起了刻骨仇恨。

现代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有时忘记了原住民诸部落之间的仇恨。这种报复的欲望与伤害传统敌人的渴望方便骑士团招兵买马、组织袭击并召集劳工来修建防御工事，但也直接导致了一些可怕的暴行。

骑士团袭击格罗德诺是对以军事胜利为威望来源、且以战神为主要神祇的维泰尼斯的直接挑衅。4月，他毫无预兆地率军深入普鲁士，一位编年史家估计他的兵力有8000人，这是当时常见的夸张说法。他在解冻时期穿过湖区，避开了条顿骑士团和马佐夫舍公爵派出的巡逻队，穿

过瓦尔米亚来到布劳恩斯贝格[3]城堡，辱骂站在城墙上的主教，并摧毁了沿海的每一个定居点。根据基督徒的记载，维泰尼斯特别敌视教堂，他亵渎祭坛、拆毁并践踏十字架，乱摸圣餐并对其吐唾沫，然后烧毁了教堂。一天之内他就掳走1200人，将他们披枷带锁地押走。当晚他嘲弄他们，问："你们的上帝在哪里？他为什么不帮助你们？我们的神在这一次和其他时候都是帮助我们的。"

如果维泰尼斯真的说过这话，那么他高兴太早了。他的军队实际上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瓦尔米亚的位置太靠西了。维泰尼斯往西打得越远，骑士团的原住民民兵就越有时间集结起来，也越容易追赶因满载战利品而行动缓慢的异教徒军队——在雪地里，异教徒军队的踪迹很容易被人找到。此时骑士团总司令正在集结一支大军，地点就在维泰尼斯离开普鲁士的必经之路上。

这是海因里希·冯·普勒茨克几十年来做梦都想得到的机会。现在他拥有80名骑士和数千民兵，占据了可以追上立陶宛军队的有利位置。运气好的话，他就能歼灭这支入侵之敌，也许还能杀死或俘虏他们的国王。

维泰尼斯也相信命运，但他明白运气具有可塑性，勇敢的领袖能够巧妙地塑造运气。他看到基督徒逼近，就命令部下在一座山顶上用树篱和树木临时搭建的护墙后摆开阵势。他一定以为基督徒不敢轻易进攻这样巩固的阵地，而且即便他被基督徒包围，他的手下还有掳掠来的牛群可以食用，而基督徒不可能携带很多给养。

海因里希迅速判明了敌人的策略。他更想在平坦地带作战，以发挥骑兵的战斗力，但他也愿意徒步作战。他命令贡特尔·冯·阿恩施泰因（那一代人当中最英勇的骑士）试探异教徒的防线。贡特尔的试探性攻击失败了，有40到60人战死，但他摸清了敌军的位置和兵力。海因里希在得到贡特尔的报告后，便命令发动总攻。

一位十字军诗人描述了一幅特别动人的景象：基督徒战士在进入阵地的时候听到被俘妇孺的哭喊、民兵当中他们的亲人的回答，以及备战的绝望之人的呐喊。后来骑士团可能会在用餐时朗读叙述这个场景的编年史，教导骑士及武士在面对这种情形时正确的态度是什么。这些段落对骑士壮举、勇气、公平、怜悯不幸者和侍奉教会与圣母玛利亚的强调能帮助我们了解十字军骑士的心态。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立陶宛方面的类似的编年史。异教徒只有口传文学，没有书面文学，而口传文学大多已经消失。

基督徒全军摆开阵势准备进攻，维泰尼斯辨认出了对手的大小旗帜。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对手是谁。他知道军事胜利不取决于人数，而取决于战斗力。骑士团城堡长官们的灰色军旗和总司令的白底黑十字大旗告诉那些知识丰富的异教徒，他们面对的是条顿骑士团的精锐。所以，当进攻者逼近时，那些没有那么勇敢（或者说最谨慎的）的立陶宛人开始寻找自己的坐骑，然后匆匆骑马逃跑。与此同时，被俘的女人挣脱了枷锁，在立陶宛军的后方制造混乱。维泰尼斯销声匿迹（逃跑）了，他的数千追随者战死。基督徒俘获了2800匹马、数千把长矛和剑，夺回了之前丢失的战利品和俘虏，并抓获了维泰尼斯的宫廷总管。一位编年史家写了一首胜利赞歌：“哦，上帝的高贵骑士，上帝必在人间与天堂嘉许你们。”为了纪念此次大捷，海因里希在托伦建了一家女修院。

这貌似一场压倒性胜利，但对整体战局没有多大影响，既是因为条顿骑士团没有足够力量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也是因为维泰尼斯逃走了。大公重整旗鼓，鼓励臣民坚决地守住要塞，并命令大家不要冒险。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年轻的骑士团城堡长官格哈德·冯·曼斯菲尔德勇敢地率军进入立陶宛，异教徒追踪他的小小队伍越过了立陶宛边境。曼斯菲尔德希望与对方决战，但异教徒害怕埋伏，不肯接受。但他们询问他的姓名，并警告他，如果他再带这么少的人进入他们的领土，就活不了多久了。

事实上，只有占领了关键城堡，才能取得重大进展，而攻打城堡非常困难。这在立陶宛尤其如此，那里的要塞位于崎岖难行的荒野之上，所以进攻一方必须从远处长途运输兵员、给养和攻城武器。占领城堡最轻松的办法是赎买或者里应外合。

里应外合的效果最好。如上文所述，海因里希俘获了维泰尼斯的宫廷总管兼格罗德诺的城堡长官。如果海因里希用此人来换赎金，就可以换回一大笔钱，或者拿他交换俘虏。但此人承诺获得自由后就把格罗德诺交给骑士团，海因里希同意了。但他也必须尽快做出决断，让这个城堡长官能解释自己之所以迟归，是因为躲藏在树林里或者迷路。不过，即便如此骑士团也不一定能拿下城堡，因为维泰尼斯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用来消灭潜在竞争对手，以给格罗德诺换一个新城堡长官的方便借口。海因里希释放了此人，条件是把十字军战士偷偷带进城，里应外合，将其占领。不足为奇的是，这个城堡长官食言了。他“出卖”了基督徒，把他与骑士团的安排告诉维泰尼斯，并在格罗德诺附近设下埋伏等待普鲁士军队到来。

海因里希也没有忽略这场行动的风险。他知道这个宫廷总管可能是个高明的骗子。我们不知道宫廷总管是如何说服总司令和他的议事会的，但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反水变节是常有的事，个人恩怨比对氏族的忠诚更重要，而野心又往往会压倒忠诚。并且，异教徒的荣誉法则强调遵守誓言，海因里希无疑迫使俘虏发了强有力的誓。海因里希也有权对宫廷总管的未来做出慷慨的承诺，甚至可以承认他为立陶宛的未来统治者之一。简而言之，海因里希有很好的理由信任这个异教徒领主，但也有很好的理由不对他全盘信任。

海因里希率军来到接近格罗德诺的地方，这时他的侦察兵遇见一个老人，对他严刑拷打，直到他供述称立陶宛人正在一条河附近埋伏，准备等基督徒军队半数过河之后发动进攻。海因里希遵守承诺释放了老

人，然后率军撤退到安全地带。

海因里希夺取格罗德诺的下一次尝试在5月底，他召集了140名骑士、一支由原住民骑士和民兵骑兵组成的强大部队以及2000名步兵。这些步兵走的路线可能与骑兵略有不同，他们乘小船通过湖泊、河流和沼泽。骑兵在穿过茂密森林接近格罗德诺时，遇见四个异教徒侦察兵。他们杀死其中三人，俘获第四人，并得知异教徒不知道他们正在逼近。自以为高枕无忧的维泰尼斯对危险毫无察觉，他甚至派遣五十人（包括那四名侦察兵）去建立了一处狩猎营地。海因里希歼灭了敌人的先遣部队，然后渡过涅曼河。他留下20名骑士和所有步兵去守卫船只，然后穿过乡村，沿途烧杀抢掠，对老人和妇女也不留情。他俘获700人，至于杀了多少人，“只有上帝知道”。

这几次胜利让海因里希·冯·普勒茨克成为大团长职位的有力竞争者（前一任大团长西格弗里德·冯·福伊希特万格去世了），但他没有当选，部分因为他占领但泽和西普鲁士的举动引发了争议，部分因为他生性专横跋扈。不管怎么说，德意志的选举人们没有接受他，而是选举卡尔·冯·特里尔为新的领袖。海因里希·冯·普勒茨克得到的安慰奖是总司令职位，后来他还担任过总军务官。

卡尔·冯·特里尔准备进攻萨莫吉希亚

卡尔·冯·特里尔就任大团长时只有四十六岁，在骑士团最高领袖的位置上算是相当年轻的了。卡尔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据说拉丁语也极好，就连他的敌人也喜欢听他说拉丁语，所以他是与阿维尼翁的法兰西教宗打交道的理想人选。因为此时骑士团正在接受教廷官员的调查，这一点十分重要。为了集中力量应付教廷，卡尔打算暂缓对立陶宛的作战。他还想与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一世议和，并解决立窝尼亚的麻烦。在普鲁士的骑士不太欢迎他的这些政策，卡尔说服他们接受他的观点的唯一办法就是亲自去东方与他们面谈。

在巡视普鲁士、视察骑士团的资源并讨论了各种可能的策略之后，新任大团长叫停了对格罗德诺的攻击。他已决定集中全部兵力攻击萨莫吉希亚，希望能打通一条去里加的较短陆路，从而阻止异教徒对库尔兰和斯米伽利亚的毁灭性攻击。

1313年4月，卡尔·冯·特里尔在柯尼斯堡安排将给养、武器装备和人员装载上船，让他们通过波罗的海和库尔兰湾去涅曼河。他还派遣其他部队从陆路去拉格尼特。虽然因为事故在海上损失了4名骑士、400名士兵、大量给养和用来建造一座新城堡的建材，卡尔还是率军逆流而上30英里，在溪流上架设浮桥。在浮桥竣工后，神父们带领庞大的宗教游行队伍举行弥撒，然后工人赶来建造了一座大型土木城堡，卡尔将其命名为克里斯特梅梅尔。这将成为他进攻萨莫吉希亚心脏地带的基地。

不久之后，海因里希·冯·普勒茨克攻击了更上游的异教徒城堡。他亲自领兵攻打比森，用舟桥运来攻城武器，但这轮进攻失败了。同时，拉格尼特的城堡长官乘船去了上游更远处的维隆。他计划从一艘大型战船上直接强攻城墙，但在他接近城堡的时候，劲风将他的船吹到了岸

边。既然没有了出其不意的奇袭效果，船员只好在一番鏖战之后把船弄回河中央，并返回拉格尼特。

这些攻击促使维泰尼斯行动起来。他特别担心骑士团的那艘大型战船，因为它能威胁涅曼河沿岸的每一座城堡。于是他命令自己的一名封臣尽快将其摧毁。

立陶宛指挥官命令100名骑兵赶往拉格尼特，另外派出600武士乘坐100艘小船顺流而下。骑士团的侦察兵和瞭望哨观察到了这些部队的运动，但立陶宛人行动极快，他们赶在侦察兵和瞭望哨向后方发出警报之前就抵达了拉格尼特，但作战计划的剩余部分就不是那么容易达成了。尽管异教徒发现骑士团的那艘大战船停在河中央，船上只有四名弓箭手，但这艘船实在太大，异教徒无法顶着弓箭手的射击攀爬其船舷。如果弓箭手得到增援，他们说不定能把来袭的异教徒杀光，因为后者很难逆流撤退。但在这个关键时刻，立陶宛骑兵阻止了拉格尼特守军，让他们不能冲杀出来。不久之后，立陶宛人砍断了大战船的锚索使其漂向下游，一大群异教徒小船紧随其后。在大船搁浅之后，立陶宛人才得以纵火将它焚毁。大团长没有造第二艘这样的大船。他的结论显然是，即便在夏天，这样的大船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冬天这样的大船则会被冰封住，可能还会被浮冰撞碎。

残酷的战争

我们从其他史料中可以了解到这个时期的战争是多么残酷。在1320年和1339年，波兰目击证人告诉教宗特使，条顿骑士团军中的武士刑讯和屠杀俘虏，杀戮无辜平民，剥光女人的衣服，虐待教士，摧毁村庄、田地和教堂。如果在信仰基督教的波兰都会发生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条顿骑士团对萨莫吉希亚的异教徒是多么凶残了。

令历史学家颇为遗憾的是，教廷听证会上的这些证词有严重的问题：条顿骑士团抵制这些听证会。这让教宗特使很恼火，而大团长说骑士团在过去已经得到了教廷的豁免权，教宗特使对此无权压制，特使就更生气了。而且，听证会上的很多证词都是道听途说，有些证言夸张到了荒诞的地步。喜欢夸大其词是中世纪的一个特点，这对现代研究者来说简直是灾难。很多证人能从对骑士团不利的裁决中获利。但另一方面，有些证人是有身份、有经验的人，他们有机会去查明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教廷的调查者单独私下里听取每个证人的证词，向证人询问一系列具体问题，所以调查者也有办法查明真相。教宗们收到特使关于骑士团不端行为和暴行的报告，就传唤骑士团的高级官员去见他们。

条顿骑士团的官员为自己辩护，他们否认了部分指控，并解释说其他指控是夸大其词或阐释有误。例如，他们与波兰人的关系并非总是很坏。普沃茨克主教让他们掌管米歇劳城堡，骑士团每年向他交一笔钱。主教需要骑士团的驻军为他的主教区暴露在异教徒面前的边境提供保护。马佐夫舍公爵们也因为害怕立陶宛人攻击而对骑士团示好。另外，波美拉尼亚公爵和西里西亚公爵正在寻求盟友共同对付瓦迪斯瓦夫一世。而在争端当中，波兰人也不是无辜的。多年前维埃纳会议[4]命令波兰主教们缴纳一笔专门的十字军税来支持条顿骑士团，而主教们从来没

有执行过这道命令。最后，波兰国王不准他的臣民参加萨莫吉希亚远征，所以干扰了正当合法的十字军圣战。教宗特使的调查没有如条顿骑士团的敌人期望的那样谴责条顿骑士团，却给现代历史学家提供了关于14世纪战争残酷性的大量证词。而且，即便赞颂十字军的历史学家也承认这种残酷性。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吹嘘自己的武功和战绩，甚至包括那些足以令心软的同时代人摇头的血腥暴行。

边境战争的原则

骑士团编年史家的工作不仅能证明战争非常可怕，他们对越过荒野的袭击行动的描述还能让我们分析其背后的战略。一般来讲，隆冬和盛夏是作战的最佳时节；其余时间里，道路泥泞是主要的问题。2月、6月和11月是基督徒最喜欢发动袭击的月份。2月的冰封河流就像高速公路；6月是收割庄稼之前天气温暖的时节；11月，民兵无须干农活，积雪还不算深，步兵可以行军。编年史家对原住民骑士在这些年里的功绩不吝溢美之词。十字军战士当中很少有人来自德意志，而取代德意志十字军的普鲁士人和立窝尼亚人都是热情洋溢的战士，他们作战的理由是对战事的爱好，以及对荣耀和世俗晋升的追求。

远征的组织工作井井有条。因为在荒野无法就地取粮，袭击者必须携带给养。他们经常将物资留在计划好的返回路线沿途，有时派人守卫，有时将物资埋在地下，有时将其藏起来。城堡是补给站和休息地点。如果不需要出其不意，他们也可以用船运输粮食和装备。

条顿骑士团知道很多条进入萨莫吉希亚的道路。他们收集商人和袭击者对路线的描述，包括曾走过这些路线的人的姓名、旅途每一阶段需要多少天，以及其他有价值的信息。袭击者穿过荒野之后都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他们一般是分兵数路，每个小单位袭掠一个指定区域，在忙完一天之后到预先约定的地点会合，并在那里扎营。会合地点一般比分兵的地点更靠前。然后他们在这个中央地点保留一支强大的部队以保护战利品和给养，并担当预备队，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威胁。一般来说，条顿骑士在一天之内足以蹂躏任何较小的地区，所以军队每天去一个新地点，沿之字形路线推进，有时改为径直向前，甚至还可以回到之前路过的地区再掳掠一轮。他们选择最有可能让守军措手不及的路线，要么抢

在守军躲藏起来之前，要么在他们刚刚从藏身之处出来的时候发起攻击。有时他们让小股部队走在前面再匆忙撤退，把追击之敌引入主力部队设下的埋伏圈。这让守军不敢轻易追击，所以骑士团有时能以非常少的兵力大胆地深入敌人乡村腹地，并安然撤退。每次远征都经过细致的筹划，且袭击者还会见机行事，对整体计划进行临时调整。基督徒和异教徒运用的战术相同，因为只有这些战术在当前环境下有效。双方的策略都是破坏对方的农业生产和贸易，从而拖垮敌人。

维泰尼斯国王之死

维泰尼斯不会允许十字军恣意袭掠他的国家或萨莫吉希亚。他是一位本领高强且意志坚定的武士，麾下有很多能干的封臣，而且他们全都憎恨基督徒。其中一位封臣名为格罗德诺的大卫，他最早于1314年出现在十字军的编年史中。他是那一代异教徒当中顶尖的战士，是立陶宛国内第二重要的城堡格罗德诺（仅次于维尔纽斯）的长官。他的前任就是之前被俘的那个宫廷总管，我们不知道后者的结局是什么。大卫的第一项功绩是摧毁了海因里希·冯·普勒茨克在1314年9月大胆袭击立陶宛东南部距离维尔纽斯很远的地区时留下的给养。他杀死了守卫给养的士兵，烧毁了粮食，掳走500匹马，让骑士团总司令左右为难。海因里希在抵达已被扫荡一空的地下仓库时，认识到敌人肯定在他回师路线上的某个地方设下埋伏。他估计自己饥肠辘辘的士兵无力作战，于是多走了500英里以绕过危险地带。途中他的士兵有的挖树根吃，有的吃饿死的马，很多人死在途中。幸存者都因为可怕的磨难而精疲力竭，很多人身染重病，短期之内无法回到岗位。格罗德诺的大卫差点就兵不血刃地消灭了一整支军队。

后来的大团长们认识到，让十字军从涅曼河逆流而上比穿过荒野的诸多沼泽和溪流要容易。在大河上，骑士团可以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他们有船只可以运输兵员和给养，有城堡可以保护战略要地并担当袭掠和大规模攻势的基地，还可以使用投射武器。另外，涅曼河及其支流径直流入立陶宛腹地，而顺流而下的立陶宛人会被河水带到库尔兰湾沿岸的沼泽地带。历任大团长在宽阔大河的沿岸建造了雄伟的城堡，他们首先在拉格尼特（靠近大河的诸多出海口）筑城以保护桑比亚，然后把城堡修到了更上游的克里斯特梅梅尔和维隆。

1315年8月，萨莫吉希亚人偷偷溜到了拉格尼特而未被察觉。警报响起之前，他们已经爬上城墙了。受惊的守军赶紧跑到主楼，那是一座坚固的塔楼，体现了西方工程技术的优越。十字军的主楼足够高，能充当瞭望塔，且敌人几乎无法直接发动强攻。它的入口是一扇高于地面的门，只有通过狭窄的楼梯才能到门口，而门里面被结结实实地封堵起来。主楼底部没有入口也没有窗户，石墙可能厚达6米。任何企图接近主楼脚下或者破坏它的袭击者都将遭到20米高空（或更高）抛下的大石头劈头盖脸的轰击，或者陷入弩弓的箭雨。即便伤员和累垮的人也能坚守这样的阵地好几天。因为主楼的射界覆盖整个城堡，所以敌军如果不能占领主楼，就会始终遭到射击，如果再有解围部队赶来，敌军将很难抵挡。萨莫吉希亚人根本没有尝试攻击拉格尼特的主楼，只是满足于破坏和焚烧周围已经可以收割的庄稼。

六周后，维泰尼斯来到克里斯特梅梅尔。他搭建了两台投石机，还带来大量罗斯弓箭手。他让其余部下去砍树并将木头堆放到干燥的地方，准备搬到护城河那里。他的计划是在城堡周围堆放大量木柴和灌木，然后点火，让城墙在烘烤之下坍塌，并用浓烟呛死守军。

大团长得知消息立刻召集部队。他必须等待军队集结完毕才能出发，但他首先派遣10名骑士和150名士兵乘船驰援。维泰尼斯早有预料，于是阻止了这支先遣部队接近城堡，十字军战士能做的只有骚扰围城军队，用弓箭与他们对射，以求拖慢他们的进度。围城第十七天，解围部队接近了。维泰尼斯还没有做好总攻的准备，但既然在大团长杀到之前只有一次机会拿下克里斯特梅梅尔，他命令用木柴和干草填平护城河并点火。数千人抱着木柴冲向城堡，他的弓箭手向城头猛射，希望将守军赶走，或者至少阻止他们向下方的步兵射击，但守军在城堞之后得到很好的防护；他们用弩弓迅猛射击，杀死了很多立陶宛人。维泰尼斯下令停止进攻，烧毁了自己的攻城武器，然后率军撤走了。

这是十字军最后一次听说维泰尼斯的消息。没人知道他的结局。传说他被闪电击中而死，但这似乎是对他的后继者格迪米纳斯的名字的错误翻译所致。我们对立陶宛统治者的谱系知之甚少，以至于好几个世纪里历史学家相信格迪米纳斯是维泰尼斯的儿子，但他们其实可能是兄弟。维泰尼斯是被自己的兄弟杀了吗？或者说这个故事是后人在诽谤格迪米纳斯？维泰尼斯死于克里斯特梅梅尔围城战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条顿骑士团既不知道这一情况，也没有记载下来。如果他们知道维泰尼斯死于克里斯特梅梅尔围城战，肯定会大书特书。维泰尼斯是一位伟人，是立陶宛人真正的民族英雄。立陶宛的第一种钱币的图案就是一个名叫维提斯的骑手，这或许不是巧合。这个形象的宗教意义很可能因为指涉那位伟大的君主而被增强了。

西方十字军抵达

卡尔·冯·特里尔为克里斯特梅梅尔解围之后舍不得解散手头的军队，想用它取得更大的战果。他遣返了很大一部分士兵，并大摆排场，让敌人的侦察兵以为他已经撤军回国；但他保留了一支6000人的部队，让他们趁夜色向河流上游的维隆进军。敌人对此毫无防备。原住民连忙从村庄赶往城堡，基督徒追击他们，杀死了很多逃跑的人。十字军没有试图攻击中央要塞，而是纵火烧屋，然后撤退。

维隆是萨莫吉希亚人防御体系中的主要壁垒。大团长还没有做好攻打它的准备，但他的部下几乎每年都会在维隆郊外纵火。他暂时还无法攻克维隆，但可以通过摧毁当地居民的房屋和田地一点一点把他们拖垮。他知道，立陶宛大公无法每年都为维隆提供粮食和更多驻军。

1316年，第一批西方十字军抵达普鲁士。这些来自莱茵兰的朝圣者（他们这样自称）是卡尔·冯·特里尔之前一次访问德意志时招募的。从这以后，十字军战士更加频繁地来到普鲁士，他们称之为“旅行”，这是中世纪对军事冒险的隐晦说法。这次远征的参与者后来说，他们杀死了200名异教徒，自己损失了50人。这个战绩还不算很重要，重要的是远征结束时有许多骑士侍从获得骑士身份。册封骑士的仪式成为每一次十字军远征中特别受欢迎的环节。每位候选人在完成了自己的英勇事迹之后，由到访的最显赫的领主授予他们骑士身份。大团长还会邀请最勇敢的战士围坐在荣誉之桌（参照亚瑟王的圆桌）前，并向表现最出色的骑士授予荣誉。

格迪米纳斯大公

在十字军战士在萨莫吉希亚森林沉浸于骑士仪式的同时，立陶宛的新大公正在向东方和南方扩张势力。和他的前任一样，格迪米纳斯明白，罗斯的王公、贵族和市民希望由东正教徒当他们的统治者，但也有些人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基督徒统治者；说到底，他们所有人都愿意接受任何能够保护他们不受鞑靼可汗（统治着南俄草原）侵犯的宗主。超过七十五年以来，鞑靼可汗统治着罗斯，即便位于蒙古帝国边缘的王公，如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王公以及西方的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王公也只享有微不足道的独立性。现在可汗的力量正在衰败，罗斯诸王公和城市觉得这是摆脱其可怕桎梏的良机。每一位王公在考虑反叛鞑靼人的时候都谨慎地寻求外界保护，因为鞑靼人的愤怒臭名昭著。如果判断失误，他们就会遭到鞑靼人的凶残报复，很少有波雅尔和市民在得罪了鞑靼人之后还能活下来讲述这段经历。得罪鞑靼人的人大多会生不如死。尽管有些邻近立陶宛的罗斯人臣服于维泰尼斯，其他罗斯人却没有寻求格迪米纳斯的保护，因为他是罗斯人的老对手，经常率军蹂躏罗斯土地。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王公首先向教宗求助，然后向波兰和匈牙利求助。条顿骑士团是他们曾经的盟友，所以这些王公甚至联络了卡尔·冯·特里尔，但没有一位西方统治者愿意派遣大军去草原，条顿骑士团尤其如此。对罗斯人而言，格迪米纳斯差不多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事实证明，这是一招妙棋，解决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西方人距离罗斯太遥远，有其他的要务在身，或者要求东正教与天主教会联合，而拜占庭和巴尔干国家又太弱。格迪米纳斯位置相对较近，愿意集中力量应对罗斯的问题，而且在宗教方面比较宽容。

格迪米纳斯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保护求助者，于是前来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格迪米纳斯经常允许罗斯的波雅尔保留其官职，并始终允许他

们按照自己的法律和风俗来生活。他尤其尊重东正教会及其领袖；后者则敦促人民忠于他。格迪米纳斯利用自己逐渐增强的实力帮助萨莫吉希亚人更好地对抗骑士团。即便如此，格迪米纳斯抵抗十字军的能力也只是缓慢增长，他无法在突然之间向涅曼河沿岸战区投入大批罗斯武士。即便很久之后，他手下的绝大部分骑兵和步兵仍是立陶宛人，只是偶尔有大群罗斯人追随他去西方。更重要的是，他能为自己的贵族和波雅尔提供军职，所以即便他们的土地遭受十字军蹂躏，他们也不至于因为饥饿向十字军投降。现在他们能够以职业军人的身份（往往是作为官员或驻于罗斯城市）体面地服役，积攒经验和军事装备，以便将来与西方对手匹敌。

不久之后，格迪米纳斯就在书信里署名自称"立陶宛人和许多罗斯人的国王"。他让自己的兄弟费奥多尔（狄奥多里克）和瓦尔尼斯（沃伊尼）分别统治基辅和波洛茨克，他的儿子阿尔吉尔达斯（奥尔吉耶德）统治维捷布斯克。后来他把格罗德诺的大卫安排到普斯科夫，让他在那里骚扰立窝尼亚骑士团。格迪米纳斯通过联姻拉拢了一些罗斯王公：他娶了维捷布斯克的女继承人，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特维尔王公。后来他把莫斯科、加利西亚、马佐夫舍和波兰王国都拉拢为盟友。[5]

格迪米纳斯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技术不如十字军，于是努力吸引西方的商人和手工匠人，即懂得如何获取或制造他需要的装备的人。他与里加的德意志商人的联系特别重要。那些市民在与立窝尼亚骑士团相争，所以他们致力于扩大贸易并帮助条顿骑士团的敌人。唯一让他们感到踌躇的是，他们也想保卫和扩张基督教信仰。另外，如果他们与异教徒君主结盟反对十字军，就违背了应被严格遵守的宗教法则，不但让自己在教宗和皇帝面前不好交代，也会让其他汉萨城市的商人和那些有臣民购买立窝尼亚产品的贵族敌视他们。但里加大主教告诉商人们，他们与格迪米纳斯的合作不会损害基督教世界。格迪米纳斯在维尔纽斯的宫廷有方济各会修士，他们进一步向里加商人保证，只要十字军停止对立陶宛

的攻击，立陶宛人已经做好了皈依的准备。方济各会是格迪米纳斯最热忱的拥护者，他们四处传播关于格迪米纳斯多么渴望成为基督徒的故事。不管这种前景多么渺茫，里加人都可以用它为自己和立陶宛大公的非正式盟约辩护。

事实上，格迪米纳斯几乎不可能皈依天主教，但他允许西方访客对此抱有幻想。他必须对东正教宽容，这样才能保证他的罗斯臣民的忠诚，而立陶宛人则希望他继续当异教徒。格迪米纳斯希望建立一个囊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异教的帝国。十字军理解不了任何形式的宗教宽容。在他们看来，宗教自由意味着纵容错误和诱人走入歧途的行为。条顿骑士团接受的教条是消灭作恶的人，他们不能接受其他宗教，因为它们会让不计其数的人陷入地狱之火。在他们眼中，这种宽容肯定是能想象得到的最大的恶。

十字军的回应

十字军本质上是推动基督教扩张的手段，很多民族都能理解和分享这种理想。它表达的宗教理念非常符合时人的思维。十字军也是扩张条顿骑士团领土的手段，他们代表教廷、教会和他们自己。他们对圣战的辩护是，这是平定异教徒并将其基督教化的唯一途径。圣战在普鲁士和立窝尼亚取得了成功，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在对穆斯林展开圣战。波兰国王和匈牙利国王在与鞑靼人和突厥人作战时采用的也是相同的思维：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同时对基督教世界也有好处的事情，就是双重正确的，他们为之花费的鲜血和财富就是值得的。

中世纪晚期各种十字军运动的共同之处是，它们是西欧人与基督教世界边界的危险敌人之间的斗争，并且是受到民众欢迎的斗争。这些十字军运动带有一种浪漫的光环，19世纪的公众还能理解它，但现代人就理解不了了。[6]

类似地，中世纪人对自己的边界上存在异教徒感到不安，即便这些非基督徒是和平且宽容的。基督徒害怕异教祭司的魔法和迷信，相信他们的符咒真的有效，所以相信针对魔鬼崇拜的战争是神圣的。东欧基督徒对自己的异教徒邻居也不满意。波罗的海异教徒和鞑靼人一样，不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立陶宛人袭击基督徒的土地，掳掠牲畜和人口（将其变卖为奴），并觉得这样的行为理所当然，无须辩护。通过大河通往拜占庭和穆斯林世界的奴隶贸易路线历史悠久。维京人开启了东欧的奴隶贸易，当地各民族也继续这种贸易，而鞑靼人将其维持到彼得大帝在位时期。另外，立陶宛的波雅尔们开始效仿他们的邻居，建立以粮食生产和农奴制为基础的大庄园。把本地劳动力当作农奴在政治上是不妥的事情，在经济上

也无必要，因为他们能从波兰、普鲁士和立窝尼亚掳掠到有经验的劳工。基督徒原则上并不讨厌奴隶制，只是坚持要求奴隶只能是非基督徒。而立陶宛异教徒的做法恰恰相反！所以十字军决心阻止立陶宛人掳掠基督徒为奴的行为。

条顿骑士团的批评者，包括15世纪的波兰学者保卢斯·弗拉基米里[7]（他要求康斯坦茨会议宣布十字军不符合基督教精神），从来没有为异教本身辩护过。认为异教在道德和智识方面比基督教优越是现代人的理念，抱有这种理念的现代人往往还相信水晶球和传统草药能治病，相信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然崇拜，但他们很少像中世纪人那样把异教与巫术和伏都教联系起来。东欧基督徒也并不比西欧基督徒对异教更友好、更心怀理解。事实上，东欧基督徒对异教的态度与西方著作（尤其是文艺复兴时代历史学家的著作）的态度相同：既憎恶，又饶有兴趣。

立陶宛人不是什么大自然之子。格迪米纳斯王公们及其波雅尔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社会化的环境里，这个环境太先进、太复杂，所以他们不是卢梭所谓的高贵野蛮人。即便在14世纪末好几位格迪米纳斯王公成为天主教徒之后，他们也只是新近受洗，他们的军队里还有许多穆斯林、东正教徒和异教徒。很少有人对西方教会表现出尊重。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格迪米纳斯王公们都是异教徒，他们对外国迷信往往只报以鄙夷态度。

十字军对立陶宛人袭击教堂，亵渎圣餐，谋杀神父、僧人与修女的故事极其愤怒。但大家不要忘记，这是黑死病的时代，是鞭笞、大规模歇斯底里、猎巫、迫害犹太人和秘密异端的时代。异教徒是基督徒能找得到的少数显而易见的敌人之一，基督徒可以把一切麻烦都怪罪到异教徒身上。异教徒是教会与国家显而易见的危险敌人。

所以，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萨莫吉希亚十字军运动与条顿骑士团的领土野心区分开。这种区别似乎很难分辨，尤其是如果我们只读现代

历史学家的作品的话，但当时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十字军圣战的宗教意义。骑士团需要臣民为其提供粮食和劳动力，需要城堡作为修道院和补给站，需要边境据点让侦察兵安全地居住，而且部队在敌人袭击者侵犯时也可以在这些据点集结，在组织针对异教徒土地的袭掠时还能以这些据点为基地。另外，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土地，如萨莫吉希亚，是异教徒袭击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基地。但如果我们只看骑士团顽强保卫自己领土的情境，就容易受误导。实际上条顿骑士团经常与异教徒签署停战协定，允许教宗使节影响骑士团的政策，并信赖立陶宛王公的承诺。当然，骑士团不是在所有时期都同等地慷慨。经验让人变得犬儒。有些外来者主张停止圣战，以便让理想主义者与异教徒对话，劝他们皈依。在听到这种言论的时候，条顿骑士团往往报以冷嘲热讽。立陶宛人通常只在条顿骑士团即将取得重大军事优势的时候才主动提出皈依。只有幼稚的新来者才会轻信他们的提议，骑士团当然不相信对方拥有诚意。类似地，波兰提出的骑士团应归还西普鲁士和库尔姆的要求（通常将其作为普遍和平计划的一部分）也不太可能让十字军的武僧们用和平手段取代武装传教。不过，在14世纪，希望和理想主义依然存在。

但在务实的人看来，要让格迪米纳斯王朝考虑皈依，武力肯定是主要的手段。异教徒很喜欢杀死神父和传教士，让他们成为殉道者。教廷希望用外交手段、加冕和派遣修士等和平手段争取格迪米纳斯王朝，而他们置之不理或拒绝接受。而且，他们是咄咄逼人的武士。不管是谁先动手，条顿骑士团都必须经常出兵保卫自己的边境，他们也经常出兵去袭击萨莫吉希亚和立陶宛，要么是威风堂堂、排场隆重地出征或起航，要么是偷偷溜过荒野，发动毁灭性的偷袭。还有大批十字军战士从西方赶来，大手大脚地花钱并甘冒死亡风险，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保卫基督教世界。

法兰西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少量意大利人也会参加萨莫吉希亚十字军。这是一场国际冒险，吸引了那

些在民族主义快速增长的时代感到不安的人。民族主义在政治、教会和文学中变得越是突出，硕果仅存的国际主义事业就越受欢迎。反对异教的十字军运动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将西方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许多特点结合起来。十字军是一种体育运动，是战争，是骑士精神的展示，是对杰出成就的肯定。14世纪是尊崇成就的时代。那些想用高尚行为证明自己的贵族普遍承认，参加对萨莫吉希亚的十字军是一种能让他们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勇气、大胆和身为骑士之价值的行为。到14世纪中叶，十字军运动的这个方面变得比它的宗教义务更为突出。十字军变得越来越世俗化，更有骑士精神，直到它和所有地方的理想主义骑士精神一样，成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古董。

当然，十字军也有民族认同的问题。条顿骑士团是德意志人的骑士团。所以他们必须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民族。大团长们很清楚自己的这份责任，也懂得如何运用德意志人对其家乡和语言的热爱，但他们不能让骑士团的德意志身份盖过其他身份。到了15世纪，这就变成一个严重问题。

在14世纪，十字军圣战的理想除了在东欧之外没有多少表达的机会。其他的机会即便有，也比从普鲁士出发的十字军更艰难、更危险，且更耗时。在圣地陷落二十年后，萨莫吉希亚远征流行起来。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巧合。二十年足以让大多数人相信，在地中海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是不切实际的。十字军的精神貌似因为圣地陷落而消亡了，但条顿骑士团懂得如何复苏这种精神：他们组织小规模的远征（若是在对付突厥人的战线上，这么小的规模不可能取得什么成绩），让参与者能带着激动人心的故事回家，讲述他们如何战胜了十字架之敌。波兰人、波希米亚人和德意志人的远征彼此之间原本没什么联系，但在14世纪却演变成一种泛欧冒险。

这样一来，德比伯爵亨利[8]于1352年1月来到普鲁士并向波兰统治

者卡齐米日大王发出挑战，也就不足为奇了。亨利带了一支军队与异教徒作战，但他得知波兰国王在普鲁士与波兰边境制造事端令骑士团无法发动讨伐异教徒的远征，于是决定了结这一冲突。他的虚张声势也许能促使骑士团与波兰国王达成妥协，不过这位英格兰贵族在去往柯尼斯堡的途中有所耽搁所以迟到，但还是正好赶上了这年冬季的远征。

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一世于1351年参加了一次隆重的异教仪式，这也不算特别不寻常。这次仪式献祭了一头红色公牛，以庆祝匈牙利与立陶宛大公科斯图提斯（1297～1382）关于赎回科斯图提斯的兄弟（他在这年夏季被卡齐米日大王俘虏）的协议达成。不过波兰和匈牙利十字军战士很快就后悔自己天真地相信了立陶宛人，因为科斯图提斯带着他的兄弟溜走，然后猛烈袭击十字军营地，波兰国王和匈牙利国王险些丢掉性命，而马佐夫舍公爵波列斯瓦夫不幸死亡。

1352年，拉约什一世在沃里尼亚的激战中负伤，卡齐米日大王为了攒钱去对抗鞑靼人，将多布任抵押给条顿骑士团。简而言之，中东欧的十字军错综复杂，不仅仅是条顿骑士团对抗萨莫吉希亚和立陶宛的异教徒，还有针对东正教王公与穆斯林鞑靼人的战争：所有人都知道，突厥人已经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

条顿骑士团用尽当时的一切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神圣使命。例如，它的建筑强调了它的军事职责和宗教职责的互相交织；每一个细节都凸显了骑士团的稳固与强大。骑士团的宣传非常成功，以至于我们经常忘记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和乌克兰的那些更重要的远征。

立陶宛人皈依的希望

立陶宛大公们经常提议与西方人商讨接受天主教的事宜。这并非总是因为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十字军对他们越来越大的压力，也肯定不是因为对十字军征服立陶宛的恐惧，但十字军施加的军事压力在大公们的算计当中肯定是重要的因素。他们的目的是消除十字军袭击带来的麻烦。长期以来，大团长的攻势对立陶宛大公构成了妨碍，让他们无力应对其他方向上的威胁，或利用南方的机遇。格迪米纳斯和他的儿子们，尤其是阿尔吉尔达斯（1296～1377）和科斯图提斯，对鞑靼人金帐汗国的衰落颇感兴趣，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扩大立陶宛对邻近罗斯各邦的影响。但是他们占领整个罗斯南部尤其是加利西亚的努力，在1370年之后受到匈牙利与波兰的君主拉约什大王的挑战。格迪米纳斯死后，阿尔吉尔达斯继承了大公头衔和处置绝大多数罗斯事务的责任，而科斯图提斯负责保卫立陶宛东部和北部边境。这两兄弟是中世纪最有才华也最富奇思妙想的外交家，他们充分利用了立陶宛的稀薄人口和经济基础。他们也是有才华的军事家，但过于精明，不肯冒大的风险。当战局对他们不利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撤退或寻求停战。这让大团长们倍感挫折，他们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知道，阿尔吉尔达斯和科斯图提斯只有在遵守协议显然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才会遵守一项协议。

诚然，大多数政治领袖在食言能给自己带来充分好处的情况下都会违背条约或承诺，但很少有人能像阿尔吉尔达斯和科斯图提斯及其后代那样，在做出承诺的时候就已经在冷酷无情地盘算着要毁约的。让大团长们特别苦恼的是，经常有教士和其他用心良好的人为立陶宛哭诉，要求大团长停止对立陶宛的圣战，因为立陶宛统治者口口声声说自己真诚地打算皈依天主教，而十字军的攻击让他们无法做出这样的举动。立陶宛统治者非常擅长利用基督徒把敌人往好的方向想的意愿，这最终令条

顿骑士团很难相信格迪米纳斯家族曾经说话当真过，尽管后来皈依基督教显然符合大公们的利益。不过，这是一个冗长而让人糊涂的故事，当时的人比现代历史学家更难理解它，而现代历史学家已经觉得这很费解了。

1361年春的某个时刻，科斯图提斯很有可能接受了洗礼。阿尔吉尔达斯和科斯图提斯率领一支强大的袭掠队伍穿过加林迪亚进入普鲁士中部，当时英格兰和萨克森十字军正在桑比亚。条顿骑士团总军务官（基地设在柯尼斯堡）向英格兰十字军领袖托马斯·斯宾塞和萨克森公爵提议一起强行军穿过普鲁士，想抢在袭击者安全逃回荒野之间拦截他们。十字军热烈响应。他们取得的战果超过了自己最大的期望，十字军把立陶宛袭击者打得措手不及，他们杀死了130人，俘获了科斯图提斯。

大团长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把科斯图提斯安顿在玛利亚堡，让立陶宛人不可能有机会营救他，并对他以礼相待。但在11月中旬，六十五岁的科斯图提斯大胆地越狱出逃。在城堡中一名立陶宛仆人的帮助下，他溜出牢房，爬上烟囱，偷了一件白披风，走过庭院，没被认出来。他发现大团长的坐骑备好了鞍具。于是他爬上马背，冲出城堡大门，未受阻拦。他后来在向东通往立陶宛的路上丢弃了这匹马，徒步南下去马佐夫舍。他的女儿是马佐夫舍的普沃茨克公爵夫人。他很快就回到了家，继续猛烈攻击骑士团并嘲笑他的敌人。这次成功逃亡让他在立陶宛西部和萨莫吉希亚深受爱戴。

与此同时，阿尔吉尔达斯向东扩张，于1363年在黑海附近的蓝水战役[9]中打败鞑靼人并占领了基辅。1368年和1370年，他抵达莫斯科的克里姆林[10]。

1370年2月，立陶宛人与骑士团的战争迎来了危急时刻。阿尔吉尔达斯和科斯图提斯率领他们的立陶宛和罗斯军队进入桑比亚，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迅速做出反应，从远至库尔姆的地方集结军队，命令他

们火速与总军务官的部队会合。科斯图提斯在鲁道[11]附近领兵纵火焚烧农场与村庄，这时十字军逼近了。他认出了对手的旗帜，立刻逃走。阿尔吉尔达斯则命令自己的部下匆匆赶到一座有树林的山上，在那里为保住战利品和俘虏而战。随后发生的战斗是人们记忆里最血腥的战斗之一。到夜幕降临时，条顿骑士团粉碎了异教徒的最后抵抗，杀死了超过1000名敌人，自己损失了26名骑士和100名士兵。阿尔吉尔达斯和往常一样成功逃走。这是他最后一次派兵攻入普鲁士。

阿尔吉尔达斯于1377年死后，科斯图提斯坚持要求立陶宛的诸多割据势力服从他的领导，从而避免互相妨碍乃至内战。这反映了立陶宛的治理体制多么松散而复杂。在格迪米纳斯数量众多的后裔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明白，他们手中的土地不足以满足所有王公的野心，而立陶宛王公们可没什么耐心与自我牺牲精神。另外，他们的部分罗斯领地已经在开始寻求独立，甚至向莫斯科求助。莫斯科王公自视为所有罗斯国家的天然领袖。格迪米纳斯家族一直非常推崇勇气、积极主动和狡黠，但从来没有教导过，也没有实践过所谓的“基督徒的美德”，就连那些皈依东正教的王公也没有。只有在所有人都受到外国势力威胁的时候，格迪米纳斯家族才能团结起来。如波兰编年史家德乌戈什所说：“不要信任异教徒。我们曾鼓励他们内讧，现在要收获成果了，除非科斯图提斯能控制住他众多的侄子和儿子们。”

科斯图提斯没有自立为大公，但他实际上享有大公的权力。不过他的政策激怒了阿尔吉尔达斯第二次婚姻的长子雅盖沃及其同母兄弟们。这几位已经在和他们的异母兄长，即阿尔吉尔达斯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们争斗。雅盖沃（1354？～1434）比他最年长的异母哥哥安德烈（1342～1399）更有资格获得大公头衔，因为根据中世纪常见的一种习俗，儿子可以继承父亲在自己出生时拥有的头衔。所以安德烈虽然是长兄，但他只是公爵的儿子，而雅盖沃是大公的儿子。另外，阿尔吉尔达斯认可自己与第二任妻子乌里亚娜所生的儿子雅盖沃的才干，而乌里亚

娜当了寡妇之后也很有权势。虽然她曾因自己的东正教徒身份被正式禁止参与对儿子们的教育，且阿尔吉尔达斯坚持要把儿子们培养成异教徒，但现在她愿意用一切手段来推进自己长子的利益，并与阿尔吉尔达斯第一任妻子的后代抗衡。为了增强罗斯人接受雅盖沃的可能性，她还劝他接受洗礼，成为东正教徒。

所以，一时之间，长期忠于异教传统的格迪米纳斯家族似乎要站到东正教那边了。如果这就是野心勃勃的格迪米纳斯王公们成为罗斯统治者的唯一途径，他们无疑会拼命争取，置任何宗教和道德顾虑于不顾。

但雅盖沃并不满足于统治父亲留给他的那部分土地（在立陶宛东部）。他决心首先控制整个东立陶宛，这意味着消灭占据立陶宛北部与立窝尼亚骑士团接壤之领土的安德烈。然后，雅盖沃还要获取属于科斯图提斯的立陶宛西部。等到整个立陶宛都成为他的囊中物（交给他可以信任的兄弟和同父异母兄弟们治理）之后，他就要继续执行在本世纪早些时候曾非常成功的扩张政策了。

---

[1] Christoph Maier，*Preaching the Crusade*：*Mendicant Friars and the Cros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因为主教们往往无法亲临现场支持自己在波罗的海的主教区，他们会从德意志的一个主教区旅行到另一个，协助高级教士的特殊庆祝活动，为十字军进行募捐和宣讲。（作者注）

[2] 特拉凯位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以西28公里处。

[3] 布劳恩斯贝格是德语名字，即今天波兰北部的布拉涅沃，邻近俄罗斯边境。

[4] 维埃纳会议是天主教会于1311至1312年在法国城市维埃纳举行的会议。亲法的教宗克雷芒五世命令圣殿骑士团解散。此前法王腓力四世（美男子）因为欠下圣殿骑士团的债务难以偿还，诬告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有异端罪，对其进行迫害，并镇压了骑士团。

[5] 这方面的精彩叙述，见S.C. Rowell，*Lithuania Ascending*：*A Pagan*

Empire within East-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作者注）

[6] 一个例外是哈佛大学的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他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文明的冲突？》载于《外交事务》，受到了广泛讨论。（作者注）

[7] 保卢斯·弗拉基米里（约1370～1435），波兰语名字是帕维乌·沃德科维茨。他是著名的学者、法学家和克拉科夫学院（后来的雅盖隆大学，即波兰第一所大学，由卡齐米日大王建立）的院长。他捍卫波兰的利益，捍卫原住民异教徒，反对条顿骑士团。他在布拉格大学和帕多瓦大学读书，在克拉科夫学院获得教会法博士学位。他代表波兰参加了1414年的康斯坦茨会议，主张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民族和平共处，谴责条顿骑士团针对异教徒的战争，并为扬·胡斯辩护。

[8] 即格罗斯蒙特的亨利（约1310～1361），第一代兰开斯特公爵、德比伯爵等。他是英格兰重要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在百年战争初期是爱德华三世的得力大将之一。他是嘉德骑士团的创始成员和第二名骑士。

[9] 蓝水战役爆发的时间可能是1363年或1362年，地点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此时金帐汗国陷入内乱，立陶宛大公阿尔吉尔达斯率军攻入鞑靼人土地，扩张立陶宛领土，最终征服了基辅大公国。蓝水是战场附近一座城镇的名字。

[10] 克里姆林这个词泛指古代罗斯城市中央的设防要塞或城堡，其中最有名的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即大克里姆林宫的所在地。

[11] 鲁道村在柯尼斯堡附近，就是今天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梅利尼科沃村。

九 立陶宛的皈依

立陶宛王公的内讧

1377年阿尔吉尔达斯去世，他的诸多儿子之间爆发内战，其中好几个都自视为他的潜在继承人。最有资格统治立陶宛东部的是安德烈，即阿尔吉尔达斯与第一任妻子的长子，但最后获胜的是雅盖沃，即阿尔吉尔达斯与第二任妻子的长子。雅盖沃流放了竞争对手安德烈，然后挫败了他与立窝尼亚骑士团结盟并卷土重来的企图。雅盖沃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但发现自己八十岁的叔父科斯图提斯现在要求家族的所有成员在一切事务上都对他言听计从，这令雅盖沃大怒。雅盖沃想要成为统治者但缺乏耐心，不肯等待科斯图提斯寿终正寝。

雅盖沃很快想出了办法去战胜科斯图提斯，并一劳永逸地消灭安德烈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性。他通过弟弟斯科盖沃与立陶宛人憎恨的条顿骑士团秘密商谈结盟，承诺在未来某个时刻成为天主教徒，然后派斯科盖沃去见匈牙利的拉约什大王、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四世（此时是德意志国王，称文策尔[1]），甚至还有可能见了教宗乌尔班六世。在与斯科盖沃会谈之后，西方君主和高级教士都劝说年迈的大团长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停止支持安德烈，并接受与雅盖沃的秘密盟约。

雅盖沃演技娴熟，擅长谋划，他把科斯图提斯的儿子维陶塔斯（1350～1430）拉拢为自己的好友。科斯图提斯发现十字军对他的军事计划简直了如指掌，而雅盖沃出兵时总是迟到，刚好抓不住德意志军队，不禁起了疑心。雅盖沃让维陶塔斯为自己辩护，科斯图提斯并没有

信服，但儿子的狂野天性也让他担忧。维陶塔斯年纪已经不小了，按理说应当有自己的土地和职责，但他还很不成熟。科斯图提斯知道，如果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指控雅盖沃通敌，只会让维陶塔斯更加确信自己的堂兄和朋友遭到诬陷。于是科斯图提斯向雅盖沃让步，从而把维陶塔斯留在自己身边再久一点。他要教给维陶塔斯的东西太多了，除了军事事务之外还有为人处世之道。当然，雅盖沃那样翻天覆地的变节不可能永远掩人耳目，因为立陶宛社会里的贵族经常无所事事，他们对地位与衔级特别在意，又因为长期生活在一起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并且酷爱飞短流长和阴谋诡计。[2] 政策上的分歧也无法解决：雅盖沃希望集中力量于东方，继续向罗斯扩张，即便这样要把部分土地让给十字军，科斯图提斯对此完全不同意。

雅盖沃认识到科斯图提斯不会试图教训他，于是更加独立自主。他没有征求科斯图提斯的许可就安排将自己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嫁给一位马佐夫舍公爵，还与立窝尼亚骑士团联合行动，并流放了自己的兄弟安德烈和卡里布塔斯（1342？～1399）。1381年，科斯图提斯逮捕了雅盖沃（可能还有雅盖沃的母亲），控制了他的土地并自立为大公。科斯图提斯以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但维陶塔斯敦促他释放雅盖沃，并允许雅盖沃回到东部的领地。

1382年，科斯图提斯率军前往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克，打算处置在当地再次掀起叛乱的卡里布塔斯。雅盖沃抓住这个机会火速赶往维尔纽斯，召唤他的支持者到那里与他会合，然后送信给大团长，请他立刻开往立陶宛，接着开始攻打科斯图提斯位于一座小岛上的城堡特拉凯。科斯图提斯和维陶塔斯赶来为特拉凯解围时，发现自己被夹在雅盖沃军队和十字军之间。雅盖沃邀请科斯图提斯和维陶塔斯与自己商谈，并暗示此次会议将解决他们的分歧。在会议室，他抓住了科斯图提斯和维陶塔斯，将他们囚禁在克列瓦[3] 的要塞，然后（可能是在母亲的敦促下）让斯科盖沃谋杀了科斯图提斯，并接管立陶宛西部的土地。接下来，他

杀死了科斯图提斯的萨莫吉希亚妻子比露特，她很有权势，还是有名的美女。最后，他与新任大团长康拉德·策尔纳·冯·罗滕施泰因签订条约，承诺在四年内皈依基督教，并在十字军征服萨莫吉希亚西部之后把它让给条顿骑士团。

维陶塔斯设下计谋，越狱成功。这位矮小清瘦且没有胡须的王公在妻子安娜到狱中与他过夜之后换上她的衣服，溜出了城堡，没有引起注意。到11月初，他已经逃到了一个嫁给了马佐夫舍公爵雅努什的妹妹那里。但他没法在那里待下去，因为雅盖沃已经在追踪他了。没过多久，维陶塔斯来到玛利亚堡的大团长面前，表示想成为天主教徒，并与骑士团一起讨伐篡位者雅盖沃。在普鲁士，维陶塔斯虽然处于他父亲的敌人控制下，但至少还安全。维陶塔斯是否需要像多年前的科斯图提斯那样设法逃出大团长的要塞呢？如果他能逃出要塞，随后能去哪里呢？

康拉德·策尔纳不确定怎样才是最好的政策。他对外交几乎没有经验，也从来没有见过维陶塔斯或雅盖沃。他最终采纳的政策非常微妙，所以很难长期维持：他为维陶塔斯进行了洗礼（用的教名是他的介绍人的名字维甘德），还为他的妻子女儿施洗（雅盖沃大度地释放了她们），然后把他们安置到萨莫吉希亚西部，让他们统治那些投降的异教徒。但他严密监视维陶塔斯，并向雅盖沃保证，他不会允许维陶塔斯给立陶宛大公国制造麻烦。维陶塔斯和雅盖沃对此都不满意。

维陶塔斯来到萨莫吉希亚之后，不计其数的武士赶来投奔他。他们虽然憎恨他的基督徒盟友，但更恨谋杀科斯图提斯和比露特的凶手。为了让维陶塔斯能回来，他们主动配合了清除异教徒祭司以及破坏异教圣树的工作。他们还帮忙在涅曼河沿岸建造了设施原始的城堡。在雅盖沃和斯科盖沃向维陶塔斯宣战的时候，这些武士积极地进行抵抗。维陶塔斯拥有一位伟大异教王公的全部美德，所以异教徒武士不在乎他名义上的基督徒身份。借用波兰编年史家德乌戈什的话说，维陶塔斯是格迪米

纳斯的所有后裔中最具男性美德的，他在大多数时候都诚实、礼貌、有人情味。

德乌戈什当然有偏见，因为他是雅盖沃的后代雅盖隆王朝的宫廷史官。德乌戈什是当时读者最多的编年史家，部分原因是他的文笔不错。他的拉丁文很扎实，讲述的逸闻很精练，他也懂得怎样把精彩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但他的主题也很重要，即波兰如何从默默无闻和混乱不堪的状态中崛起为一个区域性霸权。他的叙述主线之一是雅盖沃皈依基督教，而另一个主题是条顿骑士团的邪恶。

立陶宛成为基督教国家

雅盖沃成为天主教徒不是因为他信仰天主教，而是一种交易的结果。对立陶宛王公们来说，几乎任何事情都是交易。就连雅盖沃最大的爱好狩猎也有生意的成分。

雅盖沃之所以皈依是为了迎娶波兰王位的女继承人。她是拉约什大王的幺女，其父从1370年至1382年统治匈牙利和波兰两个国家。波兰的贵族和教士不欢迎两国的联合，所以在拉约什大王驾崩后坚持要求将两国分割。拉约什大王的幼女雅德维加原本分得了匈牙利，但因为波兰爱国者拒绝接纳她那位嫁给刚刚成为勃兰登堡边疆伯爵的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1368～1437）的长姐，雅德维加最终来到了克拉科夫。西吉斯蒙德是德意志国王文策尔（1361～1419）的弟弟，所以他太德意志化了，不为波兰人所接受。[4] 但雅德维加原先的未婚夫也有这个问题。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小王公，没有很多土地，也没有得到更多土地的前景，但他仍然是个德意志人。波兰贵族和教士取消了雅德维加的婚约之后，发现潜在的新郎人选数量有限，于是他们去找雅盖沃，后者接受了这样的提议：如果他愿意让立陶宛成为基督教国家，他就可以成为波兰的真正统治者。他咨询了教宗乌尔班六世的意见，也得到了正面的回复。波兰贵族和教士选择雅盖沃的另一个理由是，两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条顿骑士团。

此时，条顿骑士团正在入侵立陶宛高地，并取得了很大进展。维陶塔斯和萨莫吉希亚人现在是骑士团的盟友，来自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十字军如今可以长驱直入攻打立陶宛的心脏地带，不会像过去那样沿途受到警告和抵抗。

雅盖沃精明地审时度势。他急需议和，以便在克列瓦与波兰代表谈

判。他明白，确保维陶塔斯配合他将立陶宛基督教化的唯一办法是与他和解。雅盖沃不能暗杀维陶塔斯，也没有多少把握能在战场上打败他。于是雅盖沃放下架子，否决了他的兄弟们对科斯图提斯遗产的主张，秘密与维陶塔斯联络，并提议把他祖先的土地还给他。1384年7月，在维陶塔斯的指挥下，萨莫吉希亚人反叛条顿骑士团，一举占领了本部族土地上的绝大多数十字军城堡；随后，维陶塔斯和雅盖沃的军队联手攻打剩余几座要塞。但在胜利结束这一轮军事行动之后，雅盖沃就食言了，他任命斯科盖沃为立陶宛西部的统治者，只给大失所望的堂弟维陶塔斯留下马佐夫舍东南部的几块小领地。维陶塔斯无计可施，只能假装心满意足。

让基督教世界绝大部分人感到喜悦的是，1385年《克列瓦条约》签署之后传来消息，立陶宛人很快将接受洗礼，神父将在曾经的异教神祇巢穴举行礼拜。1386年2月，雅盖沃和他的几个兄弟以及维陶塔斯在克拉科夫接受天主教洗礼，接着迎娶了雅德维加。雅盖沃随后将一小群基督教神父带到维尔纽斯，开始让立陶宛人皈依。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陪伴他的数千名波兰高官和骑士。格涅兹诺大主教主持了雅盖沃的洗礼、婚礼和加冕仪式，他后来任命一名波兰方济各会修士为维尔纽斯主教，并在维尔纽斯早就被毁的第一座大教堂的原址上建造了新的大教堂。根据信息来源不甚可靠的《尼康编年史》，雅盖沃国王刑讯并处决了两名更想成为东正教徒的波雅尔。此事属实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一记载准确地表达了很多罗斯人对所谓“德意志人的信仰”的憎恨。

教会倾向于通过方济各会来与异教徒打交道。他们在立陶宛有丰富经验，此外他们对非基督徒的宽容态度很有名。他们有时甚至更喜欢异教徒，而不是那些拒绝遵照方济各会版本的福音（较为民主且热爱和平）的基督徒。他们的使命并不轻松。迟至1389年，萨莫吉希亚人还曾将俘虏的梅梅尔城堡长官捆在他的马背上，让他穿着全副甲胄，在他周围堆放柴火，然后将他活活烧死，向诸神献祭。

作为波兰国王，雅盖沃的正式称号是瓦迪斯瓦夫二世。大家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指涉“矮子”瓦迪斯瓦夫一世，不过雅盖沃本人身材魁梧。为了将他与皮雅斯特王朝的很多叫瓦迪斯瓦夫的王公区分开，波兰人仍叫他雅盖沃。他自己很少有时间去关注立陶宛的基督教化进程。他急需去王国的另一端，奔赴摩尔达维亚[5]和瓦拉几亚[6]。这些边疆地区曾属于匈牙利，但在拉约什大王在位时期，波兰对这些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科斯图提斯对加利西亚的猛烈侵袭表明，匈牙利人若没有波兰的帮助，就无法防御自己的草原前哨阵地，而突厥人似乎是比鞑靼人和立陶宛人更危险的敌人，所以匈牙利人不得不将力量投到自己的南方边疆。拉约什大王去世后，匈牙利和波兰分道扬镳，摩尔达维亚人宣布独立，并开始对黑海与波兰之间新的贸易路线上的商品征收关税。雅盖沃的任务是稳定加利西亚局势（他很轻松地做到了，因为匈牙利正处于动荡中，而且他能控制立陶宛的政策），然后将波兰的势力范围扩张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他在1387年底之前完成了这些任务，尽管他靠教宗的调停才避免了在波兰与匈牙利之间爆发战争。对雅盖沃来说幸运的是，因为他对波兰人的掌控还很弱，而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正忙着应付他那些犯上作乱的贵族和突厥人的攻击，所以报复波兰人暂时只能停留在构想阶段，但西吉斯蒙德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尴尬的是，雅盖沃的职责让他深入南方，没有办法处理斯科盖沃和维陶塔斯之间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他暂时只能警告他们，除非他们想办法和平相处，否则他将不得不除掉其中一个。

立陶宛内战

到1389年春，立陶宛王公们之间的冲突已经升级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有一次斯科盖沃对维陶塔斯说："你小心提防我吧，就像我提防你一样。"不久之后，维陶塔斯通过两名被俘的条顿骑士马夸德·冯·萨尔茨巴赫和莱茵艾克伯爵与康拉德·策尔纳联络，表示愿意交出人质（他的兄弟齐格芒塔斯及其儿子米哈乌；他的妹妹林加娃和他的妻子安娜与女儿索菲娅；另外还有约一百人），承诺让所有立陶宛人皈依天主教，并与骑士团结盟反对波兰。马夸德与大团长谈了话，大团长对维陶塔斯的诚意表示怀疑。维陶塔斯得知此事，就派了第二个代表团，在盖尔尚的伊凡[7]带领下前去向大团长告知，说斯科盖沃已经得知了上一次联络，维尔纽斯总督也得到了警报，雅盖沃最小的弟弟斯威特里盖拉（1370～1452）已经向维陶塔斯宣战。康拉德·策尔纳同意与维陶塔斯缔结新的盟约，并派遣一支军队帮助维陶塔斯去攻打维尔纽斯（这差不多是康拉德·策尔纳的最后一次行动）。此次进攻没有成功，但在之后三年里，十字军与维陶塔斯联手穿过立陶宛西部，屡战屡胜。新任大团长康拉德·冯·瓦伦罗德不准维陶塔斯与任何立陶宛人接触，除非有懂立陶宛语的条顿骑士同时在场。马夸德·冯·萨尔茨巴赫是其中最有名的，他和维陶塔斯关系很好。但马夸德是个才华横溢的骑士，冯·瓦伦罗德非常需要他的辅佐并让他为其他人树立榜样，所以不可能让他全职当维陶塔斯的跟班。

雅盖沃心急如焚。他的兄弟们要么无能，要么不值得信赖；他们的臣民（甚至包括萨莫吉希亚人）也愿意原谅维陶塔斯与敌人第二次结盟。国王只能依赖波兰人帮助他统治立陶宛。他任命的1390～1392年的维尔纽斯总督是扬·奥莱希尼茨基，他是来自克拉科夫的军官，他的儿子兹比格涅夫[8]此时只有一岁，后来因为与新国王的长期友谊而成为波

兰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国王用波兰人监管立陶宛的临时政策效果不错，但他知道立陶宛人对此心怀不满。他必须想办法解决维陶塔斯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正在帮助条顿骑士团巩固在马佐夫舍的势力。1391年春季，他的宫相[9]奥波莱公爵瓦迪斯瓦夫二世将托伦附近一座城堡抵押给大团长。这是一座具有关键意义的要塞，保卫着瓦迪斯瓦夫二世公爵在多布任和库亚维的土地，是拉约什大王几年前为报偿他的贷款和效劳抵押给他的。雅盖沃大为光火，出兵攻击瓦迪斯瓦夫二世公爵的土地，但条顿骑士团大举出动，赶走了波兰军队。这时有人提出，条顿骑士团可以干脆把瓦迪斯瓦夫二世的土地买下来；1392年5月，由于条顿骑士团希望从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那里买下诺伊马克，其他谈判也开始了。康拉德·冯·瓦伦罗德不愿购买所有权含糊不清的地产，因为这不符合“信奉上帝、荣誉与正义”的信念，但他想尽可能地帮助匈牙利国王与王后以及奥波莱公爵。7月底，他付了5万匈牙利古尔登给瓦迪斯瓦夫二世公爵，后者把多布任抵押给骑士团。在这之前，大团长刚刚花了6632古尔登买下了对诺伊马克附近兹拉托利亚的领主权。这些交易按照中世纪的标准完全合法，但对正在发展的波兰国家的主权构成了直接挑战。

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吉斯蒙德正试图肢解波兰王国，将其中最重要的南部占为己有，同时将北部那些价值略低的部分慷慨地（尽管或许只是暂时地）分给自己的同谋者。考虑到这种前景，以及西吉斯蒙德过于多嘴的个性，我们很容易理解波兰人为什么执着地为本民族的生存担忧。波兰需要的是一位和西吉斯蒙德一样狡猾而肆无忌惮的统治者。波兰人也终将慢慢地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统治者的确就是这样一个人，雅盖沃的狡猾和在外交方面的奸诈在那个时代罕有其匹。唯一的问题是，他是在为波兰的利益活动，还是在为立陶宛的利益活动，或者只是为了他自己？

雅盖沃告诉别人的东西都仅仅是他想让他们相信的。与大多数立陶宛人不同，他是个安静、喜欢沉思，甚至有些阴郁的人。他不饮酒，食量也少。他对音乐和艺术不感兴趣，不过在宫廷豢养了一些罗斯乐师。他的性欲也非常冷淡。他的一大爱好是狩猎，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听森林里的夜莺唱歌，因此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森林之一对他而言无疑是幸运的，它面积广袤，令人生畏，甚至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那时这座森林里到处是鹿、欧洲野牛和逐渐灭绝的原牛。雅盖沃在最偏僻、最与世隔绝的森林深处独处时非常开心。

雅德维加也乐于让粗野的丈夫待在森林里。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原本不肯放弃她年轻的哈布斯堡爱人。但在教士们劝她考虑那些可以成为她臣民的立陶宛人的失落灵魂之后，她才同意了这门亲事。她最喜欢教堂礼拜和做善事，最害怕的是宫廷娱乐活动和身为妻子的职责。她积极参与政治，尤其是在与大团长打交道的时候，她后来也很重视与他的友谊。她也不太清楚丈夫的计划是什么。她不懂立陶宛语和俄语，而雅盖沃的波兰语很差，且不爱说话。

立陶宛的更多内战

立陶宛人对雅盖沃怀有与波兰人一样的疑问。雅盖沃在波兰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多，他的立陶宛臣民渐渐倒向他的竞争对手。维陶塔斯的头衔是大公，比国王低，但他曾主持过立陶宛人抵抗十字军的战争，所以有机会赢得英勇而直率的美名，这正是雅盖沃永远得不到的。雅盖沃和维陶塔斯互不信任，双方都还没有忘记科斯图提斯的死。维陶塔斯于1389年投奔条顿骑士团的时候，雅盖沃任命基辅公爵斯科盖沃为立陶宛西部、即原维陶塔斯领地的统治者，还派遣另一位兄弟去参加即将爆发的战争。雅盖沃及其兄弟都没法像维陶塔斯那样赢得臣民的爱戴，有些立陶宛人之所以投奔十字军那边，单纯是为了向维陶塔斯效力。

1390年夏季，维陶塔斯率领来自普鲁士的十字军兵临维尔纽斯城下，立窝尼亚骑士团在那里与他们会合。未来的英格兰国王博林布罗克的亨利[10]借给他们的弓箭手展现了他们一贯的高超战斗力，杀死了大批立陶宛、罗斯和波兰敌人。维陶塔斯的一个兄弟死于此次战斗，雅盖沃也有一个兄弟在此阵亡。围城战最终变成了工兵之间的较量，直到五周之后天气变得恶劣。十字军不情愿地中断了白天的攻击和夜间的狂欢，撤回柯尼斯堡，在那里开始新一轮娱乐。

尽管波兰人参加了立陶宛内战，条顿骑士团与波兰王国仍处于和平状态。双方都不愿意挑起新的全面战争，雅德维加更是坚决禁止讨论对骑士团开战。条顿骑士团也有别的事情要忙，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正在筹划一次针对突厥人的大规模十字军远征。波兰人担心这场战争会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他们猜对了），并估计最后的最大输家是波兰。自波兰人上一次与条顿骑士团作战以来，骑士团的声誉一直增长，而目前很少有波兰人信任雅盖沃的动机或他的军事才干。

鞑靼人的因素

与此同时，从草原传来的消息让罗斯人和波兰宫廷兴致勃勃。自1385年以来，鞑靼可汗脱脱迷失[11]一直在竭尽全力抵挡帖木儿从突厥斯坦发起的进攻，但在1391年，脱脱迷失在一场大战中惨败，险些丢了性命，只带了一小群追随者逃离战场。他逃到立陶宛，请求庇护和支援。立陶宛和波兰如果与脱脱迷失结盟，说不定能赶走帖木儿，并成为西部草原和更多罗斯国家的主人。要达成这个目标，雅盖沃及其兄弟需要与条顿骑士团议和，甚至需要他们的帮助。但如何才能与骑士团议和呢？雅盖沃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立陶宛归属维陶塔斯，萨莫吉希亚归属条顿骑士团。但他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雅盖沃明白，他在草原上作战的胜算比他的祖父大得多。对他来说，这不会是一场由剑士、长矛兵和弓箭手进行的传统作战。战争方式的革新正在改变传统战略和战术，大炮的发明让很多年代较老的要塞一下子就落伍了（这是近期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许多城堡接受大规模翻修的原因之一），并让进攻方暂时享有相对于防守方的优势。大炮很笨重且时常很不可靠，但它们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大炮的主要用途是攻城，因为它们能比投石机更有效地摧毁较单薄的城墙，而且大炮比沉重的投石机更容易架设和操作。而如果把大炮安置在防御工事内，它们也能对进攻者造成巨大杀伤。在野战中，大炮能比弓箭在更远距离杀伤敌人，而且大炮的巨响和浓烟也能吓坏人和马。

雅盖沃亲眼见识过这种新武器的惊人威力。他知道，不断涌向东欧的十字军战士向大团长介绍了这种新武器，导致条顿骑士团开始强调远程火力，除大炮之外还在部队里编入了更多的弓箭手。即便如此，大团长相对于立陶宛人的技术优势已没有过去那么大，且这种优势仅仅是暂

时性的。现在立陶宛人能从波兰获取最新式武器（克拉科夫与欧洲的工业和技术中心意大利之间的距离其实比去立窝尼亚的距离更近），所以这些曾经的异教徒如今并不比十字军落后许多。

十字军攻打维尔纽斯

目前，雅盖沃的上述考虑都还只是梦想。他必须集中力量击退十字军溯涅曼河而上的进攻。雅盖沃的兄弟们想要用更重型的火炮来对付条顿骑士团的新武器，但当时还没有炮车，所以他们只能从水路运输这种沉重的武器。条顿骑士团控制着涅曼河的下游，所以从波兰到立陶宛的唯一水路是从维斯瓦河向上游航行到布格河，然后到纳雷夫河，再沿着它的支流直到接近在格罗德诺注入涅曼河的那些溪流，接着拖曳大炮走一小段陆路，或者通过马祖尔湖区[12]的诸多水道，全程走水路。可以预料的是，条顿骑士团在纳雷夫河以北的荒野建造了一些城堡来封锁这条路线。这给立陶宛人制造了一些困难，因为那片土地属于马佐夫舍诸公爵，但这没有阻止雅盖沃向他的兄弟们提供援助。自索多维亚人撤往东方以来，那片荒野就无人居住，只有来自普鲁士、立陶宛和马佐夫舍的袭击队伍往来其间。不过在严格意义上说，那里仍然是马佐夫舍领土。

与此同时，战争变得比以往更加残暴。条顿骑士团若是在立陶宛人的要塞内俘获了波兰人，就指控他们叛教并协助异教徒，将他们斩首。十字军在萨莫吉希亚的袭击很少遇到抵抗，所以战事简直如同搜捕。萨莫吉希亚人为了报复，有时将俘虏处死并献祭，让被俘的条顿骑士穿着全套盔甲，将他们捆在马背上，再放到巨大的柴堆上活活烧死，或者将他们捆在圣树上，用箭雨射死他们。即便如此，战争也是时断时续的。虽然战斗过程很凶残，但也有一些停战和突然的变节；而且各方都热爱狩猎，他们可以为了狩猎专门安排停战。

虽然维陶塔斯是十字军的盟友，但在看到自己祖先的土地遭到蹂躏之后，他就开始寻找别的途径来夺回自己在维尔纽斯的权力。从理性的

角度看，他知道自己最好与堂兄雅盖沃联手，但维陶塔斯是个激情澎湃的人，不会始终服从于理性。何况，他还没有原谅雅盖沃在过去对他的多次背叛，而且他知道雅盖沃企图暗杀他，所以安排了很多鞑靼卫士在自己身边。维陶塔斯的情感波动极大，他被迫向某些人寻求帮助，但并不喜欢自己的所有盟友。条顿骑士团对他的行为抱着一种冷嘲热讽但很有哲学意味的立场，正如一位编年史家所说的："异教徒很少做正确的事情，维陶塔斯及其亲戚们撕毁的条约就可以证明。"

但当维陶塔斯理性地考虑自己的处境时，他认定自己目前与条顿骑士团结盟的策略注定失败。在条顿骑士团庇护下取得的胜利会让他成为贫穷的统治者，受到本国人民的憎恨，并让自己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大团长的善意。他可能设法避开了骑士团对他一举一动的监视，给雅盖沃送了信；如果是这样，他的信一定含糊其词，即便被骑士团发现了也不会对他造成伤害。或许雅盖沃仅仅是感到时机成熟，可以向堂兄提条件了。我们明确知道的是，1392年8月初，雅盖沃派遣普沃茨克主教亨里克作为使者到普鲁士。这位看上去不像神父的皮雅斯特主教诸侯是国王的妹妹马佐夫舍公爵夫人亚历山德拉的姻亲。亨里克利用听告解的机会把他的主公的提议传达给维陶塔斯。维陶塔斯以让自己妻子回家探亲为借口，让安娜与雅盖沃谈判。他还设法让骑士团释放了很多之前被囚禁在多座要塞但受到礼遇的人质。然后，他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亨里克主教[13]，并解散了一群刚刚抵达、打算参加下一次立陶宛远征的英格兰十字军。英格兰人是欧洲战斗力最强的弓箭手，曾在之前与雅盖沃臣民的战斗中杀得他们落花流水。维陶塔斯这么做就帮了雅盖沃大忙。

维陶塔斯仔细地谋划反叛，指示驻扎在十字军城堡里的萨莫吉希亚武士杀死或俘虏驻军当中的德意志人。此后，他把立陶宛军队派往各条相距甚远的战线上，进入普鲁士和立窝尼亚，击溃了萨莫吉希亚境内的条顿骑士团军队。维陶塔斯重返立陶宛，受到了热烈欢迎。每一个萨莫吉希亚人都赞赏他的勇气和狡黠，把他的和蔼可亲与雅盖沃的兄弟们的

睚眦必报相比较。他们明白，萨莫吉希亚人的一系列军事失败很可能快要结束了。高地立陶宛人也很高兴看到外国人（波兰人）的统治结束。

过了一年，大团长瓦伦罗德才有办法报复维陶塔斯。1393年1月，他攻打格罗德诺，并投入了来自荷兰和法兰西的骑士。这威胁到了马佐夫舍与维尔纽斯之间的主要交通线，有效地孤立了立陶宛。维陶塔斯和雅盖沃向教宗特使求助，希望安排和谈。这年夏天，和谈在托伦举行。但十天后，瓦伦罗德因病退出了和谈。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

新任大团长康拉德·冯·容金根是一位坚决果断的领袖，他擅长运筹帷幄，极具远见。他相信，如果骑士团在维尔纽斯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就有助于实现地区和平。维陶塔斯和雅盖沃肯定会竭尽全力保卫维尔纽斯。

1393年末，一支强大的十字军部队在普鲁士集结，队伍里包括法兰西和德意志战士，还有一队勃艮第弓箭手（可能是英格兰雇佣兵），他们的集中射击能够对异教徒造成重大伤害，就像他们在近些年里令法兰西军队损失惨重一样。1394年1月，十字军开始沿涅曼河进军，把冰封的河面当作进入立陶宛腹地的通衢大道。维陶塔斯企图在早期阻止十字军的进军，但在十字军的第一轮箭雨下险些丧命，他的军队也被击溃。立陶宛人无力抵抗步步紧逼的400名十字军骑士和他们率领的成千上万名军士与步兵，只得匆匆撤退。

维陶塔斯从波兰得到一支强大的骑士队伍的支援，但这支部队即便与他手下的15000名骑兵加起来也不足以抵挡此时已经威名远播的十字军弓箭手向立陶宛腹地的进攻。十字军穿过森林、沼泽和开阔的田野，避开埋伏，抵达了维尔纽斯。维陶塔斯在这里还得到了一支罗斯部队的支援。维陶塔斯大公在维尔纽斯展开了一场血战，双方都损失惨重，最终维陶塔斯一方由罗斯人组成的那一翼溃散，立陶宛部队也纷纷逃跑。维陶塔斯自己也不得不撤退，这一次又险些丧命。维陶塔斯企图在安全

距离之外收拾残兵败将，重整旗鼓，与此同时条顿骑士团则开始攻打他的都城。他们从1390年起就很熟悉这里。他们制订了新计划，准备庆祝立陶宛人的皈依，这是在十字军武力保障下的货真价实的皈依，而不是雅盖沃和维陶塔斯那种模棱两可的假皈依——他们只在正式文件上才署自己受洗后的基督教名字。十字军战士问，这难道不足以证明雅盖沃和维陶塔斯对罗马的效忠是虚情假意吗？

围城战的第八天，立窝尼亚团长抵达，为十字军带来增援。他受到热烈欢迎，因为这样十字军就可以包围全城，遏制要塞守军的突击，并猛攻城墙上最薄弱的地段。立窝尼亚部队被部署到河边，他们在那里建了两座桥，然后过河去掳掠乡村。在这次搜粮行动中他们损失了50人（其中只有三人是德意志人，只有一人是骑士，说明他们的队伍中有大量原住民士兵），但杀死和俘虏了“不计其数”的立陶宛人。然而围城战并不顺利。又激战了一周后，守军冲杀出来，烧毁了十字军工兵为弓箭手建造的火力点、攻城塔和桥梁。不过，十字军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他们的大炮轰塌了一座石塔，纵火烧毁了许多木制防御工事。但不久之后，立陶宛人烧毁了十字军营地的一座塔楼，不仅导致很多法兰西战士伤亡，还摧毁了他们的大部分给养，令十字军可以在维尔纽斯逗留的时间比原计划有所缩短。大团长让工兵继续坚持作战四天，但很显然，十字军刚建好新的攻城设施，立陶宛人就能冲出来将其摧毁。给养所剩无几，十字军已经没有时间来计划强攻。此外，维陶塔斯一直在重组他被打散的军队。十字军的侦察兵报告称，维陶塔斯很快会赶来救援维尔纽斯。那就意味着十字军将不得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这样的前景很不妙。

十字军领袖聚在一起商议，他们只得不情不愿地同意放弃围城。大团长让立窝尼亚部队先撤，然后自己向西撤退，沿途遭到立陶宛人的骚扰。立陶宛人砍伐树木封路，在渡口设防，并在森林里设伏。十字军时而与敌人谈判，时而且战且退，从维尔纽斯后撤，然后突然改变方向，

穿过萨莫吉希亚，避开了维陶塔斯的军队和他设置的障碍。

此次远征是中世纪最值得纪念的军事行动之一，条顿骑士团调动了来自全欧洲的骑士和军事专业人员来攻打敌人的都城，这在任何国家都算得上值得称颂的骑士伟业。然而十字军还是无法占领这座立陶宛的最大城市。战争继续，条顿骑士团沿着涅曼河进攻，蹂躏萨莫吉希亚人定居点；但他们再也不能入侵立陶宛高地，更不能攻打雅盖沃的都城。立陶宛人仍然处于守势，等待时机。他们没有理由在一场正面对决中冒险赌上自己的全部力量，也没有理由深入普鲁士。至少现在还没有。

和平

1393年底，维陶塔斯已成为立陶宛的主宰。他驱逐了雅盖沃所有的兄弟。1394年，维陶塔斯的军队赢得了一场重要胜利，打垮了马佐夫舍、加利西亚和摩尔达维亚诸王公，于是雅盖沃彻底抛弃了自己的兄弟们：卡里布塔斯流亡到克拉科夫；摩尔达维亚统治者也逃到克拉科夫，在那里被囚禁；斯科盖沃于1396年死在基辅，可能是被毒死的；斯威特里盖拉短暂地为条顿骑士团效力，后来与雅盖沃和解。亨里克主教被毒死，无人为他落泪。

雅盖沃保留了立陶宛最高君主的头衔，而维陶塔斯则满足于较低的大公头衔，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时光。[14] 但随着时间流逝，维陶塔斯掌握了立陶宛的实权。

与此同时，十字军继续袭击立陶宛。不但普鲁士军队经常进入萨莫吉希亚，立窝尼亚团长的黑白两色大旗（中央是黑色条纹，两侧有水平的白色块，旗后有三角形小尾旗）也经常在那里飘扬。对萨莫吉希亚的最后一次袭击发生在1398年冬，十字军俘虏了700人和650匹马，杀了很多人；他们在天气易变的时节来到萨莫吉希亚，让守军措手不及。这种赌博在过去颇具风险，而一旦成功，收益就很大。维陶塔斯没有报复。他正在罗斯南部作战，希望早日结束讨厌的北方战争，因为这正妨碍他在草原取胜。但因为他向雅盖沃做过承诺，所以不能与骑士团议和。不过，承诺并不能约束维陶塔斯。

不久之后，维陶塔斯有了拒绝服从波兰命令的借口。雅德维加（她才是波兰的合法君主，而非雅盖沃）要求立陶宛人缴纳一笔税，维陶塔斯的波雅尔们不愿服从。波兰君主的要求不算过分。维陶塔斯保卫萨莫吉希亚时依赖于波兰的帮助，而波兰贵族和教士在问，他们为什么要承

担萨莫吉希亚作战的花销，而立陶宛人不用纳税。波兰人的推断可能是，维陶塔斯已别无选择，不管怎样抗议，他最后肯定还是会迫使自己的臣民纳税。

这种推断低估了维陶塔斯。大公对萨莫吉希亚并没有执念，他正在研究草原上的形势。在将雅盖沃的兄弟们从罗斯南部驱逐的过程中，维陶塔斯确信鞑靼人对该地区的控制力已经衰弱了。而且，如果自己在臣民眼里只不过是波兰的傀儡，他就会失去臣民的爱戴。

维陶塔斯明白，如果拒不纳税，他就必须与至少一个敌人议和。他觉得自己最好与条顿骑士团而非鞑靼人议和，因为他觉得自己扩张领土的最大希望是攻击已经衰败的后者。他有机会征服草原，但在对条顿骑士团作战时却顶多能维持守势。可如果要与大团长议和，代价就是放弃萨莫吉希亚。对维陶塔斯来说幸运的是，雅盖沃也执着于将鞑靼人逐出草原，以彻底消除他们对波兰和立陶宛边疆的威胁。雅盖沃的波兰臣民历来畏惧鞑靼人，所以同意他的计划。雅德维加认识大团长并对他有好感，这也对议和有利。她一直希望与普鲁士和平相处，曾多次鼓励与大团长的代表谈判，尽管过去的会议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现在谈判终于有希望取得突破了。

1398年9月，维陶塔斯与条顿骑士团的和谈取得成果，双方缔结了《萨利纳斯条约》。萨莫吉希亚从此归德意志人所有。维陶塔斯和雅盖沃率军去了考纳斯，萨莫吉希亚的最后一批异教徒在那里向条顿骑士团投降。萨莫吉希亚人愤怒地咆哮，但他们明白自己若没有立陶宛大公和波兰女王夫君的支持，就不可能抵抗下去。而且他们曾经被十字军控制过，当时的那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因此将来也许还有自由的希望。

次年即1399年的夏季，一支由立陶宛人、罗斯人、鞑靼人、波兰人和条顿骑士团组成的大军来到草原，挑战帖木儿在那里的主宰地位。结果是又一场军事灾难。[15] 如果维陶塔斯打赢了这场战役，那么条顿骑

士团的历史就会迎来一个出人意料且充满异国情调的新转向。不过，即便他们在草原吃了败仗，也不会因此重回旧的生活方式。在后来的岁月里，有些条顿骑士仍会陪同维陶塔斯讨伐罗斯敌人，范围远至莫斯科；还有一些骑士会乘船去摧毁哥得兰岛的海盗巢穴。

十字军圣战似乎结束了。条顿骑士团达成了目标，即令大多数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并征服剩余的异教徒。条顿骑士团每年还会迎来一些新的十字军战士帮他们驻守在萨莫吉希亚的城堡，但到1400年，北方十字军就基本结束了。

有意思的是，条顿骑士团受到的最大抱怨来自一些教士。他们怨恨大团长没有立刻强迫他的新臣民接受洗礼。康拉德·冯·容金根奉行的是经济发展的政策，他将很多立陶宛小波雅尔打造成了一个较小的、可靠的统治阶级。他相信只要假以时日，这一阶级就会慢慢推动那些顽固的森林居民自愿皈依。他的推断可能是正确的。

维陶塔斯也如此相信。他秘密地鼓励萨莫吉希亚人坚持下去。他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再次解放他们。

---

[1] 文策尔（1361～1419），绰号“懒人”，是神圣罗马皇帝和波希米亚国王查理四世（卢森堡家族）的儿子，继承父亲的波希米亚王位（称瓦茨拉夫四世），1378年成为德意志国王，但始终没有被加冕为皇帝。文策尔酗酒而缺乏政治才干，他在位时波希米亚的王权大大衰落。他与波希米亚和德意志贵族都冲突不断，两次被波希米亚贵族俘虏，被迫向贵族做出一系列让步。文策尔因为深陷波希米亚的斗争而无暇去德意志履行职责，也未寻求加冕为皇帝，引起德意志贵族的愤怒，于1400年被废去德意志国王之位。普法尔茨伯爵鲁普雷希特被选为新的德意志国王，但文策尔拒绝承认，于是出现两位德意志国王并存的现象。后来文策尔的弟弟西吉斯蒙德（娶了拉约什大王的女儿玛丽亚，所以成为匈牙利国王）后来继承了波希米亚，并在鲁普雷希特死后成为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

[2] 现代人也喜欢搞阴谋诡计和背后暗箭伤人，但很少有现代国家因为世袭领袖改变立场而瓦解。（作者注）

[3] 克列瓦在今天白俄罗斯的西北部。

[4] 匈牙利人也拒绝接受西吉斯蒙德当他们的国王，但他借用兄长的捷克和德意志军队镇压了匈牙利贵族的多次反叛。（作者注）

[5] 摩尔达维亚是东欧的一个历史地区，曾是一个公国，在东喀尔巴阡山和德涅斯特河之间。起初是独立国家，后成为没有独立性的自治地区，1859年与瓦拉几亚合并，成为现代罗马尼亚国家的基础。摩尔达维亚的西半部分今属罗马尼亚，东部属于摩尔多瓦共和国，北部和东南一部属于乌克兰。

[6] 瓦拉几亚是东欧的一个历史地区，在今天罗马尼亚境内。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瓦拉几亚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1859年，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合并，组成现代的罗马尼亚国家。

[7] 即伊凡·奥利尚斯基（？～1402？），他是维陶塔斯的左膀右臂，他俩的妻子是姐妹。伊凡的女儿后成为维陶塔斯的第三任妻子。伊凡曾护送维陶塔斯的唯一女儿索菲娅去莫斯科，嫁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立陶宛的很多条约上都有伊凡的签名，足见他的地位之重要。

[8] 兹比格涅夫·奥莱希尼茨基（1389～1455）是波兰重要的教士、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任克拉科夫主教，是第一位波兰籍枢机主教。他深度参与了波兰的统治，曾任雅盖沃国王的秘书，陪同他参加1410年的格伦瓦德战役，后来担任雅盖沃的儿子瓦迪斯瓦夫三世幼年时期的摄政者。奥莱希尼茨基高瞻远瞩，推动波兰王国彻底吸收立陶宛，从波希米亚王国那里征服西里西亚，与匈牙利结盟抵抗奥斯曼帝国。奥莱希尼茨基学识渊博，大力推动波兰的学术和教育。著名的编年史家扬·德乌戈什是他的秘书。

[9] 宫相是匈牙利王国从11世纪到1848年的最高级官职，是国王或副王的代表，也有重要的司法职能；起初由国王指定，17世纪开始由议会选举产生。

[10] 后来的英王亨利四世。

[11] 脱脱迷失（？～1406）是金帐汗国的重要君主，祖先为术赤第十三子秃花帖木儿。在帖木儿帮助下，脱脱迷失重新统一了分裂的金帐汗国，并与莫斯科大公国常年交战，一度占领莫斯科并屠城。但他后来与帖木儿决裂，遭到惨败。脱脱迷失逃往乌克兰，向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求援。1399年，在沃尔斯克拉战役中，立陶宛与脱脱迷失的联军被帖木儿打败。脱脱迷失后来遇害。他是最后一位发行蒙古文字钱币的可汗。

[12] 马祖尔湖区在今天波兰的北部，有两千多个湖泊。

[13] 亨里克于1390年成为普沃茨克主教时未行圣职按立礼，故不是得到正

式承认的主教，他的婚事因此引发了来自条顿骑士团的非议。天主教会要求所有圣职保持独身。

[14] 1429年，维陶塔斯企图自立为立陶宛国王。西吉斯蒙德聪明地表示愿意给他这个荣誉。但维陶塔斯的野心被雅盖沃挫败，他派人偷走了维陶塔斯准备的王冠和其他王室宝器。年迈的维陶塔斯在冬季骑马长途跋涉，企图阻止加冕礼被取消，途中马失前蹄，他负重伤而死。（作者注）

[15] 帖木儿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身去对付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了一场为期两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于1402年在安卡拉击溃奥斯曼军队。于是他成为中亚、金帐汗国、波斯和印度与小亚细亚一部分地区的主人。（作者注）

十 坦能堡战役

背景

14世纪普鲁士历史的开端是一场冲突，结尾也是一场冲突。第一场冲突开始于该世纪初，骑士团获得了西普鲁士（原名波美雷利亚）。这片领土在多个层面上具有战略意义：它的东部边境是维斯瓦河，所以任何敌对势力若是占领了波美雷利亚，就可以切断维斯瓦河上的交通要道；西普鲁士的居民对普鲁士经济至关重要（尤其是但泽城），西普鲁士的武士则是骑士团的战争机器；法兰西、勃艮第和德意志十字军前往普鲁士时一般选择穿过大波兰的路线，但如果这条路线被切断，他们可以取道勃兰登堡、诺伊马克和波美雷利亚。但波兰国王和教会认为，骑士团通过战争和购买获得西普鲁士无异于偷窃。在他们看来，不管波美雷利亚的过去怎样，或者当地的族群构成如何，它都是波兰的土地，因为那里向教宗缴纳彼得税。德意志邦国不缴纳这种税，但波兰土地都缴纳。波兰爱国者无时不为丢失了这个重要的省份而哀叹。

与14世纪同时结束的第二场冲突就是争夺萨莫吉希亚的战争。条顿骑士团认为这块土地一方面是通往立窝尼亚的陆桥，能让他们一年四季都与立窝尼亚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又是异教徒抵制皈依的中心。萨莫吉希亚人很少承认立陶宛大公的权威，而立陶宛大公拼命奋战，企图将萨莫吉希亚变成自己的国土。

出人意料的是，条顿骑士团分别通过1343年的《卡卢什条约》和1398年的《萨利纳斯条约》与波兰和立陶宛达成了和平。两个立陶宛

人，波兰国王雅盖沃和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甚至帮助骑士团结束萨莫吉希亚人的抵抗，以换取骑士团支持他们远征莫斯科和讨伐鞑靼人的行动。

1409年，萨莫吉希亚爆发叛乱，骑士团与立陶宛的合作结束了。条顿骑士团有理由相信维陶塔斯怂恿了那些叛军，而维陶塔斯背后就是狡猾的雅盖沃。骑士团的外交一贯很谨慎，但如今的新任大团长乌尔里希·冯·容金根是个鲁莽的人。他不仅相对年轻，而且似乎相信他的军事修会忘记了自己的本来目标，即讨伐异教徒。他口中的异教徒指的是萨莫吉希亚人及其盟友，不是遥远的罗斯人、鞑靼人、海盗或突厥人。他认为敌人近在咫尺：波兰和立陶宛。

大团长傲慢地要求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停止支援萨莫吉希亚叛军，这在这两个国家引发了愤怒和要求战争的咆哮。不过，波兰的激进好战分子能否煽动更为谨慎、仍然敬畏条顿骑士团军事声誉的大部分贵族与教士，还有待观察。

力量对比的变化

条顿骑士团成员，尤其是大团长的议事会成员，都自信有能力威慑波兰贵族、立陶宛波雅尔和两国的高级教士，不管大团长乌尔里希1409年的举措在两国掀起了多么大的爱国怒潮。条顿骑士团相信波兰和立陶宛统治者有太多事情要处置，不可能联手对付骑士团；他们还相信维陶塔斯和雅盖沃互不信任，不可能在军事上合作（所有人都知道他俩宿怨的起源和之后的分分合合），而他们的贵族和教士就像西方的贵族和教士一样，是一群很难驾驭的人。而且，维陶塔斯和雅盖沃还从来没有试图率军进入普鲁士心脏地带，所以他们现在顶多会攻击一些相距遥远的地点，可能在萨莫吉希亚和西普鲁士，也可能在库尔姆。大团长可以动用当地资源抵御那些危险性较低的袭击，然后集中机动部队去打击敌人的主力（它可能会入侵西普鲁士）。

此外，所有人都知道维陶塔斯和雅盖沃在他们的东方还面临着一个永久性问题，即鞑靼人的长期威胁；在他们的南方，西吉斯蒙德可以快速集结他的匈牙利、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军队入侵波兰。最后，几乎每一位德意志骑士都相信，波兰贵族或许愿意为保卫自己家园而战，但他们不愿招募军队投入一场进攻性战争；波兰高级教士和骑士肯定只会在嘴上说说豪言壮语，但拒绝出资备战或授权招募封建军队。骑士团的误判基于一个屡经验证的事实：波兰人长期以来不信任雅盖沃，就像他们不信任维陶塔斯和条顿骑士团一样。但是时间会改变一切，在当波兰国王的十年里，雅盖沃与波兰臣民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他们学会了更加信任他，也对他渐渐习惯了。他还没生出一个儿子，但已经有一个女儿，并取名为雅德维加，与她的母亲同名。这个小雅德维加有朝一日将会继承王位。在波兰人眼中，雅盖沃现在已经是他们的国王，而不仅仅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立陶宛王公。

波兰人对雅盖沃态度的改变在1409年12月表现出来了，当时尼古拉·特拉巴（后成为格涅兹诺大主教）在布列斯特参加了雅盖沃和维陶塔斯准备作战的秘密会议。他们后来通过外交手段把马佐夫舍公爵扬拉拢为盟友，但没能拉拢到马佐夫舍的西莫维特四世公爵（他保持中立）和波美拉尼亚诸公爵（他们成为条顿骑士团的盟友）。更重要的是，波兰和立陶宛人在心理上为即将开始的大战做好了准备。

即便少数相信雅盖沃可能对骑士团开战的德意志人也没有想到，最近一轮怒气冲冲的叫嚣、禁运和大团长对马佐夫舍和大波兰的袭击竟会引发一场大战。首先，大规模作战在当时很稀罕，因为这么做的风险太大，经济上的报偿太小，尤其是与袭掠敌人土地（往往只有半武装的农民防守）和向市民敲诈赎金相比。其次，除了1409年的那种零星冲突之外，波兰和普鲁士之间已经和平七十年了，而且1398年的《萨利纳斯条约》和1404年的《拉西扬茨条约》已经解决了萨莫吉希亚问题，为什么还会发生与立陶宛的战争呢？在世的德意志人和普鲁士人当中很少有人记得波兰人或立陶宛人的上一次大举入侵。敌人可能从大波兰发动边境袭击，或者攻击东普鲁士那些防御较弱的边疆地区，这样的袭击之后双方会签订新的停战协定。而在主要的萨莫吉希亚问题上，1410年的立陶宛人一定会像1409年的波兰人那样让步吧？

同理，大团长再度入侵波兰的可能性也极小。波兰人增援了他们的边境要塞之后，大团长若没有强大十字军的支援，就不能指望像过去那样轻松地赢得一系列胜利，何况不大可能有大群志愿者去普鲁士参加对一个基督教王国的入侵。不过如果在通常的骑士精神的吸引之外加上经济鼓励，仍会有不少德意志和波希米亚雇佣兵愿意去普鲁士。至于入侵立陶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过去大团长们派重兵东进的时候都会事先确定波兰人不会等骑士团进入荒野之后立刻袭击普鲁士。如今骑士团不大可能得到波兰人的配合了。最后，当前各方争夺的东西似乎并没有重要到让任何一位统治者愿意冒险打一场正面对垒的程度。所以，尽管

罗马和阿维尼翁的两位教宗以及两位对立的皇帝——波希米亚的文策尔和普法尔茨的鲁普雷希特[1]——注意到了1409～1410年东欧日益紧张的气氛，他们都没有花力气去促成和解。在遥远国度因微不足道的土地和个人虚荣而起的冲突，不值得他们采取超出常规的行动。

西欧人几乎没有注意到普鲁士的情况，因为他们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置：旨在结束基督教会大分裂[2]的比萨会议似乎反而让原本就十分棘手的局势愈发复杂化；突厥人不断北上，冲出了巴尔干半岛，进入施泰尔马克和克罗地亚，威胁到了采列家族[3]的土地（他们是雅盖沃国王和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的姻亲），从而打通了越过阿尔卑斯山天险进入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道路；勃艮第和法兰西的战争让很多曾经派遣十字军去普鲁士的家族无法抽身。不过，1410年7月15日，在坦能堡和格伦瓦德这两个村庄之间的田野上还是爆发了一场大战。

德意志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分别称之为坦能堡战役、格伦瓦德战役和加基里斯战役。它的历史地位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意义。这一场战役本身并没有一夜之间改变中北欧的历史，在战役打响之前，力量平衡早就发生了变化，而且那些变化是根本性的，所以假如坦能堡战役从来没有发生，世界的面貌也不会有大的不同。波兰王国在战前就已经在崛起，而军事修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条顿骑士团不大可能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波兰这样一个人口稠密、善于创造、富庶而充满活力的民族平起平坐；而且，因为波兰当时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这是15世纪而不是21世纪，所以假如波兰王室迅速占据了普鲁士，那里的种族构成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在坦能堡大战后的一年之内，条顿骑士团就恢复了元气，能够有效自卫并将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从他们的领土上驱逐出去。但此次战役给骑士团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极大损失，以至于之后的历任大团长再也不能重获他们的前任曾经享有的权力和威望。对条顿骑士团来说，下坡路是从那一天开始的，直到十三年战争（1453～1466）造成彻底的灾难。所以，尽管坦能堡战役可能不是中世纪普鲁士历史上最具决定性

的时刻，快速而愈演愈烈的衰落却是由此开始的。

说到底，坦能堡战役之所以重要，还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事件，得到了不厌其烦的讲述，而且整个民族的命运也很容易和它联系起来，不管这种联系有没有道理。

政治谋划

就连战役的参与者事先也没有料到会发生那样的大战。尽管大团长和立陶宛统治者之间的敌意已经有几十年了，但始于1409年8月的军事冲突并非不能通过让步来解决。教宗们为求促成妥协与和平都施加了国际压力，他们想让基督教世界团结一心，恢复教会的统一，并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上打退突厥人，或者至少阻止他们掳掠人口、抢夺战利品。

试图阻止冲突发生的世俗统治者当中最显著的要数波希米亚国王文策尔。虽然他的德意志臣民普遍拒绝承认他是神圣罗马皇帝，他还是在1409年派遣代表前去调停。10月4日，代表将乌尔里希·冯·容金根和雅盖沃国王请到一起，进行了长达五天的谈判，最后双方同意在来年的圣约翰瞻礼日（6月24日）前暂时停战。这次和解的迹象让很多人对将来也能达成的妥协充满希望。停战协定中最重要的条款授权文策尔提出永久和平的公平条件。他将在大斋节之前提出方案，在此之前双方还可以继续和谈。大斋节之前的几个月最关键，乌尔里希·冯·容金根和雅盖沃都致力于把以反复无常而臭名昭著的文策尔拉拢到自己那边。[4]

大团长让人撰写了一部萨莫吉希亚十字军简史，将立陶宛人描绘为不可信赖的叛徒，他们违背了1386年对波兰人的承诺和1398年对德意志人的承诺。这部书还说，那些皈依基督教的立陶宛人实际上是异端分子，是罗斯东正教徒；萨莫吉希亚人则是彻头彻尾的异教徒，在过去五年里没有做过一次洗礼。大团长不单依赖于文字，还派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代表团去匈牙利。这些代表于12月和西吉斯蒙德国王签署盟约，同意付给他4万古尔登以换取他的帮助。西吉斯蒙德则对来客以礼相待，请客人当他的新生女儿伊丽莎白的教父。这些代表从匈牙利去波希

米亚呈送了最后的证词，等待文策尔于1410年2月8日颁布自己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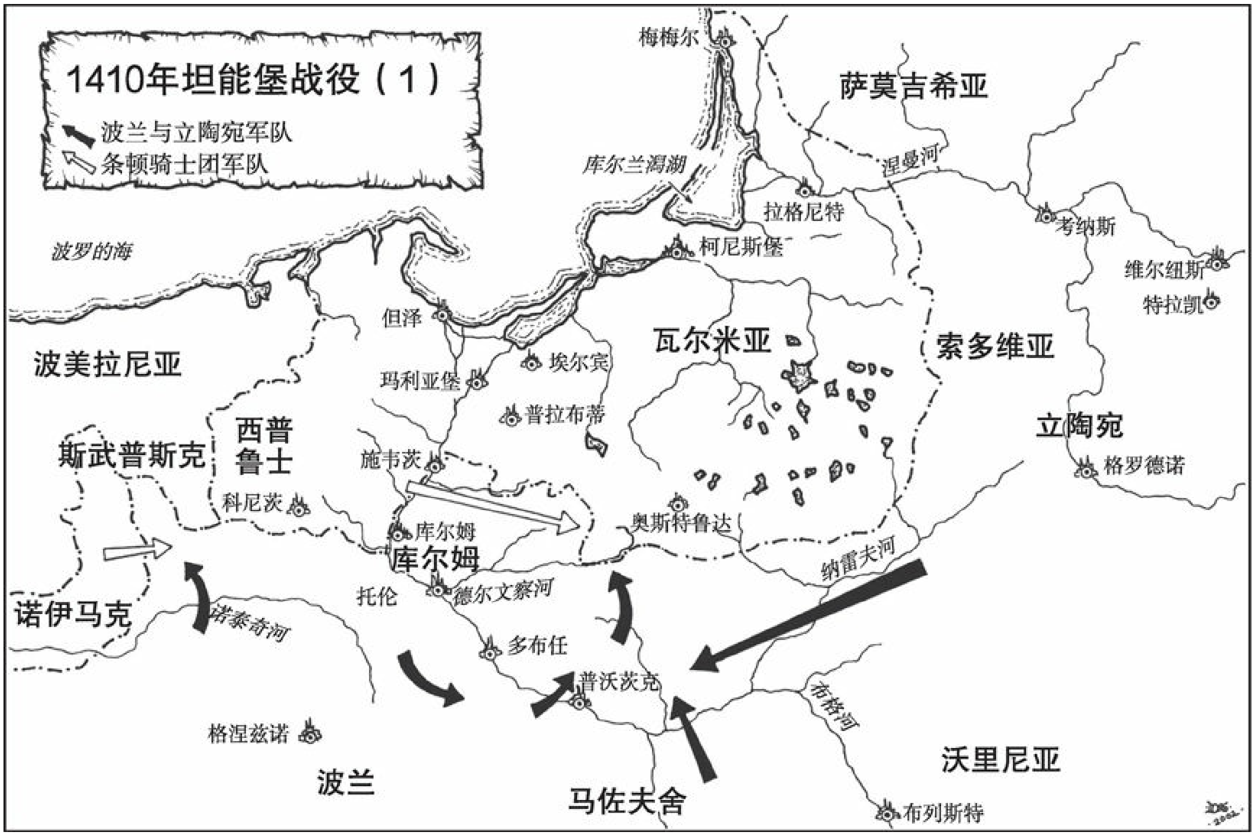
波希米亚国王提出的和平方案的核心是回到战前状态。维陶塔斯和雅盖沃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条件，尤其是立陶宛人的抱怨被无视，波兰人则被告诫不要帮助萨莫吉希亚的“非基督徒”。文策尔警告道，任何一方若不遵守他提议的条约，都将遭到他的攻击。这是例行公事的套话，不能当真。条顿骑士团大获全胜，他们对西普鲁士和诺伊马克的占有权也得到确认。事实上他们的胜利过于彻底，过于一面倒了，因此根本不可能说服波兰国王接受调停者的条件。

骑士团没有得意多久。波兰外交官在布拉格待了一个月，徒劳地辩称和约不公平，最后文策尔大发脾气，威胁要亲自对波兰开战。波兰人走了，坚信他们与条顿骑士团的战争即将爆发；也许他们的所有西方邻国都会参加到一场规模浩大的冲突当中。雅盖沃对文策尔个性的判断更准确，所以并不怕他：雅盖沃拒绝了一切继续谈判的建议。文策尔召唤他于5月去布雷斯劳开会，他故意不派波兰代表前去，让皇帝和条顿骑士团白等了一遭。

集结军队

双方都开始集结军队。雅盖沃在做好准备后召唤维陶塔斯到马佐夫舍与他会合。曾几何时，从立陶宛到马佐夫舍还需要通过林木茂盛、沼泽遍布的荒野。但在纳雷夫河上的贸易路线开启之后，维陶塔斯就能比较方便地带领他的人马来到普沃茨克附近的指定地点了。波兰王军的主力还在维斯瓦河西岸，但雅盖沃派遣波兰骑士去东岸帮助维陶塔斯防守渡口，并且每天都有更多部队赶来。到6月中旬，国王手下已经有超过3万骑兵和步兵（包括18000名波兰骑士和骑士侍从，几千步兵；一些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雇佣兵；11000名立陶宛、罗斯和鞑靼骑兵；一支强大的摩尔达维亚军队，由他们的王公好人亚历山大[5]率领；还有一些萨莫吉希亚人）。

大团长乌尔里希也集结了一支庞大军队，可能多达2万人。但容金根已经允许立窝尼亚团长与维陶塔斯签署停战协定，所以立窝尼亚骑士团的那些优秀骑士都不能参战；而且这些北方骑士对这场战争也没什么热情，尽管立窝尼亚团长立刻写信给维陶塔斯说停战将在宽限期结束时失效，但他没有派兵去普鲁士，也没有攻击立陶宛脆弱的北方土地。另外，容金根在普鲁士只能招募到约1万名骑兵，所以他军中的其他战士都是“朝圣者”和雇佣兵。西吉斯蒙德派来两名显赫贵族和200名骑士，文策尔则允许大团长招募了大批赫赫有名的波希米亚战士。



1410年坦能堡战役（**1**）

我们对双方兵力的了解非常不精确，有的估计是上述数字的一半，有的简直是天文数字。但在各种版本的兵力对比里，两军的比例都是一样的：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相对于骑士团享有三比二的优势。但大团长在装备和组织上有优势，尤其是他在附近有几座要塞，可以提供补给和避难所。而且据他所知，敌人的军队还没有集结到一处，所以他相信自己可以将他们各个击破。雅盖沃和维陶塔斯麾下的一些指挥官曾在之前的军事行动里共同作战，有些人对抗过鞑靼人，有些人有过和十字军作战的经验。不过他们的军队成分混杂，很难维持凝聚力。容金根拥有更多纪律严明的骑士，他们惯于作为一个整体作战。但他手下也有一些世俗骑士和十字军战士，这些人容易受到热情和恐慌的影响。容金根处于守势，有能力撤往预设阵地，并且更熟悉道路、路线和哪些障碍可以通过。所以总的来讲，双方的胜算差不多。

骑士团的一位编年史家（是一个同时代的人，但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续写了杰日贡的扬[6]的著作）生动地描述了战前准备工作，帮助我们理解十字军对其对手的态度：

> ［雅盖沃国王］集结了鞑靼人、罗斯人、立陶宛人和萨莫吉希亚人来对抗基督教世界……于是国王与非基督徒和维陶塔斯会合，后者从马佐夫舍赶来支援他，还带来了公爵夫人……军队之庞大难以描摹，它从普沃茨克出发，开往普鲁士。显赫的戈拉伯爵和斯蒂波尔琪伯爵在托伦，他们是匈牙利国王专门派到普鲁士谈判解决骑士团与波兰的争议的。但他们无计可施，最终离开了波兰国王。他则遵从自己邪恶的、惹是生非的意志，去伤害基督教世界。他不满足于拥有邪恶的异教徒和波兰人，还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招募了大批雇佣兵，以及形形色色的骑士和武士。他们违背荣誉和正义，与异教徒同流合污，去反对基督徒，蹂躏普鲁士的土地。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这些编年史家不偏不倚，但现代读者一定会觉得指责波兰国王招募雇佣兵有点奇怪，因为条顿骑士团也在招募雇佣兵。中世纪的人和今天的很多人一样，一旦恨起来便咬牙切齿，常常行事冲动，思维缺乏理性。但中世纪的人在行事时也非常讲究逻辑。敌对双方的领导人将很快表现出自己作为中世纪人的一面，他们有时冷静而理智，有时急躁而鲁莽，但在战役初期，双方都还比较理性。

上面引文里提到的匈牙利宫相和特兰西瓦尼亚总督[7]匆匆南返，在波兰南部边境集结他们自己的军队。但他们对波兰国王不能构成威胁，所以他们对战役没有什么影响。西吉斯蒙德和往常一样，许下承诺时豪气干云，事后却很难兑现。除了允许大团长招募雇佣兵之外，他什么也没做。不过，他当时在匈牙利北部完全可以快速集结一支大军。

入侵普鲁士

双方最高统帅的策略迥然不同。大团长按照传统习惯将他的军队分成东西普鲁士两路，在相距甚远的多个地点等待敌人入侵，并依靠侦察兵来判断最大的威胁何在。他打算迅速集中兵力到敌人的主攻方向，然后打退侵略者。雅盖沃则计划将立陶宛和波兰军队合兵一处，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这是不寻常的战术，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不时有人采用，但在蒙古人和突厥人（也就是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经常面对的敌人）那里更常见。条顿骑士团在袭击萨莫吉希亚的时候也是集中兵力于一处，但那时候他们的部队规模都较小。

在战役的这个阶段，雅盖沃的高超将才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得知维陶塔斯已经渡过纳雷夫河之后，立刻命令部下在维斯瓦河上建造一座长450米的浮桥。三天之内，他就把波兰王军主力带到了东岸，然后拆除浮桥，以备将来使用。6月30日，他与维陶塔斯会师。7月2日，波兰-立陶宛全军开始北上。国王就这样聪明地避开了大团长封锁他北上道路的企图。大团长甚至不知道雅盖沃已经渡过了维斯瓦河，这个消息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调停使者告诉他的。即便在这时，大团长还是对这一情况无法置信，因为他坚信敌人的主力将从维斯瓦河西岸发起进攻，且仅由波兰军队执行。

在通过别的渠道确认帝国使者的报告无误之后，容金根匆忙率军渡过大河，以在南方的森林和湖区寻找一个合适地点来拦截敌军，并且要抢在立陶宛和波兰搜粮队袭击河谷地带的富裕村庄之前完成。他的计划此时仍然是纯粹防御性的。他相信敌人虽然兵力强大，但给养需求也很大，所以对方的粮草消耗会比他手下给养充足的部队快得多。敌人此时还没有踏上普鲁士的土地。

大团长让海因里希·冯·普劳恩带领3000人留在维斯瓦河畔的施韦茨（希维切）保护西普鲁士免遭偷袭，防止波兰人避开大团长并趁他还没来得及再次渡河就沿河而下攻击普鲁士最富庶的地区。普劳恩是个受人尊重但地位不高的军官，他适合负责一个防御性的岗位，但不是出色的野战指挥官。容金根想把最好的军官留在自己身边，让他们辅佐自己，并为官兵做出智慧、勇气和骑士精神的表率。容金根相对年轻，有点鲁莽，但他训练有素，懂得在交锋之前要谨慎行事。表现自己大胆的合适时机是在面对敌人时，而非遇到敌人之前。

雅盖沃也是一个谨慎的军事家，一直竭力避免风险。我们没有听说过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或者亲自率领骑兵向强敌发动疯狂攻击的故事，但他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怯懦。社会风气在变化：所有人都认可，指挥官应当尽量保护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带头冲杀；人们都承认，指挥官应当掌握全军的命运，而不是在单打独斗中追求个人的声誉。

所以，国王向敌境的进军速度之慢就不足为奇了。他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不能确定自己的计谋是否成功了，而且他对容金根的军事才干也很尊重。雅盖沃肯定担心自己会闯入埋伏圈，让十字军赢得他们最辉煌的一次胜利。当他的侦察兵报告称十字军在德尔文察河的一个渡口设置了防御阵地时，他一定松了一口气。至少现在他知道容金根的位置了：他正在马佐夫舍边境守候。但另一方面，大团长的阵地非常巩固，这对雅盖沃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目前为止，双方统帅都谨慎地接近对方。雅盖沃和容金根都害怕犯下简单的战术错误，比如到天黑时还没有找到一片合适的宿营地，或者误入适合伏击或封锁的地点；另外，他们还要保护自己的辎重，预备马匹和牛群。尽管两位统帅对指挥作战都有丰富经验，但他们手中的军队规模比他们之前指挥过的大得多。军队规模越大，犯错误的风险就越大，发生误会和惊慌失措的危险也越大。

考虑到上述情况，两位统帅都能够将各自的军队带到接近敌人的地方而没有犯严重错误，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两军都有充足给养，做好了战斗准备，并对胜利自信满怀。军官们很熟悉对手，也熟悉乡村的条件和天气，并对现有的技术有很好的把握。有些部队的状态就像武装的乌合之众，但双方都有很好的尚武传统，部分队伍训练有素，并且对本地的局部战争很有经验。两军都没有受到如下问题的严重妨碍：指挥层内部的分歧、各部队之间的争吵、不寻常的疫病流行或对于即将开始的战斗的过分焦虑。这些问题都存在过，但可能比较分散，且没有严重到值得被当时的史书记载下来的程度。简而言之，双方都没有失败的理由。

条顿骑士团的每一位指挥官、军官和骑士都做好了充分准备。不确定的因素只在于战斗如何开始，每个人如何反应，以及战局如何发展。这些不确定因素在战争中始终存在。很多人参加过袭掠作战和围城战，但很少有人对两支大军的正面对垒有经验。有些十字军战士在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战役中有过悲惨的体验[8]，他们的一些对手则有可能经历过1399年维陶塔斯在乌克兰的沃尔斯克拉河畔对抗鞑靼人的惨败。只有这样的少数人才会知道对于一场成千上万名士兵在短短几分钟激烈交战的场面应当期待什么。只有他们才能通过第一手经验知道，规模如此宏大的战争现场会混乱到超出人的想象：指挥官顶多只能控制少数几支部队；战场上因为人畜太多而难以运动；噪音、浓烟、大炮的硝烟和马蹄掀起的尘土令人的感官不堪重负；兴奋导致的干渴让人体正常的脱水反应变得更为严重；人会因为精神压力和体力消耗而精疲力竭。这都会让人产生一种非理性的逃避紧张状态的渴望，让人要么逃离战场，要么沉浸在战斗中。除了少数有经验的骑士，士兵们经历过的就只有操练场上的演练、萨莫吉希亚的小规模作战、在哥得兰岛的军事行动[9]和1409年对波兰的入侵。这些作战都提供了很好的军事经验，但条顿骑士团和立陶宛人之间已经有四十年没有过大规模正面较量了，条顿骑士团和波兰人之间则有将近八十年的时间没有发生过大战。事实上，在全欧洲范围

内虽然有过很多军事行动，但真正的会战很少。老兵和新人在这么多年里的慰藉就是讲述战争故事、吹嘘、祈祷和饮酒。

立陶宛人的作战经验更丰富，但他们的经验仅限于在草原的广阔战场上和罗斯的森林里。立陶宛人骑着矮种马、穿戴罗斯的轻型铠甲，不适合与骑乘高头大马的西方骑士近距离对抗，但立陶宛人和他们的对手一样自豪，一样信任自己的指挥官。对维陶塔斯在沃尔斯克拉河上的惨败的记忆，已经被随后对斯摩棱斯克、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的胜利抹去了。1406～1408年，维陶塔斯三次率军攻打自己的女婿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其中一次打到了克里姆林宫，最后强迫瓦西里一世签署和约，恢复1399年的边界。维陶塔斯军队的优势在于，他的骑兵能够穿过敌方守军认为无法通行的地域。他的劣势在于骑兵的装备较轻，无法抵挡全身重甲、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的冲锋。他仰仗自己的鞑靼侦察兵来防止这种情况突然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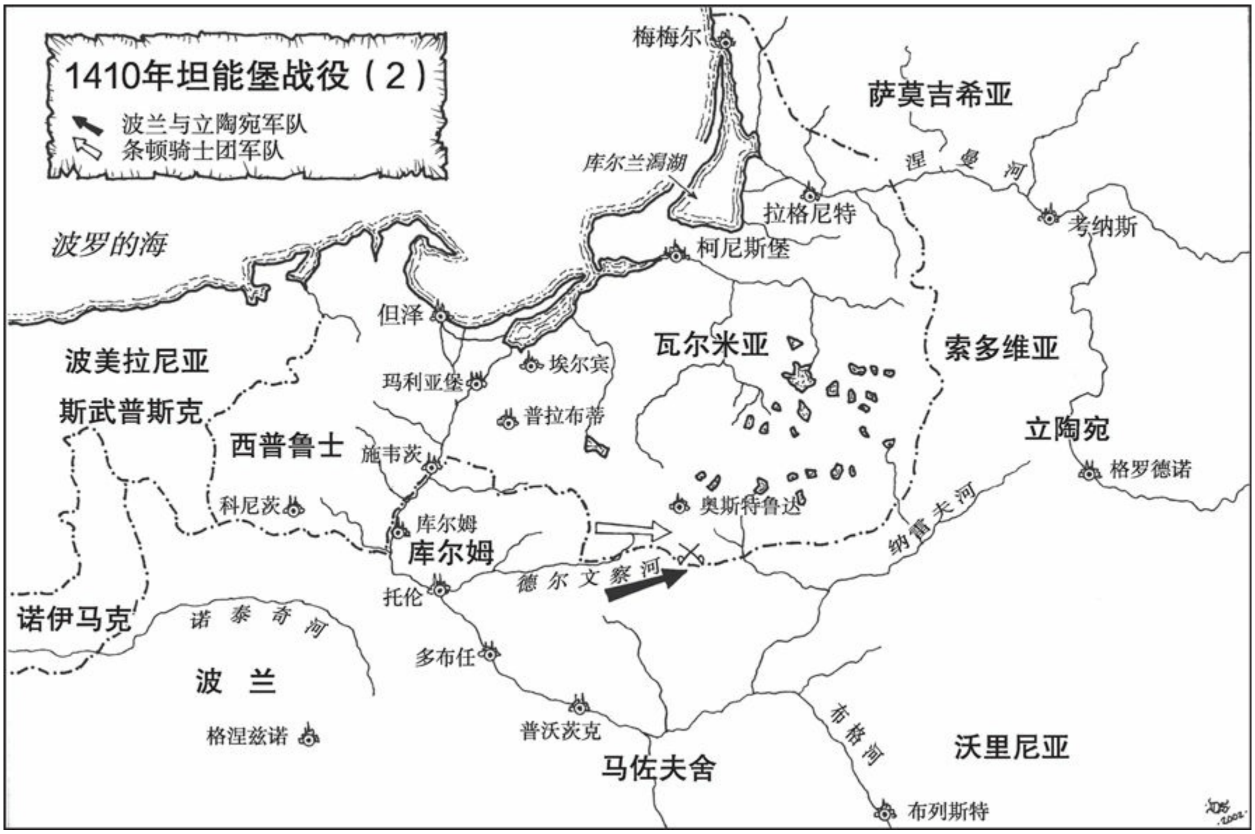
波兰骑兵数量更多，装备较好，更适合与德意志人正面对战，但他们缺乏自信，不敢与条顿骑士团对抗。波兰历史学家德乌戈什抱怨波兰骑兵不够可靠、贪恋战利品且容易惊慌失措。大多数波兰骑士（至少75%）都牺牲了装甲来换取速度和耐力，但他们不像立陶宛人那样充满浓厚的“东方色彩”。在这方面波兰骑兵与骑士团的大部分部队差不多，他们都是适合当地条件的轻骑兵。也有很多波兰骑士穿板甲，并喜欢用弩弓而不是长矛，这和条顿骑士团的许多重骑兵一样。波兰骑兵的弱点是训练和经验不足：很多波兰骑士是业余军人，主要是地主和年轻人；他们不是专业军人，并且知道自己的对手是基督教世界训练最有素、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尽管有些波兰骑兵曾在国王麾下服役，但他此次作战似乎调用了更多来自北方而不是南方的部队，南方的骑士多在加利西亚和桑多梅日为他效力。雅盖沃本可以召唤更多骑士，但他的营地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他也养活不了那么多骑士。大群几乎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农夫民兵更容易管理，贵族领主觉得民兵可以自己喂饱自己，而且不管

天气如何都可以宿营。民兵在战斗中的作用很小，他们顶多能在短时间内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让己方的骑兵有时间重组或撤退，但民兵擅长洗劫乡村，所以能为军队提供粮草。他们纵火烧村的浓烟也可以误导敌人，让他们无法准确判断波兰王军主力的位置。

雅盖沃和维陶塔斯军队的规模一定给他们的后续纵队制造了严重问题。成千上万的马匹踩过的道路上，低洼处的烂泥一定成了泥潭，这让后续部队的行军很困难，也令大车几乎完全无法拖曳；另外，人群越大、越疲惫，其成员就越是容易莫名其妙地慌乱起来。侦察兵的报告并不可靠；沿途有太多树林、溪流和敌人巡逻队。但是，不管国王的军事谋臣多么精疲力竭、紧张或犹豫不决，国王本人必须避免给人留下优柔寡断或怯懦的印象。他必须始终镇静自若。雅盖沃的阴郁性格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他不喝酒，所以能始终保持清醒，他的表情和仪态让人觉得他始终稳稳掌控着局势。他热爱狩猎，所以久经锻炼，能长时间骑马，在最幽深的树林里也可驾轻就熟，多布任和普沃茨克那些已有少数人类定居的森林在他眼里反倒显得过于温驯乏味了。而维陶塔斯则正好与雅盖沃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维陶塔斯精力充沛，感染力强，几乎无处不在，在战士当中轻松自如，对一般人眼中的艰辛不屑一顾。普通士兵没有理由抱怨他们的指挥官不懂得战士的生活或森林的危险，也不能抱怨指挥官在行军过程中不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

国王需要表现出对局势的掌控，但这本身会对国王造成危险，因为即便没有遭遇敌人，行军中的部队也可能在渡口或湖泊与沼泽之间的狭窄地域停顿。国王在这种时候必须发布命令，任何命令都行，哪怕仅仅是“大家坐下”，而不能让人觉得他无法做出决定。这样的情况再加上疲劳、干渴或焦虑，往往会导致国王匆忙发出进攻或撤退的命令，而部队却无法有效地加以执行。简而言之，千变万化的状况可能束缚国王的手脚，让他只能做出糟糕的决定。而且为了赶时间，国王可能会选择最差的方案。雅盖沃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他是经验丰富的军事家。但在很多

年里，他的长处是迫使敌人因害怕己方的优势兵力而撤退，他也擅长攻打要塞；他的目标一直是用军事手段为外交铺路。而现在，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去对抗到目前为止都不可战胜的强敌，并且可能要在不利于己方的地域交战。



1410年坦能堡战役（**2**）

雅盖沃在进入普鲁士之前似乎在德尔文察河受到了遏制。敌人占据了坚固的阵地，他不愿意一边面对这股敌人，一边在附近唯一的渡口强行渡河。他也很难向东逆流而上，因为德尔文察河的上游源头虽然不会阻滞他的行军，但那里的乡间曾经是茂密森林，古代荒野的风貌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条顿骑士团虽然利用一个世纪的和平在当地连绵起伏的乡间建立了许多定居点，连接各村庄的道路却狭窄而蜿蜒曲折。那里有太多山丘和沼泽，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陌生人很容易在茂密的树林里迷失方向。村民正在逃往设防的避难所或森林。尽管那里

的许多居民说波兰语（在那个时代，移民不会被强制要求参加语言测试），但他们忠于条顿骑士团，都不想落入维陶塔斯的机动部队（尤其是那些令人胆寒的鞑靼人）手中。这些机动部队正在试图寻找守军的位置，从而找到绕过他们的路线。让农民提供情报或担任向导是战争的一部分。熊熊燃烧的村庄标志着侦察兵的进展。在渡口对峙的两军不太容易看到火光，但他们也许看到了隆隆升起的烟柱。

然而，蹂躏乡村和烧杀抢掠早就不是波兰人习惯的战术。长期和平已经软化了这些业余战士的心肠，波兰骑士很快就开始向雅盖沃抱怨友军的暴行（鞑靼人把女人拖进帐篷轮奸，杀死说波兰语的农民，残酷虐待俘虏），最后国王终于命令释放俘虏，并告诫来自草原的骑兵在将来避免这样残酷的手段。克制其实不符合国王的利益。要让容金根削弱自己的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大肆破坏附近的农村，让大团长不得不分兵保护农民。但雅盖沃和维陶塔斯很快就会认识到，容金根是一位优秀将领，不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分散兵力。

国王肯定为此感到挫败，但他不愿让自己的军事行动因为缺乏粮草而失败，也不愿让自己的士兵死在默默无闻的河岸上。他唯一的希望是向东穿过树林和沼泽，绕过错综复杂的诸多湖泊，并寄希望于在途中不会被大团长阻拦，然后被迫在不利于己方的情况下作战。这里毕竟是大团长的地盘，条顿骑士团肯定修过一些路。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利用那些道路去骚扰波兰军队的后方呢？

容金根似乎并不担心遭到波兰人的侧翼包抄。来自附近修道院的条顿骑士曾在这片树林狩猎取乐，所以熟悉这里的每一个村庄、每一片田野和森林。他们知道，数量众多、狭长而蜿蜒曲折的湖泊会限制侵略者的选项。为了寻找穿过附近树林的道路，波兰和立陶宛侦察兵已经忙碌了好几天，但他们一条都没找到。当地居民无疑同意担当条顿骑士团的向导和侦察兵，这些本地人保证说，此地的道路不适合任何大规模军队

运动，这肯定让容金根对自己的优势战略位置自信过了头。

但他的自信落空了。立陶宛侦察兵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些通往奥斯特鲁达的道路可供部队利用，但大军必须抢在德意志人发现之前快速行动。于是国王和大公立刻开始行动。

雅盖沃在与自己的亲信谋臣商议之后，命令手下准备秘密而快速地向东前进，然后转向北方，绕过容金根的设防阵地。雅盖沃给每支部队都安排了在行军顺序中的位置，并指示所有人服从两名熟悉地形的向导。王室号手将在早晨发出信号，在那之前所有人都必须保持肃静，不得运动或发出噪音，以免泄露国王的计划。他的军队必须抢占很多个小时的先机，否则他的策略便毫无胜算。与此同时，他派遣一名传令官再次试图和平解决争端。这很可能是一种欺骗行动，企图让大团长相信国王已经无计可施，但也有可能是一种走过场的行为，让帝国的调停使者相信他有避免流血的诚意。我们很难想象容金根在这种情况下会觉得什么样的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但大团长还是召集军官们开会。除了一个人之外，所有人都主张战争，而不是继续谈判。

雅盖沃的行动可能让大团长更加相信自己占了上风。容金根的侦察兵看到波兰军营空荡荡的，推断国王在撤退。德意志人迅速架设浮桥过河追击波兰人，因为他们知道消灭正在撤退的敌人是最容易的。但随着侦察兵发现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正分成两个纵队向东北方进发，以一个很大的弧线绕过了骑士团的侧翼，容金根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计划。如果他的部下继续追击敌军，就无法阻止维陶塔斯的鞑靼人烧毁村庄；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追击敌人时可能要穿过茂密的森林，或者在某个渡口遭到伏击，而自己的后方除了惨遭蹂躏的土地和荒野之外空无一物。于是大团长改变了前进方向，以便赶超敌军纵队。容金根一方的行进速度很快，几乎超过了波兰和立陶宛军的行军进度。与此同时，波兰侦察兵完全摸不清德意志人的位置，他们在发现容金根又一次堵住了北上的道路

时不禁大吃一惊。

雅盖沃将德意志军队诱向东方，以使其远离他们位于库尔姆的坚固要塞，但波兰军队也远离了安全的避难所。他也分散了自己的兵力，让立陶宛人在波兰人路线的东方和北方行军。如果大团长能趁机突袭他的军队，尤其是在他的两路人马再次会合之前，雅盖沃就可能遭受不可挽回的灾难性损失。很多波兰人仍然认为他本质上是立陶宛人，所以雅盖沃在当前条件下求战就是拿自己的王位冒险。乌尔里希·冯·容金根肯定明白这一点。他如果能战胜波兰和立陶宛军队，就能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个骑士团的宿敌。

但大团长不懂得保持冷静和理智。侦察兵报告说入侵者来到了基尔根贝格并烧毁了那座城市，残忍地虐待市民，这让容金根怒不可遏。他不愿继续这场阵地战，而打算在夜间强行军，并于黎明时突袭敌人。大团长率领军队如此行动，是在进行无谓的冒险。消息最灵通的德意志编年史家杰日贡的扬如此描述两军近期的行动：

> 大团长带领军队、十字军和雇佣兵追击波兰国王，在德尔文察河和库任特尼克村附近抵达边境。两军安营对峙。波兰国王不敢渡过德尔文察河，就去了基尔根贝格，纵火焚烧那座城市，屠杀居民，不分老少。异教徒犯下累累罪行，奸淫妇女，毁坏教堂，割掉女人的乳房，折磨她们，将她们变卖为奴。异教徒还亵渎了圣餐，闯进教堂，捏碎圣饼，用脚践踏，如此侮辱基督教。大团长、整个骑士团和十字军当中的全体骑士与武士听到异教徒的亵渎和侮辱，无不义愤填膺，从鲁博夫赶往坦能堡，来到这座位于奥斯特鲁达地区的村庄，出其不意地冲到波兰国王面前。骑士团行色匆匆，急行军十五里，于7月15日黎明抵达。他们看到敌人便部署阵列，与敌人对峙了三个多小时。与此同时，波兰国王派遣异教徒出来骚扰，但波兰人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如果骑士团立刻进攻，就能赢得荣耀和战利品。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即刻进攻。他们想让国王出来，以符合骑士精神的形式与他们对战。总军务官派传令官给国王送去两柄出鞘的利剑。

两军的行动就是这样。容金根出其不意地冲到了波兰人和立陶宛人面前，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他浪费了自己突然袭击的优

势，让一夜没睡觉的士兵摆开阵势与敌人对峙，不吃不喝，干等着敌人做好准备。随后，他命令部下挖掘有伪装的坑，用来困住波兰骑兵，后来却命令部下后撤，让森林里的波兰王军有足够空间在开阔地摆成两条战线来对付他。于是，他挖的坑被拱手让给敌人，成了波兰人防线的一部分，他自己的强大炮兵也被部署在无法发挥火力的地方。此外，他手下步兵的位置也不好，很难为密集的骑士队伍提供适当的支援。虽然大团长应当能考虑到波兰骑士没有足够的空间展开队形所以无法冲锋，但他的指挥调度也太差了。容金根的士兵十分疲惫，早晨又淋了雨，浑身湿透，他们还饥肠辘辘，且无疑很紧张。这一天的气温也异常的高，令将士感到不适应。不过，容金根如果能让波兰国王先出动，经验丰富的条顿骑士就有机会实施他们练习过无数次的反击战术，那么骑士团还是有很大胜算。大团长虽然傲慢自负鲁莽，但他在战斗中勇气非凡，技术娴熟，且兵力雄厚。大群骑士组成的庞大阵列掩盖了他的支援部队（步兵和炮兵）的糟糕部署，让他相信自己能取得完胜。

大军排兵布阵的景象让每一位参与者永生难忘。大团长的精英骑士身穿白袍，围绕在他的白底黑十字大旗、城堡长官和主教们五颜六色的旗帜周围；雅盖沃的红底白鹰旗，鹰戴着王冠；格涅兹诺大主教的红底白色十字旗；克拉科夫城堡长官的旗帜上有戴着王冠的熊；波兰总军务官的旗帜是蓝底，上有喷火的狮头；立陶宛人的旗帜图案是一名骑白马的白色骑士（维提斯）；还有代表维尔纽斯的几何图形。一排排密集的步兵和弓箭手在军乐声中各自就位；大炮被拖曳到略微隆起的地点，以获得更好的射界。传令兵骑马来回奔波，命令各单位微调位置；军官们鼓舞部下勇敢战斗、奋勇杀敌。

当时的价值观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大团长浪费了自己出其不意抵达战场的优势，没有立刻发动攻击，然后又给敌人送去符合骑士精神的挑战象征物，即两把剑，从而耽搁了更多时间。据说与此同时波兰国王也在做弥撒，不理会请求指示的部下。在聪明地逃离渡

口之后，雅盖沃行进很缓慢，但他毕竟成功地把军队带到了战场，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才华。现在，雅盖沃却任凭局势自行发展，不管不问。也许国王在利用宗教礼拜来推迟战役的开端，因为他知道德意志骑士和马匹会因为身披重甲等待而疲劳；也许他在等待援兵；也许他精疲力竭、犹豫不决所以没有任何举措。历史学家对波兰国王的耽搁有很多种解释，但这个疑问恐怕永远也得不到解答。也许他真的很虔诚，相信此时最重要的事情是祈祷。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传统的宗教礼拜比冷静的战略或战术决策更重要：正所谓“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他的对手容金根也花了不少时间祈祷。德意志军队开始唱他们的赞歌《基督复活了》。与此同时波兰和立陶宛士兵则吟唱他们的战歌《贞洁圣母》。

战斗过程

送来两把剑的条顿骑士傲慢地将其呈给波兰国王和维陶塔斯，以挑动他们出战。国王冷静地做出回应，他命令传令官退下，然后发出开始战斗的信号。波兰人以还算不错的纪律性向前推进，高唱赞歌，而立陶宛人则狂野地发起冲锋，击退了他们对面的轻装部队。然后两军厮杀了大约一个钟头。除此之外，各方对战斗过程的记述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波兰人显然没有投入他们的主力部队，因为德意志人在维持守势，他们正等待机会无情地冲向某支撤退的敌军部队的后方，或者冲向敌军战线上的缺口。

时至今日，历史学家还在为坦能堡战役争执不休。尽管战役过程的主要脉络很清楚，但德国、波兰和立陶宛的历史学家对于战役期间的多次行动没有一致意见，甚至对战斗发生的具体地点也众说纷纭。考古学家找到了纪念战役的礼拜堂和集体墓穴，但那里的部分死者可能是被屠杀的俘虏和在战役之后日子里死去的伤员，所以就连两军战线的位置也说不清。学界只在以下几点上有所共识：到访的十字军战士位于骑士团左翼，他们面对的是立陶宛人，这可能是因为十字军战士更有动力去攻击鞑靼异教徒而不是波兰基督徒，但也有可能只是因为这样部署最方便。条顿骑士团的部队部署在中路和右翼，面对波兰人及其雇佣兵。

对战役过程的最重要记述出自波兰历史学家扬·德乌戈什笔下。他的作品很短，倾向于歌颂波兰人的贡献并贬低立陶宛人。大体上他的说法是，十字军的一翼在激战之后打败了维陶塔斯麾下的骑兵。维陶塔斯和来自斯摩棱斯克的部队留在战场，但鞑靼人抱头鼠窜，很多立陶宛人和罗斯人也跟着逃跑了。德意志十字军战士看到敌人乱哄哄地逃跑，以为自己已经取胜，便离开自己的阵地去追击敌人。这导致骑士团战线上

出现一个缺口。与此同时，波兰人与条顿骑士团打得难解难分。现在波兰人看到机会来了，就更猛烈地发起攻击，突破了骑士团左翼的缺口，也就是十字军战士打乱阵型去追击鞑靼人的地方。没过多久，波兰骑士就对条顿骑士团的主力造成了极大压力。

以上是过去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说法。但前不久历史学家发现了一封1413年的书信，对德乌戈什的记述作了大幅度修正。写信人是一位消息灵通的贵族或雇佣兵指挥官，他在信中告诫收信人在战斗中要牢牢掌控骑士队伍。这条文献证据能支持一些名气较小的编年史家对坦能堡战役的描述：一小群为条顿骑士团效力的十字军战士中了立陶宛人的计谋；立陶宛人佯装撤退，诱骗对方追击，这些十字军落入了波兰骑士在侧翼设下的陷阱。随后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冲进了对方混乱的战线，卷击十字军的队伍。

眼看大难临头，容金根此时或许应当鸣号撤退。但他绝不会这么做。他热血沸腾，把身边的骑士集合成一个楔形阵列，然后从一个地势较高的地点径直冲向他估计波兰国王所在的位置。他能看见王旗在那里飘扬，还有一大群重甲骑士。容金根敢于豪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此次冲锋上。他知道如果进攻失败，战马就会太过疲劳，无法载着他的部下离开战场。也许他希望这次角度出人意料的冲锋能让波兰军队措手不及，让他们因为缺乏足够的纪律而无法迅速改变阵型来抵抗他。但他的算计都错了。在马泰伊科[10]的油画上，维陶塔斯位于画面中央。他在自己那一翼的战场简直无处不在，建立英勇无敌的奇功。现在他带着部下匆匆奔向国王的位置，可能是想敦促国王投入预备队，加强主战线的兵力。无论如何，容金根的冲锋只来到距离国王卫队咫尺之遥的地方。他徒劳地呼喊“撤退！”，但已经被敌人团团围住。容金根精疲力竭，和他的许多最优秀的骑士一同阵亡。剩余的德意志骑兵见他战死，溃不成军。德意志军队很快惊慌失措。来自库尔姆的轻骑兵可能带头逃离了战场。波兰骑士在歼灭了骑士团的主力部队之后转而攻击那些陷入混乱、

在狭窄小径上仓皇逃跑的残敌，将其逐个消灭。最后方的德意志骑士也想逃跑，但被他们前面乱作一团溃退的友军挤得无法迈步。他们无法绕过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和大车，也无法有效抵抗从四面八方杀来的敌人，只能试图投降或者死战到底。之前得胜的左翼十字军战士满载战利品回来了，结果却落入了已经控制战场的敌人手里。这是德乌戈什对战役过程的描述，它很快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版本。就连德意志人也同意德乌戈什的说法，也许因为他认可条顿骑士团至少取得了部分胜利，即击溃了波兰大军中由异教徒组成的那一翼。

波兰历史学家强调了国王的英明领导。他们描写雅盖沃如何坚定地身先士卒；王旗一度被打落在地；来自迈森的骑士鲁波尔德·冯·科克里茨纵马冲向国王，国王险些负伤，但在最后关头被御前秘书兹比格涅夫·奥莱希尼茨基搭救。后来还出现了雅盖沃与容金根单挑的传说。简而言之，根据波兰爱国主义学者的说法，是波兰人用智慧、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打赢了这场战役。

立陶宛历史学家坚决不同意上述的版本。他们坚持说维陶塔斯那一翼没有被击溃，而是主动实施战术撤退，这在草原上的作战当中司空见惯。这种计谋诱使来自德意志的十字军战士破坏了自己的队形，一头闯进伏击圈。立陶宛历史学家指出，维陶塔斯和来自斯摩棱斯克的部队在战役的关键时刻位于胜利者的队伍中，这可以证明立陶宛主力部队没有逃跑，他们只是诱骗德意志人打乱自己的阵型，从而为波兰人制造了进攻的缺口。胜利桂冠应当属于立陶宛大公，上述佯败诱敌的战术正是在他的启发下制定的。他不知疲倦地来回奔波，指挥调度骑兵单位，先是在右翼，然后在战役高潮时又来到中路。是他带来援兵打退了容金根的冲锋。胜利的功臣不是雅盖沃，因为他在整个战役期间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既不能发布命令，也不能以身作则激励官兵。

现代学者虽然掌握了一些新的考古证据和新发现的史料，还是不能

就战役的过程达成一致。大家都同意，容金根在把军队带到战场的过程中犯了错误。大家也都同意，容金根和维陶塔斯都是勇敢的武士，在绝望的战斗中不惜冒生命危险。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雅盖沃出于各种原因选择停留在所有人都看得见他的地方，即他在山顶上的营帐处，且战役在十字军对雅盖沃所在位置的冲锋失败时迎来了决定性时刻。除立陶宛历史学家以外，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让一整支军队执行佯败而诱敌深入的策略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战术风险太大，尽管在欧洲各地的小规模作战中颇为常见；而且，如果立陶宛军队的撤退是计谋，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伏击追兵？或者当时的确设有埋伏？立陶宛人那一翼的逃跑很可能不是预先筹划的计谋。雅盖沃作为统帅非常谨慎，他一定明白，他的军队的一整个侧翼一旦全部撤退，很容易酿成大祸。得胜追击而来的十字军如果能维持纪律，就能全力突破逃跑的立陶宛骑兵留下的缺口，然后猛击波兰王军的侧翼。但另一方面，波兰战线后方的森林可能会阻碍他们撤退，也可能让十字军看不见部署在那里的波兰中路部队，或者难以有效地从侧翼或后方攻击波兰中路部队。所有人都同意，条顿骑士团的战败是因为盲目追击立陶宛军队，破坏了自己的纪律。而立陶宛军队退却的原因就是一个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谜题了：要不然维陶塔斯军队的很大一部分实施了战术撤退，要不然那些立陶宛人、罗斯人和鞑靼人是被十字军打败并逃离了战场的。

隔了差不多六个世纪以后，从我们的观察角度看，最重要的事实是：大团长的战线被打乱了，而维陶塔斯领导下的波兰和立陶宛部队充分利用了这个局面。那些相信立陶宛人佯败撤退的学者喜欢问维陶塔斯麾下有多少鞑靼人，仿佛只有这些草原武士懂得诱敌深入的策略。不过遗憾的是，关于两军的兵力数字，同时代的史料提供的信息并不比德乌戈什提供的更丰富，甚至在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的构成问题上，学者们也有分歧。但这并不重要。鞑靼人的比例不高，并且他们对十字军追兵没有造成多大杀伤。不论如何，结果是一样的：德意志战线左翼被打乱，随后波兰军队在中路取得了胜利。在此之前立陶宛人承担了大部分作战

任务，伤亡数字就能证明这一点。后来立陶宛人也继续为此役做出贡献，对敌人正在瓦解的战线施加相当大的压力。

大团长一定考虑过下令撤退，但最后却没有这么做。容金根决定豪赌一把，将全部力量投入针对波兰国王营帐的大规模冲锋，这在当时一定是他最好的选择。如果乱糟糟地穿过森林撤退，骑士团军一定也会一败涂地；随后还会有人批评大团长错失良机，没有对同样疲惫、阵脚已乱、甚至说不定已濒临瓦解的敌人发动最后一击，从而大获全胜。此时已经有数千名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倒在战场上；他们的一些部队已经崩溃，还有一些正在动摇。如果波兰国王或立陶宛大公被长矛或利剑刺死，或者只是死于流矢，容金根都能打赢这一仗。

此役完整的伤亡数字几乎超出了当时人的计算能力：最古老也是最低的估计是双方各有8000人战死。这相当于条顿骑士团武装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骑士团还有数千人被俘，其中大部分被处死，只有世俗骑士和军官被留下换赎金。后来，茫然的幸存者遍体鳞伤、精疲力竭，他们重新聚集到最近的城市和城堡，多已丢失了自己的武器装备。

雅盖沃和维陶塔斯没有办法催促他们的军队继续攻入普鲁士。他们虽然获胜，但也损失惨重。官兵十分疲劳，马匹也累垮了。立陶宛人连续作战许多钟头，波兰人也受尽睡眠缺乏和干渴以及长时间焦灼等待的折磨，而正面交锋的兴奋也特别消耗人的精力。德意志人逃走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追了10英里，杀死他们追得上的人，并将其他人驱赶到沼泽和森林里，任他们自生自灭。得胜的骑兵回营后需要休息。耐力最强的人去搜寻战利品，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这些人回来时已经和那些累得瘫倒在战场的人一样挪不开步子。与此同时，步兵忙于在战场上搜集武器、金钱、珠宝和衣服，杀死敌方伤员，屠杀出身低贱的俘虏，并将死者掩埋到集体墓穴里。波兰人和立陶宛人需要一段短暂的时间来休息和庆祝，也许还要祷告，并照料己方伤员和死去的战友。鞑靼人和非正规

部队急匆匆赶去烧杀抢掠，散播恐慌，阻挠骑士团的臣民组织防御。

有组织的抵抗并不存在。条顿骑士团损失了太多城堡长官、地方长官、骑士和民兵部队，所以无兵可用。战役的幸存者尽其所能地寻找避难所，其位置往往远离自己的本职岗位。骑士团的最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阵亡，包括大团长、总军务官、总司令、总财务官和200名骑士。骑士团的立陶宛问题专家和维陶塔斯曾经的朋友马夸德·冯·萨尔茨巴赫被雅盖沃俘虏。维陶塔斯大公命令将萨尔茨巴赫斩首，因为他拒绝表现出谦卑和臣服。他到死都傲慢而自豪，不肯为自己嘲讽维陶塔斯母亲的贞洁而悔过。他和他的伙伴期待得到礼遇，因为他们出身高贵。不过，他们在知道敌人要处死他们之后，也丝毫没有丧失勇气。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身为雅盖沃和维陶塔斯“曾经的朋友”，自己不会有好下场。

当时有些人相信，对十字军事业来说，坦能堡战役是可以和尼科波利斯战役相提并论的灾难，但大多数人仅仅为骑士团损失了数量巨大的人员、马匹和装备而惊叹。杰日贡编年史的续篇写道：“骑士团的军队，包括骑兵和步兵，被彻底击溃，他们损失了大量生命、物资和荣誉，死者之多难以计数。愿上帝怜悯他们。”

当时的人们很难理解骑士团的此次战败竟如此彻底且具决定性。消息传到各国宫廷，那里的很多老人还记得自己年轻时在立陶宛的战绩。在德意志和法兰西，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噩耗。立窝尼亚的主教和市民不知道自己该喜该忧；波兰和立陶宛的人们为自己君主的伟业兴高采烈，并为丈夫、兄弟和朋友安全回家而感恩；有些邻国的统治者希望的可能是别样的结局，也许最好让双方军队同归于尽。所有人都想要知道更多消息，尤其是那些想要理解条顿骑士团怎么可能输得如此出人意料的人。人们反应不一。条顿骑士团说自己遭到了背叛，说敌人兵力更强，说己方的战术不当；波兰人心满意足地说自己更勇敢，武艺更高强，指挥更出色，并且得到了上帝的佑助。

骑士团的宣传工作者拼命试图让同时代人相信，这次灾难其实没有那么糟糕；这是魔鬼在通过他的爪牙——异教徒和教会分裂者作恶，其罪魁祸首是撒拉森人。他们还说，现在普鲁士比以往更需要十字军战士来继续上帝的事业。波兰宣传工作者也在努力展示他们自己版本的诠释，但他们不像骑士团那样在长期的十字军运动中建立了许多长期的人脉。波兰人对雅盖沃及其骑士的赞扬往往反而会激起对深陷困境的骑士团的同情，这对波兰利益不利。欧洲各国宫廷经历了重大消息的第一轮冲击、而最初也最困难的几个月过去之后，骑士团支持的阐释开始成为主流意见。

坦能堡战役之后的将近六个世纪里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让此役显得黯然失色，但人们并没有遗忘它。现代读者在回顾这六个世纪的历史时会很难理解，为什么骑士团遭到那么负面的评价。把条顿骑士团和1914年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或希特勒相提并论是不值一驳的荒谬想法，尽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人确实相信他们的行动是为1410年的坦能堡战役复仇。在20世纪的历史语境里，很多人会觉得与坦能堡战役同时代的人说得对：世间果真有上帝的正义。坦能堡战役时代的人得出的结论是，条顿骑士团以刀剑为生，又沉溺于骄傲，所以必须付出代价；《圣经》的教训是正确的，坦能堡战役是上帝对条顿骑士团恶行的惩罚。骄傲的人爬到了高峰（容金根代表了骑士团的傲慢与怒气，世人普遍承认这一点）必然会跌落。

这种为历史事件寻找合理性的做法（世界历史作为世界审判庭的）有着明显的缺陷：如果战场胜利反映了上帝的意志，那么鞑靼人主宰草原并骚扰波兰和立陶宛边境地带，难道也是上帝正义的体现？上帝惩罚帝王的办法难道就是牺牲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这种理念符合《旧约》的神学，但很难匹配《新约》的框架。我们最好不要逗留在大众心理学或者黑暗的宗教民族主义这种玄乎其玄的领域，而是回到比较扎实可靠的由编年史和通信构成的史料领域。

现代历史学家对坦能堡战役及其后续事件的观点互相矛盾，这很有趣，也让人困惑。我们可以粗略地概括如下：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各种阐释更多的是反映了民族利益而不是事实。在那之后，历史学家变得更开明，也不像过去那样相信自己永无谬误。考古学开始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战场，让文献留下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更完整的解答。德国和波兰之间那些卷入了几乎一切历史资料的政治分歧以及支持这些争端的政党都已经消失了，所以学界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过去。更重要的是，冷战结束以后，德国和波兰历史学家之间有了足够的尊重，能够真正重视对方的意见。也许有朝一日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坦能堡战役的真相和它的真正意义，并达成较为普遍的一致意见。

---

[1] 法兰西人支持阿维尼翁的教宗，英格兰人和很多德意志人支持罗马的教宗。比萨会议则提出了第三个教宗人选。普法尔茨的鲁普雷希特死后，德意志局势变得明朗了一些。德意志人对文策尔国王失望透顶，开始讨论他的弟弟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会不会成为一位有才干的神圣罗马皇帝。西吉斯蒙德把竞选皇帝与解决教会问题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作者注）

[2] 德意志国王鲁普雷希特（1352～1410）是维特斯巴赫家族成员，1398年起为普法尔茨伯爵和选帝侯。1400年，部分德意志诸侯宣布废黜德意志国王文策尔，推举鲁普雷希特为王。他试图去意大利加冕为皇帝，但失败了。文策尔虽然拒绝承认鲁普雷希特为国王，但也没有努力去推翻他。后来文策尔的弟弟，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成为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

[3] 采列家族是今天斯洛伐克境内在中世纪晚期最显赫的家族。他们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封臣，1341年成为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采列伯爵，与波兰、匈牙利和波斯尼亚等国的统治者有亲戚关系。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战役中，一位采列伯爵救了西吉斯蒙德国王的命。西吉斯蒙德成为神圣罗马皇帝之后，授予采列家族帝国诸侯的地位。

[4] 在历史学家眼里，文策尔主要是个酒鬼。英美人对他的印象主要是那首圣诞节歌曲《好国王文策尔》，它起源于他的女儿嫁给理查二世国王的时期。捷克人对他的主要印象是他把布拉格大主教从查理大桥扔下去淹死了。（作者注）

[5] 好人亚历山大于1400年至1432年统治摩尔达维亚，他改革和巩固了国家。为了抵抗强大的邻国匈牙利，他成为波兰国王雅盖沃的附庸。他追随雅盖

沃参加了1410年的格伦瓦德战役和1422年的玛利亚堡战役。他还坚决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入侵。由于波兰王国未能帮助他抵抗奥斯曼人，他与波兰国王决裂，在1431年至1435年的立陶宛内战期间攻击波兰。他是著名的瓦拉几亚王公弗拉德三世·采佩什（1431～1476，即后世传说中“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原型）的外祖父。

[6] 杰日贡的扬（约1340～1405）是普鲁士的编年史家，他可能是古普鲁士人，是神父，在教会任职。他写的条顿骑士团史书覆盖1360年至15世纪初，后来有人续写。他的史书原本用拉丁文写就，但只有德文版传世。

[7] 特兰西瓦尼亚总督是12世纪至16世纪匈牙利王国框架内特兰西瓦尼亚领地的最高长官，由国王任命，权力极大。16世纪匈牙利王国瓦解后，最后一位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臣服于奥斯曼帝国，成为特兰西瓦尼亚统治者。

[8] 此役中，法兰西和匈牙利十字军因为缺乏战场纪律而惨遭突厥人屠杀。这种经验让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在他漫长生涯的余下部分变得极其谨慎。（作者注）

[9] 条顿骑士团代表普鲁士商人和汉萨同盟摧毁了维斯比附近一座主要的海盗基地，然后据守这座岛屿好几年，抵抗丹麦人的进攻。（作者注）

[10] 扬·马泰伊科（1838～1893）是波兰著名的历史和战争题材画家，最有名的作品包括《格伦瓦德之战》《普鲁士称臣》《卢布林联合》等，还创作了多位波兰国王的肖像。他就读和担任院长的克拉科夫美术学院后来更名为扬·马泰伊科美术学院。

十一 漫长的衰落和骑士团在波罗的海的末日

坦能堡战役的后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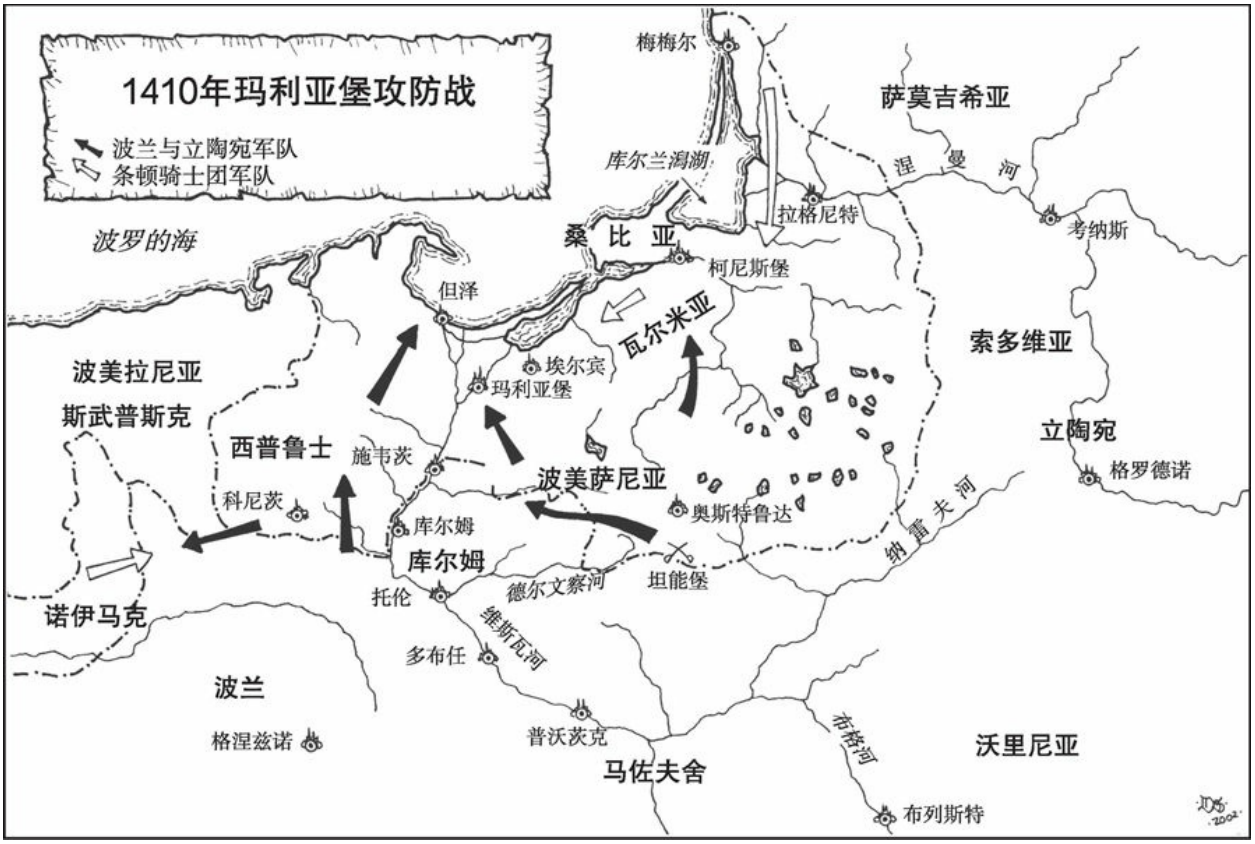
雅盖沃的军队因为战斗和追击而十分疲劳，在休整了三天之后，国王率军北上，行动不紧不慢。国王永远不应显露出慌张的姿态。虽然他可以轻松占领很多城镇和城堡，但他不愿意为了这些事情转移注意力，而是以闲适的速度径直开往玛利亚堡。如果雅盖沃能占领那座强大的要塞，他就有条件占领普鲁士的其余地区。已经有一些世俗骑士和市民赶来投奔他，宣称如果自己现有的权益和特权得到保障，他们愿意当波兰的臣民。很多城堡的驻军因为没有接到抵抗的命令或者没有足以防守城墙的兵力而纷纷投降。奥斯特鲁达、基督堡、埃尔宾、托伦和库尔姆等地的城堡长官主张抵抗，却被市民驱逐，随后市民向波兰军队投降。抵抗似乎毫无意义。就连瓦尔米亚、库尔姆、波美萨尼亚和桑比亚的主教们也匆匆赶去向雅盖沃臣服。地位较低的人们因为失败主义情绪而陷入消沉，也纷纷效仿他们。雅盖沃的文官厅署匆忙发布了大量文书，规定每一位新封臣的权利和责任。

国王派人寻得乌尔里希·冯·容金根的尸体，将其带到奥斯特鲁达下葬。这位阵亡大团长的遗体后来被送到玛利亚堡，与他的前任们一起长眠在圣安娜礼拜堂。

海因里希·冯·普劳恩

雅盖沃和维陶塔斯在享受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辉煌胜利。他们的祖父曾宣称阿勒河是立陶宛边境，这条河大致是沿海定居地带和东南方的荒野之间的边界。而现在，维陶塔斯似乎有能力对维斯瓦河以东的全部土地提出主张权。雅盖沃则准备落实波兰对库尔姆和西普鲁士的古老宣称。但就在他们短暂欢庆的同时，条顿骑士团当中崛起了一位在领导力和顽强方面足以与他们媲美的领袖：海因里希·冯·普劳恩。普劳恩过去的履历很普通，只是个不起眼的城堡长官，但他属于那种在危机时刻能够如流星般崛起的人物。他现年四十岁，生于福格特兰，这是图林根和萨克森之间的一个小邦。他最初以十字军战士的身份来到普鲁士。骑士团的武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接受了清贫、贞洁和服从的誓言，并与基督教之敌作战。他出身贵族，所以必然会得到较高的职位；长期服役让他的地位节节攀升，成为施韦茨城堡的指挥官。施韦茨是维斯瓦河西岸、库尔姆以北的一个有强大驻军的观察哨，是保卫西普鲁士边境、抵御袭击者的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在得知骑士团惨败之后，所有幸存的城堡长官中只有普劳恩一人承担起了超出自己本职的责任：他命令手下的3000士兵前往玛利亚堡，抢在波兰军队抵达之前把守那里的要塞。这是头等大事。如果雅盖沃想去攻打并占领施韦茨，就让他去好了。普劳恩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挽救整个普鲁士。所以他必须保卫玛利亚堡，而不必担心较小的城堡。



1410年玛利亚堡攻防战

普劳恩受过的训练和他的经验都让人觉得他不适合执掌权威。条顿骑士团以无条件服从上级而自豪，且此时尚不清楚有没有更高级的军官逃离了战场。但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服从的原则已不合时宜：大多数军官要犹豫很长时间才敢逾越自己的本职，没人敢独立做决定。条顿骑士团的成员很少需要做出紧急决策，他们有的是时间来深思熟虑并开会研讨，咨询议事会或者咨询一群指挥官，最后达成共识。就连最自信的大团长也会为了军事决策咨询众人的意见。但现在已经没时间深思熟虑并召开会议了。条顿骑士团的服从传统让几乎所有军官都陷入瘫痪，只有一人敢于积极行动，而其他人都在等候命令，或者找机会与其他人探讨出一个行动计划。

海因里希·冯·普劳恩开始发号施令。他命令受威胁城堡的指挥官“坚决抵抗！”；命令但泽的水手“到玛利亚堡来！”；命令立窝尼亚团长“尽

快派兵增援！”；命令德意志团长“招募雇佣兵，将其送到东方！”。服从命令的传统在普鲁士如此强大，以至于他的命令都得到了执行。这是一个原本不应当发生的奇迹。各地的抵抗都加强了；第一批波兰侦察兵抵达玛利亚堡时发现城墙上有许多守军，且已做好了防御准备。

普劳恩设法从各地集结兵力。他麾下有玛利亚堡的少量驻军、他自己从施韦茨带来的士兵、来自但泽的“船上的孩子们”、一些世俗骑士和玛利亚堡的民兵。这些民兵愿意抵抗，这一点足以证明普劳恩的人格魅力：他最早的命令之一就是纵火烧毁玛利亚堡的城市和郊区。这是为了坚壁清野，让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找不到遮风挡雨的地方也得不到给养，而普劳恩也无须分兵防守城市；这么做也肃清了城堡前方的区域。或许更重要的是，普劳恩借此表达了为保卫城堡破釜沉舟的决心。

幸存的条顿骑士、世俗骑士和市民走出了大战之后的震惊状态，开始忙碌起来。在第一批波兰侦察兵撤退后，普劳恩的部下往城堡的食品储藏室搬运了大量面包、奶酪和啤酒，把大群猪和牛赶进城堡，并从各处仓库和田野搬运粮食到城堡。他们把火炮部署到位，清除剩余的障碍物以为火炮提供开阔的射界，并讨论了抵御各种攻击手段的战术。波兰王军的主力部队于7月25日抵达时，城堡驻军已经准备好了可用八到十周的给养，而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一方则缺乏粮草。

海因里希·冯·普劳恩不屈不挠的精神对这场要塞防御战至关重要。他是随机应变的天才，渴望胜利和复仇。他的这些精神感染了所有驻军。这些品质可能在过去妨碍了他的晋升，因为火爆的脾气和对无能的人毫不宽容的态度在和平时期的军队里不可能得到赞赏。但在这个十万火急的关键时刻，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些品质。

他在寄往德意志的信中写道：

> 致收到此信的君主、贵族、骑士和武士以及所有忠诚的基督徒。我，海因里希·冯·普劳恩，施韦茨城堡长官，在普鲁士代理条顿骑士团

> 大团长之职，告知你们：波兰国王和维陶塔斯大公率领一支大军和撒拉森异教徒正在围攻玛利亚堡。骑士团的全部军队和力量都投入了此次守城战。因此，我请求诸位显赫与高贵的大人，请允许你们的臣民为了对基督的爱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利益，不管是为了救赎还是为了金钱，帮助和保卫我们，尽快支援我们将敌人赶走。

普劳恩呼吁大家帮助他抵抗“撒拉森人”的写法可能是一种夸张（不过有些鞑靼人是穆斯林），但这触动了反波兰的神经，促使德意志团长开始行动。骑士们开始奔向诺伊马克，曾经的萨莫吉希亚地方长官米夏埃尔·屈希迈斯特在那里还掌握着一支相当强大且编制完整的部队。军官们匆匆发出消息，说条顿骑士团愿意招募任何立刻就能报到的雇佣兵。

雅盖沃原指望玛利亚堡会迅速投降。其他地方的骑士团军队士气低落，只要受到一丁点威胁就举手投降，他相信玛利亚堡守军也会乖乖献城。但那里的守军出人意料地拒绝投降，那么国王的选择就不多了，而且这些选项都不能令他满意。他不愿意尝试强攻高耸的城墙，但撤退就意味着认输。于是他命令部下开始围城，希望守军会感到绝望；对死的恐惧和求生欲结合起来，往往能让人寻求有条件投降。但雅盖沃很快发现，自己的兵力不足以在攻打玛利亚堡这样庞大且设计精巧的要塞的同时派兵要求其他城市投降；他也没有及时调遣自己的攻城大炮从维斯瓦河上过来，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他的军队在玛利亚堡城下待得越久，条顿骑士团在其他地方就能有更多的时间用来组织防御。得胜的国王不应因眼下的算计失误受太多指责（如果他没有尝试乘胜追击、攻击敌人的最薄弱环节，历史学家会怎么评价他呢？），但他的围城战术确实失败了。波兰军队用投石机和从附近城堡搬来的大炮轰击城墙八周之久。立陶宛人的搜粮队在乡村纵火肆虐，只有在当地贵族和市民匆忙向他们献上大炮、火药和饮食的时候才会放过那些地区。鞑靼人在普鲁士各地神出鬼没，让所有人都确信他们的残忍恶名不是没有来由。波兰军队进入西普鲁士，占领了很多没有驻军的小城堡：施韦茨、格涅夫、迪尔

绍、图霍拉、比托和科尼茨。但普鲁士最关键的核心堡垒柯尼斯堡和玛利亚堡巍然屹立。立陶宛军中爆发了痢疾（他们吃了太多精细粮食），最后维陶塔斯宣布自己要带领部下回国。但雅盖沃坚持要留下来攻克玛利亚堡，并俘获其指挥官。他拒绝停战，并要求玛利亚堡投降。他坚信只要再坚持一小段时间，就能大获全胜。

与此同时，骑士团的援军开始赶往普鲁士。立窝尼亚军队来到柯尼斯堡，换下了那里的驻军，让他们可以到其他地方作战。这有助于驳斥所谓“立窝尼亚人背叛条顿骑士团”的指控。之前立窝尼亚骑士团遵守与维陶塔斯的停战协定没有骚扰他的土地，因而也没有迫使他分兵去保卫自己的边境，所以有人指责立窝尼亚骑士团背叛了条顿骑士团。匈牙利和德意志雇佣兵从西方匆忙赶到诺伊马克，在驻守当地的米夏埃尔·屈希迈斯特的领导下组成一支军队。这位军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动作，因为他非常担心当地贵族的忠诚度，不敢冒险与波兰军队交锋。但在8月，他命令自己的小部队袭击一群兵力相当的波兰人，将其击溃，并俘虏了对方指挥官。然后他挥师东进，收复了许多城市。到9月底，屈希迈斯特已经肃清了西普鲁士境内的敌人。

此时雅盖沃再也无力将围城战坚持下去了。只要守军不丧失战意，玛利亚堡就固若金汤。普劳恩让匆匆集结起来的部队保持斗志，立陶宛军队的撤退和骑士团在其他地方取胜的消息也鼓舞了玛利亚堡守军。所以，尽管给养逐渐消耗，他们还是为胜利的喜讯感到高兴，而且他们还深知骑士团的汉萨盟友控制着各条河流。与此同时，雅盖沃的骑士们开始敦促他回国，因为骑士们的义务服役期早已结束。国王的补给物资不多了，军中疫病流行。最终，雅盖沃别无选择，只能承认防守方相对于进攻方仍然有很大优势。拥有护城河的砖砌要塞非常坚固，只有通过长时间围困才能拿下，且即便如此可能也需要好运气或者城内变节者的协助。雅盖沃此时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更长的围城战，他在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时间和资源。

围城八周之后的9月19日，国王下令撤军。他已经在玛利亚堡以南不远处的什图姆建造了一座要塞并加固了那里的防御工事，派他最优秀的官兵在城中驻守，然后把从乡村搜罗的全部粮草都储藏在那里。随后他命令部下焚烧附近的所有田野和谷仓，让条顿骑士团更难搜集粮草来围攻什图姆。他希望通过在普鲁士心脏地带控制这样一座强大的要塞来对敌人持续施压，并鼓励和保护那些向他投降的当地贵族与市民。回国途中，他停在马林韦尔德的圣多罗特娅圣所祷告。雅盖沃现在已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在圣多罗特娅圣所逗留，一方面是因为他个人的虔诚（他不希望任何人因为他曾是异教徒和东正教徒而怀疑他如今的虔诚），一方面也是为了证明他手下有那么多东正教徒和穆斯林官兵纯粹只是为了打仗而已。

随着波兰军队撤退，历史重演了。将近两个世纪之前，来自波兰和德意志的十字军征服了普鲁士，当时大部分战斗是波兰人承担的，但条顿骑士团最终占据了这片土地，因为此时和当年一样，很少有波兰骑士愿意留在普鲁士，并为国王保卫它。条顿骑士团的忍耐力更强。如今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熬过了坦能堡的灾难。

普劳恩下令追击撤退的敌人。立窝尼亚军队首先行动，攻打埃尔宾，迫使那里的市民投降，然后南下去库尔姆，收复了那里的绝大多数城市。拉格尼特城堡长官的部队在坦能堡战役期间负责监视萨莫吉希亚，现在他的部队穿过普鲁士中部来到奥斯特鲁达，逐个占领那里的城堡，将最后一群波兰人从骑士团领地上驱逐出去。到10月底，除边境上的托伦、涅沙瓦、雷登和斯特拉斯堡[1]以外，普劳恩已经收复了绝大多数城镇。就连什图姆在坚持三周后也投降了，守军放弃了城堡以换取带着全部财产安全返回波兰的通行权。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普劳恩在骑士团最绝望的时刻挽救了它。他的勇气和决心激励了其他人，他把一场军事灾难之后灰心丧气的幸存者重新打造成战士。他不相信一场战役就能决定骑士团的历史，他激励了其他很多人分享他对最终胜利的信

念。

西方支援的到来快得出人意料。西吉斯蒙德向雅盖沃宣战，派遣更多军队去波兰南部边境，牵制了一批原本可能与雅盖沃会合的骑士。西吉斯蒙德希望条顿骑士团继续对波兰北部省份构成威胁，并在将来帮助他。就是本着这种精神，他之前与乌尔里希·冯·容金根约定，双方都不会单独与波兰议和。他有着想当皇帝的野心，所以希望让德意志诸侯觉得他是德意志机构和德意志土地的坚定捍卫者。他因此超越了自己的合法权限，像危急时刻的真正领袖一样，召唤选帝侯到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开会，并敦促他们立刻支援普鲁士。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秀。西吉斯蒙德真正感兴趣的是当选德意志国王，这是他成为皇帝的第一步。

最有效的支援来自波希米亚。这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文策尔国王原先没有表现出对挽救条顿骑士团有兴趣：坦能堡战役的消息只用了不到一周就传到了布拉格，但他无动于衷。这是文策尔的典型作风，他经常在需要决策的时候喝得烂醉，即便头脑清醒的时候也对朝政缺乏兴趣。骑士团的代表狡黠地用重金贿赂国王的情妇们，还承诺给手头拮据的领主和雇佣兵付钱，最后向国王提议让普鲁士在将来从属于波希米亚，这时国王才开始行动。文策尔突然间不仅愿意允许他的臣民到普鲁士作战，还向骑士团的外交官贷出超过8000马克的军饷。

普鲁士得救了。除了失去一些生命和财产（这两样在长期来看都是可以补充和替代的）以外，条顿骑士团似乎没有太大的损失。当然他们的威望受损了，但海因里希·冯·普劳恩收复了绝大多数城堡，并将敌人驱赶到边境之外。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坦能堡战役是一个无法治愈的伤口，最终让骑士团失血过多而死。但在1410年10月，没有人认为条顿骑士团的结局会是这样。

坦能堡战役的意义

下一场战役在舆论场上打响了。海因里希·冯·普劳恩要向德意志和法兰西贵族、西吉斯蒙德、文策尔和三位对教宗头衔拥有主张权的高级教士解释在坦能堡究竟发生了什么[2]。他需要一个可信度足够高的故事，来反驳雅盖沃的外交官已经在以精明的手段向外传播的宣传信息。普劳恩的故事必须解释骑士团的战败，但不能损害骑士们的荣誉，也不能让人觉得骑士团将来不可能打胜仗了。所以他不能说波兰人是更强的战士、他们的指挥更优秀，或者他们的兵力太强。最终他的说法是，条顿骑士团遭到了阴险的背后暗算（1918年之后德国人也是这么说的，不过逻辑性更差），罪人是一群波兰血统的世俗骑士。他指责蜥蜴同盟[3]的成员在战斗中降旗并逃跑，在十字军队伍里制造了混乱[4]。他说，容金根试图逆转这种背叛造成的后果，结果英勇战死。一种直到1945年都在毒害德国史学界的阴谋论就这样诞生了。

对一些重要的君主和教士来说，坦能堡战役的教训再清楚不过。他们早就在等待借这样的机会从骄傲的条顿骑士团那里敲诈金钱和好处。信奉机会主义的文策尔几十年来经常表现得反复无常，这一次他又成了墙头草；西吉斯蒙德也靠不住。当大团长向他们的钱箱塞钱的时候，他们就支持大团长。但普劳恩的金库并非取之不尽。于是他不得不向近期遭到入侵者蹂躏的土地和城市额外征税，这让他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起初他得到了相当积极的配合，部分原因是很多人希望避免被怀疑是叛徒，部分原因是人们理解普劳恩没有钱就无法从国外得到有效的帮助。但这种局面不能维持多久。饱受战争创伤的人民拿不出钱来。

普劳恩要做的工作很多。他现在已经把波兰和立陶宛军队逐出普鲁士，然后需要重振千疮百孔的经济，为损失惨重的骑士团补充人员，任

命新的军官，并让欧洲的重要统治者们相信条顿骑士团仍然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如果他能赢得一场军事胜利，就能达成全部这些目标，而无需用金钱购买友谊。但打一场胜仗太难，因为他的下属都相信普鲁士现在需要一段和平时期以完成重组。

普劳恩命令他的部队集结到西普鲁士，准备入侵波兰，但他在一次患病期间被部下推翻并逮捕。密谋者匆匆召集代表大会，威胁参会代表选举屈希迈斯特为大团长，让他解散雇佣兵并与波兰国王谈判，以争取永久和平。这种政策是错误的。密谋者希望逃避战争，但战争很快淹没了他们。屈希迈斯特笨拙地试图用外交手段来欺骗敌人，但雅盖沃轻松识破他的意图，先是让骑士团解除武装，然后痛击他们，迫使他们屈服。《第一次托伦条约》（1411年）的条件比雅盖沃给普劳恩的和平条件严酷得多。坦能堡战役并没有直接置条顿骑士团于死地，但维持大量雇佣兵并随时准备作战的需求最终耗尽了骑士团的经济资源。在之前的几十年里，骑士团的经济资源曾足以支撑它的战争机器。而如今，条顿骑士团就只有下坡路可走了。

衰落的世纪

坦能堡惨败之后，条顿骑士团怎么样了？他们的国家之所以衰败，肯定不只是因为被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打垮，也不只是领导人的个人失败，更不只是惰性法则的简单运作。骑士团国家内部有一些问题可以直接追溯到坦能堡的军事灾难。

第一，在混乱的关键时刻，很多原本可能永远不会有晋升机会的地方官员在形势逼迫之下掌管了一些在过去由中央领导的行政管理工作，上级则不再去视察和监督地方官员。渐渐地，地方官员习惯了独立自主，并对玛利亚堡方面约束他们自治权的命令心怀怨恨。在之后的一些关键岁月里，骑士团的军官要么过于年迈，要么过于年轻，要么刚刚抵达普鲁士，于是骑士团内部开始出现各种派系，同乡往往抱团取暖，比如巴伐利亚人和奥地利人会猜忌莱茵兰人，等等。成功的反叛破坏了大团长的权威，城堡长官和地方长官们觉得自己有理由抵制那些旨在恢复大团长控制力的改革，不管这些改革多么轻微。骑士们再也不能标榜自己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因为那种一方面假装谦卑、一方面自吹自擂的做法再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第二，宗教方面的改革成为一种执念。当时的人们相信上帝会根据人们及其领袖的道德水准来评判人类的组织或国家，所以条顿骑士团得出的结论是，坦能堡战役和之后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没能按照清贫、贞洁和服从的誓言来生活，因此受到上帝的惩罚。很多现代读者也许会觉得这种逻辑很荒谬，但骑士团的确相信，坦能堡战役之前的骑士团因为狩猎饮酒的享乐而干扰了自己的职责，忽视了作战训练，并且铁石心肠地对待臣民，以至于臣民急不可待地寻找机会投奔别的统治者。没有证据表明1410年之前的骑士团是这样的。当时的访客都认为普鲁士是一个模

范国家。坦能堡战役之前的条顿骑士的致命罪孽是骄傲，对于管理不善的抱怨是后来才堆积起来的。受到巨大压力的城堡长官和地方长官年复一年地征收紧急税，用特殊劳役压榨领地居民，并傲慢地对呼吁公平和仁慈的声音充耳不闻。

第三，衰败中的国家很难治理，条顿骑士团也不例外，而宗教生活方面的改革无助于解决国家管理的问题。也许更多的祈祷和对贞洁的强调会让骑士们善待自己的臣民，但这种现象很少发生。如果我们把条顿骑士团和同时代的教士相比较，我们能说骑士团成员特别罪孽深重吗？我们能说他们比邻国的世俗统治者更傲慢、更残酷地压迫人民吗？

直到最后一位在普鲁士统治的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为止的历任大团长无一例外地遵守了修士的誓言，他们甚至是虔诚、热忱而严于律己的人。当然，只靠他们的榜样无法把官兵约束在骑士团制度规定的范围之内，但骑士团的大多数成员肯定赞同大团长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毕竟这些大团长是在骑士团大会上由骑士、神父和军士们选举出来的。条顿骑士团早就比典型的修道会更为突出地展现自己的骑士精神，而罗马天主教会从来不会觉得豪华排场和仪式与它的宗教功能完全不匹配；今天，即便最坚定的新教徒如果亲临梵蒂冈的教廷弥撒也会肃然起敬。中世纪比今天更强调宗教游行、庆祝活动和公共祷告的重要性。我们很难想象现代国家元首会命令全体公民为本国外交官取得的成功祈祷，然后日复一日地参加漫长的宗教礼拜，且公众会自愿效仿。

真正的症结在于，大团长们发布的命令得不到执行，或者无助于解决城堡长官和地方长官面临的实际问题。问题不在于骑士团的修道院里挤满了女人或者其他的世俗人等，而在于骑士团曾经引以为傲的同质性和纪律性一去不复返了。军事灾难接踵而至，所以军官很难管束士兵和雇佣兵。饮酒和较小的奢侈行为变得司空见惯，骑士团成员因为公众的

嘲讽和批评而士气低落。宗教社群被迫处于守势，无法用武力或告诫来恢复自己的地位。解决纪律问题的办法是和平，恢复国家的财政，并找到新的军事目标，让骑士们为之忙碌并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第四，骑士的数量正在下降。黑死病之后欧洲人口恢复速度缓慢，追求宗教使命的无业小贵族幼子也更少了。更重要的是，骑士团的威望一落千丈，吸引不到优秀的新人。虽然因为军事战术的变革，骑士的价值现在不如雇佣兵，所以招募不到很多新骑士不算是场灾难（如果在一个世纪前肯定就是灾难了），但这对士气的打击很大。15世纪最成功的军队由雇佣兵组成，他们是正值盛年的专业军人，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受雇，然后被解散。这样的军队已经在实战中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打败由君主征召的骑兵、农民步兵的乌合之众和由曾经武艺高强但已经上了年纪的骑士组成的传统军队。另外，只要军饷一直发，雇佣兵就愿意继续作战。雇佣兵在普鲁士早就很常见了；现在他们变得不可或缺。数量很少的修士-骑士如今以纯粹的军官身份监管雇佣兵、招募来的民兵和军事专业人员，比如炮兵、工兵和军需官。骑士团财政紧张，所以大团长们更愿意把钱花在雇佣兵和装备上，而不是花在贵族骑士身上。骑士们察觉到自己的角色在变化，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满意。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轻松适应250年前设立的规矩，但也适应不了新时代的需求。

第五，骑士团比以往需要更多的钱。所以城市里的商人寡头和乡村的骑士明白，自己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怨恨骑士团强加给他们的义务，尤其是服兵役和纳税；但与此同时，骑士团又限制这些人在司法和外交政策上的权力。只要商业利益能得到保护、不必害怕竞争者和海盗，各城市的抱怨还不算太厉害；但在坦能堡战役之后，它们向骑士团奉献的金钱越来越多，得到的保护却越来越少。它们想要至少在外交方面有发言权。贵族也是这么想的。大团长们接二连三向这些抗议者让步，最后只剩两个选择：要么通过某种形式的议事会赋予普鲁士联盟[5]完整的参政权，要么武力镇压各城市和世俗贵族。1454年，大团长埃里

希斯豪森决定动武，这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上述内部衰败的主要原因还不能完全解释普鲁士为什么会沦落至如此悲惨的地步。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把目光从波罗的海的狭窄空间伸展出去，审视当时全欧洲遇到的那些更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于，大团长权威的丧失不是当地独有的问题。神圣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会、波兰王国、立陶宛大公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联合王国[6]都出现了国家元首无法行使执政权的现象。欧洲各地的较低阶层都在挑战上层集团发号施令的权利；在欧洲各地，各阶层的个人和群体都在尝试剥夺领导者的权力，将其攫为己有。命运之轮形象地呈现了每一位统治者所遇到的难题：君主坐在结构松散的圆轮的顶端，手持圣球和权杖，头戴高高的冠冕，身披昂贵的长袍；但这个平衡很脆弱，空气稍微流动就会打破平衡；统治者一夜之间就可能从高峰跌落，摔得头破血流。

第二个问题在于，十字军的目标已经改变了。只要立陶宛人乃至萨莫吉希亚人还是异教徒，条顿骑士团领导十字军就有宗教上的理由。但在雅盖沃成为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维陶塔斯受洗并派代表去康斯坦茨宣布全体萨莫吉希亚人都是基督徒之后，大团长的代表越来越难以令欧洲的骑士们相信在立陶宛的作战是十字军圣战、针对波兰的战争是正义的，且骑士们应当主动向条顿骑士团奉献金钱与服务，至于用传统的论点说服教宗就更加困难了。

眼下基督教世界面临的主要危险显然是在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人步步紧逼，或者貌似如此，他们也许更喜欢俘虏人口和牛群，而不是获取新的省份。不过，这对落入他们手中的俘虏提供不了安慰。伊斯兰世界在14世纪末的进展让十字军运动的传统支持者胆战心惊，他们保不住自己在希腊的领地，并且已经预见到匈牙利以南的几个古老的基督教王国将会陷落。1396年的大规模十字军圣战原本要逆转这种局势，结果却在

尼科波利斯以灾难而告终。法兰西十字军战士对敌人的轻蔑是这场败仗的祸根，而这种轻蔑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他们在萨莫吉希亚的经验，对此我们就只能去猜测了，因为立陶宛人也享有优秀武士的盛名，他们在自己的森林和沼泽里足以与任何欧洲人匹敌，也差不多能和鞑靼人平起平坐。然而，十字军多次打败过立陶宛人。十字军或许由此推断自己有能力打败土耳其人和他们在当地的斯拉夫盟友。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尼科波利斯战役之后，法兰西人不再派遣大批十字军到普鲁士，把北方十字军留给了德意志人。而现在德意志人的君主是在尼科波利斯吃败仗的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即后来的神圣罗马皇帝。他对十字军运动唯一的兴趣（当然前提是他能集中注意力于某一件事）是防备土耳其人的威胁和镇压波希米亚的胡斯派叛军。[7] 他对条顿骑士团的边境战争几乎毫无兴趣，除非这能对雅盖沃施加压力，因为西吉斯蒙德在和雅盖沃争夺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

第三个问题来自异端。波希米亚的胡斯派不仅武力抵抗西吉斯蒙德的军队，即由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十字军”，还主动发起进攻。条顿骑士团在德意志和普鲁士的一些财产因此蒙受了损失，而他们帮助西吉斯蒙德镇压胡斯派的努力没有带来丝毫补偿。在土耳其人和胡斯派异端的双重威胁之下，中欧的十字军热情枯竭了。中欧人不再愿意攻击立陶宛和波兰的基督徒民族。

第四个问题在于，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抑郁情绪，很多人觉得努力只会造成失败，即便最好的成功也是转瞬即逝和徒劳无益的。约翰·赫伊津哈[8] 把这个时代称为“中世纪的衰落”，将它比作人的衰老。的确，在这个时期，较少有贵族愿意为了宗教使命而放弃舒适的生活，较少有人愿意长途跋涉去寒冷的萨莫吉希亚荒野。夸夸其谈和作秀取代了实际行动。很多人问，努力有什么用呢？真的有希望取得什么成绩吗？世人满腹怀疑、猜忌和玩世不恭。即便要做什么，也是去抵抗土耳其人。但即便在那条战线上，上帝似乎也站在敌人那边。

骑士精神当然还没有消亡。骑士精神是萨莫吉希亚十字军运动长期以来的发动机，但它也因过热而丧失了活力。依然幸存的骑士精神仅仅是一种昂贵的表演，只有最强大的诸侯才玩得起。那些曾陪同诸侯去普鲁士的小贵族如今已经无法负担骑士精神了，而且没有一位诸侯愿意与奥地利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三世竞争，他在1377年的花费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9]。更何况条顿骑士团没有钱用新的奢华标准来招待贵宾。在14世纪还算富裕的人，到了15世纪就只能算穷人了，而大团长们现在连14世纪标准的财富都不具备。想去普鲁士参加十字军的人都不愿意灰头土脸地去，但很少有人能承担得起体面远征的开销。

简而言之，十字军已经不好玩了。14世纪骑士精神的那些标志，比如奢华、喜好冒险而追求名望，都已经消失了。萨莫吉希亚十字军东征曾经把狩猎的惊险刺激、战争的危险、奢华的旅行和精彩的娱乐结合在一起，当时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活动。现在十字军不能袭击立陶宛并砍杀那里的农民，也不敢向立陶宛公开挑战了。他们甚至无法呈现出那种风靡勃艮第与意大利的骑士精神奇观，而其他地方的十字军也不能取而代之。所以潜在的十字军战士如今只能待在家里，清谈往昔的光荣。

大团长无法遏制普鲁士国家的衰败。就连骑士团在德意志的那些修道院也对普鲁士漠不关心。在德意志的骑士团成员大肆鼓吹远征并且经常提出建议，却不能提供武士、十字军战士或金钱。没有这些的话，建议有什么用呢？骑士团新的努力方向是支持皇帝的冒险。事实上，从普鲁士出发的十字军已经结束了。条顿骑士团在那里的使命和价值已经不存在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这个事实显现出来。

十三年战争

1449年，骑士团代表大会选举路德维希·冯·埃里希斯豪森为大团长。埃里希斯豪森急于将普鲁士统一的问题提上议程，他相信骑士团的问题不在于缺乏手段，而在于缺乏意志。他正确地判断出自己目前面对的主要挑战来自普鲁士联盟，于是他遵照当时最成功的德意志诸侯的榜样，试图遏制普鲁士联盟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如果顺利的话再将其消灭。骑士团的重要军官们不仅支持他，还敦促他做出更果断的决策。埃里希斯豪森对来自普鲁士联盟之抗议者的放肆语调非常恼火，这些人要求他停止对商贸征收紧急税，并坚持要求他赶走议事会里那些在意大利受过训练的律师，从而让他无法得到律师的辅佐。埃里希斯豪森知道普鲁士联盟的弱点在于缺乏法律地位，于是他派遣年轻的律师劳伦丘斯·布鲁梅瑙（出生于但泽的城市显贵，曾在意大利学习）去拜见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1440～1493年在位）和教宗尼古拉五世（1447～1455年在位），探讨当前的危机。瓦尔米亚主教是此事中的决定性人物，他是大团长的谋士当中最坚决主张镇压普鲁士联盟的人之一，但前任大团长、路德维希的堂兄弟康拉德·冯·埃里希斯豪森多次否决了瓦尔米亚主教的提议。现在，主教的建议促使三位枢机主教派遣葡萄牙的路易斯·德·西尔韦斯主教作为教宗特使于1450年末前往普鲁士。

布里克森主教尼古劳斯·冯·库斯[10] 枢机也深度参与了这场争端。他作为外交官和学者享有盛誉，在德意志政治当中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与大团长的大量通信中包含的建议得到了骑士团的重视。

大团长在教廷的代表、精明强干的律师约多库斯·冯·霍亨施泰因提出，普鲁士联盟是一个旨在摧毁条顿骑士团的“阴谋”。他的这种策略即便在骑士团内部也没有赢得普遍的支持。他的论点拥有扎实的法律基

础，但他提出这个论点的时机太差。大团长本可以等敌人虚弱或出现内部分歧的时候再行动，但埃里希斯豪森不是有耐心的人。他自信满满地采取快速行动，也许是希望仅凭自己的人格力量就威慑对方。显然，布鲁梅瑙的影响加强了他本身就有的倾向：蔑视出身不如他高贵、没有像他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大团长及其谋士也很清楚，此时但泽与吕贝克之间的关系已经因英格兰人的竞争和海盗活动（在这个时代，商业竞争和海盗这两种事情本质上很难区分）而疏远了：但泽愿意向英格兰人妥协，但吕贝克不肯这么做。这是大团长挑战但泽商人集团的良机。

路德维希·冯·埃里希斯豪森无疑受到局势的鼓舞，自信能吓倒对手。他刚刚在立窝尼亚赢得一场大胜：海登莱希·芬克·冯·奥弗贝格于1450年6月去世，结束了骑士团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一个时代，即威斯特法伦骑士与莱茵兰骑士这两个派系之间的内战。多年前，芬克曾率领威斯特法伦骑士兵不血刃便战胜对手，随后与立陶宛议和。大团长命令芬克对敌人持续施压，立窝尼亚团长就与骑士团在德意志的各个修道院联手，约束大团长的权威。这在实质上便意味着骑士团趋于去中心化，各个地区都集中力量于自己的事务。现在芬克死了，埃里希斯豪森得以让莱茵兰骑士恢复与威斯特法伦骑士更为平等的地位。新任立窝尼亚团长约翰·冯·门登是威斯特法伦人，但他同意大团长的看法，认为必须镇压普鲁士联盟。立窝尼亚骑士团憎恨立窝尼亚联盟，而立窝尼亚联盟与普鲁士联盟相似，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

埃里希斯豪森和布鲁梅瑙很快就吓坏了普鲁士联盟成员，他们相信布鲁梅瑙的浮夸宣言当真预示了大团长将对他们的财产和自由出手。世俗贵族、士绅和市民开始制订计划，准备自保。

埃里希斯豪森以为他的对手会接受教宗或皇帝对争端的裁决，但他想错了。他让布鲁梅瑙向教宗和皇帝询问“普鲁士联盟有无合法性”只是

自作聪明的做法。教宗和皇帝当然会指派律师来查阅骑士团的特许状。律师给出了浮夸而明确的答复：普鲁士联盟不合法，必须解散。但这一结果产生的唯一效应就是让各城市和贵族们对律师保持警惕，尤其是布鲁梅瑙那样有能力让教宗和皇帝的官员相信普鲁士联盟花费很大代价获得的授权文件为伪的聪明律师。普鲁士联盟的那些高级律师不是大团长手下律师的对手。布鲁梅瑙可以浏览骑士团的大量档案，并从中找出专家需要的任何文件，而普鲁士联盟的律师做不到这一点。

没过多久，这起争端引起了派驻皇帝宫廷的教宗特使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的注意。皮可洛米尼记得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在巴塞尔大公会议期间，自己曾入神地聆听一位传教士讲述在立陶宛生活的故事和条顿骑士团的活动造成的问题。而在最近，他还在和教宗特使路易斯·德·西尔韦斯密切合作。皮可洛米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无疑是教会里最卓越的学者，他的优美修辞和高雅文风影响了每一位雄心勃勃的律师的讲话方式和每一位文书官员拉丁文写作的风格。作为“向德意志人传播人文主义的使徒”，他让“野蛮人”对自己肃然起敬的坚定决心为他吸引来很多朋友，也招来不少敌人。他要么是不知道自己写有对政治家水平和对手弱点之恶评的书信会在暗中被人拆封阅读，要么对此根本不在乎。他根据当前需要而转换立场的能力让“淳朴诚实”的德意志人大怒，他们很快得出结论，认定皮可洛米尼是个狡猾奸诈的意大利人，不值得信赖（对不同民族的刻板印象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皮可洛米尼的任务很困难。他认为自己的头等大事是阻止新的教会会议召开，因为教廷现在已经够虚弱了，不能再承受另一场巴塞尔会议的重演。[11] 基督教世界需要的是领导力而不是宿怨，所以皮可洛米尼认为，召开新的教会会议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他承认教会需要改革，但应当是尊重传统的改革，比如将教堂和修道院从一些豪门世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但德意志的小诸侯不会欢迎这样的改革。他主张，教廷如果想要在国际事务中成为有影响力的一方，就必须有自己的收入。而

且，一般来讲，教会的收入越多，它就应越有能力支持十字军运动，从而不必害怕世俗统治者的威慑，并给社会带来更多公平正义。

他的第二项任务是保全一些诸侯的权力，而恰恰是这些诸侯正在夺走教会和帝国最重要的资源。皮可洛米尼担心城市联盟和骑士联盟（比如普鲁士联盟）的势力会变得比任何一位诸侯都更强大。如果诸侯软弱无力，神圣罗马帝国就完全无用了。而没有了强大的诸侯，基督教世界就会过于虚弱，无法自卫。皮可洛米尼认为一个议会制政府无法有效运转，也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让窝囊的哈布斯堡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坚强起来。

他的第三个任务是说服皇帝、匈牙利国王、波兰国王和诸侯支持一场反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贝尔格莱德于1451年遭到攻击，但卡佩斯特拉诺的约翰[12]挽救了它。君士坦丁堡显然是土耳其人的目标，这座大城市于1453年遭到攻打时，皮可洛米尼的职责就是在中东欧促成全面和平，从而让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一同去救援君士坦丁堡。所以解决普鲁士争端突然变成了皮可洛米尼需要优先处理的大事。

但正义经常迟到。当皇帝的宫廷开始讨论普鲁士问题时，君士坦丁堡已经陷落。之前有人伏击了普鲁士联盟的代表，偷走了他们的文件；波兰大使威胁说，如果任何“外部势力”干预普鲁士问题，他的君主卡齐米日四世[13]就不会参加十字军，这引发了德意志诸侯又一轮咆哮和威胁。这些都耽误了问题的讨论。皮可洛米尼顶多只能寻求延迟做出决策。他虽然讨厌城市联盟，但不希望战争立刻爆发。

皮可洛米尼于1453年10月写给奥莱希尼茨基枢机（他是波兰国王背后的实权人物）的信很能体现他哄骗、劝说和威慑他的听众或读者，引导他们遵照他的意愿行事的手法。皮可洛米尼的书信是一篇了不起的杰作，雄辩、引经据典、睿智、奉承且自我吹嘘，它批评了波兰人夺取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位的企图。下面是他溜须拍马的一个例子：“我很清

楚，阁下肩负教会的诸多职责，不仅涉及阁下本人，还涉及国王；在他之后，阁下贵为枢机主教，自然是波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我还知道，若没有阁下的批准，国王的旨意就不能通过；朝廷征询阁下的意见；战争或和平的计划都需要事先征求阁下的意见。”如皮可洛米尼自己所说，他这封信的最终篇幅堪比一本书。他的文字拥有强大的力量，读到它的人肯定很多。威严的克拉科夫主教奥莱希尼茨基不会喜欢这一点。

皮可洛米尼在帝国议会的演讲是他最精彩的表演之一。根据他自己写的史书《普鲁士的起源》，他在演讲中说：“最崇高的皇帝陛下，依臣愚见，此次争吵既非微不足道，亦非不值一提……争夺的不是阿尔皮纳斯或图斯库拉努斯的田野，而是一位强大国王渴求的几个伟大省份。”在演讲末尾，他泛泛地谴责战争，引用了“帝王发言时，法律噤声”的谚语。他的建议当然照例被否决了。1454年1月，皇帝做出了对普鲁士联盟不利的裁决。现在大团长需要想办法来执行皇帝的裁决，但同时又不能承认皇帝裁决的第二点，即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领地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骑士团在德意志的各个修道院为了挽救骑士团，愿意对皇帝做任何让步，尤其是当这种让步会增强德意志团长影响力的时候。但大团长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权或权威。弗里德里希三世也不会做出任何可能把自己卷入战争的事。他取得成功的手段是婚姻（“让其他人打仗吧，你，幸福的奥地利，去结婚吧”），而且他刚刚娶了妻。

至于皮可洛米尼组织十字军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想法，在教宗尼古拉五世去世时已接近成功。但随着教宗去世，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待教宗选举完毕，因为新教宗可能采纳不同的政策，或者有别的事务要优先考虑。虽然新教宗卡利克斯特三世（1455～1458年在位）决心重振十字军东征的精神，所以任命皮可洛米尼为枢机主教，让他有足够的衔级来战胜各种抵制，但基督教世界已经浪费了一年时间。

战争

普鲁士联盟的成员知道，如果大团长有时间招兵买马，自己就无力与他对抗，于是他们在2月结束了诉讼，向他送去一封分离文书：他们不再对普鲁士效忠，改为向波兰国王效忠。他们的书面声明附和了波兰对普鲁士的最极端的主权声明。卡齐米日四世国王（1447～1492年在位）当然欢迎他们的举动，尽管他此时还没有做好为普鲁士联盟一方参战的准备，也不愿意开战。

普鲁士社会各阶层发出的挑战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大团长之前就已经在备战，但还没有做好准备，他发现自己不可能同时与所有敌人对抗。埃尔宾、但泽和托伦的城堡迅速陷落，然后被全部或部分摧毁。

埃尔宾和但泽的城墙和建筑均被摧毁，托伦只剩下雄伟的“但茨克”[14]，这座卫生设施是唯一能让人想起骑士团曾经统治过这里的东西。很快，西普鲁士除玛利亚堡、什图姆和科尼茨以外的所有重要据点都被叛军占领。大团长的军官缓慢地从萨克森、迈森、奥地利、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这几个都是帝国东部的邦国）招募雇佣兵，最后集结了15000万人。

这种状况若是发生在六十年前，异教徒萨莫吉希亚人就会趁机杀入乡村；若是发生在五十年前，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就会乘虚而入。但现在立陶宛是基督教国家，并且与波兰联合。没有一位睚眦必报的君主受到疯狂反德的贵族与教士的煽动，急于惩罚骄傲的敌人。恰恰相反。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四世是个性格平和的人，他的主要麻烦在于自己很难说服那些独立性很强的贵族和教士，让他们采纳任何一种外交政策，即便其目的是保卫国家、抵抗土耳其人的威胁。波兰贵族和教士没有为自己南部和东部的边疆担忧，却担心如果国王征服了普鲁士，他不仅会获

得大量资源去击退信奉伊斯兰教的敌人，还会有更强的力量来主宰他们自己。这些人担心，如果国王的权威增强、王军的战斗力提高，那么国王在和平时期就会滥用武力。因此波兰议会并不乐见王军在普鲁士取得胜利。

尽管议会对此没有热情，国王还是选择支持普鲁士叛军。令他惊喜的是，波兰军队节节胜利，似乎表明自己能够以低廉的代价迅速而彻底地消灭条顿骑士团。卡齐米日四世匆匆赶往北方揽功，以威风堂堂的胜利者之姿穿过普鲁士，在城乡居民的欢呼声中受到市长和贵族的欢迎。条顿骑士团作为一个国家似乎注定要灭亡了，其末日的到来已不是一个论月而是论日计算的问题。

普鲁士联盟开始攻打玛利亚堡，而波兰王军则监视科尼茨。唯一的危险是从西方来的援军，因为德意志团长招募了波希米亚雇佣兵。他们是当时欧洲最精锐的部队，在胡斯战争中赢得的威望还没有衰减——当时他们曾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会打成平手。即便如此，卡齐米日四世仍相信自己从大波兰带来的封建军队能够在这些雇佣兵进入普鲁士时战胜他们。科尼茨的城堡长官也姓普劳恩，名叫海因里希·罗伊斯·冯·普劳恩，他后来成为大团长。普劳恩看到两支军队在他城下交锋，于是冲杀出去，从后方攻击波兰军队。波兰骑士腹背受敌，一败涂地，国王险些被俘。假如卡齐米日四世被俘，我们可以想象路德维希·冯·埃里希斯豪森会向波兰提出什么样的和平条件。这种梦想已经激励条顿骑士团坚持了数十年，这一次差一点就成真了。

但这场战役没有产生决定性结果。它原本可能是一场无谓冲突的末尾，结果却变成了恐怖的十三年战争的开端。波兰国王财政拮据，无法招募新的军队，议会不肯投票批准足够的资金去招募雇佣兵，他的贵族也拒绝参加长期远征，所以很难对敌人造成致命打击。普鲁士联盟在但泽领导下征收重税（比大团长敢于征收的税率高得多）以弥补波兰人的

亏空，但普鲁士联盟的努力似乎也只是徒劳。他们无法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这场战争最终分裂为一连串地区性冲突，其中很多敌对关系都不能用两大阵营对抗的模式来理解。骑士团在一些小规模冲突中取胜，丢掉了好几座边境城堡，在城堞之后眼睁睁看着形形色色的雇佣兵劫掠乡村而不考虑农民忠于何方，并在不计其数的微不足道的战斗中不断失血至死。普鲁士联盟的海军（来自但泽的三艘战船）于1457年8月在博恩霍尔姆岛[15]附近的一次夜战中打败了比它强得多的立窝尼亚-丹麦舰队。丹麦退出了战争，而但泽商人无法从此次胜利中获得什么好处。

尽管普鲁士联盟的苛捐杂税让一些人重新投奔条顿骑士团，并促使好几座城市中地位较低的行会反叛，路德维希·冯·埃里希斯豪森还是无法充分利用这种局面。他没钱向自己的雇佣兵支付佣金，所以无法有效指挥他们；而且他的财政状况很糟糕，无法用减税来吸引对手倒戈。作为临时措施，他把一些城市和要塞（甚至包括玛利亚堡）抵押给雇佣兵，同时压榨剩余的臣民，索取更多金钱。

埃里希斯豪森把玛利亚堡抵押出去的决定是一个弥天大错，其严重程度仅次于挑起这场战争。雇佣兵对局势并不感兴趣，只关心军饷。他们被拖欠军饷的时间越久，就越关心金钱。大团长只能偿付部分军饷，而他后来的成功（收复玛利亚堡的城镇部分，让普鲁士联盟的若干城市投诚）并不能为他赢得雇佣兵的尊重和服从。他们反而相信普鲁士联盟会赢。在来自但泽的军队的支持下，普鲁士较小城镇的商人寡头血腥镇压了对寡头政权构成短暂威胁的下层运动，波兰国王也在库尔姆和其他边境省份帮助他们镇压叛乱。所以雇佣兵放心大胆地催促大团长，向他索要更多金钱。1457年2月，埃里希斯豪森不得不屈服于他们的要求，再次偿付一部分军饷，并规定如果大团长不能按期交出巨额军饷的剩余部分，雇佣兵就有权将抵押给他们的城堡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他当然无

法按期筹集应付的钱。

就在这时，但泽商人表现出了自己的财政实力。此时卡齐米日四世没钱支付雇佣兵的军饷，普鲁士联盟的大部分成员都因为贸易被扰乱而损失惨重，也没钱招募军队。而但泽商人还有能力筹资，且确实筹集到了所需的资金。尽管丹麦出于国王希望削弱汉萨同盟的想法与但泽开战，但泽的贸易依旧欣欣向荣。当然，筹集军费并不轻松，但泽商人为此需要付出很多牺牲，但最后他们还是筹到了钱。但泽的努力彻底毁掉了埃里希斯豪森的计划，也保证了自己在骑士团国家的废墟之上能拥有一个胜利者的位置。卡齐米日四世向但泽授予一些特权，让它主宰当地政治和贸易；作为回报，商人寡头把一些坚不可摧的要塞的城门钥匙献给国王。雇佣兵将路德维希·冯·埃里希斯豪森从玛利亚堡逐出并将他掳至科尼茨，然后告诉他说他们准备把他交给波兰国王。布鲁梅瑙曾试图劝阻雇佣兵，说他们的行为是“与上帝、正义和《圣经》为敌”，但反而遭到抢劫，然后被赶出城堡。大团长在最后关头逃走并来到了柯尼斯堡，这座远离普鲁士联盟及其舰队攻击范围的要塞从此成为大团长的官邸所在地。战争仍在继续。

在这个时候，皮可洛米尼枢机的再度登场似乎正当其时。他手头最要紧的事务来自是即将去世的瓦尔米亚主教，此人是大团长的忠实支持者。如果普鲁士联盟能安排一个对其友好的人接任瓦尔米亚主教，那么权力平衡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在有资格参选主教的教士当中，有三人居住在但泽，六人流亡到西里西亚，七人被大团长扣押（他因此遭到教宗绝罚）。大团长得知西里西亚的六位教士提议瓦尔米亚主教从他已经破产的教区退休并领取年金，从而让一位波兰教士当选，于是派遣瓦尔米亚的唱诗班领唱人巴托洛梅乌斯·利本瓦尔德去罗马与皮可洛米尼商谈。利本瓦尔德回来的时候还没走到西里西亚，就得知瓦尔米亚主教去世了。枢机主教的建议是选举一位足够强大且教宗和皇帝都认识的人物为主教，而不是普鲁士联盟和大团长提议的那些小人物。立本瓦尔德同

意这个建议，主张干脆选举皮可洛米尼本人。六位教士表示赞同，并派立本瓦尔德回罗马，向教宗卡利克斯特三世宣布他们的选举结果。

没过几天，教宗确认皮可洛米尼当选为瓦尔米亚主教，并授予他在当地处置一切事务的全权。只要能恢复和平，教宗承诺将尽力配合皮可洛米尼。当然，皮可洛米尼无法亲自去普鲁士。他在罗马有太多事务要处理，而且教宗的健康状况不佳。于是皮可洛米尼给利本瓦尔德留下了详细的指示，并任命他为自己的代理人，授予他谈判、征兵和征税的全权。他还写信给波兰国王，敦促卡齐米日四世派代表到罗马议和。卡齐米日四世对此不甚高兴，也不予配合。于是皮可洛米尼提高了赌注。

库尔姆主教的去世给了皮可洛米尼一个机会。库尔姆主教曾是普鲁士联盟的可靠支持者，实际上是联盟领导层的核心成员。波兰国王支持的库尔姆新主教人选和大团长支持的候选人都来到罗马，皮可洛米尼支持前者，但教宗将这个问题交给一位法学家裁决。法学家让皮可洛米尼在这两人当中选择。这造成了困惑。这个狡猾的意大利人究竟有什么企图？皮可洛米尼拒绝接受高额贿赂，这就让大家更摸不着头脑了。一个意大利人，还是个教士，可他居然不受贿！这个世界怎么了？

各种猜测众说纷纭。皮可洛米尼会要求西普鲁士缴纳彼得税吗？直到他把各方都拉到布拉格来的努力失败之后，上述猜测才消停下去。1458年8月，皮可洛米尼成为教宗庇护二世。他再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把两位主教候选人、波兰王室代表、普鲁士联盟的律师和大团长的法律顾问都拉到一起进行和谈了。庇护二世保留了名义上的瓦尔米亚主教头衔，再度拒绝接受贿赂，然后派了一位行政管理者北上去管理瓦尔米亚教区，并努力促成和解。这位行政管理者起初是大团长的盟友，后来保持中立，最后成为普鲁士联盟的支持者。他在冲突中没有起到什么重要的军事作用，但从那以后瓦尔米亚就成了独立领土，不受大团长或波兰国王的直接管辖。他安排各方在1458年10月到1459年7月间停战，

但这没有达成具体结果，不过参战各方直到1461年底之前都没有大规模武装冲突。

皮可洛米尼是个非同寻常的文人。他起初是改革家，后来成为外交官和作家。最后他成为十字军战士。他致力于把欧洲各国组织起来抵抗土耳其人的进攻，但这一事业就像他在普鲁士的和平努力一样失败了。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更感兴趣的是从匈雅提·马加什一世[16]手中夺取匈牙利，而不是到巴尔干半岛打仗，所以1456年贝尔格莱德防御战的成功只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些许喘息之机，而没有彻底打退奥斯曼人。匈雅提·亚诺什[17]在围城战中死亡之后，基督徒失去了一位不可或缺的将领。而且，教宗的意大利政策惹恼了法兰西；意大利各城邦沉浸于自己的事务，不肯关心海外；就连罗马本身也动荡不断。经过四年筹备，庇护二世于1464年终于组建了一支规模不大、纪律涣散的军队，并打算亲自挂帅前去与威尼斯舰队会合，然后渡过亚得里亚海前往巴尔干半岛。但在那些不服管教的士兵登船之前，患有痛风等疾病的教宗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保罗二世（1464～1471年在位）的拉丁文很差，但他很懂政治。他决心消灭胡斯派异端，所以对格雷戈尔·冯·海姆堡非常不满。海姆堡是波杰布拉德的伊日的律师，而波杰布拉德的伊日身为波希米亚国王，竟然支持胡斯派。海姆堡同时还是条顿骑士团的律师，所以教宗自然而然地选择支持大团长的敌人。于是，代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巅峰的充满自豪感的庇护二世教廷开始陷入宗教改革之前的龌龊。从此教廷对北方的兴趣仅限于金钱。而金钱总是来之不易。

现在就连但泽也没钱支付雇佣兵了，普鲁士联盟不得不解散名下的很多佣兵部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雇佣兵会离开。他们变成了武装匪徒，袭击和压榨农民。衣衫褴褛的士兵在乡村肆虐，有时说自己为一方或另一方效力，有时什么都不说。成群结队的贫苦农民加入他们，这些农民原本集结起来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庄稼和村庄，但现在他们也奔走于各地，寻找粮食和遮风挡雨之处。但他们不是乞丐，而是武装土匪，他

们会用威胁或暴力夺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们早就忘记了仁慈、忠诚和道德。

由于一名波希米亚雇佣兵指挥官变节，玛利亚堡的城镇部分短暂回到骑士团手中。但它被敌人围攻一年之久，最后因为饥饿而再次屈服。大团长没钱招募解围部队，也没有足够的船只从立窝尼亚运粮食救济被围的守军。胜利者的报复非常残酷：骑士团麾下雇佣兵的军官全被处死。

虽然遇到这些挫折，皇帝和教宗仍鼓励骑士团继续作战。庇护二世甚至向普鲁士联盟和波兰国王动用了宗教武器，对其实施停止圣事的禁令，但没有奏效。波兰国王对教宗的要求不予理会，其态度之高傲非任何一位大团长敢于设想；反叛的德意志贵族和市民同样不理睬教宗的敕令。战火蔓延到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和多座汉萨城市，波兰、胡斯派的波希米亚和皇帝的野心都卷入其中。但在普鲁士，这本质上是一场内战，波兰军队往往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卡齐米日四世得不到议会批准就不能征税，也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征兵，而波兰贵族也不愿看到国王在普鲁士取胜。奥莱希尼茨基1451年从巴塞尔大公会议回来之后便谴责了国王的政策。奥莱希尼茨基于1455年去世，但波兰教士仍然反对王室，因为卡齐米日四世决心要控制教会职位的任命权，而教士们认为自己有权任命国王。

立陶宛人对战争的贡献在于他们对立窝尼亚骑士团军队的牵制。1454年，立陶宛贵族议会与条顿骑士团签订了盟约，迫使卡齐米日四世在搪塞耽搁很久之后终于宣誓保卫立陶宛的权益，然后将沃里尼亚归还立陶宛大公国。随后，立陶宛贵族让卡齐米日自己和骑士团交战，不向他提供支持。卡齐米日四世只得通过向波兰议会让步换取议会批准，以筹钱招募雇佣兵。这是波兰众议院发展为与元老院（御前会议）平起平坐之机构的重要一步。

1461年底，大团长在德意志招募了一队雇佣兵，虽然人数不多，但似乎足以驱逐精疲力竭的敌人。于是，本次战争中唯一的大战役于1462年9月打响，但双方的兵力都不强。大团长的军队从库尔姆出发，他们之前曾在那里花费很大力气建立了一处基地。普鲁士联盟的军队则从但泽出发，那里是反叛联盟的脊梁骨，也是唯一有钱招募雇佣兵的城市。双方军队事实上都是大杂烩，有从城市招募的民兵、丧失土地的农民、桀骜不驯的雇佣兵和少数骑士。普鲁士联盟的军队在这两群互啄的弱鸡当中显得略强一点。他们运用一种很难操作的战术（在大车构成的防御工事后作战）歼灭了大团长的军队，占领了一些城堡和城镇，将埃里希斯豪森驱赶到他最后的避难所。1463年秋季，普鲁士联盟海军歼灭了骑士团的舰队。

现在是和谈的时候了，不过双方暂时还不够精疲力竭，因此不能达成协议。几乎每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主动来调停，其中教宗保罗二世和汉萨同盟的努力最坚决。终于，1466年，一位教宗特使安排了和约。连续遭到挫折、并且再也无钱招募雇佣兵的埃里希斯豪森终于接受了严苛的和平条件。

1466年的《第二次托伦和约》

1466年最终达成的和约要求骑士团将西普鲁士和库尔姆“归还”波兰国王，并赋予瓦尔米亚独立地位。玛利亚堡、埃尔宾和基督堡都被割让给波兰，这些土地从此被称为王室普鲁士。另外，骑士团承诺放弃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联系，成为波兰君主的封臣，并接受波兰臣民进入骑士团，数量可达总人数的一半。对于那些希望彻底铲除条顿骑士团国的人来说，这样不算一场完全的胜利，但这份和约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方案，新的边界也是双方在多年相持不下的战事中无法显著改变的结果。波兰人终于获得了争议多年的领土，可以为此欢欣鼓舞。他们也期待普鲁士的分割能让这个宿敌从此衰弱下去，再也无力惹是生非。但普鲁士联盟对法律形势的理解与此不同：即便处于波兰主权之下，普鲁士人仍觉得自己属于同一个国家。

正式的仪式掩盖了这一切。埃里希斯豪森去见卡齐米日四世，宣誓维护和平，但他当然不打算遵守和约的全部条款。他没有遵照和约的要求向卡齐米日四世宣誓效忠，声称自己之前曾向教宗和皇帝宣誓效忠，而这两位不会允许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教廷迅速在这方面表态支持他，宣布条约无效，因其违反了教廷法规并损害了教会的利益。条顿骑士团与教廷的纽带再一次压倒了世俗的关系，这给波兰国王带来了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尽管他在军事上几乎大获全胜，却还是很难处置这个棘手的邻居。波兰骑士也没有兴趣加入条顿骑士团。条约的这个条款从一开始就是一纸空文。

虽然教宗拒绝接受和约，但这份和约还是在后来得到了执行（大团长终于在1478年向波兰国王宣誓效忠，但只是以个人名义，不代表骑士团或其领地），所以重新开战的理由不复存在。和约最重要的条款，即

割让领土给波兰和普鲁士联盟获得独立，早就是既成事实。其他条款则相对没那么重要。卡齐米日四世已经迫使大团长臣服了，大家不会忘记这一点：先例已经立下。

大团长将官邸搬到柯尼斯堡，占用了原先属于总军务官的寓所。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总军务官此时已是波兰人的俘虏。但要成为大团长及其宫廷的基地，柯尼斯堡还得接受一些昂贵的改建。柯尼斯堡的规格不比玛利亚堡，不过仍令人肃然起敬。改换官邸也许象征着大团长丧失了从前的地位和权威。他手下的城堡长官和地方长官们霸占了最重要的地产与收入来源，导致大团长缺乏足够收入来执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权力落到了总军务官海因里希·罗伊斯·冯·普劳恩手里，他于1469当选为大团长。普劳恩继续重组骑士团的行政管理，但他仅在任一年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是一位谨慎但更传统的大团长海因里希·赖夫勒·冯·利希滕贝格，他希望恢复国土的繁荣并结束错综复杂的内讧。但他手里的资源太少，无法达成那些目标。城堡长官和地方长官们的自私自利阻挠了此时和后来的每一次改革努力。

十三年战争在普鲁士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1466年，普鲁士的社会各阶层已经不再抱怨骑士团在税收或货币贬值等方面的恶政。现在回顾来看，那些恶政指控显得滑稽可笑。贵族和市民斗争了那么久，只获得了一样比较重要的优势：控制地方政府。他们运用地方政府来压迫手工业行会和劳工，从而增加自己的利润，并更轻松地支付他们自己规定的少量赋税。在东普鲁士出现了一个新的地主阶层，他们由曾经的雇佣兵组成，得到土地以充作军饷，而这些土地来自死去的世俗骑士的遗产以及条顿骑士团的地产。这些雇佣兵取代了原先的许多原住民骑士，成为后来普鲁士很多容克家族的祖先。后来的大团长们再也不敢参加支持立窝尼亚的事业或皇帝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也不敢挑战普鲁士各阶层或波兰国王，甚至不敢挑战自己的下属。条顿骑士团在争取时间，但对未来没有计划，不知道假如机遇来临的话自己要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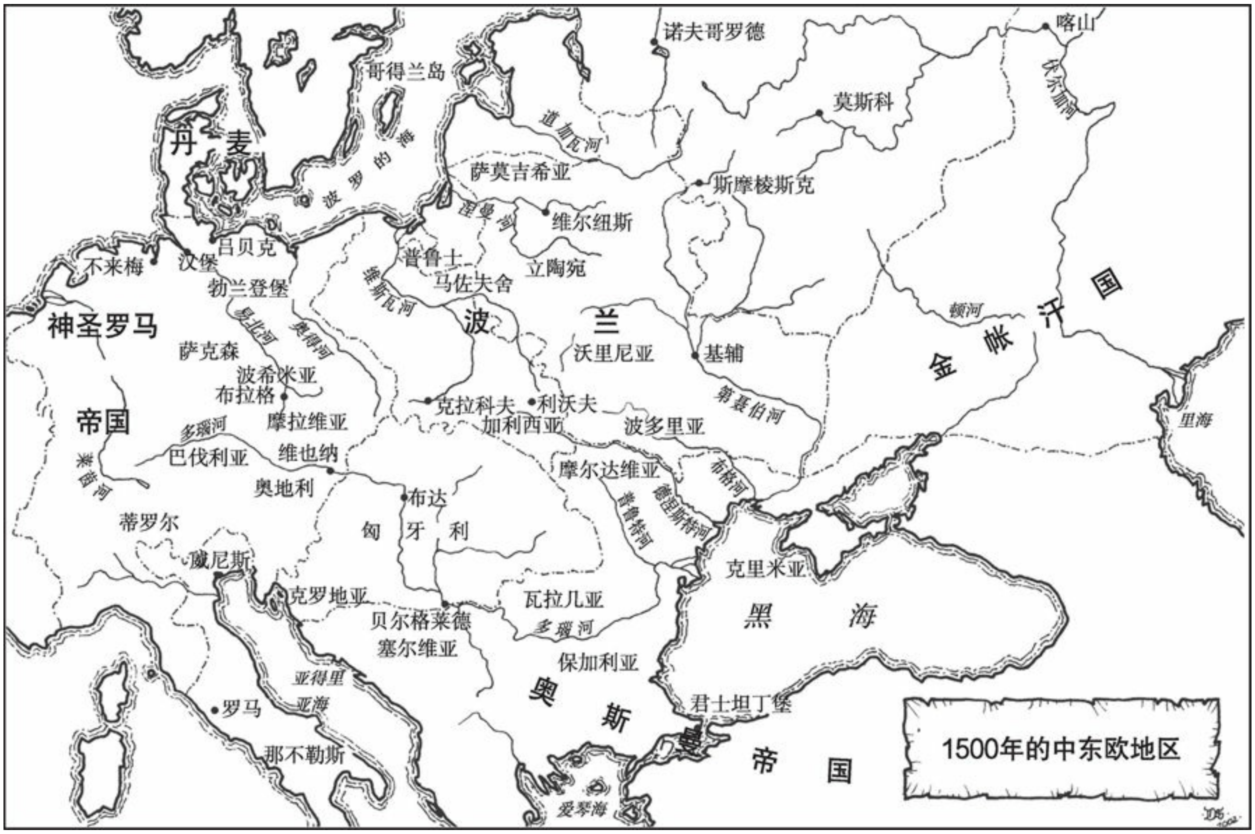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波兰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波兰拥有了自己的出海口。波兰王室早在13世纪就宣示主权的那些土地，包括库尔姆、波美雷利亚、但泽，现在终于到手了。波兰王室还将影响力拓展到更遥远的地方：斯武普斯克和波美拉尼亚。在很短时间内，卡西米日四世依托城市和士绅为自己的王权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这种政策帮助他在普鲁士取得了军事和政治胜利，但他没有把这种根基拓展到整个波兰的城市和士绅阶层，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错误。他加入十三年战争的决定违背了波兰权贵与教会的意志（1454年，奥莱希尼茨基建议他接受大团长当时愿意做出的让步，因为奥莱希尼茨基预见到势力仍相当可观的大团长会顽强地抵抗波兰人）。在普鲁士获得和平之后，国王将注意力转向王朝政治。为了这个目标，他牺牲了内政改革的机遇和相对于贵族和教会的短期优势，而正是贵族和教会试图限制王权。

在随后五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团长们成了波兰国王的贫穷附庸。严格来说，他们的主子不只波兰国王一人，但他们实际上别无他策。大团长们若是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各城市和封臣就会迅速发出怨言，重要的军官就会抵制大团长，而大团长的主子之一会训斥他。但随着15世纪即将结束，条顿骑士们发现，一些德意志诸侯似乎找到了新的办法来增进自己对臣民的权威，培养和鼓励工商业，然后对其征税。骑士们开始讨论，该用什么办法让他们的骑士团在普鲁士也能做同样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世俗改革家恰恰也擅长迅速利用人民对教会改革的要求，而这些改革措施最终引发了宗教改革。

解体和重生

宗教改革的风暴相继席卷普鲁士、立陶宛和波兰。波兰的罗马天主教会四面受敌：德意志人要求改革，立陶宛人怨恨来自波兰的支配，东仪天主教会[18]渴望更多自治权，东正教仇恨天主教会，波兰天主教徒害怕上述的这些外族。波兰的天主教会几乎束手无策，难以应对。另外，教廷认为中东欧是不重要的穷乡僻壤，在这个教会需要集中力量保卫教宗在罗马的自由（免受当地豪门贵族控制），阻止西班牙人或法兰西人主宰意大利，以及协助神圣罗马皇帝在德意志镇压路德宗信徒从而重新确立教会权威的时期，教廷可以对中东欧置之不理。教廷如何帮助年轻的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镇压他的各路敌人（此时包括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并避免让皇帝变得太强大以至于威胁教宗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始终没有得到让人满意的解答。同理，教廷也找不到什么办法来帮助波兰国王，直到反宗教改革时期耶稣会士来到克拉科夫和维尔纽斯。

但我们不能把故事讲得太快。宗教改革不是一夜之间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的，当时的人们在它刚开始的时候也预料不到它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中东欧和其他地方一样，宗教改革的先驱是在贵族和知识分子当中传播的文艺复兴文化。新拉丁文[19]标志着采纳文艺复兴思想和立场，而新拉丁文的中心始终是各级文书官衙，首先是国王们的文书官衙，然后是主教们的，而最高的榜样是教廷的文书官衙。在德意志，诸侯、骄傲的城市和雄心勃勃的高级教士竞相赞助新的艺术、文学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礼仪。这个时代的欧洲人或许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的欧洲人都更欣赏光鲜的外表，所以创办和赞助大学在这个时代是表明自己具有智识上更优越性的明确证据。



1500年的中东欧地区

萨克森率先把兼具丰富想象力与缜密逻辑性的文艺复兴思想应用于政府管理。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学者鄙视出身高贵的官员及其效率低下的办事方法，向愿意倾听的君主提出加强中央集权、征收更多赋税和鼓励商贸的措施。萨克森统治者非常成功，以至于条顿骑士团选举身体羸弱的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20]为大团长，这正是因为他们希望他能给普鲁士的经济和政府管理带来同样的奇效。

弗里德里希在任上尽力而为，这虽不足以逆转骑士团的衰败进程，但他为后来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比如几年后萨克森的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授马丁·路德提出的那种改革。但总体而言，弗里德里希大团长的作用是间接的：他鼓励主教们向大教堂管理机关引进人文主义学者，并尽可能地赋予他们重组行政机构的自由，从而改善各教区的经济和道德生活；他还聘请人文主义学者参照萨克森的蓝本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

而建设更得力、更公正的政府。

弗里德里希聘请的人文主义学者首先包括他曾经的教师、莱比锡大学教授保罗·瓦特，然后是律师迪特里希·冯·韦特恩。他们设立了新的官职，把年迈的骑士从重要的行政岗位上撤下；巩固了各修道院的财政，剥夺其部分收入给大团长调用；废除了某些社会阶层对立法的否决权；重新订立宫廷礼仪和规程；还在残酷无情的官僚斗争中将他们的保守派敌人从普鲁士驱逐出去。在德意志团长去世后，弗里德里希的兄弟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设计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废除德意志团长的职位，从而消灭继任德意志团长的人阻挠大团长的可能性。大家都可以猜到，这种计划在神圣罗马帝国很难得到支持。新任德意志团长组织了很多人反对这一对传统习俗的变更，而弗里德里希在1504年和1507年访问德意志时只是澄清而非解决了这个问题。

骑士团的外交政策同样火药味十足。战争阴云不散，各方磨刀霍霍，互相指责对方煽动战争。条顿骑士团并不刻意隐瞒自己的雄心壮志：他们希望摆脱对波兰王室的附庸关系，收复失地，甚至再次成为强国。而波兰国王及其谋臣则开始商讨彻底消灭可恶的条顿骑士团的办法，或者至少煞掉它那臭名昭著的傲气。但国王很清楚，格奥尔格公爵的军队能轻松穿过西里西亚进入波兰腹地，以保护自己的兄弟。（很久以后，萨克森选帝侯“强壮的奥古斯特”会证明萨克森和波兰之间能有多么近。）另外，波兰北部发生的战争一定会引起邻国的注意。但真正阻止骑士团和波兰王国间的冲突上升到超过焚烧村庄和偷窃牛群这种程度的，是战争的高昂开销。国王和大团长都没钱组建新的军队。国王无法说服议会批准征收战争税，因为议会代表不希望看到王权增长，否则国王便有可能去效仿条顿骑士团非常仰慕的那些德意志诸侯。

弗里德里希大团长于1510年末去世，这让骑士团又一次有机会在“全国”层面考虑新的治国想法。有人提议选举波兰国王为大团长，这

个主意的始作俑者主要是波兰贵族和教士。他们欢迎君主保持独身，因为那样就能保证波兰的选王制延续下去。国王愿意让他的后代考虑这种路线，但条件是教宗给他豁免权，允许他自己结婚！但条顿骑士团早就选好了自己的候选人：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安斯巴赫（1490～1568）。他出身于德意志最重要的家族之一，但他的家族不够富裕，无法为全部八个儿子提供合适的生计。骑士团的利益和霍亨索伦家族的利益正好吻合。

尽管这个年轻人与波兰国王、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都是亲戚，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会也有极好的关系，但要让骑士团的人选得到普遍接受并非易事。骑士团在德意志和立窝尼亚的修道院都赞同让他当大团长（没有正式举行选举），于是阿尔布雷希特于1511年加入骑士团，并于同一天就任大团长。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当即表示在道义和政治上支持他，敦促他参加帝国议会和帝国的其他重要会议，并更多关注皇帝的意愿。1512年初，阿尔布雷希特在纽伦堡与皇帝会面，他向后者解释说自己在向皇帝宣誓效忠之前必须先摆脱对波兰国王的附庸关系。皇帝不准他向波兰国王宣誓效忠，于是阿尔布雷希特立刻采取了和自己的前任一样的内政外交政策：想尽一切办法推翻两次托伦条约。但他寻求这个目标的手段与他的前任迥然不同。

阿尔布雷希特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对禁欲生活没有兴趣。骑士团成员匆忙向他解释，普通骑士和神父必须认真遵守禁欲的规矩，但大团长是出身大贵族的高级官员，不必拘泥于这些细枝末节。他们说，他只需要牺牲婚姻的可能性即可，因为他的誓言只要求独身而不是贞洁。如果教宗们可以公开与女人一起生活，枢机主教和大主教们也可以公开炫耀自己的情妇，那么年仅二十一岁、受过世俗教养的德意志大诸侯凭什么要理睬卑微修士的职责呢？

阿尔布雷希特比他的很多同时代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未来属于这

样的君主：他们能控制自己的领土，压制性喜争斗的贵族和不肯配合的议会，鼓励贸易和工业，让臣民越来越富裕并向他们征税，然后雇佣专业的军队，执行理性但大胆的外交政策，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简而言之，他是最早的专制君主之一，而且比其他很多君主都更有能力利用这一机遇，因为条顿骑士团的国家传统就是纪律和秩序（至少他们尊崇纪律和秩序，尽管这些理想在14世纪的光荣时代之后就没落了）。尽管最近几位大团长减少了骑士团内部的纷争，并重新确立了对军官们的控制，但他们仍然缺少足够的资源以建设一个专制国家，顶多只能上演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阅兵式和公开典礼（这些典礼既有宗教色彩也有骑士精神）。毫无疑问，军官和骑士、主教及其教士、修道院院长及其修士和僧侣、市民及其行会，以及骑士与其部队，能创造一流的隆重排场，但有排场不一定代表有实权。阿尔布雷希特和很多同时代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渐渐学会了辨识这两者的区别。

年轻的阿尔布雷希特的谋划需要莫大的耐心。他首先要执行必要的改革，增强自己的权力，然后再等待机会以行使这一权力。起初他依赖波美萨尼亚的“铁主教”希奥布，他是当时最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之一，他对传统和中庸之道的尊重引起了波兰君主及其高级教士的注意。但在1515年，阿尔布雷希特开始受到迪特里希·冯·舍恩贝格的影响。他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年轻江湖术士，专攻数学、天文学和占星术。年轻的大团长始终关注最新的文化潮流，他开始热情洋溢地倾听舍恩贝格的占卜。他还和舍恩贝格一起在夜间搞一些不道德的厮混。阿尔布雷希特终于摆脱了神父和年长的虔诚骑士的陪伴，过上了放荡不羁的生活，至少是在柯尼斯堡的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舍恩贝格还让他相信，现在是时候插手外交事务了；既然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21]（1506～1548年在位）即将与莫斯科大公国的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交战，阿尔布雷希特可以对普鲁士位于立陶宛后方的战略位置加以利用。舍恩贝格去了一趟莫斯科，带回了与瓦西里三世的条约，后者承诺给骑士团一笔金钱，条件是骑士团出动足够强大的军队牵制波兰军队，甚至打败和重创

他们。随后，舍恩贝格运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诱骗普鲁士议会，煽动了代表们的好战情绪。他生动而详细地描绘了波兰的计划（大部分是他捏造的，少部分是夸大其词，但包含一定的真实信息，所以能让人信服），说波兰政府要求骑士团的一半骑士必须是波兰人，还要向骑士团施加波兰式的暴政，其结果必然是令贫困和农奴制扩展到相对繁荣的几个普鲁士省份。普鲁士的市民和骑士并不傻，但他们知道波兰贵族和高级教士对波兰造成了多大损害，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最粗陋的宣传和种族偏见。

这些活动自然瞒不过齐格蒙特一世，阿尔布雷希特也不想瞒着他。只有在大家普遍承认他是可以改变各大势力之间平衡的人物时，阿尔布雷希特才会提出要求，收复骑士团在110年前享有的土地和权威。这当然需要一种崭新的统治者，而不是过去的那些虔诚而忠诚的大团长，他们只服从神圣罗马皇帝的命令，结果却将骑士团带入一场又一场灾难。阿尔布雷希特或许并不比他的前任更聪明，甚至可能也不如他们更狡猾，且肯定不比他们更勤奋（至少他年轻的时候并不勤政），但他拥有一种气场，他明白自己凌驾于传统和通常的规矩之上。骑士们敬畏他的高贵出身和教养。他有一种精巧的权威气质，相信自己有权做出判断并号令他人。他有一种姿态和腔调，能让地位较低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他的优越。没有一个前任大团长会考虑组织比武大会，更不会想要参加比武，而阿尔布雷希特于1518年在柯尼斯堡组织了一次比武大会，不仅参加骑士长枪比武，还参加了团队混战比武。

新任大团长的冒险政策引起了外交界高层的重视，但他的计划不切实际。只要处于和平时期，阿尔布雷希特就可以摆出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姿态，用各种计策与计划让德意志团长惊叹不已；但在1519年波兰-立陶宛和莫斯科大公国之间的战争爆发后，他得知俄国人承诺的资助不能到位，所以他没钱支付军饷，而帝国也不愿出手帮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更希望波兰支持他自己的冒险，因此不愿救援大团长。由于阿尔布雷

希特的政治误判，他越是努力逃避自己的问题，他的处境就越岌岌可危。柯尼斯堡的防御工事的确在最后关头迫使波兰军队退却，战争初期丢失的大部分土地也收复了，但他的全部希望在于德意志团长招募并带到边境的一支大军。1800骑兵和8000步兵穿过勃兰登堡，前往但泽。雇佣兵在那里等候大团长和他的军饷，但他们的希望还是落空了。阿尔布雷希特无法赶到，因为波兰军队封锁了维斯瓦河上的渡口，但泽的战舰在海上巡逻，而且他也无力支付军饷。在回家途中，这些雇佣兵肯定逢人就说大团长是个不靠谱的雇主。

如果齐格蒙特一世没有因在南方忙碌而抽身不得，阿尔布雷希特现在就该穷途末路了。但波兰国王只能抽调很少的兵力对付普鲁士，这些兵力不足以长时间遏制骑士团的军队。大团长的军队蹂躏王室普鲁士，收复诺伊马克，并担心波兰军队的出现。当波兰人终于赶来的时候，他们还带来了鞑靼人、波希米亚雇佣兵和优秀的炮兵，但他们兵力不足，无法攻克阿尔布雷希特的要塞。不过大团长知道如果波兰人派出强大的军队北上自己就完了，而且他也看到在自己新征服的土地上，臣民早已陷于赤贫，无法为他的军队提供粮草也无力纳税，于是主动在1520年末签订停战协定。舍恩贝格前往德意志为查理五世作战，并死在帕维亚战役（1525年）中。舍恩贝格没办法像迷惑阿尔布雷希特那样迷倒皇帝：查理五世要处理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他需要对付土耳其、法兰西和新教徒，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为遥远而微不足道的普鲁士与波兰君主起冲突。

罗马天主教在东普鲁士的消亡一点都不让人意外。阿尔布雷希特于1522年访问纽伦堡，向神圣罗马帝国诸侯请求金钱支援，却白跑了一趟，但他显然在那里受到了路德教义的很大影响。1523年初，马丁·路德专门向条顿骑士团发表声明，“请求条顿骑士团的领主们停止虚假的守贞”。新教对骑士团成员施加影响并不困难。条顿骑士们（现在数量比以前少了）长大成人时目睹的那个德意志经常因为教会的腐败而发生

动荡。他们理解路德的抗议所涉及的问题，对教廷的道德败坏也感到不满。而且，他们也懂得腐败是怎么回事。教宗克雷芒七世任命一位主教到波美雷利亚任职，后者却不亲自到任；教宗还提名自己的亲戚就任这一圣职。这些都让骑士团成员深切感受到教廷的腐败。阿尔布雷希特或许认识到了舆论风向，也肯定关心教会腐败的问题，于是采取措施，让骑士团成员为宗教改革做准备。1523年圣诞节期间，当大团长还在德意志的时候，他允许路德宗的传道者到他位于柯尼斯堡的宫廷布道。

这不是虚伪之举。这个年轻的统治者曾经行事莽撞，但他在残酷的经历之后懂得了虔诚。他年轻时的罪孽不仅给他自己，还给他的无辜臣民带来了灾难。阿尔布雷希特显然决定将余生用于为自己早先的愚蠢和鲁莽赎罪。但和更早年代的悔罪者不同，他从来没有考虑过遁入修道院进行祈祷和忏悔。这位文艺复兴时代的统治者斟酌了自己可以走的路线，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纠正骑士团地位的根本缺陷，正是这种缺陷让普鲁士遭受了一个世纪的外敌入侵和内乱，其症结在于骑士团的世俗职责和宗教职责被笨拙地混合在一起，让它的角色比一个宗教修会更大，却不足以发挥一个主权国家的功能。

大团长悄悄地试探，假如他像北德的很多主教一样追随路德的教导、并将他的普鲁士土地世俗化，他的邻国君主会做何反应。他在德意志期间，新教牧师已经在普鲁士执行了新教改革的基本工作：他们在礼拜中使用德语，开始唱赞美诗，并废除了朝圣和圣徒崇拜。这是非常务实的改革措施，迎合了公众对当前教会状况的普遍不满，但没有涉及方法论或神学。针对那些领域的改革是后来的事情。随着普鲁士的僧侣、修女和神父放弃独身的誓言，难免有传闻说大团长自己也打算放弃誓言，结婚成家，并成为一个世俗国家的统治者，关于大团长已放弃教士生活并与人结婚的丑闻构成了这些传言的核心。

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无人为此感到愤怒。教宗和皇帝当然警告他不

要这么做，他的勃兰登堡亲戚对此也不赞同，但普鲁士的骑士、各城市和贵族决定性地支持他改信新教、结婚并将骑士团国世俗化，波兰国王也表示同意。骑士团国家的世俗化是一石二鸟，解决了两个问题：没收剩余的教会财产能让大团长偿清债务；而东普鲁士可以被纳入波兰王国，与波兰国王建立和平的、互不威胁的关系。1525年4月10日，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在克拉科夫向波兰国王宣誓效忠。19世纪波兰民族主义画家扬·马泰伊科的油画让这个场景永垂不朽。这也是最伟大的波兰油画之一。

西普鲁士当初被吸纳进波兰国家的时候就保存了很强的独立性，而如今东普鲁士融入波兰国家的程度更低。公爵保有自己的军队、货币和议会，并拥有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东普鲁士的行政体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之前的法律仍然有效。一些头衔得到修改。路德宗改革对东普鲁士的影响最深远。

1526年，阿尔布雷希特与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1523～1533年在位）的长女多罗特娅结婚。丹麦人惯于为波罗的海沿岸的各个德意志邦国的君主提供配偶，东普鲁士是丹麦人在该地区联姻政策的最后一环，这让阿尔布雷希特有了一位强大的保护者和一些身居高位的姻亲。弗雷德里克一世也是当时最重要的路德宗统治者。

德意志的天主教诸邦对此发出愤怒的抗议和谴责，新教邦国则高声喝彩，但普鲁士国内却很平静。少数年纪太大或者不愿意承担世俗骑士职责的条顿骑士以及那些坚守天主教信仰的骑士去了梅尔根泰姆[22]，投奔德意志团长，后者将他们分配到自己名下的各处修道院和医院。留在普鲁士的骑士得到封地或官职。其中一些人结婚成家，成为后来勃兰登堡-普鲁士著名的容克阶层的一部分。但总的来讲，贵族阶层的构成变化很小。一个大的变化发生在贵族对农奴的权威之上。东普鲁士成为世俗国家之后，贵族对农奴的权力增强了很多。但贵族和市民没有获得

他们期待从《克拉科夫条约》中得到的那种政治影响力。1525年的农民大起义因自由农民听到宣称新领主要把他们变成农奴的谣言而起，虽然阿尔布雷希特轻松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此事严重撼动了贵族和士绅的自信，于是他们在此事和其他所有事务中都仰仗公爵的领导。

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很快放弃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的努力，于是获得了皇帝的原谅。而且在将来，如果波兰国王对普鲁士公国提出过分要求，公爵可以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保护。但此时查理五世不是远在西班牙，就是忙于对付路德和土耳其人，所以他不可能有时间仔细斟酌普鲁士这种小地方的小事。但在1526年，皇帝看到因为自己没有采取行动导致东普鲁士改信了新教，于是向立窝尼亚团长及其领地授予帝国诸侯的地位。1530年，查理五世任命德意志团长为新的大团长；从此条顿骑士团要为哈布斯堡皇朝的政治蓝图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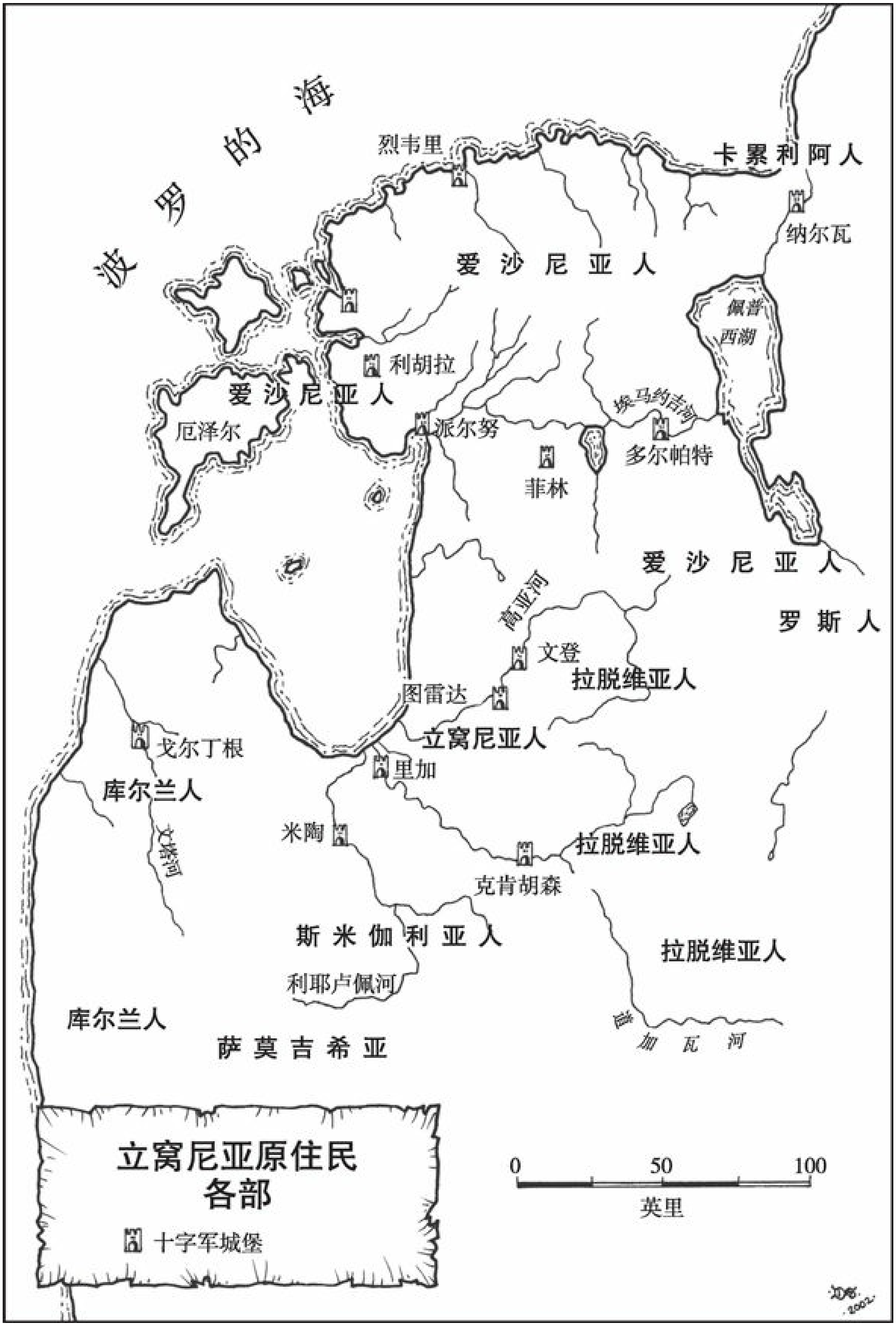
除了新教思想可以更轻松地在各城镇传播以外，王室普鲁士没有受到东普鲁士政府世俗化的影响。王室普鲁士的人民已经自认为波兰王国的一部分，只不过有自治权并且说德语，他们有权在宗教方面独立地做决定。市民欢迎和平，也欢迎路德改革的传播。这样一来，不仅普鲁士在宗教和文化上的统一成为可能，而且商人和士绅阶层也有机会确认自己相对于宗教领袖的权威，后者是很多城市和大部分乡村的名义上的统治者。

很多原本可能反对路德宗改革的人因为农民起义这一更可怕的前景而陷入沉默。1525年，普鲁士多个地方效仿德意志的农民战争爆发了农民起义，这让很多人清醒地认识到，扫清地方教会和修道院的长期弊端还不是最糟糕的变局。1526年的但泽起义进一步证明骚乱已经蔓延到城镇的下层阶级。在这种时候，上层阶级没有必要为了宗教而争吵。相安无事是唯一务实的政策。

阿尔布雷希特并不认为自己是教会的叛徒或是教会团结的扰乱者。

很多年后他还继续与罗马通信，并尊崇教宗为教会领袖。普鲁士教会与罗马正式分道扬镳是后来的事情，也是诸多不可避免的步骤之一。我们很容易夸大普鲁士之变革的性质；在1525年，新教的确立是一种受很多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赞同并欢迎的改革，因为他们觉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普鲁士称臣不到一年以后，齐格蒙特一世就可以为自己的高瞻远瞩而庆幸了。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1516～1526年在位）在摩哈赤战役中阵亡，土耳其人占领了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区。随着这位年轻的国王战死，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继承了匈牙利的剩余部分和拉约什二世对其他几个王国的主张权。斐迪南后来成为皇帝。波兰人现在三面都有强敌，东面是莫斯科大公国，南面是土耳其人，西面是哈布斯堡家族，但齐格蒙特一世至少不用为北方担忧，这已经算是一种幸运。

与此同时，皇帝在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也可以调用条顿骑士团在德意志的大量资源。他不会为了北方的事务干扰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简而言之，普鲁士土地的世俗化似乎对所有人都有利。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谁要是提议在立窝尼亚进行效仿普鲁士的世俗化改革，就必然陷入激烈的争吵。[23]


波罗的海
烈韦里
卡累利阿人
纳尔瓦
爱沙尼亚人
佩普西湖
利胡拉
爱沙尼亚人
厄泽尔
派尔努
换马约吉河
多尔帕特
菲林
爱沙尼亚人
高亚河
罗斯人
文登
拉脱维亚人
图雷达
立窝尼亚人
戈尔丁根
里加
库尔兰人
文塔河
米陶
拉脱维亚人
克肯胡森
斯米伽利亚人
拉脱维亚人
利耶卢佩河
道加瓦河
库尔兰人
萨莫吉希亚
立窝尼亚原住民各部
十字军城堡
0
50
100
英里

立窝尼亚原住民各部

---

[1] 斯特拉斯堡是德语名字，即今天波兰的布罗德尼察。

[2] 1409年3月，来自罗马和阿维尼翁双方的主教在比萨召开大公会议，旨在弥合1378年以来天主教会的大分裂。会议最终未能实现天主教会的再统一，但选举出了又一位对立教宗，是为亚历山大五世，他在1410年去世后为若望二十三世（1410～1415年在位）所继承。因此当条顿骑士团从1410年坦能堡之战的惨败中恢复元气时，天主教会内部存在着罗马、阿维尼翁和比萨三个互相对立的系统，分别拥护一名教宗。

[3] 库尔姆的一个类似兄弟会的骑士团。“蜥蜴”指的是龙。（作者注）

[4] 蜥蜴同盟于1397年在库尔姆建立，成员为普鲁士贵族和骑士，他们表面上的目的是维持治安，实际上希望将库尔姆从条顿骑士团统治下转移到波兰。1410年的格伦瓦德战役中，蜥蜴同盟领导人尼古拉斯·冯·雷恩斯（1360？～1411）是库尔姆部队的旗手，后来有人指责他过早地放下旗帜，让很多士兵误以为要撤退，导致骑士团战败。不过这种说法没有证据。还有人说波兰军队围攻玛利亚堡的时候，蜥蜴同盟传消息给玛利亚堡守军劝降。雷恩斯被骑士团处死，蜥蜴同盟其他成员逃往波兰。蜥蜴同盟被神圣罗马皇帝西吉斯蒙德和教宗格里高利十二世宣布为非法组织。

[5] 1440年，普鲁士的53名贵族、教士和19座城市（包括但泽、柯尼斯堡、埃尔宾、托伦等）在马林韦尔德集会，反对条顿骑士团的专横统治。这些人组成了普鲁士联盟。它建立在1397年由库尔姆贵族组建的蜥蜴同盟的基础上。1454年，普鲁士联盟领导人约翰·冯·拜森正式请求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四世·雅盖沃将普鲁士接纳为波兰的一部分，这标志着条顿骑士团与波兰的“十三年战争”开始，普鲁士联盟在战争中支持波兰。

[6] 1397至1523年（有短暂中断），北欧的丹麦、瑞典（包括今天芬兰的大部分地区）和挪威（包括冰岛、格陵兰等）三个王国通过“卡尔马联合”形成了共主邦联。三国在法律上仍然是独立主权国家，但遵奉同一位君主。三国之所以联合，主要是为了对抗德意志人的汉萨同盟向北欧的扩张，但最后因为国王希望三国联合而贵族希望独立而导致“卡尔马联合”分崩离析。

[7] 我们可以把胡斯派理解为早期的新教徒，因为他们强调两种圣餐（面包和酒都给信众）以及用本地语言唱赞美诗和布道。但他们也是捷克民族主义者，怨恨德意志人对波希米亚的主宰。条顿骑士团为西吉斯蒙德提供了很多骑士，帮助他镇压胡斯派，但这些骑士几乎总是被胡斯派打得落花流水。（作者注）

[8] 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是荷兰历史学家和现代文化史的奠基者之一。二战期间荷兰被德国占领，他因为反纳粹言论而一度入狱。他的代表作有《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伊拉斯谟传》等。

[9] 奥地利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三世，绰号“扎辫子的”（1349～1395），属于哈布斯堡家族，与他的三个兄弟（包括著名的“奠基者”鲁道夫四世）分享奥地利的统治权。他们兄弟四人一起签署了创办维也纳大学的文书。1377年，阿尔布雷希特三世去普鲁士参加十字军东征。他学识渊博，是数学家和星相学家，在统治期间大力支持艺术及科学，扩建和美化维也纳城。他建立了一个“辫子骑士团”，但在他死后就解散了。他曾支持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反对无能的德意志国王文策尔。

[10] 尼古劳斯·冯·库斯（1401～1464）是德意志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和天文学家。他是最早推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德意志学者之一，著有《有知识的无知》等。

[11] 巴塞尔会议上，教宗不肯把教会变成更民主的机构，教士们对此很不高兴。教宗命令他们解散会议并回家，他们拒绝。他们宣布废黜教宗，并选举了一位对立教宗。多年之后，教会才重新团结起来。（作者注）

[12] 卡佩斯特拉诺的圣约翰（1386～1456）是来自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修士和神父，主要在中欧和北欧布道，长期担任教廷的外交官。1456年，他七十岁的时候，与匈牙利军事家匈雅提·亚诺什一道，领导一支十字军成功救援了遭到奥斯曼军队围攻的贝尔格莱德。约翰甚至亲自率领士兵上战场，但在此役胜利后死于瘟疫。他后来被封圣，是法学家和随军教士的主保圣人。

[13] 他是雅盖沃的次子，接替战死的兄长瓦迪斯瓦夫三世成为波兰国王。

[14] 但茨克是条顿骑士团城堡里常见的一种厕所设施，一般是一座塔楼，它坐落于小河或溪水之上。这个词可能源自“但泽”这个地名。

[15] 博恩霍尔姆岛在波罗的海上，今天属于丹麦（历史上曾属于德意志的吕贝克和瑞典），北望瑞典，南望波兰，是丹麦领土地理上的极东点。

[16] 匈雅提·马加什一世（1443～1490），绰号“乌鸦”，为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国王（1458～1490年在位），1469年当选为波希米亚国王。他是著名的匈牙利摄政王和军事家匈雅提·亚诺什的儿子。匈雅提·亚诺什死后，匈牙利爆发了贵族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国王拉斯洛五世的叛乱，匈雅提·马加什被推举为王。他改革司法，削弱贵族，提拔有才干的平民，赞助科学和艺术。他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作战，一度占领奥地利的部分地区；他抵抗奥斯曼帝国，取得了一些辉煌胜利；他讨伐捷克的胡斯派，占领了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等地。他是匈牙利历史上颇受爱戴的强大君主。

[17] 匈雅提·亚诺什（约1406～1456），绰号“白骑士”，是匈牙利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他作为特兰西瓦尼亚总督长期与奥斯曼帝国作战，保卫匈牙利的边疆。国王拉斯洛五世幼年时期，匈雅提·亚诺什担任他的摄政王。他在1456年成功援救贝尔格莱德之后死于瘟疫。他的崇高声望是他的儿子匈雅提·马加什能够被推举为王的一个重要原因。

[18] 东仪天主教会是起源于中东、埃及、东欧以及印度的二十三个服从罗马教宗的教会，分别保有自身的悠久传统。与西方天主教不同，但与东正教相似的是，东仪天主教会允许有婚姻伴侣的男性担任神父。但如果离婚或是成了鳏夫，神父和执事不能再婚，除非他们不再当神父和执事。

[19] 新拉丁文也称现代拉丁文，是约14世纪末以来在创作、学术和科学著作中使用的拉丁文。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作家因不满中古拉丁文脱离古典拉丁语的发展，以古典拉丁文为范式发展出较规范和纯洁的新拉丁文。现代动物学、植物学和其他科学的术语大量使用新拉丁文。

[20] 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1473～1510）是萨克森公爵“勇敢的”阿尔布雷希特三世与波希米亚国王杰布拉德的伊日之女的儿子。他的哥哥娶了波兰国王扬·阿尔布雷赫特的女儿。所以条顿骑士团选举他为大团长，部分原因是为了借助姻亲关系缓和骑士团与波兰国王的关系。

[21] 他是卡齐米日四世的儿子，继其兄约翰一世（1492～1501年在位）之后成为波兰国王。

[22] 梅尔根泰姆在今天德国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1526～1809年为条顿骑士团总部所在地。

[23] 普鲁士后来的演变：
1466年的《第二次托伦和约》之后，骑士团国家分裂为两个部分，西半部分（包括波美雷利亚、埃尔宾、库尔姆、瓦尔米亚、玛利亚堡等）归属波兰王室，称为“王室普鲁士”或“西普鲁士”或“波属普鲁士”，享有很高的自治权；东半部分仍然属于骑士团，成为波兰国王的附庸。
1525年，骑士团国家在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安斯巴赫领导下完成世俗化，建立普鲁士公国（常称为东普鲁士，以柯尼斯堡为首府），为波兰国王的附庸。1618年起，普鲁士公爵因为没有子嗣，让霍亨索伦家族的另外一支，即勃兰登堡选帝侯继承了普鲁士公国。于是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此时普鲁士公国仍为波兰国王的附庸。1657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与波兰国王达成协议，让普鲁士公国脱离波兰王国。此后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发展成普鲁士王国，后来成为统一的德国的核心。而普鲁士王国的两个主要部分（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公国）之间隔着波兰土地（王室普鲁士等），这对波兰来说是个灾难。
王室普鲁士，即波属普鲁士或西普鲁士，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大部分

归属普鲁士王国，于是东西普鲁士被连成一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普鲁士的中央部分成为波兰共和国的波美雷利亚省，也叫波兰走廊；但泽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市。东普鲁士仍然属于德国，但与德国本土之间隔着波兰走廊。这也是一个灾难。1939年，希特勒与斯大林瓜分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普鲁士全部归属波兰。东普鲁士则分别属于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波兰和立陶宛。
另外，历史上普鲁士王国和德国有过“普鲁士省”“西普鲁士省”等行政区划，与上述的概念（历史地区）不完全重合。

十二 骑士团在立窝尼亚的末日

十三年战争期间，立窝尼亚和普鲁士渐行渐远。埃里希斯豪森囊中羞涩，于是向北方求助，但这反而刺激了立窝尼亚骑士团，令他们想尽办法限制大团长对他们和立窝尼亚领地的权威。到1473年，条顿骑士团包括三个自治的分支：普鲁士、德意志和立窝尼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共同的传统和偶尔一致的利益，这意味着当立窝尼亚陷入战争的时候，立窝尼亚骑士团孤立无援。

沃尔特·冯·普莱腾贝格（1494～1535年任立窝尼亚团长）在16世纪初曾多次战胜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伊凡大帝，1462～1505年在位），为立窝尼亚带来五十年的和平——这里说的是对外和平。立窝尼亚内部的问题很多，但沃尔特能够把国内问题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他于1535年以高寿去世之后，他的影响力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对他的继任者来说不幸的是，历史大潮不利于他们。首先，立窝尼亚骑士团再也不能独自统治这片土地，他们必须与立窝尼亚联盟分享权力。这个联盟有权控制铸币、颁布商业法律和刑法、商讨国家大事和统一舆论，但没有行政机构来制定有效的外交政策，也不能统一指挥立窝尼亚的军事力量。其次，在新教势力极大的波罗的海地区，立窝尼亚骑士团仍然是一个很小的罗马天主教组织。此时不仅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和普鲁士公国信奉路德宗，立窝尼亚各城市的绝大部分市民和乡村的部分贵族也是新教徒。新教甚至在立陶宛也很有影响力，波兰国王也乐于看到新教在与他竞争的国家发展壮大。他的判断相当正确：敢于在宗教问题上独立思考的公民，也会给他们的世俗统治者制造麻烦。最后，骑士团招募新人的几个传统地区，尤其是下萨克森和荷尔斯泰因，现在已成为新教

地区。只有威斯特法伦还信罗马天主教，能提供一些骑士到波罗的海服务。而在立窝尼亚本地根本招募不到很多骑士。骑士团可以招募雇佣兵来平衡新骑士匮乏的问题，但要给雇佣兵支付军饷就需要金钱，而挣钱的最好办法是增加粮食出口。那么问题就是，如何增加粮食出口？解决办法就是把当地居民变成农奴，强迫他们在骑士团的庄园劳作。[1]

有一种常见的错误观点是，十字军在13世纪征服立窝尼亚之后立即将原住民居民变成农奴。实际上，一直到15世纪，绝大部分原住民都是自由的纳税人。而在15世纪，好几种事态的发展开启了将他们变成农奴的过程。这种社会变革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原住民在战争中的作用不断减小。13世纪和14世纪，敌军经常深入立窝尼亚，所以立窝尼亚团长不得不依赖当地民兵来协助驻防城堡并参加正面对垒。等到立窝尼亚骑士团建立了有效的防御体系之后，民兵的功能就变成了修建要塞和搬运给养。第二重要的因素是货币经济的发展。原住民一直没有多少钱，他们的生活水平极低，非常凄惨。即便如此，他们缴纳的粮食都会被换算成现金，而一旦收成不好，他们就得借钱来纳粮。在陷入负债状态之后，他们先前受保护的法律地位也渐渐丧失了。另外，战俘经常被安置在庄园内，成为农奴。随着自由农民的数量减少，骑士团没办法把他们吸引到边疆地区定居，因为罗斯或立陶宛军队经常到那里掳掠人口，而庄园主倾向于用农奴来替代被掳走的自由农民。可能还有一些自由农民的儿子因为没有分到土地，不得不按照农奴的条件打工，同时保留自己的自由人地位，这样的人要么渐渐与农奴通婚，要么“滑落”到农奴的层次。

到16世纪50年代初，立窝尼亚骑士团的成员已经在公开讨论他们可以选择的路线。他们说得最多的是皈依新教，由军官和骑士们瓜分骑士团的土地，然后开展经济和教育改革，从而获得足够的收入用于国防。这种提议让坚定的天主教徒骑士火冒三丈，他们发出严正警告，说这样会毁掉他们与神圣罗马帝国和选帝侯们的关系。最终，里加教士决定让

一位新教徒成为年迈的大主教的助手和继承人，这导致了一场短暂而几乎没有流血的内战。罗马天主教派系获胜，不久之后威廉·冯·菲斯滕贝格成为立窝尼亚骑士团的团长。大多数观察者对此的理解是罗马天主教获胜了，但因为所有邻国都清楚地看到立窝尼亚联盟在军事上缺乏准备，所以这种胜利没什么意义。[2]

对西方和南方的统治者来说，立窝尼亚的问题无足轻重。丹麦和瑞典正忙于厮杀，不会向东方调用军事资源；波兰国王永远没办法说服他的贵族和教士批准军费以向北扩张。波兰贵族和教士毫无根据地相信国王是潜在的暴君，所以希望把国王保持在尽可能虚弱的状态，只能满足基本的国防需求。

然而，东方的新统治者并不这么认为。俄国的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此时还没有获得“伊凡雷帝”的绰号，但他已经享有冷酷无情、贪图土地的名声。他本是莫斯科大公，在打败了他南面和东面的鞑靼可汗之后自立为沙皇。他将自己的帝国扩张到了黑海之滨，此后很多鞑靼人不情愿地在他的军队里服役，而那些处于他控制之外的鞑靼人（主要是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梦想打败他，并复苏早已衰败的金帐汗国。伊凡四世还从波兰那里拉拢到一些立陶宛领主，并尽一切手段购置新式军事装备，网罗技术人才。后来的历史学家说他想要征服波罗的海沿海地带，从而开通与西方的贸易。但也许更现实的解释是，他就是爱好攫取邻国的土地，正如他喜欢用各种奇思妙想的手段羞辱自己的国内敌人然后将其谋杀一样。

伊凡四世用恫吓与和平提议分化立窝尼亚的统治者。在沃尔特·冯·普莱腾贝格谈成的停战协定到期后，伊凡四世提出续约条件，要求立窝尼亚人向他缴纳古老的赋税和贡金。没人听说过什么古老的赋税和贡金，立窝尼亚骑士团肯定从来没有向别人缴纳过。但多尔帕特的情况就没那么清白了。那里的主教和市民一直与立窝尼亚团长乃至里加大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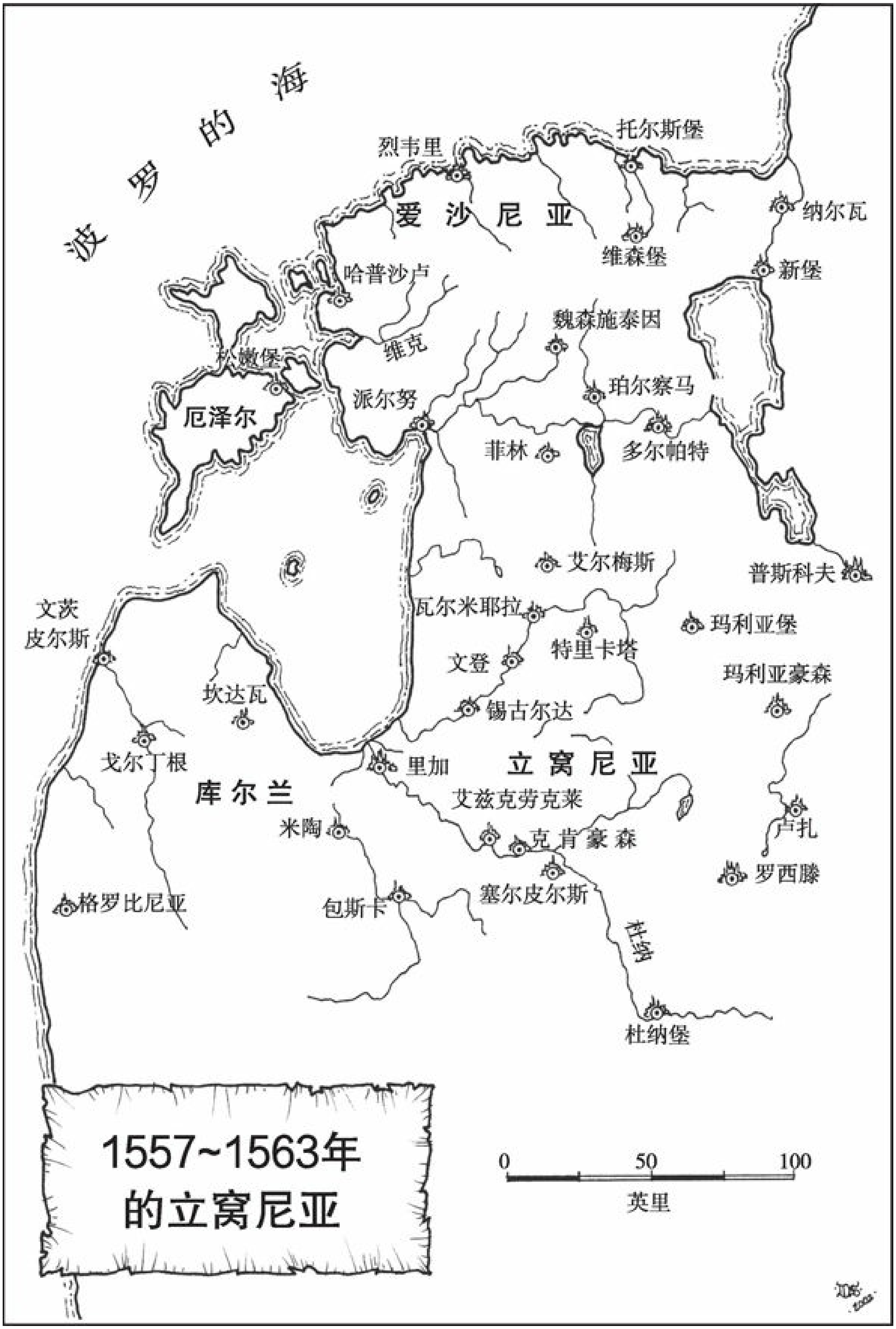
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独立性。多尔帕特的主教和市民承认，他们在过去曾向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缴纳过一些租金，让养蜂人和猎人使用一些沼泽地；如果价钱合适的话，他们可能还会愿意缴下去。

伊凡四世抓住了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他提出了一个方案，向立窝尼亚索要每年1000塔勒的贡赋，以及过去拖欠的4万塔勒税金。这一数额相当于1万头公牛的价值，所以立窝尼亚使者与他讨价还价，最后他厌烦了这种游戏，派人袭击了立窝尼亚使者的住处，去抢劫他们自称带来的钱。结果，伊凡发现立窝尼亚人并未带来分文，于是等着数钱的喜悦变成了勃然怒火。

双方都不是完全诚实的。沙皇索要的贡金源自12世纪，那时十字军还没到立窝尼亚；而且从来没有一位罗斯君主实际向当地征收过赋税或贡金。另一方面，立窝尼亚人根本不想付钱，他们期待神圣罗马皇帝宣布他们与伊凡四世签的任何条约都无效。而且，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3]（1548～1572年在位）可能会来支援立窝尼亚人。沙皇决定先发制人，趁波兰国王还在南方忙碌的时候占领立窝尼亚。

1557年底，沙皇命令他的部队和民兵集结起来，并向海岸进发。这次冬季行军既漫长又危险。立窝尼亚联盟得知，俄军已经离开莫斯科、顶着风雪向西北方推进，于是下令动员。

此次作战与半个世纪之前大不相同。立窝尼亚各城市筹集了6万塔勒用来支持一场短暂的战争，但团长威廉·冯·菲斯滕贝格决定不像沃尔特·冯·普莱腾贝格当年那样到野地里与敌人正面对垒。俄国军队和炮兵颇有威名，他们在近期与鞑靼人的战争中屡战屡胜，而菲斯滕贝格的军队准备不足。前不久的短暂内战期间，立窝尼亚军队和军官的拙劣表现以及随后的财政危机都表明，立窝尼亚远远没有做好应对严峻挑战的准备。团长不愿意寻求决定性战斗，所以这场战争会拖很久。



波罗的海
烈韦里
托尔斯堡
爱沙尼亚
纳尔瓦
维森堡
新堡
哈普沙卢
魏森施泰因
维克
松嫩堡
珀尔察马
派尔努
厄泽尔
菲林
多尔帕特
艾尔梅斯
普斯科夫
文茨皮尔斯
瓦尔米耶拉
玛利亚堡
特里卡塔
文登
玛利亚豪森
坎达瓦
锡古尔达
戈尔丁根
里加
立窝尼亚
库尔兰
艾兹克劳克莱
米陶
克肯豪森
卢扎
罗西滕
格罗比尼亚
包斯卡
塞尔皮尔斯
杜纳
杜纳堡
1557~1563年的立窝尼亚
0
50
100
英里

1557～1563年的立窝尼亚

德意志人数量不少，如果他们能集结成一支军队并得到有效指挥的话，也会有相当强的战斗力。但防御性的战略导致他们的兵力过于分散了，所以不管俄军进攻何处，德意志人的兵力都不如敌人。组成立窝尼亚骑兵部队的贵族不愿意与敌人正面交锋，因为他们会蒙受惨重损失，他们的家庭和采邑会失去保护。市民组成的民兵则没有受过野战训练。雇佣兵更是贪生怕死，也没有人愿意把农民武装起来。一言以蔽之，立窝尼亚一方没有什么斗志，菲斯滕贝格无法强迫立窝尼亚联盟的成员作战。他们最后采用的计划是保卫有防御设施的城市和城堡，用兵力很弱的部队骚扰入侵者，并寄希望于俄军的补给体系因为恶劣天气而崩溃，从而迫使沙皇下令撤军。1558年初，伊凡四世的军队未遇抵抗便穿过多尔帕特的土地，他们沿途烧杀抢掠，然后在纳尔瓦城下集结，开始围城。鞑靼人的将领率部挡住了试图接近的德意志援军。俄军大炮于5月12日开始轰击城市，但纳尔瓦城防巩固，若不是偶然发生火灾，立窝尼亚人完全守得住。很快，城市陷入熊熊大火，市民带着妻儿老小躲进要塞，俄军强攻城墙得手。俄军洗劫全城，在沙皇的俄国人和鞑靼人军队发泄完贪欲之后，伊凡四世的将军接受要塞的投降，允许守军和躲在那里的人民安全撤走。就这样，伊凡四世夺取了通往爱沙尼亚的关键枢纽，控制了纳尔瓦河上通往普斯科夫和多尔帕特的贸易路线。伊凡四世对此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立窝尼亚人愿意接受除投降之外的几乎任何条件。但他的胃口只是刚刚被调动起来。

威廉团长召集城堡长官和地方长官商讨局势。最后大家做出了怯懦的决定：给沙皇送去他要的4万塔勒贡金。但伊凡四世的胃口比这大得多：他把贡金送回，然后下令向多尔帕特进发。

立窝尼亚人现在才开始真正准备作战，但为时已晚。1558年6月，立窝尼亚联盟的各阶层在多尔帕特开会，商议下一步如何是好。他们向

丹麦求援，尽管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已经表示他无法出兵；立窝尼亚联盟授权烈韦里人封锁纳尔瓦，阻止任何船只到那里做买卖；他们还从瑞典借款20万塔勒并请求瑞典提供雇佣兵。虽然焦头烂额，但立窝尼亚联盟还是拒绝了波兰国王的要求，后者提出以将里加割让给波兰为条件换取波兰的支援。在7月，多尔帕特仅作了象征性的抵抗之后便向攻城的俄军投降。多尔帕特原本可以坚持很长时间却没能固守下来，这让立窝尼亚人士气大跌。立窝尼亚联盟的代表写信给波兰，实际上接受了国王出兵的条件。与此同时，立窝尼亚骑士团选择让菲林的城堡长官戈特哈德·凯特勒“分担”菲斯滕贝格的职责。

凯特勒是新教思想的追随者。他原本是天主教徒，不过和骑士团的所有新人一样，他在德意志驻扎过几年。在那里，他看到了改革军事修会的可能性，并渴望将其付诸实施。他回到立窝尼亚之后立刻加入了希望效仿骑士团普鲁士分支（将国家世俗化、把土地分给骑士们，让他们成为地主贵族）的那个派系。威廉·冯·菲斯滕贝格曾短暂地镇压了这个少数派，但它现在复苏了，其人数还因团长政策的失败而猛增。立窝尼亚骑士团显然不能正常扮演自己的军事角色，于是改革呼声越来越高；而戈特哈德·凯特勒支持他们呼吁的改革。在骑士团的所有城堡长官当中，几乎只有他一人在与来犯之俄国骑兵的交战中取得了一些小规模胜利。他在战场上表现出勇气和主动性，同时他还是个懂得节制的人，在达成共识之前愿意继续在旧体制内工作。

绝大多数立窝尼亚人放弃了独自进行防御作战的想法。贵族和城堡长官们在俄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犯下的暴行面前束手无策。市民对汉萨同盟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后者不仅不来援助，还利用烈韦里的麻烦绕过了它的港口，而不是按规矩把货物卸在烈韦里，随后再运往俄国。教士们向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各个统治王朝兜售自己的教区，希望能逃避危局并捞笔油水。立窝尼亚骑士团成员的所作所为也好不到哪里去。魏森贝格城堡长官追逐女人的本领比驱赶俄国人的能耐强得多；他

抛弃了爱沙尼亚最坚固、补给最充足的要塞，逃往烈韦里。这座城堡没有落入俄国人之手，单纯是因为一位年轻武士的积极主动精神。他带领少数愿意追随他的人驻防这座城堡。烈韦里城堡长官向丹麦国王求救，请他赶紧来占领这个省份，仅仅因为克里斯蒂安三世国王突然驾崩，爱沙尼亚才没有回到丹麦统治之下。鉴于没有援兵抵达，烈韦里市民决心自卫，于是他们开始修建新的防御工事，抵抗敌人强大的攻城武器。他们的旧城墙抵挡不住一轮真正的炮击，但伊凡四世给守军留下的空隙足以让他们做好准备。沙皇的部下已经精疲力竭并且耗尽了给养，于是他留下一些兵马驻防纳尔瓦和多尔帕特，然后率领主力部队和大量俘虏以及数量惊人的战利品班师回朝。多尔帕特教区再也没能恢复元气，最后一位多尔帕特主教死在俄国狱中，后来就没有人接替了。

俄军于1559年1月再度进军，这一次他们从多尔帕特通过立窝尼亚丘陵密布的乡村前往里加，然后绕过这座防御巩固的城市，进入斯米伽利亚和库尔兰。俄军在那里连续占领许多座防备不足的要塞。鞑靼人残酷无情的传统名声的确不虚，但在打败了鞑靼人之后强迫他们为沙皇效力的俄国军队几乎同样令人胆寒。

阅读编年史的人可能会怀疑，俄国人在这些年里是否和后来一样残忍，或者真的像大众记忆里那样恐怖。无疑，因为立窝尼亚承平已久，所以突然发生的暴行显得格外残酷，但此时伊凡四世还在真诚地（尽管是笨拙地）试图拉拢德意志领主和原住民农民。然而后来就不一样了，伊凡四世不时发疯，还提拔了一些野心勃勃但对他无比畏惧的新人。这些暴发户明白，沙皇不会接受任何为失败找来的借口。伊凡四世的“秘密警察”用恐怖统治来对付沙皇的国内外敌人。

而且，威胁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不只是俄国人。领不到军饷的雇佣兵和不法之徒在乡村恣意游荡。很快，立窝尼亚人便学会了保护自己，防备所有军人。他们在森林里挖掘藏身之处，把妇女和儿童藏起来，男人

们死守每一座设防的教堂和庄园直到最后一息。他们特别需要阻止四处袭掠的非正规军队恣意胡来，因为散兵游勇往往比组织严密的军队更为凶残。后来，当全欧洲的恶棍都加入在立窝尼亚作战的这一支或那一支军队时，人们渐渐学会如何躲避或熬过德意志人、立陶宛人、波兰人、瑞典人、丹麦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荷兰人甚至更稀罕的冒险家对平民的洗劫、掳掠和虐待。即便如此，战争最初几年的恐怖记忆还是没法抹去。俄国人的残暴特别臭名昭著，这对双方都是绝佳的战争宣传。俄国人用自己的恶名来震慑敌人，立窝尼亚人则用它来争取外援，并鼓励自己的臣民坚决抵抗莫斯科大公国的军队，死战到底。

俄国人谨慎地管理他们征服的地区，并确认地主和商人可以继续保有过去的权益和财产。由此可以看出，俄国人绝非毫无人性。而在1559年3月，伊凡四世在形势最为喜人的时候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与敌人停战。他希望借此促使对方和平投降，并获得有利于治理立窝尼亚的条件。

莫斯科大公国军队之所以停止前进，似乎是因为丹麦人、瑞典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即将干预立窝尼亚战争，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入侵了莫斯科大公国。沙皇显然希望通过谈判来巩固自己在北方获得的利益，在干预立窝尼亚战争的各股势力之间挑拨离间，阻挠他们，同时派遣自己的军队南下抵挡鞑靼人。他的算计落空了。北方各国的确互相嫉妒，但没有一位君主愿意从摆在自己面前的战利品那里收手，他们争先恐后地前来争夺。伊凡四世的和平姿态让他浪费了六个月时间，在这么长时间里他原本可以占领立窝尼亚的绝大部分地区，但现在他的各个敌人已在立窝尼亚站稳了脚跟，并招募军队到立窝尼亚作战。

1559年9月，立窝尼亚骑士团强迫威廉·冯·菲斯滕贝格辞职。凯特勒现在独掌大权，但军事危机耽搁了他将骑士团世俗化的工作。他已经在

维尔纽斯与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国王签订条约，让立窝尼亚在道加瓦河以南的部分成为波兰的保护领。与此同时，厄泽尔主教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了丹麦国王的弟弟荷尔斯泰因公爵马格努斯。马格努斯很快赶到了莫斯科并执行自己的政策，包括与沙皇联姻，并建立一个臣服于俄国的傀儡国家。瑞典人于1561年6月参战，烈韦里、哈尔尤[4]、维鲁和耶尔瓦的贵族向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世宣誓效忠。德意志人统治立窝尼亚的时代快结束了，但没人能预测谁将取而代之。就连干预战争的外国势力起初也做不了什么，因为1560年夏季俄军发动了一场攻势，席卷立窝尼亚。

立窝尼亚骑士团其实已经定下了对付俄国入侵者的有效策略。起初他们试图用步兵和炮兵对付俄军的袭掠队伍，但无法追击敏捷的鞑靼骑兵。当遇到数量较多的步兵和骑兵的时候，骑士团就撤入坚固的要塞。这种战术让乡村非常脆弱，很容易遭到袭掠队伍的蹂躏。凯特勒现在不得不随机应变地改革骑兵战术，从而减少俄国骑兵造成的破坏。骑士团更熟悉地形地貌，并且能撤回城堡，所以他们利用这些优势积极地骚扰敌人。这样就能阻止俄国人分散出击烧杀抢掠，也就限制了他们就地取粮的能力，从而为立窝尼亚农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而且，凯特勒还说服立陶宛人去保卫立窝尼亚南方的土地，并允许瑞典人占据北方。凯特勒将自己的剩余兵力集中起来，提拔那些为军队注入新活力的年轻大胆的指挥官。但遗憾的是，他的运气太差了，如同时代的一部编年史所述：

> 8月2日，30名骑兵离开营地约17里，去搜寻粮食。他们看见一条小溪另一侧有500名俄国人。双方距离极近，都开始射击。一名俄国人死亡，其他人穿过干草地撤退，与主力部队会合。18名德意志人返回，另外12人追击敌人。这12人看见敌军的主力部队后也立即回营，但损失了一些人。他们报告了上述情况，总军务官……带领300骑兵出发，打算与那500俄军交战。（他们不知道敌人的兵力不止这些，实际上有4万人。）他们首先攻击敌人的警戒哨兵，将其打退到敌人主力那里。德意志人穷追不舍，结果被敌人包围，插翅难逃。双方在近战中动用了火枪和军刀，但俄军力量远胜于德意志人，将其拖垮，杀死了

> 很多德意志人。留在营地没有参战的德意志人逃过了沼泽和森林，各自拼命逃跑。这次战败发生在……距离艾尔梅斯10里的地方。俄国人死了很多，用14辆大车才把死尸全都运到一座庄园，在那里火化。德意志人死亡和被俘261人。

艾尔梅斯战役是立窝尼亚骑士团的一次致命惨败。骑士团在此战中损失的人数不多，但阵亡的骑士都是立窝尼亚骑士团的精英。此后所有人都认识到，传统的政府和生活方式的末日即将来临。尽管局势混乱、屡战屡败并感到抵抗毫无希望，立窝尼亚骑士团还是坚持战斗，他们骚扰敌人的搜粮队伍，保卫自己最重要的城堡。团长和他的城堡长官与地方长官之间的大量通信表明，高效的组织并没有完全瓦解。部队仍然在受威胁的地点间奔波驰援；补给物资仍然能有效集结并顺利地得到分配；但现在骑士太少，他们的年纪也太大；雇佣兵的人数让收入有限的骑士团无力支付军饷，却又不足以在正面交锋中获胜；而且骑士团的财政状况非常凄凉。骑士团与外国君主的通信数量颇为惊人。戈特哈德·凯特勒绝望地试图从神圣罗马帝国筹措军费与兵马，并阻止邻国君主瓜分立窝尼亚，但他的努力大多只是徒劳。尽管凯特勒可能从一开始就阴谋颠覆骑士团的统治并自立为一方诸侯，但我们必须认可他做了很大努力去挽救立窝尼亚骑士团及其财产，并将这些财产完整地传给一位统治者。

不过，凯特勒已经没有什么办法让骑士团苟延残喘下去了。野战军被击溃之后，凯特勒就无法有效地保卫各处城堡。很多骑士团成员在战斗中被俘，最后被押解到莫斯科街头，他们在俄国人的胜利游行中一旦因体力不支而倒下就会被砸碎脑袋或斩首。雄伟的菲林要塞及其全部物资、武器和金库都丧失了，因为那里的雇佣兵要求要塞指挥官接受沙皇的投降要求。菲斯滕贝格想死战到底，但被掳到莫斯科，在那里过着舒适的囚徒生活直至死去。伊凡四世希望菲斯滕贝格能说服其他立窝尼亚人接受沙皇为君主，这样一来地主封臣仍能按照自己的古老传统来统治立窝尼亚，对沙皇只有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沙皇还承诺允许立窝尼亚

商人到俄国市场做生意。有一些贵族和市民的确投奔了沙皇，但他们大多数是在被俘且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投降的。更多人相信关于伊凡四世暴行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所以他获得了“伊凡雷帝”的绰号）而非沙皇的承诺，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沙皇的暴政是什么样的。他们相信更好的办法是用尽所有有望帮他们度过危机的权宜手段。不久之后，凯特勒开始秘密与骑士团成员商谈以寻求解散骑士团，让他自己成为能从俄国人血盆大口下保住的立窝尼亚那部分地区的公爵。

一些骑士团成员反对将城堡逐个交给波兰军队，但他们也提不出什么办法让立窝尼亚骑士团独力守住这些要塞。仅为守住库尔兰就需要他们集中剩余的兵力并大量举债来招募雇佣兵。凯特勒发现借钱也越来越难，因为他的恩主波兰国王再也不肯借钱给他了。

严格来说，此时立窝尼亚骑士团仍然存在，不过大多数骑士要么已经死亡，要么下落不明。他们虽然找到了对付俄军优势兵力的有效战术，但为时已晚。现在骑士的数量太少，优秀的指挥官都已经战死沙场。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需要执行大胆的战术的话，失败的次数肯定更多。艾尔梅斯的那一次战败就消灭了骑士团最优秀的骑兵部队，大多数幸存者现在都愿意把战斗任务交给别人。于是立窝尼亚出现了权力真空，外国势力纷纷涌入这一地区。

艾尔梅斯的惨败和立窝尼亚心脏地带的庞大要塞菲林的陷落，被爱沙尼亚人小心地看在眼里。这个坚忍不拔的民族从来没有屈服于十字军的主宰。爱沙尼亚人曾经发动的叛乱以惨败告终，这让他们学会了审慎，但现在，那些仍然有勇气和积极主动精神的爱沙尼亚人认为，赶走压迫者的时机终于到了。在很多代人的时间里，他们被剥夺了使用武器的权利，所以不精通武艺。但在1559年，立窝尼亚骑士团组建了一些装备剑、矛和盾牌的原住民步兵部队，并用他们支援小股雇佣兵和封建骑兵，去遏制为围攻烈韦里的俄军提供给养的搜粮队。最终俄军放弃围城

并撤退了。后来这些吃苦耐劳的爱沙尼亚农民认识到，如果他们为俄国人作战而不是与其敌对，就能再度获得独立，至少能够摆脱德意志人的统治。沙皇鼓励他们起兵造反，提醒他们说自己欢迎所有人（哪怕是德意志贵族）加入他的队伍，并会奖励他们的效劳和忠诚。他聆听爱沙尼亚人的建议，让他们充当侦察兵和间谍，派他们去德意志人占领的地区传播他的宣传消息。在俄军已经占领的地区，他命令官员为农民提供作物种子，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并阻止部队骚扰和掳掠农民。与此相对，德意志人正在向爱沙尼亚农民征收特别税作为军费，并强征了几乎所有男子当兵、搬运给养与装备，或者修建防御工事。

到1560年秋季，爱沙尼亚人认为德意志人的统治已经羸弱不堪，如果爱沙尼亚人起来反叛、夺取要塞与城堡并向沙皇求援，德意志人将无计可施。爱沙尼亚人为此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如果做了计划反而会让德意志贵族察觉，他们只需要使用原始武器，凭借自己的勇气坚持抵抗，等待训练有素的俄军抵达。编年史家吕索夫[5] 记载道：

> 秋季，乡村局势极为紧张，警报传来，哈尔尤和维克的农民造反了，因为贵族对他们征收重税并强迫他们从事困难的劳役，然而在敌人入侵时却没有办法保护农民，而是毫无抵抗地任凭农民被莫斯科大公国军队蹂躏。所以，这些农民觉得自己无须再服从贵族，也无须从事劳役，而是想摆脱他们，或干脆彻底消灭和铲除他们。于是他们恣意行动，摧毁了一些庄园，抓到贵族就把他们杀掉。

反叛的爱沙尼亚叛军人数不多，只存约4000人，而且装备很差，他们没有补给来源，也没有要塞可供躲避。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有可能让社会革命在整个立窝尼亚传播，从而让德意志人长达三个半世纪的霸权骤然崩溃。戈特哈德·凯特勒非常重视这一形势，写信给波兰国王求助，并将国家的剩余部分彻底交给波兰王室，以至于立窝尼亚骑士团在那里的统治实际上已经结束。

农民的反叛没有持续多久。他们缺少优秀的领导人、合适的武器和

恰当的训练，也缺乏经验和纪律。他们赶走了德意志军官，自己选举领导人，有时遵照古老的部落传统来选举，并为领导人佩戴传统的异教官职信物。但他们敌不过来自西方的职业军人。

镇压此次叛乱的功劳属于维克的丹麦裔指挥官克里斯托弗·冯·明希豪森。他手下只有一小群雇佣兵，但他命令主教的少量封臣作为骑兵作战，并征召附近的爱沙尼亚农民当步兵去讨伐他们那些造反的同胞。他诱使叛军头目相信正在接近的军队是另一群前来投奔的叛军，接着出其不意将其击溃并俘虏了他们。然后他迅速去攻击其他地方的叛军，也将其击溃。少数幸存的叛军前去投奔俄国人，德意志贵族则开始血腥地报复有罪或被怀疑有罪的农民和社区。

德意志贵族不满足于回到战前状态，而是坚持要求将所有的农民都变为农奴。他们这么想已经有几十年了，但他们之前不敢如此放肆地违反法律和传统。不过，现在已无人阻止他们了。在后来的岁月里，波兰、丹麦和瑞典君主同意取消农民所剩无几的权利，从而保住当地贵族的忠诚。尽管战争初期征召的封建骑兵的军事价值十分可疑，波罗的海贵族最终还是变成了勇敢强悍的武士，而且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传统和语言，所以任何想要控制和管理这些地区的人都离不开波罗的海贵族的合作。

对农民而言，反叛的失败造成了彻头彻尾的灾难。就连许多自由农民也沦于接近奴隶的状态，受到武士和骑士阶层的恣意剥削与残酷压迫，这个统治阶层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需要谨慎对待自己的臣民。此外，在这么多年的战争中，农民是损失财产和生命最多的一个群体。首先是俄军杀到，然后是瑞典或波兰军队，最后是那些趁乱兴风作浪的强盗。农民被迫缴税，房子被焚烧；他们被谋杀，被强暴，被从祖先的家园驱逐出去，被剥夺一切自卫手段，不得不忍受兵匪的蹂躏、饥荒和疾病。二十年战争结束后还幸存的人都是幸运儿。随后，贵族（现在包括

很多新到的瑞典和波兰雇佣兵统领与王室宠臣）组织了新的行政机关，比以往更有效、更残暴的方式征税并剥削农民。

到1561年秋季，库尔兰之外基本上没有一个地方仍然在立窝尼亚骑士团控制下。厄泽尔河畔的城堡松嫩堡正遭受马格努斯公爵围攻，凯特勒能奉献给波兰国王的只剩下这座城堡了。如果他等待更久，等到松嫩堡失陷之后，他就不大可能有筹码与国王讨价还价，在库尔兰得到一个公国了。他已经将立窝尼亚南部土地全部许诺给了国王，所以如果他还能给自己以及少数幸存并且愿意当地主封臣的骑士与行政管理者保留一些土地，就已经非常幸运了。9月，他派里加的城堡长官代表他和里加大主教去柯尼斯堡谈判。

这位使节留下了一份回忆录，描述了这场为立窝尼亚骑士团画上句号的短暂谈判。他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抵达柯尼斯堡，找到寓所并休息。次日上午他参加了礼拜，与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派来的两位学者一起用早餐，然后被传唤去拜见波兰国王。但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此时并不想谈正事，只是想找更多的人陪他用午餐。于是大使陪国王在一张圆桌旁坐下，同桌的还有一些贵族与一位来自瑞典的观察员。菜肴不错，葡萄酒的品质也值得赞扬。饭后闲聊之间，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安排大使与将参加谈判的主要波兰官员会谈。这次会谈纯粹关乎正事，参与者知识丰富，对关键细节进行了严肃讨论，一直进行到凌晨3点。次日一名波兰官员来到大使的寓所与他共进午餐，并私密地讨论一些更重要的细节。他们对继承问题、德语的使用、保留传统权益和特权、宗教自由和立窝尼亚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等问题达成了初步的一致。次日上午，大使会见公爵的代表，这位代表除了表达美好祝愿之外其实无话可说，因为阿尔布雷希特希望凯特勒无嗣而终，好让他（阿尔布雷希特）继承库尔兰公国，所以不许自己的代表多嘴，免得损害自己的机会。午餐时，所有的主要谈判者再次会面，波兰代表给大使送来一张便签，请求开展一次紧急的秘密会谈。不久之后，他和大使就对所有基本

要点达成了共识，包括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协议的方式。

谈判的细节过于沉闷无聊，因此这里不再赘述，但这些细节足以表明双方谈判和达成协议是非常认真的。1561年11月28日，立窝尼亚骑士团被世俗化；1562年3月5日，凯特勒团长将此事公布于众。从此他就是库尔兰公爵戈特哈德了，立窝尼亚骑士团不复存在。

随后的二十年战争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七年战争（1563～1570），主要是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冲突，最后瑞典贵族废黜了他们疯癫的国王，采用了对波兰较为有利的政策，此后丹麦在波罗的海的影响力减弱，剩余的两个西方强国瑞典和波兰联手对付沙皇。第二阶段的时长差不多（1570～1578），伊凡四世差一点就将所有对手都从波罗的海逐出，最后所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他。伊凡四世最危险的敌人是他自己，他处决了很多将军，用恐怖手段震慑自己的贵族和公民，所以俄国和鞑靼将军们取得的战果不是因为沙皇的英明领导，而是在沙皇这一负担之下赢得的。当然，伊凡的兵力不足以让他在对立窝尼亚作战的同时打退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袭击；他正确地选择优先对付鞑靼人的威胁，并消灭了他们的军事力量，为俄国后来向南方的扩张打通了道路。第三阶段是1578年之后的三年，新当选的波兰国王斯特凡·巴托里[6]解决了他与土耳其人的问题，之前他一直为此在波兰南部边境忙碌。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和国王率领自己经验丰富的军队北上，击溃俄军并将其逐出立窝尼亚，收复了曾属于立陶宛的部分罗斯土地。瑞典人参加了这轮攻势，占领了爱沙尼亚和一直到涅瓦河口的俄国沿海地带。1582年，财政破产、精疲力竭并且患有精神病的伊凡四世终于认输并签署和约，让西方人控制立窝尼亚一个世纪之久。

然而，这对瑞典和波兰来说不是好事。战争把它们拖进一个遥远地区，消耗了大量人力和金钱，并为两国未来的冲突埋下种子。

对俄国来说，这意味着又一个世纪的虚弱和孤立。俄国没有机会与

欧洲接触，于是亚洲对它的文化与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备感挫折的沙皇在不久后驾崩，他的国家陷入混乱。对立窝尼亚来说，数百年的冲突开始了。在这期间，它从西欧的一个虽然孤立但重要的部分变成了东欧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省份。很快立窝尼亚就会被人们遗忘，沦为伟人们恢宏事业的一个小注脚。

土耳其战争

钱币收藏家都知道条顿骑士团一直生存到17世纪，因为这个时期精美的塔勒钱币在今天价值很高。但在大团长的军事使命缩小为向哈布斯堡家族提供少量部队以去遥远的巴尔干前线作战之后，历史学家就对条顿骑士团失去了兴趣。

这可以理解，但令人遗憾。土耳其人于1529年首次攻击维也纳，此后几乎每年都沿着边境发动袭掠作战，直到1683年最后一次大举进攻维也纳。土耳其人北上的过程中无法推进太远的主要原因是天气：当草长得足够高，可以供养从伊斯坦布尔出征的大军的马匹时，土耳其将领已经在计算需要多少天穿过巴尔干半岛然后逆多瑙河而上了；当土耳其人抵达奥地利或波兰边境时，他们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可以作战，然后就将因天气变坏而不得不返回。如果基督徒能够阻滞敌人的前进势头，就能挫败土耳其人掳掠牛群、马匹和奴隶的行动。所以，争夺边境城堡的战斗看似不足道，其实非常关键。

条顿骑士团在德意志、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各修道院招募的部队参加了很多次这样的作战。这些部队里只有指挥官是条顿骑士团成员，参战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条顿骑士团历史的这个篇章鲜有人知，但值得研究，因为这些作战反映了哈布斯堡皇朝面临的军事问题，以及塞尔维亚人（东正教基督徒，是土耳其的臣民）和克罗地亚人（罗马天主教徒，忠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对抗。

随着拿破仑将包括条顿骑士团在内的许多宗教修会在德意志的产业世俗化，这个时代也宣告结束。

---

[1] 中欧的大多数农民都很贫穷。当然贫穷也有不同程度，但它反映的不只

是奴役条件。气候、天气、战争、疾病和物价波动也都是重要因素。立窝尼亚位于北欧，土地贫瘠，作物种植季节短暂。并且，在这一地区，在波兰、立陶宛和俄国，普遍出现了农民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而与此同时，农奴制在西欧正在消失。（作者注）

[2] 就连偏向罗马天主教的骑士也明白，必须尽快对教会实施改革。因为特伦托会议还没有召开，大家普遍感到绝望，不知何时教廷才会开始处置教会那些最紧迫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即便德意志发生了保守的教会改革，这对立窝尼亚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帮助。（作者注）

[3] 他是齐格蒙特一世的儿子，雅盖隆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

[4] 哈尔尤是今天爱沙尼亚北部的一个县，北临芬兰湾，与芬兰相望。哈尔尤县的首府塔林也是该国首都。

[5] 巴尔塔扎·吕索夫（1536～1600）是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历史上最重要的编年史家之一。他出生于塔林，在什切青受教育，1566年至去世是塔林的路德宗牧师。他用低地德语撰写了《立窝尼亚编年史》，记载立窝尼亚历史，尤其是立窝尼亚骑士团衰亡的历史。在本书中，他谴责立窝尼亚统治阶级的奢靡和道德败坏，抱怨立窝尼亚农民的迷信和异教传统，抨击战争期间各支雇佣军的凶残贪婪，赞颂波罗的海地区的新霸权瑞典。

[6] 斯特凡·巴托里（1533～1586）是匈牙利贵族，起初是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和王公，1576年娶了波兰女王和立陶宛女大公安娜·雅盖沃卡（齐格蒙特一世之女），后来当选为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他是波兰选举产生的第三位国王。他在位时间只有十年，但确立了自己作为伟大军事家和统治者的声誉。他曾在立窝尼亚抵抗伊凡雷帝对波兰边境地带的入侵。

十三 总结

在十字军的年代结束之后，条顿骑士团仍有属于自己的未来。也可以说它曾有好几种不同的未来，因为骑士团于1525年分裂成三个相互独立的部分。但这种命运不是上天注定，而是自然发生的。

在普鲁士，条顿骑士团的世俗化成员放弃了继续进行十字军圣战的努力和自己的宗教职能。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安斯巴赫皈依路德宗，将国家世俗化。希望继续当修士和骑士的人撤回德意志，讨论一些异想天开的计划，幻想征服普鲁士并在那里恢复天主教。条顿骑士团继续十字军传统的最大希望或许是按照波兰人的建议定居到奥斯曼帝国边境，运用骑士团在德意志的资源去维持一支小而高效的军队。但出于傲慢和固执、对波兰国王的仇恨、对他的动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不无道理）和对在巴尔干半岛战败的担忧，骑士团拒绝了这些提议。更何况波兰人的提议并不十分公平和诚实：波兰人是在要求骑士团交出普鲁士，迁往一个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新地方。条顿骑士觉得这是个陷阱，波兰人显然想把他们害死以攫取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只为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提供了少许支持。把条顿骑士团迁往巴尔干半岛的虚假谈判或许最能体现条顿骑士团传统在道德上的破产，以及他们的敌人如何没有良心。

大团长约翰·冯·蒂芬指挥一支普鲁士部队最后参加了一次十字军，这场1497年由波兰国王对摩尔达维亚发起的入侵以惨败告终。在人心惶惶的撤退过程中，年迈的大团长死于疾病和体力衰竭。

立窝尼亚骑士团的存续时间比他们的普鲁士兄弟长一些，其状况也

更顺利一些。很多人指责骑士们是懒惰、酗酒、寻花问柳的懦夫，这种指责是无稽之谈。更准确的评价是，这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军事修会无法从传统的北德意志家园招募骑士和武士，因为当地现在信奉新教。而立窝尼亚本身也没有足够多的贵族子弟来补充骑士团。[1] 骑士团没钱在和平时期维持大规模的雇佣军，也没有办法说服立窝尼亚联盟那些独立性很强的阶层交税，在战时也不能有效地领导各阶层执行共同的计划。最后，在危机时期，立窝尼亚骑士团再也不能指望从普鲁士得到增援。立窝尼亚骑士团无力抵挡伊凡雷帝麾下数量众多、训练有素且经验丰富的军队，统于在鏖战中被拖垮。骑士们一直努力保护路德宗和天主教臣民抵抗那位疯癫的俄国东正教沙皇。

波兰-立陶宛、瑞典和俄国闯入了立窝尼亚的权力真空。这几个国家对波罗的海沿海地带都不是特别感兴趣，但都决心阻止别人得到它。所以，尽管这几个大国都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瑞典和丹麦有冲突，波兰-立陶宛要抵抗土耳其人，俄国要对付鞑靼人），它们还是为争夺立窝尼亚骑士团这个袖珍帝国可怜兮兮的残余部分而展开战争。

德意志骑士团（这个名字比条顿骑士团更准确）在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继续执行自己的军事和宗教使命长达近三个世纪，在帝国军队里与土耳其苏丹、法兰西国王和新教诸侯作战。骑士团的绝大部分成员是罗马天主教徒，但根据1555年的《奥格斯堡条约》，在德意志的新教和改革宗地区，他们必须接受当地统治者的信仰。所以也有一些骑士团成员是新教徒。骑士团在这段历史中的角色充满了荣耀和兴衰浮沉。这个时代的条顿骑士团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组织，与中世纪普鲁士的哥特风格迥然不同。南德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一座宫殿曾是骑士团在当地的城堡长官的官邸。不过由于拿破仑废除了德意志骑士团和其他许多旧时代的遗物，他们的时代还是结束了。

拿破仑倒台之后，德意志骑士团复苏了两次，第一次是作为哈布斯

堡家族的私人骑士团，1929年之后则成为一个宗教修会。今天仍然有一些小教堂和医院属于德意志骑士团。照料病人、老人和有精神障碍的人是骑士团于1189年在阿卡成立时的最初使命，在整个中世纪，这一角色对骑士团而言一直很重要。德意志几乎每一座中等规模的城镇都有一座曾属于骑士团的医院、教堂或修道院，骑士团的存在体现在很多街道名字里。骑士团为各地居民服务，从而保存了过去的记忆与传统。

今天的德意志骑士团为非德语国家（尤其是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的德语社区提供神父。在这方面，它也重新拾起自己最初使命的另一部分：为被其他修会忽视的德意志人提供精神慰藉。

这段晚近历史表明，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不一定只将自己视为一个国家。他们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被从特兰西瓦尼亚驱逐，失去圣地，圣殿骑士团被消灭，以及来自矮子瓦迪斯瓦夫一世的嫉妒。但他们竟然忘记了自己的主要使命是担当十字军战士，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十字军曾是与普鲁士国家单独分开的另一项事业，所以他们能讨论让明道加斯的立陶宛人皈依，而无须先征服他的土地。只要参加他的加冕礼就足够了。遗憾的是，骑士团对西普鲁士和但泽的占有使得波兰人从传统盟友变成了不共戴天之敌，这让条顿骑士团相信继续扩张领土才是自保的最好办法。当他们相信自己必须控制整个普鲁士和萨莫吉希亚以及通往立窝尼亚的陆路才能安全时，他们就注定灭亡了。时代已经变了，他们却固守僵化的旧思想。

1410年的坦能堡战役让骑士团失去了萨莫吉希亚。骑士团在1422年的《梅乌诺条约》[2] 中多少算是接受了这个事实。但骑士们在随后很多年里自欺欺人，相信自己还能复苏十字军传统。更糟糕的是，他们认定自己只有在为坦能堡战役及其后的失败复仇之后，才能做别的事情。以成为别人的附庸为耻的古老观念一直咬啮着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不得安宁。上述几种自我欺骗的思想变成了纠缠骑士团的恶灵，让骑士团无法

与过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了断。

总而言之，坦能堡战役之后发生的一切，就是条顿骑士团从过时的十字军定位向别的事业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事先往往没有计划。这个过程也很痛苦，让骑士团付出了惨重代价。骑士团的未来部分取决于当时的统治者，部分取决于他们控制不了的局势。历史制定自己的规则，人类必须在历史的限制之内进行博弈。条顿骑士团把握住了14世纪的可能性，所以欣欣向荣。而当历史给出新的挑战时，骑士团未能很好地应对，于是分裂成三块。其中两块——普鲁士和立窝尼亚——在16世纪消亡。第三块则继续演化，最终在现代罗马天主教的修会与活动构成的庞大体系中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小而有价值的位置。

骑士团的政治遗产还剩下什么？或许是一种强大的象征意义。立陶宛人和波兰人记住了被归咎于十字军的恶行，而德意志人倾向于只记得十字军的光荣胜利。

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误解，因为它更多地关系到现代历史，而不是中世纪。波兰和立陶宛在18世纪从欧洲版图消失，不再是一个国家，而德意志成为一个更加向东看的强国，把自己的传统与希冀和中世纪普鲁士联系起来。这种情况导致后来的人们把中世纪东欧的十字军运动（以及德意志人、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其他向东方的移民运动，即所谓东进运动）理解为德意志帝国主义的第一阶段，后来又视其为纳粹的前身。这是对历史过于简化的误读，历史学家对这种误读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甚至比制造历史的人的责任更大，因为历史学家原本应当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中世纪历史满是暴行和残忍，但继续传播仇恨是不对的。正如英格兰和法兰西大体上已经互相原谅百年战争期间双方的很多暴行，东欧的侵略者和受害者的后代也应当如此，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没办法说这段历史的其中一方是纯粹的侵略者，而另一方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历史学家不应当把十字军运动描述为一群人出于私利夺取本属于无辜民族的土地。十字军运动实际上是更广泛也更局部的事件的一个方面。更广泛的因素包括不同宗教信仰的互动，各民族、王朝和贸易的扩张，还有伟人的作用；更局部的因素包括地理条件，各民族在过去的互动，他们对荣耀、复仇和战利品的渴望，以及重要的政治人物和貌似不重要的政治人物的生死及其中的偶然性。当然还有误解，不过我们不能对其夸大其词：当时的基督徒可能对金帐汗国了解不多，但他们不理解鞑靼人想要什么并不是问题所在。历史不只是对受害者的认定，也不只是对英雄的表彰。历史远远超过历史学家所能书写的范围，但历史学家必须尽其所能。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历史学家如果把复杂的往昔过度简单化，就会伤害未来的人们，因为他们会受到历史学家作品的深刻影响。[3]

---

[1] 骑士团几乎从来不在普鲁士或立窝尼亚招募骑士，因为担心这样的人会想方设法推动自己的世俗亲戚的利益。15世纪，上述政策在立窝尼亚有所放松，但即便那时，新的骑士也主要来自前不久从威斯特法伦到东欧的家族，那些家族有成员在骑士团占据高位，可以保证自己的亲戚得到快速提携。（作者注）

[2] 1422年的《梅乌诺条约》划定了普鲁士与立陶宛的边界，结束了条顿骑士团与立陶宛的战争，但没有解决骑士团与波兰的冲突。骑士团试图拆散波兰与立陶宛的联合，甚至向维陶塔斯献上王冠。

[3] 欢迎读者参考：William Urban，‘Rethinking the Crusades’，*Perspectives*（the newsletter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36/7，October 1998，pp.25-29；and ‘Victims of the Baltic Crusade’，*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29/3，Autumn 1998，pp.195-212。后者获得了AABS的Vitols Prize，被评为*JBS* 年度最佳论文。（作者注）

附录一 条顿骑士团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赫尔曼·冯·萨尔察：1210～1239年任大团长。他是多位皇帝和教宗的至交好友，领导骑士团在圣地崛起，并派遣骑士去特兰西瓦尼亚、普鲁士和立窝尼亚。

图林根方伯康拉德：尽管他担任大团长仅一年（1239～1240），却是第一个加入骑士团的重要贵族。此后骑士团招募骑士和募捐就变得更容易了。

赫尔曼·巴尔克：1230～1239年为首任普鲁士团长，1237～1239年任立窝尼亚团长。可能原本是来自希尔德斯海姆教堂的教士，可能于1189年在阿卡加入条顿骑士团。卒于1239或1240年。

博波·冯·奥斯特纳：1237年和1241～1244年任普鲁士团长，1253～1257年任大团长。他出身纽伦堡地区的豪门世家，却选择离开妻子并加入军事修会，令人惊讶。（他的妻子进了女修院。）博波领导骑士团度过了最严重的危机，即针对波美雷利亚的希维托佩尔克二世和普鲁士异教徒的战争。

安诺·冯·桑格斯豪森：1254～1256年任立窝尼亚团长，1257～1274年任大团长。他领导骑士团度过了1259～1260年的关键时期，其间萨莫吉希亚人打败了骑士团，随后普鲁士与立窝尼亚发生了叛乱。

西格弗里德·冯·福伊希特万格：1303～1311年任大团长。他将官邸从威尼斯迁往玛利亚堡，于是将普鲁士十字军东征确定为骑士团的主要

使命。

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 1352～1382年任大团长。他和蔼可亲，精通礼节，为骑士团在德意志、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最高层贵族当中赢得许多朋友。在他领导下，条顿骑士团的骑士精神和彬彬有礼闻名遐迩。

康拉德·冯·容金根： 1393～1407年任大团长。他的军事和外交才干让骑士团胜利结束了萨莫吉希亚战争。1398年的《萨利纳斯条约》让骑士团与波兰和立陶宛议和，并保障骑士团占有萨莫吉希亚，从而保障了通往立窝尼亚的陆上道路。

乌尔里希·冯·容金根： 1408～1410年任大团长。他在坦能堡战役中战败身死，标志着骑士团的辉煌时代的结束。

海因里希·冯·普劳恩： 1410～1413年任大团长。他英勇地从波兰和立陶宛军队手中挽救普鲁士，差一点就重振了骑士团的权力和威望。

米夏埃尔·屈希迈斯特： 萨莫吉希亚的地方长官，1414～1422年任大团长。他害怕海因里希·冯·普劳恩的政策会导致又一场军事灾难，于是领导一群高级军官发动政变，此后骑士团霉运不断。1422年的《第一次托伦条约》是骑士团衰败的真正开始。

路德维希·冯·埃里希斯豪森： 1450～1467年任大团长。他试图镇压普鲁士的市民、封臣和士绅，导致十三年战争。1466年的《第二次托伦条约》使得骑士团彻底丧失了恢复曾经的辉煌地位的可能性。

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安斯巴赫： 最后一位在普鲁士的大团长，1511～1525年在位。他向普鲁士引进路德宗改革，将骑士团的领地世俗化，结婚并成为普鲁士公爵（1525～1568年在位）。

附录二 1525年之前的历任大团长（年份为任期）

海因里希·瓦尔波特，1198～1200

奥托·冯·科尔彭，1200～1208

海因里希·巴特，1209～1210？

赫尔曼·冯·萨尔察，1210～1239

图林根方伯康拉德，1239～1240

格哈德·冯·马尔贝格，1241～1244

海因里希·冯·霍亨洛厄，1244～1249

贡特尔·冯·乌勒斯立本，1249～1253

博波·冯·奥斯特纳，1253～1257

安诺·冯·桑格斯豪森，1257～1274

哈特曼·冯·黑尔德隆根，1274～1283

布尔夏德·冯·施万登，1283～1290

康拉德·冯·福伊希特万格，1291～1297

戈特弗里德·冯·霍亨洛厄，1297～1303

西格弗里德·冯·福伊希特万格，1303～1311

卡尔·冯·特里尔，1311～1324

维尔纳·冯·奥尔森，1324～1331

路德·冯·不伦瑞克，1331～1335

迪特里希·冯·阿尔滕堡，1335～1341

鲁道夫·科尼希，1341～1345

海因里希·杜泽莫尔，1345～1351

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1352～1382

康拉德·策尔纳·冯·罗滕施泰因，1382～1390

康拉德·冯·瓦伦罗德，1390～1393

康拉德·冯·容金根，1393～1407

乌尔里希·冯·容金根，1408～1410

海因里希·冯·普劳恩，1410～1413

米夏埃尔·屈希迈斯特，1414～1422

保罗·冯·鲁斯多夫，1422～1441

康拉德·冯·埃里希斯豪森，1441～1449

路德维希·冯·埃里希斯豪森，1450～1467

海因里希·罗伊斯·冯·普劳恩，1469～1470

海因里希·冯·利希滕贝格，1470～1477

马丁·特鲁克泽斯·冯·维茨豪森，1477～1489

约翰·冯·蒂芬，1489～1497

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1498～1510

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1511～1525

参考书目

关于条顿骑士的文献颇为浩繁。由于骑士团的十字军运动跨越了多个时代与地区，其历史在后来也曾多次为政治宣传所利用，关于骑士团的文献如今大多带有拼凑的属性。大多数相关书籍与文章是用德文或波兰文写成的，但幸运的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的英文书籍也有所增加。

一手资料翻译版

The Chronicle of Henry of Livonia，translated by James A.Brundag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Madison，1961. The *Chronicle* is a lively，intelligent account of the period 1180—1227. Apparently written for the benefit of William of Modena，the papal legate who arrived in Riga in 1225，it is more thorough and more reflective than all but a very few mediaeval chronicles.

Chronicle of Novgorod，translated by Robert Michell and Nevil Forbes. Camden third series vol.25，London，1914. Much less useful than the foregoing，and uneven in quality. Unfortunately，the editors mix together the texts of several editions of this indispensable account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an important Russian state.

The Hypatian Codex，*Part Two*：*The Galician-Volhynian Chronicle*，annotated translation by George A.Perfecky. Fink，München，1973（Harvard Series in Ukrainian Studies，16，Ⅲ）. A somewhat dense and frustrating text with fascinating anecdotes. Essential for thirteenth-

century Lithuania and Poland.

The Livonian Rhymed Chronicle ，translated by Jerry C.Smith and William Urban. New and expanded 2nd edition，Lithuanian Research and Studies Center（LRSC），Chicago，2001. An indispensable narrative for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naïve，lively，informative.

The Annals of Jan Długosz ，English abridgement by Maurice Michael. IM Publications，Chichester，1997. Fails to catch the spirit of the prose of this knowledgeable Polish Renaissance author，but provides the basic story.

Johannes Renner's Livonian History 1556—1561 ，translated by Jerry C.Smith and William Urban，with Ward Jones. Edwin Mellen，Lewiston，Queenston，Lampeter，1997. A well-informed chronicle of the last days of the Livonian Order.

The Chronicle of Balthasar Russow & Forthright Rebuttal by Elert Kruse & Errors and Mistakes of Balthasar Russow by Heinrich Tisenhausen ，translated by Jerry

二手英文资料

这些是最好的英文资料。不过，有一些更有名的作品没有列在其中，因为它们不是在一些早已磨灭于历史记忆的争端中充作政治宣传材料之用，就是由作者为获取收入写成的。

Barber，Malcolm，ed. *The Military Orders*，*vol.1*：*Fighting for the Faith and Caring for the Sick.* Variorum（Ashgate），Brookfield，1994.

Burleigh，Michael. *P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erman Order*：*An Aristocratic Corporation in Crisis c.1410—1460*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84.

Christiansen，Eric，*The Northern Crusades*：*The Baltic and the Catholic Frontier*，*1100—1525* . Cambridge，1998.

Davies，Norman. *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 in two volumes.* Columbia，New York，1982.

Evans，Geoffrey. *Tannenberg 1410*：*1914* . Hamish Hamilton，London，1970.

Jasienica，Pawel（translated by Alexander Jordan）. *Jagiellonian Poland.* American Institute of Polish Culture，Miami，1978.

Knoll，Paul. *The Rise of the Polish Monarchy*：*Piast Poland in East Central Europe*，*1320—1370*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1972.

Murray，Alan V.，ed. *Crusade and Conversion on the Baltic Frontier 1150—1500.* Ashgate，Aldershot，2001.

Nicholson，Helen，ed. *The Military Orders*，*vol.2*：*Welfare and Warfare.* Ashgate，Aldershot，Brookfield，Singapore and Sidney，1998.

—*Templars*，*Hospitallers and Teutonic Knights*：*Images of the Military Orders*，*1128—1291* .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and St Martin's，Leicester，London and New York，1993.

Nicolle，David. *Lake Peipus 1242*：*The Battle on the Ice* . Osprey，London，1996.

Rowell，Stephen C. *Lithuania Ascending*：*A Pagan Empire within*

East-Central Europe，1294—13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4.

Turnbull，Stephen. *Crusader Castles of the Teutonic Knights，vol.1：The Red Brick Castles of Prussia*；and *vol.2：The Stone Castles of Livonia* . Reed，London，forthcoming 2003/2004.

—*Tannenberg 1410* . Reed，London，forthcoming 2003/2004.

Urban，William. *The Baltic Crusade.* 2nd edition，LRSC，Chicago，1994.

—*The Prussian Crusade* . 2nd edition，LRSC，Chicago，2000.

—*The Samogitian Crusade.* LRSC，Chicago，1989.

—*Tannenberg and After：Poland，Lithuania and the Teutonic Order in Search of Immortality* . Revised edition，LRSC，Chicago，2002.

四本配图值得关注的书

Arnold，Udo，ed. *800 Jahre Deutscher Orden.* Bertelsman，Gütersloh/Munich，1990.（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in the German National Museum in Nürnberg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e Historische Kommission zur Erforschung des Deutschen Ordens.）

Benninghoven，Friedrich，ed. *Unter Kreuz und Adler：der Deutsche Orden im Mittelalter* . Hase & Koehler，Mainz，1990.（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of the 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Berlin.）

Kulnyt，Birut，ed. *Lietuvos Istorijos Paminklai* （Monuments of Lithuanian History）. Mintis，Vilnius，1990.

Roesdahl，Else，and Wilson，David，eds. *From Viking to Crusader*：*Scandinavia and Europe 800—1200* . Rizzoli，New York，1992.

一手资料

19世纪的德国和波兰学者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料评注与汇编。我在下面列出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些作品。可参见http：//www.rrz.uni-hamburg.de/Landesforschung/Quellen.htm。

Scriptores Rerum Livonicarum. Sammlung der Wichtigsten Chroniken und Geschichtsdenkmale von Liv-，*Ehst-*，*und Kurland* ，edited by A.Hansen. 2 vols. E.Frantzen，Riga and Leipzig，1853. Carefully edited chronicles which are available elsewhere in more modern editions.

Scriptores Rerum Prussicarum ，edited by Theodore Hirsch and others. 6 vols. S.Hirzel，Leipzig，1861—74；Frankfurt，1965. Contains the chronicles of the Teutonic Order.

Heinrici Chronicon Livoniae ，edited by Leonid Arbusow and Albert Bauer. 2nd edition，Hahnsche，Hannover，1955. The standard scholarly edition.

Livländische Reimchronik ，edited by Leo Mayer. Georg Olms，Hildesheim，1963（reprint of 1876 edition）. The principal account of the period 1227—90.

Preussische Urkundenbuch . Hartung，Königsberg，1882-；Elwert，Marburg/Lahn，1955-. Also：http：//www.phil.uni-erlangen.de/～plges/quellen/pub/4frame.html. The collected documents of the Teutonic Order.

Liv-，Est-. und Kurländische Urkundenbuch ，edited by Friedrich Georg von Bunge. 12 vols. H.Laakman，Reval，1853—9；Riga and Moscow，1867—1910. The collected documents of the Livonian Order.

Das Zeugenverhör des Franciscus de Moliano（1312） ，edited by August Seraphim. Thomas Oppermann，Königsberg，1912. A transcript of the inquiry by the papal legate into the feud between Riga and the Teutonic Knights. Often incautiously mined for snappy quotes.

Lites ac Res gestae inter Polonos Ordineque Cruciferorum. 3 vols. Kónicke，Poznań，1892. The papal legates’hearings into the Teutonic Knights’misdeeds in Poland. Also often used naively.

Monumenta Poloniae Historica. 6 vols.Gravenhagen，1893；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Warsaw，1961. Contains the minor chronicles.

Johannis Długossi，*Historiae Polonicae in Opera Omnia* ，edited by Alexander Przezdziecki. CZAS，Cracow，1876—8.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for mediaeval Polish history.

二手资料

关于条顿十字军的德文和波兰文书籍所在多有，这个领域的文章亦数不胜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是：

Arnold，Udo，ed. *Die Hochmeister des Deutschen Ordens 1190—1994* . Elwert，Marburg，1998.（*Quellen und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Ordens* ，6.）

Benninghoven，Friedrich. *Der Orden der Schwertbrüder.* Böhlau，

Köln-Graz，1965.

Biskup，Marian，and Labuda，Gerard. *Dzieje Zakonu Krzyżackiego w Prusach*：*Gospodarka-Społeczeństwo-Panstwo-Idelogia*. Morskie，Gdańsk，1986.

Boockmann，Harmut. *Der Deutsche Orden*：*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Beck，München，1981. The most easily read overview.

Ekdahl，Sven. *Die Schlacht bei Tannenberg 1410*，*Quellenkritische Untersuchungen*，*vol.1*：*Einführung und Quellenunterlage*. Duncker und Humblot，Berlin，1982. Highly recommended.

Górski，Karol. *L'Ordine Teutonico*，*alle Origini dello Stato Prussiano*. Einaudi，Turin，1971.

Jučas，Mečislovas. *Žalgiro mūšis*. 2nd edition，Baltos Lankos，Vilnius，1999.

Kuczyński，Stefan. *Spór o Grunwald* . MON，Warsaw，1972.

Labuda，Gerard，ed. *Historia Pomorza*，*vol.1*（in two parts）：*do roku 1466*. Wydawnictwo Poznańskie，Poznań，1972.

Lowmiański，Henryk. *Studia nad Dziejami Wielkiego Ksi stwa Litewskiego*. UaM，Poznań，1983.

Murawski，Klaus Eberhard. *Zwischen Tannenberg und Thorn*：*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Ordens unter dem Hochmeister Konrad von Erlichshausen 1441—1449*.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Göttingen，1953.（*Göttinger Bausteine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0—11.）

Schumacher， Bruno. *Geschichte Ost-und Westpreussens* . 6th edition， Holner， Würzburg， 1977.

Tumler， P.Martin. *Der Deutsche Orden*： *Werden*， *Wachsen und Wirkung bis 1400* . Panorama， Wien， 1955.

译名对照表

Acre 阿卡

Adalbert of Prague 布拉格的圣道博

Advocates 地方长官

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 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

Albert von Buxhoevden 阿尔伯特·冯·布克斯赫夫登

Albert Suerbeer 阿尔伯特·聚尔比尔

Albrecht of Hohenzollern-Ansbach 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安斯巴赫

Albrecht von Habsburg 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

Aldona 阿尔多娜

Alexander of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IV 亚历山大四世

Alexander，Bishop 亚历山大主教

Alexander Nevsky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Alexandra 亚历山德拉

Algirdas 阿尔吉尔达斯

Alle River 阿勒河

Andreas von Felben 安德烈亚斯·冯·菲尔本

Andrew of Hungary 匈牙利国王安德拉什二世

Anna，wife of Vytautas 安娜，维陶塔斯之妻

Anno von Sangerhausen 安诺·冯·桑格斯豪森

Archbishop of Gniezno 格涅兹诺大主教

Archbishop of Hamburg-Bremen 汉堡-不来梅大主教

Archbishop of Riga 里加大主教

Aurochs 原牛

Avignon，Avignon popes 阿维尼翁教宗

Balkans 巴尔干半岛

Bad Mergentheim 巴德梅尔根泰姆

Bartia 巴尔蒂亚

Bartenstein 巴尔滕施泰因

Basil of Moscow 莫斯科的瓦西里

Batu 拔都

Bela of Hungary 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ernard of Clairvaux 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

Birute 比露特

Bishop of Cracow 克拉科夫主教

Bishop of Culm 库尔姆主教

Bishop of Dorpat 多尔帕特主教

Bishop of Ermland 瓦尔米亚主教

Bishop of Kujavia 库亚维主教

Bishop of Oesel-Wiek 厄泽尔-维克主教

Bishop of Olmutz 奥尔米茨主教

Bishop of Plock 普沃茨克主教

Bishop of Pomesania 波美萨尼亚主教

Bishop of Prussia 普鲁士主教

Bishop of Riga 里加主教

Bishop of Samland 桑比亚主教

Bishop of Vilnius 维尔纽斯主教

Blue Waters 蓝水

Blumenau 布鲁梅瑙

Bohemia 波希米亚

Boleslas III 波列斯瓦夫三世

Boleslas the Pious 虔诚的波列斯瓦夫

Boleslas of Masovia 马佐夫舍公爵波列斯瓦夫

Boniface VIII 博尼法斯八世

Boyars 波雅尔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Bremen 不来梅

Brzesc 布列斯特

Bruno of Querfurt 库埃尔富尔特的布伦

Bug River 布格河

Bulgaria 保加利亚

Burchard von Schwanden 布尔夏德·冯·施万登

Burgundy 勃艮第

Burzenland 布尔岑兰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国

Calixtus III 卡利克斯特三世

Capistrano 卡佩斯特拉诺

Casimir the Great 卡齐米日大王

Casimir IV 卡齐米日四世

Castellans 城堡长官

Caupo 考波

Celestine III 塞莱斯廷三世

Charles IV 查理四世

Charles V 查理五世

Charles Robert 查理·罗贝尔

Chaucer 乔叟

Christburg 基督堡

Christiansen，Eric 埃里克·克里斯琴森

Christmemel 克里斯特梅梅尔

Christopher von Munchhausen 克里斯托弗·冯·明希豪森

Cistercians 熙笃会

Clara of Zac 克拉拉·扎奇

Clement VII 克雷芒七世

Conrad of Masovia 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

Conrad of Masovia-Czerski 马佐夫舍-切尔斯基的康拉德

Conrad of Thuringia 图林根方伯康拉德

Conrad von Feuchtwangen 康拉德·冯·福伊希特万格

Conrad von Jungingen 康拉德·冯·容金根

Conrad von Landsberg 康拉德·冯·兰茨贝格

Conrad von Thierberg 康拉德·冯·提尔贝格

Conrad von Thierberg the younger 小康拉德·冯·提尔贝格

Conrad von Wallenrode 康拉德·冯·瓦伦罗德

Conrad Zollner 康拉德·策尔纳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uncil of Basel 巴塞尔会议

Council of Constance 康斯坦茨会议

Council of Pisa 比萨会议

Council of Vienne 维埃纳会议

Cracow 克拉科夫

Crimean Tatars 克里米亚鞑靼人

Cumans 库曼人

Damietta 达米埃塔

Danzig 但泽

Daugava River 道加瓦河

Daumantas 道曼塔斯

David of Gardinas 格罗德诺的大卫

Dietrich von Altenburg 迪特里希·冯·阿尔滕堡

Dietrich von Gruningen 迪特里希·冯·格吕宁根

Dietrich von Schonberg 迪特里希·冯·舍恩贝格

Dietrich von Werthern 迪特里希·冯·韦特恩

Dirschau 迪尔绍

Dlugosz 德乌戈什

Dmitri of Perejslavl 佩列亚斯拉夫公爵德米特里

Dobrin 多布任

Dobriner Order 多布任骑士团

Dominicans 多明我会

Dorpat 多尔帕特

Drang nach Osten 东扩

Duna（see Daugava） 道加瓦河

Dunaburg 杜纳堡（陶格夫匹尔斯）

Dzewa River 德尔文察河

East Prussia 东普鲁士

Egypt 埃及

Eisenstein，Sergei 谢尔盖·爱森斯坦

Elbing 埃尔宾

England 英格兰

Eric IX 埃里克十四世

Ermes 艾尔梅斯

Ermland 瓦尔米亚

Estonia 爱沙尼亚

Fellin 菲林

First Peace of Thorn 《第一次托伦和约》

First Prussian Insurrection 第一次普鲁士叛乱

Fourth Lateran Council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

Franciscans 方济各会

Friedrich Barbarossa 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

Friedrich von Habsburg 弗里德里希·冯·哈布斯堡

Friedrich von Hohenstaufen 弗里德里希·冯·霍亨施陶芬

Friedrich II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I 弗里德里希三世

Friedrich of Saxony 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

Galicia 加利西亚

Galindia 加林迪亚

Gardinas 格罗德诺

Gediminid dynasty 格迪米纳斯王朝

Gediminas 格迪米纳斯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Georg of Saxony 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

Gerhard von Mansfeld 格哈德·冯·曼斯菲尔德

German master 德意志团长

German Order 德意志骑士团（条顿骑士团）

Gniezno 格涅兹诺

Golden Bull of Rimini 《里米尼金玺诏书》

Golden Horde 金帐汗国

Gotland 哥得兰岛

Gotthard Kettler 戈特哈德·凯特勒

Grand Chapter 骑士团大会

Grand Commander 总司令

Grand Master 大团长

Great Poland 大波兰

Great Prince 大公

Great Schism 教会大分裂

Gregory IX 格列高利九世

Gregory X 格列高利十世

Guillaume de Machaut 纪尧姆·德·马肖

Grunwald 格伦瓦德

Gunzelin of Schwerin 什未林伯爵贡策林三世

Gunther von Arnstein 贡特尔·冯·阿恩施泰因

Habsburg dynasty 哈布斯堡皇朝

Hanseatic League 汉萨同盟

Hartmann von Heldrungen 哈特曼·冯·黑尔德隆根

Heidenreich Vincke von Overberg 海登莱希·芬克·冯·奥弗贝格

Heilsberg 海尔斯贝格

Heinrich VI 亨利六世

Heinrich von Plauen 海因里希·冯·普劳恩

Heinrich von Plotzke 海因里希·冯·普勒茨克

Heinrich of Bavaria，133

Heinrich Reuss von Plauen 海因里希·罗伊斯·冯·普劳恩

Heinrich Reffle von Richtenberg 海因里希·赖夫勒·冯·利希滕贝格

Heinrich von Schwerin 什未林伯爵海因里希

Henry of Derby 德比伯爵亨利

Henry of Lancaster 兰开斯特公爵亨利

Henry of Livonia 立窝尼亚的海因里希

Henryk of Plock 普沃茨克主教亨里克

Henryk of Silesia 西里西亚公爵亨里克四世

Herkus Monte 赫尔库斯·蒙特

Hermann Balk 赫尔曼·巴尔克

Hermann von Buxhoevden 赫尔曼·冯·布克斯赫夫登

Hermann von Salza 赫尔曼·冯·萨尔察

Hermann von Thuringia 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

Hiob，bishop of Pomesania 希奥布，波美萨尼亚主教

Hohenstaufen dynasty 霍亨施陶芬皇朝

Hohenzollern dynasty 霍亨索伦皇朝

Holland，Netherlands 荷兰，尼德兰

Holstein 荷尔斯泰因

Honorius III 霍诺里乌斯三世

Hospitaller Order 医院骑士团

Hussites 胡斯派

Ivan III 伊凡三世

Ivan IV 伊凡三世

Ivan of Galschan 盖尔尚的伊凡

Jadwiga 雅德维加

Jagiello 雅盖沃

Jaroslaw 雅罗斯拉夫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esuits 耶稣会

Jodokus von Hohenstein 约多库斯·冯·霍亨施泰因

Jogaila 雅盖沃

Johann von Posilge 杰日贡的扬

Johann von Tiefen 约翰·冯·蒂芬

John of Bohemia 波希米亚国王约翰

John XXII 约翰二十二世

Juliana 乌里亚娜

Junker class 容克阶级

Kalish 卡卢什

Karabutas 卡里布塔斯

Karl Birger 卡尔·比耶

Karl von Trier 卡尔·冯·特里尔

Karlstejn 卡尔施泰因

Kaunas 考纳斯

Kestutis 科斯图提斯

Khans 可汗

Kiev 基辅

Konigsberg 柯尼斯堡

Konitz 科尼茨

Kremlin 克里姆林

Kujavia 库亚维

Kurland Bay 库尔兰湾

Kurland，Kurs 库尔兰

Labiau 拉比奥

Ladislas of Oppeln 奥波莱公爵瓦迪斯瓦夫

Ladilas the Short 矮子瓦迪斯瓦夫

Ladislas of Masvoia 马佐夫舍的瓦迪斯瓦夫

Ladoga，Lake 拉多加湖

Lady Mary 圣母玛利亚

Leal 利胡拉

Lekno 温克诺

Leopold of Austria 奥地利的利奥波德

Lev of Galicia 加利西亚的列夫一世

Leszek the Black “黑色”的莱谢克二世

Liegnitz 列格尼卡

Lithuania 立陶宛

Livonia 立窝尼亚

Livonian Confederation 立窝尼亚同盟

Livonian master 立窝尼亚团长

Livonian Orde 立窝尼亚骑士团

Louis IV 路德维希四世

Louis the Great 拉约什大王

Louis Jagiellon 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

Louis of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边疆伯爵路德维希六世

Louis of Thuringia 图林根方伯路德维希四世

Louis von Erlichshausen 路德维希·冯·埃里希斯豪森

Louis von Leibenzelle 路易斯·冯·莱本蔡勒

Louis von Wittelsbach 路德维希·冯·维特斯巴赫

Louis de Silves 路易斯·德·西尔韦斯

Lubeck 吕贝克

Ludolf Konig 鲁道夫·科尼希

Luther von Braunschweig 路德·冯·不伦瑞克

Magnus of Holstein 荷尔斯泰因公爵马格努斯

Mangold von Sternberg 曼戈尔德·冯·施特恩贝格

Marburg 马尔堡

Marger 马格尔

Marienburg 玛利亚堡

Marienwerder 马林韦尔德

Marco Polo 马可·波罗

Marquard von Salzbach 马夸德·冯·萨尔茨巴赫

Marshal 总军务官

Martin von Golen 马丁·冯·葛林

Masovia 马佐夫舍

Master of the Robes 袍服总管

Matejko，Jan 扬·马泰伊科

Matthias Corvinus 匈雅提·马加什一世

Maximilian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Meinhard 迈因哈德

Meissen 迈森

Memel 梅梅尔

Men-at-arms 披甲战士

Mestwin 梅斯特温

Mewe 格涅夫

Michael Kuchmeister 米夏埃尔·屈希迈斯特

Mindaugas 明道加斯

Ministeriales 家臣

Mitau 米陶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

Mongols 蒙古人

Moravia 摩拉维亚

Moscow 莫斯科

Napoleon 拿破仑

Narew River 纳雷夫河

Narva 纳尔瓦

Nattangia 纳坦吉亚

Nemunas River 涅曼河

Neumark 诺伊马克

Neva River 涅瓦河

Nicholas von Jeroschin 尼古拉斯·冯·叶罗欣

Nicholas Traba 尼古拉·特拉巴

Nicholas V 尼古拉五世

Nicopolis 尼科波利斯

Novgorod 诺夫哥罗德

Nuremberg 纽伦堡

OleŚnicki 奥莱希尼茨基

Oesel 厄泽尔

Ossa River奥萨河

Osterode 奥斯特鲁达

Otto 奥托

Ottokar II 奥托卡二世

Papal legate 教宗特使

Paul II 保罗二世

Paul Watt 保罗·瓦特

Paulus Vladimiri 保卢斯·弗拉基米里

Peipus，Lake 佩普西湖

Peter von Dusburg 彼得·冯·杜斯堡

Peter von Suchenwirt 彼得·冯·苏痕维尔特

Peter’s Pence 彼得税

Philipp de Mezieres 菲利普·德·梅齐埃

Piast dynasty 皮雅斯特王朝

Piccolomini（Aeneas Silvius，Pius II） 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庇护二世）

Plock 普沃茨克

Plowce 普沃夫采

Pogesania 波格萨尼亚

Poland 波兰

Polotsk 波洛茨克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Pomerellia 波美雷利亚

Pomesania 波美萨尼亚

Poppo 博波

Pregel River 普列戈利亚河

Prussia 普鲁士

Przemysl 普热梅斯瓦夫二世

Pskov 普斯科夫

Racibor 拉契波尔

Ragnit 拉格尼特

Racianz 拉西扬茨

Reval 烈韦里

Rhinelanders 莱茵兰人

Riga 里加

Ringaile 林加娃

Royal Prussia 王室普鲁士

Rudau 鲁道

Rudolf von Habsburg 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一世

Ruprecht 鲁普雷希特

Russia，Rus’ 俄罗斯，罗斯

Sallinwerder 萨利纳斯

Sambor 桑博尔

Samland 桑比亚

Samogitia 萨莫吉希亚

Sandomir 桑多梅日

Saracens 撒拉森人

Saule 苏勒河

Scalovia斯卡洛维亚

Schwerin 什未林

Schwetz 施韦茨

Scumand 斯克芒塔斯

Second Peace of Thorn 《第二次托伦和约》

Semgallia 斯米伽利亚

Serbia，Serbs 塞尔维亚

Sieghard von Schwarzburg 西格哈德·冯·施瓦茨堡

Siegfried von Feuchtwangen 西格弗里德·冯·福伊希特万格

Sigismund of Hungary 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

Sigismund，king of Poland 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

Sigismund Augustus 齐格蒙特·奥古斯特

Silesia，Silesians 西里西亚

Skirgaila 斯科盖沃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St.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

St.Barbara 圣白芭蕾

St.Dorothea圣多罗特娅

St.George 圣乔治

St.Wenceslas 圣瓦茨拉夫

Stefan Batory 斯特凡·巴托里

Stensby 斯坦斯比

Stuhm 什图姆

Sudovia 索多维亚

Sventopelk 希维托佩尔克

Svidrigailo 斯威特里盖拉

Sweden 瑞典

Swordbrothers 宝剑骑士团

Tannenberg 坦能堡

Tapiau 塔皮奥

Tatars 鞑靼人

Templars 圣殿骑士团

Teutonic Order 条顿骑士团

Theodoric，missionary 狄奥多里克，传教士

Theodoric of Samland 桑比亚的狄奥多里克

Thorn 托伦

Thuringia 图林根

Tilsit 蒂尔西特

Timur 帖木儿

Tokhtamysh 脱脱迷失

Traidenis 特莱德尼斯

Trakai 特拉凯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Turks 突厥人/土耳其人

Ukraine 乌克兰

Ulrich von Jungingen 乌尔里希·冯·容金根

Urban II 乌尔班二世

Urban VI 乌尔班六世

Venice 威尼斯

Vienna 维也纳

Vikings 维京人

Vilnius 维尔纽斯

Visegrad 维谢格拉德

Vistula River 维斯瓦河

Vogelsang 鸟鸣堡

Volhynia 沃里尼亚

Volquin 福尔克温

Vorskla River 沃尔斯克拉河

Vytautas 维陶塔斯

Vytenis 维泰尼斯

Waldemar II 瓦尔德马二世

Wallachia 瓦拉几亚

Warmia 瓦尔米亚

Weissenstein 魏森施泰因

Welf 韦尔夫

Welun 维隆

Wenceslas II 瓦茨拉夫二世

Wenceslas IV 瓦茨拉夫四世

Wendish Crusade 文德十字军

Werner von Orseln 维尔纳·冯·奥尔森

Wesenberg 魏森贝格

West Prussia 西普鲁士

Westphalia 威斯特法伦

Wilhelm von Furstenburg 威廉·冯·菲斯滕贝格

William of Modena 摩德纳的古列尔莫

Winrich von Kniprode 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

Wizna 维兹纳

Wolter von Plettenberg沃尔特·冯·普莱腾贝格

Zantir 苍蒂尔

Zygimantas 齐格芒塔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条顿骑士团：一部军事史/（美）威廉·厄本（William Urban）著；陆大鹏，刘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5

书名原文：The Teutonic Knights：A Military History

ISBN 978-7-5201-5307-2

Ⅰ.①条… Ⅱ.①威…②陆…③刘… Ⅲ.①军事史-欧洲-中世纪 Ⅳ.①E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43063号

条顿骑士团：一部军事史

著者/〔美〕威廉·厄本（William Urban）

译者/陆大鹏 刘晓晖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徐一彤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3.625 插页：0.5 字数：310千字

版次/2020年5月第1版 202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5307-2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7-8392号

定价/7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项目策划 / 董风云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　涛



ISBN 978-7-5201-5307-2

ELIZA MARIAN BUTLER

The Tyranny of Greece over Germany: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Exercised by Greek Art and Poetry over the Great German Writers of the Eighteenth,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

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

〔英〕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 / 著
林国荣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

(*Eliza Marian Butler*, 1885-1959)

毕业于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德意志问题专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位于俄国和马其顿前线的苏格兰阵营的翻译及医护人员，后任教于剑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是其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初版于1934年，曾遭纳粹毁禁，战后成为英语世界的经典。

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

〔英〕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Eliza Marian Butler）著
林国荣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文前辅文

他将她独置于这间辉煌阔丽的房屋闪耀的古代大理石间。她坐在这圈神像正中，处之茫然，目光停留在那些美丽且未知的面容上；她似乎，在探听它们永恒的静默。至少在罗马，长久观详一列伟大的希腊群像，而无法感应它们高贵的静穆，诚非能事；此等静穆，乃跟随那慢慢关闭的仪典大门，将宁静之气贯注神像躯体，如同缓缓落下的白色幕布。

——亨利·詹姆斯

目录

- 作者附言
- 第一章 概要
- 第二章 发现者：温克尔曼（1717～1768）
  - 希腊今生
  - 罗马
  - 爱欲
  - 宿命
  - 拉奥孔神话
- 第三章 阐释者们：莱辛（1729～1781）与赫尔德（1744～1803）
  - 莱辛现身
  - 拉奥孔再现
  - 赫尔德回应“拉奥孔”
  - 入侵
- 第四章 创造者：歌德（1749～1832）
  - 普罗米修斯
  - 伊菲革涅亚
  - 意大利
  - 温克尔曼的罗马
  - 荷马家族
  - 海伦娜
  - 恶灵
- 第五章 敌对者：席勒（1759～1805）
  - 战败的“巨人”
  - 青年剧
  - 希腊诸神
  - 滚蛋吧！
  - 命运
- 第六章 殉道者：荷尔德林（1770～1843）

    - 伊卡路斯
    - 着魔
    - 狄俄迪玛
    - 苍白的加利利人
    - 斯卡达内利
- 第七章 反叛者：海涅（1797～1856）
    - 路西法
    - 作为鬼魂的诸神
    - 作为魔鬼的诸神
    - 流亡中的诸神
    - 欢迎你，酒神巴克斯！
- 第八章 余波
    - 温克尔曼再生：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
    - 酒神：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 神话家：卡尔·斯皮特勒（1845～1924）
    - 秘法家：斯蒂凡·乔治（1868～1933）
    - 结论
- 原始资料选
- 索引
- 附论 暴政都是人类自己建立起来的

作者附言

本书中的翻译全权由我负责，另有诉及除外。我仿效了所呈现诗篇的原初格律，并保持其韵律；但结果远难令人满意，尤其在摘取自歌德和荷尔德林的段落中。

非常愉快的是，我得以借此机会向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J.贝肯（J.Bacon）女士和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E.K.本内特（E.K.Bennet）先生致谢，感谢他们给我的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我也永远感谢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的慷慨和支持，并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审和工作人员，感谢他们诸多的善举和勉励。我常常在想，世人不过是一群在冷硬的事实孤岛之上四处晃荡的孩子，大多数人背对大海，不知懈怠地在沙滩上挖掘着、建造着。他们劳作甚多，所成甚少，即便是这些可怜的成就，通常也都经不起风浪的吹打，要么只留下一些残迹，要么就干脆什么都没留下，于是，他们便只能改换场所，从头再来。更富冒险精神的人会聚集在水边，在那里游走、摸索，胆子更大一些的，也许会尝试在那水中游上一游。他们当中的聪明人会制造出原始的木筏，那些勇敢之士则将自己的性命托付给这样的水上工具，奋力尝试在那木筏进水并沉没之前回归陆地。也会有那么一些人，会选择远离此一纷繁喧嚣的人世劳作场景，木然注视着海洋，仿佛完全沉浸在海洋的奇异、神秘和威慑力量当中了。一般而言，这样的人并不会像常人那样讨人喜欢；他们表情阴郁，姿势紧张，似乎是在告诉人们，他们不能像其他人那样适应这事实孤岛之上的生活；不过好在只要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梦想当中，他们也就不会制造什么麻烦。

第一章 概要

现代欧洲大地之上的德意志族群，一度就是此一场景当中的那群孩子，它将那孤岛视为世界，将那海洋视为未知的绝对权能。德意志人素来就对所谓绝对者抱持一种绝望的激情，无论这绝对者叫什么，也无论这绝对者以怎样的形象现身。当然，俄国人会抱持更为怪异的意象，法兰西人则更有能力将抽象观念熔铸于具体的政治制度当中；但德意志人有着独一无二的激情去追寻理念，并以同样独一无二的激情去将理念转化为事实。德意志人拥有伟大的成就、灾难性的失败以及悲剧性的政治史，这一切的一切，都灌注了德意志人那危险的唯心情怀。世人通常都是环境的受害者，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德意志人却是观念的奴仆。

德意志人不具备自我防护的能力和意识，此一怪异情状已然在德意志文学中留下烙印。在一段又一段的漫长时光中，他们满足于卑躬屈膝地模仿外人，时刻受制于全然失衡的热情。在种种格言警句、风尚以及审美理论面前，他们通常都会无可挽回地俯首称臣。这一切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也正是因为缺乏自我防护的能力和意识，极具创造性的优美作品得以产生，那样的作品充满了斯芬克斯式的魅惑，并且极富哲学意涵。一般而言，都是诗人创造生活景观，但是德意志人却要向哲学家寻求灵感。歌德的天才乃是斯宾诺莎养育而出的；席勒总是要跟康德缠斗；浪漫派诗人深深浸润在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世界中；黑格尔则主宰着青年德意志运动；瓦格纳和尼采更成了叔本华的子嗣。德意志诗人站在哲学家的肩膀上才能去观看这个世界；确切地说，德意志诗人总是要在绝对真理的王国当中，才能展开对绝对之美的追随历程。

为什么文艺复兴在德意志采取了宗教改革这一形态，这就是根本症结所在。尽管那一时期，诗性之美、艺术之美以及生活之美在欧洲其他地方得以重生，但那样的美根本就难以触动德意志。对路德那深沉且阴郁的心灵来说，“真”的分量是“美”远远不能比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不可能教会一个人如何拯救灵魂。天主教会也是一样。众所周知，正是此一发现，令哲学得以逐渐篡取原本由宗教为诗人履行的精神权能。将罗马天主教同德意志人剥离开来，路德也就等于夺走了曾经养育了德意志神秘主义并扶持了德意志美感的那套体系，这套体系也曾执掌德意志信仰。简言之，路德摧毁了基督教的神话元素，正是这样的神话元素将真和美诗性地融合起来，此后，德意志人便一直试图在希腊神话或日耳曼神话中寻找这样的诗性融合，为此，德意志人甚至尝试过回归天主教信仰。思想自由，是路德此一成就的题中之意，令科学和哲学受益无穷；而德意志诗人却因这一解放行动遭遇创伤。无论是不是怀疑主义者（德意志的伟大诗人大多数都是怀疑主义者），德意志诗人都发现，路德传递下来的基督教已经完全剥离了美的元素，同时也缺乏深沉的神秘主义元素，哲学则顺势取而代之。

宗教改革在诗歌王国引发的直接结果就是民众传统的陨落，此种境遇之下，德意志人强固的族群品性也不免一同归于殒殁；毕竟，此一时期的德意志族群品性和传统仍处在胚芽期，尚且不足以抵御此等精神变故以及随之而起的三十年战争的大灾难。此等情境之下，域外力量纷纷涌入德意志，将之吞噬，特别是巴洛克元素在德意志展示出极为夸张且怪异的形态，差不多窒息了德意志诗歌的生命力。17世纪，倒也有一批神秘主义者写就了怪异且不乏美感的宗教诗歌；一个纯而又纯的抒情诗人在德意志大地上生活过、犯罪过、受罪过并吟唱过；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书写了一部伟大的散文体小说；一个悲剧作家创制出强劲、奇异、狂热的天问剧，灵肉二元论的痛楚观念在这些剧中纠结着、翻腾着，这也正是时代精神格局的伟大写照。怪诞的表情、颤抖且尖利的声声嘶叫，指向同样的道德世界。然而，总体而论，情感之贫乏到了令人

难以置信的地步，还有那昂扬肆意的欲念、机敏、精湛的技巧、怪异的散文、山一样的学识、鼠一样的智慧，这一切真正刻画了17世纪德意志的文学劳作。

18世纪早期，德意志的精神钟摆向着戈特舍得（Gottsched）予以阐发的法国人的理智和品位摆动；然而，当瑞士人葛莫利·博德摩尔（Gemelli Bodmer）和布赖廷格尔（Breitinger）举起大旗，为想象力和神奇诗性高声鼓噪之时，德意志的精神钟摆又开始犹疑了。1748年，克洛普斯托克（Klopstock）的《梅希亚斯》（*Messias* ）前三篇问世，诗篇当中奔涌着激情和乐感，如同洪流一般，喷薄而出，涌入洛可可节律那贫瘠荒漠当中。德意志文学仿佛迎来了伟大的复生之机。这场大复兴浪潮究竟会采取怎样的具体形态，这一点从狂飙突进时期的歌德身上便不难窥见一斑。温克尔曼正是在此一时期，为德意志人找到了美的绝对标尺，也就是那所谓的希腊标尺，此一标尺在德意志人心目中是完美的，并且自那时起便一直令德意志诗人魂牵梦绕。温克尔曼的此一发现堪称奇迹，一个人无须成为德意志人，便尽可以体味该发现所激发的灵感的性质。

倘若让我来修一部1700年以降的德意志文学史，那我便只能从这个角度入手。在我看来，温克尔曼的希腊乃是18世纪下半叶和整个19世纪促动德意志诗歌进程的本质要素。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整体重演，只不过舞台设置在德意志，此一时期的德意志之接纳此等运动潮流，自然不同于欧洲其他地方。在这场大复兴运动中，如果说希腊人是暴君，那么德意志人便是注定了的奴隶。这样一个希腊深刻影响了现代文明的整体走向，希腊的思想、标准、文学形式、意象、视野和梦想，只要是世人能够寻获的，都在这场运动中发挥出足够的威力。然而，在此一纵横四海的希腊影响力潮流当中，德意志成为至高典范，以一己之身见证了这场希腊精神暴政的大跃进。德意志人以无出其右的奴隶态度效仿希腊；希腊精神最为彻底地渗透并征服了德意志人的精神和梦境，同时，德意

志人较之其他任何族群更为彻底地吸纳了希腊精神。简言之，希腊精神之欧洲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不过，其烈度在德意志臻于顶峰。

画布并非只有一面。任何暴政都是要催生反抗的；希腊诗歌的异域之美，当然也会催生强劲抵抗，这样的抵抗已然在欧洲文学血脉当中留下鲜明印记。“古今之争”在许多国家都有回响。莎士比亚对荷马英雄的仇恨已然明确呈现在《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当中，并且他也凭借这部剧作展现出强有力的反抗势头。确实，希腊人的荣光呈现出横扫一切的态势，但植根于希腊人的此一精神挑战也在莎士比亚这里得到了强劲回应。在这场反抗潮流中，德意志人表现出来的烈度非他人所能及，那样的反抗堪称暴烈。浪漫派诗人和自然主义作家以极端态势，力求解脱希腊暴政，然而，如此暴烈的反抗行动，不免迅速沦落衰朽，最终，反而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满血而归。如果说诸如弥尔顿和拉辛这样的诗人也接纳了希腊精神的深刻影响，那也只能说，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对希腊精神予以剖析，予以揭示。而德意志人则以英雄姿态全然承受了那可怕的希腊精神权能，仿佛那是德意志的宿命，也只有德意志人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本书就是以这个角度为基点展开的，论题宏大，当然会有大量材料无从处理。材料来源问题更是难以触碰。不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歌德的《伊菲革涅亚》对欧里庇得斯的法文版同名剧作有颇多借重，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处理。温克尔曼及其追随者总体上误解了希腊诗歌和艺术的特性，这一点时常有人提起，但温克尔曼及其追随者究竟对希腊人有着怎样的切实了解，这个问题倒是鲜有人提起。不过，切实知识绝少能提供灵感；理想，尽管并不切实，却是具备激发能量的，特别是对德意志心灵，而本书欲意考量的，正是此种激发能量。本书提及众多诗人的作品，此类作品于一个希腊主义者而言当然是有特殊魅力的，但这不是本书要关注的。德意志人尽可能地向着希腊标尺靠拢，这其中的成败，也不是我要关注的。我关注的是，希腊人如何影响德意志人，而非

德意志人如何利用希腊人。毕竟，本书并不是一部德意志古典运动史。倘若要书写一部德意志古典运动史，就必须将大量的批评、翻译以及研究作品囊括进来，还有一堆相应的诗歌作品以及大量的古典学论章不能忽略，但本书无意于此，对此类作品也就一掠而过了。希腊影响力之于德意志文学的伸张范围及其进行并非本书主题。因此，维兰德（Wieland）、施莱格尔兄弟（Schlegels）、格里尔帕泽（Grillparzer）以及普拉滕（Platen）之辈，本书也只能予以蜻蜓点水式的处理。歌德借《诸神、英雄和维兰德》（*Gods，Heroes and Wieland* ）向维兰德的《阿尔刻提斯》（*Alcestis* ）发难，引发了那场著名的争吵，不过，本书自然也没有工夫处理这场争吵。本书要考量的乃是希腊精神暴政之于一些伟大德意志人的烈度和性质。因此，本书选材的标准可以说全部取决于这些德意志伟大人物的个体命运。莱辛、赫尔德以及施皮特勒这样的人物实际上并未承受此一希腊宿命，本书之所以引入此类人物，乃是因为是他们将一种特殊意向赋予了此一拥有强大潜能的理想，而这一理想改变了他人的精神生活。本书本想更为详尽地处理尼采，但受制于篇幅，此一规划未能成行。在这个环节上，我最终给出的结论是：真正给温克尔曼的希腊理想以致命一击的人并非尼采，而是海涅，尼采则是海涅引入的新理想范式的第一位受害者。当然，这个结论在本书所提诸多申述当中，引发了最大的争议。因此，尼采在本书中也就无从据有主人公位置。最后，德意志生命和心灵拥有难以尽数的面相，我则主要关切其中的一个面相，因此，一定程度的风格化处理是无可避免的。本书论题实际上是极为复杂的，但作为一个完整论题，本书则是以概要的方式予以简化处理，力争将大致轮廓厘清并呈现出来。若是能大致上将德意志特性呈现出来，我就满足了，不管怎么说，我会尽力而为。倘若本书给人以电闪雷鸣般的感受，那是论题本身的缘故，与作者无关。德意志人善于制造这样的效应，他们并不通晓世事之艰深，而且似乎也不曾意识到观念或者理想会招致何等危险。

那群在想象孤岛之上四处逡巡的孤独孩童最终集结起来，以集体态

势同其他人展开游戏。他们挖掘得越来越深，但所成越来越少；他们游得越来越快，但始终在原地打转；他们建造了大船，但船很快就沉没了；他们不能也不愿接纳不同的游戏规则。但是，他们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此类事情关涉海洋之本性。

第二章 发现者：温克尔曼（**1717～1768**）

奇异的异域旅行计划时时划过心头……他渴望找回丢失的东西，无意发现新东西。

——沃尔特·帕特（Walter Pater）

《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

希腊今生

两面山墙支撑而起的一处基座上面，矗立着一个有着浅浮雕装饰的底座。一座由四头狮的爪子支撑起来的棺材就放置在此一底座上；温克尔曼的阿加托达蒙斜倚着棺材，正因痛失爱人而悲恸，他怀抱一副盾牌，盾牌上雕刻着爱人的肖像。底座浮雕所呈现的是温克尔曼手持火炬走向一座金字塔，金字塔前面堆积着希腊、埃及、罗马以及埃特鲁斯坎的古物。温克尔曼身后则跟随着绘画女神、雕刻女神、建筑女神、历史女神、批评女神、哲学女神以及考古女神。[1]

这就是后人给一个人物树立的纪念物，正是此人召唤那已然沉没的世界，令其重见天日，进驻18世纪的世事和生活。此人制造的暴烈潮流自诞生之后，便再也没有全然消退，仍然冲刷着20世纪的海滩；他的一切劳作乃是依从一种本能展开的，此种本能世人只有部分体认，也正因如此，此类劳作极具效能。他的个体存在已然是遥远之事，如今只能依凭其深藏不露的意图来洞悉其人，而那宿命却也正是借由此人而得以创生，这个创造宿命的进程依然不曾有过停歇。

J.J.温克尔曼，生于1717年12月9日，家境贫寒，父亲是阿尔特马克地区施滕达尔的鞋匠，温克尔曼是家中独子，在单间草棚当中长大，其实就是鞋匠铺，这个铺子同时也是卧室、餐厅和客厅。幼年的温克尔曼对自己的贫寒出身并无意识，不过很快，他的行为便展现出怪异之处，他甚至有了投胎重生的奇特念头。他再三请求父母让他接受教育，那样的教育既超出了父母的财力，也超出了父母的见识。温克尔曼顽固地拒绝子承父业。他的空闲时间都用于挖掘施滕达尔城外沙丘下的墓葬器皿，他对此颇为狂热。他对身边触目可见的哥特建筑之美视而不见，相反，他会耗费数小时，安坐不动，埋头攻读《骑士之域》，这是一份贵

族世家编纂的百科全书式的东西，里面记录并讲解了一些遗迹。希腊文字令温克尔曼血脉贲张，在迅速吸收了当地老师们那可怜的《新约》知识之后，十七岁的温克尔曼动身前往柏林，投身基督徒托比亚斯·达姆（Tobias Damm）门下。当时，崇拉丁抑希腊之风正席卷德意志，希腊语和希腊文学几乎完全被人遗忘，在世之人，仅有寥寥数人崇希腊抑拉丁，达姆就是其中之一。两年之后，温克尔曼一路跋涉前往汉堡，1738年2月17日，约翰·阿尔伯特·法布里西乌斯（Johann Albert Fabricius）的著名藏品将要拍卖，温克尔曼希望能买到几份精美的古典文本。热情催动天才，他不虚此行。无可满足的求知欲催动他踏上求知路，从施滕达尔到柏林到萨尔茨维德尔，再到哈勒再到耶拿。温克尔曼就这样以热忱之心钻研一切学问，但神学除外；对神学，温克尔曼的憎恶是无可遏制的，尽管他名义上还是一名神学院学生，并且神父一职还在等待他去争取。《圣经》课堂和教堂布道是此一时期温克尔曼身边的生活氛围，不过，他兀自沉浸于古代作家，此一工作也不是一直都在秘密进行。在离开大学之前，温克尔曼便酝酿起逃离德意志。1741年，他离开耶拿前往巴黎，这一次依然是一路跋涉，历尽艰辛。在抵达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之时，他无力前行，只得折返。

他身上的情感，无论好恶，都臻于暴烈程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那不教自会的渴望以及那无以解释的躁动不安，背后的动力究竟何在？难道温克尔曼真是一个希腊人，只不过生错了地方，生错了时间吗？他在德意志大地四处游荡，难道真的是要如此盲目地让自己的身体找到回家的路，返回希腊吗？他细心挖掘埋葬在地下的古物，尽心学习一门已经被人忘却的语言，对他来说，这门语言并没有死亡。这一切是为了让自己的精神也找到回家的路，返回希腊吗？

历次关口上，他总是因为贫困而遭遇挫败。在仍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资助的年龄，他有父母支撑他。他也尽显男子汉的担当，几乎祛除了生活中的一切舒适和享受，唯有青灯古卷为伴，他是孝子。此等境遇

之下，他不得不接受私人教师这一差事，以便赚取薄酬，维持生计。他在哈勒和耶拿之间的奥斯特堡担任了一年的家庭教师，对方是格罗尔曼（Grollmann）家族；大学毕业之时，他于1742年在哈德墨斯莱本找到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对方是兰普雷希特（Lamprecht）家族。也就是在哈德墨斯莱本，他身上的另一重大倾向开始显现出来：他对男人之间的友爱有着强烈本能。温克尔曼天生仰慕俊美的男青年，并且非常喜欢教导有前途的年轻人，不止一个作家从中看出了他同苏格拉底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他本人奉希腊英雄人物之间的友爱——诸如忒修斯和皮里托厄斯之间的友爱、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洛斯之间的友爱——为异教英雄友爱之典范，这样的友爱同爱情是难以甄别开来的，他对此等友爱颇为欣悦。尽管屡遭挫败，但他一直都在追寻与自己心性相合的精神，从一开始，此一追寻过程就穿插了一种阴郁的情愫，此种情愫显然是德意志式的，而非希腊式的。

他同年轻的兰普雷希特的这份情缘，足以立为存照：开始时是迷醉和狂喜，接下来便是阴沉和哀伤，最终则是令人痛楚的心灰意冷。后来的任何一段关系都不曾像这段关系那般痛彻心扉，对这段早年情缘的记忆挥之不去，伴随他终生。1763年，温克尔曼还对兰普雷希特念念不忘，他说他在兰普雷希特身上燃烧了自己，耗尽了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爱情，兰普雷希特对他从来都没有感恩之心，但他还是从来没有忘记兰普雷希特。1765年，他说兰普雷希特是他没齿难忘的朋友，是他最初的爱，也是唯一的爱。“我希望在幽暗和寂静当中深深沉陷，”1748年，他用法语致信兰普雷希特，“我希望能摆脱这种激情，它让我灵魂难安。”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温克尔曼还是时常跟兰普雷希特会面，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后者，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755年，尽管早在1743年危机迹象就已经很明显了。1743年3月，博伊森（Boysen），温克尔曼大学时期的一个朋友，在从希豪森到马格德堡的路上，发现温克尔曼在哈德墨斯莱本附近的一家旅店里面等候他。此时，两人只是几年没见，温克尔曼已然悲伤至形容枯槁，博伊森差点没

认出他来。此番场景令博伊森心生悲痛，温克尔曼以哀婉之态向这位震惊不已的友人提起恳请，希望博伊森从中举荐，为自己争取希豪森一个学校的校长职位，因为博伊森刚刚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此等哀求，博伊森无从抗拒。开弓没有回头箭，温克尔曼就此离开兰普雷希特家族，在乡村校长的职位上度过了五年荒寂时光。这也是一段磨难和奴役时光，每每回想起来，温克尔曼都颤抖不已。的确，温克尔曼已然处于命运的谷底。如果说白天的时间温克尔曼只能用来“教那些毛头孩童识文断字”的话，这样的时光也实在是惨淡，不过，夜晚则是温克尔曼自己的，这样的时光实在是享受，无以言表。在寒冷的冬季，温克尔曼会穿着破旧的皮衣，舒适地蜷缩在扶手椅上，旁边生上一堆火，他将如此舒适的时光变成他所钟爱的希腊时光，直到午夜的钟声响起。接着他就在扶手椅上睡去，从午夜时分一直到凌晨四点，而后又是两个小时的希腊时光，六点钟声响起，他就该起身上课去了。夏季时光，温克尔曼会睡在长凳上，担心不能按时醒来，他便将木块系在脚上，只要他稍微一动，木块就会掉落，那声音会将他吵醒。此时，希腊文学在欧洲已经沦落放逐之地，并且这样的放逐时光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如今，终于有人来敲门了，希腊文学将迎来重生之机。在那样的时代，获得希腊文本难上加难。然而，在阿尔特马克这座荒寂边城，一个衣衫褴褛、境遇凄惨的年轻乡村校长，却在贪婪地阅读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色诺芬、柏拉图和希罗多德，并且读的还是原文。这个年轻人在每个午夜时分，都能见证那奇妙的希腊异象。且让他如此单纯、如此执着下去吧，他会让这些幻梦成为现实的。

这凄惨的外在境遇最终还是动摇了，略略让步了。温克尔曼成功申请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为布瑙（Bünau）公爵效劳，公爵家就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诺特尼茨堡。1748年8月10日，温克尔曼得以逃离希豪森。逃离之时，他满身心都是对普鲁士无法磨灭的恨，同时还有对个人自由和独立的无限激情，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那凄惨的贫困同高翔的雄心之间的落差砥砺而成的。从此以后，人之幸福在他这里便概括为两个

语词——自由和友爱，并且永远都挂在他嘴边。他一直在同凄惨的境遇抗争，同命运抗争，此时，可以说他几乎是奇迹般地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由此，他得以从彻底的幽暗之地和悲凉的奴役境地脱身而出，进入一个更大更自由的世界。此时的温克尔曼已经得到了一个富有且仁慈的恩主，况且，德累斯顿还拥有德意志最具教养、最热爱艺术的宫廷。接下来的七年时光中，温克尔曼将主要精力用于襄助公爵搜集整理相关材料，这些材料最终成就了《德意志帝国和皇帝史略》（*History of the German Empire and Emperors* ）。不过，在萨克森，他的重大体验关乎审美，而非智识。在德累斯顿，温克尔曼全副身心地浸润于巴洛克艺术，同时，他也在试探另一个艺术王国。那恢宏的“茨温格宫”（仅仅是这个著名的建筑艺术群就足够了），还有那“大花园”（当时，“大花园”拥有一百五十多座大理石雕像，它们出自意大利、法国和德意志的贝尔尼尼模仿者之手），这一切都给温克尔曼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令他不敢直视。要是想见识一下绘画艺术，他尽可以去观瞻霍尔贝因、科雷焦、维罗奈、提香的作品，还有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这些都尽显在画廊当中。“大花园”的凉亭、谷仓当中，还有数不清的、很多都看不到的古代艺术珍品。据温克尔曼后来回忆，那些雕像就如同木排之间的青鱼，拥挤成堆，此等乱象只能观瞻，观者无法展开思考。要体认希腊之美，温克尔曼就必须前往博物馆，细心研究刻有铭文的珠宝的复制品。实际上，他不曾真正体认这些绘画和建筑，巴洛克雕刻作品在他身边掀起一阵狂风骤雨，但他的本能不曾有过一刻动摇。显然，对温克尔曼来说，那幽暗的凉亭，那不见天日的博物馆，较之“大花园”那醉人的阳光，更为甜美，更胜一筹。他几乎是以暴烈态度拒斥巴洛克艺术，尤其是贝尔尼尼及其全部作品，这就再次证明了他内心的激情是毫无妥协、毫无动摇可言的，这激情，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催动他踏上当年那条通往希腊的回家之路。

在德累斯顿的境遇以及他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较之一直困扰着他的生存困境，在他的生涯中扮演了更为深重的宿命角色。在这座萨克森

都城，他的本能偏离了原初的轨道。奥古斯都三世（1733～1763年在位）及其王后（一个奥地利公主），以及整个萨克森宫廷，要么是归附了罗马天主教，要么一开始就是天主教徒。1751年6月29日，宫廷教堂接受了王家忏悔神父列奥·劳赫（Leo Rauch）的祝福；来自意大利的教皇使节阿尔钦托（Archinto）公爵进驻宫廷。整个德累斯顿都不免望向罗马。温克尔曼得以将自己的激情同意大利和罗马勾连起来，这是必然之事，不过也是依托了此一出其不意的机缘。要说温克尔曼此时相信罗马就是他的麦加，那也只能说，他并非真正了解自己；在那样的时代和境况下，温克尔曼生出此等信念是令人吃惊的。当时的罗马乃是古典艺术独一无二的聚集之地，在随后很多代人的时间里，也是如此；著名的罗马七丘，难以计数的纪念碑、建筑以及雕像，这一切令众人的眼光无从逾越罗马，无从探视远在罗马之外的雅典和希腊诸岛。这样的罗马成了一座辉煌、壮观、令人流连忘返的中途客栈，极具震慑力，令每年如潮水般涌来的游客停驻在此，只有极少数人会选择继续前行。温克尔曼就在这极少数前行者之列，这一点一看即知，他内在的激情必然催动他向着一切希腊元素奔赴而去。他是命定了要有这么一趟游历的，在那个时代的活人当中，此一激情在他身上恐怕是最具烈度的。当然，在德累斯顿期间，罗马乃是他全部希望和欲念的唯一目标，不过，罗马不可能永远留住他。他自己也曾经谈起，这个世界上，毕竟有一种催人前行的力量，他肯定是要展开一趟面向希腊的朝圣之旅的。

要成就一番事业，刚正品性乃是不可或缺的。为此，温克尔曼必须清楚认识自己，也必须清楚认识自己的目标和局限，并决绝摆脱一切可能伤害并瓦解自我的妥协和冲突。然而，温克尔曼全然在他那内在本能的催动之下，而这一本能力量的指向却发生了偏移。温克尔曼为了逃离德意志大地，竟然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刚正品性。他迈出了这错误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而且，这一步迈出去，会是非常不祥的，因为这一步之误乃是双重意义上的。他为此选择了归附天主教，而他这么做，却是为了罗马。后来他也曾谈及此事，他说，他愿意牺牲一

个手指，愿意成为一名西比林（Cybele）祭司，为的是能看一眼希腊。此举无所谓牺牲，肯定也谈不上背叛，毕竟，这样一个在一切布道时间里都阅读荷马的人，骨子里当然是个异教徒。不过，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温克尔曼一直都在公开拥抱一切形式的基督教信仰，这样的举动可以说是直截掩盖或者否认了自己的真实信念。温克尔曼这样的人，可以一直都是好的新教徒，不过，他也完全可以转换身份，成为一个好的天主教徒，这不会对他的道德品性造成太大冲击；所谓“改宗”，只不过是一个强行打进他此前一直特别完整的道德品性当中的楔子而已。他有关这个话题的信件都很含混，相关的说辞并不平顺而且变幻难测。他不想因为显得忘恩负义而得罪布瑙公爵；他也害怕因此失去朋友的资助；当然，他也痛恨为着物质考量而选择精神依附。精神上的依附是十分可怕的，他一度完全拒绝考虑此事。因此，罗马从他的愿景中黯淡下去，最终消失不见。温克尔曼不免大病一场。看起来，没有别的出路了，要么死去，要么去罗马。劳赫和阿尔钦托都不再为他提供保障，因此，除非改宗天主教，否则他就无从指望得到生存和资金上的支持了。也就是说，唯有改宗天主教，他才有可能顺利展开一趟希腊朝圣之旅，才有可能见识希腊的大理石神像。罗马的诱惑最终胜出。温克尔曼决定“当一回伪君子”，以便达成所愿。1754年7月11日，他归附天主教；随后，他以尖刻之词发泄自己的怨气，对改宗仪式大加嘲讽。很幸运，这令我们得以洞见事情的另一面。“终于搞定了，”1755年7月25日，他致信友人贝伦迪斯（Berendis）说，“我得到了我一直在找寻的东西……自由和友爱一直都是我的伟大目标，这决定了我的一切行动。现在，自由终于到手了。”

1754年10月，温克尔曼放弃了诺特尼茨的职位迁居德累斯顿，同画家厄泽尔（Oeser）建立了密切交往。在厄泽尔的启发和影响下，温克尔曼于1755年6月写就了《略论对希腊绘画和雕刻作品的模仿》（*Thought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这本小册子内容精细且极具冲击力，的确是植根于同厄泽尔的一系列美

学探讨，是一面反巴洛克旗帜；反巴洛克运动刚刚开启，温克尔曼为其领袖。抛出这枚炸弹之后，温克尔曼于1755年9月15日离开德累斯顿前往罗马。他恳求兰普雷希特陪伴他，由自己负责全部开销，还承诺兰普雷希特能在罗马赚上一笔，但都没有起丝毫作用。兰普雷希特没有离开德意志；温克尔曼遂同一名年轻的耶稣会士前往罗马，从此同兰普雷希特断了联系。

---

[1] 温克尔曼的纪念碑坐落在的里雅斯特的奇石之苑。这座纪念碑出自威尼斯雕刻家安东尼奥·博萨（Antonio Bosa）之手，是1832年树立起来的。复制品可见*Il Sepolcro de Winckelmann in Trieste* ，Venice，1823。

罗马

罗马出现了一个特异人物，他很少抛头露面，不过，要比四处游走的主教们和权位追逐者们更具分量。这是一个德意志神父，先后攀附枢机主教阿尔钦托、亚历山德罗·阿尔巴尼，是典型的德意志学究、谦卑的随从，靠恩主为生，在其权贵朋友中寻求逢迎之道；一个犬儒中人，爱享受，嗅觉灵敏，攀上富有且颇具才学的画家拉斐尔·门斯，不过，对待罗马艺术家和古物家，却是一番怪异态度。在罗马，这名德意志神父日日埋头书册，尽管他并不爱好文学；日日勘察艺术作品，到处攀爬雕像基座，深入古物洞穴，尽管他不是艺术家。他在做什么？意欲何为？罗马人尽管没有真正弄明白这一切，但他们自有答案，因为此时，这位德意志神父写就了《古代艺术史》前几卷，而且，罗马人也已经明白了，在18世纪浮泛的艺术汪洋当中，这个叫作温克尔曼的德意志神父发现了失落已久的古代艺术。[1]

此番迷人叙事全然应和了温克尔曼早期罗马信笺当中传递的印象。温克尔曼刚刚从囹圄中获救，开始的这段岁月于他而言实在是惬意且幸福，于是他整个人便不免浸染在一片身心虚骄的氛围当中。倘若只是读一下他前罗马时期的生平传记，并亲眼在罗马见到此人，必定会大为吃惊。早期信笺并不是很多，基本上都是围绕改宗话题展开的，没有充斥于罗马信笺那种尖利的嘲讽之音。卡尔·尤斯蒂（Carl Justi），温克尔曼的传记作家，可以说是令人敬慕的，不过这位传记作家对此类尖利之音也不是全都听得见；至于歌德和帕特绘制的温克尔曼肖像，则更是展现出一个希腊艺术的单纯爱好者拥有高贵灵魂，仿佛从那面容当中就能够洞见一个单纯且自决之人，然而，这样一个人，虽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单纯，但也难免尖刻甚至卑贱。是生活改变了那个年轻的乡村校长吗？这不是那个为了阅读索福克勒斯而同睡眠抗争的年轻人吗？可能是因为他

出离囹圄的时间太晚了，也可能是因为改宗一事对他造成的创伤如今开始发作，毒害了他的心灵。但不管是何情由，从这些信笺来判断，他差不多四十岁时并非一个富有魅力之人。

必须考虑到温克尔曼高度窘迫的经济状况，这是很重要的因素。萨克森宫廷每年为他提供约三十英镑的津贴。这笔可怜的津贴最初只有两年期限。尽管此一期限一直延展到1763年，但温克尔曼显然不能靠这点儿钱支撑下去，而且即便是这点儿钱，更多时候也是劳赫（Rauch）神父自掏腰包提供给他的。因此，温克尔曼不得不向权贵圈子祈援。其实，这也没什么可羞耻的，可能是因为他禀性当中那种怪异的反复无常，他经常对此类恩惠展示出蔑视的态度，甚至会否认自己接受过此类恩惠。也不能说温克尔曼天生就不知感恩。他也会坦率意识到别人有恩于自己，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更为迅速地承认这一点，或者说，在这方面，可能任何人都比他更为健忘。他对布瑙公爵的感恩之心就经久不去，而且表达得也是情真意切，这是他性格当中令人欣然的一面。然而，他的性格有着多重面相，而且还彼此矛盾。他不能忍受那种有可能降低自己的尊严并削弱自己独立地位的恩惠。在这个问题上，他极度敏感。抵达罗马之时，他的境况非常糟糕，他根本无法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维持独立。因此，他决定全副身心地致力于艺术研究，不把时间耗费在维系身体和灵魂的事务上，这样的事情毕竟太费心神了。此举相当明智，他就可以享受寄生虫的一切优势，但又不必对任何人感恩。确切地说，他就没必要为生计操劳，同时也没必要对施舍之人感恩戴德。实际上，在同枢机主教阿尔钦托的交往中，他对此类彼此矛盾的需求就已经有了明显感受。这位昔日的教皇使节此时已经回归罗马，愿意在这位德意志改宗者面前扮演米西奈斯的角色，并且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在温克尔曼眼中，这不过是令他感到羞辱而已，因此他对此一直秉持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憎恶态度，并尽可能地疏远枢机主教大人。他先同画家拉斐尔·门斯共处了一段时间，省去了不少生活开支，并同这位画家结下了深厚友谊，而后又接受了一名丹麦雕刻家的好意。不过，即便是这样，

三十英镑的年度津贴很快便耗尽了。最后，他不得不接近阿尔钦托，后者表示热情欢迎，并在自己的府邸为温克尔曼提供了一间住所。温克尔曼非常为难地婉拒了此一邀请。他向老朋友贝伦迪斯天真地解释了这件事情，他说他的境况已经好转了，在一位丹麦雕刻家那里有免费的住宿之地。在改宗危机期间，贝伦迪斯就已经是他的密友，此时则依然在德意志扮演一个遥远的倾听者的角色。不过，可能是因为丹麦人厌倦了此等善举，也可能是因为温克尔曼手头太需要钱了，几个月后，温克尔曼主动向阿尔钦托申请搬进枢机主教的府邸居住，并义务为阿尔钦托料理图书室。这是温克尔曼自己的讲述，他说，此举“是顾及枢机主教大人的面子，而不是相反”。此后，温克尔曼经常强调这一点，而且态度相当坚决，这就不禁令人怀疑整个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但不管真相如何，他对待恩主如此刻薄，而且讲述起来更是洋洋自得，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1757年5月12日，在给布瑙公爵的信中，温克尔曼写道：

> 以前没有去过枢机主教大人府邸的客厅，几个月前，我在那里等候他，等了有一两个小时之久，于是我告诉在场的人说，我这个人很珍惜时间，每一个理性造物都应当如此。我还说，就这么数着客厅里的石头，空耗时间，这有违我的尊严。而且我也并不隐讳，在场众人当中，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对主教大人无所求的人。枢机主教大人终于现身了，他问我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说。“没有。”我说。主教大人沉吟片刻，我拒绝进一步谈话，于是他便只能继续跟其他人交谈。“现在您为什么不吭声了？”在场的一干宵小纷纷询问我。我回答说，枢机主教大人的派头让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很显然，这封信笺表达的是恶感，人类的一切情绪都是如此，倒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阿尔钦托其人相当正直，富有高度智慧且有着政治家风范，在罗马深受爱戴，若能为这样一个人效劳，应当是一桩幸事。然而，温克尔曼那狭窄且好斗的心性和见识，令他一叶障目，抓住这一事件不放，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担当枢机主教大人的仆从，这件事情本身就令温克尔曼倍感刺痛，即便他索要的职位并没有薪酬。枢机主教阿尔巴尼和帕西厄尼虽给予他恩惠，却根本没有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然而，温克尔曼即便是对待这两名恩主，也仍然表现出荒诞不经的自立

态度。1758年年底，阿尔钦托亡故，罗马举哀，但对温克尔曼来说，他的死无异于巨大解脱。赢得枢机主教阿尔巴尼的恩顾之后，温克尔曼开始飞黄腾达；尽管从一开始，他在这座永恒之城的日子就相当不错，他从一开始就可以纵情浏览文物古迹，还能够同兼具相当天赋和才具的门斯深聊绘画和雕刻艺术，直到午夜时分。这对温克尔曼来说，乃是十足的福祉，他宣称，此等福祉是他从未享受过的。

温克尔曼对于求取他人的恩顾有着相当的技巧，此等技巧绝非仅限于捡拾枢机主教家餐桌上的碎屑，也不会仅限于窘困艺术家通常的住宿和早餐之需。他永远都需要钱，这令他毕生最重要的一段交情也不免遭到损害。这是他同斯托施（Stosch）的一段交情，斯托施是菲利普·斯托施（Philip Stosch）男爵的侄子兼继承人，拥有一批相当有名的珍贵石具藏品，温克尔曼为这批藏品编排了名录。穆泽尔·斯托施在舅舅普利普死后，成为温克尔曼的终生友人，那是1757年的事情。这位年轻的前任军官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慷慨的人，如今他已经享有舅舅留下的财富并且还打算去东方览胜，对温克尔曼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只要温克尔曼略略暗示一下，自己的一切心愿就都能够得到满足，而且还是被加倍地满足。倘若温克尔曼说需要一两个盎司的土耳其咖啡豆，那就会有两百磅的极品咖啡豆不远千里从开罗奉上；倘若温克尔曼对某种昂贵酒品约略表示赞赏，这酒就会一桶又一桶地滚到他门前。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中才会出现的场景。只要温克尔曼不是那么急切地想着从斯托施的慷慨中渔利，只要温克尔曼的信笺中不是那么频繁地发出乞丐的怨诉之音，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富有且慷慨的友人的倾心恩顾。然而，温克尔曼对酒、书、钱和衣物的索取是如此之不堪，任何友情都不免承受过高的考验。出自1759年5月致斯托施信笺的这段话，就颇能说明问题，而这只不过是众多类似言辞中的一段而已：

> 您的善意令我感动，我应该亲吻您的手才是。不过，除了钱之外，您不用给我别的东西，我需要钱来购买书籍和其他物件。容我在这份便笺里面略作说明，我需要简单添置一件秋衣，以备热天过后所

> 需……我手里没钱，我必须适应这种情况；贫困毕竟是我的忠实伙伴，看来我是无望摆脱它了，对此，我有预见。感谢上帝，我还健康，精神头也不错，这是黄金也换不来的东西。

无须多言，斯托施在回信中附上了一笔不菲钱财，温克尔曼对此既羞愧又感恩。

斯托施相当富有，可以承受得起此等慷慨。温克尔曼第一次造访那不勒斯的时候，相关的说法揭示出他的境况甚至更为糟糕。当时，他同一个叫维勒（Wille）的人有通信联系，维勒在巴黎当皇家平版工。1757年年底，温克尔曼致信维勒，陈明自己极度困顿的心境。德累斯顿方面的津贴已经不足敷用了；他已经无力造访那不勒斯，尽管他筹划了很久，而且他那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古代艺术史》最终能不能完工，就部分地取决于那不勒斯之行。这情况的确有些残忍，温克尔曼对此也毫不吝言，信笺当中充斥着痛楚和抱怨，令维勒顿生怜悯；维勒即刻展开募捐活动，予以襄助，并且自己还是第一个认捐的。温克尔曼还发出了不少类似的信笺，有一封是给瑞士艺术家加斯帕·弗斯利（Caspar Fuessli）的，信中的哀婉申述令这位艺术家大受触动，他四处求援，从三个热心朋友那里套取不少资金，同时也从自己的微薄收入中分出一份，给了温克尔曼，很显然，弗斯利自己因此承受了极大的经济困顿。正如弗斯利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情形令人痛苦。人们也许都想知道，这些好心人收到温克尔曼寄来的感谢信之时会做何感想。德累斯顿方面的津贴如期而至，在这笔善款抵达之时，温克尔曼已经在那不勒斯待了两个月之久了，温克尔曼当初可是说过，没有这笔善款，他的那不勒斯之行肯定要泡汤。很显然，斯托施也收到了此类信笺，并实施了急速援救；至于阿尔钦托，则“差不多是强迫”温克尔曼接受了一笔五十银币的赠款。如此丰厚的恩惠，令接受者以极为热烈的语词对维勒和弗斯利表达了谢意。温克尔曼说，这是“对全人类的善举”。他也承认，德累斯顿方面的津贴及时抵达，令他的那不勒斯之旅得以成行；阿尔钦托和斯托施提供的资助，温克尔曼则只字未提。他

以如下动人语句结束了给维勒的感谢信：

> 你都看到了，老伙计，现在我不需要钱了。不过，我不会把钱还给你，我会把这些资助作为善款保存下来，让捐助者们日后自行处置。而且我也不想冒犯您的慷慨，我就不再多说了。[2]

温克尔曼就此开启了同包括弗斯利、伍斯特里及其圈子在内的一批瑞士艺术家的通信，这份友情持续了终生。在一系列的通信中，温克尔曼一直都惦念着弗斯利曾经的善意，因此力求展示出自己最好的一面：随和、可信、友善，而且还是以轻松、自然的方式予以妥帖呈现。这份交情，乃因一封祈援信笺而起，可算是一份惬意且正常的交情，这样的交情在温克尔曼一生中并不多见。

暗示、抱怨、感激乃至直接的祈请，这是温克尔曼常用的招数，和此类招数一起反复出现的，则是他一直都挂在嘴边的矛盾申述："我穷，我一文不名；不过我享有傲然自由，若为自由故，一切皆粪土。"实际上，这世界上很可能没有谁比温克尔曼更不自由了，那内在的激情一直主宰着他，贫穷如同牢狱将他闭锁起来，心灵则成为独立幻象的奴仆，那嚣张的自我背叛冲动扭曲了他的性格，他的情感等待着一切善意之人的垂怜。他就是命运的造物和玩物，命运对他的摆布到了可怕的地步。傲然自由，不过是堂皇说辞而已。且看一看他为了更好地研究雕像的面部，爬上路德维希庄园那座密涅瓦雕像的基座。然而，那雕像的脑袋却突然滚落，在他的脚下化为齑粉。他差点儿被砸死；不过，他那死灰一样的表情却根本不是因为这场死里逃生。当然，这场事故并不是他的错。那雕像的脑袋应当和其他雕像一样，是同躯体接合在一起的；不过，据他说，那脑袋仅仅是放在脖颈上而已。的确，不管实情如何，他毕竟是得到了庄园主人的特别允准前来参观这座庄园的。事件发生之后，守卫甚至还打开了画廊供他观瞻！他害怕令人起疑，不敢偷偷溜走。无论如何，他必须若无其事。就没有人看见吗？当然有人看见，不远处就是园丁，假装在工作的园丁。不过，最好是原谅这些人；他们

当然看见了发生的一切，也完全可以将事情报知守卫。温克尔曼却将银币悄悄塞给他们，令他们闭嘴。倘若真有自傲之心，绝不至于干出这样的事情；此番思虑非自由之人所为。当温克尔曼踮起脚尖，越过草坪，悄悄离开受损的密涅瓦雕像之时，“绝对不可”这样的辞令也许会在这个可怜人的耳边嗡嗡作响。要嘲讽这个可怜的德意志乡下人的下作品性，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自己就经常这么干。不过，要克服这样的品性，可就难了，堂皇之词谁都会说。这个德意志乡下人乃是一个自作自为之人，单打独斗闯荡江湖，他当然成就了一番伟业，不过，他从来都不知道如何担当这来之不易的声望。关于自己在罗马受到的待遇，他历来不乏尖利但也令人怜悯的夸张说辞，早期信笺充斥着此类说辞，并且往后也一直都没有断过（尽管已经没有了早年那股喧闹劲头），直到生命终结。

> 这些大人物、这些枢机主教，是如何对待我这样还算有点地位的人啊，应当将之公布于世。应当让那些笨头笨脑、俗华不堪的德意志神父开开眼，这些神父除了自己的教区，什么都没见识过。在罗马，我很少在家中吃饭，因为我一直都是枢机主教们的座上客。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物，而且他们也都清楚，傲慢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的。每次拜访枢机主教阿尔巴尼，他都会张开双臂拥抱我，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的确喜欢我。我还跟枢机主教帕西昂尼一起吃过饭，那实在是美好时光，帕西昂尼是个欢快随和的老头，已经七十八岁高龄了。我常常跟他外出游玩，他每次都亲自送我回家。我还跟他一起去往弗拉斯卡蒂，我们就穿着拖鞋戴着睡帽坐着闲聊；当然，如果顺着他的意思，穿着睡袍也无妨。这些的确都不可思议，不过，我可是实话实说。

倘若此番说辞不免有得意忘形之嫌，也不能责怪于他；他自己就曾谈起，他的青年时代实在是太过凄惨了。命运的报偿虽然迟到了，但也算丰厚，这在他看来，乃是必然之事，正所谓苦尽甘来。不过，他那构造奇特的心性倒也是忠诚的。他的母亲于1747年谢世，父亲于1750年谢世；亲情已然无家庭可以寄托，便非常稳定地向着老朋友们倾注而去。温克尔曼从未忘怀昔日朋友；他经常打听老友们的近况。他同他们推心置腹，无所保留，那样的坦诚令人心动：

> 我从来都期盼用德语写就一部作品，让外人看看我们德意志人的能力，尽管此时的曙光还远在地平线之下。至少我已经知道有那么几部作品以不错的风格表述了很多重要的事物（包括我本人的观念在内，当然还有其他人的观念）。一想到你们将满心愉悦地读到这么一部作品，我就会急不可耐、浑身颤抖。我已经在费尔米安公爵的内心唤醒了此一激情，尽管我只是将我这部作品的很小一部分读给公爵大人听。公爵大人不吝溢美，将我视为德意志民族的荣耀引见给其他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我知道你们会原谅我这份虚荣之心。

温克尔曼真正开启了美的历程，这条道路相当曲折、坎坷，他展现出相应的狡猾和手段，只为“强行开辟”一条道路，以便见识那些伟大容颜。比如说，在那不勒斯，他用尽了手段，力求能看一眼埋藏在庞培古城和赫丘利神庙的珍品。当世之人，能真正鉴赏这些珍品之价值者为数寥寥，温克尔曼就厕身其中，但是要得见这些珍品，想必难上加难。且想象一下，这么一个伟大的艺术批评家和考古学家，为了看一眼珍品，竟然像夜来之贼一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四处潜行，四处嗅探，这实在是一幅讽刺画。在那不勒斯，温克尔曼不免染上了他这个行业的普遍病症，那就是保守并垄断自己得到的一切信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挖掘者都喜欢占着茅坑不拉屎，温克尔曼也不例外：

> 凯洛斯（Caylus）对我们的工作（也就是斯托施家族那批珍贵石具藏品的名录编排工作）极尽赞誉，我在相关评论中提到了他，对此，他表示感谢。他也曾用过各种办法，想得到我在枢机主教大人的庄园里发现的那批画作的速写材料。不过，这方面的信息我是不会提供给任何人的。我自己要用的东西，是不会跟任何人分享的。

自从和枢机主教阿尔巴尼一起发现了那座神殿之后，温克尔曼在罗马的生活便彻底改变了，从此之后，他全副身心地致力于这方面的考古发掘工作，稳定且勤勉。他在此一时期的思考和发现都以描述、历史或者批评的方式记录下来，由此成就了一系列的作品，其中，1764年问世的《古代艺术史》享有至高地位，紧随其后的则是1767年以意大利语写就的皇皇巨著《未经发表的古物》（*Monumenti Inediti* ）。这部巨著在他的作品库中自成一类，因为它以有机方法研究艺术作品，彻底革新了

艺术研究，据此，艺术成为人类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温克尔曼乃是第一个倡导此论的人，也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温克尔曼令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臣服于对造型之美的关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越那些美妙且无可磨灭的时刻，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他会对可爱的农牧神雕像的头部展开沉思，也会对某位智慧女神的容貌展开沉思，对他来说，那样的时刻乃是令人迷醉的静穆时刻。他片刻都离不开它们，哪怕是恍惚之间，他都会日思夜想，满脑子都是那些美的意象。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佛罗伦萨或者那不勒斯，都是这样的情形。即便是喧闹不堪的乡间庄园生活也不能令他有丝毫分神。每逢夏季，罗马城外阿尔巴尼庄园里，绅士和淑女们彻夜欢宴。温克尔曼则仿佛用了一道绝缘体使自己同这一切喧闹隔离开来，独坐楼梯之上，如同海狸那般不屑劳作，幽僻、勤勉且幸福着，且让楼下的欢闹尽情喧嚣，一切均与他无涉。

能够引领大人物游览自己所钟爱的罗马城，应该是幸事一桩，况且，此等人物想必是有一定鉴赏力的。“神一样”的安哈尔特-德绍（Anhalt-Dessau）亲王以及同样高贵的梅克伦堡-斯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亲王，都曾在温克尔曼引领之下游历过罗马城，温克尔曼显然已经是罗马教廷的钦定导游了。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由贴身导游引领着游历这座城市，毕竟，这种游览方式会有麻烦之处。温克尔曼曾引领格尔顿（Gordon）公爵及其兄弟在罗马览胜，一路上，温克尔曼可以说是眉飞色舞，不过最终，这位钦定导游立下誓言，再也不当英国人的导游了。游览过程中，温克尔曼运用了“精彩绝伦的表述和最为高贵的比喻”，试图唤起两位英国游客对古代艺术的热情，然而，公爵却始终都是表情漠然，无动于衷；公爵大人甚至都没有表现出生命迹象，他的兄弟也差不多。巴尔提摩（Baltimore）勋爵的表现则更为糟糕。这些英国人似乎患上了疑病症，周身都笼罩在一片浓云惨雾当中，他们似乎根本就不知道生命的脉动时刻，以决然的冷漠对待万物。他们不知道欢愉为何物。整整三个小时，温克尔曼在宴会上同一批英国人坐在一起（罗伯特·斯宾塞勋爵也在其中），这些人连笑都没

有笑过。至于法国人，差不多是无可救药了；古代跟法国人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有的现代人跟古人比起来，简直就是傻子；其中最蠢的就是法国人。

时不时的狂躁，根深蒂固的吹嘘癖好，过分关心自己的声誉，尖刻且好斗，对自己的伟大批评者兼崇拜者莱辛更是刻薄，遣词造作，这一切在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通信集中演奏出不和谐的音调。不过总体上说，第二卷和第三卷读起来要比第一卷令人愉悦很多；而且，这两卷信笺当中，乞援的内容已经不占多数了。名气大了，荣誉也就接踵而来。梵蒂冈方面为他提供了图书管理员的职位，而且自1763年起他便担任古物委员会主席一职，这个职位是有薪酬的，虽然不是很高，但对温克尔曼来说，也是足够了。当然，并非一切都尽善尽美：温克尔曼每天都要待在梵蒂冈数小时，这令他烦恼不已；阿尔巴尼似乎太喜欢他了，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然而，这一切的美中不足又何足挂齿。他不是已经置身罗马了吗？身边到处都是辉煌的艺术品，而且他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如此充实的生活，每天二十四个小时都不够用，但温克尔曼每天早上还是会抽出半个小时来沉思自己的幸福。想着自己这一路的艰辛，岁月从眼前划过，他已经忘却了自己的神父袍服。他不禁抬高嗓门，用一种人人都不难想见的糟糕音调，吟唱路德派圣歌，赞美上帝。温克尔曼已然是人间帝王了。

---

[1] Veron Lee，*Studi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taly*，London，1880，p.47.

[2] To Wille from Naples，April 1758.温克尔曼给弗斯利的感谢信大体上也是一样的内容。

爱欲

这样一幅爱欲画面，不免给人以老夫少妻之感，仿佛那吟唱是在老人新婚之夜发出的。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倒是很难说清楚。此时的温克尔曼毫无疑问是幸福的，不过，他此一时期的信笺却也传递出异乎寻常的孤独感。但凡伟大观念都会令观念的担当者感到孤独。伟大观念当然会滋养其人的心灵，却也总是令其人的心性归于荒寂。温克尔曼当然崇拜友谊，不过，他整个人也是一场非凡的见证，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何等地不需要他人的情感和友爱，更不用说物质上的考量了。他毫无疑问是憎恶婚姻之人，情感的贫瘠渗透了他此一时期的信笺的角角落落，即便在他情绪最为奔放之时也是如此，而且，他情绪越是奔放，就越是可以见出他情感上的贫瘠。那激情澎湃的文字喷涌而出，浸染了信笺的每一页，但都难免和干燥了的沙粒一样，轻轻一吹，便即刻消散而去，不留一丝痕迹。他常常情绪似火，极少表现出温情；他当然会尽情燃烧，噼啪作响，但他根本不会有熔化的迹象。人类情感的常态表达，诸如自发的情感、无私的关切、爱欲的躁动，在他的信笺中是完全见不到的。他时常给一个瑞士友人写信，信中的表达是友善、亲密且轻松惬意的；这样的信笺可以说是他情感荒漠中令人惊喜的绿洲。

他的生活的这个特殊方面，就如同一场漫无尽头的耐力游戏，在发烧一般地进行着。他摒弃王后，转而与国王和无赖为伴；他并不缺乏值得信赖的老朋友，但诱惑力十足的年轻男人却总是迷惑他，欺骗他，他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不知去向，他们总是在破坏这场游戏。兰普雷希特骗了他的钱，并残忍地抛弃了他。1762年夏天，一个名叫赫尔·冯·贝格（Herr von Berg）的利沃尼亚年轻人又令他陷入激情和绝望之中，温克尔曼对此人极为痴迷，把他当神一样供起来，言语之间，甚至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温克尔曼真想将这尊男神引入罗马。冯·贝格显

然是个逢场作戏的轻佻之人，只是玩玩而已，他可不会在温克尔曼这个当世苏格拉底的面前扮演亚西比德的角色，他没有前往罗马，而是迅速改道，去往巴黎。随后，温克尔曼心目中的这个亚西比德表现得警惕且冷漠，并且在很长时间之后，才以同样的警惕和冷漠回复温克尔曼那半火山半祈请的信笺；最终，这个亚西比德则完全没有声音了，尽管温克尔曼将《论体验美的能力》（*On the Capacity of experiencing Beauty* ）这本小书献给冯·贝格，但也不曾得到他的一丝回应。更糟糕的是拉斐尔·安东尼奥·门斯这个优秀且多才多艺的画家的所作所为。门斯无力拒绝伪造艺术品这一诱惑，毕竟其中的报酬是极为丰厚的（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要戏弄那些艺术批评家一番，这其中就包括温克尔曼）。于是，门斯便以极为娴熟的笔法伪造了以朱庇特和甘米尼德为主题的画作；卡萨诺瓦（Casanova）则从旁添油加醋，将这幅画作视为罗马出土的真迹。温克尔曼一见之下，兀自倾倒，宣称这是世上最美的画作，在《艺术史》中更是一番溢美之词。几年之后，温克尔曼才知道真相，意识到这是门斯的恶举，两人的关系随即归于破裂，再也没有得到修复。这还不算，生活随后再次背叛了温克尔曼，这场背叛令温克尔曼更为伤心，更为纠结：1763年，他那伟大的意大利友人鲁吉耶里（Ruggieri）神秘自杀。在爱欲事务上，温克尔曼实在是太不幸了。岁月流逝，温克尔曼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重新洗牌，重新出牌。是啊，那偷心的贼究竟在哪里呢？那些风流倜傥的年轻人，不过是温克尔曼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只能算是兰普雷希特和冯·贝格的糟糕替代品而已。好在温克尔曼生活中并不缺乏自己的国王，枢机主教阿尔巴尼就是其中之一：

> 我是他的图书管理员；他的藏书可谓宏富，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而且我是唯一可以享受这笔财富的人。所有作品我都可以阅览。我只是在主教大人外出之时，才会伴随他左右。再没有如此亲密的友情了，此等友谊，令一切嫉恨无从作为，唯有死亡才能将之阻断。我会向主教大人坦承我灵魂当中至为幽深之处，他也同样信任于我。我自认这样的境遇可谓尽善尽美、无欲无求了，像我这样的人，世间能有几个呢。

这封写于1762年的信笺实际上是一份自传式的描摹，鉴于温克尔曼显然是希望借由这封信笺在朋友中制造某种印象，其中当然是存在水分的。枢机主教当然算是温克尔曼的知交，即便如此，枢机主教也并非真的能够满足这个德意志门生那狂躁且贪婪的心性。他比温克尔曼大三十岁，而温克尔曼对于自己理想中的年轻男人自有一番幻想，温克尔曼真正欲求的乃是年龄相当的德意志人，在这方面，温克尔曼是相当坚决的。他一直同贝伦迪斯保持联系，直到后者死亡，任凭岁月流逝，他总是能够重建这样的联系；他对诺特尼茨的同事弗兰克（Franke）也极为关切，甚至在1763年的悼词中申述说，弗兰克是他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 昔日的一切友谊都经不起岁月考验；我们的友谊则是永恒的，是以坟墓为终点的，这友谊纯净清明，没有任何杂质，而且经受了岁月的漫长考验。

在这样一场游戏中，温克尔曼面对着诸多关口，他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出牌。究竟要在哪个朋友身上赌上自己的幸福呢？温克尔曼一直都在掂量、比对和权衡，一直都在写下简短名单，据此排列次序。1763年，弗兰克位列名单首位；1764年，则是斯托施领衔。1765年，他致信刚刚结识的里德塞尔（Riedesel）男爵：“现在，我只有三个朋友了，那就是您、斯托施和门斯夫妇，当然，我将门斯夫妇算作一个人。”

一年之后，门斯伪造画作一事败露，在温克尔曼眼中，此人无疑成了典型的混蛋，如果世界上真有这么一种人的话。在刚刚给斯托施写就的信中，温克尔曼认为有三个人毒害了自己的生活，门斯名列第三位，另外两个毫无疑问就是兰普雷希特和冯·贝格。然而此后，温克尔曼和门斯的老婆之间却发生了一场情事，此事十分怪异，是半柏拉图式的，相当令人憎恶，这一切，门斯都是知情的，而且也予以默许，这位丈夫因此也就在温克尔曼这里重新得宠。弗劳·门斯（Frau Mengs）可以说是

唯一进入过温克尔曼心灵中的女人，她令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和解。此时的弗兰克应该是已经掉队了。不过在1766年，就在温克尔曼的友爱名单即将关闭时，一个不速之客闯入，并成为温克尔曼的密友，此人就是此前从未听闻过的冯·迈赫（von Mechel）：

> 我的全部心迹都在这里了……世事难测，令我常常怀疑并不存在友谊这回事，不过，你让我相信这事情是存在的，我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

兰普雷希特、贝伦迪斯、弗兰克、门斯、斯托施、弗斯利、伍斯特里、冯·贝格、鲁吉耶里、阿尔巴尼、里德塞尔，还有冯·迈赫，这一张张牌从他指间滑过，这一系列的名字都令他刻骨铭心，不过总体来说，这些名字所表征的不过是他生命中空虚的能量，还有他那陷入迷途的情感。他那无能的爱欲和无果的激情跟现实毫无关系，倘若不是因为他那特殊的脾性在他的宿命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人本来是可以完全不予顾及的。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斯托施和里德塞尔这两位男爵在温克尔曼心灵当中各占半壁江山。斯托施要比温克尔曼小几岁，里德塞尔则要比温克尔曼大了二十三岁。两人都分享了这个大名鼎鼎的友人的美学趣味和考古趣味；里德塞尔的《西西里和希腊游记》（*Journey through Sicily and Greece* ）乃是献给温克尔曼的，后来歌德对这部游记给出了高度评价。里德塞尔的品性很像温克尔曼；他们如同鉴赏家一样品评各色年轻人的美态，彼此之间没有保留。里德塞尔乃是受人敬重之人，很和善，对温克尔曼的才具充满敬慕，是极具鉴赏力的游历者，在各方面都比那花哨有余、感恩不足的冯·贝格更配得上温克尔曼的情感。两人之间的友谊肇端于1763年，可以说就是踩着冯·贝格的躯体升腾起来的：

> 这样的友谊，对方不在身边，反而令我更加坚强，我想除了你之外，还有一个人能为我带来这样的友谊，尽管世人都已经不再相信有这样的友谊了。

这是温克尔曼1764年的信笺。1765年，他同样是这么申述的：

> 来信收悉，这样的信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即便是那个负心汉，也万难写出这样的信笺，当初为了他，我可是要少活好多年啊。

此时，斯托施因为有事，已经结束了君士坦丁堡之旅，于1765年返回了德意志，两人之间的友谊经历了十年的考验，而今一如既往地稳固且亲密。温克尔曼为斯托施的藏品编排了名录，可谓帮忙不小；斯托施自然也非寻常之辈，他当然能意识到温克尔曼这一工作的价值。两人的关系一直都很诚挚，虽然谈不上多么热烈；后来，斯托施承认，自己的感情经历了一场突然的巨变，这令温克尔曼吃惊不小。1765年，正值温克尔曼同门斯夫人那段奇特情事期间——这段情事最终当然是无果而终了——他想象中倾注在门斯夫人身上的热情，却一下子转移到斯托施身上：

> 本次嘉年华，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观看一部歌剧，这中间，我满脑子都是你的音容笑貌；我完全克制不住对你的感情，不得不躲起来，让泪水尽情释放。没错，我的确坠入爱河了，我所爱的那个夫人的形象本应当更切近我的心灵，然而，我满脑子却是你的影像，我的朋友。从年轻时起，我的灵魂便只为这样的友谊开放，此情此景，便是明证。即便我满心欢悦，移情别恋，这友谊也依然要回归那源流之处，那里是友谊的巅峰，友谊的王座，人间愉悦莫过于此。我无法隐藏对你的情感，我的整个精神都彻夜翻涌，我试图用眼泪来抚平这哀伤。我数次从卧榻之上起身，而后又躺倒，且让我纵情畅游这人间至福吧。

这是一份非同寻常的自我写照，表明温克尔曼确实对女人没兴趣。谈到友谊之时，温克尔曼的语言高亢激昂，语言的背后毫无疑问是奔涌着情感激流的，那就要看一看他是否有能力建立这样一份友谊。可以说，斯托施已经是温克尔曼仅存的希望了。他认识斯托施很多年了，也喜欢斯托施很多年了，对于这样一个男人，他突然爆发出此等感情潮涌，这本身是一个好信号，同时，这一情感潮涌当中，还伴随有深沉且从未止息过的感激之心。此后，他对斯托施的感情就成了最为纯粹的爱

欲激情。对这段特殊关系，温克尔曼的情感相当平稳，他坦承，这样的关系对自己有好处，对男爵大人就不一定了；他还补充说，他有不少朋友，但同斯托施的友谊则是经历了磨难才建立起来的。这样的说法出自温克尔曼之口，的确令人感到奇怪；而且，这样的怪异表述不仅出现在给斯托施和其他人的私人信笺当中，在1766年面世的《艺术史评论》（*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Art* ）一书的献词当中也有公示。至于里德塞尔，则在他的情感世界中扮演着次要角色，但也是极具分量的，依然能够令他愉悦并痴迷。由此，温克尔曼的情感清单便最终落定为两人名单；门斯伪作一事败露之后，他便同这对夫妻彻底了断了。他1767年1月29日致信里德塞尔：

> 我的朋友，这么多年，我身边的朋友来来去去，唯有你和斯托施历经考验，是真朋友。一直以来，我冷落甚至忘记了你，现在我给你写信，就像爱人那样，唯愿你完全明了，我对你的爱是热烈的，没有任何逢迎。

由此，1767年开启之际，温克尔曼得以安坐下来，思量着手中的两张牌。没人能分清花色，也没人能说出哪张是哪张。倘若一个吉卜赛人在这个特殊的嘉年华之夜偷偷溜进主教大人的宫殿，她势必会提醒温克尔曼，他的生活就取决于他如何出牌了。

宿命

温克尔曼未抵达罗马，心绪就已经飞到希腊了；不过，希腊之旅的可能性看来相当渺茫，他也就很少再想这个事情了。奇迹并非每天都能发生，而且，他已经来到罗马并且有所成就了，这应该是足够了。然而，一个人若是内心藏了秘密，当然就会心绪难安。这的确是相当奇特的故事，不过，这故事中最为别致的情节却在于，尽管他本人对此事默不作声，甚至都已经顺从命运了，但他经常挑动他遇到的游客，希望这些游客能带他前往希腊。表面上看，他在考古领域的声望足以解释这一欲念；不过，虽然他屡次接到这方面的邀约，而且资金丰厚，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予以拒绝，但凡读到这些情节，便不免令人感觉出，他正在同宿命展开缠斗。在希腊问题上，温克尔曼始终游移不定。他当然强烈地想去希腊看看，但是，冥冥中总有一股抗拒力量在发挥作用。他一直都在刻意放大希腊之旅会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不乏热情之人替他消除设想中的困难，此时，他又会说，他太老了，走不动了。他可能确实是老了。他的生命源流在德累斯顿就已经遭遇了不少挫折。在德意志，他和他的天才一直在同这个世界抗争；如今，他的人和他的天才已经无法协同作战了；他的天才当然还在为他作战，不过，作战的方式却只能是将自己内心的希腊欲念移植到他人的心灵当中。

1758年和1759年之间的那个冬天，苏格兰画家莫里森（Morrison）主动提议，愿陪伴温克尔曼前往希腊。这对他当然是有诱惑力的，不过，此事的难度太大了，他选择了放弃。接着便是1760年1月，斯托施来信告知温克尔曼，奥尔福德（Orford）夫人正在找人陪她前往希腊旅游，他遂举荐了温克尔曼。这次，温克尔曼看来是铁了心要去希腊了，他说这是他全部的心愿了，看来这座空中楼阁终于要在一位夫人身上落实了，看来，上天也在眷顾于他，令他的空中楼阁有了坚实的基础。然

而，1761年3月，这项计划却最终泡汤了，原因是钱不够；他不禁尖刻抱怨说，这个不知感恩的世界根本没必要这么对待自己。看来，主要的障碍还是在资金方面。不过，1762年夏天，一个名叫亚当的英国人提出要带温克尔曼出游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埃及，还要游走这些地区的全部海岸地带。结果遭到温克尔曼郑重回绝。他说，他已经完全打消了这方面的欲念，他已经老了，懒得走动了，还是希望安享晚年。1764年1月，一个德意志旅行家提出了同样的慷慨邀约，他给出了同样的说法，尽管语气没那么决绝了。这年夏天，一个非常富有的英国人强有力地化解了温克尔曼的心结。他承认，诱惑力十足；他说，如果他能年轻几岁，如果阿尔巴尼放他走，他会考虑这份邀约。前一年，他就差点儿跟随名声在外的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Edward Wortley Montagu）前往希腊；此时，他再次动摇了。然而，1765年，温克尔曼非常交心地告诉弗兰克，1759年之后，他就再也不曾郑重考虑希腊之旅了，这个年份也许应该界定在1760年，至于现在，他肯定不会再想这件事情了。[1]

1766年，更为年轻、更为进取的里德塞尔结束了西西里和希腊之旅，返回意大利，引发了温克尔曼同另一个自己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颇具荷马色彩，持续了四个月之久。1767年7月，里德塞尔从那不勒斯致信温克尔曼，信中陈述了他酝酿已久的计划，他邀约温克尔曼一同游历希腊和近东地区，自己将承担全部费用。可以说，这是温克尔曼凭借自己的天才甩下的一手王牌；不过，温克尔曼还藏有另一张王牌。也是在这时，斯托施也邀约温克尔曼造访德意志。不仅是斯托施有此愿望，温克尔曼的昔日老友们差不多都有此愿望。“神一样”的安哈尔特-德绍（Anhalt-Dessau）亲王、梅克伦堡-斯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亲王以及施魏因（Schwerin）等人悉数在内，此外还有弗里德里希二世、厄泽尔，需要特别提起的是一个名叫沃尔夫冈·歌德的年轻人（温克尔曼此时尚且不认识此人），整个德意志都在恭候他驾临。此时的温克尔曼，声望已经覆盖整个德意志，以致腓特烈大帝在1765年还将皇家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提供给他；德累斯顿和布伦瑞克方面也发出了类似的

邀约。温克尔曼差点就接受了来自柏林的邀约；可惜的是，柏林方面提供的薪酬根本没有王家风范，双方的谈判遂告中断。故国之爱，一夜之间便在温克尔曼内心燃烧起来，不过，看到薪酬远远没有达到期望，这火焰便同样迅速地熄灭了。“要想让我放弃目前这种尽善尽美的生活状态，让我离开这片可爱的土地和罗马，这世界之上独一无二的城市，好处必须是大大的。”温克尔曼非常坚定地告诉斯托施。倘若给出足够的诱惑，他的忠诚是会从罗马转移到柏林的；当然，枢机主教阿尔巴尼是要从中阻拦的，主教大人担心自己最宠信的这个人会一去不复返。

当里德塞尔携带他那迷人的计划兴冲冲地赶来之时，事情就是这样。温克尔曼遂做出了一生中第二次重大抉择。只不过，这次的抉择并不牵扯伦理上的顾虑；但从事后来看，其中涉及的问题则更为重大。倘若他有意令自己的人生以及毕生的工作得到完满，倘若他希望发现自我，同时也为德意志人和同时代人发现希腊，那么他就必须将命运的赌注投在里德塞尔这边。至于德意志，既然已经等待了这么多年，那就不妨让它多等几年，不必这么急着欢迎他。温克尔曼可能只是在潜意识里意识到这一点。不过，那潜在的阻滞力量最终还是生出了，他需要钱，他已年迈，加之阿尔巴尼的存在，这些都是横在路上的障碍。而且也应当考虑到，此前虽有莫里森、亚当和蒙塔古这样的人物提起过邀约，但这些人显然都不是这么一趟旅程的合适旅伴。两相权衡之下，阿尔巴尼此时也公开表明态度，支持温克尔曼展开希腊之旅，毕竟，对枢机主教大人来说，这总比让他返回德意志要好。更何况，能够同里德塞尔一同展开这趟旅程，想必是上善之事，里德塞尔毕竟是温克尔曼钟爱并熟识的老友，他清楚希腊的情况，会令这趟旅行颇为平顺。不难想见，温克尔曼内心的震荡是极大的。对此等境况，他本人有真切描摹，他说他处于撕裂状态，一边是周围的朋友，一边是遥远的朋友；一边是希腊，一边是故土。他谈到了内心的巨大冲撞，谈到了那古老愿望的再度萌动。他是多么希望能干下这一桩最后的蠢行。他感觉到了正在弥散开来的危险，他将这样的危险同希腊联系起来。这可以理解，不过却是错误的。

的确有一种力量将他向着这个方向牵引，不过，这力量植根于他内心那暴烈的原始力量。他以一种邪恶的方式解释这种力量，不是一次而是很多次地将这种力量称为恶灵，那是魔鬼，那是他真正的对手。他在一封信笺中宣称，这是他的宿命，他无力抵抗。他承认他惧怕希腊之旅；不过，他也承认，那恶灵在内心的天平上占据上风。更糟糕的是里德塞尔，他一定要得到答案。就是这样，各方力量都在各显神通，一边是里德塞尔，一边是斯托施。温克尔曼相信，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不过，他的心却告诉他，要拒绝这件事情。

然而，他的心未必可靠。温克尔曼当然可以现在就去拜望斯托施，但是太晚了，他十八个月之前就应该这么干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仿佛命运在故意刁难于他，斯托施给了他难以计量的恩惠，1766年8月，斯托施更是给了他丰厚资助，令他顺利出版了《未经发表的古物》。每一次，温克尔曼都只是表达了感谢，并就此打住。1766年9月，斯托施来信说，他正承受着眼疾的痛苦，很可能会瞎掉。后来他恢复了一些，不过，1767年4月，病痛再度袭来。最终是在经历了多次重大手术之后，他才得以康复。不过，当年9月和第二年4月，情况再度十分危险，温克尔曼也是这么感觉的。1766年他致信斯托施：

> 说实在的，我心里很痛苦……难道就没有人能得到尽善尽美的幸福吗？难道太过优秀的人都不能得到幸福吗？我全部的希望都在此刻飘落尘泥，如同枯草一般。我只想着尽快让我的书面世，这样我就可以尽快去见我的老朋友了，说实在的，我的全部牵挂都在他身上，就是因为这个老友，我才爱上我的故土。我的老朋友，这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消息了。倘若这样的境况让你的心灵承受痛苦，倘若我能在这样的时刻鼓励你，为你疗伤，那么我愿意牺牲一切，承受一切，直到生命尽头。这世界还是有人将友谊视为最高的尘世财产，看重友谊胜过一切，我就是这样的人；而且，我希望我能因为一段非凡友谊而留下身后名。

1767年，温克尔曼还写下了如下信笺：

> 来信收悉，我无尽悲伤……只有在你这里，我才能感受到这样的

> 悲伤。就像安德洛玛刻对赫克托耳说的那样，在你身上，我感受到了一个慈爱的父亲、忠诚的兄长，感受到了一切可以触动心灵的东西，毕竟，我的家人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这样的情形太独特了。昔日那些友谊都是骗人的，都是虚假的。倘若你的病症在于内心，一个朋友的到来能够将之驱散，我会毫无迟疑地赶来见你。不过，现在的情形，只能靠你自己的勇气了；没错，是勇气，那才是疗伤圣手。[2]

温克尔曼并没有因为友谊而留名后世，他也配不上。即便他真的抛开《为发表的古物》的出版事宜六个月之久，去抚慰他的朋友，这也不能算是什么特别的友谊举动。在温克尔曼的友谊王国，并没有艾米斯（Amis）和艾米勒（Amile）那种友谊举动可以传诸后世。如果温克尔曼真的知道什么是爱，他会毫无犹疑地赶去的，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正所谓“因为是他，因为是我”。就斯托施来说，倘若温克尔曼真的这么做了，反而会令他不安，毕竟，他们的关系还不至于此。实际上，温克尔曼的所有朋友在遭遇困顿时，都不曾有过略微地表示说希望得到他的抚慰或者帮助，他也只是以考古学家和导游的身份游走在这些人当中。所以，他这样的反应对斯托施来说，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他自己倒是于心难安。实际上，温克尔曼其人完全缺乏坦诚之见，他刻意让自己相信，一个即将瞎眼之人，是不可能承受心灵上的痛楚的，因此也就不需要朋友的安慰。不知道这样的说辞会不会令斯托施怪异一笑？很有可能。1767年9月，《未经发表的古物》已经出版，斯托施也已经恢复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温克尔曼乃是情系德意志而非希腊，那也只能说为时太晚了。温克尔曼已然拒绝听从健全理智的指引了，他已经不再信任自己的理智，并且还对这理智感到恐惧，于是，他将决断的重负交托给自己的心性，任凭这个完全不可靠的人类机能为自己指条明路。

此时，里德塞尔刚刚返回罗马；前一年秋天，温克尔曼还曾前往那不勒斯拜会里德塞尔。两人之间的交情不浅，实际上，两人是可以共患难的。倘若里德塞尔的提议被证明是无可抗拒的，那么温克尔曼也就当然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决断投身希腊。他将最后的决断推迟到那不勒斯的

会面时刻。前景难料，但希腊之旅看起来已然如同宿命一般，是注定了的，是无可避免的。温克尔曼也颇令人意外地给出了信誓旦旦地说辞。他在那不勒斯待了一个多月，是1767年9月和10月；其间，他见证了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是在10月19日到22日，并且他还近距离地观看了这一壮观场景，为此，他甚至不顾个人安危。此事强化了他的隐忧，南方之旅也许会有危险；恰在此时，里德塞尔决定成婚，这也多多少少令温克尔曼感到失望。第二年3月，温克尔曼向斯托施抱怨说，其他所有友谊都已经趋于冷却了，都不能碰触他的内心了。最后则是阿尔巴尼，他力促温克尔曼前往希腊，借此阻止温克尔曼归国，由此唤醒了温克尔曼内心的警觉和独立意识。温克尔曼必须向世界和自己证明，他是完全自由自主的；若有必要，他会强行离开，即便阿尔巴尼不愿意。看起来，内心的神灵已然令温克尔曼失去了理智。友爱和自由，从来都是他生命中的主要动机，对危险先知般的预感因巨大的精神疲惫而强化起来，这一切纠结起来，摧毁了温克尔曼，此时，他的宿命之旅尚未开启。此时，他的另一个自我则仓皇地展阅如下文字，且在手足无措地抽泣：

> 我已经将希腊欲念全部抛到九霄云外了；置身此等艰难困苦，毫无疑问是愚蠢透顶的，而且没有任何回报可言，这样的年纪该想想别的事情了。[3]

在这段最后的岁月，温克尔曼必定是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1767年，他一直以来的眩晕症又开始作祟，而且变得非常频繁且严重了。此一症状在德累斯顿时期实际上更为严重，很显然，这是他精神焦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死亡和危险的阴影在他内心翻滚，同来自雅典和希腊的诱惑缠斗在一起。在一封非常平淡的信笺的结尾，温克尔曼语出惊人，说该及时行乐了。他说他还能再活二十年，但是他又说，他希望在安详死去之前，能够再拥抱斯托施一次，两相对照之下，不禁令人感觉怪异。这话不免令人意识到，这个铁定的希腊人或者说是改宗了的希腊人，正梦想着自己死后的生活，梦想着不再有操劳，可以尽享友谊的生活，念及于此，想必任何人内心都会升腾起怜悯的刺痛：

> 一切会停歇下来的，那里是希望之地，在那里可以见到老朋友，可以纵享友爱。念及此事，我就深情激荡，涕泪横流，真的高兴。我轻轻地来，也希望轻轻地走。我想念我为那高贵的友爱而抛洒过的泪水，那友爱从永恒爱情的深渊涌动而来，那就是同你的友爱。[4]

看来，死神已经近在咫尺了。1768年4月10日，温克尔曼在意大利雕刻家卡瓦塞皮（Cavaceppi）的陪伴下，离开罗马前往德意志，途中穿越了洛莱托、博洛尼亚、威尼斯和维罗纳。他刚刚进入蒂罗尔地区，内心就翻腾起一阵战栗之感，十三年前，蒂罗尔的美妙风光曾令他彻底迷醉，此时的战栗之感则更是暴烈且莫可抵御。“看呐，我的朋友，看呐；多可怕的风光！”他又对吃惊不已的卡瓦塞皮说，“马上回去吧，我们回罗马吧！”这位雕刻家一开始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而后认为这不过是他一时的情绪所致；然而，日复一日，一路上，他不停地重复那不祥的说辞：“我们回罗马吧。”无论卡瓦塞皮如何劝说，如何请求，如何斥责，他始终都是这句已然成了歌谣的说辞。温克尔曼似乎已经没了理智。到了慕尼黑，他便拒绝前行了。对德语一无所知的卡瓦塞皮，几乎是将他拖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考尼茨（Kaunitz）公爵良言相劝，但也是无果。在觐见奥地利王后之后，温克尔曼再次病倒在床，他已经开始发烧了；雕刻家意识到自己不便在场，遂离开。5月14日，温克尔曼从维也纳致信斯托施和安哈尔特-德绍亲王，他说这趟行程已经使自己疲惫不堪，心情沮丧至极，他无法再继续了，他要返回罗马，不能见他们了。5月28日，他只身踏上回程，前往的里雅斯特，并于1768年6月1日抵达。

如此恐慌、如此战栗、如此仓皇地逃离危境实际成了一场预兆，预示着正在的里雅斯特等待着他的灾难。温克尔曼付出巨大努力试图避开此一灾难，却无法避开宿命，此可谓真正的希腊方式。他对无形的危险有着特殊的感受力，同时他也完全没有能力对此类信息予以解释，因为他背弃了自己的宿命，也正是因此，他毁灭了本来要给他指引航向的罗盘。温克尔曼已然丧失了一切方向感，他的内心在翻涌，在咆哮；他能

听到那震耳欲聋的警钟，但无法知道那声响来自何处。他的心性也同样失去了力量。在这样的关口上，他本来是靠着这心性来拯救自己的，可惜的是，他同斯托施的友谊并未成为他生命中的关键因素，也就无从在这样的时刻引领他。情感和激情在惊慌时刻是不会有用处的。温克尔曼根本就不曾想到那些等着见他、拥抱他的人，他背向友爱，抽身而去，投入了杀人犯的怀抱。这一切，他从来都缺乏清晰意识，如今，则令这迷离激情走入歧途；当年，正是这样的迷离激情，催动着他奋力挖掘埋葬在沙丘中的古瓮，令他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消耗自己的健康，在希腊精神中彻夜恍惚，一觉醒来，他发现自己仍然身陷德意志。恐慌和来自北方的疲倦刺激着他，催动着他，令他后退再后退，他和他的天才一起逃离，他没有别的想法，只想着逃离。在抵达风暴中心之时，他和他的天才便一下子平息下来。生命中这最后一周的时光，温克尔曼就待在的里雅斯特，等待渡船接他前往威尼斯或者安科纳，在这段时间里，他同弗朗西斯科·阿尔坎格利（Francesco Arcangeli）肆意调情，不曾有危险的风信传到他的耳中。然而，那个“情欲旺盛的浪荡君子”，他的举止和做派就不曾引起温克尔曼的警觉吗？此人竟然一直都在尾随温克尔曼，不是这样吗？是命运将阿尔坎格利安排在温克尔曼的隔壁房间。不过，真正的原因却在于温克尔曼的品性，正是他的品性，令生命中最后这桩情爱之事竟然是同一个曾因盗窃罪而受审的道德堕落之人展开的。温克尔曼竟然将这么一个下贱且奸诈之徒接纳为自己的伴侣，这需要何等宽松的识人标准啊。就是这样，温克尔曼同这等人渣日夜厮守。阿尔坎格利显然是在寻找猎物，不停地用各种问题刺探温克尔曼；温克尔曼当然也抵挡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泄露自己的名字，也绝不至于泄露自己的身份。然而，吹嘘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时间长了，温克尔曼的警觉之心也就渐趋松懈，最终颇为神秘地说出了一些实情，甚至令阿尔坎格利怀疑温克尔曼并非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大人物。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温克尔曼以觐见奥地利王后一事为证，还拿出了王后赐给他的黄金徽章。看到这个东西，阿尔坎格利才算真正满足了；温

克尔曼也算证明了自己所言不虚。在即将动身的那个早上，他甚至邀请阿尔坎格利去罗马拜访自己，说只要阿尔坎格利来罗马，他就会为阿尔坎格利引见枢机主教阿尔巴尼，还说会略尽地主之谊，不至于辱没了他钟爱的这座古城。这是6月8日的事情。闻听此言，阿尔坎格利即刻离开房间，又迅速返回，用更多的问题来纠缠温克尔曼。温克尔曼正在考量《艺术史》第二版的修订问题，对阿尔坎格利颇为不耐烦。这正是阿尔坎格利求之不得的机会。他将前一天就准备好的绳子套在温克尔曼的脖颈上；一番搏斗之后，他将温克尔曼摔在地上，朝胸口连刺数刀。此时，一名侍者进入房间，阿尔坎格利随即逃离，几天之后被抓获，审讯之后便被处以车轮之刑。在为自己辩护时，阿尔坎格利尖刻斥责温克尔曼，说那是他的错，他不应当拿出那枚黄金徽章来炫耀。这当然是堂皇狡辩，不过，此事也不免发人深省，倘若温克尔曼不是那种人，这桩野蛮罪行也许就不会发生。

经历八个小时的痛楚之后，温克尔曼孤独死去，比活着的时候更为孤独；身边先是一堆惊惧不已的仆人，而后又是一堆神父和律师。他接受了最后的圣礼，还涂了油，立了遗嘱。尽管他还能够指认通关文牒上的那些名字，但已经无法说出自己的名字了："别管我，我说不了话了，护照上有我的名字。"[5]

温克尔曼的死有着象征意义，这样的意义见于艺术而非生活，像温克尔曼这样的人物，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形。可以说这是涅美西斯采取的行动，而且是温克尔曼自己招来了涅美西斯的报复。原因很简单，温克尔曼背弃了自己的神灵，背弃了诸神为他安排的宿命。他的确是在的里雅斯特死于阿尔坎格利这个杀人者之手。然而，是温克尔曼自己首先剪断了自己的命运线团。

---

[1] 1764年面世的《艺术史》中，温克尔曼表达了自己的迫切意愿，希望能在埃利斯展开挖掘工作。

[2] 从信笺内容来看，应该是就斯托施的某次手术而写的。不过，信里面也就这么一处提到了斯托施的病情，其余的内容则全部都是有关《未经发表的古物》的。

[3] To Stosch from Rome，November 21，1767.

[4] To Franke frome Rome，February 6，1768.

[5] “Lasciatemi，non posso parlare，dal mio passaporto lo rileverete.”

拉奥孔神话

> 见到新发现的这些艺术品，我体验到了莫大的喜悦，这是最纯粹的喜悦，无与伦比。

温克尔曼爱美，特别是雕塑之美，这是他生命中的主导激情。他在波勒兹庄园见证了有翼天使群雕，并留下那著名的描述，这就是一个例子，足以揭示出他那样的热情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有人能体验到的。他自己也清楚，他的此等才赋可是世间稀罕之物：

> 我已经年过四十了，这样的年纪，一个人是不能太放任自己了。我清楚意识到，我身上赋有的那种精微才具正在消散，过去的岁月里，每当我沉思美，这等才具如同强劲羽翼一般，将我抬升起来。

如果说温克尔曼的这种热情在早期岁月当中是不具备批判能力的，那么此种对敬慕之物真切的爱，后来则将他引入冥思境地，这样的冥思不但没有批判可言，而且还是充满静穆和敬畏的。也正因如此，随着年华老去，温克尔曼越来越像纯粹的考古学家，而非审美批评家。他几乎是一味地追慕一切希腊事物（这常常令他无以自持，后来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一系列说法），但也正是他这样一个人，曾警醒世人不可过度仰慕希腊，这样的论调出自这样一个人之口，着实不太协调：

> 您还记得吧，您从前经常跟我说：第一印象会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阻碍我们看清事实的情感，那就是略有些愚蠢的敬仰之情。[1]

温克尔曼从来不吝于坦诚自己的错误。他在细节上的错误数不胜数，他也一直都在予以修正，倘若他能多活一些时日，当然就会有更多的错误得到纠正，因为他每天都在学习，每天破晓之时，就是他开始学习之时。尽管他的杰作已然在自然淘汰过程中被取代了，他关于艺术的有机生长观念，关于艺术是同种族、气候、社会和政治境况不可分离的

观念，依然是人类心灵的一项永恒成就。大体上可以这么说，温克尔曼为欧洲重新发现了失落的古代艺术。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倒是需要指出其间一项重大情状。温克尔曼几乎没有，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见识过希腊黄金时代的雕刻艺术作品，因为在他那个时期，这些艺术作品尚未被发掘出来，不过，他却能够极为精细且准确地刻画出它们的诸多本质特征。正如帕特所说的那样：

> 实际上，就是在这么为数寥寥的散漫古物当中，温克尔曼得以从波纹中清晰地看到那面容，他从来都能据此占卜古代世界的特质，他纵情于此……他本性当中就已经蕴藏有理解希腊精神的钥匙，这钥匙本身就如同古代遗迹一样，只能是偶尔才会闪现在我们这完全异质的现代氛围当中。

温克尔曼占卜得相当准确——尽管他没有识别出来——他手中的素材都是走了样的复制品，不过，他给出的解释却是错误的。他就像一个希腊人那样去感受和思考，不过，他的说辞却像一个罗马人。显然，这是因时间和地点的错位而造成的显著错位。恰恰是这一错位，对后来的德意志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他对拉奥孔雕像的描述，这一描述就是那根催生了熊熊烈火的火柴。

温克尔曼的美学理论在初版于1755年的《关于希腊绘画和雕塑作品中模仿的思考》中就已经有萌芽了。后来，他拓展了相关论述，不过不曾有过大幅度变动。即便做了大幅度修订，情况也不会有太大不同，毕竟，真正对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学士发挥重大激发力量的，就是这本小册子，而不是他的皇皇巨著《艺术史》。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这本小册子乃是极具灵感的，那是先知的语汇，并且还时常表述得幽暗朦胧（仿佛是在跟神谕一争高下）。很显然，这本小册子乃是依托超凡洞察力写就的，并不是观察的结果。其间充斥着预见和预判；结论则都是从反面得出的，确切地说，其间确证的种种特质，都同巴洛克艺术的本质特征正相反对。巴洛克雕刻艺术家致力于归类之时的逼真和复杂，致力于以石块和大理石表达运动，同时也致力于表达激情，并将之视为运

动的灵魂。17世纪和18世纪的艺术家们，特别是贝尔尼尼，通过对介质的精妙运用，最终达成了巴洛克艺术的极致。温克尔曼则对此等神奇成就展开了暴烈反叛。他靠着自己的本能就知道，那不是希腊艺术。于是，他从德累斯顿“大花园”中摆弄的那些运动的、舞蹈的或者泛着波纹的雕像抽身离去，转而透过阁楼的栅栏，去观瞧那些在幽暗之地暗暗闪光的静态雕塑。他几乎不怎么能看清这些已然残缺不全的希腊-罗马遗物，不过，仅仅瞥上一眼就足以唤醒那沉睡的记忆了。温克尔曼重新置身“大花园”中巴洛克艺术作品的那种运动和仓皇氛围中时，仿佛听到了一系列的词语和句子从自己的潜意识中迸发而出。他就是用它们来刻画希腊雕刻艺术的。它们用在厄瑞克提翁神庙的女神像柱身上，简直就是天衣无缝。不过，任何词句恐怕都不足以刻画他心目中的至高艺术典范，那就是拉奥孔群雕，对温克尔曼来说，这件艺术品表征着“完美的艺术法则”。

> 这种普遍的、支配性的希腊杰作的特点，在姿态以及表达方面，最终乃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那海的深处总是宁静的，无论其表面多么狂野和风暴肆虐；而以同样的方式，希腊人物的表达呈现出在无论何种情感苦痛中的灵魂的伟大和镇定。这种精神被刻画于拉奥孔的面部，且不单在面部，尽管遭受着最为暴烈的苦痛。这种痛，显现于身体的全部肌肉和筋腱中，并且当它沉思于腹部疼痛的缩张时，它看上去近乎在自我体悟，无须来自脸部和其他部分的烘托；然而这种疼痛，我认为并非借助任何脸部的，或作为整体的姿态的狂暴，来呈现它自身。这样的拉奥孔并不发出可怖的喊叫，不像维吉尔诗歌中的英雄。嘴巴的张开并不认同这一点。它更像一种被压抑的焦虑的叹息。身体的疼痛和灵魂的伟大通过这种人物构造被同等地平衡，并看上去相互抵消。拉奥孔受苦；他如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菲罗克忒忒斯一般受苦。他的不幸穿透我们，直达灵魂；但我们希望能以这位伟人的此种方式来承受极苦。

这段著名评论清澈透明，其和谐令人感觉要融化其中了，此等表述看来已经是登峰造极之作了。温克尔曼的眼睛游走在内心和空间之间，以宏伟且富于冲击力的语词阐述了他的主旨，即单纯、静穆和伟大，同时也令这一表述本身变得极具震慑力。然而，我们倒也不妨看看这件艺

术品本身，它根本谈不上单纯或者静穆，实际上，拉奥孔群雕在温克尔曼内心唤起了一种宏大的意象，那意象表征着灵魂的幽深和狂躁。灵魂之伟大——温克尔曼在接下来的论说中是有定论的——在于平静的状态；那扰动的激情则是相当低级的艺术形式。拉奥孔群雕本身似乎就可以用来证明温克尔曼提起的此一论断，尽管他心目中的这件至高艺术品表征着全部的激情和运动。温克尔曼为何要选择这么一件艺术品来作为他心目中那些品质的典范呢？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毕竟，这件艺术品是完全缺乏那些他欲意阐发的特质的。毫无疑问，若是同贝尔尼尼及其追随者的作品比较起来，这件极受追捧和效仿的巴洛克艺术典范之作，应该说是具备单纯和静穆这样的特质的。温克尔曼本人只是见证过石膏浇铸而成的仿制品，这样的仿制品不可能将细微之处呈现出来。对此，尤斯丁（Justi）给出了一番锐见，他说，此时的温克尔曼是如此切近雕塑艺术的时代氛围，同时又如此远离那样的艺术氛围，这本身就绝佳地表征着新旧时代的一条分界线。不过，尤斯丁此论并不能切实解释如下情状：温克尔曼运用“单纯”和“静穆”这样的语汇来刻画这件复杂的、精微的自然主义杰作，而这件作品若是仔细勘察起来，是极具现实气息的；若是远观那存放在梵蒂冈的原件，则会发现它是一件华美的、优雅的复杂饰品，每一部分都展现出动感。温克尔曼竟然能从他心目中的此一真正典范身上看出希腊艺术的特出品质，此举无疑展现出他那异乎寻常的盲目，对此，最好的解释莫过于：他在给出那段著名论说之时承受了极大的天启。那一刻的温克尔曼，已然置身恍惚境地；在此等天启催动下，他不免要说出一系列的真理，这真理同他眼前的物件没有任何关系，他只不过是在自己内心里，将二者联结起来而已。

剩下的问题便关涉到灵魂之伟大。在这个问题上，温克尔曼理论的基础要坚实得多。他的确在拉奥孔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没有人能够证明拉奥孔身上没有灵魂之伟大。这也就为温克尔曼提供了绝佳的制高点，他据此对巴洛克艺术展开了无形的攻击和批判。为此，温克尔曼借助了维吉尔和索福克勒斯的力量，那部小册子在接下来的几段论述中成就了

一段文学简史，那是温克尔曼的文学史，正是这样一部文学史，发挥出长久且暴政性质的影响力：

> 这杰出的艺术品拥有其青年期及成年期；这些艺术品的开端看上去近似于造型艺术家的初次尝试，在这里只有浮华和惊叹能满足艺术品位。这曾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缪斯所采用的形式，而他的《阿伽门农》部分是更模棱两可的——这归于他对夸张手法的使用——甚过赫拉克利特已有的作品。或许一流的希腊画家是以他们一流作家的创作方式来绘画的……这种希腊雕塑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是那个最伟大时代——苏格拉底学派著作的时代——的希腊文学的真实特质……

自然界的感官之美和人身上的精神之美都是可以模仿的；当然也可以借由高贵、单纯、静穆和伟大这样的艺术品质，将美和崇高，将人和神联结起来。不过，所有这一切唯有研究并效仿希腊人方能达成。这就是温克尔曼传递给同时代人的审美信息。这信息背后潜藏着如下绝对律令："看到至高者，就必须爱上至高者"。此乃无可更改的法则。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温克尔曼那火山喷发般的成就，以及这一成就为何会产生如此长久的影响力。他那特出的优美风格，如同一柄轻灵长剑，闪着光芒，划过18世纪德意志那粗笨而枯燥的散文世界；他那奔放的热情一下子照亮了那长久的失落和遗忘之地，那不正是最为伟大的人类精神遗产吗？他对美实施了卓绝的剖析，由此挥刀斩断了巴洛克艺术那厚重的丛结，此时的巴洛克艺术正待舞蹈至死，已经进入了末日狂欢的耗竭阶段。弥散在"大花园"当中的狂野动感和迷狂，已然沦落僵硬之地，新的王朝正在开启，缓慢地、无可更易地、肃穆地，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大花园"阁楼的幽暗之地，那是希腊艺术品的放逐之地，而如今，它要重新登临艺术宫殿，还要夺回被诗歌和戏剧当中的正面英雄长期把持的地盘。这是温克尔曼策动的一场文学革命，是以希腊这个充满魔力的名字展开的。在这场革命中，温克尔曼制造了新的国王，不过，他的国王都是假冒的，温克尔曼对此从无意识，因为他不会去倾听他自身天才的声音。实际上，只需要多付出一点点辛劳，温克尔曼就能够得以进

入那个令他一直魂牵梦绕的国度。然而，他那内省的眼睛却拒绝去观瞧雅典卫城，尽管那座卫城就在那里，等着他去观瞧。

---

[1] To Desmarest from Rome，September 5，1766.

第三章 阐释者们：莱辛（1729～1781）与赫尔德（1744～1803）

莱辛现身

> 已经两年了，我的境况都极为糟糕，而且我越陷越深。该怎么给母亲回信呢？怎么能让母亲知道我的境况呢？显然没有可能实现的希望，我还能坚持吗？倘若天不助我，我就注定了要沉沦下去，我又怎能指望帮助别人呢？……我亲爱的哥哥，我写这些，不是为了让你为我担忧。完全不必这样。我能忍受一切，除了人们的怀疑、蔑视和仇恨，特别是那些倘若我的境遇能好上一些，我会为之付出一切的人。不要让母亲知道这些，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一个毕生作品都如同军旗一般彰显着高昂战斗精神的人，于1774年从一个德意志王侯的宫廷致信自己的哥哥泰奥菲罗斯（Theophilus）。绝少有谁会像莱辛这般令人畏惧，也绝少有人能活得像莱辛这样无所畏惧。此等卓绝智识同此等宽广宏伟的心性，在莱辛身上合为一体，这样的情形世所罕见。莱辛生于一个贫穷的牧师之家，在活下来的七个孩子中，他排行老二。贫穷伴随莱辛终生，令他痛苦不堪。倘若不是如此牵挂他同样挣扎的家人，莱辛是可以轻松承受贫困的。他身上有着堂吉诃德式的侠义精神，家人困顿而自己无能为力，令他心碎不已；但是，家人并不总是能够体认莱辛心性中这一特质，总是吵着闹着问莱辛要钱。与此同时，死神也一直在莱辛钟爱的人中制造悲剧。他的挚友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1759年在库纳尔斯多夫战场上因伤死去；1764年，他失去了哥哥戈特弗雷德（Gottfried）；他父亲于1770年离世，他母亲也于1777年故去，留下这么一个可爱的儿子，兀自悲恸不已。在沃尔芬布特尔度过了七年的艰难

时光之后，他于1776年娶艾娃·柯尼格（Eva König）为妻，然而，在度过了十二个月的短暂时光之后，莱辛失去了妻子，还有她腹中的胎儿。此情此景，莱辛也只是简短地致信一位朋友说："我妻子去了。我总算体验到了个中痛楚。很高兴不用再去经历这样的痛苦了，我很平静。"莱辛有着极强的独立意识，甚至有些过头，他害怕摆出求援的样子，即便是低微的姿态，都令他退避三舍。有三年半，他就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中苦苦等待，等待布伦瑞克王储卡尔·威廉·费迪南德（Carl William Ferdinand）兑现当初的承诺，给他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涨薪水，给他皇家史官的职位和酬劳，然而，苦苦等待，最终只换来一场空。王储的这些承诺可能超越了他的权限；可以肯定的是，王储是那种绝不道歉也绝不解释的人。这就令莱辛深陷无可忍受的两难境地，要么继续等待垂怜，要么辞去这个职位，但是这个职位是他触目所及最后的谋生手段。最终，莱辛还是迈出决绝一步，写下一封长长的解释信笺；王储总算伸出了援手，慷慨赐予莱辛一个更高的职位，涨了薪水，还提供了一间住房，供莱辛夫妻二人居住。

莱辛毕生，无论是在智识领域，还是在道德世界，都在跟群丑斗争，他的任何动作，都会引来一阵阴毒的明枪暗箭。这群小人当然也不会平安大吉，世事总是一报还一报。海涅在《德意志宗教和哲学史》（*History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Germany* ）当中，对此有上佳的评说：

> 在莱辛的刀剑面前，所有人都会颤抖。与他交战，没有人的脑袋是安全的。他的确是出于纯粹且昂扬的斗志，砍下不少人的脑袋；不过，他却也足够毒辣，竟将敌人的脑袋高高举起，让人们看到里面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若是有谁是他的刀剑够不到的，他就会动用讽刺之箭，将其射杀。

然而，小丑毕竟是人数太多了，一批神学家还给了他致命一击。莱辛其人，真理之爱是他强有力的智识激情，正是这一激情令他于1778年陷入同这批神学家的争斗当中，原因是他发表了莱玛鲁斯（Reimarus）

关于福音书之历史准确性的诸般怀疑。莱辛本来期望一场理性的讨论，但他等来的却是漫卷而来的人身攻击，审查制度更令他无从为思想自由事业展开些许反击。不过，莱辛还有一件武器，那就是他的临终遗言。正是借由这份遗言，莱辛将宽容、人性和常识留给自己的国家，毕竟，此时的德意志和以往一样，太缺乏这些东西了，这份遗言也就演变成一份绝佳的呼吁书。人类为了对抗宗教偏见和宗族偏见，曾发出难以计数的呼吁，但莱辛的这份呼吁，很可能是最具魅力的。不宽容精神仍然存在，而且会一直存在下去，毕竟，人情世故之浓重是无从消解和祛除的。然而，自《智者纳坦》（*Nathan the Wise* ）问世之后，在欧洲的非德意志思想群体中，不宽容便失去了强大力量。

几乎在一切方面，莱辛都同温克尔曼正相反对。温克尔曼几乎不知道正常的情感状态；莱辛的情感状态在一切日常关系当中，全然归属那种人情味十足的状态，而且也是非常强健的。温克尔曼四处要钱；莱辛有时候也会借钱，但他一直也在仗义疏财。温克尔曼天生就能吸引富有的恩主，莱辛则是在显贵手中倍受羞辱。温克尔曼为了美而牺牲真；莱辛则愿意为了真而牺牲生命。然而，正是温克尔曼激发了莱辛，不过，温克尔曼不曾从莱辛那里学到任何东西。

两人从未谋面，不过，两人的生命轨迹倒是有交集。1765年，两人都得到举荐，争夺腓特烈大帝的皇家图书管理员职位。莱辛最终败北，不过他淡然处之。1751年和1752年之间那个冬天，莱辛和伏尔泰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原始是伏尔泰的秘书理查德·德·卢文（Richard de Louvain）将《路易十四时代》的一份抄本给了莱辛，莱辛在前往威登堡的时候随身带上了这份抄本。伏尔泰的警觉病一下子又犯了，他认定莱辛此举是为了出这部作品的德语盗版，便用一系列威胁信笺追索莱辛，莱辛在回信中同样是淡然处之。十四年后，又发生了一场伏尔泰式的闹剧，那位普鲁士君主是不会忘记这件事情的。莱辛并不受腓特烈二世待见；腓特烈二世曾为温克尔曼提供了薪酬为二百二十五镑和三百镑

的职位；温克尔曼欣然接受了薪酬三百镑的；而后，这位向来节约的国王遣人告诉温克尔曼，薪酬削减为一百五十镑，接不接受该职位由温克尔曼自己决定。（据说这位国王的原话是：“对一个德意志人来说，这足够了。”）温克尔曼愤怒拒绝，这个职位于是被交付给一个籍籍无名的法国人。当莱辛的《拉奥孔》（*Laocoon* ）面世之时，两人的生命轨迹再次出现了交集，在这部作品中，莱辛多次征引温克尔曼的论述，并对《艺术史》表达了赞赏。温克尔曼听说莱辛曾攻击过他，对此事不屑一顾，不过，当他最终读到莱辛的《拉奥孔》之时，一开始他是极为满足的，还在1766年8月6日给施拉布伦多夫（Schlabrendorf）的信笺中写道：

> 莱辛的东西写得情真意切，很遗憾我没有读过他的其他东西；您没有告知我他现在何处，要不然我会立即给他去信。在某些问题上，我是可以给出解释的，他也完全有资格得到我的回复。得到一个受人敬重之人的赞誉，这是荣幸；得到这样一个人的批评，同样荣幸。

温克尔曼从未致信莱辛，1767年，他致信斯托施，一番思量之后，他的言辞就没那么大度了：

> 读了莱辛的书，写得不错，尽管风格上存在常见的缺陷。这家伙的知识太欠缺了，根本不值得回应，任何回应都不可能让他有所提升。倒不如劝导一个来自乌克马克的俗人，这样的人毕竟还有些常识，像莱辛这样的大学人士，则不过是想着用惊人之论来博得一些光环而已。所以，没必要回应他。

莱辛对温克尔曼其人了解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温克尔曼的死讯传来，他对温克尔曼的道德评价并不高。他写道，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分几年给温克尔曼，但即便真的如此，温克尔曼也不过是将这些时间用来拜望君王并收集艺术珍品而已。差不多就在温克尔曼离世的同时，莱辛开始计划前往意大利和罗马（他此前从未提起过这样的想法），就仿佛昔日的障碍终于在今日得以清除。也许，他一直都避免同温克尔曼会面，尽管他在智识上是非常敬仰温克尔曼的。可以肯定，只

要温克尔曼还在罗马，这座城市对他就不会有特殊的吸引力，但是现在，他则跃跃欲试，准备走上一趟。而且一种欲念也在极度刺激着莱辛：说不定，他能接替温克尔曼的位置。

> 知道我为什么烦躁吗？（1768年10月，莱辛这样问他的朋友艾伯特。）我跟大家说“我要去罗马”，所有人都立刻将这话同温克尔曼联系起来。我要去意大利，要去罗马，这跟温克尔曼有什么关系呢？我比任何人都敬仰温克尔曼；但是我讨厌被当成温克尔曼，就如同我也常常讨厌被当成莱辛。

此种心境下，当斯托施携带举荐信前来拜会他，他当然不会高兴：

> 我非常感激穆泽尔·斯托施先生的善意［1768年12月，莱辛告诉尼克莱（Nicolai）］。请转告斯托施先生，我会珍视这次机会，不过也请斯托施先生多了解了解他要举荐的这个人，在此之前，我不会即刻动用这些举荐信。不过，跟你我也不必隐瞒，我是根本不会动用这些推荐信的。我无意在罗马结交任何人，除非是我自己愿意结交的。倘若温克尔曼不是阿尔巴尼的特殊朋友和门客，我相信他那本《未经发表的古物》的结局会非常不同。这本书中可是有不少沉渣，这一切都是因为它生在阿尔巴尼的庄园。这本书也谈不上有美学价值和考古价值，如果说有的话，也只能说是温克尔曼强行塞进去的。我想看什么，我想怎么活，乃取决于我自己，跟那些主教大人无关。

不过，莱辛智识上对温克尔曼的敬重不曾因此改变。1776年，莱辛开始着手编辑温克尔曼的作品，同时也对《艺术史》展开评注工作。斯托施将自己同温克尔曼的全部通信都交付莱辛使用，当然也给出条件：莱辛只可以发表那些关乎艺术旨趣的内容，私人内容则需要全部回避。莱辛大致浏览了这些信件，说会抽时间进行摘录，并表示这并不麻烦。他虽有“坚定决心”要完成温克尔曼全集的编纂工作，但这项工作无果而终，很可能是因为他细读了这些通信。其中的“私人”内容毫无疑问令他倍感厌恶。[1]

莱辛的意大利之旅，他自己在1769年谈起这一打算的时候，认为那是“必然的宿命”，但直到1775年，他的意大利之旅才得以成行，这主要

还是因为沃尔芬布特尔的召唤。最终，他进入他的这片应许之地，根本就没有心情为之沉醉，因为他虽然刚刚在维也纳同分别数年之久的艾娃·柯尼格重聚，却又因为要陪伴布伦瑞克的列奥波德（Leopold）亲王而不得不再次与她分别，亲王要展开一段为时颇长的游学之旅。这段游学旅程从1775年4月一直延续至10月，途经米兰、威尼斯、利沃诺、科西嘉、热那亚、都灵、帕尔马、那不勒斯和罗马。对莱辛来说，这实在是一段悲惨旅程，因为他甚至连艾娃的信都收不到；他感觉艾娃可能已经亡故，或者至少也是病得极为严重，已经无法提笔写信，于是他陷入木然的绝望当中。对这趟旅程，他仅仅保留下来一份旅行日记，那纯粹是交代一些枯燥的事情，里面不曾涉及拉奥孔。据说他曾在这座雕塑面前沉思良久，最终得出的结论令人极端诧异，也许只有他本人能够理解：他更愿意观摩石膏仿制品。以他那巨大的才智，他可以仅仅依托他人的一段话以及为数寥寥的复制品和雕刻物，便提出一整套艺术理论，而无须亲眼见证那些艺术品。当然，他的意大利之旅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不过，这趟旅程完全由他自己的心性主宰，他的心性则显然要比他的头脑更为伟大。此外，还应当考虑到，拉奥孔群雕及其意义，对莱辛而言，已然是古老的故事了，已经有二十岁了；1755年，温克尔曼的册子问世；1766年，莱辛已经发表了自己对这座雕像的回应，那份回应是人类的批评机能所能造就的最为出色的天才之作。

---

[1] 达斯多夫（Dasdorf）出版了温克尔曼和斯托施1781年之前的全部通信，此一不慎举动令赫尔德惊惧不已。

拉奥孔再现

《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是纯粹智识造就的令人极为振奋的罕见艺术作品之一。或许，此前只有柏拉图的对话才能在文学王国造就此种令人激奋的情感，令读者感到亲身参与了追索真理的旅程，仿佛是在同艺术家本人一起创造那令人迷醉的结构，一砖一瓦，历历在目。这部作品也是一切所谓的美学论章当中最富教条色彩的，人们可以在其中见证到作者是在高声抒发自己的想法，读者也可以闯入其中，尽情抒发自己的看法，提出反对意见，这样的反对意见，对方会在后面予以回应，要不就是将之彻底驳倒。与此同时，论辩双方会突然发现，他们是在就同一项例证展开推敲，一方要证明一个看法，另一方则要反驳这个看法。合上书本，读者便一下子意识到，思考诗歌和艺术之性质问题，竟然如此富有张力，如此富有创造性，并且这项思考活动本身实际上绝少依赖孤单单一个人，即便自己的大部分结论都同提出这些结论的那个人所持的看法是全然对立的。然而，《拉奥孔》并非单纯的辨证练习，尽管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取得了这场现代成就。今天看来，这部作品的主要价值也并不在于其提出的美学原则，实际上，书中的大多数原则要么已经被后人拒斥，要么已经消融在批评潮流当中，沦为老生常谈了。不过，而今再阅读这部作品，莱辛那奔放恣肆、席卷一切的申述，仍然拥有令人震颤的力量。表面上看，《拉奥孔》是要勘察审美法则；但实际上，无论就目的来说，还是就结构而言，《拉奥孔》都是一部解放大剧，并且以恢宏态势呈现在恢宏舞台之上。[1] 英雄、诸神都参与到这部戏剧当中；凡俗的人类则负责在旁评说，尽管评说通常是错误的，但凡人还是尝试着去理解整个传奇、神话、艺术和诗歌的世界。丰富的参引和联想是这部作品最具魅力的地方之一。这一切都透射出丰沛的希腊戏剧手法。然而，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极为复杂的，个体化的人物更是为数众多，他们因为各自的愚蠢而制

造了不小的伤害，同时，真理借由一个缓慢的辩驳过程才被揭示出来，这一切实际上都预示了后来易卜生运用的那种叙事方式。特别要考虑到，剧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也就是以“评论人”之名出现的莱辛本人，则对问题的根本是有清晰认识的，而且也的确向众人揭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和所有有着相当分量的戏剧作品一样，《拉奥孔》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容纯粹是作者自己创造的。其中包容的宏富素材，的确能令掌控能力不足的人倍感惭愧。不过，莱辛运用素材也有自己的方式，他会甄选并简化素材，对之进行编排和分组，由此展示出剧情的本质要素，而这恰恰能够显示出他的创造性以及戏剧感。此外，莱辛操控剧情发展并将运动和生命注入剧情当中的方式也是令人仰慕的。《拉奥孔》发挥出的戏剧效果以及莱辛本人要展开的解放工作，很显然会感染所有读到这部作品的人。莱辛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拥有扎实的、足以成就一名杰出学者的古典学养[2]，他在审美心理学问题上同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谈话和通信极具激发力，这其中，尼克莱的天分虽然逊色，但也是有所贡献的。此外，他对杜波斯（Dubos）、斯宾塞、哈利斯（Harris）、凯洛斯、巴托斯（Batteux）、哈格多恩（Hagedorn）的作品都了如指掌，当然还包括狄德罗的《盲人书简》（*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les Muets*）（这可能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一部作品）。这就是莱辛的素材，莱辛就是从这些素材中将“躯干”塑造出来的，确切地说，就是将“杂乱无章的注解塑造成一部完整的书”，他以《拉奥孔》来命名这本书，不过，这一名称肯定是有欺骗意图的，毕竟，形式问题在他这里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因此，这部作品的初始版本就不下于三个。

应当承认，知识积累到足够的地步，自然就会成书；不过，单单是知识是绝无可能成就一部艺术作品的。直到1756年12月，当门德尔松提请莱辛关注一下温克尔曼那本小册子的时候，莱辛的内心才有了真正的

规划，他要将自己掌握的素材组织起来。温克尔曼的希腊艺术观念激发了莱辛，令他成就了自己的伟大观念，并开始酝酿以论辩方式将自己的观念呈现出来。1764年《艺术史》问世，这显然是莱辛生命中一个激奋的时刻，正是温克尔曼这部作品，为莱辛提供了契机和灵感，令他得以用戏剧模式重塑自己的作品，并以论辩方式将之呈现出来。温克尔曼对拉奥孔群雕的那份早期描述，如今已成为莱辛的出发点，同时也为莱辛自己的作品提供了名称。不过，《艺术史》本身并没有被莱辛纳入素材库，也没有为他的作品添加什么分量，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吸纳温克尔曼这部作品。1765年，他准备出版《拉奥孔》，破天荒地征引了温克尔曼的巨著的第二十四章，这颇有些戏剧化，就仿佛温克尔曼这部作品刚刚问世一般。这就等于是将一种诗性真理赋予了《拉奥孔》，确切地说，就是将戏剧模式灌注到莱辛的作品当中，不过，除此之外，也就没别的了。

莱辛本来是完全有可能忽略《艺术史》的，毕竟，他在文学领域是无所不知的，而且他对史诗和戏剧素来有着充沛热情，而对于造型艺术，他却历来都秉持无知态势，尽管这未必就意味着他对造型艺术之性质没有强烈的理论兴趣。在写作《拉奥孔》之时，莱辛不曾观摩过任何绘画，就更不用说雕塑了；对文学作品了如指掌，对造型艺术一无所知，盛开在德累斯顿艺术长廊中的那些画作于莱辛而言毫无效能。《拉奥孔》一书要令拉奥孔成为家喻户晓之事，然而，写作这部作品时，莱辛是否瞥过一眼拉奥孔群雕，这一点颇值得深究。不过，即便为了写作《拉奥孔》而令莱辛在温克尔曼钟爱的罗马城的画廊和博物馆逡巡数周乃至数月，想必莱辛还是会那么去写；他对线条和色彩素来都是缺乏感受的，而且已经是无可救药了。于莱辛而言，艺术始终都会是诗歌的穷亲戚。他的偏见是全然倾向于文学的，这也就是《拉奥孔》的整体倾向所在。也正是由此，德意志古典运动的一项显著特征再次显现而出。希腊令温克尔曼倾倒，但温克尔曼一直顽固地拒绝造访希腊；莱辛则更是勇敢无畏地伸张自己的艺术理论，却不曾试着亲眼见证艺术品。不过，

考虑到莱辛的作品本质上是一部戏剧作品，考虑到莱辛的写作诉求，他这么做，倒也应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中正态度之于学术论题的分量，恐怕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若是放在艺术作品的世界当中，中正态度的效能就很可疑了。《拉奥孔》是一部戏剧，这一点正是我在此处要予以明示的，既然是一部戏剧，自然会抛开一切理论考量，理论之事历来都是批评家们喜不自胜的逐鹿之地，那就留给批评家们去做吧。作为戏剧作品，自然就会出现高潮阶段，令双方冲突的本质尽显无遗，并由此带来一种启示，借由这种启示，冲突双方得以和解，其中一方还得以解放。

解释工作出现在前言部分，前言负责交代实际的场景，是随后剧情的序幕。据此前言，艺术和诗歌借由纯然的想象而结成“邪恶同盟”，此一同盟令二者相恨相杀，以相互毁灭为乐。此种关系格局，令艺术成为寓言的奴仆，诗歌则只能为艺术描摹效力；双方都成为对方的仆从，此种境遇对双方来说都不合理，而且令双方尊严尽失。唯一的救赎之道就是将二者分离开来。若是分离二者，则非得承认二者之间是存在明确区别的。一番申述之后，戏剧大幕遂即拉开，剧情随之展开。

第一幕

（第一～六章）

不妨想象一下，大幕拉开，拉奥孔群雕出现在眼前，温克尔曼和莱辛正对之展开品评，其中，温克尔曼将要点展现出来：

> 宇宙，希腊杰作的典型特质，最终，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位拉奥孔，并不像维吉尔诗歌中的英雄，不会发出可怕的叫喊……拉奥孔忍痛；但他的忍痛如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菲罗克忒忒斯……我们愿能以这位伟人的方式忍受极苦。[3]

莱辛和温克尔曼之间的冲突在第一幕开启之时便已经显现出来，直接呈现在这段著名言说当中。两个对手首先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展开了近距离交锋：灵魂的高贵只能以斯多亚的方式展现出来吗？温克尔

曼认为的确如此，并将拉奥孔群雕作为证据。莱辛没有质疑拉奥孔群雕的斯多亚风格——他是透过温克尔曼的眼睛去观察这座雕塑的——但他反对将拉奥孔和菲罗克忒忒斯进行比较，在莱辛看来，将二者比附起来是荒谬的。菲罗克忒忒斯当然也展示出非凡的英雄气质，但在痛苦境地，他却发出了激情的喊叫。荷马的英雄都有这样的特质，维纳斯也是如此，“铁铸战神”也不例外。身体痛楚令人高声叫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文明的现代人羞于喊叫，野蛮人则是害怕喊叫，他们担心一旦高声喊叫出来，勇气就会随同泪水消散而去。希腊人将超人英雄气同一切自然而然的人类激情之完好表达融合起来，在这方面，希腊人是独一无二的。菲罗克忒忒斯，甚至《忒拉奇斯妇女》中的赫拉克勒斯，都会因为身体上的痛楚而痛哭哀叹；索福克勒斯那部遗失了的《拉奥孔》恐怕也不会多一点儿斯多亚特质。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因为一切斯多亚特质都不是戏剧性的。因此，即便说拉奥孔群雕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人对自身痛哭的控制能力，那也只能说，这一雕塑所呈现的灵魂之高贵，并不是斯多亚式的。必定存在另一种类型的高贵灵魂，那么它会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恰恰触及了拉奥孔问题的核心。艺术，在温克尔曼看来，是要服从美的法则的；趣味、性格以及激情之表达，也必须服从美的法则。这是希腊杰出艺术家们尊奉的规则，因此，这一规则必定是正当的。为什么提曼忒斯在描摹伊菲革涅亚的献祭场景之时，会遮住阿伽门农的脸呢？这是美的法则所要求的。作为父亲，阿伽门农承受此等痛楚，必定会面容扭曲，扭曲的面容则必定是丑陋的。拉奥孔的痛苦表情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在艺术作品中得到缓解：扭曲的身体和大张的嘴巴，是雕刻作品中最丑陋的景观，这是一定要避免的。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所谓艺术，乃系于某个特定的时刻，既然如此，就必须选择内涵最为丰沛的时刻，这样的时刻绝对不会是激情极度喷涌的时刻，也绝对不会是行动臻于高潮的时刻。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不应当在艺术作品中持存；毕竟，艺术品若是用来呈现这样的时刻，想象力就完全没有施展空间了。

因此，应该说，拉奥孔雕塑中呈现出来的法则植根于艺术的特殊本性，也植根于艺术的界限和限制。那么，诗歌这个更为宽广的领域是否也受制于同样的法则呢？温克尔曼对维吉尔的拉奥孔提起了隐含的批评，认为维吉尔不应该令自己的拉奥孔发出“可怕的呼叫”。然而，一旦听到“可怕的呼叫声直冲云霄”这样的词句，谁又会惦记着说，这样的呼叫之声必定是嘴巴大张、极其丑陋的呢？诗人自己也根本不会对这个特定时刻表示出特别的关切，在整个事件的快速推进当中，这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个时刻而已。如果这也算是拉奥孔的软弱的话，那么这转瞬即逝的软弱根本不足以令人们对这样一个已经被证明了拥有众多德性的人失去同情。因此可以说，即便雕塑家们得到

强有力的建议说，不可以让他们的拉奥孔高声呼叫，但维吉尔也仍然有着充分的理由允许自己的拉奥孔高声呼叫。

不过，维吉尔是个史诗诗人。换作剧作家又会怎样呢？在雕刻作品中，这样的痛楚已经是无可承受了，倘若是在舞台上见证并倾听此等痛楚的爆发，岂不是更加令人痛苦？理论上讲，这一反对意见是非常充分的；但实际上，索福克勒斯的天才还是成功地克服了这一危险，这一点看一看《菲罗克忒忒斯》就不难明了。莱辛随后对这部剧展开极为生动的剖析，仿佛菲罗克忒忒斯本人现身一般，仿佛就是主人公本人在读者眼前演出一样。《拉奥孔》将菲罗克忒忒斯从传说当中召唤出来，并将他那英雄意志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莱辛则扮演了合唱队的角色，解析我们的怜悯和恐惧，此乃《拉奥孔》的成就之一。莱辛高声申述说：

绝不要瞧不起这么一个石头般坚强的人物，一连串的巨大打击可以令他高声呼叫，但仍然没有击垮他！身体的痛苦自然难以忍受，但他的意志却不曾屈服。对朋友的爱和对敌人的恨，不曾有丝毫动摇。索福克勒斯选择了超自然的创伤来克制人们对他身体痛苦的同情和怜悯，尽管要克制这样的同情并非没有难度，除此之外，索福克勒斯还添加了因被遗弃荒岛以及遭遇涅俄普托勒摩斯的背叛而承受的精神痛楚。由此，身体的痛楚便只是众多痛苦中的一项而已。此外，涅俄普托勒摩斯最终也因为见证了这撕心裂肺的痛苦，以及意识到菲罗克忒忒斯很可能会完全服从于这样的痛苦而生出悔意。此等情节便催生出戏剧效果和悲剧价值。涅俄普托勒摩斯之所以还能回归本性，能够听到自己的本性在内心发出的呼唤，完全是因为菲罗克忒忒斯是以自然的方式而非斯多亚的方式，去承受那样的痛楚的。

莱辛这一剖析，其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为了回应温克尔曼就拉奥孔群雕做出的那项流光溢彩的品鉴，莱辛凭借此番剖析揭示了造型艺术和戏剧艺术之间无可估量的鸿沟，尽管莱辛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展开长篇大论。另一方面，这一剖析也解释了那撕心裂肺的痛苦呼叫是完全有可能提升英雄品性的，并由此将那种塞涅卡或者科尔涅琉斯式的英雄（他们只是偷偷溜进舞台而已）贬抑到角斗士的层面上。他们绝无可能再次抬起他们的头颅，因为在此种境况之下，温克尔曼所推崇的斯多亚悲剧理想已然全盘瓦解。在此种境况之下，斯多亚意义上的“高贵”以及被温克尔曼阐释为“静穆”的“平静”，也就跟悲剧完全不沾边了。温克尔曼错误地贬抑维吉尔，并看错了拉奥孔和菲罗克忒忒斯之间的相似之处。由此，莱辛的第一个，也是最具分量的论敌便被打发掉了。

接着，莱辛以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为武器，展开进一步论说，

将诗歌同雕塑艺术进行对比，由此向自己也向人们证明，如果说真有模仿这回事，那也是艺术家在模仿诗人，而非诗人模仿艺术家。第一幕就是以莱辛的这一申述收场的。这一幕表明，艺术是次于诗歌的，而且艺术所涵括的范围就其本质而言要比诗歌狭窄得多，艺术的天然界限就是美，而且艺术行动是存在严格的时间限制的。诗歌拥有更为宽广的领域以及更大的潜能，这也正是莱辛意图伸张的一点；不过，人们还不曾为诗歌确立明确的法则，也不曾有谁谈起过诗歌和艺术的本质。

第二幕

（第七～十章）

莱辛的第二个对手可没有温克尔曼那样的才具。这就是斯宾塞先生。斯宾塞提起的论点是："诗歌中的好东西，到了雕塑艺术当中，通常也会是好东西。"此一看法是对诗歌的恶毒诽谤，这一点是莱辛必须予以揭示的。斯宾塞的著作，十卷本《睿智，或一种探询，关乎罗马诗人和古代艺术家遗作间的契合，作为揭示他们相互关联的一种尝试》（*Polymetis*[4]，*or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Works of the Roman Poets and the Remains of the Ancient Artists*，*Being an Attempt to Illustrate them Mutually from One Another*）是一份相当有分量的论章，莱辛曾仔细研读过，现在则是要予以驳斥了。莱辛认为，斯宾塞不曾见出艺术和诗歌的根本区别，正是因此，斯宾塞成了诗歌和艺术之"邪恶联盟"的支持者，还特地不辞劳苦地将拉丁诗人的寓意叙事溯源于绘画和雕塑，认为是绘画和雕塑启发了他们。莱辛认为这是肤浅之论，必须予以驳斥，因而提起了相当辛辣的论辩，将斯宾塞驳得体无完肤。莱辛指出，斯宾塞先生非常牵强地四处找寻拉丁诗人和古代艺术家的相似之处，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只是徒增荒诞而已，莱辛遂抓住这一点大加嘲讽。于是，讽刺之词便如同雨点一般倾泻在这个博学却没有趣味的神父身上，斯宾塞先生的确犯下成堆的错误，莱辛则不吝语词，在读者面前予以一一展示。斯宾塞这一幕延缓了剧情的发展，而且莱辛这么做应该说也没有太大必要；不过，这一幕倒也不能说完全多余，毕竟，正是在这一幕中，莱辛充分展示了诗歌和艺术之"邪恶联盟"的倡导者们做下的愚蠢之事。剧情当然没有在这一幕得到推进，不过场景本身倒是得到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领域更为宽广的诗歌由此便吹响了更为嘹亮的冲锋号；艺术则开始渐渐退却了。诗歌是艺术的小妹妹，它借由莱辛在这一幕的论析一改颓势，不再是那老迈装饰品的仆役了，那并不符合这个小妹妹的身份。随着莱辛给出的这一最终宣示，斯宾塞先生被扫地出门，大幕随之落下。

第三幕

（第十一～十六章）

第三幕的大幕刚刚开启，莱辛仍然在思量斯宾塞的蠢行，法国人凯洛斯公爵就进驻舞台，胳膊下夹着一本书，斗志十足，公爵大人乃是另一部愚蠢作品的创制者，《出自荷马〈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的画作，兼论服饰》（*Tableaux tirés de l’Iliade，de l’Odyssée d’Homère et de l’Enéide de Virgile，avec des observations générales sur le Costume* ），这部作品莱辛同样仔细研读过，而且也给出了大量的批注。凯洛斯这部作品中的信息是向艺术家传递的，这信息就是：且在绘画中忠实反映荷马和维吉尔的叙事，由此将诞生何等辉煌的画作啊！在莱辛看来，凯洛斯公爵也是温克尔曼和斯宾塞幻象的牺牲品，他们都错误并愚蠢地认为，艺术和诗歌实际上是同一的。莱辛再次提起论辩，借此证成第三个论敌的愚蠢。两人于是就凯洛斯的叙述展开剖析，开始探讨该如何刻画诸神，莱辛也借此对公爵那“奥义迷雾”展开嘲讽，这样的“迷雾”遮挡了人们的视线，就在此时，第三名演员已经准备好了进入舞台。此人就是荷马，《拉奥孔》真正的主人公，他将掀起戏剧的高潮。莱辛则继续跟公爵大人展开论辩。他提起论辩：诗歌中的场景同绘画中的场景是全然不同的。据此，莱辛以《伊利亚特》第一卷中那肆虐的瘟疫为例，揭示出荷马是如何引领读者穿越那“众多迷人场景组成的整个画廊的”，而绘画则只是展现那尸体堆积如山的场景，在这一场景当中，阿波罗从云端射下箭头，将那如山般堆积起来的尸体予以焚烧。这样的场景是根本不适合作为绘画主题予以呈现的，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成为恰当的艺术评判标准。接着，莱辛便转而考量“诸神议事”这个叙事场景，跟人们的预期相反，莱辛宣称这一场景若是在绘画中得以呈现，会令他迷醉。莱辛说，不妨看一看《伊利亚特》是如何展示这一叙事场景的，诗歌场景展示出更大的美感，那么，莱辛看到了什么呢？那朴素的四行诗是诗人们的通常呈现方式。这不正好证明荷马作为场景诗人的天赋同他激发出来的那些绘画是毫无关联的吗？有些诗歌场景可以呈现在绘画当中，有些则不能。诗性意象的整个不可见的世界，是全然对画家关闭的。更何况，在那可见的场景当中，也有许多东西对画家而言是毫无用处的。凯洛斯公爵对这一点也应当是有潜在意识的，比如说，凯洛斯公爵完全可以以《伊利亚特》第四卷的潘达罗斯叙事为例来支撑自己的看法，这是全部荷马诗篇当中最为详尽也最为生动的叙事场景了。

围绕“荷马叙事场景”展开的这场论辩，令剧情发展逐渐提速，达成最终结论之前的戏剧张力也随之提升起来。“可画的场景和不可画的

场景”这一表述以及瘟疫即将降临的场景（“令人震撼的场景画廊”），已然令读者头脑中的剧情加速奔涌而出，超越了莱辛的言说。由此，剧情之迅速推演在读者脑海里制造出剧烈的印象，当荷马正式步入舞台并开始吟诵的时候，剧情推演陡然加速：

随即，他拔出他那磨光的角弓……如此当他上好弦，他放下，将它歇置在地……接着打开他的箭筒盖，取出一只从没射过的带羽毛的箭……不久后他将锐利的箭，架在公牛筋制成的弦上，张拉，将弦拉至胸前，对着弓的铁质前端。如此当他此刻将巨弓张拉成一个环，角吱声，弦大声鸣响，而那锐利的弓急速弹出，沿着众人间他的道路飞翔。

随着剧情逐渐向高潮推进——观众当然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即将到来的场景会令观众战栗，这是文学王国最戏剧化的时刻之一。凯洛斯已然从舞台上消失了，他那“奥义迷雾”一下子将他遮挡住，莱辛则进而扮演起潘达罗斯的角色。拉奥孔群雕又开始变得模糊了，只剩下轮廓。艺术和诗歌紧密纠结在一起，如同那模糊的拉奥孔群雕的轮廓一样，四肢扭曲，面容纠缠，这样的错误就如同那条巨蛇一样，缠绕在艺术和诗歌身上，艺术和诗歌则在凄惨境地中苦苦挣扎，恰在此时，莱辛弯弓搭箭，弓弦崩响，一箭穿心，正中那缠绕着诗歌和艺术的怪物。就这样，诗歌和艺术再次分离开来，彼此解脱：艺术如同死了一般安静下来，如同那无声静止的雕像，诗歌则因为得以重新灌注了能量和生命力而震颤不已。“邪恶联盟”就此瓦解：

假如这是真的，那幅画，在它的仿效方面，使用了与诗歌创作完全不同的工具和符号，早先致力于肖像和空间中的色彩，后来刻画时间中的声响，假如，无可争议地，符号必定同描绘的事物有一种恰当的关联，那么共存的符号仅能表现共存的客体，或者共存的部分体。但是连续的符号仅仅表现连续的客体，或者在时间中互相接续的部分体。共存的客体，或者共存的部分体，被称为形体（body）。它遵循形体，就其可视的特性，是绘画的恰当客体。连续的客体，或者互相接续的部分，通常被称为行为（action）。它遵循行为是诗歌恰当的客体。

但是所有的形体不仅存在于空间中，也存在于时间中。它们有连贯的持续性，并且在持续性的每一个时刻，能识别一种不同的表象并立足于一种不同的关联。每一个时刻的表象和关联是一个连续行为的先行动作和原因的效果……它遵循绘画能模仿行为，但仅仅通过形体来认知它们。

此外，行为不能自身维持，而必须依靠特定的存在物。在此范围

内，目前，这些存在物就是形体，或者能被如此认定，诗歌亦是绘画形体，但仅借行为来阐发它们。[5]

莱辛，一个批评家，至此算是将论敌悉数打发掉了，由此也界定了诗歌和艺术的本质区别，并据此将二者彼此分离开来，令二者各自解脱，留下那些误入歧途的诗人接受荷马的温婉抚慰。此后，荷马主导了剧情之进展，并进一步阐明，诗歌必须获得真正的自由。连续的行动场景是诗歌的要义所在；纯粹堆积辞藻是有害的；静态叙事则如同瘟疫，应当极力避之。诗歌应当呈现赫柏是如何将朱诺的战车拼装起来的，而不是仅仅描述这辆战车；或者说，应当呈现阿伽门农是如何穿戴王袍的；应当呈现阿伽门农的权杖或者潘达罗斯的弓箭缘何而来，而不能仅仅是描摹这权证或者弓箭。简言之，诗人应当将空间上的共存之物转化为时间上的先后序列，据此予以呈现；这些都是诗人手中的利器。

第四幕

（第十七～二十五章）

有了这样的武器，荷马得以接着迎战并击败所有更次一级的诗人，这些诗人并没有荷马那样的武器。以阿尔布莱希特·哈勒（Albrecht Haller）为首的那群致力于静态场景的吟游诗人不战而降。然而，维吉尔恰在此时现身舞台，他拥有更为强劲的武器，并且在戏剧开启之时曾将温克尔曼击溃。维吉尔以《埃涅阿斯纪》为据，发起攻击，为诗歌的共时性场景展开辩护；不过荷马手中挥舞的则是阿喀琉斯的盾牌，并为“历时性”大声呐喊，荷马向维吉尔发起压倒性的进攻，最终将其击败。埃涅阿斯的盾牌在同阿喀琉斯那荣耀之盾发生碰撞之时，尽皆碎裂；埃涅阿斯的盾牌毕竟是不堪一击的，外强中干，胡乱拼凑而已。维吉尔的败落令静景诗人们大为震动和惊惧，毕竟，维吉尔是他们最强大的支柱。

接踵而来的是情欲诗人的大溃逃，在荷马笔下海伦那无与伦比的美貌面前，这些人已然溃不成军，荷马从未对海伦那出奇的美展开过静态描摹，相反，荷马借用此等美貌的效能来呈现这种美貌本身。特洛伊的老人们也深深慑服于海伦的美貌，无言以对，无法再去谴责特洛伊人或阿该亚人，即便特洛伊人和阿该亚人为了这永恒美貌而陷入连年战祸当中。凯洛斯选择了在这么一个糟糕时刻再次现身舞台，他提起荒诞申述，认为此一场景是非常好的绘画主题。公爵大人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惨重代价，遂悄悄溜走了。毕竟，艺术家若是描摹海伦的美貌，就只能就此一美貌本身施展拳脚，予以静态呈现，并呈现得

光华缭绕，此等美貌之效能，也就是那些迷醉其中的老人，艺术家是无从顾及的。造型之美，乃是艺术的专属职能。既然如此，就让艺术去统领这个王国吧，就让她去统治这片寂寥之地吧。诗歌则必须远离这样的领地。那么剩下的宇宙，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则都将成为诗歌的正当领地。恰在此时，忒耳西忒斯现身舞台，他提起申述说，即便是面容的丑陋，也是可以进驻诗歌王国的；他还非常尖刻地嘲讽说，这样的话，他自己那丑陋身体的共时性便可以转化为历时性的一系列行动，由此催生诗性之美，对此，私生子埃德蒙和理查三世高声附和。

第五幕

（第二十六～二十九章）

温克尔曼的《艺术史》突然面世，终结了进一步的论辩。莱辛宣示说，在没有阅读这部划时代的作品之前，不可继续论辩下去。随后就是细节上的一些批评之论，主要是涉及拉奥孔群雕的时间问题，由此，这部解放剧也就有了一个还算温和的收尾，此剧的主旨是要解除艺术对诗歌的奴役。作为一份美学论章，《拉奥孔》不算完成之作，当然也不可能有真正完成之时；作为一部戏剧，《拉奥孔》则可以说在第二十二章就已经归于完整了；毕竟，就丑陋和令人憎恶之物的呈现问题展开的长篇探讨，本质而言是离题的余论而已，从戏剧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去除的。

依托这部作品，莱辛在诗歌和艺术之间订立了一份协约，令艺术独自掌领造型之美的王国；不过，莱辛也因此为诗歌赢取了多得多的东西，而艺术则顶多是赢得了一场外交上的胜利而已。莱辛据此也就达成了这部作品的诉求，将诗歌从艺术的奴役当中解放出来，重新将运动引入诗篇当中，同时也成功地倡导戏剧对情感实施激情表达。由此，莱辛得以驱使艺术走上一条危险道路，诗歌如果愿意的话，则可以高枕无忧了。无论莱辛的此番令谕对绘画和雕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拉奥孔》对德意志文学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歌德后来在《诗与真》中有论，若要体悟莱辛这枚炸弹的解放效能，一个人必须让自己变得年轻。我相信，正是莱辛引入诗歌王国的运动观念，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歌德，尽管此一影响一开始只是无意识的。人们一直以来也都赞同，歌德的抒情诗篇比任何诗人都更具动感。后来，歌德更为充分地意识到莱辛诗歌观念的创造性效能，他特地写就了一份颇为迷人且欢愉的短诗，名为《爱，风景画家》（*Love*，*the Landscape-Painter*）。丘比特在画下一幅极为迷人的风景画之后，将一个迷人少女引入画面当中，由此令画面变得相当完美，并将动感灌注到整个画面当

中：

而当我正说着，瞧，一阵轻风

搅动着自身，并将树林晃动，

泛起那条河上的全部波痕，

掀起那淑女的面纱；

并且，我感叹甚而惊讶的是，

她迈出她的金莲和脚踝，

开始靠近并走向我

那儿，我与我年幼又顽皮的老师同坐。

而那时一切事物因此而晃动：

河流、树林、鲜花，还有那面纱，

伴着那美人如此优雅的脚步，

你是否觉得在我石头上端坐的那人，

像一块石头，而我太过呆坐又迟钝？

诗篇写于1787年，是献给玛达莱娜·里奇（Maddalena Riggi）的，诗篇本身表征了莱辛对歌德的诗学影响，无论这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莱辛打开了闸门，令洪水涌入那僵滞的德意志诗歌王国，令歌德的诗才翻涌奔腾而起，最终成就了歌德那灵动且生机十足的动感诗篇。

不过，尚存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拉奥孔》算是将史诗和戏剧从艺术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了，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拉奥孔》完全未能瓦解温克尔曼在德意志古典运动时期的戏剧影响力。莱辛徒劳地呼喊着“毁灭”，并且也策动了一场斗争，“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一表述却也是兀自矗立，不曾倒地，毕竟，这一表述太具魅力了，也太具欺骗性了。赫尔德（歌德在其生涯的可塑期对赫尔德颇为倾听）在悲剧之法则的问题上，同温克尔曼站在一起，与莱辛对抗。《拉奥孔》可谓一场劳作，不过其特殊效果却是令温克尔曼发现的那个希腊更广为人知，甚至更具魅力了。莱辛对荷马和索福克勒

斯素来尊崇，同时也将切实的生命感贯注到对荷马和索福克勒斯的阐释之中，令荷马和索福克勒斯在当时的德意志受教育群体当中展示出新的生命样态，令他们得以在德意志大地复生，显然，《拉奥孔》发出的动人号召是拥有无可抵御的力量的。是温克尔曼激发莱辛围绕希腊文学展开写作，两人之间的这场争斗激发了诗人对一切希腊事物的强烈关切。一种几乎是无限制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批判的希腊激情，便随同《拉奥孔》涌入德意志文学，并且此后便一直都是德意志文学血脉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此外，莱辛还于1769年写就了精美小册子《古人如何呈现死亡》（*How the Ancients represented Death* ），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呈现了一幅对照场景，一边是基督教禁欲主义的阴暗面，另一边则是异教徒之于生命和美的欣悦。此一对照震荡着随后的岁月，一个又一个诗人前赴后继，传递着莱辛发出的战斗呼声，席勒则将这呼声凝结为如下诗行：

那时，没有可怕的骷髅对这将死之人

可怖地显现。那最后的呼吸

被一次来自几无悲叹之唇的亲吻，

一把因死神而燃尽的火炬，所接纳。

---

[1] 我是在完成了对莱辛《拉奥孔》的此一阐释之后，才读到阿道夫·弗雷的相关研究，参见Adolf Frey，*Die Kunstform des Lessingschen Laocoon* ，Stuttgart and Berlin，1905。阅读这份研究，我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我很高兴一个如此聪敏的批评者站在我这边；另一方面，则不免也有些失落，因为我不是第一个看出这部美学杰作之戏剧结构的人。我将我的论述原封不动地展现出来。弗雷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则要粗略得多，而且他对剧幕的划分跟我也不一样，他将“俗见”（right opinion）而非荷马视为主人公；此外，他并没有看出，里面的潘达罗斯实际上就是莱辛本人。参见弗雷作品第39～45页。

[2] 莱辛是在梅森那著名的圣阿弗拉学校学习的希腊语，在莱辛时代，古老的人文主义在这所学校余温尚存。

[3] 参见第46页。莱辛在第一章开篇，引述了温克尔曼的整段论说。

[4] polymetis，足智多谋的、睿智的，荷马史诗中曾用于形容奥德修斯，他曾被直呼为Polymetis。——译者注

[5] 此处用的菲利莫尔（Phillimore）的译文，有几处略微改动。

赫尔德回应“拉奥孔”

> 感受崇高乃是我的灵魂所向。这决定了我的爱、我的恨、我的仰慕以及我对幸福和不幸的梦想，也决定了我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意志、我的表达、我的风格、我的行为、我的体格、我的谈话、我的关切，我的一切！我的爱！多么切近崇高，甚至到了脆弱感伤的程度！往事对我有着如此强力的影响，悲伤，爱人眼里的一滴泪水，亦令我如此触动！——还有什么能比往事更能切近我，更能打动我呢？——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我对沉思、哲学、诗歌、故事以及思想中肃穆之物的热气，决定了我对古代、对往昔岁月的追慕，决定了我对作为一个族群的希伯来人的热爱，也决定了我对希腊人、埃及人、凯尔特人、苏格兰人等的热爱。我的早期精神志业由此得以确定，对此，我年轻时代的地方倾向贡献良多，教会和圣坛、布道坛和布道词的影响也同样是无可争议的，当然，身为神父的职责以及信仰的影响也是功不可没。我最初的关切、我年轻时代的美好梦想、我在花园里的惬意时光、我孤独行走的身影、我对人类灵魂有了新发现和新思考之时的那种颤抖感觉、我半清明半凝重的风格、我的洞见、我辑录的“森林志”碎片、雕像碎片以及人类素材碎片，总之，一切的一切，也都是由此得以确定了的！我的生命就是向着哥特式拱顶展开的一趟旅程……

J.F.赫尔德在写下此番对灵魂海洋的奔放且极具穿透力的自我剖析之时，已经掌握了“拉奥孔”这个密码，那是一片狂风暴雨般的海域，海浪汹涌激荡，不受拘束的思想、狂放的梦想以及天启般的景象，在他心灵当中跌宕起伏。歇斯底里的音符在他的很多作品中纷纷奏响并震颤着，这样的音符伤害了他就人类历史所做的庞大概览，令他对于人类演进的先知情感变得虚假且虚浮。然而，正是这样的概览以及情感令赫尔德连同他那无所不包的心灵在他那个时代生出巨大效能。“研究文学的起源及文学迄今为止的发展与革命，这将是一部何等伟大的历史啊。”这是赫尔德在《我在1769年的游记》（*Journal of my Journey in 1769*）中不禁喷薄而出的一句话。同时，他也坦率承认：“我享有太多东西，已经失去品位了。”他的雇主曾发现，他酣睡之时，床上堆满了希伯来人和希腊人的书，书堆里面一支淌着蜡的蜡烛仍然在燃烧，这令

雇主着实吓了一跳。这样一个人是非常容易激动的，因此也是非常容易动怒的，他身上有着大量的缺点，不过，所有这些缺点都应当归因于他的神经。多刺且难以相处，这仅仅是他的外表而已，在此一外表下，隐藏着一个善良之人，甚至是一个有些多愁善感的人。他是能够做到迷人且随和的。他是极为朴素且真挚的牧师，并凭借无与伦比的布道，赢得了妻子。众多淑女名媛都仰慕于他。赫尔德也并非完全没有欲念。那个时代的一等人物都喜欢他，敬慕他。他灵魂中深藏了“丑恶的不和谐元素”，他自己也曾谈起这一点，正是这些元素令许多于他有着善良意愿的人都渐行渐远。最终，他那伤人的尖刻讽刺以及恶劣举止，也耗尽了他曾经的学生、卓越的友人歌德的耐心和宽宏。在此事上，他的妻子卡洛琳（Caroline），一个素怀崇拜之心且激情四溢的女人［歌德称她为伊莱克特拉（Electra）］是肯定有份儿的。正是因此，赫尔德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可以说是完全孤立的，如同一条丧家犬，对着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咆哮、撕咬。然而，不正是他凭借自己神奇的批判才能，将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杰作挖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吗？糟糕的境遇毒害了他的脾性，毁灭了他生命中的很多事情，特别是毁掉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罗马之旅，那是1788年和1789年的事情。和他同为牧师的费里德里希·达尔贝格（Friedrich von Dalberg）是沃尔姆斯和施拜尔的教堂神父，此人坚持邀请赫尔德前来做客，赫尔德也欣然应允；然而，达尔贝格并没有让赫尔德知道他的情妇弗劳·冯·塞肯多夫（Frau von Seckendorf）也会在场。塞肯多夫随同他一起抵达奥格斯堡，这个女人一路相随，举止放荡且态度倨傲，令赫尔德无法再接受达尔贝格的好客举动，永恒之城最终也成了赫尔德眼中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 我亦见过那里，假如我已留下来唤你的名，
>
> 噢，你残忍的，古老又现代的罗马！
>
> 但借助名字，谁已不再认得你，
>
> 噢，神殿，连同你，圣彼得的穹顶？

你沉没了，从那里创设出这一片火热的土地

一条激流涌淌而出，从新近和遥远的罗马，

那儿，元老和战士们留驻往昔，

如今却是黑披风的传教士和主教。

莱辛是以满眼的哀伤去见证罗马的；赫尔德则是在暴躁和鄙夷的氛围中见证罗马的。罗马给赫尔德带来的除了愤怒便没有别的了，这种观感一直延续到他遇到“天使般”的安吉莉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n）为止，她抚平了赫尔德灵魂中的苦恼。

怀着复杂的心情从赫尔德这个人转向赫尔德这个人的作品，就如同在倾听一株敏感植物的思想一样，很显然，这植物有着神奇的语言天赋。赫尔德拥有非同寻常的感受力，特别是对抒情诗；无论是翻译还是阐释，他再现美之灵变本质的能力差不多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特别是要考虑到他有着极为宏富的知识量。作为诗人，他可能是最糟糕的，但作为翻译家，他却如有神助。这世界上可能没有谁比他更明了那些诗性作品了，无论是希伯来的、冰岛的、印第安的，还是希腊的。他对诗歌极其敏感，对观念亦是极具感受力。一个约略的提点，就能在他这里产生极为深远的效果。“北方巫师”（Wizard of the North）哈曼（Hamann）曾锻造出如下词句：“诗乃人类的母语”。赫尔德真正挖掘了古老的德意志民间诗歌，同时也辑录并翻译了各个族群、各个时代的原始诗篇，并彻底改变了流行的《圣经》观念。温克尔曼展现了希腊艺术的有机生长进程——逐渐繁盛又逐渐败落。此一申述激发了赫尔德，催动他去追索人类的精神历程，并将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思想历程中的纪念碑加以阐释。较之哈曼和温克尔曼，莱辛对赫尔德甚至有着更为深重的影响，莱辛刺激着他不断追随自己的脚步（尽管常常是以反抗的姿态）。莱辛散射出来的智识光芒令他炫目且盲目，不过，他也一直都浸染在莱辛的思想当中。[1] 赫尔德并不是真的对戏剧感兴趣；莱辛骨子里

对抒情诗也谈不上什么兴致。考虑到两人之间的此一差异，也就有理由认为是莱辛一直在刺激着年轻的赫尔德，令他不断进行反驳、调整或者赞扬，这种刺激贯穿了赫尔德终生。在文学生涯起步阶段，他便用一部献给莱辛的作品来回应“拉奥孔”的呼叫。

赫尔德是非常理想的读者，对种种情感和观念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力。他对《拉奥孔》的回应，显然是以作者希望的方式展开的，在这项回应中，赫尔德紧紧跟随莱辛的剧情，展开了一场贯穿始终的论辩。从1769年《评论集》（*Sylvae Criticae* ）的第一份论章开始，赫尔德就开启了追随莱辛的道路。因此可以说，赫尔德的生涯路径是莱辛已经为他开辟好了的，这样一条道路当然会有令人厌倦的一面，会令赫尔德的论章显得琐碎且多余，尽管在很多细节上他都给出了颇具锐见的批评。不过在今天，人们阅读《拉奥孔》已然是为了愉悦而非为了从中获取教益，此种境况之下，赫尔德的评论也就失去了说教价值。在20世纪，倘若还有人阅读《拉奥孔》是为了从中汲取教益，那就等于是承认自己在智识上毫无进展，而且还可以据此论定这样的读者在审美上是非常迟钝的。莱辛可以说是最具理智的批评人，不过在写作《拉奥孔》之时，也仍然是受到了天启一般；赫尔德则取狂想一途，不过在回应《拉奥孔》之时，则仅仅是接纳了莱辛的激发力量而已。理想的读者未必就是理想的阐释者；激奋和热情往往会走过了头。《评论集》的第一份论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不过，赫尔德显然比莱辛更好地理解了荷马，他对荷马的阐释也更为贴切。他对诗歌之本质有着更为敏锐的意识，对艺术的理解也合理得多。他以自己敏锐的感受力，探询莱辛的薄弱环节，而这样的环节，他也的确找到了很多。

说荷马世界中的英雄在受伤的时候都会大声呼叫，这肯定是不对的：荷马的英雄会倒在地上，那漆黑的夜色掩盖了他们的眼睛；神与人当中，唯有怯懦者和恃强凌弱之辈才会在身体痛楚之时发出嚎叫；至于精神伤痛，则是另一番情境。莱辛认为在荷马的世界中凡人是看不到诸

神的，这也是全然错误的。此外，诗歌当中所谓的序时行动原则失于纯粹武断，因此，莱辛那种认为诗歌只能呈现序时行动的论断也就轰然倒地了。能量乃是诗歌的灵魂，这跟行动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荷马当然也会把握一切机会，以序时方式展开叙事。荷马的主体叙事手段是行动而非静态的场景描述，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过，荷马运用此一叙事手段，并不是为了铸造“诗性场景”，而是另外的诉求。特别是，荷马之叙事并非纯粹依托感觉和经验而行，并不是单纯地将空间上的共存转化为时间上的行动序列，倘若诗人仅仅满足于这样的叙事方式，这世界也就没有人配得上诗人这个称谓了。将一切静态场景逐出诗歌王国，将会实实在在地扼杀大量的优美诗句。同理，将一切运动逐出艺术王国，就等于剥夺了艺术的灵魂。所有的时刻都是转瞬即逝的，所有的身体状态多多少少也是如此，倘若据此认为艺术不应当呈现此类转瞬即逝的时刻，也就等于摧毁了艺术的本质。在这个问题上，莱辛同样是错误的。

赫尔德就这么不断地发出急切的声音，并没有招来反对或者论辩，因为他只不过是在大声重复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已。不过，这样的自言自语，也实在是没有任何乐趣可言。在《拉奥孔》中，古希腊的破晓时刻电闪雷鸣般降临。但是在《评论集》中，这样的盛况已然是明日黄花。读者当然想着热切地跟从莱辛，但是赫尔德浓墨重彩地阐释了自己的看法，遏制了读者追随的脚步。看来，花期已过。赫尔德就温克尔曼和莱辛的叙事风格给出了令人陶醉的对比，不过，这也并不能弥补他征引了温克尔曼对拉奥孔群雕的评说这一事实；在他的论说中，温克尔曼的看法得到了彻底证成，不过，这样的证成只不过是令读者徒增厌倦而已。更糟糕的是，赫尔德还试图将自己对菲罗克忒忒斯的解释强加给读者，他大声宣示说：“回到希腊舞台！”于是，读者顺从，但并不情愿，读者对此感到厌倦，这却是必然之事。莱辛给出的是完美的剖析，廓清了实情的前因后果，那样的分析是极具激发力的，而且也是相当简洁遒劲的。赫尔德给出的解释则是抒情诗式的（尽管还不至于像他几年之后就这个主题写就的那部情节剧那般糟糕），没有给想象力留下任何空间，

全部都是他对莱辛《拉奥孔》前三幕的观感，语气过于昂扬，辞藻过于臃肿，而且情感也显得泛滥。在赫尔德的解释中，拉奥孔毫无畏惧。很可能因为对拉奥孔问题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赫尔德才生出轻蔑之感；毕竟，赫尔德的解释跟莱辛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在赫尔德的解释中，拉奥孔的动作和呼叫，始终都是借由英雄气度予以克制的。今天的读者已经对这部剧太过熟悉了，甚至都没有必要再去阅读它了，而且也觉得没有必要为这部剧付出智识上的努力。莱辛的热情是极度高昂的；赫尔德的情感则是极度冷漠消沉的。

无论是温克尔曼还是莱辛，都不认为有任何别的民族能够为希腊人引路。[2] 赫尔德的视域则要宽广很多；他是在没有偏见的情况下，对其他族群的文学进行理解和品鉴的，他将这些作品视为文明和时代的产物。特别是他那“穿越哥特拱顶”的历程引领着他回归原始诗歌，那样的诗歌对他的吸引力一直都是无可抵御的。如果说荷马是《拉奥孔》的主人公，那么《评论集》的主人公就是莪相；如果说莱辛的作品充满了错误，那也可以说，赫尔德也犯下了极大的愚蠢错误，他对莪相的崇拜“太多，太过分，简直失去了品位”。1769年，他还相信麦克弗森（Macpherson）的诗篇是真正的原始诗篇。甚至后来当此一信念站不住脚的时候，他也不愿坦承。他就荷马和莪相做出的那项著名对照，的确是他的佳作之一。如此精细的批评者竟然会将麦克弗森那种臃肿的风格视为美的极致，这实在令人遗憾。尽管如此，本章开篇引述的那番自我剖析，则可以说跟他身处的那个时代一样，同样都表明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事情。《评论集》中的莪相以强劲姿态宣示说，原始族群或者野蛮族群也擅长以诗歌手法表达自己的哀伤，在这方面，他们毫不逊色于倍受赞誉的希腊人：

> 我不知道诗人是如何将伟大而温柔的情感如此完美地融合一体，令如此完全的英雄主义和人类情感集于一个人的灵魂的，如古代苏格兰人那样，据新发现的他们的歌曲佐证……
>
> 何处浮动着更高贵的泪水，甚过当芬格尔之子奥西恩再造他的子

> 孙和父亲的事迹以及他们之死的回忆？——何处有更高贵的泪水，甚过那老人面颊流淌的泪水，他“站姿如一棵橡树；但是火焰耗尽了我的枝丫，而我在北风的羽翼下颤抖。独自地，独自地我必得回到我的灰烬之地”。就此勇敢的奥西恩悲痛不已，就此他令两鬓繁霜的卡利尔悲痛不已。在这样的教诲中，英雄们，他们部族的父辈，深深地哀悼他们。全部的英雄气和全部的人类情感……都活现在这类人的诗篇中，感人心脾。

莪相以及莪相在赫尔德内心催生的观念明确显示出，在温克尔曼和莱辛的希腊观念之外，一项新的元素诞生了。这项新的元素实质上乃是一首哀歌。“模仿希腊人”，这是温克尔曼和莱辛发出的令谕。“不可能”，这是赫尔德在1778年的温克尔曼论章中给出的哀伤回应。这份论章颇为锐利，甚至有些狂放：

> 你已消失在何处，绘画、著作和言辞中古代世界的童真、甜美、令人眷恋的素朴感？如今你身处何处，令人眷恋的希腊，充满美、神性和年轻的样态，充满想象和由甜美真理填充的想象中的真理？你的时日远去，而我们的记忆之梦，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愿景不再将你召唤。旅行者的脚步将不再唤醒你，如同他踩踏你并遴选你的碎片。我们被绑缚的缓慢转动的时光之轮，仿佛身处一条毁灭的、裂变的旋涡……

这恰恰就是莪相悼念旧日英雄的方式。尽管温克尔曼也曾因为他所发现的那个希腊只能属于过去而感到深深哀伤，但那些残存下来的纪念物令他欣悦不已，这远远超出了他的失落感：

> ……我们……如过去一样，一无所有，除了一个余留的我们意愿之物的阴影的轮廓，除了那独然唤醒一种对我们已失之物更多渴求的暝蒙，而我们更专注地研习这原初之物的素材，甚过我们已研习的原初之物本身，假如我们已完全掌握了它们。[3]

赫尔德则强调了此一失落乃是无可挽回的，而且古时的希腊与当今时代的距离也是无可弥平的。赫尔德同样也有着强烈的欲望，想亲眼看一看希腊，去倾听那活着的希腊语言（此一欲念之强烈甚至超过了温克尔曼）。赫尔德真正缺乏的不是欲念，而是钱。

赫尔德的创造力并不止于此。他还尝试着去解决神话学的根本问题。克洛茨是莱辛的忠实追随者（赫尔德曾对这个可怜学究实施过暴烈攻击），曾就《拉奥孔》写过一些批评文章，还在其《荷马评论集》（*Epistolae Homericae* ）当中采纳了一种并非不合理的反神话立场。巴洛克诗人、洛可可诗人、抒情诗人和属灵诗人，甚至包括“启蒙”诗人在内，除了“弥赛亚”诗人克洛普斯托克，可以说所有这些诗人都一直在召唤希腊-罗马的神灵，无论妥当与否。克洛茨则认为是时候戒绝这些丑恶神灵了，若是在宗教诗篇中召请这些丑恶神灵出场，那就会有异教嫌疑。赫尔德首先为诗歌当中的希腊神话元素辩护，赫尔德这么做，部分诱因在于他的好斗品性，不过，他也因此很快进入论战的深水区，并且从此以后，再也不曾重获坚实的立足之地。一开始，赫尔德倡导诗歌中的神话元素，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元素可以提升诗歌的优雅和美感，赫尔德也是据此倡导对古老的希腊神话观念展开现代解释并予以发展，此时的赫尔德认为，希腊神话乃是美的极致，而且也很难再去重新创造那样的神话了。

应当运用希腊神话，赫尔德在1767年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 但不是像希腊人或者罗马人那样运用它们（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将它们视为宗教事实或者历史事实）；不是像宗教改革家们那样，在经历了蛮荒时代之后，思虑着将它们保存下来（作为古代的神圣遗迹，而且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声望）；不是像那些没脑子的人那样运用它们（仿佛那只是空洞的声响）；不是像那些话痨那样运用它们（这类人动不动就从希腊神话当中摘取一段隐喻，这样的隐喻已经被用滥了，这些人还是不会动一动脑子，去找新的）；我们对希腊神话的运用应当依托创造精神和艺术精神来展开，并据此开辟出新的肥沃土壤……

在此，赫尔德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若要令古老神话以创造性的方式得到新生，唯一的办法便是对这些神话有信仰，此一路径，作为虔诚基督徒的赫尔德自然是不会规划的。此外，他的历史意识以及他的常识也都令他充分认识到，世人信仰神话的时代已然消逝不见了。大概是十年之后，赫尔德对这一点予以了特别申述：

> 它们已然从这个世界消逝而去了，那是人类想象力能够塑造的最美偶像。既然它们都坍塌了，不似它们那般美妙的偶像岂不是也要随之坍塌吗？谁来取代它们？是另外一批偶像吗？

作为诗性之人，赫尔德当然会为希腊诸神的沦落而悲伤；作为基督徒哲学家，他不会希望看到希腊诸神胜利回归：

> 倘若你希望依托诸神意象迎接新希腊的回归，就必须首先让世人回归那诗性的神话迷信，回归那自然的单纯当中蕴含的一切。游历希腊并思量那里的庙宇、岩洞以及圣林，你甚至都不会觉得有任何族群能够臻于那样的艺术高度，毕竟，其他族群根本就不知晓希腊人的宗教，根本就不知晓这种富有此等生机力量的迷信，而正是这样的宗教，令神话和诸神浸染了希腊世界的一切角落。

在游历罗马之后，赫尔德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不能将希腊诸神逐出文学王国，他便向象征主义寻求庇护。赫尔德将希腊诸神视为人性之至高且神圣的表现，认为应当在这个意义上运用希腊诸神。他自己甚至也依托一些希腊神话来传达人道主义理想，他还写作了一系列的抒情剧，诸如《菲罗克忒忒斯》《阿德墨忒斯与阿尔刻斯提斯》《被释的普罗米修斯》等，这些剧作都有着强烈的伦理意味。此外，他还写就了一批他所谓的准神话作品，实际上就是散文体的神话故事，借此传扬哲理。然而，这最初的努力根本没有成功可言，欲意传达的道德信息也太过突兀；此种做法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神话的文学地位问题的。赫尔德自己对此应当也是有意识的。他对原始诗歌的了解令他充分认识到，原始诗歌是从神话当中生发而出的，因此，倘若德意志诗歌要获得重生，就必须依托神话。这方面的障碍一直都在于那个关键的信仰问题。让一个基督教民族回归异教信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赫尔德这样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不可能依照异教诗性神话的眼光来看待基督教的。在生命暮年，很可能是为了反驳已经深深信从希腊诸神的歌德和席勒，赫尔德以相当犹疑的态度同克洛普斯托克、格尔斯滕贝格（Gerstenberg）等“吟游”作家协同作战，在这场斗争中，他特别提起《埃达传奇》（*Edda*），认为那里面蕴含了特别契合北欧和日耳曼诗人的神话元素。[4] 不

过，此时他对希腊神话秉持的这种犹疑态度，并不能削弱他因为强调希腊诗歌当中神话元素之重要地位而产生的影响。赫尔德对希腊神话元素的强调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也许不像他的“人性”理想那般直接，不过，那样的“人性”理想也正是莱辛在《智者纳坦》中予以卓越阐发的。这也正是赫尔德阐述于《人性书简》（*Letters on Humanity* ）中的主导伦理观念，在这部作品中，赫尔德的集中关切恰恰就在于被温克尔曼奉为理想之美并钟爱有加的那些男神和女神，而这些神灵，却是被作为理性主义者的莱辛或多或少忽略了的。

---

[1] 赫尔德为莱辛的*Briefe，die 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1766-1777* 写作了续篇，接着便在1769年写就了*Kritische Wäldchen* ，这部作品处理了拉奥孔问题，并攻击了莱辛的论敌克洛茨（Klotz）。赫尔德还于1769年写了小册子*Wie die Alten den Tod gebildel* ，以此回应莱辛的拉奥孔论题，莱辛谢世之时，他还赋诗予以祭奠。他为莱辛书写的悼词以及他的论章*Winckelman，Lessing and Sulzer* 也足以成为明显证据，表明他从未停止过对莱辛及其观念的关切。

[2] 莱辛认为莎士比亚足以比肩希腊戏剧家，不过，这是他提起的唯一一个例外。

[3] 此处用的是G.H.洛奇（G.H.Lodge）的《艺术史》译本，字句方面略有改动。这段话出自结尾段落。

[4] 特别参见*Iduna，order Der Apfel der Verjüngung* ，1796。

入侵

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这批神秘希腊人入侵德意志了，尽管此前这个神秘族群无论是在海洋上还是在陆地上都消逝不见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个神秘族群就是以温克尔曼所见证的这种方式现身了。他们的出现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潮流，这是因为莱辛已然赋予他们充沛的生命力，令他们足以强势进驻德意志大地。这批希腊人在德意志大地上树立起绝对的完美标尺，庄重、肃穆、虚幻；他们笼罩在异域美感当中，因岁月砥砺而彰显出朦胧和沧桑。德意志遂匍匐在这群神秘希腊来客脚下，亲吻着他们借以实施暴政的棍棒；众人纷纷发出“请赐予我们神话”这样的祈请，并以迷醉的眼神看着这批神秘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访客，这些来访者在人道理想的端庄掩盖之下，已然加入了入侵者的军队。最令人费解的是，德意志人在拉奥孔群雕问题上就这么一直坚持着这种盲目态度。1755年，温克尔曼只是在观摩了这座雕塑的石膏仿制品之后，就给出了自己的一番品鉴，那是德意志人第一次碰触拉奥孔问题。后来，温克尔曼在罗马见证了群雕的原件，对自己的论说进行了细化，不过，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1764年出现在《艺术史》中的相关论说，并无本质上的改变。1766年，莱辛逐字逐句地摘引了温克尔曼最初那份论说；1769年，赫尔德再度摘引。席勒于1793年将《艺术史》中的论说全文摘引于自己《论感伤》（*Pathos* ）一文中；在两年后的《理想与生活》（*Ideals and Life* ）当中，他将拉奥孔视为征服悲伤和痛苦的至高典范。歌德曾于1771年在曼海姆拜倒在拉奥孔群雕的仿制品脚下，并在一番思虑之后，于1797年写就了自己的看法（同温克尔曼的看法并无太大不同）。荷尔德林于1790年在他的第一部散文体作品中，以流光溢彩的语词谈论拉奥孔。最终是海涅打破了这个魔咒，那还是因为他在这个历来被德意志人奉为神圣的论题上写就的一份诗篇中的一个无关的玩笑。此时，时间已经进展到1821年了。

至于其余的一干人等，则都将这尊怪异而阴沉的艺术品奉为希腊式静穆的象征，认为其中的寓意就是静穆战胜了生命的悲剧。德意志人有求于希腊人，他们有求于希腊人的正是这一点，而这恰恰是希腊人无法给予德意志的。拉奥孔群雕因此也就成了德意志古典运动的反讽象征，德意志人显然是就希腊艺术应当是什么样子有了构想，而后才找到了拉奥孔群雕，对之实施了极为严重的扭曲。拜伏于拉奥孔神话的德意志诗人（就如同那些雕刻家一样），借此创制出怪异且迷人的诗篇，此类诗篇极具奇幻气息，而且也极具哀婉气息。最终，这件艺术品催生的悲剧效果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这样的悲剧效果却正是德意志诗人竭力予以消除的（在这一点上，德意志诗人和这件艺术品的创制者们是不一样的）。

第四章 创造者：歌德（**1749～1832**）

您的守护神，维护着您的那种精神，是

高贵的、奋发的、昂扬的、无可匹敌的，

恺撒的守护神并不在那里；但在他身旁，您的天使

由于更为强力，变得恐怖，因此

在你们之间，要留有足够的空间。

——《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

普罗米修斯

诗歌世界的三个伟大创造者——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都是通过创造世界来阐释生活的，他们令各自的时代升华到崇高且极富张力的境地，不过，他们也都极为贴近自然，那样的真实性就如同现实生活，尽管他们都极尽诗性之荣光。他们的作品展示出巨大的人类经验，不过，无论这经验何等地大，却也都是同质的。他们时而令我们沉陷黑暗当中，时而又将我们提升到明媚的阳光之下；他们可以压制我们，也可以抬升我们。不过，一旦我们弄清楚自身的境遇，便能够认清楚是什么样的法则在统领着他们的宇宙，尽管在他们的世界中，就如同在我们的世界中一样，最终的秘密是不会有揭晓的一天的。

歌德是现代诗人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同这三个创造者齐平的人；不过，他的作品中的总体经验却是极端异质的，全然缺乏内在的和谐感。歌德创造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多个彼此矛盾的开端，并且是前后相继的开端，这些开端都是在他为阐释生活而展开的连续实验中创造出来的。这些成就虽然也极尽荣耀光环，却是各自孤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并无有机关联。这就如同一座迷宫，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风格尽现其中，涌动着并且彼此冲撞着。歌德如同莎士比亚那样，引领我们碰触相当的高度并探索相当的深度，也如同但丁那样，引领我们走过天堂和地狱之旅，还如同荷马那样，以此等可爱的朴素，向我们展现各个时代的生活；此外，他还以他那优美绝伦的抒情诗愉悦我们。但要将他们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品鉴，乃是相当艰难的事情，也是相当棘手的事情。这就令我们不得不逃离他的世界，因为我认为，那并不是一个世界，仿佛仅仅是深陷困惑和挫败而已。歌德提供的整体经验缺乏本质上的和谐，也缺乏潜在的逻辑，在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那里，是见不到这样的总体经验的。更糟糕的是，歌德的作品，至少是后期作品，甚至

都失去了生命力。

为何会这样呢？歌德本人首先就个中情由有所揭示，而且说得相当到位，他认为，是他处身其中的那个世界出了错；这就令他面对的世事素材较之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更为艰难、更为复杂、更为阴郁。他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知识和文化都在提升，由此造成的重负令那个世界走上了解体的轨道，这是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不曾见识过的。那样的世事潮流之中，一些东西存活下来，很多东西已然死去，正所谓世事纷纭变幻，令任何人单凭自身的力量都不可能予以吸纳并将之规整为一个整体。不断累积起来的知识令生活之神秘逐渐丧失，毕竟，生活之秘密本来就是一种巨大的灵感力量。至于歌德，则不仅仅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还表征着这个时代。倘若他的心性不是那么包罗万象（不过若如此，他也不会成为歌德，也不会写就《浮士德》），他就大可以忽略科学的进步，忽略艺术和人文的遗产，忽略哲学取得的进展，忽略现代文明那庞杂的整体结构，或者至少也尽可以忽略其中的某些方面。那样的话，他也就不必因为专业化导致的黯淡前景而承受那么多的痛苦。然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历来都想着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体味，由此便只能承受如此沉重的痛楚。不过，歌德对知识的欲望无论如何都不会逊色于他的创造本能，这种欲望常常同他的创造本能发生抵触和冲撞，而且在这样的冲撞中，往往都能占据上风，历来都令歌德处身动荡之中。

此时的整个欧洲都患上了这种病，这病也侵染并攻击着歌德，令歌德成为现代人。此时的诗人则承受着这种病的严重侵害，正在变得怠惰且绝望，要不就是变得顽固且躁动。大部分诗人都已经放弃了世代以来的特权，也就是作为生活阐释者的特权，并将这一特权交付科学家，科学家则当仁不让地篡取了这一特权。这其中，很多诗人已经毫无斗志，甚至都不再尝试同这个世界交流，转而自我闭锁在厚重的幽暗之地。歌德还不至于成为这样的失败主义者。面对现代生活的混乱，他尝试从中

创造和谐，无论是他内心的和谐还是外在世界的和谐。人们普遍相信，歌德已经达成了内在的和谐；不过，人们都不觉得歌德在创造外在和谐方面也取得了成功。要在18世纪的欧洲创造这样的和谐，岂不是超越了凡人的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期待。歌德谢世三十年之后，这个伟大的俄国天才召唤一个陌生新世界进驻光天化日之下，并令现代人进驻这个新世界。歌德肯定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得多，他当然能够取得一场更为显著的胜利，可惜的是，他约束了自己的创造天才，不完全信任自己的创造天才。

诗人的创造力是不需要知识上的组织和积累作为依托的。诗人以另一种方式洞察世界。正如歌德在年老之时说的那样，诗人之洞察世事，乃是依托预感和直觉。日常经验向世人揭示出整体的生活，包括内容和精神。像莎士比亚和歌德这样的人，身上的天才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他们能够创造出这个世界上的男男女女，就如同生活的精神创造了我们一样。他们当然也在运用语词作为媒介，不过，语词在他们那里是极为灵动且富有生命的，足以令他们创造的东西在世间获得长存，而那现实中的阿喀琉斯、福斯塔夫和浮士德则转瞬即逝。究竟是怎样的德性、怎样的神秘力量令这些天才有此成就？没有必要就荷马其人展开纠弹，这个叫荷马的人很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对莎士比亚其人，我们基本上也没什么了解，因此，世人完全可以暗自怀疑，是否真是那么一个叫莎士比亚的人写作了那些戏剧。但丁提起贝阿特丽丝这个名字，同时还奉维吉尔为地狱和炼狱之旅的领路人，贝阿特丽丝则是从天堂和地狱的过渡地带接引但丁展开天堂和星际之旅。歌德拥有强烈的自我剖析倾向，并且在这方面是典型的现代人，他时常陷入梦游状态，并最终拜伏在恶灵面前，那恶灵时常造访梦游状态的歌德，强迫他顺从自己的意志。歌德也曾明确申述说，那样的事情实在是太恐怖了，让他惊惧不已，只要有可能，他就会逃离那样的境地。

尼采称这样的恶灵元素为狄奥尼索斯精神，认为狄奥尼索斯精神是

要前来打碎已然陷落于普遍生活精神当中的个体身上的枷锁的，伟大艺术家在实施创造行动之时都会有痛楚感受，狄奥尼索斯精神则是此一痛楚感受最鲜明的表征。创造，就如同生活本身一样，鲜活艺术品之创制是以这么一个精神解体过程为先导和预兆的，此一精神解体过程也一直伴随着艺术创造行动。折磨、痛苦、劳作，人们反复用这些语词来描述贡多尔夫（Gundolf）所说的原始审美体验，而这种体验唯有一等一的伟大人物方能品鉴。其中的痛苦感受自不待言。歌德对此当然是很清楚的，他将此种原始审美体验同危险和毁灭联系起来，当然也同天才联系起来。而且歌德也曾亲口讲述说，他是竭尽所能地避免这样的体验的。我相信，这正是歌德同三位伟大先驱的根本差异之一。我肯定不至于认为荷马、但丁或者莎士比亚会拒绝这样的体验，拒绝同生活的精神建立直接且神秘的联系，无论那样的体验何时出现，也无论那样的体验以怎样的方式出现。

还有一项重大差异，此一差异很可能是以上述那项差异为依托的。生命和世界之间的本质和谐完满地渗透在荷马、但丁以及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在荷马诗篇当中，生命和世界差不多就是一回事；生命于荷马而言，就是世界，生命本身就是美的，就是值得向往的。但丁则在生命和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形而上的综合，由此创造出重改的交响曲，其中，基督教主旋律化解并消融了那难以计数且四处冲撞的杂音。莎士比亚看到也接受了一个悲剧性的世界，认为这样一个悲剧世界是一个悲剧宇宙的反映，对于这样一个悲剧世界，莎士比亚以狂暴之势予以确认，并依据自己的心绪以激情之势予以呈现。莎士比亚的这个世界可以说是英雄情怀、激情、恶毒以及幽默融构而成的辉煌盛景。这样一个世界，起于烟花柳巷，终于尘世污浊；居住在这个世界的男男女女，乃是诸神的玩具，也是诸神的一场幻梦，如同彗星尾巴一样，追随着诸神的神秘轨迹。无论是荷马的英雄观念，还是但丁的禁欲观念，抑或是莎士比亚的悲剧观念，他们处身其中并予以呈现的那个世界都是宇宙和生命的回响和回应。

歌德不曾听闻有此等和谐存在。相反，他一开始就明确听到并且也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深刻分歧和混乱。生活，也就是他常常说起的自然，于他而言，乃是令人满意的，生活本身就是真实的，得到了证成的，在这一点上，歌德同荷马是一样的；不过，世界就不一样了。此种二元观念是现代的标识，呈现出一种悖论格局，卢梭正是借由此一悖论对时代发出挑战的，此一悖论正是时代的病症，在歌德有关自身本性的二元观念当中得到了直接回应。也正是此一悖论为《维特》和《初稿浮士德》注入了情感张力和强劲动能。这也是《维特》能够横扫整整一代人并开启新的文学潮流的真正原因，毕竟，这是该二元悖论最早的美学表达，而且这一悖论较之荷马和莎士比亚的生活意象要真切得多。歌德的早期诗篇也同样或明或暗地呈现了此一悖论：《甘米尼德》（*Ganymede* ）以及《流浪者的风暴之歌》（*Wanderer’s Storm-Song* ）都展现了那令人迷醉的泛神论情感，在这两份诗篇当中，上述二元悖论同人在面对自然之时的无能这一主题联结起来；《流浪的犹太人》（*The Wandering Jew* ）则对这个世界提起了尖锐的批评；《鹰与鸽》（*Eagle and Dove* ）则尽显生活的愉悦。歌德还在一份早期信笺当中近乎绝望地呼喊：“不要管这个世界了”，“就像圣徒塞巴斯蒂安那样，被绑在树上，万箭穿心，仍然颂扬上帝”。此类恢宏片断以及磅礴的观念散布在他的早期作品当中，其间激荡着此种二元观念，最终，也正是此种二元观念催动着他从沉沦和狂喜，突然转变为尖锐讽刺。他的作品也由此转变为断片这样一种形式。生活于他而言乃是饱满且充沛的，不过，他对那种完满的世界闻所未闻，一无所知。然而，他却如同提坦神一般，倨傲地进行着创造，毕竟，那是他的本能，这样的本能是无可遏制的。葛兹、普罗米修斯、维特以及浮士德，本质上讲都是现代英雄，之所以说他们是现代英雄，是因为他们承受的是一种新的悲剧命运，他们所表征的与其说是伟大人物同世界的冲突，倒不如说是生活本身的痛楚，因为生活已然被囚禁在一种根本就不适合生活的介质当中；他们被这样的生活压迫，倨傲地试图再造生活，自愿地离弃生活，要不就是竭力超越生活并尝试着寻

找属于生活自身的元素。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一种对待生活的尖刻态度悄悄渗透到歌德的心灵和情感当中，这想来也是难免之事。鉴于生活和自然乃是同一的，歌德遂令自己笔下最富悲剧特质的失败主义者维特绝望地在自然当中策动了一股恐怖的毁灭力量。不过，此举显然是在亵渎，是对歌德的圣灵犯下的罪错。时常也会有迹象表明，歌德努力将自然同生活分离开来，并以宙斯或者诸神或者命运这样的超验名义来谴责生活。不过，这样的做法在歌德这里却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等于否决了歌德最根本的体验，即同呈现在自然当中的生活精神联结在一起；更确切地说，这是将不可分离的东西分离开来，由此来否决自己的根本体验，这本质上无异于精神自杀。而这恰恰就是他的恶灵一直敦促他去做的；除了“恶灵”，还能用什么来称呼歌德在斯特拉斯堡、韦茨拉尔和法兰克福展现出来的那种天才呢？正是这恶灵，在引领着此一时期的歌德走向毁灭境地。

此一时期，歌德有了第一次对爱的重大体验，这催生了他深深的危机意识，令他认识到那无可挽回的损失正在步步逼近，他由此生出警觉和抗拒之心，去抵御那冥冥中催促他继续向前、继续沦落的诱惑，正是这样的诱惑，要他去毁灭和被毁灭。歌德是以一种英雄方式展开抵抗的，这样的英雄主义在我看来是用错了地方。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天才催动着他去重演他肯定有过的那种体验，去完全臣服于那样的体验，让瓦解和沉沦与他一路随行，一直进抵生活、爱和死亡可以同一的境地，接受那最终的莎士比亚予以接纳的启示：世界同生活处于悲剧性的和谐关系当中。《普罗米修斯》这部剧并未完成，剧中有一场对白足以表明，他很清楚是什么“在这场变迁的末端”等待着他，于是，他拒绝继续前行。潘多拉见证了她的两个同伴之间爆发的那场激情，遂向普罗米修斯寻求解释：

潘多拉：而那是什么，毁灭了她

和我？

普罗米修斯：是死亡！

潘多拉：死亡是什么？……

普罗米修斯：那时，从那被彻底毁灭的

至深之地，你体验到一切

曾涌入你的快乐和悲伤；

而那时，你的心，在这风暴中涨满，

将借泪水自我释放

那泪水只会增添它的激情；

而你体内的一切在摇晃，响彻，和震颤，

你的全部理智在晕眩，

近景在消融，

你在下沉，

你周围的一切都没入暗夜；

而你，在自我的最深处

拥抱向一个世界，

接着，人必将死去。

潘多拉：噢，父亲，让我们死去吧！

普罗米修斯：还没到时候。

倘若这还不是尼采所谓的狄奥尼索斯状态，那也就只能说，那样的状态在诗歌王国中确实是无处可寻了，况且，那伟大的创造者普罗米修斯对此种状态是很清楚的，只不过他拒斥这种状态。歌德也一样，他的确顺从了自我保护的本能，此一本能在这场搏斗中总体上占据了上风，不过也并不总是能够占上风，而且这场搏斗也不曾有定论可言。直到歌

德八十岁高龄的时候，这恶灵才停止了对他的攻击和侵扰。不过，就他切实的诗歌成就而言，总体上可以说，歌德确认了自然的伟大和荣耀，在早期的那些开端时刻过后，他便拒绝接受生活的普遍悲剧性。简言之，当他的天才以恶灵的姿态彰显而出的时候，他便一直予以抵抗，而且抵抗到底。

也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他的创造力的败落，除此之外，便没有别的因素可以真正解释发生在他身上的这种现象了。这是他的天才的悲剧，不过，他却从这场败落当中赢得了此等胜利，若换作他人，是定然做不到这一点的。踏足魏玛之后，歌德的灵感便阵阵勃发而出，到了这个时期，他同那恶灵的斗争便已经是有意识的了。这样的灵感时刻都是短暂的、阵发式的，持续的时间都不长；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越来越需要朋友的不断鼓励以及出版方的严厉鞭策以在操劳和痛苦中完成工作，而他当初则是以热情和从容开启那些工作的。外在的鼓励和鞭策以及内在的钢铁意志，一次又一次地取代了灵感的地位。也正是因此，他那长长的规划清单从未实现，或者说，都呈现为碎片的状态。他往往是开启一项写作规划，很快便中断了，而后会在数年之后予以接续，不过，观点和角度已经完全变了，这一点从最终的写作情况很容易看出来。由此也催生了大量的琐碎断篇，其中没有任何的天才迹象。在最终阶段，他曾多次尝试完全放弃诗歌，转而从事公务、科学研究以及造型艺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若要担当诗人和创造者的职责，就必须顺应他的天才，接纳他天才当中的恶灵元素，此一恶灵力量一直都在催动他进驻悲剧世界，以便创造悲剧。歌德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选择了同自己的天才分道扬镳；他后来向席勒坦承，创造一部悲剧的念头一直令自己惊惧不已，他也看出来了，悲剧会完全毁灭自己。在一份自传中，歌德承认自己并没有致力于发展自然赋予他的机能，而是一直都在竭力获取自然否决于他的能力。他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承受着殉道般的痛楚，没有任何真正的快乐可言。这是越界行为，而且这样的越界之旅是极为艰辛的。

歌德的意大利之旅标志着他针对那恶灵力量取得了明确的胜利，在这趟旅程开启之前，他一直都在创造，他在那时创造出的种种鲜活人物，不但进驻了这个世界，而且至今都是这个世界的居民：葛兹、维斯林根和阿德尔海；维特和洛特；浮士德、梅菲斯特和葛雷琴；埃格蒙特和葛丽卿；威廉·迈斯特、费林娜和迷娘；俄瑞斯忒斯和塔索；还有一大批次要人物（诸如《葛兹》中的福尔达修士、《浮士德》中的瓦格纳以及《初稿迈斯特》中的一批人物），这些人的生活是莎士比亚式的，而这些戏剧中的主要人物则更具主观特质，此等特质在莎士比亚创造的那些男男女女身上是见不到的，更别说荷马世界中的那些英雄了，此一根本差异，显然归因于这个现代天才身上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不过，倘若说浮士德、梅菲斯特、维特、维斯林根、埃格蒙特、迈斯特、俄瑞斯忒斯和塔索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折射出歌德自身的特性，那也可以说，这些人物所涵盖的巨大领域足以证明，歌德本人也曾作为普遍生活精神的造物去体验这个世界。倘若说洛特带有歌德自传的性质，那么葛雷琴和葛丽卿则完全植根于歌德的天才。

歌德真的像一般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在相当程度上接纳了自然规定的宿命，并据此展开主观创造，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初稿迈斯特》就是明证，这部作品显然是客观作品，其中鼓荡着生活力量。这部小说展现出跟《葛兹》一样的品性，至少是在这部作品中，歌德非常从容且轻松地创造出一批人物，较之那半主观的主人公，这些人物的生活、行动以及存在本身，都更具现实主义特质。

葛兹、维特、威廉·迈斯特以及浮士德，他们各自的生活领域全然不同，不过，他们都是这个真实且悲惨的世界之中的居民。1779年，歌德写就了散文体的《伊菲革涅亚》，在这部作品中，歌德创造了一个更契合自己品位的人物，这样一个人物显然是对葛兹这样的人物的否决。由此，歌德便开启了恶灵和温克尔曼的希腊（强大且毫无顾忌的反恶灵力量）之间的战争。

伊菲革涅亚

歌德是在莱比锡的时候第一次知道了温克尔曼的希腊，当时，歌德童年时代既已习得的洛可可精神装饰正在碎裂、瓦解。科罗迪乌斯（Clodius）教授曾对歌德的一份随心写就的诗篇施以嘲讽，那份诗篇包裹着厚重的神话衣装。科罗迪乌斯的嘲讽当然有些尖刻，但也是颇有教益的，令歌德完全抛弃了神话万神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厄泽尔第一次向歌德提起了温克尔曼这个名字，并提请歌德阅读温克尔曼那本“先知书”。这件事回望起来，不免令人觉得极具象征意义，很显然，这可不是对这个年轻诗人的品位实施了一场有益的净化那么简单，尽管当时未必能看得出来。歌德之于温克尔曼其人、其观念，有着感应式的热情，不过，歌德造访葛雷斯顿之时，并没有觐见“大花园”的那座阁楼；“大花园”中那些无生命的大理石雕像就已经足以令歌德驻足了。当整个莱比锡都在热切迎候温克尔曼的时候，温克尔曼遭到杀害的消息传来了；此事毫无疑问令歌德内心震荡不已，不过，在歌德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之下以及随后那场重大挫折之中，此事也就很快被他淡忘了。

此时的歌德，不仅开始恢复过来，而且还俨然焕发出青春光彩，这自他童年时代以来还是第一次。在斯特拉斯堡，赫尔德令歌德见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希腊，那恢宏的狂飙突进运动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启的。赫尔德的希腊同温克尔曼那庄严的、雕塑般的希腊恰成相反之势；这个希腊乃是诗歌和灵感的盛行之地，活力、自然以及民族生命在其中肆意激荡。歌德此时写就的莎士比亚导言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体验，并且也有着一样的激发效能。歌德并不能算是那个时代严格意义上的古希腊学者，当然更不能算是出色的古希腊研究者，不过，他完全接纳了品达那些狂放诗篇的影响，还在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当中体认出一种同自我颇为亲和的提坦精神。哈曼重新发现并重新阐发了苏格拉底的恶

灵，那是一种直觉式的全知全能的天才，此一恶灵如今终于在一个活人身上找到同类并就此栖居下来，并即刻开始发布令谕。这还不是全部。自洛可可王国的万神殿坍塌并消散之后，歌德的精神王国当中已经没有了神灵。不过随后，弗劳莱茵·冯·克勒滕贝格（Fräulein von Klettenberg）的黑魔法和神秘主义虔敬观念就如同阴云一般笼罩了歌德的精神王国，部分地遮蔽着歌德的天空。这黑魔法，这神秘的虔敬观念，散发出极为朦胧的意味，可谓黑夜之中，暗香浮动。不过，到了这么一个时刻，歌德的精神王国则再次变得敞亮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在那地平线之上，矗立起清晰、粗犷、巨大的神话形象，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神话形象，恐怖的和邪恶的，美丽的和狂野的，怪诞的和崇高的，尽皆在列。宙斯、克洛诺斯、布罗米奥斯、甘尼米德、赫拉克勒斯、珀尔塞福涅、普鲁托、命运女神、森林诸神等。这是歌德生涯当中极具创造力的时期，他在这个时期创造了诸多神话。这些当然都是神话，却不能称其为神话学，这些神话是世界的折射和反映，象征着生活的种种奥秘。对此时的歌德来说，世界是生活的折射，尽管是扭曲了的折射。由此，此一时期歌德那些神话断篇的激发效能得以产生；“浮士德”、“流浪的犹太人”以及“穆罕默德”在歌德内心同宙斯和普罗米修斯缠斗在一起，三大不同文明的残存物借由此一时期歌德那种躁动且狂暴的精神，一下子涌入现代生活的脉流当中。歌德的精神航船已然倾覆，这象征着歌德第一次体验到了生活和爱之破碎本质。

摇撼着歌德的风暴唤醒了对港湾的强烈欲望。此一时期，莎士比亚的天才成了歌德最为强劲的精神动力，引领着歌德跨越那精神深渊；埃斯库罗斯和品达将那疾风幻化为狂风。不过，希腊的明媚岛屿则是歌德的航向标，引领着歌德向荷马靠近。歌德在荷马这里见证了最为平静、最为平和的自然。荷马成了一首摇篮曲，令那狂暴的维特之心趋于平静。在瓦尔海姆的一座小村庄里，有一座周边环绕着农舍和谷仓的教堂，教堂外的菩提树下，人们可以看到歌德安坐桌旁，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阅读荷马；也可以看到歌德在旅店花园里剥豌豆，然后到厨房烹

制，此时他脑海里全是珀涅罗珀及其追逐者们，还有那满席的牛肉和猪肉。亲身体验一把那古老的家族生活，这恐怕是最令歌德愉悦的时刻了。维特的希腊同温克尔曼的希腊并无多大关联。当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在维特面前提到这个考古学家的名字时，维特内心生出的是倨傲和厌恶。维特为了生计不得不向C公爵乞讨，那大理石雕塑展示出的淡然和静穆，根本不足以平复维特感受到的奇耻大辱。然而，奥德修斯和牧猪人的“辉煌歌谣”以及夕阳西下的场景，却成就了此一奇迹，令维特得到了平复。但凡维特提及荷马，一直都是指《奥德赛》；维特所关切的并非那些强大的英雄人物，而是里面描摹的淳朴生活，维特依托《圣经》来解释那种生活。那些族长在他们各自的生活领域之内尽情抒发着孩子般的情感，孩子般的诗篇，如此真实，如此满怀人性，如此深沉，如此狭窄，如此神秘。在那样的生活中，人只需要寥寥土地便可生活，便可长眠。显然，此时的歌德，那个有着提坦梦想的歌德，已然幻化到虚无之境，内心却涌起相反的情感，那就是对界限的诉求。《维特》就是对此一情感的表达，也是歌德在此一时期最后一部伟大作品，这不仅是因为《维特》谈到了荷马，也是因为《维特》谈到了他理想中女人的性格和特质。

然而，这一时期的歌德并没有准备好去接受此一界线必然带来的一切事物。这一时期的歌德，其心绪和情感往往都是暴烈且极富悲剧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对那“摇篮曲”进行回应。此种境况之下，一个北欧巫师的吟唱显然要比一个希腊人的诗篇更具魔力。莪相便在维特的内心取代了荷马的地位。歌德以极具华彩的语词召唤莪相的世界，这就足以表明麦克弗森的诗篇在何等程度上激发着歌德，尽管在后来的申述中，歌德认为莪相的出现只不过是表征了维特内心日益涌起的混乱。维特在最后一次见到洛特的时候，给他吟诵了莪相的诗篇，歌德为此贡献了堪称神奇的散文章节，即便在今天，那样的文字也依然动人，令人难以置信的动人。那即将吞没维特和洛特这两个不幸且无助的年轻人的激情依然在摇撼着我们，我们耳中依然震荡着那北欧的哀歌音律，于是我们不

免在困惑中自问，那昔日的巨人，那桀骜不驯的提坦，如今去了哪里？品达和埃斯库罗斯的神灵和英雄们已然消失在这四处涌起的雾霭当中；四处都是鬼魅般的身影，在哀诉古代英雄的消逝，那些英雄已然落入虚无和死亡境地了。这是提坦神的决死之旅；不过，在沦落最终的败落境地之前，则可以说希腊黄金时代的能量也已然充分发挥出来了。那恶灵的对头已然出现在德意志的精神地平线上了。

歌德魏玛生涯的前十年，以狂飙突进运动催生的璀璨星河开启，以令人绝望的溃散收场，这个十年，见证了歌德向尘世之轭屈身臣服，希望借此让自己契合这个世界并在其中生活下去。是他的恶灵驱使他走向魏玛，他后来也是这么看的；不过，魏玛生涯对他的天才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俗务缠身，为了自我拓展和自我涵养，他不得不如同囚犯和苦工那样劳作，他必须驯服自己的脾性。在这一点上，他成功了，至少在文字上是成功了；1781年，他明确接受了普罗米修斯曾与之展开倨傲对抗的限制。在《人类的限制》（*The Limits of Mankind* ）和《神性》（*Godliness* ）这两份论章中，歌德接受了普罗米修斯的挑战，并对八年前的那个歌德展开回应，就如同一个心高气傲的校长斥责一个傲慢且暴烈的学童。这两份诗篇展现出精妙而严格的美感，那样的抽象之感在他的诗篇中并不多见，由此便已经透射出他在这方面的意向；显然，这些诗篇意在在生活和世界之间达成综合，此一情状本身便足以暗示，歌德的心思进一步向着这方面靠拢了。也是在这一年，歌德在给卡尔·奥古斯特（Carl August）的信中强烈抱怨说，世界充满了愚蠢、矛盾和不公，如若不寻求退避，任凭世界遭受邪恶的宰割，这需要极大勇气。这显然要比在韦茨拉尔和法兰克福那段生涯更令人心碎，更为决绝，毕竟，此时的歌德有使命在身，他必须将这个小小的魏玛公国引上正路。

此时的歌德已然极为强烈地感受到生活与世界的不和谐，但依然选择了不对此等情状做诗性表达。即便是在《初稿迈斯特》当中，他也不曾对此种不和谐展开批判，而是对世界的阴暗面予以昂扬和激越的呈

现，这显然就是对《维特》提起的社会批判做出的正面回应，尽管《初稿浮士德》也无意对世界实施理想化，至于《维特》，则不仅要承受生活自身的痛楚，还要承受那没有心肝的惯例和人造制度的痛楚。面对这个问题，同世界的战斗蜕变为对社会的攻击，歌德因此成为卢梭的门徒，此等蜕变之后，这个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回归自然；回归高贵的野蛮人！"不过在歌德这里，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乃是"回归自然"此一口号的逻辑延伸，这对歌德来说，不免是一桩憾事。在《森林之神》（*Satyros* ）中，歌德就已经对此种解决路径提起了讽刺，此时就更没有可能予以接纳了，毕竟，他已经从莉莉·舍内曼（Lili Schönemann）的牵绊中解脱出来，成了夏露蒂人所共知的追求者，同时也是魏玛公爵的枢密官。即便是如此伟大的诗人也不能向着这么一个虚幻的田园之地寻求退避，尽管那是三十年战争时期德意志人心之所向，并且德意志人也只是在《鲁滨孙漂流记》为厌世之人开辟出更为激励人心的退避之道后，才抛弃了那样的田园向往。但是，倘若歌德有意对世界实施理想化，这样的乌托邦精神就肯定是不能少的。

温克尔曼对那个时代以及对后人的伟大赠礼，就是发现了一个真实的黄金时代，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尽管归属往昔，但确实存在过，那一件又一件的纪念物就是明证。那样一个时代是如此辉煌且伟大，如此幸福且和谐，如此美丽且崇高（这都出自温克尔曼的描摹），令这位最伟大的现代天才不免从中看到自己所珍爱的信念有充分的实现机会，那信念就是生活的本质之美。更为神奇的是，在那样一个世界中，悲剧俨然遭遇了挫败。此一黄金时代的希腊艺术和希腊文学，据温克尔曼宣示，已然将激情和受难逐出了自己的作品；或者说，即便他们会对激情和受难有所呈现，也要对之实施软化和征服，为此，他们将激情和痛楚纳入美的范畴，并展现出灵魂的高贵和伟大。莱辛对此种希腊悲剧的解释模式展开对抗，不过，赫尔德还是为温克尔曼展开辩护，歌德则进一步跟随了赫尔德并且信从了自己希望信从的那些东西。温克尔曼的希腊乃是歌德魏玛幻梦的应许之地，要说这样的幻梦有其悲剧色彩，那也仅仅是因

为温克尔曼的希腊属于往昔的时代。据此信念，要征服歌德之于生活与世界之间的不和谐意识以及他那二元悖论的心灵格局，将那个往昔的时代召唤到当前时代就足够了。

歌德在莱比锡听闻了温克尔曼的希腊，在曼海姆实际见识了温克尔曼的希腊。此时的歌德因为同弗里德里克·布里翁（Friederike Brion）分手而心情沮丧，遂造访曼海姆博物馆，在那些放置着古代雕塑石膏仿制品的宽敞展厅里游荡。这样的景观建制就是奇迹，是雕塑杰作的大集合，是伟大且理想的民族大集会。歌德在“望楼上的阿波罗”面前冥思良久，这是温克尔曼世界当中的至高典范，“阳刚之美的最高理想”。歌德凝视着阿波罗、卡斯托耳以及波吕科斯，当然，他尤其关注拉奥孔群雕。这些是罗马万神殿中关键物件的仿制品，巨大且优雅，一下子动摇了歌德对哥特建筑的热忱信仰。这一切就像是天启，不过，他来得并不是时候，当博物馆的大门在歌德身后关闭之时，他努力将自己见证到的这些东西从心灵当中驱逐出去，尝试回归自我，那样的自我在那么一段岁月当中是不会去关切静穆和宁静的。然而，他毕竟看到了也理解了那些雪白的大理石雕像，它们时常造访身在魏玛的歌德，回报歌德在曼海姆时候给予它们的赞誉。“美丽的诸神不断前来拜访我”，1779年9月4日，歌德在日记中写道，并在给夏露蒂的信中更为精妙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几个月之后，歌德便写就了散文体的《伊菲革涅亚》。

弗里德里克·布里翁也沦为此一无情且毁灭性的恶灵的牺牲品；她的命运在歌德内心催生了最初的对悲剧罪行的意识，此时的歌德也意识到自己那幽暗的心灵深渊将给其他人带来危险。洛特·布夫（Lotte Buff）也曾令歌德相信，他自己也在危险当中。莉莉·舍内曼一度将他驯服，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他最终还是打破了她的束缚。夏露蒂·冯·斯泰因更为明显地征服了歌德。两人之间时日漫长的关系经历了众多的起起伏伏，对歌德来说，这段关系总体上发挥了净化作用。1780年年底，两人订婚，将这段关系推向高潮；不过，此时，很可能也包括随后的一

段时间，两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对歌德施加了纪律上的约束，意在提纯歌德的激情，截至此时，歌德对自身激情的体验都是自然且完整的。随后便开启了一场历时五年的斗争，一边是剧烈涌动的激情，另一边是夏露蒂强加的禁欲理想。歌德自己也认为这种理想是值得追求的，确切地说，此一理想就是：借由夏露蒂那高贵的静穆和灵魂的伟大，来征服歌德那最为暴烈的恶灵。这就是歌德对这场冲突和斗争的智识态度；此时的夏露蒂已是精神希腊王国的居民，这样一个夏露蒂当然也会令歌德向着这个精神国度之居民的方向转变。“她灵魂中映衬出来的世界，实在是壮美。”1775年，歌德对着夏露蒂那雅致的身影感叹道。此时的歌德已经对夏露蒂表征的那种和谐燃起了爱之火。歌德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将夏露蒂视为他在自己诗篇中予以永恒呈现的灵魂伴侣，这样的意象同样呈现在《伊菲革涅亚》当中。她在安抚、克制歌德，让他平静下来，将他心灵当中的风暴向着平和转化。然而，真正塑造了这份著名诗篇之节律的，却是一种无从言说的疲倦：“为何看着如此深沉？”这是对两人之间这种神秘的关系发出的低声抗议，这种关系此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存在于两个飘荡在幽暗世界的暗影之间。那“翱翔在尘世巅峰之上的和平”有着超凡脱俗的美，不过此时，歌德已经沦落完全的疲倦境地，令那非凡的美最终归于虚幻。1778年，歌德在给施托尔贝格女公爵撰写的墓志当中，就回响起这样的音符：

我已爱过并经历过那最好的

并安乐地躺下熟睡，

因为我不能享用更甚了。

歌德并不总是站在夏露蒂一边。在此种反叛情绪之下，歌德眼中的夏露蒂不再是灵魂伴侣，而是一个女人，一个他有着激情欲望的女人，但这个女人又令他的欲望遭到挫败。如果这世间真的存在违愿梦这么一回事的话，那无疑就出现在歌德的一部怪异小剧本当中，这部小剧名叫《兄妹》（*Brother and Sister* ），在这部剧中，夏露蒂（不染尘烟的夏

露蒂，在剧中已经成了老妇人）竟然死了。不过，她死后留有一女，一位可爱活泼、心灵开阔、激情满怀的少女，她坦然承认自己爱上了一个她认为是她哥哥的男人，由此，她驱散了母亲的鬼魂，但同时也摧毁了两人之间这种痛苦且生硬的兄妹关系。1776年这部剧在魏玛首次上演之时，歌德亲自饰演主人公威廉，并宣读了夏露蒂·冯·斯泰因写给他的一封信。不过在剧中，这封信是出自那个同名逝者。倘若夏露蒂当时在场，想必会周身寒意，透彻骨髓。

1779年4月6日《伊菲革涅亚》首演之时，夏露蒂拒绝到场，因为她不能忍受剧中扮演俄瑞斯忒斯的歌德躺在科罗娜·施罗特（Corona Schröter）的怀中。谁又能责怪于她呢？她很清楚，而且是很痛苦地知道，这个科罗娜·施罗特，这个兼具可爱和天赋的女演员是全然顺从歌德的，这一点恰恰是她做不到的。《伊菲革涅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科罗娜在这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协作者角色，命运往往就是这么反讽。剧中，这位女主人公深沉且纯粹地爱着自己的哥哥，愿意为爱人自我牺牲，这显然是在向夏露蒂的唯灵主义致敬，这部剧是歌德第一次做出重大努力，去呈现他内心那种尚且处在飘摇状态的和谐，以此来反映一个世界。唯有在这个世界当中，这样的胜利才是可能的，这个世界就是温克尔曼塑造的那个黄金时代。欧里庇得斯的《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讲述了一对兄妹在蛮荒之地相认并借由帕拉斯·雅典娜的帮助成功回归希腊的故事。这就是一对兄妹置身险境，一个女神搭救了他们的故事。这则故事剥离了一切偶然因素，也就成为歌德自身真切经验的体现。歌德是从表面上理解并看待欧里庇得斯的这部戏剧的。维拉尔（Verrall）对结局做出了引人入胜的阐释，认为那是反讽的拼盘，是讥诮的戏谑之作，只有俗众会将之视为福音，当然，他们愿意这么干，不过，对那些耳聪目明的观众来说，这样的结局提升了这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冷酷程度。这样的解释源于一个较之歌德时代要复杂得多的时代，因此，这样的时代对希腊人之真实本质的理解也要深刻得多。这样的见解当然也比歌德的见解更为敏锐、更富批判性。能够给出此等见解

的心灵是谙熟悲剧的，无论用什么样的伪装将悲剧遮掩起来，这样的心灵都能够将其识破。倘若1779年歌德见到这样的解释，他肯定会惊惧不已并将之拒斥。这样的见解如何同“望楼上的阿波罗”形成契合呢？这样的见解同歌德的梦想、温克尔曼的梦想，怎么可能扯上关系呢？即便能够扯上关系，歌德的希腊偏见已然足够坚硬，根本不可能同这部极具穿透力的现实主义戏剧产生契合。陶里斯的空气是难以呼吸的，弥漫着血祭的味道。伊菲革涅亚、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德斯确实逃离了此地，不过，倘若仅仅是字面上接受此一结局，那将是全然的一厢情愿，根本站不住脚。伊菲革涅亚并非端庄娴静之人，而是充满激情和痛苦，同时也工于心计且无所顾忌。她置身绝望境地，采取了绝望之策，残忍但也不失情由地欺骗了那个虽然嗜血且野蛮但也简单且值得信任的国王。在这部剧中，何来灵魂之美和灵魂之伟大征服了悲剧呢？拉奥孔的经历实际上也是如此；人们普遍认定的一切伟大的希腊艺术的品性在拉奥孔群雕身上难觅踪迹，尽管人们普遍将这件艺术品作为典范来阐发那些品性。

然而，歌德是拥有创造性的天才的。他完全有能力将温克尔曼的希腊在欧里庇得斯的基座上树立起来。这是一个现代的、人道主义的希腊，是歌德真正切望的东西，其中充溢着从曼海姆博物馆那些雕像的宁静和庄严品性当中勃发而出的种种理想。俄瑞斯忒斯，那个倍受噩梦折磨、倍受痛楚的哥哥，像极了歌德自己，因此就不需要太大改动；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则是必须清除的。帕拉斯·雅典娜，拯救者，高贵的智慧女神，必须从云端下来，变身为夏露蒂·冯·斯泰因。由此，歌德便得以“用灵魂去找寻希腊人的国度”，并最终凭借自己的《伊菲革涅亚》创造出温克尔曼在拉奥孔身上看到的那些东西：女主人公身上那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以及凭借灵魂之崇高而对痛楚和苦难实施的征服。可怕的诅咒一直在追索着坦塔罗斯家族的最后余脉，不过，依据歌德的处理方式，这一诅咒引发的悲剧最终不是以女神的一项令谕得到化解的，而是靠着一个女人的纯洁。歌德剧中的伊菲革涅亚既不工于心计，也不会欺骗，这跟欧里庇得斯剧中的伊菲革涅亚是不一样的。而且

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中，要拯救这些受到诅咒之人，就必须毁灭那些可怕的神灵，那些神灵的野蛮激荡着欧里庇得斯的整部戏剧，它们的邪恶影响，歌德称为恶灵式的。在歌德的《伊菲革涅亚》中，女主人公向托阿斯国王细述了坦塔罗斯家族的漫长命运史，家族众人昔日里犯下的黑暗罪行，是埃斯库罗斯的卡桑德拉提起来就要缠斗不已的，欧里庇得斯的合唱队甚至连提都不敢提，由此，歌德便将希腊悲剧惯常的那种模糊且神秘氛围消解净尽，将一切都置于澄明之境。此举乃是从神话当中伸张教益，而不是在塑造神话。像剧中的伊菲革涅亚那样如此清晰地去知晓并理解整个传说的一切细节，意味着从理智上超越这一神话传说，认识到以怎样的方式才能将邪恶转化为善良。歌德的伊菲革涅亚显然不是命运的盲目牺牲品，她有意识地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去赎买她家族犯下的罪行；也正是因此，歌德的伊菲革涅亚才反对在陶里斯杀害陌生人，同时也拒绝将贞操献给陶里斯国王。她的手必须是干净的，她的心必须是纯洁的，否则无从达成目标。她已然在理智上经历了启蒙，在精神上保持着纯洁，由此就成了一切邪恶和病态力量的反对者，一个贞洁的反恶灵者。

歌德自己后来也在谈及恶灵之时给出了深刻言说：唯有神才能反对自己（Nemo contra deum nisi deus ipse）。埃斯库罗斯乃是通过召请诸神，才得以斩断紧紧扼住俄瑞斯忒斯的、由血腥罪行和复仇形成的戈尔迪之结。无论欧里庇得斯剧中的帕拉斯·雅典娜是不是女神，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欧里庇得斯这里，帕拉斯·雅典娜而且唯有帕拉斯·雅典娜能够避开那可怕的最终灾难，或者说，唯有她能够宣称自己拥有那样的权能；任何凡人都不可能反转诸神的令谕。然而，歌德将此种能力赋予伊菲革涅亚，令她成功驱散了那家族诅咒，由此也就否决了此一诅咒的神灵起源。在希腊悲剧当中四处出没的可怕东西，也就是歌德于1774年所说的“神话之强大世界当中的巨大身影”，也在歌德的戏剧诗篇当中投下长长的阴影，但那样的暗影最终被证明了不过是破晓之前迅速消逝而去的黑暗。即便是俄瑞斯忒斯的癫狂以及他在癫狂之中见到的先人的

幽灵，即便是伊菲革涅亚吟唱的命运之歌，也都根本无力驱散世人内心那深深的无解信念：该来的自然会来，命运无可更改。伊菲革涅亚经受住了种种诱惑，始终保持纯洁；她以英雄般的决心讲述真相，她和俄瑞斯忒斯都没有因此遭遇苦难；她的困境成为纯粹想象性的；她也许会恐惧托阿斯，但我们不会。伊菲革涅亚的境遇、经历、外在的行动以及内在的冲突，都是象征性的。俄瑞斯忒斯的心境却是实实在在的：处身恶灵钳制之下的歌德，乃是借由夏露蒂·冯·斯泰因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才获得拯救的。此一精神净化行动发生在一个理想世界，那是想象中的美丽希腊，可怕神灵已然从这个世界消散而去。在这个世界当中，高贵应和着歌德倾听的音乐战胜了悲剧，而歌德谱下此等乐章，正是为了“抚慰灵魂”。于此，伊菲革涅亚和俄瑞斯忒斯便都幻化为精神之音，可以倾听但无从得见。对悲剧的这场胜利，乃是作为戏剧家的歌德遭遇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因为伊菲革涅亚的内心冲突根本不能被称为冲突，那不过是一系列的美妙独白而已，不过是在历陈灵魂的纯洁而已。倘若说温克尔曼过分理想化了希腊以及希腊艺术的本质，那也可以说歌德走得更远，对温克尔曼的理想实施了基督教化，那时的温克尔曼并没有毅然决然地宣称自己不是基督徒。那时的温克尔曼拜倒在阿波罗脚下，将美的本质界定为阳刚之美；他是最后一个宣称《伊菲革涅亚》中那个贞女蕴含着拯救世界的力量的人。歌德在展开希腊研究的时候，以“恶魔般的人性”来斥责这部戏剧；他在1780年以自由格律对这部剧实施重塑，在1781年将之改造为散文体；最终，在就节律问题同赫尔德长时间商讨之后，他带着这部剧作前往意大利，并在意大利达成了完美的和谐境地，而唯有这样的和谐能够表达他的理想。《伊菲革涅亚》建基于一种精神上的爱的观念，这挂念未必真是歌德自己的，不过可以肯定，这观念对歌德的激发较之他那朦胧的希腊观念来得更为真切。他于1781年开始写作悲剧《厄尔珀诺尔》（*Elpenor* ），不过并未完成，始终都是断篇，而且这部作品成了他后来特别憎恶的东西。剧中包含了就复仇问题展开的一段华彩论说，不过，其余文字都是极为僵滞的，这部分地是

因为里莫尔（Riemer）对这部剧实施的修订，那样的修订毫无灵性可言。不管怎么说，问题始终都是存在的，他如何了解那些同他截然不同而且时间距离又是如此遥远的人呢？直感在这里真能帮上忙吗？也许，歌德跟温克尔曼一样，在心性上同那些人有亲和之处，尽管这样的亲和很是怪异且残缺。然而，真是这样吗？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他是在曼海姆博物馆的石膏仿制品面前一番沉思之后采纳并信从了他人的观念。他让自己接纳的这一切变得空灵，成为他和夏露蒂·冯·斯泰因的透明布料。无论是歌德还是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任何诗人，都不可能一直将这样的创造维持在恰当的轨道上。倘若温克尔曼真的握有通往希腊的钥匙，那么歌德就必须看一看温克尔曼看到的那些东西。

那恶灵又会怎样呢？歌德和夏露蒂之间一直就存在这么一个恶灵，尽管该恶灵一直都遭到压制。歌德运用了众多比喻来刻画此种境况。1778年，歌德谈到那困扰着他心性的铁笼正在收紧，很快，任何东西都无法在他心间穿行了。甚至可以说，他整个人都已经变成了烈火淬炼的铁块。1781年，歌德告诉夏露蒂，她已经征服了他的心，将藏匿在这个强盗男爵城堡中的仆从悉数赶了出去。1785年，他心里便只剩下两个神灵了：夏露蒂和睡神。两尊神灵治愈了他身上能够被治愈的一切病症，并驱赶了那些邪灵。他一度是那么幸福，而那个时候的夏露蒂也能令他倍感幸福，人们见到他，便不免生出一个垂死病人恢复健康的感觉，他衣着笔挺，心情舒畅；他的心灵如同一间干净且美观的客厅，但是空无一人。当两人的关系出现问题之时，歌德的信中展现出极大的恐惧和绝望，这实际上证明了歌德曾跟夏露蒂说起的话是真的。他曾告诉夏露蒂，她是他跟这个世界的唯一纽带。时间流逝，这纽带变得有些令人烦恼了，这是因为她嫉妒且苛求，也是因为她要求他为两人的关系保守秘密，这惹怒了他。歌德最终挣脱而去，倒也并非完全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并不是夏露蒂在歌德心中种下了对意大利的激情和渴望，然而，正是这无可救治的乡愁令迷娘面无血色并在她的歌声中啜泣。歌德就这么保持着这种怪异的静默状态，一直到他抵达罗马，其中的情由恐怕绝非

逃离魏玛或者逃离夏露蒂·冯·斯泰因这么简单，这样的情由岂非太过凡俗了？真正的情由乃在于他的天才，此时，他的天才已经揭竿而起，准备为自己的存在而战斗了。这天才为他编织出一片浸透了阳光的浪漫之地，如同魔咒般唤醒了父亲讲过的那些故事，唤醒了自己那遥远的家族记忆，对歌德来说，意大利一直都是应许之地。他的天才发出了日趋迫切的低语，并编织出那样的魔咒。

他的天才先是臣服于一种柏拉图式的激情，而后又臣服于一种精神化的激情；就如同狗一样，别人会扔给他一块切牙骨去撕咬，要不就是从斯宾诺莎那里借来一把锯作为安慰；天才被那个魏玛的枢密官呼来喝去，四处打杂；但凡公共庆典，人们都会期待这位天才耍出一些花样，供大家消遣；《伊菲革涅亚》之后，这天才便差不多没有活力、没有生气了。歌德的母亲在1783年这么描述她这个儿子：他似乎得罪了缪斯。不过，此一时期，《威廉·迈斯特的舞台使命》（*Wilhelm Meister’s Theatrical Mission* ）的写作倒是不曾中断过。歌德的天才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般顺服。两个人物悄悄闯入这个流浪剧团的破落演员队伍当中。他们是谁？这两个哀伤且无从捉摸的造物，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中一个正在渴望中痛楚不已，另一个则在低声抱怨命运。那是迷娘的声音吗？抑或是那恶灵在发出哀求之音？

你知道它否？

离开，离开，

同你一道：噢，主人，请听我祈祷！[1]

倘若温克尔曼当年顺从自己的天才，去往希腊而非意大利，那么歌德（他倒是根本无意前往雅典）显然就会在意大利找到他的天才意欲寻求的东西：浪漫、色彩、生命、温暖，以及青年时代的重生和直面危险的生活方式。当然，是那恶灵如此无可抗拒地、如此非理智地驱使歌德越过阿尔卑斯山，不过，“主人”的这趟行程却是有着自己的关切的，支

配这趟行程的，乃是一种同那恶灵正相反对的生活观念。歌德听从恶灵的指令前往意大利，不过，这趟行程却也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此时的歌德，从理智上讲，已经决定了要去熟悉并了解温克尔曼的希腊，同罗马无可化解地纠结在一起。

---

[1] 出于明显的原因，我此处选用歌德早期的*Gebieter*，而非后来的替代作品。

意大利

歌德说，他在这座永恒之城经历了一次重生，尽管人们已经羞于重复这样的鹦鹉学舌之举了，不过他还是要说；他还在一封信中用到了“第二次青春”这样的表达。《意大利游记》（*The Italian Journey* ）的确有某些部分是相当迷人的，不过，那里面也充斥着早熟的颓废。他在此行三十年之后，才依托信笺和日记将这份游记编纂出来，在此行四十年之后，才将趣味大为逊色的《第二次逗留罗马》（*Second Journey in Rome* ）拼凑出来（这都是歌德严重的拖延症的明证）。同时期的信笺，更为直接、更为真切、更富激情地讲述了一样的有关消逝了的青春的故事。处身魏玛、在夏露蒂面前那个温文尔雅的歌德此时已然完全无从辨认了，一种怪异的自我意识升腾而起，而且，此种情状必定要发展下去。青年身上那种不经思虑的自发性，借由天才存续下来，并一直保存到老年时期。此时，这种自发性一下子勃发而出，一发不可收拾，除了几个短暂的时期。此前，他曾在夏露蒂的协助下，勇敢地展开自我毁灭，不过，当这个时期结束之时，他对夏露蒂心生怨愤了，这一点在《塔索》（*Tasso* ）中已经非常显而易见。

德意志学究气和德意志彻底性一直都是歌德禀性的组成元素，就如同他的诗才一样。在意大利的时候，这些元素强有力地涌动起来，这也不免令马科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这样的人感受到一丝邪恶的快感，比尔博姆的《论不完美》（“Quia Imperfectum”）可谓一篇迷人文字，非常耐读，他那邪恶的快感就在其间翻滚着。比尔博姆在这篇文字中对意大利时期的歌德实施了描摹，那是一个操劳、尽职尽责、毫无灵性、高傲、无趣的游客。此番描摹并非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一幅颇为真实的肖像画，其中会有扭曲，不过，也都是相当精巧且雅致的夸张而已。《意大利游记》是一部相当老气的作品，是一个自持自为之人的

自白，有着严肃的目标意向，也有着强烈的心性。要看，要学，还要运用自己的学识，这值得赞誉，不过，这其中却没有任何灵性可言。歌德之置身意大利并非为了放纵自我，而是有着一系列的重大诉求，这一点他是有特别申述的。他说，他要在四十岁之前沿着正确的路线去学习，去发展自己。一旦想到《迷娘曲》，这一切便不免令人感到费解；在《迷娘曲》当中，处处都有诗行、字句乃至整个段落在展现隐藏在此一道德态度背后的强劲欲望，从中不难看出那驱使歌德离开德意志的可怕内在冲突以及他的心灵疾病和激情，而罗马之行救治了这样的疾病和激情。在这个问题上，歌德给夏露蒂·冯·斯泰因的一封私信有着更为雄辩的表述。在这封信中，歌德以悲悯之态展开自我谴责，为他的这场秘密逃离行动，也为他那怪异的沉默。面对这一切，歌德甚至很难理解自己。信中谈到了生死挣扎，谈到了此次绝望行动令他恢复了自我，还谈到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说出他经历的这一切。包括这封私信在内的多封信笺，乃是十分切实的证据，表明此时的歌德本人并不真正理解自己的这些行动，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行动是一种尝试：他要永远地脱离魏玛，脱离夏露蒂。也不能单纯地将这场逃离行动理解为逃离唯灵论，逃往异教。歌德对此多多少少还是有意识的，就此而言，可以将这场行动视为一个转折点，是从诗歌创作向着沉思造型艺术的转折。当他那直觉式的创造力来到他梦想中的和谐世界的时候，此种直觉创造力不再被充分展现出来。歌德希望用学识来取代自己的直觉创造力，这就意味着，必须用知识来代替想象力的位置。为此，他首先必须熟悉并了解古代艺术品，这些他都可以在罗马看到，可以在罗马展开研究。他说，在魏玛的时候，他这方面的渴望就已经有很多年了，他要看看这些艺术品。那恶灵如今算是臣服于他的此种欲望了；那恶灵并不知道此一欲望意在何方，便追随歌德从布伦纳山口到维罗纳，从维罗纳到威尼斯。在威尼斯歇息片刻之后，恶灵又追随歌德借由费拉拉和博洛尼亚抵达罗马。

他从威尼斯发出信笺，信中说他真的相信倘若他没有采取此一决绝行动，他会完全死掉，他想要亲眼看一看意大利的古物，这欲望令他魂

牵梦绕。过去几年间，他一直心系意大利，在此期间，但凡读到拉丁作家或者看到任何同意大利有关的东西，他就会极度痛苦。现在，他离罗马越来越近了。旅途的艰辛又算得了什么呢？他终究是要抵达罗马的，就让伊克西翁的轮子带他到罗马吧。他此时的根本信念同此一激情的勃发混融在一起，并且部分地解释了他的这种勃发的激情，此一信念就是：知识乃植根于对事物的实际观察，而且还主要是借由视觉来达成的。因此，他应当极大地倚重自己那锐利的双眼；这无异于对想象力的无能提起了狂烈且尖锐的批判，这样的批判竟然出自《浮士德》的作者，实在是令人诧异。在托尔博莱的加尔达湖畔，歌德宣称自己此前从未真正懂得哪怕一行的拉丁诗篇。此时，当沃尔克曼（Volkmann），他那个18世纪的贝克德尔（Baedeker）告诉他说，加尔达湖在维吉尔的诗篇中被称为贝纳库斯湖的时候，这个湖泊就真的在他内心焕发出不同的意义。毕竟，维吉尔诗篇曾说起，“贝纳库斯湖，浪花滚滚，波涛咆哮”。那座湖泊不正在他的眼前，不正是在风中荡漾吗？此情此景，人们也许会感觉很荒谬，这世间的湖泊不都是湖泊吗？要对维吉尔的诗句予以视觉化理解，难道一定要追随诗人走过的地方吗？

这样的琐屑之事未免荒诞，不过，其中不乏颇能触动人心之处，不妨想象一下，《塔索》的创制者就那么悠然自得地躺在刚朵拉里面，悉心倾听两个船夫按照自己的旋律吟唱塔索和阿里奥斯托。这两个船夫必定是歌德特地花钱雇来的，毕竟那个时候，刚朵拉差不多已经在湖区消失了。既然真正的效果只能是两个吟唱者遥相呼应，那么这个刚朵拉三人组就必须弃船上岸。两个吟唱人各取一处，歌德在两人中间，庄重地走来走去。他会走向正在吟唱的那个船夫，待那船夫吟唱完毕，便转身走向正待接唱的另一个船夫。一个人要将自己交付音乐，这样的办法也实在是太过操劳了，令人诧异。

操劳乃是整个这趟旅程的主音符。“重生”六个星期之后，歌德在信中谈到更多的是操劳、受累，而非愉悦。歌德本指望能依托这趟旅程学

到很多东西，然而，要学新东西，就必须将以前所学全部祛除并从头再来，这令他不堪重负。幸运的是，他有提施贝因（Tischbein）作为领路人，而且手头还有温克尔曼的《艺术史》。此时，温克尔曼已然成了歌德的教科书而不再是先知了，这本教科书是无与伦比的，从没有离开过歌德的手。从不同的风格当中辨识出不同的时代，恐怕这本教科书提供的帮助是最大的。在希腊艺术及其方法的问题上，这本教科书也是极具启发效能的，正是靠着教科书中揭示的那些方法，那些无与伦比的艺术家从属人形式中培育出全部的神圣品性。歌德还阅读了温克尔曼罗马时期的信笺，倾听了有关温克尔曼的逸闻轶事，他沉浸在温克尔曼的个性、观念以及生活氛围当中。事实上，可以说，此时的歌德竭尽所能地浸染在艺术家的氛围当中，有意识地模仿温克尔曼的生活方式；此一情状当中，提施贝因之于歌德，就如同门斯之于温克尔曼，甚至那最终的醒悟都如出一辙。歌德引述了温克尔曼的一番宣示。当年，温克尔曼宣示说，自己在罗马经历了淬炼和净化，此番宣示同样可以用在歌德身上。歌德补充说，就算是死也无所谓了，因为他心愿已足，他已经抵达了生涯的顶峰。这话等于说，除非艺术于他而言成为活生生的观念，而不再是往日里那种干瘪语词，否则他是不会停下来的。说出这话的人，一直以来都对古代事物极为渴慕，这样一个人显然也是在对《伊菲革涅亚》那种全然的虚幻情景展开暴烈抵抗；此一抵抗行动是如此暴烈，以至于这个伟大的直觉天才竟然在罗马同沃尔克曼一起安坐下来，悉心记录他未曾看过的东西，以便在动身前往那不勒斯之前，“将这一切收割下来”。

作为研究之地，罗马在歌德心目中占有头等位置；那里展示着各个时代各种风格的古物，这一切都是需要歌德付出没有停息的劳作的。这座城市，正如歌德自己在那不勒斯之时说的那样，令他对形式的感觉经受了极大的混乱。这样的混乱往往是压倒性的，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铸就纯粹的审美愉悦。不过，这世间也有那么一座城市，是不需要预先的训练或知识储备或辛苦劳作，便可以令观光者予以体验的。歌德可

以在这座城市体验到温克尔曼塑造的那种希腊启示，尽管温克尔曼从未亲眼见证这座城市。和世界上别的城市不同，这座城市以一座卫城为主导。那里的大理石神庙是单纯的、庄严的、静穆的。那里的像柱以平静且昂扬之态展示出雄心；就是这么悠然从容，就是这么雅致庄严，那女神像柱征服了一切的悲剧重负，将之转变为一场艺术征服行动。那是梦想之地，人们尽可以在这里梦想伟大、美、和谐以及静穆，因为它们就矗立在这里，同那大理石雕像融为一体。温克尔曼死了，生前愿景之真实性也随他而去，因为在一场剧烈的冲突和斗争之后，温克尔曼拒绝亲眼见证希腊。如今，歌德面临同样的挑战，不过，歌德不耐烦地将此一挑战搁置一边。当他离开那不勒斯前往西西里的时候，瓦尔德克亲王劝说道，等他回来之时，他们一起前往希腊和达尔马提亚。歌德认为这个计划是极为荒诞且轻率的。他说，这样的计划是看到了世界落入那些伟大力量之掌控的结果。他说，一个人必须站稳自己的脚跟，一定不能昏了头。后来，他安然返回罗马之时，便颇为愉悦地对着一个英国旅行家从希腊带回的速写展开沉思。他尤其对帕台农神庙的雕带感兴趣，那是菲狄亚斯（Phidias）的作品。他宣称，他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可爱的东西了，这东西给他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尽管看的只是二手材料，不过他丝毫没有遗憾。他并不是没有发觉，任何的速写、蚀刻或者石膏仿制品，都不可能传达出切实的艺术观念，为此，他在意大利旅行期间还无数次地咆哮、愤怒。他还高声喊叫着说，真要了解这些东西，就必须自己去看看。为什么帕台农神庙的雕带会是例外呢？

和温克尔曼不一样，歌德在拒绝亲自体验希腊的过程中并没有经历冲突。他天才当中更为潜意识的那一面已然满足于意大利的阳光了，已然对那不勒斯周边的乡村地区、西西里以及海洋之美颇为欣悦了。意大利的阳光足以令他迎来精神的重生。谈到这一切，他就如同一个崇拜太阳的人那样，一想起北方那阴惨和雾霭之地以及德意志那“铁一般阴沉的天空”，就心有余悸、颤抖不已。那不勒斯的优越位置令罗马显得像一座古老、幽僻的修道院。意大利的气候是歌德特别想随身带回德意志

的东西，因为永远生活在意大利，这样的年头是不会在他心里浮现出来的。他真切地感受到，他同意大利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对罗马天主教及其一切的宣讲，都完全没有同情可言；那里的嘉年华既令他厌倦，也令他愤怒；一看到那种中世纪画作或者哥特式建筑，他便禁不住退避三舍，更别提巴洛克建筑了。现代意大利和中世纪意大利令歌德同样感到厌恶，无论是宗教方面、审美方面还是卫生方面都是如此。他看重意大利，完全是因为那是独一无二的古代艺术宝库，它也保存了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画作以及帕拉迪奥的建筑。然而对于歌德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意大利的阳光令他重新爱上了生活，爱上了自然，爱上了那不勒斯和大海。

第一次见到大海之时，歌德的态度非常冷淡。在威尼斯海边，他只是约略地说景色不错，而后便专注于海滩上的贝壳和乌贼了。第二次造访威尼斯海滩的时候，他也只是就乌蛤、贻贝和螃蟹的行动方式给出了一番迷人描述，那算得上是整部游记当中最华彩的段落了。然而，在那不勒斯，大海慢慢地对他发挥出威力（当然，这要归功于那不勒斯的气候、环境以及沁人心扉的空气），他也逐渐开始接纳这种威力。他颇为谨慎地认肯了那种无边无际的感受，不过，接着他便回身去研究风暴中波浪的形状；此举乃是在对那恶灵元素或者说是狄奥尼索斯元素实施封禁，使之不会对阿波罗的形式造成侵扰。尽管如此，歌德还是在日记中谈道，有人说去看一看大海是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之事，但对他来说，在灵魂中看一看大海就足够了。毫无疑问，此时大海已然进驻了歌德的精神世界，并于四十多年之后成就了《浮士德》第二部分那段神奇叙事，在那里，歌德令主人公担当起宏伟使命，去限制海洋，为海洋划界。

歌德已经见识过大海，赞誉过大海，现在则要把自己交托给大海了。从那不勒斯到西西里的那段行程颇为艰难。歌德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座舱里度过，正如他着力叙述的那样，他通常会选择水平的位置。他当

时在他的舱位，一处开阔而危险的地方，不过，借着那艘乘风破浪的海船，他避过了它的危险，并且，借助饮食的常识，避免了它的摧残。歌德和那恶灵借此安全完成了这段航程。四天四夜，歌德一直都处在半醒半睡的状态，海浪摇动，令他同时间隔绝，歌德同那恶灵处于罕见的和谐状态，他们通力协作，致力于《塔索》的构思和写作，并由此来裁夺那未来的命运。日落、日出、狂暴的大海，那价值无可估量的秘书科尼普（Kniep）在甲板上极为辛劳地将这一切勾勒下来。那恶灵还需要更多吗？歌德还需要更多吗？由海洋开启的这段航程，最终以帕勒莫那美妙的自然景观作为终结。那美妙的自然景观就这么突然地、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歌德面前，歌德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哪里？他是谁？这趟行程又意味着什么？公共花园中的柠檬树、夹竹桃和奇异植物，北方地平线上冲刷着海湾曲线的黑色海浪，还有空气中那大海的味道，这一切都令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费阿刻斯人的岛屿之上，他，奥德修斯，则刚刚闯荡了风暴四起的海上险境，已经成为阿尔喀诺俄斯花园里那个远离故园的浪子。歌德手持荷马诗篇，将一个片断大声朗诵给科尼普听。奥德修斯遇到了瑙西卡，那样的会面方式似乎进一步呈现了歌德和奥德修斯的相似之处。尽管歌德在心计和手腕方面跟奥德修斯毫无共性可言，不过，歌德在这趟行程的问题上难道不也误导并欺骗过夏露蒂吗？于是，写就一部名为《瑙西卡》的悲剧，这个念头迅速在歌德心中萌动了。奥德修斯不仅要向女主人公隐瞒自己的名字，还要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瑙西卡也已经公开承认自己爱上了他，倘若他的名字和已婚的事实都败露了，那就会要了她的命。谎言，或者说对真相的压制，歌德当初就是借此同弗劳·冯·斯泰因分道扬镳的，她的痛楚、他的悔恨、他对损失的预感，都将在这部未来的悲剧当中得到表达，这一切也许会催生他最伟大的希腊式作品。就是在此时，就是在此地，昔日的冲突再度在他的记忆当中翻滚起来，不过，他的痛楚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强烈了。

自从跟弗里德里克·布里翁分道扬镳之后，歌德便一直尝试就此种特殊形式的悲剧罪错给出戏剧式的表达；歌德同女人的缘分通常都是这

样的宿命，他离开她们，令她们痛楚不已。《葛兹》中的维斯林根、《斯台拉》（*Stella* ）中的费尔南多以及克拉维格都身负着此等罪错；在浮士德和葛丽卿的悲剧中，可以找到对此种悲剧罪错的典范表达。歌德之抛弃弗劳·冯·斯泰因令他重新体验到那种令他撕心裂肺的力量；他从罗马写给她的信表明，他也会因为她的悲伤而悲伤，而且是那么痛苦和无助。他离开她，去找寻心目中的那个希腊；此刻，大海的涛声在他耳畔响起，一派南国风光在他眼前铺展开来，荷马诗篇在手，这样的情境当然令他心绪翻动，于是他写信告诉她，他正在给她准备一些肯定会给她带来愉悦的东西，而且他还告诉她，他的心是跟她的心在一起的。

然而，《瑙西卡》到此再无进展，仅仅是为剧情铺设的一些对白和随感而已。三十年后，歌德谈起这部悲剧的规划，说其中没有提及奥德修斯的欺骗行径，还颇为仔细详尽地申述说，这部悲剧的总体意向乃得益于旅途中同一系列女人的恩怨情仇。他说，他已经无意将他和夏露蒂之间的昔日情仇同这部悲剧联系起来，尽管这部悲剧已经胎死腹中。《瑙西卡》乃是灵感促成的，但是为什么这灵感如此迅速地便抛弃了他呢？对歌德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回答生活。在离开魏玛之前很久，歌德便已经开始从科学角度研究自然；在整个意大利行程当中，他的全部时间除了用于沉思古代艺术，便用于这方面的研究。他对自然的此种热爱，当然可以见诸《甘米尼德》这样的诗篇，不过也同样真切地反映在这些观察和研究活动当中，尽管这两种表达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此时的歌德有意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他也已经发现了人类的腭间骨，这毕竟称得上是一项重大发现，他相信全部生物是存在有机联系的，正是此一信念引导着他，令他有此重大发现。矿物学、地质学、气象学、植物学以及动物学，同艺术一起瓜分了他的意大利时光。现在，在他的书桌已经完全为诗歌而清空之后，他的生命又涌起一种强大的激情，同他那创造性本能展开对峙和搏斗，这一激情还在一番恶斗之后，将他的创造性本能击败了。他关于初生植物体的研究已然将《瑙西卡》的痛楚逐出他的心灵。1787年4月17日，星期二，歌德在帕

勒莫，日记中写道：

> 这么多如此不同的精灵在追逐我、诱惑我，这太糟糕了！一大早，我就前往公共花园，下定决心要在那里静心追逐我的诗歌梦想。不过，还没等我走到花园，另一个恶灵便将我抓住，这个恶灵在过去几天一直在追踪我……鬼影重重，四处浮动，令那旧日的迷思再度萌动。如此情景，我还能发现初生植物体吗？……我的诗歌计划遭遇挫折，阿尔卡诺斯花园，一座世界花园，取而代之。我们这些现代人为何要如此分散自己的精力呢？我们又是为何要向自己提起我们根本无从达成的要求呢？

就在几天前，歌德遇到了一个曾在魏玛待过的马耳他当地人，此人向歌德询问《维特》的作者的近况。他告诉歌德说，那可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在魏玛宫廷呼风唤雨。当歌德告诉此人自己的身份之时，这个人惊诧不已，高声说道："变化真大啊！"

《瑙西卡》就这么被遗弃在角落里，一动不动了，初生植物体研究取而代之；《德尔菲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a in Delphi* ）乃取材于许吉努斯传奇，不过，这个悲剧念头也仅仅是在歌德内心一闪而过，尽管并没有太多的原因可以令歌德放弃这个念头。然而，《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在歌德离开罗马前往那不勒斯之前，在歌德内心重新焕发出诗意，令歌德为之赋诗一首；这诗篇背后的灵感来自拉斐尔的画作《圣阿加莎》；在这件事情上，伊菲革涅亚未置一词，是歌德自己论定了这个圣徒本来无意表达的东西。诗篇写就之后，歌德将之呈送给赫尔德，歌德真诚地希望这份诗篇能够展现出足够的和谐，同时也恳请赫尔德修订其中的疏漏。至于他自己，则已经对这份诗篇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的精力一直都放在剧作上，直到他最终对之完全厌倦。这份坦白可谓意义重大。此时，他的作品集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这项工作给他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厌倦；两部小剧本需要重塑，这倒不是特别艰难的任务，不过，《埃格蒙特》《塔索》《威廉·迈斯特》《浮士德》则有待完工，这显然不是歌德的精力能够应对的。在返回罗马的路途之上，歌德首先展开《埃格蒙特》的修订工作，这项工作于1787年8月完工，此

一“无法形容的艰辛工作”，倒没有引发他太多的叹息和抱怨。《威廉·迈斯特》则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了。至于《塔索》和《浮士德》这两个大部头，修订工作也没有太多进展，距离完工尚且很远。最终，《浮士德》的两幕以及《塔索》的修订工作乃是在魏玛完成的。歌德所缺乏的，是安吉莉卡·考夫曼的精力和决心：“难以置信，所有这些事情，她竟然都完成了！”

意大利之旅并非歌德生涯中的创造性时期。在第二次逗留罗马期间，歌德有意成为一名艺术家，试图借此将第一次驻留罗马期间得出的理论付诸实践。素描、绘画乃至泥塑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这严重影响了他日后的诗学技艺。对此时的歌德来说，所谓创造，已然不再是灵感或者想象，而是建构；“制造”（making）诗歌，歌德就是这么说的。此时的歌德必须将创作对象呈现在纸面上，以便它们就站在那里。在谈到《埃格蒙特》时，他说，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像谈论一幅画作那样将《埃格蒙特》呈现在世人面前。此时，他也开始感受到需要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必须同他要呈现的人物是完全同一的。在《埃格蒙特》正待完工之时，皇帝同布拉邦特居民之间那场冲突为他提供了莫大帮助。歌德还半开玩笑地补充说，为了完成《塔索》，他有必要找一个公主恋爱，倘若《浮士德》的工作能够有所推进，他也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尽管他对这两者并没有太大兴趣。科学观察和研究以及接踵而来的造型仿制技艺，当然还有那种最大程度上建立跟剧中人物一样的体验的努力，这一切成了诗性灵感的万灵替代品，而这些都是他从意大利带回来的。这一切跟他1774年给雅克比（Jacobi）信中的那番讲述全然不同，致雅克比信中的那番讲述呈现出永恒的神秘氛围：“用一个内在世界来再现这外在的世界，这个内在的世界涵育万物，统一万物，创造万物，用我自己的形式和方式予以捶打和淬炼。”

“我必须而且也将变得完整且彻底。”1787年夏天歌德再次抵达罗马之时就是这么跟夏露蒂说的，语气颇为决绝；次年1月，歌德也得以向

夏露蒂保证说，他至少已经在这个方向上有所进展了，尽管他恐怕不得不将多半的自己留在罗马。意大利那样一个世界在歌德看来，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确切地说，意大利于歌德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且同自然和艺术也没有本质上的关联。事实上，有那么一段时间，此种莫可名状的不和谐感甚至还伸展到温克尔曼那个世界的昔日荣耀当中。在西西里的沿海航程当中，歌德再次晕船，此一感受乃是在这段时间生发出来的，歌德竭力克制此一悲观情绪的影响，但此一悲观感受已然萌发了：

> 说到底，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徒劳的人类，人们总是想望着对抗自然的暴力，对抗时间的恶毒，对抗因自身的分歧而催生的敌意，难道不是这样吗？迦太基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还有跟随他们而来的众多族群，他们成就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毁灭而已。

此时，歌德的恶灵又开始跃跃欲试了；恶灵驱使着这个畏缩不前的希腊主义者在《巫厨》（*Witch’s Kitchen* ）、《森林与洞窟》（*Wood and Cavern* ）以及《浮士德》“协议现场”的后半部分同自己展开合作，这些都是发生在歌德再次逗留罗马期间的事情。

歌德在离开这座城市之时究竟带着何等不舍，这一点从《意大利游记》的最后几段话以及他翻译的奥维德诗篇都不难看出。在离开之时，歌德抱定了信念，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新人。也许他是对的。此时的歌德已经不再是逃离魏玛之时那个为恶灵困扰的可怜造物了；较之当初的逃离，如今的回归更为真切地意味着同过去的决裂。《塔索》这部剧十分精细地揭示出，歌德返回之时夏露蒂·冯·斯泰因是如何令他失望的，也揭示出他是如何回顾这段他曾经过度理想化的关系的。这部剧似乎展现出一种更为沉重的悲剧，是一个诗人的殒殁，而此一悲剧是以意大利之旅作为终结的。《塔索》的构造存在断裂，这是因为这部剧的创造者对于剧中两大对立人物的态度发生过变化。直到第二幕结束的时候，塔索都是正面一方。但是此后，安东尼奥则变得高贵起来，他坚实地扎根于现实当中，牺牲了自己诗人和梦想家的特质。歌德胸中无疑也蕴含了这

两个灵魂，不过此时，歌德选择了那个“以稳固的感觉而持守世界”的灵魂，而非那个渴望生活在梦想之中的灵魂。塔索曾在事实岩石上碰得头破血流，所以必须紧紧地抓住这岩石，否则便根本没有生存指望。《塔索》对诗歌进行了掂量，但那样的分量太轻了。歌德苦笑着抛弃了那个诗人，任其自生自灭，连同夏露蒂·冯·斯泰因也一起抛弃了，而夏露蒂也很有可能已经抛弃了歌德。这就是这个新生的艺术家和新生的人对魏玛和德意志做出的宣示。以塔索之绝望铺就的激情乐章，就是那恶灵给出的回答，这部悲剧正是以恶灵的言辞来收场的，而且那恶灵也将自己的烙印留给了这部悲剧。

温克尔曼的罗马

正当塔索为生存而四处求告之时，歌德向世界表明，即便没有塔索，他也能在《罗马哀歌》（*Roman Elegies* ）当中有相当作为，这部作品乃是纯粹的天才之作，而且其创造者是一个严格持守这个可见世界的人。这些诗篇乃是对《伊菲革涅亚》的直接回答，同时也是断然否决。然而，这二者都是从温克尔曼的黄金时代当中得到灵感的：一部作品是在一个文雅且曼妙的女人的影响之下写就的；另一部作品则是在一个出身低微的美丽少女的怀抱中写就的，这一点从字面上就不难看出来。更确切地说，一部是唯灵主义的纪念碑，另一部则是现代诗人能够成就的最为异教主义的纪念碑。一个像克里斯提安娜·沃尔皮乌斯（Christiane Vulpius）这么年轻且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竟然成为歌德的缪斯，将他带回卡图卢斯、提布卢斯和普罗珀提乌斯的时代，并且还能够令他以六步格和五步格音律进行创作，这样的事情极其令人诧异。歌德珍爱着她。由此，太阳以其全部的南方的明媚，照耀着令歌德念念难忘的罗马城的恢宏全景。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重生。温克尔曼的罗马和克里斯提安娜在诗歌集群当中融合起来，此一集群乃是一派古代氛围，在情感和形式上，则展现出感性之美。

歌德和温克尔曼之间的一项本质差异一直都是存在的；歌德虽然跟温克尔曼一样爱美，但歌德所爱的并非温克尔曼心目中的阳刚之美，而是阴柔之美。歌德虽然也力求呈现温克尔曼式的精神和谐，不过是将之呈现在《伊菲革涅亚》当中，还将之呈现为一个纯洁女人的成就。歌德在此体验并表现的感性和谐，乃是一个美丽少女的天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温克尔曼的世界和歌德的世界注定了不是一回事，就如同散文和诗歌之间那无可测度的鸿沟一样。此外，也一定不能忘记，置身罗马的温克尔曼在找寻希腊。但是在《罗马哀歌》中（《罗马哀歌》同

样跟《伊菲革涅亚》形成直接对照），对那么一个已然消逝了的、无从亲见的世界的一切找寻都是不存在的。歌德将古罗马视为自己的田园，并且他的追寻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位创造者在他那不朽的六步格诗篇当中，一砖一瓦地重建了罗马，以便他自己和克里斯提安娜能居住其中。在这么一个阳光灿烂的异教世界，悲剧尚且没有被完全征服，至少还不至于沦落到全然瓦解的地步，而且，大体上还可以说，此前在伊菲革涅亚面前四散而去的神灵和鬼魅在歌德重建的这个罗马城经历了一场奥维德式的变形。这些轻松、优雅的神灵，这些罗马神话中的神灵，在歌德这里沾染了荷马式的静穆，同样也富有歌德年轻时代那些洛可可神灵的特质。爱神、命运之神、法玛、朱庇特、朱诺、墨丘利、巴库斯、伏尔甘以及月神等，取代了克洛诺斯和布罗米奥斯、普鲁托和珀尔塞福涅、普罗米修斯和宙斯。此类神灵并不像温克尔曼的神灵那般理想化；克里斯提安娜已然将大理石雕像中的这些神灵转化为血肉之躯。

而我是否未能教诲自我，告诉我，当直视着她胸部的

凸起，当我的手滑过她的臀部？

最终，正派地领会这尊大理石像，我思索，并比对，

我用全部感悟的眼睛去看，用全部洞悉的手掌去感。

我也曾再三镌写下诗篇，置于她的手前，

而这六步格的节律，温柔地借手指

在她背上打着节拍，她呼吸于甜美的睡梦……

在这个诗群当中，和谐随处可见。精神渗透在感官当中，并据此在诗歌和艺术之间维系了一种完满的平衡。塑性手法当然是存在的，不过，也已然化解为运动，由此令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和谐臻于绝对完整的境地。感受、思考、观察，这就是歌德在魏玛的生活内容，就如同在罗马那样。尽管歌德竭尽自己的全部诗性，将诗性之美注入温克尔曼的理想当中，不过，这其中已经没有了温克尔曼那怪异的对希腊的本能欲

望，而正是这样的本能欲望令温克尔曼的理想散发出乡愁般的情感魅力，这一切在歌德这个诗群当中是看不到的。此一诗群呈现了一个完满的当前世界，并且歌德还令荣耀的光环伺候在侧，至于诗人眼中那些古代纪念物，则不过是为这样一个当前世界增添了尊严和稳定性而已，至于那些空洞的梦想，则悉数祛除。

这样的安宁能持续下去吗？此时的歌德建立起了无可动摇的信念，认为自己不仅能够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并且还能够生活于其中，这种看起来无可动摇的信念又有几多命数呢？他真的能够就这么生活在对意大利的记忆以及对克里斯提安娜的情爱当中吗？他最终真的能找到办法去充分呈现生活吗？《罗马哀歌》称不上伟大的艺术作品，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倘若真要生活在天堂当中，至少要相信天堂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歌德在魏玛创造的这个异教罗马，乃是一个愚人天堂，乃是一处幻象，克里斯提安娜为他建造的家园则是为了帮助他维持这个幻象。歌德便只能待在这个家园当中。魏玛对待克里斯提安娜的态度也正是夏露蒂·冯·斯泰因对待克里斯提安娜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足以让歌德认清楚：他可以改变，但宫廷不会改变。更糟糕的是，他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基督教世界，这个世界要否决他创造的世界。歌德并非那种动辄愤怒咆哮之人，然而，在1788年到1794年，他确实对基督教发出了愤怒咆哮，那样的语调仅见于这个时期。其间，歌德对自己一度仰慕的拉瓦特（Lavater）发泄了一通恶毒评说，对康德的《纯然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更是暴怒不已。这一切都表明，环绕在他周围的基督教给这个新生的异教徒带来了可怕的烦扰，而这个新生的异教徒相信自己已经看透了爱和生活的精神意涵。他蔑视德意志人（“毫无独创性、毫无创造力的族群，没有性格，根本没有能力构思并创造艺术”），这令他不得不再次倒向科学的怀抱。他曾跟柯内伯尔（Knebel）谈起，置身于这么一个庸俗的国度，他的头顶竟仍然飘着那么小的一块诗歌云团，这令他大为吃惊。他观望着那个时代的德意志，触目所及，除了“恶劣和卑鄙”，便什么都没有。不难想见，《罗马哀歌》营造的温室世界不可能令歌德的天

才获得长期的驻留之地，确切地说，歌德的天才之生长已经不是这间温室能够包容得下的了，而且，那样的生长也并没有真的狂野到可以在温室当中无限繁育的程度。

是法国大革命击碎了这座奢华温室的窗格，这场可怕的风暴，以摧枯拉朽之势闯入温室当中。此等规模的世界性遭难，唯有“悲剧”一词方能予以描摹了，显然，此一世事潮流如同恶灵一般涌动起来。不过，这一次，歌德自己的恶灵是无罪的；歌德的恶灵处于全然的蛰伏和顺服状态，保持了全然的静默，尽管这静默令人有莫名之感。我并不是那种因为歌德憎恶法国大革命而对他有所指摘的人，甚至这方面的念头都没有。这场大革命所表征的原则，毫无疑问是同歌德新近建立的信念相对立的，这些信念都是歌德极为珍视的，而且也都是来之不易的；整个革命运动蕴含了对歌德来说极具威胁且极为重大的元素。这必定会令歌德感到真真切切的恐惧，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歌德当然不难体验到在自己的小宇宙当中经常遭遇的那些东西，只不过那规模已经变得庞大无比了。歌德竟然能够如此严密地钳制自己的天才，从头至尾都将这么一场大革命视为没有任何魔性的事件，对之大加鄙夷，既不认为这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觉得其中有任何伟大之处，这实在是相当有意思的事情，完全不必因此而对歌德抱有遗憾。这样一个歌德，已然对悲剧实施了封禁，甚至到了否决塔索的生活权利的地步，面对法国大革命，则只不过是在一种决绝得多的意义上拒绝承认悲剧的存在而已。大革命在法国扫荡了歌德所看重的唯一的生活态度，这态度不仅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看起来，德国和整个欧洲都难以避免这样的命运；文化和文明的拓展和深化，是歌德眼中真正的人文主义，他也正是此种人文主义的使徒，这样的人文主义只有在一个稳定且和平的世界里才有可能生长和发育。然而，这一切都在这场大革命中遭遇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只需这一点便足以确切证明，悲剧在歌德自己的生活当中以及在整个文明世界当中是存在的。可悲的是，歌德仍然在想方设法地回避这样的结论。

1790年，歌德再次前往意大利，3月到6月这几个月，他一直待在威尼斯。这段时间的信件以及《威尼斯警句》（*Venetian Epigrams* ）都表明《罗马哀歌》中的世界已然陷落了；除了克里斯提安娜，便什么都没剩下。《威尼斯警句》表达了歌德对克里斯提安娜的情感，此一情感较之《罗马哀歌》中展现的那种明朗的敬重，显然更富激情；歌德表达其中的对克里斯提安娜的渴望，对家园之和平与惬意的渴望，实际上正是对稳定和安全的渴望。这些东西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找不到的。对此时的歌德来说，世界变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正是在此时突然爆发出对民众的尖利仇恨，同时，昔日的那个意大利此时在歌德眼中也魅力全无，歌德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很现实了。世界的确变了，然而，歌德拒绝承认这种变化。他对民众依然抱持着贵族式的蔑视，他对自由的使徒依然抱持着智识上的蔑视，这也就令他的感受找到了一个情绪上的发泄口。他给予魏玛公国热情赞誉，却是因为此时的魏玛公国毫无疑问表征着旧秩序。《威尼斯警句》当中弥漫着极度的痛苦，这正是他心境的写照。

这样的心境之下，歌德也确实有理由对法国大革命实施揭露，让世人看看革命的真实情状。在歌德看来，这场革命是完全可以解释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倘若法国贵族阶层稍稍收敛一下自己的腐化，倒也未必就一定要革命。这就是歌德那些破落的反革命作品的基本意向，这些作品既非希腊式的，也非恶灵式的，可以说，这些作品表征了他的天才沦落谷底之时的情境。他的大革命作品可谓枯燥、冗长，根本没有睿智、魅力以及审慎可言。此时的歌德已经远离了现实，甚至可以说是同现实隔绝起来了，这一点不难看出，因为此时他第一次细读了柏拉图的《会饮篇》《菲德罗篇》《申辩篇》，细读之下，他竟给出极为怪异的申述，他说柏拉图的这些对话对他有直接启发，令他酝酿着将低地德语动物寓言故事《列那狐》改译为六步格诗篇。将这样的韵律用于如此特殊的目的，这还真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在美因茨遭到围困期间（歌德参加了1792年和1793年同法国的作战行动，并在战场上表现出冷

静和勇气，甚至还在瓦尔米炮战遭遇挫败之后显现出了洞察力），歌德着手进行光学研究，同时也展开了《列那狐》的改译工作，这段时间他差不多都躲在自己的帐篷里。同窗外世事的隔绝态势至此算是达到了极致。他戒绝了跟这场革命运动有任何的精神牵扯。他还刻意将自己的心灵同革命的一切结果保持距离。不过，他也曾再三尝试解释这场革命运动，力图将之敷衍搪塞过去。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自己有心予以呈现的事情，他坚信必须亲自去见证、了解并体验，任何细节都不应当被放过。由此便造成了这样一种极为怪异的情状：面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运动造成的创伤，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心灵却仅仅满足于对之实施无害化处理。

荷马家族

法国大革命将温克尔曼的罗马彻底摧毁了，歌德便不得不在此时回归希腊。1793年年底，他告诉雅各比，他已经着手研读荷马，人总得有事可做，这样的话，余生也就不至于空寂了。恰在此一时期，席勒闯入了他的生活，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就好的方面而言，席勒的信念、热情、英雄崇拜以及见解激发了他，若非如此，他完全可以怀疑，在法国大革命的摧残之下以及在同时代德意志那种完全孤立的生存境遇当中，他无法展现自己的诗才。因此，差不多也可以肯定，倘若缺了席勒，歌德很难有机会完成《浮士德》第一部。歌德自己也常常在给席勒的信中坦承这一点。“你让我再次焕发青春，”这是1798年1月6日的信，“我实际上已经放弃诗歌了，是你让我重新变回诗人。”倘若不是席勒的介入，歌德恐怕就要全副身心地致力于艺术和科学研究，并且还会将绝大部分的精力用来反驳牛顿的光学理论，尽管这门学问要求相当的数学知识，而歌德并不具备。光学理论在歌德着手的所有科学问题当中，也是唯一一个因先入之见而令歌德走上歧途的，并且在研究过程当中，歌德对他人的观点表现出极为暴烈且不能容忍的态度，这是完全有悖于歌德自身的品性的。这一切恐怕都要记入他的贷方账户。

他的借方账户的额度也是极为庞大的。席勒对歌德的了解和理解，在那个时代恐怕无人可比。1794年8月23日的一封信笺中，席勒就歌德的心灵及其发展变幻展开了剖析，那样的剖析展现出非比寻常的敏锐，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这点上能够超越席勒。这封信笺对截至当时为止的歌德的生活和生存情状实施了总体勾画，呈现了一幅总括性的画面。席勒对歌德的直觉天才是有体悟的，他很清楚地意识到，歌德的此种天才在一种幽暗力量的支配之下进行本能创造，此种幽暗力量，席勒称为纯粹理性。席勒非常清楚地见出，歌德对于现时代的素材心有恶

感，因此，歌德的意图是要重造一个希腊，借此来纠正当代那已然有了缺陷的人性。席勒也同样清楚地见出，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歌德的此种创造行动已经不是直觉式的创造了，而是一种以抽象观念为主导的创造行动，倘若任凭这样的创造行动进展下去，此种以抽象观念为主导的创造行动就必定要重归情感和直觉王国。没有什么比席勒的这番剖析更为真切或者更能说明问题了。然而，真正的麻烦恰恰就在这里，席勒在解析歌德的同时，恰恰击中了歌德那种创造力的根源。此前，处身夏露蒂·冯·斯泰因和生活之间的歌德，其创造性和自发能力已经因为此种夹缝式的生存而遭受折损。如今，席勒的此番剖析则如同启蒙洪流一般，对歌德内心潜藏着的无意识王国实施了致命打击。在意大利的时候，甚至比意大利时期还要早上一些，歌德就已经对自己的诉求和目标建立起意识了，这样的意识对歌德的天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如今，在席勒的此番冲刷之下，歌德则全然置身智识启蒙的状态之中，对自身之天才的性质已然建立起全然明晰的意识。也正是因此，歌德此后再也难以依托本能进行构思和创造了，也许他此后的抒情诗是个例外，不过，即便在抒情诗领域，歌德也并不总是能够做到以本能为依托。

在席勒的热忱引领之下，这个昔日的创造者逐渐转变为审美批评者。此一时期，歌德就诗歌、史诗以及戏剧之性质展开了连绵不断同时又极具分量的探讨，此类探讨成就了这一时期的大批通信，而这一庞大的书信库表明此时的歌德正在致力于研究文学技巧，就如同当初他在罗马研究绘画和雕塑技巧一样。只不过，当初完全是另一个天地。歌德曾屈从于莎士比亚的精神，而后又创造了非莎士比亚式的《葛兹》。他也曾屈从于自己的恶灵，并依托《初稿浮士德》创造出自己特有的表达形式。没有人会指控他照搬了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拉丁典范也曾令歌德心醉神迷，歌德遂将这些典范悉数吸纳，由此催生了《罗马哀歌》。不过现在，歌德则开始仔细研读希腊作品，他要一探究竟，看一看这些作品是如何得以创造出来的。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席勒不断抛出自己的美学作品，对希腊文学展开阐释，特别是他的名篇《论天真的

诗和感伤的诗》（*On the Naïve and sentimental Poetry* ）。实际上，席勒正是在就歌德的天才实施一番勘察之后，才从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天真”这一观念。而且席勒并没有犹豫，他直接告诉歌德说，歌德就属于这个类型，是生逢其时的希腊人。歌德乐于信从席勒的这个看法。然而，一旦展开美学上的界定，“天真”这样一个概念，还能够存续下去吗？至少歌德的“天真”是经不起这样的界定的，这一点在《威廉·迈斯特》第七卷和第八卷就已经显而易见了，歌德承认，这部作品受了席勒的巨大影响；在这两卷叙事中，理想征服了现实，那幽暗的抽象人物，也就是一个荒诞且阴沉的秘密会社的成员，篡取了世间男男女女的位置，后者虽然算不上多么体面，但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且，其真实性是相当吸引人的。

此一时期的歌德对世事颇感不安和焦虑，他对他厕身其中的时代、对同行作家以及对读者群体，都日益变得不满。他总是在抱怨找不到有分量的主题，总是在谴责环绕四周的“基督教式的道德-审美的卑贱”，正是这样的卑贱，激发了《齐妮亚》（*Xenia* ）。尽管有席勒作为激发力量，1799年之后，歌德便无法追赶席勒那巨大的创造性成就了。此时的歌德依附于席勒，就如同塔索依附于安东尼奥一样。他恳求席勒继续激发自己；他祈请席勒关心一下《浮士德》，席勒则为此度过了数个不眠之夜，全盘思量《浮士德》，并向他提出了整体修改意见。此一情状之下，席勒像极了真正的先知，他要负责解释歌德的梦。歌德对席勒的倚重可以说是到了极致。然而，他后来还是日渐清晰地觉察到此种灵感力量的邪恶品性，尽管此种感受一开始只是潜意识的。席勒提供的这种激发力量在驱使着歌德进行创造，但同时也在摧毁歌德之天才和创造力的源泉，因为席勒照亮了歌德心灵当中的幽暗之域，而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幽暗之地隐秘地、静静地创造生活，这样的幽暗之地容不得外来的勘察之光。时光推进，歌德对自己的诗歌规划秉持了一种越来越有所保留的态度，有时候他还会三缄其口，秘而不宣。施莱格尔认为，真正的审美作品必定是全然无意识的，对此，席勒报以嘲讽，极为鲜明地展现出

他对天才之本性的根本误解。“因此，你大错特错了，”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以此种嘲讽语气做结说，“迄今为止，你一直都在竭尽所能地达成一种深思境地，并据此展开写作，你还尝试对自己心灵当中的此一进程展开理解，这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席勒似乎未能意识到，自己的此番言论道出了实情。

如此锐利的席勒，却在歌德之天才这个问题上陷入迷途。席勒认为，歌德的此种天才本质上是天真的，是希腊式的，德意志文学史上之所以会有那么一个“提坦时代”，是因为歌德创造了那样一个时代；他认为《维特》乃是一个“情感”主题，是以天真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情感主题。席勒的这个错误尽管是自然而然的，但也是相当严重的。歌德的杰作《浮士德》乃是一个本质上的北方天才和现代天才的造物；《浮士德》是主观的、“情感式的”，因为《浮士德》要表达的是朦胧且无从界定之物，因为《浮士德》无可救药地无法取得同现实与世界的和解。由此可见，席勒和很多人一样，都因为《伊菲革涅亚》和《罗马哀歌》而遭到误导，当然，《威廉·迈斯特》在其中也功不可没，令席勒陷入错误境地。当席勒遇见歌德之时，歌德的诗歌世界已然瓦解了，因为歌德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仇恨《威廉·迈斯特》中那个现实世界了，而且，歌德生涯早期的那个世界，那个想象之地，那个属灵世界和异教世界，已经把歌德骗得够惨了。然而，席勒的这场错误却对歌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席勒是歌德遇到过的最具理智特质之人，这个人似乎对他有着透彻了解，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两人交情开启之际就对他展开了一番描摹和解析，并且此一解析，几乎字字句句都适用于荷马。从1794年读到席勒对自己的那番解析，直到1800年最终放弃这场挣扎和斗争，歌德都将席勒的此一解析视为一项使命，即成为这个时代的荷马，歌德认为自己应当将此一使命担当起来。

这倒不是说此时的歌德真的自我认同于荷马，如同有那么一段时间，他自我认同于俄瑞斯忒斯和奥德修斯一样。尚且需要等到1795年沃

尔夫的《荷马导读》（*Prolegomena* ）面世之后，歌德才敢于尝试走自己的路，《荷马导读》一下子就动摇了歌德对荷马这个人物的信念。

> 首先，出自荷马之名的那健全之人
>
> 最终无畏地将我们释放，并召唤我们进入这个行列；
>
> 因为谁会敢于挑战诸神或无可匹敌的荷马？
>
> 而成为一个荷马式的人，即使是最后一位，亦堪伟大。

在给沃尔夫的一封信中，歌德重申了大体上一样的看法，而且也承认沃斯的《路易丝》（1784）以及沃斯翻译的《伊利亚特》（1793）对自己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沃斯、沃尔夫和席勒便集结起来，催生了作为史诗诗人的歌德：席勒演示了歌德同荷马的紧密亲缘关系；沃尔夫则摧毁了歌德之于荷马诗篇之统一性的信念；沃斯进一步证明，一个现代的、日常的主题也可以呈现为荷马风格，而且完全有可能用德语来表达《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形式和精神。

甚至在离开魏玛前往意大利之前，歌德就已经对德语深恶痛绝，认为同意大利语相比，德语就是蛮族语言，而且他还认为，自己之所以一直无法成为诗人，全赖这门母语。《威尼斯警句》中就有两处这样的抱怨：

> 那时，命运意将我塑造为何？或许这是一个存疑的
>
> 假设；因为它通常对我们中的多数人用意甚微。
>
> 或许要我成为一名诗人；且这个意图或已回答了
>
> 德语乃一条不可逾越的栅栏，所据不逮。

这样的警句可谓尖刻，从中不难见出，歌德（德语这门语言自从“抒情歌谣”时代以来，在世代进程中，已经在抒情诗歌王国中造就出诸多无与伦比的经典，而此时的歌德已经是这个脉络当中最为伟大的诗

人之一）所要求于德意志语言的，恰恰是德意志语言无从提供的东西，确切地说，就是古典的六步格和五步格韵律。《罗马哀歌》、《威尼斯警句》、《列那狐》、《齐妮亚》、《亚历克斯与朵拉》（*Alexis and Dora* ）、《新鲍西亚斯和阿闵塔斯》（*The new Pausias and Amyntas* ）等诗篇，已经展示出极高的技艺，然而，无论歌德身怀何等技艺，若要让德语接纳一种全然外来的韵律形式，歌德势必要经历极大困难。从1788年到1800年乃至更晚一些，歌德都难以用德语节律展开写作，这就足以表明他对一切德意志事物的厌恶和不信任。倘若对他自己强行铸就的德语诗歌无法感到满意，他通常都会责怪德语，而不会责怪自己对德意志语言的这种奇怪背离。

歌德已然本能且正确地感觉到，德意志语言是不可能成就荷马那样的史诗的。德意志语言只能以短篇集群的方式写就一些没有激情的，要么是格训式的要么是微型田园诗式的诗篇。一部完整的史诗实非德意志语言所能及，这一点歌德已然十分确定。然而，恰在此时，沃斯却令歌德相信自己错了；沃尔夫则向歌德证明，已经有人成功地推进了荷马传统。歌德遂决心加入此一现代的荷马家族。

《赫尔曼与窦绿苔》（*Hermann and Dorothea* ）的确有着重大分量，因为这部作品象征着歌德对悲剧的又一次伟大征服，这场胜利并非针对歌德自身的恶灵，而是针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恶灵元素。

革命风暴已然近在眼前，这个故事也随之以黑暗预兆作为收场。这样的黑暗若是以前的歌德，恐怕是难以想象的，更是难以容忍的。不过，一种在千锤百炼之下呈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征服了恐惧和邪恶，此种生活方式全然凭借着自身的惯性，最终得以挺过一切的瘟疫、饥荒、革命以及战争；这种生活方式闯过了世事沧桑，任何统治体制、任何暴政、任何民主体制，乃至布尔什维主义、高压独裁体制以及希特勒体制，等等，都不足以将之摧毁；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寻常人家的那种狭

隘但也满足的存在方式，寻常人家，无论置身何种时代、何种境遇，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低层面生活并予以维系，而且，寻常之人也都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好的、有价值的、珍贵的。寻常之人维系着恒久的寻常身份。此乃为数寥寥的稳定生活法则之一。歌德极为精湛地呈现了此种极为微末、没有任何英雄气可言的存在方式，这差不多可以说是植物一般的存在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将自身的全部能量集中于稳定性以及主要强项之上，由此，法国大革命相形之下不过是一波转瞬即逝的扰动而已，如同水中微微泛起的涟漪，终将在世事潮流中消逝而去，沦落遗忘境地，但那小城及其表征的东西，则会持存下去。不难见出，这的的确确是一场胜利。即便一个人压根儿就不关切歌德在《赫尔曼与窦绿苔》中予以升华的这种凡俗生活，在品读这份诗篇的时候，也都不会没有同情之感。任何人在品读这样的生活方式之时，不会不愿意它持存下去。母亲在那个金色的午后穿过葡萄园，儿子和未婚妻在那个风雨欲来的黄昏回归家园，此番诗意描摹令人对收成和葡萄酒的关切丝毫不逊色于对大革命的关切，尽管这场大革命将摧毁小城居民的安宁并撕裂他们的心。这可以说是文学史上对既有标尺实施的最具胆略的颠覆行动之一。歌德改译《列那狐》当然也是有所考虑的，就如同他并非无缘无故地研读《奥德赛》一样。奥德修斯的冒险经历可谓磅礴且令人恐惧战栗，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美感，但这一切的伟大冒险在奥德修斯及其创造者眼中，都绝不足以盖过安宁惬意的家园生活的光华。这就是一种“天真”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原始态度。这样的生活态度在盎格鲁-撒克逊诗篇《流浪者》（*The Wanderer* ）以及《航海者》（*The Seafarer* ）当中也可以找到，这两部诗篇同样表达了对烛光摇曳的客厅、亲朋好友以及歌谣的渴望，当然，其中的情感色彩更为浓重一些。歌德此时已然臻于此等“天真”境地，从中也不难见出，正是在退避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歌德毕生头一回具备了足够的能力，以决绝态势去确证此种最为卑微的生活方式。

温克尔曼的罗马看来是无力为歌德提供庇护，以对抗大革命潮流的

冲击。温克尔曼的希腊仍在遥远的过去，尽管歌德和席勒一直都在通力协作，试图将温克尔曼的希腊引领到当前这个世界。至于当前这个德意志，却是有那么一些东西值得拯救，比如眼前这座迷人的小城。在这场胜利当中，温克尔曼的贡献仅限于技术层面。这主要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没有悲剧并充溢着和谐与美的世界，正是这么一个世界先是激发了《伊菲革涅亚》，后又激发了《罗马哀歌》。温克尔曼秉持着一个信念，认为雕塑艺术的标尺也同样适用于诗歌，正是此一信念主宰了《赫尔曼与窦绿苔》。莱辛曾对温克尔曼的观念提起暴烈抗议，认为那样的悲剧观念摧毁了悲剧的本质，并且在莱辛看来，从诗歌身上索取雕塑效果，此举无异于毁灭诗歌的灵魂。在这两个问题上，莱辛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也同样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全然落入温克尔曼观念之掌控的歌德，对莱辛提起的警告充耳不闻。《伊菲革涅亚》将温克尔曼的悲剧理论交付实践；《赫尔曼与窦绿苔》，其人物、意象、诗句以及情节推演，则更是雕刻而出。诗歌与造型艺术之间的平衡在《罗马哀歌》中臻于完善，但是在《赫尔曼与窦绿苔》中，天平则向着造型艺术倾斜了。只需要看一看其中的一些场景，比如赫尔曼的母亲缓缓地走过葡萄园，将之同荷马的阿喀琉斯盾牌上的收割场景以及葡萄酒的类似描述进行比较，就不难见出歌德已然在何等程度上放缓了生活的步伐以及忽略了运动和生活。就在刚刚提到的那段著名描述中，窦绿苔不小心扭了脚踝（“她崴了脚，正要跌倒”），一下子跌入赫尔曼的怀中，此番场景呈现出大理石雕像般的意象，将这对爱侣恒久呈现出来，同时也令这样的拥抱给人留下无从磨灭的印象。此情此景，这对爱侣就如同封印于希腊古瓮之上的青年男女一样，同样真切地被歌德封印在六步格韵律当中。他们并没有生活在诗歌当中，他们过的是另一种生活。济慈与歌德的小城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了永恒。

我不曾见过这些如此茕孑的街道和市场！

城镇看上去似乎打扫空荡，仿佛它的居民已逝。

多么小的城镇，依河傍海

或有着祥和堡垒的山中建致，

这虔诚的破晓，它的居民多么稀少！

或者不妨这么说，一切可死之物都是有悖于《赫尔曼与窦绿苔》的。故事本身很平凡。那怪异的韵律跟诗篇运用的语言并不契合。荷马风格显然也不能契合此等凡俗生活以及此等凡俗人物。人们不免无助地感觉到，一切现代事件都不足以用古代袍服予以强行包装。不曾有哪个伟大诗人敢于如此肆意地颠覆伦理和价值标尺。最后一点则在于，诗歌的灵魂，也就是节律和运动，遭到侵夺，由此令诗歌尽可能地向着雕塑艺术靠拢。然而，歌德的这份诗篇却是成功的。即便读者无法完全接纳这样一份诗歌，也都不得不承认这其中蕴含了一项令人迷惑的品性，正是此种品性拯救了这份诗歌。此一品性就是歌德的天才，这天才透入这份诗篇当中，就如同《罗马哀歌》那样。人们在此也许会提出一项想当然的解释，认为歌德的天才无论迷途多深，都会将此种无可界定的品性烙印在自己全部的作品当中，不过，这样的解释在这里却是没有力量的。毕竟，此时的歌德已然将大批全然不见灵感的作品抛在身后了，这样的作品不是一份两份，也不是两份三份，这样的作品可不在少数。相形之下，《赫尔曼与窦绿苔》则堪称奇迹，实实在在地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样的谚语归于无效。席勒在读完这份诗篇之后，禁不住情绪饱满地致信歌德，说他正在回归青年时代，这样的青春乃是诸神的青春，因此也将是永恒的青春。歌德则以同样的心境回复席勒说，这一切都是席勒的功劳。

然而，两人都错了。尽管《赫尔曼与窦绿苔》很受欢迎，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这样的成功自《维特》之后，便再也没有光顾过歌德——而且还有席勒以及威廉·冯·洪堡这类人杰对它狂热赞誉，但歌德后来再也没能复制这样的成功。此时的歌德，对很多事情都已经失去了兴致，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能归罪于生活兴趣的失落。他一度暗下决心要成

为德意志新文学潮流中的荷马，正是此一决心促动他和席勒尝试将古典主义强加在德意志身上，并由此催生了有关史诗之本质的一系列严肃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得以介入其中，不过未能带来太多光亮。歌德遂开始找寻有价值的论题；为此，他还不得不放弃“追逐”这个在他看来没有前途也配不上他此时观念的主题，尽管歌德后来还是在艾克曼（Eckermann）的协助下，将这个主题改造成一部短篇小说。以威廉·退尔（William Tell）为主题的一部民族史诗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歌德将这个念头溯源于1797年的瑞士之旅，他对这个主题颇为满意，因为这趟旅程令他对瑞士的风俗和情状有了相当了解。不过，回到魏玛之后，歌德便对这个念头没什么兴趣了，于是将威廉·退尔转赠席勒。整个这一时期，很可能是《伊利亚特》在支配着歌德的全部思虑。这部史诗对此一时期的歌德乃是无可抗拒的，歌德不断地予以研读，这样的研读过程，甚至令歌德认为沃尔夫是错误的，认为这部史诗是一部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只能是出自单独一个人之手。愉悦、希望、洞见以及绝望在歌德心中轮番交替，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歌德内心已然升腾起一股心绪，力图将自己比照荷马。此等心绪虽有英雄气，但也不免令歌德绝望，歌德暗下决绝之心，要以阿喀琉斯之死为主题书写一部史诗。这当然是一部悲剧史诗，不过这样一部史诗也是现代的和“情感式”的，因为史诗主题是阿喀琉斯同波吕克赛娜的爱情。此时的席勒认定，一切的现代“天真”诗篇都是一场错误，同时也逐渐意识到，歌德并不像他以前认定的那样是一个希腊人。因此，他对这样一个情爱主题给予热切赞扬，同时也提醒歌德，要从荷马那里找寻某种“氛围”，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歌德自己下定决心，这份《伊利亚特》续篇当中，不能出现任何“感伤”。歌德就一切可以到手的资料展开研究；他已经开始完全沉浸于荷马了；为了写作，他还依托了“特别的决心和特别的饮食计划”。从1797年12月到1799年4月，歌德展开了艰难的史诗劳作，时而置身于阴郁深渊当中，时而又浑身鼓荡着火与力。然而，这部史诗，这部“硬生生从缪斯那里博取”的史诗，只是写就了第一节，此后便再也没

有进展了，即便是这单单的一节，也不过是六百五十行拖沓冗长诗句的合成体，其间的枯燥无从言表。这份《阿喀琉斯》片断，成了温克尔曼素来珍视的原则的反证。在歌德这里，高贵变成了浮华；单纯变成了愚蠢浅薄；静穆变成了僵硬；伟大则干脆消失不见了。诸神则全然变成了人，而且还是完全失去了生命力的存在物。唯有阿喀琉斯的悲剧独白存留下来，讲述着自己的身世由来。这份独白表达了对死亡的向往，言辞当中满是疲惫。自从将希腊风格奉为信条之后，这是歌德第一次经历如此惨痛的失败。歌德太了解荷马了。正是因此，这份断章在歌德的一切模仿作品当中成了唯一一份充满奴性的作品。歌德曾领略过拉丁哀歌诗人的精神，并以自己的方式予以仿造。不过，他对荷马的了解是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的，在荷马面前，他是热忱且满心敬畏的小学生，由此形成的了解和理解则是致命的。后来，歌德曾跟里莫尔谈起，写作《伊菲革涅亚》之时，他对希腊的了解尚不够充分和完满。他还补充说，倘若那时他对希腊有更多的了解，也许《伊菲革涅亚》就不会有机会诞生了。“唯有不够完满的知识，才是有生产能力的。”歌德如是总结说。他彻头彻尾地对荷马展开研读，反而令他根本没有能力以自由姿态纵情翱翔，去成就一部荷马风格的史诗。他只能像一个学识有余但没有灵性可言的六年级学童一样，笨拙地在荷马诗句当中躬耕劳作。

歌德在结尾之处给予阿喀琉斯的那番陈词和他曾给予欧福罗塞涅的那番美得令人心碎的陈词，是应当予以比较的，因为两个人物都是在即将沉落冥府之时抒发了自己的心绪。一番比较之下，便不难见出，在与这位伟大的希腊同行进行缠斗的过程中，歌德的精神和意气遭遇了沉重打击，近乎沦丧。不妨去读一读《阿闵塔斯》（*Amyntas* ），这是歌德在酝酿《阿喀琉斯》之前不久写就的，而且跟《欧福罗塞涅》（*Euphrosyne* ）一样，也是以古体韵律写就的，从中也不难见出，在此前的那个时期，悲剧写作是歌德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荷马曾如此真切地激发了维特这么一个无知且激情满怀的青年，如今却令歌德归于麻痹，尽管歌德一直有心像荷马那样思考，并且也曾极为彻底地研究了荷

马的技艺、精神和风格，而且，据说歌德和荷马之间是存在亲和力的。

恶灵及其对手在歌德内心展开了无休止的冲突和斗争，到了这个时刻，这场斗争可以说是臻于顶峰了。在1797到1800年，这场斗争变得尤为剧烈，两种观念，一方是悲剧的，另一方是静穆的，在歌德心灵当中实实在在地展开了统治权争夺战。整个这一时期，歌德一直都在纠结于《阿喀琉斯》的写作工作，同时，他也在致力于《浮士德》的写作，此一时期的歌德便同时生活在两个互不相容的世界当中。唯有天才才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天才也处在极为剧烈的内部争斗格局当中。由此催生的第一个结果便是“天上序幕”，这一幕极为暴烈地将《浮士德》拉到恶灵的对立面，极为强劲地预言了浮士德的幸福终局。然而，恶灵也在那决绝的第二份独白当中展开了同样强劲的复仇行动，这一幕是在“城门前”一幕以及“协议现场”的可怕诅咒一幕之前展开的。倘若拔掉梅菲斯特的利齿，令这个魔鬼从此沦为一场玩笑，反恶灵的力量就得经受《阿喀琉斯》造成的这场严重失败，毕竟，阿喀琉斯既死，便在歌德这里再也不会有复生之机了。这是一个死结。不过，反恶灵的力量再次做出卓绝努力，反抗那创造了《浮士德》的精灵，再次将战事推进到敌人的土地上。歌德于1800年着手写作《海伦娜》（*Helena* ）。1801年1月，他生了一场重病；病愈之后，他着手写作一个很长的寓言作品序列，1803年的《私生女》（*The Natural Daughter* ）便是此一序列的开山之作，这部剧古怪且刺激，在手法和构思上都是表现主义的。[1] 这是一场从特殊到一般、从个别借由种最终到属的变迁，歌德将此一变迁归因于自己日益增长的年纪。尽管在生涯早期，他就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变迁迹象，不过，他的此一论断大体上算是正确的。

罗马最终令歌德意识到自己并非造型艺术家，他在《威尼斯警句》中非常痛苦地体认了这一点：

我已尝试过太多；绘图，以及雕刻，

用油料作画，以及用黏土塑模。

不过断断续续，既无所获也无收效；

独有一种才能，我堪当其任；

用德语写作。我是不幸的诗人，

被迫用这所有中最糟糕的质料，拓展艺术和生活！

然而，艺术仍然是歌德的一项财产，他可以去研究，可以去享受，终生都是如此。他在这个时期发表于《神殿入口》（*Propylaea* ）（1798～1800）上的一系列文章表明，温克尔曼的自然观念以及希腊艺术独特之美的观念，仍然深入他的血液中，而且，他也确实不曾抛弃温克尔曼的这些观念。他以一篇拉奥孔论章开启了《神殿入口》，这篇文章是对希尔特（Hirt）发表在席勒主编的《季节女神》（*Hora* ）上的一篇文章的回应。希尔特在文章中颇为直接地指出，拉奥孔群雕的中心人物的痛楚，绝对不曾有缓和处理的迹象，相反，那痛楚被提升到最高的程度。据此，希尔特进一步认为，古代艺术家的意向与其说是展现理想美，倒不如说是致力于特征化。歌德在回应中很明显地借重了温克尔曼和莱辛，采取了当时的正统观点。他认为，拉奥孔群雕作为一个整体，尽管有着极为强烈的哀婉氛围，但唤起的确实是一种愉悦的感受，因为美与优雅缓和了痛楚以及激情的风暴。歌德用“悲剧田园诗”（a tragic idyll）这一奇怪术语来界定拉奥孔群雕。跟温克尔曼和莱辛不一样，歌德强调拉奥孔群雕充满了运动，毕竟，歌德是借助火炬的光芒亲眼见证过这座群雕的；但是歌德在解释如何将运动引入绘画和雕塑之时，还是借用了莱辛的理论。而且很显然，歌德也受到了莱辛的意蕴时刻理论的影响。歌德的这篇论章并没有给温克尔曼和莱辛增添分量，除了坚持群雕当中蕴含着运动这一点外，用歌德的话来说就是，“固定下来的闪光瞬间，石化的波浪”。对歌德来说，就如同对温克尔曼和莱辛那样，“优雅”美化了对极度痛楚的呈现，消解了悲剧性。

歌德的温克尔曼论章可以说是为这个时期做了个了结，同时也超越了这个时期。这份论章是歌德写就的最为奇特的文章之一，可以视为歌德对于温克尔曼之感激和热忱的公开表达。《意大利游记》以及《诗与真》对此也都有相当雄辩的表达。在生命走向终点之时，歌德以颇为含混的语词总结了这一点：

> 他就像哥伦布，在发现新世界之前，在灵魂中便已经有所预感了。他的东西不会教给你任何东西，不过，他的东西能够感化你。

此一模糊表述，实际上也等于是暗示说，温克尔曼的愿景不过是一场梦幻而已，正是这样的模糊氛围浸透了以《温克尔曼及其时代》为题的那份概述。1799年，歌德以作品和通信的形式对温克尔曼展开研究。最终，他得出结论：应当为温克尔曼立一座文学纪念碑。1805年，迈耶出版了他那本18世纪艺术史概论，其中包含了温克尔曼和贝伦迪斯的二十七封通信，还有三篇温克尔曼论章：一篇是歌德所作，主题是温克尔曼的个性；一篇是迈耶所作，内容是温克尔曼的审美历程；一篇是沃尔夫所作，探讨温克尔曼的考古学分量。歌德在写作这篇论章之时感受到相当的难度。1805年1月，在一段为时不长的患病期结束之后，歌德向席勒抱怨说，他仍然完全不能提笔写作，还说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只想着摆脱温克尔曼及其一切作品。几天之后，歌德又重复了这番话。歌德实施一场文学解放的时刻到来了。此时的歌德依然对作为希腊艺术研究之先驱的温克尔曼极为敬重，而且也从来不曾丢失过这样的敬重。不过，作为曾发布了“效仿希腊人”这一神谕的预言人，歌德则一直都是对之抱持接纳态度。很可能就是在此种心境之下，歌德完成了对这个“宗师级教师”的描写，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歌德将这份论章定题为《温克尔曼在意大利》。

后世对这份论章素怀特殊敬意。无论是方法、风格还是穿透力，温克尔曼论章都可谓此类文体的典范。这份论章激发帕特就温克尔曼的心灵展开了更为精细的剖析。贡多尔夫对温克尔曼论章的敬仰是彻底且郑

重的。新近的温克尔曼传记作家瓦伦丁（Vallentin）用到了“纪念碑式的”以及“崇高的”这类语词来形容温克尔曼论章。这是古典目标和古典理想的宣言书，是对浪漫派提起的隐含批评，甚至可以说是明确批评，而且作为宣言书和批评文章，温克尔曼论章有着不少重大特征。同时，这也是一份致力于自我揭示、自我呈现的论章，这样一份论章是颇为含蓄且极为动人的。然而，温克尔曼论章虽然致力于描述温克尔曼其人，但其中建立起来的那幅肖像画却也是相当含混、朦胧的。论章中的温克尔曼显然已经幻化为一件象征物，用以象征歌德自己的希腊主义及挫败。论章的风格颇为慵懒怠惰，对现代生活的批判阴暗且无力，其中也明显地意识到过去的时代已然消逝，绝无可能回归了，并由此催生了论章当中的绝望感受，这一切的一切实际上都在讲述着同样的故事。尽管字里行间浸润了一种并非神圣的静谧氛围，甚至可以说是静穆氛围，时不时地令人念想起那令人伤感的夕阳余晖，但歌德是要借助这份论章去呈现一种理想的败落，确切地说，那是诸神的黄昏。在这份论章中，歌德故作安详姿态，对温克尔曼生命中一切的丑陋、悲剧或者邪恶元素表现出刻意的节制，甚至予以忽略，尽管如此，歌德的挫败感显然是极为严重且痛楚的，不免令人回想起他的《阿喀琉斯》断篇中主人公的求死意愿。温克尔曼死于生涯的鼎盛期，正值精力最为旺盛之时，这是温克尔曼的幸运，因为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在诸多生命阴影的掩盖之下获得永恒。温克尔曼论章实际上是一份代理辞职书，字里行间隐含了歌德本人的无助祈祷，他祈祷温克尔曼的命运也能降临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份论章当中，最引人瞩目之处是歌德以代理人身份给出的一项忏悔之论。论章从1804年威廉·冯·洪堡从罗马写给歌德的一封信中引述了相当长的篇幅。歌德征引这封通信，当然是希望借此充实文本，不过，这只是部分的考虑。我相信真正的原因在于，这封通信包含了一段申述，这段申述极为贴切地展示出歌德自己那种不抱幻想的观点：

> 我们这样的人都希望成为罗马或者雅典的居民，这不过是场幻象而已。古代跟我们之间的鸿沟太大了，那样的古代完全不沾染红尘俗

世，那样的古代已然消散而去了。

温克尔曼以成为罗马人自傲，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歌德的《罗马哀歌》表明，他也曾置身那么一个田园境地，并且也一度尽享那座永恒之城的自由。两人都曾相信，倘若艺术家和诗人都效仿希腊人，那么黄金时代就会在现代重现。然而，歌德自己在力图融入荷马家族之时遭遇挫败，而且《阿喀琉斯》诗篇更成了一场惨败，这一切都表明歌德的此一梦想沦为了碎片。如今，唯一能做的便是尽可能地改进自己处身其中的这个世界；将现代生活的精神注入古典模子里，意图借此重塑现代世界，这样的希望根本就不存在。然而，就在歌德以谜一般的姿态挥别自己的昔日主人之时，席勒，作为歌德的学生以及同样的希腊主义者，却也准备好了挥别歌德，这样的结局实在是反讽。就在歌德完成温克尔曼论章两个星期之后，席勒告别了这个世界，看来，歌德还需要书写一部尾声来结束生命中的这个时期。

---

[1] 我很清楚，歌德的《私生女》被普遍认为是希腊主义作品，但是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尽管席勒“希腊戏剧人物都是‘理想化面具’”这一理论很可能影响到歌德的这部剧作。

海伦娜

歌德的生活大体上就是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也是他所属时代的写照，他既生活在那个时代，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去塑造那个时代。他就是在那个时代，经历、体验并二次体验了少年、青年、成年、中年以及老年时期，并且在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要么调整要么创造出相应的文学模式：洛可可时期、狂飙突进时期、希腊主义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以及象征主义时期。然而，歌德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完全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在特定时期，他会接纳特定的影响并酝酿出特定的作品。他身上的天才是极为怪异的，这样的天才基本上不会允许他及时完成手中分量最重的工作。他每个时期都会留下大量的断篇，部分断篇，他选择了完全放弃，部分断篇，他则选择了予以重塑或者重写，以便将不同的精神内容填充进去。在那些伟大的创造性诗人当中，恐怕没有人会像歌德这样如此持之以恒地做着旧瓶装新酒的工作；这是歌德最恼人的习惯之一。《塔索》和《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光》（*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都见证了他如何将新观念强行置入一个原本并没有此类观念诉求的象征体系当中，并由此将原有的形式彻底撕碎。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浮士德》。这部作品成了歌德生活和思想之全部进程的镜像，因此，这部作品展示出的统一性也就全然不同于《维特》和《伊菲革涅亚》，后两部作品是单一的经验和单一的主导性情感促成的。《初稿浮士德》、《浮士德片断》、《浮士德》第一部以及《浮士德》第二部表征了歌德精神历程的众多不同阶段，对于如此纷乱的局面，人们的唯一要求恐怕就是这些作品是同质的。然而，歌德那致命的拖延症，令这最后的要求也无以达成。每个新的开端，歌德都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未完工的环节，他必须先对这些环节予以修补，而后才能考虑眼前的冲突、观念和解决办法。整部诗篇便呈现出一种回溯的样态，这样一部诗篇通常也都展示出一种不断增补而来的美；同样也会有

一些预见性的思考，如同阴影一般笼罩着眼前的危机和事件，而这样的危机和事件则有着全然不同的前提。这其中最令人沮丧的情形乃在于：整个的场景和段落很显然写得太晚了，作者本身在理智上已然不再信从了，或者说在情感上已经没有兴趣了。

歌德最初构思《浮士德》之时是不是要呈现一个遭遇诅咒的灵魂的悲剧，我们无从得知，尽管我本人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不过，在生涯中那个普罗米修斯时期，站在诗歌立场上的歌德肯定是相信诅咒的，否则，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事是不会对他有吸引力的。歌德应该也是相信魔法的，否则肯定不会写就浮士德的第一份独白并召唤地灵。与此相连的则是对魔鬼的信仰，此一信仰并没有得到清晰推演，不过，歌德对之是有深沉感受的，尽管他并不愿意承认。巫术、炼金术以及通灵术之于此时的歌德有着极大吸引力，在歌德看来，这些都是潜在自然力量的神秘表现，超越了自我的藩篱。这些神秘力量都是危险的，但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自中世纪以来，便有诸多奇异元素伴随着这些神秘力量。

当歌德在罗马展开《初稿浮士德》的写作工作之时，木偶戏和廉价小书当中的古老传说已经不再是灵感源泉。随之一同消散的则是对魔鬼力量的信仰，此种情状之下，歌德无意再去召唤中世纪的黑暗迷信。年轻时代的歌德对怪异之物和恐怖之物倍感愉悦，此时，这愉悦之感也烟消云散了。歌德从意大利致信夏露蒂·冯·斯泰因，信中谈起，他年纪大了，除了艺术、自然和真理，对什么都没兴趣了。看到斯温伯恩（Swinburne）所谓的“帕拉哥尼亚亲王的巫术世界”里面一块石头上的诡异景象之时，歌德为之颤抖；罗马的嘉年华庆典令他厌倦且沮丧；离开嘉年华庆典之后，他在博尔盖塞花园中安坐下来，写作“巫厨”一幕，这一幕正如浮士德宣称的那样，实在是枯燥乏味，不能让人信服。当《浮士德片断》于1790年面世的时候，“奥尔巴赫地下酒店”一幕明显昭示出歌德已经对通灵术没什么兴趣了；初稿里面浮士德耍弄的那些戏法，在断篇当中又被梅菲斯特耍弄了一番，浮士德则躲在幕后，对此类

戏法已然失去了耐心并颇感厌倦了。

对北方魔鬼学的这种怀疑和批判态度主宰了“巫师的安息日”，这一幕是在1800年和1801年写就的，并于1808年出现在《浮士德》第一部中。此前，歌德已经写就了《首位女巫的安息日》（*The First Witches' Sabbath*），这份诗篇对当时的一种流行说法提出了理性解释。据此说法，巫师的安息日是在每年5月1日晚上举办，地点是布罗肯山。从中不难见出，此时的歌德已然完全没有心情就此类邪恶想象给出诗性解读了，尽管此类邪恶想象在浮士德博士本人生活的那个时代令世人心灵震颤，而且，即便在无线电和飞机的时代，此类想象也不曾消散。舍勒对此有明确揭示，他指出，《浮士德》第一部当中“巫师的安息日”所呈现的，全然是荒诞场景，根本没有危险可言；这样的思考的确令人倍感安慰，不过，倘若要严肃看待浮士德和梅菲斯特之间的冲突，就应当对这个问题予以详尽阐释。当葛丽卿的阴森幽魂出现在浮士德面前的时候，歌德自己都忘记了这一点。那幽魂着实令人毛骨悚然，那是一个影子，有着死人的眼睛，脖颈处有一圈红色的狭窄印记。然而，歌德也有着一副彻头彻尾的铁石心肠，他接着便着手实施一桩审美暴行，这并不是歌德的第一个美学暴行，也不是最后一个，但肯定是其中最恐怖的一个。这就是“巫师的安息日之梦”。这实际上是一个阴沉枯燥且略有讽刺意味的幕间剧，一直未得面世的《齐妮亚》的部分诗句最终在这一幕落地生根。在这一幕当中，场景突然从葛丽卿的邪恶幽魂切换到奥伯龙、爱蕊儿、泰坦妮亚和小精灵们吟唱的明快小曲，此一突然转换昭示出歌德对魔鬼抱持的彻底的犬儒态度。但是，不能因为歌德没有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就责怪于他，毕竟很久以来歌德对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真正应该遗憾的是，这几幕并非写于1774年，或者更确切地说，真正遗憾的是，歌德没有将这几幕完全删去。1774年之后，歌德的浮士德观念经历了剧烈变化，令故事的结局尘埃落定，那就是主人公将获得最终拯救，歌德对这一点已经没有疑虑，而且也不希望让读者对此抱有疑问。在“天上序幕”当中，主人公得到了最高保证，他不会遭受永罚和诅咒，

一切置身奋斗历程中的人，都不会遭受惩罚和诅咒。梅菲斯特将在同上帝和同浮士德的赌约中都遭遇挫败，他试图赢得这场赌约，然而，这赌约不过是阻止了浮士德沦落怠惰境地。浮士德从狗身上召唤梅菲斯特的恶灵之时，所用手法大胆、简洁且专业，这同他召唤地灵之时所用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照。倘若不是浮士德博士在这其中展现出某种反讽姿态，这差不多就相当于一种反高潮的表现手法。葛丽卿身上蕴含着梅菲斯特的魔性（这是从早前版本中原封不动地摘录过来的），不过，在灵魂受罚问题上，坊间流行的廉价小书和木偶戏当中蕴含着更多的情感真理，马洛（Marlowe）的《浮士德》更是如此，这恰恰是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不能比拟的。从1797年到1801年，歌德一直都在辛苦劳作，希望能完成这部作品，此等境况之下，他是不可能构思一种全然排除了悲剧和邪恶元素的生活的。第二份独白、"城门前"以及"协议现场"展现出绝望的深渊，这几份诗节可以说是歌德写过的最为精美也最具悲剧性的东西，然而，考虑到真正主宰着整部作品的是一种崭新的乐观观念，此等绝望的深渊就令人难以理解了。不过也切不可忘记，歌德在写作《浮士德》之时，已然对希腊的解决办法开始绝望了，希腊观念根本没有能力化解这个世界的不和谐，由此，也便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那样的绝望深渊。

大约是在1800年，歌德最终放弃了《阿喀琉斯》（歌德最终明白了，温克尔曼的希腊理想、希腊之美已经是过去之事，即便强行复活，也难以逃脱再次死亡的命运），着手创作《海伦娜》，大约两周内就写出了二百六十五行。这是1800年9月的事情。歌德不禁开始担心浮士德会将海伦牵扯进去，进而令海伦之美遭到扭曲，他还将这个担心告诉了席勒。席勒则保证说，他相信歌德定能获致成功，能够达成"崇高和野蛮的综合"，尽管如此，歌德的心性还是令歌德遭遇了挫败。《浮士德》进展到梅菲斯特同合唱队争吵那一幕便中断了。此后的十六年间，不曾听闻海伦的任何消息；此后的二十四年间，那断篇也不曾增补哪怕一行。1801年1月的那场重病并非没有可能令歌德遭遇极大的精神混

乱，令他的心绪在“巫师的安息日”和《海伦娜》之间撕扯翻滚，失去归属，失去方向感，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敢给出定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800年这一年的确是歌德生命中的转折点，也是那命定的海伦的诞生时刻。海伦就是在这么一个时刻，姗姗而来。特洛伊的海伦，在神话传说当中是有着自己所属的传统角色的，而且也肯定是歌德规划当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然而，和谐之美及优雅，是海伦这个角色世代以来的寓意，此时的歌德，心灵当中涌动着爱、渴望和绝望的混合情感，这一切的情感都是针对这个传统角色的。这样的情状以前不曾出现过，以后也没有再出现。歌德曾找寻海伦，追逐海伦，占有海伦，此时此刻，海伦已然从他的世界里消失，并召唤他将两人之间的这段短暂情缘交付永恒。海伦留下的伟大遗产就在于让人意识到，昔日荣光已然消逝，哀伤是一个欲意从希腊人那里有所获益的现代人可走的唯一道路。这样一个论题将歌德引领到一个深渊的边缘，这个深渊较之几个月后他差一点儿就走进去的坟墓更为可怕。这个深渊的名字就是悲剧，还好，歌德最终还是从深渊的边缘撤回了。他本性当中那项怪异的特质再次占取了上风。那恶灵（这次隐藏得非常深）再次遭遇挫败。我们则由此拥有了一部《初稿海伦娜》（*Urhelena* ）同《初稿浮士德》抗衡。

二十四年后，当艾克曼说服歌德完成毕生作品之时，他首先便是确保完成了第五幕的主题内容，而后才着手《海伦娜》。《海伦娜》是在1827年单独出版的，副标题是“古典-浪漫幻景”（Classical-romantic Phantasmagoria）。这次就没有必要特别担心思想碎裂的现象再次发生。这倒不是说歌德不再爱恋海伦，不再爱恋那无与伦比的希腊之美；实际上，歌德从未停止过研究并追慕希腊艺术和希腊文学，特别是希腊悲剧作家。有时候，他还会萌动那旧日的梦想，希望自己成为希腊的传人；他时而计划着为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书写续篇，时而酝酿着依托欧里庇得斯《法厄同》的残片构筑一部喜剧。在生命趋于结束之时，歌德站在古人一边反对现代人，尽管他自己也是现代人，但他最终还是认为现代人不配仰望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而且，他

还离弃了克莱斯特，因为《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 ）当中阿喀琉斯遭遇的恐怖死亡令他感受到真切的恐惧，克莱斯特这部悲剧实在称得上是怪异、野蛮且近乎病态。歌德当然不是不再爱恋希腊，相反，歌德表达过自己的愿望，希望能在古代雕像的展厅中生活、睡觉，希望早上醒来之时能置身诸神的雕像当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至死都抱持着对美、静穆和安宁的忠诚。

倘若说歌德从未丧失对海伦的爱，那也可以说，此种情感的品性也在逐渐变化，从最初那强烈的占有欲，借由一个拒斥阶段，转变为克制和淡然，最终则是对这样一个美人采取了平和的沉思态度，显然，那已经不是他的美人了。这样的激情同歌德在现实生活中对洛特·布夫、米娜·海尔茨利普（Minna Herzlieb）、玛丽安娜·冯·维勒摩尔（Marianne von Willemer）以及乌尔里希·冯·勒夫佐夫（Ulrike von Levetzov）的激情差不多是一样的，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悲剧冲突在歌德生命中以五花八门的形态展现出来，这样的冲突在他同海伦的情事当中得到精神层面的演绎。写于1808年的《潘多拉》（*Pandora* ）不仅隐含地承认了自己因为对米娜·海尔茨利普的激情而遭受的痛苦，而且还以更为绝望的方式展示了一种虚幻理想对自己的奴役：

> 噢，告诉我，我父，谁予她视力
>
> 这独有的，凯旋的和可惧的大能？
>
> 谁秘密引领她下到神秘沼泽
>
> 从万能的奥林匹斯山，或者沿荫而上？
>
> 你将更快飞离残酷的命运
>
> 逃离她敏锐的，网逻的眼眸！
>
> 她已迫使我，将我的生活交付她的生活，
>
> 在我所能生活之域，几无剩余。

孕育自美的命运，确乎将他分裂，

就让他快速翱翔，以侧目的眼眸，

以免被她的好奇，洞彻他炙热的灵魂，

他必被扭返她的榻侧，因为永恒。

那迷失了的潘多拉正是迷失了的海伦。在这部有着强烈寓意的戏剧当中，“美”将从迷失中回归，对德意志的混沌以及诗人内心的混沌实施重建。然而，歌德一度对故事的幸福结局感到犹豫和退缩，没有完成这部戏剧。潘多拉的迷人女儿俄尔波勒已经预言了潘多拉的回归，但是悲伤的埃庇米修斯并没有看到潘多拉，他根本没有能力将潘多拉留在过去，他只能活在记忆的幻梦之地。富于进取精神和雄心的普罗米修斯也没能成功地将潘多拉从诸神手中夺回来：

噢，巨人们，你们的奋斗煌煌甚伟；

但唯独诸神能指引这路

朝那永恒的善与美；任他们将之追随。

《潘多拉》中展现的这种悲剧性的拒斥态度，同《海伦娜》中展现的那种彻底的放弃态度，形成了遥相呼应之势。不过，从《浮士德》第二部的规划来看，歌德最终是在写就《浮士德》第二部的时候才彻底放弃了《海伦娜》，《浮士德》第二部则是直到1816年12月才封笔。

在“海伦”断篇当中荡漾着轻松、愉快的语调，显然，此时的歌德对女主人公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即便说有兴趣，也只能说是将之视为单纯的神话故事，除此之外，便没有别的了。要让《浮士德》第二部去充分体现歌德的希腊主义，这显然已经为时太晚，这就如同让《浮士德》第一部去充分展示歌德的魔鬼学信仰一样。当席勒敦促歌德完成这部杰作的第一部分之时，歌德已经对魔鬼的权能抱持犬儒态度，当艾克曼恳请他完成第二部分的时候，歌德已经对美的力量抱持怀疑态度。他最终还是像

他自己说的那样，消化了这些“北欧遗产”，并投身希腊盛宴，这令他很满意，不过，离弃那样一个迷人的伴侣，令歌德一直悲伤不已，而且他一直没能脱离这悲伤。失去海伦也令歌德消除了对世事的幻象，此种感受赋予了《浮士德》第二部的前两幕极大的情感价值；展现在这部分诗篇当中的浮士德和海伦的故事，是以象征手法呈现了歌德游历意大利期间以及之前那个时期的希腊主义心路历程。

浮士德在去往“众母之域”的路途之上，身负着极度的寂寥和孤独，浮士德此行是为了召唤海伦，确切地说，他要召唤的并非海伦本人，而是海伦的意象，并且此举还是受命他人而非浮士德自己的心意。歌德曾试图借助《伊菲革涅亚》实现温克尔曼希腊之美的观念，当时的歌德尚且处在夏露蒂·冯·斯泰因的主宰之下，《浮士德》的这一幕实际上正是对歌德此一心念的诗性展现和诗性强化。当海伦那没有身体的幽魂出现之时，歌德和浮士德的心灵都亮了起来：

> 我依然看得见？或者是否它驻在我的灵魂，
>
> 那被挥霍开启的滥觞之美？
>
> 我可怕的旅途将我带至他的目的地。
>
> 这世界多么空旷，且未开启
>
> 在我神职生涯以前。但现在，往事一切随风；
>
> 最终，它被确凿地证成，坚实，且迷人。
>
> 假若我收回我的忠贞，
>
> 那就让我毁灭，让我更无所成。
>
> 我亏欠你，这不断加速的万能，
>
> 以及情感最私密的体认；为了迎娶你
>
> 我给予你爱和信仰，疯狂尤甚。

浮士德试图抓住并占有海伦的幽魂，这只不过证明了海伦的虚幻。那幽魂消失了，浮士德陷入死一般的痛苦当中，那境状就如同歌德在意大利之旅之前那几年间的境况，那时候，生活精神也抛弃了歌德。值此，歌德便创造了荷蒙库鲁斯，负责在浮士德这个身心麻痹期阅读浮士德的心灵，解释他的幻象。荷蒙库鲁斯是一个怪异的小矮人，拥有对世界的直觉知识，但一直都被封印在一个玻璃瓶中，他一直都想着逃出去，获得自身的真实存在。荷蒙库鲁斯就是另一个梅菲斯特；歌德曾跟艾克曼讲起，荷蒙库鲁斯属于恶灵族。不过，我相信荷蒙库鲁斯就是歌德的那个恶灵，是歌德的另一个自我，尽管外观丑陋；我还觉得那个玻璃瓶就是一种反讽意象，表征着歌德的天才在逃亡罗马之前的几年间所遭遇的禁闭和奴役。荷蒙库鲁斯醒来之时，那四处弥散的阴沉"北方氛围"令他颤抖。他宣示说，必须把浮士德转往神话传说之地，让他回归自己的心性，回归古希腊，否则浮士德就不会有复生之机。这趟行程结束之际，浮士德恢复了意识，荷蒙库鲁斯遂离开浮士德，转而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如何逃离那个瓶子并获取真实的存在。在这一幕结尾处，歌德以抑扬格韵律呈现出一幅海洋画卷，从中也揭示出，海浪可以打碎那封印着荷蒙库鲁斯的瓶子，令瓶中精灵在海洋中找到归宿，最终，荷蒙库鲁斯的灵魂从在伽拉忒亚王座面前燃烧的爱火中破瓶而出，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从那不勒斯到西西里的那段越海历程，令歌德那长期蛰伏的创造本能得到短暂释放，最终在释放的一刹那归于消散，这一切都在荷蒙库鲁斯的终局当中得到了最好的呈现。荷蒙库鲁斯，一个怪异的造物，其诗性意象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其行为方式跟歌德的天才在意大利之旅之前以及期间的表现如出一辙。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荷蒙库鲁斯了解浮士德，也知道浮士德需要什么。但是浮士德对这个聪敏的小精灵没有任何兴趣，很显然，荷蒙库鲁斯的诉求跟浮士德的诉求不是一回事。歌德将荷蒙库鲁斯塑造得如此矮小，跟实际的躯体没有任何匹配的可能，此举很可能就是为了将自己的恶灵约束起来。

浮士德在色塞利醒转过来（就如同歌德在西西里恢复过来一样），

开始在“古典的巫师安息日”中那令人迷乱的种种意象和身影中找寻海伦。此时，对西西里风景以及帕拉哥尼亚宫殿的种种记忆协同新近对希腊神话的研读，令歌德得以呈现出怪异、邪恶、美丽的早期希腊神话画卷，其埃及起源也一并展现出来。歌德曾对温克尔曼的世界展开过挖掘，此时便将那个世界的根基揭示了出来。不过，此一考古工程的诉求没有任何变化，那就是要将海伦带回这个世界。二十五年前，当歌德奋力研读荷马之时，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诉求：

> 而伴着这渴慕的最大可能的强力
>
> 是否我不该将这无与伦比的形式拖拽进亮光？

这韵律的发问（Gewalt-Gestalt [1] ）回音般反馈给《潘多拉》。

浮士德对海伦的渴慕是以一种激情方式呈现出来的，这实际上是以寓意手法表征了歌德对希腊主义的追寻，同样的激情也贯注于歌德的这一追寻历程当中。然而，当海伦本人最终在第三幕现身的时候，这个真实的海伦却令人不敢辨认。这真是那个特洛伊的海伦吗？还是说，眼前的这个海伦仅仅是古老传说的那个幻象，用于迷惑世人的眼睛，而真正的海伦却悄然生活在埃及？她是从埃及回来的？还是从“伊利昂那高高的塔楼”走来？抑或是说，她只是那个同琉刻岛上的阿喀琉斯永结同心的海伦的幻影呢？她身边的那个少女合唱队是不是真的见证过特洛伊的沦陷？还是说，那只是一场可怕的幻梦？这是记忆还是幻象？海伦也不免自问：她还是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为之争战的那个可怕意象吗？她还是那个幻象吗？她变了没有？将来，她是不是还要扮演那个角色呢？

此时的梅菲斯特伪装成福尔库德斯的一员，他很清楚，海伦从来都不具备真实的存在。正如卡戎向浮士德暗示的那样，海伦不过是神话人物，诗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梅菲斯特嘲讽海伦的不真实，并提起那彼此矛盾的海伦传说，以此折磨海伦。看着海伦在他的揶揄嘲讽之下开始向幽灵之域退却，梅菲斯特感到一阵恶魔般的快慰。《海伦娜》断

篇不仅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海伦不可能真正地回归这个世界，不可能真正地回归生活，还蕴含了更为深沉的失败主义，那也是一种更令人痛苦的怀疑主义。海伦和她的合唱队本质上属于“昏暗的冥界，那里到处都是无可捉摸的幽灵，永恒的空虚”。海伦，是希腊之美的象征，因此也就象征着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也绝无可能获得真实存在的东西。温克尔曼的希腊，无论多么美，都是一场幻象。这不仅仅是因为歌德在写作这一幕的主题内容之时已经是个老人，衰老令他对此种幽暗的虚幻有了特别的感受。1800年完成的那些诗行展现出同样的意象和感受，尽管那个时候，梅菲斯特尚且没有就海伦的虚幻特性进行挖苦讽刺。从斯巴达的墨涅拉厄斯宫殿前上演的这部幽暗的希腊戏剧转向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就会经历一场有益的震动。那悠缓的行动、那鬼魅般的声音、那古旧的语言以及整部戏剧背后那阴惨惨的美感都在催眠我们，令我们沉醉在一场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白日梦当中，令我们迷失在空幻的幻影世界当中，这样的世界不存在任何令人渴望、令人悲伤或者令人欢呼的东西。欧里庇得斯为我们呈现的是一部纯粹的悲剧，这悲剧源自一个美丽、致命且不祥的女人，她那些悲伤的受害者对她憎恶不已。尽管欧里庇得斯的这部悲剧笼罩在无可化解的阴郁氛围当中，不过，在倾听了歌德的海伦之后，再去阅读《特洛伊妇女》，想必会生出不少宽慰之感，这部悲剧可以让人在现实中找到立足之处，这当然是极大的宽慰。

浮士德和海伦相会，这个世界为此已经等待了太长时间，这一幕代表了歌德精神生活的巅峰，同时也是浮士德在前两幕表现出那样的激情和渴望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反高潮。此次相会附属于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在《浮士德》第一部当中的初次相会；歌德的这两幕场景都写得太晚了。倘若歌德能够在1800年完成《海伦娜》，他就不会再去描写海伦之美对林叩斯产生了何等影响，而会描写此等美貌对浮士德产生的影响。在两大主人公接下来的对话中，海伦学着用韵文说话，这是一个轻松、愉快且诙谐的小场景，那个时代在情爱主题上的轻佻氛围浸染了这段诗节的每一个语词。合唱队给出的旁白和评说，甚至略为有些不雅。

此外，歌德还将大段大段的信史和神话史放置其中，成就了《海伦娜》第二部分。浮士德与海伦相会的场景读起来的确令人失望（尽管其中不乏优美诗行，尽管林叩斯也表现出莫名的尊崇态度），不过，恰恰是这一点极大地展现出歌德是何等真诚。歌德已然没有能力去亲身体验这样的情境，也就只能予以间接呈现；歌德以戏谑方式来处理两大主人公之间的这场会面，就仿佛一个历经岁月沧桑的善良老人在观看两个孩童的嬉戏一样，这情境当中充溢着仁慈。海伦显然不再是这一幕背后的灵感力量；海伦是从一个莫名之地姗然而来；当她逐渐退入幽冥之域并将面纱留在浮士德手中的时候，浮士德对于她的消失并没有太深的记惦，因为此时的浮士德已然经历过一桩沉重得多的不幸。海伦那空幻的服饰化作云团，将浮士德带走，这也不曾触发人们太多的关切。第四幕开启之时，浮士德从云端降下，海伦则永远地消逝了，可能是化作朱诺、勒达或海伦娜（随读者自己去挑选），人们彻底意识到，浮士德同海伦的这段姻缘同现实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就如同第二部当中其他所有场景一样，此事对浮士德并没有太大影响。是不是这美的力量给了浮士德足够的勇气去闯荡一番呢？或者说，同半女神婚配，就是这样的结果？梅菲斯特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这也许只是一场玩笑，剩下的便是无边的沉默。

---

[1] 这两个词是押韵的，意为“暴力-形式”。——译者注

恶灵

当歌德在同艾克曼的谈话中回顾自己漫长的一生的时候，他显然意识到自己这一生遭遇了严重的错误，他的天才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挫折。歌德用众多名字来称呼这个一直阻碍他的力量，正是这个力量将他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内在的和外在的种种要求一直都在消耗着他的精力；他在公务、绘画、艺术以及科学研究上挥霍了大量时间，他也消耗大把的时间关注法国大革命，料理魏玛剧场事务，为席勒的杂志供稿；时人和同胞不曾给过他像样的鼓励，特别是《伊菲革涅亚》和《塔索》这两部剧遭受了颇多非议；他谈道，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对诗性创造抱持彻底的敌意，这个时代和这片土地充斥着仓促消化的知识和半吊子的文化，拘谨、迂腐且势利。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情况还不至于如此糟糕，此情此景，令他时常叹息不已，就像一个无助的老人。然而，即便在年轻的时候，这个德意志又能给自己的诗人和剧作家们提供怎样的主题呢？甚至可以说，那样一个德意志是否给自己的诗人和剧作家们提供过合适的主题呢？德意志的早期历史一片混沌，后期历史则根本没有任何普遍的民族旨趣可言。此情此景，歌德说，与其去崇拜希腊的悲剧家们，倒不如去崇拜他们处身的那个时代，那样一个时代，到处都激荡着伟大主题和伟大观念，希腊悲剧家们就是那么幸运地日日沉浸其中。歌德毕生都在追寻合适的戏剧主题和史诗主题，然而，此一追寻历程却演变成一场神话之旅。歌德未能找到完全适合的主题，即便是在八十岁高龄，他仍然坚信自然或者上帝是善良的，仍然坚信这个世界，也就是他生命中的阻碍力量彰显其中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善良可言的。他跟艾克曼谈起，终有一天，上帝会厌倦这个世界，那时候，上帝也许会毁灭这个世界，对之实施重造。还有谁能像歌德一样，用神话的方式表达这样一种彻头彻尾的神话态度呢？歌德尝试过提坦精神。不过，那样的精神最终被证明是歌德承受不起的。这就是为什么瑞士的山峦竟然会让歌德如此

烦乱，最终令他强迫自己从纯然矿物学的角度去看待巍峨的自然景观。荷马的万神殿反映出一个同现代完全悖反的世界，这座万神殿压垮了歌德。歌德抱怨说，现代诗人注定了只能创造女人而非男人，原因很简单，荷马已经穷尽了男人的一切，《伊利亚特》呈现了勇敢的典范，《奥德赛》则呈现了智慧的典范。至于莎士比亚，则俨然是个巨人，即便是一个赋有创造天才的诗人，一年能展读此人的一部戏剧，便已经很不错了，否则，就会被莎士比亚彻底毁掉。甚至哈默尔（Hammer）译介的哈菲兹（Hafiz）的诗篇，也是如此庞博，歌德说，此等诗篇若不能激发自己的创造力，自己就只能被击溃了。提坦精神、奥林匹亚精神、悲剧精神以及宿命精神，这一切歌德都尝试过，都不足敷用，都未能同他的真实思考协调起来。他说，看来他是不会有这样的福分了。

歌德说，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他是泛神论者，作为一名艺术家，他是多神论者。他的科学泛神主义展现出清晰的神话倾向，诸如他的植物和动物形态学、初生植物体理论以及光学理论，他将光视为初始现象，是无可分割的统一体。他说他写了那么多，最令他自傲的却是《色彩理论》（*Theory of Colour* ）：

> 我认识到了那真正的光，我要为之战斗，这是我的职责。然而，这个世界却在竭尽所能地让这光沉沦到黑暗当中。

先知就是这么谈论自己的上帝的。歌德对待牛顿理论的态度，一直都是一个真正信徒的态度，一个肯定要遭受假先知蔑视和忽略的真信徒的态度。对于歌德来说，作为初始现象的光学理论是一份宗教信仰条款，而非科学理论。问题在于，倘若作为科学家的歌德满足于初始现象的此种神话本质，那么这样的理论对于作为诗人的歌德显然就不会有任何用处；他的上帝观念也是一样的情形，他的上帝观念根本不是什么多神论，而是一种经过启蒙的、有着深沉宗教情愫的自然神论。歌德观念中的上帝是一个无可理解的奥义存在，一个赋有高度创造力和生机力量的存在，拥有无限的权能和属性，非人类心灵所能探测，那样的上帝就

是在自然当中彰显出来的无尽且永恒的爱。这些就是歌德对上帝的部分认定。此种观念是极具诗意灵性的。抒情诗篇毫无疑问可以在这样的观念当中尽情伸张，自由呼吸，不受拘束。然而，这样的观念同时也是极具拟人特质的，因此，其中的想象要素尚且不足以将此等观念改造为神话。由此，这位“多神论艺术家”便不得不从提坦神话、奥林匹斯神话、北欧神话和东方神话当中不断借取，有时候甚至不得不乞援于基督教神话。所有这些神话元素当中，希腊神话是歌德的最爱，尽管他对希腊神灵根本就没有信仰可言，甚至他生涯当中那个普罗米修斯时期也不例外，当时，他只不过是运用希腊的神话人物来表达自己的至深体验。不过，《阿喀琉斯》断篇倒是致力于客观地呈现希腊神话人物，将之视为真实存在的人物；然而，这份诗篇并没有成功。1801年，歌德陷入重病当中，克里斯提安娜听到他在病痛的恍惚中呼喊基督的名字，那呼喊声中倾注了深沉的热忱，那语句更是极为动人，令人心神摇撼。有人说，歌德的此番顿语出自他的一份早期诗篇，那份诗篇呈现了基督降身地狱的场景。确实有此可能。不过，事实依然是事实，歌德那个潜意识的自我在汲汲于寻求希腊神灵的替代品，因为希腊神灵已然遗弃了他。几年之后，歌德直接将天主教比之于荷马的万神殿，认为天主教体系同样能够激励诗歌创作。在同里莫尔的谈话中，歌德也多次明示，他认为神话是诗歌的一个本质要素，也是造就了希腊人之优越性的要素之一。

歌德对待基督和基督教三一论的态度，较之对待希腊世界那些古老神灵的态度，则要模糊得多。对于希腊诸神，歌德喜欢以象征手法予以运用，而且他也只是在暮年之时才放弃了希腊神灵，其间并不是没有哀婉和叹息。他告诉艾克曼，希腊的命运观念已经过时了，他还借梅菲斯特之口说：

你在天庭的那帮老朽的神灵，

让他们滚蛋吧，他们的时日结束了。

从通达世事的那个年龄开始，也就是从在斯特拉斯堡遇到赫尔德之时开始，他便不再信仰基督了，当然，这其中的前提是他真的有过一段不信仰基督的时期。尽管他一直都在这个问题上焦躁不定，但一开始，他对基督信仰是抱持同情态度的，不过，意大利之旅期间以及其后，他便对基督信仰抱持明确的敌对态度了。有时候，他甚至会在这个问题上给出极为亵渎之论。里莫尔曾说起，歌德对基督教这个“神圣家族”有过极为尖刻的讥讽，他将这个神圣家族比作异教当中伏尔甘-维纳斯-丘比特的三位一体。此一攻击之论是1809年8月3日的事情，这一年，歌德正尝试完成《亲和力》（*The Elective Affinities* ），并将一种神秘的罗马天主教式的终局赋予这部作品。“天上序幕”写于1797年；中间的这个时期，歌德的通信当中到处都是对“天上序幕”所表征的宗教的憎恶，那憎恶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因此，即便是《浮士德》第二部的歌剧风格的“终局”，也根本不足以论定歌德的心性真的发生过变化。然而，倘若艾克曼提供的传闻是可信的，那也可以说，歌德对基督和基督教的此种憎恶在1824年已经消散了，即便此时的歌德仍然时不时地会对三而一（Three were One）以及一而三（One was Three）这样的观念来上一番揶揄，毫无疑问，常识在歌德心灵当中唤醒了相反的故事。此时的歌德在谈起“这门宗教”之时，表现得非常宽和，甚至充满敬重，不过，其中的一些评说也彰显出一丝虔诚意味，这不免令他的此类申述引人起疑，特别是要考虑到，大臣缪勒（Müller）在日记中曾提到，这些年的歌德对基督教诸般奥义的攻击是极为肆意且恶毒的，尤其是在圣灵感孕说这个问题上。自1813年之后，歌德的这个态度就不曾有什么变化。正是在1813年，歌德跟里莫尔谈起，唯有希腊人才真正有能力避开两性纠葛，单独去呈现那不死的青年和纯洁少女，“圣母既是贞女，又当了母亲，这完全是胡扯”。歌德还在艾克曼那里留下了两则非常醒目的评论，他说他可能是自己那个时代唯一的基督徒，还说他之信仰基督，是因为在他看来，基督是最高伦理原则的神圣启示者，肯定不能将此类论说理解成歌德信仰基督的神性；切不可忘记，歌德同样也乐于将太阳作为最高

伦理原则的启示者加以敬拜。无论歌德是抱有敌意的怀疑主义者，还是宽和善意的怀疑主义者，作为诗人，他都是多神论者，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观念并不契合他的品位。

在《浮士德》第一部、《亲和力》以及《浮士德》第二部的结尾部分，歌德运用了一种他并不信仰的宗教，而且在写作前两部作品之时，他对这门宗教肯定是抱持明确敌意的，也正是因此，他是在神话意义上运用了这门宗教；这样的情形令人颇感怪异。不过也不难见出，此举意味着歌德给了基督教一个诗人所能给予宗教的最高赞誉。而且应当强调的是，在这三部作品中，基督教之运用，都是为了避免一场灾难或是为了缓解悲剧结局。然而，还有一个更为怪异的情形。这位伟大异教徒的杰作建基于基督教的地狱和永罚故事，并以天堂和浮士德的救赎结尾，此一结尾是基督教式的，而且，这显然也是一个必然的结尾。这样的情形在歌德这里无疑是非常冷酷的，因为他不会也没有能力呈现悲剧。因此，对于生命的悲剧，他能够提起的唯一神话学和解，便是基督徒所信仰的彼岸天堂。

能否认这是歌德生命当中的一项决定性情状吗？这个最为伟大的现代天才，其才具足以同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比肩，甚至超越他们，完全有能力去呈现现代世界的本质，就如同荷马呈现古风时代、但丁呈现中世纪、莎士比亚呈现文艺复兴。然而，歌德却在自己的这项任务面前遭遇挫败，这是因为歌德手里并没有可以提供襄助的神话资源，对这一点难道还会有任何怀疑吗？歌德生命中之所以会遭遇如此沉重的挫败，恰恰就是因为他一直都不肯承受如下事实：世界反映了生活，而生活乃是极具悲剧性的，也许只有基督徒不这么看。歌德相当直接地否认了悲剧，这导致了他在呈现他置身其中的世界之时遭遇了审美失败。由此可见，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作品，都在表明，他本人恰恰就是现代人之二元精神格局的典范表达。

后来的叔本华在那神秘特质胜过哲学特质的“生存意志”当中，将此种二元主义变成神话，此种“生存意志”以根本错误的方式在世界当中伸张开来。歌德在暮年之时，则是以一种半神秘、半哲学的方式切近了这个问题（歌德最早是在《初稿浮士德》当中以诗歌方式呈现了这个问题）。在1813年4月4日的日记当中，歌德留下了如下语词：“恶灵的观念和埃格蒙特的观念”。他很可能是在1816年写就了《诗与真》中的相关论说，并以此作为整部作品的结尾。在1817年的《俄耳甫斯箴言集》（*Orphic Gnomes* ）以及1820年对这些箴言做的评论当中，他将恶灵定义为个性或者个体性，也就是成就每个特定个体的那种要素，这样的要素不能在人与人之间置换，因为那是每个人性格中的命运要素。在生命历程的最后四年，在同艾克曼的谈话当中，歌德更为详细地阐发了此一观念，而这也正是他为解决生活之奥秘而做出的伟大贡献。我认为，从1816年开始接触拜伦的诗歌往后，拜伦的个性和生涯就一直主宰着他的心灵，每次在他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的时候，拜伦就会进入前台。《诗与真》的第二十章申述了埃格蒙特的性格问题，那样的申述更契合拜伦而非《埃格蒙特》的主人公。

《诗与真》呈现的恶灵，是一个真实的神话造物，歌德从哈曼阐释的苏格拉底的恶灵那里有所借取，借重于拜伦的成分则要多得多，但其主体元素都源自他本人及其切身体验。此番描述乃是歌德的最后一次尝试，他试图解释自己的终生信念：这个世界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在《诗与真》中，歌德申述说，恶灵元素是他在自然与历史当中以及在人身上不断遭遇的东西，这样的元素主要在矛盾当中彰显出来。歌德还说，恶灵元素不能用任何范畴予以归类，也无法用任何言辞予以界定，它既不属神也不属人，既非天使，也非魔鬼；恶灵是模糊的、无可理解的，却也极为强劲。他称之为恶灵，乃是效仿古人。他也逐渐意识到，最好不要尝试去思考这恶灵，他试图借助具体的形象来逃离这恶灵的困扰，于是创造了埃格蒙特，来表征恶灵品性，埃格蒙特对生活有着无尽的爱，对自己有着绝对的信心，而且还拥有无可抗拒的个性魅力。恶灵

在人身上得到了最为可怕的伸张。恶灵极为危险，极具毁灭性，而且其吸引力也是无从抵制的。唯有宇宙本身能够将其征服，恶灵同宇宙处在冲突当中，还是那句话：唯有神能够反对自己。然而，这可怕的恶灵力量，本身也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它从伦理世界秩序体系当中横贯而过，如果说生活是纬线，那么这恶灵力量便是经线。

此一特出比喻相当完满地呈现了歌德之于生活和世界的二元感受；恶灵在埃格蒙特那里得到具体表征，埃格蒙特同时也揭示了歌德自己身上的恶灵元素，对此，歌德从来都是有意识的，恶灵观念一直就伴随着他。不过最终，歌德还是否决了自己身上的恶灵元素。1831年，他告诉艾克曼，恶灵并非他本性当中的组成部分，他还黯然补充说，他曾屈从于这恶灵。1823年，歌德再次同恶灵展开缠斗，这是最后一次，当时，乌尔里克·冯·勒夫佐夫和音乐精神摇撼着歌德的根本信念。歌德再次依托具体人物来寻求庇护。一番搏斗之后，歌德还是臣服于恶灵，不过这次，他选用了拜伦来代替自己。

从1779年的《伊菲革涅亚》到1827年的《海伦娜》，歌德一而再再而三地拜倒在海伦脚下；1827年的献祭行动，实质上是歌德在赞颂自己的恶灵，尽管他毕生都在同这个恶灵进行无情斗争。从艾克曼谈话录中不难见出，此时的歌德已然看清了恶灵的创造能力和毁灭能力。他将恶灵同年轻及其荣耀联系起来，同拿破仑这个无与伦比的功业创造者、腓特烈二世和彼得大帝、菲狄亚斯和拉斐尔、丢勒和荷尔拜因、莫扎特、路德和莱辛、莎士比亚和拜伦联系起来。从无意识之境生发而出的音乐以及一切的抒情诗篇，乃是恶灵的极致表达；恶灵是一切创造行动的源泉，激情之爱就是恶灵之本真元素。1828年3月11日，歌德跟艾克曼专门谈起了生活和诗歌当中的恶灵元素，那场谈话引人入胜，歌德将《维特》时期、情诗时期、《克拉维戈》（*Clavigo* ）时期以及《兄妹》时期，视为自己生涯当中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他也谈到了《西东合集》（*West-Eastern Divan* ）时期的那段小阳春。最具启示的是歌德在1831

年6月20日就自己的创造过程给出的那番描摹：

> 那是一场属灵行动；部分和整体融合无间，同一种精神贯注其中。诗人并非四处乱撞；相反，恶灵掌控着诗人，令他执行自己的命令。

在这个恶灵序列当中，歌德只提到了一个希腊人，菲狄亚斯；至于希腊作品，歌德则一部都没有提及。显然，歌德心目中的恶灵跟他心目中的希腊，完全不是一回事。讽刺的是，暮年之时，他身上的狄奥尼索斯精神竟然征服了阿波罗精神。浪漫主义情愫此时在他身上已然发育到极致，拜伦对狄奥尼索斯精神的这场胜利自然是功不可没，然而，这一切来得太晚了。

恶灵在拜伦身上极为强劲地彰显出来，这对歌德产生了无可抗拒的吸引力：他那亢奋的青春、他那可怕的个性、他的尖刻和倨傲、他的毁灭性、他的反社会罪错。拜伦简直就是奥林匹斯之神歌德或者圣人歌德的对立物。不过，他也活脱脱地就是普罗米修斯时期的歌德，除了他高贵的英格兰出身。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决绝且强烈地否决了歌德在希腊星辰指引之下追随的那些理想。此时已然是八旬老翁的歌德，时常会禁不住地生出一种心念，也许拜伦是对的，而非温克尔曼。歌德仿佛看到自己的恶灵在这个英国诗人身上重生了。每每思量拜伦，歌德内心都要升腾起臻于极致的嫉妒，对此，路德维希（Ludwig）给出了自己的锐见，他说，那是一个悲剧性的征服者对更具光彩的被征服者的嫉妒。他们是一类人，真正吸引歌德的，正是拜伦身上的此种毁灭性元素，歌德只能这么远远地观瞧拜伦那流星般短暂但辉煌的生涯，那以灾难见长的生涯，他心中不禁暗想，要不是阿波罗的恩惠，那本应是自己的生涯才对。自从来到魏玛，歌德再也没有尝试颂扬自己的恶灵；然而，此时身处生命末端的歌德，则开始颂扬另一个人身上的这种怪异、危险且昂扬激荡的生命精神。他至死都信守自己的信念，认为这恶灵乃是毁灭性的，并将这个恶灵呈现在欧福良身上，以诗性之光华环绕着浮士德的儿

子。拜伦最终身死希腊，这会令歌德对拜伦的仰慕和嫉妒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提升吗？希腊，歌德一直在用灵魂找寻，但他从未见证过希腊，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愿，他的脚步停留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他认为它们较之希腊，毫无逊色之处。拜伦的赴死行动，蕴含着英雄主义情愫和侠义精神，那是自我的勃发，相形之下，歌德在对抗恶灵之时展现的不事声张的坚定是何等渺小。这一切来得太晚了。不过，年事已高的歌德至少还能够对此种狂野且美丽的元素表示敬意，他这一生一直都是如此苛待恶灵，拜伦则教会了他去敬重恶灵：“伊卡路斯！伊卡路斯！哦，悲惨的结局！”

最终，歌德还是承认，那恶灵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天才。此时，他应该也意识到，他的追逐海伦之旅实际上是一场虚幻之旅，他本当追随恶灵的指引。他召唤海伦来驱逐自己的天才，此举无疑是太成功了。到了生命末端，他就只能将自己交托给“隐忒莱希”，只能寄望自己得到重生。温克尔曼的黄金时代乃是一个强有力的魔咒，对歌德来说，这魔咒是邪恶的。这魔咒扭曲了这位伟大的北方现代天才，令其最终偏离了自己真正的并且是注定了的道路。

海伦娜麻痹了他

令他的理智无以复生。

第五章 敌对者：席勒（**1759～1805**）

战败的“巨人”

对于20世纪的英国读者而言，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席勒可能是所有德意志作家当中最缺乏吸引力的：顶多只能算是一个战败的巨人；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席勒虽然拥有皇皇辩才，但骨子里只是一个道学家。这两种看法都并非没有道理，但席勒此人绝不止于此。席勒是德意志文学史上最难解的作家之一，特别是要考虑到，表面上看，席勒是非常简单的，可以非常轻松地将某种程式套用于他，而且，他的文学生涯是有着明确分期的（悲剧时期、历史时期、哲学时期和戏剧时期）。此外，席勒的作品有着两大突出特点，早期是极度缺乏品位，成熟时期则是过分的道德说教，对于那些见木不见林的英国读者而言，这些都是令他们反感乃至憎恶的东西。

单就构思和写作方面的伟大而言，席勒的第一次戏剧冒险《强盗》（*The Robbers*），在他的作品库当中显得非常特别，这是一部极为凶蛮的宇宙闹剧，以一种高洁的伦理论调收尾，整部剧中，种种尖利激情彼此冲撞，席勒并没有在其中展开和解。同样的伦理音符也在《费耶斯科》（*Fiesco*）的暴烈煽情当中奏响，并在《阴谋与爱情》（*Cabal and Love*）的现实主义之中激起刺耳的噪音。不过，青年自然是要倾向于说教的；这些剧作散射出阴郁的光彩，桀骜不驯和狂躁言辞充斥其中，这一切都植根于青年席勒的本能，这本能当中蕴含了强大力量，也蕴含了强劲的戏剧天才和悲剧情感。此等情境之下，一旦这个凶悍的年轻巨人暂时中断自己的狂暴和愤怒，转而宣泄老掉牙的道德说教，这一切都是

可以原谅的，他身上的另外一些缺陷也是可以原谅的，毕竟，他还年轻。

然而，当《唐·卡洛斯》（*Don Carlos* ）中的波萨侯爵以美妙的素体诗韵律抒发了对自由和人性的高贵情怀之时（此番韵律在席勒那强劲的散文风格映衬之下，显得那么刺眼且造作），这个戏剧家的罪恶秘密便显露无遗了。他一直致力于再造我们，但我们已经对此失去耐心。那高昂的道德论调我们都听得真真切切，但是我们英格兰对文学中的此种道德论调是极其瞧不起的，尽管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英格兰人一直都奉行那样的道德。在席勒后来的作品中也不难探查出此等道德论调的颤音，当然，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此一颤音表现出更高的敏感度。我们英格兰人恐怕是最敏于辨识出这样的道德论调的，但席勒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嚣张肆意的冒犯态势，恐怕也是无人能及的。他的诗篇无不高扬那抽象的伦理标尺，由此便将此种情状揭示无遗：在他的诗篇中，真、善、美以及崇高，作为伦理标尺得到无尽的推崇；此外，还有追求与理想，智慧与学识，和谐与和平。昔日的宇宙仇恨大剧，连同那强悍的血性和狂躁之气已然成为明日黄花。此时的希腊开始为那令人迷醉的宇宙之爱书写腻人旋律，在我看来，此情此景实在是令人悲哀！这一切莫不令人们生出深深的疑问，令人们对世事之黑暗产生期待，正是在这样的疑问和期待当中，我们要看一看席勒那些叙事谣曲以及后期戏剧，也许，我们的预感能在这些作品中得到应验。那是一种世人都能理解并接纳的道德信息：罪错因受难而得到宽宥；罪人遭遇复仇；主人公遭遇诸般诱惑并最终予以克服；恶人倒地，德性胜利；无处不在的“永恒道德难题的重负”；“美丽灵魂”，从纯洁境地升华到崇高境地，令整出大戏笼罩在一片紫气当中，光华缭绕。现在，轮到我们来说教了。我们会宣扬艺术之独立性，并据此对席勒展开驳斥，认为席勒不过是用他那毫无疑问的戏剧天分来置换一堆乱糟糟的康德哲学，由此，悲剧视野便不得不弃他而去。于是，我们会斥责席勒，认为他将诗歌贬抑到修辞的水准，他的缪斯不过是那高扬的道德，他的主人是人性而非艺术。不过，即便是在

他的道德箴言当中，世人也不难感受到一种真正的伟大。于是，对此感到困惑的人们便开始怪罪他的先驱者们和他的同时代人，比如，法国的古典派戏剧家、康德的致命影响以及希腊悲剧营造出的异域氛围。我们不免哀叹这一切，这也并非没有道理。然而，罪魁祸首既非拉辛也非康德，既非索福克勒斯也非欧里庇得斯；罪魁祸首乃是死亡。倘若席勒能够活到完成《德莫特里厄斯》（*Demetrius* ），也许我们就不难感觉出，这其实根本没什么值得哀叹的。实际上，席勒之天才看似陷入诸多歧途，但他在四十六岁的年龄上却也正在一条路上大踏步前进，这条路就是，如一些作家所相信的那样，席勒最终会成为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尽管这片土地孕育出了歌德、黑贝尔、格里尔帕泽和克莱斯特这样的人物。

青年剧

席勒在着手写作青年剧之前，就已经经历了戏剧化的生活，那是他的天才同暴政、欺骗、贫困以及激情的冲突。他是在斯图加特学院之时写就了《强盗》，这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学校生活那种本质上的戏剧特质。即便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青年和老人、反叛和权威、野蛮精神和纪律精神之间的战争已然被压制到一个非常谨慎的轨道上，学院当中已然充斥着拉帮结派、挟私斗狠、连横合纵，到处都是野心和挫败、阴谋和谣言，但是，今天的学院仍然是一个足以用一部戏剧来予以表征的世界，只不过那戏剧就蕴含在日常生活当中而已。这样一部戏剧极为真切地揭示出人物之间的争斗以及人物同环境之间的争斗。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样一部戏剧包含了外来的命运要素，并且还是以至高权能的形态展现出来的，这命运可能是善好的，也可能是恶毒的，但不管怎么说，这命运是无可猜度的，是神秘的，所表征的乃是世事当中之偶然元素。符腾堡的卡尔·欧根（Karl Eugen）公爵在席勒的生命中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先是在索利图德宫，后是在斯图加特；欧根公爵是一个强悍且专制的王公，他的邪恶和德性几乎同样令人赞叹，一名学童恐怕不会遇到比欧根公爵更令人心惊胆战的校长了；他那华丽的仪仗、他那颇富德性的情妇、他的奇思异想、他的剧场和宫殿、他过去的和当前的权势，都引发了学生和臣民极大的兴致，成了这座城市永恒的谈资。此外，符腾堡公国所奉行的严格的军事训练体系——此一体系极为奢华、庄重——可以说是席勒的内部境遇，外部境遇方面则是狂飙突进运动掀起的革命潮流，此一潮流先是涓涓细流般渗透到这座文艺复兴学院，而后便洪流般奔涌而来，席卷了这座拥有众多聪敏学童的学院。两种境遇形成了强烈对照，触发的精神、情感以及智识领域的种种冲突，实际上也成就了一处温床，要造就未来的戏剧家，天下恐怕没有比这更为合适的土壤了。此外，席勒自己的生活境遇也并不缺乏悲剧要素，一个本来

还算幸福的孩子，不得不离开挚爱的家庭，一个虔诚的年轻学者，不得不去学习法律和医学，一个热忱的理想主义者，遭到友谊和生活的欺骗并彻底失去幻想，一个含苞待放的戏剧家，不得不穿上医生的粗陋服装。到处都是现实的障碍，困扰着这个昂扬的精灵。名声在召唤，但那暴君却在阻拦。绝望中，纵身跃入苦难的海洋，就这样，一个即将溺亡的人在奋力抓取那最后的稻草，这个世界就这么看着他沉下去。并不奇怪，席勒早期作品中的生命视野乃是悲剧性的。不过，此种悲剧性乃是在相当宏大的层面上展开的，这些作品也证明，席勒对那样的悲剧性是有足够体验的。当然，一个人的心灵很可能会因为对这个年轻人的怜悯而痛苦［席勒逃离斯图加特期间所承受的苦难，以及在曼海姆期间升腾而起的那种不抱幻想的生活态度，忠实的斯特莱切（Streicher）是有动人描述的］，不过，这样的苦难恰好能成就一个戏剧家。一切伟大戏剧都是悲剧性的。这个孤寂、落魄且倍受羞辱的年轻天才正在亲身体验悲剧。

不过，从一开始，此种情状更为明显地展现在他的诗歌作品而非戏剧作品当中，而席勒心灵当中的戏剧才具则遭遇了另一种倾向的冲击。一种乐观的、理想主义的特质植根于他那本质上高贵的性情当中，他童年时代那极端的虔诚就已经彰显了此一特质，到了青年时代，席勒则一直都在以半哲学化的方式尝试调解冲突，尝试化解诸如身体与灵魂、生与死之间的碰撞，并竭力将之消解到普遍的和谐当中：那是超越了道德的宇宙友谊或者宇宙之爱；天际的音乐湮没了尘世的争斗。所有的伟大悲剧作家都经历过自己心灵当中那创造性元素同毁灭性元素之间的冲突。他们创造是为了毁灭，在毁灭之后，他们都有着极为强烈的欲望去重新创造，这欲望催动着这样的悲剧作家望向更远的地方，望向更为伟大的创造行动。那眼光是闪烁不定的，的确有希望的光芒在其中闪现，不过，并无完全的信念。若非如此，他们将毁灭悲剧的前提设定，《欧门尼德斯》以及《浮士德》第二部就是这样的情形。悲剧作家是不可能既肯定又否定的。所谓冲突，乃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但是，悲剧作家必

须做出抉择，只能选择一端，而且在两种生命观念的中间地带，一个悲剧作家是绝无可能停留太长时间的。席勒也许是所有剧作家当中最为独特的，因为他竟然能够在悲剧的世界解释模式和乐观的世界解释模式之间将自己撕裂开来。从本能角度讲，他对生命的体验乃是悲剧性的，毕竟，他的审美意识差不多完全是戏剧性的，而戏剧的推演机制则不可避免地朝向灾难结局。但从理智上讲，席勒却是那种意在达成综合的人，这一点从他的哲学作品中便不难见出。从性情角度看，席勒则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此，思想家和创造者，这两种身份、两种权能，从一开始就在他的心灵中展开争斗，而且还是一场大体上不相上下的争斗。

这场剧烈且痛苦的冲突在席勒的早期诗篇中肆虐无疑，这些诗篇毫无品位可言，而且极为夸张，并且在这方面，可以说在文学史上无出其右者。克洛普斯托克式的迷狂、莪相式的阴郁、狂躁的哀叹、对暴政的猛烈控诉、歇斯底里的声色之欲、肆意的属灵诉求、病态、残酷、扭曲的情感、直截的讽刺、启示录般的愿景，这一切的一切就是1782年及其前后那个时期的《诗选集》（*Anthology* ）的特质，当然，其中倒也有那么一两份诗篇是例外，不过也不能说是十分显著的例外，这些诗篇简直不是语言能够评说的，而且看起来也的确否决了席勒的诗歌天分，即便是当他灵感勃发的时候，更确切地说，特别是在他灵感勃发的时候：

手挽手，步步高

自蒙古至希腊的预言家[1]

联袂那位最后的撒拉弗，

我们漫步高蹈，以环形的舞步

直至伟大的海洋中，那永恒闪耀的

时辰和尺度，在视线中没汩。

在这些臃肿诗篇中，希腊人名和神话指涉四处显现，洛可可式的软

木塞就那么漂浮在莪相的海洋之中。其中不乏对荷马和维吉尔的征引；不过，如此众多的典故和神灵，恐怕主要还是出自比格尔（Bürger）的《维纳斯的守夜》《*Vigil of Venus*》和维兰德的《美惠三女神》（*Graces*），此二人以及奥茨（Uz）和格莱姆（Gleim）这样的“阿那克瑞翁派”诗人，都喜欢用这类典故来装点自己的散文和诗歌。无论席勒这些诗篇中的学识渊源何在，奥维德式的氛围乃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只有《诗选集：辑自地狱和乐土》当中的两份诗篇是例外，也就是这两份诗篇还像点样子，其中一份诗篇很明显是从温克尔曼的拉奥孔群雕观念当中汲取的灵感，而且，席勒很可能是通过莱辛的那本小册子了解到了温克尔曼的此番申述：

听——仿佛大海狂风暴雨的呢喃，

如同一条激流穿越中空的岩石，发出哀叹，

那悲伤既深且重，沮丧低语不已；

烦恼痛苦在在沉吟。

扭曲的痛苦

乃他们的模样；而极度的悲伤

用嘶哑的咒骂放声亮嗓。

他们的注目空乏，极度心悸地

面朝科赛特斯河[2]之桥，他们的眼眸凝注，

流泣，当他们追随着它悲伤的航程。

（他们）互相征询，感悟心悸，

是否他们能亲聆圆满。

永恒在他们之上滚滚驶过，

而萨吐恩[3]的镰刀居中裂断。

题为《乐土》（*Elysium* ）的“悬诗”（pendant poem）没有在品位上出现问题，这一点颇值得称道。这份诗篇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正是在这份诗篇中，席勒的尘世至福理想首次浮现而出。此一理想超越了一切感官元素，并且在《理想与生活》中得到最终的表达。这份诗篇足以预示席勒后来的思想进程，不过，这并非唯一的例子。席勒后来写就了他最著名的一系列诗篇，其中出现的那些希腊神灵以及希腊神话典故，都可以在《诗选集》中找到萌芽，特别是《爱的胜利》（*Triumph of Love* ）这份诗篇，它差不多同样是从比格尔的《维纳斯的守夜》和维兰德的《美惠三女神》中汲取的灵感。这些德意志权威的背后，仍然是奥维德《变形记》的影子。此时，丢卡里翁和皮拉的神话故事（维兰德，《奥维德》卷一）、德墨忒尔（刻瑞斯）和珀尔塞福涅（普洛塞尔皮娜）（比尔格、维兰德，《奥维德》卷五）的神话故事、皮格马利翁的神话故事（维兰德，《奥维德》卷十）、朱庇特和塞墨勒的神话故事（维兰德，《奥维德》卷三）以及阿克塔伊昂的神话故事（《奥维德》卷三）已然成为席勒的精神素材。此外还有难以计数的古典掌故，其中有许多是比格尔和维兰德在自己作品中已经运用过的，而且，在当时的德意志文学作品当中也是随处可见，诸如奥林匹斯众神、赫利孔、伊利西昂、塔塔洛斯、奥尔库斯、冥河、克塞忒斯河、忘川河、阿弗纳斯湖、刻耳柏洛斯、喀戎、米诺斯、俄刻阿诺斯、赫斯珀洛斯、欧门尼德斯、帕尔卡厄、阿波罗、九位缪斯、萨图恩、克罗尼昂（《伊利亚特》，卷一，527f）、阿佛洛狄特、赫拉、提提厄斯、勒达、泽菲尔斯、埃莫、丘比特、小爱神、命运女神、月亮女神、潘多拉、普罗米修斯、阿斯特莱亚、奥里昂等。就这样，席勒的万神殿毫无意义地挤满了此类希腊-罗马-阿那克瑞翁神灵。席勒此时的作品中，对冥界及其神灵的运用乃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比如《塞墨勒》（*Semele* ）中的戏剧化描摹以及《聚在地狱塔尔塔洛斯》（*Group in the Tartarus* ）中那阴暗的色调，这一切都展示出这位悲剧戏剧家的关切所在。不过，从总体上说，此一希腊影响力乃是虚假的，而且也是极为表面的。希腊神话和希腊的命运观念在

席勒的早期戏剧中很难说有什么分量，尽管这些作品中会不时出现古典掌故。此一时期，席勒很可能也对普鲁塔克（Plutarch）有所借取，不过很显然，对希腊戏剧家们则是没有任何借重可言，他求学时不曾读过希腊剧作，在斯图加特、曼海姆、奥尔巴赫、莱比锡以及德累斯顿的时候，他也不曾有过这方面的阅读。席勒熟悉荷马，特别是比格尔译本中的一些名段，而且《强盗》中的阿玛莉亚也曾吟唱了经过席勒加工的韵文版的“赫克托耳告别安德洛玛刻”。不过，荷马只不过是偶尔用来补充他从维吉尔和奥维德那里汲取的有关众神和众英雄的故事，于席勒的天才，并无任何实际作用可言，无论是戏剧还是诗歌都是如此，充斥在这些作品当中的，乃是已然朽落的文艺复兴神灵。与此同时，席勒致力于为自己的戏剧天才寻找自己的形式。《强盗》《费耶斯科》《阴谋与爱情》都是在这个方向上展开的实验，那是现代现实主义的恢宏伸张。《唐·卡洛斯》表征着席勒屈从于法国影响力，这部剧采取了诗性语言和观念论的处理办法，在这部剧中，席勒将自己的至深情感和自己至为珍视的政治观念宣泄而出，以真正的伏尔泰方式，对观念实施了戏剧化的呈现，然而，此后的多年间，希腊的创造力便走上了陨没的轨道。

---

[1] 此处英译本中的“higher-seer”造成的韵律上的瑕疵，准确地再现了席勒原文中“höher-Seher”造成的韵律上的瑕疵。

[2] 科赛特斯河（Cocytus），流经哈迪斯（Hades）地狱冥府的五条河流之一，意为“哀伤之河”。——译者注

[3] 萨吐恩（Saturnus），农神，在古罗马神话信仰中，象征繁衍、丰收、财富、谷物、纪元更替和自由。——译者注

希腊诸神

《唐·卡洛斯》乃是席勒文学生涯开启以来最富雄心的戏剧尝试，然而，这部剧最终从一部个体悲剧转变为一部政治戏剧，由此彻底毁灭了席勒的这场实验之旅。《唐·卡洛斯信笺集》（*Letters about Don Carlos* ）表明，席勒对这场毁灭并不是没有意识。多年的劳作、巨大的艰辛，席勒一直都希望自己能成功地写就一部古典风格的恢宏戏剧，并将人性和自由灌注其中。然而，《唐·卡洛斯》最终却是一场重大挫败（尽管席勒一直拒绝承认），这样一场挫败于席勒之自信心毫无疑问是一场打击。看来，席勒是没有可能从中恢复过来了。早期戏剧中，席勒以自己那本能的轻松心态去应对一种他并没有掌握的艺术形式，个中体验当然令他迷茫且痛苦。这样的体验毫无疑问是崭新的，而且也是非常恼人的，于席勒而言，更是无从承受的，原因很简单，歌德的《伊菲革涅亚》（比《唐·卡洛斯》早几个月问世，《唐·卡洛斯》是在1787年夏天面世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对此，席勒的感受只有一个：在自己失败的地方，那位伟大的同时代人却取得了成功。此前，歌德之于席勒，不过是《维特》和《葛兹》的令人仰慕的作者，虽然高高在上，令席勒无法比肩，但还不至于到了断绝嫉妒念头的地步。1783年6月9日，席勒从奥尔巴赫致信莱茵瓦尔德（Reinwald），后者当时正考虑造访魏玛：

> 你要离开了，你很快就会见到那么多优秀人物，很快就会忘掉这个奥尔巴赫的可怜老友。你会拿我跟维兰德、歌德等人比较，你会意识到我跟他们之间的巨大差距。你回来之时，将满怀他们的理想，那么多的天才之光会令你目眩神迷；我这点黯然的荧荧之光，恐怕你不会再关注了。

此时的席勒，和世人一样，也将歌德视为狂飙突进时期作家们尊崇的无所畏惧的现实主义天才。席勒不曾梦想过能同歌德比肩，然而，

《强盗》取得的成功可谓非同凡响，一下子将席勒提升到这些一等人杰的位置上。恰在此时，席勒发现自己的这位竞争对手竟然在风格和观念两方面都转向古典主义，而自己也一直都在不辞辛劳地希望吸纳古典风格和古典观念，歌德已经先于他几个月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还胜过自己，此情此景，对席勒构成了至深的困扰和挑战。此一心念就这么困扰着他，直到1796年，从《希腊诸神》到《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到处都能见到席勒的此一感怀。此一心念困扰催生的第一个结果便是席勒之造访魏玛，此次造访改变了席勒此后的全部生涯。他必须亲眼看一看魏玛，必须更多地了解歌德，此时，歌德并不在魏玛，不过，他至少要同那些认识歌德的人聊一聊。他听到太多关于歌德的东西，足够他用一辈子，他强烈反对这种盛行的崇拜。他也听了科罗娜·施罗特（*Corona Schröter*）吟诵《伊菲革涅亚》中的一些诗节，而且，科罗娜还向他高声吟诵过一些散文体的章节。这是1787年夏天和秋天的事情。歌德和希腊、希腊和悲剧，此时已然在席勒内心无可拆解地纠结在一起。还有谁比维兰德更适合给席勒提供希腊启蒙资源呢？风闻，同维兰德的几番交谈在席勒那善于接纳的胸中唤起了对一切希腊事物的热忱（此时的席勒已然借由《伊菲革涅亚》而改宗希腊），尽管席勒对希腊并无直接的了解和认知。席勒已然进入一种对理想的迷醉状态，正是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他于1788年3月在根本没有闲心予以检查的情况下匆匆投稿，将《希腊诸神》抛给了维兰德创办的《德意志信使》（*German Mercury*）。这是继1785年《欢乐颂》之后，席勒写就的第一份还算有些分量的诗篇，实际上也是席勒的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诗篇。

这世界上并不缺乏对希腊这个传奇之地的哀悼之词，《希腊诸神》却算是其中最富激情的一份篇章。这传奇之地居住着希腊诸神，比格尔和维兰德已经将这些神灵推广开来并予以通俗化阐释。莱辛的《拉奥孔》已经为这片土地贡献了那么一两个人物，他还写就了《古人如何呈现死亡》，这份小册子激发了一系列的华美诗行，这一系列的灵性诗句的背后，则是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照。对这个已然逝去的过去，世间

涌动着无尽的哀婉，自赫尔德《观念》（*Ideas*）之后，此等缅怀之情已然成为德意志文学当中无可化解的音符。维兰德的《美惠三女神》则更是荣耀了那段诸神临在凡间的岁月。因此，席勒的这份诗篇并没有任何新东西可言；而且也完全不难想见，这个主题本身就没有太大的前景可言。奥维德《变形记》中呈现的那个世界，那个居住着“如同提线木偶一般的神话人物”的世界，“无论是奥维德本人，还是别的人，都是不可能信从的”[1]。但是，这位拉丁诗人呈现的那些事件，诸如残害、谋杀、强奸、通奸、乱伦、残忍和欲望等，在这个时期又经历了一次变形；从拉丁诗人的虚幻世界幻化为德意志观念论，这场变形之剧烈，毫不逊色于菲洛梅拉幻化成夜莺或者达芙涅幻化为树木之时所经历的那种变形。奥维德的神话在席勒的早期诗篇当中只不过扮演了诗性工具的角色，歌德的《伊菲革涅亚》令这样的神话故事焕发出美的光华，而席勒的这份诗篇意在借助韵律的力量，令他心目中那个希腊世界获得永恒，那样的韵律乃是有着强劲的催眠效能的：

当你们还在统治美丽的世界，

还在领着那一代幸福的人，

使用那种欢乐的轻便的引带，

神话世界中的美丽的天神！

那时还受人崇拜，那样荣耀，

跟现在相比，却有多大的变化！

那时，还用花环给你祭庙，

啊，维纳斯·阿玛土西亚！

那里现代学者解释，太阳不过是

没有生命的火球，在那儿旋转，

那时却说是日神赫利俄斯，

驾着黄金的马车，沉静威严。

曾有个树精在那棵树上居住，

曾有些山精住满这些山头，

曾有可爱的水神，放倒水壶，

倾注银沫飞溅的泉流。

那棵桂树曾挣扎大呼救命，

尼俄柏默然化成这块石头，

绪任克斯曾借那芦苇哀鸣，

菲罗墨拉曾在这林中悲愁。

那条小河有得墨武耳的眼泪，

她为琅耳塞福涅哭得好惨，

这座小山曾听到爱神库武瑞

呼唤美貌的朋友，唤也徒然。[2]

《希腊诸神》蕴含着强劲且持久的魔力，至今，这样的魔力仍然不曾褪去，肯定不是这份诗篇运用的语言塑造了此等魔力。语词、句法以及掌故深染了诗性意味，其中不乏含混甚至并无丰沛意义的诗句。诗篇的创造者不曾亲眼见识过自己哀悼过的这片土地，这倒完全有可能遂了诗人的心意，毕竟，诗人致力于从自己内心的一系列意象当中重塑一个希腊世界，最终，这个世界颇为危险地展示出一派阿卡迪亚风光，田园和神话在此融合，希腊和罗马神灵在此混居，那绚烂的黎明、洒满露珠的草地和销魂的长笛熔铸出一种慵懒风雅之气，这是席勒的诗篇历来都缺乏的。正是此等乐感篇章令席勒魂牵梦绕，令席勒迷醉其中，此等场景恐怕是任何别的语言都无法重现的。那恢宏的反复曲式、那由子音和元音组成的或洪亮或低沉的旋律、那雷鸣般的比拟、那哀歌般的对仗、

那时而冲上云霄时而急坠谷底的情感激荡、那强烈的古今对照，还有那钟声般响亮的语词，改变了——改变了——绝迹了——空无了（anders-anders-ausgestorben-leer），令那段往昔岁月在大地回响，直击过去之坟墓。此等雄壮的大合奏，造就了令人无从抵御的孤寂和悲伤之感。

席勒真的为奥维德的“神话木偶”所熔铸的那么一个虚幻的黄金时代心碎吗？若非如此，何以解释那诗行当中喷薄而出的情感真理呢？至少我相信，真是歌德依托《伊菲革涅亚》而召唤出的那个希腊，令席勒奉献出这份无与伦比的挽歌，席勒乃借此种意象来表征自己童年时代就已经颇为熟悉的神话人物和神话故事，尽管他从未亲眼见证过那个希腊世界。《伊菲革涅亚》激发了席勒极大的热忱，同时也令席勒陷入莫可名状的沮丧，毕竟，这部剧乃出自一个德意志人之手，席勒自感无力与《伊菲革涅亚》的创造者相提并论。席勒嫉妒它，他在1788年给里德尔（Ridel）的信中承认了自己这份嫉妒，在1793年同胡温（Hoven）的谈话中也没有避讳。充溢着《希腊诸神》的那种强烈的悲伤情绪，不是没有可能植根于席勒的此种悲剧意识：席勒自己绝不可能成为歌德，而此种悲剧意识之于这份诗篇的效能，并不逊色于此一意识，即歌德的希腊已然是过去之事了。的确，人类心灵就是这般复杂且深沉，席勒一方面因为见证到这么一种完全出乎自己能力的美而心醉神迷，另一方面却也实施了潜意识当中的复仇行动，就如同赫尔德之前所做的那样，哀叹希腊之美已经永远消逝而去了。J.G.罗伯特逊（J.G.Robertson）教授于1924年在泰勒讲座中以“德意志诗学当中的希腊诸神”为题发表了自己的演讲，他认为席勒乃依托这份诗篇为希腊诸神打开了大门，令希腊诸神得以进驻德意志文学王国。席勒的确释放了希腊诸神，然而，他这么做，可能是要令这些神灵从此消散而去（谁又说得准呢？）。但不管怎么说，席勒出此诗篇之后，洛可可诸神便淡出德意志文学舞台，并就此消散而去。以荷尔德林诗篇为标志，希腊诸神借由席勒打开的这扇大门，蜂拥进驻德意志文学王国。

《希腊诸神》明确标示了席勒精神历程的一个新时期。这份诗篇所表达的乃是一种渴望和一种仰慕，这样的情感格局无论何等混杂，最终则是令席勒如同离弦之箭一般，急切地扑向希腊文学。1788年8月28日，席勒从鲁多尔施塔特致信科尔内（Körner），信中谈起，他的重点研读对象已然变成了荷马，并且他用的是德语译本。他还告诉科尔内，他决定用两年时间研读荷马，这期间不再碰触任何现代作家。他宣示说，现代作家莫不令人误入歧途，偏离自我。希腊人给了他真正的享受。希腊人将会纯洁他的品位，往日里他那不洁的品位令他远远地偏离了真正的朴素和单纯，令他变得繁复、造作。他说，他将依托好的译本去研读古代作家，据此同古代作家建立心灵感应，而后他再去阅读希腊语原著。这样的话，他不用花费太大工夫，就能够学会希腊语。正如席勒未来的弟妹卡洛琳·冯·沃尔措根（Caroline von Wolzogen）描述的那样，席勒在造访鲁多尔施塔特这段时间，整晚整晚地阅读沃斯的《奥德塞》译本，并念给她和她妹妹夏露蒂·冯·朗根菲尔德（Charlotte von Lengefeld）听。他们还从布鲁莫伊（Brumony）的《希腊剧场》（*Greek Theatre* ）中摘引诸多段落，将之译成德语；席勒还跟她们承诺说，他会把她们最喜爱的几部希腊戏剧翻译成德语。事实上，此时的席勒还计划着效仿布鲁莫伊写就一部德语的《希腊剧场》；在通信中，席勒也曾有两次表明心迹，急切地盼望着翻译《阿伽门农》，“因为这部剧乃是人类能够创造的最美戏剧之一”。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席勒的入手译作乃是欧里庇得斯的《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他以素体来翻译这部戏剧，合唱队的赞歌则以有节律的韵文予以呈现，并且以伊菲革涅亚毅然走上祭坛作为结束。席勒差不多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了《腓尼基妇女》三分之二的翻译工作。此外，他还就《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写下一些评注，还对歌德的《伊菲革涅亚》展开了“批评”工作，不过没有完工，这份批判以对欧里庇得斯的《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的长篇评述作为开篇，为此，席勒还将欧里庇得斯剧中的多个段落转译成散文体。

一直以来，人们都特别强调说，这种种的翻译和评述工作乃是席勒在完全不懂希腊语的情况下完成的，席勒本人对这一点更是有着特别的强调。当然，席勒在求学之时曾读过荷马诗篇的原文，不过，他已经完全忘掉了这门语言，为此，他谈到，他在阅读译本之时，“会猜测原文是怎样的，要不就干脆给自己创造一个希腊语版”。于此，布鲁莫伊的法语散文体译本、巴恩斯的拉丁文直译本以及斯泰因布吕赫尔（Steinbrüchel）的德语译本，必定是补充了席勒在这方面的匮乏，但是，这些译本尚且不足以映射出希腊语之美。然而，席勒之研读和翻译欧里庇得斯，乃秉持了完全功利的诉求，这一点席勒在给科尔内的信中并无避讳，科尔内则对席勒的这项工作并无好评，对结果也没有热情：

> 我希望用这种办法在规划和风格方面都能变得更为纯朴。而且，进一步熟悉希腊剧作，可以令我从中萃取真切的、美的和真正有效能的东西，借由这么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就能形成一种理想，此一理想可以令我目前的理想得到修正和完善。

席勒之于欧里庇得斯也并非全部都是仰慕，仰慕当中掺杂了相当的批评。他曾跟夏露蒂和卡洛琳谈起，欧里庇得斯的文辞很多时候都堪称无与伦比，不过，这样的文辞常常太过冗长繁复，有些片断翻译起来实在是麻烦。他的《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评注显然表明，这个理想主义者已经拿起批判武器了。欧里庇得斯的阿伽门农，时而是残忍怪物，时而又是一个荣耀之人，这样一个人物如何让世人去仰慕或者理解呢？阿喀琉斯的行为也远非完美，而且跟阿伽门农一样，阿喀琉斯的性格当中也充斥着矛盾。欧里庇得斯笔下的阿喀琉斯有可能信从神谕，也有可能悖逆神谕。如果他信从神谕，那么他提议拯救伊菲革涅亚，就是极端的不虔敬之举，如果他不信从神谕，那么他当然就应当不惜一切地拯救伊菲革涅亚，但他最后竟然选择了让伊菲革涅亚顺应自己的命运。不过，席勒认为，欧里庇得斯对伊菲革涅亚的刻画是非常令人佩服的。那样的伊菲革涅亚混合了软弱和力量、怯懦和英雄主义，此外还有少女的端庄、内敛和尊严，这一切都形成了真切的、自然的、相当有魅力的画

面。有关克吕特墨涅斯特拉的描摹也是如此，那是真正母性温婉的典范，欧里庇得斯的刻画是卓越的，唯有一处诗行例外，此一诗行暗示了这位母亲日后会对阿伽门农采取复仇行动。这显然是在预示一个未来的杀人者和通奸者，这样的情节在这部剧中完全放错了地方，扭曲了这忠诚的母亲的形象。所有这些评点已然揭示出，此时的席勒乃是一个毫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过分信守逻辑的思考者，他准备好了将人物及其行动当中的一切矛盾和歧异祛除，尽管矛盾和歧异在真实生活中拥有极其重大的分量。席勒继而径直对欧里庇得斯这部剧中最令人困惑的部分展开评说，这个部分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整部剧作的一项特质，即传说当中有关这场阴谋的传统说法以及剧中人物的相关言辞和看法之间的歧异和矛盾。席勒对此间的歧异和矛盾甚至不屑。维拉尔后来表明，这样的歧异和矛盾构成了潜在的反讽，而且这样的反讽是有着特殊魅力的。不过席勒那敏锐的感受力却也证明了他拥有敏锐的批评能力。跟歌德不一样，希腊人还不至于令席勒陷入完全的迷醉当中。他批评剧中的合唱队纯属多余。他说，《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的文本已经残缺，结局更是可疑，因此，这部剧全然是令人困惑的，可以说，席勒的此番批评总体上是相当合理的，特别要考虑到当时的《伊菲革涅亚》热潮。

不过，他对《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的批评则揭示出他内心的一项明确意愿，他要宣示现代人之于希腊人的优越性，为此，他将歌德的《伊菲革涅亚》置于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之上，而且还刻意对欧里庇得斯的提起批评。他几乎是毫无理据地批评说，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皮拉德斯不够理想主义。皮拉德斯希望跟俄瑞斯忒斯一同赴死，但是他提出的理由在席勒看来是根本拿不到台面上来的；而且，皮拉德斯最终同意为了朋友而活下去，此等说辞在席勒看来实在是太不堪了。席勒还认为，那个亲眼见证过俄瑞斯忒斯发怒的牧羊人，竟然只听说过皮拉德斯的名字，这样的情节并不合理。席勒认为这是非常笨拙的情节设置，对此，席勒给出评点说：

> 这样的情节设置是很糟糕的，因为这就等于将偶然元素引入剧情当中，悲剧家们务必要避免这一点。比如说，倘若牧羊人听到俄瑞斯忒斯这个名字，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当然就不存在了。无论是读者还是听众，对此都是有所感受、有所预期的，倘若剧情的发展究竟采取何种路线完全是一桩偶然之事，这无疑会令读者和听众非常不悦。

毫无疑问，若偶然元素介入剧情且发挥此等效能，那么兄妹相认的神奇一幕就“彻底完蛋”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欧里庇得斯以完全合乎情理的方式引入了皮拉德斯这个名字，由此令听众（当然不会是伊菲革涅亚）对俄瑞斯忒斯的出现有所准备和预期，俄瑞斯忒斯暂时隐姓埋名，这肯定不会改变整个剧情的推演路线，但是席勒对欧里庇得斯的此种做法仍然挑三拣四，此举实际上表明席勒是在刻意刁难欧里庇得斯。帕拉斯·雅典娜也在剧中现身，席勒对此也提起批评，他将剧中的雅典娜称为密涅瓦，席勒的批评则集中于雅典娜同俄瑞斯忒斯的一番交谈，观众显然听不到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席勒认为这是很荒谬的事情。席勒似乎相信，此处引入“解围之神”是为了保持地点的一致性。诸神是非常有用的，席勒颇为嘲讽地总结说，在这方面，希腊悲剧家们是有优势的，现代作家则没有。因此，现代作家们最好是放弃时间和地点上的一致性诉求，因为现代作家并没有此等规避“技巧”。这就是席勒就这部典型的希腊悲剧做出的评点。

席勒就希腊诗歌给出的一般性评点，很可能也是温克尔曼观念的回响，而且同样是以莱辛为中转的。席勒在歌德的《伊菲革涅亚》中见证了古代艺术的静穆和伟大；即便是在激情极度爆发之时，也掩盖不了此等静穆之美。这一切令歌德的《伊菲革涅亚》超脱了当前时代。不过，倘若说歌德的《伊菲革涅亚》乃是希腊意义上的上乘之作，那也就可以说，歌德的这部剧胜过了最伟大的希腊悲剧，因为歌德的《伊菲革涅亚》赋有现代文明养育的人性之美。也许现代戏剧无法呈现俄瑞斯忒斯的魂灵降临冥界这样的场景，但现代依然可以胜过古代。歌德不仅刻画了真正高贵的希腊人，更展现出更为优越的人性范例。席勒，歌德的这

个对头，就是如此慷慨地评述了歌德的这部剧作，由此尽显自己的宽宏，并为自己赢得极大赞誉。然而，《伊菲革涅亚》的这位创造者也未能逃脱指摘。席勒当然要提起一系列的批评，他说，歌德的一些诗句“单调枯燥，无法忍受”，拙劣效仿他人转接的希腊句法，还有就是伊菲革涅亚在认出哥哥之后，竟然给出了一番冷静的哲学言辞，这一切都是应当予以指摘的，这样的指摘在《埃格蒙特》评论中更是肆意挥洒。席勒予以指摘的事实当然是存在的，不过，倘若席勒并非刻意刁难，他本应表现得更为宽和一些。相形之下，他对欧里庇得斯的态度则要尖刻得多，而且也更为自信。

1787年这一年是席勒生命中一个极为扰动的关口。这一年见证了席勒那份他自己一直认定是杰作的诗篇的诞生。这一年，席勒也见证了自己的杰作完败于歌德的《伊菲革涅亚》。这还不算完，歌德正是在《伊菲革涅亚》当中，向席勒揭示了希腊之美，此前，这希腊之美不曾冲击过席勒的思虑，如今，却给席勒带来了强劲的挑战。席勒在1787年到1789年给科尔内的信笺表明，他意识到自己不如歌德，这意识毫无疑问是强烈且痛苦的，此一意识正是《伊菲革涅亚》最先触发的。1789年3月9日，席勒致信科尔内：

> 这个叫歌德的人挡了我的路；他让我经常意识到命运对我是如此残忍。他的天才同他的命运总是那么若合符节，一切都那么轻松自然；而我总是在艰难中挣扎、拼杀，至今都是这样。

席勒的挣扎、拼杀，是为着向歌德看齐，也向希腊人看齐。为此，席勒先是抒发了强烈的哀婉之情，追怀希腊之美在人间四处游走的那段美妙日子，而后便纵身一跃，投入那段往昔岁月的汪洋当中。希腊悲剧作家那肃穆的伟大以及环绕他们四围的炫目光华，强化了席勒的自卑感。席勒虽然将他们视为同歌德一样无与伦比、值得人仰慕的人物，但对他们秉持着明确的抵制态度，他们毕竟是悖逆了自己的才具的。他需要跟他们搏斗，并将之击败。倘若像歌德那样或者比歌德更甚地效仿他

们，并超越他们，以此彰显自己的伟大，这岂不是被他们击败了吗？当席勒酝酿着创作《马耳他骑士》（*The Knights of Malta* ）之时，心里是否念及于此呢？这部剧毕竟是依希腊风格写就的，而且还配备了合唱队。不过，《马耳他骑士》并没有走得太远，令他遭受挫败的是希腊语，尽管他一度以为掌握这门语言并非难事。这个时期，席勒尚有历史作品、哲学欲念、期刊事业需要应付，1789年5月，他还得到了耶拿大学历史教师的任命，而且同夏露蒂·冯·朗根菲尔德定于1790年的婚期也在逼近，他哪里抽得出时间放在希腊语上面呢？他根本没有时间。不过，他也郑重地告诫自己，一旦有了时间，就一定要赶上歌德，赶上希腊人。1789年，席勒发表了颂诗《艺术家们》，这份诗篇令人窒息，意象极尽朦胧之能，崇高得令人迷醉，不过，其中给予希腊文学和艺术之黄金时代的分量也是恰当的；席勒并非那种低估对手的人，他当然不至于否认希腊之美。然而，这份颂诗更为狂热地高扬作为征服者屹立在19世纪门槛之上的现代人的荣耀：

何其伟大，人噢，你站立，称颂甜美的和平，

至于这个世纪的末尾，正值衰败，

于人性的崇尚和高贵。

拥有心灵的警示和难以言尽的精神财富，

渴求但友善，遇事冷静仍无畏，

时代最健全之子。

通过自由地追问，借助授权的法律，

于你的彬彬有礼处见伟大，彩礼富足

许多韶华在你胸膛隐匿。

自然的主人爱慕你的枷锁，

无数斗争中，你的力量饱经磨砺，

并从你训谕的野性，绽放出玫瑰芳烃。

以上就是席勒毕生最后一份诗篇的开篇，这份诗篇席勒写了七年，是就《希腊诸神》当中包含的尖刻的现代批判做出的回应。这回应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然而，较之《希腊诸神》的哀婉情愫，《艺术家们》却远远不是那么走心。

---

[1] R.W.Livingstone，*The Greek Genius and its Meaning to Us*，O.U.P.3rd ed.1924，p.101.

[2] 此处参考了钱春绮译文，略有改动。参见《席勒诗选》，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译者注

滚蛋吧！

席勒结婚了，并且在耶拿赢得了稳定的职业。然而，未待幸福生活的激情风暴褪去，未等困窘境遇真正结束，一场重病袭来，差点儿要了他的命。那是1790年和1791年之间那个冬天的事情，当时他染上了严重的肺炎，并发症令他痛苦难当，不得安宁，1791年夏天，这病症还复发了。不过，祸中有福，席勒因此得到了丹麦宫廷的一份资助，为期三年。从此以后，席勒再也不会被生存问题困扰了。不过，一直以来都岌岌可危的身体，此时算是彻底完蛋了。席勒再也没有真正从病痛中恢复过来，还好这病人是席勒，若是换作他人，恐怕一击之下，就彻底崩溃了。极少有人能像席勒这样，令肉体完全服从于精神，这一点从他生命最后岁月的文学产量和质量当中就可见一斑。这个时期，席勒部分地靠着药物和治疗来抵御周期性的强烈病痛，不过，他主要还是靠着理智手段展开抵抗，他在这个时期采取的生活方式会杀死大多数人，但他是靠着这种生活方式存活下来的。这个时期的席勒将白天和夜晚颠倒过来使用，这是完全反生理的生活方式；而且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极其不健康的，因为他几乎就没有到户外走走。从医学角度讲，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此时的席勒借由高度地集中精神来克制身体的不适，为此，他纵情释放那些创造性观念，而后便不得不诉求种种有害的刺激物，其中，咖啡只能算是最普通的刺激手段，席勒就是借由这样的手段同一轮又一轮的精神疲惫展开搏斗的。席勒很可能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毕竟，他能够从诊疗当中看出自己的病已经相当严重了。然而，他非但没有屈从那种毫无创造性可言的病体生活，而且还在同时间展开的这场激烈竞赛中，对最基本的诊疗措施不管不顾。对此，他和科尔内的一个共同友人在1796年1月17日的文字中有如下描述：

> 席勒的生活很是怪异。不过，很显然，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他才有可能达成过去三年间那些成就；我担心这会毁掉他。他生

>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跟任何人来往。他基本上就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待就是数月之久；一旦他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出户外，单是新鲜空气就会对他造成不良影响。好在他并不愿意回归自然，回归社会，因为唯有退居生活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自然也好，社交生活也好，只能损害这幸福，不会提供任何补偿……歌德是唯一一个常来耶拿看望席勒的人，他每天下午四点前来，一直待到晚饭之后才离开……两人一般都会展开一场兴致盎然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很晚……席勒会在房间里四处走动，躁动不安，因为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安坐下来的。他的身体正在遭受痛楚，这一点很容易看出来，特别是当窒息症状来袭的时候。讨论若是变得极为激烈，席勒会走出房间，用一些镇静剂。倘若在这样的时刻，他能置身一场有意思的讨论，身体上的痛楚会暂时离开他，特别是当某种说法能够令他凝神关注，予以拆解和拼装的时候；一旦这个说法探讨得差不多了，那痛楚就会即刻回归。要暂时性地抑制他的痛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辛苦劳作。由此便不难见出，席勒长时间地生活于一种何等紧张的状态，他的精神对他的身体实施着何等的暴政；一旦精神萎靡，身体上的痛楚便随之而起。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病竟然会如此难以治疗；他的心灵已然习惯了永不止息的活动，身体的痛楚只能激发出更为强劲的精神活动。

这世间以英雄姿态承受身体痛楚的人不在少数，而且这些人也都能够在同死亡的搏杀中有所成就；但席勒肯定是唯一一个能令精神完全不受身体痛楚影响，而且还以暴政姿态驱赶身体的人。这样的暴政和奴役已然到了极致，令他1791年之后的哲学作品、诗歌以及戏剧都展示出强烈的阳刚之气和力量，人们从中看到的是强健的身体而非致命的疾病。从这些作品中，看不出一丝一毫来自病房的呼吸；作品中也没有任何病症、病理的迹象，里面根本不曾提及生命的黑暗以及有关死亡的身体论说，特别是要考虑到，席勒是学过医的，而且也行过医。他完全活在心灵当中；1791年之后，他基本上就不曾提起他的生活状况。1793年，他回了趟家，当了父亲，先是在耶拿住了一段时间，而后又在魏玛住了一段时间，死前一年去了趟柏林，还有就是得到了一些荣誉，这些就是有关他这个时期的生活状况的仅有交代了。他不曾去过意大利或者罗马，威廉·冯·洪堡对此倍感遗憾，他从未见过大海和中国，尽管他对此一直都极为渴望。然而，就是在此等困顿之下，他依然能够演奏出《欲望》（*Desire* ）的和谐之音，在这份诗篇中，现实依然能够幻化为理想：

奇迹能领着你

抵达那美妙仙境。

席勒写就了《威廉·退尔》（*William Tell* ），但从未去过瑞士；他写就了《潜水者》（*The Diver* ），但不曾见识过比小溪更为博大的水流；他描写过大量的战争场景，但不曾见识过哪怕一场战事。这正是席勒的一个习惯。三十年战争时期一场战役的“真实画面”令他惊惧不已，那还是路易斯·冯·沃尔措根（Louis von Wolzogen）费尽周折，向《华伦斯坦》（*Wallenstein* ）的创作者描述出来的，当时的席勒正需要为马克斯·皮科洛米尼之死铺就一个合适的背景。瑞士和英格兰、俄国和法国、战役和群山、河流和湖泊之所以能够借由他那令人窒息的病房展现出来，全然是借助编年册和地图之类的渠道；高洁的精神体验就是他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同那更近乎人情的情感不是一回事。在1791年病倒之前，席勒曾经历过丰富且多变的情感生活，其中，友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一直维持至他辞世。女人对他同样有着重大影响。弗劳·薇斯雪（Margarete Schwan）、玛格丽特·施万（Frau Vischer）、夏露蒂·冯·卡尔伯（Charlotte von Kalb）、卡洛琳·冯·波尔维茨（Caroline von Beulwitz）（娘家姓朗根菲尔德）及其姐姐夏露蒂，这还只是对他影响特别大的几位，这一系列的女人在他内心唤起的感觉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强烈的色欲和高洁的精神诉求、风花雪月、受挫的激情、情感和精神上的结合，最后则是爱情逐渐淡化为亲情；这一切席勒都算是经历过了。不过在1791年身染重病之后，女人在他的情感世界里便消失了，尽管他对妻子的忠诚并未改变。这些女人一度对席勒狂热痴迷，特别是夏露蒂·冯·卡尔伯和他妻子的妹妹，如今，这样的痴迷也消散而去，不见踪迹。席勒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席勒了。1791年2月10日，卡洛琳·冯·达赫罗登（Caroline von Dacheröden）致信前途无量的丈夫威廉·冯·洪堡：

难以想象，他变了那么多。我感觉他已经对强烈而执着的爱情没有感觉了。他的整个灵魂都生活在另一个想象世界，对这个世界，他

似乎成了陌生人……从他的举止言谈和音容笑貌当中，我不难感觉出，他心之所向乃是那些甜美的幻梦。他曾跟我谈起夏露蒂，也谈到了他和夏露蒂的生活；那样的语气实在是平静，问题显然不只是顺应生活那么简单。他甚至谈到，他已然相信夏露蒂给他的幸福是卡洛琳给不了的，他们或许给彼此制造了太多依赖。

这封信是在描述一个已经超越了激情的人；夏露蒂·冯·朗根菲尔德，温和且充满感情，是忠诚的妻子，没什么才气，但脾气或者脾性上也挑不出什么缺点，这样一个女人，显然正是现在的席勒所需要的。于是，她便成为席勒的理想女人。在创造出理想中的“美丽灵魂”之前，席勒已经在实际生活中训练出了一个富于女人味的女人，并且他对夏露蒂也是倾心相待。坊间流传说，人们在解剖尸体之时，发现有已经硬化的器官，肺部只剩下一些细屑，心脏所在的位置只剩下干瘪的外皮碎片。倘若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也可以说，席勒的心真的不剩什么了。倘若这世间真的有人可以用理想来取代现实，那这个人就是费里德里希·席勒。

一直以来令席勒迷醉不已的观念王国，在1791年将他紧密包裹起来，当时，他正在研读康德，为此，他自愿当了多年的囚徒。1791～1796年，席勒写了一系列带有哲学韵味的论章，不过，总体而言，这些论章都是美学方面的。尽管这些论章都是从康德观念中汲取的灵感并且致力于补充或者调整康德观念，但人们却也不难从中见出席勒同希腊人之间的争斗。在最初有关悲剧之性质的论章中，席勒基本上没有提及希腊悲剧，既无这方面的信息，也无这方面的热情，就仿佛席勒那规划中的希腊戏剧研究工作并没有取得太多进展，仍然仅限于1788年到1789年研读的欧里庇得斯的三部悲剧以及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后面这部悲剧是席勒在信笺中明确提及的。这个时期的第一份论章发表于1792年，题为《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The Reason for our Pleasure in tragic Subjects* ），论章当中提及了于翁（Huon）和阿曼达（Amanda），也谈到了克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理查三世

（Richard Ⅲ）、埃古（Iago）和洛夫莱斯（Lovelace），希腊人的名字完全没有出现。此一时期的第二份论章题为《论悲剧艺术》（*On the Art of Tragedy*），于1792年问世，这份论章完全是受了莱辛《汉堡剧评》（*Hamburg Dramaturgy*）的影响，只有一处重要细节是例外。在这份论章中，席勒运用了莱辛的相关阐释，并且也追随了莱辛就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所做的解说，当然，在这份论章中，席勒将“净化”完全排除于悲剧情感领域，只留下怜悯。然而，在希腊问题上，席勒则不免要向莱辛发难。《汉堡剧评》将希腊人视为悲剧艺术的最高阐释者，唯有莎士比亚可以在这方面同希腊人比肩，不过，即便是莎士比亚也不足以胜过希腊人。席勒的看法则恰恰相反，为此，席勒还颇有技巧地对他心目中希腊人最为欠缺的环节发起攻击，莱辛似乎也认为那是希腊人的一个弱点。《汉堡剧评》第七十四篇谈到希腊人憎恶将罪人呈现在舞台之上，对此，莱辛评点说：

> 希腊人往往会责怪命运，令人类的罪行成为神的复仇行动，而且还是预定了的，由此，他们将人转变为机器和工具，他们并没有将如下可怕观念呈现给世人：人性当中潜藏着堕落的深渊。

席勒抓住了莱辛的这段评说，特别是抓住了“机器”一词蕴含的批判之意，据此对希腊悲剧展开全盘批判，仿佛盲目的命运主宰了一切希腊戏剧，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席勒依旧争辩说，屈从命运的盲目力量，无论如何都是对人的羞辱，而且席勒指出，这也就是为什么最优秀的希腊戏剧总是要留下一些值得欲求的东西。伟大的戏剧总是要呈现一种目的论的意涵、一种崇高的秩序以及一种仁慈的意志。至于希腊人，则从未上升到悲剧情感的纯粹高度，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哲学都不曾为他们引路。这是现代艺术的使职，因为现代艺术拥有更具观念论特质的哲学：

> 现代的哲学取向以及现代艺术都不利于诗歌，如果说我们现代人必须因此放弃重建希腊艺术的努力，那也可以说，现代哲学和现代艺术之于悲剧艺术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毕竟，悲剧艺术更依赖于道

德。唯有在悲剧艺术领域，现代文明才能够弥补自己对整个艺术王国造成的损害。

至此，席勒的看法再清楚不过了。即便希腊人能够主宰其他一切艺术领域，悲剧艺术是不会轻易在希腊人面前缴械的；就是这样，席勒依托“更为纯净”的生活哲学以及更为高贵的题材，同古人在悲剧领域展开厮杀。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个特殊的艺术领域为至高地位而战。这也是《论悲剧艺术》和《汉堡剧评》之间唯一有实质意义的差异，不过，此一差异有着极大分量。

1793年，席勒发表了《论感伤》，开篇几页差不多就是莱辛《拉奥孔》第一章内容的复制，其中引述了温克尔曼有关拉奥孔群雕的一段论说，引文出自温克尔曼的大作《艺术史》而非他早期那份小册子。席勒也就拉奥孔群雕和维吉尔的诗篇展开了同样的比较，给出了跟莱辛一样的例证，据此来证明希腊诗歌和悲剧对悲伤有着很自然的表达：诸如荷马的英雄和神灵、玛尔斯和维纳斯，还有就是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忒忒斯和赫拉克勒斯。席勒增补了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他希望借此令学生们更认同自己的权威。不过，也正如同《论悲剧艺术》论章，表面上看起来，席勒是在忠实效仿莱辛，实际上，这背后存在一个根本差异。席勒着重将痛苦场景中的约束法则拓展到悲剧领域，而莱辛则着重将约束法则限制在造型艺术领域。据此，席勒认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诗人，都不应当呈现任何臻于顶峰的剧烈情感，因为只要理性没有彻底失去效能，人类情感就不可能臻于极端。这正是莱辛所理解的美的法则，此一法则令莱辛将一切极端的情感表达逐出造型艺术王国。席勒则依托伦理观念中的人，将莱辛的驱逐令扩展开来，并据此竭力提起申述说，拉奥孔就是这方面的例子，那里表达的乃是痛苦中的崇高，是极致的感伤，对悲剧来说是如此，对艺术来说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席勒忠实地重述了莱辛提起的那些希腊英雄，只不过，莱辛据此伸张的乃是跟席勒相反的观点，由此，席勒的此番论述也就成了对希腊悲剧的一项隐含批评。

1793年，席勒发表了《尊严与优雅》（*Dignity and Grace* ），这份论章征引了温克尔曼《艺术史》中的另一段论述，席勒此时正在研读温克尔曼的这部作品。引文的主题是“优雅”，席勒同样提到了温克尔曼对“尼俄柏”“望楼上的阿波罗”“博尔盖塞的角斗士”等雕塑的评说，当然也有一段对拉奥孔群雕的评说，尽管温克尔曼并没有指名道姓。席勒这份论章以有关维纳斯束腰带的神话传说为开篇，席勒认为那是优雅的象征。不过，《尊严与优雅》的真正关切并非希腊人，这次，他的缠斗对象是康德，而非古人，他要同康德那过于僵硬的义务观念展开搏斗，为此，席勒创造了“美丽灵魂”这一观念，来对抗康德的绝对律令。然而，歌德式天才的阴影仍然穿插在这份小册子当中。其中更有一个脚注，对天才之本性展开了颇为尖刻的描述，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针对比格尔的，1791年，席勒就已经对比格尔的诗篇进行过批判，他认为比格尔的诗篇根本就不值得一读，而且还贬抑了比格尔那无可置疑的才具。这份脚注以“天才之堕落”为主题，这很可能是受了比格尔诗篇的激发。不过，我却不由自主地觉得（歌德显然也是这么看的），此时的席勒内心里真正惦记的是歌德，而且，在这份脚注中，席勒甚至告诫歌德不要步比格尔的后尘。席勒在脚注中指出，所谓天才，纯然是自然的产物；天才之人在世人眼中仿佛归属更高的种族，仿佛生来就是贵族。然而，所谓的天才乃全赖自然。据此，席勒认为，人之自然元素和精神元素之间的完满和谐，乃是希腊人的伟大成就。作为一个族群，希腊人表征着内在的优雅。不过，跟天才一样，内在的优雅仅凭自身是不够的。要达成真正的完善，就必须将优雅同尊严结合起来，并由此进展到崇高境界。

归之于希腊人的这种内在的优雅，甚至还在1793～1795年的《美育书简》中得到了更为慷慨的重述。席勒在这份书简中申述说，希腊人已然在单纯、艺术以及辉煌的人性等方面臻于极致。然而，随着教育和知识的进展，希腊人逐渐丧失了一度作为他们的标志的统一与和谐。而现代的特征则在于分工和离散。就在艺术和诗歌在雅典兴盛之际，政治自由和民族自由以及政治力量和民族力量，也在归于殒殁。不仅是雅典，

也不仅是罗马，事实上，遍观历史，到处都能看到，美是在英雄德性的废墟之上建立自己的帝国的。现代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运用美，必须让美激发人类，而非消靡人类。不过，希腊人仍然是现代人的老师，因为希腊人知道艺术乃是一场崇高且纯粹的游戏。然而，希腊人却将本应当在尘世之中施行的东西，迁移到奥林匹斯山。在那里，受到赐福的众神依然摆脱了目的、责任以及生活事务的束缚；他们自由且崇高，就如同“朱诺女神像”呈现的那样，融合尊严和优雅于一身，他们赋予我们一种情感，这种情感非理性所能构想，也非言辞能够表达。实际上，无须参照“朱诺女神像”也能意识到，希腊诸神同奥维德的神灵已然没有任何共通之处。希腊众神都是温克尔曼式的大理石神灵，仪态当中尽显“高贵的单纯和伟大的静穆”，远离一切的冲突、哀伤和悲剧。此种理想化的希腊之美，席勒当然可以予以由衷赞赏。这样的希腊之美并没有侵夺席勒的领地；而且仔细观察一番便也不难发现，席勒之所以如此决绝地仰慕歌德的《伊菲革涅亚》，是因为其中的这样的希腊之美。

1787年之后，席勒将歌德视为令自己相形见绌的巨人之后，他就将歌德同歌德所表征的希腊事物联结起来，并对二者皆予以抵抗，即便他对二者都不乏仰慕之心。然而，席勒的慷慨之气以及富于思虑的内心，是不可能将此种消极态度维系太久的。1794年，席勒自信已经掌握了解析歌德天才的钥匙，便带着这样的发现接近歌德。当歌德分批赠送他《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光》以示回应的时候，席勒被这本书开篇几章的客观现实主义完全征服了。一切的嫉妒、恶意和尖刻顷刻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由衷的欣赏和慷慨的同伴关系。有诸多因素造就了先前的敌意，不过，其中的一项情由反倒促成了席勒心境的此一转变，那就是两人的心灵从本质上讲并无相似之处。因此，两人也就不存在竞争问题。现在，席勒可以平和地看待歌德要比自己伟大得多这一事实了。而且他也看明白了，诗歌是可以容纳他和歌德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模式的；他也相信自己潜在地要比歌德更伟大。对于席勒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就足以恢复他的自信并令他的创造冲动再次活跃起来。就让歌

德如同巨人一样在自己面前高高耸立吧，就让歌德远远地胜过自己吧，现在，席勒已经能够毫无痛楚地崇拜歌德了。在德意志的帕纳索斯山上，不仅有足够的地方供他和歌德一起容身，而且，他所担当的使命乃是无可限定的，歌德担当的则是有限定的。席勒总算为自己那痛苦的自卑情结找到了化解之道，这个解决办法看起来是如此合情合理，以至于席勒未能看清楚1790年的《浮士德片断》本应当令他看得明明白白的东西：歌德实际上跟他一样，天生就是要向那难以限定，甚至根本就无法抵达的巅峰迈进的，而且，歌德的本性也和他一样，绝对不能用“天真”来形容。鉴于“天真”一词如今特别地用来描摹歌德以及希腊人，此时的席勒便需要为自己找寻一个同样特别的语词，一个同时还能够表征他那更具现代气息的雄心的语词。人们当然可以再三地表示遗憾，席勒竟然找到了两个如此粗陋的语词，不过，发表于1795～1796年的《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仍然可以说是席勒笔下最引人入胜、最具启发性、最富有灵感的美学论章。这份论章也是德意志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建设性的批评作品之一。在这份论章中，席勒将希腊人视为天真诗人，如果说此种观念在当时颇为盛行的话，那也可以说，是席勒凭借这份论章将这种观念凝结起来，同现代诗歌展开颇为透彻的比较，由此揭示出荷马诗歌模式的根本特质。在现代诗歌问题上，席勒界定了一种“感伤的”生活态度，由此便也有理由认为，他预言了德意志浪漫派的诞生，而且很可能此一举动本身，就是在创造德意志浪漫派。就希腊诗歌而言，席勒给出的界定特征，恰恰也正是利文斯通[1]界定希腊诗歌那些本质特征，诸如信守自然、单纯、直接等；两人也都曾提起希腊诗歌在语气上取冷淡、坚硬一途，批评家们不难从中看出，这样的语气同情感和感伤是对立的。利文斯通的作品很显然是基于席勒并不具备的知识，不过，利文斯通的论说，于席勒就希腊诗歌之本质而做的那些申述，并没有增添什么根本性的东西。对席勒来说，荷马乃是刻画单纯的宗师，就如同对莱辛而言，荷马是呈现运动的宗师，而且席勒对荷马的崇敬乃是彻底且平静的，就如同他那来之不易的对歌德的热忱。然而，希腊悲剧再次沦落

二流角色。席勒开列的天才人物名单上，希腊悲剧作家仅有索福克勒斯，这份名单上还有阿基米德、希波克拉底、阿里奥斯托、但丁、塔索、拉斐尔、丢勒、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菲尔丁以及斯特恩。此外，席勒只是附带地提及欧里庇得斯，认为欧里庇得斯不及埃斯库罗斯那般天真，除了这些，这份论章便再也没有提及希腊悲剧作家。席勒的此一区分，就其整体取向而言，乃清楚表明，在他看来悲剧在本质上归属感伤诗歌范畴。这并不是说他完全否认天真类型的悲剧之存在可能性。他的确将莎士比亚归类为天真派诗人，而且他还指出，这种类型的作品可以是史诗，可以是戏剧，也可以是纯粹叙事性的东西；但有一点是很显然的，悲剧的生活态度较之天真更具感伤特质，因为此种生活态度蕴含了对现实世界的伤感或者轻蔑的批判。这等于隐含地拒绝了将希腊悲剧视为最高的艺术类型，《论悲剧艺术》已经明确了这一点，这足以表明，席勒仍然对希腊悲剧缺乏理解，实际上，希腊悲剧是不能归类到天真范畴的；任何悲剧都不能有此归类。很显然，席勒所做的解析暗含了一项前提，即希腊悲剧作家归属天真类型，此一前提乃是一个重大且根本的错误。此一根本错误溯源于温克尔曼提起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歌德接纳了温克尔曼的此一申述，而今，席勒则将之视为弱点而非强项。席勒触发了这个问题，却又根本不曾直面现代悲剧，由此便不难看出，席勒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太大自信。

席勒对荷马的崇敬乃是由衷的，并无虚假成分，而且，他肯定也在总体上感受到了希腊诗歌之美。他还以令人仰慕的公正评说了两种诗歌类型各自的强项和弱点。尽管如此，他还是相当明确地站在感伤诗歌这边。席勒认定，感伤诗歌即便实际上不比天真诗歌伟大，但潜在地要比天真诗歌伟大。借由呈现观念而非描摹现实来感化人类心灵，这显然是更为高贵的使命。“后者的价值乃是借由绝对地达成有限之事而获取的，前者的价值则是在向着无限的伟大不断切近的过程中达成的。”此时的席勒也明确感受到，对自然的强烈渴慕和无尽追寻，较之同自然达成一致并忠实地再现自然更富于诗性。他在一则脚注中进一步指出，希

腊诗人对于女人以及男女关系的呈现方式，在现代读者内心往往是要唤起憎恶之感的。1795年10月和12月，席勒在给威廉·冯·洪堡的两封信笺中，更为开诚布公地提起了这些批评，并据此将桂冠给了现代精神，席勒宣称，现代精神当中的一些积极品性是希腊人缺乏的。席勒还对现代人效仿希腊人的举动颇为不屑。像歌德这样的人，内心也许蕴含了古代的一些精神元素，但是，在希腊人的领域，歌德是绝无可能赶上希腊人的，若强行为之，则必定是所失超过所得。1794年之后，席勒对歌德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相信，观念而非现实才应当是现代诗人的王国。在给洪堡的第二封信中，席勒就希腊人呈现的女人和情爱场景提起了强烈批评，信的结尾更是给出了令人吃惊的评说：歌德《葛兹》中的伊丽莎白以及歌德的伊菲革涅亚非常切近希腊女性的形象，不过，歌德作品中其他的高贵女性则并非如此。至于席勒自己，则更钟情于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创造的“美丽灵魂”，而非伊丽莎白，也非伊菲革涅亚。很显然，对抗歌德和希腊人，仍然是席勒心之所系。但此时的席勒已经开始分析歌德和希腊人跟自己的不同了，并且也已经开始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展开阐释了，也正是此一意识，令席勒从哲学王国回归诗歌王国，而且此时，他的心灵已经没有了疑虑和嫉妒，激发他的乃是同那个一度压制着他的人的友谊。1795年，席勒写就了三份伟大诗篇——《理想与生活》《理想》《旅行》，它们足以表明，席勒作为一个反省诗人，其力量已经臻于顶峰。《理想与生活》颂扬了在理想层面上展开的生活，文学史上恐怕没有比这更崇高的描摹了。希腊诸神，于荷马而言，是有限的现实，于温克尔曼、赫尔德和歌德而言，乃表征了人性的顶峰，如今，在席勒这里，则幻化为无限且无可切近的理想（此一理想就是感官与灵魂之间的绝对和谐），是感伤诗人和人性作为一个整体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这就是席勒对希腊人呈现的那种天真现实所采取的高贵复仇行动，这样的天真现实既令他愉悦，也令他绝望：

永远纯粹且水晶般清澈柔滑的

西风之光，完全真切地流经生命

在奥林匹斯，因着灵魂高蹈的福报。

月晴月圆，世代消逝；

诸神确珍爱年轻不凋的玫瑰

在无休的混乱中，未曾改变。

在灵魂高扬的平和与理智的愉悦间

人们必须选择，——这方式多么艰难；

凌越了所有的悲伤，诸神的眉宇上

联袂闪耀，以一种华贵之光。

至于希腊，自此之后于席勒而言，仍然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黄金时代，他会时不时地予以回望，满怀渴慕，尽管已经全然没有了《希腊诸神》当中那种绝望感。很显然，此时的席勒对那个黄金时代的了解远远胜过创作《希腊诸神》的时候，据此，席勒也认为那是世界历史当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席勒用那样一个黄金时代来应和自己的“感伤”诉求，他将那个黄金时代作为同现代的比照。也正是因此，这一时期，席勒的心念不再秉持回溯态势，如同《希腊诸神》呈现的那样。相反，他瞩望未来之事，那将是比希腊更为伟大的时代，那样一个时代建立起来的美的标尺，必定会帮助现代诗人超越希腊人。《旅行》乃是以六步格写就的，在这份诗篇中，席勒再次召请那个美丽、平和、静穆的黄金时代现身，诸神降临人间，教化世人，令世人学会农业、工艺、航海以及战争艺术。这样一个时代在艺术、科学、商业、殖民、爱国精神、英雄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文明成就领域，都堪称登峰造极。然而，世事变迁，这个时代很快便消逝而去；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的种种不端和恐怖，诸如法国大革命，席勒将这场革命置于同希腊黄金时代的尖锐且戏剧化的对照当中。然而，此一比照所触发的戏剧场景和戏剧化效果，乃取亢奋一途而非哀婉一途。此外，席勒还在一则注释中总结了一种特别的态度：平静地接受，同时也抱持信念和希望。在席勒看来，在人类进程中那一切的

偶然和变迁背后，自然乃是恒久不变的：

处于同样蓝色之下，越临同样的绿色

漫步于近旁，漫步于结合的遥远的世代，

且看看！荷马见过的朗日，正在我们头顶绽开笑靥。

平静地承认希腊之美已经是过去之事；对未来的美抱持信心；哀伤、嫉妒以及无用的遗憾情绪，皆因此种心灵态度而得到克制。此种心灵态度一直延续到席勒归天之时，尽管席勒在这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旧日歌手》（*Singers of Olden Times*）和《天才》（*The Genius*）这两份诗篇运用希腊来鞭挞现代，对席勒自己的时代展开讽刺。《新世纪开端》（*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这样的诗篇，则尽显一个混乱时代的绝望心绪，不过，那避难之地并不在过去，而在诗人自己的心灵当中：

在这梦境之世，自由独存，

美，只绽放于我们的深歌。

或者还会出现《世界的四个时代》（*The Four Ages of the World*）当中的绝对化申述：

那个奇妙的神性统治的时代

已经逝去，且绝不再回返。

于此，席勒也进一步提起，尽管那个黄金时代已经消逝而且是永远消逝了，但也大可不必为此绝望［见《致友人》（*To my Friends*）］：

因为我们活着，时辰被给予我们，

他总是活得堂堂正正。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间，席勒对希腊极尽放纵之能，且满怀激情。此

一时期，他对现代生活的批评恐怕比任何人都更为严厉、更不留情。不过，无论他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何等黯淡荒凉，诗人毕竟是在这个世界生活的，这一点席勒在《旧日歌手》当中予以了着重申述。此一时期的席勒已经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信念战斗至死，这信念就是：现代诗人尽管不同于古代同行，但同古代诗人相比毫不逊色，同样伟大，而且，激发现代诗人的乃是一种更为伟大的理想。看起来，席勒同希腊之间的这场冲突已然是彻底解决了，就如同席勒同歌德之间的冲突一样，有此一时期的通信为证。倘若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只需要将1793年的《尊严与优雅》当中对天才的评说与1795年的《天才》诗篇、1798年的《欢乐》诗篇中的相关申述进行比较，在后面这些诗篇中，席勒仍然认为所谓天才，乃纯粹是自然的恩赐，不过，对于天才的成就，席勒的态度则有所变化，他的态度已经向着敬重甚至仰慕的方向转变了。希腊那危险的荣耀和光华已然消散了，歌德那毁灭性的力量，也消失于无形，至此，席勒内心的一切难题和冲突似乎都得到了化解。《理想与生活》这份诗篇肯定能够传达此种印象。这份诗篇清晰地表明，人所难免的一切疾病、一切精神和心灵的困顿、一切伦理缺陷、一切身体痛楚、一切人间哀愁，都是可以克服的，为此，只需要选择在观念王国中生活就行了，因为那观念的王国是没有限制的，在那里，艺术将彻底征服悲剧：

当你被人类的悲伤所环绕，

当拉奥孔被蛇所迷惑

以难言的疼痛和悲伤的斗争，

那么起身反抗，让他的哭泣，

对抗着天堂拱顶那驶过的喧嚷

撕扯并撕碎你柔弱的心……

但是在信仰中，平和胜过所有的言说

那里居住着和谐的纯粹形式，

那儿悲惨的风暴不再翻卷；

那儿来自焦灼灵魂的苦痛在安睡，

那儿没有悲伤的可怖的哭泣，

别无所有，除了灵魂的征服……

此番崇高宣言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那份题为《理想》的诗篇，这份诗篇乃是在发出哀叹，那是深染个人感伤的哀叹，率直且真切，令人不敢卒读。青年、理想和信念、同自然的交流、爱情和欢乐的小阳春、对声名的梦想以及对真理的追寻，这一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这世间唯有友谊和使命尚存。除了早期的两份爱情诗篇，《理想》诗篇可以说是席勒一生当中唯一一次纡尊降贵，对自身的现实命运提起如此直截的哀叹之词，早期的那两份爱情诗篇则显然是植根于对夏露蒂·冯·卡尔伯那番尘世激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番“热切呼唤”当中，根本没有他那糟糕的身体状况的信息。这是仅有的一次，席勒动用了诗人的特权，借由直率的宣泄来缓解悲伤的重负。而后，席勒便将心灵转向其他地方了。对此时的席勒来说，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同希腊人的暴政展开斗争，并竭力将之击败。为此，席勒希望在悲剧领域超越希腊人，要不就将希腊悲剧用作跳板，令自己得到提升，进抵那理想王国的澄明之境。相形之下，遍观周遭世界，并在这么一个中年时期，去回望过去的生活，去感怀青年时期之后的变迁，感怀当年的情爱和当年对自然的感受，以及当年的理想和迷狂，如今都变成了什么样子，这倒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了。然而，倘若一个人能够感受席勒在《理想》诗篇中表达的东西，那么这个人也就具备创造悲剧的能力了。正是他的悲剧观念强有力地推动着他走向这最后的自由之路。

---

[1] *The Greek Genius and its meaning to Us*， passim.

命运

哦，到哪里去找寻那恢宏、巨大的命运？

那毁灭人又升华人的命运。

这是《莎士比亚的影子》（*The Shade of Shakespeare* ）中的两行诗，短短两行诗句凝聚了席勒自1792年对希腊悲剧中的命运元素提起批评以来内心发生的变化。1792年之后，席勒最终从哲学转向戏剧创作，在歌德和威廉·冯·洪堡的启蒙精神指引之下，重新对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展开研究，这一切令席勒意识到，那超验的命运观念乃是悲剧的要义所在。对席勒来说，这毫无疑问是全新的观念；除了他那理想主义的风格和方式，此一观念同样也标志着他的早期戏剧和此一时期更为成熟的戏剧之间的巨大鸿沟。此前，命运问题在席勒这里都能得到简单且有效的解决，这也包括《唐·卡洛斯》这部作品。在早期戏剧中，暴政或者暴君，还有以恶棍形象展现出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扮演了关键且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是暴君形象，还是马基雅维利形象，实际上都是符腾堡的卡尔·欧根公爵的戏剧化或者升华，暴政由他而出，他的仆从则执行着他的指令。对青年时期的席勒来说，外在的必然性乃是以他实际处身其中的那个政治体系为表征的，他的早期悲剧也就给人以一个混乱的现实世界的印象，这也正是他早期悲剧之力量的部分根源所在。但在《论悲剧艺术》中，他发现，倘若令灾难以一个恶棍的设计和谋划为依托，这将会成为悲剧的弱点，于是，席勒便转向境遇的力量，以此取代一切属人的邪恶图谋，为此，席勒还将《熙德》奉为这种悲剧类型的杰作。他于1788年开工写《马耳他骑士》，就风格和技巧而言，本来是打算以希腊方式展开的。但是，在这部剧中，外在境遇因素部分地取代了超验的命运，正是这外在境遇的力量，迫使主人公拉瓦莱特出于高贵动机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在剧情上，高乃伊和《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

亚》的影响乃同等可见。但是这部剧仅仅在风格上效仿希腊悲剧，并没有推进多远。这是席勒为着以希腊人的方式胜过希腊人而做的第一次尝试。此次尝试失败了，至于败因，则很可能在于：以这样的方式令境遇力量取代命运元素，让人感觉太过突兀和生硬了。几年之后，席勒着手修改剧情规划，他引入了一个老年人和一个年轻人之间的情爱关系，并以柏拉图对话的方式呈现出来，席勒希望借此令这部悲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变成一部希腊悲剧。从席勒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让步，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让步也不能弥补那强大命运力量的缺失，没有了这样的力量，希腊悲剧也就不成其为希腊悲剧了。不过，自《华伦斯坦》之后，席勒每每想到这部流产的悲剧，便会琢磨着创造一部新的悲剧。可席勒每次都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每次都能找到各种理由予以推脱。真正的情由在于，他始终不愿意认肯悲剧元素，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席勒的青年时代是在一种戏剧性的斗争中度过的，一方是他的个体天才，另一方是政治暴政；他生活的最后时段也是在一场冲突中度过的，一方是作为创造者的席勒，另一方则是那苍老的敌人，时间。生命的沙漏正待流逝净尽，他必须首先创造一部伟大作品；要创造一部现代悲剧，以对抗希腊人造成的乱象。他有时间吗？命运总是在他要展开创造行动之时，横加干预，将他击倒，想必他也已经意识到命运力量对他生命的侵蚀。更何况，他本能上还是个赌徒，曾耗费多少个不眠之夜去玩牌，直到有一天他计算了一下自己的损失，而后便再也没有碰过牌了。所有的赌徒都是认肯命运的。一个像席勒这样的戏剧家，有着过去和当前的宏富经验，曾在符腾堡公爵死亡之时抛弃了那个暴君-恶棍式的人物，倘若仅仅是将戏剧当作棋盘，以娴熟技巧操纵人物和境遇，就像是下棋那样，这肯定不可能令其本能得到满足。何人以及何物能够取代那个光华缭绕且强大的卡尔·欧根呢？除了希腊人称为命运的那种神秘且无可猜度的因素，还能是什么呢？希腊悲剧作家曾因为命运观念而被席勒贬抑为二流角色，现在，可算是实施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复仇行动

了。席勒并非一尘不染地从希腊悲剧作家当中穿行而过，相反，希腊悲剧深刻地影响并改造了他的观念。

如下情形相当有意思：当歌德和席勒从有关史诗之本质的研究中抽身而出，转而尝试写作叙事歌谣的时候，歌德依循这条路线去创作一部荷马式的史诗，席勒则是摸索前行，以叙事歌谣为跳板，重启自己的戏剧创作。人们通常用“哲学谣曲”（Philosophical ballad）来统称两人在1797年和1798年创作的东西；不过，此一称谓也只是用在诸如《巫师的学徒》、《科林斯新娘》（*Bride of Corinth* ）、《神与舞姬》（*The God and the Bayadere* ）这些诗篇身上才算贴切，至于席勒大多数的谣曲作品，则都不契合此一称谓，毕竟，这些谣曲即便可以获得“哲学”称谓，也仅仅是因为它们所展示的乃是命运问题的不同侧面而已。《潜水者》、《波吕克拉底的指环》、《伊比库斯的白鹤》（*The Cranes of Ibycus* ）、《富尔格之路》（*The Way to the Forge* ）、《屠龙》（*The Fight with the Dragon* ）以及《人质》（*The Pledge* ），不妨就以时间顺序提点这么一些诗篇，这些诗篇足以表明，席勒正在同命运观念缠斗，命运观念于1796年9月正式开始创作的《华伦斯坦》而言，乃是重中之重。当年11月，席勒致信歌德说，华伦斯坦之死，命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过于微末，主人公自身的错误和缺陷所扮演的角色则太过重大。不过席勒说，麦克白的最终毁灭，主要也是他自身的原因，这让他感到一些安慰。很显然，此时的席勒希望尽可能地令自己笔下的华伦斯坦操控在一种超验命运的手中。

然而，什么是命运？它如何发挥效能？在这些叙事谣曲当中，席勒似乎一直在追寻这些问题。是因为凡人引诱了神灵而遭受的报复吗？比如说，是不是像《潜水者》当中那个鲁莽之人先后两次的所作所为，胆敢去挑战自然当中那神秘的恶灵，因而招惹了涅美西斯呢？毕竟，这个女神是不会放过凡人的任何冒犯之举的。《潜水者》当中那过分的勇气，抑或是《波吕克拉底的指环》当中那过分的好运，令诸神抬高凡

人，目的却是为了将之毁灭。凡人当然尝试过将自己最为珍视的东西献祭神灵，以便逃避神灵之怒，但此举终归枉然；那指环最终还是藏在鱼腹之中，回到波吕克拉底的手中；那献祭遭到拒绝，波吕克拉底唯一的罪错便是意识到自己的幸福，因此，也就注定了悲惨且可怕的结局。这当然是悲剧，不过，就构思和观念而论，也太过简单了，不足以成就一部戏剧。于是，席勒便离弃了有关波吕克拉底之毁灭的预言。这是席勒第一次尝试呈现一种无情的、无可避免的、非理性的命运，此一尝试也足以表明，沿着《俄狄浦斯王》的脉络去写就一部悲剧，对这个现代戏剧家而言太过艰难了。然而，就他对《俄瑞斯忒斯》的了解，希腊悲剧中的命运，也并非全然意味着对无辜罪人的盲目复仇。实际上，罪人也有罪有应得的时候。阿伽门农被杀，乃是因为他出于一己之考虑而让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沦为祭品。克吕特墨涅斯特拉之所以被杀，乃是因为她谋杀了阿伽门农。罪有应得的复仇观念在伊比库斯传说中得到了典型表达，一群白鹤出现在剧场上空，令罪犯脱口喊出被杀者的名字，由此令罪行暴露。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当杀人者听到白鹤的叫声之时，当然会认为那是被杀之人在诉求白鹤为自己复仇。席勒在这个故事当中增添了自己创制的一个情节，当白鹤出现在剧场上空的时候，舞台上正在演出埃斯库罗斯的《欧门尼德斯》，此可谓席勒的天才之笔。复仇女神的合唱队此时现身舞台，发出震慑性的可怕言辞，令罪人心惊胆战，于是，罪行败露便是无可避免的了。命运，也就是那借由偶然性这一盲目工具发挥效能的命运，由此便发现了那罪人。甚至有可能复仇女神当时就在那剧场当中，吟唱着她们那可怕的诅咒，于罪人来说，这诅咒之音实可谓声声入耳（席勒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给出定论，这给这份叙事谣曲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伊比库斯的白鹤》这份诗篇可谓激奋至极，令人窒息，极为辉煌地呈现了命运之戏剧效能。然而，罪行的败露以及两名罪犯伏诛，这中间倒也难说有没有悲剧元素，而此时的席勒要致力于在悲剧当中找寻命运元素。复仇女神，无论呈现出何等恢宏的意象，也无论表现出何等的力度，都不能解决席勒当前的关切。

此时的席勒希望命运能够在华伦斯坦之殒殁中担当更大的角色，华伦斯坦毕竟是无辜受罪之人。正是由此，那诗性的命运观念，也就是那种借由盲目的工具、境遇以及偶然性等因素而对人物发挥神秘作用的命运观念，在华伦斯坦的情形中是能够发挥效能的。同样，让世人自己去想象华伦斯坦之灾难究竟在何等程度上是超验命运或者盲目机缘的作品，这也未尝不是好事。然而，这样的命运观念能移植到现代境遇当中吗？毕竟，在现代境遇当中，恩典之仁慈要远远胜过古时的命运，据信，上帝之恩典不仅会惩罚恶人，还会奖赏善人。从《富尔格之路》当中讲述的那个平常故事来判断，要将古代命运引入现代情境，其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在这个故事当中，那邪恶的仆人却得到了好人的命运，这是因为那个善良的仆人在前往富尔格的途中，停下来望弥撒。仁慈恩典的观念，无论对恶人何等严厉，在这样的情境中也不免要脱离悲剧，转归道德寓言的王国。那么，命运还能在现代情境中呈现出来吗？还是说，命运观念仅仅是希腊人的一项特权呢？今天，还能不能创作类似《俄狄浦斯王》那样的作品呢？1797年11月2日，席勒致信歌德：

> 过去这些天，我一直苦思冥想，希望能找到《俄狄浦斯王》那样的题材，希望能得到这样一部悲剧赋予剧作家的那些优势。毕竟，此等优势乃是无可限量的……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就其本质而论，则要可怕得多，我倒不是害怕正要发生的事情，我真正害怕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担心俄狄浦斯乃是那种独一无二的类型，无可效仿；若如此，那么在这么一个传奇色彩趋于消散的时代，找到类似题材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神谕在悲剧中扮演的角色肯定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的；人变了，时代也变了，此等境遇之下，倘若仍然要保留悲剧的那些本质元素，那么可怕之事无疑就会沦落为荒诞之事。

信中的这份申述可以说是席勒之俄狄浦斯情结的最早显现，此一情节差不多在席勒全部的后期悲剧作品中都能见证到，正是此一情节激发席勒写就了颇为怪异的混合剧《墨西拿新娘》。此一时期，席勒身上的此一情结同他身上的理想主义乐观情怀展开了搏杀，他的此种乐观情怀拒斥宿命观念，此一时期他写就的《屠龙》诗篇就是此种乐观情怀的典型表达，其中所展现的乃是对自我的征服。《人质》同样也是此一乐观

情怀的伸张，这份诗篇呈现了英雄主义、决心和坚韧是如何战胜境遇的，无论那是何等的逆境。这样的诗篇，就伦理效果而言当然是令人满意的，而且情节之推演也不乏戏剧效果，但这些叙事谣曲最终都不免要呈现一种欢喜结局，由此便也证明，潜藏在欢喜结局背后那种哲学，于一个悲剧诗人而言乃是毫无效用的。

在呈现华伦斯坦之殒殁这一场景的时候，席勒乃重现了《伊比库斯的白鹤》当中已经得到戏剧化处理的元素，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而已。华伦斯坦之罪错在极为恢宏的层面上展开，因为他背叛了帝国和皇帝。但是华伦斯坦却也并非全然是罪人，他的行为从他自身的立场上看，是可以得到证成的。是境遇在对抗他，同时也在推动他走下去。他的性格当中既糅合了无尽的野心，也糅合了犹豫不决的禀性，这令他既无法全然忠诚，也无法实施成功的背叛之举。他实际上是自陷一种处境，那样的处境于一个雄心勃勃的梦想家而言，是不存在退路的。于是，两条行动路线之间的选择问题便沦落为如何抓住恰当时机的问题。在此，时间和他自身的性格同样在同他对抗。他犹疑不决的时间太长了，令他最终错过了时机。他就这么一直在等待星象的结果，但是，星象给出的却是虚假的预言。再往后，那星象倒是准确地预言了他的殒殁，但一切已经归于枉然。由此可以说，在每个关口之上，命运都遮挡了他的眼睛。他认为皮科洛米尼会对他忠诚，并将全部赌注押在皮科洛米尼身上。当这一切的信任最终被击碎的时候，他的本能提醒他要防范埋伏在身边的邪恶天才布特勒，然而，华伦斯坦却又没能完全遵从自己的本能。整部悲剧都贯穿了深不可测的外在命运感，不过，这并未减损人性的关怀。华伦斯坦的性格、他置身其中的境遇、奥克塔维奥的计谋、那遭遇残酷误导的梦想发挥出的恶毒效能、对星象的致命信仰、时间的无情消逝，这一切的一切铸就了这场灾难，也令人信服地展现出人类生活和命运交织而成的神秘画面。不幸的是，马克斯·皮科洛米尼这样一个人物及其言辞，过分强调了对待这场冲突的伦理态度，这样的伦理态度折损了悲剧的现实全切，扭曲了整部悲剧。这是因为在此种伦理

态度之下，马克斯这样一个人物便足以令这场灾难成为对罪人的单纯惩罚，而不是境遇、性格和机缘联合铸就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在此，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席勒和作为剧作家的席勒再次陷入冲突当中。

同样的二元格局也呈现在《玛丽·斯图亚特》（*Maria Stuart* ）当中，在这部剧中，剧情开启之前，命运便已经对女主人公做出了死亡宣判，其确凿程度正如同那古时的预言一般，那么剩下的问题便是：这命运的预言将如何应验？此一技法像极了《俄狄浦斯王》，也就揭示出席勒是从何处汲取的灵感；特别是要考虑到，玛丽及其支持者为了规避命运的宣判而采取的举措，恰恰加速了这命运的降临。然而，在此，席勒再次引入了过分的伦理关切。这不幸的王后最终归服无辜的命运，令昔日的罪行得到宽宥，她从容赴死，荡涤了自己的罪过，苦难则将她提升到高贵境地。那毁灭了俄狄浦斯的无情命运便扭曲为一种仁慈的基督教复仇观念，以罪人的忏悔、上帝的宽宥以及天堂的承诺为终局。

在博蒂格（Bottiger）看来，席勒之创作《奥尔良姑娘》（*The Maid of Orleans* ）乃是为了呈现涅美西斯针对凡人之倨傲，也就是希腊人所谓的“骄傲”而实施的报复。女主人公宣示如下语词之时，显然是僭越了自己的神圣使命：

> 我不会放下手中这把剑
>
> 除非那骄傲的英格兰彻底毁灭。

依博蒂格之见，女主人公就是以此等宣示之词引诱了命运，命运遂展开报复，令她爱上了利昂内尔，这就等于触犯了那令她弃绝人间情爱的律条。然而，在这部剧中，读者所见证的贞德犯下罪过，然后忏悔，然后获得宽宥并重新崛起，最终以战场的荣耀死亡作为终局，那样的死亡场景当然是悖反了历史实情的，见证到这一切的读者显然不可能想见会有博蒂格那样的解释。在席勒这部剧中，贞德表征了那“美丽灵魂”，她以职责之名征服了内心的情爱，并由此变得崇高，就如同马克斯·皮

科洛米尼在她之前所做的那样。这部“浪漫悲剧”充斥了中世纪的幻梦和预言、来自地狱的黑骑士，以及剧场化的电闪雷鸣，所以它全然是非希腊式的，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同席勒就女主人公之罪错提起的悲剧解释形成契合。贞德同蒙特戈美的那幕场景当然会令人联想到《伊利亚特》中的相似场景，而且席勒还是以古老的三步格韵律写就的，但这一切也只不过是给这部本来就不真实又极为沉闷的戏剧徒增些许怪异情调而已。诗篇《卡桑德拉》（*Cassandra* ）是在《奥尔良姑娘》之后写就的，这份诗篇的悲剧性，以及其题材与叙事的动人程度，都远远胜过《奥尔良姑娘》，《奥尔良姑娘》对冲突的刻画过于理想化，到了没有人会相信的地步。尽管如此，这份诗篇仍然是席勒如下强烈信念的结果：创作一部《俄狄浦斯王》式的作品，已然远非自己或其他现代人之能力所及。此一信念是针对浪漫派的很自然的反应。席勒于1800年7月26日致信苏维恩（Suvern）说：

> 和您一样，我对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亦是绝对尊崇。不过，它们应该归属它们自己的时代，时代是不可能重现的。将一个时代活着的产物奉为另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的范例和标尺，此举无异于做死艺术，而非为艺术创造生命力。艺术之诞生和成长，乃是动态的、有机的……美是为着幸福民族而存在的；要想打动一个苦难民族，唯有靠着崇高。

席勒放弃了重铸希腊悲剧的尝试，他曾向歌德申明其中的情由，那些引人仰慕的情由跟这封信中申述的情由是一样的。然而，他内心的欲望仍然是存在的，他总是惦念着跟索福克勒斯一较高下。《奥尔良姑娘》刚刚完成，此一欲念便再度萌生。他再次取出《马耳他骑士》的草稿，又再度放回。不，这次他要动真格的了，这次他不再跟命运开玩笑了，他不会再逃避了，不会再对现代旨趣让步了；他这次一定要跟索福克勒斯较量一番，在索福克勒斯的地盘上战斗到底。他甚至预告说，昔日悲剧中的乱伦之事，今日之悲剧仍有可能重现；舞台之上应当有神谕，有遭到抛弃的婴孩，有弑父行为。《墨西拿新娘》便由此诞生，连同那合唱队以及那注定了的毁灭命运。整整一个统治家族身染罪错。一

项借由梦境发布的预言说腹中胎儿倘若是个女孩，这个家族将遭遇灭顶之灾；另有一项梦境预言暗示说，这个女儿将令自己的两个哥哥重归于好；还有预言说，当父亲的会在这个女孩出生之时将其杀死，当母亲的则将其偷偷救下，这个女孩长大成人之后，将带来预言中的灾难。表面上看，这样的情节安排完全是在效仿索福克勒斯。不过，在席勒这部悲剧中，完全见不到那铁一般的必然性、那严厉的正义和悲剧逻辑，还有那神秘的命运之道。莱俄斯和伊俄卡斯忒无视第一项预言，成为那个孩子的父母，而后，做父母的试图毁灭这个孩子，借此避开那预言中的灾难。然而，诸神是不可能被轻易忽悠的。路人救下那遭到抛弃的婴孩，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知道了那在等待着他的可怕命运。他的做法是假装完全忘掉自己的身份，仿佛这样就能避开预言中的灾难，然而，这样的做法恰恰是致命的，那命运仍然降临头顶，他就是那么活生生地见证了自己犯下的无辜罪错，那罪错是可怕的。第一项神谕乃是极为明确的；第二项神谕则是含混的，不过，这也完全是因为俄狄浦斯由于伊俄卡斯忒和莱俄斯的罪孽，无从识得自己的父母。席勒呈现的两场梦境以及两项预言，恰恰揭示出他的命运观念的二元特征；对于作为悲剧家的席勒来说，那命运是外在的、无可避免的，对于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席勒来说，那命运是罪人应当遭受的惩罚。俄狄浦斯因为父母之罪而承受苦难，他是没有选择的，席勒剧中的人物则跟俄狄浦斯不一样，尽管这些人物也都处身预言的阴影之下，但是那预言的应验却有着不同的方式，这些人物都是有选择余地的。贝阿特丽丝可以选择毁灭自己的家族，也可以选择让自己的两个哥哥重归于好，很显然，结局取决于当事三人的具体行动和作为。第二个梦境及其预言乃是相当含混的，两兄弟并未认出自己的妹妹，这也就令人间情爱得以在两兄弟死亡之时令他们重归于好。不过我觉得，此一情节安排完全是为了给预言保留一个颜面，席勒乃以如下语词结束了这部悲剧：“恶之大者，莫过于罪”。这表明，是这些人物自己的罪错导致了毁灭的结局，倘若这些人物正确行事，那样的结局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显然，唐·恺撒身上并没有担负任何命运般的

必然性，一定要去杀死自己的兄弟，而且他杀人之时也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之杀人全然是出于暴烈的嫉恨之心，这其中并没有任何的盲目可言。唐·曼纽尔则一直保守秘密，加之那样的高压手段，最终促成了自己的毁灭，也招致了贝阿特丽丝的反抗。即便如此，也不一定就会出现那样的罪行。这些人物的行为，是完全不合情理的，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这正是这部剧的巨大弱点所在）。在他们于情于理都应当说话的时候，他们却保持沉默。但凡关键时刻，他们总是留下关键问题，不予作答，却又没有任何特别的原因。当剧情特别需要他们在场的时候，席勒却令他们都消失不见，为的是将他们滞留在无知的迷雾当中，这样的情境倒也配得上情境喜剧的典型路数。不妨这么说，在这部剧中，席勒仅仅是凭借一系列的荒诞误解，拯救了人物的自由意志，得以将这部剧的伦理意涵彰显出来。然而，此等误解却也令剧中人物犯下的罪错显得根本就无足轻重，最终令伊莎贝拉、恺撒、曼纽尔和贝阿特丽丝更像是精神上有缺陷，而非道德上应当遭受谴责。合唱队在其中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因为合唱队给出的优美颂词当中，充溢着对命运和毁灭、罪错和报应的真切情感，仿佛这样就可以拯救这部悲剧，至少在读者和观众眼中是这样的。可以说，席勒是用那荒谬的剧情堆起一道“理想之墙”，这道墙实际上太过老旧而且令人厌烦，这还只是席勒欲同索福克勒斯比肩而展开的这场战斗的一部分，这部分战争情境出自这样一个心灵，倒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放眼这战场的其他部分，看一看席勒在那里是如何同古代命运和现代罪错问题进行战斗的，就是看席勒就那么在泥潭当中沉陷下去。然而，《墨西拿新娘》首演之时，席勒本人倒是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把真正的悲剧氛围，这可是他毕生中的头一遭。当时的境况确实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正如一位见证者描述的那样：

> 这部强劲悲剧差不多演出过半了，大批观众仍然凝神屏息，此时，一阵可怕的雷声响彻舞台，那由薄墙支撑起来的舞台，一下子摇撼起来；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甚至演员的声音都听不到了。有些观众甚至逃离剧场，不知去往何方，女士们在惊惧中不免尖叫声四起。演员们一开始也吓呆了，不过很快又恢复神智，重新投入演出，但

是，剧本中那浓墨重彩的桥段仍然令他们颤抖不已。特别是合唱队的领队，此时是最受考验的，因为他必须在那电闪雷鸣当中给出如下唱念：

当云朵染黑了天空和喧哗的塔，

当雷声空空地轰鸣，惨白的惊吓

俘获了所有的心脏；他们承认了

命运的强力和它可怕的灾难性的大能。

接踵而来的剧情便是伊莎贝拉对母性的诅咒。随着悲伤涌动，这诅咒之音也变得极为尖利，伊莎贝拉遂开始诅咒那冷漠的上天、诸神和自然，合唱队则对伊莎贝拉提起如下告诫，从而令先前的恐惧更形深重：

可怜的女人，停，神灵还活着，

他们就围在你身边，可怕！

……所有人都沉陷恐惧当中，雷声仍然在肆虐；我身边的人都面如死灰，大家都不敢呼吸；甚至坐在包厢中的席勒本人都好像变成了石头。

是否诸神也曾在这电闪雷鸣当中斥责过席勒，斥责他的狂妄，警告他不要挑战希腊人？那是命运的声音吗？那是审判吗？那是掌声吗？《奥尔良姑娘》当中，那电闪雷鸣的场景也展示出同样含混的戏剧效果，席勒显然是出于自身的考量而再次动用这样的舞台手段的，倘若他见识了《奥尔良姑娘》那个演出场面，他势必也会呆若木鸡。可以肯定，在接下来的一部戏剧当中，席勒离开了希腊悲剧，并回归《唐·卡洛斯》时期，这部剧将引领人们来到威廉·退尔的时代，人类将凭借自己的高贵在瑞士的群山、峡谷和湖泊征服暴政。

或许，席勒自己也被那电闪雷鸣的场景吓到了，不过，他那高昂的心气尚且不足以让他自认失败。《墨西拿新娘》的技巧是存在瑕疵的，命运在其中沦为机缘，罪错则沦为愚蠢恶行。不过，德莫特里厄斯的故

事也许能够将《俄狄浦斯王》之恢宏命运同埃斯库罗斯般的恢宏罪错叙事融合起来，而且也许还能够就那样的命运和罪错展开一场现代阐释。主人公跟俄狄浦斯一样，也是在不知道自己身份的情况下，犯下无辜罪错；不过，命运之呈现并非一场灾难，而是一场危机，危机之后，主人公沦落悲剧性的罪错境地，并成为涅美西斯的牺牲品，复仇女神则从来都不会放过此等罪错，从来都在捍卫世界的秩序。在席勒笔下，德莫特里厄斯乃是一个僭越者，这个僭越者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正统的俄国沙皇。然而，就在他的冒险行动要成功的时刻，他得知了自己的真正身份。德莫特里厄斯认为，此时选择退缩已经为时太晚，遂承受了篡位者的角色，这是命运抛给他的，最终，这成就了他悲剧性的殒殁。他的罪错乃在于他不能自制。倘若他在获知真相的时候，能够将那真相公之于众，俄国会怎样？他的波兰盟友会怎样？他自己的英雄梦想又会怎样？德莫特里厄斯就这么沉陷于欺骗和阴谋的罗网当中，性格迅速腐化，周围是一群冒险家，这些人只是将他当作自利的工具。最终，德莫特里厄斯难逃被刺杀的命运，并为一个假冒的德莫特里厄斯留下王位，此人是彻头彻尾的恶棍，让俄国陷入又一轮的战争和动荡当中，直到罗曼诺夫最后拯救了这个国家。这部剧拥有恢宏的开篇，是席勒写过的最为华美的篇章，对玛利娜的刻画堪称无与伦比，篡位者同王后之关系的描述充满悲剧反讽，整体的剧情设计堪称宏阔。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两难境遇的本质以及此等境遇引发的冲突的本质，这一切都表明，席勒终于解决了罪错和命运的问题。倘若这样一部悲剧得以完工，席勒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了。

然而，这部悲剧最终还是没能完工。命运允许席勒走这么远，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犯下了傲慢之罪，因为他竟然要跟希腊人在悲剧领域一较高下。但命运还是允许他做出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允许他以《墨西拿新娘》来了断这方面的念想，也令席勒这个名字同索福克勒斯这个名字永远地联结在一起，这是因为是索福克勒斯造就了席勒的挫败。最终，命运还是没有允许他完成那部真正的悲剧杰作，本来这部杰作是可

以证成他的自信以及他对现代戏剧的信念的。这场比拼就此结束，赌徒输得一干二净。

如果说歌德对海伦的爱是一场放浪的激情，那么席勒作为希腊主义者的生涯乃是一场悲剧反讽。歌德禀性当中的某个侧面在根本上是与希腊艺术的那种澄明、静穆和单纯相一致的。歌德还牺牲了自己的天才，来迎合禀性当中的这些情愫，而歌德这么做自有其深沉的心理原因：歌德一直都是惧怕悲剧的，这种情感一直都在他的生涯中居于主导地位。席勒却不一样，席勒之禀性紧张、热忱，如同火山一般躁动，跟温克尔曼的希腊根本没有共通之处可言，若不是歌德作为令他目眩神迷的对头，将他引领到那么一个希腊王国，他根本就不会尝试介入那么一个单纯、静穆之地。乍看起来，温克尔曼的希腊在席勒内心留下的印记是极为深刻的。但实际上，席勒内心很快便对这样的境地生出朦胧的敌意，令他将那么一个希腊远远地滞留在过去。席勒可以仅仅将那个希腊当作已然消逝的理想加以凭吊和感怀，这样的理想在席勒这里可并不在少数，而且席勒此举并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天才。事实上，席勒只需要将温克尔曼的希腊概括成一项公式，就足以与之和解了，更何况，在席勒看来，这样的公式跟通往未来理想的密钥比起来，根本就没什么魅力可言。然而，正是在这么一个寻找祛魅法宝的过程中，席勒于无形中越过了温克尔曼的魔法之地，不慎进入了希腊悲剧这一魔性王国。在这里，希腊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温克尔曼和歌德成功予以规避的那个危险，那是一种盲目的荣耀、一种毁灭性的伟大。他的天才告诫他要警惕，要拒斥，要撤退。但是，他内心翻涌着飞蛾扑火的欲望，因此，那飞蛾的命运也就成了他的命运。1805年5月9日，席勒在四十六岁的年纪仙逝，临死之际口中念念有词，吟诵着《艺术家们》当中的两行诗句：

此世之美

将作为真理在来世与我相会。

作为悲剧家，他遭遇了悲剧性的失败，这一点他心知肚明。不过，作为理想主义者，他并没有失败。

第六章 殉道者：荷尔德林（1770～1843）

伊卡路斯

19世纪刚刚开始之际，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小姑娘非常幸福地同父亲生活在布洛瓦附近的城堡里面，这个小姑娘日后将成为de S…y夫人。此城堡坐落在华美的花园当中，花园中有一座巨大的大理石水池，由高高的栏杆予以防护。栏杆之上排列了二十四座大小不一的希腊诸神雕像。一天，小姑娘和父亲在高处的窗台上欣赏风景，看到一个满面哀伤、衣衫褴褛的陌生人在花园中漫无目的地游荡。这个陌生人看到了栏杆上的雕像，整个人为之一振。他急切地靠近雕像，举起了手臂，那情形仿佛是在朝拜，依那对父女所说，这人仿佛还念念有词，在召请这些神灵。此人是谁，意欲何为，父女俩好奇心顿起，便下楼跟此人聊天。女孩发现自己见到的那双眼睛充满了梦幻和哀伤，令她无从忘记，更令她难以忘怀的是那人对父亲说的一番话：“这水应该更干净一些，就像刻菲索斯平原上的河水或者卫城之上那处厄瑞克透斯山泉一样。让这些俊朗的神灵映照在这么一汪浑水里面，这也太不堪了。”这个陌生人一声叹息之后补充道：“还好，这里不是希腊。”

“您是希腊人吗？”公爵不免问道，语气中略有戏谑之意。

“不，相反，我是德意志人。”那人不免又是一声叹息。

“相反？莫非德意志人跟希腊人是相反的？”

“是的，”这个德意志人非常简短地回答道，略有沉吟之后，他补充

说，“不过，我们都是如此；你们，法国人，也一样；你们的敌人，英国人，也不例外。我们都一样。”

父女俩恳请此人接受他们的好客，他进入这座城堡，显然已经疲惫不堪。随后，在年轻女孩的舅舅的提议之下，他们同他展开了一番谈话，话题很快便切入形而上学领域，陌生人开始谈论永恒。“希腊的美丽神灵乃是这个族群之美丽思想的产物，”陌生人总结说，“那就是永恒。”“那么，您也希望以这种方式获得永恒吗？”女孩的舅舅问道。看来，他们都开始对这个人感到好奇了。

“我？”那人的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我？您是说坐在这里的这个人吗？肯定不会。我的思想已经不再美丽。不过，要是回到九年前，我就肯定是永恒的。”陌生人不禁沉吟起来，仿佛在回望往事，片刻之后，便重复说：“是的，没错，那时候的我就是永恒的。”他不能也不会告诉他们自己的名字，只是用手捂着脑袋说，等第二天再说。主人很轻松地就说服这个陌生人留下来过夜。但是第二天早上，他一下子进入癫狂状态。在这个短暂的爆发期过后，他在极度阴郁的状态下黯然离开了。

这个故事是de S…y夫人于1852年讲给记者莫里茨·哈特曼（Moritz Hartmann）听的。这故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很可能有不少的杜撰成分；不过，除非整个故事都完全是杜撰的，否则，故事的主人公就肯定是荷尔德林无疑。1802年夏天，荷尔德林在法国游荡，当时，他也正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在那么一个时候即便他的一些同胞也会处于那样的困顿当中，但除了这个不幸的荷尔德林，是没有人能像那个陌生人那样谈论希腊诸神的。

此人是谁？他的生活怎么了？头天晚上好奇不已的善良主人，第二天骑着马到处寻找他。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了。这是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已经写就大量诗篇；不过，无论是歌德还是席勒对这

些诗篇都不以为然。他没有财产，也没办法通过写作赚钱，离开大学之后，他一直都是食不果腹；母亲时常接济他，尽管母亲也是勉为其难，但还是时时接济。他先后担任过四个家庭的家庭教师，但都为时不长。他曾在瓦尔特斯豪森的卡尔伯斯（Von Kalbs）家族当过家庭教师，但是根本没有能力对付顽劣的孩子，这令他的内心极为难受，他不得不离开那里。在法兰克福的贡塔尔德（Gontard）家中，他爱上了雇主的妻子。龚岑巴赫（Gonzenbach）将他解雇，并未说明情由，他不得不离开豪普特维尔。这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行为过于怪异，令人无法接受。至于为什么他会离开汉堡议员迈耶在波尔多的宅邸，其中情由就没人知道了。毕竟，到这个时候，荷尔德林已经没有能力合理解析自己的行为了。没过几个星期，他便陷入极度的迷乱状态，尽管还有两份伟大诗篇等着他出手。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病情越来越严重，此时的症状已经是显见无疑了，这病症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变得可怕且令人羞耻，直到他于1843年谢世。他所要求于生活的全部便是：“安宁，幽僻，写东西，不要被饿死”。

“这听起来太让人寒心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是怎样地零落尘泥啊，就那么卑微地生存着；精神上的病症让他的心灵蒙受了何等的黯淡和扭曲啊。大家也许会说，天才跟癫狂就是一回事；但是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里可没什么诗意可言。歌德和席勒对这个疯子的诗篇的看法也许是对的。”倘若那个法国公爵能够了解这个陌生人的一些生活细节，想必会有此等想法。

然而，荷尔德林很可能是德意志民族最伟大的诗人，即便这个民族历来都盛产伟大诗人。荷尔德林在世界诗林当中，肯定也是享有至尊地位的。这样一个生命，散发出的精神能量是令人生畏的。当然，他的生活经历不免要在世人那里激起廉价的怜悯，但他那令人生畏的精神能力却也令这一切的怜悯没有任何意义。荷尔德林可不是什么软骨头，相反，他是那种典型的宁折不弯、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在

他的生命中，那份坚毅从未有过半分动摇，至少在他沦落癫狂境地之前是这样的。他禀性当中的英雄气质以及斯多亚气质恰恰是太过浓重了。荷尔德林身上肯定缺乏那种给人制造痛苦的能力，绝对不具备那种以异乎寻常之势伤害自己所爱之人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在天才身上是相当常见的，此种能力人们也有颇为精当的定义：“制造痛苦的无限能力”。也根本不能说他的生命就是黯淡的、乏味的；相反，他的生命乃是光华萦绕的，甚至为他赢得了“阿波罗”的绰号。如果说他的精神过于纯净，因而无法契合这个世界，那也就有理由说，过错在于生活，而不在他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借由一种特出的品质逃脱了这尘世的沾染，人们将他的这项品质界定为“永恒的年轻”。这样一个生命，拥有年轻人的活力，又绝没有年轻人的幼稚；这个生命当中有着空灵之物。最后一点，并非卑怯而是“骄傲”是荷尔德林突出的精神品性。他所渴慕的乃是加入诸神的行列。他飞得太高了，最终则不免沦落伊卡路斯的命运。当人们发现他在布洛瓦附近那座花园中游荡的时候，他已经无可挽回地坠落了，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他本人也肯定是这么想的。“我的思想不再美了。”然而，在接纳生命的最终惩罚，也就是历时四十载的癫狂岁月之前，他还是用他那已然折断的羽翼，再尝试一次决绝的脱逃行动。

荷尔德林跟别的诗人和梦想家都不一样，但威廉·布莱克也许是个例外［不过也不可忘记，布莱克的灵感主要来源于雅克布·波墨（Jakob Böhme）］。荷尔德林几乎不沾染生活。歌德和莎士比亚、荷马和但丁，是诗人当中的巨人，不过，他们也都同众诗人一样，立足于尘世当中。他们的视域之宏阔，当然是荷尔德林无从比拟的，但是，荷尔德林能够将自己提升到如此空灵的高度，这恐怕也是他们无从比拟的。荷尔德林全然是一个精神怪物，一个纯而又纯的诗人。他完全靠着灵感为生，根本无须生活的面包。一旦没了灵感，他内心的精灵也随之死去。不难想见，这样的诗意生活很快就会转变为先知生活。最终，人性的最后残渣以及个性的最后残余，也从他的生命体上剥落而去。没人能理解

他，他也不愿跟任何人交流。他全副身心地沉浸在幻象当中，等待那最后的启示。这启示有可能降临了，也可能不曾降临，天知道。可以肯定的是，他最终是被迷狂击倒了。那样的症状是众人皆知的，而且很可能已经潜伏了很多年。此情此景，不免令人联想到伊卡路斯，联想到那遮蔽先知眼睛的幻象。

着魔

约翰·克里斯提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生于1770年，比歌德小二十一岁，比歌德晚十三年离世；不过，在他的正常生命结束之后，歌德又活了三十年。他只比席勒小十一岁，但是他的天才之归于死亡却比戏剧家席勒早了三年。荷尔德林的希腊主义时期开端于1788年的图宾根大学，终结于1802年，这一年也正是席勒催生《希腊诸神》的时候。荷尔德林的希腊主义时期跟歌德的“荷马”时期重叠，并且刚好结束于《墨西拿新娘》诞生前夕。就在歌德和席勒共襄大计，评说希腊，各自致力于铸就希腊作品，歌德欲同荷马一较高下，席勒欲同索福克勒斯比拼厮杀之时，荷尔德林也在致力于诗歌大业，同时也在为一部悲剧而劳作，这部悲剧对于希腊精神之呈现要比歌德那干瘪的短篇《阿喀琉斯》要真切得多，更别提席勒那怪异、僵硬的现代版《俄狄浦斯王》了。两位伟大悲剧家一直梦想着在德意志文学当中建立希腊主义的地位，此一梦想却在荷尔德林这里实现了。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对待荷尔德林颇为宽和——虽然没什么效果——也在温和地贬抑他。但是当他内心的精灵于1803年弃他而去的时候，他的心灵已然超越了歌德的希腊主义；此时的席勒，正在以复杂心情倾听他的“希腊”杰作催生的那场异乎寻常的电闪雷鸣。很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了一些东西，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荷尔德林就是对他们发出的祈请的应答，这样的应答，往往都是这样的情形。

荷尔德林是苏亚比安人，席勒的老乡，和席勒一样，家境中等，连“氛围”也差不多。荷尔德林早早丧父，继父待他甚好，但在他九岁时也死去。最终，这个处身诺廷根的小家庭便只剩下年迈的祖母、母亲、妹妹，还有一个生于1774年的同母异父的幼弟。在风光优美的内卡区度过一段相当快乐的童年时光之后，这个温和、无父的小男孩便进入登肯

多夫和毛尔布隆等地的修道院学校，这令他的心灵遭遇了极大伤害。图宾根大学的那段时光令他更为难过，1789年，他曾试过离开图宾根，不过最终还是在这所大学待到1793年，这是为了不悖逆母亲的愿望。荷尔德林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深沉、凝重的虔信品性，母亲对他的影响是至深的、贯彻始终的。不过，他对美的热爱以及对自然的亲近感，则是他自己的。在孩童时代和少年时期，他崇敬基督；不过，在大学时期，他连同他的两个著名学友黑格尔和谢林，都倾倒在康德面前。从康德进至席勒和柏拉图，则是很轻松就能迈出的一步，荷尔德林就是这样将自己的崇拜对象从基督转移至希腊诸神的，他奉希腊诸神为自然神灵之道成肉身。至交纽弗（Neuffer）有着希腊人血统，这令荷尔德林的希腊主义当中灌注了些许个人情愫，这是歌德和席勒的希腊情愫当中没有的，尽管他们对希腊的研究可能更为精深一些，不过，就纯粹的希腊学养而论，这个年轻人很可能要胜过他们很多。荷尔德林的早期诗篇效仿克洛普斯托克而行，从中也不难见出，此时的荷尔德林渴望达成品达那样的名声，诗篇当中充斥了古典掌故。在这个时期，研究希腊而不接受温克尔曼的光照，就如同在今天研究相对论而罔顾爱因斯坦。因此也就毫不奇怪，1790年，荷尔德林为获得哲学硕士学位而提交的两篇论文当中，就有一篇是《希腊人影响之下的艺术史》。这篇论文并不能说成熟，而且也确实见不出作者的潜力，不过是就温克尔曼的主要观念做了一份概要而已，还大量地参引了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直接的引用也多处可见。荷尔德林的这份论章对埃斯库罗斯持约略的批评态度，对索福克勒斯极尽荣宠，欧里庇得斯则沦为牺牲品，这一切都是温克尔曼的观念。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差不多是逐字逐句照搬了温克尔曼。希腊气候在希腊文明和艺术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当然不会遭到忽视。希腊艺术那“高贵的单纯”在这份论章中当然也受到了应有的赞誉。最后则是无可回避的话题，拉奥孔群雕，“那个时代最后的辉煌之作”，也习惯性地出现在这份论章当中，当然，荷尔德林更是习惯性地概述了莱辛那伟大的批评作品中给出的那些反响。

这份小册子差不多就是鹦鹉学舌之作，这表明温克尔曼之于荷尔德林已经完全失去了灵感价值，尽管荷尔德林跟同时代人一样，都处身温克尔曼之希腊的魔咒之下。1789年，荷尔德林写就一份颂词，题为《致希腊天才》（*To the Genius of Greece* ），这份颂词的迷狂程度近乎歇斯底里。不过，席勒《希腊诸神》当中透射而出的无尽光华，对荷尔德林的这份热忱却是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荷尔德林的这份诗篇也是对温克尔曼式的黄金时代的乡愁，然而，这份崇高的表达已然将那么一个黄金时代无情地放逐于无可挽回的过去。在自身的幻象最终消散之前，席勒就已经教会了荷尔德林绝望。

亲爱的世界，你在何方？荣光的模样，

大自然春天的花蕊，噢，请回返！

在这片诗人梦想的仙境

独存着你那传奇般的足音。

如坟墓般死寂，这片田野在喃喃低语，

没有一种神格向我显现，

可悲啊！所有光芒四射的黎明

我只能看见遍布的阴影。

所有的花蕾和花蕊，它们皆已凋谢

在北国暴烈地猛攻之下；

以致一朵接一朵独自凋残

死去，那个世界，诸神曾作别。

掠过繁星的天国，悲伤地寻找，

那儿，我不会发现月神塞勒涅，

越过树林和波涛，我的呼喊绵延

但没有回声，鸣响我的耳鼓。

这是席勒于1788年提起的哀悼之词，不过，荷尔德林的回应完全出乎席勒的预料。荷尔德林在1793年的诗篇中贡献了如下诗行：

阿提卡，女巨人，已沦落

那里诸神古老的子孙如今在沉睡；

在沦落的大理石庙宇的残骸中

维持着绵延无期的死寂。

为了那惘然找寻的失踪者，春季

悄然下到伊利苏斯神圣的平原；

但荒漠将它们藏于自身，

绝不再将它们的样态显露。

朝向我心哀吟的那片更好的土地，

朝向阿尔凯奥斯和阿克那里翁；

在一方狭窄的棺木中

同神圣的马拉松战役的伙伴，一道安居；

让这些成为我最后的泪涌

为我一再泪洗的古希腊；

噢，命运女神帕耳开，张开你们的利剪，

为了心属亡魂的我的胸襟。

荷尔德林在每个诗节的最后一行增加了一个音节，由此令自己的哀悼情绪较之席勒那份诗篇更为强烈，更少戏剧色调，同时也令情感更具个人特质，更为真切。荷尔德林似乎对自己哀悼的东西有着更深的了解。不过，不妨将1793年的这份《希腊·致斯陶德林》（*Greece. To*

Stäudlin）同致纽弗的那份信件做个对比，不难从中见出，此种绝望情感乃是席勒式的，并非荷尔德林自己的。给纽弗的那份信件写于1793年接近7月底的时候：

> 你平寂的火焰将更为壮丽的闪耀，也许那时我的艾火早已烟熄。但这不会令我恐惮，至少我有过那些快乐的时辰，那时我回返自大自然的乳育，或伊利苏斯平坦的园圃；那儿，我依于柏拉图的弟子中间，见识过了那辉煌的存在的飞翔……

同样风格的文字不止这些。的确，如果说这份诗篇是在回应席勒的《希腊诸神》的话，那也可以说，这份诗篇更为清晰地印证了荷尔德林在致纽弗的信中伸张的那种意涵。只不过，席勒运用自己的魔杖，将荷尔德林予以伸张的幸福和希望幻化为悲伤和绝望而已。这份诗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荷尔德林的真实情感，我认为这个问题无从定论。毕竟，人们显然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同一个问题，但信笺和诗篇各自申述的情感乃是极为不同的。那份信笺表明，荷尔德林乃是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作为当前时刻予以信从的，而且这信念出于荷尔德林的本能；那份诗篇则接纳了席勒的信念，认为那个黄金时代已然是长埋黄土了。一方面是荷尔德林其人，另一方面则是黄金时代之回归的幻象，席勒，唯有席勒，横亘在两者之间，并且颇为郑重地宣示说：

> 歌谣中的永生
>
> 必将在现世灭亡。

席勒之于荷尔德林的早期影响力是相当强烈的，可以用“着魔”来形容。席勒的精灵完全主宰了这个年轻人。从1791年到1793年，荷尔德林写就的一系列献给人道理想的颂词（诸如友谊、爱情、自由、和谐、美等），见证了对席勒之精神影响力的屈从程度，这样的屈从在文学史上堪称绝无仅有。有时候，仿佛就是席勒在借荷尔德林之口言说；有时候，仿佛就是荷尔德林在践行席勒那种效仿魔法，目的不是效仿席勒，

而是要变得与席勒本人一样。论题、节律、对比技巧，乃至萦绕于字里行间的情绪，都是一样的。然而，这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模仿，这是灵感，荷尔德林的灵感。这是祭司口中宣示的言辞，这言辞不是那祭司自己的，而是神灵的。这些早期诗篇传递出一种张力，一种令人窒息的感受，恰恰就是这一点表明，尽管那老人的心灵主宰着这个年轻人的诗性心灵，但其中有着一场潜意识中的挣扎甚至抗争。十分怪异的是，当荷尔德林逐渐熟悉席勒之时，这样的诗篇便完全绝迹了。不仅如此，荷尔德林在同席勒建立密切交往的六个月期间，甚至根本就不曾写下诗篇，尽管在此期间，荷尔德林并不是没有尝试过继续创作诗歌。接着便是1795年夏天，此时，荷尔德林很可能已经离开席勒，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了题为《致自然》（*To Nature* ）的诗篇，这份诗篇非常质朴，重现了席勒《理想》论章中的情感，用的是《希腊诸神》的节律，而且同样是在每个诗节的结尾增添一个音节。大体上可以肯定，此时，荷尔德林并不知道席勒也写就了一份诗篇，直到席勒的诗篇出现在1796年席勒自己编的《缪斯年鉴》（*Muses' Almanach* ）上（荷尔德林的诗篇未能入选）。这触发了荷尔德林莫名的痛苦，不过，此事若是站在席勒的立场上倒也不难理解。将两份诗篇刊印在同一份期刊上，这未免有些荒谬，毕竟，这两份诗篇太过相似了，相似得有些荒谬。两份诗篇都是在1795年夏天写就的，而且差不多诞生于同一时刻。两份诗篇表达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都是对于幻象失落的感受；两人都在作别自己的青年时代；两人都在诗篇当中举目四望，看到的都是一个荒寂世界。席勒于当年秋天收到了荷尔德林的《致自然》，此时，他内心必定会生出一些奇特想法。毕竟，是什么令他写了《理想》呢？那可是直接否决了《理想与生活》伸张的观念，后者仅仅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他又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么一个时候对青春的离去感怀至深呢？青春不是已经在许多年前离他而去了吗？他能感受到荷尔德林感受到的那些东西吗？荷尔德林之所以伤感，乃是因为他离开了耶拿和席勒，当然也是因为他同席勒的这段交往并没有结出任何果实。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席勒之所以写就

这份诗篇，是因为荷尔德林的离开于无形中令他意识到如下事实：青春、理想和爱实际上早已离他而去了。席勒是不是也有可能在内心生出几分嫉妒，因为他也许已经意识到，他予以拒绝的那份诗篇比他自己的要伟大得多。

而是否你将离开，甚于夺取，

噢，虚伪的人，带着你那幻想般的自由，

带着你所有的懊悔，你所有的狂喜，

残忍地离开我？

那时，是否没有什么能将你留下，

噢，曾属于我的金色时辰？

徒劳，徒劳！你的波澜正在奔淌

进入那永恒的汪洋。

这次，席勒并不是在哀悼希腊诸神，而是在追怀不那么遥远的东西。在短暂的停顿和沉默之后，回应之声从诺廷根飘来：

死亡并逝去，那哺育并抚宁我的她，

可爱的，年轻的世界，她在死亡并逝去，

而带着欢愉，那天国曾将我充裕；

这哺乳凋亡，且荒瘠如一块石头。

尽管春色仍旧歌唱，迷魅我的哀伤

如莅临一首甜美的治愈之歌，

然而我生命自由的晨间离别了

而我心的春华逝去了。

两份诗篇所表达的情绪异乎寻常地相似，这似乎表明，在这么一个孤独的时刻，是席勒在回应着荷尔德林的哀伤，尽管他并不知晓荷尔德林的这份诗篇，或者也有可能是席勒在哀伤荷尔德林的离开。毕竟，在1795年，席勒并没有特别的理由爆发这么一场伤感。但是，荷尔德林是有的。

荷尔德林在1793年秋天初次遇到席勒，当时，他正在应聘席勒的老情人夏露蒂·冯·卡尔伯的儿子的私人教师一职，席勒开具了一封措辞谨慎的推荐信，他才得到了这次应聘机会。1793年12月，荷尔德林正式入职，但是又于1795年年初辞去了这个职位，在此之前的那个冬天，他造访了魏玛和耶拿。接下来便是一段焦虑且无望的岁月，荷尔德林待在耶拿，试图靠稿费来养活自己，在耶拿，他聆听了费希特的讲座，并多次拜见席勒，席勒对他非常友好，看起来也喜欢他。为了尽可能地延长这段自由且快乐的时光，荷尔德林将生活开销缩减到几乎为零的水准，并且一天只吃一顿饭。然而，尽管他竭尽身心之所能，一切还是枉然，诗性灵感似乎彻底离他而去了。“巨人般的精灵”，他就是这么称呼这个伟大同胞的，此时的荷尔德林很可能是被席勒的天才压倒了。可以肯定，他对席勒的着迷已经到了相当程度，以至于整个下午的时光虽然歌德一直在场，他都没有意识到那是歌德，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歌德有什么特别的。很显然，那是因为席勒也在场，他便没有往别人身上分神。席勒的诗篇令荷尔德林不由自主地高声吟诵，虽然如此，在真正面对面的时候，荷尔德林一下子变得哑口无言了。不难想见，一个胆怯且满心幻象的年轻人，在同心目中的巨人会面之时，势必要完全承受那强烈甚至可以说是暴烈的个性的冲击，那激昂言辞融汇而成的激流于这样一个年轻人而言，更会是势如破竹。这就等于先将荷尔德林抬起来，接着又将他摔在地上。一开始，荷尔德林是非常谦卑且满怀感激的，而后便变得不安，感觉自己受到压迫。甚至歌德在同席勒交往之时也有类似的感受，尽管他在年龄、阅历以及控制力上都远远胜过荷尔德林。1795年，荷尔德林离开耶拿回家，此时，面对席勒之时的那种受压迫感仍然没有消

解，他对席勒仍然是无助的仰慕，不过，这样的仰慕之情当中，也蕴含着畏惧。荷尔德林已经意识到这个“巨人般的精灵”正在给自己制造危险，遂开始展开抵抗。此一时期，他的信笺呈现出怪异的混合情感，一方面是可怜的自卑，另一方面则是受伤的傲慢。他曾向席勒承认自己对席勒的依赖，同时也对此番情状表示不满。他说：“唯独在席勒面前，我失去了自由。”面对这个伟人，荷尔德林的内心悄悄生出了几分痛苦。有时候，他不免会颇为委婉地向偶像抱怨这种完全不对等的关系。他更是极为可怜地谈到，同席勒的这份交情对自己的干扰太大了。最后，1798年6月30日，他按捺不住，说出了实情：

> 不得不承认，我时常让我的天才跟您的天才发生冲突，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您那巨大的影响力面前，拯救我的自由。我很恐惧完全被您主宰，这样的恐惧总是令我无法平心静气地接近您。

不难见出，这样的着魔感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也是相当痛苦的，在荷尔德林全部的清醒岁月里，这一直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荷尔德林得以在席勒面前拯救自己的自由，不过，这却是以某种从来不曾愈合的创伤为代价的。席勒方面则是另外一番情形，他对荷尔德林确实很友善，但肯定是不懂荷尔德林的。一开始，席勒对荷尔德林的文学生涯和规划是持鼓励态度的，同时也刊印了荷尔德林的多份诗篇（其中就包括那份希腊哀歌）。他还将荷尔德林的散文体小说《许佩里翁》（*Hyperion* ）推荐给科塔出版公司，后来该公司予以出版了。他一度称呼荷尔德林“最亲爱的老乡”，并且允许荷尔德林自由出入自己在耶拿的住宅。后来，席勒对荷尔德林的来信则是尽可能周全地予以回复，他会略掉其中一部分来信，剩下的来信则不会回复得十分圆满，由此保持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而后，再给出相当友善且带有安慰性质的回复。此时，他对荷尔德林的赞美已经有所收敛，而且也刻意不让自己受制于此种关系。有时候，他会请教歌德对荷尔德林诗篇的看法，并且会一直等到歌德给出看法，在此之前，他不会替荷尔德林扬名。作为至高判官，歌德对席勒提供的这些诗篇给出的是谴责之词，当然会有一些赞美之词，不过那也

是极为微弱的，席勒由此也就验证了自己的看法。两人都不曾看过荷尔德林最伟大的诗篇，但是两人都对他作品中展示出来的品性视而不见，这一点是非常奇怪的。在荷尔德林身上，席勒当然是很快便看到了早年的自己，此时的荷尔德林像奴隶一般效仿席勒，这肯定会令席勒心有不悦，不过，对席勒来说，这一切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茨威格非常敏锐地见出[1]，席勒很可能是在荷尔德林身上活生生地见证了自己在《尊严与优雅》中创造的那个“美丽灵魂”，这也很可能令席勒更加感到不安，更何况，席勒正打算将这样的“美丽灵魂”呈现在自己的戏剧当中，而且还试图表明，此一理想乃是根本没办法契合现实生活的。《理想》中的两行诗句似乎体现出席勒认可了这一点：

消失了，不见了，那信仰

在我的精神造物那里，它却升华了。

实事求是地说，荷尔德林就是席勒的精神造物；而且，父子间那种神秘敌意在两人的关系当中也是在场的。荷尔德林于席勒而言，一直都是挑战，荷尔德林一直在催促着席勒认肯自己的独立地位和价值；但最终，荷尔德林未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席勒则很显然是予以抵制的，并对这个孩子生出了莫名的厌恶，这厌恶最终主宰了席勒的心灵。这个孩子的天才（要比自己的天才伟大许多），他是从未有所意识的，父亲的盲目令他不能相信自己的造物竟然要比自己更为伟大，这一点在席勒心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一切的情感元素都是在场的，有的是潜藏着的，有的则摆到了台面上，这就是荷尔德林为期六个月的耶拿生涯当中两人的关系状况。后来，这一切元素更为明晰地显露出来。至于荷尔德林方面，也在同席勒的天才展开缠斗，但始终不能以胜利结束这场缠斗。灵感已经离他而去；1795年夏天，荷尔德林返回诺廷根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而且也已经一文不名了。9月4日，在给席勒的信中，荷尔德林以如下诗句结束了《致自然》诗篇：

冬天包围着我，

令我僵冷、麻木；

心灵如铁，

就像头顶的冬日天空。

荷尔德林同席勒之天才的这场冲突，乃是荷尔德林反抗希腊暴政的一个侧面，荷尔德林最近的传记作家威廉·波墨对此是有锐见的；席勒和希腊都是荷尔德林内心极度荣宠的对象，同时，两者之于荷尔德林的自由，也都是威胁。

> 从早年时代开始，我就在爱奥尼亚和阿提卡的海滩上、在风光迤逦的阿基佩拉古斯诸岛上尽享快乐，那是在任何别的地方都得不到的快乐；我素来珍视的梦想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亲身前往那里，看一看青春人性的圣地。希腊是我的初恋，会不会也是我最后的爱恋呢？

这是荷尔德林在《许佩里翁》序言中写下的话，后来他删除了这段话。在这部小说中，荷尔德林呈现出另外的一面：

> 谁能承受这一切？那可怕的古代荣耀岂不是要摧毁一切，如同飓风摧毁初生的树林，就像摧毁我一样；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内心并不具备那种足以强化自信心的元素……我爱上了这些英雄，如同飞蛾扑火。我不顾危险扑向他们，然后逃开，然后又扑上去。

在《许佩里翁》当中，主人阿达玛斯首先将主人公引荐给普鲁塔克和希腊诸神，很显然，这里面的阿达玛斯就是席勒。小说中，许佩里翁谈到了阿达玛斯精神当中那“毁灭性的荣耀”，并以如下语词描绘自己同阿达玛斯的关系：“难道我不正是他那静穆热情的回响吗？他的精神乐章难道不正是在我这里奏响吗？于是，我成了我看到的东西，而我看到的东西如同那天界神灵。”显然，这也正是席勒对于希腊人的感受，到了荷尔德林这里，此一感受乃臻于压倒一切的程度。1801年，也就是荷尔德林最终寻获自由之后，他致信席勒，里面谈到了希腊文学研究问题，语气中不免有责难之意：“一旦接近希腊文学，就难言放弃了，直到有一天能够找回当初它轻易拿走的自由……”在未完稿的论章《我们

应当如何审视古典》（*The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we should envisage Antiquity* ）当中，他也伸张了同样的看法。

荷尔德林这样的心灵只能生活在理想境地，对于这样的心灵，希腊及其全部的荣光，会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力。当然，若是有信念认定那样的荣光已然是无从重建了，这影响力也就必然要打折扣。席勒之权威及其全部分量，乃是反对那股回归黄金时代的潮流的。至于理想的未来则是另外一回事。此外，现代人在回望希腊黄金时代之时，则只能是心怀“感伤”和遗憾。荷尔德林乃凭借《许佩里翁》表达了此一观念，席勒是以哀歌的形式表达此一感受，荷尔德林则是将此一感受融入悲剧。许佩里翁参加了1770年那场战争，他想要解放希腊，但最终全然丧失了幻想，而且是以极为痛苦的方式。一度激荡着自己家园的那种精神已然离去，他也无意找回那种精神。此时的许佩里翁遭受了致命的心灵创伤；要么死亡，要么无望地顺从，这就是留给他的选择。此种境遇之下，若要摆脱绝望，就只能“在诸神当中”寻求解脱之策。席勒的结论将荷尔德林抛入绝望境地，自信心之缺乏更强化了荷尔德林的绝望，而自信心之缺乏又因为同这么一个卓绝心灵的交往，于无形中被进一步强化，到了残忍的程度。许佩里翁对自身之无能的自卑意识，折损了他的行动意志。最终，他只能亲近自然，在那里寻求安慰，并弃绝了一切的人类交往。

---

[1] Stefan Zweig，*Der Kampf mit dem Dämon* ，Leipzig，1925，pp.79-83.

狄俄迪玛

《许佩里翁》表征了荷尔德林生命中那个真正的转折点，当然，也是对这样一个转折点的呈现和揭示，在这个转折点中，席勒那毁灭性的影响力遭遇了另一股力量的抵制和制衡，那就是苏塞特·贡塔尔德（Susette Gontard）的信和爱。1795年年末，荷尔德林已经在美因茨河畔的法兰克福稳定下来，担任贡塔尔德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这家的主人是一个精明且冷漠的商人，在他眼中，荷尔德林只是一个不穿制服的仆人，如果传言可信的话，这个仆人的脾性是非常躁动的。女主人苏塞特要比丈夫年轻很多，只比诗人大一岁；也许可以这么说，苏塞特天生就懂得荷尔德林并且会爱上他。两人之间可以说是心心相印，极为契合，甚至个人特质方面也是如此，令人不免联想到柏拉图有关两半人的神话故事，传说被分开的两半会相聚、相认：

> ……彼此思慕着他的另一半，想合体，而互相给递他们的手……正值因饥饿而死去，渴望长成一体……因为不再喜欢事事分离……因为这强烈的渴慕，他们中的一半对于另一半并没有表现出爱人交合的欲求，而是别的那种相互间灵魂确凿的渴望，且难以言明……没有他们中的一个人……会否认或者不承认，这种相会和彼此的融合，这种以一代二的变化，是他远古必需的恰当表露。

苏塞特曾致信荷尔德林：

> 我认同君的一切想法，即便君此生欲同我永远别离，我也不会误解君。生命何其短暂，但精神之交永不断绝！寒意袭来。生命因为短暂，就活该受罚吗？哦，亲爱的，告诉我，何日才能再相会？如今一切都悖逆爱意，我都快疯了。

荷尔德林也曾致信苏塞特：

> 我们能够给予彼此幸福，却不能拥有这幸福，多少年了，我们为此落泪，念及于此，心痛不已。然而，只爱永存，即便我们不得不就

这么死去，亦是充满力量，就因为我们的分离。

荷尔德林和苏塞特·贡塔尔德，也就是荷尔德林心目中的狄俄迪玛，绝非通常意义上的情侣，尽管两人早在1796年，就已经借由那神秘的契合而结为一体。事实上，荷尔德林在贡塔尔德家一直待到1798年秋天，这就足以证明两人是多么克制，将此一激情维系得多么精巧。两人是无力对抗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之运作基准并非那种纯粹的爱。两人同这个世界的琐碎庸俗无从契合。然而，尽管都是如此脆弱，但两人都以英雄姿态抵御了此番境遇中的种种诱惑，并收获了应有的报偿。苏塞特的丈夫逐渐看出两人之间的种种端倪；在贡塔尔德同这位年轻教师一番交谈并示以极端蔑视之后，苏塞特建议荷尔德林离开这个家庭。然而，两人都无法面对诀别的哀伤。1798年到1800年，荷尔德林居住在霍姆贝格·冯·德·霍厄（Homburg von der Höhe）家中，有细心且忠诚的朋友艾萨克·辛克莱尔（Isaac Sinclair）做伴，荷尔德林在这里致力于完成《许佩里翁》的收尾工作，并着手创作《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以及一大批颂诗。他每个月去一次法兰克福，同苏塞特短暂相会。那无疑是痛苦时刻，他们利用这样的时刻交换信笺，互诉衷肠；两人彼此隔绝，处境无望，文字成了唯一的交流手段。苏塞特销毁了荷尔德林的信笺，只留下四份残章。荷尔德林则虽然经历了四十年的癫狂期，但一直都保留了苏塞特的信笺，秘不示人，最后，在1922年，维耶托（Vietor）才将其辑录刊印出来。这些信笺尽显那可怜的境遇：令人心碎的爱恋以及昂扬的青春，令人无从相信，这些信笺的作者当时已经是三十岁的妇人，结婚已经超过十年，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是那样痛楚、迷惘和天真；那样危险且漏洞百出的幽会计划，任谁都能体味到那为了不分开而付出的绝望、疯狂且枉然的努力。在制定了诸多漏洞百出且令人颤颤巍巍的幽会计划之后，苏塞特写道：

> 你知道，我是多么恨这些阴谋一样的计划；我当然能感觉到，你敏感的心灵对这样的计划也是退避三舍的，我能感觉到你和我一样痛苦。但请你别弃之不顾，我这么做，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之上最美

好、最美丽的东西不被毁灭。

难以遏制的悲伤、滚滚而下的泪水、阵阵的啜泣，丈夫心知肚明，遂强令她承诺不要做任何伤害家庭的事情；生活在两人之间打下的楔子最终令两人彻底分离。1800年5月，荷尔德林花光了在法兰克福的储蓄。他向席勒提起诉求，希望能在1799年的《青春女神》（*Iduna* ）杂志上发表一篇东西，借此获取一笔稿费，席勒拒绝了。荷尔德林便只能从法兰克福回家，就像此前也不得不从耶拿回家一样，此时，他的生活仍然没有前景可言，亦没有任何确定性可言，尽管自从他上次寻求家庭庇护之后，已经过去了数年光阴。苏塞特最后的信笺简直不忍卒读，里面有这样的文字："不要分离"。然而，分离，尽管对两人来说是最为悲伤的事情，但终究是要发生的。1802年6月22日，苏塞特去世；消息传到荷尔德林耳中的时候，他简直无法相信。不过，这受挫的爱并没有浪费。荷尔德林终究在苏塞特死前，创作了巅峰之作，而且，此一创作主要是靠着苏塞特提供的灵感和力量。

是苏塞特帮助荷尔德林找回了对自身天才的信心，那是席勒无意间夺走的信心。也是苏塞特令荷尔德林找回了对希腊黄金时代的信念，令荷尔德林相信，那样的信念并不完全是对已然消逝的荣耀的一场幻梦。《许佩里翁》的核心一幕就是要处理重建黄金时代的可能性问题。在那一幕中，主人公向狄俄迪玛完整地重现了雅典的古老辉煌，当时，两人正乘船从卡劳莱亚岛前往大陆，那样一个雅典正是温克尔曼构想并解析过的雅典。接着，两人便看到了世间实情：

> 就如同飓风离去之后被毁灭的船一样，水手四散逃去，船身已经粉碎，龙骨也无从辨识，就那么静静地躺在沙丘之上。雅典就是以这样一幅景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只剩下凄凉树干，前一晚上还枝繁叶茂，第二天晚上便已经被大火吞噬。

这场景将许佩里翁吓倒了，世事倾覆，差点令他顺从，令他试图在爱的天堂寻求庇护。恰在此时，狄俄迪玛令他重新直面自己的使命：

> 您必须坠落凡间，就像一束光芒，就像一阵新雨；您必须像阿波罗一样，照亮凡间，摇撼那尘世的深渊，将新生赐予尘世，就像宙斯那样，否则，您何以上那天堂。

一开始，许佩里翁接纳了这精神使命，而后又拒绝了，因为他那集战神和提坦神于一身的朋友阿拉班达召唤他武力解放希腊。此举最终流产，不仅许佩里翁为之沦丧，也间接导致了狄俄迪玛的死亡。《许佩里翁》可以算是荷尔德林给予席勒的终极致敬篇章，他所致敬的乃是席勒的一种信念：希腊以及希腊所表征的一切，只能存活在歌谣当中。不过，一种不同的信念也已经浮现而出；剧中的许佩里翁认为，出错的是手段而非目的；错就错在许佩里翁背离狄俄迪玛指明的那条道路，转而跟从阿拉班达，这是一场悲剧性的错误；有关希腊重生的信念并没有错。狄俄迪玛的确被这个世界击败了，不过，她所表征的那些东西并未倒下。

此等精灵，并非孤立现象，荷尔德林还会在霍姆贝格身上见到，此乃“时代的珍珠”，她不仅是“最后的雅典人”，也是未来辉煌的报春鸟，乃是诸神派遣来，作为他们即将回归的保证，向散落四方的信仰者发出信息，令他们不要绝望。“踩着我的悲伤，向高处攀升”，这是荷尔德林在《许佩里翁》中给出的说法。苏塞特将悲伤灌注给他，这悲伤令他越过席勒式的顺服。任何人，只要像他那样爱过，就“一定会踏上通往诸神之路，一定是这样”。显然，此时的荷尔德林自感已经足够切近诸神了，他相信诸神即将回归；他已经将他们供奉在心间了：天父、地母以及他们的子嗣光亮或者太阳，此时已然成为荷尔德林神殿中的三位一体。1798年秋天，他祈请命运女神再给他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以便他吟唱出更为伟大的诗篇。接下来的1799年到1800年这段时间，便见证了一系列恢宏颂诗，它们传扬着催动人心的先知信息。

在接受席勒影响的那个时期，荷尔德林写就了一系列诗篇，从这些诗篇中不难见出，他的心灵对灵感是特别开放的，此处所谓的灵感乃是

真正意义上的灵感；他本人就是一种介质，并非他自己的种种精神都能够借由此一介质得到表达。然而，狄俄迪玛并非以这样的方式为荷尔德林提供灵感。荷尔德林的许多优美诗篇都是献给狄俄迪玛的，还有许多诗篇则是以狄俄迪玛为题的。自从狄俄迪玛在他的精神世界当中占据至高地位之后，他便同席勒的那种节律作别了，改用六步格节律或者无韵颂诗。这是克洛普斯托克引入德意志文学的表达手段，荷尔德林对此种写作方式驾轻就熟，在这方面，恐怕只有歌德才能与他相提并论。不过，狄俄迪玛从未借由荷尔德林之口发言；相反，狄俄迪玛将他塑造成诸神的代言人。荷尔德林也正是由此达成了自己的宿命，而且也很可能唯有借助狄俄迪玛，才能达成这样的宿命。“你教我观看伟大事物，吟唱沉默的诸神，你自己却保持沉默。”荷尔德林生来是个诗人；但是，他的爱、他的悲伤，则将他升华为祭司和先知，此一转变在《恩培多克勒》中有所表述，那是一部有关诸神之选民的悲剧。许佩里翁正是在狄俄迪玛手中转变成恩培多克勒的。那么，在诸神手中，又会有怎样的转变在等待着荷尔德林呢？很显然，是死亡的变形（这是《恩培多克勒》的全部内容），而荷尔德林将以洁净之身与死亡重聚。

荷尔德林写于霍姆贝格的那些颂诗表明，他正在颤抖中等待完整的启示，那启示以先知的方式确认古老的诸神正待回归，不是回归希腊，而是降临德意志，就如同重生的狄奥尼索斯降临在过去一样，满是欢欣和激昂，去唤醒沉睡中的人们。期待当中融合了神秘的希望和属人的恐惧。天界正在引领他向上而行，那力量太强大了，他说，他那无家的灵魂也正渴望着脱离这生活，确切地说，是渴望着魂归希腊。1799年1月1日，他致信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卡尔（Karl）：

> 哦，希腊，你去了哪里？还有你的天才和你的虔敬。即便是我，虽竭尽所能，也只能是追随那无与伦比的诗人们的足迹，摸索前行而已；我的言行更是荒诞且笨拙，因为我正站在现代泥潭当中，如同平足的大鹅一样，无力地向着希腊的天空拍打翅膀。

1799年的诗篇《美因河》（*The Main* ）中亦有类似表述：

但是，没有一个遥远的国度令我如此感受亲切，

因为在那里，诸神的子民

在安睡，于这片不幸的希腊土地。

如此强烈的渴望必定有着自身的能量。的确，有时候，此等重生欲念仿佛在摇撼大地：

恒河的岸边听到胜利的呼喊

因为酒神巴克斯从印度河前来征服了一切

以神圣的美酒，用以叫醒

并唤起所有梦中的子民。

《阿基佩拉古斯》（*Archipelagus* ）这份诗篇很可能是创作于1800年5月，它将全部的这些情感集结起来，由此成了一份辉煌诗篇。这份诗篇无论是韵律还是题材，都不可避免地同席勒那份题为《旅行》的枯燥诗篇形成了对比，对年纪更大一些的席勒来说，他这份诗篇差不多就是毁灭性的。席勒的这份诗篇，同样也在对雅典的黄金时代发出呼唤，还尽心尽力地罗列了那个黄金时代的全部特质，指名道姓地提及了众多神灵，但最终又放弃了黄金时代，尽管席勒还是给出了安慰性质的念想，认为荷马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的。最后这份念想则可以说是席勒这份诗篇当中唯一称得上是诗句的东西。这次，席勒的诗篇当然也得到了回应，不过，不是来自那个零落尘世的同胞，而是来自阿基佩拉古斯。那是美丽、迷人且神秘之地，荷尔德林的这份诗篇拒绝一切的描述和解析，其中的思考沉落极度深沉之境地，其中的希望则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在诗篇当中，荷尔德林再次回望并追怀已然逝去的古希腊荣耀，追怀它的精神、它的神灵：

这些眼睛绝不应瞧见它们？寻找但绝不能寻见

你，噢，神一样的风采，穿过大地成千的路径？

是否我只是听说了你的话语和谣传，它们曾伤透了，我的心

降至你的阴影中，就应尽早地离开我并逃离？

那荣耀、那痛楚、那精神的苦难，再次在现代的蛮荒洪流中翻滚而起；而后，这一切又同样地幻化为哀伤、预言和希望；那神灵、那祛位的自然群神，即将回归，并非崛起于希腊大地，而是德意志大地。甚至波塞冬都在拥抱并支撑诗人，去关切并等待诸神的降临：

噢，海神！

声音在我灵魂响彻再三，以致盖过了海水的狂澜。

无畏而迅捷的我的灵魂，如强壮的弄潮儿般。

战斗会给予新的欢跃；以及诸神的言辞，他们升腾的

领悟，和变化万千；而假如为我所哀的时代，

猛烈滋扰，俘获此脑；而凡间的灾难、不幸和错讹

痛扯我的生活，那生活亦有泯灭，并将其连根拔擢，

且让我在你幽深的水域，思慕和昶，噢，海神！

显然，是悲伤催生了希望，在荷尔德林的信念中，那悲伤引领他走向诸神，而那希望则深深植根于责任意识当中。荷尔德林自感是诸神回归的桥梁和工具；他只要坚持下去，准备好迎接诸神，就能够在死亡之际，见证诸神的降临。这正是恩培多克勒的使命，此人是荷尔德林未完成的悲剧《恩培多克勒之死》（*The Death of Empedocles* ）的主人公，荷尔德林在这部悲剧即将完工之时选择了放弃，因为新的使命观念要求一种不同的表达。《埃特纳山上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on Mount Aetna* ）是一份华美断篇，较之早前的版本更为辉煌，其中的景象更为高昂，可惜荷尔德林十分残忍地使之沦落残篇境地。

在《恩培多克勒之死》当中，先知欲同诸神比肩，因而冒犯了神灵。在遭到诸神驱逐之后，恩培多克勒又被逐出阿格里真托，因为那里的祭司、统治者以及民众都意识到他已经陨落，遂效仿诸神，将之驱逐。然而，在埃特纳山的孤独境地当中，他感受到诸神回归他的身边，因为他自愿选择死亡，借此与诸神重聚。他相信，当凡人的先知付出死亡的代价之时，诸神就会重新降临凡间：

是他们，

那活生生的诸神，那尚佳的诸神，曾缺席如此长久。

再见了，这是一个人濒死之言

因这时刻，那人确曾眷恋地徘徊在

你和那些召唤他的诸神之间，

在这十字路前，我们的精魂预言，

并道说真相，诸神将不再回返。

大可以仰慕《许佩里翁》，但也只能说，那样的仰慕肯定是有明确保留的。毕竟，在这部小说中，荷尔德林虽然也在尝试呈现自己的真实体验，但是情节的规划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创造力，人物刻画方面也缺乏技巧，那迷狂语调贯彻始终，令人不免生出单调枯燥之感，这一切都令荷尔德林的此番尝试大打折扣。但是，《恩培多克勒》却不是仰慕二字所能包容的。可以说，这是文学史上最为伟大的精神悲剧之一。就思想之崇高和悲剧观念之深沉而言，恐怕只有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堪与之媲美。《浮士德》第二部与之并置，亦显苍白，雪莱的《被释的普罗米修斯》则没有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来得那般真切。跟埃斯库罗斯一样，荷尔德林也是要借助这份悲剧来揭示先知（或者半神）同诸神的关系；跟歌德一样，荷尔德林也欲求以绝对者为映衬，创作一份人类精神的悲剧。然而，当恩培多克勒相信自己已然被诸神抛弃的时候，灵魂中的悲剧就已经开始向着更为深沉的层面沉降而去，超越

了普罗米修斯那单纯的英雄式的抵抗以及浮士德那绝望的独白。较之提坦神的命运，恩培多克勒的悲剧更切近人性；较之浮士德的苦难，恩培多克勒的悲剧更切近神性。实际上，恩培多克勒的悲剧就是荷尔德林本人的悲剧，只不过是在恢宏层面上伸张开来而已；那是精神的幻灭，在那样的时刻，一切的梦想和幻象都抛弃了他。那也是最终的启示，令他真正意识到，他在灵感时刻见证到的那种伟大，并非以此世为根源。诸神偶尔会临在于他，不过，同诸神永久相聚的唯一办法就是死亡。恩培多克勒之落寞的背后，潜隐着荷尔德林的个体体验，这样的体验是极为真切的，毫不逊色于最终与诸神重聚而催生的那种非尘世的胜利体验。这实际上是一部宗教悲剧，所呈现的乃是这个半神的苦难和净化历程，并由此确立起极为强烈的戏剧效果。恩培多克勒的本性和境遇乃是被人顺次揭示出来的，先是潘西亚，接着是他的敌人，最后则是他自己；以放逐为终局的暴风雨一幕；埃特纳山上命运的转变；阿格里真托的祭司、统治者和民众试图召回这个不久之前他们予以蔑视的人，但他们一切的恳求都没有用，尽管此人仍然对他们的爱秉持开放之心；阿格里真托的此一尝试遭遇了荷尔德林的诗意嘲讽；预言的高潮冷却为向保萨尼亚斯作别的落寞，而后，又借由潘西亚和自己钟爱的门徒回归；所有这一切构筑了一幅场景，以极具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出人类灵魂当中的精神冲突。剧中情节时刻都在变幻，每一刻都不一样，将读者置于巨大的张力和期待当中。读者大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展读这部悲剧，每次都能够发现新东西，都能够在这场冲突当中体验到新鲜和烈度，体验到信念之黎明在缓缓降临，体验到那恢宏的胜利。荷尔德林正是由此找到了一个伟大的戏剧意象，以此揭示生活和命运的奥秘。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悲剧当中充溢着种种预感，读者不免会在其中觉察出那即将到来的结局以及恩培多克勒的求死欲念，死亡将拯救恩培多克勒脱离那无可思议的命运：

我乞求诸神，因着一件出自我内心的恩惠：

一旦在未来，我将不再，

我处于年少力强的神圣使命能够担当
且不会犹豫踟蹰；但如同那些往昔的
热爱诸神的人，我的精神之力
将变得愚笨；——因此我乞求他们：
那时带上我，将一个迅疾的命运
径直送抵我心；而这会是一个暗示
天色已然破晓，那时我会被赎回；
并且，在一个于我最感赐福的时刻，
我仍会为了一段新的韶华而拯救自己，
以致诸神的那位友人将离开人群
变成一桩嘲弄和冒犯的事情。

今天，我们都知晓这样的祈请获得了怎样的应答。“突然降临的命运”以癫狂现身，荷尔德林并没有死去，而是活着成为“任人嘲讽和奚落之物”。诗歌较之生活要更为美丽，更为悲悯，荷尔德林之戏剧双重奏的命运，较之戏剧创造者荷尔德林本人的命运要好一些。

苍白的加利利人

若有荷尔德林这样的精神来全权引领生活，那么生活肯定是危险重重的，同苏塞特的诀别则令这样的危险更加严重。他曾对席勒抱持一种英雄崇拜，也曾对狄俄迪玛爱恋有加，但这两项情感均无果而终，甚至令他沉陷较之以往更为荒寂孤独的境地。并不是说荷尔德林没有朋友。黑格尔，特别是诺弗，同他相交甚厚，尽管1800年之后，他们之间的通信便中断了。他也有热情的仰慕者，比如爱德华（Edward），也叫艾萨克·辛克莱尔（Isaac Sinclair），此人是苏格兰后裔，出身相当神秘，自始至终都追随荷尔德林。在霍姆贝格·冯·德·霍厄家中时，辛克莱尔既是荷尔德林的知交，也是他的保护人，随时都在找机会给他提供经济援助。他则尽可能地予以拒绝。诗篇《莱茵河》（*The Rhine* ）就是献给辛克莱尔的；不过，另有一份题为《致爱德华》（*To Edward* ）的诗篇则表明，辛克莱尔的脾性对荷尔德林来说太过专横了，令他感受到不小的压力。辛克莱尔给他的一封信笺似乎表明，这个热忱的追慕者对苏塞特倾心有加。尽管辛克莱尔以高贵姿态抗拒此一情感，但这肯定会令荷尔德林伤心。此外，在霍姆贝格、豪普特维尔和法国，家里人也一直都是他的主要联系人。他对家人是非常忠诚的，对母亲更是敬爱有加。家庭情感乃是他生命中的第三份重大情感，不过，这份情感同前两份情感一样，都是灾难性的。席勒的冷淡，乃至苏塞特的离去，他都闯过来了，并且还将苏塞特的离去转化为一场精神上的胜利。倘若他能在进一步的折磨和苦难中凤凰涅槃，那么希腊诸神就完全有可能以凯旋之势回归他的诗篇，并借由他回归这个世界（毕竟，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然而，在霍姆贝格期间，他经受了另一场精神冲击，这场冲击是极具毁灭性的。他同母亲的关系总是牵动着他的情感。母亲给他的信不曾保留下来；不过，他给母亲的信则足以揭示收信人的性格。他的母亲肯定有着朴素且正统的宗教信仰。她对这个大儿子肯定是保有期待的，那样的

期待恰恰是荷尔德林自己最为忧惧的：母亲希望，儿子能以乡村牧师的身份获得一份稳定生活，娶妻生子，其乐融融。信中所有的信息都表明，他的母亲是慈爱且温和的，很少指摘人，也正是这一点，令她对荷尔德林的影响更为强烈。在荷尔德林那极端动荡的生存状态中，母亲代表着稳定。终其一生，母亲在他的生活罗盘中都代表了一个极点，他的生活指针总是向着这个极点旋转。然而，从理智和精神角度来看，母亲提供的极点在他的生活中呈现出反向态势，他一直都在竭力避开母亲，这也给他造成了永久的痛楚。总有一些返祖性的、非理性的力量在牵引着他，他无从控制，不自主地走向母亲呈现出来的那种境遇；他希望能像母亲那样，就如同他也曾希望自己能像席勒那样。然而，他的天才一直都在造反，拒绝投降。至此，他的天才一直都能在这场搏杀中占据上风，一直都能够借由回避或者压制之策，不受母亲提供的那幅愿景的侵袭，事实上，他一直都是靠着这样的办法来疏解母亲方面于无形中给他带来的痛苦。母亲的快乐也就是他的快乐，因为母亲的赞许和信任于他而言，乃是至关重要的，那样的分量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这么一个至真至情的儿子当然不能将自己生命中最为沉重的一段经历告诉同样至真至情的母亲，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荷尔德林甚至都不曾向母亲提及苏塞特·贡塔尔德这个名字。他只是用泛泛之词向母亲解释自己为何离开法兰克福，他告诉母亲，那是因为“雇主们”的“傲慢”，给母亲留下的印象则是女主人跟男主人一样傲慢。母亲必定会认为他的爱是不合法的，是违禁品，因此，不让母亲知情，乃是对母子两人的保护。在霍姆贝格的这个痛苦时期，荷尔德林几乎是生活在一种英勇作战的状态当中，一方面要弃绝生命中那段激情，另一方面要抵挡母亲那沉甸甸的爱，就是在这个时期，母亲一直在天真地催促他回家，去过愉悦的悠闲时光，去娶母亲中意的一个姑娘，争取能最终安定下来。对此，荷尔德林以闪烁的安慰之词予以回复，从中倒也不难体会到荷尔德林的内心遭受了怎样的折磨，那样的话也只能在远离母亲的地方才能写出来。那情爱的伤痕已然铭刻在心间，此种情况之下，他是

不可能回归家园，去面对母亲的眼睛的。事实上，从来不曾有这么一个如此挚爱母亲的儿子，能够将生命中如此重大的秘密隐藏起来，不让母亲知道。

爱上一个已婚妇女，此事荷尔德林对母亲守口如瓶，不过，在母亲面前，他防护得更为严密的，则是他对诸神的爱恋。荷尔德林一直都希望而且也时常让自己相信，他的宗教情感从根本上讲跟母亲是一样的。然而，倘若他在母亲面前袒露心迹，母亲势必不会认同他的宗教情感跟自己的是一样的，这实在是令人哀婉之事。1791年，荷尔德林从图宾根给母亲写下一封长信，信中宣示了自己的基督信仰，并从哲学角度予以伸张。事实上，此时，荷尔德林的基督信仰已经动摇，他只不过希望借此令自己和母亲一样相信，他的此一信仰并没有动摇。很显然，他的意图就是借由这么一封长信，来证明自己和母亲的信仰乃是一样的，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他最终失去基督信仰之时，便再也没有提及这个话题。在热烈追慕席勒并据此展开哲学研究期间，他便完全失去了同母亲分享宗教的念头，此一时期，他仅仅是向母亲讲述自己的外在生活，尽可能以此来取悦母亲，与此同时，他已经远离了教会。但在霍姆贝格期间，他开始相信自己作为先知去迎接诸神回归的使命，由此触发了一场精神危机，他的灵魂深渊又开始激荡起来，仿佛四处都回响起羽翼拍打之声，此时，他潜意识当中那怪异且恒久的欲念再度涌起，他希望变得像母亲那样。在霍姆贝格期间，他给母亲写下两封长信，虽然没有界定自己的真实信仰，但力图让母亲相信，本质上，两人的信仰是一致的。1798年12月11日，荷尔德林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 我最最亲爱的母亲，您常常在信中谈起宗教，仿佛对我的宗教信仰不是很确定一样。且让我在这里向您完全地袒露我的内心吧！且容我这么说吧！您灵魂中的一切生命之音，莫不在我内心引起共鸣。且用一样的信仰迎接我吧。不要对我的信仰有所疑虑，我会更为彻底地展现在您面前。我的母亲，是有些东西横亘在我和您的灵魂之间。我无法说出这东西的名字。也许是我对您的尊重太少了，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我说不清楚。不过我内心深处完全可以确信：即便您不能用

言辞表达自己，您依然与我同在；每时每刻，我都能强烈地感觉到，您在隐秘之地拥有我的灵魂……

这些文字是令人震撼的，绝不仅仅是诗性的抒发。几个星期之后，荷尔德林应母亲要求，为祖母的寿辰写就一份诗篇，在这份诗篇中，他将祖母比作基督的母亲，“是人中之凤，伟大的调解者……有着神一样的精神”。这份诗篇是即将到来之事的最初预兆。这绝不是一份改宗宣言，因为在这份诗篇中，基督显然归属凡人。不过，这也是自早年的学童期之后，基督的名字第一次在荷尔德林诗篇中重现。此时的荷尔德林非常想同母亲建立密切的精神联系，此一欲念很显然也结出了果实。

1800年和1801年之间的那个冬天，荷尔德林在豪普特维尔担任龚岑巴赫家族的家庭教师，从瑞士致信同母异父的弟弟说，他此时的主要关切乃是宗教。在这批瑞士信笺以及稍早的一批信笺当中，兴奋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错乱第一次变得明显起来。霍姆贝格时期那些信笺展示出纯净且和谐的风格，而且思维也是清平明晰的。在经历了诺廷根那个短暂逗留期之后，那种纯净和谐的风格让位给一种恢宏且激荡的节律，这种节律暗示着风雨欲来的情境，预示了他最后那批有着极为浓重的灵感特质的诗篇将要运用的自由韵律。在霍姆贝格和豪普特维尔之间的这个时期，确切地说，就是在1800年《阿基佩拉古斯》和1801年《面包和葡萄酒》（*Bread and Wine* ）之间的这个时期，荷尔德林的心灵肯定发生了某种变化。在霍姆贝格时期，他开始感受到希腊的自然-神灵正在向他靠近，于是，他向母亲宣泄此一感受，并向母亲保证，他的神灵也正是母亲的神灵。在见到母亲并接受了这个“在隐秘之地拥有他的灵魂”的女人的光照之后，他内心开始涌动起一种欲念，他要在异教和基督教的鸿沟之上，搭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诗篇《面包和葡萄酒》。

这是一份气势相当宏伟的诗篇，荷尔德林借这份诗篇，再次回望奥林匹斯和德尔菲。“未来的神灵出自那里，并回归那里。”荷尔德林禁不住再次哀叹已然消逝的古希腊理想。诸神为何离弃我们？“或者说，他

是不是曾经回归并展现为凡人的形态呢？他是不是曾经应验并完成那天堂的盛宴，给人带来慰藉呢？”我们生得太晚了。尽管诸神仍然存活，但他们都生活在我们之上的另一个世界，他们似乎不曾关注过我们，忘却了这些软弱的根本无从理解他们的世间凡胎。不过，当这世间有足够多的英雄再次崛起，他们必定会在雷鸣中到来。与此同时，诗人将如同酒神的祭司一般，在黑夜当中，游荡于大地之上。狄奥尼索斯奉派前往世间，预言诸神的离去，不过，诸神留下了面包和葡萄酒作为礼物和保证，保证他们终有一天将会回归。那面包乃是尘世的食物，经过诸神之光的赐福，那葡萄酒乃是雷电之神留下的礼物，这些东西令世人不会忘记诸神曾在世间与我们同在，并且终将回归。那叙利亚之子不正是作为上帝的引路者来到凡人中间的吗？智者看到了这一切；那禁闭的灵魂也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荷尔德林在这份诗篇中运用的诗歌技巧以及神秘的神话观念可以说是无从理解的，此一神话观念将狄奥尼索斯和基督视为一体，视为尘世之上最后的神灵，离去诸神之荣光散射而出的血色残阳。《面包和葡萄酒》当然在荷尔德林的神殿当中增添了一个新神，但荷尔德林的首要信仰仍然是指向希腊神话中的自然-神灵的，是指向天空、大地和光明的，确切地说，就是指向宙斯、塞墨勒和阿波罗的。在这三大神灵的旁边，才是他们的信使狄奥尼索斯，基督则是狄奥尼索斯的另外一个名字。圣餐礼上的面包和葡萄酒将两种观念融为一体。作为一种诗歌意象，这份诗篇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在观念上的独特联想，也因为它在基督教和异教之间实施了极为大胆的融合，这样的融合是正统基督徒根本无从接纳的。就荷尔德林而言，这样的融合也只能说是自己在精神冲突当中取得的一场暂时胜利。那样的意象喷薄而出，但也是昙花一现。荷尔德林跨过《面包和葡萄酒》搭建的那座桥，去追寻那意象；但在越过那座桥之后，那意象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荷尔德林却再也没有找到返回的路。诗篇当中所说的“酒神”，乃是献给海因斯（Heinse）的（此人是自然和异教之爱的热忱使徒），这里的酒神观念同“诗人的使

命”当中那个意气昂扬的巴库斯神乃是全然不同的，那里的巴库斯要将人们从沉睡中唤醒。《面包和葡萄酒》中的酒神乃是小神，是离去诸神同人类之间的信差。这份诗篇可以说是荷尔德林最后一份用以昭示自然之神即将回归的诗篇，因此，这份诗篇也就绝不意味着荷尔德林改变了信仰。那酒神的确在诗篇当中得到了荣宠，那样的荣耀也的确有几分基督的色彩，但那样的荣耀却也仅仅是依托其信差的身份和职能建立起来的，不过是离去诸神之光芒的黯淡反射而已。那样的光芒曾经是人类生活的日常元素，只可惜，人类已经承受不了此等光芒的直接启示了。荷尔德林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应和基督的，这种做法当然不会伤害基督的本性，但荷尔德林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从1801年4月一直到当年的圣诞节，荷尔德林又一次不得不待在家里，因为他的经济状况实在是拮据。而且荷尔德林此时的精神状况也已经是很容易确定了，只不过他的家人对心理病理学一无所知而已。就当时的境况以及那个时代的情形而论，家人当然不会觉得荷尔德林有什么异常。1801年6月2日，荷尔德林最后一次致信席勒，希望得到鼓励和帮助，赢得耶拿一个希腊文学的讲席。此时的席勒已然认定，这个“梦想家”（席勒就是这么轻蔑地向歌德谈起荷尔德林的）已经陷入“危险境况”当中，因此也就没有回复这封求助信。席勒尚且自顾不暇，而且，荷尔德林信中有言，“能够在耶拿同您亲近一些，这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了”，这话很可能吓住了席勒。席勒的沉默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了，绝望之下，荷尔德林遂动身前往波尔多，那是1801年12月。

在家中滞留这九个月间，荷尔德林写就了一系列诗篇，这些诗篇都是以无韵体写就的反复曲式颂歌，非常华美，浸润了朦胧的美感。此种诗歌技巧可以溯源于《恩培多克勒之死》，在那份诗篇中，先知实际上表征着荷尔德林本人，而且这个先知的面容也像极了基督。《埃特纳山上的恩培多克勒》依照《面包和葡萄酒》的脉络来解释主人公的使命。

这份诗篇乃是要追随“时间之神”前往冥界的，因此也就难以确定，是不是会有另一个统治者前来接受神灵的光照。这份诗篇是献给基督的，这里的基督担当着和解与调解的角色，但是在荷尔德林心目中，基督也不过是诸神当中的一员，也要追随那进献给即将回归的自然之神的恢宏赞歌。《莱茵河》也是一份荣耀颂词，在这份诗篇中，大河的脉流象征着这些半神的命运，正是他们担当着诸神和凡人之间的信使。莱茵河那威严的灵魂渴慕着东方，同时也学会了承受自己的德意志使命，这条大河不正是寓意着荷尔德林本人吗？其他的一些先知，诸如卢梭、基督、狄奥尼索斯以及苏格拉底，也都得以或多或少地清晰呈现出来。如同此一时期的诸多诗篇一样，这份诗篇在结尾处暗示了混乱和即将到来的挫败场景：

夜晚，当一切都在无序地

重组，而那最初的混沌

返归。

《日耳曼尼亚》（*Germania* ）应该是荷尔德林离开德意志前往法国之前写就的最后一份诗篇了。这是一份颂诗，它仍然浸润并消融在此一时期诸多诗篇所特有的那种令人迷醉的朦胧美感当中，并在这样的朦胧境地辗转游走。这份极富美感的诗篇，暗示了荷尔德林灵魂中翻滚涌动着的风暴，这样一个灵魂虽然得到了狄俄迪玛的安抚，但也终究潜藏了另一个面相，那就是欧洲的那场革命。当然，德意志精神最终还是平息了这场风暴，他灵魂当中的这两个面相都在诗篇当中得到了神秘暗示，尽管他没有明言。《日耳曼尼亚》乃是荷尔德林所有诗篇当中最具先知气息的，甚至《阿基佩拉古斯》《面包和葡萄酒》在这方面也不能与之相比并论。《日耳曼尼亚》中的神启展现得如此近切，仿佛就要降临了；跟世人渴望的所有神启一样，《日耳曼尼亚》中的神启跟诗人自己的梦想并不是一回事。那神启当中蕴含着危险。荷尔德林在第一诗节中也给出了悲伤的申述：他不能再去召唤希腊诸神了。他的灵魂也一定

不能再回归他过分钟爱的那个过去了：

因为那是致命的

而不允许从睡梦中将亡灵唤醒。

然而，荷尔德林毕竟是荷尔德林，他最终还是回望过去，并令诗篇中的意象和言辞再次沉陷朦胧境地：

他觉察到

曾经在世之人的影子，

正重访大地的古代诸神，

因为到来的他们压迫着我们，

而那位神圣的神-人的主人将不再

长久逗留于那片蓝色的天国。

就是在如此艰难的境况当中，荷尔德林展开了前往波尔多的孤独之旅，在波尔多，他寄居在迈耶家中，这段生涯究竟令他的精神状况恶化到怎样的程度，我们无从猜度。他灵魂当中希腊诸神同基督之间的那场战争究竟肆虐到何等程度，我们也无从知晓。那个法国小女孩是否真的看到荷尔德林在布洛瓦附近的花园中朝拜心中的那些偶像，我们也无从确认。不过可以肯定，这些都是荷尔德林生命中的主导激情，这些激情追随着他回家的足迹。也正是这些激情，在1802年到1804年一直环伺并压迫着他，令他在癫狂症的间歇期，极为艰辛地致力于品达颂诗以及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与《俄狄浦斯王》的翻译工作，这些作品在荷尔德林那里幻化为灵感，而非单纯的翻译。然而，无论这些激情何等严密地包裹着他，压迫着他，他都没有胆量再去召唤它们，除非是借由某种转接机制。原因很简单，那个苍白的加利利人，那个“唯一者”，于他的关系仍然是更为近切的：

我的君王和主人

噢，是你，我的导师，

为何离我如此遥远？

而当我询问古人，

英雄们，

和诸神，为何你

缄默不语？而今，我的灵魂

充满悲伤，仿佛神圣者是妒忌的；

以至于如果我侍奉谁，其余的就会将我贬损。

然而我完全明白，那是

我自己的错，因为，噢，我的基督

我太依赖于你

我，赫拉克勒斯的亲兄弟……

而爱，维系于一人……

《唯一者》（*The Only One*）这份诗篇，标志着荷尔德林内心希腊与基督之间的冲突的顶峰。他从法国返回之后写就了这份诗篇，此时，他已经接近最终的崩溃。这份诗篇并未完成，尽管荷尔德林后来尝试将其完工，但他的努力只能带来一团混乱，这本身也就足以揭示出他极大的心灵困顿。在这份诗篇当中，他承认了如下事实：他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最终，他选择了弃绝希腊诸神，转而信靠基督，对此，他给出了极具悲剧性的申述："我太依赖你们了"。这并非理智上的信念，因为此时的荷尔德林仍然相信，所有的神灵都源自共同的父亲。不过，他在诸神当中展开和解的努力最终令他崩溃：

而我大胆地向你们宣告

艺术也是狄奥尼索斯的兄弟，

谁给虎驾的篷车套上车轭

下到最遥远的印度

播撒欢愉的侍奉，

并种下藤树，

驯化民众的愤怒。

但是，仍有一种羞惭禁止我

拿这些世界的各色之人同你们比较。

然而，我清楚你们的创造者，

你们的父乃是同一个……

由此，这份诗篇以混沌草草收场。

《帕特摩斯》（*Patmos*）很可能是1803年的作品，也是荷尔德林予以完工的最后诗篇，在这份诗篇中，希腊诸神最终消逝而去，由此，先知便也失去了见证神灵或者塑造基督形象的希望。在这份诗篇中，荷尔德林当然提供了相应的意象，但那样的意象再无愉悦可言：

在可见的愤怒中，有一次，我看见过

天国的君王；并非我要成为什么，

而是去认知……

这份诗篇极富启示录色彩，以基督之生死为题，但是，其中已经完全没有了霍姆贝格时期甚至之后一段时期充溢着荷尔德林内心的那种神秘期待。就在这么一个准备好了迎接至高神启的时刻，基督却手持那把以火与力锻造的刀剑，挡在荷尔德林的路上，这在荷尔德林的生涯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这次，荷尔德林那已经激昂而

起、准备迎接诸神的心灵，一下子碎裂了。他那已经得到升华以便理解诸神的心，也在一瞬间崩解了。自他童年时代开始，基督就一直驻守在他心灵的幽深之处，一直在等待着这么一个时刻：

> 太多，我已遭受过
>
> 为了你和你“人子”的计划，
>
> 哦，圣母玛利亚，因为我曾听说过他
>
> 在我甜蜜的青春。

在背离自然诸神之后，荷尔德林便转而敬拜那个新来的闯入者，一开始，那崇拜展现得气势恢宏，而后，便变得犹疑不决，前后不一了。最终，荷尔德林回归母亲膝前，口中念念有词，那是破碎的感恩祈祷：

> 您的典范、您的劝诫，都引领我敬拜那更高的神灵，这令我至今都受益匪浅，您的神灵在一切属灵事物当中，本身就是值得崇敬的，您在我生命中的存在更令我的信仰得到了强化。[1]

---

[1] 这段话写于1807年，也就是荷尔德林精神崩溃五年之后。

斯卡达内利

我在诸神的怀抱中得到哺育并长大

在荷尔德林的心灵完全没入黑暗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对希腊的渴望以及对诸神之存在的神秘感受，一直都不曾消退。法国南方，那里的民众以及古老的废墟，令他对希腊有了更为近切的感受，他在返回德意志之后这样写道。他还颇为含混地谈到了“那强有力的元素，那天堂的火”，而且还给出了相当醒目的申述：“鉴于神话传说都在讲述英雄的故事，那么我也可以说，我是被阿波罗击倒的。”一些批评家虽然尽心尽责，但不够敏锐，他们竟然认为这话的意思可能是指荷尔德林在回家路上中了暑，荷尔德林的这趟回家之旅包裹在一片晦暗当中，刚才引述的那个故事根本无助于揭开这个谜团。荷尔德林早在1798年，就曾谈到某种“恶灵”正在折磨着他。在动身前往法国的前夜，他尚且致信友人：“现在我担心，我的命运将会跟坦塔罗斯的命运一样，坦塔罗斯根本没办法吞噬那么多的神灵。”[1]《恩培多克勒》这份诗篇同样充斥着悲剧预感。在《安提戈涅》评注当中，也有一段话特别谈到了癫狂，这似乎暗示了，他在最终崩溃之前，已经有了崩溃的体验，而且也暗示出，他差不多是有意识地靠着癫狂来寻求逃避：

> 在意识臻于极致的时刻，逃避意识，在被神灵真正抓住之前，用大胆甚至亵渎的言辞对付神灵，由此来防护精神之神圣的生存空间，此乃处身隐秘境地的灵魂往往会采用的一项重大防御措施。

回家之后，荷尔德林判若两人，而且极为专注地从事希腊作品的翻译工作。在发病间歇期，他表现得更是清明。这一切都令辛克莱尔拒绝相信荷尔德林真的疯了，反而认定他只不过是在效仿哈姆雷特，装疯卖傻，以此逃避生活。1804年，辛克莱尔将他从家中带走，在黑森-霍姆贝格公爵那里给他找到一个图书管理员职位，由自己给他支付薪水。然

而，荷尔德林的状况显著恶化，他于1806年被移交给图宾根的一家诊所。为期一年的治疗虽然没有根除病状，不过也已经令他成为不那么危险的疯子了，于是他于1807年离开诊所，并在图宾根与一个名叫齐默尔（Zimmer）的木匠同住。在那里，他一直待到1843年去世，这期间，一直都有温和且合理的监管。同样也是在这个时期，荷尔德林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不过，剧烈爆发的情况越来越少见了，而且也不是那么压抑了。

传闻、文献以及报纸杂志都对这个时期极为关注，种种说法更是五花八门，这也就难怪波墨会有如此决绝的怀疑，他对流传下来的一切描述和故事都不相信。然而，最富悲剧色彩的故事却并非依托传闻而来。1804年7月，小沃斯（Voss the younger）将荷尔德林的几段索福克勒斯译文大声朗读给席勒和歌德听。这些译稿刚刚出版，很显然，此前，有关荷尔德林境况的一切消息都不曾传递到魏玛这个封闭的圈子。荷尔德林的译文是席勒一直都想望着予以媲美而不得的，今天，世人普遍认为荷尔德林的译本乃是绝佳之作，尽管偶尔会有不准确的地方。这些译文绝对都足以成为辉煌诗篇，特别是其中的合唱队唱词，更是散发出令人迷醉的朦胧之美。然而，静穆和单纯在荷尔德林的译文中是完全不在场的，而且，在《安提戈涅》译稿中，荷尔德林还给诸神起了很怪异的名字，译者本人在注解中就此事做出了解释。他认为，“上帝”一词用于指称希腊诸神在这个时代显然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基督已经将此一称谓篡为己用了。荷尔德林的索福克勒斯译本完全未能赢得德意志主要希腊主义者的认肯；整个这派人都不免在内心里自问，此人究竟是不是真的疯了。“一定要读一读《安提戈涅》的第四段合唱队唱词，”沃斯致信友人说，“估计您能想象席勒是怎么笑的。”数年之后，荷尔德林差不多已经丧失了记忆，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一个曾经悲剧性地彻底误解了他的人的名字，竟然还能够令他闪现出一瞬间的旧日热情。“荣耀的席勒！”这个可怜人禁不住脱口而出，尽管此时他已经记不得自己的名字，自称“斯卡达内利”（Scardanelli）。

然而，荷尔德林已然朦胧的记忆中，仍然存留着希腊人，而且那朦胧的希腊记忆反而变得更为强韧。在发病的早期（至少有这样的传闻），家人曾专门请了一个颇有天分的年轻人给荷尔德林朗诵荷马诗篇，借此来缓解症状的爆发烈度。荷尔德林曾经信仰的希腊之美，此时无可拆解地同他对一个已经故去的女人的记忆纠结在一起，这个女人的信笺他仍然保存着，不过，很可能已经被遗忘在杂乱的书稿堆里了。

> 假如相隔遥远，虽然我们此刻分离，
>
> 我依然为你和你之过去所熟悉，
>
> 噢，我痛苦的共享者，
>
> 能否显露你的拳拳善意……

渐渐地，荷尔德林失去了持续写作的能力，不过，他仍然在残篇断页间写下给狄俄迪玛的信笺，有时候用散文体，更多的时候则是用品达体或阿尔凯奥斯体，这些文字一直都是围绕同样的主题展开的：同上帝或命运的搏斗与缠斗、对希腊的敬意。至少，这是魏布林格（Waiblinger）的说法。此一时期，荷尔德林的言谈中掺杂着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令人无从理解。1811年，荷马诗篇偶尔还是能够对荷尔德林的病状形成安抚，生活中一点点的不如意或者一点点的轻慢，都有可能令他发病，这同正常状态之下他那种谦卑风格形成了极为怪异的对比。1822年，当魏布林格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尚且拥有连贯的表达能力，不过，仅仅是围绕三个话题展开的，其一是苦难，其二是俄狄浦斯，其三便是希腊人。据说，他听闻1822年的希腊解放战争之时，仍然能够散射出一瞬间的热情之光，但仅仅是一瞬间，接着，他便重新没入无尽的黯然和冷漠当中，将自己闭锁在隐秘之地，关切着一己之思。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荷尔德林对希腊的爱转变为狂躁和愤怒。这个时期，他会简短地拜访正在翻译埃斯库罗斯的康茨（Conz），眼神中常常会表现出提防和紧张，他会大声阅读几段原文。接着，他会突然高声

喊叫说："我一个词都看不懂！这简直是天书！"言语间还爆发出阵阵歇斯底里的怪笑。1824年，魏布林格对荷尔德林有了很深的了解，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希腊成了荷尔德林的禁忌话题。法兰克福、狄俄迪玛、他昔日的诗篇、希腊人，这一切都是不能在他面前提起的。倘若有访客因为疏忽或者是出于故意而打破了这个禁忌，他就会变得极端亢奋且愤怒。有那么一次，他尖叫着说，狄俄迪玛为他生了很多儿子，现在已经疯了。最后，仅存的这么一点儿可怜记忆也离他而去。当费舍尔向他索要一份诗人在不惑之年写就的诗篇时（此时的荷尔德林仍然能够随意写就愉悦、轻快的韵文，虽然那样的诗篇已经没有任何意涵可言了），他即刻应答说："既然阁下有令，我自当遵从。那么阁下要哪方面的呢？春天？希腊？还是时代精神？"费舍尔选择了时代精神。

"没别的，就是对该死的异教徒的热忱，冲昏了他的头脑。"据说这是担当着荷尔德林养父职责的木匠齐默尔1836年向年轻的德意志作家古斯塔夫·库恩（Gustav Kühne）说的话。倘若齐默尔真的有这么一番高论，那也足以见出这个木匠的锐见，即便不能说这话正中要害。荷尔德林的精神崩溃之直接原因或者说是直接症状，在我看来就是他在那最后的关键时刻得到的令谕，这令谕要求他改变对即将满载荣光回归世间的希腊诸神的忠诚，转而将这忠诚交付人子基督。此前，他的精神一直都是靠着希腊梦想活着的，一旦弃绝了那样的梦想，他的精神便随之死亡了。这死亡倒也不是顷刻间便到来的，而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和痛楚之后到来的，也就是在这么一个过程中，他那狂躁的病状逐渐淡化为绝望的冷漠。紧随死亡哀鸣而来的是一片静寂，那静寂之中回荡着斯卡达内利的哽咽之声，此时的荷尔德林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了。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就这么毁灭了，这景象实在令人惊惧。此情此景，人们甚至都分不清楚，究竟是一度宠爱着荷尔德林的希腊诸神抛弃了荷尔德林，还是此时的荷尔德林已经同诸神重聚了？

温克尔曼的希腊观念作为一个活的传统，借由莱辛、赫尔德、歌德

和席勒这么一个脉络得以串联并传递下来，荷尔德林则是这个统绪的最后一脉。荷尔德林同赫尔德、歌德、席勒都有个人交往，还尊席勒为老师、主人，从席勒那里接收信息。然而，温克尔曼诸门徒当中这个心地最为单纯者，却没有留下自己的追随者。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诗篇直到1826年才开始结集出版，其中有很多都是第一次面世；他最伟大的诗篇则要等到1846年才算真正同世人见面；他毕生最具分量的一些断篇，则要等到今天才得以刊印在《神殿入口》（*Propyläen* ）当中，跟公众见面。辛格纳吉（Zinkernagel）在岛屿出版社出版了荷尔德林文集，这是荷尔德林作品的第一座纪念碑，荷尔德林也得以第一次有机会充分展现在世人面前。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荷尔德林都是在20世纪才被人们发掘出来的，当然，尼采是个众所周知的例外，他了解并崇敬荷尔德林。

荷尔德林之后，温克尔曼开启的这条脉络便断了，温克尔曼的希腊梦想便也随同荷尔德林归于消逝。自温克尔曼发掘出那样一个希腊之后，德意志人对古希腊的浪漫乡愁便被激起了，这乡愁在荷尔德林这里臻于巅峰，也归于完结，荷尔德林也因此沦为一种理想的祭品，这理想，即便是荷尔德林的信和爱，也是不能实现的。这场挫败令荷尔德林承受了个体的绝望，当然，并非他一人有这样的绝望。不过，他是第一个酝酿并享受那种自我牺牲观念的人，当初，温克尔曼可是拒斥了此等观念的。希腊诸神已然死去，这是赫尔德予以认定的，是席勒予以强烈追怀的，是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予以最终认肯的，为此，歌德还说："让他们走吧，他们的日子结束了。"不过，唯有荷尔德林拒绝接受此一事实，并且也发现自己不能接受此一事实。德意志古典运动的两大巨头，对于希腊黄金时代的消逝表示出极为痛彻的遗憾之情，这样的情感同荷尔德林予以伸张的那种乡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他来说，希腊黄金时代乃是他所珍视的精神财产，这情感是如此浪漫，就如同置身北方荒凉之地的杉树，在梦想着火热南国的棕榈树一般，兀自哀伤落泪。歌德和席勒都曾尝试将那棕榈树移植过来，但结果反而是令那梦想碎裂。两人都发觉，那古老的希腊于现代人乃是无缘的理想，两人也都从

这一梦想当中惊醒。荷尔德林拒绝接受这一点。他转而认从席勒式的未来愿景，在那样的愿景中，希腊式的和谐将在更高的境界中得以重建，显然，这仅仅是形而上学冥思之事，而非现实操作之事。席勒极为尖锐地将真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区分开来，并且也能够在两个世界之间转换身份，席勒的这堂课是荷尔德林根本没有学过的，而且荷尔德林想必也学不会。但席勒终究是一个伟大梦想家，他的梦想当中蕴含了极为巨大的灵感力量，令他的梦想成了荷尔德林的现实。荷尔德林信从席勒的理想未来，他将这样的未来阐释为诸神的回归，并且，他还向这个世界传扬着此一信息。至于席勒，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创造了荷尔德林，但他最终从这理想之地背身离去。精神之父最终还是抛弃了自己的精神子嗣。

作为温克尔曼统绪的最后传承者，荷尔德林的命运蕴含了噩梦般的逻辑特质。数代伟大人物对于一个伟大过去的爱恋和渴望，竟然在荷尔德林这里结晶为一个固定观念：那个消逝的黄金时代即将回归。这本身就是十足的讽刺。对希腊诸神的审美热情，竟然造就了这么一个率真且忠实的信徒并以此作为收场。这也是十足的讽刺。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战争由此便在这个年轻人的心灵当中获得了一个悲剧性的终局，对这个年轻人来说，这场战争不仅是哲学问题或者个人气质问题，甚至也不仅是致力于调解两种不同生活观念的诗性欲念问题，还是人类精神之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状，乃是因为温克尔曼在发现希腊的时候，也解放了德意志人，令德意志心灵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扑向一种观念。现在，是反抗的时候了。令人欣慰的是，此时，造反者已经诞生了。

---

[1] 这实际上是借用了品达的一句颂词，见Pindar，*Olympian*，I，54-57。

第七章 反叛者：海涅（1797～1856）

路西法

海涅作为抒情诗人的地位如今是人人都认肯的，不过，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却一直都不曾得到充分评估，当然，部分原因在于，此种尝试本身有着相当难度。在青少年时代之后，海涅便不再运用任何形式的传统文体了，青少年时期的海涅曾写就两部并不成熟但也并非没有前途的韵文体悲剧[1]，并且还着手创作一部小说[2]。此一时期，海涅写就的成形作品除了上述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还有一部诙谐体的史诗[3]和一份讽刺体的叙事诗[4]。在埃尔斯特版的海涅作品集中，散文体作品占据了七卷中的五卷，这些散文体作品的形式并不明确，内容颇为复杂，情感也是多种多样。此外，还有一些游记作品[5]，风格不一，有的是浪漫派风格，有的是印象主义风格，还有的则是现实主义风格，其中包含了大量主观和虚拟的素材，纯粹描述性的东西极少，有很多都是对生活的反思。文学评论和美学评论方面的东西[6]，则最终都成了政治、宗教以及社会性的宣传作品。更为纯粹一些的政治作品[7]，则诗性的内容和理论的内容差不多平分秋色；自传作品[8]赋有玄想的神秘特质，要么是为着论战目的而展开的宗教自白，要么是对过去进行的极富想象力的重构。他写就的浪漫传奇故事[9]则是虚构、自传和象征主义的集合。关于德意志哲学的作品[10]实质上是一份预言。几部芭蕾舞剧本[11]深染宣传色彩；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集[12]都是审美性质而非科学性质的文字，有着强烈的情感诉求。海涅运用的标题极具误导性，他的写作技巧也极其令人困惑。传记[13]会在无形中变成自传，会自行消解为一系列的攻击和谴责，并最终消融为一种神话叙事。讽刺作品[14]则会在一番渲染

之后，幻化成种种愿景。

将海涅称为随笔作家或者小册子作家，这恐怕是低估了他；将他斥为报刊作家，则是严重的不公。“讽刺作家”这个称谓似乎更为切题一些，不过，也完全不足以涵盖海涅作品所展现出的异乎寻常的情感。而且，海涅在作品中刻意为之的自我剖白显然不能归并在“讽刺作家”这一称谓之下；在海涅作品中，第一人称的运用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即便是讽刺元素也并没有贯穿海涅的全部作品；在他的六部更具分量的散文作品中，讽刺元素总体上只是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诸如他有关德意志哲学和文学史的作品、他对1832年和1840～1844年巴黎的叙述，以及他的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等等。事情的真相在于：海涅并非自己作品的唯一作者；他还有一个合作者，这个合作者是无情的奴隶主，也是海涅的仇敌，同时也是海涅的不幸伙伴。这个合作者就是海涅处身其中的时代精神，海涅自己称之为“观念”。“不，并不是我们抓住了观念；是观念抓住了我们，它奴役我们，用鞭子驱赶我们进入角斗场，我们不得不为它而战，就如同古代的角斗士一样。”早在成年之前，就像海涅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就已经加入了自由大军。也许，更恰当的说法应当是：早在成年之前，他就已经被那粗笨的政治机器吸进去了，那机器将他拖进世事污浊当中，碾压他，最终又把他吐了出来。海涅的生活实际上是一场悲剧。每一场、每一幕，海涅都亲笔记录下来，这记录工作乃是在他那严厉的合作者的监督之下实施的，这个合作者总是过分热心地介入其事。就这样，海涅和这个合作者轮流书写主人公及其对头。结果，海涅的作品无法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每部作品都自成一体，分别呈现出一个天才在同激荡时代缠斗之时犯下的种种罪错以及承受的种种苦难。海涅的作品集所呈现的就是诗与生活之冲突的现代版本，这个版本是非常伟大的，不过，基本上也是模糊难辨、令人费解的，这是因为这些作品并未凝结为明确、固定的形态，而是在时光中涣散飘摇。海涅的精神生涯之开启当然是对生活轻浮且莽撞的挑战，这样的生涯经历了众多的起起伏伏，包含了诸多闹剧场景，睿智颇多，基本的态度是玩世不恭与屡

败屡战。总体来说，海涅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部悲剧，他的抒情诗在其中扮演了合唱队的角色。那样的抒情诗篇散射出透人心脾的甜蜜，也渗透了莫可名状的痛楚，在乐感节律当中，回响着主人公的全部激情和情感。这其中，最具启示色彩的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乃是恐惧，那是在面对四处奔袭而来的滚滚红尘之时生出的激情。这就是一出大戏，如同画卷一般在读者面前缓缓展开，这样一出戏剧灌注了令人痛彻心扉的现实主义气息，尽管海涅一直都竭力以理想化的态势来刻画主人公。此种理想化的处理方式当然产生了反弹，最终令他自己深受其害，这样的效果丝毫不逊色于他对敌人实施的恶毒攻击；如果说整出戏剧是一种自我呈现，那也同样可以说，这样的戏剧是一种自我揭露。事实上，人们也都在反复引述他发表的作品，以此证明海涅此人是记恨、恶毒、残忍之辈，他为人怯懦，甚至没有信义，有着强烈的自怜自负倾向，满心妒意和恨意。不过（除了一直都在对他发挥着救赎效能的心灵之美），他作品当中也不乏段落展示他的慷慨、仁慈、友善、勇敢以及忠诚。那么，何以调和他的侠义精神与他的肮脏谩骂之声呢？何以调和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与他的恐惧喊叫呢？他内心的绵绵恨意，奔涌不绝，那背后显然潜藏了恶魔般的能量，同时，他内心的爱意也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这样的情形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倘若回望一下他生命当中最后八年的那个殉道期，便不难想见一个惊颤不已、面色苍白的惶恐犹太人形象同种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意象是如何纠结起来，轮番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那八年的殉道时光，因为奉献给一桩伟大事业而尽享光华，但其中也充斥着犹疑和软弱，在这一切之中似乎灌注了一种兼具悲剧感和美感的目标诉求。然而，这两种意象实际上都经不起仔细考察，而且，他那魔鬼般的笑声也足以将这两种意象击得粉碎，由此便有另一种更为贴切的意象浮现而出，那是海涅用来指称“黑色威廉”的比喻性说法，海涅曾亲眼见证因为同谋爱德华·汤普森的揭发而在老贝利被处死的场景：

据中世纪传说，撒旦曾经是个天使，同众天使一起生活在天堂，

> 后来，他尝试怂恿众天使造反，上帝将他贬入地狱的永恒黑暗当中。从天堂坠落之时，撒旦的眼睛就一直盯视着上界，他一直就那么死死地盯着那个揭发了他的天使。他在地狱当中沉陷得越深，他的眼神就越可怕。那必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神，因为一直被盯视的那个天使变得面如死灰；从此之后，那个天使的脸上再也没了光彩；后来，那个揭发了撒旦的天使被称为死亡天使。
>
> 现在，死亡天使爱德华·汤普森也变得面如死灰了。

可惜的是，海涅的敌人绝少有谁具备足够的想象力，因此，在海涅那可悲的不断坠落的过程中，不会有谁真的变得面如死灰，即便有这样的人，也是为数极少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海涅那痛苦、恶毒的目光也着实令人害怕。海涅之坠落正是这些人所为，这一点可以肯定，但罪责真的在他们身上吗？诸如普拉滕（Platen）公爵、卡尔·古茨科（Carl Gutzkow）乃至路德维希·伯尔纳（Ludwig Börne）之流，以及一干宵小，这样的人，真的有能力压倒海涅吗？更不用说那一干俗众同谋了。于是，人们也就有理由认为，此类人物在海涅的生命中，不过是顺势而为，就如同重力法则一样，不断地侵袭这个不幸诗人。海涅处身其中的那个时代，生活的阴暗领域似乎一直都是他摆脱不了的，似乎一直都在追逐他，而且，看起来他也是无可挣脱的了，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还是个满怀自由激情的极度敏感的诗人。此外，他的经济状况永远都不曾改观，他的家庭情感永远都是那么强烈。种族上的偏见、文学上的嘲讽、政治上的指控、经济上的拮据以及家族方面遭遇的刻薄对待，这一切的元素都汇聚起来，最终令海涅从诗歌的天堂跌落，沉入谩骂和阴谋的黑暗深渊当中。然而，他的境遇并未到此为止。他不仅就禀性而言没有能力超脱世事，而且还想望着在诗歌天堂与红尘世事中都要实现梦想和理想。抓住那被人叫作“自由”的喀迈拉，并借由制度手段将之确立于世；以手中如椽大笔去书写并找寻那和平、丰裕、和谐的黄金时代。这些都是他的目标和诉求，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这些都是他要求自己的天才去做的事情。然而，这样的目标和诉求违反了游戏规则。天才之本性就在于其永恒性，这样的本性跟时间无涉；所谓天才，是要挣脱相

对和绝对这一对比框架，如果一定要就天才说些什么的话，那就只能说，天才必定要尽可能地在形式上向着完美靠拢，并靠着这样的手段展开自我表达。然而，海涅却将自己的天才消解在时间脉流当中，他选择了去创造仅仅具备相对价值的东西。他的作品尽管都拥有巨大的美感，但也都负载了诗性想象和冷硬事实之间的歧异和裂痕，犹如同床异梦者之间的关系那样令人难安，两者终究难免要不停地扭打、搏斗，难免要沉陷彼此间的怒火当中，分道扬镳的命运是无可避免的。海涅试图从永恒梦想之境进驻现实规划之境，从根本上便已经犯下巨大错误。这令他从永恒之境坠落到时间洪流当中，这实质上是他生命中的悲剧，他在道德上的滑落和退步只不过是此一悲剧的一个侧面而已，而且还不是最具分量的一个侧面。然而，即便是这一点，也不能完整地解释诗人在面对海涅之时，不免要生出的那种非理性感受。实际上，海涅的自我感受也同样是非理性的。人们不难察觉出，海涅生命中的此类堕落现象尚在其次，因为人们都不难感受到，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另外的某个时刻，海涅身上发生了一场严重得多的堕落。那样一场堕落跟种族偏见无关，而是某种可怕的个体性的灾难：

> 哦，且让我饱览往事，俯瞰今人，那是怎样一番光景啊！且让我漂荡黑夜的大海之上，倾听波涛翻滚，所有的感觉和记忆一下子在内心苏醒，我仿佛在俯临人世，突然袭来的恐慌令我战栗、迷狂，令我跌落这尘世；我一度感到自己的眼睛因这远观而变得无比澄明，似乎真真切切地见证了星体在天空穿行，但是那炫目的光华又遮蔽了我的双眸；接着，就仿佛千年的沧桑和万般的思绪涌上心头，那是难以尽数的古老智慧；但是，这一切又是何其朦胧，令我难明其意。

此类返祖记忆暗示了一个堕落的神灵。诗人很可能意识到了此乃一场无可挽回的毁灭，一种失落了希望的生活，正是此种意识，令海涅倾注自己的全部睿智、诙谐以及讽刺才能，意图推翻人间君王和权贵，甚至将更为强大的神灵也拉下台来：

> 他就那么面露着笑容，仿佛他自己就是毁灭之神。就仿佛他希望看到毁灭，毁灭一切，只要他还能够承受那巨大的毁灭带来的噪音。

这的确是路西法的微笑，无所畏惧，无往不利。这撒旦式的毁灭情感当中无可拆解地化育了一种兼具羞耻和悲伤的激情。海涅，既被逐出天堂，便只能承受自身之内部光亮同尘世黑暗之间那无可猜度的深渊，他无法在二者之间展开和解：

> 诗人总是借助诗篇之光华现身这个世界；诗人可远观不可亵玩，远观之下，他们实在光彩照人。但切不可近观诗人！若是远观，他们周身都散射出美妙的光芒，令人如同置身夏夜的凉亭和草地，仿佛他们就是落在尘世的星星，是花园里玩耍的王子遗落的宝石珠玉；或者是草丛中落下的夕阳余晖，在嬉戏跳跃，等待着与黎明聚会，等待着融入黎明的霞光当中。切不可在朗朗天日之下去找寻这星星、这珠玉、这落日余晖。否则，就只能看到一条褪了色的可怜小虫，在泥土中仓皇爬行，看一眼便令人倍感憎恶，你都不愿意踩它一脚，因为它实在是太可怜、太卑微了。

海涅真的像他自认的那般伟大吗？他时常宣称自己是诸神的一员，真的是这样吗？他常常以动人的辞令宣示说，他是不朽的诗人，只因境遇所迫零落尘泥，在这肮脏世事中挣扎搏杀，是这样吗？在他身上，我们所见证的究竟是一出真切悲剧，还是一番纯粹的恼人说辞呢？倘若海涅在1848年死去，人们势必不会就这些问题给出毫无犹疑的肯定回答。“不朽”是个大词，倘若海涅死在1848年，人们也许不会将这个词用在海涅身上。“英雄”一词蕴含了仰慕之情，完全有可能被世人滥用。海涅将自己的心灵投注于红尘俗世当中，寄托于现实诉求，这其中当然有滥用和浪费的情况。但不管怎么说，海涅的心灵都是一个伟大诗人的心灵，从中彰显而出的愿景令海涅远远地超越世间俗众，这一点有1851年的《罗曼采罗》（*Romancero* ）为证，而且还有一些散文作品以及一些身后面世的诗篇也可以为证。如果说他的三十载成年生涯更容易招致诟病而非赞誉，且更令人们难以平心静气地对他予以评判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在他生命中最后八年的殉道时光当中，他的英雄主义情怀则是如同亮光一般，散射而出，这一点无人可以质疑。海涅并非擅长隐忍之人；特别是在生涯开启之时，那狂放的哀叹之词一再从他口中喷发而出。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完全是顺其自然的，而且他的耐性也是相当可

观的。他的幽默感、机智、爱美之心、情感，乃至他的敌意，都是即时而发，并集结起来，令他浑身都充满狂暴的、创造性的能量，正是因为他时常宣称自己是超人，此说也并不为过。他的灵魂则依然自有其“日出日落”。他是在自身想象力那“崇高且永不褪色的荣耀”当中寻求力量和慰藉的。即便在不断遭受身体痛楚的那些年，他的心灵依然能够愉悦他人，也能愉悦自己。这真是奇迹，足以令众人在仰慕中哑口无言。

时间，自然会摧毁人的身体组织，它毁掉了海涅的骨头，令海涅的肌肉萎缩。尽管他正值鼎盛年华，时间还是无情地将他抛弃，令他成为运动和事件洪流的局外人，令他在“床褥墓穴”中度日如年。当初，他为之奉献天才的事业同时也在侵蚀他的灵魂，但现在，这一切都离他而去了。这八年的时光可以说是静止的，海涅则在这段时光当中，纵情于或美丽或邪恶的愿景和幻象当中。有时候，愿景或者幻象也会消退而去，令海涅可以看到那可怕且无望的现实。于是，现实令他惊惧，显然，这是一个遭受着病痛折磨的路西法：

> 1480年，诸般歌谣回响在德意志大地，这些歌谣比德意志昔日的任何歌谣都要甜美，都要可爱；人们无分老幼，特别是妇女，都沉醉在这些歌谣当中，甚至于一个人行遍德意志大地，从日出到日落，到处都能听到此类吟唱。然而，这些歌谣……乃是一个年轻牧师所作，他正遭受着病痛折磨，在狂野中离群索居，自绝于世。读者当然都知道，在中世纪，麻风病意味着什么，也都知道，贫穷可怜之人一旦患上此等无可救治的疾病，会被隔绝在人类社会之外，禁止接近同伴。这样的人，会像活死人那样四处游荡，从头到脚，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条头巾将脸遮挡起来，还需要手持拉撒路拨浪鼓，以便适时警告人们，他要路过，请回避。这个可怜牧师就是这不幸群体中的一员，即便是《林堡编年史》也不能忘怀他的诗才；当整个德意志大地都如醉如痴地吟唱他书写的歌谣之时，他却枯坐孤寂境地，兀自伤怀。他的诗才、他的令名，正在于他那天下闻名的讽刺之能，他无情地嘲讽上帝，无论中世纪那华美饰物给予上帝何等打扮，当日之情形不正是今日之情形吗？……我时常在哀伤的午夜幻象当中，看到那牧师就站在我面前，《林堡编年史》中的他，于是成了我的兄弟，如同阿波罗一般显灵了；他那苦难的眼神散射出异样的光芒，透过那遮挡脸庞的头巾，盯视着我；不过，转瞬之间，他便飘摇而去，只听见那拨浪鼓的声音渐渐远去，如梦如幻。

[1] *Almansor*， 1821; *Ratcliff*， 1822.

[2] *The Rabbi of Bacherach*， 1824-1826.

[3] *Atta Troll*， 1842.

[4] *Germany*，*a Winter's Tale*， 1844.

[5] *The Journey through the Harz*， 1824; *The North Sea III*， 1826; *English Fragments*， 1827-1830; *The Journey from Munich to Genoa*， 1828-1829; *The Town of Lucca*， 1829-1830.

[6] *Romantic Poetry*， 1829; *Menzel's German Literature*， 1828; *French Painters*， 1831; *The Romantic School*， 1833-1835; *Letters about the French Stage*， 1837; *Introduction to Don Quixote*， 1837; *Shakespeare's Girls and Women*， 1838.

[7] *Introdution to Kahldorf on the Nobility*， 1831; *Conditon in France*， 1832; *Lutetia*， 1840-1844.

[8] *Ideas*， 1826; *Epilogue to Romancero*， 1851; *Preface to Salon II*， 1852; *Confessions*， 1853-1854; *Memoirs*， 1855-1856.

[9] *Schnabelewopski*， 1833; *Florentine Nights*， 1836.

[10]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Germany*， 1834.

[11] *The Goddess Diana*， 1846; *Doctor Faust*， 1847.

[12] *Elemental Spirit*， 1836; *Gods in Exile*， 1853.

[13] *Ludwig Borne*， 1839.

[14] *The Baths of Lucca*， 1829.

作为鬼魂的诸神

海涅的希腊语功夫足以阅读荷马诗篇原文；他对荷马诗篇了解得非常透彻，而且也有充分认知。他对希腊悲剧作家所言不多，尽管他肯定读过他们，也喜欢他们。他倒是极为敬仰阿里斯托芬，他在阿里斯托芬身上辨识出跟自己类似的精神，并且只用寥寥数语，便以雷霆之势将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刻画出来，足以令施莱格尔无地自容。简言之，海涅谙熟希腊文学，是希腊文学颇为昌明的仰慕者，不过，他从一开始就决绝地反对现代人模仿希腊题材和古典节律。希腊诸神、希腊英雄以及希腊神话不仅是海涅的老相识，而且，这一切于海涅而言也都是活生生的观念，海涅心灵之塑造，这些观念都是功不可没的。他稔熟无数的古典掌故，此类掌故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出现。当然，一般而言，他会在其中融入自己的创造性理解，而且他也总是将希腊掌故同犹太教传统、基督教传统乃至东方神话中的掌故予以并置、比较或者对照。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仔细考证希腊影响力是借由怎样的德意志渠道传递到海涅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在海涅时代，希腊观念已然融入海涅呼吸的空气当中了。《自白》（*Confession* ）中有那么一段话申述了倘若他作为一个德意志神父和考古学家能够置身罗马，那将会是何等美妙的生活，从这段话中不难见出，海涅是研读过温克尔曼信笺的。倘若温克尔曼读到海涅给予拉奥孔群雕的献词，想必会在墓冢中激奋不已：

此刻，来甜蜜地拥抱我，

你那美丽的迷人的捆绑；

优雅地，缠绕我，

用身体、手和足！

她已盘卷并将我缠绕

她那美丽的婀娜之姿——

我，乃至福的拉奥孔，

她，乃最奇妙的蛇。

海涅另有一份题为《吗啡》（*Morphine* ）的诗篇是直接从莱辛有关“死亡”和“睡眠”这对孪生兄弟的小册子当中获取的灵感。不过，这份诗篇之结尾却是相当痛楚的，是以希腊谚语“于人类而言，最好之事莫过于不曾出生”作为结尾的。海涅对莱辛极为敬重，对席勒那样的伟大心灵同样敬仰，但经常嘲讽席勒的诗歌。他跟赫尔德一样，对希腊诗歌和希腊文明采取了比较的视角；不过，即便海涅不曾读过赫尔德的一字一句，他也仍然会采用这样的视角。海涅不可能知道荷尔德林的诗篇，因为在《苏阿比亚镜鉴》（*A Mirror for Suabians* ）所举证的杰出人物当中，根本不曾提及荷尔德林这个名字；不过，他应该听闻过荷尔德林发疯的事情。“想想龚特尔（Günther）、比格尔、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不幸的勒瑙（Lenau）吧！”1849年，他曾向梅斯内尔宣泄说，“还能说什么呢，这就是德意志诗人的诅咒！”然而，无论海涅对这些希腊化的德意志人是否了解或者了解多少，同希腊在他生命中的分量比较起来，那种了解是无足轻重的，正是希腊的影响力，部分地解释了海涅之于希腊诸神的持续关切，并且肯定也部分地塑造了海涅的此种关切。于海涅而言，此乃歌德传递下来的影响力，因为歌德表征着德意志古典主义，表征着奥林匹斯王朝以及希腊造型艺术。

那么一个希腊黄金时代，于温克尔曼、莱辛、歌德、席勒以及荷尔德林而言，表征着永恒、完美之物，全然超越了时间的毁灭力量，无论他们将那个黄金时代置于过去、当下还是未来。海涅则跟赫尔德一样，从相对的角度来体验希腊。在生命将近结束之际，海涅说，他历来都将整个的过去、整个的当下和整个的未来都背负在身上。他立足自身所属时代的滚滚红尘当中，回望过去，前瞻未来，于他而言，不会有什么东西是稳定的、固定的或者经久的。他那富有深沉怀疑的理智，是显然已

经灌注了相对主义元素的心灵的产物，在自身所属时代的潮流当中，灵动而变。希腊艺术之静穆和安详，因其完美而吸引着海涅，也因其遥远令海涅生出拒斥感。他用一个词来总括此类感受——“大理石”，就是美丽、冰冷、无生命且静谧，但终究不可小觑的东西。他的异教生活观念也正是如此，那夜夜萦绕在他梦中的希腊诸神，同样也是如此。1816年的《梦中幻象》（*Dream-Visions* ）是他最早一批诗篇之一，海涅在这份诗篇中描摹了自己如何拥抱着一个“大理石般苍白的少女”（maiden marble-pale），这个少女实际上已经死了。这不免令人即刻联想到歌德的《科林斯新娘》。也许是偶然，不过这毕竟是第一次将歌德同大理石的寓意联系起来；此后，二者之间的联系便变得明确且紧密了。1819年，另一种思维联想也得以第一次浮现出来，此一联想也同样是海涅式的。此一联想建基于相对性之上，就是以合题或者反题的方式，将希腊神话和犹太神话（也包括基督教神话）联系起来：

苹果是恶的根源。

夏娃借苹果带来死亡；

厄里斯[1] 带来伊利昂的灾火：

你带来灾火亦带来死亡。

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这种对峙，此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海涅剖析生活之时所依托的模式，此一模式激发了海涅1820年的论章《浪漫派诗歌》（*Romantic Poetry* ）；两种生命观念之间的冲突所触发的悲剧呈现在《阿尔曼梭尔》（*Almansor* ）当中，在其中，海涅所偏爱的主题——十字架之于夜莺和玫瑰的胜利，被极为娴熟地引入作品当中，并得到了精细刻画，这在海涅的作品中尚属首次。

接着便发生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1824年10月1日，海涅前往魏玛向歌德表示敬意，但受到冷遇，甚至可以说是遭遇了很唐突的回绝。有人说这是因为海涅告诉伟人歌德，自己“也”在计划写作一部《浮士

德》，这话惹恼了歌德，此一传闻之真假，我们就无从知晓了。此前，海涅曾将《诗歌集》（*Poems* ）和《悲剧集，以及一份抒情间奏曲》（*Tragedies with a lyrical Intermezzo* ）赠送给歌德，并附了两份极为恭敬的信笺，但歌德均置若罔闻。歌德在自己的任何作品中都不曾提及这个年轻诗人的名字，此次，他给予海涅的冷遇则更是确定无疑了。一开始，海涅只是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甚至还以此自我欺骗。但是后来，海涅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并且像席勒在他之前已经做过的那样，就自己和这个魏玛圣人之间的本质差异展开分析。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跟席勒仍然是一样的，他绝非那种狂妄之辈，因此，他绝不至于否认或者小视对方的天才。海涅内心对此事的郁结是难以消解的，并且终究是要表现出来的。他以种种方式对歌德的品性表达过不屑之词，此类说辞倒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理据。如今，奥林匹斯王朝看来是已经拒绝他了。奥林匹斯王朝与他无关，此次教训，海涅定然是从中有所汲取的。此次短暂的拜访并没有改变歌德什么，不过，对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诗人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一场悲剧。然而，此次拜访拓展了海涅的视野。这次拜访于海涅而言，等于是同一个奥林匹斯神灵来了一次面对面，此等体验令他终生难忘，此次拜访之后，他总算知道荷马诸神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海涅之于希腊诸神那种诗性的、创造性的和极具现实气息的观念，首先要归因于歌德，而且，海涅在这方面的昂扬兴致，看来也应当首先归功于歌德。

我相信，1824年的《哈尔茨游记》（*Journey through the Harz* ）就是海涅实施的一次复仇行动，这样的复仇决绝且真切地展示出海涅的风格，尽管在当时，这部作品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在整部作品中，只要有机会，海涅就会把歌德拖进来，并且还有两次特别明确地提到了《维特》。阅读布罗肯山那顿晚餐中发生的事情，读者便不免会一再地联想到歌德。两个年轻人，如同大理石雕像一般美丽、苍白，其中一人像极了阿多尼斯，另一人则跟阿波罗颇有神似之处，而且两人都是好酒且极易感伤之士。布罗肯山的晚餐中，两人在一片愁云惨雾中，交换着

哀伤和情感。海涅以偷听者的姿态叙述了这个故事，在海涅的一番叙述之下，这故事就像是对维特讲起的一则故事的嘲讽，维特曾跟阿尔伯特讲起一个为爱而选择自溺身亡的少女，这也是格雷琴悲剧之发端。这样的观感肯定是会有一些的，也许读者不会那么轻易地信从自己的观感。不过，这两个年轻人突然间开启那种莪相式的高谈阔论模式之时，便不难想见，这仍然是在影射歌德，尽管有些扭曲。已经酩酊大醉的设宴之人将二人锁进壁橱；两人匍匐在地，不停呕吐，但仍然在夸夸其谈，此番宣泄乃以莪相的一段话作为收场，那也正是维特跟洛特读过的："今天到此为止。"这一系列的怪异意象，诸如大理石、希腊诸神、沃尔夫冈·歌德，肯定不会是纯粹的巧合。

《哈尔茨游记》也呈现了海涅最初的神话幻梦。恍惚当中，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壁龛里的忒弥斯正在同一帮法学家展开论辩，海涅不得不逃离那样的喧嚣和聒噪，冲进隔壁的房间，房间里竖着"神圣雕像"《美第奇的维纳斯》和《望楼上的阿波罗》，海涅拜倒在维纳斯的脚下。此时，希腊的静穆已然穿透了海涅的灵魂，与此同时，福波斯·阿波罗的甜美琴音也正在从海涅头顶倾泻而下。很显然，这样的吸引力生发于同海涅心性正相反对的一个极点。这是根本不可能造就真正的心灵交融的。海涅曾谈论过大海，不过，对于希腊诸神，他肯定不会说出同样的话。海涅之热爱大海，是因为他的灵魂正如同大海。他曾说过，大海似乎就是他的灵魂。大海同他的灵魂是极为契合的，无可置疑的威严、躁动难安、狂放不羁、暴烈、残忍、痛苦。奥林匹斯之神歌德对他的冷遇令他失去自信，并将此等毒液灌注到他的血液当中。很显然，这样一种大海意象或者说是灵魂意象实在是一服适时而来的解毒剂，毕竟，此等意象对静谧构成了决绝的否定，而且那伟大意象当中也是蕴含了无限的。1825～1826年的《北海集》（*North Sea Cycles* ），就呈现了这么一种躁动、狂野且痛苦的元素，此一元素在第一诗集中极速涌起，在第二诗集中，又迅速退去。在这部诗集中，海涅并没有对大海实施理想化处理，他运用的节律是现实主义的。然而，也只有真正热爱大海之人，才

能够如此忠实且准确地呈现每一种变幻不定的情感：壮观的风暴和暗藏凶险的静谧、昂扬的潮起和颓废的潮落、低语抚慰和狂放笑声、阳刚之力和阴柔之美，还有对自己制造的种种灾难所抱持的崇高的冷漠。

大海之上、大海之下以及大海之中，群集着诸神；诸神之令名依然如故，但意涵却已经发生了变化。月神和太阳神，满心哀伤，曾经的爱侣，如今不得不分离：

邪恶的嘶嘶作响的舌头

带来悲痛与毁灭

甚至加诸于那些永生的诸神。

而现在那些匮乏的诸神在天空起身

痛苦游荡于

他们无止境的荒凉之路

且不能死去，

并沿路强行兜售

他们辐射四溢的不幸。

显然，诸神已然不是你想的那样了。倘若哪个神灵在黑夜之中进入你的房间，向你宣示说，曾有那么一段古老且美好的时光，那时候，诸神与凡人同在，而这位神灵正要令那样的时光重归人间，于是高声向你索要一杯配有朗姆酒的茶水，来驱赶那不死的寒意，你大可不必吃惊。你也不必试图安抚波塞冬，因为你不是奥德修斯，你不可能像奥德修斯那样，仅凭水手的粗俗玩笑就能够轻易地打动笨拙的安菲特律特以及涅柔斯的愚蠢女儿们。倘若一定要向大海祈祷，那就这么祈祷吧：

噢，大海！

泡沫诞下的美人的母亲，

饶恕我，爱的祖母！

此等情境令人相当困惑且不安；不过，同接下来的情境比较起来，则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海潮汹涌而来，臻于顶峰，由此形成摧枯拉朽的净化之势，和平随之降临，人们看到基督大踏步而来，如同巨人，耸立于大地和大海之上：

他的头，塔一般伸进诸天，

他在赐福中将手伸展向前

覆盖陆地和海洋。

并如同他胸间的一颗心脏

他承载太阳，

那绯红且燃烧的太阳。

而这燃烧的绯红的太阳之心

倾倒出它恩慈的光束

和它甜蜜的爱的光线，

以容光和温暖

荫庇着陆地和海洋。

在此，基督以古风英雄的身份现身，在海涅的作品中，出现这样的意象也就是这么一次。海涅笔下的基督通常都是在十字架上遭受痛楚的哀婉形象，不过，这一次，也只是这一次，基督胜利了。海涅还为此一辉煌意象附上了一份极具犬儒气息的后记。但他后来又将这份后记删除，这很可能是因为后面的诗篇［也就是第二诗集结尾处题为《在港口》（*In Port* ）的那份诗篇］当中，会对“和平”有相当尖锐的回应，删除这份后记，读者就不会对此等回应建立预期，否则就会损害此一场景的诗性效果。

第二诗集乃以“塔拉塔！塔拉塔！”（Thalatta！Thalatta！）这样的致辞开篇，相当有气势，它所呈现的是退潮的场景（至少我是这么看的）。它的节律相当平缓，这同第一诗集那迅疾奔涌的节奏形成了精妙的对照。它的语调较之第一诗集要绝望得多，而且还是以一场痛苦失败为终局。第一诗集中那狂暴的笑声在第二诗集当中变得野蛮且残忍，令人不禁联想到波德莱尔在《着魔》（*Obsession*）中呈现的大海意象：

失败的人

在痛哭，受尽凌辱，那苦涩的笑，

我在大海的狂笑中听得真真。

海潮退去，时常会裸露出丑陋之物，海涅偶尔也会呈现此类丑恶。日落表征了第一诗集当中月神和太阳神的悲剧性分离。不过，在第二诗集当中，却有了不同的解说：第一诗集中的分离催生了第二诗集中一桩肮脏的婚姻，这是光彩夺目的光明女神同老朽不堪的海神之间的功利婚姻，那海神身着黄色法兰绒夜间外套，待到女神于夜晚回归他那阴冷巢穴和已经萎缩的臂膀之时，便残忍地予以啃噬。卡斯托耳和波吕科斯在风暴中发出祈请，但徒劳无益，最终还是难免沉船之灾；苍老的达奈斯族裔则依然在疲惫中继续那毫无意义的劳作，一桶又一桶地取出海水，试图将大海抽干。可怜的海仙女们眼见海涅的惨状，不免回想起普罗米修斯。不过，她们也都清楚，这个诗人要比普罗米修斯更加无能，他只不过是一个顽固、愚蠢的狂徒罢了，若能有阿特拉斯那样的耐心，便已经很不错了。所有这些无能、哀伤的形象，如同鬼影一般隐现于重重雾霭之中，所表征的就是一场失败。

此时，奥林匹斯众神如同巨大且大理石般洁白的云团一样，出现在天空；这些神灵曾经统领尘世，无限欢愉，如今则遭到罢黜，以死魂灵的身姿四处游荡，成了耸立在午夜天空中的巨大鬼魂。海涅将这份诗篇命名为《希腊诸神》，因为它是对席勒的直接回应，是对温克尔曼、赫

尔德、歌德和席勒所阐释的那座荷马神殿提起的批判，这简直就是一记耳光。海涅以现实主义风格描摹希腊诸神，也将相对主义色调灌注其中，将希腊群神描绘成失败、无助的存在，希腊群神如同他们当初罢黜的提坦族一样，如今也被年轻一代赶下王座。“即便是神，也不可能永据王座。”宙斯，当初的弑父者，如今已头发花白，满面愁容，只剩下那古老的自负。赫拉那雪白的手臂已经失去了力量；她的复仇力量已经无法再压制那珠胎暗结的贞女，也无法再压制那勇于制造神迹的儿子。（塞墨勒和狄奥尼索斯在此以朦胧意象幻化成了玛利亚和基督。）盾牌和智慧于雅典娜而言，也已经毫无功用，根本不足以阻止奥林匹斯王朝的坍塌。如今的阿佛洛狄特，已然不再是金光缭绕，而是散射出惨淡的银光。尽管她已然是腰带在身，但谁还会拥抱她呢？她已经成了维纳斯·利比提娜，死亡女神，专责操持丧葬而已。那令人生畏的阿瑞斯于她已经没有了眷恋。诸神的俊朗笑声早已沉寂下去。此情此景，的确令人哀伤。这倒并不是说海涅热爱希腊诸神，他自己也补充说，他素来厌恶希腊诸神，而罗马人对于希腊诸神则是相当仇视。海涅之哀伤，仅仅是因为他不忍看到当年的群神沦落如今的惨境，幽灵般四处游荡，孱弱得如同薄雾，一阵微风就可以将其吹散。也应当考虑到，那些阴暗的篡位者是何等贪婪、伪善且猥琐，此等情境不免令海涅生出一股恶气。此等情境之下，海涅比大权在握之时的诸神表现得更为宽宏，他愿意为这沦落的诸神而战，他愿意将他们的神坛重新树立起来。

月光之下，海涅兀自伫立海边，凝望着鬼影一般的诸神，为他们黯然伤神，如同为自己的同伴伤怀一样，这样一个海涅无疑像极了路西法，为同伴的陨落暗自垂泪，却又暗自欣喜。他已经被逐出奥林匹斯神殿，那么，群神也沦落同样的命运岂不是一种慰藉？对于此种境遇，他恐怕较之任何大权在握的神祇或者一切的凡人，都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更富理智的怜悯以及更为深切的理解。席勒倾注了一切情感，去感怀那么一个因诸神之离开而沦落荒芜境地的世界。席勒还借此创造了一种极具悲剧色彩的荒寂之感，不过，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海涅则

在哀伤当中观瞧着这些置身惨景的希腊兄弟，以极为庄严也极具现实主义风格的五十行诗句，将希腊诸神之剪影雕琢在大理石之上，并以无助的哀伤灌注其中，由此将一种特殊的魅力赋予诸神。他称他们为影子、云、雾。然而，自荷马以来，希腊诸神在海涅这里第一次焕发出此等炫目光华。当然，此等光华也是一闪即逝，接着便重新没入无尽的黑暗当中，为那永恒的星辰让路。

是大海之上那波涛翻滚的景象首先告诉海涅，诸神的地位变幻莫测，天上和人间一样没有稳定性可言。正是此种不安定的观念令《旅行素描》变成一团混乱；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大海不应当担当全责。拿破仑死了，在海涅心目中，拿破仑正是那有着大理石般面容和古典之静穆的神灵，他的额头上曾书写着："除我之外，不得信从别的神灵"。他是救世主，"哈德逊·罗伊令他蒙难，拉斯卡萨斯、奥没拉和安东马尔基为他书写福音书"。他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盗取天火，而后便被绑缚在大海之中那荒寂的岩石之上，日日遭受秃鹰啄食心脏。结果，这人间的王座和权能依然在不断坍塌，并在极端动荡的政治世界当中，纷纷瓦解，纷纷寻求改革之策。海涅感受得到正在摇撼着欧洲的每一阵战栗，但海涅胸中有着自己的自由观念作为北极星，引导着他去解释这些激情。在宗教领域，海涅则毫无激情可言。在生涯的这个阶段，海涅将犹太教界定为人间的一场不幸，而非一种宗教，而且海涅还常常揶揄犹太人。然而，如果说犹太教是一场不幸的话，那也是海涅生来便需要负载的不幸；毕竟，海涅是不可能从灵魂当中摆脱犹太教的，就如同他也不可能仅仅凭借一场洗礼，就从社交层面上清除自己身上的犹太人烙印，因为那样的印记"是绝无可能被清洗掉的"。他禀赋当中有着对异教的偏爱，但是这其中也交叉着一种情感：认为异教过于冷硬。天主教倒是拥有众多诗性的和审美的优势，不过，天主教已经同政治纠缠在一起，难以拆解，而且，海涅觉得在自己这个时代，天主教已然成为对自由的威胁。新教倒是站在自由一边，不过，新教之精神实在是太过贫瘠了。他的理智也在不断提醒他，任何宗教信条都没有绝对的真理元素可

言。在这个尘世的历史之中，宗教之间的斗争，实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在海涅的心灵当中，情形也是如此。有时候，他的心灵当中涵养着一切宗教，有时候，则没有任何宗教可言。他将这样的心灵状态称为“亵渎”。在他看来，一切宗教的神灵都是平起平坐的，而且也没有理由彼此排斥。或者也可以说，海涅轮番地令一切神灵切近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有时候是悲伤，有时候是愤怒，有时候则是剑锋一样的睿智。这其中，十字架的意象令海涅因极度的怜悯和极度的厌恶而退避三舍，他在基督论题上给出的亵渎之词是最多的，也是最令人吃惊的，无论是信笺中还是《旅行素描》中都是如此。不过，这倒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海涅真的改宗了希腊。海涅有着奇妙的灵魂重生观念，他认为这个世界乃是某个醉酒神灵的一场幻梦，这个神灵很快就会清醒。他感觉自己的心灵穿越悠悠千载时光，深入过去，也深入未来；这个世界已经在暴烈的阵痛中沦为碎片，他的心也一同碎裂，诸神则令他走上诗人的殉道之路。然而，诗歌虽然据此获得神圣地位，但终究也只能是达成自由这一神圣目标的手段而已。至于他本人，则作为新的幸福世界的先知，身染这个时代的可怕疾病，这疾病是无可救治的，将生活也转变为一场疾病，将世界变成麻风病院，唯有死亡才有可能担当这个世界的医生。没有什么能比此类极为痛楚的思想更缺乏异教气息、更为沉重，题为《诸神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Gods* ）的诗篇也正是据此呈现出极端的悲观情怀：

> 我已看透你，我已看见正义
>
> 通过这个世界的构型；我已看得太远
>
> 又太深；而离去乃是福分。
>
> 永恒的痛楚驻进我的灵魂。

海涅还经历了一场没有回报的情事，此事令他伤怀不已，他悲剧性的生活观念因此更为严重。一个无情的世界是很难将此种生活观念当真

的，特别是要考虑到，海涅本人通常也不把这样的生活观念当回事。然而，真正了解海涅的人都很清楚，即便这世间绝少有人将爱看得比命还重要，海涅也正是其中一员，爱的确会摧毁海涅。梅斯内尔曾宣称，爱已然融入海涅的生命当中，并最终吞噬了海涅；海涅的生命是经常遭到爱的拒斥的。他的堂妹艾米丽·海涅（Amalie Heine）在他尚是少年的时候，就已经令他心碎过。七年后，艾米丽的妹妹特蕾莎（Therese）再次令海涅心碎。这双重的拒斥令他倍感疼痛。这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拒斥于他而言，等于犹太人的拒斥，毕竟，两姐妹是自己家族的成员。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打击也令海涅意识到，所谓爱，并非绝对、永恒之事。两姐妹令海涅的心灵和心绪陷入动荡和混乱当中，此等情境恰好能够解释《观念》（*Ideas* ）中那死去的孩童“小维罗妮卡”为何会在“夫人”身上转生，也解释了为何“已死的玛利亚”的幽魂会令人如此厌烦地纠缠着《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The Journey from Munich to Genoa* ）。大致上可以肯定，两个堂妹对待他的那种冷若冰霜的态度，令雕像和女人在《旅行素描》当中成了同义词。早在1822年，海涅就宣示说，他同波茨坦无忧宫阶地上的一座雕像恋爱了。1824年2月，海涅更是宣示说，他同时跟哥廷根大学图书馆的“美第奇的维纳斯”和一个名叫鲍尔（Bauer）的法学家的美丽厨娘恋爱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海涅的那场梦境中，这个鲍尔也侧身忒弥斯身边那群法学家之列。）女人的雕像对海涅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意大利旅行期间，海涅碰到的每个女人，都在海涅心中幻化成雕像。一个穿着棉质褐色条纹状连衣裙的农妇，幻化成尼俄柏；一个因愤怒而全身僵直的美丽少女，立刻令海涅联想到美狄亚；英格兰妇女在海涅心中则更是白皙如大理石，也冰冷如大理石。一个被海涅叫作弗兰西斯卡（Francesca）的姑娘，实在是像极了卡诺瓦的维纳斯，令海涅日思夜想，他甚至梦到自己将那雕像抱在怀中，那雕像逐渐有了生命并开始用弗兰西斯卡的声音跟他低语。1828年，海涅在一封写自佛罗伦萨的私人信笺中宣示说，他已经跟乌菲兹宫的男神和女神混熟了，而且还认识了其他一些同样美丽的神灵，她们不

像古老的、拼凑而成的爱神那般冷若冰霜。海涅同奥林匹斯王朝的争端始于那次拜访歌德的行动，不过，在此之前，拒绝以鲜活姿态进入他怀抱的女神们，就已经令他生出怨愤。海涅就是这样从个体经历的角度来思量整个问题的，据此，他最终得出结论，希腊诸神是缺乏爱的，他们因此被征服了：

> 那时，他将酒从左至右倒给其他所有的神，从盛碗中舀出琼浆玉液。他看到赫菲斯托斯围绕宫殿忙得团团转，在受祝福的诸神间止不住地笑起来。他们整天宴饮，直到太阳落山；于这公开的夜宴，他们的灵魂并非不节制；阿波罗演奏的竖琴也并非不优美，而缪斯们用甜美的声音轮番歌唱着。[2]
>
> 接着突然间，冒出一幅画着一个苍白犹太人的画像，他滴着血，头戴一顶棘冠，还有一个巨大的横在他肩上的木头十字架；他将这十字架放到诸神的高台上，以至于那些黄金的盛碗颤动起来，而诸神陷入沉寂并变得苍白，且越发苍白，直到他们最终离去，消失于雾霭。而此时，一个悲伤的时刻随即到来。快乐的诸神不再，而奥林匹斯变成一个麻风病院，在那里，被扒皮、被炙烤、被放在肉串上翻转的诸神急不可耐地逃散，身负重伤，口吟悲歌。信仰不再给予幸福，而仅是安慰。它是一种悲伤的、带血污的信仰，施于悖逆之徒。
>
> 但或许它对于病怏的和下滑的人性是有必要的？那看到他的神也在受苦的人，更易忍受自身的痛苦。先前体悟不到自身痛苦的灿烂的诸神，对于一个贫穷的、受难的人所能感到的折磨程度是没有意识的。……他们曾是假日的诸神。……而那就是他们不曾被真正全心奉爱的原因。为了被全心奉爱，必得受苦。怜悯是最后的爱的献礼，也许就是爱本身。基督因此受到最大的爱戴，远甚所有曾在世的神所受到的。尤其为女性所爱戴。

这段论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从中不难见出，海涅心目中唯一的神-人关系，就是怜悯，紧要时刻，这种关系也可能是相互的。海涅在此反转了《北海集》中的观念，转而采取了更为正统一些的立场，无论是对于荷马群神，还是对于基督。希腊群神的幽魂在海涅这里赢得了一场道义上的胜利，并且这胜利是针对那个将他们逐出神殿的英雄的。如今，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可怜犹太人，已然征服了鼎盛的奥林匹斯王朝。不过，这并非终极的征服；海涅的词汇表里面显然不会有“终极”一词；

那个苍白的加利利人（倘若地域也能成为标尺的话）随后便从海涅的世界中消失了。至少海涅在《英国片段》（*English Fragments* ）的开篇是这么说的，《英国片段》的写作时间要早于《卢卡城》（*The Town of Lucca* ），开篇那段话实际上是《卢卡城》里面的一段，不过，那段话先是在《英国片段》中刊印出来，后来则附在《卢卡城》的后面。在这份诗篇中，海涅抒发着自己的感怀，昔日人潮涌动的紫薇园，如今已经荒寂。哥特式的大教堂也已经沦为废墟。古老的神灵悉数死去，当今时代已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创造新的神灵。不过，当今时代也拥有自己的宗教，那是围绕自由建立起来的宗教，有自己的使徒、殉道者，也有自己的叛徒，但没有神灵。

在书写那个正在受难同时也正在征服的犹太人之时，海涅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神性。《卢卡浴场》（*The Baths of Lucca* ）对普拉滕公爵发起了攻击，此番责难也令海涅自己的品位沦落到那个身为天主教贵族的蹩脚诗人的水平，甚至更低。海涅抓住普拉滕的私生活不放，将那泥潭翻了个底朝天，他自己也因此弄了一身的泥水。也许，海涅颇为急切地想去证明一个希伯来人是如何击败奥林匹斯王朝的，毕竟，他和普拉滕之所以会有此等麻烦，恰恰就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冲突是一个背教的犹太人和一个自诩的现代希腊人之间的冲突。普拉滕称海涅是一个受了洗的犹太人，口中散发着大蒜的味道，这是普拉滕在《浪漫主义的俄狄浦斯》（*The Romantic Oedipus* ）中说的话。这部剧非常沉闷无聊，是对阿里斯托芬的夸张模仿。尽管如此，普拉滕还是将种族污点贴在海涅身上，海涅也毫不示弱，指斥普拉滕是同性恋，当然，海涅自己相信这是真事。在此番冲突中，海涅表现得极为野蛮，他的嘲讽之能也是致命的，不过，海涅也因此弄脏了自己，令自己的内心承受了极大的痛楚，与此同时，整个德意志都在强烈斥责海涅。

回望往事，便不难发现，最终也许正是海涅命定了要在这个问题上置身风口浪尖。温克尔曼的热情自不待言，不过，温克尔曼的巨大热情

通常都是隐蔽在考古墓穴当中，远离公众视线；他绝大部分的私生活都是在罗马展开的，至于他的通信集，则是在1781年之前出版了完整版，因此，受众面不会很广。莱辛对整个这一问题不闻不问。赫尔德则将之视为希腊生活的一个侧面，认为这样的现象植根于“近乎疯狂的爱美之心”，因此，他对之抱持明确的贬抑态度，尽管他给出的评说是相当温和且简短的。他认为出版温克尔曼的信笺，乃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歌德曾从罗马致信魏玛的卡尔·奥古斯特，信中指出，这样的话题即便是日常交谈也不宜提及，更何况是在作品中。在有关温克尔曼的论章中，歌德对温克尔曼那直白的言辞很是震惊。《西东合集》中的《侍酒人之书》也揭示出诗人和侍酒青年之间的类似关系；《浮士德》第二部的结尾处，梅菲斯特向众天使提起的丑恶动议，也触及了此种关系的另一面。不过，歌德的“希腊”作品并没有给此种关系留下空间。席勒则更是谴责了希腊人对女人和异性之爱的态度。不过，席勒自己也崇拜男人之间那种理想的友爱关系，由此为希腊风俗增色不少。在《马耳他骑士》中，席勒经受了极大的诱惑，完全有可能将这个主题引入这部悲剧当中，并尽可能地辅以傲然且高贵的元素。然而，这部剧并没有完成，也就更没有可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出版了。《许佩里翁》的主人公和阿拉班达之间的关系，也包含着情欲元素，但是，荷尔德林高高地置身于云端，因此也就不可能赋予这样的关系以任何现实色彩。海涅则大胆地闯入这片禁地，高声喧哗着，打碎了一直以来那讳莫如深的沉默氛围。他不仅将同性恋用作棍棒，对普拉滕发起攻击（平心而论，这样的举动是有些过分了），还将之作为武器，对希腊文学的现代模仿者发起全面攻击，在这方面，海涅的立足点则要更为稳固一些。在这个问题上，古希腊观念和现代欧洲观念是存在根本差异的，据此，海涅宣称，正是这样的根本差异令这种关系在现代变得卑贱、丑陋、可耻。但在古希腊，这样的关系是开诚布公的，也是美丽且不乏英雄气息的（海涅据此对普拉滕的诗篇展开攻击和谩骂，还做了不少的摘引）。因此，这种关系并不适合作为现代诗歌的主题。对希腊文学的任何模仿，倘若忽略了这一

点，都将是片面的。海涅说，也只有普拉滕这样的人会为这种关系留出位置，可能是在作品中，也可能是在生活中。海涅说，普拉滕这样的人根本不能算是诗人，而且这样的人也是相当可鄙的。海涅的确击中了要害，直奔德意志古典复兴运动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而去，德意志古典复兴运动存在一种普遍倾向，就是过度理想化一切希腊事物，完全缺乏现实性，同性恋问题只不过是此一普遍倾向当中的一个侧面而已。席勒对现代境遇当中的“天真的诗”抱持一种更为谨慎的拒斥态度，海涅则以一段意涵颇为丰富的论说回应了席勒的此一态度，在这段论说中，海涅相当巧妙地将中世纪的浪漫崇拜和古希腊的“愤怒”相提并论：

> 这个世界曾经是完整的；古代就是如此；中世纪尽管面临着外战，但中世纪的世界仍然是有着统一性的，当然也就孕育了完整且和谐的诗人。且让我们敬仰这些诗人，并享受他们的诗篇吧；不过，要模仿他们的统一性以及和谐特质，则终究只能是一场谎言，明智之人一眼就能看穿这样的谎言，谎言既已戳穿，自然不会赢得尊重。

---

[1] 厄里斯（Eris），希腊神话中司争吵、不和的女神。——译者注

[2] 海涅此处乃是借用了沃斯译本中的一段话，沃斯的译本被称为“通行译本”。诸位应当还记得，莱辛也曾从沃斯译本中借用了一段极为相似的场景描述，以此表明，有些场景是非常适合用作绘画题材的。莱辛大概没有预见到海涅会有类似的运用。

作为魔鬼的诸神

巴黎七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之时，海涅在赫尔戈兰岛，他正在努力清除自己的羞耻感。显然，他已经极端厌倦政治，厌倦文人之争，正思忖着到何地寻求逃避。如果他的说法可信的话[1]，此时的他仍然对基督那“甜美的神-人意象”感怀不已，仍然在想象着人子抛洒在各各他的鲜血溅在希腊群神大理石雕像之上的场景，仍然在观望着希腊群神是如何病入膏肓的，并以莫可名状的情感倾听那绝望的呼喊，“潘神已死”，那喊声回荡在提比略时代的爱琴海上。恰在此时，大陆方面传来消息，宣布自由获胜了，此情此景，如同天堂来信一般。刚收获此一令人振奋的消息，未及消化，海涅便急忙将那“甜美的人-神意象”贬入幽魂之地，显然，此时的海涅已经不再需要这样一个安慰者了：

> 随着我脚下的地裂和撞击声，大地敞开，而老迈的诸神探出脑袋，以极度的烦躁和惊愕问道：“这些刺扰了大地深处的欢声在播报什么？有什么奇闻？我们应再次出山么？”“不用；你们就待在阴暗之家，那里另一位死去的战友将很快加入你们。”……“他叫什么名字？”“你们熟知他；他是那位曾将你们投入永夜之域的人。”……潘神死了！

随后的几个夜晚，海涅当然是激奋难消，不免会梦到自己飞升天堂，发现那天堂已然荒寂，只剩下一两个身着破旧的红色制服的仆人；昔日里巍峨的殿堂已经被民众摧毁，至于上帝，则已然踪迹全无。海涅在《卢卡城》的尾声当中谈到了七月革命，他将这场革命视为一个新的提坦神族对奥林匹斯王朝发动了新一轮攻击，他本人也置身革命者行列，他们恨透了那些“懦夫一样的篡权者”。

不出预料，七月革命激发了海涅的巨大热忱，这热忱催动他投身政治，投身法兰西。此后，这热忱再也没有在他身上消退，他也再也没有离开法兰西，除了几个极为短暂的时段。1831年，海涅写就了《卡尔多

夫〈论贵族〉导论》（*Kahldorf on the Nobility* ），1832年，又写就了《法兰西境况》（*Conditions in France* ），由此成就了两份自由宣言书。不过，1831年，当他尝试完成《法兰西沙龙》的时候，他就已经无力再坚守自由论题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此时的海涅已然在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滑落现实政治领域，要么就是滑落“新宗教”的王国，这“新宗教”正是圣西门分子在肆意宣扬的，他们要认肯这俗世的生活和快乐。很快，海涅便对七月革命的结果不抱幻想了，他还一度想着放弃自由事业，回归诗歌王国。恰在此时，海涅在阿弗尔格雷斯看到了德意志移民的悲惨处境，这段经历将海涅重新拉回现实政治的旋涡当中。至少，海涅自己在1833年《法兰西沙龙》第一卷的序言中是这么交代的。这些德意志移民告诉海涅，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是因为实在无法再承受德意志的压迫体制，双方交流结束的时候，这些移民极为无助地告诉他，他们没有能力发动一场革命。同这些德意志移民一番接触之后，海涅不禁于暗夜之中驻足海边，兀自啜泣，那情形就如同当年的阿喀琉斯。海涅得到的回应虽然没那么温暖，却是催人奋进的，这回应之声是一种命令，而且激荡着智慧。那声音在海涅耳畔低语，传递着一个足以拯救世界的语词（毫无疑问，那语词就是“自由”）。于是，海涅挥别了那构思中的小说和喜剧。身边的大海正在汹涌，无边无际，变幻莫测，令海涅心驰神往，令他从那诗歌的绝对王国回归政治的相对之地，重新扛起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大旗。

1833年，海涅写就《施纳贝勒沃普斯基先生传》（*Schnabelewopski* ），其中激荡着海洋之声以及波光粼粼之势。蔚蓝的阿尔斯特湖上，雪白且健硕的天鹅四处游弋；大海的咆哮声中，隐隐地有丹麦歌谣Master Vonved相伴。那遭到诅咒的“飞翔的荷兰人”号在狂暴的波涛之上穿行。海涅的精灵就沉落在那绿色的幽深之地，融入海涅众多的幻梦当中。此时，水仙子从海面升起，为这悲惨的命运哭泣，为人类终究难免的死亡结局哀伤。这是《施纳贝勒沃普斯基先生传》中唯一赋有希腊特质的场景。主宰整个故事的神灵是那不知感恩的老迈暴君耶和华，这暴君抛弃

了困境中的参孙。这个矮小但勇敢的法兰克福犹太人，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而同一个无神论者展开决斗，最终重伤致死。那老迈的偶像崇拜者耶和华自接受洗礼之后，便抛弃了自己的选民，转而幻化为纯粹的精神：

> 这个上帝，这纯粹的精神，乃是天堂的新贵。这是道德主义、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新神。我相信，这尊新神对那可怜的犹太人是心有怨愤的，这些犹太人知道他的过去，知道他当初的粗陋形态，并且还在会堂当中日复一日地提醒他不要忘记当初那晦暗的民族境遇。也许，这个苍老的绅士根本就想忘却自己的巴勒斯坦出身，忘掉自己曾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并且最早时候自己的名字就是耶和华。

现在，耶和华也难掩自己的飘摇地位，他的王座开始倾覆。自1823年之后，海涅便开始生出这方面的疑虑（这一年，海涅致信自己的一个犹太友人），认为犹太人的民族之神正在经历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和启蒙精神的改造。不过，海涅等了十年，才公开发布此种言论，这很可能是因为耶和华毕竟是他自己所属族群的神灵。尽管海涅之禀性当中有着“天生的不知感恩”，但耶和华仍然能够在这个极其背离正统的犹太人内心激发出敬重之情，而且，即便是在这么一个革命时期，海涅也并不是特别想着要给耶和华致命一击。

实际上，此时的海涅还有更紧迫也更契合于他的工作去做。自他将最后的颂词呈送拿破仑的坟墓之后，另外一尊神也死去了。沃尔夫冈·歌德去世了，必须将他也迁移到神殿当中。自1824年那次灾难性的拜访之后，海涅的所有散文作品都包含对歌德的评说。《北海集》第三诗集、门泽尔《德意志文学》（*German Literature* ）评论、《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等，都在这个话题上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此类评说可谓为数众多且色彩纷呈，海涅在其中呈现的主旨是“艺术时代”，也就是海涅心目中的歌德时代，那个时代尽管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仰慕的，但到此时已然结束了，一个更富进取精神的新时代即将展开。歌德和席勒

的相对优劣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永恒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海涅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更多地将歌德视为诗人，很明确地将席勒视为一个人。歌德为人冷淡，对政治保持冷漠态度，缺乏“阳刚观念”，嫉妒后起之秀，相当世俗，以自我为中心，这一切都多次被海涅拿来冲抵歌德的天才、创造性的才能以及诗篇之美。倘若歌德性格上的这些缺陷的确影响到了他在德意志文学世界的地位，那么海涅也正是由此搅起一摊浑水，从来不就歌德的文学地位给出明确说法。1833年到1835年，歌德写就《浪漫派》（*The Romantic School* ）一书，在这本书中，海涅最终还是直面了这个问题，并且给出了最终的看法。其中，海涅对诗歌的宣传作用抱持肯定态度，确切地说，海涅要对自己的文学生涯展开辩护。为此，他首先讽刺了同时代的一些人，这些人仅仅因为席勒笔下的英雄人物之高贵，仅仅因为席勒热爱自由以及席勒的理想主义，而令席勒居于歌德之上。这个非道德的作家非常坚决地指出，艺术跟道德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艺术也不能游离于生活之外，不可能完全独立地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这话听起来是完全在理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意识到，海涅所谓的“生活”，乃是指党派政治、社会改革和宗教宣传。要求缪斯在这些问题上奉献自己的才智，这显然是弄错了缪斯女神的本性；尽管海涅就文学之宣传职能提供了相当华丽的辩护，但海涅本人当然是不会因此而改宗的。然而，海涅的比喻性论说也总是要比他的逻辑更难以抵御；他的确将歌德迁移到奥林匹斯神殿当中，不过，他运用的方式暗藏杀机，那是一份两面三刀的颂词，绵里藏针，表面上是追捧，但实质上却是羞辱和贬抑。更为严重的是，海涅还相当强劲地将歌德的作品界定为美丽雕像，称其有着巨大的独立价值，是德意志的珍贵饰品。人们当然可以敬拜雕像，甚至爱上雕像，但雕像毕竟是雕像，无论如何，都是没有生育能力的：

> 歌德的诗歌不生造。席勒的诗歌则能。那生造是孩童之语，而歌德的优美言语则并非孩童式的。那是一种对一切艺术单独创造之物的申讨。这尊皮格马利翁[2]所雕之像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这位大师，同她身陷爱河，而她前来置身于他的亲吻之下；但就我们目前所知，她

> 未替他孕育子女。……昨日，我曾如此思索，漫步穿行于卢浮宫更下层的亭阁。我思忖着诸神的古老雕塑。那儿，他们矗立着，带着沉寂无言的白色眼眸，一种冰冷微笑间隐隐的愁绪，一种悲伤的记忆，或许是埃及的，那片他们发源的亡灵的陆地；或是一种正在受苦的欲求，因自他们已被别的神祇所放逐；又或许是悲伤，加诸他们切魅的不朽性。他们似乎等待着那将再次还予他们生机，并将其从他们冰冷、坚实的禁锢中释放出来的言语。说来奇怪，这些古代雕塑让我想起歌德的作品，恰似完美，恰似壮丽，恰似静谧，并且仿佛让我也领受了那种严格且冰冷，隔绝于我们当下温暖、澎湃生活的悲伤，他们不能同我们一道经受痛苦和快乐，他们并非人类，只是神像和石块没有快乐幸福的杂糅。

这就是海涅对这个“伟大异教徒”的忖度和思量，早先时候，海涅称歌德为“沃尔夫冈·阿波罗”，此时则干脆称之为“众神之父”“主神宙斯”，此番评说详细阐述了从一开始就潜藏在内心的这种比对。《哈尔茨游记》的行文如同车轮一般飞速旋转，辐条之上非常醒目地张贴着“希腊神灵沃尔夫冈·歌德的大理石雕像”，此等行文速度令整部作品都变得含混不清（很显然，这部作品的推动力就是怒火）。现在，这车轮的旋转速度一下子减缓下来，因为海涅在此时承受了某种反向的压力，面对希腊诸神，他内心不禁升腾起罪恶的傲慢之感，此一感受令他有必要舒缓下来，向诸神表达怜悯。

这怜悯乃是针对所有神灵的，没有例外。随后，海涅于1834年写就了《德意志宗教和哲学史》，在这部作品中，耶和华陨落了，并且也彻底毁灭了，或者像海涅说的那样，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毁灭了耶和华。这的确是一场毁灭，足以引发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足以令世人见证神性之相对性，而且也足以触发一种令人缠斗的恐惧感受。无论是希腊群神还是他们的征服者基督，都不曾在这个不敬神的犹太人内心激发过这样的恐惧：

> 在下一部分，我们将谈论这场灾祸，无神论的降临。一种反常的不安，一种神秘的崇拜，禁止我们今天写下更多。我们被租让给最可怕的怜悯。是耶和华自己预备了他的死亡。我们已熟知他，自他先前在埃及的襁褓以来，他在神赐的犊牛、鳄鱼，以及圣洁的洋葱、朱鹭

和猫群中，被抚养长大。我们见过他道别儿时的玩伴，道别他的故土尼罗河流域的方尖碑和狮身人面像，为了成为巴勒斯坦一个孱弱且贫穷的放牧部落的神王[3]，他居住在那里的他自己的宫廷里。之后，我们看到他前去接触过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文明，并去除了他所有太过人性的情感。在任何关头，不再有不可遏制的发怒和报复，或者至少不再为任何琐事大发雷霆。我们见过他移居帝国首都罗马，在那里他抛弃了全部的民族偏见，重新宣讲所有人神圣的平等性，以练达精致的语句组织了一场针对朱庇特神的反抗，他进行了长时间的组织谋划，到最后，他进入权力层面，统治了这个城市和全世界。我们发现他变得越来越精神化；他柔和地呜咽，变成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人性的友人，一个普世的恩主，最终成为一个慈善家。

并且没有什么能救他。

你听见这丧钟了么？跪下吧。他们正带来一场圣礼，给一个濒死的神。

倘若没有圣西门主义作为替代，海涅会放任耶和华就这么离去吗？很可能不会，毕竟，海涅直到最后都在很明确地追附耶和华。不过，既然新的信条已经确立起来，而且地位又是如此稳固，也就不可以再去多愁善感了。更何况，新的信条是完全值得那样的牺牲的，毕竟圣西门主义足以将希腊之欢愉和美同基督教的精神愉悦融合起来，令海涅可以同时享受二者提供的福祉，于海涅而言，此乃不可或缺之物。圣西门主义宣示了神灵在自然和人身上的存在，也宣示了神灵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存在，宣示了神灵就存在于我们的亲吻和祈祷中间。这神灵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而且也是极为宽和的。海涅以诗性的方式，将此种泛神论阐释为多神主义。希腊群神和日耳曼群神一样，都曾经是自然之神；基督不曾像海涅一度认为的那样，杀死了这些异教神灵；他们不曾消解为雾霭，不曾凝结为天空中的云团，他们就在自然当中，无处不在。不过，他们都已经变形了。基督教在他们身上实施了黑魔法，承认异教神灵之存在，不过坚持认为，异教神灵都是魔鬼。由此，奥林匹斯神殿幻化成一座空灵的地狱，诸神则相应地转变成丑陋的魔鬼；自然成了自然精灵的居所，据信，这些精灵都是邪恶的。简言之，此番情境当中，泛神主义也就幻化成泛恶魔论；毕竟，以基督教的角度观之，一切甜美、可爱

之物都是敌基督撒旦的造物，都是要予以谴责的。在《德意志宗教和哲学史》以及1835年《自然精灵》（*Elemental Spirits* ）的第一部分当中，海涅致力于表明，所有这些遭到抹黑的神灵并非基督教所说的那般黑暗。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借用海涅自己提供的意象加以说明，海涅将这些自然精灵比作夜莺，夜莺拥有超凡的歌声，这极具诱惑力的歌声在中世纪僧侣那里便难免要被称为恶魔的诡计。一直以来，海涅内心都瞩望自由，因此也就一直希望将古老的群神封印在地下，但是现在，在圣西门信条的光照之下，海涅则意欲让众神回归。不过，这项工作未及着手，便被迫停顿下来。因为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发生了。克莱森提亚·欧也妮·米拉特（Crescentia Eugénie Mirat）此时闯入了他的生活。

海涅称之为“玛蒂尔德”，显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此时内心的扰动和震荡是因为她。玛蒂尔德没有接受过教育，无知、朴素、出身微末，总之，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随便人们怎么想都成；但是，这是个欢快、吵闹、健康、粗朴、美妙且精力旺盛的十九岁姑娘，这样一个姑娘是不可能心有阴暗的。而且也不难想见，这个女人倘若有任何阴暗之处，势必会直接激起海涅的强力抵制。在这个问题上，倒也不妨看一看歌德同克里斯提安娜·沃尔皮乌斯刚刚同居的那段日子，那是何等清平的幸福境地，克里斯提安娜不正是德意志的玛蒂尔德吗？不过，也应该考虑一下此后萦绕于海涅心间多年的阴影，他在这些年间一直认为同一个“女工”结合，那是自我贬抑之举，是在惩罚自己的灵魂。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解释了海涅这种令人困惑且歧异丛生的禀性，我在那篇文章中指出，这是海涅禀性当中那贪婪的色欲和昂扬的精神之间的恒久冲突和摩擦导致的结果。不过现在，我不再这么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了，尽管这样的二元格局是海涅精神构造当中的根本成分，尽管这样的二元构造的确令海涅承受了巨大痛楚，而且也部分地解释了海涅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犹疑摇摆。现在，我相信，海涅禀性当中的核心要件是他的倨傲，这样的倨傲在现实与理想发生冲撞之时，将是悲剧性的。海涅的诉求是要对时代和人群发挥强劲的影响力，同时又完全超脱人群和时代，

绝不受时代和人群的熏染，此等目标乃是诸神的特权，于凡人而言，是没有可能性的。然而，海涅之禀性当中，并不具备超脱之才具，也不具备尊严之要素；他的禀性要素当中，即便有八分之一的要素可归于神性，至少也会有八分之七的要素是要沦落人性歧途的。“腐烂的百合比野草更令人作呕”，海涅曾引用这句谚语抒发胸臆。海涅胸中怀有春秋梦想，但这一切的梦想总是被拖入毫无价值的现实泥潭当中。圣西门主义就是他的胸中梦想之一，而且他也决心要实现圣西门式的梦想；然而，当这梦想以“玛蒂尔德”的形态展现出来的时候，海涅不禁在恐惧中退避三舍。在遇到玛蒂尔德之前，他的情欲一直都极为尖锐地分裂着，一边是极具悲剧特质的、精神化的激情，另一边则是轻佻、色情的欲念。那个时期，无论是在诗歌中还是在散文中，海涅都不遗余力地宣示说，自己禀性当中那轻佻、色情的欲念太过杂多，而且“变幻多端”。不过，此类近乎幼稚的吹嘘之词当然是有水分的，是要打不少折扣的。海涅禀性当中的感性欲念，乃是一个智识倾向的问题，而非一桩事实。海涅对女人的吸引力也许并不像他自己吹嘘的那么大；艾米丽和特蕾莎都拒绝了他，这定然强化了他禀性当中的自卑，而自卑情结乃是他一开始就有的。海涅极为挑剔，因此不可能沉陷真正意义上的感官欲念当中，他心灵的精神取向也是十分强劲的，因此他不可能从物质女人那里得到什么愉悦。至少可以肯定，肉体和精神在海涅的全部生活中，都不曾以均衡态势出现，因此，这样的生活也就不可能得到现实的祝福。玛蒂尔德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实际上，玛蒂尔德乃借助激情之力替海涅“解放肉体”，这种激情在两人之间一直就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而且，至少就海涅这边的情形而论，他是立刻就得到了真爱的回报的。1831年之后，海涅便一直凭借自己那无知的雄辩，宣扬感官和精神的融合，不过，此种融合境界却绝不可能是海涅想象中的理想之美和幸福状态。他，海涅，竟然会爱上一个微贱的年轻姑娘。这怎么可能？于是，他的内心翻滚着复杂的情感，令他倍受折磨。激情和痛苦将他撕裂。这一次，情形的的确确就是这样。这一次，海涅本想捉住一只凤凰，但最终

只是斩获了一个世间俗人，一个“鞑靼人”，这个鞑靼人正将他拖入“塔尔塔罗斯”（请原谅我使用这样的双关语）；这是因为海涅是离不开玛蒂尔德的。可以说，这是海涅生命中的又一次堕落，而且，此次堕落对海涅内心的冲击要比普拉滕事件大得多，毕竟，此次堕落对海涅禀性当中的倨傲的打击，要比普拉滕事件更为严重。最终，海涅还是强行离开玛蒂尔德，并在贝尔焦约索（Belgiojoso）公主那里寻求逃避，看来，只要他移情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能够升华他正在体验的这些激情。此情此景，令他相信自己得救了，他不禁长出一口气。1835年7月2日，海涅致信坎佩（Campe）：

> 我曾经是那么愚蠢，不过，现在我认为激情时光于我而言已经结束，我再也不会落入人性的激情旋涡，我已经像永恒诸神那般静穆、自持、节制；看一看以前的我，竟然会爆发出如此强烈的人性，就像年轻人那样。现在，则靠着那无可抵御的精神力量，我的灵魂平静下来了，往日里肆虐无度的情欲也都归于驯服，现在的我，乃静谧安详地生活在一个美丽友人在圣日耳曼附近的一座城堡当中，有高朋相伴，甚是愉悦。我相信我的灵魂已经得到了净化，我已经将尘土悉数扫去；我的诗篇将更加优美，我的作品也会更加和谐。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肯定的。我现在对一切肮脏、可鄙、躁动之事都心怀真真切切的恐惧。

仅仅几个月之后，尽管海涅仍然远离玛蒂尔德，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感觉到这场所谓的胜利正在转变为一场失败。1835年9月27日，他致信劳贝（Laube）说：

> 我已经成了那种恐惧一切激情并对之退避三舍的人。可惜啊！尽管我们处处小心，但激情那压倒一切的力量总是要征服我们，令我们失去见解和思想上的清明，即便我们并不愿意轻易地缴械投降。心灵一旦被蒙蔽，精神一旦被动摇，我们便无以同诸神为伍。长久以来，我都一直与诸神为伴，此刻是可以确认这一点的。我一直游走在诸神的光照当中，那么静穆；然而，过去的九个月间，我的生活已经呈现出风雨压城之势……我仍然在尽力平复我那已然躁动起来的灵魂，即便不能重归明朗天日之境，至少也要挣脱那夜晚的漆黑……我仍然驻留在这个可爱、高贵且智慧的女人的城堡里卖弄……不过我并没有陷入爱恋当中。我注定了只能去爱那微贱且愚蠢的女人……像我这般骄傲且智性之人，这样的境遇会是何等折磨，你能明白吗？

海涅于1834年10月同玛蒂尔德相识。1835年4月，他给勒瓦尔德（Lewald）的一封信笺足以表明他已经完全沉陷在对玛蒂尔德的激情当中。尽管如此，海涅无意同玛蒂尔德成婚，而且此时的海涅仍然沉浸在激情带来的狂乱幸福之中。两人之间会有些争吵；不过，在两人的关系史上，海涅为了解放自己而真正展开的决绝斗争，则要等到他第一次意识到那令人狂乱的激情已经消散的时候，在那样一个时刻，海涅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他的整个存在已然拜伏在一个女人面前，这个女人的精神、智性以及社会地位均不及自己。迟至1842年，亚历山大·维尔（Alexander Weill）仍然能够写下他对此事的观感：海涅对玛蒂尔德的情爱，就如同一个受到诅咒的灵魂，在经受地狱的折磨而非天堂的喜乐，那是惩罚而非奖赏。然而，这段情爱也许是海涅生命中最美丽的一段。这段情事荡漾着欢声笑语，两人就那么笑着、闹着。海涅这么一个极为倨傲之人，素怀讽刺天才，但在这个无知无识且没有知性可言的伙伴面前，从来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海涅之于玛蒂尔德的情爱乃是骑士之爱，虽然如此，他也不曾在两人之间设置什么距离；争吵也好，爱欲也好，两人都完全是相互的。他承受了玛蒂尔德的反复无常，也纵容玛蒂尔德的奇思异想；他因此赢得了玛蒂尔德全副身心的爱恋，而且，对于海涅来说，也唯有这样一个女人才会如此信从他的天才，并且她和他一样，对于维系此种关系所需要的自我牺牲浑然不觉。然而，无论是对是错，海涅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既然屈从了激情，也就自然要落入深渊。

与这场个人灾难同时发生的则是青年德意志运动遭遇的那场灾难，普鲁士当局和联邦当局对海涅、劳贝、古茨科、穆恩特（Mundt）和韦恩巴克（Wienbarg）等人的作品发布了禁令。几个月之后，此一禁令有所缓和，调整为专门的审查制度，这是相当有效的政治口衔。倘若海涅能够将此事作为终局接受下来，并克制一下自己那天生的尖刻态度，也许会有拯救之机。然而，德意志当局此举激发了海涅的战斗精神，他那无可遏制的愤怒连同可怕的锋锐勃发而出。如何意气昂扬地展开争论家

的生涯？如何最为有效地发泄对门泽尔的怒火，据说正是门泽尔反古茨科和韦恩巴克的文章挑动当局发布了禁令？如何规避或者骗过新闻审查官？这些就是海涅在1836年到1839年的主要关切，这个时期，海涅正在酝酿一项不幸的计划，他要为刚刚亡故的流亡同伴、犹太民主人士路德维希·伯尔纳书写一份传记，此人是海涅一块永远的心病。两人之间经年的冲撞、嫉妒、恨意和恶意，实际上令传记工作放在海涅手中是非常不合适的。此事招来了大麻烦，最终以一场决斗收场。在此之前，海涅就已经同古茨科不和，此人是海涅最为恶毒的敌人之一，还令海涅陷入了同他的出版商尤里乌斯·坎佩的一场令人羞耻的公开口水仗当中。此外，一个名叫古斯塔夫·普菲泽（Gustav Pfizer）的苏阿比亚人也一直盯着海涅不放，对他口诛笔伐，此人不仅道德堕落，而且是个低劣不堪的作家，还是一个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政客。此等情形之下，也就毫不奇怪，当特殊审查制度于1842年趋于缓和的时候，海涅只有两份还算有些分量的非论战性的散文作品问世，1835～1836年写就的《自然精灵》和1836年写就的《佛罗伦萨之夜》。

第一部作品乃是在认识玛蒂尔德之前就开始构思的，应该追溯到1834年，甚至有可能更早一些。这部作品是要以诗性的方式阐释圣西门派的泛神主义，并且是以古老日耳曼民间传说的形式呈现出来。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应该说是延续了《德意志宗教和哲学史》开启的工作。不过接下来，海涅梦中的神灵便有了变动。此时，玛蒂尔德现身了。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以一则寓意故事开篇，这则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海因里希·基茨勒的作家的，这个作家颇为不幸，他书写了一系列博学且明辨的作品，但极少能够完工，因此这些作品也就从来没有机会问世。基茨勒在理智上的刚正几乎到了致命的程度，这令他总是在一项论题未及充分阐发之前，便以同样的力度阐发相反的论题，这样的情形简直是无可救药。他的代表作《基督教之优越性》就是如此。这部作品包含了世人为辩护或者为荣耀基督信仰而说过或者写过的一切，而且还对异教信仰以及异教神灵展开了极为猛烈的攻击。但是在最后时刻，利巴尼奥的

《捍卫神殿》一书又令基茨勒的心思变得飘忽难定了，因为这本书令基茨勒相信基督教极为阴暗地摧毁了艺术，由此犯下了重大的亵渎罪行。最终，这个不幸的作家只得将《基督教之优越性》付之一炬，在火光升腾之时，他不禁高声喊叫："烧了吧，这破碎的美丽雕像；烧了吧，诸神的幽魂，你们现在不过是游荡在诗歌之幽灵王国的可爱魂魄而已，这书全当献祭诸神吧！"

不过，这次，海涅要献祭的并不是基督教，而是异教群神当中最美丽的神灵，爱神维纳斯。在《自然精灵》的第二部分，维纳斯以极为邪恶且可怕的形象复生。此间的诸多故事取材于威利巴尔德·亚历克斯（Wilibald Alexis）和埃兴多夫（Eichendorff）的《维纳斯山》（*Mons Veneris* ），海涅以特有的哀婉笔调复述了这些故事。接着，叙事急转直下，读者未及弄清楚怎么回事，便都被海涅囚禁在维纳斯山，和那落魄的唐豪瑟关在一起，先是倾听民谣《少年魔号》，而后是倾听海涅所做的更具悲剧性也完全是寓意性的阐释：

> 我爱她，以超凡的力量，
>
> 一种凌越沮丧的强力，
>
> 它如同一个最狂野的瀑布
>
> 洪流涌动不会缓停。
>
> 从悬崖到悬崖，它怒泻而下
>
> 而飞沫越过被漠视的石礁，
>
> 上千次，它的脖颈近乎折断，
>
> 它的航向却不曾阻断。
>
> 而假如整个天国都是我的，
>
> 我情愿将它给予维纳斯；

我愿给她旭日，我愿给她明月

和繁星，我爱她，如此痴狂。

我爱她，以耗尽的力量，

以狂野灼烧我的火焰。

这些已然是地狱之火么，

以及上帝唾弃我的一声叹息？

噢，神父，噢，乌尔班，噢，教皇，

收紧或松开你拥有的权力，

将我远离这地狱的折磨

离开此时的邪恶的权柄。

教皇哀恸，当他举起双手，

并哀恸这些言辞的破碎：

“唐豪瑟，噢，你这沮丧的人，

那魔法绝无可能破除。

“至于地狱下面的所有魔鬼

维纳斯远离那些至恶肮脏；

而我绝不可能通过她可爱的手爪

将你拯救——你徒劳地哭嚎。

“你须为肉身的欲望恕罪

用你这同步的灵魂；

你被抛弃，并被罚入

地狱永恒的痛绞。”

那美丽且冰冷的维纳斯大理石雕像，是海涅在意大利期间对之伤怀不已的，此时，它突然复生了，令海涅惊惧不已。显然，维纳斯之复生乃是海涅最为珍视的心愿，如今可算是心愿达成，然而，最终却不过是一场灾难。教皇的权杖也绝不会为他绽放，以此表明上帝宽恕了罪人。这次，他彻底迷失、沉沦了：

在汉堡的村镇，我绝不会被发现

因为我的罪孽是可憎的。

我将永远属于

我亲爱的女主人维纳斯。

《北海集》中那可怜的落魄群神之幽魂令海涅倍感痛楚，卢浮宫中的大理石神像，也曾令海涅兀自伤怀，怜悯不已。这些被糟糕残忍地对待的神灵，海涅本来是要在这部作品中为他们洗雪冤屈的，但现在看来，这些神灵在海涅心目中的确已经成了魔鬼，而且还是最为邪恶的魔鬼。特别是维纳斯，异教群神当中最美丽者，也是最令人追慕者，如今却成为群神当中最令人害怕的一个。直到1842年，海涅在一次同亚历山大·维尔的交谈中，依然不忘群神雕像这个话题，并且还同玛蒂尔德关联起来。不过，海涅此次谈话的方式和语调已经坦然了不少。海涅就是玛蒂尔德的皮格马利翁，是他将灵魂赋予玛蒂尔德。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海涅告诉卡米莉·塞尔登，他真正爱的是那些已经死去的女人和雕像。“大理石”一词不仅融合了他的宗教情感，于他而言，这个语词还有着情欲上的意涵，指涉和思想上的这种模糊状态，融合了过度劳累的肉欲。《佛罗伦萨之夜》所呈现的是一个雕像世界，海涅借助这么一个世界来描摹女人在他内心唤起的一系列超感官的、极具精神意向的情感，这也是海涅就此类情感展开的最为完整的剖白，在给卡米莉·塞尔登的临终忏悔当中，海涅将此类情感凝结起来。《佛罗伦萨之夜》非常怪异，构思精妙，但行文却又十分散漫。事实上，在马克西米连向玛利亚

讲述的往事和故事当中，并没有什么随意之事，玛利亚已经因为肺病而奄奄一息了，正躺在绿色丝绒沙发上，倾听这些故事，身上盖着透明的软棉布（此番情境乃是相当浪漫的）。不过，在嘲讽此番情境之前，在那沉沉睡去的女人醒来之前，有必要弄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很可能不过是一场视觉幻象，然而，玛利亚像极了马克西米连年轻时候极其热恋的草丛中那具雕像，这是何等诡异之事。从那以后，就有众多的雕像先后将他俘获，他的那段生命也因此如同梦境一般。至少有六个月的时间，他就是这样生活在至深的精神隔绝状态之中，满心都是对一个死去的姑娘的记忆，他未能在这个姑娘活着的时候爱过她；后来，一个梦中的女人取代了那姑娘的位置。由此，马克西米连便于无形中转向了音乐（这是最为精神化的艺术形式），也就是转向了帕格尼尼的绝妙作品以及此类乐章在他内心唤起的造型意象。马克西米连将乐曲转化为场景，并在至深的迷醉时刻，回忆起那完美的希腊艺术品。此时，叙事突然中断，大理石雕像再度现身：玛利亚又一次陷入沉睡，昭示着冷硬、美丽和死亡。第一夜的叙事以雕像开始，也以雕像结束，那雕像已然幻化为幽魂，空灵得如同梦幻，后来消融为乐曲，最终又变回雕像。

第二夜的中心人物也是雕像，不过那是一座活动着的雕像，也就是舞蹈中的酒神女祭司，而且，第二夜叙事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第二夜的诉求不是要消解大理石，而是要让雕像活动起来，由此令女人更为切近马克西米连。这显然是海涅自己所论的“诸神之黄昏”的情欲对等物，而歌德也牵涉其中。劳伦斯小姐显然是对应着迷娘，这本身就暗示了《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中琴师的女儿，那个身染悲剧色彩的小妇人。在一个矮子和一条博学的狗的陪伴之下，劳伦斯小姐在伦敦的街道上展开舞蹈，那是诡异、邪恶且赋有象征意涵的舞蹈，像极了古代花瓶和陶器上巴库斯女祭司的迷狂舞姿。五年后，马克西米连与这个舞女重逢，不过这次不是在伦敦，而是在巴黎这么一个伟大世界。那是在巴黎的一个晚会上，晚会上，崇拜快乐且疯狂舞蹈的巴黎人令马克西米连不禁回想起德意志人称为“薇莉”（Willis）的女鬼。那是一个在婚礼前一

天死去的新娘，她在死去当天的午夜时分走出坟墓，在月光洒满大地之时，跳了一支短暂的舞蹈，那舞蹈美得可怕，极为诡异且狂野。当时的劳伦斯小姐像变了个人一样。现在的劳伦斯小姐已然是贵妇人了，不过，不难看得出她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她的脸上已经有了斑点，就如同一座雕像在历经时间拷打之后，脸上沉淀了斑点。马克西米连逐渐了解了劳伦斯小姐的经历，正如劳伦斯小姐的养父母说的那样，她是“死亡之子”。不过，劳伦斯小姐有着非凡的美貌，马克西米连遂成了“这个有着天使面容和魔鬼身材的女鬼”的情人。两人一起给劳伦斯小姐那老迈的丈夫的脑袋上装了两只角。但是，当她午夜时分从他身旁起身，同昔日的舞伴（此时，这三个舞伴都已经死去了）舞蹈之时，他仿佛感觉到整个世界就像是被地狱火焰包围的冥王一样，并且那冥王还将珀尔塞福涅抱在怀中，那红色的丝绸床帏和那跳动的火焰当然也促成了此一幻象。于是，第一夜里面那冷硬的大理石雕像成了第二夜里面那热舞的巴库斯女祭司。她拒绝变成幽灵，相反，她获得了生命，此时，已然是实实在在的冥界女神了。以上就是这个现代的皮格马利翁的梦境。

同玛蒂尔德的“结合”给他造成的真正不幸，明显地体现在1837年的《法兰西舞台信札》（*Letters about the French Stage*）当中。这也许是海涅最为呆板、最为沉闷的作品了。当然，这也是唯一一部可以用这类语词来刻画的作品。玛蒂尔德当然不是令海涅悲伤的唯一原因，实际上，针对他的作品而来的官方禁令也对他的精神造成了重大影响。不过，整部信札当中弥散着不抱幻想的论调，对法国人的松散道德、物质主义以及造作的多愁善感，海涅亦是批评有加，这一切恐怕要归因于海涅自身软弱的羞耻感，这样的弱点是他一直都摆脱不掉的。信札痛苦地谈起流亡他乡之时的思乡病，并且还是以毕生第二个重大的神话幻梦结束了这部信札。在第一个重大幻梦当中，海涅得到了安抚，并且还借由美第奇的维纳斯和望楼上的阿波罗，确切地说，就是借助温克尔曼式的希腊艺术之静穆，超脱了四面楚歌的法律旷野。法国戏剧艺术信札也是以一场梦幻收尾，不过，此一梦幻呈现出决绝的失败主义态度。无边的

荒漠，漫漫黄沙，灰黄的天空，面容和四肢均已残损的可爱大理石雕像躺在脚下，这就是梦中场景。那么，什么是艺术？也许，巴黎那座巨大的斯芬克斯石像能够作答。

关于伯尔纳的作品乃是海涅和同时代人展开的又一次缠斗。歌德已经被海涅贴上了“奥林匹斯”的标签，而且歌德的作品也被他归入无生命的艺术作品的博物馆之中。由此，海涅便可以任意地垂怜它们，毕竟，海涅是伟大的反歌德派，是“运动之人”，是满怀神圣怒火及更为神圣的梦想的诗人。不过，要对付伯尔纳，海涅就必须改换战场，采纳一种开明的希腊立场，借此去评判并垂怜一个犹太人。就在此前一年，海涅刚刚在《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女人》（*Shakespeare's Girls and Women* ）当中对夏洛克及其族群实施了辉煌辩护，现在，他必须马不停蹄地去处理伯尔纳了。然而，像一个异教徒那样去感受并像一个犹太人那样去受苦，个中滋味，海涅心知肚明；拿撒勒人的脾性在这个犹太同胞这里道成肉身，他对此种脾性展开的剖析是极富锐见的，而且也不乏同情［除了在伯尔纳同让内特·沃尔（Jeannette Wohl）、萨洛蒙·施特劳斯（Salomon Strauss）的关系问题上的那些恶意指摘之词之外，此类指摘是令人遗憾的］。这部作品的私人意图就是要一劳永逸地表明，伯尔纳跟海涅是全然不同的两类人，海涅要伟大得多。这一点是应当言明的，当然，若是由别人来说明此事，则显然要更好一些。不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时人总是将他们相提并论，将二人视为政治和文学上的狄俄斯库里。如果说的确有谁因此吃了亏的话，那应该是海涅，因为海涅毕竟不像伯尔纳那般热衷革命，而且海涅的人格魅力也远远不及伯尔纳那般强劲有力。“我跟伯尔纳有什么关系呢？”海涅经常在怒火中高声喊叫，“我是个诗人！”

但是，这一切的辩解终归枉然。两人都是犹太人，两人都是德意志流亡者，两人都是自由思想家和政论作家。表面上看，两人是极为相近的。然而，两人彼此仇视，这一点伯尔纳的《巴黎信札》（*Letters from*

Paris ）和海涅的传记都给出了证明。这实际上是个人仇怨的问题，鉴于此，海涅给予伯尔纳的赞扬之词实在算得上慷慨了：

> 没必要增光添彩，只需要将他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真实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他既非天才，也非英雄。他不能侧身奥林匹斯神殿。他就是一个凡人，是这个尘世的居民。他是个好作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4]

伯尔纳的存在本身连同他的脾性以及观念，似乎都在将海涅拉回犹太人的街区，令海涅这个名字永远跟自己的名字相提并论。不仅如此，伯尔纳的共和情感乃是海涅从未分享过的，伯尔纳等于将海涅置于无可承受的进退维谷之境。海涅很可能会被认为对自由事业不够忠诚，甚至会被认为背叛了自由事业。此外，海涅则也完全有可能从那孤傲、独立且卓绝的诗歌地位之上跌落下来，陷入伯尔纳身边那批德意志流亡共和分子的肮脏泥潭当中，若如此，他肯定会落入极为不堪的境地：

> 噢，翅膀被点燃的甲虫有祸了！
>
> 如同一只身处其他陆地的蠕虫，他被摒弃
>
> 且必得在地面匍匐和爬行
>
> 随潮湿的气味可怖的昆虫。
>
> 放逐最糟的灾祸，你听他正在说，
>
> 是你被驱入那低级的队伍；
>
> 你被判联手一伙人
>
> 歹徒、附会者，以及许多蛀虫组成的。
>
> 我的翅膀已被点燃，可叹可哀！
>
> 我将不会回去我的祖国，
>
> 但，我是蠕虫，将卑微地呼吸
>
> 并在污秽和泥沼中腐烂。

如此激荡的情感，肯定是要找到一个发泄口的。为此，海涅在两人之间展开了精细的对照；一方是阴郁的拿撒勒人，另一方则是光彩四溢的希腊人，此番对照是海涅这部传记的灵魂，并且将整部传记串联起来，令这部作品获得统一性。传记由五个章节构成，其中的四个章节传达了一个重大意象：海涅在风暴肆虐的大海之上遇到即将沉沦海底的伯尔纳，但是海涅无法伸出援手，他担心这会危及船上的货物，那船上装载着未来的神灵；基督（伯尔纳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去世的）在七月革命之后落入地狱；在这个犹太弥赛亚的《塔木德》里面找到预言，这个弥赛亚乃是一个俊美、纤细却又相当有力的年轻人，正在啃噬自己身上的黄金锁链，只待有一天这锁链断裂，这个犹太弥赛亚将身负权能，降临世间，拯救世界。这些人虽然在种族上应当归属犹太人，但是跟伯尔纳不一样，他们禀性当中灌注了希腊元素，因此，如此的梦境也是合情合理之事。最终则是一场伟大的神话愿景为整部传记作了了结。在这部传记中，海涅以极大的技巧和极度的感伤，呈现了那么一个荒凉的未来场景。倘若伯尔纳的共和理想以及伯尔纳的天主教或者拿撒勒生活观念得以实现，这场景就是人类的未来，伯尔纳的理想或者愿景一旦实现，就必定要毁灭希腊之欢乐和希腊之美在尘世的最后一道幽光。

这场幻梦也许是海涅所有幻梦当中最为伤感的，在这场幻梦中，海涅发现自己在那么一个雾气蒙蒙的秋日夜晚，只身游荡在一片无边的荒野丛林当中。远处有光亮闪现，但重重魅影四处游动，将那光亮包围。他走进其中一个魅影，看到的是纤弱且赤裸的幽魂，面容甜美但忧郁，那是一群希腊水仙女，正聚拢在林中空地的篝火旁边。她们依然是那么美丽，不过，她们的四肢已然消瘦，冰冷的愁容黯淡了她们永恒的青春，深沉的哀伤遮蔽了她们的面容。她们就那么匍匐在那跳动的火苗四周，在用希腊语窃窃私语，彼此述说着现今这个糟糕的时代，述说着她们是何等恐惧那更加糟糕的未来。若是时光变得更加糟糕，她们将继续向着丛林深处逃逸。原初传来的平民的粗野聒噪之声，此时夹杂了教堂的晨祷钟声。这些可爱的林间仙女立时变得更加苍白、更加消瘦了，很

快便消散在雾霭当中。民主和天主教禁欲精神乃是这些林间仙女的魔咒和灾难，令她们的美遭受重创，那样的美，在日光普照之时，是如此欢欣，如此光华四射，现在，她们只能在午夜时分在幽林中兀自徘徊游荡，随时准备离去。

然而，海涅仍然不能最终选择希腊并弃绝犹地亚。1842年写就的《阿塔·特罗尔》（*Atta Troll* ）中有“疯狂追逐”一幕，这一幕很明显地揭示了海涅的此种态度。此次追逐行动乃是由三个美丽女人引领的，分别是女神迪亚娜、仙子阿本德和希伯来女巫希罗底，三人都经历了魔鬼般的变形，美得无可言喻：

> 骄傲地，如这最纯洁的雕像，
>
> 全能的女神一路骑行。
>
> 且她的脸如大理石般白皙
>
> 且如大理石般冰冷；而可怕的
>
> 是她的严厉而高贵的姿态
>
> 硬朗而苍白。
>
> 但一道可怖而离奇的
>
> 火焰甜蜜地在她的轨道上燃烧
>
> 漆黑如夜晚；并这般盲目地
>
> 坠入火焰，摧毁了灵魂。

她们的邪恶也都令人目眩神迷；不过，海涅最终还是选择了三人当中最为美貌也最为邪恶的希罗底：

> 是的，我最亲热地爱着你，
>
> 远胜过那边的希腊女神，

远胜过那边的北方仙女

我崇拜你，幽灵般的犹太女子。

是的，我爱你！且我懂得它

以我战栗的灵魂。

至此，海涅将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立置于自己同伯尔纳之间的对立框架当中，予以形象化，由此将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立视为希伯来（或拿撒勒）同希腊之间的对立。凯尔特神话中的仙子阿本德在这个魔鬼般的三位一体当中，应该说是分量最为微末者，同基督教没有任何关联。很显然，叙事的重点在此发生了转变，此一情形部分地归因于日渐年迈的海涅。随着年岁的增长，海涅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同自己所属族群之间的纽带。也正是这一点，将海涅从一个令他倍受折磨的幻象中解脱出来，这幻象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神灵，自海涅童年时代起，就一直出现在深夜梦境当中。现在，海涅终于可以将十字架上的这个人视为一个受迫害的变革者，一个同他亲近之人，同样梦想着解放人类，并因此沦落苦难境地。在1844年的《德意志，一个冬天的童话》（*Germany*，*a Winter's Tale* ）当中，海涅摧毁了有关基督之神性的传说：

当那清晨的雾气消散，

就在那鲜花盛开的日子，

那人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我凭靠路旁的塔楼望见了。

不管何时，我贫苦的堂兄弟，我看见

你的肖像，就充满了悲伤——

你，乐意拯救这个世界，

一个赎回世界的人，多么疯狂！

而他们确曾错误对待了你，

那个高居议会厅的绅士；

但为何，就教会和国家的议题

你不能持有你的主张？

对你来说是多么不幸，报业印刷

还未曾被发明；

关于天国的问题，你已写过一部书

并交予出版商发行。

审查机关将从那里删除

可应用于这个世界的任何部分，

审查制度将友善地销毁

钉十字架的这桩案情。

果真是金钱和银行家的转换器，

你被庙堂的嘲笑声所鞭挞，

苦恼的梦想家！而如今你吊在

十字架前，如一个可怕的警示。

欲向上与诸神比肩，此乃倨傲；欲将诸神向下拉扯，借此同诸神比肩，此乃渎神。这部作品满是渎神之词，如同滤网中的漏洞，实际上，这部作品在这个方面恰恰成了海涅一切作品中的至高典范。不过，希腊诸神、耶和华以及基督仍然被这个已然沉沦之人奉为神灵，无论这些神灵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无论他们仍然大权在握还是已经失去王位，无论他们是已经死去还是即将死去，无论他们已经在放逐当中幻化为冷硬的大理石雕还是经历了魔鬼变形，在这部作品中，诸神依然是诸神。在上引诗句当中，基督其实就是一个改革者，同一切的改革者平起平坐，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他的“表亲”海因里希·海涅，而且，两人显然都是没有神性的。两人都不过是《德意志宗教和哲学史》中一项“箴言”的例证：“伟大精神在哪里立言，哪里就是各各他”。

海涅最后的倨傲很快便遭到惩罚，而且这惩罚是相当残忍的。1844年12月23日，所罗门·海涅（Salomon Heine）——海涅万贯家财的舅舅——去世，遗嘱中没有提及这个窘困落魄的侄子。这可能是疏忽所致，因为所罗门生前曾承诺，死后给海涅的资助不会中断，倘若海涅死在玛蒂尔德前面，这份资助的一半则转归玛蒂尔德（1841年，玛蒂尔德便已经是海涅的合法妻子了）。卡尔·海涅（Carl Heine），所罗门的儿子兼继承人，并不急于修补遗嘱的这个漏洞。最终，卡尔答应修正遗嘱，但海涅必须承诺绝对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现在这个已经以卡尔为户主的家族。此一条件可谓尖刻而且还带有羞辱性，背后的情由很可能就是恐惧。窘迫的经济状况、往日里承受的众多创伤，加之遭受重挫的家族情感，这一切的因素积聚起来，令海涅身上一切最为恶劣的元素悉数爆发出来。毕竟，他的禀性当中是暗藏了此类元素的，比方说，他有着致命的阴谋倾向，有着魔鬼般的手腕，有着恶毒谩骂的天分，心怀怨毒，喜欢敲诈勒索，甚至还有奉承乞怜的天资，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而已。这一切的魔鬼元素当中，灌注了一种近乎暴烈的悲伤，一种无可忍受的不公感和屈辱感，这一切的一切都禀赋着撒旦特质，极为可怕，也极具悲剧色彩。1846年2月24日，海涅致信范哈根（Varnhagen）：

> 我素来关心的唯有人们的尊重，这是我的指导原则，为这个原则，我活着，苦着。除此之外，我根本就不关心这个世界。现在，你应该能明白我正在承受何等痛苦。救我离开这地狱吧。

于是，基督的这个“表亲”便不得不纡尊降贵，侧身借款人和银行家中间，而后，更进一步沉落自己的心灵地狱之中，那心灵俨然是扭曲了的，充满了报复欲念和痛苦。跟那些对头比较起来，海涅在手腕和愤怒这两项品质上都远远胜出，尽管如此，最终还是金钱说了算，海涅也不

得不顺应时势，于1847年给出了卡尔家族要求的那项承诺。与此同时，海涅将自己的工作强度提升到疯狂状态，并因此于1845年3月中了风。接着便是“一种深沉的引力、一种模糊的暴力”抓住了他，这似乎预示着“诗歌和散文的可怕爆发”。逐渐地，海涅将此种剧烈的激情以及疯狂的诡计，转化为“极为神圣且极具神性的愤怒”。海涅坚信自己的天才遭受了致命伤害，他认为自己快要死去了。1846年9月1日，他总结了自己的境况，简短但语意丰富：

> 上帝啊，请宽恕家人对我犯下的罪过吧。我年轻时代的好友、我自己的同宗家人，未能遵行他父亲的承诺，这的确不能说是金钱之事，这只能激起我的道德义愤；正是这一点，令我彻底心碎，心既已碎裂，死亡也就不远了。

此等动荡及其带来的恶果，恐怕只有超凡的生命力才能挺过来。1845年之后，海涅陷入半盲且瘫痪的状态，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不过，他的命数并未就此完结。英格兰方面伸出援手，令他起死回生。本雅明·鲁姆利（Benjamin Lumley），英格兰皇家剧场的总监，恰在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对海涅来说是相当幸运的念头，他邀请海涅为他创作一些芭蕾舞剧剧本。海涅从未尝试过，不过，报酬相当丰厚，而且，这对海涅来说，也是一种新的自我表达方式，显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鲁姆利这项提议之聪敏恐怕远远超出了鲁姆利本人的预料。此前，至少有十年时间，巴库斯女祭司就一直在海涅心灵当中舞蹈着，海涅也在作品中频繁提及这一点。不仅如此，狄奥尼索斯元素也开始影响海涅，《阿塔·特罗尔》中“疯狂追逐”的午夜幻象就是因此而得以显现出来的。鲁姆利的邀约对海涅来说，是一次绝佳的表达机会。舞蹈诗歌《迪亚娜女神》（*The Goddess Diana* ）成了海涅希腊主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迪亚娜和侍女、阿波罗和九位缪斯、狄奥尼索斯和狂欢队列，凭借舞蹈赢得了一个中世纪骑士的心，接着以轻快的舞蹈步伐进入骑士的城堡。在城堡之中，以舞蹈来表现希腊异教诸神的快乐生活与日耳曼的家庭德性之间的一场决斗，两者分别以迪亚娜和受人敬重的骑士夫人为表征。在这

场决斗中，迪亚娜遭遇暂时挫败，遂在天空中重新现身，引领着“疯狂追逐”，并再次俘获了骑士的心，此时骑士的身边已经围满了水仙女、林间仙子、各种精灵以及火蜥蜴。骑士遂加入了“疯狂追逐”，径直向着维纳斯山进发，不过，忠实的阿克哈特将骑士击倒在地，此举乃是出于善意，是要拯救骑士的灵魂。葬礼队伍沉浸在一片悲伤之中，并继续舞蹈着，进入维纳斯山，人们发现爱神正在同唐豪瑟跳着一支双人舞，舞蹈所表达的乃是无可摧毁的爱欲，不过，这爱欲绝对不是建基于彼此间的尊重。阿波罗和众缪斯尝试唤醒骑士，但只取得了部分成效。是狄奥尼索斯，“欢愉之神”，最终战胜死亡，将自己的情人交还给迪亚娜。可以说，这份诗篇集结了海涅异教崇拜的全部元素，其中，狄奥尼索斯更是第一次出现在奥林匹斯群神之列，并且巴库斯舞蹈在《佛罗伦萨之夜》当中也扮演了角色。在那里，巴库斯舞蹈是一种表达媒介，表达了那种狂野的、充溢着灵感并造就生命的运动，这样的运动不仅能令大理石雕像变形，也能够征服死亡。正是由于狄奥尼索斯的存在，希腊群神得以再一次变形：他们不再是鬼魂、苍白的幽灵、冰冷的大理石雕像，也不再是可怕的恶魔，而是变成了光彩照人的、美丽的、活生生的神灵；他们会在白天藏匿起来，在夜晚聚会并狂欢。此时的群神所表征的不仅是可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表征着生命。

至于基督教神话，则表征着死亡。此一信念，海涅在1847年《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 ）中呈现出来，此乃海涅的“骷髅之舞”。“愿上帝和歌德宽宥我”，海涅在《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中谈到自己对歌德的攻击之时，曾给出了此种玩笑式的说辞。不过，现在，他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发出这样的祈祷了。海涅在《阿塔·特罗尔》中将歌德列为“疯狂追逐”的成员，在《迪亚娜女神》中将歌德列为维纳斯山居民。在海涅的作品中，无论希腊诸神出现在哪里，歌德都会陪伴左右。此时，那古老的欲念，自1824年之后便一直潜藏在内心的计划，重新得到了确认，而且，那情形也是相当迫切的——他要写一部自己的《浮士德》，同德意志文学的主神一较高下。海涅自己也曾指出，这项

工作是极为艰巨的，因为他要在四个星期内，将歌德耗费六年时光才成就的杰作改造为简洁平顺的歌剧剧本。海涅此时已然成了饱经创伤的残废之人。欲同歌德一较高下，这实际上是在发起一项极为鲁莽的挑战。不过，相较于歌德，海涅有着一项巨大优势，而且海涅自己对此心知肚明。长期以来，海涅一直关注着自然精灵、中了巫术的凡人以及撒旦式群神的所作所为；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内心里是信从他们的，这是他同歌德的不同之处。海涅宣称，自己掌握了古代神话的真正精神，这的确是讲出了实情，此一优势是沃尔夫冈·歌德这个伟大的怀疑论者根本不具备的。战斗就在这个战场上展开，尽管对战双方仍然是极其不对等的。在海涅这部作品中，梅菲斯特变成了梅菲斯特菲拉，这是对神话故事实施的相当有技巧的改造，以符合芭蕾舞剧的要求，而且，此一改造于海涅而言，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第三幕中对女巫的安息日以及黑弥散的描写，表明海涅对黑魔法是有精确了解的，对魔鬼、丑陋以及邪恶之事也是有自己的情感的，这一切都超越了歌德的想象。在海涅的这部剧中，浮士德起而反抗身边一切的阴险行为，对基督教禁欲观实施了扭曲的嘲讽，并且还恶作剧式地模仿了那些令人憎恶之事。浮士德也就得以突然体验到对纯粹之美、希腊式的和谐、荷马众英雄之高贵以及那个小阳春世界的无限渴慕之情。这一切都极为契合海涅这部剧的剧情。梅菲斯特菲拉召唤海伦娜的亡灵，不过这亡灵即刻便消失了。同歌德《浮士德》中的情节不一样，海涅笔下的浮士德和梅菲斯特菲拉乘坐神马一路追赶，并在第四幕来到阿基佩拉古斯的一座小岛，海伦娜是这座小岛的王后：

> 希腊的宁静弥漫四处，神圣的芬芳的和平，古典的平和。这里没有什么使人想起迷茫的未来，或者唤起神秘的欲望和恐惧的战栗，那些超自然的精神狂喜已将自身从肉身中解放。它是完全真实的可塑的幸福感，没有怀旧的悲伤，没有空乏的渴求和迷梦。

浮士德和海伦娜的结合，梅菲斯特菲拉以巴库斯舞蹈予以祝福，但在布罗肯山上曾陪伴浮士德的女巫公爵此时也抵达这座小岛，打断了婚

礼。在北方黑魔法面前，希腊世界消退而去，变得苍老并最终沦为废墟。海伦娜及其女仆都变成了丑恶的吸血鬼，整座小岛被狂暴的海浪吞噬。在第五幕，浮士德被众魔鬼及时带走，并在一路舞蹈之中，奔赴自己的宿命。希腊诸神统治之地，就是幸福、美和生命之地。基督教神灵统治之地，则是黑暗和死亡之地。这就是海涅的狄奥尼索斯剧作《迪亚娜女神》、“骷髅之舞”以及《浮士德博士》传递出来的清晰无误的信息。未来的诸神将更具希腊气息而非基督教气息。我们的子孙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可以在老妇人的故事中，听闻那么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一个已死之人被奉为神灵，并在可怕的葬礼仪式上得到祝福，在这样的葬礼仪式上，在参与者的意象当中，他们吃的面包，乃是那人的身体，他们饮用的葡萄酒，乃是那人的血。1847年受难节那天，海涅在给犹太同胞亚历山大·维尔的一本故事集撰写的导言当中，就是如此申述的。

---

[1] 我曾在另外的文章中指出，1839年，海涅决定将1830年的《赫尔戈兰信札》（*Letters from Heligoland* ）收入有关伯尔纳的作品当中，此时，海涅修订或者重写了信札的部分内容，我在那篇文章中对此举出了诸多理据，证明海涅的确对信札做了修改。修改后的信札包含了有关自然精灵特别是流亡中的诸神的内容，这就进一步支持了我的看法。不过，我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我认为这些内容都是后来增补进去的。参见*Mod.Lang.Rev* . January 1923。

[2] 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国王，相传性情孤僻，擅长雕刻。——译者注

[3] 神王（god-king），指人神同体的君王，古代埃及人称法老为神王，西藏人也称转世达赖为神王。——译者注

[4] 最后这句话正是奥古斯都皇帝对西塞罗的评说，当时，奥古斯都发现自己的孙子正在阅读这个政治对头的作品。参见Plutarch，*Life of Cicero* ，Chapter XIV。

流亡中的诸神

别的世代和别的制度；
是的，我也曾一度爱过
荷马的歌咏，有关
阿喀琉斯和奥德赛的伟绩。
那些日子，我的心情镀金般
似太阳鲜红的炙焰，
而我的弓弩被葡萄蔓叶加冕
而号角喜气喧天。
随它们去吧——因着破碎的谎言
如今我骄傲的胜利战车，
和牵引它的迅豹，
都已死去湮灭；那些妇女亦然
她们曾佩着手鼓和哐当的铙钹
绕着我翩翩起舞；而我如今在地上
痛苦地翻滚着，
又瘸，又可怜——随它们去吧。

1848年5月的某天，海涅一生中最后一次外出，他几乎把自己拖进了卢浮宫，去面对生命中最为残酷的事实。是时候了，他要挥别自己那段幸福时光当中予以崇拜的异教群神，当然，这是告别，不是断交。海涅此处的用词是“崇拜”，这是有讲究的，毕竟，此次造访，乃是一个将

死之人最后一次向表征着爱和美的女神致敬：

> 进入这间高贵展厅之际，我几乎完全瘫软，那受到赐福的米洛的维纳斯，正是美的象征，她就矗立在那基座之上。我匍匐在女神脚下，久久不能动弹，我禁不住悲恸落泪，那哭声足以融化铁石心肠。女神垂视于我，目光中满是怜悯，却又如此绝望无助，她仿佛在说：难道你没看见我没有手臂，帮不了你吗？

很多年前，海涅曾经谈起，希腊诸神于一个贫穷破落之人而言，是毫无用处的，看来此论是说出了实情；于是，海涅结束了同希腊诸神的"爱和友爱"，将他们逐出他的心灵。变的是海涅，而不是他们。正如他在1849年4月公开宣示的那样，他不再是神一样的两足动物了；不再是歌德之后最具自由气息的德意志人了；不再是歌德之后又一个伟大的异教徒了，不再是那个戴着葡萄枝王冠向歌德的宙斯致敬的狄奥尼索斯了；不再是那个光彩照人的希腊人了，再无可能在笑声中蔑视那些阴郁的拿撒勒人了。此时的海涅不过是一个破落的犹太人，境遇悲惨，至为不幸。他同诸神的关系已经完全颠倒过来，因为他此时只希望得到诸神的同情，而不再是向诸神抛洒同情。现在的希腊诸神于他而言，已然是高高在上了，而且，高高在上的神灵也已经无法安慰并升华海因里希·海涅了。在考量他所谓的"回归上帝"以及世人常常说起的所谓的改宗事件之时，此一基本情状是必须考量进去的。改宗之事乃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可以说是于无形中发生的。他的境遇太过悲惨，他当然需要一个上帝去依靠。不过，对于此刻在内心涌动着的这些宗教情愫，海涅对其根源知道得清清楚楚。很可能早在1848年7月，海涅就致信兄弟马克西米连：

> 我的眼睛不行了，这让我感到可怕的压抑；还要在床褥墓穴中受尽煎熬，永远都看不到曙光，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如此哀伤，这样的心境本来是背离了我至深的天性，这境况是如此诡异，令我心绪难安。倘若在某个明媚的早晨，你见到我的诗篇中充满忧伤和怜悯，请不必吃惊。无数个难眠的殉道之夜，我都在构思这些优美诗篇，不过，我不曾将那思绪记录下来。这些诗篇都是献给一个非常确定的神灵的，那就是我们父辈的神灵……父辈们会在天堂如何议论我呢？我不知

道，不过我完全能想象到，某个心志强硬的天使会说：看看这个人，什么都不是，现在处境不好了，竟然让老妇人在上帝面前为他祈请，他健康之时，是何等蔑视上帝啊。

海涅在四个不同的场合，公开宣示了自己心境的这种变化，分别是在1849年、1851年、1852年和1854年。[1]

前三次忏悔听起来是足够真诚的，尽管表达得远没那么虔诚；最后一次忏悔则对上帝满是尖酸和讽刺，足以令此番信仰宣言失效。海涅是在1853年和1854年写就了《忏悔集》（*Confessions* ），不过，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前，上帝实际上就已经离弃了他。1848年到1853年的信笺和谈话中，上帝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1853年之后，海涅几乎没再提及上帝，即便有，也只是那么一两次，而且是一带而过。1853年和1854年写就的那些诗篇充斥着暴烈的怀疑主义气息，特别是在灵魂不死这个话题上——海涅在1851年接纳了灵魂不死这一观念。此外，这些诗篇还表达了对天堂的极度憎恶。你可以说如下诗行完全背离正统，但能写下如下诗行的人，肯定不会是信徒：

停止如此神圣的比喻；

停止虔诚的假定；

试着找出一个简易的答案

对于这些遭到再三纠问的问题：

为何正义的人会跌倒流血

沉甸的十字架的重压下，

携着幸福和胜利，

邪恶之人却在打马奔骥？

那是谁的错？是我们的神

（冷峻的想法）并非如此全能？

或是他许诺了这些颠倒的是非？

让善行驭于强力！

就此，我们的质疑，绝不会停止，

直到地球末日，一小撮人

堵住我们的口，而我们默然不语。

但绝不要告诉我，那就是答疑。

1848年到1853年，海涅应当是同耶和华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毕竟，对于海涅那怪异心灵创造出来的神灵而言，这个称谓也许是最为贴切的，足以抚慰这个神灵。而且，一旦和解的努力失败，海涅还可以拿这个神灵做替罪羊，将之视为一切苦难的根源。海涅之为犹太人，并非无缘无故。他创造的耶和华承载着整个宇宙的罪恶和悲伤，而且，海涅还将自己创造的这个神灵驱逐到荒野之中。甚至在实施此一终极渎神行动之前，他对自己创造的这个神灵就经常予以责难，而非赞誉。当然，他的公开说辞一直都是充满敬重的，直到《忏悔集》为止；但是在通信和谈话当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寥寥几段引文就足以清晰地揭示出海涅的态度，根本不需要长篇大论的分析：这个老绅士如果继续这样，就只能被关起来；很显然，那些无神论者已经把他逼疯了。耶和华要比希腊诸神野蛮得多，希腊诸神是绝不会让一个诗人承受如此漫长的痛苦的。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正在拿海涅取乐，毕竟，他就是身居天堂的大阿里斯托芬，而海涅则不过是德意志的小阿里斯托芬。然而，这场闹剧，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取得了足够的成功，但剧情太过漫长，逐渐变得令人厌倦。此外，这出闹剧的创造者也一直都在自我重复，在剽窃自己的尊贵可敬。这就是海涅创造的神灵，海涅将众多的诗歌和散文都献祭给这个神灵，希望能够以此获得更多的稿酬，而不是像坎佩那样，只给那么一点点酬劳。海涅曾四次公开宣示放弃对这个神灵的信仰，其中一次还是以诗集序言的方式进行的，那部诗集当中包含令人毛骨悚然的亵渎之词。海涅在去世前三个月，还声称要向防止虐待动

物协会举报这个神灵。这个神灵定然也会宽宥海涅：“那是他的信仰”（据说，海涅临死之际，就是这么宣示的）。还有那么一句妙语，想必弗洛伊德会将之视为渎神之词的最高典范：“所谓的造物，恰在毁灭之际，方显示出自己才是创造者。”海涅之创造自己的神灵，乃是有着自己的目的的。他创造的耶和华是诗人心灵的造物，因此也就完全不同于原始的野蛮崇拜，诗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诗人乃是仿照自己创造了这个神灵，将自己身上极成问题的品性都赋予这个神灵，因此，这个神灵极具个性，而且也极为机智、残忍，常常心怀怨毒，没有宽仁可言。这样一个神灵，几乎是在迫使人们攻击他，而后他会给出毁灭性的反击。不过，这也是一个强大的神灵，一个令人生畏的犹太人。海涅毕生都在致力于罢黜诸神。当天堂变得空空如也，只剩下“一个被人称为‘必然性’的老处女，且行动迟缓，满心悲伤”，海涅遂创造了耶和华，取而代之。这段短暂且没有荣耀可言的统治大概维持了五年。当海涅将耶和华作为老迈的篡位者予以罢黜的时候，此前遭到放逐的希腊诸神重新抬起了头。“起起落落，如同井中木桶”，拿撒勒主义、异教主义再次在海涅内心交织、争斗，一方沉沦幽暗之地，另一方则重见光明。

《北海集》当中现身天空的诸神，此前一直都是荷马奥林匹斯群神的鬼影而已：宙斯、赫拉、帕拉斯·雅典娜、阿佛洛狄特、阿瑞斯、阿波罗、赫淮斯托斯以及赫柏等，曾经是光彩四溢的神灵，但在《卢卡浴场》中，基督将他们驱散并令他们都消散。此后的多年间，海涅任由希腊群神自生自灭，他只是在跟随爱神的脚步，最终，海涅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认定，爱神、女猎手阿尔忒弥斯以及其他所有的希腊神灵，都是邪恶且恶毒的魔鬼。再往后，海涅经历了进一步的启蒙，这令他意识到，自己误解并委屈了这些神灵。此时的海涅已然被维纳斯俘获了。他崇拜维纳斯，没有任何羞耻感，然而，在他生命中那场最为重大的危机中，维纳斯无力提供帮助，海涅遂离开了维纳斯，因为他别无选择。这是诀别。1853年，当海涅离弃耶和华转而追寻流亡中的诸神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忘记了维纳斯。

两千年前被基督罢黜的这些神灵，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哪里？阿波罗变成了牧羊人，并在奥地利被处死，因为他那美妙的乐曲令僧侣们感到害怕，也令他们起了警觉。严刑拷打之下，他供认自己就是阿波罗，并吟唱了最后一曲令人心碎的歌谣，这歌谣令众多妇女在聆听之后，满面病容，日渐憔悴。人们认定阿波罗是吸血鬼，遂掘开他的坟墓，发现里面是空的。阿瑞斯先是沦为雇佣兵，随后又成为帕多瓦的行刑手。赫尔墨斯伪装成一名荷兰商人，做起了东弗里西亚和怀特岛之间的奴隶生意。普鲁托虽没有被迫流亡，但也只是成为地狱之主，而不再是冥界之王；基督徒称他为魔鬼，不过，他的地位跟灾难之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变化。王朝变迁对波塞冬的影响甚至还要更小一些；无论是钟声还是琴声，都无法抵达他的王国，水手们依然信从于他。狄奥尼索斯则足智多谋。他设法进入蒂罗尔的一处修道院，并成为修道院院长，而后便让西勒诺斯在厨房担任打杂修士，让潘神（或普里阿普斯）成了他的管窖人。每年秋分时节，狄奥尼索斯仍然会举行那狂野、甜美且恐怖的酒神仪式，身边簇拥着女信徒和萨提，“欢迎你，酒神巴克斯”的呼喊声依然是那么激荡。

据说，一个年轻渔人在深夜时分偶然撞见了狄奥尼索斯的此一仪式，惊惧不已，海涅对此间场景的描摹可以说是他最为有名的散文段落之一。显然，这些篇章也是这个眼瞎且瘫痪之人，在床褥墓穴当中对生命、狂喜和快乐发出的礼赞之声，可谓振聋发聩。不过，此番伸张之分量主要还是在于：这是德意志文学第一次毫不含混地认肯了酒神狄奥尼索斯，也是第一次对这个神秘、模糊且迷人的神灵做出切实回应，这个神灵的仪式当中，快乐和痛苦、美和残忍、魔鬼元素和神圣元素，乃是无可拆解地交织在一起的。歌德也曾容许狄奥尼索斯元素渗透到《潘多拉》的最后几幕以及《浮士德》第二部的海伦娜序曲当中，还在第一份戏剧诗篇中给出了相当高昂的理想主义解说，在第二份戏剧诗篇中，则给出了轻蔑和讽刺性的解说。席勒也曾在《希腊诸神》当中，阐发自己的巴库斯庆典观念，那是吵闹、运动以及沉醉的喜悦：

“欢迎你”，酒神狂女欢呼歌唱，

而文豹拉着华丽车队，

一切都在宣告大能的欢乐使者的到来，

羊人和林神在前面开道。

疯狂旋转的曼那德们[2]欢欣不停，

而她们的舞蹈将他的葡萄美酒颂扬，

那时红光满面的主人就邀请来宾

喝它一个大醉方休。[3]

荷尔德林也正是在发病前夕，完全归服了这么一个神秘的狄奥尼索斯，将他视为基督的亲兄弟。以上确实都是真的。不过，作为奥林匹斯主义者的歌德、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席勒以及作为幻想家的荷尔德林，都天生没有能力理解这个欢快、迷醉和感官荣耀之神，因为这个神灵还有另外一个面相，那就是残忍、放荡以及极度的痛苦。在《迪亚娜女神》中，海涅仅仅是将狄奥尼索斯视为“愉悦之神”。不过现在，海涅对狄奥尼索斯的理解加深了。他先是以造型艺术般的精细，描写了狄奥尼索斯仪式，接着便申述了自己对此仪式的感受，最后则是描写了此番仪式对那个惊惧不已的年轻渔人造成的截然不同的冲击。首先呈现的是美，荣耀，以及那跳着激情昂扬的舞蹈的陌生、狂野、怪异的人群，接着便是对此一解放行动的回应，在这样的行动中，胜利的感官迸发为强烈的生命潮流，最后则呈现了这场仪式的另一面，那是魔鬼的一面、邪恶的一面，也是极具诱惑力的罪恶的一面。简言之，海涅召请魔法，将狄奥尼索斯仪式重重围绕起来，这其中蕴含着狄奥尼索斯这个神灵那迷惑人的本性及其朦胧难辨的魅力。这份申述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已经没有留下什么尼采可以增补的东西了。尼采所能做的，仅仅是对海因里希·海涅这个魔法宗师写就的那三四页的篇章予以扩展、细化和剖析而已。

阿波罗在这尘世之上遭遇了令人悲伤的命运，并且似乎就此消失了；阿瑞斯干起了邪恶且令人不齿的行当。普鲁托和波塞冬在新体制下过得都算不错，赫尔墨斯和狄奥尼索斯则是在各自的世界里尽力而为。然而，群神昔日的王者和统治者，他的命运极为凄凉、悲惨，令人难以置信。王朝坍塌之后，这个昔日的奥林匹斯王者立刻开始了流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就在一百年前，一批破冰前往北极的海员在一处荒岛之上发现了宙斯；那只鹰和那只母山羊阿玛耳忒亚伴随在他身边。他用发音相当古老的纯正希腊语告诉这些海员，他至为不幸，因为他知道那些更好的时代；此人的威严以及巨大的身躯令这批海员极为敬畏，以至于海员们把他当作可怕的鬼魂或者某种恶灵。海员当中有希腊人，于是宙斯便急切地问起希腊当年那些神庙和宫殿的情况。宙斯提起的名字海员们很是陌生，不过，宙斯能够将详细的地点描述出来。当宙斯获悉自己的神庙已经沦为废墟之时，极度的悲恸袭来，他一下子瘫软过去，海员们遂在极度的惊惧之中逃离现场。后来，一个一直待在船上的教授向海员们确证说，这个怪异、落魄的生灵不是别人，只能是大神宙斯。

伟大神灵竟沉沦如此境地，海涅倍感怜悯，不过，这怜悯倒也不足以成为动力，促使海涅去恢复宙斯的古老权能，毕竟，“流亡中的诸神”当中，真正的英雄乃是狄奥尼索斯。在狄奥尼索斯要求海涅忠于自己之前，海涅心中的主神一直都是阿波罗，因为阿波罗乃是诗艺之神。不过，海涅在结识了狄奥尼索斯之后，狄奥尼索斯就注定了要对他产生无可抗拒的吸引力。狄奥尼索斯并非奥林匹斯神灵；他恰恰是否定了作为奥林匹斯之象征的静穆和安详，他是冷硬和无生命的对立面，歌德正是将这样的特质赋予了希腊艺术和神话，至少海涅是这么认为的。狄奥尼索斯拥有众多的奇特称谓，并以此接受崇拜，同时也在世人心中唤起众多相互冲突的情感，由此，便有了一种厚重的氛围将这个神灵环绕起来，这氛围此消彼长，起落不定，跨越了神性和魔性。这恰恰就是海涅的神灵。

不过，即便是狄奥尼索斯也无力阻止日益逼近的瓦解命运。在海涅最后的幻梦之中，出现了神、人混杂的混乱场景，这群造物正围着他的石棺争执不休，狄奥尼索斯只是其中一员。就这样，两只木桶并排停在井底和井口之间的半道上。哪只木桶是空的？哪只木桶是满的？人们仔细观瞧那黑暗的水井，根本无从分辨，尽管不是不可以冒险揣测。不过，最终，那已经破损不堪的井绳断裂了，两只木桶都落入井底，也许，井底存在某种可怕的真相。

《致玛嘉丽特》（*For the Mouche* ）[4] 是海涅最后的诗篇，而且也的确是名副其实，这份诗篇表明此时海涅的智识水准并不逊色于《罗曼采罗》时期，《罗曼采罗》曾震惊了整个德意志。据卡米莉·塞尔登记述，1855年11月，海涅曾有一梦，海涅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将这场梦境记录了下来，由此成就的诗篇在1856年由梅斯内尔刊发于世。当然有人对这份诗篇展开了仔细的文本考证工作，欲证明诗篇的真正作者是梅斯内尔，毕竟，这份诗篇的手稿一直都没有找到。[5] 我认为海涅很有可能在诗篇当中留有脱漏，梅斯内尔应该是就其略加增补。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这么多，当代的文献批评也是到此为止。这份诗篇乃是海涅最具悲剧性质的幻梦之一，深透人心，真实得可怕；叙事极其朴素，但也极其精细，在此等程度上将两者融合起来，恐怕也就是海涅能做到了。而且诗篇当中也蕴含了海涅那种奇特才具，这等才具无论是对他的批评者，还是对他的模仿者，都成了一个谜题，无从逾越，海涅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可以揪住人的内心。他通常会激发人的怜悯之情，此外，反讽和爱也都是他的武器，他会让人们见证他那充满悲剧情愫的心灵，由此激活上述武器。如果说所谓抒情诗不过是一种自我夸示的美丽游戏（就是一种手段，借此令人们接受诗人自身的情感，而不是对这些情感进行评估和判断），那也可以说，此种游戏在海涅这里总是能发挥出双倍的效能，而且海涅差不多也总是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在这份诗篇中，海涅作为梦的主人，垂视着大理石棺里面那个现实的海涅，“一个已死之人，面容温和、痛苦”，大理石棺周边都是文艺复兴的废墟。

不过，那大理石棺，以女像柱为支撑，逃过了世事之侵蚀。四面都刻有浮雕，全部的希腊神灵以及部分的罗马神灵都在其上；荷马以及《旧约》的众英雄，在神庙里面争执不休的“疯狂追逐”和基督；地狱中的撒旦以及巴兰的驴子。一切都是那么活灵活现。石棺当中那个死去之人的头顶处生长出一株西番莲，花朵倾斜，仿佛是在抚触那亡故之人的眼睛和额头。梦的主人将睡梦继续下去，那花朵幻化成了海涅的爱侣卡米莉·塞尔登，这诗篇则恰恰就是献给她的。在海涅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时光当中，她激发了海涅内心爱的激情，双方互生情愫，海涅这段时光的信笺和诗篇以及塞尔登对这段时光的记述，都揭示出此一激情于两人而言是何等新鲜，也揭示出此一激情的本质。由此点燃的火焰一直到海涅亡故之时，都不曾熄灭：

噢，我心爱的孩子，花朵似你，

当你吻我，我怎会未能感应？

没有花的亲吻能如你般柔嫩，

没有花的眼泪能如此剧烈地将我灼烧。

在那空灵的月光下，两人默默相对，于无言中互诉衷肠。但是，包裹着二人的死亡的静谧却突然被打破，那是一阵令人憎恶的嘈杂之声。有斥责，有争吵，石棺浮雕上的群神在争吵，撕扯。野蛮的潘神同摩西展开了野蛮的争吵，他发出狂野且恐慌的喊叫，摩西则发出同样野蛮的诅咒。希腊群神和蛮族群神也都加入战团当中。美和真在此世是永无可能和解的，人类也因此分化为永恒的两个对立的阵营。群神、众英雄以及众圣人的扰攘之声，进而被巴兰的驴子那令人无从忍受的嘶叫之声湮没，最终，这嘈杂之声将沉睡者吵醒，将其逼入疯狂境地。

在这份诗篇中，海涅既不支持耶和华，也没有站在耶和华的敌人一边。这是他平生第一次选择不介入发生在自己大理石石棺周围的激烈争吵。此时的海涅要的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平静，即便是生命的代价。他就

躺在那里，同那朵没有颜色的怪异的花交流思想，他曾在二十年前的《浪漫派》中描述过那样的花朵。那是在各各他的血浴之地生长出来的植株，那繁复的花萼之上乃微缩了基督全部的情感元素。那亡故之人，面容温和但也苦楚，静静地躺在那里，同那花朵交流。此时的海涅已然将自己等同于人子了，这在他的生命中并不是第一次（在此，海涅将自己称为人子），他是为着人类而洒下拯救世界的血。这样的比附自然是渎神的，不过，海涅并没有将此一比附坚持太久。那情感之花幻化成一个女人的形象，弯腰抚触海涅。至于海涅，则直到最后都仍然是海涅。那令人无从忍受的驴子的嘶叫击碎了海涅这最后的空灵幻梦，他昔日的所有幻象也都是因此破碎的。

---

[1] “Rectification”，*Allgemeine Zeitung*， April 25，1849；the *Epilogue* to *Romancero*； the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Salon II*；*Confessions* .

[2] 希腊神话中，曼那德（Maenad）即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女性崇拜者的称呼，这些异性以狂野、癫狂著称。这个词也可翻译为“狂乱者”（raving ones）。——译者注

[3] 此处参考了钱春绮译文，略有改动。参见《席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20页。——译者注

[4] 德国人艾丽泽·克丽尼茨，海涅晚年的精神恋人，自号玛嘉丽特，诨名苍蝇（Mouche），取自海涅，因其写信盖的图印似苍蝇。——译者注

[5] Ch.Andler，“D’un faux dans l’oeuvre littéraire de Heine”，*Revue Germanique*， Paris，May-June 1906.

欢迎你，酒神巴克斯！

可以说，希腊艺术、希腊诗歌以及希腊诸神，乃是温克尔曼挖掘出来，莱辛和赫尔德予以复生的。此后，基本的情况便一直就那么维持着，直到海涅出现。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为温克尔曼的希腊做了太多事情，也承受了不少苦楚，这一切在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中有着极大分量，此一分量远远胜过温克尔曼的希腊能够为他们做的一切。他们对温克尔曼的黄金时代实施了再造，并予以理想化或者精神化，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曾在很大程度上改造温克尔曼的希腊。海涅则是相反的情形。海涅的感受力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任何单一元素肯定不可能令这样一个人发生根本改变，毕竟，海涅对一切元素都秉持开放态度。部分地因为海涅禀性当中蕴含了毁灭性的力量，部分地因为海涅具备极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他反而会令他碰触的任何事物发生变化，希腊自然也不例外。海涅彻底改变了流行的希腊观念。奥林匹斯王朝一直享受着俗成箴言——“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所提供的力量，海涅则将这种力量彻底剥夺，因为海涅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解释成没有生命且僵硬。德意志古典主义那虚幻的理想主义，在歌德的海伦娜身上道成肉身，最终在海涅之常识感的光照之下，归于消散，为此，海涅还对荷马群神实施了现实主义的呈现，同样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处理了同性恋问题。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以各自的方式坚持认为，古代希腊人乃是阳光的、欢快的、天真的、光彩四溢的，揭示古希腊人之悲剧性的悲观主义的工作尚需留待尼采。尽管如此，海涅已然在尼采之前就将整个这一主题扭转成一出悲剧了，因为海涅眼中的希腊群神不再是黄金时代的希腊群神，而是基督征服奥林匹斯王朝之后的希腊群神：海涅眼中的希腊群神已经沦落为哀伤的幽灵，充满痛楚的大理石雕像，毁灭性的魔鬼，要不就是四处逃窜的难民。海涅令相对性以雷霆之势爆发出来，由此将奥林匹斯山夷为平地，接着便用狄奥尼索斯取代了那荣耀的太阳神。自

温克尔曼就望楼上的阿波罗展开那番描述之后，太阳神便一直就是奥林匹斯王朝派驻德意志的代表，狄奥尼索斯则是迷醉和灵感之神，是真正意义上的魔性神灵，正是这个狄奥尼索斯，最终在歌德心中征服了阿波罗，并对荷尔德林的心灵造成了深深的困扰。狄奥尼索斯，乃是希腊的晚到者，在德意志也是一样。是海涅真正地将狄奥尼索斯引入德意志，并将这个神灵留给尼采，让尼采去见证狄奥尼索斯是如何获取自己的权能的。

荷尔德林毕生都在渴望侧身群神行列并获得不朽。海涅尽管也曾有过犹疑时刻，不过最终还是抵制了不朽观念并在临死之际极为强劲地否决了此一观念。如果说荷尔德林乃是被奥林匹斯王朝放逐之人，那么海涅则是被永恒地贬入地狱了。奥林匹斯主义，或者说绝对的完美，无论置身何处，肯定跟海涅无缘。1856年2月17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海涅谢世而去，卡米莉·塞尔登见证了那一刻：

> 早晨八点的光景，我听到房间里有一阵奇怪的响动；像是蝴蝶飞进窗户并努力寻找出路之时震动羽翼的扑打之声，这声音在夏日的夜晚常常能够听到。我睁开眼睛，不过马上又闭上了眼睛。在晨曦的映照之下，我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像是一只巨大的昆虫，正在竭力飞向空中……死神……就在那个早晨，来到了诗人的床前；在这个曾经爱过她、曾经歌颂过她的人的面前现身；就是在这个人身上，死神创造出那大理石般的苍白面容，那样的面容不禁令人联想起最为纯粹的希腊艺术杰作。

也许，这正是海涅之精神在脱离自己躯体之时所做的最后努力；这个因爱而生的人也令自己所爱之人体味到了这最后的努力。他身上的能量直到最后一刻都是那么高昂，令人们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然而，若真是如此，那就要问一问，究竟是怎样的邪恶力量，竟然比爱更为强大，竟然能够征服海涅？又是怎样的讽刺，令死神将那大理石般苍白且冷硬的完美雕刻在他那冰冻的面庞之上？可不要忘记，他毕生都对那大理石般苍白且冷静的完美抱持着极度的憎恶。

第八章 余波

温克尔曼再生：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

1868年，恰好是温克尔曼遇刺一百周年的时候，海因里希·施里曼初次踏足特洛伊平原，这是一趟发现之旅，目的是发掘古希腊文明。“一个偏执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神话狂。”这是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e Ludwig）对他的看法，就是这样一个人，打破了一个多世纪前困扰着温克尔曼的魔咒，不畏艰辛，终于成功进入希腊世界。他那令人震惊的生涯以及同样令人震惊的发现，是自然原因无从解释的，若真要追究这背后的情由，则应该说是一个神话英雄的行绩。可以说，是艺术之手塑造着他的生涯，并将其向着荣耀顶峰引领，他志在超越温克尔曼。此时的施里曼就仿佛是又一次获得机会的温克尔曼，而且这次，他没有放弃这个机会。施里曼生涯的每个关口之上，潜意识当中的记忆都能发挥出效能，向他指明如何避开从前的错误。两人的出身都极为贫寒，两人都对埋藏在地下之物有着奇特的激情，两人都在童年时代就显示出这种激情；两人都是在初次听闻希腊语之时，就入了希腊语的魔咒，那情形就仿佛沉睡的记忆被唤醒了一样；两人也都是当即便下定决心要掌握这门美丽的语言，而且也都下定决心以这门语言为自己的母语。不过，施里曼自学了十八门语言，把希腊语放在了最后，这是因为他“担心这门有着强大魔力的美妙语言，会吸去他太多的精力，并由此威胁到他的经济状况”。毕竟，这个深受贫穷折磨的梅克伦堡小伙子，仿佛不曾忘记经济上的窘困是如何令他的前世倍受挫败的，于是，他竭尽身心，以极为强大的意志力改善经济状况，据此赢得独立，最终，他在三十岁之前便达成了此一目标。温克尔曼在三十岁这个年龄的时候，

尚且还在塞豪森给小孩子当老师，施里曼则已经成为俄国的商业大亨，而且极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在三十四岁的时候，施里曼才允许自己开始研读希腊；不过，他足足花了七年才从他那庞大的商业事务中解脱出来，并挣脱他那已然过于强大的赚钱本能。四十一岁的时候，施里曼总算是完全掌握了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几乎将荷马烂熟于胸，于是，他放下手中俗务，展开了一趟环游世界之旅，并在巴黎研究考古学。1869年，他迎娶了第二个妻子索菲亚·恩佳斯特洛美诺斯（Sophia Engastromenos），其时男方已经四十七岁，女方则只有十六岁，由此，他开启了生命中那场伟大的冒险。他于1873年发现了特洛伊黄金，1876年发现了迈锡尼墓穴，并且穷尽余生，围绕荷马诗篇中的线索展开发掘工作。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发现，乃是因为他从字面上信从荷马，据此，他便一劳永逸地将古典考古工作从理论空谈转入实地操作。不过，这一切的情状若是同施里曼其人及其强大心志比较起来，则全部都黯然失色了。自温克尔曼以降，一个又一个的德意志伟大人物，在对待希腊的态度上，都难免夸张和过分，此种态度最终在施里曼这里得到了极致表达。在施里曼这里，就如同在一系列前辈那里，希腊乃承载着个体的命运；不过，跟那些前辈不一样的是，施里曼主宰了自己的命运。施里曼的理想主义要胜过温克尔曼，虽然方向不同，但也足以同荷尔德林齐平，不同的是，施里曼将深沉的现实感同这样的理想主义融合起来，单单是梦想，是不足以满足那样的现实感的。他们欲意找寻的宝藏就在底下；信念可以令这宝藏见诸天日，但施里曼真正找到了这些宝藏。施里曼和那些希腊主义前辈一样，都服膺于一种固定观念，因此，施里曼在论定自己发现之物所属的时代并解释这些发现的时候，犯下了众多错误。他过于心急，将那些他认为同自己的发掘工作无关的障碍都摧毁了。他有着开拓者身上通常都会有的显著缺陷，就如同温克尔曼。不过，他也和其他人一样，一直都在错误中学习。最终，他变成了一个非正统的考古学家，而非一个赋有灵感的发现者，温克尔曼也经历过同样的转变。

施里曼对希腊的痴狂乃是极具现实主义气息的，这一点非常怪异。他在日常谈话、信笺甚至电报中越来越频繁地运用古代寓言。“我同索菲亚只用希腊语交谈，”蜜月之时，施里曼在给德意志家人的信中是这么写的，“因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是神的语言。”的确，无论是交谈，还是写作，施里曼一直都会召请希腊诸神现身，这是因为他的心灵差不多完全沉浸在荷马的过去。不过，此一情状倒也绝不至于妨碍他那敏锐的生意才能，直到最后，他都是一个生意人，而且还有着差不多可以说是美国式的自我宣示的天才。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同一个俄国女人缔结的，此次婚姻的结局对他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女方最终拒绝和他共同生活，并强迫他离婚。随后，他下定决心要娶一个希腊人，便委托友人雅典主教为自己甄选未来的新娘，并代行初步接洽。这个希腊新娘为他生下的孩子取名为安德洛玛刻和阿伽门农，孩子们和母亲在经历了一番辛苦之后，才适应了父亲。毕竟，施里曼乃是一个决绝且铁石一般的自我主义者，就像所有的偏执狂那样。施里曼的偏执非常外向，温克尔曼则是将自己的偏执聚敛在自己的内心。如果说，温克尔曼对美的热爱乃是更具精神取向的，那么也可以说，施里曼的爱美之心乃是更具审美取向的。1878年，施里曼在雅典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宫殿，以二十四座大理石神像为装饰，这些神像非常巨大，兀自耸立在天空之下。温克尔曼和施里曼都是自为之人；两人都成就了一系列的奇迹。不过，施里曼乃是全然依靠自己，借由迂回路线达成自己的诉求，正是这样一条迂回路线，令施里曼成了巨富。温克尔曼则采取了捷径，将改宗以及恩主用作手段，不过，他没有像施里曼那样走得那么远。也许，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欲念使施里曼去报答自己的前世温克尔曼所得到的恩顾和保护，施里曼本人成了一个相当倨傲且令人尴尬的恩主，不过，同时也是一个颇具君王风范的恩主。的确，除了情欲，施里曼的生涯、欲望以及成就活脱脱就像是在重演温克尔曼的，只不过，更为宏大，更为成功，而且拥有更好的定向。两人的死亡也极为相似。施里曼之匆匆赴死，乃是遵从了他那无可抗拒的冲动：逃离德意志，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施里曼同样

因为耳部手术的后遗症倍受折磨，他过于仓促地离开诊所，意欲及时返回雅典过圣诞节。此外，他身上也有着德意志人爱冲动的禀性，这一点多多少少也促成了即将到来的灾难。在行程当中，他的耳部受了寒，抵达那不勒斯的时候，已经是极为疼痛了。此种情况之下，他也就不敢登船前往雅典了，遂拍电报告知雅典方面他不能及时赶回，并改道去看医生。但是在大街上，他晕倒了，无声无息，一群人围住了他，但没人知道他是谁。第二天，他在旅馆谢世而去，享年六十八岁。

同温克尔曼比较起来，施里曼的生命要传奇得多，而且也更富戏剧性。施里曼的发现较之温克尔曼的发现更令世人瞩目，不过，施里曼在诗学王国的影响力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于1872年问世，第二年，特洛伊黄金便见诸天日了。不过，两人没有任何共通之处，尼采在后来的作品中，从未提及这个伟大的希腊主义同僚；斯皮特勒和乔治（George）也都对施里曼没有任何兴致。对于施里曼的希腊所呈现出的往昔荣耀，这些诗人是极为冷淡的，温克尔曼发掘的黄金时代却令同胞极度振奋，为何会是这样的情形呢？个中情由其实很清楚，温克尔曼发现了理想，施里曼发掘的则是现实；温克尔曼确立了美之标尺，施里曼只是挖掘了黄金。理想较之现实更具力量，即便是施里曼发掘出来的那种极为荣耀的现实。应该说，人性就是如此，至于德意志人，则可以说，此种情状已经成了公理。德意志的诗人、思想家和先知，同所谓的现实是不会有任何牵扯的。德意志人也许会有伟大的务实成就，不过，此类成就也都是从施里曼这类人的心灵当中强取而来的，这样的心灵致力于将理想改造成现实。通常情况下，此类现实都拥有巨大的力量，完全对立于德意志人的空灵幻梦，不过，这样的现实也同样令人目眩神迷。从理想到现实的此种变幻，时常借由非凡心灵运作而成，而且也带来了非同一般的结果。施里曼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足以揭示出德意志人在当时所成就的非凡之事。不过，那埋藏在地下的黄金以及他在梦境中探测并在现实中发掘而出的宫殿，却并没有像温克尔曼当年提供的希腊愿景一样，遮蔽德意志同胞的眼睛；安躺在理想底部

的现实，并非德意志人所爱。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欠特洛伊的发现者施里曼一份情，但德意志诗人根本就不欠他什么。

酒神：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如果说当今时代的诗人仍然纠结于古希腊的荣耀记忆，并且较之除了荷尔德林以外的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诗人走得更深、更远，那也可以说，此事不应当归因于施里曼发掘的古代文物或古老的黄金，而应当归因于弗里德里希·尼采对希腊悲剧的发现。[1] 冲动和肆意，乃是德意志禀性当中一项内在的特质，这在德意志希腊主义群体的心灵生活当中一直都展现得非常显著。到了尼采时代，此一特质已然在他们的作品中勃发而出，此前，这方面的迹象相对而言还是为数寥寥的。德意志的希腊主义群体当然要受制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除此之外，便很难想象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出路或者选择。那一度激发着温克尔曼的追随者的理想，就其性质而言，是肯定要将这些人彻底收服的。不仅如此，为了尽可能地切近希腊标准，一个又一个德意志诗人相继采纳了古典韵律，由此便使得他们的心灵尽管涵养着全然非希腊式的迷狂，却也能够在作品中创造出静穆的表象。歌德的渴望、席勒的热忱乃至荷尔德林的迷狂，都包裹着高贵和尊严的外衣，尽管这样的情境时常显得极为怪诞。最终，是海涅击碎了这一切，确切地说，海涅提升了狄奥尼索斯的地位，促使这个神灵最终超拔而起，由此而释放了一个较他此前摧毁的神灵要危险得多的神灵。当海涅内心那令人震惊的歧异和悲剧性的纷扰最终消散而去的时候，随之传扬而起的是一种新的、令人迷惑的且令人心神难定的声音，这声音将美、深沉和狂野融为一体，这样的融合是唯有德意志人才能够有所体味的。

这声音出自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在求学时期就知晓并热爱荷尔德林的诗篇，荷尔德林对尼采的影响一直以来人们都是有着恰当评估和充分意识的。至于海涅对尼采的影响，则至少不会逊色于荷尔德林，尽管这样的说法可能不受一些人待见，因为这些人并不愿意看到德意志最

伟大的天才之一竟然如此深刻地接受了一个犹太人的影响。不过，事实就是事实，尼采将海涅视为德意志曾经孕育的唯一一个诗人，当然，歌德除外。在《瞧，这个人》中，尼采对海涅有如下评说：

> 亨利希·海涅已给我抒情诗的最高界定。这些年，我的确徒劳地在所有王国中寻找一种音乐，如他界定的甜美和激情。他拥有那种非此我无法感知的完美的神圣的怨恨……并且他曾怎样将德语运如化境！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是目前为止最出色的德国散文的艺术家，在一种无法测算的距离上，我们超出德国人已创造的任何散文。

毫无疑问，尼采极大地深化了海涅的异教观念以及海涅围绕希腊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立而建立起来的诗性图景，而且，也正是这样的图景支撑了尼采对待这两种文化力量的态度。有时候，尼采甚至可以说是夸大了海涅在这方面的论说和观念，最终，还在《瞧，这个人》以及《敌基督》当中，实施了极为怨毒的表述。但海涅和尼采乃是同等意义上的敌基督。此外，《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有关基督之死的那个著名段落，显然是源于海涅《德意志宗教和哲学史》当中有关耶和华之死的那个段落：

> 当他年幼时，这位来自东方的神，他强硬并充满复仇感，因着他偏爱的喜好，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地狱。
>
> 但最终，他变得苍老、软弱、易摧、满心可悯，相比一位父亲更像一位祖父，但更像是一名蹒跚老矣的老祖母。
>
> 在那里，他坐在他那壁炉的角落，萎缩，因他双腿虚弱而哀叹，厌倦了世界，厌倦了他的意志，直到一天，他那全部的太过强烈的悲悯将他充塞。

尼采关于狄奥尼索斯的最后思考之所以散发出此等光彩，的确应当归功于荷尔德林而非海涅。不过，在1872年的《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却是以令人无从忘怀的笔法描写了海涅《流亡中的诸神》（*The Gods in Exile* ）中的主人公。而1872年这一年恰恰标志着德意志希腊主义的危机时刻或者转折点，就是以这一年为标志，自1755年之后就一直激荡着

德意志心灵的那场冲突急转直下，很快就要以一场最终的灾难收场了。自海涅将奥林匹斯王朝夷为平地之后，这场冲突曾有那么一个中断期；在此之前，狄奥尼索斯，那可怕的新神，一直都不曾回应《流亡中的诸神》吹响的战斗号角，而且在那个时期，德意志希腊主义可以说一直都是一番坦途，不但摆脱了早期的束缚，而且还以一种日益常态的方式对德意志心灵展开了一段和平渗透的进程，这样的情状我们英格兰人应该说是非常熟悉的。1818年，格里尔帕泽的《萨福》（*Sappho*）仍将《伊菲革涅亚》奉为指南晨星；不过，1820年，这位作家的《金羊毛》（*The Golden Fleece*）三部曲却是引领着德意志-希腊传统进一步偏离了歌德和海涅，同时也进一步深入了纯粹为着神话而运用神话的王国，在这个王国当中，神话就是诗歌，在这个王国当中，情节之意涵就是对那种歌德拒绝认肯且席勒未能再现的命运和悲剧的个体性呈现。格里尔帕泽于1843年实地造访过希腊世界，但是在这趟旅行之后并没有写就任何希腊戏剧性的东西，可以说，格里尔帕泽身上并没有任何希腊主义元素，实际上，他是深受西班牙文学影响的。由此也就同样可以说，甚至在海涅写就《希腊诸神》之前，德意志戏剧家就已经能够以伟大方式应对希腊主题，同时又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可以从审美角度切近希腊人，同时又不至于承受任何不利命运。不过，格里尔帕泽是个奥地利人，因此也就不能成为当时德意志精神潮流的代表。但是德意志方面也是一样的情形，大体上可以说，在海涅谢世之时，一个世纪之前的希腊的暴烈复兴就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行程，一切都已经平静下来了。1872年，歌德已经入土四十年了，海伦娜，歌德那命定的新娘，也已经随他而去。命运多蹇的荷尔德林，这场以崇高和静穆包装起来的危险且激荡的运动大潮中的真正英雄，也已经离世二十五年之久了。浪漫派则当然要竖起中世纪主义和基督教的大旗，来对抗此一希腊主义潮流。大量的批评和研究相继问世，致力于呈现希腊事物的幽暗面，此前，海涅就已经凭借自己那近乎恶毒的常识令希腊之荣光黯淡不少了。不过，尼采发表于1872年的《悲剧的诞生》则表明，希腊人根本就没有在这样的攻击

潮流面前丧城失地，相反，尼采乃真切地揭示出，希腊人的作品当中尚且拥有未曾有人探识过的深度，令德意志心灵如临无底深渊。“悲剧的诞生”，这个标题本身就等于发出了某种警报，有人错误地将尼采的这部作品定题为“悲剧的重生”，这夸大了其中的寓意。尼采在这部作品中宣示自己发现了“希腊悲剧的本质”，而此时的德意志人似乎已经对此等发现不再抱有期待了。此一发现实际上关涉悲剧本身的本质，这样的悲剧及其本质是歌德拒绝面对的，也是席勒从未弄明白的。《悲剧的诞生》可以说是德意志希腊主义的至高批评文献，同时也是一部文学杰作，这个世界上，能够就如此伟大的主题写就具备此等激发力的作品，这样的事情可谓寥若晨星。施莱格尔兄弟尽管有着极高的锐见，但同尼采的穿透力比较起来，也是相形见绌的；奥古斯特·威廉那著名的“维也纳讲座”，尽管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视为希腊主义论题的收官之论，不过若是同《悲剧的诞生》比较起来，就太过贫乏了。绝少有文学批评之作能够像莱辛或者尼采的作品那样具备此等灵感价值，能够对一系列的伟大诗人产生如此深重的影响。倘若荷尔德林的索福克勒斯译本无甚效能，那就根本不用指望讲座厅里会有灵感诞生。因此也就可以说，《悲剧的诞生》乃是就温克尔曼的希腊观念给出的第一次切实且毫不含混的回应，此一回应否决了那种认为一个铸造希腊悲剧的族群乃是一个欢快且静穆的族群的看法，由此直击了温克尔曼那些乐观主义观念的根系。相形之下，海涅虽然也嘲讽奥林匹斯主义，但仍然将欢快和静穆视为希腊族群的特质，尽管海涅在内心里并不喜欢希腊人。《悲剧的诞生》所呈现的希腊人，乃是阴沉、悲剧、英勇且爱美的；这个族群对他们置身其中的世界的可怕本质有着密切认知和意识，于是，他们便创造出阿波罗艺术来补救现实。正是因此，荷马也好，希腊雕塑家们也好，都极力营造一种光华四溢的神圣幻象，并将这样的幻象透射到黑暗的生活背景之上。阿波罗乃是端庄之神，有着完美的形态，正是因此，阿波罗是希腊人的梦中之神。接着便是狄奥尼索斯的入侵；狄奥尼索斯的迷狂和音乐击碎了那完美的神灵形态，消融了一切人格身份，令一切个体跌落湍

急的生活河流当中，并不得不学着去认从生活潮流当中的悲剧奥秘。阿波罗的胜势由此便岌岌可危了。不过，阿波罗也在奋力抵挡，在展开自我捍卫。这两个对手之间遂有了那么一个短暂的和解期，希腊悲剧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希腊悲剧的核心乃是狄奥尼索斯的音乐。用以敬拜狄奥尼索斯的萨提合唱团，逐渐从美学角度演进为合唱队颂诗，阿波罗式的对白就是由此脱身而出，最终诞生了一种美丽幻象。借由此一幻象，阿波罗在某个神话英雄身上道成肉身，亲临舞台，并且像狄奥尼索斯曾经做过的那样，承受这道成肉身的痛楚。由此，那狄奥尼索斯式的悲剧宇宙便如同潜流一般，支撑并伴随着对白当中阿波罗式的美和庄重典雅。因此可以说，希腊悲剧之于浸润其中的人来说，担当着双重面相并传递出双重信息。

音乐乃是催生了悲剧神话的创造性元素。如果说尼采将狄奥尼索斯确立为文学中的审美力量以及生活中的活力元素，那也可以说，尼采也由此揭示出他自身灵感的危险源泉。尼采借由德意志音乐，特别是瓦格纳的戏剧，开启了再造悲剧神话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尼采诉求蕴含在德意志心灵当中那些无可测度的元素和力量，而这一切则是温克尔曼的理想一直都致力于实施遏制乃至钳制的。即便是作为音乐狂想者的赫尔德，尽管历来都认为神话乃是根本之事，但也一直对之秉持着谨慎乃至小心翼翼的态度。不过，无论是赫尔德、歌德、席勒，还是海涅，对于神话都是心存欲念的；荷尔德林一度以神秘方式创制了神话，但那神话却毁灭了他。至于克洛普斯托克和德意志浪漫派，这些人则是在北方而非南方寻求神话，是在自身的过去或者是在自然当中寻求神话；《尼伯龙根之歌》的重新发现之旅乃于1862年在胡贝尔（Hebbel）那著名的三部曲中臻于顶峰。瓦格纳的《飞翔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当然是取材于海涅，瓦格纳正是借此对神话问题展开深刻思考，并最终得出结论：一切神话都是借由一个共同的源泉变通而来的，德意志神话和希腊神话就其全部的本质要素而言，乃是同一的。瓦格纳由此便将尼伯龙根比作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将齐格弗里德比作阿波罗，将那

荷兰人比作奥德修斯，将罗恩格林比作宙斯和塞墨勒。不过，特里斯坦乃是齐格弗里德的另一个面相，圣杯也有“花园”的面相。由此，瓦格纳的神话戏剧便有了观念的融合和深度阐释，也正是借由这样的深度阐释，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成了生活悲剧的神话表达；音乐则以极具神秘气息的方式，为神话故事伴奏并对之实施再阐释，那情形，仿佛就是神秘的音乐催生了神话故事一般。

毫无疑问，尼采塑造了数代人的欲念，瓦格纳则将此等欲念表现在乐节当中，以一种令人无可抗拒的方式荣耀了欲念及其成就。尼采说，神话必须先在地平线上升腾起来，才能再次迎来一个悲剧和英雄的时代。这样的神话乃是由音乐催生的，叔本华则正确地将这样的音乐视为悲剧性的生命意志的直接表达，表象世界则是此一生命意志的另一种形态。在聆听此种宇宙音乐的同时，人们可以将其中的神秘意涵转译为神话；那悲剧性的宇宙集结了众多意象，乐章所蕴含的审美美感，就是这个悲剧性宇宙的至高证成，神话则以阿波罗的形态来展现此种美感。没有这等音乐，就不会有这等神话；没有这等神话，也就不会有崇高意义上的悲剧；没有这样的悲剧，这个世界将是空洞的、贫乏的、纯粹物质的，那将是一个盛行肤浅的乐观主义和充斥着虚假文明的世界。这就是尼采对自己那个时代的德意志的观感，瓦格纳甚至在当时就已经在重生这么一个世界了。

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站在“后见之明”的位置上说，尼采错了。瓦格纳那粗狂的音乐剧并没有开启一个伟大的悲剧时代，而且肯定也不曾创造出对生活的神话解释。毕竟，瓦格纳并不像希腊悲剧作家那样，是在创造神话，甚至也不曾再造神话。他只不过是改造了一些古代传奇故事，以此来迎合一种生活哲学，当初的那些传奇故事当然不是用来表达这样的生活哲学的。有时候，瓦格纳甚至利用这些古代传奇故事来达成政治宣传的目的，比如《莱茵黄金》（*The Rhinegold* ）就是这样。他并不是真的相信奥丁（Wotan）、洛基（Loki）或者布伦希尔德

（Brunhild），他只是将他们幻化为意象。尽管这类神话人物都被赋予了意涵，但他们制造的意象却是极为古旧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任何古时神话都不可能真正表达现代人的忧愁和困惑；古时的众神和英雄如今已然蜕化为幽灵，根本不足以催生有生命力的信仰。基督教同样不具备悲剧特质，因此在尼采这里也就不会具备审美价值，不过，基督教也拥有自己的神话时代，那是音乐、诗歌、绘画以及雕刻艺术的伟大创造性时代，当然，尼采并不愿意将这样的时代许给基督教。不过，在基督教统绪当中，这样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了，而且，有史以来那个最为伟大的悲剧作家完全置身神话魔力圈之外，这样的现象尼采并没有给出自己的解释。不过，莎士比亚乃是英格兰人，很显然，德意志人的需求同我们英格兰人是不一样的。最起码可以肯定的是，神话，于德意志人而言，乃表征着美的或者悲剧性的生活启示，对此种神话的欲念一直都是德意志心灵的一项要素。此一欲念在尼采内心是极为强劲的，这令他甚至一度相信瓦格纳将达成奇迹。在强劲的神话欲念的催动之下，尼采一度相信，神话是可以单凭一个人的有意识审美行动来达成的，而无须那么一个借由无数代人的梦想融构而成的有机生长过程，无须那么一个有着单纯的神话心灵的族群。这是一场悲剧性的错误，追根溯源，此等错误之根系乃在于整个德意志族群凝聚而出的欲念，正如斯特里奇（Strich）的精细评说，那是可怕的神话欲念，是德意志诗人因思念诗歌家园而犯下的乡愁重病。不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实际上都是背井离乡的流亡者，而且，并不存在回归故园的路。尼采爆发出的如此强劲的热忱，并没有为德意志指明回归的路，反而成了他自己生命中的一段序幕，这序幕令他开始祛除对生活的幻象，并引领他落入极度痛苦的境地。真相就是这么可怕，但这就是真相。尼采并不是新的黄金时代的先知；尼采奋笔写作的时候，一个世界正在欧洲消亡，他不过是这个即将消亡的世界的最后一批伟大力量之一。面对现代生活的解体局面，歌德乃是第一个为此遭受致命痛楚的天才。当尼采致力于遏制此种局面的时候，此种局面已然进一步拓展开来并且也深化开来；如今，这种局面之深化和拓展

已然不知进展到何等地步了。尼采关于悲剧之重生的观念以及关于一个新的英雄时代的观念，是一场幻梦，是一个殉道者的自我陶醉，而非一个先知的自我陶醉；这只不过是一个伟大堕落者（对此，尼采当然是心知肚明的）的幻梦，在这个伟大堕落者的内心，荷尔德林那非尘世的希望正在同海涅那悲剧性的绝望进行着搏杀。

尼采生于1844年，也就是荷尔德林离世的第二个年头；这仿佛寄托了某种寓意，就仿佛是荷尔德林在尼采这里转世再生了一样，而且他还携带着海涅的魂灵，一起进驻尼采的身体。尼采展示出全然魔灵式的存在，已经不再有什么神性了。他的存在是暴烈的、无情的，有着撒旦式的倨傲。他迷醉并近乎疯狂地崇拜希腊群神当中最后那个神灵，海涅从这个神灵身上既见出美丽也见出可怕和朦胧的权能。海涅曾感到自己就是狄奥尼索斯，有时候这样的感受有着诙谐的意涵，有时候则是怀着悲剧诉求的。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尼采以狄奥尼索斯的口吻明确宣示了《悲剧的诞生》中宣示的那些东西，很显然，这样一个狄奥尼索斯乃是灵感、迷醉、残忍、荣耀、迷狂和生命之神；这是一个先知神灵在借尼采之口宣示超人的到来。实际上，在《悲剧的诞生》当中，危险就已经浮现出来了，这是尼采的个人危险，一场近在眼前的灾难。《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不是什么希腊悲剧研究，这部作品较之所谓的希腊悲剧研究可要伟大得多，也光彩得多。那是一种本能，一种伴随着诗性和幻象的本能，这世界绝少有人能拥有这样的本能，而且，更少有人能予以理解。应该说，这是这个世界最为伟大的作品之一。然而，在思想艺术王国的这份至高论章当中，却也伴随着一股危险的悲剧潜流。其中，语言和观念时不时地会极为暴烈地激荡起来，这就如同刚刚避开一处险滩或者历尽千辛万苦刚刚克服一个难题那样。总体上说，这部“最为深刻的德语作品”，却并不具备令人信服的力量。作者对生命的乐观似乎不可能最终令作者自己感到信服；他在这部作品中揭示了悲剧的本质，但实际上是在揭示自己的心灵织体。观念起起落落；生活的诸般事实也可以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予以阐释，但绝少有人能够像尼采这

样，如此无畏地实施这样的自我揭示，更何况，尼采还是一个赋有悲剧精神的人。这样一个自我揭示的过程当然令尼采倍受痛楚和煎熬，不过，这个进程本身倒也不可能对他有根本改变；但这个进程对尼采自身造成的冲击和震荡也是不可不说的。在《悲剧的诞生》当中，尼采将自己置身危险情境之中，不过，他也一直都能克制并掌控此一危险元素。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尼采就如同一个伟大运动员，以英雄气概纵身跃入激流之中，同暴烈的潮涌对抗，尝试抵达一片不可见的国度，而且人们也都清楚，他是不可能望见那片土地的：那是超人的神秘国度，是堕落时代的无畏殉道者的一场幻梦。

在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之前，尼采便已经沉落下去；这样的结局是相当可怕的，毕竟，这结局已然暗示出，他的灵魂当中那两股巨大力量仍然在进行着剧烈冲突，正是这样的冲突，以同样的悲剧方式毁灭了当年的荷尔德林。当荷尔德林刚刚开始意识到狄奥尼索斯和基督之间存在怪异的亲和性的时候，那指引他穿越生活历程的罗盘便丢失了。两人都生为凡人；两人都为了重生而毁灭了自己的肉体；两人都传扬一种普遍之爱的宗教；两人都将葡萄酒用作象征物；两人都将新的灵感灌注到正在僵硬的崇拜当中，将新的意涵赋予旧日的崇拜。荷尔德林不曾明言此类事情，不过，《面包和葡萄酒》所展示出的那种诗性的朦胧，暗示了这一切。很快，荷尔德林的心绪陷入混乱当中，癫狂的波浪不断冲撞他的心灵，于是，他最终便信靠了基督，拒斥了狄奥尼索斯。诸多迹象表明，那令荷尔德林倍受折磨的基督和狄奥尼索斯之间的神秘亲和性，也缠绕着尼采。很显然，狄奥尼索斯·扎格柔斯，那肢体被片片撕裂的神，同那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乃是相当亲和的。如果说，荷尔德林知道自己的精神家园乃与诸神同在，那么也可以说，自认是诸神之一员的尼采，因此一幻象而遭遇了巨大痛楚。当那最终的结局日渐清晰且日渐迫近的时候，尼采认定自己就是作为敌基督的狄奥尼索斯，因为他的灵魂已然开始反抗将二者视为同一的种种暗示。在《瞧，这个人》当中，尼采留下了如下反抗语词：“狄奥尼索斯反十字架”。然而，这一切都毫

无用处；此时的尼采已然处在那曾经吞噬了荷尔德林的旋涡的边缘，那旋涡也将他拉了进去。在那疯狂旋涡的边缘上挣扎之时，尼采留给了这个世界最后的信息，那是一批极为阴沉的信笺，上面的签名是“狄奥尼索斯”以及“十字架上的上帝”。自温克尔曼开始写作以来，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也便开始在德意志精英群体当中肆虐起来，如今，人类中的又一个卓绝心灵也沦为这场冲突的牺牲品。

---

[1] 比如说，可以参阅Hugo von Hofmannsthal，*Oedipus und die Sphinx*；这部作品乃是要呈现我们今天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如何施展开来的，作品本身非常怪异，既有神秘主义气息，也有心理学气息。

神话家：卡尔·斯皮特勒（1845～1924）

卡尔·斯皮特勒比尼采小一岁，但是他在1880年到1881年出版了散文体寓意史诗《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Prometheus and Epimetheus*），这本书比尼采的那部杰作要早面世三年，在行文、风格、节奏以及一般观念方面，都同尼采的那部杰作极为接近；这可真是怪事中的怪事。尼采从未提及斯皮特勒的这部作品，很可能尼采并不知道有这么一部作品；就在《奥林匹斯之春》（*Olympian Spring-Time*）初版的第一卷问世那年，尼采谢世而去。这部诗篇致力于以史诗的形式来创造神话，这是尼采曾对悲剧和瓦格纳提出的要求，后来，尼采还打算自己去践行此一工作。据尼采述说，未来的神话应当解决生活的重大问题，应当将全部的知识融入真理当中，在美、神秘和力量当中揭示真理，最终效仿宗教之道来完成人类的复兴。尼采自己也曾在《悲剧的诞生》中说过，古时的神话不能移植到现代土壤；在这方面，超人神话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因为这神话植根于进化论，进化论乃是19世纪的伟大发现，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流行的生活观念。生命有机体沿着向上的路线逐渐生长并发展起来，一切生命都置身生存斗争当中。适者生存，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尼采有关未来之更高级人种的观念，人类学家晚近的一系列发现也可以说为尼采的此一观念提供了支持。如果说，即便是这样的情状，尼采的超人仍然不能激发多大的信任，那也可以说，其中的原因更多地在于此一观念自身，而不是因为此一观念遭到了严重的误解或者误读，也不是因为此一观念之表述方式并不是特别能够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不会因为其诗性的而非科学的表达方式，就对其不太信任。此一观念之于严肃哲学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不过，非正统的思想家们，诸如萧伯纳之辈，倒是从中看出了一些遗憾和分量。倘若尼采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者的塑造力量，那么，超人神话之于诗歌的影响力恐怕就会更大一些。然而，尼采的超人观念过于朦胧、散漫、抽

象，因而不能对诗人形成激发；对科学家来说，则是过于意象化；对哲学家来说，乃是过于诗性；对唯物主义者来说，则不过是狂人的幻梦；于传记作家而言，则只能说是某种象征物而已。然而，作为一种诗性神话，超人神话仍然处于萌芽阶段。

卡尔·斯皮特勒的成就全然属于诗歌王国。《奥林匹斯之春》堪称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天才之作，诗篇包举宇内，悲剧情怀浓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斯皮特勒在这份诗篇中实际上呈现了尼采刻画于《悲剧的诞生》中的东西，那是一个狄奥尼索斯式的黑暗宇宙，在这个宇宙的映衬之下，光华四溢的阿波罗式的男女诸神凸显而出。倘若纯粹的愉悦就是艺术作品的标尺，那就只能承认，斯皮特勒此举乃是要将希腊神话移植到现代土壤，而且此举是相当成功的。不仅如此，他还借由另外的手段成就了此一奇迹：斯皮特勒在这份诗篇中气势如虹地恢复了叙事史诗之古代权能，此种文学形式在现代已然失去了魅力，差不多已经被散文小说完全取代了。此外，他运用的节律，若细细品味，听起来就像是终极的人工造物，那是一种六步格的抑扬节律，以对句形态展开，这本应当是17世纪的德意志亚历山大体，只可惜，斯皮特勒的时代已经不是17世纪了。正如罗伯特·法耶斯[1]评说的那样，这样一份诗篇，有着一万八千个诗节，更将众多神灵牵涉其中，当然有可能令读者厌倦。不过，情节上的魅力足以驱散这样的厌倦，而且，诗歌的整体布局极为宏阔庄严，众英雄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光彩四溢的种种观念、语言的力量以及稳固的现实主义，这一切也都在背后支撑着这份长诗。斯皮特勒的这种现实主义乃是他同荷马之间的主要连通环节；他的布局是原创的；他笔下的群神并没有被考古学或学术研究之类的东西修建得黯淡无光，而是在斯皮特勒为他们创造的世界当中过着自己的生活。较之荷马群神，斯皮特勒笔下的众神具备更为强烈的个体旨趣。他笔下的众神，犯起罪来，更为张扬肆意，受起难来，也更为痛楚。他们置身宙斯负责掌管的人间正义之中，同时也受着命运的严厉掌控；他们脚下的深渊，无论对他们来说，还是在我们看来，都是极为恐怖的。众神也正是由此转

变为英雄的，斯皮特勒那巨大的创造性正在于此。斯皮特勒坚持那种众神无力疏解的命运观念，这样的命运观念乃是极具悲剧性的，而且，此种观念同众神那昂扬且强势的行动形成了对照，此一对照由此获得了必要的分量和价值。他们要在厄瑞玻斯滞留漫长时光，而后是一个短暂的光明期和生命期，接着又是漫长的厄瑞玻斯时光；此乃他们命定了的永恒循环。老神没落，新神崛起并取而代之，但最终都注定了要再次堕入黑暗当中，这只是时间问题：

石块沿路铺设，那路他们小心追随，

路面下陷而光滑，如出自一块中空的磨石；

但它并非磨石的作品，它是诸神

不可计数的经历世代永恒的上下踩踏。

一个词，一声惊叹破空而出："何其长久，这世界的存留！

而因何，寰宇盛装了不幸！"

而从那里射来的光束，直至一道回声喊出：

"出自全部的永恒，没有寰宇留给悲伤驻足！"

新神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确是可怕且邪恶的，是一个无情且机械的宇宙。这个世界的领主阿南刻，生有一双黄色的虎眼，代表着"倍受压抑的力量"，是一个满怀杀心和恶意的神灵。阿南刻自身受制于更为强大的力量，那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械装置，但凡诸神或者凡人叛乱，他就在其中寻求庇护：

驾着粗重的蹄铁和巨大的战马

一个机器装置蜷坐着，确是一件怪物。

燧石和石头材质的面具，罩在它黄铜做的脸庞，

时常从孔隙间，多次直射出一道火焰

在活动目光的位置；并且代替呼吸

那里发出一道尖声又刺耳的汽笛……

并且在战马前面的轨道上，那些斑迹是什么？

那些两百亿计的忙碌的斑点是什么？

它们是灰尘和沙砾的大脑么？不，它们蠕动

并随意游走，每个都是活的小蠕虫。

但并非，并非蠕虫！因看上去，它们是有理性的造物，

有眼、耳和意图，标记于它们的特征上；

它们在它们头顶挥舞旗帜，并叫喊着：“善”

和“恶”；它们正说着：“住手”，和“这是你应该的”；

它们在教导：“智慧”；在警告：“那是一桩幻觉”；

而此刻在野兽上方，当它们凌乱地飞舞，

撞击着前来的机械装置。它们被击中了。一声惨叫；

它们撞成糨糊。一种氮气的臭味：它们死了。

如果说众神的命运是悲剧性的，那么凡人和野兽的命数就只能说是极为恐怖的，赫柏也只是在令众神吃下魔幻坚果、借此麻痹众神的怜悯情感之后，才敢让他们去观瞧忘川河中凡人的命运。在忘川河中，阿南刻那可怕的女儿墨伽拉正在给活生生的灵魂披戴满是邪恶的腐化肉身，那活生生的灵魂则是逃无所逃，避无可避：

且悲哀地向上，朝向神，看着那些兽类和男人

用祈祷的眼睛，那眼睛道出那永恒的言辞，

以友好的爱的目光穿透邪恶的肉身：

“噢，你能否告诉我们，什么将我们犯下的罪

判罚为这样一种粗野的宿命，经受我们被应允的苦难？

我亦是灵；你能感知的，我们亦能；

那么，为何我们是粗野的兽类，而你则忝列神位？”

这样的问题，在阿南刻的世界里是根本不存在答案的；在阿南刻的世界里，他发布命令，三个女儿负责执行命令。大女儿墨伽拉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二女儿莫赖厄无情、毒辣且深不可测，表征了命运；三女儿戈尔贡邪恶、反复无常，表征了欲望。阿南刻的统治体系当中也有自己的常任官员，那就是温和且善意的哈德斯。哈德斯偕同不幸的妻子珀尔塞福涅一同统领冥界；乌拉诺斯则以智慧之道统领苍穹；人类则交付众神之王来统领，无论是哪个神灵在位。不过，所有的神灵都无力更改阿南刻发布的野蛮令谕。唯有乌拉诺斯在内心珍存了希望，希望那严厉的审判日会在某天降临：

他们此刻踩着踌躇的步点走进这座死寂之屋；

房梁和墙壁以无法遏制的恐惧颤抖不止；

火苗舔舐着地基，那是可怖的景象，

当蒸汽活塞的锤打和轴承的轰隆声，重击着他们的耳鼓。

直到最终，借助他们首领的手向前刺探，

进入一个他们才敢站稳的喧嚷的地牢，

那里气味熏鼻，那里雷声震耳，

而那儿他们瞪大眼睛，带着无知的恐惧四下徘徊。

但此刻，那位君王有意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引向一个运转的引擎，它的轮子上下运动

并带动上百个阴冷的呼啸着的铁制锤子

切割出一滚石质卷轴上的符文。

而因这种锋利切割的方式，那块花岗石疼痛地尖叫，

而运转不停的石卷将自己再次翻新，

那时，从墙上的开口和裂缝中，三排

监视威胁的沉寂的声筒，露了出来。

那君王带上一面铁质面具，并大声招呼，

一支黄铜质地的声筒凑近他的嘴唇，带着傲慢的姿态：

“你们这些野蛮的铁人，现在告诉我，你正在写的乃是什么？

你正创作的卷轴的意思为何？”

而通过木质的声筒，那里发出一道嘶声的回复

凌驾并逾越了恐惧的噪声和撞击声：

“我们正在那书上锻造符文，那上面能听见

世界在谴责所有造物，以及造物的咒骂声：

身体剧烈的痛楚，灵魂的折磨，

而每一滴眼泪都在翻滚，从凡人的眼里滴落，

而每一种发自揪心焦虑的疼痛都被租让，

而每一种难过和忧伤的眼神都被传递；

那人类蓄意的悲伤，野兽沉默的痛楚，

那最小的纤虫造成的殉难-死亡，那最终和最微不足道的：

由于那时，夜晚和孤独这样遭到隐瞒，

我们精准的笔握将记录下它们，并如此揭露；

当那末日的破晓来临，那可怕又敬畏的审判，

这本书将控诉那无名的人，并道出一切。”

但是，审判之日会到来吗？可能性确实不大。阿南刻的宇宙也有其界限，在这宇宙终结之处，他的权能也就归于终结。在这宇宙之外，乃是苍茫且无际的涅槃之海，在这海洋之外，众神认为自己可以看到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在云端折射而出。的确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有那么一片被称为“米昂”（Meon）的土地——“米昂”的真正意思是“乌有之乡”——在那遥远的彼端海岸；那名叫“希望”（Hope）的天使曾在梦中得到信息，当公鸡报晓之声从米昂传来之时，当收割者在涅槃之海上收割水草之时，一个荣耀的救世主将降临，并彻底毁灭阿南刻的世界。这个救世主来自那极为朦胧且虚幻的未来之地，唯有“希望”天使在幻梦中才能凭借心灵之眼看到那个地方。在此期间，阿南刻依然是至高统治者。

就是在如此可怕的背景当中，奥林匹斯群神在厄瑞玻斯苏醒，并在一个新的灿烂黎明荣升奥林匹斯山巅，将初生太阳的光芒洒向四方，在诗篇的第二部分，也就是“新娘赫拉”当中，这奥林匹斯的光芒则变得极为炫目了。和《伊利亚特》一样，《奥林匹斯之春》的这个核心情节是相当恢宏的，不过，《奥林匹斯之春》也是一个关于愤怒的故事，讲述了这愤怒最终是如何以悲剧方式得到疏解的。不过，这是一个女人而非一个男人的愤怒，这愤怒乃是情节之源泉；这是那美貌且毒辣的奥林匹斯王后的愤怒，她身上沾染了凡人的污点，并且流淌着阿玛宗的狂暴鲜血，还有她对光明之神阿波罗那段剧烈的爱恨情仇。众神围绕赫拉展开争夺，这争斗当中充斥着侠义壮举、宫廷阴谋、辉煌的胜利和不可思议的背叛。当赫拉最终归属宙斯的时候，她和宙斯都已经犯下无可救赎的罪孽，都承受了难以形容的痛楚。不过，他们的罪行正是阿南刻所愿。他们似乎是有选择的；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不过是顺从本性而采取行动，甚至还常常违背自己的意愿。阿波罗遭到欺骗而将胜利拱手让人；正义，我们理解的正义，根本就不曾得到践行。宙斯为了得到霸权而付出了可怕代价，不过，这样的代价倒是以某种怪异的方式证成了宙斯的霸权：美的世界更契合阿波罗，而非奥林匹斯王朝，亦非凡

间俗世。

诗篇第三部分的内容极为驳杂，既没有第二部分那种强烈的属人旨趣，也没有第一部分的神迹和神秘。不过，波瑞亚斯、波塞冬、阿贾克斯、阿波罗、赫尔墨斯、帕拉斯·雅典娜以及阿佛洛狄特的诸般行绩，众多的古老故事，特别是预言者狄奥尼索斯的故事，此外还有诙谐、美、愿景、狂放的想象以及不断重现的哀伤，这一切的一切都令这部分诗篇当仁不让地成为《奥林匹斯之春》的高潮。莫赖厄乃出于怜悯而向奥林匹斯群神宽允了这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让群神在其中各展行绩，这段幸福时光在第四部分归于终结，原因是阿佛洛狄特的恶作剧。第五部分以“宙斯”为题，乃预示着这个新王朝的坍塌，尽管这部分诗篇并没有真正呈现这个王朝的坍塌场景，这就如同《伊利亚特》也曾以同样的手法预示了特洛伊即将面临的毁灭结局。当宙斯派遣赫拉克勒斯前往凡间复兴已经沦落屈辱境地的人类之时，奥林匹斯群神的春日时光便已经开始消散了。恰恰就是奥林匹斯昔日的春日光彩，催生了对于这个春日历程的整体评判，也是终极评判：群神之升华和狂喜全然拜一个拥有巨大力量和统摄力的心灵所赐；那美妙的奥林匹斯春日光景的确令人没齿难忘，但此番光景恰恰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昔日的黑暗境遇，那黑暗境遇才是真实境遇。

这并不是说斯皮特勒自身有什么内在的弱点。这份诗篇无论是细节方面还是结构方面都存在瑕疵：诙谐有时候会变得过于扰动；一些诗节显得很是怪异，还有一些诗节则是沉闷的离题之作。不过，诗篇呈现的总体性的辉煌景象当中，这些瑕疵可谓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令整体效果遭受折损。然而，斯皮特勒创造的这个神话宇宙，其现实性遭到了否决，这就是这份诗篇得到的最终回应。他笔下的群神看起来都相当真实，他创造的宇宙则更是真实得可怕，然而，此等天才作品营造出的这个宇宙，却是绝无可能赢得世人那至关重要的信仰的。诗歌，正如同科学、哲学以及宗教，其终极诉求是要解释宇宙和生活。但是，刻意制造

神话并借此去解释宇宙和生活，则是弄错了现实的本质，这是根本性的错误，无论何等的创造性天才和创造能力都不足以完全弥补此等错误。斯皮特勒的《奥林匹斯之春》尽管充溢着现实主义气息，但最终却不能得到现实的认肯。迷人、诡异但不具备任何的生育能力，这份诗篇可以说是德意志诗歌给予我们这个非神话的时代的一切怪异赠礼当中最为怪异的一份馈赠。

---

[1] Robert Faesi，*Spittelers Weg und Werk* ，Frauenfeld and Leipzig，1933.

秘法家：斯蒂凡·乔治（1868～1933）

> 这里［在慕尼黑1904年2月的古老节日上］……慕尼黑圈的所有竞技比赛和它的拥护者又一次结合成一种欢快的狂欢节日，如狄奥尼索斯、恺撒、混元女神[1]、酒神节狂女、曼那德、圣殿女役者的假面舞会。在诗歌的合唱过程中，他们将此时的自己塑造成一列狄奥尼索斯或一列恺撒；或者允许自身为一种进入狂舞状态的时空，并身心撕裂……进入那自我的遗忘状态，在其中，远近混冥，而一种音符在那种激情俘获的空气中震颤，令人难忘……一张恰巧固获了庆典结束瞬间的单人照，传达出一个栩栩如生的沉思者形象，在一个模糊的复制品中，带有某些生活光景中的深沉严肃。乔治如恺撒般以深邃的沉思状，冕冠而坐；在他正下方，舒勒身着伟大之母的暗色头纱，背靠他的膝盖，此刻确乎化身女性气质和不可思议之美。素朴的女性，甚或最浅色的，如被更高的权威所迫莅，在背景中站立不动；与此同时，前方的年轻人喜形于色但肃穆依然，争论过后，倾斜或互相背对着歇息。哪怕一名专家，在这历史手迹中也会发现，要从这幅图样和所表现的人物姿态中指认确切年代，亦为难事。

或许应当补充说：甚至无须指名道姓，也无须专家，便足以论定，如此庄重的化装舞会只能出现在德意志。而且，历史学家也都很快便能猜测说，这样的舞会乃属于某个堕落时代，比如尼禄时期的罗马就可以作为经典例证，那时的罗马将各个地方、各个时代的神话搜罗起来，在庆典之上肆意滥用，只不过是为了掩盖时代的贫瘠。为此，那时的罗马人不惜将这么一个邪恶但也稍有才气的半吊子奉为神灵。

这并不是说此类说辞也适用于斯蒂凡·乔治，他是一个有趣且高尚的诗人，曾将自己当作一门新艺术的大祭司，认为这门新艺术将复兴德意志，而后又将自己当作俊美青年马克西敏（Maximin）的大祭司，他宣称这个青年乃是神灵。后面这个说法当然是狂想，不过，斯蒂凡·乔治自己的圈子是认肯并接纳这个说法的，这些人还纷纷为“主人”树碑立传，此类作品读起来千篇一律，都取圣徒传记一途，根本不能算作批评作品或者传记作品。真实情状是不曾向公众开放的。乔治的相关通信也

没有公布于世。斯蒂凡·乔治于1933年12月去世，因此，即便这些通信最终得以公布于世，也肯定是距离他去世很多年之后的抒情了。迄今，并没有信息量丰富且客观公正的传记作品问世，倒是有不少批评作品，不过，大多数的此类作品都是敬畏感有加，洞察力不足。有那么一部颇为详尽的大部头作品是讲述乔治的生平和时代的：作者是弗里德里希·沃尔特斯（Friedrich Wolters），名为《斯蒂凡·乔治和〈艺术杂志〉：1890年以降的德意志精神史》（*Stefan George and the Journals for Art*，*German Spiritual History since 1890*），1930年出版于柏林。本章的相关摘引皆出自这本书。尽管这本书包含了众多的独家材料，不过，作品的批评态度过于孱弱，因此不足为信，而且行文也过于呆板滞重，可读性不强。不过，这部六百页的大部头作品，虽然还是以小字体印刷而成，但作品本身相当坦率且不事雕琢，因此，倒也对得起在上面花时间的读者。贡多尔夫提起了诸多浮夸指令（这些指令已经因为他以行话的方式予以措辞而流行开来），要求人们在这么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面前卑躬屈膝，但此类指令显得过于挑衅了，因而令这本书的解释价值尽丧无遗。显然，贡多尔夫的热情反而伤害了作品。此等过度推崇甚至令歌德也深受其害。乔治的生命力尚且不及歌德的四分之一，因此，他承受此番折损的程度必定是歌德的四倍还多。不管怎么说，人们都倾向于将简单化为复杂，将美化为极度的深刻，将神秘化为莫可名状的含混，但此种倾向并不会令那严重的夸张倾向变得更易于承受。威廉·波墨也曾对荷尔德林做过同样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似乎都希望在自己崇敬的诗人和这个世界之间树起一道无可跨越的障碍。乔治其人，对凡间俗众以及一切的平易之事均秉持蔑视态度，可谓贵族做派，由此，便也不难理解他对秘义的崇拜。有许多年，他根本就拒绝同公众有任何交流，他也会印发自己的文集以及《艺术杂志》（*Journals for Art*），不过仅供私人传阅，可以说他是尽可能地同自己所属的时代隔绝开来，其程度达到了人的极限。最终，影响时代的欲念在他内心升腾而起并占据了主宰地位，而他的诗篇也开始公之于世的时候，他选择的是装潢精美的版本，这样

的版本简直无法阅读。人们真的开始阅读的时候，便会发现自己已经头晕目眩了。很可能，乔治此举乃是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一个有着寓意的玩笑。字母“r”跟字母“t”根本就没办法分清楚，一般不用大写字母，除非是为了强调什么；对标点符号的运用极为吝啬，几乎到了残忍的程度。倘若乔治运用的韵律颇能收服人心，那么给读者设置的这些玩笑式的障碍，倒也能在短时间内予以克服；但实情并非如此。有时候，乔治会采用斯温伯恩式的节律。但更多的时候，他的节律会变得拖沓，甚至停滞。毕竟，乔治极为蔑视的那种阴郁在他的诗篇中几乎是不会有任何空间的，正如乔治的门徒们讲述的那样，只有那些有机会亲耳聆听乔治高声吟诵这些诗篇的人，才能体味这些诗篇的美。在外人耳中，乔治诗篇的韵律听起来则只能是如同花岗岩粒一般粗糙，或者如同打磨过的大理石一般滑腻且诡异；有时候则是轻动有余，稳定不足，如同他的早期诗篇一样。但是，乔治的读者当中，没有人会否认他的作品有着一种迷人的特质，一种严格的完美性。乔治的诗篇可谓意涵丰沛，甚至可以说是负载过度了；而且，它们也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智识作品。他的风格是高度浓缩的，包含了众多新的且含义十足的语词和句法，其中一些还刻意制造出一种古旧的氛围。他的诗篇绝少借重德意志语言的朴素之美，尽管德意志语言是有乐感的，而且相当灵活，能够展开精微的描摹。相反，他将德意志语言改造为另一种表达工具；在他笔下，德意志语言变得更为率直、更为肃穆、更为滞重，形式感更强，此番改造之下，那僵硬的句法和智识上的单纯朴素令德意志语言全然变成了另一种语言。就是这样，艺术家之手（乔治当然称得上是艺术家）对自然生长而出的这个美丽造物实施雕琢加工，将躯体之上的繁茂饰物悉数剪去，将躯体结构彻底裸露出来，将寄生之物悉数清除，并拔除缠绕其上的杂草，最终，将一切的冗赘之物也悉数清除，据此改变了这门语言自身的种种自行其是的倾向。可以说，乔治还深挖了德意志语言的下层土壤，令那水晶般清澈的水自行喷涌而出，水波荡漾，无比澄明，没有半点尘迹。此番修建和雕琢之下，德意志语言在优雅方面有所折损，一度动听

的音调也尽数消失，但在形式完美度方面，却有所斩获。乔治的语言风格当然也就是他的诗篇的风格。这些诗篇的艺术性胜过诗性，取智性一途而非神秘一途，自发性极为罕见，完美性则成为常态，而且是极高的完美性。他的诗篇接纳了太多思考，由此，这位美学立法者便自然而然地伤害到了那深沉且无意识的诗性源泉。总体上看，乔治的作品笼罩在一种我们最好称为凋萎病的范围当中，不过，这氛围却是充斥了美感。斯蒂凡·乔治及其圈子乃属于文士阶层，而且也深受文艺复兴文学团体的幻象之害：他们都相信诗歌可以借由审美法则加以控制，因此，诗歌也就可以成为学派之事。此类团体很容易在剧烈的动荡期诞生并崛起。乔治的这个团体乃是直接针对19世纪90年代盛行一时的自然主义潮流以及此一潮流催生的文学无政府主义的。对于一个催生了瓦格纳、尼采和斯皮特勒的时代而言，乔治及其圈子是很自然的现象。乔治乃是19世纪克努特王族的第四个继承人，他们志在强势地击退现代生活的潮涌。

这样的姿态若是置身精神王国，当然是要激发世人的仰慕和效仿的，特别是这样的姿态乃出自一个显要之人。沃尔特斯、贡多尔夫、摩尔维茨（Morwitz）以及塞里尔·司各特先生提供的信息和回忆材料[2]，都不难得出一种印象：乔治其人乃相当霸气。在这一点上，诗篇和传记都可以为证。乔治生而拥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在此等魅力之外，又平添了他那种主宰追随者的欲念和决心。在1890年聚集在他身边的那批门徒眼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们期望在他身上见证无可测度之物，这恰恰是因为他对这些门徒拥有异乎寻常的影响力，而这也肯定会反过来对他自己产生某种影响。他的音调越来越像神父，神态当中的仪式气息也日益浓重起来，时光又将他的语言打磨得如同在做礼拜；然而，最终，什么都没发生。倘若是一个先知，当然可以将全部赌注押在未来，先知本人是不会活着见证那个未来的。但大祭司的情形可不一样。而且，这么一个深深迷醉于尼采的大祭司，内心当中无可避免地会梦想着见证一个道成肉身的神灵（倘若他是德意志人的话），就乔治而言，这神灵表征着美，是来自希腊的信使，正如乔治吟诵的那样：“希腊，我们永恒

的爱”。在世纪之交，必须要有这方面的启示降临了，这是非常迫切的。此时的乔治，其境况跟1830年的昂方坦（Enfantin）是一样的，当年，昂方坦的门徒让他独留囹圄之中，去找寻那降临凡间的“圣母”（Supreme Mother），那是他自己召唤过的，但一切归于枉然。克拉格斯（Klages）、舒勒和沃尔夫斯克尔（Wolfskehl），乃是乔治最为忠实的追随者，此时也开始对“主人”感到厌倦了，对于德意志的重生也变得日益不耐烦了。显然，这一切的一切仍然是那么遥远，没有任何切近的迹象。乔治对女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憎恶，他蔑视异性情欲，极度推崇艺术、生活以及情爱当中的男性元素。很可能就是这些因素在这三个躁动不安的追随者内心激起了一场反动，令他们在巴霍芬（Bachofen）那本有关母权体制的知名作品面前变得毫无抵抗力。于是，他们决心依托女性原则来革新这个世界，将世界带回母系状态，在他们看来，那才是人类的宿命，只不过在过去因为男性的征服行动而遭遇了挫折而已。可以说，这场运动乃是法国圣西门运动的翻版，七十年前，圣西门分子不也是在狂热地找寻那“神秘之母”（Mystic Mother）吗？只不过，此次运动移植到极具神秘气息的德意志心灵王国，并且也因此较之当年的圣西门分子要狂热得多，几乎到了癫狂境地。这场德意志运动所尊奉并追寻的“宇宙母神”（Great Mother of the Cosmics），较之圣西门派的“自由女神”（Free Woman），承载了多得多的神秘气息，后者乃是未来的女祭司，既分享昂方坦的神权，也分享昂方坦的王座。乔治并没有像昂方坦那样，宣示那句危险的口号：“找到那个女人”。如果说乔治也对此事表示出兴趣，那只能说这是出于别的考量，他肯定不希望这三个热忱且大有希望的年轻人跟他疏远。然而，这三个年轻人却把乔治的此种兴致当真了，而且还极为热切地希望改造这个世界，令这个世界进入硕果累累的原始混沌状态。于是，他们便恳请主人施行强力魔法，完成此事，确切地说，就是将他整个的才能凝聚在一个时点之上：

> “请您赤身裸体置身广场，”他们恳请说，“召唤神灵！”“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施展罪行，令世界陷入混沌！且运用您的歌声，破解命运，刺穿这僵硬的天日，直透暗夜母亲那悸动的紫色心脏！”

乔治当然没有接受此类怪异请求，他拒绝迎合这种精神病院、监狱以及那要命的荒诞举动，没有人可以因此责难乔治。不难想象，面对这些要求，这个贵族诗人是以何等傲然且惊诧的眼睛盯视着“暗夜母亲”（Mother Night）的这些狂热追随者的。当然也不难想见，当自己的要求遭到拒绝之时，这些追随者是何等愤怒，这个圈子毫无疑问将因此碎裂，不难想见，他们又是何等悲恸。此时，有传言说，他昔日的一个门徒正要抛开他，去独立完成此事，不难想见，此一传闻会令乔治陷入何等的困顿和烦恼当中。乔治当然不愿意为他们造势，不愿意在暗夜之中的幽暗之地为他们制造那种“宇宙战栗”。而且，乔治同时也担心他们已经得到或者说是伪造了某种重大启示。这一切都是揣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当这些人在疯狂召请“宇宙母神”施行魔法并举办狄奥尼索斯狂欢仪式，以便将母神从原始暗夜当中召唤出来的时候，马克西敏出现在乔治面前：

> 同慕尼黑方面的同人已经开始发生摩擦，因此只有跟乔治相当亲近的友人才能够看到马克西敏。在“三诗人游行庆典”［荷马、维吉尔和但丁］活动中，马克西敏乃作为一个充满爱意的天才站在但丁-乔治身边，年轻的面容，大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脸部轮廓棱角分明，跟“主人”一样，手持透亮的蓝色预言球，透射出极为深沉的学识……在沃尔夫斯克尔举办的另一次化装游行活动中，马克西敏同贡多尔夫谈论着眼前的“门徒”队列，他身着一件朴素的蓝色外套，头戴紫罗兰花环。除了这些安静的庆典活动，他从不在任何别的活动现身。[3]

这个俊美的年轻人此时年方十三岁，是乔治在慕尼黑结识的，大约三年之后故去，“主人”和忠实门徒都郑重宣示，马克西敏乃是神灵。人们对他的出身和家庭一无所知，整个这段故事就这么包裹在晦暗和神秘当中，乔治、贡多尔夫和沃尔特斯提供的相关记述也根本无助于驱散此一谜团。马克西敏的神性的确得到了宣示，但并没有得到证明或者支撑；尽管1906年，有人私下印发了一本名为《马克西敏：一部回忆录》（*Maximin，a Memorial* ）的书——这本书从来不曾发售，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书中摘引了马克西敏的一些诗作，还登载了他的一张照片，

但这些基本上也无助于廓清事实。我个人觉得，马克西敏不过是神性之美的一个象征，乔治主要是看中了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男性元素，而且，乔治主要是将他作为同“原始暗夜母神”对等的神灵加以使用的。乔治对马克西敏的情感乃是偶像崇拜式的，这一点可以从乔治的诗篇《第七环》（*The Seventh Ring* ）当中判断出来。后来，乔治也曾告诉司各特，这个年轻人的死令他极为悲恸，一夜之间，头发都白了。不过，乔治并没有向司各特提及这个年轻人的神性，司各特对马克西敏是相当了解的，他认为，乔治不曾说过马克西敏乃是神灵这样的话，也不会有这样的念头。据司各特先生记述，乔治是一个纯然的怀疑主义者，没有任何的神秘主义倾向。他也许会在诗歌当中运用神话，但他绝对不会信以为真。因此，乔治虽然一手创制了马克西敏神话，不过，他本人是拒绝成为这场幻象的祭品的，相反，他是刻意在其他人的心灵当中培植此种幻象。无论如何，乔治创制的此一神秘意象，乃是作为现实强加给德意志的。当时光进入20世纪，德意志大地之上便传扬着这样的信息：一个神灵已经降临凡间，乔治，艺术的大祭司，乃与这神灵同在，先是作为主人，后是作为朋友。不久，乔治的崇拜者群体当中便显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要么是对这段故事予以模糊处理，要么是用一堆含混之词将其湮没。不过，所有的崇拜者都认肯，“马克西敏体验”（Maximin-Experience）乃有着深沉的宗教特质。不过，乔治、贡多尔夫以及沃尔特斯对这个神话都是予以信从的；特别是乔治，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在他为《马克西敏：一部回忆录》撰写的序言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份序言重印在乔治的一部文集当中。他的名字一直都同马克西敏神话联系在一起，并且很可能在未来的世代当中，也将仅仅因为马克西敏神话而为人铭记。

马克西敏神话不过是为乔治的绝美诗篇提供了灵感，于德意志的世事进程并无任何明确的影响可言。情况就是如此，毕竟，马克西敏不过是一个衍生性质的神灵，只不过是将诸多人们都很熟悉的元素融合起来而已。W.科希（W.Koch）曾对这些元素有过剖析，并据此指出，哈德

良皇帝所钟爱的安提诺斯、阿多尼斯、恩底弥翁、赫拉克勒斯、甘尼米德以及后期的罗马皇帝卢西乌斯·尤里乌斯·维鲁斯·马克西米尼乌斯，有关这些人物的观念和回忆都融入了马克西敏神话当中。乔治通常都是运用《圣经》意象和语言来刻画一个神灵，而这个神灵乃是希腊神灵而非基督教神灵，这一点往往会令那些冷静的读者感到吃惊。此外，乔治在描述神性之具体特质时展现出的创造性是非常显见的，这一点同样会令冷静的读者感到吃惊：

> 我是唯一者，亦是他者，
>
> 是母体和子宫；
>
> 我是剑鞘，是匕首，
>
> 我是殉道者和世界末日；
>
> 我是富人，是乞丐，
>
> 我是箭矢和弓弩；
>
> 我是祭坛和祷告者，
>
> 我是质料和表象；
>
> 我是幻象和先知，
>
> 我是信条和理智；
>
> 我是木头，是火焰，
>
> 我是开端和终结。

这样的窃窃私语我们都似曾相识，而且，这其中透射而出的一般观念也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倒是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在谈论上帝和众天使时运用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神秘主义者的方式，这样一个神秘主义者跟完全不同于自己的精灵的精灵有接触，而且对这场接触有着相当清晰的记忆，足以用一种怪异且个性化的方式展开描述。

不管是出于怎样的情由，马克西敏最终都未能令圈外人相信他不仅仅是一个面相俊美的男孩。不过，对乔治来说，马克西敏肯定是启示了一种特殊的希腊之美，这就是当年曾令温克尔曼予以迷狂陈词的希腊之美。倘若考量一下作为大祭司的乔治同自己的这个神灵之间的关系，我们便也不难记起，当年的温克尔曼乃是何等热切地寻找这种关系，但最终还是归于失败。也许，当年的考古学家推动的车轮，到了乔治的时代算是转动了满满一圈。那些背教的信徒脱身狄奥尼索斯的怀抱，大声召唤着“母神”，但这一切都归于枉然。马克西敏将他们全部封印在美轮美奂的阿波罗幻象当中。温克尔曼就博尔盖塞庄园中“有翼天使”（Winged Genius）发表的那番陈词也许是对乔治此番态度的最佳刻画：

> 置身这样一个地方，我希望去描述那样的美，那种类型的美并非起源于凡间。那是一个有翼的天使，坐落在博尔盖塞庄园，俨然是一个健壮俊朗的青年人的体型。倘若有谁愿意设想这个可爱的形象，不妨让自己的想象力执着于大自然当中处处都展示出来的那种独特的美，同时也请冥思一下那来自上帝并回归上帝的美，由此便可以在睡梦当中塑造那样一种天使意象，那天使的面容焕发着神圣的光彩，身形则展示出最高的和谐；这便是博尔盖塞庄园中这座雕像呈现出的美。不妨这么说，这是自然在上帝的允准之下，依据天使之美而塑造出来的。[4]

如下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倘若尼采不曾写就《悲剧的诞生》，那么无论巴霍芬有关古代母权体制的理论于这些追随者有着何等魔力，他们都不会对狄奥尼索斯在生活中的复兴抱有此等希望。如下情况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倘若尼采不曾坚持神话之于艺术的至尊分量，乔治也就不会创造马克西敏神话。不过，乔治之于希腊之美的爱恋，很显然主要是源自温克尔曼而非尼采。两人在品位和气质上都存在根本的近似，不过，各自的生活和成就却是全然不同的。温克尔曼，忙碌、活跃，喜好探究且满怀热情，较之孤高和神秘的乔治，展现出一种正常得多的存在形态；温克尔曼犯过许多错误，不过，他从来不尝试神秘化，也不曾受制于种种幻象。乔治提起的诡异主张，无论是否出于真心，则都表征了一种诡异、危险且幽暗的元素，此一元素乃是尼采注入德意志的希腊主

义血脉当中的。

---

[1] 混元女神（the Primeval Mother），即苏美尔文明神话中的“最初女神”（Nammu），相当于巴比伦神话中的“迪亚马特”（Tiamat），即所有神之母。——译者注

[2] C.Scott，*My Years of Indiscretion* .司各特先生给了我拜访机会，令我可以亲耳倾听他对往日里他认识的那个斯蒂凡·乔治的回忆，在此特别表示谢意。

[3] 此次游行庆典发生于1904年3月，应该就是马克西敏去世前不久的事情，此时，沃尔夫斯克尔已经回归信徒行列。具体日期这一问题上乃是极为含混的。不过，就我所知，这场运动是在1900年或1901年臻于顶峰的，在这些年间，乔治会在每年下半年同马克西敏会面。

[4] 此处仍然是采用了洛奇的译本，不过我将“流光溢彩”（effulgence）一词改换为“光彩”（radiance）。

结论

歌德的恶灵、尼采的超人以及乔治的马克西敏，乃是现代德意志的三大神秘造物，这些神秘造物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溯源于温克尔曼对希腊的发现。这其中，歌德的恶灵乃立足于现实，因此有着强劲得多的潜在能量。必须意识到此一怪异元素的存在，此一怪异元素乃得名于大家都熟知的苏格拉底的“魔性”，不过，所表征的却是尼采后来所谓的生活和艺术当中的狄奥尼索斯面相。尼采将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称为“最伟大的德语作品”，并在《悲剧的诞生》中引述了《谈话录》中的一段话，那是1828年3月11日歌德同艾克曼的一次谈话，主题是恶灵之显现。看起来，尼采应当是从歌德的恶灵观念中得到启示，构筑了自己的狄奥尼索斯观念，确切地说，尼采将自己的古典学识同海涅就狄奥尼索斯的暗夜仪式所做的灵性描摹融合起来。自此之后，恶灵-狄奥尼索斯便成为德意志文学血脉当中一股内在的能量。正是这股能量催生了超人，催生了斯皮特勒的赫拉克勒斯，催生了众多诗篇，并且也在当今时代的伟大批评作品和传记作品当中发挥着显见的权能。由此，恶灵驱动的超人便取代了那些黯然世代当中的圣徒、罪人和殉道者。不管怎么说，传记乃是恶灵发挥巨大魅力的场所，因此也就很自然地倾向于采纳一种传奇色调，毕竟，那是众英雄的编年史。现代作家虽然一贯蔑视那种生造、扭曲以及曲解事实的做法，不过往往也都是借由一种奥义十足的心理解释手法，令自己的作品发挥出巨大效能。相形之下，往昔时代那些率直的传记作家虽然总是会给出率直的谎言，但也绝无可能达成此等巨大效能；此种情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盎格鲁-德意志血统的H.S.张伯伦于1912年、G.西美尔于1913年、贡多尔夫于1916年以及E.路德维希于1920年以各自的方式运用了此种几乎是通灵式的心理解释之法对歌德展开解析，令歌德成为一种隐秘英雄崇拜的核心人物。1920年，E.波尔特拉姆（E.Bertram）毫无掩饰地将自己

那本令人仰慕的尼采研究作品称为“神话学的尝试”；路德维希则对拿破仑、俾斯麦和施里曼实施了纯然戏剧化甚至史诗化的阐释，令这些传主成了超人。此外，斯蒂芬·茨威格于1925年写就的《恶灵之战》（讲述了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乔治圈子就“主人”写就的一系列作品、塞萨尔兹（Cysarz）的席勒传记和瓦伦汀的温克尔曼传记都可以归属这个序列。从中不难见出，此一时期的德意志精神地平线严严实实地笼罩在溯源于歌德和尼采的神话雾霭当中。此种情境之下，德意志的民族英雄皆幻化为超人，其中许多人都赋有魔性并处在恶灵的掌控当中，还在希特勒时代降临之前的那些年间经历了进一步的神化，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先知和先驱。这并不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进程，不是一个借由迷信元素之添加而形成的民间进程，相反，这是智识精英的一场意志行动，此时，他们的心灵已然处于极度魅惑的状态。

如果说乔治的马克西敏神话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现在就来判别此种影响未免为时尚早。不过，我还是愿意冒险揣测，有关马克西敏生平的诸多实情不可避免地会公之于世，这场非同寻常的神话很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归于幻灭，而且现在就已经有幻灭的迹象了。不管怎么说，马克西敏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一个相貌俊美的青年，没有活到成年；马克西敏并不能如同歌德的恶灵那样侧身这个世界的伟大精灵行列，并幻化为其中的一股自然力量；马克西敏神话也同尼采的超人神话不一样，并不是因为进化论在一个有着深沉先知禀赋的心灵当中激发而出的极强幻梦。身着朴素的蓝色外套，头戴紫罗兰花环，这样一个马克西敏可以是一场幻象，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噱头。自温克尔曼的希腊从时间海洋当中浮现而出之后，一股又一股的浪潮冲刷着现代生活的海滩，马克西敏乃是最后的那股潮涌。

试想当年，那个落魄的德意志修士，逡巡在罗马的街道之上，势必不会预见到自己将给后世制造此等扰攘，更不会想到自己会激发后人写就那样的作品。他身后的那些人俨然就是一个军团；即便是就德意志希

腊主义的成就实施严格筛选，也足以成就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拉奥孔》、《伊菲革涅亚》、《海伦娜》、《希腊诸神》、荷尔德林诗篇、《恩培多克勒》、《流亡中的诸神》、特洛伊黄金、《悲剧的诞生》、《奥林匹亚之春》、《第七环》等，所有这些成就，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溯源于温克尔曼，如今，舍弃温克尔曼，便根本无从想象德意志文学和德意志生活。此外，荷尔德林诗篇乃全然是对德意志希腊主义的辩护。不过，人们也有充分理据去哀叹这场运动。歌德的杰作乃是在接纳温克尔曼之希腊的魔咒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构思的。在接触了那么一个全然异质的世界之后，歌德对自己的杰作实施了修订，结果令这部杰作遭受折损。同样的灾难也降临在《伊菲革涅亚》《海伦娜》《罗马哀歌》《赫尔曼与窦绿苔》《阿闵塔斯》《欧福罗塞涅》《阿列克斯与朵拉》《新鲍西亚斯》《潘多拉》身上，它们都无力逃脱。今天，我们都愿意用全部这些作品去交换歌德的抒情诗篇以及《维特》和《初稿迈斯特》，当然还有《初稿浮士德》。德意志古典运动的这个公认领袖，乃是借由德意志方式才抵达自己的顶峰的。席勒也是以希腊样板展开自我塑造的，此举同样令他所失甚于所得。《阿喀琉斯》断篇、《墨西拿新娘》、《迪亚娜女神》、《敌基督》以及马克西敏神话，面对这样一份希腊主义清单，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僵硬、诡异、危险、毛骨悚然，还有就是荒诞不经。所有这些都是那么异乎寻常。德意志希腊主义包含了诸多面相，个人心中的评判取决于何种面相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就事情的本性而言，并不存在终极评判。也许有人会问，倘若德意志天才不曾因为南方磁场而偏离了自己的自然路线，是否会铸就截然不同的、更为伟大的作品，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歌德的德意志天才当然会诞生未知的子嗣，不过，这样的子嗣从未来到这世间，此情此景，难道真的有人会愿意用荷尔德林诗篇来交换吗？说到底，在总结德意志希腊主义运动之时，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这场运动，这都是我们必须直面的困境，而且，此一困境是无可化解的。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需要考量，那就是温克尔曼之发现希腊所引发的

悲剧后果在众多人的生命中是很显见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温克尔曼自己。他对他所爱恋的那片土地有着莫名的神秘恐惧，他崇拜那种希腊式的友爱，这催生了他那可悲可叹的终局。歌德则一直生活在对那“冷酷的女人”的战栗当中，就这么消耗了多年的光阴，在那“没有鸟儿吟唱之地”，他的天才承受着何等痛楚，恐怕是一言难尽，更不用说他在那段追逐海伦娜的枉然岁月当中所承受的精神困顿了。席勒则一直在同一个超人般的对头进行着决绝缠斗，最终遍体鳞伤，到死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在放手之时是否得到了赐福。荷尔德林对诸神的土地有着极为深重的思乡之病，这可怕的病症最终耗尽了他的心性，也摧毁了他的理智。海涅的生命可谓一场悲剧，其中最为悲剧的时刻也许就是他最终向他的“亲爱的米洛的维纳斯”作别的时候。尼采那倍受折磨的心灵则因为对狄奥尼索斯的迷狂崇拜而被撕裂。施里曼英年早逝，还不是因为他太爱恋希腊了。希腊诸神的致命魔力在斯蒂凡·乔治这里最终筑成了马克西敏神话，此一神话实际上是一场令人极为怜悯的悲喜剧。莱辛、赫尔德和斯皮特勒恐怕是仅有的几个受益于而非受害于温克尔曼之希腊及其荣耀幻景的人；其余的人则都是遭遇了极大的震动和冲击，那力量直透灵魂深处。

温克尔曼在艺术王国发现了静穆、单纯和高贵，除了德意志，还有哪片土地会因为艺术王国的这项发现而催生如此悲惨的结果呢？还有哪片土地会令狄奥尼索斯这个名字挥洒出如此可怕的效能呢？倘若是印度教协同起怪异的荣光和狂野的恐怖入侵了德意志，那么它铸成的灾难能够同奥林匹斯主义及其光华四射的静穆所造成的灾难相提并论吗？那如同云雾一般令人困惑的德意志品性，就那么盯视着我们，令我们无从作答。不过，最起码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唯有在那么一个对自己不满且因此充满悲剧情怀的族群当中，同某种异域理想的斗争才会持续如此漫长的时日。对盎格鲁-撒克逊心灵而言，希腊艺术和诗歌之美竟然催生了如此疯狂的痛苦，从中得到的纯净愉悦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斗争太过浪费，实在是令人叹息，甚至可以说是太过顽固。除了

温克尔曼，德意志的希腊主义者实际上都担当不起对待美的此种异教态度，尽管这态度是歌德辛勤培育起来的，也是海涅大力宣扬的。客观、冷漠的沉思非德意志人力所能及。他们当然希望俘获并据有希腊之美，令它成为自己的财产，或者干脆胜过它，若不能胜过它，就摧毁它。他们也希望将希腊之美强行拖入现代，希望挖掘那深藏地下的财宝，俘获希腊诸神。此类欲念既暴烈又狂野，因此，德意志希腊主义会如此令人震撼、令人痛楚也就毫不奇怪。其中一个人被谋杀了，一个人突然死亡，两个人疯了，还有一个则发狂了。神话狂热乃是可怕的疾病，几乎摧毁了他们的一切。温克尔曼其人终究在这世间走过一趟，仅此一点，就足以引发世人十足的悲悯和遗憾。然而，世界就是世界，事实就是事实。英国有句谚语叫“逆来顺受”，这也许能带来几分宽慰。那批伟大的德意志希腊主义者留下了无与伦比的诗歌和魅力无限的散文，这一切都是德意志之悲剧情愫的文学副产品。我倒不是说，个人悲剧倘若能够催生伟大艺术，那么也就能够得到先验的证成。不过，倒也不妨退而求其次，（有意忘记此一悲剧情愫造成的那些痛楚）权且享受此等美景，作为异教徒，这当然是可以的，尽管作为德意志希腊主义者，却是没有这般福分。

原始资料选

A. GENERAL

Cholevius，C. L.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oesie nach ihren antiken Elementen* ，2 vols. Leipzig，1854.

Dilthey，W. *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 . Leipzig，1920.

Finslek，G. *Homer in der Neuzeit* . Berlin，1912.

Maass，E. *Goethe und die Antike* . Berlin，1912.

Marshall-Montgomery. *Friedrich Hölderlin and the German Neo-Hellenic Movement* ，i. O.U.P.，1923.

Pater，W. *The Renaissance* . London，1904.

Robertson，J. G. *The Gods of Greece in German Poetry* . O.U.P.，1924（Taylorian Lecture）.

Schlegel，A. W. *Vorlesungen über dramatische Kunst und Literatur* . Leipzig，1846.

Strich，F. *Die Mythologie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Klopstock bis Wagner* ，2 vols. Halle，1910.

Trevelyan，H. *The Popular Background to Goethe's Hellenism* .

London，1934.

Vernon Lee. *Stud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taly* . London，1888.

Wagner，R. *Die Kunst und die Revolution*，*Oper und Drama*，*Das Kunstwerk der Zukunft*，*in Sämtliche Schriften* . Leipzig，1913-1917.

Zweig，S. *Der Kampf mit dem Dämon* . Leipzig，1929.

B. EDITIONS OF WORKS AND LETTERS

Winckelmann. *Werke* ，ed. Eiselein. 12 vols. Donau-Eschingen，1825-1829.

—— *Briefe* ，ed. Förster. 3 vols. Berlin，1824.

Lessing. *Werke* ，ed. Lachmann-Muncker. 24 vols. Berlin，1886-1924.

—— *Briefe* ，ed. Lachmann-Muncker. Vols. xvii-xxi of above.

Herder. *Werke* ，ed. Suphan. 32 vols. Berlin，1877-1909.

—— *Briefe* ，ed. E. Herder，in *Herders Lebensbild* ，3 vols. Frankfort，1856-1857.

Goethe. *Werke* （Festausgabe），ed. Petsch. 18 vols. Leipzig，1926.

—— *Briefe* ，ed. Stein. 8 vols. Berlin，1924.（An excellent selection. The standard critical Weimar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letters has also been consulted.）

—— *Briefwechsel mit Schiller* ，ed. Vollmar. 2 vols. Stuttgart，1881.

Schiller. *Werke* （Säkularausgabe）， ed. Hellen. 16 vols. Stuttgart， 1904-1905.

—— *Briefe* ， ed. Jonas. 7 vols. Stuttgart， 1892-1896.

—— *Briefwechsel mit Körner* ， ed. Geiger. 4 vols. Stuttgart， 1893.

Hölderun. *Werke und Briefe* ， ed. Hellingrath， Seebass and Pigenot. 6 vols. Berlin， 1923， 2nd ed.（Also contains Susette Gontard’s letters to Hölderlin and other biographical material.）

Heine. *Werke* ， ed. Elster. 7 vols. Leipzig， 1887-1890.（The second edition is not yet completed.）

—— *Briefe* ， ed. Hirth. 3 vols. Munich， 1914-1920.

Nietzsche. *Werke* （Taschenausgabe）， ed. Förster-Nietzsche. 11 vols. Leipzig， 1917.

—— *Briefe* . 5 vols. Berlin， 1902-1909.

Spitteler. *Werke* . Diedrichs in Jena.

—— *Briefwechsel mit Adolf Frey* ， ed. L. Frey. Leipzig， 1933.

George. *Werke* . Bondi in Berlin， 1927ff.

C.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WORKS

I mention only those works which have been particularly useful in this study； to attempt to give a survey of all the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works which have helped to build up my knowledge of the authors involved would

be impossible.

Justi，C. *Winckelmann*，*sein Leben*，*seine Werke und seine Zeitgenossen* . 3 vols. Leipzig，1866.

Vallentin，B. *Winckelmann* ，Berlin，1931.

Schmidt，E. *Lessing*：*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und seiner Schriften* ，2 vols. Berlin，1923，4th ed.

Oehlke，W. *Lessing und seine Zeit* . 2 vols，Munich，1919.

Frey，A. *Die Kunstform des Lessingschen Laokoon* . Berlin，1905.

Haym，R. *Herder nach seinem Leben und seinen Werken* . 2 vols. Berlin，1880-1885.

Bielschowski，A. *Goethe*：*sein Leben und seine Werke* . 2 vols. Munich，1896-1903.

Gundolf，F. *Goethe* . Berlin，1928，12th ed.

Ludwig，E. *Goethe*：*Geschichte eines Menschen* . 3 vols. Stuttgart，1920-1921.

Eckermann，J. P. *Gespräche mit Goethe* . Leipzig，1923.

Minor，J. *Schiller*：*sein Leben und seine Werke* . 2 vols. Berlin，1890.

Berger，K. *Schiller*：*sein Leben und seine Werke* . 2 vols. Munich，1905-1909.

Robertson，J. G. *Schiller after a Century* . Edinburgh，1906.

Cysarz，H. *Schiller* . Halle，1934.

Hecker，M. and Petersen，J.，ed. *Schillers Persönlichkeit* . 3 vols. Weimar，1904-1909.

Petersen，J.，ed. *Schillers Gespräche* ，Leipzig，1911.

Gerhard，M. *Schiller und die griechische Tragödie* . Weimar，1919.

Gundolf，F，*Hölderlins Archipelagus in Dichter und Helden* . Berlin，1923，2nd ed.

Könitzer，W. F. *Die Bedeutung des Schicksals bet Hölderlin* . Würzburg，1932.

Lehmann，E. *Hölderlins Lyrik* ，Berlin，1922.

Böhm，W. *Hölderlin* . 2 vols. Halle，1928-1930.

Litzmann，C. T. *Friedrich Hölderlins Leben in Briefen von und an Hölderlin* . Berlin，1890.

Atkins，H. G. *Heine* . London，1929.

Marcuse，L. *Heinrich Heine*：*ein Leben zwischen Gestern und Morgen* . Berlin，1932.

Houben，H. H.，ed. *Gespräche mit Heine* . Frankfort，1926.

Ludwig，E. *Schliemann*：*Geschichte eines Goldsuchers* . Berlin，1932.

Bertram，E. *Nietzsche*，*Versuch einer Mythologie* . Berlin，1921.

Knight，A. H. J. *Some Aspects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Nietzsche*，*and particularly of his connection with Greek Literature and Thought* . C.U.P.，1933.

Podach，E. *Nietzsches Zusammenbruch* ，Heidelberg，1930.

Spitteler，C. *Meine Beziehungen zu Nietzsche* . Munich，1908.

Faesi，R. *Spittelers Weg und Werk* . Leipzig，1933.

Scheller，W. *Stefan George* . Leipzig，1918.

Wolters，F. *Stefan George und die Blätter für die Kunst*，*deutsche Geistesgeschichte seit 1890* . Berlin，1930.

Gundolf，F. *George* . Berlin，1930，3rd ed.

Koch，W. *Stefan George*：*Weltbild*，*Naturbild*，*Menschenbild* . Halle，1933.

Morwitz，E. *Die Dichtung Stefan Georges* . Berlin，1934.

索引

Acropolis，the，48

Adam，R.，35，36

Aeneid，the，63，162

Aeschylus，14，47，95，101，102，183，208，237；the *Agamemnon* of，47，168，177；the *Eumenides* of，160，192；the *Oresteia* of，191；the *Prometheus* of，94，224；the *Supplices* of，140

Agamemnon the，47，168，177

Albani，Cardinal Alessandro，18，21，25-28，30，31，35，36，39，42，55

Albani，the Villa，55

Alcestis，7

Alcibiades，29

Alexis，Wilibald，275

Altmark，the，14

Ancona，42

Andler，Charles，his *D’un faux dans l’œuvre littéraire de Heine*，297 n.

Anhalt-Dessau，Friedrich Franz，Prince of，27，36，41

Antigone，the，232，235，236

Apology，the，121

Arabian Nights，*The*，22

Arcangeli，Francesco，42，43

Archimedes，183

Archinto，Alberigo，Count of，16-18，20，21，23

Ariosto，108，183

Aristophanes，250，262，292

Aristotle，178；the *Poetics* of，129

Athens，16，40，105，135，181，219，305，306；the Archbishop of，305

Augsburg，72

Augustus，the Emperor，281 n.

Bachofen，J. J.，327，331

Bailey，the Old，246

Baltimore，Lord，*see* Calvert

Barnes，J.，his Latin translations from the Greek，169

Batteux，C.，58

Baudelaire，Charles，his poem *Obsession*，256

Bauerbach，163，164

Beerbohm，Max，his *Quia Imperfectum*，106

Belgiojoso，Princess Christine，272

Belvedere Apollo，the，98，100，180，254，269，299

Benacus，*see* Garda，Lake of

Berendis，H. D.，17，20，30，31，133

Berg，F. R. von，29，30，31，32

Berlin，12，36，57 n.，175

Bernini，L.，15，45，47

Bertram，E.，332

Beulwitz，Caroline von（*née* Lengefeld），176

'Black William'，246

Blake，William，206

Blois，203，206，232

Bodmer，J. J.，5

Böhm，Wilhelm，215，236，324

Böhme，Jakob，206

Bologna，40，107

Bordeaux，205，231，232

Borghese Gardens，the，137

Borghese Villa，the，43

Börne，Ludwig，246，274，275，280；Heine’s book on，264 n.，280 ff.；his *Letters from Paris*，280

Bosa，Antonio，11 n.

Böttiger，K. A.，194

Boysen，F. E.，13，14

Breitinger，J. J.，5

Brenner，the，107

Brion，Friederike，98，112

Brumoy，P.，169；his *Greek Theatre*，168

Brunswick，36

Brunswick，Carl Wilhelm Ferdinand，Crown Prince of，52

Brunswick，Prince Leopold of，56

Buff，Charlotte，98，140

Bünau，Count Heinrich of，14，17，19，20；his *History of the German Empire and Emperors* ，15

Bürger，Gottfried August，163，165，180，251；his *Vigil of Venus* ，161，162

Byron，George Gordon，Lord，his influence on Goethe，151，152，153，154

Cairo，22

Calvert，Frederick，7th Lord Baltimore，27

Campe，Julius，272，274，292

Casanova，G. B.，29

Castor and Pollux，statue of，98

Catullus，171

Cavaceppi，B.，40，41

Caylus，A. C. P. de Tubières，Count of，26，58，64，65，66，68；his *Tableaux tirés de l'Iliade，de l'Odyssée d'Homère et de l'Énéide de Virgile，avec des observations générales sur le Costume* ，64

Cervantes，M. de，183

Chamberlain，H. S.，332

Cicero，281 n.

Cid，*Le*，189

Clodius，C，A.，93

Constantinople，32

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332

Conz，C.，237

Corneille，Pierre，influence of，on Schiller，189

Correggio，A，A. da，15

Corsica，56

Cosmics，the，327 ff.

Cotta，J. F.，214

Critique of Pure Reason，*The*，269

Cysarz，H.，333

Dacheröden，Caroline von，176

Dalberg，Friedrich von，72

Dalmatia，109

Damm，Christian Tobias，12

Dante Alighieri，85，86，87，88，150，183，206，328

Dassdorf，K. W.，55 n.

Denkendorf，207

Desmarest，44 n.

Diderot，D.，his *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les Muets* ，58

Diotima，*see* Gontard，Susette，217-25 *passim* ，232，237

Dostoyevski，Thedor Mikhailovitch，87

Dresden，14，15，16，17，18，22，34，36，40，59，93，163；the Zwinger in，15；the Grosser Garten in，15，45，46，48，93

Dubos，J. B，，58

Dürer，Albrecht，152，183

Ebert，J. A.，55

Eckermann，J，P.，129，140，141，142，146，147，149-53；his *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 ，332

Edda，*The* ，80

Egypt，35，144，269

Eichendorff，Joseph von，275

Einstein，Albert，208

Elster，E.，his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Heine，243

Enfantin，Barthélemy Prosper，326，327

Engastromenos，Sophia，304，305

Epistolae Homericae，78

Erechtheion，the，46

Eumenides，the，160，192

Euripides，7，158，177，208；the *Iphigenia in Aulis* of，169，189；the *Iphigenia in Tauris* of，100-2，169；the *Phaethon* of，140；the *Phoenician Women* of，169；the *Trojan Women* of，145；influence on Goethe，100-2，123，140；Schiller's opinion of，169-72，183

Fabricius，Johann Albert，12

Faesi，Robert，317；his *Spittelers Weg und Werk*，317 n.

Faustus，138

Ferrara，107

Fichte，Johann Gottlieb，4，213

Fielding，Henry，183

Firmian，Count Karl，25

Fischer，J. G.，237，238

Florence，26，260

Flying Dutchman，*The* ，311

Franke，J. M.，30，31，35，40 n.

Frankfort on the Main，12，90，96，205，217，218，219，227，237

Frascati，25

Frederick the Great，36，53，54，152

Freud，Sigmund，292

Frey，Adolf，his *Die Kunstform des Lessingschen Laokoon* ，57 n.

Fuessli，Caspar，25，23 n.，31

Garda，Lake of，107

Genoa，56

George，Stefan，301，306，322-31 *passim* ，333

and the Cosmics，326-8

influence of Nietzsche on，326，331

creation of the Maximin myth，322，323，328-32，335

and Winckelmann’s Greece，330，331，335

his *The Seventh Ring* ，329，333

disciples of：Schuler，323，327；Klages，327；Wolfskehl，327，328，328 n.

Georgics ，the，162

German Mercury ，the，165

Gerstenberg，H. W. von，80

Gleim，J. W. L.，161

Gods of Greece in German Poetry，*The* ，168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4，19，32，36，67，70，72，80，81，83-154 *passim* ，159，185，190，200，206，207，208，213，221，231，238，239，251，252，257，263，267，271，278，280，290，294，295，296，299，308，309，310，311，313，324，332，333，334

and Schiller，121-4，129，173，174，180，182-4，187，188，191，192，196

debt to Lessing，69，70，132，133

opinion of Hölderlin，204，205，214，236

treatment of Heine，253，254，261

attitude to Christianity，119，148，149，150

search for a mythology，94，150，151

nostalgia for Winckelmann’s Greece，139-46，152，154，200，299，300，307，309，335

the “daimon”，83，87，90，92，96，98，102，104，105，107，111，116，119，123，126，142，143，146，152，154，332，333；Goethe’s resistance to，88，90，91；in conflict with Winckelmann’s Greece，93，115，131，139，153；Charlotte von Stein and，98，102，104；Goethe’s definition of，151，152；Nietzsche and，332

Goethe，works of：

Achilleis fragment，the，130，134，139，148，207，334

Alexis and Dora，126，334

Amyntas，126，131，334

Bride of Corinth，*The*，190，252

Brother and Sister，99，153

Chase，*The*，129

Clavigo，112，153

Eagle and Dove，89

Egmont，92，114，115，172；and the “daimon”，151，152

Elective Affinities，*The*，140，150

Elpenor fragment，the，103

Euphrosyne，131，334

Faust，86，92，93，94，107，112，114，115，123，124，132，136，287；*Urfaust* the，89，123，136，137，139，151，334；*Faust Fragment*，the，136，137，182；*Faust I*，114，115，121，131，136，137-9，149，150；*Faust II*，111，132，136，139-46，149，150，154，160，224，239，294；*Urhelena*，the，139；*Helena*，132，135-46，152，333，334

First Witches' Sabbath，*The*，137

Ganymede，89，113

God and the Bayadere，*The*，190

Godliness，96

Gods，*Heroes and Wieland*，7

Götz von Berlichingen，92，93，112，123，164，184

Hermann and Dorothea，126-9，334

Iphigenia，7，83，93，99-103，105，109，114，116，117，123，127，128，130，136，142，146，152，309，333，334；effect on Schiller，124，164-7，181；Schiller's critique of，169-72

Iphigenia in Delphi（projected），114

Italian Journey，*The*，105，106，133

Limits of Mankind，*The*，96

Love，*the Landscape-Painter*，69

Natural Daughter，*The*，132，132 n.

Nausicaa（projected），112-14

New Pausias，*The*，126，334

Orphic Gnomes，the，151

Over all the Summits hovers Peace，99

Pandora，140，141，144，294，334

Poetry and Truth，69，133，151

Prometheus，89，90，91

Reynard the Fox，121，126，127

Roman Elegies，*The*，116，117，118，120，123，124，126，128，129，135，334

Satyros，97

Second Sojourn in Rome，105

Stella，112

Tasso，92，106，108，111，114，115，116，136，146

Theory of Colour，147

Venetian Epigrams，*The* ，120，125，126，132

Wanderer’s Storm-Song ，89

Wandering Jew，*The* ，89，94

Werther ，89，92，95，96，113，129，136，153，164，334；influence of Homer in，94，95，131；Schiller’s critique of，124；Heine’s allusions to，253，254

West-Eastern Divan，*The* ，153，263

Wherefore did’st thou give us those deep looks？ ，99

Wilhelm Meister ，92，93，114，123，124，181，184；*Urmeister* ，the，92，96，105，127，334

Winckelmann and his Age ，133

Wizard’s Apprentice，*The* ，190

Golden Fleece，*The* ，309

Gontard family，the，205

Gontard，Susette（Diotima），217-25 *passim* ，226，227

Gonzenbach，A.，205，229

Gordon，Alexander，4th Duke of，27

Göttingen，University of，254，260

Gottsched，J. C.，5

Graces，*The* ，161，162，165

Greek Genius and its meaning to us. The ，166 n.，183 n.

Greek War of Liberation，the，237

Grillparzer，Franz，7，159；the *Golden Fleece* of，309；the *Sappho* of，309

Grollmann family，the，13

Gundolf，F.，88，134，324，326，328，329，332

Günther，J. C.，251

Gutzkow，Carl，246，274

Hadmersleben，13

Hafiz，Shirazi，47

Hagedom，F. von，58

Halle，12，13

Haller，Albrecht von，67

Hamann，J. G.，73，94，151

Hamburg，12，277

Hammer，J. von，147

Harris，J.，58

Hartmann，Moritz，204

Hauptwyl，205，226，229

Havre de Grâce，266

Hebbel，Friedrich，159，311

Hegel，G. W. F.，4，208，225

Heine，Amalie，260，272

Heine，Carl，246，285

Heine，Heinrich，7，52，242-300 *passim*，309，311，313，335

and Goethe，251，253，254，267-9，278，280，287，288，290，296

and Schiller，251，267t 268

knowledge of Greek，250

the gods of Greece and their effect on，252-7，261-5，268，269，275，279，282-90，293-8，309，310

attitude to Christianity，252，254，267，261，262，264，270，282-4，287，289，290，293，295，297，298，308 n.

blasphemies，256，258，259，261，269，284，285，291，292，298

and Dionysus，286，287，289，294-6，299，300，307，309，314，332

and statues，254，260，275，277-9，283，284，297，335

emotional life，259，260，271 ff.

and politics，244，258，264-6，268，274，275，281

Heine，works of：

Almansor，243 n.，252

Atta Troll，243 n.，282，286，287

Baths of Lucca，*The*，244 n.，262

Conditions in France，243 n.，265

Confessions，243 n.，251，291，291 n.，292

Doctor Faust，244 n.，287-9

Dream-Visions，252

Elemental Spirits，244 n.，270，275

English Fragments，243 n.，262

Epilogue to Romancero，243 n.，291 n.

Florentine Nights，243 n.，275，277，287

For the Mouche，297

French Painters， 243 n.

Germany，*a Winter’s Tale*， 243 n.，284

Goddess Diana，*The*， 244 n.，286，287，289，295，334

Gods in Exile，*The*， 244 n.，296，308，309，333

Gods of Greece，*The*， 257，309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Germany， 52，244 n.，269，270，275，308

Ideas， 243 n.，260

Introduction to Don Quixote， 243 n.

Introduction to Kahldorf on the Nobility， 243 n.，265

Journey from Munich to Genoa， 243 n.，260，267，278，287

Journey through the Harz， 243 n.，253，254，269

Letters about the French Stage， 243 n.，279

Letters from Heligoland， 264 n.

Ludwig Börne， 244 n.

Lutetia， 243 n.

Memoirs， 243 n.

Menzel’s German Literature， 243 n.，267

Mirror for Suabians，*A*， 251

Morphine， 251

North Sea Cycles，*The*， 243 n.， 264，262，267

Poems， 253

Preface to Salon I， 266

Preface to Salon II， 243 n.， 291 n.

Rabbi of Bacherach，*The*， 243 n.

Ratcliff， 243 n.

Rectification （in the *Allgemeine Zeitung* ）， 291 n.

Romancero， 249，297

Romantic Poetry， 243 n.， 252

Romantic School，*The*， 243 n.， 267，298

Schnabelewopski， 243 n.， 266

Shakespeare's Girls and Women， 243 n.， 280

Town of Lucca，*The*， 243 n.， 262，265，293

Tragedies with a lyrical Intermezzo， 253

Travel Sketches， 258，259，260

Twilight of the Gods，*The* ，259

Heine，Matnilde，*see* Mirat

Heine，Salomon，285

Heine，Therese，260，272

Heligoland，264

Heraclitus，48

Herculaneum，26

Herder，Caroline，72

Herder，Johann Friedrich，7，40，51，55 n.，71-81 *passim* ，238，251，263，311

character，71-3

admiration of Winckelmann，70，73，75，97

his answer to Lessing’s *Laocoon* ，74 ff.

and the gods of Greece，78-80，168，185，239，299，335

and Goethe，93，103，114，149

Herder，works of：

Admetus and Alcestis ，79

Ideas ，165

Iduna，*oder Der Apfel der Verjüngung*，80 n.

Journal of my Journey in 1769，71

Letters on Humanity，80

Philoctetes，79

Prometheus Unbound，79

Sylvae Criticae（*Kritische Wäldchen*），73 n.，74-6

Wie die Alten den Todgebildet，73 n.

Winckelmann，*Lessing und Sulzer*，74 n.

Herodotus，14

Herzlieb，Minna，140

Hesse-Homburg，Friedrich Ludwig，Count of，235

Hippocrates，183

Hirt，A.，132

Hitler，Adolf，333

Hitlerism，126

Hofmannsthal，Hugo von，his *Oedipus und die Sphinx*，307 n.

Holbein，H.，15，152

Hölderlin，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81，168，201-40 *passim*，251，252，263，299，S04，307，309，311，313，315，324，333，334，335

childhood and education，207，208

influence of Winckelmann and Lessing on，208，209

Schiller and，211-16，219，225-8，231

Susette Gontard（Diotima）and，217-25

relations with his mother，227-9

influence on Nietzsche，308

the gods of Greece，208，220 ff.，235，300；in conflict with Christ，229 ff.，238，295，313

and Dionysus，221，229 ff.

madness，234 ff.

calls himself Scardanelli，201，234，236，238

the last of the Winckelmannites，239，240

Hölderlin，works of：

Archipelagus，*The*，222、229，232

Bread and Wine，229-32，315

Death of Empedocles，*The*，218，221，223，231，235，334

Empedocles on Mount Aetna，223，231

Germania，232

Greece. To Stäudlin，210

History of Art under the Greeks，208

Hyperion，214-21，224，263

Main，*The*，222

Only One，*The*，233

Patmos，224

Poet's Mission，*The*，230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we should envisage Antiquity，*The*，216

Rhine，*The*，226

To the Genius of Greece，209

To Nature，211，215

Homburg von der Höhe，218，220，221，226-9，234

Homer，6，14，17，57 n.，85，86，87，88，89，92，128，150，179，182，185，186，206，207，222，258，288，297，310，328

in Lessing's *Laocoon*，61，64-8，70

Herder's interpretation of，74-6

influence on Goethe，94，95，111，112，121，125，129-31，143，147，148

Schiller's knowledge of，161，163，169；and admiration for，184

Hölderlin and，236，237

Heine and，250

pantheon of，179，185，253，257，262，293

Schliemann inspired by，304

Spitteler and，317

Hora，the，132

Hoven，F. W. von，167

Humboldt，Wilhelm von，129，134，175，176，184，188

Hybris，284；Schiller and the doctrine of，195 ff.

Ibsen，Henrik，57

Iduna，219

Iliad，the，65，128，130，147，195；and Goethe's *Achilleis*，130 f.；and Spitteler's *Olympian Spring-Time*，321，322；Voss' translation

of，125

Ilium（Troy），144

Inselverlag，the，238

Iphigenia，sacrifice of（picture by Timanthes），61

Iphigenia in Aulis，169，189；Schiller’s critique of，169，170

Iphigenia in Tauris，100，102；Schiller’s critique of，169-71

Jacobi，F. H.，115，121

Jena，12，13，173，174，212-15，219

Journey through Sicily and Greece，32

Juno Ludovisi，the，181

Jupiter and Ganymede，Mengs’ picture of，29

Justi，Carl，19，47

Kalb family，the von，205

Kalb，Charlotte von，176，188，212

Kampf mit dem Dämon，*Der*，214 n.，333

Kant，Immanuel，influence on Schiller，4，158，177，180；influence on Hölderlin，208；his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Pure Reason*，119；hi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269

Kauffmann，Angelica，73，114

Kaunitz，Wenzel Anton，Count of，41

Keats，John，128

Kleist，Ewald von，51，140，159，251，333；his *Penthesilea*，140

Klettenberg，Susanna Katherina von，94

Klopstock，Friedrich Gottlieb，80，221，311；the *Messias* of，5；influence on Hölderlin，208

Klotz，C. A.，73 n.，78；his *Epistolae Homericae*，78

Knebel，K. L. von，119

Kniep，J. C.，（Goethe’s secretary），111，112

Koch，W.，330

König，Eva，52，56

Körner，C. G.，168，169，172，174

Kühne，Gustav，238

Kunersdorf，51

Kunstform des Lessingschen Laokoon，*Die*，57 n.

Lamprecht family，the，13，14

Lamprecht，the son，13，18，29-31

Laocoon，the，61

Laocoon，statue of，9，43，49，56，80，101；Winckelmann’s description of，45-8，59-63 *passim*；Lessing’s interpretation of，60-3；Schiller and，81，162，179，180；Goethe and，98，132；Hölderlin and，208；Heine and，251；*see also* Lessing

Laube，Heinrich，273，274

Lavater，J. G.，119

Lee，Vernon，*Studi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taly*，18 n.

Leipzig，93，163

Lenau，Nikolaus，251

Lengefeld，Charlotte von，168，169，173，176，177

Lessing，Gottfried，51

Lessing，Gotthold Ephraim，7，27，49-70 *passim*，73，76，78，152，183，209，238，252

life and character，51-3

humanity，53，80

lack of response to art，59：and to lyric poetry，74

admiration of the Greeks，60-70，76，77

compared to Winckelmann，53，54

admiration of Winckelmann，55；criticism of，60-3，128

Goethe’s debt to，69，70，132，133

Schiller’s debt to，162，171，178，179

Heine’s tribute to，251

Lessing，works of：

Briefe，die 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73 n.

Hamburg Dramaturgy，The，its influence on Schiller，178，179

How the Ancients represented Death，70；Schiller’s debt to，165

Laocoon，or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ainting and Poetry，49，54，56-60 *passim*，182，333；dramatic power of，57，58，60；inspired by Winckelmann，58，59；analysis of，60-70；effect on Goethe，69；Herder’s reply to，71-81；Schiller’s debt to，81，162，165，179

Nathan the Wise，53，80

Lessing，Theophilus，51

Letters from Paris，280

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les Muets，58

Levetzov，Ulrike von，140，152

Lewald，August，273

Life of Cicero，281 n.

Limburg Chronicle，*The*，250

Livingstone，R. W.，183；his *The Greek Genius and its meaning to us*，166 n.，183，183 n.

Livorno，56

Lodge，G. Henry，his translation of Winckelmann’s *History of Art*，77 n.，331 n.

Loretto，40

Louvain，Richard de，53

Louvre，the，268，277，289

Ludwig，Emil，153，303，332，333

Luise，125

Lumley，Benjamin，286

Luther，Martin，4，152

Macpherson，James，76，95；*see* Ossian

Magdeburg，13

Malta，113

Mannheim，81，97，98，101，103，160，163

Maria Theresa，Empress，41，42

Marlowe，Christopher，his *Faustus* ，138

Maulbronn，207

Maximin，323，328-35 *passim*

Maximin，*a Memorial* ，329

Mayence，the siege of，121

Mechel，C. von，31

Mecklenburg-Sohwerin，Prince of，36

Mecklenburg-Strelitz，Georg August，Prince of，27，36

Meissen，school of St Afra in，58 n.

Meissner，A.，251，260，297

Mendelssohn，Moses，58

Mengs，Margarita，31，32

Mengs，Raphael，18，20，21，29，31，33，108

Menzel，Wolfgang，274

Messias ，the，5

Metamorphoses， the，162，165

Meyer，Heinrich，133

Meyer，Hamburg Consul，205，232

Michael Angelo，110

Milan，56

Milton，John，6

Minerva，statue of，24

Minnesang， the，125

Mirat，Crescentia Eugénie（Mathilde），271 ff.

Mons Veneris， the，275

Montagu，Edward Wortley，35，36

Morrison，34，36

Morwitz，E.，326

Mozart，W. A.，152

Müller，F. von，149

Mundt，Theodor，274

Munich，41，322

Muses' Almanach , the, 211

Mycenae, Schliemann's discoveries at, 304

My Tears of Indiscretion , 326 n.

Naples, 22, 23, 23 n., 26, 35, 66, 109, 110, 111, 114, 143, 154

Napoleon I, 152, 258, 267

Nero, 323

Neuffer, C. L., 208, 210, 225

Newton, Isaac, Goethe and, 122

Newtonians, the, Goethe and, 148

Nibelungenlied , rediscovery of the, 311

Nicolai, F., 55, 58

Nietzsche, Friedrich, 4, 7, 301, 307-15 *passim* , 326, 331, 332, 333

discovery of Greek tragedy, 299, 307, 309, 310

admiration of Hölderlin, 238

debt to Heine, 295, 308

attitude to Hellenism, 308, 310; and to Christianity, 308, 313,

315

the Dionysiac，87，91，300，308，310，311，313，315，335

his search for a mythology，312，313，316，317，332，333

and Goethe’s daimon，332

madness，315

Nietzsche，works of：

Anti-Christ，*The* ，308，334

Birth of Tragedy，*The* ，306，308，309，316，317，332，333；and Winckelmann’s Greece，310；effect on the followers of George of，331

Ecce Homo ，308，315

Thus spake Zarathrustra ，308，314，316

Niobe，statue of，180

Nöthnitz，Castle，14，17，80

Nürtingen，207，212，215，229

Obsession ，256

Odyssey ，the，147；influence on Goethe of，95，127；Voss’ translation of，125，168

Oedipus Tyrannus，the，207；Schiller and，191-5，199；Hölderlin’s rendering of，232

Oedipus und die Sphinx，307 n.

Oeser，A. F.，17，18，36，93

Olympian，i，235 n.

Olympian Spring-Time，316-22，335

Olympus，140，163，181，257，261，265，270，299，300，309，321

Oresteia，the，191

Orford，Lady，35，36

Ossian，the Poems of，influence on Herder of，76，77；on Goethe of，95，254

Osterburg，13

Ovid，116，167，181；Schiller’s use of，162，163，166；the *Metamorphoses* of，162，165

Paganini，Nicolo，278

Palermo，111，113

Palestine，209

Palladio，A.，110

Paris，12，22，29，244，280；July Revolution in，264，265，282

Parma，56

Parthenon frieze，the，110

Passionei，Cardinal Domenico，21，25

Pater，Walter，19，44，134；*The Renaissance* of，9

Penthesilea，140

Peter the Great，152

Pfizer，Gustav，275

Phaedrus，the，120

Phaethon，the，140

Phidias，110，152，153

Phillimore，R. J.，67 n.

Philoctetes，the，62

Phoenician Women，*The*，169

Pindar，95，208；influence on Goethe of，94；Hölderlm's renderings of，232；his *Olympian* i，235 n.

Platen-Hallermünde，August，Count of，7，246；Heine's attack on，262-4，272；the *Romantic Oedipus* of，262

Plato，14，120，208，210；the *Phaedrus* of，120；the *Symposium* of，120；the *Apology* of，121

Plutarch，163；his *Life of Cicero*，281 n.

Poetics，the，129

Polymetis，*or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Works of the Roman Poets and the Remains of the ancient Artists*，64

Pompeii，26

Potsdam，260

Prolegomena ad Homerum，the，125

Prometheus，the，94，224

Prometheus and Epimetheus，316

Prometheus Unbound，224

Propertius，117

Propylaea，Goethe’s essays for the，132

Prussia，Winckelmann’s hatred of，14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La*，6

Quia Imperfectum，100

Racine，Jean，6，158

Raphael，15，110，152，183；the Saint Agatha of，114；the Sixtine Madonna of，15

Rauch，Father Leo，16，17，19

Reformation，the，5

Reimarus，H. S.，53

Reinwald，H.，164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Pure Reason，119

Renaissance，the，4，6，150

Renaissance，*The*，9

Revolution，the French，186；effect on Goethe of，119，120，126，127，146

Rhinegold，*The*，312

Ridel，C. J.，167

Riedesel，Baron J. H.，31，331 35，36，37，39；his *Journey through Sicily and Greece*，32

Riemer，F. W.，103，130，148，149，150

Riggi，Maddalena，69

Rilke，Rainer Maria，330

Ritterplatz，the，12

Robertson，J. G.，lecture on *The Gods of Greece in German Poetry*，168

Robinson Crusoe，97

Roman Catholic religion，the，4；Winckelmann's conversion to，16，17；Goethe and，110，148；Heine and，258

Romantic Oedipus，*The*，262

Rome，9，16，17，39，81，134，135，175，181，263，323；Winckelmann and，18-28 *passim*，34，36，40，40 n.，41，42，44 n.，59，83，108，116-18，121；Lessing and，54-6，73；Herder and，72，73，79；Goethe and，98，104，106-10，112，114-18，123，182，143；Heine and，251

Rousseau，Jean-Jacques，88，97

Rudolstadt，168

Ruggieri，C.，30，31

St Afra，school of，58 n.

Saint Agatha，114

Saint-Simonians，the，265

Saint-Simonism，Heine and，270，271，275；the Cosmics and，327

Salzwedel，12

Sans Souci，260

Sappho，309

Saxony，15

Saxony，Augustus III of，16

Scardanelli，*see* Hölderlin

Schelling，Friedrich von，4，208

Scherer，W.，137

Schiller，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4，70，72，80，81，92，132，133，155-200 *passim*，295，307，309，310，311，333，335

relations with and influence on Goethe，121-5，129，130，139，141，146，187，192

influenced by Goethe，164-167，171-3，180-4，188

youth，education and character，159-61

ignorance of Greek，169，172，177

use of mythology，161-3，165-7，180

and Winckelmann’s Greece，127，181，183，185，186，200，299

criticisms of Greek art，178，179，183，184

emotional life，176，177，188

treatment of ‘fate’ in ballads and later plays，188-200

opinion of，and influence on Hölderlin，204，205，208，211-17，219-21，225，227，228，231，236，239

Schiller，works of：

Anthology for 1782，*The*，161，162

Art of Tragedy，*On the*，178，179，183，189

Artists，*The*，173，200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The*，186

Bride of Messina，*The*，193，196，197，199，200，207，334；first performance of，198

Cabal and Love，157，163

Cassandra，195

Cranes of Ibycus，*The*，190，191，193

Demetrius，158，199

Desire，176

Dignity and Grace，180，187，214

Diver，*The*，176，190，191

Don Carlos，158，163，164，189，198

Elysium， 162

Excursion，*The*， 185，222

Fiesco， 157，163

Fight with the Dragon，*The*， 191，193

Four Ages of the World，*The*， 186

Genius，*The*， 186，187

Gods of Greece，*The*， 165，167，173，185，207，294；influence on Hölderlin，£09，210，211；Heine’s answer to，257

Group in the Tartarus， 162，163

Happiness， 187

Ideals， 185，188，211，214

Ideals and Life， 81，162，185，187，211

Knights of Malta，*The*， 172，189，196，263

Letters about Don Carlos， 164

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kind， 180

Maid of Orleans，*The*， 194，195，196，198

Maria Stuart， 194

On Naïve and Sentimental Poetry， 123，165，182

Pathos，81，179

Pledge，*The*，191，193

Polycrates’ Ring，190，191

Reason for our Pleasure in Tragic Subjects，*The*，177

Robbers，*The*，157，159，163，164

Semele，163

Shade of Shakespeare，*The*，188

Singers of Olden Times，186，187

Song to Happiness，*The*，165

To my Friends，186

Wallenstein，176，189，191-5

Way to the Forge，*The*，191，192

William Tell，176，199

Schlabrendorf，F. W.，Count of，54

Schlegel，August Wilhelm von，7，250，310

Schlegel，Friedrich von，7，124，310

Schliemann，Heinrich，301-7 *passim*；career，303，304；knowledge of Greek，304；monomania for Greece，305，335；compared

to Winckelmann，303-7

Schönemann，Lili，97，98

Schopenhauer，Arthur，4，151，312

Schröter，Corona，100，165

Schwann，Margarete，176

Scott，Cyril，326，329；his *My Tears of Indiscretion* ，326 n.

Seafarer，*The* ，127

Seckendorf，Sophie von，72

Seehausen，13，14，304

Selden，Camille，277，297，300

Sepolcro di Winckelmann in Trieste，*Il* ，11 n.

Seventh Ring，*The* ，329，333

Shakespeare，William，6，85-90 *passim* ，150，206，313；Lessing’s opinion of，76 n.，178；Goethe and，92，93，94，123，147，152；Schiller and，177，183，188，191；his *Troilus and Cressida* ，6

Shaw，Bernard，316

Shelley，Percy Bysshe，his *Prometheus Unbound* ，224

Sicily，35，109，110，111，143，154

Siècle de Louis XIV，*Le* ，53

Simmel，G.，332

Sinclair，Edward or Isaac，218，226，235

Sixtine Madonna，the，15

Socrates，13，29，210；the daimon of，94，151，332

Solitude，the school at the，159

Sophocles，140，158，179，183，188；Winckelmann and，14，19，42，46，47，60，208；Lessing and，61，62，70；Schiller and，195，196，200，207；Hölderlin’s renderings of，230，236；the *Antigone* of，232，235，236；the *Laocoon* of，61；the *Philoctetes* of，46，60，62；the *Trachinian Women* of，61；the *Oedipus Tyrannus* of，195，196，199，207

Spence，Rev. Joseph，58，63，64，65；his *Polymetis*，*or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Works of the Roman Poets and the Remains of the ancient Artists* ，64

Spencer，Lord Robert，27

Speyer，72

Spinoza，Benedict，4，104

Spitteler，Carl，7，301，306，316-22 *passim* ，326，332；and

Nietzsche，316，317；and the creation of a mythology，316，322；and Homer’s pantheon，317；and Winckelmann’s Greece，335；his *Prometheus and Epimetheus*，316；his *Olympian Spring-Time*，316-22 335

Spittelers Weg und Werk，317 n.

Stein，Charlotte von，97-104，106，107，112，113，115，116，118，122，137，142

Steinbrüchel，J. J.，169

Stendal in the Altmark，11，12

Sterne，Laurence，183

Stolberg，Auguste，Countess of，99

Storm and Stress period，the，93，96，135，159，164；Goethe and，5

Stosch，Baron Muzel，21，22，23，31，32，33，35-41，54，55，55 n.

Stosch，Baron Philip，21

Stosch collection，the，26

Strassburg，90，93，149

Strauss，Salomon，280

Streicher，A.，160

Strich，F.，313

Studi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taly，18 n.

Stuttgart，57 n.，159，160，163

Sulzer，J. G.，180

Supplices，the，140

Süvern，J. W.，195，196

Swinburne，Algernon Charles，137，325

Symposium，the，120

Tableaux tirés de l'Iliade，de l'Odyssée d'Homère et de l'Énéide de Virgile，avec des observations générales sur le Costume，64

Tasso，Torquato，108，183

Tell，William，129，199

Thirty Years' War，The，5，97，176

Thomson，Edward，246

Tiberius，the Emperor，264

Tibullus，117

Timanthes，61

Tirol，the，40，294

Tischbein，J. H.，108

Titian，15

Torbole，107

Trachinian Women，*The*，61

Trieste，41，42，43；Winckelmann's cenotaph in the Giardino Lapidario at，11 n.

Troilus and Cressida，6

Trojan Women，*The*，145

Troy，Schliemann's excavations at，303，304，307，333

Tübingen，207，208，227，235

Uffizi Palace，the，260

Ukermark，54

Usteri，L.，23，31

Uz，J. P.，161

Vallentin，B.，134，333

Valmy，battle of，121

Varnhagen von Ense，Rahel，285

Vatican，the，28，47

Venice，11 n.，40，42，56，107，110，120

Venus de’ Medici，the，254，260，279

Venus of Canova，the，260

Venus of Milo，290，335

Verona，40，107

Veronese，Paolo，15

Verrall，A. W.，100，170

Vesuvius，Mount，39

Vienna，41，56

Viëtor，C.，218

Vigil of Venus，*The*，161，162

Vinci，Leonardo da，110

Virgil，87，107，328；Winckelmann and，46，47，62，63；in Lessing’s *Laocoon*，60，62，63，65，67，68；Schiller’s use of，161，162，163，179；the *Aeneid* of，63，162；the *Georgics* of，162

Vischer，Luise，176

Volkmann，J. J.，107，109

Voltaire，F. M. A. de，53；his *Siècle de Louis XIV*，53

Voss，J. H.，125，126；his *Luise*，125；his translation of the *Odyssey*，168，261 n.；and of the *Iliad*，125

Voss，J. H.，the younger，236

Vulpius，Christiane，117，118，148，271

Wagner，Richard，4，311，326；and the creation of a mythology，311-13，316；his *Flying Dutchman*，311；his *Rhinegold*，312

Waiblinger，W.，237

Waldeck，Christian August，Prince of，109

Waltershausen，205

Wanderer，*The*，127

Weill，Alexander，273，277，289

Weimar，72，91，96-9，104，106，107，113，114，116，118，120，125，129，146，165，175，213，253

Weimar，Carl August，Duke of，96，263

Wetzlar，90，96

Wieland，Christoph Martin，7；Schiller and，164，165；his *Graces*，161，162，163；his *Alcestis*，7

Wienbarg，Ludolf，274

Wille，J. G.，22，23，23 n.

Willemer，Marianne von，140

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7，11-48 *passim* ，60-70 *passim* ，76，78，80，83，97，103，105，108，109，110，117，121，127，133，134，135，200，208，209，240，251，257，299，301，303，315，332，333，334，336

character，14，16-25，27，34 ff.

personal relationships，13，21-3，28 ff.，263

his innate knowledge of Greek，11，12，45，103，118

compared to Lessing，53-6

compared to Schliemann，303-7

Goethe’s essay on，19，133，134

Schiller’s use of，162f 171，179，180

his conception of Greece，5，6，7，48，77，80，109，115，127，185，252，299，306，307，311，333，334，335；its influence on Lessing，58，335；on Herder，70，73，335；on Goethe，93，95，97，98，100，101，105，116，132，139，142，144，154，334；on Schiller，181，183，200，334；on Hölderlin，209，238，240，335；on George，330，331；Nietzsche’s answer to，310，311

Winckelmann，works of：

History of Art among the Ancients，*A* ，18，22，26，29，35 n.，42，45，77，77 n.，81，108，179，180，208；Lessing and，54-70

Monumenti Inediti，26，37，38，38 n.，39，55

On the Capacity of experiencing Beauty，29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Art，33

Thought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17，45

Winged Genius，the，331

Wittenberg，53

Wohl，Jeannette，280

Wolf，F. A.，125，126，130，133；his *Prolegomena ad Homerum*，125

Wolfenbüttel，51，52，56

Wolters，Friedrich，326，328，329；his *Stefan George and the Journals for Art*，*German Spiritual History since 1890*，324

Wolzogen，Caroline von，168，169，177

Wolzogen，Louis von，176

Worms，72

Wunderhorn，legend of the，276

Württemberg，Karl Eugen，Duke of，159，189，190

Xenophon，14

Young Germans，the，4，274

Zimmer，235，238

Zinkemagel，F.，238

Zweig，Stefan，214；his *Der Kampf mit dem Dämon* ，214 n.，333

附论 暴政都是人类自己建立起来的

林国荣

终生浸淫德意志唯心传统且经历了战争劫难的梅尼克，对德意志“灵魂”有如下评说：“比起其他民族，德国精神所特有的往往是一种狂飙式的倾向，想要从那围绕着它的、而且或许是强烈地推动着它、诱惑着它并折磨着它的现实条件之下，突然之间朝着绝对、朝着将会使它得到解放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时候还只是半形而上学的世界飞跃。［……］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通过人们所称之为新现实感、现实主义、现实政治等等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是作为行动上的新导航星而备受礼赞的东西。从而他们就认为，他们已经又一次地征服了绝对。这就是说，德国精神中那种古老的形而上学冲动，又一次地表现了出来，但是由于错误和颠倒，它并没有征服任何真正的形而上学领域，而只不过是把一种地上的领域装扮成一种形而上学的领域，或者是与之近似的领域而已。”[1]

问题是，德意志“灵魂”当中如此强烈且扭曲的“哲学”冲动，是因何而生呢？本书之缘起就在于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和回答：德意志灵魂当中极为诡异地缺失了悲剧和诗性的要素，由此招致“哲学”顺理成章地篡取了本来应当交托给悲剧和诗歌的对人类生活和族群生活的立法和训诫权能，这也就是本书书名所标示的“希腊的暴政”。正是这样的心灵暴政机制从德意志民族生活开始涌动之际开始，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德意志人创造现代世界常规生活景观和政治-历史秩序的能力，对这一点，作者毫无隐晦。很显然，本书作者绝不是那种习惯于将民族历史叙事极为傲慢

地掩盖在“命运”旗帜和“悲剧”观点之下的人，仿佛民族历史真的必须如此深沉、神秘，而且必须苦难深重，否则便不足以决然超越人类自身的常识和见解，不足以建立足够的暴政式尊严。实际上，这样的历史思维恰恰是本书作者用近一半的篇幅予以无情剖析和驳斥的。本书以极为瑰丽的方式，揭示了一段极为诡异、精微而且是决定性的民族灵魂之历程，诙谐背后隐藏着苦痛，苦痛当中又透射出戏谑。我无须在此再现书中场景，实际上，如此瑰丽的场景应该说是属于作者个人的，就如同荷马史诗一样，本质上就没有可能由他人再现。亚里士多德说过：戏剧须有终局，但史诗永不会结束。这句话恰恰可以用来充分传递这部作品的意蕴。既然是一部史诗级作品，当然会采纳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开端，本书作者也不例外：“为什么文艺复兴在德意志采取了宗教改革这一形态，这就是根本症结所在。［……］对路德那深沉且阴郁的心灵来说，‘真’的分量是‘美’远远不能比拟的。［……］将罗马天主教同德意志人剥离开来，路德也就等于夺走了曾经养育了德意志神秘主义并扶持了德意志美感的那套体系，这套体系也曾执掌着德意志信仰。［……］无论是不是怀疑主义者，德意志诗人都发现，路德传递下来的基督教已经完全剥离了美的元素，同时也缺乏深沉的神秘主义元素，哲学便顺势取而代之。”

悲剧和诗性元素之缺失、由此导致的正当的历史理解能力以及塑造生活之能力的缺失，毫无疑问是“哲学的暴政”造成的，作者将德意志灵魂的此一本质性缺陷溯源于一场由人间必然性主宰的“偶然事件”，那就是温克尔曼对拉奥孔群雕的“发现”，温克尔曼也正是凭借此一偶然“发现”，在德意志灵魂的史诗进程中扮演了阿喀琉斯的角色。本能且强烈的哲学爱欲于无形中推动着他对拉奥孔群雕实施了自己的解释，“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是温克尔曼凭借此一“发现”而确立起的希腊艺术的最高典范和理想标尺。毫无疑问，对那个时代的德意志人来说，这也是一项极具激发力的政治隐喻，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柏拉图的理想国意象。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全然荡涤了一切人间痛楚、苦难、激

情和欲望的政治意象，一种无论莱辛如何竭力予以缓解也终究是绝对静态的灵魂场景。阿喀琉斯的强烈爱欲推动史诗向前发展，由此催生的命运序列在歌德身上臻于巅峰：“歌德生命中之所以会遭遇如此沉重的挫败，恰恰就是因为他一直都不肯承受如下事实：世界乃反映了生活，而生活乃是极具悲剧性的，也许只有基督徒不这么看。歌德相当直截地否认了悲剧，这导致了他在呈现他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之时，遭遇了审美失败。由此可见，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作品，都在表明，他本人恰恰就是现代德意志人之二元精神格局的典范表达。”

由此可见，温克尔曼一手创建的“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其本质要义便是因哲学与生活之割裂和对峙而催生的二元精神结构。这样的精神结构从根本上瓦解了哲人对于生活的悲剧意识，由此便也无从指望哲人会对人类生活和历史建立起悲剧式的体悟和见解。在此，本书作者丝毫不吝笔墨，以歌德为范例，揭示了德意志心灵对那个时代最为伟大的悲剧事件的理解框架：“法国大革命击碎了这座奢华温室的窗格，这场可怕风暴，遂以摧枯拉朽之势闯入温室当中。此等规模的世界性遭难，唯有‘悲剧’一词方能予以描摹了。［……］歌德竟然能够如此严密地钳制自己的天才，从头至尾都将这么一场大革命视为没有任何魔性的事件，对之大加鄙夷，既不认为这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觉得其中有任何伟大之处，这实在是相当有意思的事情。［……］这样一个歌德，已然对悲剧实施了封禁。”

阿喀琉斯当然不会尊重阿波罗的雕像，奇妙的是，温克尔曼也并未见识过拉奥孔群雕的原本，本书作者实际上还以极为精细的考证，确定了温克尔曼甚至连这座群雕的复本都没敢面对面地去“凝视”，最重要的是，在历经困顿和挣扎之后，他还是没有鼓起足够的勇气亲身前往希腊“看一看”，作者给出的结论是：说真的，他不敢。

当柏拉图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将亚西比德式的极富本真特色的“爱

欲”观念引入雅典教育体系当中之时，“公元前5世纪观念”的保守诉求已经深深陷入秋日阴霾般的冥思境地，亚西比德在柏拉图《会饮篇》中所展现的写真的轮廓棱角以及与之伴随的强烈情绪感在此种局面当中，毫无疑问构成了强烈的精神冲击，并且也想当然地吸引了大批急于寻求出路的年轻人。然而，公元前390年前后，柏拉图设想着建立一个富有强烈政治诉求的学派之时，便选择了拒绝为自己学生的政治行为及其后果承担责任，这毫无疑问是违背了“德性是可传授的”这一根本性的苏格拉底信条。于是，关于“美好心灵”的一切文化意识仿佛沉入夏日午后的冥思当中，处处散发着有着高度哲学教养的慵懒气息，拒绝为消除从现实中四处迫近的罪恶出力，对改革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充满厌恶。显然，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雅典文化精英对付不了一个急速变动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需要才智和理解的光芒，更需要纯粹基于才智的大量行动，它也要求有更多的人投身于日常的忙碌当中，哪怕为此牺牲掉一切的前途乃至性命；伊索克拉底的得意门生，也就是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领袖提摩太就是此中人物的典范。文化精英们的澄澈宁静以及不为琐事烦心的潇洒，确实可以用来反衬严肃的务实阶层欲意树立的生活方式，然而这并不能凸显现实生活的庸俗丑陋的面目，因为真正的宁静和优雅只属于希波战争之后的那几十年。文化精英们能领悟的是思想，而非事实，柏拉图将这一潮流推进到极端；思想讲究的是可能性和未来，事实所讲究的是当下的世界，因为正是这个世界是人们不得不生存于其中的，也是当下的这个世界造就了现实生活所必需的才智，人们也必须让当下的这个世界继续走下去，这就是伊索克拉底极力推进的路线。文化精英们的精神天然地依附于既定的秩序，缺乏万物消长且人间的任何建制终究无常的意识。还有谁能像公元前5世纪末和公元前4世纪初的雅典保守派文化精英那样，对世界和历史实在的巨大变化如此地浑然不觉呢？还有谁能像他们那样竭尽如此天赋，为“艺术”而牺牲“生活”，为恬谧的“美好心灵”而牺牲《旧约》和罗马人的历史当中教导的火与力呢？

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世界，尤其是在雅典，灾难正如圣保罗提到

的“夜来之贼”，往往越过了人们对世界以及对自身有限能力的理解，往往就在出人意料的时刻到来。这样的时代需要人们去掌控，掌控这样的时代却殊为不易，它要求于人们的品质表现为最强悍的认知能力和最果敢的行动能力。在伊索克拉底的时代，希腊，尤其是雅典，其政治和文化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变主要体现在：传统的谙熟经典和拥有高深教养的人们已经不可能借助那种保守主义的阅读方式来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伊索克拉底要用新的修辞学教育来取代诗歌和悲剧的位置。也许还有太多的人否认“时代精神”的诞生和存在，但时代本身总是要提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随着人民的民主逐渐因为种种危机而获得力量和信心，一项日益普遍的信念也开始得到更具分量的证成，此即天生的、直觉的但也经过明辨的民间的智慧要优越于贵族、文化精英和富人那些习得的、过于复杂微妙的、极端自私自利的高深教养。人民主义的政治支持者也开始建议放弃受过精致文明训练的政治领导者，转而采纳普通人天生的实践感觉。伊索克拉底的新修辞学教育体系很快便在经验和理智的双重引导下，超越了平民-贵族-僭主这一十分有限且狭隘的城邦政治眼界，伊索克拉底的“君主教育”转向毫无疑问是令人吃惊的，作为竞争者的柏拉图便成为反对势力的代言人，伊索克拉底由此便遭遇了“东方式的奴性”和“专制”为主的指控。但是，伊索克拉底此举也并非没有传统和现实的充分理据，这样的理据恰恰也是建立在他对黄金时代的雅典以及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更深一层的认知之上；伊索克拉底的理想君主显然已经经由新修辞学的教育而祛除了城市无产阶级身上的群氓禀性，同时也肯定不会侧身三十僭主时期横行希腊世界的腐朽寡头体系。更确切地说，雅典的提摩太乃是对应于罗马的西皮奥式的领袖人物。

实际上，早在伯利克里时期，雅典的城邦共和体制就已经从内外两个方向上发生了断裂。内部民主日趋激荡，土地贵族以及古老的德莫权能的暗弱，相应地也就意味着以苏格拉底为典范的纯粹理性的虚无主义之风势力日增，城邦体制遭受侵蚀看来是无可遏制的发展倾向了；伯利

克里采取限制公民权作为积极的应对之策，审判苏格拉底则是保守阶层发动反击的信号。然而，提洛同盟本身所昭示的超城邦的政治诉求则更能说明问题；尽管柏拉图力主禁止年轻人探询法律之渊源，但后退的时机已然错过。孕育了苏格拉底辩证之法和前伊索克拉底修辞术的社会风气乃植根于动荡和危机当中。正如麦考莱所论：“雄辩术之发育在雅典达到了一种非凡的卓越程度，这主要是因为雄辩术在雅典所发挥的影响力。时代动荡，体制乃是纯粹民主形态，人民所接受的教育乃完全奔着一个目标，那就是让人对强烈且突然的印象产生极强的契合感，敏锐但并非稳重的推理者，情感强烈，原则纯粹，精美作品的激情崇拜者，这一切都使得演说在雅典收获了极大的鼓励，在这方面，雅典堪称独一无二。”[2] 相形之下，伊索克拉底的新修辞学教育体系乃建基于一项基础相当宽广的政治意识之上，这是前伊索克拉底时代以及同时代的各种在我们现代眼光看来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教育体系都感到陌生的，这一政治意识就是：对希腊历史过程和同时代的雅典生活所实施的一切“哲学”式的系统化揭示，确切地说，就是所有那些将发展结构呈现为冰冷图式并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为“特殊德性”问题或者特定社会群体的做法，都是以掩盖政治实情为代价的。对生活的真正呈现应当以普通人那绵密的生活织体为参照框架，芸芸众生融构而成的故事乃是充满野性和激情并且极为复杂的故事。显然，伊索克拉底的此种修辞学意识是针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学派而发的，无论是《理想国》还是《法律篇》实际上都是以“图式”化的方式来应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典型；此种做法的本质就是凭借以“照料灵魂”为名义展开的个体性诉求取代作为政治命运之基础的集体性命运。

就此，耶格尔进一步暗示了修辞学和哲学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修辞学所诉求的乃是普通人的“常识”，“普通人并不难觉察出来，这些哲学家汲汲于揭露常人言谈中的种种矛盾，却并没有注意到自身行为中也是存在诸多矛盾的；尽管哲学家宣称是在教导自己的学生如何在未来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却在当前问题上一言不发，而且根本就没有能力提

供任何的正确建议。而且，普通人也并不难进一步洞察出，民众，其行为当然是建基于意见，但也正是因此，民众很容易达成一致并采取正确的行动路线，而这恰恰是那些自称已经充分掌握了‘知识’的哲学家做不到的”[3]。毫无疑问，苏格拉底学派开启的“照料灵魂”的个体性脉络，将会激发出极为剧烈的自我正义感，这样的自我正义感一旦在作为历史常态的世事沉浮中遭遇挫折，便会立刻要么转化为极端的道德义愤，要么就幻化为同样极端的伦理怀疑主义。

伯利克里在《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中将死亡和坟墓确定为政治和城邦生活的最终疆界，同死亡之必然性相关联的事物则作为政治的最高表达呈现出来；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一点激发了柏拉图的愤怒和厌恶，并决定了柏拉图同雅典民主政体及其领袖人物伯利克里之间的本质性分歧。严格来说，希腊哲学在看待政治之时，也正如同托马斯·潘恩以及现代自由主义者看待政府及其行为那样，通常将其视为必要的恶。没有人能否认自然和人类事物中的恶以及必然性，这注定了哲学不得不或者说是被迫同人类事物所展现出的“不幸状态”打交道。阿里斯多芬在其喜剧作品中呈现的哲学形象也许过分刻薄地展现了哲学对于人类事物的冷漠，但苏格拉底确实较之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强调哲学同自然的研究者的区别，其核心要义在于：不能把哲学混同于有关存在的科学，因为哲学本身并非此种形态的科学，甚至也不是某种完成形态的智慧，而毋宁说是为达到此种科学所付出的努力。确实，哲学的本质是理论的。但是，促动哲学家朝向沉思的运动本身则不能融入有关存在的科学当中：哲学，正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集中呈现的那样，乃是某种爱欲。因此，此种爱欲，也就是那种推动灵魂朝向神圣事物的力量，仍然是神秘的。哲学家必须接受一种根本信念的支配：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尽管柏拉图在对话中所呈现的对生活的哲学拷问达到了何等残酷的程度是一看即知的。无论如何，哲学因此也就预设了人类幸福的问题应当以偏向于哲学的方式获得解决。

苏格拉底当然是以一种堪称卑下的姿态参与现实生活的，但此种态度的精神基础却在于一种严格的区分：一方面是人只是在共同生活的活动中所能见到和理解的事物，另一方面则是孤立状态中的个体所关心的和所认识到的事物。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之间的等级设定，也就是沉思生活高于政治生活，经由柏拉图设计出来，并由亚里士多德予以确立之后，沉思与行动便也从本质上呈现出分离的倾向。托马斯·阿奎纳的“至善”观念完全在于一种宗教想象，也就是单独的个人针对上帝的想象，这种想象不要求友人或者他人在场。此种观念与柏拉图关于不朽灵魂之生活的观念从根本的精神倾向上讲是完全一致的。人类幸福的实质，反映在对来世生活期望中，尽管这种期望在希腊哲学中往往呈现为对话的形态，并带有戏谑的色彩，但绝不能因此否认此一问题对于哲学生活本身的重大意义；此种意义在阿奎那的哲学作品中达到巅峰状态，但丁则通过诗歌作品证明了此种哲学形态的生活本身同诗歌的兼容，从而以偏向哲学生活的方式解决了哲学和诗歌之间的长久争斗。归根结底，政治生活，或者公共生活，比如交谈、立法、办事、说服和被说服，无论对柏拉图来说，还是对但丁这样的中世纪虔诚者来说，都不能构成永恒极乐的前奏。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将人类生活呈现在说服和被说服的格局当中，其中所包含的充沛激情意味着行动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对话和运动的性格特征成为柏拉图蔑视并嘲讽伯利克里的根本原因，在柏拉图看来，理念天空中的生活乃是通过单独个体对真理的沉思来实现的，而葬礼演说中所呈现的对话和行动状态无疑构成了对沉思生活的本质性背离，而人要想走出洞穴生活，便只能依靠自身的进行冒险的决心，任何的对话和行动都不足以构成走出洞穴的动力；正如柏拉图在谈到沉思生活时所说：“那就如同我们学习其他事物一样，是不可能通过语言分析来达到的。”柏拉图在此将政治生活所要求的对话以及在对话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常识同对真理的沉思置于尖锐的矛盾两端。

此种极端的对峙格局实际上正是同时代雅典政治生活当中那种极端张力的写照和反映；习惯的秩序遭到了颠覆，激情由此得以释放，各方

都自感自己的激情乃是唯一正当的道德情感，年青一代纷纷崛起，不过他们和黄金时代的雅典先辈全然是两类人，确切地说，年轻人既缺乏训练，也缺乏经验；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乃面对着同样的世事格局，但是在伊索克拉底看来，苏格拉底派那种虚假的哲学表面上看是以几何学和天文学式的高远理智来压制激情和欲望的，然而实情并非如此，相反，“照料灵魂”这一口号于缺乏经验、训练乃至教养的年轻一代来说，是有着植根于本能的巨大吸引力的，因为这终将给那种“哲学”式的自我正义感提供最为炽烈的燃料。

苏格拉底派的“哲学”教育是以“常识”和人类生活的复杂性为牺牲品，由此建立起一种类型化、模式化的叙事形态，此种叙事形态无论是“以范例传授哲学”还是“以哲学传授范例”，最终都只能导致政治-文化视野的狭隘和政治-文化理解力的萎缩，这种不良影响经由哲学取道传递下来，对后世的人类戏剧叙事造成的毒害是非常严重的，对此，不妨借用麦考莱的一段话予以评说：“几乎所有的希腊史家都对人性当中最为显见的现象展示出最为粗浅的无知。在他们所做的描述中，古典时代的将军和政治家们都完全没有了个性。他们都被人格化了；可以说他们就是激情、天才、观念、德性、邪恶，但他们却不是活生生的人。［……］假如事实就摆在眼前无可否认，这些作家也会设定一些怪异且深刻的规划，目的就是解释这些根本无须解释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任何人只要自我审视一番，也就都知道了。”[4] 托马斯·卡莱尔曾有一项著名问询：究竟谁应当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负责？对此，卡莱尔给出的答案是：所有法国人。文明之毁灭不一定非得重大的罪行或者极端的罪人方能造成，实际上，普遍而言都被认为是好人的芸芸众生，倘若不断地侵蚀信仰并不断地展开小恶之举，也同样能够置文明于毁灭境地。倘若依据柏拉图的“哲学”观念，就很容易错误地认为，此等人间悲剧想必是一些特别的罪恶之徒所为。实际上，即便所有人都将自身的贪欲维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政治也仍然会陷入僵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陷入困境，这样的困境是“哲学”教育从来都没有能力掌控的。马丁·路德当然

无意让自己策动的那场改革成为大规模财产再分配的跳板，成为世俗邦国和民族-国家崛起的跳板，而且路德肯定也是绝对不会以青史留名为诉求的。1789年的人们则确实希望万民都能够接受自己的理想，但是他们根本不会料想到，大革命的理想之所以能在各个民族得以传布，完全是因为这些理想能够帮助这些民族变革并提升自身的军事建制，由此来对抗法国军队。18世纪的民主人士估计连做梦都想不到像俾斯麦这样的人竟然会用普选体制来威慑德意志自由派，并由此决定性地推动了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的民主进程。苏格拉底派以“灵魂”为诉求的“哲学”教育，只能培育起近乎情绪宣泄的“自我正义感”，在泛希腊和帝国政治背景当中，这样的“自我正义感”也只能以希腊人的种族优越性为最终归宿；此种局面之下，一切的“自由人”观念都将丧失现实和常识根基，正如麦考莱评述的那样：“一个智慧之人会珍视政治自由，这是因为政治自由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因为政治自由倾向于遏制统治者的奢华铺张和法官的腐化；因为政治自由造就了实用的科学和文雅的艺术；因为政治自由激发了人们的勤劳并提升了社会各阶层的舒适度。而这些理论家却想象着政治自由禀有永恒且内在的善，这样的善同政治自由带来的福祉是两回事。他们将自由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并且认为为此目的是应当不惜任何代价的。”[5] 在《回顾与反思》中，俾斯麦劝告文化情绪勃勃日上的同胞学会依从事实，放弃那种无可言说的历史性仇恨，冷静审视法国，他特别指出，如果真要回顾历史，那不妨认真看待一下卡佩王朝，法国的开创者们实际上也是同样的一些务实并尊重事实的人；如果德意志人的心胸开阔一些，他们就更有理由尊重并重视创建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缔造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开创意大利统一的加富尔。但是在一个柏拉图式的神学化、道德化的帝国世界中，人类究竟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这一点殊难定论，因为传统的政治-历史标准或者说人类自身的理智标准已然瓦解。

由此，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也获得了新的定位，显现为一种更为冷漠、静穆，但也更具威胁性的形象。在奥克肖特看来，哲学是人类

理解力的最高境界，它独具根本性并唯独哲学才向“整全”或者“最重要的问题”保持开放态势，因此哲学从性质上就不可能同常态的、稳定的政治保持一致。哲学是一种“无预设的、无保留的、无禁忌的和无修饰的经验” [6] 。施特劳斯以类似的方式写道：“哲学是这样一种努力，它试图消解社会赖以存在的要素，因此，它威胁到社会。” [7] 奥克肖特则干脆指出：“哲学并不是生活的升华，它倒是对生活的否定……企图实现一个完全一致的经验世界，这当中或许有着某些堕落的甚至颓废的东西，因为这样一种企图需要我们暂且宣布放弃一切可以被称作善和恶的东西，一切可以被珍视或者被抛弃的东西。” [8] 由此，政治便被视为一种次等的活动，政治行为、事件和人物不过是“精神的低俗、虚幻的忠诚、欺诈的目的、虚假的意义” [9] 。毫无疑问，这一切论断会让穆勒大惊失色。在他们的论述中，民主及其运用的种种手段和制度形态，也许采用的是最和平的方式，也许是教育群众走向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成熟的唯一可行方式，但归根结底，民主必定是技术性的，因此要做的就是从根本上切断民主同知识以及人类理性之间的联系。此种非理智的政治状态将改革的领导者或者赋有改革意识的政党领袖置于无法采取行动的境地，并彻底阉割了他们的政治意志。德意志政治恰恰成了此一困境的经典范例。

19世纪晚期德意志史学中崛起的那种文明诉求和异乎寻常的伦理诉求，实际上也确实是兰普雷希特所谓的“集体心理”在此一时期的一种几乎是出自本能的反应，它所回应的是逐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要求停止文化和文明之间的那种长期对抗，也就是德国观念同西欧观念之间的长期对抗，并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融入整体性的欧洲资本主义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想全然放弃德意志的传统精神诉求，自尼布尔-兰克以来一直遭受冷遇的歌德、席勒、莱辛和温克尔曼在此一时期的突然复兴，正是在这一集体心理状态的转变中可以得到恰当理解；但就德意志史学自身的传统来说，以尼布尔-兰克所展现出的“个体性”方向而非歌德-席勒-莱辛-温克尔曼传统所展现的“观念论”方向则是其内心

最深的本能和忠诚所在。“文化观”史学在此时的崛起便是为了发挥一种桥梁性的功能，以此来克服此时表现得越来越尖锐的“个体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梅尼克在《德意志灾难》中的一段反思性的总结无意中道出了此种“集体心理”的缘起和性质：“我们不需要任何激进的再教育，也能够再度有效地在西方文化共同体中扮演角色。只有纳粹自大狂的反文化和假文化才必须彻底铲除。然而，绝不能以一种缺乏意义的空洞的世界主义来取代它的位置。相反，应该是一种在过去由各种最个性化的德意志精神成就联手造就的并且能够获得进一步发展空间的世界主义。德意志精神再度找回自我之后，依然需要在西方共同体中完成它不可替代的特殊使命，这就是我们的期待和希望。”[10]

梅尼克的这种不甘于失败却又无处得到弥补的自我逃避主义心态不禁使人回想起普勒斯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此种精神所做的评论：“非但没有将对理想主义的执着与对现实情况的责任之间的鸿沟缩小［……］反而一直在扩大两者之间的分歧”[11]。显然，对于梅尼克来说，对于“灵魂”“深度”的文化诉求，这本身就足以构成宽恕一切道德缺失的美学和哲学力量，并将柏拉图《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纯粹的自我中心主义正义观置于已经模糊了的道德-政治责任和现实命数之上，而这种力量本身也正可用来弥合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托马斯·曼在战前的一次演讲中再次确认了理查德·瓦格纳所塑造的日耳曼精神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的基础并不在于政治-历史意识的培育，而在于某种理想主义形态的文化和世界观意识，他评论道：日耳曼精神“已经分崩离析，完全归于瓦解……但这种精神仍然具有装饰性、透析性，并且具有强烈的知性气质，因此它必然会对世界公民产生无限魅力，并因其天生的高贵诉求而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和效力”[12]。

在某种意义上，托马斯·曼的敏锐洞察力使他得以更为公正地呈现19世纪晚期的欧洲精神。埃德蒙·伯克所构想过的欧洲的“共同家园”以及兰克所构想的欧洲的“神圣统一体”以一种模糊而表面高贵的文化意识

形式而非一种经济-法律主张，体现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精神当中。1907年，梅尼克出版了《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这本书作为新康德主义知识理论在史学领域的最佳结晶，在战前一代的欧洲人内心重塑了对于政治和理想、精神和现实之间依据严格的新康德主义原则进行直接结合之可能性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性危机的自觉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于19世纪中后期以来欧洲历史学精神的不失骄傲的总结。梅尼克在书中近乎强硬地论证了民族国家的个体性诉求同普遍价值诉求之间的内在和谐性质，他充满乐观地指出，可以呈现为普遍价值形态的那些东西，比如古典时代的人性理想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价值观念，实际上都是诞生于民族或者政治体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当中，基督教提倡的个体之无限价值也只有在同罗马民族宗教相互冲突的背景中才能得到阐发和确立。梅尼克指出："并非偶然的是，'德意志'这一名称最早成为我们民族的标志，是同德意志民族的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步。那时，一种普世使命能够有助于在人类内心激扬民族观念。最后，难道欧洲的第一个大型民族国家不是带着民族自治的完整意识建立起来的吗？革命的法国难道不是来源于18世纪的母体、来源于一个被普世观念与世界主义观念日益浸透的土壤吗？"[13] 显然，梅尼克依然忠诚于兰克的传统，在将欧洲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统一体时，他心目中的统一体是以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双重斗争和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影响为基础的，在精神与现实的张力和互动的乐观格局当中，梅尼克的政治意识是非常突出的，甚至高居于文化的地位之上："纯粹的、来源于统一文化的、丝毫未受任何政治影响的文化民族是极其罕见的。［……］例如意大利文化民族的形成就受到了对于罗马帝国的追忆以及教皇国与罗马天主教会统治的政治影响。"[14] 然而，随着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在1873年摆脱经济低谷之后的日益繁荣，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危机阴影的日渐临近，欧洲被置于精神和现实日益拉大的分裂和对抗格局当中，或者更精确地说，被置于类似狄更斯关于"时代"的"双城"格局当中。现实的进展使得人们很难再保持梅尼克意图传扬的那种传统的历史哲学的乐观主

义，面对精神与现实之整体格局的撕裂，人们要么以一种超然的犬儒主义和宿命论态度，在纯粹的“科学”和“实证”研究中寻求逃避，要么则逐渐沉入文化和世界观的或狂热或温柔的梦幻当中寻求安慰。

在1848年德意志自由主义者的“强人政治”观念归于挫败之后，历史学发生了极为不幸的转向，正如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远古之时就说过的那样，“故事往往都有三个版本”，围绕“世界史”建构起来的种种宏阔的历史哲学体系应运而生，试图强行修补令梅尼克终生抱憾的“精神”和“权力”或者说是“强人”和“智人”之间的断裂和鸿沟，也许这是无可避免的，也许这也正是人间俗状无可回避的命数，蒙森那种强劲、棱角分明且极具断代意识的政治叙事以及德意志自由主义者本来应该是毫无退让可言的政治欲念就此灰飞烟灭，“历史”转而展现为一个纯粹基于目的论的进程，在这方面，黑格尔首当其冲，就如同同一时期英格兰的辉格党史家麦考莱那样。在麦考莱看来，英格兰1688年发生的宫廷政变以及此一变化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果便是历史进程之目的本身所在；1688年革命的成果并非“生命、自由和财产”本身，而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成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世界史”或者“普遍史”便是在这个意义上达到了目的和终点，尽管这些权利的具体呈现形态及其与社会事实之间并非完全的合拍等这些方面依然存在并不小的变动空间，但原则与历史是在1688年取得了合一；此后的工作是布莱克斯通这样的法学家的工作，抑或是边沁派的社会改革者的工作，这都不重要，都只是“世界史”故事的“余论”，而此前的历史则只是作为达到此一目的和终点所必经的暗影和铺垫阶段。在麦考莱看来，将“生命、自由和财产”视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本身构成了对真理的确认和执行；而真理在麦考莱看来既无关于公民，也无关于具体的国家和历史经验，真理的唯一相关者是人之为人。麦考莱当然不会不意识到所谓人之为人在世间实在的现实中是会成为具体存在物的，因此真理才不得不以“世界史”作为介质，真理也因此势必呈现为一种“世界精神”。历史也便由此获得了其目的性和规律性。显然，麦考莱的《英格兰史》在19世纪的英格兰所扮演的角色

正对应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19世纪的普鲁士所扮演的角色；尽管思维模式和办法不同——黑格尔通过理论沉思和逻辑建构、麦考莱通过政治经验和现实事件的进程，但两者都殊途同归地以各自的方式在逻辑上摆脱了康德所谓的历史之“可悲的偶然性”或者歌德所谓的历史之“暴力与无意义的混杂”。

最后，让我们回到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当中，他提起一项总结性评说，那里面很显然是激荡着悲悯心绪的：“在近代文化和文明中，人类的一切都来自灵活生活之中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各种力量之间的一种健全的、自然的且又和谐的关系。［……］其中任何一个的片面发展，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灵魂力量，都会威胁着破坏整体，并且越走越远，最后将导致对个人、群众以及整个民族的灾难，如果一场事变的风暴把它们推向危险的方向去的话。”[15] 尽管梅尼克在这项评说中并没有特别指涉德意志灵魂，但人尽皆知，这段申述本身实质上是再现了那个著名的浮士德问题：

> 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
>
> 这一个想和那一个分离，
>
> 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
>
> 以固执的官能紧贴凡尘；
>
> 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
>
> 飞向先人的崇高灵境。

德意志人为了化解如此深重的二元精神格局，不得不采纳民族主义的解决办法，而且也不得不将民族主义推进到精神变态的地步，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烈度都是如此。那么，究竟是谁之过？本书作者并没有像泰纳引领的19世纪风潮那样，去追究种族、环境和时代方面的因素，而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人物为线索的灵魂谱系，此举当然不能说是全然

公正的，不过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在本书作者看来，一切的悲剧史诗当中，总是少不了需要人类自身去承担的过错。

---

[1]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70页。（迈内克为梅尼克的另一译名。）

[2] T.Macaulay，“On the Ancient Orator”.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macaulay-critical-and-historical-essays-vol-3，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9月6日。

[3] W.Jaeger，*Paedia*，Vol. III，trans.from the German Manuscript by Gilbert Highe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68.

[4] T.Macaulay，“On the Ancient Orator”.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macaulay-critical-and-historical-essays-vol-3，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9月6日。

[5] T.Macaulay，“On the Ancient Orator”.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macaulay-critical-and-historical-essays-vol-3，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9月6日。

[6] Oakeshott：*Experience and Its Mod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3，p.2.

[7] Leo Strauss：*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221.

[8] Oakeshott：*Experience and Its Mod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3，pp.355-6.

[9] Oakeshott：“The Claims of Politics”，Scrutiny，VIII，1939-1940，p.148.

[10] F. Meinecke：*The German Catastrophe*，trans. by Sidney B. Fa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p.1.

[11] Helmut Plessner：*The Limits of Community*：*A Critique of Social Radicalism*，trans. by Andrew Wallace，Humanity Books，1999，p.57.

[12] 托马斯·曼：《理查德·瓦格纳的苦难与伟大》，见*Past Masters and Other Papers*，Alfred Knopf，1933，第92页。

[13] F.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12～13页。

[14] F.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15页。

[15]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45～46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英）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Eliza Marian Butler）著；林国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9

书名原文：The Tyranny of Greece over Germany：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Exercised by Greek Art and Poetry over the Great German Writers of the Eighteenth，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SBN 978-7-5201-0817-1

Ⅰ.①希… Ⅱ.①伊… ②林… Ⅲ.①德国文学-文学评论 Ⅳ.①I51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1750号

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

——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

著者/〔英〕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Eliza Marian Butler）

译者/林国荣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甘欢欢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6 字数：363千字

版次/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0817-1

定价/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林国荣

哲学博士，宜春学院公法与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海国图志”丛书编委。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 涛

ELIZA MARIAN BUTLER

温克尔曼之发现希腊所引发的悲剧后果，在众多人的生命中是很显见的。

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温克尔曼自己。歌德一直生活在对那“冷酷的女人”的战栗当中，就这么消耗了多年的光阴，在那“没有鸟儿吟唱之地”，他的天才承受着何等痛楚，恐怕是一言难尽。席勒一直在同一个超人般的对头进行着决绝缠斗，最终遍体鳞伤，到死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在放手之时，是否得到了赐福。

荷尔德林对诸神的土地有着极为深重的思乡之病，这可怕的病症最终耗尽了他的心性，也摧毁了他的理智。海涅的生命可谓一场悲剧，其中最为悲剧的时刻也许就是他最终向他的“亲爱的米洛的维纳斯”作别的时候。尼采那倍受折磨的心灵则因为对狄奥尼索斯的迷狂崇拜而被撕裂。

施里曼英年早逝，还不是因为太爱恋希腊了。希腊诸神的致命魔力在斯蒂凡·乔治这里最终筑成了马克西敏神话。莱辛、赫尔德和斯皮特勒，恐怕是仅有的几个受益于而非受害于温克尔曼之希腊及其荣耀幻景的人；其余的人则都是遭遇了极大的震动和冲击，那力量直透灵魂深处。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201-0817-1

定价：79.00 元

DEUTSCHE

德意志文化

（1945～2000年）

KULTUR

〔德〕赫尔曼·格拉瑟 ■ 著

1945-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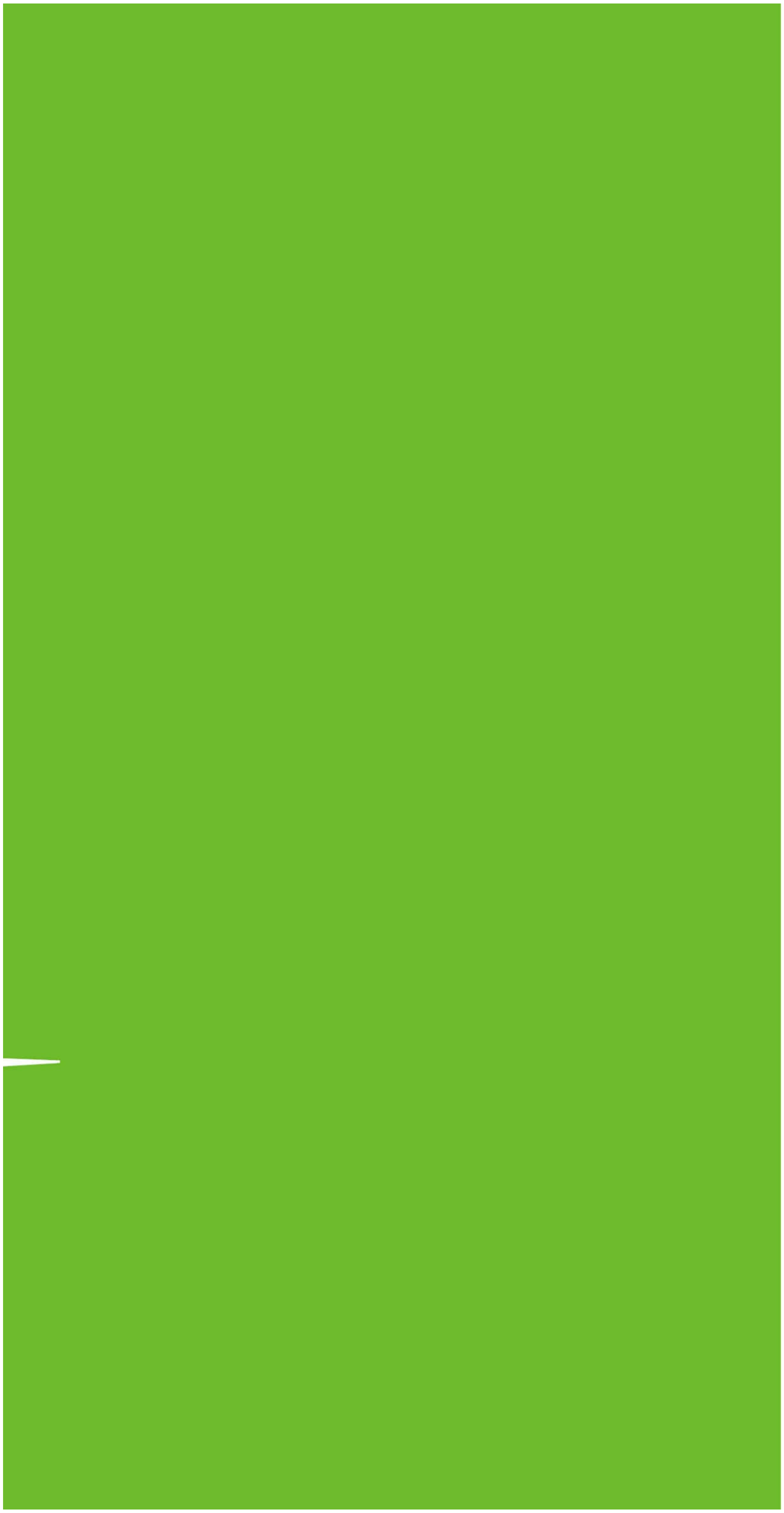
周睿睿 ■ 译

Hermann Glaser

译莱
丛茵

这是一本关于
当代德国的全方位的社会史，
亦是一部关于新的文化理论和实践的著作，
它将为你展现
一个更真实的德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莱茵译丛

德意志文化
（1945～2000年）

〔德〕赫尔曼·格拉瑟（Hermann Glaser） 著
周睿睿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录

- 第一部分 废墟时代
  - 第1章 第三帝国的末日
  - 第2章 盟国占领德国
  - 第3章 与纳粹主义清算
  - 第4章 黑暗中的德国
  - 第5章 民主的复苏
  - 第6章 积极的建设者
  - 第7章 文化的回归
- 第二部分 分裂的德国
  - 第8章 两个德国的产生
  - 第9章 巨大的中心国家
  - 第10章 知识分子的荣耀与苦难
  - 第11章 西德文化生活的二分法
- 第三部分 变革的时代
  - 第12章 现代化与反抗
  - 第13章 西德的文化革命
  - 第14章 东德的配合与阻力
  - 第15章 浮冰和暖流之间
  - 第16章 多元的魔力
  - 第17章 后现代
- 第四部分 德国统一
  - 第18章 狂喜和身份危机
  - 第19章 文化的疑难杂症
  - 第20章 政治疆域的模糊
- 参考文献
- 人名索引
- 索引
- 图片说明

- 译后记

第一部分 废墟时代



柏林废墟，**1945**年

第1章 第三帝国的末日

炼狱

1945年5月7日凌晨2点41分，谈判室。随着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在欧洲走到了尽头——之后的8月14日，在投放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之后几天，日本也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在法国兰斯的一间校舍里，西方盟军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已建立了自己的司令总部。美国、英国、苏联、法国这四个战胜国的代表出席了谈判。武装部队运营参谋长、希特勒最信任的军事顾问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签署投降书之后，起身请求发言。他说，在这场长达五年多的战争里，德意志人民和德意志国防军的付出和遭受的痛苦或许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多。“此时此刻，除了希望得到各位的宽容，我已无话可说。”没有得到回答，他带着他的代表团离开了房间。



德累斯顿约翰尼斯大街防空洞里烧焦的尸体

据1945年5月9日最新的国防军报道，自午夜开始，所有战线上的一切武器都沉寂了。国防军似乎已料到这将会是一场无谓的反抗。“这场长达近六年的英勇奋战就此结束。这场战争不仅给我们带来过巨大的胜利，也给我们带来了极惨重的失败。最终，德意志国防军面对压倒性的暴力，充满尊严地忍受了失败。”“充满尊严的失败”演说是纳粹最高统帅部编织的最后一个谎言。自这场战争爆发以来，德国国防军已完全丧失道德理智，发起了反对犹太人、波兰人和俄国人以及欧洲其他民族的种族灭绝，不负责任地延长战争使得损失不断增加。直到最后一刻，纳

粹德国的将军们，只要手中还有权力，便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把所到之地焚为一片焦土，把他们的士兵赶入毫无意义的死亡，而自己却常常临阵脱逃并得以幸存，甚至乔装混入平民。

> 帝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于1943年2月18日发出了口号——“我问你们：你们想全面战争吗？必要的时候，你们想要这场战争进行得比我们今日所能想象的要更全面和彻底吗？”——在1945年这一切完全坐实：德国和德国人的“最后的日子”开始了。“第三帝国自杀了，而那具尸体叫作德国。”埃里希·开斯特纳在他1945年2月27日的日记上这样写道。

尽管纳粹政府一直致力于强力操控人们的是非观，仍旧有许多人在追求和平。1945年的新年演说，希特勒在对德国人民发出号召的同时也做了充满威胁意味的宣告，说德国的投降永远不会到来。

然而，可怕的灾难接踵而至，首先是空袭。盟军的飞机空袭越来越频繁。在1945年4月16日美国盟军领导人宣布决定运用战略性空中进攻全面击倒德国后，投掷了135万吨炸弹。这导致大约360万间寓所被摧毁，750万人无家可归以及60万人死亡。即使已经到了战争的最后三个月，还有12万德国人在空袭中丧生。

> 在炸弹攻击中丧生人数最惊人的是1945年2月13日在德累斯顿的那场空袭：这所城市被夜间轰炸（773架轰炸机）和白天轰炸（311架轰炸机）毁灭，至少有3.5万人在这座逃亡者遍地的城市里死去（另外的估计则称有4万～6万或者更多的人丧生）。在整场战争中，最残酷的袭击都是针对平民的。乌尔苏拉·冯·卡尔多夫在她的日记里面记录道（1945年3月12日）：“人们听到来自德累斯顿的恐怖叙述。上万人丧生。整个城市挤满了来自东边的难民。活着的人都在忙着从废墟瓦砾中挖寻尸体。英国人鼓吹他们的善良，但实际上他们同盟国的野蛮程度不亚于纳粹。对待逃跑者，无论老人、母亲或儿童，都是用炸弹和磷光雨去烧焦，让他们残废或窒息——惨绝人寰。”

党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发出指令，在敌人到来之前清理集中营并把犯人押送到后方的集中营去。“可是，1945年1月注册的囚犯人数超过70万，其中至少1/3的人在‘死亡行军’中丧生。”

当歇斯底里的“坚持最终胜利”的口号也不能再唤起纪律观念强烈的驻军士兵任何共鸣的时候，纳粹分子开始残害自己的士兵。二战期间，驻军司法审判机构一共判决了大约3万起死刑；而与之相对的美军内部只有过1起死刑判决。

> 哈特穆特·冯·黑廷格（Hartmut von Hentig）在1945年的希特勒生日当天（4月20日）来到柏林，被晋升为少尉并委任为作为元首后备军的国防军陆军总司令。他在法兰克福大道上，每经过两盏路灯，都会看到电线杆下晃荡着一个逃跑的士兵。这个威慑的作用并非十分明显，因为部队又被转移至南德，随后是总司令被转移，当时坐在运输火车上的“几个身穿深色服装的同志，在我们到了他们家乡附近时下了车”。

由纳粹主义煽动并被各种“消息”证实的黑色恐怖，使东部地区对俄国人的恐惧不断蔓延。大量难民迁徙的队伍试图跋涉到西德。希特勒在入侵苏联期间对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所说的——“我们一旦赢了，谁会管我们是怎么赢的。我们都已经这么不择手段了，我们必须赢。否则我们整个民族、我们这些坐在顶端的人以及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将走向灭亡”——这种阴暗的想象如今开始应验。三年野蛮血腥的战争留下了一个残败不堪的苏俄。对俄国人来说，现在正是一个复仇的好时机。

> 苏联进军东普鲁士后，截止到1945年5月，格但斯克海湾有200万～300万的难民和士兵被疏散；2万～2.5万人在此丧生。最惨重的一次灾难是载着大约有6600名难民党组织人员的巡洋舰被一艘苏联潜艇用鱼雷袭击，只有1252人得救。一个生还者后来这么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坏人，是畜生。”那些不能继续前行的孕妇和老人就直接被活活弄死。
>
> 从陆地走比从海洋走更危险。道路常常被苏联坦克封死。“难民的队伍常常被已碾压过的路或雪山阻挡，但他们还在走着。马常常滑倒，车常常垮掉。很多人只带了一辆小手推车，里面已经是他的所有家当了。这是一场与绝望对抗、艰苦卓绝的斗争。食品，尤其是对婴儿至关重要的奶水几乎没有。除此之外，还得一直害怕会被坦克碾轧。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和病人，都放弃了，自己寻了死。”

为了推迟第三帝国的灭亡，纳粹政权发动了最后的征兵招聘：面向所有儿童、少年、女人和老人。在盟军成功光复法国和在东西方战线取得胜利后，希特勒在1944年9月25日号召所有德国人支持以及签署保卫德国民族的公告。约瑟夫·戈培尔狂热地宣告了来自特奥多尔·科尔纳的口令："人们起来，让风暴来临。"但是，兵败如山倒，已经无法阻挡。

希特勒再一次在薄弱环节和东线集结了大量部队。阿登山脉[1]的进攻开始似乎很顺畅，四天之后就陷入了僵局，到次年1月最终彻底失败。它终究没能为第三帝国避免失败，仅仅是拖延了而已。

1945年2月12日，苏联在东线开始发动全面进攻。强大的战争机器席卷了梅梅尔和喀尔巴阡山脉间早已筋疲力尽的德国陆军。苏联红军开始对柏林——1月16日希特勒元首总部迁移之处——进军。1月19日，苏联红军抵达西里西亚边境，之后没多久俄国人就占领了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西方盟军预计苏联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持续攻势大约近四周。几天后德国军队不得不撤退到莱茵河后方，3月6日科隆失守。一天后，美国人拿下了雷马根的铁路桥。

"告诉那些男孩们，他们应该勇往直前。我相信这场战争马上就会结束。我希望，那时我的士兵都在前线，荣誉会从天而降。"（乔治·巴顿，美国第三集团军将军）

而纳粹德国的军队仍在负隅顽抗，以至于无谓的流血事件继续上演。卡塞尔在4月3日，纽伦堡在4月19日，慕尼黑在4月29日相继失守。1945年4月25日，美国第69步兵团和苏联第58近卫师团在易北河的托尔高会师，并在同天决定包围柏林。

恶魔的末日

尽管第三帝国的末日已经来临，纳粹主义运动还在做垂死挣扎。这次的口号是：拯救自己！那些依然在宣扬为民族壮烈牺牲的精神的纳粹

党羽和领导人，那些在政治、军事及管理上为德意志民族如今的毁灭出谋划策的领袖，其实已经悄悄地准备好要离开。这些国家的罪人、大规模屠杀的刽子手，他们所试图逃避的罪行之恶劣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恩斯特·尼基施曾经形象地把第三帝国形容为“低等魔鬼帝国”，纳粹政权在最后阶段的丑态尤其证明了这个描述的精辟。尼基施说，纳粹党羽的原型是流氓，流氓的意思是自大的人，没有信仰，对一切都无所谓，只顾保护自己的利益。

希特勒，因为无数次的反复歇斯底里、抽噎、发怒，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因此得罪了戈林和希姆莱，两个他最亲信的同谋。这两人瞒着他，违背其意愿地与敌人谈判，并试图篡权。

独裁者的生命仿佛一出虚情假意的拙劣感伤剧那样落幕了，仿佛他不曾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和毁灭他们的幸福。4月28日至29日的夜晚，他决定自行了断。而在此之前，他刚刚与他的情妇爱娃·勃劳恩举行了结婚仪式，戈培尔和鲍曼作为证婚人。附近人民冲锋队[2]的一名分部领导沃尔特·瓦格纳也被带过来，这对新人在其面前宣明两人均为纯正雅利安血统且无遗传性疾病。对此，约阿希姆·菲斯特在他所著的希特勒传记中评论道，显然，从这一刻开始，“元首”和他的统治已经彻底完蛋，一切已成定局。“但不管他的名字曾经被吹捧得怎样神乎其神，结局可一点也不神话。”

在1945年4月29日的政治遗嘱里，希特勒任命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为德国总统，戈培尔（希特勒自杀不久后自杀）为德国总理；自1932年担任帝国财政部部长的格拉夫·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受邓尼茨委任为国家政府执行官。躲到弗伦斯堡的新政府为了避免无条件投降，努力试图与西方国家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共同战线。但最终邓尼茨还是同意了无条件件投降。战争机器就此停止了运转。

1945年5月2日，汉堡。佩特拉·S.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许多德国人大梦初醒时的心情。“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夜晚！我睡得如此幸福，脑海里还总想着：‘希特勒死了，纳粹死了！希特勒和纳粹死了！’今天一早我就去上学了。在路上我还在想，是否还能看到纳粹党徽。但一个都没有。奇怪的是，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哀悼，尽管他们亲爱的、尊敬的、被他们这些傻瓜视为神一样的元首已不在人世。”

无尽的痛苦折磨着人们和他们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共有约5500万人丧生——单单在苏联就大约有2600万人（其中700万是平民百姓）；在被德国俘虏的570万苏联士兵中有超过300万人死去或被杀害。735万德国人中有逾60万平民遇难。在波兰有600万人，南斯拉夫有48.5万人，法国有53.7万人丧命，另有500万～600万犹太人被杀害。战争结束时，德国的土地上有800万～1000万难民流离失所。

再一次获救

经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春天一定是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埃里希·开斯特纳在他1945年2月27日的日记里面写道，不过，这个春天却并不在我们的日历之中。“历史的四季以世纪计。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与死全都在这‘新时代的11月’。”

战后史的历书展现的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桑顿·怀尔德在战争期间所创作的《我们再一次得救》中一针见血地描述了人的基本模式：幸存者从不放弃。

“这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不断地重新开始。一次又一次。不断地重新开始。我们怎么会知道，这次会比从前的好呢？可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断地重新开始，好像我们知道这一次一定会更好一样？”

5月到来了。阳光如此灿烂，空气如此温暖，以至于人们有种身在夏天的错觉。许多人感觉这是某种“慌乱的田园生活”。阿尔努夫·巴尔林这样回忆道。最好的礼物就是宁静。当他回忆起1945年5月，首先想

到的就是那些日子的悄无声息，它的宁静，日复一日在蓝蓝的天空下。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几乎不再有恐惧。仿佛深渊、痛苦都不复存在。新生活从废墟里萌芽了。

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纳粹政权倒台——尽管为祖国带来深重的耻辱，但也能让德国回归人性，流亡美国的托马斯·曼在电台里对他的德国听众这么说道。这一时刻是艰难而悲伤的，因为德国并不是用自己的力量主动迎接这一刻。“但权力并不是一切，它甚至连主要问题都不是。德国的尊严从来都不只是权力。德国曾经通过人类的成就和自由的精神为权力赢得过尊重与赞叹，以后它也可以这样。”

在战俘营，即使生活质量已经降低到不能再低（“这是我的帽子，这是我的大衣，这是我的剃须刀，全都在麻布袋里”），对理性声音的期待仍然觉醒了。废墟时代最重要的诗作是君特·埃西斯的《盘点》（*Inventur* ）（因为它第一次直白、不加修饰地勇敢写出了当时的状况）。诗里说，铅笔芯是那个时期代表文化希望的物品：“每天它都给我写下诗句，写下那些我夜里想过的事情。”

野蛮的思想曾经妄图把人类引向灭亡，可惜它并没能瓦解一切，相反却带来了新的开始。一种文化意识如浴火重生的凤凰——凤凰浴火重生是那时人们很爱用的比喻——一般，在昨天与今天之间、传统与新事物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找寻立足点。这一切都基于一种热情，野蛮时代过后，人们正是凭借这股热情开始重建文化。人们还有一种“补偿”文化的愿望，那并不需要完全开发全新的东西，而首先是剔除意识形态，重新发现原有文化。

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他的文集《德国的灾难》（*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1946年出版，但在1945年已完成草稿）里表述了战后时期形成的某种历史观，以及政权垮台后，在他心里冉冉升起的理想：今后，德国的每个城市和城镇都兴起“歌德社区”。那是“伟大的德国精神通过生动的见证由耳直达内心——那些声音是高贵的德国

音乐和诗歌”。尤其是节日中，应该从头到尾被伟大的德国音乐装点得更加崇高：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至于古典诗歌，“即使我们的祖国遭遇如此的大不幸，依然可以在满地狼藉中找到一些未被摧毁的东西，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德意志的‘圣礼受洗’”。

大教堂、寺庙、教堂这些神圣之地是真善美的象征。人们对歌德的《伊菲革涅亚》[3]（*Iphigenie*）特别钟爱，战后许多舞台都用这一剧目作为开场表演，或将此剧作为整个废墟时期他们演出计划的核心。死亡、废墟、贫困——然而，在这一切之上，人们随着宽恕一切的美好人性飞扬。每个人，只要他“出生在天空下，受过纯洁胸脯的哺育”，都会听见人性的声音，“和它一起翱翔”。



战后纽伦堡的街道，**1945**年

大多数的流亡者也满怀激情，胸中充满了德意志精神的理想天空。演员沃尔夫冈·朗霍夫再次回到德国，他在1946年2月18日写给他在苏黎世亲友的信中表述了自己的心情：“能再次回到祖国家乡的感觉好极

了。”

“我们期待最美好的德国人文主义精神再现——正义的精神、对真理的热爱、对信仰的拥护。”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在1945年11月25日“德国民主重建文化协会”的集会上提出并阐述了“东方精神”，并鼓励热衷社会贡献的作家和艺术家，如约翰内斯·贝歇尔、安娜·西格斯、路德维希·雷恩、阿尔弗雷德·坎特诺维茨、斯蒂芬·赫尔姆林、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恩斯特·布洛赫、斯特凡·海姆去苏联占领区，而亨利希·曼[4]却在计划回国不久前逝世。

事实上，德国自从1945年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就已经失去了行政力，而1945年6月5日通过的《关于战败德国及其最高权力机构政权对英联邦、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转交宣言》则从法律上确定了它的生效。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运行、管理和维持的责任都转到战胜国手中。德国的最高武力机构也通过单方面宣誓转交同盟国管理。

> 六月宣言[5]被钉在焚毁了的帝国大厦的残墙上。弗里德里希·迪克曼指出，这份宣言为政府机构还悬而未决的德意志国家起了一个之前没有过的新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德国”（Deutschland）。从俾斯麦1870年统一的四个德意志邦国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被纳粹用“大德意志帝国”的名头书写了“德国历史中最短命且最罪恶的一页”。“短暂的国家版图布满了鲜红的血印。”同盟国的文件用各自的语言为这个国家起了一个新的国名（Germany，Allemagne，Germanija），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了国名尚值得推敲。

武力吞并德国显然不是同盟国的打算。在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的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表示，并不想灭绝德意志民族或者奴役其人民。他们只是想给德国人民一个在民主与和平的环境下新生的机会。“如果德国人民不断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就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各国人民行列。”

纳粹政权的垮台使欧洲再次燃起新生的希望。1946年9月，温斯顿·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的演讲中征引政治思想史时说，欧罗巴这块“高贵的大陆”，享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疆土和最温和宜人的气候，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原住民的家乡。

对德国人来说，战后时期具有非凡的意义。流亡归来的作家、时任法国文化官员的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写道，生活在这里的是一个不曾改变过的、认真工作的、井井有条的民族。就像蚁窝被捅了的蚂蚁一样，人们在废墟中来回跑着，担心找不到紧缺的物质粮食和得不到明确的指示。西占区在重建资本主义的权力与财产关系，苏占区则在建立国有社会主义制度、力争上游，这让人无暇反省和哀悼。“零点时刻”（Stunde Null）[6]，好像没有人察觉到纳粹主义在战后留下的无法形容的野蛮伤痕及那些与他们相关的个人责任。

> 忙于沉浸在个人痛苦中的人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及如何在悔恨中开始道德重建的工作。欧根·科贡[7]于1948年写成《党卫队国家》，揭露和分析了纳粹恐怖制度。在书中，他根据自己对“德意志民族和集中营”的观察，对第三帝国的罪行做出了明确的描述，并对德意志民族政治信念的改变做了透彻的分析——到今天为止，都还只有极少的作品涉及这个课题。那是因为，分析的结果证明：希特勒的灵魂不仅仅只存活在德国人中；因为整个世界对于极权主义的抵抗力同等脆弱；因为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自己也成了受害者；因为过去的威慑在现今混乱的恐惧中失去了作用；因为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尤其是行为到最后总是与“言善”相悖。科贡还提到了战俘们的命运，尤其是德国投降之后的战俘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占区所忍受的糟糕环境有时跟集中营没有什么区别。1200万～1400万人被用野蛮残忍的方式放逐。密封的火车车厢把他们成群驱赶到西德。这一切都是后来持续发生的非人道罪行的又一确凿证据。

一些艺术家被从纳粹监狱和集中营中解救出来，另一些结束了内心流亡或流亡国外，决定投身民主建设。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道德创建的意识。这种意识清楚地体现在誓约中，那是一份1945年4月19日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操场上，来自35个国家的2.1万名集中营幸存者

纪念5.6万名惨死于纳粹手下的囚犯的誓词：“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和平、自由的新世界。对我们死去的同志和他们家人，我们自觉有罪。为了表示你们斗争的决心，请举起手来宣誓并跟着我念：我们发誓！”

特奥多尔·豪伊斯很早之前就提到，“零点时刻”具有两面性。1949年，他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当选前夕他表示，“从根本上来说，1945年5月8日给我们每个人所留下的是一个悲剧且充满疑问的历史论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天可以说我们既被拯救了又被消灭了”。海因里希·伯尔在一封他虚构的《写给我儿子们的信》里写道：“德国人总是不断地问自己，5月8日这一天到底应该意味着失败还是解放。我们在这儿等待我们的‘敌人’来营救我们。”

> 把战争结束解释为“零点时刻”，这与社会史研究的结果相矛盾。根据最新的研究，自1943年年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革命性的转变就已经开始，到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转变已经完成。转变，不仅仅指的是第三帝国被打败，德国丧失了东部地区的领土，旧贵族阶级的权力被剥夺，还指战争后期就已经开始的巨型民族大迁移，不管是逃亡还是被驱逐。原有的信仰、社会阶层和文化差异被取消，德国社会由此被深刻动摇，“一切都被摇得丢了位置”。回首历史，后来联邦德国中产阶级社会的轮廓在这个虚无情绪浓重的“紧急社会”时期就已显现。政治机构和标准体系受到占领国和德国本土那些在纳粹时期采取了反抗行动，或至少被纳粹当局禁言的政治及社会活动人士的强烈影响，我们也可以说它所带来的剧变是革命性的突破。

波恩政治[8]对“零点时刻”无法下定论的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针对这件事，1985年，西德联邦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时逢战争结束40周年之际发表讲话，直面德国纳粹主义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罪责问题，证明了他出色的能力。讲话在短期内就被编印成多达120万份的小册子，录制成6万份唱片和磁带，获得了热烈的反响。这是一个政治的突破。这段讲话提到的三点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在后来的几年尤其是德国统一后不断被质疑：“解放”的主题是否有优先权、纳粹主义的所有受害者是否应获得同等的尊敬以及魏茨泽克对随大流主义的批评。

“我们有一切理由把1945年5月8日认定为德国历史错路的终点，这个终点也是美好未来的希望的起点。”

---

[1] 指突出部之役（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 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最后阶段成立的国家民兵部队，其成员为16～60岁尚未被征召服役的健康男性公民。该部队并非传统上由德意志国防军负责建立，而是纳粹党根据希特勒在1944年9月25日发布的元首命令建立的。人民冲锋队于1944年10月18日纪念莱比锡战役131周年时组建，并在两天后正式宣布成立。

[3] 伊菲革涅亚是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之长女，为古希腊剧作家所喜爱的悲剧人物。

[4] 亨利希·曼［Luiz（Ludwig）Heinrich Mann，1871～1950年］，重要的德国作家之一，托马斯·曼的哥哥，出生于德国吕贝克，逝世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5] 即上文的《关于战败德国及其最高权力机构政权对英联邦、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转交宣言》。

[6] 零点时刻，特指德国自1945年5月8日纳粹无条件投降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说它是零点时刻，是因为无条件投降和纳粹政权的彻底崩溃给新的开始创造了机会。

[7] 欧根·科贡（Eugen Kogon，1903～1987年），德国记者、出版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他信仰基督教，反对纳粹，被认为是联邦德国和德国的欧洲一体化的精神之父之一。

[8] 两德分裂后，波恩是西德的行政首都。

第2章 盟国占领德国

区域划分和西方态度

战争胜利后的盟国（“三巨头”：美国、英国、苏联）对德政策源于1941年8月14日的《大西洋宪章》。罗斯福和丘吉尔对该宪章达成了共识，并于同年9月（也）得到了苏联的同意，而当时美国还没有加入战争。宪章内容是关于国家政策的一般原则：放弃不符合人民愿望的领土扩张和改变；各国人民有权利选择他们的政府形式；在最终消灭纳粹暴政后，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和平、紧密的经济合作。



苏联国家元首约瑟夫·斯大林、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上

在雅尔塔会晤（1945年2月）以及战后的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到8月2日）中，美英苏确定了盟友合作关系并同意法国加入联盟。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三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这些不同因为合作的意愿而

显得不那么重要。《波茨坦协定》的草案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公报上公开发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作为四大战胜国代表接管了在德的最高管理权力机构，严格遵守了对德共同政策的原则。但尽管如此，管制委员会根本无法在管辖区内单凭一己之力推行共同议定的法律法规，因为这属于该区域军事政府的权力范围。在许多情况下，因为意见分歧而发出的似是而非、含糊其辞的声明早已释放出信号：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加剧。

西方占领国的德国政策基本由美国主导。对德国到底是应该实行严厉的惩罚还是提倡宽容的改变？自1941年开始，争议愈演愈烈。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摩根索概念的创始人，提出了后来的“摩根索计划”——以严厉措施抑制德国的发展；德国必须成为以农业经济和牧场为主的国家。对于这个计划，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相当犹豫，但最终放弃执行。

在共同努力下使德国非军事化、去纳粹化、权力分散化、民主化以及解散——这几项内容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中达成的共识性原则——在具体执行中，除了坚定不移的实用主义外，教育的理想主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 美国人特别注重德国人的再教育，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每个人的性格和民族的理想。再教育顾问小组不仅包括了心理学、人类学、心理分析学及社会学界的美国精英，还有弗洛姆和库尔特·莱温这样的德国移民。另外一个科学家小组的核心是政治学家弗朗茨·纽曼、宪法专家奥多·基希海默以及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他们都在马克斯·霍克海默从法兰克福搬迁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所工作，建立了纳粹独裁的战略服务分析办公室并为其撰写建议。主要内容是：盟国在军事胜利后如何在德国建立民主关系以及构建国家的经济、社会和党派，以避免德国重蹈覆辙并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增强公众对专制的敏感度。

再教育概念在自己的阵营里也时有混乱。德裔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列文斯坦认为，以为一个战败国或任何一个民族竟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教

育是“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是一种“狂妄的谬论”；而“蛮横的知识帝国主义”，即以为一个本身就急需教育的民族所说的理论竟然能教育别人，把这个谬论变得更糟。这种时而严厉、时而充满同情的“清扫过程”被证实是有效的。尤其是德国人有这种听话、刻苦、勤奋的态度，盟军在德国管制管理系统上完全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他们所下达的命令总是毫无异议地被服从。1945年8月6日，在进驻德国三个月之后——反纳粹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成功，“重建也取得了积极成果”——占领军和美国安全指挥官艾森豪威尔的公告完全符合美国的对德政策所定义的教育改良主义。

> 我们会帮助你们，“在民主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你们的生活。一旦你们那些受纳粹主义污染的学校和法院净化完毕，它们立刻就会重新开放。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和教育将会得到最有力的支持。你们已经出版了很多报纸，选出了很多可信赖的人在企业里代表你们，或者做军政府的顾问。这种或者类似措施的幅度将越来越大。你们将会被允许组织“地方工会”或者在地方上“证明自己的政治权利”。以此为目的的聚会都可以在得到地方军事政府的许可后举行。工会和政党最急迫的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好必要准备。在工会的组建和参与民主意义上的政治活动方面，你们将获得完全自由。其余的约束和限制什么时候被我们取消，这全取决于你们自己的表现。（美国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1945年6月8日）

各个占领区之间的边境受到了（与其紧密程度相比）相对严格的监控。由美国军政府出版发行的图画杂志《今日》在1947年3月刊中问道，还要等多久人们才能在无须被不同的盟军的边检人员检查下自由畅行德国？“或者说得更明白点：什么时候才能废除占领区界线？”

苏联单方面违背《波茨坦协定》精神的行为，特别是索取赔款和将战利品据为己有，使东西部占领区关系出现了很大裂痕。“占领区边界”把苏联占领区同德国其他地区分离开来，作用等同于“国境线”。“这种分离很早就表明，西部占领区边界将被苏联占领区当局及德国行政机关在行动上给予国境线的同等对待，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被充满敌意的邻国所包围的国家的、很难逾越的边界。”

为此，可以想象得到，在当时的德国，任何从东部到西部和从西部到东部的旅行都会是一场冒险。“车厢里充满了盘问，紧张氛围显然易见。经过苏联的检查站之后这种氛围才被打破”，美国通信官军官斯蒂芬·海姆这样记录他第一次穿越“占领区”的旅程。由于彼此都处于恶劣的生活条件中，东部地区的火车和西部地区的火车中的谈话内容也都相似，只是因为内部政治的发展和俄国占领者特殊的意识形态让彼此表现得不同。

> 俄国人？他们什么都讲。比方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看上去非常悲惨的女人。当俄国人问她为什么，她回答是因为饥饿，俄国人感到非常震惊，他表现得很悲伤就走开了。但是之后他又再次出现，牵来了一头奶牛说：“瞧，女士……”转过一个拐角，人们就已经看见一个瘦小的农民弯曲着他那两条伸向天堂的胳膊……哈，这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胜利者嘛。他们说，最可恶的是那些德国人。“没错，”一个工人插话并且看上去非常愤怒，“我，德国共产党的保罗·克洛泽，我说，德国统一社会党就是浮渣垃圾。他们带着面包走到那些女人的面前说：选择德国统一社会党。加入德国统一社会党，我们就让你们的儿子回家。你们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吗？他们问那些农民。如果不是，机器就会鸣笛，东西就会被没收。他们像纳粹分子一样窥探窃听；周围到处都有这些流氓混蛋。民主主义者在大选上是如此逍遥自在，可以去撕下其他人的宣传海报，去涂鸦他们陈列的橱窗，去炸掉会场关掉灯。现在我要去德累斯顿给我的死党们带去他们那里禁止的《电报》和《每日明镜》。每次当我来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工厂前等着，问：‘保罗，你给我们带了什么……？’”（恩斯特·布鲁谢尔）

写作过不少东西德游记的汉斯·维尔纳·李希特认为，在英国占领区内的生活最自由，在美国占领区内的生活物质最好，最危险的是苏联占领区。

美国：友好的敌人

美国占领区政策最特别的成功之处在于，在对德国地区的掠夺和占领之后展现出了物质上的优越。美国佬来了！——刚开始，人们害怕地呼喊着。但是，这些恐惧很快就被兴趣抵消了。美国士兵都很友好，乌尔苏拉·冯·卡多夫在她1945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有时候，一

些人会越过栅栏探看我们。我们喜欢和他们聊天……他们带给我们巧克力，我们说着蹩脚的英语——扯天扯地，尽可能地打探未来政局。”浆洗下士们的军装外套可以得到一包“好茶和肥皂”。一位科隆的目击者回忆说：“美国人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只不过问了有没有鸡蛋，年轻女孩子们就直接和他们交朋友了。之后他们坐在台阶上拉起了手风琴。然后我们得到了对于我们来说很新鲜的雀巢咖啡粉。我们已经太久没有见到咖啡了……”

> 跟着西方盟军的德国人是幸运的。研究德国的美国占领区的克劳斯·迪特马尔·亨克表示，他们在后来的西德展现的形象是友善的敌人。鉴于德国所造成的人道灾难，美国的占领和统治德国对决心根除纳粹主义的战胜者来说，太公正和有意义了——这是怎样一种人类和政治远见的胜利。“1944/1945年的美国占领方式拉近了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与东德的军事占领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统治既没有在两国间形成那种阻挡两国快速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没有出现不可复原的创伤。”

美国人展现出了精心保养和整齐的习惯，以及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美好生活的能力：口香糖、罢工、美容、生活杂志……都让德国人印象深刻；这些小东西让这个被第三帝国的沉闷历史所压迫的小世界里的人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遥远的奢侈品消费世界。特别是有着丰富内容的“美国汇款到欧洲合作社”发送的包裹，即“关心包裹”，还有它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包装，仿佛传播着“美好新世界”的神话。400卡路里的营养价值在那个物品紧缺时代里就已是小的人间天堂。

> “关心”（美国汇款到欧洲合作社）集22家美国社会福利组织之力，于1945年11月在纽约成立；它综合了多种民间倡议，激起新一轮绵绵不断的助人合作的浪潮。1946～1949年，仅仅在德国就发送了500万份“关心包裹”，为每一位接收者点燃了“黑暗中的光”[1]。

在美国，许多战犯得以了解美国社会的高生活水平，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消除自己纳粹主义的病态观念时非常不坚定。与此同时，他们还第一次体验了流行文化，这和德国扭曲的恐怖独裁截然不同。不少

战犯都在占领区的地窖里播放爵士音乐——这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了一种拒绝纳粹式仪式和禁忌、严格规定以及独裁的等级制度的生活态度。战争结束两年后，“午夜慕尼黑”广播节目成了欧洲最热的爵士乐广播之一。

> 1945年开始的美国化，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的美国化为德国的西方化定位铺平了道路，即放弃德国的老路，视自由、民主、自主为进步的任务。这样的亲英美式道路很快就面临与苏联的抗衡。反过来，苏联占领区对自由的镇压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他们之前只是模模糊糊感到的事情，即西方占领当局早先预言过的、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在苏联于1948年6月26日到1949年9月30日所做的柏林大封锁期间，西柏林通过英美的空中桥梁供给的生活用品和物质，维持了一个城市的自由状态。对英美所代表的那种国家体制的认同感因此变得特别强烈。



美国士兵和德国姑娘谈话

美国人也呼吁停止实行赔偿和拆解政策。此外，美国外交部部长乔治·马歇尔在1947年6月5日宣布了一个应有德国参与的欧洲救济重建计划，这个欧洲复兴计划被称为“马歇尔计划”。根据这个计划，1947年6月，美国政府照会时任美占区军政府长官的卢修斯·克莱将军关于有序和繁荣欧洲的新纲领。在这个计划中，稳定、发展的德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限制德国权利以保证德国军国主义不会再次复活同等重要。根据这个精神，作为下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应该得到保障。马歇尔的前任、美国外交部部长詹姆斯·弗朗西斯·伯恩斯在1946年9月6日宣布，美国将在军事上保护、在政治上促进一个非共产主义的西欧的建设。

1948年2月23日至3月6日，六国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建议英美法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德建立联邦性质的政府制度，并且加入马歇尔计划和鲁尔管制。作为对这个会议的反应，苏联督军驱散了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并在1948年3月20日终止了委员会活动。这意味着被四国共同托管的德国不再有统一的“政府”，这也为两个德国的建立拉开了序幕。

苏联占领区

苏联红军占领东德和柏林后，红军战士们积累已久的战争压力随即如脱缰野马般释放。屡屡发生的强奸事件让所有人陷入无限的恐惧，却因为受害者的缄默和后来东德政府的有意忽略而不被正视。恩斯特·荣格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仿佛所有的恐惧从地狱里爆发。相比之下，托马斯·曼的纯个人揣测则更符合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西方诸国的口味，这些国家无不十分愿意看到曾经是纳粹当政、如今被打败的德国如何伏低做小。“俄国人在柏林应该蛮受欢迎的。他们购置粮食，与女孩子约会。他们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两种描述都是对的。与冷酷、官僚、工业化的德国战争及杀人机器相比，俄国士兵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行为。“是

的，俄国人来到农场，并且分发巧克力给孩子们。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他们对小孩真的很友好。跟别人之前对我们讲述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当然会洗劫，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们把农场从上到下翻了个遍，抢走所有他们能够带走的东西。我们女人可没什么开心的事。农夫妻子那正有孕在身的女儿，第一个落入俄国大兵的手里，被他们蹂躏。她年迈的母亲过来想帮助自己的女儿。于是俄国人把她也一并收了……那个老农民站在自己的农场，被俄国人端枪指着，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妻女被强暴。”

战后不久即从莫斯科来到柏林苏联占领区的权力接管者对此类不法行为继续装聋作哑。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童年时因为移民苏联的母亲被捕而在莫斯科一家孤儿院长大，之后就读了共产国际学校。他在回忆录《变革释放他们的孩子》里记录道，当他在与一个德国女人谈话时听到她们在过去的几周里遭受了多么可怕的经历——这不是指纳粹分子，而是俄国人——他有多么惊恐不安。



柏林国会大厦上的苏联国旗，**1945**年**5**月**2**日

根据埃里希·库比的记录，大柏林地区大约80%的强奸事件是在1945年4月24日到1945年5月3日之间发生的，这是“战斗激励”最直接的结果。“苏联军队沉醉在胜利中，沉醉在这次挺进西方的经历中。他们是真的就像喝醉了一样。”据黑尔加·山德尔和巴巴拉·约尔在1945年春天和夏天所做的调查统计，在柏林生活的140万少女和妇女中至少有11万人被苏联士兵强奸；大部分的强奸恶行（至少10万起）发生在1945年4～6月；其中，40%的妇女被轮奸。超过1.1万名妇女因此而怀孕，大约1100名孩子因此出生，导致的结果是发生大量堕胎和自杀行为。总共有190万起德国女人和女孩被苏联士兵强奸的事件，其中140万起发生在之前的德国东部地区以及逃亡和驱逐期间，剩余的50万起发生于后来的苏联占领区内。估计一共有29.2万名因强奸出生的孩子。而苏联军队领导层，直至1945年年初都在鼓励报复行为（“母亲们无法平息的眼泪呼唤着你们无情的复仇”），此后又一再采取严厉措施重整军队纪律。“我们的报复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愤怒并非不理智。”1945年2月9日的军队报纸这样写道。3月26日，苏共的机关报纸《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疆土外的苏维埃人》的文章，提醒苏联红军战士的责任，因为他们就是苏维埃文化的代表，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他

们。曾被莫洛托夫称赞过其口号可以鼓舞两个军团的伊利亚·爱伦堡的政论通讯也就此结束。

曾经被迫流亡的德国共产党干部（根据他们的领导名字分为三个小组：乌布利希小组、阿克尔曼小组、苏贝托卡小组）重返德国。他们主要做的是听从方针指示与德国占领当局保持高度一致。通过他们在德国人民中的工作，保证关乎德国民众利益的占领政府当局的命令和指示被彻底实施。

在格奥尔吉·朱可夫的领导下，苏联军政府第一个在其管辖范围内建起了治理机构。在其治下的德国，一共有五个联邦州或省级行政单位，这些行政单位的负责人是四个被苏联认可的党派（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党员或无党派人士。苏联军政府颁布的第2号政令比西方盟国更早地实现了政治联盟。德国共产党认为强迫德国走上苏联的道路是错误的，因而获得了很多支持。“在消灭希特勒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要完成德国自1848年革命以来就开始的民主化和对德国公民的民主化再教育。”

自1945年秋天开始，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力推在苏占区和西占区加速建设一个“统一的工人政党”的主张。“根据这项主张，苏占区内的发展要被视为模范，而创新和重要进步应被视为德国共产党的功劳。与此相对的是，西占区内的发展要被当作‘极其负面’的情况来对待，因为自战争结束它就没有什么新的变化。”1946年4月，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强迫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奥托·格罗提渥和威廉·皮克当选为具有同等权力的党主席。

早在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迫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之前，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就已经合并为“反法西斯联盟”。该联盟于1945年7月14日发表宣言，称将联合力量以解决重大问题。“由此，我们翻开了德国历史的崭新一页。”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奋力彻底清除德国国内希特勒主义的残渣余孽；同心同德，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重建；给人民提供工作、面包、衣

服和住所；在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础上为人民提供法律保障；保障思想及良知的自由，同时警惕任何形式的宗教和道义洗脑；重新获取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信任，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民族间的往来。”

---

[1] “黑暗中的光”，语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鲍茜娅的台词。

第3章 与纳粹主义清算

战争罪审判和西占区的去纳粹化

《波茨坦公告》强调了盟国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决心。行动最积极的是管辖德国西部地区的美国军事管辖区。苏联在这一点上也同样积极（相比之下，英国和法国政府当局的态度则略显犹豫和被动）。在解放纳粹集中营时目睹了太多惨状，其恐怖程度只有十字军东征可以相比，这加强了盟国即刻对集中营看管人员展开正式军事审判的决心。

第一次重大的战犯审判发生在1945年9月17日，一个英国军事法庭开庭审理了贝尔森集中营[1]的指挥官约瑟夫·卡拉门以及他的47名下属。卡拉门和其他10名被告人被判死刑。同年11月15日，美国军事管辖区也开始了人数达1941人之多的达豪审判。在1517起裁决中，324人被判死罪，274人被判终身监禁，946人被判剥夺自由，367人被判无罪。英国军事法庭和法国军事法庭则分别宣判了240人和104人死罪。

1945年，军事管辖机关发布了大量“彻底清除”纳粹主义的指示及决定，以保证德国全民族的去纳粹化。1945年9月末，总参谋长埃尔森将军的斯密斯中将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拜仁州将会被清洁，彻底禁止所有纳粹党员活动的计划。然而，拜仁州的许多保守派民众都对这个决定表示担忧。

之前，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已经完全接受并赞同纳粹主义，这让人无法想象他们现在又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改变自己的政治信念的，即使德国的“国民信念”表面上好像已经在向新的当权者靠拢，并且德国人在每个可能的场合都会大声表明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

为了排除暴力，美国实施了“一场纸上革命”——所有居民要填写一张由131个问题组成的问卷，以对其世界观进行总结性分析。这种形式的官方计划建立在以道德检验为目的基础上，做的是所谓的清教徒式的自我审视和测评，也包括了同意被处罚。如福尔克尔·多特魏希和所理解的，这其中的程序颇有政治审讯的意味。

> 恩斯特·冯·萨洛蒙——他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时代见证人（这位出生于1902年的作家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因涉嫌谋杀而被判在瓦尔特拉特监狱监禁）——在其同名自传体畅销书中认为，这份“问卷”颇有敦促人们做天主教式自我反省的味道，此话有一定道理。只可惜在这次“反省”中，人们所诉诸的对象并非天主教会，而是一个世俗机构——盟军军政府。
>
> 问卷以个人基本信息开始，以第131项“外语知识以及掌握程度”结束。完成问卷的填写是参加任何工作或就业的基本前提。为了申请奥格斯堡报社的工作，乌尔苏拉·冯·卡多夫必须先去美国少校那里获得是否可以申请该工作的同意，并完成“一份有着148个问题的荒唐问卷”的填写（数目多少她自己都糊涂了）。“你的体重、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疤痕、你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是否有以及有哪种贵族的头衔、你信仰的宗教、是否离开教会、赚多少钱、是否被逮捕过。我觉得最荒唐的问题是，1933年的选举中你选了谁。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人们大可以在回答中撒谎；其次，我所受的教育告诉我，选举保密是民主基本法的一部分。
>
> 在填表的时候，我们陷入了一种忘乎所以的情绪，简直都忘了我们是来做什么的，觉得这整件事完全可笑到不行。以前是犹太人要这样做，如今显然轮到了有高贵祖母的我们。”

截至1946年3月15日，美国管辖区已收到大约140万份调查问卷，约74.2万份（截至1946年6月是161.3万份）问卷被讨论研究。“在去纳粹化中心提交一份作为人品鉴定保证的‘完美鉴定’成为必要，这导致某些监管委员会很快泛滥。有证在手的德国人，出于同情或者‘助人为乐’的精神，会给他们的同胞也提供一份这样的证明。物质贿赂或‘私人关系’成为‘收买’的常见形式。”

在美国机关收到的1300万份问卷中，有1/4被迫参加调查的人遭到

起诉。60万人被处罚，其中50万人被判缴纳罚金。所犯之罪大致分为两类：类别一较为严重，大约有1549起（都是严重的政治罪或者刑事罪）；类别二是处罚轻的罪，大约有21600起。

> 卢茨·尼德哈莫认为，德国也有“清洁概念”，同样是反法西斯，但宁愿自己组织，而美国的去纳粹化行动则把这样的尝试扼杀在了摇篮里。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被拒之门外，保守势力被栽培成有运作能力但非政治性的管理者，促成了“自由法律”的诞生。尼德哈莫最后说——完全不带政治色彩而仅仅是从去纳粹化的管理技术上来看——这成为前纳粹党员大规模平反的决定性手段。而这一点，拜仁州总理荷格纳早已预见。

> 1947年8月，美国政府因为有意把西德并入反苏联盟，命令克莱将军去纳粹化运动到1948年3月31日正式结束。去纳粹化行动遭到德国有关机构的抵制（美占区有545个法庭被强迫对350万人进行审判），因为，迄今为止，它们只判了一些小罪，而重罪则束之高阁。“吊死罪小的，放跑罪大的。”支持“去纳粹化法”的拜仁州总理荷格纳曾致信在军政府任职文官的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多恩说，此次去纳粹化政治的变动将带来的后果是：那些真正的罪犯，本来已经渐渐地轮到他们了，现在却得以享受宽宏大量的处理。“几年之后，曾经的纳粹主义者就会重新控制德国政府。这话绝不是夸张。”

纽伦堡法庭和双重道德

1945年年末，尽管曾经一致对外的反法西斯同盟已经出现巨大裂痕，但它们还是成功地一起举行了纽伦堡审判。军事战胜希特勒之后，该审判是为未来国际法加入道德因素的一次尝试。

> 根据《波茨坦协定》，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共同签署了关于起诉和处罚欧洲轴心国的主要战犯及确定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协议。以下罪行的罪犯应该被起诉及追究个人责任：“反人类罪，即谋杀、毁灭、奴役、驱逐或者其他一切的非人道行为。”全体会审法官由四个签属国任命指派的四名成员和四名代表组成；此法庭于1945年10月28日在柏林举行开庭会议；审判工作于1945年11月20日在纽伦堡正式开始。

审判庭主席罗贝托·H.杰克逊在起诉书中认定，他的任务意味着沉

重的责任。法庭起诉的所有罪行都必须在审判中得到偿还，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对这些设计巧妙的邪恶罪行的漠视。假如它们再来一遍，文明就会被毁灭。“这里的被告席上坐着20个‘毁灭’的形象。我不关心他们的个人命运。但重要的是，这些被告代表着那些邪恶势力，在他们的肉体化为尘土之后很久，依然会是我们这个星球结构的一部分。”

1946年9月30日和10月1日，历时八个月的审理终于到了对22名已做无罪申辩的被告人进行宣判的时候。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伦纳、罗森堡、法朗克、弗利克、施特莱歇尔、绍克尔、约德尔、赛斯-英夸特及鲍曼（缺席判决）被判绞刑；赫斯、冯克、雷德尔被判终身监禁，斯拉克和斯佩尔被判20年有期徒刑，邓尼茨被判10年有期徒刑，沙赫特、冯·巴本和佛里切被判无罪。四个被起诉的组织，即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盖世太保以及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根据法院宪章的定义被判为犯罪组织。

“纽伦堡必须被纪念，被不断提起——它是在那被科技狂妄所主导的伪文明的荒野中点起的一盏明灯，是那荒野中一片真正‘进步’的绿洲。因为在这次审判中，虽然还没有深入到犯罪结构，但罪行的始作俑者得到了惩罚，他们是那些最终需要对罪行负责的人，那些把地狱带到人间的恶魔。”（埃里克·热格）

> 在纽伦堡，对主要战犯的诉讼后还有12场审判，对象为纳粹国防军和党卫队的医生和高级官员，资本家弗里德里希·弗里克和阿尔弗莱德·克虏伯，法本公司（IG Farben）主要人员，将军欧伦多夫，其他特别行动队领导以及外交部官员。纽伦堡审判一共有206名被告，其中38人被判无罪，102人被判最短18个月、最长20年的有期徒刑，23人被判无期徒刑，36人被判死刑。其中，24人被执行了死刑。

纽伦堡审判的最大争议点在法律公则和司法制度：罪刑法定原则。没有人应该被那些行为之后才规定和宣布的法律法规惩罚，即犯罪之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能定罪处罚（后来的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的基本法第103章第2节中也写了这个内容）。然而，被告人却又是因为以百万计的谋杀罪而被起诉，根据的是当时德国已有的刑事法——此处指的是德国1871年的刑法法典——这是诉讼和审判的基本。纽伦堡审判有了新的法律规定，将国际法扩展到国际刑事裁判权。历史上第一次，个体的人因为违反国际法而需走上国际法庭。



纽伦堡法庭：被告席

另外一个拒绝这种所谓“战胜者的正义审判”的原因是，这些战争胜利者所谴责和控诉的行为，他们自己也做过——只因为是自己人就不被定罪接受惩罚。事实上，斯大林在诉讼还没有开始进行前就已经提出，某些特定的主题是绝对不允许涉及的，其中有德国与苏联1939/1940年的秘密协商以及那场苏联所犯却拒绝承认的、约2.57万名波兰军官被残杀的卡廷大屠杀。

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大约250家报社和电台的新闻记者、摄像以及

电影摄影师参加并固定追踪了此次审判。此外，约翰·多斯·帕索斯、尤历卡·曼、比特·德·门德森分别为《生活》《伦敦标准晚报》《新政治家》三家报纸媒体撰写报道。维利·勃兰特从不来梅到法兰克福再到纽伦堡："我不知疲惫地写着报道，但是不止一次地，我觉得我那位美国同事给家里打电报的状况也很值得报道：'我快崩溃了，已经无话可写了。'"

德国媒体也积极投入报道诉讼审判的过程，并公布了大量资料性的背景消息。就纳粹政府的恐怖统治，这是第一次给德国民众上了一堂如此完整的大课——尽管面对这些诉讼审判他们并不那么关心。

> 与纽伦堡法庭的道德原则形成间接对比的是，美国上至最高军方及市政管理机构，在审判纳粹犯罪和罪犯或纳粹党羽时的道德立场的含糊和摇摆。这体现在，比如说，美国外交部在战争期间的所谓姑息主义集团对纳粹经济精英的明显的示好，还在和平时期时两者就有密切联系。这些行为给欧洲的犹太人带来了悲惨的后果。美国外交部被派往帮助德国迅速复苏经济的人，也是在战争期间负责制定美国政府对犹太难民的政策的人。这个"姑息主义集团对逃亡的难民不采取任何拯救行动，把任何关于集体种族屠杀的消息尽可能地大而化小……当纳粹的大量大型屠杀轰轰烈烈地进行时，这个姑息集团还阻止所有美国的救援行动，哪怕只要相对简单的措施就能拯救1万人的生命"。
>
> 这些德国经济精英，本来只要作为政府成员露面就一定会遭到公然拒绝，但马歇尔计划的钱让这些"精英"重新出现在半国营性质的经济领域成为可能——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角色。盟国的双重道德标准还体现在，无论是英美法盟国还是苏联都费尽心思地为自己的阵地招徕德国科学家，无论其政治上是否有多么不堪的过去——单单在美国的管辖区就有1000名这样的科学家被招揽。此外，在西德，为纳粹科学家大开方便之门或对其逃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也大有人在。上千纳粹官员通过"梵蒂冈教廷"或"修道院"或"潜逃"路线，逃向世界各地。随着冷战的开始，西方战胜国当局还帮助大量的重罪纳粹分子获得自由以及再次获得事业晋升，特别是军官和特工，因为当局想利用他们的技能。

罪与罚 [2]

1945年苏黎世剧院，马克斯·弗里施上演了一出名为《他们现在又唱歌了》的话剧。在剧中，死者的世界（21名被德国处决的人质在被处决的过程中唱歌）和背负着罪与罚的活人的世界面对面。“您知道，人们在说什么吗？现在他们又在唱歌了！他们说：只要他们听到枪声或者不公之事发生，他们就会唱响！”这出话剧在德国上演的时候，面对这个摆在自己面前的责任问题，震动至深的德国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弗里施击中了时代的神经：“每个人都关心和担忧自己的罪责。”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二战时期逃亡到美国的挪威小说家西格丽·德温塞特的眼里，德国人的哀悼与伤痛几乎是假惺惺的。她在1945年10月25日的《新报》上提到，在这个拥有7000万人的民族里，如果单看个体，自然分好男人和好女人、坏男人和坏女人、聪明人和笨蛋，但作为整体的德国人，其民族的、集体的思想立场一定非常糟糕。

卡尔·亚斯佩觉得“这个挪威女人的愤慨完全合理”。并且他回应道，注定要绝望的人不能再回答。“在无权无势、手无寸铁的时候，如果还想继续活着，就不得不选择装聋作哑、顺从忍耐。但如今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战胜国和他们土地上那些懂得认同人权、谴责罪人的人民告诉我们：德意志民族不应该灭亡，这意味着，他们给了我们生存的机会。我们德意志民族应该被教育，这意味着，我们被允许重新构造和发展我们原本美好的精神世界。”

卡尔·亚佩斯在他的书《罪问》（*Die Schuldfrage* ）里面再一次非常努力地对纳粹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述。1948年，也就是该书出版一年后，他接受了巴塞尔大学的职位。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某种听天由命的情绪，即使这位哲学家在关于离开的声明中强调，去还是留并不能表明他的信条。当他已经无心研究过去的时候，这个道德哲学权威离开了德国。

另外一个道德哲学家更是再也没有回到德国：托马斯·曼拒绝接受

他家乡的住所。瓦特·冯·莫洛，1933年的普鲁士诗人学会主席，在1945年8月向托马斯·曼提出请求："请您快回来，告诉大家，人有义务去相信人，并且一再去相信。否则人类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 莫洛的信被公开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法兰克·提斯在他的文章中对这封信进行了思考，他呼吁境内和境外逃亡移民的团结："我们并没有期待自己因为没有离开德国获得什么奖赏。留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但是，那些像托马斯·曼那样真诚而深刻地感到痛苦的祖国的儿子们，居然至今都还没有找到回到祖国的路，这有些奇怪。让我们拭目以待，他的痛苦会最终是通向死亡还是重生。"托马斯·曼在回信中不无讽刺地声明，假如德国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而欢迎他回来，而不仅仅只是想重新拥有他的作品、他的名声，他会很高兴。"我没有忘记，您后来做了多少糟糕事，而我则侥幸逃脱。很多事情您都不了解：流亡的心悸，那种连根拔起的痛楚，那种无家可归的紧张和恐惧。"



在伯根-贝尔森的万人坑，**1945**年**4**月

从1919年就已经生活在瑞士的赫尔曼·黑塞也拒绝回到德国，拒绝为德国人民的再教育出力。黑塞不满德国国内蔓延的机会主义。

和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一样，很多当时到访德国的人都认为，德国国内的改变是不可信的。人们到处都会遇到那些变脸艺术家，他们现在虽然表现出忏悔，但是其悔意的真实性和真诚性不得不让人存疑。

1949年8月，女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自1933年从德国逃亡

后首次回到故乡。她在大学生时代曾与马丁·海德格尔成为朋友。海德格尔在1933年任弗莱堡大学新“选出”的校长，被纳粹崛起的伟大与荣耀所环绕。他曾经试图用种族主义的论调毁掉他一位慕尼黑大学的犹太同事，其手段不可谓不肮脏卑鄙。作为当年万马齐喑中特别突出的一个，他在战争结束后没有任何表现出悔过羞耻的姿态。阿伦特记录道，纳粹的罪行、战争以及失败的事实，是被接受还是被抑制，将笼罩德国的全部生活。她说，德国人想出各种方法以回避这个震撼后果所带来的影响。从杀人工厂中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一种可能，即德国人只是做了其他人也能做，或者将来处于相同状况下也会去做的事情。盟国不得不完成一个完美复仇计划的任务。它证明所有人的罪孽同等深重，不知这算不算是某种安慰。

在政治运作层面上，欧根·科贡已在1947年提出了政治错误的合法性。他认为，自两年前开始，人们从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中解放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方式本身造成了今天的混乱局面。科贡说，当下的结果首先是：非纳粹化比再纳粹化还少。四处流传着这么一句调侃讽刺的话：自从民主的太阳照耀了我们，我们就越来越纳粹了。

“德国的缺陷和盟国的错误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似的，稳稳地无缝对接。这真令人害怕，它成功地使所有看到这一点的人感到了紧张。”

诚然，科贡担忧的是德国民族主义会以某种新形式崛起——1949年6月的《月份》杂志曾展开一场关于德国是否会重新“觉醒”的讨论。

神话般的反法西斯主义

在苏联占领区（和后来的东德区），反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神奇的公式，在它的帮助下，社会各界共同起誓团结一致，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这种通过反法西斯所包装的讲话方式，具有神话般的特质。“反法西斯的神话建立了一个自己特有的系统，后来的语言无不遵从：德国社

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的政治讲话，无论是关于反纳粹的起义还是关于集中营的‘生活’状况……所有讲话最后都凝结成了一种被‘反法西斯主义’概念所主导的神话模式。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这个概念是一个‘不稳定的，朦胧的凝聚’。其‘整体性’及与之相关的‘功能’都和这个神话的建立有关。”（米迦勒·齐默尔曼）

苏联占领区和后来东德的反法西斯主义真正兴起的背后原因是，苏联军政府和德国共产党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坚决贯彻执行波茨坦会议关于合作开展惩处和清除纳粹主义的条款。

该决定促进了快速地进行土地、经济、教育以及司法改革，还包括了征用军工企业和战争罪犯及纳粹罪犯的所有财产。这首先对社会主义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相当迷人——这些人最希望阻止魏玛共和国的落后及反动力量复辟了。

大约有52万名纳粹主义者、军官和战犯被追究责任，85%的法官和检察官被关押，由人民法官和人民检察官取代其职位、接手其工作。在教育界的4万名教师中，有2.8万名老师因为曾是纳粹党党员而被解雇；他们的岗位被仅受过短期培训的新老师接替。教育特殊化被综合学校的引进以及教会和学校的分离消除。大学教育应该主要是让农民的孩子和工人受益。

从1945年9月开始，苏联管辖区就已经不再有终身制公务员了。在一系列的土地改革过程中，所有拥有超过100亩地的人及纳粹积极分子的全部财产都将被无偿征收。超过50万名农民工、失地农民和东欧来的难民分到了平均每人4亩的土地。截至1950年，大约21万名新农民产生。310万亩土地中有210万亩被分配出去，余下的全部成为后来所谓的全民所有财产和社区集体所有土地。工业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国有化（即转变为全民所有）的方式。

在西占区，苏战区消除法西斯结构的这股能量受到左翼或左派自由主义的欢迎。苏占区的民间党派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反法西斯方针。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恩斯特·莱默指出，在这四个反法西斯-民主党派之间已经发展起了一种团结，如果没有这种团结，后来的新德国根本不可能建立。

重视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中坚力量很快就意识到，苏占区的反法西斯主义脱离了法制道路并吸取和采用了斯大林的大清洗方式。

就连战后直接从“底层”组建的人民委员会和反法西斯委员会都被列为非法。早在1945年5月17日，瓦尔特·乌布利希就已经在威廉·皮克那里抱怨过这些“自发行为”，对德国共产党同志的“革命观点”也颇有微词。他指出，“各种莫名其妙的‘委员会’和‘委员’纷纷出现”，“我们大部分的同志是被拉帮结派地安置的”。甚至在反法西斯阵营里也可能有纳粹的掩护机构，它们的目标在于阻碍民主的发展，“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瓦解它们”。



法西斯牺牲者日，德累斯顿的集体大会，**1945**年**9**月

“法西斯主义”被当作一个统称来使用，它成为关押和迫害反对派及自己队伍里的异己或清除“阶级敌人”的理由。事实上，这种断言不仅仅始终只涉及纳粹机构的前任机要员；从一开始，国家官员、行政管理人员、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教师、记者、医生、学者、高级知识分子、企业家、工厂主以及“贵族子弟”等都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和资产阶级精英，要被孤立和“消灭”。

在苏联政治警察（德文缩写为NKWD）[3] 指导下布设起来的营地和以前的纳粹集中营没有多大的区别。“1933年的第一批纳粹集中营和1945～1950年关押大约24万名‘阶级敌人’、约9.5万人在关押期间死亡的11个苏联特别营地，它们的极权精神颇具可比性。越是了解苏联特别营地，就越是发现这种苏联式‘反法西斯的’伪共产主义是多么腐朽不堪。”（曼弗利·黑宁森）布痕瓦尔德一方面是一个纪念英雄的痛苦与反抗的地方；另一方面，这里直到1950年都被当作新的国家公敌营地（有1.3万人死于此）。

当机会来临——人们在首次还算是自由选举时害怕右翼党派获得优势——在苏占区内，人们开始区别“积极纳粹党成员和名义上的纳粹党成员”。“名义上的纳粹党成员”需以忠诚的行动来保证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根据苏联军事管理处1947年8月16日给德国的第21号命令，没有犯罪的纳粹党成员将被授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然，这个指令也颁布给了德国司法法院，用于打倒和惩罚犯罪的纳粹分子。没有法官批准的逮捕也是可行的；法院的全体人员都被操控，陪审员也已被给予了“正确性的”指导。当时的德国中央对内管理处副主席埃利希·梅尔克强调了该命令的政治意义（……“进一步巩固我们权力的子问题”……）。针对有人反对在调查中应用盖世太保式的方法，他强调，尽管这种方式是不被允许的，但是调查工作不能不应用这种“必要的强硬”。涉事者也是在不知要被带去批斗的情况下被请走的。尽管早前已有约3万名德国人被苏联法庭这种诡异的快速审判判决，如今这些新的审判也还是太过可疑。

这次司法恐怖的高潮是1950年春天凯姆尼茨地方法院的“瓦尔德海姆诉讼”。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指导处对拣选出来的法官和检察官

的指示是，此次被告的罪状已经被证实，所以传召证人、收集证据以及辩护过程都可以直接跳过，关闭公开审理。半个小时的审理就敲定了判决结果。26名被拘禁者被判死刑。此后，民主德国政府的追捕和迫害热情逐渐减弱。截至1957年，一共只有2场纳粹审判。在“社会主义重建”中，东德所呈现的是一个划清过去的国家，一个从德国的罪责中解脱出来的国家。

但这也包括了掩盖纳粹罪行。在民主德国40年的历史中，只有一次针对纳粹“人道清除”[4]罪行的诉讼。假如重建需要，纳粹专家就会立刻得到平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大佬们不但到最后都没有向犹太人道歉，反而通过拒绝归还种族灭绝中幸存者们充公的财产，成为纳粹雅利安化的受益人。只有图宾根州曾有过战后赔偿法，但也好景不长。虽然纳粹受害者可以拿到相对高的薪水、住相对好的公寓以及有特别的奖学金提供给他们的孩子的教育，但是也只有那些服从、顺从统一社会党的人才能受得这样的照顾。

在民主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面对过去、反思过去这样的概念就已经不再重要，至少不再是重要的公共话题。联邦德国则被演绎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发展或复苏的基地，是社会主义进步东德的反面教材。

---

[1] 伯根-贝尔森集中营，也称贝尔森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德国西北部下萨克森建立的一座集中营。1943～1945年，统计约有5万名俄国战俘和超过5万名犯人死于其中。该集中营于1945年4月15日被英国第十一装甲师解放。

[2] 《罪与罚》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长篇小说。此处借用其隐喻。

[3] 内务人民委员部（Narodnyy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NKVD）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政治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实行机关。

[4] 纳粹的“人道清除”，包括杀害患病儿童、残障人士、集中营囚犯。

第4章 黑暗中的德国

在路上

当战争机器停止运转，一场大型的“迁移”开始了：“因为恐惧而逃亡”。人们都在路上：在街上、沿着铁轨、越过田野，步行、骑单车、开货运车、挤火车。难以想象的大规模迁移的不幸场景随处可见。在欧洲，当时有2000万～3000万人无家可归。

“火车，渡轮，收容所/道路纵横交错，四处/挤满。到处都一样：/从哪儿来，去向哪儿/回家，/大概家已经不再属于我/烧焦的废墟上，/隐约有人的面容，颤抖、颠沛/穿过寒冬微光里的原野/拿着一小包东西……”（玛丽·路易斯·卡斯尼茨）

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在一篇报道里说，这片土地上纵横交错的铁路是民族的生命线。迁徙的人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其中很多人其实无家可归，只好以火车站和火车为家。铁路上的生活：“成千上万的对话，用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成千上万的闲聊，迷失了来时的路却依然希望寻找明天。”

在路上。除了去监狱服刑的人，还有刚刚从监狱里放出的德国士兵和上百万流离失所的人。纳粹分子曾经在所有被占领国征召强迫劳动者。在这近1000万被驱赶的人中，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占大约一半。如果他们无力独自踏上返乡的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会替他们组织遣返回国，但首要任务还是为他们建立临时收容所。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约有100万来自东欧的难民拒绝回到祖国家乡；他们想移居国外，留在西方（这也是导致苏联和美国政治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因为两国对强制遣送难民回国并没有做好准备）。

在这些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中也有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犹太幸存者。这些幸存者同别人相比更加无家可归，本已艰难的难民营常常必须增加更多的落脚之处。很快，大批波兰犹太难民也来到难民营。慕尼黑及其附近地区是大屠杀幸存者向往的避难所。

在路上的大部分人都是平民：在盟军轰炸前及时撤离的人，其中还有许多从KLV（被遣送儿童所）[1] 回来的孩子，他们艰难地返回城市。反之，城市居民则做“仓鼠之行”[2] 。另一些人则努力与亲戚朋友再次取得联络。谁看见我的儿子了？谁看见我的丈夫了？母亲们、父亲们、妻子们、孩子们，不停地问着路上缓缓前进的人们。他们展示着照片，希望能得到亲人的消息。

驱逐

战争结束前，大约有100万德国人在苏联红军的节节挺进前逃亡。如今，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他们像当年以色列人迁出埃及那样，逃离东欧。

> 为了苏联的利益，盟国决定将波兰西移，德国由于此举损失的领土则通过把德国和波兰的边境线移到奥得-尼斯线（Oder-Neiße-Linie）来补偿。依然居住在现在的波兰边境的德国人被驱逐出境。《波茨坦协定》中也有关于德国人口转移的部分，盟国据此计划把“滞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国人遣返德国。这个遣返必须以人道的方式进行。1945年11月20日，盟国对德控制委员会确认了该计划。

从1945年到1950年，来自前第三帝国的东部地区、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的约1173万人被驱逐，剩下约264.5万人。此次驱逐共造成约211.1万人丧生。“现在，被宣泄的仇恨一方面在于德意志民族的陈年旧疾，即一直以来对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缺乏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也没有想办法推进和维护德意志少数民族的自主自立。希特勒是这些矛盾纷争的始作俑者，纳粹分子在德意志民族和布拉格以及华沙政府之间挑拨离间，终于造成了一些事件，给希特勒提

供了入侵的借口。早就在德国土地上安顿下来的那些民族也无视共同生活的原则，站在纳粹镇压者这边。大量的人口迁移是由德国人开创的。从1939年开始，10万人被从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和西普鲁士向东方驱逐。几十万原住波罗的海诸国、沃利尼亚、加利西亚、比萨拉比亚、布科维那以及其他‘去往帝国的家’（Heim ins Reich）地区的德意志人在这里定居。”

旧债方偿，新债又生。驱逐不仅通常是在非人道的条件下进行的，还涉及骚乱和集体屠杀，国外煽动者也被运来。（因为土著人不希望或者只有少数人希望参与这种野蛮的私刑，比如1945年7月31日的乌斯季屠杀。）[3] 移民通常都被强迫去做劳工或进拘留营。驱逐的通知在上路前几天才到，在遭驱逐的同时还包括被侵占财产。

> 一名来自布尔诺的被驱逐者回忆道：“完全不考虑老人的疲惫身体，我们被没日没夜地沿着公路驱赶前行。就连一点坐下来吃饭的时间都不给我们。他们一边从后背鞭打我们，一边喊着：‘你们这些德国猪，快点！’我们在正午的炎炎烈日下抵达了赖赫拉德。在那里，我们的背囊被再一次搜刮，所有半路上能用的、能吃的都被夺走。然后就继续向波尔里茨前进。许多孩子和病人已经走不动了，依然被用脚踢、用枪托打，被迫挪步，直到体力耗尽，直接一起拖到街沟里。没有丝毫抱歉或者不好意思的……层层恐怖笼罩着我们。我们队伍中的人越来越少。这样的酷暑，却从来不许我们喝水，甚至从来不许母亲给婴儿哺乳。正是因为这样，许多婴儿在途中夭折。”



在德累斯顿经过的难民，**1945**年**9**月

被驱逐的人抵达德国后，总算是基本安全了，但又有很多新问题产生。身无分文、衣不蔽体，连换洗的内衣裤都成了急缺，要找到容身之所更是难上加难。并且，本土居民和当地政府也懒得管，所以收容所也可以拒收难民。

在这片新的家园里，被驱逐者的处境只能缓慢地改善。例如，1946年10月，拜仁州仍有14.6万名难民居住在非人的生活环境里。“除此之外，宿营的难民还常被以强制手段送进私人住所居住。这也让本地居民和难民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本地居民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得到保障。农村的形势更严峻。来自手工业和工业地区的难民很少参加那些急需劳动力的务农作业。这些被驱逐的人经常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排外的社会环境。尽管偶尔有‘通婚’，但是这些通婚的人还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完全地融入当地社会。另一个背景的不同体现在宗教信仰上面：苏台德人主要信奉天主教，西里西亚人则以新教徒居多。尽管拜仁州的信仰结构并没有在数据上呈现出改变，但是宗教会社内的

信仰团结被打破了：1939年，拜仁州共有1424个本地的宗教团体，1946年只剩下了9个完整的团体。”

战争失败了，还带来了资源的全面衰竭，德国毫无抵抗地接受了东部地区领土的丧失。在苏联占领区和后来的民主德国，奥得-尼斯界线在官方的语言里甚至被称为“和平界线”。直到1970年，西部的联邦德国都拒绝在官方场合承认这条界线，但在具体的政治宣言中对其进行了确认。

> 受害者有惊人的忍耐力。“他们忍受了逃亡、强制搬迁或被驱逐。他们失去了亲人、财产和家乡。甚至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许多人都必须生活在难民营里。这些人的数量在800万～1000万。但他们居然没有革命，既没有社会革命也没有民族革命。他们没有像阿尔及利亚人对法国人那样建立起秘密军事组织（OAS），没有像巴勒斯坦人那样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他们没有变成恐怖主义者。他们并不拒绝加入西德社会，而是带着巨大的力量前行。他们没有坐等返乡那天的到来，而是在外地、在难民营里庆祝家乡的节日——用团聚和政治演说的方式。这些团聚和演说微不足道，却能抚慰他们受伤的灵魂。”
>
> 1950年，被驱逐者联合会放弃了“复仇与报复”，全身心地投入一个致力于为其追随者实现合理的实质性索赔的事业中。尽管他们试图阻碍过所有东方政策的实施，但那并没有造成什么危险影响。波恩当局从未要求收回东部地区的领土，而仅仅是拒绝承认领土的丧失。



纽伦堡的临时房屋

日复一日的困苦

在接管德国国家暴力机关的同时，占领国也通过法律接管了救济政策。所有占领国如今都在努力，稍稍填补一下日复一日的困苦的空白——在欧洲，希特勒的战争和恐怖统治带来了一片焦土，摧毁了经济。

从英国流亡回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尤尔根·卡钦斯基在经过穿越德国几千公里的旅程后，在一封写给同样是流亡回国的诗人安娜·西格斯的信里写道，他逐渐认识到，就德国现在的状况而言，什么是最重要、最具决定性、最基础的东西："任何时候，当你想着运用各种安慰或严厉的言辞去和人们交谈、辩论、解释、沟通，当你想在思想中或者在实际中帮助他们清除法西斯主义留下的碎片时，请不要忘记……他们饥饿、疲惫、没有工作。"

> 《今日》杂志的第2期追溯了欧洲粮食危机的源头：纳粹分子不仅把被占领国的食物储藏洗劫一空，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适当的粮食生产条件。不仅如此，这场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交通工具匮乏，而这会导致食品运输和分配困难，这个困难的后果如今正在显现。于是，一面是农村粮食过剩、满园满野的食物放置腐烂，一面是被饥饿笼罩的城市。五年的捕鱼限制让欧洲北部海域蕴含更多的鱼量，但是无数渔船和码头设施的毁坏只能让总捕鱼量，也是数年来最好一次的渔获量中的一小部分能够运达欧洲市场。

“卡路里”是一个神奇的概念。和平时期的通行标准是每人每天必须摄入3000～4000卡路里的热量，现在，这个界线被定在1550卡路里。开始时，甚至连这个水平都不能达到。比如说，多特蒙德曾经在战争期间实现了每人每天2000～4000卡路里，1945年5月和6月下降到了891卡路里。在萨尔，每人每天大概耗费1000卡路里的热量（矿工有特殊补贴）。在波茨坦会议上，盟国明确规定，德国的生活水平不得高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除了英国和苏联。莱纳·格里斯在他的《粮食定量社会》中指出，热量的水平是一等重要的政治问题。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日益紧张，西方盟军能给予多少资助物资也成了他们重要的“形象宣传广告”。多少卡路里代表共产主义，多少卡路里代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呢？

> 瓦尔特·肯博斯基是苏联占领区的一位居民。他还记得1945年日复一日的饥馑和粮票。他回忆说：“母亲和祖父拿到的是5级‘饥饿票’，用这类票只能买到咖啡替代品。战争时的黄油盘可以收起来了。所有的食品储藏库都已经被纳粹销毁。但是，万能的苏联还是很快让食品运输轨道运转起来。葵花籽油和其他他们有的一切东西。库尔女士对我们说，新任市长求问司令官，如果老百姓饿死，他该怎么办。扩建墓地，这就是司令官的回答。我拿到的是4级票，‘吃不饱，也饿不死的量’。但我们也没有挨饿。地窖里还存着去年秋天的土豆。阁楼里还储藏着3箱猪肉罐头，4方罐食用油，醋和糖。大奶酪圈必须每周用盐水擦一遍，否则会变干，每天晚上，我们从中切一小盘。”

> 作家汉斯·埃里斯·诺萨克描写了汉堡的普通一天中——在《沉沦》里描写了整个城市被炸弹轰炸毁灭——人们如何为求生而绝望地努力。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他待在商店里面不出去，因为外面天寒地冻，更因为他只能买得起两片干面包。而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已经走

完了去人民食堂领取食物的一小时路程。因为缺电且没有做饭的条件，人们只能依赖食堂。多数食品都由那里配发。“大约下午3点，她在燃炉上把吃的加热，这样房子也能稍稍暖和一点。饭后我要么做些手工，要么劈柴。大约5～6点我会试着睡一觉，拉起窗帘，用睡觉来代替缺少的能量。晚些时候我们还会吃些茶点和小吃，如果没有人来拜访，就会在15瓦的蜡烛下坐着做点事。10点时警笛鸣响3次，10点15分响2次，10点30分响1次，这表示‘宵禁’，我们被禁止外出。我还会醒着在被窝里坐到凌晨1点钟，直到把床捂热。”

自从纳粹经济和战争政策崩盘后，帝国马克[4]便不再值钱了。人们只能到配给卡制度外的黑市，尤其是以物易物的市场上去，“免费”获得更多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他们用皮草、首饰、银器、地毯、家具和艺术品换来鞋子、保暖衣物和生活用品。

美国国会公文里有这样一个矿工的案例：这个矿工每星期挣60帝国马克。他还有一只母鸡。它每星期平均下5个鸡蛋。通常其中一个蛋矿工会留给自己吃，其余的4个他则拿来易换20根烟。在黑市上，这些当天市价为8帝国马克的物品会以160帝国马克的物价出现。也就是说，这只母鸡的劳动成果所赚取的价值是它主人的将近3倍。（特奥多尔·埃什堡）

尤其是香烟货币。西方盟军的士兵和美国人特别确保了此类供应的稳定，那些在盟军服务处工作的或者是有熟人在占领军中的德国人（尤其是“小姐们”），能够在黑市上高价贩卖香烟或其他物品，或者进行易物交换。这种黑市交易甚至渗入军队的最高层和管理机构。至少在一些大的黑市交易里，哪怕某些买卖（比如说像青霉素之类的药品）极其肮脏，人们也完全不认为黑市交易是非法的行为。

这番斗争完全是为了维系生存。因此，人们认为，以非法的手段去获取必需品应该理所应当地被允许。当人们为了“自救”而劫持了盟军运输的煤炭时，科隆大主教弗林森对这个行为给予了教会的理解和赦免。因此，民间传言中把此次行动称为“弗林森行动”。

饥荒给那些没有被战争和驱逐殃害到失去家园和财产的农民带来了

极大好处。“他们可以自给自足，盈余的就在易物贸易中高价售出。用从城市里拖来的波斯地毯铺牛舍好像很夸张，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由于食品配给运输存在问题，每个地区的农业结构都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像鲁尔区的处境就明显比拜仁和梅克伦堡要困难得多。1946年5月，一个美国记者在他的一篇关于梅克伦堡（280万人口，约为1939年的两倍）的旅行报道中指出，该州的粮食情况比某些美国和英国地区的要好很多，原因归结于他们良好的农业结构和其间土地改革的作用。苏联军政府所规定的份额交售系统让德国农民相当担忧：去年总共收获了91.3万吨土豆，其中61万吨必须要被征收。“苏联官员表示，不仅是农民本身的粮食，而且还有农产品征收额都要通过这些给农民分配的种子来保证。对于已经习惯了原先传统方法的农民，这种规定额度的系统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不合算的。”

饥饿、黑市和毁灭——克里斯多夫·克列斯曼认为——是谈到“战后早期”时人们最先联想到的画面。“时代史不仅是对那些历史性时刻的记忆，还有那些军事和政治彻底崩盘后最直接、最真实的经历。”

> 1945年，从挪威、瑞典回来的维利·勃兰特战后第一次来到不来梅，看到了“一座处于生死攸关之际的城市”。“不来梅市市长把这所城市称为‘一片爆发过后的火山区’，还有一个海港，但早就名存实亡。无法想象它被摧毁的程度，真是史无前例的崩溃。马上就过去半年了。我在归美国管辖的威悉河河边，苦苦思索这种程度的破坏的答案。”勃兰特说，他遇到的人衣衫褴褛、营养不良、对未来没有任何想法。“不来梅是一座处于生死攸关之际的城市。在这里，生命和对生活的兴趣再次勃发。在那个9月中，我体会到了，人类的痛苦和伟大是如何紧密相连，遗忘又是如何同时蕴含着逃离和祝福。”
>
>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这片废墟中的街区。在一些瓦砾堆上，一个十字架或者一个小牌提醒着人们曾经发生了什么。一些人在家旁的废墟中寻找着什么。在马格德堡的街上，每天都有100～200人提着水桶在水泵前面排队，噢，来自奇迹的水。他们都住在半毁或全毁的建筑里，有些人也住地下室或者那些所谓的单间，那是用碎木条和废墟墙壁的碎片建起来的房间。

破坏——从统计上来讲，德国城市所崩塌的瓦砾量超过4亿立方米，约为1000万节火车车厢的容积。在西德有近225万人无房可住。

如果从空中给这个毁坏的城市拍一段录像，人们很难从影像里猜测在这片荒凉的凹陷地和破房子中还有人在生活——他们曾经生活在那里，现在又重新生活在那里（从战争或者撤离中返回，只要没有入境限制）。

通常只剩下地下室能住：地下室住房，像临时房屋、军营、尼森小屋（Nissenhütten）、地堡、半圆拱形活动房屋、窝棚、宿营车等都属于“临时简易住房”。此外还有人“住宿”在营地、宿舍、饭店、体育馆等地。“普通的住处”在遭到轰炸的城市里普遍奇缺。还有些人，尽管自己的住处在战后还幸运地基本未受损地留在那里，但也会面临这样的情况：撤离或逃亡回来后，自己的住处已经被陌生人占了。

房管局努力让现有的房屋被合理分配，可这只能通过强制实施的方式才行。有足够住房的地方都会被征用。

> 难民们忧心忡忡，眼巴巴地祈求住宿。绝望的脸上流着泪水。我们想给他们帮助。他们迫切需要至少几天的生计。（但是，没有房管局的准许，票务中心是不允许擅自向外发票的。）他们在亲戚或者熟人那里，在空的窝棚里或者地下室里短暂歇脚，但这恰恰是应该避免的。如果柏林管理当局不懂得心比理智更重要，整座城市就会面临饥荒和瘟疫……难民们被送往收容处，那里有着安全的临时护理和医疗监控。返乡者归来想回到自己原来的老住处，结果发现这个住处已经被9个新租户占住。各种激动和愤怒。必须要找出一个方法，能同时平复双方情绪、满足双方要求。谁曾经为了活命离开自己的家，谁就不能指望现在轻易地重新拿回曾属于他的财产。那些经受过战争考验的陌生人，自然有权利得到房屋的使用权。屋里的家具自然还是他的财产。然而，这些返乡者必须要尝试与现在的租户共同分享这间住房。双方当然都很委屈——但住房实在紧缺。

---

[1] 被遣送儿童所（Kinderlandverschickung，KLV）是二战之前专门为儿童的收养和送遣而设置的机构。

[2] 二战后很多人坐火车从城市到乡村，拿着值钱的东西向农民换取食物。这种现象被称作Hamsterfahrten，即仓鼠之行。

[3] 乌斯季屠杀是1945年7月31日发生在拉贝河畔的乌斯季的针对德意志人的屠杀事件，乌斯季是波西米亚北部（苏台德地区）一个居民主要是德意志人的城市。7月31日15点30分，位于城内布雷兹诺的一座军火库爆炸。死亡人数为26人或27人（其中7人为捷克人），数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后，针对德国人的种族屠杀立即在城内的四个地点开始，他们都戴着白色臂章，因此很容易识别。包括妇女和儿童遭到殴打，被刺死、枪杀或淹死在消防水池里。肇事者是革命卫队（战后准军事集团）、捷克和苏联士兵以及一群从其他地方来的捷克人。

[4] 国家马克，又名帝国马克（Reichsmark，标记为RM）为德国自1924年到1948年6月20日期间发行的货币。1国家马克等于100国家芬宁。国家马克的发行是为了替代已经极度贬值的纸马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马克分别被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所取代。

第5章 民主的复苏

国家结构和建党

盟国在接管德国政权的同时，也保留了德国人自己的行政组织，并且在各级管理处任命了新的高级管理人员，如赖诺尔德·麦尔担任符腾堡州总理、威廉·凯泽担任不来梅市市长、弗里茨·沙弗尔以及继他之后的威廉·霍格纳担任拜仁州总理、卡尔·沙纳格尔担任慕尼黑市市长。许多后来知名的联邦政治人物，像康拉德·阿登纳、弗里茨·厄勒、古斯塔夫·海纳曼、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等人的政治生涯也是从当时任职市长或者参加议会起步的。

占领国手里握有完成新民主任务的候选人的完整信息。早在1942年年初，美国人就着手建立“白名单”，直到1944年12月才大致完成。这些名单首先根据流亡者的想法——他们中有一批人在美国政府和管理机构之中工作——和“秘密来源”（1941年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前的美国驻德使领馆所掌握的信息）形成，其次根据美国商人的说法以及情报局的调查研究结果。此外，它们还采用了“好意的”战俘意见，以及从占领区的宗教人士和前民主党派代表、工会以及逃亡者内部知名人士的意见中提取的信息。那些被纳粹党开除或在第三帝国初期就隐退的官员都被重新召回任职。这些被盟国任命的德国管理人员深知“提升”一词的双重意义：他们被授予职位，并不是经过长期的选拔程序最终获得影响力——他们不得不想到，如果被看出，比如说，不够好或者不顺从，就会立即被再次“解雇”。基本上，他们都是被开到公寓门口的军队车辆（吉普车）“接走”，然后领到办公室接受新的任务，没有丝毫考虑的时间。

在西部，盟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行政权又重新交回到德国人手里。结果表明，这个由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管理人员组成的“原装”管理班子是

成功的。“传统的德国管理系统完美地适用于盟国当时的处境……一方面，面对最高国家权力权威时……它总是行得通；另一方面，面对那些对现在的军政府充满疑虑的社会活动时，总是行不通。”（西奥多·埃申堡）

在东部，严格的去纳粹化与共产主义的宗旨导致精英阶层产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公务员被废除。早在1945年6月，苏联军事管理机关就已经在萨克森、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图林根、萨克森-安哈特等州以及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安哈特等省任命了管理机构及其主席，建立了11个德国中央政府机构：交通运输、邮政电信、贸易和公共事业、工业、燃料工业、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司法等；5个下属机构：德国移居、统计、税收管理、内部事务与区域间事务——比如对外贸易。虽然重要位置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但他们同时也培养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党派人士。1946年10月，在州议会、专区议会以及市议会于大柏林举行选举时，由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强制合并而成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获得了绝对多数票，建成了所有党政府。最值得一提的是图林根州总理鲁道夫·鲍尔，因为他极力追求某个独立的、不同于其他苏联占领区的政治宗旨：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地维持德国各联邦的独立和稳定。在1947年6月5日到7日召开的、拜仁州总理汉斯·艾哈德也受邀参加的德国各州总理会议——州总理会议将是未来23年内，东西两德州政府首脑彼此最后的联系所在——后不久，鲍尔逃到美国占领区，并首先在那里躲藏了两个月。

1945年9月，在西部，美国人首先建立起了以现在的“联邦州”为称谓的综合性行政区域：大黑森、符腾堡、巴登和拜仁州（1947年年初不来梅州也加入其中）。英国人随即效仿，在1946年建立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下萨克森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行政区。法国人在其占领区内也建立了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紧随着崩塌的是社会的重建——在社会重建的第一阶段，基层管

理机关是唯一尚可有效运转的行政管理单位。而这些也符合（西方）盟国的政治目标计划，即通过再教育项目，发展“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基层民主）。市政当局很快就领会到，这样一个自治概念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并可以在之后的建国中引用——特别是联合加强地区乡镇的地位。早在1945年8月已经开始筹备德国城市联合的准备工作——这是康拉德·阿登纳的倡议——虽然遭到西方盟国的质疑，但是推动此进程的德国政治家依然立足于德国的民主力量坚持前进。直到1946年，各大城市和各州的选举（有了在小中型城市的经验之后）才被准许；这成为后来民主党派被接纳和建立的前提。



康拉德·阿登纳在西柏林和柏林市市长恩斯特·罗伊特以及议会领导人奥托·苏尔，**1946**年

美国军政府的机关报刊《新报》从新闻业的角度，对德国情况做了全面的观察。1945年10月28日，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政党蓬勃发展的报道。随着政党被接纳，久违了政治自由的德意志民族只能慢慢地找

回独立思考和政治行动的参与能力。事情也越来越清楚：这只是一个过渡期——人们从每个地区都听到了政党积极活动的消息。左翼党派尤为积极，建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地方和地区的统一战线是讨论焦点。社会民主党举办了该党的第一次重大会议（在汉诺威附近），来自英国占领区内的所有区域代表与来自伦敦的代表在此次会议上会面，对社会民主的现代政治问题做了共同探讨。“来自伦敦的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埃里希·奥伦豪尔的讲话表明，12年的分离并没有折断国内外社会民主党支持者的渊源。”他在1946年5月的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库尔特·舒马赫（1930～1933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成员，1933～1944年被关在集中营）则被选为主席。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的组织历史——1946年2月，康拉德·阿登纳被选为英国占领区的基民盟主席——反映了该党从起源上就有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地区的传统。在章程上，克里斯多夫·克雷斯曼吸取了广泛的公民集会运动的特点，迅速把该党提升为潜力强大的左翼党派的主要竞争者。“联盟”这一概念体现了联合运动的成功之处。而创始成员平均年龄在50岁到60岁也说明，基民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官员一脉相承。他们都参与了前中央、前德国民主党和基督教工会在各个地方的创建。法国报刊这样总结基民盟的内部分散性发展趋势：该党派在柏林更多表现出社会主义和激进，在科隆则是教会和保守势力，在汉堡则更多向着资本主义和复古主义发展，在慕尼黑则具有反对革命和地方主义的性质。

>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回忆》中写道，在拜仁新建基督教社会联盟有两股潮流。一股希望拜仁人民党用另一个名字（比如拜仁人民联盟）重建拜仁人民党；赞成这个提案的阿洛伊斯·洪德哈默和弗里茨·舍费尔深受广大天主教教职人员的支持。另外一股潮流支持的是约瑟夫·穆勒（在第三帝国时期多次被捕）和基督教劳工领袖亚当·斯德格瓦德，他们尽管也希望党独立自主兼具拜仁特性，但应主要基于基督教民主的整体精神。“基于我个人的基本分析，我的想法其实和康拉德·阿登纳的想法相符——尽管当时我对他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想法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党派系统是失败的，它不会重新活跃起来，也不应

该被复活。”

自由党派的重心——德国自由民主党（Liber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LDPD）、民主人民党（Demokratische Volkspartei，DVP）——都在符腾堡，1945年9月，特奥多尔·豪伊斯、莱因霍尔德·迈尔和其他同人在此共同创建了民主人民党。“民主人民党希望能团结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两党、德国人民党以及德国民主党，同样还有保守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所有成员和选民。在其他各州，自由党派陆续以不同的名号成立。1946年1月，英国占领区内的所有党派都统一归入德国自由民主党（Freien Demokratischen Partei，FDP）。特奥多尔·豪伊斯，这位后来的联邦总统，也是德国自由民主党的第一位主席。”

在西德，德国共产党最初“并不是以激进、革命的阶级政党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一个反法西斯的民主政党”，一个为德国国家与民族统一、为公正和平而奋斗的党，“一个想走德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党”。（这个策略，使得该党在1946～1947年第一次联邦选举上取得相当大的成功。）

在苏联占领区，德国共产党自然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他们被视为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以及追求和实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维护者。

自1945年秋以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加速推进“统一工人党”在苏占区和西占区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苏占区的发展一直被视为榜样，给德国共产党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反之，西占区的发展则被描述得“相当负面”，原因是那里自战争结束后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其责任被一概归咎于“反动势力”或者舒马赫的破坏企图。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柏林地区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在1945年年初参加了在汉诺威的威尼格森举行的第一次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会议，与库尔特·舒马赫的反共产主义的强硬态度首次交锋。舒马赫认

为，统一党走向的趋势展现的是一种将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强加于社会民主之上的企图。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党在共产主义的领导下就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党。1946年4月，苏占区强制将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奥托·格罗提渥和威廉·皮克被选为主席。

经济生活

西方占领当局在普遍准许政党组建之前就已宣布，他们不仅允许和认可，更欢迎和支持工人工会的联合组织。这些组织也采用工会运动从企业中产生，然后自下而上组建起来的方针。因此，建立起来的地方组织从一开始就表达了他们随着时间的推进联合统一工会的愿望，而像魏玛共和国时期那种由于党纲不同而产生林林总总的工会和工种机构而导致的分裂则应尽量避免。在美国和英国的军政府管治区内，这种联合只能缓慢地发展。正如英国人在1945年8月所说的，这个建设应该“缓慢和良好”地进行和实现。尽管西方盟国表示，他们无意“规定德国的工会怎样建立”，但他们终究还是对德国跨地区组织持不信任态度。同时他们还担心，共产主义者会逐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

统一工会最积极的是70岁的汉斯·伯克勒，这位从1903年就在工会运动中奔走服务的政治家（在第三帝国时期属非法，因此时常被逮捕和拘留）在科隆重新组建了工会。“科隆工会在由伯克勒所起草的五点纲要的基础上成立，于1945年8月2日被英国占领区军政府正式批准。也在同一天，波茨坦会议落下了帷幕，经占领国一致表决同意后，工会和政党获得正式许可。”

“经济民主”也属于西德民主化的内容。德国经济曾经是希特勒的贵人，而盟国从一开始就知道德国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派十分重要，其他党派也致力于为社会服务。因此，西占区的发展走了一条美式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中间之路，一条自己的路。后来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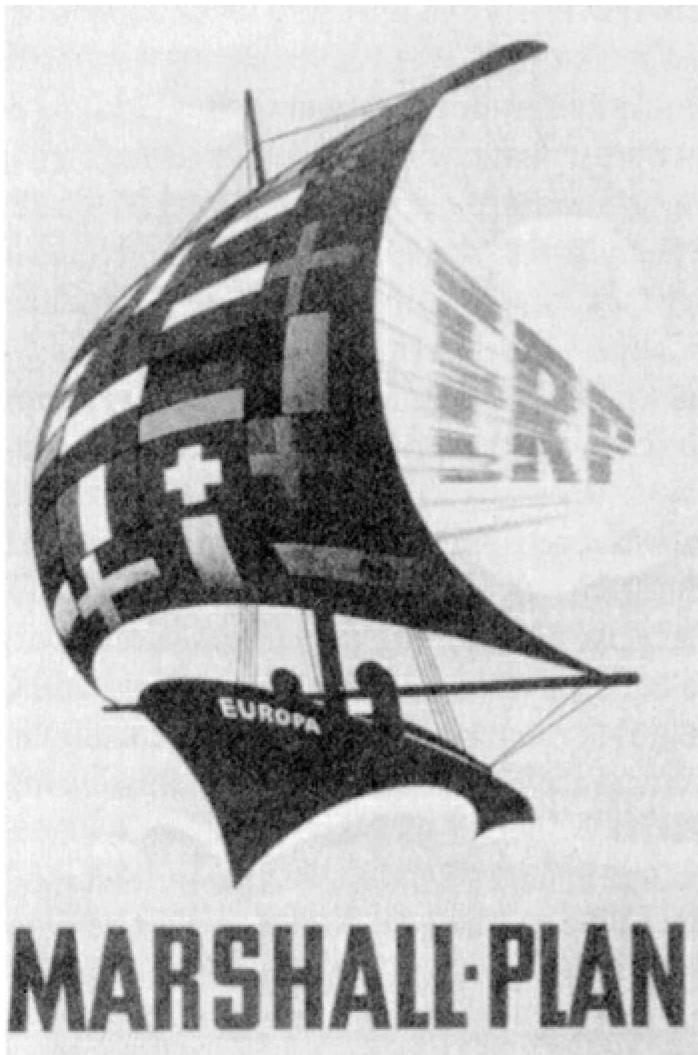
> 1946年，阿尔弗雷德·穆勒-阿尔马科在《经济控制和市场经济》中首次定义“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他与路德维希·艾哈德、沃尔特·欧尔肯、弗朗茨伯姆、亚历山大·吕斯托、威廉·罗普克等一组经济学家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就已经看到了纳粹专制的末路，并开始思考发展一套纳粹垮台后的经济制度。他们认为：经济力量不应只一味听凭市场，在这里国家应该发挥守夜人的作用，国家的任务是负责扫清一切不公平所造成的社会阻碍，个体的自由只有在允许所有他人同等自由的限度内才能发展。

这些对战争结束的预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构思、概念和空想的作用犹如经济思想形成的酵素。对全球经济萧条以及接踵而至的失业的记忆，国家社会主义对经济的强干预的过往，面临在苏联占领区内日益增强、通过控制经济竞争来追求共同利益的强制经济的冲击。人们认为，应该通过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成效保证社会进步，同时结合自由的积极性。

同各个领域的占领政策类似——也包括经济领域——首先是为了给德国人制定一套“正确的”民主行为模式，所有这些政策都是1945年或者更早时候形成的，“计划”这一概念在其中十分重要。一方面是一系列消除“负面的”错误的国家社会主义结构（例如德国卡特尔形式），包括经济制裁和处罚的措施（削减、赔偿）；另一方面是再度借计划模式为开辟一条通往自由市场经济之路做好准备，比如通过改组货币关系，其中1948年的货币改革达到了变革的高潮。

东西方之间的观点差异在（战败国对战胜国所承担的）赔偿要求上以及与之相关的削弱政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45年7～8月的波茨坦会议确定，德国应被强制对以前给其他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进行最大程度的补偿。对俄国的赔偿需要通过拿走被苏联在德国占领的地区以及使用德国的海外结存款项，美国和英国以及其他有权要求赔偿的国家则希望通过占领德国西部地区（包括海外存款）来补偿。德国所做的赔偿不应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的赔款形式，而是以实物交付的方式进行，意思是——正如1945年年初雅尔塔会议的主张——设备拆卸、商品运送、德国劳动力利用。相比对德国拆卸武器装备的运用，英国人更

关心的是如何削弱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法国人更在意的是德国的机器机械，而苏联则在其占领区内大力拆除和削弱一些纯和平工业（部分在《波茨坦协定》中也是存有异议的）。



马歇尔计划的广告，**1948**年

对赔偿-削弱政策态度的转变是由美国人开头的。沉重的占领军费用，以及有意将德国工业产品（尤其是能源）的重新运转作为欧洲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的希望让西方盟国在冷战期间偏离了原本的计划。当然，这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当原来的削弱政策还在继续运行时，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已然在望。

总体来说，西德通过西方盟国的赔偿政策获益良多，而东德则很吃亏。时至今日，都还会有人怀疑东西德是不是在同一场战争中战败的。

“西方强国的赔偿政策是更为明智的，因为他们善待失败的敌人，并且与之结为盟友。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选择——当然，美国也负担得起这样的政策，相比之下破碎不堪的苏联则不能。就这方面而言，西德人实在走运。人们不应该抱怨，但也不能说西德的这个好运就是他们应享的福报。”

再教育

盟国接管德国托管地政权期间，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原则和措施都基于一个信念，即德意志民族必须且可以被再教育。首先，处罚被认为是影响道德转化最重要的手段。只有当德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并承认所犯的罪行，他们才能重新成为正直的人。再教育，在西方主要得到美国人的认定，在去纳粹化的刑事诉讼中起了积极正面的作用。这些从19世纪开始就被“黑色教育”塑造出来的德国人对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方法并不陌生：对需要被修正的人民必须先要“剥削”，然后再给予奖励。尽管许多家庭在去纳粹化的过程中备感负担，但再教育对德国年轻一代的教养成果总算是相对成功的。

> 对于约翰·金贝尔来说，美国人对再教育的这份坚信不是出于天真幼稚且毫无意义的希望，而是来源于某种根深蒂固、万众一心的观念：美利坚的民主体制与民主传统也是从“边缘”中自然发展起来的。19世纪，北美洲殖民地的边境逐步向西部扩张，新的政治团体决定去除过去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习惯，在新的环境里谱写新的篇章——这是一个摆脱愚蠢与错误的过去的开始。他们认为，美国的拓荒者可能更符合卢梭对人性的设想，找寻自然和本质，而且比他们之前的任何人都要接近本质。
>
> 美国为德国民主化所做的努力，清楚地映射出了美利坚民主起源的预设图。去纳粹化、削弱、去军事化、土地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包括军政府负面或破坏性的计划——都将产生一种类似的效果，一种类似于美国开拓者的决定性的作用，就是抛掉旧文化的枷锁。

当然，如果没有英国人的支持，美国一厢情愿计划的占领政策也无法落实。英国人把对德意志民族的再教育视为他们对德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43年就开始为之做准备。1943年8月8日的英国外交部声明表示，唯有以接纳一个改革后的德国重新回归欧洲怀抱为目标——尽管每一步都必须万分谨慎——的政策，才有在未来存在的可能。“这句话被外交部德国顾问委员会的约翰克·劳特贝克在1943年12月3日写为‘德国的重生’备忘录的警句。此外，他还明确援引1943年的艾登声明，他本人很可能也参加了该声明的起草。出于利益关系的考虑，他赞成，必须把重点放在德意志民族的‘再教育’这项几十年的大任务上。”（库尔特·库斯居克）

思想的苗圃

纳粹将政治思想教育视为工具。战后，人们也提出一种与纳粹理念相对应的教育理念，一种以人文主义文化的力量为基础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应该在基督教文化、西方传统、德国教育遗产及稳固结合西欧文化的基础上，为民主的、社会的法治国家培养公民。”

人们一方面对教育系统的组织形式进行政策讨论——在美国占领区内不断美国化（尤其是综合学校），在英国和法国占领区内，则普遍对德国官方的广泛介入持保守甚至抵制的态度——另一方面，像《文集》这样超出教育圈的杂志也发起了激情洋溢的关于价值观的讨论。



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再次开放。大学生们站满大街的景象

“指引我们的是纯粹的高尚品德，一种对精神世界的永恒的坚定信念……一直被人嚷嚷，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低调和务实，我们民族的想象力和思想被主观地否认、一再不被接受，所以我们要把它们引回来，聚集起来。”（赫尔曼·诺尔）

赫尔曼·黑塞的小说《玻璃球游戏》（*Glasperlenspiel* ）让人们对战后返乡一代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12月，皮特·苏尔坎普所带领的S.菲舍尔出版社向德国读者推出了这本小说。后来接手苏尔坎普出版社的齐格弗里德·昂塞尔德在图宾根《学报》（1948年10月）上表示，阶级分层明确的卡斯蒂利亚省的图景满足了来自人们心灵精神意识的向往渴望：一种对纯粹的和更高存在的追求。黑塞的话是对这个时代说的，更是对这个时代的学术青年的寄语：“恐惧和苦痛的时光来临。如果说在这苦痛中还有一份幸运，那也只可能是纯精神的幸运：回首，拯救之前

的教育；展望，做这个完全堕入物质世界的时代中坚忍而明亮的形象。”他认为，人不应该追求一个完美的信条，而应该追求理论本身的不断改善。

这个被哲学热情引领的改革论题在现实存在的物质困境前显得无能为力和黯然失色。许多毁坏的校园被重建，许多教学楼被用作难民营，无家可归之人的收容所或供占领军使用。在汉堡，400所学校里能使用的只有60所。基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共有1134间教室，到1945年9月1日时只剩下100间。

战前的出生率高峰带来了很多难民孩子。由于师资匮乏，孩子们只能在一个大教室里面上课。通常一个班有70～80个学生。人们火急火燎地让一些没有污点的作家赶着编写新教科书。

像对普通义务教育的学校系统的态度一样，人们对大学的重开也充满了积极和热情。“思想的苗圃”在第三帝国期间被夷为平地，人们的思想被践踏。1945年11月6日，汉堡大学重新启动教学工作。议员亨利·兰达在他的讲话里呼吁，“为了经受苦难考验的民族的美好明天”“为了永葆青春的汉莎城市汉堡的荣耀”“为了德意志文化在西方文化中不朽的精神之光”而努力。

盟国当局宣扬，德国大学在纳粹时期之后已经恢复状态。这个说法纯粹是他们的主观臆断，并且也是错误的。

> 1933年，许多高级学者被驱逐出境。留下来的大部分教授都要适应这种大环境，也就是说，对贿赂谄媚功力的要求要远远超越于对“学术贡献”的要求。走套路成了领导者的原则。比如说，1933年，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其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入职讲话上，大肆颂扬“这次变革的伟大”，他说“这次变革”把“知识服务”同“劳务服务”以及“兵役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就连反对纳粹学生干部暴力行为的教育家爱德华·斯普朗格，也赞扬和肯定“科学和国防力量”一体化的这一发现。
>
> 在普遍的去纳粹化措施的影响下，大学也自然有了某些改变。但

某种灾难依然在延续，比如日耳曼语言文学受到极大意识形态的压力。路西乌斯·德·克莱斯的顾问沃尔特·多恩在一部回忆录里这样叙述道：“因为我的愚见，军政府开始了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错误，即通过他们来重振老慕尼黑大学以及其他的高校。这些军事征服者不是委托一个可靠积极的教授小组去实现民主大学的重建，而是自己尝试去重振老慕尼黑大学，这当然没有纳粹分子的参与。那结果呢？只要这些或那些纳粹教授还有丝毫被改造的可能，就不会设立教授的位置。迄今为止，这都是建立民主的、反军国主义的大学时难以逾越的障碍。”

当时，想读大学的德国年轻人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那时困难条件所能允许的范畴。例如，海德堡大学医学系在1945年秋季学期时的5000名申请人中只能录取1000人。而那些绝不会被大学考虑的人有：纳粹积极分子、曾在希特勒青年团或者是在德国女子联合会等机构担任过职务的大学生、在亲卫队中做过志愿者的人，此外还有骑士团城堡学校的学生[1]。被优先考虑录取的是：政治受害者、残疾军人、被迫长期中断学业的大学生、无党派人士、海德堡人以及来自东德的难民。

在哥廷根，10000名候选人中只有4830人被录入大学，由此不难看出“这种根据才华和专业知识的严格挑选是提高高校水平的最好方法”。吉森的大学等着录取的有3000名学生（早前这所大学只收1250名大学生）。马尔堡大学首先开始招收学生的是医学系。为了能够在大量的申请人中选出最优秀的1200人，他们只允许那些分数为“良好”的，通过医学院预科考试的学生继续接受大学学习。在耶拿，为了印证当时苏联占领区的另一个例证——展示社会的进步意识——学生不论年龄、性别和信仰通通被录取。除了对通过预科考试的学生的正常录取外，现在的国民学校和职业学校学生也可以参加大学学习。

为了寻找一个大学学习的机会，C.K.来到了埃尔兰根——在他找到寄身之处之前——第一个晚上是在城堡花园里的一张长椅上度过的。后来，他在一个牧师给“流浪者”开设的房间处弄到了一个床位。“在这里，我开始了与官僚机构和饥饿的战斗。当我为了大学注册去拜访设在宫殿广场的大学管理处时，他们问我，是否有房间证明。他们说：‘鉴于如今城市和大学人满为患的现状，我们只能招收那些真正住在这里的高中毕业生。’”而房管局的居住许可证只会发给已经在大

学注册的人。后来，在一包美国香烟的帮助下，C.K.在移民局拿到了居住许可证和住房分配，最终获得了大学分配的学习位置。

> 大学生在注册入学之前要接受政治调查，而这个调查在美国占领区受到严格的控制，并且只能用英语和法语完成。在埃尔兰根，军事征服者对“主要问卷”进行了再考察。大约在1947～1948年的冬季学期期末，726名学生隐瞒了自己的党籍。

在西德，承载着精英科学和教育理念的大学与“大众教育”是分离的。比大学更政治化的是业余大学，也就是成人教育。他们大多数投身于教育民主化中新成立的新教的学院，其重心主要是“焦点时事问题”。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人教育运动的唯心论的主要文艺趋势已经有所发展。对“善良”的要求也有某种政治和社会的背景条件，因为鸡血洋溢的“极端人文主义”所宣传的“转变”和“思考”的努力必须一直表现出对德国历史错误（“历史阴影”）的背离，也就是说，不许“逃离”到“审美”和“艺术”中去——当然，这些人认为，德国文化暂时的衰落并不影响“德意志精神的不朽”。外在失去的东西要通过内在获得。海因茨·弗吕格尔认为，新教教会和学术机构携手建立起了系统性地持续开展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基督教对话”的教育场所。这是一种努力与世界沟通和对话的尝试。

> 为了新教院和（世界的）人民学校，1945年下半年发展起来了一条“新教育途径”，它常常受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成人教育工作者的推动。因此，应该感谢这些“青春洋溢的”推动力。被纳粹迫害的国内流亡者想在完全失败后再进行一次尝试，“通过教育上的全民运动影响德国的命运”（爱德华·布鲁纳在1946年9月的第一届拜仁州全国教育会议上所说）。与学校和高校相反，战后人民学校的成立并非因为中央政府的规划，更多的是获得了当地企业的支持。

阶级斗争的人文主义

在文章《德国的灾难》（发表于《建设》1947年第1期）中，亚历山大·阿布施这位1946年从墨西哥逃亡回到苏联占领区的共产主义者——主要负责接管新闻传播和政治的工作——大声疾呼，无论昨天还是

今天，德国刻不容缓地面对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哲学问题，沉湎于永恒的内心世界的“永恒问题”并不是逃避之路。在分析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的著作《德国的灾难》时，他要求德国人不要沉浸于新的幻梦，而要在社会世界的现实里寻求实在具体的答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德国唯心论哲学中抽象投机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克服纳粹时期的歪理邪说。”

阿布施所说的特别符合苏占区，也就是后来的民主德国的教育政策的特征。新的教育，意思是不仅教人民主主义，也教人社会主义——也就是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人文主义精神的道德完成式——的政治教育。海因里希·代特斯——1945年柏林的教师教者工会创建人之一，后来的东德中央民众教育师范部门领头人——把教育事业编排进了两大改革的进程中，即道德改革和政治改革，这是两个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但又同时相互依存的改革。这样的理解符合1945～1948年在学生委员会、青年委员会以及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和学生会的形成中的实际情况。

“学校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不论财富、宗教和血统，给予每个孩子和青少年与他们的爱好和能力相适应的高质教育。”

德国学校的民主化法案（1946年5月22日）制定了符合《波茨坦协定》思想及盟国需求的任务和目标。青年人应该被教育培养成为能独立思考和做事认真负责的人，他们有能力也已经准备好，为人民的社会服务。作为文化传递者，学校的使命是把年轻人从纳粹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在和平友好的人民共同生活和真正民主主义的思想中走向真正的仁爱。

德国共产党的干部（包括从苏联流亡返回德国的安东·阿克曼、保罗·万德、奥托·文泽）与苏联占领区的五个州的国家教育部部长（全部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一起，保证受到肯定的教育政策改革派成为中坚，由此，教师和教材的意识形态方向逐步形成。

与西德相反，强大的社会政治责任铸就了苏联占领区/民主德国的教育计划草案。在草案中，教育被解释为“和阶级有关的教育”，即工人阶级及其进步盟友为建设社会主义、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德意志民主学校（1949年8月24日）的教育政策方针——很大程度上等同于1949年8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教育学代表大会上教育政策委员会的决议——中指出（“民主的”一词如通货膨胀般地被使用），必须把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孩子培养塑造成为愿意并且有能力促进新民主经济、建设和治理新的民主主义国家的繁荣民主社会的社会活动家。“作为民主主义系统教育中的部分，民主学校主要服务于进步人士的利益，帮助他们改善知识，提高教育。由于它们在民主社会中的这些职能，学校已经不仅仅是学校了。”

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等教育政策来说，在各大城市纷纷成立起来的大学预科班有重要意义。1945年秋季，也就是大学重新开学后不久，它们作为社会大学分支的教育机构被建立起来。其目的是帮助年轻的工人和农民，更确切地说是出身工人、农民家庭的孩子以及遭受政治性和种族性迫害者，达到大学入学水平（1945年之前仅有4%）。在西德也设有类似性质的机构，主要是提供给战后初期的退伍军人和政治迫害者。从1947年起，这些预科班逐步演变为偏向于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培养骨干力量的专业机构，录取学员时主要考虑其政治可靠性。1947年12月，这些机构被作为大学学前部归入高校一列。1949年，它们被设立为工农学院，其地位等同于大学其他院系。“‘就像其他所有情况一样，这里也应遵从斯大林同志说的话：在正确的政策方针给定之后，干部决定一切……’在赫尔曼·坎特的小说《礼堂》里，工农学院考试委员会负责人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他面前，小说的主人公罗伯特·依斯瓦必须作答。坎特借这本小说，确切地描述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目的。1959年3月31日，德国经济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保护和发展德国经济与文化》确立了这个目的。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权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计划，需要培训大量绝对忠诚、具有服务意识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高质量合格骨干。必须建立一个高校一般成熟的领导型教育机构，使那些较为年长、已参加工作、适合学习及政治可靠的干部较快地接受科学培

训。”（托马斯·阿默）

---

[1] 德意志民族的条顿骑士精神一向为希特勒所推崇。12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时期，德意志骑士组成了一个条顿骑士团，并于13世纪在德意志的普鲁士地区建立了骑士团国家，然后向东扩张，1308年占领但泽，后又入侵俄国。1404年俄国、波兰及立陶宛联军打败骑士团后，骑士团的扩张才告一段落。
骑士团最主要的特征是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过着强调纪律、义务和秩序的苦行生活，其目的乃希望通过严厉可怕的纪律，让骑士团在光荣、崇高而个人显得渺小的世界里，培养奉献的精神。希特勒极为推崇骑士团的这种有纪律、义务和秩序的行为准则，并且后来以此作为普鲁士军官团法规的基础。在纳粹德国有仿效骑士团的骑士团城堡学校（Ordensburgen），就是利用条顿骑士团和其他骑士团所建的中世纪城堡当训练营地，是培养纳粹干部的高级学校。

第6章 积极的建设者

易服色和返乡者的命运

从覆灭到社会重建，德国的过渡在盟国的严格引导下（这些引导常常包括精神和物质的援助）进行。假如没有那些社会组织为一个全新、更好的德国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个过渡恐怕也无法进行得如此成功。尽管这些社会组织完全可以回避最本质的道德问题——罪责问题，它们也可以选择冷漠，只要改头换面就可以和过去划清界限。在这些群体里——这些群体是：服预备役炮兵的一代、废墟女性、知识分子以及艺术家——纳粹灌输的思想都在瞬间或者一段较短的“清整阶段”后不见了。思想情感就像是一块白板，白板上写的是克服眼前困境的生存意志和幸存的幸福感。“天底下没有比在太阳下更美好的事。”英格堡·巴赫曼后来写就的这首诗恰好适合于描述那个觉醒重建的五月天。

“废墟时尚”尽管只是表面现象，也能代表某种对“看”的开放态度。日常的生活终从单调阴沉的灰色法兰绒和军帆布的灰色世界中走出来，被色彩点亮：各种色调的头巾、方形垫肩的大衣、长裤、哈伦裤、训练服、百褶裙、厚厚的过膝长袜、滑雪靴、毛皮大衣（不同种类的动物毛皮）、软盘帽子、巴斯克帽、棒球帽（非军人式的）、宽松的衬衫领子、各色领带、灰色皮革和窄肩改良军大衣、双排扣夹克、短裤。最蓬勃兴旺的行业之一是把床单改制成“风衣”的裁缝小店，因为这传递出某种流行的早春都会风尚。人们还可以搭配太阳镜，再搞一支美国香烟叼在嘴里。好的服色帮助人们摆脱了辛苦生活的重压。人们穿戴整齐，时尚靓丽地穿梭在废墟般的城市中。

> 记者约瑟夫·穆勒-马莱是离职士兵，在英国人到来的前一天，他在吕贝克城市剧院找到了栖身之处。安顿下来以后，他脱下军服，从服装道具中给自己找了些有意思的衣服——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情

景。“一切都有它的道理。某些东西走了，自有其他东西来取代，就像战争结束了，和平便渐近。我们用战争换来和平……米白色的裤子，浅棕色的夹克。每一样都出自优雅的剪裁。配上吸引眼球的扣子。在衣领的内侧还缝着玻璃纸纸条：《新婚之夜在天堂》（沃尔特·穆勒出演）。上午，我就穿得如此漂亮的出去，我倒想知道，如果我没有换衣服的话，英国人会怎么对我。他们会把我的同伴们赶在一起。‘快，快’地喊着推他们，用靴子踢，关进公园的篱笆里一整宿，然后强迫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长途徒步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且整个长途前进过程都不提供口粮。后来，创建《时代》这本刊物时，我依然穿着这件‘新婚之夜’的衣服，因为我没有其他的便衣，这件衣服就这样穿了很多年。”

代表自由的美国化尤其给年轻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些被编入国防军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曾被判永远做国家这台机器的小小齿轮。对个体私人的开放带来极大的满意，但享受这样的幸福的同时也要居安思危，自由的社会和政治前提必须受到保障。私有制创造了民主。后来对此疑虑重重的一代，在此时已经有了先锋：他们一方面希望国家的干预少一点、再少一点，另一方面又希望国家能强大得可以维护他们对个人主义的向往和对幸福论的追求。

去纳粹化和法庭都放过了这个“白色年代”。这是“疑惑的一代”——他们活跃，但同时又“理智，没有具体的思想体系，却对煽动颇具免疫力”。（赫尔穆特·谢斯基）根据马丁·格莱芬哈根的描述，这些将近战争结束时被纳粹当局教育出来，作为服预备役炮兵的年轻人，这些在1928年左右出生的人，是一支社会和社会心理的步兵方阵——他们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联邦德国的发展史。

在服预备役炮兵的这一代当中，很多人曾在孩童时期或青少年时期经历了第三帝国和战争，但是没有机会被要求参与“工作”，而年纪更大一些、大约超过20岁的，则多数曾经作为士兵经历了数年战争生活，之后又多次遭受牢狱之灾——他们是“被利用、迷失、被出卖的一代”。因纳粹迫害而早亡的沃尔夫冈·博尔歇特用他的文学作品充分表达了这种失望的心声。

“一个男人回到了德国。这个男人，他已经离开很久，很久很久。也许是离开太久，他回来的样子和刚走时是那么不同。他看起来像是某幅画中的那个亲人，那个为了吓走鸟儿（或者有时为了吓走晚上的人们）而在田野上伫立的人。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千多个日子，他独自在外面的寒风中等待。他必须用他的膝盖骨作为入场费来支付。一千个寒冷的夜晚，他在外等待，现在终于回到了家乡。这个男人回到了德国。”

1947年，在卡巴莱[1]“流动包”（Die Schaubude）里，埃里希·凯斯纳用《德国的旋转木马》总结“被剥夺继承权者”的心声：“这是第三级的返乡/没有桂花树，没有喜悦/空气凝结。死亡结账/你想找寻你的家/家已不再/你想找寻你的孩子/他已被埋葬/你想找寻你的妻子，她已离开/你回来了，无人拥你入怀/你一无所有，无家可归。”

曾逮捕了大量人入狱（1945年，美国人捕获了310.7万名德国士兵，英国人抓捕了231.99万人）的西方盟国现在开始快速地大批释放囚犯。1945年6月16日，《拜仁州日报》报道，所有在欧洲的美国武装力量管辖区内的德国战俘，除了66万人（其中有早前武装亲卫队的成员）之外，其余全被释放。英国占领区也首先释放了30万名战俘，允许他们离开营地投身农业工作。

以前士兵中的许多人都和德国军队一样，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能不肯定一点，即人类本有各种“尊严”，而自己却为了一个极为“无耻的”事情去奋斗。他们遭受过战争困境和艰辛，以及后来在战俘营的折磨。现在战争结束了，他们面对着饥饿、破碎的房子和混乱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大多数职业军人觉得他们的未来备受阻碍。尽管很多情况下人们对曾经的战俘都有优先照顾，但是在大学录取这件事情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除此之外，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去纳粹化也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夫妻的长久分离，也造成了许多家庭危机。

最糟糕的是那些陷入苏联战场的士兵。1908年出生的赫尔姆·戈尔维策——一名教会成员，1940年加入武装部队——在1945年时效力于费迪南·薛尔纳的军队，后者根据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在邓尼茨内阁内部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的将军。（他在战争结束时离开了部队，逃到奥地利的美国占领区后在那里被逮捕，然而在同年5月底被引渡到苏联。）戈尔维策口渴得半死，鞋子被红军战士脱掉，光着脚被送到在部队营房中设立的营地。一段苦难的长途漂泊就此开始——许多人都一样：他们常年在极差的条件下被拘留，其中大部分没能幸存。

> 对于战俘来说，十分重要的事是什么时候能被允许回到德国，或者说什么时候能离开战俘营——以及他们是否能保有相对过得去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战俘们特别倾向于英美的俘虏营；因为在那里，他们不但可以得到好的对待，而且还能在再教育措施的背景下为“不一样的德国”做一些准备——当然，许多已经被纳粹思想所蛊惑的人并不会利用这个机会。由之前的德国通讯记者和编辑所创办的名为《呼唤》的报纸很好地印证了美国俘虏营中的成功改造。这份报纸当时在纽约印刷，并在美国军方的审查和监控下出版。汉斯·维尔纳·里希特、沃尔特·科本霍夫以及阿尔弗雷德·安德施是该报编辑，发行人是古斯塔夫·勒内·霍克，出版商是科特·卫茨（后来在慕尼黑创立了宁芬堡出版社书店）。他们还以“振聋发聩的”实事求是精神创立了刊物《友好的德国人》，提出了德国的责任问题（而此举却引起了多数“同伴”的愤慨）。
>
> 英国的再教育进行得如火如荼（1944年9月通过英国全体内阁成员决定），瓦德玛·芬·科诺尔林根，这位1933年在纳粹到来前最后一刻被搭救出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穿过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法国最终逃到英国）对这个项目的推动起了突出作用。在雅士谷赛马场建立了一个为反法西斯战俘而设立的精英训练营，这些战俘在后来西德的民主国家建设中扮演了主要的协助和参与的角色。科诺尔林根所筹划创建的战犯大学，是一所教授全面的政治性历史知识的学校。威尔顿公园营地由此产生，此外，这里也是“战犯时期”的德-英讨论场所。

风雨中的青春

许多“废墟儿童”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遭炸弹袭击之前已经被儿童家园（KLV）陆续运往安全的地方。战争结束后，许多孩子又被送

回他们那几乎被战争摧毁的家乡，他们多数只能居住在破败不堪的公寓和收容所里。因为经历过恐怖的逃亡而最终侥幸存活，这些孩子产生了一种“保护盾”般的情绪，恰好这种情绪使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免受生存意志的重大创伤。战后，中小学以“战争生活”为题征文10000篇，这些文字传递了他们的印象。



柏林的家庭，**1946**年

1932年7月10日，我出生在纽伦堡。战争爆发的时候，我7岁。随之而来的是饥饿、贫困、恐惧、泪水和恐怖的飞机轰炸。我们在地下室暗堡里度过了好几个星期。城市里和城市周围到处都弥漫着战火硝烟。我们在这个灰暗的冬天里守望。几个星期前，我们收到了通知，我的爸爸在战争结束不久前战死沙场。这个打击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尤其是那时候我还有更多的兄弟姐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知道他死了总比知道他在俄国或者西伯利亚什么地方挨饿受冻要好得多。现在我14岁了，我必须得考虑找一份工作。我想做记者，所以为此我还要多多学习，以至于能完全符合这个工作的要求。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的伤口将会慢慢愈合。

在西德，二战后有大约120万名少年儿童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而他们中的25万个孩子又因为母亲的离世而变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由于母亲需要工作养家，丧父的孤儿几乎每天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钥匙孩子”）。而他们中年纪稍长的则要在上学的同时，还必须接过照顾弟弟妹妹和大量家务工作的担子。同样艰难坎坷的还有联邦地区内那些被驱逐出家乡的青少年的命运，他们的年龄段是14～24岁（1949年有155.5万人）。由于房屋被炸弹大规模摧毁，在那个时期可居住房屋无法满足联邦共和国区内的定居居民的需求。这样，73万名青少年逃难者只能待在暂住地营地和乡村收容所里。1949年年底，光是在拜仁州就有2.7万名青少年生活在496个大型营地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情况则更加恶劣，61034名青少年被安排挤在491个营地里。1950年5月，西德共有472121名25岁以下的青年登记处于失业状态；这些失业的辍学者人数不断增加，预计有70万人，占总失业人口的21%～25%。

废墟时代，由于经济崩盘萎靡，青少年犯罪率也在不断上升。“青年的荒废”成了关键词：人们为他们惋惜，人们为他们的行为愤慨，人们尝试将就着面对他们。1947年年底发起了一场对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青少年的认识调查。比如说，在菲尔特的1.1万名在校儿童中就有60%的孩子没有自己的鞋，35%的孩子要两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40%的孩子没有过冬的衣服。在卡塞尔则是7.5%的孩子完全没有鞋子穿。在柏林，据统计有12.5万名孩子没有可穿的鞋子。在慕尼黑，2万名孩子同自己的父母分离，1.7万名孩子不是睡在自己的床上，1.4万名孩子没有牙刷。在曼海姆，有70%的家长没有东西可烘干，只有一半的人有第二套换洗的衣服，20%的人患有饥饿性水肿。在法兰克福每天有近百名青少年在总火车站的地下室过夜，他们中平均有60%的人有一张劳改所释放证书。

这些青年的身体除了被冷漠、失望、暴力和绝望占据，还有对建设的强烈意愿以及对“向导和陪伴”的渴望。

“我们站在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里。让老的一套见鬼去吧。我们想工作，想开创，为了去弥补那些我们错过的以及偿还那些我们欠下的。新的极点差异太大，他们极有力地想把我们夺走。但是，善与恶还没在我们的思想中成形，我们还没有能力看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无助地望着我们的长者，成熟的和有经验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向导，不，最好是一位教育者，一个可以促进和巩固我们的成长的人，直到我们有能力自己站立。”（海因茨·皮恩特克）

曾被纳粹主义者镇压过的新教和天主教教会联盟、青年联盟、社会工会青年组织现在很快获得了许可——首先是地方上的。出于对不断上升的青少年犯罪率的担忧，在美国管制区内开展的青少年工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有德国的普遍职责，占领国仅可以行使咨询和控管的职权；另一方面，他们发展了专门针对青少年的再教育项目。人们看到，该项目非常具有吸引力（其中当然也有物质的原因）——这个项目被美国军队称为“德国青年活动”。

在众多的政治青年联合社团中，自由德国青年团[2]（Freie Deutsche Jugend，FDJ）在阐述东西德之间的思想意识的具体环节上极其重要，在青年工人运动为统一所做的努力中表现突出。自由德国青年团在苏维埃化的进程里逐步发展为一个有战斗性的共产主义骨干组织，被德国共产党称为“人民前线青年”，尤其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给其他青年团提供输送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把他们归于特别的一体化力量。1945年再度开始的政治工作，据法兰克福的一位见证者的回忆，是自发的、直接的。在地下秘密活动中，人们学习到欣赏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分离不再存在。然而就在不久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德国青年团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

从原始条件和生活条件来看，在苏占区内的青少年的境况和那些在西占区的青少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德国共产主义者和后来的德国统一

社会党尝试通过鼓动和压制的手段为社会主义运动争取青少年的支持，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利用（从公民文化和社会想法上去改变他们）。与此相对应的是，多重青年文化的并存被禁止，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代沟，被伪唯心论，换句话说也就是，被通过集体空想忽略掉了。尽管苏占区和后来民主德国的青年教育都是在象征反法西斯的符号下进行的，但是自由德国青年团（1946年有30万成员）的象征，如某些仪式和权力主义的组织形式，与纳粹青年组织极为相似。在苏占区内实现统一青年组织的想法遭受了重大失败；1949年，已经有20万名青年人从“进步的”苏占区非法移居到被作为资本主义象征而受到批判的西方。

废墟上的女人

也许是出于自愿，也许因为那是任务——1945年，如果没有废墟女性不知疲倦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劳动，那么，所有的城市都还将一直淹没在瓦砾堆和垃圾堆中。

柏林市市长阿图尔温纳博士在1946年6月13～14日的第一届妇女福利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到，德国的命运大部分掌握在妇女的手中。当谈到德国的将来和性别角色的划分时，他说，一个女人先天就有别于男人，“不会仅凭心血来潮，而是会一直满怀激情地负担起未来”。

西德人和东德人都没有给予废墟女性对“生存工作”所做出成绩应得的肯定和赞赏（直到后来她们创造了神话，引得万众瞩目）。所以，妇女们也不能从她们的重建工作中要求相应的权利。囤积，黑市买卖，在公园里种植蔬菜，缝补衣服，修理鞋子，必要的房屋修理等，甚至那些被迫作为废墟女工的人所做的工作。当时丝毫没有人认识到这些劳作的巨大意义。第一本杂志大肆吹捧将电力供应带回正轨的工程师或把第一辆电车安在铁轨上的机械师，而不是一个用最后一块地毯成功换取一袋马铃薯的三个孩子的母亲。

> 在毁坏的城市里如蚂蚁般密密麻麻挤满了收拾瓦砾碎片的人们；他们几乎所有都是女人，除了零星几位老翁，因为很多男人至今都没返回家乡。战后女性，“废墟上的女人”——尤其是在柏林——是艰难时期女性力量的著名典范。

在苏联占领区内，人们计划通过大量理论性和宣传性的热情来推动实现自19世纪以来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的社会主义传统（奥古斯特·倍倍尔：《女性和社会主义》，1883年）以及通过杰出的女权主义战士实现社会主义的女性运动（像克拉拉·蔡特金和罗莎·卢森堡一样）。与此同时，妇女政策被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写进反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政治措施政策中，这在1945年的妇女福利委员会以及1947年的德国民主妇女联盟的创建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西占区，魏玛共和国时期妇女运动的女政治家们和女记者们的身影尽管依然可见——比如伊丽莎白·瑟贝特、海伦·韦伯、海伦·韦塞尔、路易斯·施罗德（1947年在柏林当选市长）；尽管出台了大量新法，许多法律也被修订，但妇女运动在整体上还是没有重要的影响力。党派之中依然保留着父权家长制。

1949年，两个德国分别成立。东西两德都在宪法中确定了妇女平等的权利。当然，东德在这方面的法律比西德更早地被贯彻执行。除了该项平等权利之外，民主德国宪法还确认了把实现提高妇女地位的需求，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方面，作为社会和国家的任务。相比联邦德国的婚姻-家庭法是在任务分配和角色理解的基础上，以婚姻双方的自由决定作为出发点，东德的法律是在多方面发展的女性个性的基础上表现社会主义理想。法律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一切所带来的是职业妇女的比例提高，妇女在政治生活中有更高的参与度，受教育机会和儿童照管方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以及妇女的自主权得到增强（比方说，在终止妊娠方面）。

妇女平权被视为民主德国的一项大成就。两性关系和家庭结构是德

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宣传招牌，对比资本主义，这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势。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女性自我价值观念的不断提升和不断增强的女性社会意义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后果是强制性解放和由此导致最终的解放抑制（这又与个人自由相关）。德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否确实成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两性关系，又或者是否解放的需求只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映的只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中的下层建筑的现实？诸如此类的问题，日益尖锐。



克罗伊茨贝格区内的废墟上的女人，柏林，**1949**年

在纳粹时期，“公民道德”主导家庭生活——社会和性病态的反常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已被国有化，并且被定向到了种族主义之上——随着纳粹政权的垮台，这种所谓的道德也被动摇了。东德的强奸和西德的诱奸，战争暴行的揭露和为了生存的苦苦挣扎，这一切都动摇了原来具

有普遍价值、在多变的生活中可以用来支持人生的价值体系。人们慢慢意识到，某些他们一头扎进去，在当时以为是世界末日的战争末期缔结的婚姻关系到了战后无法维持。“离婚率上升到了战前的两倍，在1948年达到了顶峰。”

一份战后早期的家庭调查显示：一方面，人们极度渴求新的经验；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式社会结构又在回归，这两者之间的角力不可谓不激烈。在战后初期，政治和媒体都对这次角力给出了新的解读。

妇女作为家庭的守卫者，在家庭中履行爱心、照料、救治的职能，她们理应料理家务，繁衍后代。这种固化的道德观念已被社会化。男人因为有家庭之外的工作，故而在生理、心理以及道德上都可以减负。作为一家之主，他被授予了一种权威，社会通过工业化、机械化、战争和财产的破坏以及家庭以外的权利和影响剥夺了他的这种权威。“这个所谓标准化的性别等级制度，公民家庭的结构特点，作为‘等价的多样性’出现在当时所接受的认知和与之相关的语言规则里……因此，这种意识形态和结构的家庭形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对这种成年人和孩子亲密地共同生活的结构和形式作为自由和自我实现权利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机会被白白地浪费了。”（安吉拉·佛格）

> 两性关系的紧张在那个时代的电影里被清楚地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对比这个时期那部批评时代的、讽刺的、情色的且轻蔑地伤害了“神圣的感情”的电影《苹果掉了》（赫尔穆特·奎特纳，1948年）和《柏林叙事》（1948年，书籍作者：君特·纽曼，导演：R.A.斯特摩勒）。在这部电影里，小市民私人家庭欢乐是唯一充满意义的生活内容。在《苹果掉了》这部电影拍摄期间，就已经有大量的来自慕尼黑大主教机构的抗议者反对这种原罪的卡巴莱式的歌舞表演的处理。经过拜仁州军政府的调解，才最终以公报的形式得到了暂时的停息。导演赫尔穆特·奎特纳声明，电影创作中绝对不会有丝毫伤害宗教和道德敏感的目的意图，并且接下来的电影工作也将继续遵循该思想。天主教和新教教会方面则宣布，他们不查清该电影所造成的公众影响不会罢休。

---

[1] 卡巴莱（Cabaret）是一种有喜剧、歌曲、舞蹈及话剧等元素的娱乐表

演，盛行于欧洲。表演场地主要为设有舞台的餐厅或夜总会，观众围绕着餐台边进食边观看表演。此类表演场地本身也可被称为卡巴莱。卡巴莱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其后又有同类表演在德国柏林进行。卡巴莱是一种简单且直接的表演方式，以简单的布景及服装，纯用歌曲向观众表演故事。

[2] 自由德国青年团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官方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团是东德唯一被官方允许并提供资助的青年组织，该组织招收民主德国14～25岁的男女青年，人数占民主德国青年总数的75%左右。大多数台尔曼少先队员都会最终加入自由德国青年团。

第7章 文化的回归

为本质斗争

在盟国艰辛的再教育过程中，文化（狭义的文化）扮演了中心角色。占领国当局文化部门的主要官员多为德裔移民，或者是曾在大学学习和工作中接触与了解德国的人，他们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和历史都非常熟悉。他们以及部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都相信，最终，纳粹主义并不能伤害到“德国精神”。后来证明，这个信念是痛苦中的“生存手段，能建起跨越鸿沟的桥梁，是迷雾中的指南针”。

文化能增强人们心中的善念，在西方文化中，它首先意味着“归主”。脱离了信仰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其价值就不会得到尊重。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索指出，奥古斯特·布鲁门的《中心的精神，不一样的德国》（1946年）和约翰尼斯·黑森的《德国精神的重建》（1946年）都认为无神论的传播是“德意志灾难”的主要缘由。莱茵霍尔德·施耐德期望着“德意志精神的回归”（同名著作在1946年出版），这种精神通过莱辛、康德、费希特、尼采这样的哲学家的演绎，能够抽象出某种本质。阿尔弗雷德·米勒-阿玛克在其著作《没有上帝的世纪》中谴责19世纪的政治家和科学家，这些人用虚无主义和纯理学说替代了信仰。《新西方国家》这本杂志为了基督教的宇宙秩序冲在第一线。“1946年，菲利普·勒尔施在杂志《精神世界》的第1期中这样写道，古老的基督教之所以衰微，原因无外乎渐进发展的工业化，并建议——和他所有那些基督教教友一样——‘归主’和‘谦卑’是危机中唯一的救赎之道。”（赫尔曼·乔斯特）

1945年出版的《摩亚十四行诗》让人印象深刻。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夫在政治监禁期间完成的这部诗集是对德国陷入的那段黑暗时期的

反省和思考（他在柏林战役发生前不久被盖世太保谋杀）。一些神学家也被纳粹分子杀害，作品在他们死后发表（1946年）：迪特里希·潘霍华[1]的《泰戈尔的诗：通往自由的路上》和维尔纳·伯格鲁恩的诗歌《愤怒之日》。特奥多尔·海克尔在1939～1945年写下的《日记》里描述了相似内容，即他在纳粹主义的、无上帝的非法治国家中内心备受的煎熬。1945年秋，恩斯特·维歇特在题为“给德国青年的话”的演讲中，称纳粹国家是“基督之敌的帝国”，在这里，由一帮杂种的“超人”组成的乌合之众，竟敢与上帝叫板。信仰天主教的早期左派表现主义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文章《不死的人》（1946年）则努力找寻圣体的重现。在纯文学当中，伊丽莎白·朗格瑟认为，反对野蛮的纳粹，是救赎的信徒必须做的事。

> 伊丽莎白·朗格瑟的语言相当隐晦，充满了各种神话比喻，她用这种方式驱除了宗教上的怀疑和本人的负罪感。这个本身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女子在保护她与一位犹太人非婚生的女儿卡德里亚免于遭受纳粹分子的伤害、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尝试中，没有足够的勇敢（不过当时本来就不太可能）。这样的“背叛”——被救的女儿要经过几十年才可以讲述她的命运——决定了这位女诗人下意识里对解脱的渴望。这种渴望见于小说《不可磨灭的印记》（1946年）。
>
> 托马斯·曼是一位喜欢讽刺的神话捍卫者。他始终与这种空虚的内心和激情保持着距离（但能被“真正的”热情充满并燃烧）。1947年，他出版了一本大型时代小说《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生平》。这部小说苦心孤诣地为纳粹主义现象寻求某个形而上学的解释——比如所有间接落入希特勒手中的人，自己（因为被这种魔鬼力量所诱骗）会感到某种升值。由勒维昆这个人物形象表现出的艺术家的危害象征着德意志民族灵魂的风气败坏，最终，通过纳粹主义而彻底毁灭。托马斯·曼分析，德国这样发展最后只有“下地狱”，这意味着：市民艺术家和市民阶层的终结、艺术和哲学的终结、传统的人文主义和理智-科学概念的终结、自由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

神学-哲学的再思考

人是宗教的。可如果他不够八面玲珑、见风使舵的话，就肯定会因

为第三帝国的教会连带着对宗教也失望。教会，作为公共机构，几乎完全适应了这个暴政的非法治国家。“国家和民族主义”在威廉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为德国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雅利安-北欧的神学体系里达到了高峰（它不同于信义宗[2]教会，想想看后者的突出代表人物马丁·尼莫拉神父）。

这样的蒙蔽，再加上反闪米特的特征，造成路德派新教教会——除了少数人发起抵抗之外——面对国家社会主义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时，万马齐喑。当时以教皇庇护十二世为教宗的天主教，也在面对第三帝国时努力保持这个“最尴尬的”（双重含义的尴尬）中立，教皇本人亦不能公开为犹太人说情。只有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教会才突然有胆子反对，哪怕这事是纳粹分子为“下等生命”布置的“安乐死”和灭绝性屠杀。

如此，战后的教会有一切理由表达一下懊悔（“心灵的悔悟”），忏悔罪过（“忏悔”），并用“工作”来弥补之前的错误（“赎罪”）。不同于天主教教会一如既往的缄默，路德派新教教会委员会（EKD）在他们1945年10月18～19日于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中表达并起草了一份《罪责宣言》。

“我们带着巨大的痛苦在此发言：因为我们，许多民族、许多国家遭受了无尽的苦难。我们现在要在这里，以耶稣基督之名，表达我们团体的忏悔：尽管我们多年以来，也曾经以耶稣基督之名，与纳粹强权的可怕思想做过斗争。但我们谴责自己，谴责自己没有更勇敢地表达，没有更诚心地祈祷，没有更愉悦地信主，没有更热情地爱世人。现在我们和我们教会应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 格奥尔格·邓茨勒和沃尔克·法布里西乌斯的《基督徒和纳粹分子》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这场斯图加特的“悔罪”，这场在世界教会委员会的代表出席的会议上所做的悔罪，以及给全世界基督徒发出的悔罪信息，并未被团体认同和接受。“教会没能传递出悔罪的必要性。人们并没有在‘斯图加特宣言’似是慷慨激昂的表述中找到某种合适的解

释。而是，就算德国已经普遍发展进步，这份宣言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只被当作一种不合理的煽动。至于为什么会获得这样的反应，宣言本身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这种传达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在宣言的字里行间找到答案。尽管他们在斯图加特坦白承认了当时没有尽力去做本需要做的努力，但宣言内所做的那四种否定的比较（‘没有更勇敢地表达，没有更诚心地祈祷，没有更愉悦地信主，没有更热情地爱世人’）却给人以一种印象，就好像他们已经做出了某些勇敢和无畏的成就似的。”

至于天主教，教皇庇护十二世在1945年7月2日给德国天主教徒颁发了“荣誉证书”，褒奖“教会对纳粹主义不屈不挠的反抗”。同年8月23日，德国主教们在一份主教通告中表示，他们对“天主教民”居然未被如此大规模的强权的盲目崇拜所征服“感到欣慰和喜悦”。“我们很欣慰，我们的信仰从没有也永远不会在邪恶面前屈服。我们很欣慰，这种不敬神的和无人道的邪说，除了我们天主教信徒外，也没被其他人接受。”绝大部分天主教教职人员曾和第三帝国同流合污的事实，就这样被轻描淡写。

神学家卡尔·巴特在1935年被波恩大学免职，后来参加了反抗希特勒的活动。从1945年起，巴特从瑞士寄来他的“公开信”，这些信主要是抗议新教和天主教会的伪善，试图把所有的罪和责隐藏在他们兄弟般友爱的神父和牧师的大袍下。（比如，符腾堡大主教特欧菲尔·乌尔姆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一天后发出谕令，不要抱怨和控诉，而要原谅和互助。）

在这个不信超验论（“我相信，因为它是不理性的”）的世界里，除了极端的神学，还有无神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试图在“固有”和“平凡”中发现卓越。“本质”是“存在”的前提，“存在”由“本质”产生。传统、信仰、习俗等都不是天然就稳固存在的结构，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在其中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人被“抛入”这个世界，又在其中“堕落”，只有通过承担责任才能理解这个世界。在废墟时期给德国精神生活很大影响的让-保罗·萨特认为，人作为有行动力的生物，做任何决定都不隶属

于某种“非做不可”。人通过做事的方式成为他自己。

萨特及其哲学理论有各种各样的受众。1947年7月，马尔堡哲学教授朱利叶斯·艾宾浩斯说，他费尽千辛万苦都无法弄到萨特的小说。“也许，如果能使占领国当局了解到我们多么乐意知道法国人弄出了多么令人兴奋的文学作品——它在丹麦写成，在德国使所有系统化深思的哲学头脑（这里指的是克尔凯郭尔[3]、雅斯培[4]和海德格尔）相形见绌，他们也许会同意放开一点图书管制。”

> 1942年，萨特的存在主义作品《苍蝇》在俄国人建立的剧场“海鸥”俱乐部上演——该俱乐部以啤酒、香肠、伏特加和罗宋汤闻名。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娜·波伏娃共同出席了首演。在西部占领区内，这出话剧最初因其离经叛道的内容而遭禁。禁演一直持续到1947年9月，当时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在杜塞尔多夫把它搬上了舞台。
>
> 内容的梗概是，主角俄瑞斯忒斯谋杀了他的继父和母亲。当知情者埃列克特拉因此备受良心拷问时，俄瑞斯忒斯却完全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我做了我的事情，埃列克特拉以及我的行为都是好的。我会为我所做的负责，就像一个渡船的船夫扛着他的游人过河。我将会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河岸，然后跟他们解释原因。他们越是沉重，我就越是开心，因为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行为。”
>
> 厄里倪厄斯，神之公正的黑暗的警告者，被萨特认为是一群恶心的苍蝇，覆盖了城市，把所到之处弄得很不堪。

与法国哲学不同的是，卡尔·雅斯培的存在哲学从废墟时代开始就已经流行。人在失败时，总是试图抓住某种真正的本质，对那些“零点时刻”的人来说，这是疗伤的药膏。他阐明，尽管人们一再以某种所谓绝对的名义假装思考和行动，可他们真正做出来的事又与这些绝对名义背道而驰。他们口里讲着美德和公正，但恰好是这些掩饰了不道德和暴力。他们打着某种真相的旗号相互谴责彼此的观点，可正是这种永远无法到达的“真相”使所有人都成了说谎者。那些在客观的保护伞下散布开的，其实是非法膨胀的主观本身，这种不恰当的膨胀既伤害了其他人的“主观”，又伤害了自己的“主观”。存在主义的辩论家坚守一个悖论，

即人只有放弃了规范其行为的束缚，才能建立自身存在的规范，只有这样，他才能认清自己、与他人交往。

马丁·海德格尔重新发现了一种哲学体系，该哲学体系认为人的存在即是一种忧虑。人们在各种各样的世俗忧虑中迷失了自己。这种担忧恐惧已成为一种基本的心理状态，一种在“大千世界”里公然孤独的心理。海德格尔在他的《林中路》（1949年）一书中描述了某种“基调”，某种自尼采以来主宰德意志精神的基调，即覆灭的基调。

部分学术青年感到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非常符合自己的心情。尽管当时只能看到该作品的部分章节（1943年）的摘要，但是加缪“荒诞的思想”却流进并几乎渗透了废墟时代的社会思想意识。某个行为可以既无意义又有意义，这种思想令人着迷。就像西西弗斯应该去推动石头，虽然永无机会把它推上山顶——但他同时能感到幸福。决定采取积极行动的人给了自己的存在一个意义，一个似乎被现实隐瞒的意义。《西西弗斯神话》成为一代人的祷告书，他们通过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的”想象来逃离命运无名的压力。因为这里面有着西西弗斯所有隐藏的快乐：他的命运属于他自己，他的巨岩是他的东西。这个荒诞的人愿意这样，而他的辛苦永无止境。

“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脚下！人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他的负担。但是西西弗斯教会我们更大的忠诚，也就是拒绝了众神以及推动巨石。他也觉得，一切都好。这种与权威顶峰的对抗足以满足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应该相信西西弗斯是一个幸福的人。”

> 这种哲学激进主义很快就被西方盟国所带来的物质主义置换。荒诞的勇敢被越来越强的现实感替代。存在主义因此逐步跨向了具体主义。精神的觉醒为非常时刻的生存渴望蓄积了能量。当20世纪40年代结束时，西德社会通过重建、修复得到巩固，人们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对安全感的根本追求也开始引起青年人的思考与关注。他们发现，根本任务是通过物质去巩固个人日常的和集体的生活世界，改善生活质量。存在主义，就像当初慷慨高歌地决定了废墟一代的精神一

样，渐渐变得不再流行。本质终究还是通过存在决定：自由成了强迫的消费，后者则成了众望所归。荒诞，从头到脚，学会了进步，从寻求意义的荒野进入目的性的区域。不幸的灵魂在物质化中找到了安宁。

流亡者的声音

从政治角度看，再教育首先意味着恢复那些受抑制和排挤的流亡在外的德国思想。尤其是左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在对人们进行反法西斯主义启蒙时，完全不同于盛行一时、圈囿于内心的宗教神秘主义。对现有社会制度做出批判的作品有沃尔特·贝伦德森的《人文主义前线》（1946年）、理查德·安德鲁斯和阿尔弗雷德·坎特诺维茨的《禁与焚》（1947年）、E.C.维斯可夫的《陌生的天空下》（1948年）。杂文中汉斯·迈耶的《德国流亡者文学》（1947年）和坎特诺维茨的《流亡中的德国作家》（1948年）以及斯特芬·赫默林的广播演讲及其政治-文学杂志的编辑项目，像《呐喊》《东与西》《变迁》《法兰克福期刊》等都是新秩序建立中反法西斯主义复辟的代表。

在流亡中，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从来没有停止过关注和思考德国的状态。“讨论一直没有中断。小说、歌词、剧本，以及个人传记中都有尖锐的反映。有一些是很直接的描述和批评，另一些则被置于历史的比较中。只有少数的钻进了神秘的云彩里。许多死了，腐烂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流亡让作家们变得脆弱和悲观。”流亡文学使其作者保持着生气和战斗的欲望。

德国流亡文学中的重要作者有：

君特·安德斯

约翰内斯·R.贝歇尔

贝托·布莱希特

赫尔曼·布罗赫

马克斯·布罗德

费迪南德·布鲁克纳

马丁·布伯

埃利亚斯·卡内蒂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阿尔贝托·埃伦施泰因

莱昂·福伊西特万格

布鲁诺·弗兰克

莱昂哈德·弗兰克

乔治·斯特凡

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

斯蒂芬·赫尔姆林

马克斯·赫尔曼-内瑟

斯特凡·海姆

弗里茨·侯赫威尔德

玉栋·冯·霍瓦特

汉斯·亨尼·雅恩

乔治·凯泽

阿尔弗雷·坎图洛维茨

赫尔曼·克斯特

安妮特·科尔布

埃尔瑟·拉斯克-舒勒

埃米尔·路德维希

亨利希·曼

克劳斯·曼

托马斯·曼

路德维希·马尔库塞

彼得·德·门德尔松

罗贝托·穆齐尔

罗贝托·诺依曼

特奥多尔·普利维尔

阿尔弗雷德·波尔加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约瑟夫·罗斯

内莉·高盛

勒内·希克利

安娜·西格斯

玛尼·斯佩伯

马克斯·陶

恩斯特·托勒

弗里茨·冯·安鲁

约翰内斯·乌尔兹蒂尔

彼得·魏斯

弗朗茨·韦福尔

卡尔·沃尔夫斯科尔

卡尔·楚格迈尔

阿诺德·茨威格

斯蒂芬·茨威格

在戏剧领域，苏黎世剧场在第三帝国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自由灵魂的堡垒，是那些迫不得已离开德国的演员和导演的避难所。1933年，这里的演出依然是很小众的，主要演一些能赚钱的娱乐剧。后来在奥斯卡·沃特林的带领下（从1938年起）开始了一个新的任务：抵挡野蛮对人性和艺术的入侵并且在思想上与之抗争到底。

战争结束后，苏黎世剧场重新定义了自己的主要意义。首先，不要低估他们物质上的帮助。1945年5月9日，即德国纳粹国防军投降那一天，沃尔夫冈·朗霍夫组织了一场“德国救援活动”。全体剧团成员为他们的德国同事誊写简·基奥都西、让·保罗-萨特、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图尔顿·怀尔德、费迪南·布鲁克纳的剧本。剧院成了问讯处。人们收集戏服、生活食品、道具、窗帘帷幕以及歌剧台本。5月6日，莱昂哈德·斯特科写了《理想戏剧在自由德国重建的摘要》，希望占领国的管理机构和艺术审查等官方机构能认识到戏剧艺术对民主国家思想形成和塑造的重要性。德国城市的废墟时代在不久的将来会落下帷幕，开启全新的自由。“因为这对苏黎世提供第一个全面的洞察当代戏剧文学的工作非常有帮助。许多在德国被禁的作者，像凯泽、布鲁克纳、沃尔夫、布莱希特、维尔弗、汉森科勒弗、弗兰克·布鲁诺、霍瓦特，都在苏黎世崭露头角。最终，马克斯·弗里施、弗里德里斯·迪伦马特以及布莱希特的叙事文学剧，托恩通·维德斯和约翰·斯坦贝克的寓言戏剧也紧随其后在此上演，为戏剧带来进一步发展。另一条路线则从苏黎世发展到后来的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以及东德的德国剧院。”



约翰·斯坦贝克：《月亮下去了》。特蕾泽·吉泽（左起第三位）与沃尔夫冈·朗霍夫（最右）在苏黎世剧场的首场演出

贝托·布莱希特、简·基奥都克思、卡尔·楚克迈尔、托恩通·维德斯、费迪南德·布鲁克纳都在苏黎世剧场进行过首演或首次在此用德语演出。戏剧顾问和导演库尔特·赫施费尔德对热点话题和现代主义作家有特别的识别力。他组建了一个具有极高表演水平的剧组：玛丽亚·贝克、特蕾泽·吉泽、恩斯特·金斯堡、埃米尔·斯托尔、沃尔夫冈·海因茨、库尔特·霍维茨、沃尔夫冈·朗霍夫、卡尔·帕瑞拉。除了沃特林自己的演出之外，尤为突出的还有莱奥哈德·斯特科以及莱奥波德·林·德伯格——他们在舞台布景设计师西奥·奥托的支持下，创造了剧院的新风格。

在库茨·赫施费尔德的鼓励下，马克斯·弗里施开始做起舞台剧创作。被称为“挽歌尝试”的《现在他们又在唱歌》完成于1945年复活节，1946年爱情故事《圣塔克卢茨》进行首演。同年，在穿越了破碎的德国之后，他创作了警示集体自杀的《中国长城》（“洪水可以是人为的”），三年后又接着创作了舞台剧《当战争结束时》。1947年，迪

伦马特的新戏剧《写在书上》被库茨·霍维茨搬上了舞台。1949年，“历史剧”《罗慕洛斯大帝》问世。（总的来说，迪伦马特在他祖国以外的地方都获得了广泛的肯定。）

那些在国外度过纳粹恐怖时期的德国文化代表人物经常以间接的方式参与及影响战后的精神重建——如通过杂志和报刊（尤其是通过美国人出版的《新报》及被美国人支持和赞助的杂志《月份》）。此外，为大量纳粹时期受排挤的批斗者平反也很困难：“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在此期间要么已经丧生，要么失踪。而他们那些被第三帝国的艺术代理热系统‘清理’过的作品，也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能被阅读到。”（约斯特·赫尔曼德）而西方盟国的对流亡者的友好文化政策背后的真实目的并非想促进逃亡艺术家“真正”回到德国，而仅仅是因为担心这些有权威、有声望的流亡者出来扰乱他们的再教育政策。流亡文学中的顶级行家汉斯·阿尔贝·瓦特对此现象所做的观察是，许多流亡国外的移民是很希望回到德国的，但是不被允许，因为战胜国当局对他们的归来既不感兴趣，也并不希望看到他们回国。除此之外，重返德国对于他们来说内外都存在着保留条件。另一些逃亡者也存有犹豫，即是否有勇气在中晚年还要回到破碎的欧洲重新开始建设新的生活。还有一些逃亡者感到为难，他们已经在国外建立了家庭，他们的孩子是在英国或美国，在那个他们已经融入的环境里长大的。重返欧洲也就意味着，孩子或少年们要第二次背井离乡，面临的也是一个未知的未来。比这些私人原因更让人需要考虑的是政治的不确定，是对这个国家、对回到这个整个民族都曾站在纳粹的立场上背叛过他们这些流亡者的国家的不确定感。

第三帝国时期涉及了各个领域的文化和文化人才的流出，如：

出版商

G.B.费舍尔

雅各布·赫格纳

鲁道夫·乌尔施泰因

画家

约瑟夫·阿尔伯斯

马克斯·贝克曼

莱昂内尔·法宁格

乔治·格罗茨

保罗·克利

奥斯卡·柯克西卡

瓦斯里·康定斯基

汉斯·普尔曼

库尔特·斯维特

建筑师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恩斯特·麦

埃里希·门德尔松

密斯·凡·德罗

布鲁诺·陶特

作曲家

汉斯·艾斯勒

保罗·亨德米特

阿诺德·勋伯格

库尔特·威尔

指挥家

埃里希·克莱伯

奥托·克伦佩勒

布鲁诺·瓦尔特

具象艺术方面的流亡者里则有大部分20世纪享誉世界的德语话剧界泰斗级人物：

导演

莱奥波德·杰西纳

弗里茨·科特纳

弗里茨·朗

莱奥波德·林德贝格

欧文·皮斯卡特

马克斯·莱因哈特

莱昂哈德·斯特科

乔治·塔柏

贝特霍尔德·菲尔德

男女演员

阿尔贝托·巴塞曼

伊丽莎白·伯格纳

恩斯特·布施

玛琳·黛德丽

恩斯特·多伊施

迪拉·杜里罗克斯

洛特·莱尼亚

彼得·洛

格蕾特莫斯海

卡罗拉·内尔

马克斯·帕伦贝格

在超过6000位流亡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医学家中，有一些是20世纪最有名的学者，他们中有2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

马克斯·玻恩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弗里茨·哈伯

里瑟·迈特纳

埃尔文·斯勒丁格尔

理查德·威尔施泰特

法官和宪法专家

恩斯特·弗兰克尔

罗贝托·肯普纳

奥托·基希海默

格哈德·莱坡德

维尔纳·冯·西姆森

雨果·辛兹海默尔

汉斯·凯尔森

社会经济学家

弗里茨·巴德

弗朗茨·奥本海默

威廉·吕伯克

约瑟夫·熊彼特

社会学家

诺贝托·埃利亚斯

特奥多尔·盖格

勒内·柯尼希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卡尔·曼海姆

赫尔穆特·普勒斯纳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阿尔方·西尔伯曼

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埃里克·埃里克森

埃里希·弗洛姆

卡琳·霍妮

奥托·兰克

威廉·赖希

特奥多尔·瑞克

教育学家

弗里茨·伯利斯基

库尔特·哈恩

海因里希·罗登施泰因

索尔·P.罗宾逊

此外还有大量的哲学家

特奥多尔·阿多诺

君特·安德斯

汉娜·阿伦特

恩斯特·布洛赫

汉斯·卡西尔

马克斯·霍克海默

汉斯·约纳斯

鲁道夫·卡尔纳普

赫尔穆特·库恩

特奥多尔·莱辛

卡尔·律维特

赫伯特·马尔库塞

路德维希·马尔库塞

卡尔·波普尔

乌尔里希·索纳曼

俄国人对共产主义或者是右翼社会主义作家采取不同的态度，这种有区别的对待在占领区重建之初就已形成。西部的移民来东部是受到欢迎的，即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被信任。部分在政府公共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是前西部移民，但是在1950～1951年的斯大林清洗运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告发为“帝国主义间谍”，并因此遭到迫害。

黑名单、灰名单、白名单

在文化再教育的时候——美国占领区是让信息控制部门进行操作，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则是由剧院和音乐管理部门负责，苏联占领区则是通过由苏联军方管理的文化部门进行具体作业——盟国军政府主要依靠“文化进口”，即“小心仔细地”为德国选择“文化输入”的内容，为德国人重新打开看世界的窗口。为此目的而开设的文化馆有：美国之家（到1947年1月已经设有127个公共设施以及136间阅读室）、英国中心（“桥梁”）、文化中心、苏联文化馆。它们负责传播反法西斯精神以及人道主义和民主概念，并以不同的着重点进行，最常见的落实方式是召开会议、讨论会以及信息材料的分发（如书籍、杂志、宣传小册子）。

盟国带着自己的改革计划而来，却在具体实施时受到很快希望“在场”的德国文化界的影响——这些人无不很快地进行“再定位”（就像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们做的那样），以在盟国的保护伞下重新工作。因此，占领区政府不存在为缺乏供应而抱怨的必要。

> 埃里希·开斯特纳从慕尼黑报告——他被一辆美国吉普从迈尔霍芬/蒂罗尔的避难所中接走，带到了拜仁州的首府慕尼黑，在那里被安排入职《新报》的文艺专栏主编——这里到处是德国演员、导演、记者和电影工作者。“他们需要信息。他们寻找关系。他们有着各种计划。他们期盼着与老同事重聚的喜悦。他们住在乡下。他们急迫期待再次回到慕尼黑。谁掌有许可颁发的权利？法尔肯贝格还将会继续保留这

> 种小型剧场的演出吗？它会用什么剧开幕？是桑顿·怀尔德的《我的城市》吗？几时呢？在九月初吗？”开斯特纳遇到了沃尔夫冈·科尔彭，在小型剧场的院子里又遇到了鲁迪·逊德勒和阿瑟·玛丽亚·拉本阿特。这两个人想在剧院得到市政府的允许时开始小型歌舞场剧目。他们计划用维隆·林格尔纳茨以及波德莱尔的剧本，滑稽短剧和舞蹈节目以及漂亮的女孩（比起好的剧本，漂亮的女孩便显得不足道，而诙谐讽刺的歌曲小调也令人十分期待）来使小型歌舞剧场获得关注。“我必须参与。令人沮丧的是没有写出新的东西，不过他们如果再给我几天时间的话，还可以补救。”

名单和考评（占领国政府会参考可信者有时甚至是内心流亡者[5]的意见）帮助检验政治是否可靠。1945年10月，美国新闻检查局领导层对外宣布，他们手里有一份1440个德国人的名单，这份名单足够对美国管制区内所有文化领域做定性。“黑名单”、“灰名单”以及“白名单”组成了一个评判的基本背景标准，它决定了那些想在媒体、电影、戏剧以及音乐等行业寻找工作的德国人的去与留。“黑名单”中的知名人士有钢琴演奏家吉森教授，指挥家汉斯·科纳普尔布什以及威廉·福特翁格勒，电影明星埃米尔·杰宁斯，作家恩斯特·容格尔以及弗里德里希·斯尔布格。

> 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是柏林剧院院长，曾被纳粹授予“国务委员”，1945年后多次被逮捕。1946年，他写了一篇名为《德国演员社会学》的文章。“对演员来说，艺术是第一位的，更确切地说，是好的角色和有趣的演出任务。政治教育中缺乏的部分通过德国演员来与整个德国民族分享……纳粹的说教是肤浅的，只是玩弄一点大众心理学，它不可能有什么深层次的东西。旁观者很惊奇地发现，在过去12年内，演话剧的演员大部分并不觉得纳粹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更不会认为他们自己和纳粹的无耻有关。因此，尽管他们也知道人们口口声声说的德国人的集体责任罪状，却漠不关心，毫不认为自己有哪怕一点点罪责。”

战胜纳粹政权后，和政治及社会领域一样，文化领域里摆在盟国面前的是两大重要任务：解散已有的纳粹主义组织和重建制度——一个不仅能保证自由，还能保证公平的民主制度。为了让德国人不再重蹈法西斯覆辙，盟国一开始就统一态度，委托可靠的人来承担文化方向的带领组织工作以及合作。“当他们开始建立新文化时，各个占领当局不同形

式的文化理念也逐步清晰地体现出来。尽管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区别都被掩盖着，因为《波茨坦协定》表示反对所有集权式的趋势及支持推进德国的联邦制度结构。最初几年，与英国和法国相比，美国和苏联在文化政策方面表现最为积极突出。在西方占领区联合内，美国显而易见地担任了此区的领导角色。”（约斯特·赫尔曼德）

文化协会

苏联对德国的未来制度的计划整体来说是相当明确的，即特别强调德意志民族的共产主义。文化政策上，在苏联占领区内意味着德国艺术工作者应该在去除纳粹主义思想体系上起到首要作用，以免给人一种德国文化的苏联化印象。相比西占区通过去纳粹化委员会对艺术家进行严格测评，苏占区对于那些有名望的艺术家的态度则是不论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表现，都给他们提供聘用、住处、食品包裹，也就是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例如，保罗·魏格纳、霍斯特·卡斯帕、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埃里希·彭托、威廉·福特文格勒、阿里贝特·魏舍尔这些被美国人列入“黑名单”的艺术家。）

“占领国和德国共产党人致力于达成一个建立在德国传统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反法西斯-民主共识。”

> 苏联的文化政策在苏联军政府德国情报署，即早期的“宣传部”文化官员的协助下实现。这些与德国文化最接近并且最有能耐的名人（人们称为“列宁格勒党团”——他们把列宁格勒视为苏联最突出的西方城市）很少考虑，经历了普遍的思想革新后的德国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对于文化领域，文化部部长谢尔盖·图尔潘诺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我们的功劳在于，我们帮助德意志民族重新开辟了自己的进步文化，重新开辟了世界。或者说——就1930年至1945年公民的、人道的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文学来说——我们至少是帮助他们认识了进步文化和新世界。”

6月底，诗人约翰内斯·R.贝歇尔向苏联军事司令部申请在柏林批准成立“德国民主主义革新文化协会”，以这种特殊方式促进德国人文主义

的革新。（贝歇尔在1933年离开德国之后，先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1935～1945年在苏联生活过。）

每个占领区内，“统一德国的知识分子”都被这样一种信念所引导，即德国的文化没有被纳粹和战败动摇，并且有能力给予每个人支持。文化协会的宣言，如亨利希·曼所说的，充满了对德国文化永不质疑、永不放弃的精神。作为第一任协会主席的贝歇尔，在与苏联文化官员达成了共识后，成功做到了“在与德国艺术工作者和学者交往中，实现这个深思熟虑的纲领”。“超越党派的中立”的标签，如曼弗雷德·耶格尔所说，迎合了传统德国对文化的概念。而关键词“革新”一方面体现了传统的再生，也就是人文基质的再建立；另一方面也指向了某些新含义，即克服精神与权力间的矛盾。

> 1945年7月3日，大约1500名德国人（主要是西区的公民）参加了在柏林广播大厦最大的演播室中举行的文化协会第一次公开大会。柏林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这份表决通过的宣言宣告，“伟大的德国文化”作为“我们祖国的骄傲”应被再次唤醒。因此，德意志民族要从历史中所有的保守和反动中解放自己，重新回到世界民族的共同体中。最好的德国人——所有职业、不分阶级——应该在眼下这个德国历史的艰难时刻里团结起来，完成德国的革新以及在精神文化领域建立全新、纯净、积极生活的使命。只有作家伯恩哈德·凯勒曼发出了批评的声音：文化协会要懂得找出所有该为德国过去的畸形发展负责的诗人、出版者、公务员、高级官员、将军、银行业者或是全能的实业家。“他将会抓住你们的胸口，把这个可怕的问题掷到你们脸上：你们为什么玷污了德国的光荣与骄傲？为什么？为什么？回答我。你们都该死。”与此相反，保罗·魏格纳则要求“歌德精神的回归”。

汉斯·迈耶（1935～1945年流亡于法国和瑞士，后在法兰克福广播电台，1958～1963年在莱比锡任文学史教授）在他的书《再教育的文学》中佐证，两个作家，一个在慕尼黑，一个在被俄国人占领的柏林地区——“就在那些挨家挨户兜售的术语‘再教育’和‘民主革新’的缝隙里，为德国的文学生活创造了条件”——他们是埃里希·开斯特纳和约翰内斯·R.贝歇尔。因为他俩的努力，战后的那些年，从1945年直到冷战，不

管在美英法苏哪个占领区都还有德语的文学。“开斯特纳在《新报》的文艺专栏被广泛阅读、讨论——从什未林到罗拉赫，约翰内斯·R.贝歇尔所创立的德国民主主义革新文化协会在四个占领区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受到了追捧。”

这个文化协会不愿脱离激昂、崇高、肯定的语言模式和特定的文化礼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保守的、德国的；可在另一面，没有任何其他文化机构比得上它那样从内容上致力于新艺术。真正的文化，正如协会组建成员之一的汉斯-格奥尔格·迦达默尔（当年莱比锡大学的校长）阐述的那样，不应该只满足于仅仅把文化作为教育的世界，艺术、科学和我们所有的社会自我意识形态不应该被认为是从现实压力中实现解脱的形式，而应该是从现实中实现某种升华的表达。

> 除了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评论报》发行人莱奥·鲍尔、日耳曼学者恩斯特·博依特勒、天主教时事评论员和《法兰克福报》的出版者之一的沃尔特·德克斯也参加了文化协会在法兰克福的筹备工作。约翰内斯·R.贝歇尔在德国境内到处旅行，对能够再次回到家乡慕尼黑感到无比开心。在上拜仁区，他拜访了恩斯特·维歇尔以及他的田庄。后来，同是贝歇尔成立的建设出版社很快在柏林发行了维歇尔所写的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故事《尸林》。文化协会在斯图加特成立，成立会上贝歇尔做了专题报告，而这个会议的领导人是后来的首任联邦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伊斯。

在冷战的环境下，文化协会在西方占领区尤其受到美国人镇压——弗兰克·特罗莫勒如是说。但他也忘记提到——苏联档案馆的开放让人们有了一些新认识——苏联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文化协会当作“特洛伊木马”。瓦尔特·乌布利希与斯大林商讨了该协会的创办。这种别有用意的伪装是为了制造团结一致的假象，以避免批评。“该文化协会应该成为一个广泛的群众组织，一个没有政党政治标签的组织。我们没有兴趣把这样的一个文化协会清晰地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这对我们来说用处不大……文化协会在官方上与共产主义党派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苏共和德共的文化政策

1946年2月3日到5日，德国共产党举行了首次文化会议。德国共产党主席威廉·皮克以及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安东·阿克曼在讲话中强调了文化协会的精神，即运用广义的文化定义，自由发展符合人民利益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支持所有有意为民主革新做贡献的人，打破固有阶级的教育垄断，发展全民教育，在民主的意义上改变中小学教育内容。不过，他们的发言也颇有“弦外之音”：德国共产党追求一种刚性文化。1948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一次文化会议也充分地体现了这种想法。德国共产党认为阶级矛盾会激化，并从这个出发点深入探讨了何为“公民意识形态”。

> 奥托·格罗提渥发表了题为“现今精神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演讲，讨论了经济基础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精神根源，尤其对种族主义学、尼采的超人道德以及施彭勒的《西方国家的没落》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判断某种思想有什么价值，评价标准是它们导致了何种历史事实及何种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权力。奥托·格罗提渥后来转向存在主义，因为存在主义拒绝任何社会联系，以至于有意无意地又回到了尼采的思想。文化会议不仅仅涉及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清算，最主要的是确立何为现代公民意识形态的主导潮流。



诗人叶夫根尼·多马托斯基对苏联士兵讲话，柏林，**1945**年**5**月**2**日

苏联军事管辖的文化政策逐渐走上拥护红色思想的道路，尤其是图帕诺上校委命文化部领导蒂姆斯茨少校强行打破由安德烈·斯丹诺早从1946年开始在苏联掀起的一场反对形式主义、现代主义以及颓废派的运动。瓦尔特·乌布利希1945年的口号已经赤裸得不需要特别掩饰：“这一点很清楚。必须看上去民主，但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四个占领国实施的文化再教育政策尽管在大城市里常常遭到反对和破坏，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共鸣板。受委任的办事机构——根据盟军当局的意思——被赋予很高的地位，这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因为社会文化赋予他们“生命意义”。当然，由于占领国当局对其所占领地区实施的文化政策方向的不同，东西德的发展很快就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的苏联占领区内只强调集体，并且不允许更大的独立，所有发展依赖于苏共中央的指示以及补

贴。而在西占区，文化政策属于地区管辖的组成部分——由专业的文化专员和各市的文化参议会来管理发展。

> 苏占区文化重建第一阶段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当德累斯顿的社区尚有较大的自主空间时，苏联军事管理政府的文化官员对德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口号：只有当人有足够的知识和道德力量，并根据自己的想法行事的时候，饥饿和毁灭才能被克服。
>
> 1945年6月，约瑟夫·凯贝特重新站上了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的指挥台。同年8月，“德累斯顿十字合唱团”[6]在二战后首次登上舞台。表演在7月以莱辛[7]的《智者纳坦》拉开序幕。埃里希·彭都饰演主角，其“舞台美术中天才般的简约”受到了广泛赞赏。
>
> 卡尔·奥尔夫执导的《安提戈涅》无疑非比寻常。这部戏剧于1950年1月27日首映。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日丹诺夫主义下引发了一场反对此剧流露出的“形式主义”的“运动”。全体演出者和领导层被强行解散。事实证明，盟军空袭对德累斯顿的毁坏[8]给光荣的德累斯顿国家剧院带来的负担比新国家的文化教条及其后果还要轻许多。

寄希望于歌德

无论是中央文化还是地方文化，无论是苏联占领区文化还是西部占领区文化，文化的再教育一定程度上都会导向“继承”及重温德国经典（尤其重要的是“人文主义者歌德”——1946年，赫尔曼·黑塞荣获法兰克福歌德奖）。

“从来没有——哪怕在最黑暗的岁月里——智慧和善良的声音、爱和忍耐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歌唱。歌德——我们清楚地听到——是这片声音中的主旋律……这个声音在呼唤谁？人类。他的民族。讲他的语言的民族。”（阿尔布雷希特·戈瑟）

1949年，歌德两百周年诞辰给德国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它“本来”面貌——另一种德国面貌、真实的德国面貌的机会。二战后首次如此大规模地利用文化政策，包括文化旅游，把经典和商业结合：“歌德

的德国邀请你！”歌德应该协助德国重返文化民族的和平大家庭。

阔别16年，托马斯·曼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在法兰克福，这座他在此获得歌德奖的城市中为歌德年发表了致辞。他还去了魏玛，并强调了东西两德的共性。“‘好的德国’是一种力量，由音乐、由伟大的道义赐福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德国人可以成为某种模范，他不仅仅是德意志民族的榜样和集大成者，也是——当他的‘自我’拓展到人类的‘自我’之时——人类的榜样和集大成者。”



马克斯·佩希施泰因所画的歌德画像，**1949**年

托马斯·曼希望借在东西两德怀念歌德的机会消除东西两德渐行渐远趋势的想法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比如说，保守的政治评论家弗里德里希·西博格就认为，尽管从法兰克福到魏玛的路很短，但是，对《浮士德》的作者来说，这可是一条受难之路。“托马斯·曼和德国没有缘，谁又有呢？”对这样的抗议，托马斯·曼明确回应，旧祖国的完整对于他及他此次访问意义重大。对他来说，“与东德的人民保持距离，并一定程度上把他们归类于左派，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考虑到苏联占领区内的政治压制，欧根·科贡希望托马斯·曼拥护真正的人性，而不仅仅是

一味坚持抽象的人性。

> 沃尔夫冈·哈里希在东部地区的《每日观察》中这样写道："那些意图分裂德国的人可笑的反对和'善意的劝告'并不能动摇托马斯·曼前往魏玛的决定。他冲破了这个被谎言和诽谤制造的政治'铁幕'。他的出现记录下了他不能也不愿意认可的事实，即东西两德区域的分裂。托马斯·曼此时此刻在东部地区新反法西斯-民主制度中发现了什么？他认为，在转变了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已经被彻底根除。他在此看到了一个社会秩序，可以从实际上保证——至少在他的祖国——反动势力的政权和他们挑起的战争永远抬不起头。"

虽然官方一直在努力让歌德庆典的氛围不被破坏，但庆典期间，学术界一直围绕着怎样才是正确地理解"歌德"——跟东西德的问题完全无关——进行激烈的争执。卡尔·雅斯贝斯在1947年获得歌德奖时，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他主张批判地研究歌德。他认为，歌德并不能成为效仿的榜样，歌德是可以带来某些危险的，就算歌德本人也并不见得会屈服于这些危险。

1945年前后的文化意识——首先是奠定文化脱离政治的基础，在撤退政策的基础上，给民主以精神支持——是用歌德和经典来装点自己，此言可谓一语中的。西方国家身份认同的热心捍卫者恩斯特·罗贝托·库尔提乌斯，在瑞士纸媒《行动》上展开反对卡尔·雅斯贝斯的论战。作为一位罗马语族语言文学专家和波恩人，他的文章被《时代》（1949年4月28日）采用。"我们在歌德年里。我们以歌德的伟大声名控诉，这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哲学家既卑微又狂妄地谴责歌德，以此损害德国精神和德国哲学的声望的行为。"

歌德年终于过去，约亨·G.莱特霍伊泽在《月刊》（1949年12月）里这样评论。他说，这是非歌德的、争吵不休的一年，仿佛若干服从于不同政治世界观的巨大兵营互相对峙。如果说跟歌德真有什么关系以及有某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来表明这种关系的话，那应该是被天灾人祸折磨不堪的柏林人依然充满热情地一波波涌向每一场关于歌德的报告和讲

座。报告厅总是太小，为了争夺进去的位置，人们真的会打起来。

柏林概念

1945年，在柏林这座城市，盟国文化的再教育以完全不同的甚至相互竞争的方式同时进行。

苏联红军征服柏林被赋予很高的象征意义——作为早期德国首都的柏林被视为“法西斯恶魔的地狱”，在战争结束后成为苏联军事管理的文化政策的重点区域。直到1945年7月初，西方盟国才接手分配区域主管整个柏林。

> 1945年5月14日，尼古拉·贝萨林上将遵照4月28日的一号指令，规定电影院、剧院、餐厅的营业时间到21点为止，并立即开设了一个文化事务办公室。贝萨林上将向柏林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发出邀请，前来参加在苏联军政府官员主持下召开的关于重建文化生活的会议，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
> 6月6日，艺术创作者协会成立。协会主席由70岁的演员保罗·魏格纳担任，沃尔夫冈·哈里希这位“灰色阁下”从事政治监控工作，受到苏联当局的充分信任。卡尔·霍费尔被任命为美术学院院长，他与他的副手海因里希·埃默森着手学院的重组工作，6月25日举办了画展，展出52位在纳粹时期遭受迫害的艺术家的180余件作品。自1945年10月21日起开始凯绥-柯勒惠支纪念展，自1945年12月29日起开始柏林艺术家作品展。时任施特格利茨公共教育办公室主任的雕塑家汉斯·乌尔曼策划了一场名为“十二年后”的展览，后来该机构的很大一部分文化工作被协会转交由市政府艺术总局和各市行政区成立的艺术局负责。

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1945～1948年负责柏林精神的重建工作）表示，那些经历过1945年的人绝对会惊叹，这座曾备受文化精神折磨的城市复苏得如此之快，并且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彼特·德·门德尔松，这位在美国军方中颇有声望的前柏林人在1945年6月如此评价道：“柏林没有死。它在某些方面的活跃甚至超过了巴黎。”他觉得“这种在死亡与废墟中依然欢乐、依然繁忙的艺术氛围很容易让他想起之前德国经历的通货膨胀时期[9]”。除了物质待遇优厚之

外，在西方军政府文化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有足够多的理由把这个柏林被军事占领的时期视为他们人生中“最丰富、最有趣”的阶段。年轻的男人们、少数新入职者以及那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或许永远无法达到管理阶层中层位置的女人都觉得现在所处的领导位置是他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他们不再只是小小的编辑，而是堂堂的报纸创始人。他们做的工作是安排并分配出版许可，而不是校对文字的手稿。居然是一个年仅25岁、毫无戏剧经验的年轻人决定于尔根·斐林能否获得一张剧院许可证。

此外，还有那些随着西方盟军武装部队回来的移民，他们中许多人都土生土长于柏林。随后，他们与德国反法西斯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频繁交流，结识了年轻友人，再次联系到以前同事，慢慢理解了那些从纳粹主义时期活过来的人。除此之外，柏林精神以及前帝国首都特有的开放态度，比如好奇心，都有助于消除“十字军东征”式的情绪。然而，怀柔路线的代表，比如电影官员亨利·C.阿勒特——“鹰派”主要存在于罗贝托·麦克卢尔领导下的美国信息控制科——也不能不感到某些失望：至1949年年初，柏林美国管制区内有76所电影院。当大众都在追求美国最新电影的上映影院座位票时，放映集中营题材的影片如《死亡磨坊》的电影院几乎是零上座率。好莱坞是物质与精神上的助力，尤其是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期间，苏联对柏林进行封锁，由美国发起、与英国人共同合作的空中桥梁（277264架次飞机所运送的183万吨货物）进一步推动了西部城市的“美国化”进程。

在柏林的苏占区内，文化的春天也在悄然来临。苏联的掠夺和强抢所造成的恐慌在三年后依然有后遗症。1948年10月，据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记录，这种恐慌被文化的觉醒所掩盖。“希特勒来过又走了，然而德意志民族将留下。”依照斯大林的这个指示，苏联占领区内的政策出乎意料地友好，区内充满着一片对德友好的氛围。

四个占领国在文化重建中暗自较劲。柏林，直到分裂，俄国人在

> 教育艺术、戏剧以及广播和电影的领域内的地位都是主导性的，尤其是他们在对这座城市拥有完全统治权的两个月内为未来的发展铺设了基础。他们文化政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自由思想和实用主义为先，就如彼特·德·门德尔松说的“疏通，而非限制”的策略。除此之外，他们还十分重视与共产党知识分子的合作，这不仅仅体现在党的机构层面上，还涉及私下与个人的交往。“柏林及整个西欧最活跃的知识分子都乐于接受共产主义，因此俄国人拥有一群高素质的合作者，这一点是任何其他占领国都无法企及的优势。”
>
> 德国共产党以及东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文化政策成功地考量了在反法西斯名义下，从保守资产阶级的阳春白雪到无产阶级暴动式的煽动的文化全景。1929年出生、后来任职波特兰柏林剧团的副导演和导演（1977～1991年）的曼弗雷德·维克沃夫这样回忆道：“我们曾被纳粹判了死刑。文化是我们最大的生活支柱。”“这是我们1945年这代人的第二次生命。这种文化力量的改变关于生存，更多还关于生命，一切都坚定了我对理性的信仰。”

尽管，初期的多元和开放从1946年起在越来越狭隘的教条主义下沦为牺牲品，但战后建立起来的文化生活依旧在继续。这不仅仅事关苏联的专制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也因为文化生活中以改革为导向、大胆反对的“核心精神”。诗人弗朗茨·费曼（出生于1922年，在经历过纳粹青年团和苏联囚禁后，首先对德国统一社会党表达好感）认为，那时发生的尤其是触动了年轻人的事情，今天的人肯定很难理解。

“在改革创新的名义下，某些政治价值恢复了意义，尽管它们有时都被滥用了，但还是被孜孜不倦地使用：‘民族’‘祖国’‘未来’‘生命意义’‘共同利益’‘牺牲勇气’‘诚信’‘敬业’‘拼搏’‘奉献’……政治在真理的旗帜下复活……‘真理’——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词。”（弗朗茨·费曼）

废墟时代初期，柏林以及苏联占领区内的文化政策状况错综复杂。汉斯·迈尔在他的书《巴别塔》中就曾警示过，民主德国的开端就已透露了它的结局。他写到一个德国和另一个“到西方去”的德国的希望，他写到这个一切悬而未决、历史有多种可能的时代。曼弗雷德·里德尔，当时还在莱比锡，是恩斯特·布洛赫[10]的学生，将这一切称为“有好的

开头的神话”。他说，有人从一开始就怀疑反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幻想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宣传。

总的来说，四个盟国都在努力用它们的文化政策（“柏林窗口”）——在和德国人的合作中——去强调和证明自己的能力及意义。通过这种方式——这也在这个艰难时期增强了他们的认同感——德国人也认识到，即使别人不愿认可他们是一个国家民族，也至少愿意认可他们是一个文化民族。而柏林，一如既往地再次体现了它在魏玛共和国的黄金年代记忆中的独特文化魅力。

地方文化

《巴登日报》编辑、法国文化管理处作家、诗人奥托·弗拉克在1946年4月写道，人们不希望除了柏林以外的其他地区都被“草草打发掉”。他说，未来的德国建立在各分区的法律上，它不再是从中央到地方，而是从边缘出发，从至今依然围绕着“中心”的联邦州出发。联邦主义运动已然在望。“柏林人努力他们的，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慕尼黑、图宾根、弗莱堡、巴登-巴登、美因茨、法兰克福、威斯巴登、科布伦茨、汉堡等城市，从去年夏天开始就已经开启了生活的新篇章——还有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卡塞尔以及其他地方……我们不需要人工规划，也不存在为希特勒遗留的极权主义招魂的危险。柏林人决定未来的方向——不能这样。他们得照顾自己，他们的城市还在废墟中。我们是联邦主义的，重建只能……从地区出发。”

从柏林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后，许多城市以及更小的地方的文化团体——逐步走向多中心结构——也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并努力向外传播。悲观情绪的现象在柏林也时有被察觉。1948年11月25日，路德维希·艾贝雷在《柏林日报》中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没有中心》的文章，它清楚地指出，柏林三代人所积累下来的精神力量都将在三年后在汉堡、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及慕尼黑消逝。那些曾经在巴贝尔斯堡开设过工作室的导演现在在盖瑟加斯泰格[11]（Geiselgasteig）拍摄电影。在斯图加特的国王大道上，人们能遇见那些招牌已深埋在总督

府废墟下的时装设计师。莱茵州的剧场如果少了那些在御林广场学习过的演员的加盟增色，也不会如此受欢迎，而是像德国西北广播那样鲜少被提及。如果没有选帝侯大街的原生笑话，汉堡卡巴莱的访客们也会少了许多乐趣。之前在柏林的记者，现在也大多在写作西方文化生活的报纸评论。

举个例子，图宾根是战后较有文化意识的地方。据塔德乌斯·特洛尔（本名汉斯·拜尔，曾在英国被短暂囚禁，后在1945年返回家乡）报道，尽管从法国占领当局那里领取面包比从美国那里难一些，但法国占领当局也同许多学生及“那些为了能在精神的废墟中活动，愿意拿起信仰拐杖的怀疑者”一起，把此地建设成了一个精神的乐园。这个城市拥有当时德国最好的剧院之一。伊丽莎白·弗利肯席尔特、汉诺·威德、特奥多尔·洛斯、奥托·韦尼克、安琪拉·萨洛克以及维尔纳·克劳斯（因参演《犹太人劳斯》而被抵制）都是当时的剧团的演员。“卡洛·斯密德翻译了卡德隆斯的《明天是新的一天》，并为汉诺·威德写了了不起的歌舞剧歌曲。特奥多尔·豪伊斯对他的学生们说：‘逃离到浪漫的幻想中是懦夫的行为’。”

图宾根也是当时日耳曼学的中心（有雨果·莫泽、保罗·克拉克洪、赫尔曼·斯奈特、沃尔夫冈·宾德、弗雷德里克·圣格勒）。法律讲座则由特奥多尔·爱申堡和卡洛·斯密德主持。卡洛·斯密德与那些曾受纳粹主义诱惑的年轻人一起探讨学习，试图唤醒和激发他们的民主意识。每周，哲学家威廉·魏谢德尔都邀请博士研究生以及朋友们参加一个特定主题的探讨。最有名和最受欢迎的是他延续十天之久的哲学秘密会议（比如，他们很深入地探讨了马丁·海德格尔的《林中路》[12]）。

道德教育机构的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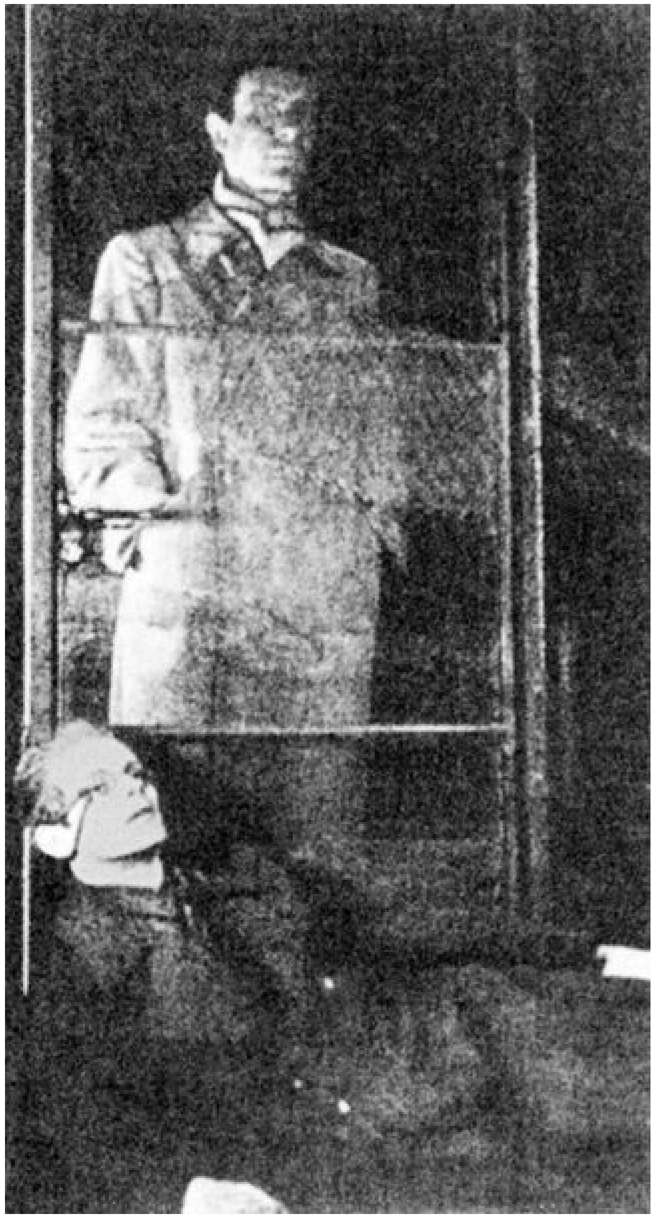
在盟国对德国的再教育计划中，剧院被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正符合它们的国民教育理念，剧院（以及博物馆）是最重要的文化场所。战争中有许多建筑物被毁：1937年，国家、州立以及城市剧院有179所，如今只有98所，也就是过半数的剧院被炸毁或烧尽。除此，其他的许多剧院也被损坏。剧团也纷纷被解散——自1944年9月1日起，第三帝国宣传

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设置德国剧团运行司。但是，“剧院频道”（人们对戏剧观看的热情和需求）从未间断。

在许多地方，甚至是小地方（比如说，拉恩河附近的仅有6000名居民的威尔堡），剧团的传统也快速被重新唤醒或建立，盟国的负责剧院方面的官员对此非常支持。1947年秋，133所国家、州立以及城市剧院被重建，连同84座临时舞台、125所商业私人剧院以及20座私人临时舞台。除此之外，还有57所巡回演出的剧院、农民戏院、客场演出戏院，共419所剧院可供使用——这么庞大的数目也是前所未有的。

戏剧在各种地方演出，包括临时的房子、音乐厅、演讲堂、电影院、体育场、城市大厅、教会或市政大厅。在临时的营地，技术、舞台布景以及座位设备都较匮乏。在困境中，演员们身穿日常的衣服演出（这个也被视为升级革新）或者只穿现成的戏服演出。1946年11月，卡塞尔国家剧团在市政厅的“蓝色大厅”临时舞台演出了“威尔第最宏伟的歌剧”《阿依达》，整个舞台只由三根大柱子、一些楼梯平台以及深蓝色的挂幕帘组成。

1945年11月1日的《新报》登载了一封来自法兰克福、评价城中重新上演的戏剧的读者来信。总的来说，未来的巨大机会及人们对所有特别是地方戏剧工作的热情并不因为传统而回温，而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许……正是因为不得不从最原始、最简陋的开始，反而能够回归戏剧的本质，产生新的形式、新的风格，它们不会像今天的形式和风格那样，被观众直接称为‘遗少风格’……困苦反而促成了本质。”



沃尔夫冈·博尔歇斯的作品《门外》**1947**年在汉堡剧场首演（汉斯·克威斯演“贝克曼”，赫尔曼·棱绍演“另一个人”）

卢茨·贝施（埃尔福特城市剧院主任顾问）认为，苏占区有“戏剧狂热”——直到1945年年末，苏联军政府已经建立了74所剧院——每个月的演出数目在40～50场，有时甚至达到55场或更多，通常是在下午和晚上演出。

废墟时代期间的戏剧热情有许多原因：一方面，这是由于当时并

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另一方面，除了广播和电影院外，戏剧也是用审美来逃离的一种方式——逃离灰色的日常生活，上升到轻盈的理想天空。“戏剧，”君特·律勒认为，“观众们觉得，在战后几年的困境时期，是可以帮他们重新找回生活兴趣和生活感受的艺术经历。一句话：艺术拯救了这个民族。”戏剧给饱受物质匮乏之苦的人们带来了慰藉，平衡了他们社会声望下降后的心理——那时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或者失去地位，他们是难民、被去纳粹化的人、返乡人、失业者。观剧的作用好比一个重新恢复社会地位的标志，是民间更好时光的映照。

当戏剧业投入工作、克服困境、为房屋的重建做准备时，艰难时期的自由组织体现了一种新的审美：没有帷幕和舞台前沿的小型剧场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戏剧，汉堡“小型剧场”的导演赫尔穆特·格梅林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新的文化生活有许多中心，其中，前帝国首都柏林在戏剧业的复兴中处于前列。1945年5月27日，“文艺复兴”剧院开业。6月26日，就在柏林市中心的废墟中，劫后余生的德国戏剧以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寄生虫》重新开业，当时采用的还是1943年和1944年国家剧院演出季的版本。不久，苏联人禁演了这个版本，因为他们不喜欢那个结局，参演人员每人发放500帝国马克和1个食品包裹作为补偿。下一个上演的剧目是托尔通·韦尔德斯的《我们的小城》，导演是布鲁诺·许布纳。之所以还能拿到脚本，是因为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费尽周折，于1939年在苏黎世首演时把它弄到了手，但《我们的小城》在柏林首演后也很快停演。苏联有关文化官员的解释是，在如此艰难的时刻，不能对德国人民要求过高，认为他们可以接受一部大部分场景在墓园的剧目。9月，保尔·魏格纳在柏林战后首演莱辛的《智者纳坦》（剧场的名字现在改为“马克斯·莱因哈特的德语剧院”），这倒是没被反对。之后，皇宫公园剧院也开业了。

“在戏剧生活的回温中，前帝国首都柏林处于文化多元的前列。尽管面对饥馑和摧毁，柏林人依然渴望戏剧。他们带着满腔炽热和理想的

对戏剧的那种渴望，是今日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弗里德里希·勒夫特）

> 弗里德里希·勒夫特是年轻一代博学智慧的艺术评论家的代表——受魏玛共和国戏剧批评家的影响，尽管其中许多重要的评论家战后已经不再在德国工作。（阿尔弗雷德·波尔加尔和朱利斯·巴伯移民美国，于1955年离世。阿尔弗雷德·克尔移居英国，1946年去世。）
>
> 新的戏剧评论很快赢得声望并引起轰动。这些评论家完全不同于早期轻快风趣的风格，他们强调戏剧的教育功能以及社会政策等方向。作为后来民主德国最重要的戏剧杂志的《戏剧时代》于1946年5月首次出版。虽然该杂志在思想及意识形态上备受限制，但依然是当时表演艺术的重要论坛之一。

雷克林豪森市是那个时代较特别的戏剧会演地，以鲁尔戏剧节闻名。鲁尔戏剧节是由首位联邦德国总统豪斯提出的：“煤矿于我就如艺术，艺术于我就如煤矿。”其实，鲁尔戏剧节的历史远没有此话这样浪漫。1946/1947年战后的冬天，时任汉堡德意志剧场管理处主任的奥托·布尔迈斯特与他的同事以及企业工会一起把货车开入了鲁尔区取煤。因为当时的汉堡德意志剧场内太冷，人们几乎被冻僵，连艺术家都罢工了。

布尔迈斯特出身平凡，读的是公立中小学。他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以及工会成员，在第三帝国时期曾被收监。他的文化知识全是自学而得。歌德、席勒、赫尔德这些德国经典作家是他的偶像。他梦想着一个民主全新的德国，在这个国家里“国民”文化和艺术也可以普及到工人阶级。在进入鲁尔区取煤的途中，整组人只能到雷克林豪森-苏德维希的国王路易斯4/5矿区的侧门。那里的步哨曾经是一名水手，出没在汉堡，尤其是圣保利[13]。他说服了矿区企业工会帮助这些“从汉堡来的可怜人”。“煤炭是我们之前用来骗英国人的东西”（因为矿场的煤炭是要交给英国人的）。作为对此人“个人奉献”的感谢，作为对非法煤矿交付的感谢，汉堡剧院作为嘉宾来到雷克林豪森，小镇和矿山组织安排了一场

演出。一半的入场券卖给矿区成员。艺术工作者们被安置在雷克林豪森的私人住所并被提供矿区大锅饭作为三餐。这样一个简陋的开头慢慢发展成后来的鲁尔戏剧节——这一切要归功于布尔迈斯特，这位第一任汉堡德意志剧场管理处主任的努力。

剧本-进口

在现代戏剧方面，盟国从战后就开始迅速地分别从自己的语言区引进剧本。美国官方戏剧共有60部翻译剧本，其中45部被真正公映。法国戏剧的翻译列表中共有98部作品，英国人的有15部（全部都是同时期的作品）。由于德国马克不可兑换，所以在国外基本上毫无价值可言，盟军政府在某段时间内手握这些戏剧作品的翻译版权和放映版权并扮演着传播代理的角色。他们把戏剧“主要视为文化宣传和再教育的工具。但不希望民众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们是艺术的敌人。除此之外，盟军各国之间很快开始了互相竞争。尤其是西方盟军和苏军之间，彼此都想获得对方的尊敬。没多久，征服者开始尊敬被征服者，因为被征服者可是不同社会体制竞赛的生力军。为此，他们加紧给各自占领区提供精神食粮，尤其是在双方共同参与统治的首都城市柏林和维也纳”。（汉斯·戴贝尔）

在当时的美国戏剧业中，百老汇式的享乐在当年那个特殊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军政府给德国安排的文化项目则正好与他们的本土文化相反，全都以精神再教育作为导向——远离各种消遣娱乐。被选为翻译项目的戏剧作品主要是那些体现美国积极美好一面的或者是“讨论西方国家”的戏剧。尽管如此，半数以上被放映的影视剧依然是百老汇的滑稽戏、喜剧、通俗戏剧、笑剧以及惊险侦探片。

英国官方戏剧名单里有批判现存社会制度的家庭剧《监察员来了》以及《时代和联合之路》，这两部都是约翰·普里斯特利相当成功的作品。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很快也被引入了德语戏剧界——确切地

说，是通过1947年6月在苏黎世上演的《大教堂里的谋杀》。1947年秋季，正值《大教堂里的谋杀》在西德（科隆、哥廷根以及慕尼黑）上演之际，布鲁诺·维尔纳发表讲话谈到了艾略特。他说，生于美国、后来入籍英国并加入天主教会的艾略特是欧洲名人之一，他的充满基督教精神的戏剧展现了远远超越地方狭隘和小市民道德、面向世界的开放性。

法语戏剧演出名单中，上演最多的是阿努伊[14]的《安提戈涅》、萨特的《苍蝇》、加缪的《卡利古拉》以及季洛杜的《特洛伊战争不会爆发》。《安提戈涅》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正义”，作者用两个角色来代表正义的两面：国家利益至上的科瑞翁和叛逆青年安提戈涅。在两个角色的对话中，人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境况中的矛盾，那些内心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人则在对话中一再寻找关于适应和同胞的“理性”言论，并且他们也能找到。

至于德语戏剧，只有那些反对派、流亡以及内心流亡的作者的作品才会受到重视。弗里德里希·沃尔弗（1888年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军医，随后由于拒绝服兵役而被送进疯人疗养院，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1933年通过瑞士和法国最终移民苏联，1941年后开始在大众传媒界推动反法西斯主义）就经历了“归来”。1947年4月，这位来自柏林潘科的作者写信给在纽约的埃尔温·皮斯卡托尔——此时他已返回德国，并参加了苏占区内广播业的重建和戏剧的发展工作——说当时他仿佛是一具由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埃及木乃伊：柏林黑贝尔剧院上演《氰化钾》（1929年），造船路剧场上演《卡塔罗的水手》（1930年），慕尼黑小型剧场上演《马穆鲁克》。

除了弗里德里希·沃尔弗，还有格奥尔格·凯泽。凯泽1939～1940年创作了剧集《士兵田中》，描绘了当年轴心国的柏林-东京，作品《美杜莎之筏》（1945年）则描述了人存在的条件及自然人性。君特·艾森伯恩也凭作品《非法者》（1945年）获得了极大成功。

在描述归乡者的作品中，仅有博尔歇特的《门外》赢得了掌声。除了正符合当时的热点话题，该作品表现派的表现形式也十分令人震撼。《门外》于1947年11月在汉堡小剧场首演（导演沃夫冈·利伯奈纳，在此作品后他还把这部戏剧改编成电影《爱47》）。该剧在首演时也举行过一次小会谈，与会者认为，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作者，博尔歇特前进了一大步——因为他直逼堕落的边缘，而人就生活在这个边缘上。

> 博尔歇特的作品在西德和东德普遍引起了相当正面的共鸣。尽管1948年的西德已有28部戏剧上演（而在民主德国，第一部戏剧作品直到1956年才在罗斯托克人民剧院开演）。埃米尔·贝尔茨纳尔在《莱茵-内卡报》这样评价：这部戏剧表现了一种精神上的巨大空虚，就连悲叹也贯穿着一种人性的空虚。德国共产党作家和戏剧批评家弗里茨·埃尔芬贝克（他和乌布利希小队一起从苏联返回柏林）则评论说，在黑贝尔剧场（1948年4月）观看《门外》是自1945年以来，他在德国最沉闷的经历之一："一种灰暗的沉沦，落入悲观、无助、混乱的万丈深渊。"正面的评价则主要称赞作者坚决追求真相的决心。（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东柏林周日》）。这是一部"年代"戏剧，充满了优点和缺点——一段让杂文作家呐喊，却只有诗人才能描述的年代。（汉斯·魏格尔，《喜剧》）

魏玛共和国时期戏剧老将卡尔·楚克迈尔以戏剧《魔鬼将军》赢得了废墟时期和战后时期舞台的巨大成功（1947～1950年共演出3238场）。那种对人物角色的精准把握以及完全设身处地的情感使这部现代德国戏剧完全呈现出"绽放的活力"，因为它"在生命的丰盛中直接观察人的存在"。献给哈罗斯将军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了大批人对偶像的盲目崇拜，一个本来不搞政治的人，被恶魔般的力量诱导，悲惨而"勇敢"地付出了代价。

布莱希特剧团（建于1948年）成为东柏林政治和社会话剧与音乐剧的大舞台，数十年来，尽管一直受到思想束缚，它依然保存了创新性。苏联占领区决定出台的反法西斯艺术构想吸引了演员兼导演的沃尔夫冈·朗霍夫（在达豪集中营一年的监禁后，他于1934年移民瑞士）回乡。他在《沼泽战士》中描述了他的经历。他在苏黎世剧院工作到1945年，

之后担任了杜塞尔多夫城市剧院总经理，1946年在柏林接管德国大剧院。

在苏占区，公民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富有经验的戏剧专业人士、后起之秀和流亡归来的人聚集在一起，因此戏剧乐于尝试，且成果丰硕。而西德的戏剧——尽管导演和演员资源同东德的一样优秀——则不受约束，看的人更多。“什么讨好，就演什么。”

维尔纳·舒尔茨-莱姆培尔在谈及莱茵兰的戏剧业时说，关于“零点时刻”的各种传说和谣言是历史中一块难啃的骨头。对所有戏剧业工作人员、艺术工作者、市里的父母官、观众和盟军的文化管理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戏剧在战后重新开演。有许多种途径可以连接“战后”和“战前”。戏剧演出的重启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自我认识，它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与不光彩的过去做极端决裂的方式以达到道德的革新。当时还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对刚刚过去的灾难也有责任，大家认为自己是被征服的、不是被解放的，他们抱怨自己是受害者，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只得寻找人性价值。对艺术的热爱成了他们在战争这场犯罪里的“不在场证明”，并且其还可以担保，他们确实同更遥远的过去有关，本民族也有过辉煌的时刻。

社会政治本该做到某些东西却没有做到，没做到的就用雄辩术来补充代替。当编剧、导演和翻译家贝特霍尔德·菲尔特1948年从美国来到西德时，他惊奇地发现，对早期经典作品上演的一头热仍在继续。他把在柏林、杜塞尔多夫、维也纳等城市观看演出中所观察到的这种新旧混杂的风格称作“帝国总理风格”：“没来由的狂喜或冷冰冰炫耀的辞藻，只强调表演的官腔和作秀，然后又突兀地切换到几乎微不可闻的轻声、私人的表演。”

西德戏剧以传统为导向，掀起最大躁动的是流亡后于1947年返回柏林的弗里茨·科特纳。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一个最恨空洞辞藻、装模作样

的表情手势以及陈词滥调的导演。他赋予主人公人性。“当科特纳谈到，德语语言怎样在纳粹统治下腐蚀、德语如何转瞬就变得夸张空洞时，我突然明白了，科特纳反对的是什么样的主人公。”（皮特·查德克）科特纳希望实施一个“分解过程”，“这是一个必要的、想好了的过程，要拆卸和揭穿那些20年以来因为错误价值和无知变得不可信的东西”。这个30年以来几乎每个主角都由自己出演的戏剧狂人，如今要反驳他自己的演出（包括《明娜·冯·巴尔翰姆》[15]《浮士德》《哈姆雷特》《强盗》[16]《丹东之死》[17]）：西德的戏剧业已经失去生命力，应该重新唤起艺术创造的能力和反叛传统的勇气，应该与中庸做斗争。

> 科特纳1950年在柏林黑贝尔剧院演出的席勒作品《唐·卡洛斯》引发了战后初期的戏剧丑闻。人们对西班牙皇宫的舞台设计强烈不满，演员现代式的舞台服装也让他们感到厌恶。（卡洛斯身着工作裤，“大概是个修车匠”。阿尔巴穿着皮革套装，“像是一个早熟的坦克指挥官”。）对角色的诠释也不对劲：国王不再是国王，调查官是一个比国王还高的荒诞统治者，台词不像血气方刚的英雄少年说的。最重要的是，人们看不见那个庄重的理想主义者席勒。这儿缺乏“席勒的激情”“烈火般的呼吸”。观众和批评者没有理解到——而这正是这个时代“重塑经典形象”的代表性人物的特征——科特纳有一种探讨的智慧，能提出尖锐问题且对每一个疑惑都很敏感的智慧，他运用这种智慧把深陷“德意志意识形态”错误阐释的德语经典去神话化，而这其实是早就该做的。他们不明白，科特纳“无情、冷静地追踪每一种角色中的人性成分，并一旦认定追踪有了结果，就会根据结果来设置角色”。

音乐迷

音乐在纳粹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高的文化位置，特别是它似乎能满足理查德·瓦格纳的“日耳曼整体艺术”[18]的设想。希特勒是拜罗伊特音乐节[19]的常客，他的“圣杯守护人”威妮弗蕾德·瓦格纳（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也是“元首”的盲目崇拜者。此外，希特勒还定时去看歌剧，并且很赞赏“新生代”，如维尔纳·埃克的《培尔·金特》，约瑟夫·戈培尔对此作品也很着迷（埃克甚至被请入元首包厢内演出）。

事实上，歌剧作为主要以传统风格表演的剧种很少演出有失体统的

内容或形式。这种情况使得歌剧在二战后的复苏过程比较不被关心和重视。1945年11月，海因里希·斯特罗贝尔受法国军政府委托，为巴登-巴登州电台成立音乐部——斯特罗贝尔于1935年流亡巴黎，如今从那里返回德国——穿越西南部进行了首次信息之旅。他对那些所谓“新开端”的音乐剧和“轻歌剧的甚嚣尘上”甚为失望。

“我看到的要么是一些基于不现实幻想演出的歌剧或者舞台剧，要么是一些深受纳粹主义影响的歌舞剧。而之后的音乐和艺术也都像是在纳粹主义的基础上延伸发展的。”

现代歌剧中，保罗·亨德米特[20]的作品《画家马蒂斯》于1946年12月在符腾堡国家剧院首演，获得较高的认可。除了在这部歌剧中“德国人”受到比画家格律内瓦尔德更多的颂扬之外，亨德米特的流亡生涯也使他声名大噪。作曲家于1947年初夏来到法兰克福——但拒绝从美国回到德国长期生活——尽管如此，人们对他的态度也不仅仅是欢迎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还是像家庭成员一样迎接他返乡（他在哈瑙出生，曾是法兰克福歌剧院的首席小提琴家）。

> 相对于激进的无调音乐[21]，保罗·亨德米特的作品表现的是“有节制的现代派”式的“调和”。亨德米特信守音乐的持续性。这点在《建设》杂志上也得到了强烈的认可。杂志上说，新音乐要感谢这位作曲家，感谢他把音乐从断片般的、混乱的原始状态中拯救出来，赋予了音乐新的形态，从那些结结巴巴的音节中拼凑出新的语言。《建设》杂志提到，亨德米特一方面被认为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是展现民族遗产的艺术家代表。艺术与生活密不可分，艺术的发展有赖于整个民族的逐步发展，最终成为自由且富有责任感的人。
>
> 正直品质的缺乏让理查德·斯特劳斯成了反例：一个天资虽很高但人品却很可疑的艺术家。在纳粹主义下，他的机会主义充分体现了艺术家本性的阴暗面。“这样一个人才的独特和力量，几乎是一个天才，但不知道要对自己的‘天赋’承担义务！一个这样大的人物——却完全不伟大！这不能不使我觉得，这个现象极为可怕，并有些令人作呕。”（克劳斯·曼）

在废墟年代，严肃的古典音乐在人们的愿望和价值中有崇高的地位。“人们希望——‘绝对战争’曾削弱了文化——能再度感受古典音乐，作为一种慰藉以及抵御残忍现实的屏障，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平衡和鼓励。”不久，不仅在大城市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乐团和合唱团，高素质的音乐家也随着难民一起来到西德并在此寻找工作的机会。这对比如班贝格尔交响乐团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

音乐，对于“那些日子”里的人们来说是神醉，是对另一个世界的献身、不搔首弄姿的沉醉、不狂热的欢欣。就像恩斯特·布洛赫总结的：音乐，因其直接的、人性的表现力，相较其他艺术形态而言，更能容纳痛苦、欲望及被压迫者（压抑感在那个时期几乎人人都有）的希望。

演奏目录不同于早期的剧目。那些被纳粹禁止的作曲家的作品现在再次被演奏，有时还予以优先表演。“着重突出重演门德尔松[22]、马勒，法国、俄国、英国或美国的音乐。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小心的补充，人们慢慢接纳了像亨德米特、克热内克、威尔、米尔豪德、洪纳格尔、普罗柯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等20世纪的音乐叛军。”

“音乐新星”通过新成立的无线广播获得重要的资助。在巴登-巴登，在坚定而尽责的海因里希·斯特罗贝尔带领下的无线广播表现得尤为突出。斯特罗贝尔在由他出版的杂志《旋律》战后第一期里抱怨，大部分的德国音乐爱好者几乎完全不了解过去30年的艺术发展历程。

卡尔·奥尔夫[23]1895年出生于慕尼黑，算得上是第三帝国时的“随大流者”［《月》（*Der Mond*），1939年；《克鲁格》（*Die Kluge*），1943年］。二战后，他幸运地以1937年写成的《布兰诗歌》（*Carmina burana*）获得突破性的国际成功。受此次成功的鼓舞，他坚持不懈地继续发展他的音乐、戏剧以及音乐教育的作品（《安提戈涅》，1949年）。他的作品的特点是：减弱音乐手段、强调音乐节奏及音乐服从戏剧效果。他的作品，因其特有的通俗性，被纳粹时而以意识形态为理由

拒绝（但是他在国外受到的肯定却没有减少）时而又接受。他是唯一一个能在纳粹政权下继续创作的德国新音乐的作曲家。



慕尼黑爱乐乐团在大学礼堂的演奏会。贝多芬第九交响曲，**1945**年

卡尔·阿玛迪乌斯·哈特曼[24]出生于1905年。在纳粹时代，他拒绝公开作品，所有的创作写完就放入抽屉。战争结束后，他完成了第二部弦乐四重奏曲并且校订了他的四首交响乐，这些作品以及舞台清唱剧《阿呆物语》（*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 ）被首演。

还有出生于1903年的鲍里斯·布拉赫尔。他在战争期间所创作的重要作品直到1945年之后才被熟悉。1948年，他接受任命任职于柏林音乐学院。在他战后几年创作的作品中最突出的是小型歌剧《洪水》（1947年）和《夜莺》（1948年）。

在德国作曲家当中，老一辈和年轻的艺术家先锋（除了上面提到的名字，主要还有贝恩德·阿洛伊斯·齐默尔曼和基尔瑟赫尔·克雷柏）基本是走向了阿诺德·勋伯格、安东·韦伯恩[25]和保罗·亨德米特的风格。勋伯格提出了十二音技法[26]概念，同时保证音乐的建设性和主观表达，令很多人着迷。托马斯·曼在他的小说《浮士德博士》曾对十二音技法做了分析，这更赋予这种技法更多的某种（恶魔般的）声名。曾在美国因“非美运动”受到怀疑的德国共产党员、勋伯格的学生汉斯·艾斯勒，后来返回东德。他认为，勋伯格是音乐史中不可缺少的人。（用他的话说是：“中产阶级的腐化与衰败。没错。但这是何等美丽的晚霞。”）

勋伯格在他最后几年时间里热衷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问题——这个状态一定程度上延伸到了其音乐中，使他的音乐也具有某种乌托邦的结构。他于1934年流亡洛杉矶，1951年在那去世。

安东·韦伯恩在1945年遇难去世。在萨尔斯堡周围的小城米特希尔（他从维也纳逃走，在此住在他女儿家），当他走到门前去呼吸新鲜空气时，一个美国哨兵开枪射杀了他——因为他没有遵守宵禁。第二代的音乐先锋派觉得他是超越勋伯格的最高典范。奥利维埃·梅西安[27]在

1949年的克拉尼西斯泰因的暑期课程上就已经创作了一首完全结构化的音乐作品，在该作品中，十二个音高被扩展到其他乐曲结构的决定因素（节奏、音量、音调）上。

> 那个时代对音乐的理解是矛盾的。歌剧的回归表明，由“公民”转化成“人”的希望（西奥多·W.阿多诺）同从前一样，甚至比从前更强烈。除此之外，反浪漫主义的情怀重新冒头，以下这些人都用不同的方式追随过这种情怀：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亨德米特、埃克、亚尔纳赫、罗伊特、哈特曼、福特纳、布拉赫尔、齐默曼、克雷柏、亨茨。他们“对几何的爱”是对传统口味的一种挑战。许多小圈子展开了关于新音乐的激情讨论。人们认识到，这些艺术家在创造作品时，并不仅仅把过去看作需要保护的遗产，有时也是需要清除的障碍。未来，犹太人社区和秘密社团的新音乐不应该被禁锢起来，系列音乐演奏会可以帮助这些独特的音乐维护自己的特性。1945年11月，卡尔·阿玛迪乌斯·哈特曼在慕尼黑创办了“音乐万岁”，这种模式在国内外都有类似尝试。作曲家、音乐学生以及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可以在专门的课程中逐步熟悉现代音乐。
>
> 在达姆斯塔特附近的克拉尼西斯泰因猎宫里，新音乐国际暑期课程在最初的设想中只不过是音乐学院的延展课程，后来它竟发展成了现代国际论坛。

在所谓的形式主义争端爆发之前，苏占区内的人们对现代音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如果现代音乐和音乐爱好者之间的鸿沟无法消除，音乐生活的没落就不可阻挡。尽管人们承认对伟大的音乐遗产的维护是一项重要任务，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艺术是可以仅仅通过珍惜过去来延续和发展的。当艺术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新的补充时，等待它们的将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当时在东德生活的音乐批评家汉斯·海因茨·斯杜肯施密茨曾断言，勋伯格不能理解那些仅仅把艺术视为生活点缀的人。现代音乐传达的不再是颓废的西方，而是一种雄心勃勃的艺术。世界本来就不和谐，他们不想美化、麻痹。他们愿意忧虑，想为思考和净化世界贡献力量。“勋伯格用天才追求这个目标。”

> 在西德，现代音乐中潜在的令人不适感在“符咒丑闻”[28]（1948年）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事件中，拜仁州尽显保守天主教文化政策

> 的先驱者本色。维尔纳·埃克排演了芭蕾舞剧《符咒》，此剧取材于海涅的《浮士德片段》，把“魔鬼的”欲望置于舞台中心。西南广播播放了该剧的音乐，由维尔纳·埃克亲自指挥。随后的1948年6月，拜仁国家歌剧院进行了该剧的舞台首演。“这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热点事件之一，吸引了如此之多的人观看和参与讨论。”这个“感官的刺激”，特别是第三幅舞台背景“黑色弥撒”，激怒了当时在位的拜仁州文化部部长阿洛伊斯·胡恩哈德默。遵照大主教阁下的意愿，他在五场演出之后命令停止该芭蕾舞表演。

笑的勇气

弗里德里希·卢夫特在回忆君特·诺伊曼的“零点时刻歌舞剧”《黑色狂欢节》时提到，在重生的戏剧之城柏林，戏剧无处不在，在舞台屋、公园、社区中心、电影院、教会、仓库或者储藏室“孜孜不倦地上演”。这看上去随意的评论讲的是在从纳粹压迫中解放的春日里萌芽生长的小型歌舞艺术，这些小型歌舞艺术的共同点是地点的随意性，卡巴莱式的“即兴”迎合了这种需求。对小型歌舞剧的热情正如对戏剧的狂热一样广泛流行。当时，在柏林有400份开设剧院的申请、1000份设立歌舞场的申请。1945年8月，埃里希·卡斯特纳在慕尼黑这样写道：“如果所有的计划都实现，那么很快歌舞场的数量就会比砸毁的房子还多。”

> 纳粹分子对大城市小型舞台表演进行了猛烈镇压，这使人们几乎忘记了笑声。在狭隘、没见过世面的纳粹分子眼中，魏玛共和国时期歌舞表演文雅的自由精神就像炸弹一样危险。“图霍尔斯基及其同谋者”因此被驱逐、迫害、禁止和杀害。然而，讽刺文学和歌舞表演——反法西斯的重要武器——却在流亡的主要地方蓬勃发展，“讽刺精神”从那里一次又一次通过无线电波进入德国这个大监狱。据估计，英国广播公司对德语区播送的《二等兵阿道夫·西沙尔的信》［由来自维也纳的流亡化学家和小型歌舞演员罗贝托·艾伦茨威格（笔名罗贝托·卢卡斯）撰写］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固定听众有1000万。
>
> 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后，叛逆和冒失的口头作品又重新受到欣赏。许多歌舞场项目得以最终实现，这还得感谢西方战胜国的宽容。他们想着，至少只要他们自己不成为攻击对象，歌舞表演也可以是启蒙的实用工具。歌舞场成为政治再教育的重要基地，与纳粹主义残留思想做斗争，推动人们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开斯特纳是1945年8月首次出现的歌曲剧团“表演篷”（Schaubude）的重要作者，他的“左派情怀”是节目的重要特征。戏团的掌权人物是乌尔苏拉·赫尔京，她是在维尔纳·芬克直到1935年还存在的剧团柏林“地下墓穴”里成长起来的。经过“严冬里痛苦的改建”后，这个“表演篷”在1946年春终于有了自己的礼堂。在新房子的开幕节目《成人连环画》中，乌尔苏拉·赫尔京的《行军歌曲1945》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女歌手这样回忆道：“当我唱到最后一个音符时，大家全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互相拥抱并呐喊，有些人哭了。你几乎很难相信，那是怎样的一种宣泄。而这种宣泄跟我本人只有那么一丁点关系。那只不过是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唱了对的歌，配上了对的歌词。”

知名的讽刺作家和小型歌舞演员都经历过迫害和排斥，或通过内心流亡度过危险的“寒冬”。共产党版画家和漫画家赫伯特·桑德伯格在20世纪20年代是德国革命视觉艺术家协会（ASSO）的会员，在1934年至1945年待过监狱和集中营。他下定决心，被解救后要出版《阿呆物语》的“继承版”。1945年，他与保罗·瑞拉、霍斯特·隆美尔、君特·魏森伯恩一起在柏林获得许可，创办杂志《明镜》和《文学、艺术与讽刺》。投稿人都是一些著名的作家、绘画家，其中的卡尔·斯诺格也在1946年经苏联允许，重新成立了杂志《世界舞台》。

“滑稽人”是柏林最著名的小型歌舞场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其音乐代理弗里德里希·帕舍想出来的。碰巧，时年33岁的作家和作曲家君特·诺伊曼从战争监禁出来后重返家乡。“他为两个节目创作了剧本和音乐，还介绍了他的妻子塔吉娅娜·塞斯女士成为节目的中流砥柱。他参加了较随意的、由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格林德根斯同时还在东德德国剧院演出了《俄狄浦斯王》）导演的歌舞剧《全剧场》，他创作了一部和《全剧场》一样从头到尾都由自己谱曲写词的歌舞剧：《黑色狂欢节》，其在1947年12月15日首演。”（克劳斯·布德奇斯基）

1948年，君特·诺伊曼创办了讽刺杂志《岛民》。由于货币改革后杂志销量还是很一般，诺伊曼还向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提供杂志文章，有的改编为广告文案，居然也获得许多的共鸣。它的节目常带有反共倾向，以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派为立场，并与阿登纳政府唱对台戏。

“生活就是一个娱乐场，/娱乐场。在这个闲逛的广场，/娱乐场，/充满着各种心情，/带着快乐，/哇——/溜着滑梯进入深谷！”

柏林的疯狂人尽皆知——1947年4月画刊《今日》描述道，战争结束之后，歌舞场就像是柏林地上的蘑菇般疯长（包括无毒的和有毒的）——除此之外，慕尼黑也是无礼而快乐的中心。人们表现出“对整个时代的基本错误的谴责”。

维尔纳·芬克——这个“第三帝国的滑稽人”曾被拖到过集中营，曾经作为士兵参加过二战，后来很快从美军俘虏营中被释放——认为，他的独奏歌舞应该是反对官僚主义、规划、工作压力和政治僵化的“都市人未来的幽默艺术”。1945年夏天，芬克在慕尼黑重新开始他“逗笑”的工作，随后在斯图加特建立了歌舞剧场“捕鼠器”。他在《元旦讲话1945》中说，人们不需要为过去一年哭泣。“在今年初始，我们仍然是帝国。我来拼写这个词，帝国（Reich）：R是功名心（Ruhmsucht），E是浮华（Eitelkeit），I是错误（Irrtum），C是狂妄自大（Cäsarenwahn），H是英雄膨胀（Heroeninflation）。”

像芬克一样，许多其他小型歌舞演员和讽刺作家也在推动“纯粹非理性批判”——这个“欢乐而无望的社会”。大学生成立了歌舞场“特赦”，用比如恶搞德国国歌的方式来抨击残存的德国民粹主义。除此之外，“幸存者”是一个重要的巡演团体（“我们是幸存者，/来来回回凑热闹的人，/根据艺术自由不成文的法律敢于/敲打棺材上的盖子”）。

在杜塞尔多夫，罗勒和凯·洛伦茨，两个原来从没干过这行的人，

在1947年创立了歌舞场“滑稽”［Kom（m）ödchen］，该舞厅是“1948年货币改革中少数能有幸存活下来的舞厅之一”。在“小型文学、画家和演员的舞台”上，人们借“怪异的歌曲”表达他们对“世间所发生的事情”的痛苦和不安。就像“滑稽”的开场曲唱的那样，“没有阻碍”或“内心焦虑”是《新闻周报可可》报道的“檀香山与柏林之间的事情”。

放眼整个世界，歌舞剧场多数是不太成功的。它们只专注于那些东西德类似的日常话题：食品购买困难、住房短缺、制卡和配给卡制度、代用材料、用电限制。人们带着批评的眼光回首纳粹时期，可人们很快又有了其他的批评对象：他们批评调查问卷和非纳粹化法庭的官僚作风，谴责广泛存在的政治机会主义。



慕尼黑的**“表演篷”**车在一次广告花车游行中穿越城市，**1948**年**8**月（最前排分别是赫尔穆特·克吕格尔、乌尔苏拉·赫尔京、布姆·克吕格尔）

在东德，很快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重建”的小品特别主题。由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压，标题预告讽刺东德的歌舞厅艺术的“清风”越来越淡凉。但是在西德，就算节目一再被“招安”又再度出现，也一样存在“不顺从”的危险。美国军政府抱怨日益增强的反美国主义。1947

> 年9月，歌舞厅许可证持有者被通知将有更严厉的控管措施："我们下一次会在你们的秀场做抽样检查，如果你们觉得不妥，就得付出昂贵代价。歌舞厅许可证持有者要对他们表演里面所说的每个词每句话负责，就算艺术家只是凑巧今天晚上在此演出。"

沙漠中的文学

"战后文学之所以那样举步维艰，主要是要找到位置和方向。"海因里希·伯尔如是回忆"零点时刻"作家们的困难局面。"那些日子"里的文化呈现的是干旱、深渊、贫乏、熟知的风土、盛开的小菜园以及模糊而遥远的地平线。纳粹导致一切传统断层。纳粹垮台后，艺术家工作室的抽屉已经空无一物（汉斯·迈尔）。

弗里德里希·卢夫特1946年2月17日在他第一次通过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播放的广播文学批判中表示，战争把德国人又带回了精神的荒原——但是，人们依然充满了对美好充实思想的渴望、对世界的好奇、对善良声音的兴趣、对人类的"坚强的爱"、对人性的向往。现在，在经历过12年被仇恨所扭曲的空气之后，这一切终于可以大声喊出来。

> 德国文学从19世纪起就被社会和政治"禁欲"的唯美主义主导。如今，文学中的突出人物反对这股潮流，尝试"直视深渊"，给自己和读者带来希望。沃尔夫冈·博尔歇特的作品《门外》以战场归来的贝克曼的绝望作为结尾——在各种尝试之后，主人公走进了易北河。然而，博尔歇特的散文却奏起明朗的音符。没有的返乡的一代，最终成为到达的一代。"我们是没有告别的一代，我们知道，所有的到达都属于我们。"对机器旁的人、对车间的人、对试验室里的研究者、对讲台上的牧师、对世界上的母亲只有一点，那就是当战争蠢蠢欲动的时候，说"不！"
>
> 东德和西德的作家与诗人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团结一心。纳粹分子的罪行、战争、破坏、罪孽和惩罚都是重要的主题，比如，安娜·西格斯流亡期间的小说《第七个十字架》里就涉及了七个集中营犯人的逃亡。"这个民族有时会软弱和胆怯，但坚定地拒绝接受强权。"

约翰内斯·R.贝歇尔1940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无产阶级成长小说《告

别》（之后1945年，它是在德国新建的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许多转型小说的一种模式，这些小说的主题是信仰人道社会主义的力量，告别错误并站在“正确的”阶级立场。

贝歇尔几乎是天真地不断使用“民族”“家乡”“解放”这类词。“是的，他甚至使用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主题和词语（祈祷、十字架、惩罚、救赎、圣洁、永恒），因为他认为，这些词很适合唤起读者们的兴趣、希望和勇气。”1947年由瑞士流亡返乡回苏联占领区的斯蒂芬·赫尔姆林，从一开始就是民主德国最敏感的艺术家和最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谈到过直截了当的新古典主义以及他的同事贝歇尔创作诗的惯用路数——这些路数在他的斯大林式诗歌里频频出现。他说，贝歇尔（1954～1958年任民主德国文化部部长）是政治的代表，他把作者看作教育者，读者是被教育的人，文学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在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精神和权利间棘手的关系就这样被拟人化。

那些采取激进的开放态度去回首“德意志精神”和“德意志文化”垮台的作家——如沃尔夫冈·博尔歇特、沃尔夫·迪特里希·斯努雷、汉斯·埃里希·诺萨克、皮特·胡赫尔、特奥多尔·普利菲尔、斯蒂芬·赫尔姆林、保罗·策兰、马克斯·弗里施、内莉·萨克斯、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沃尔特·科尔本霍夫、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埃里希·弗里德、伊丽莎白·朗格瑟、沃尔夫冈·柯本、路易斯·林泽尔、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恩斯特·斯纳贝尔、海因里希·伯尔——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社会想法，在不同的情况下（内心流亡或流亡国外）经历了纳粹主义。不久，他们看到了废墟瓦砾景观，感到其中的绝望和压抑。很快，他们开始相信进步的再生能力会像灰烬中的不死鸟一样，把他们的兄弟姐妹领向自由。不同于起源自魏玛时期、此时尚有影响力的“哦-好家伙”（O-Mensch）式的乐观，悲观主义是西德文学的一个独有特征。1929年出生于柏林、直到1979年都生活在东柏林的君特·库耐尔特在1949年这样的警示——当一个人，/在废墟下，/从他被炸毁的房中/拖出来，他颤抖，/

说：/“再也不要，至少别马上又来”——中，暗含他本人对东德社会主义进步理念的怀疑，这违背了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所提倡的一扫抑郁忧伤的精神。自1948年以来，贝托·布莱希特也在民主德国颇具影响力。他对人类和历史的怀疑也包括针对东德共产主义指导教师宣布的“新人类”不可阻挡的崛起。布莱希特作品里的主要冲突是：被慈悲心和同情心所驱动、想要改善世界的人却没有能力做一个好人——和东德共产主义正统宣称相反的现实的矛盾。自然，在多元化的西德，这种情绪比在具有强烈“构建”意识的东德更容易传播。

在东柏林地区，“鹰派”对柏林乐团的组建表示怀疑——埃贝托市长以及其他党和政府代表让布莱希特觉得“全省的臭气全都聚集于此”——所以，他们和这位诗人之间仍然存在许多摩擦，布莱希特虽然尊敬威廉·皮克，却对沃尔特·乌布利希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政府感到反感。“这种淡化矛盾的氛围，乌烟瘴气，胆小怕事，这一切让布莱希特心烦意乱。但只要事关捍卫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成果以及为共产主义事业去奋斗，他都会挺身而出。”

> 废墟时代的两次作家大会反映了德国文坛内不断增强和扩大的冲突，这些冲突也存在于他们想“进谏的”、在某些世界观的问题上强行插手的盟国之间。1947年在柏林举行、由理查德·胡赫担任名誉会长的柏林作家大会是苏联政府和在德国工作的苏共党员共同策划的，不过，这次会议也表现出四个“保护国”之间的默契，尤其是它邀请了内心流亡和流亡作家的主要代表。因此，它对东西两个柏林都有代表性。记者、历史学家梅尔文·拉斯基在苏占区一个小剧场里发表了演讲，主题是苏联作家缺乏自由。“从现在开始，德国作家里也有真实或表面上追随东西德党派的两面派。”
>
> 六个月后，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办的代表大会进一步恶化了政治氛围。苏联占领区的作家没有出现。大会主题是关于出入境的禁止以及阻止区域之间自由出版交流的问题，但会议重点探讨的却是“纯文学”和“入世文学”间的关系。
>
> 1950年12月，在德国诗歌散文小说中心（1948年重新成立）的年会上，约翰内斯·贝歇尔被选入主席团，这引起了西德民众的强烈抗议。斯蒂芬·安德烈斯，也就是1943年创作了《我们是乌托邦》、1949

年开始出版小说三部曲《洪水》的作者，谈到“国家奴隶的塑造者”时道：“我不点这些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对于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是作为个人跟他们说话，而是作为一类人的代表，即在每种独裁统治中向上爬的人。”

肯定和荒凉之间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特奥多尔·阿多诺1949年说过的这句苦涩格言后来被反复引用。这话的意思说的是一种可怕的经历，德意志文化无法阻止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这一点，弗朗茨·格里尔帕策[29]早在1848年的一首讽刺短诗中就已预见到：新的教育由人性通过民族性，最终走向兽性。

然而，德意志内心盛开的小菜园一向被懂得美丽文字艺术的看守者照料，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受到纳粹的恐怖或第三帝国的彻底崩溃的威胁。克里斯托夫·梅克尔翻译了他父亲艾伯哈特·梅克尔的作品《寻找图片》——艾伯哈特是20世纪30年代的成功作家——作品讲述的是一个熟悉且典型的德国例子：文学家成了地狱里的书法家。“他的艺术观点是经典的，在譬如‘灵魂尊严’或‘永恒价值’这类使人敬畏的措辞使用上达到顶峰。资产阶级的浪漫态度，似乎在第三帝国结束后也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大自然充满诗意的优美可以给人们以安慰、传输生命的力量，但“绿色”也是从“灰色”[30]中长出来的，却被视为永恒循环的“符号”——“菩提树永远散发芬芳——/你有什么好担忧？”（伊娜·赛德尔）。既然这样，失去对刚刚发生的那些恐怖事件的敏锐感知亦不是难事。“当下”的美学光芒——《当下的美学光芒》是1953年由汉斯·埃贡·侯尔图森和弗里德黑尔姆·肯普出版的一本文集的标题——亦会美化人们对现实以及各种可能的感知，也就麻痹了人们对应尽的社会责任的意识。

在“退伍兵”诗人中，有许多用美丽的文字艺术去表达他们对战争和纳粹暴行的道德谴责的诗人，如1912年出生的鲁道夫·哈格尔斯坦格——汉斯·迈耶1945年10月返回法兰克福时曾听过一场他的诗歌朗诵会——“十四行诗。包罗万象的周期。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没有什么被遗漏，因为每写一首十四行诗，都仿佛一次作曲。内容有关战争，有关意大利艺术，有关意大利艺术与意大利发起战争之间费解的矛盾。一位有才的诗人曾在此朗诵，显而易见。”他希望凭借这种严苛的形式弄清楚这种混乱是为了什么。海因里希·沃姆维格认为，文学的传统在过去纳粹12年的统治中完全没有发展，反而大片枯萎。人们强烈地渴望从精神上逃离这个时代，想象一个理想的世界，在浪漫主义和形而上学（也就是在“长满蓟属植物的修道院”）中去寻求安慰。

刚开始时，流亡作家还很难在西德入籍。赫尔曼·布罗赫、罗贝托·穆齐尔、布雷特威尔·冯·霍瓦特、恩斯特·托勒、利欧·福伊希特万格、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亨利希·曼等人的作品以及在1945年去世的乔治·凯泽、埃尔瑟·拉斯科-许尔勒和弗朗茨·韦弗尔的作品基本默默无闻，在文学上也无影响力。与此同时，在第三帝国“内心流亡”的诗人——汉斯·卡罗萨、维尔纳·伯格鲁恩、鲁道夫·亚历山大·斯罗德、恩斯特·荣格尔、伊娜·赛德尔、奥斯卡·罗尔克、威廉·勒赫曼、格奥尔格·布利廷、卡尔·克罗洛夫、伊丽莎白·朗格瑟——的作品成为风向标，因为他们的作品是“迷茫而出神”的文学，和激动人心的“新开始”相比，展现更多的是纳粹和战争的痛苦延续（于尔根·曼泰）。

在抒情小菜园之外——“抒情小菜园”被用来形容“用阿那克里翁[31]式轻快的调笑和卖俏以及花花草草掩盖恐怖的、大张着口的万人坑”（伊丽莎白·朗格瑟）的文学——还有另一些诗人直面荒凉。沃尔夫冈·魏劳赫在他1949年出版的诗选《千克》中提出“荒凉文学”[32]这个概念，借助君特·艾希的诗句描述这个“树木被砍伐一空的荒凉地带”。魏劳赫把艾希的诗句收录进一部德国战俘写作的诗集《你的儿子，欧

洲》。魏劳赫认为，艾希是作家中的作家，会从头审视语言、本质和概念。他的诗扬弃那些“不合时宜”的比喻，诗作《坟坑》就是一例：“……我耳边响着/荷尔德林[33]的诗章/像白雪皑皑般映照的/是尿里的云彩……”这些诗句颇受假道学绅士们嘲讽，他们说这是虚无的乐观主义。

当然，诗歌体裁的变化和作家的人生轨迹也有关。或许是出于负罪感吧，曾经在第三帝国出版过诗歌的作者在战后通过某种“现代风格”掩饰他们曾在第三帝国出版作品这个不甚光彩的过去，并且夸大当时的审查制度的压力。他们宣称，在第三帝国时期自由创作言论受到难以想象的限制。约阿希姆·君特属于当时少数愿意承认事实的作家：“实际上，我们可以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只不过我们自己没有选择那么做。总的来说，当时所受的压力远没有现在表现出的那么夸张。”

汉斯·迪特尔·舍费尔在他的著作《分裂意识》里面列举了一些有关“文学压抑”的重要例子：“君特·艾希战后出版的诗集《遥远的家园》（1948年）里超过三分之一的诗是在第三帝国期间所作，一部分当时就已经在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并没有听说艾希和第三帝国官方对文艺作品审查制度之间有什么冲突。此外还有皮特·胡赫尔，和几乎所有的同辈一样，完全没有‘在希特勒时代选择沉默’。直至1939年，他已经有14部广播剧剧本被大家所熟知。”除此之外，像埃米尔·巴特、约翰内斯·博普罗夫斯基、霍斯特·朗格、沃尔夫·冯·尼贝尔许茨、恩斯特·斯纳贝尔、欧根·哥特罗布·温克勒和卡尔·克罗娄都在第三帝国时期出版了作品。

在纳粹时代，戈特弗里德·本也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不过他有一种狂想的非理性，这让他对1933年的纳粹世界观不无同感，然而这种非理性又与怀疑的理性相关联。他的逃避现实（“哦，所以我想再回到：草地，沙滩，鲜花盛开的宽阔走廊”）同他对世界的寻找产生了冲突。他站在“火车站的路上，/林荫大道上，狭长的海滩——/甚至第五大道

上”，“击倒”他的不仅仅是空虚，还有城市的文明。正因为这样，他在距离“象牙塔废墟”之外很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位置，在那里构筑了保守的价值意识。他用各种主题、各种隐喻，频频回望魏玛共和国的黄金年代，反倒给年轻人指引了一条通向文学自由“赐福之地”的道路，口号是“留守”。

“诗人……要有马的鼻孔——我的天赋坐在我的鼻孔里，这是尼采说的——马鼻孔在所有开始的和马鞍的位置，在知识分子那里，在那里：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相互搀扶着向前挪动，像两个海怪，带着精神和毒药，书籍和罢工——在那里，瑞丽最新的创作：用苍白亚麻布和有菠萝黄器官的模特勾画时尚的转变。那些无法描述颜色的色彩层次，光与影的色彩——一切都是诗。”

沃尔特·戈本赫夫1948年发表了《来自新生代作家的心声》（作者当时已经40岁，曾作为战犯在营地报纸《呼唤》工作过，并在《新报》担任过编辑）。赫尔穆特·冯·库伯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显然是旧瓶装新酒：同样凄凄惨惨，同样是伤感和傲慢的混合体，同样是前线士兵的心态，同样是对心灵和良知的警告。“无论如何，对这个人来说，时代的精神不及精神的时代重要。”

在这类讨论中——擅用比喻的戈本赫夫用某些理由扭转了枪口，他指责冯·库伯的批判是“躲在隐喻后面打笔仗”——最终涉及的都是“老”和“旧”语言的问题。在第三帝国，辩证的语言是要遭排斥和迫害的，它之前也从未赢得过真正的社会声望（想想看德国的语言学和日耳曼学）。纳粹的名词汇编留下许多野蛮的空话：优生、优等民族、毁灭犹太人、人体试验、毒气、最终解决方案……现在又加入了再教育的官僚词（法庭、同路人、卫生清洁方案……）和一些以俗俚方式让人类交流更加民主的词（老板、保姆、青少年、粉丝……）。

几十年来肯定的语言模式形成了政治的官方语言，现在它们又服务

于“民主军队”。1945年11月，多尔夫·斯特恩贝格在杂志《转变》的第一刊中开始了他的专栏“非人性词典”。他分析语言，为的是指出词语和概念是如何在纳粹时代堕落的。粗暴的句子结构、枯萎的语法、畸形的词语是暴政的表达，应该与作为道德文明的民主语言区分开来。此外，像顾虑、方向、监督、有个性的、贯彻执行、使用、妇女工作、设计、文学工作者、军营、按成果的、女孩、人类治疗、组织、宣传、培训、代表、实事这类词语也被痛斥。“语言的腐败是人类的毁灭。我们应该提高警惕！词语和短语就像花园或者地牢，我们禁锢在自己所说的话的用词中。”

《新报》主编汉斯·哈贝指出，德国出版者中只有少数人保持了“希特勒语言的霉菌”原有的样子。“一个极好的德国记者拿给我一篇精辟的文章，文章鞭挞了非人道的语言，要求回归德语。这是一篇充满好意的精辟文章。可也许我们不能发表它，那只是因为他写作时使用了希特勒的德语。”

对所有拥护合乎时代精神的语言以及追求政治热情的写实文学和直面残酷现实的人来说，《蝎子》都符合他们的诉求。1947年11月，汉斯·维尔纳·里希特这样为这本新杂志做宣传。为给杂志的成立做准备，年轻的作家们在作家伊尔莎·施奈德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家中碰面。出席者有沃尔特·戈本赫夫、阿尔弗雷德·安德施、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雷、海因茨·弗里德里希、恩斯特·克莱德、沃尔特·古根海默、沃尔夫冈·贝赫勒、弗里德里希·民森、尼古劳斯·桑巴特、君特·艾希、沃尔特·西尔斯贝特、沃尔特·海斯特。许多人当年曾在被禁的报纸《呼唤》工作过。第一次会议的重点是宣读草案和征求意见，这里的内容成为以后会议的模式。后来，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受邀参加了这类会议，并从中发展出“47社”。“每个不必要的华丽辞藻都被抨击。那些被丢弃的大词，都是空洞的、被与会者认为已经丢失本来意义的词：心脏、痛哭、快乐、悲痛。参会者听到的只是精练的陈述句。在这间房子里，格特鲁德·施泰因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受到同等忽视。”

这个“文学作坊”跟（大部分保守的）当时的日耳曼学一样，同受到美国短篇小说强烈影响、短小简单的“新语言”相反，无比陈腐，思想意识更是完全被他人掌控。1945年后再次创立的一些新文学奖则被视作对这种“新文学”的排斥（有莱辛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伊默曼

奖、威廉奖、拉贝奖）。弗里德黑尔姆·克罗尔说它是通向重建和复辟的道路指南，此话不无道理。1950年君特·艾希获得“47社”奖，那只是看起来与传统保守的文学奖项在颁发上有所不同。艾希本是荒凉文学的发起者之一，他的特点是简洁而逼真的语言，这种语言极大地激发了内部流亡的“文字艺术的铃声”。可是在“47社”颁奖的时候，他却觉得一切仿佛又在回到密码般的奥秘的文字。他以诗歌《法兰克-西藏-樱花园》获得佳评。“……听，从这些地区传来/成倍的祷告/樱花树冠/一个磨盘陌生地旋转。”

“荒凉文学”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在此之前，文字的精简和归结是为了表达具象、立足于真实的历史世界的话，“荒凉文学”的目标则是超越时间的普遍性。“纯粹的诗”标志着一个正在到来的转折。“魔法般的诗学”的时代，物质在其中“反反复复地捶打”，借着这种改变精神的语言风格回归。“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也有政治动员因素，但保罗·策兰[34]的‘含混神秘’的诗语言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恰好绝非作者本意，但阅读他的诗时，读者感到——当然这也跟读者早年形成的特定的阅读和理解习惯有关——诗里隐含着那么多政治和保罗·策兰本人的生平信息，却像密码般被编写得高深莫测，以至于对诗的解读只能采用纯属美学形式和宗教般虔诚的感性方式，而启蒙式的理性解读方式则完全不可能。”

出版业

投降后短短几个月，人们就开始考虑出版和图书贸易继续运行的问题。第一个授权证书被颁发。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随着所有文学领域的再版和新版发行发展、慢慢丰富起来的图书市场”。1946年年底，三个西方占领区内已经有超过2000家书店。每部新作品问世，平均每个经销商都会收到两三本。

出版商发行许可证由盟国经过仔细的政治审核后颁发。1947年9月，拜仁州有书及杂志的出版许可证的单位约90个，相比之下，1933年以前拜仁州有超过200家出版社。因为制造许可证有一定难度，信息控制司开始控制接下来的许可证颁发量。德国委员会则主张至少给“无不良记录的出版商”正式的批准。

两年内（1945～1947年），德国已经新发布或者新发行了大约

5000本图书。（1947年6月，在柏林德国书展之际列出了4913本出版书目，但并没有提出需要完整书目的要求。）在大约25万册书里面有5000份普通标准版本。然而在这些书里面，通常都是一些只有较少页数的书籍。此外，专业参考书也包括在内，另外还有一本多行的情况。1947年8月，曼努埃尔·加赛尔分析了“德国图书生产的迷思”：大多数出版商意识到了知识缺乏的现象，他们同时也希望抢到书籍出版这块“纸蛋糕”的更大份额。想象力丰富的恩斯特·罗沃尔特，通过循环使用报纸纸张的方式，印刷了10万份小说。尤其是，他把扉页缩写为“rororo”商标，从1950年起成为第一平装书品牌。大众熟知了重要的德国作者尤其是外文作家，比如，欧内斯特·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斯内克莱·路易斯、安德烈·纪德、安东尼·德·圣-艾修柏里、伊格内修斯·斯隆。尽管印刷数量巨大，却（由于缺纸）仍然不能满足大量需求。因此，出版商明确要求他们的读者，虽然小说循环使用了报纸用纸，也不要全部买完。书应该落到那些真正对它们感兴趣的买家手中。

对于出版商来说，从外国作者那里拿到版权是很困难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盟军当局的支持。广大读者心情迫切地期待著名的贝尔曼·费舍尔出版社出版那些在美国和瑞典问世的图书。因为费舍尔是出版流亡文学的中心，并拥有国外重要书籍的出版权。

犹太医生戈特弗里德·贝尔曼来自格利维采，是一所柏林外科诊所的助理。1925年，他与出版商萨穆埃尔·费舍尔的女儿结婚并加入贝尔曼·费舍尔出版社，1932年接手管理出版社。德国政权被纳粹分子接管后，他与部分在德国受到排斥的出版社一起流亡维也纳，1938年从党卫队手中侥幸逃脱。他在斯德哥尔摩重开出版社，两年后，与家人移居美国。（皮特·苏尔坎普则在德国接着管理运作出版社剩余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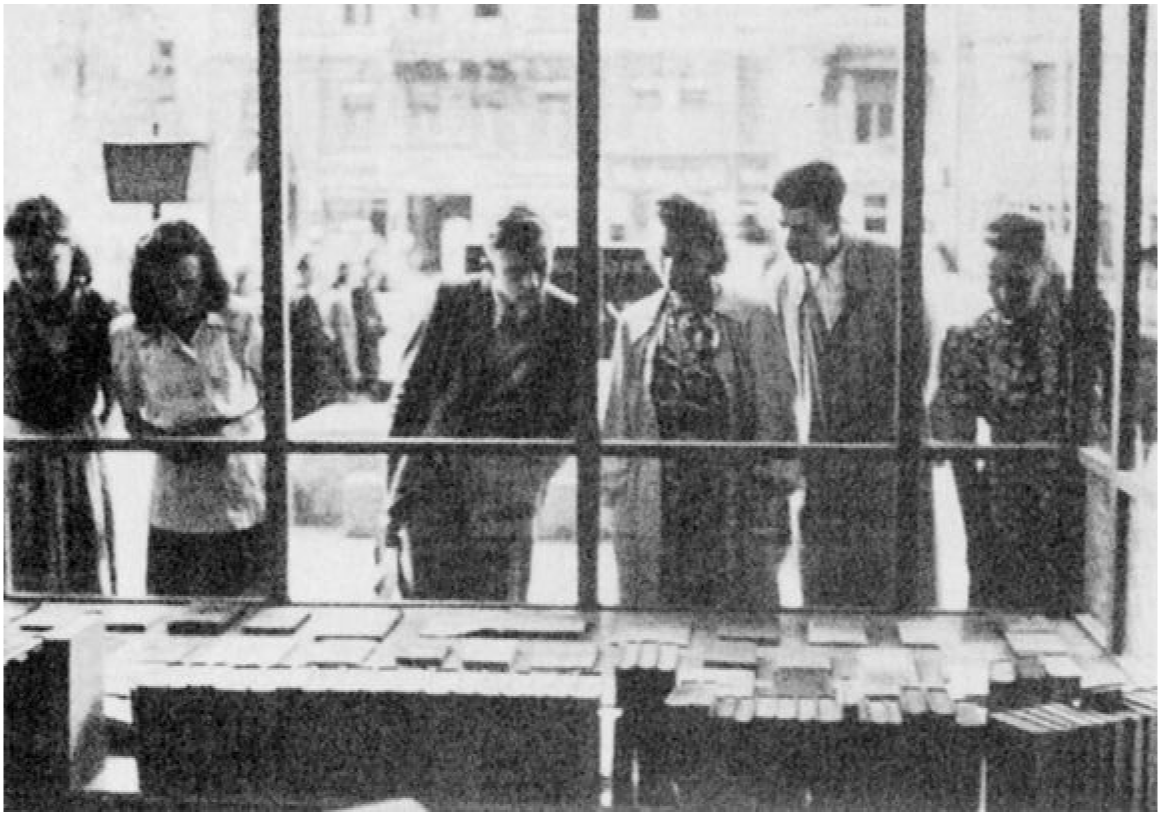
1947年5月，贝尔曼·费舍尔把一些重要书籍的版权转交给美国军队，美国便也有义务把出版社在德国部分的权利转交给他们。他如愿有了使用书籍印刷所需纸张的权利。费舍尔出版社的第一个方案是主要出版流亡文学。从1948年起，这个系列每本书的第一版都印了5万份：恩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赫尔曼·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托马斯·曼的《小说选集》。再后来是恩斯特·彭措尔特的《波文茨班德》、威廉·萨洛扬的《人的喜剧》、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卡尔·楚克迈尔的《波岑的马格达莱纳》、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的《德国读本》、斯蒂芬·茨威格的《昨天的世界》。其他的授权版本还有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和《赡养者约瑟夫》（约瑟夫四部曲的第四部）、弗朗茨·韦弗尔的《本纳黛特之歌》、桑

顿·怀尔德的《三月的望日》和根据该小说改编的怀尔德戏剧的舞台演出权，弗朗茨·韦弗尔的《亚科博斯基和上校》以及卡尔·楚克迈尔的《魔鬼将军》。

由于费舍尔出版社办公地点在柏林，面临日益尖锐的东西矛盾，这让贝尔曼·费舍尔感到危险。因此，他安排苏尔坎普1947年在法兰克福创建苏尔坎普出版社。1948年，该出版社完全接替了柏林工作室的业务。费舍尔和苏尔坎普因为对出版社的任务以及未来的发展角度持不同看法，导致两个出版社步调不一，最终分道扬镳。

约翰·贝歇尔希望在苏联占领区成立一个“无限沟通的”文学社。这个想法在1945年8月“民主改革文化联盟”成立建设出版社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对许多人来说，在一片废墟中生产书籍简直是一个疯子的笑话，因为据埃里希·温特在一本出版社年鉴里的报道，当时最紧要的是减轻普遍存在的物质匮乏和贫困。建设出版社的创造离不开许多乐于奉献牺牲的人所做的努力，其中最应该感谢的是苏联占领区当局政府的理解和鼎力支持。

贝歇尔在由文化联盟出版的《建设》杂志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为了给他们提倡的文学开放性设一个底线：“在没有彻底清理鼓励或发起之前那些毁灭的世界观和道德之前，我们无法建立任何东西。”这句话表明了建设出版社从一开始就给出的出版项目限制。这个由贝歇尔倡议、提倡文化改革作品的“严肃与教育”很快变成了“审核”和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操作或由德国统一社会党管理的出版业，也就是说，相对容易“指挥”的出版业。



在柏林选帝侯大街的玫瑰旧书店里许多书又被再次陈列（**1947**年）

民主德国文学是出类拔萃的“计划文学”。也就是说，一个文学作品产生的所有阶段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指挥和控制：创作，印刷以及出版，发行和文学评论，最终所成的读物和带来的效果。为达到此目的设立了一条完整的机构链，其核心无疑是所谓的“印刷批准程序”。

在民主德国的“阅读视野”里，看向西方的目光很大程度上被阻挡。虽然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所有联邦德国重要的新出版物都会在杂志《新德国文学》上看到评论。在此，出发点是只存在一个德国的文学，而这一点在当时已经是想入非非了。多数情况下，西方书籍就是违禁品。乌尔苏拉·赫肯卡普在她的研究中谈到，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文学的理解是“半黑暗中的感知”。而两德一致的现象是——尤其是在废墟时代——诗人戈特弗里德·本得到极大的赞赏。贝歇尔本人从来没能掩饰自己的惊讶。“因为，诗歌屈从于政治就是他写的主题。而本，一旦他为了追求承认而牺牲掉自己的正直，就不得不悄然退场、没有掌声。因

为他的追求承认是因为他希望在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以及获得文学奖。”

本在两个德国都被当作“积极解构”的代表——他在东德是只会说“好的”的典型，而这正是东德的教育目标，而西德则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成功资本家典型而为其喝彩。

再次“播放”

1945年4月29日，埃里希·开斯特纳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白天慕尼黑电台沉默了好几个小时。晚上10点，我们围坐在森林咖啡馆，电台突然开始再次转动。它还能播放什么呢？‘劲爆’音乐！先是没有评论的电台静寂时间，然后是没有歌词的爵士乐。这是怎么了？慕尼黑电台现在是在无人岛吗？还是值夜班的人热爱美国专辑？”4月30日，美国军队占领了易斯曼宁的设备以及慕尼黑的无线电大楼遗址。显然，电台没有其他人，因此某个技术人员在那段时间“代理”值班。5月12日，慕尼黑电台再次复出——每天半小时节目，仅限于新闻报道、地方军政府指示以及寻人信息。5月21日，在慕尼黑广播电台的地下室临时安装的小小广播室被启动运作。节目设置得相当大胆，第一位内政评论员赫伯特·盖斯纳曾抱怨过节目并请美国人来改善它。这也就是吉米·容格曼会备受关注的原因：他与维尔纳·格茨一起从美国士兵广播电台那里接手了“午夜慕尼黑”这档节目，并把它做成了欧洲最成功的爵士广播之一。

那些通过电台传播流行起来的舞蹈和娱乐音乐带来了“精心制作的声音”，而这正是观众渴望的：重新开始“五点茶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是1948年宝丽多发行的专辑《卡布里-费舍尔》，专辑版权始于1943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纳粹时期的德国流行音乐，主要是沙龙音乐改编的电影歌曲、情调小曲、饮酒歌和小歌剧乐曲。其中很大一部分在1945年纳粹垮台后仍可以听到（正如他们的演员，几十年来观众的最爱，在1945年后也

依然在露脸：汉斯·阿尔卑斯、约翰内斯·希尔希特斯、伊夫林·金内克、玛丽卡·罗尔克）。纳粹数十年对德国音乐创作的“照管”和对“外来”音乐防范带来的后果是，就算在比较开放的西德地区，对国际流行音乐的自由改编也发展得极其缓慢。“1945年后德国的‘流行音乐’，口口声声说文化独立，可无论是在曲调还是在歌词上都只是把美国音乐模型中的听觉习惯修剪得德国化了而已。西德的日常文化生活已被各种各样的美国化充满，这无疑是给观众一个信号。而这些观众本身，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噩梦般的回忆弄得敏感到不堪其扰，他们的意识里依然害怕受到过多‘外来影响’。”（汉娜·布伦霍贝尔）

在苏占区和后来的民主德国，为了强调民族文化遗产，关于流行音乐和民歌的讨论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意义。西方流行音乐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因为年轻人喜欢它们。“他们能记住大量的歌曲，一天到晚哼唱着这些旋律。”苏联占领区的“校长文化”从不怀疑，只有民歌里才有重要的文化。民歌和流行歌曲这两个流派的主要区别是精神态度的不同。民歌是用一种高贵的形式来表现民族特性中最好的一面，它的内涵来自心灵深处，它的纯粹直接诉诸受众。它的目的不在于成功，不需要用任何外部手段和技巧来增强本身的吸引力。它是人类精神最美丽的创作之一，它是一份礼物。“相反，流行音乐追逐成功，不遗余力地使用各种手段来实现它的目的。它们不避讳平俗，这是基于一种正确的认识，即人们喜欢平俗，这是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

“校长文化”是一种浮夸的、在“培养高贵的人”的忧虑中过度膨胀的文化教育学——“校长文化”在肯定性的语言模式上，跟西德的“西方守门人”式文化如出一辙。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首纯粹而忧伤的歌——跟东西德地区没关，它在战争时就流行起来，连接了前线士兵的心——仿佛一阵清风，吹拂过废墟时代。这首歌是《莉莉·玛莲》，作词者是汉斯·莱普，作曲者为诺伯特·舒尔策。这首歌被超过十五种语言翻唱，被许多出名和不出名的歌手唱过，不过这些歌手多多少少都模仿了德国女歌手拉莉·安德森（原名布能贝格，后嫁给威尔克）。拉莉·安德森原住在柏林，在战争期间受到纳粹分子的迫害，逃到了朗格奥格岛。1945年

5月战争结束后，岛上挤满了不约而同来到的盟军士兵，都发疯般地想见到歌手本人，听她再次唱起：“在兵营雄威的大门前，那里有一座路灯。如果它依然矗立，我们就在灯下再次相会。就像从前啊，莉莉·玛莲，就像从前啊，莉莉·玛莲。”“这首歌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是流行音乐的奇迹。以‘教育’为目的的广播意识或意识形态对它的贬低都没有掩盖它的光芒。”

废墟时代也有黄金青春，爵士乐由此迎来了第一次突破——尽管大多数人心中仍有不满：“为什么强迫我们接受口齿不清、不成调的，让人想起丛林噪声的声音？”

> 1935年，在纳粹广播中，爵士乐已经被禁止。1937年，“对不良和有害音乐文化的整顿”以及《关于保护音乐文化的规定》随之而来。沃尔特·肯珀斯基说，他的兄弟罗贝托是一个爵士乐迷，在战争期间拥有许多虫胶唱片，以至于需要十页打印纸才能把大约250个标题——从安布罗斯和阿姆斯特朗到沃勒和本尼·德·维勒的作品——都写上去。大家称这些年轻人为“爵士笨蛋”。爵士是平民对平民的音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在法国海岸安装的盟军电台广为流传。本尼·古德曼、汤米·多尔西、安提·肖尤其是格伦·米勒的音乐鼓舞着士兵们，即使后来成为战犯，依然沉迷于这些旋律中。许多在美国俱乐部表演的德国专业和业余的音乐家最终都返回了家乡。“进行曲四二拍的节奏是国家暴力机关在让人服从。而四四拍，从四二拍中做了一些很难分辨的变化，突然就打消了斗志。人们听着四四拍，放下武器，和其他人兄弟般地抱在一起摇摆着跳起舞来。”爵士乐主要是通过广播电台传播的。“我们这些年轻的、不那么年轻的爵士乐爱好者会整夜坐在收音机前，为的是听那些我们终于不会因为听了它们就要受罚的音乐：按盟军的叫法是，美国力量网络的摇摆乐。当马克·怀特那铿锵的声音在‘午夜慕尼黑’响起时，我们陶醉在那种感觉里。中午我们也添加爵士能量。那是‘午宴慕尼黑’，一档在画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考尔巴赫以前的宫殿里录制的日间节目。”（欧·哈森卡姆普）

苏联占领区对爵士乐复兴的态度是复杂的——第一张德国爵士乐唱片就是在东德灌制的。很快，那里回到了“行军”时期和鼓动群众的歌曲时期。刚开始，态度还是相当宽容的，尤其想想镇压爵士乐是法西斯曾经干的事。负有民族传承使命的红色公民教育文化政策是不能与这种音

乐的“靡靡之音”相结友好的。爵士乐不被定义为音乐（他们说，爵士乐与艺术没有多大的关系，就像犯罪小说与歌德的《亲和力》没有关系一样）。音乐是艺术，不同于爵士乐的地方在于，音乐是在另一个精神层面上。音乐是整个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爵士乐则不然。“爵士乐只能做一件事：通过节奏的力量把我们的身体送入符合节奏的摇摆中。”（这一句贬低除了语言风格，内容上同特奥多尔·阿多诺在西德痛斥爵士乐时所说的一模一样。）

> 苏占区对爵士乐日益强烈的压制态度也体现在，从1947年起就活跃、受到莱比锡电台支持的汉高乐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唯一一支正规爵士乐的小乐队。“1949年建国后，民主德国残存的爵士乐俱乐部都被解散。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主德国的爵士乐陷入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思想负责的德国作曲家音乐家协会的压力中。他们在出版物中强调爵士乐有‘颓废的’‘西方的’‘晚期帝国主义的’特性。许多已经在民主德国定居下来的知名爵士音乐家离开了这个国家。”

1945年5月4日10点，英国人接管了汉堡红树大道旁未被摧毁的电台大楼。19点，英国国歌在此奏响，随之播出了公告：“你好，你好，这里是汉堡无线广播电台，盟国军政府站。”这个信息控制单位马上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才可以在没有德国雇员的情况下，用极少的机器做广播节目？”通讯员、编辑、主持人都早就像一阵风似的跑散了。就算他们没有跑，纳粹德国也不会让他们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但是，技术人员还在。1945年5月4日，当英国军队的三名军官慢慢开过来的时候，技术人员站成笔直的一排。现在，蒙盟军政府的允许，应该做点什么：应该有人教导德国普通大众他们即将面临的事情。组织得一塌糊涂的难民潮应该得到有效管理，停滞的经济应该被拉回轨道。这些都需要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信息首先是从卢森堡来的。因为卢森堡有一间美式英语、英语和法语军用电台，其在1944年找到了一个完整的发射器。那里做出的消息和节目转到汉堡播放，还有评论、小品和音乐。除此之外，德国的业务由英国国际广播电台接管。彼特·冯·赞恩是“第一时间”的德国工作人员之一。不久，阿克塞尔·艾格布雷希特也加入了汉堡

广播电台的团队，他于1933年被纳粹分子逮捕，后来获释。

法国占领军不会使用他们管辖范围内之前的传输设备。科布伦茨从1945年10月4日开始，每天播放数小时节目。科布伦茨之后，要到1946年3月31日，法国管辖区内才有巴登-巴登的西南广播电台开始播送节目。广播电台，正如戴高乐将军所说，是为了“用德国语言播放法国节目，这是为了德国人民好”。法国广播电台监督发现，广播是宣传、文化渗透和政治导向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他们因此计划对听众实行“长期监护”，但是方兴未艾的再教育热情让人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过于明显的宣传只会让德国听众望而却步。德国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台长是弗里德里希·毕肖弗，他的电台经验可以追溯到1933年以前——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以他的评论系列“时代的批判”给电台带来了实际的社会影响力。该电台很快就有了出色的收听率。

1945年5月4日，苏军在柏林通过特格尔电台发出了第一条电台消息。柏林在两天前已经完全落入苏军手里。5月18日，马苏埃大道旁奇迹般未被战争摧毁的无线电广播大楼里，柏林城市管弦乐团演播的第一台交响音乐会通过电台转播。技术人员和播报人员多半留在楼里——因为当苏军攻占柏林时，电台大楼成为格外安全的所在（同时，这些工作人员还设法破坏了纳粹军方让他们炸毁大楼再自尽的命令）——广播工作因此很快得以恢复。苏联人的控制仅限于外围，比如，他们安排了对反法西斯主义负责的德国工作人员，这些人有：汉斯·马勒，时年34岁；马修斯·克莱因，曾任牧师。盟军司令部内部并未就此举行会谈，美国和英国的军政府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广播电台：一个是DIAS，另一个是西北德国广播二台。柏林广播电台开始属盟军共用，在它的启动仪式上，演奏了英美法苏四国的国歌。

后来成为南德意志电台台长的汉斯·鲍施在总结这段电台重建的时光时说，德国第一代电台人在盟军官员的指令下还是充分利用了机会。

电台记者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身兼生活咨询员、为受困苦和压迫的人辩护的律师、不公的控诉者、促使人们反思过去的大声疾呼者数职。在那段报纸一周只发行一到两次、音乐厅和剧院还是一片废墟的时光里，广播电台陪伴着惶惶不安、忧心忡忡的老百姓，其紧密程度远胜过后来大放光彩的经济奇迹时期以及达到小康的时期。

“这些年来，无线电台在德国赢得了声誉。在听众意识里，那个在纳粹独裁统治时期就已习惯的政府的喉舌印象在渐渐消除。”

德国广播事务管理局转入占领国的手里。广播电台站行使的是各个军政府的电台的职能。美国人接管了三个以前的帝国电台——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并偏爱分散模式。随着播出时间的不断延长，德国工作人员的人数也不断增加。1946年4～5月，慕尼黑电台一个星期的播出时间纪录为86小时，有7名美国员工和370名德国员工。1946年7月11日，在费利克斯·布特萨克被任命为总编辑之后，节目的结构设计再次回到了德国人的手里。美国人通过了一部拜仁州的广播法，以此为根据来进行广播事务管理局的合法转让。1948年10月10日，根据这部广播法，慕尼黑广播电台获得了美国占领区内的第一个由德国人管理的电台的资格。

英国人更喜欢以英国广播公司为蓝本，运行一个中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1945年8～9月重启科隆广播电台后，他们也紧抓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以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电台的建设。西北广播公司成立于1946年10月1日。1951年它已经拥有了510万听众，其中一半的听众在西部占领区。这个广播公司对西部地区广播的质量和结构有很大意义，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公司的大小，更多在于该公司的领导修·卡尔顿·格林（1934～1939年任《每日电讯报》驻柏林记者，1940年开始任英国广播公司德国部部长）——“一个开明的人会给德国人更多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总有好感。他经常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激怒了美国人，挑起了法国人和俄国人的抗议。”作为“首席控制者”，他的目标是广播机构能够独立，非国家化，经费通过收取收听费来负担，由监管机构监督，在所有著名的社会群体里面成为代表。

与西占区自由的多中心布局相反，在苏占领区形成的则是以柏林广播为中心，以地方台部分节目为补充的电台广播格局。在苏占区的新广播电台的建设中，内容和组织上都借鉴了魏玛共和国电台和苏联广播电台。因此，无线电台的内容基本上是支持反法西斯的民主秩序

的建立以及宣传德国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所以，在文学和音乐广播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在法西斯独裁统治时期被禁作家的作品。许多信息性广播的内容主要是与纳粹主义的过去清算。1946年8月15日建立了民主广播电台的主管部门，汉斯·马勒被聘任为电台总经理。柏林电台隶属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的中央秘书处。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地区电台在德国民众教育管理处的指令和监督下工作。“苏占区在战后一年半后建成了一个很大程度上被集中操纵的广播电台系统。这里所有关键位置都由德国共产党党员，或更确切地说是苏联反法西斯阵营训练有素的干部担任。”

新闻媒体

盟国的专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年前就已开始筹划德国媒体重建的大方向了。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民众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放弃报刊阅读和广播收听。第二阶段，出版发行盟军的报纸，重新运作盟军的广播站。第三阶段，给报纸颁发再次出版的授权证书。西方盟国从自己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大众传媒对一个民主社会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盟国拥有在美英媒体自由中有多年经验并了解西方媒体业中的弯路错路的杰出专家，战后的白纸给了他们一个在这个被占领的国家尝试自己理想构建设计的机会。在认识到自己曾经被纳粹宣传以出奇的方式欺骗后，德国民众对信息的饥渴变得十分强烈。

西方盟军自抵达德国边境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分别在自己的占领区内用德语出版军队报纸。1945年秋季，一共有16种美国出版物，直至1946年年初英国共出版21种报纸。这些报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第12军团的宣传与心理战分队队长汉斯·哈贝的杰作。和他并肩战斗的是1913出生于凯姆尼茨的作家斯蒂芬·海姆——他于1933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随后流亡美国（后来，他作为占领军成员被调回德国，但因为亲共的态度被部队开除，并于1952年移居东柏林）。

紧随军队前进的哈贝小组的态度是，在媒体自由的环境下为德国再次打开看世界的窗口。关于这一点，他们站在宣传和心理战分队领导以及麦克鲁尔将军的对立面。麦克鲁尔将军要求：“德国人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德国人必须被说教。”经过一番拉锯战后，哈贝“德国

的精神发展再次与外国文化潮流接轨”的想法终于被执行，这是为了创造“互相鼓励、互相交流的前提条件”。美国人自1945年10月起发行了一份跨地区的大报纸。这份报纸充分采用了美军发行量至460万份的军团报和额外发行的《军政府机关报》的经验。这份大报纸取名《新报》，在之前慕尼黑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印刷室印刷，总编是汉斯·哈贝，从1946年1月开始由汉斯·瓦伦贝格（美籍德裔，曾经领导过美国报纸对苏联的《每日观察汇编》报的竞争）和埃里希·柯斯特纳担任文艺专栏主编。《新报》的质量突出到可以成为后来德国报刊业的模板和榜样的程度。

《新报》及其柏林分部的特点是观察当时的东西德的关系。在这里发文章的许多人都是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像约翰内斯·贝歇尔、安娜·西格斯、斯蒂芬·赫尔姆林、F.C.魏斯科普夫。这无疑给编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这使得美国与苏联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尽管瓦伦贝格对苏联在东部地区以及柏林地区的政策做出越来越批判的评论，还是有人谴责该报刊是左倾派（在东柏林地区，《新报》甚至在1946年8月第一次被查封）。瓦伦贝格于1947年9月辞职，一年后返回美国。他在“美国之声”做广播编辑，经常被热衷于冷战的人攻击，不过攻击并无效果。

还有英国的报刊《世界》，经过战后第一个冬天的几个月的准备时间，第一期报纸在1946年4月2日发行。该报的成立没有任何特别理念。

英国人对再教育看得比较随意。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该报印刷数量很快就上升到了100万份。在公众眼里，该报纸是一个没有鲜明观点的两面派。这个印象是《新报》第一位主编汉斯·切尔失败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汉堡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在1933年之前属于Tat圈子[35]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1946年年初，他的位置被鲁道夫·昆斯特梅尔取代。

早在1945年7月28日，宣传与心理战分队的三号指令就已结束西方盟军的“紧缩政策”。“紧缩政策”的意义是对待德国人要严格苛刻。（1945年5月22日的一号指令的内容是要格外强调占领军和被征服的德国人之间的距离和鸿沟。“紧缩政策”被视为心理战中的必要部分。）而现在，他们给德国报纸开了一条获得许可证的路。问题在于，各个盟国对新闻媒体的组织形式、详细计划以及何时通过德国报纸的许可这些具体问题的态度存在差异：在西部，美国是第一个同意颁发报纸许可证的

国家。根据规定，许可证的颁发需要至少三个持有不同政治观和世界观的人组成的出版者委员会同意承担责任，这个委员会必须时刻紧跟不断变化的宣传与心理战分队命令，这些命令会告诉他们评论应采取何种导向以及哪些是新闻播报应该强调的重点（对记者和报纸来说，这是一个触手众多、覆盖面广的监控机构）。可是，新的德国媒体面对官僚主义及官僚倾向操作信息时的抵抗决心也增强了。

在英国和法国占领区内，党派都加入报纸的出版发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跟党派有关的报纸才能被允许发行。（早在1942年，流亡伦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就已经要求建立党报，他们计划返回德国后发展德国报业市场）。当然也有人在英国占领区内建立独立的报纸，尤其是以党政为导向的新闻每天都在打擦边球，而德国统一社会党对东区新闻媒体的影响亦使对“党派”新闻体的不信任不断加深。

在苏占区，苏军占领柏林不久后被批准的党派很快就收到每日新闻的发行许可：占有优先位置的是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自由民主党也获得了党报的发行许可。当然，中央党报只有一份。“到1948年苏维埃一共给21家报纸颁发了许可。苏共对舆论的操控通过纸张的配发来实现：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获得的纸张远远超过其他党派。因此，这两个党相较于其他党派，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地区舆论优势。而对‘公民报纸’的内容采取不分彼此的态度则要等到1947年年底。”（诺伯特·弗莱）

1945年5月15日，苏联消除了由于禁止所有德语报纸导致的媒体真空：在这一天，首先发行的是《每日评论》，它先是在新克尔恩区的一间小印刷厂印制，后来用位于老柏林报刊区、民主社会主义的弗朗茨易尔出版社的旋转活塞发动机印刷报纸。用“德语给德国人民发行的苏联报纸”开始由红军司令部发行，在该部门被废除后，由苏联军事管理处接手。编辑们在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信息部主任谢尔盖·图潘瑙上

校的领导下工作，图潘瑙曾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后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经济学。“刚开始的时候，《每日评论》的苏联出版家利用德国人的帮助，尤其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帮助。他们是前驻军官员，多数都在斯大林格勒蹲过牢狱，后来在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营地接受过再教育，然后被派往各个前线，以用口号来宣传快速结束战争。德国雇员中还有公民记者，他们愿意并且适合参与德国的反法西斯建设。负责机要部门的领导开始是德国人，很快他们的副手也都是德国人。刚开始的时候，人员比例是120名苏联人和40名德国人，但是几年下来，到1955年年底时，最终剩下的只有12名苏联人。”（R.赖因哈特）



在慕尼黑售卖《南德意志报》，**1946**年

至1947年夏天，在除了柏林以外的苏联占领区内，只有两家报纸一期发行量可达15万份：哈勒的《自由》和波茨坦的《边疆民声》。在德累斯顿，也就是第三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天制作最后一份报纸的地方（这份报纸是《自由之战》第105期，当然，它没法被送出去了），先是有一家名为《日报》的刊物（1945年5月22日第一次印刷）。《日报》在8月1日并入跟《新报》一样以杰出小品文专栏享有盛誉的《每日评论》。

> 《柏林人报》从5月21日开始发行。6月12日，德语的《民报》第一份期刊也发行了，这是德国共产党新建立的机关刊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报《人民》以及政党同盟的机关报纸（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新时代》，德国自由民主党的《明日》）紧随其后。德国统一社会党最重要的刊物是《新德国》，1946年4月23日第一次发行。“在此之前数日，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这一消息作为《新德国》的第一项任务自然被报道得很详细。报纸头版的《给德国人民的通告》宣布了一个更好时代的崛起。在第六页的消息是演员汉斯·阿尔贝尔斯在离开德国多年后很高兴再次回来并向《新德国》的读者问好。开始的这几年应该说是在《新德国》五十年历史中最好的几年。那里有争论的文章，还有有争议的讨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导向和编辑工作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当总编辑莱克斯·恩德以及鲁尔道夫·赫尔曼斯塔德对瓦尔特·乌布利希的方针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被撤职了。1953年6月17日之后，这份报纸越来越像官方公告栏。”

最先出现的那批周刊的共同点是先锋精神、重建的热情和携手向前的态度。在这些周刊中，《时代》——1946年2月12日第一期——的创刊具有重要意义。给《时代》颁发许可的是：洛维斯·H.罗伦斯，他任漫画版《星期》的主编至1944年；理查德·图因格尔曾是建筑师，1933年后作为作家闻名；埃瓦德·施密特·德·西默尼，之前的《法兰克福报》的执行主编；杰尔德·贝瑟吕斯，律师，第一届由盟军政府任命的汉萨同盟市民议会议员之一，后在汉堡市政府中负责建筑工作。

> 杰尔德·贝瑟吕斯让《时代》在其多舛的历史里保持了连贯性（存在一些内部争议），使其日后成为联邦德国最重要的报刊之一。1949年11月，他通过信托的形式为《时代》买下了发行画刊《明星》的出

版社50%的股份，建立了他的新闻帝国。1946年，他30岁，属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纳粹时期，他与一位犹太女子结婚，并且是那些受政治迫害者的守护者和中坚保护力量。《时代》的第一位专职作家是恩斯特·萨姆哈贝，因对占领国当局做了犀利批评而很快被辞退。

恩斯特·弗里德伦德尔是一位来自布雷斯劳的犹太医生的儿子，1914年自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纳粹时期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他在《时代》的第一阶段就确定了它自由保守主义的政治态度。1946年，为了在饥荒中挣得温饱，他举家从瓦杜兹搬迁到汉堡。“这个人没有‘精神压力’，也不受到任何怀疑，他道出了我们其他《时代》的出版者说不出来的东西。”（杰尔德·贝瑟吕斯）

《时代》曾与纽伦堡法庭做过一番角力——里夏德·图因格尔尤其反感甚至痛恨首席检察官罗伯特·肯普纳——这表明，在《时代》编辑部内部曾经也有一股反动潮流，但参与1944年7月20日密谋刺杀希特勒行动的人[36]也参加过这份报纸。反动潮流被这些人的加入破坏，正是他们确定了《时代》的自由主义倾向，马里恩·多恩霍夫女伯爵公开了他们的遗嘱。（马里恩·多恩霍夫女伯爵，1909年生于东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施泰因城堡，在法兰克福和巴塞尔学习国民经济学，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1945年在节节挺进的苏联红军到来之前离开东普鲁士。）

1947年1月4日，《明镜》继承了《本周》（*Diese Woche*，只存在了六个星期），发行了第一期刊物。“负责出版的英国政府当局决定，杂志必须在独立的德国人领导下发行。”当时24岁的鲁道夫·奥格斯坦是首席编辑——几年后成为独立出版人。《明镜》这本联邦德国最成功的周末杂志的历史起源于英国军政府代理新闻军官约翰·卡隆尔少校的一个突发念头。1946年年初，他觉得一本新闻杂志会对德国人有益。他认为这本杂志应尽可能少地以《时代》这样的美国杂志作为榜样，而向《新闻回顾》这样的英国杂志靠拢，从普通人的角度介绍政治事件中的人物，以此介绍抽象的政治事件。卡隆尔设计了《新闻回顾》的德国版。第一个试刊号在1946年3月29日发行。出生于布拉格、时任汉诺威报纸监察的英国陆军二级军士长哈里·波尔和流亡英国的德国记者亨利·奥蒙德从这份试刊中获得灵感，而奥蒙德恰好懂一点企业经济学，也可以弄到钱、纸张、空间、印刷机、运输工具等，于是他们也加入了奥格

斯坦。三个人开始寻找德国员工——奥格斯坦曾在汉诺威读完高中，战争开始的那一年正好高中毕业，又有三年炮兵兵役积累下的经验。《本周》登出了读者维克多·戈兰茨的来信，题为《鲁尔河畔的饥饿》——文章揭露了英国政府的无耻形象——引起了轰动，15000份杂志以每份1个帝国马克的价格立即售罄。英国机构表达不满，而其他文章也招来法国人和苏联人的抱怨。在柏林监督委员会的英国人命令英国人撤回这份报刊。但是，卡隆尔少校却做到了用另一个新的名字继续发行这本杂志，杂志得以作为一个拿着英国许可证的德语报刊继续存在。奥格斯坦想出了一个新的名字“明镜”。“如果我在这份报刊上有功劳，那这个就是大功劳。这个名字简直太好了。”

1946年，《德国犹太人周报》首次发行，这是重返德国的犹太人的喉舌。从1947年1月1日起，周刊《莱茵的墨丘利》在弗朗茨·阿尔贝特·克拉莫尔的领导下每周发行。弗朗茨·阿尔贝特·克拉莫尔在八年的流亡生活之后回到科布伦茨，他对《莱茵的墨丘利》的设想是“基督天主教的信息通道”。周刊模仿1815～1816年约瑟夫·格勒斯发行的老《莱茵的墨丘利》。1948年2月出现的《德国周日报》则定义自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独立周刊”，发行人是当时的大主教汉斯·利尔耶。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着一个想法，通过“跨越地区的，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准的工作来升值一个常被误解的逻辑概念”。《基督与世界》杂志在1948年6月货币改革的前几天拿到发行许可。这是一份以“信息”来定位自己的杂志，负责人是欧根·格斯登迈尔，他兼任新教教会救济机构主席。从东亚回来的克劳斯·梅纳特是主编，招募了一些保守派记者，他们中有一些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观点和所作所为绝对不清白。

出版业的上升和新闻机构的重整旗鼓有很大关系。伦敦的“盟国出版服务”（Allied Press Service，APS）直到1945年年底都是中心，而它的建立也得益于前乌尔施泰因出版社记者彼特·德·门德尔松的工作。从1945年6月起，美占区和英占区都有了“德国新闻服务”（German News Service，GNS），后来改名叫“德国新闻机关”（Deusche Allgemeine Nachrichtenagentur，Dana，1947年后改为Dena），由美国派发营业许

可。1946年10月，“德国公共新闻服务”（ADN）成立，英国人在汉堡建立的“德国新闻服务”自1945年12月起改名为“德国出版服务”（dpd）。法国人则在巴登-巴登建立了“莱茵”，后更名为“南部”。相较于报业、杂志业，盟国在这类出版机构里保有很长时间的绝对及直接领导权，直到1947年，德国人参加编辑工作的可能性还非常低。1949年，Dena和dpd合并为德意志新闻社，主编是弗里茨·桑格尔，社会民主党党员。刚刚被选出来的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曾想阻止他上位。桑格尔在德新社的第一篇声明中写道：“保护新闻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不受国家、政党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这是我们这个新的新闻社的标志。”

逃到杂志

乌尔苏拉·冯·卡多夫1939～1945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任文艺专栏编辑，1948年任《南德意志报》编辑部成员。她在1945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她的一位汉堡同事于尔根·许德库珀夫告诉她，“上面的”人有很多计划：大量的杂志报纸项目在酝酿中。光是汉堡就计划了超过300种报纸和100种杂志。

这种对杂志的狂热不仅仅在汉堡，在其他城市也在爆发。尽管纸张紧缺，尽管技术和组织有阻碍，新创建的杂志数量依然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政治、经济、科技、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及文学、神学及哲学的杂志多种多样。其中不乏高质量的杂志。150～250家文化政治杂志有严格的标准，发行量上百万。那几年，德国是杂志的天堂。在纳粹政权12年的闭塞之后，倾泻而出的是那头脑里酝酿已久、有怒不敢言的愤慨。第一次，流亡者的声音传达给了德国大众。在当年的苦难里，若有自由时间去写作和阅读就是苦中作乐了。”哈特曼·格尔茨如是回忆那段“逃到杂志”的日子。

事实上，一个发动了绝对战争，如今又得忍受绝对失败的民族已经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他们在精神上，依旧向那些传播了勇气和能力的人靠拢，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杂志创建人和杂志作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主而独立。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经历——发起反抗、遭到迫害、不得

不内心流亡——让如今的自主独立名正言顺。他们不指望外国人的再教育，他们大声疾呼，德国人应该用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再教育。总的来说，他们对盟国的再教育政策持积极态度，但他们也一直努力，让德国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一席之地。

一些打动人心的词语宣示了这样的意志：专注于本质。所谓本质是传承、思考、革新、变化、建设。那些1945年第一期出版的或者为1946年准备发行的期刊的名字则表达了某些理想主义的承诺，如：《建筑》《播种》《新词》《收集》《入口》《未来》《遇见》《反思》《团结》《结束与开始》《渡轮》《清新的风》《存在》《精神和行为》《金色大门》《地平线》《水性》《新建设》《新晚报》《新欧洲》《新秩序》《棱镜》《立场》《展望》《世界之声》《公元》《变化》。

> 鲁道夫·佩歇尔在“德国民主革新文化协会”出版的《建设》1945年第3期中写道——《建设》是苏占区最重要的杂志之一——现在人们必须重新学习写作和说话，要对宏大的词汇和煽动的表达保持怀疑。内心的清洁要通过语言表达，灵魂的排毒不应该终止于语言。跟《建设》类似、由阿尔弗雷德·坎托洛维茨出版的杂志《东和西》（杂志在四个占领国那里都获得了许可）主要专注于找出所有占领区内新文化热情的共同点。由于冷战步步紧逼，该杂志在1949年以失败告终。虽然《意义与形式》——1949～1962年在皮特·胡赫尔的领导下——在国际上已有一席之地，但胡赫尔作为无党派人士从一开始就陷入争议，他用“灵活的坚定”克服了这些争议，直到离职。

西德杂志业的轩然大波是1946年8月15日首发的《呐喊》的1947年4月刊17号不被允许发行，原因是一篇犀利且独立的左倾派文章将在这一期发表。该报的出版人阿尔弗雷德·安德斯和主编汉斯·维尔纳·里希特曾在1945年为美国的德国战俘提供同名报纸，现在必须离开，许可证转入曾经在美国军政府出版部工作过的埃里希·库比的手里（库比工作到1948年）。

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后来承认，有人曾经咄咄逼人、傲慢自大。英

国新闻界官员彼特·德·门德尔松表示，《呐喊》第一阶段的成功归功于它代表了一个庞大而又年轻的德国，欧洲的年轻人应当对此感到重任在肩（“欧洲青年是人道的，对自由有无止境的渴望”），他们应该拒绝集体犯罪并批评美国军政府采取的措施。《呐喊》的第四期已经卖出了10万份的好成绩，其读者群体以回国的士兵居多。

> 文学或和艺术相关的主题对所有杂志都十分重要。海因里希·弗姆维格认为，文学是当时的避难所。当然，这也符合传统的德国价值观结构（从文学的高峰到政治的低谷）。但同时，人们也准备好应对受过教育的市民意识里不好的一面：消除想一套做一套的模式，寻求一种政治的文化和文化的政治。因此，大量杂志的副标题与文化和政治相关：“文化和政治的杂志”（《法兰克福期刊》）；“文化政治月刊”（《建设》）；“民族共识、文化、政治、科学半月刊”（《新欧洲》）；“时事政治文化文稿”（《东和西》）；“政治文化历史杂志”（《新西方》）；“政治社会和文化重建杂志”（《新语》）。某篇社论证实了人们的印象：这两个词的组合有某种纲领性的重要意义。总之，这个领域经常被写作“精神”，但许多作家理解中的“文化”却包含更多。所以，他们写了一些文章，全部说的是“公共精神”“新文化的开始”“精神生活的复苏”。
>
> 战后，杂志积极正面地影响了德国的政治文化：促进了民主共和的教育，从实际上开拓了精神视野。那段时间，人们心理和精神极度痛苦、批判思考无能、急需哪怕一点点安慰（海因里希·弗姆维格），杂志帮助人们升华物质痛苦，降低精神妄想，重新开始批判思考，文化成为生存和生活的帮助。

尽管如此，那个时代的德国杂志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地方主义，这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大部分作家在第三帝国时期与整个世界的精神发展产生了断层。1948年10月首次发行的《月份》是以建立“一个以言论自由为基础、公开的、讨论和分析的论坛”为目标的刊物。它有美国当经济后盾（也获得美国特工部门的资助），成为西方反共产主义自由派的一个主要论坛。出生于1920年的梅尔文·拉斯基，1942～1943年任《新领导》文学编辑，1944～1945年战争任新闻记者，1946～1948年任驻外通讯记者，在德国记者海尔姆·亚尔斯利希（杂志的文学中心人物）的支持下担任主编。拉斯基对知名西方作家的时效性和质量有敏锐

触觉（这些人包括内特兰德·卢塞尔、阿诺德·J.汤因比、詹姆斯·伯恩翰、奥尔德·赫胥黎、本内德托·克洛斯、威廉、勒普克[37]、保罗·田立克、约瑟夫·熊彼特、T.S.艾略特[38]、托马斯·曼、乔治·奥威尔、恩斯特·罗伯特·瑟提乌斯[39]、W.H.奥登[40]），发起了一些研讨，既崇尚传承西方精神，又对西方精神提出质疑。他们也发掘年轻的德国作家，并把他们引入国际舞台。在杂志第一期的开卷语上写着，战争和血腥暴力的阴影从未像现在这样笼罩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每个公民头上。因此，仅仅理解为什么是不够的——当然，理解是必要的前提。因为，只有当人们根据所获的知识行动时，才配得上德国伟大哲学家的箴言：“人的最高任务是知晓怎样成为一个人。”（康德）

影院的繁荣和电影的斋戒



战后在柏林的第一场电影公映，**1945**年

纳粹电影工业——尤其是自1942年起在宇宙电影集团内成立、帝国直属的公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天还在生产电影。不过，大多数电影院都已经被毁了。到1945年年底，在西方占领区已经有1150间电影院（在1944年的6484间电影院中）重新开业。到1946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2125间），1947年年底上升到2850间，1948年年底到2950间，1949年年底上升到3360间。

在东西两德，电影院都是除了无线广播外，少数消遣和获得信息的方式之一。它成为城市或乡村中文化社会生活的中心：那里，人们再次坐在“黑暗的空间里，面对着魔法般的白墙，在这面墙上，摄影视觉的实现施展着魔法”。赫尔曼·卡多在1946年8月的《法兰克福期刊》对“电影院做了一番从内到外的”观察后说，尤其是在小电影剧院和影院屋占多数的乡村，观众尽管重新用老的娱乐方式消遣，但已不再有像在旧世界被毁坏前的那种无条件的热忱了。“观众的判断和意见都明显变得更加批判。”

> 战后几年，电影周报是盟军电影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由英国和美国生产的《电影里的世界》在1945年5月18日已经被引入德国的电影院。占领国的影片展示的重点是树立和强调自己作为保障、公正及民主政治重建工作的帮助者的形象。首先，对纳粹时代的罪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但从1946年夏天开始，德国民众就对指控深表厌烦。在《一周观察》里，故事只占三分之一。此外，在开始的几年，几乎没有任何来自苏联或法国占领区的报道。

德国自己出产电影遇到的情况则是，柏林-巴贝斯堡一带少数未被摧毁的制造设备现在属于DEFA [41] 管辖。1946年10月15日，DEFA协同苏联军政府共同推出了战后第一部德国叙事电影：沃尔夫冈·施陶特的《凶手就在身边》。“这个主题对德国电影股份公司的电影发展有纲领般的意义。它使德国过去的积极探讨成为德国电影股份公司电影的重要内容。”（三部库茨·马尔茨格的电影可作为范例：《阴影中的婚姻》，

1947年；《彩色方格》，1949年；《神的建议》，1950年。）除了政治主题，历史、文学和传记题材的影片也很受观众的喜爱。

西方占领区的第一部电影《说出真相》（英国许可证）是一部无关痛痒的喜剧片。1947年7月，以赫尔穆特·克洛特纳作为艺术总监的汉堡电影公司发行了克洛特纳执导的电影《那一天》。电影分七段，一辆战后立刻被两个机械工拆散的老车讲述了它跌宕的历史。它讲述了那些在纳粹主义时代被政治和种族迫害的人和他们的反抗、被杀害，以及那些在战争中死去或者从东欧逃出的人。

第一部通过美国许可的电影是1947年12月在西柏林首映、汉斯·阿尔贝斯主演的《我们上面的天空》。在这部电影里，一个男人从战争中归来。他面临着新的柏林生活，挣扎在饥饿、贫困以及谎言之间，成了盗贼。他的儿子也从战争中归来并且失明了。他再度恢复了视力，看到他的父亲在街上所行的不义之举。“他奋起反抗，离开了父亲的家，勤奋工作，最后把生活在贫困中的亲生父亲引回正途。”

人们在第三帝国覆灭后的那段电影停播的时间上寄予了某些希望。1945年，导演哈拉德·布劳恩说，从深层意义上来说，这段时间甚至是必要的。正如古老的饮食营养经验教给我们的，在一段高度集中、高度紧张的生活后，没有比斋戒更适合重振身心的办法了，哪怕实行斋戒会很难受。他说，过去十三年的德国电影走了一条弯路，它们为获得独裁机构的注意和“关照”而欢欣鼓舞，电影的鼓动宣传效果成了绝对的、高于一切的关注点。未来的电影创作应该遵从于思想：应该建立自由的艺术创作秩序。如果一定要总结这些已经有些陌生但必须完成的任务的话，那应该是“我们创作的电影为的是帮助人在艰难的生活中获得一些满足”。

“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在今天，没有人可以做得好像过去几年的罪孽、混乱、死亡和恐惧完全没有存在过那样，无论是在生活，还是戏

剧或电影中。我们要制作的显然不只是‘时代电影’，还是——不管那是轻松、无时间限制还是古怪风格——那些从我们命运的黑暗泉水中汲取了营养、转而来帮助我们战胜命运的电影。”（哈拉德·布劳恩）

“电影斋戒期”后几年的电影质量参差不齐，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例外除了上面提到的电影，还有《阴影中的婚姻》和《昨天和明天之间》——并没有特别出色的。因此，人们总是既惊叹又羡慕意大利的电影，他们用新现实主义把电影史带入了一个新阶段。罗贝托·罗塞里尼的主要作品《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4/1945年）以及后来的《派萨》（1947年）、《德国零年》（1947年）以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了法西斯的垮台。而维多里奥·狄西嘉从一开始就以戏剧艺术的形式去展现电影（《擦鞋童》，1946年；《自行车失窃记》，1948年）。当埃利希·开斯特纳1947年11月在苏黎世观看了影片《擦鞋童》后，他被深深地震撼到：“狄西嘉导演的电影《擦鞋童》讲述的是从黑市沦落到少年监狱，在那里身体和心灵都深深堕落的孩子们的命运。自《战舰波将金号》[42]以来，这是最令人感动的社会电影。”

货币改革之后，人们不再愿意尝试这种“小众口味”。导演和制片人预期的大众口味是那种对芳香的田园风格的向往，他们也接受这一点。尽管还有废墟时代可以做题材，但关于废墟时代的电影没人愿意看。UFA电影公司的风格经久不衰。德国战后的第一部乡土影片重新洋溢着轻歌剧的风格，名字是《黑森林少女》（1950年）。

艺术离开墓穴

1937年夏天的慕尼黑，纳粹对自由和多元化艺术生活的镇压在“堕落的艺术”这场展览中达到了高潮（每天大约有2万名参观者，基本对展览持肯定态度）。

1938年5月，纳粹公布了一条收集“堕落的艺术”作品的法律。这条

法律也预示着现代艺术的私人收藏要面临无偿征收。为了筹集外汇，大量的艺术品被卖往国外。1939年，4000件艺术品在柏林被烧毁。许多艺术家纷纷逃亡，或被禁止工作，或尝试偷偷地以内心流亡的方法活下去。

“墓穴里的艺术”——布鲁诺·维尔纳用这个比喻形容那些追求新思想内容、新表现力和新形式的艺术在第三帝国时的处境。1937年以后，没有一个艺术家（多数在55～70岁）被允许在德国开办展览。像卡尔·霍费尔、恩斯特·哈尔拉赫、埃米尔·诺尔德、卡尔·斯密特-娄特鲁夫、马克斯·佩希施泰因、埃里希·赫克尔、奥托·戴克这一类艺术家留在乡村，在那里秘密地工作。其他的艺术家，如马克斯·贝克曼、马克斯·恩斯特、奥斯卡·科柯斯卡、约瑟夫·沙尔，离开了德国，但是常常面临生计问题。年轻艺术家跟他们“堕落且掉格的”老师一样，偷偷地工作并且通常更加孤独无助。有一些人则逃亡国外。就这样，他们中许多人被遗忘。当然，也有艺术家在第三帝国里为了生存做出让步。尤其是那些人体画家，比如1947年离世的格奥尔格·科尔贝，在纳粹分子那里很受欢迎。而如埃米尔·诺尔德一类的风景画家——西格弗里德·伦茨在他的小说《德语课》中描述了他们的命运——则清楚地表现了许多艺术家（在所有方面的）矛盾行为。早在1933年之前，诺尔德就写了一部回忆录，在里面为德国民族艺术，也就是后来被称作“血与土[43]艺术”做宣传，反对塞尚以及法国艺术。1928年，他加入了纳粹党。

艺术自纳粹主义中解放出来后，从墓穴里爆发。这是一段非常辛苦的路。艺术家到全国各地旅游，带着水彩画、油画和背包里的小雕塑品。他们参观博物馆，哪怕人家只字未提购买，依然希望别人对他们的作品有兴趣。私人画廊里也人头涌动，当然，那里的环境也常常是离奇荒诞的（比如，法兰克福艺术小陈列室坐落于罗斯场旁，为汉娜·贝克所有。人们必须走过一段从房屋外面搭建起来的临时木头阶梯才能从房子的第一层“上楼”到第二层）。

> 1945年8月，格尔德·罗森、海因茨·德洛克斯和马克斯·莱昂·弗莱明在选帝侯大街一间被摧毁的纺织品-军事用品连锁店的屋子里，开了德国战后第一家私人现代艺术画廊。（一位画廊的参观者原来是名长途汽车司机，愿以17幅画交换两只汽车轮胎。这17幅藏在他家储物间的画竟是佩希斯坦、基尔希纳这些桥社[44]艺术家的作品。）香烟是支付入场费的“货币”。有了香烟以及对再教育颇感兴趣的盟国的首肯，画廊居然举办了一些重要展览、讲座和讨论会。开幕式上展出了年轻的艺术，也就是柏林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补充了从阿奇彭柯[45]到施密特-罗特鲁夫[46]的经典现代派作品。
>
> 在慕尼黑，君特·法兰克画廊在1946年的春天再次运转并搬进一间别墅的大工作室。由克萨维尔·福尔作品展开始了展览活动，随后是五场贝克曼工作期的作品展，一场大型的朗兹·马克纪念展以及奥斯卡·斯莱默的作品展。战争结束后不久，法兰克收到了1902年出生的画家恩斯特·威廉·奈的来信：“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当然人们可以料到，为了艺术能做点什么……希望现在艺术能再次获得自由——在这可怕的三十年过去后。”

战后第一场大型德国艺术展在柏林举行。1945年初夏，展览在柏林光明区洋甘菊街4号开展。在纳粹当政时期被判处艺术孤立的柏林雕塑家汉斯·乌尔曼负责了收集工作。他骑着脚踏车转遍整个柏林，寻访那些和他一样在纳粹时期被禁止工作和展出的老同事。

在废墟时期的众多展览中，有两场展览对战后的艺术理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48年，克斯特纳协会在汉诺威以诺尔德的作品开展。1947年2月，“极度艺术”在奥格斯堡的谢茨勒宫展出。在此展出的全都是那些在第三帝国时期不能展出的作者的作品。其中，约瑟夫·萨尔、君特·斯特鲁普、乔治·罗德、理查德·奥特、恩斯特·哥特林格、维尔纳·吉尔斯、马克斯·阿克曼、维利·鲍迈斯特、康拉德·维斯特法尔、弗里茨·维特、卡尔·昆茨、鲁普雷希特·盖格等画家尤具代表性。

奥格斯堡的展览介绍了14位画家，其中主要是抽象派画家。这其中不乏对第三帝国风格问题的挑衅。1949年，战争结束四年、货币改革一年后，科隆市艺术协会和科隆市共同举办了一场展览。创意这场展览的

是当时的科隆艺术协会会长托尼·费尔德基尔钦。这场展览提供了全面了解德国当代艺术的视角，131位艺术家的496件作品被展出，包括诺尔德、赫克尔、霍费尔、戴克、贝克曼、奈、潘科克、佩希斯泰因、施密特-罗特鲁夫、鲍迈斯特、麦思特曼、特里尔、温特尔等。



第一次艺术展览展示的是在第三帝国禁止的“堕落的艺术”的图片

许多曾经在内心流亡或海外流亡中翘首期盼第三帝国终结的艺术家常常会问，人们可以期待现在出现一场巨大的心灵净化吗？随大流者、

机会主义者、遗老遗少、“随机应变”者会不会再次占上风呢？

1946年，恩斯特·维歇特在他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讲话中发表了看法：尽管美国表示要尽最大努力去清扫德国“房子”，但他们在拘捕第三帝国的艺术代表约瑟夫·图拉克或者阿诺尔德·布雷克仅仅几个星期后，为制作美国将军半身像而再次将这些第三帝国艺术代表释放的行为实在令人愤怒。这种操纵难道不可笑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给希特勒的帝国总理府装修的“文化暴徒”赫尔曼·卡斯帕，改名卡尔·卡斯帕，居然也“改头换面”又出来招摇过市了，这可是盟国的功劳。

1949年，特奥多尔·豪斯发起了一个艺术应急组织，被邀请的艺术家首先只包含在希特勒德国时代知名的画家和雕塑家。格奥尔格·迈斯特曼在第三帝国时期曾被禁展，凭借一份名单，把那些在第三帝国时期被排斥、被称为“堕落”的艺术家，把那些被警察暴力驱赶、被抢走画笔和画布、无法从事创作的艺术家，把上千件作品从20世纪30年代的博物馆里被扔出来、被焚烧或者卖到国外的艺术家重新拉回人们的视线。不过，这些关于文化艺术的介绍和展览也有很糟糕的后果，因为它们常常从保守的立场出发，如此一来，它们的美学影响也常常是僵化甚至反动的。

很多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在第三帝国时被强制变得千篇一律，或者自己就很有“先见之明”地顺从了当局的意志，这些“肯定的文化”的神庙如今也“轻松过关”，仿佛野蛮的审美从没有玷污它们的“神圣殿堂”一样。纽伦堡的德国国家博物馆被它新成立的管理处首任主席特奥多尔·豪斯称为“德国灵魂的避难堡垒”。

尤其在大学，现代艺术的保守阻力正在成型。它们担心自主会带来艺术混乱地“释放”。汉斯·赛德迈尔——1936～1945年在维也纳大学，1951年开始在慕尼黑大学任艺术史学家——1948年出版了他的书《失去中心——作为时间符号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视觉艺术》。（帕斯卡的话被当作格言：“离开中心意味着离开了人性。”）反现代性在

书里找到理由："绘画在现代是最便捷的艺术。"赛德迈尔认为，如果不能相信，人——潜在地——相似于上帝并扎根于某个——哪怕是错乱的——世界秩序的话，人性也就变得不可靠。

赛德迈尔的书成了畅销书，也引来了尖锐的批评。在1949年第二届德国艺术史日上，维尔纳·哈夫特曼发表了精彩论述。他指出，所有新艺术的所谓损失都是自由价值的最好证明。在达姆城的"我们时代的人物形象"（1950年）对话中，威利·鲍迈斯特批评了赛德迈尔，他指证赛德迈尔有纳粹的过去，在书里运用了一些颇可奏效的概念偷换的诡计，即用道德的"好"与"坏"标准来替代艺术史或审美中的"好"与"坏"标准。"赛德迈尔几乎全无民主思想。他的理论单调得就像罗森贝格的种族理论……他看不到人性和堕落的分别。他看到的只有人性中的堕落。他断言，现代艺术既没有伦理价值，也没有宗教属性。我强烈反对他的断言。"

风格问题

哪些才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表达式，是超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抽象主义？还是绝对艺术？废墟时代充满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权威的艺术历史学者弗朗茨·罗（成为权威，主要是因为他主张建立强有力的艺术家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解决造型艺术家的材料问题和保障所有艺术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地位）在1946年年初的演讲中为风格的和平共存做了一番辩护："亲爱的同事们，画栅栏还是画满是害羞的紫罗兰的草地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只要它们都是艺术品。"

但是，这不能满足那个兴奋时代的精神。从表现主义的历史表现来看，表现主义也是有局限性的。发展已经继续。比如，汉斯·艾伯哈特·弗里德里希从1946年11月开始出版杂志《棱镜》，艺术批评家弗里德里希·艾达玛·冯·肖尔特马在杂志的第二期中表示，表现主义发展到毕加索和康定斯基式的极端形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是既成事实，今天，经过所有那些骚乱、战争之后，它很难依然被定义为现代。除此之外，他还警告，在他看来，表现主义和纳粹艺术出自同样的精神温床，不应该被重新接受。卡尔·舍夫勒也一样，在他的书《美好时光和贫困岁月》（1946年）中指出了表现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相关性并拒绝表现主

义。吕德克也批评了表现主义，说它是“不和谐、不协调、令人不适、负面否定的艺术”。他认为，这种“貌似革命却让人感官烦躁的艺术”作为小资产阶级风格是失败的，应该尽量避免。

在废墟时代，除了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也备受关注：超现实主义展现了一种精神运动，“不是物质的运动，不排除大多数的超现实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里强调国际主义的需要，有一种明显的反民族国家的心态”。对此，画家亨氏·特略克斯1947年在由巴登-巴登的沃尔德玛-克莱因出版社的杂志《艺术作品》——那个时期最重要的现代艺术论坛——进行了说明。



这个展览的标题反映了对现代艺术的不确定

战争留下了系列景观，它们既是真实的，也是精神的：被炸成瓦砾

堆的城市，希望和绝望同行，建筑成果和荒芜，处处能见的人心惶惶的田园——一切就像一本巨大的“超现实主义的模范画册”，巴尔巴拉·克里如此写道。绘画只不过是把这一切再画出来而已：超现实主义艺术并不想弥补缺失的温饱。笼罩在居民区上空的既不是1950年代的安全，也不是1960年代的无聊，人们在那里不是居住，仅仅是头顶有片瓦。那个年代只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人们发现，过去所谓的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反差或者平静的生活-不平静的艺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汉斯·乌尔曼用铁做成的笨拙的危险标示、卡尔·哈通所做的仿佛挖掘出来的巨大的原始卵石、亚历山大·卡马罗的薄薄金属丝线、特略克斯的微微发光的荒凉凹陷地、马克斯·齐默曼和其他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重现了这个丑恶的、仿佛非现实的现实，小丑般的失败，每个人都可以在下一个街口或下一个日历中发现它们。当时，维尔纳·黑尔德来回游走在东柏林的潘科区和西柏林之间，在那些反射在黑暗通道的废墟的丘陵里，发现了‘海边的柏林’，那曾经是幻象，现在则是眼前事实”。

> 维尔纳·黑尔德在第三帝国时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他生活在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恐惧中。1946年后，他给他的一些画命名为“海边的柏林”。这位艺术家有一种悲观的宿命论，就像马克斯·贝克曼[47]害怕集体主义和“零们的起义”（Aufstand der Nullen）的威胁一样，“自然”对他是某种安慰。
>
> 超现实主义的“沉船氛围”贯穿了卡尔·霍费尔的画作。卡尔·霍费尔，1878年出生，1920年开始在柏林绘画艺术大学任职，1933年被纳粹分子开除。这位艺术家用一些强力的隐喻来形容纳粹的灾害：虫蛹、面具、饥饿、瞎子、疯子、死亡的舞者、瓦砾场、毁灭的夜晚——这些都代表了“被损害的人”[48]。《囚犯》（1933年）预示着集中营，《钟塔吹奏者》（1935年）预示着炸弹警报，《看守人》（1936年）预示着漫漫长夜。1937年，霍费尔画了一幅《废墟中的男人》，预示了这个城市的毁灭。1938～1943年，他有超过600件作品丢失：有一半是在法西斯的打破旧习运动中，其他的则是一次炸弹袭击中其工作室被炸毁。霍费尔战后的画作为当时再思考和变迁的亢奋状态吹入了一股深沉厌世及巨大质疑的沉重的风。如《死亡之舞》《重建中》《微粒小夜曲》《瞎子》等画作都清楚表现了人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愚蠢、无用、不可救药。在画作《瞎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人的

手紧紧相握，毫无方向地在一片满是朽木的森林里笨拙地行走着。“我们认识到：最糟糕、最罪恶的人类行为就是政治。”卡尔·霍费尔在他给赫尔曼·黑塞的信中这样写道。

同其他现代艺术流派一样，抽象艺术在第三帝国时期也遭到唾弃和鄙夷，但它在废墟时期却找到了新的共鸣。因为抽象艺术用自己对本原和本质的信念，超越了当下悲凉的现实。1946年，威廉·乌德指出：“超现实主义用的是一种独创而非常规的方式，把人们的感觉和实际事物结合起来。所以，当人们面对一件超现实主义、用所有感觉和所有具象整理而成的抽象艺术品时，并不会感到多么反常。”

抽象艺术的第一波浪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掀起，这是对威廉二世时期文化的“绒毛世界”[49]的回应。而1945年后的抽象艺术则成为逃离具体的、就在眼前的废墟景观的一种方式。如果人们把艺术理解成——就像抽象绘画的代表人物威利·鲍迈斯特所理解的那样——对某个尚未探索的领域的某种“冒犯”的话，那么，抽象的不仅比具体的更有精神性，更重要的是，它比具体的更“真实”。鲍迈斯特（1889年生）早在战争期间就已经撰写了《艺术中的未知》——那时他在伍珀塔尔技术学院找到了一块容身之处——但该书直到1947年才出版。书中写道，现实只是推动了绘画，具体事物是一扇通向未知的形式世界的窗。绝对的艺术是独创的、线条分明的，它撕破一切传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简单、“自然”、典范。“它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一幅孤立的‘美丽的图画’，而是一组作品的希望。对它来说，重要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个案，而是发现那孕育无限潜能的土地。更确切地说是创作的方法。”

新的抽象艺术的中心在慕尼黑兴起，特别是威利·鲍迈斯特、鲁普雷希特·盖格、弗里茨·温特1949年成立的禅小组（ZEN-Gruppe）。在法兰克福，恩斯特·威海姆也展开了他战后的事业。小组的荣誉会员是德籍美国人海拉·冯·瑞白。1920年代，她游学于杜塞尔多夫、慕尼黑和巴黎，学业完成后，与康定斯基、夏加尔、莱热和德劳相识并于1929年在

柏林建立了一间抽象艺术博物馆并出版了一本名为《才智》的杂志。因为喜爱所罗门·古根海姆的抽象艺术，她推动和领导了古根海姆收藏室的建成。战后，她来到慕尼黑，在为慕尼黑的贫困匮乏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对抽象画的中兴感到兴奋不已。她不仅为慕尼黑画家的生活与工作奔走、分发食品小包裹，而且在1948年从古根海姆收藏室中选出50幅作品，在巴黎、苏黎世、斯图加特、慕尼黑、汉堡、杜塞尔多夫、布伦瑞克、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进行巡展。

战前，弗里茨·温特已经开始创作主要是自然主题的绘画。战后，他从战俘营归来，成了慕尼黑艺术先锋的领头人。他在1930年代的画作有《森林之土》和《植物性》。“对温特来说，抽象的形状是心理状态的表达方式。1949年，这些形状变得比较和缓、紧实，并且是明显的单个个体，和其他个体形状泾渭分明。而不是像在他早年的画作里那样，个体形状和个体形状之间有强烈的呼应。”

恩斯特·威廉·奈和他的抽象色彩艺术成为昂扬的重建时期的抽象艺术代表。早在1943年，恩斯特·荣格就已经在他的艺术中发现了“原始和意识的印记”。恩斯特·奈像创作赞美诗一样创作绘画，而马克斯·贝克曼的作品则有点像“哀歌”的创作，因为后者看着过去。恩斯特·奈的绘画是一种“魔法般的”创作，那是赋予精神世界某种感官画面。人们眼前的废墟世界被“架空”，而这并非通过某种“水至清则无鱼”式的“审美逃离”。这是从“黑白世界”到“彩色地带”、从北方的乌云密布到南国的万里晴空、从悲苦的废墟生活到明朗的风景的转换，这种转换，在废墟时代是人们生存下去的必需品。

某种“平铺直叙”的结构是这种“逃离”艺术的特征，在这种结构中，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表达主义和抽象主义的形态彼此重叠。上帝赐予的“自由的自然”也成了拯救的某种比喻。关于“废墟的美丽”，艾伯哈特·汉普尔在1948年的《艺术杂志》里说：“不仅是我们德国人，许多其

他欧洲民族也必须习惯在这废墟间的生活。这种不可弥补的失败带来的压抑感会控制人们的情绪。但是，如果我们有开放的艺术的眼睛，很快就会发现，重建产生了更大的统一，这种统一常常能够赋予建筑某种美，早先的建筑有很多不必要的单元，刷上各种可有可无的墙灰，它们不具备这种美。这种美是有影响的，如果消除藩篱，回归上帝赐予的'自由的自然'，它的影响力还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深。"

抽象艺术尤其对"生生不息"、有着"魔法般未来"的大自然着迷。废墟时代的悲哀在新的、富饶的形态和色彩前慢慢下沉，所以说，这些形态和色彩也是有实际用处的。过去带来的伤感被某种未来主义消解了，这种未来主义在后来设计经济奇迹时期时变成了一股透亮而明朗的清风。如果说废墟时代的抽象艺术意味着某种转折——从悲苦转向有着新本质的进步主义（同样也包括认识的转折：抽象比具体更有精神性），那么，抽象艺术的辩证也酝酿了：1950年代，精神的-抽象的重新变回形式的-具体的，被作为"形态构建"具象化了。由此，这个很想从"现实"的牢笼中解放自己的艺术流派，最后反倒代表了它想传递的信息的反面——代表了一种物质主义，而这种物质主义蕴含的恰好是一种没有形式的幻象。

绘画之争开始

在苏联占领区内，尤其是柏林和德累斯顿的艺术生活被权力和风格间的冲突所主导。"苏联占领区内，比较自由的文化政策和效率较高、非官僚化的组织政策在起作用"——卡琳·托马斯说——"在战后早期有一系列有名的艺术家，他们可不只是在苏联占领的城市的前德国共产党成员或者追随者。因为在这里，人们有理由希望，在苏联文化官员的帮助下，长时间冻结的旧德国会很快变成自由的社会主义新德国。在柏林和德累斯顿仍有早年'德国革命教育艺术家协会'的社会现实主义传统。在凯特·柯勒惠和《十一月团，1912～1922》的工作下，一些艺术家，其中有卡尔·霍费尔和康拉德·费里克斯缪勒，为苏占区内最初强调的反法西斯论战的文化政策做出了贡献。"

1946年8月25日至10月29日在德累斯顿展出的"德国艺术展"被艺术家们看作反法西斯-民主文化政策的见证和开端。那些从逃亡和内心流

> 亡中返回的艺术家对这个新的开端满怀巨大热情。当时德累斯顿市政府文化部部长以及工艺大学的校长威尔·格罗尔曼（在1947年年底移民西柏林之前）“和画家汉斯·格隆德希一起考察了美国和法国占领区，目的是把一些艺术家的画作，比如马克斯·阿克尔曼以及维利·鲍梅斯特的作品直接从工作室取来。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和奥斯卡·科克斯卡这些被纳粹诋毁的德国现代艺术家以自己画作和雕塑品重新赢得了声誉”。可是，1947～1948年的换年之际，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超越阶级、超越政党的文化政策就已走到了结局。

宣传自由和开放仅仅是出于策略原因，实际还是由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945～1949年任魏玛国家建筑艺术大学校长的赫尔曼·亨瑟尔曼，也就是后来的民主德国的首席建筑师，在《建设》杂志中说，艺术展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揭露文化政策的目标。无意就是没有目的。此刻，新的民主德国奠定了基础并宣明了它的目标，包括视觉艺术上的目标。他说，未来的艺术展必须要有现实性，因为它是民族的良心和民族期待的声明。

社会主义艺术要“声明”的主要是表达乐观和进步的意识。来自德累斯顿的威廉·鲁道夫的钢笔画和木刻作品描绘了1945年2月13～14日的炸弹袭击带来的人间地狱之景，而威廉·拉赫斯尼同一主题的画作《德累斯顿之死》则一反德国统一社会党禁止悲哀的教条——它后来变成东德国家喜爱并强制接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1954年，拉赫斯尼从德累斯顿艺术教授的岗位中被解雇）。其他的艺术家则被“国家委托的艺术”收买和渐渐腐化。

早在1949年，已经有一些艺术家不愿屈从德国统一社会党一板一眼的“规矩”，不愿在小市民气十足的憋闷空气里生活。他们已经在考虑迁居——A.R.彭柯在画作《东搬到西》中象征式地画下了这个主题。

在西德，对西式现代性的认同阻挡了对风格多元的认同，遑论保护和推动多元。跟西德一样，东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给那里的艺术划出了一块“自留地”——莱比锡尤其被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在面对西德

的“形式主义艺术”时，它也阻碍了人们理解现实主义的多元形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是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的含义非常广泛，以至于没有词可以形容它，又或者得用许多形容词来概括它：浪漫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表现现实主义、写实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视觉现实主义、概念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等。

在西德盛行的机会主义和商业意识使现实主义的传统（以卡尔·罗辛、弗朗茨·拉兹韦尔、格雷特·荣格斯为代表）备受排挤。而在东德上演的则是构成主义者遭到驱逐的一幕，像赫尔曼·格罗克纳或是倾向于抽象象征派的奥斯卡·内林格尔，都因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化教条而再一次“内心流亡”。“东西德的流行趋势仿佛有某种一致性，虽然是在两地，但那并不出于根本不同的原因。人们不得不说，单个艺术家所承受的在两地是相似的。这一切让人不得不继续对官方艺术持保留态度，长时间以来的‘局外人’角色也不得不继续存在。”

> 随着东西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绘画之争也越来越严重。首先，在所有占领区，人们都希望艺术家能得到某种类似于工会的组织。创造新的社会秩序、政治事业心、创立新历史观和去除纳粹思想被视为首要目标。满地疮痍的废墟景观以及被这个景观具象化了的德国文化和道德的毁灭敦促着人们在政治或社会上有所作为。比如，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一些艺术家——如用版画批判社会的奥托·潘柯和卡尔·施威斯格——理解的“艺术是人类对神灵的呼唤，将存在视为神灵的一份礼物，希望通过人性，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礼物”。
>
> 1945年冬天，不来梅的艺术展超越了老沃普斯韦德[50]的风格（“回到自然”）。《威悉信使报》（*Weser-Kurier*）面对“流畅的静物画和风景”对艺术家问道：“难道，德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还可以做得好像我们最好的人的鲜血白白流淌、我们美丽的城市仍然屹立那样么？难道废墟是我们眼花了？难道在我们家乡的土地上，大多数人民并不是东奔西走么？艺术难道不是他们最大的安慰么？”

城市规划

战争末期德国城市的毁坏程度令人担忧，“重建”简直是一项不可能

实现的乌托邦空想。这将是几代人，或者至少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作业。沃尔特·格罗皮乌斯认为德国的重建要一百年才能完成。

首先是物质破产和人才缺乏。这让人感觉，所有计划最终都将在虚无中搁浅。首先要克服这种感觉，同时要增强人们的希望，让人们相信新开始就在“此时此刻”。当然，一切必须暂时限定在“最重要”的范围内。



德累斯顿一瞥，**1945**年

1883年出生，1920年代在教堂建筑界闻名的建筑师奥托·巴特宁目睹了战争的毁坏（他当时正看着一个被炸毁城市的法院，说它看上去仿佛一个“石头的骷髅”），这让他深刻怀疑，重建究竟还有没有可能。

“重建？技术和资金上都做不到，我就这么告诉您。我说什么？——精神上都不可能！但是，如果对现有的断壁残垣加以利用，从废墟里拣出还能用的那么一些材料，是可以搭建简易房间的。简单、明亮的房间，住在里面，每个人的权利都公平透明，没有暗箱操作。”（奥托·巴特宁）

这种“瓦砾堆边的异端思想”为某些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共有：他们对清算纳粹邪恶根源的态度几近极端。汉斯·施维佩特认为“如果我们在整理每一片废墟、铺平每一条道路、建起每一间急救屋”的同时，没有去除心灵的污渍、没有铺平精神和灵魂的大道、没有搭建道德和理智的房屋的话，就什么也做不成。如果说有一种精神能够让城市景观焕然一新——关于这一点，许多结束了内心流亡的建筑学家都有话说：奥托·巴特宁、汉斯·沙隆、鲁道夫·施瓦茨、马克斯·陶特、海因里希·特塞诺——那它必须首先让伦理道德也焕然一新。曾在第三帝国时期备受镇压的德国工厂联合会也抱有同样的希望，积极准备重建。战后，德国工厂联合会希望勃发，不过人们还是可以看出，会内的意见并不一致。

简约的建筑风格一方面有其伦理原因：告别巨大的、绝对的、故意使人印象深刻的纳粹建筑——人们认为，这有悖“民主的真诚”。另一方面，战后的规划也有其实用考虑：第三帝国时期，由纳粹首席建筑师、城市规划师阿尔贝特·斯皮尔（1943年起任军备及军备生产部长）精挑细选的工作小组在战后也投身重建工作，该小组的态度也由之前的“纳粹式”庞大调整到简单，因为只有简单才能做。战后，一系列由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组成的“被毁城市的重建规划工作小组”担任了重要职务。

建筑师们和城市规划师们对城市兴建的想法都各不相同，甚至矛

盾。哪些计划应该被执行大部分取决于当地社区的重建计划。在这个过程中，至少社区民主很快就发挥了作用。

> 1947年，德国工厂联合会号召一份请愿签名。奥托·巴特宁、威利·鲍迈斯特、格哈德·马库斯、埃瓦尔德·马塔勒、弗里茨·舒马赫、古斯塔夫·哈森普鲁格、奥托·豪普特、汉斯·雷斯蒂克、汉斯·维斯佩特等人响应了号召。请愿书中写道："纳粹的垮台把我们之前的生活和工作世界彻底破坏了。那时，我们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这让我们相信可以重新工作。两年后的今天我们意识到，就连我们的精神也被毁坏了，精神的表达更是一落千丈，我们陷于绝望不能自拔。所有民族都面临这样的任务，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它关乎存在与否。而我们，创造的我们，良心上时刻不忘的就是建筑一个生活和工作的可见的新世界。"

"彻底重建"的想法基于一种看法，即盟军实行严苛的拆减政策[51]。盟国认为，德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因而不会对它有什么特别同情。另外，还有以百万计的难民要被安顿。最后，还有某种长期以来反城市化、仇恨文明的传统，现在反倒被视为进步了。"主张集体住宅区的人想实现人民这幅特殊的蓝图。这个想法显示了新的精神方向。集体住宅区，这一由于经济和教育因素所产生的自救方式，依据民主精神和规则得以落实。"

远离大城市废墟、走向绿色的"花园城市运动"的热情不断升温。时尚的人，就算他希望变成沐浴在完美的科技和文明之光下的"新新人类"，在目前的德国也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于是人们背离了这样的想法，重新珍视简单朴实的生活。因此，就算是城市里的人，也想把困苦变为一种美德。

> 在马格德堡和德绍，建筑师休贝托·霍夫曼根据苏联拆减政策的期望，计划了一项"收缩计划"。根据该计划，在原有的工业用地上建立绿色区域，后者可作为休憩区。在基尔，人们开始通过种植绿化来掩盖战争、轰炸和拆减政策留下的疤痕。政治人物和规划者们满口承诺自然的调和作用："你们看到的这片空地将会被种上草木，瓦砾废墟隐含的恐惧与绝望就此终止。事实上，在多年的灰色世界后，绿化和育林区将是城市里的第一股愉悦的清风。绿化将医治人们因为恐惧而患

上的‘瘫痪症’。”“城市希望通过种植树木给人们工作和责任感。城市里盛行的重建精神的核心是，到处都会出现小而透明的生活共同体。这些生活共同体充满活力、心手相连，为城市某个切实可见的区域承担一份责任。”

另有一批人崇尚清楚的、功能性强的建筑方式——这不唯是困苦的压力，因为困苦逼得人们不得不采取最有效的缓解困苦的建筑方式。它也是美国方面以及德国的流亡学者（尤其是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重点传递给德国人的一个信息。他们说，在西欧和美国，人们认识了现代建筑技术，这种技术特别适合用于重建。马丁·瓦格纳，这位移民美国的前任柏林土木工程监督官在《建设》1946年第9期里写道，在那些曾经采用结实的横梁、厚英寸地板和厚重的屋顶复合木板的地方，以后就得使用纤薄的框架结构和节省木材的胶合板；在那些曾经采用厚重的砖、石灰、砂浆的地方，以后就得使用玻璃棉、矿渣棉、折痕箔这一类轻便的隔离材料，必须从垄断厂家和专利持有者手中解放这些材料，让它们以最低价格在市场中销售。

功能性的考量渗入政治和社会领域，现代建筑被视为一种民主社会意识的表达。建筑师阿尔方斯·赖特尔在杂志《法兰克福期刊》里评价道，大多数的城市设计受到现代主义者的支持，他们的考虑表现出一种妥协的、做事做一半的态度，这不免让人担忧。没有人听说过哪一座城市——汉诺威是例外——胆敢尝试全新的设想，都只是保存、修复，最好是小心地修改。可是归根结底这些都无关街道、城市景观、紧急通道、广场设计，而是生活和经济状态的改变是否带来精神状态的彻底改变。如果某个很有良心的城市规划师或某个经验丰富、聪明的城市建设艺术专家建议的不是重建旧的、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中心，而是在某个便利的地方造一座新城，他完全可能面对勃然大怒、扑头盖脸的浪潮。

在战后首位城市建设监督员汉斯·沙隆的带领下，对战后德国建筑史有重要意义的柏林空间构架图被制定出来，它激起了人们对城市建设的积极讨论。在构架图中，高速公路占据中心位置。在大刀阔斧的改造中，只有老城中心和博物馆岛[52]作为某种回忆被例外保留。沙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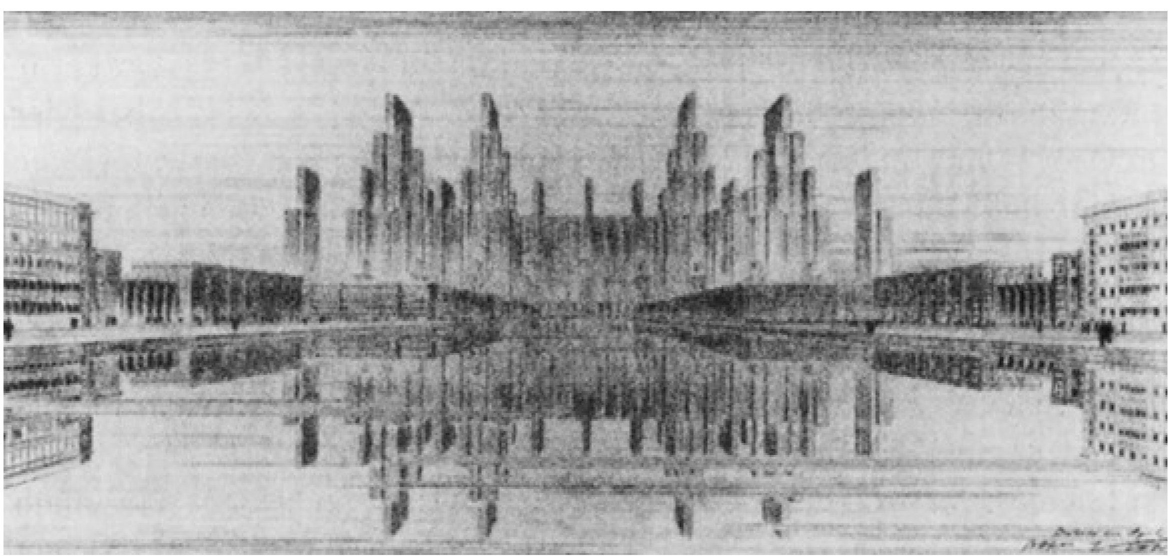
写道："炸弹袭击和战争结束后，机制的松散给了我们一种构建新的城市蓝图的可能。"这就意味着，街道应该被重新编排，设计新结构时应该主要考虑现代城市广泛的经济生活和生活空间的平衡。

由勒·柯布西耶提出的、权威的《雅典宪章》[53] 王者归来。战争毁坏了城市，却似乎给建筑学家实现他们的几何梦想提供了一个机会，尽管模型已不再是当初的几何模型。1947年，部分反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者制订了马歇尔计划，德国期待获得重建的援助。也就在这一年，美国军政府在德国举办了沃尔特·格罗皮乌斯[54] 的巡回演讲。在演讲中，格罗皮乌斯大力宣传包豪斯理念，并称赞沙隆是德国"最好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包豪斯这种来自德国却被德国放逐的、社会的、改革的建筑艺术成为自由的象征，和它最杰出的代表一起回到了惴惴不安的德国。现代建筑艺术，以其"诚实""透明"与"开放"展现和反映了一个年轻国家的精神。轻快、自由、国际主义的风格也有其标志，那就是致力于科技和文明进步，把社会乌托邦式的设想延伸到居住平等的理念上。他们反对乡土主义、民粹主义、历史主义和把一切都当纪念碑来建造的建筑风格，尤其因为这些是纳粹主义偏爱的建筑结构形式。格罗皮乌斯还主张线条明晰的内部划分，即大城市划分为邻里单元，这是为了让个人的重要性得到强调并发挥其作用。这场穿越德国的旅行让格罗皮乌斯感受到了笼罩德国的阴郁。精神和肉体被深刻摧毁的氛围使他几乎无法说出鼓励和积极的话语。

另一种流派则有别于功能主义。它强调保留及呵护历史的重要性，尤其致力于被毁的老城中心的重建。海因里希·特塞诺1947年为重建吕贝克老城写了四个方案，在方案鉴定书里，他坚决维护"卫生需求"，即正如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光线、阳光和花园，不应该什么也没有就被安置到旧房间里去住一样，历史老城中心也不应该完全冲着满足现代交通的需求被改变。特塞诺批评了那些仅仅关注汽车交通利益的解决方案，建议保存所有尚存的房屋、街道和结构，重建老城结构内若干被摧毁的建筑并修建一些新的绿化地带。

对每个城市的重建有决定意义的是它们坚持哪种风格。慕尼黑、纽伦堡、弗莱堡、美因茨、维尔茨堡采取的主要是一种小心修复和历史化的重建，做出符合历史结构的城市平面图。弗罗伊登斯塔特[55]的改造设计是这种风格的典型。柏林、汉诺威、法兰克福、科隆则贯彻“新建”的理念，为了汽车交通需求，从根本上改变了道路结构。在法兰克福，人们试图做某种妥协，一方面拒绝完全按照历史原貌来做整座城市的重建，另一方面也尝试去掉新现代主义的极端因素。

位于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的设计之争就像一面反射镜，反射出现代主义和传统设计思路的冲突。浪漫还是现实？歌德博物馆以及德国自由主教教堂议事会的主任恩斯特·博依特勒希望完全按照原貌恢复旧居，丢失的部件则通过摹造补充。卡尔·雅斯贝斯、恩斯特·罗贝托·库尔提乌斯、马克斯·普朗克也赞成这个计划，而赖诺尔德·施耐德、莱奥波德·齐格勒、卡尔·舍夫勒等人则对这样的重建持反对态度。“这样做难道不是说谎么？难道不是利用这个谎言扔掉我们那些不愉快的失败、痛苦和历史的灾难么？”施耐德这样问道。奥托·巴特宁则表示，在讨论中可以有“不仅-而且”，但是对建筑师或者建筑商来说就只有非此即彼。例如，在重建歌德故居时，应该每分每毫精确按照原有样子修建还是让某些东西“随风而逝”？他建议，在歌德故居的原有基础上建造结构简单的房屋，配合原有的比例和光线度并且采用已经修补好的或可以修补好的画作、家具和家庭用具。



大城市重建草图，**1945**年（奥托·考茨）

与西部地区一样，苏联管辖区内也在进行着关于城市规划是做新的现代建筑还是传统重建的辩论。与此同时，尽管盟国之间的紧张日益加剧，他们关于建筑问题共同进行的讨论则在柏林落下帷幕。特别有影响力的是库尔特·李卜克内西和赫尔曼·亨泽尔，前者师从汉斯·波伊泽[56]，从1931年起在苏联工作，后者是符合新社会建筑秩序需求的代表建筑师（斯大林大道就是他规划的）。依照苏联文化政策方针，一种独立于英美影响和西方设计理念的“自由”德国建筑文化自1949年以来渐渐发展。在这种建筑文化中，对19世纪初期德国古典主义传统的回归为的是赋予“德意志爱国者”的东德人民新的希望和自尊。

就此，关于什么是最佳城市发展理念的公开讨论结束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于1950年7月27日通过的《城市建设的十六项原则》指出了东德建筑文化重要的一点，即城市中心就是人们生活的政治中心，重要的政治、行政和文化场所都设立于此。在市中心的广场可以举行政治示威游行以及民间节日庆典活动。

斯大林大道主要采用的是赫尔曼·赫尔森曼的草案，它也成为东德的新社会主义建设模板：毫无生气、为斯大林式轻视个人权利和生活质量的极权极尽歌功颂德的超大型建筑。库尔特·李卜克内西认为，与之相反，西方的“概念艺术”对来自人民的民族文化艺术和民族传统抱有一以贯之的讥讽态度，并试图创造某种“世界艺术”，以此褫夺人民的民族意识，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计划前奴颜婢膝。

而社会主义的未来主义则要求已经被公认为“美丽城市”的城市进一步成为“进步城市”。人们并不期望松散或嵌入自由空间的城市，而是期待为人民的节日庆祝提供像样场所的广场和宽阔的大街。尽管联盟党都有不同的意见，但这些党的代表早已因为（尤其是）批评解决财产问题的执法方式被贴上“反动分子”的标签。建筑界的某位代表提出人应该适应城市结构，这种说法也被解读为误导。

从1952年夏天起，德累斯顿、罗斯托克、马格德堡和莱比锡的“城市建设”的决策及规划步骤都或多或少有了统一方案。区域性的不同和影响只体现在示范区和交通主干线的建筑语言上。对东德艺术表达起引导作用的意愿是：“通过运用继承了我们宝贵的建筑传统的现实主义表达方式，与标志着帝国主义没落的形式主义做斗争，以服务于人民的真正利益。”

> 以德累斯顿为例，德累斯顿的发展就是一条从“新的”到“美丽的”城市、从开放讨论到固定意识形态的模范道路。人们对1945年2月13～14日的轰炸袭击记忆犹新。在那份记忆的阴影下，许多声音都要求把德累斯顿打造成一座能摆脱历史的老城。1946年春天的城市规划比赛展现了德国尚未分裂时的总体趋势，即各城市重新考量自身的地理情况并赋予其新的表达。“清洗”是可能带来毁灭的，未来的城市值得毫无保留地去追求。“由此，某种期望浮出水面。它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孕育，在纳粹的‘重组计划’中得到意料之外的推动。”

> 与这种计划相反，也有人要求把德累斯顿建成“巴洛克姿态”。从1945年3月起担任土木工程监督官的赫伯特·科纳特提出了一份重建计划，这份计划指出如何有机而适度地维护有价值的古物，同时考虑各种需求，尤其是交通需求。“随着‘德累斯顿灵魂’的呼吁的诉诸，某种转变在悄悄发生，这种转变在其他的城市——比如明斯特或纽伦堡——也可被察觉。空战仅仅一年后，对空战的记忆及‘崩溃’带来的哀鸿就已逐渐褪色。未来似乎已在远方。人们做好了准备，并乞灵于‘遗留的古物’，仿佛那些古物护佑着灵魂。”

---

[1] 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年），德国信义宗牧师、神学家，认信教会成员之一，出生在德国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潘霍华曾经在德国参加反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运动。因同伴计划刺杀希特勒失败，潘霍华在1943年3月被捕，并于德国投降前一个月被绞死。

[2] 信义宗（德语：Evangelisch-lutherische Kirchen，英语：Lutheranis）也称路德会、路德教派，属于更正教之一，在欧洲语言中原为路德宗。信义宗肯定“因信称义”，即认为人凭信仰蒙恩而得称义和得救；天主教教义则认为人要蒙恩必须得到代表上帝的教会的接纳和做足够的善行。信义宗源自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于公元16世纪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3] 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是丹麦神学家、哲学家及作家，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

[4] 卡尔·特奥多尔·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年）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1967年成为瑞士公民。雅斯培被看作存在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将存在哲学与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进行了严格的区分。

[5] 内心流亡是指德国的艺术家、作家等在纳粹当权时反对纳粹政府，但也没有或者没能流亡海外，只得用离群索居等方式表示内心的“流亡”。

[6] 德累斯顿十字合唱团（Dresdner Kreuzchor）是德国最古老的童声合唱团之一，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它也是一个以清唱闻名的合唱团。

[7]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年）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剧作和理论著作对后世德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莱辛是一个涉猎广泛的作家、思想家和批评家。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领导性的代表人物，他是思考市民的自我意识的先驱者。他的理论及批评作品以经常运用滑稽、讽刺的风格与准确的论证而独树一帜。《智者纳坦》是莱辛的代表作之一，主题是宣传启蒙中重要的理性概念，对宗教进行了审视性的批判。

[8] 德累斯顿轰炸（1945年2月13～15日）是二战期间由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联合发动的针对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在今天，它依然被看成二战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包括圣母大教堂内的老城亦遭轰炸，在其中丧生的平民难以统计。英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曾说：“德累斯顿被毁具有史诗般的悲剧性。这座象征着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城市曾经美得让人惊叹。而纳粹统治期间，它又成为德国的地狱。在这个意义上，就20世纪的战争恐怖而言，德累斯顿轰炸事件是一个绝对带有惩戒意味的悲剧。”

[9] 此处指1914～1923年的通货膨胀。1918年一战结束后，马克贬值到只值之前的一半。

[10]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年），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希望的原则》（*Das Prinzip Hoffnung* ）。

[11] 盖瑟加斯泰格位于上拜仁地区的格林瓦德镇的东区。

[12] 《林中路》包括1936～1946年海德格尔的六篇文章，其中有探讨艺术本质的《艺术作品之源》，阐释尼采思想的《尼采说上帝死了》，探讨黑格尔的经验论的《黑格尔的经验概念》。

[13] 圣保利是汉堡临近港口的一个区。其中最著名的是绳索街，它是汉堡的夜生活中心，德国最大的红灯区，有脱衣舞俱乐部、性商店、妓院、性博物

馆等。20世纪60年代初，尚未出名的披头士乐队在汉堡绳索街的几家夜总会演唱。约翰·列侬说：“我可能是在利物浦出生，但我是在汉堡长大的。”

[14] 让·阿努伊（Jean Anouilh），法国剧作家。1910年6月23日生于波尔多。《安提戈涅》是阿努伊的一部代表作，剧本脱胎于索福克勒斯的名剧《安提戈涅》。

[15] 《明娜·冯·巴尔翰姆》是德国启蒙时代戏剧家、文艺理论家莱辛的戏剧作品。

[16] 《强盗》是德国古典主义作家、诗人席勒的戏剧作品。

[17] 《丹东之死》是德国三月革命前期作家毕希纳的戏剧作品。

[18] “整体艺术”指统一多种艺术形态（如音乐、绘画、造型艺术、舞蹈、建筑）的艺术作品。这个概念起源于德国浪漫主义。

[19] 拜罗伊特音乐节（Bayreuther Festspiele），又称理查德·瓦格纳音乐节，是一个音乐节和歌剧节，每年一度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举行。音乐节由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发起，1876年8月13日首次开幕。

[20] 保罗·亨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哈瑙。他身兼多职，是作曲家、理论家、教师、中提琴家和指挥家。不论是在音乐作品或是在音乐想法上，亨德米特都是近代重要的德国作曲家之一。1934年，亨德米特完成重要作品《画家马蒂斯交响曲》（*Sinfonie Mathis der Maler* ），并于次年完成歌剧《画家马蒂斯》（*Mathis der Maler* ）。

[21] 无调音乐，又称“无调性音乐”，是现代音乐的一个重要流派与表现形式，其构成方式与有调性的古典音乐具有互补意义。

[22] 门德尔松是犹太人，其作品在纳粹当权期间被禁演。

[23] 卡尔·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年），德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指挥家。卡尔·奥尔夫的音乐创作以作品《布兰诗歌》最为著名。

[24] 卡尔·阿玛迪乌斯·哈特曼（Karl Amadeus Hartmann，1905～1963年），德国作曲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画家，少年时又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1923年入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又师从韦伯恩。希特勒上台后，他因反对纳粹而停止了创作，二战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致力于新音乐的推广。他创立的“音乐万岁”是专门针对新音乐的系列音乐会，由拜仁广播电台承办。

[25] 安东·弗雷德里克·威廉·冯·韦伯恩（Anton Friedrich Wilhelm von Webern，1883～1945年），奥地利作曲家，第二维也纳乐派代表人物之一。韦

伯恩1883年出生于维也纳，1902年入维也纳大学学习音乐学，1904～1908年师从于勋伯格，与勋伯格、贝尔格组成新维也纳乐派（或称第二维也纳乐派），1920年起定居维也纳，从事指挥和教学。纳粹占领奥地利期间，因受纳粹迫害（希特勒明令禁止演出第二维也纳乐派的音乐），不得不过起隐居生活。1945年前往萨尔斯堡看望女儿女婿，在宵禁灯火管制时于户外吸烟，被一名美国士兵误杀（该士兵在战后因懊悔而酗酒，于1955年身亡）。

[26] 十二音技法（Zwölftontechnik）是20世纪古典音乐的一种创作手法，最先由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马蒂亚斯·豪尔和阿诺德·勋伯格分别提出。其中勋伯格的理论得到较多人认同，并在他所属的第二维也纳乐派间广泛流传。时至今日，十二音技法大都以勋伯格的理论为基础。十二音技法可以说是由浪漫乐派后期至新古典主义音乐期间的无调音乐所发展而来，其理念在于一个完整的半音音阶内的12个半音，每个音的重要性都相等，而非传统乐理所提倡的音阶内以个别音主导其他音的概念。所以，相关的音乐作品亦不应带任何调性，也不采用任何调号。

[27] 奥利维埃·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1908～1992年），法国作曲家、风琴家、音乐教育家，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常融入复杂的节奏语言（他私下钟爱古希腊和印度音乐），并以“有限移调调式”（梅西安在他早期作品中提出的概念）铺陈出和声与旋律。有一段时间，他全心投入关于“全序列主义”参数化的实验，因此被后世认定是序列主义领域的革新先锋。

[28] 1948年的“符咒丑闻”：时任拜仁州教育和文化部部长的胡恩德哈默下令维尔纳·埃克的自由芭蕾在拜仁国家歌剧院停止演出，尽管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9] 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Seraphicus Grillparzer，1791～1872年），奥地利剧作家，诗人。

[30] 纳粹党冲锋队又称褐衫队。队服在改为褐色之前是灰色。

[31] 阿那克里翁（Anacreon，公元前520～前485年），生于小亚细亚沿岸的爱奥尼亚城邦提欧斯（Teos），古希腊著名诗人，以饮酒诗与哀歌闻名。

[32] “荒凉文学”等同于“废墟文学”。

[33]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年）是德国浪漫派诗人。他将古典希腊诗文移植到德语中。其作品在20世纪才被重视。他被认为是世界文学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34]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年），本名保罗·安切尔（Paul

Antschel），法国犹太诗人、翻译家。策兰出生于罗马尼亚切尔诺夫策（现属乌克兰），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之一。

[35] 《事实》（*Die Tat* ）是一份德语的政治及文学杂志。1929～1933年，这份杂志的态度是保守的。Tat圈子主要由杂志撰稿人组成，其中既有左翼也有右翼，主要的论点是批判资本主义、宣扬德意志民族的闭关自守、呼唤新的精英。

[36] 7月20日密谋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一个试图刺杀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并推翻其政权的行动。当天，德国陆军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于德国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狼穴”基地引爆其公事包内的炸弹，但并未成功将希特勒炸死，仅造成其轻伤，政变也很快失败。希特勒下令将所有涉案人员逮捕并处以极刑，盖世太保一共逮捕了7000人，并最终处决了4980人。由于主要领导人多被处死，德国反纳粹组织也因此遭到了致命打击。

[37] 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1899～1966年），生于德国施瓦尔姆斯特，经济学教授，他的思想影响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

[38]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年），美国/英国诗人、评论家、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作品对20世纪乃至今日的文学史影响极为深远。代表作有《荒原》《圣灰星期三》《古典与现代散文》《大教堂谋杀》《岩石》等。

[39] 恩斯特·罗伯特·瑟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德国罗曼语系专家，创建了文学中的中世纪拉丁语研究。

[40] 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年），英国/美国诗人，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中国旅行，并与其同伴小说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合著了《战地行纪》一书。

[41] 德国电影股份公司（Deutsche Film AG，Deutsche Film-Aktiengesellschaft），缩写为DEFA，是东德的国有电影公司，成立于1946年5月13日，总部设在波茨坦。其存续期间共拍摄约700部故事片、750部动画电影及2250部纪录片和短片。两德统一后，德国电影股份公司解体并被拆分出售给法国维旺迪媒体集团。

[42] 《战舰波将金号》是1925年的一部苏联黑白无声片，片长75分钟，导演是谢尔盖·爱森斯坦，主演是格列高里·亚历山大洛夫，上映后震惊整个电影界。这部默片是为纪念1905年“波将金”号军舰起义而拍摄的，它不仅是蒙太奇美学的开山之作，也是电影史上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之一。2002年，英国《视与听杂志》影评人组票选，《战舰波将金号》名列史上第7位。影片讲述的是“波将金”号上的士兵不堪长期遭受压迫和凌虐，愤而起义，将军官们全部

丢下海，此举得到黑海沿岸最大的港口城市敖德萨居民的鼎力支持和援助。之后，沙皇调动庞大的军力，对当地居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43] 血与土（Blut und Boden）是一个德国种族意识形态，指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这一论点起源于19世纪末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

[44] 桥社（Die Brücke）是德国表现主义的一个艺术组织，1905年成立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发起者和代表人物有基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施米特-罗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和海克尔（Erich Heckel）等。桥社艺术家创作时强调必须表现画家个人的幻想和趣味，反对一味模仿自然。其绘画风格表现在使用艳丽、对比强烈的颜色，有意识地简化作品中的形象，避免过多的细节。他们的油画作品有着木版画似的风格、锐利的线条及大胆的构图。

[45] 亚历山大·阿奇彭柯（A. Achipenk），乌克兰裔美国艺术家，现代雕塑的铺路人之一。

[46] 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Karl Schmidt-Rottluff），德国画家、图像设计家、雕塑家。经典现代派的重要人物，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

[47] 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1884～1950年），德国画家、雕塑家、作家。生于莱比锡，1936年因躲避政治迫害移居阿姆斯特丹，1947年赴美。其作品受印象派及象征主义的影响，常常刻画悲剧之中或极具生机的人物，主要作品有三折画《出发》（1932～1935年）、《捉迷藏》（1945年）、《阿尔戈英雄》（1949～1950年），以及象征主义作品《带篷马车》等。

[48]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此处借用了概念。

[49] “绒毛世界”是一种比喻。一战前的德国作家特奥多尔·冯塔纳讽刺德国社会由既想做大人物又想追求经济利益的“资产阶级式的感情”主导，是“一座摆着绒毛沙发的极乐岛”。1878年，剧作家卡尔·施泰因海姆写道，他出生于一个“绒毛世界”，“亲爱的上帝把德国人放到绒毛的床上”，“绒毛”意喻“舒适”。

[50] 沃普斯韦德是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市镇。1889年那里建立了一个艺术村。

[5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计划解除德国的工业。这个想法最初起源于彻底拆除德国的军工业，但后来波及其他工业领域。比如，鲁尔区的许多工业生产设备被运往苏占区。美占区1946年5月通过了一项计划，根据计划，应该拆除1600个工业企业，让德国的工业化程度重新回到1938年的水平。以上这些政

策统称拆减政策。

[52] 博物馆岛（Museumsinsel）位于德国柏林市中心，施普雷岛（Spreeinsel）的北端。柏林所有博物馆都由此发展而来，也是柏林的旅游重点。1999年，因建筑与文化的结合，博物馆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179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采纳了考古学家、艺术学教授阿洛伊斯·希尔特的建议，准备在岛上建造一座博物馆，以展出古代和新时代的艺术珍宝。1810年，腓特烈·威廉三世正式颁布法令举办向公众开放的艺术展览，以回应柏林市民对于公众教育和公开艺术展会越来越大的呼声。博物馆的工程由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教育家威廉·冯·洪堡负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博物馆岛的70%被炸毁。20世纪90年代末，博物馆岛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

[53] 《雅典宪章》（Charte D’Athènes）是法国知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于1933年提出的一份关于城市规划的文件。先由“历史遗迹与遗迹地点国际委员会”制订出《雅典历史遗迹复修宪章》。然后，在瑞士由28个著名建筑师和设计师组成的“现代建筑国际大会”制订出《雅典宪章》，主张理性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并解决高层住宅大厦、土地规划、交通要道和住宅区分离、保存历史建筑等问题。1933年，正式由勒·柯布西耶的现代建筑国际会议提出。二战后，欧洲各国重建都市时城市规划多以《雅典宪章》为蓝本为典范。早期宪章并不完善，但经各国多年来讨论改善，已有各自的更完善、更人性化的都市发展规划宪章。除了延续当初《雅典宪章》对历史古迹的保护，还增加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相关内容。

[54]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年），德国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现代设计学校先驱包豪斯的创办人。

[55] 弗罗伊登斯塔特（Freudenstadt）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内黑森林附近，是著名的疗养胜地。

[56] 汉斯·波伊泽（Hans Poelzig，1869～1936年），德国建筑家、画家、舞台美术家，因其表现主义建筑和新现实主义建筑闻名。

第二部分 分裂的德国



东德克罗依茨贝格区封锁墙，柏林，**1963**年

第8章 两个德国的产生

货币改革和宪法

在一次关于德国分裂的谈话中，君特·格拉斯将两大敌对政府要员康拉德·阿登纳和瓦尔特·乌布利希形容为两名虽有不同未来却追逐同一个政治目标的政治家：一个致力于建立新生德国与西方强国的联系，另一个则为建立德国与东方的联系而奋斗——一名莱茵河区的分裂主义者和一名萨克森区的分裂主义者。“我不想说这两个人有意‘寻找’对方，但无论如何他们相遇了，他们接受了战胜国这个概念。在周日，也会有人有时把德国当作一个整体一样谈论着，做一些周日演讲，却早已接受了国家的分裂，他们参与并加固了这个过程。这个意识高于其他一切。”

然而，两个德国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分裂，与其说是人为的影响，不如说是由当时形势决定的。西方联盟和苏联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首先导致了美国对德政策的改变。

1946年9月6日，美国外长詹姆斯·伯恩斯于斯图加特发表演讲，公布了一项积极的对德外交政策。之后的事实证明，在德国战后史中，真正决定命运的一年是1947年。1947年12月，在伦敦举行的四大战胜国外长会议失败——自1945年9月起，外长们就已经开始忙于解决德国问题，但毫无结果。1947年，事情有了极其有力的进展。两个占领区的经济委员会被重组，议员数量由52名增至104名，另外，联邦参议院被确立为二级议院（由联邦州政府的24名代表组成）。

最重要的决定在6月20日这天产生：由西方列强占领的军事区开始推行货币改革，目的是整顿战争中被破坏殆尽的德国经济。基于公共设施融资原因，货币滞销以一种荒诞的不平衡模式服务于商品供应。强制

执行的经济统治借助物价控制的确阻挡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但对于保持国家物价的稳定，其作用微乎其微。调节实际物价的是黑市。通过货币改革，流通货币大幅度减少，德国国家债务急剧减少。每位居民在规定日都可以得到40马克的预付款，两个月之后再得到20马克的预付款。所有现金欠款由原价值锐减到原价的10%，银行账户里100马克的存款实际只是6.5马克。资产负债率也一样被调整至成1∶1——抵押除外，因为人们并不会过分地庇护财产的所有者。

> “奇迹发生了：民众信任新货币，长期以来被遏制的物资突然出现在市场上，一天又一天，商店的橱窗展台说明从没有人能制止商品供应。路德维希·艾哈德是1948年至1949年联合经济区经济管理负责人。他在货币改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整顿货币和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缺少其中一个，另一个都不可能成功。”
>
> 1948年，《乌伦斯皮格尔》在5月所出版的期刊中刊登了卡尔·施诺格的一首诗，这首诗用“平日梦想”这个词回答了和平到来的这一问题。“……当妈妈能开心地摇晃孩子，当叔叔能赠送外甥手表，当人们能不用凭证明更换住所，当买得了车子的人能自己驾驶，当人们能更换不再适用的家用器具，当人们能买上足够的肉并邀请朋友。可是，我的子子孙孙们呀，这样的梦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
> 然而，并不用等到孙子辈。就在这首诗出版的一个月后，西占区推行的货币改革就让民众开始步入消费天堂。卡尔·克罗洛生于1915年，当时在哥廷根以自由作家的身份谋生。他说，他慢慢地理解到这也许就是西德战后史中最“具体”的一天（“市场上供应着可以买到的真实货物，当然还不是一切，但是供应得已经很多了”）。

1948年6月23～28日，在德国苏占区推行了货币改革（引入了德国马克-东部体制），但是这次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食物配给制仍然存在，黑市依然兴旺。为了改善货物供应状况，10月成立了国家贸易组织（HO）。在加入组织的每个零售店里，人们无须购买证和粮票就可买到商品货物。苏联曾经试图把它的货币改革推行到整个柏林，但这个想法受到西方列强在德国西占区引入新马克的阻挠，最终失败。随之而来的柏林封锁[1]虽然被西方盟国的空中桥梁[2]解除，但四大战胜国的管理业已分崩离析。11月，市议员大会和市政府分裂。

在西德，恩斯特·罗伊特（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市长；而在东德，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德国统一社会党）当选为市长。



圣诞节烤鹅又回到了市场

企业囤积了大量货物，它们之前以“疲软货币”生产，现在以“强硬货币”卖出，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不过，刺激了民众的公共道德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东西：由德国联邦银行在货币改革之后发行的首批纸币（一张5马克纸币）的正面图案。纸币上半裸的欧罗巴女神骑在风格化的金牛背上，右手托着太阳，膝盖被轻纱略微遮掩，乳房裸露，朝着未来前进。人们批判这种毕加索式风格的创作线条凌乱。负责的版画家得给他的作品一个说法。同样的，50马克和100马克纸币上“无知和无趣登峰造极”的图案也让公众感到愤慨，但是这些货币的流通却并未影响生产和消费。

因为货币改革，文化首先成为“滞销品”。比起艺术家的作品，新商品供应的形象美学更加吸引人。因为不想在空无一人的剧院表演，剧院不得不顺应大众的品位。因为缺少出行资金和费用，也就没有了巡回演出。音乐厅也空无一人，大部分演出也被取消了。

报纸杂志的订阅取消。短时间内，杂志社接二连三地破产。出版商兰伯特·施耐德回忆，他的杂志读者突然丧失了兴趣，这令他无比沮丧，面对强硬的德国马克，读者能表现的好像只有精神上的同情。在这几个月里，许多这样的杂志暂停了印刷，《呼吁》和《转变》也在其中。

1948年8月，一场事先准备好的宪法大会在基姆湖畔的城堡里召开。在联邦制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会议制定了适用于所有德国联邦州的基本法方针。从9月1日起，国会参议院（来自11个联邦州的65名被选举的代表）与西方盟国一起在波恩继续了这场讨论。最终在1949年5月8日的第三次草案议会中，《西德基本法》以53票赞成12票反对获得通过，并于1949年5月23日生效。

准则委员会在国会参议院上就宪法前言的编写提出了这么一条建议：“由所有德国人的希望推动。”尽管这句表述没有出现在最后的稿本中，但基本法却反映出了这种要联合掌握国家命运的民主力量的坚定意志。宪法序言里宣言式的文字可以理解为对国家政治道德的某种表述，这些政治道德最终将战胜纳粹主义的暴政国家，至少在那些为心灵的革新而奋斗的人的理想天堂里是这样的：“我德意志人民，认识到对上帝与人类所承担之责任，受到意志的鼓舞，维护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并愿以联合欧洲中一平等成员之身份服务于世界和平……”

确立于联邦德国的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深植于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它并不是由某个主动的法律所规定的，而是在任何法律之前先有的人权。基本权利的确立明确表明：这里的国家和社会将要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建成。“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这是基本法第一章的内

> 容，重视及保护此项尊严是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德国人民信奉的是：不可侵犯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下述基本权利视为直接有效的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法则。”
>
> 作为最高准则的正义概念包括社会福利国家（国家社会义务，特别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时）。自由和平等以多种方式延伸——个性自由发展的权利，生命和身体不受侵害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信仰和良心自由权，因良心原因拒服兵役的权利，言论自由权，艺术、科学、研究和教学自由，组织或集会自由权，迁徙自由，职业选择和培训场所自由选择权，财产权的使用应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自由民主基本制度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应该可以帮助消除东西之间日益发展的紧张关系而导致的“德意志的僵化状态”。“整个德意志民族面前有一个任务：用自由自主的方式来完成德国的统一和自由。”《现在》杂志中的一则评论写道，虽然不会有德国人抗议现在为德国所盖的紧急屋顶，然而人们不太会以为宪法只是应急措施，而会把它看作为现在开始重建的房屋打下的坚固地基。联邦德国“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不久将被实践唯物主义覆盖。

大家长阿登纳，大文人豪伊斯

1949年9月15日，73岁的康拉德·阿登纳以202票赞成、142票反对、44票弃权和1张无效的票——自己投自己的票——以多数票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或西德）总理（总共402名议员）。反对党领导人是库尔特·舒马赫（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前在1949年8月14日的第一次联邦议院大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拿下了139张选票（31%），社会民主党获得131张选票（29.2%），自由民主党获得52张选票（11.9%）。阿登纳与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和德国党的部长组建了他的首次内阁政权的联合政府。

1946年4月23日，阿登纳对他一个亲近的朋友说，他不得不做这个政治工作，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承担，但这个工作很耗人，身体疲劳且

非常吃力不讨好。“不知怎么的，一旦我要对这个工作负责，我就试图逃避它。老一代的人在一切领域中都必须担负起领导人的责任，这简直就是德国的灾难。中年一代几乎都退出了政治圈，因为之前他们都加入了纳粹党。年轻一代还没有决策能力，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其他方面。他们还需要完全地改造……”

这个大家长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他在第一次政府声明中强调，将使社会市场经济超过计划经济。在外交上，阿登纳坚持无论如何都不会容忍苏俄和波兰把私自确定的奥得-尼斯河线作为边界，因为这会导致德国领土的分裂。而且，几百年来在欧洲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德法矛盾也必须要终结。他尤其感谢美利坚合众国的联合，因此向美国倾斜，并开创了西欧的一体化（对于他而言，这比国家重新统一更重要）。

阿登纳的保守派和天主教的生活方式、对普鲁士的反对、对民族国家持怀疑态度的历史认知、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概念使他成为大多数人心中的领军人物。相对于文化的多样性，人们对经济的发展更感兴趣。比起精神文化的辩证法和多样性，物质上的稳定和坚固更为重要。

在与法国外交部部长罗伯特·舒曼（“新欧洲”的建筑师）的紧密合作下，阿登纳致力于调解与“死敌法国”间的关系，调解在与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建交时达到顶峰。

1956年，《卢森堡-萨尔条约》决定萨尔兰在第二阶段（1959年结束）归属西德，从而永久解决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不断加重的德法冲突。这表明与法国之间相互理解是十分可行的。“萨尔奇迹”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1945年后兼并了萨尔兰并至今为止一直单方面操控萨尔州政治的法国人顺应了相反的民意，证实了自己是个好输家。法国在关于《萨尔章程》（1955年）的表决中表明了这一点（1954年《巴黎条约》规定萨尔州主权交还给联邦德国。在这个条约范围内，联邦德国计划与法国一起，在持续的货币和关税同盟方面使萨尔州欧洲化）。阿登纳担

心否决章程将危害与法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但团结在支持回归德国的“家乡联盟”下的党派（萨尔民主党/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却感到欢欣鼓舞——这里也展示了危险的民族主义声音。

阿登纳与美国外交部部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3～1959年）在由阿登纳本人操作的西方化框架内有密切的关系。两个人都想把联邦德国建立成一座能够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彼得·科赫在他的自传中写道，阿登纳出于反布尔什维克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原因，把那些由于社会改革讨论而被扼杀在摇篮里的泡沫碎片搅在一起。阿登纳断然划清自己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关于这一点，他不惜歪曲任何历史（他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地写道，纳粹主义在德国那些天主教和新教的地区遭遇了坚定的精神反抗，而那些信仰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地区最早沦落——这根本是完全罔顾信奉天主教的拜仁州最先对希特勒敞开大门，最后才是红色的普鲁士这一事实）。库尔特·舒马赫称阿登纳为“一个为教会联盟统治于德意志人民之上的胜利笨拙庆祝的人”和一位“盟国总理”，后者是用来谴责阿登纳的西化思想的。

阿登纳在宗教和政治上建立的对苏维埃联盟的强烈反感没有妨碍他的实际行动。1955年，他访问莫斯科，以他法学家的冷漠和谨慎、世界伟人的魅力与苏联进行了他最伟大的成功谈判之一。大约1万名战俘和2万名被拘禁的平民得以脱离俄国人的监禁返回家乡。弗里德兰边境过渡营是从战争结束至1955年，为180万民众建立的第一个咨询点，这成为阿登纳顽强不屈的标志之一。

> 依靠强大的顽强精神、手段和不妥协的意志，阿登纳把他的想法付诸政治行动。1950年他当选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1953年由他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在第二次联邦议院大选中拿下45.2%的选票，1957年在第三次联邦议院大选中拿下50.2%的选票。典型的事件是，1957年他打着“不搞实验”的标语参加大选。1959年，美国记者、时事评论员威廉·西格蒙特·施拉姆把由从容不迫的伟大领袖

康拉德·阿登纳博士主宰的德国纳粹主义后的第一个十年恢复期称为德国乃至西欧的机遇。

阿登纳灵活地说服了建立于1949年6月的最高事务委员会的西方“监督高层”（由英国人布莱恩·罗伯逊、法国人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以及作为最高指挥官的美国人约翰·麦克洛伊组成），使他们相信德国主权有必要独立。



1957年联邦议院竞选海报

在与政治对手的政治斗争中，阿登纳从不“多虑”。他就事论事和玩世不恭的幽默感是他强有力的办公方式，他用这种信心十足的方式并以匹配的风格演绎着“老东家”的角色，与议会保持着距离。（联合议会党团本来能够分担政府繁重的工作事务……但政府内阁成员对提案不感兴趣，如果可能的话，根本就不应该提出提案……）在内阁会议中，他很

喜欢分配审查部长们星期日演说词的任务。他把大段讨论总结为符合他自己意图的一两句话。他的措辞，不管是书写上还是口语上，都非常简明扼要，他避免使用含混不清的词义和空洞的套话，他用词谦虚，演讲方式简洁。

一方面，这位极其注重实际的政治家是一名大大咧咧的竞选人，他给大家分享收到的竞选礼物，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会怀疑别人的人（对同事严加管束、利用、鄙弃），一个不怀好意的、放肆的谈判者，一个懂得给自己筑起又宽又深的堑壕的人。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怀疑论者，他是敏感的、犹疑不决的，在内心深处备受异议的折磨。戈洛·曼说他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精明的理想主义者”，顽强且狡猾，但也有创造力并且富有思想。

尽管从来没有对纳粹分子表示好感，但阿登纳对之前的纳粹分子的态度相当宽松。特奥多尔·奥贝伦德是1953～1960年的联邦贸易部部长，但他是公认的“深褐色”。“哀悼的能力”在打算先重建国家经济再重整军备的阿登纳身上很少见。赦免浪潮代替了道德净化。纳粹时期的随大流者和历史不干净的大部分人有各种原因来感谢这位联邦德国总理，他没有跟民众提道德悲哀，却要求人民抑制和遗忘。汉斯·玛利亚·格洛布克是纽伦堡种族法的评论员——当年，他是纳粹政府内务部的高层议员——却成为康拉德·阿登纳最亲密的同事。

> “哈兰事件”是阿登纳时代复辟文化氛围的典型。哈兰这名纳粹时期的电影导演（他导演过煽动性的电影《犹太人苏斯》和《科尔堡》）在经历一系列司法程序后被无罪释放并且重新开始拍摄电影。新的德国法制并未把政治道德放在心上，对呼吁，尤其是以汉堡国家新闻处领导人埃里希·吕特为代表的抵制哈兰的新电影《永恒的爱人》（根据特奥多尔·施托姆的小说改编）的呼吁倒是很敏感。本来，人们至少可以期望哈兰沉默吧。“因为他完全缺少判断能力，他重新把德意志人民的声誉置于危险之中，迫使我们得向世界证明，还有上百万的德国人尽管乐意与所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人和解，但并没有忘记真正的魔鬼和卑劣行径。”

“接近195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之内几乎没有人再担心他的纳粹过去是否还会遭到国家或者司法机构的纠缠。若干保守小党派提出了某些受人欢迎、他们自己也会从中获益的要求，在这些要求的推动下，联邦议院所有党派联盟机构废除了根据1945年投降条约设定的德国公民强制性个人问责制。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被减轻罪责并得到了谅解。不仅360万人的非纳粹化和数以万计的赦免被一笔勾销，而且在这段时间内，那些于1945～1949年在纽伦堡审判中或者由同盟国军事法庭判定为战犯的人大部分都被释放。”（诺伯特·弗雷）

“反攻倒算的僵化”是阿登纳时代精神的特征。它重新出现在波恩——这座西德的首都——“在小城市的偏狭与闭塞中找到了某种安全感，而这种慰藉是危险的、模棱两可的”（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康拉德·阿登纳在他的《回忆》中解释，国会参议员之间（特别是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拜仁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举行了关于应该是波恩还是法兰克福成为临时首都的争论，这些争论是有政治性的。法兰克福位于社会民主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黑森州，人们希望依靠这个城市在整个联邦区域内相应扩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对于波恩，英国人已经发表声明，他们愿意交还隶属于英占区和军事管理区的波恩区；而对于法兰克福，美国人没有发表这样一份声明，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安顿着美国的组织机构和十分重要的管理办事处，而大部分其他城市难以有足够的容纳空间。从精神学角度来看，这却是另一码事：这位曾是勒恩多夫市民的科隆前市长[3]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国家，他觉得，置国家于在法兰克福这样一座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上演的权力游戏之中是一件危险的事。

沃尔夫冈·柯彭的小说《温室》于1953年出版并在波恩进行公演。他自己的评论是，这部小说超然于人们的薪水、组织机构和当代事件之上，有一种诗性的真实。但这部作品尤其反映了某种政治的真实：地方主义是小地方的精神，总会拒绝承认多样性和复杂性。“温室气候出现在废石的锅炉里，空气汇集越过大河和海岸。别墅矗立在水边，玫瑰被栽培，剪刀掠过院子，一片欣欣向荣，略显陈旧的老鞋下咔嚓作响的石

头……德国犹如一个巨大的公共温室……”

最高领导人阿登纳有一位温和的对手：特奥多尔·豪伊斯，他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一位敦厚随和的共和党人。在他的脸上，卡尔·楚克迈尔说可以看到德意志民族的遗产和岁月，但同样也可以看到充沛的精力和勃勃的生机。1949年9月12日，豪伊斯在第二次投票选举中以416票当选为联邦总统。这并非提名库尔特·舒马赫（他拿下312张选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而是豪伊斯在大联盟圈内担任自由民主党主席引起的强烈反对，反而得到了艰难组织联邦总统当局的机会。他的政治见解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拜仁基督教社会联盟看来太过自由，除此之外，他对基督教疏远的行为也受到指责。

当特奥多尔·豪伊斯甫入国家最高领导层时，他还默默无闻。但1954年再次竞选时，他得到了987名议员中的871张选票。竞选一年前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3%的民众希望他能连任。14000封祝贺信件被寄往为他设立的办公大楼：德国总统官邸。豪伊斯已经成为新联邦德国最著名的标志人物和代表人物。1963年12月12日他去世时，《纽约时代》杂志写道：“他是新德国的合适的标志，而且他是这个国家民主形式的首席建筑师。”对他的爱戴和尊敬是对他身上散发出的热情的回应。阿登纳代表的是真正的政治家，相比之下，特奥多尔·豪伊斯代表的则是希望和思慕，是那些人们希望在自家屋子里以及在国家的苍穹下看到被达到和满足的希望和思慕：舒适和安心，生活气息浓厚的教养和高尚的生活方式，有声望的尊严和祖父般的和蔼可亲。特奥多尔·豪伊斯是“德国的讲师”，温和而坚决，和蔼却有精神上的信服力。“如果说我认为为了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的方向也有一项教育任务需要完成，那么这项任务是，让冷静清醒成为人们的义务。”

上面那句话写在豪伊斯致托马斯·德勒的信里。信中豪伊斯批评了德勒的政治狂热并告诫他，勿用锤子搞政治。比起原则性问题，这样的

矛盾分歧无疑更多涉及性情。在他们的思想方面，两个人都是共和派的自由党人，却绝不仅仅代表他们的党派——自由民主党。因为在1955年，这个党派在下萨克森州任命出版极右文章的莱昂哈德·施吕特为文化部部长，当时豪伊斯甚至想退出这个党派。埃里希·门德自1946年起是自由民主党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业务负责人，1949年起自由民主党联邦董事，1960～1968年任自由民主党联邦主席。门德对政治文化有着和豪伊斯不同的看法，也许他能更好适应战斗联盟的巅峰。

> 特奥多尔·豪伊斯知识广博。作为德国精神的代表，他不仅必须而且也愿意做很多演讲，即便有时候这些演讲泛滥成灾且在某种程度上显得过于冗长。豪伊斯的朋友和私人助手汉斯·博特形容豪伊斯是个“信仰自由派的作家”，“针对热情洋溢的感情和过分的陈词滥调，他提出朴实无华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事实的意义”。总的说来，这句名言说得很对。豪伊斯视他的工作为帮助新的联邦德国——在黑格尔“扬弃”的意义上——重获精神传统。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德国精神不变质，那它应该被保留；如果德国精神沉湎于肯定并与共和式的美德唱反调，那它应该被批判地清除。真正的德国精神应当得到提升和精炼，这样才能保护和增强文化力量。豪伊斯从自身的政治经验知道——这个经验是：尽管他那时对希特勒持怀疑态度，1933年3月，他与其他四名德国国家党的成员还是同意了授权法——基本权利绝不能只是概念上的存在，而应当指导具体的行动。
>
> 豪伊斯公开明确表示，谋反罪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光荣的，他通过给德国反对分子平反来抵抗纳粹主义死灰复燃的趋势。他曾与阿登纳有过一次争论（1950～1952年），在这个争论中占了劣势，他不接受把被纳粹主义玷污过的德意志之歌作为国歌。

乌布利希，总督

随着激昂的曲调——由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作词，汉斯·艾斯勒谱曲的国歌——新东德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歌颂自己的成立，好像那里德国僵化的状况也能被带动着一起飞舞一样：“我们耕种，我们建筑/学习、创造干劲足，/自由的一代茁壮成长，相信自己有力量/青年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你们就是祖国的新苗，/空前灿烂的阳光照亮祖国的天/照亮祖国的天。”

第一部由临时人民议院于1949年10月7日颁布生效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一个“反法西斯-激进民主的共和国”的建立，它坚称德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并且只能有一个德国国籍。

“扫清废墟，重建家园/面向未来展雄翅/为了你的崇高事业，统一的祖国/不让旧日灾难重临/为此我们紧密团结……”

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每一位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国家权力的内容和界限”决定了在一切法律保留条件范围内的公民权利。除了个人自由和受保护权利还有集体社会的权利，比如工作权。保障公共设施适用于经济秩序，财产及其公有化，家庭和妇女，教养和教育，宗教和宗教社区。由私有和国有经济共同组成混合系统的经济秩序包括“社会主义”改造，比如通过经济规划、征收和公有化。“从表面上看公布的是国民议会宪法（以魏玛共和国为方向）的蓝图。因为缺乏法治，写进宪法的基本权利的价值流失是早已预料到的结果，特别是因为缺乏司法审查的法律以及宪法审判权。人民议院里作为补充而设立的宪法委员会本应该监督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但完全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弗里德里希·托马斯）光是不受约束的宪法就可以表明，“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需要通过不断迫害自己队伍里的政治异己分子或者讨厌的人，以及给中产阶级者安上常常是莫须有的罪名，才能实现。

在1950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德国统一社会党把自己描述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下有意识、有组织的德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党中央委员会选定瓦尔特·乌布利希担任新设立的总书记这一职务。瓦尔特·乌布利希宣扬阶级斗争尖锐化。在第一次“党肃清会”上，首先是之前移民过西方的人被剥夺权利，这些人有保罗·默克（迄今为止的政治局委员）、雷欧·鲍尔（德国广播电台的主编）、威利·克莱克麦尔（国营铁路的总经理，在监狱里被拷打致死）、雷克斯·恩德（《新德意志报》的主编，作为囚犯死于铀矿开采区），理由是他

们跟美国间谍诺埃尔·哈维兰·菲尔德合作过。针对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类似迫害也早就开始了。

> 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国共产党员，1893年出生于莱比锡，父亲是一名裁缝。1919年战争服役结束后，作为莱比锡德国共产党联合创始人之一而出名，开放的教育环境造就了乌布利希。卡罗拉·斯特恩在其传记中叙述道，乌布利希积极努力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以及不同的文化领域和古典时期的文化遗产（作为社会主义先锋的席勒和歌德）。在这个过程中，（红色-天鹅绒）思想的单维性就显然已经和资产阶级肯定性文化的理解相差无几。“这个理解既包括‘与尼古丁和酒精的斗争’和体育活动，也包括对新知识、对非教条联想的抵制态度。这背后隐含着一个谬论：人们借助马克思主义公式不仅能理解，而且还能引领艺术和科学。在这个简单到极点、用少量定理即能完全解释清楚问题的世界里，没有个人主义者、不运动锻炼的人、爱生活享受的人、爱动脑筋的人、基督教徒、多疑的人、公民、梦想家、艺术家什么事。”
>
> 乌布利希的强项是从一开始就有的纪律意识、他的勤奋、他的组织才能、他对名字的惊人记忆力、他持久的工作力——有了这些“次要品性”，他想走哪条路都不会有问题。
>
> 拥护“创世主斯大林”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把它能成为共产主义领导精英这一功劳归功于训练有素的成员们。这些成员是否能毫无顾忌地踩过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是斯大林主义资格审核程序的一部分。有猜测说，1934年乌布利希出于个人竞争的目的，阻止了从纳粹监狱里解救前国会议员共产党员恩斯特·台尔曼的计划。这一猜测虽然没有被证实，但之后他却特别参加了1936/1937年涉及德国移民分子的莫斯科肃清运动，并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人们也得承认，在这场肃清运动中，他——因为曾在柏林和巴黎生活过，进行秘密活动（为的是建立德国人民阵线）——不仅是参与者，也是受害者。斯大林轻率地让以前追随他的人消失、被逮捕、被处死、被暗杀，住在主要寄宿处“卢克斯”旅馆里的移民分子与苏维埃人民一样，生活在害怕和恐惧中，通过互相告密来逃脱这些惩罚。这次事件有2546名牺牲者。恐怖在咆哮。那些苏维埃政权的最高代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起诉甚至被杀害，比如苏联政治家和经济理论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当年列宁的亲密战友），或者长时间居住在柏林的共产国际成员卡尔·拉狄克，或者与托洛茨基要好的格里高利·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耶夫。乌布利希好不容易毫发无损地侥幸逃脱，这不仅要感谢他的机灵，更要感谢他的幸运。



瓦尔特·乌布利希在**1966**年**6**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的一次演讲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沉湎于对斯大林的狂热中。“记忆中的德国，你最好的朋友/哦，感谢斯大林，没有人像他一样与你如此亲近，/东德和西德将由他领导统一。”（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1953年）

乌布利希时代一直延续到1971年6月他辞职。1960年代，塞巴斯提安·哈夫纳把这位自俾斯麦以来最成功的德国国务活动家称为“第二个德国专政的缔造者”。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乌布利希完全依附于苏联——他自己一直说的是，这是和苏联合作的独立德国的发展。同时，塞巴斯提安·哈夫纳认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好战的教条主义特性也可

追溯到自政权建立初就残害德国共产党员的镇压和迫害行为。

在所有权威性观点前，如果说阿登纳狡猾地代表了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西方民主主义理想世界的话，那么，在乌布利希身上体现的就是唯唯诺诺、平淡无趣的中庸的成功，以及狭隘和冷漠、上升趋势却势不可当的官僚作风。

在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为了建立东德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政体，乌布利希离开莫斯科，返回柏林——当然是以“总督”的身份，但他的抱负却让他觉得这个身份是种羞辱。他对这个国家既爱又恨。他离开过这个国家，现在又以领导人的身份再次回来。他深受某种“纯理想化的受虐情结”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依附苏联的共产党员谜一般的精神气质典型，其正好体现了这种思想：他们不仅为了信仰在与纳粹主义的战斗中牺牲，而且在面对背叛他们、折磨并杀害他们、明知有罪却不认罪的本党成员惨无人道的暴力时，也甘愿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斯大林和他的帮凶则有某种有益于扩散震慑和恐惧的“施虐情结”，他们在这种“施虐情结”下寻找最忠诚的牺牲者。“暴怒的上帝”——取自《崩溃的上帝》，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一本文选，书中写道，之前变节的知识分子得好好交代自己的错误——可以放心地把事情交给它的使者去办，乌布利希就是这些使者中最可靠的一员。

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对乌布利希而言，这同样是对他1919年十月革命之时脱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种弥补，现在共产党员是为德国开启正确道路的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这种思想上乌托邦式的盲目令人眼花，掩饰了新的“德国民主工人党派”建立在强迫和欺骗基础上这一事实——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决定是在自由中做出，那否决大约会占很大优势——在西柏林，82%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合并。然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

也有赞同的声音——受混合的理想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鼓舞。奥托·格罗提渥1945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1946～1954年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共产党员威廉·皮克共事，且自1949年10月起与总理或者说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阁主席共事。

> 乌布利希与他的同事一起，不顾一切地实现了统一政党这个“坚定的念头”。在苏维埃区或者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约有2万名社会民主党人辞职，100万名社会民主党人逃至西德，5000名社会民主党人被东德或者苏维埃法院判决——其中400名死于监禁。“库尔特·舒马赫曾经预言，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里，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献血者’。整体而言，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本来，‘自愿合并’是修饰对社会民主党人士施加压力的说辞。但这个论点也不能掩盖德国统一社会党不断转变成‘新型斯大林主义政党’的事实。早在1948年，所有的社会民主影响就已经消失，而‘社会民主主义’也从那时起就被公开宣布是共产主义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主要敌人。”（赫尔曼·韦伯）

“劳动人民的祖国”仅是一个那些社会工作权益与国家意识形态一致的人的祖国。首先，苏联的军事管理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纳粹主义的奖励计划，按照苏联社会模式的税收制度替代了奖励计划——旨在实现掌握国家命运，以通过加强工作效率来提高以生产力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和改善工作纪律。人民想获得更好水平的生活这一“自私”的要求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互不相容。

“来吧——威廉·皮克，我们的客人/您向我们允诺的/可不仅仅是橄榄和卷心菜/还有你的吃食以及格罗提渥。”

1960年威廉·皮克去世之后，国家总理这一职位被废除。设立了国务院，由乌布利希担任主席。因为共产党政权与名义上国家的最高权威合并，此时的他处于事业巅峰，在糖果和鞭子的交替作用中继续推动着对人民的管治。一方面，自1963年以来，他就赞成计划和引导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能提高“经济杠杆”，比如成本、价格、利润、信贷、报酬和奖金，以及能提高计划经济效率的“新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他也特别通过日益壮大的间谍服务来加强对机械设备的监控和压制。他以苏

联红军作为靠山来阻止劳资冲突。同样，罢工从意识形态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掌握社会的真实情况，所以只能通过“工人不能对自己人采取行动”这一教条起作用。

在经历第三帝国时期长时间的监狱拘留后，埃里希·昂纳克在1945年以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青年秘书的身份继续其政党生涯。1971年年初，埃里希·昂纳克在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元首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协商时把乌布利希描述成是“自愿退位”，瓦尔特·乌布利希的政治生涯就此走向了尾声。这位“不可替代的人”——他在政治局形容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越来越多地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看作“东欧的师父”）——充分扮演了他的角色。此外，他不适应休养生息的方针，这一方针此时能决定东西关系以及在维利·勃兰特和瓦尔特·谢尔领导下的联邦德国政府新的对东德政策。最后，苏维埃党领导人甚至妄想，乌布利希可能会突然与勃兰特一起做反对苏维埃联盟利益的事。如同在斯大林主义的肃清运动中一样，他这种内心深处颇有感受的人此时却“突然”颇合时宜地退职（没有被谋杀或者处决，而是步入“退休”，这意味着将要人走茶凉了）。在德国土地上，他使社会主义取得卓越的胜利并赶超了苏联的社会主义。

为了展示他在建筑构造上的骄傲，瓦尔特·乌布利希转而尝试“给这个国家大部分城市装上高大的塔形建筑。计划在莱比锡、耶拿和柏林执行。同时，这也是个大力打击犯罪的时代。1968年，因为国家领导人（以及建筑师亨瑟尔曼的计划）的爆破指令，不仅莱比锡的保利教堂沦为了牺牲品，波茨坦的宫殿和卫戍教堂也被毁掉了”。人们追逐的已经不是某种信念，而是“自己的信念高于其他任何一种信念”的信念，它有越滚越大的倾向，颇具破坏性。而经济力量却不足以支撑，就算可以勉强支撑，也势必给人民带来过重负担。在休养生息政策的背景下，这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冲突。

阿登纳和乌布利希试图弥补的正是被他们自己的政策摧毁的东

> 西。他们两人的失败不仅在世界政策上，也在自己身上。他们如此坚定、如此明显地为分裂国家的特殊存在承担义务，以至于他们都成了分裂政策的标志。在许多疏远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东德人民看来，阿登纳也是德国的分裂者，至少有时候他确实在做分裂国家的事情。对于大部分西德人民而言，乌布利希是骇人的形象，这正是西德人民害怕共产主义的原因。就算旁边有人对他提出理性建议，他也不会考虑。只要是分裂德国的行动，阿登纳和乌布利希总能成功。这两个人都成了“国父”，抚育国家，直到国家自食其力，但是他俩之间却存在界限。他们宁愿建立对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不愿意和解。

在莫妮卡·马容的小说《寂静六行》中，一位有影响力的前机关干部赫伯特·贝亨鲍姆对女历史学家罗莎琳德·波科维斯基讲述了他的回忆。这位机关干部回忆了他返回德国时的情景。“我们的火车穿过边界开往德国的那一瞬间成为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回到由苏联军队解放的德国。车厢里所有的同事都噙着眼泪挥舞着手臂。这一刻，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祖国，从好战的帝国主义和残忍嗜血的法西斯主义中永远解放出来的德国。我们知道，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更加艰辛、充满汗水和泪水的道路。”在这里，这位有影响力的斯大林主义者的修辞法“像他喉咙里的黏膜一样”干巴巴，并且“他那种与僵了的颈椎一样固执的想法也已经变得腐朽”。波科维斯基说（莫妮卡·马容借此表达她自己对乌布利希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术语词库的看法）：思想力量已经摧毁了一切。由于斯大林主义的罪过，许多最初允诺的东西变了样，许多人不接受这样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它的开始仿佛一场骗局，之后变得越来越糟糕。

赫伯特·贝亨鲍姆的身份建立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这实际上也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保罗·班德认为这既是吸引力也是工具。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证明自己的方式，正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通过其民主宪法来证明自己一样。东德宣布，反法西斯是唯一需要从德国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反法西斯主义为东德的存在建立了唯一无懈可击的证明。面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人们可

以选择民主社会主义，而反法西斯则不容选择。“这一切在信心满满的情况下发生，由此产生了强大的笃定和自信。德国共产党员不觉得需要对希特勒负责，并且，作为个人而言，这个想法也没错。为什么他们应该为某一个男人的罪行而赎罪呢？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与这个人进行过斗争呀。一旦他们获得权力，就可以把纳粹分子和纳粹主义消灭。他们不仅相信他们自己，还相信西德的纳粹主义也已经一扫而空。”

---

[1] 柏林封锁（Berlin-Blockade，1948年6月24日～1949年5月12日）是冷战时期的第一次重大国际危机，并首次造成了人员伤亡。在二战后处于多国占领下的德国，因冷战令苏联和西方国家关系恶化，苏联遂封锁了西方盟国通向在其管制下的柏林地区的道路和铁路，使苏联在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城市。

[2] 为了防止城市落入苏联手中，西方盟国组织架起了柏林空中桥梁，为西柏林提供物资供给。英国皇家空军和刚刚成立的美国空军等航空部队在一年内进行了278228次飞行，向柏林人提供了2326406吨物资，包括燃料和食物。

[3] 阿登纳二战前曾以天主教中央党党员身份担任科隆市市长十几年。

第9章 巨大的中心国家

没有适宜气候的议会制

建设一个民主合法化的西德不是易事，即便有盟国的“监督”，这一过程也会遇到许多潜在的或者常常是公开的对力：要么是还没有克服纳粹的集权结构，要么是只会“机械”地运用议会的力量。

1966年，政治学家威廉·亨尼斯说，人们不会抵抗而会接受政府议会制。但对于什么是政府议会制并没有足够多的认识，以至于这种制度可能存在的危害以及日益显现的缺点不仅没有使人担忧，就连一次真正的了解兴趣都没有。就内容而言，从战后政治的大量资料可以看到，人们可以不加入联邦议院，但至少直到1950年代中期，联邦议院在外交方向上确定（重新统一，之后的重新装备军事以及补偿）的重大问题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辩论的大平台，但紧接着这些重大问题就被列为禁忌。作为公共机构，联邦议院至今不具有任何特别的特征，更确切地说，它再次丢失了鲜明的特色。政治热情已被耗尽，政治棱角也已被磨平。

一些议会派本想开创新的联邦制，却颇为大量懒惰的机关人员、议院活动和官僚主义者掣肘。各种联合会的宣传替代了思想广阔、激励人心的政治理念。技术官僚取得了政权。议员人数在不断增加，特别是能够通过联邦大会带来利益的集团的议员人数，他们不是为了政治奋不顾身，而是用政治来谋生。

政治经济学教授特奥多尔·艾申堡1961～1963年任图宾根大学校长，一开始就对新的民主主义道路做出了反应。1955年，他发表的文章《协会的统治？》是议会制批判的里程碑。他用许多例子表明，在基本法和国家公务员法中根深蒂固的管理体制将被各种小团体的权利打破。知道“联合会公爵领地”那股无名力量的公务员都害怕与他们陷

> 入斗争。有时候这种胆怯会延伸到部长们身上，他们把“选举流动奖”看作他们的乌纱帽并把宣传放在高于官员利益的首要地位上。这样慢慢地——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政治需求——产生了“自满状态”。“需要负责的人之间出现了消极的竞争，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在严格的条条框框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康拉德·阿登纳的领导下“落后地”运行着。如果《阿伦纲领》[1]（1947年2月）仍然把这个政党当作经济政治的改革党，那么，巩固权力的考量已被推到台前。政党间的斗争将转化为接管国家的态度。

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对党的领袖，本应特别关注联邦环境的发展。随着库尔特·舒马赫英年早逝（1952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在政治的安逸中搁浅。1895年出生的舒马赫曾是阿登纳最强劲的对手，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重伤，是德国国会的议员，在纳粹时期几乎长时间被拘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也是战后时期最热情的政治家，他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如果没有他在联邦议会的抗争，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联邦国家，而会产生一个联邦联盟。他为了重新统一德国而奋斗的最终政治目标——被东德的共产主义一口否决——因为阿登纳强制实施的亲西方政策没有实现。但不管怎样，恰好在这样重要的“决定命运的问题”上，他体现了德国人民的良知。不过，他以伤人的尖锐语气攻击对手，就连本党派的人也得罪了，并且他的“爱国嚣张气焰”妨碍到了别人。威廉·凯森（不来梅的市长和参议院议长）曾经在1949年警告舒马赫，让德国社会民主党垄断爱国主义的做法会有严重后果，但他显然忽略了是历史的先例让舒马赫害怕德国人民会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没有祖国的党。舒马赫忍受着巨大痛苦生活在新的西德，要求建立新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水准，虽然肉体残缺，精神上却是永不倒下的斗士。“我们赞同民主，民主是承担我们过去和未来的理念。我们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借助民主政体的手段为了社会主义奋斗。”



紧急情况法案第**3**次宣读草案，**1968**年**5**月

埃里希·奥伦豪尔自1949年以来任联邦议院议员，1952～1963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然而他不能胜任舒马赫的继任者这一职位。他是舒马赫的反面，是一个机关人员，心思完全放在了组织忠诚度、组织纪律性和团结性上。在当时，“奥伦豪尔代替阿登纳”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愿望，“老实人和爱国者”奥伦豪尔根本对付不了狡猾的阿登纳。

卡洛·施密特（从1949年开始任联邦议院的议员，1957～1966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代理主席，同时也是文学家，曾获得1967年法兰克福歌德文学奖）要求社会民主党精兵简政，否则就没人能晋升。在194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拿下了29.2%的选票，1953年为28.8%，比上一次选举还降低了0.4个百分点。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大范围地区的不稳定，急切的讨论要求党派从机关人员的官党转变为人民的政党。对此，赫伯特·维纳、弗里茨·艾勒和卡洛·施密特确定了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务实重效的新纲领的方向。

1959年11月13～1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340名代表参加了巴特戈德斯贝格会议。随着《巴特戈德斯贝格纲领》的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坚守任何一条世界观或者历史理论观，他们拥护的是能在多元的国家内有理由存在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尽管经济版没有刊登“社会主义化”这个术语，但报纸写道，公有制作为国家监控的一个合法形式是实用且必需的，若用其他手段，就无法建立经济权力的健康秩序。在某些工业企业里存在的共同决定制标志着向经济新秩序靠拢的开端，但也强调了竞争的意义。国际形势有所缓和、裁军、反对大规模毁灭武器和整个德国加入欧洲和缓地带让德国终于获得批准能拥有自己的国防军。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不断取得政权的道路上走完了最费时和最困难的一段。到此为止了！漫画家在卡尔·马克思的脸上画上了讽刺的眼神。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会议前，党主席团在最后的集团信函结尾签署的是“致以社会主义的问候”，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会议后签署的是“致以友好的问候”。

1966年，西德的政治氛围终于找到了“安宁”——一方面，人们很高兴纷争动荡不再（瑞士记者弗里茨·勒内·阿勒曼满意地断定：“波恩不是魏玛！”）；另一方面，人们也嗅到了经济不景气和发展停滞不前——“大联合政府”[2]的建立让这种意义下的政治“安宁”在议院制里“功德圆满”。路德维希·艾哈德下野，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成为新的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成了副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接管了财政部，而卡尔·席勒就职于经济部。两大党派的纲领和计划彼此非常相似，其箴言是“不要斗争，只要和谐”。阿登纳时代之后，走阿登纳老路的人（曾涉足联邦总理一职）和追随艾哈德的人“悄然”退场。

特格尔恩湖好人[3]

现代德国“试剂”中的主要成分是一名体态丰腴但行动敏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人，比起“温室波恩”，他更喜欢在南拜仁的前阿尔卑斯山地区过他的自由日子。路德维希·艾哈德（1945～1946年拜仁州的经济部部长，1948～1963年任联邦经济部部长，1963～1966年任联邦德国总理）是德国经济奇迹中伟大的标志性人物。

他确保了德国建设和德国民主的团结和稳定。作为“构建的社会”——“构建的社会”是他晚年的口头禅——德国觉得自己有必要遵循阿登纳“不搞实验！”的原则。但是，作为从废墟和碎片中拔地而起的这样繁盛而闪烁光芒的国家的开国元勋，艾哈德也是一个有革新意识的人。政治学家汉斯·迈尔认为，战后时期唯一切实的制度改革者原本是艾哈德。也就是说，当他使得僵化的社会情况再次活跃起来，当他废除了食品配给票和强迫性集体劳动，自由市场经济才得到发展。拉尔夫·达伦多夫持同样的观点。

“本世纪德国社会最彻底的变革与艾哈德这个名字密不可分。如果人们也考虑社会，而不仅仅考虑政治结构的话，可以说这次变革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彻底。”

A.J.尼霍尔斯注意到，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艾哈德的纲领多么具有开创性，他们把它说得太诗意了。艾哈德没有重新搞新自由主义那一套，而是创造了全新的制度。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对参与理性的认知，即如果人们既要避免教条的、忽略人性基本需求的计划经济，又要避免不计社会后果、放任无度的资本主义，就必须既讲自由又讲义务。

在他广为传播的著作《为全民的富裕》（1957年）中，路德维希·艾哈德指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和构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曾说，他还从没遇到过这么一位对正确道路有如此直觉的经济学家。“随着经济政策由强制经济转型至市场经济，我们做的要比采取狭义上的经济措施多。我们宁可在新的基础上和新的开始之前创造

我们社会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生活。我们必须发誓放弃那些因为精神的不自由而引起的、不可容忍的暴政和极权主义思想。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新秩序，通过在有效组织下的自愿分工和责任意识追求整体的秩序。”

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的做法是先慢慢放弃计划经济，慢慢理解社会市场经济可能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与他们的做法相反，艾哈德在某些方面有近乎天真的能动性，他成功地把政治道德和经济成果结合起来。勤奋、诚实、拥护自由与物质独立和个人富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应被废除，但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不错的收获。

“现实人道主义”精神同样影响了艾哈德强制实施的负担平衡法（1952年8月）。在国民经济发展问题上，战争/战后时期因为毁坏和驱逐而产生的亏损和损失都应得到调节。为了给法律的实施筹备资金，有相当资产的人必须每年向调节基金交付财产、抵押利得税和信贷利得税，这些税款由位于巴特霍姆堡的联邦调节局管理。这样，战败导致的财政后果应该能被分配到所有国民身上。法律强制执行的负担平衡福利金是消费的催化剂，如主要赔偿（按照遭受损失的程度排列等级）、战争损失抚恤金（为了生活费用和养老的生计补贴，根据损失和家庭收入计算的赔偿抚恤金）、家用器具损失、储蓄存款赔偿。法律不强制执行的有重返社会/建设的借贷、居住面积补贴、扶困基金救济金、教育补贴等。



1958年，联邦副总理和经济部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一次柏林的卡巴莱演出上

当然，艾哈德在他的政治生涯，特别是任职联邦总理时期促成的某种心态也越来越妨碍社会政治的思想改变。“善行”闷死在“善意”的泡沫地毯里。1965年，《明镜》周刊记者赫尔曼·施莱伯把这个“特格尔恩湖好人”描述成一个非政治化的、有真实感情形象的男人。

如果“瓦解派知识分子”中有人胆敢指责社会市场经济的意图和成果，总理会勃然大怒。当罗尔夫·霍赫胡特在《明镜》里——汉斯·维尔纳出版的文集《为了新政府或者“别无选择”》的预印本收录了这篇文章——说艾哈德热衷于在上层领导层中搞阶级斗争时，艾哈德反唇相讥：是有这种唯理智论，最后变异成蠢材论。“于是，我不再是诗人。而小人们开始以最愚蠢的方式狂犬吠月。”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对当代的

消极和怀疑态度，它会让年轻人把元帅权杖放进背包里。所以，需要在有责任感的精神和苍白的（物质的、没有气节的）精神中做个区分。《明镜》周刊这样讽刺道，路德维希·艾哈德想的和说的好像“积极在哪里”这个问题不是提给开斯特纳，而是提给他一样。“从他嘴里出来的不是原本的语言，而是流动的思想。”而约翰内斯·格洛斯（1964年）却认为，艾哈德不是外强中干的敌人。“艾哈德对德意志民族品德持高度赞赏态度。社会和它的总理之间达成一致的首要原因就在于他。”

波动时期的富裕

1956年1月29日，苏黎世剧院上演了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悲喜剧《老妇还乡》，该剧由奥斯卡·瓦尔特林导演，特雷塞·吉塞和古斯塔夫·克努特主演。1956年5月，在慕尼黑的小剧场里，由汉斯·施维卡特导演，再次由特雷塞·吉塞饰演“老妇人”一角的德国首演也取得了成功。这次成功是巨大的，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部戏剧被搬上舞台达115次，在国外，这部戏剧是战后以来最成功的德语舞台剧。在批判式的写作中，迪伦马特对德国经济奇迹做出总结——用“社会批判的胡闹”的形式。

女人们：适宜的裙子包裹着娇小的身子；

男孩：年轻人开着富有运动感的车子；

男人们：商人的大型轿车；

女孩：奔赴红毯上的舞会；

医生：在新的铺着绿色瓷砖的手术室里兴高采烈地进行手术；

所有人：晚餐在家乡享用，然后愉悦地点上一根上好的香烟慢慢吸。

教师：有求知欲的人好学地学习着；

第二个人：勤劳的实业家积累的无数财宝；

所有人：伦勃朗到鲁本斯。

画家：艺术可以完全为艺术家负担生活；

教士：圣诞节、复活节和基督降临节，大教堂将因基督徒们变得拥挤；

所有人：闪耀着光芒，威严地疾驰在铁轨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连接着民众的火车又要出发了。

回首经济奇迹时期，亚历山大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在《哀悼无能：集体行为基础》（1967年）中写道，西德人通过从对自己的纳粹过去的纠结中抽离来做到物质上的提升。历史良知的缺失来源于自怜自伤（自相残杀以及抑郁中的自我憎恨）。多数德国人并未有意摆脱弗洛伊德“回忆、重复、处理”意义上的过去，回顾过去时，他们会觉得纳粹统治时期如同儿童时得了传染病的介入治疗阶段。如果说人们在“元首”的保护下愉快地经历了集体倒退——做“被选中”的人民当然棒极了——那么，随着“零点时刻”的到来，特别是在货币改革和西德建立之后，人们赶快以高昂的激情转向正常的生活状态，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事没有发生过。亚历山大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说，废墟上的重建激起了钦佩和羡慕的企业精神，所有的激情都集中在工业建设和现代化上。



为拍摄时尚照片做准备，柏林，**1950**年

费德里柯·费里尼的一部电影《甜蜜生活》于1970年代初期激起了公众的不安，被称为揭露联邦德国“甜美生活”的电影。名妓罗斯玛丽·尼特利比特在法兰克福被谋杀（1957年），这桩谋杀案倒让民众在上映之前就认识到了这部意大利电影的主旨：上层社会的某些阶层和社会最底层及犯罪分子在生活方式和不道德行为上是很相似的。尼特利比特被神秘地杀害了，她的顾客圈子主要是富有的或者有影响力的男士。当费里尼的电影上映时，对尼特利比特的一个熟人的听证会正在进行，因为缺乏证据，他被无罪释放并一跃成为彩虹出版社的当红明星。［罗尔夫·蒂勒完成了一部批评社会的轰动一时的电影《女孩罗斯玛丽》（1958年），由娜嘉·提勒主演。］

1958年出版、由格尔德·盖瑟撰写的小说《最后一球》是一个关于

一座名叫“诺伊-斯普尔”（Neu-Spuhl）的中小工业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迎来了经济奇迹。战争已经过去，伤口已经结痂，凶兆反正会有：人们变得同样的肤浅、同样的自私、同样的野蛮。“在诺伊-斯普尔，人们不停地说着东西的价格。”但只有少数人还知道人际关系也有价值。

马丁·瓦尔泽于1957年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姻》。对此，维尔纳·赫尔维希在《南德意志报》的评论里写道，这部小说清晰地描写了那个如今摧毁了所有人性，在西方世界特别是联邦德国里蔓延的深度谎言。在婚姻和职业经理塑像的拉锯战中，我们不懂得在实际中让宝贵的个人自由结出硕果，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我们的无能。

甜美生活的背面

画报《快点》的第三年第1期（1950年1月1日）中刊登了一张标志了1950年代的突破的卷首画：一位年轻的母亲，衣着整洁，高举着她赤裸的婴儿；她身后是她的丈夫，梳着精心打理的发型，领带略微随意地系着；左侧和右侧是祖母和祖父（他还穿着竖领衣服），所有人手握香槟酒杯愉悦地、兴奋地、面带微笑地注视着这个哭泣孩子的脸庞。“为第二个五十年代干杯！要活到2000年！”

大部分的人都满心希望地向前看。但是，那些在战争和战后时期被熬得油尽灯枯的人几乎与“甜美生活”无关。1/10的年轻人丧失了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双亲。根据联邦政府于1953年10月20日发表的一项声明，西德1/3的居民从社会或者救济保障中获得帮助。直到莫斯科于1950年5月宣布释放战俘，估计有150万德国人在苏联监狱里。同时增加了大量从民主德国逃出的人，逃亡直到1961年建立柏林墙才停止。失业率上升，饥饿和传染病四处蔓延，不断需要使用从美国进口的抗生素。1957年4月，奥博豪森才首次采用新索尔克血清来为人群接种疫苗以抵抗小儿麻痹症。还有在战争中致残的人，阵亡士兵的遗孀和总是希望“奇迹”（即丈夫、儿子、兄弟、亲人的愉快回归）发生的350万名失踪者的家属。他们的命运是战争最糟糕的结果。

1950年，有23.2%的人从事农业工作，1960年有14.1%，1970年有8.5%。1950年，有42.3%的人从事工业工作，1960年有47.8%，1970年有48.8%。在劳务部门和公共服务业中，1950年工作的人占总人数的32.3%，1960年为37.1%，1970年为42.7%。在领工资和薪金的人当中，几乎一半人每个月只能领到250德国马克。1950年代初，工业行业的工作——鉴于不完美的企业组织架构和落后的现代化——属于“体力劳动”。劳动者特别是专业工作者面临的挑战导致不同工作的强烈认同感。在被认可的社会市场经济整体概念框架下，人们也感觉自己对“整体”负有责任。“保持排字机所有零件的干净和干燥！”这是印刷和纸业工业公司的中央机关报《印刷与纸》在第23期（1950年12月1日）上写的。“就像铅印是血液一样，杂志是机器的心脏。当干燥的字模欢呼着经过不同的心室时，操作机器也成为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同时提醒和要求您：保养和爱护机器的心脏。”

> 明斯特科学家汉斯-保罗·巴哈特和海因里希·波皮兹做了一项颇具开创性的调研，调研以在西德广泛的工业行业做的问卷调查为基础，结果勾勒出五种劳动者典型：只有1%的人会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阶级斗争做出反应；超过1/3的人勉强接受经济组织的软弱无能并退回自己的私人小天地；大约25%的人认为工会还没有做到所有应该做到的事情，但他们会用全部热情来响应企业生产力的发展；1/8的人有旧式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期望社会缓慢但坚决地向着一个新的、不再分上层和下层的经济社会秩序发展。总的来说，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对目前的工作配给情况和社会现状感到满意。

父权制的家庭结构不断加强。货币改革后，许多妇女丢掉了她们的工作，战后回国的人受到优待。1951年，有57%的妇女没有工作，相比之下，男性失业率则为近43%。这样一来，妇女又要依附于男人的收入，男性再次担任了负担家庭生活的角色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家庭领导”。“当我的丈夫成为家庭领导时，我就显得相当多余了。不管怎么样，他让我觉得没有他的话，我不可能把所有事情做得这么好。”

出生在战争年代、在婴儿和孩童时代就经历过战火和歉收的孩子成

了很大的担忧，这尤其会演变成学校的困难。一旦母亲参与工作，“钥匙挂在脖子上的孩子”的问题就会凸显。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在废墟时代，大部分的人都很穷，大家的感觉是一样的；而如今，消费压力和社会声望之间的差别对人们的身体和心灵都造成巨大负担。一部分人相对快捷地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准，另一部分人则没有——尽管他们也孜孜不倦地努力——挫败感和嫉妒感由此不断滋生。家庭内部关系遭到损害，而人们却往往只把家庭理解成“为提高小康水平而建立的工作小组”。约阿希姆·伯达默（时事评论员和神经-抑郁症的专科医生）提出了关于父亲和母亲在机械化消费社会的家庭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他说，父亲是中心和权威——权威好比“知识产权”，这并不仅仅指对生育，而且指父亲对孩子心灵上的成长负有责任。这样的父亲身份在不断消失，有工作热情和劳动意愿的父亲认为，他个人的任务就是给家庭提供经济保障。实际上，他对家庭的态度过于草率。反之，由于对男女平等的错误理解（从特定的男性工作到运动和享乐品消费的极限），妇女也陷入纷乱之中，离开了家庭和灶台。伯达默的书《当今的男人：外形与心理》（1956年）提出，“没有影子的女人”遇上了“没有素质的男人”。

> 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无主之家》于1954年出版。小说描写了被冷落的孩子的悲惨世界，他们成为成人生活方式的牺牲品。齐格弗里德·伦茨说，伯尔的角色以不容忽视的方式责成读者思考时代。“他的角色让我们又一次认识到自己，认识到我们长期以来是什么，我们因为冷漠和胆怯不敢承认的东西是什么。”读者看到了自己的困境。伯尔用一些事件摧毁了这些角色，使他们的困境看起来更加具有真实性。但正是这一点又让人们不愿意信任这位“科隆好人”。他言之谆谆地指出，这个“新毕德麦雅[4]时期”熠熠发光的外墙掩盖着一个阴暗的后院，这个欧洲中心的国家有极其贫瘠的边缘地带，而现在这些贫瘠边缘已经延伸到了中心。一面是繁荣的焦躁能量，另一面则是道德的淡漠。

政治的随大流主义和投机主义是“和气生财”的商品美学的左膀右臂，尽管成功地遮住了二十年以来经济奇迹后的社会畸形：人们尚未意

识到，启蒙式辩证的寒流（社会越来越理性化）已凝结成冰山——至少，家庭“照管”感情上的亏空还在公众关注的水位之下。但是，在经济奇迹时代，被忽视了情感需求的青少年用闹事来争得关注的事件已经频发，除了这些闹事青年的打斗事件之外，还发生了一系列惊人的犯罪事件，这些事件无不证明了“环境的侵略性”，证明了亚历山大·米切利希[5]的理论。

> 在1962年至1966年之间，尤尔根·巴奇残暴地杀死了四名青少年（并有上百次无果的谋杀企图）。巴奇这种行为的典型心态模式（很大范围内与权威人物症候群相似）是闭塞教育方式和闭塞环境的产物。收养他的父母体现出了小市民的美德（真诚、准时、整洁、信任、勤奋），但他们并不理解这个少年的独立。巴奇称呼他的养父为一个“劳动动物”和“粗暴典型者”，“挣扎于生活”，“对孩子或者通常对于人都没有好言相待”。
>
> 1960年1月，三个来自朗道的男人在普法尔茨（一座舒适的城市，被葡萄种植园环绕，有古老的胡桃树和许多花园，一条鲜花大道通往教堂）杀死了三名士兵。作案者的动机主要是由于社会排斥导致的深刻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导致他们成为同性恋者。能特别反映主要作案者精神-心灵情况的是他的房间内的布置：涂黑的家具，一个摩洛哥的吸烟桌，墙上挂着一幅自己创作的与墙壁大小般的画。画的底色是深蓝色和深绿色，一半是太平洋，一半是史前世界景色，中间是一个女性和一个男性的身体，深褐色的皮肤，更高的地方写着：怀念人世天堂里无忧无虑的生活。

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

联邦德国有一种“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趋势，这种趋势不单指精神状况，社会状况也呈现出类似结构。最底层是外国的雇员，随着德国-意大利协议的确定，通过意大利劳力介绍，正式招募他们来为1955年的德国经济服务。类似双边协议还有1960年与西班牙和希腊的协议，1965年与土耳其的协议，1963年与摩洛哥的协议，1964年与葡萄牙的协议，1965年与突尼斯的协议，1968年与南斯拉夫的协议。1955年，外国劳动者数量为79697人，占了总劳动人数的0.4%；1960年为329356人，占了总劳动人数的1.5%；1970年为1948951人，占了总劳动人数的9%。

从1951年至1956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上升了9.4%，1956年至1960年上升了6.6%。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导致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影响劳动力供应缩减的原因有教育学制的延长，工作时间的缩短（1957年至1967年规定平均每周工作时间由46.1小时减至41.6小时），战后年代出生率低、高退休率，1955年联邦国防军的建设（首先是从工作岗位上抽走了50万人服兵役和担任公务员）以及随着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东德的逃跑浪潮渐渐平息（到那时为止，有大约1400万东德人逃至联邦德国，其中有大量具有合格资质的专业人员）。

> “我们已经习惯了国外的劳动者，”南拜仁劳动局局长瓦伦丁·希布雷希特这样写道，“平日里我们到处都能遇到他们，在建筑工地和工厂里，医院和旅馆里，饭店里，理发店里，甚至在家庭中，如果人们有幸能请到并留下外国帮佣的话。”但是，在德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依然存在距离感，甚至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因为，尽管普通德国人在国外旅行时很喜欢国外的风土人情和如画风景并对当地极有好感，但他们在自己家里却多多少少有些看不起这些人的出身。这需要审慎的表达，君特·瓦尔拉夫于1969年描述了如下常见的对外国劳动者的评价，人们觉得他们“胆小、肮脏并且好色”。“他们辱骂金发女郎并追求我们的妻子。跟他们争吵的人只能得到插到肋骨间的刀。他们脑子里只有女人、妓女、面条。”

> 不过，在社会文化领域还是产生了某些“渗透”的联系，它们能多多少少软化联邦德国地方保护主义。特别有吸引力的是外国人开的餐馆，它们让人们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喜爱享受美食的志同道合者的共性。有良好教养的绅士们带着他们的恋人——正如当时一张促销广告描绘的那样——在剧院散场后去新开张的基安蒂酒窖，就是为了能与她共饮一瓶精选的意大利红酒并享用地中海地区的美味食物。

195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为了研究中产阶级这一最广大的群体——认定，劳动者的社会意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们可能不会再接受这类特定的身份，“被雇佣劳动者、无产阶级、无产者”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都已经不复存在。正如库尔特·舒马赫自1954年以来认为的，他们从思想上与社会重建时期要求的工人阶级已经远离。人们对重建和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感到非常满意。1950年的劳动者月均收入是243德国

马克，这与战前时期的真实收入情况相符。1960年的劳动者月均收入则是512马克，同比提高了111%。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提升，就算考虑不断提高的生活费用支出，这也提高了76%。“经济增长表现在更好的食物、更好的衣服、更好的住房上，表现在汽车的普及和旅行热上，表现在重建和新建的城市上。”社会市场经济得到了广泛赞同，社会主义的事业心衰退了。

两大党在1945～1948年均持有反资本主义方针。这些方针以及工会明确的、以罢工威胁做后盾的要求显著加强了工人的参与权、参与决定权、信息知情权和影响权。特别是1951年颁布的《矿冶工业工人参与决定权法》（铁、钢、采矿）被认为是伟大的胜利，这开启了通往社会秩序的大门。“但是，只有当整个德国的宪法从劳动资本家统治权这一枷锁里解放出来的时候，实现社会秩序的奋斗才会结束。”确实，仅从表象上看，“资本主义的结束”导致“工会的被驯养”（左翼首席理论学家维克托·阿加茨于1955年被罢免）。根据特奥·皮尔克的说法，在关于基础工业的社会主义化和整个参与决定权的斗争中，工会的失败是他们领导失灵的结果，正因为领导失灵，这个人数众多的组织成了“盲目的权力”。



大房间里的**party**，**1961**年

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在1953年的联邦大选中获胜之后，基督民主工会的坚定双翼展开了飞翔（其中“无党派”的要求与分裂的威胁是联系在一起的）。代表“社会自由”的基督教社会理论，所谓的劳资双方在平等前提下“和平共处”——受到耶稣会会士、神学教授瓦尔德·冯·内尔-布罗伊宁的决定性影响——受到了重视。1957年，金属工人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发起罢工。瓦尔特·迪克斯认为，有人认为在以消费为主导的大众社会里，工人的“阶级意识”已经随着他们的小市民愿望一起消失，这样的想法明显不能被证实。他认为，罢工的劳动者们其实是将现代“中产阶级的”想法，比如休假或旅行，和极其鲜明的阶级思想联系在一起。根据废墟时期社会主义化的要求，1950年代的工会

渐渐采取了参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措施。过去强调阶级社会，而今宣传中产阶级社会，人们相信中产阶级社会可以为所有人实现。为了有机会加入消费社会，现存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被忽略了。如果人们感觉自己的福利有望得到提升，那么他们将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批判地接受权力（像联合会一样的工业家族）的统治。因为没必要再过“下等深渊”的生活，所以他们也就任由“上面的人”调配管理。不断增加的雇员数量也促成了无产阶级思想的流失，其中也有部分人来自工人阶级。1953年，雇员人数由400万增加至1200万。

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原来的中产阶级被迫退居二线。基于所有财产的原因，经济上足够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独立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授予了中产阶级人士各种特权，他们被看作这个社会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在这点上他们的价值体系不断向市侩扭曲。经济奇迹时代的新兴中间阶层并不关注独立工作带来的所有财产，而是关注能用来消费的收入。“更美好的生活”是中间阶层的口号。社会的中流砥柱（中间阶层的消费社会）是起带头作用的消费者，他们贪婪地追随着广告的平庸神话。

经济知名人物

1957年，1万个“上层社会人”挣的钱大约相当于将近200万个“下等人”挣的那么多，纳税最多的500人的收入相当于50万个纳税最少的人的收入。有459个人的年收入超过100万马克。人们估计，到1960年，这个数量可达1万人。在老的资本家之外还出现了新的资本家，老富人与新富人一起获得了成功。君特·格拉斯在小说《千年》中虚拟了三个讲述者，瓦尔特·马特昂是其中之一，在西德拜访朋友和敌人时，他确定西德的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他的父亲是一位来自维斯瓦河附近的尼克斯瓦德的磨坊主，小心翼翼地把一小袋蠕虫转移到西德——那是他最昂贵的财产，因为这些蠕虫能预示未来。许多人前来并获得了能使他们成功的建议：印刷巨头、财经专家、资本家、政治家，蠕虫们永不停歇。

德国的快速发展是存在问题的——“蠕虫里还有蠕虫”。

> 一百家最大企业（原始资金为1000万德国马克）的名单证实了德国奇迹般的经济复苏。1959年，这份名单首次刊登在了《法兰克福汇报》上。把这份提名与1936年的情况相比，当年站在顶点的两大康采恩——法本[6]化学工业和联合炼钢厂在战后已经解体。法本化学工业的大型后续公司却还存在，有固定的原始资金并是领先企业，它们在战后清单上排名第一、第二和第五。走在最前沿的盖尔森基兴采矿公司是炼钢联合会的后续公司（排名第四），奥古斯特-蒂森-冶金厂排名第十四。在拜恩涂料厂和巴登苯胺厂之后，排名第三的企业是曼内斯曼公司，其之前排名第七。赫斯特涂料厂排名第五。还有一些广为人知的品牌也在名单上：克虏伯、西门子、戴姆勒。直到战争结束，艾福瑞德·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的父亲古斯塔夫是德国最大的军火商（因为疾病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1948年，艾福瑞德·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代替其父亲参加纽伦堡审判，被判入狱12年，但于1951年被释放。从1953年起，他再次成为该企业的领导人。约瑟夫·卡迪纳尔·弗林斯自1942年以来任职大主教，1945～1965年任福尔达大主教联合组织的主席，在克虏伯的审判期间，他就公司的社会福利费用解释道：有权获艾森荣誉公民称号的一定是公司的领导人。

> 同样，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弗里德里希·弗里克[7]于1950年与法本化工的弗里茨特·梅尔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成员卡尔·拉舍一起提前离开了兰茨贝格监狱。自1943年以来，人们就已陆续组建“帝国工业集团的小组”和“对外经济问题工作组”，为对纳粹结束后的资本主义工业政策得以延续做好了准备（用知识准备，且常常有党卫队和冲锋队高级领导人在内）。

对新兴富人而言，货币改革尤其意味着经济快速提升的开始。除了精明能干和积极主动，储藏的商品和原材料以及见风使舵的投机活动，包括用新货币来解决物价波动问题，也是他们致富的原因。汽车工厂主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博格瓦德、袜子工厂主汉斯·蒂尔菲尔德、收音机工厂主马克斯·古隆蒂希以及饭店老板弗里德里希·雅恩都是这个经济繁荣时期最成功的代表。

博格瓦德于1928年创建了歌利亚工厂（三轮车）并在不久之后掌控了汉莎-劳埃德大部分的股权。1948年，这位58岁的企业家研发出第一

辆德国战后汽车“汉莎1500”，这辆有着现代浮筒造型（Pontonform）的汽车与现代（美式）汽车车型相称。此后，他又相继推出一系列成功的车型。但是，这家企业于1960年宣告破产。

1946年，汉斯·蒂尔菲尔德仅带着一只箱子从苏占区越过“绿色边境”来到了西占区。1951年，他号召整个西德的女性参与竞争美腿女王王冠，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姑娘参与测量了自己大腿、小腿、脚踝和脚掌的长度和宽度，一位来自霍尔斯特的姑娘赢得了冠军。这次测量活动是到那时为止范围最大的市场调研分析。借助穿孔机，蒂尔菲尔德处理了调研结果并完成了“1/3的女性身材”的市场图谱，他是第一个穿上德国生产的尼龙和纤维贝纶袜子的人。在1950年代，贝纶袜要价将近200马克，人们也得担心袜子抽丝、变色或失去弹性（之后的“连裤袜传说”之所以成为传说就是因为女性没必要再系着长袜松紧带或者吊袜带了）。

“一个对抽丝生气的女人愤怒的不仅是损失的钱，她还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被抓了个现形。此外，幻想中发生的桃色事件也会被这条倒霉的裂缝一个耳光打醒。”

马克斯·古隆蒂希于1947年开始创业，他用诡计克服了强制经济：收音机的生产和销售在当时是被禁止的，所以他销售每个小孩都能组装成收音机的积木。直到货币改革，他已经卖出了10万个这样的“小型”匣子并挣得了2000多万德国马克。1950年代，他的产品因价格优势获得成功：1955年，他把第一台磁带录音机的价格定在500德国马克以下，紧接着1956年又把第一台电视机的价格定在1000德国马克以下。

施瓦本酒馆里的奥地利服务员弗里德里希·雅恩的事业起步于1955年：他用8000德国马克的原始资金在慕尼黑开了“林茨酒馆”，餐馆主打维也纳风情，贩卖便宜的“南德-奥式烤鸡”。七年之后，他已经拥有上百家餐馆，它们大多分布在西德和奥地利。

《上帝得到权力：回首和环顾德国的富裕生活》是库尔特·普里茨科莱特一本著作的名字。自1955年起直到他去世（1965年）前，他的书都会定期出版。作为经济评论家，他发现了一个市场漏洞：读者群众的兴趣矛盾，既想揭发上层社会，又想从中获悉能导致“黄金巨浪”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并且为了个人发展，人们也许还会偷偷留意上层社会的行为指示。他用这部作品提供了一本描述男人、有权者、垄断集团特征的简明手册。

> 1950年代，在老牌及新富企业里都产生了一股新的带有明显影响力的领先力量：他们是“领头的”雇员，他们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数十年以来“工业巨头”的地位。由于企业科学领导的新方法，“财产合法所有人”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们雇佣有经验的负责人和组织者，而这些人则不断发展成自己的固有等级。
>
> 詹姆斯·伯纳姆的《经理的革命》于1941年在美国出版。他在该书的德语译本里也阐释了越来越美国化的西德经济的真实情况。对于经理人而言，主观能动性不是重点，计划才是，包括生产过程在内的各种任务都必须具有组织性和协调性。经理人也就是所谓的生产领导、商务领导、技术领导、管理负责人，在国家机关里，他们被称为管理人、全权代表、办公室主任。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个人剥削而言，人们把这样的经理人经济看作一种合作剥削的制度。
>
> “经理病”是1950年代经常发生的事，常见于40～60岁压力极大的“负有责任的人物”身上。这些人基本是在整个生命中用强制努力和欲望，通过辛勤劳动获得成功的人……他们经常声称，当他们没有一个特定目标地工作着并且获得一个几乎不停歇的形象时，他们会觉得不快乐。

伟大的消费联合会

在这个伟大的国家，在这一片闪耀着繁荣之光的地区，人们在路德维希·艾哈德赞同的呼喊中骄傲地挺着胸脯宣告：“我们回来了！”人们环顾这个牛奶和蜂蜜流入的国家。幸福的权利（追逐幸福，这在美国宪法中被明确确定）在不断席卷着日常生活的美国化浪潮中成了集体以及个人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繁荣的社会学”断言，新的重要人

物（“中心人物”）是“小人物”。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自由，旅行使他成为世界公民，他相信自己可以长期稳定地就业，他比以前更富裕但花得也更少。真实情况是没有这么亢奋的——社会在不断前进：1950年，一个工业工人还需要为了1千克的咖啡豆工作22个小时37分钟，为了1千克的肋肉排工作4小时35分钟，为了1千克的糖工作1小时。到了1959年，他用6.15小时换来1千克咖啡，用2小时25分钟换来1千克肋肉排，用26分钟换来1千克糖。1950年，一双质量好的鞋子的价格相当于两个工作日的工资，而一台收音机是15个工作日的工资，一辆轻便式摩托车是56.5个工作日的工资，一辆大众汽车是493个工作日的工资。到了1959年，人们需要花费10个小时42分钟的工资来买一双鞋，13.5个工作日的工资来买一台收音机，21个工作日的工资来买一辆轻便式摩托车，174个工作日的工资来买一辆大众汽车。



卡米拉·昆策尔，**“**柏林小姐**”**，**1959**年

“小人物”是思想开放的、狡黠的、自信的（当然也更容易被控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被服务。作为顾客，在平等的中产阶层之间，他感到自我强大。百货商店是重要的词语，用低廉的价格就可以享用封建的享乐。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把法兰克福“N氏邮购公司”的清单称作“没有作者的最畅销书”。

1912年出生的商人约瑟夫·内克曼（1938年在一家犹太人的邮购公司工作，战时是“衣服和类似物品的代理国家专员”，1945年被捕）以他的邮购公司成为经济成功的标志。“内克曼成功了！”据说，他在战后重建时期每晚只睡四小时，清晨，在完成骑马训练之后——作为马

术师，他在运动上也取得了成就——他第一个到公司，大部分时候也是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人。他形容自己同路德维希·艾哈德是“神交”。他把奢侈品做成了消费品，“这是为了消除阶级差异”。他还拥有一家内克曼旅行社，该旅行社在西德大宗旅行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来自美国的精明广告经理——销售心理学家欧内斯特·迪希特的德国巡演让人明白了轻松、游戏般的优越。“一场新型、不流血的颠覆活动的使者，一支打着文明的旗号挺进生活空间的军队”——万斯·帕卡德的畅销书《秘密诱惑：抓住每个人的潜意识》（1958年）揭露了这种操控的方式——而他们的调侃态度有助于消除地方主义的印象。如果人们仍然生活在沉闷的境遇中——至少广告会显露出人们原本想追求的生活：向广阔的世界起程。广告宣传能（在表面上）满足人们因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向往。商品美学的平庸把欲望导向消费。面对世界的不安定，人们重回商店。

广告

我们该去那里/无须担心

暮色暗下来，温度降下来/也无须担心

但是/还有音乐

我们应该做什么

开心点，还有音乐/还有思考

开心点/面对结局/还有音乐

我们去往哪里最好

我们的问题和所有年份的惊恐

能进入梦想洗涤房，无须担心

会发生什么

最好当死一般的寂静/来临

（英格博格·巴赫曼）

广告美学对“美丽”有一种狂热崇拜，这尤其体现在各种“选美女王”的“机构”中。一方面，这体现了商品美学在向时尚前进（所以销售策略越来越回到美女竞争）；另一方面，这种崇拜也“鲜活地”展示出了德国女子的奇迹，与此同时还有新德国感性的一面。

1955年，汉斯·埃贡霍尔·图森认为，如今的公共美女竞选第一眼看起来像是以美女海伦为偶像、永远护卫人类性别差异的某个粗俗而模糊的变种。“实际上，选美正是以一种十分荒诞的形式倒转了它的原本思想。正如妇女把自己的热情隐藏在羞涩之后、把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隐藏在私人的生活帷幕后一样，高贵社会的本质应该是不加冕的女王。”

保守派文化批判认为，美国展示了现代文明社会除了宽松的外表还带来了些啥。《金赛报告》[8] 毫无保留地公开了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舆论哗然。和这种“性别歧视”针锋相对的是贞洁和处女道德。保守派文化批判称，男性的骑士精神是为了保护妇女。“贞洁道德、处女身份、女子对男子第一次委身的秘密和重要性难道不应该建立在对出色妇女的了解基础之上吗？”他们说，这类“修身”杂文批判的不仅是“非道德”，它其实也顺势针对妇女解放——“女子-妇女奇迹”用某些外在形式，标志这一“柔弱性别”不再愿意扮演“炉灶旁的平庸女人”或“娇养的金丝雀”这类角色，也不再只满足于孩子、厨房和教堂了。弗朗茨-约瑟夫·乌尔梅林的“最高保卫机构”——家庭问题部——则将母亲设立为工作。早在就职家庭问题部部长之前，他就在政治上积极努力，把婚姻中的两性对立视为“严酷的竞赛角逐”：一股“反对不安、物质利益的束缚和丧失个性”、反对“必须把人纳入就业”的平衡力量。

1950年，希尔德加德·克内弗主演的维利·福斯特的电影《罪女》因其中一段简短的裸戏引起一场激烈的抗议运动——尽管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是完整的且完全符合被拉平的中产阶层“肯定”的文化理解：一位因战争而堕落的夜总会女郎在与一位艺术家的相爱中再次找到了“自

己”以及“女性的义务”。教士们在布道坛劝说反对《罪女》，发怒的道德信徒用障碍物堵住电影院。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州议会议长煽动地表示：“我在等待游行。”传单重提“我们妇女和女子的婚姻”以及讽刺希尔德加德·克内弗的“我们人民健康的正派感受”。即使过去了20年，在自传《被赠予的马》里，希尔德加德·克内弗依然对战后德国人民的反应感到惊讶。“我不理解，”这位“罪人”写道，“我错过了建立道德观的年代……我没有意识到，随着货币改革，定期食粮和供暖卧室到来，过分的‘贞洁’观也大行其道，并对早前发生的那些他们不理解的事情一律采取忽略、放弃和排斥的态度。”

性革命

1960年代中期，遮羞布落下。如今，曾经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过分怕羞之心转向了反面：好色成为时尚——一些电影已经“准备好了”，比如《轮舞》（导演马克斯·奥菲尔斯，1950年）和《她只跳了一个夏天》（导演阿尔内·马特森，1951年），即使有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阿道夫·居斯特亨提倡的“纯洁银幕行动”，这些电影依然获得了成功。

现代的复制及传播技术使真切、自由的上门性服务成为可能。尤其通过表现性激素，大众传媒满足了它们在富裕社会指定的用途。画刊以精细到毫米的细节展示裸露情节，其详细和露骨到了乳头和阴睾变硬的程度。为了提防对青少年不利的文章，画刊出版处起初还设有联邦检查点，用以监督。在1965年的52期杂志中，《快点》（*Quick* ）杂志有27期，《歌舞》（*Revue* ）杂志有28期的标题有关“先进的脱光时期的女性表皮”。引起狂热兴趣的主题有生殖、分娩、流产、卖淫、婚礼、通奸、性无能、妒忌、离婚。脱光成了流行时尚，对妇女露胸的讨论超过了政治生活问题。

在科学层面上，赫尔穆德·谢尔斯基创办的探究性别、道德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性别社会学》（1950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性科学家汉斯·吉塞、精神病科医生汉斯·比格-普林茨、人类学家卡尔·萨勒皆以关于性问题的重要著作而闻名。路德维希·马尔库塞在其著作《伤风败俗》（1962年）中写到了“愤怒起源”。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乏许多

杂志、报纸上的文章，都登载了对性法律进行调整的建议。黑森州的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是联邦德国最有责任心的法学家中的一员，他要求废除对成人间“简单的同性恋”的处罚。他认为，对通奸的处罚是不必要的。他提倡避孕——因为避孕比流产好，特别是对年轻女孩而言。要教育年轻人采取避孕措施，将建立避孕用具贩卖点——比如自动贩卖机——视为犯罪是不必要的，禁止猥亵这一条就够了。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妇女或者男人自愿绝育既不能被视为无耻，也不能被看作损害身体的行为。这些都是可被接受的隐私。人类可自行决定他是否要小孩以及他本人希望予以他的性爱和性欲什么样的意义。

> 电影银幕上广受欢迎的偶像是碧姬·芭铎（Brigtte Bardot，BB），非常年轻，出身不明，大部分时候半裸着，是“一头没有神秘香水的甜美小野兽，至少也是普通人心中虚拟的小女子。半张着湿润撅起的嘴唇，躺在沙滩、海草和没有整理的床上，没有思想、没有罪恶感、没有压抑。她是那一代人的缩影：在欣赏她的同时也在欣赏《德州怪兽》系列电影中躁动的詹姆斯·迪恩”。（彼得·狄美）
>
> 对于品鉴色情的中产者而言，根据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撰写的同名小说（1959年的德国译本）改编的电影《洛丽塔》中的形象才是偶像。“在全世界，裸露双腿的公立学校女学生多年来就已是轻轻松松就能让成熟女性‘出局’的准型。从课桌到床上——这是私密且无法实现的情色理念，如今广告利用它来谋取利益并且因此开始建立女性广告准型。”（弗里德里希·希堡）
>
> 奥斯瓦尔特·科勒相当成功地刺激（两层意思的“刺激”）了消费者。他认为是他唤起了性爱浪潮，话也可以这么说。他在《快点》和《新评论》中的成功系列连载用一些具体案例向人们介绍并普及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性科学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系列连载，这些人“可能永远不会想到为了解决他们家庭以及性生活方面的困难而从书本里寻找建议”。（顺便提一下，出于这个原因，“尽管有某些内容”，就连市图书馆也还是引进并购买了科勒的有插图附注系列的丛书。）在四个月内，有500万市民观看了根据科勒系列《爱情的奇迹》改编拍成的电影。

天主教武断地坚持教条主义态度——1968年，梵蒂冈（保罗五世教皇）再次反对计划生育（避孕药物已经自1958年，在西德自1961年起被

逐步推广）——而新教教义则展示了自由主义的趋势。神学家赫尔穆德·蒂利克曾撰写过一本名为《性》的书，他在《明镜》杂志的访谈中解释道，人们对性爱的理解有着彻底的转变，这样的变化尤其存在于年轻人的婚前关系中。

一项先由社会学家、之后由黑森州的文化部部长路德维希·冯·弗里德堡领导的民意调查显示，1962年，16岁以上的人中只有1/50的人有一个固定的女/男朋友（1985年这一数据是1/5）。而在当时，甚至没人敢提“是否打算在婚前同居”这样的问题（而在1985年，已有82%的人表示他们愿意先同居再结婚）。



奥斯瓦尔特·科勒最著名的性启蒙读物《你的丈夫，不明生物》和《你的妻子，不明生物》，**1967**年出版，后被拍成电影

在《高中里的性矛盾：一项调查问卷的结果》这一文章中，自由汉萨城市汉堡的教育局局长奥托·布吕格曼确定，中学里的性矛盾几乎总是与市民社会阶层所压制的性道德的矛盾。为了修订性道德，或者说为了促进性教育，1969年，联邦政府为了健康的宣传教育给学生们发放了性教育图集。之前在德国联邦大会中有过一次关于学生情况的讨论，联邦政府在讨论中谈到，家长不满意对孩子和青少年的性教育。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赫列娜·拉姆斯认为，这本书源于“启蒙神经官能症”。

在《拜仁国家报》中，人们评价这些性启蒙的文章的语言是“未开化的”：“这是冷冻的色情书的语言。”

> 1965年，乌尔里希·莎莫尼的电影《它》首次上演（它被认为是“德国新生电影”的开端）。地产经纪人助理曼弗雷德（布鲁诺·迪特里希饰演）和科技制图者希尔克（萨比娜·丝尼恩饰演）同居。“他们的共同点看起来没有问题。之后希尔克怀上了小孩。因为她认为曼弗雷德会把小孩当作枷锁，并且她自己也不想‘出于责任感’而结婚，她打算打掉这个小孩。她向曼弗雷德隐瞒了怀孕的情况并试图寻找各种各样的医生，但医生们都多多少少用令人讨厌的陈词滥调拒绝介入这件事。当曼弗雷德最后终于通过希尔克的一个朋友获知真相时，她刚好找到了一个‘愿意帮忙的人’。两个人在卧室里相向而坐——无言。”

商品美学迷人的光辉覆盖在经济奇迹之上——外观如同选秀出来的美丽小姐、电视播音员和封面女孩一样——影响了化妆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德国女人”给自己化上妆并吸着烟）。特别是现在，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年轻的女子和男子，或是自我感觉是“女士”和“先生”的妇女和男人充满对漂亮服饰的向往。人们既喜欢运动风也喜欢优雅风，既喜欢时尚风也喜欢豪华风，既喜欢美国人也喜欢法国人，既喜欢贝纶制品也喜欢高级时装设计。纽约、巴黎和罗马的一切都在起主导作用。年轻女孩的梦想围绕着衬裙，用贝纶能为“年轻的、如同羚羊般正在成长的女孩”制作出“敏感的”时装，而因吃香喝辣而变得丰满的家庭主妇也能享受贝纶的好处。

“年轻女士不再需要缝补这么多……熨这么多，清洗变得越发轻松……服饰的繁荣不断发展。人们能穿得更好，彼此也更满意。”

> 克里斯蒂安·迪奥自1943年就是巴黎的时装设计师，于1947年起草了“新视野”，在战时单调服饰的交替期间，他为新兴女性设计了细腰、高跟鞋、浪漫的荷叶边和明亮的肤色——柔嫩的、需要依靠的、高雅的、脆弱的。淳朴的优雅代替了军队的笨拙（妇女经常要服兵役）。随“新视野”的成功而来的是战争结束的宣布。不久他又创立了新的“新视野”：1951年的椭圆线条（重点突出胸部、腰部和臀部），1952年的箭头形线条（裙子的钟形款），1952年的郁金香线条（拉伸腰部，紧身裙），1954年的H形线条（胸部处低矮，铅笔款紧身裙），

> 1955年的A形线条（上装开线至臀部，打褶的裙子），1956年的圆弧形线条（落肩，宽松裁剪的衣服）。1966年，迷你裙成为时装，从英国流行开来。

由卡尔海茨·格劳登茨和签署波恩协议的女官员埃莉卡·帕普利茨写的书《礼节》告诉人们，什么是“适当的”：在第三帝国、战争时期和废墟时期的破败之后，文雅的市民社交举止迎来了复辟。弗里德里希·希堡认为，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掌握必要的“举止行为”，但建立不了社会，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把更高的生活方式普及给大家。如今大部分的社会名流都是靠宣传出名的，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不会从社会作风上看到出现在正常消费的生活道路上的错误痕迹。

> 她穿着内衣站在三格的梳妆镜前，腋窝下露出了少许腋毛，穿起衬裙，梳着马尾辫。梳妆台的玻璃平板上放着梳子、润肤膏和粉盒、香水，她穿起尼龙长袜。“我看起来怎么样？”接着她突然以单脚为轴快速地转着圈，衬裙的网纱迎着风鼓胀起来。她穿上了一件黑色的钟形裙，扣起了衬衣上胸前的扣子。“我漂亮吗？”接着，她在颧骨上轻拍了些胭脂，用指尖打圈的方式涂抹着皮肤，打开她满是睫毛膏的小箱子，用舌尖沾湿了眉笔，打上香粉。准备好出门了。“我们出发吧！”父亲坐在起居室里椭圆形的办公桌旁说道。安格莉卡·梅希特尔在《我们贫穷，我们富裕》的小说里描写了这一幕。

赌运和哀伤

“你们知道的年代”（以及人们后来感伤地回忆着，认为犹如青少年启程的年代）是一个时间阶段。在这个时间阶段里，在文学以及艺术上，深刻意义和毫无意义之间、阴暗魅力和嘲讽搞怪之间的波动是很常见的。几何学式的效率被毫无计划的颜色和线条混乱所替代。在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愈发僵化的状态中，洛可可式风格兴盛起来。这种风格游戏人生的态度让大汗淋漓的小市民的梦想轻松起来。新的赌运有着吸引人的沉郁、奔放自由的情欲、阿拉伯式的漫不经心和狡猾的暧昧——它们影响了一些作品，比如《蓝色侍从官》（由沃尔夫·冯·尼贝尔许茨撰写），《众神的玩物》（由鲁道夫·哈格尔斯坦格撰写），维尔纳·吉

尔的绘画，贝勒·巴赫曼的轻松绘画（同样对菲利普·罗森塔尔的瓷器创作有影响）。

对“什么是精巧生活”这个问题，无论是出于学术还是后来时尚的好奇心，“存在主义的巴黎”都是出色的“发射场和遛马场”。与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自由恋爱的让-保罗·萨特住在那里。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波伏娃的书《第二性》（1949年）“对身处巨大绝望、完全孤立的妇女而言，犹如那信号灯在黑夜中闪烁着光芒”。（爱丽丝·施瓦泽）

萨特相信，自由先于并造就了人类的本性。（“我就是我的自由！”）在社会意识中，萨特的这种信念被视为一种可以挣脱“体制约束”的生活态度。在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的狭隘（包括橡皮树-异国情调和卡普里岛旅游）里，反抗颇吸引人。阿尔贝·加缪谈到“反抗中的人们”，反抗促使了团结：“我反抗，故我们在。”1960年他去世之际，《最美丽》（*Das Schönste* ）杂志写道：“一名希望者离去了。”

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存在主义（广义上理解的存在主义）成为西德美感崇拜的风尚、态度和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迷惘一代的形象逐渐消失，取代他们位置的是对迷惘一代的逢场作戏。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描述的空虚的人们——这本书作为rororo平装第一系列中的一本于1950年出版，获得惊人的成功——是衣服没领子且胡子拉碴的社会，是由绝望的、居无定所的个人主义者、戏剧丑角和蛮汉组成的一群人。生活的空虚理应在过度的吃喝较量和漫长的爱情之夜中消除。在威士忌和斗牛之间，甜美野蛮生活的弧线将越发紧张。

奥登·艾博斯的《恐惧年代》（德语版，1958年）的主要情节——保守的抒情诗人、散文家和批评家汉斯·埃贡霍尔·图森（图森著有《没房子的人》，1951年）认为这是一个现代的不如意的例子——在纽约酒吧里上演。“当历史的道路被中断时，当军队用大话、套话组织着他们再不能恢复的荒凉时，当必要与恐惧、自由与无聊互相联系在一起时，

酒吧交易就到了鼎盛时期。”酒吧作为战争的遗物被保留了下来，“遗物成为祸患，恰好处于花花世界和垃圾处理场的中间。对许多同伴来说，在民主的荒漠中，酒吧是夜晚的绿洲”。酒吧尤其是新兴的“存在主义一代”的中心聚集地——他们被勤劳的、忠实的市民用“怪异的眼神”多疑而钦佩地打量着。

弗朗索瓦丝·萨冈和波纳德·巴菲特用真人表现了什么是1950年代的阴沉美学、雌雄同体的忧郁和卖弄风骚的“青年风格”。《你好，忧愁》：反对挥汗如雨的田园生活本质上局限在美学的反抗中。弗朗索瓦丝·奎雷兹称自己是弗朗索瓦丝·莎岗，19岁那年（1954年）出版了小说，她引用了保罗·艾吕雅的一首诗作为书的开篇：“再见悲伤/你好悲伤/在天花板上列出……离开我吧，悲伤/再转过来吧，悲伤/你存在于我梦中的心上……”

17岁的塞西莉讲述着她的恋爱生活、她的父亲和如同丝线般柔弱疲惫地笼罩在她身上的悲伤。在这个索然无味的奢侈世界里，她代表了时代对美丽的新看法：对有教养、整洁、死板管控的生活方式感到惧怕的青少年。

“你看起来像一只野猫。要是我有一个漂亮、有着金黄色头发、有温顺的瓷器般眼睛的丰满女儿就好了。”

做爱——免于惩处，不必担心——尤其吸引了介于少女和年轻女士之间的女子。她的教育被“确定”在礼貌和好教养上，而她的性爱却被压制。一本狂热崇拜的书被拍成了一部狂热崇拜的电影（导演奥托·普雷明格，1958年），不计其数的女子模仿电影中的女主角扮演者珍·茜宝，把自己的头发剪得像火柴棒那样短。紧接着，弗朗索瓦丝·莎岗的其他书也获得了快速的成功：《微笑》（1956年）、《一月之后》《一年之后》（1957年）、《你喜欢勃拉姆斯吗？》（1959年）。“……那是令人窒息的悲伤。在玩世不恭的背后是温柔、甜美和绝望。”（芭芭

拉·邦迪）

博纳德·比费作品里的绝望更让人难以忍受。这位1928年生于巴黎的艺术家于1947年卖出了他的第一幅绘画，1948年“影评人奖”的授予使他为人所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位画家创作了大约1500幅作品。他为弗朗索瓦丝·莎岗的芭蕾舞剧《失落的侧影》起草舞台形象，与弗朗索瓦丝·莎岗和作为记者发现以及作为电影导演帮助碧姬·芭铎（他的第一次婚姻是与她一起）突破自己的罗杰·瓦迪姆一样，比费是法国“早熟”的一代人。他的商标是畅销的高度风格化的阴暗色彩。他平静的生活是“死一般的寂静”，“贴近自然”。就像萨特的《恶心》或加缪的《异乡人》描写的那样，这些作品展现的是局促不安的、其实只是逗弄的恐惧。“在严谨的几何布局中，人物显得僵化、空洞、龇牙咧嘴。离开空旷房间的平面人物成了无生命的物质，带着他的三角面具，他编造的歌曲。”（维尔纳·博肯坎普）

英格丽德·施密特-哈茨巴赫如是报告哈瑙的“青春少女时代”：“人们在哈瑙煮出了第一壶浓咖啡。这自然是非常时髦的……我们经常以一种姿势站立着——右腿稍微往前放，臀部轻微的挪动。偷偷留意电影院里和杂志上的一切，尤其是跟碧姬·芭铎有关的一切。我非常赞赏为了表演而露出的性感……我们多次看到那些闹事青年，那是一场真正的狂热崇拜的电影。于我而言，同样重要的是藤条上的马里恩·米切尔。这个女孩来自丛林，长长的金黄色的散开的头发。那时我们也会偷偷坐在一起看小册子——如今称作连环画册——比如阿吉姆、西格尔德和泰山，并且会想象我们就是珍[9]……躺在泰山有力的臂弯里，在藤条上一起荡漾，这当然只是个梦想而已……总而言之，一些电影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恩出演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这一下子完全是另一个男人的角色。哭泣和表现出的感情。许多年轻人在服饰、发型和行为手势上都模仿他。此外当然还有埃尔维斯式的鬓发。梳子碰到的地方，裤子口袋的后面，没有他，人们当时都不会出门，女孩们也是……‘一起睡觉’是禁忌。‘抚摸’在当时是个神奇的词，而且对此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可以一直摸到腹部，到那里就应该停止了，接下来‘禁区’开始了，我们是这么叫的……我有时也穿着衬裙去摇滚酒吧，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都穿着紧身的裤子，因为去摇滚需要翻筋斗，左边和右边，再扭动腰部，裤子会更实用些。摇滚如同一个阀门，通过它我们身上能感受到

的所有能量都可以被释放。这是生活的乐趣和反抗。‘黑人音乐’在当时只针对成年人。对于我们，我们享受着音乐就像是享受着毒品。不间断地跳两个小时的舞，我至今还能准确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有关于亲吻的最高纪录……那时候克劳斯·金斯基带着他的小提琴演奏民谣，在市政大厅客串演出……我的‘哲学家’彼得，根本就不会跳舞，这让我觉得棒极了。他穿着黑色高领毛衣，戴着有趣的眼镜坐在那，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给我写过诗还题词给我。我们曾经长时间地彼此依偎着躺在床上，界限不明显，但我们没有走下去……我现在穿的还是黑色的衣服，衬裙已经被淘汰了……在存在主义者的节日里，我们歌唱，弹吉他，探讨哲学然后听朱丽叶·格雷考。我的朋友贝妮塔和我看加缪及萨特的书。我们相向而坐，在蜡烛下朗读一小段然后探究其意义。1959年夏天，我与贝妮塔一起搭便车去了趟巴黎。我的父母至今都认为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在当时搭便车的几乎都是男孩子……墙上悬挂着艺术品，有莫迪利亚尼、梵高、图卢兹-洛特雷克、马奈、莫奈……在巴黎我们看到了秃顶的女歌手，在爵士音乐的地下室里我们感觉回到了家乡——完全处在生活的中心。但是，我们却不敢去拜访萨特。”

怪异的口味

假如“丑”适应了时尚的式样，“丑”——自助餐可以证明这一点——能卖得特别好。只是这样的句子却还存在：丑卖不好！（《丑卖不好》是美国式样设计者雷蒙德·洛威的一本著作，1953年出版，成了常被人引用的名言。）式样设计是座右铭。这是时代的要求，不仅要买卖，还要给继续推动发展的经济和谐配上美学的光芒，这样经济才更加名正言顺。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也是群众的社会，“向上”也在拉平，商品美学不仅仅事关如何操控、如何诱惑，也事关如何教育人群。具体的大环境很明确：每个人，只要他够有上进心，都可以买得起“好口味”。西德抓住了这次机会，一切向“漂亮”看齐。在这一点上，用塑料生产生活必需品这一变革也使人们更加买得起。塑料的“容易成型”与“缺乏质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更加促进人们“用过就扔”的心态。聚酯纤维、绉布、尼龙、贝纶、PVC、丽塑板、特莱维拉……都是咒语。1950年代的美丽世界极大程度上就是“塑料世界”。

现代的式样设计——这也受到包豪斯建筑的影响——尽管主要看重

功能方面的美丽，但它们同时也重视产品要能带给人们某种流畅的“暖流”，使人们在情绪上感到愉悦。杰尔特·瑟勒说，1950年代的设计承担了战争前后设计密码连接点的作用。许多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模仿尽管表现出与战前不同的商品美学，但终究还得回溯到“更早”（偶像“整齐”）之上。用社会进化论阐释的德国的“流线型”在不断起着影响（比如大众和梅赛德斯的车身）。与其相反的则是“纠结的”、玩弄罗曼蒂克的、“违背常规的”、“怪异的”口味。古怪、执拗、不匀称的形态占据着主导地位，再加上刺眼奔放、五彩缤纷的颜色使用。尽管由于纳粹主义的灌输，人们对现代艺术依然常常持有偏见，但蒙德里安[10]、克利[11]、康定斯基等的元素还是一再被使用到商品中，并且销量很好、广受喜爱。1952年，纺织厂宝莎公司成立了一个装饰品工厂，在9000件模型中70%是抽象的图案。材料很受大众喜欢：木头弄弯、变圆或压成椭圆并被胶合，玻璃、嵌丝玻璃被切割被磨光，金属模压、冲孔、弄弯、涂色，带有凹形结子的家具装潢料，塑料羊毛条，抽象图案的地毯，有花纹装饰及不匀称图案的窗帘和垫子，各式各样物品的彩色塑料薄膜，倾斜支撑的家具，摇摆样式的椅子，包灯。



1955年的舒适起居，包括飞利浦公司生产的柜式电视

腰子形的桌子是那个时期夸张设计的典型特征——这是同第三帝国时期各种长毛绒的“猎人风格”的决裂。现在人们打算精心布置成现代人类所希望的那样。长远来看，这也与设计师的长期追求有关：他们希望赶上世界水平，或者说成为领先工业国家的标准。室内装潢的热销品有斯堪的纳维亚式的住宅和克诺公司的家具。在《马格纳姆》这本印刷工艺和排版都遵从新风格的杂志中，编者卡尔·帕维克写道：“丹麦人民已经完成了从新德里到纽约、把平面装饰丹麦化的过程。斯堪的纳维亚人

成了式样的新模范。瑞士人成了版画艺术的佼佼者。意大利人高居于建筑构造领地，法国人拥有天才般的建筑构思……德国对国际式样形成的贡献至少是一个构造精良的无线电收音机。”

1950年代，米兰靠三年展逐渐发展成为有良好品位的设计圣地。在所有的领域——从蛋杯到铺好的桌子，从壁纸到布置完的起居室，从厨房瓷器到科学仪器——“美学来临了”。《南德意志报》曾报道了1954年的米兰三年展，文章冠以“置身于现代式样的童话森林中”的标题。“式样约束的大师”瑞典人尤其受推崇，他们的设计看上去好像完全没有刻意修饰，式样从外观上看是精美细致的：极薄、相当细长，仿佛一折就断。他们利用“有趣的”彩色和最最柔和的从无色到涂色的过渡。所有显得“精巧的”、轻快的、愉快的、“透明的”、轻盈的东西都被德国的观察者关注着——也许，德国经济奇迹-物质主义时期的气氛笨拙迟钝，这些东西正好平衡了那些感觉。

在拜仁州工厂联合会——它是德国工厂联合会的一员，自1907年成立以来一直关注着和谐的（人文的）环境设计——的一本册子上写的是关于“房子中的用具”。文中说，文化垃圾，哪怕如今在百货商场遍地都是，也不算现代的特征。册子尤其介绍了“外形美观的用具”，除了各种各样的锅碗瓢盆之外，还有一座荣汉斯兄弟公司的挂钟、一个西门子牌的宽大炉灶、一台博世牌冷冻冰箱、一台薇莲-盖瑟牌直通式加热器，一台梅斯公司的电视机（款型是“马略卡岛”），一台普法夫公司的缝纫机。另外还有来自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博朗公司生产的四款用具：SK61超级立体声唱片机，HL1台扇，T52UKW晶体管和D40幻灯机。博朗对1950年代的德国设计有重要的意义。与百货公司的优雅相比，工具公司生产的产品具有明亮、明了、简单的式样特点，这与现代家居元素是一致的。“如果使用有意义性和目的性，如果成型和生产完全满足这个意义性和目的性，那么这件产品不仅在其外形上是成功的，在个人共同的态度，即我们称为‘风格’的方面也是成功的。”文德·菲舍在《样式——并非一致——布朗设计20年》（1976年）的目录里写道。德国设计领域的三大首脑汉斯·古格洛特、奥托·艾舍和赫伯特·希尔舍在博朗风格（唱片机和电器，其中还有电动剃须刀）的发展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奥托·艾舍与瑞士人马克斯·比尔（包豪斯的学生，建筑师

和雕塑家）一起在乌尔姆建立了一所设计学院，这所学院被理解成是包豪斯思想的继承者，它以“帮助建立与我们这个科技时代相匹配的生活态度”为目标（自1951年起担任校长的马克斯·比尔的话）。绍尔基金会自1947年起就大力宣传其设计，并竭力争取出资者，诉诸德国的道德诚信。自青年时代起，艾舍就与绍尔兄弟和他们的交际圈有联系并且坚决反对纳粹主义。在为学院举行落成典礼时（1955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在700名来宾前——其中不乏包豪斯建筑师——谈论关于“民主社会里艺术家的必要性”，不久之后他又对“新包豪斯”的实用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理论和实践要以工业制造为方向。设计公共设施（修道院）的马克斯·比尔则不予考虑。问题是比尔或者非比尔意味着有质量还是没质量以及“是学院水平还是厂校水平”，马克斯·本塞如此说道。1968年，德国联邦大会停止了每年向该学校提供的20万马克补助，同样，符腾堡州州议会也停止了130万马克补助的供应。“设计学院具体化了西德民主文艺复兴的希望，又同希望一起灭亡。”（克劳德·施奈特语，建筑师和1959～1967年的大学讲师）

私人住宅和家用器械

建设美丽的、让人放松的、文明的社区住房是建筑师们追求的最高目标。这涉及“坚固的幸福”，也就是好的住房（“美丽住宅”的展览直到1950年才首次出现于汉堡）。光照和空气起决定性作用，墙壁越来越多地被玻璃替代，这样能满足人们对阳光的要求和朝南的向往。许多的社会建筑报道推广了这样的画面。报道指明，在应急避难场所和租房生活之后，拥有自己住宅的时机终于到来。

富裕人家孩子的最大幸福是平屋小别墅，在那里建筑师们的艺术能够在“温暖的、治愈的、令人振奋的灯光”中特别准确地得到展现。“地面上的建筑，在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形式的同时还明亮而宽敞……”在“光线良好、通风适宜的”家园里，人们宛若置身于意大利。

房间门是玻璃制的。门把手是红色的。玄关镜的边框是红色的。衣帽挂钩是红色的。挂钩上的帽子是红色的……地板上铺着浅色的地毯。房子里一切都井然有序。白葡萄酒杯里装着白葡萄酒。杯子放在杯垫上。酒瓶立于篮子内。因为屋内有孩子，橡胶做的奶嘴和可乐瓶被放置在装有麦金托什高品质的巧克力和太妃糖的箱子里。孩子奔跑在房子的后面，独自一人，没有光缝，没有毛绒玩具，嘴里也没有含

着拇指……如果他们打算建一个游泳池，那么他们还要从“蜂巢”中取出合适的水球。生活将会是这样，如同《家》第12期的卷首画所描绘的一样：在淡黄色的游泳池里漂浮着一只淡黄色的被切割了的水球。

展示风格的时刻来临。联邦总理用很好的例子做了前导，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路德维希·艾哈德把他的住宅和接待楼建造成了平屋小别墅，建筑设计师瑟夫·鲁弗被聘请负责这次设计，作为现代权威的代表，人们相信他有能力平衡“格调上的平庸”。

行列式建筑（Zeilenbau，住宅成行排列，俗称“板楼”）被看作“闪光城市”的模范，即便行列式建筑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被局限在低层建筑上。它被看作一次解放，一次从早期资本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剥削住房的无耻和可憎行为中、从改革者“好心好意”的伪浪漫中，特别是从已经无法忍受的走廊式街道中的一次伟大的、有必要的解放。“我们可以这么形容行列式建筑：它们是准确的、明亮的、健康的和合适的。”埃里希·库恩于1957年在《基督和世界》中如此写道。

当然，这一切需要理想的城市规划。如果打算节约地基，那么人们就必须竖起“横向平房匣子”。美国展现了——在当年，那是“颇有说服力的方式”——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扩张：卫星城是低矮的且拉伸得很宽的，坐落于城市的郊外，用混凝土和玻璃搭建的市中心建筑仿佛多层蛋糕般耸立云霄，这保证了高额的利润。

那时，建筑空间比建筑的坚固更重要。设计师是冒险的艺术家，是一个能独立“整理”广大群众、促使现代生活运转的人。建筑师的职位很令人神往。城市和住宅都是服务于通向文明完美的整个过程中的机器，勒·柯布西耶是领军人物，他借1950～1954年于朗香（阿尔萨斯）建成的朗香教堂表明：现代建筑绝不能忽略人的感受。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说，绘图中的道德主义者和现代运动的先锋不应该被误解成是呆滞机械论原则的追随者，他们并不想大肆赞扬机器，对纯人文价值也并没有展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在格罗皮乌斯的70岁高龄（1953年）之时，人们向

他发出了热烈的致敬。机器和对新生活方式向往的人道要求的问题成了讨论的中心。和格罗皮乌斯相似，理查德·诺伊特拉（代表作为《如果我们想生存下去》，1956年）促进了设计规划从传统的顺序计划、从几何学以及对称性和传统的美丽模板中的脱离，并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确定了“生理学的空间”。对此，他理解的空间是与“神经作用”相匹配的——这样可以整合空间的划分、家具的布置、绒毛样式、视觉和听觉上的现象、嗅觉上的刺激，使作为“畸形文明社会中过度紧张的孩子”的人类最大可能地获得神经的放松和愉快的感觉。

> 同样，在现代起居室设计中，肾形式样（Nierenform）和直角式样（Rechter Winkel）被互相结合，“有机建筑”浪漫化了“几何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卫生学和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生活空间的完成是1951年达姆施塔特谈话（Darmstadt Gespräch）的重点（“人和空间”）。大约有1000人追随着由奥托·巴特宁主持的讨论并成为重要的建筑师，其中有理查德·黎门斯米得、瑟夫·鲁弗、奥托·恩斯特·施维策、汉斯·施维佩特、汉斯·夏隆（当然不是密斯·凡德罗和格罗皮乌斯）以及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奥特嘉·伊·加塞特、阿尔弗雷德·韦伯）。当忠于自己名声的海德格尔超越了“本质”——他说，房荒不在于房子的缺少，而是因为“会死的人”必须学会居住；汉斯·施维佩特则认为，“空间意愿”是经常存在的，只是人们没有足够的科技手段去实现它。奥特嘉说，人类是一门“技术”，人类属于自然，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不健康的，他必须创建科技世界，通过一台科技仪器来生存。国际现代建筑师代表大会（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rchitecture Morderne，CIAM）成立于1928年，在1954年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举办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西格弗里德·吉地欧解释称“美丽”是“韵律”。人们不能把韵律像贴标签一样贴在建筑上，韵律需要计划和想法。适用于城市中的韵律意味着拒绝过于规律的分配，因此，应该“随性”划分空间、房屋、住宅。

1955年于斯赫弗宁恩举行的国际建筑师联合会（Internationalen Architekten-Union，UIA）的第四次会议——会议受到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提出了标准化、合理化的问题。整个地球几乎缺少10亿套住宅，只有“标准化的城市”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灵魂的城市”里的群众住房可以被任意分解、任意替换、任意搬运，而“闪闪发光的新城理想”应该是它的反面——没有装饰和“热情”，所有的东西在数量上都

是统一的、直角的、可以随意运用在建筑上的，标准化的平面图、房屋立面、鸟瞰图。伊莲娜·赞德说，房子一直在变化，为的是服务人类、人类的矛盾和人类的自然性，却缺乏连续性——除非人们在此之前把人类、生活、气候、太阳、雨水、风和土壤也全都标准化。一旦涉及金钱和付款，理性主义者就会变得少有的精神恍惚。但是，人们会为自己辩解。

建筑历史学家维托里奥·马尼亚戈·兰普尼亚尼提出了“现代社会模棱两可的延续性”。

“无论社会住房建筑、预制装配式房屋、高校、综合型学校还是医院，都是一样的：它们绝大部分都在狭隘的狂热中被生产成炫耀建筑技术、毫无空间质量的蠢笨的集装箱……目光短浅的总审计署建筑和DIN-标准化-建筑给不合群的冷漠加上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必要时会充分运用‘自由’赋予建筑各种实用美学的隐喻含义。它们成了德国经济奇迹时代不露面的标志。”

高高耸起的细高建筑物不符合设计原则，它们仅仅可以标志对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无界限的信任（令人信服的建筑学上的个人绩效，包括由赫尔曼·麦克勒、弗里德里希·威廉·克莱梅、埃贡·艾尔曼、瑟夫·鲁弗、汉斯·夏隆、奥托·巴特宁创建的）。作为完美的玻璃制成的幻象，这些犹如破土蘑菇般的建筑把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汉堡和汉诺威的市容搞得同芝加哥和纽约没什么两样（这赋予了国际风格概念一种消极的意味），它们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艾贝哈德·舒兹是少数几个在这个时期对系统化的建筑做出批评的记者之一，他反对商人建筑的大规模部署和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而标准化制作的“蜂巢建筑”。舒兹说（1977年）：“我们住在新兴的城市里，或者说，就像勒·柯布西耶这种丑角带给我们的那样，住在建好的楼板和它们的身份里，这种身份——如同某个货物箱——实在配不上建筑师的称号。”

> 人们住在卫星城里，在近郊或者市内工作。早晨从卫星城开车至近郊或者市里。晚上所有的汽车再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从市内到近郊或者卫星城，从近郊到另一处近郊，从近郊到卫星城。再晚一些的时间，除了阒无一人的市内，近郊和卫星城里的人们坐在电视机旁，他们中的一些人开车从卫星城或者近郊出发去剧院、电影院、市内酒馆。午夜时分他们再开车返回近郊或者卫星城，早晨再次开车去市内，如果不是礼拜日或者节假日的话。（格哈德·茨维伦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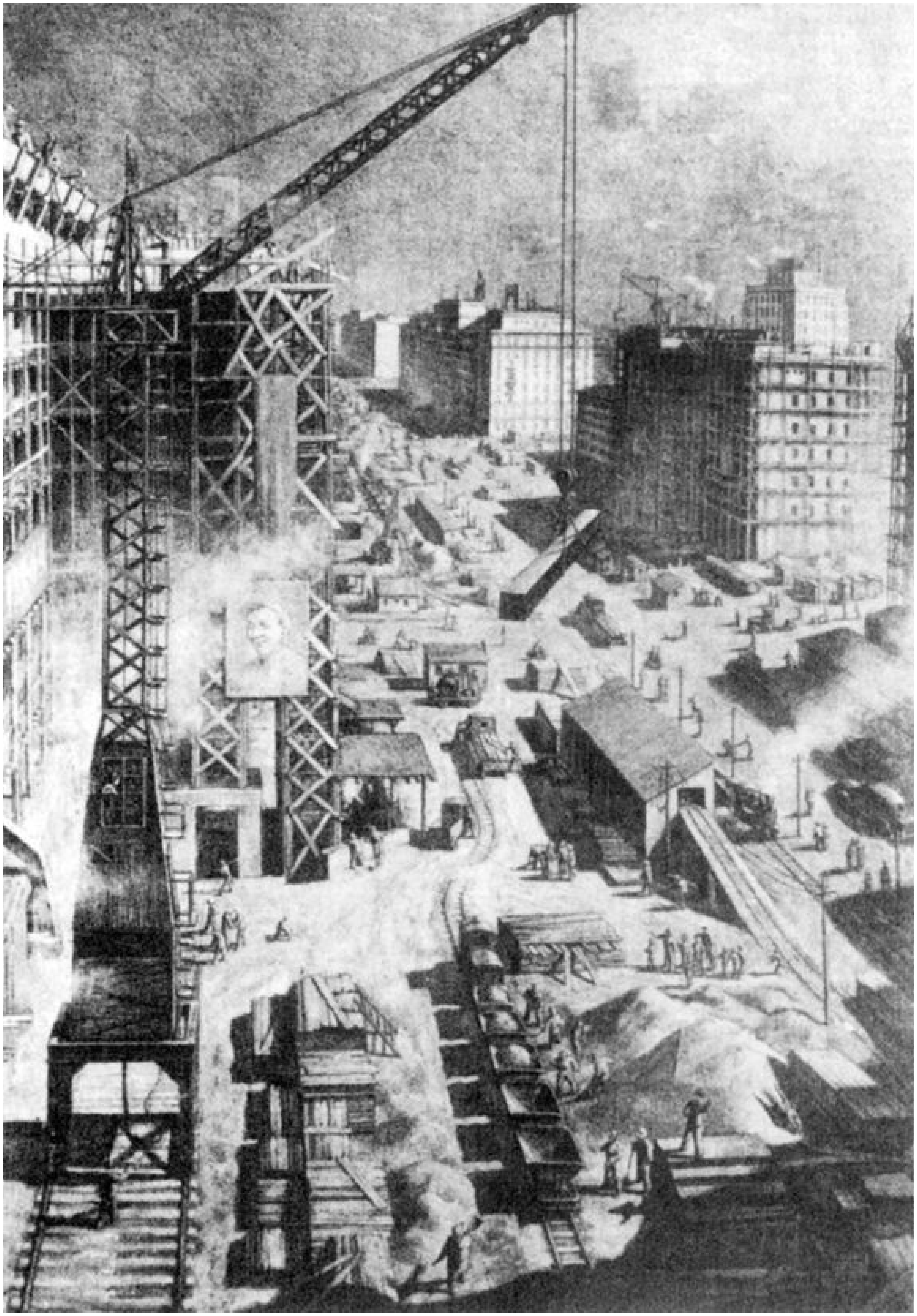
“明天住在市里”是一句格言，东柏林的人们，特别是建筑导演赫尔曼·亨瑟尔曼，以这句格言开始“新社会空间的组建”。亨瑟尔曼1951年的作品《纺织牧场旁的房屋》刻画了斯大林大道建设的开端，这条大道的设计原则介于包豪斯风格和糕点风格之间。

要把新德国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建筑群或城市的想法变为现实，需要考虑到“苏联的经验，德国首都柏林第一条社会主义街道斯大林大道建设的经验，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城市东部钢铁冶金联合企业居住城市建设的经验”。东德政府于1952年10月3日做出的决定（会上通过了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城市建筑重建计划）开启了预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东德大型城市规划的案例之后，根据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建筑法和城市建设准则，开始进行中小城市的规划。”

1951年，弗斯滕堡、斯大林城和艾森许滕施塔特相继建立了第一片住宅区。它们是“简陋的、不显眼的、以开放的行列式排列的建筑。与那些东德传统的新教条没有任何联系。依照瓦尔特·乌布利希的批评，1952年建立的建筑群也严格向柏林的斯大林大道的建筑设计准则看齐”。这座斯大林城有着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坚持贯彻本地区独特建筑传统的建筑师。

“政治缓和时期”有时也会允许在旧市容的基础上建筑，就着对“成长结构”某种程度的体验来摆脱意识形态上的“野兽主义”。然而，1955年以后，全国居住场所由传统到工业施工方法的转变导致了“新兴德国城市”的建筑概念的快速贬值。“早先的房屋和建筑设计是封闭的，考虑

到东德的建筑传统，房屋的建筑也会尽可能对称。现在，人们积极致力于开放的和轻松的建筑模型，用大型砌砖建筑方法和板材建筑方式建造。”最终，传统的城市轮廓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风景越发松散、尤以起重机至上的住宅景观，经济和技术的约束主导了这个交替过程。顾及“在其他城市面对相同任务时也适用的普遍准则”，在部长议会里的建筑业顾问委员会“在符合工业建筑的条件下”制定出了新的指标。按照这些指标，最重要的是空间的松散，“建筑群的位置应更加自由，居住和购物之间要有功能分割”。这预示着，至今为止的城市设想将被打破。“即将建设的统一行式建筑忽视了城市历史的精细结构以及区域性的具有特征的设计标志。”（耶恩·迪威尔）



海因茨·略夫勒：建设斯大林大道，**1953**年

移动的业余生活

汽车使得富裕社会“日常的移动”成为可能。汽车，尤其是向往异地的交通工具，它输送闲暇时光里的人们到达梦想之地。最重要的是，汽车是身份的标志、进步的偶像，帮助并为经济和社会的提升保驾护航。在1950年代的一张宣传广告画中，人们能看到带有可掀开行李室的最新款福特汽车停靠在马路边，身穿白色Nyltest牌衬衫、打着领带的父亲刚好放下最后一件打包行李，旁边他的妻子穿着细方格花纹女装，戴着白色手套，头顶新烫的发型，牵着系着黑色丝绒蝴蝶结的儿子。他们身后是一栋四层楼高的、四方平直的新风格的房子。邻居从窗户探出了头。

“我们办到了。新车停在家门口。所有邻居都倚靠在窗户旁，看着我们在为了一次短暂的周末旅行准备。是的，我们买得起这些，我们打算从生活中获得这些，为此我们两个人都在工作，我的先生在工厂上班，而我则再次回到以前的公司做秘书工作。”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国家实力的提升实现了长时间以来悬而未决的私人拥有大众汽车的梦想。在废墟年代看起来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经济奇迹时代完成了。二战前有802129辆私家轿车，这是对不包括柏林和萨尔兰的西德地区的轿车的估算，1946年降到了192438辆。1953年，私家轿车的数量再次回到百万辆边界，这一数据在接下来的八年内增长了5倍。

> 沃尔夫斯堡的汽车厂是第一家恢复生产的工厂。战争摧毁了85%的设备，好歹还保留了一台能运转的机器。它起初由美国人占领，之后（1945年5月23日）由英国人接管。直到1945年年末，它装配了1293台汽车，其中有539辆军用吉普车，这与西占区私家轿车的整体生产情况是相吻合的。1948年1月2日，英国人将工厂的管理权交给德国人，前欧宝董事会成员海因里希·诺德霍夫成为负责人。1947年，大众工厂以将近9000辆私人轿车的产量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商。1961年12月4日，自1945年以来第500万辆大众汽车于星期一晚上完成了。戴姆勒-

奔驰于1946年，欧宝于1947年，福特于1948年，宝马/慕尼黑于1952年相继恢复生产。西德于1950年重新建立了汽车联盟，多是生产战前的款式。战后，博格瓦德推出了第一台新设计的德国私家轿车“汉莎1500”。这款车与其他款式一样（其中“伊莎贝拉”的销量将近17万辆并获得出口至130个国家的世界性成功），在1950年代左右因其流线型式样、镀铬装饰和白色薄壁轮胎很符合德国购买者的面子需求。

大规模机动化开始于微型和小型汽车——类似有三个或者四个车轮的摩托车，更确切地说是有摩托车部分的汽车。1955～1967年，由汉斯·格拉斯公司在下拜仁州的丁格尔分格生产的Goggomobil是战后德国最成功的微型汽车，一共出厂了24.5万辆。由弗里茨·芬德研发的一个座位三个轮子的汽车（“芬德-弗里茨”）在1953年至1962年由雷根斯堡战时尤因汽车结构出名的梅塞施密特工厂进行改款生产。梅塞施密特的微型汽车大约销售了7万辆。1955年，由宝马生产的“Isetta 300”（是米兰工厂微型汽车的改良复制品）是1950年代一款非常流行的微型汽车。

对南欧的向往引起了一股特别的驾驶潮流。开车的人较少因为想要欣赏或体验这个或那个，在这里或者那里生活。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去过那里。旅行者们带回了作为战利品的相片，起初是黑白照，之后是彩色的，最后带着自拍的视频回家。仿佛迁徙的候鸟（主要是春天和夏天），上百万人同时开车前往地中海海滩（“条顿烧烤”），为了让阳光能照射在肚子上或者心中。“在狭窄的、塞得满满的汽车里，箱子和包堆放在行李架上，哭闹的孩子坐在后座上，父亲开着汽车，母亲坐在副驾驶上，膝间放着街道地图，就这样人们开车前往南方。开车，下车，发现美丽，上车，继续开车。”在尤尔根·冯·曼格斯的小型歌舞剧《泰格迈尔先生》里，主角简短且精确地总结了1950年代以来旅行的真实情况：旅行广告、配插图的报道、电影、流行歌曲无不加深了人们对远方的憧憬。



20世纪**50**年代博格瓦德**“**伊莎贝拉**”**汽车的广告

1952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4的成年人在上一年进行过一次休假旅行，到1955年就已经有一半的成年人自货币改革以来进行过一次或

多次休假旅行（1953年和1956年之间每年有不到1/3的人去旅行）。但是，仍然只有20%的德国人有旅游护照。在废墟时代，人们只能梦想着开车前往异国。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支付得起这个昔日的梦想，人们自信地以客人的身份返回几年前曾经被德国纳粹分子占领过的国家，颇带有某种新的骄傲。来自经济奇迹国的德国人觉得自己“满世界地跑”，将人群抛向世界各地的享受度假幸福的沙滩上的力量是强大的，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在他的《旅游业理论（1958年）》中如是写道，这是一种盲目的、不可言说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在其自身论证的波涛中不断失败。旅游的潮水意味着实际的迁徙运动，通过它，我们的社会状态得以调整。但每次潮水，无论它多么无力，都批判着它所回避的东西。

很多大众媒体将对南部的向往之情市场化，它们试图让人们相信浪漫的、大大的幸福蓝图，但是，相对于这些蓝图而言，现实是很糟糕的。如果人们要想支付得起去远方的度假，就必须勤奋地工作并且强化节约。新的旅游形式为向往和缺钱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叫作野营：帐篷加马达。

随着财富的增加，帐篷被房车代替，带着小市民的骄傲，人们带着自己的四面墙（由塑料和金属板构成）旅行穿越宽广美丽的世界。“在轮子上的定居生活”将幼兽般安静的田园生活与对远方的向往之情的满足连接了起来。在野营地点，人们脱离了工作日的重力，暂时将它束之高阁，人们享受着自由的生活，而不必放弃日常的生活习惯。

还有其他消遣方式。听收音机和之后的看电视排在第一位。东西德莫不如此。

> 史蒂芬·克拉夫奇克如是描述东德的“广播欢乐”：“第一个收音机已经在那里了。第二个收音机，它具有用于说话、爵士和管弦乐的按键，竖立在起居室的沙发床旁边。妈妈只有在早上为了时间才打开它。她为了赶上广播节目，在厨房和起居室之间来回走动，而且还会

> 生气地说：‘又错过了。’直到爸爸终于在橱柜上安放了一个扬声器。她在起居室里穿衣服时只需要打开收音机，在她将劈的柴放到炉子中时就已经知道了她想知道的一切。她偏爱的多是对话广播节目的电台。长时间的音乐使她心烦。当我在晚饭之后想听我的音乐时，就把扬声器插头拔出收音机，断开连接。妈妈喜欢故乡的歌曲或优美的华尔兹舞曲。”

人们定期去电影院，1956年以8.18亿位顾客成为电影产业的光辉之年。人们在周末喜欢出门，聚餐的餐桌成为社交的一个重要场所。年轻人多去跳舞厅、咖啡厅。散步却越来越多地（埃里希·东布罗夫斯基在1957年8月的《法兰克福汇报》中如是抱怨）成为史前的活动。令人遗憾的还有：在运动和类似的兴趣中——根据1950年代末的一次问卷调查，运动只是22.5%的人最常进行的业余活动——与主动消费相比，重心被更多地放在被动消费上。尽管联邦青少年保护计划倾尽全力，还是没能实现团结多于1/3的青少年参加任何一个青少年社团。而这些青少年社团中又只有一半，也就是说大约150万个是体操协会和运动协会。如今，共有大约400万个属于德国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运动协会，而在这些运动协会中只有一半在真正定期运动，其他的只不过在自欺欺人。很多人都在努力用“教育的爱”来维护运动理想相对“技术圆满论”的“纯净性”。民主需要奥林匹克竞赛——“在这种情势下，两个通常很难统一的要求倒具有了唯一的联系：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方面，但同时认识到在战友中平等的你。”（弗兰克·提丝）

运动的理想和实际的差异在足球中有所表现。有60万～70万名足球运动员，与此同时，每周日平均有500万观众观看足球比赛。每周大约有1200万人会花1个德国马克买彩票，每年会赌输掉近0.5亿。

货币改革几周后，在1948年8月8日，科隆-明格多夫在二战投降后第一次迎来了冠军赛决赛（在西德）。有7万人在体育场观看，东西德有数百万人在收音机扬声器旁收听纽伦堡和凯泽斯劳滕之间的比赛。纽伦堡俱乐部以2∶1获胜，这是它第七次获得冠军称号。从1951年起，在

教练赛普·赫尔贝格执教的德国国家队中效力、来自凯泽斯劳滕的弗里茨·瓦尔特作为新生代天才而出名。1954年，他33岁，在这一年里，他作为国家足球队（其他成员有赫尔穆德·兰、吉普·珀斯帕尔、霍斯特·埃克尔、维尔纳·莱布里奇、奥特马尔·瓦尔特、汉斯·夏菲、马克斯·莫洛克、卡尔·迈、托尼·图雷克、维尔纳·科尔迈耶）的队长从柏林凯旋，他们战胜了被高度推崇的匈牙利，成为世界足球冠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没有料到这会成为现实。1954年的足球，世界杯冠军是德国！”（弗里茨·瓦尔特）对很多人来说这证明了“我们又是人物”，这标志着经济奇迹体现到有形的层面上。

德意志的自信也通过在其他体育项目中取得的成功得以加强。自1950年以来，赛普·韦勒是著名的跳台滑雪运动员。1951年，威廉·赫茨在NSU摩托车上平了摩托车的世界纪录。在1952年于赫尔辛基举办的夏季奥运会上——这是德国运动员再次被允许参加的第一个夏季奥运会——赫伯特·沙德在5000米长跑中在埃米尔·扎托佩克和克里斯·查塔威之后位列第三名。在奥斯陆的冬季奥运会中，德国的“滑雪姑娘”蜜儿·布希纳和奥茜·莱歇特赢得4枚奖牌，里阿和保罗·福尔在双人自由滑（以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和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乐曲作为背景音乐）中获胜。由安德烈·欧斯特克掌舵的雪橇队也夺得金牌，挪威的出版界写道：“如果不是两个仿佛公象般的德国人坐在雪橇上，他们还会更快。”赫伯特·克莱作为创下世界纪录的游泳运动员驰名天下。拳击运动员布比·硕尔茨在1958年成为重量级的欧洲冠军。在骑马竞赛中，弗里茨·蒂德曼也是顶尖级别的。

被文化评论家批判的运动商业化总体来讲还保持在适度的界限内。伯尔尼世界杯冠军的加冕为国家足球队的每个运动员带来2500马克的奖金和全套沙发，弗里茨·瓦尔特拒绝了国际米兰和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分别提供的165000马克和250000马克的开价。他觉得，一个足球运动员每个月不应该挣得比320马克更多的薪金。职业选手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在两个等候厅

“巨大的中部国家”有某种地理的矛盾，因为德国的正中有一块无人地带。开始，东西德间尚可通行，后来界限被严密封锁，政治家对此束

手无策——这个“地带”仿佛噩梦，又被反共产主义排挤，人们谈起它来，措辞总得格外小心谨慎。“巨大的中部国家”在西德，在波恩成为形容稳定的俗语，而柏林的中部则被认为是令人对危险冲突心存不安的真空地带。不过，它也为具体化政治和文化上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希望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在“巨大的中部国家”中，人们一提到在本来的中部——德国中部——所发生的事情，就反应过激。双重建国被人们否决，或被认为是愚蠢的，这一点，就连语言也有所体现。德国中部与“巨大的中部国家”脱离。并不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对现实存在并掌控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态度是既着迷又排斥。在中部德国，自由的灵魂没有什么机会，它被排斥到西德，后者由此成为文化复活的中心，中间阶层和上流阶层的离去使东德成为“小人物的国民”“纯小资产阶级”的国家。

作为对《波恩条约》（1952年5月26日）（该条约规定了三个西方盟国和西德之间未来的关系）终结的反应，东德当局开始封锁直至当时仍然可穿越的德国内部的界限和西柏林。大多数德国民众完全被经济奇迹所吸引，并没有由此受到过度干扰。闫斯·丹尼尔（鲁道夫·奥格斯坦）在《明镜》周刊中写道：西德的西方伙伴们既没有为尼斯河东部的区域做出什么贡献，也没有为德国的再次统一付出什么努力。对他们来说，西德作为外省，比作为一个统一的、即使是没有武器的德国更令人舒服。

“但是1800万易北河对岸的德国民众指望着我们，没有我们，他们不得不看着他们的孩子在非人的、让人窒息的系统中成长，这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陌生的。我们在基督徒的首相下为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将在欧洲文化的名义下为他们做什么？”

“这就是德国民众的祖国：7000万人处于两个等候厅中。”埃里希·库比在以此为名的书（1957年）中——弗里德里希·希堡将该书称为“闲扯者一绝”——断定，根据他在过去12年中对易北河东西两岸的观察，

分割是“白纸黑字的”，至少对于两德政府来说是如此。他们总是在采取策略来防止重新统一。在这件事情上，西德政府大概和西德民众意思相仿，德国统一社会党却不是这样。

等候厅I等级中的大多数居民在内在外都按照如下的原则行为处事：哪里对我好，哪里就是我的祖国。那些将国家骄傲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想要奋力实现的人当然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

> 在“巨大的中部国家”中，中部以西爆发了新毕德麦雅（Neon-Biedermeier）潮。“考察西德的新闻记者发现，按照自己的习惯在白天长时间地睡觉是非常困难的，每个早晨他都被附近的锤子声、敲击声和其他的噪声吵醒，那里正在搞一个房子的建设，对面正在改建一个遗址，直到他最终暴躁地开始他每天的工作，并且由于德国人的勤奋和德国的重建也不再能有足够的睡眠——他的备忘录这样写道。”（之前流亡海外的诺伯特·穆棱在穿越他早年家乡时这样写道。）

在另外一个等候厅，即等候厅IV等级中生活着1700万居民，他们在内在外都按照如下的原则行为处事：哪里对我不好，哪里就不是我的祖国。这个原则也是高度合理且理智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这个原则直接导致过激的民族主义，就此而言，糟糕的事情被归咎于外国政府无民族感的统治。只有重新统一的想法才点亮了对更好生活的希望。“但是你们能想象么？在欧洲的中部，大约有7000万的德国人被夹在奥得河和莱茵河之间，被德国的麦卡锡煽动，已经在那里的新的胡根贝格[12]们让他们按照国家规定来做事，你们能想象这些人会安静么？”

400万德国人从乌布利希的管辖区域逃离，这种行为被视为秘密的选择，对共产主义的拒绝以及对西德的选择。这样的事件可以解释为对东德系统的非暴力的麻木反抗——但这也未必就可以解释为是对西德的拥护。“我们这些从独裁中逃出来的逃亡者必须问问自己，我们要逃往何处。”格哈德·茨维伦茨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格哈德·茨维伦茨从俄国的战俘监狱被释放之后，在莱比锡师从恩

斯特·布洛赫学习哲学。他和作家埃里希·吕斯特及后来成为《世界》文艺专栏主编的君特·策姆一起，属于沃尔夫冈·哈里希领导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所以，1957年的夏天，他不得不逃往西柏林。“西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共产党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给年轻的、具有批判态度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西德没有德国中部也能存活。这样的想法让人生气和恼怒，一点也不比错误少。同时，我们在德国中部、在畸形的双重国家的强制中、在骄傲和嫉妒的混合情绪中、在愤怒和失望中、在怨恨和绝望中凄惨地活着。我们的骄傲受到了伤害，这是因为西德的骄傲看起来并没有受到伤害。渐渐地，没有回应的爱的恶瘤在我们内心深处慢慢成长。”

罗伯特·哈韦曼事件是东德对自由灵魂镇压的典型例子，但是他拒绝离开东德——他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信仰共产主义的高尚，与此同时并不放弃发表言论的自由。他是化学家，1943年取得在柏林大学的授课资格。同年，他作为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小组“欧洲联盟”的共同创始人而被纳粹法庭判处死刑。由于他必须进行重要的研究工作，他的死刑执行两次被推迟。1945年后，他加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由于参与创立文化协会，从1950年到1963年是东德人民议院的代表，因为他又被认为是间谍，美国人在1947年解除了他作为凯泽-威廉研究所领导的职务，接着他成为东柏林洪堡大学的物理化学研究所的所长。14年的职业生涯之后他被禁止工作，在自己家里受到严密监控。



在东德人民军队的监视下建筑柏林墙，柏林，**1961**年

西德不但仔细地关注在东德受迫害的反对者的命运，并且还把它们拔高到自己假想中的固有“纯净的良知”的负面参照物：这就是学生赫尔曼·约瑟夫·弗拉德的大致情形，他在1950年由于散发传单而在东德被判处死刑，被赦免后于1960年来到西德。艾娃·缪勒作为大学生在1948年由于煽动反苏维埃以及所谓的间谍活动而被判处25年的强制服役劳动（1954年被赦免并被遣往西柏林），她于1957年写成的传记体小说《无树为你开花》是关于分裂的德国政治和社会形式的重要文献。埃莉卡·冯·霍恩施坦因于1960年以“德意志的困苦”为题，发表了关于43名1950年代东德逃亡者的报告。瓦尔特·肯波夫斯基，1948～1956年鲍岑监狱的政治犯，在其移居西德之后写下了被捕报道《在框中》。东德的政治和文化束缚总会不断掀起新浪潮，逼得逃离的人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在《意义与形式》的最后一期（1961年由于“纸张短缺和人员不足”短暂停

刊）的第一页上出现了贝托·布莱希特的一首诗，借用这首在其他时代（纳粹主义时代）写成的诗声称：

“你说：/我们的情况很糟糕。/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无力。/现在，努力了这么多年/我们的境况却比从前更艰难。/但敌人却在那里，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他的力量好像在成长。/他呈现出不可战胜的面目。/我们错了，别再否定。/我们的数量在渐渐减少……”

有两个事件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对德国人的政治和文化觉悟产生了影响：1953年6月17日的暴动和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立的柏林墙。东德的劳动者们来到了街上，反抗他们所受到的剥削（导火索是政府宣布将标准提高至少10%），之后暴动被苏维埃占领军镇压，西德却软弱无能地保持着目击者的角色。波恩的联邦议会决定，悖理地将6月17日作为德国统一日（而不是德国分裂日）而定为法定假日。

1961年，德国内部界限的最后一个开放地点被关闭。闫斯·丹尼尔（鲁道夫·奥格斯坦）在柏林墙的建造中不仅看到了使东德在结构上衰弱到贫血的难民流的结局，还有包括阿登纳影响力在内的盟国政治的延续——这些人从1950年起就积极地将重新统一宣传为“解放”。君特·格拉斯和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雷给东德作家协会的成员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强调了8月13日突然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影响。

恩斯特·布洛赫因为在柏林墙修建期间去西德旅游，后来再也不能返回东德。他在写给东柏林科学研究院院长的信中说：“在8月13日的事件之后，这个事件使独立的思考者不再有生存和影响空间，我不再愿意使我的工作和我自己承受不体面的境遇和威胁。所以，我以76岁的年纪决定，不再返回莱比锡。”

瓦尔特·闫斯，从1956年起任古典语言学的教授，1962年起兼任图宾根大学的修辞学教授。他作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广播剧以及翻译

的作家而著名。他热情地欢迎了恩斯特·布洛赫。他作为民主主义者离开东德，知道社会主义只能在民主政权中、“首先在人的住所”中实现。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来到我们这里，他教会我们，只有在如卡尔·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的社会主义中，才能够“解除财富对人类本性的束缚”，没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主义。“我们不想忘却他，就像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布克内西、贝托·布莱希特一样，这样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

1953年6月17日的暴动几天之后，贝托·布莱希特对乌布利希公开表示支持，但同时也对东德的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这封信后来被歪曲地发表，只剩下最后屈服的套话。）保守政治力量想在1961年就此“肃清”布莱希特在西德剧院中的演出计划。法兰克福市立剧院的台长哈利·布克维茨发现，“法兰克福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由于政治原因而需要对已经死去的诗人进行镇压简直是令人羞耻的”。66位台长在一个声明中宣告，德国戏剧的艺术工作不可缺少的前提是台长对演出计划的个人责任。艺术良知和政治审查必须听凭布莱希特自愿地表演或者不表演。（柏林席勒剧院的波列斯瓦夫·巴罗格在1961年8月推迟了《潘提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的首映——他声称，虽然自己“并未被不理智和没教养的攻击所动摇，但我相信，在当时的时间点上……结果可能是误会和骚乱”。）布莱希特是否应该在西部表演，弗里德里希·托贝格在西德无线电广播的专题系列广播节目“有待商榷的事情”的一次演讲中如此问道。维也纳的某个作家（1938年移居瑞士，1940年从法国经过西班牙和葡萄牙飞去美国，1951年作为美国的驻外工作者返回他的家乡）在他的文章中非常尖锐地攻击了对布莱希特持友好态度的西德的台长和导演。

1951年，由贝托·布莱希特执笔、保罗·德绍作曲的歌剧《鲁库鲁斯的审讯》在柏林国家歌剧院首映（赫尔曼·舍尔申为乐队指挥），尽管首映获得了热烈欢迎，但演出计划在次日就被取消。德国统一社会党批评它搞“形式主义趋向”，布莱希特做出改变，把“审讯”一词改为“谴

> 责”——谴责侵略战争、谴责防御战被批准。一年之后在西德的演出（在法兰克福，由哈利·布克维茨主演）依然按照第一稿来表演，但有一部分评论不满于诗人“极端含糊的”行为。
>
> 1955年5月，布莱希特在克里姆林宫获得斯大林奖，根据报纸报道，他将奖金存在一家瑞士银行。他对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保持忠诚，很多选择了西德的自由民众的秘密理想“布莱希特在某一天将带着他的行李箱出现”只是个幻想——“尽管布莱希特一再使自己陷入被责备的境地。但他是个懦夫么？还是对他来说西德的自由不足以使他拒绝俄国的金钱？”然而，当贝托·布莱希特于1956年8月14日与世长辞时，他又赢回了很多同情。杂志《最美丽的》（“致所有美丽艺术的朋友”）（它有能力为宽广的圈子中的“高雅的品位”服务）写道：“其著作的伟大，其在艺术上的智慧最终超越了在政治信仰上的偏见——诗人布莱希特从来不需要辩解。他的著作具有特殊的功效，德语由于他的精神而获得新的内容。德国戏剧对他最强有力的推动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他，我们的诗歌会极端贫乏。”

1961～1962年，关于分裂的德国的争论开始变得非常激烈。典型例子就是62岁的赫尔曼·克斯滕在米兰的一次演讲中攻击28岁的作家乌维·强森（他于1959年从东德移居到西柏林）。科斯腾说，柏林墙竖立了一个转折点，两边的谎言必须结束，这场政治事件加速了道德的和理智的复原，他希望强森在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战线”间找到自己的路。乌维·强森反而捍卫东德当局，声称在东德强制实施的社会主义虽然导致400万民众跨越当时还敞开的边界，但劳动力的缺乏使东德的共产党员不得不进行防卫。赫尔曼·克斯滕在这一点上谴责强森的共产主义思路，而强森则以称克斯滕为“骗子”来回应。

乌维·强森1934年在波莫瑞出生，1945年和他的家人一起来到梅克伦堡。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英格丽德·巴奔德埃德》（*Ingrid Babendererde* ）中，他叙述了一个女中学生和一个男中学生的命运：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对教会的迫害运动中，他们作为青少年牧区的成员受到“审理”并且因此逃往西柏林。强森在此对自己在东德生活的经验进行改编，这部小说中的很多元素在之后的著作中也能找到。作为西柏林的本地人，他具有西德的护照和“德国”国籍（他对自己境况的定义）。他

在1959年发表长篇小说《雅克布的勇气衡量》，1961年发表《关于阿希姆的第三本书》，1965年发表《两种观点》。这些作品有强森固有的缜密性和对细节的痴迷，还有对“确定的”现实的极大怀疑（“我不会试图展示那些模棱两可的现实”）。通过这些作品，他试图给德国分裂的社会和精神图景寻找某种理由。

在《雅克布的勇气衡量》中，铁路员工雅克布·阿布施去往西柏林，后来又返回德累斯顿——他既对西方的自由感到诧异，又不再对东部的现实感到熟悉：一个到处“穿越的”人的命运。他死了，在他穿过铁轨的时候被火车头撞倒。“安全的并不安全，正如它是什么样的，并不保持什么样，并且今天不再来。我不理解。就像我感觉不到下雨。但是我看到它。”

> 强森在西柏林获得马西莫别墅（Villa Massimo，罗马）的奖学金，由于他与克斯滕的争辩，这个奖学金是有争议的。他离开了“东部地区”，因为那里他找不到出版社发表他的书《雅克布的勇气衡量》，但是在西德却可以。很明显，这只不过是纯描述的东西，东德当局却认为是控诉。他的新住所位于东部地区和西德之间的区域，这个中间区域是有利的，它使他能够清楚地看到东德出现的其他可能性。
>
> 如果人们注意到强森在东德的表现，就会赞扬他对资产阶级的西德的描述，同时会认为他对东德的辨识是不充分且歪曲的。在西德，人们认为他是准确了解东德现实的专家，但他对西德的描述则被认为是片面的。特别是保守的评论界认为他是一个政治作家，他虽然准确地把握了东德的局势，但并没有准备好按照原则来评判它。就这一点而言，他不仅受到赫尔曼·克斯滕的抨击，而且受到布连塔诺的外交部部长海因里希的抨击。“针对某个地带的阐述”，这个地带既不在柏林墙这边也不在柏林墙那边，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观察“柏林墙”，很难归入西德官方的反共产主义的思想类别中。

格哈德·茨维伦茨在他的小册子《分裂的词语》中认为，语言的分裂——以易北河为界限切开——促使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分裂，如果是这样，不再可能存在和平的回归。“仇恨和复仇从分裂的言语中成长，这是每个内战的最有效的元素。分裂的言语为此提供了相应的意识形

态。”只要作家不反抗，他们就是有罪的。更坏的是政客，他们用语义学（将语言融入社会-政治的背景）的楔子将民众分裂成几派，并且试图借助于语义学的控制利用言语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 马丁·阿伦德斯在东德生活到1984年，谈及使德国语言分裂的四个发展趋势：1.用新的单词表示原有事物（塑料、廉价品、副食）；2.用新的单词表示新事物（联合企业、同志、旅行同志）；3.对意识形态束缚的嘲讽（教育亮红灯）；4.语义上的曲解或者片面化（斗争小组、阶级意识）。

东德和西德的语言规则显示出结构上相似的趋势，当然，它们的目标方向是相反的。在东德，将教导意识形态的、刻板机械的、复杂的含义简化为易懂好记的措辞；在西德，将在“感情编码”中泛滥的愉快安逸的场景转为陈词滥调的软垫。决定性的区别是：在东德，官方语言规则能够被严格执行以及能够主导所有其他领域，特别是主导传播学和诗歌的领域；在西德，语言批判毫无保留地将对统治的语言鉴赏力的反抗视为对统治者的反抗。实现计划指标的德语和拖拉机手的德语、反资本主义德语和反帝国主义德语为了相互补充而具有重新统一的德语、和平和自由德语以及自治权德语，这些德语将实力政策搬来作为傀儡。东德揭开了西德作为复仇者、法西斯主义分子、帝国主义分子、战争发起者、间谍、挑衅者的民主主义的领导力量的伪装。而西德却又看到，“所谓的东德”的政体让东德的兄弟姐妹沦为奴隶，生活在极大的困境和怀疑中，然后——正如康拉德·阿登纳在暴动一年之后（1954年）联邦议院的纪念会中演说的那般——如同一场风暴爆发一样：“不受重视的死亡和危险。”在“与苏维埃政权的兄弟般的共同工作中”，国家人民军队为和平而战。与此同时，在对面，联邦国防军复仇式地威胁社会主义。在工农国家，工人自由提高额度并且赞成农民集体化，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的那一侧，剥削猖獗。西德再次谴责人们在东德越来越变成奴隶。故事片的可视语法和可视语义显示了类似的场景，这些故事片考虑了分裂问题：《分裂的天空》（1964年），《那年我十九岁》（1968年，东

德），《没有归路的路》（1952年，西德）。赫尔穆德·克罗特纳导演的电影《没有星星的天空》（1955年）是个值得夸奖的例外，这个电影用1950年代特有的矛盾且感伤的电影语言刻画了德国的苦难。

> 1961年3月，教育家哈特姆特·冯·亨迪希进行了一次柏林行，他当时在图宾根的人文主义中学中担任古文的教师。他说，从东德到西德的大门正在关闭，现在我们必须换个方向找路。两个德国在政治上重新统一的前景不再呈现，现在主要涉及人民的权利，但是和解办法却与之冲突。“我们澄清……处境——用可以列举的事实：面对‘军国主义’的非难，导游请求他的旅行社‘举起手来，你们之中谁曾经在手中拿过武器！’——一个！转向工作人员：‘您觉得这个怎么样？’——或者用定义：对你们来说，东德叫作对人民的‘民主主义’统治——所有捏造的东西都有助于集体化的幸福，这个幸福也包括认可这种幸福。对我们来说，民主是对少数人的保护，是一种当‘我没有道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所有人的幸福’时的可能，是一种使人们不必使用暴力而能达到统一的机制。或：对你们来说，‘党派’等于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将不同的利益融入一个预先假定的利益中，对我们来说，则不可能将我们的利益毁灭在共同的必然性中。或：对你们来说，‘自由’是历史的完成，对我们来说它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或：对你们来说，‘权利’是（法律的）规则，通过它来保护国家（这个国家）防御敌人，对我们来说，它是舆论，通过它来产生法律，在国家之前就存在法律并且国家从法律中才能产生。所有这些差别都是存在的，当我们讨论十月革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没有一句话不贯穿着这些差别。我们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只有在我们感觉到这一点时，我们和其他的人，才能够受到教育、受到反驳或得到理解。”

---

[1] 1947年2月，在阿伦市的圣米歇尔中学，在“基督教民主联盟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下通过了基民盟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纲领，又称《阿伦纲领》。

[2] “大联合政府”是联合政府的一种形式，指在和平时期，由议会中两个分属不同政治光谱的最大政党一起合作形成的联合政府。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安排方式，通常出现于存在多党内阁制国家。在德国，“大联合政府”指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组建的联合政府，任期分别是1966～1969年、2005～2009年、2013年至今。

[3] 此处作者借用了布莱希特的戏剧《四川好人》的表达。

[4] 此处是比喻。“毕德麦雅时期”（Biedermeier）是指德意志邦联诸国在1815年（维也纳公约签订）至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历史时期，现则多指文化史上的中产阶级艺术时期。

[5] 亚历山大·米切利希是一名德国医生、心理学家和作家。

[6] 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是一家建立于1925年的德国化工企业，由若干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有紧密合作关系的大型化工公司组成，总部设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全盛时期曾是德国最大的公司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康采恩之一。二战期间法本公司参与了众多战争罪行，战后被盟国勒令解散，于1952年进行清算，拆分为爱克发·吉华集团、拜耳公司、BASF和赫斯特公司（Hoechst）等10家公司。法本公司解散后，其股票仍在德国证券市场上交易，法律上的法本公司作为原有财产的控股人，直至2003年才宣布破产。

[7] 弗里德里希·弗里克的康采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军火生产，因此他在战后被作为战争罪犯并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8] 《金赛报告》（*Kinsey Reports*）是由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Charles Kinsey）及华地·帕姆洛依（Wardell Pomeroy）等人所写的关于人类性行为的两本书，分别是《男性性行为》（1948年）及《女性性行为》（1953年）。金赛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动物学家以及性学研究中心的创立者。由于这个研究结果挑战公众对于人类性行为的传统信念，以及讨论以往被视为禁忌的话题，这个研究使公众感到震惊，立即引起争论和轰动。

[9] 珍是《人猿泰山》的女主角。

[10] 皮特·科内利斯·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1872～1944年），荷兰画家，风格派运动幕后艺术家和非具象绘画的创始者之一，对后代的建筑、设计等影响很大。

[11] 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年），瑞士裔德国画家。他的画风受到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他对色彩的变化有独特的鉴赏力，成熟时期的作品更是大量采用多种多样的混合媒材，比如沙子或木屑等，创作出具有特别张力的画作。他和他的朋友、俄国画家康定斯基，都是当时包豪斯的名师。

[12] 胡根贝格（Hugenberg，1865～1951年）是德国著名军火商。纳粹主义和反闪米特主义在魏玛共和国的兴起也是因为他的煽动。

第**10**章 知识分子的荣耀与苦难

TUIS——弄人和官爷

自1930年代以来，贝托·布莱希特就有一个计划：研究知识分子的角色。他写了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Tuis*，这篇小说特别研究了魏玛共和国——用的是中国的寓言素材。1953年，布莱希特着手戏剧《图兰朵或洗刷嫌疑者的会议》。“五十年了，我梦想着自己属于某个大兄弟会，这个兄弟会称自己为Tuis——Tellekt-Uell-In的首字母。因为，在国家中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这个兄弟会的伟大想法进行，它领导人类。”农民Sen这样说，他期待着一个这样的阶级转换。在小说和戏剧里，Tuis都是“这个阶段市场和商品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洗刷罪名的人”“伸长脖子的人”“智慧的出租者”“撰写者”“劝阻者”。Tuis在国内的数量越来越大，并且成为公务员、医生、技术人员和很多专业的老师，还成为神职人员和演员。在大型Tui学校里接受教育，他们具有他们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

布莱希特写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暴露知识分子的愚蠢，首先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好莱坞中考虑平民的知识分子。他在好莱坞认识到，这些知识分子有理想主义的思想，但在实现政治观点时却过于小心和胆怯。他还考虑到移居美国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它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在好莱坞生活过：马克斯·霍克海默、弗里德里希·布洛克、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雷欧·洛文塔尔、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君特·安德斯。“……在一次游园会上，两个丑角——霍克海默和布洛克碰面，他们是两个来自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Tuis。霍克海默是百万富翁，布洛克具有良好的家世，所以只有霍克海默能在他所在的停留地购买教授席位，并对外掩盖研究所的革命行为。”

但是之后布莱希特意识到，“Tui主义”现象并没有随着在东德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而消失：首先是因为关于正确道路的争吵，这一再将Tuis分裂成多个派别；其次是因为它毫无原则地情愿被调整以及它灾难性地乐于使自己被利用（洗刷每个污点）。一个上层Tui就是贝托·布莱希特自己，当然，他没有公开表达这种终身的利己主义者和极端自私者的自我认识。大而化之的“洗刷罪恶的人”一直都是别人。

上层Tui的角色落到了西德的戈特弗里德·本的身上。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传统阵营中的知识分子都对他感到惊奇（他在第三帝国时代开始时向左翼炫耀纳粹分子的反理性主义是有伤风化的），他仿佛现代派的缩影。深受商品美学偶像控制的，小市民气十足的经济奇迹社会盛行平庸和地方主义，本用孤独个体感知的虚无主义来与其唱反调。这种虚无主义深深地使社会市场经济“对彼此友好”的口号震惊。

“还有请柬和桌上的鲜花与感情？我本人没有这些。我有疲倦、郁闷、大量的暴怒、迟疑、犹疑、魔法——这能够让我坚持一个小时，但是感情，我用它来做什么？”

伊丽莎白·恩德雷斯认为，本的态度包括独白元素和集体否定，还有“例如那些陌生的城市名，它们和鲜花以及大地以及在‘快乐产生力量’的格言下的旅行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大都表达了东西两德开始几年的向往”。



贝托·布莱希特和保罗·德绍

本的作品［《断片》（1951年）、《早年诗歌及戏剧》（1952年）、《小酒店》（1953年）、《阿普雷斯路德》（1955年）；散文：《托勒密》（1949年）、《表达世界》（1949年）、《外省生活》（1955年）、《谈话》（1955年）］用高昂的发展结局让人注意到“世界的苦涩”。在忧愁的雾霾中他将自己表现成“雷达思考者”的形象，以搜寻不同的政见。他紧紧抓住“形式”作为唯一的支持，“无它，上釉”。“绝对的诗”是——在虚无主义的潮流中——“这首诗没有信仰，这首诗没有希望，这首诗不针对任何人，这首诗由使您神魂颠倒的词语组合而成。”规则即是灵魂，它的定律是：措辞、新创词语、风格、所有不同的著名的毁灭。他用抒情诗-小品文式的花花公子腔来讽刺抱

有乐观重建心态的、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根据波德莱尔的说法，花花公子腔是英雄主义在没落时期的最终实现。关于莱纳·玛利亚·里尔克，本写道："这些伟大的抒情诗有寒酸的形态和源泉，仿佛白血病，埋在罗内塔河古铜色山丘之间的一片田野里，他就法国的六弦写了我这个时代永远不会忘的诗：'谁说的胜利——克服就是一切！'"

逃脱"共同的平均水平"是西德知识分子的重要目标。因此，虽然当时并没有声明废除这个利益，但只要人希望通过精神的、有见解的话语——这些话语首先也是文学性的——提高共同的道德水平，它就还显得高深莫测。人们想要书写、讨论、争辩，由上层建筑向下层建筑施加影响，人们距离现实太远。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批判理论的代表，而非对政治或社会现实"过多干涉的人"。他们产生影响的"地方"是专家论坛、文艺小品栏、夜间演播室、书，特别是还有兼有各种观点的文集、诗选。

新产生的智识主义（有许多代表人物：戈特弗里德·本、赫尔曼·克斯腾、埃里希·开斯特纳、阿尔弗莱德·波尔加在威廉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开始活动）表面光鲜，这尤其体现在各种"文化活动"上：会议、聚会、周末研讨会都提供了公开露面的机会。

"达姆施塔特谈话"（Darmstädter Gespräche）在1950年成立。第一次活动（《我们时代的人像》）主要是艺术史学家汉斯·赛德麦尔［《中心缺失》（1948年）的作者，做过关于"现代艺术的危险"的报告］和维利·鲍迈斯特［《艺术中不为人知的》（1947年）的撰稿人］之间的辩论，画家维利·鲍迈斯特有备而来，打算以"驳赛德麦尔和豪森斯坦，捍卫现代艺术"为题做报告——最终他没有做这个报告，因为赛德麦尔离开了大厅——不仅对赛德麦尔保守天主教的观点持反对态度，而且还批判了他的纳粹主义的过去。

在所有的"达姆施塔特谈话"中，哲学家马克斯·本瑟（生于1910年，大学学习数学、哲学、物理，1949年成为斯图加特技术大学的上述专业的教授）起着重要作用。"本瑟是战后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启蒙者和伦理学家之一，其严密的思想、对西德的'复辟'和甚嚣尘上的随大流主义深恶痛绝的批判——巴登-符腾堡州的政府因为记恨，拒绝将他称为斯图加特的教授——引起大量批评的轰动。"（爱德华·博康）

成功的西西弗斯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结合了“Tuis式的”快速换位和“概念的持续努力”（“艰难的工作”）。在他的第三部诗集《盲文》（1964年）中有一首诗，该诗不仅描写了大众启蒙的努力，而且总结了西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左翼知识分子——哪怕他们有时举止仿佛“纸火鸡”——的特殊“教育”成果：“有耐心地/戳穿矍铄的崩溃。”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第一部诗集（1957年）中有一首诗《给西西弗斯的指示》：“你所做的，没有前途。好：/你已经懂得，放弃它，/但你不甘心，/与石头周旋的男人。没有人/感谢你……”但，恩岑斯贝格本人也可算作成功的西西弗斯，人们也感谢他：他成了一个国内国际都享有盛誉的文学和政治“主管”。他不但滚动了石头，而且将石头推到了不同的山上，他通常巧妙地处理多个石头。当他在1968年预告文学的死亡并且把诗人从写字台放逐到大街上时，他自己却见缝插针地在小房间里继续勤奋地书写：当意识形态信徒们从诗一般的觉悟中搞出某个词的组成部分时，他早就用新诗歌体的自我意识填满了“白纸”。他证明了自己是花花公子和唯美主义者、伦理学家和有学问的诗人——一直是有才智的语言艺术家。“……我向往破坏者！/懦夫使我满足！/小心翼翼地规划我的生命/如美丽的铜版画的收藏室/期待在夏季住所的冷流。”他为“选择”找到许多惯用词，并以很多国家为家——但是对用经济奇迹的精神给他提供了许多素材，供给他以用愤怒、嘲讽、抨击、揭露的语气指指点点的动机的西德，则纠结在由爱生怒、由乐生惧的心态中。

当轻松风趣的小品文陷入危机，只有批判文化和对文化持悲观态度的陈词滥调还在流传时，恩岑斯贝格狠狠地谴责了那些以为自己会一直处于优势的人们。典型的例子颇具传奇色彩：1957年2月8日，南德无线电广播在阿尔弗雷德·安德施的编辑下播出了《〈明镜〉：一本杂志的道德和花招》。几周之后，这篇文章出现在《明镜》中，这证明了批评

者和被批评者都足够机敏。

恩岑斯贝格曾经是现在也是个伦理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个善于宣传的人，他还有不让自己由于过多次出场而受到伤害的能力。作为抒情诗人、随笔作家、政治评论家，同时还是知识渊博的编辑和翻译作家，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刻”：什么时候该“在路上”去美国旅游，什么时候该把“从美国失望地逃往古巴”当作文章标题，什么时候该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保持距离，什么时候该建立左翼杂志《时刻表》（*Kursbuch* ）（1965年），什么时候该与变得无聊且满嘴“辩证法”的革命告别。T.R.M（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进步史中的三十七首民谣》中的一行抒情诗也可以看作恩岑斯贝格的特色：“……在灾难的预言上是最清醒的一个。”

阿尔诺德·盖伦、恩斯特·荣格和弗里德里希·希堡是文化批判保守派（具有纳粹主义的过去）的代表。在这些人那里，英雄的悲观主义和狂想曲形式的没落情绪（如特别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著作中表现的那样）被分析的克制代替。但是他们又觉得，“理智的历史性胜利”是假胜利，是“中间立场的丧失”，是与自然的冲突。“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具有天命和不幸的不可抗性，即使它也叫作自由。”

“技术时代的灵魂”（盖伦的同名书在1957年出版）在新工业文化中大量丧失。启蒙辩证法、理性转向反面——这些是左翼对文化没落的批判——被解释为“现代性”魔法的完成。一方面，精神——灵魂的敌手——是世界变得系统化的原因。另一方面，在“自动化”中，还另有一种有魔力的元素在起作用，那是某种先于理性的力量，但推动了理性主义。这种矛盾性也表现在，保守派知识分子会猛烈抨击“在艺术和知识本身的精神领域中过激的智识化”。

恩斯特·荣格尤其是那种用他们的民主化和精英-贵族腔的美国化及“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保持距离的中产阶级的典范。比照当时流行

的随大流主义，荣格作为“孤独的人”“不合时宜的人”反倒备受推崇。这个“冷眼大师”在玩弄小品文、杂文上很有一套，玩弄手法主要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伟大的孤独者”。在“庸碌的人们”追逐时代精神的同时，荣格隐退到象牙塔中，他为此颇感骄傲，看上去也毫不关心操劳的大众。

弗里德里希·希堡从1956年起任文化刊物《法兰克福汇报》的负责人，因此对西德的文学生活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在著作《堕落的快乐》（1954年）的一卷中承认，托马斯·曼是“一个特别聪明并且有格调的人”，希堡表达了他对西德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讥讽（讥讽其傲慢的权威、文化的忙乱、暴发户式的毫无品位）。他说，文学意识并没有形成，灵魂社会没有产生，在经济繁荣的国度中，灵魂的改革完全没有进行。

47社

海因里希·伯尔认为，由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开创的“47社”取代了德国在1945年后失去的中心、研究院和文学首府。早在多元化成为流行之前，这个组织就已实践了多元化。

1948年4月在贝格施特拉塞青年之家的第二次会议之后——这个组织在这里第一次向公众介绍了自己——君特·格罗尔在《南德意志报》中写道，今后，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人空间，只要是讨论现代文学，这个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格奥尔格·亨塞尔在《达姆施塔特回音》中认为，这个组织的机会在于结合了“友好和批判”，在于其散漫的结构，这种散漫的结构将不同的艺术气息融合在一起。1949年10月，阿默湖畔的乌廷会议也有来自国外（法国、荷兰）的客人出席，人们决定，克服“迂腐和苍白的欧洲对话”，强化“真正的年轻的欧洲”的沟通。1950年5月在因齐格科芬的会议中，当君特·艾希第一次获得这个组织授予的奖项时，人们在“老前辈”赫尔曼·克斯滕的带领下对“另一个德国”也表示了尊敬。此外，克斯滕还是“仁慈的、父亲般的导师”。在西德日益加剧的

乡土观念当中，他体现了“黄金二十年代”“罗马式咖啡馆”的智慧和诙谐，展现了国际大都市文化的风貌。

“两地”对47社影响很大，这也昭示了在组织中流行并且也为组织代表的文学倾向：修道院般的分离和隔绝（在因齐格科芬，人们还真在一个从前的修道院中开会并睡在修道院小房间中）与具有高智商刺激气氛的文学咖啡馆。一方面是诗意的内倾性——会议场地大多具有“精致的内在”——另一方面是小品文的外向性和文雅的好奇心。



君特·格拉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党竞选支持者于**1965**年请大家参加一个招待会，（前排从左起）艾格尼丝·芬克、英格博格·巴赫曼、鲁特·勃兰特，（站立的从左起）博恩哈德·维基、弗里茨·科特纳、汉斯·维尔纳·亨策、君特·格拉斯、维利·勃兰特、卡尔·席勒

除了君特·艾希，还有两位女士，伊尔斯·艾辛格和英格博格·巴赫

曼，表现出“崭新的内心世界”——这是一种不再通过伤感的修辞法和黑色的隐喻技巧，而是通过存在的真理和无影射的象征手法来表达的内心世界。1921年出生在维也纳的艾辛格（医学专业，出版社编辑，在乌尔姆参与了设计学院的建立并且在当地的业余大学任教，“漂亮得不可思议”，1953年与艾希结婚）。1952年，47社在波罗的海海边的宁多夫为她的《镜子故事》颁了奖。她的小说《更大的希望》（1948年）和短篇小说《绞刑架下的讲话》（1952年）在当时仅为少量的文艺读者所知。“她的《镜子故事》追溯了一个女孩的人生经历，在这个镜子中看到一个人的死亡与出生。这或许是战后最特别的、最纤柔的日耳曼文学，一个十分惊人的秘密被羞涩地掩盖着。关于这本书，常常冒失的批评也会为不常见的赞许让步。”（汉斯·格奥尔格·布伦纳）

1926年出生在克拉根福的英格博格·巴赫曼（在因斯布鲁克、格拉茨和维也纳从事哲学研究），1952年第一次在小组中崭露头角，1953年在美因茨的春季会议中获得47社的奖。她的诗歌被评价为“惊人才华的成绩”。“大多数无韵的节，富有意义的图景和令人感动的对语言的驾驭。”对她于同年出版的诗集《无言的时刻》，评论家君特·布吕克在《法兰克福汇报》中评论道：“戈特弗里德·本之后在德语区不再有抒情诗的天才，作为抒情诗人的基本条件在他身上比在英格博格·巴赫曼身上更令人信服。”这样的评价比布吕克与47社对峙更为重要。巴赫曼的深奥之处在文学运作之外，同时又有斗争般的语言特质。她背后有隐秘、令人难以捉摸的情色和恋尸的气质。

如果说给君特·艾希、伊尔斯·艾辛格、英格博格·巴赫曼（还有约翰内斯·波布罗夫斯基于1962年、彼得·比克瑟尔于1965年、尤尔根·贝克于1967年）颁奖明确表现了年轻一代与流行的物质主义相反的，或抒情-自省，或神秘-本质，或艺术-阐释的文学情境，那么，给海因里希·伯尔（1951年）、马丁·瓦尔泽（1959年）、君特·格拉斯（1958年）颁奖则表明了当时文学作品对时代的抨击和赞同的要素。

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集《火车准点到》于1949年出版，《漫步者，请你来矿泉》于1950年出版，随后是1951年的《亚当，你那时在哪儿？》、1953年的《别说一句话》、1954年的《无人看守的房屋》、1959年的《九点半台球》、1963年的《小丑之见》。在文章、评论和发言中，伯尔也发挥了他的小品文才能，他无所顾忌地挺进多数人止步不前的社会“禁地”。在署名上，他通常是第一个或第一批中的一个，而其

他人的评论则一般都有所保留。他无法顺从、无法适应、无法平静。在语言上，他的散文缺少能刺入陈词滥调这片“松软的肉”中的倒钩和硬刺。“我保留直观看历史的权利”——这最终使他不能广泛流行。他在具体的理解方面减少了复杂性。尽管他——挺讽刺地——宣称，他认为他的抨击是象征性的而不是个人的，他寻求对个人的斗争。他将他最激烈的攻击之一对准了阿登纳，而当时这个人已经去世——也就是说对准的是阿登纳的坟墓——他认为这是对权力的傲慢的化身体验。

世界对君特·格拉斯比“充满愤怒、猛兽般、邪恶幻想的”君特·格拉斯对世界要好得多，格拉斯在阿尔高的鹰旅店获得47社的颁奖后，约阿希姆·凯泽在1958年的《南德意志报》上如是写道。这个诗人朗诵了出自他那几乎完美的小说《铁皮鼓》的两个篇章，这些篇章表露出“狂野的表达能量、对表情不可抗拒的保证和对超常-荒诞联系的极大感受力。一个驼背鼓手在精神病院讲述了一个富有画面感的故事。到处都在诵读同样的故事，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有或没有遭到破坏，是否能写一部小说，还是因为这场发生在波兰和鲁尔区的、伟大而充满暴力的芭蕾舞剧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份关于我们自己的报告：这还悬而未决”。（约阿希姆·凯泽）

> 《铁皮鼓》扰乱了联邦德国的从容，文学评论被来回撕扯。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认为，作品仿佛断片，在这些断片上，评论家和语言学家要劳苦工作至少十年之久，直到他成熟到被封为圣徒或者被遗忘。他预言性的“欢呼”遭到愤怒者的破坏，这些愤怒者谴责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令人厌恶的猥亵言辞”和哗众取宠的语言。
>
> 格拉斯1927年出生于但泽，战争期间从军。战争结束后，以石匠为生，在一个钾盐矿工作，后就读于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学院。1956年搬到巴黎时几乎身无分文，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小说事业，1959年离开巴黎。“我并没有为类似于‘用粗暴的范文为战后德国文学指路’这种高尚意图驱使。我也没想满足‘克服德国的过去’这种廉价需求。因为我的尝试是衡量自己的（失去了的）地方，我特别乐于一层层地铲除所谓的中产阶级沉淀物（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冰碛物）。做这种尝试是没法保留一点点慰藉或净化的。”

1950年代中期，汉斯·维尔纳·里希特观察到了47社这个圈子组成的显著变化："新一代、战争的孩子们"开始崭露头角。这些"新手"和老一代不同，首先是由于他们具有更多的技能而且他们的语言具有灵活性，很多人都在大学任职，如恩岑斯贝格、瓦尔泽、瓦尔特·赫勒何。在下珀金格（1957年）的会议上，特奥·皮尔克曾经尝试用社会学的论点加以批评，还导致了与诸如恩岑斯贝格、瓦尔泽以及格拉斯的激烈争论，因为这些人希望保持美学和形式的规范。尽管如此，47社整体上呈现出组织的政治化——这是对由苏联红军（1956年）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反应，对扩大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势头的反应，对1958年3月德国联邦议院对阿登纳的提案所做出的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框架下的联邦国防军核武器升级决议的反应。

47社成为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政治家的眼中刺，不是因为其（文学的）市场垄断的姿态，而是因为他们尽管"散漫"而且"没有专业性"，但作为"左派的幕后统治集团"，尤其能在媒体上刺激和挑衅，人们越把它当弄人，这个作用便越明显。就像汉斯·埃贡霍尔·图森在1960年11月的《南德意志报》的文章中写的那样，文学的叛逆，若结合半官方的观点就是联邦德国的公众之星，将"不同政见"并在全满的文化产业中持续占据要职的人不在少数，他们还自诩"圈外人"，拿着薪金，享受那个富裕社会的所有舒适，这是他们每天攻击的目标。1963年1月，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主席赫尔曼·约瑟夫·杜夫胡尔斯一枪打落了"谴责简单化"这只鸟，出于对47社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的担心，他把该小组命名为"机密的帝国商会"。

保守势力的外部压力不能动摇47社的稳定，甚至还使该组织更加团结。问题产生在自身的范围内。1966年，约80名德国战后文学的代表人物出席在美国普林斯顿召开的会议，以"梳着披头士发型"的年轻奥地利人彼特·汉德克的名义，"怀着对有权有势之人的怒火"发出反抗之声。年轻作家用言之无物的描写来写作太容易成功，批评家非常同意这一

点，因为他们的标准恰好还足够适用这种无聊的废话。

汉德克1942年出生在克恩腾，1966年出版小说《大马蜂》和三个剧本《咒骂观众》《责难自己》《占卜》。“你们是独具风格的演员，你们是张着嘴巴待着的人，你们是失去父亲的同伴，你们是假革命家，你们是残留的人类，你们是自我住所的庇护者，你们是内部的流亡者，你们是悲观论者，你们是知性论者，你们是虚无主义者，你们是个性化，你们是集体主义，你们是政治上的未成年人……”此处的戏剧艺术文字游戏的表达方式符合被47社认为是决定性的美学范畴。但在政治浪潮中，它于1967年在普尔弗缪勒（瑞士法语区）的会议上被推翻。大学生进行示威游行，反对文学的“清理者”，支持“具体的行为”，他们希望世界不再表演，而是可以看到改变。“他们到达贵族的车上。我知道，学生是少的。他们的幕后操纵者坐在礼堂里，我的朋友们，他们已经从无害的形式主义者转变为狂猛的思想家，现在成了革命者。”（汉斯·维尔纳·里希特）

媒体景观

西德的“媒体奇观”——尽管输掉了战争，依然能够依照西方占领国的样本产生一个自由的和独立的、在民主政治意义上可靠的媒体——首先是西方同盟国媒体政治的成果，它们使公共讨论制度化。1949年，当西方盟国考虑到基本法的条款5，保留许可义务时，报社数量从150家增加到将近550家，1950年年底又新增加了80家。“老出版商——媒体”基本都感受到了通过授权媒体而定下的新闻业标准及隐藏其后的政治伦理（民主-共和主义的渊源）的约束。在这个范围内，复辟的和反动的势头自然也可以在乡下自由地蔓延开来。

除在卡尔·赫尔曼·弗拉赫（1964～1971年）主编下的、左翼自由派声誉持续上升的《法兰克福评论报》以外，《南德意志报》（1966年日发行量22万份），尽管总部设在拜仁州的慕尼黑，也成为整个联邦德国中一家重要的、对公众舆论有影响力的媒体。

《法兰克福汇报》政治立场中立，后来中间偏右，自1949年11月1日开始出版发行（1966年出售25万份）。“我们不想为懒于思考的人写作。但此外我们认为，广泛作用的联盟和思想的权利或许是可能的”，这份“为了德国的报纸”上的一段评论这么写道。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经过对九期报纸（1961年12月7～16日）的全面审阅，称《法兰克福汇报》式新闻学为“蛋之舞”（Eiertanz）并且谴责其在报道中的歪曲。他说，精细的法兰克福人用两个舌头讲话，他们说的是统治的语言。“汉斯·马格努斯，一个恶意的读者”，出版人本诺·莱芬贝格如此辩护道，并且在事情过去整整一年之后，仍然登载了一篇长达42页的辩护词。

几年前（1957年），恩岑斯贝格批评了《明镜》的语言。虽然其自1946年以来出版的周刊在此期间至少八次被禁或者被查封，但人们仍无法确定这个刊物所持的信念。它还没有立场。“从一种情况到另一种情况所采取的姿态倒不如说是取决于故事的要求，从中可以被推测的是：作为其噱头。他们往往是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通过其他的故事来否认这个故事，因为这个需要另一个‘吊架’。”恩岑斯贝格说，《明镜》的意识形态不过一种怀疑的无所不知，除了对自己本身外对所有事情的怀疑。《明镜》没有能力做批判，只能做装模作样的批判。

《时代》周刊的发行量从其1950年的最高点（8.1万份）下降到1953年的4.4万份。这一方面是自由派日报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主编理查德·蒂恩格尔偏离了自由派方向的领导。在一次反对这种趋势的抗议中，马里恩·冯·多恩霍夫女伯爵自政治版的编辑工作停职。1955年，蒂恩格尔解雇了服务部主管约瑟夫·缪勒-玛莱恩，随后他又被占有更多资产的共同发行者杰尔德·布瑟琉斯撤职。自那时起，《明镜》每版发行6.1万份。此否，多恩霍夫女伯爵回归。随着时间的推移，1965年，他们第一次没有再亏损。

在周报中，遵循基督教的那部分占较重份额。《莱茵墨丘利》在1946年由弗朗茨·阿尔贝特·克拉默建立，他在流亡中度过了八年，作为一个天主教徒、非正统的保守派、联邦主义者、社会自由派的形象得以凸显——首先是因为保罗·威廉·温格。1948年他在科布伦茨开始了长达35年的编辑工作，直到去世仍然奋斗在报纸行业中。

《基督和世界》第1期于1948年6月早于货币改革几天发行，克劳斯·梅恩纳特是该报的决策者。他被欧伊根·格斯滕迈尔任命为主编，格斯滕迈尔那时作为新教教堂福利机构的领导人对报纸负责（从1949年到1969年是联邦议会的成员，自1954年开始是联邦议会的主席）。梅恩纳特，1906年作为工厂主的儿子在莫斯科出生，人生1/3的时间在德国以外度过。他写了一本同情俄国群众的书《苏维埃人》（1958年）并对此进行宣传，这在冷战期间是一种挑衅。

废墟时代的报刊十分兴盛，后来由于货币改革而大大减少。一系列重要的文献和文化报刊依然能够幸存（《德国评论报》《新评论报》

《高地》《当代》《法兰克福期刊》《宏观》《墨丘利》《月份》），虽然后来由于资金不足导致版次减少，但是发行区域却有所增加。此时新创刊的有《文学》（1952年）、《视野》（1952年）、《心宿二》（*Antares*）（1952年）、《新德意志文学》（1953年）、《重音》（1954年）、《新德意志手册》（1954年）、《技术时代语言》（1954年）、《文本与符号》（1955年）、《祈祷》（1955年）、《选择》（1958年）、《安泰俄斯》（*Antaios*）（1959年）、《论点》（1950年）、《今日戏剧》（1960年）、《文本与批评》（1963年）、《南瓜仁》（1965年）、《时刻表》（1965年）、《墨鱼》（1968年）。

在约阿希姆·莫拉斯和汉斯·佩施克领导下的《墨丘利》的副标题是“欧洲思想的德语报刊”。根据副标题的意义，《墨丘利》是一个论坛，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和文学评论的主题在此被讨论。各门学科之间的专业化相互抵消，由此祛除了思想偏狭的危险。

《法兰克福期刊》自1946起由欧根·科贡和瓦尔特·迪克斯出版发行。该刊一直受到从事主编的瓦尔特·玛利亚·古根海姆的强烈影响，直至他英年早逝，其致力于政治和现存社会制度批判。就算当其发行量从7.5万份（1946年）下降到2万份（1950年）时，该报纸作为一份左翼天主教的、遵循社会主义如工会的立场的报刊，在西德的精神生活上依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从1955年到1958年，阿尔弗雷德·安德施发行了一份“文学的报刊”《文本和符号》，该报也做出了许多在哲学、建筑学、塑造的艺术、电影和音乐方面的贡献。“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在德国再次成为风气，‘知识分子’是用来骂人的称呼。安德施以斯多葛式的自我意识出版了一份报刊，该报刊对自己的定位是批评的知识分子的论坛。”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在对这个出版物的回顾中确信，他由作为南德的无线电广播的无线电-杂文的领导人的安德施发掘为作家。

大约10年后（1965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发行、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出版的《时刻表》在国际背景下讨论政治和社会话题——这是顺应社会越来越政治化的潮流。“别朗读颂歌，我的儿子，朗读航行时刻表，/它们更精确。赶在太迟之前，/挂起水文图/要警惕，别唱歌。/白天到来，从那里传到门旁/敲打并画在拒绝者的胸前/做下记号……”恩岑斯贝格的诗歌这样写入“给高段人的读本”，重要的“航行时刻表”指向现实的方向。

通俗报纸（“彩虹出版社”）则公开宣称自己的非政治性——它们也有特殊的受众。这些通俗报纸加强了经济奇迹世界对物质的渴望，并利用给各种庸俗传奇配以丰富的插图，帮助摆脱通常是残酷的商业竞争结果的失意。文化批判批评这是文化的腐败没落，是“歪曲的视野”，“毫无羞耻感”，“过度逃避日常生活的倾向”和“性迷恋”。

1964年，约3000万西德公民定期消费画刊。此外，出现了针对年轻人的刊物——特别成功的是《好极了》（*Bravo*，自1956年起发行）。在1960年代，它是具有强烈节拍的音乐、摇滚音乐和性知识浪潮波及年轻人的传声筒。1965年，14～19岁的年轻人消费了88.5万份。由于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杂志的发展，《听着》（*Hör zu*）特别成功，第一期在货币改革不久后发行，销售量高达10万份，1965年更是达到了400万份的极限。讽刺文学类作品出售得也很好。《不好意思》（*Pardon*）的发行量在1961年到1969年间从5万份增长到36万份。

“画刊”和“彩色周报”［由于许多是关于皇后索拉雅[1]（*Soraya*）的浪漫且情意绵绵的故事——索拉雅与她的丈夫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于1958年由于无子女而不得不分开——这些报刊同样被称为“索拉雅报刊”］的大部分将女士作为目标读者。服装、美容、菜肴、孩子，当然还有爱情和婚姻是主题，政治则被抛之脑后。一份妇女报刊的分析在1966年7月发表，卷首画所展示的几乎只有年轻的、时髦的、整洁的、

令人喜爱的不知名的女孩——有一些是展示如何穿搭时装或美容的，有些是因为其光艳照人。大的赢利份额分别由5～6个画报出版商占据，1968年市场份额为：鲍尔占26.1%，施普林格占13.3%，布尔达占8.9%，贝塔斯曼占8.4%。

> 1961年4月最重要画报的发行量总计为：《明星》1333641份，《快》1242202份，《歌舞》1046915份，《新画报》810238份，《彩色画报/慕尼黑画报》868882份，《法兰克福画报》480628份。在所谓的绘图周刊中，《新刊》（*Das neue Blatt* ）993273份，《家和世界》822844份，《星期六的新世界》532490份，《绿刊》（*Das grüne Blatt* ）364773份，《新邮报》317006份，《周末》295981份。女性和时装双周刊杂志中，《康斯坦策》630847份，《给您》（*Für Sie* ）510124份，《布里吉特》493182份，《电影与女性》382750份。

左派认为，《图片报》的不断增长是新闻自由的灾难。《图片报》作为“从施普林格的家里出来的怪兽”击败它的对手——这可是一个定位在文盲边缘上的报纸，对持续讨论的希望来说，这是大大的讽刺。1964年，这个最大的跨区域德国“日报”售出了405万份。而这份报纸的出版者，直到他去世（1985年）都自诩为阿登纳时代价值观的政治传教士。

自1955年10月出版的报刊《最美丽的》针对的目标群体是心情愉悦的精英，他们不仅穿着更漂亮，居住更舒适，饮食更美味，旅行更出色，而且他们想要发现文化的美好，因此“迫不及待地期待每月的新一期”。

由威利·弗莱克豪伊斯设计的《年轻人》（*Twen* ）的突出特点便是涉及纨绔子弟（Jeunesse dorée）的内容（他要对直至1970年的外表负责）。同《最美丽的》一样，《年轻人》并不是靠发行量（每个月几乎不超过10万份），而是靠它所传播的“生活水平”“思想”——远离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风度：“新鲜的、狂妄的、感性的、无法抵抗的外表、不妥协的、现代风格的、主题刺激的、基调愉快的、乐观的和对生活充满兴趣的”——来获得成功的。

反抗的支点

无线电广播是一个从战后开始流行的新闻媒介，为“无家可归的左派”提供了展示更大公开性的可能。持保守派立场的沃尔夫·约布斯特·西德勒时任柏林《每日镜像》的副刊主编，他对此颇有微词。

“无线广播公司的晚间播音和夜间栏目作为从文学上表达反抗的支点可以退休了。在那里称赞自己弱点的人全是国家中的权贵。”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没有一个不为无线电广播工作的作家——这在经济上也很重要，因为以这种方式远离大众口味，独立的、不顺应潮流的思想还能够拿“薪水”。“是麻烦，是沙子，不是在世界的驱动装置里的油。”君特·艾希在广播剧《梦》中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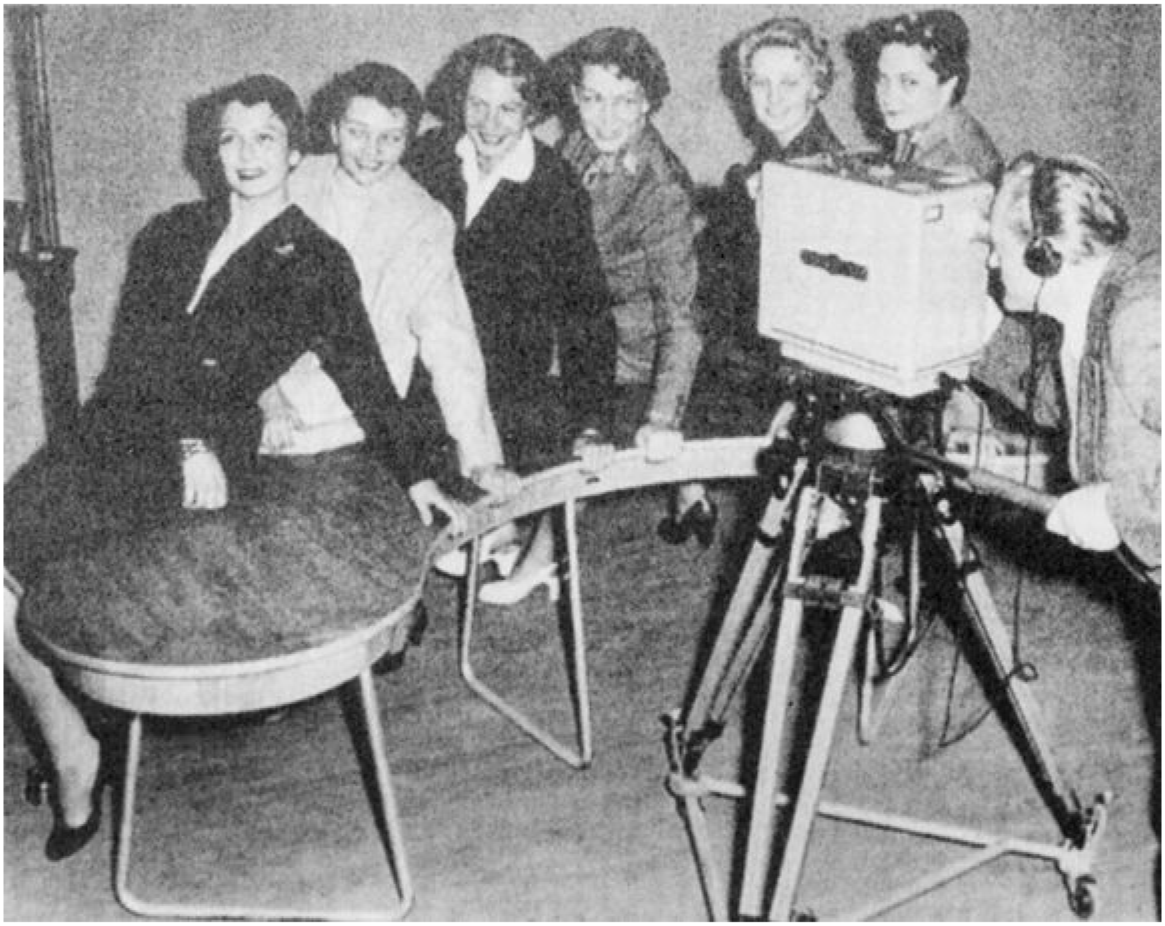
无线广播公司很喜欢播放的广播剧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传达了一个概念，恩斯特·布洛赫称之为“原则希望”。它并不建议廉价的解决方案，但要求在人们中唤醒人性。沃尔夫冈·伯歇特的广播剧《门外》（1947年）是新的德国无线电广播发展史的里程碑。自此之后，重要的男女作家们均发现了这种文学的类型，包括君特·艾希、伊尔斯·艾辛格、英格博格·巴赫曼、弗雷德·冯·霍尔歇尔曼、马克斯·弗里施、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海因里希·伯尔、格尔德·厄尔施雷格尔、莱奥波德·阿尔森、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姆、沃尔夫冈·维劳赫。

> 广播剧的听众反应是强烈的。“物质的表象”很大程度地拘禁了想象力，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喜欢在“混响室”中展开的艺术方式——电子产品，“一方面是通过技术手段对变响的和同时消声的言语和声响的混合，另一方面是在听众内心非肉体的、纯精神的‘观看’”（海因茨·施维茨克的广播剧文集《说话，让我看见你》的前言）。这是一群感觉细腻的听众，厌倦了粗野、现实的喧嚣，享受“内心舞台的平静”。对于“场景”，正如伊尔斯·艾辛格所展示的，恩斯特·施纳贝尔（在西北部德国无线电广播中的第一个语言部门领导，后于1951～1955年接任台长）认为，本来这些黑暗以外的故事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它们如在昏暗房间中的电影画面那样消失在一瞬间。1940年出生的电影编剧赫尔

> 玛·桑德斯布·拉姆斯在对经济奇迹国家内的“广播剧领域”的回忆中这样写道：“广播剧是最悦耳的，是人们在家里就能够拥有的。这是有关那些仿佛蚂蚁般的人群的故事，从建筑物内部开始啃咬，直到倒塌。老实人和纵火犯，老虎朱瑟夫，大火，烫衣板的声音，这是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

恩斯特·施纳贝尔说，无线电广播在停战后第一年比政党更多地履行民主职责。康拉德·阿登纳所持观点与此相反，他有“使无线电广播成为当时联邦政府的政治领导工具”的想法（他一直认为联邦政府对无线电广播栏目上丧失影响力是极为难堪的），至于电视——鉴于这个新闻媒介被预期有极大影响力——类似的观点就更强烈了，不过这也更危险。尽管联邦总理曾多次尝试，希望使联邦政府相对于各州成为媒体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但均以失败告终。

> 根据1961年2月28日联邦立法院的判决，全部的无线电广播权限被判给各州，无线电广播作为“文化现象”落入各州是在基本法中所确定的文化权之下。此外，不管哪种组织形式都必须给予保证：其中以类似的方式，如在公开-司法的机构中，所有社会的重要力量可以得到表达，新闻报道的自由将保持不变。根据一项调查，56%的居民希望有第二个信息通道，国家已经在1961年3月决定，独立于存在的机构，创建一个公众权力的中央公共福利的电视机构。对于德国电视二台（ZDF）作为第十二个无线电广播电视机构的国家合同在1962年1月1日生效。州政府的11个代表、联邦政府的3个代表、来自在联邦议会代表党派的12个理事以及40个社会重要团体属于该电视台理事会。按照汉斯·鲍施（自1958年起担任南德无线电广播的台长和联邦德国公法性广播台工作组ARD主席）的观点，这样的组成是“在国家的控制影响、政党政治的努力调解和对符合宪法规定的重视之间妥协的典型例子”。



电台女播音员，（从左至右）乌尔苏拉·冯·玛内斯库尔、伊赫娜·科斯、达格玛·贝格迈斯特、安娜特·冯·阿雷廷、露特·布莱塔格、希尔德·诺克，**1955**年

根据联邦立法院的定义，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否真的如此，一方面取决于媒体自身的文化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听众在思想上的准备，即是否有合理利用视听的信息和交流的可能性。“合法行为和不法行为在电视中如此接近，跟我用的其他工具一样”，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在他的书《在通向无父社会的路上》写道，不法行为从使用方式中产生：正如我们看表演不是为了获得信息，而是满足某种幻想，如在家的人离开家，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发明，而是因为用户和代理商被推去了学校。“人们在晚间沉浸于电视、电台而无法自拔，毫无疑问与人们白天所承受的生存压力相关。”

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负责人非常严格地运用了这种“沉浸”来衡定未来

的发展。电视应被理解为用来教育人类的工具。当1950年代中期德国语言诗歌研究院在一个主题为文学-广播-电视的会议上讨论时，西德电台在汉堡电视中心的领导人维尔纳·普莱斯特，以用在电视上的口号结束他的报告：“人类，变得重要！”（Mensch，werde wesentlich！）西南无线电广播的台长弗里德里希·比肖夫，警告说伴随着电视的必然到来，如果电视节目的制作没有足够艺术，必然出现危险。作为西北部德国无线电广播的台长，普莱斯特在谈及1952年的试播时说，在德国的电视中从不允许有广告，这样做是为了——联邦邮政局长汉斯·舒贝尔特的原话——为“德国灵魂的复苏”做出贡献，人们当然不是在美国。

> 1955年有10万名电视观众注册，1957年10月达到100万名，1958年年底达到200万名，1960年年底达到400万名，1963年10月达到800万名。一开始购置设备伴随着高额的成本。1951年，柏林的第二次德国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17家公司的30个电视样品，尽管当时有两种规格。台式机售价1200～1500马克，电视箱或者电视柜相应地贵一些——客厅家具以社会威望为目的，通常受到“西欧传统”的限制，就像名字叫作“提香”“拉斐尔”“列奥纳多”“列奥纳多·奢华”。
>
> 从每日新闻开始，“这样的一道蔬菜炖肉，它必使你们成功”［西北无线电广播1952年12月25日播出的第一个节目是歌德的《剧院的序幕》（*Vorspiel auf dem Theater*）］属于电视的“大杂烩”，故事片、运动、实时的和卡巴莱式的节目大受欢迎。在西北无线电广播的总经理阿道夫·格里梅的带领下，1953年10月在汉堡的洛克斯泰特第一个战后演播室开放时，发布了口号“给予欢乐！”，完成了娱乐的扩大。国家最重要的主持人是汉斯-约阿希姆·库伦坎普夫，他以智力竞赛节目《谁对谁？》（*Wer gegen wen*）而闻名，彼得·弗兰肯菲尔德，以其以美国范例定位的即兴表演秀《1∶0给您》（1∶0 *Für Sie*）而闻名，罗伯特·勒姆布克以其《愉快的工作顾问》（*Heiteren Beruferaten*）（自1955年起）而闻名，还有克莱门斯·维尔门罗德的电视烹饪节目，马克斯·施梅林庆祝电视的回归。第一批家庭连续剧大受欢迎。1953年8月30日，杜塞尔多夫的“莱茵的阳台”第一次向当时还相当少的电台转播《国际早购买》（*Internationale Frühschoppen*）——由维尔纳·霍福尔主持——成了最热门的信息节目之一。
>
> 政治性的“时事述评节目”也很成功。这些节目也正好很清楚地表明，宪法在新闻媒介方面“不进行审查”的原则，在猛烈的政治观察以及政治压力下，坚持到底是不容易的。例如，北部德国电视台1964年

> 11月在节目《全景》中展示了鲁兹·莱曼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批判了西德政治犯罪的刑事诉讼，电视台在官方压力下不得不在六周后与之保持距离。广播节目中享有盛誉的解说员欧根·科贡被领导停职，而此前勇敢的主编格尔特·冯·帕琴斯基在一段时间之前就已被辞退。在告别演讲中，科贡向在西德业已萌芽的公开活动的“独裁者”发出警告。

是否以及如何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来启蒙，尤其表现在节目的内容上。这些现象在西德这个“复辟的宫廷”中无疑也典型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愚人角色”：幽默小节目在百万听众中获得巨大的成功（收视率达到90%）。

在论文《用嘲讽来批判——西德卡巴莱式讽刺的实践、影响及问题（1945～1974年）》中，尤尔根·佩尔泽一口断言：五六十年代幽默小节目的问题在于，尽管人们想要以平民-自由的身份来施加评论，却并未诉诸日益富足的、对改变几乎没有兴趣的观众。因为不能灵活地对转变的历史局面以及转变的影响情况做出反应，最终只在或多或少提高的娱乐水平上发生改变。这几乎与政治的启蒙无关，最多只等于某个阀门，而此阀门最终还是建立在现存意义上的。政治幽默小节目的反抗被越来越多地证实为只是表面上的反抗。

> 迪特·希尔德布兰特和萨米·德雷克塞尔1956年创立的“欢笑和突进团体”被看作政治上的幽默小节目剧组，直接触及最新问题，具体对准政治丑闻和犯罪行为。这“冷静进取、开开心心边打边骑的四剑客”（迪特·希尔德布兰特、克劳斯·哈芬施坦、汉斯·J.迪特里希和乌尔苏拉·诺阿克）对阿登纳——他们称之为“凯旋的马”——有某种“深刻的谢意”，因为你不能想象比他更好的攻击对象了。
>
> 西柏林的“豪猪”在1949年10月首播，致力于节目的易于理解和富于幽默感。“实际上，他们以这种方式上升成为特别通俗的幽默小节目，同时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绝大多数观众正面评价这个栏目，并且总体来说明显地感受到震惊、感动或抨击。”
>
> 1947年凯和罗赫·洛伦茨在杜塞尔多夫创立了“旧钢琴”。“旧钢琴”开始阶段的讨论集中于越来越流行的机会主义和表达对军国主义的忧虑，到了在1950年代后半期，其“文学地”、委婉地表达讽刺的趋势有所加强，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 小型歌舞演员沃尔夫冈·诺伊斯将在大的中心国家所排挤的东西公之于众。1962年，由他主演、在当时电视上非常受欢迎的连续剧《弗朗西斯·杜尔布里奇的围巾》于结束前30个小时在报纸上预告了凶手，电视民族被激怒了。诺伊斯被看作“联邦德国的幽默小节目名嘴第一名”（“如果不十分确切地像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那样思考，则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逐出”）。人们称他为“有鼓的男人”“民族嘲讽者”“经济奇迹中的蒂尔·欧伦施皮格尔”“柏林的宫廷小丑”“诽谤者”。

幽默小节目在东德一开始大多是表面上反对教育专政的“阀座”。“蓟”（Distel）［除了“胡椒磨”和“大力神俱乐部”外东德最重要的幽默小节目］的负责人认为，“我们的作用和我们的目标是以特殊的讽刺、幽默、挖苦等手法，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权力关系和财产关系”。在这样一个思想方向的主导下——对政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幽默小节目的特殊性质并不能发挥作用。尤其在每个节目开始之前，台词都必须呈交给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主管的区域领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小型歌舞演员变得越来越顺应时势，越来越机会主义。对一些作家来说，越过一点点“允许的”界限就成了特殊的刺激。同时，通过使用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比如在莱比锡的“胡椒磨”中）成就了辉煌的政治——讽刺的表达方式和多义的台词，并以高程度的娱乐性和攻击性把原本完整的整个栏目切割成一个个小块。

1976年，文化部制订了对所有行政区内所有职业卡巴莱剧的创作计划，该计划直至1985年有效，同时还强力促进了600多个业余卡巴莱剧。这使讽刺一时间成为文化目标。某些人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反复受到审查并且打破了意识形态上的节奏。

然而，教育专政的刺激更多促成了各种匿名的“东方联盟笑话”，这些笑话仿佛间接的反抗。释放的笑声虽然不会妨碍有影响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有官僚作风的干部野蛮行使权力，但“地下活动”使他们在琐事上出丑。人们能够稍微改编一下席勒的诗，说成“士兵滑稽地进入地狱”。在东德和东欧人民的笑话陈列中出现政治领袖，如“屠杀者、强

盗、骗子、丧心病狂的人和白痴、酗酒者、无知者，最好的情况下也被称为自以为聪明的人”。越是那些民间传闻中高不可攀的，越毫不留情地被轻视和嘲笑。“他们的行为从未被写成一个高尚的题材。民间幽默令人惊讶地对各个统治者在等级上的差别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

东德的生活谎言

在报刊《建设》1946年第7期中，维克托·克伦佩尔（在他死后出版的日记中记录了幸存的犹太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可怕经历）勾画了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在纳粹诽谤的年代后重新获得社会影响力。最基本的条件是一些人从普通民众的行列中走出来，他们没有沦为本能的奴隶，反而懂得了什么才是有理性的本能。

“如果我们采用纯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概念，这个概念与作为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概念有所不同，那么我们现在的理想化的要求必须是：我们必须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

东德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不是所有人，但绝大多数——是Tuis，他们从意识形态上接受自己作为政治工具，对此也有心理准备，这摈除了他们在道德上成为“指路明灯”的可能。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是，在东德的制度中差不多只有那些适应的人能够不受干扰地生活和工作，并且这意味着：要牺牲自发的活力、开放和诚实，放弃对无聊和受限的臣民观念的批评能力。有雄心和想要发挥作用的人必须入乡随俗。对他们的这种成果不可避免的代价是在道德尊严上和个人正直上的损失。

> 当东德分崩离析之时，分子生物学家闫斯·莱希意识到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思想上的压力，对东德的知识分子进行清算。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能够以多样化的方法成为教条社会主义的帮凶，并背叛了自己以及人民的事业——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和权贵阶层狼狈为奸、共同工作、“履行其职责”。人们必须不抱幻想地认清这些从而远离生活的谎言。如果他们接管权力的缰绳，那么知识分子衰退，他们操纵官僚

> 政治和专家政治，他们失去了与抽象现实的联系，成为权力的拥有者和管理者。知识分子分裂成许多个不同的群体：第一部分是信念坚定的体制支持者，第二部分采取坚定的态度随时准备“再结晶”（鲁道夫·巴霍），第三部分或许是最大的群体，表现出适用非政治的态度，第四部分（最小的）由活跃的“抗议者”和“改革者”组成，他们渴望有力的改变，然而另一方面是与此相反，至少还是谨慎行事。
>
> “弄人”证明了自己是有制造混乱能力的反对Tui的人。这些人在言语上超越制度，他们不使用武器，而是冒着可能被踩踏的危险。他们总是被人嘲笑，却毫不动摇地说出自己认之为真理的反命题。“只有弄人才有机会被关注。只有弄人才能够冲破束缚。”

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恩格勒反驳了西方笼统的猜想：在东德根本没有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艺术在于，人们没有对无家可归者负责，却让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夹层中。对此，艺术领域提供了机会，借助艺术品特有的对立性，或是避开了政治上非黑即白的锋芒，或是将其连消带打融入某种笼统的“大杂烩”（社会主义、反法西斯主义、民族间的友谊）中。在1950年代，这意味着，尽管整体社会的条件并不乐观，依然有一些优秀的艺术成就：如贝托·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和瓦尔特·费尔森施坦的“滑稽戏”，地方现代美学的杰出代表有鲁道夫·茂尔贝格领导下的“德累斯顿十字合唱团”和君特·拉明领导下的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还必须要提到的是德累斯顿的现场画家约瑟夫·赫根巴尔特和汉斯·特奥·里希特。“这种孤立的现象自然不是为了反传统文化。它们会多多少少引起一些公众探讨（比如德绍和布莱希特的《鲁库鲁斯》），以半官方的方式融入整体的文化生活中。如果人们回过头来看科学，考虑到如恩尔贝格的俾斯麦传记这样的作品，便会发现这样的特性也适用于最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东德。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杰出学者尤尔根·库琴斯基在一部他的传记体作品中要求自己是‘岛’（Insulare）。”（君特·威尔特）这背后尤其——如海纳·穆勒——具有某种特别意味深长的愤世嫉俗：“剧本在独裁的背景下比在民主主义下写起来更好，也正如其一直具有的特性。”要么就折向牧歌式的回程：莎拉·基尔施的诗满是兼具怪诞与抒情的怀旧景观，讽刺的是许多政客还真以为它们是非政治

的，这些诗也能解释为知识分子的心理风貌，他们又一次在内心深处流亡。



维利·诺伊贝尔特：政党讨论，**1962**年

人烟稀少的国家，/尽管有广袤的原野和机器/村庄仍然在沉睡/在黄杨树的花园里，猫/很难被石块打到。/

八月里星辰坠落。/九月里人们开始捕猎，/还有飞行的灰雁，行走的鹳/穿过无毒的草地。啊，云彩，/他们飞过山脉越过森林。/

如果此时人们没有在读报纸/那么世界正常运转。在李子酱罐上/美妙地反射着自己的脸，而且/火红地照耀着田野。

东德的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首先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东德打成

一片，因为新的国家明确且坚决地反法西斯并且由此给予他们特殊的权利。“德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法西斯自发地生成”，闫斯·莱希将此称作一个传奇。人们不想再走上德国的非政治性的文化歧途，而是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承诺。对此最重要的是——诗人君特·库内尔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员和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抒情诗奖的获奖者，1979年移民到西德）回忆道——战胜衰落，重建的并不只是毁坏的城市，“而尤其是更好的、更自由的、更高尚的、更和平的联盟。人们对此感觉到受到召唤。人们意识到这是道德上的义务，屈从于公共利益……人们不再想要非政治的，而政治的是：煽动性的和启蒙性的。当然我也不例外”。这也是受教育群众势力的信念以及回归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侨民共同寻找的新方向。

最初，由国家拉拢、在物质上也获得补贴的知识分子在东德起到他们“完全重要的作用”——只要他们举止得当并且适应国家的教义。在那些国家干部眼中被视为形式主义或颓丧的——所谓“阻碍了德国文化的进步”——便没有存在的资格。“表现资本主义衰落的‘灰加灰绘画’，与德国民主制度共和国的新生活存在明显的冲突”，瓦尔特·乌布利希于1951年10月31日在人民议院上宣布关于五年计划的法律草案时如此解释，人们既不需要月球表面的图片，也不需要腐烂的鱼类以及类似的物品。民族最高级别的首席指导员颁布法西斯主义的术语，一门以堕落和毁坏为榜样的艺术是病态反美学的。一年之后，在1952年7月第二次德国统一社会党党代表会议上，为了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而奋斗的新人必须处在艺术创作的中心，成为积极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勇士。通过这样的方式，艺术家在人类的发展中塑造新人和进步人士，艺术家协助培养数以百万计的进步人士。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表明了这能够通向的地方，他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主题为“我们共和国文化工作者的任务和同样的全德国知识分子最好的一部分任务”的党代表会议中以“大合唱”为题，朗诵了他对政党的感谢：“你大于我们，你是我们的全部意愿：/我们感谢你，你，我们在成长！/只有你能够实现和平的梦想。/你

的红旗迎着世纪之风升起。/称呼你赞美的第一个完整的德国，/因为只有通过你德国才能统一和自由！/让你感到自豪，让你承认完全的自豪：/你的所有力量，胜利是你的，政党。”

东德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人——除了史蒂芬·海姆、（非常矛盾的）史蒂芬·赫尔姆林和贝托·布莱希特之外——对1953年6月暴乱的平息以公开拒绝的方式做出反应。“自发的团结随着罢工的结束而消失。对下层压力的不信任，对已有一次被法西斯主义所诱导的群众想法的怀疑，对西方可能的反应的担心，批判性地面对自身机构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保持克制。尽管有对所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压抑，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已经变得极其有钱有特权——现在他们的行为也显而易见：他们的确不只失去了锁链[2]。”

然而，苏联共产党在1956年2月的第二十次党代会对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评判终究给一些反叛的知识分子（如曼弗雷德·比勒、格哈德·茨维伦茨、埃里希·吕斯特）提供了批评性“发言”的可能。1956年6月在开姆尼茨举办的年轻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海因茨·卡劳要求“艺术需要思想的解放，艺术需要宽容”。在1956年11月匈牙利起义被镇压之后，围绕乌布利希的强硬核心能再次得到实现并转向进攻。有五条进攻线路——这表明，除了Tui外反对派知识分子的阵营有所扩大——

1.科学研究所及其代表，如柏林洪堡大学，在哈雷、耶拿和莱比锡的大学（如汉斯·迈尔、恩斯特·布洛赫）；

2.文学代表（如埃里希·吕斯特、格哈德·茨维伦茨）；

3.出版机构及其代表：如《德国哲学报》的沃尔夫冈·哈里希，文化协会报刊《星期日》的古斯塔夫·尤斯特，建设出版社的瓦尔特·扬卡[3]、沃尔夫冈·哈里希；

4.讽刺报刊《欧伦施皮格》和政治卡巴莱，如莱比锡的幽默小节目“胡椒磨”；

5.反对派中的一些领头人，如卡尔·施尔德万（政治局成员和干部调查中央委员会秘书）、恩斯特·沃尔维贝（国家安全部部长）、弗雷德·欧尔斯勒（政治局成员和首席思想家）。

> 布洛赫的学生格哈德·茨维伦茨在西德能够通过潜逃而逃脱逮捕。紧随其后的是布洛赫（1961年）和汉斯·迈尔（1963年）。哈里希、扬卡、尤斯特和其他人被判处严重的劳改。这起诉讼就是一场笑剧，从一开始人们就知道，除了“有罪”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能，审判不公属于制度问题。如瓦尔特·扬卡在其逮捕和定罪的报告中写道，法庭对律师主张宣告无罪的建议根本没有记录在案。“这就是这样。当政党给予指示时，法官服从。法庭对扬卡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并接受检察总长对共同被告人的提案。”
>
> 这场对扬卡的诉讼正如其他的诉讼程序和事件清楚地说明了东德知识分子可怜的Tui心态。很多人出席了扬卡审判，包括安娜·西格斯、维利·布雷德尔（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博多·乌泽（德国艺术科学院诗歌和语言组的秘书）。观众席出现了对扬卡的嘘声，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主编埃都瓦·冯·施尼茨勒、《星期天》主编博恩特·冯·屈格尔根、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国》代理主编君特·凯茨舍博士也参与其中。“他们冲撞对方并且用拳头敲击台面。如同在惬意的讲座之后疯狂的学生们……甚至没有人以卢卡斯朋友的名义抗议不实的指控，这是整个诉讼期间最令扬卡失望的。”
>
> 1989年5月1日，扬卡被授予“祖国的金色勋章”，“感谢他在德国的民主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杰出的贡献。”这一转折点之后，1989年11月5日在德国剧院的演讲中，他，一个在最困难的年代中一直为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西班牙的和国际的志愿者鼓足勇气的人，以呼喊结束其论述：“我们必胜！我们必胜！”

自1959年以来，东德文学和艺术走向比特费尔德道路，与工人阶级一起“向文化的高度进攻并将其占领”。在明文中叫作文化工作者应该作为“灵魂工程师”来创造非黑即白、不容置喙的“东德意识”，认可现有的权力关系并且辅助创建它。相比于其他东方国家，东德的发展最负面、最呆板、最笨拙，汉斯·迈尔在与弗朗索瓦丝·邦迪的谈话中这样表达

道，人们欺骗自己，卡夫卡没有活过，詹姆斯·乔伊斯没有写过《尤利西斯》（*Ulysses* ）。

瓦尔特·乌布利希1959年在比特费尔德进行的电子化学联合企业的演讲中预告了一种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新形式。这意味着：作家前往工厂寻找素材，而工人则应该坐到桌子旁。“拿起笔，哥们儿！”德国统一社会党通过唤入生命的运动来追求最初的目标：群众的动员，这是首次导入关于文化政治的主题，对于教育赤字的消除在这些工作中达到一个更好的政治意识，因为感觉到过去的意识水平还有不足之处，关于工作小组日记和工厂的壁报的促进信息从下往上流通，使用政党的文章作为信息来源。同时，促进人民通信运动：工厂中的工人从报刊中得知生产过程中的成功和困难。这样产生的文学应促进意识形态的恢复。如果作家是小团体写作或宣称自己是写作的工人，人们就希望他们能被更好地归置到意识形态的监督之下。各个机构都认为，自己的领导作用从现在开始将毫无争议。

> 举个例子，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之一的W.列文在一次政治教学法会议中推荐“赖因哈德·本尼茨克在《新德国》1959年9月5日的副刊《艺术和文学》中的诗歌，他已长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并且是卡尔-马克思城年轻作家工作联盟的成员”，那么人们能够认识到新民间文学的自然性，另外还有铀的例子（“铀在群众手中，服务和平”）：“睡吧，哥们！/换班后获得你的工资，/父亲回到家里/还有浴盆以及花洒/已经在等着咱俩。/睡吧，哥们！”

乌布利希在1964年4月第二次的比特费尔德大会上确定，努力达到高质量也未必成功。此外，比特费尔德道路也给作家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查明“不合情理的”地方的可能性。人们表示忠诚，与社会主义同行，然后在一旁扭打，滚到灌木丛中。对艾尔文·施特里马特来说——他的小说《养蜂人欧勒》讲述野外工作者的儿子和养蜂人欧勒·汉森的故事——“偏差”意味着关键问题的答案：“我们怎样才能在我们的社会中好好地安置新人、进步者，我们才不会切掉他对事业的追求，但即便如

此，我们也不会让他脱离以走向无政府的一方。”在埃里克·诺伊赤的小说《石头的痕迹》（1964年）中，主角木匠汉内斯·巴拉（施工现场的国王、一个孤独的战士、自身财富的追求者）曾经有过相当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但他最终变成一个认真负责的、集体主义指向的社会主义者。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小说《分裂的天空》（1963年）中述及一个教育学女学生（在一家火车工厂的生产队中完成了实习）对一个柏林墙建成后待在西柏林的化学家的爱，她拜访她的朋友，然而决定反对西方的社会制度。

1963年1月，君特·库内尔特在报纸《世界舞台》上发表一个故事，勾勒出在瓦尔特·乌布利希领导下的东德的文化政治局势：“禁止照明。”

“他说那是多余的奢侈/他禁止人们建造/灯，他说这是为了阻止犯罪/这是国王塔索斯·冯·克山托斯的命令/他生下来/就是盲人。”

>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称，选举闹剧在知识分子的引导下由99%的民众共同完成，数百万人定期参与欢呼和游行，人群中超过多数是少年先锋队、德国自由青年联盟或者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参与国家安全部“通风报信”活动的人超过50万。“没有人宣布他没看到、没有经历甚至参与到对我们的环境的无情的污染和破坏，使我们的城市没落，媒体和公开报告中的恶意欺骗，愚蠢的口号，道德的沦丧，通过贪污、间谍活动、告密、谄媚和对权力的巴结来毁坏我们的关系。”
>
> 在错误上执迷不悟也许有一个特殊原因，因为最终那是正确的。东德的Tuis本可保持如西德左派知识分子的态度，因为后者从“原则上”来说也期待用马克思主义来救治世界，1960年代末的抗议活动就是他们态度的最好表现。来自布拉格的诗人扬·法克托尔（Jan Faktor）自70年代中期以来经常、自1978年起完全生活在东柏林，尽管对东德知识界深表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却一如既往，这尤其受西德学生运动及其思想导师的影响。其中，更多以“公民”为导向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的东欧国家的反对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信念不应归因于勇敢或者适应性，不是培养或教育的成功，它“和音乐、裘皮大衣或很黏的‘透明胶带’，和‘符号D’，和《世界景象》以及其他西方来的东西一起出现。它来自西德左翼的讨论集团，来自院外反对派，来自红军派

的思想领域。这个信念与西方左翼人士对西方制度的愤怒相似。它来自每个人的无力感和‘那也不幸福’感，在西方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此外，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消费的或者左倾的西方文学也给予它营养，这些文学以各种方式被偷运到东德”。由此，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反倒成了全德国的一条纽带。

法兰克福学派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方向样本对西德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十分迷人，因为它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揭露富裕社会的实用唯物主义的错误本质，并提出一个完全的社会改造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目标。这种出身的知识分子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富足，但是喜欢亲自参与到舒适富裕的居民生活中。“右手吃饭，左手写作。”Tui的可疑之处也正在于此，许多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发言人在其后生涯中转投保守主义的阵营，断然反对早前的观点。

他们在“高阁”流连忘返，从生活实际退到理论制度中，分析现实时却常常失之于极端偏颇，远离“人民阵线”——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首先遭遇“舒适的逃避主义”的谴责。娱乐副刊中本是多种多样、常常以娱乐的幽默方式来进行的文化批评，被法兰克福学派以其在概念上钻牛角尖的“批判性理论”变得越来越系统化。回想起来，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即使磋商不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保留剧目”，僵化的关系到底也由此被活动开了。另外，许多事也在指向一个结论：曾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达到顶峰的思想革命看起来在所有方面都收效甚微。

“由于重要的实践被阻挡而产生的绝望用一种诡异的方式给予思想喘息空间。如不知道利用这个机会，那简直是一种亵渎。”（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

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被视为先锋文化、极大影响着大学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就以这种方式经历了一次回归。由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和弗里德里希·布洛克领导的社会研究学院——在魏

玛共和国中借助百万富翁费利克斯·威尔建立，通过弗朗茨·诺伊曼、赫伯特·马尔库塞、雷欧·洛文塔尔和本雅明的共同努力得到巩固，然后迁移到美国——重新定居在德国。1946年10月，法兰克福大学的管理委员会业务管理主席克林克霍夫受研究所的正式邀请回到法兰克福。这经过了法兰克福市市长、社会民主党党员瓦尔特·科尔布的同意。他接过他的旧教席，成为哲学系的系主任，然后被选为校长，在这些能力方面，他为法兰克福大学的重建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所大学“是从零开始重建的”。阿多诺于1949年11月初抵达法兰克福，那时他46岁。

在东德大张旗鼓的马克思主义被教条禁锢得十分狭隘——“官僚干部”是最重要的角色——法兰克福学派算是其反面：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与市侩主义泾渭分明，是迟疑并且谨慎的，他们明白系统化思考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在批判资本主义原则上是严格且不可争辩的，这吸引了更年轻一代的部分。此外，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其他研究院工作者还引入了西方文明的反面经验，这影响了反美主义者组织的抗议活动。

总的来说，“批判的理论”是对精神反抗的勇气的表达——“困难的工作”。

……不耐烦的

以满足的名义

绝望的/有耐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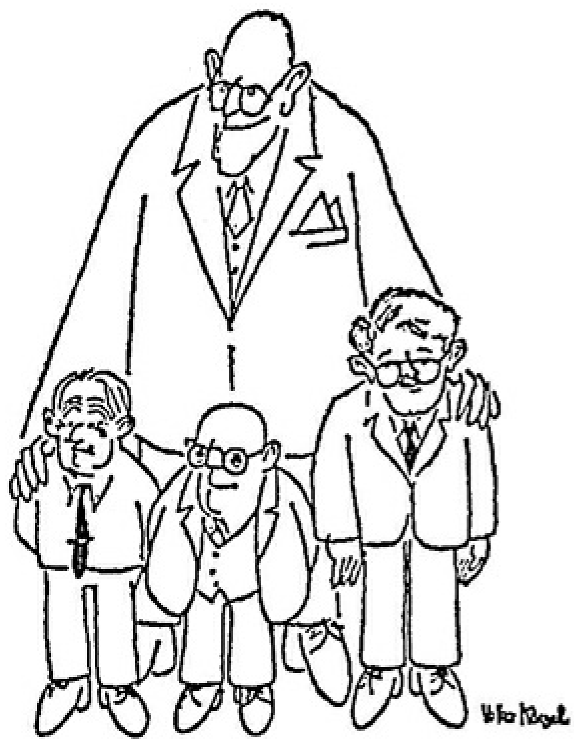
以绝望的名义

绝望怀疑/不耐烦的有耐心的

以不可教育的教育名义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困难的工作》，献给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

“否定辩证法”是对现有制度的拒绝，也就是反制度。因为启蒙思想并不比它植根其中的社会制度这类具体历史进程好多少，它本已包含退步的萌芽。启蒙思想必须在其中接纳对退化因素的反思。这样的“宏大批判”是借理性之手制止理性凌驾一切。真理并不归因于理性的意识，而是必须在现实中逐步塑造理性意识。但随后面临的危险是，对立概念的纯洁性在现实中遗失。“诚意的改革者用旧语言推荐革新，通过接管已被细细研磨过的分类机构和机构背后的坏哲学加强了他本想打破的权力，这是最没希望的状态。”



“批判的理论”之父及其子孙赫伯特·马尔库塞、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以及尤尔根·哈贝马斯（漫画为沃尔克·克里格之作）

按霍克海默的表述，“批判理论”在于这样的信念：我们没有能力显示、只有能力阐明绝对的善，这正是我们的痛苦之处，这也正是需要做出改变之处。经济奇迹世界为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进攻提供了许多诱因。就算接受完全自由的乌托邦尚很困难，但人们至少足够自由，能认识到他们过去所承受的束缚终能被废除。《启蒙辩证法》——该书在美国创

作——的中心点是，把启蒙扳到它的对立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者看到人们对理性、对自己启蒙——即自我批评的反省——的漠视）。工具理性为目标服务，丧失了它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在于利益最大化，而在于社会的人性化。合理化的过程——马克斯·韦伯用“去魅化”（Entzauberung）这个概念来刻画这个过程的矛盾性——意味着灾祸的胜利。“对不断的进步的诅咒是不断的倒退。”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在1966年出版。如格奥尔格·皮希特所称，这是欧洲哲学的最后一本书。该书用否定的形式保护了欧洲哲学的经典主题，如纯粹性、自由和不朽、生命和死亡，使它们能够在沉默的事实中展开。否定的论证也就是“想不同的思想！”这句话后面有一个简单的认识：虽然这个世界可以没有人而存在，但是人不可以没有世界而存在。现代苦难的唯一出路是调和，对客观、未知事物的认可。辩证法即是不断地意识到矛盾和不一致，并将其定义为“未知”，辩证法中的矛盾原则之所以优先于其他原则，是因为矛盾正是以“统一思想”的不统一为标尺来衡量的。

> 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分析了肯定性文化背后的虚假，研究了现代群众歇斯底里的形成过程或影响，特别是反犹太运动的形成，这在“左翼分子”中引起深深的焦虑。当然，法兰克福学派中尤其是阿多诺常常运用过多、过于复杂的概念，把哲学搞成文字游戏，这也与研究该有的坦率相悖。当言语和概念过多时，“实质”就会丢失。卡尔·R.波普尔[4]——“简单”哲学的衍生大师——揭露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抽筋般的语言态度。（比如他说，“社会的整体并不导致其构成本身总结之上的个体生活”说的其实就是：社会由社会的内在联系所组成。）概念所主张的追求通常说穿了只是单纯的口头杂技，而正是这不接地气的口头把戏显得花样百出、吸引着观众。当然，人们也不能忽视，“批判的理论”努力的并不是简单化复杂的事实，而是在适当的平面上用多样化的语言上表现本就复杂的事实，这也阻挡了经济奇迹时期的特征——简化——的渗透。“因为对我来说，语言作为思想的构成成分对思想的意义非同小可，就像威廉·冯·洪堡对德国传统的意义那样。我在自己的思想中在语言上也要求自己遵守这样的纪律，避免过于简单的语言。”（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阿多诺认为，在否定语言的严密结构中，首先应该抓住和严防浪漫-宏

大、沉浸于非理性中、肯定现存制度的术语（“本质的术语”）。如果商品的思想及其宣传的语言有失尊严，则必须试图对这种恶化追根溯源，“拒绝追随这类语言和思维模式”。批判理论用概念的严谨来批评用商品包装来传递信息的社会，这深深地吸引了新老知识分子——他们无不对坚定不移地躺在陈词滥调上睡大觉的政治深恶痛绝。

---

[1] 索拉雅·伊凡迪亚利-巴克提亚利是伊朗末代皇帝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第二任皇后。离婚后她失去了皇后的头衔，但获得“伊朗公主”的称号。她其后在法国发展演艺事业，终生没有再婚。

[2]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最后两句话。此处被借用。

[3] 瓦尔特·扬卡（Walter Janka），德国出版商，1914年出生于开姆尼茨。曾经进过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二战结束后，在东德定居。

[4] 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Sir 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年）出生于奥地利，逝于英国伦敦，犹太人，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波普尔最著名的理论在于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从实验中证伪”的评判标准：区别“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在政治上，他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奠定了理论根基。

第11章 西德文化生活的二分法

电影和戏剧

1950年代后半期，看电视成为大众最喜欢的业余活动，电影院里的观众迅速减少。联邦德国成立后，电影曾一度繁荣，但它只是用来展示歌舞升平，美化社会缺陷，平息渴望，认可保守的思维模式。1956年是最高峰，6438家电影院的观众人数达到8.15亿。克劳斯·克莱迈尔认为，那时的电影是阿登纳时代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的电影。电影里“修饰”的成分特别多。在1960年代新电影产生之前，也有其他风格，但不如戏剧、文学、艺术和音乐这些方面来得多。在国家的支持下，德国电影得以迅速发展，但这是以牺牲艺术自由为代价的。政府自己成立了担保组织，在1950～1951年承担了2000万马克，1953～1956年承担了6000万马克（通常给整个电影系列，相当于八部电影）。通过这个担保组织，政府监督控制着50%的电影产业，包括对演员的选择。

纳粹时期电影里那些表象的东西并没有被去除。在非政治的领域里，在残酷现实的背景下，它的那些关于人情人性的东西依然受人欢迎。在货币改革的大背景下，有一些反映生活困苦和不堪回首的过往的惨痛电影，但还是以歪曲和梦幻现实题材的电影为主，这些电影为现实生活里发生的事蒙上了一层让人看不真切的面纱。不管是战争事件、流亡者的命运、司法错误，还是爱情故事，总是拿个假的世界来冒充，对外国的影响，如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则视而不见。



电影海报，**1954**年

1950年代，大量的音乐剧延续了战前的有声电影——歌舞剧——

的传统，同时也受到了美国音乐的影响。电影和流行音乐紧密结合起来。1958/1959年度联邦德国的热门电影一半是流行音乐剧。阿图尔·布劳纳——战后著名电影制作人，经济奇迹时代的电影大亨——说，只有三种电影类型在商业价值方面不会令人失望：史诗电影，根据畅销书或者成功的画刊小说改编的电影，热门电影。

唱片的标题常与电影同名，或者电影与唱片同名。演唱者及乐曲通过电影、电视和无线电让人们熟悉，这保证了唱片的成功（1949年销售了600万张唱片，1958年已达5800万，主要是流行音乐）。1959/1960年，32部音乐片中有18部请了唱片明星——彼得·克劳斯4部，费雷迪·奎恩、科尔内利娅·弗罗波伊斯、弗雷德·巴特尔曼各3部，卡特琳娜·瓦伦特和彼得·亚历山大各2部，扎拉·利安德1部。

战后，由娱乐业出品的歌曲继续“美国化”，南美音乐节奏也日益普及。德语伤感歌曲进一步繁荣——如鲁迪·舒里克的《爱情吟游诗人》，在流行乐坛成功的有艾夫林·库内克，莉斯·阿西娅（《哦，我的爹地》），卡特琳娜·瓦伦特（1958年获得“德国电影大使”联邦十字勋章），彼得·亚历山大，乌多·尤尔根斯（1966年欧洲歌曲大赛获奖），德拉菲·多彻（被年轻人刊物《好呀》选为“年度歌手”），费雷迪·奎恩（1956年联邦德国第一位唱片销量达百万张的音乐人，他的畅销歌曲大多与他的电影同名）。科尔内利娅·弗罗波伊斯以童星出名（《收起泳裤》），1950年她在柏林泰坦尼亚宫首次登台，1960年代后期海因切以“调皮而聪明的淘气包”的形象成为妈妈们、奶奶们的最爱。（相反，有着猫王超凡魅力的摇滚乐被认为是噪音和骚乱的制造者，它会引起斗殴和警察介入。）

1964年，保罗·赛特、费迪南德·弗里德和汉斯·施瓦布-菲利斯认为，阿登纳时代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也带来了“电影的惨败”。德国电影的成绩曾是令人绝望的。在战后开始的贫穷年代，电影充满了希望，货币改革后，电影工业往乡土电影方向发展，声名狼藉的勇士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道德理念只为迎合小市民们的品位。

获得较好影评的有：1953年赫尔穆特·克罗特纳的《最后一桥》（玛利亚·谢尔和博恩哈德·维基主演），1953年哈拉尔德·布劳恩根据托马斯·曼的小说改编的《国王陛下》（迪特·伯舍、鲁特·罗伊维利克、利尔·达戈维尔和马蒂亚斯·维曼主演），1954年赫尔穆特·克罗特纳根据卡尔·楚克迈尔的舞台剧改编的《魔鬼将军》（库尔德·尤尔根斯和维克托·

德·科娃主演），以及1954年阿尔弗雷德·维登曼的《卡纳里斯》（O.E.哈瑟主演）。

困境中的联邦德国电影在1960年代初通过科幻电影逐渐获得重生。1962年，26个电影制片人、摄影师和演员在上豪森签署了一份宣言，这后来成为让电影业走出低迷的途径（通过国际短片电影节使这个城市成为电影界重要的文化-政治中心）。

“因循守旧的德国电影的崩溃终于使我们所摈弃的思想立场丧失了经济基础。新的电影将是我们电影新的生机，老的电影已经死去。我们相信新电影。”

参加签字的是一群“后起之秀”，其实有些已经超过30岁了，他们和其他年轻的初入行者一起，宣誓要维护宣言的精神：乌尔里希·莎莫尼（《它》，1965年），沃克·施隆多夫（《年轻的托尔罗斯》，1965年），彼得·莎莫尼（《狐狸的禁猎期》，1966年），亚历山大·克鲁格（《告别昨日》，1966年），维尔纳·赫尔佐格（《音讯》，1967年），约翰内斯·沙夫（《文身》，1967年），艾德扎·黑兹（《饭点》，1967年）。这些电影的主题涉及联邦德国当时的现实问题，如堕胎、节育、父母子女的冲突、社会排外、离婚、小市民家庭生活、年轻人的爱情、女性解放。

1932年在哈尔贝尔施塔特出生的亚历山大·克鲁格是电影理论家、电影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作家。从法律、历史、教堂音乐专业毕业后他曾做过几个短片的制片人和导演，1962年他和艾德扎·黑兹一起在乌尔姆成立了电影艺术造型学院。他利用自己的各种经历创立了一种新的叙事形式，通过蒙太奇展示了现实片段（剖析-证明）、社会病态及其影响，主要是纳粹时期的。1966年的电影《告别昨天》改编自一本名为《生活轨迹》的书里的故事，主人公是安妮塔·G.，“如一个地动仪，用探针探入我们的社会里”。她是犹太家庭的孩子，出生在莱比锡，战后来到了联邦德国，但是她与社会格格不入，因为偷窃和欺骗被判刑，然后成为科长的情人并怀孕，最后她去警察局自首了。显然这是法律的失败，但同时黑森州最高检察官、法律人性化的代表弗里

> 茨·布劳尔也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中。电影《马戏院帐篷顶上的艺人》（1968年）通过图像和旁白的结合反映了空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如艺术家、电影制作人的情况。亚历山大·克鲁格改变了传统的电影结构并举例证明，电影能调整人们的理解力。电影根本性地拓宽了文学的手法。他的电影是完美的“无目的电影”，没有遵循人们“看电影的习惯”。他认为，电影应该发展为一种责任，并且应该有群众基础。但作为一个新的电影先锋，他更多地受到了观众的批评指责。

在对德国新电影的回顾中，乌尔斯·珍妮认为1966年可被称为“真正新开始的一年”，年轻的导演仿佛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头。“德国卷起了这波新浪潮，对每个参与者来说，质量首先比什么都重要。”当然，这些电影常常只以联邦德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为背景。所以，老一代的逃避现实就这样在年轻人身上延续。电影反映出的就是这样一代人，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个想过要试试另一种走法。他们的电影全和私生活有关，基本上讲的都是有点小甜蜜、又有点小忧伤的“二人世界”。受到“地下电影院”的影响，1967～1968出现了电影“叛乱”。赫尔穆特·克斯塔尔德在电影《特别值钱》里展示了一个超大的男性生殖器，龟头像一张嘴一样，背诵了内政部促进电影事业发展的法律的附件条款及奖励规定，紧接着，被宣扬消费的广告照片包围，向着照相机透镜前的玻璃片射精。

国家的“官方精神”认为，国家剧院是肯定国家政权的堡垒。西德的剧院里表演着“欢庆的场面”，东德的剧院则是社会主义的意义。弗里德里希·鲁弗特用一句话描述了在走进西德剧院前就知道会看见什么：“满满的房子，空空的精神。”在一次题为“戏剧的乌烟瘴气和不法行为”（1955年）的讨论时，著名戏剧评论家西格弗里德·梅尔辛格对《斯图加特日报》说，如果还讲究艺术的话，我们的戏剧一无是处。梅尔辛格说，官僚主义和地方化使文化产业进入了可怕的状态，而同时艺术家前所未有地被烦乱不安和诱惑困扰，缺乏新的剧本。相反，来自法国的欧仁·尤内斯库、阿瑟·阿达莫夫，尤其是萨缪尔·贝克特的“荒诞剧”却引起了很大反响。

1969年《塔索》[1] 被拉下神坛引起轰动，拉开了新的戏剧发展阶段的序幕。彼得·施坦在台上用架子抬起了病中的诗人塔索，以此直接表达了对艺术工作意义的质疑——影射了联邦德国“只想不做”的矛盾和对其的质疑。1970年，彼得·施坦以剧团共同决定的模式接管了柏林剧院的管理工作。人们常常拿他的作品和马克斯·莱茵哈特的作品进行比较。

1960年代初期出现了以罗尔夫·霍赫胡特的《基督代理人》（1963年）、《士兵》（1967年），彼得·魏斯的《法庭调查》（1965年）以及海涅尔·基普哈特的《奥本海默案件》（1964年）为代表的文献剧，这些作品无不围绕一个问题：政治道德的情况将不会在理想的天堂中“预设”存在，而是在当前历史的过程中产生。这是一股戏剧政治化的潮流。大学生剧院里也在酝酿这股潮流，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1946～1952年）就已公开反对新出现的反动倾向，并且批评现存的戏剧业等级森严、没有社会精神。因为这些学生剧院，戏剧对社会的批评在增强。

> 1955年，原杜塞尔多夫大剧院院长古斯塔夫·格林德根调任汉堡的德国大剧院，在他之后是卡尔-海因茨·施托罗斯。在波鸿，自1949年到1972年是汉斯·夏拉任职剧院院长。同时，古斯塔夫·鲁道夫·塞尔纳（他之后是格哈德·弗里德里希·赫林）到了多特蒙德，库尔特·许布纳在乌尔姆（自1962年起在不来梅），波列斯瓦夫·巴罗格在柏林的王宫花园和席勒剧院，海因茨·希尔佩特在哥廷根（自1950年起），汉斯·施维卡特在慕尼黑室内剧院（自1947年起），库尔特·霍维茨在慕尼黑国家大剧院（自1953年起）。来自民主德国的彼得·帕利茨施自1966年起在斯图加特任剧院院长，致力于“以布莱希特式戏剧为例，把当代和历史搬上舞台，但并不抱‘治愈社会’的期望。”
>
> 1950年代的演员中，以下这些人比较出色：玛利亚·贝克、恩斯特·多伊奇、瓦尔特·弗兰克、凯特·戈尔德、约阿纳·玛利亚·戈尔温、海德玛丽·哈特尔、汉斯·恩斯特·耶格、约翰娜·冯·科茨安、希尔德·克哈尔、维尔纳·克劳斯、汉内斯·迈瑟梅、卡尔·帕利拉、维尔·夸德弗利克、埃里希·舍娄、赫尔曼·绍尔贝格、安杰特·维斯格贝、奥斯卡·维尔纳、保拉·维塞利、玛利亚·威默。

纯净之音的王国

歌剧，就像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在他的作品《表演艺术-歌剧-平民》（1955年）中写的那样，充满了表象的元素，仿佛瓦尔特·本雅明美学的反面被推到表演中，歌剧舞台呈现的大多仿佛博物馆里昔日的图片和式样，这些东西可以勾起一丝回顾的欲望。这种情景——用阿多诺的话来说，那就是歌剧使公民变为人——在五六十年代的歌剧中特别典型。保守的、肯定的音乐文化反映了新时代的复古特征，纯净之音的王国位于政治和社会的“泥洼地”之外。

批评家卡尔·舒曼在回顾1950年代末的音乐生活时指出，经济的创伤也可以导致文化的创伤。到那些新落成的富丽堂皇的音乐厅中去的将不再是穿着陈旧衣服和皱巴巴运动装的人，而必须是那些内在对音乐享受高度相符的、在衣着和收入外在方面相符的人们。“音乐文化”是“给存在镀金”，而赫伯特·冯·卡拉扬则是“音乐文化”的现身说法。卡拉扬在第三帝国时期崛起（“音乐界的阿尔贝特·斯佩尔[2]”）。他在一次谈话中强调，听众为“美好的欲望”所左右。他以前曾几乎无望地期望，当今变为现实的繁荣会将小人物变成产业拥有者，也提高了剧院对他的需求。他希望成为特殊的一类：

“当今的听众不再在大剧院中偶尔经历一出有受欢迎的女主角的短暂巡回演出。人们希望这些明星能够永葆舞台青春，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们的声音余音绕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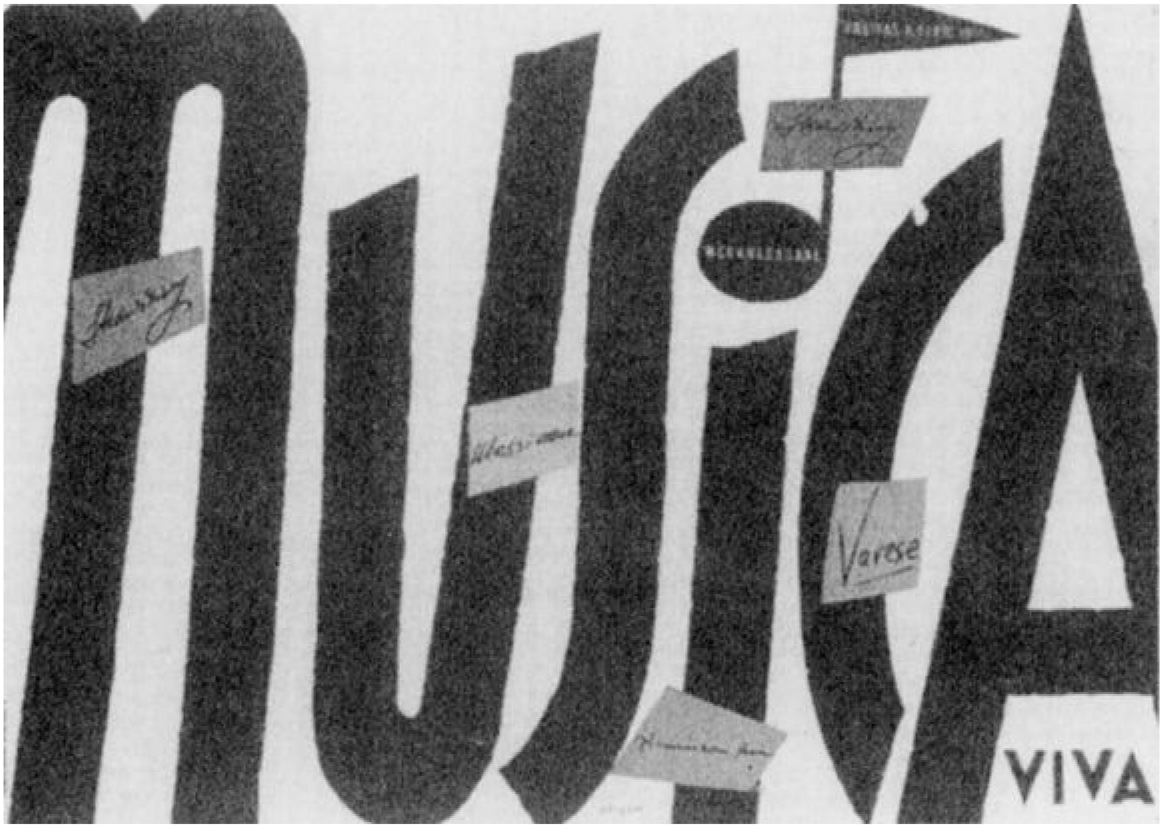
> 音乐生命体征得到“巩固”的重要特征是众多的节日演出，这也是当时流行的戏剧文化。它们在1950年代早期就重新得到建立，其中有一些可追溯到废墟时代，如今也得到扩建——其中有威斯巴登五月节演出以及自1950年起的慕尼黑歌剧节演出，在赫斯菲尔德温泉教堂废墟的节日演出以及自1951年以来的柏林联欢周。
>
> 拜罗伊特音乐节自1951年起重新开办。1949年1月，威尼弗雷德·瓦格纳为了有利于其子维兰德和沃尔夫冈而放弃对音乐节的协助，之后，美国人放弃了这座军队监管扣押的建筑。音乐节以歌剧《帕西法尔》开始。《帕西法尔》由以“瓦格纳丰碑”为口号的维兰德·瓦格纳执导，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尼伯龙根指环》一样，这部“舞台献祭”也

由汉斯·克纳佩茨布施指挥，同时有知名的歌唱家出演，演出了22场。维兰德·瓦格纳致力于推进去神话、去除舞台装饰和过度的庄重，以及试图通过精明雅致的论证把舞台之上“褐色”的气氛去除掉。期望已久的画面“非政治的艺术”——纳粹曾“招募”了瓦格纳，对此，威尼弗雷德·瓦格纳负有最大责任，而这个阶段过后——也犹如一个公告，正如1951年在节日演出剧院复演开幕式中公布的那样：“为了节日演出顺利地进行，我们恳请节日演出的舞台上政治艺术的对话和辩论能够友好地停止。‘这里只表演艺术。’节日演出管理部。”

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女试图把她祖父的作品“推陈出新”，首先通过“神秘的现实主义”，比如说借助于灯光的变换，把思考和反思的象征性手法用到反妖魔的神话方面，施以现代化的影响。这让钟情于“爱情与武士”的保守观众大为光火——这是威尼弗雷德·瓦格纳的话，她附加了一句“在流放地”，说明她早已有所准备。国内外闹得最大的是一些意见认为“瓦格纳事件”已经结束了，人们在非政治的瓦格纳事件中认识了“真实的瓦格纳”。艺术家、批评家、早期的大众同志、国民、自由人士、基督社会的、社会民主的、资本家、公会会员迅速投身到拜罗伊特音乐节之中。

1957年，霍斯特·科格勒如此报道“德国歌剧生活之旅”，那些在一些城市演出布鲁克纳[3]以后的现代音乐的曲目一开始就已经在许多歌剧听众中遭到了很大的阻力。私人举办者根本不可能举行单独的同时期节目的音乐会。他们本来满怀欣喜并向大家做出保证，但是观众完全对他们予以嘲讽。有人写来愤怒的信件，或威胁称，假如给那个违抗众议继续演出哪怕一两首被认为是现代作品的独唱演员发薪水，将不再预定下一季的门票。

然而，“公众的喜爱”也有“传播”作用。比如，许多作曲家的首次演出大获成功，这要感谢大提琴演奏家路德维希·赫尔舍，迪特里希·菲舍尔-迪斯考极力推荐汉斯·维尔纳·亨策和艾瑞伯特·莱曼。在指挥家中，赫尔曼·舍尔兴成为“音乐新星”的领军人物，这不仅关系到老一代的代表（阿尔诺德·勋伯格、阿尔班·贝尔格、安东·韦伯恩）而且涉及他们年轻的后继者。



海报设计：赫尔穆德·尤尔根斯，**1957**年

人们也能接受1920年代的音乐“叛军”，如保罗·亨德米特、恩斯特·克热内克、库尔特·威尔、阿尔蒂尔·奥涅格。亨德米特的歌剧《画家马蒂斯》在首次演出（1946年）取得成功之后被收录到保留曲目中。现代音乐剧作家的其他作品，比如克热内克在第三帝国时期被秘而不宣的歌剧《卡尔四世》（杜塞尔多夫，1958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现代作曲家们拒绝沿着传统歌剧夸张的剧本方式而决定转向文艺歌剧。在这方面有戈特弗里德·冯·艾内姆的《丹东之死》（原著作者为格奥尔格·毕希纳），维尔纳·艾克的《爱尔兰故事》（原著作者为叶芝）和《检察官》（原著作者为果戈理），沃尔夫冈·福特纳的《血色婚礼》（原著作者为洛尔卡[4]），汉斯·维尔纳·亨策的《洪堡的王子》（歌词作者为英格博格·巴赫曼）和《致年轻情侣的悲歌》（原著作者为奥登），吉塞尔赫·克雷贝的《强盗》，赫尔曼·罗伊特的《唐璜与浮士德》（*Don Juan und Faust*，原著作者为格拉贝[5]）。

贝尔恩德·阿洛伊斯·齐默尔曼唯一的歌剧《士兵们》经雅各布·米切尔·莱茵霍尔德·伦茨主演之后显示，在一座城市歌剧院的组织机构中，同时在考虑糅合观众的视觉与听觉习惯的前提下要实现现代音乐剧有多难。齐默尔曼和科隆市签订了为这部歌剧谱曲的合同。1959年，当他完成前两部时候，当时科隆大剧院的经理奥斯卡·弗里茨·舒尔和音乐总监沃尔夫冈·萨瓦利希解释说，这部歌剧是不能上演的。齐默尔曼随即中断了第三部的工作，只能获得西德广播电台一个协奏性的稿约，这部作品在1963年得以公开首演。科隆大剧院新的经理阿莫·阿斯曼解释道，舞台的首映式现在可以进行了，这部歌剧在第三幕定稿后于1965年2月15日第一次被搬上舞台，之后，八家其他剧院也上演了它。

这种系列音乐只为一个很小的圈子所接受，首先是提亚斯·路易吉·诺诺（1924年出生）、皮埃尔·布列兹（1925年出生）和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1928年出生）为代表的——他们不再模仿勋伯格，现在，安东·冯·韦伯恩是他们的榜样。在科隆的电台里，由声音材料整理的数字化作品按电子工作室的方法实施。电子音乐应该是，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说，用语言感官不可视的：因此，它适合用广播收听，而不需要同时观看什么。“就我自己而言，我喜欢听这种音乐，在最自然的情况下实现我的幻想，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只有静听，最好是闭着眼睛，还有把所有围绕着我的烦恼排除在外。”

1968年12月，这个时期的学生在骚动并进行抗议活动，亨策的清唱剧《梅杜萨之筏》在汉堡上演。一张格瓦拉的招贴画和红色的旗帜悬挂在戏台上面，引发了来自柏林和汉堡的组织者（电台的统治者）及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组织之间的冲突。这种年轻的、民主的意识让亨策十分着迷，“年轻人到处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抗议、他们的厌恶。他们反对对有关人类生活的所有美好设想、计划和蓝图都加以玩世不恭的嘲笑的社会”。工作室氛围似乎被抛弃，人们又重新回到“生活化的”东西上。有节奏的胡志明口号抑扬顿挫地昭示着这个美丽的自欺欺人时代的结束。至于把自己的居住地由意大利迁到德国，用政治行动的具体地点来交换富有艺术美学表象的福地，演员、诗人、哲学家和只是叼着古巴雪茄的美食家，亨策从不加以考虑。

“中心的遗失”与“新无约束派”

战后，抽象派艺术成了时代新政治秩序的标志，成了民主与共和精神的某种声明。此前，纳粹分子曾对抽象艺术特别加以非难。另外，抽象艺术的创作对象并非具体事物，这也将其从令人不快的客观现实上引开。这还没完，抽象派艺术被贴上了反共先锋的标识——民主德国宣传其作为官方艺术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正是资本主义颓废派的对立面。

> 战后初期的艺术家联盟，例如在雷克林豪森的“年轻的西方”、在慕尼黑的“禅49”、在杜塞尔多夫的“53小组”，尽管联合了老中青成员，但他们的艺术作品的共同点也是一样的：永远没有具象以及与纳粹专制下的血与土地-现实主义艺术划清界限。跟这些联盟成员不一样的另一些艺术家则认为，在那些极度抽象的图案、纹样和结构上看到了逃离当时原本存在和历史性问题的途径。对此，不满的情绪高涨。抽象派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艺术，尤其是德国工业联邦协会在战争一结束就成为为数不多的抽象派慷慨的赞助商之一（卡尔·霍菲居然被冲昏了头，能说出“抽象的冲锋队”这种话）。但结果其实很糟糕：那些于战争刚刚结束时在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中表现世界末日的艺术不久就被遗忘了，或者没有被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些艺术都是内心流亡的代表艺术家所作（如理查德·厄尔泽、弗朗茨·莱德兹威尔、卡尔·霍菲），他们要么当日看到了“灾难的来临”，要么是1945年以后和新加入进来的艺术家一起对“灾难状态”的描述。眼窝深陷的人们、难民、残疾人士、在喧闹的大墙废墟中抱怨的妇女（鲁道夫·施利希特、卡尔·胡布赫、汉娜·赫希、维尔纳·赫尔特、哈拉尔德·杜维的图片）。在经济奇迹的神话里，人们不希望重温这些内容。

维利·鲍迈斯特（1889～1955年）的作品特别巧妙地结合了无具象、色彩和谐与表意抽象，并且深受大众喜爱。鲍迈斯特也是和弗里茨·温特、恩斯特·威廉·奈以及特奥多尔·维尔纳比肩的理论家及画家。年轻一代在“国际风格”方面成为德国先驱者的最终结合体。“鲍迈斯特、维尔纳和尤里乌斯·毕希尔曾在黑色的战争年代渴望过宏大自由。如今，这些三四十岁的艺术家实现了自由，并用绘画方式表达出来，感情上安全无害，理智上也可以节制。‘巴黎高等学院’是这类以无形式与塔西主义著称的抽象表达方式的绘画艺术的故乡。也正是在这里，祖籍德国的‘精神语法学家’汉斯·哈同与沃尔斯大大推进了以氛围为先导、韵律

自然的绘画方式。”

从总体上来说，1960年代抽象派艺术没有重大事件发生。无论是单色调（后继者是伊夫·克莱因）还是通常以灯光效果勾勒的从二维到三维的“结构主义”（如海因茨·马克、奥托·皮纳、君特·于克），无论是连续的简约主义还是彩色几何的新具体主义（君特·弗鲁图伦克、托马斯·棱克、格奥尔格·普法勒、奥托·赫伯特·哈耶克）——包括一些“事件”发生，也没有形成什么大气候。所有、各种（或者什么也没有）都成了“反思艺术”。“零即是静止。零是开始。零是轮回。零是终止。”

“新无约束流派”跟世人见面的方式是在各种展览里展出。艺术家联盟展和一年一度在艺术馆举行的大慕尼黑展几乎没有展示出挑衅的倾向。巴塞尔文献展也是这样——该展第一次于1955年举办，成为五六十年代最为重要的艺术政治成果之一——该展尝试着在广泛的国际基础上，借助巨大的公共效果，把艺术家们的讨论聚集在同一处。该文献展的成果促使这个展览按照制定的安排发展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是随着艺术的变迁——文献展也改变了其特点，并与普遍的发展相吻合，越来越多地朝着商业的机制演变。1982年第七届文献展已基本等同于有计划、有条理的国际艺术品市场的路段。”（多丽丝·施密茨）

> 第一届巴塞尔文献展把20世纪的艺术公诸天下，首先，德国的表现主义就是在此展出并得到“平反”的。第二届巴塞尔文献展（1959年）则完全以抽象派为标志。在《月刊》中对“抽象派大聚会”进行了详尽报道的马丁·G.巴廷证实了，这个领域里的每个边边角角都得到了照顾，不再有任何一个没被发现的角落。在1964年的第三届文献展中流行艺术预示了一个艺术方向，就是着手研究消费界及其困境，然后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然后自身转化成消费品。
>
> 在筛选德国的“展览艺术家”时，渐变多于突变。恩斯特·威廉·奈、弗里茨·温特、约瑟夫·法斯本德、罗尔夫·内施、哈普·格里斯哈勃、汉·提尔、海因茨·特吕克斯连续出席了这三届展会。在雕刻家中，一个完好人像的代表作占有很大的比重。
>
> “展览专业户”不仅有汉斯·乌尔曼和诺伯特·克里克，还有格哈德·

马克、托尼·施塔德勒、古斯塔夫·塞茨、汉斯·梅特尔，来自下一代的博恩哈德·海利格和卡尔·哈通也都通吃了各种展览。直到第三届才开始改变。当时对托马斯·林克、埃里希·豪泽尔和奥托·赫伯特·哈耶克的作品有了全面的展示。1968年的第四届文献展则以美国艺术为主，而在迄今表现为基调的地方出现了矛盾的态度和反传统形式（其中有君特·于克、格奥尔格·巴泽利茨、A.R.彭柯、西格马尔·波尔克、格哈德·里希特、莱纳·鲁滕贝克、弗朗茨·艾哈德·瓦尔特）。

文学的空想

1959年，当学生们被问及他们最喜欢的作家时，1/5的人选择了托马斯·曼（生活在德国的作家则为布莱希特、歌德、黑塞、穆西尔、贝根格鲁恩、卡夫卡、茨威格、本、伯尔）。欧内斯特·海明威位于第二位。《最美丽的》一篇评论写道，在知识分子的新生力量那里，文学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处在零点。影响也就只能从同时代的人发起。评论说，由于第三帝国，文学的连续性被破坏，读者消失，新的参与者既不习惯也没有经验该如何欣赏或创作文学。只有海因里希·伯尔依然做到了与老一辈作家保持差不多的步伐，尽管对当年的一些问题没有感受，但是他懂得嵌入一定距离。他的现在和往昔渐渐无界限地消失模糊。“另一位年轻的作家，他的时间显得像在放大镜下那样清晰，沃尔夫冈·柯彭，没有被年轻的读者命名为唯一的‘最喜欢的作家’，从年轻人引用的先锋学说中很少看到。”对文学品位的这样一个抓拍瞬间表示，特别是就德国的作家而言，读者偏爱于传统-防御、中庸的现代风格。然而，这一点又与对弗朗茨·卡夫卡的广泛兴趣相矛盾。在这期间，卡夫卡获得了大批的读者。

格奥尔格·毕希纳奖1960年被授予保罗·策兰。该奖授予的是一个其生活和作品都展现了“汗水淋漓的田园”心态最强的两个极端的诗人。保罗·策兰1920年在切尔诺夫策出生，他那犹太人的父母被拖到乌克兰的一个采石营地，并在那里遇难。战争期间，策兰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劳改所里忍受了痛苦，1947年流亡到维也纳，自1948年开始生活在巴黎，1970年在那里获得了新生。他的诗歌有《骨灰罐里倒出来的沙》（1948年）、《罂粟与记忆》（1952年）、《语言栅栏》（1959年）、《无主的玫瑰》（1963年）、《纤维太阳》（1968年）。他的

《死亡赋格曲》，以黑暗的符号描述了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改变了诗人的诗歌原则。“阴影诉说着真实。”1958年，当策兰接受不来梅文学奖时，他谈到他的表达方式：“但是，他们现在必须经受他们自己的缄默，经受可怕的沉默，经历上千个把他们带入致命黑暗的演讲。他们经历了……如今得以重见天日，过去的一切都让他们更加‘富足’。”

阿诺德·施密特的作品的特点是阐释性的语言梦境，他的顶点是《经梦》（1970年），一本好几千克重的大型超级书，它是这位作家符号书写的字母美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施密特从针砭时弊的小说集开始（尤其是《利维坦》，1949年），越来越多地摈弃了流传颇广、史诗式的叙述性文学样板，在丰富的小说布局中呈现密码式编写的摘要，引人入胜的朦胧和广泛展开的亚历山大式知识，进而出现了新的构词法、文本的转换、值得注意的正字法和标点法。施密特的文字不与人亲近的外表导致他写作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完全沉浸在对书的狂热中），这虽然推远了“普通读者”，但忠诚的“破解者团体”依然簇拥在他周围。

与此相反，内心深处的崇拜在茂盛的杂草中萌芽。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汉斯·卡罗萨、伊纳·塞德尔、格尔特鲁德·冯·勒·福特、维尔纳·贝根格鲁恩格外强调自己的西方性尤其是基督徒性——借此巧妙地掩盖自己纳粹主义时代的政治问题。公民-社交名人-基督徒-调解人-诗人：施罗德的一部作品就来源于对这些独特观念的筛选，作品名为《存在的丰饶》，1958年出版。汉斯·卡罗萨写了一系列拯救世界的诗歌，其中一首名为《老泉》（“……许多旅者走向遥远的星光，/还有一些走在通往遥远星光的路上，/还有一些在走向你的路上”），通过各种读本广泛传播。而伊纳·塞德尔则处于通往母亲和发现大自然的探索过程中。

苏黎世的文学史家埃米尔·施泰格在一次关于“文学和公共领域”的演讲中声明，他在“文学活动”中看到集体意志正在变质，而这正是诗人赋予过去时代的灵魂。如果简单翻看一下新的小说和剧本题材，就会发现其中充满着精神病患者、对公众有危险的人、令人厌恶的大量特征和复杂的人。如果一个著名的剧作家（此处施泰格指的是彼得·魏斯[6]的

《法庭调查》）把奥斯维辛搬上舞台，而之前创作的萨德侯爵剧本（《由萨德侯爵导演夏亨顿精神病院病人演出的让-保罗·马拉被迫害和刺杀的故事》，1964年）也赢得了世界性的成功，“我们就可以假设，他在这两部戏中均把那可憎的巨大权势算在今天的观众头上，这样算自然也没错”。施泰格说，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在富裕、宁静的年代里，大多数时候，“倦怠和烦扰的恶魔”，也就是魔鬼般的无聊，把绝望蔓延到全部的生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虚无主义常常是一个奢侈品。”

施泰格的演讲引起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讨论，几乎所有有名望、有地位的作家都参加了。当他们不加掩饰、言之凿凿地宣布，公民的愿望是超越时代的艺术，而后者是现世的美丽表象时，这个时代特有的逃避主义已到达最高点——同时，就鄙人（指本书作者）完全中立的角度看来，也为反动的势头加了一把火。

对复辟的文学性质的不满刺激了1924年出生的卡尔海因茨·德施纳，他曾是一名士兵，在法国、荷兰、西西里岛和“布雷斯劳堡”服过役。他认识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不“安宁的”）现实。他对“复辟”的文学充满敌意地展开了全方位攻击：他的文学论战文集《拙劣艺术、习俗和艺术》于1957年出版，引起轰动。保守派自然对之加以否定，但“进步的阵营”对其也持怀疑态度——除了汉斯·卡罗萨、恩斯特·荣格、维尔纳·贝根格鲁恩、鲁道夫·格奥尔格·宾丁，作家对赫尔曼·赫塞、罗伯特·穆西尔、赫尔曼·布洛赫、汉斯·亨利·扬、戈特弗里德·本、格奥尔格·特拉克尔以及其他作家也加以抨击。他谴责——当然，谴责用的例子通常很不适当——文学“作坊”的思想偏见。

德国的学校读本（如经典文学篇章）算得上复辟和反动思想的指示器。那些本可以从“另一个德国”那里获得，尤其是关于流亡作家思想的篇目，自始至终既没有人教，也没有人学。后来，有人揭露了近似于法

西斯式的文学理解的根基何在。柏林的法律学家阿尔弗莱德·欧伯拉克博士1963年时说道，年轻的读本读者被当成傻瓜了。他公布了对144例西德学校读本的研究结果，借此表明：这些读本对当代生活几乎完全不描写，而是对“底层”加以各种浪漫想象。

还要哲学做什么？

尤尔根·哈贝马斯说，反观德国上半个世纪的哲学，各个学派和各种原则问题的提出有惊人的连贯性。他说，1920年代，德语区内新的理论已经纷纷成型，其关于哲学理论的哲学讨论直至50年代和60年代依旧占主导地位。“当时，新康德主义的影响远远超出德国，一时形成了的某种‘帝国主义’姿态。针对这种姿态，五种哲学新方向推动了潮流：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时而以先验逻辑、时而以本体论为导向的现象学；以雅斯培、利特[7]和施普兰格[8]为代表，上承狄尔泰，时而存在主义、时而带有新黑格尔主义色彩的生命哲学；以舍勒[9]和普莱斯纳[10]（某种程度上卡西尔[11]也算这个流派的代表）的哲学人类学；以捷尔吉·卢卡奇[12]、布洛赫、本雅明和霍克海默为代表，上承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批判社会心理学；以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13]和波普尔为代表，以维也纳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逻辑实证论。”此外，还有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颇负盛名的新实证主义哲学。

还有其他因素也加强了哲学发展的连续性，这是由于哲学思想亦有人格化的表现形式。或许，只要过几年，人们就会觉得在过去和战后那些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姿态已经过时了：“……我说的是雄辩的姿态。海德格尔、雅斯培、盖伦[14]、布洛赫和阿多诺也是用这种姿态，作为学术导师，在他们的学生面前，在文学的公共领域，在政治刊物上，甚至在大众传媒中捍卫、训练和传播他们的思想。”

当代史中的法西斯主义现象对德国的哲学发展有显著影响。1945年之后，人们根本没办法中立地认识自己。政治的生活经历使如布洛赫、

霍克海默、阿多诺一类的被流放者（和返乡者），如雅斯培和利特一类的内心流亡者（流亡程度各有差别），如海德格尔、弗莱尔[15] 和盖伦一类的知识分子先驱或帮助过纳粹政权的学者这三类人分道扬镳。“当然，如果间接的知识分子著作权问题不是政治的罪行，也经受得住哲学探讨的各种后果和副作用，并能被当作某个系统问题悬而不决的话，自身污点的影响力也不会超过二十年。”

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推理，把存在问题建立在最终问题上。而人则是在“走向死亡”，在“走向终结的存在”，在“走向死亡的存在”中体验“最终”。人类的存在必须首先“设计”他的存在，在此，他既有可能向自我实现发起冲击，又有可能在自我疏离中丧失自我。人类的存在通过对存在的认识得以显现。“存在”害怕“什么也不是”，这是其基本状态的最大特征，但“存在”也能够在“自由存在”中选择新的身份。（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1940年代末产生了巨大影响。海德格尔的思想在战后时期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马丁·海德格尔的异性极是卡尔·雅斯培。在1978年他死后才出版的名为《关于海德格尔的笔记》一书中，他写道，德国的现代哲学教授中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海德格尔。雅斯培认为，海德格尔当然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美好的和诱人的，昂贵的工作和虚假的，有希望的和没有接触的，近圆的和易坏的，恐慌的，经常被迫害的，从来未能安安静静地恋一次爱，粗暴然后悲哀的，动人的，唤起同情的，希望得到帮助的，在权力中昏了头的，在崩溃中不知所措和斯文扫地的，一直在努力的、总是间接的、自私自利而自己又看不清的本能：海德格尔的思想方法是挑衅性的而非讨论性的，听起来挺有煽动性而又不能真的自圆其说。他说得好听，但从不按思想做事。

雅斯培从“观望不是存在”这句话出发，始终在“干涉”真实。他的文章《当代的精神状况》（1931年写成，1947年出版）既有现实的责任，

又有理想的激情。这是这位哲学家——面对着暴众及其机制和机构，忧心忡忡——为人类的“本我存在”振臂高呼。人类的历史中，追求自由是不是一个徒劳的尝试？抑或那突然意识到“自由”的瞬间，只是“自然存在”和“技术存在”这两场无法估量的睡梦之间的插曲？

> 差不多1/4个世纪的时间，卡尔·雅斯培都是德国的良知（汉娜·阿伦特）。他强烈地反对核武器：“直到现在，个体的人尚可掌握自己的生活。他可以在战争中杀人或者被杀。人可以消灭人民。而现在，人可以灭绝人类整体。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仅仅已经成为可能。从纯理性的角度考虑，它就是会发生。”除了他的书《核爆炸和人类的未来：我们时代的政治觉悟》（1958年），小册子《联邦德国驶向何方？》也备受关注。小册子出版三周后就有了3万读者，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售出将近10万册。“乌布利希当时还顶着绝对统治权的光环，也在一封信中说，关于西德的发展，作者和自己‘为着同样的担心所苦恼’。”

在杂文《还要哲学做什么？》（1963年）中，阿多诺表达了怀疑，哲学，作为理解思想的行为，是否滞后于它本该理解到的程度：世界被赶向灾难已经到了何等程度，现在再来搞哲学式的沉思冥想或教徒式的静观养性，似乎为时已晚。1960年代末的抗议活动至少意味着，行动比反思更重要——就算这些行动在第一阶段还会诉诸哲学，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同样，恩岑斯贝格认为，联邦共和式自由的智识已经（或许暂时）终结。这一点在哲学领域也得到验证：以为自己已经被启蒙的自欺欺人的时代走到了尽头。当然，随之而来的也不是变革。空空荡荡的思想空间的门前，是“愤世嫉俗的理性”和新的“不明”。

新教的宗教体系和天主教的环境

新教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说，人一直只能是那个他将要成为的人。在此之前，他还是他，他自己真实的“现在”摆在他面前，他既可能得到它，也可能失去它——无论是生是死。“即使在死亡中，上帝也会走近我，让我为他的将来和我的自由努力奋斗。我不知如何言说他遇见我的方式。但是我知道，他会在那里找到我，为我打开自由之门。”这种形而上的比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经济奇迹时代的进步信念不谋而

合。用神学对世界的观照来分析存在——布尔特曼同马丁·海德格尔为友，并和他一起工作过：人们在最终-具体中只能看到，自己也许可以设计新的将来。成熟[16]的意思是不仅寄希望于“完全是另一种存在”的上帝，还是同拿撒勒[17]的耶稣一起——世界的上主，成熟的原型——致力于最终的世界，在那里成为基督，行动的基督。

“上帝和世界之间的人”是弗里德里希·戈加滕的主题，他接受“世俗化”。责任不能是空的，正因为人被从罪中赦免，他才能承担责任。信仰的希望指向拯救世界：“一切都是你们的。”（《哥林多前书》）理性一直在为拯救人类努力，却并未带来解脱。如若人们心中还念着整个世界均为上帝的赐予，那么目的就还是绝对有意义的。“科学是没有宗教信仰的，要么就不是科学。但只有有信仰的地方，科学才可以没有宗教信仰。”（海因茨·扎尔恩特）

保罗·田立克1933年移居美国，在那里开始了他的神学事业。他希望，他和他的工作都能填补宗教和“世俗”文化之间、信仰和思考之间、基督教和其他高级宗教之间的鸿沟。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纯粹的本质和异化状态的本质——也就是存在——是不一样的。他胸怀入世的神学——“存在的勇气”[18]——抨击人类从上帝、从其他生灵及从自己的异化。

作为“新现实的信使”，田立克也深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致力于使上帝的话语重新被人读懂。无论是在大学讲台还是在布道坛上，宗教的隐语，包括语出冒犯或非宗教的声明，都应该被打破，为的是让它重新达到世俗人类的耳朵。

神学家多萝特·索勒以“左派的雄辩”倡导废除公民和基督教文化之间、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话题的联系。1968年，她出版了杂文集《无神论地信仰上帝》和文集《幻想和顺从：关于未来基督教伦理的思考》。她写道，旧的上帝已死，新的基督教神学的希望在于耶稣——唯

一的耶稣身上。新教教义中的“话语”有如禁语，其独裁属性昭然若揭，“照亮的话语”应该代替“话语”。启蒙，只有在同时考虑社会和政治的启蒙时，才是可行的。

卡尔·阿梅里的论战文章《投降条约或德国的天主教教义》引起了诸多讨论。文中，阿梅里描写了“在德国天主教环境里的统治”。他说，自19世纪起，小市民道德制度使教会停滞不前。基本道德，如信仰、谦恭、慈善、禁欲的努力不再被提起，甚至干脆被“次要道德”取代。“次要道德”体系中的“世俗信仰”不过是一个“粉饰太平”的信仰，其“品行”的特征是利己主义。因此，天主教的信仰，正如第三帝国的新教一样，只有当纳粹分子压迫到了自己头上来的时候，才会敏感地做出反应并反抗。当人的尊严和人性遭到伤害和摧毁时，无人做出抵抗，只有当教会的立场受到威胁时，才有人反抗。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天主教的思维方式与道德体系和真正的基督教渐行渐远。“但是，今天，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时代中，有人以为，他发现了同教会的‘理想’关系——也就是寄生虫和它的受害者的关系。”

> 从之前属于德国东部地区的逃跑的和被驱逐的情况使西德的天主教徒份额明显提高，只比新教徒的份额略低。尘世的思想仍然不够发达，人们严格地同其他人划清界限，狭隘使荒诞的奇葩盛开。1953年，当时维尔茨堡的主教尤里乌斯·德普夫纳拒绝为一个制糖厂举行落成典礼，原因只不过是一个新教教士也要身着新教长袍出席，并同样也要履行圣职行为。拜仁州是一个教皇极权主义偏见的避难所。在美国的保守天主教派的帮助下，人们修正了早先美国军政府的自由的中小学教育政策（格奥尔格·N.舒斯特职位变动，被任命为拜仁州的国务委员）。1946～1950年当权的拜仁州的教育和文化领域部长，阿洛伊斯·洪德哈默终于达到了目的：推广教会学校。影响尤其坏的是天主教会对不同教派间通婚的否定。1958年，主教们纷纷在牧函中表示：“向异教通婚发出警告，不会破坏宗教信仰的融洽，反而会帮助人们，保护自己不必经历分裂信仰的痛苦和灵魂的冲突。”父母被要求在天主教的家庭氛围中培养他们的孩子，为的是让孩子们在碰到其他宗教信徒时会“免疫”。

左派天主教仍然势力很弱，没有任何政治归属，唱反调的人是被孤

立的。瓦尔特·迪克斯和欧根·科贡办的《法兰克福季刊》是一个重要的论坛。还有《作品刊》，杰尔德·希尔绍尔任主编，编辑部里的克里斯蒂安·盖斯勒的处女作小说《问讯》（1960年）探索了刚刚过去的历史对当下的影响余力，这激起了众怒。而在天主教青年报刊《结局和开始》（1946～1949年）的小圈子里，个别成员后来在工会运动中担任了记者或组织者（如弗朗茨·约瑟夫·鲍茨和特奥·皮尔克）。

尽管奥斯瓦·冯·内尔-布洛宁代表了天主教社会学说内积极的一面，但是，天主教工人运动曾被纳粹主义狠狠地削弱过，从此不再有独立的分量。他们自1955年开始动员基督教的工会运动，尽管获得了西德的天主教主教们的支持，但被新教教会拒绝，成员数少得可怜（1960年代中期为25万人——与此同时，德国工会联合会会员人数达到650万）。

梵蒂冈（教皇庇护十二世）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问题上的罪责被提出，要归功于罗尔夫·霍赫胡特的戏剧《代表》。剧本在1963年2月20日于柏林首演。1963年5月2日，19名议员在联邦议院抛出一个问题：“教皇庇护十二世这个人物，不仅在纳粹当政时期极大地帮助过犹太人，而且在他全部执政期间都与德国民众站得特别近。如今他竟从德国方面受到抨击，这难道不会让我们民族的朋友离心么？”当时的联邦外交部部长杰哈德·施罗德对霍赫胡特的剧本“攻击教皇庇护十二世”深表遗憾。德国天主教的中央委员会对在独立的西柏林竟有这样一个剧本上演提出控告。关于剧本的讨论掀开了所有过去见不得天日的战后丑闻。曾经发表过剧本的罗沃赫尔特出版社在首演的七个月之后出版了一份文献资料，收到了大约3000条评论、报告和信件。1975年，约7500种出版物发表了《代表》。不仅如此，不计其数的公共讨论展开了，尤其是在那些该剧演出过的地方。

由于第二届梵蒂冈宗教会议和神学家如卡尔·拉纳、汉斯·昆（图宾根）、爱德华·席勒贝克（奈梅亨）以及一些普通教徒如海因里希·伯

尔、露易丝·林瑟、瓦尔特的努力，教会的基石亦多多少少受到了动摇。“敢于尝试更多的民主”这个口号给教会染上了色彩。天主教不仅被认为是保守的生活态度，神学家约翰·巴普提斯特·梅斯认为教会亦应该是一个行使社会批判职能的机构。《法兰克福汇报》称，在动荡的1968年召开的埃森天主教教徒代表大会为“一次不顺从的成功练习”。当时甚至有一个天主教的行动委员会要求教皇辞职。“美丽的自我欺骗”时期（也是自由化时期）才刚刚开始，其间“老雅各宾派”走到了尽头。才过去一个十年，逆流就又完全回潮（就算教皇用许多旅行来表演他的“世界主义情怀”）：人类面临的挑战，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被忽视，解放的神学遭到蔑视和镇压。1979年12月15日，神学教授汉斯·昆不再被允许从事教学工作。

> 天主教神学家和心理治疗师欧伊根·德雷尔曼曾在帕德博恩神学院任神学教义学讲师，1991年他丢了执教许可。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教会评论家，在15年时间里出版了大约40本书——其中《牧师——一种理想的精神图谱》（1989年）特别成功。他本人仿佛人格化的新教学会的全部方案，几乎没有漏掉任何主题。德雷尔曼抨击天主教会的僵化和教条，也寻找揭露过于“性早熟”的本教会内心生活的方式（有关独身不娶妻、避孕、堕胎），就这一点而言，他是一个积极的新教徒。这名“叛逆者”获得如此大的共鸣，尤其是因为梵蒂冈的狭隘与偏见在20世纪末重新回到了宗教裁判所的程度。不过，今天倒是不能再烧死异教徒了。德雷尔曼在给帕德博恩的大主教的信中写道：“我宣布，福音不会为你们的威胁所左右。”

阻碍重重的学校改革

德国的教育委员会是散漫不经的德国委员会的后任，于1965年建立（后者也于同年停止运作）。这是一个呼唤中小学改革的组织。“建立综合性学校”的建议受到尤其强烈的反对，该建议竟因为其“平等主义倾向”而被诟病。“教育事业的结构图”（1970年）目的在于软化综合性学校的冲突，寻求某种妥协。结构图确认教育扩大的合法性，那时的教育尚与就业制度的发展无丝毫关系，教育的扩大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个结构为的是确保教育基础达到统一，但并不意在根本清除中小学制度的三

分法。机会的不均等应该通过基础教育的扩展和定位定向教育的引入来消除。

1964年，格奥尔格·皮希特在周刊《基督与世界》上以《德国的教育灾难》为题发表了连载文章，之后不久同名书出版。文章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反响，联邦议院就皮希特的论文进行了两次长达数小时之久的讨论。斯图加特、慕尼黑、汉堡和柏林的州议会以及教育部部长的会议也学习了皮希特的论文，最终在百人全体会议（“柏林声明”）上宣布了“积极的教育政策”的必要性。皮希特认为，西德是动荡不安的，因为他的“灾难预警”建立在需求标准上。教育危机意味着经济的紧急状态。如果缺少够水平的新生力量，当前的经济繁荣很快就会结束。比较各国教育统计数据，他认为西德在欧洲国家的最底层，仅在南斯拉夫、爱尔兰和葡萄牙之上。年轻的科学家移居国外，而中小学内的状况更糟糕：如果没有任何举措，在短短几年内，学龄儿童就只好回家，因为他们既没有教师也没有教室。

至于大学，人们则要求重建，尤其是那些推出了新学术形式的大学。1957年建立的科学顾问委员会认为，大学的能力怎么看也不能满足当下的需求。此外，大学依然是“地位的大学”。在100个高级中学学生中，英格兰和法国有25个来自工人家庭，瑞典有23个，西德只有8个。全民教育和大学教育缺乏整合，高校和民众学校（后者本来就很不发达）以及高级中学合作极少。“第二教育途径”仍然很不充足。这一切都是教育还极度缺乏民主化的最大表征。

调查

文化在德国复活？1950年5月，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季刊》上如此发问。他就此表示，在西德盛行的、坐井观天式的、以为自己已逃出生天的自我安慰是危险的，并且是不是真的安全也还难以确定。但是，祸害的根源要从更深处挖掘。本时代的错误事关新民主

的实质：西德对追思工作几乎没有准备，遑论深入探究纳粹主义的本质思想及其可怕的罪行——那本将是一个自我启蒙、自我净化的过程。

> 霍斯特·克吕格在法兰克福旁听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1963～1965年），他写道：“22个男人在此被起诉，8个被监禁，17个被特许保释。他们所有人，除了个别例外，全部看起来跟其他人一样正常。他们的举止也跟常人一样。他们是吃得好、穿得好的上了年纪的先生们。我们新德国社会的大学学生、医生、商人、工匠、管理人、市民，自由的西德公民，像潮水一样涌来，跟我一样，纷纷把车停在外面，来观摩这次审判。我不由得想起战争结束不久后看的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作《凶手就在我们中间》。那已经是17年前的事了。”

阿登纳及其政府有西方盟国撑腰，反共产主义很快就比反法西斯主义更重要。从现实政治的考虑来看，这极不负责任地帮助有罪者洗脱了罪名，让本该受到谴责的人重新变得有头有脸，更是赦免了犯罪的主谋。人们有气无力地反对右翼政党。民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文学的魑魅魍魉没有被禁绝。法庭根本不把纳粹的罪行放在心上或关心得太迟。坚定而正直的法学家，如理查德·施密特、弗里茨·鲍尔（黑森州的司法部部长、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的发起人）、马丁·希什，则从者寥寥。早年“披着长袍的杀人犯”中的多数人，现在要么还头顶着乌纱帽，要么正在享用他们的养老金。

1958年，数州的司法部部长成立了查清纳粹主义罪行的中央办事处。尽管他们在勇敢的领导者——前检察官阿达尔伯特·吕克尔——的带头下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但对于罪行来说终究为时已晚。特别是城市里缺乏道德的动力来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揭发许许多多个人的（简直就是全体德国人民）的可怕罪责。随着第三帝国的时代越来越远，决定性的取证变得更加艰难。此外，对那些“办公桌旁的罪犯”来说，采用当年的司法评估和审判的标准也并不合适。

> 1984年，《南德意志报》做了一次回顾，清晰地展现了新德国对道德的忽略和松散已到了何等让人震惊的地步：“尽管在路德维希堡保存了逾130万张索引卡片和系统分类的行为资料，尽管自1958年起进行

> 了4802场调查和大约13000场审讯——尽管有这一切，总体情况对那些经历了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特莱希恩施塔特或特雷布林卡这类集中营并侥幸存活的受害者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一瞥而知，至1983年1月1日止，有88587人因纳粹罪行被指控，只有6465人接受了审判，12人被判死刑，158人被判终身监禁，80355人被宣告无罪，大约1767名被告的诉讼程序悬而未决。被判较长时间监禁的人数尚且无法估计。”

1962年，阿明·默勒建议关闭当代史的档案馆——他说，人们必须赢得第一时间，但其实早就赢得了。尽管可以追踪大多数的罪犯，但人们并没有控告他们。1967年，默勒成为德国基金会第一批获奖者中的一个，基金会由一群中庸的保守者构成，康拉德·阿登纳是名誉会长。当时，制度化了的权利随着德国国家民主党一起在政治上走向相对强势，由此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文化”，甚至被拔高到政治层面（除了默勒，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和诗人博恩特·冯·海塞勒也不属于那帮“毫无感觉的‘政-知’分子”，后者是与“道德堕落及价值毁灭”做斗争的优秀斗士）。德国基金会的颁奖仪式在慕尼黑举行，以主教尤里乌斯·德普夫纳、慕尼黑的大主教弗赖辛和拜仁州的首相阿尔丰斯·戈佩尔为代表的社会高层兼栋梁出席了这次颁奖仪式。

彼特·魏斯的《审讯》被称为“11首歌组成的清唱剧”，该剧的材料直接来自奥斯维辛审判。在《审讯》的末尾，“第一被告人”说：“我们全部/我要再次强调这一点/没有造什么‘我们的’孽/就算，说出这点很难/就算，我们自己也怀疑/今天/因为我们的民族重新/爬到了/领先地位/我们应该处理一些其他事情/而不是谴责/那早就过了追诉期。”

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思考

悲观主义的让·阿梅里在他的书《罪与罚的另一岸：克服压顶的尝试》（1966年）中写道，依照当时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潮的意思看来，希特勒帝国只不过是一次历史的工伤事故。书中描写道，曾祖父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照片总有一天会挂在漂亮的房间里，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关于集中营的情况会比关于某次大规模失业还要少。希特勒、希姆莱、海

德里希[19]、卡尔滕布伦纳[20]会成为像拿破仑、富歇、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一样的名字。“哪怕今天，我都已经读到一本书，书名叫《关于德国》。其中有一篇虚构的德国父亲和他非常年轻的儿子的对话。在他儿子的眼中，布尔什维克主义竟和纳粹主义之间没有区别。至于1933～1945年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人们将会学习到，以后自己也会这么说：只要条件类似，天下乌鸦也都会一般黑——而完全忽略一个最最简单的事实，即它确确实实就是在德国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发生的。”

1987年，拉尔夫·吉奥尔达诺提了“第二罪责”：1945年后对“第一罪责”的按下不表和信口雌黄，这一点直到今天，依然是西德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而它是还得背负很长时间的罪责。希特勒那一代，也就是所有那些从年龄上相符、对第三帝国有责任或有协同犯罪责任的人，总有一天会死光。而沉默的或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大多数人，则会和这个他们生活中的巨大谎言一起，影响后来的、再生的德国社会的一部分，让这个社会，仿佛奥斯维辛从没发生过一样，照常生活、思想、感受和行事。

齐格蒙·鲍曼提到秩序的辩证法，提到大屠杀的独特性和普遍性。无论历史在大屠杀之后会以什么方式做出改变，都几乎不能改变那些使大屠杀发生的历史因素本身，或者我们自己也不能确定。“不管怎样，不管我们知道了什么（或者似乎更应该说因为我们几乎什么也不知道），这些因素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杵在那儿：如果使大屠杀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并未被连根拔除，未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怎样才可以确信，1941年造成了大屠杀的那些因素从那时起真的已经远离了社会的内部组织呢？”

鲍曼认为，羞耻的感觉使人自由。羞耻是使人们懂得从大屠杀中学习道德的一课，祛除和封印过去那可怕恶灵的唯一可能。这是我们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做到的，它使得我们只为了与过去和平共处，便忽略了警

钟长鸣。“并不是要在羞耻和骄傲中做一个选择，而是选择感知，被道德净化了的羞耻的骄傲。”

“‘我念着奥斯维辛’必须伴随着我的所有设想。”特奥多尔·维森伦德·阿多诺如此表述了一个不容置喙的要求。奥斯维辛不能再发生了。这是一个希望继续追求和从道德上真正做到“启蒙”的政治文化敲响的绝望警钟。

---

[1] 托尔夸托·塔索是16世纪的意大利诗人。德国文豪歌德以他为主题，创作了五幕戏剧《塔索》。

[2] 贝托尔德·康拉德·赫尔曼·阿尔贝特·斯佩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1905～1981年）是一位德国建筑师，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成为主要战犯。为了帮助希特勒管理帝国经济，他和希姆莱一起加强了强制劳动，逼迫大量的战俘和犹太人等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从事非人的重体力劳动。越来越多的文件资料显示，当时他在战俘营和集中营等事件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

[3] 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24～1896年）生于奥地利安斯菲尔登，于维也纳逝世，是一位奥地利作曲家、管风琴演奏者和音乐教育家。他以创作交响曲、弥撒曲与经文歌著称。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因其丰富的音响结构、多重的复调特性和宏大的结构而被认为是德奥派浪漫主义最后阶段的代表人物。布鲁克纳的作品以其对不和谐音的使用、突然的转调以及延绵不断的和声而对当代音乐激进主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4]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del Sagrado Corazón de Jesús García Lorca，1898～1936年），西班牙诗人、剧作家。现被誉为西班牙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5] 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贝是三月革命前期的德国作家。

[6] 彼得·魏斯（1916～1982年），德国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和电影艺术家，后加入瑞典国籍。他最为知名的作品是戏剧《马拉/萨德》（*Marat/Sade* ）和小说《反抗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Resistance* ）。

[7] 特奥多尔·利特（Theodor Litt），德国文化哲学家、社会哲学家、教育家。

[8] 埃都瓦·施普兰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年），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是德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

[9]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年），德国哲学家，也是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

[10] 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1892～1985年），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

[11]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年），德国哲学家。受学于马尔堡的新康德主义传统，卡西尔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文化哲学。《符号形式的哲学》是卡西尔在文化哲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他亦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认识论、科学论、哲学史的著作。

[12] 捷尔吉·卢卡奇（匈牙利语：György Lukács，1885～1971年），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将物化和阶级意识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

[13] 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年），20世纪著名的美国分析哲学家，生于德国。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之一。

[14] 阿尔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1904～1976年）是德国重要的而且富有争议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其立场被认为保守。

[15] 汉斯·弗莱尔（Hans Freyer，1887～1969年），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他受生命哲学的影响，属于新黑格尔派。

[16] 此处的成熟并非指生理上的成熟。原文用词来自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用来定义“启蒙”的“成熟”，简单地说即懂得运用理性进行思考的状态。

[17] 拿撒勒源自希伯来词netzer，意思是枝芽或苗。《以赛亚书》曾经以“枝子”来形容大卫家系的后代。在古代，大卫家族的多个分支居住在此地，这可能是此地名称的由来。那里是耶稣基督的故乡。福音书中描述他的父母圣若瑟和圣玛利亚住在这里。在拿撒勒，天使加百利到玛利亚那里告诉她她将因圣灵怀孕，所生的将会是救世主，耶稣降生后以就是在这里长大。

[18] 在有神论存在主义者的视野中，真正要紧的并不是一再强调人类存在时与生俱来的那份焦虑或虚无感，而是人类是否能够对此困境有所回应。田立克称那些人类所从事以证明人生具有价值的尝试为“存在的勇气”：举凡一切的

道德观念、禁欲主义、犬儒主义、自然法权……这些都是人类面对虚无人生处境时所选择的回应态度，这些内省的态度证明了人类具有某种高于动物性的特殊品格，这种品格被田立克称为“存在的勇气”。

[19] 莱因哈特·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1942年），德国纳粹党卫队的重要成员之一，地位仅次于希姆莱；由于行事残酷，而有着“金发的野兽”“铁石心肠的人”“纳粹的斩首官”“死亡的追随者”“第三帝国的黑王子”等许多称号。

[20] 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1903～1946年），奥地利裔亲卫队上级集团领袖，1943年接掌国家安全总局与国际刑警组织。在纽伦堡审判中，他以亲卫队最高负责人的身份面对审判，最后被判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并处以绞刑。

第三部分 变革的时代



抗议美国入侵柬埔寨的示威游行，**1970**年**5**月

第12章 现代化与反抗

西方与东方：新社会与现代性的赤字

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注意到1948～1965年的经济奇迹背后蕴含了深刻的精神内涵。同1960～1965年的学潮酝酿期以及随后的学潮相比，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和使日常生活秩序化的工作太平淡无奇了。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生活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他们随后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抗议活动），总以为大多数民众的呼声有太重“黄金时代”的烙印，相对而言，还是自己的个人精神履历更加重要。这些话语权的拥有者只会鼓吹某些表象——让社会的大多数人认可为幸福的表象。代表着战后时期的消费、娱乐、住房甚至时尚的意向唤起了与日俱增的怀旧情绪，人们开始对那个时代产生了研究兴趣。

在1948年货币改革和1963～1965年奥斯维辛审判之间，西德经历了一次社会与文化的重大变革。这次变革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日后的学潮。因为尽管学潮后来被人们翻来覆去地研究，其本身却并未对公众的集体思维模式产生深刻的刺激。

这个变革就是现代化，使城市和农村社会、生活条件、个人和集体的存在感都产生了急剧变化的现代化——后来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重建中的现代化”。作为经济基础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社会的精神格局也日益凸显，“有了这些基础，一场显而易见的社会变革在随后的几年就出现了，这是一场充满了活力的深刻变革，其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和技术领域。此前的经济技术变革只是它的潜伏期。这不是一次即刻就能看出效果的社会突变，而是潜力酝酿的结果，它撼动了旧有思想的基石”。

早在1982年，汉斯·彼得·施瓦茨就建议，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1950年代的社会变动。他认为，从50年代中期开始，“崭新而庞大的现代化推土机”就在不断地铲除连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未能摧毁的前工业时代的残渣余孽。在这种意义上，50年代应该被作为重大的转捩点来重新审视，它把当今作为成熟西欧国家的德国从它的历史中剥离。

1950年代，并不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说的那样，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新旧社会形式上的转轨。根据政治学家汉斯·迈耶的观点，50年代是在阿登纳的领导下，德国人民终于在反现代性的第三帝国灭亡后，凭借所有代表了“现代”的形式与原则，不容置疑地向世界宣称：我们进入了“现代社会”。罗塔·伽尔认为，一个看起来那么守旧，对外宣传只是想“保护”和“重建”的联邦共和国政府，竟在统治的最初几年就寄希望于变革与发展，并以此作为新的公共认同和自我定位的出发点，这实在值得玩味。在这个背景下，霍斯特·缪勒把它称作“一个激进的崭新开始，带来了拐点”。鲁道夫·莫西则干脆断定，德国在50年代走向了一个新社会。

在1950年代文化生活的表象中，阿克谢·席特找到了新的研究模型。正是这些文化的表象证实了作为一项工程的现代化，与所谓的凄惨的“德国式道路”不同的现代化，是通向进步的康庄大道，而这被许许多多的先锋派潮流所推崇的现代化，本身就是由多个不同时代叠加而成的：摩登世界里的不摩登的人们，不摩登世界里的摩登的人们。被马克斯·韦伯称作“西方理性主义的普世化”的东西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保守皮毛下的现代化”已然含有那时德国的保守派对现代性的肯定，他们其实比199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进步多了。

195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浪潮根源诸多。下面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地起了作用：威廉时代的进步思想，魏玛共和国时代推崇的“世界大都

市”的开放性，甚至后来毁于自身道义的第三帝国的现代性结构。它也包括导致了最终突变，使“政治文化”和民主化顺理成章的战后德国西方化和美国化进程，以及当时德国的欢欣鼓舞与欣欣向荣。这些都对现代化得以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恐怖的战争和颓丧的战后时代已经过去，一种“美好新世界”的情绪正在蔓延：完整的家庭，舒适的家居，轻松、和谐而多彩的时装设计向人们传达着一种生活在“美丽新世界”的幸福感。可以说，德国人从未对祖国有那时那么大的认同感，从未找到像那时那么强烈的“家乡”的归属感。

“到处都是曲线啦，圆弧啦，羽翼啦。仿佛那段有着绞架和党卫队，喊着‘希特勒万岁’的可恶的历史弯路可以通过甲壳虫、牡蛎和焖腰子得到赦免。我们觉得，现在好像卸下了罪孽的沉重负担。”

而“另外一个德国”，也就是民主德国，则仿若在遥远的异邦。那里的人们远远地注视着这边，钦羡这里的快乐。他们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像这样欢欣，却不得不在心理上尽力保持平衡。两个德国时间上的隔阂，在真正的柏林墙建起之前就已存在：西德的人们已经开始奔向“摩登时代”了，东德还在第三帝国时代的废墟里挣扎。“有一次，一个国家机关的秘书对我说‘社会主义是贫穷的’，他在一个为特殊使命而设置的机关里任职。和通过马歇尔计划很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西德不同，东德至今仍然饱受物质匮乏之苦。只要看一眼住宅的厨房和卫浴里可笑的塑料装潢，或者莱比锡街道两侧鸽笼般的住宅楼——就连这样的住宅楼还是给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住的——就会明白这一点。在那些住宅里，水管接在生锈了的钢管上，然后输送到楼层高处。四家的浴盆里只有一家放出来的水是干净的，其他三家的都是铁锈色。在新建的高楼里做客时，我走在曲折的楼梯上，楼板是倾斜的，墙面被胡乱刷过，这就是‘起重车逻辑’，大跃进式生产的产物。在这种‘新建筑’里生活的东柏林住客对

我说，两个新搬进来的退休同事对这样的居住条件颇有微词，几个月之后，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一怒之下交还了党员证。”

东德现代化“赤字”的严重程度，在民主德国政权垮台后才被曝光，西德以越来越围观者的态度记录着这一切。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也催生了某种程度的怀旧情绪。两个德国的差距使东德人，尤其是那些住在贯穿东西德铁轨旁的东德人，感觉自己的生活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过去，不得不用与“美好旧时光”有关的联想来自我欺骗。老一辈的西德人也常常怀念青年时代。有些人声称，在民主德国才能找到一点点早已在西德消失殆尽的“德意志身份”。“于是兴起了历史博物馆，它们告诉人们，德国在变成今天这个美国化了的德国之前是什么样子。”

> 肯尼迪鼓吹的和平战略极大地影响了德国的内政与外交，使人们觉得推倒柏林墙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开放柏林墙通行。这是维利·勃兰特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项特别主张，受到艾贡·巴尔的支持。他认为，柏林墙是恐惧和东德专制政府坚持的标志。“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有可能逐渐消除东德政府的忧虑——尽管这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告诉他们，推倒柏林墙，消除界限可以实现，即使有风险，也是可以共同承担的。”“通过接触来改变”的政策可以被程序化。在这自由的社会风气下，德国总统勃兰特和他的外长瓦尔特·席尔批准通过了一系列与华沙组织国家的协议，如1970年8月12日与苏联签署的《莫斯科协议》，1970年10月7日与波兰签署的《华沙协议》等。当然，这些协议也是在西德人的公民权得到确保的前提下才被签署的。
>
> 尽管立场各自不同，1971年9月3日，英美法苏的四方会谈还是成功举行[1]，会议以国际法的形式确认“不通过武力改善现有状况”。苏联首次承诺开放东西柏林市民之间的无障碍交往。此后，两德又通过了一系列协议。1971年12月17日条约的签订恢复了联邦德国和西柏林被柏林墙阻隔的通行。四方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以及随后两个德国间的条约于1972年6月3日正式生效。

自由主义的西方各国承诺，绝不向民主德国强加任何与其意识形态相悖的东西。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世界在其现实的存在下日复一日地遭到腐蚀，重要的只是那些特权阶层，游离于只对平民有效的体制

之外。有一些东西，从社会、政治、文化或者经济的角度都不足以使人信服，被柏林墙简简单单地联系了起来。此外，尽管不那么情愿，西方国家还是越来越承认并试着接受两个德国的存在。并且，由于东方政策带来种种好处，与民主德国的国家元首达成越来越多的妥协——这些妥协也包括将长期提供给日益下滑的“战略经济对话”国的经济援助。作为“反法西斯主义防护墙”的柏林墙使一种政治幻想维持了三十年之久，最终却因作为“下层基础”的社会经济已被侵蚀得千疮百孔而一朝覆灭。

民主德国与西方世界及其现代化步伐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晰，民众也就有了一种认命的情绪，认为自己的一生注定要在民主德国度过了。所有要求、所有希望——只能当民主德国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之时才能变为现实了。“因此，人们尽管未必是共产党员，却积极使自己适应国内的生活。并不是他们选择了民主德国，他们也认为，国家可以有一种更好的形式，但这就是他们的祖国啊。祖国的成就也就是他们的成就，祖国的成功也会给他们脸上增光。今天我们争论那到底是出于某种国家意识，还是那1700万在战后有着同样特殊命运的德国人在同病相怜，都不过是嘴皮子官司。”

“德国被分裂，说到底我们得感谢希特勒和四个强权大国的霸权政治。但是，柏林墙的建造，我们却得归功于自己。它是东西德双方政治不成熟的结果。”

彼得·本尔德对民主德国的心理蓝图做出这番评估三年之后，柏林墙倒塌了。两德间现代化的赤字差距，人们之前带着认命的态度孤立地忍受过，互相抵偿过，现在从本质上促成了和平演变，并以一种新的、人们未曾料想到的方式继续存在。这些差距产生的问题令人震惊，统一也使两德一起面临新的危机：随着西德保有的众所周知的亲英美化，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及其后果也进入了整个德国——至少是在前西德，因为资本主义不计后果的开采与剥削，社会化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失去了它

的效力。

反对肯定性文化

20世纪60年代末爆发于联邦德国的学潮运动急剧而武断地片面否认了50年代大行其道的现代化进程。当然，学潮运动本身就以“现代化辩证法的辩证”的姿态出现，目的是不让现代化进程在自我满足中停滞不前。可是，学潮运动能够取得巨大成功，还得感谢此前社会通过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进步（尽管现代化是其攻击对象）。50年代的现代性文化和60年代末的学潮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两股新观念不断涌现的文化思潮都在探索，如何使这个联邦共和国从摆脱“德国式”集权主义的过程中获得繁荣——尽管会走一些弯路——而黄金的50年代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尝试。反叛的学潮一代作为文化革命的使者，在其“无政府状态的短暂夏日”里促成了僵化结构的解体——这些变革首先出现在艺术领域、官僚机制、教育界和政治之中。许多变革一直被左翼的旗手高调地宣扬了重要意义，但可惜的是，它们终究只是轻轻挠了一下表皮，直到日后这些左翼旗手本身也在小册子《青年之罪》的修订版中蜕变为中立主义者甚至右倾的新保守主义者。

> 1985年，柏林自由大学举办了一次名为“左翼知识界在文化革命和文化毁灭中寻求突破”的座谈会（座谈会是由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赞助的）。作为这次座谈会延续的是后来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社民学联[2]代表会议。在此会议上，奥斯卡·奈格特说，别在社民学联的悲剧上再加演一场复兴的闹剧了。他的发言获得了潮水般的掌声（他也警告大家，不要被机会主义所左右，贬低自己选择的道路）。听众中一位小姐高喊道：“你们都已经忘记自己的初衷了！”还有人说：“什么都没有了。所说的一定会发生的革命，消失了。”一个慕尼黑来的青年悲哀地说：“你们的书，你们的思想连同你们的脸面一起丢失了。”“我受够了，我也退出好了。”社民学联从前的一个人物如此愤愤然地宣告。哈贝马斯对此评价道：在从前反叛的青年左翼中，只有丽塔·苏斯穆特作为妇女部长保留了下来。

彼得·施耐德在其小说《伦茨》（*Lenz*，该书出版于1973年）中描

绘了作为一代人的学潮参与者的精神与社会图景：整整一代人，在自己的国家，这个有着经济奇迹和高度文明的现代国家，竟然倍感陌生。“这一日下午，伦茨在城里的购物街上漫步……他注视着橱窗里的摆设，感到很惊讶，那里居然每个月都会陈列出新的汽车、皮大衣、鞋子、电视机，晚礼服和西服。永远都有社会名流，三年以来一成不变地从红色的跑车上走下来，永远都有在巴利（Bally）专柜售卖贵得要死的鞋子的女售货员，永远都有关于詹姆斯·邦德的电影，永远都有像他和他的朋友们跟进政治新闻那样急不可耐地等着最新款的大众汽车的人们。”

赫伯特·马尔库斯[3]替残酷的自利主义起了个比较好听的名字——“肯定性文化”。面对被过于物质化的文化理念，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但这些声音首先并非以社会批判和社会分析，而是以社会心理的形式出现，见于各种非主流文化以及“选择性文化”。对于各种秘密发展起来的青年文化模式来说，无论其风尚在于艳丽的色彩，还是在于混乱，或在于进攻性，或在于顾影自怜，美国风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罗尔夫·迪特·布林克曼和拉尔夫·莱纳·吕古拉将其在三月出版社出版的选集命名为《酸》，可谓此类文化转型的里程碑。他们俩在1969年总结了这些转型的文化是如何作为新文化的使者，在过去的几年中凭借其通感般的爆破力瓦解了联邦德国的“肯定性文化”。

《酸》中的文章以一种扮酷的口吻写成，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经济奇迹时期贪图安逸、装腔作势的小市民气。“哦，黑暗中的笑容，哦，污浊的洞！给爱让出一点位置吧！不过一句操蛋而已。操蛋的手臂，操蛋的嘴，操蛋的屁股。让我舔舔你肚子上的咸水，让我僵硬的阴茎在你的乳房中间摩擦，穿过你的腋窝。我要吮吸你的乳头，你的耳朵，舔你的屁股。我要在你的肚子上躺着，做梦。”

节选的文段具有代表性地表现了那时对社会底层和随后到来的学潮

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性解放观念：运用流行文化的表现手法，系统地、有组织地解放肉体，这对于冲破美学意义的形式局限具有标志性。

流行于社会底层的不仅是《酸》的语言，还有关于植物种族的描述。急流勇退吧，做你自己的事吧，任社会发展吧。那些看样子像是在“局外”的人，实际才是局中人。那些逃离社会以及其中一切的所谓礼仪和谎言的人，才是真正“有范儿”、真正识相的人，因为他知道：在远离压迫的地方有一个嬉皮国，美丽而和平，那是艺术的挪亚方舟，它会在无政府状态的狂喜和蓬勃的烟雾中到达巅峰。裸体，与你交融，这一切都被赋予了向遮遮掩掩的哲学示威的含义，而灌木般犬牙交错的蓬乱发型则仿佛存心激怒精心剪裁、注重效率的“布尔乔亚式分头”一样充满了挑衅意味。



鲁迪·杜契克在**1967**年的一次游行上用扩音器讲话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4]成了流行文化的盛典。1969年8月中旬，50多万名穿着牛仔裤、运动鞋的年轻人聚集在位于纽约州贝瑟尔小镇附近的奶农马克斯·雅思古尔的240公顷的牧场上，来参加“这个史上最盛大的摇滚音乐节，青年文化力量的和平示威”，这次集会持续了3天。

新的美国式叛逆神话起源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迎合了人们“美国梦”破灭的心路历程。美利坚曾经是那样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国度，但随着美国的探险之旅的深入，这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的阴暗面和矛盾性也愈加被曝光。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宣扬的充满火药味的反共产主义，以及1964年美国加入越南战争使情况更加恶化。美国的地下组织发表了很多言论，成为人们反对西方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旗号。约翰·肯尼迪用卡里斯玛式[5]的个人魅力把德国青年

> 也召集到其麾下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紧随其高潮——1963年在西柏林的勋伯格广场上发表的宣言“我是一个柏林人！”——的是肯尼迪遭到了刺杀，然后为了黑人民族而战斗的勇士马丁·路德·金也被暗杀了，美国的“民主”图景顿时被抹了黑，尽管这幅图景在再教育政策里被描绘得是那么激动人心。然后，罗伯特·肯尼迪[6]也遭到了暗杀，而关于这一点的记忆是那么深刻，因为他是唯一在三位有望成为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中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要为千百万弱势人群，尤其是美籍黑人尽力，并且火速结束越南战争的。“我们在政客身上再也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随着金和肯尼迪的被暗杀，美国政治焕然一新的机会就永远地错失了。”托德·吉特林如此说道，他当时担任美国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主席。

迪特·巴克[7]对非主流文化进行定量分析后认为，对非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的最好称呼是社会边缘人，想要逃离社会规范和束缚的边缘人。如嬉皮士、雅皮士、垮掉的一代、新左翼、诗人、各种乐队和社团、电影制作人、煽动者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逃离到幻想中的自由乡村的梦想从未破灭，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风格。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股广泛的、想要打倒拜金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小市民社会虚伪的双重道德的热潮。

波恩瓦德·费斯佩尔是崇尚国家社会主义的作家威尔·费斯佩尔之子，后来和恐怖主义者古德伦·恩斯林同居并有一个儿子，1971年开了一个治疗自杀的心理诊所。他在小说《旅途》中对一个美国朋友说：“我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恨，我恨杜布罗夫尼克[8]，我恨德国。我恨到处滚的蔬菜。我恨满大街的汽车。我恨街道。我恨柏林。我恨孩子。我恨我的父亲。我恨所有把我变成这样一头母猪的人。我恨我的教师，恨很多很多东西。”

洛尔福·迪特·布林克曼是废墟一代的代表人物。这一代人带着学潮特有的狂飙突进般的热情崛起，在崛起的同时也被孤立。布林克曼关注着这一代人的挫败感和进攻性：他们生长在经济奇迹中，却深感心灵的堕落——本来，强烈的自我意识可以帮助他们从艺术表现的绝望中走

出，重塑一个新的自我认同，但现在，连这些自我意识也被剥夺了。布林克曼的第一本小说《在坑内》于1962年出版，描述了一个年轻男子外在和内心的孤独，在过境时重访了自己的家乡，试图寻找纯洁和无辜，却不得不发现自己的寻找纯属徒劳。这位作家把他的目光投向了毁灭、污垢、垃圾、满脸横肉的人们、赘肉。叙述常常把读者引向厕所，那里潮湿而肮脏，但被描写成驱赶商品美学的一剂清新的除臭剂。没有一个事物是"存在"的，所有的都在毁灭、堕落、异化。布林克曼出版过一本日记和笔记集，内容关于石化的生活、不受限制的憎恨、沉沦的天空和僵化的西方世界，《梦、起义、暴力、谋杀——起义者微妙感觉的探索》是它的标题。

大抗拒

1966年，四国联盟很讲究"力量均衡"地选出了最好的代表，与作为联邦德国总理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和时任德国外长的维利·勃兰特开始共同努力，缓解当时德国内政和外交的僵持局面。战后还从来没有一个内阁是由这么多政见不一、互相矛盾，而在政治上又具有贯彻力，同时在各自专业领域如此富有才能的成员组阁而成的，这其中有：赫尔曼·霍尔谢尔、克特·施 特罗贝尔、格奥尔格·勒伯尔、布鲁诺·黑克、赫伯特·维纳、卡洛·施密特、凯-乌维·冯·哈塞尔、卡尔·席勒、汉斯·卡策、杰哈德·施罗德、汉斯-荣格·维施奈维斯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杰哈德·施托尔滕贝格。基辛格本人则是"被人以词语的本意称作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尽管在1970年代这个称呼越来越受到质疑，甚至受到嘲笑。他一直在抗拒知识精英的等级以及精神上的条条框框，尽管这样，却从未被夸夸其谈和不切实际的热情所左右"。

正是这些"和谐平均律"，让人们感受到生活正日渐走上正轨，社会里弥漫着一股追求和谐的风气，让人很好维持这一切，这股风气会促使冲突产生的叛逆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由此，当德法裔记者比阿特·克拉斯菲尔德1968年11月8日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大会上，在柏林议

会大厅里公然揭露基辛格本人曾参与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并送其以“法西斯主义者”的美称时——这无异于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此事便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比阿特本人在当天被判一年监禁，并不得保释。“这个判决是这样的严苛，相形之下，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战犯的判决过于宽松了，还有那些一直被审判但从未被判决的、有着纳粹背景的政治明星人物。这一切都给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他们的前辈尽管对民主二字信誓旦旦地宣布效忠，却从来没有真正地学会何谓民主。”



伊朗统治者夫妇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和法拉赫皇后（中）拜访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右）和总统夫人威赫米娜（左），第二排是露特·勃兰特和时任德国外交部部长的维利·勃兰特。照片摄于**1967**年**5**月的奥古斯图斯堡

随着四国联盟的建立，德国自由民主党成为唯一一个勇负“反对党监督”重担的政党，而它是否真的能担此重任，人们从质量和数量上都

无法信赖。所谓“议会外反对党”同德国社会学生联盟合并，前景不容乐观。一连串反对紧急状况法[9]、反对礼萨·巴列维访德、冲击施普林格出版社[10]和反对美国发起的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使得议会外反对党在许多极端民主主义者眼中顿时变成了为真正的共和国基础秩序而战的先锋队。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共和国正由于学生骚乱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之中——从这个情况不难推测，民主的“本我”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

汉学系学生艾尔哈德·奈克曼于1967年夏递交给汉堡安全防务站高校工作组的理论论文反映了当时政治敏感的青年学生的声音。此论文被一名教授节选作为口号，呈给了加布伦茨[11]：“德国的大学不是处在危机中，而是已经完全衰落。这一切只有通过一场革命来改变。”该论文拟出了一幅战略性的草图，鼓吹“持续的高校骚乱政策”，该政策主要目的是通过“汉堡大学学生群体的大规模行动”建立一个新的公共领域。1967年11月9日的扰乱汉堡高校校长办公室的聚会标志着事件升级到白热化阶段。德特列夫·阿尔伯斯和辛内尔克·贝默两人打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标语“在陈腐的长袍下的1000年”（Unter den Talaren Muff von tausend Jahren）迈步向前，引得礼堂中很多教授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 许多大学都发生了骚乱。在汉诺威，葬下欧内索格[12]一周后成立了反抗者议会，这使学生运动迅速扩大，也给那些仍然相信着缓和的人明示了其爆炸性的影响力。哈贝马斯举行了一次重要演说并指出，只有学生运动才能够唤醒人们此前被当局有意或无意打压或封锁了的意识，甚至连当局者本身都有可能把这个意识从自己当中驱逐出去。作为议会外反对党声音的学生运动，确实部分促成了政治公共领域的重建，他们行使了民主监督的职责。游行示威的力量，在我们这个不想革命的状况下，独自担负起了政治启蒙的重任，它以启蒙为自己的目标。尽管如此，在本该进行民主讨论的时候竟出现了暴力和反暴力，哈贝马斯对此忧心忡忡。“针对事采用武力”口号很容易转化为针对人的暴力，他这样警告试图以“针对事采用武力”作为口号的左翼法西斯主义者，这个口号使他们自己被城市安全防卫警卫队列为攻击目标。

对当局压迫的抗拒是与当时流行的“建立一个无专制社会”的希冀分不开的，这个无专制社会应该以民主作为基石，注重民生，最重要的是要能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愉悦。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学说的基础上，赫伯特·马尔库斯阐发了“无压迫文化的想象”，这个设想由“利比多道德”（libidinöse Moral）决定。马尔库斯在联系了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13]的观点后做出如下结论：“在一个真正具有人性的文化里，存在应该更像是享受而不是受罪。人们应该一边娱乐，一边发展，一边生活，生活不是为了受苦。”

如同赫伯特·马尔库斯的同行者阿多诺一样，自从商品交换社会高度发达以来，艺术就一直在反对越来越受程序化约束的生活，并视这种生活为本该是自由主体的“人”的对立面。“艺术的功能不是让一个齿轮开始运作，而是抵制不管做什么都必须讲究功能和效果的心态。艺术才是注重终极目的的，可在充满了等级意味的有关管理当局的控制下，它却变成了毫无目的。艺术想要无摩擦地融入社会，可在这样一种管理思想下，却被全社会看作异类。”

> 彼得·魏斯在其1970年创作的戏剧《荷尔德林》中，设计席勒对荷尔德林说了这样的话：“美的概念先于自由的概念而生……社会结构变革之前，须先有人的变革。”在该剧之后的段落里，马克思对荷尔德林说：“要为变革做准备，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研究具体的历史状况，另一条是赋予深刻的个人体验以具体的形式。”
>
> 魏斯的戏剧，尤其是《越南讨论》（在此剧中，魏斯以越南的历史和长时间的解放战争为例，讨论底层人民拿起武器反对压迫是必要的，美国消减革命的根基的努力也是必要的），极大地影响了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怀旧性的历史工作以及对于法西斯时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研究使那个时代的小说《反抗的美学》受历史性和神话性的影响颇重。“这本小说讲述的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及其受害者的故事，尤其着重于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起义，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受到位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大本营的领导和援助——这些人的故事通过一些参与过起义的人，男人和女人，通过一些历史事件来展现。许多都是真实的人名、真实的事件，有一些使用了化名，还有一些是为了叙述方便而杜撰出来的，我隐去了真实的地名，而采用柏

林、巴黎、巴塞罗那、西班牙内战广场、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大城市名取而代之，但是从一些影射和文段节选中大家还是很容易在历史中找到其原型。另外，我也同时穿插了关于十月革命之前和之后那一段历史的描述。”

打破常规

社会上充满了挑衅心理，其目的是冲破思想和行为上的一切规范、守则、态度、禁忌、偏见以及已有但毫无意义的秩序，以此来为将要到来的运动做准备。艺术领域首先有了反应，而在这些反应的影响下，其他方面也开始看到了反叛的迹象，叛逆的美学开始流行，当然这也只有在有关当局表现出足够宽容度的前提下发生。人们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主日祷告文，而开始要求成功。哈贝马斯认为，最开始用来打破陈规的新技术也给久旱干涸的官僚机构带来了一丝清风，因为它们针对复杂而又易感的交往网络中的雷区，所以事半功倍。流行文化的狡猾之处在于，它在下意识中萃取并提炼了日常生活五光十色的色彩和轮廓，并将其扩大、加工，再把它们重新带回人们的意识，新的游行示威的技术就采用了这个特征，使得象征性的符号变得可笑。



1968年**12**月，女学生乌苏拉·塞佩尔因非法侵犯他人住宅被起诉，她和几个同学在法庭上跳脱衣舞，以此挑衅法庭

然而，以这种方式政治化了的公共领域却并不能带来学习和改进。失望了的革命激情急不可耐地向着老化的各种机构发起了精心策划的冲击，在长长的征途中，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态很容易转化成因为受到挫折而产生的好战心理。哈特穆特·冯·亨提西1968年在纽伦堡的一次名为“联邦共和国的反对党”的谈话中指出，青年们的这种浑身长刺的心态有一个错误的人类学基础，只不过损害公共秩序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这样做只能证明做这些事的人的脆弱易感。

“我们应该对每一点小小的挫折感到高兴，因为它们是由我们的天性生发而出的，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小小的插曲，是它们阻止了我们不至于陷入真正的抑郁性格，也不至于一时冲动做出什么糊涂事。”

费茨·图尔菲与迪特·昆策尔曼、莱纳·朗豪斯合办了一号公社[14]，公社是在已是危房的柏林耳房里成立的，以流亡到美国的作家乌维·约翰逊命名。公社的成立是那时以现在人的角度难以想象的政治闹剧中

的标志性事件，反对性压抑极大地刺激了小市民的想象力。

这些革命的小丑实行了一种为当时社会礼教所不齿的生活方式，当然，从潜意识心理学来说，这也是他们自我的一种解放。一切都是对司法的嘲笑——如果这样做有助于人们找回真理的话，我会坚持到底，这是图尔菲在法庭上的表态——混乱中的乐趣，群交（当然，创办者莱纳·朗豪斯和他的女友，也就是一号公社的封面女郎乌施·奥伯迈尔很快又回归到了传统一夫一妻制的世界当中，像许多正常的情侣那样）。在死一般的寂静里，革命者为这个严肃的社会带来了生趣。“谁两次和同一个人睡觉，谁就是创办者。”当柏林的学生1967年夏快乐地迎接费茨·图尔菲从狱中释放时，他们喊出了这个口号。变不整洁为浪漫，在革命性的演说中加入色情、污秽的词语，人们用这些来尝试着摆脱商品美学的魅力光泽和讲究卫生带来的压力。布尔乔亚式的整洁癖和被赋予了革命意味的叫春放在一起受到关注，大家只不过是想要做人罢了。

1969年1月31日，法兰克福学院社会研究所被占领，占领者们威胁释放除了阿多诺、路德维希·冯·弗里德堡和鲁道夫·贡泽特之外的三名领袖，警察出面了。他们逮捕了几名学生，其中有身为阿多诺的博士生和社会民主主义大学生联盟领袖的汉斯·荣格-卡拉尔。很快，阿多诺本人的授课也受到了干扰，主要是因为一些女生在讲堂上表演起了脱衣舞。在一次《明镜》周刊的访谈中，对议会外反对党在支持和反对态度中摇摆不定持反对态度的阿多诺表示，他从未在其作品中为任何一种行为或运动塑造某种榜样。不久之后他死了，学生中怀有敌意的人的攻击使他很伤心，他们认为他是蒙昧者死灰复燃，他的死震惊了公众，他们以升级的暴力方式来控告他的精神著作权。

霍克海默退隐到了泰辛，其作品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以求与神学靠拢。在一篇名为《反对左翼极端主义》的笔记中，这位越来越保守的哲学家写道：“在今天，对资本主义进行攻击必须要在双重意义上接受对于极端主义威胁的反思。如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法西斯倾向一样，攻击资本主义的人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即左翼极端反对党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恐怖的极端主义。”

辩证法术语

议会外反对党的语言——这种语言带有浓重的法兰克福学派腔，当然很快也被人们弃置不用——开创了一个圈子，该圈子受阿多诺的作品《本真性的行话》影响很大，那都是些新的概念和思考维度。须知即使在1945年之后，德语语言教育也受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格林大字典》[15]的压倒性影响，囿于系统条理的各科各目的桎梏之中。这些字典、德语教科书、歌集、史书将官话、套话潜移默化于语言使用者之中，社会在这些伪田园的语言保护伞下定型。传统官方的德语能通过粉饰太平的表述，把不幸描述成幸运。辩证法认为，在传统的德语中沉沦，社会将不再有发展的空间。《本真性的行话》从语言上证明了被标准的官方词汇浸淫的“受过教育的人”没有撼动现有秩序的能力。

新发明的辩证法的语言在此犹如一杆标枪，是冲破现有泛滥的陈词滥调、偏见和各种所谓理论的武器。新潮的表述及通过其体现出来的新思想激活了民主的讨论。碎碎念的肤浅和表面文章像石膏一样一块一块地被撬开。议会外反对党的语言开创出了一种提问的方式，这种方式将不留情面，然而诚实地揭开用空洞的套话也不能自圆其说的表面和谐下的真面目。在否定和制宪会议的辩证法里，也是通过这些辩证法、词语和概念领域被大大激活。这些词语和概念被从德国人的思维当中抽离出去很久了，即使偶尔存在，也只不过是在深奥的学术论文中使用，以为其增加光彩度，比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心理学研究。

让·阿梅里，一位曾受过纳粹分子迫害的哲学家和散文家，是认识到“辩证法术语”中具有辩证色彩的新语言——包括带有象征意味的单元词——真正从结构上开始接近“本真性的行话”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否定和质疑的必要性，即使站在本身的立场上，也不再具有反馈作用。“辩证法术语”成了为敌-友界限划分服务的工具，对任何言论的态度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左翼的语言必须在这样的“辩证法术语”的萌芽阶段就揭示其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必须把自身打造成“天将降大任

的群体”形象。阿梅里反对的不仅仅是批判性理论拙劣的模仿者，比如，他也认为阿多诺引以为豪的《否定辩证法》充斥着专业术语，整本书尽是“拒绝平庸的蛮横表现，最终结果是语言和思想脱节得厉害，以至于读者满怀希望地阅读，到了最后却像是剥开洋葱的培尔·金特[16]，茫然不知所云”。《辩证法术语》，无论自以为多么具有进步性，最终其实都在涉及走向落后的危险。“抛开那些真实思想中蕴含的暧昧和文字游戏，抛开那些通过变戏法般供人取乐，沦为时尚的所谓辩证法而吸引人眼球的语言——它们从出生之日起就准备着以堕落为时尚，抛开所有有根有据的反对意见，从逻辑和合理性上面都可以推倒的辩证过程——抛开以上这些，辩证法面临着成为自视甚高、自命为精英阶层的内部自我交流的工具的危险。从它在自己的术语和行话里下滑之日起，这种危险将使它，无论它打算采取什么方式进行自我辩护，名声扫地。”

> 议会外反对党语言有非同一般的贯彻力，这一点也体现在反对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身上。他们都是语言修辞的天才，致力于将新潮的理念变为现实，他们用嘴皮子功夫努力打造出一个更好的、更具有价值的、有头有脚的世界观模型。在这些善于说辞的年轻左派中，鲁迪·杜什克是最具演讲天赋的。鲁道夫·奥古斯塔因写道，在这一点上，1945年之后的德国只有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赫伯特·维纳两人可与之相提并论。
>
> 尽管鲁迪·杜什克演讲时天花乱坠，他却能够有效地使听众陷入他的演说魔力中。这个奇迹与他的演讲方式是分不开的：他不仅仅是靠嘴在讲话，他在麦克风前一站，就代入了自己的整个灵魂，甚至他那顶巴斯克帽子下的浓密的眉毛也在说话。他在那些被乏味的政治演说毁掉了的修辞中注入了一种新的声调，即使他提议马上就在雷根斯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发动革命，他的话也会那么具有说服力，连他自己都会相信。
>
> 鲁迪·杜什克的革命生涯终止得十分突兀。1968年4月11日，机会主义工人、地域主义者约瑟夫·巴赫曼（一次单一性事件，但受到了施普林格报纸的影响）开枪击伤了他，杜什克死于1979年圣诞节期间一颗击中头部的子弹。

恐怖主义

如果我们从其变态的恐怖主义特征来观察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反抗运动——当然，这样的观察未免片面（因为，同最终以武力结局的教条主义一样，通往可实现的人本主义的道路同样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修筑）——那么，其心理构图中的反现代路径就十分明显，它们囿于领导人的人格结构，并以反英美化为出发点。

德国红军派[17]的恐怖主义分子将吉利安·贝克[18]比作纳粹分子：他们自己居然被说成是“希特勒的孩子”！人们有理由怀疑一系列发生在西德，已构成犯罪的无政府主义爆炸事件是“红军派”构建西德社会所进行的尝试，这些尝试的目的说穿了就是把西德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社会。“如果不看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那伙人的犯罪能力和纳粹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似性，《希特勒的孩子》这本书所分析得出的精神与文化上的渊源正是促使乌里克·迈因霍夫和古德伦·恩斯林的信念。荣格·卡拉尔，20世纪60年代末除鲁迪·杜什克之外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最具有影响力的发言人，在他惨遭暗杀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很多新左派主义者从小就深受落后的、非理性的甚至纳粹式的思想的耳濡目染。正是这些思想使他们接触到了这个社会里仍然阴魂不散的法西斯主义因素。”

但是，贝克认为，这些都算不得真正的“大开眼界”。用战争的方式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会使人本身的法西斯性也变得合理起来。贝克表示，1970年代末的这两个组织——新纳粹和恐怖主义组织——在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上有共同之处。比如说，两个组织的成员都是使用武力和恐怖袭击来迫使别人遵从自己的意志。这些成员经常公开表述自己对他们归为“敌人”那一类人的憎恨以及想要毁灭这些敌人的意愿，他们认为，只要是自己的敌人，就活该被他们以恐吓、夺取其自由甚至以斩草除根的方式使其消失。他们都是反议会制、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反联盟且很不宽容的。他们都自命为社会精英，自诩有能力领导广大草根阶层进行革命，而这也是为了广大草民好。因为这些草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

对自己好的。他们破坏、致人伤残、谋杀，一切行为都是在对个体的权利和法律的完全无视下进行的。

> 我们想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生活。我们的运动破灭了，但它不是作为乌托邦的理想破灭，而是作为社会运动而失败的。我们一直追随的社会主义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图景，我们想要的实际比这些图景更多。我们一直在身外寻找被羞辱的人，结果最后才明白：被羞辱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一切的一切，一切的错误，都有我们推波助澜。今天，我感到自己比其他人激进许多，他们胆小得连自我都无法回归。相对于我所做的而言，弗里茨·图尔菲、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所做的那一套才是真正的逃避（莱纳·朗豪斯如是说）。

在尝试着解释恐怖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及其含义的时候，贝克一直沿着追寻每一个恐怖分子的生平履历的途径，他这么做是为了从他们的生平中找到这些恐怖分子行为动机的蛛丝马迹。比如19岁的苏珊娜·阿布莱希特，1977年谋杀德意志银行主席的荣格·彭托事件的参与者，曾对其父母说过这样的话：“鱼子酱，我已经吃够了！”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她的心理活动，即憎恶一个表面上物质发达，实则人人只为自己着想、忽略他人的社会。这种心理活动在其他恐怖分子身上也很多见。这些“出身于条件良好的家庭的孩子”，由于从小就被灌输的敏感性观察到了这一点，并力图反对，只是他们本身不知道如何使用非法西斯式的更好的行为来表达反对，这正表明这些恐怖主义行为的源头是一种挫败感，但最终变质为攻击性。这些人不懂得如何自我反省，将原本是人本主义的人生目标放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结果这些目标一失足变味为暴力的变态反应。



1977年**9**月**5**号，汉斯·马丁·施莱耶遭袭并被绑架，**1977**年**10**月**19**日他被发现时已遭杀害

卡尔·海因茨·扬森认为，其后一代，也就是第二代恐怖分子，仍保有战后一代心理负担记忆的阴影。这些想要逃离我们这个发达社会的孩子，要么就是深刻厌恶着他们在其中成长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市侩家庭里弥漫的物质主义，要么（如果他们出身贫寒）就是备受经济衰退的打击，感到个人的未来黯淡无光。自由主义的内政部部长维尔纳·迈霍夫为这些年轻人的行为动机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解释：他们追求一个更好的世界，但他们的革命动力却未能在合适的时机以投身于改革的方式得到发泄，因为真实世界的政治在他们眼里过于沉重。就这样，他们最终走入了谋杀、凶杀和低级的银行抢劫等死胡同。

那么，为什么女性在恐怖主义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呢？超过半数构成犯罪的恐怖主义事件是由她们造成的。几乎所有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的女性经济状况都是良好的。在对众多女性恐怖主义者的生平进行

了研究之后，古斯塔夫·纳斯的结论是：年轻人还没有学会如何区分理想与现实，如何区分什么样的图景只能用来做梦，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人为做到的。有一种世界只存在于理想和“主义”中，有一种世界存在于已建立的社会及其统治结构和不完美中，这两者之间的鸿沟使他们无比震惊。其中一些人震惊之后的反应就是走向极权，尽管他们完全可以选择走另一条道路，完全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反应。无视于良知、法律、行为后果以及家庭与社会的牵挂，这样的行为更容易为以感情为主导的那一类人所采用，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才特别适合于做极权主义的领导者。而思想解放的女人在面对着男人们的粗暴和冷血时，不甘居于劣势，她们要超越，她们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补偿自己与男人之间获得解放程度的落差。

联邦德国的现代化和英美化进程的前景一片光明，因为这些过程是在非暴力的环境下完成的（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外人看上去如此和平的社会中，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纳粹犯罪分子存在。）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感到恐怖主义是“自由的侮辱”。“自由的侮辱”这个口号是一小群好战的人提出来的，其人数多少看似微乎其微到不足为患，但他们的一系列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径，给联邦德国的国家以及社会体系甚至文化心态蒙上了噩梦般的创伤阴影。不但如此，被这些恐怖行为激化的反应也搅浑了现代化建设的空气，导致整个社会开始弥漫着一种消极情绪。当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的活动浮出水面时，海因里希·伯尔[19]确定，这是一场6个人对6000万人的战争。

> 人称“波西米亚人”的安德里亚斯·巴德尔伙同牧师之女古德伦·恩斯林、女记者乌里克·迈因霍夫和律师霍尔斯特·马勒，他们的计划是以革命般的暴力手段来为土崩瓦解的学生运动的目标增加新的推动力。1968年，巴德尔、恩斯林和其他两名同伙在法兰克福的购物大楼放置了两枚燃烧弹，显然，他们是受到了莱纳·朗豪斯和弗里茨·图尔菲一号公社一张传单的“启发”：1967年，布鲁塞尔一家购物大楼起火案造成了300人死亡，这张传单用这样一个富有火药味的问题叫嚣着：“什么时候柏林的购物大楼才能起一次火呢？……燃烧的购物大楼，燃烧的人，第一次让一个欧洲大城市感受到了越南战争中的人们那种支离破

碎的感觉（亲眼看着人们被烧，甚至自己也被烧），显然，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还没有经历过。”

这几名案犯被抓后，法庭的判决一度从提审改为释放，然后又改变了一次判决，巴德尔在柏林被人指认并被捕。1970年，他事先经过安排，同乌里克·迈因霍夫在柏林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的图书馆会面并获得自由，之后又有一场纵火案，该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被严重烧伤。暴力行为开始一步步升级，直到1980年代末，一直都有新的受害者。尤其使人记忆深刻的是1977年5月5日绑架德国雇主协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耶，在这次绑架案中，他本人的司机和三名警务人员遭枪击身亡。此案直接导致了全国性的恐慌。同年10月13日，一架从马洛卡飞往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几名巴勒斯坦人劫持，飞行员被一名恐怖分子杀害，因为他们提出的释放巴德尔及其同伙的要求没有被答应。这些犯人被依照特律释放后，巴德尔、让·卡尔·拉斯珀和恩斯林在施塔姆海默监狱自杀。他们死后的第二天，施莱耶的尸体在埃尔萨斯被发现。直到1977年的“德国之秋”，一共有28人在恐怖活动中丧生。

---

[1] 这是冷战开始后，处于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双方第一次聚首德国。

[2] 全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大学生联盟”，是德国一个左翼性质的党派，成员以大学生为主。

[3] 赫伯特·马尔库斯（Herbert Marcuses，1898～1979年），他是德美混血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

[4]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是美国纽约州乡村小镇贝瑟尔在1969年举办的音乐表演活动。贝瑟尔距离阿尔斯特县的伍德斯托克43公里。为期3天的音乐节，共有40万名音乐爱好者涌入贝瑟尔，使得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成为史上最成功的摇滚音乐节之一。

[5] 卡里斯玛（Christmas）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韦伯认为卡里斯玛是这样一类人的人格特征：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诚的态度看待这些领袖人物。

[6]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1964年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1968年6月初他刚赢得了民主党加利福尼亚预选的胜利，便于6月5日早晨在洛杉矶一家旅馆内遭枪击而身亡。

[7] 迪特·巴克（Dieter Baacke，1934～1999年），德国教育家、比勒菲尔德

大学教授。

[8] 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古称拉古萨（Ragusa），克罗地亚南部港市，此城面临着意大利半岛的东岸，位于杜布罗夫尼克地峡之末端，以风景优美闻名，是热门的度假胜地，有“亚得里亚海之珠”的美称。它也是克罗地亚语言及文学的其中一个发展中心，是不少诗人、剧作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及其他学者的居所。

[9] 1968年5月30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紧急状况法，确保国家在危机情况下（自然灾害、起义、战争）有行使特殊职能的能力。此法遭到所谓的议会外反对党的大规模反对。

[10] 1968年4月11日，有人在柏林枪杀了当时作为学生运动领袖的鲁迪·杜什克。当医生抢救其生命时，施普林格出版社的晨报记者警告自己的同事不要插手此事，这造成上百名愤怒的学生冲击出版社。

[11] 奥托·冯·加布伦茨（Otto von Gablentz），时任德国驻荷兰大使。

[12] 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1940～1967年）是一名德国大学生，于1967年6月2日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进行反对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访问德国的示威活动时，被便衣警察枪杀。这是他首次参加政治示威。欧内索格当时是26岁的学生，研究浪漫主义、德语文学和文化。当他被杀时，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仅有的一个）孩子。他的死亡是左翼的一个集合点，六二运动团体以他被杀的那天命名。20世纪60年代末的左翼学生运动在他死后膨胀起来，许多当时才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德国政治家都深受影响。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旁设有本诺·欧内索格的纪念物，他家乡汉诺威的一座桥梁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13] 《审美教育书简》又译《美育书简》，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的代表作。是1793～1794年席勒写给丹麦王子克里斯谦公爵的27封信，1795年经整理出版。追求人类本性的完善，提倡理性的自由是席勒美育思想的核心。

[14] 1967年1月，“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合会”的成员在西柏林组织了“一号公社”，这是德国开风气之先的头一个，也是最著名的被称为“公社”的男女合租式公寓。就像其他公社一样，一号公社成为反权威运动的种子。他们鼓吹男女平等，并创建了托儿所和免费学校。他们排斥市民阶级的小家庭，指责那是压制情感的一种神经质强迫性的社会组合。一号公社强烈反对的是战后那种看重表面道德的虚伪社会。一伙年轻男女合租公寓，共用厨房、厕所、浴室，在今天的德国是完全正常的事，但是在1967年，这一现象激怒了整个国家。被称作“一号公社”的这种充满挑衅性的男女混合公寓住房，彻底颠覆了德国传统社会的礼教习俗。

[15] 这是一本影响力巨大的德语词典，其对德语的意义就如同《牛津英语词典》对英语的意义。该词典就单词的起源和各时期的不同用法等做了说明，同时还列举有摘自文献中的例句。

[16] 《培尔·金特》是易卜生创作的戏剧作品之一，它通过纨绔子弟培尔·金特放浪、历险、辗转的生命历程，探索了人生是为了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重大哲学命题。剥洋葱是剧中一幕：饥饿难忍的培尔·金特想以洋葱果腹，不料所有洋葱都是只有外皮的无心果实。

[17] 这个深受极左思潮影响、发端于西德“1968年学潮”的团体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震惊世界的暴力恐怖组织。1968年4月2日晚，极左青年安德雷亚斯·巴德尔和古德伦·恩斯森（女）伙同另外两人用自制的燃烧物点燃了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从而拉开了恐怖活动的序幕。1970年，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等人成立了“红军派”组织，它的成员大都出身富裕家庭，以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在最初的17名核心成员中，有10名大学生、2名律师和2名记者。他们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政治理念十分极端。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红军派”把攻击目标锁定在德国经济、金融和政界的高层人物身上，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的暴力事件，34人成为恐怖袭击的牺牲品，其中包括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以及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多名政商界要人。

[18] 1932年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小说家、新闻家，在恐怖主义的研究上很有名气。其作品《希特勒的孩子们》就是以德国“红军派”为对象写作的。

[19] 海因里希·特奥多尔·伯尔（Heinrich Theodor Böll，1917～1985年），生于德国科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13章 西德的文化革命

经历的学问

“学问”（Belesenheit），这是一个被彼得·魏斯所提倡，并且在抗议活动中成为典型的概念——“你应该读书。你应该让自己受到教育。你应该思考发生在你周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应该有自己的观点！”——这个概念的提出和流传导致了一股理论的和社会批评的论文热潮的出现，其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苏尔坎普出版社系列，其“灰色”（hektographierte）文学作品在当时的市场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众多林立的小出版社纷纷建立，它们格外以出版来自美国的反传统、颠覆性的“地下出版社”的作品为导向，积极促进实验性的或稀有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政治理论和政策论战的作品面世。它们的动机建立在一种另类的自我认识之上，可说是站在了资本主义出版行业本质的对立面：尽管它们也希望通过书这件商品来挣钱，但是对于它们来说，书的使用价值高于其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它们的工作中，“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给阅读的、思考的人民带来思想、概念、想象和启发”。

1968年，左派作家们举办了一个“唱反调”的图书博览会。这些作家自认为是文学的“生产者”，是“所有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和文学创作者中的专家”。1970年的组织规章里写明，文学创作者的任务是分析全社会的发展以及它带给文学创作领域的影响，确定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从这些分析当中，我们可以制定出进行阶级斗争的社会策略。这样做的目的是，废除社会分工类别的组织方式。”作家出版社的签约作者们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

与传统的理解相比，在他们眼里，学问更像是一种个人经历，纷繁的经历构成了革命者的“祖先肖像画廊”。从作品中抽离出的艺术形象在

那个时代的精神“演习”中内化，并通过各种时尚的、符号的、合乎礼仪的方式表现。

马克思是思想上毋庸置疑的先行者，他的一系列理论使人们有理由希望，通过否定之否定，借助发挥幻想和希望可以使一个关于不再被陌生化的社会的乌托邦变为现实。马克思认为，自由在于“社会化的人，也就是生产者，理性地调节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并将其划在社会化的控制之下，而不是任其为某一种贪婪而盲目的权力所支配”。通过自主自觉的工作以及阶级斗争，剥削者必须拿出资源来供社会共享，“地球上的天堂”由此得以实现。在那时，人们不需要再去“工作”，而只是“从事”于某件事，这种自主自愿的“从事”超越了迄今为止被异化和使人讨厌的“工作”。只是，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人们因为工作而遭受了压迫和剥削。

> 猎人、渔夫、批评家——在现今社会里，不管这人是谁，他都必须一直这么做下去，只要他不想丢掉过活所需的饭碗——而在共同体化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不必仅限于一个封闭式的工作圈子，他可以在各行各业中挑选任何一种自己喜欢的分支来从事，而这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社会会自己调节生产。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我们可以上午捕鱼，下午养牛，吃过饭之后再做会儿批评家，只要我有兴趣，我就什么都可以干，并不必非得变成专职猎人、渔夫、牧羊人或者批评家。

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成了革命的榜样，因为他站在卡斯特罗一边，参加了古巴的人民解放革命。在和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卡斯特罗本人产生了裂痕之后，他从1965年开始，在玻利维亚组织了一系列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国家苦心经营的新殖民主义的行动。1967年，他在玻利维亚被军方逮捕并遭到杀害。“切·格瓦拉的警句‘我们要创造两个、三个、四个越南’被学生运动者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地接受，激励了许多人。这句话——正如‘切，万岁’一样——被多次刷写在了墙上。”

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发现了一本反殖民主义宣言：《地球上被诅咒的

人》。1925年生于马提尼克的非洲裔医生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是这本书的作者。他终身都在为将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斗争，1961年死于美国，“黑色教父”运动将他奉为领袖。1965年第2期的《时刻表》首次发表了《地球上被诅咒的人》中一整章的德文翻译。书上说，落后的民族挣脱了它们的锁链，它们成功地挣脱了枷锁，这些民族决定通过武力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抗议活动者认为，毛主义是对正统共产主义及其经典著作中偏激见解的一次创造性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超越。《毛主席语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德左翼分子的“红色圣经”。书的扉页上写着林彪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被人们当成义务来遵守。在毛泽东看来，叛逆的青年一代是更加美好的未来的保证：“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 女学生们照罗莎·卢森堡的榜样来打扮和调教自己，以此来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她们很快发现，被称为上层建筑的所谓理论，其实是她们的男同志们用来掩饰性高潮的说辞，和小市民的男权呓语没有很大差别。和以前一样，人们期待的女性应该闭紧嘴、不说话。“即使我们仍然想开口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说不出什么来，即使我们真的说出来了，也会被堵上。小市民的残渣余孽、所谓社会主义的群交、社会主义的孩子、爱情、社会主义的真实性、同性恋、社会主义制度磨人的角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感伤、社会主义的生活援助、革命的摸索、关于性革命的论调、全社会的性高潮、社会主义解放、战斗！”上面一段话来自一张传单——很能体现叛逆的左派妇女们面对来自左派的压迫时的态度——这张传单与后来为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智囊团所采用的那句口号不谋而合：“从小市民气的遗毒中解放社会主义的杰出人才！”

商品美学

恩斯特·施罗德在柏林的席勒剧院扮演着浮士德，台下一群虔敬的听众静静聆听着歌德有如神来之笔的台词。突然，正当演员要说出那句经典台词的时候，扩音筒里猛地爆出一群事先已有准备的学生的声音：“歌德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又关我们

什么事？”成百上千的传单飞进了“包厢和衣冠楚楚的人群之中”。演出被迫中断。

“你们这些人啊！发生在越南的屠杀，你们冷漠地袖手旁观，心底都不起一丝波澜，你们只管在浮士德式的伟大中沉醉，就觉得万事大吉。这是恐怖的文化，它该停止了！”

精心布置的舞台激怒了深受学生抗议活动影响的叛逆一族，他们所要反对的正是这种受过教育的、布尔乔亚气十足的文化消费。资本主义的一切向经济看齐的观念，甚至连精神与存在都被出卖给了经济利益的做法通过文化的意识形态传播，连哄带骗地暗示大家“像现在这样，一切都好；只要像这样走下去，一切都会好”，这样的谎言该结束了。叛逆的年轻人反对的是道貌岸然的“领带文化”[1]，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纷纷以套头衫和牛仔裤作为自己的时尚，这套“反时尚的时尚”很快成为青年们的时尚新宠。这种时尚的对立面是布尔乔亚式的旅行手册式的思维，以及“一颗势力心、两只利害眼”的看热闹的心态。总而言之，他们就是要反对经济奇迹时期被仪式化、商品化的文化生态。一年一度的文化市场走马灯似地变换，粉墨登场地都是些伪文化人，只管乱哄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真正的社会活动却被束之高阁。这么一帮伪君子们，只要闲来跟着工人的示威游行走上几步，签几份裁军协议，就饥寒交迫中的发展中国家发表几句感言，便施施然以为自己已经给一群迷途的羔羊伸出援助之手了。对人们应该持何种态度这类问题，在他们眼里，同明天应该穿什么衣服这类问题没有多大区别。

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导致了文学公共领域的沦落。早先的文学公共领域被貌似“公共”或貌似属于私人领域的文化消费所取代。文艺以及文艺批判的读者群变成了消费文化的消费者群。尽管自由资本主义的通信系统不但通过经济实惠的通信疏通了消费者和文化商品之间的渠道，而且从心理上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畏难情绪，但是，大众文化的

名声一直毁誉参半，因为它积极地适应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消费人群对于文化产品的休闲与娱乐功能的诉求，而不是拉高广大的听/观众群的欣赏水平，使他们关注并欣赏一些本质上更为完整的文化形态。

人们对日常生活现象变得越来越敏感——即使是在中小学，思想前卫的教师也开始批判性地分析各式“文章类型”，诸如广告、海报之类——尤其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那些被鲜红的旗帜所装扮起来的，期待可以运用这些分析来改变各种社会关系的现状的希望。“商品美学”的概念，在这一切中扮演着一个启发式的关键词。之前的各种理论，尤其是那些关于政治的操纵与压迫的因果联系的讨论——这类政治性的讨论在大学生和青年中学生中间举行过多次——所有在这些讨论和理论中阐发的观念，都被“商品美学”这一概念系统化了。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2]描述了商品的生产和推广与人的意识和需求之间的联系。在这些作品中，他继续发展了一些批判性的术语，关于“商品美学”的问题由此上升为有关“商品美学”的一套理论，这都是他的功劳。商品美学关心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体现其特征的一面。对新产品的贪婪被唤醒了。每购买一件产品，它都必须是真正的“新”产品，第一次被开发的产品，顾客的感觉在市场上占据首要地位。为了适应这种需求，人们所追求的那些抽象概念被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出来：白色的碧浪代表着洁净，牛奶沐浴露代表着柔顺丝滑，保时捷系列代表着进取和突破。在各种被通感的商品所营造出的五光十色的秀场前，问题的中心已经不再是商品的真实性。人们不再关心什么是“隐藏在后面的本质”，配件俨然已成为主体。正如卡尔·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商品对潜在的顾客青睐有加，商品美学的刺激性就在于商品所影射的各种美好愉悦的、“恋爱般的感觉”。

新达达主义

约瑟夫·博伊斯[3]的艺术由单纯的艺术行为延伸到了实用的政策领

域，也推动了某些潜在的社会政策理论的产生。这些理论肇始于1968年，同鲁道夫·施代纳[4]的人类学观念、德国古典主义、德国浪漫主义的观念在“社会整容、一种社会建设的艺术”的主要理念下相融合，使“正在进行中”的、海潮般的运动向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发展——他是故意想要冲破现有的文化模式的束缚。1971年，他成立了“通过全民公决直达民主”组织。从“艺术等于生活，生活等于艺术”的理念出发，他以使所有人都有权公开享用学术资源的口号为前提，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担任教职，因为这一点，他——在学生的技术支持下——甚至与约翰内斯·劳领导下的北威州政府产生了矛盾。他的学生约格·伊门多夫发展了LIDL艺术[5]，以此讽刺当时的处于国家内部的权威当局者。1968年1月21日，他左腿绑上了一根被绘成黑红金的木刷，在波恩联邦宫前进行示威，以鞭挞当时缺乏创意、碌碌无为的联邦政府。当他在1969年运动周年日重新前往波恩，试图以在联邦宫一侧建立一个LIDL之屋来庆祝LIDL行动周年时，警察只用了三分钟就毁掉了这个以纸和木头搭建起来的建筑。

很快，“正在进行时”的行为艺术的小打小闹就被更大的示威场面所取代。在这种场合，行为艺术家特别喜欢称自己为“做事的人”。比如，1969年的某一天，汉斯-尤尔根·舒尔特（HA Schult）和君特·萨里埃一起，把慕尼黑的沙克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废纸堆。一年之后，他又和一些如同海藻和菌类一般疯狂生长的边缘文化一起出现，批判普罗大众对待废品的愤怒态度。“完全的艺术家”蒂姆·乌尔里希在汉诺威市开办了一家销售艺术想法的办公室，向顾客们推销艺术化的商品，以此表明自己对它们的支持态度。“被批判的愤怒所激动，高喊着由政治术语组成的口号，年轻的叛逆者从各地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他们受到像约瑟夫·博伊斯这样颇负盛名的艺术家们的支持，冲向了许许多多的攻击目标，正是由于这些目标场域的存在，那时的国际艺术买卖被分成了各种封闭的小流派。年轻的艺术家绝不后悔和1968年的学生们一起上街游行，并借此机会以达达主义式的搞怪和嘲讽，以各种具有爆炸性的流行文化来

激怒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公民们。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是既可以欣赏喷瓶喷出来的五颜六色的广告，又可以看懂解剖刀一般细致犀利的社会批判的，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同样心安理得。”（卡琳·托马斯）

> 许多各不相干的图片突然同时出现在一处，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图片（看看在任何一家小报刊亭外挂着的海报吧，那上面盖满了图片、图片所属的文章标题以及图片所描述的内容的页数，灾难、性、艺术、运动、谋杀，所有这些主题同时出现在一张平面上，声嘶力竭地呐喊着），这些图片与嘈杂的广告叫卖声结合，是组成人工合成、包装过的看点的原材料。现代的媚俗世界被夸张但真实地暴露于日光之下，与此同时，这些肤浅的东西依然还在为人们津津乐道。“罗伊·里奇登斯坦的滑稽画、安迪·沃霍尔的明星画和汤姆·韦瑟尔曼的裸体画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消费世界做了艺术上的锦上添花，这比坐在家里安安静静地看书摘要有趣多了。”这些人创造出一种引人注目的“色彩几何”，用这种方式尝试着“把严格的艺术结构”流行化，或者像奥托·赫伯特·哈耶克那样，用大块的塑料把城市装扮成一个充满色彩的世界。

在寻找新的艺术造型的时候，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起决定作用的角度——这样的例子有君特·余克的“被钉钉子的钢琴”和约瑟夫·博伊斯的“不能坐的椅子”，二者均诞生于1963年。“习以为常的东西成了噩梦。因此，这些东西只有在毁灭中才能获得自己的艺术魅力。它的日用功能反而被疏远了——这些艺术品是对那些想要舒舒服服地‘躺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表达方式’上睡大觉的人的一次讥讽的鞭挞，艺术品就是要拒绝平庸而舒适的靠枕。这是在教育那些心存侥幸的政治家，不要以为可借着现代艺术之名便可督促人们提高效率，多多办事。抵制的时代来临了。”在这个时代，主流的、肯定性的“高大全”人物形象在慢慢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埃米尔·舒马赫[6]的作品中古旧的人物和风景，霍尔斯特·扬森和汉斯·贝尔摩的作品中扭曲的人脸和躯体，西格玛·波尔克的格子画，伯恩纳德·舒尔策的超现实主义题材。尽管人们的表现手法可以如此多样，如此不同，那些表现却都源于同一种不满：对格式化的艺术形式的不满，这些一成不变的艺术规则早已不能反映混浊、散漫和充满歧义的现实了——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不变的东西。当时，在慕尼黑成立了一个艺术小组，起名为“距”，其“源于本质的呐喊将矛头指向了被消费

压迫和社会习俗逼得日益狭隘的个人，它满含讽刺地对经济奇迹时期的意识形态中错误的社会和政治认识唱着反调，同时，也为社会自由提供了一种蓝图”。

> 在格奥尔格·巴泽利茨[7]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上，警察以淫秽露骨为由没收了《裸体的男人》和《桶中之夜》这两幅画作。其实这两幅作品深刻揭露了那个时代的小市民气和假正经。“当人们建立起第一家色情用品商店时，就已经陷入了和《裸体的男人》和《桶中之夜》一样色情的诅咒。尽管，图画中的手淫场面其实却是在隐喻消费社会中的孤独、人与人的疏离和贪婪。”

> 1960年代末的叛逆艺术在1963年的《QUIBB宣言》中已隐约可见，即预先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社会活动的主张。汉斯·彼特·阿弗尔曼是《QUIBB宣言》的作者，他原以埃德瓦德·金霍茨的抽象拼贴画（比如《干净：为一首沃尔夫·比尔曼所作、关于一个肥胖而友爱的父亲的歌作画》）为榜样，用《QUIBB宣言》影射精神的扭曲和政治上的误解。但后来，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弗尔曼放弃了自己的艺术生涯，以全身心地身投于政治活动。《QUIBB宣言》的内容就是，当下盛行的艺术是统治者的艺术，因此，被统治的大多数对其丝毫不感兴趣。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叛逆的学生和艺术家很快又重新接受了“艺术就是艺术”的主张。潜意识中的感伤，隐秘的浪漫主义和一些新出现的形而上的追求，所有这些都在艺术家们的下意识中涌动。卡尔·鲁尔伯格[8]在回顾时评论说，20世纪60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般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演化为任人宰割的痛苦感。而80年代的艺术，在他看来则满是新表现主义的狂野，新神话派等派别重新开始怀旧，开始向主流文化靠拢。“当大画家杰哈德·里希特[9]1963年带着讽刺的毒刺，和西格玛·波尔克一起创建所谓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时，人们说，君特·格拉斯当初会宁愿多写一本书，而不是投身于政治；当格奥尔格·巴泽利茨像恩斯特·路德维希·克希纳[10]一样——此人曾把他道德冲动的年轻时代说成是‘年轻的白痴’——把他那些令人难忘的、叛逆的、‘色情年代’的画作贬低为‘青春期的泥’时，我们便看明了，告别那些对社会还充满着美丽幻想的年代会带给我们什么。”

不再玫瑰色的电影——解放的剧院

反工业文明的文化革命导致了一连串后果，在电影行业的后果就是，一夜之间，人们不再追求技术的完美。这次改革的公理“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电影”的提出就是要反对“虚假的、一切都顺利的、油嘴滑舌的电影”，“与这样的电影相比，我们更加倾向于粗线条同时也更具有生活气息的作品。我们不想再拍一切都如梦幻般美好的玫瑰色的电影——我们想让它富有更多色彩，有血有肉”。此话来自“新美国电影小组”的《开篇宣言》，它所提倡的审美情趣和行动主义很快传到并影响了德国。人们把电影理解为一种生活的模式，应该“直言不讳”，并且充满了猥亵和血腥，推崇这样的电影，是为了阻止“满汉全席”饕餮式的电影消费。人们开始认同并接受电影不一定非要那么具有艺术性，这当然会导致一大批电影业余爱好者作品的产生，不过人们出于爱面子而隐瞒了这一点。“事情开始起了变化，有了发展，人们可以或快或慢、如其所愿地去做一件事，可以从某一个独到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未经多想，未经论证，来自四面八方的资金一批接一批地投入其中，使人们有能力使用现代技术。随随便便地记录一下某一次愉快的郊游就被认为是电影作品，试试新镜头就是一次电影业的实验。当他们拍摄女友裸体的录像时，他们便认为自己是在为性自由而斗争，偷偷地拍摄两人一起睡觉时的私密行为，他们便认为是在为世界革命做贡献。”盖布里尔·劳勃[11]在1969年奥伯豪森[12]第十五届西德短片电影节上如是说。



电影《爱比死更冷》中的汉娜·史古拉、乌利·罗梅尔和莱纳·法斯宾德，**1969**年

“奥伯豪森派”在1960年代初认为，他们的功课在于，以真实的内容反衬经济奇迹时期电影内容的虚假，拓宽人工的、僵化的、资产阶级式的电影制作方法。而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电影则呈现出一种反美学主义，其是以对构图和叙述的强烈不信任为基础的。

> 新的电影人戒除一切商业元素，他们的作品中有很多美国式的混合元素的注入。安迪·沃霍尔决定了所谓的“布景”。譬如，在1963年的《睡眠》中，镜头中出现的只有一个睡梦中的老人，从同一个角度记录拍摄长达六小时之久。1968年的*Fuck* 的内容则是色情淫秽的困扰。“除了赫尔穆特·考斯塔兹的《特别有价值》（拍摄于1968年），其余的都是些不是电影的电影，如彼得·内斯特勒拍摄于1967年的《鲁尔区》，维尔纳·内克斯拍摄于1968年的《科勒克》，托马斯·施图克拍摄于1968年的《温暖的点》，汉斯·福克斯拍摄于1969年的《电影68》或者阿道夫·温克尔曼拍摄于1968年的《自拍》，这些电影内容过于平淡无味，几乎没有推动任何前进。”电影《宝贝儿的事》（拍摄于1968年，导演为梅·施皮尔斯，演员有乌施·格拉斯、维尔纳·恩科、亨利·冯·吕克）的成功清楚地说明了，对艺术很敏感的观众们对反美学主义本

身的反应是多么冷淡。该电影的创作意图在于，揭露民众的循规蹈矩、顺从和小市民气，电影的创作者们通过讲述一个看似辛辣、实则毫无恶意的故事来达到这个意图。在施瓦本[13]地区的波西米亚人中间有一个人名叫马丁。有一日，马丁目睹了一场抢劫并报了警，尽管他自己也受到了怀疑。他的女朋友芭芭拉则在警署跳了一段脱衣舞，帮助被捕的人逃脱。马丁最终还是被捕，但他射出了子弹，擦伤了警察。“导演认为，用修辞的方式来主导主角看似异常滑稽的表演，最终体现出其原则，看似正常的世界在这原则前原形毕露。”

年轻的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14]充满信心地发展了他的电影主题，引人注目的是其浓重的叙事元素。“我认为，为了表现出我想说的东西，采用一种简单的处理手法是有必要的。”

正如许多他的同行和表演艺术家一样（比如汉娜·许古拉、英格里德·卡芬、皮尔·拉本、库特·拉布），法斯宾德来自“慕尼黑行动剧院派”，该派在1968年年初成了“反传统剧院”。1969年，他制作出了第一部电影《爱比死更冷》。紧随其后的短短三年中，他制作出了十来部叙事电影以及电视电影，所有这些电影的故事主体都是巧合性犯罪和贫苦的城市郊区景致。电影《卡策尔马赫》（*Katzlmacher*）主要描述了生活在联邦德国的外籍务工人员的精神世界，德国小市民对外国人有着法西斯式的排斥和憎恶，这使他们很痛苦。《R.阿莫科先生为什么走了？》则是一部有关“生活压力、社会的无为、社会人的冷漠——以及不同人群中骇人的差距”的电影。（一个技术绘图员因为深刻的挫败感而产生了攻击性，打死了他的妻子、他妻子的朋友和他自己的孩子。第二天，他准时出现在上班地点，把自己吊死在办公室的厕所里。）

人们把法斯宾德称为“幻想的无政府主义者”。他通过骇人的直接和细致观察表述自己的想象和困扰。“很快，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参与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做出快速而即时的反应，也不压制‘激动的情绪’。人们的想象力应该‘无政府主义’地自由发挥，而不应该由某种意识形态证明其合法性，也不该被美学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法斯宾德可以自由地修正意见、推翻之前的论述、承认过去的错误、制订

新的计划，他在心理上没有任何阻碍。这种直率和诚恳的、拒绝一直待在象牙塔里、自己给自己以保证的心态肯定会被社会误解并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感。表现同性恋者的反抗的《自由的丛林法则》，鞭笞反闪米特主义者的《垃圾》和《城市与死亡》，这一切在审慎的考察者看来都有如无稽之谈，但其同时也证明了，法斯宾德冲破了所谓禁忌边界的束缚。”作为自学者，他尽情嘲笑电影艺术的“规则”，在扭曲的激情中，他毫不顾念自己那放浪形骸的生活。与之相呼应，他也随手打破了电影的体裁限制，并且用一种反美学的美学丰富了电影世界。

人们借行动主义之手许给自己以剧院的解放：观众不应该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演员也不应该再为剧院的权力结构所困。有人说，剧院的行程已经僵化，每一场演出都不再是因为真正的动因所激发，同政治敏感的青年人之间的联系也失掉了。在那如同庙宇一般的高高在上的博物馆里，享乐和休闲一族正懒散地漫步在休息室中。

街头剧院，作为以上那种剧院的对立模式，出现了。演出方式和剧目的选择都可以激发观众们的政治热情。演员和观众应该被带入一种相互联系的互动关系中，这种关系会消除舞台所带来的疏离感。

费尔南多·阿拉巴尔[15]特立独行，他的生平更为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非主流的面纱。这位古怪而优秀的“揭露戏剧家”很受人们追捧。（他于1967年拍摄了《亚述人的建筑和皇帝》，1969年拍摄了《乐趣之园》和《而她给花朵们戴上了手铐》。）受到安东尼·阿道斯提出的概念“表现野蛮与恐怖的剧院”的启发，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尝试着以夸张手法表现肉欲、施虐和痛苦，以悲剧的手法使人们的心灵达到净化（这是“灵魂的一剂针药”），批评家格奥尔格·亨瑟尔对此评论道：“阿拉巴尔将他下意识中的恐怖成分具体塑造成为幽灵列车上的演出形象；仿佛观众坐着迷茫的列车，在黑暗中被追逐，在转角处，一道突然亮起的闪电照亮了咆哮的怪兽，这种感觉甚是骇人。”

1951年，朱利安·贝克和朱迪斯·玛里娜在纽约建立了“直播剧场”。后来，他们迫于来自美国本土的压力，于1964年迁往柏林。在柏林艺术学院，人们穿着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统一的服饰，上演了《肯尼斯·布朗号的禁闭室》：人们被凌辱、剥夺了尊严——他们受到了惩罚：不

许相互说话，走动只能采用小跑步的方式，不许坐下，没有得到许可不许碰触自己的身体，接到命令后要站在一根酷刑鞭旁边，不许越过画在地板上的白线——他们紧张的心灵和拷问在两个小时的演出中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出戏剧在许多西欧城市里巡演，可算得人们在舞台上所能看到的最残酷的东西了。”很长时间以来，漂泊的剧组人员——那时是32个——一直在国内国外找寻着安身之处，1967年年初，他们总算在克莱菲尔德找到了暂时落脚之处。

连工人阶层也那么受市民剧场的“收买”，在总是以反对党的身份出现的左翼看来，举行在雷克林豪森[16]的鲁尔电影节[17]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演出进行时，工人阶层和资产阶级市民一样坐在城市剧场中，看上去并没有多大差别。到处都盛行着文化消费，到处都一样。女人们穿着银光闪闪的扎眼的礼服，男人们穿着黑色西装，所有人都故作严肃。

“裸体”是为了从精神上褫夺做作的肯定性文化的地盘，裸露成为进步戏剧工作中导演的首选。“在剧院里裸体——这是合乎伦理的还是伤风败俗的呢？”这是波兰籍剧院实验派耶尔泽·格罗妥维斯基提出的问题，此人极具理论性的剧目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褫夺，意味着放弃一切可能为我们做自我辩护的理由，放弃一切粉饰我们的遮羞之物，勇敢地做自我批评。赤裸的身体象征着追求绝对坦率的艺术，它是在向大家宣告自己的努力，要放下一切人为造作之物，感受信任，变得纯净：我就是我这样的人。当然，格罗妥维斯基自己也害怕——后来，如洪水般泛滥的裸体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和舞台上也证实了他的担忧——这种追求最后会变成针眼般狭隘，仅容得下资产阶级颓废派那么点儿目标。“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为某个目标而奋斗的人，最终却突然发现，这些东西根本就是残缺而丑陋的。”

在高涨的抗议活动中，行动派剧场、反传统剧场、示威、静坐示威、占领等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高校里的教与学，电视节目上一股脑出现的嘉宾论坛，论坛上乱哄哄的好戏，这一切都越来越接近革命艺术，构思上也颇具煽动艺术。朱迪斯·玛里娜（她是埃尔文·皮斯卡托在

纽约工作室的学生）就1968年发生在巴黎的五月风暴谈道："我想，皮斯卡托提出的'政治性剧场'的构想，随着五月风暴时学生们占领巴黎德·奥迪翁剧院被画上了句号。"



柏林的剧院上演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戏剧《夏天之客》，导演彼特·施泰因，**1974**年

1971年，《今日剧场》的七月刊以"街头剧场"为重点，那一期的头条写着《1971的实验结束了吗？》。在一份关于第四次"实验"的报告中——实验内容是法兰克福的一家进步剧场论坛——恩斯特·温特说："前来观看者带着对艺术的渴望，期望看到一场戏剧的预言，期望发现新的作家和表现手法，他们后来一定会大呼上当。"除了弗朗茨·科萨福、科约兹和康拉德·巴耶尔，其他戏剧家只是来走走过场，与戏剧本身毫无关系，还有一些人对剧场的发展毫无信心，更有一些人打算永远离开剧场，将戏剧工作仅仅看作实用的社会工作。甚至连为剧场开发一批新的"无产阶级"观众，借此脱离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观众的影响的尝试也

失败了。

然而，那个时代舞台上最重要的变革却并没有无功而返，只是它不在于开发了新的观众群，而在于人们开始考虑剧场的流动性——正是借助了这一次变革，“市民的剧场”才得以度过了危机。库特·许伯纳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其中有扎代克、明克斯、汉斯·彼得、多尔、伯克哈德·毛尔）把1962～1973年的不来梅推上了“划时代的剧场”榜首。

> 在那些年头，不来梅几乎是唯一一处没有大动干戈搞实验的舞台，它只是满怀着对未来的好奇一头扎进工作。这就是说，在不来梅，人们不会把摸不清来路的东西弄进彩排室“实验”，而是冒着更大的风险一头钻进最主要的工作，个人的发展方向也由此确定。彼得·扎代克[18]是这样，威尔弗里德·明克斯是这样——他从一个小小的舞台布景人员成长为一流的导演——彼得·施泰因[19]也是这样，汉斯·霍尔曼、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克劳斯·米夏埃尔·格吕伯都是这样。

冒险多一点民主

“冒险多一点民主！”有着卡里斯玛式人格魅力的维利·勃兰特以这句箴言将许多挑剔的左派人士紧紧绑在自己身边。在《回忆与联想》一书中的“良心的机会”一章里，霍尔斯特-艾伯哈德·里希特（Horst-Eberhard Richter）[20]说，维利·勃兰特是一个可以承担过去并影响未来的人。

在1969年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第六次选举上，尽管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仍然是德国势力最强大的党派，社会民主党却在这次选举中越过了40%这道大坎。瓦尔特·希尔接替了在选举中失败的德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埃里希·门德，领导德国社会由国家自由主义向左派自由主义的转型。在希尔的帮助下，维利·勃兰特于该年10月21日以超过必要票数249票两票的251票当选为德国总理。39年以来，终于有一位社会民主派人士站在了德国政界顶端。早在几个月之前的5月5日，德国联邦大会就选出了司法部部长古斯塔夫·海纳曼作为时任德国联邦共和国总

统的海因里希·吕布克的接班人——海纳曼是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由此为日后的权力更迭做下了铺垫。

维利·勃兰特于10月28日发表了就职演说，在演说中，他预告了一个“内政改革”的计划，该计划的关键词是“持续和更新”“更多民主”“变革的能力”。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的范围内，联邦德国的安全在于维护德国国家的统一和自我决定的权利，而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却并未被纳入人们的考虑范畴之内：尽管德国的国土上存在着两个德国，它们彼此并不是外国。在经济政策方面，要努力做到“稳定发展，不让萧条来临”，也就是要在经济政策上保持一致。在教育和科学政策面前，内政有优先权；对选举人的年龄限制应该去除，婚姻法、刑法、税务法的改革，以及政府、联邦国防军和社会政策的改革也应该继续。“我们并不是已经发展到了民主的尽头，我们的改革才开始。”

沃尔夫冈·耶格[21]认为，新的联邦德国总理的就职演说是崭新开始的宣言，宣告着德国将要向新的目标以及“新的疆界”进发。这样的崭新开始，勃兰特的崇拜者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代初也为美国绘制了自身的蓝图。“这是联邦德国有史以来要求最高，斗志最昂扬的就职演说……勃兰特把他在半年前载于《新社会》五月刊上的颇受争议的论文《选择》的内容搬到了他的政府计划书当中：‘对于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来说，民主是国家的组织形式。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民主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应该影响并被贯彻到所有人的社会存在中。’”

> 勃兰特当选为总理标志着人们的意识已经产生了深刻的转变。这不仅仅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坛的扶摇直上。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一个私生子，这位左派社会党党员，哪怕通过流亡也要与纳粹政府做坚强的斗争，承受了多年的诽谤，他提出的共和国公民意识对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终于获得了认可。早在1965年，君特·格拉斯就

道出："要是1933年的19～26岁的年轻人有着维利·勃兰特般的政治敏锐度和道德责任感，我们将会免去多大一场灾难啊！"

勃兰特的政治热情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来自在他之前的伟人、他个人的远见以及充满希望的"白日梦"，当然也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和他对权力的直觉，这一切日后都使得他的内政和外交获得了成功，这些成功也得到了应有的承认。如果没有维利·勃兰特，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至多不过是一个街头组织。1972年，莱纳·巴泽尔领导下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该提案失败后，勃兰特在第七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一举夺魁。社会民主党首次成为势力最大的政党。艺术家、出版界人士、作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于党派政治，在他们看来，维利·勃兰特就是政治更新的象征，他身上融合了权力与精神、实用主义与道德、启蒙与进步。勃兰特和时任德国外长的瓦尔特·希尔共同实行了向东德开放的外政，这项政策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1970年12月，勃兰特于访问波兰期间在华沙集中营纪念碑前下跪："他用这标志性的一举把花环的两端终于连接在了一起，尽管之前它们还那么硬挺挺的。在那湿漉漉的花岗岩石上，他向后退了一步。这位国家领导人屈膝下跪的姿势定格成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造型，那一刻时间凝固。他膝盖着地，却并不是倒下，双手叠放，头下垂。"（此话出自《明镜》周刊上赫尔曼·施莱伯的原文。）勃兰特这一跪有着十分重大、具有影响力的意义。那时，到处都在嘲讽着德国对于新的世界规则的意识，保守的圈子尤其是大企业主以及受他们控制的党派在对待东欧各国的问题上，总是提出各种修正主义的权利要求。当此时，勃兰特以他的一跪清楚地向世人说明了，德国承受着巨大的道德负罪感，要悼念法西斯遇难者，并请求原谅。

第二次当选总理后，勃兰特的性格弱点也显示出来了，而这些弱点又被疾患和他性格中的矛盾所加重，由此表现得更加明显——1971年，

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之时，德国内政旧病复发，尤其是计划中的改革不能得到经济支持。尽管人们就如何改革展开了很多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却从未有过完整的结果。“党派政治的极化和意识形态化多数情况下‘只在’政治雄辩中出现。在这些辩论中，文化的斗争日益白热化，很多斗争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关于‘另一种共和国’的问题。总的来说，那个时代的德国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联盟，这个联盟尚处在探索与试验的阶段，这些探索与试验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很难评估。不过，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划时代的阶段，正如同那个阶段的许多改革一样，带来了真实效应。”

勃兰特和赫伯特·维纳两人处不好关系。维纳是一个有着战略性远见和冷静头脑的谋士，一个尖刻的批评家。不仅如此，他还“乐于沉思、冥想，思考失败、自我冲突，思考生命的易逝和自身肉体的消亡。他饮酒。并且，作为一个60岁的人，他和女人之间仍然保有‘感伤而爱慕’的关系”。阿努尔夫·巴宁认为，勃兰特是一个一直在寻找最终家园的政治家——“其实，不管到哪里，他总感觉自己是客人，一直、一直在漂泊。”说得更加深刻一点，人们其实不会在任何地方停留，终其一生都只是一个局外人，无论到哪里都是天涯过客。勃兰特时代的终结在1974年5月突如其来：随着纪尧姆事件的曝光（勃兰特的私人顾问被发现是一名民主德国的间谍，并被逮捕），勃兰特宣布辞职。赫尔穆特·施密特接任总理职务。瓦尔特·希尔接任古斯塔夫·海纳曼成为第四任联邦德国总统。

> 古斯塔夫·海纳曼永远不能掩饰他自己对联邦德国第一阶段的历史是持相当保守态度的。是他，“起草了唯一一份值得一提的反对康拉德·阿登纳政策的意见书”。海纳曼的接任者希尔则与他正相反，担任“联邦共和国先生”的生活轨迹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成功史”。尽管希尔是勃兰特之外又一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同盟的顶梁柱，但他所遵循的却是在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结盟的历史案例上做一些调整和加工的路径，就像是他的盟友弗拉赫和迈霍夫所做的那样，这条路径比较保守。希尔把重点放在德国政策的与时俱进和继续发展之上，而不是像阿登纳那样来一个“从零开始”，他这么做并没有减少阿登纳时代所取

得的成绩，这些成绩当中也有德国自由民主党贡献的一分力量。

---

[1] 穿西装打领带在那个年代是生活较为富裕的资产阶级的装扮。

[2]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1936年3月23日出生于德国，1979～2001年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哲学教授。

[3] 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年），著名的德国行为艺术家，其作品包括各种雕塑、行为艺术，信奉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观点，代表作如《如何向死兔子讲解图画》《油脂椅》等。

[4] 鲁道夫·施代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年），奥地利社会哲学家，人类学创始人。作品有《真理与学问》等。

[5] LIDL艺术是活跃在1968～1969年的德国行为艺术项目。目标是追问表现和可被表现的，语言的图像性和图像的语言性之间的关系，它是一次为战后德国的守旧氛围带来新鲜空气的尝试。

[6] 埃米尔·舒马赫（Emil Schumachers，1912～1999年），德国画家，战后德国重要具有代表性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

[7] 格奥尔格·巴泽利茨（Georg Baselitz），德国画家，曾就读于东德，后迁居西德。北美人认为他是个新表现主义者，而欧洲评论界一般认为他是现代主义者。1960年代警察曾查禁他的一幅画《桶中之夜》，因为该作品有着露骨的性爱内容，促使他更快进入了艺术家的行列。巴泽利茨是身价最高的在世画家之一，现在担任柏林艺术学院的教授。

[8] 卡尔·鲁尔伯格（Karl Ruhrberg），德国现代艺术批评家，1960年代活跃于德国艺术舞台。

[9] 杰哈德·里希特（Gehart Richter），1932年生，德国视觉艺术家。

[10] 恩斯特·路德维希·克希纳（Ernst Luduwig Kirchner），德国表现主义国家，“桥”画派的创始人。

[11] 盖布里尔·劳勃（Gabriel Laub，1928～1998年），波兰裔记者、批评家。

[12] 奥伯豪森（Oberhausen）位于德国鲁尔工业区西部，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州直辖市，隶属于杜塞尔多夫行政区。它还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自行车骑行城市成员中之一。

[13] 施瓦本。既是民族，部分来自日耳曼；也是地理区，位于德国西南部历史地区，包括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南部和巴伐利亚州西南部，以及瑞士东部和阿尔萨斯。

[14] 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1945～1982年），德国导演、演员和话剧作者，新德国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巴特-弗里斯霍芬（Bad Wörishofen）。法斯宾德是一个双性恋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共拍摄了41部电影，主要作品包括《四季商人》等。他死于毒品过量服用，他的死被一致认作为是新德国电影的结束。

[15] 费尔南多·阿拉巴尔（Fernando Arrabal），生于1932年8月，是西班牙剧作家、编剧、电影导演、小说家和诗人。

[16] 雷克林豪森（Recklinghausen）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北部的城市，位于鲁尔区的北部。

[17] 它是欧洲最具有历史的电影节之一，始于战后初期。

[18] 彼得·扎代克（Peter Zadek，1926～2009年），德国导演、剧场经理翻译、剧作家，被誉为德语剧院中最好的导演之一。

[19] 彼得·施泰因（Peter Stein），1937年生于波恩，德国剧场、歌剧和电影导演。

[20] 霍尔斯特-艾伯哈德·里希特，1923年生于柏林，是德国的心理分析家、社会哲学家，在德国的和平运动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21] 沃尔夫冈·耶格（Wolfgang Jäger），1940年生于德国，德国政治学家，1995～2008年任位于弗莱堡的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的校长。

第14章 东德的配合与阻力

教育独裁下的生活

作家莱纳·昆策，1933年8月出生于一个矿工之家，16岁那年加入德国统一党。他在大学学习音乐和艺术史，博士毕业之前被人指控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后，他退还了党员证——他的妻子也是捷克人——“与书本隔绝，与报刊隔绝，与外界隔绝，紧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尽管如此，他还是未曾放弃对“拥有人性化面孔的社会主义”的希望。1976年，他出版了《神奇的年华》一书——此书以简短的方式驳斥了自由德国青少年[1]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谎言，如什么受到保护的童年啦，美好的少年时代啦之类，驳斥了有关当局目空一切的自吹自擂——并因为此书被开除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却获得了联邦德国作家协会成员的资格。在诗集《敏感的路》中，莱纳·昆策用四行诗的形式精辟地描述了民主德国教育专政的嘴脸，如：“无知/于是你们就会一直无知下去/我们会这样/来教你们”。

教育本该是以启蒙和授人以方向为诉求，在东德却走到了反面：教育成了愚民的策略。国家组织了一支由教师、识时务者和广告家组成的队伍，组建起教育的专政，被这样教育出来的人除了服从国家意志，既没有多少可抵制的，也没有多少可做之事。外在的压迫是和内在的潜移默化相结合的。在东德国家安全部[2]的协助下，“臣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而统治者自己也充满了恐惧（在这里，我指的是每个工作人员在侦察别人的同时也在被自己的同事暗中侦察）。

一面宣传，一面压迫，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们才会五体投地地高唱赞歌。各种使人印象深刻的叙述赞美着社会主义的独特和高尚：人们总是斗志昂扬，胸怀爱国主义的义务，为了实现伟大理想，同假想出来的家

乡和祖国的敌人做坚决斗争。经济建设与工作中的英雄人物，教育和文化都在证实着他们为全民族做出的巨大功勋。个人主义、自我意识和批评能力在对出席公共场合时的领导人类似于宗教般的景仰和集体赞歌中消亡。组织布下了一张张严密的网，每一个个体都深陷其中。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当时的人数最多的党派，其次德国工会联盟也占有相当的分量，还有为青年一代而设置的自由德国青少年。除此之外，还有德国民主妇女联盟、德苏友好协会、运动和技术协会、德国运动联合会、文化联合会，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组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加入这些组织的好处当然在于获得一种官方的、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的认证，还可以避免被提出一些干系更大的要求。尽管国家成功地做到了让理想主义为意识形态服务，但很多人对于乱哄哄的党派政治还是保有相当的距离的。尽管人们似乎在表面上跟着起起哄，却一直在努力，一有空子就尽快地消失到个人的小天地里去。官方的宣传早已嗅到其中阶级敌人的味道，连舞厅的地板上都有敌人在窥伺着，看着那些不良青少年在那儿随着布吉·伍吉[3]跳舞，而人们“竟然还对这样的群魔乱舞报以掌声”。

对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极权的国家来说，为了维护稳定，必须得到青少年的认可。在民主德国的教育专政体制下，“国家的监工”理解下的教育是一种规章、一种条例、一种细则，就这样他们还想要自己受人喜欢。民主德国将作为辅助的道德体制纳为教育目标，这种道德体制要求人们在严苛的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完成任务时牢记纪律性，以及为了更高的目标（比如说国家、民族、家乡）应该忘我地努力和付出，它从几十年前起就在影响着德国人的集体精神气质了。对极权体制的迷信被包装了起来，包装纸就是新的社会主义人民传来的捷报：他们迈着胜利的步伐奔向未来。每一个生长在民主德国的青少年都应该接受到这样的教育：要随时准备着巨大的付出，要有坚定不移的阶级意识，要为共产主义而战斗——这些话是埃里希·霍内克1981年在柏林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上写下的。

> 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统一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大学，甚至后面的再教育也从未间断。教育是民主德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所有公民都有同等的获得教育的权利，十年制义务教育，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接受更高级的教育，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接受职业培训——这些原则是包含了很多进步因素的，比如在高中十年级时，所有学生都会接受多种职业技术的培训。但是，试图通过学校和青少年组织的交互影响来把孩子和青少年“绑定”在一种“全日制教育流程”中的行为，却并不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而是作为无间歇的意识形态渗透被滥用了（至少，青少年可以在青少年组织里暂时逃离教育管制，因为多数的妈妈需要去工作，所以超过80%的中小学生都会被送去1～4所课余青少年托管所）。和“市民-帝国主义”青少年政策不一样的是，民主德国的孩子和青少年不像前者那样，是社会化操控和剥削的对象，而是被纳入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体系中去。反面是很明显的：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教育体制下，青少年是政治操纵的对象，被嵌入一个没有任何漏网之鱼的秩序化结构中（从早上6点的到校开始直到晚间6点的课外活动）。民主德国的教育目标是：限制个人人格的发展，不允许孩子们有个人的意志。当时柏林的一位幼儿园女教师的扼腕长叹可说是一个很好的注解：“永远同意，永远说是，这使我安心。”

但是孩子们终究会长大，成长教会了他们各种各样的“免疫”策略，在几十年的漫长过程中，防止了国家权力在这样的青少年政策中取得彻头彻尾的成功。非黑即白的思想教育对“教育的牺牲品”所造成的伤害并不是太大。随着柏林墙的修建，之前已经被明显察觉到了的公开反抗爆发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逃往西德（仅仅在1960年的1～9月，就有43648名年龄在15～25岁的年轻人离开了民主德国）。音乐使反抗变得更为激烈。“1965年10月发生在莱比锡市中心的‘摇滚示威游行’只不过是冲突的一种激烈的表示，而这种冲突早从九年前就开始在民主德国各地纷纷爆发，直到1965年夏天，终于成为青少年冲突的导火索。最开始时只不过是一些英美的摇滚乐团，比如披头士、滚石，在民主德国青少年中间如同在资本主义世界那样大为流行。人们通过西方的电台收听他们的音乐，用磁带录下，并在自己的乐器上学着演奏。”收听这样的音乐、“不修边幅的”长发、“散漫的”行为作风，尤其是某些共同的俚语把东德的青少年和西德的同龄人联结在了一起，增强了他们对国家权力的

恐惧——无论是反法西斯那一代，还是其后的一代，都对青年人的需求及其文化表达方式感到陌生和不理解。尤其是民主德国青年人所使用的俚语——比如“禽兽啊！”“真爽”——在国家权力机构的监控者看来，都是很可疑的，因为这些语言中的自发性和想象力是那么明显，它们那么具有创造性，根本就不吃死板的功能性德语的那一套。这些监控者断定，十来岁和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所使用的语言表达了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一切向钱看的心态。但是，这些语言已然发展得如此蔚为可观，以至于已经无法再轻轻松松地就禁止它们的使用了——至少，它们也是一种突出的文学修饰。1973年，《少年W之新烦恼》问世，这是一则关于一个个人主义的局外人的生存和死亡的故事，本书是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1934年生于柏林）写作的——这本书后来被搬上了舞台，走进了电影院，改编成电视剧，获得了巨大成功。

> 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的故事的主人公埃德加·维伯奥被作为民主德国青少年的集体肖像来解读，因为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是一个17岁的国内年轻人在讲话，也有着和其他年轻人同样的基本问题”。有谁想象得出没有牛仔裤的生活吗？牛仔裤是世界上最高贵的裤子。因为有了牛仔裤，我再也不穿那些人造材料制成的破布片了，它们看上去总像是在跟谁怄气似的。为了牛仔裤，我完全可以放弃一切，当然最好的东西可能除外。音乐也除外。这里我说的可不是什么门德尔松选段之类的，而是真正的音乐，人群。我并不是反对门德尔松，但是这样的音乐不能从深处打动我。我说的当然是真正的牛仔裤。有了它，我什么裤子也不要。比方说，真正的牛仔裤前裆是没有拉链的。根本就只有一种牛仔裤才可被称为真正的牛仔裤。

“驻扎”是教育专制的图谱，它决定了整体的居住环境。城市的衰落，尤其是房屋与住宅，本是“市民阶层的”起源之处，如今也日益式微，这不仅与修葺所需的建筑材料和资金匮乏有关，而且同有组织的住宅区相比，新城区的“驻扎”方式（每一层楼分成许多小套间）也使得一种政治监视从本质上更容易进行。在对东西两德的住宅修建成果进行比较时，人们得出的结论是，1949～1970年，民主德国每年人均住房建造率只有联邦德国人均住房建造率的16.5%，最多也只达到了57.7%。不仅

如此，民主德国新建造的住宅也明显小很多——只有联邦德国人均拥有住房面积的1/3。

教育专制的规则和计划经济——两者的关系是相互的（都有着束缚作为集体动物存在的人们的教条的烙印）——不放过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作用当然也有好有坏。

妇女广泛地参与工作在当时是经济上的必须之举。她们从家庭的束缚中脱出，但此举同时也为国家把权力之手伸向孩子敞开了大门，孩子们被国家接管，受到的是国家的教育。与此同时，参加工作也推进了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们越来越多地获得了独立和自主。但是，家庭保护和抵御政治要求的功能依然未能被摧毁。不过，汉斯-约阿希姆·马兹认为，民主德国的家庭教育模式基本还是家长专制式的，因为多数家长本身就是压制性教育的牺牲品，被迫在一个只有适应和服从才能求得一碗饭的社会中生存。“多数情况下，孩子们被非常严苛地‘按’进家长的意愿和社会压迫的节奏的模子之中：从休息时间、睡觉时间和吃饭时间直到一个职业妇女所必须遵守的社会作息时间通通有规定，这也属于家庭与社会压迫交互作用的范畴。”

由于所获得的物质鼓励很低，人们一心为工作的观念以及在工作上取得进展的兴趣也较低。他们工作的动能仅限于为自己赢取稍微像点样的生活——自己的小居室、沿着墙排成一排的柜子、一台洗衣机、一台电视机、一辆特拉比[4]，等等。在长时间的配给制下，食品配给总算得以保证，尽管多少有些片面。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受到亲戚和熟人从西德寄来的一些包裹，尤其是在困难时期。

吃喝在民主德国是难得的业余享乐，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德国的胖子一点也不亚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胖子。“以口舌之欢来稳固情绪”的做法在民主德国公民中非常流行：狂饮、吸烟、暴食都是安慰精神的好办法。进食方式当然是非常不健康的：过多的脂肪和甜食，而新鲜蔬菜和水果则极度缺乏。健康食品简直是闻所未闻，素食不仅走到哪儿

都会受到嘲笑，而且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民主德国的统计年鉴，1987年，平均每名公民每年消耗18.6千克黄油，54千克白糖，99.4千克肉食以及肉制品。由于营养过剩，35%的男子和45%的女子明显超重。由于不健康饮食所导致的病症，按照保守估计也要对一半以上的因病死亡负责。几乎有65万名专业人员嗜酒，大约15%的民众滥饮，由此可以估算出，总共约有250万民主德国公民是酒精瘾君子。

职业道德的缺乏导致了“长期的闲逛式罢工”。《工作法》的序言里写着“不再有被剥削的、不自由的工作的重压，为自己和社会自由工作”，此话被人们逐字逐句地采纳了。正如伊莱纳·伯默在其尖刻的分析《彼处》（写于1982年）中所记述的那样：只要老板、厨子或者酒保不乐意，餐馆就可以一直关门，或者客人想要进来也会被敷衍阻止——“请您等一会儿，我们会给您安排位置的”——尽管餐馆明明是空的。“酒保的例子很典型。整个民主德国都是这样。蔬菜店门口挂着牌子：‘外出采购，停止营业’——实际上售货员却在路上溜达，让那双萨拉曼达的靴子穿起来更合脚。超市收银台前的队伍排得越来越长，而售货员却在和她的女友闲聊某一首她最爱的歌。明明在工作时间，房产管理所所有办公室都关着门，门后传来一阵阵大笑——那是某一位工作人员庆祝生日的笑声。‘个人不管用’的办法到处都管用。某一位顾客的抱怨几乎不能引起任何批判性的后果。人们会对这位怒气冲冲的公民保证，他的批评已经被放入集体中进行评估。”



东德活跃分子运动的创办者阿道夫·亨内克（**1905**～**1975**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东德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厄尔尼茨的石煤矿山作坊

明明缺少职业道德，却要用大量的宣传投入来掩饰：教育专政对遵守规范，尤其是当个人和集体取得成果时，不吝赞美之词，否则就会采用非难、警告和核准的方式来工作。除此以外，各种“计划”——比如1950年代末的第一个“重工业五年计划”和“化学工业落成计划”（“化学给人面包、富裕和美丽”）——还会吹捧各种其实并没有达到的成果。手工业及其服务是例外，直到民主德国末期，超过半数的手工业及其相关服务由私人掌控，1981年时的统计数据是59%。

充满狂想的“工业宣传”——尽管民主德国的生产力一直比其他东欧国家高——使得在西德的人们错误地估计了局面，结果当两德统一以后，人们在面对东德经济的悲惨境遇时不禁大吃一惊。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乐观精神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民主德国内部，在真正的工人和政治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之间已经存在着一条怪异的鸿沟。这在民主德国建立初期就很清楚：某一个列宁式的干部政党的强制性代表需求的提案遭到了反对。企业集体合同的实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会在实行计划中起到的功能性作用，Wismut公司的员工们在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为苏联的核经济工作，1953年6月17日柏林工人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起义余波，甚至包括1956年短期的去斯大林主义和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通过这些事件，工人们各种公开以及未公开的反抗形式呼之欲出。埃里希·霍内克1971年提出了不容反驳的政治纲领，纲领中强调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性，尽管保证了社会安定，但从长远看来，它却彻底毁掉了本已落后的民主德国工业，恶化了人们的职业道德，并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更加失去了可信度。

> 本身并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当时的存在状况，在1989年两德和平统一之后方才重见天日。1990年，以压倒性多数投票给要以联邦德国为“榜样”的正是工人政党，投票之时，他们憧憬着更好更美丽的生活。也有一部分人民运动，还在做着关于革新民主德国以及关于有着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美梦，面对着真正的人民的意见时只能自我欺骗。比如，23岁的国营铁路员工米尔科就这么说：“当我听到关于剧院顾问、诗人、画家这类职业时，我就明白：我可以从事这些工作，我也想干这些工作。这些工作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有着人性化的面孔。还有十年就可以完成。告诉你，我都不必在那里。”

关于农业经济集体化的规定也一直受到质疑，尽管其体制一直运行良好：食物配给令人满意，农村人口有相当的社会保障。一部分的中间阶级生活富裕。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医生、技术师、工程师）对生活极其满意，更不用提广泛的政治决策阶层以及他们背后大大小小的圈子，这一切都致使数十年来，危机一直在潜伏着。

从理论上来讲，民主德国的人们当然也是有休息时间的，因为这样的休息时间可以被广泛用来鼓励自主努力。社会和各种组织结成了一张紧密的网，保证了对人民群众的全面掌控。人们有义务参加社会活动，以保证他们不受私人喜好的引诱。由官方规定的一些仪式（比如青年礼）营造出一种伪理想主义的氛围，实则是尽可能地全面搜罗“服务人员”。

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友谊与社交”，意识形态化的官方语言会这么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和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剥削的同事不一样，他们在社会主义保障和规定的工作时间的基础上还有着多余的精力留给休息时间。他们会说，社会主义的休息时间将会依法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多，所以不仅能提供放松和娱乐，还能通过许多文化和科学联系促进个人发展。

> 1963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会议上，瓦尔特·乌尔里希提出了专政教育中的休息时间计划纲要。与之前相比，上班族将更多地影响他们的住宅、城市、村庄、企业、俱乐部以及文化宫的美化。文化宫里丰富多彩的生活不断，在那里，人们有机会在小圈子、图书馆和工作小组中获取全方位的知识，从深度和广度上丰富自己。从事写作的工人可以在企业以及小团体办的报纸的编辑部、小组、俱乐部和文化宫、业余小型歌舞场和剧院找到很好的工作机会以及听/观众群。在合唱团里，人们排演新歌曲的意愿和能力在增长，青年人表现出了跳舞的热情。剧院乐团、舞蹈队、合唱团以及年轻有才的工作人员都满怀热情，创造新作品、保护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在多变的文化节目中寻找并找到自己的路。电影和摄影团队应该参与全方位的美好生活的构建，并在其表演和展览中向广大公众敞开大门。
>
> 爱好文学的人可以在图书馆结社，爱好历史的人可以在博物馆结社。

崭新人类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失败了，出于失望，混日子和机会主义的心态占据了上风。“混日子的人都有着痛苦而颓丧的心灵，只有在听从于当权者（父母、教师、牧师）的意志时才能找到相对的平静和轻松。尽管他们的意愿受到了伤害，他们的骄傲受到了损毁，但是，他们

却以放弃自身的价值获得了回报。那就是他们现在终于可以不被打扰，有时甚至能心甘情愿地做做工作，获得平静了。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没有反对意见！现在他们只是在进行他们的义务！其他的一切本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就凭我一个人也改变不了什么。这些人从来不出头，永远退居后台，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一定会给出简短的、千篇一律的、事先设置好的回答：‘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某种程度上，他们在已被定下条条框框的小市民生活中消磨日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可以种种花草、培养爱好。从这里面甚至可以生发出某种雄心壮志，他们对现在的富足生活感到很骄傲，考虑的也是如何使生活富足。‘邻居对此可会怎么想哪！’的思虑是井底之蛙文化和小市民‘田园生活’的推动力。莎拉·克尔施[5]把民主德国的落后文化及其落伍之见描写得十分有趣：‘在红色绣球花，弯曲的树/以及红房子前有一位老女人/她给我端来了茶，庄重地/端回了盘子，回到她倾听和观察的岗位/在她那绣满了乱七八糟廉价花纹的窗帘后’。”

人们纷纷逃向田园，这严重地削弱了社会政策的反对力量，以至于当人们已经看到西德的“能量”带来的剧变时，都抱着一种相当无助而且听天由命的态度。尤其是这一切无动于衷地算计着利用东德的版图，毫不顾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那本应该是人们可以从中获取很多利益的投资。一旦和45年的东德专政教育的后果正面相遇，西方世界对于本就极困难的心理转换很重要的移情作用消失了。此外，东德的精神气质也受西方的电视节目传播而来的西德图景的影响，充满了幻想。失望情绪（思想里的柏林墙）在两德统一之后很快就转向了东德人自己。1990年，尚有77%的东德人对市场经济保有信心，两年之后就降到了大约50%，之后又降到了大约只有1/3。1990年，绝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接受西德的机构体质，五年以后，从德国联邦议院和政党开始到职业与中小学教育机构，再到卫生系统，大家都对此持怀疑态度。看似吊诡的是，尽管如此，近几年以来，对社会主义理念的认可度在上升。对共产主义的好感在1990～1995年从7%增至27%，今天多数人都接受社会主义

作为一种理想的存在，而在1990年年初，只有少部分人持此观点。

专政教育倒塌之后，克里斯塔·沃尔夫提出了“为了我们的国家”的号召，希望以此拯救社会主义理想，在那时，大多数人对这个理想已经不抱希望了。1990年5月的大选显示，人们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西德，自然，对于即将到来的变革也并没有多少准备。“再也不低贱了”，在其转型的日记《被变卖的铺路砖》中，托马斯·罗森洛谢尔用这种萨克森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两德统一带来的希望的憧憬。今天，人们不禁要问，那时为这一切付出的代价是否最终能得到补偿。“那时也可以有别的方式的，比如赔款而不是交回。那样的话，就不会是事关重大的90%的东德财产落入西德的手中，使得西德胜者为王的理论被坐实得如此之久。或者，也可以让已经开始自我反省的东德媒体有几年的独立时间，而不是立刻——这真是一个坏说法——‘接管’，那样的话，历史问题就不会仅仅被简化为不切实际的史塔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再一次减轻了德国人的反省工作。当然，这些差异并不是人们当初想要的。一跃而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也成为经济和思想上的一剂猛药。”

非主流的浪潮

在民主德国，教育和艺术的宗旨都是赞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同尤其是从资本主义世界飘来的美国化和颓废化危险做斗争。巨大的监视机制（史塔西）将所有公民都假想为潜在的阶级敌人，在这种监视机制下，文化必须巩固这个由工农组建起来的政权外在的团结性，并用理想来支持“顺民心理”。当然，当时文化的“墙头草”性格也是被接受的：私人的内心活动并未遭到“修理”，这就使得文化尚有可能退回并逃离到单纯的审美领域。

传统市民阶层的精英或被迫缄口不言，或被迫逃亡，在此之后，有着无产阶级和小市民-理想主义传统的文化和审美情趣就得以贯彻，这样的审美情趣，与早些年扭曲变形为国家主义的中产阶级情趣在本质上

并未有太多区别。“民主德国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目的是，使在文学、戏剧和音乐中一直被模仿接受的德国古典主义和市民现实主义在1945年后的再教育和战后一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至于被完全滤除。19世纪末以来，人们一直在效仿魏玛共和国的民族和国家工具化的做法，魏玛共和国成了样板，现在，魏玛古典主义也被东德国家统一社会党当作社会主义的国家文化形式所采纳，希望能发掘出魏玛古典主义的最终本质。

> 民主德国对“意识形态纠葛”的理解并不关乎魏玛古典主义本身，而是关于对它的接受。对魏玛古典主义的接受应该和一种新的通路对照来看，强调其乌托邦式的内涵，同社会主义民主紧密相连。在这一点上，东德倒是可以部分采用阐释的方法，这些方法是由流亡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人们采用官方的、排外的方式看待魏玛古典主义及其在剧院、传统场所和诗朗诵会上的表演的管理，认为这样就可以排除其部分看法，这些看法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精神上的根。换句话说，由战前的市民阶层所产生的“魏玛古典主义”被怀疑有法西斯主义倾向。

非主流的浪潮在民主德国的运气不佳。在一本供八年级至十年级学生学习用的文学教科书上写着，歌德之作《普罗米修斯》的主旨是所有人类都应为社会生活的人道主义构造而尽力。这句话实际上是这一种意思的委婉说法：在民主德国，中小学和青少年政策的教育理念首先是为压迫任何形式的反抗而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革命性的艺术形式（那种个性的、自我的表达，如爵士乐、披头士、摇滚乐）一定会受到嘲讽。尽管人们那么愿意顺从，那么不愿意站在政治的对立面（这当然是很危险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与当局的距离还是越来越大，他们不再像官方青少年政策设想的那样“听话”、那样“守规矩”了。他们带着越来越无所谓的态度打量着官方政策的目标和价值观，以及上辈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稳定是理所当然的。在中小学、教育机构和职业中获得教育从而建构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人们对其机会的均等性的评估并不是那么肯定的，然而，与其相连的管束和说教也受到了批评。”人们越来越在准备着挣脱国家机构所定义的标准守则，这导致了青年一代对国家的忠诚度的下降，尽管在开始阶段缓慢而不引人注意，

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大批的年轻人想要外逃就是一个说明其后果的很好的例子。两德的统一说明，双重身份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存在，而这些年轻人最终在某种程度上竟然可以做到同时注意官方的规范和可被重复的知识结构，同时保持自己真实的日常生活阅历，还不得精神分裂症，他们已经可以相对轻松地绕开“头脑中的栅栏”了。

我们可以把东德对国家青年机构和公共生活机构的距离感同西德的做一个比较，当然，反对声音的空间是很小的。不仅如此，东西德的青少年在两个方面被同样死死地管束着：一方面是消费，另一方面则是“阶级使命”。不仅如此，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下的东德国家保障了物质的供给，而物质生活的充裕却降低了人们在教育、职业以及社会环境等各个领域“奋勇进军现代化”的兴趣和勇气。不随波逐流的心态是进取的机智和富有发明性的前提，但在东德的青少年中，这种心态非常罕见。

尽管如此，到了1970年代，还是有一些非主流的，尤其是年轻的艺术家和作家纷纷组成了许多小而相当混杂的圈子，编辑各种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既可以在西德的艺术和报刊市场上，又可以在“东德受到主导的文化中唯有特权者才能占有的仓位”中获得成功。爆发“群众运动”时，参与者并不认为这一定会是一场政治运动，如果是，那就是某些非政治的、艺术的东西阻碍了国家规定的文化。审查机构的行为方式是颇具有歧义的：一方面，人们也感觉到那些出版发行量较少的报纸杂志尽管偏离了党的中心路线，但另一方面，其在本质上却与主导文化的那一套没什么不同。因为这两边——一边是非主流的、自己工作的自学者，另一边是受过专业训练，与国家主流文化紧密相关的艺术家——“所有人上的中小学都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并且从幼儿园到博士毕业都一直被同样的意识形态洗脑。这样不情不愿地走上了当局规定的道路之后的人也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有一种模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认识，要么彻头彻底地不问政治。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

如果真的有，也和这些非主流的报刊出版毫无干系。”

> 直至1989年，一共有30多本文学、10本政治杂志以及上百本自涂自画的艺术家的小册子问世。其实1980/1981年的《学术诗选》的禁令对这些自己出版的报纸杂志以及“艺术家的小册子”的发展是一支推动剂。1980/1981年，弗朗茨·福尔曼——他是报刊《精神与形式》的编辑之一，也是艺术学会的成员——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一些总是向他求助的年轻作家身上。经过了为诗人乌维·科尔贝[6]和弗朗克-沃尔夫·马提亚斯[7]奔走呼号之后，福尔曼俨然已成为那些在东德不得出版其作品的作家的避难所。当他确定这样的状况不再是偶然发生而已成为惯例之后，随即委托乌维·科尔贝和萨沙·安德森编撰一本诗文的合集。他原本的想法是，这应该是一本供艺术学会作为内部学习资料的诗选。这本合集包括彼得·布拉施、沃尔夫冈·希尔比西、卡佳·朗格、伯特·帕彭福斯-果雷克、洛塔尔·托勒以及其他人的诗文。该书的底稿于1981年秋天被上交给康拉德·沃尔夫，此人是东德艺术学会的主席。（克劳斯·米夏埃尔）

>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对诗集的出版不予准批。史塔西也以非正式的方式安插了人手监视这些叛逆的作家们。为了抑制文学上的不服从继续发展，首先被下达的指示是，与民主德国国内每一个市区内的文学中心合作，加强与后辈作家的联系，使其“去政治化”。一部关于保护作家职业生涯的法律出台了。尽管如此，对私人朗诵会或展览直接采取干预措施还是相当有保留。1984年年初，来自民主德国各地的30多位年轻作家聚集在东柏林的一家后院摄影棚里，试图组建一个不受任何势力影响的作家协会。他们的愿望是，让民主德国出版界出版一些早该被出版的著作（像沃尔夫冈·希尔比西这样的作家在西德已被公认为诗人了，其作品在东德却一直尚未被印刷）。这个协会最终失败，因为“受到史塔西通报合作者[8]控制的人员政策巧妙地激化了政治上较为活跃和不那么活跃的作家们之间的冲突”，除此以外，该组织很大一部分参加者都抱有离开民主德国的念头。

尽管文化上的压迫那么大，大到连反对的声音都变得十分微弱，但对于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来说，1970年代还是一个“突破的时代，寻找自己道路的时代”。西德1968年运动的政治热情涌入东德，早在那之前，东德就已经发生了“地下层的震动”了。摇滚乐越来越流行，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人们的装束也起了变化，越来越有挑衅意味（如头发越留越长）。对此，国家也施加了十分大的压力：开始由法律许可

追捕长头发的年轻人，不听话的摇滚乐团被无情地驱散，所有的中小学校里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特别富有“非主流”危险性的是鲁道夫·巴罗[9]和沃尔夫·比尔曼[10]，尤其是这二人的社会和国家批评——在阐发上，一个侧重于理论，另一个侧重于艺术——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构为基础，给当时的东德形势领起了一首自己的曲调，迫使这些本已僵化的形势起舞。

巴罗出生于1935年，先后在出版机构和工业单位里供职。他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年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其作品《另一种道路：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批判》（此书于1977年在西德出版，他为此被判8年有期徒刑，但是在服刑16个月之后被驱逐至西德）认为：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被其根本和内在的矛盾扯碎，这些体系和运动主要扎根于不可战胜的苏联历史，人们应该从那里着手研究。今天在东欧当权的共产主义政党属于大国力量均衡的一些棋子。理想的实质早已被蛀空，其后果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的颠覆，这对权力结构来说是具有毁灭性意义的，这一点的后果到处可见，首先就是苏联，如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例。另外，1970年12月的波兰事件[11]使人们认识到，导致该体系动荡的危机并不仅仅是一些暂时的原因，还是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巴罗认为，从政治上来看，随着拉科西[12]等人的上台，原来的革命组织者执掌了权力。那些广泛的文化革命的本质，以及所有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分工、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的变革，正可以被“另一种道路”所解释。人类的解放运动越来越紧迫，但解放的条件必须被重新研究，解放的内容也应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被重新定义。

> 巴罗在草案中提出了一个革新的共产主义政党。如今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激励和纪律机制已然欠缺，但在这个新的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下，社会将焕发出更高的经济能力，而参与工作的人民也能够真正参与决策过程——关于储蓄与消费的关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产物，关于住房建设和纪念碑修建，关于教育和权力机构自我宣传的投资，关于把妇女从家务劳动的奴役地位解放出来所需的代价和一个有机社

会的安全的代价，一切一切的决策。他认为，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1976年，当沃尔夫·比尔曼踏上观光西德的旅途时，他刚刚因为恶劣地损害了公民义务而被东德的相关当局剥夺了公民权。这位词曲作家，1935年从汉堡迁往东德——在他的内心，“批判的孤独”一直在纠结——感受到了“背井离乡的命运”（这句话是海因里希·伯尔形容的，他在自己家中收留了比尔曼）。“在这个工人-农民的国家生活了几年之后，”比尔曼在《东德悼词》中写道，“我感觉到，这里的共产主义病了。我写作歌曲和诗歌，想使它健康。但是那些官僚却并不理会我这剂苦药”。

当我们到达了岸边

还久久地坐在小船上

那是因为，我们看着天空

而天空在水中最美

梨树间飞过

几条小鱼儿，飞机游着泳

曲曲折折地穿过湖底，然后粉碎

轻柔地，在柳树干上粉碎

——在柳树干上

什么从我们的梦中显现

在这破碎的大地上

奇迹之门不想闭合

在这污秽的连接处

我们的朋友将会怎样

你会怎样，我又会怎样——

我好想离开

最好就留在此处

——最好在此处

比尔曼的被驱逐出境引发了生活在东德的著名作家的抗议活动，这些作家中有8位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连著名的雕刻家弗里茨·克雷默以及许许多多的名流人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呼吁东德领导人对比尔曼的驱逐进行重新考虑，也就是收回成命。这样的动作，在这个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下的国家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在其文化政治上更是头一回。很多参与抗议的人，如斯特凡·赫尔姆林、君特·库内特、斯特凡·海默、克里斯塔·沃尔夫，本身也因为与党纲相偏离而受到了一定的处分。

“对沃尔夫·比尔曼的打击被看作对全社会上进行创作和批判工作的人的打击。这是一些尚未被收买的人，他们觉得那一丁点的自由空间应该是用来战斗而不是用来附和的，而现在这一点自由也受到了威胁。对比尔曼的打击就是对自己的机会的打击。”（此话出自伯恩德·瓦格纳，作家，1985年离开东德。）



沃尔夫·比尔曼

比尔曼被剥夺公民权后的那一个十年再也无法挽回东德知识界的消亡。知识分子们不是逃离出国，就是被剥夺了一切保障。知识分子和政府间之前达成的宽容协议终于宣告结束。除了公共机构，任何地方都不能再从事脑力工作，新闻界关闭，出版业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活动。如果某人不想成为国家的“御用文人”，那他就只有退隐。“说得更精确一点：所有理想的上层建筑坍塌了，艺术家孤独地站在自己的废墟之中。”

仔细看来，比尔曼的抗议——是“一束由多刺的植物扎起来的花束，红色的康乃馨，纸做的花环，这花束使得东德政府如此的震怒”——就像是一份丢人的、没有诚意的赠礼，里面放着一段气死人的、相当叛逆的赠言。比尔曼本人在其中唯一摊到的形容就是“不舒服”。人们认为，应该做的是带着沉思泰然自若地忍受这种不舒服。这句话听起来并不那么狂热，而下一句就更加有距离感了：“我们并不以

> 比尔曼的言行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围绕着这句话又展开了一句忠于国家的宣言。“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站在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对立面。”由此，西德的“敌人”形象在东德党派色彩浓郁的环境中得以长青。（曼弗雷德·耶格）

讽刺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执政者不太喜欢的一种形式。在缓和期，小型歌舞剧场的演出冒着更大的风险。“社会主义的小歌舞剧院的演出——只要它和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没有直接干系——是潜在的朋友和盟友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演出，它不是生产行为，会阻碍进步，但这终究是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

> 彼得·恩斯卡特，全东德最成功的歌舞剧人之一——他的节目《公民》《保护你们的财产》在1980年代中期走进了15家大型剧院——同时也是作品被演出最多的剧作家之一，谈起了“小型歌舞剧院之家”应该紧密团结，对抗外来的审查。“事实上，东德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团体像小型歌舞剧人一样，在面对审查时那么紧密团结。”“像往常一样，我们必须把剧本的第一版稿子交给党和政府进行审批。”恩斯卡特回忆说。在此之后，审查者通常情况下会安排一次谒见，在这次谒见中，“某一处或某几处有反共产主义嫌疑的小地方——为了使党高兴——要自觉删除。随后的谈话在剧院内部举行”，恩斯卡特继续说道。没有什么比在这样紧密的小圈子里给一堆行政人员表演剧目更丢脸的事了。民主德国的歌舞剧节目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剧目的票经常卖光，甚至会害得观众为求一票而打架。（西格弗里德·施塔德勒）

东德的文学讽刺小品就像是某种由安慰剂和酸酸甜甜却含着苦核的润喉糖混合而成的一大把药片。这些适应了集权政府及其审查的讽刺小品是可接受的，但并不总是令人舒服，它们用给怯懦和挫败感提供出气筒的方式来支持这个体制，人们会说，文中刚才提到的问题不过是一些表面的问题，而产生问题的体制基本还是健康的，应该被肯定。作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赫尔曼·康德（他的前任是安娜·希格斯[13]）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其小说《光芒》《印象》中表达讽刺意味的，因为乐观精神仍然在占上风。他的角色就像是中世纪宫廷里的愚人一样：讥讽，却不会引起太大的反感。另一些作家，如君特·德·布鲁因、斯台凡·海默、君特·库内特、伊尔姆特劳特·摩根纳、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汉斯·约

阿希姆·夏德利希、卢茨·拉特瑙，写起文章来就麻烦多了，因为他们讽刺的矛头不仅仅满足于时存的东德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某几处小缺陷和小弱点，“而是批判性地审问时局的创造性，并且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标尺来衡量。1971年召开了第八届党代会，埃里希·霍内克在会上提出了文化政策自由化的建议，这些作家以热情洋溢和多产的方式回应了这个建议”。但是，就在他们多少有些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件的同时，他们就已经站错队了。

反对派的文学

东德的文学——除开那些讽刺的作品不算——是不是反对和抗议的声音的堡垒，尽管小心，却仍然有着发出反对声音的倾向呢？因为在西德，阅读时需要运用“字里行间”的艺术是妇孺皆知的，这样就使得东德的文学作品获得了多方面的好评。然而两德统一以后，对东德文学作品的反应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去，人们质疑其反抗性并且贬低其价值。

汉斯·约阿希姆·夏德利希参与了1976年比尔曼事件的签名上书（就因为这件事，他不得不离开东德）。他指出，超过16位东德重要作家本应该逃往西德，这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东德文学是怎样唯“御用文学”规则马首是瞻的。“自我审查也是审查的一部分。有一些人是这么看的：自我审查是作家们保存自我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文学用巧妙的方式赢取胜利的合法来源。说出点儿什么，却又不真的说出来，把某些文字的表达美化到辨认不出，这样，黑暗的美和美的黑暗最终得以在我们面前显现——尼采说过，带着锁链跳舞是最高的艺术。”东德的文学就是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号角而起舞的舞蹈。

东德文学的问题很大，这是瓦尔特·扬卡的看法。他在1956年个人的公开审判中曾深刻领教过这些文学的缺少逻辑性和机会主义。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作家，东德历史末期发生的和平演变是否还会产生呢？对此君特·德·布鲁因[14]的回答与扬卡的看法截然相反：东德的文学多年来

一直在精神领域努力，为这个演变做好了前期准备。即使是18世纪的法国作家们也并没有亲自披挂上阵去攻占巴士底狱，但是，他们的确也在革命浪潮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不可否认。当然，以18世纪的法国作家来对比东德作家，这样的比较未免高抬了后者一些。德·布鲁因在《人到四十岁》——其自传的第二部——中的形象是一个讲究策略的、谨慎的随波逐流者，基本是一个不同政见者。这个“因为渴望和谐所以随时准备妥协，而这妥协有的时候也会触及我所能容忍的范围的边缘”的人非常诚实地描写了东德文学创作者的“精神状态”：“也许，可自由发挥的余地比我们所说的要大一点。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自觉地老老实实回到我们本人都经历过的那种状态。不管这听起来多么像是某种借口，其中也还是有真实成分的。每一次，当某一个人‘自由发挥’过度时，他就会被驱逐。”

一个适应的过程开始了。有些人出身时贫贱无奇，后来却慢慢地成长为特权阶层。“然而，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却并不与之相冲突。它所认同的是，那些为国家和党付出最多的人理应得到最多的回报。很多人从中获益，这一点是公开的。事情的关键不在公平、同情或者怜悯之心。国家所做的事情就是惩罚或者奖励。谁有功劳、有贡献，谁就可获得一套住房、一些优待……而那些占据领导层的人理所当然地相信，他们的贡献最多，所以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享有更好的生活。”

乌维·科尔贝1957年出生于东德。他认为，极大的无助感产生了沉默。他一生中74%的时光都被柏林墙抹上了阴影。“而且，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而且，我们也缺乏勇气。站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我们并不想忘记这一切。我们鄙视传统仪式化的力量，但我们又不得不在传统面前收起我们鄙视的锋芒。”

当这样一种被自私和恐惧所控制的心态蔓延，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对抗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压迫就变得格外有意义。克里斯塔

·沃尔夫在1965年12月15～18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中央委员会上——她本人也是1963～1967年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警告道，如此这般会出现文化人才上的青黄不接，并且强调，出于良心，她无法投票同意某些对自己同人的打击行为。东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瓦尔特·乌尔里希及其继任者埃里希·霍内克首先提出了要整顿艺术家，首先的打击对象就是沃尔夫·比尔曼、斯台凡·海默和海纳·穆勒[15]。

> 沃尔夫的小说《关于克里斯塔·T.的思考》于1968年问世，这是一个关于一名不问政治、只关心私人生活的妇女的故事。这本小说的面世“犹如一道闪电一样照亮了民主德国的艺术与文学界”。人们重新举起埃里希·霍内克在1971年12月讲出的口号：只要社会主义的立场稳固，在艺术和文学的天空里没有禁忌。1976年1月，鲁尔夫·米夏埃利斯在一次关于作家（福尔科·布劳恩、戈尔迪·泰茨纳、布里奇特·莱曼）新作的研讨会上说，东德的文学作品不能再用那种“字里行间”的方式说话了，文字表述要直爽。同月，弗里茨·J.拉达兹表示，东德诗歌的新调调——用哀歌来代替赞歌——宣告了东德文学作品倾向的转变。人们果断将艺术放在一个独立且与历史学同等的地位上，这在东德文学的讨论中，可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创新之举，而它也从此再没有被忽略过。
>
> 尤其是海纳·穆勒——其作品有《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1956/1977年）、《弗里德里希·冯·普鲁士二世的生平履历》、《莱辛的睡眠梦幻叫喊》（1977年）、《哈姆莱特机器》（1977年）等——他是一名扬弃美学限制的作家。他在文学形式上的实验标志着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小市民习气的文化理解的摒弃，同时被摒弃的还有这些人的“流于形式框架的历史阐释”。通过他的努力，东德文学得以成功地跟上了“西方的先锋者”的步伐。
>
> 在1978年5月30日举行的作家大会上，斯台凡·赫尔姆林发表了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深刻分析了东德某位高层行政人员的观点：作家应该被看成一支队伍。但是，该观点中所指的事情却与作家创作毫无共同之处，这两者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一位共产主义作家——赫尔姆林提到了他的朋友君特·库内特、斯台凡·海默、弗朗茨·福尔曼和克里斯塔·沃尔夫——应该是所有前进或者后退着的乌托邦的儿女，他是散布“异端邪说”的人，也是殉道者。［他们的前辈是光荣的斯巴达克斯和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z von Assisi）。］

1980年代，文学领域中的分裂到达了顶峰：作家中的青年人和年轻一代推开了通向未来的大门，与此同时，他们也连接着那充满禁忌的过去，并且接过了现代派传统的衣钵（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

这些年轻的“反抗者”中的一员（克里斯多夫·海恩）竟然敢在1987年民主德国第十届作家大会上公开断言，审查已经过时了，是无用的、反人道的、反人民的行为，不但如此，它也是不合乎法律规范的、违反宪法精神的，因此理当受到惩罚。他认为，东德的文学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但人们还应当努力促成更多的效果产生——做这一切需要力量和勇气，尤其是要有一根挺直的脊梁骨。这样的言辞道出了人们的愿望：关于“另一种民主德国”的愿望，期望着改变，期望着打破各种所谓社会主义的称为束缚的“规范”。

文学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教育专政中起到什么样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关注审查在其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审查是东德国家文学政策中的绝妙手段，“这个机制的出色代表就是前东德文化部部长克劳斯·霍普克”。而东德国家人事政策的任务则是，确保在文化机构、大众传媒、出版社、电影界、艺术联合会，到处都会有忠于党和国家路线的公务员来执行监督：所有的出版物都必须先获得许可方可问世，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引进报刊和书籍受到很大的抑制。政策上的刑法使插手他人的精神自由成为合法。东德国家安全机构尤其是通过许许多多的“非正式工作人员”向着作家和艺术家的私人领域渗透，以至于后来监管报告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史塔西是自己丢失了对全局的掌控。

人们就生活在这真实存在的恐惧中心，这种恐惧甚至常常会使人自我审查。在这种状况下，东德作家还以文学的形式进行反抗——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实在令人称赞，尤其是，当人们拿他们和那些流

行于西德知识分子之中、如杂草般蔓延的顺从和机会主义相比时，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审查和自我审查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一个真正的关于审查的法律在东德并不存在。这就使得瓦尔特·乌尔里希竟然可以言之凿凿地说，在民主德国从来没有过出版审查。埃里希·霍内克也可自吹自擂，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审查只在那些当事人头脑里进行。说完这番话，他又袒露心声般地补充了几句："我们没有审查……在我们这里，审查只是通过自觉的力量才得以实行的……我们是唯一一个让事情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那些"事情"，必须严格按照事先划定的轨道行进，不得有半点偏差。

> 福尔克·伯劳恩的诗集《缓慢的、吱嘎作响的早晨》饱受争议。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审查是如何"通过意识塑造"来进行的："印刷许可在四十四个月的严格的文学政策秘密操作后，被分摊在出版社社长艾伯哈特·君特尔、分部主任沃尔夫冈·霍普克、文化部部长汉斯-容恩·霍夫曼和中央委员会秘书库特·哈格四个人身上。好在四位审查官最后都一致同意，本书通篇反映出作者伯劳恩一心向着社会主义。"和作者本人打那场"持久战"还是值得的，教育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作者本人认为，自己对我们社会-人道主义建设负有责任，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为发展做贡献。"艾伯哈特·君特尔满意地说。福尔克·伯劳恩对出版他作品的人表示感谢，让他完成了"阶级任务"，并且还题了词，向对手证明其勇气。"献给我勇敢而成功的出版商，满怀感激的作家敬上。"
>
> 然而，"审查官们"的"重返社会措施"却并不是总那么成功。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政策的高层领导人也常常对一些非主流的出版物网开一面，东德的作家也敢于通过西德的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了。

曼弗雷德·耶格认为，在自我审查和文学导向交互作用的影响下，作家手里的牌是很坏的，因为他们必须忍受不懂文学的人同自己"合作"，如果他们还想在官方的文化机构混迹并且不被赶出国的话。审查机关不是对允许他们插手文学创作提出了要求，并且正式保留了作品的版权么？

在这些小小的争夺战中，为了从官方机构那里抢夺自由空间，同时避免自我审查出现，作家们使用了各种方法——这其中有，为了引开审查机关的注意力，在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言和内容的技巧——比如，乌维·科尔贝就在其诗选中抄录了“一篇由五段单纯的名词排列组成的文章，题目是《本人小说的核心》。中德出版社和柏林文学办事处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如果把每个名词的首字母一个接一个地连起来读，就会组成一个非常反革命的口号：

‘你们的能力可悲。/ 你们的要求充满了谄媚。/ 你们早年的血腥旗帜如今懒散地绷紧在你们的肚皮上。/ 你们英雄神话的牺牲者在我看来是牺牲给了高涨的性欲。/ 一个白发老者撕碎了你们口口声声的革命。’

当然，只有当他本人写一则说明告诉大家如何解读这些字谜时，科尔贝的这种处理才有意义。诗人孤独地在他那小房间里庆祝一下这点秘密的胜利是没有用的。但如果这样做，国家权力机构也就会马上察觉那些不为人知的、正在悄悄蔓延中的反对团体。”

针对东德审查机关的抗议在20世纪80年代末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也间接说明，东德的意识形态以及权力政治的沦丧已经比许多人察觉到的还要厉害。那些不乐意接受权力机构监管时自相矛盾的自由主义做法的人发现，由东德国家批准的审查只有随着执行这些审查的政权的覆灭才会停止。

教会和海怪史塔西

在《时代周刊》举办的关于东德国家统一社会党专政下的反抗的论坛的开场白上，记者罗伯特·莱希特“极其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民主德国是不是仅仅依靠拥有史塔西和新教教会才得以作为一个国家持续了那么久？对上级的含糊态度本是马丁·路德所发起的新教的典型特征。在其思想中，“一个基督教徒的自由”不及国家那么受到重视。而这

个思想在1945年后的东德（尤其是在那些盛行新教的主要地区）重新有了显著的印记。

第三帝国覆灭后，德国共产党普遍持有的观点是，宗教和教会是过去几个世纪的遗毒，现在终于即将走向灭亡。然而，教会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坚定的反抗使得东德国家统一社会党不得不接受其存在。另外，教会也接受了这个新的“上级”，在这个“非基督教的国家”里，表现得一会儿机会主义，一会儿泾渭分明。后来的公民权维护者鲁尔夫·海因里希在其著作《监护权的国家》中写道：“就像教会在其他地方对人们产生作用一样，生活在东德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每天也能感受到真实存在的基督教。这里的基督教在学习如何从社会主义制度下教会的特殊结构性中获得好处，越来越得心应手。”没有任何一个官僚机构比教会本身更适合于把工作者们心中激进的人文主义简化为具体实践时的导向了。正是这一点使得在东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会成为东德统一社会党和国家权力不可替代的同盟军。每个人都退隐到神圣的环境中，这并不符合新教的教宗。但是，新教不拒绝与权力的“上级”相往来，这也表明它本有与权力进行妥协的准备，不管这妥协多么耐人寻味。人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会”，而这样的教会既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摇旗呐喊，也不与社会主义制度唱对台戏——该说法来自阿尔布莱希特·舍恩赫尔牧师，他是“民主德国新教教会联盟”的第一任主席——既然如此，那么对政府做出让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通过对国家表示忠诚来获得公事和人事上的好处或国家的嘉奖，这样机会主义者的努力同拯救危险之人的意愿一样普遍存在。来自教会的超过3000名以上的“非正式工作人员”曾经加入过史塔西。

洛塔尔·迈齐埃是民主德国教会联盟的副主席。他认为，如果教会被彻底拒绝，人们本应该把广阔的社会领域全部听任国家处理，并不保有任何国家认为可能对其极权意愿产生抵制的东西。而舍恩赫尔认为，以为一个无神论的极权政府每时每刻都只会做错事的想法是错误的。他

进一步指出，需要其“领地”的教会用一种艰难而至今不为人所知的方式，在一个自诩为无神论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陪伴着基督徒们，同时也希望帮助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保护其权益和尊严。

不错，大量神职人员冒着个人危险对东德国家的压迫进行了抵抗，他们的教堂成了反对党和持异见人士的家——教会当局始终带着不信任的眼光看待这一行为，并忧心忡忡——但由此并不能就认定，德国的新教终于在历史上站到了正确的一边，也就是站在被压迫者而不是压迫者的一边，站在人民而不是当权者的一边。真相更多是这样的：教会的等级自最上层的特权阶层到最底端被压迫的阶层有精细的划分，教会政治体系的稳定依赖于这种精细的划分，但正是这种等级划分使教会仿佛某种江湖帮派，而与此同时，教会又不断地向教众施以“虔诚”的压力。随着民主德国越来越多地被承认是一个独立国家，外部的环境也促使教会当局在1961～1989年越来越少地批判东德内部的矛盾。

教会当局和教会基层小组的关系一向紧张（“用锄头反抗剑！”）。这也体现在，“有些人虽然够格，也申请成为牧师或其他教职人员，却最终并不能得到职位。但你永远不能说这是因为教堂特别团结。……当教会中的某位领导在有基层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于公共场合发表讲话时，他们总会用某种外交式的花言巧语对问题的锋芒避而不谈，以至于到最后几乎什么也没说。”

无论对民主德国的教会给予肯定还是否定的评价，有一点无可否认：其文化、宗教和精神的力量被无所不在并拥有全权的史塔西大大削弱了。“八爪鱼史塔西让我们饱受折磨，我们都不敢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个话题。”

> 20世纪的极权国家创造出了很多迫害人类的恐怖机器，东德的史塔西就是一例。笼罩于史塔西之上的疯狂也可算得上独一无二了：那种超现实和荒谬让人如同置身卡夫卡的小说，却也印证了什么是恶之平庸[16]。马克思所说的量变积攒而产生质变，在史塔西处也能体现

为，其工作人员多为男性，而其中的许多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的外形给人感觉无外乎愚蠢、放肆、厚颜、暴力，由此，史塔西这台机器也用一种极其诡诈的方式完美运行。史塔西最大的心理和政治成就在于，它——就像“模范教堂”一样——牢牢地把大量的人和自己捆绑在一起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工具。史塔西执着地认为，通过精细入微地观察，借助所获取的数据以及对数据的“阐释”可以改变人。对东德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执念真是充满想象力。一方面，“不忠实的人”要么被消灭、要么被放逐（因为这些人是“人民的祸害”，看起来也不像是能够被“再教育”改变）；另一方面，自20世纪初就有的可被教育的“新人类”模型又得从头到脚好好打造。

“安全的领域”，文学

君特·德·布鲁因报道了他是怎样从政治上的无罪变为有罪的。其中关于史塔西是如何征集人员的内容不足为道，但是，对他和史塔西博弈的每一步棋的描写却很能说明问题：两个未经预约的访问者，自称为史塔西工作人员，相当礼貌地请求一次谈话。这两个人说，西德的人们认为，这位诗人的行为可算得上是反对东德政府，但他本人还是一位相当忠诚的东德公民。德·布鲁因很愿意聆听，并了解了更多关于所谓的西德意向的详情。他以为这件逸事是一次蒙混和试探他的假动作，结果还真的接到了慕尼黑自由德国作家联合会的来函，请求安排一次会晤，并希望他同意印刷一本未出版的小说，这本小说在西德尚且无人知晓。德·布鲁因猜测，史塔西一定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出于这种考虑，他从一开始就自觉向有关当局承认了收到过这样一份来函。“他们再一次来到我的住处，用指尖拈起这封信，拿放大镜仔细地检查了邮戳，然后把信封和信件放入一个透明的袋子里以便带回去做检查。”德·布鲁因被窃听。很快，他就被载入档案，用的是假名“罗曼”，随着时间过去，关于他的案例报告、窃听记录、信件复印件和谈话记录很快累积成厚厚的一沓卷帙。

回忆这一切的时候，德·布鲁因觉得，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侮辱，他永远也不能满怀信心地谈论尊严和正直，并且对别人做出评判了。他说，被史塔西找去谈话时的他比现在回忆时的他要坚强许多。他震惊地

判断，某种程度上自己暂时有一些地方无法适应。“带着一个由于恐惧而颤抖的灵魂，完完全全是出于怯懦，而不是出于任何一种能使事情变得好起来的信念，我必须继续生活。”

史塔西关于弗朗茨·福尔曼的“卷宗”——这些卷宗直到他1984年7月8日去世才告一段落——显示，福尔曼“一直受到协调的差异和强制性措施的影响”。这位诗人1922年在埃尔茨山脉出生于一个纳粹主义的药房老板之家。早年的他认为，东德是一个更好的德国社会。通过独断的反法西斯主义，他试图纠正自己青年时期误入的歧途，当然，由此也就看穿了这个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下的政府的谎言。反过来，该党的代表人又一股劲地努力着，希望通过“目标明确的影响”使福尔曼及其妻子放弃“他那顽固不化的立场”。可是，这位诗人投身民主运动，还和一些所谓的边缘群体“同流合污”，使得“调整”其精神特征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于是，时任东德文化部秘书长的库特·略夫勒来了，和福尔曼进行了无数次私人谈话，最后把他交给了史塔西。略夫勒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安排他接受心理诊所的治疗，不得有误（当然，这事也常常被敌对势力所滥用）。福尔曼的另一个密友则对史塔西报告说，福尔曼受到了病态的困扰，这病害得他神经错乱，觉得必须同一切想法不一致的人做坚决斗争。他说，这种精神上的变态已经发展到了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不再能够做出理智的、使人信服的言论。

当福尔曼的声誉在西德达到顶峰之时，东德却在对他做“病理分析”，其结论是——这分明是一个社会化政治精神错乱症、用某种方法来反对各种艺术上的离经叛道，结果举止时而文雅迟钝、时而开朗野蛮的实例嘛！

> 熟人和亲戚成了间谍，史塔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强行闯入了私人领域，在那里也安上了监控。后来成为联邦德国议员的积极和平主义者薇拉·沃伦贝格曾被自己的丈夫告发。1977年被开除国籍的莱纳·昆策曾被曼弗雷德·波莫跟踪，后者是史塔西最具奴性也是最危险的线人之一（而曼弗雷德·波莫后来还改名换姓，说自己是伊布拉辛姆·波莫，成了

东德境内新建的社会民主党最主要领导人之一）。

被称为“艺术殖民村”的普伦茨劳贝格[17]算是没有被史塔西干涉的福地。柏林东部简直就是东德的施瓦宾格[18]：多姿多彩的非主流文化集散地。

来自捷克的扬·法克托认为，柏林东部的普伦茨贝格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生活区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迁来——无论他们是否有意于从事艺术创作。“相较于东德的整体状况，普伦茨贝格是一个特别混乱的区，其中艺术家也未必就是主力。因此，普伦茨贝格的所谓街景绝对不会是单调一致的——‘个人主义者的集合’也许是一个恰当的形容。”这些个人主义者加在一起，用亚文化的方式对当时东德的意识形态做出抵抗。后来浮出水面的是，在这些人当中甚至有一些“红色的波西米亚人”，本身虽是史塔西的工作人员，但其中很多人的住房简直就是大逆不道。随便说两个普伦茨贝格有名的作者吧，萨沙·安德森和贝尔特·帕本福斯-戈列克。西德文学界对他俩受恩斯特·扬德尔、约翰·费沙特和阿诺·霍尔茨启发写出的诗赞赏有加，是因为他们总是把自己在西德的出场安排得很有戏剧性。沃尔夫·比尔曼形容他们是“用铅笔和画笔工作的晚达达主义侏儒”，他进而评论道，“普伦茨贝格刻意摆出一种远离政治的姿态，这其实是对现实的逃避。它是史塔西主要部门HA-XX/9和HA-XX/7这两个暖房里精心培育的品种”。

1991年，沃尔夫·比尔曼在毕希纳文学奖获奖感言上揭露了萨沙·安德森和贝尔特·帕本福斯-戈列克这两个“一无是处的牛皮大王”（原话）原是史塔西的“非正式员工”——本来只是有传言，但后来传言得到证实——那么问题来了：东德的文学和文化史中的重要一章是不是得改写呢？因为，普伦茨贝格到那时为止一直被认为是东德先锋文化的中心，如果东德还有先锋文化的话。其实，普伦茨贝格只是一场文化作秀，史塔西既导又编且演，因为此处——有别于东德其他地区讲话的文化概念——适合于成为城市精神的某种“外属领地”。

> 他已经倾尽全力反抗了国家，反抗了东德的体制，安德森本人声称。他说，他还和自己的摇滚乐队一起站在舞台上唱了沃尔夫·比尔曼作词的歌。“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被禁演。就是因为这样，史塔西派了一个团来，试图用发出噪声的方式来搅黄我的音乐会。”
>
> “我也不是诡辩家。但如果说间谍是指史塔西可以从他那里获得一些信息的人的话，那我就是间谍吧。如果史塔西动用了所有手段，偷听了一切聚会、窃听了一切电话，并且从中做出对其他人的报告，那我就是间谍吧。我本人从来没有为了给史塔西提供什么信息而捏造故事。如果说我有的话，那也许是——不，我可以说肯定是——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太开放了。我其实知道这个体制的许多内情，我敢肯定，我所提供的信息是挺有利用价值的。”（萨沙·安德森）

史塔西这台巨型机器的运作依靠“纸上谈兵”。所有“情报”——据估计，东德国家安全部在1960年代末有1.3万名编制内正式员工，1989年，其数量增至6.9万，而非正式员工人数已达50万——都被仔细地写在了纸上。尽管文献大多数已佚失（被毁坏或者保管不当），剩下的那些依然在两德统一后为东德这段历史提供了“有据可查”的基础。统一后，罗斯托克的民权维护者兼神甫约阿希姆·高克受联邦政府委派，出任史塔西文件管理委员，领导根据1991年出台的《前民主德国文件法》而成立的机构，该机构管理的文件长度超过200公里。高克说，东德的道德败坏到令人忧心的地步，这与民主的政治道德形成强烈反差，因为在那里，人高于一切。值得“好好研究”的是广阔的土地上无处不充满谎言，那些文学里的“反对”尤其体现出道德的真空。直到两德统一，一直作为作家在东德生活的约阿希姆·瓦尔特用长达几卷的篇幅，不偏不倚、资料详尽地描述了“行动的同志们”做的事——借用赫尔穆特·拜厄尔后来为史塔西所做的主页上的形容：“安全警察、永远在密切注意、专家、审讯者和侦探。”可以说，关于音乐、造型艺术、戏剧、电影（当然也包括技术和自然科学，尤其是法学）这些“安全领域”的文件会得到类似的结果。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法官，如果想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治下的国家里“自证清白”，统统需要屈尊撒一个又一个的谎。他们一方面受到歧视、排挤、

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也有所反抗，另一方面也大大地支持着这个体制。他们对名词术语排列比对工人更亲近。

“知识分子和党内官僚间那种古怪的互打掩护甚至渗透到了生活方式上。这是文雅的小市民气。”（闫斯·莱希）

---

[1] 自由德国青少年，德语Freie Deutsche Jugend。1946年成立的14岁以上青少年的组织。到1989年为止，自由德国青少年是原东德唯一的青少年组织，并且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有密切关系。

[2] 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uer Staatssicherheit，MfS），成立于1950年，1990年解散，简称史塔西（Stasi）。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直接受德国统一社会党高层领导人的领导。

[3] 布吉·伍吉是一种以钢琴为基础的蓝调音乐，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北部，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开始流行。

[4] 一种产自东柏林的轿车。

[5] 莎拉·克尔施（Sarah Kirsch），1935年4月出生于德国，德国女作家。

[6] 乌维·科尔贝（Uwe Kolbe），德国诗人，散文家。20世纪80年代其作品被东德政府禁止出版，后获得西德永久签证，前往汉堡。

[7] 弗朗克-沃尔夫·马提亚斯（Frank-Wolf Matthies），德国作家。因为和东德政府持不同意见遭到逮捕，后迫于国际性示威的压力而获释，他后来逃往资本主义国家。

[8] 1950～1989年，史塔西管辖有17个监狱，约9.1万名正式聘用的探员，17.5万名位于民主德国国内的正式的通报合作者（即著名的“IM”），另有2万名“IM”位于联邦德国境内。

[9] 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1935～1997年），德国哲学家，政治人物。后成为西德政党“绿党”的创始人之一。

[10] 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1936年出生于汉堡，德国曲作家、词作家，其作品通过西德电视台的转播为许多东德人所知。

[11] 1970年12月，波兰决定提高46种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价格，引起格但斯克等沿海城市数十万工人罢工，后波党改组了政治局，盖莱克代替了哥穆尔卡

担任第一书记，并取消了涨价的决定。

[12] 1948年匈牙利左派势力组成联合政府，由劳动人民党掌权。1949年劳动人民党建立一党专政。拉科西（Rakosi）1949年8月20日～1953年6月任总书记，1953年6月～1956年7月18日任第一书记，1952年8月14日～1953年7月4日任匈牙利总理。

[13] 安娜·希格斯（Anna Seghers，1900～1983年），德国女作家，以描述二战时期道德体验而知名。著有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死者青春常在》等。1947年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1950年迁居东德，1983年6月1日逝世于柏林。

[14] 君特·德·布鲁因（Günter de Bruyn），1926年生于柏林，德国作家。作品多为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这些小说常常以东德的艺术家私人生活为背景。另著有部分带有历史色彩的散文，尤其是普鲁士历史。

[15] 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1929～1995年）前东德剧作家、诗人、作家、散文家、剧场导演。著作有《任务》《哈姆莱特机器》等。他被称为布莱希特以来德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其“拼贴剧”的艺术手法对后现代戏剧很有贡献。

[16] “恶之平庸”的概念出自社会学家、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为《纽约客》撰写的专栏文章《自由记者报道：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3年，阿伦特旁听了对执行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原以为她会看到一个残暴的形象。但她发现，站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来十分平庸，与常人无异。而艾希曼也为自己辩解说：“一切都是奉命行事。”这就是“恶之平庸”的由来。阿伦特借以指出，许多骇人听闻的恶行并非需要残暴完成，只需要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不思考、不辨是非、“奉命行事”即可。

[17] 现位于柏林东部的潘科区内。

[18] 施瓦宾格（Schwabing）是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的北部区域，曾经是慕尼黑著名的波希米亚主义区域，至今仍然拥有许多酒吧、夜总会和餐馆，深受游客和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

第15章 浮冰和暖流之间

经历饥渴症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在1970年第20期《时刻表》上发表了《一种传媒理论的基座》，这是一篇事关“解放的文化”的精彩短文，宣扬自由交流。在同一期《时刻表》上，左派作家马丁·瓦尔泽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西方的新声音》的文章。尽管这篇文章并未扬弃瓦尔泽一贯“非在野反对党”风格的社会批判路线（主要是鞭挞意识形态操纵），却也捕捉到了新的潮流转向：人们在借助毒品、音乐或类似的东西寻找一个未被任何意见先入为主的经验领域。瓦尔泽引用了雷斯利·A.费德勒作为理论先锋：“青少年坚持不为任何事物所牵绊，他们视此为现代工业系统的某种必然结果，为福利国家的后果。不管它们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些后果和结果将他们从工作和责任，同时也由任何一种道德牵绊中解脱。”

瓦尔泽并不相信费德勒所预言的这种“逃离社会”的稳定性。1971年他完成了小说《加利斯特式病症》（该小说于1972年出版）。这是一个感伤主义者的故事，主人公因理想与现实、乌托邦与日常生活间的鸿沟而痛苦，他试图分析这些痛苦，并通过参加一个反对党小组来治愈。“加利斯特为了治愈而上下求索。如实记录自己的病症已是一个开端。他跟过往的朋友没法继续下去了，转而找寻新的朋友。这些新的朋友说他是得了资本主义综合征，他们给了他一种新的语言，并给他介绍了另一种良心。跟这些人在一起，他的行为方式也有所改变，那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方式。他对积极正面的东西充满了饥渴，但那种旧的竞争心态时时也会借尸还魂。挣扎一直存在：加利斯特的现状是堪忧的，但他也不是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些人和他一起努力。”

瓦尔泽有一种模糊的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态度意在扬弃对盛行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竞争精神，建立一种新的团结的生活共同体。这种颇具启蒙意味的想法并未得以实现。这也成为他日后小说的主题。（如1976年的《爱的另一面》，1978年的《奔马》，1979年的《灵魂工作》，1982年的《致利兹特爵爷的信》，1985年的《大火》。）在这

些小说中，他描写了一些“平民英雄”的悲惨境遇——他们丧失了社会属性，精神生活也受到极大影响。

所谓的社会必然性此时已被视为明日黄花——从赫尔穆特·海森布特到彼特·汉德克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人们醉心于“新情调”——这包括克里希那穆提[1]、菩萨或者其他圣贤那些反映着美丽与纯净的内心世界的呼声，当然也有赫尔曼·黑塞——为之颤抖，并由此开启通向内心而非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彼特·汉德克像R.D.布林克曼一样猛烈抨击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所使用的语词并称其为“胎死腹中的语句”，他们抨击不分青红皂白的“革命化”言辞，主张对生活和世界进行艺术加工。这个主张尤其受到瓦尔泽的批判，他认为，在这些所谓的“新情调”之下很可能暗流涌动，法西斯主义得以借尸还魂。

学生运动超出了原定的轨道，变成一种对顾影自怜式的自我实现的狂热崇拜，最终演化为后现代式的漠然。福尔克·路德维希和德特列夫·米歇尔的剧作《一个左派的故事》捕捉到了这个沿袭过程。《一个左派的故事》是对过去诙谐而独立的一瞥回眸。本剧由路德维希和米歇尔两人共同完成，路德维希担任导演，在脱离于柏林帝国剧院、于1960年代成立Grips剧院演出，将“进步的儿童以及青年剧院，不与定性的审美为伍，遵循反专制的教育原则”的精神变为现实，并经历数个十年，仍然不减其本色。在这出政治歌舞剧的最后，从前的激进学生约翰内斯成了一个有着稳定职位的大学讲师，成为一栋带有一个极具情调的酒窖的房屋的产权所有者。这位看破红尘的男子坐在花园里，被新一代的学生们所环绕，评论说“绝对真空”是一种革命者得以积极潜伏的状态。

“人们又可以互相说话了！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所得！就连我在监狱里也有所习得。看看你们周围坐着的都是些谁。MLer，你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混蛋。我，这个无政府主义的老头。那儿，几个激进分子。这里坐着些女超人。那里一群红男绿女，还有一群对什么事也提不起兴趣的人。我们中既有理性决定论者，也有感

性决定论者。”

青年人开始从学生运动的遗留风尚中抽身，高度抽象和索然无味的“逻辑”不再具有吸引力，他们开始转向“新的官能主义”。如果说那些“老去的”左派人士乞灵于那些不容挑战的偶像，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毛泽东甚至斯大林，并希冀通过已被奉上神坛的教条来改变社会的话，那么现在自发的反叛则正好是针对之前那种“释义的驯化”。针对议会外反对党的抗议并非意指不再有革命的意愿，而是表明人们反对将政治运动硬按入固定的模式和套路之中。理论被青年人视为社会控制（他们称其为“释义机器”）。

人们用格言式短语——譬如用喷料喷在墙上的涂鸦——表达不快或者反对，他们的发泄对象既有通过大众媒体传递的官方废话，也有左派意识形态里那些啰里啰唆的理论：“合法的，非法的，爱他妈法不法”；“要胡言乱语，不要报告批准”；“情愿活着，不要普通”；“今天，你呕吐了吗？”；“生活是一台复印机，你只是其中的一份拷贝”。无政府主义论调和行为的甚嚣尘上——比如图尼克斯运动[2] 或房屋占领运动——对应着某种去政治化潮流。它们不在意于分析社会和政治制度、其桎梏的起因以及怎样长期消除这些桎梏，而是采取了直接介入的方式——在于摆出一个“临时性的”反对姿态。一方面，人们希望能更多地运用感性（在情感和感情热乎乎的暖流中前进，甚至感化那些攻击者）；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再满足于被“未来的社会”这张空头支票来打发，而是通过获得当下的成功来感受喜悦：“行动之后就有满足。”对理论和结构思考的扬弃同时包含退化和进步的内容，用以鉴别是否克服“文化中不好的部分”的标准就是是否成为“圈内人”。这些“圈子”既通过成员的社会影响力来彼此划分，“圈内人”也会紧紧抱团成为小帮派以示与其他“圈子”的不同，这两种方式都有助于增加圈子的凝聚力。

关于这种情况，提尔玛·费希特和齐格瓦特·略侬敦克（Sigward Lönnendonker）有过如下描述：在西德的所有大城市以及西柏林，上

> 千名支持议会外反对党的青年居住在自愿加入的封闭街区里："多数人在生活共同体中长大。他在街角的面包店买面包，在某个经营无公害的艾玛阿姨小店买麦片，在早餐时阅读《石灰路》（*Pflasterstrand* ）、*Info-BUG* 、《基蒂》（*Zitty* ），去某个自行管理的小企业或者什么非主流项目上班——假若他不是'不工作主义'的信奉者的话。他每五天去照管一下小店，他的小车是在某个汽车修理作坊拼凑起来的，晚上他在露天电影院看《卡萨布兰卡》，这之后他将出现在某个茶社、左派酒吧或者音乐小屋，他的睡前读物是书店里的各种书。这样的街区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医生、律师、妇女事务咨询家、各种妇女和男性团体都有，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同那些普通公民的日常谈话相比，这里的交流更加深入。居住在这里的人、学生、激进分子只有在不得不说话的时候才会跟其他人说话，譬如面对警察时。在西柏林和法兰克福甚至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对两年半以来从不跟外人说话的状态表示心醉神往。如果自己做到了，他们会很骄傲。"

酒吧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因为它提供了从压抑中解放、跟其他人调情的机会——在这里你甚至不一定要与人交流，就可以做一个"纯爷们"。酒吧文化是由弗朗茨·约瑟夫·德根哈德、汉内斯·瓦德和迪特·苏维尔克鲁普这样的艺术家们兴起的。在这里出现了各种团体："洛克十字山"（Lok Kreuzberg）、"声响石头碎片"（Ton Steine Scherben）、"古龙水跳蚤"（Floh de Cologne）等。"大象印刷美术馆"成立了。少年及青年剧院，如"红色智力"（Rote Grütze）或者"握紧"（Grips）大获成功。一些非主流的交流中心，如汉堡的"工厂"、柏林的"节拍器"、纽伦堡的"来吧"以及非主流的城市小报，如柏林的《点子》和《基蒂》、纽伦堡的《号啕》和法兰克福的《石灰路》高歌猛进。人们对社会大变革年代的怀旧情绪通过"锤子、镰刀和吉他"的方式在小众艺术里得以宣泄。沃尔夫·比尔曼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歌曲写手，在他的歌里，大大小小的声音、富有进攻性的和富有感情的、历史的和当下的都有一席之地。

托马斯·齐尔发现"水仙花"[3] 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类型人群。这类人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我"的功能被弱化。这种弱化，加上与"现实我"脱离的"理想我"使这些人从心理结构上缺乏长期支撑，而这正好造就了这类人的"个性"。"水仙花"性格的人常常多愁善感，表现为顾影自怜，这种

特质与整个1970年代盛行的新虔信主义风潮遥相呼应。内心成为通向人们渴望的圣洁世界——这个年代久远而依然盛行的浪漫幻想——的光荣之路。人们希望从精神负担——什么理性啦、知性啦——中逃脱。这样的社会风气给非主流、毒品、无数心理疗法和教派的出现亮了绿灯。要顶住：概念都已过时，去他妈的压抑。那些帮助人们从满世界疯狂的男性主义和逼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上进”压力中解脱的人简直被奉为精神导师：他们不是文化革命的老兵，他们是非理性主义的狂飙突进者，在虔信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演奏出音阶。自发被认为是内心的闪光。现下流行的关键词是自然、近距离、安全感、感受、幸福、游戏、可靠、想象力、音乐性的、感性的、宁静的、简单的。回归内心并不像想象的那般安全无害，它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亦有损伤。人们不再是“议会外反对党派”，而是“反政治派”。人们鄙视政治，却又认为政治确保个人得偿所愿是理所当然。“新内心派”的密码简直和满大街商品化审美的婚姻广告词如出一辙：共同、友爱、友好、欢乐、热爱自然、女性化、自立、有诱惑力、有幸福的能力、感性的、纤细的、娇柔的、感官的、解放的。“我想和你一起生活、恋爱、欢笑。我想和你一起携手走我们未来的路、呵护我们的关系、生孩子、待在家里、拥有家庭。我们用不同的注视着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和其中在我们周围的人们，见彼此所见，讲彼此所讲，共同成长，翻山越岭。”

积极的内心主义存在于生活共同体中。在这里，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全都接受过致病的物质主义教育，试图寻找生活的精神支柱。共同居住首先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人们渴望和与自己同质的人筑成一个小巢穴。比邻而居意味着拥有同样的信念和生活态度。浪漫化的“漂泊”生活像是工业社会过于精明的“效率至上主义”的反面，是渴望安全感的表述。当然，这种社会浪漫主义也常常在另一种真实里碰壁，其后果就是所谓的“生活共同体综合征”：“生活时间”的绝大部分被顾影自怜的精神分析占据，不过多数并未到达两口子拌嘴的高潮程度，因为自省而虔诚的沟通方式原是此类生活共同体的存在前提之一。行话是生活共同体的纽带之一，另一个纽带是懒散的生活作风，这两个纽带使作为“疗养”的生活得以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继续。此外，生活共同体的成员也颇具流动性，如果多样的共同生活反而给他造成了负担，他也可以较快抽身。

新的社会文化活动

非主流的生活预示着同“有所成就”迥异的生活模式的到来。“非主流”小姐，一位美丽高大、身材丰满的女性（这是赫尔穆特·海森布吕特在《简单故事》中的描写），尽管作为大而化之的乌托邦不复存在，却也“不知怎么地”更贴近生活了：她在小细节和具体的事情上有所展现。人们意识到了通过经济增长所能获得的界限，新的创造力形式应运而生，它们一再强调自己与“胸有大志”和永远那么完美的宏大体系大相径庭。现在奉行的口号是“小的就是美的”，这是一种对清晰可见的未来掌控的谦虚态度，它从斗室里而非毫无节制的膨胀中获得快乐——斗室，那被看作平等冲和之地，是友好的象征。当然，非主流文化也有受文化悲观主义影响的自私一面：它只在乎“我”和“自己人”，丝毫没有考虑到正是工业社会才使公正成为可能。因为倘若没有大量生产的话，货品根本就没可能分发到普罗大众手中。东柏林作家拉尔夫·施耐德甚至看见了“简单生活”的另一面，他认为“简单生活”是好色和寄生虫般生活的另一个版本，甚至听见某种法西斯主义在其中滴答作响。从冷水疗法到日光浴到把阿道夫·希特勒塑造成一个光辉形象之间搭建了一条思想史的捷径，“同素食主义者的联合小区居住到在某座盐山上做一个美食家一样”。

非主流，即是对现有世界“四平八稳”的现状和“毫无节制”的野心的叛逆。建造原子能电站，反对；砍伐树木，反对；拆迁房屋，反对；修建铁路，反对；兴建工厂，反对。人们亟待喘息、自在和自由，故而猛烈对抗那些是或者看起来像损害自在的事。“新的世界观正在形成：地球是慷慨而仁慈的，历史却是不连贯、不可知而恐怖的。进步需要牺牲者来献祭，与此相对，地球却那么明确、易懂、令人安心、给人保障。它总是很快捧出收获，这样谁都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它不疾不徐，不会催说我们现在就得做。而谁如果要等历史的回礼，那他就有得等了，假如运气不够好，只能空手而归。”（约格·波普）

> 在1982年的一项问卷调查中，尽管91%的人会从“技术”这个单词联想到进步，但同时也有67%的人从同一个单词联想到“环境破坏”，56%的人联想到“恐惧”。51%的人认为技术和失业有关，只有18%的人对此表示反对。仅22%的人可以想象技术之下的自由，而55%的人认为技术导致人们失去自由。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追捧变为对绿色的崇拜以及对“采菊东篱下”式的退隐生活的梦想。狂热地崇拜进步？“不用了，谢谢。”人们追寻着新的纽带关系，追寻着群体的温暖。他们期待从国家或者社会那儿获得某种帮助实现“归去来兮”梦想的发展方式。

没有稳定的工作不再是一种耻辱，放弃社会的晋升和事业亦不表示此人愚不可及。通过工作获得自我实现这一布尔乔亚式的理念失去了吸引力。“有所从事”则代表了更多的满足：旅行、搞音乐、保护友情、与人聊天等。与老一辈人相比，现在人们更准备卸下盔甲，开诚布公地交流。对理解、温暖和安全的需求被更直接且更理直气壮地表达出来。人们认为，应该尝试更加温柔地去和他人打交道，应该对弱者和异类更加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应当建立在竞争而应在充满互相理解的平等基础上。恋爱关系和性快感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且更加大大方方。青年人们对于自己的肉身有了一种更关切和更愉悦的态度，这态度也适用于他们的表达方式。托马斯·齐尔说这是“文化的释放”。他说，这大大拓展了青年们可期待、可幻想、可希冀的空间，即使这些期待、幻想、希冀不能一一在现实空间中实现。早些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家对生活的期待还在极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影响，这影响直达他们内心世界的图景。异类的活动范围相当小。传统以及社会风气在多数领域都像一个暴君般统治着个人、群体、社会出身和阶层的发展。正因为过去三十年的发展，青年人的选择面大大拓宽，至少在脑海里，人们可以不受影响——禁忌、规范和传统的影响——将每一种可能“一一玩遍”。

社会运动向着选择性的私人空间及私人的选择性里发展。在这样的社会新风潮中——1983年，德国联邦议院在政府换届时组成了新的保守班子，为这股社会风潮注入了最大的推动力——形成了三个关键词：环

保、女性、和平。

站在环保运动形成时期前线的是各个地方的自发市民，他们谈论能源、交通、城市规划这些话题。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经济发展触礁，一如罗马俱乐部的宣告，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恶化后果、自然与社会生存环境的持续破坏、新型重大科技如核能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危险系数、技术官僚化控制体系的不断收紧，所有这些问题在早先的学生运动中尚且几乎无人意识到并鲜有人问津，现在却激起了广泛而批评性的讨论，并直接导致了绿党的诞生。引人注目的是议会外甚至是反议会的力量，因为传统政党——如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长时间以来普遍对新出现的问题采取漠视态度，尽管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家赫尔伯特·格鲁尔早在1975年就在其著作《被洗劫一空的星球——我们政治的骇人图景》中提出明确警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艾尔哈德·艾普勒亦鞭挞过本党在环境问题上的疏忽。

妇女解放运动在学生运动时，尽管作为理论被提出，却从未付诸实践。这尤其招致了参加运动的女学生——她们都曾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专制和父权主义而奔走呼告——的不满。妇女们找寻自我的身份认同——“多数女性都是不问政治的，但这是因为政治到目前为止永远都只为男性定义，而对于女性的需要充耳不闻。”——这种找寻在1970年代初期形成一股运动力量，《明星周刊》（1974年6月）上的一篇自我告白《我堕胎了》成为引爆运动的导火索。374位女性，其中有些是知名人物，公开表示她们所受的待遇非法，并敦促无附加条款地终止第218条法规中关于反对堕胎的决定。“我的肚子归我所有！”成了许多示威游行的口号。“那简直是一次爆炸。全德国的女性都团结起来了。”1977年创办女性报刊《艾玛》的爱丽丝·施瓦泽如是说。

随着女性对立文化的兴起——它试图把男性从所有的生活方面剔除

——女权运动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女性项目、女性酒吧、女性之夜、女性合唱团、女性咖啡馆、女性剧院、装给女性的房屋——所有这一切都由一个口号推动：男人，谢谢，不用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被女权运动冲昏了头的女人们有一种狂热的变革情怀。女权运动的中心阵地之一就是对女性性行为的去禁忌化。在自助和自我尝试的小组里，女人们探索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内心：独立的女性化身体意识由此产生。避孕药使无数妇女享受了性的自由。女同性恋者在女权运动中获得了踏入公共视线诉说自己诉求并尝试新的同居方式的勇气。”（玛丽-露易丝·维恩贝格）在社会政策方面，女人们主张在工作、政治权利和家庭生活中的平等。



施瓦本格明德的联邦国防军在俾斯麦营房前的和平牵手：电影导演福尔·施隆多夫，作家君特·格拉斯及和平研究者阿尔弗雷德·梅西特斯海默，**1983**年**9**月

在第三个阶段，女权运动获得了越来越多公共领域的支持，譬如政

党的支持（尤其是绿党的支持）。不过，其片面性和夸张性也招致反对有所反弹。女权组织仇视男性，固执地主张获得绝对自由，使其陷入孤立：那些愿意改变女性社会地位的自发者和推进者更愿意通过传统的女性联谊会或建立政党而非加入女权小团体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女性解放的两面性同样导致，由受人约束的状态中解放至另一种不独立状态的吊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关系匣子”正体现着某种“亲密关系暴政”的特质（理查德·塞内特）。人际交往及社会创造力不再升华至全社会，而自贬身价至虔诚而起劲的二人世界研究。

普遍存在的“婚姻关系的痛苦”（“四处盛行的婚姻关系谎言”）成为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文学作品的重大主题（如尼古拉斯·伯恩斯的长篇小说《历史另一面》，杰哈德·罗特的长篇小说《冬季旅行》，哈内利斯·塔绍的长篇小说《乡土和平》，卡琳·史图克的中篇小说《分局》，彼特·汉德克的中篇小说《左撇子女人》，盖布里埃拉·沃恩曼和马丁·瓦尔泽的书中也有此内容），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1971～1980年，85.4万对夫妻离婚，其中的49.2万对夫妻育有大约80万个幼龄孩童。在这段时间，还有多少对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不为人所知，因为许多夫妻出于经济原因，更愿意采用分居而非离婚的方式。

随着艾滋病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健康社会的“禁区”，尤其是纵欲和滥交在至少是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彻底禁绝。由沮丧情绪产生的攻击性倾向指数急剧上升。赫尔伯特·马库斯曾经希望出现的性道德——那种抚慰内心却并不排外从而获得升华的能力——并未出现，反而是某种社会性病态的混乱出现了。手握镰刀的桑纳托斯（Thanatos）随着艾滋病毒攫住那一具具为情欲而律动的身体，为死亡开辟出一条通路。“这种仿佛是一夜之间蔓延开来的病充斥着报纸的头条，却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广告效应，只为最后推出发明的新药。在关于性行为的讨论中，对于无忧无虑的恋爱生活的向往被人们对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恐惧所取代。”（海因茨-君特·维斯特）

胡伯特·费希特死后出版的长达八卷的长篇小说《敏感》中的故事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一个情感破碎的人生。这个“躲躲藏藏、半裸的男人”，“作为同性恋、作为半个犹太人、作为没有父亲长大的野孩子、作为自学者、作为双性人、男同性恋及非洲裔美国人的谈话对象”（福尔克·哈格）“跑遍了半个世界”。费希特的冒险包括了那些欲望和渴望、施虐和受虐的黑暗区域。作者充满危险的好奇心贯穿他的发现之旅——他于1986年，在经历了可怕的痛苦之后死于汉堡——他本人亲历了这些人种、社会、病态心理学的现象，对问题的亲身体验使一部全方位的著作问世，这部作品是献给时代的“黑色幽默”。

和平运动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由苏联或者反美机构策划，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如是说。他认为，和平运动产生的动机仅仅是出于生存的恐惧，并且是已经被证实的恐惧。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和平运动的前哨战是由50年代反对联邦德国再度军事化、60年代反对德国拥有核武器的运动以及议会外反对党打响的。自1945年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各种持和平主义态度的组织，其中有一部分是青年工人，就在“再也不要战争”的口号下纷纷集会——这些人对政党深感失望，因为彼时的政党为联邦德国重新军事化及加入西方共同防御体系开了通行证。早在1960年就有过反对核武器的复活节示威游行。这次活动正如反对紧急情况法案运动及反越战游行一样，其参与者主要是学生。

国际问题的激化和政治家在处理东西方停止军备竞赛问题上的无能诱发了1980年代的和平运动。而其维度也涵盖许多：政党、工会、教会组织，尤其是新的社会运动。意见之不统一、派系斗争及参与者之间相左的策略计划都在充满想象力的各种活动中被一一化解。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最终成为和平主义运动的一匹黑马，是他将和平主义者凝聚起来。他推行的改革及减少军备政策使视反共计划为使命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措手不及，终于为一直在升级的原子能竞赛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Si non vis bellum para pacern”口号的感召下（这是神学家卡尔·巴特的说法：“如果你不想要战争，请建筑和平。”），罗伯特·容克致

力于为打造“现世乌托邦”添砖加瓦，他是这么认为的：想象力和“众人拾柴火焰高”式的理性在政治领域可大有作为，这样，全人类将有更好未来。作为未来派的通讯员、记者和出版家，容克自1950年代起就在这样的理念下积极地参与反核及和平运动。作为学者，他研究未来学，这是一门通过世界范围内的调研，试图将被期待的发展道路所需的知识与“未来意志”相连、而并非单纯将现况外推的学科。容克始终反对悲观主义、停滞不前及麻木不仁。图尼克斯运动和“没未来”这类事情，对于1933年流亡他乡、反纳粹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的他来说，好比有条件的假释，被他带着鲜活的乐观主义精神推到一边。他相信通过“集体想象力”（他称其为“未来工厂”），更好的世界是可以实现的。容克尤其信任新兴的社会运动和广大公民的参与，他的著作《人的地震：对忍无可忍的反抗》（1983年出版）即是对两者的颂扬。

神学的新时代

1980年代的心理学热是受到“意识拓展计划”影响和鼓动而兴起的。该计划是多种学科的混杂物，认为地球射线与星界太空、肢体语言与磁性、传心术学与占星术学、因果报应与转世轮回间必有一体世界存在。天主教的秘传祈祷练习扩展为反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新纪元到来”的图景中达到顶峰。这种世界观里集宗教、文化批判和生态理念及圣贤学说于一身，认为一切皆有恰当的位置：无论是感觉的或是超感觉的，神秘主义的或是灵魂主义的，黑暗的或是光明的，邪恶的或是善良的。福里吉约夫·卡普拉认为，今天的人类站在转型的边缘，这将要归功于一场通过找寻遗失的“整体”来使世界发光的运动，这句话的意思是——借用中国的智慧来解释——升阴（代表女性、卫护、感觉、合作精神、本能、追求同质化）而潜阳（代表男性、推动力、进攻性、竞争意识、理性、分析型）。生态行为站在了自私行为的对立面。



1960年代的集体冥想

哲学家兼神学家君特·施维受德日进[4]的强烈影响，认为在追寻遗失的"天人合一"的道路上，新纪元的唯心论及灵性说同新型的基督教并非不可调和的针尖对麦芒。泛神论的异端学说（"一切皆为神"）可通过泛-总-无神论的经典范式（"万物皆存在于神之中"及"神存在于万物之中"）得到化解。新纪元论的信徒大力鼓吹兼实践颇具东方色彩的冥想，受此启发，基督教徒也重新发掘在基督教传统中业已存在的冥想和神秘主义，并将其与东方的经验结合。至少在宏观层面上，世界再一次被赋予魔力。

在这个已被过度理性化的技术社会中，早已酝酿着——至少是在业余时间——从灵魂中驱逐作为异象的鬼怪并由此治愈悲哀情绪的要求。在这充满魔幻色彩的基调里，各种教派、崇拜、意识形态和精神导师粉墨登场，纷纷把非理论、生命力、意志、欲动力甚至"魔鬼的"作为其理论的中心。各类活动纷纷指向感性的力量——它是反理性的"逃离"浪潮的原推力。新的"唤醒运动"并非师承于消极主义的生活方式，而是实践着一种令人愉悦的"治愈系"哲学，而后者则深深扎根于不带批判性的折中主义。

在“水瓶纪”[5]，阿多夫·霍尔说——希望牧师们别觉得受到了侮辱——如果布道者不希望自己被边缘化，他们将必须去学习瑜伽课程，阅读西藏生死书，懂得关于健康而营养全面的食品、冥想、秘传教义、隐微术及生物动力学的知识。当因果报应论占据上风，没人会再去想“去神话化”。入世的神学为“有头脑的人”辩护，与政治化的神学势不两立，它努力建立新的本笃会[6]，建造“山上的城市”（就像新教中描述的那样）。正是受此影响，身为东德马克思主义者并做过相当长时间绿党党员的鲁道夫·巴罗由官僚骨干转向上帝的信徒。

在保守神学派眼里，“转变”只是回归有效的“坚定信仰”。在等级森严的、神圣的结构里，天真的信徒应该受到保护，使其不为不安全感所困扰。汉斯·坤恩因为对牧师在神学活动中的不可或缺性提出质疑并主张修订与此相关的教义，失去了他在图宾根大学天主教神学教授的教职。坤恩说，尽管旧式的宗教裁判所业已销声匿迹，它却借助一种新的形式死灰复燃。虽然不会再有人上火刑架被烧死，但异类却可以被从心理和职业上遭到毁灭。红衣主教约瑟夫·拉辛格，梵蒂冈教廷红衣主教会议的行政长官，便是大力鼓吹反现代性风潮的极好例证，也是天主教食古不化势力的带头人。“从罗马传来的不新鲜的新消息：在拉辛格的主导下，梵蒂冈教廷的权利诉求重新成为上帝的特权。不允许批评的声音，反抗更不用说。根据最新的梵蒂冈教会法案（1983年通过）天主教教规第751条，对信仰的真理性的‘顽固怀疑’及‘针对宗教和教会权利的统一性的犯罪行为’应予开除教籍的惩罚。”（汉斯·坤恩）

> 天主教的教会活动，尤其是那些1980年代的活动，在“两种文化”——教会机构的宗教观和宗教感情，尤其是年轻人的宗教感情——之间划下了醒目的深深鸿沟。“一边是传统的耶路撒冷神殿、朝圣之旅和正式的告解，另一边则是青年们交替的、多彩的、政治性的文化。”（此为《南德意志报》1986年对亚琛的天主教徒代表大会的报道。）
>
> 新教的教徒代表大会直到1960年代都尚未获得“正式教会”的承认。在现在，人们不再从圣经，而是从社会学中寻求解决办法。这

个“多元化转向”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愿意“面对世界、问题以及本人信仰的根基时，保持开放和批评的心态”，这也是新教教徒代表大会引进的“可能性市场”机制的前提，在这个“市场”里，上百个来自教会或非教会的团体、机构向人们兜售自己组织的活动，大做广告。批评家们指出，这些多姿多彩的行为从数量上反映了活动的丰富性，表明了该教派不再死守新教教义，而采用了一种宗教-共容的开明态度。

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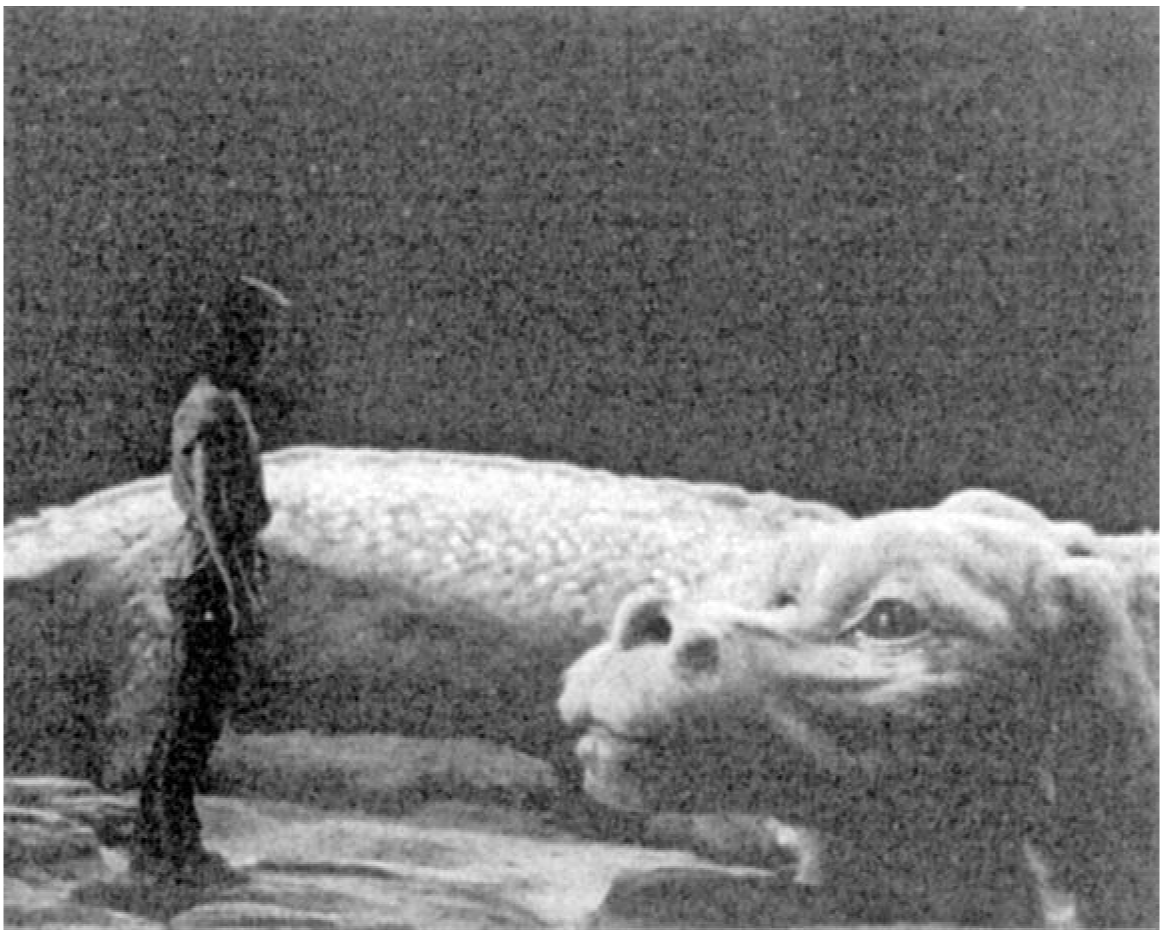
幻想的力量——文学界的新宠，它模糊了想象和冥想、娱乐和痴迷之间的界限。奇幻文学也迎合了人们的宗教需求：这种文学创造了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用来比照并不令人满意的现实，特别容易使读者“入戏”。

有人批评奇幻文学热反映了逃避主义情绪。对此，卡尔·阿梅里引用“逃脱文学派”代表人约翰·罗纳德·鲁埃尔·托尔金（广受喜爱的“《魔戒》三部曲”的作者）的话来回答：“谁会反对逃跑呢？只有监狱管理员本人！”奇幻文学的读者仿佛一个在睡梦中玩耍、置身于另一个无边无际的自由疆界的人，而在他身边的则是那些身沾泥污和草秆、对此疆界一无所知的同辈。

奇幻文学杂糅了古风和高科技。那些令人迷幻的超脱建立在异教风味且闪烁着科技色彩的烟幕弹上。人们对启蒙的理性感到厌烦，这样的心境里有一个魔窟：在那里，女巫、鬼魂、各种活色生香的鬼怪幻象都有一席之地。电影《星球大战》是一部讲述生存的怪异史诗，它的上映在联邦德国甚至成了文化事件。在米夏埃尔·恩德斯（他被称为“德国托尔金”）的书中，文学的新浪漫主义熠熠生辉。其作品《莫莫》（*Momo*）在1973年被约翰内斯·沙夫、《无尽的历史》在1979年被沃尔夫冈·皮特森拍成电影。

米夏埃尔·恩德斯所著《无尽的历史》中的小巴斯蒂安，因不堪学校压力，决定去拯救受到威胁的“范塔西埃”（Phantásien）王国。在“范塔西埃”，人们懂得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世界和周围的人。“就像在我

们这里，两个世界相遇只会导致两败俱伤一样，在那里，两个世界相遇会把它们都变得更好。”米夏埃尔·恩德斯在《无尽的历史》中植入了两个救世史式的传统：对孩子具有弥赛亚般力量以及对诗歌具有拯救能力的信任。当充满创造性的想象力重新赋予梦想信任的时候，摧毁性的文明就会失去其力量。具有孩子和艺术家双重角色的巴斯蒂安拥有不羁的原创性和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在两个世界里同时生活：一个是一团糟的现实世界，在书中用铜红色打印；另一个是他梦想和愿望的宇宙，在书中用充满希望的绿色打印。“他最终找到了可以拯救范塔西亚的魔咒，他代表着‘通过踏上内心道路’来拯救世界的讯息。”（玛丽露易丝·克里斯塔德勒）



剧照：幸运龙福赫尔和印第安小男孩阿特莱尤，电影改编自米夏埃尔·恩德斯的《无尽的历史》，**1983**年

《本时代精神面貌》一文的关键词中有“瞬间”，尤尔根·哈贝马斯用以概括当年的文化生活。“人们对现代声势浩大的运动产生怀疑，告别了功能主义和新客观主义，宏大理论贬值，启蒙的普世性也遭到背

离。现在，长篇和中篇小说都转向传统形态和描述主体本身，城市规划和建筑转向历史主义，社会学转而关注日常生活，电影转向晚期表现主义风格，教堂转向新形式的虔诚和虔信主义，历史学转向叙事，哲学转而关注存在这一问题。全方位的即时性、高级形式的紧缩、精神无政府主义、对具体事物的狂热，甚至在科学理论中也出现了相对主义。文化批判里的象征符号也从俄狄浦斯变为了纳尔齐斯。”

---

[1] 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1895～1986年），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灵性导师。他一生去过全球7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演讲，他的演讲被辑录成超过80本书，并被翻译成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当代的佛教界肯定他为一位“禅”“中观”导师，而印度教界则认为他是位阿罗汉、开悟者。在现今全球包括美国、欧洲、印度和大洋洲都设有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及学校，致力推广克氏慈悲与当世解脱的理念。

[2] 1978年1月27～29日在西柏林的柏林工业大学举行的一个激进主义运动，又称图尼克斯会议，有5000～20000人参加。

[3]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尔齐斯，爱上自己在湖水中的倒影。每日凝视，终至憔悴而死，死后化为水仙花。故在西方语境里，水仙花常指自恋、顾影自怜者。

[4] 德日进（本名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法语名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J，1881～1955年），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耶稣会教士。德日进在中国工作多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5] 水瓶纪（The Aquarius Age）大概将会开始于公元27世纪，是十二个星座年代其中之一。根据不同的星座学家计算，人类进入水瓶纪的大致时间为公元2638年（Elsa M. Glover），公元2654年（Max Heindel），或者2680年（Shepherd Simpson），不过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他们的计算已经十分接近了。1929年，国际天文联会界定88个星座。根据双鱼座与水瓶座的边界划分，水瓶纪大概开始于公元2600年。

[6] 本笃会又叫本尼狄克派。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于公元6世纪由意大利人本尼狄克创立。因为该院的会服为黑色，所以该院的修士又被称为黑衣隐修院修士。入院修士要发“绝财”“绝色”“绝意”三愿。该会强调“读经与生产”“祈祷与劳动”，重视教会音乐。

第16章 多元的魔力

文化为所有人

传统文化行为遵循一种古旧的、只唱赞歌的美学。现在的文化政策正是反对这一点，这个想法或是在1968年学潮时产生，或是受到学潮思想产生。公社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早在1965年，有一个工人团体就已在同年于纽伦堡召开的德国城市议会上演说了一种文化政策的概念——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受到精神生活贫乏影响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人们意识到重建城市实则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摧毁城市，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

> 1971年，第十六届德国城市议会全体代表大会在“拯救我们的城市，现在！”的口号中召开。美国社会学家约翰·肯尼斯·葛布瑞斯在会上发言，猛烈抨击大城市里的悲惨状况，他认为，这个问题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城市”方可解决。葛布瑞斯提请注意一个事实，人们观察到美国的发展，几年之后，世界其他地方就开始效仿。这样说是不无道理的。城市成了工业发展的竞技场。利益最大化成了一切的准则。“在经济化的城市里，我们可以找到几乎所有问题的源头。而正是这源头成了今天的摩登都市的标志。”（此讲话题为“利益驱动——特大城市最终通向墓地”。）

在这样的形势下，1974年奥拉夫·施温克、克劳斯·雷弗曼和阿尔方斯·施皮尔霍夫联合出版了《新文化政策辩护词》。书中，作者们提出，国家的义务包括让公民“有能力”自由地支配业余时光。他们认为，倘若人民没有足够多的文化创作，尤其是当他们甚至连如何开始文化创作都不知道的时候，和平与兴旺就会受到威胁。在1960年代，文化政策为“大颂赞歌文化”和“节庆活动文化”提供了最好的发展空间，但从1970年代初起，进步的文化政策家就开始克服为环境所致的懒惰，他们收集了大量的理论“粮草”，作为“突围”时“长途行军”的支撑。尤其是一些城市的文化部门负责人，不惜亲自“下水”，做改革这件吃力不讨好的活

儿，他们不想等到所谓的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反正也没几个人相信——真正发生时才来做。经过长达数年的有关中小学和教育的讨论——尤其在教育改革上吵得不可开交——人们开始提出“文化公民权”。在奥拉夫·施温克的领导下，新教学院Loccum自1970年起成为讨论的中心。1974年，在法兰克福的一家林务所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在奥拉夫·施温克、希尔马·霍夫曼、罗伯特·容克、皮特·帕利兹、罗塔·洛美因、迪特·索伯茨威格、阿尔方斯·施皮尔霍夫和赫尔曼·格拉泽的倡议下提出了建立文化政策协会的构想。该协会于1976年6月在汉堡州阿托纳市政厅成立，自此作为文化政策的协调方、信息来源和论坛而发挥作用。

奥多·马夸德称，美学、文化学和人文科学将成为“治愈良方”：它们可使人忘记现代化带来的生活世界的遗失，它们为这个日益苍白的世界添上急需的色彩。现代化，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即是“去魅化”。但“去魅化”是可以通过审美创造的魔力得到补偿的。真实生活中的去自然化激起了人们伤感的那一面，比如对自然和历史温情脉脉。在一个看不透的、日益冰冷的世界里，自由、高高飘扬的文化艺术会代替那些抽象的、形而上的玄学，使人振奋。

青年文化的零活儿

“经历饥渴症”“彩色”“告别原则”是新的青年文化的兴趣所在。1970年代——米夏埃尔·鲁茨基说——是一个迷雾朦胧的年代，但它并不冰冷，而是颇具暖意，人们试图通过“发生点儿什么”的方式来驱除迷雾。重要的并不是说出真相、避免错误，而是触碰即将在迷雾中隐去的真实。终于，人们需要来制造一些“经历”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关于真理的问题，就如关于道德的问题一样，将被束之高阁。

人们想要把工作压力、疲倦、缺乏、自我局限、拖延症踢出日常生活，用轻松、热爱生活、自发性、无拘无束和享受来替代。“生活的模

样不应该被成年人制定，成年人的敏锐早在迪斯科里呆滞”，在“严肃里消散。迪斯科厅真是个好地方，因为人们可以在那里建立联系，可以自娱自乐，可以幻想艳遇，可以自己站在灯光下成为焦点，也可以在安全距离之外静静观察众生相——这是一个充满秘密的地方，这里没有明亮的白天和冰冷的霓虹灯，它们会把一切照得纤毫毕现。当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唱起‘老师请别管孩子。嘿老师们，请别管我们这些孩子’时，青年们会觉得从大人们的‘教育帝国主义’中获得了短暂喘息”。

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成立于1965年，同1962年成立的“滚石乐队”一样，属于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流行乐队之一——当然，更早成立的“甲壳虫乐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甲壳虫乐队”（成立于60年代初）演唱四人重奏的流行音乐，从1966年起就不再开音乐会了。1970年，“甲壳虫乐队”成员单飞，乐队解散。吊诡的是，他们解散后的那一段时间的流行音乐却正是由“甲壳虫乐队”来“定调”的：他们那些振奋人心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热爱，对青春人生的享乐，那些充满感情的力量和能量的宣泄（他们歌里那些“Yeah，Yeah，Yeah”），一切都正符合一个想要挣脱抽象、严肃、纪律和意识形态的青年的感受。*Let it be* 是他们的告别之作，却毫无准备地规划了新的青年环境：坚持自我。直到90年代，共有50亿张“甲壳虫乐队”的唱片售出，包括专辑 *Pepper’s Lonely Hearts*，*Club Band*，*Yellow Submarine*。该组合划时代的文化意义从1980年约翰·列侬遭受枪击身亡后受到的致敬上可见一斑。这位乐团的灵魂人物曾将那富有革命性的、青春的激情转化为他的音乐风格，却在40岁那年于纽约被一个“古怪的人”枪击身亡。



朋克青年和摇滚青年在汉堡的一次街头庆祝活动中，**1970**年代

米夏埃尔·鲁茨基于1980年代创作的《等待期》不再讲述“经济饥渴症”的故事，而是充满感情。“等待期”既可被理解为某一个运动的逐渐消亡，亦可被理解为一个新运动的酝酿期。“这渴望，这无聊，这些空虚的时间，逐渐消融在另一些空虚的时间里。”谁还有撑过等待期的气力呢？还有谁值得信赖，可以追随呢？《启示录》的图景会即刻就显现，还是尚在将来呢？等待期的观望本身就可以结束等待——如果还可以观望的话——前提是被观望的对象可以足够全面地描述等待本身。这个过程并不需要阿亚图拉（Ayatollah）。

而“零活儿”（Bricolage）可填满等待期。列维-施特劳斯[1]重提这个概念［他当时用的是“胡乱涂画”（Bastelei）这个词］，意指从现有体系中抽离某些单个因素以作他用的行为模式。风格被时尚取代，风格甚

至等同于时尚。“必须遵守”不再重要，变化才是原则。人们可以“穿上”所有“蔽体之物”。使某人与众不同的不再是“气质”或他的哲思，这些都不够：某人身上最“深刻”的是他的衣着。迪特·巴克如是描绘抗议活动之后的青年文化。

衣着比任何说出来的哲思更有“根本性”。“我在传递信息。信息就是这些穿在我身体上的表达物和为此精选的配饰。”

这类把自己穿成一场秀的模式极易上手：不成熟的自恋、把自己化为“独特人种”的“青年学”、对“性别角色”的抗议、对“不合规矩”的补偿。自我浸淫的青年们——当然也有许多其他样的青年——有一种自我意识，让人无从着手。“零活儿”表达了对世界的容忍及对其“组成结构”的接受、从“理论支持”的选择模式中抽身。“零活儿”消减“复杂”，却并非通过把“复杂”放进“体系”而组织之、结构化之，而是通过把观察到、感受到的排成一列，根据个人需要抽取。在等待期中，再没有对真理孜孜以求的追寻。表面化使人们分心，任何事物被随意地（根据个人喜好）孤立取出并接受。

> “迷茫一代”的外观形色各异，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雅痞（年轻，城市，专业）。雅痞是抗议运动那一代青年的“反面”，他们钟情于精致的生活方式、金钱与成功。“雅痞们喜欢那些有故事的装备：荣卡利马戏团[2]、盆栽棕榈树、安德烈·海勒的焰火、吊床、某个意大利设计店的绘有野性图案的毛衣。用乌多·林顿贝格的话说是，“我们要的是拉普罗茨的衬衣和施沃茨的表”。玛丽-露易丝·维恩贝格以柏林克罗茨贝格一带为例，描写市民文化的衰落和雅痞文化的兴起。他们是这样的：身着细腻的初剪羊毛织成的粗针毛线衫，女人搭配粉紫色工装裤，男人搭配工人蓝色工装裤，身体健康却步履拖拉、顶着爆炸头。这是他们的居住环境：斑斓的地板、松木的架子、旧式沙发和各种废铜烂铁，他们去的酒吧看上去疏于管理，有时很肮脏，用大件垃圾堆砌而成，由大把大把的社会工作者、城市规划师、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议会外反对党派、专业和非专业的租赁咨询家看管。现在的“治愈系”采用一种自上而下“让你快乐”的办法：边缘化的青年应该被拉入日常轨道，异类的生活状况应该得到改善，朋克被视为正常，房屋的改装为多个小隔间。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派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简直就是作为符号而存在，他们的薪酬比普通人略高，偏爱后工业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受到的良好教育使他们能轻松找到服务行业的白领工作。雅痞们可以是工程师、记者、信息科学家、自由职业者、律师、软件或者硬件专家、医生、教师。他们在这个充斥着服务业的工业社会里做一份跟信息有关的工作。他们用新角度来看待事物：酷、高科技、懒散、优雅、有个性、消费、美学。他们并不推崇放弃消费，但如果消费，则必须是在个性基础上的高雅消费。雅痞们接受教育的地点是1980年代的德国高校，他们又回到了“杂家”的状态，什么学科都懂一点（“杂家”就是“零活儿”，与精深相对）。

解放教育学的终点

1970年代初，解放教育学在黑森州的“框架原则”内到达了问题迭现的最高点。这类教育计划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自我决定和与他人商讨决定的能力。这其中也掺杂了某些议会外党派的行为模式。彼时，拉尔夫·达伦多夫[3]认为，框架原则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思想上都是可悲的产物，堂堂的德国文化部部长竟用其大名来遮掩其出版物内容中的一塌糊涂，这一事实已是德国教育悲惨状况的最好证明。在1974年的州议会竞选大战中，中小学教育改革便是各党派争夺的主要阵地：基督教民主联盟以47.3%的得票率成为最强政党，由社会民主党和德国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盟不得不忍受差距微弱的失败。

解放教育系统成了遭受保守势力诋毁的替罪羊。打击恐怖主义则是从根基上铲除批评意见的好学并易上手的工具。即使在左派中，对“入世”的教育学的不信任感也在上升。受强调自发性和批评性思想的影响，严肃追求解放的中小学制度被认为是对个性的束缚，孩子们被按照个性和禀赋分类，彼此疏离，童年也被隔绝在这个追求进步的社会网之外。如上观点在左派之中越来越流行。

妮娜居住在柏林，是工人家庭的小孩。她的父母轮流倒班。为了冲破教育机构的限制，她必须经历漫长的“行军”，这个“行军”开始于她八个月大被送进托儿所的时候。早上6点30分，父母把她送来，下午4点30分，父母把她接走。幼儿园之后是小学。她6岁上小学。柏林的小

学时间长达六年，然后是中学。中学分四个年级，总共有300名学生，他们被分为十个进度。从七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始按成绩分班。到了九年级，分班机制已经分出了四个等级。每隔50分钟，妮娜就必须奔去下一个课程或者学科教室，她经常需要在一天之内出现在五个学习小组当中，和五拨不同的学生一起上课。她并不是例外，尚有1200名学生及100名教师需要经历同样的奔波。

“十一年级的时候，妮娜离开这间中学，去了一所文理中学的高中部。她和其他9个青少年一起，经历了长达半年的班级学习。然后就有了新的课程体系，同学们刚刚熟悉彼此和老师就不得不互说再见。妮娜以较好成绩毕业。她被老师一路要求着，从幼儿园开始直到高中毕业考试。她的学习生涯和学习时间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研讨课时长一个半小时、内容随机，和现实只是偶有交叉。”

“传教般的教育”致力于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铲除专制的传统和结构，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是重点研读对象。这种教育体制认为青少年可通过社会化的教育得到培养。但也有若干持怀疑态度的反对者，公然站在“反教育学”的立场上。1975年，艾克哈德·冯·布劳恩缪尔说孩子们被奴役了。他把教育机构称为“一家巨大的、用所谓的科学精密搭建起来的妓院”，孩子们被迫在其中“卖淫”。

“反教育学”把自己定义为“儿童之友”，取消任何传统的、“上进”的招募制度。它重在支持而非培养。儿童并不被看成尚有缺陷的生物，需通过教育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是从一生下来就承认他们是自由的，也就是有自发性并自主的个体。相较保守派“大胆做教育！”的格言，“反教育学”显而易见要内敛许多：认为人具有可塑性、试图控制人的行为、把教育当成工具，这一切都完完全全忽略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精神。

大声说好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即使专拣其中重要的来说，也是不胜枚举。大体来讲，“大声说好”（多数情况下其实是“大声说好也不好”）作为否定之否定出现，消解了抗议运动的“解

放”重责，用“叙事的欢乐”替换了这副重担。现在，大家重新作诗吧，跳舞吧，玩耍吧，画画吧，从铺天盖地的理论中解脱，好戏开始上演。内容退居形式之后，舌灿莲花、妙想横生和奇幻神话比逻辑推导、抽丝剥茧和醍醐灌顶更重要。大量铺陈的场面效果装饰了内容的平庸，繁复的色彩运用成为保留节目，“经历饥渴”要用讨喜的、言过其实的内容来填充，所有这一切得到广泛运用——直到人们最终对它们失去兴趣。插科打诨的小说小唱同架子十足的正儿八经互相穿插，人们由对现代性的失望一路逛到后现代的出现，在各种十字路口踌躇、回望、离开。

“让我们唱起赞歌……”女诗人乌拉·汉恩写道。她被“大批评家”马塞尔·莱西-拉尼科所发掘，从1980年代初开始就是20世纪最受尊敬、读者最多的作家。（1981年出版《心在头上》，1983年出版《玩耍的人》，1985年出版《朋友之火》，1988年出版《不能更近》。）这位迷人女作家的诗作成功填补了诗歌在描写新的主观和内心方面的空白，把“好”变为符合时代精神、微带揶揄的叙事性歌唱。

皮娜·鲍施的“舞剧史诗”获得了成功（“来，和我一起跳舞”）——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舞蹈，而是大手笔。她的舞剧并非讨喜的小情小调的作秀，而是真正搅动人心的、灵魂深处的大起大落——这全得益于她能将即兴舞蹈也表演得那么完美的功力，这功力使她作为芭蕾舞女主角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她用一反芭蕾传统的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个性与纠结，即便自省充满“水仙花情结”，她也能通过舞台上的一些表达技巧，使它显得很虔诚。皮娜·鲍施的舞剧事关精神上的“经历饥渴”，对此莱蒙德·霍厄用艾尔丝·拉斯科-许勒[4]的一首诗来总结。这首诗中，“逃离世界”这一充满文学性和心理学特征的词，正适合诠释皮娜·鲍施舞剧（包括1974年的《弗里茨》，1975年的《春天的牺牲者》，1977年的《来，和我一起跳舞》，1978年的《通信室》，1982年的《瓦尔泽和内尔肯》，1986年的《维克托》）中的人物形象。《逃离世界》这首诗是这样的：

“我要回到那无疆的/内心深处，/我的灵魂已经绽放，/那永恒的秋光/或许，回归已经太迟，/哦，我在你们中死去！/因为你们啊，把我和你们自己一同扼毙。/我要用纤维把自己缠绕/结束这混乱！动摇/你们会迷茫，/逃走/向我的方向。”

约翰·克莱斯尼克和约翰·诺伊迈耶所编导的芭蕾舞有极多的女性演员份额，除了他俩之外，罗莎蒙德·吉尔默、莱茵希德·霍夫曼和薇薇安妮·纽波特也是杰出的代表，这样的芭蕾舞尤其在青年当中引起巨大反响。“这样的芭蕾舞具有进步性和巨大的创新性，它也有社会批判性，挑战那已然腐朽的旧习俗。它为少数人呼喊，展现丑陋、不美，尤其是在那些并无剧院可建的地方表演。它为自己敢于表现肮脏而骄傲，嘲讽那些机械、人工的标准。在我们的政治维度里，它是偏左的——左边，正是心脏的位置。”但与此同时，这些芭蕾舞剧并不失其艺术上的高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把深奥的芭蕾舞之美传递给观众。观众在舞动的韵律中感到自己也被代入了。



皮娜·鲍施在舞蹈剧《对抗相逢之歌》中的表演。柏林艺术学院，**1971**年

维姆·文德斯的电影《巴黎，得克萨斯》（1985年）颇有狂想曲之风。这部电影标志着电影业另类文化的高峰。《时代周刊》评论说，《巴黎，得克萨斯》是维姆·文德斯最完整的电影，也是史上最棒的电影之一，该电影是一个现代童话，讲述了一个为了大家放弃自己梦想的人的故事。观众和知识分子狂热地发掘这个隐藏在美式外衣后的“白雪公主”式的故事：这是一个被毁的人，放弃讲话、没有姓名，毫不动摇地从沙漠深处一步步蹒跚走回人生；他和在兄弟家长大的儿子一起踏上寻找妻子的道路，他的妻子不想过普通市民的生活，此时在一个通过小孔观看的色情演出团体中工作；在那里，这对夫妻需通过反射镜和通话装置才能交谈。“这部电影出色地描绘了两个尽管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生活的人。”

人们显然是受够了启蒙理性式工作压力，对概念感到疲倦，一些感性的叙事型狗血小故事让他们开心。这些故事不需要观者有多大的理解能力，它们只是被用来消费，从而也“不知怎么地”就能带来安慰——尤其是告诉人们，世界只是它现在的样子，并不会变成各种理论里描述的那副样子，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啊。“启蒙派”的“最后的莫西干人”，比如迪特·维勒斯霍夫，对这类倚靠技术制作、讲述庸俗故事的电影表达了忧思，他认为这类电影的主旨无异于低俗小说。（“我是疯了么？还是你们突然都疯了？要么我看的是另一部电影？”）

维姆·文德斯，1970年从电视与电影学院毕业，毕业作品即是他的第一部电影［自此作品源源不断：《怕点球的守门员》（1971年）、《爱丽丝漫游城市记》（1973年）、《错误运动》（1975年）、《随着时间推移》（1976年）、《美国朋友》（1977年）、《事物的状态》（1982年）］。他一直在发掘新神话主义的道路上奔跑。《柏林苍穹下》是其成名作。《新闻周刊》对此给出双重赞美：其电影的诗意和感性使其他德国导演难以望其项背，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懂得运用间离效果[5]的诗人。在《明镜》周刊的采访中，文德斯声称，电影院应当重新尝试为人服务，“电影院可以像天使一般”。他说，《柏林苍

穹下》中为此设置了天使丹尼尔和卡希尔这两个角色（他们分别由布鲁诺·冈茨和奥托·山德尔扮演），这两位天使飞翔在柏林上空，他们阅读人心，记录下真实感触的瞬间——这一点是受到副编剧彼特·汉德克的影响："这与观察一个孩子、种植一棵树不一样。这需要热情……由此，不重要的变得重要、醒目、真实。"



哈利·迪恩·斯坦顿在维姆·文德斯的电影《巴黎，得克萨斯》中

年轻的拉尔夫·温克勒来自德累斯顿，四次被美术学院拒收，前去拜访马勒·格奥尔格·科恩——后者赶在柏林墙修建之前由东德迁居西柏林。当他第一次到达西德时，还认为唯利是图者很快将遭到毁灭，他们看似强硬的外壳很快将荒草丛生，"那里只有野马嘶叫、阒无人声"。后来，"滚石乐团"的魅力使他了解到，"新人类"并不在东德，而在西德。"新生活在西德展开。我对这一认识颇感震惊。"从1980年起，温克勒本人也住在西德，有时还会住在伦敦，用他的话说是，"被东德一口

吐掉，西德又不愿意吃”。后来，他用A.R.彭柯的笔名跻身当代最成功的艺术家之列。他对冰河时期的洞穴艺术有特殊偏爱，用A.R.彭柯的笔名向莱比锡的地理学家阿布莱希特·彭柯致敬，后者因其对冰河世纪的出色研究闻名于世，温克勒在少年时期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其著作。

东德体制下的经历塑造了彭柯的个性，他又将此转化为充满感情的、活动的密码（他的艺术作品杂糅了人物形象、象征和信号）。他背离了在东德已变质为专制教育的启蒙思想的教育，转向古老而又迷失了的“我”这一断层，正是“我”组成了谜样的“存在”。他象形化的作品以神秘感的流失为主题，后者正是功能理性主义所带来的诸多后果之一。对“过渡”（《过渡》亦是彭柯最著名的画作之一）的渴望就旨在完全扬弃感情-理智及古代-现代的两分法，否定之否定由此成为肯定之肯定。

“大声说好”艺术是片面追求理性的现代灰色世界的补偿。它由彩色走到多样现实，最终走到后现代的多元化。

出版业全力以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视业的大行其道并没有对纸质文字造成挤压。所谓的“古腾堡星系”的末日（马沙·麦克卢汉语）并未到来。这个时期的出版业“全力以赴”，产品丰富多彩到耀眼。

以博人眼球为要务的新闻在“性与犯罪”盛行的经济奇迹时期已见雏形。《图片报》就是此类报纸的成功典型。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倾向愈发强化（当然，商业化操作的电台、电视台带来的竞争压力也是原因之一）。海因里希·伯尔的中篇小说《丧失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又名：暴力的兴起及其后果》，讲述的正是某家报社肆无忌惮挖掘他人隐私及桃色新闻的故事，可谓全无品位及人性下限。该小说发表于1974年，是对当时日益沦丧的出版业的真实写照。日益下滑的状态在1988年的格拉德贝克人质劫持事件中触底：两个绑架者在整个德国四处流窜，

中途甚至杀害了两个人，途中一直被报纸、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大军包围。两个罪犯的言论及采访在警方的干涉下，像热门恐怖片一样播放。

尽管经历了这些弯路，由盟军于二战后建立起的出版及媒体业并未失去其共和式的感召力。所有作品，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依然坚持保证多元性和真实性。1984年，联邦德国内共有386家报社，1267份“特别期刊”，由125个编辑部（Kopfblätter）负责，年销量21083100份。1954年，联邦德国全面引进电视，该年度日报销售量为1340万份，到了1982年，该数目攀升至2100万份。在那些可跨地区订阅的大报纸中，《南德意志报》1984年销量为343600份，《法兰克福汇报》为355500份，《世界报》为205000份，《法兰克福观察报》为189000份。

抗议运动带来了政治的多元化。出版业也在政治的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定位，有许多新的报社成立。一些无政府主义派的出版社成立，一些左派的出版社成立，它们都成为批评资本主义、宣传解放思想的中心阵地。此外，许多报纸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另一条路》《言论》《南瓜仁》《时刻表》《美学》《交流》。当然，当风头转向时，这些报纸必须保持话题的灵活才能继续生存——由卡尔·马库斯·米歇尔和哈拉德·韦瑟主办（稍后由提尔曼·施潘格勒接手）、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担纲的《时刻表》即是一例。之前的非主流运动带来的对理论的倦怠对一些有着坚实“上层建筑”的报纸来说，可谓釜底抽薪。1982年，希尔德格拉德·布莱纳主办的报纸《另一条路》停刊，当期社论写道：“抗议运动中被抗议的那些事使我们的作品失去其效用。因此，像《另一条路》这一类的报纸失去的不仅仅是读者，还有影响力。”

城市杂志——如《点子》《基蒂》《号啕》《石灰路》——有较高的销售量，是非主流运动喜爱的“广播站”。这些杂志在其读者身边的环境里就地取材，因此可谓评估政治和社会情绪风向的可靠标尺。

有言论称，1979年成立的*Taz*作为非主流的日报确实可以继续办下去，作为左派重要的言论阵地，它与那些教条化的报纸相比，令人感到耳目一新、脚踏实地、客观、全面——正因此它甚至得到了保守派

> 的肯定。《法兰克福汇报》赞美*Taz*，说它既有勇气又有能力看穿真实中令人不舒服的那一面，并由此得出结论。尽管存在资金短缺、同某些读者间的矛盾（如*Taz*的编辑办公室常遭女性主义者、房屋占领运动者及某些小混混蹂躏）及办公室派系斗争的问题，*Taz*仍展现了其推动变革的能力。

黄色报纸致力于通过“本地桃色”和“世界韵事”的组合方式驱赶小康社会的无聊——毕竟标准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需要娱乐，因此黄色报纸的做法针对她们“有所动作但别过火”的要求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女权主义报刊在1970年代中期终于做到了使妇女问题获得长期关注。1970年，在柏林出版了第一份女性杂志《佩拉基娅》（以布莱希特的一部戏剧命名），出版者是“妇女解放运动组织”。1976年，《勇气》杂志在创刊仅一年后就获得年销量5.5万份的可喜成绩。由爱丽丝·施瓦策于1977年2月创办的《艾玛》年销量20万份，成为世界第二大女性杂志。1983年竟出现了59种妇女杂志，达到顶峰，但其中多数是昙花一现，此后又回到1977年的状况。《勇气》不得不于1984年停刊，《艾玛》1986年则只售出6万份。

不断增长的“经历饥渴症”也体现在针对特定读者群的报纸的增长上。1970年代开始，这类报纸的名称数量翻了三倍，销量翻了四倍（每周约有4000万份）。它们关注不同的兴趣群体：健康、运动、环境、爱好、解放、生态、神秘主义、时尚、生活方式。1975年以来最具有活力的大出版集团是格鲁纳&雅尔（Grunner Jahr），新发行12份报刊的鲍尔集团，新发行5份报刊的施普林格集团和新发行4份报刊的布尔达集团。1974～1984年出现的新刊总销售量为10万份，这些大集团的新刊销售量占总量的1/5。

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形容彼时的文学艺术类期刊状况再贴切不过（“一个走了，另一个又来了”）。《月份》于1978年重整旗鼓后长时间低迷不振。由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亲自操刀的《泛大西洋》也经历了和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为知识人定制的杂志”的《韦斯特曼月

刊》同样的失败命运。与之相比，《水星》杂志则在经历编辑部换血之后得以保持自己的风格，虽销量不算太好（5000份）但也不至于倒闭。*L’80* 杂志——由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和约翰诺·施特拉瑟创刊，当时名为*L’76* ——直至停刊仅售出6000份。《法兰克福季刊》1985年与有社会民主党倾向的《新社会》合并。1987年欧根·科贡的逝世使德国出版业丧失了一名最具影响力的代表。“科贡及其伙伴瓦尔特·迪克斯是两代出身平民、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的导师，这两位共和主义者试图通过工人运动的方式把这些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教育成公民。”出于这个原因，科贡从1946年起就承担了《法兰克福季刊》的出版工作。

> 执“反文学精神”的抗议运动过去后，许多文学报纸又重现江湖——其中有一些是非常小规模的，最著名的是《写字簿》《升降机》《墨水瓶》。《重音》《新德语册》《技术时代的语言》《今日剧院》《鱿鱼》则长期致力于文学素养的培养。一系列有特定主题的报刊后来被出版社以系列口袋书的形式出版：“皮博尔”出版了《电梯》、“戴奥真尼斯”出版了《墨水瓶》、“罗沃尔特”出版了《文学杂志》、“费舍尔”出版了《新观察》。文化类栏目出现在日报中，这些报刊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作为重要卖点的主题，它们通过周末增刊的方式与传统的“大杂烩”式的报纸展开竞争。

亨利·南恩治下的《明星》同鲁道夫·奥格斯坦治下的《明镜》间长达数十年的竞争最终在1983年以《明星》失败、《明镜》占上风而结束。“对于历史学家和纳粹的遗老遗少来说，这意味着数星期、数月甚至数年的争执不休。”这整件事原是《明星》杂志记者戈尔德·海德曼的一个骗局，此人因发表坚信纳粹的骗子康拉德·库姚伪造的所谓希特勒日记，为《明星》编辑部带来9300万马克的收益，当然，编辑部也为它的轻信付出了代价。此案最终走上法庭，成为“20世纪最具轰动性新闻”之一，审判过程被详细记录下来，这直接导致《明星》1984年的销售量锐减了15万份，广告部的损失达到12%～15%。最糟糕的是，《明星》杂志从此失去在出版业居高临下的风头。曾在《明星》工作至1980年的埃里希·库比用“投机取巧的混乱制造家”来形容该杂志创始人亨利·南恩，他甚至认为，南恩缺少节操，很有可能也是另一家黄色杂志的出

版人。

《明镜》号称“杂志业的一驾马车”，至1987年它诞生四十周年之时，一直稳保其重要地位，从未间断——它的特点是爆炸性地揭露事实、记者刨根问底、信息丰富可信。1986年，它每周的平均销量为900万份，其中大约13万份销往国外。马丁·瓦尔泽认为，《明镜》从未和任何社会势力保持长时间的“盟友”关系，它总是“很快成为反对政府的那一派，但又同时是反对反对党的那一派。《明镜》从不持续地和任何一方、任何党派、任何权力派系做朋友”。他说，《明镜》常使社会免受官员的无良、当局者的洗黑钱和个人崇拜的毒害。“所以，大家应该感谢这份报纸。”

---

[1]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年）是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他所建构的结构主义与神话学不但深深影响人类学，对社会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也有深远的影响。

[2] 荣卡利马戏团，总部设在科隆。1975年由伯恩哈德·保罗和安德烈·海勒在维也纳成立。

[3] 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Gustav Dahrendorf，1929～2009年），达伦多夫男爵（Baron Dahrendorf），德国裔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自由派政治家，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4] 艾尔丝·拉斯科-许勒（Else Lasker-Schüler，1869～1945年），德籍犹太裔女诗人，表现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5] 间离效果，又称陌生化效果、疏离，是德国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布莱希特所提出的戏剧表演理论，是指将观众疏远于戏剧或电影，这被布莱希特称为叙事剧（史诗剧）。布莱希特认为戏剧应为政治服务；观众对舞台上的戏剧投射情感会妨碍观众的冷静判断。在剧本的创作上，他多以异国的、模糊的时空背景，并运用说书人讲述故事，以达到观众与剧情间的疏离效果。

第17章 后现代

启蒙批判和玩世不恭的胜利

阿尔弗雷德·多布林说，寒冬压在头顶，我们住在山里，受到危险和贫乏的威胁。欢乐总是短暂，阳光总是苍白，就算它们偶尔临幸住在雪山里的我们。“突然响起了音乐，一个老人摇着手风琴，跳舞的人们旋转着——这震撼了路过的人：周遭的一切是如此野性、如此闭塞、如此苍白、了无希望。突然，有了一个声音，一个欢乐的声音，一个无忧无虑、纯粹的欢乐的声音。”

尼采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所描绘的伤感画面仿佛是后现代时代文化景观的一个缩影（尽管后者从整体上主要是乐观的）。尼采仿佛后现代的祖先，因为他是第一个捕捉到“启蒙的辩证”是新时期的命运，并对理性主义的衰落同时抱有乐观和悲观态度的人。对于尼采来说，“所有因素迅速地、出乎意料地碎成千万片，它们消解在永远流动、永远流散的变化之中。现代的人们不倦地把一切过往编织为历史”。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有了对生命的整体性的渴望，这种渴望只可通过情感、本能、审美、神秘感去捕捉和理解，但尽管如此，仍然不无讽刺。

> 后现代是对现代的一种回答。这种回答基于一种观念，即过去若不能被摧毁，再看它的人们就一定会用新的方式来解读：这是不无讽刺的，也并非出于无知。后现代的姿态，在我眼中，就仿佛是一个男人爱一个博学多才的女人，所以他不能对她表白说：“我从心里爱你。”因为他知道她知道（她也知道他知道）这句话是，我们意大利人会说是莉亚拉 [1] 、德国人会说是海特维希·科特斯-马勒 [2] 写的。不过有一个解决办法。他可以对她说：“正如莉亚拉在我这种情况下也会说的那样：我从心里爱你。”在这个时刻，当他避免了无知的假设、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即人们不能装听不懂了之后，他对这个女人说的是他想说的话，即他爱她，但他的爱并非出于无知。（翁贝托·艾柯 [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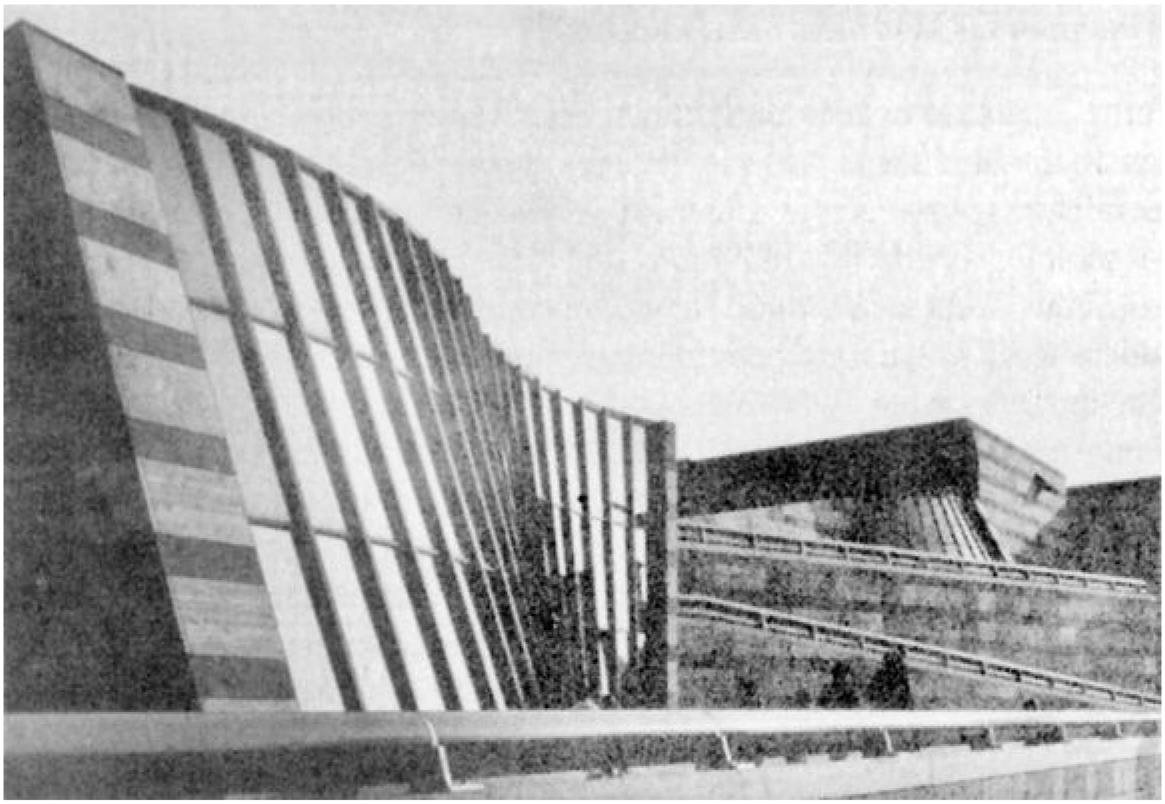
悲观的后现代主义不再相信世界自有“理性”和“意义”，尤其是对通过功能主义理性（即技术）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深信进步的历史观（黑格尔和马克思尤为强调这一点）感到深深怀疑。受过教育、作为理性存在的“人”的主体失败了，继续起作用的权力也应被解构，这样想象力才能有所发挥。“绝对浪漫主义”的敌人是绝对的系统化思考，后者通过各种“宏大叙事”传递各种理念（如自由、平等、博爱）。当时的人们把理性主义的扬弃当成启蒙的挽歌，这个想法使那些赞成“终结启蒙的错觉”、迎接“欢乐的声音——无忧无虑的、纯粹的欢乐的声音”的人欢欣鼓舞。

利奥塔德说——此人是法国最重要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之一——19～20世纪，人类已经为追求整体和同一、概念和感觉之间的统一和透明的、可被交流的经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若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对整体宣战。我们应正视那些不能被表现的，激活那些充满争议的。”（鉴于抗议运动早就已经提出反对整体性，反制度化，反对现有的、传统的市民文化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诉求，我们可以说这些诉求已具有后现代的特征。）尤尔根·哈贝马斯觉得，利奥塔德和其他后结构主义者的思想里蕴含着新保守主义，追求对现代性事业和启蒙的、解放的思想的背离。

假如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正是哈贝马斯1980年9月在法兰克福被授予阿多诺奖时的演说的标题——如果启蒙重现它开始时的热情，并在兼顾历史发展的前提下审视其主张、概念、方法和目标的话，这项“未竟的事业”便有望完成。假如现代性从自身开始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不再以经济建设，而以社会的生态重组为目标），它将重新有能力成为混沌中的指路明灯。

沃尔夫冈·韦尔什反对悲观主义者所持的“启蒙失败”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的中心意义在于其后理性主义，它深刻洞察到那个从人类学

角度得到验证的、广泛的理性概念的重要性，20世纪的现代性本身就是在宣扬这个概念。现代性所缺少的这个东西将在后现代被广泛的真实所消解。韦尔什为此特意选用“横向理性”这一概念，用以为身陷批判的理性辩护和重新定义。



斯图加特的国家美术馆，詹姆斯·斯特林建造，**1984**年

传统的理性主义容易沦为控制和程序化的机器，这一点需被摒弃。但若对理性抱有笼而统之的怀疑态度，那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对理性有意义的责难正是通过理性的方式才得以提出。重要的是，重新整合那已被无数“理性类型”（分析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历史理性、机会理性、参与理性）割裂成千万片的理性。

“并没有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态度比另一种更加理性——它们最多只是比另一种更有趣罢了。审美的差异取代了理性的分别。就算并没有更好，仅仅是不太一样，人们也有权偏爱这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只是，出

于理性的偏爱在此刻让渡给了冲着‘更有趣’而去的审美利益。”（赫尔穆特·F.施皮纳）

乌尔里希·贝克[4]认为，是时候砸掉符号的二元论寻找符号间的共性了，在此之后，就可以明白，其中哪些在今天已经受到考验。“问题是这样的（用传统的话说是这样的）：怎样才能联合真实与美、技术与艺术、经济与政治等呢？当交流的符号互相运用、彼此相融，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既不是A，也不是B’的第三者，一个全新的符号，使新事物成为可能并长时间显现的时候，会出现哪些真实、哪些理性呢？”

当人们艰难地尝试着从思想上接受之前被认为是“强有力”的启蒙思想也有弱点的时候，玩世不恭成为一剂良药。彼得·斯洛特戴克的著作《玩世不恭理性的批判》（1983年）所取得的成功让人们注意到某一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心理世界，他们缅怀理性的失败，但同时却既未对丢弃理性做好准备，又没有足够力气去承担启蒙这项未竟事业的工作。人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关于启蒙的说教，启蒙却在过去从未得到贯彻，现在也没有发生。“这种意识既自觉占据制高点，又自叹命薄，它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均与自己无关。这种想法的错误已经危害到它们自身。”如今，全球的“上层建筑”都有所行动，而非追求“更好的知识”。因为行动没有错觉，且脱离权力。如果没有挖苦和讽刺，当今的启蒙和它的历史之间不可能有健康关系。现在，我们必须在对开头保持“忠诚”的悲观主义——它让人想起颓废——和失礼而愉快地继续最初任务二者之间做出选择。

> 从心理学上来讲，人们可以把现今的玩世不恭者理解为感伤主义的边缘。玩世不恭者控制了其抑郁的症状，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保有对工作的热情。对，虽愤世嫉俗却有工作能力，这一点正是现代玩世不恭者的精髓——尽管有那些事，经历了一切事，他们还是可以做到。这个社会的各种关键部门都被这种玩世不恭者的态度所统治：代表团、议会、监督机构、企业领导集团、教师、医生、院系、律师办公所、编辑部。某种小聪明的辛酸是他们行动的底色，因为玩世不恭者绝不蠢笨，他们看透了一切，看到了虚无，他们知道一切终

将走向虚无。他们的精神系统有足够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足可以把对自己欲望的持续怀疑转化为生存的动力。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做这些，是因为短期的物质压力和自我动力说的是同一句话，这句话对他们说，必须这样做。其他的做不做无所谓。正因为这样，新的“入世”的玩世不恭者才理所当然地有一种自己仿佛牺牲者，并把更多人变为牺牲者的感觉。

保罗·费耶阿本德[5]“一切皆可能，一切皆可取”这句格言也大大活跃了德国的科学理论界。理性和科学被一直解构下去，直到达达式的“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在那里，它们和其他传统一样待价而沽：苍白的怀疑主义使它们平凡，审美的颠覆使它们没有生气。

形式比内容重要；欣赏的诉求比道德的约束重要；流行文化和科学毫无高下之分；语言主宰思想；风格和论证一样有内涵。“艺术家们”面对混乱的、支离破碎的现代世界时，常带着嘲讽的“无所谓”的心态。这个世界同以前那个由系统理性和科学理论组成的有序宇宙再无一点相似。

费耶阿本德理论的关键词受到狂热追捧，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人们开始觉得这些理论逼人太甚，由挫败感生出厌倦之心。“超越道德”的无所谓取代了进步。斯洛特戴克认为，用放弃哥白尼震撼做宣传的托勒密裁军使人重回感官，这么说是从获得满足的主体快乐的角度出发的。费耶阿本德还认为，沃霍尔“一切皆美”的口号保证了万象自有价值的权利并尊重了小人物的严肃性。

亚快乐、过路人、拯救者

现代的亚快乐随着无孔不入的电信技术深入人间，它们就像是用电缆连接的洛可可艺术一样，并不意在启蒙，而是“让人更蒙昧”。那些表现出“蒙昧”样子的人，其实是因为受够了一波接一波以批评为己任的启蒙者的理论。他只不过想酷（cool）一点过活，并不是想真的把自己冻死。“曾经有‘无意识的无知’阶段，后来人们意识到‘完全有意识地知道

自己无知’的境界难企及，现在，有人发明了第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无知：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米兰·昆德拉）模仿成完全可以承受。”（伯恩德·古根贝格）

爱情不再以“真正的”爱情的形式完成，而是“亲密关系的编码”；人们通过“无休止的胡言乱语”把“对恐惧的恐惧”驱除在生活之外，以此来避免存在所带来的难题。“整体而言”，再没什么意义值得发掘。可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愿意因为生活“没有意义”而停止从中获得快乐，自导自演的亚快乐应运而生。“大快乐就是小快乐。如果有人说他感受到了快乐，那没什么值得嚷嚷的。因为，小快乐中的主题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是否应该拒绝快乐的标准。在这里，某种没有标准的自我映照就已经足够。这里没有那些苦苦相逼的二元论：什么是真实的爱，什么是假象的爱。这种二元论建立在对社会交往中他人行为的分析上，非常影响情绪。”（尼古拉斯·鲁曼）



博托·施特劳斯的戏剧描绘了联邦德国的后现代式社会。此为柏林剧院的海报，**1973**年

爱情的去本体化发生于亲密关系的心理中。“处在亲密关系中的人做着他们早已预演的事，用已经练习过无数次的语言表达心声，两个

人都处在一种早已设定的模式当中。这里，随着早已精心设计过的、看上去仿佛有宗教性的节奏进行着某种世俗的仪式。希望和恐惧、力量和需求、情感和想象都不能自由表达，它们呈现的方式好像有导演安排一样。人们像驯兽一样驯化灵魂，同时也像驯兽一样驯化自己的欲望，自觉自愿地走入同一种模式。”约格·波普认为这种所谓的“关系习俗”包含了一种对性抱有敌意的道德：这类人的代表当然没有站到布道席或者讲台上，他们躺在席梦思上，穿着紧巴巴的牛仔裤、蓄着长发，读卡斯塔尼达[6]，听平克·弗洛伊德，这帮人尤其喜欢谈论心理问题。“梦见自己在环形楼梯上行走的人表示被困在自我和他人的牢笼中上下彷徨不得意。”他们用毫无意义的废话所带来的轻松平衡内心快乐的缺失，他们不再体会感觉，而是游戏感觉。

享乐主义的快乐并不想“识别色彩”，只想“享受彩色”。他们和那些唱着“别害怕感受快乐”的美国写歌人以及指挥罗伯特·麦克菲林一起游戏人生，他的德国好同志乌多·林顿贝格如是评论道：“玩偶跳舞⁄别再怕所多玛与蛾摩拉[7]⁄保持快乐，保持享乐⁄直到在棺材里变为灰烬。”

博托·施特劳斯的作品主题即是描写那些从“意义”上剪裁下来的无数个“今天”的碎片是如何无休无止地扩散的。无语言、无社会、无历史、无意识、无特征、无希望、无理由——他剧作中的人物是仅凭性格辨认的路人，这些人只是顺带做了什么事，别人也仅把他们当路人甲（en passant）而已。媒体社会、消费社会铆足了劲，在它们油光可鉴的产品上照见了自己。“这个社会是从历史中剪下来的断片，它把未来当作一张彩色广告单，无视生态破坏和核危机，无视对人类的屠杀和饥饿的蔓延，每天都在拖延。这个社会长成了今天这种样子：每天都在‘见喜不见忧’地自欺欺人，对自己说这样下去永远没问题。”文化工业的机制和运作隔绝了真实、直接的生活信息。施特劳斯认为，人们野心勃勃地想要掌控真实，却因为分析理性半途而废，启蒙的、辩证的、充满人文社会情怀的思想被丢弃、埋葬。”

“他听见男人和女人们搭话的声音。那是两个几乎彼此不认识的青年。只是听上去是两个而已，谁知道真的有多少个？他们说着话，好像整个市场都在发声。他们不是说话，而是启动持续交流的模式。他们不是说话，而是互换惊慌的废话和快餐般的语气重音。”

在《卡尔德维喜剧》里——这是一部影射消解的现实的戏剧，所以它不追求任何意义——“男人”说：“我想对你说什么来着，不是真的。我现在好满意，嗒嗒啦嗒。我们把一切都藏在意义生产里了，嗒嗒啦嗒。这么做值了。现在我们可以写下新的和谐记录。嗒嗒啦嗒。”

彼特·汉德克转型为新内心主义诗人，此举招致部分文学批评家比对待博托·施特劳斯更为尖锐的讽刺。从1970年代末开始（《缓慢回家》，1979年），汉德克的文章就越来越多地充满“求治愈”的心态，这心态正与时下的反启蒙主义相吻合。汉德克反对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的文章，他的诉求远比这些深刻。他自诩为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作家的接班人，这些作家是“他的兄弟”。在1981年的一次谈话中，汉德克承认，他过去四五年的作品写的全是三千年前的事儿。1975年出版的小说《真实感受的时刻》的主人公格雷戈·柯施尼格是一名奥地利驻巴黎记者，汉德克给他安排的经历标志着诗人的转向——他开始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信差”（语见《复习的想象》，1983年）。“那时他的经历，即使还在他试图接受的时候，就已希望自己永不忘记。他的双脚陷在沙子里，他看着自己的脚，同时也看见了另外三种东西：一片栗树树叶，一面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小镜子，一根小孩用的头绳。这些东西躺在这儿已经有段时间了，可突然，它们全变成了神奇的事物。‘谁说世界已经被发现了’？”

> 彼特·汉德克的“揭示文学”——从戏剧《走出村庄》到充满自传意味的小说《无人处的一年：新时期的童话》——中有一股“舍我其谁”、颇为自傲的腔调，不想在现实里弄得两手泥污，而是要远远逃至那精美的风景中（约阿希姆·凯泽）。请并不要把这当作多余或者保守或者仅仅是表面功夫。汉德克很难被感动，因为在我们这个内容丰富的世界里，绝大多数肯定的、积极的、赞美的主题已被滥用，失去原有意义、像是谎言。米夏埃尔·克吕格在一次关于汉德克的讨论中，把理性和启蒙称为与健康的人类理智双生的丑兄弟。这话很清楚地表明反启蒙主义的先锋们的影响已经多么深入人心——尤其是批判启蒙离生活越来越远。“站起来吧。向着天空的方向。看看太阳光，相信你们沸腾的内心。你们的眼皮颤抖，那就是真实的颤抖。让色彩绽放。记住这澎湃的诗歌。逆风而行。走出村庄。”

类审美化和符号的兴起

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和广受喜爱的随意性不可分割。对美学领域来说，这意味着艺术家作为“信念制造者”的职责已经多余。20世纪八九十年代，“真善美”的三叠系作为艺术的审美道德和社会属性不再受到重视。新的美学自立门派，中心思想是认为艺术就是理想的现形，这一乌托邦式的观念深深打动了有责任心的艺术及其“思想美学”。那些连“现在”都想放弃的人当然更不乐意背上既遥远又难以企及的“未来”的重压。若还要追求艺术作品的“剩余价值”，那简直都能引起躁动了。

艺术史家马克斯·伊姆达尔“揣测”后现代“其实是现代的某种特殊消费方式的表述而已，因为它从过去的不同年代抽取不同的东西，用一种类似于审美的方式把它们塞到一个模子里，混淆视听”，它仿佛“某种纯粹的对名人警句的运用，意思就是说，运用仅仅是为了获得抽象的满足感或不痛不痒地表示自己比较有文化，并不是真的以严肃的态度相信这些警句的内容”。

“审美的时效化”其实只是一种肤浅的美化而已，把事情变得更漂亮，为“经历”搭建空间。连火车站都被改建成“用月台连接的感官世界”。艺术机构的作用是批量生产“经历”。

沃尔夫冈·韦尔什称1990年代的“美化热潮”为利用美学的类审美化（商品美学、传媒美学、城市名片等）。“类审美”指的是真正审美所需的决定性条件——敏感——缺席的状态。如果说真正的审美可以强化感受，那么类审美则是以“无感受”为纲——它使人们丢掉敏感，阻碍人们的感受甚至使人们不再感受，而这个效果是全方位的：身体变得迟钝，精神也被蒙蔽。

“人造的经历使人们失望，因为它在真实世界里什么也不是。但这个失望却让人们越来越快地从一个人造经历投身下一个人造经历，如同

饮鸩止渴。生活与真实可以通过审美的介入得到改善——这个古老梦想似乎在消解。很明显，那些转瞬即逝的、表象的瞬间被艺术接管，用平板的方式实现。”

但与此同时，韦尔什试图从哲学上把美学塑造成从自我毁灭（消解于虚无）中拯救民主社会的形象。“反抗的后现代美学”成了普世理性的一部分。对他来说，美学思想其实是真实的，因为它多多少少可以让人想起那个主要是依据某个美学理念构建的事实。比如作为政治文化重要因素之一的宽容，如果对异类不够体察，那就是一条无用的原则。审美通过使人们变得敏感的方式介入社会进程。

后现代技艺高超地模糊了理论之间的边界，语义学由此被密码学消解。内容和含义的作用下降。安德里亚斯·胡伊森[8]认为，我们不再站在“恐惧时代”现代主义的对立面。那是苦行僧般的卡夫卡式或勋伯格式的现代主义，那是被动的现代主义，那是价值坍塌的现代主义、疏离的现代主义、暧昧的现代主义、抽象的现代主义，那种现代主义已经完成。不，不是那种。后结构主义给我们带来的现代主义由无数文本不断编织而成，它以否定来证明自己：否定代表和真实、否定主体和历史。这样的现代主义在判断“当下”以及由此而生的那种对抽离状态的赞美时——在罗兰·巴特[9]看来，这并非恐惧，而是愉悦（jouissance）——未免显得教条，但它可以带来极度的幸福感。

符号携带内容，人们对它们在什么公认的背景下携带的是什么含义已取得一定共识。人们通过符号互相理解。后现代主义喷发出磅礴的自由，与“恐怖的启蒙”相对，这自由喷发的惊心动魄之处正来自人们一再追寻的“当下”那五彩斑斓的形态。它关心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而是“有事情发生”以及“它是这样发生的”。过去那种强化的深入的思维仿佛被哲学上的“为艺术之艺术”以及“发生”“事件”“动因”三者之间的孤立“解除了武器”。

不确定和问题本身变成了迷人的东西。寻找答案的过程不再揪人心肝，而是像变戏法一样有趣。重要的并不是寻找真理，而是享受过程。宏大的“叙事”、人类进步史中的那些“被科学证明的道理”以及被怀疑精神和某一个预定目标推动的“教育”不再具有信服力。一切理念的、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仿佛是普世的“蓝图”变成了虚构。散射与平均摧毁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普世价值。安德烈·格鲁克斯曼说，“新人道主义”正是从被人们意识到并欢庆的堕落本身出发，那是被称作“人性”的、使世界伪善或者更加虔诚的幻想的堕落，这样的幻想，我们在过去几百年中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新人道主义”就是“消极人道主义”，使那些追寻肯定的人失望。

多元而多极的后现代在“绝对主义”上画了个大叉，也就等于在有绝对主义倾向的“全球模式”上画了个大叉。它不离“小叙事”，这些小叙事既无优劣之分，更遑论可供构建体系。世界因为系统化的思考被去魅，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系统化思考本身也被去魅。系统化思考的去魅加上极端的主体批评，这就是后现代的道德。

新的不透明

许多思想家（比如上文的沃尔夫冈·韦尔什）极力想通过各种讨论赋予后现代这个概念以某种严肃的定义——他们对各种术语各持己见，这使得整件事更加扑朔迷离。不过，模糊和迷茫本身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雾原本是后现代主义气候的显著特征。尤尔根·哈贝马斯称其为“新的不透明”，他认为这只能通过“沟通理性”来解决。

> “沟通理性”这个概念无视后现代主义的理性批判，直指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传统理性。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还理性以清白，它既不是工具理性，也不是包容理性。前者把一切都当作物品和对象来对待，后者把一切囊括其中，最终自己变成鱼龙混杂的总和。
>
> 哈贝马斯通过“沟通理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沟通行为”）反转了局势，受到威胁的世界如能重新重用整合和参与的理性，就还有希望。

> 不管是全球性还是地区性问题（战争、军备竞赛、饥饿、贫困、失业、挫败感、侵略、环境破坏、经济危机）都不能通过已经分裂成无数个“亚版块”的社会和政治来得到解决。只有联合一致的思想和行动才可以。

当“语言游戏”借着后现代的精神状态大行其道，拒绝启蒙，故意使用一些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显得“幽深莫测”的逻辑和论证，不透明感就大大增强。如果用理性的方式来批评理性，不就正好证明了理性的坚不可摧么？与其这样，倒不如用“一种花哨的、天马行空的、自行想象的、狡猾或者甚至诗意的思想方法”，既不具有严肃性，又不具有系统性；既不需要对真实性负责，又不需要对普遍性负责。这样的话，别人用任何一条道理都挑不出错处，更无法与之进行有条理的对话。

欧多·马夸德把这种自诩的哲学家称为“专家的替身”，意思是，这种人永远无法成为科学舞台上的真正主角，只可能是靠插科打诨、虚张声势、装疯卖傻混口饭吃的现世宝罢了。克劳斯·拉尔曼以迪特·坎培尔的“时尚哲学”为例，说明这些都是“反对启蒙的胡言乱语”。拉尔曼说，当今的社会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以夸夸其谈和无知无畏为时尚，某些杂志，比如《骚动》（*Tumult*，交通学杂志）和《理性批判杂志》（*Konkursbuch*）为这种时尚保驾护航。这一切使语言变得不像语言，语言的内容竟不再是把事情说明白，而更多的是“脚踩西瓜皮”，溜到哪儿算哪儿。

后现代有一些“反思想的思想家”，这些人中的活宝仿佛溜进大学教室或者编辑部里的小学生，以“让人听不懂”和“让人无法捉摸”为行事准则，若想继续混下去，唯有祈望没人来跟自己的不清不楚较真。这些不清不楚的人会做的只有给无实际证据做填充内容的绣花枕头包上华丽的外包装，同时把“让人听懂”说成是无理要求。

后现代语言的“不清不楚”也有可能是“有教养的抽象”所带来的另一

个后果。抽象原是苏格拉底哲学，过于精致的抽象却使得原本追求精准的苏格拉底哲学走向自己的反面。读者艰难无望地攀登那座远离生活、故意避免直接的“概念”高峰。（特奥多尔·W.阿多诺也算用这种方式组织语言的开山鼻祖之一。）

这到底是机敏的分析，还是故弄玄虚、用概念堆砌的平庸，尼古拉斯·鲁曼也无法断定。他的理论体系以人的形象作为基底，此人把理论从意义里“分离”并“数字化”，此人顺应时势，并不为任何理念所掌控。在鲁曼“冰冷目光”的注视下，根本就没有什么超乎一切之上、以人类主体为蓝本、人类又依此建立某个自由而平等的生活共同体的理性。“有的只不过是老鼠，迷宫里的老鼠，互相窥视，由窥视中建立各种系统结构，但并没有什么共识。”这些系统通过比照自身的环境来相互比照。所有的系统，包括人类个体，对其他人来说永远只是环境，以通过自问自答不断精细化自身系统的方式拉开与其他系统的距离。

> 汉斯·布卢门贝格，用欧多·马夸德的话来说是“一个写问题侦探小说的人”，仿佛一个舞技娴熟的舞者，在许多读者眼里，他是尼古拉斯·鲁曼的对立面。当然，两者也有共同的特点：作为后现代主义者，这两个人都有能力和“揪人心肝的真实”保持距离——不管是作为系统理论学家，提出完全“超脱”的“结构主义”；还是作为语言哲学家，热衷于诠释学。
>
> 在“知识的花园”里漫步，鉴于人生的时间和世界的时间之间的巨大差异，只能是一场不能完成的、靠运气而无系统的漫游。很多人倒下了，他们的未解之谜在时间里风化，有一些永远无法解开，世界打他们身边而过，走得踪影杳然。叙事的“小形式”——那些“零零碎碎的小思想”，在历史中逐渐被集成一捆，其观点的姿态代替了观点中的指点意义散发出五彩之光——这些“小形式”反映了一种“当时当地的思想”。超验论主义者纵情享受红尘，提倡告别原则，他们生命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证明某种“绝对意义”（因为我们死得太早，反正也没办法证明）。哲学神父们讲述着某些故事，人们从这些故事中（就像听法国洛可可时期神父的布道一样）不能准确辨别这是不是宗教。充满使命感的思想家那些神谕般的腔调已经过时了。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情感充沛的小团体又不想放弃那些集大成于一身者，他们能把世界观讲得那么不偏不倚，他们绝妙地踩着“存在”的钢丝，他们现身说

法。

后历史[10]，历史学家的争执和日常史

1960年时阿诺德·盖伦所说的“后历史”这个概念主要是用来描述造型艺术的状况。他认为，造型艺术的发展已接近完成，其后将要到来的是调融混合所有风格和形式，但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人们对“历史终结”之后的时代评价颇为悲观：推动历史前进的理念到此已被使用殆尽（特奥多尔·莱辛[11]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提过这个问题：“赋予无意义意义”）。

随着弗朗西斯·福山的论文（后来成为一本书）《历史的终结？》的发表，讨论到达高潮。在西方理论系统眼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仿佛一部庄严的戏剧落下帷幕。有人认为，随着自由民主对左派和极权右派的胜利，人类可望很快获得幸福，对“人性政府”的追求也就此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任何一个角度，都难以找到一条更加理性的道路了，这意味着，即使连意识形态也不需要向前发展，被西方世界所实践的价值观和衡量标准是普世的。

“历史终结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情绪一致，因为两者都想躺在“后”状态之上大睡懒觉。至于“后”状态之后要发生什么，它们懒得管，只想享受当下。保持怀疑是一种美德，即使在后现代也是一样，而这样做却并没有保持怀疑——观念和判断都被相对化，已经做到的变成了金口玉言，至于没有做到的就让它去吧。

这与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前的东德的社会图景有某种相似之处：那里的人们认为，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就是历史终结，这之后的任何发展客观上无必要、主观上没人愿意，因为由俗世通往天堂的大门已经开启。历史只有在资本主义还没灭亡之前是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后现代在这个由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下的国家完全不会有出头之日。因为所有后现

代所主张的事情都是被禁止的：它的反系统主义、它的相对主义、它那游戏人生的美学态度。在西德的人可以把后现代看作抗议运动时期过后的时代特征，东德却没有这个经历——抗议运动时期，那二十年中的文化生活，各种观点风云迭起，抗议，对立，让人心情激荡。而东德却只有比特菲尔德[12]周围的荒漠以及惨淡的阳光。没有音乐，就连无忧无虑的快乐都是不被允许的。

> 尽管如此，两德统一后，来自东德的杜尔斯·格吕拜因作为一名出色的后现代主义诗人脱颖而出，迅速在整个德语地区获得了声望，这使所有人大吃一惊——就连对他写的批评也表示了震惊。他的诗歌题名——《颅底课》《皱纹和坠落》等——让人容易着迷，因为它们讲的是一些可以兑现的话：没有关于东德的被占领或不被占领的历史的沉思、没有自怜的沉重和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整个没有东德式的美学，有的只是出手不凡的掌控：用相当部分的“暗黑”来表现后现代的“国际范儿”。“诗歌向你走来/柏林墙已经打开/等待的痛苦，圈囿黑格尔那狭小世界里的聊赖/全都过去，还有钢铁般的静谧。”
>
> 1962年出生于德累斯顿、33岁获毕希纳奖的格吕拜因一点都没有表现出等待的痛苦。他聪明地把诗歌写成戏谑的、不痛不痒的混合物。人们原以为东德就只有那高高在上的、无聊的黑格尔哲学，现在立刻忘掉这一点。他巧妙地在影射和故弄玄虚之间保持平衡，此外，竟然还在保持文学上的“政治正确”的基础上表示了沉思。
>
> 弗里茨·拉达茨开始对格吕拜因的诗歌颇为迷恋，后来他却认为格吕拜因的诗歌并非现代性的描写，而更像是时尚连锁效应。“涂脂抹粉的现实意义。好比是用手机通话，那就好像是手机在讲话一样，而不是面对面的交谈。”明星批评家，同时也是《法兰克福汇报》出版人之一的弗朗克·习马赫评论道：“格吕拜因是希望。那种承诺已经兑现的希望。”正因为如此，这位作为诗意的“我”存在的后现代主义诗人很快就凭借世界主义的热情脱离了民主德国的苦海，以惊人的速度在文学的后历史学中取得一席之地。

“历史学家之争”——这是一个1980年代末的文化之争——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右翼保守主义派别提出的“历史相对论”引起了争执：有人认为，在“损失清算”中，纳粹党的罪犯们应该被从有影响力的公共领域中驱逐，这样才能为建立新的国民身份认同腾出地方。但这种做法，就如

同哈贝马斯在1987年7月发表的文章《损失清算的一种：德国历史学界的悔过倾向》中所指出的，与用宪法来爱国的爱国主义相悖。哈贝马斯尤其着重反对历史学家恩斯特·诺特，此人试图提出“犹太人种族屠杀是个人行为”“毒气杀人只是技术”的论调，并试图用某种海德格尔式的语言风格来证明古拉格群岛比奥斯维辛集中营“更本原”。

“历史学家之争”进行到一半，与其有关的出版物所引起的反响程度已经超过联邦德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争论。汉斯-乌尔里希·维勒说，在同主张“重评价值体系”的修正主义的争论中，那些持反思态度的人的辩护总体来说是非常有力的。民众的警觉、自由的公共领域所持的批评态度和历史学家共同取得了这次成功。这表明，大家挂在嘴边、经常被认为受到威胁的政治文化得以保全。这使人心稳固，人们可以希望未来如有类似的争论，那些在“历史学家之争”中向修正主义发起猛烈批判的言论也将占上风。这种共和式乐观的最好证明是：1984～1994年的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他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直从未受到质疑的原因是，此人作为联邦德国最高的政治代表形象，公开抵制把第三帝国“历史化”和为纳粹推诿罪责、减轻责任的做法，这一点从不含糊。

> 1990年代又有一场新的“历史学家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多数德国人都站在反对美国科学家的前线。引起这场争论的动因是丹尼尔·约纳尔·戈德哈根的一本书：《希特勒的自愿执行者》（1996年）。该书的中心论点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原因在于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反闪米特主义。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应，有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说明，德国的历史学家普遍对该书提出的问题采取置之不理或者回避的态度已经是对以上论点的最佳证明，因为此论点事关德意志个人和集体的道德罪责以及他们必须为通过灭绝的方式来实现反闪米特主义所负的责任。
>
> 马丁·瓦尔泽在1998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的致谢演讲里说，他要同那些所谓的“观念战士”做斗争，这些人“手持道德的手枪”，逼所有作家履行“观念义务”。“观念战士”指的是那些“每天都在媒体里谈论奥斯维辛的人。无休无止地展览我们的耻辱”。身为德国犹太人组织主席的伊格纳茨·布比斯指责马丁·瓦尔泽的言论是“精神纵火”，因为后者明确主张“一种视而不见的文化”。布比斯的指责在联邦德国境内引起了广泛

而深入、意见各异的讨论。马丁·瓦尔泽的说法在公众中颇受赞同，在出版界却广受批评，因为他是在用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激活原有的一些想法。人们纷纷指责他那些落后的喋喋不休，其中某些模糊语言很可能沦为反闪米特主义和反启蒙的工具。（健谈或者饶舌原是马尔泽1998年出版的一部广受赞誉、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跳跃的泉》的特点。）

人们对当代史非常敏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建史。封建史学家感到自己颇为小众，希望用“背面敷粉法”来找到一些补偿。在西德，大量逼真的展览和新建的博物馆迎合了人们对于“高贵人群”的想象。伦茨·克里斯-雷腾贝克1980年时说，这些大型展览，无论从概念上还是理念上都没有专业指导，它们主要是由一些感兴趣的人，尤其是政治家或者政客举办的。显然，这些展览主要并不是为了增加人们对封建时代的了解，意识形态才是主要目的。“这是政治角斗士在现代的伟大胜利。”

东德的历史学则长时间采用阶级斗争诠释的办法——农民战争是进步的表现，工人运动则是高潮。后来终于发现了人物和民族的价值，比如强调市民和启蒙的施泰因男爵及其教徒论坛，或者英雄式的布吕希纳及其解放战争。东德试图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衍生出某种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意识，说明它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者的国际主义的整合”，但两德人民之间交流越来越多，很多民主德国人士认为这是要取代德意志民族的本原意识，十分荒唐。在德意志民族身份认同和以“社会主义国家公社”为导向的身份认同间存在着张力，钟摆在1970年代摆向了另一边。

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张把“德国”这个概念从课本里剔除，几年之后，民主德国便开始利用德国历史为自己的历史正名。他们勾画出一个整体的轮廓，首先是萨克森和普鲁士作为民主德国的“原生地”，之后扩展到整个德国疆域。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对普鲁士有了新的认识，某些历史人物，譬如马丁·路德、弗里德里希二世甚至俾斯麦都不再是禁忌话题。民主德国史学界致力于通过新的眼光增进人们对本国传统的理解。该转向首先见于备受关注的论文《普鲁士的两种历史》（1978年），作者英格丽德·米腾茨威在其中写道：“这即是说，普鲁士是我们过去的一部分。”

在民主德国，日常史尽管常被滥用于意识形态，但也颇有科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文化学家尤尔根·库辛斯基和迪特里希·缪尔贝格）。西德在1970年代经历了一次历史学视角的转向（“在你站立的地方向下深挖”）。“人们不再那么轻易就想到‘上帝的瞳孔’或者‘世界精神’。现在，我们开始更加关心自己，以及我们的生活、行为方式和意义模式的来源。大家都在要求用具体的、自下而上的写法来‘书写社会史’。”

当然，日常史热潮扎根于以基础为导向的“历史工作室”，常常为了具体而忽视结构，这种历史观本来是“进步”的，但会因为过于专注纯粹的“材料”以及多面叙事带来的快乐而失去了它引人进步的那一面。汉斯-乌尔里希·维勒说，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美化日常生活，为了对抗冰冷的目的理性和大城市及庞大官僚体系中的匿名者，刻意营造一个看起来幸福的世界。

作为多面编码的建筑

保罗·费耶阿本德有一句格言，说普遍的规则不会导致让“普遍理想”破产的艺术产生，正是因为一切皆被允许，后现代主义文化才成为多重真实的建筑场。审美和方法上的“无政府主义”所具有的潜能也把建筑和城市规划从纯粹功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198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有人开始研究功能主义。不管是社会还是私人住宅，不管是集体所有的建筑还是私人所有并用于商业的公司：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的城市，中心城区都被混凝土所浇筑的堡垒毁得七零八落，在这样的人造城市里，生活质量根本无从谈起。

曾长时间担任法兰克福建筑学博物馆馆长的海因里希·克罗茨称，现代性在1970年代走入了残酷的死胡同。感官、想象、历史感现在正在要求获得应有的尊重。后现代主义当然不仅仅是给空荡荡的功能主义披上迷人墙纸的布置装潢公司。

后现代是1980年代建筑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建筑学的后现代主义起源于美国。在美国，功能主义一度发展到顶峰——这首先得益于受纳粹迫害、流亡到美国的德裔包豪斯建筑学家。冷硬的混凝土建筑所引起的不适感也相对较高（索尔·施泰因贝格常常据此创作漫画）。不过，美国建筑法所规定的自由却不只保证了功能主义的存在，它同样使兼具各种风格的混合建筑成为可能。这种建筑把传统的美学顾虑全然抛在脑后。小罗伯特·文丘里[13]在其著作《建筑中的复杂与矛盾》中建议道，有生活气息的建筑总比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建筑好，哪怕这个建筑本身并不那么成功。

法兰克福市的博物馆建筑曾引起轰动，那便是后现代风格，尤其值得一提的有德国建筑博物馆（设计师O.M.翁格斯）、艺术手工博物馆（设计师里夏德·迈尔）、史前史及古代史博物馆（设计师约瑟夫·保尔·克赖休斯）。法兰克福——用迪特·巴特茨柯的话说——如果房屋没有那些锯齿状的玻璃凸出部位，窗户和门框没有刷上显目的颜色，没有露台，没有弯弯扭扭的楼梯和阳台，以及把这些都连接起来的走廊，那它简直会令人绝望。剩下的东西绝大部分粗笨不可言，那些简陋如史前遗物般的建筑，冷冰冰、让人望之生畏的鸽笼般楼房，被误解的功能主义，嗯，后现代主义就是来接它们的班的。

斯图加特市新国立美术馆的修建（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是建筑在文化领域的一次重大表演。后现代主义借助的无边无际的想象在此被发挥到极致。这位英籍建筑家在这里同时倾注了传统和现代的、抽象和具象的、精英主义和流行文化的符号。他杂糅了传统的圆形小屋作为主体模式，却在扶手上采用了冰蓝和粉红这样的时尚颜色。人称“建筑界的詹姆斯·乔伊斯”的斯特林在建筑上奉行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普遍性和辩证性、时而故意冷静时而有意激起感情的“两条腿走路”法。他对其中如何安排电路甚不关心，并用西方建筑文化中的某些名言来说明这一点，这正反映了一种视源头和语境为一物的天真的历史主义。

“斯特林声名大噪。有人认为可笑，有人认为粗鄙，有人认为贴切，有人认为深奥。他的英国口味在许多流行的相似之处上一再体现。一种娱乐的、叙事的、让人有多重惊喜的建筑风格重领风骚，这种风格并不畏惧产生游乐园或者迪士尼乐园式的效果。”

面对建筑里过度的颜色和躁动的“多重编码”，人们开始本能地追求适度和平衡。终于在1990年代末激起了一场“还简单以名声”的运动——简单，那是“永不过时的时尚”。后现代主义从世界普遍性的角度出发，重新发现作品中的地区特质，减少繁复，但也不过分简化，赋精确性以生命来代替冰冷感，克制过于旺盛的热情，用形式来呈现人性和都市的需要——对文化生态高度敏感的后现代主义极其重视简约。这种简约主义有别于那种以抽象为目标的简约主义：它并不是为了野心勃勃地达到某种艺术高度，而是从实用的传统出发；它并不是为了故意展现某种闭门造车的形式，而是用一种浓缩精简的方式回应无数需求和愿望。

“现在的简单是一种生动的、不易办到的、个性鲜明的简单。也许它甚至会让人不安。但是，它对于当下的意义和现代性本身一样不可或缺。我们所有人都必将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精细的差别

从启蒙美学的角度看，艺术由现代派发展至后现代派是倒退。“一切都是美的”标志着立场和标准丧失，造型艺术可以任意为之。冲着快感而去的艺术观众欣赏的不只是“艺术的吸引力”，还是“市场游戏的吸引力”，艺术在其中只不过相当于股票——根据公司业绩一路高涨或者猛跌。后现代艺术家展示的主要是那些有经济能力的“受教育阶层”的趣味，这些艺术家口中的“精细差别”也只不过是从中产阶级审美品位中提取的。这颇具讽刺意味：人们和大众审美品位的“平庸世界”越来越有距离，可是他们自己也在其中——尤其是他们明明知道，拙劣的作品就是拙劣的作品。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当下的审美形式正符合艺术生产的现状，它的特点是：形式以绝对的优势高于功能，表现方式比被表现的本身更重要。

在“形式主义”的影响下，再没有任何“前进的梦想”可以打动后现代派艺术家了。他们并不为任何历史或者存在的意义所动。假如人们

把“想象”理解为受到理想感召的创作欲望，那么后现代派的艺术是全无想象力的。没人知道，用哪种“语言”才能讲清楚“存在”，“存在”又使用的是哪种“语言”或者人们怎样才能把自己和它扯上关系。“是呀，没有人知道，是只有一种存在还是有很多种存在并行，它只有一种媒介还是许多种。”仅仅只在几年前，在那各种理念和理论喷发的年代，那混乱的、多姿多彩的、充满矛盾的年代，从下接地气的社会批判到纯乌托邦式的“拯救”良方，那时的批评家和美学家还很清楚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分属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艺术流派，坚信某一种学说，他们努力在各流派间搭建起交流平台，他们还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当下的、进步的，知道路要往哪儿走。但在今天，有的只是任意为之和毫无下限。

这倒并不是说从此再没有纯理念性因素被提出或者被推广——但这要看市场需求。有了市场，本已“过时”的东西通过“凹个造型”就能变成“新潮”，就连完全没有任何思想的东西也能通过“凹个造型”摇身变为“具有批判性的努力”。比如曼弗雷德·施内肯伯格，他是一名受过专业教育的、有经验的市场策略专家——这可是一号“时刻准备着”自由出击的人——但他同时也是“documenta 8”这个卡塞尔艺术家圈的领头人和主办人，这个圈子在分秒必争的“排名”中找存在感，却说自己的行为是“艺术在社会领域的回归”。他们宣称自己具有批评精神，那些所谓的批评其实只不过是胡扯。佩特拉·基普霍夫在做客《时代》时称这种现象为“任意随便的堡垒”，在“一切皆有可能”的口号下，乱象纷呈，粉墨登场，如万花筒一般。

艺术理念的衰退促成了多种艺术流派的比肩而立。迄今为止的艺术发展一直遵循着线性规律，现在的结构调整却是要让它走上艺术“百衲衣”的路线——艺术“百衲衣”是沃尔夫冈·马克斯·浮斯特和杰尔德·德·弗里在其1982年出版的著作《渴望图形》中的比喻。这个比喻激发了热烈反响，“其中之一是一个1978年成立的年轻、具有强烈主观意识的艺术家团队的回应。他们的画作充满激情，时而颇具表现主义大篇铺陈的风

采，时而用耀目刺眼的颜色，时而色调低沉、富有进攻意味，以此来反对现今已成为冷血的、追求纯客观的艺术概念。那些画作有着鲜艳欲滴的色彩，以从未有过的迅疾速度占领了市场，成为公共热点话题之一。这个团体也自成立以来，一直同时身受极端的喜爱和尖刻的攻击”。现在德国元素也加入“新野性”和解构意义的潮流了——在国际艺术界，德国人“很有意思”、赫赫有名——他们是混乱、无政府主义、神秘而又荒唐的“老法兰克人”[14]。现在的“老法兰克人”性情严肃忧郁，性格迟缓谨慎，他们中的前辈是格奥尔格·巴泽利茨和欧尔根·勋内贝克，强调画作的比喻色彩的是马库斯·吕佩茨，强调历史性的是阿塞姆·基弗。

> 能很好地操纵这种看似杂乱无章的人是杰哈德·里希特。此人是“无理论之理论”的代表（“我就喜欢不确定的”）。他的“无理论之理论”有许多变种，在艺术上体现为风格的不断变化，但他均能很好地掌握。他逃避一切章法，强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创作什么，他说自己是善变的、无所谓的、被动的，不遵循任何一种意愿、体系、方向，自己也没有任何规划、风格、愿望。他的绘画和艺术仅仅是为自身存在，不附加任何世界观，有意为之的风格的断裂和主题的混乱——他既画上面大写“奶牛”二字的奶牛（1964年），也画哭泣的杰奎琳·肯尼迪——这使他成为“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派的主角。西格玛·波尔克1965年5月也参加了“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派，由此背离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初衷。

> 很明显，阿塞姆·基弗的成功有违后现代主义的“随意性”原则。他的作品也缺少色彩的堆积、浅薄、挑逗性和多重符号[15]，而具有“狂躁的”德国特征，充斥着暗沉的、神秘主义色彩的气息。基弗在1970年代初期曾经是给农民设计农舍和干草棚的专家。他设计的那些室内画虽然看起来蠢笨，但自有一种“血与土地”式的感觉，让人回忆起过去的年代——比如说一把沃坦[16]的剑，仿佛墓碑一样插在某一栋小木屋中间，再用某种类似于孩童的笔迹写一句很典型的“德国话”，刻入画中作为题名。除了木刻画之外，他还用砖和大理石创作，或者画一些适合挂在角落或者走廊里的小画，他偏爱采用勃兰登堡省份的风景（《勃兰登堡的沙》《勃兰登堡的石楠》《路径：勃兰登堡的沙》），这些画上都真真切切地撒了不同的沙子，就连稻草也被拼贴在画上。

时年拥有700间画廊的纽约算得艺术商业和一众德国后现代派艺术

家的福地（马库斯·吕佩茨、约格·因门多夫、杰哈德·里希特、阿塞姆·基弗），他们在那里获得金钱、名誉和自己的艺术特征。他们主张的艺术是不存在什么“艺术先锋”之说的——也就是说，并不冲着某个特定的指向发展——他们按照后现代派的口号来行事：“我站在这里！我也可以做些别的。”这样的艺术，没有风格就是风格，它对补偿那些在艺术上有欠缺的地方颇有帮助，用欧多·马夸德的话来说就是“赔偿性的”。通过“色彩”，现代世界的疑难和不自由仿佛迎刃而解，挑逗性把人们的目光从内容的先天不足上引开。权宜之计帮助取得了人们的谅解。艺术嘛，那就是用来被演出、被享受、被游戏的，不是用来让人烦恼、给人压力的。

“单色画也好，屏幕上的裂缝也好，小五金也好，胶卷带也好，杂乱的东西，脂肪，一瘸一拐的老人——什么都是艺术，什么都可以被出售，什么都是好的。是啊，什么都是好的：后现代的艺术就像是一个傀儡，只会讨观众的好，不问为什么，也不想做其他事。艺术就像是‘现状’的公共关系：它负责它的粉刷、广告、装饰和化妆。”（彼特·尼鲍姆）

约瑟夫·博伊斯站在后现代的“以任意为原则”的对立面——他虽不是什么启蒙学家，但也是那些用创造力来追求艺术的人的精神导师（彼特·吕慕科夫说他是一个擅于虚张声势的高手，一个擅于吸引观众的天才）。战后还没有哪个艺术家获得博伊斯这么大的关注。这位“卡里斯玛式的物质主义者”有一种魅力，“臣民”的爱戴和敌人的恨意对这种魅力的作用同等重要。这个男人头戴毡帽，他的魅力不是通过“精神交流”这种方式拐弯抹角地散发的，而是有着具体形象：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家。他做了什么、怎么做，都不如他怎么表现自己重要。他摆的造型比艺术本身对博伊斯的外形影响更大，这使他成为媒体世界的宠儿。只要他出场，电台和电视台都会如影随形。



1980年代，艺术高度繁荣：科隆艺术节上的来客

博伊斯的造型被市场化，以达到忽悠平民的目的。他戴着毡帽，穿着带飞袖的马甲，仿佛一位艺术的巡回传道者一样，信步走过浮华世界。他的诙谐和社会形象常常使人忘记他性格的核心。二战期间，时任俯冲轰炸机驾驶员的博伊斯曾经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高空摔落。游离于火线之间的游牧民族塔塔人把几乎冻僵的博伊斯从废墟里挖出来，他失去知觉好几天，塔塔人给他身上涂抹油脂，用毡裹紧给他取暖，他这才奇迹般地捡回一命。从此以后，他几乎每时每刻都用一顶帽子遮住手术时安装上的一块银质头骨。还有他的出身带来的宗教气息：具有天主教色彩的基督教文化遗产是他创作的“酵素”。弥撒、宗教仪式的行列、神秘主义、圣骨、十字架、圣体显示匣、圣杯、蜡烛、花束、焚香时升起的香烟是博伊斯艺术符号体系的主要特征。1962～1963年创作的《钉十字架》有慑人的信服力，这是因为他有意避免天主教的豪华排场，作品里

体现出的是“圣洁的天真”。他使用那些看似贫瘠的材料，如毡、脂肪、蜂蜜、蜡、铁、木头和其他“基本材料”，这本就可以激起人丰富的联想，更别提这些材料在每个参观者心中因为宗教背景的不同所引发的含义。博伊斯运用这些材料，常常有意推到荒谬的极致，这是为了突出那些简单而极端的对立，如冷和暖、发出者和接受者、出生和死亡、女性和男性、有机和无机。“这个时代为机械专家政治所主导，人类傲慢到亵渎神灵，博伊斯却在此时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大自然的温柔力量，唤起大家对环境和地球的丰富馈赠的意识。光影效果，流动的沙，和平，水果。有时，他仿佛一位先知，在黑板上大书特书生命的极致，就像柏林国家美术馆里的展品一样。他宣传简单和自然法则。这种方式唤起了每个人的责任感，也使他的民主政治运动成形。但这一切只有在真正热爱和平的世界里才能成真。”

死亡的螫针一直扎在博伊斯的艺术中。他那噩梦般的受伤经历在艺术中被具象化。1976年威尼斯双年艺术展上的《停下电车》取材于博伊斯家乡克莱沃的一座战争纪念碑，它警醒着回忆，分析着回忆，同时也完成了回忆。“炮筒和笨重的炮弹，在那上面是一个塑料做的人头，它有一副远古人的模样，骄傲却充满恐惧，在那些战争机器上显得很小。左边是一截断裂的铁轨，象征着对过去的记忆的断裂。”《展示你的伤口》是一个多面的艺术设计。两具棺材，那种被医院用过的棺材，放在中间。然后还有一块石板瓦，上面有几个神秘的单词。这几件物事的奇怪组合有一种古怪而压抑的气息，这气息主要来自棺材。人们可以从它们剥落的锡层和断裂的导杆上看出，有多少人在此“走过了他们最后的路”。这是一些物品，正是这些物品清楚地表明，死亡是如何把活生生的人变成“物品”的。《雷电打在公鹿上》在博伊斯死后展出，一具铜状物，一辆平车，那像是羊的东西象征着生物，组成了银色的四大块，围绕着公鹿，在这个“自然的、神秘的空间里，充斥着冷感”，这是一个仿佛“初始阶段的空间，没有记忆”。这些概念用生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象征着某个步步紧逼的末日。博伊斯借此向人们发出警告，希望人们深刻

反省。

> 博伊斯深受埃瓦德·马特雷的影响，后者的作品意指宇宙和谐。博伊斯在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时就是马特雷的高才生。他的画作是“最能体现风格”的作品，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他用这些画作不倦地宣扬自己的理论。他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坚信，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创造性原是人类生存的理由。因此，在美国，人们更倾向于把博伊斯看作来源于中世纪的某个魔法师，而不是未来的先知，其“更好未来”的信念来自杜塞尔多夫的某个“政治真空人”。

约瑟夫·博伊斯可以成为每一个“他”，每一个人都能在他的作品上找到点什么——基于这一点，他并非后现代主义的对立面，而正好契合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内涵：艺术是现实的补偿。神话通过艺术的方式得到表现，人们也相信它（当然，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会称其为“虚张声势”）。人们觉得自己“不知怎么地”被并入了某个整体，其中再没有可疑之处。博伊斯的信徒们认为，博伊斯的行为艺术就是那股超越精神、直抵灵魂深处的温暖和力量之流的发动机。

“艺术和生活这两个概念在你那里得到了最高的表现。它们和生活及死亡联系在一起。艺术万岁。”

重返中庸音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中的整体态度由曾经是革命性的科学和严谨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的无所谓——这也许是因为人们彻底转向了当初理念的反面，也许是因为“科学和严谨”这个概念中本身包含了一定的不准确性，而这个不准确性在后现代主义中得以显现。

1986年，达姆施塔特开办了第三十三届国际音乐假期班，这个假期班对战后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沃尔夫-埃伯哈德·冯·莱温斯基在报告中指出，本地的多元性已经为新音乐的发展亮起了信号灯。他认为，如今的作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容易，因为现在人们可以使用所有风格，取材限制也几近于零。可是，年轻作曲人中却鲜有懂得

怎样利用这来之不易的自由，以达到令人信服的效果。莱温斯基引用作曲家赫尔穆特·拉亨曼的话说：“我第一次来到达姆施塔特是1957年。那时，在本地的音乐小圈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些非常革命性的想法，也开始采用新的作曲技术，这些成果让我很吃惊。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在听众中引起的冲突，他们是有意要承担这些冲突，同时并不避讳触碰某些平民的禁忌，他们甚至不屑于使用什么小伎俩让人家不注意到自己‘犯了忌讳’。”莱温斯基评论道，今天的作曲人太容易当了，他们太早就接了太多盈利的活儿，尽管他们多数是自己单打独斗而并不依靠某个团体或流派。拉亨曼给1984年的作品取名《僵化》，说这部作品就是“死去的音乐”的典型——“基本上是它死前最后的抽搐”。这部作品正是展现了内在的僵化。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音乐尚在打破某些规范的偏见，到了70年代，不成体系的音乐“消费品”已经让这个努力变得没有必要了。当然，这些“消费品”也不会被“物尽其用”。艺术资助可以帮助它们举行首演，之后就没有第二场演出了。

获得更多成功的是那些致力于“中庸音乐”的人。赫尔曼·达努泽[17]认为，要总结20世纪的音乐发展，仅仅说现代派音乐（他的定义是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人物是阿诺德·勋伯格和阿尔班·贝格）是不够的，还有另外三种“音乐文化”：传统音乐、作为现代派音乐一部分的先锋音乐和“中庸音乐”。

> “中庸音乐”，顾名思义，既不是阳春白雪的纯艺术性音乐，又不是下里巴人的口水音乐，这样的音乐创作要求填补了以上两者之间的空白。在材料选取上，亦既有别于过于“前卫”的无调音乐，又有别于过于“古董”的、传统的、以和谐为功能的音乐。“中庸音乐”在当时有重要作用，处于“先锋前卫”和纯文化工业式生产之间的地位是它的最大特征，在相对较广但又符合风格和限度要求的范围内包容尽可能多元的想法。基督教的礼拜仪式（尤其是在教会运动的影响下），新的媒体的出现（广播、电影等），还有教育学和政治，都对音乐的创作提出了功能上的要求。由此，“中庸音乐”作为一种音乐理念，指的是有

一定艺术内涵（哪怕不是自由创作）加上一定的功能性的音乐，成为20世纪的典型范例。

相较于阿尔班·贝格而言，后现代主义的青年更加喜欢理查德·施特劳斯[18]。后者的作品里有着戏谑的自由、感情丰富的内心、奔腾的激情，这比什么无调音乐或者音乐结构的革命更来劲。就这个意义而言，老一辈的大师，如罗尔夫·利伯曼的晚期作品《森林》也是成功的，因为《森林》中的音乐，也是多种不同调性风格的结合体，却能很好地彼此融合，互相推向高潮。1987年在日内瓦首演之后，就有人认为这个具有喜剧风格的音乐作品将成为市民剧院的保留节目，并将和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随想曲一样，在有品位、懂行的人那里获得巨大欢迎。

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曾在1955年力推安东·冯·韦伯恩的音乐成为标准，后来回归到“作曲”当中。在他“那部奔放的、有时又优美的作品”《夏娃的魔力》首演后的一次谈话中，有人说他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宠儿，被人们围着献殷勤。尤其是他的《光》[19]（施托克豪森说这是献给2000年的作品，其中《夏娃的魔力》只是段落中的段落），用田园牧歌般的情怀表达了新世纪的祈望。据当时的报纸报道，需要七天时间才能完成这场宏大的、包罗万象的演出，其程度只有歌德的《浮士德》和瓦格纳的《尼伯龙根指环》可与之相比。

当“新世纪”的神话徐徐降落，施托克豪森由“先锋”转为“后卫”，可谓走在后现代派角色转换的前列——人们开始看向内心，看向过去。这位“有才华的、聪明的、能够完美控制所有艺术、技术、管理和广告问题的音乐家”溜入“精神导师”这一角色中，用作曲给“整体性”这一要求断了奶。

还有另外一些“先锋派”的人物，比如李格提、基瑟赫·克列伯、米尔科·克列门、伊桑、克劳斯·胡伯、马利修·卡格尔、迪特·施内贝尔、阿里伯特·莱曼、柏恩德·阿洛伊斯·齐默曼，都好像完全未接受教育一

样。不过，1986年，齐默曼的作品《给一位年轻诗人的安魂曲》在这位作曲家逝世16年之后由科隆爱乐乐团第三次演出，获得了很大关注。

> 公认的先锋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约翰·凯奇[20]，他受到了其他拒绝贯彻崇尚唯灵论、恣意妄为的后现代主义先锋派音乐家的尊敬。凯奇对传统毫无惧意，开创了全新的音乐形式和音调，这些音乐有一些甚至是借助电脑或者凯奇自己发明的某些乐器来演奏的（比如1952年的《水的音乐》，原是给一位钢琴家创作的，但除了钢琴之外，还有收音机、烟斗、打牌的声音以及敲打木棍的声音掺杂其中）。凯奇“从传统束缚中解放了音乐，也使音乐不仅限于传统乐器”，从而成为先锋派的核心人物，也对联邦德国的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因为如此，西德广播电台在1987年他75岁之际，曾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他的音乐。

尽管不拘泥于和谐的和声是音乐的大势所趋，但真正获得承认，还是要待先锋音乐家们懂得，如何使先锋音乐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能运用它触动人心。1986年，阿里伯特·莱曼的歌剧《托拉德》首演取得的巨大成功（莱曼凭借1978年的《李尔王》已在现代音乐剧中稳坐一席之位），更多并不在于交响乐团所表现的音乐本身质量有多好，而在于演出时那些巨大和声取得的爆炸性效果。“在传统的歌剧院里爆发了有力的、西方式的巨大声响，乍一听是古典，但是为了更好的目标。”

沃尔夫冈·利姆成名是在1974年，当年22岁的他凭一部弦乐四重奏《墨菲妮》在多瑙河音乐节上第一次为人所知。他在这部作品中，尝试着用一些平和的音调来调和音乐里的不和谐音。摩擦当然可以产生能量，但若要凸显矛盾和刺激性，便不应该扔石头。适当的友善给人以喘息之机，梦想得以在其中变为现实。

汉斯·维尔纳·亨策从未想过什么“新音乐剧”。他当然也是当时音乐的一位主角，虽不是先锋派的代表人物，却是“中庸音乐”的铺路人。亨策的第一部作品颇有斯特拉文斯基之风，随后接近勋伯格的十二音音乐，再之后，在意大利音乐的“灵性”影响下——亨策从1970年代末开始

定居罗马附近的马力诺——他的作曲与那种“连载式”的音乐渐行渐远。他有许多作品，包括交响乐、钢琴曲、小提琴音乐、室内音乐和芭蕾舞音乐，尤其是歌剧，如《鹿王》《洪堡王子》《给年轻爱人的挽歌》《年轻的爵爷》，还有一部儿童歌剧《波利西诺》。在这些作品中，传统音乐的和声和后现代的无调精湛融合。1968年，他以一部清唱剧《美杜莎之筏》献给切·格瓦拉，从而公开表明政治上的左倾倾向。作为音乐家，他希望能够创作“人类与社会革命的伟大作品”。在接受《明镜》采访时，他曾表示，自己正随着潮流变化，在步步远离七八十年代的“世界革命”的想法，但并不会因此远离一直对他那么忠心的乐迷们。

亨策的音乐在日渐兴盛的中产阶级社会里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些中产阶级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亨策的成功秘诀在于他的创作原则：不是只有不堪入耳才可以是现代音乐。

虽然曾因为采用了无调音乐的歌剧《我们到了河边》出人头地，亨策终究一步步远离严苛无趣的先锋派音乐，最终完全反对先锋派音乐——就算还不是冤家对头，但也是叛门出教，永不回头。他的音乐中有新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特征，这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一切，正如汉斯-克劳斯·容海因里希在亨策的歌剧《英国猫》（1983年）首演时赞扬的那样，绝对不是胡拍乱打，不是只有过气样本的空洞声音，它的表达既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只会重复传统的陈词滥调。亨策的音乐充满了历史、回忆和经历，借用好听和流行的调子表达深奥的内涵。亨策把这一切都糅合进音乐，使其充满活力和戏剧张力，有力量、有对比。他的作品丰满、有力、感性，而且好卖。亨策的野性及其“音乐生涯”的不确定性让他能够对抗任何音乐法则定下来的刻板和枯燥以及评价标准的单一性。

---

[1] 莉亚拉（Liala，1897～1995年），意大利女作家。

[2] 海特维希·科特斯-马勒（Hedwig Courths-Mahler，1867～1950年），女

性小说家，写了很多受当时女性欢迎的爱情小说。

[3]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年），意大利学者（中世纪学家、符号学家）与作家。除了严肃的学术著作外，著有大量的小说和杂文，经常给杂志专栏撰写以睿智、讽刺风格见长的小品文。最驰名的作品为小说《玫瑰的名字》与他的杂文集。

[4]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2015年），社会学家，德国人，出生于斯武普斯克，是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贝克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提出了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全球化社会学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5] 保罗·卡尔·费耶阿本德（Paul Carl Feyerabend，1924～1994年）是一位在奥地利出生的科学哲学家，以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教授的三十余年间（1958～1989年）的著作最广为人知。费耶阿本德因他的科学无政府主义和反对普遍的方法论规则的存在而闻名，他的著作影响了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发展。

[6]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1925～1998年），秘鲁裔美国作家和人类学家，以唐璜书系列（12本书和许多更短的作品）而著名，书中记载了他拜印第安人萨满巫师唐璜为师的经历，唐璜其人的真实性曾被多名学者质疑。

[7] 所多玛（Sodom）和蛾摩拉是圣经中的两个城市，首次出现在《希伯来圣经》。因为城里的居民不遵守上帝戒律，充斥着罪恶，被上帝毁灭。后来成为罪恶之城的代名词。

[8] 安德里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1942年～），德国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9]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年），法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其许多著作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其影响范围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10] 后历史，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流派，宣传传统历史哲学的终结和功能转型。“后历史”概念的提出可追溯至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斯如是说》中的“最后的人”。该流派为国人熟知的代表人物是提出“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其他代表人物有奥斯瓦德·斯本格勒、阿诺德·盖伦、迪特玛·坎培尔、让·鲍德里亚。

[11] 特奥多尔·莱辛（Theodor Lessing，1872～1933年）是德国犹太人哲学

家。他1872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犹太家庭，大学先后在弗莱堡、波恩及慕尼黑攻读医学，1907年起在汉诺威大学担任哲学讲师。魏玛共和国时期，特奥多尔·莱辛强力反对兴登堡担任德国总统，1933年时为了躲避纳粹而搬迁到捷克斯洛伐克玛丽亚温泉市，同年8月遭纳粹派人暗杀。

[12] 比特菲尔德是位于当今德国萨克森-安哈特州的一座小城，是化学工业中心。萨克森-安哈特州在两德统一之前属于东德。1968年11月1号，比特菲尔德的一家电子化工厂发生氯稀爆炸事件，造成42名工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所以作者说“周围的荒漠”。

[13] 小罗伯特·查尔斯·文丘里（Robert Charles Venturi，Jr.），1925年生于美国费城，是美国建筑家以及文丘里-斯考特·布朗公司的创办人，1991年普利兹克奖得主。

[14] 法兰克人是对历史上居住在莱因河北部法兰西亚（Francia）地区的日耳曼人部落的总称。所建立的王国中比较著名的有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

[15] 美国理论家詹明信在其著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曾经总结过后现代文化产品的特点，其中包括大量色彩堆积、多重符号使用、肤浅、怀旧情绪等。故此处作者有此一说，认为基弗的作品中的一部分缺少典型的后现代文化产品特征。

[16] 沃坦是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指环》中的人物，原型是北欧神话中的奥丁。

[17] 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 Danuser），1943年生于弗劳恩菲尔德，是瑞士裔德国籍音乐学家。他的研究重点是18世纪至19世纪音乐史、音乐演奏、新音乐理论和新音乐美学史，即音乐分析。他的研究融合了作品分析、音乐美学研讨、作者生平、体裁与机构史。对先锋派、民族主义、诗学、美学和历史编纂学的领域他也有所涉及。他广泛的大众传播工作使他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德语音乐学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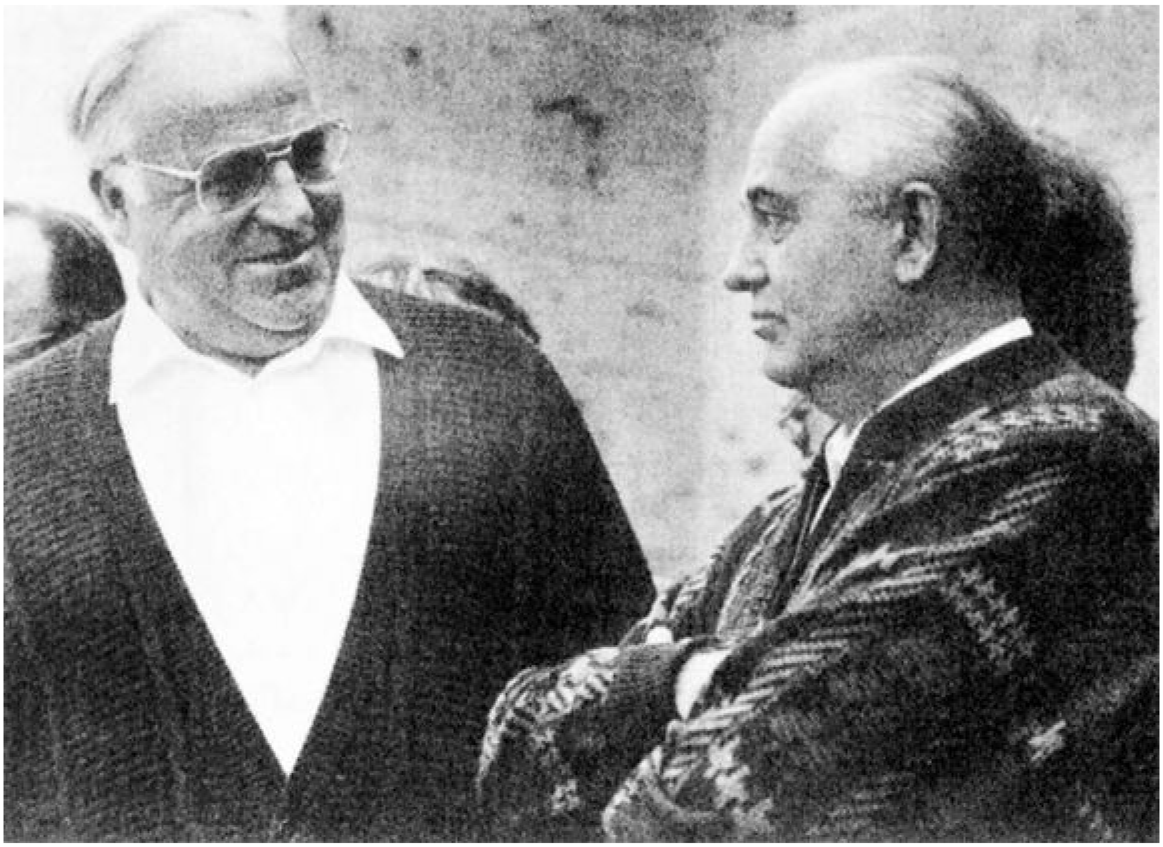
[18] 理查德·格奥尔格·施特劳斯（Richard Georg Strauss，1864～1949年），德国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指挥家。他与以写圆舞曲著称的小约翰·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维也纳施特劳斯家族完全没有关系，一般都以全名理查德·施特劳斯（R. Strauss）称呼，以与该家族的众多成员相区分。

[19] 《光》（*Licht* ）是施托克豪森一生中规模最大、创作时间最长的系列作品（1977～2003年）。由七套歌剧串联而成。每一套代表一个星期中的一天，所以副题亦称为“Die sieben Tage der Woche”（“The Seven Days of the Week”，一个星期的七天）。整套作品以三个角色为主轴：米迦勒（Michael）、路西法（Lucifer）和夏娃（Eve）。由于《光》在人力、物力、

时间和金钱等方面的花费都非常庞大，直到现在，全套作品仍未曾正式公演，当中头五套作品曾独立公演，另外还有从个别歌剧中选取段落演出的。

[20] 约翰·米尔顿·凯奇（John Milton Cage Jr.，1912～1992年），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勋伯格的学生。他最有名的作品是1952年作曲的《4′33″》，全曲三个乐章，却没有任何一个音符。他是机遇音乐［aleatory music，或“机会音乐”（chance music）］、延伸技巧（extended technique，乐器的非标准使用）、电子音乐的先驱。虽然他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但仍被普遍认为是他所处的年代中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第四部分 德国统一



1990年**7**月访问苏联期间，赫尔穆特·科尔曾与戈尔巴乔夫在后者位于高加索的家中有过一次非正式会面（**Archiz**，**15.7**）

第18章 狂喜和身份危机

改革和转向

在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的历史观里，历史的发展是由一个一个的“英雄人物”决定的。我们的纪念碑文化就是“人物创造历史”这一观念的具体表现。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认为，已经过去的20世纪给新形式的英雄提供了很好的舞台——这些英雄不再是因为战争的胜利、征服、凯旋而成就，而是那些懂得放手和舍弃的人。“我们有理由认真研究这些懂得否定的专家。因为欧洲大陆的存活仰赖于他们。”因为这样，苏联的赫鲁晓夫、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匈牙利的亚诺什分别推动自己的国家走上背离斯大林主义的道路，而西班牙则在阿道弗·苏亚雷斯的领导下告别旧日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冷战结束，俄国帝国主义失势，暴力政府倒台以及德国统一，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位“懂得退让的英雄”、历史里的特殊人物，他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加入了“欧洲大家庭”并影响力日增，这绝对是戈尔巴乔夫的功劳。

>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为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撼动了当时的世界政治。他意识到，苏联“帝国”在经济上同当时的自由主义世界落后得越来越远，为了保住他个人军权所需动用的手段亦将会加快这一进程。放弃争夺世界霸权使苏联和美国共同开始裁减军备，这成为和平共生的前提——到当时为止，世界上的多数人还因为两大阵营的对立被分隔在两端。戈尔巴乔夫相信，把国家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极权统治必不能长久，营造一个有人类尊严的社会也不能靠强制完成，他因此赋予社会主义理想一个全新面貌。“社会主义有一张新面貌，那就是人性的面貌，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念。因此，未来的社会将会实现人性。”转型通过改革（Perestroika）（政策和社会系统上的改革）和公开政策（Glasnost）（公共生活的公开和透明）开始：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是自由的理想。而如戈尔巴乔夫般的个人居然可以改变世界，原因

应当是当时的苏共政府腐败丛生，以至于一个小小的推动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1989年，民主德国分崩离析。10月17日，几个“懂得退让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英雄”夺了埃里希·昂纳克的权。维利·斯多夫[1]同埃贡·克伦茨[2]和君特·沙博夫斯基[3]一起起草了解除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权力的协议。“这个被审判的人坐在那里，找不到一句辩护词。这个对民主德国颐指气使了十八年的男人黯然退场。政治局的人各自心怀鬼胎。沙博夫斯基说：‘没有狂喜。每个人都在努力让一切看起来正常。这是件累死人的事。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在做什么偷偷摸摸的事一样。而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冷血的混蛋，无所顾忌，之前一直在大肆搜刮，现在急着把钱运过约旦河去。’”

时至彼日，民主德国已经在“运过约旦河去”的路上走得很远。从1989年年初开始，要求保障公民自由、反对东德政府压制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据当时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文件显示，1989年10月16～22日共有24起未被批准的示威举行，参加人数超过14万人。23～29日，未被批准的示威游行是145起，参加者有54万人。10月30日到11月5日，未被批准的游行是210起，参加人数有135万。）尤其是莱比锡的“星期一游行”，奠定了这场运动成功的基础。人们后来用“英雄城莱比锡”来表达对这次运动的尊敬。至于为什么正好是在莱比锡发生了这么多抗议活动，原因也在于，这座城市是欧洲最脏、最暗的工业区之一，灾难般的老城拆迁，生活基本供应紧缺，贫瘠的健康和社会设施。人们在此可谓遍尝日常生活之苦。与此同时，莱比锡博览会却呈现出一派虚假的欣欣向荣之象，其中的国际联系加强了文化导向。

想要逃往国外的人数猛增，尤其是那时的匈牙利和捷克已先后为民主德国的公民敞开了通向西方的大门。1988年，记录的外逃人数到达了39000人，而前三年平均每年的人数是22000人。1989年，25000个民主德国公民通过匈牙利逃往西方，1989年10月，14000个民主德国公民在

波兰和捷克乘坐封闭的火车，途经东德最终到达西德。（而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尤为嘴硬：“我们不会为那些跑掉的人掉一滴眼泪。”）

> 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举行了40周年国庆庆典。可是，自由德国青年团合唱队却拒绝在有10万名青年参加的火炬游行队伍里唱战歌。而当时，昂纳克和其他嘉宾就在观礼台上。到那个时候，东德和俄国的官方友谊已经结束了。因为戈尔巴乔夫相信，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元老不会及时加入已是大势所趋的西化潮流中。“但如果我们止步不前，就会马上被生活惩罚。”

在野党和其他团体申请成为政治同盟。11月7日和8日，东德的政府和政治局在维利·斯多夫的带领下退居幕后。11月9日，前政治局成员沙博夫斯基故意曲解事先写好的关于开放东西两德交通的通告，宣布开放柏林墙。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和平方式完成的德国人民革命，当时的亢奋和欣喜——“我们是一个民族”——简直到了没有边界的地步。

民主德国的“文化革命”是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和大势所趋的现代化进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后果。民主德国的结局，用迪特列夫·波拉克（来自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的话说，或多或少是被“逼上梁山”的，因为两列相对而驰的列车无法达到统一：一列是越来越严重的集权，一列是则是更多的分权和多元化。就像所有高度工业化社会经历的那样——当然，高度工业化在东德迟迟未来——经济、法治、权利、文化和宗教都会发展出各自的运行轨迹。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和理性化进程会加重社会矛盾。而德国统一社会党党魁的做法是用更多的集权来回应社会结构的变化——自主化、多元化、分权、个人主义等——这种冠名为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做法是一定会失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几乎随处可见的影像传媒推动了分化和个人主义的流行，当这些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之时，他们硬说这样的发展是无效的，并动用体制内的所谓“骨干”和官僚集权，试图把这些发展全部纳入“领导和生产一体化”的系统当中。

沙博夫斯基说："粉饰太平已经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以至于人们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把这一切抛诸脑后。如果民主德国自己都在从内部土崩瓦解，那么只能表明当时的体制不足以承担它该承担的任务。"

民主德国内的"文化革命"在人们渐渐褪去恐惧之后才慢慢开始。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审查和压迫不再被说成是某种传教般的信念，而是不安全和迷茫感的表达。旧的领导精英未老先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理解这个变革的世界和在本国发生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政治的仆役和雇工，对高层很没骨气地报喜不报忧。哈特穆特·茨瓦尔用"撤销现实"来形容对不符合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美好愿望的消息通通闭目塞听的行为。

对于那些联邦德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另一个德国采取完全闭目塞听或者仅仅是浮光掠影式报道的态度。东德对西德的认识是如此贫乏，以至于在两德统一的时候，竟无人拿得出一体化协商的具体计划来。只有数十年前的库特·舒马赫设想到了统一的进程。至于统一这件事情，用彼特·本德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计划，没人想到。德国统一就这么来了——那不是一个行为，那是一个结果。""我们应该从社会和经济上入手，让人们看到西德超过东德之处。西德的经济对东德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相较之下，东德的权力机构不再成为可靠的手段。除了使用经济这块磁铁把东德牢牢吸过来之外，没有第二条更方便促成两德统一的道路。"

> 民主德国在两德统一之后没有产生社会动荡，这是因为同联邦德国的合并使它"升值"了。1987年，联邦德国总统赫尔穆特·科尔用最高礼仪和军队致敬的方式在波恩迎接了埃里希·昂纳克的到访——这意味着西德承认东德是一个独立国家，而巴伐利亚州的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也借给东德以亿计的贷款，为当时已经支离破碎的东德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
> 西德的公众也持续地让自身被"一个暴力系统中的具有控制性的自我认同崇拜"所欺骗；人们甚至发明了一种奇怪的欲望，对这些残余政权的少得可怜的成绩施以尊重，并且突破界限，建设一个早就已经过期了的意识形态。

当然，联邦德国通过现身说法的方式——尤其是它那在任何时候都熠熠生辉的经济奇迹——帮助了民主德国转型。1988年11月，莱比锡学者瓦尔特·弗里德里希向埃贡·克伦茨提交了一份绝密文件，其中详细描述了联邦德国在经济、文化和时尚方面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而民主德国国内的问题则层出不穷，有一些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如基础设施的落后和生活基本品的欠缺，信息的不通畅，民主建设也相当落后），这些问题越来越明显，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人们开始对民主德国之内所谓的社会主义是否真的具有优越性产生怀疑。“由完全不开放到经济改革，这个过程把一切矛盾都激化了。”其实，民主德国的最终结局是人民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西德的人们则在1989年11月9日，当柏林墙倒下的时候，才开始狂欢。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柏林市市长瓦尔特·孟培尔说，就昨天而言，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他后来成为德国联邦参议院议长。

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准确地把握了时代所发出的信息，他理解东德人民感到时间压力的心情——因为他们生命中的数十年时间是在谎言中度过。他在一个需要执行力的时机，准时地运用了自己的权力。他跳上了一列已经开动的列车，在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尔的帮助下，用两德协定的方式把这列列车送抵正确的站台——当然，这也受益于当时较好的外交环境。



柏林墙开放夜的勃兰登堡门，**1989**年**11**月**9**日

1990年9月12日，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外长同民主德国第一届民选产生的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和联邦德国外长共同在莫斯科签署了所谓的《四加二协定》。这份协定赋予后来统一的德国以真正的主权。科尔在这份协定中表达了对之前的四个二战战胜国的感谢，因为它们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正式承认德国是一个国家民族（Staatsnation）。

“之前还有哪个民族有过这样的机会，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长达数十年的分离？我们和我们的邻居达成共识，在自由之中重建了德国的统一。”

不过，狂喜过后的那几年似乎印证了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4]的“不安感觉”——这感觉来自他对转型期的哲学思考。事情并没有像维利·勃兰特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原本属于一体的东西自动地融为一体。“新的

德国”，从转瞬即逝的、自信自觉的凯旋高地摔下，跌入身份危机的文化低谷，至今依然无人能说完全克服了它。

某些著名面孔下的复杂心情

尽管经过了统一，依然有部分人如同梦游，继续做着关于东德也能实现民主的美梦。不过，清醒的人已经自觉地把头探出去，认识真实的世界。以上是君特·库内特的断言。这个断言只有一半说对了：统一之后，东西两德人民之间的陌生感越来越强，有些人已经开始缅怀东德。这带给在格雷格·居希领导下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其前身）很大好处，1990年，该党进驻德国众议院。

> 东德人获得了自由，但自我身份感的丧失却使他们饱受其苦。那些“真诚努力的人”的数目比较大，他们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很有认同感，不过并不想参与腐败。“星期天，我们跟一群办事人员一起乘车回萨尔聪根。包间里还坐着几个年轻人，嘟囔着‘德国统一社会党就是一坨屎’。英格丽德，我的妻子，对我说‘把你的党员证塞到钱包里’，我之前把它放在西装上衣旁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并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因为它对个人前途有帮助，今天我也不会因为个人前途而退党。”汉斯·迪特·弗里彻勒，德国统一社会党萨尔聪根温泉地区的第一书记，如是描绘道。这样的场景是统一后常常发生的。1986年，弗里彻勒曾经写过一篇广受关注的报告，里面记叙了一个官僚的工作与生活。而六年之后，他得等待自己的书得到批准，那是一本描写党内工作浮华表象背后的书。该书的出版简直就是东德的“自由主义政策”。书中的主人公工作勤奋、要求也不高，每天工作18个小时，无休止地同东德日常生活的种种困难做各种斗争，这个人物反映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虽然他相信党，但“每日的疯狂”——物质匮乏、经济低落、挫折感、没有娱乐——却常常让他陷入怀疑。

这是一个理想转为现实的时代，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被揭露，导致了人们产生反感、丧失勇气。听证会有时会带来审判，一些“德国统一社会党中的腐败、滥用职权和中饱私囊”的事件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让人们对那些没有经过特别审判程序就进入这个圈子的人产生了同情。

> 1990年9月8日，民主德国法院对埃里希·昂纳克提起诉讼，理由是“滥用职权、对国家不忠和腐败的高度犯罪”，因为刚刚动过癌症手术，不能把他关进监狱，人们无法为这位前国家领导人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不过，在位于波茨坦附近的比立茨红军医院短暂停留之后，他还是跟他的夫人马格——曾任人民教育部部长，推行教条化意识形态的政策是她的执政特点——一起被送往莫斯科，把他递交当局的决议因为一项新的刑事处罚条例“法不责众”遭到拒绝。一年之后又被遣返柏林，接受审查，由柏林法院第27号刑事审判庭提起公诉。1993年，诉讼被撤销，昂纳克一家前往已移居智利的女儿处落脚，一年后，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前党魁逝世。
>
> 就像昂纳克在柏林地区法庭说的那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民主德国不是随便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标志，说明社会主义是可行的，并且优于资本主义。民主德国是一个实验，一个失败的实验。”

那些对昂纳克审判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场审判只是对国际法的挑衅，在刑事处罚上的结果也是荒谬的。人们简直可以从中看到一个英雄的历程。这是“英雄主义的废墟”，德裔美籍作家伊莲娜·迪舍如是说。她是昂纳克辩护律师尼古拉斯·贝克的助手和妻子，因此格外关注这场审判。在一篇发表于《纽约客》的文章中，这位作家带着某种同情写道，这个已经得了绝症的八十岁老人，他对工人阶级的喜爱从未间断，而同时这种狂热又是这么孩子气。“昂纳克有一种光芒。他不算伟人，但是他坐得正，是德意志民族宁折不弯的象征。”

在那些生活在东德，真切地感受了东德的人——政治局的口号、中央委员会的那些蠢猪、部委里的那些“硕鼠”、外事局的那帮吃白食的人——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外汇筹措委员亚历山大·沙克-格罗多夫斯基是一个尤其聪明的墙头草。一俟获得了国际资本操控的“准入证”，他马上摇身一变成了东德现代化一代的代表。他曾经接受德国统一社会党重任，在对外经贸部担任秘书之后，1977年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的经济委员会成员，尤其在1983年东西德关于百万贷款的谈判中，他作为“商务协调”部的主任发挥了巨大作用。该谈判是在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介绍下举行的，格罗多夫斯基其后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也

发展出了一段“真实的友谊”，他学习到如何把成功的生意和成功的政治结合起来。“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帝国”有强大的私交人脉网络，可以同他一唱一和。

汉斯·莫德罗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德累斯顿的第一书记，也是1990年2月初组建的“圆桌会议”代表之一——该“圆桌会议”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给躁动不安的人民最后一次和平的建议”——他同西德建立起紧密联系，为第一次民主选举铺平了道路。东西德统一的协定在他的主持下达成，共九章45条，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的形式实现。这个协定得到了人民议院的首肯，该议院那时终于由自由、直接和保密的选举产生（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率为40.8%，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为21.9%，等等）。

> 洛塔尔·德梅齐埃这个“普鲁士人、基督教徒、保守主义者”是一个过渡期的杰出政治家，在法律范围内非常努力地促成统一，用这种方式，让东德的价值在统一之后也得以保存。后来他却失势——主要是因为一项未被证明的指控，说他曾非正式地为史塔西工作过；他有过三种职业：音乐家、律师和政治家，“节节高升”。从政治中抽身之后——他是人民议院144名议员之一，这些人在统一之后都进入了德国议会，曾任特别事务部部长、基督教民主联盟代表——政治向着德梅齐埃所预言过的那样发展：分离只有通过分享才能被战胜，“谁说了算”的问题应该被淡化。

东西德统一进程推动了关于宪法的讨论，当然，这个讨论只是外围式的，也没有什么结果。多数政治家并不想做一场试验，他们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改进宪法、增进人民参政议政的可能。当时宪法第146条的有效性随着时日推移逐渐失去，取而代之的是由德国人民决定的法规：“这部宪法旨在保护德国的统一和德意志人民的自由。”而法学家杰尔德·罗伊洛克认为，这样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不能在一部宪法里说，德国的自由已经完成，尽管这部宪法并不是由人民自由决定产生的。“这个矛盾揭露了看似亲民的宪法政治实际是伪善的。”同样，宪法也忽略了加强对保证民主稳定至关重要的爱国主义。人们在柏林墙

倒塌时所感受的狂喜并没有转化成“不竭的动力”。相当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统一的过程中选择袖手旁观或裹足不前。

关于民族国家的争吵

在第一次全德联邦议会创立会议上（地点是柏林帝国大厦）——选举在1990年12月2日进行，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占了多数席位（哪怕在东德）——维利·勃兰特发表了一席讲话，主张统一了的德国从一开始就应把自己理解为正在变为现实的一体化欧洲的一部分：他认为，国家主义对于多数德国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并且招致反感。“德国和欧洲是一体，现在是，将来更是。”

这也是对之前的君特·格拉斯的某种间接的回应。自民主德国和平演变以来，君特·格拉斯就一直主张保留德国的“多国家制”（用谢林的话来讲，德意志最好的形式就是多民族的民族）。可以自力更生、有自我意识的民主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可以预防国家主义的死灰复燃。狂妄自大让德国人失去了在联邦体制下以文化来定义国家的机会，非但如此，他们还使用暴力，把统一的国家往一个帝国的路上逼。“这是奥斯维辛的前模式。这是一种潜在的反闪米特主义，它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国家社会主义的人种意识形态借国家社会主义之力，成为一种不咸不淡的精神基础。”

> 君特·格拉斯的小说《广阔的地》（有批评家，如马塞尔·莱西-亚尼基认为这是一本无聊透顶的书）是描写转型的，它尤其被东德人当作捍卫东德生活方式的宣言书。君特·格拉斯——东德记者克里斯多夫·迪克曼带着轻嘲如是总结道——把民主德国当作德国历史，联邦德国当作民主德国历史，他用一种历史的包容性来反对纳粹德国驱逐迫害犹太人的意识形态，他的平和及开明是送给被历史绑架、不引人注意的东德的礼物。格拉斯一一点名那些西德的压榨者。“他们的影子分成4001份，落在公有企业上、落在不动产上、落在容克土地上，它们分成了7000份各自为政的私营企业，以及250万个受到威胁的工作岗位。”“这简直就像一个灵堂”，冯迪如是说——他原名为提奥·乌特克，因为对冯塔纳[5]深深着迷所以人称冯迪，是原文化联盟中负责巡回讲

座的人，是1986年出版的小说《塔尔霍夫》中特务的原型。该小说的作者是汉斯-约阿希姆·沙德里希，此人于1977年离开东德。



君特·格拉斯，《自画像二》，**1972**年

“在我生命的多数时间里，”尤雷克·贝克在1990年6月举办的一次东西德知识分子的聚会上说，“社会主义都没有机会。康复的尝试只让我病得更严重。”这句话揭示了相当一部分西德知识分子对于两德统一及其后果的矛盾心态。因为这个观点既不统一也不明确，被理查德·赫尔辛格指责为带文明批评色彩的反西方主义。立场坚定者如海纳·穆勒，当那些“西方胜利者”指指点点时，他坚决建起学术和道德的堡垒。海纳·穆勒从民主德国的结局中几乎没有学到什么，对于他来说，一切之前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西方世界那里感受到的依然有效。实际上忠诚拥护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抗拒心理上保持一致，他们不愿接受西方的民

主文明，把它看成同心同德生活共同体的威胁。保守党派则认为，联邦德国受到过多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仿佛美国的“特工”一样，对民主德国殖民。对此，克里斯多夫·海因还在转型期时就有一个形象描述：“我们一旦失败，麦当劳就会把我们吃掉。”

两德PEN中心[6]对统一的态度不一致，也是统一之后知识界不同态度的很好例证。西德：愿意接受民族国家的那些人对东德作家抱有对立情绪，愿意接受文化国家的人对东德作家抱有好感。东德：对西德的文学抱有怀疑的观望态度，要么为自己“集体无意识”地同德国统一社会党共舞做无罪开释，要么使劲抨击以求竭力抱住西德的大腿。

两德统一也给PEN带来了一系列戏剧效果，这些效果开始于1990年5月于基尔举行的PEN年度会议上，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德语作家的经验和视角，并终结“德国对德国”这样的闹剧。选择它作为主题的原因是此前汉斯-约阿希姆·沙德里希所写的一篇评论，他在里面抨击了民主德国的PEN协会。这次批评是由克劳斯·霍普克加入PEN协会引发的，霍普克1973～1989年曾任文化代表，主管出版、售书和图书馆业务。雅克·卡尔宗克是PEN协会的创始人之一，1965～1968年曾任杂志《南瓜仁》的主编，该杂志对东德的社会主义一贯持反对态度，他还是1968年支持民主和裁军的主要喊话人。卡尔宗克认为，民主德国的文学应该至少首先战胜斯大林主义文学的影响。那些由东德逃往西德的“变节者”，曾经在不同的时段为他们的“异端邪说”付出“流亡”的代价，这些人毫无悬念地极力反对两个PEN合并。按照莎拉·基尔希的话说，民主德国的PEN根本就是在邪恶的条件下成立的，应当解散。

时任西德PEN主席的卡尔·阿梅里同来自东德、生活在西德的作家意见一致。他说，人们没必要对着那些已经压力很大的东德作家行使“洗衣机”的职能。他挂印而去，接任他的后两任主席杰尔德·海登赖希和英格丽德·巴赫尔也做了同样的事。

为了挽回已经陷入僵局的谈判，1995年，60个西德PEN成员也加入了东德PEN，这些人当中著名的有：马里翁·格拉芬·敦霍夫、马克斯·冯·德·格林、瓦尔特·闫斯、彼特·吕姆科夫、约翰内斯·马里奥·西美尔、克劳斯·施塔埃克以及——哇噢！——君特·格拉斯。君特·格拉斯说：“我将无法属于西德PEN，如果它坚持把东德PEN拒之门外的话。”他认为，自以为是会带来结局，他也担心拉帮结派。这种情况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在PEN里出现过，那时比较喜欢拉帮结派的是德国共产党作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荒唐的是，现在又出现了拉帮结派，这次却是那些曾经生活在东德、又不得不去往西德的作家，他们对于1989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感到无所适从，因此把自己变得又臭又硬。不过在1998年，东西德PEN终于完成了合并。

来自东德的作家们对东德持怀疑审视的态度，但他们更对西德抱有对立情绪。他们很快写出了一系列充满隐喻的作品，这些作品都事关身份危机。这是他们在两德统一之后从广大人民那里感受到的，他们用这些作品赋予这些感受一种表达。比如，福尔克·布劳恩就用讽刺小品的形式写成《自由的伊菲格尼》（1992年），这是对充满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曲追思，也是对统一后的德国表示讽刺的一份小传单。这位作家对那些逃往西德的人不带一丝好感，他认为在西德，穷人必须战斗，富人享受和平。他认为，在西德所谓人民就是那些被征服的人。“我还在这里，我的土地去了西方/住草棚的人奋战/住宫殿的人享太平。”

曾任美军宣传部官员的斯特凡·海默在1945年就是布劳恩口中的“征服者”。而现在，作为一名民主德国公民，他必须经历东德的衰亡，但“无论如何”，那也是“他的”国家。“我不能丢掉我的整个生命，那就是疯了。尽管在这里人们受到很坏甚至带有犯罪性质的待遇，我也相信，它的基本理念是好的、正确的。”海默在同弗里茨·J.拉达兹的一次谈话中如是说。拉达兹就1953年6月17日发生的事件和东德的斯大林主义写过批评性小说，分别是《六月中的五天》（1974年）和《科林》

（1979年）。他因为1976年在抗议开除沃尔夫·比尔曼的请愿书上签字而被东德作协拒之门外。

相当一部分东德人觉得自己在西德失去了身份，而他们的做法让拉达兹愤而出走，那简直就是东德的圣灰星期三[7]。一群终日担惊受怕、伏低做小的人，当他们最终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候，却变成一帮愤怒的乌合之众，摩拳擦掌、你推我挤地冲向赫尔提和比尔卡[8]。这位时年八十一岁的作家用自己的方式“去了西德”。1994年10月，在柏林中及普伦次劳尔贝格地区举行了统一后德国的第二次议会选举，他作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代表进入德国议会，并作为名誉议长发表了开幕演说。

剧作家海纳·穆勒则把西德的经济奇迹成为“奥斯维辛的后果”。“所有的德国大型康采恩都为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工作过。在盟军里，它们则为美国和英国的工业卖命。”可即使这样，也丝毫不能阻止柏林歌舞团的当家作家在资本主义的西德赚个盆满钵满。“用左派思考，用右派进餐”——这是东德文学的绝好材料之一——已经是自1968年运动以来全德国的普遍现象。

克里斯塔·沃尔夫的《美狄亚》（副标题是“声音”，剧中用六段独白对这个希腊神话故事进行另一番阐述。这个杀害自己孩子的女魔法师在剧中被写成一个充满人性的女英雄）虽然算不得时代性的代表作品，但是其核心含义却直指统一后的东德身份危机。美狄亚的故乡科尔基斯被正直的国王与王后统治，那里的子民全都懂得为其他人着想，财产被均匀分配，以至于没有人需要嫉妒另一个人。榆木脑袋的国王阿依特斯毁了这片社会主义乐土，美狄亚去往科林斯，她最初有些激动，却很快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中，因为科林斯的社会不平等更加严重。“我要去往哪里呢？是否有一个世界、某个时间能容得下我？我问，却没有人回答。这就是回答。”这是一个死心的结局。

失意而非快乐

1993年8月赫尔穆特·科尔发表了一次演讲，说德国总统应由东德产生（因为时任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的第二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在1994年就将结束了）。科尔推荐的总统人选是萨克森的司法部部长施台凡·哈特曼（基督教民主联盟），此人参与了总统候选人竞选，几个星期之后又放弃了，因为他的保守激怒了公众。闫斯·莱西是由一个乡绅集团推举出来的，但他在那些有实力的政党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这本是一个大好机会，可以通过这次选举选出一个左派的、自由主义的科学家和出版家，从而大大推动两德一体化进程——想想看德国总统将拥有的活动范围，这绝对不可能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推动力——而这个机会却白白从指缝间溜走，不管后来当选的来自西德联邦州的罗曼·赫尔佐格如何迅速地获得了多大的欢迎。

> 东西两德本可以共同成长，却被西德的指手画脚阻挡了进程。“距离、失望、仇视和失意而非快乐在再次统一的德国”是1992年第34期《明镜》周刊的大标题。《时代》1995年9月的增刊也以《统一，却不同一》为标题。
>
> 沃尔夫冈·提尔瑟是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代表（他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在波恩取得地位和影响力的东德政治家之一），他警告说可能出现这么一种状况，即两德的统一在西德的主导下完成，可即使这样，就算经济上行得通，其也是人性上的一次失败。

1996年，社会学家伯恩哈德·沙弗斯指出了德国一体化进程中不同步的状况同步出现，即整个机构和法律体系已经经历了改天换地的变迁，但细小的行为模式和精神情绪仍然无丝毫变化。不管在东德激烈的政治与社会“重装”中需要许多西德人“帮忙”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和正确——这些西德人也多少能重新认识自己的任务范围，并把东德人看作自己的民族——曾任汉诺威市市长的海因里希·列曼-格鲁伯调任莱比锡当市长，或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库特·比登科普夫成为萨克森的州长，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但东德被西德殖民的印象依旧挥之不去（西德提供给东德直到1995年的1亿马克支援是例外）。沙弗斯认为，东西两德的根本价值观完全不同，比如，西德人对

宗教和教会有很强的归属感。他说，在欧洲再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经历过东德那般剧烈彻底的“把教堂拉下神坛”的运动了。但与此同时，被基督教赋予如此崇高意义的父母以及家庭地位对东德的影响又比西德要大得多。

说到政治走向，那些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好的，只是它们在东德被糟糕地实施了”意见的人远远超过50%。在经济方面，西德在过去几十年中从“社会的市场经济”中受益良多，因此，人们强烈抗议取消“社会国家”的形态。反而在东德，所谓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几乎肆无忌惮地横扫人们的心灵，尽管西德在1990年曾对其做出能占整个经济体系77%这一乐观预测，但到了1995年，它在新的国家和社会体系下实际所占的份额只有34%。

埃姆尼德研究所1995年7月所做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东德民众认为东德在16个领域具有优越性，而在1990年只有3个。这三个领域所获得的肯定在1990～1995年有了显著增长：妇女平等由67%上升到87%，社会安全由65%上升到92%，犯罪预防由62%上升到88%。之后被东德人认为具有优越性的领域是：对职业培训的肯定由33%上升至70%，对中小学教育的肯定由28%上升至64%，对住房供给的肯定由27%上升到53%。“这些和其他数据显示的东西是最简单的人类理智都会告诉我们的。即无论是为了一体化进程，还是为了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改革，东德的精神史都应该比现在更严肃地被对待。”

两德统一后，幻想中充满着诱人的商品美学的“西德式小康”在许多人眼里破灭了，人们重新想起德国统一社会党之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威胁的警告，这警告如今变得如此具有说服力。在一次问卷调查中，针对“民主是否最好的国家形式”这一问题，1990年5月有79%的东德人说是，而一年之后就降到了70%。当问题被限定得更小，变成“您是否认为，我们现今在德国内享有的民主是最好的国家形态？”时，表示肯定

的人1990年只有42%，1991年7月则降到32%。

> 芭芭拉·塔海默是东德颇受欢迎的写歌人，她清楚地记得人们在1989年9月到1990年3月那段时间曾处于怎样的“打鸡血”状态。“‘我简直不能相信现在大家都居住在汉堡了，而且还适应得很好。’不，东德之后并没有人想回到过去。可是大家却带着悲伤的情感，缅怀东德原本可以做得多好。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自己明明已经加入了瑞士或者西德这样的‘外国’，却一再地想回去。他们死死地抱住东德，从两年前就开始苦苦哀求，直到人们把他们放到法国去。在法国他们多数人从农场工人开始干起，却发现自己既不能从事强体力劳动，又不能很好地融入有条理的工作程序中。他们看超市免费发放的、有诸多实用信息的报纸，日复一日看着美丽的日落。终于有一天，他们意识到自己渴望的是什么了。他们不是想念希登塞岛[9]，也不是想念朋友，他们就是想念那些破烂、丑陋不堪的小酒馆，想念旅店里三人分睡的大床，想念那些穿套头毛衣的人。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不正常。‘在东德冉冉升起的是自由，在西方你只能洗洗睡了。’这就是他们现在的状况——哈哈，自由的意思就是：‘人人都能成功，人人都能堕落。’”

东德人情绪这么糟糕，首先是经济洗牌的后果。洗牌不是渐进式的，而是暴风骤雨式的。它受到在西德也渐渐有声势的对社会国家的怀疑的影响，采用破产管理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的刹车机制在于工会的权力。同时，西德在“政治调整”上粗暴插手，往往并不在意设身处地地去体会东德人生活的艰难之处。

> 西德的政党长驱直入，随手掩埋掉一切被他们激起来的东西。他们借着无法无天的狂妄向我们出售他们的民主。有少部分人反抗了。反对者的小股“部队”发出抗议的喊声，艰难地在不利的“地形”上“挥剑奋战”。其实早在所谓的“圆桌”上，我们就已经真切地体会到所谓民主的真面目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被贴上“降价”的标签，只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 我可以原谅我那些东德的同胞们，他们不够勇敢，并且被西德的民主和小康闪花了眼睛。可那些西德的政治掮客们，他们一向只做对自己而言正确、对我们却错得离谱的事情，我不原谅他们的强盗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有辱“成熟”，他们还用令人难以忍受地方式利用信基督的、民主的、自由的和爱国的同志，这些同志是东德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长时间培养出来的。他们利用史塔西的奴才，利用经济投机商，而这些人躲在易北河对岸，这些人需要为这个国家的疮痍负

责。

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这的确是一场绝好的闹剧。但它蹂躏了德国的道德。可以肯定本有其他的可能。那不必是第三条路，只要人们耐心地互相接近，并对那些即使是在东德长大的人也抱有尊敬，民众运动原本就是为他们兴起的。

政治的统一已经画上了句号。统一，从政治形式上来说，已经完成——那些追逐权力的政客似乎很占理。可是，直到两德人民之间的鸿沟弥合，直到心灵和文化的“柏林墙”倒塌，直到精神的差异被消除，还需要整整一代人。（康拉德·魏斯，东德电影制作人）

统一前的几天，东西两德的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为新的社会民主党。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主席沃尔夫冈·提尔瑟曾经希望，西德人不必摆出战胜者的姿态。“胜利不是他们争取来的，我们却需要忍受失败。”他说，前东德不能够变成德国的殖民地，它必须是新德国的一部分。

“我们将成为德国这个新国家里的新的男女公民。我们会有一大堆新的、旧的问题，会有一大堆压在我们头上的历史，但我们是平等的男女公民，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充满勇气，充满希望，充满进取的力量，充满对知识的渴望。我们会有‘重整河山待后生’的要求，也会有许多新的建议和想法。如果我们都把这一经历当作成长中的果实，就可以创造和利用新的机遇。”

然而，1990年代发生的事却表明，用理性的方式共同成长、水乳交融并没有发生。“统一是愿望，隔离才是真实：经济的隔离、社会的隔离、心理的隔离。”提尔瑟立足的政治文化（那是一种全面历史观、敏锐的感受力、带批判态度的自我认识的“混合物”，总而言之，完全符合启蒙的原则）只在少数人当中存在，虽然他们就此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也不容置疑，但并没有被两德统一的实际操作者倾听，更遑论被注意到。

埃姆尼德研究所1995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您今天是否希望两德没有被统一？”回答“是”的人占15%，回答“不”的人占83%。“在您看来，

统一后的发展怎样？”回答“比预期中的好”的人东德为13%，西德为25%。回答“比料想中的糟”的人东德占53%，西德占43%。“如果您在东德，给自己做一个统一后收支总结，结果是怎样的？”25%的人说“赚了”，17%的人说“赔了”，58%的人说“不赚不赔”。“东德公民是不是统一后德国里的二等公民？”东德有72%的人说“是”，27%的人说“不是”，西德有22%的人说“是”，77%的人说“不是”。

还剩什么

“希特勒偷走了我的童年，斯大林偷走我的青年，昂纳克偷走我最好的年华——科尔的幕僚们还要偷走剩下的所有年头！”这是一个“1935年度”的人在《西柏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宣言，如果生在东德，他们几乎是彻底玩完了（假如他们没有进入东德国家机器系统的话）。

但这是一个现象，它表明身份认同的破碎，这个现象存在于整个德国：失业者、“多余的人”、没有希望的人。那些政治和现代化的失败者，从东西两德汇聚成一个同仇敌忾、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的“生活水准降低”的步兵方阵。自然，人人心中都各自有一个需要对此负责的“罪人”。西德为平衡“德国与德国”之间的差距，向东德播撒巨大的物质帮助，东德的基础设施因此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巨额的贷款却加深了西德人认为统一是一笔“只赔不赚的买卖”的印象。而在东德方面，人们却对事情的发展持乐观态度（Status quo ante）。1992年，有人对中小学以“德国统一”为题的作文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选取图林根和莱茵兰-普法尔茨两州作为东西两德代表，研究发现，只有1/3的中小学生对统一持正面看法。“最好是这帮人打哪儿来回哪儿去。”“愚蠢的西佬（Wessis）根本无法理解东德曾经历过什么。现在应该反过来再来一次：西德并入东德。”（从1989年开始，共有1568070人由东德迁往西德，488430人由西德迁往东德，两相抵消，共有1079640人迁往西德。）

公民法学家弗里德里希·朔勒梅不无忧虑地仔细观察着已在政治领域冒头的排除异己和化整为零现象。“我知道，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换汤

不换药，我也知道这可以走到多糟糕的地步，尽管它们看上去是在统一之后才冒出来的。‘强迫人自由’也是一种专制，这种专制让被强迫的人即使身处‘自由’，也依然不得安宁，这让我担心。还有那些要求甩掉陌生包袱的愤怒叫嚣，和那些老掉牙的‘我才是正统’的姿态。旧的伤害已经够多了，现在又来了新的。专制的羞辱后紧接着就是自由的羞辱。”

> 沃尔夫·来珀尼斯认为两德统一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后果。旧联邦州[10] 的政治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利用统一为自己鼓噪作势。“重建德意志国家统一”只是一个宪法概念和一个政治雄辩术里耳熟能详的修辞，但从不是政治具体实施时需要关心的问题。“德国政治家没有自我审查。东德异己政见者被排除在外，这使他们越发缺乏反省意识。‘东德极权政府模式’在东德覆灭之后依然存在，比之前更加厚颜无耻。”
>
> 在早前的东德至少流行某种对任何政策都持怀疑态度的“异己思维”，其作用相当于反对党，它深植于德意志传统里新教教会对于公权的理解，这种理解更加执着于“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不是对某种权力或者多数派服从。虽然这种想法常常以个人牺牲为代价赢得公众的注意，但它最终并没有演变成一种权术。“东德社会的过度政治化反使政治这个概念失去了它原有的神圣含义。即便持异己政见者赢得了政治表达的自由，但他们对于政治的轻蔑并未改变。”民众运动气呼呼地拉长着脸，却没有更多动作，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自然是，选民并不尊重自己不受干涉的道德原则，在政治这个传动机制里，“伪政治道德”的砂子成了推动力。

那件激起新联邦州愤怒的事情很早就引起了旧联邦州的注意：“用宪法来爱国”（而非所谓的“实用物质主义”）的地位基础还相当薄弱。“适意的生活”真的只需在消费上达到小康，而并不同时包含一个国家公民的自在吗？“‘人们指责东德人不知感恩。他们竟然对意见自由、选举自由、旅行自由和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毫无感激之心。事实上，自由在东德已经几乎不是一个问题了。也许这是因为，在西德，自由已经是不需要讨论的话题，而这种‘不需要讨论’的感觉比其他所有感觉传递得都要快。’这是历史学家洛塔尔·加尔的猜测。而理查德·施罗德则补充道：‘假如有人对一个失业者说：现在你可以自由旅行啊。或对一个害怕失去住房的人说：你可以对此在公共场合自由展开骂战啊。这显然是

非常不合时宜的。’”

在统一刚刚完成的阶段，创新动力的缺失和逃避责任带来了很负面的效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报道说，人们害怕承担风险、懒于创新、缺乏活力、缺乏适应力。但与此同时，公民社会的道德体系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从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意识形态和西德密不透风的围攻的双重枷锁里挣脱。它的发展使西方的发展水平相形见绌，因为它带来了新鲜感和好奇心。乌托邦式的终极梦想在新联邦州依然有价值，并未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懒散而失去其光彩。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列宁式”和“晚期资本主义式”逻辑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恰好是那迅疾的身份认同重建教育——在那漫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集权的压制下的身份——使人们想起了西方共产主义的全盛时期：让百花齐放！多样比单一要好。

海纳·克约普把东德的“自由化道路”分成三种主要类型，但其实这三种类型适用于全德国。

创新自由化：他们多来自受过精英教育的阶层。尽管有各种声音，批评两德统一类似于殖民，他们仍然自视为统一中的获胜者。因为统一为他们打开了未来之门。他们期待着无数种可能，并一一尝试自己的想法。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多元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威胁。“他们的社会人际网络是多相不均一的，三教九流全都有。他们推崇多种关系所带来的机会，并不用任何一种价值与之绑定。”

规范自由化：他们多来自社会中层中的下层或社会底层中的上层。在适应西方以家庭观念为主导的规范过程中，他们显得相对笨拙。他们觉得这种模式正在式微，而有组织的“仇雠相对”则让他们感觉很掉价。在他们眼里，未来的开放性即是不确定性，多元的生活选择也更像是一种威胁。他们的社会人际网络以家庭为中心，同外界的联系则以高墙隔开。

隶属自由化：这类人的机会更少，情况比较严峻。他们多数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破碎。个人生活之外的世界在他们眼里是有敌意的、危险的。他们常常试图通过各种怪异的行为来保护自己。对于他们来说，暴力常常是唯一显得自己有用的方式。他们的社会人际网络并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让自己变得有用的生活构建的范本，关系也很少，就算有，也多半自诩为“被排除在外者的集合”。在这种集合里，通过极端方式获得归属感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方式带给他们归属感、认同和“自己具有行动力”的感觉。

在克丽丝塔·沃尔夫的自传体小说《还剩什么》的末尾，女主人走过她住所的所有房间，关上所有灯，只有桌上台灯还亮着：“它几乎叫我感动。这一刻，它仿佛有思想一样，精准地把握了一点。这一点，我将在未来某天用我的新语言说出。未来某天，我想着，我将轻松而自由地说出它。现在还太早，然而，难道不会一直‘太早’下去吗？难道我不该现在就去坐在桌边，坐在那盏台灯下，摆好纸张拿起笔开始写作？写还剩下些什么。写我的城市的基础，写它为什么走向衰亡。写这里没有除了不能生活之外的不幸，写最终也没有除了不曾活过之外的绝望。”

这位女作家的生活反映了许许多多生活在极权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境况。勇敢和妥协始终处于天平的两端，人们苦苦挣扎，以免自己过于同流合污，保持至少一点点气节，但又始终不能完全做到。自我安慰成为一项必备技能。“有一天讲真话将变为可能”这个希望补偿了生活在谎言之下的精神与灵魂上的窒息感。“总有一天我可以说出来。”这种用文艺腔表现出来的悲苦存在只得寄希望于未来，其任务是写下真话。但是，趋利避害的本性却在告诉人们勿做反抗。

上文中克丽丝塔·沃尔夫的小说在两德统一的那一年，即1989年的11月出版，它在1979年六七月时就已写成。小说激起的文学界争论——其中有不可避免的个人攻击——抓住了许多“本质”问题：艺术形象是否必须代表道德？它是不是必须在“气节问题”上站在对的那一边？抑或其质量可以只求自说自话，即为了艺术的艺术？可恰恰那些

认为“气节问题”有待商榷的人（他们说，艺术会由此“沦为工具”——这是令人生厌的，即使本意不错）抨击克丽丝塔·沃尔夫的小说，认为其文学质量欠佳，同时也抨击她的人品，说她缺乏政治反抗的勇气，所作所为是投机主义行径。尤其遭到批评的是带有一段非常德国式的论述的一章，那段论述有关思想和行动，其内容是对一所传授蛊惑思想的中学的案例研究。

“一路走来有什么/这我们已经知道。路前方有什么/我们却一无所知，/直到/我们走过的那天。”（海因茨·策科夫斯基）

---

[1] 维利·斯多夫（Willi Stoph，1914～1999年），东德政治人物。1964～1973年出任东德部长会议主席。1976～1989年再次出任东德总理。

[2] 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1937年～），生于德国波莫瑞省的科尔堡（现属波兰），是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最后一任总书记。1989年他在原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辞职后曾担任数周的东德领导人。德国统一之后他被控谋杀而被判处六年半的有期徒刑。刑期到2003年结束。

[3] 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1929年～）是东德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官员。1989年11月，他令柏林墙和两德边界开始拆除，开启两德统一的序幕。

[4]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1927～2009年），波兰哲学家、思想史家，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析闻名，这一点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中。在晚年著作中，他更加关注信仰问题。

[5] 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年）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他1819年出生于胡格诺教徒家庭，6岁成为药店学徒，20岁写出处女作，在莱比锡进修。他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1849年成为全职作家。代表作有《沙赫·封乌特诺夫》（1883年）、《艾菲·布里斯特》（1895年）和《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年）等。他被认为是19世纪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

[6] PEN中心是德国的一个作家协会。PEN是英语“诗人、散文家、小说家”（Poets，Essayists，Novelists）的简写。

[7] 大斋首日，又名圣灰礼仪日、圣灰星期三、圣灰日，是基督教教会年历的大斋期（四旬期）之起始日。当天教会会举行涂灰礼，要把去年棕枝主日祝圣过的棕枝烧成灰，在礼仪中涂在教友的额头上，作为悔改的象征。大斋首日是根据复活节的日期前四十天（不计算主日），因此每年的大斋首日的日期都不同。最早可以是2月4日，最迟是3月10日。

[8] 它们是当时德国的两家较大的百货公司。

[9] 希登塞岛是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一个市镇。总面积19.03平方公里，总人口1014人。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原属东德。

[10] 两德统一后，西德11州称旧联邦州，东德5州称新联邦州，一共16个联邦州。因为统一是以东德并入西德的形式完成的。

第19章 文化的疑难杂症

戏剧传播

统一的狂喜慢慢被清醒所取代。此时对东德的话剧状况做一个回望有助于消减统一带来的“文化身份伤害”。因为，东德造型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同西德的旗鼓相当（尽管东德国家的控制与审查机制让创造条件变得比较艰难），除此之外，东德的一些著名电影导演也曾在西德扬名立万。

某种“渗透”把两德的话剧发展捆绑在一起，尽管有一些不可回避的差异，但合作的紧密程度超过其他领域。在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下的国家搞话剧是有难度的——艺术家的个人追求和政令的责成间总会有些矛盾——但正是难度的存在反而促成了柏林墙两侧的结盟，因为在墙的两侧，都有被“强制宽容”了的艺术家。西德的话剧制作人也认为，从东德的话剧中受益匪浅，尤其是柏林歌舞剧团，那是一个重要的艺术风向标。

> 早在苏占区建立话剧系统时，之后成为东德所属的戏剧工作者就已展现出极大的乐于尝试的心态。尤为突出的是沃尔夫冈·朗霍夫，他在第三帝国时期曾流亡瑞士，就职于苏黎世剧院，1945年应邀回杜塞尔多夫担任当地艺术总监。1946年前往东柏林，接任德意志剧院的领导工作。在那段时间，国家社会主义累累罪行的阴影犹然挥之未去，许多艺术家由此十分抵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艺术至上主义，他们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剧院应承担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剧院，应成为道德教育机构。社会主义，对持这种态度的艺术家来说，便是实现“戏剧传播”的一个有力担保。此外，东德的戏剧业结构也给从业者提供了有较好经济收益的工作。“在那里，并没有逼着你去成功的小皮鞭一路挥舞，不成功就必须成仁的非此即彼在那里不存在。创造环境无比舒适，只要艺术家们待在允许范围内，他们的生活保障无可挑剔。”
>
> 在冷战期间，东柏林是全德国的戏剧之都。此外，有戏剧网络的

> 各省（尤其是图林根和萨克森[1]）也奉献了很高水准的戏剧。即使是中小剧院的导演也能产出胜于大都会柏林的作品（比如，德累斯顿的沃尔夫冈·恩格，卡尔-马克思城的弗朗克·卡斯多夫，波茨坦的沃尔夫·温克尔格隆德）。在汉斯-安塞姆·佩尔腾的领导下，罗斯托克剧院演出的西德剧目超过其他所有东德城市所演西德剧目的总和。德国导演界1990年代的青年才俊利安德·豪斯曼——他在西德的事业从1991年在法兰克福起步，之后导演多场演出，从1995年开始担任波鸿剧院的院长——的艺术潜质是在位于梅克伦堡[2]的一座小县城帕西姆得到开发的，在魏玛首次成为导演界的新星。

在东德，几乎没有人为了戏剧而只做戏剧，这是在东德任职多年的剧作家依莱妮·波莫的定论。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何在东德拥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具有那么多勇气，尤其是那些杰出的剧院院长——赫蕾娜·魏格尔、沃尔夫冈·朗霍夫、瓦尔特·费尔森施泰因、沃尔夫冈·海因茨、本诺·贝松——用他们的剧院为那些有着自己独到想法的演出提供了那么好的活动空间。

“在东德，写剧本的人、导演、演员，不管他们是遵从布莱希特还是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传统，不管他们的剧目是叙事诗还是唤起观众共鸣的通俗作品，所有这些人都对‘为了艺术而艺术’这个出发点抱不信任态度。他们做戏剧是有意图的——为了改变糟糕的现状，有些时候，戏剧是他们通向更好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点。”

正是这一点深得负责检查和批准的文化官员之心，他们多数也都会在剧院的领导机构里担任一官半职。不过，他们多数还是对被海纳·穆勒一语以蔽之的“行军革命”式剧院采取抵触态度。

这样的创作条件给西德人，尤其是左派的戏剧制作人带来了很好的效益，但也暗含了一些阻碍。德国统一社会党赋予戏剧业以崇高地位，却被“带来不幸权威的首席教师们”所利用（“带来不幸权威的首席教师”是两德统一后发表在原属东德报纸《当代戏剧》的一篇回望总结性文章《阻碍的历史回顾》提出的），这些人同某些投机取巧的戏剧批评

家沆瀣一气，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东德戏剧业的高质量并非集体团结创作产生，也非社会审美品位的集中反映，而是“由重要戏剧制作人联袂工作、审视现状和国家的革命道路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系列”。这些“审视”是有批判性、辩证眼光和创新性的，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集团里却不乏思想僵化、目光短浅、市侩气十足的人，有些人则老气横秋，这导致许多厌倦了政治伪装和“走钢丝”的东德导演在工作中颇感受挫，以至于放弃工作。他们有些人作客西德，有些人则离开东德——不管怎样，他们在西德都因为“从不放弃蛊惑挑拨”和受布莱希特及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3]影响的戏剧精神而备受批评，受了一肚子气。

与此同时，西德的戏剧，无论是从剧目安排还是导演理念上来说，都十分受时兴的“西式新情调”及当代政治风向和时尚所左右。戏剧被充满诱惑、仿佛秀场般的电视节目攻城略地。与之相较，东德戏剧的流入成为抵御“什么都无所谓”的坚固城池。西德戏剧制作人和导演——西柏林的舞台，波鸿、法兰克福、汉堡的剧院，慕尼黑的室内剧和法兰克福的歌剧院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因此非常喜欢跟来自东德的使者发展出一场艺术“亲和力”的关系。

1981年的《今日剧院》载文称，东德导演分三种类型：只在东德工作型、只在西德工作型、东西两德两地工作型（1982年，共有69部东德导演执导的电影在外国获奖）。作为东德公民的托马斯·朗霍夫不无悲哀地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中最优秀的人中有一部分竟不能在自己家里工作”。关于时下东德对来自西方的诱惑采取的盲目跟从态度，他说：“谁要是不在西德拍电影，那他在东德自己家里也没什么价值，这人就是过气了。”

一些知名导演很好地利用了手中的旅游特权，开始是客座导演，后来就长期居住在西德。

在那些作为客座导演作客西德的人当中（弗里茨·马夸德、克劳斯·埃尔福特、沃尔夫冈·恩格），露特·贝格豪斯的“歌剧电影”非常突出。她同作曲家保罗·德绍结婚，1971年接任赫蕾娜·魏格尔出任柏林歌舞剧团团长。一年之后，由她执导的韦伯歌剧《魔弹射手》[4] 在柏林国家歌剧院演出，受到诸多批评。批评称，她展现的是一片无烟火气息的乐土，却并无塑造任何可有益于“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共同体”的榜样形象，亦无对人民的塑造。她的后继者曼弗雷德·韦克维特自1982年起出任东德艺术学院院长，此人是个机会主义者，十分忠于“路线”，在贝格豪斯的《魔弹射手》上演时就警告大家勿受此剧影响世界观。可正是露特·贝格豪斯非比寻常的想象力使她在音乐剧领域做出了令人难忘的新发现。“她和海纳·穆勒一样，是布莱希特思想的继承者，但又不仅限于此。她用令人着迷而又忠于真实的方式见证了20世纪下半叶。她不断地把有时已陷于僵局的舞台艺术重新盘活。她看问题的方式——尽管充满那么多纠结——在哲学与艺术意义上都具有意义，正是这些方式让我们的戏剧一直保持清醒。”（乌多·齐默尔曼，东德歌剧作曲家、莱比锡歌剧院院长，代表作有《白玫瑰》[5] 。）

离开东德的导演举例如下：

本诺·贝松。代表作《快乐感觉》，由他本人及许多其他人的经历加工而成。曾与一些颇具才华的作家合作，其中有哈特穆特·朗格和彼特·哈克斯。受到批评是因为缺乏“对符合阶级特征的矛盾处理”。

阿多夫·德雷森。他同沃尔夫冈·海因茨合作的《浮士德·一》自1968年在德意志剧院上演就受到攻击，其猛烈程度甚至惊动了国务委员会。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克劳斯·居希称，该演出忽视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前提，即东德的发展已然终结了《浮士德》，因此，照瓦尔特·乌布利希的话说，《浮士德》该写第三部分了。亚历山大·阿布施表示，党希望在《浮士德》里看到的是一个强悍的人格，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形象。“作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反对一切隐藏或公开、有意或无意的倾向，用冷漠、忽视或其他的小市民艺术手段掩盖《浮士德》的基本思想。”

海纳·基普哈特。曾任德意志剧院的总顾问。1949年公开表示支持

东德，移居东柏林。1959年申请离境，因他在当时的条件下，尤其是文化政策下，看不到任何“作为作家或戏剧专家有所用途”的机会。

亚历山大·朗。他于1980年执导的莎士比亚剧目《仲夏夜之梦》在德意志剧院上演，对1980年代的东德戏剧业产生了深刻影响。

马蒂亚斯·朗霍夫和曼弗雷德·卡格。1971年，二人执导席勒的《强盗》，探索革命运动的本质。

托马斯·朗霍夫。其父沃尔夫冈·朗霍夫受到尊严被践踏的对待是他的噩梦。

彼特·帕里奇（原是从西德过来的）。1959年，他和曼弗雷德·维克维尔特共同导演布莱希特的话剧《教父亚图的发迹史》并在柏林歌舞剧院上演，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反响。

B.K.塔格雷恩。他于1961年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经济学院学生舞台上演的海纳·穆勒剧目《迁居女人或乡村生活》被贬为“反动的粗制滥造”。后来他同爱娜·施列夫合作的于1985年上演的史特林贝格剧目《茱丽小姐》又被贬斥，致使他直到1980年代中期一直只能在东德之外的地方执导。施列夫也在经历过失败的逃亡和牢狱生活后离开了东德。

在两德戏剧业的鸿沟被消除、自由交流成为可能之后，东德的戏剧业很快便被腐蚀。西德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的一些事情在两德统一之后也出现在东德。戏剧业为何存在成了危机问题，这一点，约阿希姆·菲斯特早在70年代就已用“戏剧失去了社会功能”的悲惨来形容。没有作者，没有观众，没有接班人。各个剧院院长及顾问争论不休，每个人都可笑地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人，这也许是戏剧业还存在的唯一证明了。

在西德，新的不确定性引起了艺术家的不安全感。而观众，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大吃一惊了。有人指责剧院已经千疮百孔，变成了“一场展览，各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幼稚创造被当作成果来展出，是活生生的现世宝”（哈特穆特·朗格）。图片取代了意义，人们也懒得理解什么意义，所有人都因为忙着给作品上纲上线和凹造型而忙到抽搐。罗贝特·威尔森成了深奥派“戏剧批评家”的精神导师。格奥尔格·亨瑟尔在1979

年评论威尔森剧目《死亡销毁和底特律》时说："非文学剧目是这种戏剧的后果，从克劳斯·米夏埃尔·格吕伯到皮娜·鲍施，颇值得玩味。"他进而用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此话可用于总结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戏剧界的"漫无目的"："没有一件艺术作品代表某种观点。有观点的只是人。"

> 当时的戏剧业缺乏起码的概念和真诚——像汉斯·霍尔曼和汉斯君特·海默这样的导演被称为"揭发运动家"，沦为异类——为了让后现代、"酷感"的观众不至于"无聊致死"，某种"轰动主义"应运而生。它在汉斯·诺伊费尔斯和格奥尔格·塔伯里那里，犹然展现出追求内涵的戏剧风采，而到了彼特·扎德克那里，则变为大号丑角吉尼奥尔[6]。乌尔里希·韦尔德格鲁伯是同彼特·扎德克具有同等非政府主义精神的主角。由他主演的《奥赛罗》被彼特·伊登描绘为一个"堕落、令人瞠目结舌、躁动、多数时候半裸、常常大汗淋漓的怪物，不符合任何一种文明秩序，所有反应都是毫无节制的。他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让整个舞台充满了疯子一样的咆哮，搞成一场爆炸"。

具有先锋精神的人日渐老去，真正的文化意识被加以嘲讽和丑化。这一切从那些向来以高质量而闻名的戏剧人身上碾过。而另一些与时俱进的人，则把他们领导下的剧院变成了某种高质量的文化中心，可兼顾尽可能广的品位范围。正因如此，当时的慕尼黑小型戏剧院（院长迪特·多恩）、汉堡的塔利亚话剧院（院长尤尔根·弗利姆）、鲁尔区的缪尔海姆剧院（院长罗贝托·修利）可以开开心心地就抵御住了当时哀鸿遍野的戏剧业危机。而在维也纳，作为城堡剧院[7]院长的克劳斯·佩曼使尽浑身解数，让他的剧院尽可能满座。这首先是因为，佩曼在其职业生涯中总能很聪明地运用想象力，无视各种"政治正确"，并不介意"树敌颇多"。而在西德年轻一代的导演中，1948年出生的路克·邦迪也保持了较好的名声，这主要是因为他懂得怎样运用阐释技巧和品味上比较保险的"手工"来表达新奇。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给自己找乐子的人，所以我总需要时不时把握住一些确定的东西，这较少是出于责任感，更多出于兴趣。"

对于东德的戏剧业来说，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社会主义的国民剧院”，而某些尽管受到意识形态压力，但仍然对现实抱有敏锐怀疑态度的戏剧人并不太愿意严格遵循这个理念——它“是一个美好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理想，古典主义艺术家的作品用艺术形式把这个理想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个理想将在社会主义社会变为现实”（语出戏剧业会议，莱比锡，1960年）。为了实现这个理念，将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对加强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受此影响，早在1951年，沃尔夫冈·朗霍夫导演的《埃格蒙特》[8] 在德意志剧院上演，为了——正如歌德本人所说——“用一个伟大的例子”来激发观众，“让他们把所有力量都致力于我们祖国的统一”。朗霍夫的排演版本被比他更冷静的布莱希特称为“不辩证的理想主义”，全剧在充满献身意味、崇高庄严的剧终时达到顶峰：贝多芬的交响乐伴随着牢狱的倒塌而响起，倒塌的墙后是“耀眼的光芒，象征着被解放的人民，中间是身着红衣的克拉拉，手中挥舞着荷兰的旗帜”，克拉拉把胜利的桂冠授予埃格蒙德。

1954年，新成立的东德文化部部长约翰内斯·R.贝谢解释说，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表现不应有东德-西德剧院之分，而应是有且只有一个德国国民剧院，这也是席勒、莱辛等先贤们为之努力的。在其后数十年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导的文化政策下，与西德的“国际范儿”和美国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德为保持本民族鲜明个性和自觉意识所做出的努力，东德一直致力于把剧院建成传承和发扬德意志文化传统的堡垒——魏玛[9] 成为常常被提及的术语。在东德，社会主义的国民剧院被认为是应该建立在两个支柱之上：一个是通过保护古典文化来传承传统，另一个是激励当代剧目创作。在1964年的一次采访中，彼特·哈克斯说，人们已经渐渐学会如何在舞台上表现社会变迁，不过现在还可以更进一步：去讲述某些人物的伟大故事，同时也并不忽略其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局限。人们已经渐渐开始在舞台上表演新的经典之作，大家对此都很满意，这也是符合市民戏剧精神的。而更上一层楼则是像“狂飙突进”那样的人，因为阶级已经有了更多的自觉意识，开始“伤害”传承下来的社会和艺术

（在此，哈克斯提起他本人的作品《罗伯齐茨的战役》和海纳·穆勒的《廉价劳动力》）。而现在，古典主义在踌躇，“人们并不因为忽视就放弃过去的伟大作品，而是努力改进它们。我想我们终会到达”。

但最终还是没有到达：东德的文化并未实现这些豪情壮志，反而因为各种借着“改进”的借口而出台的禁忌，道路越走越窄。德国统一社会党认为，一切只有在引导之下才会是最好的，所以对于“人的品性中哪一些应该被强化”这样的问题也要下命令，“不安分守己的戏剧”因为种种“这会不会导致这样那样”的考虑和一厢情愿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被撤销。

尽管如此，剧本作家和导演们也一直敢于在舞台上表现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改善、政治教条之外的想法甚至对当下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一些看法。埃尔温·斯特里马特的喜剧脚本《卡茨格拉本》于1953年由贝托·布莱希特亲自导演——这是布莱希特第一次执导时代戏剧——是希望唤醒人们对“乡村青少年”的希望。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的《少年W的新烦恼》1972年在哈勒首演，该剧本依然是以青年男主人公自杀而结尾。福尔克·布劳恩的《过渡社会》（1989年）收效不佳，因为该剧的形象以观众代理人自居，充分表现了日常的悲苦，有些过分“实诚”。

> 一个没有说服力的革命不会触动心灵。它应当牢牢起到火车头的作用，拖着整辆列车进入旅程。贫困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的压迫，也是人类历史中完全无必要的败笔。就像赛马时不断地换马一样，其实也只不过有一匹又瞎又残的老马。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一场灾难。年轻人若不能飞，老人就得借出他的拐杖。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离开大门。伟大的头儿、宝贝般的骨干、光荣的候选人。我问自己，为何贡献我的力量，为何为这个新事物贡献我的名声——它并不一定更好。至少不会在我有生之年更好，我不希望它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不希望即使在睡梦中也没有希望。奥尔加，我是一个多么死脑筋的家伙啊，履行自己的责任，为某种更高级生物，为一个蠢货，所谓的新人类。

一些出色的作家如海纳·穆勒、福尔克·布劳恩、彼特·哈克斯、托马

斯·布拉什（他在1968年因为“仇视国家教唆罪”被判两年以上徒刑，1977年迁居西柏林）试着让自己适应社会、“攀登文化高峰”，但因为他们有时不知适可而止，常会被“根据制度”困在某个地带动弹不得。海纳·穆勒的“反动的拙劣作品”《女迁居者或乡村生活》想表达集体土地改革尽管取得了客观进步，但这些进步的另一面则是对个人的轻视。《哈姆雷特机器》和《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既不允许出版，也不允许上演。不过弗里茨·马夸德的《建筑》终究在1980年得以首映，尽管该剧，按导演的话说“有许多乌托邦式的场景影射现实，常常是带着痛感的”。“尖叫疼痛的乌托邦”：当时东德的作家仿佛西西弗斯，当工作的疲惫感太强，便只能逃离到古希腊罗马的例子中——哈克斯写了《安菲特律翁和欧法拉[10]》，穆勒写了《菲罗克勒特[11]》《俄狄浦斯暴政》《赫拉克勒斯5》《普罗米修斯》。

> 海纳·穆勒为东德的观众写作：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机会的同志、做事稳妥的技术官僚、让人信赖的人。文本制作是鼹鼠一样的破坏活动。在《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中，人们看到“颅骨销售员”，上“夜班”给地下的死人“重新铺床”。这人原是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千年帝国”里的“当代预兆尸毒”，研究失败之后具有了免疫力，对历史乐观主义持警醒态度。同样，关于信仰进步的启蒙家莱辛的神话也在《莱辛的睡梦呐喊尖叫》里被毁：在充满肉体痛苦和可怕战争的黑暗时代，这位推崇“市民悲剧”的启蒙诗人患了无梦的嗜睡症。白日梦一直未被实现所带来的持久失望渐渐让“醒着”成了一种负担。因此，莱辛——就像海纳·穆勒本人一样——“做着一个德国戏剧的梦”，而这梦做得太早：30年了，我一直试着用语言文字来保持自己不要跌入道德的深谷，因为文件的灰和书中的尘患了胸病，对文学的厌倦让我作呕，对寂静的向往让我几乎燃烧。我开始忘记自己的文字。我是一个筛子。一直有越来越多的词语从我当中落下。很快，除了自己的声音，我将不再听见任何声音，而那个声音是追问那些被遗忘词汇的声音。（杰尼娅·舒尔茨）

统一之后，有一件事情变得很明确，即德国的“戏剧传播”不再是一个纯精神探讨的话题，而成为经济政治里投入-回报的斤斤计较。在东德地区，国家领导人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崩溃，造成普遍的贫困，这也影响了戏剧业。文化的结构和基础设施在来自西德地区过渡期的帮

助下得以保存。这之所以还成为可能，是因为艺术界和政策界的人同心同德，为了保存现有的戏剧业，做出一些个人牺牲也在所不惜。如果没有国家官僚机制的介入所产生的磨合，如果观众对反对的声音没有那么抵触——这首先也是因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审查机制——那么东德地区的文化意识构成也会很快消散，其后果至少是，在这样的社会变革期，“反映真实生活里的戏剧冲突”的戏剧无法上演。当时“普遍而惶然的无所适从”本也蕴含了一个机会，也许它会促成一个新的开始（托马斯·朗霍夫），而人们并未利用它。

曾经的柏林歌舞剧院几乎是一个神话，现在这个神话连同与之紧紧相连的海纳·穆勒，日渐失去光彩。海纳·穆勒于1995年12月30日去世，在他1992年发表的自传里曾经写道，自从布莱希特的去世，柏林歌舞剧院已是一座墓穴。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柏林舞台剧院，在其成立的第四十个年头里，终于作为一个文化传播机构开始放出光彩。其“去神话性”是随着1981年哈勒申·乌弗迁入莱尼埃广场发生的，当时它由埃里希·门德尔松主持，还叫作“宇宙电影院”。四年后，电影院的灵魂人物彼特·施泰因退出。作为“德国戏剧业的豪华游轮”的柏林舞台剧院并未因此垮掉，还在向前发展，并取得了成功。在西德大剧院浩浩荡荡的大军压境下，它当然难以幸免艺术影响力和经济效益上的下坡路。出于无奈，柏林舞台剧院推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但投入和回报之间的差距居然越来越大，这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的大经济环境下不成比例增长的开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观众人数一直在减少。通过票价无法收回的成本由1957年的60%增长到1974年的82%，到了1991年，达到87%，而为每一个观众所需要花出的开销由1957年的平均每人12.7马克增长到1974年的84.6马克，而在1991年，这个数字是185.8马克。

剧院——作为道德感化机构的剧院——用营造思想空间的方式进行

愉快的启蒙，真的有必要夺回失地了。

> 戏剧评论家杰哈德·斯塔德迈尔用听上去泛泛而论，实则颇为精辟的话来总结德国戏剧业1990年代所面临危机的原因：肥胖的机构，瘦骨嶙峋的艺术。越来越多的戏剧人，尤其是剧院院长，搞的都是一些“贫瘠的戏剧”（在这个意义上，它跟杂交猪——“西方养殖精神最棒的想法之一”——有可比之处），这些戏剧站在摇晃不稳的腿上，因此自己也摇摇欲坠，搞不好就要得上神经病或者血管梗死，却有一个无比烦琐的精神状况。“杂交”还有一重意思：情绪高涨、夸张、失节。经济的失节——在这个问题上，国有剧院比社区剧院的情况严重，歌剧院比话剧院的情况严重，院长和导演们的情况比演员的严重——导致剧院要伤害其他文化设施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阻碍了人们对剧院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艺术状况做出有效的回应。政治的介入使得人们的考虑越发瞻前顾后，剧院面临倒闭的威胁，而柏林席勒剧院的的确确在1993年关门了。音乐娱乐工业反而受到资助，而且经济领域中还有专门的拨款。国家兴建了无数新的设施，由此，娱乐文化在全国推广开来。

阿特拉斯[12]的“受命”艺术

西德的主流艺术形式为商业化操控，造成人人力争上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与此同时，东德造型艺术的发展则更像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圈子，圈子的中心是国家——引导、审查、激励、奖赏的权力因素。

> 受意识形态影响，几乎总是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历史题材绘画尤其合前东德地区领导者的口味。这种“受命艺术”的形式几乎十几年无变化。举几个例子：《为了和平而工作》（海因里希·埃默森，1950年）、《建设斯大林大道》（海因茨·略夫勒，1953年）、《狱中的罗莎·卢森堡》（茱塔·达默，1957年）、《年轻的建筑工》（阿克塞尔·舒尔茨，1963年）、《红旗之路》（杰哈德·邦辛，1969年）、《生活之乐》（保尔·米夏埃利斯，1977年）、《苏联历史画卷》（诺伯特·瓦根布莱特，1990年）。

当然，“体制外”也不是不存在，但那样的艺术就几乎全然脱离大众公共视野，因此，那样的艺术家要么就得“内心流亡”，要么就得肉体流亡——逃离东德（从1949年到1989年，这个人数总共是600人）。

最终，杰出的艺术家还是找到了某种平衡的办法，既达到艺术上的高度，又与国家靠近——或者至少不会被否决。“官方认可和非官方认可艺术之间的界线并不像某些西德审视者自作聪明地在杂志封面上写的那样，很难一刀切。自从1976年的比尔曼事件之后，艺术工作者和党派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步调一致已然受到至少是一点微弱的损毁。发展变得复杂，人们却只能在其中较为清楚地辨认出一种区别：艺术家和仅仅只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幻想家。”（卡特琳·托马斯）

1980年代，就连非主流的艺术也不再是自说自话的“地下”小情调，俨然已获得了呈放射状散发的好感。在这些对非主流艺术表达好感的人中，既有对严格规定好坏的政党政治逐渐产生怀疑进而对个别行为采取宽容态度的文化官僚，也有追求团结共生的文化协会成员或大学教授。不变的是，同时讨好两边——自家的文化机构和西方的文化公司——的想法如鲠在喉，使得一向被宠坏了的东德现实主义文化的主角们毫无疑问地成为美学新趋势的阻碍者，因为，要不是这样，他们就得跟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旅行特权，跟那些不听话的“新来的”分享他们通过买卖文化所获红利的这块肥大蛋糕——那些新来的才不管什么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了。

莱比锡的“四人组合”（沃尔夫冈·马特尔赫、维利·席特、伯恩哈德·海西斯和维尔纳·图布克）还算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们第一次在国际上亮相是在1977年卡塞尔的第六届纪录片节上。与此同时，在西德，也有人又开始对“现实主义的新形式”表现出兴趣。但是，东德艺术家的现实主义同被流行文化所操控、逐渐变得平庸的现实主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主要通过铺天盖地广告式以及搞笑的图片来博取眼球。而东德艺术家的现实主义则接近古典现代派，在展现自身与现实的关系时，表现出价值观的保守、富有历史感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

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例外有约瑟夫·黑根巴特、汉斯·特奥·里希特、

杰哈德·阿尔滕伯格），东德的艺术在西德基本是不为人知的。而现在，在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国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些画家，宣称自己是“明显的德国人、了解传统”，自己的作品“富有内涵、有益道德”。莱比锡“四人组合”以及他们的学生向全体德国观众喊话，对追求利益最大化、各种风尚走马灯似变换的艺术市场表示厌倦。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客观主义、真实主义、矫饰主义、复古主义——无论哪种偏好，在东德艺术中都能找到一点。

“这些艺术的主题范围很广，从基督受难、圣母怀抱受难耶稣的悲恸形象、监护病房、堵车、性行为、贫乏的室内装修、步行街、环境污染到下班时间、生产队的庆祝、人满为患的海滩、工作场所的疏离和婚姻危机，等等。”

20世纪的彼此为敌又造成了悲剧的两个极权体制，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沃尔夫冈·马特尔赫超过真人大小的作品《世纪步伐》（铁版画）中有所体现。“一个魔鬼般的形象仿佛持凶器滥杀无辜者一样，从历史中跑出，头深深缩进躯干，一只眼睛是瞎的，另一只的眼球掉出来老长。它的左手做出向希特勒致敬的笔直手势，右手紧紧握拳。代表‘落后反动’的左腿套在靴子、黑色军装裤和军章流苏里（代表军权主义），代表‘进步’的右腿则被漆成白色。”此作品的用意之一也是隐喻东德的艺术政策：自从国家社会主义倒台以来，苏战区和后来的东德都流行一种言之凿凿的观点，即反法西斯主义取得了对恐怖极权的胜利，社会主义的人性形象应该首先通过艺术得到传播。



西格哈德·基勒：《海因里希劳动生产小组》，**1970/1971**年

生活和工作在哈勒的维利·席特一直致力于在党代会的高度上做一些活动。他喜欢毕加索、莱热[13]和古图索[14]，作为共产主义者，政治倾向无可厚非，但他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自我批评中发誓否认了这一点，而这为他登上东德造型艺术家协会主席的座位铺平了道路。他的作品《配电台旁的化学工作者》（1968年）勾勒出了“计划者和领导者”的新类型，该类型“消解了四肢发达、孔武有力的工人英雄形象，为的是更好地适应‘技术和科学革命’。作品中，配电板被画成透明的，人们可以透过它看到后面的工人以一个‘造物主’般的形象出现，正以高度的注意力用手指操控配电台上的强大能量”。

受国家领导的文化机构则并不太关心敏锐的感官，而是盛行一种清

晰的“受命”规则。那些强烈批评法西斯主义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受到奖赏，而质疑这个规则的人则几乎没有机会得到什么任务。在分配任务的委员会里，总有那么些艺术家，因“其艺术观是个人主义且主观的，崇尚颓废的艺术理论”，同苏占区的意识形态和官僚机制对着干。政治局一份关于画家状况的报告（1959年11月）写道，自1953年起，东德的艺术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及采用现当代素材上开了倒车。“在一个又一个紧挨着的工作室里，我们在那些被检查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发现了某种‘体温变化’，这是一种对艺术表达手法的不确定的尝试，它向所有方向投石问路，最后直接成为对颓废艺术偶像的粗浅模仿。”这些偶像有：图卢兹-洛特雷克[15]、马蒂斯[16]、毕加索和德国表现主义画家贝克曼、诺尔德和霍弗尔。在这个时期，画作的对象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马戏团小丑、酒保、喝酒的人、妓女、残废者、猫、狗，都是画布上的主角。

> 除了大家对应起到教育民众作用的反法西斯主义艺术表示一致赞同外，一些拒绝任何形式或内容上的强制的著名艺术家——德国统一社会党政府也正在努力争取到更多的“艺术创造者”——在开头的几年都觉得日子不错。而冷战的到来则结束了这股开明的风气。
>
> 不过，缓和期也不是一直都没有的。1954年，《造型艺术》杂志的总编就是一位彻头彻尾拒绝官方形式的艺术家，和之前进过集中营的赫伯特·桑德贝格一起，连强调艺术意识形态化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政府也对他俩让步。“他在其后的两年内，通过《造型艺术》，把部分西方的艺术引入了东德。”
>
> 这扇“通向世界的窗口”在1956年匈牙利起义被镇压后关上了。桑德贝格被雪藏。1959年的会议则把“艺术在什么范围内作为工作生活的动力”的标准变得更窄。“艺术之不受约束”概念被涂成了一张大花脸，再难见其本来意义。霍斯特·斯特雷培尔——1933年入境，后被遣送出德国——的墙画《弗里德里希大街[17]火车站》因不符合规矩被擦掉。当然，从后世的眼光看，给艺术作品“添脂加粉”的也有，在统一之后，这类“修葺”工作很不受欢迎。杰哈德·里希特是一位精通于融会贯通国际风格的画家，后来流亡西德，试图恢复他在德国卫生博物馆（德累斯顿）大厅的壁画，尽管他称该画作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和平-欢乐-蛋糕-乐园”，此举也并不受待见。

在画作《固执的遗忘》中，伯恩哈德·海西斯用奥托·戴克的三联画中的中间一幅来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父亲那辈人参加了那些战争。海西斯本人1941年自愿加入德国国防军，后成为坦克手和党卫队成员。从苏联的战俘营中被放出来以后，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他认为，在东德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他的艺术作品是回忆过去的工作，却被一些“分配任务的人”认为是失败主义和历史悲观论，而这些作品隐晦地批评了东德的艺术批判，这可体现在其画作《巴黎公社社员》中。在这幅作品里，工人并非作为英雄般的战斗者形象出现，而是惊惧地等着政府部队到来的普通人。海西斯曾在20世纪60年代丢掉了莱比锡版画及书籍装帧艺术学院院长和教授的位置，70年代时又得以重新上岗。

鉴于他的声望，他被允许行使“关于当代问题的对话”这项社会职能。他那充满悲观情绪的启蒙概念（艺术无法阻止血腥的疯狂，但可以警醒人们保持理性和判断力）是盛行于东德的进步乐观主义中的不和谐音符。作为出了名的叛逆者，他获得了许多奖项和奖章。

维尔纳·图贝克也未践行诺言——东德文化部给他一个任务，在弗兰肯豪森温泉绘制一幅全景图（该画将长达125米，描述1525年雇佣军在某侯爵指挥下残酷镇压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正是党所喜爱的历史积极主义。他为此“国家使命”工作了十二年，本来的立意应当是，历史上的某次失败也可为将来的成功铺平道路，而在图布克笔下，却着重体现了这次早期农民革命所经历的恐怖。

对两边德国艺术发展略作比较即可发现，东西德在内容要点、主题以及表现手法上都有很大分歧。“德国咖啡馆”被分裂——这是约格·伊门多夫的比喻，他在题名为《德国咖啡馆》的系列画作中，画出了“铁丝网、拇指夹、浮冰、监视塔和狼群等主题，这些主题之前没有人使用”。数十年过去——从19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现代性争论”在此期间依

然争吵不休——如今又有了甚嚣尘上的绘画之争，争论的焦点并非在东西两德的紧张关系中，它们分别在东德和西德内部也是针尖对麦芒。

> 东德的社会主义艺术观认为，抽象可用来表达现代式的天马行空及资本主义的颓废懒散，而在这颓废懒散中却隐含了对人的忽视——这一点与一众西方保守派的艺术批评家观点类同，他们是：马克斯·皮卡德、阿诺德·杰伦、汉斯·赛德迈尔。他们都会把“无图形”的艺术解释为缺少作为中心的人。而共产主义则坚信，新人类可以被创造。对关键缺失的挽歌被赞美俗世天堂的颂歌取代，昭示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这一“宗教观”的美好显现。

在西格弗里德·歌尔看来，东德艺术的问题在于，艺术堕落至小市民所欣赏的品位——因为人们错把“迁就小市民品位”当成社会主义——而这本是曾经的先锋们在反对沙龙艺术时所极力斗争过的。艺术，变成了只有借助图像诉诸感官，而非唤醒某种精神意识之时，才能被人解读。“东德的艺术家们自己给自己戴上历史主人公的大帽子，被困得动弹不得，因为他们被困在要命的柏林墙之内。”在人们的道德观里流行着一种故步自封的心态：因为没有多少行动自由，所以被给予内心世界的“安慰奖”。

“现实的艺术用专业手法表现充满内在冲突，其基础是远离表现主义艺术那种动不动就拔高的‘人性’的激昂情绪。这样的艺术才应该成为德国的国家艺术。”

歌尔不无挑衅地表明，东德的现实主义艺术——也许出于无奈，也许出于自愿，总之是被西式的光怪陆离的各种风格夹着走——延续着一种德国的艺术传统，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风格，却充斥着表现主义及超现实主义元素。如卡尔·霍弗尔、杰哈德·阿滕伯格、奥斯卡·奈尔林格这一类的艺术家一直不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成了党政教条互相争权夺利的炮灰”，尤其是如果他们胆敢尝试细致和抽象形象的混合风格的话。

尽管政治上有大包大揽的倾向，在东德，“德国的艺术”（sit venia verbo）还是可以在它们那些并非只有贬义的“乡土气息”中冬眠。两德统一之后，它们仅仅通过自己的“宁静”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闻，大大挑战了西式的文化营销。东德艺术家的超然与不断要求变换口味的西式艺术市场相对，后者永远在追求新鲜感，对价廉物美的“手工品”不屑一顾。

1982年，汉堡艺术家协会举办了一场展览，题为“时代比较”，旨在介绍东德的绘画，君特·格拉斯在展览目录上写道，东德绘画的主题常常是“德国的”。“德国式绘画”在东德艺术界意味着承袭德国的文化传统。西德的“国际范儿”被他们誉为“文化背叛”。与之相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如约翰内斯·R.贝歇在1952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届党代会上指出——是唯一的艺术手法，导致德国民族艺术的节节攀升。尽管很多艺术作品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宣传造势，人们依然不应忘记，在东德，表达内心的艺术并未受到“时尚”是否“过气”的威胁，而是得以保存。

> 格奥尔格·巴瑟利茨1975年骂骂咧咧，说海西斯或马特豪尔根本不是艺术家或者画家，他们是混账王八蛋，从没画过一幅画，他们是意识形态的广告宣传专家，专业服务于糟糕的“好事”。（巴瑟利茨本人1957年从柏林-维森湖艺术学院被迫退学。作为惩罚，人们本想把他送去褐煤露天开采场进行劳教，他却转学至夏洛特堡艺术学院。）

东德艺术家，在那小小的斗室中，自然学会了对艺术家状况的批评表示“隐忍”。柏林墙倒塌之后，沃尔夫冈·马特豪尔十分受伤地说：“统一后的德国，关于艺术的争论十分不堪。今天，仿佛所有观点的不同之处都只同东德有关，要么就是在东德内部，要么就是针对东德，尤其是在1989年的那个月内的。在那些受人挑唆的争论中，所有出了名的现实主义和象征风格的画家全都被人辱骂。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工作过，却无人想要问问他们的原因、态度以及他们做了些什么。”作为“反击”，这位艺术家“非常疑惑”地问，为什么尽管国家声称保护艺术

自由，在西德四十年的历史中，真正好的、原创的作品却如此之少，批量生产、满坑满谷及假大空的绘画却又如此之多且受到乐此不疲的优待。

西方艺术陷入后现代主义话语语境——从“时代精神”走到“没有时代”（“时代精神”和“没有时代”是柏林分别于1982年及1988年举办的两次艺术展的题名）——陷入“全球化事件”和“国际范儿”，作为精英“持股人”，却离“人民”这个大“资产”越来越远，对民众的审美教育漠不关心。1989年两德统一后，东德艺术家一旦不再需要受限于意识形态作画的小领域，就陡然充满骄傲地捧出一系列巩固身份认同的“乡土气息主义”作品，课题本身的“乡土气”通过精细的手法表现，成为高品质艺术。当用“无知者无畏”（feuilletonistischer Chuzpe）、以放肆和粗鲁搏出位（Kaschierte Substanzlosigkeit）的文艺副刊来掩饰其无病呻吟本质的西德艺术，碰上另一个德国那坚守老派作风的天真质朴，自然难以相互理解。对于东德来说，西德“艺术建筑工”的浅薄审美观也十分不可理喻，他们认为这些“建筑工”除了“认真在黑板报上画个图”之外什么都不会（那为数众多却广泛遭到艺术商务孤立的“外省艺术家”除外）。两德统一后，时髦潇洒的画廊和艺术品店很快在新联邦州遍地开花，依然有一些原东德的“国家艺术家”宁愿“躲进小楼成一统”。尽管有那么多画廊、精品店，这些人却无人问津。

应该做什么呢？东西两德都面临窘境，东西两德艺术的横向比较在这窘境下显得越发分明。不安、新奇、无计可施，这一切都使双方在对方那里有了一些新发现。接近变为同质，变为城市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用全球化去思考和感受）。迄今为止，自成一体的德式艺术并未敢对开放带来的其他文化表现出多少接纳。在身份认同亦已趋近多元的时代，找到新定位的关键词是跨文化——并不是失去自身形状的那种跨文化，而是多种深植于意识及潜意识中、差异甚大的生活经验及世界观之间的紧张却和平的交流。

埃杜瓦德·贝奥坎普认为，东德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在渐渐增强。尤其是年轻一代和非官方人士在两德统一后颇为受挫，因为西德的艺术商业挟带咄咄逼人的优越感和“进步”宣言席卷而至，几乎是十分残酷地踩在他们脸上。渐渐地，东德艺术家也意识到，盛行于西德的文化自身也需同相当多的困难及相当大的无所适从做斗争，并没有比自己这边好。战后的艺术进步曾饱受称赞，但并没有提供任何“必修课程”，可供人们反复咀嚼，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与此相对的是东德的艺术，虽然一直处于守势，但正是那“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架势反而促生了鲜明、不可替换的个性。东德最好的艺术家从来不怕比较艺术品质上的高下，而现在，他们却得畏惧艺术商业操作里的条条框框和拉帮结派。东德的画作，尤其是莱比锡的画作呈现出的多元，正是反极权，同时也反故作标新立异的经典表象——“那是批判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很久以来一直在从教条、党政中抽身而退，我们在那里面看到了未来和乌托邦。它们虽然已属于历史，却也有惊人的时代性。”（而199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18]却几乎把全部的东德艺术“抵制”在外了。）

魔法通道

通过电信时代的“魔法通道”涌入信息消费者眼中的东西就像一种魔药，让每个人错以为自己是主角，而他的意识却是关闭的。这么多人对媒体消费趋之若鹜，离现实却越来越远，这是他们对媒体口中的“繁重工作”感到厌倦的缘故，而媒体之所以这么讲，绝不是因为他们持有后现代主义哲学观，而是目的性很强的行为。那目的就是在交流市场中获取利益最大化。大家一边消费着，一边高高兴兴地做着无头苍蝇。

西德的电视业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起步，由启蒙思想决定的多媒体未来的状况并不乐观。政治的首要诉求是受欢迎，盟国的“恩赐”给了它发展机会，因此电台和电视台首先应履行“文化职责”，机会就此被白白浪费——而这是征得了大家同意的，因为“大家”中的多数人无法或不想领受通过媒体传达的解放。一篇对1992年的美因茨电视批评会——这是为数不多的电视批评论坛，在当时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的报道称，电视业的霸头、批判者和朋友为了欢聚而欢聚一堂，所有人都对“启蒙思想的神奇治愈性深信不疑”，他们毫无实际用途的言行已然成为一根

难以忍受的刺，而这样的聚会每年都把这根刺向肉里面推进一厘米。得出这样的结论，本身已可以反映电视业的惨状了。

“他们向‘电视机’、向社会勇敢而毫无效果地呼吁，希望大众媒体从使人迷惑和变笨的道路转向道德教化的道路，通过潜移默化达到‘另一种电视，另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应该被看重的不是商品，而是真实。”

电视批评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报纸副刊和文化编辑部的“后娘养的孩子”（同那些“亲生孩子”的生活状况形成了巨大反差），它早就不再是什么“坚固的哭墙”了，因为媒体在此并未履行教育功能。当然——正如《经历社会》一书的作者杰哈德·舒尔茨所说——一切在幼儿园、小学和大学里都已注定。

美国媒体学者奈尔·波斯特曼在更带有消极保守倾向的德国媒体批评那里被尊为权威。在美国，人们的想法受电子信息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一致的倾向已经到了某种危险的地步：所有人完完全全地认同无所不在的电子信息所传达的内容，而这则使得电缆伸得更远。每家每户平均每天有7个小时开着电视，美国孩子平均在上学之前，就已经看了5000个小时电视节目，到中学毕业为止已看16000个小时。40岁时，美国人平均观看超过100万条电视广告，直到他们领取第一笔退休金，这中间还会再看100万条。

看电视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相（真相，就是客观的信息），而是娱乐，是一场秀——一个人造的世界，精心策划，为了取得某些系列效果，人们或哭或笑，或不耐烦继续看。电视演绎世界的方式反而成为世界“本该如此”的榜样。这些新媒体的存在便是让人娱乐至死。

> 自1960年代以来，理论界及哲学界对媒体的乐观态度一路下滑。麦克卢汉认为，假如人们不是在镜像中认识世界，不是倒退着走入未来的话，那么即使是纸质图书时代的末期也有积极进步的一面。“电子

> 化”是我们感知世界方式的巨大转变，它结成了一张有来有往、宽广紧实的网。电子视觉时代的意义是无法借助旧式媒介理解的（电视机可不是加了画面的收音机）。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由电视机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电视机是一个信息——不管内容怎样，传播形式的变化已导致了许多的变化。
>
> 这番一反传统、高度概括的言论并未给麦克卢汉这位加拿大教授带来许多非议。人们并没有由此指责他是卫道士。媒体世界，说到底，本也不在意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对发生的事情加以鞭挞。

德国的电台电视台系统把私人化和商业化排除在外。就连德意志第二电视台（ZDF）也根据最高法院的一条判决，与“ARD电视台直接的竞争关系不得导致节目质量的下降”。电台电视台播放什么节目，需履行一定的文化及道德教育功能，这一点在各个联邦州的法律中均有体现。人民的精神生活也许得到基本保障——这个意向被有些批评家说成无聊。不过，事实证明电视节目还是很具有吸引力的：1955年全德国有1350万台收音机，有30万台电视机；1975年，收音机数量为2110万台，电视机为1920万台。1984年，西德公民平均每人每天坐在电视机前1小时10分钟，1990年则增长到2小时15分钟。

这还不够。随着双轨制的出现（公共电视台履行教育功能，商业电视台则以市场为导向），出现了大规模的文化转向，影响深远。路德维希斯哈芬推行了电缆先锋政策，1984年RTL电视台大受欢迎。一年以后，SAT1作为第一家私营电视台成立。许多大型出版社都为此做出了努力（贝塔斯曼、布尔达、鲍尔、施普林格、霍茨布林克）。私人获得运营电视台的许可是在基民盟执政的州首先获得通过并积极推进的，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州较为缓慢但也在跟进。但是，该党1971年党代会上通过的政策仍然使人疑心（“社会意见的多元化和文化标志不应为只追求经济利益的商家让路。”）——这一政策主要受到通信科学家和参议员彼特·格罗茨的影响，此人不仅在党内颇具影响力，也是参议院里屈指可数的杰出知识分子，对于其他问题，他的态度也是人尽皆知的：电视台节目质量的竞赛应该由比哪家电视台节目价钱更低来取代。他进而提

出疑问，自由化是否导致简单化、麻木化、粗暴化，并自问自答：“某种程度上会吧。但一个强大富饶的德国不可能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汪洋大海中的一座‘绿色媒体’的小岛继续存在。如果德国对于媒体依然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那么那些把今天的巴伐利亚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变成富有影响力的媒体中心的康采恩就会搬到卢森堡去，从那里发送德语节目，把德国的市场逐渐吸干。”

多数私营电视台都渐渐走上轨道。1989年，西德公共节目中有25%由私营电视台发送。统一之后，“争抢观众”的竞争越发激烈。这场竞争在短短三年时间之内给德国电视业带来的改变比过去三十年加起来还多。私营电视台意识到，节目门槛的降低可以导致收视率的提高，也就导致了广告费的提高。由此，公共电视台则需要通过提高质量来与之相抗衡——因为公共电视台主要靠收取费用。不过，一再有人批评此举为短视的、迎合大众的政策。

电视娱乐

自德国电视业兴起以来，家庭剧就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如《薛勒曼一家》（1954年9月首播）及随后的《黑瑟巴赫一家》一样，这些家庭剧都是按照美国剧集的方式设计编排的，讲述的却是德国故事。

随着美国大热的《达拉斯》（又译《家族风云》）及其后的家庭奇幻剧《丹弗家族》和《鹊鬃》的引入，肥皂剧成为大众的最爱。德国制作人敏感地从社会生活中截取积极片段，获得意料中的成功：1985年拍摄的《黑森林诊所》斩获60%的收视率。由汉斯·W.盖森朵夫执导的《橡树街》（1985年12月首播）几乎成为“没有剧终的剧集”——“我所有的素材够制作1000个结果，这剧还可以再演二十五年。”该剧有固定收视及评论甚至“制作”——情节上的制作——人群，可谓西德生活的一个缩影。由艺术手法模拟出的真实显得特别清楚，因艺术最终也会变为真实。德国“编年史”《家乡》是一部由十一个部分组成的电影，由埃德加·莱茨和彼特·施泰因巴赫执导，西德广播电台和自由柏林电台协助拍

摄，在“家庭剧”的形式后隐藏着很强的表现力、道德思考及叙述技术。

“收视率至上”使暴力变为备受欢迎的主题。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侦探类电视剧中，它们模仿某些文学榜样，在充满紧张的背景下展开，诱惑人们机敏思考，比如埃里克·欧德的《特派员》、ARD电视台的《塔托德系列》、由汉斯约格·费米和葛茨·格奥尔格这种电视业大家执导及马里奥·阿多夫和施台凡·库特主演的《影子人》。

暴力作为侦探游戏手法出现在电视节目中，越来越不能满足那些本已因受挫感而产生攻击性倾向和唯恐天下不乱（这种情绪和全社会寻找刺激的大背景有关）的观众。有人不再满足于幻象，而希望来一场真人秀：他们的暴力行为的诱因是“秀”，但那些血腥同艺术感并无关联。

暴力取材于真实生活、制作成“秀”，这使得发生在真实世界里的暴力不再对人们的感知造成冲击力，或冲击力减小。这是电视节目以及与之相关的视觉恐怖带来的危险，尤其对青少年更是如此。（自1980年代以来，视频市场就充斥着这些令人憎恶的东西。超过半数以上在市场内流通的视频、电影，不仅对青少年有危害，甚至危害人类。）不仅在商业电视台，就连在公共电视台，“谋杀”——包括许多版本：闷死、刺死、打死、砍头、烧死——的价值都极高。在每天的德国电视节目中，大约有70～100人被杀。半数节目带来了攻击性后果。人们对于这种非人性主题的流传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射击、做爱、咆哮”——甚至导致某些色情片以尸交作为主题，这已经不仅仅是伤风败俗的问题了，这样的行为简直毫无被教化的可能，“它是在摧毁刚刚起步的共同生活的根基”（瓦尔特·闫斯）。

另一种“建构主义”视觉则完全回避任何形式的暴力，它也可能导致道德上的漠不关心。哥尔夫克里格的《没有画面的战争》在1991年就遭

遇了美国审查机制。报道以“干净的战斗”之名出售这部电影，仿佛它只是一场游戏一样——这是一场“谎言的混战”才对，它居然把战争打扮得冠冕堂皇。

对国内外政治的报道及其评论、政治和文化专题节目、纪录片等则体现了高水准的“介入客观”和“启蒙共和”精神。但是，它们也同样受到商业压力的威胁。因为这样的压力，海因里希·布雷洛厄取材施雷耶被杀事件[19]，将其制作成上下两部纪录片，冠名为《死亡游戏》以博人眼球。

小品依然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依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或许正因为编导室的引入，迪特·希尔德布兰特、维尔纳·施内德、杰哈德·波尔特等人依然是德国电视的宠儿。弗里德里希·诺沃特尼也是一样。早在他成为西德广播电台的台长、主持《来自波恩的报道》前，就已经懂得用轻嘲来体现他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独立性，懂得怎样让政治在那些只打算在电视节目中找乐子的人那里也显得有趣。

脱口秀是娱乐档当中对收视率有极大促进作用的节目，它以滚雪球的方式流行全国。它的内容范围一方面满足电视观众并未泯灭的对信息以及思想启蒙的需求（埃里希·博默的《塔上说》、罗格·威廉姆森的《威廉一周》），另一方面——阿尔弗雷德·比欧雷克的《生物林荫道》属于两者之间——也能满足性欲旺盛的观众们观看“精神脱衣舞”的期待（马格蕾莎·施莱纳马克的机关算尽充满市侩气，她还洋洋得意。又或维萝纳·菲尔德布施主持的色情表演接近色情片，但她还不以为耻）。

废话连篇成为一种流行事物。就连由马塞尔·莱西-拉尼基、西格莉德·略夫勒和海穆特·卡拉塞克主持，于1988年3月在ZDF台开播的《文学四重奏》也渐渐向这个标准堕落。大众是多么容易被内容空洞的废话所吸引且乐此不疲，这真令人吃惊。电视观众越来越孤单，有时甚至全家

都陷入相对无言、各管各的境地，可他们却又很享受脱口秀节目，那被他们认作一个精彩舞台，其实这只是对在真实生活中缺失对话的模拟。有些脱口秀还可说是安全无害，譬如由托马斯·戈特沙克主持并在多种版本中日臻完美的节目。有些脱口秀节目则简直算无耻，说的尽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匪夷所思之事，且还要加上各种歪曲编造。有这样的态度，哪愁没素材呢。

“这些人只管围着光怪陆离的‘社会大展销台’兜圈子，看看谁有利用价值。这儿一个被生活压垮的人，那儿一个怒气冲冲的人，这儿一个怪胎，那儿一个牺牲者——哈哈，镜头前的生活是如此多姿多彩！”

脱口秀和娱乐节目打造了一批明星：托马斯·戈特沙克、哈拉德·施密特、尤尔根·冯·德·李普、鲁迪·卡雷尔、琳达·德·莫尔（而君特·约赫、约阿希姆·弗斯贝格、弗兰克·艾斯特纳、迪特·托马斯·黑克等人则逐渐过气）。这些明星的共同特征就是对当局的政治不会造成丝毫危险。他们是一群成功的偷猎者，节目结束之后，立即就会参与观众花生、盐棒等零食所获利润的分红，而这些零食，正来自观众刚刚在收看他们的节目期间所嚼食的那些品牌（这个内幕是由“疯傻歌匠”卡尔·达尔披露的）。这些偷猎者明白，再没有比同时政有关且言之有物的讨论更损害推崇“愚民政策”的节目成功了。

> 显然，听见一个笑话却不明白笑点在哪，算是日常生活中碰见的最窘情况之一了。电视台播放的喜剧则非常有慈悲心地让我们免受其苦。人们不必因为听不懂笑话而坐立不安，或在实则窘迫至极的情况下爆发一阵大笑来解放自己。人们可以说，喜剧就是为了让人呵呵傻笑或幸灾乐祸的。喜剧的媒介不就是有许多笑点的笑话嘛，说得好听点：傻话不也就是没有笑点的笑话嘛，人们没必要非得理解什么。

“对全面地传播信息负有责任”——“我们对所生活的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的了解，都是通过大众传媒获得的”（尼古拉斯·鲁曼）——这个责任，同“文化”与“教育职责”一样，同属ARD和ZDF电视台的领导原

则。如卡尔·霍扎默，ZDF的创始人，认为“其所创办的电视台的宗旨是用愉快的方式、有远见的严肃性和阿奎那般的清醒对真善美负责”。此语无他意，只在指出——用吕迪格·金斯基的话说——媒体，正如其他所有“存在”一样，只有在拥有以上品质的时候才算拥有“存在”。这话说得似乎很玄，却道出了公共政策建构的意义。在这样的意义引导下，德国的电视制作人尽管数十年以来一直处于党派政治的压力下，却依然有源源不断的杰出记者、编辑、部门主管和电视台台长涌现。“电视制作人”中十分出色的有——当然，领导阶层依然鲜有女性出现这一事实也相当令这一工种丢脸——弗朗茨·阿尔特、克劳斯·贝德纳茨、克劳斯·冯·俾斯麦、克劳斯·海因里希·卡斯多夫、汉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君特·高斯、克劳斯·哈普莱西特、英格·赫尔曼、维尔纳·霍夫、路克·约希姆森、卡尔-海因茨·科普克、达戈贝特·林德劳、尤尔根·罗德曼、埃贡·蒙克、弗里德里希·诺沃特尼、弗里德海姆·欧斯特、汉斯尤尔根·罗森保尔、杰尔德·鲁格、阿洛依丝·沙特、彼特·施瓦岑瑙、格奥尔格·施台凡·托勒。

双轨制的引入对公共电台来说也是一次突破，尽管这突破在此之前就已犹抱琵琶半遮面。电台的许多听众投向电视的怀抱，现在电台人试图通过某种程度的媚俗（“没话找话”、狂轰滥炸的音乐、主持人唠叨不休）来夺回部分失地。由于节目细分为文化类、谈话类、音乐类等，尽管有收听率压力，小部分听众的喜好仍可以兼顾：文化环保类节目可对某些在现实生活中颇受挫折、故步自封，或者过着苦行僧一般生活、游离于大众教育之外的听众给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灵感。

对于公民来说，收音机会播放五花八门、荤素搭配的节目：信息、娱乐、教育、咨询。电台被视作文化资产。双轨制给电台带来了又一重形象：音乐冲浪、休闲去处、带来利润的人。“收音机履行了前所未有的洗脑职责”，因此哪怕它播送的是流行夜幕，也是媒体中的备胎。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电台仿佛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充斥着广告——有批

评家以“平地”来形容其寡淡浅薄——这些电台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感，他们认为，电台应该让人主动想去听，而不应只是背景声音。因此，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有些电台也就放弃了刻意迎合低水平节目的政策，转而与“毫无思想搪塞大众的”电视台打擂台，致力于高雅艺术的文艺复兴。

若电台不再走“走遍世界”-“怪才”-“杂烩”路线，而打造启蒙教化又不乏趣味的“节目几何”，原可赢回其文化形象和精神影响力。1990年代，电台业处于转捩点：反而是年轻一代更多地收听电台节目，但人们无法确定，这场“文艺复兴”是“商业化电台遍地开花”还是公共机构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电台文化”的结果。

对于战后一代来说，收听广播曾经带给他们最主要的教育经历，电台的娱乐功能也悄悄地用一种升华的形式得以发挥。尤列克·贝克说：“电台的成立在开始阶段几乎是一种任务。那时，它承担了向广大公民传播的责任：告诉他们当今世上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娱乐他们——却并不一定以廉价的方式，而是通过娱乐增强或唤醒他们对民主和公正的认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现在的电台人则越来越逃避其责任，无论是出于无能还是懒惰。”此话有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1927年评价电台是“未来的当下性（futurischer Aktualität）”：“电台的结果是不受谴责的。它的可能性不受限制。电台是一个好东西。”

> 乌尔斯·魏德玛认为电台是“一个温暖的媒体”，而电视则是“寒冷的、冰一样的”。（尽管在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看来，“冷文化”亘如磐石，“热文化”则水性杨花。）他认为，不管是仅听还是边听边做，人们总可以爱上电台，而爱上电视就要难得多了。“试试爱上一幅两秒钟之后就闪没了的画面——切！——该画面让位给另一画面，同上一幅一样很快被人遗忘。”“那些充满怀旧情绪的听收音机的日子，当然它们也有黑暗面（想想纳粹时期收音机作为极权宣传的工具！）。想想电台那些过去的好日子，它为了公民们的社会化、为社会踏入民主做了那么多事情，这一切不是凭空而来的。但即使那时，也并没有人神化。我们人类总无法做到完美。应该期待一个稍微好点的电台，不必期待一个理想得不得了的。我们不应成为原教旨主义者。电台现在

的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来解决。只有政治意志的变化才能带来内容的变化。一个愿意让我们自由思考、对我们提出要求，而不是拿我们当孩子一样硬塞给我们东西吃的政治。一个愿意重新掂量手中所有资金、重新掂量在哪里花钱的政治。”

东部的苍穹之战，电影和印刷业

西部的媒体战胜了社会主义——这是卡尔-埃杜瓦德·冯·施尼茨勒在其自导自演的东德电视节目《黑色管道》即将告终时所做评论中的一句。施尼茨勒来自一个富有家庭，青年共产党员，在二战期间曾身陷囹圄，二战结束后前往英国，在BBC德语部任职，后又分别在汉堡和科隆的NWDR电视台任职（他也是科隆NWDR电台1946年成立时的创始人之一），1947年前往东德，渐渐变成一个“搅局者”。

尽管有铁幕和柏林墙的存在，仍不能阻挡ARD和ZDF的节目扩散光芒。联邦邮局沿着东西德分割线在山岭或河谷里建造的播放站也给了极大的技术支持。ARD和ZDF的节目深入东德人心，只有包括德累斯顿和易北河谷（人称“没有感觉的河谷”）的一小部分地区无法接收西德节目。德国统一社会党同“电台犯罪”做斗争终告失败，尽管他们自己的触角也远伸至西德，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几乎需要和全体人民过不去。1966年，依据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成立的意见研究中心举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超过80%的青年人收听西德电台。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西德的电影更刺激、娱乐节目更有趣、音乐更摩登。

西德的媒体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不仅因为它们展示了西德生活的多样性，也因为西德人有意识地运用媒体作为宣传工具影响东德人，比如柏林里亚斯电台，德国统一社会党就视其为敌人电台。和冷战同时进行的还有一场意识形态的“苍穹”之争，在苏占区及其后的东德，“德国电台人”（1948年重新开张）也带着支持西德的节目投入了这场混战。

除此之外，还有德国自由电台904，此台宗旨是做在西德被视为非法的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于1956年8月17日被最高法院定为非法）的扬声器及做反对联邦国防军的德国士兵的代言人。1970年代初，因为埃里希·昂纳克要推行东西两德缓和政策，“德国电台人”和德国自由电台904均被勒令停播。

> 东德也有专门针对西德的节目，直到1952年都有地方电视节目同它们一唱一和。在这些特别节目中，“主要的话题是死灰复燃的帝国主义对工农的剥削、使德国重新拥有自己的武装、两德的分隔、共产党员所遭受的迫害和在背后捣鬼的团体、之前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是否应在现行政府里获得高职聘用。人们对来自西方的攻击颇多回应，通过建设新社会的方式维护了自己进步的尊严。这些话题范围本身涵盖了某种自相矛盾，这样的自相矛盾是东德媒体政治家直到1960年代初都无法自拔的。首先，他们在自己同西方之间画一条明确界线，强调自己的合法性。其次，他们时刻不忘拔高任何一个微小成就，以给民众造成生活质量会在短期内有大幅度提升、离开故土十分划不来的印象。最后，他们强调，对来自西方的所有声音必须有所回应。”（沃尔夫冈·缪尔-贝宁豪斯）

西德媒体在东德取得的最大成就是非直接的：东德的电台和电视台为了保持自己的听观众，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放弃教条的狭窄条框、放弃呆板无趣的说教，节目本身必须越来越自由。

战后第一代电台人——同占领西德的盟军截然相反，苏联军队很快就把电台的领导权交还德国人——遵循德国统一社会党秘书处的指示，视德国统一社会党-东德中央电台为教化工具，认为电台的任务是教会人们“用阶级意识来判断事情”，“如何同敌人做斗争”，“教育群众”，“同苏联建立积极关系”。违背此想法的节目在之后也未获准播放。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了电台节目的题目以及统一单调、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服务的美学。

电台和电视台服从政治导向，这是通过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宣传部来实现的。该部门旨在实现政治局的意愿，即“通过长

及全球的路线、短至意见向导的全面系统为所有媒体提供导向”。所选取的信息及新闻仅仅和稳固政权有关，至于是否有新闻时效性，则不那么重要。娱乐节目虽多种多样，但多数并不会使人们无目的性、带着玩心去体验。它们应服务于“更高的东西”，应服务于教化民众，因民众被归为自我意识较弱、较不成熟的那一类。但是，具体怎样做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笨拙，东德的电台电视台求助于ARD和ZDF，之后甚至是西德那些纯为商业盈利而运营的电台电视台。尽管在东德式国家资本主义的环境下，电台电视台无须害怕竞争，唯一向外的通道是严肃合作，但终究只有在至少向西德榜样依葫芦画瓢的时候——比如，在《彩色沙发》这档节目中采用了西式的“秀”元素——才不致被民众所抛弃。同资本主义时代残渣余孽做斗争的斗志应像鞭子一样，成为所有人的诉求。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曾在很好的实践里一度成为现实，但那恰恰只有在专业而有能力的记者、编辑、主持人、制片人设法绕过审查之时才会发生。

那股牵着电台电视台的力量缺少毅力，这导致在较好的教育条件下，大把人才只得到很少的发展机会。有才华者被雪藏或遭驱逐不是偶尔发生，假如想功成名就，则常常必须担负一些可疑的责任（譬如为史塔西工作）。

两德统一之后，西德的“矫枉过正”者怀着傲慢自负的心态。东德的电台电视人在艰难环境下获得了很高的素质，这些素质却因为西德那些要“掰正路子”的人横加干涉，无法通过与之相匹配的方式得以发挥，尤其是当事情和“谁是新领导”有关的时候。东德的人民议院1990年2月5日通过有关意见、信息和媒体自由的法案，从而为媒体的精神及文化自主提供了法律保障——从1989年12月到1990年，汉斯·本辛任东德德国电视台（DFF）台长（此人1961～1966年曾任东德文化部部长，后在东德电视业活动）——当然，人们很快发现这一法规只是暂时性的，因为两德统一条约中的第36条实际是要解散东德的电视业以及德国电视台。以

1991年12月31日为期，东德的设施“应根据电台业的联邦结构这一标准，通过东西两德共同的国家合约，凡第1条所陈述各州设施皆当解体，或由某一个或多个其他州中符合公共法的机构接管”。电台业由鲁道夫·米尔芬茨尔受命接手——“所有事情居然令人吃惊的平静和如期完成”——他之前是巴伐利亚州电台领导人之一，一个不折不扣要“掰正路子”的人。

短时期以内——指的是东德政权四十年之后的开头几个月——对原东德那些思想解放、希望努力利用刚刚到来的自由大展身手的媒体人来说，自由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机会。

“这几个月，是我在德国被占领、被分裂、现在又被统一的全部历史里所听过的最好的几个月。前前后后所有时间，只有这几个月有最好的电台及电视台新闻业。其实，西德竟会愿意屈尊接受东德的影响，这只是一个幻想，我并没有保持它多长时间，那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罢了。”（君特·高斯）

一个吊诡的情况是：双轨制的引入导致整体质量下降，西德媒体备受其害。而在东德，电台电视业仗着体制大行腐败，双轨制反而显得大有作为。一向在小市民中流行的教育专制反衬得西德的多样化更加光彩（其实只是虚张声势）。在媒体业里，条条空虚无聊的大道通向天空。

电影业的情况是：东德的国有电影制片企业集团（DEFA）的作品即使在西德也备受推崇，统一后却几乎解体，其作品也不怎么被放映——尽管德国电影批评调查显示，在电影制作人和电影学家公认的百部德国最佳电影中，有14部由DEFA制作。DEFA消失在由某个信托公司保管的故纸堆中（750部故事片，2300部纪录片，750部动画片，还有3000部由DEFA配音的东欧电影）。

弗朗克·贝耶的《石头的踪迹》于1966年在东德首映，其后虽因为

一些有组织的抗议被迫下线，却也获得了应有的承认。该影片主演是曼弗雷德·克鲁格，东德最受欢迎的娱乐艺人，1977年离开东德，在西德很快于电视业中获得成功（尤其是作为犯罪现场报道专员和在电视剧《宝贝克罗茨贝格》中的表现）。

> 和贝耶及康拉德·沃尔夫一样，埃贡·君特也属于东德最重要的导演行列。（1965年的《当你长大，亲爱的亚当》未通过审查，1968年的《告别》也是如此。1972年的《第三者》被禁止出口，而其主演阿明·缪勒-施塔尔于1980年离开了东德。1978年的《乌苏拉》被禁止再演。）君特目睹两德的分裂，于1978年移居西德。在他最好的电影名单里，有弗朗克·贝耶的《五枚弹壳》《停留》《说谎者雅各布》《狼群中的裸体》，西格弗里德·昆恩的《弗列德里希·威廉·格奥尔格·普拉托的第二生命》《亲和力及女演员》，罗兰德·格拉夫的《勃兰登堡省研究》《法拉达》《琥珀房间》，海纳·卡罗的《俄国人来了和伊卡鲁斯》、康拉德·沃尔夫的《戈雅》《群星》《丽茜》《马默洛克教授》《运动场上的裸男》，君特·吕克的《订婚的人》。他认为特别出色的是《保尔和宝拉的传奇》（原著：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导演：海纳·卡罗；主演：安格丽卡·多姆罗瑟），这部电影也广受观众喜爱。

“东德电影史悄无声息地消失”，这比1990年代的西德电影只有寥寥数部能达到顶级水平还要让人郁闷（这几部是罗穆瓦德·卡马卡的《致死者》和卡洛琳·林克斯的《寂静的另一边》）。获得过联邦电影奖金奖和银奖中值得一提的是克劳斯·马利亚·勃兰道尔的《格奥尔格·埃尔瑟——一个德国来的人》、伯恩哈德·维基的《织网》、维尔纳·施罗厄特的《马琳娜》、彼特·瑟尔的《卡斯帕·豪瑟》和赫尔穆特·迪特尔的《施通克》。当时有一股电影热，许多地方纷纷兴建多功能电影中心，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一部西德电影获得国际声誉。“市场运动”首先是从喜剧兴起的——“笑有用”——克丽丝缇安娜·派茨用“乱搞关系”来概括这些喜剧特征，“毫无感染力的晚熟青春期口味，没有传递出一丝对生活的热爱或情感”。（这些喜剧当中，票房较好的有《男人公寓》《城市谈话》《没人爱我》《被打动的男人》。）

至于东德的“老媒体报纸”，在统一后有一部分被西德出版社收购。

东德大厦坍塌之时，报业已是管理技术老化，编辑部的信息也尽是过时的。报业被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国家所控制，对以上两者言听计从，彻底沦为它们的工具。

> 所有报纸隶属于内阁下属的新闻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对编辑部所应采取的路线甚至选材做出指示。地方报纸属德国统一社会党地方办公室管。就连如何培训记者也要按照国家的规定来。2/3的记者就读于人称“红色修道院”的位于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的新闻专业。而只有那些依照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标准社会活动表现好的人才能取得入学资格。一个重要的“管信息的”是东德国家所属的消息处AND，该处垄断管理了所有外国消息报道机构。只有《新德国》有一些自己的记者。东德的报纸倒是不少，39家日报，970万份报纸。平均每1000居民就有583份报纸。1988年，总共有1812家报纸。其中，39家日报，667家直属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企业报，508家报刊，176家消息日报，4家大地区报，354家地区信息报，34家周报。

东德的记者本来也许可以凭借自身努力做到“净化”和思想解放——如果再多给他们点时间的话。但老练的西德人很快蜂拥而至，占据了报业的所有领导位置。

前直属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地区报有绝对优势。即使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也占据了67%的发行量及90%的地区报社，但这并不会推进人们所期望的报刊多样化。60%的新联邦州地区仍然是一份报纸当家（日报的发行量比旧联邦州地区少2/3）。“西德的大出版社可通过收购东德报纸来扩大其市场影响力。与此同时，当这些大出版社进驻之前全属国有的东德报刊业市场之后，西德的报纸系统也暗潮涌动。一场关于报刊集中性的辩论在所难免。”（玛努艾拉·格拉布）

全德的中小学和大学

1990年代刚开始，统一后不久，“中央圆桌”工作小组“修养、教育和青年”成立了。回首东德专制的教育制度，该小组在一份倡议书中提倡全民教育的去斯大林化和人性化并给出了建议。回首历史，可以发现

人们对何为理想中小学的设想有颇多共同之处，这些设想是在战后西德立志告别国家社会主义以教育作为工具的做法时形成的。

> 在东德的中小学课程里，社会被描绘成无差别的和谐体。“没有矛盾的社会”是指导画面。至于真实的生活究竟怎样，则被从教材里尽数剔除。教材中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感恩及对工人作为抽象的唯一有益于社会的阶层的塑造有损孩子们对真实生活的研究。生态被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和技术发展做到，历史被认为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发展，被压迫的阶级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是历史课主线，仅仅选择和这条主线有关的数据和事件。东德仿佛是德意志民族历史中唯一可能的发展结果和终结点。

两德统一后，按规定曾经数十年影响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教育体制应迅速改变，以民主导向重新编造。“中央圆桌”倡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教育制度应在各人先天条件下，促进发展的机会均等；应为保证人权，促进终身教育；应尊重所有青少年人格的不可侵犯性；教育机构不应只是传授知识或为了找工作所需的手段的地方，而应符合全面教育的内容要求；每个人的人权无论其年龄、性别、性取向、国籍、社会或家庭背景、文化政治和宗教认同，均应获得尊重；教育的所有领域都应实行民主协商；应促进业余活动的多样化；保障职业培训、再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权利。

但是，统一后德国的中小学教育并未满足这个希望。20世纪90年代给东德带来了彻底的结构转变，也就是说，以西德的中小学及教育制度为标准转变。东德中小学教育中典型的“和谐责任”曾经导致学生毕业后走入社会的无能，认为冲突是可以调解的利益差别，这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赞成新联邦州内部改革的人面对坚定的实用主义者，无法贯彻自己的想法。教育与科学部部长在由洛塔尔·德梅齐埃、汉斯·约阿希姆·迈尔等人组成的内阁中发表高论说“教师大面积感到不安”，这让事情变得更糟。这些人尽管愿意创造一些机会，他们的情况却和当时的社会一模一样：首先必须经历真正的威胁，而威胁本身即可以带来机会。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在自己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利

用机会。加上全体教师因为之前的“意识形态错误”必须“矫正”，其使教师失去了教书育人的渴望，而这份渴望本可以加速内心的改革。因此，从心理上看来，全西德的教师情绪全都一模一样：改革的干劲被例行公事浇灭——好吧，也不能说是完全浇灭，因为90年代依然有一股革新的愿望，这些愿望来自“过冬”后的中小学实践和教育项目。

哈特穆特·冯·亨提希的著作《重新思考中小学教育》激起了对数十年以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上的讨论。他评论说，“实践理性的练习”在全德国流行，“急匆匆却未必有效，极端却并不理想”。那些曾在二十年前感动过他的经历和想法比这一切意味的要多得多。

> 亨提希认为，德国的中小学并不是生活和获得经验的场所，不是“一个孩子们可以长大的地方”，年轻人不能在那里学习到关于理想、责任和问题的内容，“而是某个看护所、温室、暖房，或者一瓢凉水浇醒他们的地方，或者分类机构，或者发动机，或者‘后来人’制造仪，或者社会活动站，或者以上的总和，而且是一种条件恶劣、收效甚低的总和”。
>
> 人们面对着坏消息：青少年暴力、孤立少数人、市议会的无能、新联邦州的滞后、教育者的自我怀疑、关于生活的谎言、城市管理失控。不良兆头蠢蠢欲动：沉溺于电视和电脑、远离思考和知识、非理性、原教旨主义、事业、社会老龄化。野蛮似乎又将回到德国，这可不仅仅指某一方面。有人把挫败感和由之而生的攻击倾向归罪于反极权运动（他们说“这都怪1968年的学生运动！”），理由是这些运动致使规则被损、无政府主义和悲观情绪抬头。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合理的。至少，东德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等级制度森严、极权主义的制度更容易使人诉诸暴力。

哈特穆特·冯·亨提希对于“明日中小学”的设想实际是重复了数十年以来，西德的中小学教育改革时而乐观、时而悲观的提议：多样性的中小学应教会孩子们如何生活，孩子们在其中理解何为和平、公正、有序、有责任的共同生活，放眼全人类。中小学应该是文明的——文明的意思是，让人们学会信赖、责任和理解。

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就算还没有完全失去其锋芒的

话，也已经同教学实践渐行渐远了。各州的文化部从来也就没能起到正确的思想导向作用，现在更是听任其法律及规划部门萎缩。KMK，也就是文化部长常会，因其对理论的敌意和轻视出名。90年代中期终于出现了较完整的教育概念，其中心不再是投机取巧而是参与理性，不再纯实用主义地解决当下之急，而是着眼真正理想的整体教育理念。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文化委员会有一份备忘录，名为《教育的未来，未来的中小学》（1995年），其中提到，两德统一、就业市场和业余活动领域的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应被纳入考虑范围。常常用到的概念"作为学习之家的中小学"自是一种理想状态（理想和理念终于又回归讨论，这真是一件可喜之事），但对于雄心勃勃写就的"未来教育理想"来说，它也有结构和管理上的可借鉴之处，可使理想接上地气：尤其是，每个中小学依此可被给予最大限度的自主权和自理权。

而对于我们的大学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科研水平下降，更在于大学丢失了对社会的敏感度、丢失了它的好奇心、丢失了它作为大学的自我意识。引人入胜的问题不再常常被大学提出。它也不再那么能够为青年一代起到领航作用——这个领航作用不是指传授某个或某些分门别类的、一旦离开科研领域就不再有用的世界观，而是指潜移默化依据事实提问的能力。如若没有这种能力，不管是医生、律师、教师还是国民经济学家，都无法理性地（或者说符合理性精神地）工作。以上想法是彼特·格罗茨于1988年提出的。

> 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新建大学数量激增。除了专科、音乐以及艺术学院之外，自1964年始，17所大学、6所综合学院及8所其他学院开堂授课（波鸿）。1960年至今，学生人数翻了6倍。当然，这些学校的建立同某种理念或设想无关，而是某种程度上同改善当地社会经济结构有关。"因为并没有共识，所以这些大学也可追逐不同的目标，由此埋下日后深深失望的伏笔。"（托马斯·埃尔维恩）

1990年代，德国大学似乎失去了希望，创历史新低：学科子系统崩溃，导致这些系统之间看上去没什么差别，并且为着日渐缺乏的资金打

得头破血流；对过长的学制怨声载道，科学责任越来越少（教授之于学生，学生之于学校机构）；政治的优惠杳如黄鹤，且对高校的问题不再做内容上的探讨，而执着于争论是否国有。

柏恩德·海宁森是柏林洪堡大学斯堪的纳维亚学及文化学教授。他认为，所有这些令人恶心的情况都是因为科学家们越来越各管各事、无法控制其“自由”造成的。德国关于教育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大学的讨论，没有一个公认的平台。它们很少能离开私人谈话那种影响甚少的领域，如果离开，那也只有在国家预算出现危机的时候。1968年的叛逆学生除了激发一场胎死腹中的教育改革之外，还对此很快做出一些任何时候都令人无语的反应，而不是在长久的公共领域树立大学及国家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公众的无语正对应大学的无语，而大学的无语从历史角度上看，则症结在于受教育的市民阶层对政治的无所作为。教和学的自由——尽管教授为此从国家那里支取工资，但真正的“委托人”是真理——被越来越多地滥用。德国科学界太少太少的人做到了这一点，尽管从经典科学认识来说，做到这一点乃属常识。

“既然科学是一项公共事务，就要求学者在公共领域对言行负责——并不是一群随便任意的私人或者赫拉克利特[20]所说的蠢材集合起来达到一定数量就可称公共领域。洪堡[21]所说的追求孤独和自由是科学成就的前提，但这只有在科学家自明对文明亦有责任，从而超越个人之时追求才有意义。”

两德统一之后，“红色大学”的腐败在方方面面（尤其是人文和社会学科）昭然若揭。这本应敦促东德做一场“自我清洁”。结果，西德的高校却借所谓的同事间互帮互助的名义来对东德高校体系进行“清扫”（也就是教育领域的“掰正路子”），借新官上任之机大肆招纳自己的人马。1989～1994年，东德高校约有20000名科学家被扫地出门，这个人数几乎是东德时期教授以及研究人员总数38900人的一半。超过60%的研究

人员失去工位，没被赶走的教授中有一半被安置到西德工作。

> 东德学生人数仅为13.3万人——说仅为，是对比西德150万学生大军。同东德总人口相比，这个数目实在是很少。1987年，只有12.6%的东德适龄青年被大学录取，而西德的这一数字为27%。教授和讲师的人数相对学生而言则很高。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职工人数为50人，学生人数是150个。比较一下西德：慕尼黑的路德维希-玛克西米利安大学哲学系职工人数差不多也是50个，而仅第一专业学生就有3700个。

承认东德的杰出文化和科学成就并不意味着美化东西德之间的人口迁徙和表象之下的反抗（沃尔夫·勒培尼斯）。这不过是不把所有事情都和道德高下联系起来而已。西德并不是更好的那一个，只不过是更幸运的那一个。地理上的优势并不能够给任何一个住在易北河西岸的人以把自己打扮成道德楷模的权利。“人们没有明白，既然东德的政党可以进入全德正规的党政体系且能占据高位，为什么艺术家和科学家就非得受迁居那份尴尬罪。此刻，德国的政治错综复杂，文化则随波逐流。不过，在文化和科学政策讨论中，不把所有事情都和道德高下联系起来也可以有很糟糕的后果：那些现已存在的特权人群将会从中受益。因此——并不是跟西德相比，而是同中欧及东欧那些正在改革的新国家相比——东德过去四十年以及在统一过程中所发挥的文化和科学智慧，必须被批判地重视。”

> 东德约有1万份博士论文因各种原因秘而不发。不仅是大学、工业大学或者专业学院有决定博士毕业的权力，形色各异的学院、下属数个机构的科学院，甚至6所军队大学和警校也有这些权力。最终，德国统一社会党还管辖5所高校，并且决定研究方向。托赖庇佑，12.3万人获得博士学位，2万人获得大学执教资格。

对东德科学发展的研究当然不能全丢给东德历史学家去做。这是汉斯-乌尔里希·维勒从他的专业角度（历史学）所给的意见。他说，这是不无道理的，人只有在——用时髦话讲——事情同自身相关时，才能做出合理判断。可有一个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对那些黑色岁月做出令人信服的研究么？难道不是那无数个持批判态度的时代史学家，对

国家社会主义深恶痛绝，所做的研究方足信么？“不，有能力的东西德史学家应被糅合到一起。西德人在一定距离之外，可以带来冷静和同其他极权体制以及西方式国家的比较。东德人则了解更多内幕和斯情斯景，这又是局外人无法重建的。”东德高校1990年代中面临的巨变，那是一幅两极分化的图景。

新联邦州的教学与科研终于获得了思慕已久的自由。某些意识或艺术形态获得了更多的宠爱，发展一日千里。同样一日千里的还有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硬件设施差距。在27个地方各自占山为王的16所大学、22所专业高校和12所艺术学院间的地区与地区、学科与学科、院系与院系的差距正在逐步扩大。而数年以来一直处于过渡阶段，有各种特别项目、学者交流项目、特别资助研究项目以及方兴未艾的远程教育的私立大学使得差距更加被拉大。尽管如此，80%的工业研究，约50%的校外研究和超过1/3的高校职位被取消。与先前设想的融合不一样，东德的高校，几乎是在从人员、结构等方面完全适应西德。

西德科研领域中的学霸们当然促进了东德高校体制的现代化和去意识形态化，但与此同时也唤醒了东德人心中深刻且影响长远的敌视西方的情绪。这还没完。所谓的“西方学科”同东德占优势的学科针锋相对。“战线”被搅得错综复杂：那不仅仅是“东佬”和“西佬”之间的对立，而且是“那些致力于当地大学和那些一直就有的少部分对高校自治、存在和地方建设漠不关心的‘忠于家乡’的西德教授间的对立”。

克劳斯-尤尔根·舍尔是社会民主党科学论坛的执行主席，该论坛设于柏林。他认为，高校的拆迁和建设不仅对东德高校是一个新的机会，早已被一己私欲和官腔沾染僵化的西德高校也可从中受益良多。学生可从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中做更多职业准备，研究对经世致用的强调也有很高价值，学制可受更强的管理、更有结构性，大学同社区以及经济的合作在增强，人们在此过程中也可尝试如何使管理更有效率、如何获得更

大的灵活性，以及如何有新意地获取资源。

---

[1] 图林根和萨克森均为东德联邦州。东德被苏联占领之后，长时间处于苏联的制度管理下。1952年7月推出了去邦联制和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因此东德内部不称州而称省。统一后，东德联邦州称新联邦州。

[2] 东德的5个联邦州为：萨克森、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图林根、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特。

[3] 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1863～1938年），原名阿列克塞耶夫，是俄国著名戏剧和表演理论家，获得过列宁勋章和红旗劳动勋章，是苏联剧场导演。他坚持以“体验艺术”为创作核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其代表作有《演员的自我修养》。

[4] 《魔弹射手》（*Der Freischütz*）是德国作曲家韦伯的代表作，全剧共三幕，于1821年6月21日在柏林皇家歌剧院首演。在德国民间传说里面，Der Freischütz指的是百发百中的射手，因为他拥有神奇的魔弹。《魔弹射手》是浪漫派歌剧的典范。

[5] 白玫瑰（德语：Die Weiße Rose）是纳粹德国时期一个知名的非暴力反抗组织，其成员包含了慕尼黑大学中的许多学生及教授，主要是由汉斯·朔尔（Hans Scholl）、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Christoph Probst）、亚历山大·施莫雷尔（Alexander Schmorell）、库尔特·胡贝尔（Kurt Huber）和维利格拉夫（Willi Graf）领导。此团体之所以为人所知乃是其于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陆续发送了6张未具名的传单，主要内容在于呼吁人们参加反抗希特勒政权的运动。白玫瑰的6名核心成员于1943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并于同年被杀害。而他们所散发的第6份传单后来由法学家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带出德国，并辗转通过北欧流入英国，且于1943年7月被大量印刷后通过同盟国的飞机散发在德国境内，其标题为《慕尼黑学生的声明》。由于他们无惧于死亡而仍坚持对抗第三帝国的统治，白玫瑰的成员们在今日广受德国人尊敬，被视为英雄。

[6] 吉尼奥尔（Guignol）是一个法国木偶剧及其主角的名称。虽然最初的形象聪明勇敢且具有讽刺性，但在法语中使用“吉尼奥尔”则约定俗成作为贬义，意为“小丑”。

[7] 城堡剧院（Burgtheater）是奥地利的国家剧院，世界上最重要的德语剧院之一，位于维也纳。城堡剧院成立于1741年，由哈布斯堡王朝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建立在皇宫之邻。

[8] 《埃格蒙特》是一部由歌德创作的戏剧，完成于1788年。这部作品深受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贝多芬曾为该剧配乐，主题是历史和艾格蒙特伯爵的英雄主义。在音乐中，贝多芬表达了他个人的政治理念，尤其是对一个因强烈反抗压迫而被处死的英雄的赞美。

[9] 位于图林根州的魏玛城市虽小，却因为歌德和席勒在文化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0] 大英雄赫拉克勒斯为了赎罪要完成许多工作。欧法拉买下了他。当欧法拉得知赫拉克勒斯身份之后与之结婚并育有二子。

[11] 菲罗克勒特，希腊神话中国王珀伊阿斯之子，是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同行者之一。

[12] 阿特拉斯是希腊神早期话期神祇，普罗米修斯的一个兄弟。最高大强壮的神之一。因反抗宙斯失败而被罚顶天。

[13] 约瑟夫·费尔南·亨利·莱热（Joseph Fernand Henri Léger，1881～1955年），法国画家、雕塑家、电影导演。

[14] 雷纳托·古图索（Renato Guttuso，1912～1987年），意大利画家、文艺批评家、政治家。

[15] 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1864～1901年），法国贵族、后印象派画家、近代海报设计与石版画艺术先驱，为人称作“蒙马特尔之魂”。

[16] 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年），法国画家，野兽派的创始人及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一位雕塑家及版画家。

[17] 弗里德里希大街是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区重要的文化和商业街，构成腓德烈城（Friedrichstadt）的核心。它北起老米特区的北部，南到Kreuzberg区的Hallesches Tor。由于该路为南北走向，它与莱比锡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等东西向主轴线道路交汇。地铁U6线在地下运行。在冷战期间，它被柏林墙上的查理检查站一分为二。在冷战和柏林分治时期，弗里德里希大街地下车站，尽管设在东柏林，但是为两条交叉的西柏林轻轨线和西柏林地铁U6线所利用。这个车站充当这些线路的换乘站，火车在此停靠，但这些线路的其他所有东柏林车站是被封锁的“幽灵车站”（Geisterbahnhof），火车通过，但不能停靠。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西柏林乘客可以从一个站台转移到另一个站台，但若没有适当的文件则不能离开车站。

[18] 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是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展览之一，在

德国卡塞尔每五年举办一次，与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及威尼斯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在三大展览中资历排行第三。

[19] 汉斯·马廷·施雷耶是一名德国经济官员，纳粹时期曾任党卫队中尉。自1977年起任德国工业协会主席。1977年被“红军派”在法国北部暗杀，使“德意志之秋”达到高潮。

[20] 赫拉克利特（Heraklit）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其基本主张是存在非永久，一切都在变。

[21] 威廉·冯·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1767～1835年），学者、政治家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威廉·冯·洪堡被看作德国文化史上影响最深刻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和他的弟弟亚历山大都有广博的学识并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亚历山大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而威廉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化科学，如教育学、国家理论，对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分析。他是普鲁士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普鲁士外交官。

第20章 政治疆域的模糊

民主和丑闻

如果给德国的丑闻写一部编年史，那定可谓包罗万象、源远流长。托马斯·曼在战后所企望的——“世上曾经有过德意志精神，以后还会再有，那就是驱除对权力的迷信。这将通过人们的努力和自由的精神做到”——没有到来。

当然，在政治教育和政治文化中重要的是，在所有社会领域里都依然有相当多的人，面对日复一日的道德需求和现实生活中滥用权力之间的巨大反差并不会变得麻木不仁。也许人们可以这样自我安慰：丑闻只有在民主体制里才会存在，反倒使它成为衡量法治国家是否有所作为的指数（只有在揭露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才是）。“媒体揭发，法庭送它的终。”（克里斯蒂安·许策）他认为，丑闻的爆出是为了体制的清洁，它是民众面对代表他们的人时，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它可以证明民主体制还算健康。

> 小说《河旁女人》是海因里希·伯尔去世前不久完成的。它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沉重的存在”。该小说从妻子、对手、情人的角度，通过对话和自白的形式展现了波恩政治名流的生活剪影。这部作品在构思和文辞上并不成功，但对政治哲学来说却有极大意义。作者带领读者观看分散在不同角色上的关于“上月成交多少”的自白。“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了多远？努力记忆是为了避免遗忘，伯尔把这种本属私人的记忆功能移植到了小说的角色上：你们不可以忘记自己曾经是谁、干过什么！”《宁静的漫步者》是歌德的《东西诗篇》中的一首——同这部小说中充满绝望而又懒散的讽刺不谋而合——小说在扉页上就写着这首诗：“面对卑鄙下流/无人控诉/因为那是权谋/人们也这样对你说/即使坏绝/也能青云直上/但只有正确/才能接通真相。”

某些出版物，比如《明镜》或《明星》（在它还没因为希特勒日记伪造事件把自己变成丑闻主角之前），为“民主的自我净化”起了很大作

用。然而，对德国的丑闻编年史一瞥可知，揭露腐败常常极其难做到，对幕后主使的追讨更是常常半途而废或者根本无果而终。

比如，在1959年拜仁赌场 [1] 一案中，拜仁州许多政要被判监禁。主要证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竟在誓言之下公然说谎。1960年，他因为“由于疏忽做了伪证”被判四个月监禁，在复审中又被开释，理由是，他在对拜仁州执政党做不利证词之时，因患甲亢“而低血糖，故思考能力受到影响”。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逝世于1988年10月，当时他已是德高望重的拜仁州政府总理。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一路——阿登纳第四任内阁中的国防部部长，在同库尔特·基辛格结盟组成的联合政府中任经济部部长——充斥着各种事件和丑闻。但这一切并未中断这位“好斗、骂骂咧咧、自吹自擂、不穿外套、据说是病态迷恋权力的上拜仁人”的受欢迎乃至成功。

施特劳斯是《明镜》事件 [2] 的始作俑者。这是在德国影响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事件因对维尔茨堡教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德·海特的控诉而起，联邦检察院依据一项对《明镜》周刊展开的军事-政治调查提起诉讼，并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鉴定报告。由此，法院发出监禁及搜房命令，理由是叛国、内乱和集体贿赂嫌疑。《明镜》位于汉堡和波恩的编辑部被警察占据，出版商鲁道夫·奥格施泰因、社长汉斯·迪特列夫·贝克和许多高层编辑被捕。尚在西班牙度假的总编，同时也是军事问题专家的康拉德·阿勒斯因外交部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介入也遭逮捕。在众议院发表讲话的康拉德·阿登纳称此次事件为“骇人听闻的叛国”。阿登纳说，这是《明镜》为了赚钱，有计划地犯罪。针对奥格施泰因和阿勒斯二人的审判因为证据不足没有在最高法院开庭。五位来自自由民主党的联邦部长下台。在埃里希·门德作为党魁领导下的自由民主党，将联合政府继续维持下去的希望寄托于早已不堪重负的施特劳斯从部长职位引咎辞职。结果此人不但没有辞职，反而绕开部长会议，使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重组的联盟成功入主阿登纳的第五届内阁。该内阁于1962年12月开始运作。《明镜》的发行量由50万份激增到60万份。尽管如此，德国依然花去约200万马克来对出版商进行审判。特奥多尔·埃申伯格写道：“我们不应该以为这只是一时之计，事情过后便可各自拍手走开（ad acta）。我们应该在记忆里重重写上两个字：重审。”

在媒体界激起轩然大波的是巴舍尔事件 [3] （又称瓦特康特事件）。它对社会舆论造成的影响却并不大——除了能满足某些人的性偷窥癖之外——直到1988年5月8日的新大选，社会民主党在石勒苏益

> 格-荷尔施泰因州议院都保有绝对优势。1987年，据《明镜》揭露，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州政府总理乌维·巴舍尔指使他人攻击对手比庸·恩霍姆，尤其是其私人生活。巴舍尔当时的同事莱纳·普费弗作为证人指证。
>
> 巴舍尔发誓他没做过这些事，但其政治信誉已受损，因此辞职。1987年10月11日，他被发现死于日内瓦一家旅馆的浴缸里，疑为自杀。但1994年，死于谋杀的怀疑又占了上风，可就连一向办事利落的国会调查委员会也没能查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内幕来。

公众对丑闻的接受能力已越来越强。西格哈德·内克指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随着国家权力的延伸，人们对政界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把本就复杂的事情搞得更加复杂。腐败不再为高官专利，而可轻易做到，该可能性的增强（变富具有很大的诱惑）让官僚体制中人的道德观起了波澜。

公众对于政治权力运作的内容及形式的敏感度也大幅度增强。丑闻被发现的概率也同时增加，有些甚至早前都不被认为是丑闻。

政治在社会中争权夺利、占山为王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定义何为丑闻的意见也不一样。政治新秀，比如绿党，一身轻松，在面临危机或争执之时，较少考虑“国家利益”的负担。

官方的政治术语则倾向于把道德标杆上调，因为如此可获取更高的支持率。但这样一来，期待和真实之间的距离也拉大了。“公众满怀期待，当‘道德楷模’秀再一次失败出丑，大家打心底里开心。”

自觉的民族

前文提到过的“新的不透明”时期流行着一种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神话化”政治。说“神话化”，是因为这种政治仅允许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并从这种方式中引申出一种行为导向。人们早先曾对文明抱有货

真价实的敌视态度，而今，反而视技术为信念。左派运动被人们当作“反进步的瓦解工作”，批判理性被认为会降低生活质量。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保守的“思想工厂”展现了较高的思想水平。

新保守主义对进步抱着乐观态度，相较之前，则对更多的事情抱有好感。因为，正如约翰内斯·格罗斯所说，新保守主义同“悲惨世界”的公共感受保持距离，不愿让物质富裕所带来的享受因为某些悲观丧气而变味。流行于左派阵营的悲天悯人可能颇能引发某些人类似于被鞭打时产生的性快感，大多数人无法正确应对，所以这种快感常常可能落地生根、变为使人狂躁的无望。而新保守主义则学会熟练规避自己的窘态和“不成体统”的地方，为流行的政治课题寻找策略，从而抵消意识形态上的不足。这样的聪明做法与左派阵营形成鲜明对比。

> 保守主义者的想法并不是孤独地漫步在乡野小路，仅为倾听树叶飒飒或流水潺潺而来的。他们的“产品”是根据时下需要，在“思想工厂”里完成。他们对自己的认识不是“真理”的守护者，而是权力的管理者。他们的言辞不求永恒，只为下一次竞选。他们像企业家计算一项新产品的销路一样计算他们言辞的影响力。这些言辞无关真理，只为影响；无关文明，只为讨巧；无关价值，只为利益和权力的衡量。保守主义者不知不觉由鼓吹现代性的优越性的专家转为擅于后现代式无所谓的专家。“告别原则”对他们来说不是难事。（赫尔穆特·柯尼希）

两德统一后，新保守主义以非理性的“窃窃私语”替代思想的可推敲性，其地位明显高于其他。民族怀旧主义的鬼魂游荡于新老联邦州。而处于领导地位的民主政治家们，自以为双脚牢牢站立在宪法之上，却并未意识到这只鬼魂的危险性。民众着重强调这次和平的革命使德国又成了一个民族，有鉴于这种情绪，“民族”又成为政治讨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启蒙公民对民族的定义——一群生活在共同法律约束下，由一个共同的立法体代表的人——显得不够劲，就连一向对民族主义这个“神经衰弱症”保持警钟长鸣、致力于在更广阔空间里建立秩序的历史科学如今也认为民族国家身份是必要的。哈根·舒尔茨认为，从无数次欧洲统一努力均遭失败中应该吸取一个深刻的教训：欧洲的统一不可能逆民族

及各民族的合法体完成。

有些人乐观地认为，务实的德国人也会追求一个务实的，也就是说中庸的民族感——这个想法被部分知识分子，比如君特·格拉斯，抨击为无理的自我安慰。与这种乐观想法相对，也有人认为应对“德国神话”的新抬头保持警觉，这种想法也不无道理。在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统治末期也颇多地诉诸民族神话（路德、腓特烈大帝、俾斯麦），但首先引发的是国内的暴力事件。霍耶斯韦达[4]已成为一个概念：1991年，该市发生了长达数天的青年袭击外国人事件，而该城的老人则在一旁鼓掌欢呼。

1992年8月，统一后新联邦州爆发的种族主义烽火在罗斯托克被点燃。青年纵火，除了光头党之外还有许多迄今并不引人注意的少年儿童冲击政治避难申请中心。当地居民欢欣鼓舞地支持这些行动，警方忙得顾头不顾尾，十分无助。

“促使这些凶手作案的原因是怨恨。他们‘仇恨外国人’的宣告已经引发了内在的紧张。‘仇恨外国人’表达的是由吃亏和麻木带来的不确定的、带有强烈客观歧视的感受。”

> 南斯拉夫的内战彻底动摇了人们对“历史中，理性终将到来”的希望，也把欧洲政治的弱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清楚地说明，回到过去那种非理性-暴力的行为方式完全是有可能的。与之相较，两德的统一确实也坚持了建立在宪法原则之上、西德数十年成功实践且深植于民众内心的联邦制结构。在新联邦州，尤其是萨克森、勃兰登堡和图林根，人们对建立于当地历史及文化之上的身份认同迅速地发生了感情。由地缘而产生的傲慢在国家的几个大党派那里完全找不到一点回应。“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是欧洲路线的强烈促进者，该路线建立在德法友谊关系之上，他可不愿意这条路线受到德国国内传来的不和谐噪音的影响。西德的文化概念总体由现代性——这也意味着身份的多重性——的观念决定，它让“关于德国民族的叫嚣”有所收敛。与“保卫莱茵河”相对的“保卫说不”更重要（欧多·马夸德）。古代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尔是其专业中为数不多、作品不仅被专业圈内之人阅读的代表，这些作品带给人思考，即反省的民族感情可使民主重新焕

发活力且更加坚固。

对外国人的仇视情绪很长时间以来都潜伏于东德。执政党与其说阻止、毋宁说为新法西斯团体的抬头大行方便。根据弗兰克·舒曼——《青年世界》报前任记者——的一项分析，对外国人的仇视情绪为东德的落后乡土气和狭隘的精神所促进。为了国家利益而鼓吹的反法西斯主义流于形式，而并未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认真研究。青少年因不满国家名目繁多的管制，也故意做出法西斯的举动来以示抵制。第一位外事专员阿尔穆特·贝尔格指出，在东德亲民及平等的表象之下，互相理解的愿望几乎没有。数以千计来自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如今在东德学习和生活的学生和工人，像纳粹时期的犹太人居住区一样被排除在社会民众之外。而随着两德统一到来的贫困，更对青年人采取极端行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表明，右翼极端势力的暴力行为不仅是东德的问题，现在西德的一些地名也能载入新右翼恐怖主义的地图册了。1992年11月23日，有两人在对位于默恩的土耳其家庭房屋的纵火中丧生。1993年5月29日，有四个居住于索林根的土耳其家庭成员在对其房屋的纵火中丧生。不过，与此同时，民主社会对右翼极端势力威胁的敏感度也在增强。1992年11月至1993年1月，在德国有超过300万人举行反对仇视外国人、反闪米特主义与暴力袭击的示威游行。

某几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或可使人稍微安心：右翼势力获得法律认可的潜在性在几次骚乱之后大幅度下跌。这个结果也对应了行事微妙的新保守主义阵营的人员增长。新保守主义在“私校教师、大学教授（哲学、历史和政治专业）、记者、出版人、作家、公务员、法学家和教育学家”这个颇具影响力的圈子中获得支持。他们的目标是重新教育德国人成为“自觉的民族”。海默·施维克和乌尔里希·沙赫特于1994年出版的书《1989年以来的德国经验总览》就为德国人的民族自信和民族感而摇旗呐喊。

国家的新造福者仿佛黑纱罩面。他们纠结于神话和神秘主义，而这两者的多重含义和多重解释方法则一直都是逃避既成事实的好途径。“真善美总会用某种方式获得意义，但那应该是英雄-精英式的。普罗大众应从他们的狭隘井底被解放——与此同时，有人面对消费社会的暴力在某个深处无助哭泣——并被带到光明的高处。”

献给1944年7月20日和1953年6月17日的爱国人士的书围绕博托·施特劳斯的散文《膨胀的公羊颂歌》。该文以作者的想象力对精神倒退提起诉讼，所用语言旨在加强人民必要的听、愿、想、忆。“施特劳斯的想法一直不合群，无法翻译成社会-道德通用的语言。但他既可以这么说话，并——尽管有那些常识的存在或重重累积的‘理解的废话’——期待被听懂，因为这些话隐含了对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事件的具体回忆。”其实他并没有说什么，但又用“本质”的行话有所表述。反启蒙的思想，背后衬着灯光、衣服上满是华丽褶皱，大模大样地登场。

> 散文《膨胀的公羊颂歌》首次问世于文集《桩：无人问津的艺术与科学之地年鉴》。修改后的版本发表在1993年2月8日的《明镜》上，引起轰动。施特劳斯是一位擅长用分析和精妙讽刺对社会事件做研究的作家，游离于知识分子群的边缘。在此文中，他把自己打扮成某种新的但自己也没给出明确定义的法规的主角，显然是想描绘出英雄般崇高的景象。“我说的是摒弃，它几乎是别无他路地来源于各种难以理解的咕噜咕噜声，来源于地球内部，来源于我们已经如此成功地追逐到的那些东西。我们有眼无珠：它并不想看见它带来了多少毁灭。被瞄准的东西本身带来了所有力量的源泉。”



光头党和其他新纳粹对受到警察保护的示威朋克大声咒骂（汉诺威，**1984**年**8**月，**“**混乱日**”**）

博托·施特劳斯这个大走神秘路线的文明批判者不乏模仿者——其中有在保守思想下勤奋努力的维利·勃兰特的遗孀布莉琪特·塞巴赫-勃兰特、老牌左派人士克劳斯·莱纳-罗尔、电影制作人汉斯·尤尔根-西伯贝格、犹太裔保守派史学家米夏埃尔·沃尔夫松、之前做过总编的莱纳·齐特尔曼——所有这些新“保守革命”的代表人士当然不会走诗意的天马行空的那一路。他们动不动就放声大哭或者咄咄逼人的架势是为了表达“变软弱的联邦共和国”的烦恼，文化的宽容、自由的政治和社会公正对他们而言是一块块投石。除此之外，历史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被淡化——这是恩斯特·诺特的常用话题。这个话题说穿了其实就是抵制外国人、保证德意志民族道德和文化上的同质性，甚至为德国去抱奥匈帝国这个地地道道的前现代国家的大腿赢得好感。所谓的阳春白雪美

学观、为德意志的深刻和悲惨大唱的赞歌，其实都只是政治掮客的幌子而已，他们以为两德统一为他们阻止人们批判地思考提供了机会。只是，他们这么做，还欠一个法螺吹得够响的传令官，他们所提倡的“自觉的民族”，在失业率日益增长、大量民众面临非社会主义体制的今天，并不多么光彩。德国的政治和文化史却告诉我们，用“有一搭没一搭的咩咩叫”来谱写“膨胀的公羊颂歌”，后果绝对可以相当悲惨。

议会制的危机

德国的政治文化数十年来坚信，民主社会的基石在于许多政党的存在。但是，这一点几乎丝毫不能改变丑闻持续不断或不信任代议制民主及议会体制的示威游行一波又一波发生。乡镇、联邦州和国家之间互相踢皮球的游戏带给政治家许多从中获利的机会。与此同时，年轻人或女性在等级森严的政党体制内，长时间不能前进一步。

> 多党制国家的稳固性主要在于，与魏玛共和国不同，它可以避免政治阵营的分裂。自1961年起的后二十年时间，德国联邦议院几乎只由三个政党组成：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极端右翼或极端左翼党派不可能长时间存在。比如全德意志同盟，这是一个自1950年开始运作（解散于1961年）、由被驱逐的人组成的党派。或者右翼保守的德国党，也只被支持到1967年。极端右翼的德国国家民主党尽管在1966～1968年进入多数州的议会，但也无翻牌可能。弗朗茨·勋胡贝（Franz Schönhuber）1983年建立的共和党也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仅仅过了一个十年，该党的政治生涯就被画上句号。绿党1979年在不来梅，1980年在巴登-符腾堡，1982年在汉堡、下萨克森和黑森，1986年在拜仁，1987年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分别第一次取得了它在州议会的席位。在1983年第十届西德联邦议院选举中，以5.6%的得票率进驻国家议院。加上1990年12月起的民主社会主义党，联邦议院有五个党了。

自1980年代以来，民众对政治的理解经历了较为深刻的转变，两德统一后，新联邦州普遍的情绪又加深了这种理解。许多公民尽管参加政党，却与之保持距离。懒得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时举棋不定的人数不断增加。固定投票者由1980年的60%降到1986年的48%，再降到1992年的

21%。对有些评论家来说，这意味着多党制国家的末日即将到来。根据哲学家约瑟夫·胡贝尔1988年的一项分析，对政党的不信任以及不参与选举的人数翻了两番：这可以作为衡量反对新专制主义示威、对“面包和游戏”的许诺失望的呼声的指数。当然，这也可以反映出民众在面对政党机器时自主性在增强。

> 有明显证据表明，在从政人员中，官僚主义和专家主义甚嚣尘上。1986年，500个众议员中有200人来自公共职位，也就是说本身就是公务员或事业机关人员。他们的职业分配是这样的：70个教授或教师，80个管理人员，55个政党、工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专职人员，30个从业律师，25个工程师（占全体有高等学历众议员的2/3）。相关研究任务由当时的总统菲利普·耶宁阁下令进行，他对此评论道，德国的联邦议院不仅是一个公务或功能议院，也是一个学术议院。

有人说，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终结，人们由此也失去了对乌托邦的纲领性构建，与此相反，人们赞美“做事的人”的现实观。但这是对未来政治意义的错误估计。不仅为了当下的执政，更为了后人，都应该保留对乌托邦的设想。不过假如政党在拉选票时，对别人提出的关于未来的问题只能大而化之或老调重弹地回答，却并不能给出实际解决的方案或建议，总之就是缺乏实际想法、只会说空话的话，这种政党在选举中败北也就不足为奇。

“优秀的年轻人，假如是左派，就会宁愿去国际人权组织也不去社会民主党。假如是右派，就会宁愿去宝马公司也不去基督教民主联盟。”

1987年，康拉德·阿达默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指出，基督教民主联盟三十年以来一直对两句说辞颇为自得：外交政策立足于西方联盟；经济政策立足于市场经济。他们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国家，在联邦以及州选举中获得好成绩。但是这一切不能表明，如若他们坚持这种狭隘的纲领，也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那两句说辞是他们在20世纪中叶提出的，但对如今而言，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说辞。

赫尔穆特·科尔理解的党派是权力直通车。其人的政治攀升同社会民主党当时所处的低谷期和时代精神向厌恶理论的转变不无关系。他那聪明的“安全无害感”在其成功的光环下更具信服力。追随科尔的人既没有因为库特·比登科夫[5]的离开（而比登科夫后来当上了萨克森州政府总理，成功地扳回一局）也没有因为“驱逐”海纳·盖斯勒而走开。海纳·盖斯勒本想通过新理念和未来可行的构想给党内“换换空气”。有人曾预言，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向赫尔穆特·科尔这个全知全能般的德国总理角色看齐，却并没有纲领和任何清楚的未来目标，其早晚会在政坛上蒙羞。预言在1998年成真：“老牌”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所组成的联盟失掉多数选票，败给了杰哈德·施罗德的红绿联盟[6]。

瓦恩弗里德·德特林是海纳·盖斯勒在阿登纳政府、丽塔·许斯姆穆特在家政部的“军师”。他眼中的赫尔穆特·科尔是一个走中间路线的人，在内政上致力于民众的融合，在外交上是一个成功的介绍人。但他也认为，科尔对基督教民主联盟因为缺乏社会政策的考量而导致的失败负有责任。他说，科尔消化了这个他自己也参与缔造的现代政党的营养，却在退场的时候把这个“德国总统选举协会”的政党也拉下了舞台。

自由民主党人在1990年代逐渐失其“自由主义式的谨慎魅力”（哈特穆特·冯·亨提希）。因为奉行“臂肘政策”（Ellbogen-Energie）[7]，自由民主党逐渐变成挣钱多的人的党，背离了它在战后的道路——当时的德国总理特奥多尔·赫依斯对该党起到了引导作用，使它获得了很大的文化影响力：启蒙的人本主义、负责社会的自由主义。无党派的沃尔夫冈·杰哈特做了党主席之后——其后是克劳斯·金克尔——自由民主党同社会和政治原则渐行渐远。（他们说：“没人那么怀旧，还会思念弗莱堡左派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年轻法律部部长萨宾娜·罗特豪依瑟-施那恩贝格效仿老牌自由主义者布克哈特·赫尔施退党了。新的秘书长古依多·韦斯特维勒，年轻、强健、敏捷，很聪明地运用煽情的口号、大胆

的比喻、鼓惑的言辞，让自由民主党人继续显得赫赫扬扬，但雅痞式的自由主义终究只是银样镴枪头。他们做了一场后现代主义政治之秀，但这场秀并未能团结党内人心涣散的技术派花花公子们（即使为了作秀，有些时候他们也显得比由议会外反对党进化而来的绿党更加激进）。格罗茨曾说，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在使年轻公民消除政治门户之见上的做法颇为无能。用此话来形容自由民主党，亦然。

拉尔夫·达伦多夫1987年时曾说："社会民主主义江河日下。"这位早先的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带着精英感的傲慢否认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存在意义。他认为，世俗的政治权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设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实现，曾经为之努力的政治团体现在各自有了新的利益划分。"对他们来说，所要做的只是指出由他们一手创造的世界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剩下的则是竭力维护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这两种做法都不能激发渴望，因此，于终究为政府服务的选举中获得多数殊为不足。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江河日下。"

社会民主党的两难之处在于，它满腔热情地坚守着一种世界观的原则，而在该种世界观主宰下的世界却正是被它自己成功推翻的。在极端思想从各个角落冒出来的今天，社会民主党不再够格做新的指路人。勃兰特和施密特时代过后，一切都清楚表明，1970年代追求政治突破的风尚已然消逝，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被卡住，新社会远未到来。风向变了。

> "选民中的多数已经根本不想听什么改革了。尽管有国家的宏观调控，很多打着为了民众利益的幌子、实则追求其技术专家治国目标的事情在迅猛的思想解放及政治参与的潮流中逐渐现出原形。另一些则变为泡影，因为政治家和官僚一再触犯人类行为规则的底线。彻底的失望和彻底的清醒迅速蔓延。经济来源也在枯竭。联邦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给开销庞大的改革政策画上了句号——不管人们是不是真的还想改革。"（沃尔夫冈·耶格）越来越束手无策的社会民主党无法为德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如何鼓励德国的国民经济进行投资和创新，如何把公共财

> 政预算重新拉上正轨，如何解放受到束缚的社会市场经济，如何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
> 1987年接任维利·勃兰特成为党魁的汉斯-约亨·福格尔在1983～1991年担任社会民主党在众议院的代表团主席，像一个大汗淋漓的马车夫一样把遭受选举失败打击、郁郁寡欢的政党团结在一起，使这辆马车不致散架。但对于重新夺回尤其是大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的选票，终究无能为力。

即便是修订过的《哥德斯堡计划：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要草案》，那也是看似千言，实无一策。

1990年代，联邦共和国缔造者的孙子辈登上政治舞台，为社会民主党制定“未来的扮相”：首先是不那么具有卡里斯玛式魅力、更注重实干的鲁道夫·沙尔平，接下来是1995年上位成功的奥斯卡·拉方丹[8]——一个懂得动脑筋的党内拿破仑，懂得用左派式的启蒙作为背景启发人民，这比孤陋寡闻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满怀敌意的虎视眈眈要高明得多了。他的做法得到立场鲜明、以非教条主义而闻名的杰哈德·施罗德的襄助。思维灵活、热爱生活的共同点把施罗德和拉方丹联系在一起，与苦行僧般的“党的战士”沙尔平形成鲜明对比。施罗德和拉方丹的作为得到喜爱所有人也被所有人喜爱的“爷爷”约翰内斯·劳的关照，终于在政府换届的时候让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成为新的德国总理。

大众新闻以超乎寻常的巨大热情关注着绿党的崛起，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党派可以从一开头就避免“旧党派”的错误和过失——尤其是因为，绿党并不关注利用眼下的机会可以取得多少实权，而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敏感，从而为指明方向提供一种可能呢？或者它的成功只是一种宣泄，宣泄人们对碌碌无为的旧党派的失望呢？——与此同时它自身的“环保主义”也逐渐消失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随着“政治先锋”的棱角逐渐被磨平，比如，在日复一日使人厌倦的琐碎小事中，或是只有获得多数选票才意味着成功的经验日益坚固，那么绿党触礁也只是时间问题。绿党如果成功，可以对其他党派在“改革”的考虑上以身作

则，从而促使议会体制的复兴；倘若失败，那么所有党派和民众之间的鸿沟就会更深。

彼特·格鲁霍维斯基认为，绿党的成功首先是不断扩大的价值观转变的结果。那些左派-环保主义或左派-自由主义的后物质主义者极有可能投他们的票。但按克劳斯·欧弗的解释，绿党的出现和崛起属于新出现的政治“洪水现象”的一部分，该现象——同“房屋占领运动”和“保护树木运动”一样，对女性与和平问题忧心忡忡，反对核电站，提倡环保项目，推崇民众自主和生态耕作——有实无名。常常被提起的“自然”在此的意义是生活和政治的统一体（政治的私人化，私人的政治化）。绿党对道德观念和思想态度的主张十分刚性，但恰好是这一点与政治的责任感形成抵触，因为政治的责任感意味着妥协和结盟，仅仅这一点就会把绿党的自我认知逼到面临破碎的边缘。这个情况在科索沃冲突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约施卡·费舍尔[9]可谓压舱石。这位政治家在第一届红绿州政府联盟（黑森，1985年）中，作为环境部部长负起了责任，进入众议院之后，也一直保持一颗有自己主张、擅于分析、极富雄辩才华的政治头脑，1998年出任德国外交部部长。作为叛逆者、实干者和绿党党魁——他脱下绿党喜欢的运动鞋，也不拒绝佩戴领带，因为领带帮他理性思考——费舍尔以身作则，告诉人们什么是绿色感觉，什么是绿色智慧，如何在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的弯路、错路之后，“通过权衡，找到中庸正路”。

社群主义

1990年代的西方，人们越来越厌烦政治文化，这是其在民主的保护伞下，长期的腐蚀过程的结果。党派的群雄逐鹿——那头鹿就是国家，与此同时，公民则越来越失权——是这个过程开始的重大原因。民主遭遇了危机，因为实际上它已没有多少民主（汉斯·赫伯特·冯·阿尼姆）。



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看望柏林普勒茨湖监狱里的少年服刑犯（**1986**年**5**月）

在东德，国家机器在其统治期曾显得那么神秘莫测的腐败和谎言被一一揭露。同时，对之前被神化了的西式民主的失望也在蔓延。

两德统一之后，全德国的政治气候也被统一。结构性失业下的麻木不仁更增强了对这统一的政治气候本就十分适宜的“民主终结”说辞的接受度。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不安全感都在上升，这导致一方面对强势国家及严刑峻法，另一方面对扩大公民参与的呼声都越来越高。然而，膨胀的国家暴力与西德数十年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背道而驰。尽管没有遭到1962年通过《紧急状态法》时那般强烈的反对（尤其是自由民主党都因为这事转右了），但国家暴力膨胀包含危险，这已是德国政治文化不可争辩的组成部分。

“政治正确”——这是一个无孔不入然而并非因为信念而确定下来的道德体系——并不能赋予公民社会所有政治文化复苏所需的材料。政治团体的丑闻并非根本问题——对比一下当时日本和意大利的惊天丑闻，德国的只能算是小菜一碟——最根本的危险在于，整个德国社会浸透在一种寡廉鲜耻的“自我服务”精神中（特奥·索莫）。人们受够了在这个只讲攫取的社会中生活。在这里，腐败早已不是例外，因为一切都围绕着“挣钱”两个字转。“个人生活和国家生活都有比挣钱更重要的东西”，这是1992年夏天一次示威的口号。示威获得了极大关注，玛丽安·杜霍夫女伯爵[10]、赫尔穆特·施密特和沃尔夫冈·提尔瑟都在这次示威书上签了字。公民们失望透顶，无论政府或反对党都既无热情也无韬略，多数事情都交给“偶然”来决定。东德的终结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觉醒，相反是死水般的惫懒。

“历史仿佛一条巨大神秘、奔腾咆哮的河流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而站在岸上的我们，心惊胆战地问自己它将奔向何处。”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一番论断的基础上写道，联邦共和国在统一后被“第二条生活谎言”附体——“第一条生活谎言”在广为人知的阿登纳时代诞生：“我们所有人都是民主的。”——他的意思是，德国又回到了它的老路。和旧式国家的决裂唤醒了一种感觉：人们不必硬逼着自己做“道德模范学生”，而可以在毫无顾虑地保留健康的民族感情的同时引导欧洲。政治风云变幻，焕然一新并非好事。哈贝马斯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曾经用有效的警觉成功构建了联邦共和国精神气质的左派也在蜕变瓦解，而是因为自由保守主义者分崩离析。

在经济领域，全球化俨然成为新的偶像，被用以代言一种无底线，亦不受社会国家道德束缚的实用主义。“全球化”成了为裁剪本国工作岗位而将其挪至劳工价格低廉的国家脱罪的借口。与此同时，一种个人主义也在私人生活中大行其道，它其实是利己主义，“原则”和“责任”对它

都不过是儿戏。社会在分裂，因为嘴脸伪善的多数在面对不辍为社会努力的少数时，公然否决启蒙的政治生活方式。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制约（以及与此相关的，上下一心对自私自利的控制）让位于现代特有的、对乌托邦理想横加指责的享乐主义。外在的表象，譬如就业结构的转变（生活的电脑化造成了沟通不畅）或家庭生活的倒退（在大城市里，超过半数的人独自生活），凡此种种都加速了对社会具有约束力的价值秩序的崩塌，而这些价值正是迄今为止构成社会民主的关键因素。老派自由主义者玛丽安·杜霍夫女伯爵在一次演说中说，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什么东西把它联结在一起：如果没有了传统，没有了游戏规则，没有了制约自私自利及其残酷后果的公认的行为准则，那么，国家或集体都会失去稳定，和谐共生也会沦为不可能。如果听任现在的状况继续发展，那么这种像野马一样“不羁”的人将无可避免地堕入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为自由社会松弛的内聚力上弦，价值保守的道德观同各种新老团体不谋而合。这些团体多数是超越党派甚至反对结党的（因为他们认为，各种党派都已失去其道德因素）。“公民社会”或“社群主义”这样的概念被高高举起，人们尝试把个人主义从绝对客观主义的束缚中抽离，以及重提放弃、禁欲、牺牲、服务、团结这些同70年代解放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行为模式。

> 根据蒂莫西·加顿·阿什的分析，社群主义的关键词是“区域的”“当地的”“同工作有关的”“自愿的”“民主的”“礼貌的”“宽容的”“非暴力的”，等等。社群主义从东欧的和平演变中壮大力量，又回到了曾在七八十年代风起云涌过许多新社会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而今尽皆偃旗息鼓的西方。当西德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躲在大学的象牙塔里，不痛不痒地批评着“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之时，东德在即将和终结之后则孕育出多种社会行为模式，实践表明，这些模式——并未受批评它们“缺乏理论”的人所左右——大大增强了人们对政治道德复苏、对集体生活至关重要的责任感重建的希望。“国家的落空”——因为政治阶级看来首先是为自己服务的，然而就连民众也开始效仿这种自私自利的态度了——如今碰到了重建政治目标的制约力。社群主义认为，在“危机社会”里随波逐流是自甘堕落、无视后果、掩耳盗铃，提倡人们做事不受他人影响，独立自主。

有些理论有极高的道德诉求，这些道德诉求常常有潜在的呼吁对象，以特定的词语表达。这些理论诉诸这种逻辑——相较于某个意图良好的上层建筑而言，社会成为某种生活共同体更是作为下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作用的结果。社群主义所提倡的只有在德国政治坚定不移地继续走社会国家的道路（以及社会市场经济），并阻止社会达尔文主义蔓延的情况下，才能成真。要给这个“原始社会”划定规矩，必须少数人敏感地“大惊小怪”，他们的警觉也会顺便激活如今陷入僵局的党派机器。

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1984～1994年）及其继任者罗曼公爵的成功促使这种意义上的“社群”起了作用。他们的“官腔”只有在其由拥有说服力的人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才能带活僵化的关系。至于怎么说则有许多种讲法，总之要使理论和联邦共和国的民主与文化发展挂钩。

由此，尽管不能消除民众和党派之间的陌生感，但至少可以重新赢得人们对政治的信任。回到托马斯·曼1945年5月10日的讲话，“通过人类的贡献，自由的精神”，找出权力中值得被尊敬和投入的一面。

芯片革命

不仅是手工，就连脑力劳动都能由机器代劳。20世纪的这次科技革命也许是科技史上迄今为止最重大的一次。

“人类发明的每一种机器都可以用小小的一台电脑来配备。”（A.金）

> 电脑可以通过人工感官，比如光电二极管、麦克风、温度计，从外界接收印象。它可以“记忆”，也可以“学习”，即如果对其处理结果不满意或者处理过程太长的话，输入的程序可以自我做出调整。它也可以“行动”，即，自动化机器和环境的关系可以通过介入环境来改变，这需要它的“四肢”，也就是伺服单元来完成，后者通过电子神经做出的“决定”操控机械动作。如果把感知和记忆、学习和处理联系起来，那么电脑的“行为”就有点像人的行为了。

20世纪50年代，具有半导特性的锗和硅被用来生产晶体管。这种晶体管取代了当时采用的、体积较大的电子管。研究表明，在一个主要由硅构成的“芯片”上通过物理化学反应制造多个晶体管是有可能的。这一结果进而使可把两个输入信号转换为一个逻辑输入信号的连接电路的集成化成为可能。“由此，在减小用于组建芯片和计算机的零部件的体积上前进了一大步。因为路程缩短，传输信号的速度也加快，故障率也降低。60年代，不断细化的工艺和新效应的开发促使集成密度呈指数增长，因为人们可以以越来越紧密的结构制造逻辑单元。”（克里斯蒂安·莫棱豪尔）

从宏观电子到微电子没花多长时间：1946年，美国人建造的晶体管计算机ENIAC由18000个晶体管组成，重达30吨，造价约150万马克，额定功率150千瓦。1958年，美国人基尔比第一次在一块硅上安装了许多个小电子管，程序由此更加精细。今天，在一块硅晶体上面已可以安装150万个电子开关。

至于数字传输技术，一根光纤的传输速度比铜线的可要快多了。二十年之前，一根电话线每秒可传输几千个字节，今天，一根光纤每秒可传输十亿个。一张CD光盘可以存储的数据相当于超过20万台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量。

根据诺伯特·维尔纳“控制论”命名的新技术致力于电脑在管理和控制工业生产中的研发。里尔克[11]笔下的“在寂静的工厂里，自动装置自己给自己加油”的场景似乎变为现实，全自动化的工厂已成为可能。

> “大厅空无一人。几个工程师、技术人员和装配工人在仪表盘的巨大屏幕前来回走动。他们观察成套仪器，通过操控某根摇杆或扭动某个旋钮来修改错误。除此之外，其他的全都是自动。一条传输带传来原材料，这些原材料通过一个监视器得到检测，然后被送往加工机器——所有这一切都由中央配电板调控——直到自动装箱。收音机、冰箱、拖拉机、自来水笔、汽化机、螺丝钉、飞机，所有这一切都是这样被做出来的。”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埃里克·利威尔和布劳恩1947年

描绘的“新工厂”已不再是幻想。



虚拟现实头盔：通向网络世界的大门

对现代生产至关重要的仪表板总成控制系统十分繁复，这要求研发团队有极高的“灵活智慧”。“我们试着把技术降到最低”曾经是理智的泰勒制科学管理模式专业人士的座右铭，如今倒过来了：“我们要有质量地任用高质量的人——精神资本应该得到充分利用。”

早先工业社会的秩序曾经让工人捣毁机器。具有创造力的个人及个人色彩强烈的创造力不受喜爱，这是在大规模生产中工作的人们的必然命运。而在人性-计算机化社会，大家不再需要直奔目的而去的血肉“机器人”，而是聪明、有预见性、行为自主，同时又极度认同企业的专业人士。

彼特·布罗德纳说，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加速以技术为中心

的发展（前方是僵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借助人工智能否认“活人的工作”的意义），还是应该走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如此可以重新找回“人”的认同。“以人为本的生产理念不测量技术的可能或人工的极限，而旨在更大程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潜能，即把机器当作生产资料来使用，用和以技术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设计人的行为。这不是模仿人类能力，也不是把机器当死机器来使用或把机器排除于生产之外。人类生产和机器生产具有相反特点，由此可以得到统一。”

芯片革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智慧会不会越来越多地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如果把人当作有自我组织能力的材料的产品，那便不能否认电脑智能。如果把人理解为有精神、有灵魂的生物，那么，他所具有的兼容感知、理解、学习、思考和补充，构成日常认知基础的复杂智慧，从原则上来说无法被电脑复制。然而，人工智能研究的出发点却是：人和机器有本质的共同点，即拥有可以处理信息的系统。“机器是能把某些输入加工为某些产出的任意一种工具、一种物质系统、一种装置。”这个定义用来形容大脑也说得过去，因为大脑可以“再现”。

> 特奥多尔·罗斯扎克在《思考的丧失：论电脑时代的神话》一书中写道，对信息的狂热崇拜意味着某种纯理性哲学观，即通过信息处理模式可以全面、准确无误地复制人类思想的方方面面，人类智慧和人工智能都属于信息加工系统这一“物种”。他认为，这是一种还原论[12]的想法，但影响很大。光速传播的信息无外乎由一个一个很小的事实组成的一捆（有些有用，有些无用），却绝不能取代思想的本质。买卖数据以及几近于迷信的数据崇拜者视而不见一个基本事实是：精神在理念中——而不是信息中——思考。信息尽管可以传达或装饰理念，但自己并不能产生理念。人类文明并不靠收集和处理信息才发展至今，而是因为那些丰硕、动人、有力的理念。伟大的理念，比如公正、平等，完全不是靠信息产生的。这么多信息中——现今的信息量每12个月就会翻一番——没有一条提出哪怕一个十分寒酸贫乏的理念。电脑的“思考”只是程序上的，那已到它能力的极限；电脑“思考”之后，还需要人来设计这样的电脑程序：单线程、效率至上、渴求信息、没有思想。

如果人们看到，每一次通过硬件节省时间都必须扩充软件（处理速

度和路径的复杂程度成反比），那么信息处理也达到了其物理极限。一台地球那么大的电脑在同地球年龄一样长的时间里也无法处理比10^{93}比特更多的信息。而一盘国际象棋的走法可能就可达到10^{120}种排列组合。所有一切使经验成为经验、文化成为文化、社会成为社会、意义成为意义的东西，都无法通过机器来存储。“一台电脑并不比一台蒸汽机更有文化。”危险之处并不是机器成为人，而是人成为机器。

“对于我们来说，出现超智能机器倒还不是那么危险，真正危险的是人变成为机器控制的智能。”（胡贝特·L.德雷福斯）

> 这还没完。信息和数据巨幅增长，专业人士局限在越来越小的范围，知道的越来越多。专业人士的眼界越来越窄——想想医疗领域的专业划分到了什么程度。说“一叶障目”或“专业傻瓜”一点也不为过。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增强辨认方向能力，也就是提倡总结能力得到一定平衡。专业人士应该从自己那点狭窄的子领域中脱出身来，看见“整体”这座山。当然他可以有所专攻，但他不应该迷失于细节。有了总结能力就可辨明方向。我们也可以称对这种能力的培养为综合教育、“哲学”教育或公理教育。出于这种考虑，1987年的巴登-符腾堡州研究报告认为：“在机械化的工业社会于断片、化约、分析及专业精分中寻找救亡良方时，我们要建立的信息社会应该建立在新的信息和交流技术上，在行为方式上注重整体、全面。专家应该给‘通才’让出更多空间。”

芯片革命最重大的结果之一就是需要越来越少的人力。霍斯特·科恩和米夏埃尔·舒曼在研究自动化工业后指出，该领域已有及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巨额投资项目意味着“巨大的失业潜力”。该论断适用于所有领域。无人能预料由微电子技术引起的合理化潮流将到达何种程度。人们曾经希望，发展会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现在这被证明是错的。经济增长，在更加自由而不是更加社会化的市场经济里，意味着取得的增长值首先会被用来合理化分工——这不仅是出于世界市场经济的原因。由于德国的工资不能降低到工业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水准——至于把工作岗位迁到工价低廉的国家，那则是理所当然的——在强度的合理化分工压力下，人们被迫在已有的竞争程度上加码。微信息处理器可不受人

类规定的约束，它每日每夜都在生产。

世风日下的社会国家

在德国这个社会国家接近新千年甚至在新千年后继续危害其根基的是缺乏设想的政治，人们称其为“结构性丑闻”。它受到生产关系的转变以及世界和本国经济的转变（比如全球化）的影响，转而导致必然的失业。1997年年初，失业人数已超过460万，占德国总人口的12%（旧联邦州失业率为10.6%，新联邦州失业率为18.7%）。

克劳斯·海夫纳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可被替换的人”人数多到可以组建军团，这些人无望获得稳定工作。真想阻止2/3社会——2/3的人工作，1/3的人失业——的出现以及民主社会国家随之而来的深刻动荡的话，就得采取一些极端措施。

> “资本主义夺走了工作。就业人数剧减。我们正向着一个没有工作的资本主义大步奔去——不仅德国，全世界的后工业国家全都如此。”（乌尔里希·贝克）杰里米·里弗金是华盛顿经济趋势资金会主席，著有《工作的终结及工作的未来》一书。他说，信息社会让工作来源日益干涸。想要寻找新的有意义的工作，必须去那些超出传统工作范围之外的领域探索。早先，工业技术取代了人工劳动，机器的力量取代了肌肉的力量。新的电脑技术则使电脑取代人类的脑力劳动成为可能。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人类都在被会思考的机器逼得一退再退。里弗金指出，在美国，尽管工业生产一直在增加，但工厂工人在全体员工中所占的份额却在过去三十年内，由33%下滑至17%。再过十年，全美工作的人口中仅有12%在工厂工作。而到了2020年，全世界的工作人口中则只有2%还在工厂。在新千年的头二十五年内，我们就会看见流水线作业工人完全被取代。即使在传统的、人们寄予希望的服务行业，自动化和越来越少的人工过程也早就开始了。里弗金认为，非营利及公益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第三根擎天柱。它们可以提供“人性市场”，那会对人类劳动有较高需求。当然，如果单纯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出发，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非营利领域的新型工作只赔不赚。但是，它对整体国民经济却大有裨益。里弗金建议，对新产生的虚拟空间经济应该提高税率，在其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应被投用于公益。这应该被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并成为21世纪社会的重头戏。

解决失业问题并无王道。不过，赫尔曼·萨林格指出，失业并非仅仅是经济领域必须解决的问题，它首先是社会与道德的责任。此言甚是。因此，失业的重担不应只由那些正身处其中的部分人群负担，而是全社会都应公正承担。在此提公正这个概念，是因为它是维护那些深受其害的人团结的保障，并且，这个概念本身也包括承认因承受力不同、贡献不同，社会中不同人群在承担多少及承担方式上亦有不同。

也有人提出，大规模失业可通过社会改革来解决。阿克谢尔·布斯特-巴特斯在一篇全面研究报告中，对革新现行就业政策提出了设想——当然，也得不无悲观地看到，他所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多数都没有考虑到，更遑论彻底分析，解决失业首先需从经济政策入手，而如何解决则有多种道路。关于如何解决，意见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相信自由市场有自动调节功能，试图通过各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尤其为那些高盈利，因此也有更多投资的企业减负——来达到全体就业。另一派则强调，失业问题首先应通过重调就业机制、缩短工作时间来解决。针对就业机制，争论的焦点是经费问题。“一派认为，经费应通过提高国家债务及收入最高人群的税收来获得。另一派则恰好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巴特斯认为，应达成如下共识：应该为工作提供资金支持，而这需要经济政策制定者从社会全盘考虑，并了解社会心理。

> 失业的经济负担几乎一半由低收入人群承担。用这个数目比照增加就业措施（简称ABM）所需资金，差别并不大。就算只计算这些措施最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那么也有65%的投入立刻就能收到回报。如果加上间接产生的国家经济效益，则有91%～95%的投入收到回报。

“工作”问题在有报酬的就业意义上，与“人口发展”问题向“业余时间”问题靠拢，业余时间会“超过”工作时间。这个现象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忧虑。

霍斯特·O.欧帕肖维斯基认为，单纯的“工作社会”向“工作-业余社会”的转变最迟2010年就会出现。星期四晚上，一周的工作基本已经完

成[13]。与此同时，数量不断增加的自由职业者的工作压力也在增长。全年365天中，200天放假，165天工作。可尽管如此，“业余社会”并未成型。因为，尽管实际工作时间缩短，400年以来的工作伦理对人和社会机构的影响依然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流走。工作作为有意义的人类活动的象征，即使在不断增加的业余时间里，依然有其意义。这对志愿工作和在业余时间里各人自己所做的工作意义尤其重大。欧帕肖维斯基认为，传统的工作概念应向作为有意义的活动理解的工作转变，后者可以涵盖就业工作和社会工作以及私人和公共生活。在业余时间里从事的自主活动，包括自己的事、公益活动、邻里互助、家庭工作以及协作工作，同就业工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一次谈话中，安德烈·格尔茨指出，工作时间缩短是否有益，取决于工会、社区、政治团体、教会等是否能有意识地懂得为人们在业余时间里提供构建生活、环境、满足私人及集体需要的条件。

1990年代，关于社会国家的讨论越来越激烈：社会国家已无力支付其几十年以来所固有的形式。失业人口的增加让失业帮助和社会救助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人口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老龄化，向社会国家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工作人群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可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养老的支出？卫生事业和疾病防治的庞大开支已然超过原有底线。除此之外，“应得权利”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国家应对一些在过去被认为是个人责任的事情负责，这个想法多多少少得到了印证。反过头来，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工薪较高的德国，显然无法期待这会带来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新就业岗位的增加。有人认为，这一切都要求政体的改变：削弱社会国家，改善德国的经济环境。

小康国家——根据康拉德·阿达姆的观点——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会自我调整。华栋广厦之中，依然有人犹嫌不足。为了平息这些不足，国家必须损害一些诉求，而正是这些诉求使国家在公正的基础上成为小康

之国。这些诉求包括所有在纯个人和纯物质定义的富裕之上追求的目标。恩斯特·福斯特霍夫在这个趋势开始时就已道出其两难困境：“越是涉及公共利益就越会不可避免地同各种其他利益产生矛盾，最终再也‘找不到任何社会组织做其保护伞’。这是一条很令人惋惜，却一再被证实的定律。”

麦因哈德·米格尔认为，社会国家扭曲了人。历史错误被各种禁忌和幻想掩盖。人民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所产生的价值回馈，因此他们在社会国家前裹足不前。社会如想保持其社会含义，首先就必须面向社会睁开眼睛。他认为，对社会国家的幻想破灭以及对许多过去的禁区的踏足是克服发展陷入僵化的转捩点。“如果一个启蒙的社会想要保留它今天的一切，从民主的精神上来讲是应该被尊重的。但这基本不可能。民意调查在此可给出许多宝贵信息，尽管那些看透今日社会国家运行机制的人并未对民主提出根本质疑。因为社会国家也许正好是对一个个人主义社会的修正。这些看透了的人也愿意重新认识社会国家，扩大可有所作为的领域。他们认识到，社会国家今天的形态已成为继续发展的阻碍。如不从根本上去除这些阻碍，早晚它们会以革命的方式毁掉社会国家。没人想看到这一切发生。”

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朗茨·明特费林的意见则正好相反。他认定，国家有义务创造和保障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的社会结构和框架条件。“‘社会的’是社会的核心而不是边缘，更不是最不重要的一条。”社会国家——也就是国家的社会行为——不会夺取个人的努力，也不能取代社会的团结及人类的互爱。

“社会国家的反对者通过将其塑造为‘个人对自己负责’和个性的对立面来败坏其形象。他们想把社会国家这个词搞成滥用和无能的同义词。但这不是‘会这样还是那样’的问题。这涉及个人责任、社会凝聚力和国家及社会行为之间的平衡。”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消解了工作社会的价值核心——这个幽灵在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出现[14]——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历史联结因此破裂。欧洲和美国的民主以“工作民主”的形式诞生——其意义在于，民主的基础是民众参与工作。工作，一直以来，不仅是私人，也是政治存在的意义。“这完全不‘只不过’是上百万人失业的问题。这也不只是社会国家的问题。这也不仅仅只是避免贫困或保证公正的问题。这是一切问题。这关乎欧洲的政治自由和民主。资本主义和基本政治、社会、经济权利的根本联系并不是什么只要捉襟见肘便可随时省略的‘社会善行’。作为社会的‘减震装置’的资本主义更像是在历经法西斯主义后的一个答案。这是启蒙的应用。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们只有在有住所、有稳定工作及物质未来的时候，或许才能成为懂得和运用民主之道的公民。这是最最简单的真理：没有物质保障就没有政治自由，也就没有民主。人们由此面临各种新老极权思想和极权政府的威胁。”（乌尔里希·贝克）

展望21世纪

20世纪末的“危机社会”（乌尔里希·贝克）是盲目、不计后果的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出现，是因为一直以来，人和国家机构的思想和行为都以工业社会为理所应当（工业社会隐含的精神是追求经济进步，无视环境问题，认为“人定胜天”），而这个信心已经破裂。一直都有新的动力推动现代化进程，发展速度越来越令人目不暇接，它破坏了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惯性，也破坏了人类的继续进化。如果人们不费时间停下来想想到底想要什么，又有哪些可能做到，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变得“更好”的机会。

“那么，也就没有时间用来摸索和总结。有可能会犯一些可怕的错误。人们会越来越急迫地需要改正错误，却正因为急迫犯更多错误。而这些错误的后果扩散速度会越来越快。全球都处在‘急迫’的危机之中。”（彼特·卡夫卡）

乌尔里希·贝克说，人们不但没有主动决定应该发生的事，反而听任自己沉湎于“反身现代化”。这话的意思是：因无视或漠视导致的“世界危机社会”的速度在加快，外来干预无法改变，而只有当这个社会自

己到达辩证转折的那一点时才能修正（也就是说，不是通过“革命”，而是内在意识的发展带来的结果）。随着危机社会的发展以及在危机社会之中，理性的单线性上升到达其极限——理性的单线性，作技术化、官僚化、经济化、垄断化等解——它将打破僵局。贝克谈到阻塞，那可不仅仅指我们日常所说的堵车，而指的是社会各领域、形形色色的阻塞。到处都有阻塞或泛滥，比如已有数千个频道的大众媒体，一边已经踩到公共法律体制的边界，另一边则为无原则大开方便之门。

20世纪末，问题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变成雪崩。究其原因，竟是现代人类不断增长的创新能力（譬如基因科技或者人工智能）。只有当工业社会自己“有能力”进行创造的、参与的思考时，这场雪崩才能被制止。约瑟夫·胡贝尔提到了“现代性的自我现代化”。他认为，这事关发展“由经济建设向社会-生态建设转变”。

人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进步，什么是保守。除了“保守主义事件”还有“模仿浪漫主义事件”，后者指的是借“生活”“共同”“自然”这些被过度神话的大旗，轻率地在民主和社会国家机构建设中牺牲好不容易取得的技术发展。



柏林新城市中心的计算机模型，前为波茨坦广场，右后方是亚历山大广场

事实上，体制建设走到今天已经无法阻挡。世界人口的爆炸、核能量的获得，以及认识到用传统工业社会的发展方法已经走到尽头并已带来难以控制的威胁，这一切都把生态发展的话题提上议事日程。“传统现代化时代所面对的问题在自我现代化重建时代的今天是生态问题。”

展望21世纪，现代工业社会以及德国的命运将会如何，在于人们是否能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找到那关乎每个人以及全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

的答案。

越来越快的发展速度能否稍稍减缓，达到一种平衡的、适应不同文化和不同人群需要的新的生活节奏？

不断的“专业细化”能否稍稍放下，好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哲学中那么重要的许多W[15] 问题的意义？回答这些问题，教育才能综合专业知识、素质培养和责任原则。

社会分裂为“工作”和“业余”的两分法怎样才能被工作和业余的综合体（活动）所替代？这种“综合社会”又具体该怎么运行，从哪里获得经济来源呢？

工作的未来在哪里？结构性失业会成为常态吗？会不会变成2/3社会或者4/5社会呢？

德国这个社会国家能不能在变革中保留其本质完好无损呢？

在这个被越来越不规则地组织、受制于诸多权力结构规则（市场、协会、议会制民主）、已被分成无数细小碎片的社会里，是否还有可能在不断的讨论中取得理解？这尤其取决于知识是否能有效传播，后者取决于个人或集体是否能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否能被激发终身学习的动力，以及终身学习又可从社会获得什么回馈。

是否有可能从许许多多获取知识的方式中总结出某个关乎一切的重点，类似于“找到未来方向的知识”？媒体和文化又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启蒙的“单子”[16] 有没有可能，一方面保留每个最小单元（此处的单元也包括空间的经济意义的单元）的独一性，另一方面又在不同质化的前提下，把全球联为某种必要的整体呢？

“封闭的”单数身份能否被复数的身份取代？而与此同时，是否能保证所有身份最后不会重新变成只有一种含义，而那些迄今没有被归类的身份以及那些纯粹由人类感情引导、互相靠近的努力在建立新身份的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呢？

人们共同面临的伦理和道德原则的崩溃是否能被富有责任感的媒体和真正自由的市场（社会的市场迄今为止都没有受到重视）——用有道德的实利主义（追求最多人的最大幸福）和可以唤起人们集体责任意识和团结意识的社群主义——制止呢？启蒙的意识是否能进而发展为“出自本能的”道德，也就是人人都从心里愿意做“真、善、美”的事情呢？

在所有思想、生活、活动领域，尤其是在生态方面（在人-科技-自然的关系里）出现的失衡是否能通过某种“平衡的哲学”得到解决呢？

美的民主化是否能植根于深刻的“人类审美教育”呢？文明最后会不会在审美的麻木里终结呢？

东德失败了，因为它并没有践行它所宣传的社会主义。西德也有可能失败，如果资本主义无所顾忌地疯狂发展的话。也许以“有道德的实用功利主义”为导向的“第三条道路”才能带领我们走出迷雾。“荆棘之路通向星空”（Per aspera ad astra）[17]：通向星空的道路总是坎坷不平的。在过去五十年的西德慢慢形成的辩证的政治文化或可在困难的前进中给我们以力量。而东德克服了四十年的困苦——以和平的形式演变是了不起的举措——这个经历或许也可增强人们的认识：文明的韧性和顽强是多么必要。如果没有了它们，德国的存在无法得到保证。

忙忙碌碌，永不倒下，

我们前进得缓慢，但步步结实。

为了永恒的华厦，

一砖一瓦地建筑，

但时间的伟大，

每分、每日、每年给予我们力量。

（弗里德里希·席勒）

---

[1] 有控告指出，1955～1962年，拜仁州内政部部长盖瑟霍林格和州政府总理鲍姆加特纳及其他政府要员曾经收受贿赂，将赌场的营业许可证颁发给私人。1959年拜仁州州立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但仅判了鲍姆加特纳2年、盖瑟霍林格15个月有期徒刑。对此《南德意志报》于1959年8月的一份报纸登出文章，标题为《赌场审判，好严酷的惩罚》。

[2] 1962年的《明镜》事件是西德的一次政治事件。《明镜》周刊的记者因为一篇批判性的文章被以叛国罪的名义面临法律惩罚。这是西德成立以来第一次公众自发站出来强烈抗议，因为他们认为此举是滥用权力，让一份杂志沉默不语。根据2012年的维基解密，该事件的起因原是德国联邦情报局试图操纵杂志所致。而到2012年为止，《明镜》周刊的工作人员在事件后五十年，依然不得调阅当时的有关文件。

[3] 1987年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发生的一起丑闻。时任该州政府总理、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乌维·巴舍尔利用手中权力压迫对手——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对对手进行私人攻击。在竞选小册子里，攻击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恩霍姆为“乡下来的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捏造事实说“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人将使性侵儿童成为合法的”。因此，作者讽刺说“能满足某些人的性偷窥癖”。

[4] 霍耶斯韦达（德语：Hoyerswerda；索布语：Wojerecy）是德国萨克森州的直辖市，位于该州北部的索布人居住区，科特布斯以南约35千米，德累斯顿东北约54千米。

[5] 库特·比登科夫（Kurt Biedenkopf，1930年～），法学家、政治家。和赫尔穆特·科尔同属基督教民主联盟。1973～1977年任基督教民主联盟总秘书长。争夺党魁时败给科尔。

[6] 德国政党各自具有其代表颜色，这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党派倾向原因。基民盟/基社盟的代表色是黑色，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红色，绿党是绿色，自由民主党是黄色，德国统一社会党是粉红。德国的政党分化组合，联合组成政府的

时候往往根据他们的代表色的组合称谓他们，比如红绿联盟（如施罗德政府）、红黑联盟（因红黑两党为德国最大的两党，红黑联盟也被称作“大联盟”）。

[7] “臂肘政策”，形象比喻为了成功不计损害他人利益，仿佛人不断以臂肘拱开其他人。

[8] 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1943年～）德国左翼政治家。1995～1999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99年3月他因不同意施罗德走第三条道路的右倾倾向，辞去了党主席和财长职务，由施罗德接任。2005年5月正式退出社民党，6月他带领追随者成立劳动社会公平党组织，2007年与原东德地区左翼组织联合，成立了德国左派党。2005～2009年10月9日任德国联邦议会左派党团主席。2009年10月9日辞去议会左派党团主席职务。

[9] 约施卡·马丁·费舍尔（Joschka Martin Fischer，1948年～），生于巴登-符腾堡的格拉布隆，1998～2005年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联邦德国副总理一职，1999年1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任欧盟议会主席。他曾经是德国绿党（B’90/Grüne）内的一名重要人物，200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之后退出政治舞台。

[10] 玛丽安·杜霍夫女伯爵（Marion Gräfin Dönhoff），1909年出生于位于东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施坦因城堡。《时代》报的主编和出版人之一，是德国战后时期颇负盛名的媒体人。曾获德国图书和平奖。2003年，德国以其名成立了玛丽安·杜霍夫奖，用以表彰促进国际理解的人。

[11]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年）是一位重要的德语诗人，除了创作德语诗歌外还撰写小说、剧本以及一些杂文和法语诗歌，其书信集也是里尔克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对19世纪末的诗歌体裁和风格以及欧洲颓废派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12] 还原论或还原主义（Reductionism，又译化约论），是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复杂的系统、事务、现象可以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

[13] 流行于德国的俗语“周五一时，各干各事”说的是基本从周五中午开始已无人工作。似可印证这一点。

[14] 因为此处谈及资本主义，所以作者借用“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出现”来类比。

[15] W问题是指谁、什么、何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谁、为什么。在德语中这些词都以W开头。

[16] 此处的单子概念出自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的著作《单子论》。“单子”起源于古希腊语。莱布尼茨定义单子（Monad）是一切事物最根本的元素，所谓不可再分，因而单子不具备一般物理粒子在时间、空间上的延展性，是一种抽象存在。

[17] 原文为拉丁语。语出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卡。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废墟时代

1 Daniel Jonah Goldhagen：Hitlers bereitwillige Vollstrecker. Ganz gewöhnliche Deutsche und der Holocaust Berlin 1996.

2 Richard Matthias Müller：Über Deutschland. Olten und Freiburg i. Br. 1965，S. 10.

3 Robert Musil：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Hamburg 1992，S. 16 f.

4 Hermann Glaser （Hg.）：Was bleibt - was wird. Der kulturelle Umbruch in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Bonn 1994.

5 Ders.：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5. Ders.：Kultur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3 Bde. München，Wien 1985-1989.

6 Nürnberger Nachrichten，8. 5. 1946.

7 Die Wehrmachtsberichte 1939-1945. Bd. 3：1. Januar 1944 bis 9. Mai 1945. München 1985，S. 569.

8 Max Domarus （Hg.）：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Bd. II：Untergang （1939-1945）. Würzburg 1963，S. 2188.

9 Erich Kästner：Notabene 45. Ein Tagebuch. Gesammelte Schriften

für Erwachsene. Bd. 6. München，Zürich o. J.，S. 83.

10 Sir Arthur T. Harris：Despatch on War Operations. 23rd February，1942 to 8th May，1945. London 1995.

11 Rolf-Dieter Müller/Gerd R. Ueberschär：Kriegsende 1945. Die Zerstör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1994，S. 41.

12 Ursula von Kardorff：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 bis 1945. München 1994，S. 293 f.

13 Martin Broszat/Hans-Adolf Jacobsen/Helmut Krausnick：Anatomie des SS-Staates. Bd. II：Konzentrationslager，Kommissarbefehl，Judenverfolgung. Olten und Freiburg i. Br. 1965，S. 159 f.

14 Walther Hofer （Hg.）：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2，S. 254. F. Wüllner：Die NS-Militärjustiz. Baden-Baden 1991.

15 Hartmut von Hentig：Aufgeräumte Erfahrung. Texte zur eigenen Person. München，Wien 1983，S. 250.

16 Rolf-Dieter Müller/Gerd R. Ueberschär：Kriegsende 1945；a. a. O.，S. 112.

17 Thomas Schuler：Wenn Menschen zum Vieh werden. Süddeutsche Zeitung，29. 1. 1994.

18 Rolf-Dieter Müller/Gerd R. Ueberschär：Kriegsende 1945；a. a. O.，S. 116 f.

19 Ebd.，S. 44 f.

20 Hans-Ulrich Thamer： Verführung und Gewalt. Deutschland 1933-1945. Berlin 1986， S. 756.

21 Manfred Zeidler： Kriegsende im Osten. Die Rote Armee und di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östlich von Oder und Neiße 1944/45. München 1996.

22 Margaret Bourke-White： Deutschland. April 1945. München 1979， S. 51.

23 Ernst Niekisch： Das Reich der niederen Dämonen. Hamburg 1953.

24 Joachim C. Fest： Hitler.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Wien 1973， S. 1016.

25 Rolf-Dieter Müller/Gerd R. Ueberschär： Kriegsende 1945； a. a. O.， S. 105.

26 Elefanten Press （Hg.）： Trümmer. Träume. Truman. Die Welt 1945-49. Berlin 1985， S. 21.

27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Hg.）： Die Entsteh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Nr. 224/1989， S. 2.

28 Erich Kästner： Notabene 45； a. a. O.， S. 83.

29 Die Neue Zeitung， 10. 12. 1945.

30 Arnulf Baring：8. Mai 1945 In： Merkur， Heft 5/1975， S. 449.

31 Thomas Mann： Deutsche Hörer！ Fünfundfünfzig Radiosendungen

nach Deutschland. Werke. Das essayistische Werk. Taschenbuchausgabe in 8 Bdn. Hg. von Hans Bürgin. Bd. 3：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Frankfurt am Main，Hamburg 1968，S. 290.

32 Günter Eich：Inventur. Gesammelte Werke. Bd. 1. Frankfurt am Main 1973，S. 35.

33 Joachim Kaiser：Wieviel gelogen wird. Auch eine Erinnerung an die Stunde Null. Süddeutsche Zeitung，28./29. 4. 1979.

34 Friedrich Meinecke：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 Wiesbaden 1946，S. 7 f.，174 ff.

35 Wolfgang Langhoff：Ein Deutschland-Brief. Die Neue Zeitung，18. 2. 1946.

36 Friedrich Wolf：Auch wir können nicht schweigen. Aufbau，Heft 3/1945，S. 204.

37 Johannes Hohlfeld （Hg.）：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und Geschichte von 1848 bis zur Gegenwart. Bd. VI：Deutschland nach dem Zusammenbruch 1945. Berlin，München o. J.，S. 2 ff.

38 Friedrich Dieckmann：Deutschland in der Stunde Null. Merkur，Heft 5/1995，S. 456 ff.

39 Johannes Hohlfeld （Hg.）：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und Geschichte von 1848 bis zur Gegenwart. Bd. VI.；a. a. O.，S. 29.

40 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Hg.）：Europa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1945-1982. Das Zwanzigste Jahrhundert II.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13

41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Europa in Trümmern. Augenzeugenberichte aus den Jahren 1944-1948. Frankfurt am Main 1995.

42 Helga Grebing：Demokratie ohne Demokraten？Politisches Denken，Einstellungen und Mentalitäten in der Nachkriegszeit. Erlanger Forschungen. Bd. 50：Wie neu war der Neubeginn？Hg. von Everhard Holtmann. Erlangen 1989，S. 15.

43 Eugen Kogon：Der SS-Staat. Das System der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Frankfurt am Main 1946，S. 404 f.

44 Jörg Wollenberg：»Stunde Null« oder Kontinuität？Eine szenische Dokumentation zum 40. Jahrestag des 8. Mai 1945. 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 Mai 1985.

45 Jürgen Kocka：Zerstörung und Befreiung. Das Jahr 1945 als Wendepunkt deutscher Geschichte. Politik und Kultur，Heft 5/1986，S. 47.

46 Heinrich Böll：Brief an meine Söhne oder：Vier Fahrräder. Die Zeit，15. 3. 1985.

47 Martin Broszat/Klaus-Dietmar Henke/Hans Woller （Hg.）：Von Stalingrad zur Währungsreform. Zur Sozialgeschichte des Umbruchs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89. Ferner Hans-Erich Volkmann （Hg.）：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Eine perspektivische Rückschau. München 1995.

48 Norbert Seitz：Die kalte Revision. Zur Aktualität der 8.-Mai-Rede Weizsäckers.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Nr. 5/1995，S. 389

ff. Ferner Peter Bender：Ganz und gar am Ende.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der deutschen Niederlage 1945. Merkur，Heft 5/1995，S. 451 f.

49 Richard von Weizsäcker：Zum 40. Jahrestag der Beendigung des Krieges in Europa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waltherrschaft. Bonn 1985，S. 1 ff.

50 Wolfgang Benz：Potsdam 1945. Besatzungsherrschaft und Neuaufbau im Vier-Zonen-Deutschland. München 1986.

51 Ludolf Herbst （Hg.）：Westdeutschland 1945-1955. Unterwerfung，Kontrolle，Integration.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Sondernummer） München 1984.

52 Christoph Frei：Hans J. Morgenthau. Eine intellektuelle Biographie. Stuttgart，Wien 1994. Bernd Greiner：Die Morgenthau-Legende. Zur Geschichte eines umstrittenen Plans. Hamburg 1995.

53 Matthias Etzel：Die Aufhebung vo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setzen durch den Alliierten Kontrollrat （1945-1948）. Tübingen 1992.

54 Peter Intelmann：Zur Biographie von Franz L. Neumann. 1999 - Zeitschrift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Heft 1/1990.

55 Alfons Söllner （Hg.）：Zur Archäologie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Bd. 1：Analysen von politischen Emigranten im amerikanischen Geheimdienst 194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6，S. 7 f.

56 Wolfgang Malanowski：1945：Absturz ins Bodenlose. Der Spiegel，Nr. 16/1985，S. 195.

57 Bayerischer Tag，11. 8. 1945.

58 Heute，Nr. 31/1. 3. 1947.

59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 Bd. 1. Theodor Eschenburg：Jahre der Besatzung 1945-1949. Stuttgart，Wiesbaden 1983，S. 337.

60 Stefan Heym：Nachruf. München 1988，S. 373.

61 Der Ruf，15. 2. 1947.

62 Der Ruf，15. 8./1. 9./1. 10. 1946.

63 Ursula von Kardorff：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 bis 1945. München 1994，S. 317.

64 Stadt Köln （Hg.）：»... vergessen kann man die Zeit nicht，das ist nicht möglich ...« Kölner erinnern sich an die Jahre 1929-1945. Köln 1985，S. 303

65 Klaus-Dietmar Henke：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München 1995，S. 32.

66 Die Neue Zeitung，18. 11. 1946.

67 Antje Dertinger：Die süße Waffe des US-Imperialismus. Im November 1945 wurde in New York »Care« gegründet. Frankfurter Rundschau，16. 12. 1995.

68 Oliver Hassencamp：Der Sieg nach dem Krieg. Die gute schlechte Zeit. München，Berlin o. J.

69 Anselm Doering-Manteuffel：Westernization. Forschungen zur politisch-ideellen Entwicklung der westdeutschen Gesellschaft in den 50er und 60er Jahren.（Konzeptpapier，ungedruckt，Tübingen 1991）

70 John H. Backer：Die deutschen Jahre des Generals Clay. Der Weg zur Bundesrepublik 1945-1949. München 1983. Wolfgang Krieger：General Lucius D. Clay und die amerikan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1945-1949.（Forschungen und Quellen zur Zeitgeschichte，Bd. 10） Stuttgart 1987.

71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446.

72 Norman M. Naimark：Die Russen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97. Volker Koop：Zwischen Recht und Willkür. Die Rote Armee in Deutschland. Bonn 1996.

73 Hans Rauschning （Hg.）：Das Jahr ’45. Dichtung，Bericht，Protokoll deutscher Autoren. München 1985，S. 113.

74 Thomas Mann：Tagebücher 1944-1. 4. 1946. Hg. von Inge Jens. Frankfurt am Main 1986，S. 210.

75 Sibylle Meyer/Eva Schulze：Von Liebe sprach damals keiner. Familienalltag in der Nachkriegszeit. München 1985，S. 26 f.

76 Wolfgang Leonhard：Die Revolution entläßt ihre Kinder. Frankfurt am Main，Berlin 1961，S. 285 f.

77 Erich Kuby：Die Russen in Berlin 1945. München，Bern，Wien 1965，S. 314 f.，297 f.，299.

78 Helke Sander/Barbara Johr （Hg.）：BeFreier und Befreite. Krieg，Vergewaltigungen，Kinder. Frankfurt am Main 1995，S. 54 ff.

79 Hartwig Bögeholz：Die Deutschen nach dem Krieg. Eine Chronik. Reinbek bei Hamburg 1995，S. 15，Ferner Peter Erler/Horst Laude/Manfred Wilke （Hg.）：»Nach Hitler kommen wir.« Dokumente zur Programmatik der Moskauer KPD-Führung 1944/45 für Nachkriegsdeutschland. Berlin 1994.

80 Johannes Hohlfeld （Hg.）：Dokument der Deutschen. Politik und Geschichte von 1848 bis zur Gegenwart. Bd. VI：Deutschland nach dem Zusammenbruch 1945. Berlin，München o. J.，S. 13.

81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207.

82 Johannes Hohlfeld （Hg.）：Dokumente der Deutschen；a. a. O.，S. 24 ff.

83 Jürgen Danyel （Hg.）：Die geteilte Vergangenheit. Zum Umgang mit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Widerstand i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Berlin 1995. Hans Fenske：Kein radikaler Elitenwechsel. Die französische Entnazifizierungspoliti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 6. 1993. Rainer Möhler：Entnazifizierung in Rheinland-Pfalz und im Saarland unter französischer Besatzung von 1945 bis 1952.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Landtages für die Geschichte von Rheinland-Pfalz，Bd. 17. Mainz 1992.

84 Adalbert Rückerl：Die Strafverfolgung von NS-Verbrechen 1945-1978. Heidelberg，Karlsruhe 1979，S. 25 ff.

85 Bayerischer Tag，29. 9. 1945.

86 Volker Dotterweich：Die Entnazifizierung. Josef Becker/Theo Stammen/Peter Waldmann （Hg.）：Vor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wischen Kapitulation und Grundgesetz. München 1979，S. 144.

87 Ernst von Salomon：Der Fragebog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88，S. 6 f.

88 Ursula von Kardorff：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 bis 1945；a. a. O.，S. 339.

89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114.

90 Lutz Niethammer：Die Mitläuferfabrik. Die Entnazifizierung am Beispiel Bayern. Berlin，Bonn 1982.

91 Peter Kritzer：Wilhelm Hoegner. Politische Biographie eines bayerischen Sozialdemokraten. München 1979，S. 245.

92 Telford Taylor：Die Nürnberger Prozesse. Zürich 1950. Martin Hirsch/Norman Paech/Gerhard Stuby （Hg.）：Politik als Verbrechen. 40 Jahre Nürnberger Prozesse. Hamburg 1986. Jörg Friedrich/Jörg Wollenberg （Hg.）：Licht in den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 Zur Enttabuisierung der Nürnberger Kriegsverbrecherprozesse. Frankfurt am Main 1987.

93 Ansgar Diller：Abrechnung und Sühne. Nürnberg und die Entnazifizierung. Jürgen Weber：Auf dem Wege zur Republik 1945-1947. München 1985，S. 47，63 f.

94 Die Neue Zeitung，23. 11. 1945.

95 Erik Reger：Kleine Schriften. Bd. 2. Hg. von Erhard Schütz. Berlin 1993，S. 117.

96 Adalbert Rückerl：Die Strafverfolgung von NS-Verbrechen 1945-1978. Heidelberg，Karlsruhe 1979，S. 25 ff.

97 Uwe Wesel：Den Mächtigen den Krieg vergällen. ZEIT-Dokument，Nr. 1/1995，S. 42. Gerd Hankel/Gerhard Stuby （Hg.）：Strafgerichte gegen Menschheitsverbrechen - Zum Völkerstrafrecht 50 Jahre nach den Nürnberger Prozessen. Hamburg 1995.

98 Tausend Jahre Schuld. Der Spiegel，Nr. 50/1995，S. 63.

99 Willy Brandt：Erinner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145.

100 Christopher Simpson：Die internationalen Wirtschaftseliten und das Wiedererstarken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 1945-1948. 1999 - Zeitschrift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Heft 2/1990，S. 17，24 f.

101 Robert Wistrich：Wer war wer im Dritten Reich. Ein biographisches Lexikon. Frankfurt am Main 1987，S. 11 f.

102 Tom Bower：Verschwörung Paperclip. NS-Wissenschaftler im Dienst der Siegermächte. München 1988.

103 Rena Giefer/Thomas Giefer：Die Rattenlinie. Fluchtwege der Nazis. Weinheim 1995.

104 Max Frisch：Frühe Stücke. Santa Cruz. Nun singen sie wieder. Frankfurt am Main 1966，S. 135 f.

105 Sigrid Undset：Die Umerziehung der Deutschen. Die Neue Zeitung，25. 10. 1945.

106 Karl Jaspers：Antwort an Sigrid Undset. Die Neue Zeitung，4. 11. 1945.

107 Die Neue Zeitung，25. 3. 1948.

108 J. F. G. Grosser：Die große Kontroverse. Ein Briefwechsel um Deutschland. Hamburg，Genf，Paris 1963，S. 19.

109 Ebd.，S. 24 f.

110 Thomas Mann：Warum ich nicht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gehe. Werke. Das essayistische Werk；a. a. O.，S. 180.

111 Hermann Hesse：Brief nach Deutschland. Die Neue Zeitung，2. 8. 1946.

112 Joachim Vahland：Warum Richard Hönigswald in der deutschen Nachkriegsphilosophie nicht vorkommt. Merkur，Heft 12/1995，S. 1147 ff.

113 Hannah Arendt：Besuch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93，S. 27.

114 Eugen Kogon：Das Recht auf den politischen Irrtum. Frankfurter Hefte，Heft 7/1947，S. 655. Der Monat，Nr. 8/9/1949，S. 58 ff.

115 Michael Zimmermann：Der antifaschistische Mythos der DDR. Kulturamt Prenzlauer Berg/Aktives Museum Faschismus und Widerstand in Berlin e. V. （Hg.）：Mythos Antifaschismus. Ein Traditionskabinett wird kommentiert. Berlin 1992，S. 137.

116 Ruth-Kristin Rößler （Hg.）：Entnazifizierungspolitik der KPD/SED 1945-1948.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Goldbach 1994.

117 Ilse Spittmann/Gisela Helwig （Hg.）：DDR-Lesebuch. Von der SBZ zur DDR 1945-1949. Köln 1989，S. 144 f.

118 Ernst Lemmer：Demokratischer Block. Aufbau，Heft 2/1946，S. 121.

119 Wolfgang Leonhard：Die Revolution entläßt ihre Kinder；a. a. O.，S. 314.

120 Brigitte Kaff （Hg.）：Gefährliche politische Gegner.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n der sowjetischen Zone/DDR. Düsseldorf 1995.

121 Manfred Henningsen：Der Buchenwald-Komplex. Merkur，Heft 1/1996，S. 83.

122 Lutz Niethammer （Hg.）：Der »gesäuberte« Antifaschismus. Die SED und die roten Kapos von Buchenwald. Berlin 1994. Siegfried Stadler：Legende der Selbstbefreiun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5. 4. 1995. Manfred Overesch：Buchenwald und die DDR oder Die Suche nach der Selbstlegitimation. Göttingen 1995.

123 Friedrich-Christian Schroeder：Zur weiteren Festigung unserer Macht. Dokumente zur Entnazifizierung in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szon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2. 4. 1995.

124 Freunde der kleinen Nazis. Der Spiegel，Nr. 12/1992，S. 101.

125 Klaus Wiegrefe：Sicherheit für Verbrecher. Die DDR als

angeblicher Hort des »Antifaschismu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2. 6. 1995.

126 Marie Luise Kaschnitz：Große Wanderschaft （Auszug）. Überallnie. Düsseldorf 1965.

127 Hans Werner Richter：Unterhaltungen am Schienenstrang. Der Ruf，1. 10. 1946，S. 6 ff. Ferner Klaus R. Scherpe：Erzwungener Alltag. Wahrgenommene und gedachte Wirklichkeit in der Reportageliteratur der Nachkriegszeit. Jost Hermand/Helmut Peitsch/Klaus R. Scherpe （Hg.）：Nachkriegsliteratur in Westdeutschland 1945-49. Schreibweisen，Gattungen，Institutionen. Literatur im historischen Prozeß. Neue Folge 3. Argument-Sonderband. Berlin 1982.

128 Jürgen Weber：Auf dem Wege zur Republik 1945-1947. München 1985，S. 189.

129 Angelika Königseder/Juliane Wetzel：Lebensmut im Wartesaal. Die jüdischen DPs im Nachkriegs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4.

130 Juliane Wetzel：»Mir szeinen doh«. München und Umgebung als Zuflucht von Überlebenden des Holocaust 1945-1948. Martin Broszat/Klaus-Dietmar Henke/Hans Woller （Hg.）：Von Stalingrad zur Währungsreform. Zur Sozialgeschichte des Umbruchs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89，S. 329.

131 Claus Larass：Der Zug der Kinder. KLV - Die Evakuierung von 5 Millionen deutscher Kinder im 2. Weltkrieg. München 1983.

132 Richard Thilenius：Die Teilung Deutschlands. Eine zeitgeschichtliche Analyse. Reinbek bei Hamburg 1957，S. 72.

133 Johannes Hohlfeld （Hg.）：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und Geschichte von 1848 bis zur Gegenwart. Bd. VI：Deutschland nach dem Zusammenbruch 1945. Berlin，München o. J.，S. 58 f.

134 Rolf Grix/Wilhelm Knöll （Hg.）：Die Rede zum 8. Mai 1945. Oldenburg 1987，S. 138. Heinz Nawralit：Die deutschen Nachkriegsverluste unter Vertriebenen，Gefangenen und Verschleppten. München，Berlin 1986. Ferner Wolfgang Benz （Hg.）：Die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aus dem Osten. Ursachen，Ereignisse，Fol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5. Louis Ferdinand Helbig：Der ungeheure Verlust. Flucht und Vertreibung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Belletristik der Nachkriegszeit. Wiesbaden 1988. Ekkehard Kuhn：Nicht Rache，nicht Vergeltung. Die deutschen Vertriebenen. München，Wien o. J. Albrecht Lehmann：Im Fremden ungewollt zuhaus. Flüchtlinge und Vertriebene in Westdeutschland 1945-1990. München 1991. Rainer Schulze/Doris von der Brelie-Lewien/Helga Grebing：Flüchtlinge und Vertriebene in der westdeutschen Nachkriegsgeschichte. Hildesheim 1987.

135 Dieter Franck：Jahre unseres Lebens 1945-1949. München，Zürich 1980，S. 50.

136 Johann Georg Reißmüller：Das Massaker von Aussi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7. 7. 1993. Heinz Nawralit：Vertreibungsverbrechen an Deutschen. München 1982.

137 Dieter Franck：Jahre unseres Lebens 1945-1949；a. a. O.，S. 52.

138 Susan Boenke/Konrad von Zwehl （Hg.）：»Angesichts des Trümmerfeldes«. München 1983，S. 165 f.

139 Peter Bender：Über die Notwendigkeit der Niederlage. Merkur，Heft 5/1995，S. 453 f.

140 Brief Jürgen Kuczynskis an Anna Seghers，Ende August 1945（unveröffentlicht）.

141 Heute，Heft 2/1945，S. 39 ff.

142 Stadtarchiv Dortmund （Hg.）：Dortmund im Wiederaufbau 1945-1960. Eine Dokumentation. Dortmund 1985，S. 53.

143 Rainer Gries：Die Rationen-Gesellschaft. Versorgungskampf und Vergleichsmentalität：Leipzig，München und Köln nach dem Kriege. Münster 1991.

144 Walter Kempowski：Uns geht’s ja noch gold. Roman einer Familie. Hamburg 1978，S. 108.

145 Hans Erich Nossack：Dieser andere. （Brief an Hermann Kasack，30. 11. 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76.

146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 Bd. 1. Theodor Eschenburg；a. a. O.，S. 267.

147 Ebd.，S. 64.

148 Georg Hensel：Glück gehabt. Szenen aus einem Leben. Frankfurt am Main，Leipzig 1994，S. 116.

149 Die Neue Zeitung，7. 5. 1946.

150 Christoph Kleßmann：Die doppelte Staatsgründung. Deutsche Geschichte 1945-1955. Bonn 1982，S. 46 f.

151 Willy Brandt：Erinnerungen；a. a. O.，S. 142.

152 Gerhard Rabeler：Wiederaufbau und Expansion westdeutscher Städte 1945-1960 im Spannungssfeld von Reformideen und Wirklichkeit Schriftenreihe des Deutschen Nationalkomitees für Denkmalschutz，Bd. 39. Bonn o. J.，S. 10.

153 Dieter Franck：Jahre unseres Lebens 1945-1949；a. a. O.，S. 27 f.

154 Berliner Tagesspiegel，27. 9. 1945.

155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73.

156 Jürgen John. Die Ära Paul in Thüringen （1945-1947）. Köln 1996.

157 Stefan Schnell：Der deutsche Städtetag. Bonn 1970，S. 17. Ferner Otto Ziebil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Städtetages. Stuttgart 1955.

158 Die Neue Zeitung，28. 10. 1945.

159 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g.）：Nach-Denken. Über Kurt Schumacher und seine Politik. Berlin 1996.

160 Christoph Kleßmann：Die doppelte Staatsgründung；a. a. O.，S. 143.

161 Franz Josef Strauß：Die Erinnerungen. Berlin 1989，S. 70. Ferner

A. R. L. Gurland：Die CDU/CSU. Ursprünge und Entwicklung bis 1953. Frankfurt am Main 1980.

162 Walter Roller：Geduldet oder gefördert？Die Entwicklung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Jürgen Weber：Auf dem Wege zur Republik 1945-1947. München 1985，S. 162.

163 Helga Grebing：Die Parteien. Wolfgang Benz （Hg.）：D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1：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81.

164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207.

165 Walter Roller：Geduldet oder gefördert？a. a. O.，S. 153 f.

166 Beatrix Bouvier：Ausgeschaltet！Sozialdemokraten in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szone und in der DDR 1945-1953. Bonn 1996. Harold Hurwitz u. a.：Die Stalinisierung der SED. Wiesbaden 1997. Andreas Malycha：Partei von Stalins Gnaden？Die Entwicklung der SED zur Partei neuen Typus in den Jahren 1946 bis 1950. Berlin 1996. Ders.：Auf dem Weg zur SED. Die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Bildung einer Einheitspartei in den Ländern der SBZ. Beihefte zum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Bd. 17. Bonn 1995. Norbert Podewin/Manfred Teresiak：»Brüder，in eins nun die Hände ...« Das Für und Wider um die Einheitspartei in Berlin. Berlin 1996.

167 Rolf Badstübner/Wilfried Loth （Hg.）：Wilhelm Pieck. Aufzeichnungen zur Deutschland-Politik 1945-1953. Berlin 1994.

168 Gloria Müller：Mitbestimmung in der Nachkriegszeit. Britische Besatzungsmacht - Unternehmer - Gewerkschaften. （Düsseldorfer Schriften

zur Neueren Landesgeschichte und zur Geschichte Nordrhein-Westfalens，Bd. 21） Düsseldorf 1987.

169 Jörg Wollenberg：8. Mai 1945. Fachbereich Erwachsenenbildung der Universität Bremen. Bremen 1985，S. 101.

170 Christoph Kleßmann：Die doppelte Staatsgründung；a. a. O.，S. 128.

171 Dieter Grosser/Thomas Lange/Andreas Müller-Armack/Beate Neuß：Soziale Marktwirtschaft. Geschichte - Konzept - Leistung. Stuttgart 1990. A. J. Nicholls：Freedom with responsibility.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in Germany. Oxford 1994.

172 Wolfgang Preß：Geniale Leerformel. Von den Ideen des Erfinders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Die Zeit，28. 6. 1991.

173 Werner Plumpe：Vom Plan zum Markt. Wirtschaftsverwaltung und Unternehmerverbände in der britischen Zone. Düsseldorf 1987.

174 Jörg Fisch：Reparationen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1992.

175 Othmar Nikola Haberl/Lutz Niethammer：Der Marshall-Plan und die europäische Linke. Frankfurt am Main 1986. Hans-Jürgen Schröder：Marshallplan，amerikan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und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1947-1950.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2. 5. 1987. Gerd Hardach：Der Marshallplan. Auslandshilfe und Wiederaufbau in Westdeutschland 1948-1952. München 1994.

176 Ulrich Herbert：Ungerechte Lastenverteilung. Die Zeit，8. 1. 1993.

177 John Gimbel：Die Bedeutung der Besatzungszeit 1945-1949.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5. 5. 1965，S. 48.

178 Kurt Koszyk：»Umerziehung« der Deutschen aus britischer Sicht.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22. 7. 1978，S. 5.

179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im Vergleich. Stuttgart 1983，S. 163.

180 Manfred Heinemann（Hg.）：Umerziehung und Wiederaufbau. Die Bildungspolitik der Besatzungsmächte in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Stuttgart 1981. Karl-Heinz Füssl：Die Umerziehung der Deutschen. Jugend und Schule unter den Siegermächten des Zweiten Weltkriegs 1945-1955. Paderborn 1995.

181 Herman Nohl：Die geistige Lage im gegenwärtigen Deutschland. Die Sammlung，November 1947

182 Siegfried Unseld：Begegnungen mit Hermann Hesse. Frankfurt am Main 1975，S. 37.

183 Ludwig Kerstiens：Die höhere Schule in den Reformplänen der Nachkriegszeit. Zeitschrift für Pädagogik，Heft 6/1965，S. 538 ff.

184 Ulrich Chaussy：Jugend.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3：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40. Karl Dietrich Erdmann：Überblick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Schule in Deutschland 1945-1949. Neue Sammlung，Heft 3/1976，S. 215 ff.

185 Die Sammlung，Heft 4/1946，S. 197 ff.

186 Dietrich Goldschmidt：Hochschulpolitik. Wolfgang Benz （Hg.）：D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1：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362.

187 Ludwig von Friedeburg：Die Universität nach 1945. Eberhard Holtmann （Hg.）：Wie neu war der Neubeginn？Zum deutschen Kontinuitätsproblem nach 1945. Erlangen 1989，S. 71.

188 Wilfried Barner/Christoph König （Hg.）：Zeitenwechsel. Germanisti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vor und nach 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6.

189 Christoph Kleßmann：Die doppelte Staatsgründung；a. a. O.，S. 97 f.

190 Die Neue Zeitung，4. 11. 1945.

191 Nürnberger Nachrichten. Trümmerzeit 1945-1950. Sonderausgabe 1985.

192 Alfred Wendehorst：Geschichte der 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 1743-1993. München 1993，S. 224.

193 Josef Foschepoth：Im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 Die Anfänge der Gesellschaften für christlich-jüdische Zusammenarbeit. Göttingen 1993.

194 Hochland，Heft 8/1947，8. 576 ff. Ferner Hermann Boventer （Hg.）：Evangelische und Katholische Akademien. Gründerzeit und Auftrag heute. Paderborn 1983.

195 Jörg Wollenberg：Schule der Demokraten. Hermann Glaser/Lutz von Pufendorf/Michael Schöneich （Hg.）：So viel Anfang war nie. Deutsche Städte 1945-1949. Berlin 1989，S. 303 f.

196 Alexander Abusch：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Aufbau，Heft 1/1947，S. 8.

197 Siegfried Baske/Martha Engelbert （Hg.）：Zwei Jahrzehnte Bildungspolitik in der Sowjetzone Deutschlands. Dokumente. 1. Teil：1945-1958. Berlin 1966，S. 25.

198 Ebd.，S. 91.

199 Thomas Ammer：Die Arbeiter- und Bauern-Fakultäten. Ilse Spittmann/Gisela Helwig （Hg.）：DDR-Lesebuch；a. a. O.，S. 200.

200 Ingeborg Bachmann：An die Sonne. Merkur，Heft 6/1956，S. 534.

201 Josef Müller-Marein：Es war eine Kleiderfrage. Die Zeit，9. 5. 1975.

202 Joachim Fest：Erziehung zur Skepsis. Gedanken aus Anlaß einer Selbstvorstellung. Neue Sammlung，Heft 4/1983，S. 335.

203 Helmut Schelsky：Die skeptische Generation. Eine Soziologie der deutschen Jugend （1958）. Düsseldorf，Köln 1963，S. 74 ff.

204 Martin Greiffenhagen：Die Flakhelfer werden sechzig. Anmerkungen zum Jahrgang 1928. Stuttgarter Zeitung，22. 10. 1988.

205 Wolfgang Borchert：Draußen vor der Tür und ausgewählte Erzählungen. Hamburg 1956，S. 8，23.

206 Erich Kästner：Gesammelte Schriften für Erwachsene. Bd. 7：Vermischte Beiträge II. Zürich 1969，S. 101.

207 Martin Broszat/Klaus-Dietmar Henke/Hans Woller （Hg.）：Von Stalingrad zur Währungsreform. Zur Sozialgeschichte des Umbruchs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89，S. 683 ff.

208 Helmut Gollwitzer：»... und führen，wohin du nicht willst.« Bericht einer Gefangenschaft. Frankfurt am Main，Hamburg 1954.

209 Rüdiger Overmans：Ein untergeordneter Eintrag im Leidensbuch der jüngeren Geschichte？Die Rheinwiesenlager 1945. Hans-Erich Volkmann：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Eine perspektivische Rückschau. München，Zürich 1995. 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g.）：Kriegsgefangene. 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in Deutschland. 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der Sowjetunion. Düsseldorf 1995. James Bacque：Der geplante Tod. 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amerikani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Lagern 1945 bis 1946. Berlin 1989. Arthur L. Smith：Heimkehr aus dem Zweiten Weltkrieg. Die Entlassung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1） Stuttgart 1985.

210 Der Ruf. Zeitung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in den USA. Faksimile-Ausgabe. München o. J.

211 Christian Ferber：H. W. Richter war gegen Kollektivschuld. Die Welt，28. 3. 1987.

212 Hartmut Mehringer：Waldemar von Knoeringen.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München，London，New York，Paris 1989，S. 249，251.

213 Hannes Heer （Hg.）：Als ich 9 Jahre alt war，kam der Krieg. Ein Lesebuch gegen den Krieg. Reinbek bei Hamburg 1983. Rosemarie Winter：[Schüleraufsätze in Nordrhein-Westfalen 1948] Die Sammlung，Heft 10/1949，S. 639.

214 Archiv Hermann Glaser，Roßtal.

215 Ulrich Chaussy：Jugend.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3：Gesellschaft；a. a. O.，Frankfurt am Main 1983，S. 37.

216 Jugend zwischen gestern und morgen. Verwahrlosung und Kriminalität der Jugendlichen - Gefahr oder Zeiterscheinung. Die Neue Zeitung，8. 2. 1948.

217 Junge Menschen über ihre Not. Briefe an »Die Neue Zeitung« erörtern ein Generationsproblem. （Brief von Heinz Piontek） Die Neue Zeitung，1. 4. 1946.

218 Walter Rosenwald/Bernd Theis：Enttäuschung und Zuversicht. Zur Geschichte der Jugendarbeit in Hessen 1945-1950. München 1984.

219 Ulrich Mählert：Die Freie Deutsche Jugend 1945-1949. Von den antifaschistischen Jugendausschüssen zur SED. 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 1995.

220 Dieter Franck：Jahre unseres Lebens 1945-1949；a. a. O.，S. 38.

221 Ina Merkel：Leitbilder und Lebensweisen von Frauen in der DDR. Hartmut Kaelble/Jürgen Kocka/Hartmut Zwahr （Hg.）：Sozialgeschichte der DDR. Stuttgart 1994，S. 362.

222 Marianne Feuersenger：Die garantierte Gleichberechtigung - ein umstrittener Sieg für Frauen. Freiburg 1980. Ute Gerhard：Die staatlich institutionalisierte »Lösung« der Frauenfrage. Hartmut Kaelble/Jürgen Kocka/Hartmut Zwahr：Sozialgeschichte der DDR；a. a. O.，S. 383 ff. Marieluise Janssen-Jurreit：Sexismus. Über die Abtreibung der Frauenfrage. München 1976.

223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 （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S. 211.

224 Barbara Willenbacher：Zerrüttung und Bewährung der Nachkriegsfamilie. Martin Broszat/Klaus-Dietmar Henke/Hans Woller （Hg.）：Von Stalingrad zur Währungsreform；a. a. O.，S. 599.

225 Angela Vogel：Familie.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 Bd. 2：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103 ff.

226 Jost Hermand：Kultur im Wiederaufbau.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1969. München 1986，S. 79.

227 Cordelia Edvardson：Gebranntes Kind sucht das Feuer. München 1986.

228 Thomas Mann：Doktor Faustus. Das Leben des deutschen Tonsetzers Adrian Leverkühn，erzählt von einem Freunde. Frankfurt am Main 1981.

229 Georg Denzler/Volker Fabricius：Christen und Nationalsozialisten.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1993，S. 228. Ferner Martin Greschat：Im Zeichen der Schuld. 40 Jahre Stuttgarter Schuldbekenntnis. Eine Dokumentation. Neukirchen-Vluyn 1985.

230 Ebd.，S. 348.

231 Georg Denzler/Volker Fabricius：Christen und Nationalsozialisten；a. a. O.，S. 347.

232 Karl Barth：Offene Briefe 1945-1968. Zürich 1984.

233 Julius Ebbinghaus：Was ist Existentialphilosophie？Die Neue Zeitung，28. 7. 1947.

234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Österreich，Schweiz. Stuttgart 1976，S. 33.

235 Jean-Paul Sartre：Die Fliegen. Die schmutzigen Hände. Zwei Dram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61，S. 59，70 f.

236 Kurt Rossmann：Martin Heideggers Holzwege. Der Monat，Heft 21/1950，S. 236 ff.

237 Albert Camus：Der Mythos von Sisyphos. Ein Versuch über das Absurde. Hamburg 1959，S. 101.

238 Jost Hermand：Kultur im Wiederaufbau；a. a. O.，S. 103.

239 Alfred Döblin：Schicksalsreise. Bericht und Bekenntnis. Ausgewählte Werke in Einzelbänden. In Verbindung mit den Söhnen des Dichters hg. von Riley，Anthony W. Solothurn，Düsseldorf 1993.

240 F. C. Weiskopf：Denk ich an Deutschland in der Nacht ... Die Themenkreis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im Exil. Die Neue Zeitung，7. 2. 1947.

241 Hans-Albert Walter：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50. Darmstadt und Neuwied 1972 ff.

242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8.

243 Ebd.，S. 54 ff.

244 Jost Hermand：Kultur im Wiederaufbau；a. a. O.，S. 94.

245 Das vernachlässigte Exil. Hans-Albert Walter im Gespräch mit Lerke von Saalfeld. Rundfunkmanuskript/Deutschlandfunk，24. 9. 1989，S. 3.

246 Horst Möller：Exodus der Kultur. München 1984，S. 51 ff.

247.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t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S. 173.

248 Maritta Hein-Kremer：Die amerikanische Kulturoffensive.

Grün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Information Centers« in Westdeutschland und West-Berlin （1945-1955）. Beiträge zur Kulturpolitik，Bd. 5. Köln 1966.

249 Erich Kästner：Notabene 45；a. a. O.，S. 83.

250 Die »Weiße Liste« deutscher Kultur. Die Neue Zeitung，25. 10. 1945. Henric L. Wuermeling：Die weiße Liste. Umbruch der politischen Kultur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81.

251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42.

252 Jost Hermand：Kultur im Wiederaufbau；a. a. O.，S. 89 f. Ferner Franz Knip-ping/Jacques Le Rider/Karl Mayer （Hg.）：Frankreichs Kultur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45-1950. Ein Tübinger Symposium am 19./20. 9. 1985. Tübingen 1987.

253 Ilse Spittmann/Gisela Helwig （Hg.）：DDR-Lesebuch；a. a. O.，S. 208.

254 »Zeit des Neubeginns«. Gespräch mit Sergej Tulpanow. Neue Deutsche Literatur，Nr. 9/1979，S. 42 f.

255 Kulturbund zur demokratischen Erneuerung Deutschlands. Ilse Spittmann/Gisela Helwig （Hg.）：DDR-Lesebuch；a. a. O.，S. 212.

256 Manfred Jäger：Kultur und Politik in der DDR 1945-1990 Köln. 1994，S. 7.

257 Magdalena Heider：Politik - Kultur - Kulturbund. Zur Gründungs- und Frühgeschichte des Kulturbundes zur demokratischen Erneuerung

Deutschlands 1945-1954 in der SBZ/DDR. Köln 1993，S. 33 ff.

258 Hans Mayer：Die umerzogene Literatur. Deutsche Schriftsteller und Bücher 1945-1967. Berlin 1988，S. 45.

259 Bernhard Zeller （Hg.）：»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 Literarisch-politische Publizistik 1945-1950. Eine Ausstellung des Deutschen Literaturarchivs im Schiller-Na-tionalmuseum，Marbach a. N.，Katalog Nr. 23. Stuttgart 1973，S. 50.

260 Hans Mayer：Die umerzogene Literatur；a. a. O.，S. 45.

261 Frank Trommler：Sozialistische Literatur in Deutschland. Ein historischer Überblick. Stuttgart 1976，S. 681 f.

262 David Pike：The Kulturbundbau：Causes，Context and Consequences. Bernard Genton/Cyril Buffet：Die vier Besatzungsmächte und die Kultur in Berlin 1945-1949. Berlin 1997.

263 Gerd Dietrich：Programm zur Erneuerung der deutschen Kultur：Zur Ersten Zentralen Kulturtagung der KPD 1946.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Jg. 34/1986，S. 483 ff.

264 Joachim Streisand：Kulturgeschichte der DDR. Studien zu ihren historischen Grundlagen und ihren Entwicklungsetappen. Köln 1981，S. 79 f.

265 Joachim-Rüdiger Groth/Karin Groth：Materialien zu Literatur im Widerspruch. Gedichte und Prosa aus 40 Jahren DDR. Kulturpolitischer Überblick und Interpretationen. Köln 1993，S. 5 f.

266 Matthias Herrmann：»Nicht，daß wir die Tradition gerettet hätten.« Musik，Oper und Theater im Jahre 1945 in Dresden. Dresdner Hefte，Heft 1/1995，S. 99 ff.

267 Albrecht Goes：Goethegedichte in dieser Zeit. Die Neue Zeitung，28. 2. 1947

268 Thomas Mann：Ansprache im Goethejahr. Gehalten am 25. Juli 1949 in der Paulskirche zu Frankfurt am Main. Bernhard Zeller（Hg.）：»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a. a. O.，S. 492 f.

269 Friedrich Sieburg：Frieden mit Thomas Mann. Die Gegenwart，Heft 14/1949，S. 16.

270 Frankfurter Rundschau，28. 7. 1949.

271 Frankfurter Neue Presse，30. 7. 1949.

272 Wolfgang Harich：Das demokratische Deutschland grüßt Thomas Mann. Tägliche Rundschau，31. 7. 1949.

273 Karl Jaspers：Unsere Zukunft und Goethe. Die Wandlung，Heft 7/8/1949，S. 584 ff.

274 Die Zeit，28. 4. 1949.

275 Jochen G. Leithäuser：Das Goethe jahr ist überstanden. Rückblick und Bilanz. Der Monat，Nr. 15/1949，S. 286 ff.

276 Erich Kuby：Die Russen in Berlin 1945. München，Bern，Wien 1965，S. 70.

277 Jürgen Reiche：Zukunft nach dem Ende. Hermann Glaser/Lutz von Pufendorf/Mi-chael Schöneich （Hg.）：So viel Anfang war nie. Deutsche Städte 1945-1949. Berlin 1989，S. 40 f.

278 Wolfgang Schivelbusch：Vor dem Vorhang. Das geistige Berlin 1945-1948. München 1995，S. 39 ff. Ferner Melanie Kanzler：Die Einflußnahme der amerikanischen Besatzungsmacht auf die Berliner Kulturpolitik in den Nachkriegsjahren 1945-1947，Berlin 1990.

279 Hans Borgelt：Das war der Frühling von Berlin. München 1980.

280 Bertolt Brecht：Arbeitsjournal. Frankfurt am Main 1973，S. 850.

281 Michael Semirjaga：Sowjetische Okkupation und das kulturelle Leben in Berlin. Bernard Genton/Cyril Buffet：Die vier Besatzungsmächte und die Kultur in Berlin 1945-1949. Berlin 1997.

282 Wolfgang Schivelbusch：Vor dem Vorhang；a. a. O.，S. 55 f.

283 Budapester Kulturforum. Diskussionsbeiträge von Mitgliedern der DDR-Delega-tion. Berlin 1986，S. 21.

284 Franz Fühmann：Vor Feuerschlünden. Erfahrung mit Georg Trakls Gedicht. Rostock 1984，S. 84 f.

285 Manfred Riedel：Die Sage vom guten Anfang. Sinn und Form，Nr. 4/1992. Hans Mayer：Der Turm von Babel. Erinnerung an ein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91.

286 Otto Flake：Die geistige Hauptstadt. Badener Tagblatt，20. 4.1946.

287 Ludwig Eberlein：Kultur ohne Metropole. Der Tagesspiegel，25. 11. 1948.

288 Peter Roos：Genius loci. Gespräche über Literatur und Tübingen. Pfullingen 1978，S. 33 f.，55，81 f.

289 Günther Rühle：Die Wiederherstellung des Theaters. Hilmar Hoffmann/Heinrich Klotz （Hg.）：Die Kultur unseres Jahrhunderts 1945-1960.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91，S. 73.

290 Wolfgang Pöschl：Aida ohne Dekorationen. Ein gelungenes Experiment in Kassel. Die Neue Zeitung，15. 11. 1946.

291 Gertrud Becker：Frankfurter Brief. Die Neue Zeitung，1. 11. 1945.

292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27.

293 Günther Rühle：Die Wiederherstellung des Theaters；a. a. O.，S. 73 f.

294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77 ff.

295 Jürgen Reiche：Zukunft nach dem Ende. Hermann Glaser/Lutz von Pufendorf/Mi-chael Schöneich （Hg.）：So viel Anfang war nie；a. a. O.，S. 36.

296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11 ff.

297 Bruno E. Werner：Kritik der Theaterkritik. Die Neue Zeitung，30. 5. 1948.

298 Walther Schmieding：Kunst gab ich für Kohl. Die Entstehung der Ruhrfestspiele. Legende und Wirklichkei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6. 5. 1977.

299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33.

300 Bruno E. Werner：Drei Aufführungen »Mord im Dom«. Die Neue Zeitung，27. 10. 1947.

301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67.

302 Heinz Pauck. »Draußen vor der Tür«. Uraufführung in den Hamburger Kammerspielen. Die Neue Zeitung，24. 11. 1947.

303 Rhein-Neckar-Zeitung，13. 12. 1947.

304 Fritz Erpenbeck：Lebendiges Theater. Berlin 1949，S. 287 f.

305 Hans Weigel：Die Komödie [Wien]，Nr. 6/1947/48，S. 194 f.

306 Heinz Pauck：»Des Teufels General«. Deutsche Erstaufführung in Hamburg. Die Neue Zeitung，21. 11. 1947.

307 Werner Schulze-Reimpell：Man spielte，was gefiel. Die Theater im Rheinland. Klaus Honnef/Hans M. Schmidt （Hg.）：Aus den Trümmern. Kunst und Kultur im Rheinland und Westfalen 1945-1952. Köln 1985，S. 451 f.

308 Heimkehrer？Texte von Berthold Viertel，Fritz Kortner，Erwin Piscator. Theater heute，Heft 10/1970，S. 26.

309 Der letzte der Löwen. Peter Zadek 1959 über Fritz Kortner. Theater

heute，Heft 11/1979，S. 18.

310 Henning Rischbieter：Berlin，Hebbel-Theater 1950. Im Gefängnis der Diktatur. Fritz Kortner inszeniert Schillers »Don Carlos«. Theater heute，Heft 2/1984，S. 43 ff.

311 Michael Walter：Hitler in der Oper. Deutsches Musikleben 1919-1945. Stuttgart，Weimar 1995.

312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113.

313 Ottofritz Gaillard：Der Fall Hindemith. Aufbau，Heft 1/1947，S. 38.

314 Klaus Mann：Der Wendepunkt. Ein Lebensbericht. Frankfurt am Main und Hamburg 1963，S. 439 f.

315 Ulrich Dibelius：Musik.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110 f.

316 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Dritter Band. Frankfurt am Main 1973，S. 1249 ff.

317 Ulrich Dibelius：Musik. Wolfgang Benz （Hg.）：D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4：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131 f.

318 Edmund Nick：Carl Orffs »Bernauerin«. Die Neue Zeitung，11. 7. 1947.

319 Hans Heinz Stuckenschmidt：Luft vom anderen Planeten. Notizen

über Arnold Schönber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2. 12. 1964.

320 Ulrich Dibelius：Musik.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 a. O.，S. 114.

321 Hans Heinz Stuckenschmidt：Kranichstein，das Schloß der Neutöner. Die Neue Zeitung，8. 8. 1947.

322 Friedrich Herzfeld：Deutsches Musikleben auf neuen Bahnen. Aufbau，Heft 2/1946，S. 177 ff.

323 Hans Heinz Stuckenschmidt：Arnold Schönberg. Aufbau，Heft 12/1946，S. 1240 f.

324 Fritz Brust：»Abraxas« von Egk. Die Neue Zeitung，12. 12. 1947.

325 Werner Suhr：Werner Egks »Abraxas«. Die Neue Zeitung，10. 6. 1948.

326 Werner Egk：Die Zeit wartet nicht. Künstlerisches，Zeitgeschichtliches，Privates aus meinem Leben. München 1981，S. 398 ff.

327 Günter Neumann：Schwarzer Jahrmarkt. Eine Revue der Stunde Null. Berlin 1975，S. 5.

328 Erich Kästner：Der tägliche Kram. Gesammelte Schriften für Erwachsene. Bd. 7：Vermischte Beiträge II. München，Zürich 1969，S. 14

329 Ursula Herking：Danke für die Blumen - damals，gestern，heute. München 1973.

330 Robert Lucas：Die Briefe des Gefreiten Hirnschal. BBC-Radio-

Satiren 1940-1945. Wien 1994，S. 263.

331 Klaus Budzinski：Wer lacht denn da？Kabarett von 1945 bis heute. Braunschweig 1989，S. 25 f.

332 Ebd.，S. 25.

333 Friedrich Luft：Die gepolsterte Bank der Spötter. Zur Situation des politischen Cabarets in Deutschland. Der Monat，Heft 105/1957，S. 33.

334 Werner Finck：Silvesterrede 1945. Die Neue Zeitung，31. 12. 1945.

335 Klaus Budzinski：Wer lacht denn da？a. a. O.，S. 16.

336 Jürgen Pelzer：Kritik durch Spott. Satirische Praxis und Wirkungsprobleme im westdeutschen Kabarett. Frankfurt am Main，1985，S. 63-84.

337 Klaus Budzinski：Satire mit Musik：Das Düsseldorfer »Kom（m）ödchen«. Das Schönste，Heft 10/1961，S. 360.

338 Wigand Lange：Antiamerikanismus und Zensur im Kabarett der Besatzungszeit 1945-1949. Frankfurter Hefte，Heft 2/1984，S. 56.

339 Volker Bohn：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 Texte und Bilder. Frankfurt am Main 1993，S. 25.

340 Hans Mayer：Die umerzogene Literatur；a. a. O.，S. 17.

341 Volker Bohn：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a. a. O.，S. 29.

342 Wolfgang Borchert：Generation ohne Abschied. Da gibt es nur eins！Draußen vor der Tür und ausgewählte Erzählungen. Hamburg 1956，S. 125，126.

343 Hans Mayer：Die umerzogene Literatur；a. a. O.，S. 33.

344 Wolfgang Emmerich：Kl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DDR. Leipzig 1966，S. 91 f.

345 Ebd.，S. 106.

346 Stephan Hermlin：Abendlicht. Berlin 1979. Karl Corino：Außen Marmor，innen Gips. Die Legenden des Stephan Hermlin. Düsseldorf 1996.

347 Joachim-Rüdiger Groth/Karin Groth：Materialien zu Literatur im Widerspruch. Gedichte und Prosa aus 40 Jahren DDR. Kulturpolitischer Überblick und Interpretationen. Köln 1993，S. 62 f.

348 Wolfgang Emmerich：Kl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DDR；a. a. O.，S. 43.

349 Volker Bohn：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a. a. O.，S. 14.

350 Klaus Völker：Bertolt Brecht.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1978，S. 363，373.

351 Hans Mayer：Die umerzogene Literatur；a. a. O.，S. 39.

352 Peter de Mendelssohn：Die verhinderten Hochverräter. Der Fall Becher. Der Monat，Heft 29/1951，S. 487.

353 Christoph Meckel：Suchbild. Über meinen Vater. Düsseldorf

1980，S. 167 ff.

354 Hans Egon Holthusen/Friedhelm Kemp：Ergriffenes Dasein. Deutsche Lyrik 1900-1950. Ebenhausen bei München 1953，S. 64.

355 Hans Mayer：Ein Deutscher auf Widerruf. Erinnerungen （I）. Frankfurt am Main 1982，S. 320 f.

356 Heinrich Vormweg：Literatur.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50 f.

357 Peter Rühmkorf：Die Jahre，die Ihr kennt. Anfälle und Erinnerung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72，S. 88 f.

358 Nikolaus Born/Jürgen Manthey （Hg.）：Literaturmagazin 7：Nachkriegsliteratur. Reinbek bei Hamburg 1977，S. 195. Ferner Christiane Deußen：Erinnerung als Rechtfertigung. Autobiographien nach 1945：Gottfried Benn - Hans Carossa -Arnolt Bronnen. Tübingen 1987.

359 Wolfgang Emmerich：Zwischen »Nullpunkt« und Nonkonformismus. Hilmar Hoffmann/Heinrich Klotz （Hg.）：Die Kultur unseres Jahrhunderts 1945-1960.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91，S. 64.

360 Günter Eich：Latrine. Gesammelte Werke. Bd. 1. Frankfurt am Main 1973，S. 36.

361 Hans Dieter Schäfer：Das gespaltene Bewußtsein. Über deutsche Kultur und Lebenswirklichkeit. 1944-1945. München 1981，S. 9 ff. Ferner Axel Vieregg：»Der eigenen Fehlbarkeit begegnet«. Günter Eichs Realitäten

1933-1945. Eggingen 1993.

362 Gottfried Benn：Ithaka. Gesammelte Werke in 8 Bdn. Hg. von Dieter Wellershoff. Bd. 6：Stücke aus dem Nachlaß. Szenen. Wiesbaden 1968，S. 1475 f.

363 Ders.：Reisen. Ebd.，Bd. 1：Gedichte，S. 327.

364 Ders.：Probleme der Lyrik. Ebd.，Bd. 4：Reden und Vorträge，S. 1087 f.

365 Hellmuth von Cube：Wir kennen die Melodie ... Die Neue Zeitung，1. 2.1948.

366 Hugo Steger：Sprache im Wandel.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15 ff.

367 Dolf Sternberger/Gerhard Storz/W. E. Süskind：Aus dem Wörterbuch des Unmenschen. Hamburg 1957，S. 9.

368 Hans Habe：Im Jahre Null.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sse. München 1966，S. 123.

369 Gruppe 47. Zusammenschluß junger Autoren. Die Neue Zeitung，7. 11. 1947.

370 Rainer Schauer：Von Hechten und Literaten. Vor fünfzig Jahren wurde in einem einsamen Haus die Gruppe 47 gegründet. Die Zeit，16. 5. 1997.

371 Hans Werner Richter：Wie entstand und was war die Gruppe 47.

Hans A. Neunzig （Hg.）：Hans Werner Richter und die Gruppe 47. Frankfurt am Main，Berlin，Wien 1981，S. 52 ff.

372 Friedhelm Kröll：Literaturpreise nach 1945. Wegweiser in die Restauration. Jost Hermand/Helmut Peitsch/Klaus R. Scherpe （Hg.）：Nachkriegsliteratur in Westdeutschland 1945-1949. Berlin 1982，S. 143 ff.

373 Günter Eich：Gesammelte Werke. Bd. I：Die Gedichte. Die Maulwürfe. Frankfurt am Main 1973，S. 247 f.

374 Hugo Steger：Sprache im Wandel；a. a. O.，S. 23.

375 Manuel Gasser：Fragwürdigkeiten der deutschen Buchproduktion. Die Neue Zeitung，4. 8. 1947.

376 Volker Bohn：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a. a. O.，S. 62.

377 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Bedroht - bewahrt. Der Weg eines Verlegers. Frankfurt am Main 1967，S. 225.

378 Bernhard Zeller （Hg.）：»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a. a. O.，S. 51.

379 Ebd.，S. 51 f.

380 Wolfgang Emmerich：Kl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DDR；a. a. O.，S. 48.

381 Ursula Heukenkamp：Haben wir uns richtig verstanden？Die Literatur der Bundesrepublik Erinnerungen aus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22. 3.1996，S. 6 ff.

382 Erich Kästner：Notabene 45；a. a. O.，S. 134.

383 Rüdiger Bolz：Von Radio München zum Bayerischen Rundfunk. Friedrich Prinz （Hg.）：Trümmerzeit in München.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einer deutschen Großstadt im Aufbruch 1945-1949. München 1984，S. 241.

384 Hanna Brunhöber：Unterhaltungsmusik. Wolfgang Benz （Hg.）：D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4：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173 f.

385 Paul Höffer：Schlager oder Volkslied. Aufbau，Heft 2/1947，S. 150 f.

386 kleeblatt radio，Ausgabe 14/Juli 1995 und 15/Okt. 1995.

387 Werner Burkhardt：Musik der Stunde Null. ZEIT-Magazin，Nr. 46/47/1983，S. 37 f.

388 Oliver Hassencamp：Der Sieg nach dem Krieg. Die gute schlechte Zeit. München，Berlin o. J.，S. 109 ff.，31 f.

389 Werner Burckhardt：Musik der Stunde Null；a. a. o.，S. 44.

390 Paul Höffer：Jazz-Musik. Aufbau，Heft 5/1946，S. 541 f.

391 W. Hagen：Jazz.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 （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S. 288 f.

392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 Bd. 1. Theodor Eschenburg：Jahre der Besatzung 1945-1949. Stuttgart，Wiesbaden 1983，S. 137.

393 Peter von Zahn：Der zweite Anfang des deutschen Rundfunks. Vortrag. Rundfunkmanuskript des Bayerischen Rundfunks，27. 6. 1987，S. 3，1 f. Ferner ders.：Stimme der ersten Stunde. Erinnerungen 1913-1951. Stuttgart 1991.

394 Axel Eggebrecht：Der halbe Weg. Zwischenbilanz einer Epoche. Reinbek bei Hamburg 1975，S. 339 f.

395 Sabine Friedrich：Rundfunk und Besatzungsmacht. Organisation，Programm und Hörer des Südwestfunks 1945 bis 1949. Baden-Baden 1991.

396 Hans Bausch：Rundfunkpolitik nach 1945. Erster Teil：1945-1962. München 1980，S. 149.

397 Susan Boenke/Konrad von Zwehl （Hg.）：»Angesichts des Trümmerfeldes ...«；a. a. O.，S. 78 f.

398 Edgar Lersch：Auf neuer Welle. Der Rundfunk in den Westzonen. Hermann Glaser/Lutz von Pufendorf/Michael Schöneich （Hg.）：So viel Anfang war nie. Deutsche Städte 1945-1949. Berlin 1989，S. 282.

399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138. Ferner Michael Tracey：Sir Hugh Greene. Eine Biographie. Berlin 1984.

400 Wolfgang Mühl-Benninghaus：Medienpolitische Probleme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1945 und 1989. Heide Riedel （Hg.）：»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 ...« Eine Ausstellung des Deutschen Rundfunk-Museums. Berlin 1994，S. 10.

401 Norbert Frei：Die Presse. Wolfgang Benz （Hg.）：D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4：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370 ff. Ferner Kurt Koszyk：Pressepolitik für Deutsche 1945-1949.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sse. Teil IV. Berlin 1986. Wolf-Dietrich Nahr：Die befohlene Pressefreiheit. Deutsche und amerikanische Medienpolitik 1946-1953. Berlin 1991. Dietrich Oppenberg （Hg.）：Handbuch Deutsche Presse 1947. Reprint des Zeitungsteils. Düsseldorf 1996.

402 Stefan Heym：Nachruf. München 1988. Michael Söllner：Presse - Verordnete Vielfalt. Hermann Glaser/Lutz von Pufendorf/Michael Schöneich （Hg.）：So viel Anfang war nie；a. a. O.，S. 271.

403 Heinz-Dietrich Fischer：Reeducations- und Pressepolitik unter britischem Besatzungsstatus. Die Zonenzeitung »Die Welt« 1946-1950. Konzeption，Artikulation und Rezeption. Düsseldorf 1978.

404 Rudolf Reinhardt：Zeitungen und Zeiten. Köln 1988，S. 32 ff.

405 Hans-Jörg Heims：Erinnerung an ein Zentralorgan. Seit 50 Jahren gibt es die Tageszeitung »Neues Deutschland«. Süddeutsche Zeitung，23. 4.1996.

406 Karl-Heinz Janßen：Die Zeit in der ZEIT. 50 Jahre einer Wochenzeitung. Berlin 1995.

407 Gerd Bucerius：Vom Wesen der Demokratie. Die Qualen des Neuanfangs 1945，gespiegelt in den Artikeln eines großen Journalisten：Ernst Friedlaender. Die Zeit，25. 3. 1983. Norbert Frei/Franziska Friedlaender （Hg.）：Ernst Friedlaender zur Zeit. Leitartikel aus den Jahren 1946-1949. München 1982.

408 Marion Gräfin Dönhoff：Namen，die keiner mehr nennt.

Ostpreußen - Menschen und Geschichte. München 1964.

409 Hans Dieter Jaene：Der Spiegel. Ein deutsches Nachrichten-Magazin. Frankfurt am Main，Hamburg 1968.

410 Deutsches Allgemeines Sonntagsblatt，1. 10. 1967.

411 Ursula von Kardorff：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 bis 1945；a. a. O.，S. 342.

412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fünf Bänden；a. a. O.，S. 157.

413 Die Neue Zeitung，13. 1. 1947.

414 Rudolf Pechel：Mutter aller Kultur. Aufbau，Heft 3/1945，S. 298.

415 »Sinn und Form«. Reprintausgabe der ersten zehn Jahrgänge （1949-1958）. Nörd-lingen 1988.

416 Heinrich Vormweg：Literatur im Asyl. Nicolas Born/Jürgen Manthey （Hg.）：Nachkriegsliteratur. Literaturmagazin 7. Reinbek bei Hamburg 1977，S. 203.

417 Ingrid Laurien：Politisch-kulturelle Zeitschriften in den Westzonen von 1945-1949. Helga Grebing （Hg.）：Zur Politischen Kultur im Nachkriegsdeutschland. Politische und kulturelle Zeit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1945-1949. Projektantrag Göttingen 1980 （unveröffentlicht）.

418 Heinrich Vormweg：Literatur im Asyl；a. a. O.，S. 203.

419 Der Monat，Heft 1/1948，S. 3.

420 Friedrich P. Kahlenberg：Film.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359 f.

421 Hermann Kadow：Kino von innen und außen. Frankfurter Hefte，Heft 5/1946，S. 7.

422 Hilmar Hoffmann/Heinrich Klotz （Hg.）：Die Kultur unseres Jahrhunderts 1945-1960.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91，S. 137 f.

423 Friedrich Luft：»Und über uns der Himmel«. Filmuraufführung mit Hans Albers. Die Neue Zeitung，12.12.1947.

424 Harald Braun：Die Bedeutung der »Filmpause«. Zwang und Ziel einer Fastenzeit. Die Neue Zeitung，12. 11. 1945.

425 Dieter Krusche：Reclams Filmführer. Stuttgart 1973，S. 157 f.

426 Erich Kästner：Treffpunkt Zürich. Die Neue Zeitung，21. 11. 1947.

427 Bruno E. Werner：Kunst in der Katakombe. Nordwestdeutsche Hefte，Heft 3/1946. Charles Schüddekopf：Vor den Toren der Wirklichkeit. Deutschland 1946-1947 im Spiegel der Nordwestdeutschen Hefte. Berlin，Bonn 1980，S. 343.

428 Georg Meistermann：Die Legende von der Stunde Null. Über die Umwege bei der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Süddeutsche Zeitung，14./15. 2. 1981.

429 Doris Schmidt：Bildende Kunst.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a. a. O.，S. 183.

430 Markus Krause：Galerie Gerd Rosen. Die Avantgarde in Berlin 1945-1950. Berlin 1995.

431 Doris Schmidt：Briefe an Günther Franke. Portrait eines deutschen Kunsthändlers. Köln 1970，S. 179.

432 Akademie der Künste Berlin：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 Kunst in Deutschland 1945-1950. Katalog. Berlin 1975，S. 9.

433 Ernst Wiechert：Über Kunst und Künstler. Das Gedicht. Blätter für Dichtung，Hamburg 1946. Berndt Schmidt/Hannes Schwenger：Die Stunde Eins. Erzählungen，Reportagen，Essays aus der Nachkriegszeit. München 1982，S. 47 ff.

434 Hans Sedlmayr：Verlust der Mitte. Die bildende Kunst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als Symptom und Symbol d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55，S. 88，133.

435 H. G. Evers （Hg.）：Darmstädter Gespräch. Das Menschenbild unserer Zeit. Darmstadt 1950，S. 150 f.

436 Gerhard Finckh：Die Suche nach dem »richtigen« Stil - Kunstdiskussion in München 1945-1949. Friedrich Prinz （Hg.）：Trümmerzeit in München；a. a. O.，S. 113.

437 Friedrich Adama von Scheltema：Ist der Expressionismus noch junge Kunst？Prisma，Heft 2/1946，S. 17 f. H. Lüdecke：Die Tragödie des Expressionismus. Notizen zu seiner Soziologie. Bildende Kunst，Heft 3/1949，S. 109 ff.

438 Heinz Trökes：Der Surrealismus. Das Kunstwerk，Heft 8/1947，S. 30 ff.

439 Barbara Klie：Übergangszeit. Drei Phasen der Kunst nach dem Krieg. Der Monat，Heft 200/1965，S. 100.

440 Bernhard Schulz （Hg.）：Grauzonen Farbwelten. Kunst und Zeitbilder 1945-1955. Katalog zur Ausstellung der Neuen Gesellschaft für Bildende Kunst. Berlin，Wien 1983，S. 189，220.

441 Wilhelm Uhde：Abstrakte Malerei. Die Umschau，Heft 2/1946，S. 187 f.

442 Wieland Schmied：Zeitgenössische Kunst：Entwicklungen der deutschen Malerei von 1945 bis zu den siebziger Jahren. Universitas，Heft 12/1979，S. 1253 f.

443 Gerhard Finckh：ZEN 49. Friedrich Prinz （Hg.）：Trümmerzeit in München；a. a. O.，S. 120.

444 Eberhard Hempel：Ruinenschönheit. Zeitschrift für Kunst，2. Jg./1948，S. 76 f.

445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 40 Jahre Nähe und Ferne. Köln 1985，S. 10 f.

446 Eckhart Gillen：Kunst in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szone und in der DDR 1945-1990. Text zur Dia-Serie. Inter Nationes Bonn.

447 Hermann Henselmann：Zielbewußte Kunstausstellung. Aufbau，Heft 4/1946，S. 428.

448 Gabriele Muschter/Klaus Honnef （Hg.）：Westchor Ostportal. 12 Positionen zeitgenössischer Kunst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95，S. 19.

449 Rainer Zimmermann：Expressiver Realismus. Malerei der verschollenen Generation. München 1994，S. 201，191 ff. Ferner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a. a. O.，S. 26 ff.

450 Klaus Honnef/Hans M. Schmidt （Hg.）：Aus den Trümmern. Kunst und Kultur im Rheinland und Westfalen 1945-1952. Köln 1985，S. 325.

451 Weser-Kurier，5. 12. 1945.

452 Walter Gropius reist im Auftrag der amerikanischen Militärregierung durch Deutschland. Der Spiegel，Jan. 1948.

453 Otto Bartning：Ketzerische Gedanken am Rande der Trümmerhaufen. Frankfurter Hefte，Heft 1/1946，S. 64.

454 Hans Schwippert：Theorie und Praxis （1944；mit einem Nachwort versehen Ende 1946）. Baukunst und Werkform，Nr. 2/1947.

455 50 Jahre Deutscher Werkbund. Im Auftrage des Deutschen Werkbundes hg. von der Landesgruppe Hessen，bearb. von Hans Eckstein. Frankfurt am Main，Berlin 1958，S. 36.

456 Philipp Rappaport：Der Wiederaufbau der deutschen Städte. Essen 1945. J. C. Rossaint：Vom Neuaufbau unserer Heimat，Düsseldorf 1945，S. 4.

457 Magistrat der Stadt Kiel （Hg.）：Bürger bauen eine neue Stadt.

Kiel 1956，S. 33 f.

458 Martin Wagner：Baumeister von Deutschland. Aufbau，Heft 9/1946，S. 881.

459 Alfons Leitl：Erwägungen und Tatsachen zum deutschen Städte-Aufbau. Frankfurter Hefte，Heft 4/1946，S. 64.

460 Großstadt der Zukunft. Pläne zum Wiederaufbau Berlins. Die Neue Zeitung，23. 8. 1946. Hans Scharoun：Zur Ausstellung »Berlin plant«. Neue Bauwelt，Heft 10/1946，S. 3.

461 Vittorio M. Lampugnani：Wiederaufbau？Unmöglich. Deutsche Stadtplanung nach 1945. Keine »Stunde Null«.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 8. 1983. Wieder-Aufbau oder Neubeginn？Die Legende von der »Stunde Null«. Bauwelt，Nr. 48/1981，Nr. 48/1984.

462 Werner Durth/Niels Gutschow：Träume in Trümmern. Stadtplanung 1940-1950. München 1993，S. 156 ff.

463 Lothar Bolz：Von deutschem Bauen.（Ost-）Berlin 1951，S. 32 ff.

464 Bruno E. Werner：Romantik oder Wirklichkeit？Gedanken über den Wiederaufbau. Die Neue Zeitung，25. 7.1947.

465 Werner Durth u. a.（Hg.）：1945. Krieg - Zerstörung - Aufbau. Architektur und Stadtplanung 1940-1960. Schriftenreihe der Akademie der Künste，Bd. 23. Berlin 1995，S. 278 f.

466 Ebd.，S. 272 ff.

467 Ebd.，S. 275.

第二部分 分裂的德国

1 Hans-Christian Huf （Hg.）：Das Land der großen Mitte. Gespräche über die Kultur der Bundesrepublik.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89.

2 Hans Riehl：Die Mark. Die aufregende Geschichte einer Weltwährung. Hannover 1978.

3 Karl Schnog：Wann wird das sein？Ulenspiegel Nr. 5/1948，S. 2.

4 Dieter Bänsch （Hg.）：Die fünfziger Jahre. Beiträge zu Politik und Kultur. Tübingen 1985，S. 225 f. Ferner F. Ehmke：Schlechte Noten. Werk und Zeit，Nr. 6/1952.

5 Lambert Schneider：Neubeginn 1945-1950. Rechenschaft über vierzig Jahre Verlagsarbeit 1925-1965. Ein Almanach. Heidelberg 1965，S. 90 f.

6 Deutscher Bundestag/Bundesarchiv （Hg.）：Der Parlamentarische Rat 1948-1949. Akten und Protokolle. Bd. 8：Die Beziehungen des Parlamentarischen Rates zu den Militärregierungen. Boppard am Rhein 1995.

7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on 23. 5. 1949. Textausgabe mit Erläuterungen von Prof. Dr. Friedrich Giese. Frankfurt am Main 1949. Karlheinz Niclauß：»Restauration« oder Renaissance der Demokratie？Die Entsteh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1949. Beiträge zur Zeitgeschichte. Hg. von Peter Haungs und Eckhard Jesse. Bd. 10. Berlin 1982.

8 Wolfgang Benz （Hg.）：»Bewegt von der Hoffnung aller Deutschen«. Zur Geschichte des Grundgesetzes. Entwürfe und Diskussionen 1941-1949. München 1979.

9 Gerhard Hirscher：Carlo Schmid und die Gründung der Bundesrepublik.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Bochum 1986. Dieter Gosewinkel：Adolf Arndt. Die Wiederbegründung des Rechtsstaats aus dem Geist der Sozialdemokratie （1945-1961）. Bonn 1991.

10 Wolfgang Benz （Hg.）：»Bewegt von der Hoffnung aller Deutschen«. Zur Geschichte des Grundgesetzes. Entwürfe und Diskussionen 1941-1949；a. a. O.，S. 492 ff.

11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5 Bdn. Bd. 2. Hans-Peter Schwarz：Die Ära Adenauer. Gründerjahre der Republik. 1949-1957. Stuttgart，Wiesbaden 1981，S. 27.

12 Klaus Hohlfeld：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und Geschichte von 1848 bis zur Gegenwart. VI. Band：Deutschland nach dem Zusammenbruch 1945. Berlin -München，o. J.，S. 390 ff.

13 Rudolf Mittendorfer：Robert Schuman - Architekt des neuen Europa. Hildesheim 1983.

14 Peter Koch：Konrad Adenauer.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Reinbek bei Hamburg 1985，S. 432 ff.

15 Konrad Adenauer：Erinnerungen 1945-1953. Stuttgart 1965，S. 45.

16 Walter Müller-Bringmann：Das Buch von Friedland. Göttingen 1956.

17 Thomas Allan Schwartz：America’s Germany. John J. McCloy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ambridge，London 1991. Kai Bird：The Chairman. John J. McCloy：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 New York 1992.

18 Die Kabinettsprotokolle der Bundesregierung. Hg. von Hans Booms. Bearb. von Ulrich Enders und Konrad Reiser. Boppard 1982 ff.

19 Hans Maier：Die Deutschen und die Freiheit. Perspektiven der Nachkriegszeit. Stuttgart 1985，S. 29. Ferner Konrad Adenauer：Teegespräche 1950-1954. Rhön-dorfer Ausgabe. Hg. von Rudolf Morsey und Hans Peter Schwarz im Auftrag der Stiftung Bundeskanzler-Adenauer-Haus，bearb. von Hanns Jürgen Küsters. Berlin 1984.

20 Golo Mann：Konrad Adenauer，Staatsmann aus Sorg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4. 2.1976.

21 Norbert Frei：Vergangenheitspolitik. Die Anfänge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München 1996. Manfred Kittel：Die Legende von der »Zweiten Schuld«.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in der Ära Adenauer. Berlin，Frankfurt am Main 1993.

22 Stephan Reinhardt：Der Fall Globke.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Heft 5/1995，S. 437.

23 Hans Schwab-Felisch：Die Affäre Harlan. Der Monat，Heft 28/1951，S. 414 ff.

24 Norbert Frei：Amnestiepolitik der Bonner Anfangs jahre. Die Westdeutschen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Universitas，Heft 12/1996，S. 1155 f.

25 Theodor W. Adorno：Auferstehung der Kultur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Hefte，Heft 5/1950，S. 169 ff. Ferner Eugen Kogon：Die restaurative Republik. Zu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Weinheim 1996.

26 Konrad Adenauer：Erinnerungen；a. a. O.，S. 173. Ferner Reiner Pommerin：Von Berlin nach Bonn. Die Alliierten，die Deutschen und die Hauptstadtfrage nach 1945. Köln，Wien 1989.

27 Hermann Proebst：Adenauer. Vierzehn Jahre mit Adenauer. Sonderbeilage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15. 10. 1963.

28 Wolfgang Koeppen：Das Treibhaus （1953）. Berlin-Grunewald，o. J.，S. 29.

29 Konrad Adenauer - Theodor Heuss. Unter vier Augen. Gespräche aus den Gründerjahren 1949-1959. Bearb. von Hans Peter Mensing. Berlin 1997.

30 Hermann Rudolph：Papa wider Willen. Zeit-Magazin，Jg. 1984. Ferner Hildegard Hamm-Brücher/Hermann Rudolph：Theodor Heuss. Eine Bildbiographie. Stuttgart 1983. Ingelore M. Winter：Theodor Heuss. Ein Porträt. Tübingen 1983.

31 Erich Mende：Theodor Heuss in Bayern. Zum 100. Geburtstag des ersten Bundespräsidenten. Bayerischer Rundfunk. Sendemanuskript，29. 1. 1984，S. 2.

32 Friedrich Henning （Hg.）：Theodor Heuss；Lieber Dehler！Mit einem Geleitwort Hildegard Hamm-Brüchers. München 1983.

33 Erich Mende：Das verdammte Gewissen. Zeuge der Zeit 1921-1945.

München-Berlin 1982.

34 Ders.：Theodor Heuss in Bayern；a. a. O.，S. 9. Ferner Theodor Eschenburg：Heuss als Schriftsteller. Merkur，Nr. 151/1960，S. 868 ff.

35 Theodor Heuss zum 10. Jahrestag der Erklärung der Menschenrecht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24. 12. 1958，S. 679.

36 Theodor Heuss：Dank und Bekenntnis. Gedenkrede zum 20. Juli 1944. Tübingen 1954.

37 Konrad Adenauer - Theodor Heuss. Ein Briefwechsel. Das Parlament，April 1977.

38 Symbole für das neue Deutschland. Welcher Name？Welche Hymne？Welcher Feiertag？Die Zeit，15. 6. 1990.

39 Friedrich Thomas：Aspekte der Verfassungsentwicklung und der individuellen （Grund） Rechtsposition in der DDR. Hartmut Kaelble/Jürgen Kocka/Hartmut Zwahr （Hg.）：Sozialgeschichte der DDR. Stuttgart 1994，S. 487

40 Hans Georg Lehmann：Deutschland-Chronik. 1945 bis 1995. Bonn 1995，S. 75.

41 Arnulf Baring：Auskunft über Ulbricht. Merkur，Heft 10/11/1964，S. 1090. Carola Stern：Walter Ulbricht. Köln 1964.

42 Joachim-Rüdiger Groth：Literatur im Widerspruch. Gedichte und Prosa aus 40 Jahren DDR. Köln 1993，S. 22.

43 Friedrich Dieckmann：Konspiration mit der Vormacht. ZEIT-Punkte：Vom Reich zur Republik，Nr. 2/1992，S. 92.

44 Richard Crossman：The God that failed. Paris 1950.

45 Hermann Weber：Mit Zwang und Betrug. ZEIT-Punkte：Vom Reich zur Republik，Nr. 2/1992，S. 70.

46 Klaus Schröder：Wilhelm Pieck，sei unser Gas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Arbeiterinteressen und Sozialpolitik in der DD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9.11. 1995. Ferner Peter Hübner：Konsens，Konflikt und Kompromiß. Soziale Arbeiterinteressen und Sozialpolitik in der SBZ/DDR 1945 bis 1970. Berlin 1995.

47 Wilfried Loth：Stalins ungeliebtes Kind. Warum Moskau die DDR nicht wollte. Berlin 1994. Heinrich Potthoff：Bonn und Ost-Berlin 1969-1982. Dialog auf höchster Ebene und vertrauliche Kanäle.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Bonn 1997.

48 Friedrich Dieckmann：Konspiration mit der Vormacht；a. a. O.，S. 92.

49 Peter Bender：Im Gegensatz verbunden. Westdeutsche und ostdeutsche Staatschefs. Merkur，Heft 7/1996，S. 596.

50 Monika Maron：Stille Zeile Sechs. Roman. Frankfurt am Main 1991，S. 200，30，156.

51 Gabriele Baumgartner/Dieter Hebig （Hg.）：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r SBZ/DDR 1945-1990. München 1996 ff. Bernd-Rainer Barth/Christoph Links u. a.：Wer war Wer in der DDR？Ein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Frankfurt am Main 1995.

52 Peter Bender：Im Gegensatz verbunden；a. a. O.，S. 592 ff. Ders.：Episode oder Epoche？Zur Geschichte des geteilte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96.

53 Wilhelm Hennis：Der deutsche Bundestag 1949-1965. Der Monat，215/1966，S. 27 ff.

54 Theodor Eschenburg：Herrschaft der Verbände. Stuttgart 1955，u. a. S. 28 ff.，87.

55 Heinrich G. Ritzel：Kurt Schumacher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72. Willi Albrecht：Kurt Schumacher - Reden，Schriften，Korrespondenzen 1945-1952. Bonn 1985. Arno Scholz/Walter G. Oschilewski：Turmwächter der Demokratie. Ein Lebensbild von Kurt Schumacher. Bd. I：Sein Weg durch die Zeit. Bd. II：Reden und Schriften. Bd. III：Als er von uns ging. Berlin 1953.

56 Hans-Jochen Vogel：Schumachers Werk ist nicht davor gefeit，mißbraucht zu werden. Sein Erbe wirkt in der SPD weiter. Vorwärts，12.10.1985.

57 Brigitte Seebacher-Brandt：Ollenhauer. Biedermann und Patriot. Berlin 1984. Ferner Volker Ulrich：Der Typus eines SPD-Funktionärs alter Schule. Frankfurter Rundschau，17. 11. 1984. Arnulf Baring：Ausersehen，vergessen zu werden. Ollenhauers Weg in die Nachkriegspoliti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6.12. 1984.

58 Petra Weber：Carlo Schmid 1896-1979.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1996.

59 Wilhelm Mommsen：Deutsche Parteiprogramme. Berlin-München 1961，S. 114 ff. Klaus Lompe：Zwanzig Jahre Godesberger Programm der SPD.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7.11.1979，S. 3 ff. Kurt Kotzbach：Der Weg zur Staatspartei. Programmatik，praktische Politik und Organisatio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45 und 1965. Berlin-Bonn 1982.

60 F. R. Allemann：Bonn ist nicht Weimar. Köln 1956.

61 Wolf-Dieter Narr：CDU-SPD. Programm und Praxis seit 1945. Berlin，Köln，Mainz 1966，S. 209 ff.

62 Daniel Koerfer：Kampf ums Kanzleramt. Erhard und Adenauer. Stuttgart 1987.

63 Hans Maier：Die Deutschen und die Freiheit；a. a. O.，S. 19.

64 Hans-Christian Huf（Hg.）：Das Land der großen Mitte；a. a. O.，S. 67. Ferner Volker Hentschel：Ludwig Erhard. Ein Politikerleben. München/Landsberg 1996. Christoph Heusgen：Ludwig Erhards Lehre von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Ursprünge，Kerngehalt，Wandlungen. Stuttgart 1981. Volkhard Laitenberger：Ludwig Erhard. Der Nationalökonom als Politiker. Göttingen 1986.

65 A. J. Nicholls：Freedom with Responsibility.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in Germany 1918-1963. Oxford 1994.

66 Nikolaus Piper：Was würde Erhard heute tun？Die Zeit，24. 5.1996.

67 Ludwig Erhard：Wohlstand für alle. Düsseldorf 1990，S. 23.

68 Hans Georg Lehmann：Chron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49 bis heute. München 1989，S. 51.

69 Hermann Schreiber：Der gute Mensch vom Tegernsee. Der Spiegel，37/1965，S. 27 ff.

70 Der Spiegel，21. 7.1965，S. 18.

71 Johannes Gross：Erhards Regentschaft. Die zweite Kanzlerdemokratie. Der Monat，192/1964，S. 8. Ferner Rüdiger Altmann：Das Erbe Adenauers. Stuttgart 1960. Karl Hermann Flach：Erhards schwerer Weg. Stuttgart 1963.

72 Sigrid Mayer：Friedrich Dürrenmatt. 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 Grundlagen und Gedanken zum Verständnis des Dramas. Frankfurt am Main，Berlin，München 1983. Friedrich Dürrenmatt：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 Komödien Ⅰ. Zürich 1957，S. 355 f.

73 Alexander u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 München 1967，S. 24 ff.，19.

74 Gerd Gaiser：Schlußball. Aus den schönen Tagen der Stadt Neu-Spuhl. München 1958，S. 133.

75 Werner Helwig：Humor aus Verzweiflung. Martin Walsers »Ehen in Philippsburg«. Süddeutsche Zeitung，Jg. 1957.

76 Bernhard Schäfers：Sozialstruktur und Wandel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 Studienbuch zu ihrer Soziologie und Sozialgeschichte. Stuttgart 1981，S. 153.

77 Anton Kehl：Die Arbeitswelt.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 a. O.，S. 162.

78 Heinrich Popitz/Hans Paul Bahrdt u. a.：Das Gesellschaftsbild des Arbeiters. Tübingen 1957.

79 Sibylle Meyer und Eva Schulze：Von Liebe sprach damals keiner. Familienalltag in der Nachkriegszeit. München 1985，S. 172. Ferner Gerhard Wurzbacher：Leitbilder gegenwärtigen deutschen Familienlebens （1951）. Stuttgart 1969. Angela Vogel：Familie.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a. a. O.，S. 107 ff.

80 Joachim Bodamer：Der Mann von heute. Seine Gestalt und Psychologie （1956）. Freiburg，Basel，Wien 1964.

81 Heinrich Böll：Haus ohne Hüter （1954）. München 1981.

82 Siegfried Lenz：Heinrich Bölls Personal. Die Zeit，15. 12. 1967. Ferner Günther Schloz：Der gute Mensch von Köln. Heinrich Böll：Poeta laureatus wider Willen. Deutsche Zeitung/Christ und Welt，27. 10. 1972.

83 Paul Moor （Hg.）：Das Selbstporträt von Jürgen Bartsch. Frankfurt am Main 1972.

84 Jürgen Neven-duMont und Karl Schütz：Kleinstadtmörder. Spur 1081. Hintergründe zum Fall Lebach. Hamburg 1971.

85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Hg.）：Ausländer. 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Heft 201/1984，S. 3 ff.

86 Valentin Siebrecht：Die ausländischen Arbeit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er Hefte，Heft 8/1964，S. 557 f.

87 Elefanten Press （Hg.）：Che，Schah，Shit. Die Sechziger Jahre zwischen Cocktail und Molotow. Berlin 1984，S. 25.

88 Hans Paul Bahrdt：Marxistisches Denken in der deutschen Arbeiterschaft？Die Neue Gesellschaft，Nr. 6/1955. Heinz Kluth，Ulrich Lohmar，Rudolf Tartler：Arbeiterjugend gestern und heute. Heidelberg 1955.

89 Gerd Hardach：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fünfziger Jahre. Restauration und Wirtschaftswunder. Dieter Bänsch （Hg.）：Die fünfziger Jahre. Beiträge zu Politik und Kultur. Tübingen 1985，S. 57 f.

90 Michael Ben：Die Gewerkschaften der 50er Jahre. Elefanten Press （Hg.）：Bikini. Die Fünfziger Jahre. Kalter Krieg und Capri-Sonne. Berlin 1981，S. 130.

91 Hans Willi Weinzen （Hg.）：Viktor Agartz. Partei，Gewerkschaft und Genossenschaft - Wirtschaftspolitische und andere Schriften von Viktor Agartz. Frankfurt am Main 1985.

92 Theo Pirker：Die blinde Macht. Die Gewerkschaftsbewegung in Westdeutschland. Teil 1：1945-1952. Vom »Ende des Kapitalismus« zur »Zähmung der Gewerkschaften«. München 1960.

93 Walter Dirks：Der lange Streik. Frankfurter Hefte，4/1957，S. 234 f.

94 Gerd Hardach：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fünfziger Jahre；a.

a. O. Werner Abelshauser：Die langen fünfziger Jahre.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1966. Düsseldorf 1987. Michael Wildt：Vom kleinen Wohlstand. Eine Konsumgeschichte der fünfziger Jahre. Frankfurt am Main 1994.

95 Günter Grass：Hundejahre. Neuwied-Berlin 1963，S. 513.

96 Max Kruk：Die hundert größten Unternehm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11.1959.

97 William Manchester：Krupp. Zwölf Generationen. München 1968.

98 Karl Unger：Neue Aufgaben für Flick，Krupp & Co. Ober die Kontinuität kapitalistischer Industriepolitik. Vorwärts，17. 8.1985.

99 Roger Gloor：Nachkriegswagen. Personenautos 1945-1960. Bern，Stuttgart 1985，S. 86 ff.

100 Dieter Franck：Die fünfziger Jahre. Als das Leben wieder anfing. München，Zürich 1981，S. 36.

101 Sabine Weißler：Fahnen des Neubeginns. Perlonstrümpfe. Elefanten Press （Hg）：Perlon-Zeit. Berlin 1985，S. 150.

102 Heinz Blüthmann：Der letzte Auftritt eines Alleinunterhalters. Die Zeit，16. 11. 1982.

103 Peter Amstutz/Roland Bunzenthal：Der Aufstieg begann mit dem »Linzer Stüberl«. Frankfurter Rundschau，31. 8.1982.

104 Kurt Pitzkoleit：Gott erhält die Mächtigen. Rückblick und Rundblick auf den deutschen Wohlstand. Düsseldorf 1963. Ders.：Wem

gehört Deutschland？Eine Chronik von Besitz und Macht. München，Wien，Basel 1957. Ders.：Das gebändigte Chaos. Die deutschen Wirtschaftslandschaften. München，Wien，Basel 1965.

105 James Burnham：Das Regime der Manager. Stuttgart 1949.

106 Otto Graf：Die Krankheit der Verantwortlichen und der Gesundheitsschutz des geistigen Arbeiters. Universitas，10/1953，S. 1009 ff.

107 Ernest Zahn：Soziologie der Prosperität. Köln 1960.

108 Jürgen Eick：Jahrhundert des kleinen Manne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4. 11. 1959.

109 Kurt Blauhorn：Alles soll jetzt besser werden. Dieter Franck（Hg.）：Die fünfziger Jahre；a. a. O.，S. 56 f.

110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Das Plebiszit der Verbraucher（1960）. Einzelheiten I. Bewußtseins-Industrie. Frankfurt am Main 1964，S. 168 ff.

111 Sibylle Zehle：Josef Neckermann. Ein dressierter Mann. Die Zeit，4. 6.1982.

112 Ernest Dichter：Strategie im Reich der Wünsche. Düsseldorf 1961.

113 Werbung. Ein bißchen irre. Der Spiegel，Nr. 4/1966，S. 41.

114 Ingeborg Bachmann：Reklame. Karl Otto Conrady （Hg.）：Das große deutsche Gedichtbuch. Kronberg/Ts. 1977，S. 1002.

115 Hans Egon Holthusen：Die Schönheitskönigin. Süddeutsche Zeitung，Jg. 1955.

116 Sabine Weißler：Sexy Sixties. Elefanten Press （Hg.）：Che，Schah，Shit；a. a. O.，S. 96 ff.

117 Angela Delille/Andrea Grohn：Blick zurück aufs Glück. Frauenleben und Familienpolitik in den 50er Jahren. Berlin 1985，S. 67 f. Franz-Josef Wuermeling：Familie - Gabe und Aufgabe. Baden-Baden 1959.

118 Heimweh nach den falschen Fünfzigern. Der Spiegel，Nr. 14/1978，S. 99 f.

119 Hildegard Knef：Der geschenkte Gaul. Frankfurt am Main，Berlin 1981，S. 232.

120 Die gefallene Natur. Der Spiegel，Nr. 19/1966，S. 50 f. Ferner R. Dörner：Das Bild der Frau in der Illustrierten. Das Argument，Nr. 3/1962. E. Becker：Das Bild der Frau in der Illustrierten. Zeugnisse - Th. W. Adorno zum 60.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 1963.

121 Helmut Schelsky：Soziologie der Sexualität. Hamburg 1955. Ferner Hans Btirger-Prinz/Hans Giese （Hg.）：Schriftenreihe zur Sexualforschung. Stuttgart 1952 ff. Hans Giese （Hg.）：Die Sexualität des Menschen. Handbuch der modernen Sexualforschung. Stuttgart 1955. Ludwig Marcuse：Obszön. Geschichte einer Entrüstung. München 1962. Karl Saller：Sexualität heute. München 1967.

122 Hans-Joachim Schoeps：Soll Homosexualität strafbar bleiben？Der Monat，171/1962，S. 19 ff. Peter Bratt：Ober einen zweifelhaften Strafrechtsparagraphen. Ein Streitgespräch. Merkur，Nr. 188/1963，S. 943

ff. Dieter Giese：Die Strafwürdigkeit der Erwachsenen-Homosexualität. Frankfurter Hefte，Heft 9/1967，S. 631.

123 Fritz Bauer：Sexualität，Sitte und ein neues Recht. Die Zeit，11. 2. 1966.

124 Peter Demetz：B. B. Geschichte einer Legend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3. 4. 1985.

125 Vladimir Nabokov：Lolita. Hamburg 1959.

126 Friedrich Sieburg：Nichts da，Leut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 10. 1959. Ferner ders.：Zur Literatur. Hg. von Fritz J. Raddatz. 1957-1963. Stuttgart 1981.

127 Oswalt Kolle：Dein Mann，das unbekannte Wesen. München 1967. Ders.：Deine Frau，das unbekannte Wesen. München 1967.

128 Helmut Thielicke：Sex. Ethik der Geschlechtlichkeit. Tübingen 1966. Der Sexus ist kein Sündenpfuhl. Spiegel-Gespräch mit Professor Dr. Dr. Helmut Thielicke über Moral und Kirche. Der Spiegel，Nr. 49/1985，S. 68 ff.，75.

129 Mädchen überholen die Jungen. Der Spiegel，Nr. 10/1985，S. 89.

130 Otto Brüggemann：Sexuelle Konflikte in Gymnasien. Heidelberg 1967. Ferner Thilo und Hartmut Castner：Sexualrevolution und Schule. Neuwied-Berlin 1970.

131 Sexualkunde-Atlas. Biologische Informationen zur Sexualität des Menschen. Opladen 1969.

132 Helene Rahms：Wer mag da noch lieben？Sexualkunde in der Klempner-Sprach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Jg. 1969. Sexualkunde - heute neu？Informationen der Fachgruppe Gymnasien der 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 im DGB，Nr. 1/1970.

133 Dieter Krusche：Reclams Filmführer. Stuttgart 1977，S. 309.

134 René König：Menschheit auf dem Laufsteg. Die Mode im Zivilisationsprozeß. München 1985. Marietta Riederer：Rückblick auf die Fünfziger Jahre. Süddeutsche Zeitung，19./20. Mai 1984. Mit Pepita voll im Trend. Der neue Kult um die 50er Jahre. Der Spiegel，Nr.14/1984，S. 230 ff.

135 »Stern« vom 6. 8.1954. Elefanten Press （Hg.）：Perlon-Zeit. Berlin 1985，S. 108.

136 Angela Delille/Andrea Grohn：Blick zurück aufs Glück；a. a. O.，S. 112 ff.

137 Karlheinz Graudenz/Erica Pappritz：Etikette neu （1956）. 11. völlig neu bearb. Auflage 1969. Ferner Horst-Volker Krumrey：Entwicklungsstrukturen von Verhaltensstandarden. Eine soziologische Prozeßanalyse auf der Grundlage deutscher Anstands- und Manierbücher von 1870 bis 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138 Angelika Mechtel：Wir sind arm，wir sind reich. Stuttgart 1977，S. 35 f.

139 Alice Schwarzer：Das andere Geschlecht. Die Zeit，13. 5. 1983. Simone de Beauvoir：Das andere Geschlecht （1949）. Reinbek bei Hamburg 1968.

140 Jean-Paul Sartre：Die Flieg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61，S. 70 f. Ferner Michael Th. Greven：Der Einzelne als historisches Subjekt？Kritische Theorie und Sartrescher Existentialismus. Dieter Bänsch（Hg.）：Die fünfziger Jahre. Beiträge zu Politik und Kultur. Tübingen 1985，S. 184 ff.

141 Albert Camus：Ziele der Kunst. Das Schönste，Heft 11/1960，S. 20. Zum Tod des Dichters Albert Camus：Eine Hoffnung ging verloren. Das Schönste，Heft 1/1960，S. 37 f.

142 Wystan Hugh Auden：Das Zeitalter der Angst. Ein dramatisches Gedicht. München 1958，S. 5.

143 Helmuth de Haas：Der Einzelne und die Nachtbar. Das geteilte Atelier. Essays. Düsseldorf 1955，S. 197 f.

144 Françoise Sagan：Bonjour tristesse （1954）. Berlin 1957，S. 9，15，152.

145 Elefanten Press （Hg.）：Perlon-Zeit；a. a. O.，S. 41.

146 Werner Bökenkamp：Ein Zwangsarbeiter der Elendmalerei. Das Leben des Ber-nard Buffe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5. 3.1958.

147 Ingrid Schmidt-Harzbach：Rock’n’Roll in Hanau. Elefanten Press（Hg.）：Perlon-Zeit. Berlin 1985，S. 37 ff.

148 Raymond Loewy：Häßlichkeit verkauft sich schlecht. Düsseldorf 1953. Ferner Odd Brochmann：Über Häßliches und Schönes. Berlin 1956. Christian Borngräber：»Stil novo«. Design in den 50er Jahren. Phantasie und Phantas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9. Andreas Schwarz：Design，Grafik

Design，Werbung.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a. a. O.，S. 222 ff.

149 Waren und Wohnen. Elefanten Press （Hg.）：Bikini；a. a. O.，S. 196. Rainer Raestrup：Alles Plastik. Die schöne Welt der 50er Jahre. Wechselwirkung，Nr. 19/1983，S. 31. W. Glenz：Kunststoffe - ein Werkstoff macht Karriere. München，Wien 1985.

150 Gert Selle：Die Geschichte des Design in Deutschland von 1870 bis heute. Entwicklungen der industriellen Produktkultur. Köln 1978，S. 169.

151 Paul Maenz：Die 50er Jahre. Formen des Jahrzehnts. Stuttgart 1978，S. 134 ff.

152 Kurt Pawek：Das Leben nach 45. magnum，Nr. 24/1959.

153 Irene Zander：Im Märchenwald der modernen Form. Die Mailänder Triennale 1954. Süddeutsche Zeitung，Jg. 1954.

154 Dies.：Tendenzen eines Zeitstils：das Understatement. Beobachtungen auf der Mailänder Triennale 1957. Süddeutsche Zeitung，24./25. 10. 1957. Ferner Gerhard Schön：Mehr als ein Warenhaus. Mailand eröffnet die XI. Triennale. Stuttgarter Zeitung，10. 10. 1957. Giselher Wirsing：Platz an der Sonne für jedermann. Erkenntnisse und Gedanken auf der Triennale in Mailand. Christ und Welt，Nr. 39/1957.

155 Hans Wichmann：Gerät in der Wohnung. Die Wohnung. Bayerischer Werkbund，Heft 3. München 1962，S. 8.

156 Paul Maenz：Die 50er Jahre；a. a. O.，S. 174.

157 Andreas Schwarz：Design，Grafik Design，Werbung；a. a. O.，S. 228 ff.

158 Otl Aicher：innenseiten des kriegs. Frankfurt am Main 1985.

159 Andreas Schwarz：Design，Grafik Design，Werbung；a. a. O.，S. 232.

160 Glas verdrängt die Mauern. Das Schönste，Heft 3/1958，S. 29 ff.

161 Hannelies Taschau：Landfriede. Zürich，Köln 1978，S. 77 f.

162 Der Bungalow. Wohn- und Empfangsgebäude für den Bundeskanzler in Bonn. Pfullingen o. J.

163 Erich Kühn：Die blühende Stadt. Geborgenheit im umschließenden Raum und Nähe zur Natur. Christ und Welt，14. 3. 1957. Ferner Hans Paul Bahrdt：Humaner Städtebau. Hamburg 1968.

164 Anton Henze：Ronchamp. Le Corbusiers erster Kirchenbau. Recklinghausen 1956.

165 Richard Neutra：Wenn wir weiterleben wollen. Erfahrungen und Forderungen eines Architekten. Hamburg 1956.

166 Irene Zander：Nicht Form - sondern Rhythmus. Die Neue Zeitung，Jg. 1951.

167 Ders.：Das Gespenst der Wohnmaschinen. Süddeutsche Zeitung，13./14./15.8.1955.

168 Vittorio M. Lampugnani：Architektur und Stadtplanung.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4 Bde. Bd. 4：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9，S. 212 f. Ferner Alfred Simon （Hg.）：Bauen in Deutschland 1945-1962. Hamburg 1963. Wolfgang Pehnt：Neue deutsche Architektur. Stuttgart 1970. Alexander Mitscherlich：Thesen zur Stadt der Zukunft. Frankfurt am Main 1971. Jürgen Joedicke：Architektur im Umbruch. Geschichte，Entwicklung，Ausblick. Stuttgart 1980.

169 Eberhard Schulz：Der Niedergang der Städt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9. 10. 1977. Ders.：Zwischen Glashaus und Wohnfabrik. Bremen 1959. Ders.：Die Prediger mit dem Reißbrett. Stuttgart 1964.

170 Gerhard Zwerenz：Bericht aus dem Landesinneren. City Strecke Siedl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2，S. 10 f.

171 Camilla Blechen：Zwischen Bauhaus und Zuckerbäcker-Stil. Der Ost-Berliner Architekt Hermann Henselmann wird achtzi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 2. 1985. Hermann Henselmann：»Ich habe Vorschläge gemacht«. Hg. von Wolfgang Schäche. Berlin 1995.

172 Jörn Düwel：Frankfurt an der Oder. Grenzstadt nach Osten. Werner Durth u. a. （Hg.）：1945. Krieg - Zerstörung - Aufbau. Architektur und Stadtplanung 1940-1960. Schriftenreihe der Akademie der Künste. Bd. 23. Berlin 1995. S. 339，344，353.

173 Wolfgang Sachs：Die Liebe zum Automobil. Ein Rückblick in die Geschichte unserer Wünsche. Reinbek bei Hamburg 1984，S. 82. f. Ferner Hans Dollinger：Die totale Autogesellschaft. München 1972. Hermann Glaser：Das Automobil. Eine Kulturgeschichte in Bildern. München 1986.

174 Ulrich Kubisch/Volker Janssen：Borgward - Ein Blick zurück auf Wirtschaftswunder，Werkalltag und einen Automythos. Berlin 1984.

175 Ulrich Kubisch：Motor-Roller mobil. Vom zivilisierten Zweirad zum Fast-Automo-bil. Eine Geschichte der Massenmotorisierung. Berlin 1985.

176 Thomas Weymar：Ein Volk auf Achse. Wechselwirkung，Nr. 19/1983，S. 25.

177 Monika Sperr：Schlager. Das Große Schlager-Buch. Deutsche Schlager 1800-Heute. München 1978.

178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5 Bdn. Bd. 2. Hans-Peter Schwarz：Die Ära Adenauer. Gründerjahre der Republik. 1949-1957. Stuttgart，Wiesbaden 1981，S. 380 f. Ferner Kaspar Maase：Freizeit. In：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 Bd. 2：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214 ff. Stiftung 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g.）：Endlich Urlaub - Die Deutschen reisen. Köln 1996.

179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Vergebliche Brandung der Ferne. Eine Theorie des Tourismus. Merkur，Nr. 126/1958，S. 719 f.

180 Horst Krüger：Camping - ein Sommermärchen. Deutsche Augenblicke. Bilder aus meinem Vaterland. München 1969，S. 266 ff.

181 Stephan Krawczyk：Das irdische Kind. Berlin 1996，S. 37.

182 Erich Dombrowski：Ausflüge - Ausflüchte？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 8. 1957.

183 Carl Diem：Der Sport im heutigen Leben. Gefahren und Aufgaben. Universitas，Heft 5/1955，S. 487 ff.

184 Frank Thieß：Olympia als moralische Idee. Neue Literarische Welt，Jg. 1953.

185 Friedhelm Baukloh：Massensport Fußball. Frankfurter Hefte，Heft 11/1952，S. 859 ff.

186 Elefanten Press （Hg.）：Bikini. Die fünfziger Jahre；a. a. O.，S. 295.

187 Alfred Georg Frei：Finale Grande. Die Rückkehr des Fußballweltmeisters 1954. Berlin. 1994.

188 Heinz Maegerlein：Als der Sport ein Spaß war. Dieter Franck （Hg.）：Die fünfziger Jahre；a. a. O.，S. 170 ff.

189 Günter Gaus：Wo Deutschland liegt. Eine Ortsbestimmung. Hamburg 1983，S. 8，37 ff.，45.

190 Jens Daniel：Ein Lebewohl den Brüdern im Osten. Der Spiegel，Nr. 1/1952，S. 3 ff.

191 Erich Kuby：Das ist des Deutschen Vaterland. 70 Millionen in zwei Wartesälen （1957）；o. O. 1959，S. 194 f.，205. Friedrich Sieburg：Donnerkeil des Plauderer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7. 8. 1957.

192 Norbert Muhlen：Das Land der großen Mitte. Notizen aus dem

Neon-Biedermeier. Der Monat，Nr. 63/1953，S. 237 ff.

193 Gerhard Zwerenz：Ärgernisse - Von der Maas bis an die Memel. Köln 1961. Günther Busch：Gesamtdeutsche Ärgernisse. Merkur，Nr. 165/1961，S. 1093 f.

194 Gerhard Zwerenz：Aus dem Tagebuch eines Geflohenen. Reflexion und Kritik. Der Monat，Nr. 135/1959，S. 45.

195 Peter-Jochen Winters：Er glaubte an das Gute und Humane im Kommunismu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4. 4. 1982. Hartmut Jäckel （Hg.）：Ein Marxist in der DDR - Für Robert Havemann. München 1980. Silvia Müller/Bernd Florath （Hg.）：Die Entlassung. Robert Havemann und di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65/66. Berlin 1996.

196 Eva Müthel：Für dich blüht kein Baum. Frankfurt am Main 1959.

197 Erika von Hornstein：Flüchtlingsgeschichten. 43 Berichte aus den frühen Jahren der DDR. （Neuauflage） Nördlingen 1985.

198 Walter Kempowski：Im Block. Ein Haftbericht. Reinbek bei Hamburg 1969.

199 Bertolt Brecht：Gesammelte Werke. Bd. 9：Gedichte 2. Frankfurt am Main 1967，S. 678.

200 Manfred Hagen：DDR - Juni’53. Die erste Volkserhebung im Stalinismus. Stuttgart 1992. Ilko-Sascha Kowalczuk/Armin Mitter/Stefan Wolle （Hg.）：Der Tag X - 17. Juni 1953. Die »innere Staatsgründung« der DDR als Ergebnis der Krise 1952/54. Berlin 1995.

201 Curtis Cate：Riß durch Berlin. Der 13. August 1961. Hamburg 1980. Jürgen Rühle/Gunter Holzweißig：13. August 1961. Ilse Spittmann（Hg.）：Die Mauer von Berlin. Köln 1981. Werner Müller：Die DDR und der Bau der Berliner Mauer im August 1961.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6. 8. 1986. Hans Georg Lehmann：Mit der Mauer leben？Die Einstellung zur Berliner Mauer im Wandel.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6. 8. 1986. Michael Lemke：Die Berlinkrise 1958 bis 1963. Interessen und Handlungsspielräume der SED im Ost-West-Konflikt. Berlin 1995.

202 »Hoffnung kann enttäuscht werden«. Ernst Bloch in Leipzig. Dokumentiert und kommentiert von Volker Caysa/Petra Caysa/K. D. Eichler/Elke Uhl. Frankfurt am Main 1992.

203 Winfried Stephan/Michael Krüger （Hg.）：Vaterland，Muttersprache. Deutsche Schriftsteller und ihr Staat seit 1945. Berlin 1979，S. 183 ff.

204 Friedrich Torberg：Soll man Brecht im Westen spielen？Monat，Nr. 161/1961，S. 59 f.

205 Kurt Fassmann：Bert Brecht. Drama im Zwielicht. Das Schönste，Heft 11/1959，S. 54 ff.

206 Das Schönste，Heft 9/1965，S. 20.

207 Uwe Johnson：Ingrid Babendererde. Reifeprüfung （1953）. Frankfurt am Main 1985.

208 Heinz Ludwig Arnold （Hg.）：Uwe Johnson. Text & Kritik，Nr.

65/66/1980，S. 22.

209 Uwe Johnson：Mutmaßungen über Jakob. Frankfurt am Main，Hamburg 1962，S. 178 f.

210 Kuno Raeber：Bei Uwe Johnson in Rom. Das Schönste，Heft 5/1962，S. 27 ff.

211 Gerhard Zwerenz：Das gespaltene Wort. Ein Pamphlet. Der Monat，Nr. 143/1960，S. 88.

212 Martin Ahrends：Allseitig gefestigt. Stichwörter zum Sprachgebrauch der DDR. München 1989.

213 Fritz J. Raddatz：Die gespaltene Sprache. Ein deutsch-deutscher Vergleich. Süddeutsche Zeitung，5./6. 4. 1975.

214 Hartmut von Hentig：Berliner Gespräche. Beobachtungen aus Anlaß einer Studienfahrt im März 1961. Merkur，Nr. 165/1961，S. 1063.

215 Bertolt Brecht：Gesammelte Werke. Bd. 5：Stücke 5. Frankfurt am Main 1967，S. 2203.

216 Ders.：Der Tui-Roman. Ebd.，Bd. 12：Prosa 2. Frankfurt am Main 1967，S. 611，626.

217 Klaus Völker：Bertolt Brecht.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1978，S. 405.

218 Gottfried Benn：Probleme der Lyrik. Gesammelte Werke in 8 Bdn. Hg. von Dieter Wellershoff. Bd. 8：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Wiesbaden 1968，S. 2031.

219 Elisabeth Endres：Die Literatur der Adenauerzeit. München 1980，S. 91.

220 Gottfried Benn：Rilke；a. a. O.，Bd. 7：Vermischte Schriften. Wiesbaden 1968，S. 1735.

221 H. G. Evers：Darmstädter Gespräch. Das Menschenbild unserer Zeit. Darmstadt 1950.

222 Eduard Beaucamp：Das programmierte Bewußtsein. Max Bense wird sechzi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Februar 1970. Max Bense：Ausgewählte Schriften in 4 Bdn. Hg. von Elisabeth Walther-Bense. Stuttgart 1997 f.

223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blindenschrift. Frankfurt am Main 1964，S. 58 f. Ders.：Verteidigung der wölfe. Frankfurt am Main 1957，S. 70.

224 Hermann Glaser：Der erfolgreiche Sisyphos. Neues Forum，Nr. 284/285/1977，S. 36 ff. Reinhold Grimm：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Materialien. Frankfurt am Main 1984. Joachim Schickei：Über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Frankfurt am Main 1970.

225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option auf ein grundstück. Verteidigung der wölfe. Frankfurt am Main 1957，S. 68.

226 Ders.：landes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1960. S. 7.

227 Ders.：Die Sprache des »Spiegel« （1957）. Einzelheiten I：Bewußtseins-Industrie. Frankfurt am Main 1964. Ferner ders.：Einzelheiten II：Poesie und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64. Ders.：Deutschland，

Deutschland unter anderm. Äußerungen zur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67.

228 Ders.：Mausoleum. Siebenunddreißig Balladen aus der Geschichte des Fortschritts. Frankfurt am Main （1975）1994，S. 61.

229 Arnold Gehlen：Über die gegenwärtigen Kulturverhältnisse. Merkur，Nr. 100/1956，S. 530.

230 Ders.：Die Seel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 Hamburg 1957.

231 Ders.：Moral und Hypermoral. Wiesbaden 1986，S. 96.

232 Friedrich Sieburg：Die Lust am Untergang - Selbstgespräch auf Bundesebene. Hamburg 1954.

233 Heinrich Böll：Angst vor der Gruppe 47. Merkur，Nr. 209/1965，S. 776.

234 Gunther Groll：Die Gruppe，die keine Gruppe ist. Süddeutsche Zeitung，10. 4. 1948. Reinhard Lettau：Die Gruppe 47. Bericht. Kritik. Polemik. Ein Handbuch. Neuwied，Berlin 1967，S. 56 f.

235 Jürgen von Hollander：Wer und was ist die Gruppe 47？Die Neue Zeitung，16. 5. 1950.

236 Ilse Aichinger：Spiegelgeschichte （1954）. Wo ich wohne. Erzählungen，Dialoge，Ged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63，S. 18.

237 Hans Georg Brenner：Ilse Aichinger - Preisträgerin der Gruppe 47. Die Literatur，1. 6. 1952. Reinhard Lettau：Die Gruppe 47；a. a. O.，S. 77.

238 Reinhard Lettau：Die Gruppe 47；a. a. O.，S. 89.

239 Hermann Glaser：Bölls Aufsätze. Kritiken，Reden - Schnappschußprosa mit Überblende. Hanno Beth （Hg.）：Heinrich Böll. Eine Einführung in das Gesamtwerk in Einzelinterpretationen. Kronberg/Ts. 1975，S. 103 ff.

240 Joachim Kaiser：Die Gruppe 47 und ich. Süddeutsche Zeitung，5. 11. 1958.

241 Günter Grass：Rückblick auf die Blechtrommel. Oder：Der Autor als fragwürdiger Zeuge. Süddeutsche Zeitung，12./13. 1. 1974. Ders.：Die Blechtrommel （1959）. Darmstadt-Neuwied 1984. Franz Josef Görtz：Die Blechtrommel. Attraktion und Ärgernis. Ein Kapitel deutscher Literaturkritik. Darmstadt-Neuwied 1984.

242 Hans Egon Holthusen：Die literarische Opposition. Süddeutsche Zeitung，26. 11. 1960.

243 Reinhard Lettau：Die Gruppe 47；a. a. O.，S. 504.

244 Ebd.，S. 222 f.

245 Peter Handke：Publikumsbeschimpfung und andere Sprechstücke. Frankfurt am Main 1966，S. 46 f. Ferner Rolf Günter Renner：Peter Handke. Stuttgart 1985.

246 Hans Werner Richter und die Gruppe 47. Frankfurt am Main，Berlin，Wien 1981，S. 106 ff. Ferner ders.：Briefe. Hg. von Sabine Cofalla. München 1997.

247 Harold Hurwitz：Die Pressepolitik der Alliierten. Harry Pross（Hg.）：Deutsche Presse seit 1945. Bern，München，Wien 1965，S. 55.

248 Dieter Schröder：Der Anspruch einer Zeitung. Beilage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anläßlich der Ausstellung »40 Jahre Zeitgeschichte - 40 Jahre SZ«. München，15. 11. 1985.

249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 11. 1949. Fern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Das politische Weltgeschehen auf der Titelseite der FAZ vom 1. 11. 1949 bis zum 17. 11. 1980. Mit einem Vorwort von Bruno Dechamps. 2 Bde. Frankfurt am Main，Stuttgart 1980.

250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Journalismus als Eiertanz. Beschreibung einer Allgemeinen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1962）. Einzelheiten I：Bewußtseins-Industrie. Frankfurt am Main 1964，S. 18 ff.

251 Klaus Heinrich Meyer：Zeit und Zeitung.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Der Monat，Nr. 252/1969，S. 104.

252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Die Sprache des »Spiegel«.（1957） Einzelheiten I；a. a. O.，S. 75，90 f. Ferner Paul Sacharnst：Der Spiegel - Entzaubert. Analyse eines deutschen Nachrichtenmagazins. Essen 1961. Dieter Just：Der Spiegel. Arbeitsweise，Inhalt，Wirkung. Hannover 1967. Hans Dieter Jaene：Der Spiegel. Ein deutsches Nachrichten-Magazin. Frankfurt am Main 1968. Franz-Hubert Tobling：Personendarstellung im »Spiegel«. Erläutert an Titel-Stories aus der Zeit der Großen Koalition. Tübingen 1983.

253 Theodor Eschenburg：Ein realistischer Träumer. Gerd Bucerius zum 75. Geburtstag. Die Zeit，15. 5. 1981. Marion Dönhoff wird 75 Jahre

alt. Widersprüche aushalten，Spannungen leben. Die Zeit，30. 11. 1984.

254 Otto B. Roegele：Widerstehen zur rechten Zeit. Abschied von einem Journalisten，der die Gründerzeit verkörperte. Rheinischer Merkur，9. 12. 1983.

255 Christian Schütze/Peter Diehl-Thiele：Ein leidenschaftlicher Erklärer. Zum Tod von Klaus Mehnert. Süddeutsche Zeitung，6. 1. 1984. Christian Schütze：Mehr »Welt« als »Christ«. Zustandsbericht über eine Wochenzeitung. Der Monat，Nr. 244/1969，S. 95 ff.

256 Wilmont Haacke/Günter Pötter：Die politische Zeitschrift. Bd. II：1900-1980. Stuttgart 1982. Janet K. King：Literarische Zeitschriften. 1945-1970. Stuttgart 1974.

257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Dokument aus der Finsternis des »Wirtschaftswun-ders«：»Texte und Zeichen«. Die Zeit，2. 2. 1979. Hans Christian Kosler：Meisterschaft des anonymen Geistes. Zur Kabinetts-Ausstellung »Texte und Zeichen« in Marbach. Süddeutsche Zeitung，17./18. 1. 1981.

258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Verteidigung der wölfe. Frankfurt am Main 1957，S. 85.

259 Hans Jürgen Usko/Günter Schlichting：Kampf am Kiosk. Macht und Ohnmacht der deutschen Illustrierten. Hamburg 1961. Ferner Hans Albert Walter：Die Illustrierten - Schizophrenie als journalistisches Prinzip. I，II，III. Frankfurter Hefte，Heft 3/4/5/1965. Horst Holzer：Illustrierte und Gesellschaft. Zum politischen Gehalt von »Quick«，»Revue« und »Stern«. Freiburg i. Br. 1967. Otto Walter Haseloff：»Stern«. Strategie und

Krise einer Publikumszeitschrift. Mainz 1977.

260 Christian Schütze：Satire verkauft sich gut. Der Monat，Nr. 246/1969，S. 105 ff.

261 Ingrid Langer/El Sayed：Frauenzeitschriften. Frankfurter Hefte，Heft 7/1966，S. 473 f. Ferner Anglika Delille/Andrea Grohn：Blick zurück aufs Glück；a. a. O.，S. 100 ff.

262 Eberhard Stammler：Traumwelt als Konsumware. Konkurrenzkampf unter der Diktatur des Publikumsgeschmacks. Christ und Welt，18. 12. 1964.

263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Der Triumph der Bild-Zeitung oder Die Katastophe der Pressefreiheit. Merkur，Nr. 420/1983，S. 653. Ekkehart Mittelberg：Wortschatz und Syntax der Bildzeitung. Marburg 1967.

264 Kurt Becker：Axel Caesar Springer. Vom Verleger zum politischen Missionar. Die Zeit，27. 9. 1985. Hans Dieter Müller：Der Springer-Konzern. Eine kritische Studie. München 1968.

265 Michael Koetzle （Hg.）：twen. Revision einer Legende. München，Berlin 1995.

266 Werner Ross：Mit der linken Hand geschrieben. Der deutsche Literaturbetrieb. Zürich 1984，S. 46.

267 Günter Eich：Träume （1950）. Träume. Vier Spiele. Berlin，Frankfurt am Main 1959，S. 189.

268 Heinz Schwitzke：Sprich，damit ich dich sehe. Sechs Hörspiele

und ein Bericht über eine junge Kunstform. München 1960，S. 19.

269 Helma Sanders-Brahms：Frieden，Freiheit，gute Butter. Elefanten Press （Hg.）：Perlon-Zeit. Berlin 1985，S. 9.

270 Heinz Werner Hübner：Wandel durch Anordnung. Hörfunk und Fernsehen in vier Jahrzehnten. Die Zeit，2. 8.1985.

271 Rolf Steiniger：Rundfunkpolitik im ersten Kabinett Adenauer. Winfried B. Lerg/Rolf Steiniger （Hg.）：Rundfunk und Politik 1923-1973. Berlin 1975，S. 342.

272 Hans Bausch （Hg.）：Rundfunk in Deutschland. Bd. 3. München 1980，S. 477.

273 Alexander Mitscherlich：Auf dem Weg zur vaterlosen Gesellschaft. Ideen zur Sozialpsychologie. München 1963，S. 423.

274 W. E. Süskind：Literatur - Rundfunk - Fernsehen. Die Deutsche Akademie für Sprache und Dichtung tagt. Süddeutsche Zeitung，Jg. 1955.

275 Elefanten Press （Hg.）：Bikini；a. a. O.，S. 265 f.

276 Peter Grubbe：Freiheit，die ich meine. Der Monat，Nr. 199/1976，S. 88.

277 Jürgen Pelzer：Kritik durch Spott. Satirische Praxis und Wirkungsprobleme im westdeutschen Kabarett （1945-1974）. Frankfurt am Main 1985.

278 Der Berliner Kaputt-Kabarettist Wolfgang Neuss wird sechzig. Nürnberger Zeitung，2. 12. 1983. Wolfgang Neuss：Wir Kellerkinder.

Serenade für Angsthasen. Frankfurt am Main 1983.

279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S. 298 f.

280 György Dalos：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entschuldigt mich. Das Ende des Ostblockwitzes. Frankfurter Rundschau，31. 12. 1993.

281 Victor Klemperer：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Tagebücher 1933-1945. Hg. von Walter Nowojski unter Mitarbeit von Hadwig Klemperer. Berlin 1955.

282 Victor Klemperer：Der Intellektuelle in der Gesellschaft. Aufbau，Heft 7/1946，S. 686.

283 Jens Reich：Vettern im Verrat. Eine Abrechnung mit der DDR-Intelligenz. Frankfurter Rundschau，21. 3. 1992. Ders.：Abschied von den Lebenslügen. Die Intelligenz und die Macht. Berlin 1992，S. 173，51，174.

284 Wolfgang Engler：Jenseits des Machtprinzips. Die Zeit，9. 4. 1993. Ders.：Die ungewollte Moderne. Ost-West Passagen. Frankfurt am Main 1995.

285 Günter Wirth：Gegenkultur aus bildungsbürgerlichem Geis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 4.1995.

286 »Ich bin kein Held，das ist nicht mein Job.« Ein Gespräch mit Heiner Müller über die Rolle der Intellektuellen im SED-Staat. Süddeutsche Zeitung，14./15. 9.1991.

287 Sarah Kirsch：Rückenwind. Gedichte. Ebenhausen bei München

1977，S. 51.

288 Jens Reich：Abschied von den Lebenslügen；a. a. O.

289 Günther Rüther：Die deutsche Literatur - ein Bindeglied der geteilten Nation？Günther Rüther （Hg.）：Kulturbetrieb und Literatur in der DDR. Köln 1987，S. 11.

290 Manfred Jäger：Kultur und Politik in der DDR. 1945-1990. Köln 1994，S. 34.

291 Joachim-Rüdiger Groth：Partei，Staat und Literatur in der DDR - Grundlagen，Interpretationen und Hinweise für den Unterricht. Günther Rüther （Hg.）：Kulturbetrieb und Literatur in der DDR；a. a. O.，S. 59.

292 Manfred Jäger：Kultur und Politik in der DDR；a. a. O.，S. 71.

293 Joachim-Rüdiger Groth：Partei，Staat und Literatur in der DDR；a. a. O.，S. 64 f.

294 Walter Janka：Schwierigkeiten mit der Wahrheit. Reinbek bei Hamburg 1989，S. 105，91，128. Walter Janka：...bis zur Verhaftung. 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Verlegers. Berlin 1993. Ferner Elmar Faber/Carsten Wurm （Hg.）：Autoren-und Verlegerbriefe des Aufbau-Verlages 1945-1969. Berlin 1995.

295 Literatur und Kommunismus. Ein Gespräch zwischen François Bondy und Hans Mayer. Der Monat，Nr. 185/1964，S. 56.

296 Joachim-Rüdiger Groth：Partei，Staat und Literatur in der DDR；a. a. O.，S. 327.

297 Ebd.，S. 69 f.

298 Wolfgang Emmerich：Kl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DDR. Leipzig 1996，S. 200 ff.

299 Volker Bohn：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 Texte und Bilder. Frankfurt am Main 1993，S. 207. Ferner Günter Kunert：Erwachsenenspiele. Erinnerungen. München 1997.

300 Hans-Joachim Maaz：Der Gefühlsstau. Ein Psychogramm der DDR. Berlin 1990，S. 15.

301 Jan Faktor：Von Irrtum umklammert. Die Sonderrolle kritischer DDR-Intellek-tueller im Ostbloc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6. 9.1993.

302 Theodor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 （1966）. Frankfurt am Main 1970，S. 241.

303 Rolf Wiggershaus：Die Frankfurter Schule. Geschichte. Theoretische Entwicklung. Politische Bedeutung. München，Wien 1986，S. 450，492.

304 Max Horkheimer：Notizen von 1950 bis 1969. Dämmerung - Notizen in Deutsch-land. Hg. von Werner Brede. Frankfurt am Main 1974. Ferner Helmut Gummi-or/Rudolf Ringguth：Max Horkheimer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73.

305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schwierige arbeit. In：blindenschrift. Frankfurt am Main 1964，S. 58 f.

306 Max Horkheimer/Theodor W.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1947，1969）. Frankfurt am Main 1971，S. 3 ff. Ferner 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8 Bdn. Hg. von Alfred Schmidt und Gunzelin Schmid Noerr. Frankfurt am Main 1985 ff. Günter Rohrmoser：Das Elend der kritischen 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Herbert Marcuse. Jürgen Habermas. Freiburg im Breisgau 1970. Alfred Schmidt：Zur Ide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Elemente der Philosophie Max Horkheimers. München 1974. Gerhard R. Knapp：Theodor W. Adorno. Berlin 1980.

307 Max Horkheimer/Theodor W.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a. a. O.，S. 35.

308 Georg Picht：Atonale Philosophie. Theodor W. Adorno zum Gedächtnis. Merkur，Nr. 258/1969，S. 892.

309 Rolf Wiggershaus：Die Frankfurter Schule；a. a. O.，S. 667 f.

310 Karl R. Popper：Ein Plädoyer für die intellektuelle Redlichkeit. Claus Grossner：Verfall der Philosophie. Hamburg 1971，S. 287.

311 Theodor W. Adorno：Was ist deutsch？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1966.

312 Alfred Schmidt：Übergang zur verwalteten Welt.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7）. Günther Rühle：Bücher，die das Jahrhundert bewegten. München，Zürich 1978，S. 150.

313 Friedrich P. Kahlenberg：Film.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367.

314 Heinz Ungureit：Film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Filmkritik，Heft 1/1964，S. 13.

315 Paul Heimann：Das deutsche Filmwesen der Gegenwart. Universitas，Heft 4/1959. Martin Osterland：Gesellschaftsbilder in Filmen.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s Filmangebots der Jahre 1949 bis 1964. Stuttgart 1970.

316 Monika Sperr （Hg.）：Schlager. Das Große Schlager-Buch；a. a. O.；Siegfried Schmidt-Joos：Geschäfte mit Schlagern. Bremen 1960.

317 Paul Sethe/Ferdinand Fried/Haris Schwab-Felisch：Das Fundament unserer Zukunft. Bilanz der Ära Adenauer：politisch - wirtschaftlich - kulturell. Düsseldorf，Wien 1964，S. 219 ff.

318 Zehn Jahre deutscher Nachkriegsfilm. Das Schönste，Heft 5/1956，S. 47 ff.

319 Nicola Chiaromonte：Bild und Wort. Anmerkungen zum intellektuellen Film. Merkur，Heft 11/1963，S. 1036 ff. Rolf Dörrlamm：Junger Film - alte Filmhilfe. Der Monat，Nr. 226/1967，S. 49 ff.

320 Peter W. Jansen：Anatomie einer Provokation. Der Modellfall Oberhausen. Merkur，Nr. 243/1968，S. 671.

321 Alexander Kluge：Lebensläufe. Anwesenheitsliste für eine Beerdigung （1962）. Frankfurt am Main 1974.

322 Dieter Krusche：Reclams Filmführer. Stuttgart 1977，S. 193 f.，

217.

323 Urs Jenny：Nach einem Jahr. Der junge deutsche Film. Merkur，Nr. 230/1967，S. 475，478.

324 Peter W. Jansen：Ein Jahr Kinorebellion. Merkur，Nr. 248/1968，S. 1135 ff.

325 Zuschauer，Intendanten，Subventionen. Der Monat，Nr. 80/1955，S. 180，169.

326 Joachim Kaiser：Schauspiel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er Hefte，Heft 5/1952，S. 333 ff.

327 Henning Rischbieter：Theater.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89.

328 Theodor W. Adorno：Theater - Oper - Bürgertum. Der Monat，Nr. 84/1955，S. 532 ff.

329 Hans-Klaus Jungheinrich：Mehr als die Demontage eines Denkmals. Enthüllendes über die Karriere Herbert von Karajans. Frankfurter Rundschau，Jg. 1983. Robert C. Bachmann：Karajan - Anmerkungen zu seiner Karriere. Düsseldorf 1983.

330 Walter Panofsky：Ein »Commonwealth« der Opernhäuser？Bericht über ein Gespräch mit Herbert von Karajan. Das Schönste，Heft 3/1962，S. 15.

331 Bayreuth：Die Götter dämmern. Der Spiegel，Nr. 10/1976，S.

150.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 Stuttgart 1976，S. 154 f.

332 Hartmut Zelinsky：Das erschreckende »Erwachen«，und wie man Wagner von Hitler befreit.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Heft 9/1983，S. 9.

333 Horst Koegler：Manager der Musik. Eine Reise durch das deutsche Konzertleben. Der Monat，Nr. 104/1957，S. 56. Beethoven，Mozart，Brahms beherrschen Europas Konzertsäle. Das Schönste，Heft 9/1958，S. 16 f.

334 Vision eines Lebens - vertont. Die Deutsche Oper am Rhein brachte die Neufassung der Oper »Karl V.« von Krenek. Das Schönste，Heft 5/1958，S. 19.

335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 Stuttgart 1976，S. 144 f. Ferner Joseph Müller-Blattau：Der Weg der zeitgenössischen Oper - von Strawinsky bis Henze. Universitas，Heft 10/1964，S. 1044 f.

336 Wulf Kunold：Bernd Alois Zimmermann：Deutscher Musikrat. Zeitgenössische Mus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eft 3 （1950-1960） zur Schallplatten-dokumentation. Bonn 1982，S. 11 f.

337 Ulrich Dibelius：Musik；a. a. O.，S. 116.

338 Hans Oesch：Einführung in die elektronische Musik. Universitas，Heft 2/1956，S. 170.

339 Karl H. Wörner：Der Komponist Karlheinz Stockhausen und sein Werk für moderne Musik. Universitas，Heft 7/1969，S. 726.

340 Ulrich Dibelius：Musik.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a. a. O.，S. 125.

341 Martin Warnke：Von der Gegenständlichkeit und der Ausbreitung der Abstrakten. Dieter Bänsch （Hg.）：Die fünfziger Jahre. Beiträge zu Politik und Kultur. Tübingen 1985，S. 425 ff.

342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a. a. O.，S. 28 f.

343 Ebd.，S. 21 f.

344 Ebd.，S. 106.

345 Doris Schmidt：Bildende Kunst. Wolfgang Benz （Hg.）：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e.；a. a. O.，S. 195.

346 Martin G. Buttig：Das große Treffen der Abstrakten. Der Monat，Nr. 131/1959，S. 78 f. Ferner documenta. 15. Juli bis 18. September 1955. Reprint der Katalogausgabe. München o. J.

347 Paul Sethe/Ferdinand Fried/Hans Schwab-Felisch：Das Fundament unserer Zukunft；a. a. O.，S. 226.

348 Nationalgalerie/Staatliche Musee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Hg.）：1945-1985. Kuns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usstellungskatalog. Berlin 1985，S. 686.

349 Hat sich die Avant-Garde ergeben？400 Studenten wurden nach ihren Lieblingsautoren befragt und jeder fünfte entschied sich für Thomas Mann. Das Schönste，Heft 6/1959，S. 8.

350 Karl Otto Conrady：Das große deutsch Gedichtbuch. Kronberg/Ts.

1977，S. 948.

351 Hermann Burger：Paul Celans Bilder wissen mehr. Seine »Gesammelten Werke« in 5 Bd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0.12.1983.

352 Wolfgang Ignée：Nihilismus als Luxusartikel. Emil Staigers Rede über »Literatur und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Folgen. Christ und Welt，13. 1. 1967. Ferner Christoph Siegrist：Nationalliterarische Aspekte bei Schweizer Autoren. Rolf Grimminger （Hg.）：Hansers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Bd. 10：Literatu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is 1967. Hg. von Ludwig Fischer. München 1986，S. 670 f. William S. Schlamm：Vom Elend der Literatur. Pornographie und Gesinnung. Stuttgart 1966.

353 Karlheinz Deschner：Kitsch，Konvention und Kunst. Eine literarische Streitschrift. München 1957.

354 Alfred Oberlack：Schulbücher unter dem Dreschflegel. Bad Godesberg 1965.

355 Jürgen Habermas：Wozu noch Philosophie？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Frankfurt am Main 1981，S. 15 ff.

356 Hermann Glaser：Martin Heidegger und die Politik. Ein Dossier. Bundesrepublikanisches Lesebuch. München 1978，S. 120 ff.

357 Karl Jaspers：Notizen zu Martin Heidegger. Hg. von Hans Saner. München，Zürich 1978，S. 75，77.

358 Rolf Hochhuth：Karl Jaspers oder Die Lebensfreundlichkeit. Eine

Erinnerung，die an der Zeit is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 2.1974.

359 Hermann Rudolph：Das Buch als Gewittervogel. Wiedergelesen：Karl Jaspers’ »Wohin treibt die Bundesrepublik？« （1966）.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9.1977.

360 Hans Fischer-Barnicol：Der Glaube als Befreiung. Rudolf Bultmann zum achtzigsten Geburtstag. Christ und Welt，21. 8.1964.

361 Friedrich Gogarten：Verhängnis und Hoffnung der Neuzeit. Stuttgart 1953. Ders.：Der Mensch zwischen Gott und Welt. Heidelberg 1952. Ders.：Jesus Christus，Wende der Welt. Grundfragen der Christologie. Tübingen 1966.

362 Paul Tillich：Gesammelte Werke. Stuttgart 1964.

363 Dorothee Sölle：Das Gespräch zwischen Christen und Marxisten. Merkur，Nr. 238/1968，S. 140. Dies.：Atheistisch am Gott glauben. Beiträge zur Theologie. Olten，Freiburg 1968. Dies.：Phantasie und Gehorsam. Überlegungen zu einer künftigen christlichen Ethik. Stuttgart 1968.

364 Carl Amery：Die Kapitulation oder Katholizismus heute. Reinbek bei Hamburg 1963，S. 23，32，27，10. Ferner ders.：Fragen an Welt und Kirche. 12 Essays. Reinbek bei Hamburg 1967.

365 Franz Sonnenberger：Die Rekonfessionalisierung der bayerischen Volksschule 1945-1950. Zeitschrift für Bayerische Landesgeschichte，Jg. 1982.

366 Christian Geissler：Anfrage. Hamburg 1960. Dieter Lattmann：Die Antwort auf die »Anfrage«. Das Schönste，Heft 10/1960，S. 8.

367 Günter Hollenstein：Die Katholische Kirche. Wolfgang Benz（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 Bd. 2：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245 f.

368 Rolf Hochhuth：Der Stellvertreter. Reinbek bei Hamburg 1963. Bernd Balzer：Rolf Hochhuth. Der Stellvertreter. Grundlagen und Gedanken zum Verständnis des Dramas. Frankfurt am Main，Berlin，München 1986，S. 15，47 f.，50 f.

369 Theodor Pfizer：Erklärung des Ausschusses zum Abschluß seiner Tätigkeit.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8.9.1965.

370 Georg Picht：Die deutsche Bildungskatastrophe. Analyse und Dokumentation. Olten，Freiburg i. Br. 1964.

371 Ders.：Die deutsche Bildungskatastrophe. Dunkel über der pädagogischen Provinz. Christ und Welt. Sonderdruck. Juni 1965，S. 1.

372 Jürgen Habermas：Vom sozialen Wandel akademischer Bildung. Merkur，Nr. 183/1963，S. 413 ff.

373 Helmuth Dolff（Hg.）：25 Jahre Deutscher Volkshochschulverband. Braunschweig 1978.

374 Horst Krüger：Das zerbrochene Haus. 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66，S. 260.

375 Rudolf Wassermann：Justi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Zur Aufarbeitung der NS-Vergangenheit durch die Justiz. Neuwied - Darmstadt o. J. Martin Hirsch/Diemut Majer/Jürgen Meinck （Hg.）：Recht，Verwaltung und Justiz im Nationalsozialismus. Ausgewählte Schriften，Gesetze und Gerichtsentscheidungen von 1933-1945. Köln 1985.

376 Wulf Reimer：NS-Verbrechen：Bilanz nach 26jähriger Ermittlung. Süddeutsche Zeitung，1.3.1984. Adalbert Rückerl （Hg.）：NS-Prozesse. Nach 25 Jahren Strafverfolgung：Möglichkeiten - Grenzen - Ergebnisse. Karlsruhe 1972. Ferner Jörg Friedrich：Die kalte Amnestie. NS-Tät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84.

377 Hans Gresmann：Das Münchener Spektakel um die »Deutschland-Stiftung e. V.«und ihr»Konrad-Adenauer-Preis«. Die Zeit，10. 3.1967.

378 Peter Weiss：Die Ermittlung. Oratorium im 11 Gesängen （1965）. Reinbek bei Hamburg 1969，S. 185 f.

379 Jean Améry：Jenseits von Schuld und Sühne. Bewältigungsversuche eines Überwältigten. München 1966，S. 127.

380 Ralph Giordano：Die zweite Schuld oder Von der Last Deutscher zu sein. Hamburg 1987，S. 11 f.

381 Zygmunt Bauman：Dialektik der Ordnung. Die Moderne und der Holocaust. Hamburg 1992，S. 20.

382 Detlev Claussen：Nach Auschwitz. Ein Essay über die Aktualität Adornos. Dan Diner （Hg.）：Zivilisationsbruch. Denken nach Auschwitz. Frankfurt am Main 1988，S. 57.

第三部分 变革的时代

1 Hans-Peter Schwarz：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politisches Selbstverständnis.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B. 36/1982，S. 3 ff.

2 Hans Maier：Die Deutschen und die Freiheit. Perspektiven der Nachkriegszeit. Stuttgart 1985，S. 19.

3 Axel Schildt：Moderne Zeiten. Freizeit，Massenmedien und »Zeitgeis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r 50er Jahre. Hamburg 1995，S. 20，416 ff. Ferner Kaspar Maase：Bravo Amerika. Erkundungen zur Jugendkultur der Bundesrepublik in den fünfziger Jahren. Hamburg 1993. Bernd Polster （Hg.）：West Wind. Die Ameri-kanisierung Europas. Köln 1995. Alf Lüdtke/Inge Marßolek/Adelheid von Sal-dern （Hg.）：Amerikanisierung. Traum und Alptraum im Deutschland des 20. Jahrhunderts. Stuttgart 1996. Hellmuth Karasek. »Go West！« Eine Biographie der fünfziger Jahre. Hamburg 1996.

4 Karl Markus Michel：Rückkehr zur Fassade. Kursbuch，Nr. 89/1987，S. 127.

5 Peter Merseburger：Grenzgänger. Innenansichten der anderen deutschen Republik. München 1988，S. 87 f.

6 Ebd.，S. 84.

7 Egon Bahr：Zu meiner Zeit. München 1996. Ferner Heinrich Potthoff：Bonn und Ost-Berlin 1969-1982. Dialog auf höchster Ebene und vertrauliche Kanäle.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Bonn 1997.

8 Hans Georg Lehmann：Chron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49 bis heute. München 1989，S. 107 f.

9 Peter Bender：Sind wir unschuldig an dem Monstrum？Schandmauer oder Schutzwall - auf jeden Fall das Ergebnis verfehlter Politik hüben wie drüben. Die Zeit，8. 8. 1986.

10 Johannes Wendt：Zwischen Selbstprüfung und witzigen Anekdoten. Die SDS-Ve-teranen besinnen sich auf ihre Geschichte. Frankfurter Rundschau，4. 7. 1985. Ferner Peter Mosler（Hg.）：Was wir wollten，was wir wurden. Zeugnisse der Studentenrevolte. Reinbek 1988. Rainer Bieling：Die Tränen der Revolution. Die 68er zwanzig Jahre danach. Berlin 1988. Oskar Negt：Achtundsechzig. Politische Intellektuelle und die Macht. Göttingen 1995.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Der Papier-Truthahn. Gedichte 1955-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71，S. 153.

11 Peter Schneider：Lenz. Eine Erzählung. Berlin 1982（1973），S. 37 ff.

12 Herbert Marcuse：O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I. Frankfurt am Main 1965.

13 R. D. Brinkmann/R. R. Rygulla（Hg.）：ACID. Neue amerikanische Szene. Darmstadt 1969，S.11.

14 Hermann Glaser（Hg.）：Jugend-Stil. Stil der Jugend. Thesen und Aspekte. München 1971. Uwe Schmitt：Die Blumenkinder sind lange verblüht. Woodstock - die Suche nach einer Legend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 5.1986.

15 Robert Jungk：Die Zukunft hat schon begonnen. Stuttgart（1952）

o. J.

16 Emil-Peter Müller：Antiamerikanismus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Care-Paket und Cruise Missile. Köln 1986. Dan Diner：»Verkehrte Welten«. Antiamerikanismus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3.

17 Spiegel-Spezial：Die wilden 68er. Die Spiegel-Serie über die Studentenrevolution. Hamburg 1988，S. 29 f.

18 Dieter Baacke：Untergrund. Einblick und Ausblick. Merkur，Heft 6/1970，S. 526 ff.

19 Bernward Vesper：Die Reise. Frankfurt am Main 1977，S. 10.

20 Genia Schulz：Brandblasen der Seele. Zur frühen Prosa und späten Lyrik Rolf Dieter Brinkmanns. Merkur，Heft 11/1985，S. 1015 ff. Rolf Dieter Brinkmann：Erkundungen für die Präzisierung des Gefühls für einen Aufstand：Träume. Aufstände/Gewalt/Morde. Reinbek bei Hamburg 1987. Ferner Gert Ueding：Schrille Stimme. Rolf Dieter Brinkmanns Erzählung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9. 6. 1985. Frank Schirrmacher：Blick in ein Gehirnalbum. Nachgelassene Tagebücher Rolf Dieter Brinkmann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5. 7. 1987.

21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5 Bdn. Bd. 4：Klaus Hildebrand：Von Erhard zur großen Koalition. Geschichte und politisches Klima einer Republik 1963-1969. München 1984，S. 260 f.

22 Hermann Korte：Eine Gesellschaft im Aufbruch.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n sechziger Jahren. Frankfurt am Main 1987，S. 41.

23 Hildegard Weiss：Die Ideologieentwicklung in der deutschen Studentenbewegung. München 1985. Willy Albrecht：Der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DS）. Vom parteikonformen Studentenverband zum Repräsentanten der Neuen Linken. Bonn 1994.

24 Michael Schneider：Demokratie in Gefahr. Der Konflikt um die Notstandsgesetze：Sozialdemokratie，Gewerkschaften und intellektueller Protest （1958-1968）. Bonn 1986.

25 Reinhold Oberlercher：Zweitausend Studenten als harter Kern wollten 1968 das System aushebeln.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8. 4.1988.

26 Hartmut von Hentig：Die große Beschwichtigung. Zum Aufstand der Studenten und Schüler. Merkur，Heft 5/1968，S. 385 ff.

27 Wilfried Röhrich：Geschichte und politisches Klima einer Republik. München 1988，S. 83 f. Ferner Jürgen Habermas：Protestbewegung und Hochschulreform. Frankfurt am Main 1969.

28 Herbert Marcuse：Triebstruktur und Gesellschaft. Ein philosophischer Beitrag zu Sigmund Freud. Frankfurt am Main 1965，S. 186.

29 Theodor W. Adorno：Die gegängelte Musik. Der Monat，Heft 56/1953，S. 182.

30 Peter Weiss：Hölderlin. Stück in zwei Akten. Frankfurt am Main 1971，S. 70，191.

31 Hans Schwerte：Herakles und der Kentaur. Anmerkungen zu Peter

Weiss. Hans Höller （Hg.）：Hinter jedem Wort die Gefahr des Verstummens. Sprachproblematik und literarische Tradition in der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von Peter Weiss. Stuttgarter Arbeiten zur Germanistik，Nr. 201. Stuttgart 1988，S. 2.

32 Hartmut von Hentig：Die große Beschwichtigung. Das Nürnberger Gespräch 1968：Opposition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eiburg im Breisgau 1968，S. 167 f.

33 Spiegel-Spezial：Die wilden 68er；a. a. O.，S. 50.

34 Christian Enzensberger：Versuch über den Schmutz. München 1968.

35 Reimut Reiche：Sexualität und Klassenkampf. Zur Abwehr repressiver Entsubli-m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68.

36 Keine Angst vor dem Elfenbeinturm. Spiegel-Gespräch mit Theodor W. Adorno. Der Spiegel，Nr. 19/1969，S. 204.

37 Max Horkheimer：Notizen 1950 bis 1969 und Dämmerung. Notizen in Deutschland. Hg. von Werner Brede. Frankfurt am Main 1974，S. 210. Ferner Alfred Schmidt （Hg.）：Max Horkheimer heute：Werk und Wirk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38 Theodor W. Adorno：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Zur deutschen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1964.

39 Jean Améry：Jargon der Dialektik. Merkur，Heft 11/1967，S. 1058.

40 Gretchen Dutschke：Rudi Dutschke. Ein deutscher Revolutionär.

Köln 1996.

41 Harald Wieser：Rudi，ein deutsches Märchen. Der Spiegel，Nr. 16/1988，S. 101.

42 Karl Heinz Bohrer：Die Kinder Hitlers？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6. 9.1977. Jillian Becker：Hitlers Kinder？Der Baader-Meinhof-Terror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78.

43 Dieter E. Zimmer：Der lange Marsch durch die eigenen Wesenheiten. Die Zeit，17. 6.1977.

44 Gerhard Mauz：Ein Phänomen der Verzweiflung. Der Spiegel，Nr. 33/1977.

45 Karl-Heinz Janßen：Die schrecklichen entlaufenen Wohlstandskinder. Die Zeit，9. 9.1977.

46 W. Guthermut：Warum Frauen jetzt die Terrorszene beherrschen. Abendzeitung，5. 8.1977.

47 Heinrich Böll：Will Ulrike Meinhof Gnade oder freies Geleit？Gabriele Dietz u. a. （Hg.）：Klamm，Heimlich & Freunde. Die Siebziger Jahre. Berlin 1987，S. 119.

48 Ulrike Marie Meinhof：Deutschland Deutschland unter anderm. Aufsätze und Polemiken. Berlin 1995.

49 Stefan Aust：Der Baader-Meinhof-Komplex. Hamburg 1985，S. 592. Ferner Dorothea Hauser：Baader und Herold. Beschreibung eines Kampfes. Berlin 1997.

50 Ralf Schnell：Die Literatur der Bundesrepublik. Autoren，Geschichte，Literaturbetrieb. Stuttgart 1986，S. 343.

51 Ebd.，S. 33f.

52 Karl Marx：Das Kapital. Dritter Band. In：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Bd. 23. Berlin-Ost 1970，S. 828.

53 Ders.：Auswahl und Einleitung von Franz Borkenau，Frankfurt am Main，Hamburg 1956，S. 56f.

54 Irene Lusk：Che lebt. Eckhard Siepmann：Heiß und kalt. Die Jahre 1945-69. Berlin 1986，S. 575.

55 Frantz Fanon：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Frankfurt am Main 1966. Ferner ders.：Aspekte der Algerischen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69. Ders.：Schwarze Haut，weiße Masken. Frankfurt am Main 1980. Renate Zahar：Kolonialismus und Entfremdung.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Frantz Fanons. Frankfurt am Main 1969. David Daute：Frantz Fanon. München 1970. Detlev Claussen：List der Gewalt. Soziale Revolutionen und ihre Theorien. Frankfurt am Main 1982.

56 Worte des Vorsitzenden Mao Tse-tung. Peking 1967，S. 341 f.

57 Eckhard Siepmann：Heiß und kalt；a. a. O.，S. 516.

58 Ebd.，S. 628.

59 Jürgen Habermas：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von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Neuwied 1962.

60 Wolfgang Fritz Haug：Zur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Kursbuch，Nr. 20/1970，S. 140. Ders.：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1. Ferner Roland Barthes：Mythen des Alltags. Frankfurt am Main 1964.

61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 40 Jahre Nähe und Ferne. Köln 1985，S. 159 ff. Ferner Doris Schmidt：Bildende Kunst. Wolfgang Benz （Hg.）：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schichte in 3 Bdn. Bd. 3：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198 f.

62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a. a. O.，S. 114 f. Ferner Werner Haftmann：Malerei im 20. Jahrhundert. Ein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München 1979. Karl Ruhrberg：Die Gleichzeitigkeit des Gegensätzlichen. Hilmar Hoffmann/Heinrich Klotz：Die Sechziger. Die Kultur unseres Jahrhunderts.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87.

63 Werner Hofmann u. a. （Hg.）：Kunst in Deutschland 1898-1973. Hamburg 1973. Blatt 1963.

64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a. a. O.，S. 130.

65 Ebd.，S. 137 f.

66 Karl Ruhrberg：Die Gleichzeitigkeit des Gegensätzlichen；a. a. O.，S. 178.

67 Gabriel Laub：Siebzig Stunden Filmstrapazen. Die 15. Westdeutschen Kurzfilmtage in Oberhausen. Die Zeit，Nr. 14/1969.

68 Hilmar Hoffmann：Papas Kino stirbt. Hilmar Hoffmann/Heinrich

Klotz：Die Sechziger. Die Kultur unseres Jahrhunderts.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87，S. 189 f.，201.

69 Dieter Krusche：Reclams Filmführer；a. a. O.，S. 645.

70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Die Anarchie der Phantasie. Gespräche und Interviews. Hg. von Michael Töteber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Ders. Die Kinofilme 1. und 2. Hg. von Michael Töteberg. München 1987.

71 Dieter Krusche：Reclams Filmführer；a. a. O.，S. 627.

72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Die Anarchie der Phantasie；a. a. O.，S. 9 f.

73 Georg Hensel：Spielplan. Schauspielführer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Berlin 1986，S. 1524.

74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Österreich，Schweiz. Stuttgart 1976，S. 255 f.

75 Michael Buselmeier：Festspiele für integrierte Arbeiter. Recklinghausen，eine Fiktion in ihrem 23. Jahr. Die Zeit，23. 5.1969.

76 Jerzy Grotowski：Nacktheit auf dem Theater - sittlich oder obszön？Theater heute，Heft 8/1971，S. 1 ff. Ders.：Für ein armes Theater. Zürich 1986.

77 Hans Daiber：Deutsches Theater seit 1945；a. a. O.，S. 257.

78 Erich Wendt über die Vierte Experimenta. Pfingsten，Fest der Rezipienten. Theater heute，Heft 7/1971，S. 32 f.

79 Günther Rühle：Theater in unser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76，S. 189 f.

80 Horst-Eberhard Richter：Die Chance des Gewissens. Erinnerungen und Assoziationen. Hamburg 1986，S. 194.

81 Hermann Vinke：Gustav Heinemann. Bornheim 1986. Rudolf Morsey：Heinrich Lübk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München，Wien，Zürich 1997.

82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5 Bdn. Bd. 5/I. Wolfgang Jäger：Die Innenpolitik der sozialliberalen Koalition 1969-1974. Stuttgart，Mannheim 1986，S. 24 f.

83 Günter Grass über Willy Brandt. »Draußen - Schriften während der Emigration«. Der Spiegel，Jhg. 1966.

84 Gabriele Dietz u. a.（Hg.）：Klamm，Heimlich & Freunde；a. a. O.，S. 18.

85 Wolfgang Jäger：Die Innenpolitik der sozialliberalen Koalition 1969-1974；a. a. O.，S. 154.

86 Arnulf Baring：Ein Politiker auf der Suche nach seiner Heimat. Kritische Anmerkungen zu drei Biographien über Willy Brandt. Die Zeit，5.3.1976. Ferner Carola Stern（in Zusammenarbeit mit Manfred Görtemaker）：Willy Brandt. Reinbek bei Hamburg 1976.

87 Arnulf Baring：Machtwechsel. Die Ära Brandt-Scheel. Stuttgart 1982.

88 Wolfgang Jäger：Die Innenpolitik der sozialliberalen Koalition 1969-1974；a. a. O.，S. 160.

89 Reiner Kunze：Die wunderbaren Jahre. Lyrik. Prosa. Dokumente. Hg. von Karl Corino. Frankfurt am Main，Wien，Zürich 1978，S. 24，26，86.

90 Hans-Joachim Maaz：Der Gefühlsstau；a. a. O.，S. 20.

91 Dorothee Wierling：Die Jugend als innerer Feind. Konflikte in der Erziehungsdiktatur der sechziger Jahre. Hartmut Kaelble/Jürgen Kocka/Hartmut Zwahr （Hg.）：Sozialgeschichte der DDR. Stuttgart 1994，S. 404 ff.

92 Wilma Grossmann：Kindererziehung in der DDR. »Die ewigen Jasager beunruhigen mich！«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Nr. 12/1991，S. 6 ff.

93 Dorothee Wierling：Die Jugend als innerer Feind；a. a. O.，S. 408 f. Ferner Wolf Oschlies：»Lieber rückwärts aus dem Intershop als vorwärts zum nächsten Parteitag！« Bemerkungen zum DDR-Jugendjargo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4. 10. 1986.

94 Wolf Oschlies：»Lieber rückwärts aus dem Intershop als vorwärts zum nächsten Parteitag«；a. a. O.，S. 43.

95 Ulrich Plenzdorf：Die neuen Leiden des jungen W. Frankfurt am Main 1976，S. 26 f.

96 Trabi... find’ich gut. Mit Beiträgen von Heribert Hofner，Harald

Kaiser und Willi Mertens. Hamburg 1990.

97 Hans-Joachim Maaz：Der Gefühlsstau；a. a. O.，S. 31 f.，87. Ferner Heike Trappe：Emanzipation oder Zwang？Frauen in der DDR zwischen Beruf，Familie und Sozialpolitik. Berlin 1996.

98 Irene Böhmöè：Die da drüben. Sieben Kapitel DDR. Berlin 1982.

99 Peter Hübner：Die Zukunft war gestern. Soziale und mentale Trends in der DDR-Industriearbeiterschaft. Hartmut Kaelble/Jürgen Kocka/Hartmut Zwahr （Hg）：Sozialgeschichte der DDR；a. a. O.，S. 171 ff.

100 Frank Böckelmann/Bernhard Ziegler：Freizeit. Wolfgang R. Langenbucher/ 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 （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S. 215 ff.

101 Simone Hain/Stephan Stroux/Michael Schroedter：Die Salons der Sozialisten. Kulturhäuser in der DDR. Berlin 1996. Ulrich Hartung：Arbeiter-und Bauerntempel. DDR-Kulturhäuser der fünfziger Jahre - ein architekturhistorisches Kompendium. Berlin 1997.

102 Hans-Joachim Maaz：Der Gefühlsstau；a. a. O.，S. 72 ff.，119.

103 Sarah Kirsch：Rückenwind. Ebenhausen bei München 1977，S. 18，51.

104 Hans-Peter Lühr：Pluralismus von Identität. Das deutsch-deutsche Kulturbewußtsein. Problemkreise Angewandter Kulturwissenschaft. Hg. von Caroline Y. Robertson Wensauer. Heft 1/1997，Karlsruhe 1997，S. 42.

105 Ralf Rytlewski：Ein neues Deutschland？Der Bürger im Staat. Hg.

von der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aden-Württemberg，Heft 3/1989，S. 153.

106 Gunther Mai：Weimarer Klassik und Nationalkultur i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49-1968. Erfurt 1994（Manuskript），S. 14.

107 Jürgen Scharfschwerdt：Klassikrezeption in Schulbücher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DDR. Politik und Kultur，Nr. 2/1989，S. 65.

108 Iris Häuser：Wir wollen immer artig sein，denn nur so hat man uns gern. Jugendpolitik und das Verhältnis Jugendlicher zu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Der Bürger im Staat. Hg. von der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aden-Württemberg，Heft 3/1989，S. 195. Ferner Barbara Hille/Walter Jaide （Hg.）：DDR-Ju-gend. Opladen 1991.

109 Wolfgang Kühnei：»Doppelte Identität« zwischen offizieller Norm und eigener Erfahrung. DDR-Jugendliche mit ambivalenten Werten und pragmatischer Orientierung im Prozeß der deutsch-deutschen Einheit. Frankfurter Rundschau，7. 10. 1991.

110 Freya Klier：Lüg Vaterland. Erziehung in der DDR. München 1990.

111 Andreas Kühne：Nonkonform in kleinster Auflage. Autonome Zeitschriften in der DDR. Süddeutsche Zeitung，April 1992.

112 Klaus Michael：Feindbild Literatur. Die Biermann-Affäre，Staatssicherheit und die Herausbildung einer literarischen Alternativkultur in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28. 5. 1993，S. 30. Ferner Franz Fühmann：Schneewittchen. Ein paar Gedanken zu zwei jungen Dichtern. Sinn und Form，Nr. 28/1976，S. 1259 ff.

113 Peter Böthig/Klaus Michael （Hg.）：MachtSpiele. Literatur und Staatssicherheit. Leipzig 1993，S. 202 ff.

114 Korruption，wohin man blickt. Das Manifest der ersten organisierten Opposition in der DDR. Der Spiegel，Nr. 1/2/1978. Detlef Pollack：Politischer Protest -Politisch alternative Gruppen in der DDR. Opladen 1996. Ulrike Poppe/Rainer Eckert/Ilko-Sascha Kowalczuk （Hg.）：Zwischen Selbstbehauptung und Anpassung. Formen des Widerstandes und der Opposition in der DDR. Berlin 1996.

115 Rudolf Bahro：Die Alternative. Zur Kritik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 Köln，Frankfurt am Main 1977，S. 14 f.，178. Ders.：Eine Dokumentation. Köln 1977. Heinz Brandt：Die Alternative，die aus dem Kerker kam. Die Arbeiten Rudolf Bahros：erst damit verläßt Stalin den Raum. Frankfurter Rundschau，18.2.1978.

116 Wolf Biermann：Das war’s. Klappe zu. Affe lebt. Ein Nachruf auf die DDR. Die Zeit，2. 3.1990.

117 Ders.：Und als wir ans Ufer kamen. Alle Lieder. Köln 1991，S. 280.

118 Bernd Wagner：Tod der Intelligenz. Das Jahrzehnt nach der Biermann-Ausbürge-rung. Frankfurter Rundschau，20.12.1986.

119 Bernd Wagner：Tod der Intelligenz；a. a. O.

120 Manfred Jäger：Weggegangen，dageblieben，ausgestiegen，mitgelaufen. Verdrängte Konflikte unter Schriftstellern aus der ehemaligen DDR. Frankfurter Rundschau，30. 9.1992.

121 Siegfried Stadler über Peter Ensikat. »Ab jetzt geb ich nichts mehr zu.« Nachrich-ten aus den Ostprovinzen. （München 1993）.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5.2. 1994.

122 Barbara Meyer：Die literarische Satire in der DDR. Neue Zürcher Zeitung，19./20. 4.1986.

123 Antonia Grunenberg：Entgrenzung und Selbstbeschränkung. Zur Literatur der DDR in den achtziger Jahren. Alexander von Bormann：Kulturelle Affinität oder Diskulturalität？Wechselwirkungen in der Literaturentwicklung beider deutscher Staate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3.10. 1987. Heinrich Mohr：Mein Blick auf die Literatur in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1. 3. 1994.

124 Hans Joachim Schädlich：Tanz in Ketten. Zum Mythos der DDR-Literatu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8. 6. 1990.

125 Regina General：Stimme einer Stimmung. Ein Gespräch mit Günter de Bruyn. Die Zeit，9. 3.1990. Günter de Bruyn：Vierzig Jahre. Ein Lebensbericht. Frankfurt am Main 1996.

126 Uwe Kolbe：Mauerschatten，ins Wort verlängert. Schreiben und Schweigen in der DDR. Neue Zürcher Zeitung，10./11. 9.1996.

127 Angela Drescher （Hg.）：Dokumentation zu Christa Wolf：Nachdenken über Christa T. Hamburg 1991.

128 Rolf Michaelis：Zwei Welten in einem Land. Neue Strömungen und Tendenzen in der DDR-Prosa. Die Zeit，16.1.1976. Fritz J. Raddatz：Ein neuer Ton in der Lyrik der DDR：Elegien statt Hymnen. Die Zeit，23.1.1976.

129 Stephan Hermlin：...das Vorrecht der Dichter，vernunftlos zu träumen. Rede auf dem DDR-Schriftstellerkongreß 30. 5. 1978. Frankfurter Rundschau，3. 10. 1978. Ferner Karl Corino：Außen Marmor，innen Gips. Die Legenden des Stephan Hermlin. Düsseldorf 1997.

130 Christoph Hein：Die Zensur ist überlebt，nutzlos，paradox，menschen- und volksfeindlich，ungesetzlich und strafbar. X. DDR-Schriftstellerkongreß. Die Zeit，4.12. 1987.

131 Hans Joachim Schädlich：Tanz in Ketten；a. a. O.

132 Klaus Hensel：Lauter kleine Kriminalgeschichten ...in der Ausstellung über das Literatur-Zensurland DDR. Frankfurter Rundschau，18. 5. 1991.

133 Heimo Schwilk：Mutige Verleger，dankbare Autoren.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19. 4.1991.

134 Manfred Jäger：Das Wechselspiel von Selbstzensur und Literaturlenkung in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4.10.1991，S. 16，24.

135 Die Kirche im Sozialismus：Ein ZEIT-Forum über die Rolle der Protestanten unter der SED-Diktatur. Die Zeit，22.3.1991.

136 Rolf Henrich：Der vormundschaftliche Staat. Reinbek bei

Hamburg 1990.

137 Die Kirche im Sozialismus；a. a. O. Albrecht Schönherr：Kirche im Sozialismus-der beschwerliche Weg der Protestanten in der DDR. Die Zeit，7. 2.1992.

138 Robert E. Goeckel：Die evangelische Kirche und die DDR. Konflikte，Gespräche，Vereinbarungen unter Ulbricht und Honecker. Leipzig 1995.

139 Horst Dähn （Hg.）：Die Rolle der Kirchen in der DDR. Eine erste Bilanz. München 1993. Gerhard Besier：Der SED-Staat und die Kirche. 1969-1990. Die Vision vom »Dritten Weg«. Berlin，Frankfurt am Main 1995.

140 Vom Unverständnis der Amtskirche zur »Kirche von unten«. Frankfurter Rundschau，21. 2. 1992. Ferner Manfred Richter/Elsbeth Zylla （Hg.）：Mit Pflugscharen gegen Schwerter. Bremen o. J.

141 Die Kirche im Sozialismus；a. a. O.

142 Günter de Bruyn：Dieses Mißtrauen gegen mich selbst. Ein Beitrag zum Umgang mit den Stasi-Ak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8. 2.1993.

143 Hans-Jürgen Schmitt：Fast nichts ist wahr，fast alles ist Lüge. Ober die Gefahr，sich auf Stasi-Akten zu verlassen：das Dossier des Schriftstellers Franz Fühmann. Süddeutsche Zeitung，11./12. 12. 1993. Franz Fühmann：»Im Berg«. Texte aus dem Nachlaß. Hg. von Ingrid Prignietz. Rostock 1991. Hans Richter：Franz Fühmann - Ein deutsches Dichterleben. Berlin 1992，Barbara Heinze：Franz Fühmann. Eine

Biographie in Bildern，Dokumenten und Briefen. Rostock 1998.

144 Birgit Lahann：Genosse Judas. Die zwei Leben des Ibrahim Böhme. Berlin 1992.

145 Jan Faktor：Intellektuelle Opposition und alternative Kultur in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1. 3. 1994，S. 32.

146 Hajo Steinert：Die Szene und die Stasi. Die Zeit，29.11.1991.

147 Uwe Wittstock：Von der Stalinallee zum Prenzlauer Berg. Wege der DDR-Litera-tur 1949-1989. München 1989. Alexander Haeder/Ulrich Wüst：Prenzlauer Berg. Besichtigung einer Legende. Berlin 1994.

148 Sascha Anderson：Ein hoffentlich schöner und lang anhaltender Amoklauf. Zum Thema AIM 7423/91.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0. 10. 1991.

149 Iris Radisch：Ein ZEIT-Gespräch mit Sascha Anderson. Die Zeit，1. 11. 1991.

150 Joachim Gauck über den Umgang der Deutschen mit ihrer Vergangenheit. Frankfurter Rundschau，28. 1. 1995. Ferner Walter Süß：DDR-Staatssicherheit gegen Bürgerrechtler. Das Parlament，4. 1. 1991. Lienhard Wawrzyn：Der Blaue. Das Spitzelsystem der DDR. Berlin 1991.

151 Joachim Walther：Wider die eilfertigen Rechercheure. Ein paar Beispiele und einige Grundsätze zur gegenwärtigen Debatte um Schriftsteller，Literatur und Staatssicherhei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7. 1. 1993.

152 Ders.：Sicherungsbereich Literatur. Berlin 1996. Ferner Jürgen Fuchs：Landschafter der Lüge. Schriftsteller im Stasi-Netz. 5 Teile；a. a. 0.，Der Spiegel Nr. 47-51/1991.

153 Jens Reich：Abschied von den Lebenslügen：a. a. O.，S. 43.

154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Baukasten zu einer Theorie der Medien. Kursbuch，Nr. 20/1970，S. 159 ff. Martin Walser：Über die neueste Stimmung im Westen. Kursbuch，Nr. 20/1970，S. 19 ff.

155 Fritz J. Raddatz：Zur deutschen Literatur der Zeit. 2. Die Nachgeborenen. Leseerfahrungen mit zeitgenössischer Literatur. Reinbek bei Hamburg 1987，S. 146.

156 Volker Ludwig/Detlef Michel：Eine linke Geschichte. Theaterstück mit Kabarett. Berlin 1980，S. 107 f.

157 Jörg Bopp：Trauer-Power. Zur Jugendrevolte 1981. Kursbuch，Nr. 65/1981，S. 155.

158 W. D. Narr：Die Generation der Ausgeschlossenen. Die Zeit，20.1.1978.

159 Klaus Laermann：Kneipengerede. Zu einigen Verkehrsformen der Berliner »linken« Subkultur. Kursbuch，Nr. 37/1974. Franz Dröge/Thomas Krämer-Badoni：Die Kneipe. Zur Soziologie einer Kulturform. Frankfurt am Main 1987.

160 Andi Bauer：Mit Hammer，Sichel und Gitarre. Linke Off-Kultur der Siebziger. Gabriele Dietz u. a.（Hg.）：Klamm，Heimlich & Freunde；a. a. O.

161 Thomas Ziehe：Pubertät und Narzißmus. Sind Jugendliche entpolitisiert？Frankfurt am Main-Köln 1975. Ders.：Worum geht es in der Narzißmus-Diskussion？Neue Sammlung，Heft 2/1981.

162 Heiratsanzeige. Die Zeit，18. 7.1980.

163 Helmut Heißenbüttel：Das Ende der Alternative. Einfache Geschichten. Stuttgart 1980，S. 16.

164 Rolf Schneider：Die Grünen - ein Unglück. Der Spiegel，Nr. 13/1980，S. 38 f.

165 Jörg Bopp：Wir machen es jetzt. Zur Moral der Jugendlichen. Kursbuch，Nr. 60/1980，S. 30 ff.

166 Peter Henkel：Nur noch 30 Prozent halten die Technik für einen Segen. Frankfurter Rundschau，6. 3. 1982.

167 Jörg Bopp：Wir machen es jetzt；a. a. O.，S. 42.

168 Denis Meadows：Die Grenzen des Wachstums. Bericht des Club of Rome zur Lage der Menschheit. Stuttgart 1972.

169 Karl-Werner Brand：Kontinuität und Diskontinuität in den neuen sozialen Bewegungen. Roland Roth/Dieter Rucht （Hg.）：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1987，S. 31.

170 Herbert Gruhl：Ein Planet wird geplündert. Schreckensbilder unserer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5.

171 Erhard Eppler：Ende oder Wende？Von der Machbarkeit des Notwendigen. Stuttgart，Berlin，Köln，Mainz 1975.

172 Helke Sander vor der Delegiertenkonferenz des 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Studentenbundes 1968. Roland Roth/Dieter Rucht （Hg.）：Neue soziale Bewegungen；a. a. O.，S. 91.

173 Alice Schwarzer：So fing es an！Die neue Frauenbewegung. München 1983，S. 24.

174 Marie-Luise Weinberger：Aufbruch zu neuen Ufern？Grün-Alternative zwischen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Bonn 1984，S. 45. f. Ferner Marielouise Janssen-Jur-reit：Sexismus. Über die Abtreibung der Frauenfrage. München 1976.

175 Richard Sennett：Die Tyrannei der Intimität. Entstehung und Verfall der öffentlichen 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1982.

176 Nicolas Born：Die erdabgewandte Seite der Geschichte. Reinbek bei Hamburg 1979. Gerhard Roth：Winterreise. Frankfurt am Main 1978. Hannelies Taschau：Landfriede. Zürich，Köln 1978. Karin Struck：Trenn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8. Peter Handke：Die linkshändige Frau. Frankfurt am Main 1976. Gabriele Wohmann：Abschied für länger. Neuwied，Darmstadt 1965. Dies.：Ernste Absicht. Neuwied，Darmstadt 1970. Martin Walser：Ein fliehendes Pferd. Frankfurt am Main 1978. Ders.：Jenseits der Liebe. Frankfurt am Main 1976. Ders.：Seelenarbeit. Frankfurt am Main 1979. Ferner Edgar Wilhelm：Das Ende von Beziehungen. Trennungsproblematik in der gegenwärtigen Literatur. Buch & Bibliothek，Nr. 4/1984，S. 321 ff.

177 Botho Strauß：Rumor. München 1980，S. 47.

178 Martin Koschorke：Zweitfamilien und Zweitpartnerschaften. Zur

Struktur und Dynamik zusammengesetzter Beziehungssysteme. Referat （Manuskript） zur Tagung der IUFO，Kommission für Ehe und Eheberatung. Stein bei Nürnberg，Juni 1983，S. 16.

179 Heinz-Günter Vester：Thanatos’ Wiederkehr - AIDS. Universitas，Heft 4/1986，S. 371 ff.

180 Hubert Fichte：Geschichte der Empfindlichkeit. 17 Bde. Frankfurt am Main 1987 ff. Volker Hage：Die Geschichte der Empfindlichkeit. Hubert Fichte und sein monumentaler Romanzyklus：Der verborgene Selbstentblößer. Die Zeit，9. 10. 1987. Hubert Fichte：Hotel Garni. Frankfurt am Main 1987. Ders.：Homosexualität und Literatur 1. Frankfurt am Main 1987.

181 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Die Zeit drängt. Eine Weltversammlung der Christen für Gerechtigkeit，Frieden und die Bewahrung der Schöpfung. München 1986，S. 115.

182 Robert Jungk：Der Jahrtausendmensch. München，Gütersloh，Wien 1973. Ders.：Der Atomstaat. Vom Fortschritt in die Unmenschlichkeit，München 1977. Ders.：Zukunftswerkstätten. Hamburg 1981. Ders.：Ermutigung. Streitschrift wider die Resignation. Berlin 1987.

183 Fritjof Capra：Wendezeit. Bausteine für ein neues Weltbild. Bern，München，Wien 1986. Ferner Carlos Castaneda：Der Ring der Kraft. Der zweite Ring der Kraft. Das Feuer von innen. Die Kraft der Stille. Frankfurt am Main 1979-1986. Franz-Xaver Kaufmann：Religion und Modernität. Johannes Berger （Hg.）：Die Moderne - Kontinuitäten und Zäsuren. Göttingen 1986. Peter Jennrich：Die Okkupation des Willens. Macht und Methoden der neuen Kultbewegungen. Hamburg 1985. Sekten.

Kursbuch，Nr. 55/1979. Willy Hochkeppel：Nebelwerfer als Aufklärer. Merkur，Heft 9/10/1985.

184 Günther Schiwy：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lorenen Einheit. New-Age-Spiritualität und Christentum. Buch & Bibliothek，Heft 40/1988，S. 186 ff. Johann Baptist Metz：Theologie angesichts der späten Moderne. Kursbuch，Nr. 422/1983，S. 904 f.

185 Jörg Bopp：Psycho-Kult - kleine Fluchten in die großen Worte. Kursbuch，Nr. 82/1985.

186 Adolf Holl：Wassermannzeit. Kursbuch，Nr. 86/1986，S. 17.

187 Rudolf Bahro：Logik der Rettung. Wer kann die Apokalypse aufhalten？Stuttgart 1987.

188 Hans Küng：Unfehlbar？Eine Anfrage. Köln 1975.

189 Ders.：Die alte Inquisition ist tot，es lebe die neue. Die Zeit，4.10.1985.

190 Hans-Ulrich Jörges：Aachen - ein Katholikentag der zwei Kulturen. Verhinderte Reise in die Innerlichkeit. Süddeutsche Zeitung，13./14. 9. 1986.

191 Robert-Julius Nüsse：Zeitansage oder Markt.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tage. Frankfurter Rundschau，Beilage zum 22. Deutschen Evangelischen Kirchentag in Frankfurt am Main vom 17.-21. 6. 1987.

192 Carl Amery：Bitte keine Panik an den Notausgängen. Über den

Glanz und die Gefahren des laufenden Fantasy-Booms. Titel，Heft 1/1985，S. 50.

193 Gundolf S. Freyermuth：Software Fantasy. Frankfurter Rundschau，3. 3. 1984.

194 Michael Ende：Die unendliche Geschichte. Stuttgart 1979，S. 168.

195 Marieluise Christadler：Opfer oder Retter der Gesellschaft？Die Rolle des Kindes in der Jugendliteratur. Horst Rabe （Hg.）：Jugend. Beiträge zum Verständnis und zur Bewertung der Jugendrevolten. Konstanz 1984，S. 125.

196 Jürgen Habermas：Stichworte zur »Geistigen Situation d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79，S. 30 f.

197 John Kenneth Galbraith：Die Zukunft der Städte im modernen Industriesystem -Konzept der organischen Stadt. Rettet unsere Städte jetzt！Vorträge，Aussprachen und Ergebnisse der 16. Hauptversammlung des Deutschen Städtetages vom 25.-27. 5.1971 in München. Stuttgart 1971，S. 16.

198 Olaf Schwencke/Klaus H. Revermann/Alfons Spielhoff：Plädoyers für eine neue Kulturpolitik. München 1974. Ferner Hermann Glaser/Karl Heinz Stahl：Die Wiedergewinnung des Ästhetischen. München 1974 （aktualisiert und erweitert：Bürgerrecht Kultur. Frankfurt am Main，Berlin，Wien 1983）. Städtische Kulturpolitik. Empfehlungen，Richtlinien und Hinweise des Deutschen Städtetages zur Praxis städtischer Kulturpolitik 1946 bis 1970. Stuttgart 1971. Kultur in den Städten. Eine Bestandsaufnahme. Bearb. von Gerald Kreißig/Heidemarie Tressler/Jochen

von Uslar. Stuttgart 1979. Hilmar Hoffmann：Kultur für alle. Perspektiven und Modelle. Frankfurt am Main 1979. Stadt und Kultur. Arbeitshilfen des Deutschen Städtetages zur städtischen Kulturpolitik. Bearb. von Jürgen Grabbe. Stuttgart 1986. Kultur vor Ort. Hinweise und Materialien zur Förderung der offenen Kulturarbeit in den Städten. Von Gerald Kreißig und Jürgen Grabbe. Stuttgart 1987. Manfred Abelein，Die Kultur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d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öln，Opladen 1968.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 Hilmar Hoffmann：Kultur für mor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5. Erna Hekkel/Horst Keßler/Dieter Ulle/Klaus Ziermann u. a.（Hg.）：Kultur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von 1949 bis zur Gegenwart. Köln 1987.

199 Norbert Sievers：»Neue Kulturpolitik«. Programmatik und Verbandseinfluß am Beispiel der Kulturpolitischen Gesellschaft. Hagen 1988.

200 Odo Marquard：Die Unvermeidlichkeit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Universitas，Heft 1/1987，S. 21 ff.

201 Michael Rutschky：Erfahrungshunger. Ein Essay über die siebziger Jahre. Köln 1980，S. 263.

202 Jörg Bopp：Wir machen es jetzt. Zur Moral der Jugendlichen. Kursbuch，Nr. 60/1980，S. 29. Hans Rombeck/Frank König：Pink Floyd. Bergisch Gladbach 1981.

203 Mark Hertsgaard：The Beatles. Die Geschichte ihrer Musik. München 1995.

204 Michael Rutschky：Wartezeit. Ein Sittenbild. Köln 1983，S. 227 ff.

205 Dieter Baacke：Jugend und Jugendkulturen. Darstellung und Deutung. Weinheim，München 1987，S. 151 ff.

206 Dieter Baacke：Bewegung beweglich machen Oder：Plädoyer für mehr Ironie. Dieter Baacke u. a. （Hg.）：Am Ende - postmodern？Next Wave in der Pädagogik. Weinheim，München 1985，S. 197.

207 Helmut Fritz：Das Gegenbild der Protestgeneration. Yuppies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Rundschau，27. 12. 1986. Ferner Matthias Horx：Aufstand im Schlaraffenland. Selbsterkenntnisse einer rebellischen Generation. München 1989.

208 Marie-Luise Weinberger：Von der Müsli-Kultur zur Yuppie-Kultur. Über den sozialen Wandel in innerstädtischen Revieren von Ballungsgebieten.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Heft 4/1987，S. 353 ff.

209 Claus Leggewie：Jeder sei mutig auf seinem Platz. Nicht Superstars und große Programme，nur ein neues akademisches Milieu kann die Universitäten noch beleben. Die Zeit，20. 5.1986.

210 Bernd Erich Heptner：Als Hochsprache und Literatur verpönt waren. Geschichte eines Kulturkampfe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9. 10. 1987.

211 »... der jugendfrohe Anfang der Tyrannis«. Schule & wir，Heft 6/1977.

212 Klaus Mollenhauer：Vergessene Zusammenhänge. Über Kultur und Erziehung. München 1983. Konrad Wünsche：Ideologiekritik und Emanzipation sind passé. Kultur erzieht sich selbst. Klaus Mollenhauer bricht mit seiner pädagogischen Vergangenheit. Die Zeit，27.1.1984.

213 Jürgen Zimmer：Eine （fiktive） Berliner Kindheit. Pychosozial，Nr. 17/1983，S. 7 ff. Ders.：Der lange Marsch. Die Zeit，2./3. 1984. Ders.：Die vermauerte Kindheit. Weinheim，Basel 1986.

214 Ekkehart von Braunmühl：Antipädagogik. Studien zur Abschaffung der Erziehung. Weinheim，Basel 1976. Ders.：Zeit für Kinder. Frankfurt am Main 1978. J. Oelkers/T. Lehmann：Antipädagogik. Herausforderung und Kritik. Braunschweig 1983. Michael Winkler：Stichworte zur Antipädagogik. Elemente einer historischsystematischen Kritik. Stuttgart 1982.

215 Michael Winkler：Über das Pädagogische an der Antipädagogik. Zeitschrift für Pädagogik，Heft 1/1985，S. 75. Schule & Reform. Bestandsaufnahme und Perspektiven. Die Horen，Heft 121/1981，S. 3. Hartmut von Hentig：»Die Menschen stärken，die Sachen klären.« Ein Plädoyer für die Wiederherstellung der Aufklärung. Stuttgart 1985.

216 Andreas Kilb：Gesang von Amseln und alten Meistern. Über die Lyrikerin Ulla Hahn und den Zustand des deutschen Gedichts. Die Zeit，25. 3. 1988.

217 Pina Bausch. Theatertanzgeschichten von Raimund Hoghe. Mit Fotos von Ulli Weiss. Frankfurt am Main 1986，S. 7. Norbert Servos：Pina Bausch - Wuppertaler Tanztheater oder Die Kunst，einen Goldfisch zu dressieren. Seelze 1997.

218 Horst Koegler：Tanztheater. Ballett-Jahrbuch 1986. Petra Schaeber：Flirten，Kokettieren，Anmachen，Aufreißen. Statt »Schwanensee« Geschlechterkampf. Vorwärts，19. 1. 1985.

219 Wim Wenders/Sam Shepard：Paris，Texas. Drehbuch. Nördlingen 1985.

220 Peter Buchka：Wim Wenders triumphiert in Cannes. Sein Film »Paris，Texas« erschließt eine neue Dimension des Kinos. Süddeutsche Zeitung，22. 5. 1984. Ders.：Augen kann man nicht kaufen. Wim Wenders und seine Filme. Frankfurt am Main 1985.

221 Dieter Wellershoff：Fromme Lügen. Zur Diskussion：Wim Wenders，»Paris，Texas«. Die Zeit，15. 2. 1985.

222 Jörg von Uthmann：Zweischneidiges Lob. Wim Wenders im Spiegel amerikanischer Kriti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Jg. 1987. Gerhard Bechtold：Der »Fall Wenders« oder：die Kolonialisierung der Gehirne？Filmfaust，Nr. 37/1984，S. 32 ff.

223 André Müller spricht mit Wim Wenders über seinen Film »Der Himmel über Berlin«. Der Spiegel，Nr. 43/1987，S. 230 ff.

224 Norbert Grob：Alle Helden sind Engel. »Der Himmel über Berlin« und das Kino des Wim Wenders：neue Räume，Erfahrungen und Geschichten - Stimmen und Bilder einer Stadt. Die Zeit，30. 10. 1987. Wim Wenders/Peter Handke：Der Himmel über Berlin - ein Filmbuch. Frankfurt am Main 1987.

225 Nationalgalerie/Staatliche Musee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a.r.penck. Ausstellung und Katalog：Lucius Grisebach in Zusammenarbeit

mit Thomas Kirchner und Toni Stooss. München 1988，S. 16.

226 Heinrich Böll：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oder：Wie Gewalt entsteht und wohin sie führen kann. Köln 1974.

227 Georg Alexander Heussen：Medientaktik. Nach dem Geiseldrama. Über das Abwägen von Ziel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2. 8.1988.

228 Reinhold Krämer：Nachliterarische Zeiten？Schreiben und Lesen in der Computer- und Mediengesellschaft. Bertelsmann Briefe；121/1987，S. 14 ff. Otto B. Roegele （Hg.）：Die Presse in der deutschen Medienlandschaft. Themenheft 6.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1985.

229 Janet K. King：Literarische Zeitschriften 1945-1970. Stuttgart 1974.

230 Jürgen Busche：Das Ende eines Anfangs. »Alternative« - Zur Einstellung einer Zeitschrif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6.12.1982.

231 Andreas Proksa：taz. Criticon，Heft 107/1988，S. 120.

232 Lutz Küche：Strukturwandel auf dem Zeitschriftenmarkt. Harter Kampf um die Leser.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3. 7.1987.

233 Bernd-Jürgen Martini：Tendenzwende auf dem Zeitschriftenmarkt. Die Titelflut ebbt langsam ab.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15. 7.1988.

234 Hermann Kurzke：Die Dauerhaftigkeit der Kurzlebigen. Eine geht，eine kommt：Zur Lage der Kultur und Literaturzeitschrif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1. 3. 1988. Josef Quack：Ein notwendiger Luxus. Zur Situation der Kulturzeitschrif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6.1.1984.

235 Frank Schirrmacher：Ein Ende. »Westermann’s«，die Yuppies und die Kulturzeitschrif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1.1987.

236 Peter Glotz：Der streitbare Linkskatholik. Zum Tode des politischen Publizisten Eugen Kogo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0.12.1987.

237 Erich Kuby：Der Fall »Stern« und die Folgen. Hamburg 1983.

238 ZEIT-Dossier：Die Magazin-Maschine. Der »Spiegel« von innen. Die Zeit，25. 9. 1987. Erich Kuby：»Der Spiegel« im Spiegel. Das deutsche Nachrichten-Magazin -kritisch analysiert. München 1987. Martin Walser über Rudolf Augstein und den »Spiegel«. Mit keiner Seite dauerhaft befreundet. Der Spiegel，Nr. 8/1987，S. 248.

239 Reinhard Baumgart：Postmoderne - Fröhliche Wissenschaft？Die Zeit，16. 10. 1987.

240 Michael Köhler：Postmodernismus. Ein begriffsgeschichtlicher Überblick. Amerikastudien，Nr. 22/1977. Charles Jencks：Die Sprache der postmodernen Architektur. Stuttgart 1980. Albrecht Wellmer：Zur Dialektik vo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Vernunftkritik nach Adorno. Frankfurt 1985. Burghart Schmidt：Postmoderne - Strategien des Vergessens. Ein kritischer Bericht. Darmstadt 1986. Christa Bürger/Peter Bürger （Hg.）：Postmoderne：Alltag，Allegorie und Avantgarde. Frankfurt am Main 1987. Jacques Le Rider/Gérard Raulet （Hg.）：Verabschiedung der （Post-）

Moderne？Eine interdisziplinäre Debatte. Tübingen 1987. Rolf Günter Renner：Die postmoderne Konstellation. Theorie. Wolfgang Welsch（Hg.）：Wege aus der Moderne. Schlüsseltexte der Postmoderne-Diskussion. Weinheim 1988. Text und Kunst im Ausgang der Moderne. Freiburg 1988. Heinrich Klotz：Kunst im 20. Jahrhundert - Moderne，Postmoderne，Zweite Moderne. München 1994.

241 Jürgen Habermas：Der Eintritt in die Postmoderne. Merkur，Nr. 421，Heft 7/1983，S. 752.

242 Friedrich Nietzsche：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Karl Schlechta（Hg.）：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I. Frankfurt am Main，Berlin，Wien 1969，S. 267.

243 Umberto Eco：Nachschrift zum »Namen der Rose«. München，Wien 1984，S. 78 f.

244 Jean-François Lyotard：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postmodern？Ders.：Das postmoderne Wissen. Ein Bericht. Wien 1986.

245 Jürgen Habermas：Die Moderne - 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I-IV）. Frankfurt am Main 1981.

246 Wolfgang Welsch：Unsere postmoderne Moderne. Weinheim 1987. Ders.：Vernunft. Die zeitgenössische Vernunftkritik und das Konzept der transversalen Vernunft. Frankfurt am Main 1995. Christoph Menke/Martin Seel（Hg.）：Zur Verteidigung der Vernunft gegen ihre Liebhaber und Verächter. Frankfurt am Main 1993. Peter Koslowski：Die postmoderne Kultur. Gesellschaftlich-kulturelle Konsequenzen der technischen Entwicklung. München 1988.

247 Helmut F. Spinner：Wissenschaft kommt nicht von Wissen，und Kunst kommt nicht von Können，aber Wissenschaft ist trotzdem keine Kunst. Merkur，Heft 9/10/1985，S. 861 ff.

248 Ulrich Beck：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Zu einer Theorie reflexiver Modern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3，S. 194. Ders.：Risiko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86.

249 Peter Sloterdijk：Kritik der zynischen Vernunft. Bd. 1. Frankfurt am Main 1983，S. 36 f.

250 Michael Rutschky：Über die Postmoderne. München und die Lebenskunst. Unterordnung der Wahrheit unter den Reiz. Frankfurter Rundschau，28. 2. 1987.

251 Bernd Guggenberger：Sein oder Design. Die Dialektik der Abklärung. Berlin 1987，S. 29.

252 Niklas Luhmann：Liebe als Passion. Zur Codierung von Intimität. Frankfurt am Main 1982，S. 110.

253 Jörg Bopp：Wir wollen keine neuen Herren. Streitschriften zur Jugend- und Psycho-Szene. Frankfurt am Main 1982，S. 106 f.，101 ff.

254 Nürnberger Neue Lehrerzeitung，Heft 1/1986，S. 7.

255 Reinhard Baumgart：Verfluchte Passanten-Welt. Erotik des Trauerns：»Paare，Passanten«. Die Zeit，25. 9. 1981.

256 Botho Strauß：Paare，Passanten. München，Wien 1981，Einbandtext.

257 Joachim Kaiser：Botho Strauß geht aufs Ganze. Wie sich der Autor vom dialektischen Denken freimacht. Süddeutsche Zeitung，14. 10. 1981.

258 Botho Strauß：Niemand anderes. München，Wien 1987，S. 152.

259 Ders.：Kalldewey Farce. München，Wien 1981，S. 50 f.

260 Thomas Anz：Die neue Überheblichkeit. Der Dichter als Priester und Prophet. Anmerkungen zu Botho Strauß und Peter Handk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7. 4. 1982.

261 Peter Handke：Die Stunde der wahren Empfind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5，S. 81.

262 Ders.：Über die Dörfer. Frankfurt am Main 1981，S. 120 f.

263 Werner Hofmann：Sehendes Sehen. Versuch über Max Imdahl. Merkur，Heft 12/1996.

264 Walter Grasskamp：Die unbewältigte Moderne. Kunst und Öffentlichkeit. München 1989. Rüdiger Bubner：Ästhetische Erfah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9.

265 Peter Iden：Die 9. »documenta« gleicht der Erklärung eines Bankrotts. Frankfurter Rundschau，13. 6. 1992.

266 Wolfgang Welsch（Hg.）：Die Aktualität des Ästhetischen. München 1993，S. 15.

267 Ders.：Ästhetisches Denken. Stuttgart 1991，S. 10，57.

268 Andreas Huyssen：Postmoderne - eine amerikanische

Internationale？Andreas Huyssen/Klaus R. Scherpe （Hg.）：Postmoderne. Zeichen eines kulturellen Wandels. Reinbek bei Hamburg 1986，S. 33 f.

269 Helmut Holzhey：Technologisches Zeitalter oder Postmoderne？Eine philosophische Tagung in Braunschweig. Neue Zürcher Zeitung，2. 10. 1986.

270 André Glucksmann：Der negative Humanismus. Eine neue Protestkultur in Frankreich.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1. 2. 1987.

271 Mathias Schreiber：Gibt es eine postmoderne Moral？Die Aufklärung，der Todes-Schock und die Umkehrung des Denken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2. 3. 1984.

272 Jürgen Habermas：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Zwölf Vorles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5，S. 395.

273 Florian Rötzer （Hg.）：Denken，das an der Zeit ist. Frankfurt am Main 1987，S. 14. f.

274 Dietmar Kamper. Hieroglyphen der Zeit. Texte vom Fremdwerden der Welt. München 1988.

275 Klaus Laermann：Das rasende Gefasel der Gegenaufklärung. Dietmar Kamper als Symptom. Merkur，Heft 3/1985，S. 211 ff. Dietmar Kamper：Zur Soziologie des Imaginären. München 1986. Ders.：Macht und Ohnmacht der Phantasie. Darmstadt，Neuwied 1986.

276 Klaus Laermann：Fiat nox！Ein Essay. Die Zeit，2. 8. 1991.

277 Stephan Wehnowski：Wie Ratten im Labyrinth. Perspektiven der

Soziologie：Die Provokationen im Werk von Niklas Luhmann. Süddeutsche Zeitung，4./5. 6. 1988.

278 Eckhard Nordhofen：In den Gärten der Erkenntnis. Über den Philosophen Hans Blumenberg. Die Zeit，8. 8. 1986.

279 Hans Blumenberg：Lebenszeit und Welt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86.

280 Reinhard Baumgart：Postmoderne - Fröhliche Wissenschaft？Über eine lange verschleppte，leergedroschene Frage. Die Zeit，16. 10. 1987.

281 Francis Fukuyama：Das Ende der Geschichte. Wo stehen wir？München 1992. Ferner Martin Meyer：Ende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1993. Perry Anderson：Zum Ende der Geschichte. Berlin 1993.

282 Durs Grünbein：Schädelbasislektion. Ged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91，S. 61.

283 Fritz J. Raddatz：Nicht Entwurf der Moderne，sondern Faltenwurf der Mode. Ein kritischer Blick auf den Lyriker Durs Grünbein. Die Zeit，22. 9. 1995.

284 Jürgen Habermas：Eine Art Schadensabwicklung. Apologetische Tendenzen in der deutschen Zeitgeschichtsschreibung. Die Zeit，11. 7. 1986.

285 Hans-Ulrich Wehler：Entsorgung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München 1988，S. 211.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ünchen，Zürich 1987. Hilmar Hoffmann （Hg.）：Gegen den Versuch，Vergangenheit zu verbiegen. Eine Diskussion um

politische Kultur in der Bundesrepublik aus Anlaß der Frankfurter Römerberggespräche 1986. Frankfurt am Main 1987. Eike Hennig：Zum Historikerstreit. 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Fasch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8.

286 Daniel Jonah Goldhagen：Hitlers bereitwillige Vollstrecker；a. a. O. Volker Ullrich：Hitlers willige Mordgesellen. Ein Buch provoziert einen neuen Historikerstreit：Waren die Deutschen doch alle schuldig？Die Zeit，12. 4. 1996.

287 Die Sprache des Erhabenen/Das Bild des Erhabenen/Die erhabene Tat. Merkur，Nr. 487/488/1989.

288 Museumskunde，Heft 2/1984，S. 98.

289 Rüdiger Thomas：Staatskultur und Kulturnation. Anspruch und Illusion einer »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Nationalkultur.« Günter Feist/Eckhart Gillen u. a. （Hg.）：Kunstdokumentation SBZ/DDR 1945-1990. Aufsätze. Berichte. Materialien. Berlin 1996，S. 33 f.

290 Lutz Niethammer unter Mitarbeit von Werner Trapp （Hg.）：Lebenserfahrung und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Die Praxis der »Oral History«. Frankfurt am Main 1980，S. 9 f. Detlev Puls （Hg.）：Wahrnehmungsformen und Protestverhalten. Studien zur Lage der Unterschichten im 18. und 19.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79.

291 Hans-Ulrich Wehler：Wider eine frischfröhlich erzählend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Frankfurter Rundschau，22. 8. 1988. Ders.：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München 1988. Ferner Ursula A. J. Becher/Klaus Bergmann （Hg.）：Geschichte-Nutzen oder Nachteil für das Leben.

Sammelband zum 10jährigen Bestehen der Zeitschrift »Geschichtsdidaktik«. Düsseldorf 1986. Gerhard Paul/Bernhard Schoßig （Hg.）：Die andere Geschichte. Geschichte von unten. Spurensicherung-Ökologische Geschichte-Geschichtswerkstätten. Köln 1986.

292 Gespräch mit Heinrich Klotz. Kunst und Kirche，Heft 2/1986. Ferner Jahrbuch für Architektur 1985/1986. Braunschweig，Wiesbaden 1986. Städte bauen. Kursbuch，Nr. 112/1993.

293 Robert Venturi：Komplexität und Widerspruch in der Architektur. Braunschweig，Wiesbaden 1978. Robert Venturi/Denise Scott Brown/Steven Izenour：Lernen von Las Vegas. Zur Ikonographie und Architektursymbolik der Geschäftsstadt. Braunschweig，Wiesbaden 1979. Stanislaus von Moos：Venturi，Rauch & Scott Brown. Bauten und Projekte. München 1987. Ferner Kenneth Frampton：Kritischer Regionalismus. Andreas Huyssen/Klaus R. Scherpe （Hg.）：Postmoderne. Zeichen eines kulturellen Wandels. Reinbek bei Hamburg 1986，S. 151 ff. Charles Moore：Bauten und Projekte 1949-1986. Stuttgart 1987.

294 Dieter Bartetzko：Zwischen Bauwerk und Kulissenbau angesiedelt. Das Neue Frankfurt und seine Postmoderne. Gedanken zur Architektur am Main. Frankfurter Rundschau，1. 6.1984.

295 Manfred Sack：Das Zitatenmuseum. Von Schmäh- und Bravorufen hitzig untermalt，wurde in Stuttgart die neue Staatsgalerie gebaut. Die Zeit，9.3.1984. Ferner Wolfgang Welsch：Nach welcher Moderne？Klärungsversuche im Feld von Architektur und Philosophie. Peter Koslowski/Robert Spaemann/Reinhard Löw （Hg.）：Moderne oder Postmoderne？Zur Signatur des gegenwärtigen Zeitalters. Heppenheim 1986，S. 248. Hanno-Walter Kruft：Das Kunstmuseum als Kunstwerk？

Beobachtungen zum Museumsbau der letzten Jahre. Neue Zürcher Zeitung，4./5. 4. 1987.

296 Eduard Beaucamp：Konstruktiver Pop. Die Eröffnung der Neuen Staatsgalerie in Stuttgar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0. 3.1984.

297 Vittorio Magnago Lampugnani：Die Modernität des Dauerhaften. Essays zu Stadt，Architektur und Design. Berlin 1995，S. 38.

298 Pierre Bourdieu：Die feinen Unterschiede. Kritik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rteilskraft. Frankfurt am Main 1987，S. 59 ff.

299 Jean-François Lyotard：Philosophie und Malerei im Zeitalter ihres Experientierens. Berlin 1986，S. 69 ff.

300 Karlheinz Schmid：Manfred Schneckenburger. ZEIT-Magazin，Jg. 1987.

301 Ulrich Wanner：Die 8. documenta in Kassel huldigt der Postmoderne：Kunst in schicken Räumen kitzelt und kalauert. Der Geist ist Schnickschnack. Nürnberger Zeitung，15. 6. 1987. Laszlo Glozer：Bedeutungsschwanger bis unterhaltsam. Die documenta 8 präsentiert sich als bunte Stimmungspalette. Süddeutsche Zeitung，13./14. 6. 1987. Petra Kipphoff：Das hohe Fest der Beliebigkeit. Die Zeit，19. 6. 1987.

302 Wolfgang Max Faust/Gerd de Vries：Hunger nach Bildern. Deutsche Malerei der Gegenwart. Köln 1982

303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a. a. O.，S. 225.

304 Günther Gercken：Figurative Malerei nach 1960. Christos M. Joachimides/Norman Rosenthal/Wieland Schmied （Hg.）：Deutsche Kunst im 20. Jahrhundert. Malerei und Plastik 1905-1985. München 1986，S. 468.

305 Eduard Beaucamp：Die verbrannte Geschichte. Anselm Kiefer und die deutschen Myth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1. 4.1984. Petra Kipphoff：Verbrannte Erde und gestürzte Trommler. Zwei Künstler des deutschen Dilemmas. Die Zeit，13. 4.1984.

306 Georg Hensel：Bluff dich durch die Postmoderne. Schnellkurs als Party-Service：Brauchbare Sätze，Zitate，Namen，Redensar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6. 6.1987.

307 Peter Niebaum：»All is pretty« - Vom Schwindel zwischen modern（d） en Einbahnstraßen und postmodernen Sackgassen. Nebst Bemerkungen über Aufklärungskrisen und Krisenaufklärung. Anschläge，Jg. 1987.

308 Heiner Stachelhaus：Joseph Beuys. Köln 1987. Klaus Staeck（Hg.）：Ohne die Rose tun wir’s nicht. Für Joseph Beuys. Heidelberg 1986. Armin Zweite （Hg.）：Beuys zu Ehren. München 1986. Götz Adriani/Winfried Konnertz/Karin Thomas：Joseph Beuys. Leben und Werk. Köln 1994.

309 Hanno Reuther：Die Fraktion der Bewunderer und die Bank der Spotter. Ein Versuch über Joseph Beuys und seine Gemeinde （n）. Frankfurter Rundschau，17. 8.1985.

310 Wouter Kotte/Ursula Mildner：Das Kreuz als Universalzeichen bei

Joseph Beuys. o. O.1986.

311 Peter-Klaus Schuster：Der Mensch als sein eigener Schöpfer. Dürer und Beuysoder das Bekenntnis zur Kreativität. Süddeutsche Zeitung，22./23. 6.1985.

312 Doris Schmidt：Missionar der Gewaltlosigkeit. Joseph Beuys starb 64jährig an Herzversagen. Süddeutsche Zeitung，25./26.1.1986.

313 Peter Iden：Schönheit ist der Glanz des Wahren. Zum Tod von Joseph Beuys. Frankfurter Rundschau，27.1.1986.

314 Walter Fenn：Der Künstler als Schamane. Zum Tode von Joseph Beuys. Nürnberger Nachrichten，25./26.1.1986.

315 Heiner Bastian：Joseph Beuys. Blitzschlag mit Lichtschein auf Hirsch. Bern 1988.

316 Walter Fenn：Der Künstler als Schamane；a. a. O.

317 Peter-Klaus Schuster：Der Mensch als sein eigener Schöpfer；a. a. O.

318 Wolf-Eberhard von Lewinski：Die Kompositionslehrer und die Avantgarde. Der »Darmstädter Pluralismus« als Signal für die neueste Musik. Neue Zürcher Zeitung，22./23.11.1986.

319 Hermann Danuser：Vier Kulturen der Musik. Paradigmen der Musik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Neue Zürcher Zeitung，19./20. 7.1986.

320 Hans-Klaus Jungheinrich：Von Smokingherren dezent

umschwärmt. Ein neues Stockhausen-Werk beim Metzer Musikfest. Frankfurter Rundschau，2.12.1986.

321 Gerhard R. Koch：Das Neue und die Heilsherrschaft. Karlheinz Stockhausen zum Sechzigs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2. 8.1988.

322 Ders.：Schrecken auf Entsetzen getürmt. Aribert Reimanns »Troades«. Uraufführung zur Eröffnung der Münchner Opernfestspiel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9. 7.1986.

323 Hans-Klaus Jungheinrich：Wie wir Tiere uns ansehen. Hans Werner Henzes neue Oper »Die englische Katze«. Frankfurter Rundschau，4. 6. 1983.

第四部分 德国统一

1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Die Helden des Rückzug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9. 12. 1989. Ders.：Zickzack. Frankfurt am Main 1997.

2 Michail Gorbatschow：Die sozialistische Idee und die revolutionäre Umgestaltung. Der Spiegel. Dokument Januar 1990，S. 7. Konrad Löw：Das Prinzip Gorbatschow.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Köln 1989.

3 Thomas Blanke/Rainer Erd （Hg.）：DDR - Ein Staat vergeht. Frankfurt am Main 1990. Hannes Bahrmann/Christoph Links：Wir sind das Volk. Die DDR zwischen 7. Oktober und 17. Dezember 1989. Eine Chronik. Berlin，Weimar，Wuppertal 1990. Horst Hensel：Hyänengelächter. Lesestücke auf einen deutschen Herbst. Köln 1990.

4 Peter Przybylski：Tatort Politbüro. Die Akte Honecker. Berlin 1991.

Günter Schabowski：Das Politbüro - Ende eines Mythos. Reinbek bei Hamburg 1990. Egon Krenz：Wenn Mauern fallen. Die friedliche Revolution：Vorgeschichte -Ablauf - Auswirkungen. Wien 1990. Hans Modrow （Hg.）：Das Große Haus. Insider berichten aus dem ZK der SED. Berlin 1994.

5 Cordt Schnibben：»Genosse，schlagen die uns tot？« Wie Erich Honecker und sein Politbüro die Konterrevolution erlebten. Der Spiegel，Nr. 18/1990，S. 199.

6 Ewald Lang （Hg.）：Wendehals und Stasi-Laus. Demo-Sprüche aus der DDR. München 1990. Hans Uske：Die Sprache der Wende. Bonn 1986.

7 Wolfgang Schneider （Hg.）：LEIPZIGER DEMOntagebuch. Leipzig，Weimar 1990. Neues Forum Leipzig：»Jetzt oder nie - Demokratie«. Leipziger Herbst ’89. München 1990. Erich Loest：Nikolaikirche. Leipzig 1995.

8 Cordt Schnibben：»Makkaroni mit Schinken，bitte«. Wie Erich Honecker und sein Politbüro die Konterrevolution erlebten. Spiegel，Nr. 17/1990，S. 90.

9 Daniel Küchenmeister （Hg.）：Honecker - Gorbatschow，Vieraugengespräche. Berlin 1995.

10 Robert Darnton：Der letzte Tanz auf der Mauer. Berlin-Journal 1989-1990. München 1991. Hans-Hermann Hertle：Der Fall der Mauer. Opladen 1996.

11 Bernhard Schäfers：Der Vereinigungsprozeß in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Deutungsversuchen. Gegenwartskunde，Nr.

3/1991，S. 283. Ferner Abriß der DDR. Kursbuch，Nr. 101/1990. Christiane Lemke：Die Ursachen des Umbruchs 1989. Politische Sozialisation in der ehemaligen DDR. Opladen 1991. Bernd Faulenbach/Markus Meckel/Hermann Weber （Hg.）：Die Partei hat immer recht. Aufarbeitung von Geschichte und Folgen der SED-Diktatur. Essen 1994. Getrennte Vergangenheit，gemeinsame Zukunft. Ausgewählte Dokumente，Zeitzeugenbe-richte und Diskussionen der Enquête-Kommission »Aufarbeitung von Geschichte und Folgen der SED-Diktatur in Deutschland«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1992-1994. 4 Bde. München 1997.

12 Cordt Schnibben：»Genosse，schlagen die uns tot？«；a. a.O.，S. 206.

13 Enger Radius. DDR-Ärzte untersuchten ihre ehemaligen Staats- und Parteiführer. Der Spiegel，Nr. 31/1990.

14 Hartmut Zwahr：Ende einer Selbstzerstörung. Leipzig und die Revolution in der DDR. Göttingen 1993.

15 Ilse Spittmann：Die DDR unter Honecker. Köln 1990.

16 Peter Bender：Ein Magnet，stärker als die Macht. Was in den alten Deutschland-plänen reine Utopie blieb，wird jetzt von der Wirklichkeit überholt. Die Zeit，9. 2. 1990.

17 Detlef Nakath/Gerd-Rüdiger Stephan：Von Hubertusstock nach Bonn. Eine dokumentier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auf höchster Ebene 1980-1987. Berlin 1995.

18 Hartmut Jäckel：Schiefe Bilder und der getrübte Blick aufs Ganze. Die DDR-Be-richterstattung：Anmerkungen zu einem publizistischen

Sündenfall. Frankfurter Rundschau，11. 8. 1990.

19 Gerd-Rüdiger Stephan （Hg.）：»Vorwärts immer，rückwärts nimmer！« Interne Dokumente zum Zerfall von SED und DDR 1988/89. Berlin 1995.

20 Süddeutsche Zeitung，11./12. 11. 1989

21 Rudolf Augstein：Aufs Weltpodest geschleudert. Über Helmut Kohls Weg zum Staatskanzler. Der Spiegel，Nr. 40/1996. Ferner Karl Hartung：Neunzehnhundert-neunundachtzig. Ortsbesichtigungen nach einer Epochenwende. Hg. von Freimut Duve. Frankfurt am Main 1990. Patricia Clough：Helmut Kohl. Ein Portrait der Macht. München 1997.

22 Hans-Dietrich Genscher：Erinnerungen. Berlin 1995，S. 813 f. Ferner Philip Zeli-kow/Condoleezza Rice：Sternstunde der Diplomatie - Die deutsche Einheit und das Ende der Spaltung. Berlin 1997.

23 Helmut Kohl：»Aus eigener Kraft allein hätten wir es nicht geschafft«. Fernsehansprache des Bundeskanzlers am 2. 10. 1990. Der Spiegel-Dokument，Dezember 1990，S. 10.

24 Leszek Kołakowski：Wir fürchten etwas Unbestimmtes. Was bedeutet der Zusammenbruch des Kommunismus philosophisch？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5. 2. 1994.

25 Günter Kunert：Traumverloren.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scheiter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0. 11. 1989.

26 Gregor Gysi：Das war’s. Noch lange nicht！Autobiographie. Düsseldorf 1994.

27 Landolf Scherzer：Das letzte Gefecht. Wie der SED-Sekretär Hans-Dieter Fritsch-ler die Wende in der DDR erlebt. Die Zeit，5. 1. 1990.

28 Ders.：Der Erste. Köln 1986.

29 Thomas Neumann：Die Maßnahme. Eine Herrschaftsgeschichte der SED. Reinbek bei Hamburg 1991.

30 Der Spiegel，Nr. 50/1989，S. 30 ff.

31 Erich Honecker：»Die Strafe wird mich nicht mehr erreichen«. Frankfurter Rundschau，4. 12. 1992.

32 Reinhard Merkel：Erich Honecker gehört nicht vor das Berliner Landgericht. Die Zeit，28. 8. 1992. Jens Reich：Durch den Export wird der Rechtsstaat zum Esel. Bemerkungen zum Prozeß gegen Erich Honeck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2. 1. 1993.

33 Irene Dische：Der zehnte Tag. Berlin 1993. Kursbogen zu Kursbuch，Nr. 111/1993.

34 Jens Reich：A la lanterne？Über den Strafanspruch des Volkes. Kursbuch，Nr. 111/1993，S.ll.

35 Peter-Ferdinand Koch：Das Schalck-Imperium lebt. Deutschland wird gekauft. München 1992.

36 Der Spiegel，Nr. 47/1989，S. 14. Autorenkollektiv Hans Modrow u. a.：Geächtet oder geachtet？Die DDR in der internationalen Staatengemeinschaft；Geschichte - Standpunkte - Dokumente. Berlin 1994. Uwe Thaysen：Der Runde Tisch oder：Wo blieb das Volk？Der Weg der

DDR in die Demokratie. Opladen 1990.

37 Matthias Jung：Parteiensystem und Wahlen in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29. 6.1990.

38 Hans-Joachim Meyer：Mit Augenmaß und Festigkeit. Erinnerung an die Rolle von Lothar de Maizière im Prozeß der deutschen Einigun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5. 5. 1991. Lothar de Maizère：Anwalt der Einheit. Berlin 1996.

39 Gerd Roellecke：Abgründe der Verfassungsdiskussion. Universitas，Heft 8/1996，S. 774.

40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1. 12. 1990.

41 Günter Grass：Kurze Rede eines vaterlandslosen Gesellen. Die Zeit，9. 2. 1990. Gespräch mit Günter Grass über »Eiertänze«，verpaßte Chancen der Sozialdemokratie und Fremdheiten beim Thema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Rundschau，27. 7. 1990.

42 Christoph Dieckmann：Das letzte Westpaket. Günter Grass’ deutsches Ge-schichtsbuch »Ein weites Feld« wird im Osten geliebt als Verteidigung des Lebens in der DDR. Die Zeit，1. 12. 1995.

43 Günter Grass：Ein weites Feld. Göttingen 1995，S. 558.

44 Roland H. Wiegenstein：Bilanzen & Kosten. Frankfurter Rundschau，16. 6. 1990.

45 Richard Herzinger：Die obskuren Inseln der kultivierten

Gemeinschaft. Heiner Müller，Christa Wolf，Volker Braun - deutsche Zivilisationskritik und das neue Antiwestlertum. Die Zeit，4. 6. 1993. Ferner ders.：Masken der Lebensrevolution -Vitalistische Zivilisations- und Humanismuskritik in Texten Heiner Müllers. Berlin 1993.

46 Brigitte Seebacher-Brandt；Die Linke und die Einheit. Berlin 1991. Joschka Fischer：Die Linke nach dem Sozialismus. Hamburg 1992. Peter Glotz：Die Linke nach dem Sieg des Westens. Stuttgart 1992. Wolfgang Kowalsky/Wolfgang Schroeder （Hg.）：Linke，was nun？Berlin 1993. Peter Glotz：Die Jahre der Verdros-senheit. Ein Tagebuch ohne Rücksichten 1993/94. Stuttgart 1996.

47 Sarah Kirsch：Schwarzer Pet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8. 7. 1990.

48 Die Woche，24. 11. 1995，2. 6. 1995. （Günter Grass：Im deutschen Muspott. Gespräch über den Beschluß des West-PEN，sich nicht mit dem Ost-PEN zu vereinigen.） Rundbrief PEN，16. 5. 1997.

49 Rolf Michaelis：Dein Wort in Goethes Ohr！Die Zeit，10. 4. 1992.

50 Karl Otto Conrady （Hg.）：Das große deutsche Gedichtbuch. München，Zürich 1992，S. 857.

51 Fritz J. Raddatz：Ein ZEIT-Gespräch mit Stefan Heym. Die Zeit，6. 12. 1991.

52 Stefan Heym：Aschermittwoch in der DDR. Der Spiegel，Nr. 49/1989，S. 55.

53 Heiner Müller：Auschwitz kein Ende. Ein Gespräch mit jungen

französischen Regisseuren. Berlin，September 1992. Drucksache 16 des Berliner Ensemble，S. 607.

54 Ders.：Krieg ohne Schlacht. Leben in zwei Diktaturen. Köln 1992.

55 Christa Wolf：Medea. Stimmen. München 1996.

56 Spiegel-Streitgespräch：Wolfgang Schäuble und Wolfgang Thierse über Fehler und Probleme im Umgang zwischen Ost und West. Der Spiegel，Nr. 34/1993，S. 24. Wolfgang Thierse：Mit eigener Stimme sprechen. München 1992. Ferner Johannes M. Becker：Ein Land geht in den Westen. Die Abwicklung der DDR. Bonn 1991. Bernd Giesen/Claus Leggewie （Hg.）：Experiment Vereinigung. Ein sozialer Großversuch. Berlin 1991. Friedrich Schorlemmer：Bis alle Mauern fallen. Texte aus einem verschwundenen Land. Berlin 1991. Konrad Löw：... bis zum Verrat der Freiheit. Die Gesell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DDR«. München 1993. Robert Hettlage/Karl Lenz （Hg.）：Deutschland nach der Wende. Eine Bilanz. München 1995. Ursula Langkau-Alex/Thomas M. Ruprecht （Hg）：Was soll aus Deutschland werden？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1995. Daniela Dahn：Westwärts und nicht vergessen. Vom Unbehagen in der Einheit. Berlin 1996.

57 Bernhard Schäfers：Ambivalenzen des Einigungsprozesses：Integration und Differenzierung. Gegenwartskunde，Nr. 1/1996，S. 113 ff.，121.

58 Christiane Kohl：»Andere nehmen den Strick«. Über Leipzigs neuen Oberbürger-meister Hinrich Lehmann-Grube. Der Spiegel，Nr. 31/1990，S. 38 ff.

59 Elisabeth Noelle-Neumann：Die Vorzüge der Freiheit stehen noch nicht im Mittelpunkt. Die neuen Bundesbürger und die Demokrat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0. 9. 1991.

60 Marlies Menge：Sehnsucht nach dem Kaputten. Die Zeit，12. 9. 1991.

61 Tina Rosenberg：Die Rache der Geschichte. Erkundungen im neuen Europa. München 1997.

62 Konrad Weiß：Verlorene Hoffnung der Einheit. Der Spiegel，Nr. 46/1993，S. 41. Ferner Hans Mayer：Der Turm von Babel. Erinnerungen an ein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91. Thomas Meyer：Was bleibt vom Sozialismus. Reinbek bei Hamburg 1991. Peter Bender：Unsere Erbschaft. Was war die DDR - was bleibt von ihr？Hamburg，Zürich 1992. Heinz Ludwig Arnold/Frauke Meyer-Gosau（Hg.）：Die Abwicklung der DDR. Göttingen 1992. Eberhard Kuhrt/Gunter Holzweißig/Hannsjörg F. Buck u. a.：Am Ende des realen Sozialismus. Beiträge zu einer Bestandsaufnahme der DDR-Wirklichkeit in den 80er Jahren. Opladen 1996.

63 Wolfgang Thierse：Spielt euch jetzt nicht auf wie Sieger，ihr Westdeutschen. Frankfurter Rundschau，8. 10. 1990. Ferner Manfred Stolpe：Demokratie wagen. Aufbruch in Brandenburg. Reden，Beiträge，Interviews 1990-1993. Marburg 1994. Ders.：Sieben Jahre. Sieben Brücken. Ein Rückblick in die Zukunft. Berlin 1997.

64 Klaus von Dohnanyi：Das deutsche Wagnis. München 1991. Ferner Klaus Hansen：Nichts trennt uns mehr als die gemeinsame Sprache. Deutsche Verständigungs-probleme. Universitas，Heft 3/1996.

65 Stolz aufs eigene Leben. Der Spiegel，Nr. 27/1995，S. 40 ff.

66 Joachim Brune u. a.：... aber die Mauern bauen die Menschen sich selbst ... Speyer 1991.

67 Friedrich Schorlemmer：Ich sehe und säe unverdrossen das Senfkorn Hoffnung. Frankfurter Rundschau，11. 10. 1993. Ferner Ruth Reiher/Rüdiger Läzer （Hg.）：Von »Buschzulage« und »Ossinachweis«. Ost-West-Deutsch in der Diskussion. Berlin 1996.

68 Wolf Lepenies：Ressentiment und Überheblichkeit. Die Intellektuellen im deut-schen Einigungsprozeß.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 3. 1992. Ders.：Folgen einer unerhörten Begebenheit. Die Deutschen nach der Vereinigung. Berlin 1992.

69 Elke Libbert：Wie auseinanderwächst，was zusammengehör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 1. 1993.

70 Heiner Keupp：Phantasma »Deutsche Identität«. Süddeutsche Zeitung，10. 11. 1994.

71 Christa Wolf：Was bleibt. Frankfurt am Main 1990，S. 107.

72 Frank Schirrmacher：Dem Druck des härteren，strengeren Lebens standhal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 6. 1990. Ferner Thomas Anz （Hg.）：Es geht nicht um Christa Wolf. Der Literaturstreit im vereinte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91. Michael Braun：Jenseits der »Gesinnungsästhetik«. Was bleibt von der Literatur aus der DDR？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4. 10. 1986.

73 Karl Otto Conrady （Hg.）：Das große deutsche Gedichtbuch. München，Zürich 1992，S. 778.

74 Günther Rühle：»Was sollen wir tun？« Zur deutschen Dramatik nach 1945 - bis heute. Theater heute. Sondernummer 1996，S. 114 ff.

75 Urs Bircher/Martin Kreutzberg：Das Sprechtheater der achtziger Jahre in West und Ost. Politik und Kultur，Heft 3/1984，S. 49.

76 Wolfgang Emmerich：Kl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DDR；a. a. O.，S. 350 f.

77 Ebd.，S. 347 f.

78 Otto F. Riewoldt：Theaterarbeit. Über den Wirkungszusammenhang von Bühne，Dramatik，Kulturpolitik und Publikum. Hans-Jürgen Schmitt （Hg.）：Die Literatur der DDR. Bd. 11 der Hanse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m 16.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Wien 1983，S. 133.

79 Schauspielhaus Bochum （Hg.）：Das Bochumer Ensemble. Ein deutsches Stadt-theater 1979-1986. Königstein 1986.

80 Einfühlung und Analyse. Der Regisseur Thomas Langhoff im Gespräch. Theater heute，Heft 6/1981，S. 14.

81 Ruth Berghaus：Faszinierende Zeugin unseres Jahrhunderts. Leipziger Volkszei-tung，Jg. 1996.

82 Christa Hasche/Traute Schölling/Joachim Fiebach：Theater in der DDR. Chronik und Positionen. Berlin 1994，S. 38，76，70，43，91，77.

83 Elmar Schleef：Droge Faust Parsifal. Frankfurt am Main 1997.

84 Joachim Fest：Wozu das Theater？Der Spiegel，20. 12. 1971.

85 Theater heute，Heft 1/79，S. 2.

86 Georg Hensel：Einladung zu Tagträum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4. 2. 1979.

87 Frankfurter Rundschau，17. 5. 1976. Ferner Diedrich Diederichsen：Das babylonische Theater. Regie als Amoklauf. Nonkonformismus als Norm. Buch und Biblio-thek，Heft 7/8/1983，S. 590 ff.

88 Claudia Balk （Hg.）：Regie im Theater. Frankfurt am Main 1988/1989. Uwe B. Carstensen：Klaus Michael Grüber. Frankfurt am Main 1988. Günther Erken：Hansgünther Heyme. Frankfurt am Main 1989. Mechthild Lange：Peter Zadek. Frankfurt am Main 1989. Hannelene Limpach：Dieter Dorn. Frankfurt am Main 1989. Hans Joachim Ruckhäberle：Alexander Lang. Frankfurt am Main 1988. C. Bernd Sucher：Theaterzauberer 2. Von Bondy bis Zadek. 10 Regisseure des deutschen Gegenwartstheaters. München 1988. Jörg W. Gronius/Wend Kässens：Theater Macher. Gespräche. Bodenheim 1990.

89 Ein Gespräch mit dem Theaterregisseur Luc Bondy. Neue Zürcher Zeitung，29./30. 10. 1994.

90 Christa Hasche/Traute Schölling/Joachim Fiebach：Theater in der DDR；a. a. O.，S. 39.

91 Ebd.，S. 21.

92 Ebd.，S. 27.

93 Peter Hacks：Die Maßgaben der Kunst. Düsseldorf 1977，S. fll f.

94 Christa Hasche/Traute Schölling/Joachim Fiebach：Theater in der DDR；a. a. O.，S. 213.

95 Volker Braun：Die Übergangsgesellschaft. Volker Bohn：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a. a. O.，S. 434.

96 Christa Hasche/Traute Schölling/Joachim Fiebach：Theater in der DDR；a. a. O.，S. 111.

97 Genia Schulz：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is Age of Hope. Heiner Müllers Blick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Merkur，Heft 5/1979，S. 479 f.

98 Eine kurze goldene Zeit beinahe der Gerechtigkeit. Gespräch mit dem Regisseur Thomas Langhoff. Süddeutsche Zeitung，4. 1. 1990.

99 Heiner Müller：Krieg ohne Schlacht Leben in zwei Diktaturen. Köln 1992.

100 Sebastian Popp/Bernd Wagner （Hg.）：Das Theater und sein Preis. Beiträge zur Theaterreform. Hagen 1994，S. 81.

101 Gerhard Stadelmaier：Das Hybridtheater. Geblähter Apparat - magere Kuns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 2. 1992.

102 Erich Pracht u. a.：Einführung in den sozialistischen Realismus. Berlin 1975.

103 Monika Flacke （Hg.）：Auftragskunst der DDR 1949-1990. München 1995.

104 Günter Feist/Eckhart Gillen/Beatrice Vierneisel （Hg.）：Kunstdokumentation SBZ/DDR 1945-1990. Aufsätze. Berichte. Materialien. Berlin 1996. Eckhart Gil-len/Rainer Haarmann （Hg.）：Kunst in der DDR. Köln 1990. Karin Thomas：Zweimal deutsche Kunst nach 1945；a. a. O.

105 Karin Thomas：Utopie und Menetekel des bildnerischen Eigensinns. Gabriele Muschter/Rüdiger Thomas （Hg.）：Jenseits der Staatskultur. Traditionen autono-mer Kunst in der DDR. München 1992，S. 108 f.

106 Peter Säger：Neue Formen des Realismus. Kunst zwischen Illusion und Wirklich-keit. Köln 1973. Rainer Zimmermann：Expressiver Realismus. Malerei der verschollenen Generationen. München 1994.

107 Eckhardt Gillen/Rainer Haarmann （Hg.）：Kunst in der DDR. Köln 1990，S. 16.

108 Ders.：Kunst in der Sowjetzone und in der DDR. 1945-1990. Dia-Reihe. Inter Nationes Bonn.

109 Ebd.

110 Jörn Schütrumpf：Auftragspolitik in der DDR. Monika Flacke （Hg.）：Auftragskunst der DDR；a. a. O.，S. 21.

111 Ebd.

112 Günter Engelhard：Ein Grübler liebt den Kampf，art，Nr.

10/1989，S. 42.

113 Werner Tübke：Reformation - Revolution. Panorama Frankenhausen. Dresden 1988.

114 Antje von Graevenitz：Der Weg ist nicht zweigeteilt，sondern rund. Überlegungen zum Bilderstreit in （West-） Deutschland nach 1945. Siegfried Gohr/Johannes Gachnang （Hg.）：Bilderstreit. Widerspruch，Einheit und Fragment in der Kunst seit 1960. Köln 1989，S. 228.

115 Siegfried Gohr：Humanismus oder Humanität？- Anmerkungen zur neueren deutschen Kunst. Gabriele Muschter/Klaus Honnef （Hg.）：Westchor Ostportal. 12 Positionen zeitgenössischer Kunst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95，S. 14.

116 Art. Das Kunstmagazin （Hg.）：Zeitvergleich. Malerei und Grafik aus der DDR. Hamburg 1982，S. 12.

117 Interview Johannes Gachnang mit Georg Baselitz 6. 11. 1975. Katalog Georg Baselitz：Zeichnungen. Groninger Museum. Groningen 1979.

118 Wolfgang Mattheuer：Die Schlacht der Vorurteile. Zum Streit zwischen deutschdeutschen Künstler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7. 10. 1990. Ders.：Äußerungen. Leipzig 1990.

119 Landeshauptstadt Erfurt/Freistaat Thüringen （Hg.）：Configura 2 - Dialog der Kulturen. Texte und Bilder zur Ausstellung. Erfurt 1995.

120 Eduard Beaucamp：Streit der Schneckenhäus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 7. 1991.

121 Verena Lueken：Metastasen des Nichts. Zum fünfundzwanzigsten Mal：Die Mainzer Tage der Fernsehkriti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1. 5. 1992. Ferner Kurt Hickethier：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ernsehens. Stuttgart 1997.

122 Karl-Otto Saur/Rüdiger Steinmetz （Hg.）：Fernsehkritik. Kritiker und Kritisierte. München 1988. Manfred Delling：Engagement für ein neues Medium. Ausgewählte Fernsehkritiken von 1964 bis 1993. Frankfurt am Main，Berlin，Bern，New York，Paris，Wien 1995.

123 Gerhard Schulze：Vernunft im nachtechnischen Zeitalter. Was tun，wenn alles getan ist？Neue Zürcher Zeitung，30./31.12.1995. Ders.：Die Erlebnisgesellschaft. Kultursoziologie der Gegenwar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1993.

124 Neil Postman：Das Verschwinden der Kindheit. Frankfurt am Main 1983. Ders.：Wir amüsieren uns zu Tode. Urteilsbildung im Zeitalter der Unterhaltungsindustrie. Frankfurt am Main 1985. Ders.：Die Verweigerung der Hörigkeit. Lauter Ein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1988. Ders.：Das Technopol. Die Macht der Technologien und die Entmündigung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92.

125 Marshall McLuhan：Die magischen Kanäle. Understanding media. Düsseldorf 1968，S. 90 Ders.：Die Gutenberg-Galaxis. Das Ende des Buchzeitalters. Düsseldorf，Wien 1968. Thomas Heinze：Medienanalyse als Kultur- und Gesellschaftskritik. Kurseinheit 1-3：Medientheorien. Fernuniversität/Gesamthochschule Hagen 1987.

126 Hannes Bahrmann：Der Siegeszug des neuen Mediums. Der Staatsbürger. Beilage der Bayerischen Staatszeitung，Nr. 2/1994，S. 2.

127 Peter Glotz：Die Attacke - Nachtgedanken zum zehnjährigen Geburtstag des privaten Fernsehens. Vorwärts，Dez. 1995，S. 10.

128 Freddie Röckenhaus：Wie viele Programme erträgt 1 Mensch？Die Zeit，26. 11. 1993. Ferner Petru Dumitriu：ABC der neuen Medien. Heidelberg 1985. Eckart Gottwald/Regina Hibbeln/Jürgen Lauffer（Hg.）：Alte Gesellschaft - Neue Medien. Opladen 1989. Die Medien. Kursbuch，Nr. 90/1987. Hilmar Hoffmann （Hg.）：Gestern begann die Zukunft. Entwickl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Bedeutung der Medienvielfalt. Darmstadt 1994.

129 Ien Ang：Das Gefühl Dallas. Zur Produktion des Trivialen. Bielefeld 1986.

130 Frank-Dieter Freiling：Die endlose Alltags-Story. 150mal »Lindenstraße«：Populär wie die Wetterkarte.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9. 9. 1988.

131 Claudia Wegener：Reality-TV. Opladen 1994.

132 Jo Groebel/Uli Gleich：Gewaltprofile der deutschen Fernsehprogramme. Opladen 1993. Michael Kunczik：Gewalt im Fernsehen. Köln，Wien 1975. Ders.：Gewalt und Medien. Köln，Wien 1987. Helga Theunert：Gewalt in den Medien - Gewalt in der Realität. Gesellschaftliche Zusammenhänge und pädagogisches Handeln. Opladen 1987. Hans Robert Eisenhauer/Heinz-Werner Hübner （Hg.）：Fernseh-Kritik. Gewalt in der Welt - Gewalt im Fernsehen. Mainz 1988. H. B. Brosius/T. Hartmann：Erfahrungen mit Horror-Videos bei Schülern unterschiedlicher Schultypen. Communications，Nr. 14/1988. B. H. Kniveton：Angst statt Aggression. Eine Wirkung brutaler Filme. Fernsehen und Bildung，Nr. 12/1978. Werner

Glogauer：Kriminalisierung von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durch Medien. Wirkungen gewalttätiger，sexueller，pornographischer und satanischer Darstellungen. Baden-Baden 1991.

133 Die Zeit，5. 3. 1993.

134 Klaus Bresser：Was nun？- Über Fernsehen，Moral und Journalisten. Neuwied 1992. Paul Virilio：Krieg und Fernsehen. München 1993. John R. MacArthur：Die Schlacht der Lügen - Wie die USA den Golfkrieg verkauften. München 1993.

135 Bettina Hurrelmann：Fernsehen in der Familie. Auswirkungen der Programmerweiterung auf den Mediengebrauch. Weinheim 1989. Jan-Uwe Rogge/Klaus-Jensen：Über den Umgang mit Medien in Familie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8. 1. 1986.

136 Nikolaus von Festenberg：Talk und Teufel. Über das Geschwätz im TV. Der Spiegel，Nr. 13/1996，S. 238. Jan Bielicki：Es plappert Über die Talkshow-Flut.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Heft 9/1995，S. 817 f.

137 Hermann J. Huber：Die Absahner. Wie die populären TV-Stars mit eigenen Unternehmen Profit machen.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18. 5. 1990.

138 Norbert Bolz：Der Sinn des Unsinns. Comedy im Fernsehen - die Lust am bedeutungsfreien Ritual. Die Zeit，30. 5. 1997.

139 Niklas Luhmann：Die Realität der Massenmedien. Opladen 1996.

140 Rüdiger Kinsky：Über Medien-Wirklichkeit.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Heft 1/1995，S. 44.

141 Heinz-Dietrich Fischer：Fernsehmoderator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ünchen 1983.

142 Michael Wolf Thomas：Umbau des Radios. Publizistik und Kunst，Jg. 1989.

143 Mathias Greffrath：Die Anpassung an imaginäre Konkurrenz ist eine Spirale nach unten. Frankfurter Rundschau，9. 6. 1986.

144 Florian H. Fleck （Hg.）：Zukunftsaspekte des Rundfunks. Stuttgart 1986. Ferner Otfried Jarren/Peter Widlok （Hg.）：Lokalradio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1985.

145 Jurek Becker：Die Worte verschwinden. Der Spiegel，Nr. 2/1995，S. 160.

146 Harro Zimmermann：Wider die zweite Unmündigkeit. Einige Gedanken zur Radiokultur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Rundschau，4. 5. 1994.

147 Urs Widmer：Auch der Rundfunk kann vom Kopf her stinken. du，Heft 6/1994，S. 79，81.

148 Medien. Zwischen Ohnmacht und Faszination. PZ，Nr. 75/1993，S. 3. Karl-Eduard von Schnitzler：Meine Schlösser oder Wie ich mein Vaterland fand. Berlin 1989.

149 Wolfgang Mühl-Benninghaus：Medienpolitische Probleme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1945 und 1989. Heide Riedel （Hg.）：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 ... 40 Jahre DDR-Medien. Berlin 1994，S. 14.

150 K. Hickethier：Hörfunk. Wolfgang R. Langenbucher/Ralf Rytlewski/Bernd Weyergraf （Hg.）：Kulturpolitisches Wörterbuch；a. a. O.，S. 263.

151 Wolfgang Mühl-Benninghaus：Medienpolitische Probleme in Deutschland，S. 12 f.

152 Ebd.，S. 11.

153 Manuela Glaab：Medien. Werner Weidenfeld/Karl-Rudolf Korte （Hg.）：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1993，S. 464.

154 Workshop 11. 1. 1993. Einrichtung und Abwicklung. Heide Riedel （Hg.）：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a. a. O.，S. 287.

155 Ebd.，S. 289.

156 Thomas Schuler：Die Mörder sind unter uns. Die Zukunft der Defa-Filme liegt beim Fernsehen ... Süddeutsche Zeitung，1./2. 6. 1996.

157 Frank Beyer im Gespräch mit Hans Müncheberg. In Heide Riedel （Hg.）：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a. a. O.，S. 228.

158 Manfred Krug：Abgehauen. Düsseldorf 1997.

159 Harry Blunk/Dirk Jungnickel （Hg.）：Filmland DDR. Ein Reader zu Geschichte，Funktion und Wirkung der Defa. Köln 1991.

160 Hans-Dieter Seidel：Der bewegte Markt. Komödien und sonst nichts？Zur Lage des deutschen Film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8. 6. 1996.

161 Das Lachen macht’s. Der Spiegel，Nr. 38/1996，S. 214 ff.

162 Rolf Geserick/Arnulf Kutsch （Hg.）：Publizistik und Journalismus in der DDR. München，New York，London，Paris 1989.

163 Manuela Glaab：Medien；a. a. O.，S. 467 f. J. Grubitzsch：Presselandschaft der DDR im Umbruch. Ausgangspunkte，erste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Media Perspektiven，Nr. 3/1990，S. 140 ff.

164 Manuela Glaab：Medien；a. a. O.，S. 471 f.

165 Jan Hofmann：Einführungsreferat auf dem Treffen der bildungspolitischen Initiativgruppen in Ost-Berlin.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Heft 5/1990，S. 6 ff.

166 Christoph Führ/Carl-Ludwig Furck：Handbuch der deutschen Bildungsgeschichte. Bd. VI und VII：1945 bis zur Gegenwart.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München 1997 f.

167 Gisela Helwig （Hg.）：Schule in der DDR. Köln 1988. Ferner Heinrich Kanz：Deutsche Erziehungsgeschichte 1945-1985 in Quellen und Dokumenten. Frankfurt am Main 1987. Bernd-Reiner Fischer/Norbert Schmidt：Das zweifache Scheitern der DDR-Schul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6. 9. 1991. Oskar Anweiler/Hans-Jürgen Fuchs u. a. （Hg.）：Bild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45-1990. Bonn 1992. Sonja Häder/Heinz-Elmar Tenorth

（Hg.）：Bildungsgeschichte einer Diktatur. Bildung und Erziehung in der SBZ und DDR im historischgesellschaftlichen Kontext. Weinheim 1997.

168 Jan Hofmann：Einführungsreferat；a. a. O.，S. 8.

169 Hans Joachim Meyer：Man hat den Lehrern eigenes Handeln systematisch abgewöhnt. Frankfurter Rundschau，10. 5. 1990. Uwe Göbel/Winfried Schlaffke （Hg.）：Bildungssituation und Bildungsaufgaben in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Köln 1991.

170 Ilka Gropengießer/Gunter Otto/Klaus-Jürgen Tillmann （Hg.）：Schule. Friedrich Jahresheft XII/1994.

171 Hartmut von Hentig：Die Schule neu denken. München 1993，S. 9，113，205 ff. Ferner ders.：Bildung. München 1996.

172 Bildungskommission NRW （Hg.）：Zukunft der Bildung. Schule der Zukunft. Denkschrift der Kommission beim Ministerpräsidenten des Landes Nordrhein-Westfalen. Neuwied，Kriftel，Berlin 1995，S. 86.

173 Peter Glotz：Keine Fragen mehr？Spekulationen über das Elend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Die Zeit，15. 4. 1988.

174 Axel Hacke：Aus der großen Reform ist nichts geworden. Bilanz der Gründerzeit. Süddeutsche Zeitung，30. 4./1. 5. 1988.

175 Bernd Henningsen：Von der Einsamkeit und Freiheit des Wissenschaftlers. Die Humboldtsche Universität und die Politik. Frankfurter Hefte，Nr. 12/1996，S. 1105 ff，1110.

176 Alexander Fischer/Günther Heydemann：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r DDR. Bd. I：Historische Entwicklung，Theoriediskussion und Geschichtsdidaktik. Bd. II：Vor- und Frühgeschichte bis Neueste Geschichte. Berlin 1988/1990. Ralph Jessen：Professoren im Sozialismus. Aspekte des Strukturwandels der Hochschullehrerschaft in der Ulbricht-Ära. Hartmut Kaelble/Jürgen Kocka/Hartmut Zwahr （Hg.）：Sozialgeschichte der DDR；a. a. O.，S. 217 f.

177 Mechthild Küpper：Die Humboldt-Universität. Abwicklung und Selbstreform. Berlin 1993.

178 Hans-Karl Klettenberg：Im Westen reformunfähig，im Osten reformunwillig. Frankfurter Rundschau，30. 6. 1994.

179 Jesko Schulze-Reimpell：Auf den Marxisten klebt ein neues Etikett.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18. 5. 1990.

180 Wolf Lepenies：Wir sind kein besiegtes Land. Gibt es Dinge und Strukturen der DDR-Wissenschaft，die in eine neue Zeit zu retten sind？Die Zeit，23. 11. 1990.

181 Wilhelm Bleek/Lothar Mertens：DDR-Dissertationen. Promotionspraxis und Geheimhaltung von Doktorarbeiten im SED-Staat. Opladen 1994. Dies. （Hg.）：Bibliographie der geheimen DDR-Dissertationen. Bd. 1：Bibliographie. Bd. 2：Register. München 1994.

182 Hans-Ulrich Wehler：Hart widersprechen und mit dem Unfug stets konfrontieren. Ein Gespräch. Frankfurter Rundschau，24. 9. 1992.

183 Klaus-Jürgen Scherer：Hochschule Ost. Einige Aspekte und Eindrücke. Frankfurter Hefte，Nr. 12/1996，S. 1120 ff.

184 Rüdiger Liedtke：Die neue Skandal-Chronik. 40 Jahre Affären und Skandale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89. Fritz Lietsch/Bernhard Michalowski （Hg）：Die Bananenrepublik. Skandale und Affär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Eine Chronik. München 1997.

185 Thomas Mann：Deutsche Hörer！Fünfundfünfzig Radiosendungen nach Deutschland. Werke. Das essayistische Werk. Taschenbuchausgabe in 8 Bdn. Hg. von Hans Bürgin. Bd. 3：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 Frankfurt am Main，Hamburg 1968，S. 290.

186 Christian Schütze：Des Volkes letzter Trumpf. Für Skandale gelten Gesetze，die jeder kennen sollte - vor allem der Politiker. Süddeutsche Zeitung，11./12. 2. 1984. Ders.：Die Kunst des Skandals. München，Bern 1967.

187 Wolfram Schütte：Treue und Liebe，nicht Glauben. Selbstgespräch am Ultimo. Heinrich Bölls posthumer Roman »Frauen vor Flußlandschaft«. Frankfurter Rundschau，Jg. 1985. Heinrich Böll：Frauen vor Flußlandschaft. Roman in Dialogen und Selbstgesprächen. Köln 1985，S. 7.

188 Peter-Ferdinand Koch：Der Fund. Hamburg 1990.

189 Paul Pucher：Der Pfälzer und der Bayer. Über die Gegenspieler Helmut Kohl und Franz Josef Strauß. Der Spiegel，Nr. 35/1985，S. 64.

190 Daniel Koefer/Karl-Heinz Janßen：Sie kamen bei Nacht und Nebel. Vor zwanzig Jahren erschütterte die Spiegel-Affäre die Republik. Neues über die Rolle von Strauß und der FDP. Die Zeit，22. 10. 1982.

191 Sighard Neckel：Die Wirkungen politischer Skandal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9. 2. 1990，S. 6 ff. Rolf Ebbinghausen/Sighard Neckel （Hg.）：Anatomie des politischen Skandals. Frankfurt am Main 1989.

192 Claus Leggewie：Der Geist denkt rechts. Wo Politik vorgedacht wird：Ein Streifzug durch die konservativen Denkfabriken der Bundesrepublik. Die Zeit，16. 10. 1987. Ders.：Der Geist steht rechts. Ausflüge in die Denkfabriken der Wende. Berlin 1987.

193 Johannes Gross：Die Misere der öffentlichen Gefühle. Oder Trübsinn würzt den Genuß des Wohlstand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 3. 1980.

194 Hagen Schulze：In manchem überholt，aber nicht überwunden. Über Geschichte und Zukunft des Nationalstaate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7. 4. 1991. Ders.：Staat und Nation in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München 1994.

195 Helmut König：Von der Masse zur Individualisierung. Die Modernisierung des Konservatismus in der Bundesrepublik. Leviathan，Heft 2/1988，S. 269.

196 Jörg Bergmann/Claus Leggewie：Die Täter sind unter uns. Beobachtungen aus der Mitte Deutschlands. Kursbuch，Nr. 113/1993，S. 17.

197 Peter Ködderitzsch/Leo A. Müller：Rechtsextremismus in der DDR. Göttingen 1990. Frank Schumann：Glatzen am Alex. Rechtsextremismus in der DDR. Berlin 1990.

198 Thomas Nipperdey：Die Deutschen wollen und dürfen eine Nation

sein. Wider die Arroganz der Post-National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3. 7. 1990.

199 Christian Meier：Wir brauchen Vertrauen.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nationalen Selbstbewußtseins. Der Spiegel，Nr. 5/1995，S. 154.

200 Spiegel-Gespräch mit Almuth Berger：Nie zur Toleranz erzogen. Der Spiegel，Nr. 14/1990，S. 108 f.

201 Hans-Uwe Otto/Roland Merten（Hg.）：Rechtsradikale Gewalt im vereinten Deutschland. Opladen 1994.

202 Heimo Schwilk/Ulrich Schacht（Hg.）：Die selbstbewußte Nation. »Anschwellender Bocksgesang.« Berlin 1994，S. 20.

203 Rainer Zitelmann：Wohin treibt unsere Republik？Berlin 1995.

204 Ernst Nolte：Streitpunkte. Heutige und künftige Kontroversen um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Frankfurt am Main 1993.

205 Thomas E. Schmidt：Die Demokratie als Seinsverfehlung. »Die selbstbewußte Nation« - Ein »konservatives Manifest« aus dem UllsteinVerlag. Frankfurter Rundschau，5. 10. 1994.

206 Gerhard A. Ritter/Merith Niehuss：Wahl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undestags- und Landtagswahlen 1946-1987. München 1987.

207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Peter Lösche（Hg.）：Parteien in der Krise？Das Parteiensystem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er Aufstand des Bürgerwillens. München 1986. Demokratie auf dem Prüfstand. Eine Veranstaltungsreihe des Bertelsmann Forums 1988-1989. Bertelsmann

Briefe，Heft 124，Juni 1989. Hans Apel：Die deformierte Demokratie - Parteien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91. Erwin und Ute Scheuch：Cliquen，Klüngel und Karrieren. Über den Verfall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 eine Studie. Reinbek bei Hamburg 1992. Hans-Peter Bartels/Trutz Graf Kerssenbrock：Abgewählt. Wie den Parteien das Volk abhanden kam. Düsseldorf 1994. Hans-Georg Betz：Krise oder Wandel？Zur Zukunft der Politik in der postindustriellen Moderne. Hans Herbert von Arnim：Ist Kritik an den politischen Parteien berechtigt？Hans Rattinger：Abkehr von den Parteien？Dimensionen der Parteiverdrossenheit. Jürgen W. Falter/Siegfried Schumann：Nichtwahl und Protestwahl. Zwei Seiten einer Medaill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2. 3. 1993. Hildegard Hamm-Brücher：Wege in die und Wege aus der Politik（er）verdrossenheit. Claus Leggewie：D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lasse und die Bürgergesellschaft.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30. 7. 1993.

208 Joseph Huber：Abschied vom Parteienstaat. Die Zeit，11. 11. 1988.

209 Hans Heigert：Abgeordneter - eine Karriere. Süddeutsche Zeitung，25./26. 10. 1986.

210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braucht die Parteien. Aber der Machtanspruch der Parteien gefährdet die Demokratie. Bundespräsident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im Gespräch mit Gunter Hofmann und Werner A. Perger. Die Zeit，19. 6. 1992. Gunter Hofmann/Werner A. Perger（Hg.）：Weizsäckers Parteienkritik in der Diskussion. Frankfurt am Main 1992. Aufstand in den Parteien. Positionspapier von Rebellen aus CDU，SPD und Grünen. Der Spiegel. Dokument，Heft 3/1993.

211 Thomas Darnstädt/Gerhard Spörl：Streunende Hunde im Staat. Der Spiegel，Nr.13/1993，S. 147.

212 Konrad Adam：Sehnsucht nach Programm.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4. 3. 1987.

213 Heiner Geißler：Zugluft. Politik in stürmischer Zeit. München 1990.

214 Warnfried Dettling：Das Erbe Kohls. Frankfurt am Main 1994.

215 Hartmut von Hentig：Alles tun können，was anderen nicht schadet - oder：Der diskrete Charme des Liberalismus. Merkur，Heft 400/1981，S. 960 ff.

216 Theo Rütten：Der deutsche Liberalismus 1945 bis 1955. Baden-Baden 1984.

217 Peter Lösche/Franz Walter：Man glaubt der Partei kein Wort mehr. Die Freien Demokraten haben ihre Bindung an soziale Milieus und an politische Prinzipien verlor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 12. 1995. Franz Walter：Wie modern ist die FDP？Die Zeit，7. 6. 1996.

218 Ralf Dahrendorf：Das Elend der Sozialdemokratie. Merkur，Nr. 12/1987，S. 1024，1034，1037. Jonathan Carr：Helmut Schmidt. Düsseldorf 1993.

219 Karl Dietrich Bracher u. a. （Hg.）：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5 Bdn. Bd. 2：Wolfgang Jäger：Die Innenpolitik der sozial-liberalen Koalition. 1974-1982. Stuttgart 1987，S. 263.

220 Ralf Dahrendorf：Das Bündnis der Selbstbewußten. Die Zeit，24. 9. 1982.

221 Oskar Lafontaine：Das Gesicht der Zukunft. Reformpolitik in einer veränderten Welt. Hamburg 1988.

222 Jürgen Leinemann：Junge，das mußt du durchhalten. Über Johannes Rau und das Anekdotische. Der Spiegel，Nr. 5/1986，S. 43 ff.

223 Manon Maren-Grisebach：Philosophie der Grünen. München 1982. Gerd Langguth：Der grüne Faktor - Von der Bewegung zur Partei？Zürich 1984. Klaus Gotto/Hans-Joachim Veen （Hg.）：Die Grünen - Partei wider Willen. Mainz 1984. Emil-Peter Müller：Die Grünen und das Parteiensystem. Köln 1984. Anna Hallersleben：Von der Grünen Liste zur Grünen Partei. Göttingen 1984. Thomas Kluge （Hg.）：Grüne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4. Sabine Stamer （Hg.）：Von der Machbarkeit des Unmöglichen. Hamburg 1985. Wolfram Bickerich （Hg.）：SPD und Grüne - das neue Bündnis. Hamburg 1985. Brigitte Jäger/Claudia Pinl：Zwischen Rotation und Routine. Die Grünen im Bundestag. Köln 1985. K.-J. Scherer/F. Vilmar：Ökosozialismus？Rotgrüne Bündnispolitik. Berlin 1985. Thomas Ebermann/Rainer Trampert：Die Zukunft der Grünen. Hamburg 1985. Oliver Tolmein （Hg.）：Ökorepublik Deutschland - Erfahrungen und Perspektiven rotgrüner Zusammenarbeit. Hamburg 1986. Manfred Langner（Hg.）：Die Grünen auf dem Prüfstand. Analyse einer Partei. Bergisch-Gladbach 1987. Rudolf van Hüllen：Ideologie und Machtkampf bei den Grünen. Bonn 1990. Michael Schroeren （Hg.）：Die Grünen. Zehn bewegte Jahre. Wien 1990.Verena Krieger：Was bleibt von den Grünen. Hamburg 1991.Joachim Raschke：Bilanz und Neubeginn. Marburg 1991.Udo Knapp：Das Wagnis. Ökologische Realpolitik；pragmatisch，

staatsfern，mehrheitsbewußt，grün.Frankfurt am Main 1991.Hubert Kleinert：Aufstieg und Fall der Grünen. Analyse einer alternativen Partei. Bonn 1992.Ders.：Vom Protest zur Regierungspartei. Die Geschichte der Grünen. Frankfurt am Main 1992.Joachim Raschke：Die Grünen. Wie sie wurden，was sie sind. Bund Verlag 1993.Peter Gatter：Die Aufsteiger. Ein politisches Porträt der Grünen. Hamburg 1987.

224 Bernd Guggenberger：Zwischen Feldküche und Familientreffen. Die Umweltpartei im Umbruch：Rigide Gesinnungsethik muß der Verantwortungsethik weichen. Die Zeit，21. 6. 1985. Carl Offe：Zwischen Protest- und Parteipolitik. Die Zeit，10.10.1986.

225 Helmut Fogt：Die Mandatsträger der Grünen. Zur sozialen und politischen Herkunft der alternativen Parteielit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5. 3. 1986.

226 Jürgen Leinemann：Rebell und Macher. Der Spiegel，Nr. 22/1995，S. 40 ff. Joschka Fischer：Von grüner Kraft und Herrlichkeit. Reinbek bei Hamburg 1984.

227 Hans Herbert von Arnim：Das Münchhausenproblem der politischen Klasse. Der Staat - Beute der Parteien？Frankfurter Rundschau，19. 2.1993. Ferner Jean-Marie Guéhenno：Das Ende der Demokratie. München，Zürich 1994.

228 Robert Hughes：Nachrichten aus dem Jammertal. Wie sich die Amerikaner in political correctness verstrickt haben. München 1994.

229 Theo Sommer：Ein Abgrund von Doppelmoral. Die Zeit，21. 5.1993.

230 Ein Manifest：Weil das Land sich ändern muß. Die Zeit，13. 11. 1992. Herbert Riehl-Heyse：Jedem das Seine，mir das meiste. Süddeutsche Zeitung，20./21. 2.1993.

231 Jürgen Habermas：Die zweite Lebenslüge der Bundesrepublik：Wir sind wieder »normal« geworden. Die Zeit，11.12.1992.

232 K. Schwarz：Demographische Randbedingungen neuer Stadtstrukturen. Zeitschrift für 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Heft 4/1987. E. Spiegel：Neue Haushaltstypen. Entstehungsbedingungen，Lebenssituation，Wohn- und Stadtortverhältnisse. Hamburg 1985.

233 Marion Gräfin Dönhoff：Auch die Freiheit hat ihre Grenzen. Die Zeit，1. 4.1994.

234 Ralf Dahrendorf：Die Zukunft der Bürgergesellschaft. Frankfurter Rundschau，24. 1. 1992. Ferner Wilhelm Heitmeyer（Hg.）：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uf dem Weg von der Konsens- zur Konfliktgesellschaft. 2 Bde. Frankfurt am Main 1997.

235 Hans-J. Misselwitz：Nicht länger mit dem Gesicht nach Westen. Das neue Selbstbewußtsein der Ostdeutschen. Bonn 1996.

236 Klaus von Beyme：Zivilgesellschaft contra Staatsversagen. Frankfurter Rundschau，23.1.1993.

237 Friedbert Pflüger：Richard von Weizsäcker. Ein Porträt aus der Nähe. Stuttgart 1990. Werner Filmer/Heribert Schwan（Hg.）：Richard von Weizsäcker. Düsseldorf 1989. Ferner Richard von Weizsäcker：Vier Zeiten. Erinnerungen. Berlin 1997.

238 Günter Scholz：Die Bundespräsidenten. Biographien eines Amtes. Heidelberg 1992.

239 Volker Gransow：Mikroelektronik und »Freizeit«. Politisch-kulturelle Folgen einer technischen Revolution. Berlin 1982，S. 7.

240 Christian Mollenhauer：Mikroperipherik. Mitteilungen der Fachhochschule für Technik，Nürnberg，Jg. 1986.

241 Eric W. Leaver/J. J. Brown：Die Fabrik der Zukunft；o. O.1947.

242 Klaus Kemper：Der Tod des klassischen Industriearbeiters. Die Mikroelektronik schafft eine ganz neue Arbeitswel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5. 3. 1986.

243 Peter Brödner：Fabrik 2000. Berlin 1985，S. 118.

244 Georg Klaus（Hg.）：Wörterbuch der Kybernetik. Bd. 1. Frankfurt am Main 1969，S. 380. David Ritschie：Gehirn und Computer. Die Evolution einer neuen Intelligenz. Stuttgart 1987. Computerkultur. Kursbuch，Nr. 75/1984.

245 Theodore Roszak：Der Verlust des Denkens. Über die Mythen des Computer-Zeitalters. München 1986. Willi Köhler：Der Verlust des Denkens. Frankfurter Hefte，5/1987，S. 475 ff.

246 Jochen Köhler：Die unwünschbare Maschine. Warum Computer existentiell dumm sind. Frankfurter Rundschau，11.1.1986.

247 Hubert L. Dreyfus：Künstliche Intelligenz. Von den Grenzen der Denkmaschine und dem Wert der Intuition. Reinbek bei Hamburg 1987，S.

99 ff.

248 Peter Zec：Informationsdesign. Die organisierte Kommunikation. Zürich 1988，S. 107 f. Ferner Hermann Glaser：Das Verschwinden der Arbeit. Die Chancen der neuen Tätigkeitsgesellschaft. Düsseldorf，Wien，New York 1988.

249 Horst Kern/Michael Schumann：Das Ende der Arbeitsteilung？Rationalisierung in der industriellen Produktion. München 1984，S. 44 ff.

250 Klaus Haefner：Mensch und Computer im Jahre 2000. Ökonomie und Politik für eine human computerisierte Gesellschaft. Basel/Boston/Stuttgart 1984.

251 Ulrich Beck：Kapitalismus ohne Arbeit. Über Mythen der Politik，globale Wirtschaft und die Zukunft der Demokratie. Der Spiegel，Nr. 20/1996，S. 140 ff.

252 Jeremy Rifkin：Die dritte Säule der neuen Gesellschaft. Die Zeit，2. 5. 1997. Ferner：Für eine Zukunft in Solidarität und Gerechtigkeit. Die Hauptgedanken des Wortes der Kirchen zur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Lag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 3.1997.

253 Hermann Sallinger：Handikap-Punkte. Neue Wege aus der Arbeitslosigkeit. Universitas，Heft 10/1987，S. 1065 f.

254 Axel Bust-Bartels：Beseitigung der Massenarbeitslosigkeit durch soziale Innovation？Alternativen zur Arbeitsmarktpolitik.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B. 43/1987，S. 3 ff. Ders. Vollbeschäftigung ohne Niedriglohn. Opladen 1999. Ferner Gerhard Schröder：Es gibt Arbeit für alle. Living. Das Kulturmagazin，Nr.

2/3，1994，S. 47.

255 Horst W. Opaschowski：Wie leben wir nach dem Jahr 2000？ Szenarien über die Zukunft von Arbeit und Freizeit. BAT Freizeit-Institut. Hamburg 1987.

256 Streitgespräch zwischen André Gorz，Peter Glotz und Tilman Fichter：Kapitalistisches Konsummodell und Emanzipation.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Heft 5/1986，S. 393.

257 Konrad Adam：Mit dem sozialen Netz im Trüben fischen. Der Wohlfahrtsstaat schafft die Risiken，vor denen er schützen will.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 3.1992.

258 Meinhard Miegel：Es hat die Menschen deformiert. Tabus und Illusion verschleiern das historische Versagen des Sozialstaate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 4.1996.

259 Franz Müntefering：Der Sozialstaat ist nötig. Wider die verführerische Philosophie seiner Zerstörun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5. 4.1996.

260 Ulrich Beck：Kapitalismus ohne Arbeit；a. a. O.，S. 142.

261 Ders.：Risikogesellschaft -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1986. Ferner J. Brüggemeier：Tschernobyl，26. April 1986. München 1997.

262 Peter Kafka：Gegen den Untergang. Schöpfungsprinzip und globale Beschleunigungskrise. München，Wien 1994，S. 110 ff. Ders.：Das Grundgesetz vom Aufstieg. Wege zum wirklichen Fortschritt.

München，Wien 1989.

263 Ulrich Beck：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Zu einer Theorie reflexiver Modern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3，S. 169.

264 Joseph Huber：Zukunftsfra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Frankfurter Hefte，Heft 8/1987，S. 676 ff Ders.：Die Regenbogengesellschaft. Ök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5.

265 Friedrich Schiller：Die Ideale. Karl Otto Conrady（Hg.）：Das große deutsche Gedichtbuch. Kronberg （Ts.） 1977，S. 294 f.

人名索引

Abs，Hermann 56

Abusch，Alexander 95，567

Ackermann，Anton 47，96，131

Ackermann，Max 204，214

Adam，Konrad 620，639

Adama von Scheltema，Friedrich 207

Adamov，Arthur 361

Adenauer，Konrad 78，80-82，162，194，229，234-242，246，249，252，254 f.，310，314，327 f.，334，336，340，356，359，383，390，610 f.

Adorf，Mario 588

Adorno，Theodor W. 124，157，167，181，239，317，352-355，362 f.，373-375，382，385，403，406，408，431 f.，503，515

-»Negative Dialektik« 408

-»Wozu noch Philosophie？« 375

Ahlers，Conrad 611

Ahlsen，Leopold 335

Ahrends，Martin 314

Aicher，Otl 291

Aichinger，Ilse 324-326，335

Albers，Detlef 402

Albers，Hans 178，190，200

Albers，Josef 123

Albrecht，Susanne 410

Alexander，Peter 358

Allemann，F. R. 255

Alt，Franz 591

Altenbourg，Gerhard 576，581

Alter，Henry C. 138

Alvermann，Hans Peter 421

Ambrose 180

Amery，Carl 377，482，551

Améry，Jean 384，408

Ammer，Thomas 97

Anders，Günther 119，124，317

Andersch，Alfred 102，172，196，322，332

Andersen，Lale 179

Anderson，Sascha 447，464

Andres，Stefan 167

Anouilh，Jean 148

Antes，Horst 420

Archipenko，Alexander 203

Arendt，Hannah 60，124，375

Aretin，Anette von 337

Armstrong，Louis 180

Arnim，Hans Herbert von 624

Arrabal，Fernando 425

Artaud，Antonin 425

Ash，Timothy Garton 628

Assia，Lys 358

Assmann，Arno 366

Auden，W. H. 197，285，366

Augstein，Rudolf 192，306，310，408，500，611

Baacke，Dieter 398，488

Baade，Fritz 124

Baader，Andreas 409 f.，412 f.

Bab，Julius 146

Bach，Johann Sebastian 30

Bachem，Bele 284

Bacher，Ingrid 551

Bächler，Wolfgang 172

Bachmann，Ingeborg 98，324-326，335，366，533

Bachmann，Josef 409

Bahr，Egon 392

Bahrdt，Hans-Paul 263

Bahro，Rudolf 343，448 f.，480

Baierl，Helmut 465

Baky，Josef von 200

Bardot，Brigitte 279，286

Baring，Arnulf 29，431

Barlach，Ernst 202

Barlog，Boleslaw 146，311，362

Barschel，Uwe 611

Bartetzko，Dieter 522

Barth，Emil 170

Barth Karl 115，478

Barthes，Roland 61，512

Bartning，Otto 216-218，222，294 f.

Bartsch，Jürgen 265

Barzel，Rainer 430

Baselitz，Georg 369，421，495，525，581 f.

Bassermann，Albert 123

Bauer，Fritz 279，383

Bauer，Leo 130，243

Baudelaire，Charles 126，319

Bauman，Zygmunt 385

Baumeister，Willi 204，207，210-212，214，218，320，368

Bausch，Hans 183，336

Bausch，Pina 492，568

Bautz，Franz Josef 379

Bayer，Konrad 427

Beaucamp，Eduard 321，523，583

Beauvoir，Simone de 116，284

Bebel，August 107

Becher，Johannes R. 31，119，128-131，165，167，175-177，187，242，245，346，570，581

-»Abschied« 165

-»Kantate« 346

Beck，Julien 425

Beck，Ulrich 505，635，641

Becker，Hans Detlef 611

Becker，Jillian 409 f.

Becker，Jurek 549，593

Becker，Jürgen 326

Becker，Maria 121，362

Becker，Nicolas 545

Beckett，Samuel 361

Beckmann，Max 123，202-204，209，212，578

Bednarz，Klaus 591

Beethoven，Ludwig van 30，129，155，304，570

Behlmer，Hinnerk 402

Bekker vom Rath，Hanna 203

Bellmer，Hans 420

Belzner，Emil 149

Benda，Ernst 253

Bender，Hans 500

Bender，Peter 250，394，541

Benjamin，Walter 16，352，362，373

Benn，Gottfried 170，177，318 f.，326，370，372

Bense，Max 291，320 f.

Bentzien，Hans 597

Berendsohn，Walter A. 118

Berg，Alban 157，365，531

Bergengruen，Werner 112，169，370-372

Berger，Almuth 615

Berghaus，Ruth 566

Bergmeister，Dagmar 337

Bergner，Elisabeth 123

Bermann，Gottfried 174

Bersarin，Nikolai 137

Bertelmann，Fred 358

Bernitzke，Reinhard 349

Besch，Lutz 144

Besson，Benno 564，566

Bettelheim，Bruno 124

Beutler，Ernst 130，222

Beuys，Joseph 418-420，526-529

Beyer，Frank 598

-»Spur der Steine« 598

Bichsel，Peter 326

Biedenkopf，Kurt 554，620

Bieler，Manfred 347

Biermann，Wolf 421，447-453，455，464，470，545，550，552，575

Bill，Max 291

Binder，Wolfgang 142

Binding，Rudolf Georg 372

Biolek，Alfred 590

Bircher，Urs 564

Bischoff，Friedrich 182，338

Bismarck，Claus von 591

Bismarck，Otto von 32，246，344，520，614

Bissier，Julius 368

Blacher，Boris 156 f.

Bloch，Ernst 32，124，140，154，307，310，335，347，373 f.

Blöcker，Günter 326

Blücher，Gebhard Leberecht 520

Blume，August 111

Blumenberg，Hans 515

Bobrowski，Johannes 170，326

Böckler，Hans 84

Bodamer，Joachim 264

Böhm，Franz 85

Böhme，Erich 590

Böhme，Irene 439，564

Böhme，Manfred（Ibrahim）463

Bohrer，Harry 192

Bohrer，Karl Heinz 410，499

Bökenkamp，Werner 286

Böll，Heinrich 34，164 f.，264，324，326，335，370，379，412，449，497，499，609

-»Haus ohne Hüter« 264

-»Brief an meine Söhne« 34

-»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497

-»Frauen vor Flußlandschaft« 609

Bond，Edward 534

Bondy，Barbara 286

Bondy，François 348

Bondy，Luc 569

Bondzin，Gerhard 575

Bonhoeffer，Dietrich 112

Bopp，Jörg 472，508

Borchert，Wolfgang 100，144，149，164 f.，335

-»Draußen vor der Tür« 144，149，164，335

Borgward，Carl F. W. 271，300

Bormann，Martin 27，54

Born，Max 124

Born，Nicolas 476

Borinski，Fritz 124

Borsche，Dieter 359

Bott，Hans 241

Boulez，Pierre 366

Bourdieu，Pierre 524

Brahms，Johannes 30

Brandauer，Klaus Maria 599

Brando，Marlon 287

Brandt，Rut 325，401

Brandt，Willy 56，75 f.，248，253，255，325，392 f.，400 f.，428-431，543，548，617，622

Brasch，Peter 447

Brasch，Thomas 571

Braun，Eva 27

Braun，Harald 200 f.，359

Braun，J. J. 631

Braun，Volker 455，457，551，571

Brauner，Arthur 358

Braunmühl，Ekkehard von 491

Brecht，Bertolt 13，31，119 f.，139 f.，150，166，310-312，317-319，343，346，370，498，564-566，569，571，573，593

-»Das Verhör des Lukullus« 311

-»Turandot« 317

Bredel，Willi 348

Breitag，Ruth 337

Breker，Arnold 205

Breloer，Heinrich 590

Brenner，Eduard 94

Brenner，Hans Georg 325

Brenner，Hildegard 497

Brentano，Heinrich von 313

Breshnew，Leonid 248

Brinkmann，Rolf Dieter 396，399，467

-»In der Grube«

Britting，Georg 169

Broch，Hermann 119，168，372

Brod，Max

Brödner，Peter 632

Brown，Kenneth 425

Brücher，Ernst 41

Bruckner，Ferdinand 119 f.，364

Brüggemann，Otto 281

Brunhöber，Hanna 178

Bruyn，Günter de 453 f.，461 f.

Buber，Martin 119

Bubis，Ignatz 519

Bucerius，Gerd 191，331

Bucharin，Nikolai Iwanowitsch 244 f.

Büchner，Georg 172，365

Buchner，Mirl 304

Buckwitz，Harry 310 f.

Budzinski，Klaus 162

Buffet，Bernard 285 f.，288

Bultmann，Rudolf 376

Bürger-Prinz，Hans 279

Burnham，James 197，273

Burrmeister，Otto 146 f.

Busch，Ernst 123

Bust-Bartels，Axel 637

Buttersack，Felix 184

Buttig，Martin G. 369

Byrnes，James Francis 44，229

Cage，John 532

Calderón de la Barca，Pedro 142

Camaro，Alexander 208

Camus，Albert 117，148，284，286 f.

-»Der Mythos von Sisyphos« 117

Canetti，Elias 119

Capra，Fritjof 479

Carell，Rudi 590

Carnap，Rudolf 124，373

Carossa，Hans 169，371 f.

Carow，Heiner 598

Casdorff，Claus Hinrich 591

Caspar，Carl 206

Caspar，Horst 128

Cassirer，Hans 124，373

Castorf，Frank 564

Castro，Fidel 322，415

Caven，Ingrid 424

Celan，Paul 165，173，370

Cézanne，Paul 203

Chagall，Marc 211

Chaloner，John 192

Chardin，Teilhard de 479

Chataway，Chris 304

Christadler，Marieluise 482

Chruschtschow，Nikita 347，537

Churchill，Winston 33，36 f.

Ciulli，Roberto 569

Clay，Lucius D. 44，52，92

Conert，Herbert 225

Costard，Hellmuth 360，423

Courts-Mahler，Hedwig 503

Cremer，Fritz 450

Croce，Benedetto 197

Cube，Hellmuth von 170 f.

Curtius，Ernst Robert 136，197，220

Czechowski，Heinz 562

Dagover，Lil 359

Dahrendorf，Ralf 255，489，622

Daiber，Hans 148

Dall，Karl 591

Dalos，György 341

Damme，Jutta 575

Danuser，Hermann 530

de Sica，Vittorio 201

Dean，James 279，287

Degenhardt，Franz Josef 469

Dehler，Thomas 241

Deiters，Heinrich 95

Delaunay，Robert 211

Demetz，Peter 279

Denger，Fred 149

Denzler，Georg 114

Deschner，Karlheinz 372

Dessau，Paul 311，319，343，566

Dettling，Manfred 621

Deutsch，Ernst 123，362

Deutscher，Drafi 358

Dichter，Ernest 275

Dieckmann，Christoph 548

Dieckmann，Friedrich 32

Diedrich，Hans J. 340

Dietl，Helmut 599

Dietrich，Bruno 282

Dietrich，Marlene 123

Dilthey，Wilhelm 373

Dior，Christian 282

Dirks，Walter 130，268，332，378 f.，499

Dische，Irene 545

Dix，Otto 202，204，579

Döblin，Alfred 33，112，118 f.，182

»Der unsterbliche Mensch« 112

Dohnanyi，Klaus von 557

Dolmatowski，Jewgeni 132

Doll，Hans Peter 428

Dombrowski，Erich 303

Domröse，Angelica 598

Dönhoff，Marion Gräfin 191，331，551，626 f.

Dönitz，Karl 27 f.，54，101

Döpfner，Julius 378，384

Dorn，Dieter 569

Dorn，Walter 53，92

Dorsey，Tommy 180

Dos Passos，John 56

Dotterweich，Volker 51

Drechsel，Sammy 340

Dresen，Adolf 567

Drewermann，Eugen 380

Drews，Richard 118

Dreyfus，Hubert L. 634

Dufhues，Hermann Josef 328

Dulles，John Forster 236

Durbrigde，Francis 340

Durieux，Tilla 123

Dürrenmatt，Friedrich 120，122，165，258 f.，335

-»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 258 f.

Dutschke，Rudi 408 f.

Duwe，Harald 368

Düwel，Jörn 298

Dymschitz，Alexander 133

Ebbinghaus，Julius 115

Eberlein，Ludwig 141

Ebert，Friedrich 166，231

Eckel，Horst 304

Eco，Umberto 503

Eden，Anthony Sir 89

Eggebrecht，Axel 182

Egk，Werner 153，157 f.，365

-»Abraxas« 158

Ehard，Hans 80

Ehmsen，Heinrich 137，575

Ehrenburg，Ilja 47

Ehrenstein，Albert 119

Ehrenzweig，Robert 159

Eich，Günter 30，169，172，324-326，335

-»Inventur« 30，169

Eiermann，Egon 295

Einem，Gottfried von 365

Einstein，Albert 124

Eisenhower，Dwight D. 21，38，40，50

Eisler，Hanns 123，157，242

Elias，Norbert 124

Eliot，T.S. 148，197

Ellwein，Thomas 604

Elstner，Frank 591

Eluard，Paul 285

Emmerich，Wolfgang 565

Ende，Lex 190，243

Ende，Michael 482 f.

-»Die unendliche Geschichte« 482 f.

Endres，Elisabeth 318

Engel，Wolfgang 564，566

Engels，Friedrich 310，449，468

Engelberg，Ernst 344

Engholm，Björn 611

Engler，Wolfgang 343

Enke，Werner 423

Ensikat，Peter 453

Ensslin，Gudrun 399，409，413

Enzensberger，Hans Magnus 274，302，321 f.，327 f.，330，332，353，375，466，497，499，537，626

Eppler，Erhard 474

Erforth，Klaus 566

Erhard，Ludwig 84，230，255-258，274 f.，293

Erikson，Erik 124

Erler，Fritz 78，254

Ernst，Max 202

Erpenbeck，Fritz149 f.

Eschenburg，Theodor 74，78，142，252，611

Eucken，Walter 85

Fabrizius，Volker 114

Faktor，Jan 351，463

Falckenberg，Otto 126

Fanon，Frantz 416

Farah Diba，Kaiserin 401

Faßbender，Joseph 369

Fassbinder，Rainer Werner 423-425，428

-»Katzlmacher« 424

-»Warum läuft Herr R. Amok« 424

Faul，Ria und Paul 304

Faust，Wolfgang Max 525

Fechner，Eberhard 589

Fehling，Jürgen 138

Feininger，Lyonel 123

Feldbusch，Veronika 590

Feldkirchen，Toni 204

Felixmüller，Conrad 213

Fellini，Federico 260 f.

Felmy，Hansjörg 588

Felsenstein，Walter 343，564

Fendt，Fritz 300

Fest，Joachim 27，568

Feuchtwanger，Lion 119，168

Feyerabend，Paul 506，521

Fichte，Hubert 477

Fichte，Johann Gottlieb 111

Fichter，Tilman 469

Fiedler，Leslie A. 466

Field，Noel H. 243

Finck，Werner 160，162

Fink，Agnes 325

Fischart，Johann 464

Fischer，G.B. 123

Fischer，Joschka 624

Fischer，Samuel 174

Fischer，Wend 291

Fischer-Dieskau，Dietrich 365

Flach，Karl-Hermann 330，431

Flade，Hermann J. 309

Flake，Otto 141

Fleckhaus，Willy 334

Flemming，Max Leon 203

Flick，Friedrich 54，271

Flickenschildt，Elisabeth 142

Flimm，Jürgen 569

Flügel，Heinz 94

Forst，Willi 278

Forsthoff，Ernst 639

Fortner，Wolfgang 157，365

Fouché，Joseph 384

Fraenkel，Ernst 124

Franck，Walter 362

Frangois-Ponçet，Andre 237

Frank，Bruno 54，119 f.

Frank，Leonhard 119

Franke，Günther 203 f.

Frankenfeld，Peter 338

Franz von Assisi 465

Frei，Norbert 188，239

Freud，Sigmund 403

Freund，Ludwig 384

Freyer 374

Frick，Wilhelm 54

Fried，Erich 165

Fried，Ferdinand 359

Friedeburg，Ludwig von 280，406

Friedlaender，Ernst 191

Friedrich，Hans Eberhard 207

Friedrich，Heinz 172

Friedrich，Walter 542

Friedrich，II. 520，614

Friedrichs，Hanns Joachim 592

Frings，Joseph 75，271

Frisch，Max 57，120 f.，165，311，335

-»Nun singen sie wieder« 57

Fritzsche 54

Fritschler，Hans Dieter 544

Froboes，Conny 358

Fromm，Erich 38，124

Fruhtrunk，Günther 368，420

Fuchs，Hannes 423

Fuchsberger，Joachim 591

Fühmann，Franz 140，447，456，462 f.

Fuhr，Xaver 203

Fukuyama，Francis 516

Funk，Walther 54

Furtwängler，Wilhelm 126，128

Gablentz，von der 402

Gadamer，Hans-Georg 130

Gaiser，Gerd 261

Galbraith，John Kenneth 484

Gall，Lothar 390，560

Ganz，Bruno 494

Garciá Lorca，Federico 365

Gasser，Manuel 1744

Gauck，Joachim 465

Gauguin，Paul 265

Gaulle，Charles de 182，235

Gaus，Günter 592，597

Gaze，Heino 137

Gehlen，Arnold 322 f.，373 f.，516，580

Geiger，Rupprecht 204，211

Geiger，Theodor 124

Geißendörfer，Hans W. 588

Geissler，Christian 378

Geißler，Heiner 620 f.

Geitlinger，Ernst 204

Genscher，Hans-Dietrich 542

George，Götz 588，599

George，Stefan 119

Gerhardt，Wolfgang 621

Gerstenmaier，Eugen 193，331

Gessner，Herbert 178

Gide，Andre 174

Gidion，Siegfried 294

Giehse，Therese 121，258 f.

Giese，Hans 279

Gieseking，Walter 126

Gille，Sighard 577

Gilles，Werner 204，212，284

Gilmore，Rosamund 493

Gimbel，John 88

Ginsberg，Ernst 121

Giordano，Ralph 385

Giraudoux，Jean 120

Gitlin，Todd 398

Glaab，Manuela 600

Glas，Uschi 423

Glaser，Hermann 485

Globke，Hans Maria 238

Glöckner，Hermann 215

Glotz，Peter 587，604，620 f.

Gluchowski，Peter 624

Glucksmann，André 513

Gmelin，Helmuth 145

Goebbels，Joseph 22，24 f.，27，143，153

Goertz，Hartmann 194

Goes，Albrecht 134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30，130，134，136，147，181，222，244，254，338，370，417，445，532，569，610

Gogarten，Friedrich 376

Gogh，Vincent van 287

Gogol，Nikolai 365

Gohr，Siegfried 580 f.

Gold，Käthe 362

Goldhagen，Daniel Jonah 519

Gollancz，Victor 192

Gollwitzer，Helmut 101

Goodmann，Benny 180

Gomulka，Wladyslaw 449

Goppel，Alfons 384

Gorbatschow，Michail 478，537-539

Göring，Hermann 27，54

Gorki，Maxim 427

Görres，Joseph 193

Gorvin，Joana Maria 362

Gorz，André 638

Gottschalk，Thomas 590

Götze，Werner 178

Grabbe，Christian Dietrich 366

Graf，Oskar Maria 119，168

Gräf，Roland 598

Grass，Günter 16，229，270，310，325-328，421，430，475，499，548，551，581，614

-»Die Blechtrommel« 327

-»Ein weites Feld« 548

-»Hundejahre« 270

Graudenz，Karlheinz 283

Greco，Juliette 287

Greene，Hugh Carleton 184

Greiffenhagen，Martin 100

Gries，Rainer 72 f.

Grieshaber，HAP 369

Grillparzer，Franz 167

Grimme，Adolf 338

Grohmann，Will 213

Groll，Gunter 324

Gropius，Walter 123，216，220 f.，291，294

Gross，Johannes 258，612

Grosz，George 123

Grotewohl，Otto 48，83 f.，132，247

Grotowski，Jerzy 426

Grüber，Klaus Michael 428，568

Gruhl，Herbert 474

Grün，Max von der 551

Grünbein，Durs 517

Gründgens，Gustaf 116，126，128，145，160，362

Grundig，Hans 214

Grundig，Max 271 f.

Grünewald，Mathias 153

Guevara，Ernesto Che 415，533

Gugelot，Hans 291

Guggenberger，Bernd 507

Guggenheim，Solomon R. 211

Guggenheimer，Walter 172

Guggenheimer，Walter Maria 332

Guillaume，Günter 431

Günther，Eberhard 457

Günther，Egon 598

Günther，Joachim 169

Gunzert，Rudolf 406

Guttuso，Renato 577

Gysi，Gregor 544

Gysi，Klaus 567

Habe，Hans 171，186

Haber，Fritz 124

Habermas，Jürgen 354，373，395，402，404，417，482，503，513，518，626

Hacks，Peter 566，570-572

Haecker，Theodor 112

Haefner，Klaus 635

Haffner，Sebastian 245

Haftmann，Werner 207

Hage，Volker 477

Hagelstange，Rudolf 168，284

Hager，Kurt 457

Hahn，Kurt 124

Hahn，Ulla 492

Hajek，Otto Herbert 368 f.，420

Handke，Peter 329，467，476，494，509 f.

Harich，Wolfgang 135，137，307，347

Harlan，Veit 238 f.

Harpprecht，Klaus 592

Hartmann，Karl Amadeus 156 f.

Hartung，Hans 368

Hartung，Karl 208，369

Hasenclever 120

Hasse，O. E. 359

Hassel，Kai-Uwe von 400

Hassencamp，Oliver 180

Hassenpflug，Gustav 218

Hatheyer，Heidemarie 362

Haug，Wolfgang Fritz 418

Haupt，Otto 218

Hausenstein，Wilhelm 320

Hauser，Erich 369

Haushofer，Albrecht 112

Haußmann，Leander 564

Havemann，Robert 308

Havenstein，Klaus 340

Hayek，Friedrich von 256

Heck，Bruno 400

Heck，Dieter Thomas 591

Heckel，Erich 202，204

Heesters，Johannes 178

Hegel，Georg Friedrich Wilhelm 241，373，503，517

Hegenbarth，Josef 343，576

Hegner，Jakob 123

Heidegger，Martin 60，92，116 f.，142，294，373 f.，376

-»Holzwege« 117，142

Heidemann，Gerd 500

Heidenreich，Gert 551

Heiliger，Bernhard 369

Hein，Christoph 456，550

Heine，Heinrich 158

Heinemann，Gustav 78，253，429，431

Heintje 358

Heinz，Wolfgang 121，564，567

Heiseler，Bernd von 384

Heisig，Bernhard 576，579，581

Heißenbüttel，Helmut 467，471

Heist，Walter 172

Heitmann，Steffen 553

Heldt，Werner 209，368

Heller，André 488 f.

Helwig，Werner 261

Hemingway，Ernest 172，174 f.，284，370

Hempel，Eberhard 212

Hendrix，Jimi 398

Henke，Klaus Dietmar 42

Hennecke，Adolf 439

Henningsen，Bernd 605

Henningsen，Manfred 64

Hennis，Wilhelm 251

Henrich，Rolf 459

Hensel，Georg 324，425，568

Henselmann，Hermann 214，223 f.，249，296

Hentig，Hartmut von 24，315，405，602 f.，621

Henze，Hans Werner 157，325，365-367

Herberger，Sepp 304

Herder，Johann Gottfried von 147

Hering，Gerhard F. 362

Herking，Ursula 160 f.

Hermand，Jost 112，122，127

Hermann，Ingo 592

Hermlin，Stephan 31，118 f.，165，187，346，450，455 f.

Herrmann-Neiße，Max 119

Herrnstadt，Rudolf 190

Herz，Wilhelm 304

Herzberg，Klemens 137

Herzfeld，Friedrich 158

Herzinger，Richard 550

Herzog，Roman 553，629

Herzog，Werner 359

Heß，Rudolf 54

Hesse，Hermann 59，90，134，175，210，370，372，467

-»Das Glasperlenspiel« 90

Hessen，Johannes 111

Heukenkamp，Ursula 177

Heuss，Theodor 34，83，131，142，206，234，240-242，621，629

Heydrich，Reinhard 384

Heydte，Friedrich August von der 610

Heym，Stefan 32，40，119，186，346，450，453，455 f.，551 f.

Heyme，Hansgünther 568

Hilbig，Wolfgang 447 f.

Hildebrand，Klaus 400

Hildebrandt，Dieter 340，590

Hildesheimer，Wolfgang 335

Hilpert，Heinz 362

Hilsbecher，Walter 172

Himmler，Heinrich 24，27，384

Hindemith，Paul 123，153 f.，156 f.，365，533

-»Mathis der Maler« 153

Hirche，Herbert 291

Hirsch，Burkhard 621

Hirsch，Martin 383

Hirschauer，Gerd 378

Hirschfeld，Kurt 120 f.

Hitler，Adolf 12，21-28，33，68，71，78，85，101，113，115，152，171，205 f.，236，242，250，384 f.，394，409，472，500，558，610

Höch，Hannah 368

Höcherl，Hermann 400

Hochhuth，Rolf 258，362，379

-»Der Stellvertreter« 362，379

Hochwälder，Fritz 119

Höck，Dorothea 460

Hocke，Gustav René 102

Hoegner，Wilhelm 52 f.，78

Hoelscher，Ludwig 365

Hoerschelmann，Fred von 335

Hofer，Karl 137，202，204，209 f.，212 f.，367 f.，578，581

Höfer，Werner 339，592

Hoffmann，Hans-Jürgen 457

Hoffmann，Hilmar 485

Hoffmann，Hubert 219

Hoffmann，Reinhild 493

Hofmannsthal，Hugo von 175

Hoghe，Raimund 492

Hölderlin，Friedrich 403

Holl，Adolf 480

Höllerer，Walter 328，500

Hollmann，Hans 428，568

Holthusen，Hans Egon 168，277，285，328

Holz，Arno 464

Holzhamer，Karl 591

Honecker，Erich 248，435，440，453，455，457，538 f.，541 f.，545，558，595

Honecker，Margot 545

Honegger，Arthur 154，365

Höpcke，Klaus 456，550

Höpcke，Wolfgang 457

Horkheimer，Max 38，124，317 f.，352-355，373 f.，406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353

Horney，Karin 124

Hornstein，Erika von 309

Horváth，Ödön von 119 f.，168

Horwitz，Kurt 121 f.，362

Hoven，Adrian 357

Hubbuch，Karl 368

Huber，Joseph 619，642

Huber，Klaus 532

Hübner，Bruno 145

Hübner，Kurt 362，428

Huch，Ricarda 166

Huchel，Peter 165，170，195 f.

Hugenberg，Alfred 307

Humboldt，Wilhelm von 355

Hundhammer，Alois 82，158，378

Husserl，Edmund 373

Huxley，Aldous 197

Huyssen，Andreas 512

Iden，Peter 569

Imdahl，Max 511

Immendorff，Jörg 419，526，580

Immermann，Karl 172

Ionesco，Eugène 361

Jäckel，Hartmut 542

Jackson，Robert H. 53

Jaesrich，Hellmut 197

Jäger，Hanns Ernst 362

Jäger，Manfred 129，452，458

Jäger，Wolfgang 429，432，622

Jahn，Friedrich 271 f.

Jahnn，Hans Henny 119，372

Jandl，Ernst 464

Janka，Walter 347 f.，454

Jannings，Emil 126

Janssen，Horst 420

Janßen，Karl-Heinz 411

Jarnach，Philipp 157

Jaruzelski，Wojciech 537

Jaspers，Karl 57 f.，116，136，222，373-375

-»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 375

Jauch，Günther 591

Jenninger，Philipp 620

Jenny，Urs 360

Jens，Walter 310，551，589

Jessner，Leopold 123

Jochimsen，Luc 592

Jodl，Alfred 21，54

Johnson，Uwe 312 f.，405，417

-»Ingrid Babendererde« 312

-»Mutmaßungen über Jakob« 312 f.

Johr，Barbara 46

Jonas，Hans 124

Jophin，Janis 398

Joyce，James 348

Jünger，Ernst 45，126，169，212，322 f.，372

Jungermann，Jimmy 178

Jungheinrich，Hans-Klaus 534

Jungk，Robert 478，485

Jürgens，Curd 359

Jürgens，Grethe 215

Jürgens，Helmut 365

Jürgens，Udo 358

Just，Gustav 347

Kádár，János 537

Kadow，Hermann 198

Kafka，Franz 348，370，512

Kafka，Peter 641

Kagel，Mauricio 532

Kahlau，Heinz 347

Kaisen，Wilhelm 78，253

Kaiser，Georg 119 f.，149，168

Kaiser，Joachim 30，327，510

Kaltenbrunner，Ernst 54，384

Kamper，Dietmar 514

Kandinsky，Wassily 123，207，211，288

Kant，Imanuel 111，198

Kant，Hermann 97，453

-»Das Impressum« 453

-»Die Aula« 97，453

Kantorowicz，Alfred 31，118 f.，195

Karajan，Herbert von 363

Karasek，Hellmuth 590

Kardorff，Ursula von 23，42，51，194

Karge，Manfred 567

Karmakar，Romuald 599

Karsunke，Yaak 550

Kaschnitz，Marie Luise 66

Kaspar，Hermann 205

Kästner，Erich 23，29，100，125 f.，130，159 f.，177，186，201，258，320

Katzer，Hans 400

Kaulbach，Friedrich August 180

Käutner，Helmut 110，200，315，359

Keilbert，Joseph 133

Keitel，Wilhelm 54

Kelemen，Milko 532

Kellermann，Bernhard 129

Kelsen，Hans 124

Kemp，Friedhelm 168

Kempner，Robert M. 124，180，191

Kempowski，Walter 73，180，309

Kennedy，John F. 392，398，429

Kennedy，Robert 398

Kern，Horst 634

Kerr，Alfred 146

Kertzscher，Günter 348

Kesten，Hermann 119，312 f.，320，324

Keupp，Heiner 560

Kiefer，Anselm 525 f.

Kienholz，Edward 421

Kiesinger，Kurt Georg 253，255，400，610

Kierkegaard，Søren Aabye 116

Kilby 630

King，A. 629

King，Martin Luther 398

Kinkel，Klaus 621

Kinski，Klaus 287

Kinsky，Rüdiger 591

Kipphardt，Heinar 362，567

Kipphoff，Petra 524

Kirchheimer，Otto 38，124

Kirchner，Ernst Ludwig 203，214，421

Kirsch，Sarah 344，443，551

Klarsfeld，Beate 400

Klebe，Giseselher 156 f.，366，532

Kleiber，Erich 123

Klee，Paul 123，288

Kleihues，Josef Paul 522

Klein，Herbert 305

Klein，Matthäus 183

Klein，Yves 368

Klemperer，Otto 123

Klemperer，Victor 342

Kleßmann，Christoph 75，82

Klie，Barbara 208

Klinkelhöfer 352

Klotz，Heinrich 521

Kluckhohn，Paul 142

Kluge，Alexander 359 f.

Knappertsbusch，Hans 126，364

Knef，Hildegard 278

Knoeringen，Waldemar von 102

Knuth，Gustav 258

Koch，Hans 236

Koegler，Horst 364

Koeppen，Wolfgang 126，165，240，370

-»Das Treibhaus« 240

Kogon，Eugen 33 f.，60，135，332，339，378，499

Kohl，Helmut 541 f.，553，558，615，620 f.

Kohlmeyer，Werner 304

Kohtz，Otto 223

Kokoschka，Oskar 123，202，214

Kołakowski，Leszek 543

Kolb，Annette 119

Kolb，Walter 352

Kolbe，Georg 203

Kolbe，Uwe 447，454，458

Kolbenhoff，Walter 102，165，170-172

Kolle，Oswalt 280

Kollwitz，Käthe 137，213

König，Helmut 613

König，René 124

Köpcke，Karl-Heinz 592

Körner，Theodor 25

Korte，Hermann 400

Kortner，Fritz 123，151 f.，325

Koss，Irene 337

Koszyk，Kurt 89

Kowa，Viktor de 359

Koczian，Johanna von 362

Kracauer，Siegfried 124

Kraemer，Friedrich Wilhelm 295

Krahl，Hans-Jürgen 406，409

Krahl，Hilde 362

Kramer，Franz Albert 193

Kramer，Hans Albert 331

Kramer，Josef 50

Kraus，Peter 358

Krauss，Werner 142，362

Krawczyk，Stephan 303

Kreikemeier，Willy 243

Kreimeier，Klaus 356

Krenek，Ernst 154，365

Krenz，Egon 538，542

Kresnik，Johann 493

Kreuder，Ernst 172

Kreutzberg，Martin 564

Kricke，Norbert 369

Kriegel，Volker 354

Kriss-Rettenbeck，Lenz 519

Kroetz，Franz Xaver 427

Kröll，Friedhelm 172

Krolow，Karl 169 f.，231

Krosch 373

Krosigk，Graf Schwerin von 27

Krug，Manfred 598

Krüger，Bum 161

Krüger，Helmut 161

Krüger，Horst 382

Krüger，Michael 500，510

Krupp von Bohlen und Haibach，Alfried 54，271

Kuby，Erich 46，196，306，500

Kuczynski，Jürgen 72，344，520

Kügelgen，Bernt von 348

Kühn，Erich 293

Kühn，Siegfried 598

Kuhn，Helmut 124

Kühne，Andreas 447

Kujau，Konrad 500

Kulenkampff，Hans-Joachim 338

Kundera，Milan 507

Kunert，Günter 166，345，350，450，453，456，544

Küng，Hans 379 f.，480 f.

Künneke，Evelyn 178，358

Kunz，Karl 204

Kunze，Reiner 433，463

Künzel，Carmela 275

Kunzelmann，Dieter 405

Kurt，Stefan 588

Küstermeier，Rudolf 187

Lachenmann，Helmut 530

Lachnit，Wilhelm 214

Laermann，Klaus 514

Lafontaine，Oskar 623

Lampugnani，Vittorio Magnago 295，523

Landahl，Heinrich 91

Lang，Alexander 567

Lang，Fritz 123

Lange，Hartmut 566，568

Lange，Horst 170

Lange，Katja 447

Langgässer，Elisabeth 112，165，169

Langhans，Rainer 405 f.，410，413

Langhoff，Matthias 567

Langhoff，Thomas 566 f.，573

Langhoff，Wolfgang 31，120 f.，150，563 f.，567，569 f.

Lasker-Schüler，Else 119，168 f.，492

Lasky，Melvin J. 167，197

Laub，Gabriel 422

Le Corbusier （eig. Jeanneret-Gris，Charles Edouard） 293，296

Le Fort，Gertrud von 371

Leander，Zarah 358

Leaver，Eric W. 631

Leber，Georg 400

Léger，Fernand 211，577

Lehmann，Hans Georg 393

Lehmann，Lutz 339

Lehmann，Wilhelm 169

Lehmann-Grube，Hinrich 554

Leicht，Robert 459

Leip，Hans 179

Leipold，Gerhard 124

Leistikow，Hans 218

Leithäuser，Jochen G. 136

Leitl，Alfons 220

Lembke，Robert 339

Lemmer，Ernst 62

Lenin，Wladimir Iljitsch 245，468

Lenk，Thomas 368 f.，420

Lennon，John 487

Lenschau，Hermann 144

Lenz，J. M. R. 366

Lenz，Siegfried 203，264

Lenya，Lotte 123

Leonhard，Wolfgang 46，183

Lepenies，Wolf 559，606

Lersch，Philipp 112

Lessing，Gotthold Ephraim 133，146，172，570，572

Lessing，Theodor 111，124，516

Leuthäusser-Schnarrenberger，Sabine 621

Leuwerik，Ruth 359

Lévi-Strauss，Claude 488，593

Levin，Kurt 38

Lewin，W. 349

Lewinski，Wolf-Eberhard von 530

Lewis，Sinclair 174

Lichtenstein，Roy 420

Liebeneiner，Wolfgang 149

Liebermann，Rolf 531

Liebknecht，Karl 310

Liebknecht，Kurt 223 f.

Liebrich，Werner 304

Ligeti，György 532

Lilje，Hanns 193

Lin Biao 416

Lindenberg，Udo 489，508

Lindlau，Dagobert 592

Lindtberg，Leopold 121，123

Link，Caroline 599

Lippe，Jürgen von der 590

Litt，Theodor 373 f.

Lodemann，Jürgen 592

Loerke，Oskar 169

Loest，Erich 307，347

Loewenstein，Karl 38

Loewy，Raymond 288

Löffler，Heinz 575

Löffler，Kurt 462，

Löffler，Sigrid 590

Lommel，Ulli 423

Lommer，Horst 160

Lönnendonker，Sigward 469

Loos，Theodor 142

Lorentz，Lore und Kay 163，340

Lorenz，Lovis H. 191

Lorre，Peter 123

Löwenthal，Leo 317，352

Löwith，Karl 124

Lübke，Heinrich 401，429

Lübke，Wilhelmine 401

Lüdecke，H. 208

Ludwig，Emil 119

Ludwig，Volker 467

Luft，Friedrich 146，159，164，361

Luhmann，Niklas 507，515，591

Lühr，Hans Peter 444

Lukács，Georg 348，373

Lüpertz，Markus 525 f.

Lüth，Erich 239

Luther，Martin 520，614

Luxemburg，Rosa 107，310，416

Lyck，Henry van 423

Lyotard，Jean-François 503，524

Maaz，Hans-Joachim 350，437

Mack，Heinz 368

Mäckler，Hermann 295

Maetzig，Kurt 200

Mahle，Hans 183，185

Mahler，Horst 405，413

Mahler，Gustav 154

Mai，Karl 304

Maier，Hans 255，390

Maier，Reinhold 78，83

Maihofer，Werner 411，431

Maizière，Lothar de 460，542，546 f.，602

Malina，Judith 425，427

Malthus，Thomas Robert 322

Manescoul，Ursula von 337

Manet，Edouard 287

Manger，Jürgen von 300

Mann，Erika 56

Mann，Golo 238

Mann，Heinrich 32，119，129，168

Mann，Klaus 119，154

Mann，Thomas 29，45，58 f.，113，119，134 f.，156，175，197，323，359，370，609，629

-»Dr. Faustus« 113，156，175

Mannheim，Karl 124

Manthey，Jürgen 169

Mao Tse-tung 415 f.，468

Marc，Franz 203

Marcks，Gerhard 369

Marcus，Gerhard 218

Marcuse，Herbert 38，124，317，352，354，375，396，403，476

Marcuse，Ludwig 119，124，279

Maron，Monika 249 f.，447

Marquard，Odo 485，514 f.，526，615

Marquardt，Fritz 566，572

Marshall，George 44，56，87，221

Marx，Karl 236，254，310，373，403，415，418，449，468，503，538

Mataré，Ewald 218，529

Matisse，Henry 578

Mattheuer，Wolfgang 576，581 f.

Matthies，Frank-Wolf 447

Mattson，Arne 278

Mauer，Burkhard 428

Mauersberger，Rudolf 343

May，Ernst 123

Mayer，Hans 118，120，140，164，168，347 f.

McCarthy，Joseph Raymond 307，398

McCloy，John 237

McClure，Robert 138，186

McFerrin，Robert （Bobby） 508

McLuhan，Marshall 496，585

Mechtel，Angelika 283

Mechtersheimer，Alfred 475

Meckel，Christoph 168

Meer，Fritz ter 271

Mehnert，Klaus 193，331

Meier，Christian 615

Meier，Richard 522

Meinecke，Friedrich 30，95，111

Meinhof，Ulrike 409 f.，412 f.

Meistermann，Georg 204，206

Melchinger，Siegfried 361

Mende，Erich 241，428，611

Mendelsohn，Erich 123，573

Mendelssohn Bartholdy，Felix，154

Mendelssohn，Peter de 56，119，138 f.，193，196

Merker，Paul 243

Merseburger，Peter 392

Messemer，Hannes 362

Messiaen，Olivier 157

Mettel，Hans 369

Metz，Johann Baptist 379 f.

Meyer，Hans Joachim 602

Michael，Klaus 447

Michael，Marion 286

Michaelis，Paul 575

Michaelis，Rolf 455

Michel，Detlef 467

Michel，Karl Markus 391，497

Miegel，Meinhard 639

Mielke，Erich 64

Mies van der Rohe，Ludwig 123，220，294

Milhaud，Darius 154

Miller，Glenn 180

Minks，Wilfried 428

Minssen，Friedrich 172

Mirandola，Picco della 529

Miró，Joan 288

Mitscherlich，Alexander 265，337

Mitscherlich，Alexander und Margarete 259 f.

Mittenzwei，Ingrid 520

Modigliani，Amedeo 287

Modrow，Hans 546

Mohammed Resa Pahlewi，Schah 401

Mohler，Armin 383 f.

Mol，Linda de 590

Mollenhauer，Christian 630

Möller，Horst 390

Molo，Walter von 58

Molotow，Wjatscheslaw 47

Momper，Walter 542

Mondrian，Piet 288

Monet，Claude 287

Monk，Egon 592

Moras，Joachim 332

Morgenthau，Henry 37

Morgner，Irmtraut 453

Morlock，Max 304

Morsey，Rudolf 390

Moser，Hugo 142

Mosheim，Grete 123

Mozart，Wolfgang Amadeus 30

Mueller-Stahl，Armin 598

Mühl-Benninghaus，Wolfgang 595

Mühlberg，Dietrich 520

Muhlen，Norbert 307

Mühlfenzl，Rudolf 597

Müller，Heiner 344，455，550，552，565-567，570-573

-»Die Umsiedlerin« 567，571

-»Lessings Schlaf Traum Schrei« 455

-»Germania Tod in Berlin« 455，572

Müller，Josef 82

Müller-Armack，Alfred 85，111

Müller-Marein，Josef 99，331

Münster，Clemens 332

Müntefering，Franz 640

Müntzer，Thomas 580

Musil，Robert 13，119，168，370，372

Müthel，Eva 309

Nabokov，Vladimir 279

Nannen，Henri 191，500

Napoleon Bonaparte I. 384

Naß，Gustav 412

Nay，Ernst Wilhelm 204，211 f.，368 f.

Neckel，Sighard 612

Neckermann，Erhard 401

Neckermann，Josef 274 f.

Negt，Oskar 395

Neher，Carola 123

Nekes，Werner 423

Nell-Breuning，Oswald von 268，379

Nerlinger，Oskar 215，581

Nesch，Rolf 369

Nestler，Peter 423

Neubert，Willi 344

Neuenfels，Hans 568

Neumann，Franz L. 38，352

Neumann，Günter 110，159 f.，162

Neumann，Robert 119

Neumeier，John 493

Neuss，Wolfgang 340

Neutra，Richard 294

Neutsch，Erik 350

Newport，Vivienne 493

Nicholls，A. J. 256

Niebaum，Peter 526

Niebelschütz，Wolf von 170，284

Niekisch，Ernst 27

Niemöller，Martin 113

Niethammer，Lutz 52

Nietzsche，Friedrich 111，117，132，170，454，502

Nitribitt，Rosemarie 261

Noack，Ursula 340

Nocker，Hilde 337

Nohl，Herman 90

Nolde，Emil 202-204，578

Nolte，Ernst 518，618

Nono，Luigi 366

Nordhoff，Heinrich 299

Nossack，Hans Erich 73，165

Nowottny，Friedrich 590，592

Novotny，Antonín 449

Oberlack，Alfred 372

Oberländer，Theodor 238

Obermeier，Uschi 406

Ode，Erik 588

Oechelhaeuser，Gisela 452

Oelschlegel，Gerd 335

Oelßner，Fred 347

Oelze，Richard 368

Offe，Klaus 624

Ohlendorf，Otto 54

Ohnesorg，Benno 401 f.

Ollenhauer，Erich 81 f.，253 f.

Opaschowsky，Horst W. 637

Ophüls，Max 278

Oppenheimer，Franz 124

Orff，Carl 133，156

Ormond，Henry 192

Ortega y Gasset，José 294

Orwell，George 197

Ost，Friedhelm 592

Ostler，Anderl 304

Ott，Richard 204

Otto，Theo 121

Packard，Vance 276

Paczensky，Gert von 339

Paeschke Hans 332，499

Palitzsch，Peter 362，485，567

Pallenberg，Max 123

Pankok，Otto 204，215

Papen，Franz von 54

Papenfuß-Gorek，Bert 447 f.，464

Pappritz，Erica 283

Paryla，Karl 121，362

Pasche，Friedrich 160

Patton，George Smith 26

Paul，Rudolf 80

Paul VI. 280

Pawek，Karl 290

Pechel，Rudolf 195

Pechstein，Max 135，202-204

Peitz，Christiane 599

Pelzer，Jürgen 339

Penck，A. R. （Ralf Winkler） 214，369，495 f.

Penzoldt，Ernst 175

Perthen，Hans-Anselm 564

Petersen，Wolfgang 482

Peymann，Claus 569

Pfahler，Georg Karl 368，420

Pfeiffer，Reiner 611

Picard，Max 580

Picasso，Pablo 207，231，577 f.

Picht，Georg 354，381

Pieck，Wilhelm 48，62，84，131，166，247

Piene，Otto 368

Piontek，Heinz 105

Pirker，Theo 268，328，379

Piscator，Erwin 123，149，427

Pius XII. 113，115，379

Planck，Max 222

Pleister，Werner 338

Plenzdorf，Ulrich 436，453，571，598

-»Die neuen Leiden des jungen W.« 436，571

Plessner，Helmuth 124，373

Plivier，Theodor 119，165

Poelzig，Hans 223

Polgar，Alfred 119，146，320

Polke，Sigmar 369，420 f.，525

Pollack，Detlef 540

PoHock，Friedrich 124，317 f.，352

Polt，Gerhard 590

Ponto，Erich 128，133

Ponto，Jürgen 410

Popitz，Heinrich 263

Popper，Karl R. 124，355，373

Posipal，Jupp 304

Postman，Neil 585

Preminger，Otto 286

Presley，Elvis 359

Priestley，John Boynton 148

Pritzkoleit，Kurt 272

Prokofjew，Sergej 154

Purrmann，Hans 123

Quadflieg，Will 362

Quest，Hans 144

Quinn，Freddy 358

Raab，Kurt 424

Raabe，Wilhelm 172

Raben，Peer 424

Rabenalt，Arthur Maria 126

Raddatz，Fritz J. 455，517，552

Radek，Karl 245

Radziwill，Franz 215，368

Raeder，erich 54

Rahms，Helena 281

Rahn，Helmut 304

Rahner，Karl 379

Rákosi，Mátyás 449

Ramin，Günther 343

Rank，Otto 124

Rasche，Karl 271

Raspe，Jan-Carl 413

Rathenau，Walter 51

Rathenow，Lutz 453

Ratzinger，Joseph 480

Rau，Heinrich 577

Rau，Johannes 419，623

Reagan，Ronald 478

Rebay，Hilla von 211

Reger，Erik 54

Reich，Jens 342，345，465，553

Reich，Wilhelm 124

Reich-Ranicki，Marcel 492，548，590

Reichert，Ossi 304

Reick，Theodor 124

Reifenberg，Benno 330

Reimann，Aribert 365，532 f.

Reimann，Brigitte 455

Reinhardt Max 123，146，361

Reinhardt，R. 190

Reitz，Edgar 359 f.，588

Remarque，Erich Maria 119

Renn，Ludwig 31

Reuter，Edzard 626

Reuter，Ernst 81，231

Reutter，Hermann 157，366

Revermann，Klaus H. 484

Ribbentrop，Joachim von 54

Richter，Gerhard 369，421，525 f.，579

Richter，Hans Theo 343，576

Richter，Hans Werner 41，66，102，165，172，196，258，324，328 f.

Richter，Horst-Eberhard 428

Riedel，Manfred 140

Riemerschmid，Richard 294

Rifkin，Jeremy 635 f.

Rihm，Wolfgang 533

Rilke，Rainer Maria 319，630

Rilla，Paul 160

Ringelnatz，Joachim 126

Rinser，Luise 165，379

Robertson，Brian 237

Robespierre，Maximilien 384

Robinsohn，Saul P. 124

Rodenstein，Heinrich 124

Roellecke，Gerd 547

Roh，Franz 207

Rohde，Georg 204.

Röhl，Klaus Rainer 617

Rökk，Marika 178

Romain，Lothar 485

Roosevelt，Franklin D. 36 f.

Röpke，Wilhelm 85，124，197

Rosen，Gerd 203

Rosenbauer，Hansjürgen 592

Rosenberg，Alfred 54，207

Rosenlöcher，Thomas 444

Rosenthal，Philipp 284

Rossellini，Roberto 201

Rössing，Karl 215

Roszak，Theodor 633

Roth，Gerhard 476

Roth，Joseph 119

Rowohlt，Ernst 174

Rousseau，Jean-Jaques 88

Rücker，Günther 598

Rückerl，Adalbert 383

Rudolph，Wilhelm 214

Ruf，Sep 293-295

Ruge，Gerd 592

Rühle，Günther 145，428

Rühmkorf，Peter 526，551

Ruhrberg，Karl 421

Russel，Bertrand 197

Rüstow，Alexander 85

Ruthenbeck，Reiner 369

Rutschky，Michael 486 f.

Rygulla，Ralf-Rainer 396

Sachs，Nelly 119，165

Sagan，Françoise 285 f.

Saint-Exupéry，Antoine de 174

Saint-Just，Louis Antoine Léon de 384

Sais，Tatjana 160

Saller，Karl 279

Sallinger，Hermann 636

Salocker，Angela 142

Salomon，Ernst von 51

Samhaber，Ernst 191

Sandberg，Herbert 160

Sander，Helga 46

Sander，Otto 494

Sanders-Brahms，Helma 335

Sänger，Fritz 194

Sarée，Günter 419

Saroyan，Wilhelm 175

Sartre，Jean-Paul 115 f.，120，148，284，286 f.，374

-»Die Fliegen« 116，148

Sauberzweig，Dieter 485

Sauckel，Fritz 54

Sawallisch，Wolfgang 366

Schaaf，Johannes 359，482

Schabowski，Günter 538，540 f.

Schacht，Hjalmar 54

Schacht，Ulrich 616

Schade，Herbert 304

Schädlich，Hans Joachim 453，549 f.

Schaeffer，Willi 137

Schäfer，Hans 304

Schäfer，Hans Dieter 169

Schäfers，Bernhard 554

Schäffer，Fritz 78，82

Schalk-Golodkowski，Alexander 546

Schalla，Hans 362

Schamoni，Peter 359

Schamoni，Ulrich 282，359

Schardt，Alois 592

Scharf，Albert 592

Scharl，Josef 202，204

Scharnagl，Karl 78

Scharoun，Hans 217，220 f.，294 f.

Scharping，Rudolf 623

Scheel，Walter 248，393，428，430 f.

Scheffler，Karl 208，222

Scheler，Max 373

Schell，Maria 359

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548

Schellow，Erich 362

Schelsky，Helmut 100，279

Scherchen，Hermann 311，365

Scherer，Klaus-Jürgen 603

Scherzer，Landolf 544

Schickele，René 119

Schildt，Axel 390

Schillebeeckx，Edward 379

Schiller，Friedrich 145，147，152，244，341，403，567，570，645

Schiller，Karl 255，325，400

Schirach，Baldur von 54

Schirdewan，Karl 347

Schirrmacher，Frank 518，562

Schivelbusch，Wolfgang 138

Schiwy，Günther 479

Schlamm，William S. 237

Schleef，Einar 567 f.

Schlemmer，Oskar 203

Schleyer，Hanns Martin 411，413，590

Schlichter，Rudolf 368

Schlöndorff，Volker 359，475

Schlüter，Leonhard 241

Schmeling，Max 339

Schmid，Carlo 142，254，400

Schmid，Richard 383

Schmidt，Arno 371

Schmidt di Simoni，Ewald 191

Schmidt，Doris 369，528

Schmidt，Harald 590

Schmidt，Helmut 431，622，626

Schmidt-Harzbach，Ingrid 286

Schmidt-Rottluff，Karl 202-204

Schnabel，Ernst 165，170，335 f.

Schnaidt，Claude 292

Schnebel，Dieter 532

Schneckenburger，Manfred 524

Schneider，Hermann 142

Schneider，Lambert 232

Schneider，Peter 395

Schneider，Reinhold 111，222

Schneider，Rolf 472

Schneider，Romy 357

Schneider-Lengyel，Ilse 172

Schneyder，Werner 590

Schnitzler，Karl Eduard von 348，594

Schnog，Karl 230

Schnurre，Wolfdietrich 165，172，310

Scholl，Hans und Sophie 291

Scholz，Bubi 305

Schomberg，Hermann 362

Schönberg，Arnold 123，156-158，365 f.，512，531，533

Schöneback，Eugen 525

Schönherr，Albrecht 459 f.

Schönhuber，Franz 619

Schopenhauer，Arthur 406

Schorlemmer，Friedrich 461，558

Schörner，Ferdinand 101

Schreiber，Hermann258，430

Schreinemakers，Margarethe 590

Schröder，Ernst 417

Schröder，Gerhard 379，400

Schröder，Gerhard 621，623

Schröder，Richard 560

Schröder，Rudolf Alexander 169，371

Schroeder，Louise 107

Schrödinger，Erwin 124

Schroeter，Werner 599

Schubert，Franz 30

Schuberth，Hans 338

Schüddekopf，Jürgen 195

Schuh，Oskar Fritz 366

Schult，HA 419

Schulz，Axel 575

Schulz Eberhard 296

Schulz，Genia 572

Schulze，Bernard 420

Schulze，Gerhard 585

Schulze，Hagen 613

Schulze，Norbert 179

Schulze-Reimpell，Jesko 606

Schulze-Reimpell，Werner 151

Schumacher，Emil 420

Schumann，Frank 615

Schumacher，Fritz 218

Schumacher，Kurt 82-84，234，236，240，247，252 f.，267，541

Schuman，Robert 235

Schumann，Karl 363

Schumann，Michael 634

Schumpeter，Joseph 124，197

Schündler，Rudi 126

Schuricke，Rudi 358

Schütze，Christian 609

Schwab-Felisch，Hans 359，499

Schwarz，Hans Peter 390

Schwarz，Rudolf 217

Schwarzenau，Peter 592

Schwarzer，Alice 284，474，498

Schweikart，Hans 259，362

Schweizer，O. E. 294

Schwencke，Olaf 484 f.

Schwesig，Karl 215

Schwilk，Heimo 616

Schwippert，Hans 217 f.，294

Schwitters，Kurt 123

Schwitzke，Heinz 335

Schygulla，Hanna 423 f.

Seberg，Jean 286

Sedlmayr，Hans 206 f.，320，580

Seebacher-Brandt，Brigitte 617

Seghers，Anna 31，72，119，164，187，348，453

-»Das siebte Kreuz« 164

Sehr，Peter 599

Seidel，Ina 168 f.，371

Seitz，Gustav 369

Selbert，Elisabeth 107

Selle，Gerd 288

Sellner，Gustav Rudolf 362

Sengle，Friedrich 142

Sennett，Richard 476

Seppel，Ursula 405

Sethe，Paul 359

Seyß-Inquart，Arthur 54

Shakespeare，William 567

Shaw，Artie 180

Shdanow，Andrej 133

Shukow，Georgi 48

Shuster，George N. 378

Siebrecht，Valentin 266

Sieburg，Friedrich 126，135，280，283，306，322 f.

Siedler，Wolf Jobst 334

Silbermann，Alfons 124

Silone，Ignazio 174

Simmel，Johannes Mario 551

Simson，Werner von 124

Sinjen，Sabine 282

Sinowjew，Gregori 245

Sinzheimer，Hugo 124

Sitte，Willy 576 f.

Sloterdijk，Peter 505，507

Smith 50

Sobotka 47

Sölle，Dorothee 377

Sombart，Nicolaus 172

Sommer，Theo 626

Sonnemann，Ulrich 124

Speer，Albert 54，218，363

Spengler，Oswald 132，322

Spengler，Tilmann 497

Sperber，Manès 119

Spielhoff，Alfons 484 f.

Spils，May 423

Spinner，Helmut F. 505

Spranger，Eduard 92，373

Stadelmaier，Gerhard 574

Stadler，Siegfried 452

Stadler，Toni 369

Staeck，Klaus 551

Staiger，Emil 371

Stalin，Jossif 37，55，97，131，139，165，244-246，347，468，558

Stanislawski，Konstantin 565

Stanton，Harry Dean 495

Staudte，Wolfgang 200

Steckel，Leonhard 120 f.，123

Stegerwald，Adam 82

Stein，Gertrude 172

Stein，Peter 361，427 f.，573

Stein，Freiherr vom und zum 520

Steinbach，Peter 588

Steinbeck，John 120 f.

Steinberg，Saul 522

Steiner，Rudolf 419

Stemmle，R. A. 110

Stern，Carola 244

Sternberger，Dolf 171

Stirling，James 504，522

Stockhausen，Karlheinz 366，531 f.

Stöhr，Emil 121

Stoltenberg，Gerhard 400

Stoph，Willi 538，540

Storm，Theodor 239

Strasser，Johano 499

Strauß，Botho 508 f.，616 f.

-»Anschwellender Bocksgesang« 616

-»Kalldewey Farce« 509

Strauß，Franz Josef 78，82，255，400，409，541，546，610

Strauß，Richard 154，531

Strawinsky，Igor 154，533

Streicher，Julius 54

Strempel，Horst 579

Strindberg，August 567

Strittmatter，Erwin 349，571

Strobel，Heinrich 153，156

Strobel，Käte 400

Stroux，Karl Heinz 362

Struck，Karin 476

Struck，Thomas 423

Strupp，Günther 204

Stuckenschmidt，Hans 158

Suárez，Adolfo 537

Suhr，Otto 81

Suhrkamp，Peter 90，174 f.

Süssmuth，Rita 395，621

Süsterhenn，Adolf 278

Süverkrup，Dieter 470

Syberberg，Hans Jürgen 618

Tabori，George 123，568

Taschau，Hannelies 476

Tau，Max 119

Taut，Bruno 123

Taut，Max 217

Tessenow，Heinrich 217 f.，222

Tetzner，Gerdi 455

Teufel，Fritz 405 f.，410，413

Thalheim，Barbara 555

Thälmann，Ernst 244

Thiele，Rolf 261

Thielicke，Helmut 280

Thierfelder，Hans 271 f.

Thierse，Wolfgang 553，557，626

Thieß，Frank 58，304

Thomas，Friedrich 243

Thomas，Karin 213，419，525，575

Thomas，Rüdiger 520，555

Thorak，Josef 205

Thurnwald，Hilde 109

Tiedemann，Fritz 305

Tiller，Nadja 261

Tillich，Paul 197，376 f.

Tolkien，John Ronal Reuel 482

Toller，Ernst 119，168

Torberg，Friedrich 311

Töteberg，Michael 425

Toulouse-Lautrec，Henri de 287，578

Toynbee，Arnold J. 197

Tragelehn，E. K. 567

Trakl，Georg 372

Trier，Hann 204，369

Trökes，Heinz 203，208 f.，369

Troll，Thaddäus 142

Trolle，Lothar 447

Troller，Georg Stefan 592

Trommler，Frank 131

Trotzki，Lew 245，468

Troutbeck，John 89

Truman，Harry S. 221

Tucholsky，Kurt 159

Tübke，Werner 576，579

Tulpanow，Sergei 128，133，189

Tüngel，Richard 191，331

Turek，Toni 304

Uecker，Günther 368 f.，420，529

Uhde，Wilhelm 210

Uhlmann，Hans 137，204，208，369

Uhse，Bodo 348

Ulbricht，Walter 47，62，131，133，150，166，183，229，242-250，298，307，310，346-350，375，442，449，457，558，567

Ullstein，Rudolf 123

Ulrichs，Timm 419

Undset，Sigrid 57

Ungers，O. M. 522

Unruh，Fritz von 119

Unseld，Siegfried 90

Urzidil，Johannes 119

Vadim，Roger 286

Valente，Caterina 358

Venturi，Robert 522

Vesper，Bernward 399

Vesper，Will 399

Vester，Heinz-Günter 476

Viertel，Berthold 123，151

Villon，Francois 126

Vinz，Curt 102

Vogel，Angela 110

Vogel，Hans-Jochen 622

Vorm weg，Heinrich 168，196 f.

Vris，Gerd de 525

Wader，Hannes 470

Wagenbach，Klaus 500

Wagenbrett，Norbert 575

Wagner，Bernd 450

Wagner，Martin 220

Wagner，Richard 152，364，532

Wagner，Walter 27

Wagner，Wieland 363 f.

Wagner，Winifred 152，363 f.

Wagner，Wolfgang 363 f.

Wallenberg，Hans 186 f.

Waller，Fats 180

Wallraff，Günter 267

Walser，Martin 261，326，328，466 f.，476，501，519

-»Ehen in Philippsburg« 261

Walter，Fritz 304 f.

Walter，Hans Albert 122

Walter，Ottmar 304

Wälterlin，Oskar 120 f.，258

Walther，Franz Erhard 369

Walther，Joachim 465

Wandel，Paul 96

Warhol，Andy 420，423，507

Wäscher，Aribert 128

Weber，Alfred 294

Weber，Carl Maria von 304，566

Weber，Helene 107

Weber，Hermann 247

Weber，Max 354，391，485

Webern，Anton（von） 156 f.，365 f.，531

Wedel，Dieter 588

Wegener，Paul 128，130，137，146

Wehler，Hans-Ulrich 518，607

Wehner，Herbert 254，400，409，431

Weidenmann，Alfred 359

Weigel，Hans 150

Weigel，Helene 564，566

Weil，Felix 352

Weiler，Sepp 304

Weill，Kurt 123，154，365

Weille，Benny de 180

Weinberger，Marie-Luise 475，489

Weischedel，Wilhelm 142

Weisenborn，Günther 149，160

Weisgerber，Antje 362

Weiskopf，F. C. 118，187

Weiß，Konrad 556

Weiss，Peter 119，362，372，384，403 f.，414

-»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404

-»Die Ermittlung« 362，372，384

Weizsäcker，Carl Friedrich von 477

Weizsäcker，Richard von 35，518，553，625，628

Wekwerth，Manfred 139 f.，566 f.

Wellershoff，Dieter 494

Welsch，Wolfgang 504，511，513

Wenders，Wim 493 f.

-»Der Himmel über Berlin« 494

-»Paris Texas« 493 f.

Wendt，Erich 175

Wendt，Ernst 175，427

Wenger，Paul Wilhelm 331

Werfel，Franz 119，169，175

Werner，Arthur 106

Werner，Bruno E. 148，202

Werner，Oskar 362

Werner，Theodor 368

Wernicke，Otto 142

Wessel，Helene 107

Wesselmann，Tom 420

Wessely，Paula 362

Westerwelle，Guido 621

Westphal，Conrad 204

Weyrauch，Wolfgang 169，335

Wicki，Bernhard 325，359，599

Widmer，Urs 593

Wiechert，Ernst 112，131，205

Wieder，Hanne 142

Wiemann，Mathias 359

Wiener，Norbert 630

Wierling，Dorothee 436

Wieser，Harald 409，497

Wilde，Oscar 568

Wilder，Thornton 29，120，126，145，175

Wildgruber，Ulrich 568 f.

Willemsen，Roger 590

Willstätter，Richard 124

Wilmenrod，Clemens 339

Wilson，Robert 568

Wimmer，Maria 362

Winkelgrund，Wolf 564

Winkelmann，Adolf 423

Winkler Eugen Gottlob 170

Winkler，Ralf 495 f.

Winter，Fritz 204，211，368 f.

Winzer，Otto 96

Wirth，Günter 344

Wischnewski，Hans-Jürgen 400

Wittgenstein，Ludwig 373

Wohmann，Gabriele 476

Wolf，Christa 350，443，450，455 f.，552，561 f.

-»Der geteilte Himmel« 350

-»Medea« 552 f.

-»Nachdenken über Christa T.« 455

-»Was bleibt« 561 f.

Wolf，Friedrich 31，120，149 f.，165，564

Wolf，Konrad 447，598

Wolfe，Thomas 174

Wolffsohn，Michael 618

Wolfskehl，Karl 119

Wollenberger，Vera 463

Wollweber，Ernst 347

Wols （eigentlich Wolfgang Schulze） 368

Wuermling，Franz-Josef 277

Wurm，Theophil 115

Wuttke，Theo 549

Yasgur，Max 397

Yeats W. B. 365

Yun，Isan 532

Zadek，Peter 151，428，568

Zahn，Peter von 182

Zahrndt，Heinz 376

Zander，Irene 295

Zátopek，Emil 304

Zavattini，Cesare 201

Zehm，Günter 307

Zehrer，Hans 187

Zetkin，Clara 107

Ziegler，Leopold 222

Ziehe，Thomas 470，473

Zimmermann，Bernd Alois 156 f.，366，532

-»Die Soldaten« 366

Zimmermann，Friedrich 610

Zimmermann，Max 209

Zimmermann，Michael 61

Zimmermann，Udo 566

Zitelmann，Rainer 618

Zuckmayer，Carl 119 f.，150，175，240，359

-»Des Teufels General« 150，359

-Zwahr，Hartmut 541

Zweig，Arnold 119

Zweig，Stefan 119，175，370

Zwerenz，Gerhard 296，307，313，347

索引

Abrüstung 478，538

Abstrakte Kunst 210-213，367-369

Abtreibung 360，474

Aktionstheater 425-428

Amerikanisierung 42 f.，99，139，178，273-275，288，358，391，444，550

Antifaschismus 61-65，105，107，125，139 f.，150，164，250，345，577，615

APO 401，407 f.，416

Arbeitslosigkeit 634-638，644

Arbeitszeit 266，637 f.

Architektur 123，218-226，248 f.，292-298，483，521-523

Aufarbeitung der DDR-Vergangenheit 443 f.，465，544 f.

Aufbau-Verlag 131，175，347

Aufrüstung 375，477

Auftragskunst 578 f.，583

Ausländerfeindlichkeit 615

Auto 271 f.，288，299 f.

Bauhaus 220 f.，288，281，522

Berlin 43，46，137-141，145，159，162，182 f.，204，213，220-222，231，248，266，296-298，305，309 f.，392 f.，489

Berlin-Blockade 43，139，231

Besatzungszonen 32，36-40，48

Bildende Kunst 123，137，202-216，284，286，288，343，345，357-369，418-422，495 f.，516，523-529，574-583

»Bildzeitung« 334，496

»Bitterfelder Weg« 348-350，442，578

Bonn 239 f.，305

Bremen 75

Bundeswehr 266

Bündnis 90 546

Bürgerinitiativen 474

Care-Pakete 43，211

CDU 82，234，239 f.，252，268，310，328，400，428 f.，474，490，548，586，619-621

CDU （Ost） 48，546，556

Comics 286，396

Computer 629-635

CSU 82，234，239 f.，268，328，428 f.，474，548，586，619，621

DDR-Fernsehen 594-598

DDR-Nostalgie 544 f.

Defa 199 f.，598

Design 212，288-292

Dialektik 407-409

Displaced Persons 28，66 f.

documenta 369，511，524，576

Dokumentartheater 362

Dresden 22 f.，133，190，213 f.，224

Emanzipation 107 f.，277，360，416，437，474-476，499

Engagierte Kunst 164，166 f.，172，213-215，324-329，371 f.，

467，563 f.

Entnazifizierung 50-53，79，88，92，100 f.，125 f.

Entspannungspolitik 248，392 f.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esen 89-94，380-382，433-444，484，489-491，585，600-608，644

Eskapismus 167-169，212，343，352，361，370-373，418 f.

Esoterik 478-481

Europa 235，324，428，548，614

Exil/Emigration 31，58 f.，118-125，138

Exilliteratur 118-122，168 f.，174

Existentialismus 115-118，132，284，287，373 f.

Expressionismus 207，369

Fall der Berliner Mauer 394，540，542 f.

Familie 108-110，263 f.，277，360，437 f.，476，554

Fantasy-Literatur 481 f.

FDP 83，234，241，400，428 f.，432，474，490，548，619，621

Feminismus 475 f.，498 f.

Fernsehen 272，336-339，356，367 f.，565，584-592，594-597

Fernsehserien 588

Festspiele 363 f.

Film 110，123，139，145，198-202，238 f.，278-282，286 f.，303，315，356-361，422-426，482 f.，493-495，598

Fischer Verlag 90，174，500

Föderalismus 80，127，141，233，614

Frankfurt am Main 222，240，295，522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30，497 f.

»Frankfurter Rundschau« 130，330，497

Frankfurter Schule 317，351-355，406 f.

Frauenbewegung 107，475，628

Freizeit 441 f.，485，634 f.，644

Friedensbewegung 473，477，628

Gastarbeiter 266 f.

Geisteswissenschaften 485，513-516

Gewerkschaften 84 f.，256，268，379，440

Glaube 111 f.

Gleichberechtigung 107，233 f.，264，475

Globalisierung 585 f.，627，635，638

»Godesberger Programm« 254 f.，623

Graffiti 468

Große Koalition 255，400 f.

Die Grünen 474 f.，619，621，623

»Gruppe 47« 172，324-329

Hamburg 181 f.，295，401

Hannover 222，295，402

Happening 368，404，406，419，426

Heimatfilme 202，359

Historikerstreit 518 f.

Homosexualität 265，279

Hörspiel 335

Humanismus 30 f.，89，95 f.，125，128 f.，134，140，345，513

Innerlichkeit 118，167，324，371，444，467，470 f.，492，509，581

Jalta-Konferenz 36，86

Jazz 43，177 f.，180 f.，445

Jugendkultur 467 f.，486 f.

Kabarett 159-163，339-341，347，452 f.，590

Kalter Krieg 86，130 f.，537

Katholizismus 377-380，480 f.

Kiel 219

Kirche in der DDR 459-561

Kirche，evangelische 94，110，113-115，280，459 f.，481

Kirche，katholische 110，113-115，280，379 f.，480 f.

Kirchentag 481

Kommune 405

Kommunitarismus 428，644

Konsumgesellschaft 118，231，264，270. 274，417 f.，446

Konzentrationslager 24，34，50，64，67，518

KPD 48，83，132，190，246

Kriegsgefangenschaft 28，33 f.，66，100-102，236，262

Kriegsheimkehrer 100-102，164 f.

Kriegsverbrecherprozesse 50，53 f.

Kriegszerstörungen 24，67，75 f.，216 f.，256 f.

»Kulturbund« 31，128-131，175，195，308，347，434

Kultureller Auftrag 336，584，586，591

Kulturnation 140，548

Kulturpolitik der Alliierten 111，118，122-134，137-141，143 f.，147f.，150 f.，184-187，199，213 f.，222

Kulturpolitik der DDR 134 f.，139 f.，166 f.，288-294，442，444-451，453 f.，456，463 f.，469 f.，574 f.，577 f，596

Kunstausstellungen 137，203 f.，211，213 f.，368 f.，519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632 f.

Kunstmarkt 523-526，580 f.

Leipzig 224，248 f.，436，539

Liebe 473，476，507 f.

Literatur 89，100，112，116-125，130，134-136，147-151，164-177，196 f.，284-287，318-320，324-329，334 f.，347-351，370-373，396 f.，414 f.，433，436 f.，442，444-458，462-464，476，481 f.，492，499 f.，507-510，517 f.，550-553，561

Literatur der Nachkriegszeit 100，112，116 f.，130，148-151，164-177

Literatur in der DDR 347-351，436 f.，442，444-448，450-458，

462-464

Luftbrücke 43，139，231

Lyrik 112，167-170，318-320，324-326，371，492

Marshall-Plan 43 f.，56，87，221

Materialismus 117，234，290，351，396

Mauerbau 266，309

Mode 98 f.，272，282 f.，488

Moderne Musik 156-158，364-367，530 f.

Montagsdemonstrationen 539

Morgenthau Plan 37

München 67，162，177 f.，222

Musical 574

Musik 123，152-158，178-181，343 f.，362-367，530-534

Nationalbewußtsein 520，614-618

Nationale Identität 140，518，520，548 f.，613-615

Neokonservativismus 612 f.，615-618

»Neues Deutschland« 190，243，349，599

New Age 478-480，532

Nische 343，434，443，472 f.，575，582 f.

NPD 383，619.

Nürnberger Prozesse 53-57，191，270 f.

»Oberhausener Manifest« 359，422

Öffentlich-rechtliches Fernsehen 336，587，591

Ökologie 473，622，631，642

Oper 133 f.，152-154，157，343，362-367，533 f.，566

PDS 544，546，552，619

PEN 167，550 f.

Perestroika 538

»Persilschein« 52

Philosophie 115-118，124，142，317，373-376，483，513 f.

Planwirtschaft 243，247，256，437-440

Politikverdrossenheit 619，621-624

Pop/Rock 333，398，436，444 f.，448，470，486 f.

Pop-Art 369，396，404

Posthistoire 516 f.

Postmoderne 467，492，502-507，510-518，523-525

Potsdamer Abkommen 32，36 f.，53，67 f.，72，84-86，95，127

Prenzlauer Berg 463 f.

Pressewesen 185-198，329-334，347，451，496-501，599 f.

Privatfernsehen 586 f.，597 f.

Protestantismus 376-378，459 f.，480 f.

Protestbewegung der 60er Jahre 350-352，366 f.，375 f.，389，394 f.，400-409，414-422，426-428，466-469，497

Radio 145，156，177 f.，180-185，272，334-339，584，592-597

Rationalisierung 632-635

Realismus 574 f.，581

Rechtsradikalismus 614-616

Regenbogenpresse 498

Regietheater 565，568

Reparationen 86 f.

Republikaner 619

Rock’n’Roll 286f.，358f.

Rolle der Frau 106-110，263，277 f.

Rowohlt Verlag 174，285，379，500

Satire 159-163，333，339-341，347，452

Schlager 178 f.，358

Schlüsselqualitikationen 634，642-645

»Schreiben nach Auschwitz« 167

Schuldfrage 34，57-60，98，101 f.，113，126 f.，384，430，518 f.，618

Schulwesen 89-91，95 f.，378，380-382，435，490 f.，600-608

SDS 366，395，401 f.

SED 48，79，106，132，190，243，246，250，312，349，444，540 f.，544

Sekten 480

Selbstverwirklichung 467，470

Sensationsjournalismus 496

Sexualität 277-282，285-287，333，361，396，405 f.，473，475 f.，508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85，235，256，267，394，554，622，628

Sozialistischer Realismus 214，367，581

Soziologie 124，134-136，317，483

SPD 48，82 f.，85，106，190，234，239 f.，246 f.，252，254-256，392，400，428-432，463，474，490，546，557，586，620，623

SPD：Zwangsvereinigung mit der KPD （Ost） zur SED 48，84，190，246

»Der Spiegel« 192 f.，322，330，500 f.，610

»Spiegel-Affäre« 610

Sport 303 f.

Sprache 151，170-172，195，371，407-409，508

Staatsnation 140，548

Staatssicherheitsdienst 433，444，447 f.，456，459-465，539

Stadtplanung/Städtebau 216-225，248 f.，292-298，483 f.，521 f.

»Stern« 191，333，500，610

Straßentheater 425，427

»Stunde Null« 33-35

»Süddeutsche Zeitung« 330，497

Suhrkamp Verlag 174

Surrealismus 208-210

Systemtheorie 515

Talkshows 590 f.

Tanztheater 492

Teilung Deutschlands 229 f.，305-316，392-394

Terrorismus 409-413，490

Theater 30 f.，118-123，125-127，133 f.，141，143-152，258，310 f.，343，361-364，417，425-428，467，563-574

Theater in der DDR 343，563-574

Tourismus 274，302

Trümmerfrauen 106 f.

Trümmerkinder 102-104，263

Tübingen 142

»Umerziehung«（»Reedukation«） 38-40，88 f.，102，105，111，118，122，125，133，137，143，147 f.，159 f.，182，390

Umweltschutz 472-474，622 f.，628，641 f.

Universitäten 92 f.，96 f.，206，374，352，381，401 f.，489-491，604-608

Unterhaltungsmusik 178-180，358 f.

Verdräng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238，241 f.，259-261，382-384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30 f.，34 f.，57-65，95，98，101 f.，112 f.，258-261，327 f.，382-384，430，518 f.，615

Verlagswesen 123，173-177，414，447 f.

Vertreibung 33 f.，67-71，235，257

Wahlen 79 f.，234，350，428，473，546，548

Währungsreform 86，229-234，271

Warenästhetik 212 f.，277，282，288-292，418

Weimarer Klassik 134，444，570

»Die Welt« 187

Wende 441-443，454，538-547

Werbung 274-276，278

»Werkbund« 218，290

Westintegration der BRD 235 f.，252，477

Wiederaufbau 216-225，234，260，306，389，484

Wiederbewaffnung 238，251，328，477

Wiedervereinigung 235，251 f.，306，309 f.，394，537，541-562

Wirtschaftswunder 255 f.，258-261，264 f.，389，552

Wohlstand 117 f.，264，267-269，274，555

Wohngemeinschaft 496，471

Wohnungsbau 292 f.，391 f.，437，521 f.

Wohnungseinrichtung 288-293

Yuppies 488 f.

»Die Zeit« 99，191，331

Zeitungen/Zeitschriften 185-198，207 f.，232，279，329-334，446 f.，470，497-501，599 f.

Zusammenbruch der DDR 537-543

图片说明

Archiv Dr. Karkosch，Gilching S. 483

Archiv für Kunst und Geschichte，Berlin S. 319，451 （Foto：Binder）

Berlinische Galerie，Landes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Photogr. Sammlung，Berlin （Herbert Hensky） S. 439

Bickel，Moidele，Berlin S. 508

Bildarchiv Hermann Glaser，Roßtal S. 31，44，49，71，260，301

Bild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Berlin S. 90 （Foto：Hanns Hubmann），S. 176 （Foto：Friedrich Seidenstücker），S. 205 （Foto：Hanns Hubmann） S. 289

Bundesarchiv，Koblenz S. 237

Fotoagentur Voller Ernst，Berlin S. 37，232 （Fotos：Jewgeni Chaldej）

Galerie Alex Lachmann，Köln S. 47 （Foto：Jewgeni Chaldej）

Grass，Günter，Berlin/Verlag Gerhard Steidl，Göttingen S. 549

Kartografie Achim Norweg，München S. 39

Keystone，Hamburg S. 103，487 （Foto：Peez）

Kneidl，Helga，Hamburg S. 427

Köln Messe/Art Cologne S. 527

Landesbildstelle Berlin S. 109，228

Märkisches Museum，Berlin S. 281 （Foto：Volker Kreidler，Dresden）

Münchner Stadtmuseum S. 87，209，357，365

Neue Staatsgalerie Stuttgart S. 504 （Foto：Peter Walser，Stuttgart）

Sächsische Landesbibliothek Dresden，Abt. Deutsche Fotothek S. 22，217 （Fotos：Richard Petersen.）

Schaarschuch，Kurt S. 63，69

Schauspielhaus Zürich S. 121

Schiller-Nationalmuseum，Marbach a. N.S. 135

Schürer，Hans，München S. 155，189

Stiftung Deutsche Kinemathek，Berlin S. 297

Süddeutscher Verlag，Bilderdienst，München S. 55，81，144 （Foto：S. M.），S. 161 （Foto：Fosch），S. 253，308，337，388 （Franz Hug），S. 401，405，411 495，536 （Fotos：AP），S. 423，479 （Foto：Franz Huber-Winter），S. 617 （Foto：Udo Thomas）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S. 223

Ullstein Bilderdienst，Berlin S. 20，199 （Fotos：Fritz Eschen），S. 232，245 （Foto：Ullstein - ADN - Bildarchiv），S. 257 （Foto：L. Kindermann），S. 269，275，325 （Foto：dpa），S. 397 （Foto：Hans Dieter Sallein），S. 475 （Foto：BAR），S. 493 （Foto：Binder/Thiele），S. 543 （Foto：PEEWEE），

S. 625 （Foto：Stark-Otto），S. 631 （Foto：Buddy Bartelsen），S. 643 （Luftbild：Ullstein Bilderdienst，Computer-Visualisierung：J. Brockmann u. Dalecki & Partner，Hamburg），

VG Bildkunst，Bonn 344，577

Trotz aller Bemühungen ist es dem Verlag nicht gelungen，sämtliche Rechteinhaber der Abbildungen ausfindig zu machen. Wir bitten darum，sich mit dem Verlag in Verbindung zu setzen，damit wir eventuelle Korrekturen bzw. übliche Vergütungen vornehmen können.

译后记

德国的5月向来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2015年5月，我再次来到位于纽伦堡郊外的格拉瑟先生家中拜访。距离上一次来访已经过去四五年。其间，《德意志文化（1945～2000年）》中文版的初稿定稿，格拉瑟先生在纽伦堡市政厅庆祝了他的85岁生日，我成了他一手创办并奋斗过的协会的会员，他失去了青梅竹马的妻子，我失去了姥姥，我在汉堡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正式开课。

吃饭的时候，格拉瑟喝了很多酒，因此变得健谈。在那简朴的乡间餐馆里，我们发散性地聊了很多公共和私人话题，然而最多被提到的还是启蒙。

我一直不认为启蒙是一个“西方式原教旨主义”的命题。远至中学历史课本上出现了画像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浓墨重彩的五四运动，再到马哲课上一笔带过、不明所以的康德，近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和“未竟事业”的哈贝马斯，甚至中国学者许纪霖的“启蒙已死，启蒙虽死犹生”，大到仰望星空的大家，小到在历史考试上答卷子的中学生，许多人在不同的环境里谈论启蒙。启蒙，不仅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康德的三大批判或罗尔斯的政治正义，也是康梁、鲁迅等先辈终其一生奔走呐喊甚至为之喋血的目标。它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根基，是隐藏在我们当下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后的终极命题。

启蒙不仅仅是一次运动，还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回到源头，康德说，启蒙是成熟人敢于运用理性的一种能力。走过17、18、19、20世纪，我们在“启蒙”的名义下，信过自由平等博爱，信过以实证为基础的

现代科学是了解宇宙奥秘的终极手段，信过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会给人类带来福祉。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自由平等博爱”被发现或沦为极权政府煽动群众的幌子；或沦为国际寡头制定单方面游戏规则、为了敛财无所不用其极的托词；或沦为官僚及其衍生机构一手权钱交易、一手丢给普罗大众的止痛药。技术的进步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人类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核技术使地球毁灭成为可能，基因科技则在一步步挑战人类的伦理底线。尽管经济的指数日益向上，却既不能阻止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莱茵河和21世纪初弥漫于华北地区的雾霾或全世界都在讨论的食品安全问题，损害数以万计人的健康和生命，也不能帮助我们在日益繁华的水泥森林里少一些疏离感和迷惘，甚至连抑郁症、校园暴力、空巢老人这样的案例都随之大大增加。我们似乎更幸福，我们似乎更不幸。所以，我们究竟该相信什么？

通读全书，似乎很难简简单单地“一言以蔽之”作者想要表达什么。的确，在许多地方，作者似乎给我们造成了一种“不敢下定结论”或曰“不敢站队”的印象：刚刚在欢欣纳粹政权的覆灭和痛斥其对德国和全人类的伤害，接着就指出盟军的占领有许多拿不上台面的事；刚刚为阿登纳领导下的经济复苏感到欣慰，然后又立刻说明阿登纳的为人及著述多有虚伪之处；刚刚对东德的“海怪施塔西”极尽讽刺，然后又不忘多嘴去写东德国家对文化的做法类似于一个保险柜；刚刚为西德的多元文化摇旗呐喊，马上又对“一切皆有可能”带来的价值沦丧和粗鄙盛行表示担忧；刚刚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两德统一和全球化，回头就开始说它们让旧有的问题进一步发酵。他似乎是在发现的同时也一直在自我质疑，质疑的不仅仅是结论，还有发现本身，甚至他似乎有意在书中“左右手互搏”。

在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五分钟名人”的时代，有多少“人生导师”孜孜不倦于对其他人布道：“我这样才是对的，其他的想法？呸，要么俗，要么蠢，要么有说不出口的原因。”“这才是人生/本学科的终极奥

秘，而我是多么聪明，一眼就洞见。”相较于他们的酣畅淋漓、铁板钉钉，本书有些地方似乎太过于唯唯诺诺、唠唠叨叨。而相较于盛行于世的“大师学者”，格拉瑟似乎太过小心谨慎，谨慎到了让人看着不痛快、难以号令教众的地步。人家都忙不迭地把自己捧上神坛。而这本书的态度，何止是远离神坛，简直是有意识地不愿意自己或任何一种理论被抬上神坛。所以写着写着，突然害怕稍稍有那么一点挨上神坛了，他立刻把自己拉下来。

这也许同他经历过纳粹统治有关。但这种“不轻易站队”的态度正是一个学者或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人都应该有的态度，而对任何形式的“神坛”的警惕和距离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因为他永远都会为“会不会不是这样呢”“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呢”留下问号，所以他也永远对世间万象抱有孩子般的真诚与好奇。这种态度反映到本书里，就是作者虽然运用了自己的判断，但这种判断仅仅用来对每一件事给出阐释和评说的可能，他对每一种历史和社会现象做到无差别的对待，从而忠实地，然而又不是没有观点地把万象呈于读者眼前。这是任何一个以“都听我说！”为宗旨的自负之人永远不能达到的境界。运用理性，常常迫使人离开那轻松的、提供保护的空间，像探测飞船那样独自在充满未知和各种不确定的茫茫宇宙中飞行，所以这才需要“敢于”。

吃饭接近末尾的时候，格拉瑟喝下一杯李子利口酒，对我说：“我终究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启蒙是我的信仰。”

我很喜欢本书结尾提到的拉丁谚语：“荆棘之路通向星空。”那条荆棘路也许不仅是奔走呐喊，不仅是皓首穷经，不仅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甚至不仅是九死不悔的决心，还是我们内心深处随时随地的清醒和谦卑，以及由之而来的对自己的怀疑。怀疑是痛苦的，但正是这怀疑化作动力，指向无穷尽的未来。仿佛教堂的尖顶之上，永远不会达到，而又永远在努力接近的广袤上苍。

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上代甚至上上代人，凡略受过些教育的，有几个不曾在心里幻想过欧洲？除了发达和富裕以外，那更是西岱岛的“午夜巴黎”和飘扬着香颂的左岸、是维也纳金色的交响乐、是康桥的月光、是晨曦中布拉格的查理十字桥、是圣马可广场蓝天下的鸽子。那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与我们遥相呼应的遥远文明，到了近代，却纷纷摇身一变成了殖民者。然而，它们所带来的，除了屈辱，还有摩登与文明。

它们的出现，让我们在漫长的“存天理灭人欲”后开始思索“人”和“自由”的意义，让我们重新懂得“睁眼看世界”。因此，如果我们对“西方世界”有复杂的感情，那么对欧洲则是又爱又恨或者不得不爱。莎士比亚的戏剧、19世纪的小说、西洋古典乐、蒙娜丽莎的微笑、康德和马克思的哲思、红酒、交谊舞，甚至在教堂里踏着玫瑰花瓣、身披白纱举行婚礼，所有这一切伴随着我们中国人取得自由、伴随着我们发展、伴随着我们重回大国行列，也融入了我们的审美。就连学术界也“言必称希腊”，以“死去的白人男性”为尊。

同美国相比，它于经济和科技的发达之外更有一种诗意的魅力。就连这块大陆的名字，都是被宙斯诱拐的金牛背上的美丽少女，多么撩人。任何对于欧洲的观察，总是容易首先去描绘那层绮丽的面纱。

然而这层绮丽的面纱下面是什么？或曰，即使欧洲天生是美人，自带绮丽面纱，那么戴面纱的美人究竟是什么样，她在想什么，这面纱又是怎么织起来的？

翻译这本书，就是希望揭开面纱，看见美人脸上的雀斑，甚至知道美人也有生理期——但这样的美人，更加真实。

中国崛起了。伴随着崛起中的中国的，应该还有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对欧美简简单单地说一句“帝国主义”就

置之不理。现在的中国，必须跟许许多多的国家和民族打交道，这其中就有欧洲。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才能知己知彼、立于不败。

然而，盛行的舆论乃至学界中，不乏对此几乎无知的人。对于欧美世界，要么是“外国的月亮的确更圆”式的“体制好，人民素质好，经济好，哪儿都好”的论调，要么是粗暴煽情的“欧美阴谋论”。两者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出自相同的一点：没有逻辑、没有思考、不负责任，甚至连起码的虚心研究都没有。

可毛泽东都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欧美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自有各自的成因，亦有各自的结果。我们常说“欧美”“美欧”，好像自己已经很懂。可是，有几个人说得出大陆学派和英美学派研究方法的区别，又有几个人能解释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何如此不同呢？有几个人坐下来研究“欧洲价值观”和“美国价值观”的区别何在，又是怎么体现在它们的对外对内政策上的呢？

翻译这本书，就是希望从源头开始，一步一步地厘清当代欧洲社会的某种脉络——说当代欧洲未免有些托大，但德国如今是欧洲的龙头，也是欧洲的缩影。就价值观体系来说，德国的哲思可以说是奠定现当代欧洲文化和政治语境的基石。所以，希望可以借此书管中窥豹。但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自己戒骄戒躁，同时给国内读者提供一种可能的、或许是更加全面的视角。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宽容我的“较劲”和缺乏经验。感谢歌德学院给我的支持，给初出茅庐的我的第一本书以赞助基金的荣誉。

感谢各位前辈对我的一切鼓励和帮助。尤其要感谢我母校——四川外国语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各位恩师：谢谢你们给我打下良好基础。

感谢朱毅超。她是玛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的语言学硕士，为本

译著第二部分的初稿提供了大力帮助。

此译著献给我的父母，两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我、支持我。

尤其感谢并亦将此译著献给我的姥姥：孙家清。她是中国传统书香世家的大家闺秀、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是共和国的建造者、是永不懈怠的进步学生，也是奉献的母亲。她是我萌生翻译这本书的想法之初时就聆听并立刻支持且一直鼓励我所做之事的人。她告诉了我，光明与美好长存，值得许多人努力。

周睿睿

2016年4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文化：1945～2000年：全2册/（德）格拉瑟（Glaser，H.）著；周睿睿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6（2017.6重印）

（莱茵译丛）

ISBN 978-7-5097-7684-1

Ⅰ.①德… Ⅱ.①格…②周… Ⅲ.①文化研究-德国 Ⅳ.①G1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7318号

·莱茵译丛·

德意志文化（1945～2000年）（全2册）

著者/〔德〕赫尔曼·格拉瑟

译者/周睿睿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张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8.25 字数：612千字

版次/2016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2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684-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2-6607号

定价/98.00元（全2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周睿睿

1985年生于湖北武汉。现为德国汉堡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讲师、全球化管理中心研究员、德国文化政策协会成员。在汉堡大学讲授《文化政策研究导论》和《德中公共文化政策比较》。



赫尔曼·格拉瑟（Hermann Glaser）

1928年生于德国纽伦堡。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其专业领域涵盖日耳曼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著作等身。曾获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勋章、纽伦堡文化大奖章在内的多个奖项。

格拉瑟为读者展示了德国文化如何因为国家被不同的意识形态割裂而分道扬镳，各自生长，直至半个世纪以后才重新汇合的历程。他……用平等的视角……构筑了一部战后德国的精神史。

——陈煜，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一部主任

德国文化界和史学界的必读经典著作。除了专业贡献……独创了一种叙事艺术。……这部大师之作的基础是格拉瑟本人亲身经历了所有这些他报道的历史，而且他作为作家、活动家，数十年以来甚至左右了德国文化史的进程。因此，很难有另一个史学家能够像他那样，同活生生的德国历史以及其中的事实和数据紧密相连。

——奥利弗·舍伊特，汉堡高等艺术学院教授

甲骨文

甲骨文微信公众号

www.ssap.com.cn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ISBN 978-7-5097-7684-1

9 787509 776841 >

定价：98.00元（上下册）

ZUR

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

GESCHICHTE

〔德〕汉斯·莫姆森 ■ 著

DEUTSCHLANDS

IM 20.

赵 涟 ■ 译

JAHRHUNDERT

Hans Mommsen

译莱
丛茵

汉斯·莫姆森
这位德国重要的当代史学家信心十足并很有把握地
破译了民主、专制与抵抗相交织的
德国历史的核心要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2010 Deutsche Verlags-Anstait，München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赵莲 译

〔德〕汉斯·莫姆森 著

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

Zur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歌德学院（中国）翻译资助计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前言

本书所集纳的有关德国1918～1945年历史的文章对从纳粹专制统治建立、第三帝国危机再到崩溃这条道路上的重要节点进行了探讨。同时，本书借助示范性的事例对抵抗希特勒的运动及希特勒内政外交目标进行了描述，同时也将纳粹统治体系可能的历史替代品是什么纳入考虑。这些文献的很大一部分迄今为止没有发表过，或者是仅在冷门出版物上发表过。在个别情况下本书引用了业已出版的文章，考虑到最近的当代史讨论，它们会具有新的现实意义。

目前当代史出版方面存在一股浪潮，它们宣传一种对纳粹统治的新的整体诠释方式，其出发点是将希特勒独裁政治和德国民众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一分为二。正是鉴于这一点，本书所刊登的文章旨在将阿道夫·希特勒的作用纳入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并突出强调了使纳粹专制和由它所启动的武力与恐怖升级成为可能的结构性因素。

本书的第一部分以魏玛共和国解体和1933年纳粹攫取权力为题，一方面研究了魏玛帝国宪法的缺陷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议会制度的失败；另一方面则对1948/1949年《基本法》通过时议会理事会（Parlamentarische Rat）从中吸取了哪些教训进行了探讨。其中有一点变得清楚明确，议会制度的失败只能在很小程度上归咎于宪法政策方面的因素，尽管给予帝国总统的特权使向着希特勒专制过渡变得简单。决定共和国衰落的是保守派集团和德国国防军（Reichswehr）领导层对国家总统的影响，他们表示支持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是为了防止他们所担心的议会制度复萌的发生。

希特勒是这种态势的受益人，在这种态势下他想必是害怕公开改选的。他和他的手下绝对没有遵循什么深思熟虑的攫取权力的战略，同样，他们也不是要追求什么革命性的彻底变革，尽管最初的考虑——在德国共产党（KPD）计划的颠覆活动中扮演民族拯救者角色并以“圣巴托罗缪之夜”（Bartholomaeusnacht）的形式篡夺政治权力——即便在1933年1月30日之后也没有完全消失。希特勒临时拼凑起来的战略理念倒不如说是不停歇的民族主义宣传和对公私机构系统一体化（Geichschaltung）的结合。令激进的纳粹冲锋队（SA）感到十分失望的是，希特勒满足于对现有国家机构的一体化以及采取伪合法路线，他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缩写NSDAP）形式上的领导权转交给倒不如说是平淡无奇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本书的第二部分对希特勒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体系中的地位以及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德国公众对其政策支持度的日益提高进行了分析。作为总理，希特勒保持着一直以来的领导方式，尽可能少地关注政治细节，而且，在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退隐到诺伊德克（Neudeck）之后，他干脆开始对政府的日常事务不闻不问。国民议会（Reichstag）因为《国会纵火法令》（Reichstagsbrandverodnung）和《授权法案》（Ermaechtigungsgesetz）而形同虚设，与此同时，内阁作为决策机构被剥夺了权力，这造成了制度上的真空。与苏联体系不同，1932年12月希特勒解散由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建立的中央领导机构之后，这个空白并没有为一个相应的党的机构所填补。

自那之后，超过36名省党部头目（Gauleiter）竞相追逐“元首”（Fuehrer）的青睐，此外还产生了一系列“二级（sekundaer）管理机构”，它们作为元首的直属机构导致了一种空前的“野生”状态。这种态势以及取代管理行为的“人治”原则导致了一场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以及管理单位的日趋瓦解。塞巴斯蒂安·

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很早就在其《论德国之双重性格》（Jekeyll & Hyde）一书中描述了希特勒统治体系内部的对抗，并警告说不要过高估计这位专制者的“政治家”特性。

在当前的研究中，下面这种趋势占据了主导：将这位专制者蛊惑人心的诱骗功夫与大部分德国人无条件服从他的意愿相对照，并且以将元首和追随者一分为二为出发点；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文章则对狂热崇拜希特勒的心理根源及其限度进行了分析。与某些学者所代表的对“民众共同体”简直可以说是唱赞歌似的高度评价相反，纳粹政权事实上仅仅在它达到了惊人的外交成就顶峰时才能指望得到人民的一致肯定。对此，希特勒所担当的和平维护者的角色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是战争一开始——最迟自1941年秋开始，人们就逐渐开始觉醒，当然最初这主要是针对“高官统治”（Bonzenherrschaft）制度，而并非针对希特勒个人。

纳粹宣传机构系统突出强调的“民众共同体口号”唤起了一种社会平等感。但是除了少数几个诸如实行强制参加“同喝一锅汤”（Eintopfessen）活动这样的象征性行动之外，社会差异仍旧存在，经济上的崛起与广大人民关系不大，改善中产阶级境况的承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空头支票。所有这些都造成普通百姓退回到个人空间以及进一步的去政治化。“民众共同体”通过将犹太人和所谓的“共同体外人”（Gemeinschaftsfremden）排除在外而自动开启了极端化的螺旋——这一假设与人们所掌握的社会数据资料不符，而且，用它来解释以法西斯主义政党结构为基础的体系的逐渐极端化是不合适的。

纳粹体系的法治国家基础和道德基础的日益瓦解是国社党的对抗结构所固有的。借助对犹太人迫害升级的例子，本书对法制观念的逐渐被掏空和司法部门被无限用于政党的目的进行了描述，它同样也描述了向种族灭绝战争的过渡，这场种族灭绝战争使波兰和苏联被占地区人民完

全失去了法律的保护。鉴于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和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的谋杀行动，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Endloesung）开始了，与之并行的还有负责强化德国民族特点（Volkstum）的帝国专员（Reichskommissar）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所推动的日耳曼化政策——“东方总体规划”（Generalplan Ost），该政策计划驱逐和清洗上千万人。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化为失控的暴力行为的不断升级，这在政权最后几周内极端的谋杀行动中达到了顶峰，并且也更多地波及本国人民。

本书第三部分着手探讨的是第三帝国的日渐解体。这关系该体系逐渐自我毁灭的各个方面、希特勒早就该采取的合理化改革措施的缺失以及他拒绝对军事高层架构和政治领导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革。最迟到兵败斯大林格勒的时候，后者似乎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了。1944年七二〇运动失败，之后在元首地堡（Fuehrerbunker）中与现实隔绝的希特勒完全抵触任何路线上的改变，这使得反对政权推行坚持抵抗政策（Durchhaltepolitik）的力量无法表达意见，也导致它在走向深渊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人们称该政权有着不同寻常的稳定性。然而，军事方面几年来就呈现出崩溃的迹象；公共机构瓦解；（不管是中层还是市政层面的）内部和日常管理因为权力被国社党和党卫队（SS）攫取而被架空——前者与后两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自从墨索里尼下台之后，纳粹党办公厅主任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和担任帝国组织机构部长的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就在恢复国社党的活力，因此他们必然也推动着这个迟钝笨拙、索然无味的群众性政党（Massenpartei）向着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转型。但是这样的一场政党改革欠缺所有的内在条件。博尔曼的战略局限于不惜一切代价为坚持抵抗政策煽风点火的思想动员。借助与此相联系的“党化”（Partifikation）政策，纳粹党办公厅似乎试图在最后一刻推翻希特勒和国社党在1933年1月30日之后通过一体

化政策（Gleichschaltungspolitik）与传统国家机构达成的妥协。值得注目的是，博尔曼和希姆莱企图将“德国人民冲锋队”（Deutscher Volkssturm）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借此抹去恩斯特·罗姆（Ernst Roehm）失败的一页。

纳粹统治体系逐渐极端化的顶峰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领导精英们一致同意应当尽一切努力使德国“没有犹太人”（judenfrei）。但是直到1940年，除了推动犹太人移居国外之外没有其他现实可供选择的替代办法，后来推行的对犹太居民的杀戮在当时还是不切合实际的考虑。此外，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迫犹太人移民国外的措施在吞并了拥有300多万犹太公民的波兰之后最终被证明是“杯水车薪”。同样，从尼斯科（Nisko）计划到马达加斯加计划（Madagaskarplan）的各种保护区计划也没有确保问题的“解决”。

这个难题被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以及走出“最终解决”的这一步仍然是个复杂的过程。在研究当中占据主导的推断是，希特勒在1941年深秋（在德国对美国宣战似乎让在那之前的外交顾忌一去不复返之后）作出了系统清洗欧洲犹太人的决定，此前特别行动队的杀戮和最早一批集中营在苏联被占地区的设立为之带来了前景。与之相对应，本书第三部分第三个章节所论述的“走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则拿出证据证明了，在万塞会议（Wannseekonferenz）于1942年初召开的时候，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措施还未采取，甚至希特勒也还遵守着关于迁移要“向东”流放的犹太人的一般口头规定。后来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系统实施的欧洲“最终解决”计划在万塞会议结束之后的几个星期才开始。

因此，一切都表明，尽管希特勒十分渴望除掉欧洲的犹太民族，然而他并没有为由希姆莱和艾希曼付诸实施的整体解决方案下达任何正式的命令。这符合他避开不舒服和不受欢迎的决策并掩盖责任的倾向。可是，这种政治意愿形成的混沌状态是大屠杀整体计划的起源所特有的，

而且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系统内部没有对计划的实施进行反对，以及为什么地方官们对最后由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3年10月掀起的谋杀行动的反应会是集体排斥。

本书的第四部分收入了有关反对希特勒历史的文献，并描述了1943年团结在七二〇运动中的各个抵抗圈子所处的不同阶段和所确立的不同目标。直到1939年的时候，当时兴起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除了防止战争发生之外还没有真正达成什么战略，而希特勒出乎意料地在法国速战速决并与苏联达成《互不侵犯条约》（Nichtangriffspakt）都对正在形成的反对力量产生了持续的削弱作用。虽然在《慕尼黑条约》（Muenchner Abkommen）签署时已经存在一个小范围的反体制核心，但是直到1941年深秋的时候才形成了一个阵容更为广泛的反叛集团。民族保守派反叛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才认识到，对盘根错节的政权领导结构进行改良性的干预和促使西方力量对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政策（Lebensraumpolitik）及其预备阶段采取坚定立场的努力一样，对于政权陷入在军事上滥杀无辜的灾难所能产生的补救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在亨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hkow）领导下形成的军方反对派在改变军事高层结构的努力徒劳无功之后从中吸取了教训，并决定通过刺杀的方式除掉希特勒，而平民反对派——例如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则在很长时间里对是否支持后来由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推动的刺杀计划持保留态度。1943年主动权转到特雷斯科、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Friedrich Olbricht）和施陶芬贝格手中，与此同时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则在军方反对派和以格德勒为首的圈子之间担当着联系人的角色。

对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反叛者来说，有一个考虑具有重大的意义，那就是不能因为继续对苏联的种族灭绝战争而最终威胁第三帝国的政治和军事行动能力。而对以格德勒为首的圈子来说，道义上的动机则处于核

心位置——尤其是对希特勒、国社党和党卫队罪恶政策的否定，同时它也关乎缔造一个宪法政策上的新秩序，它带来了在被视为失败了的魏玛议会制度之外的其他选择。与提早准备放弃德国在战后欧洲领导地位的“克莱骚圈”子（Kreisauer Kreis）成员不同，格德勒和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领导的保守—民族主义这一派系只是为了一个欧洲联盟的形成而迟疑地告别了这一要求。反叛者用一个全面的改革纲领来与德国国家思想的腐败变坏对抗，这一纲领结合职业思想，主张自治并赞成（具体来说存在相当多变体的）联邦制度。特别是“克莱骚圈”以全面的广泛社会改革与整个欧洲经济合作相结合的新秩序理念而闻名。

与1944年七二〇运动不同，很大程度上受哈罗·舒尔策—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和阿维德·哈纳克（Arvid Harnack）鼓舞的“红色乐团”（Rote Kapelle）主张密切依照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特色的战后秩序。与源自盖世太保并在冷战影响下得到加强的诠释方式相反，亲苏间谍活动实际上起的作用倒不如说是微不足道的。和反对派组织“白玫瑰”（Weisse Rose）类似，它关系的是为反对继续铤而走险和军事上毫无意义的战争行为赢得更广泛人群的支持。由于苏联情报部门的重大泄密，壮大膨胀的反对派组织“红色乐团”在1942年就成为盖世太保手下的牺牲品。

最后本书还回忆了我的学术导师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研究领域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多年来《当代史季刊》的出版人。这里的关键不可能是在年青一代历史学家的大规模论战面前为他进行辩护，但或许可以帮他摆脱为国家社会主义做准备工作并在1945年后阻碍新开端的指责。身处几代人之间，在被迫移民再返回德国之后，罗特费尔斯认为，自己作为学术导师的职责首先是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受历史至上主义深刻影响的历史学和战后失去方向的时期之间进行斡旋，并促生一种历史意识上的连贯性。

目录

- 第一部分 从魏玛到第三帝国
  - 第1章 从魏玛共和国到国家社会主义元首国家
  - 第2章 1918年11月9日：首个德意志共和国的机遇与失败
  - 第3章 1948/1949年议会委员会建立民主国家时从魏玛共和国吸取的教训
  - 第4章 国家社会主义攫取权力：革命还是反革命
- 第二部分 希特勒的崛起与权力垄断
  - 第5章 阿道夫·希特勒与1919年至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崛起
  - 第6章 法西斯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 第7章 希特勒和政治的毁灭
  - 第8章 双重人格：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早期对希特勒的诠释
  - 第9章 希特勒、德国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 第10章 民众共同体的神话——资产阶级国家的瓦解
- 第三部分 第三帝国的危机和崩溃
  - 第11章 国家社会主义暴力体系中道德层面的缺失
  - 第12章 第三帝国的瓦解
  - 第13章 走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国家社会主义对犹太人迫害的升级
- 第四部分 第三帝国的抵抗运动
  - 第14章 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总结
  - 第15章 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和德国抵抗希特勒的反对派
  - 第16章 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在1944年“七二〇”运动中的地位
  - 第17章 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计划中德国和欧洲的未来
  - 第18章 “克莱骚圈”的外交设想
  - 第19章 “红色乐团”和德国抵抗运动

    - 第20章 汉斯·罗特费尔斯：连接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
- 感谢
- 人名译名对照表

第一部分 从魏玛到第三帝国

第**1**章 从魏玛共和国到国家社会主义元首国家

多数同时代的人认为，1933年1月30日组成的阿道夫·希特勒任帝国总理的民族集中内阁（Kabinett der nationalen Konzentration）只不过是众多短命的总统内阁（Praesidialregierung）中的一个，他们只给了这个新执政联盟短短几个月的寿命。没有一个政治观察家会想到，保罗·冯·兴登堡大人最后这个总统内阁会发展成一个极权主义的元首国家。希特勒的保守派联盟伙伴也预计，如果真能成功地除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消灭自由工会，那就可以按照极权思想对这个总统内阁进行重组。甚至主要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也沉迷于这样的幻想当中——在左翼政党瓦解之后将这个在他们眼中变得多余的纳粹群众运动（Massenbewegung）改造成一个由元首精挑细选的小规模的骑士团（Orden）[1]。

但是事实上，随着阿道夫·希特勒帝国总理地位的稳固，回到议会体制的回头路最后被堵上了。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阵营内部和国家总统身边的联盟伙伴担心，总统制度可能会被废除并退回到议会制，而总统制度似乎预示着政治党派萎缩退化到意识形态阵营当中的日子即将来临。为了避免总统制度被废除，他们进一步迎合希特勒，同意解散国会并紧接着同意了他们本打算阻止的新选举。因为他们不愿意冒险，让左翼党派在新的公开选举中获得多数并因此而阻碍他们所期盼的极权主义宪法改革的道路[2]。

从1930年9月开始，国社党在选举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并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以37%的得票率到达了高峰，之后开始走下坡，在11月的选举中经历了严重的选票流失，在接下来12月的地方和地区选举中选票流失甚至高达40%。纳粹运动的危机体现在党内的关系紧张上，尤其是冲锋队的反抗愈演愈烈，党的财政捉襟见肘，同时选举宣传的吸引力降低。1932年8月13日兴登堡断然拒绝希特勒接管总理府的要求使他的威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纳粹运动的内部危机再也无法隐瞒了。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最能干的党领导干部——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乱七八糟的党有了运转良好的领导机构要归功于他）决心劝阻希特勒放弃不成功便成仁（Alles-oder-nichts）的战略，该战略可能使国社党面临遭到孤立的威胁。他试图促使希特勒与施莱歇（Schleicher）将军内阁达成联盟，但是遭到了断然拒绝。因为国社党在1932年年底的时候没有能力在竞选中获胜。当事实证明希特勒并非孺子可教时，施特拉塞尔在1932年12月放弃了他在党内的职务，可能是借此向党的领导人说明他斟酌考虑的严肃性。但是希特勒却闻到了背叛的气息，特别是当施莱歇向施特拉塞尔提供了一个部长职位时[3]。

从人的因素来考虑，如果不是弗兰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希特勒的战略肯定会以一场政治灾难而告终。他不顾希特勒的强烈猜忌，背着这位现任总理向持怀疑态度的国家总统暗示中央党（Zentrumspartei）将即刻进入内阁而且内阁会成为一个实际上的多数派政府，从而实现了民族集中内阁。这为国家总统扫除了为不断增多、取代常规立法的紧急法令（Notverordnung）承担责任的障碍，而这正是他所厌烦的。

就这样，一个纯粹是杜撰出来的多数派政府（因为巴本只是假装开始了与中央党的谈判）导致了民族集中内阁的形成。对希特勒极度怀疑的兴登堡看不到任何摆脱困境的办法，巴本向他担保说，希特勒在内阁

中将被久经考验的保守派部长所包围并且将在方方面面依赖于他们，以此来安抚兴登堡。赞成共和的政党和资产阶级媒体也以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将成为内阁的真正领头人，他是除弗兰茨·冯·巴本之外的民族集中内阁的主要建筑师之一，并且自己就担任了三个部长职位。

尽管有着总理的额外优势并且得到了戈培尔（Goebbels）所能想到的所有手段的支持，但是希特勒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仅仅获得了43.9%的选票，仅仅和德国民族人民党一起勉强获得了议会多数。然而这个联盟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通过提交全面的《授权法案》使国会自行失去作用。在强大的压力和革命手段的威胁下，资产阶级政党在3月23日同意了《授权法案》。最初有效期为期四年，后来该法案延长了两次，成为纳粹统治形式上的法律基础。

此前2月27日晚上年轻的荷兰共产主义者在国会大厦礼堂纵火已经造成了一个新的态势[4]。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人认为，德国共产党不会接受左翼政党被逐步排挤并将以武力行动作为回答，他们预计行动将在3月5日国会选举之后的晚上进行。他们无法设想德国共产党会保持无所作为的状态，而共产党煽动斗争的口号和大罢工呼吁主要意义在于掩饰其暂时按兵不动的战略。事实上，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国会大厦纵火案的那天晚上因为在腓特烈斯费尔德（Friedrichsfelde）召开秘密会议而无法取得联系，因此无法对最初的逮捕浪潮做出适当的反应。

在燃烧的国会大厦震撼下以及即刻被捕的案犯属于德国共产党的错误信息影响下，希特勒和匆忙赶往火灾现场的纳粹大佬们谈到了“共产主义的号志灯”。共产主义者打算通过这一行动妨碍国会选举，对此希特勒丝毫没有怀疑。筹划好的借助《授权法案》将这些党派排挤出去的攫取权力战略因此而受到了质疑，而且出现了这样的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兴登堡将把执行权转交给德国国防军，那样选举就会暂时失效。

为了避免这样的态势，在普鲁士内政部形成的一个以戈林（Goering）和新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为首的专家小组决定，鉴于想象出来的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内战威胁而动用为此类情况准备的紧急状态计划。匆忙之间准备并在第二天（2月28日）就由帝国内阁通过的《保护人民与国家法令》（Verordnung zum Schutz von Volk und Staat）使民事紧急状态取代了军事紧急状态。这个再也没有被废止的法令被称做“第三帝国基本法”是有道理的。随着基本权利被取消，它为打压德国共产党和部分社民党人以及消除各州自治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使得在各州权力攫取提前进行。后来在极大政治压力下得到了也包括中央党在内的党派通过的《授权法案》实际上只有令走向极权专制的举措合法化的功能。

对于希特勒内阁的起源，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Karl Dietrich Bracher）称之为一种“新式的权力攫取”，它采取了形式上合法的方式，并避免了与宪法秩序的公开决裂。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走向权力的道路为这种行事方式做出了榜样。和墨索里尼一样，在伪合法方式的背后是来自迅速壮大成一支百万兵力队伍的冲锋队暴力行为方式的赤裸裸的威胁。然而合法性几乎是谈不上的。因为纳粹领导人在1月30日之后所采取的战略包含大量违宪的内容，特别是在关系选举前期的政府组成以及对反对派的阻挠时[5]。对通过《保护人民与国家》紧急法令的理由的误导性说明也是同样。事实上那根本不能称得上是一次共产主义的抵抗尝试，这一点在2月28日上午就已经清楚了。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妨碍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到深秋时还在帝国法院用可疑的原始资料来论证这一点。

与此同时，纳粹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凭借巴本和施莱歇内阁创立的配套机构，这很能说明纳粹攫取权力进程的特点。2月28日的紧急法令以巴本在1932年7月20日颁布的普鲁士法令为基础，这并非偶然。同样，政府也得以动用巴本内阁为奥特兵棋推演（该推演以左翼政党进

行武装大罢工的情景为出发点）而准备的逮捕名单。除此之外，这些醉心于“没有政党的政府”幻想的总统内阁不管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法律上都为纳粹政权这个立宪国家的酝酿打下了基础[6]。

上面所描述的这种发展立刻被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加到“民族奋起”（nationale Erhebung）和革新的陈词滥调当中，这种发展的根源在于自1929年以来加剧的德国议会制度的危机，而这场危机是世界经济崩溃的一个后果。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有着对宪法缺乏共识的弊端，而且资产阶级中间和右翼党派仅把它视作保障和平的过渡，认为它要求接替德意志帝国是没有道理的。在1920年6月的国会选举进行期间，魏玛联盟党派以及支持宪法的力量就已经沦为少数了。因此，指责魏玛的民主政治家造成了制度的不稳定是错误的，虽然恰恰是来自主要的社民党多数派方面的过多的法治国家原则对除掉行政、外交和帝国内的皇室精英构成了阻碍，而这是早就该进行的。

在初期持续不断的危机过后，共和国在1923年之后成功抵御了极右翼分子进一步的叛乱企图，并在整顿货币和1924年道威斯（Dawes）计划通过的背景下明显巩固了议会制度。然而这是以势力对比不知不觉地向右推移为代价的，这体现在将社会民主党排除在外的公民联盟内阁（Buergerblockkabinett）的形成上。外国贷款的注入为可以明显感觉到的经济复苏提供了支撑，这在1927年给公职部门带来了全面的薪俸改革，并促使大工业首次与共和国达成了妥协。

至少，共和国成功地抵御了极右翼浪潮（它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导致与作为核心的巴伐利亚内政矛盾的严重激化），并使大量准军事组织去军事化，比方说“钢盔党”（Stahlhelm）和青年德意志骑士团（Jungdeutscher Orden）。国社党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降格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派别，而且，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它也没能显著壮大其潜在选民。1923年之前强有力存在的反犹太主义势头在这一稳定期内也

得以被击退。同样，它也成功地使德国民族主义者有限地参与到议会制度当中。

但是，外在的稳定［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顽强争取到的外交成就降低了它的难度］却没有内在的共和国—议会制度的扩大与之相对应。事实倒不如说是相反。在1919年魏玛宪法通过时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左翼自由派组织日益丧失影响力，这不仅仅是在选举活动当中，在公众心目当中也是如此。自由中间党派的日益削弱构成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特征，自1930年9月起它们对多数派的形成就已经无足轻重了。这与人们日益摒弃自由派的观点是相符的，与此同时，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媒体和学术讨论中的影响力增大，这还不算民族主义浪潮在大学生以及学术界新生力量中的突飞猛进。反自由主义思想浪潮是一种遍布全欧洲的现象，在德国，它因为敌视才智的非理性主义和当时正产生影响的反《凡尔赛和约》综合征而表现更为激烈。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宣传侵袭德国之前，像“元首原则”（Fuehrerpinzip）和“民众共同体”这样的流行语早已是为人所熟悉的政治词汇了。同样的还有这样的想法：必须从挫败的思想中唤起根本的“民族奋起”，它最终与西方社会传统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决裂，并把重点放在“普鲁士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上，就像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宣传的那样。

特别是在共和国后期，只靠改革是不够的想法得到了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广泛承认，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倒不如说是一场“保守主义革命”，那就可以把政治权力和打造的任务交到“年青一代”的手中，他们没有被西欧文化和价值观的沦落所影响，并将再次想起符合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精神的德国唯心主义的起源。特别是汉斯·策雷尔（Hans Zehrer）大力宣传的年青一代神话在受教育阶层中为国家社会主义攫取权力作了思想准备。此外还出现了影响颇大的“军人民族主义”（soldatischer Nationalismus）文学，它与恩斯特·

荣格（Ernst Juenger）的《作为内在经历的斗争》等书一起抵制着国家社会主义的雄辩[7]。

然而我们不能高估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些思想史根源，尽管我们不得不说，在1933年之后进入纳粹国家领导位置的德国学术阶层没有在政治和道义上发挥作用。因为议会制度解体的决定性原因在于外交与军事政策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及自道威斯计划生效以来社会政策方面冲突的加剧。后者首先涉及利益政策冲突，但是由于工农业精英这一方和军事机构另外一方的盘根错节，这些冲突在内政上的爆炸力日益增大。

与常见的想法相反，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成就——特别是《罗加诺公约》（Locarno-Abkommen）的签署和结束莱茵地区被占领状态（但功绩却被继任者占为己有）——都没有带来共和国力量的加强。只要盟军以战争赔款的形式扼住德国政府的咽喉命脉，只要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的条件是不可能的，政治右翼对于为施特雷泽曼的谅解政策承担责任就犹犹豫豫，该政策被贬斥为“履行（条约）政策”。因此就出现了这种效应，如果出现外交政策所决定的危机或者紧急状况，例如在鲁尔区被占领、签订道威斯计划以及后来的杨格计划（Young-Plan）时，只有在将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上不遗余力与资产阶级政党斗争并在议会遭到孤立的社会民主党纳入进来时才能产生议会所需要的多数。因此1928年最后一届社民党领导的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议会制内阁只是因为面临着马上要进行战争赔款谈判的压力才产生的，而且它在道威斯计划通过后就立刻垮台了。这些事情表明，外交压力通常会带来制度的稳定，因为反对共和的右翼不敢大胆地站出来，而且他们在外交政策上也没有妥协的能力，因此温和的资产阶级力量就与社民党结盟了。

世界经济危机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尤其是胡佛《延债宣言》（Hoover-Moratorium）以及战争赔款问题在1931年被搁置——改变了这

种态势。因此，帝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uening）的希望破灭：他所渴望的战争赔款阵线的成功一直拖到洛桑会议才出现，而且好处让冯·巴本得去了，非但没能给他的总统内阁带来稳定，也没能给他按照极权精神改造宪法的机会。反共的力量醉心于可以自己推行德国强权政治的幻想的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在他们看来，海因里希·布吕宁的调停政策变得可有可无了。战争赔款支付的实质结束也使他的退场板上钉钉了。

这种态势和德国的军事政策密切相关，多年来它一直致力于避开《凡尔赛和约》对解除德国武装的规定，而且即便在结束与苏联的军备政策合作之后，“秘密国防军”（schwarze Reichswehr）仍在着手通过改头换面的预算将其日益泛滥的军备计划付诸实施。军方领导对在国际裁军谈判中立场要更加坚定的敦促伴随着总统内阁政策，并在民族集中内阁中得以继续。就这样，在国防军领导人的敦促下，德意志帝国在1933年10月退出了裁军会议[8]。

自1929年起，军事院外集团的压力在下面这个方面也加大了：因为组建预备役部队是被禁止的，所以，由于10万国防军陆军的服役期限为12年，征兵开始出现缺口。为了继续扩军政策并确保其财政条件，事实上行使总参谋部（Generalstab）职能的军队机关敦促将社民党排挤出普鲁士和帝国政府。因此其负责人施莱歇将军决定性地参与了海因里希·布吕宁总统内阁的就职仪式，人们希望布吕宁不会为非法扩军制造什么障碍。1932年6月，德国国防军和帝国内政部长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发布的冲锋队禁令遭到施莱歇的激烈反对，并导致格勒纳辞职，这拉开了布吕宁内阁下台的序幕，而布吕宁内阁不愿造成与社民党的决裂并结束宽容政策。在他们大力支持的弗兰茨·冯·巴本总理失败之后，施莱歇和国防军领导人认识到，自己不得不最终走出掩体、走到政府的最高领导位置上了，而此前他们是通过帝国总统发挥他们的影响力的。他们醉心于能够利用希特勒并将其束缚在“合法柱”（Pfahl der

Legalitaet）上的幻想当中，而希特勒则期待着重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撼动共和国根基的第二个利益冲突涉及道威斯计划实行后工业劳资关系的恶化，该计划使此前实行的将工资成本增加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做法变得不合时宜。力量无论如何都被通货膨胀危机削弱的自由工会和基督教工会看到，仅凭一己之力无法阻止11月革命在社会福利方面取得的成就被一点点蚕食，而且他们不得不在工作时间和工资问题上忍受一而再再而三的克扣。

只有依靠原本为了稳定货币在1924年引入但随后成为常设机构的国家仲裁机构，他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顶住企业家组织的压力，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工会内部的反对者增多，他们最终以革命工会反对派（Revolutionaere Gewerkschaftsopposition）的名义公开拥护德国共产党。由于社会福利政策的不平等，达成自由工资协议的情况越来越少，几乎所有的情况都要仲裁机构介入。最终，西北钢铁制造业组织（Nordwestliche Gruppe der Eisen und Stahl erzeugenden Industrie）决心通过西部重工业大规模停工的方式来对国家仲裁发起正面攻击，它的目的是消除自由工会对工资政策的影响。这场所谓的“鲁尔铁争端”（Ruhreisenstreit）虽然以企业方面的战术撤退而告终，但它没有减轻劳资协定阵线的负担，以至于重工业价格政策最终不得不在内阁会议桌上决定[9]。

魏玛的产业劳动关系一方面受经济相对停滞和高结构性失业率（Sockelarbeitslosigkeit）的拖累，另一方面受到鲁尔区重工业回归战前大规模销售的算盘落空的拖累，这导致了严重的开工不足。雇主方面因此而下定决心通过大幅度削减工资降低固定成本，并在必要情况下通过系统停工和对工会施加政治压力来强行采取必要的取消劳资协定的措施。与此相联系，重工业公开声明不再与议会制度的合作，使自己成为

一场极权主义宪法改革的代言人，这场改革将由“帝国革新联盟”（Bund zur Erneuerung des Reiches）对外推动。

与此同时，削减工资和1930年开始的衰退使工会遭到严重削弱，并间接导致工人运动受到削弱，运动中的改革派多数日益陷入激进派的压力之下。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德国共产党得以大幅壮大了其主要由长期失业者圈子组成的支持者队伍，而企业工人则支持全德工会联合会（ADGB）和社民党。随着失业者数量在1932年超过600万人，民主工人组织的活动空间缩小。虽然特别是帝国旗帜（Reichsbanner）和“铁的阵线”（Eiserne Front）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动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且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有能力抵御国家社会主义工厂组织NSBO（国社党的工会组织）对其领导干部的袭击，但是（尤其是鉴于与屈从于共产国际指令的德国共产党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们没有能力防止政治右翼不知不觉的政变。最晚从冯·巴本推翻普鲁士社民党政府开始，社民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就被剥夺了总罢工这个工具，而且，它们很大程度上在最终导致希特勒内阁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消极的角色。

所以，在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加剧的条件下，再也没有能阻止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抬头的有效力量了。该运动极其有效地对德国社会“不一致的各个行业”（ungleichzeitige Sektoren）发起了动员，并能将不同利益集团对制度的不满为己所用。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不同，国社党放弃在地方和地区层面推行建设性的政策，也不会明确什么具体的内容。取而代之，他们将来自成员的凝聚力用在持续不断的竞选宣传和宣传活动上，并完全出于煽动性的理由推动人们参加选举。

阿道夫·希特勒及其慕尼黑追随者小圈子给国社党打上了特有的法西斯主义烙印，这将它与资产阶级但也与左翼政党区别开来。它的特征是：无限的元首崇拜、禁止党内所有层面的民主选举和对纲领的解释、精力完全集中在动员发动追随者上而且不明确具体的纲领内容。领袖魅

力和派系主义（Faktionalismus）的结合保证了下级领导人在无条件忠于希特勒的同时又有相当大的活动余地。国社党的主要冲击方向是针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11月共和国”的代表，它和德国民族人民党一样把德国战败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国社党再三利用利益冲突来为自己动员，同时，人们可以感觉到，它避免在政治上做出选择，并有意识地利用了强硬反对派立场的优势。

1928年的时候，国社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还不超过2.4%，这促使普鲁士政府取消了一直延续到当时的禁止希特勒演说的命令。但是选民运动中出现了明确的逆转。国社党打入产业工人阶级的努力失败，但它出人意料地在自1924年以来尤其饱受长期农业危机之苦的德国北部农村地区赢得了支持者，而且还是在完全没有组织支持的情况下。为了赢得在此前一直被忽视了的农民，希特勒认为有必要破例偏离他避免改变纲领的原则，改动党纲内赞成不受限制征收土地的一节。

此前对右翼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潜在选民转向了国社党，在这种情况下，自1929年春季开始，国社党取得突破为群众运动的进程拉开了帷幕，与之相伴的是资产阶级中间党派选民储备的几近完全瓦解。正如事实所表明的，国社党成功地将完全不同的潜在选民暂时凝聚在一起。第一个根本性突破随着发动农民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投反对票而完成，同样为它所发动的还有退休人员和养老金领取者，也就是布吕宁通货紧缩政策影响最大的那些群体[10]。

第二，与社民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相比，国社党能够将特别多的年轻选民拉到自己身边，鉴于这个在战前特别庞大的年龄段在这几年里达到了选举年龄，这具有重大的意义。最终它跻身为自由选民组织和四分五裂的利益派系的委托人。除此之外，国社党［借助瓦尔特·达雷（Walter Darre）建立起来的“农业政策部门”（Agrarpolitschs Apparat）］对魏玛共和国的主要农业政策机构帝国农业联盟（Reichslandbund）进行渗

透，并把它的潜在选民拉到自己身边。

国社党选民的社会组成随着选举运动的进行而发生了改变。与各自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比较而言，中产阶级选民的代表过多，而产业工人阶级的比例较小，同时可以看到，上层中产阶级被纳入进来的人数直线上升，而在最初阶段出于抗议而选择极端政党的选民数量减少。国社党是一个有能力将极其不同的社会群体暂时维系在自己身边的一个综合性的政党。但是其极高的不稳定性（在1933年1月之后才减小）不允许这个选民自始至终呈发散状态的运动与特定的社会群体相认同。

国社党对广大德国民众的吸引力仅在微不足道的程度上以其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为基础，1930年它转而反对杨格计划并在1931年加入“哈茨堡阵线”（Harzburger Front）的意义也只是次要的。至关重要的是，这个党有能力把自己描述成取代12年议会危机的唯一的和不容妥协的选择及一个“新德国”的保证，而且它承诺消除政党垄断并缔造一个真正的“民众共同体”。借助这个内容空洞的论证，它不仅成功地吸引到为了抗议而投极端党派票的选民，也吸引到了年轻选民。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国社党从未有过为自己赢得多数选民的时候。它所拼凑起来的集合体充其量可以称做消极的或者是佯装的人民党，它以高度的不稳定性为特征。这体现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上，当时国社党不得不遭受14%的选票流失，与此同时，在个别支持者群体方面选民的波动幅度还要剧烈，因此国社党面临着选民无限增长神话破灭的危险，而这个神话的宣传十分成功。如果不是帝国总统身边的保守集团在议会选举进行前就建立了民族集中内阁并由此颠倒了选举和政府形成的关系的话，事情肯定就会是那样。

事实证明，可以通过内阁中的保守派多数控制希特勒的想法是个幻想，特别是因为，兴登堡退隐至诺伊德克，而希特勒则足够聪明地摆脱了“看家狗”冯·巴本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着总统。兼任双重部长的胡

根贝格的所谓强势地位同样被证明是错觉，尤其是德国民族人民党正处于衰落过程中。希特勒最终利用胡根贝格未经协调就在殖民地问题上对英国政府步步紧逼而迫使他退出内阁。与此同时，在社民党遭到禁止，而共产党干脆受到镇压之后，资产阶级政党在杜撰的民族最终实现了统一的谎言下承受着巨大的自行解散的压力。希特勒得以在没有遭遇较大阻力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各州政府的一体化，通过任命戈培尔为帝国人民启蒙和宣传部长以及任命鲁道夫·赫斯和恩斯特·罗姆为不管部部长，他成功地使内阁的比重向着有利于国社党的方向转变。

同时，社会也在进行一体化，这剥夺了其保守派伙伴的组织支持。与新教不同，起初保持了谨慎态度的天主教受帝国与罗马教皇宗教协定的影响，开始与新政权接近，并且几乎是未有异议地跳上了戈培尔大力号召的“民族奋起”列车。重新争取到的关键词“民众共同体”传播开来，并掩盖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正在站稳脚跟的警察国家禁止任何表达言论的可能并可能受制于政府镇压政策的事实。

在1934年6月30日之后，冲锋队的最高领导人遇害拉开了纳粹统治最终得以巩固的序幕。在戈林和希姆莱的推动下，希特勒以“先发制人”（Flucht nach vorn）的方式对冲锋队领导集体进行了清洗。借此他完全击败了恩斯特·罗姆这个竞争对手，罗姆作为冲锋队这个几百万人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力图进行一场“二次革命”（zweite Revolution）、消除希特勒与遗留下来的国家秩序所做的妥协。应该说，“长刀之夜”保证了德国国防军对武器的垄断，它将党卫队带到了政治权力的核心，就这一点而言，军队的参与被证明是一场“惨胜”。

将军们建议，为了将这个独裁者与军方的利益绑在一起，在依稀可以预见的兴登堡的死亡之后将帝国总统和帝国总理的职位合二为一。这为希特勒消除了任命继任者的困难。它为元首国家教育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而戈培尔则着手利用所有自己可以支配的宣传手段来令希特勒

神话深入人心。按照计划，这导致了思想精神的枯竭。

我们现在能从这些历史事件中得出哪些论断，这个问题需要加以区分地回答。当年特有的态势将不会重现——在这种态势下，敌对利益重叠在一起并导致对一个不受欢迎但是绝对有效的共和国秩序的清洗。同样，帮助国社党获得权力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极度仇恨目前虽然在社会边缘群体中仍继续存在，但是在欧盟条件下是再也无法设想的了。德国民众当中极权主义观点的沉积（它促使民众容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怖）即便在今天也没有消失，但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避免这些观点重获新生。同样，我们也不希望德国重回到传统的民族主义的老路上。这可能不能说是意识形态立场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关于魏玛共和国毁灭的教科书中遇到这个问题，而且鉴于当前的政治态势它的意义重大），而更多的是用权力收买和腐蚀的问题，这点我们可以从知识分子精英的例子中看出来。但它尤其适用于德国职能性精英（Funktionseliten）对自由机构的草率放弃，这使希特勒的专制成为可能。

---

[1] 请参阅Hans Mommsen，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刊登于Hans Mommsen的*Von Weimar nach Auschwitz. Zur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n der Weltkriegsepoche*，Muenchen 2001，S.167ff。

[2] 参见Juergen Falter，*Hitlers Waehler*，Muenchen 1991，S.29ff.；请参阅同书的S.27ff。

[3] 关于施特拉塞尔危机参见Udo Kissenkoetter，*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P*，Stuttgart 1978，S.88ff.，以及Peter D.Stachura，Gregor Stasser and the Rise of Nazism，London 1983。

[4] 关于国会纵火案情结参见Hans Mommsen，Van der Lubbes Weg in den Reichstag-der Ablauf der Ereignisse，刊登于*Von Weimar nach Auschwitz*，Muenchen 2001，S.175ff.，以及Sven Felix Kellerhoff最近的Der Reichstagsbrand. *Die Karriere eines Kriminalfalls*，Berlin 2008，该书再次证实了这位荷兰人是独自作案。

[5] 请参阅Karl Dietrich Bracher/Wolfgang Sauer/Gerhard Schulz，*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Studien zur Errichtung des totalitaeren Herrschaf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3/34，Koeln 1960，S.154ff。

[6] 参见Hans Mommsen，Regierung ohne Parteien. Konservative Plaene zum Verfassungsaufbau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刊登于Heinrich August Winkler（出版）的*Die deusche Staatskrise* 1930-1933，Muenchen 1992，S.1-18；关于布吕宁请参阅同书的S.490ff。

[7] 请参阅Klemens von Klemperer的*Konservative Bewegung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Muenchen 1962，概览参见Hans Mommsen：*Aufstieg und Untergang der Rupublik von Weimar*， Berlin 1998，S.376ff。

[8] 请参阅Heinz Hoehne的*Die Zeit der Illusionen. Hitler und die Anfaenge des Dritten Reiches* 1933-1936，Duesseldorf 1991，S.169ff。

[9] 基本分析参见Bernd Weisbrod的*Schwerindustr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teressenpolitik zwischen Stabilisierung und Krise*， Wuppertal 1978，S.415ff。

[10] 参见Falter，*Hitlers Waehler*， Muenchen 1991，S.34f.和S.364。

第2章 1918年11月9日：首个德意志共和国的机遇与失败

自从联邦德国如彗星般转瞬即逝的经济崛起开始变得暗淡，备受诋毁的魏玛共和国的形象也有所改变。人们指责它说，与被称做是“自卫型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的联邦德国不同，它因为对宪法中立主义的理解使它的左翼和右翼敌人有可能逐步撬动议会制度，并因此为国社党在1933年1月30日之后攫取权力铺平了道路。这种对魏玛共和国的看法忽视了当时动荡的外在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1917年《和平决议》（Friedensresolution）通过时就联合在一起的国会党派认识到自己面临着下面这个任务：鉴于威廉二世的帝国被革命推翻，它们必须建立一个自由的政治秩序并将德国人民团结在这一秩序下。

1918年11月9日魏玛共和国的成立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发生的，除了社会困顿（例如很大一部分国民缺乏食物）之外，它还以内战性质的激烈冲突为特征。共和国必须摆脱德意志帝国失败的沉重遗产以及战争影响和《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这包括将因为威廉二世以及帝国政府失败而产生的革命形势［这体现在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的建立上］转变成一个符合宪法的政府的任务。后者应当有能力在符合国际法的基础上结束战争状态，同时防止反革命力量从中分一杯羹，这些反革命力量还一直以为可以否认帝国的军事失败，可以把帝国崩溃的责任推到社会主义政党的“背后捅刀子”（Dolchstoss）上。

不管人们如何具体评价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社会民主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在1919年11月之后推翻君主制度的几个星期里的政策——他与帝国结束后幸存下来的“最高陆军指挥部”（Oberste Heeresleitung，缩写OHL）的联盟或者是与绝大多数立场反动的自由军

团（Freikorps）和志愿组织的合作并不总是有助于平息部分工业工人的抗议运动，但他在尽可能快地推动选举以便召开立宪国民大会（Nationalversammlung）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坚定与果断以及很早就把拟定未来国家宪法草案的任务交给自由派的宪法学家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ss）都值得人们给予其绝对的承认。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地位的巩固在1919年1月16日的德国国民大会选举中还没有表现出来，这使得多数派的形成变得简单。

德国国民大会不得不于1919年2月6日在魏玛而不是首都柏林举行反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退出人民代表委员会之后激烈的内政冲突。1919年1月1日在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领导下成立的规模又小、立场又极端的共产党在1月的斗争当中以及后来都扮演着从属性的角色，直到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联合起来它才在议会有了一定的分量。支持社民党的工人阶级当中的左翼革命派起义在当时就遭到不公正的诋毁，人们诋毁它“与斯巴达克同盟有关”。冲突的激化尤其要归咎于多数社民党党员僵化死板的秩序思想，当罢工运动失败时，他们过于轻率地向军方求助。

1919年7月31日德国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是多方政党让步的结果，但是它仍旧带有胡戈·普罗伊斯的痕迹，而且宣传的是一种改良的议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总统的合法地位在面对国会的自主权时是有保留的，这一地位是与德意志帝国国家利益至上的传统密不可分的。与占据主导的国家法学说相一致，普罗伊斯不怎么重视公民基本权利的调控功能，但是即便他肯定后来联邦德国所实行的第三人效力（Drittwirkung），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可能超出突出的中立主义宪法概念的范畴。因此，再往后批评魏玛宪法的制定没有走上系统保障基本权利的道路就是多此一举的了[1]。

普罗伊斯在各州会议咨询前期就不得不在上帝一位论问题上作出根

本性的让步，并且不得不放弃将各州降格为行政单位以及赋予共和国突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特征的打算，这些似乎要重要得多。他扩大乡镇自治职能并借此启动管理民主化的努力同样也失败了。因此格哈德·舒尔茨（Gerhard Schulz）在其关于魏玛国家改革的基本研究中得出了下面这个倒不如说是持怀疑态度的结论：与普罗伊斯根据其鲜明的民主基本观所设想的情景相比，帝国宪法更多的是“极权国家思维的产物”[2]。

尽管存在着这些局限，但是，我们将不得不高度评价胡戈·普罗伊斯在宪法制定过程中的贡献。甚至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一直也表示怀疑，争取国家完全议会制度化是否值得——例如受邀为宪法筹备提供咨询的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要求仅仅将帝国参议院（Reichsrat）议会制度化，而普罗伊斯从一开始就坚信，未来的德国宪法将最终带来议会制，他称其为“民主最佳和最富成果的组织形式”。因此他也间接批评了仍在继续产生影响的委员会国家的思路，比方说特别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就对其偏爱有加。“我们的任务”，他在一篇关于1919年1月宪法草案的备忘录中写道[3]，“不能是用民主排挤议会制度，而更当是一个议会制民主的发展与巩固”。

然而普罗伊斯不想承认纯粹的代议制宪法（Repraesentativverfassung）具有议会制的属性（依据代议制宪法，人民代表机构发挥着国家主权唯一载体的作用），他与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和奥地利社民党在见解上的差异就在于此[4]。他不认为政府是议会的委员会，而是论证说，“在纯粹的议会制度下……政府部门”形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机关之间的弹性纽带”——也就是说君主制以及民主制的国家首脑和议会之间[5]。

同时普罗伊斯为产生一位公民投票选举的总统尽心尽力，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将简化迄今为止的君主立宪制向议会制共和国过渡的问题纳入考虑。马克斯·韦伯也是这种考虑的大力支持者——也就是说让一位总

统与议会势均力敌。他的话听起来似乎有明显的波拿巴主义倾向，但是他没能将赋予总统职位超强领袖魅力特征的广泛要求贯彻实施[6]。因此，正如汉斯·博尔特（Hans Boldt）所说，它仍旧是一个由帝国总统面对国会（同时由帝国政府担当“纽带”）的二元制度[7]。

魏玛宪法赋予帝国总统的地位是人们批评它的核心——得到公民投票支持的、制衡人民代表机构无限议会主权的力量。这事实上是与在一般情况下发挥榜样作用的西方议会制度的根本决裂。同样，普罗伊斯的宪法草案中已经为帝国总统设定的在执法和立法之间模棱两可的地位也遭到了同时代观察家的批评[8]。

这也体现在下面这一点上：作为还是由国民大会选举出来的帝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丝毫没有迟疑就担当起帝国内阁领头人的职务。虽然总统在政务活动方面受帝国总理签字同意的约束，但是因为拥有可以根据第25条解散国会并借此让国会的不信任票流产的大权，所以他有有效的途径对内政决策施加影响。另外，总理制定方针政策的职权和签字确认权也有助于保持帝国总统和政府首脑关系的平衡。

相反，宪法规定赋予总统任命总理的自由而且对他没有多数票的约束，这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这在艾伯特总统任命威廉·库诺斯（Wilhelm Cunos）而不是当时已经蓄势待发要组阁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为帝国总理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9]。还要糟糕得多的是——鉴于魏玛宪法第48条——它没能限制总统的特权，因此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总统任期突然结束之后，普罗伊斯还在致力于宪法中预定的关于魏玛宪法（WRV）第48条第5款实行法案的通过，该法案本应对总统的全权进行明确的说明和限定。然而该提案被兴登堡驳回，他称它是对总统特权的限制，是违反宪法的。1926年11月，他向帝国总理马克思提条件说，若要继续执行法律草案就要先全面改革选举权并巩固他的地位，这将导致宪法向着独裁的方向发展。因此该草案被搁置并再也没有在国会提出

过[10]。

根据第48条所拥有的紧急条例颁布权在艾伯特任总统时就被用来与常规立法竞争（很多时候是因为国会的贪图安逸）——这本来肯定会很早就促使宪法的捍卫者行动起来。但是相对于兴登堡及其身边的人有意奉行的旨在以牺牲政府为代价来扩大总统职权的政策而言，在共和国最初几年里这种滥用的比重是很小的。不过，兴登堡一直力求在形式上遵守宪法规定，直到1930年春天大联盟破裂，特别是自从中央党和国社党威胁向最高法院起诉他通过布吕宁违背紧急条例法以来[11]。

紧急条例颁布权在总统内阁时代的过度扩张几乎不受宪法的约束，但是资产阶级中间党派却忍受了下来[12]。公民投票对总统的支持以及总统在外交和防务政策方面的执行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政治党派承担不那么舒服的政治责任的意愿的丧失，这主要也是因为它们能成功摆脱党派身边的利益组织支配的时候越来越少。总统出于对宪法的错误解读而在1932年出于自己的责任感要求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这让希特勒攫取权力变得简单[13]，这一点可能也具有决定命运的意义。但是，自1925年以来一直朝着有利于总统方向进行的权力转移首先要归咎于忠于共和国的党派的失败，它们没有能力就总统职位的人选问题达成一致，也没有能力阻挠院外选举委员会推动任命保罗·冯·兴登堡——所谓的坦能堡（Tannenberg）会战的获胜者——为总统，它们希望这将带来外交和内政上的转折。

1925年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共和国党派的两难境地，自1920年6月的选举以来它们在德国国会就已经不再有明确的多数。在就是否接受《凡尔赛和约》进行投票之际，德国民主党（DDP）就能否承担国会责任，仅出于战术原因对条约投反对票。尽管有着这些很早就能看到的弱点而且在革命结束后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其中包括占领莱茵兰（Rheinland），但是通过引入地租马克（Rentenmark）和克服通货膨

胀，魏玛共和国的各届内阁成功地从本质上稳定了议会制度并成功地击退了极右翼的叛乱企图——从1920年3月的卡普（Kapp）政变到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进军统帅堂（Feldherrnhalle）。在奥匈帝国分裂后成立的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通过巴黎和会建立的新秩序而出现的议会制度大多数分崩离析了，恰恰是在与这些国家的发展相比时，仅仅逐步得到西方外交和财政支持的魏玛政府的成绩就必须明确加以突出强调了。

共和国经历了最初的持续危机之后，在整顿货币和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背景下，议会制度明显得以巩固。但这是以势力在不知不觉中向右转移为代价的，这体现在将社民党排除在外的公民联盟内阁的形成上。与此同时，它成功地使无数准军事组织去军事化，并击退了在1923年作为挑起和利用不满抗议的政党在地方获得了影响力的国社党。尽管如此，特别是学生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主义努力的深入宣告了政治心态的彻底改变，它有利于对自由中间党派的侵蚀，而这起初是不知不觉发生的。

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首先是由对西方列强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依赖决定的。1923年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区（这要归咎于德国对强加给自己的赔款偿付拖拖拉拉）清楚明确地把这一态势摆到了人们面前。《凡尔赛和约》的条款（特别是政治右翼在反对“战争罪责”条款第231条斗争的口号下对其进行系统的大肆宣传）给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增加了沉重而且多半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但是，由此所决定的帝国在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依赖性使得政治右派阻止“履行政策”（特别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犹豫了良久才最后下定了决心）的所有努力都显得不合时宜了，并且防止了德国民族人民党及其背后的集团特别是军方积极参与到公开反对共和国的爱国组织的独裁宪法实验当中。

要在恼人的赔款问题上达成可以过得去的解决方案就必须在将社民党纳入进来的情况下达成妥协，并逾越民主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中间派

政党之间的鸿沟。这一局面使德国有机会借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小心地克服了德意志帝国在外交上的极度孤立。直到1931年赔款将最终结束的迹象显露出来、裁军谈判似乎将扩大德国活动空间的时候，聚集在（当时已经接管德国民族人民党领导权的）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身后的极权主义右翼分子才认识到自己有必要亲自接管权力并积极推动议会制度的改造，使其向着“极权主义民主”发展。这一目标和鲁尔区重工业坚决推翻11月革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成绩特别是劳资协议制度的计划密不可分。议会制度没有在多数人民的意识中扎根，而且在一种“新的”元首原则（Fuehrertum）中寻求解脱的趋势偏偏在资产阶级圈子得以滋长，魏玛宪法的缺陷肯定也有助于这些局面的出现。

除此之外，批评者宣称，1919年开始引入的比例代表制（Verhaeltniswahlrecht）导致了党派的四分五裂，并因此而导致了议会制度的危机。但是后者并非令议会工作难度加大的长期联盟危机的根源。小党派的比例从未超过15%，而且它们对多数派的形成从未起过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说的“议会危机”的根源更多的是指中间党派的无能[14]，它们没有能力与社民党达成有益的妥协，而没有社民党是不可能形成多数的。通过修订选举法来稳定多数派的努力后来看来是味可疑的药剂，因为魏玛宪法实际上遭抱怨的核心说到底也就是通过跑到舒服的反对派角色这边来逃避政治责任的趋势，这也包括社民党在内。此外还要再加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制度中移植过来的利益组织在政治党派中过度膨胀的影响力。

比魏玛共和国的机构缺陷重要得多的是对于起支撑作用的基本价值观缺乏共识。约瑟夫·贝克尔（Josef Becker）挖苦说，“构成各党派之间微弱的基本共识的不是共和国宪法，而是对修改《凡尔赛和约》的要求”[15]。站在联邦共和国这个“万无一失的安全之所”，很多历史学家指责魏玛宪法被“制定得自己可以废除自己”[16]。与此同时，鉴于1919年对于宪法基本问题缺乏共识，当时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对于宪法的理解仅

仅是“公开的政治形式”。这体现在魏玛宪法第6条上，它允许在国家形式发生变化时改动宪法，只要具备了必需的符合资格的多数[17]。

此外，将不受宪法左右的基本准则确定下来与当时国家法学说的一致见解相抵触，并且会让人感觉新宪法丧失了合法性。改动选举法（例如在5%的条款上）不会令多数派的情况发生太大变化，此外还会产生在1930年之后将德国人民党（DVP）和德国民主党排除在议会共同责任之外的效果。而且，就像各方在危机中斟酌考虑的那样，操控选举法在政治上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通过提高选举年龄就能阻击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不过是个幻想，这些内政部长威廉·冯·盖尔男爵（Wilhelm Freiherr von Gayl）都认真地考虑过了。

1948年议会委员会（Parlamentarischer Rat，即制宪会议。——译者注）就宪法进行咨询时，委员们对魏玛共和国的失败记忆犹新。他们首先把失败归咎于宪法的本质缺陷。首当其冲的是下面这个指责：宪法纯粹出于对民主的形式主义理解而无条件服从多数裁定原则，因此对民主的反对者毫无抵抗力。这种论点的背后很多时候隐藏着对议会享有无限自主权原则的拒绝和很晚才在议会委员会消除的对多数派“专制主义”的担心[18]。

相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波恩/柏林共和国“自卫型民主制度”的说法忽视了下面这一点：在魏玛共和国稳定下来之后，通过党和组织禁令阻止宪法秩序被掏空的努力并不少。它们虽然绝大多数是针对共产党左翼，但也针对国社党和其他民族组织；一个例子是1921年和1922年《共和国保护法》（Republikschutz）的制定，但是巴伐利亚州政府很早就避开了该法。不过普鲁士自由邦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冲锋队的干涉日益遭到总统内阁的阻挠和打乱，这些内阁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眉来眼去，并将其视为有用的制衡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力量。同样，普鲁士警察一再看到自己受到显然是站在国家社会主义者一边的民事司法的阻碍。

州委员会（Staatenausschuss，魏玛国民大会时期各州的代表机构，后为帝国参议院所替代。——译者注）面对胡戈·普罗伊斯的最初计划强行将各州保留下来以及宪法中央集权要素的不断减弱没有加强魏玛民主制度的内在抵抗力——尽管普鲁士发挥了直到1932年7月才被摧毁的共和国堡垒的作用。巴伐利亚自1922年以来所走的特殊道路也表明了这一点。及早消除帝国和普鲁士（考虑到法国对莱茵兰的野心，它的存在是不可侵犯的）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有助于共和国制度的稳定，但是鉴于革命的发展走向和地区力量的持续作用这没有实现。

基于联邦德国最终记录下来的成功史，德国在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领导下的总理民主制时期成功地逐步消除了魏玛时期流传下来的对议会制度的理解，这一点在很多时候变得无足轻重了。魏玛共和国的看法是，政党和议会的职责首先是面对政府代表形形色色的社会利益[19]。但是，当议会委员会的各党代表成功地顶住各州代表的反对并从宪法上保证了政治党派是政治意愿形成不可或缺的工具时，起初试图让联邦参议院（Bundesrat）作为“合法性保护区”限制议会自主权的努力失败了。在这个关键词背后隐藏的是对魏玛时期帝国总统的跨党派职能的追忆和对绝对多数制专政的公开怀疑。

因为各党领导人在波恩打消了这些考虑，而且联邦参议院的职责范围受到局限，正在形成当中的联邦德国走向对自己新的认识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在最初的联邦议会选举过后，面对占据主导的形成超党派政府的趋势，担任基民盟最高领导人的康拉德·阿登纳获得了承认——当时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让社民党成为反对党的决定间接给了他支持，并以在联邦议会极其微弱但足够的多数接管了总理府。由此他打开了走向执政党与反对派相互作用的道路，这种关系使得获得多数并任命总理成为政党的核心任务，并且因此而有利于大党的形成。与魏玛时期对宪法的理解相比，根本性的质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变化。与之相比较而言，吸取魏玛共和国的经验而做出的修正（如5%条款、建设

性不信任投票和联邦总理制定政策方针的职权）意义倒不如说在其次了。

对魏玛宪法的公民投票元素的批评也是同样，特别是国家总统的普选。公民对杨格计划投反对票的消极效应通常被高估了。事实证明，共和国的反对者过度利用公民投票来反对国会的再三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成功。相反，1926年关于没收旧日诸侯财产的全民投票却产生了一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共和派阵营有利的实力较量[20]。只是在联系总统其他特权（其中包括对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的情况下，保罗·冯·兴登堡担当国家首脑角色的意图才得以成为现实，他才得以在这个位置上通过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而施加灾难性的影响。

然而，任命希特勒的关键责任在总理弗兰茨·冯·巴本身上，这点很多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是他欺骗兴登堡说，由他推动的“民族集中内阁”在中央党加入进来后将拥有议会的多数（这是他随后仅仅表面上与中央党进行结盟谈判的背景）。因此产生了下面这个似是而非的悖论，在假定新内阁即便是总统内阁也将拥有议会多数的情况下，兴登堡在1933年1月30日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以避免保守集团担心的退回到议会制度的情况的发生[21]。单是这个过程就说明，最迟到海因里希·布吕宁退出时就不能说它是个符合宪法的程序了。随着国会的解散和确定1933年3月5日为新选举日（理由是让德国人民有能力对新组成的“民族集中内阁”表态），组阁和选举的关系已经被本末倒置了，正如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表述那样[22]。直到今天个别宪法学家还持这样的见解——希特勒政府的形成是合法的，这很难理解。人们很难把这一发展过程的责任归咎到宪法的弱点上，杜撰希特勒是在民主选举中获得了权力也是不可以的。

事实上我们今天完全有理由尊敬魏玛共和国的创造者和先行者，他们在极其沉重的外来负担下并背负着威廉二世体制的遗产为德国的民主

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即使他们的努力最终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攫取权力而失败。魏玛共和国特别在现代福利国家方面但也在国家财政秩序和税收政策方面留下了至关重要的遗产，这一点人们不应该忘记。同样，不管是在经济产业还是教育文化现代化方面，魏玛共和国的成绩也不应当脱离人们的视野，尽管魏玛时期经济相对停滞不前。特别是对福利国家制度来说也是同样，今天公众视之为理所应当的，但它是在恶性通货膨胀、农业危机和工业转型的压力下产生的。在魏玛共和国成立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在回顾历史时公正地将其一分为二地来看待。

---

[1] Hugo Preuss，Verfassung des Freistaates Preussen vom 30.November 1920，刊登于*Jahrbuch des oeffentlichen Rechts Bd.X*（1921），S.271，援引自Horst Moeller的Parlamentarismus-Diskussio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刊登于M.Funke/H.-A.Jacobsen/H.H.Knuetter/H.-P.Schwarz（出版）的*Demokratie und Diktatur. Geist und Gestalt politischer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Bonn 1987，S.154。

[2] Gerhard Schulz，*Demo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r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Bd.I，Berlin 1963，S.207。

[3] Hugo Preuss，*Recht*，*Staat und Freiheit*，Tuebingen 1926，S.386f.

[4] 参见Reinhard Overdieck，*Parteien und Verfassungsfrage in Oesterreich. Die Entstehung des Verfassungsprovisoriums der Ersten Republik* 1918-1920，Muenchen 1997。

[5] Hugo Preuss，Verfassung des Freistaates Preussen vom 30.November 1920，刊登于*Jahrbuch des oeffentlichen Rechts Bd.X*（1921），S.271，援引自Horst Moeller的Parlamentarismus-Diskussio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刊登于M.Funke/H.-A.Jacobsen/H.H.Knuetter/H.-P.Schwarz（出版）的*Demokratie und Diktatur. Geist und Gestalt politischer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Bonn 1987，S.154。

[6] 参见Wolfgang J.Mommsen的*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2.Aufl.，Tuebingen 1974，S.389ff。

[7] Hans Boldt，*Verfassungsgeschichte. Politische Strukturen und ihr Wechsel*

，Muenchen 1993。

[8] 参见同一作者的Die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刊登于Karl Dietrich Bracher等人（出版）的*Die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 *Politik*，*Wirtschaft*，*Gesellschaft*， Bonn 1988，2.Aufl.，S.52。

[9]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Aufstieg und Untergang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1918-1933，Berlin 1998，S.166f。

[10] Schulz，*Demokratie und Diktatur. Geist und Gestalt politischer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onn 1987，S.470ff。

[11] 参见Hermann Puender的*Politik in der Reichskanzlei. Aufzeichnungen aus den Jahren* 1929-1932，hrsg. Von Thilo Vogelsang，Stuttgart 1961，S.129f.；请参阅Mommsen的*Aufstieg und Untergang*， Berlin 1998，S.522。

[12] 魏玛宪法第48条全权的扩大甚至得到Gerhard Anschuetz等自由主义宪法学家的肯定；请参阅Mommsen的*Aufstieg und Untergang*， Berlin 1998，S.437f。

[13] 请参阅Henry A.Turner的详细描述，*Hitlers Weg zur Macht. Der Januar* 1933，Berlin 1999，S.140f。

[14] Gustav Stresemann，*Vermaechtnis. Der Nachlass in drei Baenden*，*Berlin* 1932/1933，S.244f.

[15] 参见Josef Becker，Geschichtsschreibung im politischen Optativ？，刊登于*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 80/50，S.33。

[16] Heinrich-August Winkler，*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Muenchen 2000，S.407.

[17] 请参阅Ernst Wolfgang Boeckenfoerde的Der Zusammenbruch der Monarchie und die Entsteh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刊登于Karl Dietrich Bracher等人的*Die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 Politik*，*Wirtschaft*，*Gesellschaft*，Bonn 1988，2.Aufl.，S.42。

[18] 参见Hans Mommsen的Der lange Schatten der untergehenden Republik. Zur Kontinuitaet politischer Denkhaltungen von der spaeten Weimarer zur fruehen Bundesrepublik，刊登于*Von Weimar nach Auschwitz. Zur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n der Weltkriegsepoche*， Stuttgart 1999，S.362f.；同一作者的Lehren aus der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i der Demokratiegruendung des Parlamentarischen Rates 1948/1949，见下，S.53-66。

[19]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The Origins of the Chancellor Democracy and the Chance of the Democratic Paradigm in West Germany，刊登于Jost Duelffer（出版）的*Western Integration*，*German Unification and the Cold War. The Adenauer Era in Perspective*，*Special Issue of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25，No.2，2007，S.7-18。

[20] 请参阅Ulrich Schueren的*Der Volksentscheid zur Fuerstenenteignung* 1926，Duesseldorf 1978，S.48-51。

[21] 参见Hans Mommsen的Das Scheiter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r Aufstie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Von Weimar nach Auschwitz*，Muenchen 2001，S.153f。

[22] Karl Dietrich Bracher/Wolfgang Sauer/Gerhard Schulz，*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Koeln1960，S.50f.

第3章 1948/1949年议会委员会建立民主国家时从魏玛共和国吸取的教训

在议会委员会就宪法进行咨询时，委员们对魏玛共和国的命运还记忆犹新，他们把它的失败首先归咎于宪法的根本缺陷。与此同时，他们把国家社会主义攫取权力视为在劫难逃的厄运，因此这些宪法之父们努力使新的国家尽可能地不受专制的损害。魏玛和国家社会主义专制的双重失败似乎堵住了简单回到魏玛宪法上的道路，尽管在占领国的影响下通过的各州宪法在很大程度上仍与其有着联系。

与此同时，一种看法也在持续发挥着影响：民主主义议会制度（就像在巴黎郊区签署的条约给中欧国家盖上的印记那样）不仅仅在德国失败了，而且在欧洲大陆普遍失败了，特别是议会制度在法国解体之后。议会制原则仅仅在荷比卢三国和受英式宪法榜样影响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站稳了脚跟[1]。德国反对希特勒的力量从头至尾都在寻找议会制度的替代选择，而且在德国移民当中全心全意维护该制度的人也寥寥无几，这很能说明这种形势的特点[2]。很大一部分德国领导精英的反议会制立场根深蒂固，它不仅体现在魏玛时期随着时间流逝而加剧的敦促强化帝国总统地位和放弃关于不完全总统结构的魏玛宪法第45条的趋势上面（这后来在总统内阁时期成为了现实），也更多地体现在1945年之后仍可以听到的批评上面——希特勒的崛起是一个所谓的魏玛共和国“过度民主化”的直接或者是间接后果，与此同时也是各地人们对“大众民主”（Massendomokratie）概念理解不准确的结果[3]。

阿道夫·希特勒攫取权力最终是通过民主选举完成的——这个看起来几近根深蒂固的假设是上述这些想法的基础。直到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这种看法仍旧存在：共和国是被左翼和右翼极端主义扼杀的，任命希特勒是对民主形式主义理解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也就是将民主理解为

无条件地忠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与此同时，与魏玛共和国相比联邦共和国是“自卫型民主”的说法忽略了一点，即在魏玛体制1920年稳定下来之后人们一再试图限制公开宣称的共和国反对者对共和国秩序的掏空，比如说借助1921年的《共和国保护法》[4]。同时这也表现在下面这一点上：尤其是各州提出的防止国家社会主义暗中削弱国家机构的努力遭到了政府的阻挠制止。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宪法学家仍坚持他们的看法，称希特勒攫取权力形式上是合法的，事实上1933年3月政府组成和选举的关系是“本末倒置”[5]的（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的评论很有道理）。此外，奥托·布劳恩领导的普鲁士政府率先进行的一体化似乎很难被宪法原则包括在内，顺便提一下，他的政府为后来至关重要的《国会纵火法令》准备了技术性的法律工具。但是正如往常一样，对这个问题的评价是（这的确也无可否认）：对希特勒的任命是在帝国总统兴登堡身边的保守派集团的敦促下发生的，它主要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防止他们所担心的退回到议会制度的发生[6]。

不管怎样，1933年1月30日民族集中内阁的形成以魏玛宪法基础的事实失效为前提。这种情况也使魏玛宪法有可能在形式上生效至1945年5月，尽管是以完全被掏空的形式，这单单一个原因就够了：希特勒在被视为“革命性”的行动——像威廉·弗利克在1937年建议的那样颁布一项全面的“帝国立法”法案——面前怯懦不前[7]。就这一点而言，1948年当宪法之父们在纳粹专制的建立与魏玛政治制度和特别是帝国宪法的结构性缺陷之间确立间接联系时，他们基于的出发点是错误的想法。

除掉公民投票选举的、作为“皇帝替代者”行使职权的国家总统并在这方面与西方议会制原型相结合，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共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人们不能简单地把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责任推到年事已高的兴登堡身上，他是在弗兰茨·冯·巴本有意识地欺骗他说新内阁将因为中央

党的立即加入而变成一个在议会拥有多数的内阁时才做出这一举措的。当反对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扩大紧急法令颁布权的意见日益增多并且产生影响时，当他开始怀疑到那时为止的总统政府路线是否该继续下去时，对俾斯麦之前的普鲁士部长威胁弹劾内阁记忆犹新的兴登堡就更容易被说服了[8]。

另外，魏玛宪法第48条（它的主要内容在于解除党派对国家最后的责任）的致命影响无疑首先要归咎于兴登堡始终拒绝给内政部1926年提出的执行法令草案投赞成票——暂且撇开在艾伯特时期就已经蔓延开来的为了解决持续不断的立法任务而对紧急状态条款的滥用不谈[9]。同样，兴登堡出于对德皇时期指挥权的怀念而要求任命国防部长权的态度也完全不在宪法范围内，而这种态度对共和国的结束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尽管如此，议会委员会作出的剥夺联邦总统在此之前的特权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该特权使他有机会干预现行政策并插手特别重要的人事决定。在《基本法》中实现的联邦总理地位的加强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且它反映在譬如说强调制定方针政策的职权以及防止通过不信任投票将个别部长“清除出”内阁上面。当然，由此所打开的走向总理民主的道路并非真正有意而为之的。

这尤其适用于建设性不信任投票，这方面从魏玛后期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普鲁士三人委员会（Dreimaennerkollegium）通过改变议事规程使政府组成在第三次投票时也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的战术举措对此起了作用[10]。在普鲁士，这妨碍了戈林成为总理，或许这导致他后来失去了在帝国层面的发展可能。不管怎样，没有获得足够多数的管理内阁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并成了“骑士”（Herrenreiter，不仅指赛马者的外貌，还含有傲慢、冷淡、脑袋空空之意。——译者注）冯·巴本的唾手可得之物。

当然，建设性不信任投票作为魏玛共和国长期联盟危机重要后果的实际意义往往被高估了，尽管这个机构性的刹车装置对在职政府的下台可能很有用，因为这其中存在的形成多数的强制性既不能持久地跨越现有的利益冲突也不能替代所缺乏的多数。除此之外，此前恰恰是海因里希·布吕宁通过限制性法律（它们部分在联邦德国的议会实践中得以继续）在类似的方向采取了行动，并由此有效地缩小了议会的活动空间。

对破坏性多数形成的担心在1948年之后也一直持续着，这从议会委员会内外各种各样将联邦参议院扩建为合法性保护区并拒绝给予联邦议会完全自主权的努力就能得知，这在基姆湖（也称茵梦湖。——译者注）绅士岛上的准备阶段就很明显了。例如黑森州基民盟领导人埃里希·克勒（Erich Koehler）要求“防止政治党派痴迷于权力”[11]，而对公开声明支持基社盟的阿道夫·聚斯特亨（Adolf Suesterhenn）来说，“议会专制违背良心的程度”可能“并不亚于一人专制”。瓦尔特·门采尔（Walter Menzel）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宪法草案被右翼称做“一种原则上的无限暴政”，只不过在该草案当中由多数取代了希特勒而已。

在盟军占领德国之后，德国人民大多数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且对“魏玛国家”的反感就像人们对它的轻蔑称呼那样，丝毫未减。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意愿降至最低点，并且仅限于少数人，特别是遭到政治迫害的人、归国侨民或者是在第三帝国期间被排挤的精英们。战败和崩溃导致了一种广泛的与己无关的态度（Ohne-mich-Einstellung）。与此同时，公众对魏玛共和国的失败的批评变得激烈起来，它的失败使希特勒攫取权力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表明到了一切重新开始时刻的政治真空导致了广泛的民族冷漠，并促使分离割据主义努力重新抬头。

西方盟国试图通过它们的“再教育”政策来填补这个真空。它们主要依靠慢慢重新组成的工会的代表，但也包括魏玛共和国的著名政治家。不管是社区管理部门的重新启动还是新成立的州的政府和管理机构的建

立都是如此。上文提到的这些人同样也被拉去建立首批代表机构，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在公开选举之前进行的，而且这些人决定性地参与了在占领国监督下进行的各州宪法的制定。因此，除了少数例外，这其中与魏玛宪法存在的普遍联系就得到解释了[12]。

拖延到1947年的宪法咨询和同一时间媒体进行的关于德国政治新秩序的讨论两者之间关系的紧张一目了然，关于魏玛共和国的流行偏见重新又回到这些讨论当中。调查研究用“宪法民主制度”的概念来说明讨论中所持的观点。它们主要旨在对上下两院形式的议会制度进行职业化的修改，但在关于州宪法的咨询中遭到美国占领军的否决。因此旨在限制代议制民主（repraesentativ Demokratie）的战略在议会委员会准备阶段就已经失败，而且没有像基民盟争取的那样，出现联邦参议院被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上院的情况。巴伐利亚州总理汉斯·埃哈德（Hans Ehard）和社民党宪法学专家瓦尔特·门采尔引起轰动的妥协更多的是对众多有远见的宪法学家所争取的参议院解决方案构成了阻碍。另外，该妥协避免了议会的独立自主性受到上院的限制。

直到1948年5月议会委员会举行会议，在它之前进行的关于讨论当中对议会制进行职业化修改的咨询和会议才结束。此前一直被遏制的政治党派的影响到这个时候才由于特别是委员会的组成而得以承认，并让此前居主导地位的“反政党效应”后退。就像威廉·亨尼斯（Wilhelm Hennis）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描述一样，在这次“纯粹的党派人士会议”中政党终于作为西德战后政坛的晚产儿得到了行动起来的机会[13]。

将联邦参议院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上院只是受限制地进行，而著名的埃哈德—门采尔妥协妨碍了高瞻远瞩的宪法制定者所争取的参议院解决方案，这一点直到不久前还遭到公开抱怨。1948年之前在西德地区十分活跃的关于宪法政策选择的时政讨论反映了反对议会制的不满情绪和对退回到魏玛共和国情形的担心。甚至康拉德·阿登纳偶尔也会擅自批

评“议会专制主义”，并且说，“议会多数的专制”也可能会存在 [14] 。

与此类似，不管是在基姆湖绅士岛的宪法大会上还是议会委员会内部都有很强的反对将公民投票要素纳入未来宪法的潮流。这时不同的政治阵营得以达成一致。社民党和纯粹议会制的支持者对人民选举帝国总统和公民投票反对杨格计划的灾难性后果记忆犹新。另外，资产阶级阵营对公民投票形式的拒绝则是源于对所有不受阶梯形代表和间接选举控制的间接民主的广泛怀疑。

事实上，魏玛共和国公民投票要素的意义被高估了，特别是因为，公民投票没有一次最后获得了成功，其中也包括支持共和的关于没收旧日诸侯财产的公民投票，它只是因为议会没有发挥作用才发生的。人民选举帝国总统也不能被视为从头至尾都是有害的，倒不如说是这样，在把总统职务托付给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时放弃利用它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毫无疑问，议会委员会从魏玛持续危机的经验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接受政治党派是形成意愿和多数不可或缺的工具的这个事实。然而，它的发生并非没有阻力，而且罗伯特·勒尔（Robert Lehr）表示，“未来整个德国的宪法”必须重新消除政治党派的优势，基民盟的主要代表——其中包括特奥多尔·施特尔策（Theodor Steltzer）也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对 [15] 。

威廉·亨尼斯认为 [16] ，可以通过一次“纯粹的党派人士会议”遏制这种公开的反政党效应（就算不能完全消除的话），这是联邦共和国制定宪法的契机之一。事实上，政治党派作为西德战后政坛的晚产儿终于有机会行动起来，并且，与共同参与了宪法大会和有关制定基本法的非正式咨询委员会的宪法政府代表和专家权威相比，它们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性。相对于政党在其中仅仅作为消极因素出现的魏玛宪法而言，宪法对政治党派在政治意愿形成中的作用的承认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进步。

与此同时，有鉴于魏玛的历史，人们试图通过实行5%条款来应对

令人担心的党派分散现象。这被证明在一定范围内是适宜的，但是人们不应当忽略：分裂的小派别的存在不是在魏玛时期变得困难的联盟形成的真正问题，特别是这些党派的比例从未超过15%，因此它处在一个完全可以与联邦德国相比较的规模上。除此之外，这样的一部选举法在1930年9月之后首先会打击德国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和争取重新形成功能较弱的政党制度的那些人。

毋宁说，至关重要的是利益集团不受约束的影响力，它与立场右翼的职能性精英一起，使得逾越民主左翼和资产阶级中间派之间的鸿沟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通过当今十分常见的政治党派公开融资来抑制它对具体利益的依赖——这个结论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开始就在斟酌考虑，但是鉴于魏玛当时的条件它只能是乌托邦而已[17]。与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党被组织剥夺了权利相比，今天从这一结论中形成了一种新的过度特权化，这是典型的对魏玛经历的过度补偿之一，它有可能导致代议制宪法被撬动的危险，这是令人担忧的。

与这种对政治体制结构性缺陷的过度反应类似，虽然在原本的宪法咨询中没有计划，但是联邦总理府仍扩大成一个与各部门竞争的机构：拥有约500名职员，其中至少120人是高级职位，这也包括自60年代后期进行的名为“国务部长”（Staatsminister）的议会国务秘书（Parlamentarisch Staatssekretaer）职位的设立。由此联邦总理制定方针政策的职能得到了行政机关的固化确定，同时也完成了它在承担政治职责竞争中的扩张，而这是以各部门的职权范围缩小为代价的。这只有一个先例——帝国总理府升格为决定性的调控工具，它在总统内阁时期开始并在1934年之后迅速发展。原本是协作性质的帝国总理府国务秘书在部长排名中的地位上升表明了这一点[18]。与联邦共和国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考虑议会委员会宪法制定时有两个因素必须特别提及。一

个是基本权第三人效力原则和联邦宪法法院作为除政府和议会之外的第三个国家机关的突出地位。它在魏玛时期没有对应的机构——尽管设立了最高法院（Staatsgerichtshof），虽然最高法院完全清楚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州法院（Obergericht）对议会意愿形成的影响。因为联邦宪法法院实行违宪审查（Normenkontrolle），到基本法通过的时候，存在着一种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与西方议会制原型的背离，这包含着不断掏空议会独立自主性和在不为人察觉的情况下剥夺合法性的危险，这是毫无疑问的。

另外一种改变涉及发生了变化的对民主的理解，它以英国为样板，并以政府党派和反对派的斗争为出发点，它到康拉德·阿登纳的头两届内阁时才形成。因此，为任命总理创造多数的角色落在了政党身上，它取代了在1949年还占据主导的按比例代表社会利益的职能，并因此而使大党的形成成为可能。然而旧的态度看法并没有完全消失，这反映在直到19世纪50年代州一级还存在着超党派政府上，但是德国共产党很快就从中退出了[19]。阿登纳借助最初非常微弱的优势形成联盟政府的决心和库尔特·舒马赫走向反对派的决定使得民主与议会制典范的根本转变成为可能，由此，与魏玛体系的远离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完成了。

最近几十年来联邦德国的发展和公民联盟内阁时期的魏玛共和国的情形越来越接近——除了在下面这个事实上存在着根本差异之外，那就是当前的多数派政府是建立在对捍卫民主宪法秩序的广泛共识的基础上的。不能与政治冷漠相提并论的蔓延的“党派愠怒”预示，政治活动有被选民利益所取代的趋势，并面临失去与人民的联系的威胁。

与此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断推进的行政擎柱化（Versaeulung）正在进行，它也包括各州在内，而且有掏空或者是（像在联邦和各州管理协议情况中那样）绕开议会监督权的危险。同样，财政政策多次动用补救方案，这原本是布吕宁时期在经济危机和过大的通货膨胀政策压力

下形成的，而且触及议会的预算自主权。自以为是地用F.R.冯·阿勒曼（F.R.von Allemann）的话——波恩不是魏玛——来美化自己不太恰当[20]。在某些方面，当前的政治制度面临着与魏玛共和国后期类似的挑战，特别是多数党的衰败方面。与此同时，魏玛的下面这个错误必须避免：政府干预工资政策并因此把左右翼既得利益者的聚集在一起的压力揽在自己身上[21]——譬如在布吕宁时期时就是这样，煤价是在内阁的会议桌上决定的[22]。

至于从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得出的教训，首先引起普遍重视的是这样的经验，那就是一切都取决于对公共机构被不知不觉的掏空的应对和保证司法权的独立，然而这是有附带指示的，那就是要让法官和律师处在民主宪法的基础上。当可以看出所争取的目标具有违反法律和不人道的特征时，为纳粹政府服务的职能性精英仍表现出意愿，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在德国继续发挥着影响的对合法性的迷信来解释。它尤其体现在下面这一点上：与西欧不同，在路德教和理想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德国没有抵抗权利的传统，而且直到战后才迟疑地给予了希特勒抵抗运动无保留的承认[23]。

如果我们试图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能从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经验中吸取多少教训以及它们落实到宪法形式和现实中的情况如何，结果得出的只能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图像。议会委员会从魏玛宪法所谓的和事实上的功能缺陷所得出的直接结论部分被证实是积极的成就，但部分也被证实是基于不实历史论据的宪法陈述，它们暴露出多少有些明显的与“德国道路”和魏玛反议会制度思想的渊源。对公民投票的批评就属于此类，对魏玛比例代表制影响的完全高估也是同样，尽管人们找到的替代选择无可否认地经受住了考验。鉴于魏玛历史而被纳入基本法当中的其他宪法政策上的调整措施几乎不适用于抵挡不稳定的多数派的压力——后者对第一个德意志共和国来说可是臭名昭著的。

通过确定基本权利的不可更改，宪法之父们和德国人民从魏玛宪法的失败和阿道夫·希特勒和国社党对它的掏空和压榨中得出的最重要教训在于，承认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不受政治操纵侵犯、保障公民参与以及防止国家权力变得独立的宪法秩序是不可或缺的。恰恰是在1930～1933年魏玛从议会制过渡到不完全总统制这期间的这些经验（当然还有代表原则逐步遭到侵蚀和独裁结构的发展形成）对联邦德国形成了一个始终现实的挑战——要用内在的活力实现这个民主制度并使它始终值得公民信赖。

---

[1]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ie Krise de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und die Durchsetzung autoritaerer und faschistischer Regime der Zwischenkriegszeit，刊登于K.E.Jeismann/R.Riemenschneider（出版）的*Geschichte Europas fuer den Unterricht der Europaer*（=Schriftenreihe des Georg Eckert-Institus Bd.27），Braunschweig 1980，S.144ff。

[2] Hans Mommsen，Gesellschaftsbild und Verfassungsplaen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Gesellschaft. Ausgewaehlte Aufsaetze*，Hamburg 1991，S.292ff。

[3] 请参阅Theodor Heuss的*Aufzeichnungen* 1945-1947，Eberhard Pikart出版，Stuttgart 1966，S.114，以及Hans Mommsen的Der lange Schatten der untergehenden Republik. Zur Kontinuitaet politischer Denkhaltungen von der spaeten Weimarer zur fruehen Bundesrepublik.，刊登于*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Gesellschaft*，Hamburg 1991，S.382f。

[4] 请参阅Gotthard Jasper的Justiz und 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刊登于VfZ 30（1982），S.202。

[5] Karl Dietrich Bracher/Wolfgang Sauer/Gerhard Schulz：*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Studien zur Errichtung des totalitaeren Herrschaf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3/34，Koeln/Opladen 1960，S.50.

[6] 参见Hans Mommsen，*Aufstieg und der Untergang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1918-1933，修订版，Berlin 1997，S.625f。

[7] 参见Guenter Nebila，*Wilhelm Frick. Der Legalist des Unrechtsstaates.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Paderborn 1922，S.155f。

[8] Mommsen，*Aufstieg und Untergang*， Berlin 1998，S.657f。

[9] Gerhard Schulz，*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r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I，Berlin 1963，S.470ff.

[10] 请参阅Hagan Schulze，*Otto Braun oder Preuss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1977，S.726ff。

[11] Adolf Suesterhenn，Ein-oder Zweikammersystem？， 刊登于*Rheinischer Merkur*， 8.und 15.Oktober 1946。

[12] 基本信息见Sebatian Ullrich的描述，*Der Weimar-Komplex*：*Das Scheitern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und die politische Kultur der fruehen Bundesrepublik* 1945-1959，Goettingen 2009，他主要强调宪法制定在各州的意义。

[13] Wilhelm Hennis，Die Rolle des Parlaments und die Parteiendemokratie，刊登于Richard Loewenthal/Hans-Peter Schwarz（出版）的*Die Zeite Republik.* 25 *Jahr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e Bilanz*， Stuttgart 1974，S.212。

[14] 参见Karl Heinz Niklaus，*Demokratiegruendung in Westdeutschland. Die Entstehung der Bundesrepublik von* 1945-1949，Muenchen 1974，S.71和S.78f。

[15] 同一出处，S.89；Wolfgang Benz（出版），*Bewegt von der Hoffnung aller Deutschen. Zur Geschichter der Grundsetzes. Entwuerfe und Diskussionen* 1941-1949，Muenchen 1979，S.194f。

[16] Wilhelm Hennis，Die Rolle des Parlaments und die Parteiendemokratie，刊登于Richard Loewenthal/Hans-Peter Schwarz（出版）的*Die Zeite Republik.25 Jahr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e Bilanz*， Stuttgart 1974，S.212。

[17] Mommsen，*Aufstieg und Untergang*， Berlin 1998，S.245。

[18] Dieter Rebentisch，Reichskanzler zwischen Politik und Verwaltung，刊登于Dieter Rebentisch/Karl Teppe（出版）的*Verwaltung contra Menschenfuehrung im Staat Hitlers*， Goettingen 1986，S.65-99，以及Siegfried Schoene，Von der Reichskanzlei zum Bundeskanzleramt，Berlin 1968。

[19] 参见Gerhard Lembuch，*Parteienwettbewerb im Bundesrat*， Stuttgart 1976，S.29f.，以及Dolf Stemberger，*Lebende Verfassung. Studien ueber Koaltion und Opposition*， Meisenheim 1956。

[20] Fritz Rene Allemann，*Bonn ist nicht Weimar*， Koeln 1956。

[21] 参见Rainer Lepsius，Die Praegung de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Bundesrepublik durch institutionelle Ordnungen，刊登于同一作者的*Interessen*，*Ideen*，*Institutionen*，Opladen 1990，S.71ff。

[22] 参见Hans Mommsen，Das Dilemma Tarifpolitik. Die Politisierung der industriellen Arbeitsbezieh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刊登于Karsten Rudolph/Christl Wickert（出版）的*Geschichte als Moeglichkeit. Ueber die Chancen von Demokratie. Festschrift fuer Helga Grebing*，Essen 1995，S.211-223。

[23] 请参阅同一作者的Widerstandsrecht und totalitaere Diktatur，刊登于Franz-Josef Hutter/Carsten Tessmer（出版）的*Die Menschenrechte in Deutschland*，Muenchen 1997，S.135ff。

第4章 国家社会主义攫取权力：革命还是反革命

国家社会主义在1933年1月30日接管权力是否应该被视为革命的过程，这个问题的历史已经像该事件本身一样悠久了。将民族集中内阁的形成粉饰为“民族奋起”，并通过戈培尔的宣传将紧随其后的权力巩固阶段描述成“民族革命”，这些都是为了把政府更迭说成是德国政治的根本性新开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向着独裁方向的冲击由此得到了强调。

在后人看来，1933年1月30日无疑是历史的休止，但是这一点同时代的人起初并未感觉到。事实上，在当时人们无法预见，希特勒能成功地不仅把对手也把联盟伙伴除掉，并建立起一个民族专制政权，而且这个政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之际都能以相对广泛的人民共识为依据，甚至得到了其他西方国家的承认——尽管1933年4月抵制犹太人的活动形成了国内政策加剧极端化和迫害犹太人的明显先兆。

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是否应该把纳粹统治的建立称为“革命”，如果对于这个概念人们的理解不是纯粹的颠覆活动，而是通过努力在质上达到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的话（通常这是将重大欧洲革命与单纯的国家或政府的危机区别开来的标准）。与此相类似，尽管界定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想把阿道夫·希特勒列入世界杰出革命家之列的打算似乎仍值得怀疑。同样在雅各布·布尔克哈特（Jacob Burckhard）看来，希特勒也不能进入被认定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人物之列，而是要归到“重大的强有力的毁灭者”一类[1]。

然而，希特勒在德国和欧洲政治中压倒性的毁灭作用并未妨碍很多作者明确承认他的革命特质。休·特雷沃—罗珀（Hughes Trevo-Roper）在《希特勒最后的日子》中避免得出这个结论，并对其革命特性表示了怀疑[2]，而约阿希姆·克莱门斯·费斯特（Joachim Clemens Fest）在其仍

旧还占有重要地位的希特勒传记中则毫不犹豫地将这位专制统治者推到了距离左翼“伟大革命家”不远的位置上，即便他也承认，与列宁或者是罗伯斯庇尔的纲领相比，希特勒的革命纲领有意为之的可能性较小，倒不如说貌似偶然产生的[3]。

对革命家的定义在研究文献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承认这位德国专制者发挥了一位成功“社会革命家”角色的说法占据了优势。这个论点最早是由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和达维德·舍恩鲍姆（David Schoenbaum）带入到讨论当中的[4]，尽管是以在特定条件下的形式，而几年前赖讷·齐特尔曼（Rainer Zitelmann）和米夏埃尔·普林茨（Michael Prinz）果断开始着手对其进行研究并利用材料来对其进行论证[5]。现在，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和由它所引发的世界大战的长期影响对早就该进行的德国社会现代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引发作用，这一点是完全没有争议的，而社会现代化——就像达伦多夫声称的那样——是国家以稳定为导向的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然而，人们绝对不能抱有任何的错觉——例如，就像沃尔夫冈·查普夫（Wolfgang Zapf）在精英的更替方面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证明那样[6]：真正的现代化动力直到60年代产生，虽然战争和随后德国的分裂为其创造了某些社会条件。

违背民意地将希特勒视为“现代化推行者”似乎也有点可疑，纳粹政府日益破坏性的政策不由自主地摧毁了旧传统的包袱，否认这一事实同样也是成问题的。后面这一点既涉及贵族和大地主的地位、地方教会的统治地位也涉及交通渠道的落后。在社会关系方面，纳粹专制到处加强业已存在的合理化和现代化推动措施，但是如果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它们没有释放出任何新的更不用说是创新性的打造性的力量了[7]。

因此，将革命范例与现代化理论联系起来（从舍恩鲍姆开始它们就如幽灵般出现在各种文献中）无助于澄清事实。在语义哲学上要诡计同样毫无意义，比如说杰弗里·赫弗茨（Jeffrey Herfs）自创的“保守的现代

主义”（reactionary modernism）概念[8]、与之相对的亨利·A.特纳（Henry A.Turner）的“乌托邦式的反现代主义”[9]。在这方面最极端的是普林茨和齐特尔曼的立场，他们暗示希特勒是一个常常遭到误解的革命家，他明确争取的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

这样的立场距离起初由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Klaus Hildebrand）所代表的见解不远了：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中特有的种族主义成分形成了它真正的革命特性[10]。丹尼尔·戈尔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用一种革命阶梯秩序将这种论点推到了极致，这种秩序的最高端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革命”[11]。必须把种族均一性强加给社会的想法在犹太人世界阴谋这一失真图像的推动下，就像是摆脱不掉的思想一样贯穿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当中。它必定以不断加重的消耗、失控的恐怖活动和对人的极度轻视而告终；特别是在失败的情况下它以荒诞不经的激化形式出现。确定它背后的新社会的轮廓十分困难。为这样的幻想打上“革命”的标签意味着事后再赋予其严肃认真的表象。

有意识地把革命的概念局限在突然的社会或政治体制变革现象上，不再将对国家社会主义来说十分典型的对意识形态目标傲慢的过度拔高（因此还有把误导性的千禧年幻想强加于人）视为革命性的，现在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在吹毛求疵。与此同时，这样一个被挑选出来的术语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法西斯政策的特殊性上转移开来，而这种特殊性在于其真实的寄生性质。胡安·林茨（Juan Linz）就曾指出，必须将法西斯主义理解为源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其共产主义变体的矛盾的“政治舞台的晚产儿”，而且要将其解释为特有的“后革命主义”抗议运动[12]。它从广泛的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社会主义的不满中吸取力量，这种不满是其意识形态的温床。这种不满与不一致的各行业的可发动性同时发生，这对正处于飞速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来说是十分典型的。

在这方面，法西斯运动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应当解释为反革命组成

或者后革命组成更好一些。因此，不能将法西斯主义理解为处于同一历史层面上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变体，而应将其理解为对其反射性的模仿，弄清楚这一点是必要的。这既适用于它发展形成的政治形式和结构，同样也适用于它与共产主义结构显著不同的操纵性的动员技巧[13]。

在具体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产生和崛起源自对11月革命的抗议和打击“11月罪犯”的斗争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国社党的成功建立在对不断积聚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不满的发动基础上，而这种不满源于没有得到承认的失败。11月的事件给德国右翼资产阶级力量留下的精神创伤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紧密领导核心身上尤其明显。希特勒就反复回忆11月的颠覆活动，并再三表示，11月9日永远不能也不可以再出现[14]。

1918年11月的创伤一再对政权的内政政策产生影响，这从希特勒对于下令定量配给食物犹豫不决及其牺牲受压迫民族以保证德意志人民有足够的食物供应的努力就能看出来。同样，他拒绝对女性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及拒绝因为战争而限制消费——乃至关闭慕尼黑赛马跑道（Trabrennbahn）和理发店——都可以理解为是这一创伤的后效。总体战的纲领肯定是戈培尔正式强加给这位专制者的[15]。

对来自共产主义抵抗的危险的高估（例如对苏联战俘的过度封锁）同样来源于这个后革命精神创伤。另外，类似的态度在民族保守主义反对者中也可以看到，他们为颠覆辩护说，11月9日肯定会导致德国完全布尔什维克化，所以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它再次出现[16]。这种对11月革命、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特有认知也在紧密追随者圈子之外给国家社会主义带来了空前的心理上的推动力。

尽管如此，如果因为它对1918～1920年革命持坚决反对的立场而片面地强调纳粹运动的反革命性质将是误导性的。因为和右翼政党范围内

所有新的社会运动一样，它的目标是消除19世纪资产阶级结构以及对社会重新进行根本性的塑造，这其中体现了纳粹世界观的千禧年说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这个方面占了往往被算在它头上的“现代性”的一部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是希特勒在20年代时对于使用“革命”这个词极其克制。在关系到11月的颠覆活动时，宣传虽然使用“日耳曼”或者是“民族革命”的字眼，希特勒也宣称向统帅堂的宣传性进军是“德意志革命”的第一步[17]，然而，可以看出，“革命”这个概念在1923年后的党的宣传中很大程度上退到了次要位置，直到1933年1月才作为自我描述重新得到广泛的运用。然而这并不适用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左翼，他们在口头上坚持“革命”讨论，但是随着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的辞职——以及最终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会组织的解体而变得完全无关紧要了。

在1930年之后的紧锣密鼓攫取权力时期，希特勒没有将一个有着异乎寻常的新开端的党的广泛目标与“革命”这个词联系起来。这肯定也有战术考虑方面的原因，因为单是考虑到对外领导德国国防军希特勒就要遵循突出的合法路线。然而在1933年1月30日之后，他毫不犹豫地重新动用了革命的概念，但通常是以“组织良好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小剂量”形式，因为他需要人们赞成计划中的《授权法案》[18]。不管怎样，他兴奋地谈到了“革命的革命”或者是“古往今来最重大的革命”，后来可能也热情洋溢地说到了“一场历史规模的真正革命”[19]。所有这些表述都预示着对“革命”这个概念的运用首先是宣传性的，他借助革命来为自身的立场提供辩证支持，但与此同时将其说成是独一无二的。

希特勒的这场革命讨论的内容实际上多么空洞，这从他自1933年初夏开始所采取的立场就能看出来——他要求结束革命活动。他在1933年

7月6日向帝国的地方长官们保证说[20]，革命必须过渡到健康渐进发展的轨道上，然而这并没妨碍他后来谈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法西斯革命”[21]。鲁道夫·赫斯在一次讲话中曾与党内的恩斯特·罗姆反对派遭遇，在这次已经可以让人感觉到6月份长刀之夜的刀光剑影的讲话中，他为了先发制人让“二次革命”的闲言碎语无计可施而将希特勒称做“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和革命家”，这就并不令人奇怪了[22]。

然而，政府在权力稳固期间逐步向国家社会主义元首国家转变，但这时它在一般情况下却放弃了对现有机构进行转型或者是继续伪革命的路线，虽然具体看来暴力侵犯行为层出不穷——几乎就像这是国社党习以为常的一种习性似的。与所有人的预期相反，希特勒放弃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权，将它交给看起来倒不如说平淡无奇的鲁道夫·赫斯，这使保守派联盟伙伴产生了希望——在除掉“马克思主义政党”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会被缩减成一个由元首挑选的骑士团[23]。同样，希特勒也放弃了对政府机构进行形式上的改造，尽管他任命戈培尔为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以及任命赫斯和罗姆为不管部部长破坏了无论3月份的选举结果如何都不改变内阁组成的承诺。但是，将未来的宣传部打造成一种下属几个部的上级大部的构想仍旧没有实现。

不管怎样，对各部门进行渗透（虽然形式上没有取缔它们）的国家社会主义一体化政策（它源自“斗争时期”的竞选战略）被暂时保留，而范围更广的革命活动被有意识地封锁。罗姆危机引起了轰动，其政治背景建立在冲锋队的社会革命预期基础上，在《授权法案》颁布之后的头几个星期，冲锋队在国社党欣喜若狂地瓜分官职时保持了克制。恩斯特·罗姆和冲锋队领导在此之前曾指望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计划的“将运动的合法性转给国家”[24]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东西，而并非进一步继续伪合法路线。

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将攫取权力说成是“合法的革命”[25]隐含着

这样的含义，在该策略背后隐藏着一个多少不为人知的政治理念。但这里关系的也是典型的“反复摸索”（trial and error）的方法，它与拒绝任何机构化的冲突解决模式结合在一起。毕竟，人们必须承认，希特勒和小圈子党领导转化了自1930年夏天以来的党和冲锋队的过度动员是个值得一提的政治成就，当时竞选持续不断，国内氛围如火如荼，而且在圣巴托罗缪之夜后偏偏又突然发生偏移。但是这一成就是与暴力的蔓延密不可分的，在（例如通过设立“野蛮的”集中营）将潜在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反对力量排挤出去之后，它首先针对的是国民当中的犹太人。

暂停“民族革命”的事实导致，表面上被一体化的国家机关重新接管了权力，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作为竞选工具变得多余之后被逼退回到单纯的监管和宣传功能上。党和国家之间出现的内在紧张关系仍旧是内政的推动力量，并启动了递增发展的极端化进程，该进程一方面因为运动的社会革命要素和（在某些方面的）无政府主义要素的突进；另一方面则因为政府官僚的妥协让步而出现，并迅速让自己变得理所当然，而且使自己无需帝国领导方面的特别推动[26]。

显然，希特勒更偏好业已产生的这种混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的法律秩序和规范被悄无声息地掏空，同时又没有产生新的机构来取代它们的位置。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是希特勒的下面这个习性，只有在紧急状态下（偶尔在他的官员们的大肆敦促下才会这么做，例如在杀害恩斯特·罗姆的事件当中）才会背弃他的下属军官或者是部长，并取而代之建立新的专员职位与其竞争，在实现他所追寻的空想目标的过程中，它们的相互竞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在这方面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是，希特勒断然拒绝了威廉·弗里克通过一部大德意志帝国宪法并由此消除在宪法政策上的不确定状态的建议。这位专制者表示，他希望避免革命的破灭（在他看来放弃《授权法案》就意味着革命的破灭），取而代之，他希望在《授权法案》原本确

定的时间期满后继续延长，这很能说明他的特点[27]。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例如在建立元首选举机构（Fuehrerwahlsenat）这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上[28]，希特勒拒绝任何可能暗含个人约束意味的对机构职责范围的明确。

将希特勒长期促使帝国变得难以管治的态度说成是革命主义动机是不大合适的，但是把它与变成习惯的对政治决策乃至未来的“最终解决”保持开放态度联系起来或许倒可以，他多次表示过，最终解决将在战争结束后出现。这涉及比方说教会政策，在教会政策上，他没有听从官员们特别是马丁·博尔曼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敦促对教会高层采取大规模行动，尽管他对于使战争作为德国的生存方式长期持续下去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而这么做的缘由则是避免德意志民族因为爱好和平而松懈虚弱。

对犹太人的毁灭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因为制度的天性而产生的后果（因为在战争被触发导致潜在的国内冲突呈幂指数增长之后，不断加剧的利益冲突寻找并找到了一个补偿性的出气孔，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冲突被推到了个人仇恨的出路上并以激烈的敌对斗争形式释放出来），这个问题必须保持没有定论的状态[29]。

与此相联系的是这样一种机制：在殖民地地区——首先是奥地利和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ktorat），然后是被合并的东部地区，最后是德国驻波兰占领区（Generalgouvernement）和苏联被占地区，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按照该机制获得了承认，它们反过来对旧帝国产生影响，而且中期来看导致了已有政治机构和法律秩序的进一步崩溃或瓦解。随后，由此释放出来的活力使得希特勒在1933年与当时已经存在的国家及其军方、管理部门、外交和经济界代表达成的妥协被不断掏空了。

与此同时，1933年被刹车的政党革命方案后来又得到了政府的采

用，因为遵循了该方案，罗姆和他在党内的同道中人成了希姆莱、戈林和国防军领导反密谋行动的牺牲品。在经历了不仅象征着军事危机也象征着政治危机的斯大林格勒战败之后，约瑟夫·戈培尔在其于1943年2月18日在体育宫发表的轰动性讲话中宣告发动“总体战”（totaler Krieg），借此争取对政府在攫取权力阶段向当权派精英所做的让步进行修正，以便将全部力量集中到战争努力上[30]。

就算在这方面，希特勒也被证明是真正的障碍，就和心有抵触的省党部头目们一样。这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1944年“七二〇”暗杀行动和1944年夏红军突破中央集团军群的双重危机的发生。直到这时，希特勒才放弃了他禁止接触（noli me tangere）的立场，对小圈子领导集团的敦促做了让步，委托戈培尔担当负责总体作战动员的帝国专员[31]。

事实上，这位日益退缩在元首地堡里的专制者倾向于将干预局限在现有的高层架构和管理结构上。一个例子是，他阻挠解散本质上已经变得多余的帝国经济部，这或许是出于本能的洞察力，认识到已经变得脆弱的统治制度再也经不起重大的调整。另外，戈培尔认识到，如果迄今为止的懒散马虎像他看到的那样继续下去，如果不事不宜迟地采取严肃认真的努力大力推动挖掘最后的资源，他的坚持抵抗的口号就会失去可信性。

在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加强军工生产要求的推动下，发动全部还可供支配资源和劳动力的努力从这时开始主要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社党不得不担心，不然自己会被排挤到边缘位置。希特勒挑选施佩尔为继任者的谣言被国社党理解为间接的威胁。因此纳粹党办公厅主任马丁·博尔曼和帝国组织机构部长罗伯特·莱伊自1943年夏开始对党进行全面的复兴活动，它因为成员达到800万人而被膨胀起来，变成了一个迟钝笨拙、在政治上索然无味的机构。特别是党的干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腐败和无所作为的。与此同时，他们还被视为敷衍取

巧者，在享受着免服兵役地位特权的同时甚至在战争后期也过着其他国民只能梦想的奢侈生活。

博尔曼的复兴政策体现在集会浪潮、宣传攻势、大规模示威、开放日以及成员游行上，其目的是对干部和党员进行动员[32]。此外还有重拾国社党在民众心目中受损的威望的努力，马丁·博尔曼下令国家社会福利组织（Nationalistische Volkswohlfahrt）原则上只能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出现也是努力之一。与此同时，国社党保证自己享有照顾和疏散炸弹伤者的特权，而国家和教会的救援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33]。同样，只有国社党有资格疏散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通过使党的工作以民众的直接需求为导向，它至少暂时成功地提高了这个政治组织和各党分部的声望。但是它所争取的对国民的动员仍旧是个还没有实现的愿景。

与此同时，党要求在内政和日常管理范围内接管权力，它试图通过任命省党部头目为帝国国防委员、将其拉到自己身边来实现这一目的。戈培尔促成的所谓“地方三角”的形成也有利于国家机关和国社党机关的融合，这原本恰恰是博尔曼所回避的。类似的篡权努力涉及武装力量，其相对独立性在1944年“七二〇”政变失败后事实上被废止。同时引入纳粹指挥官的目的是，在对其进行系统的政治监督之外，中期以狂热偏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来取代现有的军官团，并由此更加接近“人民军队”（Volksarmee）的构想。这些指挥官根据博尔曼的意愿受纳粹党办公厅的严格领导并接受单独培训[34]。1944年10月所谓的“德国人民冲锋队”的形成采取的是同一方针。在他们的军事观念中值得怀疑但是服务于发动民众共同体以及党和武装力量融合的民兵部队（除了后备军的技术管辖范围）不是隶属于国防军，而是隶属于国社党的领导。它应当由党的干部领导，1945年初还为他们设立了斥资不菲的军事训练营。因此，恩斯特·罗姆在1934年6月30日之前遵循的建立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人民军队的目标其实已经到了一个触手可及的距离。

革命讨论在这些效果极其可疑的动员努力的背景下再次出现，这很能说明特点。例如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4年10月18日纪念莱比锡民族大会战的声明中将人民冲锋队称做是一场“革命的人民运动”[35]。对最后的储备力量的动员和坚持到最后一个人在这时被说成是完成“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与此类似，希特勒在1944年5月26日对将领和军官的讲话中说：“我们还没有走到这场革命结束的时候，而是某种程度上才处在它开始的时候。”而且他含糊地补充说他需要时间来进一步说明[36]。在这个时候，这种伪革命言论被用来为一种结果是断掉自己一切后路的立场辩护。

这种表述和类似的表达必须放在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斗争时期神秘化的背景下来看待。不单单是希特勒，整个宣传都将“斗争时期”作为历史成功模式来突出强调，称它证明了：只要保证民族的狂热信念以及他们对坚持抵抗的果断支持，“最终胜利”的实现就会近在眼前。国社党在1923年11月9日晚上前途无望的处境被拿来与当时的危机相比较。他们说，在那之后几年里运动不可思议的崛起是实现它将再次克服出现的挫折的证明。党办公厅在1944年9月29日的一项命令中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到现在为止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局面！它从未被偶尔的挫折和重大的困难所迷惑”，在同一时间出版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演说家材料中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德意志人民和民族要进行的战斗本质上是在与同样的敌人进行的同样的战斗，我们在运动的斗争时期那些年里曾经在国内与他们进行过同样的斗争。”[37]

重提斗争时期并将国内外威胁等同视之——这在当时所有的宣传指示当中都能看到，而且它们强调了下面这个虚构的内容：一旦国社党能把情况掌握在自己手中，它将强行带来胜利的转折。当时的公告（其中部分显示出戈培尔的笔迹）当中包含着同样的思想轮廓，并信誓旦旦地表明了坚持到“最后一个人站立并倒下”的绝对意愿。这背后是而且特别是希特勒再三强调的“意志崇拜”以及意志的绝对性是不可战胜的伪尼采

观点[38]：当德意志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土和家园、乡村和城市直到最后一个人时，仅仅由雇佣兵部队组成的盟军部队将不得不认识到，与“全部人民”对抗是没有前途的，并将停止作战。

和这一幻想联系在一起的是下面这个荒唐的信念：党在1933年没有“全力以赴”，没有冷酷无情地消灭国家和军队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精英，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会出现军事和政治危机。因此混在民众共同体当中的叛徒和“失败制造者”毫无例外都必须把他们赶出去。除了有计划地争取人种的均一化之外，现在也必须让政治思想均一化了。在灭亡过程中政权还打算消除可能的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在暂时战败的德国复苏的力量，它采取的方式是貌似预防性地着手消灭事实存在或潜在的敌人。所谓的“格栅行动”（Gitter）或者叫做“雷暴行动”（Gewitter-Aktion）就是服务于这一目的，它导致了几千名德高望重者被捕[39]。只是因为崩溃突然发生，幸存的魏玛共和国政治精英们才没有被加害。所谓的“狼人”（Werwolf）计划也与此有关，它主要应帮助国家社会主义继续存在下去，而不是直接进行游击活动[40]。

毫无意义的“死亡行军”（Todesmarsch）也应归于大规模谋杀的范畴，犹太和非犹太裔集中营难民还有一些战俘和劳役成为死亡行动的牺牲品。这个时候恐怖主义的释放不仅仅针对处在德国监禁下的外国人，也针对所有敢于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坚持到底口号的德国人。在最后一刻如此嗜血的心理背景是通过极端的过激行为来“补偿”自身失败的需求，其目的是通过除掉所谓的政权的内在敌人，借助暴力带来信誓旦旦地要实现的意志上的统一。

因此，本质上来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回到了它最初的状况，只是试图用恐怖主义来帮助完成意识形态上的灌输。与此同时，它致力于让自己在历史上幸存下来。将希特勒的自杀美化成英雄主义行为与政权后期的自导自演天衣无缝，现在它从解放战争的局面中找到样板，在戈

培尔喜爱的乌发电影股份公司（UFA，Universum Film A.G.的缩写，意为宇宙电影有限公司。——译者注）的彩色电影《科尔贝格》（*Kolberg* ）中，观众看到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些[41]。

在衰败崩溃的阶段，所有的顾忌和传统都灰飞烟灭，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变得赤裸裸，看到这些会让人很难同意它与表面上可以与之相比的极权主义浪潮类似，很难同意它们都具有革命的性质——如果对革命的理解不是恰恰在崩溃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毁灭性和自我毁灭的能量的话，希特勒和他忠诚的追随者想借这种能量无视所有业已形成的历史形式和传统将不切实际的幻想强加到政治现实当中。就像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之前说过的，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看到了失败风险背后的英勇的“诸神的黄昏”（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歌剧的最后一部分，意指世界末日。——译者注）的结局。1933年，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在厚颜无耻地反驳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的批评时试图利用这个论据来为国家社会主义攫取权力辩护：这是“最后一个伟大的白种人计划，可能是世界精神的最伟大实现之一”，同时也是“令一个民族重生的最后的努力”[42]。与此类似，希特勒在1937年11月曾预言德国人“作为占优势的白人力量和种族”的地位[43]。但是失败的预兆、对各种死亡崇拜变体的嗜好就在它的旁边。

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地位体现了对德国社会部分是潜伏的、部分是大白于天下的潜在暴力和极权主义态度的成功动员。尽管如此，除了像寄生虫似地利用遗留下来的机构和思想立场之外它没有走得更远。它表面上的成功里面总是带有毁灭的病菌。“东方总体规划”和在扩大的国家社会主义统治范围内建立人种均一结构的广泛幻想事实上比致命的妄想好不了多少，它很难被纳入欧洲革命的范畴内。断然背弃西方社会内在价值观的发生横贯着革命与反动这对概念，它缺乏能保证纳粹制度至少部分存活下来的持续的实质性要素。纳粹体系崩溃了，并没有值得一提的历史遗产留下。

[1] Jacob Burckhard，*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Bern 1947，Kapitel 5。

[2] Hughes R.Trevor-Roper，*The Last Days of Hitler*，London 1958 3.Aufl.，S.260f。

[3] Joachim C.Fest，*Hitler. Eine Biographie*，Berlin 1973，S.1035和S.1037。

[4] Ralph Dahrendorf，*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Muenchen 1965；Daivd Schoenbaum，*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Class and Status in Nazi Germany*，London 1966. Neuauflage，*Die braune Revolution. Eine Sozial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Berlin 1999，S.311ff.

[5] Michael Prinz/Rainer Zitelmann（出版），*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Darmstadt 1991，insbes.S.IX；请参阅Einleitung von Prinz in der 2.Aufl.，Darmstadt 1995以及Zitelmann的Die tatolitaere Seite der Moderne，Darmstadt 1991，S.13；参见同作者的*Hitler. Selbstverstaendnis*，Stuttgart 1991 4.Aufl.，S.495f。

[6] Wolfgang Zapf，*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Elite. Ein Zirkulationsmodell deutscher Fuehrungsgruppen* 1919-1961，Muenchen 1966 2.Aufl.

[7] 请参阅J.Noakes，Nazism and Revolution，刊登于N.O'Sullivan（出版）的*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olitical Reality*，Brighton 1982，S.87f。

[8] Jeffrey Herf，*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Culture*，*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Cambridge Mass.，S.II ff.

[9] Henry A.Turner，*Faschismus und Modernisierung*，Goettingen 1982，S.157-182.

[10] Klaus Hildebrand，*Deutsche Aussenpolitik* 1933-1945. *Kalkuel oder Dogma*？，Stuttgart 1999 Neuauflage，S.135f.

[11] Daniel J.Goldhagen，*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New York 1996，S.456f.

[12] Juan J.Linz，Some Notes 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ascism in Sociolog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刊登于W.Laqueur（出版）的Fascism. *A Reader's Guide. Analyses*，*Interpretations*，*Bibliography*，Berkeley 1976，S.4ff。

[13]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ie NSDAP：Typus and Profil einer faschistischen Partei，刊登于C.Dipper/R.Hudemann/J.Petersen（出版）的*Faschismus und Faschismen im Vergleich. Wolfgang Schieder zum* 60. *Geburtstag*，Vierow 1997，S.23-35。

[14] 请参阅T.Mason的The Legacy of 1918 for National Socialism，刊登于A.Nicholls/E.Matthias（出版）的*German Democracy and the Triumph of Hitler*，London 1971，S.215-239。

[15]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ie Rueckkehr zu den Urspruengen：Betrachtungen zur inneren Aufloesung des Dritten Reiches nach der Niederlage von Stalingrad，刊登于M.Gruettner/H.G.Haupt（出版）的*Geschichte und Emanzipation. Festschrift fuer Reihnhard Ruerup*，Frankfurt/New York 1999，S.418-424。

[16] 请参阅同一作者的The 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and the Restoration of Politics，刊登于*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4，*Ergaenzungsbd*.（Dezember 1992），S.123f。

[17] 见Zitelmann的*Hitler*，Muenchen 1963，S.82f。

[18] Reichtagsrede vom 23.3.1933，刊登于M.Domarus的*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Bd.I/I*，Muenchen 1963，S.237f。

[19] Reichtagsrede vom 30.1.1937，刊登于Domarus的*Hitler*，*Band I/I*，Muenchen 1963，S.665；Zitelmannd，*Hitler*，Muenchen 1963，S.104以及Domarus，*Hitler Bd.II* /2，S.1658；Gedenkrede vom 8.11.1940，Zitelmann，*Hitler*，Muenchen 1963，S.104。

[20] Reichsstatthalterkonferenz vom 6.Juli 1933，刊登在*Die Regierung Hitler*：*Teil I*，1933/34 （=Akten der Reichskanzlei，Regierung Hitler 1933-1938），Boppard 1983，S.630f。

[21] 请参阅Zitelmann的*Hitler*，Muenchen 1963，S.93ff。

[22] Rede von Rudolf Hess vom 2.Juni 1934，摘录自Karl Dietrich Bracher/W.Sauer/G.Schulz的*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Koeln-Opladen 1974，S.285f。

[23] 参见Hans Mommsen的Riegierung ohne Parteien. Konservative Plaene zum Verfassungsumbau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刊登于Heinrich Aaugust Winkler的*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1932，Muenchen 1992，S.17。

[24] Adolf Hitler，*Mein Kampf*， Muenchen 1933 67 Aufl.， S.418.

[25] Karl Dietrich Bracher，*Zeit der Ideologien. Eine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des* 20. *Jahrhunderts*， Stuttgart 1982，S.171和S.179；请参阅同一作者的*Zeitgeschichtliche Kontroversen um Faschismus*，*Totalitarismus und Demokratie*，Muenchen 1976，S.62ff。

[26]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Ausnahmezustand als Herrschaftstechnik des NS-Regimes，刊登于M.Funke（出版）的*Hitler*，*Deutschland und die Maechte. Materialien zur Auss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Duesseldorf 1976，S.30-45。

[27] 参见Guenter Neliba的*Wilhelm Frick. Der Legalist des Unrechtsstaates*，Paderborn 1992，S.155f.；M.Broszat的*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Muenchen 1983 10 Aufl.， S.360ff。

[28] 请参阅Broszat，*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Muenchen 1983 10 Aufl.，S.360ff，以及Dieter Rebentisch的*Fuehrerstaat und Verwalt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Verfassungsentwicklung und Verwaltungspolitik*， Stuttgart 1998，S.101和S.422。

[29] 请参阅Hans Mommsen，Die Realisierung des Utopischen：Die ‘Endloesung der Judenfrage’ im ‘Dritten Reich’，刊登于*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9（1983），S.381-420。

[30] 请参阅G.Moltmann，Goebbels’ Rede zum Totalen Krieg am 18.Februar 1943，刊登于VfZ12（1964），S.13ff.和H.Heiber（出版）的*Goebbels’ Reden* 1932-1945，Duesseldorf 1991，Nr.17，S.172ff。

[31] 请参阅Rebentisch，*Fuehrerstaat und Verwaltung*， Duesseldorf 1991，S.516ff。

[32] Anordnung der Parteikanzlei vom 17.2.1943，刊登于*Verfuegungen*，*Anordnungen*，*Bekanntgaben*， hrsg. von der Partei-Kanzlei der NSDAP，7 Bde.，Muenchen 1942-1945（VAB），Bd.IV，1943，S.24ff.；Das Aktionsprogramm der Reichspropagandaleitung vom 3.Juli 1943，刊登于*Akten der Partei-Kanzlei*，T.II，Nr.06561ff。

[33] 请参阅Herwart Vorlaender，Die NSV.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ation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Organisation*， Boppard 1988，S.515和S.173f。

[34] Volker Berghahn，NSDAP und ‘geistige Fuehrung’ der Wehrmacht 1939-1945，刊登于*VfZ* 17（1969），S.67ff.；A.W.Zoepf，*Wehrmacht zwischen*

Tradition und Ideologie. Der NS-Fuehrungsoffizier im Zweiten Weltkrieg， Frankfurt 1988。

[35] 参见F.W.Seidler，*Deutscher Volkssturm. Das letzte Aufgebot* 1944/45，Muenchen 1989，S.383。

[36] Rede Hitlers vor Generaelen und Offizieren der Wehrmacht am 26.Mai 1944 im Platterhof auf dem Obersalzberg，Pers.Stab.RFSS，IFZ.MA 316，Bl.4949ff.

[37] Martin Bormann，Anordnung 55/43 vom 29.9.1943，刊登于VAB Bd.4，S.9；Aufklaerungs-und Rednermaterial der Reichspropagandaleitung der NSDAP，Lieferung 9（Sept.1943），S.2和S.4。

[38] 请参阅Proklamation Hitlers vom 12.November 1944，刊登于J.Domarus的*Hitler*，Bd.II/2，Muenchen 1963，S.2161f。

[39] W.Hammer，Die ‘Gewitteraktion’ vom 22.8.1944. Vor 15 Jahren wurden deutsche Parlamentarier zu Tausenden verhaftet，刊登于*Freiheit und Rechts* 5（1959），Nr.8/9，S.15-18。

[40] Arno Rose，Werwolf 1944-1945，Stuttgart 1980，S.70ff.，以及K.D.Henke的*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Muenchen 1995，S.948ff。

[41] 请参阅F.Courtade/P.Cadars的*Geschichte des Films im Dritten Reich*，Muenchen 1975，S.217ff.，以及‘Voelkischer Beobachter‘ vom 31.1.1945。

[42]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Nation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刊登于O.Dann（出版）的*Die deutsche Nation. Geschichte.Probleme.Perspektiven*，Vierow 1997，S.93。

[43] Rede Hitlers auf der Ordensburg Sonthofen vom 23.11.1937，刊登于H.Picker的*Hitlers Tischgespraeche im Fuehrerhauptquartier*，Stuttgart 1977，S.482。

第二部分 希特勒的崛起与权力垄断

第5章 阿道夫·希特勒与1919年至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崛起

阿道夫·希特勒从无名小卒到成为帝国总理以及无所不能的专制者——他的这条道路对很多观察家来说似乎有着无法解释的魅力。绝大多数的希特勒传记都求助于马克斯·韦伯的领袖气质说，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德国人毫无异议或者是满腔热情地同意并遵循希特勒的过分要求，这一点此前在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重要希特勒传记——以及汉斯—乌尔里希·魏勒（Hans-Ulrich Wehler）的《德国社会史》第四卷中都有强调[1]。最近卢多尔夫·赫布斯特（Ludolf Herbst）在一篇内容丰富的评论中提出的观点是，希特勒的“德国救世主”角色要追溯到早期在慕尼黑时期与他志同道合者的杜撰，因此他的魅力建立在一个传说的基础上[2]。就和很多在他之前的诠释者一样，赫布斯特致力于解释这个矛盾：为什么希特勒凭借平庸的才智、中人之资（而且还没有能力建立长久的社会联系）却可以先是担任党的领袖，然后又在德国历史上灾难性的12年里担任了总理。为了阐明希特勒走入政坛的道路就需要对1919年至1923年这一时期以及源自第三方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这种影响使他作为宣传鼓动性的演说家、之后成为无可争议的党领袖青云直上成为可能。

这与下面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安东·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的德国工人党（DAP）是如何成功地从一个不能登堂入室的组织变成一个在1923年底时成员已经超过5200人的地区性政党的。

因此是时候描绘一下这个进程了——在这个进程的发展过程中，偏偏正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的德国工人党（后来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译者注）在众多相互竞争的民族党派和组织中成功取得突破发展成了群众运动，也是时候研究一下阿道夫·希特勒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了。

当希特勒在1918年11月离开帕泽瓦尔克（Pasewalk）野战医院回到慕尼黑时，他是社会的局外人，而且政治上一片空白。发生革命的那几天他是在第二步兵团兵营度过的，在1919年5月时他是巴伐利亚国防军第四军指挥部通讯部门的一员，听从卡尔·迈尔（Karl Mayr）上尉的命令。

11月革命的时候，希特勒人在军营，根本没有参与革命过程，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崭露头角。他只在边缘上参与了些许打倒委员会统治的努力。

与后来在《我的奋斗》中所美化的不同，他没有以任何方式确定自己的政策。成为其导师的卡尔·迈尔后来说，自己5月份遇到他时，希特勒“完全没有原则”，而且只要能给他弄个职位，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流派什么路线，他都会听命于他[3]。

根据卢多尔夫·赫布斯特的研究，希特勒在卡尔·迈尔的通讯部门任职时期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推动，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了，当时他的雄辩天赋已经开始为人所知，他在那里被培训成一个鼓动性的演说者，足以让他在早期的德国工人党崭露头角。他也因此而与担任讲师并隶属图勒（Thule）学会的民族诗人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和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Karl Alexander von Mueller）建立了密切关系。

直到这一时期，希特勒才成为极端的反犹太主义者，除了迈尔、埃

卡特和米勒的影响之外，尤里乌斯·F.勒曼（Julius F.Lehmann）大量出版发行的反犹太主义册子也对他产生了影响。所有这些人对希特勒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他在林茨和维也纳时期的模糊回忆的影响。在此之前希特勒没有鲜明的反犹太主义观点，这点从布里吉特·哈曼（Brigitte Hamann）的分析中可以看出[4]。

可以断定，他在国防军第四指挥部的活动（它于1920年3月31日结束）对希特勒政治观念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直到他写完《我的奋斗》第一卷时才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修饰完善。这些政治观念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他原创的，即便是希特勒所代表的根除性的反犹太主义或者是针对凡尔赛和“11月罪犯”的臭名昭著的论战也都不是[5]。

众所周知，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是从他成为异常成功的德国工人党（他名义上是作为第555名成员加入的）鼓动演说家开始的[6]。他的无数次公开演讲为他在民族主义圈子建立宝贵的社会关系助了一臂之力，特别是与贝希施泰因（Bechstein）夫妇、布鲁克曼（Bruckmann）出版家族但也包括与艾尔莎·汉夫施丹格尔（Elsa Hanfstaengl）及其先生的关系，后者赞赏地在他们举办的沙龙里把他介绍给了很多人[7]。

与此同时，希特勒成功地将一群无条件忠于他的追随者聚集在自己身边，其中也包括鲁道夫·赫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马克思·阿曼（Max Amann）和克里斯蒂安·韦贝尔（Christian Weber），除了不可或缺的人民演说家的地位之外，他还成功为自己争取到了党内的支持。因此希特勒能够逐步对党的委员会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领导圈子，其中主要包括迪特里希·埃卡特、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鲁道夫·赫斯和赫尔曼·埃塞尔（Hermann Esser），这个圈子慢慢挤到了安东·德莱克斯勒领导的党委员会身边。

在希特勒推动将卡尔·哈勒（Karl Harrer）开除之后，1921年6月，

在德莱克斯勒推动的与奥托·迪克尔（Otto Dickel）（他一直与德国社会党有接触）的“民族工厂组织”（Voelkisches Werksgemeinschaft）合并努力的问题上又出现了似乎无法调和的矛盾。希特勒认为这是一种讨厌的竞争，同时他担心这会威胁德国工人党的本体。从这时起他就公然表现出已经追求了很长时间的野心和抱负了——让自己坐到当时正在不断壮大的党组织的最高位置上，并通过示威性地宣布辞职向党委员会施加巨大压力令其满足自己的要求[8]。

这一出乎意料的行动使希特勒在党内获得了几乎是不受限制的领导地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宣布“25点纲领”不容改变的决议使这一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关于无纲领政党方案的想法要追溯到1920年。当时希特勒就已经宣称，这个纲领必须“坚定不动摇”，而且要担当起类似于识别标记的作用[9]。向着形成一个法西斯政党类型的第一步就这样迈出了，在放弃了总是变化的纲领性目标的情况下，它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发动支持者上，而且距离参与现实政治和选举的想法还很遥远。

在希特勒的想象世界里，元首原则和“理念”（Idee）是共生的关系，但是其实际内容却从来没有具体化过。例如1922年他在《人民观察者》（*Voelkischer Beobachter*）报上表示：“我们的党不是个组织，而是对我们人民强烈信念的体现。”[10]他的目标在于，在民族组织阵营内为德国工人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争取垄断地位，与之相对的则是抑制党内在政策方向上的冲突。

当时希特勒虽然对具有领袖魅力的元首的垄断地位（1921年7月21日的法令仅对其进行了微不足道的限制）提出了要求，但是他意图在政治体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不得而知[11]。他仍旧首先自视为最好的宣传鼓动者，是在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陆军元帅（原文有误，鲁登道夫实际没有接受元帅军衔，实为上将。——译者注）身边的“击鼓振奋士气和集合队伍的人”。直到1923年11月他还称自己是这

场“伟大的德国自由运动”的“探路人”，是为一个人们还未发现的元首服务的[12]。

将元首崇拜转嫁到希特勒个人身上的倡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而且它并非来自希特勒本人，倒不如说它是在1922年10月贝尼托·墨索里尼进军罗马的影响下发生的。鲁道夫·赫斯发挥了最重要的元首思想（从这个时候开始仅仅指希特勒）先行者的作用，他是希特勒最狂热的崇拜者之一；在1923年初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散播的一份由鲁道夫·赫斯执笔的传单中，这种对希特勒的崇拜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赫斯将希特勒视为“未来的德国领袖和救世主”。这个最初以传单形式传播的口号后来为当时已经沦为党报的《人民观察者》报所采用，并升格为党的宣传的核心内容[13]。

强调希特勒不仅是党也是德意志人民的魅力领袖，同时也是未来的德国的墨索里尼，这是埃卡特、罗森堡和埃塞尔十分有意识地推动的。该举措有这样的作用：将分裂成很多小群体和理念支持者的党团结并正面动员起来，考虑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右翼保守阵营中面临着被孤立的威胁，这一举措似乎是迫切需要的。卢多尔夫·赫布斯特把重提成功的党领袖的魅力称做希特勒的慕尼黑跟班的“发明”，这是有道理的[14]。

所以说，将国家社会主义系统地策划成政治宗教并强调希特勒是救世主，是希特勒的紧密支持者圈子的大作。这个圈子基本上局限于慕尼黑，他们定期在咖啡馆会面。在后来慕尼黑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历史上的著名事件中从头至尾都能看到他们的名字。这其中包括赫尔曼·埃塞尔、恩斯特·罗姆、鲁道夫·赫斯、赫尔曼·戈林、马克思·阿曼、克里斯蒂安·韦贝尔、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和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在他们所制造的氛围下，希特勒最终摆脱了所有的障碍，不再仅仅作为副手寻求引发他们所力争的德国变革，而是大胆地亲自走

上了最高领导的位置[15]。

11月9日的政变尝试是由希特勒启动的，在那之前事实已经表明，没有冯·泽克特（von Seeckt）上将的参与，民族主义组织以及自由军团运动不敢冒险行动。然而希特勒试图促使政府专员冯·卡尔（Ritter von Kahr）参与行动的努力全线失败，而且众所周知，向统帅堂进军（他将其理解为非军事示威活动）在巴伐利亚警方的枪林弹雨下也宣告失败[16]。

但是，直到1923年11月9日啤酒馆政变企图失败之后，希特勒才迅速进入指派给他的德国的墨索里尼的角色。希特勒在慕尼黑人民法院的诉讼中获得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宣传平台，并且他通过人民法院的慷慨姿态获得了弥补11月9日政变失败的机会，这些也对此都大有裨益。反之，在对民族主义组织领导权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鲁登道夫在公众中的威望下降，并在1925年总统选举之后沦为政坛的无名之辈。

希特勒前所未有地将慕尼黑人民法庭的诉讼变成一场鼓动宣传，而且这确保了他第一次在德国公众和资产阶级媒体中受到极为广泛的关注。因为直到那时候，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之外还得不到什么公众的反响。他被有反常规地判以很轻的处罚，之后希特勒利用在兰茨贝格（Landsberg）监禁的时间通过撰写《我的奋斗》第一卷展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意识形态纲领，并对其宣传鼓动战略的每个细节进行了加工，至于运动的原则性目标方面他则没能超越老生常谈[17]。

希特勒身边的亲信当中有少数考虑周全的人，他们完全清楚这种对具体纲领的有意识遏制。例如奥托·施特拉塞尔在1930年8月（与希特勒决裂之前）曾这么写到：“所以，严格来说，我们有的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纲领，而不是一个一旦我们步入政府就能提供的建设性纲领。”而且他补充说：“因为这些有创造性的人——就像这个希特勒一样——实际

上根本不是什么有创造性的人，他们身上的创造性是个抽象概念，这种创造性存在于承载者的本性、教育和培训中，而不存在于可以形成深思熟虑的、按计划采取的行动的能力上。尽管如此，他们偶尔能够实现或者做到人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如果这可以借单纯的政变实现，如果其他能在可能的反作用出现之前就从中吸取教训的人在场的话”。[18]

直到20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元首的统治地位主要在日益分化的纳粹社会中得到了巩固。这主要归因于对希特勒实行的演讲禁令被逐步取消了，先是在巴伐利亚，后来是在普鲁士。因此希特勒直到1928年之后才作为公开演说家获得了普遍的重视，起初作为演说家获得了极大成功的还有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他从这时开始担任帝国组织机构部长（Reichsorganisationsleiter）。就这方面来说，希特勒直到1928年9月的选举之后才成为核心领导人物。

在被捕期间放弃对党的领导是希特勒走的聪明的一招，这使他在提早获释后有可能彻底重新开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溃散和1925年的重建使希特勒有可能将竞争组织排挤出去或者将其一体化，并且在发挥党的领导职能的慕尼黑分部的帮助下孤立民族主义阵营内的竞争对手。向着纯粹的元首政党的最后转变在1926年的班贝格（Bamberger）领导人会议达到了顶峰，在该次会议上，希特勒成功将在此之前还跟他唱对台戏的约瑟夫·戈培尔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拉到自己身边，并借此让反对慕尼黑派系统治地位及其无纲领政策的反对派失去作用[19]。

这次冲突是魅力元首政党纲领遭受的唯一的严重质疑，其背景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北部与西部党团的公开对抗，此前它们在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倡议下合并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西北德省党部头目工作组”当中，它们反对慕尼黑派系的统治地位，尤其反对埃塞尔和施特拉塞尔。在人事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是原则性的本质分歧——正如提交的纲领草案所表明的那样，分歧并不在拒绝“25点纲领”上，而主要在于纯

粹将其用于战术宣传目的上。以剥夺没收旧日诸侯财产为例就清楚了，希特勒在1926年2月的班贝格领导人会议上断然拒绝了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提议的公民投票。

后来奥托·施特拉塞尔领导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左翼就再也没有机会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内获得承认了；与此同时，回归现实政策的机会也被贻误殆尽，反而继续沉迷于不理性地为元首歌功颂德，加强人们对救赎的信念。在奥托·施特拉塞尔喊着“社会主义者离开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口号退出国社党的同时，担任帝国组织机构部长的他的哥哥格雷戈尔则致力于通过不断地扩大和优化的党机构来务实地解决这一冲突，同时又不触及领袖的权威。在1932年秋的危机当中，鉴于11月的国会选举结果令人沮丧，他试图说服希特勒放弃不成功便成仁的战略。当希特勒拒绝时，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12月8日辞去了党内职务，而希特勒对此的回答则是空前的迫害行动，但是首先是推翻施特拉塞尔的政党改革。打消希特勒不切实际的政治观念并钳制领袖崇拜的最后一个机会就这么白白错过了，这在本质上具有重大意义[20]。

元首原则获得承认，一个完全以招募成员和宣传动员为导向的政党产生，与此同时与其竞争的民族主义组织遭到排挤，这些尤其发生在慕尼黑。委员会统治被打倒之后，那里的政治氛围有利于民族运动的崛起，德国工人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参与其中，在图勒学会和日耳曼兄弟会（Germanenorden）——但也在全德联合会（Alldeutsch Verband）都找到了很有影响力的支持者[21]。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国防军的作用，特别是恩斯特·罗姆作为巴伐利亚地区国防军与自由军团和民族主义组织联系人的作用。没有巴伐利亚国防军，希特勒一跃成为政治家将是无法想象的。

“将国家社会主义策划成政治宗教”的结果是“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元首描述成救世主，将党描述成宗教社区，将它的纲领描述成信

条”[22]。在希特勒看来，党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他醉心于能建立起“元首和人民的直接接触”的幻想中，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则恰恰相反，它需要“精心打造的组织技巧与结构”，从而避免“领袖气质被日常化”并维持希特勒所代表的魅力元首政党的生命。

因此，党机构似乎是在着眼于希特勒的领袖魅力运动下发展的，它在海因里希·希姆莱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推动下得到了扩大并被彻底塑造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官僚机构。这关系到一种劳动分工。它以在党员和支持者帮助下对民众共同体策划的不断升级为前提，并在1928～1932年——特别是1929年的竞选中导致希特勒领袖魅力被削弱。这尤其体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始核心地段——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在这些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1923/1924年的动员顶峰。

因为从1925年重建到1933年攫取权力之前的这一阶段，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增长方面，这个后来的“运动首都”被证明是个没有什么成效的战场，这一点与东德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是不同的。尽管用了最大的“残忍和战斗力”进行选举，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32年11月在州一级仅获得了30.5%的选票，在慕尼黑只获得了24.9%的选票[23]。直到1933年3月5日的时候，选举结果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不管是巴伐利亚人民党还是社民党的表现都很突出。1932年11月时，慕尼黑分部成员大约有5200人，绝对算不上是最强大的地方组织之一。直到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吸纳的人数在有政治组织的慕尼黑人当中也没能超过五分之一[24]。在1932年4月的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国社党在慕尼黑获得的选票不超过28.5%，虽然在州一级选举中票数有所增长达到32.5%，但仍低于平均水平。很多迹象表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的增长达到了极限，而且它在1922年获得的相对强有力地位只能在攫取权力后在不自由的选举条件下才能再次产生[25]。1933年1月30日之前，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拥护者就开始出现疲劳效应。

恰恰以慕尼黑为例可以表明，希特勒的魅力元首统治只是碰上了一个在意识形态和心理上都做好了准备的“民众共同体”，而且政权暴力统治的升级是在人民没有做出值得一提的抵抗情况下发生的[26]——这一想法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一方面，对元首的崇拜建立在一个被精心打磨到了极致的党的宣传组织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它所控制的宣传机关与党机构虽然有能力让政治和宗教反对力量以及政治党派及社会关系失声，但是戈培尔的宣传机关所杜撰的不同社会力量融为一个统一的“民众共同体”却与（特别是巴伐利亚的）社会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同样，与此有别的希特勒崇拜也日益走到了尽头。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他宁可在上萨尔斯堡（Obersalzerg）而不是在慕尼黑逗留就很有代表性——对“运动首都”的内在占领也从未成功过。

---

[1] 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 Stuttgart 1998（2.Aufl.），S.62；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Bd* 4，*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ue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uenchen 2003.

[2] 参见Ludolf Herbst，*Hitlers Charisma. Die Erfindung eines deutschen Messias*， Frankfurt am Main 2010，S.59ff。

[3] 引自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 Stuttgart 1998（2.Aufl.），S.166；参见Anton Joachimsthaler，*Korrektur einer Biographie. Adolf Hitler 1908 bis 1920*， Muenchen 1989。

[4] 参见Brigitte Hamann，*Hitlers Wien. Lehrjahre eines Diktators*， Muenchen 1996 7 Aufl.，S.496ff。

[5] 参见Ludolf Herbst的分析，*Charisma. Die Erfindung eines deutschen Messias*， Frankfurt am Main 2010，S.178ff。

[6] Werner Maser，*Sturm auf die Republik. Die Fruehgeschichte der NSDAP*，Duesseldorf 1994，S.129ff.；Kershaw，*Hitler 1889-1936*， Stuttgart 1998（2.Aufl.），S.159ff.；Ernst Deuerlein，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刊登于*VfZ 7*（1959），S.177-227；参见Hellmut Auerbach，Hitlers politische Lehrjahre und die Muenchner Gesellschaft 1919-1923，刊登于VfZ 25（1977），S.1-45。

[7] Andreas Heusler，*Das Braune Haus*， Muenchen 2008，S.80ff.

[8] Wolfgang Horn，*Fuehrerideologie und Parteiorganisation in der NSDAP*（*1919-1933*），Duesseldorf 1972，S.86f.及S.92ff.

[9] Wolfgang Horn，*Fuehrerideologie und Parteiorganisation in der NSDAP*（*1919-1933*），Duesseldorf 1972，S.91。

[10] *Voelkischer Beobachter* vom 25.11.1922；请参阅Horn的*und Parteiorganisation in der NSDAP*（*1919-1933*），Duesseldorf 1972，S.93，Anm.204。

[11] 参见Herbst，*Hitlers Charisma. Die Erfindung eines deutschen Messias*，Frankfurt am Main 2010，S.156ff。

[12] Albrecht Tyrell，*Vom 'Trommler' zum 'Fue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ae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SDAP*，Muenchen 1975，S.12ff.；Horn，*Füehrerideologie*，Frankfurt am Main 1978，S.147f.，dort das Zitat auf S.148。

[13] Werner Maser，*Sturm auf die Republik. Die Fruehgeschichte der NSDAP*，Duesseldorf 1994，S.350f.；Margarete Plewnia，*Auf dem Weg zu Hitler. Der 'voelkische' Publizist Dietrich Eckart*，Bremen 1970。

[14] Herbst，Hitlers Charisma. Die Erfindung eines deutschen Messias，Frankfurt am Main 2010，S.140ff。

[15] Herbst将受军方影响更大的核心追随者小圈子与全德范围的民族主义团体区分开来，参见S.144ff.；请参阅David Clay Large的*Hitlers Muenchen. Aufstieg und Fall der Hauptstadt der Bewegung*，Muenchen 1998，S.194ff。

[16]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Adolf Hitler und der 9.November 1923，刊登于*Von Weimar nach Auschwitz. Zur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n der Weltkriegsepoche*，Muenchen 1999，S.102ff。

[17] 请参阅Herbst的*Hitlers Charisma. Die Erfindung eines deutschen Messias*，Frankfurt am Main 2010，S.179ff.；参见Othmar Ploeckinger的Adolf Hitlers 'Mein Kampf'，Muenchen 2006，参见S.78ff。

[18] Otto Wagner所做的与Otto Strasser会谈的记录，刊登于Henry A.Tuerner（出版）的*Hitler aus naechster Naehe . Aufzeichnungen eines Vertrauten 1929-1932*，Frankfurt am Main 1978，S.126ff。

[19] 请参阅西北工作组和班贝格领导人会议，Horn，*Fuehrerideologie*，Frankfurt am Main 1978，S.231ff。

[20] 关于施特拉塞尔危机请参阅Udo Kissenkoetter，*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P*，Stuttgart 1978，S.88ff.，以及Peter D.Stachura，Gregor Stasser and the Rise of Nazism，London 1983，S.368ff.，以及Herbst的分析，*Hitlers Charisma. Die Erfindung eines deutschen Messias*，Frankfurt am Main 2010，S.233和S.269。

[21] 请参阅Stefan Breuer的*Die Voelkischen in Deutschland. Kaiserreich und Weimarer Republik*，Darmstadt 2008，S.236ff。

[22] Herbst，*Hitlers Charisma. Die Erfindung eines deutschen Messias*，Frankfurt am Main 2010，S.196ff。

[23] 参见David Clay Large，*Hitlers Muenchen. Aufstieg und Fall der Hauptstadt der Bewegung*，Muenchen 1998，S.292。

[24] 请参阅Clemens Vollnhals的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Muenchen 1925 bis 1933. Foerderer und Gegner，刊登于Muenchener Stadtmuseum（出版）的*Muenchen-'Hauptstadt der Bewegung'*，Muenchen 1999，S.165ff。

[25] 参见Andreas Heusler的描述，*Das Braune Haus*，Muenchen 2008，S.121f.和S.209ff.。请参阅Matthias Roesch的*Die Muenchner NSDAP 1925-1933*，Muenchen 2002，以及Hans Guenter Hockerts的Warum war Muenchen die 'Hauptstadt der Bewegung'？，刊登于Stefanie Hajek/Juergen Zarusky（出版）的*Muench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Menschen*，Orte，Strukturen，Berlin 2008，S.32f。

[26] Michael Wildt的*Volksgemeinschaft als Selbstermaechtigung*，Hamburg 2007，S.361。

第6章 法西斯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常见的极权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强调极权主义的统一党（Einheitspartei）的作用[1]，鉴于苏联共产党（KpdSU）的作用它被解释为极权专制制度中的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力中心。它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干部性政党也好，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性政党也好，一种统一的意志似乎贯穿了这个党，而且它的特点是成员对专制者或者集体实行的暴力统治的无条件忠诚。

这个可以从列宁和斯大林主义制度上觉察到，并且紧接着转嫁到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模式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尽善尽美的专制制度形象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为了具体表现与之相比较的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抽象性）它反映了“政权阶段”的必要条件。绝大多数传统极权主义理论家像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C.J. Friedrich）、布热津斯基（Brzesinski）、弗兰茨·诺依曼（Franz Neumann）和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和约阿希姆·克莱门斯·费斯特等作家（这里只能点到为止提及大批著作作者中的几个人的名字[2]）主要对该制度的运作方式感兴趣。只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个例外，她把给极权主义独裁者带来权力的运动及其思想基础的奠定放到了显著位置[3]。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极权主义理论家从不关心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历史，而是完全将其视为阿道夫·希特勒政治生平的衍生品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它。不管希特勒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纳粹政权的作用有多重要[4]，援引他的传记是解释不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29年之后一跃成为群众运动以及国社党在政权内所发挥的作用的。下面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结构和功能的典型分析：一方面确定它与共产党干部性

政党的典型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在党内所采取的政治行动形式对元首国家这种表现形式的重要性。

德国工人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开端与无数民族组织的开端简直毫无差异，它们很大一部分同样是在全德联合会的下属组织推动下产生的，特别是1919年在图勒学会的推动下。这些组织的目标是，通过发动民族反犹太主义形成一种抗衡正在崛起的、因为选举法民主化而获益的左翼政党的力量[5]。除了在意识形态上与自由主义和工人运动明确对立之外，它们的后室社团热（德国工人党创建人安东·德莱克斯勒似乎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与法西斯组织形式相反的，这个烙印是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慕尼黑活动分子群体逐步给这个眼下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年轻政党打上的。作为慕尼黑国防军第四军指挥部的情报员和德国工人党建立联系的希特勒在1921年出于本身无关紧要的动机完成了在党内的第一次权力攫取，他通过大规模集会对安东·德莱克斯勒领导的党委员会施加压力，作为党的宣传负责人，他将这些大规模集会用作新的煽动工具[6]。

通过将个人的便利、慕尼黑派系（其中包括马克思·阿曼、鲁道夫·赫斯和赫尔曼·埃塞尔）的无限忠诚和由他形成的政治构想结合起来，希特勒引入了对他个人无条件服从的元首原则。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成功地使这个年轻的党不在纲领性问题上提建议出主意。他宣布同样由他个人强制推行、内容上未受影响的“25点纲领”不容改变。他本能地像个职业宣传专家那样行动，他认为任何对曾经采用的宣传口号的改动都是荒谬的，并试图让党效忠元首的意志[7]。

当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年轻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变成纯粹的宣传组织的计划（为了利用与议席联系在一起的特权而参加选举的观点还没有得到承认）很大程度上没有实现。希特勒反而意外地发现自己被卷入了得到自由军团支持的巴伐利亚爱国组织游行示威当中。在随后成

立的埃里希·鲁登道夫领导的政治作战联盟（Politischer Kampfbund）当中，希特勒只有政治宣传者的作用。尽管作出了最大的宣传努力（这使他与一般情况下都持赞同态度的巴伐利亚政府专员冯·卡尔的冲突日益增多），他仍有要输掉主动权的危险，在右翼反动运动的国家社会主义派系方面，主动权主要是在富有军事经验的领导恩斯特·罗姆和恩斯特·克里贝尔（Ernst Kriebel）的手上[8]。希特勒夸夸其谈的表现也遭到了部分右翼的公开批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埃尔哈特（Ehrhardt）舰长通过下面这个评论所表达的对他的否定："这个家伙以为他在从事政治。"[9]

事实上希特勒不再掌握着巴伐利亚的发展了，自从鲁尔消极抵抗失败之后，巴伐利亚的发展就由这样的意图所决定，那就是用一个专制政权（必要时由冯·泽克特将军领导的一个三人执政集团）来替代柏林政府，并在镇压萨克斯和图林根共产主义暴动的借口下向柏林进军。为了抗议人们最后不再征求他的意见，他挑起了11月8日和9日的政变企图，并随着进军统帅堂而吞下了苦果[10]。这一切没有以灾难告终，这一点希特勒要感谢巴伐利亚政府以及慕尼黑最高法院在对他和鲁登道夫的诉讼上难以言说的表现。

至于党嘛，它在政变之后瓦解成大量掩盖自己真实面目和相互竞争的后继组织。希特勒不得不担心，和鲁登道夫的德国民族自由党（DVFP）在民族联盟下走到一起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遵循的是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大德意志民众共同体（Grossdeutsche Volksgemeinschaft）不同的路线，并且自己面临着被排除在外的危险[11]。但是他成功地说服鲁登道夫参加了简直是毫无希望的1925年总统选举，结果是毁灭性的失败，这也迫使鲁登道夫退出了政坛[12]。

事实证明，希特勒决定放弃对党的领导并在提早获释后推动在1925年完成的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重建是极其成功的[13]。同时他得以依赖慕尼黑派系以及保持着忠诚的北德的志同道合者，而且他坚持个体

成员的加入。新的党组织逐渐适应了绝对的元首原则。尽管还存在着多数联邦州对他实行演讲禁令的障碍，但希特勒仍由此获得了通过他在慕尼黑的统治地位（那里仍旧还是组织上的总部）控制正在形成的整个党的机会[14]。尽管如此，认为自从1925年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个以统一的元首意志为导向的、团结和组织完善的党的想法仍是误导性的。希特勒党内统治技巧的基础是，只要个人保持忠诚就会放手给下属，而且并不用总部指令来管束他们，实际上元首心底里并不关心他们。只要党处于绝对的反对派位置，只要它的任务仅限于不断的纯粹的宣传，禁止党内意愿在任何组织级别的形成以及为了便于总部任命领导人而取缔在地方范围内的选举——这种方法就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

这个在摸索中发展的党的特点是，希特勒作为毋庸置疑的党的元首在各种各样的党团派别之上活动，并尽可能避免在出现政治冲突的情况下作出选择[15]。1924年产生的党的西北组织试图在格雷戈尔和奥托·施特拉塞尔（毫无疑问这两人是该运动最具政治天分的首脑人物）的领导下形成一个政治目标，它赋予迄今为止在没有具体内容情况下进行的极度国家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宣传以明确的方向，并使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看起来不再像是魏玛政党风景线上的纯粹的寄生虫了。众所周知，希特勒在1926年班贝格领导人会议上阻挠施特拉塞尔此外还有戈培尔准备的计划通过。该计划虽然在很多方面不成熟，但是相对于矛盾重重的“25点纲领”来说，它在一致性、连贯性方面要强太多了，此外“25点纲领”与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的立场没有本质的区别[16]。

希特勒虽然在没收旧日诸侯财产问题上把党的政策推向右翼[17]，但是直到最终攫取权力他都没有明确地选择政治方向，因此国社党因为它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反资本主义论证而受到工业界圈子的批评，而它与此同时又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激烈的竞争对手出现[18]。在确定空想、模糊的最终目标的同时保持纲领上的灵活性，这使它能像变色龙一样对各种变化莫测的地区和特殊阶层的选民利益作出调整。格雷戈尔·

施特拉塞尔创立的帝国竞选领导小组投机地利用选民的现有不满，并创立了一个在某些方面可以替代现今民意调查的信息系统。排在首位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动员选民，而不是对特定政治矛盾的宣传[19]。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其纲领内容上与极端资产阶级右翼没有质的区别。

什么构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西斯特征？它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确定。在党的组织方面，它不是以通过政治商讨和党内利益均衡的方式缔造成员和支持者的政治融合为目标的。情况倒不如说是恰恰相反。在希特勒和与其关系密切的慕尼黑集团的影响下，集体商讨的所有要素——以及所有机构化的党的组织——都被系统消除了，并为新的在任何层面都有效的元首原则所取代。将党团结在一起的是与富有魅力的元首的同志情谊和由他所确定的对获得无限权力这一最终目标的空想。

由于党的政治意愿的统一，政治讨论和商议在希特勒看来就是多余的了，并且还是向着议会制度的倒退。起初还允许在党大会背景下就事实问题进行会议式的集会，但是后来它们就变成了在多数情况下为党意愿的形成做陪衬的纯粹的喝彩和示威活动[20]。虽然希特勒再三说（特别是在1932年12月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辞职之后）他同意建立一个党的委员会——慕尼黑“褐色大厦”（Braun Hause）的委员会大厅就证明了这一意愿，但是罗森堡、弗里克和其他人再三努力，这个机构也从未产生。希特勒本能地拒绝任何集体委员会的约束[21]。

在运动时期适用的东西被类比着移植到体制时期。只是例外的是，希特勒愿意依靠党内和国家的委员会。很快又停止了的1933年夏天的帝国地方行政长官会议就是个例子，希特勒召开该会议是为了将它用作抵御自下而上的党的革命的基石[22]。在1932年政党改革和指定鲁道夫·赫斯为元首副手之后，一个能够要求代表党的集体委员会同样没有形成，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班子已经任命（它可能被设想为平衡的因素）[23]。

省党部头目一再要求希特勒至少邀请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定期进行磋商。然而由参与者发起的省党部头目会议却是禁忌，并且最终遭到禁止，这意味着，即便是体制内的真正权力承载者也被杜绝了进行机构化的政治商讨的可能。与意大利不同（在那里，作为影子存在保留下来的法西斯大委员会在1943年得以复活）[24]，在帝国内阁不再召开会议、仅勉强维持了作为票据交换场所的总理府（Reichskanzlei）和国务秘书会议的协调工作以及传阅文件书面决定的程序（Umlaufverfahren）之后，第三帝国在1944年时就不再有在必要时能发挥制衡希特勒绝对主权作用的代表机构了[25]。

即便在斯大林主义最显著的发展时期也不曾有过这样个人化的决策过程——而且是在所有层面。尽管这两个专制者的领导方式存在着种种一致性，但是斯大林制度一直含有回到集体领导的可能，而纳粹政权在希特勒退出后立刻在不惜兵刃相见的继任竞争者的对抗中分崩离析了。这个党没有作为一个团结的组织，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由博尔曼的党办公厅仅仅进行着有限控制的联盟存在着，它以希特勒大开了绿灯的省党部头目对职位的肆意霸占为特征，作为帝国行政长官（最后则是作为国防委员）的他们相互进行了最为激烈的争斗[26]。与受希特勒和慕尼黑党内集团影响的政治理解相对应，决定领导职能所有者之间的臭名昭著的竞争的是：形势变迁，这些官员没有人能指望自己的位子受到机构化的保证，而是取决于党领导以及专制者的意愿。正如人们所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进，党的“封建化”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而这么说完全是有道理的。

与共产主义政党不同，这个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等级制度化。它的结构更多是由不断增多的下属机构所决定的，因为希特勒一直习惯于用这种使他获得领导权的方式来解决机构冲突，例如在1931年冲锋队问题上或者是1938年2月占领帝国战争部的问题上。因此党的结构不受机构从属关系的影响，而是受等同的地位以及因此而造成的持续冲突的

深刻影响。这其中包括，除了长期不堪重负的调查解决委员会（Uschla）之外，没有任何解决政治冲突的机构[27]，特别是因为，任何形式的讨论——甚至是党内性质的讨论都被抨击为“议会制”。

运动时期体现为各省党部头目之间持续不断、激烈争斗仇恨的东西到了纳粹制度下则以地方官员之间不断升温的竞争的形式继续着，直到政权最后的日子。它的基础是，官方对言语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就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冲突）把客观矛盾和利益矛盾赶到了个人调解的道路上。随着帝国改革被规定为禁忌，相应的利益冲突被挤到了其他领域[28]。这些地方官们相互之间就公众事务缔结私人合约很能说明特点，例如罗森堡和莱伊或者莱伊和帝国经济部都是如此，它们代替了对缺乏的机构统一的要求[29]。

因此，政权无力让分歧重重的利益在中期实现妥协是这个党的组织结构的一个反映。在杜撰说和谐已经事先稳定下来的情况下，这使得对权力的分配永不停歇，不管遵循的意识形态目标是什么，并在“人治”这个关键词下面原则上确定了各层面职能担任者的完全管辖权[30]。此外，由此产生混乱的职权分配因为官员在纪律和专业两方面的双重隶属制度而变得更加含混不清。

只要党完全处于反对派的位置，这种迎合希特勒的倾向并将其美化为没有官僚作风的组织技巧相对来说就是有效的，尽管在斗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十分显著的因摩擦造成的损失。因为它使成员和支持者有可能把全部能量都集中在不停歇的宣传活动上，其目的是在动机和组成极其不均的抗议运动中动员广大群众。

自1930年9月选举之后活力就未曾中断的竞选活动的极大的波动和其中所反映出的支持者的一度减少不太引人注意。但是，当崛起浪潮结束、党的最佳选民储备（约36%的选票）耗尽的时候，运动在1932年11月面临着完全崩溃的危险。与保守右翼联盟让希特勒有可能在1933年带

着总理的优势领先3月份的选举，就这样崩溃才得以避免。公开选举——这是指在政府重新组成之前——很有可能会导致重大的挫折，在之前的地区选举（例如图林根）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迹象[31]。

很能说明这个至关重要阶段的国家社会主义竞选宣传的特点的是下面这个战略，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说成是与到那时为止的魏玛政党制度本质不同的东西，并且首先将广泛的反议会制度和政党情绪为己所用。当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得不直接同民族反对派（也就是冯·巴本）较量时，它就失去这一优势了；通过无休止的宣传鼓动来发动动员以及对左翼实行恐怖主义都产生了反效果[32]。国家社会主义动员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避免明确的政治选择并回避在左右翼之间作原则性的选择，这样不管是反社会主义还是反资本主义的不满都可以在政策上捕捉。随着在州一级层面上被纳入联盟当中，该政策的可行性越来越低，但资产阶级联盟伙伴对这个机会的利用却只是有限的[33]。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竞选成功不仅要追溯到从1931年开始引起注意的元首崇拜效应，它同样也建立在一个异乎寻常有效的竞选领导的基础上，它由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扩建并在1930年由戈培尔接管[34]。与此同时，事实上在扮演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角色的施特拉塞尔通过集中制的、在一定程度上官僚作风的领导层似乎是成功地绕开希特勒将这个四分五裂的党变成了一个团结的机构。这让它（在力量投入方面）看起来比那些与其竞争的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强很多，尽管来自工业方面的补贴相对少得可怜[35]。此外还有有效的对右翼资产阶级利益组织的渗透战略。最终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员控制的帝国农业联盟以及1932年在普鲁士的新教教会选举是诸多例子中的两个[36]。

一方面，元首崇拜和领袖魅力、在运用相对现代手段（电影、飞机、培养演说家和远程教学）情况下对大众的系统动员以及要追溯到运

动时期的对右翼民族组织的一体化解释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会取得一直持续到1932年7月的空前选举成就的原因，而对到那时为止的固定选民的极度削弱是另一个原因。相反，发动的技巧以一种普遍趋势为基础，那就是较少强调政策内容和狭义的价值观秩序而代之以更多地突出立场、意向和氛围并以此来替代实际政策——借此与时代精神相符。从利益统治中脱颖而出的梦境是进行法西斯主义动员之前所杜撰的神话。

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所特有的法西斯主义风格可以以1932年12月8日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尔的冲突为例来说明。这次冲突导致施特拉塞尔辞去了党内的职务以及一场针对他的惩罚运动，并最终以他在1934年6月被杀而告终。施特拉塞尔反对希特勒的不成功便成仁政策，在他看来，党正在瓦解，不能再冒险进行另一次竞选了，因此这一政策是不再适合的了；更确切地说，必须由建设性的政策来取代它，他已经为其作了客观上的准备，扩大了党的领导机构[37]。

特别是他对希特勒发誓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像希特勒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正在变成宗教的世界观运动”，而是一个必须在国家内争取权力的“斗争运动”，其目的是使国家有能力“实现德国社会主义”。他认为，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蛮力冲突，更多的是形成“一个重要的广大缔造者阵线”[38]。也就是说，施特拉塞尔从在那之前的灾难政策转向了建设性反对战略，同时他没有因此而否认他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基本目标的东西。

希特勒的反应很能说明他的政治理解的特点。首先他不能相信施特拉塞尔的忠诚，而是硬说他在计划反对党领导的阴谋。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一篇影响巨大的意见书（他给起的标题是《论关于建立运动更大战斗力指示的内在原因》）中在所谓的“过度官僚主义化”的关键词下推翻了施特拉塞尔的所有组织扩建，在成员数量波动极大的情况下，这对一个迅速发展的群众性政党简直是自杀性的，而且不管怎样对任何务实的

党的工作者来说这看起来肯定是荒谬可笑的[39]。

希特勒拒绝自己和党基层之间存在任何的中间组织结构，但省党部头目是例外；他对党的任务的定义是为“国家社会主义理念”而“将民族集合起来”。这个典型的在内容上空洞无物、由他个人代表的想法表明，希特勒一方面草拟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幻景（他有意让它不那么清晰并因此能够掩盖可能的利益分歧），另外他把在这个意识形态自我明确层面下的东西（因此也必然包括政治组织和宣传）都纯粹视为技术性的管理行为，而这种行为原则上是可以替换的。

这导致，在这位党的元首含糊其辞的话语中，政策被与作为目标本身的纯粹的精神动员等同起来，而不是将其理解为特定价值观秩序的实现或者是在不同利益间的调停。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所特有的法西斯主义要素在于，有计划地对有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保持开放、价值观立场的形式化、系统化甚至对内容的歪曲捏造都遵守着迎合、迁就希特勒个性的原则。对可能的利益冲突的简单否认和有计划地美化运动的团结一致性是他们的秘诀，但与此同时也是一个长远来看掩盖起来十分费劲的内部矛盾。

在政权阶段，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发展特点是，此前获得的对政治的理解及其组织形式被逐步移植到国家和社会，其间摩擦不断。这个党自身变成了无组织的形态，尽管它给自己加上了最宽大的官僚机构缓冲垫，但是其领导结构绝对不是完整和自成一体的。直到1941年之后，在鲁道夫·赫斯逃往英格兰之后出任党办公厅负责人的马丁·博尔曼才重新建立起一个党中央机关的雏形[40]，而党自身因为分裂成众多的省党部组织而根本没有作为统一的控制中心与国家机关面对，而且没有真正垄断国家机构，也就是说并没有像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政权那样。

希特勒的保守派联盟伙伴曾经认为，在接管总理职位、消除议会制度和击败“马克思主义政党”（左翼被简而化之表述成了这样）之后，国

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作为群众性政党就是多余的了，而且它会被改造成一个政治领导人精挑细选的骑士团[41]。这当然是幻想。但是其中正确的地方在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组织逐渐变得多余，同样，内战军队冲锋队作为对内进行威胁的工具似乎也日益变得多余，尽管记到恩斯特·罗姆名下的政变政策是他的对手的捏造。

但是，和1934年6月30日联系在一起的党派清洗活动丝毫没有改变下面这一点：那就是，运动中在政治上没有融入的这部分人（而且无可否认他们是法西斯特征最强的那些人）坚持在他们看来很典型的政治目标的升级。在斗争时期条件下，这是国家社会主义战略的标志。因此，渐增的极端化趋势是在运动时期采取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形式的释放。正如马丁·布罗萨特（Martin Broszat）给它起的名字那样，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必然地走上了“挑选消极世界观要素”的道路[42]，并且一直把焦点放在不满最为严重的政治领域，首先是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种—种族少数民族的迫害上。

在“自下而上的党革命”刹车和1934年6月30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清洗措施之后[43]，在“野蛮”行动中对犹太人采取措施的努力也重新抬头，尽管这是与党中央的指示相悖的。在党能摆脱延续下来的国家机关的驯化效应的地方——按照从奥地利到苏台德地区和瓦尔特高（Warthegau）直至帝国驻波兰占领区的阶梯等级，目标和手段的升级日益获得解放这一点表现出来，并在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斯拉夫民族亲属迫害的极端化中达到顶峰。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党组织没有巩固成政权内部的决定性力量，它反而失去了构成成功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的重要职能。例如，希姆莱代表党卫队拒绝了取得舆情报告的权利，而此前赫斯费尽力气才使其成为下属组织的义务[44]。同样，对公共管理部门（社区层面是例外）直接施加影响的尝试失败了。虽然政治评价的工具是对人员政策进行干涉的

一个重要杠杆，但是党根本没有一个步入正轨的机关来胜过国家机关，后者成功使得干预不得不始终通过元首的代表进行，因此不得不经过漫长的官方途径[45]。

党的四分五裂及其领导机关的软弱产生了下面的影响：它仅具备有限的能力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即使决策掌握在忠诚的党员同志手中。元首代表以及博尔曼有效领导的党办公厅所扮演的监察部的角色——它逐步遏制帝国总理的影响并在政权临近结束时几乎完全剥夺了拉默斯的作用[46]——是重新取得对枝蔓丛生的党机构的控制的出发点。因为自从1939年起成员数量不再有限制，党员数量最终增长到了800万，以至于不能再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精英结构了。结果，党内清洗一再上演，而博尔曼则考虑结束战争以便实现根本的政策上的转变。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组织极度不受欢迎的现象在战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随着战争的进展它日益变得一览无余。党的干部们不愿结束的腐败和通常被视为不合理的他们不可或缺的地位引起了嫉妒和怒火。鲁道夫·赫斯的抱怨——党不能失去与人民的联系——从1941年开始进一步变成了现实[47]。1942年2月威悉河—埃姆斯河（Weser-Ems）省党部头目卡尔·勒韦尔（Karl Roever）草拟的改革专题报告表明了这种状况，报告徒劳地要求设立接待日并效仿天主教会更多地贴近人民[48]。

然而，因为通过照料炸弹伤者获得了与维护帝国情绪联系在一起的新任务，党在政治上成功复活。它借此与国家社会主义国民福利慈善机构（NSV）一起发挥了一定的社会福利职能，尽管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导致参与机构的工作重叠。这是一种旨在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从寄生虫角色中拉出来并改善其声望的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尤其是长远来看大批被免职的干部再也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以至于博尔曼下令大规模关闭了隶属组织[49]。

人民冲锋队落入国社党的手中，而不是像从军事上容易想到的那样转移到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后备军（Ersatzheer）的手中——这成了这次复活的终点[50]。最后的战斗完全符合希特勒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狂热渗透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设想。与此并行的是下面这个事实：省党部头目因为对自己主权范围内民事权力的吞并（然而这取决于他们在公共部门对手的个人权威）而觉得自己实现了他们最初祈愿的目标，所有的相关行政决定都转到他们手上，然而普遍的职权混乱往往掩盖了国家社会主义干部声名狼藉的行动上的无能[51]。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政权阶段日益变成一个官僚机构，它首先服务于官职任命上的任人唯亲，其次服务于党员干部的敛财和特权化，而且尽管干部更替频繁，它仍没有能力产生有效的组织。在阿道夫—希特勒学院和国家政治教养院（Napola）培养自己的党领导新生力量的萌芽倒不如说全线告败。这不仅仅是因为多次将这些人员抽走的武装党卫队的竞争，也主要是因为这个老式机构本质上不允许其他人员以当事人形式补充进来。此外，党员干部可怜的社会威望使得年轻人去寻找其他事业上的成功，而不是像不受尊重的“纳粹党政治头目”那样[52]。

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距离成为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的样板还很遥远。

---

[1] 请参阅Manfred Funker（出版）的*Totalitarismus. Ein Studien-Reader zur Herrschaftsanalyse moderner Diktaturen*，Duesseldorf 1978；Ernest A.Menze（出版）的*Totalitarianism Reconsidered*，London 1981。

[2] Carl J.Friedrich/Zbigniew K.Brzes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Cambridge，Mass.1965；Franz Neumann，*Behemoth. Struktur and Praxis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44*，Frankfurt am Main 1967；Ernst Fraenkel，*Der Doppelstaat*，Frankfurt am Main 1974，Karl Dietrich Bracher，*Schluesselwoerter in der Geschichte. Mit einer Betrachtung zum Totalitarismusproblem*，Duesseldorf 1978；Ernst Nolte，Despotism，Totalitarianism，Freedom-oriented Society，刊登于Menze（出版）的

Totalitarianism Reconsidered， London 1981，S.167-178；Joachim C.Fest，*Das Gesicht des Dritten Reiches. Profile einer totalitaeren Herrschaft*， Muenchen 1977 6 Aufl。

[3] Hannah Arendt，*Elemente und Urspruenge totaler Herr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55。

[4] 最近的请参加Manfred Funke的*Starker oder schwacher Diktator*？*Hitlers Herrschaft und die Deutschen*， Duesseldorf 1989，S.38ff.und passim；Karl Dietrich Bracher，*Zietgeschichtliche Kontroversen um Faschismus*，*Totalitarismus*，*Demokratie*， Muenchen 1976，S.80f.，S.85和S.93f。

[5] 请参阅Uwe Lohalm的*Voelkischer Radikalismus.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voelkischen Schutz-und Trutz-Bundes 1919-1923*， Hamburg 1970，S.53，S.285ff.，S.295f。

[6] 参见Albrecht Tyrell，*Vom Trommler zum Fue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ae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SDAP*， Muenchen 1975；Werner Maser，*Der Sturm auf die Republik. Die Fruehgeschichte der NSDAP*， Frankfurt am Main 1981，S.268ff.；Wolfgang Horn，*Fuehrerideologie und die Parteiorganisation in der NSDAP* （*1919-1933*）， Duesseldorf 1972，S.58ff。

[7] Georg Franz-Willing，*Die Hitler-Bewegung. Der Ursprung 1919 bis 1922*， Oldendorf 1974 2 Aufl.，S.80；Horn，*und Parteiorganisation in der NSDAP* （*1919-1933*）， Duesseldorf 1972，S.101ff。

[8] 请参阅Bruno Thoss的*Der Ludendorff-Kreis 1919-1923*， Muenchen 1978，S.314ff.；Hans Hubert Hofmann，*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uenchen 1961；Hans Mommsen，Der 9.November 1923，刊登于Johannes Wilms（出版）的*Der 9.November. Fuenf Essays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Muenchen 1994。

[9] 请参阅Peter Schmidt的*Zwanzig Jahre Soldat Adolf Hitlers*， Koeln 1941，S.39ff。

[10] Harold Gordon，*Hitler-Putsch 1923. Machtkampf in Bayern 1923-1924*，S.279ff.；Hofmann，*Der Hitlerputsch*， Koeln 1941，S.203ff.

[11] 请参阅Horn，*Fuehrerideologie*， Koeln 1941，S.185ff。

[12] 请参阅Horn，*Fuehrerideologie*， Koeln 1941，S.217f。

[13] 请参阅Horn，*Fuehrerideologie*， Koeln 1941，S.220f.和S.278f。

[14] Horn，*Fuehrerideologie*， Koeln 1941，S.285，和Dietrich Oriow，*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1933-1945*， Bd.I，Pittburgh 1973，S.78f。

[15] 这在Joseph Nyomarkay的*Charisma and factionalism in the Nazi Party*，Minneapolis 1967，特别是S.26ff.得到了最突出的强调。

[16] 参见Ulrich Woertz，*Programmatik und Fuehrerprinzip. Das Problem des Strasser-Kreises in der NSDAP*， Diss.phil.，Erlangen/Nuernberg 1966，S.97ff.；Gerhard Schildt，*Die Arbeitsgemeinschaft Nord-West.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NSDAP 1925/26*， Diss.phil.，Freiburg 1964，S.156ff.；Reinhard Kuehnl，*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nke 1925-1930*， Meisenheim 1966，S.44。

[17] 请参阅Hans Mommsen，*Die verspielte Freiheit. Der Weg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en Unterga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S.250。

[18] 请参阅Henry A.Turner，Die *Grossunternehmer und der Aufstieg Hitlers*，Berlin 1985，S.234ff。

[19] 请参阅Thomas Childers，The Limits of National Socialist Mobilization，刊登于同一作者的*T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1919-1933*， London 1986，S.235。

[20] 请参阅Hamilton T.Buerden，*Die programmierte Nation. Die Nuernberger Reichsparteitage*， Guetersloh 1967；Gerhard Paul，*Aufstand der Bilder. Die NS-Propaganda vor 1933*， Bonn 1990，S.199ff。

[21] 参见Martin Broszat，*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Muenchen 1969，S.262f.；Dieter Rebentisch，*Fuehrerstaat und Verwalt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Verfassungsentwicklung und Verwaltungspolitik 1939-1945*， Stuttgart 1989，S.422。

[22] 参见Broszat，Staat Hitlers，Muenchen 1969，S.160f.；*Peter Diehl-Thiele*，*Partei und Staat im Dritten Reich*， Muenchen 1969，S.70ff。

[23] 请参阅Orlow的*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Bd* .2，Pittsburgh 1973，S.138ff。

[24] 请参阅Lothar Gruchmann的*Der Zweite Weltkrieg*， Muenchen 1985 8 Aufl.，S.236f。

[25] 基本参照Lothar Gruchmann的Die Reichsregierung im Fuehrerstaat. Stellung und Funktion des Kabinett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刊登于G.Doeker/W.Steffani（出版）的*Klassenjustiz und Pluralismus . Festgabe fuer Ernst Fraenkel*， Hamburg 1973。

[26] Jeremy Noakes在*Government*，*Party and People in Nazi Germany*，Exeter1980，S.15说过，自从1932年政党改革开始就有了具体的政党，这里指的是各个地方。而Martin Moll则大大高估了省党部会议的意义，参见Steuerungsinstrument im Aemterchaos？，VfZ 49（2001），S.224ff。

[27] 请参阅Donald M.McKale的*The Nazi Party Courts . Hitler's Management of Conflict in his Movement*， 1921-1945，Kansas City 1974，S.120ff。

[28] 参见Karl Dietrich Bracher/W.Sauer/G.Schulz，*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Koeln/Opladen1960，S.291ff.；Broszat，*Staat Hitlers*，Muenchen 1969，S.158；Rebentisch，*Fuehrerstaat und Verwalt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Verfassungsentwicklung und Verwaltungspolitik*，Stuttgart 1998，S.190ff。

[29] 参见Rehinhard Bollmus，*Das Amt Rosenberg und seiner Gegner*，Stuttgart 1970，S.85ff.和S.123；Ronald Smelser，*Robert Ley*：*Hitler's Labor Leader*， Oxford 1988，S.226f.；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ie Stellung Hitler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刊登于同一作者的*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Ausgewaehlte Aufsaetze*，Hamburg 1991，S.75f。

[30] 参见Dieter Rebentisch/Karl Teppe（出版）的*Verwaltung contra Menschenfuehrung im Staat Hitlers. Studien zum politisch-administrativen System*，*Goettingen* 1986，Einleitung S.24ff.；Jane Caplan，*Government without Administration. State and Civil Servic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Oxford 1988，S.336f.；Hans Mommsen，*Beamtentum im Dritten Reich*，Stuttgart 1966，S.34f。

[31] 关于选举的发展请参阅Juergen Falter的*Hitlers Waehler*，Muenchen 1991，S.30ff.；Childers，The Limits of National Socialist Mobilization，*T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1919-1933*，London 1986，S.252ff。

[32] 参见Hans Mommsen，Machtergreifung und deutsche Gesellschaft，刊登于W.Michalka的*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Paderborn 1984，S.33f。

[33] 关于Thueringen政坛请参阅Guenter Neliba的*Wilhelm Frick. Der Legalist*

des Unrechtsstaates.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Paderborn 1992， S.58ff。

[34] Paul， *Aufstand der Bilder. Die NS-Propaganda vor 1933*， Bonn 1990， S.71ff。

[35] Udo Kissenkoetter， *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P， Stuttgart 1978， S.35和S.48ff.； Peter D.Stachura， *Gregor Strasser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ondon 1983；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财政主要请参阅Horst Matzerath/Henry A.Turner的Die Selbstfinanzierung der NSDAP 1930-1932，刊登于*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1977），S.59-92。

[36] 请参阅H.Gies， NSDAP und landwirtschaftliche Organisationen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刊登于*VfZ* 15（1967），S.341-376；关于教会选举参见Klaus Scholder的*Die Kirchen und das Dritte Reich*， Bd.I， Frankfurt am Main 1977， S.255ff。

[37] 参见Kissenkoetter， *Gregor Strasser*， Stuttgart 1978， S.162f。

[38] Entwurf seines Schreibens an Hitler vom 8.12.1932， Stuttgart 1978， S.202f。

[39] Entwurf seines Schreibens an Hitler vom 8.12.1932， Stuttgart 1978， S.178ff.； Hitlers Denkschrift vom 15./21.12.1932， Koblenz BA， NS22/110；abgedr. Hans Mommsen， *Adolf Hitler als 'Fuehrer' der Nation*， Deutsches Institut fuer Fernstudien， Tuebingen 1984， S.162ff。

[40] 参见Peter Longerich， *Hitlers Stellvertreter. Fuehrung der Partei und Kontrolle des Staatsapparats durch den Stab Hess und die Partei-Kanzlei Bormann*， Muenchen 1992， S.167ff。

[41] 请参阅Hans Mommsen， Regierung ohne Parteien. Konservative Plaene zum Verfassungsumbau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刊登于Heinrich-August Winkler（出版）的*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1933. Handlungsspielraeume und Alternativen*， Muenchen 1992， S.14ff。

[42] Martin Broszat， Soziale Motivation und Fuehrer-Bind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Nach Hitler. Der schwierige Umgang mit unserer Geschichte*， Muenchen 1988， S.28。

[43] 参见Peter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Geschichte der SA*， Muenchen 1989， S.222ff.； Orlow，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Bd.2， Pittsburgh 1973， S.121ff。

[44] 请参阅Heinz Hoehne的*Der Orden unter dem Totenkopf. Die Geschichte der* SS，Guetersloh 1967，S.122。

[45] Mommsen，*Beamtentum im Dritten Reich*，Stuttgart 1966，S.74f.和S.56f。

[46] Rebentisch，*Fuehrerstaat und Verwalt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Verfassungsentwicklung und Verwaltungspolitik*，Stuttgart 1998，S.459ff.；Longerich，*Hitlers Stellvertreter. Fuehrung der Partei und Kontrolle des Staatsapparats durch den Stab Hess und die Partei-Kanzlei Bormann*，Muenchen 1992，S.159ff。

[47] 请参阅Parteitagsrede vom Rudolf Hess vom 16.9.1935，Koblenz BA，NS 26/vorl.1183。

[48] Das Memorandum in IfZ Fa.204。请参阅Dietrich Orlow的*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Bd.2，Pittsburgh 1973，S.352f.，和Longerich的*Hitlers Stellvertreter. Fuehrung der Partei und Kontrolle des Staatsapparats durch den Stab Hess und die Partei-Kanzlei Bormann*，Muenchen 1992，S.119和S.191。

[49]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拥有大约100万名干部。D.Orlow，*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Bd.2，Pittsburgh 1973，S.92页和S.424f。

[50] 请参阅Franz W.Seidler的’*Deutscher Volksturm*’. *Das letzte Aufgebot 1944/1945*，Muenchen 1989。

[51] Rebentisch，Fuehrerstaat und Verwalt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Verfassungsentwicklung und Verwaltungspolitik，Stuttgart 1998，S.526ff.；Karl Teppe，Der Reichsverteidungskommissar. Organisation und Praxis in Westfalen，刊登于Rebentisch/Teppe的*Verwaltung contra Menschenfuehrung im Staat Hitlers*，Goettingen 1986，S.289ff。

[52] Michael Scholtz，NS-Ordensburgen，刊登于VfZ 15（1967），S.277和S.287；Dietrich Orlow，Die Adolf-Hitler-Schulen，刊登于VfZ 13（1965），S.272-284；请参阅Orlow的*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Bd.2，Pittsburgh 1973，S.187ff。

第7章 希特勒和政治的毁灭

研究阿道夫·希特勒个性和政策的出版物数以万计，这使得从如潮水般的见解和诠释中得出明确的判断十分困难。但是，这恰恰是解释希特勒在任总理的很短时间内在世界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所必需的。在纳粹政权期间，大多数观察家和传记家都倾向于将这个起初完全被低估了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视为严肃的和有效的强权政治家。只有少数批评家，例如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和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坚持他们的信念[1]：这个德国专制者应该首先被视为江湖骗子。

希特勒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在1930年9月至1932年7月的竞选中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和提早赢得的外交承认使得即便是很多外交对手也打消了最初的怀疑。例如，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就醉心于希特勒本身友好温和但是由于身处运动当中受到“极端左翼分子”的有害影响而不得不依赖他们的支持的幻想中。

在较早的当代史研究中，希特勒肆无忌惮的强权政治家形象占据了主导——他能够把统一的意志强加给国家直至每一个国民。在从法西斯意大利照本宣科而来的“极权主义专制”理论影响下，这样的想法得到了承认——希特勒用虚假的承诺“拐骗”了国家，并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操纵技巧使他们毫无异议地站在了自己身后。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可能是战后早期最重要的德国当代历史学家——将对这位专制者的评价简化成这样：纳粹统治制度“从开始到最终都和这个人一起站立和倒下”[2]。

事实上希特勒不管在党内还是在国家机关内都成功地排除了所有反对力量，并让自己作为无可否认的领导人得到承认。其起点是他于1921年7月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完成的“首次”权力攫取。在发挥其变

得不可或缺的宣传演说家作用过程中，希特勒以安东·德莱克斯勒推动的与民族工厂组织的合并谈判为契机，以他最终退党相要挟，使党委员会把不受限制的政治领导权交给他[3]。

随着这次在党内获胜，希特勒将一种法西斯政治理念在这个直到那时还以鄙俗的社团热为特征的后室党内贯彻了下去。这其中包括绝对的元首原则、禁止党内选举和集体意愿的形成以及党务工作完全以宣传和招募成员为导向。希特勒宣称，一个“统一组织和传输、能总结成简短的表达方式的世界观需要一个像冲锋队那样组织起来的政治党派”[4]。在他看来，党的任务是发动动员不断壮大的支持者队伍。党是否应该参加政治选举直到1926年还存在争议，后来这因为战术上的原因而成为现实，而并非对建设性参与国会工作的考虑。在政变过程中希特勒得到了与他一起密谋策划的追随者群体的支持，他们作为慕尼黑分部登上了党的最高领导位置，并在1925年党重建之后也保留了这一特权。

自从希特勒在1921年7月获得成功之后，运动由他个人来领导这一点就没有争议了。他充分利用在兰茨贝格的暂时监禁，在党的禁令被取消之后在1925年通过形式上的重建禁止民族主义群体集体加入。同样，希特勒也成功地将埃里希·鲁登道夫（他把他推入了1925年毫无希望的总统竞选当中）这样可能的竞争对手排挤出去。接下来的一年里出现的由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约瑟夫·戈培尔领导的西北工作组也是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它因为试图通过一个新的更加合乎时代的党纲并抵制慕尼黑圈子而失败。这样，党的领导就不再受任何监督机构的影响了。

希特勒足够狡诈，对那些最激烈反对的人，他偏偏委以其重任，这样就把他们拉到了自己身边。这个人事圈子尤其包括上巴伐利亚的药剂师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纳粹运动的设计主脑之一。他在1932年秋绝望地放弃了党内职务，因为他认为希特勒的不成功便成仁战略是灾难性的，在他看来，是该战略将党推入了失败的境地。希特勒解散了施特

拉塞尔建立的帝国组织机构一部和二部，并没有建立任何的替代机构，而他曾经力图借助它们不仅协调党务工作、监督省党部头目同时也为争取当中的权力攫取作好政治准备，这很有代表性。他的知己鲁道夫·赫斯作为“元首的代表”没有能力协调最终人数超过36人的省党部头目的渐渐疏离的野心，这些人顽固地坚守着希特勒给予他们的直属地位。因此，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帝国指挥部”只是有名无实，而与此同时建立一个核心党领导是希特勒所禁止的 [5] 。

只有兜个圈子通过能对帝国立法施加影响，同时也领导着元首代表办公室的元首秘书马丁·博尔曼才能对党机关施加影响。当鲁道夫·赫斯因为轰动性地逃亡英格兰而被宣布精神有问题时，博尔曼作为党办公厅的负责人走上了党的最高领导位置 [6] 。然而博尔曼为精简国社党领导层打下人事基础的努力仍旧是七零八落的碎片，尽管他系统推动了政权的党化进程，并为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而对常规和国内管理机构进行了排挤。

希特勒名义上让赫斯负责党的领导，这一战术举措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他试图以此来安抚保守派联盟伙伴；另一方面这样他自己也就摆脱了烦人的党领导，后者迅速在慕尼黑的“褐色大厦”转变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 [7] 。作为帝国总理，希特勒日益回避日常政府工作。在国家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前往诺伊德克庄园、放权给希特勒之后，在总理府看到希特勒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上萨尔茨贝格（Obersalzberg）逐渐成了躲避这些令人不快的政府事务的藏身之地。

这位帝国总理害怕内阁里的同僚气氛，并强迫各部门主管部长们在开会之前就相互商量好要做的决定。因此，内阁会议到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核心领导的职能，并在1938年2月之后被完全取消。因为希特勒也禁止他的部长们继续啤酒之夜的惯例（可能是因为他害怕他们的竞争），政府成员只有在官方庆祝场合才会碰面。帝国内阁作为同事合作

的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立法工作的协调成了地位被抬高的总理府部长的职责，而他的部长同事们接触到帝国总理的可能则日益受到了马丁·博尔曼的封锁[8]。

在1934年之后开始的双重进程符合希特勒的个人倾向——元首权力得到无限承认、国家机关广泛四分五裂，同时没有什么协调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SS领导机关并没有弥补这一点。希特勒拒绝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希望用“人治”原则来取代公共管理机构的法治国家基础，这导致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个人化。这尤其表现在相对于等级行政主管他更偏爱直接隶属原则上，这无异于鼓励人们绕开官方渠道。这样，不断加剧的四分五裂但也包括官员对“元首”的个人依赖就不可避免地得到了推动。

1934年8月20日的时候，在帝国总理和总统的职务合二为一之后，公职人员和国防军成员——此外还有国会议员就已经不得不发表针对元首个人的效忠誓言，而不再像原本那样对宪法起誓。由此和随着之前就希特勒接管帝国总统职务进行的全民公决，从国家法方面建立“元首国家”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就完成了。结果除了“元首和帝国总理”的官方头衔之外，“元首”的叫法也在国家范围内变得普遍。就这样，这个专制者的大权独揽再也没有宪法的防护墙来抵御了。

但是另一方面，希特勒挫败了其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让被委任到各州的帝国行政长官听命于他的指示的努力，弗里克的目的是保证管理的统一并以各州职权为代价缔造一个统一的国家。当弗里克抱怨他的武断行为时，希特勒决定，一般来说必须停止“向他阐述”他和弗里克之间存在的“关于他的决策”的意见分歧，但是这不适用于“具有特别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9]。同样，希特勒拒绝了弗里克的提议——鉴于《授权法案》即将到期，应建立一部《大德意志帝国宪法》，他的理由很有代表性，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避免革命行动。他更倾向于延长《授权法

案》[10]。因此魏玛帝国宪法形式上的有效期要到1945年5月。

出于类似的理由——不让自己卷入机构约束当中的需要——希特勒也对设立一个立法机构并最终为他自己不能再履行职务的情况设立一个元首选举机构的再三尝试进行了阻挠，尽管他之前曾多次作出这方面的承诺[11]。这一发展和比方说新增部门及直属元首的特别机构的迅速建立一样，是和政府统一性的日益瓦解相对应的。

与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不同，希特勒不关心当前的政府事务，他基本上只通过副手或者身边的人作口头指示，并且偏爱一种非正规的执政方式。与此同时，“元首命令”日益取代常规立法，即使国会作为代表机构仍旧存在，并在个别情况下为提交给它的法案喝彩，譬如说《纽伦堡法案》。国会选举偶尔会举行，以便赋予政府额外的合法地位。但是所有这些都导致执政体系加剧瓦解，而希特勒自己没有真正填补他故意制造的决策中心的空白，对此他在身体上也越来越没有这个能力了。

因此，下面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了：作为独裁者统治帝国而且没有值得一提的反对派，这个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毫无疑问，他对人的心灵有着强烈影响的个性魅力从中起了重大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下面这点，即便是下定决心要对希特勒决策（例如在东线战争问题上）提出抗议的部分老练的名人在亲自听他演讲时也不仅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甚至会在会见后成为狂热的崇拜者，或者是像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那样，尽管主观上冷落对待，但是客观上自觉没有能力最终声明不再追随这个专制者。在与希特勒当面会谈时，只有少数对话伙伴——像是法国大使罗贝尔·库隆德（Robert Coulondre）或者是帝国经济部长沙赫特（Hjahlmar Schacht）——能逃过希特勒目不转睛的凝视。希特勒的魅力建立在这样的心理机制基础上：他在紧要关头能令其他人感觉到他紧绷到极限的意志力，这给他带来了能预见未来的天才幻想家的

名声[12]。

但是这并非全部。另外一个因素是，希特勒善于迎合每一次的多数听众的情绪并使自己好像是满足他们期待的工具一样。恰恰因为没有任何形式的内在内容，他更多的是试图在这种高涨的气氛下把他喜欢称做“不容更改”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当他作为演说家出现时尤其如此。但是他这么做原本也是在狭义的框架内，因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这种个性特质来面对一场真正的对话。具有代表性的是，希特勒几乎所有的决定都是通过在较长篇幅的讲话中向公众披露的方式作出的。这涉及对波兰作战、对苏联作战以及对美国宣战的决定。只有在慷慨激昂的亢奋状态（他的长生不老药）下，他才作出决定。尽管对目标构想的时间拉得很长，但是这些决定都是一时冲动、很多时候是在条件反射下引发的，它们从未伴随着对目标和手段的认真斟酌和考虑。

希特勒用这种领导方式几乎总是得到了肯定，这主要与一种氛围分不开，这种氛围很能说明他身边的人、发誓效忠于他的国社党干部举止行为的特点。它源自运动内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斗争——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目标和方法递增极端化的趋势源自组织结构，它主要是没有明确给予下属领导的职权的后果。希特勒确定了意识形态框架并给予必要的推动以便让下属保持这一路线，“挑选消极的世界观要素”（马丁·布罗萨特）事先确定了路线的方向（这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而且它将在迫害和灭绝犹太人中经历最严重的激化[13]。

政府、经济界和社会主要精英对党部分目标的广泛认同形成了它的背景，与此同时还有自20世纪20年代危机以来不断加剧的德国中产阶级对道德的漠不关心，以及积聚的《凡尔赛和约》综合征，整个民族都不愿接受该和约。1919年之后，希特勒在慕尼黑迅速利用了这种氛围，从而使这个实际上的无名之辈（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二等兵）变成一个使民族崛起为有着德国特色的千年帝国的幽灵。

希特勒拥有一个高度有效的国家机关，此外还有一个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敦促扩军和作出修改的军事集团，他们在把他推入总理府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作决策方面，他对这些潜力的利用不足。他依赖于非正式的顾问人员，拒绝看文件，转而采用口头的形势报告方式，并尽可能少地关心专业管理，比方说他任命不具备资质的人来担当国家领导职务，而且人员一旦任命，希特勒也同样不准备替换——任命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帝国外交部长就是个再清楚不过的例子，尽管后者在伦敦的荒唐行为备受指责。

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同样的还有希特勒只在某些情况下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习惯，不对影响进行评估就打开冲动的阀门，并且因为不断授予特别全权而日益加剧了国家机构的四分五裂。职务的便利和戈培尔的宣传部煽动的元首崇拜加剧了“抵制元首”的广泛趋势，以便在推动极端化之前先发制人，正如伊恩·克肖所指出的那样[14]。这一切肯定进一步加快了政权自我瓦解的进程，总理府的一个主要官员很早就称之为“秩序还不错的无序”[15]。战争和因为战争而降低了难度的对忠于国家立场的发动动员推迟并掩盖了政府的瓦解进程，但最终使这个进程变得不可逆转。

作为专制者的希特勒则忙于他早期的爱好——建筑、电影新媒体和他认为是艺术的东西，起初他把最初失败的责任推给他的将军们，但是，对苏战争的挑战促使他出于祖传的傲慢和对自己能力的高估开始事无巨细地指挥战争行动。自那之后他就把国家元首的责任和统帅的责任混为一谈了——而且这只是在由他策划煽动的众多战场中的一个。

在不断变化的总部的围墙包围下——最后是总理府下的元首地堡内，他日益逃避国家元首的活动和职责，从在盟军炸弹轰炸下成为瓦砾的德国大城市逃走，最后他也开始害怕德国公众，直到在高速公路上的生日招待会。在那期间，戈培尔、戈林、希姆莱和施佩尔每个人都以自

己的方式寻找机会让帝国这艘船重新变得可控并让希特勒继续远离决策中心。与之相对，马丁·博尔曼直到最后都在详细说明英雄式自我灭亡的构想，并让他的电传打印机服务于毫无前途的坚持抵抗斗争。最后，希特勒的自杀结束了一场政治和道德的惨败，人们所能想到的不能比这更糟了。

在纳粹领导的小圈子内，受“总体战”的影响，消除模糊不清的高层领导结构并精简领导机关的认识从1942年起就开始广为人们所接受。然而官员不得不体会到，希特勒拒绝彻底的改革，他害怕改革会威胁他的权威。因此他也拒绝早就该采取的措施，例如取缔因为四年计划部门的建立而变得多余的帝国经济部或者是取消可有可无的州高级法院。同样他也拒绝必要的节约或者简化管理，而且还在1944年安排重开关闭的慕尼黑赛马跑道[16]。同时他的个人威望但还有如直觉般出现的认识也发挥了作用——鉴于政治体制因为极端个人化而变得动荡，生人勿近的政策是明智的。

希特勒在早就该进行的高层领导结构改革问题上的谨慎态度最为明确地表明了这点。戈培尔在1943年初就推动形成一个具有特别全权的所谓的“三人委员会”，它应当将必要的合理化改革措施贯彻实施。但是这个包括总理府和国防军领导在内的新的委员会没有实现任何深刻的改变，因此戈培尔讽刺地称之为“三贤人”（heilige drei Koenige）[17]。同样，戈培尔推动的恢复帝国国防部长会议计划也没有获得成功。最后，在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明确提出全面改革要求之后，这位帝国宣传部长试图让自己获得“负责总体战的帝国全权代表”的任命，对此希特勒在1944年7月25日——戈培尔在帝国体育宫发表著名讲话一年之后——在中段军事危机的影响下才同意。

戈培尔借此一跃成为内政负责人的期望没有实现。改革倡议在发动国民坚持到底的意愿的宣传活动中烟消云散。希特勒自己（例如在女性

义务兵役制问题上）倒不如说保持着克制，而且，令他的宣传部长十分失望的是，他无法说服希特勒参加一些比较重大的公开活动场合，戈培尔通过强调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e）在七年战争战役中的传奇来费劲地掩饰这一点[18]。

尽管这些瓦解的迹象已经明确无误，但在政府官员小心翼翼的批评下，希特勒的地位直到战争深入仍旧未被动摇，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布拉赫尔一语中的地说："权力职能的对抗作用唯独在有无限权力的元首的决定性地位中被废止了"，这种决定性地位源自"势力集团无法一目了然的并列和对抗"[19]。希特勒的领导方式以这样一个原则为基础：在下属保证个人忠诚的情况下给予其宽大的活动空间。所以说纳粹体制内存在鲜明的派系主义是有道理的[20]。这给这位专制者带来了相当大的个人活动自由。他不用非得处理材料或者提议，只要他们不触及他的权威，而且他倾向于让冲突和竞争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自行优胜劣汰。

在1942年夏的著名意见书当中，威悉河—埃姆斯河区省党部头目卡尔·勒韦尔拒绝了希特勒偏爱的并在斗争时期曾一度十分成功的"任其生长"原则，这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摩擦造成了重大的损失[21]。但是这一行动导致"元首"不仅从日常决策行为——以及因此也从现有的政府事务中退出，而且也从对其错误决策和罪行的批评中免责了。"如果元首知道会怎样？"模式反映了一种十分广泛的思维方式。它把一系列错误决策归罪于党、党卫队、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但是将置身错误顾问中央的希特勒排除在外。

希特勒在莱比锡人民法院诉讼背景下将在党内势力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元首神话有计划地扩大。希特勒敬礼的采用、对他个人宣誓效忠、在党日发展起来的仪式和干部对希特勒的追随关系都服务于这个目的[22]。通过将希特勒说成是上帝派来的"国家元首"，戈培尔一步步实现了将

个人对民族的忠诚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的计划。所有可以想到的民族认同的基准点都对准了希特勒崇拜。在这方面，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不同，在那里，除了领袖墨索里尼之外，维托里奥·艾玛努埃尔（Victor Emanuel）国王和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元帅也仍旧是民族认同的人物。并不矛盾，第三帝国也成功地在公众的意识当中建立起了阿道夫·希特勒个人与德意志民族虚拟的一致性，因此任何对专制者的背弃似乎都成了对民族的背叛。所以，7月20日的密谋反叛在发出第一声号召时选择了这样的捏造说：希特勒成了“不了解前线的”国社党干部的暴动的牺牲品[23]。

在艺术上加工希特勒崇拜导致人们对管理不善、失败和政府犯罪升级的批评没有转移到希特勒的身上。接受西方盟国询问的那些德国战俘并不畏于严词指责纳粹制度[24]，但是对于指责希特勒个人却是例外。这解释了下面这个现象的原因——尽管自从开始攻打苏联后元首神话最初遭受了损害，但是在德国公众当中越来越多地遭遇保留和拒绝态度的这个神话却仍旧不同寻常地长期存在了很久。直到1939年的时候，希特勒仍被首先视为维护和平的保证人并受到崇拜，直到1940年人们还相信他有能力及时结束战争。到了1942年，当人们面临着将在战争中度过第二个冬天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大概最迟到1945年4月时，民族与“元首”个人的认同才变成了对他出卖民族的指责。

1945年之后在公众但也包括在历史编纂中占据主导的希特勒主义首先把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归咎于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专制者的影响，这是他们推翻对希特勒的崇拜并把这场灾难的责任推给专制者个人的一种反映。其中有一个明显的辩护的倾向。它反映在德国人被希特勒“诱惑”的陈词滥调当中，就好像强权政治的傲慢和罪恶的种族幻想没有在纳粹宣传当中得到足够的表现似的。由此，下面这种习惯也就有了解释——使对这种对希特勒的评价刨根问底的作者遭受“低估”或者是干脆“淡化”专制者责任的指责[25]。关于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在国会纵火案中是否独自作案的讨论是由这样的潜台词所决定的——避免“国民教育”不希望看到的对希特勒的辩护[26]。

消除这种对希特勒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作用的高估、明确国家社会主义领导精英在这场“德国灾难”中的参与并认识希特勒个人的平庸[27]，实现这些可能花了相对较长的时间，尽管——正如上面所提到过的——譬如指出“意志崇拜”是专制者的核心行为动机的彼得·斯特恩（Peter Stern）或者很早就揭露了希特勒神话作用方式的伊恩·克肖等洞察敏锐的作家提前认识到了这些[28]。

希特勒作为人“走下神坛”主要是马丁·布罗萨特的成就，这成为可能是因为之前掌握在盟军手上的德国档案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外开放。1966年，我在一本关于“第三帝国官场”的书中着手研究了这个“烫手山芋”，并在书中强调说，希特勒“在所有需要原则性和确定立场的问题上”都是“一个软弱的专制者”。这在业内引发了热烈讨论，其中多次出现这样的误解：我宣称希特勒没有无限的权威[29]。与之相对，我的评论提到了眼下已经普遍得到研究确认的现象——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十分顽固不化，但是希特勒在很多情况下害怕作决策，特别是在战争后期他没有能力最终做出内部革新的决定，并且没有能力在多种可能中作出抉择。他更倾向于支持一种不成功便成仁战略，而且他越来越不愿作出必需的政治妥协。

在提高目标的同时又无力评估可供支配的资源，这对希特勒来说十分典型，而且它与日益加剧的对现实的逃避和对现实视而不见密不可分。对此最接近他的伙伴在1933年之前就曾作出警告，并强调说，空想的元首不能落入不负责任的顾问手中[30]。事实上，没有能力吸引独立自主同时又有批评能力的顾问的是希特勒自己，而且他同样不愿在军事问题上容忍矛盾的存在。尽管他在意识形态上无限狂热，但他仍是个软弱的专制者，一个最终通过可悲的自杀完成了英雄式自我牺牲的随波逐

流者。

事实证明，希特勒甚至没有能力长期保护已经取得的成就——即便是外交成就。倒不如说，作为政治家，没有什么成绩是他不能——出于极度的妄自尊大——再失去的了。他的没有分寸导致他很早而且是必然地开始毁灭他的政治作品——他把业已实现的一切立刻通过一场空前绝后的滥杀无辜而孤注一掷，目的是追逐一个甚至连轮廓都没有的虚幻的目标。他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启动了一个灾难性的政治动力，“他的历史角色仿佛带着其内在的必然性而走向了自我毁灭”。与此同时，他“仅仅只是一个因为一切机构、法律和道德障碍都被消除而释放出来的反人道主义冲击链的极端拥护者”[31]。

希特勒根据一个仅仅看似封闭的世界观思想体系行动，而且在这方面他是不断蓄积的极端化的发动机。但是将这些虚幻目标贯彻实施是身处部门争斗丛林的下属机关提出的。这关系到一个进程，马丁·布罗萨特以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表达对此进行了简要说明：这些惯用语不得不“最终要求自己‘信守诺言’”，被当作用于政治动员的空想的最终目标进行宣传的东西在性急的执行者手中就变成了可付诸实践的暴力行动[32]。因此，希特勒也成了德国社会拥护的人物（而他则以他们作为共鸣的基础），即使他一点点正面的成就都没有。

很能说明特点的是，希特勒避免了公开与杀害犹太人以及因此而不可名状的“水晶之夜”事件联系起来。他也从不直接谈及杀害犹太人，或者是让它看来会是未来要发生的事。因此，不管他是如何驱动针对犹太人的灭绝进程的，我们仍有可信的理由相信这一推论——希特勒没有明确下达包括总体解决“犹太人问题”以及必然还有“大屠杀”在内的命令[33]。希特勒统治的非正式结构允许这样的行事方式发生，它甚至使之成为可能，因为适合该体系的抵抗的所有出发点都被剥夺了。希特勒自己遵守着这样的语言规范，“进一步向东”驱逐犹太人以及将他们“作为游击

队员对待”。但这对下面这个事实没有丝毫的改变——希特勒个人对“杀害犹太人”的罪行以及对苏联进行灭绝战争负有责任，并直接和间接地启动了它们。与此同时他使得大规模犯罪的想法在他身边消失，这种态度席卷了整个德国精英群体。囿于“成员职责”的思想并且受对道义漠不关心的深刻影响，在必须要这么做的时候，这些精英没能阻止一个政治冒牌货的滥杀无辜。

---

[1] Sebastian Haffner，*Anmerkungen zu Hitler*， Muenchen 1994 26 Aufl.

[2] Karl Dietrich Bracher，*Zeitgeschichtliche Kontroversen. Um Faschismus，Totalitarismus und Demokratie*， Muenchen 1976，S.85.

[3]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Aufstieg und der Untergang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1918-1933*， Muenchen 2001 2 Aufl.，S.207f。

[4] 参见Adolf Hitler的*Mein Kampf*， Muenchen 1933 67 Aufl.，S.422f.

[5] 有关该综合征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ie NSDAP. Typus und Profil einer faschistischen Partei，刊登于*Von WEimar nach Auschwitz. Zur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n der Weltkriegsepoche*， Stuttgart 1999，S.201-213。

[6] 参见Peter Longerich的描述，*Hitlers Stellvertreter. Fuehrung der Partei und Kontrolle des Staatsapparates durch den Stab Hess und die Partei-Kanzlei Bormanns*， Muenchen 1992。

[7] 有关这方面参加最近Andreas Heusler的*Die Geschichte des ‘Braunen Hauses’*， Muenchen 2008。

[8] 参见Lothar Gruchmann，Die Reichsregierung im ‘Fuehrerstaat’. Stellung und Funktion des Kabinett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刊登于Guenther Doeker/Winfried Steffani（出版）的*Klassenjustiz und Pluralismus. Festschrift fuer Ernst Fraenkel*， Hamburg 1973，S.187-233。

[9] Lammers an Frick am 27.6.1934，BA R 43/II 495；请参阅P.Diehl-Thiele的*Partei und Staat im Dritten Reich*， Muenchen1969，S.69。

[10] 请参阅Dieter Rebentisch的*Fuehrerstaat und Verwalt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1939-1945*， Stuttgart 1989，S.45f。

[11] 参见Hans Mommsen， Ausnahmezustand als Herrschaftstechnik des NS-Regime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Von Weimar nach Auschwitz*， Muenchen 2001，S.253f.和Martin Broszat的*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Muenchen 1969，S.103f。

[12] 请参阅J.P.Stern的Hitler. *Der Fuehrer und das Volk*， Muenchen1978，S.22f。

[13] Martin Brozsat，*Nach Hitler. Der schwierige Umgang mit unserer Geschichte*， Muenchen 1988，S.28f。

[14] 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 Stuttgart 1998，S.665f。

[15] Hans Mommsen， Aufgabenkreis und Verantwortlichkeit des Staatssekretaers der Reichskanzlei Dr.Wilhelm Kritzinger，刊登于*Gutachten des Instituts fuer Zeitgeschichte* Bd.2，1966，S.376。

[16]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Ausnahmezustand als Herrschaftstechnik des NS-Regime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Von Weimar nach Auschwitz*， Bd.2，1966，S.263f。

[17] 参见Hans Mommsen， Die Rueckkehr zu den Urspruengen-Betrachtungen zur inneren Aufloesung des Dritten Reiches nach der Niederlage von Stalingrad，Bd.2，1966，S.315ff。

[18] 请参阅 J.P.Stern的*Hitler*， *Der Fuehrer und das Volk*， Muenchen1978，S.31f。

[19] Karl Dietrich Bracher， Stufen totalitaerer Machtergreifung，刊登于VfZ 4（1956），S.42；请参阅Ian Kershaw的Der *NS-Staat*， Reinbek 1988，S.130ff。

[20] 最基本的仍旧是Joseph Nyomarkay的*Charisma and Factionalism within the Nazi Party*， Minneapolis 1967。

[21] 参见Mommsen， Die Stellung Hitler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刊登于同一作者的*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Ausgewaehlte Aufsaetze*， Hamburg 1991，S.224。

[22] 基本内容参见Ian Kershaw的*Der Hitler-Mythos . Vo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n Dritten Reich*， Muenchen 1980，S.46ff。

[23] 参见Kaltenbrunner-Berichte am Bormann und Hitler ueber das Attentat vom 20.Juli 1944，刊登于Hans-Adolf Jacobsen（出版）的*Spiegelbild einer*

Verschwoerung， Stuttgart 1961，S.24。

[24]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ie Aufloesung des NS-Herrschaftssystems，刊登于Michael Gruetter（出版）的*Geschichte und Emanzipation. Festschrift fuer Reihnhard Ruerup*， Frankfurt am Main 1999。

[25] 参见Karl Dietrich Bracher，Probleme und Perspektiven der Hitler-Interpretation，刊登于同一作者的*Zeitgeschichtliche Kontroversen. Um Faschismus*，*Totalitarismus und Demokratie*， Muenchen 1976，S.83ff。

[26] 参见Sven Felix Kellerhoff的*Der Reichstagsbrand. Die Karriere eines Kriminalfalls*， Berlin 2008。

[27] 参见J.P.Stern的根本描述，*Der Fuehrer und das Volk*， Muenchen 1978，bes.S.55ff。

[28] Kershaw，*Der Hitler-Mythos*， *Vo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n Dritten Reich*， Muenchen 1980，S.149f.；还有Martin Broszat的引言，Muenchen 1969，S.9ff。

[29] 参见Hans Mommsen，*Beamtentum im Dritten Reich*， Muenchen 1966，S.8，Anm.26；请参阅Ian Kershaw的*Der NS-Staat. Geschichtsinterpretationen und-kontroversen im Ueberblick*， Hamburg 1988，S.187ff。

[30]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Adolf Hitler aus der Sicht von Gefolgsleuten und Zeitgenossen，刊登于同一作者的*Von Weimar nach Auschwitz*， Muenchen 2001，S.81ff。

[31] Mommsen，Hitlers Stellung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刊登于同一作者的*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Ausgewaehlte Aufsaetze*， Hamburg 1991，S.66f。

[32] Martin Broszat，Soziale Motivationen und Fuehrerbind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Nach Hitler. Der schwierige Umgang mit unserer Geschichte*，*Muenchen* 1988，S.32f。

[33]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Auschwitz 17.Juli 1942 . Der Weg zur europaeischen 'Endloesung der Judenfrage'*，Muenchen 2000，S.108ff.；同一作者的Der Wendepunkt zur 'Endloesung'. Die Eskalatio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刊登于Juergen Matthaeus/Michael Mallmann（出版）的*Deutsche*，*Juden*，*Voelkermord*， Darmstadt 2008，S.67f。

第8章 双重人格：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早期对希特勒的诠释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1938年移居英国，到那里之后他先是在流亡德语报《报纸》（*Die Zeitung* ）工作[1]。他始终不懈地致力于这样的工作——使英国大众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有更加具体了解并消除对整个德国人民的谴责批判。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见证是他的争鸣与启蒙著作《论德国之双重性格》，该书是他在“奇特的战争”（drole de guerre）时期撰写的，并在1940年由马丁·塞克尔和沃伯格（Secker & Warburg）出版社出版[2]。尽管他在32岁的时候还是政论界的新人，而且当时还不得不求助于英文翻译，但他下定决心，即便是作为英国移民也要为打倒纳粹政权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促使英方将德国移民当作传声筒。哈夫纳的《论德国之双重性格》一书中包括一篇慷慨激昂地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檄文，并以难得一见的敏锐和富有远见的分析见长。它们使他的著作看起来像是同属一个时代的立场鲜明的纳粹政权反对者的一流证词，但同时也在很多方面领先于后来的历史分析。这首先涉及哈夫纳对阿道夫·希特勒以及主要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评价，它们显然与同一时期的评价不同[3]。哈夫纳的研究坚决反对当时在英国也十分普遍的看法：阿道夫·希特勒本质上的立场是温和的，而且人们必须支持他来对抗运动内部的极端分子。这种普遍的看法也促成了内维尔·张伯伦采取绥靖路线并迁就、迎合希特勒的意愿。哈夫纳警告不要与希特勒缔结任何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这不仅是考虑到《慕尼黑条约》的破裂，也是因为希特勒在心理上没有能力履行他所承诺的责任。世界只是在缓慢地露出曙光，“希特勒不会遵守他的诺言”，很多人还不明白，“他不会感到他公开宣称的目标、纲领和想法的约束”[4]。在这里哈夫纳指的绝对不仅仅是战术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意义上的。他指出了“希特勒表述的难以置信的矛盾性”，它们不过是掩盖其极端自闭症的“面具和面纱”[5]。哈夫纳认为，希特勒的自我中心是解释其行为的关键。希特勒政策中的“唯一

固定不变的”因素是，“尽管一切无法估量，但总是为他个人量身定做”，而且为一种“隐蔽的、诡秘的卑劣感”充当着精神上的补偿[6]。因此他把希特勒的行为首先描写为曾经的“受压迫者”的报复行动，他“在一个慕尼黑阁楼里教老鼠如何为了吃到面包屑而跳跃”[7]。

哈夫纳明显的传记方式强调了希特勒相对于他所考虑的一系列思想的独立性。试图将希特勒理解为“被连接在一个理念或者运动火车头”上的煤水车，错误地判断了希特勒摧毁一切意识形态类别的执拗和固执。哈夫纳认为，与之相比较，将“德国和欧洲历史理解成希特勒私人生活的一部分”要更贴切一些[8]。他说，“愤怒怨恨、个人崛起和一个装腔作势的强烈渴望的满足”——希特勒把原则上可以替换的政治内容置于这些目标之下。

哈夫纳的心理学诠释与J.彼得·斯特恩的解释相一致，根据后者的说法，希特勒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将自己的私人范围变成了一个公众的领域。这给了这个不起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二等兵以真实性可信性，这一再给他带来了大批支持者的盲目肯定[9]。然而哈夫纳的分析没有停留在对私人范畴的强调上，而是试图同时将希特勒理解为同一时期德国自我认知的代表人物。在这一背景下，他表示，希特勒个人的不幸与德国1919年的困境如此巧合地同时发生并非偶然[10]。哈夫纳指出，德国以“愤慨、抗拒和仇恨”应对1918年失败的特性与希特勒对1918年11月失败的反应是一致的。“希特勒只需要把‘希特勒’换成‘德国’就能唤起成千上万和成百上千万德国人充满了仇恨的、可怕的怒火，正如他所感受到的那样。”因此希特勒对在大众中存在的仇恨感和愤慨发挥了催化剂的功能，而且他不仅把这些仇恨和愤慨集中到“11月政变”，也集中到所谓的犹太人对德国人不幸所负有的责任上。

因为这些论点，哈夫纳在很多地方比后来马丁·布罗萨特的分析早了许多，后者把希特勒的崛起和受欢迎主要归因于：希特勒发挥了德国

社会中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不满的倡导者以及这种群众情绪的发声筒的作用，而且他因为强大的移情能力和无可否认的蛊惑煽动天赋而很善于适应这种情绪[11]。当然，哈夫纳没有得出与布罗萨特相同的结论：必须最终将希特勒解释成德国历史发展的后果而不应将其视为所发生事件的最终根源。因为只有“在普遍亢奋的背景下他才能把自己的神经过敏体会成普遍的事实，并将集体的神经过敏变成自己疯癫错乱的共鸣板”，布罗萨特这样论证说，并借此将希特勒元首原则的主观与客观功能区分开来[12]。

与此相对，离开德国这个“第一个为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所占领的领土”对哈夫纳影响很大[13]。对他来说这种表达的关键是，将英国公众的注意力转到公开发声有困难、分裂成各个组织的德国反对派身上。当然，他的新秩序建议所具有的突出的反普鲁士和反中央集权基本特征和他对纳粹统治的分析处于无法消除的对立关系，他认为，纳粹统治主要由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改造所决定[14]。因此，哈夫纳论证说，西方大国的作战目标绝对不能局限于在军事上打败这个德意志帝国，而必须是帝国联邦的瓦解和受普鲁士影响的帝国传统的消除。他的与1866年前存在的德国邦联挂钩的新秩序建议显得陈旧过时而且自相矛盾。它们源自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国家社会主义成功地将俾斯麦帝国这样的普鲁士传统用于自身地位的合法化并因此使它的价值大幅降低[15]。

哈夫纳以罕见的尖锐犀利驳斥了希特勒的讲话和行为存在“某种政治家动机”的想法，而且他强调，希特勒“不是什么政治家，而是戴着政治家面具的骗子”，是国家首脑和部长圈子里的“一个伪装得很糟糕的强盗”[16]。如果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诠释可能显得没什么独创性，但是从1939年的角度来看，当时希特勒只显示出了成功而并没有受挫，那么这种诠释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大胆的，而且这还是对一个刚刚流亡到伦敦、个人生存都很困难窘迫的德国移民来说。

哈夫纳对国家社会主义专制的见解当中至关重要的是下面这个论断：被正面突出强调的专制者的目标说到底只不过是完全服务于扩大权力和加强个人权威的赝品。因此，哈夫纳也不畏于将希特勒称为“赌徒”，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永久价值的虚无主义态度，他可以孤注一掷。作为“最出色的潜在自杀者”，希特勒没有任何出类拔萃的地方，而且“除了和他的自我（的联系）之外”，他没有任何社会联系[17]。

像是有千里眼似的，哈夫纳明确地预言，“为了维护或者扩大他的权力——他有今日所要归功于的权力、在他与迅速死亡之间仅存的权力”，希特勒将冒任何可以设想到的险。因为能保护他不重新落入他已经摆脱的“地狱”的，除了行使权力之外一无所有了[18]。这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希特勒的心态，它看不到其他的选择和不同的可能性，而是醉心于一个不顾所有阻力坚持下去的不成功便成仁战略，正如哈夫纳强调的，它包括，决定一旦做出，在遵循的方面会特别固执呆板，但在对待近期目标上具有很高的战术灵活性。哈夫纳强调，这个专制者只知道一种实现自己要求的方法，“不断、直接和不加掩饰地使用武力”，这也是他自己的成功处方[19]，他说的没错。哈夫纳把这种心态解释为希特勒在1919年之前的局外人身份的反映。

对于西方外交界愿意接受希特勒进入政治家圈子、给予其外交承认并将其作为同等地位的伙伴对待，哈夫纳进行了十分严厉的谴责。他警告说不要拿希特勒的和平承诺当真，并强调说，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天生没有能力生活在和平中”，而他这么说完全是有理由的。因此，他认为，结束战争要以希特勒和纳粹体制的垮台为前提，同样，战争首先是一场“对希特勒的战争”[20]。所以说，哈夫纳在这时就已经要求对希特勒进行国际审判，只有这样才能撕下他脸上的面具，揭露他“骗子”的真面目。

通过把这个专制者描述成不能纳入常规的政治范畴、同样也不信奉

确定利益的政治骗子，哈夫纳指出，这里关系到的是一种新式政治，它不能用原本的标准来衡量。因此他否认纳粹政策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并且认为希特勒天才的地方仅仅在于“肆无忌惮的自恋”和他“本能地”领会“权力特定形式”的天赋能力[21]。哈夫纳说，因为拜罗伊特（Bayreuth）圈子的影响——该圈子“完全提前理解了希特勒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观”，希特勒的“政治表现癖”和他“对制造戏剧性场面的偏好”获得了特殊的影响力[22]。

然而哈夫纳不准备承认纳粹世界观拥有具有承载力的实质内容。他认为，纳粹世界观是“除了名称之外”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它除了反闪米特人的动机之外就是个“十足的谎言”[23]。他把下面这个值得一提的观察与此联系起来——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特有活力同时让人们可以称之为积极内容的所有一切都慢慢流光。“疯狂的狩猎”，他这样说道，突然“再也没有了目标和终点”。

这一观察值得人们思考。事实上，除了灭绝犹太人的消极目标之外，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内容缩减成为空洞的套话的集合，并在政权开始的几年之后距离一个内容易懂的正面纲领越来越远，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对此，希特勒禁止在战争结束之前考虑未来欧洲的塑造就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例子[24]。

与此同时，哈夫纳指出了一个事实：纳粹运动及其政权不能容忍政治的静止状态和事情的发展停滞不前，因为这必然将导致“这座空中楼阁的倒塌”[25]。他认为，本质上这个政权欠缺真正的内在稳定，并将仅仅靠“为了优异而优异”、收买下属领导和无尽的活力凝聚在一起。该政权的所有特征都指向短命。在这方面，哈夫纳主要提到了下属的虚无主义，如果这个专制者被除掉，他们就会失去所有的凝聚力。因此他预言，只要除掉希特勒就将导致该体制的迅速崩溃，正如事实所表明的，这完全是一语中的。

然而哈夫纳通过指出一点对这一观察进行了局限——从一开始就被纳粹化的第二代的成长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局面。这一预言随着20世纪40年代事态的发展而得到了证实。看一下党卫队的组织构造就可以知道，保证纳粹统治制度相对有效的不是“老战士”，但或许是通常比较年轻的权力斗争者集团 [26] 。

接着，哈夫纳以出人意料的犀利宣称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实质内容并且令人惊讶地“思想水平极低”。他证实说，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本质上必须理解为动员的技巧，例如从1933年9月希特勒在“胜利的党代会”上的阐述可以得知 [27] 。“纳粹主义”，他在1939年解释说，“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对特定类型的人显得有吸引力的具有魔力的表达”。它的“世界观”只是“可疑的矛盾的集合”，但是它的效力却不能低估 [28] 。

哈夫纳率先对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作的局限揭露了它在功能上的运用，这在1939年的时候是对希特勒诠释的一个新要素。然而，哈夫纳在他战后出版的作品中部分收回了这一观点或者对其进行了调整修改。在埃贝哈德·耶克尔（Eberhard Jaeckel）的影响下，他在其《破解希特勒》一书中承认，希特勒编造出了“一个有一定说服力的、尽管边缘都支离破碎的”思想架构 [29] 。但是他仍坚持认为，希特勒的世界观具有显著的唯意志论特征，与耶克尔不同，他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它突出强调了纳粹世界观中的矛盾和内在关系的紧张 [30] 。

三十多年之后，类似的见解才开始在现代史研究中得到承认，它们绝大多数强调纳粹意识形态的操纵特性和无实质内容，并对从纳粹世界观中简单地推导出政权的政策提出了质疑 [31] 。哈夫纳指出，这里的关键不是人们传统理解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与特殊政治理解密不可分的特有心态，这在今天得到了日益广泛的承认。

事实上，希特勒倾向于悄无声息地放弃原本党纲的内容，哪怕是核

心内容，如果它们不符合当前战术利益的话。面对约瑟夫·戈培尔强化的元首崇拜和粗暴的反闪米特主义，起初很显著的民族主义暗流日益退却，职业思想也是同样。剩下的只有虚幻的最终目标设想，除了力争世界统治地位的陈词滥调和实现统治民族人种组成均一的幻想之外它仅限于对“民众共同体”神话的介绍。希特勒和戈培尔再三要求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本质上是个空洞的套话。1932年12月，希特勒在防止他所担心的所谓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对党的分裂时发明了这套套话，而戈培尔在1944年时还提醒专制者要坚持该思想的绝对性[32]。

在哈夫纳写下他对第三帝国内在需求分析的那个时候，他在很多方面的认识都是引人注目的。当时，和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仍热衷于政权不会再长期存在的希望当中，而且他关心的也是成功地彻底消除国家社会主义和使希特勒丧失信誉的必要性。他对政权的诠释绝大多数局限在希特勒的角色上，它低估了来自起初毫发无伤的国防军和继承下来的管理部门的稳定力量。

哈夫纳对德国民众态度的描述必然具有高度的假定性质（他把他们分为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忠于政权的和不忠于政权的国民以及反对派几部分），但是他反对泛泛地把所有德国人都视为无条件的希特勒的追随者，而且这是有道理的。他努力让英国公众明白，在极权主义条件下表达对政府决定的摒弃或者与其保持距离的可能性接近于零。由于迄今为止的社会和机构形式日益瓦解，明确与政府站在反对立场的那些人也很难找到出发点来采取不会以剖腹自杀告终的抵抗行动。

出于这位移民想做点事的强烈欲望，哈夫纳高估了由外对德国国内局势施加影响、同时让德国移民作为不忠于政权的国民的声音发表意见的可能性。反对派必须具备行动前景的论点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显而易见，但是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它几乎没有得到英方的什么回应。因此，1939年时哈夫纳就转而主要尝试对当德国失败（他认为这是自然而

然的）时盟军的德国规划施加影响。同时他准确地认识到，在纳粹制度条件下是没有什么可能回到魏玛共和国了，并且认为到目前为止的政治党派和组织的抵抗尝试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取而代之，他要求形成一个“新阵线”，当然他不想它与左翼的人民阵线（Volksfront）的努力相混淆。这些考虑反映了他的正确认识，在当时的德国，回到魏玛议会制度似乎是陈腐过时的了。哈夫纳强调，“新组合和反命题”的时机成熟了，而且他对牺牲精神不屑一顾，特别是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试图以此来保存它们的非法组织[33]。与此同时，他低估了非法的德国共产党尽管在盖世太保严重干预的情况下仍旧还具有的影响力[34]。虽然如此，他仍及早地认识到，一个“真正有机会推翻纳粹的新的反对派阵线”开始在迄今为止的政治形式之外形成了。事实上，将承担1944年“七二〇”刺杀行动的第二阶段的抵抗是脱离了预示着返回到魏玛时期的党派政治阵线立场展开的。

由于在对其内在动力的评估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哈夫纳在1939年所做的摧毁纳粹制度和不能向它伸出妥协之手的檄文因而从其他同时代的表态中脱颖而出。值得一提的是，他警告不要低估该政权的效率，不要把经常得到突出强调的国家社会主义干部的“优异”当做全部，他揭露说，那只是纯粹的行为主义。另外，他反对视这个纳粹国家为“纯粹的专制政体”的错误见解。他强调说，恐怖主义和宣传鼓动、专制和无政府主义、“责无旁贷的顺从”和“责无旁贷的热情”相结合构成了它真正的本质[35]，而他说的没错。当代史研究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看法。

与此同时，哈夫纳明确表示，国家社会主义宣传的相对有效性是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德国人民的社会心理状态相一致为基础的，他说，他在根深蒂固的反自由主义、对公共管理行为普遍没有兴趣中——但也在从属于国家领导个人的意愿中看到了这种心理状态。他的结论是，未来的民主化不仅要以完全摧毁纳粹制度为前提，还要以瓦解吸收了普鲁士强权国家思想的帝国传统和德国的联邦结构为前提。该结论的得出比

1945年5月8日之后在西德一度得到承认的明确的联邦渴望早了很多。

经常可以听到的对同时代反对者的批评并不适用于哈夫纳，批评说，这些同时代的反对者“低估”了希特勒（不管它指的是什么）[36]。哈夫纳明确无误地指出了这个专制者“毁灭世界”的作用，并大力倡导从三重意义上根除他，“作为制度、人和传说”[37]。他及早为一种对该政权的理解扫平了道路，这种理解杜绝了高估希特勒智力和政治表现的可能性并破坏了该政权宣传性的自我美化。

因此，他避免了将希特勒在政权内的核心地位及其毁灭能力与即便是仅仅间接的建设性特性和作用联系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他一再强调其极度毁灭性和（至少同样重要的）非法——也就是犯罪特征。当了解到哈夫纳在没有了解到内部材料、仅借助对可获得的印刷材料的细致研究表达了他的见解时，所有的这一切就变得更加值得一提了。在其1978年出版的《破解希特勒》一书中，哈夫纳保留了很多最初的立场（尽管有时形式上有所弱化），特别是他对希特勒作为个体的蔑视。希特勒“根据个人生平的标准搞政治”的基本命题他同样保留了，正如他拒绝承认希特勒具有政治家的素质[38]。然而从这时开始，他对希特勒组织天赋的强调要多了很多，并把他称做一个“精力极其旺盛、极富想象力和极有效率的推动者”[39]。哈夫纳特别用希特勒所谓的经济政策的成功来证明后者，并承认其具有相对的军事战略天赋，对此在最近的希特勒研究中评价则有所不同[40]。另外，希特勒“害怕拍板”和没有能力“建立长久统治”并从制度上保障一旦实现的东西[41]，此时哈夫纳对这方面的强调比以往更多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尤为明显，正如哈夫纳强调的那样，因为目标的无限升级，它必然会失败。哈夫纳说，“借助空前绝后的武力行为”，希特勒“恰恰导致了与他希望产生的结果相反的结局”[42]。尽管对这个专制者个性的评价不一，目前当代史研究与哈夫纳的很多说法接近，特别是对第三帝国意志形成过程更准确的了解驳斥了在国家最高端的是一个指挥井井有条的国家元首的假设。同样，希特

勒害怕作决定和他丧失现实感的趋势越来越突出地显露出来[43]。最晚到伪造希特勒日记事件的时候就已经表明——格哈德·魏因贝格（Gerhard Weinberg）和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等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希望从起初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库耀（Kujau）的伪造日记中找到的统治秘诀是不存在的，因此希特勒世界观的坚定的内在核心也是不存在的[44]。毋宁说，在大量宣传的所谓最终目标的空想外壳下隐藏着的并非具有承载力的政治实质。纳粹体制真的只是徒有其表。

哈夫纳1939年的研究对善于思考的个人形成的挑战不比他后来在《破解希特勒》以及相关出版物中[45]对纳粹政权的分析小。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希特勒的角色和德国政治文化与生俱来的弊端之间的联系，同时又不落入可疑的希特勒中心论当中，后者的辩解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哈夫纳对双重人格、希特勒政权犯罪基础的证实因为一种独一无二的世界观而闪耀着光辉，而且除细节问题之外，他锐利的分析即便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仍旧没有人能够超越。

---

[1] 请参阅Horst Moeller的Exilpublizistik in Grossbritannien. Sebastian Haffner und Die Zeitung，刊登于Gerhard A.Ritter/Peter Wende（出版）的*Rivalitaet und Partnerschaft. Studien zu den deutsch-britischen Beziehung im 19.und 20.Jahrhundert. Festschrift fuer Anthony*，Paderborn 1999。

[2] Sebastian Haffner，Germany. *Jekyll and Hyde*，London 1940；1941年New York Dutton &Co.出版的美国版。眼下该书已经有了翻译回德文的版本，1900出版社1996年以Jekyll & Hyde. *1939 Deutschland von innen betrachtet* 的题目出版了该书。

[3] 请参阅Gerhard Schreiber的*Hitler*，*Interpretationen 1923-1983*，Darmstadt 1984，S.85f.，还有S.71f。

[4] Haffner，Germany. *Jekyll and Hyde*，London 1940，S.14f。

[5] Haffner，Germany. *Jekyll and Hyde*，London 1940，S.19。

[6] Haffner，Germany. *Jekyll and Hyde*，London 1940，S.18和S.20。

[7] Haffner，Germany. *Jekyll and Hyde*， London 1940，S.17。

[8] Haffner，Germany. *Jekyll and Hyde*， London 1940，S.13f.

[9] 参见J.Peter Stern，*Der Fuehrer und das Volk*， Muenchen 1981 2Aufl.，S.91。

[10] Haffner，Germany. *Jekyll and Hyde*， London 1940，S.31f。

[11] 请参阅Martin Broszat的Soziale Motivation und Fuehrer-Bind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Nach Hitler. Der schwierige Umgang mit unserer Geschichte*， Muenchen 1988，S.22ff。

[12] 请参阅Martin Broszat的Soziale Motivation und Fuehrer-Bind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Nach Hitler. Der schwierige Umgang mit unserer Geschichte*， Muenchen 1988，S.24f。

[13] Sebastian Haffner，*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London 1941，S.107；请参阅Klemens von Klemperer的*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 Der deutsche Widerstand auf der Suche nach Verbuendeten*， Berlin 1994，S.64f。

[14] 请参阅Horst Moeller的Exilpublizistik in Grossbritannien，Exilpublizistik in Grossbritannien. Sebastian Haffner und Die Zeitung，刊登于Gerhard A.Ritter/Peter Wende（出版）的*Rivalitaet und Partnerschaft. Studien zu den deutsch-britischen Beziehung im 19.und 20.Jahrhundert. Festschrift fuer Anthony*，Paderborn 1999，S.22。

[15] 详见英文稿，London 1940，S.300ff。

[16] 详见英文稿，London 1940，S.21和S.35。

[17] 详见英文稿，London 1940，S.21f。

[18] 详见英文稿，London 1940，S.22。

[19] 详见英文稿，London 1940，S.23f。

[20] 详见英文稿，London 1940，S.33f。

[21] 详见英文稿，London 1940，S.27。

[22] Haffner，Germany. *Jekyll and Hyde*， London 1940，S.34f。

[23] Haffner，Germany. *Jekyll and Hyde*， London 1940，S.53f。

[24] 参见Hans Werner Neulen的*Europa und das 3.Reich. Einigungsbestrebungen im deutschen Machtbereich 1939-1945*， Muenchen 1987，S.34；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er deutsche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und die Ueberwindung der nationalstaatlichen Gliederung Europas，刊登于M.Hettling/P.Nolte（出版）的*Nation und Gesellschaft. Historische Essays. Festschrift fuer Hans-Ulrich Wehler*， Muenchen 1996。

[25] 请参阅Hans Werner Neulen的*Europa und das 3.Reich. Einigungsbestrebungen im deutschen Machtbereich 1939-1945*， Muenchen 1987，S.34；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er deutsche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und die Ueberwindung der nationalstaatlichen Gliederung Europas，刊登于M.Hettling/P.Nolte（出版）的*Nation und Gesellschaft. Historische Essays. Festschrift fuer Hans-Ulrich Wehler*， Muenchen 1996，S.36。

[26] 此外还有Michael Wildt对帝国中央安全局人员的研究，*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uehrungskorps des Reichsicherheitshauptamtes*，Hamburg2002，S.362f.。请参阅Gunnar C.Boehnet的The Jurists in the SS-Fuehrerkorps 1925-1939，刊登于G.Hirschfeld/L.Kettenacker（出版）的*Der ‘Fuehrerstaat’. Mythos und Realitaet. Studien zur Struktur und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Stuttgart 1981，S.364ff。

[27] Haffner，Germany. *Jekyll and Hyde*， London 1940，S.72f.

[28] Haffner，Germany. *Jekyll and Hyde*， London 1940，S.71f。

[29] Sebastian Haffner，*Anmerkungen zu Hitler*， Muenchen 1978，S.97f.；但是与Eberhard Jaeckel在*Hitlers Weltanschauung. Entwurf einer Herrschaft*，Stuttgart 1981 Neuaufl.中的分析相反，Haffner强调（特别是在S.134f）.，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在希特勒那里并不统一，Haffner，*Anmerkungen*， Muenchen 1978，S.103f。

[30] Sebastian Haffner，*Anmerkungen zu Hitler*， Muenchen 1978，S.97f.；但是与Eberhard Jaeckel在*Hitlers Weltanschauung. Entwurf einer Herrschaft*，Stuttgart 1981 Neuaufl.中的分析相反，Haffner强调（特别是在S.134f）.，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在希特勒那里并不统一，Haffner，*Anmerkungen*， Muenchen 1978，S.112。

[31] 参见Ian Kershaw的分析，*Der NS-Staat. Geschichtsinterpretationen und Kontroversen im Ueberblick*， Hamburg 1988，S.132ff。

[32] 参见die Denkschrift ueber die inneren Gruende fuer die Verfuegungen zur Herstellung einer erhoehten Schlagkraft der Bewegung，BA Potsdam，NS 22/110。

[33] Haffner，*Germany* . Jekyll and Hyde，London 1940，S.180f.

[34] S.208f.的这一表述——德国共产党是“完全不相干的”唯一的德国反对党——可能更多是源自政治愿景而不是真正的分析。

[35] S.208f.的这一表述——德国共产党是“完全不相干的”唯一的德国反对党——可能更多是源自政治愿景而不是真正的分析，S.150。

[36] 参见Schreiber的*Hitler-Interpretationen 1923-1983* ，Darmstadt 1984，S.27f。

[37] Haffner，Germany. *Jekyll and Hyde* ，London 1940，S.37。

[38] Haffner，*Anmerkungen zu Hitler* ，Muenchen 1978，S.30和S.61。

[39] Haffner，*Anmerkungen zu Hitler* ，Muenchen 1978，S.35。希特勒是个非常成功的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论证高估了他自身的能动性，并错误地认识了纳粹经济政策摇摆不定的影响；此外可参见Christof Buchheim的Zur Natur des Wirtschaftsaufschwunges der NS-Zeit，刊登于同一作者参与（出版）的*Zerrissene Zwischenkriegszeit. Knut Borhardt zum 65* . Geburtstag，Baden-Baden 1994，S.97-119。

[40] 参见Manfred Funke的Hitler und die Wehrmacht，刊登于Wolfgang Michalka（出版）的*Der Zweite Weltkrieg. Analysen. Grundzuege. Forschungsbilanz* ，Muenchen 1989，S.301-213。

[41] Haffner，*Anmerkungen zu Hitler* ，Muenchen 1978，S.141f。

[42] Haffner，*Anmerkungen zu Hitler* ，Muenchen 1978，S.25。

[43]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ie Stellung Hitler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刊登于同一作者的*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Hamburg 1991，S.67ff.；参见Manfred Funke的*Starker oder schwacher Diktator. Hitlers Herrschaft und die Deutschen* ，Duesseldorf 1989，S.80f.以及Dieter Rebentisch的*Fuehrerstaat und die Verwalt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Verfassungsentwicklung und Verwaltungspolitik 1939-1945* ，Stuttgart 1989，S.42f.和S.46。

[44] 参见Josef Henke的Die sogenannten Hitler-Tagebuecher und der Nachweis ihrer Faelschung，刊登于Friedrich K Kahlenberg（出版）的*Aus der Arbeit der*

Archive. Festschrift fuer Hans Booms， Boppard 1982，S.287-317。

[45] 请参阅Sebastian Haffner的*Zur Zeitgeschichte*， Muenchen 1982，S.96ff.；同一作者，*Von Bismarck zu Hitler . Ein Rueckblick*， Muenchen 1987，S.231-276；同一作者，Hitlers Leistungen，刊登于*Merkur 32* （1978），S.130-145。

第9章 希特勒、德国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与1914年7月4日不同，当时德国人民抑制不住的欢呼雀跃伴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对1939年9月1日进军波兰人们的感觉却是震惊和害怕。在德国几乎感觉不到对战争的热情。这很令人惊讶，因为帝国政府给予扩充军备和扩建国防军以最优先的地位，并同时推动全面的宣传活动以便“德国人民战备化”。作为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威望主要建立在他所实行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轰动性成功上。当1939年9月1日德国人民被迫要面对该政策的后果时，他们却畏缩了，并以为可以在与波兰的冲突可能只是插曲的这个值得怀疑的希望中高枕无忧。

德国人民的这种矛盾立场与他们还没有消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有关。尽管战争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很大一部分德国人容易受右翼党派及其背后利益集团的鼓动影响，这些鼓动称，社会主义民主党“在背后捅刀子”导致了军事的崩溃，使帝国稳操的胜券被人拿走。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领导下的最高陆军指挥部强迫立刻停火，这样他们就摆脱了对军事失败的责任，并把同盟国苛刻的停火条件扔给共和派政治家特别是核心领导人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出于对爱国主义的错误理解，温和派社民党人对明确强调军方的责任及其立刻换班犹豫不决。

德国公众不清楚帝国军事崩溃的原因。不承认战败加强了修正主义党派所展示的幻想——利用军事手段在不远的将来令1918年的失败翻盘是有可能的。大多数德国人认为《凡尔赛和约》在领土、经济和军事上的规定是苦涩的不公正行为，它被要求修订，政府方面推动的在“战争赔款问题”上的煽风点火在很长时间里深深影响着内政氛围。阿道夫·希特勒将这场反对所谓凡尔赛“耻辱和平”的斗争用作有效的宣传杠杆，并

毫不迟疑地保证把德国重新带回到强国之列[1]。

与此同时，尽管经济条件严峻，国防军领导仍成功避开了《凡尔赛和约》解除武装的规定，并启动了计划长远的非法军备扩充。“秘密国防军”的意义虽然往往被高估了，但是毫无疑问，隐秘的战争政策的扩军措施无意中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很大的帮助。例如，未来军队的招募和训练计划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也没有被超越。如果没有这些准备工作，1939年之前德国军备努力的规模就是不可能的[2]。

魏玛共和国时期，一再有共和党试图揭发这些非法扩军并控制这些准军事组织的民族主义组织和自由军团的活动——以恩斯特·荣格的《钢铁风暴》（*Stahlgewitter*）为代表的影响甚广的“军事国家社会主义”文学与尤里乌斯·古姆贝尔（Julius Gumbel）或者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等和平主义立场的作者相对，后者因为其小说《西线无战事》而遭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愤怒攻击。虽然如此，但这些防卫组织（Wehrverband）对魏玛共和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恰恰与它们从1923年起开始增强的军事重要性在同等程度上增大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宣传上利用部分民众所赞同的武力崇拜，特别是利用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红色阵线士兵联盟（Roter Frontkampferbund，德国共产党的保卫组织。——译者注）之间挑起的冲突[3]。

这种准备好动用武力的氛围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1929年之后的升级。但是决定性的突破是通过希特勒与年迈的帝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身边保守的德高望重者结盟完成的。这其中国防军领导的影响和立场就至关重要了，他们兑现了希特勒强行回到普遍义务兵制的承诺。与此同时还存在着这样的努力——为补充早就该补充的十万人的陆军把眼下已经发展壮大成一个包括几十万人的防卫组织的冲锋队拉到身边。因此国防军并非无限度支持希特勒的帝国内阁[4]。

希特勒决心用一切手段消除《凡尔赛和约》对军备的限制并推动帝

国重新扩军，但是他避免对外透露这一计划。他更多的是让自己扮演一个“和平总理”的角色。1933年2月3日他在与国防军指挥官进行的一场会谈中表明了他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 [5]，而他的公开表态（例如2月1日的“帝国政府对德国人民的号召”）则以“支持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承诺为特征 [6]。在3月23日《授权法案》通过之际所作的声称是“和平讲话”的表态当中，他谈到，再进行一场战争是“没有尽头的疯狂”，民族集中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致力于和平 [7]。但是对于在裁军问题上抛头露面希特勒很是犹豫。这只是顾及帝国暂时存在军事弱势而采取的单纯战术，这一点对于知内情的人和对手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与此同时，1933年10月违背这位帝国总理最初的想法将德国退出国际联盟（Voelkerbund）裁军会议贯彻实施的正是国防军的领导 [8]。

在戈培尔的支持下，希特勒原则上把他的宣传煽动方针一直保持到了1939年。退出国际联盟被点缀以和平声明，它们的战术意义是加大法国干预的难度。对帝国外交举措的宣传强调也是同样——从德国与英国签订海军协定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化区乃至萨尔的回归。1935年的《国防军法》被说成是“德国的自卫行动”、德国防卫力量的重建被说成是“和平要素” [9]。这是一场有计划的欺骗，它的对象也包括德国大众，他们只是后来才了解秃鹫军团（Leion Condor）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作用。

从1937年开始，公开探讨国防问题上出现了转折。从这个时候起，宣传突出强调的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战争和对“德国和平军队”的自豪感。虽然如此，媒体却不再竭尽所能地暗示必要时动用军事手段的意图了。德军进军奥地利共和国被宣称是“友好访问” [10]。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宣传战（1938年开始启动，服务于为计划的军事干预做好心理准备的目的）当中同样避免明确说出战争冲突的想法 [11]。众所周知，希特勒用一场快速、保持孤立的战斗击溃捷克斯洛伐克的图谋失败了。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本意容忍内维尔·张伯伦的干预，并同意慕尼黑会议的

协定，这些协定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了大片土地。

1938年9月27日时，希特勒还下令让一支机动部队行军穿越柏林政府区，以测试国民的战争意愿。但他不得不看到，总理府前大量沉默和怀有敌意的国民不再像通常那样热烈鼓掌[12]。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Shirer）称这是他所见过的给他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反战示威[13]。与此同时，对于《慕尼黑条约》签订以及由此防止了战争的消息，人们却是欢呼振奋。苏台德（Sudeten）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各地得到积极回响并打消了给人们造成了沉重负担的对和平能否维持的忧虑[14]。而在这之前的几天里，国民的情绪可谓千钧一发，当时有对希特勒不信任爆发的危险[15]。

但是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公众态度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舆情报告中说“元首新的不流血胜利大大加强了”对他的信赖和信念。实际上，《慕尼黑条约》给希特勒带来了“几乎是传奇般的声望”。他在战前最后几年里的外交成就多次导致人们草率地低估继续帝国的武力扩张政策必定会带来的危险。例如，在1939年春的时候，部分德国公众中竟然出现这样的看法：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和没有爆发军事冲突就吞并默麦尔（Memelland）地区要归功于元首独一无二的“天才”。舆情报告称，“对元首及其外交政策的信任变得如此之强，以至于任何地方都不害怕卷入战争”[16]。如果当时希特勒隐退了，那他可能就会作为“和平总理”为民族所传颂了。

不管怎样，国民中出现了最初的抵抗。例如，有人认为，因为默麦尔而冒战争的风险不值得。尽管如此，（在戈培尔的宣传支持下）下面这种如意算盘一直保留了下来——使英国和法国在一场可能发生的与波兰的冲突中置身事外是可能的[17]。不管怎样，1939年夏天，多数国民还不相信会发生战争，最多是一场局限在地区范围内的战斗。直到最后，能阻止英法参战的希望都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德国与苏联签订了

《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绝大多数国民相信，“元首这一次也会成功地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实现他的目标”，1939年8月初下巴伐利亚行政区政府负责人的一份秘密通告中这样说道[18]。

然而，在1938年11月10日对大约400名记者和出版者进行的一次秘密讲话中，也就是说还是在“水晶之夜”发生期间，希特勒突然调转了宣传方向，下令国民未来要在情绪上为战争做好准备，这样他就等于间接承认了之前奉行的方针是一场掩人耳目的演出[19]。“形势迫使我几十年来只谈论和平”，这个专制者说，因为只有“在继续强调德国的和平愿望和和平意图的情况下”，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才有可能实现。他说，但是现在存在着这个危险，“很多人脑子中会继续这样的看法——当前的政府本身是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和平的决心和意志相认同的”。他认为，调整德国人民的心理、慢慢向他们表明必须“采取武力手段实现”特定的东西，这是必要的。

战前几年的舆情报告给人以深刻印象地显示，对战争的担心和对和平的渴望在德国人民中占据了主导，旨在提高国防意愿的具体措施效果有限就表明了这一点。显然，多数民众认为，加强德国军备的广泛措施和这些年的民事动员准备完全是出于防御目的的。苏台德危机一度打破了德国公众的幻想。1938年10月，舆情报告称对战争的精神极度不安已经确确实实出现了。在《慕尼黑条约》签订之后，对一场新战争的担心再度出现，并在1939年春重新受到重视。因此，政府缔造可以与1914年8月相媲美的战争热情的宣传目标完全失败了[20]。

1939年9月1日之前媒体曾避免“战争”这个表达，即便在出征波兰伊始也还是如此。因此该行动被说成是一个迅速结束的插曲，“和平的党代会”的声明走的也是同一个路子。尽管其中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180度大逆转，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仍然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欢迎，他们将其视为可以将与波兰的冲突孤立起来的机会。英法宣战更加是出

乎他们的意料，当时人们指责英法有意识地推行“包围”政策。即便在出征波兰之后，希特勒的“和平维护者”形象仍然继续产生着影响；波兰出乎意料的迅速战败被视为元首的引人注目的胜利，并使他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了顶点。

随着承诺的战争迅速结束的希望落空，他的受欢迎程度发生了变化。虽然大部分德国民众在反英宣传影响下愿意把拒绝希特勒1940年7月19日和平建议的责任推给英国，但是直到那时都没有被打破的关于希特勒的“政治家技能”（这可以回顾如此多的不流血就取得的成就）的神话开始褪色。随后在1941年深秋，当结果表明迅速结束战争不可能实现而且人们面临在战争中度过第二个冬天时，公开的愠怒开始了[21]。在迅速取得胜利阶段产生的战争热情现在开始明显减弱，并让位给一种倒不如说是怀疑的态度。这一变化随着1941年6月21日对苏联的突袭开始，舆情报告称“休克效应有所减弱”要归因于这种变化。

事实上，大部分追随者不理解在东线作战的目标，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思维还局限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范畴当中，部分是因为向东铺开似乎超出了德国的能力。最初对东线战场胜利的热情让位于绝不是没有道理的怀疑——因为攻击苏联使帝国卷入多条战线作战是否正确。东线的战地信件中不仅反映了军事形势的不断恶化，也反映了对被要求用尽全力的士兵来说意义已经丧失[22]。

因为盟国的大面积轰炸，守卫自己的家园受到威胁，而捍卫故土似乎要沦为一场闹剧，这些也使人们开始对自己行为的意义产生了疑问。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努力和推动“抵抗思想教育”已经不能阻止厌战情绪的加剧了。从苏联委员制抄袭而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督导军官”（Nationalsozialistische Fuehrungsoffizier）的引入也没有带来丝毫的改变。武装部队中央局（Allgemeines Wehrmachtsamt）负责人、赖内克（Reineke）将军的设想很荒谬——通过在世界观上动员军队实现这一

点，“信念坚定的士兵以坚定的思想给家里写信，而且这样前线就会成为家乡的力量源泉”，但是这反映了怀疑态度也在后方蔓延的现实[23]。

在过早宣布马上就要获得“彻底”胜利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战争宣传在接下来的俄罗斯战争中可信性日益降低。国民开始宁可相信其他的信息来源而不相信官方的消息，其中包括从前线回来休假的人或者是盟国的广播报道。戈培尔再也不能有效地消除从1942年开始在东线战场蔓延的低落情绪了。因为一点一点的军事成功而暂时出现的情绪好转“只是一个又一个挫败期之间的喘息”[24]。相信帝国政府所描述的苏联敌人形象的国民越来越少。一种非官方的公众意见产生，它明显有别于官方的报道，并迫使戈培尔推翻迄今为止只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方式并开始提供更接近于事实的信息。

《帝国报告》（情报部门收集的舆情报告）在1942年2月8日说：“今天的问题不再是离取得胜利还要多久，而是在还有可能令这场战争于我有利地结束的条件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在与头两个冬天类似的条件下在俄罗斯再度过第三个作战的冬天是不可设想的，“特别是鉴于敌人的战斗力”[25]。然而，即便是情报部门的舆情报告也只记录了国民的一部分态度。其中，不断增多的沉默的大多数仍旧没有被考虑进去，尽管报告在希特勒命令下最终不得不停止，这意味着关于帝国范围内部真实状况的仅有的具有一定可信性的信息来源消失了。

与此同时，政府改变了公开的说法：“比情绪更加重要的是，国民的态度一再——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星期里——证明，它一如既往是由对元首的信赖和对战争最终胜利的信念所支撑的”，党办公厅在1942年初这样说道[26]。事实上，情绪在纯粹的绝望和自我振奋之间交替变化，“我们一定要赢得战争，因为否则一切就都失去了”。这其中反映了政府最晚从斯大林格勒战败开始就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即便这位专制者不愿承认这一点。他还一直指望消耗战略能够成功，它虽然不允许再

采取决定战役的行动，但是应当会导致红军抵抗力被削弱。

因此纳粹宣传甚至称赞国防军不断增多的撤退行动是间接的胜利，同时人们不愿承认，德方在人口上的不均衡就已经不允许为东线部队提供必要的哪怕是数量接近的替补兵力了。1944年“七二〇”运动的刺杀者和精神领袖——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转折之前就完全清楚这一事实状况了。在大量实施国防军高层架构改革的尝试因为希特勒的冥顽不灵而失败之后，他对优柔寡断的陆军元帅和最高统帅们（他们因为赠与和封地而保持了好心情）的毁灭性批评最终促使他尽一切努力以暗杀的方式除掉这个专制者[27]。

希特勒在政府中的独裁权力地位主要建立在他的个人魅力基础上，尽管他因为被东线战争指挥占据了精力，越来越害怕公开露面并避免探访日益被轰炸袭击摧毁的大城市。他公开讲话的数量也不断减少——这令戈培尔大为痛心。因为希特勒作为演说家所具有的吸引力简直是改善沮丧情绪不能或缺的，即使这位帝国宣传部长有意识地突出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的形象以便为四分五裂的希特勒崇拜续命。

正如伊恩·克肖对他的评价那样，希特勒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不真实的人物”[28]。与约瑟夫·斯大林不同，日常的政府事务早已不掌握在他的手中，而且他比前者更加不理会军事和政治现实。尽管如此，对元首的崇拜仍然使所有这些牢骚抱怨都得到了克服。与拥有君主制度和军队的法西斯意大利不同，第三帝国不再有机构能发挥与权力完全集中在希特勒身上相抗衡的作用。1944年7月20日之后，起初还能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国防军最终不再是独立的机构了。

因为希特勒篡夺了所有国家认同的可能，否定他个人就相当于背叛国家。这导致了这样的心理反射，将希特勒从对政权罪行和挫败的责任中剔除出来，并定期把这些责任推到官员特别是将军们的身上。民众不断加剧的不满主要针对党和党卫队，因此没有加剧对政权的全部否定，

这本来可以为扎根于人民的抵抗运动提供基础。正如伊恩·克肖描述的那样[29]，鉴于不断恶化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国民开始从第三帝国抽身。尽管如此，对元首的认同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很多人一直还希望他能带来积极的宿命。

把虐待俄罗斯战俘和平民的责任完全推给希特勒是错误的。军方领导头脑中反布尔什维克的陈词滥调的灾难性影响不可忽视，它们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反共产主义和反闪米特主义的灌输洗脑上。它阻碍了将军们摆脱致命的“种族灭绝战争”战略，它因为军事崩溃而对德意志帝国产生负面影响。对政府罪行——特别是在东线推行的“焦土”（verbrannte Erde）战略——遭报复的忧虑使坚持到底的口号悄悄深入强硬派心中。但是此外还要加上到处都变得活跃起来的临时军事法庭（Standgericht）和特别法庭的威慑，它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针对帝国成员。政府恐怖机关的压力也针对部队自身，政权试图以可以想到的最严厉的报复强迫人们坚持到底，直到剩下最后一人。因为临阵脱逃或者离开部队而执行的1.8万次死刑说明了士兵被强行塞入到早已变得毫无希望的战斗当中的原因[30]。

与在“伟大爱国战争”旗帜下让内政上的针锋相对后退的斯大林不同，纳粹政府对显露端倪的军事失败的回答是激化国内矛盾。纳粹领导人再一次醉心于错误的信念当中：不仅在种族—人种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缔造均一性会决定性地提高德国民众的抵抗意愿。党办公厅负责人马丁·博尔曼和作为组织负责人的罗伯特·莱伊希望在政治上激活政党可以使坚持到底的意愿增强很多倍，并希望自1943年夏开始变得清晰无误的帝国军事危机出现转折。他们重新动用“斗争时期”的一系列思想，并要求全面扩大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非军事权力职能，并通过建立“德国人民冲锋队”也抓紧军队，这曾在1934年遭到拒绝。

力争的“党化”（国家机关完全听命于党的意志）与对政权实际和潜

在敌人的迫害升级联系在一起。但是力求的动员没有出现。因为最后一刻的宣传攻势，对希特勒施加影响以便结束这场变得毫无意义的战争的机会被最终贻误了。不如说，继续维护其权力地位的省党部头目全线告败了。他们没有勇气忤逆希特勒的自毁命令。希特勒神话将散沙一盘、陷入内在瓦解的政治制度勉强维系到了最后，直到这位专制者的自杀突然结束了这场妖魔夜宴。大多数“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已经背弃了希特勒和纳粹政权，广泛的“民众共同体”早就再也谈不上了。

---

[1] 关于鼓动人们反《凡尔赛和约》的内容请参阅Ulrich Heinemann的*Die verdraengte Niederlage. Politische Oeffentlichkeit und Kriegsschuldfra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oettingen 1983，S.151f.和S.238ff。

[2] 参见Michael Geyer的*Aufruestung oder Sicherheit. Die Reichswehr in der Krise der Machtpolitik 1930-1935*， Wiesbaden 1980；同一作者，Das zweite Ruestungsprogramm 1930-1934，刊登于MGM17（1975），S.125-172。

[3] 参见Bernd Weisbrod的Gewalt in der Politik.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刊登于GWU43（1992）；请参阅Hans Mommsen的Militaer und zivile Militarisierung in Deutschland 1914-1938，刊登于Ute Frevert的*Militaer und Gesellschaft im 19.und 20* . Jahrhundert，Stuttgart 1997，S.265-276。

[4] Klaus-Juergen Mueller，*Das Heer und Hitler. Armee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Regime 1933-1940*， Stuttgart 1969，S.35ff.

[5] Aufzeichnung der Generalleutnants Liebmann ueber Hitlers Besuch bei General Freiherr von Hammerstein-Equord am 3.2.1933，刊登在Klaus-Juergen Mueller的*Armee und Drittes Reich 1933-1939*， Paderborn 1987，S.263。

[6] 参见Max Domarus的*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Bd.I/I，Muenchen 1963，S.193。

[7] 参见Wolfram Wetter的Ideologien，Propaganda und Innenpolitik als Voraussetzungen der Kriegs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刊登于Militaergeschichtliche Forschungsamt der Bundeswehr（出版）的*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d.I，Stuttgart 1979，S.397f。

[8] 关于退出裁军会议的内容请参阅Wilhelm Deist的Die Aufruestung der

Wehrmacht，刊登于*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Bd.I，Stuttgart 1979，S.39f。

[9] 参见Ian Kershaw的*Der Hitler-Mythos. Vo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m Dritten Reich*，Stuttgart 1980，S.113f.；Wette，Ideologien，Propaganda und Innenpolitik als Voraussetzungen der Kriegs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刊登于Militaergeschichtliche Forschungsamt der Bundeswehr（出版）的*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Bd.I，Stuttgart 1979，S.16。

[10] 参见Ian Kershaw的*Der Hitler-Mythos. Vo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m Dritten Reich*，Stuttgart 1980，S.113f.；Wette，Ideologien，Propaganda und Innenpolitik als Voraussetzungen der Kriegs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刊登于Militaergeschichtliche Forschungsamt der Bundeswehr（出版）的*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Bd.I，Stuttgart 1979，S.132。

[11] 请参阅Ernest K.Bramstedt的*Goebbels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ropaganda 1925-1945*，Frankfurt am Main 1971，S.241ff。

[12] Helmut Krausnick，Vorgeschichte und Beginn des militaerischen Widerstandes gegen Hitler，刊登于*Vollmacht des Gewissens*，Frankfurt am Main 1960，S.265。

[13] William L.Shirer，Berlin Diary.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New York 1941，S.143。

[14] 参见Marlis G.Steinert的*Hitlers Krieg und die Deutschen. Stimmung und Haltung der deutschen Bevoelke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Duesseldorf 1970，S.72。

[15] Kershaw，*Der Hitler-Mythos*，*Vo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n Dritten Reich*，Muenchen 1980，S.122。

[16] 援引自Steinert，*Hitlers Krieg und die Deutschen. Stimmung und Haltung der deutschen Bevoelke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Duesseldorf 1970，S.81。

[17] 参见Bericht des Regierungspraesidenten Oberbayern vom 10.Juli 1939，Duesseldorf 1970，S.84。

[18] 援引自Kershaw，*Der Hitler-Mythos*，*Vo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n Dritten Reich*，Muenchen 1980，S.125。

[19] 参见Wilhelm Treue的Hitlers Rede vor der deutschen Presse vom

10.November 1938，刊登于VfZ6（1958），S.182f.；请参阅Wette的Ideologien，Propaganda und Innenpolitik als Voraussetzungen der Kriegs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刊登于Militaergeschichtliche Forschungsamt der Bundeswehr（出版）的*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Bd.I，Stuttgart 1979，S.133f。

[20] 参见Wilhelm Treue的Hitlers Rede vor der deutschen Presse vom 10.November 1938，刊登于VfZ6（1958），S.182f.；请参阅Wette的Ideologien，Propaganda und Innenpolitik als Voraussetzungen der Kriegs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刊登于Militaergeschichtliche Forschungsamt der Bundeswehr（出版）的*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Bd.I，Stuttgart 1979，S.141f。

[21] 参见Kershaw的*Der Hitler-Mythos*，*Vo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n Dritten Reich*，Muenchen 1980，S.150ff.

[22] Steinert，*Hitlers Krieg und die Deutschen. Stimmung und Haltung der deutschen Bevoelke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Duesseldorf 1970，S.227和S.273f。

[23] Juergen Foerster，Geistige Kriegsfuehrung in Deutschland，刊登于*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Bd.9，Muenchen 2004，S.570f.；请参阅Steinert的Hitlers Krieg，S.278。

[24] 请参阅Aristotle A.Kallis的Der Niedergang der Deutungsmach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ropaganda im Kriegsverlauf，刊登于*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Bd.9，Muenchen 2004，S.222。

[25] Heinz Boberach（出版），*Meldungen aus dem Reich.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Bd.9，Herrsching 1984，S.338。

[26] 援引自Steinert的*Hitlers Krieg und die Deutschen. Stimmung und Haltung der deutschen Bevoelke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Duesseldorf 1970，S.339；请参阅Anordnung 91/42 des Leiters der Partei-Kanzlei vom 18.1.1942，刊登于VAB Bd.4，S.9；Aufklaerungs-und Rednermaterial der Reichspropagandaleitung der NSDAP，Lieferung 9（Sept.1943），S.320f。

[27] 参见Christian Mueller的*Oberst i.G.Stauffenberg*，Stuttgart 2000，S.216。

[28] Kershaw，*Der Hitler-Mythos*，*Vo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n Dritten Reich*，Muenchen 1980，S.172。

[29] Kershaw，*Der Hitler-Mythos*，*Vo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n Dritten*

Reich， Muenchen 1980，S.181ff；请参阅Kershaw的*Hitler 1936-1945*， Stuttgart 2000，S.567f.，S.723f.，S.729f。

[30] 请参阅Manfred Messerschmidt的*Die Wehrmachtsjustiz 1933-1945*，Muenster 2005。

第10章 民众共同体的神话——资产阶级国家的瓦解

自从美国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必须将国家社会主义称为“中间派极端主义”这个论点以来，资产阶级中间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作为大众运动的崛起以及如何衡量它在政权阶段的作用这个问题就被推到了当代史研究的核心位置上[1]。与李普塞特的论点相对，选举研究证明，并不算少的一部分纳粹选民要算入工人阶级，因此简单地把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归为中产阶级是不对的。尽管如此，在政治上变得无所归依的资产阶级（Buergertum）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存在一种不稳固的相互关系。资产阶级中间阶层在1930年9月至1933年3月的选举过程中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选民中占了过大的比例，这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在魏玛共和国后期的危机当中，新教资产阶级尤其倾向于把票投给希特勒，并放弃他们在那之前一直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

这一发现乍看起来是矛盾的，因为阿道夫·希特勒鉴于他的出身和政治世界观是以资产阶级的敌人身份出现的，并一再以最激烈的言辞贬低它。事实上，对他来说，关键是消除被他谴责为“自由主义的”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政治和社会形式。

国家社会主义宣传用“民众共同体”的口号来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它承诺消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之间的对立并超越地位的障碍和收入的差异缔造国家意志的统一。1934年1月在接受汉斯·约斯特（Hans Jost）采访的过程当中，希特勒把力争实现的“民众共同体”描述为“一切有效工作的共同体，这意味着所有生活利害关系的统一，这就是说消除私有的资产阶级和在工会机制下组织起来的大众……”[2]。这个矛盾的构想被他用做了煽动手段，同时他与争取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的想法保持了距离，而是更多地醉心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构想，为了发动社会的目的而挑起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而且他偏爱精英结构——恰恰不是人人平等的结构。

希特勒习惯于把自己美化为劳动者，并虚伪地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子孙后代，但要求为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所有的人民阶层。1937年5月1日在柏林卢斯特花园（Lustgarten）的讲话当中，他强调说，国家的领导已经由“来自所有生活层面的德国人”——其中也包括“过去的资产阶级”接管[3]。与此同时，这个专制者继续全盘否定所有被他称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他的官员也开始贬低资产阶级，他们多数由没能在资产阶级社会飞黄腾达和出人头地的人组成。然而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轻视并不妨碍他们给自己添置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别墅（多数带有暖房），它们往往源自犹太人的财产。与纳粹宣传所维护的民族同志完美形象的矛盾大得不能再大了，后者是以谦逊、节俭、牺牲精神和执行的意愿为特征的。

尽管希特勒有意识地针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展开论战，但纳粹宣传消除阶级斗争的承诺特别在上层资产阶级中一致获得了好感。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31年春之后的关键选举中首先得到了市民中产阶级的支持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在攫取权力之前的几个月里，资产阶级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所占的比例显著增大。与之相对的是，其农民支持者队伍（党在1930年9月取得的突破要归功于他们）在此后一年里明显四分五裂，以至于党最终在农村未得到充分代表，但易北河以东地区是个例外。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引人注目的选举成就主要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根基的渗透上，它从职业组织、具有多种非政治性质的地方联合会或者是体育俱乐部一直延伸到防卫组织。美国历史学家鲁迪·寇莎（Rudy Koshar）在其关于拉恩河畔马尔堡（Marburg an der Lahn）的研究中指出，恰恰是在中产阶级中蔓延的对魏玛政党国家的不满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崛起提供了土壤[4]，而他这么说完全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者成功渗透了资产阶级的俱乐部和组织团体，并把它们变成没有停歇的选举斗争的工具。

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的反政党效应和他们在共和国陷入危机的几年里不断增多的政治愠怒被国家社会主义宣传有效地利用，它靠承诺消除迄今为止的党派统治这张王牌而胜出。“我立下了一个目标”，希特勒在1932年7月27日埃伯斯瓦尔德（Eberswalde）的轰动性选举讲话中宣称，“那就是把德国的13个政党从德国扫地出门”，他继续说，“……政党将消逝，在它们之后留下来的将再次是我们的人民。而且我们不希望成为一种职业、一个阶级、一种地位、一种宗教信仰或者是一个州的代表”[5]。希特勒这样对将超越此前内政矛盾的“民众共同体”信誓旦旦恰恰获得了资产阶级选民的巨大肯定，并引发了一种广泛的民族觉醒氛围，与之相比，存在着分歧的政治利益和社会阶级差异暂时变得不重要了。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尤其满足了资产阶级的渴望。

正如诺贝特·弗赖（Norbert Frei）说的那样，“民众共同体”口号散发出一种“社会平等感”[6]，它掩盖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并释放出消除中产阶级危急的经济状况的希望。然而政府的社会预言没有实现。消除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局限在企业家参加五一游行这样的公开姿态和实行分红上限这样微不足道的社会福利修正举措上，局限在“喜悦中产生力量”（Kraft durch Freude）和“劳动之美”（Schoenheit der Arbeit）等粉饰性的项目、上层阶级也参与到同喝一锅汤和寒冬赈济（Winterhilfe）活动当中。

因为要想最终回到“德国手工业帝国阶层”（它转变成一个烦人的四年计划的监督机构）就必须重新参加强制入会的同业公会、学徒期满考试合格证书和大合格证书制度，工业中产阶级感到自己遭到了敷衍搪塞。《保护零售业法》没有带来有效的限制百货商店市场份额的措施。因此在竞选中傲慢自大宣布的中产阶级政策慢慢停了下来。

尽管个别要求得到满足，但手工业立刻看到自己处于来自军工业方面增大的经济压力下。同样在商业和小商贩当中，重建旧有的社会结构的期待也没有实现。倒不如说，尽管经济因为扩军备战而开始繁荣，但是恰恰那些构成了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社会支持的领域失去了早前的重要性。就这一点而言，与在魏玛时期占据主导的趋势密不可分的全面现代化正在进行，而民族社会主义先驱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日益失去了影响力[7]。

资产阶级地位的相对下降同样反映在公职人员地位日益削弱和教育业及高校的发展倒退上。只有个别享有特权的职业群体才免于停滞不前，特别是医生，他们在纳粹政权下得以显著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例如通过扩建国家公共卫生事业。与之相对，公职人员的工资停滞不前，而且对职业发展和人事提拔方针的干涉越来越严重。总而言之，整体景象是割裂的。中产阶级的个别部分从扩军和军事化当中获益，而其他的则被大康采恩的迅速扩张挤到了边缘地带。

然而，与最近一些作者强调纳粹“民众共同体”政策的成功不同，有关社会群体迅速普遍地觉醒。这一过程在1934年就已开始，当时，戈培尔试图利用其“失败主义者运动”阻止资产阶级圈子开始出现的不满，1936年该运动在中产阶级群体达到了顶峰。因此，他们最初欢迎希特勒内阁组成时的欢欣雀跃日益衰退。此前资产阶级习惯分裂成大量地方组织和联合会甚至聚餐日，而且他们十分典型的不关心政治的心态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渗透，但是长期来看它发挥了干扰因素的作用，资产阶级圈子避开了对党机构的监督，并大力抨击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推动的任人唯亲，特别是对“老战士”（Alte Kaempfer）的偏爱。

到这时为止，伴随着排挤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来的“民族奋起”的活力消失，而承诺的全面社会改革仍没有出现，党的一体化政策在社区层面日益遭受阻力。通过引入元首原则，国家社会主义工人

党对几乎所有民事组织进行了纳粹化，元首原则取代了到这时为止的普遍的组织选举。与此同时，德国劳动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的垄断地位使得因为其党成员身份而享有特权的干部们打破了习以为常的资产阶级交往方式和行为准则，并排挤了很多是自己加入政党的传统精英。

这样，对资产阶级基础设施的间接政治化就完成了，充其量是把中立的娱乐机构剔除在外。这导致，对反复追忆悠久传统的公民协会的兴趣减少了，而且它们失去了它们以前的代表作用。正如弗兰克·巴约尔（Frank Bajohr）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描述那样，在此前影响力很大的汉堡公民协会的例子当中就出现了这一现象[8]。以前很有影响力的德高望重者现在退回到私人生活当中，把地方政坛让给了新崛起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活动分子。这样，一直存在的社会道德氛围就在很大程度上解体了。

除了将现有组织一体化之外还新建了政治色彩形形色色的强制性组织，它们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附属机构出现。鲁迪·寇莎以马尔堡大学生联谊会转变成纳粹同志会（Kameradschafshaeuser）为例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其中产生了相当多的冲突摩擦，它们很多具有政治特性。它们在官员之间挑起对纳粹等级制度来说十分典型的竞争对抗，并导致了政治上的极端不透明。

所有这些肯定使党高层的腐败增多了很多倍，并迅速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干部在人们口中被骂作是利用权势尽情享受、脱离人民的高官。正如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所表明的，这种情况导致普通公民退回个人空间和去政治化愈演愈烈[9]。戈培尔从中得出了这一结论，他让乌发公司的电影制作首先以非政治性的娱乐为导向并且只在例外情况下制作政治导向的电影。

随着一体化政策推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任人唯亲和现有机构

被掏空，在1933年之前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在社区层面上也逐渐瓦解，民族同志试图通过间接对政府部门施压来弥补他们公共作用的损失。这解释了告密事件不断增多的原因，其发起者试图借此来抵偿他们失去的社会地位。这最终导致戈林严格禁止了告发制度。这其中以及道德冷漠的深入人心反映了资产阶级作为从历史角度看能胜任的社会构成正在不断瓦解。

正如理查德·埃文斯所强调的，纳粹政权绝对没有带来更大的社会平等，尽管民众共同体宣传一再佯装它做到这一点了并作为对未来的投射保留了相当大的吸引力。阶级差异仍旧和一直以来一样，发挥着作用。与此同时，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力日益减弱。埃文斯在描述诺尔特海姆（Northeim）市的情况时写道，“节日和庆典变成了空洞的仪式，人们确切地说是出于害怕而不是因为信念而参加”。他断言：“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地方组织不得不满足于人们的顺服和在口头上说好听的话。”[10]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普遍出现的民众的茫然情绪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加剧为真正的反对。典型的内政上的不透明使人们无法察觉变得显而易见的错误发展的体制原因。这导致，批评集中在各个地方职能行使者身上，但是这没有演变成对制度的整体否定。与此同时，对经济和政治稳定的需求阻碍了所有的反对运动。

主要由扩军引起的经济崛起导致一个结果——恰恰来自中产阶级的并不算少的一部分年轻一辈出乎意料地迅速在社会上崛起或者在心理上显示出社会地位的提高，这尤其涉及在党机关内但也包括其他变得臃肿的政府官僚机构的职位，例如在党卫队帝国、德国劳动阵线和国防军内。间接地，这也涉及产业工人，他们出乎意料地要指导数百万的强制劳工（Zwangsarbeiter）和战俘。在军工业繁荣给年轻人带来了卓越的个人发展机会而他们为政权的外在成功和进步所迷惑的同时，在那

些“经历了德皇威廉二世时代的人”（Wilhelminer）——正如他们大概被称做的那样，也就是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健在的那一代人——当中十分普遍的倒不如说是拭目以待的怀疑态度。

然而，人们是否应当像特别是乌尔里希·魏勒做的那样，把帝国出现的社会结构称做是“人人平等的以表现为导向的社会”，考虑到产生作用的政治和种族挑选机制和归类标准，这是值得怀疑的[11]。同样，宣传还有立法和司法判决所强调的“民众共同体”是否与纳粹政权的社会与政治现实相一致，这也是个问号。

这尤其适用于下面这个设想，民族的内在团结通过将犹太人和“共同体外人”的“排除在外”而得到了巩固，特别是通过对犹太同胞的武力侵犯，例如对所谓“种族亵渎者”（Rassenschaender）的公开行动。对纳粹运动的极端核心来说无疑有这样的效应，但是它们很难抓住更广范围的民众的心。倒不如说，多数国民，正如我们今天知道的那样，对于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且相对保持了克制。“水晶之夜”的经过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一事件过程中，戈培尔期待的民愤的爆发恰恰没有出现[12]。因此，米夏埃尔·维尔特（Michael Wildt）的论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为了摧毁这个民族和缔造民众共同体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工具”——偏离了事实[13]。

正如德特勒夫·波伊克特（Detlef Peukert）所表述的那样[14]，国家社会主义“民众共同体”宣传的目标是形成“一个意识形态均一、社会已经适应、以表现为主导和等级制度结构的社会”，而且它包括“彻底消灭”所谓的“不同种者”的含义，这是毫无争议的。特别是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对这样的一系列思想没有抵抗力，这也是没有争议的。有点不同的是，米夏埃尔·维尔特将“缔造民众共同体”视为一个具有承载力的战略，它因为运用武力特别是反闪米特主义常见的武力而将“德意志民族”变成“一个攻击性的、种族主义的民众共同体”[15]。

维尔特所代表的论点——与持续不断地制造暴力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是提升影响力和推动社会一体化的目标——似乎在很多方面存在问题。一方面，他暗示纳粹领导层有一个理性的和有效的权力分配方案，而这个方案从未存在过，这点是很明确的。在政权阶段，对政治敌人实施暴力是为了通过展示实力从而给资产阶级选民留下印象。然而，对犹太人的暴力侵犯是服务于权力分配以及社会一体化战略目标的假设则过于夸大了，并且赋予纳粹政策以计划上的连贯性，这不符合其特有的条件反射式的实践，而且忽视了导致武力释放的是相对盲目的意识形态上的推动力这一点。

国家社会主义恐怖行动的欲望是扎根在其“世界观”和对政治的理解当中的，并且随着对党肆意采用武力的制裁的消失以及由此挑起暴力行为的真正升级而加强。这种机制很难将其评价为策划的“民众共同体”综合征的组成部分。这首先需要源自实践的证据说明德国社会的政治均一性因此而得到了促进。

在我们的上下文里，维尔特的下面这个假设尤其重要——这些暴力行为带来了德意志国家的一种特殊的新形式。它意味着，政权成功地建立了全面共识并缔造了一个相对均一的“追随者队伍”，同时将“共同体外人”和犹太人“排除在外”。虽然不管是宣传还是希特勒或者政权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定期这么宣称，但是现实却是另外一个样子。虽然中产阶级内部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反对努力，但是纳粹政权内部形成了一种“利基社会”（Nischengesellschaft）（弗兰克·巴约尔），它保留了完全不同的心态并与意识形态的完全一体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触发，失望和觉醒在资产阶级阵营中越来越普遍，同时这些完全为人所认知的政府弊端和恐怖行为主要被推到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党卫队身上，而且总是按照这种固定的说法：“如果元首知道。”

此前，希特勒的外交成就增强了人们对“元首”的好感，但他没有将其和国内形势联系起来。它在征战法国之后达到了顶峰，但最迟到俄罗斯战争在1941年秋天不会结束变得清晰可见时骤然下跌。从这时起希特勒不再被视为和平的保证，而这在之前对他的受欢迎程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1941年开始，德国公众开始越发批判性地看待戈培尔的“民众共同体”口号。促使民众继续支持政权的是：在战争中特别是在布尔什维克威胁面前必须站在国家一边的信念。在国内，战争决定的对平民社会干涉日益加重了民众忠诚的负担，而且它们涉及的刚好是资产阶级阶层：教育行业、工业领域和文化活动。就此而言，正如它们在近年来流行的那样，“得到支持的专制制度”（弗兰克·巴约尔）或者“人民国家”（格茨·阿黎，Goetz Aly）这样的概念倒不如说是误导性的[16]，尽管纳粹政权最初能够为自己争取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好感这个事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即便米夏埃尔·维尔特对于将民众共同体讨论用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上也很迟疑。因为事实上，打算将部分民众和国防军士兵坚持到底的意愿解释为“民众共同体”的体现并从中看出愿意为“人民和祖国”做出牺牲的献身精神是有问题的。单是从报纸上的阵亡战士讣告中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变化，只是宣传一点都不愿意承认它是事实而已。某些历史学家忽视了德国士兵除了服从上级命令之外别无选择这个简单的事实。民众总体而言也是差不多的，党卫队的暗杀团和战争最后几个星期的特别法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这场“民众共同体”实验来说（如果它以这种明确的形式曾经存在过的话），纳粹领导人只有少数几年的时间可支配。关于地方发展的实证研究在下面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一体化最终没能成功，而且类似地对于农业领域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说到底，将纳粹体系维系在一

起的不是自发的肯定，而是恐怖威胁，而且人们不应当忘记（某些比较年轻的作者就是这样），这个纳粹政权不是个开放的体系。倒不如说，成功地禁止公开交流使个人退回到私人领域，并使政治抗议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可能。

在国家社会主义实行专制的12年里，它没能摧毁资产阶级架构，尽管它们被大幅削弱。除了纳粹组织的渗透，可以确认的是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产阶级深入骨髓的道德败坏，他们欣然地靠犹太人的财富致富，并且没有起来反对暴力迫害以及放逐，尽管——正如安乐死事件所表明的——这在1938年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

民众不加批评地容忍犹太裔的大学老师和医生被开除的意愿事后看来十分可怕。作为教育阶层的一员，1945年4月底，在美军进军之前的几个小时，我的同僚们是如何失控地将荒废的马尔堡国防军仓库洗劫一空的在今天仍令人厌恶地历历在目。当时，对我来说，传统的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完全被毁了。

---

[1] Seymour M.Lipset，Fascism-Left，Right and Center，刊登于同一作者的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1960。

[2] 援引自Richard Evans的*Das Dritte Reich*， Bd.II/2 Diktatur，Muenchen 2005，S.603。

[3] 摘自Max Domarus的*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22-1945*，Bd.I/2，Muenchen 1965，S.690。

[4] Rudy Koshar，*Social Life*，*Local Politics and Nazism-Marburg 1880-1935*，Chapel Hill/London 1996，S.284ff.

[5] Wahlrede Adolf Hitlers am 27.Juli 1932 in Eberswalde，刊登于*GWU* 10（1959），Muenchen2005，S.122。

[6] Norbert Frei，*1945 und wir. Das Dritte Reich im Bewusstsein der Deutschen*，Muenchen 2005，S.122.

[7] 请参阅Stefan Breuer的*Die Voelkischen in Deutschland. Kaiserreich und Weimarer Republik*， Darmstadt 2008，S.247ff。

[8] Frank Bajohr，Die Zustimmungsdiktatur. Grundzuege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in Hamburg，刊登于Forschungsstelle fuer Zeitgeschichte（出版）的Das Dritte Reich，Goettingen 2005，S.111ff。

[9] Evans，*Das Dritte Reich*，Bd.II/2 Diktatur，Muenchen 2005，S.597f.和S.600ff。

[10] 参见Evans的Das Dritte Reich，Bd.II/2 Diktatur，Muenchen 2005，S.601。

[11] 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ue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Muenchen 2007，S.767.

[12]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Auschwitz*，*17.Juli 1942*：*Der Weg zur europaeischen 'Endloesung der Judenfrage'*，Muenchen 2002 2 Aufl.，S.73ff。

[13] 参见Michael Wild的*Volksgemeinschaft als Selbstermaechtigung. Gewalt gegen Juden in der deutschen Provinz 1919 bis 1939*，Hamburg 2007，S.361。

[14] Detlef Peukert，*Volksgenossen und Gemeinschaftsfremde. Anpassung*，*Ausmerze und Aufbegehren unter dem Ntionalsozialismus*，Koeln 1992.

[15] Wildt，*Volksgemeinschaft als Selbstermaechtigung. Gewalt gegen Juden in der deutschen Provinz 1919 bis 1939*，Hamburg 2007，S.13。

[16] Frank Bajohr，Die Zustimmungsdiktatur，刊登于*Hamburg im 'Dritten Reich'*，Goettingen 2005，S.106f.；参见Goetz Aly的*Hitlers Volksstaat. Raub*，*Rassenkrieg und nationaler Sozialismus*，Frankfurt am Main 2005，S.88f.u.passim。

第三部分 第三帝国的危机和崩溃

第11章 国家社会主义暴力体系中道德层面的缺失

什么是恶的问题在历史上常常被提出来，但是在概念上历史学家的研究工具却无法给出定义。在很多方面看来，纳粹政权是恶对一个文明开化世界的侵入，对于这一点人们是一致的。但是经由对倒退回野蛮暴力的进程的单个分析，这个惯用语对解释说明的历史学家仅仅形成了一个挑战。这时，用术语来讲就要追溯到盟国在纽伦堡对主要战犯的诉讼上了。为这个国际军事法庭的行动做了十分重要准备的美国检察机关把主要的控告要点捆绑成反和平和反人类的犯罪阴谋，并将犯罪集合的法律主体转到被起诉的个人和组织身上[1]。

在纽伦堡，可能结果迅速表明，起诉主管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Jackson）控告被起诉人进行的是一场阴谋——这是一个虽然在诉讼技巧上可以理解，但事实上站不住脚的控告点，因为很难从一开始就按照一个固定的计划行动，而且有几个被起诉人肯定会因此在这一点上脱罪。除此之外，政权的种族毁灭意愿本来必须得到更多的强调，因为“大屠杀”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反人类罪，因此汉娜·阿伦特事后创立了“反人类罪”模式[2]。尽管纽伦堡对战犯的诉讼在使用司法手段消除纳粹政权暴力政策方面具有种种不足，但是，因为它们试图突出该政权的犯罪特性而且不仅仅根据单个违反国家法和国际法的情况作出调整，因此大大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公众的看法。

后来的考虑出发点同样是纳粹政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犯罪的政府的

这个论断。在到那时为止的国际法讨论当中，战争罪的概念足以用来描述对国际是非观念的违背，而现在它得到了补充，也成为纳粹犯罪的总称，它也包括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机的非法性质的犯罪行为在内。这个定义意味着，它不仅仅关系到零星的和偶尔的对人道主义的违反，而且也是一种有组织规模同时也超出了个人过分行为的蓄意犯罪。在这个意义上，纳粹政权、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党卫队可以说是罪行累累。

犯罪行为的范围大得令人难以想象，其中极少数能直接与战争行为联系起来。第三帝国对武力运用的登峰造极和大规模屠杀导致500万犹太人被杀害，超过300万苏联战俘以及难以计数的波兰、俄罗斯、乌克兰和塞尔维亚平民死亡。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吉卜赛人遭清洗，耶和华见证人和其他宗教异见者被处死，还有南斯拉夫和西方各国的俘虏被杀。最后它还包括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政治对手、有害社会者和刑事犯——以及安乐死的牺牲品。纳粹政权留下的斑斑血迹是无法视而不见的，尽管不乏掩盖它的努力。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这样极端的武力升级如何能够发生。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指向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纳粹世界观中的种族主义组成部分构成了这些罪行不可缺失的背景，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种族灭绝不管是在《我的奋斗》还是纳粹运动意识形态的基本文献当中都没有直接提及。源自19世纪的反闪米特人种族传统的杀戮词汇一直都不具体，而且在这方面希特勒也是鲜有例外地仅仅间接地通过影射来表达，或者是使用害虫词汇[3]。

事实上，除了推动移居国外，即便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狂热偏激的一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看不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可能，而且1940年5月的时候，海因里希·希姆莱还称灭绝整个部族的想法是“非国家社会主义的”[4]。党卫队散播的“下等人”口号和将在德国生活的犹太

人有计划地等同于《冲锋队》（*Stuermer*，纳粹的反犹周报。——译者注）描绘东欧犹太人的陈词滥调是为了系统降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本身但也包括民众当中阻拦对犹太人采取暴力行为的门槛。坚持不懈地再三宣传犹太人破坏了民族的内在统一而且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抵抗力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大多数同时代的人没能想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党卫队对待这个结论是认真的——它导致犹太人从多民族体中完全消失并被从德国统治的范围内根除。

纳粹种族思想的政治爆炸力起初被很多同时代的人低估了，受保守主义形式的反闪米特人主义影响——它源自1893年德意志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的蒂沃里（Tivoli）纲领，高级官员们倾向于把“犹太人问题”像是球场一样让给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极端主义分子，他们没弄清楚，在该领域的妥协让步或早或晚地必然导致法治国家被完全掏空。事实上，就算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反闪米特人极端分子的比例也相对很小，而且对整个德国民众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极端的反闪米特种族主义主要存在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小领导集团内，他们绝大多数来自战后早期以民族主义—反闪米特主义为导向的组织[5]。

同时代的观察家醉心于这样的想法——作为“发展过程中的缺点”的反闪米特人主义将逐渐丧失其重要性，然而它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极端核心的主要活动范围，与给予针对犹太人的行动以合法形式的种种努力相反，他们得以始终依赖希特勒的亲自掩护。马丁·布罗萨特准确地用“挑选消极的世界观要素”的说法简要地说明了令犹太人问题激化的这个机制[6]。由于冲锋队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其他大多数目标因为利益冲突未得到解决而受阻，所以政治上没有充分融为一体的国社党干部剩余的社会改革能量就转移到“犹太人问题”范畴。人们可能有这种感觉，希特勒傲慢狂妄的反闪米特人主义具有压倒性的战术意义上的宣传功能，而且他在实际迫害犹太人的问题上绝对不是总是作为煽动唆使者

出现的，这很有代表性。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下面这种情况，随着专制制度的稳定度提升而出现了兑现诺言的迫切需要，它促使对犹太人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毋宁说，毫无创造性拼凑在一起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除了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容之外还可以看到对它来说十分典型的“意志崇拜”（J.彼得·斯特恩）以及它的行为主义[7]。其中的关键是将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权力意志”（Willen zur Macht）思想体系平庸化。对希特勒及其紧密追随者来说，纯靠意志能移动大山的想法十分典型。这可能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希特勒仍沉醉在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将最终得到历史的承认的信念当中[8]。国家社会主义的极端唯意志论就源自这个突出的决定主义基本立场，它肆无忌惮地毫不理会历史悠久的成熟架构，例如相互冲突的利益阵营等。

因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本质上与现实的关系是割裂的，他们力求按照革命精神击败现实。出于他们受千禧年说影响的“千年帝国”未来构想（它又回顾过去援引了历史悠久的日耳曼本质和文化乌托邦），他们认为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是衰败的迹象而加以摒弃，并用一个统一起来的“民众共同体”幻象和回归到非凡时代来与这个幽灵对抗。逃离当下让人感觉所有运动以及后来建立起来的专制制度所进行的政治让步和联盟仅仅是权宜之计。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政治的理解不以调解利益分歧和在对手之间找到平衡为目标，那被称做是犹太人的勾结交易。从一开始国社党就以争取全部权力和要求最终全面解决为目标。

因此纳粹运动倾向于淡化现有的结构并鼓励不断的推动发展和发动动员。党的组织迎合这一战略，只要下级领导忠于希特勒，他就对自己的倡议拥有广大的空间。职权范围缺乏界定，有利于所有在职者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的机构化不足，而且党以不断的竞选宣传为导向，这些保持了运动的活动机能。它不知道什么是休息状态，因为那就意味着

它的凝聚力受到了致命威胁。它避免结盟并在不同的选民群体奉行相互矛盾的纲领，却没有遭受必须要将其具体兑现的危险。这是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它在右翼资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支持者区分开来的质的区别 [9] 。为了动员而进行的动员是自1929年以来竞选能如此成功的秘诀，这些竞选的进行利用了所有可支配的力量。嘴上画着“我们的旗帜在我们面前飘动”口号的褐色行军队伍象征性地表示着在到达一个空想的最终目标这个基准点之前的动员。

在政权阶段，党在政治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毫无用处，因为这时所有的关键任务要么由帝国宣传部要么由盖世太保（在制作舆情报告方面）承担了，而且此外它被削减得只剩下了顾问的职能，这时社会革命的核心能量转到了犹太人问题上，同时它变成了情报部门偏爱的活动范围。帝国内政部看似要驯化国社党并将其转变成一个公法组织（例如1933年12月在关于缔造党和国家统一的法案当中）的尝试因为鲁道夫·赫斯和马丁·博尔曼的矛盾失败了 [10] 。

阿道夫·希特勒显露出来的对法学家和公职人员的极度轻视对党的自我认知产生了影响。它用“人治”原则来对抗国家官僚机构的有序管理行为，该原则导致政治决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个人化，并导致它逐步掏空了管理机构的合法性 [11] 。事实上，传统的常规国家机构被纳粹运动架空，尽管人们知道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它的工具来保障权力和排除异己。逐步发展成一个党卫队国家在1934年时就在酝酿当中了。

从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到1934年6月30日为了镇压而进行的杀戮是一条不曾中断的恶意违法路线，它从谋杀、勒索、暴力行为延伸至有计划地侵犯财产。虽然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执政早期的几年里还披着代表法律和秩序、严厉打击共和国政治腐败的外衣，但是在他们用所谓的侵吞公款诉讼来拖累政治对手特别是天主教牧师的同时，国家社会主义干部们却到处都在以非法手段中饱私囊，他们占有了犹太公民、被迫

害的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财产[12]。1938年3月，这可能在奥地利再次大范围出现。

同样，帝国司法部长古特纳（Guertner）不得不不断忍受对司法的明确违背：1934年6月30日是将对最高冲锋队领导的谋杀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在事后表面上合法化了，1938年11月则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的刑事诉讼被党最高法庭放弃和撤销。从司法部长在保护性监禁问题上的失败到把全部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刑事检控交给党卫队——一条坚持不懈地掏空司法国家根基的直线就这样划出了[13]。

事实证明，司法被掏空及其被动地容忍党代表公然违反法律是个不可挽回的进程，而通过调整至少保证部分特定的法律秩序的动机长远来看值得怀疑。这种对法治国家的侵蚀从希特勒下令干预他个人感觉过轻的判决到成功防止“有贡献的”党员遭刑事诉讼、相对于已经确立的法律法官更愿给意识形态总则以优先权乃至战争期间州高级法院院长的评论在诉讼开始之前就确定了要宣布的判决结果[14]。1942年5月，希特勒在国会的喝彩声下废除了一直保留到当时的法官终身制。独立司法（除了例外情况）只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15]。

“水晶之夜”是个具有代表性的休止符，对于这个过程，政府最多是允许使用“犹太人行动”这个概念，因为它否认该事件。它针对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众的反应证明，他们明确拒绝党公然违法、明确拒绝损害财产，认为这是违反法律秩序；另一方面，因为盖世太保的正式命令，两万多名犹太人被捕一事没有遭遇抗议而为人们所忍受。政权被推到了守势。因为人们担心公开对纳粹犯罪者进行刑事诉讼会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党最高法庭撤销了大量诉讼或者是以赦免为之画上句号，因而帝国司法部长认为不得不做出荒唐的指示，对因为批评大屠杀而违反《反阴谋法》的人也不能提起诉讼[16]。

在战争条件下，体制的规范要素加速瓦解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在

波兰战争期间采取的武力行为——但特别是帝国政府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处理方式显示，不尊重国际法的决定已经断然作出了，这还不算安全警察和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的行动，它们在对波兰上层阶级特别是高级神职人员清洗中达到了顶峰。除此之外主要是譬如说特别行动队在沃伊尔施（Woyrsch）指挥下对平民百姓进行了难以宽恕的暴力行为。但隶属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OKW）推翻了布拉斯科维茨（Blaskowitz）将军和其他军事指挥官引入的军事法庭诉讼，这还是在希特勒通过普遍大赦使在波兰战争中犯下的罪行逃脱惩罚之前。不公正的增强仍旧不会受到惩罚[17]。

种族立法为降低阻拦的门槛做好了准备。通过把“共同体外人”和犹太人排斥在外，纳粹政府走上了歧途，将不喜欢的人群视为潜在敌人并最终视为“下等人”，并将他们从公民权利规范中剔除。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犹太人完全“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他们不能要求任何的法律保护。斯拉夫民族成员、吉卜赛人和反社会的人也完全一样。在为“民众共同体”提供更高品质的法律权益的同时，他们根本不让剩下一丁点儿对个人的法律保护。

这样的发展因为所谓的惩戒赦免（Disziplinarerlass）而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再次出现，它是1941年5月颁布的“犯罪命令”的重要组成部分。命令中明确说，在苏联被占领地区对平民进行的犯罪行为没有追究法律责任的必要，在评判此类行为时要考虑到：“鉴于11月革命之后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实行的布尔什维克暴力行为，1918年的崩溃和造成无数人为运动流血牺牲的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战争关键要归因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18]这种对使用武力的纵容在全体将领那里只因为影响自控而引发了苍白无力的指责，但没有带来必要的原则性抗议，它明显违背了《海牙公约》，剥夺了对东部民族成员的所有法律保护。类似的情况还包括专员命令和在后方行动的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的大发脾气，他们在8月转而不仅像海德里希（Heydrich）最初命令的那样对布尔什维克干部

和“有国家身份的犹太人”，而且也开始以从事游击队活动为借口对犹太妇女和儿童进行清洗。到战争结束时，50万人成为特别行动队以及与其合作的党卫队旅和刑警营的牺牲品。

对在苏联被占地区的犯罪过程进行具体描写可能就扯得太远了，它们最后演变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双方的血腥作战。与其密切相关的是大屠杀的执行，国防军在多个方面参与其中，它为其提供了后勤上的先决条件和必要的保卫部队并在个别情况下亲自参加了枪杀[19]。在占领之后，军方管理机构立刻着手对犹太人进行区分和标记，这是后来实行的迫害措施的前提。当然，这涉及的只是部分军队，而且东线作战的很多士兵完全没有参与。然而，作为希特勒1941年5月30日对部队指挥官讲话结果颁布的军队命令和希特勒“种族灭绝战”的要求完全相认同，后者的目标不仅是摧毁苏联政权还要消灭这个俄罗斯国家并把其国民当做奴隶。

现在困扰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多数军官特别是全体将领们或多或少都毫无保留地支持希特勒的毁灭政策。其中，恰恰在高级军官中根深蒂固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起了关键的作用，它从一开始就具有突出的反闪米特人成分。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源自1917～1921年，而且希特勒和纳粹宣传肯定只是把它激活了而已。可能它也导致了令人费解的对对手的错误判断，同样也导致了这样的想法，即便“成百上千万”人不得不因此而忍饥挨饿也要养活军队，就像一份为其作准备的备忘录中所写的那样[20]。德方作战的不人道不是对意料之外的苏联抵抗的反应，而是从一开始就在计划当中的。

这些对到1941年6月22日袭击苏联之前的政治和军事态势变化的粗略描述表明，纳粹政权已经除掉了所有可能阻止武力以组织规模升级的反对阵营。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冲突当中，国防军领导人曾完全醉心于政府毫无目标的扩张政策。面对由希姆莱连同其作为德国民族强化专

员的职能所建立起的强势地位，政府机关眼睁睁地失去了影响力。司法也日益成了政府压迫政策的杂役，特别是因为它在迫害外国强制劳工以及后来迫害犹太国民过程中放弃了自己的职权。

所有正常的道德标准都已丧失，并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对现实的逃避，这在对德国人手上的犹太人实行灭绝时最为明显。与此同时，这种灭绝政策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战争的发展不同的话，它可能会意味着数亿斯拉夫民族成员随着希特勒于1941年启动的庞大的日耳曼化计划（所谓的东方总体规划）的进行而遇害，或者是被流放到乌拉尔山另一边的不毛之地[21]。安乐死强度的加大、杀死老弱以及“干掉”所谓的“共同体外人”也都属于此类。一旦随着时间的流逝国民思想中对灭绝外来民族的所有道德障碍都已清除，以巨大的人道主义代价启动欧洲“民族移动”就只是个时间和资源的问题了[22]。

众所周知，希特勒口头上对“东方”产生一种新的“领导人类型”表示了欢迎，它不再在官僚机构和司法的范畴内思考，也没有任何国家社会主义“高人一等者”思想自身充分施展的道德上的顾忌。在德国驻波兰占领区和俄罗斯的帝国委员会，德国民事管理机关、战地宪兵（Feldpolizei）、安全警察和党组织的代表们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他们有极大的行动自由并形成了一种由对受压迫民众的憎恨所支撑的同志情谊。使用武力和杀戮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希特勒“无情枪杀任何有所怀疑的人”的命令在这里被付诸实践[23]。全体人员“最终解决”的心态甚至通过玩世不恭和偏激狂热、对人生命的无限不尊重和对无法想象的残酷行为的习以为常而超过了这些。此外还有酗酒、空前的腐败和掠夺。

肆无忌惮地对受压迫人民运用武力、毫无顾忌地射杀人质（即便是因为可疑的缘由）、整个村子整个村子被毁灭和血腥的谋杀行动——对这些的接受留下了它的痕迹。干部和军事指挥官的玩世不恭、肆无忌惮和狂妄自大几乎无人能比。这与各个级别肆无忌惮的敛财致富结合在一

起。在东线十分突出的“高人一等者”的恶习逐步转移到了西欧，最后则转移到了帝国范围内。奥拉杜尔（Oradour）事件——对少数几个游击战士的毫无意义的惩罚行动——就是这种心态转移到法国占领区的结果，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北部重复出现，从而在1945年4月底对帝国区域产生影响[24]。政权最后几周内大量的谋杀行动、死亡行军、容忍对被俘美国飞行员施以私刑都属于此类。不管往哪里看，惨无人道地对待被压迫人群都被容忍下来，至少人们没有公开地与其进行斗争。不容许犹太人或者苏联战俘进入防空洞，这没有遇到丝毫阻力。工厂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帮助他们，因为那样肯定会引发与护厂队（Werkschutz）和盖世太保的冲突。

我们可以把这里所发生的情形视为社会道德的进一步沦丧。常常提及的“民众共同体”仅仅存在纸面上。部分是因为政权特务的渗透和警察的监督，部分是因为在战争中特别是由于盟军轰炸袭击而变得极端的国民积极性，传统的社会道德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被毁。个人倒退回自己的小天地，成熟架构中的安全不再。泛滥的告发成了地方社会不知不觉分崩离析的一种代偿物，它们一再给了盖世太保用它自己的力量得不到的材料。这种并非出于政治动机的告发的蔓延表明公众道德处于很低的水平。这其中反映了随着战争的发展社会道德基础的普遍毁灭[25]。

这种状况体现在每个人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逃脱压力和威胁并不再有能力建立社会联系的思想状态上，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后方。阿尔费雷德·德尔普（Alfred Delp）神甫谈到，德国人民堕落成一种“不明是非的生命力”，其结果是，个人只还以“原始的保证生命和满足需求”为目标。他从中看到了一种“日耳曼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认为它的结果肯定是西方文明价值观完全被毁。除了多数德国人无力逃脱的世界观被灌输洗脑之外还有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所产生的意志消沉的作用，它使得在很多人看来相信一个自由国家政治团结的可能似乎是可疑的[26]。赫尔姆特·詹姆斯·冯·毛奇（Helmuth James von Moltke）要求将“在我们同胞心

中重建人的形象”作为抵抗的最高目标并由此重建起民事社会和个人参与政治责任的基础，这是合乎逻辑的[27]。

在已有条件下，国民对党和体制的信任总的来说迅速减少。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干部的大佬主义和可怕的腐败不能再继续瞒过人民，对于大量国社党干部免服兵役、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知平民百姓疾苦，他们不满地作出反应。不久之前，第三帝国程度惊人的腐败得到了深入详尽的描述，恰恰是领导集团的成员——不仅仅是赫尔曼·戈林和尤里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无耻地敛财致富[28]。偷税漏税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圈子十分稀松平常，毕竟阿道夫·希特勒也认为，他没必要为从《我的奋斗》的大批量发行中获得的收入交税，而该书是由官方发行销售的。对于通过保证慷慨的年俸（这当然是免税的）获得他的将领和其他官员的认可喜爱，希特勒没有丝毫迟疑。由高级干部的级别决定的惩罚办法反映在所有规则上。公共道德这样的东西在所有圈子里都是陌生事物。

一个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最腐败的纳粹领导人之一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1942年在海德堡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赞成面对保安部和盖世太保的统治日益得到承认至少（当然只是为“民众共同体”成员）重建起法治国家的雏形，这简直荒谬极了[29]。这什么结果都没有产生，司法完全变成国家权力的差役，尽管准备好了的关于排挤共同体外人的法律（草案在1945年1月1日提交）并未生效[30]。随着希特勒1942年5月的认可，公法最后还有效的部分也失效了，占据统治的是纯粹的肆意妄为（至少是在刑法范围内），不仅是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特别法庭制度也变成了国家的专有工具。

犯罪的升级没有引发对公正和不公的区分，尽管犯罪者为他们的行为想好了二流的辩护。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1943年10月6日希姆莱在波兹南（Posen）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就谋杀犹太人一事对在场的政府官

员们和盘托出，但与此同时称赞他的人坚持完成了这个艰难的任务，没有失去他们的内在立场也没有给自己敛财，这是个无与伦比的委婉说法[31]。

在民众当中广泛存在着一种模糊的因为德方灭绝犹太人而产生的罪责意识。说明精英的立场的难度更大了。对道德漠不关心习以为常不是1933年才开始的，而且准备干脆排斥令人不快的过程是进步了的纳粹政权的常规行为之一。这种态度还得到了因为阴险诡计遭起诉的威胁的支持。还有，他们一次又一次——直接或者间接——敛去犹太人的财富，通过指出这种获得形式上的合法性它们被淡化了。在1945年之后变得普遍的对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的引证也是半斤八两。真正的紧急状况倒不如说是，本来有可能影响事情发展的那些人埋没了他们的良知。

不仅是一体化和司法瘫痪、种族政策标准侵入司法判决的所有领域、在总则过度延伸和推断司法影响下任意决策的长驱直入，法治秩序总体被破坏也是纳粹政权的特征，其代理人出于意识形态的蒙蔽和对权力的欲望而排斥一切不公正意识并且不愿看到他们行为的不道德。因此厚颜无耻和对人的蔑视主导了政治行为，而公正即便在缩小的仅适用于雅利安人民众共同体的范围内也失去了意义。对纳粹官员来说，小中产阶级道德观的内心世界是不可或缺的——比方说这在鲁道夫·赫斯（Rudolf Hoess）但也在海因里希·希姆莱身上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在大量流血、暴力、对人的压迫当中被小心地保护着，而且它具有简直是完全相反的特征，但是这与公众和个人道德的普遍瓦解并不冲突，这对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很具有代表性。

---

[1] 请参阅Bradley F.Smith对该进程起源的描述：*Der Jahrhundert-Prozess. Die Motive der Richter von Nuernberg. Anatomie einer Urteilsfindung*，Frankfurt am Main 1977，S.25ff。

[2] Hannah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 Ein Bericht von der Banalitaet des Boesen*，Leipzig 1986 Neuaufl.，S.400f.

[3] 参见Ian Kershaw的*Hitler 1936-1945*， Stuttgart 2000，S.647ff。

[4] 请参阅Helmut Krausnick的Denkschrift Himmlers Ueber die Behandlung der Fremdvoelkischen im Osten，刊登于*VfZ* 5（1957），S.196-209。

[5]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ie Funktion des Antisemitismus im Dritten Reich，刊登于Dirk Blasius和Dan Diner的*Zerbrochene Geschichte. Leben und Selbstverstaendnis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4，S.161-171。

[6] Martin Broszat，Soziale Motivation und Fuehrer-Bind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Nach Hitler . Der schwierige Umgang mit unserer Geschichte*， Muenchen 1988，S.28和S.33。

[7] J.Peter Stern，*Hitler. Der Fuehrer und das Volk*， Muenchen1978，S.22ff.

[8] Hans Mommsen，Rueckkehr zu den Urspruengen. Betrachtungen zur inneren Aufloesung des Dritten Reiches nach der Niederlage von Stalingrad，刊登于同一作者的*Von Weimar nach Auschwitz. Zur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n der Weltkriegsepoche*， Stuttgart 1999，S.318f。

[9] Hans Mommsen，Die NSDAP. Typus und Profil einer faschistischen Partei，Stuttgart 1999，S.208f。

[10] 参见Martin Broszat的*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Muenchen 1969，S.262ff。

[11] 请参阅Dieter Rebentisch/Karl Teppe的Einleitung，刊登于同一作者（出版）的*Verwaltung contra Menschenfuehrung im Staat Hitlers. Studien zum politisch-administrativen System*， Goettingen 1986，S.23ff。

[12] Frank Bajohr，*Parvenues und Profiteure. Korruption in der NS-Zeit*， Frankfurt am Main 2001，S.49ff.u.passim.

[13] 参见Lothar Gruchmann的出色描述：*Justiz im Dritten Reich. Anpassung und Unterwerfung in der Aere Guertner*， Muenchen 1988，S.487f。

[14] Ralph Angermund，*Deutsche Richterschaft 1919-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0，2.Aufl.2001，S.231ff.

[15] Max Domarus（出版），*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Bd.II，Wuerzburg 1963，S.1865f.；请参阅*Angermund* 的*Deutsche Richterschaft 1919-*

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0， S.248f。

[16] Gruchmann，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Anpassung und Unterwerfung in der Aere Guertner*， Muenchen 1988， S.487f。

[17] 参见Gerhard Eisenblaetter的*Grundlinien der Politik des Reiches gegenueber dem Generalgouvernement 1939-1945*， Diss.phil.， Frankfurt am Main 1969， S.31ff.， 请参阅Alf Luedtke/Bernd Weisbrod（出版）的*No Man's Land of Violence. Extreme Wars in the 20th Century*， Goettingen 2006。

[18] Hans Buchheim/Martin Broszat/Hans-Adolf Jacobsen/Helmut Krausnick， *Anatomie des SS-Staates*， Muenchen 1997， S.493ff.

[19] 参见Hamburger Instituts fuer Sozialforschung制作的展览Verbrechen der Wehrmacht以及Hannes Heer以及其他人（出版）的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Dimensionen des Vernichtungskrieges 1941-1944*， Hamburg 2003 2.Aufl。

[20] Chiristian 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s-und Vernichtungspolitik in Weissrussland 1941 bis 1944*， Hamburg 1999， S.46ff.

[21] Karl Heinz Roth， 'Generalplan Ost'-'Gesamtplan Ost'. Forschungsstand， Quellenprobleme， neue Ergebnisse， 刊登于Mechthild Roessler等人（出版）的*Der 'Generalplan Ost'. Hauptlini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Planungs-und Vernichtungspolitik*， Berlin 1993， S.60f。

[22] 参见Goetz Aly的重要描述：'*Endloesung*'*. Voelkerverschiebung und der Mord an den europaeischen Juden*， Frankfurt am Main 1995， 特别是S.46ff。

[23] Besprechung im Reichsministerium fuer den besetzten Ostgebiete am 16.Juli 1941 （IMT XXXVII， S.86ff.）； 请参阅Peter Longerich的*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enchen 1998， S.362f。

[24] 请参阅Gerhard Schreiber的*Deutsche Kriegsverbrechen in Italien. Taeter*，*Opfer*，*Strafverfolgung*， Darmstadt 2000， S.149ff。

[25] 请参阅Robert Gellately的*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Enforcing Racial Policy 1933-1945*， Oxford 1990， S.130ff.； Hans Mommsen， Der deutsche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und die Wiederherstellung der Grundlagen der Politik， 刊登于同一作者的*Die Weisse Rose und das Erb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Muenchen 1993， S.198-215。

[26] Roman Bleistein（出版）的*Dossier*：*Kreisauer Kreis. Dokumente aus dem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7，S.66f.；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er Kreisauer Kreis und die kuenftige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Muenchen 2000，S.217ff。

[27] Brief Moltkes an Lionel Curtis vom 25.3.1943，刊登在Freya von Moltke/Michael Balfolur/Julian Frisby的*Helmuth James von Moltke* 1904-1945. *Anwalt der Zukunft*， Stuttgart 1975，S.456。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er deutsche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und die Wiederherstellung der Grundlagen der Politik，刊登于同一作者的*Die Weisse Rose und das Erb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Muenchen 1993，S.198-215。

[28] Frank Bajohr，*Parvenues und Profiteure. Korruption in der NS-Zeit*，Frankfurt am Main 2001，S.35ff。

[29] 参见Christoph Klessmann的Hans Frank-Parteijurist und Generalgouverneur in Polen，刊登于Ronald Smelser（出版）的*Die braune Elite*， Darmstadt 1999，S.41-51。

[30] 参见Diemut Majer的*Grundlagen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chtssystems*，*Fuehrerprinzip*，*Sonderrecht*，*Einheitspartei*， Berlin 1987，S.182ff。

[31] Bradley F.Smith/Agnes F.Peterson（出版）的*Heinrich Himmler. Geheimreden 1933-1945*， Frankfurt 1974，S.169ff。

第12章 第三帝国的瓦解

德意志帝国在1945年5月8日和9日的无条件投降不仅意味着德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也意味着它的政治制度完全从内部崩溃。自从1943年1月国防军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一个有凝聚力的执政体系就在加速瓦解。旨在从国家机关那里夺取更多权力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办事机构不断加强的努力也加速了这一进程。1944年6月，当盟军登陆法国加剧了军事危机时，在其推动下的内在崩溃就全速进行了，而当红军在东线中段的突破揭露了德国将会输掉战争的事实时，崩溃进一步加剧了。

在这一背景下就有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尽管如此政权仍有能力把战争进行到最后一刻，直到德国五分之四的领土被盟军占领，国防军才对挺进的盎格鲁—萨克森盟军投降。直到最后一刻，德国领导人都没有采取任何真正与西方或者斯大林谈判的举措。海因里希·希姆莱通过“犹太世界控制权”（Weltjudentum）代表与西方盟军建立联系的敷衍尝试就像他通过福尔克·贝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取得外交联系一样全线失败了，却使希特勒将他踢出了党并解除了他的公共职务[1]。直到希特勒自杀之后，戈培尔才试图与朱可夫（Shukov）元帅开始停火谈判，但这时已经毫无希望了[2]。

事实表明，只要希特勒还活着，政府就没有能力结束这场显然已经输掉的战争。在之前的几年里，希特勒也拒绝任何与被占领国家签订可行性协议的苗头，那本可能形成后来和平谈判的出发点。尽管承受着盟军在整个欧洲的宣传压力，但希特勒避免了与西欧邻国在领土和政治问题上和解。希特勒对帝国总理府（Reichskanlei）部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Heinrich Lammers）表示，任何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战后欧洲新秩序方案的讨论“对战争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他禁止着手研究

对未来欧洲的构想[3]。在他决定对苏联进行“种族灭绝战争”之后，和平的概念对希特勒来说失去了任何意义，与之相反，他的考虑范围局限在东线战争持续不断的设想中[4]。

但与此同时，希特勒在领导战争方面早就该作出的决策面前却打了退堂鼓。当戈培尔逼他要么与莫斯科“犹太人的骗人把戏”（他更倾向于这一选择）要么与华盛顿资本主义“交易所犹太教徒”达成协议来结束两线作战时，这个专制者转而找借口说，只要国防军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的军事胜利，这样的谈判就没门儿。从战略上来看存在着很大问题的1944年夏对匈牙利的占领就源自这样的考虑，它导致了德国在中段的防御被严重削弱，通过1944年12月阿登（Ardennen）反击扭转局势的毫无起色的尝试也是同样[5]。

日益逼近的军事惨败只会掩盖以同样方式发生的政权的内在解体。后者只是通过元首国家的外表维系在一起。希特勒在总理府下面的地堡里貌似把自己封锁了起来，不再与外界保持定期的联系。尽管如此，他拒绝了马丁·博尔曼到德国南部去的建议，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更多是存在幻想而不是现实当中的“阿尔卑斯山要塞”（Alpenreduite）。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的这一天，帝国大部分地区已经为盟军占领。除了莱茵河英国陆军（britische Rheinarmee）最初留给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元帅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之外，只有南德、斯堪的纳维亚和库尔兰（Kurland）的几个狭长地带还在德国人手里。帝国四分五裂，在弗伦斯堡（Flensburg）新建的帝国政府没有任何行为能力。承担起死而复生的帝国总统职务的邓尼茨认识到，他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有序的方式完成投降并把尽可能多的德国组织（人员）交给西方列强监禁。

随着希特勒在总理府下面的元首地堡内自杀，纳粹政权事实上已经

不再存在。然而，不管是成功逃出战火燃烧的柏林却在被英国组织捕获后自杀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还是在试图离开首都时被杀的马丁·博尔曼，他们都幻想着能在邓尼茨的内阁中发挥作用。更清楚地认识到了政权灾难的约瑟夫·戈培尔结束了家人和自己的生命。纳粹统治的代表人物离职，军方领导也是同样，他们仅仅还能为军事投降签字而已。

更可悲的是，这个“千年帝国”很难不画上句号。但这场溃败并非偶然发生的，而且军事崩溃只是它的框架而已。因为政权很多个月以来就处于内部瓦解的状态，只是通过元首国家的外表维持着。专制者还在期待的外交转折——在柏林等着西方国家和斯大林决裂的决定结果是对自己的挫败。但是即便在几个星期前，希特勒也不再有任何真正的权力了，尽管他身边的人因为惊恐地看到了在最后一刻被处死的希姆莱的副官和埃娃·布劳恩（Eva Braun）的妹夫赫尔曼·费格莱茵（Hermann Fegelein）的命运而不敢反抗。希特勒向已不再存在的军队和正在瓦解的军团发号施令，而且他所组成的后备部队纯粹是他的幻觉。

在政权的最后几个月，帝国最高机关仅仅由柏林的分支机构代表，而它的管理机关则疏散到了南德，并试图在更加艰难的条件下维持与部门领导人的无线电和电话联系。博尔曼推动要坚持不懈活动的党办公厅缩在一列专车中继续活动，直到电话联系崩溃。

二战的最后几个月，元首总部的幻象世界处于慢性解体进程的尾声，该进程伴随着失去现实感的不断加剧。对这一发展而言，国家社会主义帝国高层体系的衰落尤其具有代表性。最初协调各部门决定的是总理府部长拉默斯，他通过与各个部门协商协调政府决定（希特勒从1937年起就冻结了内阁会议）。

与此同时，身为党办公厅主任和元首秘书的博尔曼跃升为“灰衣主教”（graue Eminenz），日益阻碍了拉默斯向希特勒通报刻不容缓的政府事务。最后，拉默斯只能在这个竞争对手在场的情况下与总理谈话，

而且即便如此，两人的见面也越来越少了。博尔曼以元首秘书身份起草的非正式的元首指示越来越多地取代了连署命令。

除了博尔曼之外，只有一些下属能影响元首的命令——如果他们像海因里希·希姆莱或者阿尔贝特·施佩尔那样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个专制者的话。然而，博尔曼的计谋得逞，他先是在1944年12月把最高指挥权转交给上莱茵集团军，然后是在1945年1月24日再转交给新建的维斯瓦（Weichsel）集团军，从而把希姆莱赶出了元首总部。相反，一度被视为希特勒继承人的阿尔贝特·施佩尔和在远离元首总部多年之后重又每天和希特勒谈话的约瑟夫·戈培尔得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但是帝国高层作出受监督的决策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少。

与英国不同，第三帝国没有一个“战时内阁”来作关键的决策。在战争爆发时，威廉·弗里克试图通过成立一个赫尔曼·戈林任主席的帝国国防部长会议来保证一定的协调。但是他过于放任自流了，以致帝国各部门和数量越来越多的元首直属机构的独立性反而增大。由于这些专业或者地方特别机构的产生——特别是在隶属和被占领地区，执政行为的统一性完全瓦解。

这种不透明的高层结构反过来影响着所谓的“中层机关”——州长官府（Oberpraesidien）和省行政长官府（Landeshauptmannschaft）。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按照市政模式统一管理抑制中层的部门分割，然而特别机构不断建立，甚至下至最低的管理层面，并导致意想不到的四分五裂和管理行为的低效率。因为帝国国防专署办事处的建立和省党部头目接管民事管理，国家机关的统一性完全消失在相互竞争的责任范围大海中了。传统机构组织崩溃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人民启蒙和宣传部长这时自己也抱怨说，真正意义上的内政已经不再存在，但这并没有杜绝瞎忙活的管理机构未经协调地颁布法令行为增多的现象，这很有代表性。

在国家社会主义当权者圈子内部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能指望希特勒

来精简早就该精简的领导机关，特别是他只关心少数他认为很紧迫的政治领域。这位专制者在1941年时就已经断然拒绝了财政部和内政部旨在阻止各部门以及特别机构渐行渐远的建议，并推迟了早就该采取的简化管理的举措。在那之后，人们受“总体战”的影响要求进行行政改革，而事实证明他是顽固的改革反对者，他害怕这样的改革会损害他的威望。

因此，例如取缔变得多余的经济部、取消可有可无的州高级法院管辖区等措施都以失败告终，这还不算希特勒1944年还曾撤销的慕尼黑赛马跑道的关闭令。直到1944年夏天的时候，在灾难性的形势压力下，希特勒才被迫形式上同意戈培尔在“总体作战”口号下要求的精简。

同时，1943年初保卢斯（Paulus）元帅领导的第六军战败所引发的严重军事危机要求采取只有强有力高层领导才能完成的根本措施。但是谁能发出这一倡议呢？反正是不能指望身为内政部长已经让希特勒大为恼火并且自从1941年以来就请求离职的威廉·弗里克来纠正。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领袖气质反对党和其他部门相互竞争的利益，维护内政和公共管理机构的管辖权，此外他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国家行为不满的主要攻击对象。但是，在墨索里尼下台之后（这在帝国被理解为凶兆）在戈培尔推动下于1943年9月接替弗里克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同样也被证明没有能力重建中央的权威[6]。

戈培尔在1943年初发起倡议，并推动了所谓“三人委员会”的建立，拥有特别全权的该机构应当使管理合理化并梳理经济。他本指望自己能被包括在内，但是希特勒把该任务托付给了总理府和党办公厅负责人，也就是拉默斯、博尔曼和身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负责人凯特尔（Keitel）。这三个人成了他习惯每天打交道的人员，而这位帝国宣传部长被挤到了一个纯粹顾问的角色上。因为凯特尔在这个委员会中和预料的一样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而博尔曼局限于提出党的利益，所以行事谨慎的拉默斯就成了这个机构的领导人，这没有带来任何深刻的改变。

直截了当地说，他缺乏有力的权威，不能像戈培尔希望的那样再次推动车轮转动。因此戈林和戈培尔鄙视地称为“三贤人”。

于是宣传部长在1943年3月进行了几乎没有什么希望的尝试，在戈林（他绘声绘色地向他抱怨“内政外交缺乏领导”）的帮助下恢复帝国国防部长会议。他在日记中轻蔑地记录说，他希望借此来避免拉默斯“作为某种帝国总理”逞英雄。但是该计划再次因为戈林臭名昭著的不作为和缺乏决断力而失败了。

在希特勒日益失去作用、不能再指望他产生协调性影响变得清楚之后，后来改革体制高层结构的努力则源自不可避免的必然了——鉴于东线的人力和物力损失严重必须准备新的储备并消除军工业经济的劳动力短缺。在这种形势下，帝国武装和军需品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权力地位，这尤其是因为他在希特勒那里享有很高的个人威望。他威胁要将一直以来阻挠管理合理化和简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排挤到一边。这反过来促使莱伊和戈培尔开始行动。

尽管戈培尔在他的日记记录中抱怨说，施佩尔“不够国家社会主义”，因此它可能造成这位军备部长宁可从事冷静理性的数字游戏，而不是像戈培尔那样以“对最终胜利不可撼动的信念”为赌注，但他成功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仍然给戈培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施佩尔以非传统的方法并在超越其职权的情况下完全按照党的风格实现了引人注目的军备产出的提高，他简直在这当中看到了心灵的相通。不管怎样，当施佩尔给希特勒的一份内容广泛的意见书中要求委任一名主管的专员时，戈培尔抓住了机会。戈培尔提出自己可以担任这一职位，并在1944年7月25日被希特勒任命为“帝国总体作战全权代表”并由此而被任命为国内政策的负责人[7]。

为最终胜利发动德意志民族的最后能量这一职责被委任给戈培尔，这在多个方面具有代表性。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促使这个宣传部长于

1943年2月18日在后来变得著名的体育宫讲话中作出了“总体战”的声明，并呼吁充分发动所有的力量[8]。但是很快他就明白了，他所推动的坚持到底的宣传必定毫无成果，只要它们与本土战线的实用主义举措相伴。出于这一考虑，他把自己变成了挖掘最后可支配人力储备的代言人，这包括因为希特勒抵制而一再推迟的妇女义务兵制在内。然而他对实际的效果没什么兴趣。首先是借助有力的行动证明民众共同体“拧成一股绳”的胜利意愿。宣传必须貌似“要求自己信守诺言”，才能有一定的可信性。

这位帝国总体作战全权委员的具体方案局限在让动员进程运转上，这完全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思路。与此同时，党应当被纳入要形成的审核附属委员会地位的国家委员会当中，这只让另外一个官僚机构取代了军区机关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很快这位部长就不得不断定，和他的前辈们一模一样，他也无力对抗日益独立的地方官员，特别是因为全权委员对党和国防军的命令权被剥夺了[9]。

该行动没有产生值得一提的强化德国战斗力的作用，但可能具有持续的心理作用。为了防止正在逼近的德国的失败，戈培尔采取了让国民就狂热的坚持到底意愿起誓的这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这就是1943年2月他在体育宫讲话中宣告“总体战”的意义。与此同时，作为党办公厅负责人的马丁·博尔曼和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负责人的罗伯特·莱伊试图使党成为在政治思想动员国民方面具有决定意义的和有效的工具。

自从1942年起，博尔曼就担当起将因为成员数量增多而膨胀并在很大程度上腐化堕落的笨拙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旗舰重新变成一个强有力组织的责任。实行封闭会议之夜、定期举行强制性成员集合和宣传行军（从1943年夏开始为一场按计划开始的集会大潮所取代）应当在公众中重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声望，并使其有能力赢回政治上的主动权

[10]。借助武力约束的方法，博尔曼在对外强调的“自发性”不愿出现的时候给予了帮助。

与此同时，通过绕开主管的地方机构照料在轰炸中受伤者的饮食起居，博尔曼利用炸弹袭击给国民造成的困境来加强党的参与和存在感。国家社会福利组织接到严格指令，仅可以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活动[11]。通过譬如把党纳入疏散儿童下乡和照顾难民这类措施当中，它成功地改善了自身严重损毁的声望，尽管相当一部分国民对逃避军事义务并从黑市得到供给的“褐衫”官僚的不信任仍旧存在。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党的干部队伍在“世界观”和组织上开始恢复[12]。

与此同时，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摆脱了篡夺国家机关职权的最后障碍。将省党部头目任命为帝国国防委员再加上戈培尔给了他们地区和地方管理要听命于他们指令的权限，这些都为此提供了契机。被任命到旧帝国境外的、被指派为所谓的“领导人储备”的主权代表回国在省分部和区域层面形成了一股新的任人唯亲的浪潮，尽管他们无法指望回到他们以前在东部的位置。所有这一切导致内政和公共管理机构进一步遭到排挤，面对党对职权的篡夺它们仅在个别情况下获得胜利。同时，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很多时候被保安部和盖世太保招来当做援助机构，例如在阵地建设或者将距离前线很近地区的国民送回原地等情况下，此时博尔曼则以东普鲁士省党部头目科赫（Koch）的独断专行措施为榜样。

这个党化（这就是说，党对公共机构的侵入）的进程超出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权力攫取阶段所怀抱的最大胆的梦想[13]，博尔曼对党机构的内部精简和改组为该进程提供了支持。党对国家机关职权范围干预最明显的表现是引入国家社会主义指挥官。它有意识地借鉴苏联委员制度，其目的是考虑到并不遥远的民主化将国防军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也体现在这些指挥官受党的纪律约束上面。除此之外，博尔曼在1945年3月命令专门为此接受训练的党员同志进行一次特别行动，以促

使“在受敌人威胁的东线”的国民坚持抵抗到底，但因为地方军事指挥官持拒绝态度而以惨败告终。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自愿担当起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底政策的可靠代表，通过这一努力，国社党回到了在魏玛时期所采用的宣传动员方法上。“斗争时期”的经验被用作在英勇地竭尽所有意志力的情况下能够克服毫无希望的境遇的证明。1943年9月29日党办公厅的一项命令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到现在为止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局面！它从未被偶尔的挫折和重大的困难所迷惑！”在同一时期出版的演说家材料中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德意志人民和民族要进行的战斗本质上是在与同样的敌人进行的同样的战斗，我们在运动的斗争时期那些年里曾经在国内与他们进行过同样的斗争。”[14]

当时没有一次宣传指示不提到“斗争时期”，没有一次不将国内威胁与国外威胁等同起来的。人们意图借此来证明这个杜撰的事实：如果党把一切都掌握在手中就能取得走向胜利的逆转。希特勒当时的声明（部分由戈培尔的手稿所披露）有着同样的思维轮廓，并呼唤直到最后一个人“站立和倒下”的绝对意志。在这些表达方式的背后是希特勒日益加以突出强调的“对意志的崇拜”以及伪尼采式的想法——意志的绝对性是战无不胜的。如果德意志人民捍卫自己的土地、家园、乡村和城市直至最后一人，那么只是由雇佣兵部队组成盟军联盟就不得不意识到，对抗整个民族是前途无望的，它们就会停止战斗。

在这个口号的基础上，1943年10月18日，在莱比锡的民族之战纪念日组成了“德国人民冲锋队”，计划中它的主要职能是实现对德国国民的“彻底”煽动，在戈培尔和博尔曼看来，这是“最终胜利”的保证，而且比直接将人民冲锋队用于军事目的要重要得多，因为这个训练和武装配备不足的民兵组织——特有的低技术含量的“人民突击步枪”（Volksgewehr）可能就是为它们可制造的——军事价值很低，而且

被拉到东线作战的那些人民冲锋队部队经常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完全被彻底摧毁了[15]。

然而，对戈培尔来说，关键远不止是对最后军事储备的发动动员。“我们知道”，1943年10月20日宣传部的一次号召说，“即便一种思想的捍卫者倒下，这种思想也会永存。再也没有太多能量投入的敌人最终将在一个狂热战斗的民族的这种凝聚力面前投降”[16]。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圈似乎一直沉迷于其中，直到他们自己开始相信它。然而如果它没有带来“最终的胜利”，他们也会说这一构想保证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在未来德国的“胜利”。

在第一次人民冲锋队集合之际，戈培尔宣称，这一“团结在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下的整个民族的一致的大规模行动”将导致一支“神圣的人民军队”的形成并实现“民众共同体”[17]。因此戈培尔和博尔曼不顾国防军的顾虑，实现了“德国人民冲锋队”的领导权应当掌握在党手中的目的。作为预备军（Ersatzheer）司令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职权局限在组织、军备和训练上。最初的考虑是，地方的党干部们自行指挥要建立的部队，但是人们很快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区域和地方部队领导人通常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但是戈培尔和博尔曼坚持将党的运动与军队融为一体的基本思路不放，在他们之前希姆莱在建立国民掷弹兵师（Volksgrenadierdivision）时就奉行这一思路，并且它曾在1934年6月令冲锋队的最高领导人恩斯特·罗姆掉了脑袋。现在人们又回到了斗争时期的革命立场上。

希姆莱选择1813年莱比锡民族大会战纪念日来宣布“德国人民冲锋队”成立并非偶然。他更多的是试图将要恢复的人民冲锋队与普鲁士后备军（Landwehr）传统联系起来，并给人以这种印象，导致拿破仑失败的首先是普鲁士后备军的功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越来越多地借用德国民族历史，这很有代表性。乌发电影公司的影片

《科尔贝格》1945年1月30日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在拉罗谢尔（La Rochelle）大西洋要塞（当时用潜水艇和飞机将胶片运到了那里）和柏林陶茨（Tauentzien）宫首映[18]。该片描述了科尔贝格市英勇抵御法国皇帝拿破仑占尽优势的军队的故事，战斗以法国人最终在1813年战败而告终——就像法伊特·哈兰（Veit Harlan）杜撰的历史那样。不管怎样，戈培尔希望这部斥巨资拍摄的电影能真正强化坚持抵抗到底的意愿，而且他认为，对他来说这部电影可以相当于几个师的力量。为了不完全丢尽他的脸面，他让人不再在国防军报告中提及1945年3月18日科尔贝格要塞被攻占一事。

这样的动员宣传运动在1944年和1945年初起了多大效果很难评估，但是在国民当中怀疑和漠不关心仍占据绝对优势。事实上，人们需要不断加强对国民的恐怖威胁才能对外保住脸面。对党内反作用问题的答案看起来有些不同。它们是矛盾的。特别是戈培尔对博尔曼在官僚机构上花费的心机进行挖苦讽刺，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他一直不断给下属的党的办事机构发布大量新的命令和宣传指令。在个别情况下，离开岗位的主权代表还会被施以严厉措施，甚至是处以死刑，虽然只是例外情况。尽管如此，他成功地将省党部头目和省党部领导班子纳入坚持抵抗政策当中，而低一级的国社党结构逐渐不再发挥作用——往往受狂热的青年领导影响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除外。

至于省党部头目，事实证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积极活跃，并且无力利用他们不断增大的权威来防止进一步的战争破坏，尽管在阿尔贝特·施佩尔擅自阻挠破坏希特勒于1945年3月重申的“尼禄（Nero）命令”时，他们当中有部分人保持了缄默并容忍了他的行为，该命令要求摧毁工业和交通设施。自己先气馁了的省党部头目会作为具有行动能力的群体出现并像法西斯大委员会免去墨索里尼职务那样使希特勒丧失能力是无法设想的。

与之相反，省党部头目们2月25日在已经严重损坏的帝国总理府最后一次拜访希特勒时，再一次在博尔曼要求下就“带着最终胜利站立和倒下”的套话发了誓[19]。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形佝偻、不敢与人视线接触的专制者，他慢慢才能找回以往常见的滔滔不绝的雄辩，并（被困在他的虚假世界中）再次信誓旦旦地称将使用“神奇武器”，拜访者清楚，它们并不存在。他们仅限于与他进行必要的握手，思想交流被博尔曼暗示制止，因为他们不能不必要地增加元首的负担。最后一次集体采取行动的机会就这样被浪费掉了。

直到变得太晚了的时候，戈林才决心让希特勒的怒火烧到自己身上，而且与他同时，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开始了结束战争的举措或者是开始与西方国家和解。相反，希特勒却将事先取得部分胜利作为戈培尔向他提出的与斯大林接触一事的先决条件，在希特勒自杀之后，戈培尔试图接触但徒劳无功。在1944年7月20日之后，作为直到那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的机构，国防军在客观上和心理上都不再有能力将步履蹒跚的大帝国的领导权揽到自己身上。再也没有人愿意或者有能力承担起整个的责任并结束一场变得毫无希望的战争了。

与此相反，国民被一种远远超出一切现有恐怖的恐怖所控制，面临瓦解的军队也是同样，严格到极致、下令执行了数万次死刑判决的军法将他们绑在了一起[20]。流动战地军事法庭（Feldgericht）以及帝国国防委员用做常规司法的临时军事法庭的建立策动了这种恐怖，而且它们针对士兵、平民、外国人、战俘和“民族同志”。此外再加上盖世太保和安全警察对大量囚犯和抓获的强制劳工的肆无忌惮的枪杀，这造成了几万人死亡。

最后一刻的嗜血屠杀主要源自一种补偿自身失败的行为主义。毫无意义的“死亡行军”也要归入此类大屠杀当中，它涉及犹太及非犹太裔的集中营囚犯，但也包括战犯和强制劳工，并在各地突然转变为肆意妄为

的屠杀。

偏激狂热的党精英和他们的帮凶们的行动是出于下面这种高度神经质的想法，若要提升抵抗的意愿，除了德意志人民在人种上的均一性之外也必须不遗余力地强行取得政治上的均一性。对事实存在或潜在政治敌人的追击、试图通过对几千名德高望重者进行所谓的“雷暴行动”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精英根除、对“七二〇”运动最后的幸存者以及其他政治囚犯的清洗都源自这样的设想——在事情变得太晚之前再一次完成“全部工作”。

通过对潜在的“人民祸害”或者是叛国者的清洗，煽动者试图在最后时刻给自己勇气并麻痹自己的绝望。重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纯洁性”、不像1933年之后那样在与旧精英（他们因为背信弃义和失败主义而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内在和外在危机）缔结联盟时作出妥协的疯狂想法，导致外线顶住盟军进攻的时候越来越少，用在“除掉”所谓的政权内部敌人上的能量越来越多。

在政权最后阶段获得机会得以充分发展的大量心理扭曲需要独立的描述。在灭亡之前，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历史起源，不过现在只是描述它英勇的一面并将其作为榜样和成功的保证来突出强调的。在崩溃的过程中，国家社会主义力图让自己在历史上幸存下来。将希特勒自杀说成是根据政权后期自导自演而做出的英雄行为就是其中之一，它体现在对自由战争时期的历史榜样的借用上。

党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早期的集合状态。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1945年3月罗伯特·莱伊推动的“希特勒自由军团”的组成，希特勒对其明确表示了肯定。与此相类似，戈培尔在同一时期推动的“狼人”行动也可以这样来解释[21]。起初计划是在苏联战线后从事军事破坏活动，但是这个主要由非常年轻的希特勒青年团志愿者组成的组织主要是为了维系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命。它要对“叛国者”和“人民敌人”进行清洗，这随后

转变成了对亚琛（Aachen）市长弗兰茨·奥本霍夫（Franz Oppenhoff）的谋杀。它与军事游击战没有任何关系，更多的是一个尝试，尝试帮助第三帝国会在受压迫期过后重获新生的这一神话不会破灭。

在了解了随后发生的悲惨崩溃的情况下，直到最后一刻都遵循着希特勒的恐怖命令并将任何抵抗的骚动扼杀在血泊中的那些狂热分子的自以为是是很难理解的。最后时刻的破坏活动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党的复苏和煽动努力却表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本质上以幻想为特征的政治理解。它的唯意志论特征赤裸裸地表现在政权的瓦解上面，在政权建立的那几年里，情况也是一样，但因为传统精英的抑制性作用程度有所不同。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944年“七二〇”颠覆企图失败之后第三帝国的领导层没有了行动能力并且几乎是漠然地等着灾难降临，直到希特勒自杀（它解除了盲目顺从的禁令并突然撕碎了自己制造的幸存神话的谎言）之后才采取结束战争的措施。这个旷日持久的衰败进程在苏联军队突破中段防线和诺曼底登陆让帝国的军事失败变得不可逆转之后变成了必然，除此之外公共机构不断被掏空和瘫痪。由于带着可疑的合法性从事活动并醉心于新封建主义思想、肆意妄为的主权机构取代了它们，到那时还相对独立的机关部门的行动能力也被完全摧毁了。纳粹统治制度最后仅仅靠着军事逼迫和为了动员而进行的动员来维系了。该制度的内在瓦解和军事失败就像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一样了。

---

[1] 参见Felix Kersten的*Totenkopf und Treue. Heinrich Himmler ohne Uniform*，Hamburg 1952，S.343；Folke Bernadotte，*Das Ende. Meine Verhandlungen in Deutschland im Fruehjahr 1945 und ihre politischen Folgen*，Zuerich 1945，S.66f.；还有Klaus-Dietmar Henke的*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Muenchen 1995，S.886ff。

[2] 请参阅Ralph Georg Reuth的*Goebbels. Eine Biographie*，Muenchen 1990，S.608f.；请参阅H.R.Trevor-Roper的*Hitlers letzte Tage*，Frankfurt am Main

1968，S.19以及Georgi K.Shukov的*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Stuttgart 1969，S.604f。

[3] Lammers an Rosenberg am 10.August 1944，刊登在Hans Werner Neulen的*Europa und das Dritte Reich. Einigungsbetrebungen im deutschen Machtbereich，1939-1945*， Muen-chen 1987，S.161f.戈培尔改变了他之前的立场，从这时开始赞成“大洲的社会新秩序”，不管它的名字叫什么；参见Elke Froehlich（出版）的*Die Tagebue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II，Bd.15，Muenchen 1995，S.467。

[4] 参见Andreas Hillgruber的*Hitlers Strategie*，*Politik und Kriegsfuehrung 1940-1941*， Frankfurt am Main 1965，S.562ff.；Rolf-Dieter Mueller，*Hitlers Ostkrieg und die deutshe Siedlungs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91，S.23f。

[5] 参见das Memorandum Goebbels’ an Hitler am 25.Juli 1944 （BABerlin，NL II 8100）；请参阅Reuth的*Goebbels. Eine Biographie*， Muenchen 1990，S.56以及Goebbels’ Tagebuecher vom 10.，20.und 23.September 1944 （*Tagebuecher*，T II，Bd.9，S.464，S.542和S.655）。

[6] 请参阅Dieter Rebentisch的*Fuehrerstaat und Verwalt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Stuttgart 1989，S.499ff。

[7] Memorandum Speers vom 12.und 20.Juli 1944，刊登于Willy Boelcke（出版）的*Deutschlands Ruestung im Zweiten Weltkrie. Hitlers Konferenzen mit Albert Speer*， Frankfurt am Main 1969，Nr.2；Peter Longerich，Goebbels und der totale Krieg，刊登于*VfZ* 35（1987），S.298；Chefbesprechung vom 22.Juli 1944 （BA PotsdamR43 II 664 a）。

[8] Helmut Heiber（出版），*Goebbels’ Reden 1932-1945*， Duesseldorf 1991，Nr.1，S.12ff.；请参阅Guenther Moltmann的Goebbels’ Rede zum Totalen Krieg am 18.Februar 1943，刊登于VfZ（1964），S.13ff。

[9] 关于戈培尔定得很高的期望参见Goebbels’ Tagebuch T.II，Bd.II，2.Februar 1943。

[10] Meldungen zur Versammlungswelle der NSDAP vom 8.November 1943，刊登于BA Potsdam NS 6408，Bl.39和404。

[11] 参见Herwert Vorlaender的*Die NSV.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ation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Organisation*， Boppard 1988，S.14；Armin Nolzen，Die NSDAP，der Krieg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刊登于Militae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der Bundeswehr（出版）的*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Bd.9/1*：*Die deutsche Kriegsgesellschaft 1930-1945*， S.152f。

[12] 请参阅Aufklaerungs-und Rednermaterial der Reichspropagandaleitung der NSDAP，Lieferung 9 （September 1942），Nr.2和Nr.4；Anordnung Bormanns Nr.5543 vom 29.September 1943，刊登于Parteikanzlei der NSDAP：*Verfuegungen*，*Anordnungen*，*Bekanntgaben*，7 Bde.，Muenchen 1942-1945，besonders Bd.4 （1993），S.24ff.和Bd.5 （1944），A543页；请参阅Akten der Parteikanzlei，T.II，Nr.06561ff。

[13] 请参阅Dietrich Orlow的*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Bd.II*：*1933-1945*，Pittsburgh 1983，S.345f。

[14] 请参阅党办公厅发行的小册子Ich kaempfe. Die Pflichten des Parteigenossen，hrsg. von der NSDAP，见上，o.J.（Muenchen1943）。

[15] 请参阅Franz Seidler的*Deutscher Volkssturm. Das letzte Aufgebot*，Muenchen 1989，S.383ff。

[16] Zeitschriftendienst/Deutscher Wochendienst，hrsg. vom Reichsministerium fuer Volksaufklaerung und Propaganda vom 20.Oktober 1944 （ZD Nr.285）.

[17] Goebbels‘ Rede auf der Gauleiter-Tagung vom 8.August 1944，摘自Wolfgang Bleyer的Plaene der faschistischen Fuehrung zum totalen Krieg，刊登于*ZfG* I （1969），S.132f。

[18] 请参阅Francois Courtage/Pierre Cadars的*Geschichte des Films im Dritten Reich*，Muenchen 1975，S.21ff。

[19] 参见das Gauleitertreffen in der Reichskanzlei vom 25.Februar 1945；请参阅Rudolf Jordan的*Erlebt und erlitten. Der Weg eines Gauleiters von Muenchen nach Moskau*，Freiburg 1971，S.252ff.以及Karl Wahl的‘*... es ist das deutsche Herz’. Erlebnisse und Erkenntnisse eines ehemaligen Gauleiters*，Augsburg 1954，S.385f。

[20] 请参阅Manfred Messerschmidt/Fritz Wuellner的*Die Wehrmachtsjustiz im Diens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Zerstoerung einer Legende*，Baden-Baden 1987；Juergen Thomas，Die Wehrmachtsjustiz im Zweiten Weltkrieg，刊登于Norbert Haase/Gerhard Pauls（出版）的*Die anderen Soldaten*，Frankfurt am Main 1995，S.43。

[21] 参见Goebbels Tagebuecher，T.II，Bd.15，S.393f.，S.45，S498；请参阅Charles Whiting的*Werewolf. The Story of the Nazi Resistance 1944-1945*，London 1972，S.145ff.以及Arno Rose的Werwolf 1944-1945，Stuttgart 1980，S.70ff。

第13章 走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国家社会主义对犹太人迫害的升级

大屠杀的历史在近几十年来成了分析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的核心范例。在多年来德国和国际研究界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一考虑将这一课题排除在外之后，现在它走到了兴趣的中心[1]。大量对德意志帝国占领地区（特别是苏联）“最终解决政策”的研究大大扩大了我们的认知，并揭示了德国中东欧占领政策和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系统毁灭之间的密切联系，这通常被人们用奥斯维辛（Auschwitz）代码来表示。这同样适用于对参与“最终解决”人员的认识。它一方面涉及安全警察和保安部、党卫队编队和治安警察（Ordnungspolizei）的职能，另一方面也涉及纳粹统治机关其他工具的参与，因此必然也要将国防军、占领区民事管理机构、在地方从事活动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办事机构、托特组织（Organisation Todt，臭名昭著的工程建设组织。——译者注）、东部托管机构（Treuhandstelle，负责登记、管理和利用波兰国有资产的机构。——译者注）和其他机构的职能包括在内。

与此同时，“最终解决”的实施不仅源自希特勒和柏林中央机构的命令，也源自他们与地方统治者之间的互相影响，对于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致。走向“最终解决”的道路绝对不是明确勾画好了的，卡尔·施洛伊内斯（Karl Schleunes）“走向奥斯维辛的曲折道路”的表述方式现在仍旧适用[2]。除了参与毁灭进程的干部的立场和动机问题之外，主要还有这样一个问题：系统杀害欧洲犹太人的决定性转折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大屠杀是何时发生的？因为这里关系的不是一个意味着对犹太人迫害不断升级的简单的线形发展进程，而且，具有代表性的是，马丁·博尔曼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2年10月曾担心，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性会减弱，“犹太人问题”恰恰不会引起年轻人的重视[3]。这样的看法

促使他们加快实施迫害的举措。

阿道夫·希特勒启动“最终解决”的正式、全面的命令是否存在以及该命令是何时下达的？这个问题和以往一样仍在有关文献中讨论着[4]。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未来“灭绝犹太人种”的设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浓缩成具体的行动指示的？因为在开始出征俄罗斯之前，实行有计划推行的系统清洗的可能还在所有现实考虑的范围之外，即使全部消灭的想法在日益变得极端的反闪米特人的宣传语言特别是希特勒的言语中都曾出现过。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将世界观的最终目标转变成政治现实，而这不是需要来自专制者方面直接或者间接的命令下达那么简单。一直都在谈论的力争的“最终解决”必须首先作为现实的未来计划出现在人们眼前。

强制移民和保护区计划

显然，政府遵循的解决方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及之后都仅限于强迫犹太人移民海外或者是移民到东欧一个还需要再确定的保护区内。马达加斯加计划尽管是如此的乌托邦和不可能实现，但它在赖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和他的忠实助手们看来恰恰是结合了两种方案的理想组合，因此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执行。即便后来这个表面上的解决办法也曾在执行者的脑中掠过，并使得隔离看起来像是个过渡措施。在1940年5月关于“对待东部外来民族”的意见书当中，希姆莱还明确排除了消灭整个种族的可能（这与后来的“东方总体规划”完全不同），并认为，对于“犹太人问题”只有推动移居他国的道路可走[5]。即使盖世太保负责人米勒（Mueller）在1941年10月下令禁止犹太人继续离开西班牙和法国，这也并不意味着向着“最终解决”的过渡，而是与海德里希同一时期的保护区计划联系在一起的[6]。

即便是通常避免就当前对犹太人迫害问题发表具体意见的希特勒也处于在强制移民国外和毁灭政策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这（恰恰）

在一再为人所引用的1939年1月30日帝国纪念日讲话中也可以明确看到[7]。如果犹太人触发新的世界大战，结果将是“犹太人种的毁灭”——这样的威胁是20世纪20年代的反闪米特人宣传的一部分，将犹太人用作人质是其中定期出现的陈词滥调，这在后来在专制者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表态中也可以隐约看到。这次讲话本身通常可以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得到解答。希特勒的威胁直到讲话的后三分之一部分才出现，并且其中提到了依云（Evian）会议。该会议旨在促使出席会议的政府接纳移民过来的犹太人。谋杀威胁是与欧洲有足够的自由定居区来接纳犹太民众的暗示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明确与强制移民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在这次讲话中还是在后来他收回了这些表述的讲话当中，希特勒都没有阐明他对“灭绝犹太人种”的具体设想。激起西方世界的反闪米特人主义，以便长远来看产生共同的反犹太人行动——他脑海中一再重复出现的这个想法表明了这一猜测：浮现在他眼前的是全球规模的对犹太人的毁灭。然而，希特勒在帝国纪念日的诋毁具有代表性的却是必要时也将利用战争手段来争取“最终解决”的这个设想。引人注目的是，希特勒从未在任何地方进一步阐述过这个几乎像是后人伪造的，而且一再为他自己所引用的表述。

随着波兰共和国被吞并、帝国驻波兰占领区建立和西普鲁士和瓦尔特高被蚕食，由于超过170万波兰犹太人被纳入进来，这使迄今为止的移民政策成果大大被淡化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形势。与此同时，在战争的条件下，大规模运用暴力手段以及清洗波兰学者、牧师和知识分子但也包括犹太人的障碍没有了。帝国驻波兰占领区因此成了在苏联被占领地区实行压迫的试验田，但是在苏联实行的压迫起初不是主要针对犹太人[8]。对于解决“犹太人问题”来说，从中并没有产生任何新的前景。尽管缺乏明确的目标，但是这也导致，将帝国驻波兰占领区用做“垃圾倾倒场”并将犹太人（最初是从瓦尔特高和西普鲁士）流放到那里的努力得以贯彻实施。这遭到了德国驻波兰占领区总督汉斯·弗兰克的明确抵制，他得以促使戈林禁止将犹太人进一步流放到那里，而同时

弗兰克不得不忍受波兰人从被吞并地区迁移。由于这个死胡同，1940年初出现了这样的考虑，争取将德国的犹太人迁移到苏联，但是这因为苏联政府没有兴趣而失败[9]。

这个倡议与阿道夫·艾希曼推动的尼斯科计划（再加上一系列其他保护区解决方案）是何关系并不清楚。鉴于移民方案走入了死胡同，这些方案不由得正式产生。从在卢布林（Lublin）地区建一个保护区的计划结果发展成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区计划。海德里希提出的远期和近期相互交替的计划因为参与机构的利益冲突后来则是因为要为苏联战争进行动员准备而成为泡影[10]。鉴于这一进退两难的境地，海德里希对外交部提出的马达加斯加计划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并下令属下认真研究就可以理解了。他这么做了，尽管这个东非岛屿几乎不适合来安置至少500万的犹太移民，这还不算下面这点——在英国驳回了希特勒在法国战争后提出的“宽宏大量的和平建议”之后，该计划无论如何都是废弃过时的了。官方看来，马达加斯加计划直到1942年才结束。显然，马达加斯加计划促使帝国中央安全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开始更加紧锣密鼓地着手未来“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当事实证明逐渐成为海外领土解决方案代码的马达加斯加计划至少暂时是失败的时候，帝国中央安全局就开始考虑其他的选择了[11]。

这可能也与希特勒决心通过攻击苏联快刀斩乱麻地解决这个难题密不可分，尽管表面上取得了各种成功，但是随着轴心国军事上开始孤立，这个难题开始对政府的活动空间产生局限。不管怎样，与艾希曼密切共事的特奥多尔·丹内克尔（Theodor Dannecker）在1941年初时还曾写道：“按照元首的意愿，战争过后，犹太人问题在德国掌握和控制的欧洲范围内将有一个最终的解决。”这并不是指系统地清洗，这一点从丹内克尔随后的表述中就能看出，他说，这需要“最细致的准备”，需要“对一个在还未确定的领土上进行、细枝末节都确定下来的定居行动进行规划”[12]。

这一目标是海德里希1941年3月26日向戈林提交的计划草案的基础，并导致海德里希在7月31日授予其“为在德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内总体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准备”的权力[13]。戈林的全权长时间与希特勒“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命令混为一谈[14]。但是它符合海德里希奉行的巩固其在该领域职权的方针，特别是因为，他担心与东部占领区帝国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竞争。不管怎样，争取实现的“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是着眼于在结束战争之后进行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时纳粹领导人盘算的是苏联迅速战败和英国妥协，那就意味着在10月时就能结束核心战斗[15]。

对苏联的毁灭战

力争的领土的“最终解决”应当通过“向东流放”来完成。这样它就与希姆莱启动的东欧民族“土地重划”（Flurbereinigung）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东方总体规划”中达到了首个高潮。但是，1941年初秋时还存在的未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前景因为对苏联的种族灭绝战争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场战争（在希特勒1941年3月30日论述所表明的态度影响下）伴随着反闪米特人宣传的加强。尽管如此，除了事先计划的对共产国际和党的干部的清洗之外，隶属集团军但归新任命的党卫队和警察高官指挥的安全警察和保安部特别行动队起初也仅限于毁灭“党和国家内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极端分子”，但是反犹太人的集体迫害行动可能未受到阻碍[16]。

这些特别行动队和他们所形成的指挥部起初似乎遵守了这些指示，海德里希在普雷奇（Pretzsch）所做的口头说明对其进行了补充。但是从1941年8月开始，个别情况下从7月份开始，他们就开始清洗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犹太人，然而起初还不是地区范围的。显然，这不是源自总部下达的口头或者是书面指令，而且最初命令的范围也无从证明。它更多的是基于下面这个出发点：变得越来越没有顾忌的武力运用的日益熟练和沦为处决行动牺牲品的范围的扩大自动发生了，其中“犹太布尔

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是骚乱策源地和游击队员支持者的陈词滥调也起了作用。与此同时，对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反犹太大屠杀也是个额外的推动因素[17]。

与特别行动队行动形成竞争的党卫队旅和7月就已经对本土犹太人采取行动的刑警营或许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推动力。例如，希姆莱在1941年8月1日下令党卫队第二骑兵团枪杀所有的男性犹太人并将妇女儿童赶到普里彼特（Pripjet）沼泽[18]。事实证明后者失败了，但是却让人看到了在背后发挥作用的设想——剥夺犹太人的生存基础并干脆杀掉他们。希姆莱在8月初公开通过高级党卫队和警察指挥官弗里德里希·杰克林（Friedrich Jeckeln）命令特别行动队C支队杀死所有不能工作的犹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这其中出现了很快变得普遍的对有无工作能力的犹太人进行区分的表达——也就是说有无生产力。同样的想法也出现在波兹南移民总部负责人罗尔夫—海因茨·赫普讷（Rolf-Heinz Hoeppner）于7月16日呈交给艾希曼的建议当中，即通过“随便某种迅速有效的手段解决”在利茨曼市（Litzmannstadt，现波兰的罗兹。——译者注）犹太人区的“没有工作能力的”居民[19]。

几天之后，赫普讷对艾希曼提出了一个在德国在欧洲势力范围内“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揣测，“当前苏俄的大量区域”可以安排为接纳范围，但是对此还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决定”。他要求，“从一开始就完全明确，最终应当拿这部分移民出来、大德国定居区都不欢迎的部分人怎么办”，以及它的目标是“持续地保障他们的某种生活”还是将他们完全根除[20]。这表明，对于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纳粹领导层直到那时仍旧概念模糊。

然而，在中央没有为此形成一个正式意愿的情况下，负责的指挥官们对下面这一点却存在着共识——在未来整体解决之前应尽可能地毁灭苏联被占领地区的犹太居民。在这一精神下，特别行动队 A支队的领导

人瓦尔特·施塔莱克（Walter Stahlecker）在1941年8月初谈到了“在东部地区存在的清除犹太人问题的可能性”[21]。他指责帝国委员欣里希·洛泽（Hinrich Lohse）忽视了这一点，并认为“立刻清洗整个东部地区的犹太人”是为以后计划的“将其运送到欧洲以外犹太人保护区”减轻负担，他这里指的是在当时还很现实的马达加斯加计划。因此他赞成将犹太人集中在特定的区域。与此同时，即便是如此坚决的对本土犹太居民的清洗最终仍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一认识立刻得到了参与者的承认。例如特别行动队B支队的领导人阿图尔·奈比（Arthur Nebe）在1941年7月23日就注意到，在战争期间“解决犹太人问题”因为“犹太人的数量过于庞大而只能通过迁移才能实现”[22]。这同样表明，对于将犹太居民“向东”迁移应该如何进行，总部还没有任何现实的构想[23]。

到10月份为止与附属机构一起杀害了50多万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的行动没有被视为替代选择，而只是被视作力争的保护区解决方案的前期阶段。正如1941年深秋时所表明的，在高官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反对意见，例如白俄罗斯总督威廉·库彼（Wilhelm Kube）对将德国犹太人运到里加（Liga）的反应就证明了这一点。库彼坚决地反对将从德国流放过来的犹太人和本地犹太人等同看待，并因此导致戈林一度中止了运输。同样，洛泽也进行了抗议[24]。在这一背景下希姆莱的命令证明了柏林总部对于在“犹太人问题”上应该如何处理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继续向东”

希特勒的出发点似乎也是这个设想——先将从德国流放的犹太人安置到东部的犹太人区，然后再“进一步向东”转移。不管怎样，希姆莱在1941年9月18日告诉瓦尔特兰（Wartheland）总督阿图尔·格莱瑟（Arthur Greiser），元首希望让旧帝国与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里没有犹太人。因此他打算，“尽可能在今年就作为第一步先将旧帝国和保护领地的犹太人运送到两年前新加入帝国的东部地区，并在明年春天进一步向东推移”[25]。这一行动导致本来就已经人满为患的利茨曼市犹太人区变

成了流放德国犹太人的转运中心。然而，于11月开始的运输后来转向了明斯克和里加。

自从1941年9月开始，处理“犹太人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省党部头目们敦促要让他们的版图上“没有犹太人”起了导火索的作用。虽然戈培尔要求将柏林的犹太人迁移没有成功，但是它达到了让希特勒肯定9月8日作出的犹太人有标识义务的规定的目的。此外，部分迁移仍在继续。希姆莱决心推动这一事务。他试图通过设立泰瑞辛（Theresienstadt）集中营消除对流放计划的阻力。

与此同时，希姆莱对“犹太人问题”在帝国驻波兰占领区的解决施加了影响。设立犹太人区的进程在那里半途而废了，因此到1942年初的时候中小城市以及乡间还有很大一部分犹太人居住。东加里西亚（Galizien）起初是在军事管理下，这时划归给了帝国驻波兰占领区。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影响下，当地出现了大量针对犹太居民的袭击和屠杀事件，例如在斯坦尼斯劳（Stanislau，现为乌克兰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译者注）和塔尔诺波尔（Tarnopol）。相反，东加里西亚发生的事件辐射到波兰其他地区，从1941年10月起，在将犹太人迁入犹太人区进行隔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枪击行动[26]。

加大迫害力度的至关重要的动力来自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他当时是卢布林区的党卫队和警察负责人，希姆莱在1941年7月将规划和建设警察基地的工作托付给他，这些基地构成了由他推动的东部定居点计划的出发点。格洛博奇尼克为坐落在卢布林的党卫队军工厂和其他项目弄来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犹太人。与此同时，新任命的加里西亚区党卫队和警察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卡茨曼（Friedrich Katzmann）推动了通往克拉科夫（Krakau）的面子工程四号干道的扩建，它后来被赞誉为“党卫军大道”[27]。因为没有其他人员可以支配而且国防军企业拒绝为这些野心勃勃的计划提供自己的劳动力，因此这些

项目使用了犹太人，为了让他们有瓦遮头而建立了一系列强制劳工营，它们一直延伸到遥远的乌克兰地区。犹太难民在难以言说的恐怖条件下从事工作。四号干道以及卢布林营地的恐怖体系从一开始就旨在通过劳动毁灭犹太人。卡茨曼有意识地让尽可能多的被拘禁者因为受到不断的虐待和膳食不足死亡，以至于根据统计他们的寿命预期只有三到六个月。在强制劳工营地死亡者的数量达到数万人 [28] 。

监禁此前从事过其他工作的犹太人劳动力导致他们的家人无人供养。没工作过或者被视为没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被压迫得不到最低的生活保障。在极其可怜的条件下被一起关到犹太人区的犹太人家庭被德国当局视为安全风险和“瘟疫携带者”。按照德国占领者残暴的伪逻辑，让集中营里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死去，但不找没有工作能力的人麻烦似乎是荒谬的。因此对他们进行清洗的考虑就迫在眉睫了 [29] 。格洛博奇尼克发起了这一倡议，并利用他与党卫队领袖的良好关系来为德国移民创造空间，他的理由是在正在进行的对波兰本土居民的迁移之外将犹太人从卢布林地区赶走，随着情势变迁，这只能意味着杀死他们 [30] 。接着，希姆莱先是试图将负责安乐死的元首个人办公厅主任、T4行动（纳粹安乐死计划。——译者注）专家菲利普·鲍赫勒（Philipp Bouhler）派到里加，然后是卢布林，以便为清洗那里没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创造条件。起初它关系的是一个“试验性的行动”，因为当时对于采用什么方式杀人和可能的毁灭能力都没有具体概念。尽管如此，海德里希刻不容缓地将艾希曼派到了卢布林，以便对进展进行现场报告是很有启发性的 [31] 。

此前曾将10万犹太人迁出瓦尔特高的省党部头目格莱瑟同样考虑在T4的帮助下采取清洗措施。与此不同，在卢布林计划的“迁移”更多的是向系统地“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过渡，而不是什么援助措施。在这里，在中期争取迁移到一个犹太人保护区内的考虑消失了。随着希姆莱批准，格洛博奇尼克从这时开始“认真不懈”地着手具体事宜。在1941年

10月13日与他碰面的时候，这位帝国党卫军领袖批准了贝乌热茨（Belzec）集中营的建立并保证了T4的人力援助[32]。鉴于这一全权，格洛博奇尼克获得了弗兰克和帝国驻波兰占领区总督府主要代表的赞成[33]。接着，1942年春，另外一个集中营在索比堡（Sobibor）建立，后来则是特雷布林卡（Treblinka）。

帝国驻波兰占领区1941年秋末作出的决定迈出了为了系统毁灭犹太人而专门进行部分清洗的质的一步，起初是着眼于帝国驻波兰占领区。随着贝乌热茨集中营的建立，犹太人居民委员会（Judenraete）得到指示“将所有不具备生产力的犹太人和犹太家庭登记在册”[34]。这样将劳动力和非劳动力加以区分的原则就制度化了，它后来不久在奥斯维辛—比克瑙（Birkenau）被当做惯例使用。这与同一时期所争取的对劳动营和“供给营”（Versorgungslager）的区分相一致，没有劳动能力的难民因此被判了被饿死的缓刑。在瓦尔特高也有类似的考虑。

帝国驻波兰占领区和瓦尔特高发起的行动在某些方面领先了旧帝国意愿的形成。柏林的指挥中心还在放逐和清洗之间难以决定的时候，对地方的行动者来说事情却已经不是如此了。8月16日的宣传部会议说到“将无劳动能力的犹太人运到俄罗斯”或者是“干脆杀死”[35]，这表明，人们还没有解决的方案。就在1941年12月时，戈培尔还在日记中说，犹太人必须“首先从帝国范围内走开”，同时他搁置了流放应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所有犹太人都应当向东流放。他们在那里变成什么样我们不可能有很大的兴趣。”这个嘲讽性的评论表明，对于具体的行事方式人们没有任何的构想[36]。

备受讨论的万塞会议也反映了海德里希的矛盾态度。会上恰恰没有讨论主动杀害的方法，而是讨论了让犹太人长期慢慢灭绝的可能：“现在，随着最终解决的进行，犹太人应当在相应的领导下以适当的方式在东部成为义务工。在男女分开的情况下、以大工作队为单位将具备劳动

能力的犹太人带到这些地区修建马路，毫无疑问，很大一部分会通过自然减少而消失。”海德里希的这段讲话还不是针对几个月后启动的系统清洗的。然而，海德里希发觉，除掉“可能最终剩下的剩余人员”将是必要的[37]。

海德里希的阐述反映了加里西亚的情况，而且绝对不是对开始起步的灭绝政策的纯粹掩饰。海德里希将当时的措施与“未来最终解决”的远期目标区分开来。他认为，相当一部分犹太人会在劳动过程中死亡，并且说，应当“把撤出的犹太人先是一火车一火车地送到所谓的过境走廊犹太人区”，“以便从那里进一步向东运输”。所以说，全面的保护区方案的构想重新获得新生，因此在立刻灭绝和迁移到乌拉尔山另一边这两个选择之间的矛盾不决也再次出现，但是它很难被视为人道主义的替代选择。

海德里希的阐述——特别是通过艾希曼的转达复述——令我们认识到，在1942年1月时还没有具有实施能力的“最终解决”的整体计划。事实上，万塞会议两个星期之后，海德里希在布拉格对同仁讲话时才形成了这个远景：应将不能德国化的捷克少数民族流放到为盖世太保计划的北冰洋保护区并担当被流放到那里的1100万犹太人的看守。显然，他想的是，可以将古拉格（Gulag）集中营用于这些目的[38]。力争的“最终解决”是着眼于较长时期计划的，这与阿道夫·艾希曼几周后考虑到集中营的扩大而启动的欧洲范围的流放计划不同。同样，希姆莱在万塞会议几天之后下令，将10万名犹太被拘禁者而不是因为在营中受到可怕对待而有很大比例已经死亡的苏联战俘迁移到奥斯维辛（他打算把奥斯维辛扩建成一个被拘禁者军备中心）[39]。

系统毁灭

东线战争显示出转折的苗头，这使得将欧洲犹太人流放到乌拉尔山另一边的北冰洋地区的设想变得不合时宜，具体的近期目标和空想的远

景目标相重叠，并融汇成奥斯维辛—比克瑙和其他集中营的核心的毁灭功能。其中，在战争条件下尽可能地推动对犹太人的杀戮的考虑也起了重要作用。对海德里希的下属——特别是对艾希曼来说，不管怎样，在万塞会议之后，不仅将旧帝国和保护区，也将西欧和南欧也纳入流放计划当中的道路通畅无阻了。一旦启动，毁灭装置就几乎是自动运转的了。而且，在德国占领区或者依附于它的国家里，卖国贼也并不少见。

就这样，政权走上了通往最终启动“最终解决”的道路。很多迹象表明，其切入点是1942年的三、四月份，也就是说在格洛博奇尼克在卢布林区的实验似乎经受住了考验之后。虽然从1941年10月起就显示出明显的激化，而且很多迹象表明，人们对马上就要获得的对苏联胜利的欢欣雀跃在这方面起了影响作用。但是此时还需要这个专制者的一项甚至是持续不断的命令。在将犹太人流放到旧帝国之外的问题上以及希姆莱所争取的扩大犹太人的概念上，希特勒倒不如说保持了克制谨慎。这样的命令是在1941年12月12日在总理府举行的省党部头目会议上作出的——这一假设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万塞会议纪要所表明的倒不如说是相反的内容。

希特勒一直是“最终解决”的思想发动机，但是在具体决策的时候却宁可不发一言[40]。灭绝犹太人的目标一直处在纳粹政权政策的核心位置并主导着希特勒的思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将犹太居民赶出德国的统治范围的意图日益增强。但是人们必须提炼出一个远远不止是个别杀害行动的解决方法，虽然大量的杀害行动是不成问题的。通过建立集中营（再加上卡茨曼的斩草除根政策），格洛博奇尼克指明了一条有效和可行的道路，正如艾希曼首次实地考察后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具有代表性的是，种族灭绝通过清洗在参与者眼中看来是多余的那部分犹太居民进行——他们没有与劳动进程融为一体，而是遭受着传染病和饥饿的折磨。为了对该行为进行似是而非的道德辩护，他们同样需要这样的捏造。大规模屠杀说到底是人道主义解决方案的假想也得以有悖常

理地与之联系在一起。甚至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也迷失这样荒唐的说法：灭绝犹太人，说到底要比盟国炸弹袭击德国平民更为人道[41]。

走向系统“最终解决”的突破在一个犹太居民比例特别高、居民反闪米特人立场突出和占领机构极其腐化的地区发生，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对犹太居民的暴力活动正是在那里日益升级。清洗和大屠杀是家常便饭[42]。即使在卢布林区出现的集中营的杀戮能力起初还有限，但它们的存在仍旧打开了走向解决一个一直被推迟到那时的问题的道路，尽管大屠杀正在进行，但这个问题仍因为犹太人数量的庞大而存在。弗兰克在万塞会议的时候还坚持着未来继续“向东”流放犹太人的目标[43]，但是现在看起来，罗森堡“自己动手清洗”的要求似乎是现实可行的了。希姆莱不得不让在T4人员帮助下的贝乌热茨集中营的建立看起来像是走出因为部分运出帝国区域而导致的、几乎是无法解决的堵塞问题的出路[44]。

在清洗前将有工作能力和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区分开来，后来固定化为例行公事，贝乌热茨和卢布林地区的其他集中营可能是最先实行的。因为他们的毫无人性，纳粹帮凶形成了这一流程，这使之前还曾反对全面灭绝计划的执行者最后的道义或者伪道义顾忌都被一扫而空了。迈出实施大屠杀的质的这一步与希姆莱的向东迁移计划（格洛博奇尼克应为其做准备）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并非偶然。一旦断然作出这个决定，不加区分地灭绝犹太人的决定就昭然若揭了。

这并不是说，在之前的几个月和元首总部没有考虑过如何能解决掉德国人手上的所有犹太人。但是，这该如何进行，其方式和方法仍还模糊不清。“最终解决”必须从各种各样的灭绝行动中提炼出来。这要求——与卡尔·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运动的分析类似——“终于找到的政治形式”。因此明确的语言上的规定是不存在的，即使希特勒自己也永远只是说流放出境。只要全部灭绝犹太人是一个单纯的行为远景，它也不可

能是希特勒命令的具体内容。

至于道德层面，这个区分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各种各样内在外在因素敦促全面灭绝（因为所有部分解决方案似乎都不合时宜了）的这个过程对于第三帝国意志的形成是具有代表性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迫不得已的境况、并不全面的考虑计算和意识形态的偏激狂热作用在一起，使得“最终解决”成为现实。

---

[1] 概况请参照Christopher R.Browning的*Judenmord. NS-Politik，Zwangsarbeit und das Verhalten der Taeter*， Frankfurt am Main 2001，S.11-92；同一作者，*Die Entfesselung der ‘Endloesung’. 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politik 1939-1942*， Berlin 2003；Peter Longerich，*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enchen 1998；Raul Hilberg，*Die Vernichtung der europaeischen Juden. Die Gesamtgeschichte des Holocaus*， Berlin 1982；同一作者，*Taeter*，*Opfer*，*Zuschauer. Die Vernichtung der Juden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2。

[2] Karl A.Schleunes，*The Twisted Road to Auschwitz. Nazi Policy towards Jews 1933-1939*， Chicago 1970.

[3] 引自Marlis Steinert的*Hitlers Krieg und die Deutschen. Stimmung und Haltung der deutschen Bevoelke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Wien 1978，S.553。

[4] 对研究争论的分析参见Browning的*Judenmord. NS-Politik*，*Zwangsarbeit und das Verhalten der Taeter*， Frankfurt am Main 2001，S.60ff。

[5] Denkschrift Himmlers ueber die Behandlung der Fremdvoelkischen im Osten（Mai 1940），Helmut Krausnick出版，刊登于*VfZ* 5 （1957），S.194-198。

[6] Uwe Dietrich Adam，*Juden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Duesseldorf 1972，S.310.

[7] Hans Mommsen，Hitler’s Reichstag Speech of 30 January 1933，刊登于*History & Memory 9* （1997），S.147-161。

[8] 对波兰问题进行了杰出描述的Browning的*Entfesselung*， Berlin 2003，S.49ff。

[9] Sueddeutsche Zeitung vom 13.6.2005：Sonja Zekri，Ein neues Madagaskar. Wie Hitler versuchte，Juden in die Sowjetunion umzusiedeln.

[10] 关于尼斯科参见Browning的Judenmord. NS-Politik，Zwangsarbeit und das Verhalten der Taeter，Frankfurt am Main 2001，S.16ff.；同一作者，*Der Weg zur 'Endloesung'. Entscheidungen und Taeter*，Bonn 1998，S.110；关于后续计划参见Longerich的*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Muenchen 1998，S.96f.；Browning：*Judenmord. NS-Politik*，*Zwangsarbeit und das Verhalten der Taeter*，Frankfurt am Main 2001，S.20ff。

[11] 请参阅 Magnus Brechtken的'*Madagaskar fuer die Juden'. Antisemitsiche Idee und politische Praxis*，*1885-1945*，Muenchen 1998，S.228ff.；Hans Jansen，*Der Madagaskar-Plan. Die beabsichtigte Deportation der deutschen Juden nach Madagaskar*，Muenchen 1997，S.320ff.；Hans Mommsen，*Auschwitz*，*17.Juli 1942. Der Weg zur europaeischen 'Endloesung der Judenfrage'*，Muenchen 2002，S.108。

[12] 摘自Goetz Aly的*'Endloesung'. Voelkerverschiebung und der Mord an den europaeischen Juden*，Frankfurt am Main 1995，S.269。

[13] 原文见Peter Longerich（出版）的*Die Ermordung der europaeischen Juden. Eine umfassende Dokumentation des Holocaust 1941-1945*，Muenchen 1989，S.78；请参阅Mommsen的*Auschwitz*，*17.Juli 1942. Der Weg zur europaeischen 'Endloesung der Judenfrage'*，Muenchen 2002，S.155f。

[14] 但是不久前Browning在*Entfesselung*（Berlin 2003，第456、457页）中认为，7月31日的授权对海德里希来说是个"专利"，它可以"追溯到希特勒在7月中旬的煽动言论"，但是与海德里希在1941年3月向戈林提出的关于在整个欧洲"解决犹太人问题"考虑的关系是毫无疑问的；请参阅Aly的*'Endloesung'. Voelkerverschiebung und der Mord an den europaeischen Juden*，Frankfurt am Main 1995，S.270。

[15] *Die Tagebuecher von Joseph Goebbels*，Elke Froehlich（出版），T.II，Bd.1，Muenchen 1994，S.269。

[16] 请参阅Mommsen的*Auschwitz*，*17.Juli 1942. Der Weg zur europaeischen 'Endloesung der Judenfrage'*，Muenchen 2002，S.117f。

[17] 请参阅Klaus—Michael Mallmann的Die Tueroeffner der 'Endloesung'，刊登于Gerhard Paul/同一作者（出版）的*Die Gestapo im Zweiten Weltkrieg*，*'Heimatfront' und besetztes Europa*，Darmstadt 2000，S.448ff。；Ralf

Ogorreck，*Die Einsatzgruppen und die Genesis der 'Endloesung'*， Berlin 1996，S.47f。

[18] Martin Cueppers，*Wegbereiter der Shoah. Die Waffen-SS，der Kommandostab Reichsfuehrer-SS und die Judenvernichtung 1939-1945*， Darmstadt 2005，S.153.

[19] Longerich，*Die Ermordung der europaeischen Juden. Eine umfassende Dokumentation des Holocaust 1941-1945*， Muenchen 1989，，S.74f。

[20] Schreiben an Eichmann und Hans Ehlich v.3.9.1941，摘自Browning的*Judenmord. NS-Politik，Zwangsarbeit und das Verhalten der Taeter*， Frankfurt am Main 2001，S.59f。

[21] Stahlecker an Lohse vom 6.8.1941，刊登在Hans Mommsen/Susanne Willems（出版）的*Herrschaftsalltag im Dritten Reich*， Duesseldorf 1988，S.467ff。

[22] Wolfgang Benz/Konrad Kwiet/Juergen Matthaeus（出版）的*Einsatz im 'Reichskommissariat Ostland'. Dokumente zum Voelkermord im Baltikum und in Weissrussland 1941-1944*， Berlin 1998，S.46ff。

[23] Christian Gerlach在Die Wannsee-Konferenz，das Schicksal der deutschen Juden und Hitlers Grundsatzentscheidung，alle Juden Europas zu ermorden中正确地指出，放逐德国犹太人的决定绝对不是和清洗他们一个意思，刊登于*WerkstattGeschichte I8*（*1997*）， S.42ff。

[24] Longerich，*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enchen 1998，S.462ff。

[25] 同一作者，*Die Ermordung der europaeischen Juden. Eine umfassende Dokumentation des Holocaust 1941-1945*， Muenchen 1989，，S.157。

[26] 基本参见Dieter Pohl，*Von der 'Judenpolitik' zum Judenmord. Der Distrikt Lublin des Generalgouvernements 1939-1944*， Frankfurt am Main 1993；同一作者，*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1941-1941. Organisation und Durchfuehrung eines staatlichen Massenverbrechens*， Muenchen 1996；请参阅Thomas Sandkuehler的*'Endloesung' in Galizien. Der Judenmord in Ostpolen und die Rettungsinitiativen von Berthold Beitz 1941-1944*， Bonn 1996。

[27] 请参阅Hermann Kaienburg的Juedische Arbeitslager an der 'Strasse der SS'，1999，*Zeitschrift fuer Sozialgeschichte II*（*1996*）， S.19ff.，格洛博奇尼克

与卡茨曼的关系起初是由竞争所决定，但后来则是由合作决定。

[28] 请参阅Pohl的*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1941-1941. Organisation und Durchfuehrung eines staatlichen Massenverbrechens*，Muenchen 1996，S.338ff.，S.355；Sandkuehler，‘Endloesung’ in Galizien. Der Judenmord in Ostpolen und die Rettungsinitiativen von Berthold Beitz 1941-1944，Bonn 1996，S.142ff.，S.148。

[29] Aly，*‘Endloesung’. Voelkerverschiebung und der Mord an den europaeischen Juden*， Frankfurt am Main 1995，S.267f。

[30] 关于Globocnk的角色参见Pohl的*Von der ‘Judenpolitik’ zum Judenmord. Der Distrikt Lublin des Generalgouvernements 1939-1944*， Frankfurt am Main 1993，S.99ff。

[31] Pohl确定这一过程的时间为1941年11月，Frankfurt am Main 1993，S.100f.；请参阅Christian Gerlach的*Krieg*，*Ernaehrung*，*Voelkermord. F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Vernichtungspolitik im Zweiten Weltkrieg*， Hamburg 1998，S.154。

[32] Der Dienstkalender Heinrich Himmlers 1941/42，bearb.v.Peter Witte u.a.，Hamburg 1999，S.233；请参阅Peter Witte的*Zwei Entscheidungen in der ‘Endloesung der Judenfrage’*，Prag 1995，S.61。

[33] 请参阅Bogdan Musial的*Die deutsche Zivilverwaltung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Generalgouvernement. Eine Fallstudie zum Distrikt Lublin 1939-1944*， Wiesbaden 1999，S.196f.；Longerich，*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enchen 1998，S.453。

[34] 请参阅Bogdan Musial的*Die deutsche Zivilverwaltung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Generalgouvernement. Eine Fallstudie zum Distrikt Lublin 1939-1944*， Wiesbaden 1999，S.455f.；Pohl，*Von der ‘Judenpolitik’ zum Judenmord. Der Distrikt Lublin des Generalgouvernements 1939-1944*， Frankfurt am Main 1993，S.93f。

[35] 请参阅Cornelia Essner的*Die ‘Nuernberger Gesetze’ oder Die Verwaltung des Rassenwahns 1933-1945*， Paderborn u.a.2002，S.394ff。

[36] Goebbels-Tagebuecher，见上，T.II，Bd.2，S.533f.

[37] 刊登于Longerich的*Die Ermordung der europaeischen Juden. Eine*

umfassende Dokumentation des Holocaust 1941-1945， Muenchen 1989，，S.85ff。

[38] 刊登于Miroslav Karny u.a.（出版）的*Deutsche Politik im 'Protektorat Boehmen und Maehren' unter Heydrich 1941-1942*， Berlin 1993，S.205f.；请参阅Gerlach的*Krieg*，*Ernaehrung*，*Voelkermord. F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Vernichtungspolitik im Zweiten Weltkrieg*， Hamburg 1998，S.125。

[39] Richard Breitman，*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Hanover 1991，S.158；Browning，*Judenmord. NS-Politik*，*Zwangsarbeit und das Verhalten der Taeter*， Frankfurt am Main 2001，S.109。

[40] Gerlach，Die Wannsee-Konferenz，das Schicksal der deutschen Juden und Hitlers Grundsatzentscheidung，alle Juden Europas zu ermorden，S.43ff.；Browning，*Judenmord. NS-Politik*，*Zwangsarbeit und das Verhalten der Taeter*，Frankfurt am Main 2001，S.71ff.；Mommsen，*Auschwitz*，*17.Juli 1942. Der Weg zur europaeischen 'Endloesung der Judenfrage'*，Muenchen 2002，S.159。

[41] Politisches Testament v.29.4.1945：在他再次把"国际犹太主义"说成是战争"真正的罪人"之后，希特勒强调："我没有再让一个人不明不白：不仅几百万成年男人可能遭受死亡、不仅城市里的几十万妇女儿童可能会被烧死和炸死，而真正的罪人却没有为他们的罪责赎罪，即便是通过人道主义手段——这种情况这一次不会发生"，Max Domarus，*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Bd.II/2：1941-1945，Muenchen 1965，S.2237。

[42] Pohl，*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1941-1941. Organisation und Durchfuehrung eines staatlichen Massenverbrechens*， Muenchen 1996，S.139ff。

[43] Rede v.16.12.1941，摘自Longerich的*Die Ermordung der europaeischen Juden*， S.191f。

[44] 请参阅Peter Klein的Die Rolle der Vernichtungslager Kulmhof，Belzec und Auschwitz-Birkenau in den fruehen Deportationsvorbereitungen，刊登于Dittmar Dahlmann/Gerhard Hirschfeld（出版）的*Lager*，*Zwangsarbeit*，*Vertreibung und Deportation. Dimensionen der Massenverbrechen in der Sowjetunion und in Deutschland 1933 bis 1945*， Essen 1999，S.459-481。

第四部分 第三帝国的抵抗运动

第14章 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总结

纳粹政权抵抗运动的政治面貌是以无数种抵抗行为变体为特征的。这关系到将不同的种类和方针政策的差异纳入考虑，但是将反抗和意图消除体制的抵抗活动进行精确地划分并不总是可能的。我们这里将所有超越部门领域反对的争取消除纳粹专制的努力都理解为抵抗。但是在论述它们的时候，处于中心位置的更多的是可以想到的替代纳粹统治的政治—社会选择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颠覆在各自不同态势下都有什么机会的问题[1]。

欧洲各种形式的反抗和德国抵抗运动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是迫不得已才与大部分国民的民族立场对立的。与此同时，恢复被普遍认为是失败的魏玛帝国宪法的回头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被阻住了。因为希特勒至少在其执政的头几年里成功获得了相对广泛的国民支持，所以这种抵抗无法指望自发的同情，并为自己招致了出卖民族利益的仇恨和憎恶。因此它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2]。

同时，从共和国后期四分五裂的党派形势产生了反对团体方针政策上的极端化，这种状况直到后来才被遏制[3]。一方面它关系在共和国后期依据社团（Verband）形成的抵抗组织，它们主要包括政治左翼，其中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在德国共产党之外坚持下来的革命组织之间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裂痕。在《授权法案》通过的时候社民党还醉心于这样的幻想当中——虽然组织不会在国家继续存在，但是——与俾斯麦的《反

社会主义非常法》（Sozialistengesetz）类似——议会党团会继续存在下去，而这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及早决定建立一个非法机构，不再等着党被正式禁止了。

然而这一举措进行得心不在焉。在1933年1月30日之后，德国共产党还号召进行公众示威游行，并像到此前所做的那样收取党费。这减小了政治警察（后来是盖世太保）的工作难度，每每在这些非法的德国共产党组织试图与前社民党或者是资产阶级阵营联系的时候，政治警察（盖世太保）就会将其破获。共产国际预期纳粹政权不会长期存在，并希望中下阶层会在接下来的革命形势中转而加入无产阶级阵营——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因此非法的德国共产党直到1939年都坚持着建立一个覆盖整个地区的地下机构的目标，这个地下机构应当成为在短期内转变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骨干。这也被证明是空想，并导致共产党在纳粹统治早期不得不付出巨大的血的代价。虽然最后转移至布鲁塞尔和巴黎的总部成功维系住了自己的成员，但是扩大群众基础并将失望的社民党人争取到自己身边的打算全线失败了[4]。同样，它也没有能力有效避免德国劳动阵线蛊惑人心的宣传——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为其打造了“精神上的社会主义”的概念[5]。

在流亡布拉格的党领导层领导下重新组建的流亡社民党（SOPADE）试图通过在南德和萨克森成立边境秘书处来与帝国境内党的前干部建立联系。然而，因为盖世太保间谍成功打入布拉格总部，这结果被证明是灾难性的。相反，大量社会主义抵抗组织形成，它们部分来自立场比社民党更左的德国社会民主共产党（SDAP）和国际社会主义斗争联盟（ISK，Internationaler Sozialistischer Kampfbund），部分——像“新开端”（Neubeginnen）这样的——组织则自行产生。这其中包括“革命社会主义者”、“德国人民阵线”和类似的非法联合，它们各自占据地区要害，行动相互独立[6]。

自由工会（Freie Gewerkschaften）在1933年5月2日之前进行了值得怀疑的与纳粹政权妥协的尝试，并在很大程度上缺席了抵抗运动。如果工会成员投入抵抗运动，那这通常是与德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1933年4月成立的联合工会领导圈保持了非正式的形式，并在1938年与资产阶级反对派建立了联系。社民党抵抗组织在同一时期内逐渐被击溃，或者是作为歌手或者体育组织保留下来，不再在政治场合出现。只有德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一再对革命骨干进行改组，但它们通常都被盖世太保粉碎。与革命派阵营不同，社民党改革派看不到采取反对行动的出发点。在源自工人运动的抵抗因为盖世太保1938年加强了镇压而屈服的同时，天主教青年组织（katholische Jugend）的反对团体成功地将它们的活动继续到了1941年。

与之相对，保守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组织起来的时间明显晚得多，如果撇开赫尔姆特·詹姆斯·冯·毛奇的朋友圈子或者诸如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津（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这样第一时间起来反对的零星的先行者不算的话。直到1938年夏，随着希特勒决心对捷克斯洛伐克开战，他们多数人都欢迎的1933年“民族奋起”的成果和德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新强大似乎被草率地当成了赌注的时候，这些人当中才出现抵抗。

1938年秋，在引退的总参谋长（Generalstabchef）路德维希·贝克倡议下，外交部周围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保守派抵抗组织。它在两个方面与继魏玛共和国组织形成的反对派存在着差异。自1938年秋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以私人交际圈为基础，并从社会的边缘和利基地带出发从事活动。其中，原本一脉相承的普鲁士贵族的联系但还有高级官员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民族保守主义抵抗（它因为立场以占优势的民族主义和旨在保守主义复辟的立场而有了这个名称）在很长时间内避开了盖世太保的注意，后者没有把他们在上层社会的批评言论当回事。

与第一阶段的反对的第二个根本差异在于，回到魏玛到这时已不再在考虑之列，特别是因为反对派的右翼将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归咎于议会制民主的所谓缺陷和社会“失去个性”。此外，放弃魏玛宪法是在几乎涉及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议会制度瓦解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法国，该制度在莱昂·布卢姆（Leon Blum）的人民阵线政府实验之后陷入严重危机，并在失败之后为贝当（Petain）元帅领导的极权政府所取代[7]。这些事件体现在了民族保守主义抵抗运动的组成上。除了以汉斯·罗宾逊（Hans Robinson）为首、成员大部分来自“克莱骚圈”的组织之外，抵抗运动中没有自由中间派的身影，罗宾逊因为是犹太人而在1938年不得不移民丹麦[8]。魏玛共和国的职业政治家只在例外情况下可以见到。其代表人物——如康拉德·阿登纳或者是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拒绝合作，因为他们看不到颠覆计划现实的政治前景。拥有议会经验的只有尤里乌斯·勒伯尔（Julius Leber）——卢卑克（Luebeck）的工人领袖和多年的帝国议会议员以及属于全德工会联合会领导圈子、此前担任黑森州州长的威廉·洛伊施讷（Wilhelm Leuschner）。

很有代表性的是，在“七二〇”运动当中占优势的是一些在政治上德高望重的人，他们通常是高官、外交官或者军官，而学者、工业家和商人不见踪影，两大教派的高级神职人员也站得远远的。反叛者大多自认为国家公仆，最初他们认为自己以国家的名义行动是理所当然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争取基督教和社民党工会成员的支持只是附带性的，他们把科隆的凯特勒之家（Ketteler-Haus）作为会面的地点。与这些联合起来的工会领导代表——其中包括威廉·洛伊施讷和雅各布·凯泽（Jakob Kaiser）——会合在一起的还有马克思·哈贝尔曼（Max Habermann），他曾领导过德国商店职员联合会，并且是工会的民族主义派代表。从这里他们和前中央党领导建立起了联系，特别是约瑟夫·维尔默（Josef Wirmer）和约瑟夫·埃尔辛（Josef Ersing）。

在格德勒春天与英国政治家建立了联系之后，他们向他提出了这个

问题，“除了将军们之外他的背后还有谁的支持？”此后，格德勒开始接触工会团体。尽管工会领导人在国内的支持者有限，但格德勒仍通过与他们建立联系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举措，他使抵抗运动走出了前政权职能行使者的小圈子。然而，工会领导们类似官员的心态在很多方面与受保守主义影响的格德勒的支持者的态度相一致，比方说乌尔里希·冯·哈塞尔或者约翰内斯·波皮茨（Johannes Popitz）。威廉·洛伊施讷取得产业工业支持的要求遭到特别是尤里乌斯·勒伯尔和卡洛·米伦多夫（Carlo Mierendorff）的怀疑审视。另外，盖世太保体会到，洛伊施讷在柏林工人圈的受欢迎程度是不可阻挡的，那里的人说他是下一位帝国总理[9]。

工会成员在“七二〇”运动中首先自视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理人。洛伊施讷期望在军方进行政变之后将出现与库尔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计划类似的对宪法的半独裁改革，为此他打算押上工会的利益，同时不让它们自身成为武力颠覆的杠杆。与1933年春的谈判类似，将工会纳入国家的情景在他眼前浮现，而且他的“德意志工会”（Deutsche Gewerkschaft）计划就产生自这一前景。它被设计为一个统一的工会组织，建立在强制所有就业者加入的基础上。这被融入格德勒的规划当中，并使其具有突出的社团主义特征，工会对整个福利和工资政策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并在经济政策上拥有否决权。

在外交部、国防军和公共管理机构活动的反对派的共同之处是防止战争。但是，当希特勒因为《慕尼黑条约》似乎一度与战争计划保持了距离的时候，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关系下，这些相对迟疑的颠覆尝试在萌芽的状态停滞不前了。促使英国对希特勒采取坚定立场并接下来孤立他的外交努力全线溃败，而且在波兰战败之后这种可能再一次发生了。希特勒对法国的胜利最终使反对派送他去养老并向西方列强提议由赫尔曼·戈林担任帝国总理的计划成了无米之炊，并使他们陷入严重的危机。通过部分改革和换掉海因里希·希姆莱以及约瑟夫·戈培尔等对专制者影响特别有害的个别国家社会主义官员来进行补救的希望被证明是

个错误，因此在除掉希特勒的情况下对政府进行彻底改组的前景也是同样。

在1940年秋之后重新形成、摆脱了野心勃勃的“同情者”（fellow traveller）的反对派从这时开始不再原则上排除刺杀专制者的可能性，尽管像格德勒等著名反叛者（在原则上否定抵抗权的理想主义国家传统影响下）直到最后仍对刺杀暴君的方式有怀疑。与此同时形成了一分为二的局面，民间反对派使力争的对政权的颠覆取决于军事政变。他们把很大的力气花在为未来内阁制定部长名单上，但没有为政治发动国民反对政权做任何的准备。因此反叛寄希望于军方政变形式的“从上（而下）的革命”，接着启动一个民事过渡政府，但是它什么时候能通过选举获得合法地位就不得而知了。

与此相反的是“克莱骚圈”，与民主保守主义团体相比，这个圈子里聚集的主要是年青一代的反对派，他们起初没有参与颠覆事件的计划。在他们的精神领袖赫尔姆特·詹姆斯·冯·毛奇的领导下，这个根据“克莱骚”庄园命名的抵抗组织为有朝一日纳粹统治制度瓦解进行着设想规划[10]。从毛奇的角度来看，纳粹政权处在一条异乎寻常的歧途的末路，它曾从变革开始，并在丢掉了西方的普世精神和放弃了人类的个人尊严的时候走到了末路。毛奇认为，这两者导致了隐姓埋名的现代理性国家（Anstaltstaat）的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对人力的掠夺式使用、国民广大群体的社会窘境和没有灵魂的物质主义消费社会。从这方面来看，纳粹政权似乎是整个欧洲错误发展的顶峰，这一发展将与政权同时走到历史的终点。

与卡尔·格德勒及其同道中人不同，对“克莱骚圈”来说这里关系的是一场根本性的、在他们看来是革命性的社会改革——以及在西方强调个人的资本主义和东方强调集体的社会主义之间走上“第三条道路”。该圈子的核心成员包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一些名人，毛奇、彼得·冯·瓦

滕堡（Peter Graf von Wartenburg）伯爵、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Adam von Trott zu Solz）和弗里茨—迪特洛弗·冯·德·舒伦堡（Fritz-Dietlof von der Schulenburg）等。他们与卡洛·米伦多夫、特奥多尔·豪巴赫（Theodor Haubach）和阿道夫·赖希魏因（Adolf Reichwein）等改革派社民党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同时与耶稣派神甫阿尔费雷德·德尔普和奥古斯廷·勒施（Augustin Roesch）过从甚密，他们拥护天主教团结一致并对该圈子的目标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把他们所要求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用“个人社会主义”的概念来概括。

毛奇期望有朝一日不仅能实现政权更迭，也能带来一个异乎寻常的新开端，不仅将德国也将整个基督教西方包括在内。面对纳粹法庭人民法院院长罗兰德·弗赖斯勒（Roland Freisler），他坚称，他和其他被告“只是考虑”而没有与具体的颠覆准备联系在一起。这是有意识地回到“克莱骚”最初所采取的立场——打算一直等待，直到政权自己筋疲力尽。在这个意义上，他在1943年1月时还强烈建议不要像格德勒准备的那样“过早（采取）颠覆行动”，因为全面反转的时间还没有成熟。当时对于格德勒还可以听到这样怨恨的话，说他是反对派的“克伦斯基（Kerenskij）”——在“革命”迫在眉睫的时候他却在计划政变[11]。同时，在毛奇1944年1月被捕之后大多数“克莱骚圈”成员毫无保留地投身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借“瓦尔基里”（Walkuere）行动有针对性推动的政变。纳粹统治继续存在下去将导致社会道德基础毁灭，并会导致“日耳曼布尔什维克化”，这将完全毁掉道德恢复的可能，这个考虑对此产生了决定性的意义[12]。

“克莱骚圈”在专家鉴定基础上提出的“新秩序原则”与格德勒提出的改革建议没有本质上的差别[13]。此外，很多迹象表明，从1942年开始，这两者的新秩序计划之间日趋一致。在不断把更多同道中人聚集在自己身边的格德勒的倡议下，在1940年和1941年之交时就已经出现关于未来国家形式和建立过渡政府的系统考虑，它们将从内政上为掌握在军

方手中的政变提供保障。在《目标》意见书中，与路德维希·贝克、乌尔里希·冯·哈塞尔、约翰内斯·波皮茨和延斯·耶森（Jens Jessen）联系密切的格德勒提出了一种整体计划，它在自治思想的基础上赞成非集中制、计划了阶梯式的代表机构和两院制度并将职业原则考虑在内。特别是，其中放弃了延伸至市政层面的直接选举，从而有利于间接代表制度，并给了计划中的临时国家元首对组阁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除了夸张保证不会受政党政策的影响之外，这一宪法建议具有突出的独裁特征，而且实际上会导致议会被广泛剥夺权力。其中反映了对议会运作被不负责任的煽动者所利用并成为迷惑煽动大众的平台的过度担心。草案也包括一些有问题的修改（其中包括家庭中的父亲的重复投票权），而且实际上会导致行政主管的强势地位，这些草案的过度转向暴露了它对政治后果缺乏认识。

克莱骚集团的计划因为坚持不懈地贯彻国家辅助原则而与众不同，并完全放弃了政治党派。格德勒在这方面考虑得更为现实一些，但是他希望能按照保守主义思想遏制政党纯粹的思想提供者功能。毛奇将初选放到自发形成的“小团体”手中的构想有些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它将国家变成了大量在履行公共责任方面相互竞争的“小团体”的合作社，只把不可缺少的经济和国防政策领域的职责交给国家。该构想的实现会变成——并非本意的——小领导集团的特权化和寡头政治，而且恰恰不会带来开放的精英的形成，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毛奇试图用二者择一的政治形式来对抗现代国家暴力以及他争取解散传统民族国家、建立一个地区欧洲的果敢是令人赞赏的[14]。

通过强调自治和辅助，反对派的两个派系对完全的国家的苛求作出了回答，但是同时预先规定了经济和财政政策的中央调控，这只有通过欧洲大陆国家团结到一个跨国组织下、借助独立和直接选举的机构才能实现。不管是“克莱骚圈”还是格德勒圈的新秩序计划都争取建立一个其

特权远远超过当前欧盟的欧洲国家联盟。从这方面来说，“七二〇”运动明确并面向未来地对民族国家原则说了“不”，而且，为了使伙伴国的权利完全平等而放弃最初德国在欧洲国家联盟中具有优势地位的梦想，在这一点上该运动表现得十分坚决。对克莱骚集团来说，这是从德国和欧洲新秩序只有在整个欧洲基础上才可能的认识上得出的，而对于未来俄罗斯的地位则没有明确的设想。

人们曾希望将德国抵抗运动的经济设想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驱，但是这只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适用。不管格德勒的思想还是克莱骚集团的设想都是从对劳资协定自主权和罢工权的严重限制出发的，它们争取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无冲突”的社会秩序，并希望通过原材料工业国有化尽可能地中和常规的社会矛盾。在工会问题上存在着清楚明白的战略差异。但是“克莱骚圈”接受过渡时期采用“德意志工会”的方案，就这方面而言它对格德勒和洛伊施纳宣传的工会模式作出了妥协。然而长期来看它们愿意回到将企业家和就业者连接到一起并给予后者相当大的企业共同决定权的企业社区（Betriebsgemeinschaft）原则上。

反对派对未来这一天的规划是在广泛禁止与西方思想交流的极权主义统治的雾霾下产生的。这解释了为什么像毛奇、特罗特和约克这样与英国私人关系密切的人仅仅是十分从属性地把盎格鲁—萨克森宪法奉为典范并使他们早期的跨大西洋友好关系变淡的原因。反叛者的思想发展由头至尾是受德国理想主义传统或天主教团结一致约束的，而且找不到通往受实证更大影响的西欧宪法思想的桥梁。

最初格德勒、冯·哈塞尔和波皮茨以为能大致接受纳粹政权造成的局面——政治党派瓦解、左派和秩序国家要素被打压。他们希望在貌似已经产生的白板上对宪法进行很大程度上不考虑历史困难的彻底改造。最晚到1943年，结束战争并不遥远的期待在欧洲各地出现的时候，这发生了改变，纲领貌似比民族保守主义反对派还要右派的自由德国民族委

员会（Nationalkomitee Freies Deutschland）的出现是逐步再政治化的一个指标，其结果是在“七二〇”抵抗运动内，旧的和表面上已经消除的方向矛盾重新点燃了。这方面，毛奇1943年在土耳其之行中因为他突出的超级敏锐的政治意识而敦促他的对话伙伴适当地让左翼参与计划中的颠覆政府当中很能说明特点。

在同一时期内，在直到1943年10月去世之前一直担任“克莱骚圈”内社民党发言人的卡洛·米伦多夫敦促下，“跨党派民主人民运动”草案产生了，它应当作为“所有幸存和具有生命力的社会和民主力量的集合”在颠覆完成后立刻诞生[15]。“七二〇”运动反叛者对米伦多夫的“社会主义行动”进行了认真和深入的研究，这样他们就迈出了从一个德高望重者的辩论联盟的基础走向将公众纳入具体政治行动中的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是长年政治学习进程的结果，它导致这些下定决心行动的精英们克服了最初的极权国家思想。

然而，不同反对派对米伦多夫方案的理解是不同的。格德勒想的是建立一个国家领导的群众组织，它至少能暂时遏制民族主义政治党派在新政权产生。相反，毛奇着眼的是自发的“小团体”（Gemeinschaft）的共同作用，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决心悔过和回头的和平党派。而对立场务实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关键则是对颠覆政府的直接政治支持——因此也包括一个民主平台的建立。参与者（特别是在刺杀行动前特别忙碌的最后几个星期）无法再就跨党派人民运动的纲领达成一致，在格德勒圈基督教导向的要求问题上，倒不如说出现了与尤里乌斯·勒伯尔领导的社民党一派的决裂，这些使人注意到反叛运动所承受的日益增大的行动压力，但也证明了对来自共产主义竞争者的潜在威胁的顾忌。

在这幅图像当中，军方反对派的立场被排除在外，他们在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的果断领导下保留了走自己道路的权利，而且他们不想把军事戒严的手段无条件让给平民反对派。他们没有任何为结束希

特勒统治争取普通士兵支持的考虑。政变更多的是采取军事紧急状态的传统方法，而且预定将任命到防区的平民政治专员仍旧听命于指挥官。这次军事颠覆失败主要是因为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反叛者认为，军事命令途径无论如何都会正常发挥作用。同样，打算通过捏造一次“不知前线疾苦的党领导”的暴动企图使部队的誓言失效的尝试也失败了。

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下定决心改变预定的颠覆内阁构成，使其向左转。他考虑任命尤里乌斯·勒伯尔为帝国总理，当后者拒绝之后又考虑任命威廉·洛伊施讷。他是否利用了最初计划的格德勒手上的声明还是个疑问，而后者否认军方有权干预政治。不管怎样，在7月20日之前的几天因为逮捕的威胁而行动自由严重受限的格德勒也看到，自己在政治上遭到孤立。与他关系密切的顾问汉斯·贝尔德·吉泽菲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毫不顾忌地向美国驻伯尔尼代办艾伦·杜勒斯（Allan Dulles）告发说，施陶芬贝格是“工农政府”的支持者。然而，施陶芬贝格的东方选择是谈不上的。不管怎样，尤里乌斯·勒伯尔和赖希魏因建立联系有助于试探非法的德国共产党领导对颠覆事件的立场。这在政策上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施陶芬贝格吸引到自己身边的反叛者小圈子决定进行刺杀，尽管没有任何盟国承诺说会容忍颠覆政府或者是作出让步，比方说通过开辟西线战场。“七二〇”颠覆计划的始作俑者亨宁·冯·特雷斯科说，为了重建德国的威望，刺杀行动不管怎样都必须进行[16]，这段被很多地方引用的话表明了一种临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反叛者为了结束希特勒绝无仅有的恐怖统治而不惜为自己招来出卖国家的仇恨。刺杀行动失败导致在一场变得早已没有意义的战争和一场纵情毁灭中死去的人比此前的战争年代还多，这是空前的。鉴于西方盟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僵化，在刺杀行动成功后组成颠覆政府并避免一场内战的机会很小。但是尝试不能不进行。

上述对“七二〇”行动支持者群体的分析试图对主要的趋势进行总结并指出直接参与或者积极支持过颠覆尝试的主要人物。这一进程的诸多侧面只能一扫而过，尽管像“白玫瑰”、雪绒花海盗、“红色乐团”、佐尔夫（Solf）圈和反间谍机关中的抵抗组织等都值得深入阐述。同样，这里试图进行一种总结，所以没有详细着手研究特别重要的问题：一系列反叛者特别是军事范围内的反叛者卷入灭绝犹太人的问题[17]。对这点进行阐述会额外暴露一点：民族保守主义抵抗运动（很明显克莱骚是例外）是由原本服务纳粹政权或者明确对其抱有好感的组织支撑的。对德国反对派进行研究恰恰表明了非黑即白的描述可能是多么的没有益处，特别是当人们努力将反对派视为在国家社会主义控制下的德国其他可能的发展的万花筒的时候。

---

[1] 参见Hans Mommsen，Gesellschaftsbild und Verfassungsplaen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s*， Muenchen 2000，S.53-158。

[2] 概况参见Juergen Schmaedecke/Peter Steinbach（出版）的*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und der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Muenchen 1985 2.Aufl。

[3] 请参阅Klaus-Juergen Mueller的*Der deutsche Widerstand 1933-1945*，Paderborn 1986，S.13-21。

[4] 仍旧是Detlef Peukert的描述，*Die KPD im Widerstand*， Wuppertal 1980。

[5] Walter Ulbricht，*Die Legende vom ‘deutschen Sozialismus’*， Berlin 1945，S.61.

[6] 请参阅Peter Grassmann的*Sozialdemokraten gegen Hitler* 1933-1945，Muenchen 1976。

[7]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Wilhelm Leuschner und die Widerstandsbewegung des 20.Juli 1944，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S.167ff。

[8] 参见Horst R.Sassin的*Liberale im Widerstand. Die Robinson-Strasser-Gruppe 1943-1942*， Hamburg 1993。

[9] 参见Hans Mommsen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S.340。

[10] Guenter Brakelmann，*Helmut James von Moltke* 1917-1945. *Eine Biographie*， Muenchen 2007；Volker Ullrich，*Der Kreisauer Kreis*， Hamburg 2008.

[11] Motlke an Freya am 4.8.1943，刊登于Helmut James von Moltke：*Briefe an Freya 1939-1945*， Muenchen 1988，S.519。

[12] Hans Mommsen，*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S.217f。

[13] 参见堪为典范的Ger van Roon的编辑：*Neuordnung im Widerstand. Der Kreisauer Kreis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Widerstandsbewegung*， Muenchen 1967，S.561ff。

[14]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er Kreisauer Kreis und die kuenftige Nuerordnung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S.109ff。

[15] 请参阅Mommsen，Der Kreisauer Kreis und die kuenftige Nuerordnung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S.341ff。

[16] 参见Gerd R.Ueberschaer的Generalmajor Henning von Treschkow，刊登于同一作者（出版）的*Hitlers militaerische Elite* Bd.2，Darmstadt 1998，S.256-66；请参阅Bodo Scheurig的*Henning von Tresckow. Ein Preusse gegen Hitler*， Neuausgabe 1987，S.210和S.217f。

[17] 请参阅Johannes Huerter的Auf dem Weg zur Militaeropposition. Tresckow，Gersdorf，der Vernichtungskrieg und der Judenmord，刊登于*VfZ52*（*2004*），S.257-262和紧接着*VfZ54*（*2006*）的讨论。

第15章 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和德国抵抗希特勒的反对派

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被视为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有道理的。他站在1944年“七二〇”颠覆尝试的准备工作的最前列，并且也亲自进行了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如果他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成功的话，那么为将一场早已输掉的战争毫无意义地继续下去而牺牲的几百万人就会幸免于难，中东欧广大地区也会免遭摧毁——不管是因为德国的“焦土”政策还是因为盟国的大范围轰炸或者是直接作战。

狼穴（Wolfsschanze）会议兵营（Lagebaracke）的爆炸只使希特勒受了点轻伤，而施陶芬贝格和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阿尔布雷希特·里特尔·默茨·冯·基尔海姆（Albrecht Ritter Mertz von Quirnheim）和维尔纳·冯·黑夫滕（Werner von Haeften）则在班德勒街的国防部大院（Bendlerblocks）内被匆忙拼凑起来的处决委员会按军法击毙。即便在那之后这位专制者也没有停止磨灭对反叛者的纪念的行动。海因里希·希姆莱命令一个党卫队突击队在夜里将埋在柏林圣马太教堂公墓埋葬的尸体挖出后焚烧并将骨灰撒到地里。今天在该墓地仍有一块纪念碑纪念这一事件。国家社会主义破坏对反叛者的记忆并除掉其家人的意图结果却相反。今天施陶芬贝格这位勇敢的刺杀者和1944年“七二〇”颠覆运动的领袖被誉为“另外一个德国”的代表人物和民族荣誉的维护者[1]。

施陶芬贝格是施瓦本地区一个德高望重的贵族家族的子孙，他是充满激情的士兵同时也是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仰慕者，后者在其作品中预言了德国的灾难。施陶芬贝格是德国国防军最有天赋的总参谋部军官之一。他对1933年1月30日表示欢迎，但是很快在内心上与纳粹政权保持了距离，并且很早就开始批评希特勒及其领导方式。从1941年6月22日袭击苏联开始，他就清楚了，德国正在向着军事失败前

进。在1939年时他就讽刺说“傻瓜在作战”，但是他还希望，一旦赢得战争清除“褐色害虫”就将是可能的了[2]。在输掉莫斯科一役之后他还希望，竭尽全部力量就能纠正希特勒的错误决定。

其中包括下面这个要求：结束迄今为止对东部人民的压迫，让希特勒不仅摧毁苏联统治制度也摧毁俄罗斯国家并进行种族灭绝战争的计划告吹。在不能再对俄罗斯人民进行战争的信念上，施陶芬贝格是与亨宁·冯·特雷斯科少将一致的，后者先是担任中央集团军群（Heeresgruppe Mitte）的第一参谋长（Ia）主管指挥组织训练，后来担任过军事行动部门的负责人。在违背专制者明确意愿的情况下，这两位军官建立了一支俄罗斯志愿兵部队，目的是为反对遭人憎恨的布尔什维克制度的解放战斗争取苏联人民的支持。同时他们要求更好地对待俄罗斯平民和战俘，数十万战俘在“战俘营”（Stalag）内被饿死。特别是施陶芬贝格，他反对为了流放强制劳工而进行的追捕行动。然而施陶芬贝格和特雷斯科的设想没能得到实现。直到军事形势极度恶化，与俄罗斯战俘将军安德烈·弗拉索夫（Alxeji Wlassow）就建立志愿兵部队问题的谈判才开始，但是东线的崩溃抢先了一步[3]。

这样的认识构成了这些努力的背景：在莫斯科战败之后依然如故的损失越来越无法弥补，因此军事上的失败单是因为人口因素就不可避免。因此这30万俄罗斯志愿兵部队对东线德军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与1941年6月征战开始时相比，东线部队的人员只剩下了最初的一半[4]。

施陶芬贝格认为袭击苏联是一个在困境中采取的举措，并将其视为希特勒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一再强调，即便有更好的领导，这场征战也不可能坚持下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他就大力赞成出台一项和平决议——在帝国还存在军事和政治行动能力的时候[5]。因为他在总参谋部主要负责提供“后备人员”，因为国防军损失不断增大，达到了每个月10万人以上，每天将成千上万人送死，同时又看不到结束作战行动的前

景，这种自己也有责任的沉重负担令他心情压抑[6]。

因为被任命到总参谋部，施陶芬贝格得以进入军事决策中心，并且他认识到，希特勒奉行的战略日益对现有力量构成了苛求。担任中央集团军第一参谋长的亨宁·冯·特雷斯科通过影响军队指挥官实现高层架构改革（它将剥夺希特勒对行动决策的直接影响）的努力得到了施陶芬贝格的完全认同，他在1943年1月18日介入了对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元帅符合同样精神、值得纪念但是完全未达到目的的说服活动中。拒绝了他并想把他派往前线的曼施泰因鄙夷地说，“他想让我相信，战争已经输了”。而施陶芬贝格——他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表达“将军阶层的铺地毯的人”（Teppichleger im Generalsrang）已经众所周知——评论说：“这不是一个陆军元帅的回答。”[7]施陶芬贝格不再沉醉于可以实现高层架构改革的幻想当中。他认为，通过全体将领的共同外交措施促使希特勒让步的普遍想法是空想，而且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因此他后来认为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的相应建议是不合理的，并且没有采纳。考虑到陆军元帅们的不作为，施陶芬贝格认为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除掉专制者，因为这是唯一现实的避免彻底军事崩溃的机会。在1942年夏末的时候，他就曾对一位同事说，希特勒是“真正的责任人。只有消灭他，原则性的改变才成为可能。我愿意来完成它”[8]。在这样的信念下，施陶芬贝格与亨宁·冯·特雷斯科取得了一致，后者从1942年初夏开始建立起一个持反对立场的军官关系网，该网络的目标是通过刺杀的方式除掉希特勒[9]。在中央集团军区周围产生的第二股反对力量起初只与军方反间谍体系中以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为首的抵抗组织有联系。但是特雷斯科在1941年秋天的时候就通过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与当时的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建立了联系（当时后者还打算试探最终与英国达成和解的可能）[10]，并从1943年起与贝克——并通过他与格德勒为首的平民反对派保持着密切联系。

是否要通过调到前线摆脱作为军事行动部门负责人一直压迫着他的决策压力，施陶芬贝格犹豫了片刻，但是他留在了军事决策中心。当他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突尼斯第10装甲部队第一参谋长时，他参加了北非的艰苦战斗，但是委任在几个星期之后就因为他在1943年4月7日受重伤而结束。这丝毫没有改变他继续积极投身除掉希特勒的决心。尽管复原得还不够，但是1943年10月1日他就在班德勒街就任了国防部陆军署负责人，并迅速走到当时由特雷斯科和奥尔布里希特推动的叛乱准备工作的核心。

短暂的恢复期加强了施陶芬贝格结束战争一事不能再拖延下去的信念。1943年5月在与他的叔父于克斯屈尔（Uexkuell）伯爵谈话时他表示，“将军们至今什么都没做到，现在必须上校们出面了”，并且他以书信的形式告诉奥尔布里希特有3个月“可供支配”[11]。8月时，奥尔布里希特和特雷斯科就向其透露了他们拟定的颠覆计划，该计划意在利用为在帝国范围内生活的800万强制劳工进行抵抗的情况而制定的行动计划——“瓦尔基里”行动。这个绝妙的颠覆计划的幌子使部分军事机构参与到后勤准备工作当中。11月当特雷斯科被调到前线的时候，颠覆的准备工作则主要由施陶芬贝格进行了，尽管伤势还有影响，但他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精力和活力并成为反叛的核心。

施陶芬贝格没有把计划的反叛理解为“抵抗”（他避免使用这个表达方式），而是将其理解为“民族奋起”。明确在他眼前的是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奥古斯特·奈德哈德·冯·格奈泽瑙（August Neithardt von Gneisenau）这个榜样，这主要是因为施特凡·格奥尔格思想的介绍[12]。他与一起参与颠覆的哥哥贝托尔德（Berthold）一起考虑进行全面的革新，它“应当触及与1918年和1933年完全不同的生活层面”。他认为，在盟军登陆法国之前的时候结束战争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帝国还没有失去军事行动能力的时候，这场战争恰恰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有益新秩序而进行的，因此形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犯罪”[13]。

施陶芬贝格首先自认为是军人，而且军事上的考虑构成了其行为的出发点。但是，促使施陶芬贝格毫无保留支持反叛并且最后实行刺杀的军事动机却与人道主义考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他辛辣地讽刺他的军官同事无思想无道德，他们在信赖元首的同时享受着假期和升迁，但是忘却了“本身的职责”。他强烈抗议对东部工人的奴隶化、已经开始的对犹太居民的毁灭和国防军对苏联战俘的不人道对待。纳粹政权在东方铤而走险的毁灭政策不仅在军事上产生不良后果，而且伤害了民族的荣誉，这促使他毫不犹豫地行动。

基于他的基本军事态度，施陶芬贝格强调军官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他认为军官是国家公仆而不是职业性的，而且他认为军官是“国家的根本代表和民族的真正化身”[14]。这种“黩武主义”源自对普鲁士改革的理想主义看待，它恰恰与他每天所体验到的相反：他每天面对的是普鲁士军事传统因为血腥残暴和道德冷漠而衰落。在追忆格奈泽瑙的同时，他断然拒绝广为流传的军官作为纯粹的军事工程师的形象，并对军官采取社会行动和承担政治责任的义务进行了大力强调[15]。

与和他关系不错的冯·廷根（von Thuengen）男爵相反，他为军队提出了参与政治领导的要求；反过来，他谴责将军们的无能，辛辣地称他们是“将军阶层的铺地毯的人”[16]。他咄咄逼人地说明军方要求走到颠覆的最高领导位置并且不仅仅是做跟班的理由，并强调说：“我们既是军队的领导、也是人民的领导，而且我们将把领导权拿到手中。”[17]施陶芬贝格、他的两个哥哥和其他反叛者这种与意志力相伴的自信心是颠覆尝试虽然面对内外阻力仍旧成为现实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施陶芬贝格让军队扎根国民的设想令人想到普鲁士的奋起，在尤里乌斯·勒伯尔（他很快就与其成为思想上的密友）看来，它也具有历史典范的特征并且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他们与追溯普鲁士改革遗产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及其并肩作战者的差异就在这里。施陶

芬贝格对武装力量的浪漫主义看法反映在下面这一考虑上：军官们不能像1918年11月那样不发挥作用，而且主动权不能被人从手上拿走。施陶芬贝格论证说，国防军说到底是“我们国家最为保守的机构”，但是它“同时扎根于人民”[18]。出于这一看法，他认为国防军的职责不仅是要防止面临的失败发生，还要保护国家免于崩溃[19]。从中产生了下面这个必要性：借助过渡性质的军事紧急状态保证回归到法治和秩序状态，以便抵消预期的阻挠力争实现过渡政府的力量。

另外，施陶芬贝格颠覆计划的一个明显弱点在于，其成功首先取决于军事命令颁布链及其服从的状况要保持完好无损。在军事紧急状态没有遇到较大阻力得以实现的巴黎和维也纳的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在帝国范围内却不是这样，在那里，尽管刺杀行动失败，军区指挥官们对于总部颁布的命令仍旧不予执行或者只是拖拉执行[20]。

与赫尔穆特·冯·毛奇的设想相反，“政治专员”们隶属于军事指挥官并且1860年普鲁士紧急状态规定似乎重新得到了贯彻实施，这很有代表性[21]。因此这里关系的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军事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为颠覆发动国民和普通士兵的准备都没有，起初颠覆应当在捏造希特勒被“不了解前线的党领导”杀死之后产生。平民反叛者催生跨党派人民运动的讨论没有得到在最后阶段紧密合作的施陶芬贝格和贝克的任何回应。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依靠军事极权国家之外可能的确没有别的选择，特别是反叛者们起初还希望坚持东线战争。

1943年初首批刺杀计划失败之后，施陶芬贝格越发进入到反叛运动的核心，特别是在赫尔姆特·詹姆斯·冯·毛奇1944年1月被捕之后。这也与日益变得紧张的军事形势和纳粹政权对内对外的一致极端化有着密切关系。毛奇在1943年初说服不同的反叛组织时说，颠覆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他的被捕尤其使“克莱骚圈”成员与施陶芬贝格建立起联系，并开始积极支持其刺杀计划，这与其最初不参与具体的刺杀准备工作的打

算相反[22]。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约克·冯·瓦滕堡（Yorck von Wartenburg）、弗里茨—迪特洛弗·冯·德·舒伦堡特别是尤里乌斯·勒伯尔这时都是反叛小集团的成员。

与此同时，路德维希·贝克担当起四分五裂的平民反叛圈子的领导任务。贝克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得出了除掉暴君的结论，并全身心支持奥尔布里希特和特雷斯科的颠覆计划。贝克通过奥尔布里希特与施陶芬贝格——他的前下属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并取得了思想上的广泛一致。两个人在国防军政治领导角色问题上的见解完全一致，尽管其来源有所不同。因此贝克得以成为施陶芬贝格与平民反叛组织的主要联系人，并且得以限制倔强的格德勒的领导要求，后者认为他的任务主要在于阻止“将军们采取某些政治行动”[23]。

施陶芬贝格利用因为不断推迟刺杀而出现的延迟来扩大反叛在军事机关中的基础，同时加强与平民反对派的接触。起初误解并不少见。例如，他对威廉·洛伊施讷的亲信赫尔曼·马斯（Hermann Maass）的话（不能抛弃“贵族的历史成就”）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猜疑[24]，而反之，约瑟夫·维尔默的保证（“不管从哪个方向看都不应再热情洋溢地赞誉旧情形”）明显令施陶芬贝格安了心[25]。

无疑，施陶芬贝格坚决拒绝回到“魏玛状态”以及党派国家的议会体制。他受到法团主义（korporatistisch）思想的强烈影响，并与新保守主义思想越走越近，这种思想在“克莱骚圈”就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考虑到格奈泽瑙时，他考虑“产生一个可以支撑国家的阶层并使它如此强大，以至于它有能力进行明智和坚定的领导”。在劳特林根（Lautlingen，原文为Lautling，但应该是指施陶芬贝格家族所在地Lautlingen。——译者注）的商讨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家长式作风后来在多大程度上退到了次要位置不得而知。通过对社会要素的强调，他的政治世界观显示出与“普鲁士社会主义”思想的某种亲缘关系。

同时不管是施陶芬贝格还是贝克都没有直接参与平民反对组织的计划。对这两人来说，享有优先地位的是行动的必要性——这一点他们与社民党人尤里乌斯·勒伯尔是一致的。因此不管是贝克还是施陶芬贝格都避免令与预定将担任帝国总理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的紧张关系升级[26]。这位莱比锡前市长认为军方纯粹是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执行机关，这是以对政治和作战形势值得怀疑的评估为基础的。施陶芬贝格不理解格德勒对正在消失的外界活动空间的天真误判及其“嘈杂的”表现。尽管如此，他仍努力进一步与格德勒加强联系，虽然后者仍旧拒绝采取刺杀的方式并在被捕期间转而持这种见解：从行动的失败中可以看到神意裁判[27]。

施陶芬贝格起初试图在考虑到预期的德国共产党影响的情况下让颠覆政府的组成更多地向左转。对威廉·洛伊施纳和尤里乌斯·勒伯尔（施陶芬贝尔更赞成他而不是格德勒当帝国总理）的忠诚使得他继续坚持让格德勒来担任帝国总理职务。尽管如此，格德勒仍感到自己在政治上遭到孤立，并且越来越怀疑地看待施陶芬贝格，而有鉴于盖世太保的监视，施陶芬贝格避免进一步会面完全是有理由的。这导致格德勒的亲信、争取在未来颠覆政府中的领导位置的汉斯·贝尔恩德·吉泽菲乌斯密谋策划反对施陶芬贝格，并这样向美国驻伯尔尼代办艾伦·威尔逊·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抹黑说，施陶芬贝格为“东部解决方案”（Ostloesung）说话并力图建立一个“工农政府”。这充其量可以以与施陶芬贝格会面时的误解为根据[28]。

在后来民主德国历史学家夸大其词的此类推测中，只有下面这些是真实的：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出现理解为政治警告信号的施陶芬贝格同意了尤里乌斯·勒伯尔和阿道夫·赖希魏因发起的倡议，与德国共产党非法领导建立了联系，以促使他们对颠覆政府采取容忍政策。赫尔姆特·詹姆斯·冯·毛奇在1943年底会见美国外交代表并争取西方盟国对过渡内阁力争向左转能有更多的理解，这一努力走的也是同一路线[29]。相

反，施陶芬贝格在任何时候都没准备将与苏联达成协议纳入认真考虑的范围，而是希望能将东线稳定到西方盟国到达的时候。

但是所有促使西方妥协的考虑以及最后时刻通过马德里建立的接触努力全线失败了。对开启西线的模糊希望不得不打消。与仍旧沉醉在外交幻想中的格德勒相反，施陶芬贝格完全清楚，亚当·冯·特罗特也还一直梦想着的外交解决没有成功的前景，提交了一份令人清醒的形势分析的奥托·约翰（Otto John）令他更加确信了这一点。尽管存在着这一切不利因素，但是为了德国在世界上的名誉，颠覆必须大胆地进行。他与路德维希·贝克一致认为，“单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为了德国”，刺杀行动也必须进行[30]，即便成功的希望极小。

在1944年7月20日他随身携带后来在盖世太保的一份总结中流传下来的笔记中，施陶芬贝格写道：“当前的政权没有权利把全体德意志人民也拉入到他的灭亡当中。在政权更迭之后，最重要的目标是德国还是力量对比中一个可用的势力因素。”这份显然是在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法国北部之前产生的记录从纳粹政府的失败中得出一个结论：“俄罗斯征战形成了整个军事发展尾声的开始，它从下令杀死所有委员开始，并随着让战俘饿死和为了争取平民劳动力而进行的追捕而得以继续。”[31]施陶芬贝格在其他地方指出了对犹太人的杀害和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暴力政策。这份被冠以《备忘录》题目的卷宗令其行为的军事和人道主义动机的内在统一清晰地浮现在人们眼前。其中的一个根源在于他对“真正普鲁士本质”的信奉，“自由的观念”与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在人生道路上给予他的儿子的那样。对下属士兵的责任感、民族荣誉感同样还有对日益增多的腐败（它在希特勒个人身上达到顶峰，但也是制度与生俱来的）和为暴力歌功颂德的道义上的愤怒促使他行动起来。如果不是他坚强不屈的行动决心、他的道德力量和为德国牺牲生命的意愿，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行动就不会发生。对后人来说，能做的只有满怀着崇敬和自豪之情让他鲜活地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

[1] 传记的经典之作是Peter Hoffmann的*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 und seine Brueder*， Stuttgart 1992 2.Aufl.；军事方面参见Christian Mueller的*Oberst i.G.Stauffenberg*， Duesseldorf 1970；Joachim Kramarz，*Claus Graf Stauffenberg*，*Das Leben eines Offiziers*， Frankfurt am Main 1965。

[2] 请参阅Mueller的*Oberst i.G.Stauffenberg*， Duesseldorf 1970，S.161和S.216。

[3] 请参阅Hoffmann的*Stauffenberg*， Stuttgart 1992，S.249f；Hans von Herwarth，*Zwischen Hitler und Stalin. Erlebte Zeitgeschichte 1931-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2，S.332ff。

[4] 参见Bernd Wegner，Von Stalingrad nach Kursk，刊登于*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d.8，Muenchen 2007，S.8ff.和S.67；Bernhard Kroener，Die personellen Ressourcen des Dritten Reiches，同书，Bd.5.I，Stuttgart 1988，S.878ff。

[5] 请参阅Hoffmann的*Stauffenberg*， Stuttgart 1992，S.254，S.258f。

[6] 请参阅Hoffmann的*Stauffenberg*， Stuttgart 1992，S.320。

[7] Mueller，Oberst i.G. *Stauffenberg*， Duesseldorf 1970，S.280，S.554；请参阅S.258。

[8] 请参阅Mueller，Oberst i.G. *Stauffenberg*， Duesseldorf 1970，S.246。

[9] 全面分析参见Winfried Heinemann的Der militaerische Widerstand und der Krieg，刊登于*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d.9/1，Muenchen 2004，S.718ff.，S.808ff。

[10] 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Offiziere gegen Hitler*， Walter Bussmann再版，Berlin 1994，S.51f。

[11] 摘自Mueller的*Oberst i.G.Stauffenberg*， Duesseldorf 1970，S.290f.；请参阅Hoffmann的*Stauffenberg*， Stuttgart 1992，S.302。

[12] Mueller，*Oberst i.G.Stauffenberg*， Duesseldorf 1970，S.299f。

[13] Mueller，*Oberst i.G.Stauffenberg*， Duesseldorf 1970，S.348f。

[14] 摘自Hoffmann，*Stauffenberg*， Stuttgart 1992，S.180。

[15] 摘自Hoffmann，*Stauffenberg*， Stuttgart 1992，S.262，请参阅S.268。

[16] 参见Hans Mommsen的Die Stellung der Militaeropposition im Rahmen der deutschen Widerstandsbewegung gegen Hitler，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Muenchen 2000，S.373f。

[17] Hans Mommsen，参见Langsamer Weg in den Widerstand. Klaus-Juergen Muellers Biographie zeigt Lugwig Beck in neuer Perspektive，刊登于*Frankfurt Rundschau* vom 25.Juni 2008。

[18] Hans-Adolf Jacobsen（出版）的*Spiegelbild einer Verschwoerung*，Stuttgart 1984，S.34。

[19] 请参阅Stauffenberg an Georg von Sodenstern vom 13.3.39，刊登在Hoffmann的*Stauffenberg* 上，Stuttgart 1992，S.458f。

[20] 基本研究参见Peter Hoffmann的*Widerstand gegen Hitler und das Attentat vom 20.Juli 1944*， Konstanz 1994。

[21] Hans Mommsen，Verfassungs-und Verwaltungsreformplaene der Widerstandsgruppen des 20.Juli 1944刊登于J Schmaedecke/Peter Steinbach（出版）的*Der Widerstand gegen Nationalsozialismus*， Muenchen/Zuerich 1985，S.581f.

[22]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Neuordnungplaene der Widerstandsbewegung des 20.Juli 1944，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S.189f。

[23]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 in neuer Perspektive，基本材料见Klaus Juergen Mueller的*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Paderborn 2007。

[24] Mueller，*Oberst i.G.Stauffenberg*， Duesseldorf 1970，S.305f。

[25]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Carl Friedrich Goerdeler im Widerstand gegen Hitler，刊登于Sabine Gillmann/Hans Mommsen（出版）的*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Carl Friedrich Goerdelers*， Bd.I，Muenchen 2003，S.liiiff.

[26] 请参阅Klaus Juergen Mueller的*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 Paderborn 2007，S.482，S.500。

[27] Hans Mommsen，Carl Friedrich Goerdeler im Widerstand gegen Hitler，刊登于Sabine Gillmann/Hans Mommsen（出版）的*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Carl Friedrich Goerdelers， Bd.I， Muenchen 2003， S.lviif。

[28] 请参阅Hoffmann的*Stauffenberg*， Stuttgart 1992， S.472ff。

[29] 请参阅Klemens von Klemperer的*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 Der deutsche Widerstand auf der Suche nach Verbuendeten 1938-1945*， Berlin 1994， S.283ff。

[30] 分析参见Hoffmann的*Stauffenberg*， Stuttgart 1992， S.472ff。

[31] Jacobsen（出版）的*Spiegelbild einer Verschwoerung*， S.373；请参阅S.57。

第16章 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在1944年“七二〇”运动中的地位

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在1944年“七二〇”运动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且是平民这一系的代表人物。作为莱比锡的市长，他被视为德国主要的地方政治家之一，并在德国城市联盟（Deutsche Staedtetag）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1931年他退出德国民族人民党，他认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领导下的该党激进的阻碍路线是错误的[1]。他很早就支持帝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及其为了“实事求是政策”放弃政党国家的决定，并担任了负责物价的帝国专员的职务[2]。

在布吕宁下台之后，他没有进入冯·巴本内阁，事后格德勒认为这是个错失的良机。后来在阿道夫·希特勒领导下形成了民族集中内阁，他没把这一变化视为彻底的转折，因此他在1934年11月再次担任了负责物价的帝国专员一职。他试图接近帝国政府，同时参与了有关城镇章程改革的决定性咨询，这导致《德国城镇法》（Deutsche Gemeindeordnung）在1934年通过，同时没能阻碍由该法所确定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城镇层面享有优先地位。

从力争财政平衡的角度出发，他赞同关闭国会并消除政党国家（指党派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3]，而且他在多个范围广泛、写给政府的意见书中支持继续布吕宁的通货紧缩政策。尽管他的见解与希特勒内阁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路线互不相容，虽然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腐败做了种种批评，但他仍忠于纳粹政权，他眼前浮现的是纳粹政权在国家主义——独裁意义上的退化萎缩。

这也适用于1936年11月26日他从市长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格德勒虽然在春天已经与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公司讨论过加入

董事会的问题，但是在他很有说服力地再次当选为市长之后则搁置了这一事宜 [4] 。然而与帝国政府在维护城镇自治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剧。他在1936年9月17日关于四年计划的重要报告对希特勒和戈林的扩军计划造成了阻碍，并导致他在政治上遭到孤立 [5] 。因此他作为主要的地方政治家的地位眼看着无法保住了，因此被迫辞去市长职务也是可以预见的了。

格德勒辞去莱比锡市长职务的表面原因是在他逗留赫尔辛基期间违背他意愿进行的莱比锡的门德尔松—巴尔托尔迪（Mendelssohn—Bartholdy）纪念碑被拖走事件。当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的此次对德国犹太作曲家的袭击事件对格德勒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在此前的几年里一再致力于同化犹太人，即使犹太人立法给他的空间很有限 [6] 。但是决定性的辞职原因是，鉴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压力不断加大以及从这个时候起帝国政府不再给予支持，格德勒的地位变得难以为继了 [7] 。

他未曾中断的做事的强烈欲望以及与柏林政府保持接触的努力促使他在西门子公司的帮助下并在赫尔曼·戈林的批准下进行了大量的海外出访，其私下的意图是对外交决策进程进行影响。格德勒1938年秋寄存在纽约的一份意见书反映了他对德国内政清醒和失望的程度。意见书中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权势的野心使德国失去了“法治国家的特性”，并导致公共道德产生深刻的危机，但格德勒的批评仍仅限于体制，并没有针对“国家领导”——以及阿道夫·希特勒。

1938年深秋的一份基本报告从经济政策出发，绘制了即将来临的内政危机的全景，并要求重建权利保障——特别是基本权利。报告中包含对纳粹制度的全面批评，并赞成进行彻底的宪法改革以及恢复地方和地区自治。此外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公共法律方面的垄断地位也应当消除。“希特勒作为个人专制者在历史上和客观上是可以设想的”，他在报

告中说，“但一个政党的专制却是不可想象的”[8]。其中反映了正在形成当中的反对派也抱有的幻想，那就是人们可以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党卫队这一方面与专制者这另一方面区分开来。

格德勒在完成海外出访后写的大量意见书针对不同的对象，但是也有自我厘清的作用。其中，在格德勒看来，关键是突出强调，西方国家原则上愿意与德意志帝国达成和解，同时也警告它们不要低估德国。他努力的核心是争取避免战争冲突。但是这与主张内政改革和批评腐败及道德沦丧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他与20世纪20年代的保守主义文化批评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乐观的基调占据了主导，这让他直到1939年还希望能在政府中担任要职[9]。

尽管他对现政府的批评越来越多，但是格德勒充其量只是间接参与了1939年9月的反叛活动，但他与路德维希·贝克、汉斯·奥斯特、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和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aecker）为首的反叛组织保持着接触[10]。尽管他对《慕尼黑条约》的成果评价是负面的（毕竟他的能促使英国政府采取坚定立场并教训希特勒要守规矩的考虑失败了[11]），但他一直还为能促使帝国政府让步、防止战争的希望所支持。即便在波兰战争开始之后这仍旧是他的方针政策。在反对战争扩大的努力方面，他与贝克和冯·哈塞尔是一致的，而且他认为下面这种情况会是个机会，英国或者美国能向希特勒提出一个他不得不接受的和平提议，而如果希特勒不想拿自己下台来冒险的话就不得不接受该提议[12]。此类的推测表明了正在形成的反对派的走投无路，这很有代表性。在战胜法国之后，这个反战党派分崩离析了。但是格德勒仍坚持他的立场，它由德国中期将输掉这场战争的信念所支撑，战争在道德、政治和经济方面带来的后果只能以灾难告终。

格德勒撰写的数量多得非同寻常的关于内政外交形势的记录、意见书和反思可以被看做缺乏行动可能的表现，因此也可以被视为对缺乏实

际打造机会的补偿。然而，突出的道德特征和在某些方面的乌托邦特性直到1939年之后才成为格德勒文章的独特特征。他的作品反映了由内部改变纳粹政权的机会越来越小的真相。格德勒亲自交谈过的阿登纳无论如何都不对此表态[13]；说到底，他对事态的现实见解与格德勒过于乌托邦的评估无法统一，而且他还洞悉到，在回到魏玛共和国的道路似乎被堵上之后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入点存在。

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量书面意见之外是格德勒挖掘和维系同道中人的不懈努力，从1942年起则是为计划中的颠覆政府进行的具体的人事安排上的考虑。前者很难描述，因为特别是保持和维护个人接触和对颠覆计划的主动知情之间的界限是很难分清的。违背常理的是，这个十分松散的争取支持者的形式（从密谋的角度来看它似乎问题重重）在很多方面使平民反对派免遭盖世太保的抓捕。中上阶层资产阶级的不满这个安全机构绝对是清楚的，但是它没真的当回事，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反对派的任何骚动却都招致了立刻的干涉。然而，格德勒在施陶芬贝格刺杀行动前几个星期有时候过于坦率的表现被视为对计划中的行动的威胁。因此施陶芬贝格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再考虑顾及格德勒了[14]。

格德勒的人际关系具体范围有多广以及如果颠覆成功它们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性，这很难描述。它的起点是与路德维希·贝克亲密友好的关系，它很快得到与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和约翰内斯·波皮茨密切接触的补充，并由此产生了与延斯·耶森的联系。同样，与持反对意见的外交事务成员的联系也很早就产生了，该群体在1938年9月赞成防止对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的发生[15]。重要的是与赫尔曼·凯泽（Hermann Kaiser）上尉的接触，凯泽慢慢有了与正在形成中的军方反对派的联系人的作用。与工业界例如克虏伯和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的联系还不能意味着他被纳入抵抗运动当中，对于抵抗，这是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这也适用于格德勒可能是通过博世而与莱奥·贝克（Leo Baeck）建立的联系[16]，同样还有与州主教特奥菲尔·武尔姆（Theophil Wurm）的联

系。

1941年格德勒和科隆工会组织特别是与威廉·洛伊施讷和雅各布·凯泽建立的关系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个由洛伊施讷、雅各布·凯泽和马克思·哈贝尔曼（格德勒定期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领导的小范围工会组织的背后有着相对广泛的同情者群体，例如在尼古劳斯·格罗斯（Nikolaus Gross）和伯恩哈德·莱特劳（Bernhard Letterau）领导下的科隆工会组织，还有特奥多尔·布劳尔（Theodor Brauer）、约瑟夫·维尔默、欧根·博尔茨（Eugen Bolz）、约瑟夫·埃尔辛这些前中央党成员，他们又通过劳伦丘斯·西默尔神甫（Pater Laurentius Siemer）与瓦尔伯贝格（Walberberg）多明我会修道院保持着联系。洛伊施讷也从自由工会圈子带来了数量可观的支持者，尽管他们在勒伯尔和米伦多夫颠覆事件中的行动能力倒不是令人怀疑的[17]。来自这一方面的支持消除了小范围反叛圈直到那时候一直具有的相对秘密的特性。尽管与机关没有任何联系，尽管它更多的是以贝克和格德勒为核心的一种松散的关系网，但是汇集在这里的德高望重者自认为是“一种影子内阁”[18]。

如果你问格德勒在抵抗希特勒运动中的地位，那么首先可以断言，他在1939～1944年是处于平民反对派的核心的，并因为持续不断的努力脱颖而出，一方面是尽全力扩大反叛者的圈子，另一方面是对军方施压令其起来反对专制者并在必要情况下武力推翻他。恰恰在慕尼黑会议以及对波兰和法国战役之后的几年里——当时很多在1938年还支持改变制度和剥夺希特勒权力的路德维希·贝克和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的支持者背弃了正在形成中的运动，格德勒是某种稳定的根源，并代表着平民反对派及其军方伙伴的连续性。通过大量的意见书，他对反对派的新秩序构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1939年，他一直与国外保持着决定性的、尽管作用被低估的接触，并决定性地参与了颠覆的技术和人员准备工作。

另外，即便在1935年因为政治原因被迫辞去莱比锡市市长职务之后，格德勒也还没有迈出与纳粹政权明确决裂的这一步。他一步步才认识到，通过颠覆方式结束希特勒的统治是绝对必要的。在从地方政坛隐退和结束了帝国价格专员的职务之后，直到1939年夏天，格德勒才正式受克虏伯和博世委托进行了大量海外访问，并拓宽了他的外交视野，这些访问的背后是通过他的意见书影响政府政策的动机，例如通过对赫尔曼·戈林的影响。他一直还抱着这样的希望，能够重新担任官职，使他有可能参与到政治决策进程中，然而他没有认识到，他保持着联系的帝国各部门和中央官僚机构的政治地位在不断下降。直到1939年，格德勒才最终放弃重新掌管某个政治部门的希望[19]。

格德勒虽然同情由路德维希·贝克启动、新任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只半心半意支持的阻止希特勒通过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触发一场世界大战的计划，但是他并没有参与其中，这个时候他正逗留国外。和其他很多反叛者一样，对他来说，抵抗的决定不是可以确定一个明确的日期、在某个时间点作出的决定。确定不再与政府来往是随着1939年事情的发展发生的，它的背景是，他认识到不能再使希特勒摆脱让战火烧遍波兰的念头了。他在1939年11月对已经改变的政治态势进行说明的报告是他走向积极抵抗道路的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20]。

即便在格德勒作出了这一重要决定并与纳粹政权彻底决裂之后，他也没有考虑过以革命起义的形式和阴谋活动的方法武力推翻政权。他的思想局限在资产阶级右翼和魏玛考虑的消除议会民主制度的战略框架内。这导致了恢复库尔特·冯·施莱歇在1932/1933年考虑过（但没有认真考虑）的颠覆计划并设想以建立一个临时军事专制制度的形式除掉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极端派的代表人物（如果必要也包括希特勒自身在内）的想法。因此这不仅符合正确的政治评估（除了国防军之外没有能进行颠覆的政治力量），而且他更多的是从后来的总统内阁的角度采取行动的，它们导致了这样的颠覆情景。格德勒对该方案有好感也是因为它采

用熟练的统治工具，而且那似乎可以被视为合法的。

直到去世，格德勒都在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前却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伦理道德决定的对谋杀暴君的拒绝态度之外，避免一个新的“背后捅刀子”传奇产生的考虑在很多反叛者身上都能看到。但是这个动机对格德勒来说并不是决定性的。除了他受伦理思想影响而从一开始就排除了采用谋杀和暴力手段这一可能的基本立场之外，还有他长期抱有的幻想：一旦面对周围的人的坚决反对，希特勒最终将让步并会臣服于他必须做的事。因此格德勒沉醉在主要将领的坚决抗议活动会促使希特勒让步的想法当中。然而，作为此类行动先决条件的军事领导的内在团结早已不在，除此之外，希特勒足够巧妙地避开了这样的对抗或者（在个别情况下）将抗议的举措扼杀在他滔滔不绝的安抚性和以恩人自居的长篇大论中。另外，尽管一再在各个阵线之间进行调停，但是贝克对于格德勒起劲儿的忙忙碌碌持批评态度，并说他是“危险的乐天派”[21]。当贝克病重生命垂危的时候，没人考虑过让四处奔波的格德勒来接替他的位置领导平民反对派。

甚至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之后，人们也只能争取到让格德勒心不在焉地参与到刺杀行动的准备工作当中。和他亲自去找希特勒要求希特勒辞职的提议一样，格德勒称“与元首开诚布公地会谈”是必要的论点同样被他的军事对话伙伴当做是乌托邦拒绝了[22]。格德勒在刺杀问题上摇摆不定的立场在这之后也一点都没有减退。他将刺杀行动的失败解释为神意裁判，并且，在7月20日之后的流亡过程中，在面对不同东道主时他仍对此深信不疑[23]。

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描述事情经过时说，他的参与局限在改变政府体制上，而刺杀行动则源自军方。在他1944年11月撰写的《我们的思想》意见书中，格德勒再次否定了刺杀行动，称他和他的朋友们应该取而代之争取“公开行动”的。他谈到了为了拯救祖国的“明确政变”[24]。

可能这与其对国家的新教—理想主义理解有关，他不能感知到希特勒行为的卑劣性。

尽管在双方相互十分尊重，但是在刺杀行动前的几个月里格德勒和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之间的不和谐音越来越多并不奇怪。这主要与格德勒的信念有关，他认为，军方在颠覆中的作用必须限制在单纯的权力保障上并放弃干预政治。显然，当施陶芬贝格直接与洛伊施讷和凯泽磋商时，不和谐音已经存在了[25]，他与尤里乌斯·勒伯尔似乎越过格德勒进行的联系也是同样。事实证明，弗里茨—迪特洛弗·冯·德·舒伦堡是重新消除这种相互猜疑的不可替代的联络人[26]。

在《我们的思想》中，格德勒回顾性地谈起了施陶芬贝格，并称其为“一位品格高尚的”总参谋部军官，他“后来被证实是一个也想搞政治的古怪的人。我尊敬他，但和他有些冲突。他想要一个依赖左翼社会党和共产党人的不明确的政治路线[27]”。除了不同的政治判断之外，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矛盾，也是促使格德勒通过吉泽菲乌斯向美国驻苏黎世代办艾伦·杜勒斯警告施陶芬贝格意图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原因[28]，这体现在格德勒所使用的修饰语上——“没有经验的年轻人”[29]。

尽管资产阶级反对派内部关系的紧张自1943年就开始加剧，但是格德勒在其形成中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虽然他为争取他们对密谋的同情或者是参与接触了多少重要人物再也无法了解，但是毫无疑问，格德勒广大的人脉对反叛是有好处的。即便事后无法再确定具体谁参与了颠覆政府计划人员名单的制定以及军区政治专员的挑选，但可以肯定，贝克首先是请格德勒来负责这一任务的[30]。但成问题的是，并非所有被列在名单的人都对他们想要的任命有足够的了解。

从1938年9月到1940年6月德国袭击法国的这一阶段里，格德勒把很大一部分力气花在利用他早期逗留国外期间所建立的联系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上。考虑到反对派内在的软弱性，促使英国采取立场坚定的政策

与此同时对希特勒作出妥协的战略自然是一条以明显空想为特征的出路。其中一再表现出格德勒对英国的利益以及伦敦还拥有的有效活动空间的根本错判。就这点而言，所谓的X报告和罗马教皇的和平使团完全是以错误的先决条件为出发点的[31]。随着德国袭击法国，格德勒随后意识到，他所采取的战术最终失败了。

后来，格德勒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向军队高级指挥官说明防止战争继续的必要性上。他一直还抱有这样的期望，能促使高级将领对希特勒采取共同行动。不管是1940年7月还是11月撰写的首先针对将领们的一系列意见书（只要它们还能修复）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特别是在一篇题为《整体形势》的精心制作当中，他强调说，将战争继续下去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因为经济和后勤原因这场战争不可能打赢。

格德勒推动参与者行动起来，他所显示出的巨大积极性是得到了多方证实的，并且在冯·哈塞尔的日记中有着生动的描述。有时格德勒做得过分了，会激怒他的对话伙伴，此外他也威胁到计划中的行动的保密性[32]。然而这其中体现的紧张不安是可以理解的，颠覆政府只有迅速行动才能带来过得去的谈判条件的考虑加剧了这种紧张。至于内政局势方面，出于同样的理由格德勒倾向于把事情描述得更加暗淡悲观，而不是像在当时看起来合适的那样，比方说当他预言食品和原材料供应将在1941年崩溃的时候就是这样。但在这件事上，他的判断仍旧是有充分理由的[33]。

格德勒的改革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四分五裂的反叛组织的认同，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就没有那么明确了。事实上，他们的共同之处倒不如说是否定性质的：在反叛者眼中，关键必须是确定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从而取代失败的魏玛议会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后者决定性地促成了希特勒的崛起。不管是格德勒还是克莱骚的宪法政策方案都在职业思想、广泛的分权和自治的结合中寻找出路。另外，格德勒的计划以中

央对人民议院（Volkskammer）和等级代表机构（Staendekammer）的强势为特征，这主要可以理解为对魏玛议会危机的过度反应。与之相对的是，克莱骚集团旨在明显削减国家主权，但是在经济政策范围内主权应当保留[34]。尽管在重点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这两个派系的合作仍在“七二〇”运动当中不断加强，然而对军方反对派的立场仍尚未解决。

分歧首先因为格德勒独断专行的表现而爆发，他表现得不愿与自己的反对者接触，特别是“克莱骚圈”内的反对者。1943年7月双方的主要代表在施陶芬贝格刺杀计划前期进行的共同会晤导致了这两个集团的公开冲突。毛奇坚信，颠覆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且德国国民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新开端。在克莱骚代表看来，格德勒的设想似乎是“反动的”，而且彼得·冯·瓦滕堡伯爵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克伦斯基解决方案”这样恶毒的词汇，而毛奇在给弗雷亚（Freya）的信中则对这位“阁下”大人进行了抱怨，说他不指望格德勒能带来真正的新开端[35]。这在某些方面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两个流派之间不管是在秉性还是目标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但这一点不适用于经济政策，虽然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格德勒教条主义的表现和他曼彻斯特学派式的措辞提供了足够的误解的理由。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各方的立场距离并不遥远，因为不管是格德勒还是克莱骚集团都受到绩效竞争理论的主要影响，同时与弗赖堡圈子（Freiburger Kreis）的关系也起了作用。同样在原材料产业国有化问题上，它们的立场更加接近。格德勒恰恰在经济政策方面重提所谓的经济“自然法则”并间接求助于社会达尔文范畴的倾向推动了这样的误解：这两个群体正是在这方面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相反，在社会政策领域则存在着明确的差异。它首先涉及社会政策问题被赋予的地位问题。对“克莱骚圈”来说，社会问题似乎是在纳粹专制下达到高峰的崩溃进程的主要根源。因此他们赞成让社会关系新秩序

处在力争实现的改革政策的核心位置，该政策通过广泛的参与决定和盈利分享的要求与天主教社会伦理学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与和格德勒合作的基督教工会成员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基本方针恰恰在于将国家对社会政策的干预降至最低并在财政上为经济减负。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希望用“冲销政策”（Ausgleichspolitik）这个术语来代替“社会政策”[36]。

格德勒认为至关重要的社会政策药剂是就经济学基础对工人进行启蒙。这点他希望能通过广泛普及他的《经济学初级读物》来给予决定性的推动[37]。他愿意肯定“德意志工会”方案主要是源自能把失业者和社会保障负担转嫁到工会身上的考虑，个别的“严重情况”例外。然而格德勒对他的社会政策观点进行了微调，因为他在后来的文章中阐述说，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公平地分配盈利是必要的，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应当归完成工作的人所有[38]。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又回到了他原来的社会政策架构上，将现有的商会（Wirtschaftskammer）并入劳工总会（Arbeitskammer），它们应当对失业者和社会保障的范畴进行管理，同时他不再回到“德意志工会”的方案上来。

这些矛盾对1943年1月8日会议来说是决定性的，贝克、冯·哈塞尔、波皮茨、耶森、格德勒、冯·德·舒伦堡、特罗特、毛奇和格斯登美尔参加了此次会议[39]。事实上，格德勒和毛奇这两个主要的对头没有对内容进行讨论，而且他们俩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着。正如毛奇给弗雷亚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没有压抑积聚的不满，“然后还射出了一支在箭筒中收了很长时间的‘克伦斯基解决方案’的毒箭，显而易见箭也很好地射中了靶子”[40]。尽管进行了多次调解尝试，年青一代和老一辈的矛盾（就像冯·哈塞尔对其特性的描述那样[41]）仍无法真正克服。但是，在共同事业的意识下，这些矛盾被挤到了次要位置上。

无疑，特别是在他计划颠覆政府接任总理的想法在反叛者当中得到

认同之后，格德勒觉得自己是决定性的领导人物，而且正如欧根·格斯登美尔（Eugen Gerstenmaier）回忆的那样，他就像是一个拥有小联盟伙伴的多数派党主席那样进行着磋商[42]。他可以这么做，因为他拥有同情抵抗的将领们的支持，他往往通过路德维希·贝克的介绍与他们建立了联系[43]。同时，工会这一派也在他的背后支持他，在此之前威廉·洛伊施讷拒绝加强与“克莱骚圈”的联系并也因此而选择了格德勒，尽管他把赫尔曼·马斯派到了克莱骚委员会担任代表[44]。但是偶尔独断专行的表现引发了年青一代可想而知的抵制——特奥多尔·利特（Theodor Litt）客气地称其为“他本性的控制欲”[45]。

从1942年底开始在反对派内部出现了重心的不断转移，格德勒的核心地位因此被不断掏空。这与中央集团军群抵抗核心的产生密不可分。它要追溯到亨宁·冯·特雷斯科的倡议上，而他很早就与汉斯·奥斯特保持着联系，同时他与贝克和格德勒的联系直到1942年中才建立。虽然路德维希·贝克的声望和权威仍旧无可争议，但是长期患病中断了他的参与协作，而且刺杀行动的准备工作转移到了年青一代总参谋部军官团体的手中。在促使军队领导人行动的所有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决定行动。格德勒也不得不体会到，他对元帅们的干预仍旧毫无结果[46]，这对他的影响力并没有好处。

此前施陶芬贝格接替了特雷斯科在国防部的位置，当他打算在“瓦尔基里行动”外衣下为刺杀进行后勤准备之外也从政治上保障颠覆时，他将一系列著名的平民反叛者培植成他的亲信，其中包括尤里乌斯·勒伯尔、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弗里茨—迪特洛弗·冯·德·舒伦堡和阿道夫·赖希魏因。在毛奇于1944年1月被捕之后，剩余的克莱骚集团的积极核心对施陶芬贝格进行了支持。格德勒不得不断定，洛伊施讷也与施陶芬贝格直接建立了联系，而考虑到非法的德国共产党不断增大的影响，后者对于保证工人阶级的支持有着强烈的兴趣。

通过内阁组成将政治左翼充分绑在一起的想法使施陶芬贝格有了这样的考虑，如有必要则让洛伊施讷替代格德勒出任总理，但是洛伊施讷拒绝了，部分是出于对格德勒的忠诚，部分是因为他更希望致力于德意志工会的建立。格德勒则产生了自己不再处于事件核心的感觉，而这种感觉绝非没有根据。例如，他没有收到关于“七二〇”刺杀行动的消息，而一个星期前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原因主要在于，人们不得不考虑到假如他被捕的话怎么办，而且抵抗核心不愿冒任何的风险[47]。

施陶芬贝格是不是还使用主要由格德勒为颠覆准备的材料（其中包括政府声明和计划的电台讲话的内容[48]）以及他是不是更愿意让尤里乌斯·勒伯尔当总理，这肯定是不得而知[49]。相关书面材料被销毁使得回答这些问题变得不可能了。格德勒相信，由他起草的政府纲领建立在反叛者共识的基础上，而且这在很多时候也的确是事实，即使它强烈的说教成分没怎么得到小范围领导集团的认可。但是，在这件事上，对格德勒来说很有代表性的对法治国家思想的强调和他对规矩和公正的号召是毫无争议的。

对反叛者整体来说，他们原则上反对希特勒的专制政权并希望形成一个具有承载能力的其他政治选择。后者是否成功做到了，不管是对格德勒还是“克莱骚圈”的新秩序计划但也包括其他很多新秩序计划来说，人们都可以进行适当的怀疑。在基本原则上——消除独裁国家、长久的法律保障、大范围的分权和“消除大众存在”（Massendasein）——存在着一致。格德勒1943年末/1944年初关于“帝国政府的矛盾和目标”草案可以被视为整个民族保守主义抵抗运动的檄文，尽管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细节上争议因素仍旧存在。

格德勒很早就不得不断定，与政权的承诺相反，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实行的不是秩序与公正，取而代之的是腐败和专断独裁统治，它不把任何的比较当回事[50]。在1942年1月初的文章中他以尖锐的形式谴责对

犹太人的“不人道”，他们因为在1月17日之后被流放到莱比锡以外的地方而进入他的眼帘，而且他将刚刚开始的大屠杀与迪奥克莱蒂安皇帝（Diokletian）时期对基督徒的迫害相比较[51]。在1945年1月27日（也就是他去世的前几天）的号召当中，他也抱怨说，“数十万犹太人被夺走了生命”[52]，而且在几个星期之前撰写的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讲话的反驳当中，他的措辞更加激烈：政权“禽兽般地毁灭了几百万犹太人”[53]。

格德勒什么时候开始清楚，对犹太人的迫害会演变成对在德国统治范围内犹太国民的有计划根除，这无法明确断定，但有可能是1943年初。在他的记忆当中，对他而言这是与“水晶之夜”重叠在一起的。他回忆说，在这天晚上，“在邪恶的仇恨下最神圣的东西遭到了玷污”[54]。他用简短的几句话概略地叙述了不人道的流放条件、犹太人在波兰被杀害和毒气室，但是对于在苏联被占领地区和帝国驻波兰占领区的情况他没有更确切的了解。在类似的背景下他曾表达过对安乐死的愤怒，他对安乐死的描述要精确得多。

但是对迫害犹太人和大屠杀的体验并没有改变他对所谓“犹太人问题”的原则性立场。在《目标》意见书中，他相对详尽地对此表明了立场，并认为“解决方案”是在海外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在加拿大或者南美。在犹太人问题上，国际规定承认犹太人有拥有自己民族国家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格德勒认为，可以拒绝给没有同化的犹太人国籍，不给他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可能，同时他认为经济上的限制是多余的[55]。他在监狱笔记中重新将这个于1941年底提出的纲领的所有要点记录下来，只是这时他要求（至少对幸存者来说）赔偿并归还犹太人的财产[56]。在被排除在根除措施之外的那些犹太公民方面做的修改符合从1917年起在保守派阵营和最高陆军指挥部传播的思想。格德勒在1944/1945年时还赞成社会孤立犹太国民，并以美国的经验为依据。但是他此时与《纽伦堡法案》保持着距离，并且希望把在异族通婚问题上

找到令人满意的规定的任务交给“健康的种族感和人道主义”[57]。

格德勒处在异化的反闪米特人主义传统下[58]。在他的巴勒斯坦游记中看不到仇恨，它们传达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构建能力的善意眼光[59]。同样，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1933年4月1日对正在实行的封锁进行了积极抵制。他在监狱笔记中一再谈到“犹太人的重大罪责”，但是接着就说道：“我们不能拒绝给予犹太人上帝赋予所有人的权利。”[60]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反对政府的暴力迫害措施的：他用最激烈的言辞谴责1938年11月9日的暴力行动和在1939年秋末对波兰犹太人的凌辱，同样还有后来的灭绝政策。这与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亲属的犯罪使民族蒙羞和失信的主题以及“神的报复”的符咒联系在一起，这在后来的文章里他一再谈到[61]。

格德勒的真挚、个人的正直和开诚布公给与他建立了联系的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于未曾动摇的新教信仰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格德勒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散发出一种惊人的乐观主义精神，它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没有完全消失。他有一个正面得非同寻常的人物形象，它有时候接近于天真，但是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在面对对话伙伴时所表现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坦诚。特别是康拉德·阿登纳明显地感觉到，这与敦促颠覆的反叛者不太相称。但矛盾的是，令格德勒将他所知的泄露出去的恰恰是他的随意和轻率，他本来一直将其守护到了1944年的夏天，因为盖世太保虽然了解他不断地赢得支持者，但没把它当回事，以为那不过是在资产阶级中蔓延的“牢骚埋怨”。然而格德勒的轻信倾向也导致他在受盘问时为了说明反对派的范围之广而透露了比盖世太保所预期的更多的名字和资料[62]。

可靠、正直、个人魅力与和善也使格德勒在与其思想不一致或者觉得他有家长作风的那些反叛者那里享有很高的声望。直到1943年都是反叛活动推动力量的格德勒完全彻底地坚信，通过他的新秩序建议不仅能

为消除纳粹专制统治奠定基础，而且也能克服自帝制灭亡以来的德国政治危机。他的新秩序计划所基于的战术考虑是多么可怜可以从下面这点得知，即便在他看来是个错误的1944年“七二〇”刺杀行动失败之后，他仍从给人感觉像是传教士似的态度出发在大量文章中传播他的思想并基本上一成不变地进行着宣传。在1944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他还在流亡的时候，他就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德国未来的任务》意见书中总结了他的思想，后来他将其像是作为政治遗产一样交给了接待他的东道主保存[63]。

在被捕之后，格德勒没有停止撰写同类文章，即便是在原本是要安排他个人事项里——譬如说给安东·基彭贝格（Anton Kippenberg）的信——他都一再谈到政治问题。其中混杂着对西方政要建立“真正的和平”、不要犯与1919年《巴黎和约》同样的错误的呼吁。这些文章证明，对于当时欧洲大陆所产生的势力对比，格德勒的所知甚少，而且对于盟国的战争目标规划他也只有支离破碎的了解。他对未来欧洲和平的要求与此形成了难以逾越的矛盾，例如他直到最后都坚持的对波兰东移的要求——波兰应当通过被纳入巴尔干联盟当中获得免费的入海口，而普鲁士东部则计划回归帝国。同样属于空想性质的还有他对法德之间和睦解决阿尔萨斯—洛林（Elsass-Lothringen）问题的设想。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后期的这些考虑不再处于时代的制高点。他在面对死亡时写下的文章主要围绕与西方盟国达成一致的问题，以便继续针对红军的防御战。他徒劳地希望能恢复他与瓦伦贝格（Wallenberg）兄弟的关系，并通过瑞典使节向瑞典君主求助，请求他们进行和平调停。同时他沉醉于或许自己能担当调解人的幻想当中，并幻想着出现一个希特勒—希姆莱—沙赫特—格德勒政府[64]。与此同时，他大力反对任何重复以惩罚换和平（Straffrieden）的行为，为德国国民辩护说，他们当中有90%“对于集中营及其恐怖残暴一无所知”并被希特勒的外交成就所蒙蔽。他对所有有关国家首脑发誓说将放弃对“复

仇和报复”的需求并建立一个新的和平的世界秩序。在间接进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他反对任何神化国家的行为。同时宗教成分随着对“内在反省”的要求进入到核心位置，而二战的悲剧似乎成了公正的神的报复。

这个与外界脱离了联系的囚犯不由得产生了面临一个世界决策的想象：“面对死亡，在感觉到责任的巨大动力的同时，我知道，现在的关键是人类在不幸的世纪里是会跌倒还是能重新获得安宁与幸福，我向所有人发誓，我会创造将打开后面这条道路的那些政治基础。”[65] 同时他自责说没有阻挠刺杀的道路，而且，通过规模巨大的文学暴力行为，他似乎补上了被搁置的促使德国专制者屈服的努力。尽管他在大量文章中大力强调专制者的责任，但是他似乎一直都没明白他深刻的犯罪个性。像迪特里希·邦赫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所做的那样，将国家理解为犯罪至关重要的根源——这超出了格德勒的思想范畴，而且在这方面他似乎是德国新教国家蒙蔽迷惑行为的牺牲品。

---

[1] 关于格德勒赞成1919年东部国家计划请参阅Ines Reich的*Carl Friedrich Goerdeler*：*Ein Oberbuergermeister gegen den NS-Staat*， Koeln 1997，S.84ff。

[2] 请参阅Sabine Gillmann/Hans Mommsen（出版）的*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Carl Friedrich Goerdelers* （=*Schriften*），Bd.I，Muenchen 2003，S.179f。

[3] 他是向总统内阁过渡的坚定拥护者，并支持Kuno Graf Westarp在1932年谈到的“政党黄昏”的观点；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ie Illusion einer Regierung ohne Parteien und der Aufstieg der NSDAP，刊登于同一作者的*Von Weimar nach Auschwitz*， Stuttgart 1999，S.127f。

[4] 请参阅Ines Reich的*Carl Friedrich Goerdeler*， Koeln 1997，S.239ff。

[5] 请参阅Ines Reich的*Carl Friedrich Goerdeler*， Koeln 1997，S.245f.以及*Schriften* Bd.2，Muenchen 2003，S.411ff。

[6] 对格德勒代表被迫害犹太人利益的持续努力的生动描写见Ines Reich的Carl Friedrich Goerdeler，Koeln 1997，S.203ff。

[7] 参见Gerhard Ritter的*Carl Goer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Stuttgart 1964，S.82f。

[8] *Schriften*，Bd.2，S.744.

[9] Schreiben Goerdelers an Fritz Wiedemann vom 19.10.1938，刊登于*Schriften Bd* .I，S.643f.以及Schreiben vom 10.12.1938，BA Berlin，NS10，Bd.335，Bl.178ff。

[10] Schreiben Goerdelers an Fritz Wiedemann vom 19.10.1938，刊登于*Schriften Bd* .I，S.486f。

[11] 请参阅*Schriften* Bd.I，Muenchen 2003，S.477ff。

[12] 请参阅*Schriften* Bd.I，Muenchen 2003，S.650f。

[13] Hans-Peter Schwarz，*Adenauer. Der Aufstieg.1866-1952*，Stuttgart 1986，S.40f.

[14] 请参阅Chritian Mueller的*Oberst i.G.Stauffenberg. Eine Biographie*，Duesseldorf 1970，S.385f.，S.465f.以及S.473；Bernd Gisevius，*Bis zum bitteren Ende*，Bd.2，Hamburg 1961，S.300-305；请参阅Peter Hofmann的*Widerstand*，*Staatsstreich*，*Attentat. Der Kampf der Opposition gegen Hitler*，Muenchen 1969，S.502。

[15] 参见Marion Thielenhaus的*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Deutsche Diplomaten 1938-1941*，Paderborn 1984，S.61ff。

[16] 此外请参阅Arnold Paucker/Konrad Kwiet的Jewish Leadership and Jewish Resistance，刊登于David Bankier（出版）的*Probing the Depths of German Antisemitism*，New York 1999，S.389f。

[17] 参见Hans Mommsen的Der 20.Juli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Muenchen 2000，S.295f。

[18] 参见Ger van Roon的*Widerstand im Dritten Reich*，Muenchen 1987，4.Aufl.，S.131。

[19] 参见Schreiben Goerdelers an Fritz Wiedemann vom 19.10.1938，刊登于*Schriften* Bd.I，Muenchen 2003，S.643f.以及 Schreiben vom 10.12.1938，BA Berlin，NS10，Bd.335，Bl.S.178ff。

[20] Denkschrift zur Innenpolitik，4.1.2，Okt./Nov.1938刊登于*Schriften* Bd.I，Muenchen 2003，S.703ff.很能说明特点的是，他没有具体到专制者的作用。

[21] 参见Klaus-Juergen Mueller的*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 Eine Biographie*，Paderborn 2008，S.467f。

[22] 请参阅Ritter的*Carl Goer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Stuttgart 1964，S.358。

[23] 请参阅Ritter的*Carl Goer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Stuttgart 1964，S.409。

[24] BAK N 1113，Bd.26，p.I.

[25] 请参阅Hans-Adolf Jacobsen（出版）的*Spiegelbild einer Verschwoerung*，Stuttgart 1984，S.248。

[26] 参见Winfried Heinemann的*Ein konservativer Rebell. Fritz-Dietlof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 und der* 20. *Juli*，Berlin 1990，S.143ff。

[27] Unsere Idee，Bl.25.

[28] Gisevius，*Bis zum bitteren Ende*，Hamburg 1961，S.237，S.241f.；请参阅Allan Welsh Dulles的*Germany's Underground*，New York 1947，S.171ff.，以及Mommsen的Gesellschaftsbild und Verfassungsplaen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Muenchen 2000，S.139f。

[29] Unsere Idee，Bl.25.

[30] Jacobsen（出版）的*Spiegelbild einer Verschwoerung*，Stuttgart 1984，S.145。

[31] 请参阅Klemens von Klemperer的分析*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 Der deutsche Widerstand auf der Suche nach Verbuendeten 1938-1945*，Berlin 1994，S.162ff。

[32] 参见van Roon的*Widerstand im Dritten Reich*，Muenchen 1987，S.131f.；请参阅Aufzeichung Ulrich von Hassels vom 2.8.1941，刊登于Ulrich von Hassel的*Tagebuecher*，Berlin 1987 Neuausgabe，S.200f.；关于格德勒自向施陶芬贝格施加压力的情节请参加Mueller，*Stauffenberg*，Stuttgart 1992，S.364。

[33] Gesamtlage，November 1940，参见*Schriften*，Bd.2，Muenchen 2003，

S.828ff。

[34] 关于Kreisau请参阅Ernst Wilhelm Winterhager的*Der Kreisauer Kreis. Portraet einer Widerstandsgruppe*， Berlin 1985， S.100ff.； Mommsen， Gesellschaftsbild， Muenchen 2000， S.116f。

[35] Brief an Freya vom 9.1.1943， 刊登于Helmuth James von Moltke的*Briefe an Freya 1939-1945*， Muenchen 1988， S.450f.； 请参阅Ulrich von Hassells Tagebuch vom 12.1.1943。

[36] 参见Mommsen的Gesellschaftsbild， Muenchen 2000， S.88ff。

[37] Daniela Ruether， *Der Widerstand des* 20. *Juli auf dem Weg in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Auffassungen der buergerlichen Opposition gegen Hitler*， Paderborn 2002， S.353ff.

[38] Unsere Idee， Bl.8 （oben Anm.24）； Die Aufgaben der deutschen Zukunft， *Schriften* Bd.2， S.1017ff.； 请参阅Ruether的*Der Widerstand des 20.Juli*， Paderborn 2002， S.171。

[39] 细节参见Unsere Idee， Bl.8 （oben Anm.24）； Die Aufgaben der deutschen Zukunft， *Schriften* Bd.2， S.1017ff.； 请参阅Ruether的*Der Widerstand des 20.Juli*， Paderborn 2002， S.283ff。

[40] Brief an Freya vom 9.1.1943， 刊登于Moltke的Schriften， Muenchen 2003， S.450f。

[41] Von Hasselll， *Tagebuecher*， Berlin 1987 Neuausgabe， S.347； 请参阅Ruether的*Der Widerstand des 20.Juli*， Paderborn 2002， S.282， Anm.68。

[42] Ruether， *Der Widerstand des 20.Juli*， Paderborn 2002， S.283。

[43] 请参阅Heinemann的*Ein konservativer Rebell*， Berlin 1990， S.299， Anm.55。

[44] 参见van Roon的*Neuordnung im Widerstand*， Muenchen 1967， S.228f。

[45] 摘自Ritter的*Goerdeler*， Stuttgart 1964， S.61。

[46] 请参阅Goerdelers Briefentwurf an Kluge， 25.7.1942， 刊登于*Schriften*， Bd.2， S.856ff和an Ulbricht， vom 17.5.1944， S.853ff。

[47] 参见Peter Hoffmann的*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 und seine*

Brueder， Stuttgart 1992，2.Aufl.，S.421。

[48] 他们是由舒伦堡和其他人校订过的，参见Jacobsen（出版）的*Spiegelbild einer Verschwoerung*， Stuttgart 1984，S.143。

[49] 请参阅Hoffmann的*Widerstand*，*Staatsstreich*，*Attentat*， Muenchen 1969，S.437，请参阅S.433f。

[50] 参见Unsere Idee，November 1944，BAK N1113，Bd.26，Bl.18f。

[51] Aufzeichung ueber Judendeportationen aus Leipzig，Januar 1942，刊登于*Schriften*， Bd.2，Muenchen 2003，S.846。

[52] Aufruf vom 27.1.1945，刊登于*Schriften*， Bd.2，Muenchen 2003，S.1235ff。

[53] Aufzeichnung vom Dezember 1944，Bl.2，刊登于Bleistein（出版）的*Dossier Kreisauer Kreis*， Berlin 1985，S.1201。

[54] Unsere Idee，Bl.19。

[55] 请参阅Fritz Kieffer的Carl Friedrich Goerdelers Vorschlag zur Gruendung eines juedischen Staates，刊登于*Zeitsch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uer Rechtsgeschichte*， Bd.125 （2008）， S.499ff。

[56]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Auschwitz*，*17.Juli 1942. Der Weg zur europaeischen ‘Endloesung der Judenfrage’*， Muenchen 2002，S.10f。

[57] （原文编码误。——译者注）Gedanken eines zum Tode Verurteilten，刊登于Schriften，Bd.2，Muenchen 2003，S.1137。

[58] Unsere Idee，Bl.33.

[59] 参见Schriften，Bd.I，S.627ff。

[60] Gedanken eines zum Tode Verurteilten，in：a.a.O.，S.1138.

[61] 参见Christof Dipper的Der Widerstand und die Juden，刊登于Juergen Schmaedecke/Peter Steichbach（出版）的*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Muenchen 1994，S.598-616；Hans Mommsen，Der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gung，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S.397ff.；尽管有个人联系，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格德勒赞同弗赖堡民族经济学家Constantin von Dietze尖锐的

反闪米特人立场，该立场是作为Anlage 5 zur Denkschrift ’Politische Gemeinschaftsordnung’ an die BKD起草的（请参阅Dipper，Der Widerstand und die Juden，刊登于Juergen Schmaedecke/Peter Steichbach（出版）的*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Muenchen 1994，S.606）。

[62] Jacobsen（出版）的*Spiegelbild einer Verschwoerung*，Stuttgart 1984，S.232以及’Politisches Testament’，Aufzeichnung vom 31.1.1945，刊登于Schriften，Bd.2，Muenchen 2003，S.1251。

[63] 参见*Schriften*，Bd.2，Muenchen 2003，S.1051和S.1201f。

[64] Aufruf，27.1.1945，刊登于*Schriften*，Bd.2，Muenchen 2003，Anm.24。

[65] Der wahre Frieden，Ende 1944，Bl.7.

第17章 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计划中德国和欧洲的未来

在战争一结束的那段时期里，对德国反对希特勒历史的兴趣主要旨在通过印证“另一个德国”为建立德意志联邦德国和民主制度赢得额外的合法性。这与下面这种很早就开始的趋势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否认共产主义抵抗运动有权被纳入新生成的民主秩序当中，正如通过强调抵抗“来自指挥部级别”而将所有不属于“七二〇”小范围反对派的那些组织排除在外的趋势占据了优势那样。这一趋势同时也是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政府拒绝态度的反映，现在该趋势已经让位给对所有属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组织的广泛研究了。

尽管在国家社会主义篡权之后盖世太保采取了激进强硬的手段，但是反对努力仍保留下来或者新产生出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是只有数量很小的少数人参与了积极抵抗，对此也不可能存在疑问。敢于进行看来毫无希望的颠覆尝试属于“七二〇”反叛运动的光荣篇章之一，如果成功，它将能避免几百万人死亡和欧洲广大地区被毁。与它相比，“七二〇”运动的新秩序计划在当时具备的条件下是否可以实现这个问题则变得次要了。

将德国反对派反对希特勒的计划视为后来在联邦德国产生的议会民主宪法的早期阶段是错误的。毋宁说，人们必须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给予其应得的赞赏并对其产生特别的兴趣，因为它们使推断出替代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制度的可以设想的历史政治选择成为可能。因为在反叛者看来（具体看来他们的立场不同），简单地回到魏玛的议会民主制度既不可能也不值得期待。事实证明，1919/1920年在巴黎郊区会议上为欧洲广大地区引入的议会制原则是脆弱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失败了。议会制度只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低地国家保持了稳定；在东南

欧，它与独裁形式混杂在一起；而且不管是在法国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议会宪法秩序最迟到法国共和国对轴心国失败的时候分崩离析了。此外，在德国民族保守派阵营内流传着这样的看法，所谓的魏玛“大众民主”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攫取权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德国反对派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紧接着魏玛共和国后期的政党和社团结构形成，除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工会组织之外还包括天主教群体，而且总体来说左翼革命性目标占据了主导，而第二阶段的抵抗（1933～1945年）则是自发产生，而且绝大多数是来自之前曾经积极支持纳粹政府、部分还在其中担任过行政和政治职务的德高望重者和官员。这尤其适用于军方，例如路德维希·贝克和冯·维茨莱本（von Witzleben），但也包括后来的军方反对派领袖，像亨宁·冯·特雷斯科和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

反叛者行动的出发点是，坚信自己处在一个有机会有可能实现一个根本的国家和社会新开端的历史环境下。不仅是魏玛共和国，而且支撑它的政治力量似乎也被所发生的事件的力量抹去了。一个根本的社会和政治新开端的想法在很多反叛者的思想中经久不散，通过这个新开端就可以消除19世纪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并有利于一个团结的民众共同体。他们认为自己处在一个开放的历史态势下。弗里茨—迪特洛弗·冯·德·舒伦堡和其他反叛者指责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使国家返回到本以为刚刚消除了的政党国家，并阻碍了真正的新秩序建立。

“七二〇”运动留下的全面的新秩序计划与对一个早就该进行的异乎寻常新开端的期待联系在一起。除了德国人的细致缜密之外，平民抵抗组织因为缺乏自己行动的可能而继续遭到排挤并倒退到计划的范畴，这种情况也起了作用。但是下面这种考虑尤其处于核心地位，那就是以一个自成一体的、具有承载能力的政治选择与在部分国民当中拥有超强认

同的国家社会主义相对抗。尽管“克莱骚圈”（它在计划构想方面是抵抗运动的主导）、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和路德维希·贝克为首的群体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他们在下面的见解上是一致的：纳粹政权的颠覆必须和彻底的新开端联系在一起，同时它消除了德国沦为一个采取犯罪行为方式的专制体制的深刻根源。

毛奇在1941年关于《起始点、目标和任务》的重要意见书中说，战争结束会带来“有利于重建世界的机会，这是人类自中世纪教会衰落之后还从未经历过的”，并且他谈到了一个“新纪元”的开始[1]，而格德勒在同一时期撰写的《目标》中则表示，人们正生活在“错误发展似乎达到了顶峰的几年”，并且他为重建“政治的完整”以及重新赢得国家与社会的人道主义和基督教基础进行了宣传[2]。这种对国家面临异乎寻常转变的预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反叛者会以希特勒造成的一片空白（Tabula rasa）为出发点，这让实现根本的新开端成为可能。这尤其适用于克莱骚集团，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是西方文明错误发展的终点，而且它要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并且是以放弃基督教普世价值和“天生责任”为基础的。

既然回到议会民主制度的回头路似乎被堵上了，反叛者们就开始努力与貌似没有用过的历史典范挂钩，其中尤其是职业思想受到重视，但也包括自治原则，它在德国政治文化中经常发挥着替代代议制宪法的选择的作用。缔造一个君主制国家高层的尝试也属于此类，这一尝试因为威廉二世拒绝让位给一位王位争夺者而告吹。此外，借用新保守主义思想或者是将普鲁士立宪制和1805年之后的改革时期理想化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这些思想通常以抛弃西欧宪法国家为特征。在极权统治的霾雾下，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与西方政治思想的联系。在他们的改革意见书中看不到对法国大革命和人权传统的援引，它们更多的是与德国理想

主义传统联系在一起。这基本上也适用于与盎格鲁—萨克森世界联系密切的人物，例如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或者是赫尔姆特·詹姆斯·冯·毛奇。甚至诸如尤里乌斯·勒伯尔等左翼代表也认为所谓的机械接纳西方宪法思想是魏玛共和国的一个根本错误。

“克莱骚圈”和格德勒圈的宪法政策草案首先旨在排除失控的大众情绪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同时限制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克莱骚集团希望能将必需的初选限制在地方范围内并将初选的举行转交给自发形成的“小社区”（kleine Gemeinschaften），英国的“友谊社”（friendly societies）对它们起了影响作用。为了承担邻里职责它们应当首先在社区层面形成，但是也应拟定邻里方案，就像最初“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宣传的那样[3]。每高一级的代表机构都应当尽可能间接选举，直至国民议会。克莱骚集团的方案由坚决将辅助原则应用到国家身上组成并且是委员会制度的一个保守变体。政治党派和大范围的竞选在这个根据层次清晰和具体人物安排的制度中是多余的。要建立的各个州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自治，但社会福利和经济政策是例外。

格德勒的宪法模式在某些方面具有现实主义特征。尽管强调自治思想，但是联邦要素占据的空间明显小得多。一个中央集权状态的国家与一个强大的中间机构相对，而各部门机关的下属管理部门则隶属于它。这个来自格德勒的建议在很多方面与纳粹政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帝国中间机构的努力相一致，党和公共机关在其中相互联系在一起。与克莱骚集团不同，格德勒对本质上更加偏爱的间接选举原则进行了如下的限制：在中央议会应该有一半是直接选举出来的。但是其独立自主性也受到由各行业（其中包括中央的“德意志工会”）派出的“上议院”（Reichsstaendehaus）各阶层代表的不断削减。全国性质的政治党派的影响应当尽可能加以限制，但是格德勒认为普遍禁止是不可行的。

在这两种模式下，临时国家元首以及帝国元首（比魏玛共和国的总

统强多了）拥有全面的特权，例如范围很广的否决权和解散权，而且代表机构的自主权受到严重限制。这是对魏玛共和国的长期政府危机的反应，但是导致（肯定是无意的）行政权的地位的明显加强。这不一定与尽可能分散政治意愿的形成从而杜绝对未成年选民的极权主义操纵的努力相矛盾。将公民纳入一目了然的地方自治体当中将教育他们要在国家中负责任地合作。目光敏锐的支持者——例如社民党人埃米尔·亨克（Emil Henk）很早就认识到，约束选民和使挑唆煽动者停止恶劣行径的努力会带来成问题的政治意愿形成的寡头垄断[4]。因为（“克莱骚圈”比格德勒更为强调的）间接代表体制将当选议员的数量限制在一个越划越小的范围里面。事实上，大量对平民百姓的猜疑和对其政治可操作性的担心仍旧存在，这很难说仅仅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发动大众的反应，而是也与20世纪20年代的选举权讨论有关。格德勒解释说，他建议对选举权进行限制——特别是提高选举年龄的——理由是，“在这样一个因为不自由和宣传而变得不加批判的人民当中”，政治无法以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为依据。出于另外一些理由，“克莱骚圈”的草案拒绝给予女性以被选举权。

反对派易变和多样化的考虑旨在指出一个除国家社会主义元首国家之外的其他选择，它没有局限于各方要求的法治国家的重建和面对政权腐败不断升级而令公共秩序重新生效上，而是将彻底的社会改革包括在内，改革应当结束阶级斗争并缔造社会平衡。对“克莱骚圈”目标产生了很大影响的阿尔费雷德·德尔普神甫在他的《第三条路》意见书（它没有保留下来）中委婉表达了对德国同时还有欧洲新秩序的构想，在意见书中，他赞成西方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之间进行调停。德国必须构成“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的想法为大多数反叛者所赞同，而且它与西方世界的观念和目标联系在一起：在“地区外列强”（美国和苏联）的行动面前维护受基督教影响的欧洲认同[5]。

但这并非针对东欧国家。特别是在年青一代反对派当中，20世纪20

年代俄罗斯浪漫主义的影响仍旧存在，默勒·范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坚决维护的没有为西方唯物主义文化所控制、还从未动用过同时又受基督教强烈影响的“年轻人民”的想法也是同样，例如它对舒伦堡、“白玫瑰”和“克莱骚圈”内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对俄罗斯农民生活环境的尊重也是亨宁·冯·特雷斯科和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考虑的背景之一。这两位军官都认为，专制者顽固坚持的不仅要摧毁苏联公共机构也要摧毁俄罗斯国家的战略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施陶芬贝格说，不能而且不应对俄罗斯人民展开和赢得战争。在这一关联下，他对帝国领导进行了能够想到的最猛烈的抨击，谴责委员下令谋杀数百万战俘以及不人道地对待东部的劳工[6]。他与特雷斯科一起很早并违背希特勒意愿地致力于俄罗斯志愿兵组织的建立，也就是后来的弗拉索夫军队。另外，这种亲俄的同情态度很多时候妨碍了对共产主义政策切合实际的评价。例如毛奇1943年也还醉心于能将“与俄罗斯没有关系的共产党人”纳入计划中的颠覆政府的幻想当中[7]。但是，像后来的前东德历史学家强加给它的那样，加深对东方理解来试图与斯大林建立特殊意义上的和平关系是谈不上的。

与此同时，“七二〇”运动的不同派系就大家需要一个彻底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这一点达成了共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正确地把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选举成功和大规模失业联系起来。最近的研究表明，反叛者的经济政策见解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尽管像毛奇和瓦滕堡这样的人自视为社会主义者，而他们把格德勒归到了死板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名下。毕竟，计划对原材料工业进行社会主义化并借此将核心的社会民主事务考虑在内，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在工会问题上他们走的则是不同的道路。

克莱骚想的是建立企业工会，按照“小社区”模式赋予员工在企业中参与盈利分配权和全面的共同决定权，同时他希望放弃集中的工会组织。显然，这个方案要追溯到阿道夫·赖希魏因在耶拿人民大学活动时

期所形成的思路。当时他在考虑厂区居民区的想法。它是从老一点的生产合作社照本宣科而来的，并应当通过“小集体”的合作社模式消除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在马尔堡时期，赖希魏因则致力于行会的建立。企业家和就业者应当在行会中联合起来，并应“在企业内共同、平等责任实现更高统一的情况下，原则上消除作为严格分开的领域的企业家职能和就业者职能” [8] 。这个方案与毛奇和约克的“小社区”思想惊人的一致。

在克莱骚集团，人们对下面这一点认识错误，力争实现的企业工会在现代大规模经济条件下过分限制了就业者的自由流动。但是它们适合主要克莱骚成员所代表的“绩效竞争”原则，这一点是和弗赖堡圈子的国民经济学家相一致的。彼得·约克·冯·瓦滕堡和弗赖堡圈子的密切联系要追溯到他们在德意志法研究院（Akademie fuer deutsches Recht）的合作。但是他们把“绩效竞争”原则放在为了给公民缔造社会保障而进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下面 [9] 。

格德勒和克莱骚在经济政策方面出现的矛盾大部分建立在一个误解的基础上，而这个误解是因为格德勒有时专横独断、一意孤行的表现而造成的。因为除了克莱骚集团进一步推动就业者的共同决定权和参与盈利分配权之外，双方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差异。甚至在格德勒和威廉·洛伊施讷以及雅各布·凯泽达成一致的“德意志工会”问题上，也因为给帝国临时国家元首的指示为其指派了过渡性的功能而形成了妥协。“其功能的完成在于将由它承担的任务过渡给国家和经济自治机关。” [10] 克莱骚明确地反对建立此类“庞大臃肿的机构”。与之相对，格德勒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将国家的绝大多数社会保障职能转交给“德意志工会”，它计划超出德国劳动阵线的范围，所有就业者都必须强制加入。即便在格德勒设计好的阶梯形行业利益代表组织内，它也会构成一种不相称的东西，并给予工会过高的支配地位，尽管人们考虑的是杜绝劳动争端 [11] 。

联系他在布吕宁时采取的立场，格德勒希望将社会生存救济在很大程度上放到“德意志工会”手中并将国家从中解放出来，而克莱骚集团却将其作为国家的核心责任。与沉醉在通过启蒙和教育工人阶级（也通过他撰写的《经济学初级读物》）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中的格德勒不同，特别是作为“克莱骚圈”中的耶稣会代言人的阿尔费雷德·德尔普坚称有必要进行一场真正的社会变革，给个人带来物质上的生存保障。“20世纪的这场革命”，在面对罗兰德·弗赖斯勒进行辩护时他强调说，“需要确定的议题和建立新的稳固持久的人的空间的可能” [12] 。与此类似，他按照《新事通谕》（*Enzyklika Rerum Novarum* ）的精神提醒教会它的现实社会责任，并强调，力争的“思想改革”以“状况改革”为先决条件。在《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 ）的影响下，阿尔费雷德·德尔普坚决赞成实行家庭工资、普遍最低生活保障和按照社会公正精神“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其中也包括保证劳动的权利和“使工人作为工人而不是同志或者是民族同志”加入到“社区”中。这个天主教立场的社会政策组成给社会主义伙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这个问题上，“克莱骚圈”在“个人社会主义”制度中寻找答案，它希望按照控制自由主义精神“使绩效成为社会地位的准绳并成为负责任地参与政治意愿形成的认证”。在这里被视为社会问题的不是被视为物质上的等同问题，而更多的是个人承担公共责任的能力和意愿的重新生成的问题。在战争期间灵敏地感知到社会变化的阿尔费雷德·德尔普发觉，人们继续使个人倒退到“纯粹没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生命力”以及“原始的保住性命和满足需求”的状态。他担心社会义务责任瓦解，害怕“日耳曼布尔什维克主义化”，并与国民中蔓延的“不包括我的心态”进行了斗争。

事实上，磨灭根本的义务责任、家庭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日趋瓦解，一个根据人种和种族标准、根据性别年龄来划分等级的阵营社会的形成都有导致社会行为反常的危险。这一认识促使克莱骚集团成员在

1944年1月毛奇被捕后积极投身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刺杀计划的准备工作，并放弃了此前的等待观望战略。恰恰考虑到社会上和思想上的社会畸形日益增多，德国反对派的根本目标就更加在于“在我们同胞心中”重建“人的形象”（就像毛奇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表述那样）[13]，并借此使在厚颜无耻和腐败中僵化麻木的国民重新具备承担社会和政治责任的能力。

同时，在“七二〇”运动中还发生了一个值得一提的对欧洲思想开放的进程。这对克莱骚集团来说并不出人意料，因为毛奇和约克很早就对民族国家思想持拒绝态度。对他们来说，欧洲大国在经济上的联合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他们考虑建立跨地区的自治单位，这些单位超越了国家的边境，并将经济上密不可分的不同国家的地区团结到一起。一个超越原本民族国家单位的地区欧洲的构想直到今天仍没有失去它的魅力。与此同时，克莱骚集团成员希望能在欧洲实现他们的新秩序方案。因此在第三次克莱骚大会前期出现的一份意见书中称：“不管德国的主动权会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于外来势力的侵入，中小规模的自治体自发的持续作用都将……保持其必要性。我们的任务将是，特别是在这些领域为以健康的自治形式实现的、作为欧洲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普遍解决形式的个人社会主义思想做好准备，并作为对欧洲和平的建设性贡献把它提出来。”[14]

对资产阶级反叛者来说，他们最初强调的民族主义立场正在逐步瓦解，它有利于一个欧洲经济联盟的建立，并且是在放弃了诸如将民族军队作为民族学校等受人欢迎的想法的情况下。反叛者形成的方案与欧盟的最新发展相比领先了很大一截。然而，至少能部分保证希特勒的外交成就（如与奥地利合并）的错觉在很长时期内仍旧存在。

后来颠覆计划的跨度之大令人惊讶，它绝对没有局限于为政治颠覆确定主要参数上，而是也将大量看来并不迫切的政策领域——例如教

育、培训、高校体制或者是土地规划纳入计划当中。同时，计划中反映了民族保守主义抵抗运动中只在例外情况下才能看到政治阶级的代表、政治中间派以及魏玛共和国代表缺席的状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居于次要位置或者退到幕后，因为在抵抗运动在1939年之后所面对的令人沮丧的条件下，反对和恢复议会环境似乎不存在现实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积极地反抗政权——这可能就需要泛滥的乌托邦思想，而这更多地可以在政治万花筒的边缘地带找到。

“七二〇”运动首先在国家高级官员、外交官、军方和机关法律工作者中招募人员，他们大部分都曾在政府中身居要职，部分甚至还在担任着要职。加入到他们当中的有一系列工会会员，这主要是因为格德勒和前自由派及基督教工会领导人联合在一起，同时他们又与科隆凯特勒之家保持着联系[15]。而毛奇又因为采取了有针对性的人事政策而拉拢了大量在此前十分积极的社民党人，其中包括曾被国家社会主义党抓捕的卡洛·米伦多夫、特奥多尔·豪巴赫、阿道夫·赖希魏因和尤里乌斯·勒伯尔，同样还有两个教派的代表。运动的社会基础因此得以扩大了。

虽然如此，反叛仍旧在很长时间内是德高望重者的行动，他们觉得自己是天生的民族代表并且认为民主支持并非不可缺少。颠覆规划是根据国防军将在“瓦尔基里”行动框架内宣告军事紧急状态并接管政治权力进行的。其中，施陶芬贝格会在多快速度内把权力交给路德维希·贝克和卡尔·格德勒领导下的待命的非军方政府，这一点还不得而知。军事与民事力量的关系没有得到足够的澄清。

不管是哪种情况，首先考虑的不是在颠覆发生时发动国民，颠覆政府依赖更多的将是军队。为使计划的政变合法化而使用欧洲革命的手段——传单、海报、群众集会等，这些距离反叛者还很遥远，虽然他们打算以电台讲话和声明的形式立刻告诉国民颠覆政府正在以及接下来将采取的举措。为此而准备的文本具有官方政府公报和道德号召的特征。它

们充满了极权式国家对待公民的气息，公民被号召保持忠诚而不是行动起来。年青一代的反叛者反对这种看起来像是旧式家长的作风，并对“阁下们”及其联盟谈判进行了口诛笔伐，克伦斯基解决方案的恶毒说法开始一传十，十传百[16]。

从1943年初开始，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伯身边就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行动小组，它主要包括尤里乌斯·勒伯尔、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和弗里茨—迪特洛弗·冯·德·舒伦堡。有些迹象表明，施陶芬贝格建立了一个摆脱了格德勒支配的独立的平台。不管怎样，施陶芬贝格似乎推迟了起初计划的立刻组建政府的计划，并让计划中的军区政治专员隶属于军方的领导。与此同时，与格德勒的关系紧张加剧，后者直到最后都反对刺杀行动，并通过贝尔恩德·吉泽菲乌斯向苏黎世的艾伦·杜勒斯抱怨说，施陶芬贝格打算建立一个“工农政府”[17]。这个后来东德作者也强加给他的“向东转”罪名是捏造，但是对尤里乌斯·勒伯尔心怀感激的施陶芬贝格可能的确倾向于在颠覆政府中加强左翼势力。事实上，社会主义者在其中占据了关键的位置，尽管路德维希·贝克担任总统、格德勒任总理的格局最终得到了遵守。

反对运动中很早就有声音指出，颠覆政府“如果没有得到国民强有力的支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持续。例如，在1939年不得不移居国外的汉斯·罗宾逊希望建立一个“自由革新运动”（Freiheitliche Erneuerungsbewegung），它应当在个别地区建立基地，并在权力更迭的时候出现在公众当中[18]。这个想法起初没有得到详细说明。直到1943年，在普遍的再政治化的氛围下，它才为人重新着手研究。“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成立表明，德国共产党即便在颠覆之后也是一个政治要素，而且它的民族平民主义纲领对于民族保守主义反对派来说是个挑战。

在这一态势下，卡洛·米伦多夫借助日期确定在1943年圣灵降临节

的“社会主义行动”计划脱颖而出。通过将日期确定在6月13/14日第三次克莱骚大会举行（他出于掩饰的原因没有参加）的这一天，他表明，该声明是与克莱骚集团的思想相一致的。它赞成“为了拯救德国”建立一个“跨党派的人民运动”，该运动应当把基督教、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团结起来。这个倡议得到了致力于“将社会民主主义乃至左翼纳入进来的”约克和毛奇的支持。通过采取“跨党派人民运动”方案——它不仅领先于后来的集团体系，也领先于法国戴高乐的人民联盟（Rassemblement du peuple），抵抗运动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超越了在那之前一直奉行的德高望重者政策。

该计划包括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并要求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秩序”[19]。另外，它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特奥多尔·豪巴赫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目的是将所有反对派别包括共产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尤里乌斯·勒伯尔在此后不久也谈到了“在所有幸存和有生存能力的社会和民主力量基础上”建立“一种新人民阵线”的必要性。但是至关重要的是为了给颠覆提供民主支持而建立一个“跨党派人民运动”并由此迈出从迄今为止占据主导的受极权主义影响的权利攫取到民主革命动员这一步的决定。

然而关于这一人民运动的结构和纲领却看法不一。按照格德勒的愿望，它应当将“所有地位、所有阶层的人和所有省分部（Gau）统一起来”，并包括“从社会民主党到中央党乃至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德国人”。他期望它能引导在他看来不可避免的民族党派的形成。毛奇则将它视为具有建设意愿的力量的一场广泛的联合运动，他所期待的“志同道合者的政党”会在该运动中超越民族的界限集合在一起。

“人民运动”的纲领导向问题不可避免地在反叛者内部导致了冲突。与基督教社会主义比较接近的卡洛·米伦多夫和特奥多尔·豪巴赫希望能实现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共生[20]。然而阿道夫·赖希魏因提出的表述

——“人民运动拥护德国文化和德国人民的基督教历史”——却遭到尤里乌斯·勒伯尔的明确反对，他反对“让旧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原则被简单地丢弃”。同时，非法的德国共产党的压力还有对伦敦社民党流亡委员会的顾忌也都起了重要作用[21]。

在7月20日之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人民运动纲领方面再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共识。这时再次出现的导向政策方面的分歧中显示出一个政治成熟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它也呈现出在心理上对此前完全隔离的外界的开放，它突然结束了反叛活动在政治上的相对隐晦性。如果刺杀行动成功的话，是否还能形成意见一致的颠覆政府或者施陶芬贝格向左（可能是让勒伯尔担任总理）改组政府的想法是否就会实现，这肯定无从得知了。毕竟，比如说在黑森，部分原社民党工人阶级的阴谋组织准备好了如果发生颠覆就采取政治行动[22]。“人民运动”的建立是否迅速得足以避免内战的局面，这很难估计，在这方面各个省分部的情况是不同的。可能由社会主义者占据了很多关键职位的颠覆政府也不可能坚持下去。但不管是哪种情况，一场灾难性的战争都会结束，在这场战争里，1944年夏天之后死亡的人数和在此之前死亡的一样多，而且整个欧洲都被严重摧毁。

反叛者清楚，他们会因为他们的行动而受到被误导的国家的叛国指责，但是为了拯救这个民族他们自愿忍受了下来。虽然最初与盟国达成和解的希望破灭，而且到了刺杀行动的时候，保证帝国在领土上的成就已经没有机会这一点已经是完全清楚的了，这些成就是在民族国家对凡尔赛和约的修订的框架内的，但是出于民族自尊心的原因，行动是必要的。例如，亨宁·冯·特雷斯科流传了下来的表述这样说道：“刺杀希特勒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如果失败了，那么尽管如此也必须尝试政变。因为关键不再是这个实际的目的，而是德国抵抗运动敢于在世界和历史面前做这个至关重要的努力。”[23]与此同时，施陶芬贝格认为，结束一场不负责任的战争的动机获得了决定性的比重，即使人们醉心于能暂时

稳定住东线战场的幻想当中。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下面这个情况，对希特勒的反叛准备致力于紧密的欧洲合作也就是一个欧洲联盟，并放弃了最初的民族主权的限定。在这个问题上，格德勒也反常地走得很远，放弃了在未来欧洲国家共同体内保留民族军队的想法，他认为出于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原因国家共同体早就该出现了。有利于跨国合作（先是以欧洲标准）的消除传统民族强权思想的智力过程对二战结束后的德国政治具有决定意义。就此而言，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杠杆，它有利于对西方以及对民主—多元宪法形式开放，而且可以用它来克服“德国道路”思想和德国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中存在的局限。德国抵抗运动所代表的在希特勒之外的其他选择一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时代局限性，尽管由它产生了令国家道德恢复、重新获得政治能力的至关重要的推动力。

---

[1] 刊登于Ger van Roon的*Neuordnung im Widerstand. Der Kreisauer Kreis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Widerstandsbewegung*， Muenchen 1967，S.507f.；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er Kreisauer Kreis und die kuenftige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Muenchen 2000，S.210。

[2] 参见Sabine Gillmann/Hans Mommsen（出版）的*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Carl Friedrich Goerdelers* （=*Schriften*）， Muenchen2003，S.879f。

[3] Mommsen，Der Kreisauer Krei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Muenchen 2000，S.211。

[4]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Neuordnungplaene der Widerstandsbewegung des 20.Juli 1944，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S.178。

[5] 关于Delp请参阅Betrachtung ueber Europa in der Neujahrsnacht vom 1.1.1944，刊登于同一作者的*Gesammelte Schriften*， Roman Bleistein出版，Bd.3，Frankfurt am Main 1984，S.78ff.；请参阅Bleistein的Alfred Delp. *Geschichte eines Zeu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9，S.218ff.和S.271。

[6] 参见*Spiegelbild einer Verschwoerung*，*Die Kaltenbrunner-Berichte an*

Bormann und Hitler ueber das Attentat vom 20.Juli 1944， Archiv Peter出版，Stuttgart 1961，S.34；请参阅Chriatian Mueller的*Oberst i.G. Stauffenberg. Eine Biographie*， Duesseldorf 1970，S.224和Bodo Scheurig的*Henning von Tresckow. Ein Preusse gegen Hitler*， Frankfurt am Main 1987，S.176f。

[7] Van Roon，Neuordnung，Muenchen 1967，S.585；请参阅Klemens von Klemperer的*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 Der deutsche Widerstand auf der Suche nach Verbuendeten 1938-1945*， Berlin 1994，S.286f。

[8] 参见Hans Mommsen的Adolf Reichweins Weg in den Widerstand und den Kreisauer Kreis，刊登于*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S.355ff。

[9] 请参阅Daniela Ruether的*Der Widerstand des 20.Juli auf dem Weg in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Auffassungen der buergerlichen Opposition gegen Hitler*， Paderborn 2002，S.281f。

[10] Van Roon，*Neuordnung*， Muenchen 1967，S.567f。

[11]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Wilhelm Leuschner und die Widerstandsbewegung des 20.Juli 1944，刊登于*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S.329ff。

[12] 参见Alfred Delp的Im Angesicht des Todes，刊登于*Gesammelte Schriften*，Bd.4，2.Aufl.，S.313；Roman Bleistein，Alfred Delp. *Geschichte eines Zeugen*，Frankfurt am Main 1989，S.245ff。

[13] Brief Moltkes an Lionel Curtis vom 18.4.1942，刊登于Freya von Moltke/Michael Balfour/Julian Frisby的*Helmuth James von Moltke.1907-1945. Anwalt der Zukunft*， Stuttgart 1975，S.155。

[14] 参见Roman Bleistein（出版）的*Dossier*：*Kreisauer Kreis. Dokumente aus dem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7，S.246f。

[15] 参见Vera Buecker的研究，*Nikolaus Gross. Politischer Journalist und Katholik im Widerstand des Koelner Kreises*， Muenster 2003，S.181ff.，S.196f。

[16] 请参阅Ruether的*Der Widerstand des 20.Juli*， Paderborn 2002，S.315ff。

[17] 参见Schriften，S.103；Mommsen，Gesellschaftsbild und Verfassungsplaen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S.139f。

[18] Horst Sassin，*Liberale im Widerstand*， Hamburg 1993，S.70ff。

[19] 后续参见Mommsen的Carlo Mierendorffs Programm der ‘Sozialistischen Aktion’，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S.341-351，Berlin 1952，S.283f。

[20] 参见Mommsen的Carlo Mierendorff，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S.341-351，Berlin 1952，S.347f。

[21] 参见*Spiegelbild einer Verschwoerung*， S.501；参见Otto John的Maenner im Kampf gegen Hitler，1，Julius Leber，刊登于*Blick in die Welt*， 1947，S.22；Julius Leber，*Ein Mann geht seinen Weg*， Berlin 1952，S.283f。

[22] 请参阅Emil Henk的*Die Tragoedie des 20.Juli*， Heidelberg 1946，S.48ff。

[23] 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Offiziere gegen Hitler*， Berlin 1984，S.109。

第18章 “克莱骚圈”的外交设想

与1940年之后聚集在莱比锡前市长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和1938年辞职的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身边并大力着手外交问题的民主保守主义反叛者不同，以赫尔姆特·詹姆斯·冯·毛奇和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为核心的松散的朋友圈子主要研究的是未来新秩序的内政方面，由这个圈子产生了后来的“克莱骚圈”。同时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他们所力争的新秩序不能仅限于德意志帝国，而是必须以欧洲为标准进行构想。

赫尔姆特·詹姆斯·冯·毛奇很清楚，第三帝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但是直到1942年他还期待着战争对手会精疲力竭并导致其在战争谈判中投降，而且不会出现中欧列强（Mittelmaechte）的完全崩溃，也就是说，内政倡议还存在着活动空间[1]。毛奇指望纳粹政权能从内部衰败，而不是作为军事失败的结果。他将这视为要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的错误发展的终点，这一错误发展造成了西方普世价值的沦丧、对个人义务责任的放弃以及现代国家的产生。

毛奇诊断说，这是西方的衰落期，它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而走到了它的终点和转折点。在1941年春关于《起始点、目标和任务》的意见书当中，他强调，战争结束提供了“一个有益重新构建世界的机会，这是人类自中世纪教会衰落以来从未有过的机会”。他期望出现异乎寻常的转折并谈到了一个“新纪元”和一个彻底的新开端，认为是时候为这个新开端做准备了。

就此而言，对“克莱骚圈”来说，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全欧洲的视野，同样，他们没有把国家社会主义得到承认理解为德国特有的而是欧洲的危机。随着纳粹政权对波兰和法国的军事成功而似乎到处都在突进的同时期的大区思想对他们没有影响，它们甚至使民族保守主义反叛者

例如格德勒和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产生了能带来德国领导下的欧洲团结的希望。对他们来说，倒不如说逐渐显露出来一个理念，它主张面对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的影响都要维护欧洲的同一性。这尤其适用于“克莱骚圈”内的阿尔费雷德·德尔普神甫和耶稣会成员。例如，德尔普反对“地区外列强”的干预，而且在这方面他以西方的传统为依据，他将其理解为基督教、日耳曼遗产和古风的共生[2]。

致力于加强普世对话并从1941年起与西欧和德国不同抵抗组织建立了相对紧密联系的那些人也有类似的考虑。威廉·维瑟特·霍夫特（Willem Visser’t Hooft）、德国抵抗运动与海外基督教会最重要的联络人在他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反对纳粹德国的抵抗运动的最高目标必须在于“维护欧洲生活的完整”[3]。他与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者虽然加入了“克莱骚圈”，但是起初在外交政策上走了自己的道路。他将社会主义思路与职业原则联系起来，并谈到面对资本主义列强以及苏联的威胁“让欧洲的普通人亲如兄弟”。他眼前浮现的景象是在消灭极权主义制度后两种欧洲打造模式的结合：“在大众时期之前的民主欧洲”和消除了这个欧洲之后的“民主欧洲”。他期望这可以“最终消除欧洲民族主义特别是军事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4]。

同样对毛奇来说，他所力争的欧洲革新也是与建立一种新生活形式分不开的，它与对共同的基督教根源的全体回忆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在1942年4月18日对他的英国朋友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说下面这番话的背景：“对于我们来说”，他在斯德哥尔摩写道，“战争过后欧洲不是边境和士兵，而仍是复杂的组织和重大计划的问题”。对欧洲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在我们的同胞心中重建人的形象”[5]。“克莱骚圈”的计划就针对这一目标，但是它没有停留在教育、宗教、家庭重建问题上，而是同样涉及未来欧洲宪法的原则。毛奇和约克——“克莱骚圈”最重要的灵感来源在有针对性地为下面这种情况做准备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迄今为止的欧洲民族国家结构会在很大程度

上变得无足轻重，而且在领土方面也出现全面的新开端。他们相信，这一发展会导致产生一个自主的欧洲联邦国家，它必须拥有明确的对地区自治单位的命令职权，并且会在原本的民族国家里——特别是德国和法国——产生发展起来。

一个地区欧洲的构想直到今天仍散发着显著的魅力，在隶属或者依附于第三帝国的国家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这个构想似乎预示着即将实现。毛奇说，从纳粹的掠夺经济中将形成一种欧洲复合经济[6]。《起始点、目标和任务》中就说明了对“从欧洲动员中产生一个大型共同经济组织”的期望，“它将由欧洲内部的经济机构领导”[7]。在毛奇和约克的倡议下，1943年6月的第三次克莱骚会议明确讨论了未来欧洲经济秩序的问题，并考虑在欧洲内部进行经济劳动分工、对农业市场进行均衡和针对生产过剩的威胁采取措施，以及要求采取共同的税收、贷款和交通政策，这样会为欧洲经济的共同发展奠定基础[8]。鉴于非德国货币在德国控制的经济集团内反正不能自由兑换，建立一个货币联盟的问题就变得迫切了。

通过这些规划，“克莱骚圈”将民族保守主义抵抗组织特别是以卡尔·格德勒为首的圈子的方案与自己拉近了，后者觉得放弃传统的民族国家属性要困难得多，而且他们追随一相情愿的保证帝国在中欧霸权地位的想法的时间相对较长。“克莱骚圈”很早就同意将民族国家主权转交给一个欧洲中央政府并创建一部欧洲宪法。在这个问题上，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走在了前面，他在1939/1940年冬天就考虑建立一个欧洲关税和货币联盟、一个共同的最高法院并引入全欧洲公民[9]。

克莱骚对未来欧洲新秩序的设想以一种双重性为特征。一方面它准备给予未来的欧洲机构全面的职权。例如要建立的欧洲“最高立法机构”不受制于成员国。毋宁说，其成员不应当由这些成员国选举而是应当直接选举产生，因此这实际上领先了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10]。另一

方面，毛奇设想的是将欧洲重新划分为“历史形成”的、规模类似的自治体，而它们又源自自发形成的“小社区”的联合，也就是说，把尽可能多的职能留在地方层面上。这种双重结构在实践中应当如何运作，计划中没有进行更具体的解释。毛奇和约克在宪法政策中对辅助原则有多坚持，他们对经济和社会政策需要欧洲联邦国家统一指挥的怀疑就有多小。

特奥多尔·施特尔策在1942年产生的《欧洲宪法体制》备忘录中记录的考虑以同样的方向为目标。他在其中要求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同时它又拥有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政府，但是他希望避免任何的霸权解决方式。英国是会加入未来的欧洲联邦还是会隶属于美国集团，这一点仍然不清楚，这也是毛奇所斟酌考虑的[11]。在对未来欧洲联邦的基督教基础的强调（它在“十字架下的欧洲”这一表达下达到了顶峰[12]）方面，施特尔策绝非孤身一人。在帝国思想和奥特马尔·施潘（Otmar Spann）职业思想的影响下，特别是“克莱骚圈”内的耶稣会成员主张加强基督教导向。与基督教界保持着联系并且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新教徒也有类似的想法[13]。格奥尔格·安格迈尔（Georg Angermeier）、保罗·勒施（Paul Roesch）和阿尔费雷德·德尔普的亲密顾问以及与高级神职人员的联系人在这个问题上持毫不妥协的立场，要求建立一个“欧洲民族”。他将其视为未来欧洲秩序的不可或缺的根基[14]。

对于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还能持续多久，1944年“七二〇”运动内部存在着不同观点，具体来说，关于维持德国东部边境的问题，格德勒在很大程度上紧抓着虚幻的希望不放[15]。与之相对，毛奇很早就清楚，西里西亚（Schlesien）将落入波兰共和国手中[16]。另外，他以为，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普遍可以预见的战争的结束，和平政党将在有关国家占得上风并会表明决心赞同全欧洲就保证和平达成一致[17]。但是最晚到1943年春的时候，这个毕竟是幻想的情景就完全改变了。《大西洋宪章》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再加上红军的军事成功在很大

程度上造成了新的局面。

作为用心的观察者，毛奇没有忽略，盟国的决定严重缩小了德国反对派的行动空间。与此同时，他不想无条件地放弃主动权。他得出下面的结论，“在美英俄构成的紧张三角内，德国对秩序的贡献”必须发生，而且他醉心于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可能来应对担心出现的“对欧洲生活的组织性压迫”的信念当中[18]。因此反对派的行动不能局限在发动具有补偿意愿的欧洲政治力量上，就像基督教界试图做的那样。倒不如说，必须尽一切努力说服西方政府相信德国反对派的存在和行动能力并促使它们合作。

尽管外交和军事整体形势令人沮丧，但毛奇仍坚持他的目标：破坏战胜国力争的对帝国的吞并，为帝国作为整体失去行为能力的情况在德国投降之前就使各州临时元首具有国家主权的一切特征。将贯彻眼下已经与其他抵抗组织达成一致的克莱骚纲领的任务交给他们[19]。毛奇希望，为此赢得西方占领国的宽容以及最终对自发的改革倡议以及自下而上进行的重建的肯定。“不管在外国势力要求下德国主动权被压制得有多严重，中小型自治体和技术组织自发的持续作用仍旧将是必要的。我们的任务将是主要在这些领域为这样一种思想做准备——以健康自治形式实现的个人社会主义是欧洲社会经济问题的普遍解决方式，并作为对欧洲和平的建设性贡献把它提出来”，1943年春克莱骚集团的一份卷宗中这样写道[20]。

这些大致勾勒的思路并非完全成熟的（这也是因为毛奇在1944年1月被捕），但是这个概念框架却是清晰的，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早已得到巩固的盟国对德政策方案的狭窄走廊中为独立自主的和平计划指路的机会微乎其微[21]。与此相联系的是“从真实的德国内部改革出发对欧洲信任的形成产生影响”的这个目标[22]。同时，绕道欧洲的方式也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也为德国保证“民族文化的和平发展”并阻

止结构外的政治秩序原则被强加于人[23]。

一个划分成自治单位、具有联邦性质的德国可以构成欧洲新架构的细胞核——这个构想因为盟国的军事和外交决定而成了无米之炊。因此毛奇没有局限在此处所概述的计划的准备工作上。“克莱骚圈”与海外的接触不仅旨在为“克莱骚圈”的立场赢得国际支持，也越来越多的是出于让西方盟国放弃无条件投降要求的努力。

然而，事实证明，找到愿意将“克莱骚圈”立场转达给官方机构的外国伙伴变得越来越难。1942年4月特罗特·楚·佐尔茨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就已经如此[24]，当时他鉴于苏联不断扩大的军事成功而寻求英国政府的合作，之后不久舍恩菲尔德（Schoenfeld）请求盟国给颠覆政府担保的备忘录也是同样[25]。紧接着1943年底克莱骚第三次会议之后产生的答“美国教会和平计划”的文件也没有得到华盛顿和伦敦的什么回应[26]。因此毛奇与国外建立联系的努力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27]。

后来为反叛争取当时驻安卡拉大使弗兰茨·冯·巴本的值得怀疑的尝试也属于这些努力之一。在通过特罗特·楚·佐尔茨初次接触之后，1943年7月，毛奇在安卡拉与冯·巴本短暂会面，但是毫无成果。但是这构成了毛奇在12月尝试与美国驻开罗大使亚历山大·柯克（Alexander Kirk）建立联系的出发点。在1943年11月写给柯克的信中，毛奇指出，有效的军事合作“以政治方面意图的某种=统一”为先决条件。相反，柯克在1944年1月递交的备忘录则明确表示，“除了德国武装军队无条件投降之外没有什么能结束欧洲的战争”[28]。因此，该行动主要因为美国接触伙伴的态度而失败，他们只是出于刺探情报的目的才与抵抗运动代表见面的。

在毛奇动身离开之后，他的接触对象亚历山大·柯克和汉斯·维尔布兰特（Hans Wilbrandt）撰写的以与他交换看法为基础的意见书说明了“该组织愿意与盟国进行政治和军事合作”的先决条件[29]。它旨在避

免苏联占领德国，并以成问题的考虑为出发点，那就是能将德国支持盟国在西线登陆与东线战场的巩固联系在一起。其中它请求盟国理解，颠覆政府只有“借助十分强大的左翼才能行动”，而且“不从属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的参与是可以容忍的。

这份意见书突出了“德国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展”的危险，并强调，“德国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是“德国最严重最危险的未来威胁”，并警告说，“战争将由红军的胜利决定”。该文件只部分反映了毛奇的见解，但是他同样大力主张避免苏联进入到欧洲中部，而且他特别借助这一论据提出要与西方盟国进行政治——必要的话也进行军事合作。这其中包括了反对派观点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因为它不再坦率地拒绝德国无条件投降。但是特罗特在出国访问时始终坚持拒绝态度，这构成了他（和此前毛奇）考虑的开放德国西线战场的先决条件。

因为毛奇在1944年1月被捕，与西方盟国接触的不断努力而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虽然特罗特·楚·佐尔茨不知疲倦地致力于通过瑞典和瑞士与盟国建立联系，但是，和常常发生的一样，他的考虑遭到了严重的怀疑。这主要与企图打俄罗斯牌同时暗示轰炸战的负面影响分不开。与此同时，特罗特的立场与“克莱骚圈”其他成员的立场产生了差异，这是因为他进一步强调面对苏联的袭击应保证中欧的安全并突出了帝国的桥梁功能，这在《东西方之间的德国》意见书中得到了更详细的解释，遗憾的是该意见书遗失了[30]。特罗特与和艾伦·杜勒斯关系亲近的一位同事格罗·冯·格费尼茨（Gero von Gaevernitz）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可能在政府面前支持特罗特的想法。与毛奇保持着活跃思想交流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31]。

与挪威抵抗圈子保持着联系的特奥多尔·施特尔策在最后时刻试图在1944年7月撰写的给西方盟国的呼吁书中“以我们这个由不同政治阵营走到一起的圈子的名义”通过与反对派合作避免即将面临的混乱。“因此

我们觉得自己有义务”，呼吁中说，“在形势使任何接触可能都变成空想之前尝试与三大力量接触”。但是在“七二〇”刺杀行动失败之后这份备忘录才到达伦敦[32]。同样，维瑟特·霍夫特支持世界基督教教会运动的努力和英格兰奇切斯特的贝尔斯（Bells von Chichester）主教进行的改变盟国政府看法、争取它们对计划的颠覆行动的积极支持的努力也失败了。因此，“战争背后的战争”和“七二〇”运动一样失败了[33]。但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自1943年以来的外交接触表明，赫尔姆特·冯·毛奇尽管对刺杀行动还有顾虑，但他早就正确地参与到颠覆努力当中，并与施陶芬贝格保持着联系；同样这也适用于“克莱骚圈”的大部分人，他们都在毛奇被捕之后加入到围绕于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的小范围抵抗圈子当中[34]。

---

[1] 请参阅在“克莱骚圈”第三次大会之前产生的Denkschrif ‘Aussen-und Innenpolitik’，刊登于Roman Bleistein（出版）的*Dossier*：*Kreisauer Kreis. Dokumente aus dem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7，S.248。

[2] 参见Alfred Delp的Betrachtung ueber Europa in der Neujahrsnacht vom 1.1.1944，刊登于同一作者的*Gesammelte Schriften*， Roman Bleistein出版，Bd.3，Frankfurt am Main 1984，S.78ff.；请参阅Bleistein的Alfred Delp. *Geschichte eines Zeu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9，S.362f。

[3] 参见Dietrich Bonhoeffer的*Gesammelte Schriften* Bd.I，Eberhard Bethge出版，Muenchen 1965，S.362f.；请参阅Klemens von Klemperer的*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 Der deutsche Widerstand auf der Suche nach Verbuendeten 1938-1945*， Berlin 1994，S.242ff。

[4] 参见Klemperer的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 Berlin 1994，S.246。

[5] 刊登于Freya von Moltke等人（出版）的*Helmuth James von Moltke.1907-1945. Anwalt der Zukunft*， Stuttgart 1975，S.185。

[6]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er deutsche Widerstand und die Ueberwindung der nationalstaatlichen Gliederung Europas，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Muenchen 2000，S.273ff。

[7] 刊登于Ger van Roon的*Neuordnung im Widerstand. Der Kreisauer Kreis innderhalb der deutschen Widerstandsbewegung*， Muenchen 1967， S.512f。

[8] 参见Moltkes Essay：Fragestellung zur Wirtschaftspolitik.14.Juni 1943， 刊登于van Roon的*Neuordnung*， Muenchen 1967， S.552ff。

[9] 参见Hans Rothfels的Trott und die Aussenpolitik des Widerstandes，刊登于VfZ12 （1964）， S.215f。

[10] 请参阅Mommsen的Der deutsche Widerstand und die Ueberwindung der nationalstaatlichen Gliederung Europas， 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 S.274。

[11] 参见Ernst Wilhelm Winterhager的*Der Kreisauer Kreis . Portraet einer Widerstandsgruppe*， Berlin 1985， S.223-228；请参阅Klemperer的*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 Berlin 1994， S.310ff。

[12] 参见Bleistein（出版）的*Dossier Kreisauer Kreis*， Berlin 1985， S.261。

[13] 请参阅Dagmar Poepping的基本研究*Abendlaendisches Denken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Hamburg 2002。

[14] 请参阅Antonia Leugers的*Georg Angermaier 1913-1945. Katholischer Jurist zwisch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m Regiment und Kirche*， Mainz 1994， S.108ff。

[15] 参见Hans Mommsen的Neuordnungplaene der Widerstandsbewegung des 20.Juli 1944， 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 S.193ff。

[16] 请参阅van Roon的*Neuordnung*， Muenchen 1967， S.362。

[17] 请参阅Hans Mommsen的Der Kreisauer Kreis und die kuenftige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 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 S.215。

[18] 参见Bleistein（出版）的*Dossier Kreisauer Kreis*， Berlin 1985， S.252；请参阅Hans Mommsen， Der Kreisauer Kreis und die kuenftige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 刊登于同一作者的*Alternative zu Hitler*， Muenchen 2000， S.313ff。

[19] Erste Weisung an die Landesverweser vom 9.August 1943， 刊登于van Roon的*Neuordnung*， Muenchen 1967， S.567ff。

[20] Aussen-und Innenpolitik，Aufzeichnung vom Fruehjahr 1943，刊登于Bleistein（出版）的*Dossier Kreisauer Kreis*，Berlin 1985，S.246f。

[21] 请参阅1943年6月14日在“克莱骚圈”通过的Grundlagen fuer eine Aussenpolitik der Nachkriegszeit，Berlin 1985，S.269f。

[22] *Denkschrift zur Befriedigung Europas*，Fruehjahr 1943，同上，S.255。

[23] 请参阅Gunter Schmoelders的*Personalistischer Sozialismus. Die Wirtschaftskonzeption des Kreisauer Kreises in der deutschen Widerstandsbewegung*，Koeln 1969。

[24] 刊登于van Roon的*Neuordnung*，S.572-575。

[25] 刊登于van Roon的*Neuordnung*，S.575ff。

[26] 请参阅刊登于van Roon的*Neuordnung*，S.309f；内容由Trott和Moltke密切合作编写。

[27] 关于这些先决条件参见Klemperer的*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Berlin 1994，S.188ff.和S.209ff。

[28] 摘自van Roon的*Neuordnung*，Muenchen 1967，S.322。

[29] Van Roon，*Neuordnung*，Muenchen 1967，S.582ff.；Klemperer，*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Berlin 1994，S.286ff。

[30] Van Roon，*Neuordnung*，Muenchen 1967，S.310f.；*Klemperer*，*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Berlin 1994，S.332。

[31] Van Roon，*Neuordnung*，Muenchen 1967，S.310f.；*Klemperer*，*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Berlin 1994，S.367。

[32] Van Roon，*Neuordnung*，Muenchen 1967，S.310f.；*Klemperer*，*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Berlin 1994，S.313。

[33] Van Roon，*Neuordnung*，Muenchen 1967，S.310f.；*Klemperer*，*Die verlassenen Verschwoerer*，Berlin 1994，S.226ff。

[34] 请参阅Thomas Childers的The Kreisau Circle and the Twentieth of July，刊登于David C.Large（出版）的*Contending with Hitler. Varieties of German Resistance in the Third Reich*，Cambridge Mass.1991，S.99-118。

第19章 “红色乐团”和德国抵抗运动

1942年，盖世太保用“红色乐团”的名称来统称一个由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和作家以及工人组成的范围很广的网络，盖世太保将其视作为苏联服务的情报组织。这个名称源自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的告密者，他们在比利时和荷兰运作无线网络向莫斯科提供消息。然而，这个由哈罗·舒尔策-博伊森和阿维德·哈纳克领导、被赋予了这个名称、中心位于大柏林区的抵抗组织的核心并非从事专业间谍活动[1]。虽然舒尔策-博伊森自从1941年末就致力于与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系，但是，在苏联中间人愿意提供无线设备的情况下，计划仍然失败了。结果只向苏联伙伴发出了唯一一次实验性质的无线电报。因此，硬说存在一个“红色乐团”的表述是误导性的，它不像同一时期利奥波德·特雷佩尔（Leopold Trepper）在西欧运作的那样具备有能力正常运转的无线电网络[2]。

“红色乐团”关系的是一个间谍组织的印象在冷战时期获得了新的养分，特别是因为东德历史学家以官方的历史见解为依据，强行赋予其完全共产主义的性质，并高估了它与非法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倒不如说是很少的联系。对战后的那几年来说，具有代表性的是下面这个事实：CIA提携了一些人——例如最高军事法庭顾问曼弗雷德·勒德尔（Manfred Roeder），他在帝国军事法庭的诉讼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描述的工作[3]。在麦卡锡时代占据主导的反共氛围有利于红色乐团是纯粹的共产主义秘密组织的神话继续存在。

因此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红色乐团”被剥夺了隶属抵抗运动的权利；它被视为苏联情报部门管辖的纯粹的间谍组织。没错，该网络的部分成员寻求过与苏联情报部门接触，而且该运动的一些积极成员曾经试图向苏联政府提供有关的军事情报。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地与莫斯科建立

起具有承载能力的无线电联系。相反，苏联情报部门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它将几个联系人的名字未加保护地用一系列加密不足的电报泄露出去，因此被盖世太保发现了痕迹。这在1942年8月导致150多次抓捕行动和轰动性的“红色乐团”参与者遭帝国军事法庭起诉事件[4]。

东德的史料编纂特别强调了该组织的共产主义性质，在联邦德国，德国研究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全线加入到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的阵营当中，他在其关于卡尔·格德勒和德国抵抗运动的重要著作中对“红色乐团”进行了批判[5]。批评在《明镜》周刊编辑海因茨·赫内（Heinz Hoehne）在其他方面十分重要的研究中达到了顶峰，他剥夺了它成为抵抗运动一部分的权利，并认为它作为进入一个外国情报部门齿轮装置的组织没有什么重要性[6]。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布拉格的帝国军事法庭档案和莫斯科的其他相关材料才对研究开放。历史见解的修正首先要追溯到柏林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的倡议[7]。

事实上，对这个反对网络来说，为苏联进行各种间谍活动只扮演着从属性的角色，而且1942年被捕的大多数人都对其一无所知。他们当中很多人在攫取权力之前（这与资产阶级抵抗运动完全不同）就已经明确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了，但是除了以阿维德·哈纳克和哈罗·舒尔策-博伊森为首的小圈子之外，它没有一个密谋组织的雏形。

这个被称做“红色乐团”的组织直到1941年才成长为一个松散的不同抵抗圈子的联盟。它绝对具有个人的特征，而且同谋和知情之间的界限因此必然是不确定的。在最高层的一方面是经济专家阿维德·哈纳克——著名人文科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的侄子，另一方面是最初的《反对者》（*Gegner*）杂志圈子成员航空专家哈罗·舒尔策-博伊森。1931年哈纳克与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一起建立了一个研究俄罗斯计划经济的工作组，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和投身政治的政论家在这里进行讨论，其中包括埃米尔·莱德雷尔（Emil Lederer）、奥托·赫茨施

（Otto Hoetzsch）和克劳斯·梅纳特（Klaus Mehnert），还有捷尔吉·卢卡奇（Georg Lukacs）、恩斯特·尼基施（Ernst Niekisch）和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uenger）。与此同时，作家恩斯特·库克霍夫（Ernst Kuckhoff）领导着一个政治论坛，并且与沙尔芬贝格学校（Schulfarm Scharfenberg）和奥登瓦尔德学校（Odenwaldschule）——也就是和改革教育学核心有联系。通过米尔德里德·哈纳克-菲什（Mildred Harnack-Fish）（阿维德·哈纳克在美国访问研究时认识了她，之后不久与她结婚），与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联系也建立起来[8]。

以哈罗·舒尔策-博伊森出版的半月刊《反对者》为核心的圈子与这个不同艺术圈和文化圈组成的松散网络保持着联系，前一个圈子很早就开始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是在国社党攫取权力之后只维系了几个月的生命。博伊森投身青年德意志骑士团的活动，并在1933年和团结在“大德意志联盟”（Grossdeutscher Bund）下的联盟运动的其他人建立起联系。1933年4月，他写信给他的母亲说，他“以年青一代的精神统一和一种骑士团和精英的形成为目标”，这符合魏玛共和国后期针对资产阶级政党的集会努力路线[9]。这个最初来自保守派阵营的年青知识分子当时还沉醉在能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向着彻底的社会主义方向引领的幻想中。他眼前浮现的是一个超然于党派形成的年青一代联盟的景象，而且他希望避免与现有的政治党派产生任何联系：“我们不服务于任何政党。我们服务于看不见的成千上万人的联盟，现在他们还分布在所有阵营当中，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走到一起来的那一天很近了。”[10]《反对者》的规划就服务于这一目标。舒尔策-博伊森将他的一部分财产投资到这份杂志上，并作为权威编辑撰写了大部分的文章。1933年4月20日，也就是在希特勒内阁形成几个星期之后，《反对者》就以醒目的大字印刷了一篇社论，他在文中自称为“第三个普鲁士的先头部队”并支持在一个“独立的德国”里进行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个德国不应反对而应与苏联共同行动[11]。

这个倡议迅速成为盖世太保禁令的牺牲品（舒尔策-博伊森也一度被捕），它只有放在魏玛共和国后期政治分裂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舒尔策-博伊森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最初来自右翼阵营，但是在1928年加入了阿图尔·马劳恩（Artur Mahraun）领导的“青年德意志骑士团”，舒尔策-博伊森与他保持着私人联系。1931年脱离德国国家党（Deutsche Staatspartei）的“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同样争取建立一个年青一代的跨党派组织。它与奥托·施特拉塞尔是一致的，可是后者被迫流亡国外。但是舒尔策-博伊森能使国家社会主义者反转到一个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视角从一开始就错了。

舒尔策-博伊森很快不得不体会到，在纳粹政权下继续他的记者工作是毫无希望的了。因此他选择通过进入纳粹等级制度累积经验和人脉的办法，同时也通过应召加入国防军来为自己获得职业支持。起初他不相信国家社会主义者会将在他看来无疑存在着内在矛盾的纲领付诸实施。从1934年开始，舒尔策-博伊森对纳粹现实感到越来越满足，他过于高估了其社会主义萌芽，而且他承认纳粹政权具有一种过渡功能，因为它加速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瓦解。“在普遍的混乱中”，第三帝国“安静并可靠地”遵循着它的道路，他这样记录说。

这绝对不是一个轮廓确定的内政方案。对哈罗·舒尔策-博伊森来说，形成接替传统政党形式的“骑士会”的思想占据着主要的位置，其中，他曾经所隶属过的“青年德意志骑士团”继续产生了榜样的影响。他遵循着建立一个由年青一代支撑的“反对精英”的构想，他们将在一个广泛的社会主义新秩序中消除旧世纪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包袱。尽管他有着民族保守派的背景，但是舒尔策-博伊森很早就支持与苏联联合。他和其他很多人都觉得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致命危机。这强化了当时流行的对苏联的好感和对德意志帝国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凡尔赛和约》的保障力量的肯定。在这一背景下可以看到，阿维德·哈纳克与苏联驻柏林商贸团代表特别是与亚历山大·考提科夫（Alexander

Kortikov）建立了紧密联系，而且他对苏联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2]。

起初是期望及早消除纳粹专制制度，此后哈罗·舒尔策-博伊森遵循的是在与苏联合作建立欧洲新秩序的构想。哈纳克也赞成这一路线，但他同时没有中断由妻子米尔德里德·哈纳克-菲什促成的与美国外交界的联系。特别是舒尔策-博伊森打算从内进一步推动这个作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革命主义特征得以突出的想法。还在为《反对者》杂志工作的时候，他就想过西方的新秩序和一种新类型的人的产生，它将擦去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的错误立场并催生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管届时它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在这里，他摆脱了民主的幻想，更多的是为了实现新秩序而赞成独断专行的方法。在这一背景下，舒尔策-博伊森希望苏联能作出建设性的贡献，然而他对斯大林统治的不人道和破坏性特征认识错误——就和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对这个由他建立起来的同情者组织来说，在避开西方国家立场的同时将苏联理想化很有代表性。纳粹外交政策的反苏导向引起多大关注，这种情况就有多严重。

因为他对苏联自然资源和人口条件的全面了解，阿维德·哈纳克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苏联将决定着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它将毁灭“这个旧欧洲及其迄今为止的文明”。舒尔策-博伊森也坚持这样的估计，苏联将赢得战争并“埋葬旧欧洲及其迄今为止的‘文明’”。他将此与乐观的期望联系在一起：之后“真正的世界大战才会开始”，在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将普遍得到承认。他在1942年初还这样记录说，在这场随后完全爆发的冲突当中，德俄关系将构成世界政治的支点[13]。

就此而言，舒尔策-博伊森仍停留在最初的全球社会主义变革的观点上，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失败，希特勒间接为此进行了准备，而且苏联将在这一变革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相当不明确的揣测，它

们源自根深蒂固的反西方态度并显示出对苏联强权的潜在恐怖主义的危险低估。因此，与内在合乎逻辑的考虑相对应，舒尔策-博伊森和哈纳克毫不迟疑地通过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来支持苏联的立场并将重大情报交给莫斯科，尽管众所周知建立自己的无线电联系的尝试失败了[14]。

在不战就取得吞并奥地利、建立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外交成功之后，纳粹政府决定采用战争手段使得舒尔策-博伊森、阿维德·哈纳克以及他们的并肩作战者有可能从这时开始借助防止战争的要求在德国国民中寻求共鸣。鉴于多年来与苏联外交官所保持的联系，他们没有片刻怀疑过，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只是防止两条战线作战的战术诡计而已。他们很早就察觉到德国正在准备对苏联的袭击。通过他在帝国航空部的关系，舒尔策-博伊森利用机会在袭击前好几个星期就向莫斯科通报了德国的袭击意图。但是斯大林粗暴拒绝听信，就和其他听起来差不多的情报一样。然而，尽管苏联领导层对关于德国作战的机密情报感兴趣（而且这让人看出了他们的战略意图），但是舒尔策-博伊森通过当时已得到巩固的与苏联情报部门的接触与莫斯科领导层建立政治接触的持续努力却全线失败了。

和多数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吸收了大量小范围朋友圈子的舒尔策-博伊森和阿维德·哈纳克为首的小集体也缺乏一个具有承载能力的方案——如何能消除起初没人相信它能存活多久但是很快就巩固成专制制度的纳粹统治。事实证明，这个抵抗组织网络内的个别小组织所力争的战略——通过贴纸条、散发传单和非法传播关于腐败的出版物、就社会不公和暴力政策对公众进行启蒙——没有什么前途，因此，通过一场跨党派运动取代政权的最初目标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

阿维德·哈纳克1937年就表示，“政权的瓦解”只能从内进行：“反对派必须把他们的蜘蛛网吐遍整个政权的齿轮装置，与此同时努力与国外建立联系。”[15]这符合哈纳克以及舒尔策-博伊森遵循的策略：占据国

家机关（例如帝国航空部）中具有影响力的职位，并由此建立一个在纳粹体系出现外来危机时有能力接管权力的网络。人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乌托邦对其嗤之以鼻，但是同时人们应当清楚，即便是1944年的“七二〇”运动（除了军事专制作为过渡办法之外）也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新秩序方案，更遑论在1941年之前了。

从1941年起，避免或者尽可能快地结束与苏联战争的努力进入到哈罗·舒尔策-博伊森密谋活动的核心位置。由此，根据它的内在逻辑，这个抵抗组织进入到一个有利于苏联的战斗姿态中，是为其成就进行辩护的时候了。与德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相反，阿维德·哈纳克和哈罗·舒尔策-博伊森很早就十分清楚地看到，鉴于红军的军事优势，中期来看德国方面没有于己有利的决定东线战事的机会。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直到1942年夏天才得出这个结论：继续这场不仅针对苏联体制也针对俄罗斯人民的战争必定将以一场军事上的灾难而结束——单单是因为人口的状况和德方在莫斯科战役之后持续并且无法再弥补的极大损失就已是如此。

“红色乐团”对征战俄罗斯以及双线作战的警告是再正确不过的。它们化为下面这个痛苦的认识，舒尔策-博伊森在1942年初撰写的非法传单中这样总结说：对苏联的战争必然会在军事上失败。该传单的题目是《对德国未来的担心遍及人民》，它在1942年2月被寄给了几百位收信人。舒尔策-博伊森在其中对“俄罗斯战争的荒谬”进行了抗议，他说“最终胜利”的空话是无稽之谈，并警告不要“继续这场让整个大洲都成为废墟的战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帝国军事失败不可逆转的既早又准的预言：“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最终胜利不再可能。将战争每延长一天都只会带来难以言说的痛苦和牺牲。”恰恰是与军方反对派对战争形势的判断相比，这种明确的表述给人的印象极深，并且表明，通过对苏联国内发展的深入研究，哈纳克和舒尔策-博伊森都得出了一个比甚至是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和亨宁·冯·特雷斯科还要实际得多的看法[16]。

“红色乐团”不眠不休的宣传活动留下的记录十分有限。与反叛者行动接触过的人的范围无法估计，散发传单和反战宣传的规模也是同样。这主要与参与帝国军事法庭诉讼程序的人必须履行义务不能报告他们为“红色乐团”进行的活动有关。这一保持缄默的趋势在1945年之后得以继续，当时在公众中占据主导的反共态度使得时代见证者和幸存者在心理上几乎不可能说出自己在抵抗运动中的作用。因此，这一全面鼓动反战的活动只留下了蛛丝马迹。与此同时，审讯的官员在1942年8月31日抓捕行动开始之后对平民反叛活动不感兴趣，而是完全把精力放在寻找与苏联情报部门和共产主义抵抗组织的接触上，这也发挥了作用。

1941年6月22日促使哈纳克和舒尔策-博伊森身边的朋友圈进一步重叠了。这其中包括雕刻家库尔特·舒马赫、前共产党员瓦尔特·屈兴迈斯特（Walter Kuechenmeister）和前共产党编辑瓦尔特·胡泽曼（Walter Husemann）。一群规模更大一些、与政党没有密切关系的年轻共产主义者加入到他们当中。这些反叛者致力于让德国国民认识到纳粹政权毫无意义和犯罪性质的政策。舒尔策-博伊森的非法传单这样迫切地表达这一希望说，“心系人民的国防军力量与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部分坚定地走到一起”将带来一个转折；只有“拒绝服从和履行义务”才有可能“挽救民族免于沦亡”[17]。舒尔策-博伊森在他的宣传小册子中要求，“关于真实状况的事实必须渗透到人民当中”，并要求摆脱“谎言的泥沼和阴险的别有目的的乐观主义”。“我们必须最终结束德国人的旧的错误观念——认为国家是在更高一级的存在。”[18]

最值得一提的是将德国对俄罗斯平民的犯罪行为记录下来并将从中得出的认识在非法传单中传播的倡议。让国民知道真正的战况并推动消极抵抗的努力随着1942年夏天《国内战线》的出版而达到顶峰——它的出版被算在约翰·西格（John Sieg）的名下。舒尔策-博伊森的意见书《对德国未来的担心遍及人民》就刊登在这里，当时的署名是“亚基斯”，并被主管的帝国军事法庭判决委员会称做是“被告最激烈和最恶心

的拙劣之作”[19]。这些出版物虽然只留下了样本，但却是一场全面宣传战的组成部分，它由约翰·西格在《致东线战场公开信》的标题下推动[20]。它也包括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给警察主管的信》，这封信不加粉饰地揭露了随着游击战冲突在俄罗斯的发展国防军犯罪的不断升级[21]。

“红色乐团”这个宣传鼓动的方向以下面的希望为基础，那就是通过与苏联领导人接触（其中包括传递对战争十分重要的机密情报）为在纳粹政权战败后进行谈判的选择做前期的准备[22]。特别是俄罗斯专家阿维德·哈纳克是从这样的期望出发的：斯大林“绝对不会敦促德国苏联化”，而是会满足于一个“非法西斯主义、非帝国主义制度在德国”的存在，“不需要担心它会有攻击性的倾向”[23]。这与舒尔策-博伊森对他父亲说的话不谋而合：人们必须避免1918年的局面再次出现，其特点是德国缺乏庇护和支持[24]。

这样一个亲俄、亲共的态度对在1944年“七二〇”运动中联合在一起的那些组织的多数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直到跨党派人民运动计划——“社会主义行动”——诞生，他们才有意识地向缔造一场“人民革命”迈出了一步，但是这应当在颠覆完成之后才付诸实施。如果不是苏联情报部门的重大错误暴露了柏林组织主要人物的名字从而使他们被盖世太保抓获，“红色乐团”本可能在抵抗纳粹政权的斗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盖世太保显然没有渗透到他们的网络当中[25]。

尽管如此，恰恰是在与第三帝国其他抵抗组织进行比较时，“红色乐团”拒绝和抗争纳粹统治的激烈程度和决心都十分突出。它成功地调动起相当广泛的抵抗潜能。在对政权彻底拒绝的态度上，它超过了其他所有组织，甚至是非法的德国共产党，而且它对系统毁灭政治道德伦理基础的批评与“白玫瑰”的传单和“克莱骚圈”的意见书不相上下[26]。因此，它并非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历史上的细枝末节，这还完全没算上它

在国民中所拥有的高度支持。这些建立针对所有民众的反战宣传的尝试很遗憾只保留下来了一部分，它们呼吁建立一个“国内战线”，同时试图与资产阶级抵抗组织建立联系，它与这些组织保持着松散的个人联系，比如说与卡尔·迪特里希·冯·特罗塔（Carl Dietrich von Trotha）[27]。因此，这个抵抗行动的多样性就不令人意外了，它从不隶属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组织延伸至资产阶级阵营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希特勒反对者[28]。

---

[1] 请参阅Juergen Denyel的Die Rote Kapelle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Widerstandsbewegung，刊登于Hans Coppi/Juergen Dayel/Johannes Tuchel的*Die Rote Kapelle im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1994，S.15ff。

[2] 请参阅Leopold Trepper的*Die Wahrheit. Autobiographie*， Muenchen 1975，S.119f。

[3] 请参阅Peter Steinbach的Die Rote Kapelle-50 Jahre danche，刊登于Coppi/Danyel/Tuchel的*Die Rote Kapelle*， Berlin 1994，S.56ff.；最近则是Anne Nelson的*Die Rote Kapelle. Die Geschichte der legendaeren Widerstandsgruppe*，Muenchen 2010，S.345ff。

[4] 请参阅Heinz Hoehne的*Kennwort Direktor. Die Geschichte der Roten Kapelle*， Frankfurt 1970，S.285ff。

[5] Gerhard Ritter，*Carl Goer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Stuttgart 1956，S.106f。

[6] Heinz Hoehne，*Kennwort Direktor*， Frankfurt 1970，S.303ff。

[7] Hans Coppi概况参见的Elsa Boysen的*Harro Schulze-Boysen. Das Bild eines Freiheitskaempfers*， Koblenz 1992，S.47f.以及Hans Coppi的*Harro Schulze-Boysen*：*Weg in den Widerstand*， Koblenz1993；Peter Steinbach，Die Widerstandsorganisation Harnack-Schulze-Boysen，刊登于GWU42 （1991），S.133-152以及Nelson的Die *Rote Kapelle*， Muenchen 2010，S.477。

[8] 参见Shareen Blair Brysac的传记*Mildred Harnack und die ‘Rote Kapelle’*，Berlin2003，S.282ff。

[9] Der Gegner-Kreis im Jahre 1932-33. Ein Kapitel aus der Vorgeschichte des

Widerstands，刊登于*Evangelisches Bildungswerk Berlin*，*Dokumentation79/91*，Berlin 1990。

[10] Der Gegner，5.Maerz 1932，摘自Elsa Boysen的*Harro Schulze Boysen*，Koblenz 1992，S.10。

[11] Der Gegner 4.Jg.（1933），S.1；请参阅Schulze Boysen an seinen Vater（Mitte April 1933）："在未来围绕着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宗教结构的斗争当中，我们希望成为第三个普鲁士的先驱"，*IfZ*，ED355/2。

[12] 参见Brysac的*Mildred Harnack*，Berlin2003，S.284ff。

[13] 参见Elsa Boysen的*Harro Schulze-Boysen*，Koblenz 1992，S.44。

[14] 请参阅Elsa Boysen的*Harro Schulze-Boysen*，Koblenz 1992，S.44，S.47 Anm.8。

[15] Brysac，*Mildred Harnack*，Berlin2003，S.287。

[16] 请参阅Christian Mueller的*Oberst i.G.Stauffenberg*，Duesseldorf 1970，S.870。

[17] 请参阅Peter Steinbach/Johannes Tuchel（出版）的*Lexikon des Widerstandes*，Muenchen 1998，S.270f.；Elsa Boysen的Mildred Harnack，Berlin2003。

[18] 请参阅Peter Steinbach/Johannes Tuchel（出版）的*Lexikon des Widerstandes*，Muenchen 1998，S.270f.；Elsa Boysen的Mildred Harnack，Berlin2003，S.273。

[19] 参见Heinrich Scheel的*Vor den Schranken des Reichskriegsgerichts*，Berlin 1993，S.259f。

[20] 参见Heinrich Scheel的*Vor den Schranken des Reichskriegsgerichts*，Berlin 1993，S.260。

[21] Hans Coppi，Harro und Libertas Schulze-Boysen，刊登于Coppi/Danyel/Tuchel的*Die Rote Kapelle*，Berlin 1994，S.199ff。

[22] 请参阅Juergen Danyel的*Die Rote Kapelle*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Widerstandsbewegung，刊登于Hans Coppi/Juergen Dayel/Johannes Tuchel的*Die Rote Kapelle im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Berlin 1994，S.29ff。

[23] 摘自Egmont Zechlin，Berlin 1994，S.31。

[24] 请参阅Dayel的Die Rote Kapelle，Berlin 1994，S.29ff。

[25] 还有Anne Nelson令人入迷的描述，*Die Rote Kapelle. Die Geschichte der legendaeren Widerstandsgruppe*，Muenchen 2010，它成功地描绘了活动延伸得很远的“红色乐团”的整体形象；请参阅我的讲座Von Spionage kaum eine Spur，刊登于2010年6月20日*Frankfurter Rundschau*，66.Jg.Nr.147，S.23。

[26] 请参阅Heinrich Siefken的*Die Weisse Rose und ihre Flugblaetter*，Manchester 1994，S.8f.und passim，以及Soenke Zankel的*Mit Flugblaettern gegen Hitler. Der Widerstandskreis um Hans Scholl und Alexander Schmorell*，Koeln 2008，S.250ff.和S.354f。

[27] Scheel，*Vor den Schranken des Reichtsgerichts*，Berlin 1993，S.253ff.

[28] 参见Johannes Tuchel的Maria Terwiel und Helmut Himpel，刊登于Coppi/Danyel/Tuchel的*Die Rote Kapelle*，Berlin 1994，S.267f.；Beatrix Herlemann的Die Rote Kapelle und der kommunistische Widerstand，Berlin 1994，S.79ff。

第20章 汉斯·罗特费尔斯：连接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1]

汉斯·罗特费尔斯属于少数被迫移民并在1945年后走上回国之路的德国高校教师。在蒂宾根（Tuebingen）教授近代史的25年里，汉斯·罗特费尔斯得以再一次至关重要地影响了德国历史学，并为联邦德国的内在上层建筑作出了贡献。本书不是一一列举他在教职工作之外担任无数职务和荣誉职务的地方，也不是对公众给予他的承认进行描述的地方。不久前出版的扬·埃克尔（Jan Eckel）的全面著作要更为适合，这部题为《一位知识分子的传记》的作品对这些传记性材料进行了准确和有益的调查[2]。因此，这里的关键也不可能是再次对汉斯·罗特费尔斯的人生道路进行阐述。我更多的是想尝试将他的毕生事业与历史联系起来，这一历史背景以德皇时代结束、魏玛共和国瓦解、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攫取权力和政权强行采取隔离与移民措施乃至联邦共和国的建立为特征。

罗特费尔斯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不在于对被遗忘或者被忽视的原始资料库存进行实证性的累积。他的全部作品首先以量多得几乎无法遍览的历史政治随笔见长，它们的突出特点是致力于在不同时代之间架起桥梁以及构建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尽管经历了一些断层。这与他生活经历的影响是一致的。作为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学派的成员（他很早就在其中扮演某种同类中佼佼者的角色），他处在德国帝国传统的影响下，受到历史主义的决定性影响[3]。

战争的经历、受重伤和退伍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创伤，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军事史课题特别是对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兴趣增大上面[4]。与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不同，罗特费尔斯没有与魏玛共和国建立有益的关系，尽管他放弃了君主制思想并认为复辟计划是陈旧过时的。纳粹政权强加给他的指责在最后一刻导致罗特费尔斯移民国

外，先是英格兰，然后是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观点上的深刻改变。与费利克斯·吉尔贝特（Felix Gilbert）和哈约·霍尔本（Hajo Holborn）等德国移民不同，罗特费尔斯没能将美国当成自己社会和文化上的家乡[5]。

因此，虽然放弃了芝加哥高级教授的职位，但是回到德国并不意味着其历史政治见解发生了深刻重大的转变，尽管美国的经历给他本质上保守主义的思想加入了适度的自由主义思想。罗特费尔斯并不是没有犹豫过，这主要是出于物质供给的考虑，但是当他决心追随蒂宾根的名望时，他首先致力于建立信任，起初是在职业范围内，但后来也包括在面对占领国和外国代表德国利益的时候[6]。

同样在历史工作方面，罗特费尔斯也把精力集中在这一目的上。出发点首先是为奥托·冯·俾斯麦面对德皇威廉的错误的“世界政策”而采取的对外但也包括对内政策进行辩护，这种错误的政策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因此，对俾斯麦联盟体系特别是与俄罗斯缔结庇护条约的辩护是其分析的核心，他同样进行了辩护的还有这位帝国首相在实现帝国统一之后所遵循的谨小慎微和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它显然与来自普鲁士保守派还有民族自由党（Nationalliberale Partei）方面的嘹亮声音不同。

即便在他1965年4月1日在德国联邦议会前发表的纪念这位帝国创建者诞辰150周年的讲话当中，罗特费尔斯仍对这位政治家的伟大及其深思熟虑的外交远见坚信不移。他为俾斯麦的一个“保持不完整的民族国家”的目标进行辩解，并回忆说，放弃进一步加强国内团结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当然这在他去职之后对稳定的执政形势造成了阻碍[7]。

这一亲俾斯麦的基本立场与对威廉二世的尖锐批评联系在一起，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一基本立场也将参加过战争的一代与大多数更老一点的专业代表区分开来。他们对俾斯麦内政的评价也与之相对应。罗特费

尔斯很早就指出了他所认为的社会福利政策立法的根本意义，实际上它奠定了一直存在到今日的德国福利社会的重要基础。然而，俾斯麦在保险立法方面没能顶住民族自由党的压力获得成功，没有产生一个更具有弹性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对此罗特费尔斯感到遗憾。根据他早期的经典研究——1927年出版的《特奥多尔·洛曼（Theodor Lohmann）和国家福利政策的斗争年代》，在帝国档案进行了广泛的原始材料研究之后，直到在蒂宾根的时候他还打算对他关于俾斯麦社会福利政策的著作进行补充完善。为此，他显然将这些档案摘选一起经美国带到了蒂宾根，但没找到机会完成这项工作[8]。正如罗特费尔斯强调的那样，普鲁士德国迅速扩张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将俾斯麦的社会福利政策思想（他作为大庄园主的经历对此产生了深刻影响）挤到了旁边，这肯定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重点为什么这么强调、解释的关键在于，罗特费尔斯可能受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普鲁士社会主义”纲领的影响，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认为国家大权和职业结构的结合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并因此将德意志帝国的内在巩固理解为历史性的但是后来错过了的机遇。此类的考虑一直伴随着罗特费尔斯，直到晚年。他将俾斯麦和马克思尊称为归根结底互为补充的历史力量并将其与自由传统相对的尝试也是与此分不开的，尽管这一想法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很难得到华约集团同事的好感[9]。

与此同时，在罗特费尔斯的史料编纂著作当中，试图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1848年革命与当前之间架起思想桥梁的努力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他认为中东欧至关重要的错误发展是贯彻了国籍原则以及民族国家。他不知疲倦地为“自治的帝国的东面”的辩护也是属于此类，同样还有他顽强坚持的论点，这位帝国创建人原则上拒绝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并且只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与民族自由党派达成了妥协，特别是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10]。

罗特费尔斯一再谈到俾斯麦“符合上帝意愿的民族”（gottgewollt Nationalitaeten）的说法，而且他说与自由派在民族问题上走到一起纯粹是战术性质的，这样他在这方面还有在与同时代力度加强的研究相比的情况下就进入到某种局外人的位置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把奥托·普夫兰策（Otto Pflanze）关于俾斯麦在帝国统一问题上立场的首批单行本交给我时说“请防守”，因为我当时正忙于《从俾斯麦到东方》的修订版。

我们不能不看到关于这方面的本质性的东西。俾斯麦个人在罗特费尔斯的整体观念中发挥着与随着威廉二世“个人统治”开始的中欧错误发展（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相对的代表人物的作用。俾斯麦没有摆脱独裁专制特征的喀提林（catilina）式强权意愿——在没有对这一点认识错误的情况下，罗特费尔斯一再强调俾斯麦的现实政治与深刻的伦理基础联系在一起，这促使这位帝国创建者对战争强权手段加以局限并从道德上采取行动。因此罗特费尔斯的兴趣也触及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理论。

通过突出强调俾斯麦的国家思想，罗特费尔斯以同时代的德国史料编纂为出发点，而且他将国家与民族对立起来，这对我们当前的概念来说是陌生的。其中在历史主义中得到提炼的理想主义的认同哲学继续发挥了作用。罗特费尔斯也痛苦地意识到，国家的理念作为本质上的道德力量遭到了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驳斥并被证明是天真的。同时，他的整个历史编纂立场旨在在唤起国家思想（他正确地将其与希特勒肆意妄为的统治相对）的情况下促生一种历史政治连贯性的要素。这应当有助于消除德国近代史（也是他人生经历）中的深刻断层。

随着接受邀请来到享有盛名的“边境”大学柯尼斯堡（Koenigsberg）大学，汉斯·罗特费尔斯不再从事针对俾斯麦和普鲁士的出版活动，并开始越来越多地着手中东欧民族问题的解决。他一再强调说，人种均一

的民族国家原则在东部种族混杂的地区肯定会失灵，而且巴黎和会上制定的领土新秩序只在后继国家内部导致了新的民族冲突。因此他在回顾时坚称这个哈布斯堡多民族国家原则上具有生存能力。他认为俾斯麦一度考虑过的将普鲁士和这一波兰地区在领土上结合起来的计划是一个可行的但可惜被错过了的解决办法。

类似的还有，他强调，俾斯麦虽然打算利用一切可支配的手段对波兰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民族主义努力采取行动，但是相反他没有质疑波兰农民的政治忠诚度并因此拒绝将西普鲁士省份系统日耳曼化，这背后隐藏着的是对跨国解决德国少数民族在新建的波兰和巴尔干国家的境遇的希望。与此相联系，他更偏爱在爱沙尼亚一度具有生命力的德国国民的文化自治，而且他赞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卡尔·伦纳（Karl Renner）和奥托·鲍尔（Otto Bauer）的类似思想，他们用人的原则取代领土原则，这也反映在波西米亚和布科维纳（Bukowinisch）问题的调停中。

鉴于德波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初严重激化，罗特费尔斯希望通过此类解决尝试迈出走向中东欧大区新秩序的头几步。在他看来，其重要性足以让他积极参与到德国代表团为华沙国际历史学家大会所作的准备工作当中并提出他的新秩序方案，尽管身为犹太人的他个人遭到了中伤和迫害。最终，他因为中伤后来拒绝主动参与活动，但是仍参加了代表大会[11]。

尽管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了种种批评，但是罗特费尔斯存在着不利于斯拉夫人的以德国为中心的视野上的局限，正如沃尔夫冈·诺伊格鲍尔（Wolfgang Neugebauer）最近强调的那样[12]。罗特费尔斯在柯尼斯堡后期对中东欧区新秩序的考虑包含了方向上的适度调整，但他不想触碰到波兰共和国的存在问题。它们具体以某种不明确性见长，这是与其空想的性质密不可分的，它们以各民族在这个历史决定的混杂条件下和平共存为目标并反对民族排他性和种族主义狂热。在这些条件下，他承

认德意志的民族特性（Deutschtum）具有文化上可能还有政治上的优越性。因此只产生了与国家社会主义移民思想以及同时代民族特点理论的十分有限的亲和性。但是罗特费尔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可能又以这些思路为出发点并将其转用到一个欧洲共同体的构想上。

扬·埃克尔持这种看法，罗特费尔斯对东部地区的秩序设想中体现了“一种总体来说沙文主义的优越性思想和支配思想”[13]。但是他从罗特费尔斯关于《中欧思想的形成》的文章中得出了片面的结论，并忽视了发挥“前哨”作用的东部德国少数民族被有意识地赋予了“中间人的工作”，这恰恰不能归因于民族国家的狭隘以及民族主义的“强权思想”。一种自己无意识的对斯拉夫民族优越感肯定进入到罗特费尔斯的考虑当中，正如埃克尔所强调的，这对“中立平衡”的机会构成了威胁[14]。

在做这些考虑时，罗特费尔斯受到了土生土长的民族意识的影响，而且在1975年时他还表示，“民族性”是“欧洲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范畴”，但是必须避免它成为欧洲各民族共同生活的“毁灭性的爆炸装置”。鉴于西德广泛的对民族相对的漠不关心，他说：“拒绝民族意识”违背了“历史性以及人的尊严”。在他看来，他所认定的“民族性的不容商讨性”允许两个德国暂时的分开发展——也就是“两个祖国的可能性”，但是他另一方面谈到了坚信重新统一前景的“民族责任”，这并没有将积极支持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关系缓和政策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从这时开始，罗特费尔斯用戴高乐的“祖国的欧洲”意义上的欧洲联合努力取代了建立中东欧新秩序的努力，他试图以此方式来重新填补1918/1919年态势与逐渐显露端倪的联邦德国向西融合态势之间的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他一度认为在受二战影响最大的国家里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超高潮”[15]。在南欧冲突方面，他与这种构想保持了距离，但是坚称民族国家没有能力解决民族问题。因为他同意为即将进行的驱逐

文献资料汇编作学术顾问，他越来越清楚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而它肯定在于信誓旦旦相互指责对方不正当上。另外，他毫不动摇地坚称在波茨坦西方盟国在驱逐问题上没有做好。

罗特费尔斯的学术全集在从美国回国之后就着手架起德国历史传统的桥梁（其中对奥托·冯·俾斯麦和普鲁士传统的引证扮演了核心角色），这无需详细的解释。通过坚持自己历史学家的个人身份，他同时试图在国家社会主义可怕的道德和政治灾难面前重新建立起连贯性，而且不管是在方法上还是内容上他都没有因此而走新的道路，那样的话对这位60多岁的学者来说将是个过分的要求。

同时，除了他在专业机构内的重要地位之外，罗特费尔斯不管是在抵抗希特勒运动历史还是当代史研究发展方面都确立了新的重点。两者都与重新获得历史连贯性的努力有关。罗特费尔斯的《德国希特勒反对派》的基本阐述就是个例子，其英文版1947年就已出版。罗特费尔斯试图表明，与受国家社会主义诱骗的部分民众相对还存在着“另一个德国”，他们从他所强调的俾斯麦帝国和新保守主义的传统蕴藏中汲取营养。与西方盟国在很大程度上淡化德国抵抗运动存在的趋势相对，罗特费尔斯勾勒出了一幅不同抵抗组织的全景。

1947年以英文、1948年以德文出版的该项研究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反响[16]。在西德，它被理解为减轻道德负担的主动出击。事实上，对罗特费尔斯来说，关键是证明“另一个德国”的存在，而且他选择了一个范围很广的抵抗运动的概念，它将共产主义者也包括在内；直到冷战时期，罗特费尔斯才逐步回撤，但他仍坚称“红色乐团”的追随者虽然与苏联有联系但仍应算作抵抗组织[17]。他试图表明，反对派包括所有社会阶层和政治、宗教立场的成员，而且这总体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国民的反映。

起初西德公众把罗特费尔斯的书视为抵制对德国笼统批评和德国集

体罪责论点的行动，而对他来说，关键主要是象征性地在抵抗运动中看到德国历史的连贯性。因此他强调，“人性对非人性战线的形成”超越了导向政策上的分歧，而这体现在抵抗运动上。他认为，即便在面对颠覆很大程度上没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下——决心抵抗是在一种“非常情况”下（正如他惯于强调的那样）对“维护不会磨灭的人性的回忆、为一个还未知的未来挽救人的形象”的贡献。

罗特费尔斯将抵抗运动理想化的趋势是与他促生历史—道德意义的普遍努力相关的，这应当在“德国灾难”之后为德国作为民族生存下去奠定基础。罗特费尔斯认为，不管成功属于什么类别，抵抗运动对维护人性的至关重要的贡献是人的投入的“绝对性”。这种有意识的美化首先具有产生一种与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之前的德国历史“连接”的功能，并且鉴于在第三帝国发生的早前价值观的瓦解，它为一个新开端奠定了基础，但却很难像尼古拉斯·贝格（Nicolas Berg）做的那样与对“民族赦罪”的需求等同起来[18]。对罗特费尔斯来说，关键是在第三帝国的灾难过后与旧的历史传统联系起来。

罗特费尔斯的第二个全面倡议是积极支持对德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承认和机构扩建。这体现在他长年担任《当代史季刊》的编辑上。他独特地将“当代史”确定为“共同生活者的时代”，并召唤产生影响的历史认识的“主观因素”及其不可否认的道德涵义[19]。罗特费尔斯以其特有的绝对性大力反对“任何形式的遗忘意图”，并警告人们不要舒服地排斥对国家社会主义强权政策的共同责任。历史研究“即便在最陡峭的（山崖前）也不能避开”，它必须有助于“净化我们周围和我们之间的空气，并强化这样的力量，对这些力量来说，关键是维护人的尊严，即便是面对着新的危险”[20]。

汉斯·罗特费尔斯自1952年起花在《当代史季刊》出版上的精力与这样的期望有关，那就是通过揭露国家社会主义的强权政策以及德国公

众被纳粹宣传成功操纵的背景，貌似消除德国历史上的这条歧途，并由此为历史连贯性的更新创造先决条件。罗特费尔斯为编辑所付出的非同寻常的心血是后人所不能及的，这表明了，对他来说，促生一个完整的历史观是多么重要。几乎没有一篇文章他不自己从文风上进行改写，如有必要还会配上评论性的前言。

尽管如此，后来人仍对罗特费尔斯进行了指责，说他对纳粹政策的犯罪性质说明不足，并且很大程度上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大屠杀排除在外。这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特别是因为这种情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不是国际研究兴趣的中心[21]。除了尼古拉斯·贝格之外，特别是卡尔·海因茨·罗特（Karl Heinz Roth）对汉斯·罗特费尔进行了指责，说他通过其可能会消除民族国家原则的东部政策思想与法西斯想法接近，并在1945年之后淡化了纳粹政权的犯罪[22]。硬说罗特费尔斯的考虑——特别是在民族国家原则之外为中东欧和东欧范围找到解决办法的考虑推动了国家社会主义生存空间的想法（哪怕是间接地）看起来十分荒唐。这并不意味着除了防止试图美化纳粹政权的文章之外，罗特费尔斯习惯于确定特定导向政策的重点。因此他决定扣下某些文献不发，例如在菲舍尔争论（Fischer-Kontroverse）中获得核心意义的里茨勒（Riezler）日记，或者是关于对1944年“七二〇”运动反叛者审讯的“卡尔滕布伦纳报告”[23]。但是这些是例外。通常在《当代史季刊》里出现的完全都是不同的意见，尽管偶尔会有评论性的引言。这也同样适用于罗特费尔斯在他的住处举行、只有小部分学生参加的博士生专题讨论会的开放和自由的氛围。那里以及课堂上公开自由的氛围都促进了罗特费尔斯的极高声望。

另外，在蒂宾根时期，尽管个人受到崇拜，但是学生和老师之间仍保持着距离。大量的推动和智力挑战不能掩盖一个事实，罗特费尔斯的历史观并不总能传授给年青一代。他将德国历史的三四个时期结合在一起的视角说到底仍旧是向后看的，没有再对联邦德国所经历的现实保持

足够的开放，特别是在二战间接影响减弱的程度上。不管怎样，年青一代恰恰在与罗特费尔斯的对话当中清楚，他们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在对抵抗希特勒运动历史的不同评价上，这一点尤其凸显出来。

罗特费尔斯所持的介乎不同时代之间的立场保证了他在战后几十年里在专业领域和德国公众中都具有主要的影响力，这主要也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和难以置信的精力、执行能力和他道德的完美无缺。然而，作为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公开反对魏玛共和国并在1932/1933年一度把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内的右翼极权政府纳入考虑的保守派人士，他对国家社会主义从未有过片刻的好感。但是他低估了种族反闪米特人主义的爆炸力，并且起初醉心于这会作为“发展过程中的缺点”自行消失的幻想中。因此他认为，他能保住自己在柯尼斯堡大学的地位，事实证明这失败了，就和之后不久他所做的通过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op）的调停保证在德国的学术存在的努力一样[24]。

在结束流亡回国之后，罗特费尔斯致力于恢复旧的联系并“搭建桥梁”。他有意识地避免对归国犹太移民这一特殊地位的任何利用。他与以前的同事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并且毫不畏于与他们合作，即使他们背负着曾在纳粹政府活动的负担。他如今的批评者所想念的原告的角色他偏偏不愿意担当。虽然他并不畏惧对极右翼倾向表明旗帜，例如在弗兰茨·冯·巴本和奥托·恩斯特·雷默（Otto Ernst Remer）的例子当中，而且这也适用于几个背负沉重负担的同事，但总体来说，他致力于与变成纳粹帮凶的那些人达成和解，这其中包括著名的学生，如维尔纳·康策（Werner Conze）和特奥多尔·席德尔（Theodor Schieder）。对他来说，关键是促进一致的产生并撕破不必要的阵线。

如果尼古拉斯·贝格还有他的传记作者扬·埃克尔指责罗特费尔斯说

他在学术上建立了“1945年后德国人普遍的辩护反射”的话，那么这肯定会让亲眼看到罗特费尔斯毕生事业的人不仅仅是惊讶了[25]。毕竟，大力致力于鉴定联邦德国近代史，并且借用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的话（“使我们自由的不是掉转目光而是看过来”[26]）说大力反对对纳粹制度犯罪特征进行任何掩盖的主要就是罗特费尔斯。然而，正如他的抵抗书籍所表明的，他倾向于帮助特别是很大一部分支持过纳粹政权的精英逃脱判决。

与之相对应，尼古拉斯·贝格论证说，罗特费尔斯处在对纳粹时期的事情奉行“沉默”政策的广大历史学家骨干力量的最前端。卡尔·海因茨·罗特也一针见血地说，因为罗特费尔斯在专业中的战略位置，他将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至关重要研究问题的表达推迟了“几十年”[27]。他的传记作者扬·埃克尔加入到这一批评当中，尽管是以较为谨慎的方式，并说二战后的时期是“为近代历史减负的重新诠释，它将国家社会主义赶出了德国历史的连贯性”。

这两位作者所代表的对汉斯·罗特费尔斯的编史著作与历史无关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他的个人和学术成就。对罗特费尔斯的批评是对德国历史学界以及德国公众笼统的谴责的一部分：他们被强加上的罪名是直到几年前还坚持为第三帝国历史辩护的视角并美化了德国的犯罪。作为高校讲师和历史随笔作家，汉斯·罗特费尔斯鼓舞激励了几代后辈历史学家，并为打破变得索然无味的历史传统从而鼓励他们承担起他们的道德政治责任及公开表明立场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又没有忽略历史进程的连贯性。

---

[1] 该报告是2006年6月11日为纪念汉斯·罗特费尔斯逝世30周年在蒂宾根大学作的纪念讲座。

[2] Jan Eckel，*Hans Rothfels. Eine intellektuelle Biographie im 20.Jahrhundert*，Goettingen 2005.

[3] 请参阅Matthias Beer的研究报告Hans Rothfels und die Traditionen der deutschen Zeitgeschichte，刊登于Johannes Huerter/Hans Woller（出版）的*Hans Rothfels und die deutsche Zeitgeschichte*， Muenchen 2005，S.161f。

[4] Carl von Clausewitz，*Politik und Krieg. Eine iddengeschichtliche Studie*，Berlin 1920.

[5] 参见Eckel的描述，*Rothfels*， Goettingen 2005，S.213ff.，S.222f.；请参阅Peter Th.Walther的Hans Rothfels im amerikanischen Exil，刊登于Huerter，同上，S.85f.以及Woller（出版）的*Hans Rothfels und die deutsche Zeitgeschichte*，Muenchen 2005，S.83ff。

[6] 请参阅Winfried Schulze的*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Muenchen 1989，S.141f.；Eckel，Rothfels，Goettingen 2005，S.231ff。

[7] 纪念俾斯麦诞辰150周年，刊登于*VfZ12 （1965）*，S.225-235。

[8] 请参阅Eckel的详细分析，*Rothfels*， Goettingen 2005，S.148ff.；我记得，他把带到美国去的帝国档案的节选保存在蒂宾根的办公室里，一直还打算写个全面的描述。

[9] 参见Hans Rothfels的Bismarck und Karl Marx，刊登于*Jahresheft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59/60*， Heidelberg 1961，S.51-67。

[10] 参见Hans Rothfels的*Bismarck，der Osten und das Reich*， Neuausgabe Darmstadt1960，S.26；请参阅Eckel的*Rothfels*， Goettingen 2005，S.155f。，他与将罗特费尔斯的东方政策计划与民族主义立场相认同的努力划清了界限，例如Willi Oberkrone在Historiker im ‘Dritten Reich’中，刊登于GWU50 （1999）；Ingo Haar，Anpassung und Versuchung. Hans Rothfels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刊登于Huerter/Woller（出版）的*Hans Rothfels und die deutsche Zeitgeschichte*， Muenchen 2005，S.63-82以及同一作者刊登于Ingo Haar/Michael Fahlbusch（出版）的*Handbuch der voelkischen Wissenschaften*，Muenchen 2008，S.58f。

[11] 请参阅Eckel的*Rothfels*， Goettingen 2005，S.204f。

[12] 参见Wolfgang Neugebauer的Hans Rothfels als politischer Historiker der Zwischenkriegszeit，刊登于Peter Drewk/Klaus Zernack（出版）的*Osteuropaeische Geschichte in vergleichender Sicht*， Berlin 1996，S.333-378。

[13] Jan Eckel，Geschichte als Gegenwartswissenschaft，刊登于Johannes Huerter/Hans Woller（出版）的*Hans Rothfels und die deutsche Zeitgeschichte*，

Muenchen 2005，Muenchen 2005，S.22f.，以及同一作者的*Rothfels*，Goettingen 2005，S.123ff.，S.153f.；参见Ingo Haar的Anpassung und Versuchung. Hans Rothfels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刊登于Huerter/Woller（出版）的*Hans Rothfels und die deutsche Zeitgeschichte*，Muenchen 2005，S.7ff.以及同一作者，刊登于Fahlbusch的*Handbuch der voelkischen Wissenschaften*，Muenchen 2008，S.18f。

[14] 请参阅Karen Schoenwaelder的*Historiker und Politik.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Frankfurt am Main 1992，S.55ff。

[15] 请参阅Hans Rothfels的Zur Krise des Nationalstaats，刊登于*Zei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Goettingen 1959，S.93f.；请参阅Hans Mommsen的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Humanitaet. Zum Gedenken an Hans Rothfels，刊登于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出版）的*Aspekte deutscher Aussenpolitik im 20.Jahrhundert，Stuttgart 1976*，S.26。

[16] 参见Eckel的分析，Rothfels，Goettingen 2005，S.248ff。

[17] 请参阅Christoph Cornelissen的Hans Rothfels，Gerhard Ritter und die Rezeption des 20.Juli 1944，刊登于Huerter/Woller（出版）的*Hans Rothfels und die deutsche Zeitgeschichte*，Muenchen 2005，S.113。

[18] Nicolas Berg，*Der Holocaust und die westdeutschen Historiker. Erforschung und Erinnerung*，Goettingen 2003，S.163。那里可以看到这一断言：罗特费尔斯“将德国人在1945年之后的普遍歉疚反射作为科学建立了起来”。参见Rothfels的纲领性文章：Sinn und Aufgabe der Zeitgeschichte，刊登于*Zei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Goettingen 1959，S.9-16。

[19] 同一作者，Das politische Vermaechtnis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s，刊登于*Zei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Goettingen 1959，S.165。

[20] 批评参见Eckel的Rothfels，Goettingen 2005，S.364ff.；Berg，*Holocaust*，Goettingen 2003，S.163f以及S.189，称罗特费尔斯“违背良心”淡化了大屠杀的重要性。

[21] Karl Heinz Roth，Hans Rothfels und die neokonservative Geschichtsschreibung diesseits und jenseits des Atlantik，刊登于*Sozialgeschichte* H18 （2003），S.41-71。

[22] 请参阅Eckel的*Rothfels*，Goettingen 2005，S.244f。

[23] 细节参见Eckel的*Rothfels*，Goettingen 2005，S.187。

[24] Berg，Holocaust，Goettingen 2003，S.163。不管是Eckel还是Berg都批评罗特费尔斯倒不如说遏制了大屠杀研究（这在国际研究上也是不正确的），表明他们对一位犹太裔高校讲师在西德从事活动所处条件的完全不了解。

[25] Rothfels，*Zei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Goettingen 1959，S.16。

[26] Karl Heinz Roth，Hans Rothfels. Geschichtspolitische Doktrinen im Wandel der Zeiten，刊登于*Zeitschrift fu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49（2001），S.1073；请参阅，同一作者的Neo-konservative Geschichtspolitik diesseits und jenseits des Atlantik，刊登于*H-Soz-Kult* vom 15.Februar 2003，S.1-6。

[27] Eckel，*Hans Rothfels*，Goettingen 2005，S.187。

感谢

感谢德意志出版社（Deutsche Verlags-Anstalt），特别是我的校对安特耶·科尔斯迈尔（Antje Korsmeier）博士，感谢她建设性地参与了本书的拟定以及对部分文章的权威编辑，这些文章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以已经出版的版本为基础。

汉斯·莫姆森

2010年7月27日于费尔达芬（Feldafing）

人名译名对照表

Adennauer，Konrad 阿登纳，康拉德

Allemann，Fritz Rene von 阿勒曼，弗里茨·勒内·冯

Aly，Goetz 阿黎，格茨

Amann，Max 阿曼，马克思

Angermeier，Georg 安格迈尔，格奥尔格

Arendt，Hannah 阿伦特，汉娜

Badoglio，Pietro 巴多格里奥，佩特罗

Baeck，Leo 贝克，莱奥

Bajohr，Frank 巴约尔，弗兰克

Bauer，Otto 鲍尔，奥托

Beck，Ludwig 贝克，路德维希

Becker，Josef 贝克尔·约瑟夫

Benn，Gottfried 本，戈特弗里德

Berg，Nicolas 贝格，尼古拉斯

兹

Bernadotte，Graf Folke 贝纳多特，福尔克

Bismarck，Otto von 俾斯麦，奥托·冯

Blaskowitz，Johannes 布拉斯科维茨，约翰内斯

Blum，Leon 布卢姆，莱昂

Boldt，Hans 博尔特，汉斯

Bolz，Eugen 博尔茨，欧根

Bonhoeffer，Dietrich 邦赫费尔，迪特里希

Bormann，Martin 博尔曼，马丁

Bosch，Robert 博世，罗伯特

Bouhler，Philipp 鲍赫勒，菲利普

Bracher，Karl Dietrich 布拉赫尔，卡尔·迪特里希

Brandt，Willy 勃兰特，维利

Brauer，Theodor 布劳尔，特奥多尔

Braun，Eva 布劳恩，埃娃

Broszat，Martin 布罗萨特，马丁

Bruening，Heinrich 布吕宁，海因里希

Brzesinski，Zbigniew Kazimierz 布热津斯基，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

Bullock，Alan 布洛克，艾伦

Burckhardt，Jacob 布尔克哈特，雅各布

Canaris，Wilhelm 卡纳里斯，威廉

Chamberlain，Neville 张伯伦，内维尔

Chaplin，Charlie 卓别林，查理

Clausewitz，Carl von 克劳塞维茨，卡尔·冯

Conze，Werner 康策，维尔纳

Coulondre，Robert 库隆德，罗贝尔

Cuno，Wilhelm 库诺，威廉

Curtis，Lionel 柯蒂斯，莱昂内尔

Dahrendorf，Ralf 达伦多夫，拉尔夫

Dannecker，Theodor 丹内克尔，特奥多尔

Darre，Walter 达雷，瓦尔特

Delp，P. Alfred 德尔普，阿尔费雷德·P

Dickels，Otto 迪克尔斯，奥托

Doenitz，Karl 邓尼茨，卡尔

Drexler，Anton 德莱克斯勒，安东

Dulles，Allan Welsh 杜勒斯，艾伦·威尔逊

Ebert，Friedrich 艾伯特，弗里德里希

Eckart，Dietrich 埃卡特，迪特里希

Eckel，Jan 埃克尔，扬

Ehard，Hans 埃哈德，汉斯

Ehrhardt，Hermann 埃尔哈特，赫尔曼

Eichmann，Adolf 艾希曼，阿道夫

Ersing，Josef 埃尔辛，约瑟夫

Erzberger，Matthias 埃茨贝格尔，马蒂亚斯

Esser，Hermann 埃塞尔，赫尔曼

Evans，Richard 埃文斯，理查德

Gaevernitz，Gero von 格费尼茨，格罗·冯

Gaulle，Charles de 戴高乐，夏尔

Gayl，Wilhelm Freiherr von 盖尔男爵，威廉·冯·

George，Stefan 格奥尔格，施特凡

Gerstenmaier，Eugen 格斯登美尔，欧根

Gilbert，Felix 吉尔贝特，费利克斯

Gisevius，Hans Bernd 吉泽菲乌斯，汉斯·贝尔德

Globocnik，Odilo 格洛博奇尼克，奥迪路

Gneisenau，August Neithardt von 格奈泽瑙，奥古斯特·奈德哈德·冯

Goebbels，Joseph 戈培尔，约瑟夫

Goerdeler，Carl Friedrich 格德勒，卡尔·弗里德里希

Goering，Hermann 戈林，赫尔曼

Goldhagen，Daniel 戈尔德哈根，丹尼尔

Greiser，Arthur 格莱瑟，阿图尔

Groener，Wilhelm 格勒纳，威廉

Gross，Nikolaus 格罗斯，尼古劳斯

Guertner，Franz 古特纳，弗朗茨

Gumbel，Julius 古姆贝尔，尤里乌斯

Habermann，Max 哈贝尔曼，马克思

Haeften，Werner von 黑夫滕，维尔纳·冯

Haffner，Sebastian 哈夫纳，塞巴斯蒂安

Halder，Franz 哈尔德，弗朗茨

Hamann，Brigitte 哈曼，布里吉特

Hanfstaengl，Elsa 汉夫施丹格尔，艾尔莎

Harlan，Veit 哈兰，法伊特

Harnack，Adolf von 哈纳克，阿道夫·冯

Harnack，Arvid 哈纳克，阿维德

Harnack-Fish，Mildred 哈纳克-菲什，米尔德里德

Harrer，Karl 哈勒，卡尔

Hassell，Ulrich von 哈塞尔，乌尔里希·冯

Haubach，Theodor 豪巴赫，特奥多尔

Henk，Emil 亨克，埃米尔

Hennis，Wilhelm 亨尼斯，威廉

Herbst，Ludolf 赫布斯特，卢多尔夫

Herfs，Jeffrey 赫弗茨，杰弗里

Hess，Rudolf 赫斯，鲁道夫

Heuss，Theodor 豪斯，特奥多尔

Heydrich，Reinhard 海德里希，赖因哈特

Hildebrand，Klaus 希尔德布兰特，克劳斯

Himmler，Heinrich 希姆莱，海因里希

Hindenburg，Paul von 兴登堡，保罗·冯

Hitler，Adolf 希特勒，阿道夫

Hoehne，Heinz 赫内，海因茨

Hoeppner，Rolf-Heinz 赫普讷，罗尔夫-海因茨

Hoess，Rudolf 赫斯，鲁道夫

Hoetzsch，Otto 赫茨施，奥托

Hoffmann，Heinrich 霍夫曼，海因里希

Holborn，Hajo 霍尔本，哈约

Hugenberg，Alfred 胡根贝格，阿尔弗雷德

Husemann，Walter 胡泽曼，瓦尔特

Jackson，Robert H. 杰克逊，罗伯特·H

Jaeckel，Eberhard 耶克尔，埃贝哈德

Jeckeln，Friedrich 杰克林，弗里德里希

Jessen，Jens 耶森，延斯

John，Otto 约翰，奥托

Jost，Hans 约斯特，汉斯

Juenger，Ernst 荣格尔，恩斯特

Kahr，Gustav Ritter von 卡尔，古斯塔夫·冯

Kaiser，Jakob 凯泽，雅各布

Kaltenbrunner，Ernst 卡尔滕布伦纳，恩斯特

Kapp，Wolfgang 卡普，沃尔夫冈

Katzmann，Friedrich 卡茨曼，弗里德里希

Keitel，Wilhelm 凯特尔，威廉

Kelsens，Hans 凯尔森斯，汉斯

Kennan，George 凯南，乔治

Kershaw，Ian 克肖，伊恩

Kippenberg，Anton 基彭贝格，安东

Kirk，Alexander 柯克，亚历山大

Kleist-Schmenzin，Ewald von 克莱斯特-施门津，埃瓦尔德·冯

Koehler，Erich 克勒，埃里希

Kortikov，Alexander 科蒂科夫，亚历山大

Koshar，Rudy 寇莎，鲁迪

Kriebel，Ernst 克里贝尔，恩斯特

Kuechenmeister，Walter 屈兴迈斯特，瓦尔特

Kuckhoff，Ernst 库克霍夫，恩斯特

Kube，Wilhelm 库彼，威廉

Kujau，Konrad 库耀，康拉德

Lammers，Hans Heinrich 拉默斯，汉斯·海因里希

Lammers，Wilhelm 拉默斯，威廉

Leber，Julius 勒伯尔，尤里乌斯

Lederer，Emil 莱德雷尔，埃米尔

Lehmann，Julius 勒曼，尤里乌斯·F

Lehr，Robert 勒尔，罗伯特

Lenin，Wladimir 列宁，弗拉基米尔

Lenz，Siegfried 伦茨，西格弗里德

Letterhaus，Bernhard 莱特豪斯，伯恩哈德

Leuschner，Wilhelm 洛伊施讷，威廉

Ley，Robert 莱伊，罗伯特

Liebknecht，Karl 李卜克内西，卡尔

Linz，Juan 林茨，胡安

Lipset，Seymour Martin 李普塞特，西摩·马丁

Litt，Theodor 利特，特奥多尔

Lohmann，Theodor 洛曼，特奥多尔

Lohse，Hinrich 洛泽，欣里希

Lubbe，Marinus van der 卢贝，马里努斯·范·德尔

Ludendorff，Erich 鲁登道夫，埃里希

Lukacs，Georg 卢卡奇，捷尔吉

Luxemburg，Rosa 卢森堡，罗莎

Maass，Hermann 马斯，赫尔曼

Mahraun，Artur 马劳恩，阿图尔

Mann，Heinrich 曼，海因里希

Manstein，Erich von 曼施泰因，埃里希·冯

Marx，Karl 马克思，卡尔

Marx，Wilhelm 马克思，威廉

Mayr，Karl 迈尔，卡尔

Mehnert，Klaus 梅纳特，克劳斯

Meinecke，Friedrich 迈内克，弗里德里希

Menzel，Walter 门采尔，瓦尔特

Mertz von Quirnheim，Albrecht Ritter 默茨·冯·基尔海姆，阿尔布雷希特·里特尔·

Mierendorff，Carlo 米伦多夫，卡洛

Moeller van den Bruck，Arthur 默勒·范登布鲁克，阿图尔

Moltke，Freya Graefin von 毛奇伯爵夫人，弗雷亚

Moltke，Helmuth James Graf 毛奇伯爵，赫尔姆特·詹姆斯·冯

Mueller，Heinrich 米勒，海因里希

Mueller，Karl Alexander von 米勒，卡尔·亚历山大·冯

Mussolini，Benito 墨索里尼，贝尼托

Napoleon I. 拿破仑一世

Neugebauer，Wolfgang 诺伊格鲍尔，沃尔夫冈

Neumann，Franz 诺依曼，弗兰茨

Niekisch，Ernst 尼基施，恩斯特

Nietzsche，Friedrich 尼采，弗里德里希

Nolte，Ernst 诺尔特，恩斯特

Olbricht，Friedrich 奥尔布里希特，弗里德里希

Oppenhoff，Franz 奥本霍夫，弗兰茨

Oster，Hans 奥斯特，汉斯

Papen，Franz von 巴本，弗兰茨·冯

Petain，Philippe 贝当，菲利普

Peukert，Detlef 波伊克特，德特勒夫

Pflanze，Otto 普夫兰策，奥托

Popitz，Johannes 波皮茨，约翰内斯

Preuss，Hugo 普罗伊斯，胡戈

Prinz，Michael 普林茨，米夏埃尔

Reichwein，Adolf 赖希魏因，阿道夫

Reinecke，Hermann 赖内克，赫尔曼

Remarque，Erich Maria 雷马克，埃里希·玛丽亚

Remer，Otto Ernst 雷默，奥托·恩斯特

Renner，Karl 伦纳，卡尔

Ribbentrop，Joachim von 里宾特洛甫，约阿希姆·冯

Robespierre，Maximilien de 罗伯斯庇尔，马克西米连·德

Robinson，Hans 罗宾逊，汉斯

Roeder，Manfred 勒德尔，曼弗雷德

Roehm，Ernst 罗姆，恩斯特

Roesch，Augustin 勒施，奥古斯廷

Roesch，Paul 勒施，保罗

Roever，Karl 勒韦尔，卡尔

Rommel，Erwin 隆美尔，埃尔温

Rosenberg，Alfred 罗森堡，阿尔弗雷德

Roth，Karl Heinz 罗特，卡尔·海因茨

Rothfels，Hans 罗特费尔斯，汉斯

Ruestow，Alexander 吕斯托，亚历山大

Schacht，Hjalmar 沙赫特，亚尔马

Schieder，Theodor 席德尔，特奥多尔

Schlabrendorff，Fabian von 施拉布伦多夫，法比安·冯

Schleicher，Kurt von 施莱歇，库尔特·冯

Schleunes，Karl 施洛伊内斯，卡尔

Schoenbaum，David 舍恩鲍姆，达维德

Schulenburg，Fritz-Dietlof von der 舒伦堡，弗里茨-迪特洛弗·冯·德

Schulz，Gerhard 舒尔茨，格哈德

Schulze-Boysen，Harro 舒尔策-博伊森，哈罗

Schumacher，Kurt 舒马赫，库尔特

Seeckt，Hans von 泽克特，汉斯·冯

Shirer，William L. 夏伊勒，威廉·L

Shukov，Georgi K. 朱可夫，格奥尔吉·K

Sieg，John 西格，约翰

Siemer，P. Laurentius 西默尔，P·劳伦丘斯

Spann，Otmar 施潘，奥特马尔

Speer，Albert 施佩尔，阿尔贝特

Spengler，Oswald 斯宾格勒，奥斯瓦尔德

Spranger，Eduard 斯普朗格，爱德华

Stahlecker，Walter 施塔莱克，瓦尔特

Stalin，Josef 斯大林，约瑟夫

Stauffenberg，Berthold Schenk Graf von 施陶芬贝格伯爵，贝托尔德·申克·冯

Stauffenberg，Claus Schenk Graf von 施陶芬贝格伯爵，克劳斯·申克·冯

Steltzer，Theodor 施特尔策，特奥多尔

Stern，J. Peter 斯特恩，彼得

Strasser，Gregor 施特拉塞尔，格雷戈尔

Strasser，Otto 施特拉塞尔，奥托

Streicher，Julius 施特莱歇尔，尤里乌斯

Stresemann，Gustav 施特雷泽曼，古斯塔夫

Suesterhenn，Adolf 聚斯特亨，阿道夫

Thuengen，Karl Freiherr von 廷根男爵，卡尔·冯

Trepper，Leopold 特雷佩尔，利奥波德

Tresckow，Henning von 特雷斯科，亨宁·冯

Trevor-Roper，Hughes 特雷弗-罗珀，休

Trotha，Carl Dietrich von 特罗塔，卡尔·迪特里希·冯

Trott zu Solz，Adam von 特罗特·楚·佐尔茨，亚当·冯

Turner，Henry A. 特纳，亨利·A

Uexkuell-Gyllenband，Nikolaus Graf von 尼古劳斯伯爵，于克斯屈尔-居伦班德·冯

Ulbricht，Walter 乌布利希，瓦尔特

Visser’t Hooft，Willem 维瑟特·霍夫特，威廉

Weber，Christian 韦伯，克里斯蒂安

Weber，Max 韦伯，马克斯

Wehler，Hans-Ulrich 魏勒，汉斯-乌尔里希

Weinberg，Gerhard 魏因贝格，格哈德

Weizsaecker，Ernst von 魏茨泽克，恩斯特·冯

Wilbrandt，Hans 维尔布兰特，汉斯

Wildt，Michael 维尔特，米夏埃尔

Wilhelm II. 威廉二世

Wirmer，Josef 维尔默，约瑟夫

Witzleben，Erwin von 维茨莱本，埃尔温·冯

Wlassow，Alxeji 弗拉索夫，安德烈

Wurm，Theophil 武尔姆，特奥菲尔

Yorck von Wartenburg，Peter Graf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彼得

Zapf，Wolfgang 查普夫，沃尔夫冈

Zehrer，Hans 策雷尔，汉斯

Zitelmann，Rainer 齐特尔曼，赖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德）莫姆森（Mommsen，H.）著.赵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

（莱茵译丛）

ISBN 978-7-5097-4417-8

Ⅰ.①希… Ⅱ.①莫…②赵… Ⅲ.①德意志第三帝国-研究 Ⅳ.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6214号

·莱茵译丛·

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

著者/〔德〕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

译者/赵涟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59367004 责任编辑/冯立君 段其刚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谢丽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印制/岳阳

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3

版次/2013年6月第1版 字数/280千字

印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4417-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1-7084号

定价/4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赵　涟（女）

山东青岛人，新华社翻译、编辑，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毕业，北京大学传播学硕士，瑞士苏黎世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访问学者。

3A设计艺术工作室
010-59367108
装帧设计／宋　涛



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

1930年生于德国马尔堡，1968年起在波鸿鲁尔大学担任近代史教席教授，曾在普林斯顿、哈佛、伯克利、耶路撒冷和华盛顿等地作访问研究。他是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和奥地利科学院的成员，1998年获颁卡尔·冯·奥西茨基当代史与政治奖。

目前存在将希特勒独裁政治和德国民众共同体一分为二的浪潮，

而汉斯·莫姆森旨在将阿道夫·希特勒的

作用纳入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同时，

突出强调了使纳粹专制及其所启动的武力与恐怖升级

成为可能的结构性因素。

www.ssap.com.cn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ISBN 978-7-5097-4417-8
定价：49.00元

HEIMLICHE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

LESER IN DER DDR

——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
〔德〕英格里德·宗塔格 等 ■ 著

KONTROLLE UND VERBREITUNG

UNERLAUBTER

吴雪莲 ■ 译

LITERATUR

Siegfried Lokatis
Ingrid Sonntag

译莱
丛茵

该书不仅仅涉及文学，
也描写了东德的反对派公众、
反抗行为和媒体发展史。
阅读后会觉得自己经历了一次探险之旅。

——《新莱茵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hristoph Links Verlag，Berlin 2008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
〔德〕英格里德·宗塔格 等 著
吴雪莲 译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

HEIMLICHE LESER IN DER DDR

KONTROLLE UND VERBREITUNG UNERLAUBTER LITERATUR

译 歌德学院（中国）翻译资助计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录

- 在专制下读书
- 迷宫与窗户
    - 大墙后迷宫中的读者
    - 东德社会公众与秘密使用媒介
    - 脑袋中的保险柜
    - 秘密阅读与颠覆性写作
    - “我们从未偷偷做过什么，我们就那么做了”
    - “根据‘斜线战术’排兵布阵”
- 经审查的审查官与顽强反抗的读者
    - 海关审查官
    - 向西行，向东行
    - 为阶级斗争参与秘密阅读
    - 关于私自偷带图书的各种回忆
    - 外婆的卡尔·麦
- 冷战与低俗之作
    - 检查站的煽动性刊物
    - 秘密读者
    - 库斯勒、奥威尔与《真相》
    - 一种“现象”被揭穿
    - “低俗之作”令人身不由己
    - “建议死刑”
- 毒草柜与守夜人
    - 摘自一名图书管理员的生活传记
    - 柏林国家图书馆的毒草柜
    - 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
    - 我爱德意志图书馆
    - 隐喻中穿行
    - “他们还是半信半疑”

- “图书筛除”
- 经批准方可读书
- 图书展览与图书盗窃
  - 大千世界馥郁芬芳
  - 带着图书和文稿穿越边境
  - 向两个方向穿越边境
  - 西德图书之于东德作家
- 宗教读者群体
  - “成袋成袋地上缴图书”
  - “仅供教会内部公务使用”
  - 国家安全部为何秘密阅读《守望台》？
  - “教会重视独立”
- 政治读者群体
  - 未能赶上的追赶？
  - 鲁道夫·巴赫罗的作品与接受
  - “另辟蹊径的写作之路”
  - 无审查
  - “他们那么多自由刊物令我们自愧不如”
  - 萨密兹达—文学—现代性
- 一书难求
  - 卡尔·麦——秘密读物与极端事件
  - 科幻小说与唱片
- 编辑致辞
- 编者及作者简介

在专制下读书

——审查效应研究概述

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Siegfried Lokatis）

> 我喜欢剪报服务用的那些袋子，我要是一名自由职业人，就没有资格订阅那些报纸了。其中很多报纸都可以扔掉，但从《新苏黎世报》上整页摘取的可不能扔！特别一提的是：报纸反面经常有更多有意思的东西。有些我留存起来，其他的寄给国外，“仅供剪报服务使用”这样的警告也不管不顾了。像我一样，1944年的时候作为一个18岁的战俘，每天对比着读过《纽约时报》里一篇接一篇关于二战各个敌对势力的报道之后，便不愿再让别人规定他可以读什么看什么和听什么。[1]

德国作家海因茨·克诺布洛赫（Heinz Knobloch）

莱比锡文化馆“书之屋”项目于2007年9月26至28日举行了会议“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会议上讨论了一种现象，对于曾经生活在读书的国度下精神文化丰富多彩的东德人民和造访这个国度的西方客人来说，这一现象最为熟悉不过：读者们经常以相当冒险的方式尝试接近那些在东德难以见到，出于文化政治原因被隔离或禁止的书刊。退休游客和书贩过海关时紧绷的神经，图书馆里的毒草柜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还有书展展台上令人朝思暮想的西方图书，这些回忆在二十年后仍然存在于脑海：那是一种将生活打上专制烙印的日常经历。

这种体验如今已经很难领会。与现如今媒体过度饱和的情况相反，一个没有一台自己的打印机和复印机的世界，让人们领略了其对立世界那稀有而珍贵的文字带来的魅力。大家竞相以各种巧妙的形式读书，整本抄下莱比锡书展上的各种图书，然后在秘密圈子里交易买卖。“专制

育人”，一位秘密读者曾这样评论道，为此他还学习了速记法，并为了读波兰的秘密出版物萨密兹达（Samisdat）学了波兰语。[2] 我们来把电影世界里的神话串联到一起：人在华氏451度下就能把书背下来了。[3]

其实秘密阅读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审查。

学界对东德审查体系的核心内容到目前已经研究得比较成熟了。[4] 文化部的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作为图书审查的枢纽，扮演着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下国家行政机关的角色。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以最终授权的78家出版社为依托，批准各项出版计划，并向各出版社下发文件。出版社每出一本书事先都要通过所谓的发行许可审查，这是一种经典的系统化预审查模式。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自1963年成立以来，同时还管理着莱比锡大宗图书交易委员会中央发行处以及大众书店零售贸易，也就是图书销售系统，还领导着图书馆、旧书交易以及相关外贸机构尤其是版权办公室的工作，并严格组织安排图书授权事宜。

主要是外汇短缺在最大限度上限制了西方图书进口，对学术书刊的投入也就相当有限，并且促成了50年代末“比特费尔德道路”下闭关自守的文化政策，从而在西方现代文学“颓废派”面前彻底地自我封闭。此外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还不定期地向海关提供官方咨询性服务，但和邮局一样，海关处理礼品邮递以及日常图书审查还是更多地和国安部合作。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众多领域（如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某些出版社和图书馆）暗藏着审查这一导致麻痹瘫痪的毒瘤，更不用说自我审查了，自我审查接管了上述各种机构的工作，其作用已经多次证实，但又不太容易得到证实。这种多方面的审查体系如何在总体上对读者产生影响、限制并压制读者，而又在紧急时刻激励读者，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足够大的研究课题。在审查体系遍布的各个分支里，从档案卷宗和图书馆到旧书交易再到海关，形成了各种为秘密读者带来挑战的审查机关，砌成了国家文学政策这堵看不见的墙。

那么，涉及秘密读者的这项新学术课题就是审查效应研究。

关于东德的这一全新研究领域可以找到历史上的范例作支撑，可参考的有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几篇论述，讲法国大革命前夕无奇不有的书贩世界，[5] 但在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引领的时代，当然还有“第三帝国”时期[6] 都存在与这里所讨论的类似现象。可惜到目前无论是针对“秘密阅读”还是图书走私，还是纳粹时期受到左派宗教环境阻挠的地下读物，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现在研究可能为时已晚，第三帝国时期的秘密读者，他们丰富的经历和体验已经再也无从找回。而东德也需要得到解释，为什么晚了整整十五年才开始研究这一重要课题。

90年代初期，大家对犹如大众体育般普及的秘密阅读还明显有着共同的经验体会，这种体验可能也很难专门作为一项研究课题与经济落后的其他表现形式区分开来。国家文学政策隐藏的秘密、国安部和审查局隐藏在幕后的文献档案及其下属的大型出版社似乎是更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7]

然而审查研究不能局限于图书出版发行及图书审查，要通过研究审查实现的各种途径对审查研究进行修正调整，并且不能忽略其他不同的、与现存制度相悖的信息来源。一本在东德被禁止或未能印刷的图书，在西柏林能够轻松入手，或者甚至在美占区广播电台作为朗读节目播出，了解这种现象及其原因以及经何人禁止，都没有多大意义。不对隐藏在背后的图书结构进行分析就完全不能对审查措施的真实效应下结论。

另一方面，审查效应研究需要已经系统化进行过的审查研究，以此为依托并从中找出研究的标准规范，否则很难确定哪些图书杂志，在什么时间出于哪些原因，被施以多少政治压力而被禁止，或者只因不受好评而下架。然而事情是极其复杂的，哪些图书和文本体裁被禁止没有统

一的标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审查研究来说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接下来的文章中会多次提到一些特别的作品，比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日食》[8]，还有耶和华见证人的杂志《守望台》。这些都是40多年铁打不动的禁书，传播此类书籍受到的处罚最为严重。

然而很多在五六十年代还被隔离的图书，自70年代以来又可以出版了！其中有德国探险小说家卡尔·麦（Karl May）的小说，1982年开始在新生活出版社出版，从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当时发行的世界文学作品书目中也能了解50年代后期有哪些禁书。人民与世界出版社虽然推迟了很久，也一如既往地经过诸番讨论，但还是出版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977）、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982）、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84）和法国作家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89）的首批作品，还有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即使没有“和平革命”，这本书1990年也能在东德出版。

相反，斯大林的作品最初大量发行，后来最迟在1961年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之后便消失了，在此期间还有数不清的文章和书籍遭到摒弃，这些书籍有来自南斯拉夫、中国、阿尔巴尼亚或者以色列的，还有德国作家普利维尔（Plievier）的小说和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Lukács）的作品。这里涉及国家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针，这些方针从来没有统一的实施标准，而本身在审查机关内部就对如何实施这些方针存在争议，在此期间出台的一系列权威性决策也许与不断变动的意识形态背景相关，但也许仅仅只是出于审查官的一时偏好。然而，海关和各图书馆在每件案例上是否遵守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出台的规定并且在多大程度上遵守规定，还是独断专行，这个问题有待研究。至少有时每个海关辖区图书没收的情况各不相同，如1959年，一些海关没收图书时做

了相关记录，而其他一些海关就没有。边防警察扣了一本黄色书刊，而交通运输警察遇到年纪大的游客携带旅行读物时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9]

柏林和莱比锡各大图书馆处理封存图书的标准也不统一，有时令读者迷惑不解，有时也出人意料地向读者亮绿灯。

所以禁书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因为不存在具体哪一位秘密读者。宗教团体对政治禁书的残酷本质并不感兴趣，根据海关的统计数据，40多年来被没收的书籍中，纯粹从数量上看，毫无争议占据绝对优势的是爱情小说和类似的庸俗文学。

同时海关也会把庸俗但并无害处的文学作品当做政治事件处理。

比如海关当局曾经这样论证《米老鼠》画册的危险性："所谓的青少年杂志像《米老鼠》等，尤其会使我们的青少年脱离社会工作。在此提出以下目标，在东德成立所谓的青少年俱乐部，以防止青少年加入德国共青团和少先队。这样就完成了实践的第一步，将我们的青少年从西方当权者罪恶的阴谋诡计之中拯救出来。"[10]

也就是说哪一类文学体裁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优先权或者落得被剔除的命运，都没有经过认真思考定夺。不管是令我们感到舒服还是厌倦的秘密读者，他感兴趣的是《抉择》，当然还有公路地图和占星术、诗人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Bravo》杂志和《图片报》、连环画、中国的宣传报道和美国人类学家卡斯塔尼达（Castaneda）、瑞士作家埃里希·冯·丹尼肯（Erich von Däniken）、《日瓦戈医生》和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的《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新教修身读物和色情文学、电视节目单和《法兰克福汇报》、君特·格拉斯和古拉格刊物、煽动性刊物和哈费曼（Havemann）、画报和法国作家尤内斯库（Ionesco）、《詹姆斯·邦德》和恩斯特·荣格尔

（Ernst Jünger）、艺术家手制书、《踢球者》杂志和诗人莱纳·孔策（Reiner Kunze）、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和作家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t）、军事书籍和时装杂志、弗里德里希·尼采和《新周刊》、奥威尔和《Otto》商品目录册、朋克杂志和《花花公子》、《Quelle》商品目录册、旅行读物、《明镜周刊》、列夫·托洛茨基（Leo Trotzki）和导演路易斯·特伦克尔（Luis Trenker）、环境图书馆的杂志和地下杂志、企业地址名录、耶和华见证人的杂志《守望台》、斯蒂芬·海姆（Stefan Heym）的《六月的五天》、瑜伽书和美国未来科幻小说等。

为了展现各种禁书丰富的内容结构，就要做到有的放矢，区分特殊的重要读者群，走访了解某个群体的行家，获取各种类型的禁书对于这些行家具有特殊的意义。像之前关于“两德图书交流”[11]和“东德杂志”[12]的会议一样，让来自东西德的各位年长、年轻的学者和时代见证者们聚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样能将观察事物的细致性和保持距离的客观性这二者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有丰富充实的感受，如能实现这一融合，“犯案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对峙便不那么令人畏惧。

和研究审查效应密切相关的是抵抗审查的行为，而轻率地评价抵抗审查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当然，我们对秘密阅读的牺牲者，如巴德尔·哈泽（Baldur Haase）和西格马尔·福斯特（Siegmar Faust）给予全部的同情。但是审查也是有其原因的。比如为抵制西方污秽刊物而进行的斗争就受到了教会的绝对支持，而受东德文化政策指引的反法西斯的改造理念也并非毫无根据。德国现实的秘密读者可绝对不能盲目定论为“政治上正确”，西德一些研究反苏联宣传的专家便在戈培尔（Goebbels，纳粹德国时期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那里习得了他们的手艺。而在今天，禁书、青少年保护条例和刑法法典也依然存在，网络上在此期间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永远的审查官”[13]和秘密读者之间的斗争早就进入

了新一轮较量。也许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研究课题就获得了公开性的重要现实意义：文字和信息审查的繁文主义覆盖了整个社会，一方面这种野心勃勃的繁文主义带来了压迫束缚和层层阻碍，另一方面被审查者的回应反馈，还有他们几乎永不枯竭的战略资源和逃生之法，东德历史的例子能让我们犹如在一所庞大的实验室里，在慢镜头下注视观察这一切。

如果想在这里观察并学习这些复杂的游戏规则，那么把个人政治倾向置于一边将不无裨益。研究这一课题，编者的任务不是再次实行审查，然后打分数，起到政治上、美学上或是宗教上的激励作用，而是要考虑并尊重各位作者的视角。

本次大会的一个讨论重点是50年代冷战背景下两德之间的宣传手册之战。我们最年长的时代见证者哈罗德·霍尔维茨（Harold Hurwitz）自1947年以来和他的妻子共同组织推广由美国人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创办的杂志《月份》（*Der Monat* ）。霍尔维茨早在60年代就写了《秘密读者》一书，我们大会的名字也由此得来。[14]

1961年之前的图书走私规模是很难估计的：1956年海关对柏林利用城市轻轨、地铁等方式通过两德边境的人数进行了估算，每月共计1200万，即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实行专项行动，也无法检查其中的百分之一。[15] 在西方冷战先驱的眼里这里是一块用来分发大量传单和小册子的优先地带。相反，柏林墙建立以后，秘密读者能秘密读书的地方就少了很多，像柏林国家图书馆、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当然还有书展。德国作家君特·德·布律（Günter de Bruyn）对此讲道：“即使因为不能去西德书店和图书馆买书看书感到失望，这种失望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获取信息有其他各种渠道，比如无线电广播节目，这种方式现在对我来说变得更重要了，还有学术图书馆，如果了解图书馆里的情况并和管理员建立起互信关系，那么读者会看到更多图书馆里收藏的精神走私

品。柏林墙另一边如果有亲朋好友不怕费时费力地应对审查，敢于偷带图书杂志，也会起到帮助，再后来通讯记者也成为一处信息源泉。”[16]

1996年，在题为“墙中洞”的有关两德图书交流的会议上，出版商马克·莱姆施泰特（Mark Lehmstedt）就“大墙后迷宫中”的读者现状出现研究上的漠视而表示不满。从他的这项研究可以知道有何种方法在何种地方为获取西方图书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也就能基本了解秘密阅读的情况，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在此向他的会议报告授予荣誉席位。[17]

审查效应研究预先划分为三个要点。首先，最重要的是实施图书审查的重要机关，海关、邮政和国家安全部，审查局本身始终居于次要地位。

其次是关于一些敏感的临界点、相对有渗透性的地方和“墙中洞”：也就是关于书展和“书展偷窃”或是各大图书馆持特殊学术研究许可便能破门而入的毒草柜。我们想从最了解这些地方的行家那里获知，为什么有些书德意志图书馆里有，而莱比锡大学阿尔贝蒂娜图书馆和柏林国家图书馆就没有，或者反之。还有，是否存在统一的标准，这些标准是何时开始有的，是什么样的又是如何得以实施的。



图**1** 海关抓获一起报纸走私的档案资料

最后要区分特定的重要群体。毒草柜的问题尤其涉及学者和大学生；而在政治背景下，东德批判家鲁道夫·巴赫罗（Rudolf Bahro）或者波兰秘密出版物萨密兹达就比较重要；在教会领域，大家就可能对其他书籍感兴趣，尤其是神学类书籍。但各个群体之间的界限也不是固定的，因为教会的上层覆盖面很广。

这次大会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就意味着这一领域包含的所有课题目前并非都得到了适当的研究和处理。虽然学界对宗教领域的秘密阅读已经有了相关的详细研究，并且是以教会式、对比式的研究方案进行的，尽管如此，该领域毫无疑问还是需要单独召开一次研讨会议。

此外还要考虑到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马列主义学院里存在的秘密阅读现象，以及类似的与统治阶层密切相关的学院，这些地方藏有共产党党史上最为敏感的机密。这里举行过经篡改出版的机密文件的保密仪式，如布鲁塞尔会议记录等，这次保密仪式散发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一些历史学家，也让最忠实保密的人反而成了秘密读者。然而根据所有海关统计数据，走私最多的绝对是低俗文学刊物。根据这一统计结果，必须对相关的日常生活经历进行相当广泛的研究，而我们的会议仅能对此起到发起倡导的作用。

这次大会上取得的一个重要结论是非法引进的消遣类书刊意义巨大，然而对此无法进行适当的详细研究。还有50年代为反抗西方“低俗”刊物和私人租书业而进行的各种运动目前还未揭开面纱。

1955年《柏林报》一篇报道阐明了这里所讲的意思：“保罗·肯泊（Paul Kempe）的文学谣言发源地，位于8号房门的私人书铺，关门了。‘书友’保罗从来不注意妥善保存图书或者添增新的出版作品。他那

些原封不动的资本就是一个鸡蛋箱那么多的书，全是凶杀、色情类烂书，每本10芬尼借给特别好的读者，大多都是年轻人［……］几天前，城区参议会的工作人员发现肯泊在倒弄西柏林和西德出版的凶杀类书刊，紧接着人民警察和参议会的工作人员一起进行了调查，最后在肯泊家中的家具后发现一个箱子，里面藏了一个鸡蛋箱，装有200多本低俗的破烂旧书［……］。”[18]

旧书商受中央旧书局的协调安排，既为读者供书，又为清除查抄图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非常了解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经过各种努力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旧书商了解情况。有待研究的还有西德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首都的“常设代表处”[19]、国际宾馆和书店的重要作用，不过这些地方就是个没有底的筛子，这类题材放在回忆录和奇闻轶事里有其价值所在，但基本上不适用于做系统性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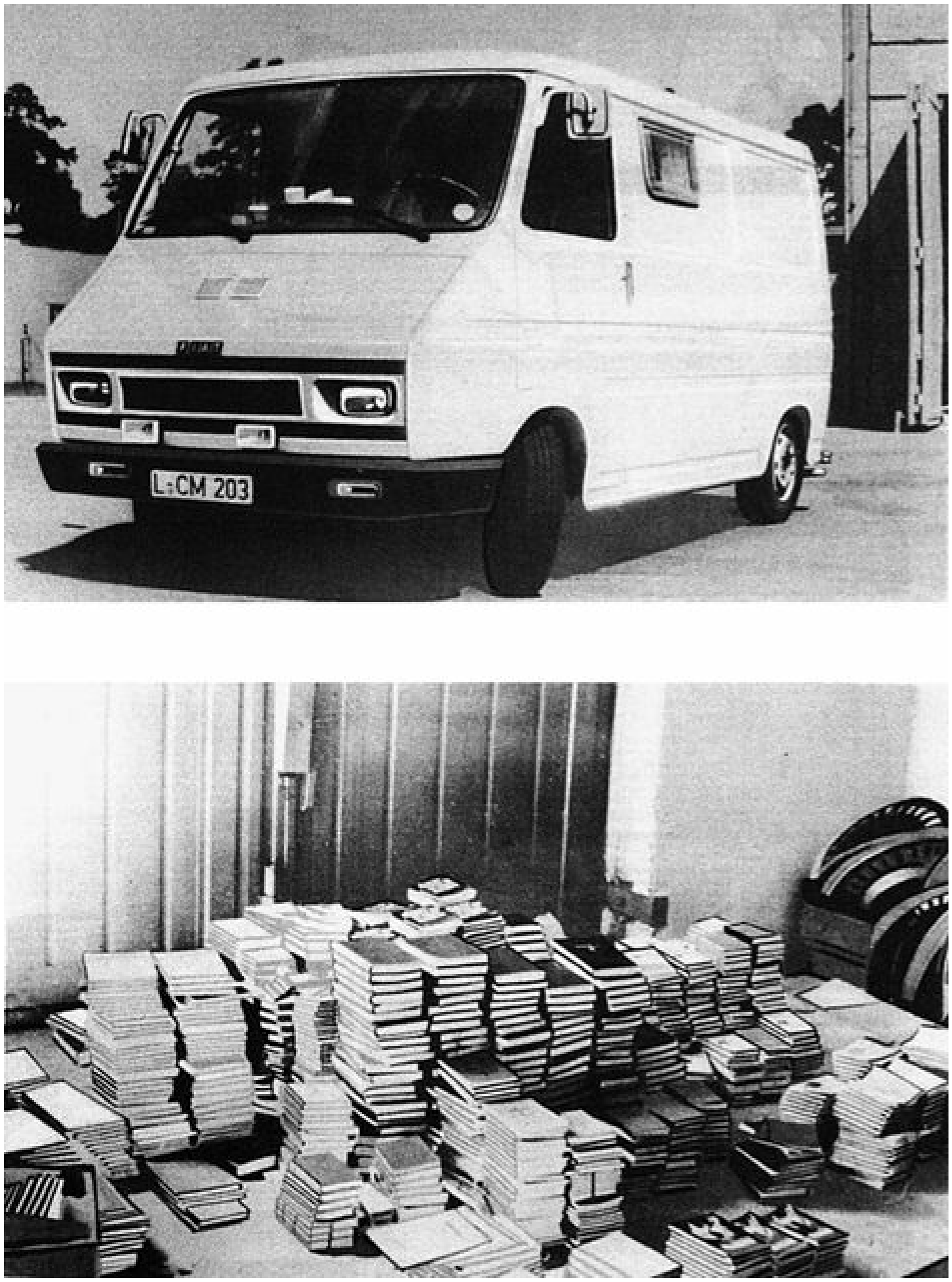


图**2 1980**年**6**月，东德海关在边境一辆从西德开往波兰的小型运输车里总共发现了**4080**本宗教书籍，藏在汽车各个隐蔽的地方

从研究方案来看，及时调查走访那些过境旅行的退休人士是最缺失的一项工作。用莱姆施泰特的话说，“他们被儿孙们肆无忌惮地变成了走私者”，“他们像在书商那儿正规订货一样，把政治上绝对无害的走私品带过海关”，为“在德国图书贸易史上赢得一席值得尊敬的地位”。[20]

尽管缺少这项调查结果，本次大会还是阐明了很多基本问题。

第一，经印制并传播的非法书刊数量大得惊人。一辆大众客车就能填满44000册耶和华见证人的《守望台》[21]。各个不同领域的人士都一致认为，无论是50年代西德发行的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册和传单，还是海关和邮政查抄图书的统计数据都说明西德图书生产市场的超高活跃性。据海关统计，比如1979～1980一年半的时间里共检查了140600件装有宗教书刊的大宗货物和小包裹，其中28437件全部没收，4302件部分没收，561件发回西德。[22]

这就引申出一个更有趣的问题：读者能见到的，也就是说比如被海关漏掉或者通过检查的是些什么样的图书，又有多少数量。当然我们无法根据统计数据给出一个笼统的回答，最终只有书贩和秘密读者知道答案，为此我们的会议纲领就起到了作用，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多种出发点。从邮政和海关的有效行动和薄弱环节，进入图书馆毒草柜的渠道，到耶和华见证人发明的种种技术手段，准确无误流传的巴赫罗《抉择》（*Alternative* ）的样本，《月份》杂志的传播网络，再到逃脱海关检查的商业性唱片走私，一切都要具体现象具体分析，但总体上都证明了图书消费市场的繁荣活跃，毫不逊色于图书生产市场。

秘密阅读的纷繁多样的对立世界引发出了更多的问题，这样一来，一种“秘密阅读经济学”便粗具雏形。实际上这场同审查的交易和审查本身一样历史悠久，早在16世纪，教皇设立禁书单以及意大利特兰托宗教会议上建立防疫封锁线的决议对保护天主教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荷兰的印刷商和书商就利用因图书被禁而扩大的读书需求，向两边推进贸易。这样的贸易能达到什么样的规模，达恩顿在讲述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作品中，以一家事业蒸蒸日上的瑞士出版社以及百科全书的传播为例给出了回答。[23]

“东德秘密阅读经济学”可以首先以此为出发点：出于政治原因剔除

西德图书的行动得益于外汇差价而披上合法的外衣，由于外汇差价西德图书价格翻倍，对每一位东德民众都产生了影响。还有国家图书总局的外汇储备短缺，只能优先用来购进学术书刊。

面对这样的现状，西德方面开始发放非法刊物，比如《月份》杂志。除了反对非人道战斗团这样的战斗组织，我们还听说不下50个这类传播刊物的团体都出现了日益繁荣的援助经济。在东德，特别受欢迎的图书还促成了交易所的出现和黑市交易机制的形成，比如看卡尔·麦的书能缩短购买汽车的等待时间，比尔曼的有声读物售价绝对超过200东德马克。

就连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在东德出版的世界文学图书也成了“热销品”，在大众书市上很快一售而空，只有通过最硬的关系才能搞到，所以来自西德的特许出版物都以超大印数发行。1991年被揭发的图书加印事件虽然是违法的，但却有力地说明了读者们对西方图书的巨大需求。像美国推理小说家钱德勒（Chandler）的《湖中女子》，并非如合同及官方统计数据所称印数是30000册，而是240000册，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St.Exupéry）的《小王子》不是出版了98000册，而是388000册。[24] 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在两德统一后对其非法印制的图书总共须赔偿1200万，利润都流入了统一社会党的账户，这样，统一社会党凭借因图书审查而扩大的读书需求，让自己有条不紊地发了一笔横财。这条值得关注的价值链最终在碎纸机里，在德意志图书馆的封锁书库里，或者在中央旧书局进行图书再出口的时候结束了。

关于“秘密阅读的技艺”值得特别写一个篇幅。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可以回溯到以前的图书印制方法，因为先进的图书复制方法已被国家垄断。从手抄、背诵到手工印制艺术家手制书，各式各样的办法犹如剧场保留节目一般，令人看了不由得发出赞叹。

耶和华见证人的做法是把文稿藏在李子干里，或者化在蜜蜡里。雷

纳·埃克特（Rainer Eckert）用了一招，是他在研读普鲁士海关资料时发现的：用十字金属线把书捆绑起来藏在火车厕所马桶下面。另一方面，西德策划秘密阅读的组织者采用更上乘的技术手段，邮政审查官的X光设备里还存有图像为证，比如用无线电广播为图书做宣传，利用西风和热气球，还有用定位精准的火箭分发传单和宣传手册，耶和华见证人则利用起微型电影胶片。

不仅海关和毒草柜的看守人，还有利用白灰黑三种不同掩藏手段的西德倒运图书的组织者，都让我们了解了官僚统治的变化发展。审查措施通常都是面对各种非透明又存在内部官僚现象的问题及一种看不见的竞争力结构做出的反应，所以审查措施像是偶然现象，很难被秘密读者发觉。

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审查官面临的一些问题：圣诞期间的包裹数量太大，而且很麻烦的是，审查官总要对禁书目录上没有的新书新册子做是允许通过还是没收的决定，在不断接受思想灌输的同时，自我防线肯定会失去免疫能力，最终变得脆弱不堪，帕特里夏·采卡特（Patricia Zeckert）也讲到一位审查官参观书展时偷了一本色情字典。还有一些秘密读者肯定感兴趣的是铁路和邮政，哪个方式更适合图书走私，并且何种方式在何时适合何种图书，是否能在柏林国家图书馆借到一本在莱比锡被禁的图书。然而这些事后认识掩藏了一点，就是参与图书走私的人在当时面临着一个难以预料的“黑盒子”，必须小心谨慎地试验自己的活动空间。

秘密阅读、书展行窃和走私图书在当时要冒多大的风险，如果被抓到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统一的答案。散布图书的动机、没收图书数量及图书带来的政治轰动性都是量刑时要考虑的因素，从强制长期监禁——像东德初期，巴德尔·哈泽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就遭受了牢狱之灾，此外这也是当局对耶和华见证人长期实行的惩处

办法——还有国安部敲诈勒索，再到例行公事般地没收图书并且不予上报等，惩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就像秘密阅读非政治类实用书籍在这里被视为大众现象一样，可以利用石蕊测试这种很好的调研方法，来展现审查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贯彻实施，比如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与专制独裁的日常交涉体验，包括应对专制如何统筹安排、采取了哪些投机手段，以及最终如何准备反抗专制。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是，秘密读物本身扮演了哪些政治角色。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大量信息基本上自由开放，很容易令人低估文字的危险性。但在审查体系下，各种不同的图书文字无论在得到政府的批准还是被政府禁止后都带上了政治色彩，进而具有了轰动效应。这样，秘密阅读作为反抗本身的最简单形式被赋予了一层象征意义。

此外还有很多自传式的事例证明政治热书如何对个人产生震撼而又深刻的影响，就像奥威尔的《1984》对于巴德尔·哈泽一样。学者托马斯·克莱因（Thomas Klein）提出了一个具有吸引人的问题，这种私下里推行的秘密阅读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以小型团体的方式运作，并最终和精心策划的反对派公众一同从事着具有危害国家倾向的全新活动。

但是与秘密阅读的常态相比，这是个例外情况。在40年两德共存的背景下，这种常态是可以理解的，秘密阅读不正是证明了广大群众超越东德而扩及整个德国的努力和追求吗？过于推崇哲学的目的论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西德最受欢迎的热销书中没有多少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著名作品，如作家艾特马托夫（Aitmatow）、拉斯普京（Rasputin）、田德里亚科夫（Tendrjakow）和特里福诺夫（Trifonow）等人的作品。如果将秘密阅读的对立世界置于适当的背景之下，就要看到东德获得印制许可的批判当代现实的纯文学作品得到了广泛接受，还

要看到文学界批判性公众的形成，他们拥有的可信度还是来源于各个重要作家反抗审查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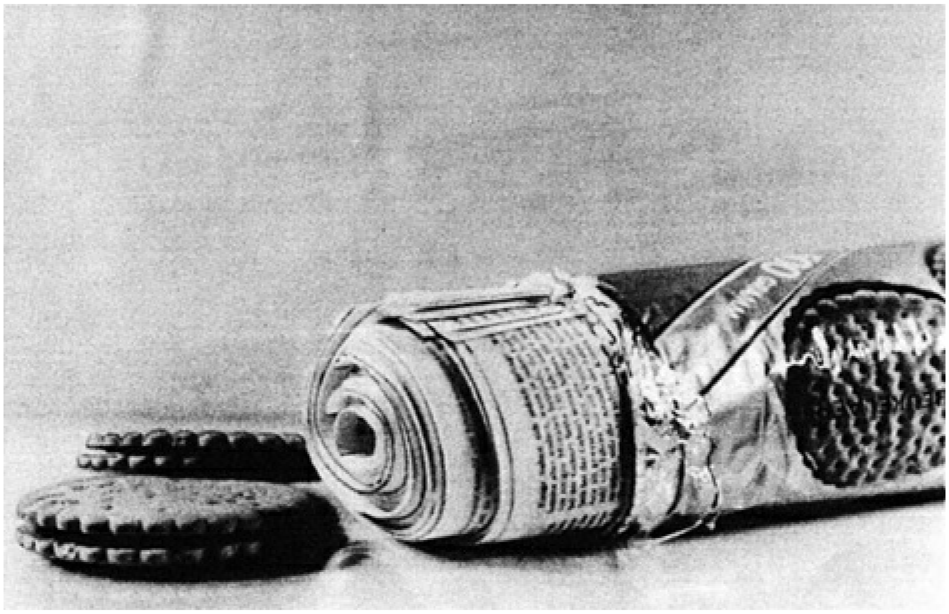


图**3** 海关抓获的报纸走私附属走私品

秘密读者们也读了很多公开发售的书刊。最后简而言之，研究秘密阅读要建立起广泛的维度，从允许读书、容忍读书到出于文化政策需要而读书。众所周知，东德是一个“读书的国度”，或者用作家约翰内斯·R.贝歇尔（Johannes R.Becher）的话说是一个“文学社会”更好，这并非是完全凭空而谈的。看看公布于众的审查档案、国安部档案以及90年代初的图书加印丑闻，再看看统一社会党图书贸易的财政盈利机密，就会得到新的认识，某些神话传奇便不攻自破。在这个“读书的国度”秘密历史背后隐藏着哪些神秘的未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利用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将当代视角和过往经验融入未来的多样性之中并互动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更广阔翔实的蓝图。

---

[1] Knobloch，Heinz：*Mit beiden Augen. Mein Leben zwischen den Zeilen*，Berlin 1997，S.123f.

[2] Peter Fix在为大会拍摄的电影《Gift für die Republik》中说道。该电影在一门有关莱比锡图书学的讨论课基础上，于2007年拍摄而成，导演、策划及剪辑分别为Tina Stepan，Anika Heintze和Geraldine von Googswardt。

[3] 《华氏451度》为美国作家雷·布拉德伯里所著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压制思想自由的世界，不允许人民持有图书，一旦发现一概烧掉，最后一群人只好把书整本地背下来。华氏451度是纸的燃点。此书后经改编拍成同名电影。

[4] 参阅Westdickenberg，Michael：*Die “Diktatur des anständigen Buches”. Das Zensursystem der DDR für belletristische Prosaliteratur in den Sechzigerjahren.* Wiesbaden 2004。

[5] 参阅Darnton，Robert：*Literaten im Untergrund. Lesen，Schreiben und Publizieren im vorrevolutionären Frankreich.* Frankfurt a.M.1988。

[6] 参阅Gittig，Heinz：*Illegale antifaschistische Tarnschriften 1933-1945* . Leipzig 1972。

[7] 参阅Bräuer，Siegfried；Vollnhals，Clemens（Hg.）：*“In der DDR gibt es keine Zensur”. Die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und die Praxis der Druckgenehmigung1954-1989* . Leipzig 1995；Mix，York-Gothart（Hg.）：*Ein “Oberkunze darf nicht vorkommen”. Materialien zur Publikationsgeschichte und Zensur des Hinze-Kunze-Romans von Volker Braun.* Wiesbaden 1993；Walther，Joachim：*Sicherungsbereich Literatur. Schriftsteller und Staatssicherheit in der DDR.* Berlin 1996；Wichner，Ernst；Wiesner，Herbert（Hg.）：*“Literaturentwicklungsprozesse”. Die Zensur der Literatur in der DDR.* Frankfurt a.M.1993。

[8] 英译本名为《中午的黑暗》。——译者注

[9] Bericht betr. Unentgeltliche Einfuhr von Literatur u.a.Druckerzeugnisse aus Westberlin und Westdeutschland，10.11.1959.BArch DL 203，294，AZKW，HA 2.参阅Vorlage für die Dienstbesprechung beim Minister，Begründung，S.4.BArch DL 203，294，AZKW，Leiter。

[10] Bericht zur Ein-，Aus-und Durchfuhr von Druckerzeugnissen，15.7. 1959.BArch DL 203，294，AZKW，HA 2.

[11] Lehmstedt，Mark；Lokatis，Siegfried（Hg.）：*Das Loch in der Mauer. Der innerdeutsche Literaturaustausch*（*Das Loch*）. Wiesbaden 1997.

[12] Barck，Simone；Langermann，Martina；Lokatis，Siegfried：*Zwischen*

Mosaik und Einheit. Zeitschriften in der DDR . Berlin 1999.

[13] Houben，Heinrich Hubert：*Der ewige Zensor* . Berlin 1926.

[14] Hurwitz Harold：*Der heimliche Leser.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des geistigen Widerstands.* Köln 1966.

[15] Analyse der Schieber Tätigkeit an der Sektorengrenze im Monat Dezember 1955，21.2.1956.BArch DL.203，127，15-0100.

[16] De Bruyn，Günter：*Vierzig Jahre. Ein Lebensbericht* . Frankfurt am Main. 1996，S.111.

[17] Lehmstedt，Mark：*Im Dickicht hinter der Mauer-der Leser* （后简称为：Im Dickicht）. In：Lehmstedt；Lokatis（Hg.）：*Das Loch* ，S.348-357.

[18] H.M.：*Kempe und "Der Mord im Sonderzug"* . Berliner Zeitung，22. 11. 1955.

[19] Christoph Demke记述过的一段回忆性文字对此很具有代表性："每到夜晚我们都读《夜霜》，就像我们1968年时晚上听布拉格的广播，穿着长睡衣辛苦地蹲在收音机前［……］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了来自西德常设代表处的朋友。差不多应该是1979年。我妻子和我换着读，只有几天的时间，因为还要把书继续传给别人。我们就在夜里看书，一页接一页飞快地读［……］我不得不说：最新的书刊让我很失望。那本书当时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明显完全依赖于当时的读书环境，那种环境早就不复存在了。"摘自Horch und Guck 53/2006，S.22f。

[20] Lehmstedt：Im Dickicht，S.355.

[21] "一位西德人（联邦邮政的工作人员）去参观书展，把书藏在一辆小巴士的侧板和顶板，试着偷带出境运往东德，总共有44149本书刊和174盒耶和华见证人的录音带［……］还有一次，一个西德人和一个挪威人一起将39653本波兰语和俄语的教会小册子、图书还有1000张唱片藏在一辆为此特制的小轿车里（车内还加了两层底板）偷运到波兰。"Information der Zollverwaltung der DDR，7.8.1980.BArch DL 203/294/04-07-05。

[22] "一位西德人（联邦邮政的工作人员）去参观书展，把书藏在一辆小巴士的侧板和顶板，试着偷带出境运往东德，总共有44149本书刊和174盒耶和华见证人的录音带［……］还有一次，一个西德人和一个挪威人一起将39653本波兰语和俄语的教会小册子、图书还有1000张唱片藏在一辆为此特制的小轿车里（车内还加了两层底板）偷运到波兰。"Information der Zollverwaltung der

DDR，7.8.1980.BArch DL 203/294/04-07-05。

[23] Darnton，Robert：*Glänzende Geschäfte. Die Verbreitung von Diderots Encyclopédie oder Wie verkauft man Wissen mit Gewinn.* Berlin 1993.

[24] 见柏林艺术学院收藏的人民与世界出版社档案中的印数统计。

迷宫与窗户

大墙后迷宫中的读者 [1]

马克·莱姆施泰特（Mark Lehmstedt）

在过去两天半的会议中，我们以1945年后两个德国的界定与合作为背景，针对图书的印刷发行和贸易问题已经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然而对其中一个层面却完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可以说彻底忽略掉了，这就是读者。毕竟图书的受众是读者，图书是否遭到禁止直接对读者产生影响，因此至少在大会临近结束时将读者作为主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但作为读者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对很多讨论过的问题根本不了解，或是仅有一种十分模糊的想象，他们积累的完全是自己的经验，随之也就产生了各自看问题的视角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

接下来我在讲到有关读者的各方面时，重点既不是具体有哪些西方图书在东德找到了读者，更不是读者如何阅读这些图书这个还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探讨的问题十分简单：东德读者有哪些渠道可以接触到西方图书。我的资料来源不是档案数据，而仅仅是通过对一些人进行访谈获得的回忆性信息（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回忆）。我的民意调查绝对不求具有代表性，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还有待进行，大家可以期待通过这类调查而有更多的细节浮出水面。

首先我想进行一些铺垫：

1.对“Literatur”一词我自然不是取其狭义——纯文学，而是取其广义

——一切以印刷品的形式公开销售的东西。不过在此我先将报纸和大众刊物尽可能排除在外。

2.从东德读者的视角出发，那么历史进程中的差异是务必要考虑到的。1961年之前两德边境开放时与柏林墙建立后的近三十年，接触西方文献的渠道可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在1972年的《基本协议》以及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宣言》）签署前后也有很大区别。

3.就像历史进程中的差异一样，东德的不同区域也有差别，一般划分为两部分：柏林与“共和国”。除柏林外，其他几个大城市也有特殊意义，首先是那些大学城以及有深厚历史渊源而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底蕴的城市，特别是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当然也包括耶拿、哈雷、罗斯托克和格赖夫斯瓦尔德。

4.最后不能忽略的是七八十年代东德一项读者社会学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读者的主要阅读年龄期基本上随着进入职场和建立家庭而结束。这意味着从20岁到30岁，读者的数目、读书所用的时间以及所读的书籍数量均急剧下降，这当然不包括职业读者或因工作需要所读的书。

“西方图书”这一概念对东德读者而言首先意味着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的书籍。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出版物仅对小众才有一定意义，这类人群被称为科技知识分子，可能还包括一些以生产出口产品为主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才。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要想阅读此类书籍必须掌握外语；重要的非德语世界文学，东德读者当然可以读德语译本，但这肯定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纯文学领域。

从40年代末起，对东德读者来说西方国家的书籍就是特别的书籍。无论其内容如何，它们均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在东德境外的地方出版，也就与本地出版发行的书籍相反，没有接受过必须的标准审查。每本东

德自己出版的图书，仅仅鉴于它是在本地出版的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它符合相应的标准。哪怕放大或者破坏了迄今为止的（各类）标准限度，它也被打上了党与国家权威的印记。而东德境外出版的图书虽然并无害处，本来也并无恶意，因为在境外出版而无须获得党（领导）和国家的明确批准，不受这种调控机制的束缚，因此不光对于秘密警察和海关人员，就连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它们始终都有足够的理由“引起怀疑”。来自西方的图书是“异常”的，处在必须遵守的标准之外。

在出版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差异解释了西方图书为何具有特殊地位，即使在东德可以合法购得这类图书，它们仍旧享有这种地位。毫无疑问，最大数量接触西方图书的渠道（至少从1961年起）当属东德各出版社推出的授权版本，即德语原版以及德译版本（此外还有西方其他语言译本）的特许授权版。尽管这些版本在东德也得接受标准审查并且必须获得认可，但其文字内容毕竟不是在东德写作条件下写出的，更不是着眼于东德标准体系写就的。因此这些书处于标准之外，起码或多或少地游走于灰色地带。

罕见的是，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那些（为数不多）虽然冠有西方出版地和出版社的名字，但在东德书店却能买到的图书。这方面首屈一指的当推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如帕尔-鲁根斯坦（Pahl-Rugenstein）和勒德贝格（Röderberg）出版社，还有出版马克思主义期刊的出版社。先不说这些都是德国共产党自己的出版社，或是亲德国共产党的，因为这些出版社的出版物涉及的政治题材非同一般，甚至有被禁止的题材，而且其表述风格也不像人们所熟悉的迪茨（Dietz）出版社那么平淡无奇，所以在东德肯定会特别吸引读者的兴趣。［在东德唯一一本通过正常渠道可以买到的有关罗伯特·哈费曼（Robert Havemann）、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和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的书，是罗伯特·施泰格瓦尔特（Robert Steigerwald）的《“真正的”或反革命的“社会主义”：哈费曼、杜奇克和比尔曼想要什么？》（*Der “wahre” oder*

konterrevolutionäre “Sozialismus”. Was wollen Havemann，Dutschke，Biermann？），1977年由位于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的马克思主义期刊出版社出版。这样在东德就可以以完全合法的方式阅读该书中所引用的上述三人已发表的文章。]

在东德书店中出售的除了少量西方出版物外，就是上述马克思主义文献了。当时读者根本不清楚，比如苏黎世第欧根尼（Diogenes）出版社的许多书以及英国的泰晤士&哈德森（Thames & Hudson）艺术书籍出版社的书如何能够进入东德市场。（我所知道的这些书肯定不是在东德的印刷厂印制的。）

除了正规的书店，甚至与西德之间正式的图书贸易也成了一种渠道。70年代末在东德知识界突然兴起了一份订书单，谁想要慕尼黑汉泽尔（Hanser）出版社的尼采选集三卷本，或是卡尔·施莱希塔（Karl Schlechta）的三卷本《尼采传》，或是威斯巴登的因泽尔（Insel）出版社的六卷本叔本华选集，可以在上面登记预订（自然是用东德马克按1∶1汇率兑换），订购的读者还真的把书拿到了手中。至于这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背后隐藏哪些原因，当时的读者百思不得其解。毕竟那个时候各家出版社的相应计划一再受到冷遇，东德的出版社出版尼采或叔本华的著作还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甚至1987～1988年时还公开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探讨东德是否允许出版尼采的作品。这样看来，上面提到的三部作品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恰恰是在科技领域有更多的西方图书以同样的方式流入东德买主的手中，当然每种书的销售量要相对少得多。

版权贸易肯定是60年代才开始繁荣起来的，而50年代，确切地说是在1961年8月13日之前，另一个获取西方图书的渠道是在西柏林（也包括西德，但条件限制很大）买书，该渠道无疑占了主导地位。西柏林作为前沿城市，在为东柏林的居民提供图书、报纸和杂志方面的作用无论

怎样高度评价都不过分，对此也迫切需要进行独立而详细的研究。东德对外及两德贸易副部长库尔特-海因茨·默克尔（Curt-Heinz Merkel）的一段话非常富有启发性，他在1958年5月17日写给文化部副部长埃里希·文特（Erich Wendt）的信中提到，根据东柏林刑警提供的资料，“1957年仅在东柏林就有40万册漫画书被没收”，而在1958年前四个半月内又有“近8万本已经”被没收。这些数字不仅让人猜想到经西柏林流入的出版物数量之巨大——有多少逃脱了查抄？！——而且同时令人确信东德读者的首要阅读兴趣根本不在于那些经图书学的标准衡量过的经典之作，也不在于那些文学史或科学史著作中经常出现的阳春白雪之作。

当然黑市的兑换率一般是5～10个东德马克才能换到1个西德马克。在这种条件下，一本在西柏林买的书就获得了很高的物质价值，相当于一天甚至几天的劳动所得。（一本平装袖珍版书售价2西德马克=10～20东德马克，50年代每月26个工作日的月平均收入为400东德马克，这意味着日收入约为15东德马克，一本书的开销至少等于0.7～1.3个工作日的所得；一本精装书售价7.5西德马克=37.5～75东德马克，为此甚至要工作2.5～5天！）其后果不言而喻：如果不是总归得从东德人感到眼花缭乱的各种不同报纸和（大众）杂志中进行抉择，买书时人们首先尽量挑便宜的，也就是买平装袖珍版的，或是偏爱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冒出的小册子（如前面提到的漫画）。在内容方面也严格筛选，只买非买不可的，也就是确实想读的，此外还得是适合一读再读的。这同时对读者的读书态度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由于不菲的价格和书市的特殊情况（换钱自然是非法行为，把印刷品带入东德同样是不允许的），读者对书和杂志收藏得格外精心，读书时也更为全神贯注；即使那些读后本该扔掉的小册子，都被作为经典的可反复阅读的“精读”对象收藏起来。物以稀为贵，因得之不易所以还私下互相借阅，这样每本书的读者数量就更多了，通常情况下这是难以想象的。此外这些书籍还代代相传：50年代在西柏林买的书，10年20年后，孩子们就开始读起了父母书柜中的图书，到了80年代甚至孙子辈的也开始读祖父母书柜中的书了。（仅举一个例

子：我有达姆施塔特现代图书俱乐部1958年版的《尤利西斯》，而东德版本1980年才在民族与世界出版社出版，我不知道我母亲是如何弄到1958年那一版的。然而可能50年代西德的各种图书俱乐部因其物有所值的图书价格，对东德读者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黑市汇率让西方图书几近天价，所以起码在西柏林，对于住在轻轨可达范围内的东德居民的读书生活来说，图书馆业——从美国纪念图书馆到各占领区附近特别密集的商业性图书出租店——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西德方面也花了大量财力来支持，像波恩政府向西柏林与文化生活有关的众多机构包括图书馆给予了大量经济补贴，让这些机构更好地为东柏林和东德居民提供服务，这些服务有些收取东德马克，有些甚至是免费的。

1961年东德边境封锁后，就基本不存在在西德购书的可能性了，借阅就更不用谈了。这么一来上面提到过的版权贸易和本地图书馆的图书供应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

戈特弗里德·罗斯特（Gottfried Rost）和赫尔穆特·勒策施（Helmut Rötzsch）在他们的发言中已经谈到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的杰出作用。1945年以后，一代代的大学生、科学工作者和教授们一直把这座图书馆作为或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图书馆来使用（或者从那里的图书管理员的角度来看：滥用）。德意志图书馆的作用不仅仅限于为莱比锡市的读者提供服务，全国各地的读者都来这里借书，因为只有这里藏书丰富，能借到很多西方图书，而东德其他图书馆借阅西方图书需要特别批准。

除德意志图书馆外，西方文献馆藏丰富的首推柏林国家图书馆、德累斯顿和哈雷的州立图书馆、魏玛德国古典文学中心图书馆以及各大学图书馆，还有到目前几乎还没提过的各工商企业、研究院与学会的内部图书馆体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在各自领域中收藏的西方文献特别是期刊数量可观。然而一般来说这类图书馆只对内部员工开放，不是

人人都可借阅其藏书。

上述各类图书馆不仅为公众及某些特殊群体提供西德出版的图书，而且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它们还提供东德各出版社购买版权后出版的图书，这一点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鉴于众所周知的事实，许多这类特许授权出版的书在书店供不应求。特别是这类东德特许版本也在那些根本没有外汇额度无法购买西方出版物的图书馆上架（如各市、区、乡镇的公共图书馆、青少年图书馆、企业图书馆等），在这些图书馆读书的是“一般”读者，这样的读者基本上不会误入某所学术性图书馆，而且也没有机会去专门的企业或机关内部图书馆。

还有要说明的是，除了在图书馆内读书和公开合法外借图书，有些图书馆工作人员还私下为其亲友非法借书，通过这种方式，一些禁止公开流通的图书便到了没有特许借书证的读者手中。这样非法借阅西方图书在极端情况下能够达到什么规模，从柏林国家图书馆一位负责人的故事中可见一斑：他把特种书库中的上百本非借阅图书拿回了家，不说数年，也至少有数月用这些书办了个流动图书馆。当然他最后为此进了监狱。

东德读者在布拉格、布达佩斯甚至是在莫斯科（少数）几家书店中也许能以最民主的方式，不受来自社会方面限制地自己购买西方出版物。这些书店通常都有平装袖珍版的卡夫卡、黑塞、萨特、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人的作品，但也有通俗文学［比如法国和比利时风格的漫画书《阿斯泰利克斯》（*Asterix*）或《丁丁》（*Tintin*）］，这些书自然数量十分有限，具体能碰到哪些书纯靠运气，而且价格不菲。顺便说一句，在布达佩斯也能买到西方非德语国家的报纸，如法国的《世界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和美国的《国家先驱论坛报》。可蹊跷的事还在后面，在布拉格、布达佩斯或莫斯科的国家书店，甚至在政党的下属书店完全合法购买的图书、报刊和

杂志在过边境到东德的时候还是完全有可能被海关没收，这时候指给海关看上面写有卢布、克朗或者福林价格的赫赫有名的印章也于事无补。

几十年来莱比锡书展一直是东德文学界的盛事。出版商克劳斯·G.绍尔（Klaus G.Saur）等人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该书展对东德所有读书迷的重要意义，它让人有机会全面了解西方出版社的出书信息：一方面通过书展上展出的书籍，读者可以在各个展台把书拿到手中翻阅，站功好的还能在那里把书从头到尾看完［甚至像沃尔夫冈·希尔毕西（Wolfgang Hilbig）报道的那样，居然有人在那儿用手抄书］；另一方面免费发放的图书目录一般收录了所有可供货的图书，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又让人气馁，因为这些书在东德一本也买不到。倘若有人试图得到一本在莱比锡书展展出的图书，要么通过偷窃（虽然西方书商不愿看到图书被偷，但他们对此常常能宽容对待），要么反过来西方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在尽可能远离展览馆的地方赠送图书，比如有些出版社［如乌尔斯坦（Ullstein）出版社］整箱整箱地送，一旦这样就离违法不远了。

定期参观书展会令读者很纠结，因为看到书展上有如此众多的书籍，大家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不能在街角的书店中买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几乎每个人有意或无意间都遭受过这份罪。大概每个参观过书展的读者都能回忆起当他或是她琢磨着如何才能至少搞到一两本认为特别重要的书时，就陷入了一些荒诞又经常令人十足绝望的思想迷途。

特别是1972年以后，两德之间的旅游往来就成了获取西方出版物最重要的大众化渠道。在这方面家庭关系自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图书史的角度来看，家庭联系占多大份额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10%、40%或者甚至80%的东德家庭在西德或西柏林有远近亲戚，他们中有多少人和这些亲戚至少不定期地保持联系？）退休者成了东德倒运西方图

书最重要的“书商”，他们被儿孙们肆无忌惮地变成了走私者。他们像在书商那儿正规订货一样，把政治上绝对无害的走私品带过海关，这么一来他们在德国图书贸易史上就赢得了一席值得尊敬的地位。

1972年后两德旅游往来越频繁，在交界另一边有家庭以外的熟人和朋友关系也就越重要。在这方面大家尽可能地以物易物：100东德马克的图书（或其他物品）被寄往西德，为此，视友谊程度而定可以收到价值10～100西德马克的图书。这些书或被带来（也就是走私）或被邮寄，常常遭到没收，从而给被牵涉到的人带来了麻烦。虽然以这种方式流入东德的图书数量有限，但从整体上看也不能过于低估这类需求对西德出版社和书商的经济意义。

在这种图书交换体系中，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科学或其他方面建立的联系从一开始就发挥着一种特殊作用。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凭借他们的业务关系，系统地安排同行们将各种专刊从世界各地邮寄过来，便能够建立起正规的拥有西方文献的图书馆。教会的“干部”在这方面也起着特殊作用，此外就是70年代初开始数量飞速增加的外交人员、商务代表以及在东德工作的西方记者。所有这些人都往东德带报纸杂志，数量多得往往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从柏林开始，走到哪儿散发到哪儿。此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也可以自由出入东西柏林不受检查，所以未必是他们本人，但他们的孩子肯定就成了为同学们带书的人。

东德读者无论想以什么方式拥有西方图书，都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先不考虑他的购买力十分有限（无论是亲朋好友送给他们的西德马克，还是准备去黑市上兑换的东德马克），他们不光要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图书中进行选择，而且首先要想想，一台钻机或是一张阿特·塔图姆（Art Tatum）的唱片对他来说是不是比一本书更为重要。因为要知道，一本书除了要跟其他媒体产品还要和所有产品竞争，而最终获胜的常常

不是书籍。

就从东德读者的视角出发，无论是1948年的货币改革还是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都没有彻底分裂德国的图书市场，反而形成了一种多层次获取西德出版物的体系。其特点是传统的商业获取模式一定程度上被前现代化的非商业获取模式所取代；但后者仍具有的商业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以非机构化的形式（出版社和图书贸易）显现出来。同时需要强调之所以能够保持跨边境的联系往来，首先是因为两个德国的出版业自50年代初就发展了多种商业合作模式（特许授权版本、代印和代销等），就像国际上不同国家间常见的那样（在这方面对两德间的关系与同样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英美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肯定会很有启发）。出版业，还有不能漏掉的图书馆业以复杂的方式同时为德国战后政治和经济秩序起了稳定化和非稳定化作用。

很难断言，在全部阅读的书籍中西方文学对东德读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因为它们对不同年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人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当然还要考虑到文本体裁。从宏观上看，意义最大的大概要算一些纯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非诗歌和非戏剧作品），至少东德读者的核心像西德读者的核心一样熟悉西德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纯文学经典之作，这些作品在东德拥有的读者群体从社会意义来看恐怕比在西德还要广。而相反，只有很少一部分读者对纯政治作品感兴趣，图书审查、监控以及封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奏效的，但是有两本西德出版社出版的政治书籍（特点是作者生活在东德），对1989年夏秋之际一个国家整个体系的崩溃起过重要作用：罗尔夫·亨里希（Rolf Henrich）如今显然完全被遗忘了的论文《行使监护权的国家》（*Der vormundschaftliche Staat* ）和瓦尔特·扬卡（Walter Janka）的《真相难白》（*Schwierigkeiten mit der Wahrheit* ）。当然，扬卡的那些自传体文字只有脱离了印刷品的形式，通过1989年10月28日在东柏林德意志剧院的朗诵会上还有经电台与电视台转播变成口头传诵的东西后，其炸弹般的爆破力才充分显示出来（幸

好部分作用效果被专门记录在了另一本书中）。

在此我还要谈到现代化电子媒体传播方式，也就是电台和电视台，从东德读者的角度看，它们又为获取西方图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东德的统计年鉴中不难发现家庭配备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数量呈上升趋势。自70年代初国家不再系统地对收听与收看西方广播和电视进行干扰以来，就出现了一种不受国家监视和控制的传播体系，令国家花费力气建立起来的整个标准监控流程显得十分荒谬。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毫不费力（也几乎不冒任何风险）地参与西方政治、文学、哲学、自然科学及所有其他领域的讨论，其中也包括以书籍为主的讨论。由于有了录音带，70年代起又有了盒式磁带录放机，人们可以借此创建自己的图书馆，还可以复制后在私人圈子内流传。许多在东德多年后才出版或者根本没有出版的书籍，都以这种方式传入东德，虽然没有到达读者手中，却到达了听众耳中。比如我记得1977～1978年间曾听过伦敦英国广播公司（BBC）一连数周播出的英文版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Archipel Gulag* ），没过多久还听过自由柏林广播二台播出的恩岑斯贝格（Enzensberger）针对“再社会化”所写的匕首般锋利的小品文。我在什未林的朋友们有一整套电台播出的作家作品朗读会的录音剪辑，从海因里希·伯尔到齐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再到君特·格拉斯，应有尽有，还有几百种比尔曼的科隆音乐会剪辑。

东德读者接受西方图书后受到了哪些影响，如果可以梳理的话，也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提炼出一些基本的模式，当然前提条件是，为德国书商与出版社协会历史委员会的以出版商和书商为侧重点的口述历史项目提供系统性和有代表性进行的读者调查结果。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也正是从事历史性阅读研究或读者研究的学者希望看到的结果。此外还需一提的是，文字只要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读者或听众，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 “墙中洞：两德图书交流”会议发言稿，Leipzig 14.-16.September 1996.发表于同名会议录音带，Wiesbaden 1997，S.348-357。

东德社会公众与秘密使用媒介

米歇尔·迈恩（Michael Meyen）

1.一种原本不可能存在的现象

按照德国当代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观点，“秘密使用媒介”是不可能存在的，其在1996年提出将大众传媒称作“社会的记忆”。[1] “大众传媒系统”将各种信息散播得如此之广泛，以至于接下来就必须假定这些信息已经众所周知——或者假定对信息的熟知度至少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只有当人丧失身份地位才能承认对信息一无所知。卢曼将这一功能称作“记忆”，因为每次进行信息传播时，都可以认为其他人已经具备了同样的背景知识。按照这种对“大众传媒系统”的解读方式，“秘密使用媒介”便失去了意义。

同样，“秘密”和“公开”这两个概念第一眼看上去并不匹配。“秘密”发生的事情如何与“公众”相联系？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格哈茨（Jürgen Gerhards）和弗里德海姆·奈德哈特（Friedhelm Neidhardt）将“公众”描述为一种原则上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参与的“讨论系统”，这种讨论系统具有的功能对于政治就像市场的功能对于经济一样，并且在复杂的社会下，没有大众传媒形成不了讨论系统。我们都知道，这样一种作为“讨论系统”的公众在东德是不存在的。

大众传播

- 东德媒体（“政治上精心策划的公众”）
- 西方媒体（“广播媒体为主，也包含其他出版机构”①）
- 反对派公众（“非官方公众或反公众”②）

公开活动

偶遇（“小众”）

① Silberman, Marc: *Problematizing the "Socialist Public Sphere": Concepts and Consequences.* In: Marc Silberman (Hg.): *What Remains? East German Culture and the Postwar Public.*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 Studies. Washington 1997, S. 1－37.

② Bathrick, David: *The Power of Speech: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the GDR.* Lincoln and London 1995.

图**1 Arena**模式对公众的划分（格哈茨/奈德哈特 **1990**）

尽管存在“秘密”与“公开”的对立问题，格哈茨和奈德哈特的理论模式依然具有可行性，因为二人都将东欧变革的各种经验融入了Arena模式——首先一条经验就是，即使没有大众传媒也能实现传播过程，为社会变革做准备。格哈茨和奈德哈特区分出三种公众层面（见图1）：大众媒介传播、公众活动或集会以及所谓的“小众”（公车上、工作中以及酒吧里的谈话）。在Arena模式中，这三种层面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例如游行或集会是各种观点意见的试验场，“小众”的参与者及其言论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同时，“小众”能够接收并审查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对于东德的图书文献，图1这种模式要稍作改动，大卫·巴斯里克（David Bathrick）所称的“反对派公众”可能就要归入公众活动一栏了。[2] 像东德80年代由反对派或艺术家通常在教会背景下编辑出版的杂志《环境报》或者《两难选择》（*Grenzfall*）的读者就很少，几乎谈不上“大众传播”。[3]

虽然可以将这种公众模式解读为对东欧国家政治变革做出的反应，

但“秘密”这个概念在此所占的分量依然非常有限，对于接下来要谈到的西方媒体同样如此。在公众活动层面，最多能将密谋集会称为“秘密”使用媒介，但这必然不符合格哈茨和奈德哈特对这一层面的定义，在偶遇层面是指陌生人之间的交流：比如火车小隔间里碰巧坐在一起的乘客进行交谈，这个隔间里的乘客不一样，谈话的主题也不一样，这里就没有“秘密”可言了。

从这次会议纲要来看，“秘密使用媒介”的现象是肯定存在的。会议宣传中提到一个“全新的又极其广泛的研究领域”、各种“动力”和“策略”让东德民众投入这一研究领域当中，还有提到一堵“看不见的墙”，是这堵墙建立起了国家文学政策。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Siegfried Lokatis）在他的邀请函中将“秘密”一词翻译为“非法”，并且提及众多组织和联合会，还提到“特别难以获取”的图书和杂志，因为“经审查被海关隔离”所以“或多或少遭到禁止”。我们从会议纲要中便可了解到审查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后果：过境走私、图书馆里的“毒草柜”、非法读书圈子，还有手抄复制全部图书。在我的记忆中，我对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我在东德北部的吕根岛长大，那里被称为一个“一无所知的山谷”。[4] 虽然邻屋有各种西部牛仔杂志和英雄主义杂志可以借阅两天，像《拉斯特》（*Lassiter*），副标题为“那个年代最刚烈的男人”，但为了不让所有人都拿到杂志，对于村子里其他青年来说才算得上真正的秘密阅读。我记得有一次一家人的平安夜我们都很生气，因为从西德寄来的包裹破损得巧克力和咖啡都没法吃了，爸妈把责任归咎到住在西德宾根的亲戚，因为包裹底层放着三期旧的《时代周报》。而下次收到圣诞礼物时就没有报纸了。一次，班里一些同学在村子里的广场上放乌多·林登贝格（Udo Lindenberg）的歌曲《通往潘科的特别列车》，声音特别大，惹来了麻烦。后来服兵役的时候，如果上级进了房间发现没有按规定把东德广播电台做标记，接着所有收音机的调台旋钮上相应的位置都要被贴上白条。[5] 当时在我们所在的州首府罗斯托克最有诱惑力的是西德北部的“石荷州电台”。谁被逮住，一般就要上交收音机，服役结

束后能拿回来，一些人服完兵役离开兵营的时候带了三个收音机走。秘密收听广播在当时首先是个经济问题。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特殊的经历——80年代，小地方，一个一般的东德家庭，即使允许估计也没有人打开收听西德广播电台。时间、地点和社会环境早就不是影响媒介使用以及秘密体验的全部因素了。为将“秘密使用媒介”从社会学的角度定位，我将在第4章节就这一现象阐述我如何划分东德媒介使用者类型[6]，并且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讨论。第2、3章节首先讲的是本文所应用的原始资料，接下来是东德“秘密”使用媒介的背景条件。最后第5章节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对Arena模式进行修改以及如何修改，这样也将大会上的讨论内容包括了进来。

2.原始资料

我对东德媒介使用情况的两项研究已经对这里讲到的相关素材做了分析。第一项研究是有关五六十年代的电视传播，以及这种在当时看来的“全新媒介”如何改变了东西两德的国民日常生活，改变了其他媒介的使用情况。[7]民意调查结果是主要的原始资料来源。虽然东德60年代中期才开始进行具代表性的民意调查，但媒体人在此之前就已有意试着了解公众，因此试着通过分析公众来信，举行听众、观众及读者集会，在农村和小城市开展全民问卷调查来了解清楚公众反馈情况，此外还有位于波恩的全德事务部或者美国当局委托对东德难民和西柏林外来人群进行采访。这些调查研究虽然同样不具代表性，但都是匿名进行的。为检验、归类并权衡调查结果，我还以历史性数据分析法调出一些官方统计数据，包括文学及学术论文、流行文化讨论以及职业媒体观察家的评论。因为每种媒介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这种媒介的受众信息，所以我在一项系统化抽样调查中针对研究涉及的时间段，对统一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新德国》、媒体节目杂志《广播电视在手》和幽默杂志《厄伦施皮格》进行了翔实的分析。第二项研究有关80年代媒介使用情况，[8]这些研究结果作为资料来源重新得以利用。重新塑造这段时期西德广播电

视节目的影响力范围，这一要求虽然从未在研究中直接提出过，然而借助于听众及观众研究还是可以实现的。

此外，为了将东德媒介的不同使用情况展现出来，我们在2000～2002年间对100多个东德人进行了走访，了解了其生平经历（见图2）。各种媒介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哪些意义，对于这一问题，质性研究方法胜过一般性调查法。生平采访能达到的最好成果也就是在不要求完整性的前提下，记录一些典型的事例，而对于特别现象在整体人群中的分布情况，从来都给不出有启发性的结果。一方面有些人已经离世，或者年岁已高，很难回忆起往事。另一方面这种访谈的前提是，受访者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同一位陌生人讲述他的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阶层里，这两个方面不可能同时兼备。[9]

然而为了不使调查结果失去全面性，我们是按照“理论抽样”（或者也叫“理论饱和”）法选取的受访人群。这种方法源于“扎根理论”，该理论旨在针对某一现象来发展并归纳式地引导出扎根的理论。[10] 理论饱和法认为，某种研究对像比如媒介使用包含的形式非常广泛。[11] 研究这一领域，受访者必须尽可能具有多样性，决定选取哪些人作为受访者的标准也应不断补充调整，直到“新的采访结果”不能再提供新的信息为止——这个只有理论可行性，因为当采访了八九十个人后，每个人的生平都还可以挖掘出更多意想不到的细节。

性别和受教育程度

- 57 位女性，44 位男性
- 45 人具有高中或大学学历，56 人学历较低（初中毕业）。

出生年份

- 1930 年及更早：4 人
- 1931 至 1940 年：17 人
- 1941 至 1950 年：28 人
- 1951 至 1960 年：31 人
- 1961 至 1970 年：16 人
- 1971 年及以后：5 人。

其他说明

- 33 人在西德没有亲戚或朋友（标准是指至少定期通信）
- 28 人为统一社会党党员
- 23 人接收不到西方电视节目
- 21 人在东德的曾经居住地人口少于 10000
- 19 人有宗教信仰（标准是指 1989 年以前时常参与教会组织活动）
- 7 人在 1989 年 11 月 9 日以前逃往西德

图**2** 生平采访—抽样调查（**n=101**）

如何选取受访人，一方面以“使用与满足”理论和工业化社会媒介使用情况为依据，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对东西德媒介的使用及评价是与对社会系统持有的基本观点相关联的，使用媒介是出于社会情况和心理状况的需要。因此可以推断出，在东德人们对媒体的期望和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并且模式和在西欧类似：女士使用媒介区别于男士，城市居民区别于农村居民，老人区别于年轻人，对于职位较高或者经济独立的人，媒体传播的信息对于他们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同于对于女秘书或者贤内助的意义。东德与西欧的区别之处在于是否能接收西方广播电视。大约六分之一的东德居民接收不到西方电视节目，为了解这六分之一的情

况，我们对来自德累斯顿地区的23人进行了采访。满足“接近体制”的条件不那么容易，也不是每个人谈到东德时都直言不讳。建立必要的信任是需要时间的，受访者一旦确定就不能再变，因此我们采取了一种间接的方式，以职业、职位和生平为标准挑选受访者。政党事业、专职选举以及领导岗位都属于“接近体制”的范畴，相反“远离体制”指的是教会领域、艺术家和医生、工匠、店主等，当然还有1989年之前离开东德的人。起初只按照一般社会人口统计的标准进行筛选：性别、年龄和西方广播电视接收权，而后我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如下问题，即是否能够在其他领域取得不同的调查结果，因此最后在自由艺术家、出于政治原因离开东德的人士、党校老师或者某位统一社会党地方报的编辑这些人中进行选取。

我们在对受访者生平的采访记录中还发现，一些中上层人士（通常包括大学生）与所谓的草根之间存在理解上的问题。[12] 此外二者通常都存在很大的年龄差距，有时候一方希望影响另一方的历史观，比如有些人想告诉青少年曾经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鼓励受访者，在采访之前都对他们称“专家”，他们在东德生活过因此是这个国家最了解日常生活，因而也就是最了解媒体的人。

在东德的生活水平：80 年代中期日常生活结构，对东德的态度，是否在西德有亲属关系；
可使用的媒介，获取信息的渠道：电器、广播电视节目、订阅读物、报刊亭、电影院、图书；
媒介使用模式及使用原因：“与媒介打交道的日常生活”，部分电视节目汇总（东德和西德），各种日报专栏汇总；
对媒介的评价：可信度、形象、信息时效性；
目前生活水平：物质条件、媒介使用情况、东德印象。

图**3** 采访话题

回忆总是一种再造。1989年后，东德人被强迫改写生平，将以前的生活合法化——不仅在自家镜子前，工作中也经常如此，对东德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自的生活水平以及当时的“政治气候”。从访谈可以看出，两德统一十多年后，生活水平相比之前得到了改善。愿意接受采访的人能够流畅地谈及统一社会党党员身份、担任的重要职务以及曾经的信念，或许是经受住了回忆过去带来的考验，或许是调整自己适应了新形势。因为随着时间流逝，受访者很难再想起曾经经历了哪些转变，有关80年代中后期的回忆不是很全面。我们首先向采访者询问生平简历，然后试着再造非常普通的一天，比如东德后期某个时候，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1988年11月苏联的月刊杂志《人造地球卫星》被封杀之前。住房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吃早点？孩子什么时候要出门了？报纸什么时候被塞进了报箱？晚上什么时候开始看电视？这些问题能够帮助重新激活记忆，因为媒介使用和日常生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同时这些问题能够缓解谈话时的紧张气氛。有关生平和日常生活的问题是采访主题的一部分，采访内容纲要见图3。采访主题仅仅说明应该触及哪些话题，这样也就留给了受访者一定的空间，描述他们自己的观点、讲一些小插曲以及确定谈话重点。同时所有访谈都被录音，然后再进行文字记录。

3.东德媒介秘密使用情况：三个论题

论题1：由于法律从来没有禁止使用“不受欢迎”的媒介，所以为了避免来自道德上的压力或者防止经济损失，通常也只能“秘密”地使用这些媒介。

图4总结了所有在东德国家试图阻止民众接触西方媒介的措施。然而这一目标却没能实现，因为干扰发射台信号太弱，也阻碍了自己节目的接收，旨在切断西方广播电视的“牛头行动”也就成了一个小插曲。两德边界封锁以后，本来应该进行“内部消毒”，而德意志自由青年联盟的中央机关报《青年世界》于1961年9月5日写道，今天开始闪电再次来

袭，“这次击中的是所有牛头和精神越境者”。为了拯救“卷入西德之流”的受害者，《青年世界》的解决方案是：商讨，紧急情况下就“一顿痛打”，“不可教化的”就拧下天线或者立即彻底拔了天线。“我们的目标是：所有人都要收听社会主义电台，收看社会主义电视！”谁在自由青年联盟的召集大会上依然执迷不悟不改邪归正，就要等着受到青年联盟分队的制裁，将天线从屋顶拆掉。拆卸工人的努力没有收到很大成效，在柏林的边界地带和交界处50千米的带状区，由于东德居民里出来的业余手工天才发挥了作用，家用天线还是能够接收西德电视节目。此外自由青年联盟的干涉也破坏了东德民众的生活氛围，1961年9月7日，《青年世界》发出枪响后的两天，统一社会党中宣部就意识到，抵抗西德电视的行动让民众纷纷行动起来，自8月13日建柏林墙以来还没有哪一项措施能产生如此大的效应。[13]

印刷物：1948 年以来的“新闻墙”②

- 从订阅报纸列表上删除西德特许出版物；邮政销售和邮政运输垄断集中化；检查来自西德的包裹信件，搜查来自西德的旅客
- 1955 年 9 月 15 日青年保护条例

广播和电视③

- 干扰发射台（主要干扰美占区广播电台，1952 年开始，持续到 70 年代中期）
- “牛头行动”（1961 年 8 月 13 日柏林墙建立后的几周）
- 实行禁令地点：兵营、住所、公共场所（如旅馆）

② Meyen：*Unterhaltung*，S. 194－196.

③ Meyen：*Unterhaltung*，S. 202－207.

图**4** 在东德接触西方媒介的渠道

虽然国家安全部接管了邮政审查，允许持有西德出版物，但传播西德出版物要受到处罚，即便如此“新闻墙”也未能完全关闭。审查体系抗衡不过两德之间的交流往来，很多印刷物通过正常邮寄渠道到了东德，

也不是所有的包裹信件都被开包检查，邮政部在1957年称之为一种“系统性的销售推广”，没有人知道这种销售推广具体达到了什么样的规模。[14] 1961年以前，柏林的两德边境还是开放的，西柏林各报社时不时以东德马克价格向东德居民提供订报业务，报纸在报社自取。对于小册子之战，西柏林也拥有最好的基础条件。50年代末期，柏林估计共有50家协会从美国情报局那里获取资金，向东德走私出版物。[15]

和收看西方电视节目一样，使用其他西方媒介同样面临着思想道德层面的问题。1950年《新德国》开设专栏“谎言报纸不可信”，1953年底该报对“色情文学、流氓图书和战争煽动书籍泛滥”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类书籍通过众多地下渠道外流并危害东德青年，1955年5月这些书甚至还被告上了法庭。“反对毒害青年斗争委员会”在一次公审中判处“阿登纳政府”有罪，并要求东西两德政府严惩引进和持有漫画书刊的行为。[16] 一些1952年出版的小说如埃里希·略斯特（Erich Loest）的《西德马克再度贬值》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那些低俗图书、流氓电影还有反对收听美占区广播电台的政治运动脱离了为和平而战的方针，会直接将人引向犯罪的地狱。1952年3月11日东德信息局局长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在《新德国》中写道，谁打开美占区广播电台，要么是蠢货，要么是美国间谍。1952年4月8日艾斯勒同样在《新德国》重申了这条警告，让更多的人引起重视。柏林市中心的钓鱼者协会在对外开放时间里放着美占区广播电台的节目。艾斯勒写道，如果战争来了，钓鱼活动也就结束了。“是的迈耶先生，问题就是这么严肃，所以我们也这么严肃地进行反抗偷听敌对广播电台的斗争。”1950年12月，国家有关部门在《和平保护法》的基础上针对“战争煽动者”又增添了一条模糊的法律规定，警告凡是“轻视或侮辱”和平运动的一律判刑。一些宣传积极分子还收集起反对收听美占区广播电台的个人承诺和签名，萨克森州迈森附近的一个生产队甚至还在拖拉机上拉起了反对美占区广播电台的战斗口号。[17]

论题2：1973年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提出正常接收西德广播电视节目的要求之后，来自公众道德上的压力在逐渐减弱，并且承受这种压力的也只有公共场所、国家武装部门和党员干部，因此“秘密使用媒介”的情况主要与当事人的出生年份、与体制的接近程度以及事业方向相关。

60年代中期很流行的做法是大家到了晚上再把西德电视节目天线安置到阳台上，节目结束之后再拆掉。但当时宣传部的一份内部报告中就明确写道，发现有人在工作中、啤酒桌旁，尤其是在火车里毫无顾忌地谈及此事，并且有的电视节目也以文字的形式散播开来。[18] 一位教师，生于1944年，在采访中谈到他小时候就曾签字保证不会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接收西德节目，但很快就意识到了“我们在互相隐瞒欺骗”。他上大学时偷偷读过黑德维希·库尔茨-马勒尔（Hedwig Courths-Mahler）和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的作品，后来在学校一位同事给了他一本《铁皮鼓》，因为当时东德还没有出现过君特·格拉斯的作品，所以用一份《新德国》报纸包起来偷着塞给了他。

正如这位教师所讲，到了1988年还有教师声称收看西德电视节目的人不允许在社会主义教育机构工作，还有在一次抽样调查中，一位来自莱比锡的初中教师虽然住在装有电视天线的新房子里，但至少理论上是否可以打开电视收看节目，她还是不知道。年青一代只有父母在东德发展过事业，或者至少父母为他们的事业操心过的，才会有这方面的经历体验。一位女口译员，1972年生，当时生活在开姆尼茨，虽然能在家里把西德电视台的每日新闻和巴伐利亚三台的流行歌曲录到磁带上，磁带是他父亲“花了很多钱在越南人那买的”，“是索尼之类的”，但有些敏感歌曲还是要删掉，比如盖尔·斯图尔兹弗鲁格（Geier Sturzflug）的《我们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那时候我父母就很关心，不希望我们那么早就因为这些没用的东西糟蹋了我们的未来。”

经历过类似良心斗争的主要是老一代的人和国家武装部门相关的工作人员。“我坚持不收听西德电台节目”，一位装配工人这样说道，这位装配工来自德累斯顿附近，生于1918年，他能升职为劳动保护监察员要归功于党组织的提拔。还有一位来自德累斯顿的党校女教师，生于1949年，称自己为“东德生人”，说她“原则上”没有听过西德广播电台、“德国广播电台或者美占区广播电台之类的”，称大多数节目“到头来全部都是反共产主义的”。一对来自图林根州格拉市的夫妇，两人都生于40年代，都是党员，“和东德一起成长”并且“愿做东德人”，这对夫妻同样意志很坚定，用他们的原话说是“我们对自己很忠诚”。有位汽车司机，“比如有球赛之类的”，他就到邻居那去看，而采访中没有了解到他妻子是否知道此事。两德统一前没多久他们那片住宅区装配了电视天线，“正式装上了天线以后”，这对夫妻也就无“忠诚”可言了。

莱比锡大学教授汉斯-约尔格·施蒂勒（Hans-Jörg Stiehler）对国安部有关德累斯顿地区收看西德电视的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看到了一篇关于电视天线安装队的报告。安装队在80年代末试着到各个住宅小区尽可能揽到更多的客户，自然也会遇到国安部工作人员，这些人是不允许接触西德广播电视的，资料中也提到他们曾经承受着道德上的压力。如果坚守纪律，不光会遭到邻居鄙视，安装队的人也抓住统一社会党的思想标语不放，用什么全球开放或者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来为开展工作做宣传，并称之为“国民经济性的群众创举”。谁不配合，就会被指责有“思想问题”。[19]

很多受访者还提到，对西德电视的管制程度到了80年代有所减弱。“就是这样”，一位生于1966年的记者说道。他谈到曾经在公民学的课上大家对西德电视节目展开了讨论，然后他还在墙报上写了一些对节目的评论。一位来自图林根的旅店老板，生于1952年，住在离西德交界只有几公里的地方，说道，“在图林根充斥着一切西德的气息”。虽然公共场所“一律禁止”收听西德广播，可他自己还是有时在酒馆里打开巴伐

利亚三台收听节目。一次市长来了，问他是不是调错了电台。这位店主讲述的时候还很骄傲地说他根本“没当回事”，就说：“哎哟市长啊，我可能又弄错了，我一会儿把它调过来。”就这样问题解决了。

就连在东德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假期疗养所，电视厅里都在放西德电视一台和二台的节目，还有那些本没有收看权限的人也对禁令视而不见。一位警察的妻子说她虽然看了，但是必须“小心点儿”并且“不能谈论”。一位在罗斯托克的海军军官认为，有线电视软化了相应的军队规定。大家私下里都知道，收看西德电视不予处罚，而在此之前比如可能会遭到降级军衔的警告，“撤职并退出现役”是最高惩罚。这位军官虽然一直遵守规定，但是从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规定还要涉及军官，因为他们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立场。还有另一位军官，1953年出生，在国防部宣传司工作，为了给他的“宣传言论”添加引用更丰富的辞藻，在办公室里读起了西德报纸，然而“过去多年”他对“西德电视禁令”其实一直抱以接受态度。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因为父亲一辈就“在警察局工作”，“我知道我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最近”不知什么时候他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可以看报纸，而不能看每日新闻或者政治类节目。

论题3：虽然“走私”印刷物也是东德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只有少数人对“不受欢迎”的政治题材或者高等文化书籍感兴趣。“秘密”阅读的主要是低俗图书、漫画和商品目录册。

那位国防部的军官是个例外，因为只有少数东德人对政治报道、对只能“秘密”收看收听的东西感兴趣，当然几乎在所有生平采访中受访者都讲到了走私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有老奶奶（精密机械工人，生于1931年）把《新邮政》和《彩色周刊》杂志藏在紧身内衣下带过了边境；有一位工程师（生于1943年）从匈牙利度假回来在行李箱里面装了10本《值得冒险》画报；还有海关人员，没收了一位老奶奶的《踢球者》杂志，显然因为他自己想看（对一位生于1974年的牙医助手采访中得

知）。从采访结果来看，走私最多的是各种彩印杂志和《Neckermann》及《Otto》商品目录册，而非小说、日报和新闻杂志这类禁书。这个结论与一项50年代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相符，虽然这个时期购买阅读西德印刷物很方便，但当时大多数东德人只是偶尔看看西德报纸，不乐意花很多钱在上面，也可以说不愿冒险。TNS市场研究公司在1956年对曾经逃离东德的工人进行了民意调查，想知道他们都通过哪些途径了解西德的情况。大约30%的受访者表示通过走亲访友、收听广播、信件往来，还有道听途说也能获知一些信息。只有3%的人读西德报纸。1953年夏天美国对西柏林食品分发站的研究也证实了以上结果，只有2%的受访者是从新闻报道中获知西德的救助行动。[20]

在大多数人物采访中受访者都表示对西德报纸、政治类周报和新闻杂志不是特别感兴趣。一位来自魏玛市政厅的工作人员，1951年生，80年代在伊拉克工作过一段时间。她说有一次在一家酒店大厅里看到两本新闻杂志《明镜周刊》，里面有关阿富汗和苏占区的报道“确实值得一看”，“但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新闻，因为我们可以看西德电视”。一位长途司机，1948年生，统一社会党党员，长期在国外跑客运，说他做到遵守“规定”没问题。当然“每个高速公路休息站都放着”报纸，他到了晚上会时不时地翻一翻。“我们坐在车上，想干点儿什么呢？吃面包，喝瓶啤酒，看看报纸”，主要是“为了打发时间，不然就睡着了”，看完报纸就进了废纸篓。“我们要那些报纸干吗呢？”里面的内容和他的生活没有关系，很多文章他也看不懂。“然后就在那闲聊”，聊关于某个女王，他可从不想因为这种报纸“丢了工作”。

对于那位了解伊拉克的魏玛人来说，德国服装裁剪类杂志《Burda》比《明镜周刊》重要多了，因为她时不时想缝制一件“西式连衣裙”。一位女会计，1954年生，她说在时尚领域西德至少比东德走在前面五年。为了一本《Neckermann》商品目录册她甚至“出卖了她的奶奶”。这类商品目录册也在各个公司里互相传看——当然是秘密地，因

为大家可不想丢了这么件宝贝。“那本目录册。简直难以形容”，一位生于1943年的女出纳员说道。“连衣裙，窗帘，工业品。还有电视！那本商品目录就是全世界。”还有西德的八卦报纸也“总是在互相传阅”，这些报纸甚至被她称为“圣物”。在她的经历中有一件事特别难忘，有天晚上她女儿把一张画报掉进了洗脚水。“我快崩溃了，因为那报纸都湿了，西德的报纸可是价值连城呀。我发火了。然后我们用手把报纸晾干，一页一页地晾啊！第二天我跟同事道了歉，因为把她的报纸弄湿了。”比这位出纳员年轻的人就不换女性杂志或者画报来看，而是换青年杂志《Bravo》，当时学校里都在看这本杂志，还有卖杂志配套的装饰画。那位女口译员，就是曾经在她父母的帮助下把巴伐利亚三台的流行歌曲录到索尼磁带上的，记得那些装饰画曾经卖到了10东德马克以上。

各种商品目录册、画报还有低俗小说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亮点。一位来自莱比锡的普通职员，1950年生，讲到她从西德过来的亲朋好友只给她带来了“八卦报纸”，她当时“如饥似渴地扑了上去”，又谈到在东德实际上从来没有关于艺术家和政界名流私人生活的报道，而看看西德的报纸能见到各类题材报道得淋漓尽致，“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东西，所以也就很吸引人”。类似的还有一位售票员，1959年生，认为那些低俗图书在亲戚之间传来传去不易破损，比报纸更好保存，说到东德从未有过“这样一本爱情小说或者低俗作品”，在电影院花上1个东德马克看一部童话电影就能给业余生活增添色彩。虽然西德的报纸杂志“既无意义又没内容”，但大家还是互相传看，“那些东西就是与众不同”，而且越是“禁止的”就越是有意思。

4.东德媒介秘密使用者之类型划分

为将论题3提到的少数人，就是也对禁书或者《明镜周刊》里的文章感兴趣的读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定位，也为了进一步阐述此次大会确定的研究主题，本章我将用到我对东德媒介使用者的类型划分图。[21] 归

类划分能够使复杂多样的事物条理分明，并且使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区别一目了然。一种类型代表的是共同具有某些特征的人群。在此我对东德媒介使用者类型进行划分时依照两个标准，首先根据使用媒介的基本出发点——是为获取信息提高文化水平，还是为了娱乐消遣——其次是根据对统一社会党传媒政策的态度以及倾向于西德的程度，这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受访者对西德媒介的倾向度越高，在类型图中就占据越偏上的位置（见图5），越希望从大众传媒中获取信息，那么在类型图中就占据越偏左的位置。阅读全国性的报纸、收听文字广播节目，比如德国广播电台的节目，以及收看电视里的政治时事述评节目，比如“Panorama”（全景）、“Kennzeichen D”（D标志）和“Objektiv”（物镜），都能表明这种以获取信息为主的媒介使用导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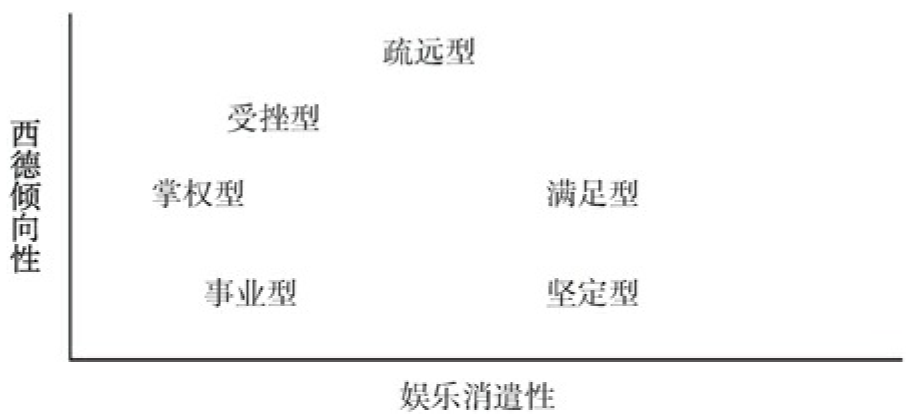


图**5** 东德媒介使用者类型

以上所列举的采访案例，都应归为图5右下方的位置。比如把画报掉进水里的出纳员，就属于“满足型”，这类人群在民意调查中占的比重最大。“满足型”是指在东德日常生活满负荷运转的一类人——主要是女性，一般为中学学历，非党员，生于1930～1960年之间，在生产单位工作过，在食堂、商店以及其他服务行业任职，或者普通办公室职员，像打字员、秘书或者会计等。她们每天必须早起早睡，要照顾孩子打点家务，所以很少有业余时间与媒介打交道。当然晚上会看看电视，但只是为了放松，了解一些能够拿来闲聊的话题，换换脑子和心情。虽然总会

有一些东德和西德的新闻节目，不过能始终了解社会最新情况也是不错的，但像《每日新闻》《今日》以及《时事聚焦》这样正式的新闻节目对于她们来说并不重要。这类“满足型”最多也就是粗略浏览一下报纸，私下里偷着看的只有商品目录册、小说或者彩印杂志这类书刊，因为总是对东德没有的东西感到好奇。一位女工人，1931年生，说她想“看看不一样的面孔”，“读读不一样的笑话”。这类人群没有受到“秘密行为”带来的道德上的压力，因为社会地位的上升不是“满足型”的追求。

这一点也适用于“疏远型”，这类人群和“满足型”接触的各种媒介类型差不多，主要是出于休闲娱乐，家里也没有统一社会党出版发行的报纸，并且几乎都与教会有联系。其中部分人有收入来源，或者至少有个落脚处，并且通常也有工作任务在身，类似于社会服务机构，比如在出版社工作，或者管理出境申请、负责青少年有关事务，此外也有少数人或是艺术家，或在小型公司、旅店或个体商户工作，或者朋友圈子仅限于朋友及家人。“疏远型”具有中等教育水平，或者至少接受过职业培训，也许这类人群放弃接受高中教育的原因是，不愿在东德谋求事业。此外没有人担任和政党有关的职务，从事的工作都和像教育这样“敏感又棘手”的领域无关，比如做理发师和裁缝，做装配工人、经纪商，或者做旅店老板、秘书、锁匠、橱窗装饰师，又或在一家科普出版社做销售主任，即使没有政治信仰也可以保证经济来源。作为“疏远型”一类的人没有必要秘密收听收看西德广播电视，因为没有人对他们有什么特别要求，这类群体也不会想到去读《铁皮鼓》的。

“坚定型”也不会有这种想法，至少到图书公开发售之前是不会去读的。属于这类群体的有莱比锡女教师，不知道自己的房子里是否能接收西德电视节目，还有来自魏玛周边的夫妇以及那位老工人，“原则上”没打开过西德电视台。“我没兴趣看西德电视节目”，一位生于1932年的中学校长说道，“西德电视恰恰也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坚定型”已经融入了东德生活，或者出生于东德刚刚成立后的十年内，他们从事的是负责

党和国家领导宣传工作的重要领域——教育系统、传媒界、国家武装部门和行政部门，不与生产打交道。这一点区别于“事业型”，“事业型”的人在经济领域或者党内任领导职位，所以知道哪些渠道是行不通的，也就对信息的需求量更大。一位来自莱比锡的女士，生于1937年，一家联合企业的部门领导，负责住宅建筑和住宅分配，说她通过工作“当然也进入了一些圈子”，这些圈子里的人“与一般民众相比，持有非常强烈的批判态度”。她最终“稍微挽回了糟糕的局面”，必须自己到本来没有信息资料的地方设法弄到这些信息资料。对于这类人实际上不存在“秘密使用媒介”。由于国家让他们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升，因此他们面对任何批判时都与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此外，“事业型”群体认为在一个由他们参与重大事宜决定的国家，不必“秘密”行事。一位来自莱比锡的女士，生于1944年，在市政委员会工作，清楚地回忆起一件特例——70年代中期，有一次女党委书记来探望生病的她，她就把阳台上的天线拔掉了，因为她“不愿这个时候被卷入任何讨论”。

围绕“东德媒介秘密使用”这一主题召开的大会上所讨论的现象，主要归为“受挫型”和“掌权型”。这两类人群信息需求大，并且对西德的倾向程度很高。属于“受挫型”的主要是男性技术类知识分子，具有中等收入水平，非统一社会党党员，没有过升职经历，或者升职受到阻碍，因此并不受制于国家，在国家面前作出的更多是一种防卫反应。一位来自哈雷的学者，1952年生，1985年去了西德，以前在东德时每个季度都要到华沙或者布达佩斯买一次《明镜周刊》来看，并且定期看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创立编辑的杂志《大西洋通讯》。“只要想看，总能找到途径，但确实比较难。我自己一直都是个大读者。想弄到奥地利作家汉德克（Handke）和托马斯·本哈德（Thomas Bernhard）的最新作品也是有办法的，这些书肯定已经流传出来了。”“掌权型”也同样可以找到这些途径，而与“受挫型”相反，因为渴望权力的位置，所以为了获得第一手信息，也频繁地使用东德的媒体，属于这一类型的的有牧师、艺术家以及其他能够相对自由选择从

业领域的群体。“掌权型”在东德并非普遍现象，虽然我们是有针对性地选取受访者进行民意调查，然而结果只有四位受访者属于这一类型。一位作家，生于1953年，1974年就申请离境，然后成功冒充司炉工和仓库管理员离开了东德。采访中他讲述了很多通过教会或者莱比锡书展和西德接触的事情，比如曾经偷着读过统一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新德国》——用他的话说就是被别人抄袭的报纸。他在一家教会出版社工作，在办公室里看这种报纸很难。“在那没法顺利地看报纸，尤其是《新德国》，不然同事都会被震惊到的。”

以上类型图说明，在东德接触媒介以及与之相关的“秘密使用媒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22] 性别、日常工作、职位、私人圈子里的言论氛围、个人条件以及知识水平、和西德的联系、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和东德体制打交道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依赖于生活年代、出身、所受教育以及投向其他领域的可能性，比如教会领域。我们这次大会上最主要讨论的话题——政治活动家罗伯特·哈费曼（Robert Havemann）和批判家鲁道夫·巴赫罗（Rudolf Bahro）、政治读者群体和图书馆借阅限制——是精英群体讨论的话题。本文所涉及的题材对于大多数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来说无足轻重，也是因为很多人生活忙碌并已将自己融入了这个国家之中。走私最多，也是拥有秘密读者最多的是娱乐性书刊或者商品目录册，80年代中期，幽默讽刺杂志《厄伦施皮格》的编辑们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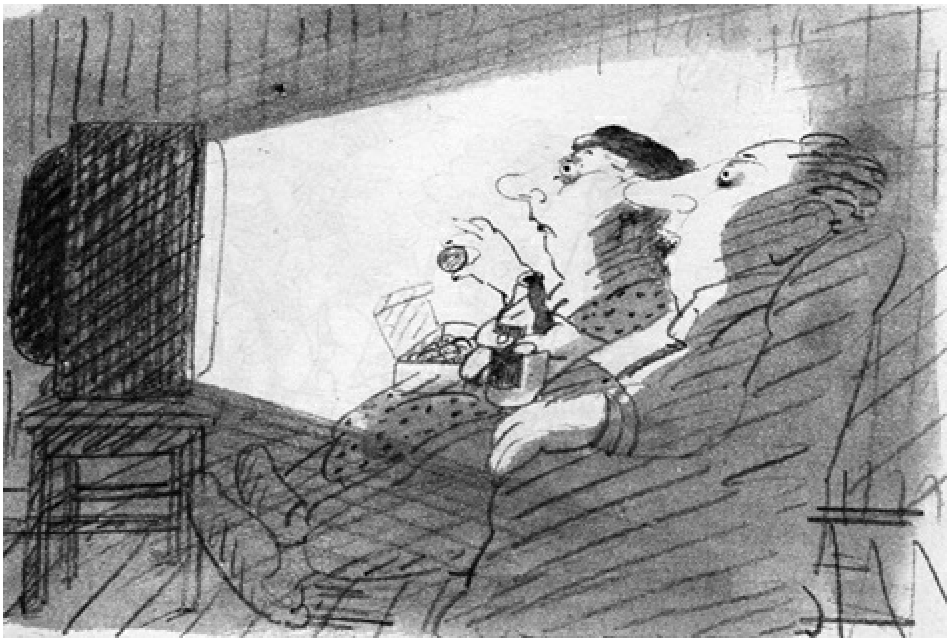


图**6 “**你知道吗，我们是一个读书的国度？**”**（曼弗雷德·博芬格，**Manfred Bofinger**）

5.秘密使用媒介：一种对公众理论的挑战

本章总结不再对新的公众理论进行讨论，而仅仅针对研究东德“公众”传播普遍应用的理论如由格哈茨和奈德哈特提出的Arena模式（见图1）提出几个问题：

问题1：公众理论通常着眼于政治范畴。Arena模式将公众描述为一种活动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系统。但政治对于很多东德人民，并且不仅仅对于东德人民来说，是一类边缘题材。然而像杂志《Bravo》《新邮政》或者《Neckermann》商品目录册这些西德书刊，即使大多数东德人一年仅仅看上两三回，这些西德刊物也毫无疑问已对公众言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问题2：格哈茨和奈德哈特只论及“一种”公众——也就是唯一一种Arena模式和一种趋向“无穷尽的公众”。只有在大众媒介传播层面才能保证“所有”人士的参与，至少保证以公众的身份参与。而有相当数量的

东德人依然既无法接触到西德媒介，也无法获得另一种“反对派公众”的信息。[23] 这一点至少符合“坚定型”群体，也适用于部分“事业型”群体，即使他们不曾生活在东德北部“一无所知的山谷”。因此还需要对多种公众组成部分进行区分，然后研究这些组成部分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并且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问题3：Arena模式过于强调了媒介传播的意义。格哈茨和奈德哈特虽然认为三个层面原则上平等一致，但其排列顺序（见图1）就已说明其实并非如此。当然，Arena模式，还有特别是大众传播这一层面之所以这样定义，也是为了体现民主。显然，大众传播保证“所有人”确实都可以参与舆论以及决策的形成过程，至少以公众的身份参与。然而东德的例子说明舆论形成于大众传播层面之下的精英阶层，并且只包含很少一部分人群，这类人群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们有在拥挤的客厅里议论纷纷的艺术家，有读者群体，有反对派或者互相传阅看书的朋友圈等。虽然东德长期以来从未有过所有人一起参与这类传播过程，很多人参与的情况可能也未曾有过，然而还是为一场政治转折做好了铺垫。

---

[1] Luhmann，Niklas：*Realität der Massenmedien.* Frankfurt a.M.1996.

[2] Behrend，Hanna：*Feministische Gegenöffentlichkeit im “Realsozialismus”.* In：*Medien und Zeit* 1/2002，S.16-26.

[3] 参阅：Kowalczuk，Ilko-Sascha（Hg.）：*Freiheit und Öffentlichkeit. Politischer Samisdat in der DDR 1985-1989* . Berlin 2002；Poumet，Jacques：*Die Leipziger Untergrundzeitschriften aus der Sicht der Staatssicherheit* . In：Deutschland Archiv 1/1996，S.67-85；Knabe，Hubertus：*Nachrichten aus einer anderen DDR. Inoffizielle politische Publizistik in Ostdeutschland in den achtzigen Jahren.* In：Aus Politik und Zeitschrifte B36/1998，S.26-38；Lotz，Christian：《*radix-blätter* 》. Zur Geschichte eines Untergrund-Verlages in der DDR. In：Deutschland Archiv 3/2002，S.424-432。

[4] 参阅Stiehler，Hans-Jörg：*Leben ohne Westfernsehen. Studien zur Medienwirkung und Mediennutzung in der Region Dresden in den 80* er Jahren（以下简称：*Medienwirkung* ）. Leipzig 2001。

[5] 参阅Osang，Alexander：*Keinen Sender mehr.* In：Ulrich，Andreas，Wagner，Jörg（Hg.）：*DT 64. Das Buch zum Jugendradio*；*1964-1993* . Leipzig 1993，S.54-61。

[6] 参阅Meyen，Michael：*Denver Clan und Neues Deutschland. Mediennutzung in der DDR* （以下简称：Denver Clan）.Berlin 2003；ders.：*Mediennutzer in der späten DDR. Eine Typologie auf der Basis biographischer Interviews* （以下简称：Mediennutzer）. In：Medien &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 1/2004，S.95-112。

[7] 参阅Meyen，Michael：*Hauptsache Unterhaltung. Mediennutzung und Medienbewertung in Deutschland in den* 50*er Jahren* （以下简称：Unterhaltung）. Münster 2001。

[8] 参阅Meyen：*Denver Clan* 。

[9] Fuchs，Werner：*Biographische Forschung. Eine Einführung in Praxis und Methoden* （以下简称：Biographische Forschung）. Opladen 1984；Hirzinger，Maria：*Biographische Medienforschung* （以下简称：Biographische Medienforschung）. Wien 1991。

[10] 参阅Glaser，Barney；Strauss，Anselm：*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 Chicago 1967。

[11] Fuchs：*Biographische Forschung* ，S.228-230.

[12] 参阅Hirzinger：*Biographische Medienforschung* 。

[13] Meyen：*Unterhaltung* ，S.218.

[14] Meyen：*Unterhaltung* ，S.196.

[15] 参阅Körner，Klaus：*Politische Broschüren im Kalten Krieg 1947-1963* . In：Vorsteher，Dieter（Hg.）：*Deutschland im Kalten Krieg* . Berlin 1992，S.88。

[16] Meyen：*Unterhaltung* ，S.198.

[17] Meyen：*Unterhaltung* ，S.204.

[18] Meyen：*Unterhaltung* ，S.219.

[19] Stiehler：*Medienwirkung* ，S.105.

[20] Meyen：*Unterhaltung*， S.197.

[21] 参阅Meyen：*Denver-Clan 2003.* Ders.：*Medienwirkung*， 2004。

[22] 参照Meyen：*Denver-Clan*， S.156-167。

[23] 参照Wimmer，Jeffrey：（*Gegen*-）*Öffentlichkeit in der Mediengesellschaft. Analyse eines medialen Spannungsverhältnisses.* Wiesbaden 2007。

脑袋中的保险柜

——对东德秘密阅读的走访调查

安妮·里希特（Anne Richter）

拿着一台老式索尼M-335录音机，我想就“东德秘密阅读”这一题目对身边的人展开调查，身边在这里指的是广义上我直接认识的人。

H是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职位甚至还相当高。从他那儿我本希望能获悉国家安全部是怎么找到那些有禁书和读禁书的人，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这类“罪犯”。这个线索本来是能够从法律的角度来为我具体介绍情况的，可惜他尊口不开。H负责军事谍报部门的工作，因此很少与普通读者的读书经历有关，甚至可以说根本无关。有一次H需要一本在东德买不到的有关音乐理论的书，很快就发现不管通过什么渠道想获得这本书都很难，而且对身居要位的他来说也太棘手。

接下来的又一次失败更令人感到可惜。我以为夫妇U和W肯定能给我讲述一些奇闻轶事，当我告诉他们俩自己现在对禁书这个题目感兴趣时，U马上就提起了他们在捷克的亲戚，说他们定期从亲戚那儿拿到一些西德杂志。就连W也想起了好几个大概从熟人那儿听到的段子，正要讲出来助兴，这么一来为了将整个谈话赋予正式以及学术的背景，我就兴冲冲地掏出了录音机，但也许有些太迫不及待了。U马上反对录音，她不想接受采访，包括她丈夫也是。当我问到她为什么这么激烈反对时，她说是因为国家安全部，这个部门可能仍旧在工作，对这种事谁都没有把握，到最后还可能被秋后算账。这次本来很可能收获很大的访谈突然中止了，我也在大家面前表现出不愿再过多谈及这个话题的样子。

巧合的是，U和W跟H还是姻亲。当我继续探索U对国家安全部的恐

惧从何而来时，发现她在东德时期与国家安全部的关系就很糟，所以她在访谈中由于不信任而表现出的强烈反应也就可以理解。

当然就此题目也进行过富有启发意义、有趣并且成功的访谈，其中最长、内容也最丰富的一次是对H的采访，她是一位67岁的退休教师，曾经教授德语和俄语。她回忆起的东西很多，特别是涉及作者生平每每很精确。她回想起了一些禁书，还有一些只有部分作品被禁止的作者，他们还有很多“批判性”作品却可以自由阅读。作为俄语教授，她的兴趣不在西方文学，而首先是苏联或批评苏联的文学，然而她所能想起的秘密阅读过的第一本书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飘》（*Vom Winde verweht* ）。这本书是她在60年代“拐了好几道弯”才借到的，而且必须在一夜间读完。“因为很多人谈论此书”，禁果自有其诱人之处，可读后她却觉得其实尽是“瞎扯”，要是有人发现她读这本书，也许会笑话她的，因为一位教师要注意“一定的品位”，但根据她的说法却“相安无事”。

接下来她读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s）的《日瓦戈医生》，“当然是从西德偷带过来的”，然而没有读完，因为借期太短。还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癌症病房》她也是赶着读完的，至今那些对苏联政权“非常尖锐的批判”还令她记忆犹新，这种批判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也毫不逊色。

“所以这些书在苏联不能出版，在我们这儿自然也不能。我得说禁止出版也并非全无道理。帕斯捷尔纳克的批评，怎么说呢，有时候那是真叫一个尖锐。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包括在苏联发生过什么，还有斯大林，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事很可怕。我，或者说我们经常不愿承认这些事。我不愿相信这些事。”

一个在东德城市埃尔富特（Erfurt）的熟人有个姐姐在西德，她把东西裹在换洗衣物中，“总是不断地带点儿什么过来”，“要是边防的人

查到这些东西，就会没收，没收也就没收了”。毫无疑问，H知道每次走私，每次阅读禁书都是违法的，可她似乎并不惧怕如果被抓到会带来什么恶果。她一共去过两次西德，当她讲起其中一次借着去西德旅游的机会给儿子带了一本《Bravo》[1]杂志时，再次证实了她的这种态度。杂志被她毫无遮拦地放进了手提包，她说这是最佳办法。“如果要是得开包检查我就说：哎哟，这是什么？这怎么会进了我的包的？！接着杂志就会被没收，不过也仅此而已。”此外她还深信，她所阅读的东西不会被当作禁书认出来，因为“那些人根本不懂，那都是些珍贵的文学作品”。

有些批评苏联的图书或是作者，其发行量虽然很小，却仍旧可以出版。这类书她回忆起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Bulgakows）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以及“斯蒂芬·海姆（Stefan Heym）或是施特里马特（Strittmatter）的一些作品”。还有苏联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Tschingis Aitrnatow），他“稍微沾点儿异议分子的边儿”，“但比较谨慎、温和，其出发点是改进社会体制，所以人们也就比较包容”。针对他的作品也采取的是限制印数的对策，书卖完后就很难再弄到了。此外她还想起鲁道夫·巴赫罗（Rudolf Bahro）和瓦尔特·扬卡（Walter Janka），这两位的作品也因太具批判性而难以出版。当问起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时，她说：“我不喜欢他，对我来说他太粗俗了［……］太尖刻。”她并不认为比尔曼的批判是善意的。

“后来到了70年，他被开除国籍的时候，要不就是73年或是某一年，反正是7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他在科隆举办了一场大型音乐会，西德电视台当然进行了实况转播。那场转播我看了，看到半截就睡着了。”

A：你看过《1984》吗？

H：没有，那本书我没读过。我对它不怎么感兴趣。我也不是那种人，如果有什么事不受欢迎，我也并不是非要做不可。只是有时好奇

心太强，一些书也就读了。

后来她丈夫R走进了房间，当问他对东德的秘密阅读体验能想起些什么时，他脱口而出："丹尼肯（Däniken）！"1973年根据这位瑞士作家的同名作品拍成的电影《回忆未来》在上映三天后被封杀，"因为它对人的权威提出了质疑"。有一次R从"一个意大利人"那借过这本书，R有个同事的祖父母是意大利人，持意大利护照。

> H：后来他父母去意大利，带回这么一本书，我也跟着看了。R硬塞给我一些禁书，这些书给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那种感觉真是好！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书里所写的一切，但还是感兴趣：持这种态度也未尝不可［……］
>
> R：大家根本不知道都有些什么东西，怎么谈得上去弄到这些东西呢。我的意思是说，对根本不了解的东西是不会惦念的。当然了，那些退休者还是带回了一些东西的［……］
>
> H：没错，我到底从哪儿知道这些的呢？想起来了！通过西德电视节目，比如斯蒂芬·海姆，我挺想有几本他的书的，但我没有跟那位同事的父母打听，我不想惹麻烦……
>
> 还有什么书是禁书？
>
> R：斯大林的书，不过那些书反正也没有人读。

总之我认为与H和R进行的访谈很成功。我在所有谈话中都发现，避免使用"禁书"这个词，而是用少见的或不受欢迎的、难获得的图书，有助于谈话顺利进行。

本来还想采访K，他在莱比锡学徒时学的是图书出版与营销，后来在一家名为B.G.托伊布纳（B.G.Teubner）的科学出版社工作过。在本该进行访谈的那个星期他外出旅行了，我们就又约定一次电话访谈。可我几乎还没开始问一两个问题，他就意识到自己根本与禁书没任何关系，而且"本是个不喜欢让别人以电话方式刨根问底的人"。他把听筒给了他妻子T，他妻子试图尽量讲述她所能忆起的一切，而且一再强调自己能

想起来的并不多，可后来还是想起一些往事。

50年代她看过一本讲述苏联劳改营沃尔库塔的小说，书名、详细内容还有自己是从哪儿借到这本书的，她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有一些书在私下”流传。此外大家在战后很喜欢读“太平盛世”的书，许多人还有“1945年以前”的书。

T：如果问大家当时都读了哪些书，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像如今有一些低级趣味的廉价小说是绝不会出版的，是的，这类小说、这种廉价小册子是绝不可能出版的。

A：没错，这我听说过，经走私偷带过境的消遣文学作品特别多。

T：消遣文学！这是个准确的定义。

A：没什么内涵。

T：没有，肯定没有内涵。

A：尽管如此，这种书到了边境还是被没收了。

T：是这样，我能想起来，那时候我偏巧喜欢读这类书，就是因为书里描述的与日常生活不同，日常生活中总是问题多多。

70年代她表姐的丈夫从西德带过来一本杂志，大概是藏在汽车坐椅下带过来的，没有被发现。”

T：也许是边检人员没有严查吧。

A：他们查起来也是时松时紧。

T：就是这样，不是吗？有时要是看着某人的相貌比较顺眼，边境人员查起来就不那么严，有时他们甚至连厕所卷纸都要打开来彻查。她表姐夫还带来过邮售目录和商品广告，让人大开眼界。

A：您家里还有不该有的书吗？

T：噢，（笑）这我可真是无可奉告了。虽然我们有很多书，但哪些是现在还是当时［……］我现在还真说不好，我不知道。特别炙手的没有，像当时写沃尔库塔（Workwta）的那种书没有。

［……］对不起，我们无法再向您提供更多的信息。

P女士也是一位采访对象，与她访谈的时间不长，因为我们以前就谈论过东德禁书的问题，我直接就问起了有趣的逸事。她的第一次有关经历发生在70年代末，那是三本《Bravo》杂志被没收的故事。她当时坐在从吕贝瑙（Lübbenau）开往科特布斯（Cottbus）的短途火车上，心无旁骛地读着《Bravo》，三本杂志被叠放在一起，外边还用一张报纸裹着。不知何时两位男子站到了她身旁，告诉她，她所读的东西是违禁品，并把杂志没收了，但并没有进一步的惩罚，倒霉的是那几本杂志不是她的，而是她跟一个在西德有亲戚的街坊借的。但那位大方的施主大概也估计到了可能会失去那些杂志，因为它们“总是在同一类人中间传来传去”。

P再一次接触禁书是通过一位朋友，一个“文学发烧友”。他有一次问P读没读过比尔曼的书，认为她不妨读一读，接着说到做到就把书借给了她，她也很喜欢。后来这位朋友去德累斯顿上大学，他们失去了联系，那本书现在还放在她家的书架上。P的禁书不算多，她父亲是党员，在一家报社当领导。“他不愿意我看禁书。”此外她还有的唯一一本禁书是《反权威教育》，这“当然不符合社会主义教育和教养纲领”。她不记得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不过她经常光顾位于弗里德里西大街和科特布斯的旧书店，她认识那里的老板娘，总会不时得到一些书。或者朋友之间换书看，“年轻人总是爱干违禁的事［……］嗯。我肯定还记得更多趣事，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我把一切都锁进了脑袋中的保险柜”。

---

[1] 德语国家发行量最大的青年周刊，创刊于1956年。——译者注

秘密阅读与颠覆性写作

——80年代东德图书审查与反对派公众

托马斯·克莱因（Thomas Klein）

在秘密小圈子内进行的秘密阅读与讨论，只要涉及违规犯法的行为，即出版和传播自己撰写的针砭时政的文章，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禁书”大多来自国外，持有这类书籍，根据海关与警方条例，一般情况下后果仅是没收而已。只有传播这类书籍才可能追究刑事责任。相反，试图通过出版和传播印刷品来塑造一群反对派公众针砭时弊，这本身就已经是对统治者的最大挑衅了。这在专制政治体制内怎么可能做到呢？这种体制的特点就是统治者对其精心策划的公众实施极端监控。

80年代出现了一些和平主义社区工作小组，后来从中发展出独立的和平运动，形成政治上的另类团体网。只有通过这些团体的政治化，反对派在不断开展行动的同时，才能克服社会内部欲对其进行隔离的阴谋，通常被夸张地称作倍增器的“西方媒体”才能对它们进行报道，而这类报道才不会那么轻易地被贬斥为“西方通讯社异想天开的煽动”。

这种反对派公众是在80年代逐步兴起的，其活动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各种成功的公开政治宣传活动如“化剑为犁”[1]，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的征集签名活动和抗议宣言，由于1987年国家安全部对柏林环境图书馆入侵搜查而进行的警戒守卫以及对1988年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活动上发生逮捕事件的反应。还有一系列声援活动也进一步促进了公众势力的形成，如声援柏林某中学由于政治原因被开除学籍的学生，1989年举行的另类教育代表大会，抗议对教会发行的报纸进行审查以及抗议1989年4月地方选举中出现的舞弊现象。这些现实政治行动记录了政治化进程，是对内部社会矛盾和外部影响力量的反应，这些影响

力量包括东欧的民主化与人权运动、西德的和平与生态运动以及苏联的政治演变等。政治化过程发生在独立的和平运动之中，它显示出自我组织的特殊形式与方法，也受制于各另类团体与其顶头对手如国家安全部、国家主管教会领域的机构和国家教会之间的抗衡。国家教会对这些团体在半公众化的教会内部以及教会之外的过激化行为是惧怕的。

政治性图书审查一般是指：在一个经控制的政治空间对文字或其他公开发表的意见的监控。简而言之，凡是有图书审查的地方，由反对派和抵抗者形成的公众就是反对派公众，这是对对国家或体系持批判态度的公开言论被阉割的反应。反对派公众的形成始于一种经历，即自己的愿望在现存社会中无法自由说出，或是自己的声音毫无影响力。必须打破这种社会的清规戒律，才能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才能与别人交流，所以推动了反对派公众的形成，这个形成过程是一种政治实践，一种为有针对性地对当下经官方精心策划的公众产生冲击的政治实践，同时也是一种对统治关系及其辩护性宣传的求解放性的批判。但反对派公众也是一种称谓，它指的是一个行动者和接收者的圈子，还有在内部交流意义上拥有自己公众的社会空间，这种内部交流是指比如进行一场为反对经统治者策划和监控的公众而进行的社会运动，并提出其他可行性方案。

图书审查与随之而出现的为反对派公众而战的局面，不光是独裁和专制的独有特征。出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的图书审查，还有刑法政策对西德刚直不阿的常态的影响，这些都有着相当漫长和极为丰富的历史。这类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赋予自身权力的行为，就是在当今德国也仍在延续，而且匪夷所思。正如各个国防机构与体制相联系，对当下经精心策划的公众进行落实、维护和再造的手段和形式就像为反对派公众而战的方式方法一样，也是与体制相联系的。现代公民社会通行的准则是：在政治或商业上站住脚的公众通过与以下各派势力的不断融合再次得到巩固，这些势力包括反对派公众、具有批判精神的新闻界和亚文化群。其

中起着披露作用的新闻界，比如可以对某一集团或政府的不轨行为予以曝光，同时传递着民主自控力和自由媒体的密函。在这个例子之外，对社会政治机制的调研则对具有批判精神的新闻界的作用进行了中和。早在60年代，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就借用他创建的“压制性宽容”的概念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相反，东德是一个垄断官僚专制下对公众直接进行政治监控的例子。这意味着体制对反对派公众异常敏感，这些反对派公众的影响力可能极高。然而问题是，反对派公众能否形成以及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反对派公众求解放的势力就在其颠覆性能力中得到证实。在专制体制下，对具有颠覆性的反对派公众所进行的压制性化解一般采取图书审查的手段，并对从事反体制论坛活动的人给予刑法制裁。一旦这些化解措施失败，反对派公众就可以成为形成反对派对立势力的要素。这类成功的解放过程在东欧通常是与出现“社会平行结构”的例子联系在一起的。

对公众进行监控的效应不仅仅在专制体制下体现在体制的决心与能力上，即摧毁公众任何形式的颠覆资源和任何对体制的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为了限制反对派公众活动的影响所采取的办法有对其他可行的社会环境进行隔离，让社会讨论对反对派公众的话题获得免疫性，或者促使民众进行自我审查。如果自我审查能定期在自己的头脑中以搜查的方式进行，从而让寻找颠覆国家行为物证的实际搜查变成多此一举，那么体制捍卫者就获得了成功，否则无遮拦的思维过程就会导致刑事诉讼。司法这时就常以文学批评者的身份出现，即使在专制体制下，也常常伪善地强调：“思想是自由的。”可谁要是准备把自己的所想说出来，那他可能还是会遇到麻烦的。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公开，言论自由到头来不过只是特许的言行自由这一点就越清楚明了。

80年代东德反对派的特点确实在于其反对派公众的形式。如果不了解东德反对派的历史，就无法理解这一点。[2] 到了1951年，统治者以残

暴的攻势镇压了所有反对活动和抵抗行为，从而导致由公民和左派反斯大林人士组成的反对派被肃清。东德统一社会党内的斯大林主义摆脱了各种反对派势力的残余，这些势力以党派的形式活跃着，或带有工团主义色彩，或从事秘密谋反。60年代时，新一代反对派的冲突场所转移到了生活文化领域，冲突的地点很少发生在街头，从70年代起其活动越来越向机构化文化领域的公共场所转移，首先是青年俱乐部，有些也在基督教教会的受保护场所进行。70年代末，禁止在机构化公共场所举办任何反对派活动的规定富有成效，多数左派圈子内反对派组织的一些阴谋企图也被最大限度地粉碎了，当权者不再准备也不再有能力将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纳入体制内。也就是从那时起，新产生的、非正式以及持不同政见的各种组织与体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并且被迫退出政治舞台，进入“替代性公众”角色，以私人聚会的方式在住宅中搞一些作品朗诵会、文化展览或是沙龙聊天会变得频繁起来。这类活动的危险性与其“无害性”相当，国家方面不用大动干戈，也不用花很高的“政治代价”就可以将其取缔。在比尔曼因被开除国籍而遭排挤之前，70年代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另类反对派文化界一直试图系统地对官方文化设施进行渗透，以便取得更大的社会反响。不同的是，80年代亚文化圈内的艺术文化界则不问政治，并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封闭起来。

然而回归到一种有限的社会公众之中还有另一条道路，在1978年3月6日国家与新教官方教会达成的妥协方案下，国家有限度地承认了教会的自治，此举提高了教会作为组织机构的地位，被封锁的反对派公众在教会中似乎有了代理，这样被封锁的反对派公众就可转入教会那部分受到保护的“半公众”圈内。在这块社会飞地上自这时起也就形成了一小块特殊土壤，国家认为与监禁反对派相比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这块自治的团体交流新场地，各种不同的流派于是聚集到一起，组成了“文化反对派”，其中包括70年代被粉碎的阴谋集团的积极分子，60年代末以来以“公开活动”方式进行青年文化抗议的群体，还有1964年起在基督教教会内产生的建筑兵[3]和拒服兵役者和平组织。

然而在年代交替之际，不仅反对派活动的地点改变了，活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1978年9月引进了军事教育课，这特别激起了教会领域内传统和平主义者的情绪，他们更加反对社会的进一步军事化。军事体系的对峙，如有关扩充军备的辩论以及北约双重决议在东德和西德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和平运动。基督教和平主义与此政治领域的亲和力在为追求和平而发展起来的社区性工作小组中可见一斑。与新的先锋派“文化界”完全相反，这里可以观察到迅猛发展的政治化倾向，正是这一时期潜在的“和平问题”变得异常敏感，从而让无神论社会化和高度政治化人士出乎意料地与教会人士走到了一起。同时西方的一些新的社会运动，如对“后工业化”体系的批评，对生态经济与文明批评的兴起，以及反对核能源的运动对东德新反对派的格局也产生了影响。随着基础团体的政治化，有关反对派公众形成的最有效的讨论方式就获得了一种实际尺度。一个对这类团体的实践具有主导意义的问题是：在不必进行自我审查的条件下，如何以政治上和刑罚上的最小代价使自身立场尽可能地在公众中得以传播？

70年代末，对任何形式的反对派组织和反对派公众给予刑法处罚的恐吓虽然不断加强，却收效甚微。一般而言，1979年第三次刑法修正案中对违反国家秩序的犯罪行为的恐吓模式到80年代已经不再实施。仅仅将此归功于国际安全与欧洲合作会议[4]，认为是国际法和国际趋势起了作用，还有失全面。在此还要考虑到在不断深入的“合法化”方面内外压力的综合作用，这种合法化既关系镇压幅度也关系教会作为“保护地带”的独特之处。通行的集会权和出版权概念在法律上为半合法的灰色区域留下了缺口，国家的干预触及国家与教会关系这一敏感领域，基础团体、新受众和定居下的社区成员的聚合促使教会周围社会结构的混合，使“反对派公众”达到新水平，也让国家的监控和约束能力受到限制，国家教会越来越成为政权在行使这类能力时的替代物。在基督教教会与政权的关系中，前者的特殊兴趣和特殊地位因此就成了国家、国家教会和反对派关系结构中依存态势的组成部分。这种态势的一个后果就

是管理法成为刑法的优先代理。



Nur zur innerkirchlichen Information

DIE UMWELT-BIBLIOTHEK

INFORMATIONEN UND MITTEILUNGEN

3. MOEGLICHKEITEN ALTERNATIVER ENERGIEERZEUGUNG
4. SCHWARZE TAGE IN SCHWARZ
5. EINGABENBEANTWORTUNG

-Schönberg-

Möglichkeiten alternativer Ebergieanwendung
(zur Eröffnungsveranstaltung am 2.9.86)

Seit dem Reaktorunfall bei Tschernobyl worden die Stimmen wieder lauter, die eine Abkehr von der bisherigen Energiepolitik und damit die Zuwendung zu alten neuen Energienutzungsformen fordern. Nur ganz wenige dieser sogenannten alternativen Energien sind ein Nebenprodukt der modernen Technologien, den größten Teil hat der Mensch schon vor Jahrhunderten und Jahrtausenden genutzt. Das meiste Wissen darüber ist aber wieder verlorengegangen. Daraus leiten Zeitgenossen den Schluß ab, daß diese Energien keine Bedeutung erlangt haben und sie auch nicht erlangen werden. Denn bilden sich Meinungen wie, "man könne nicht auf Atomenergie verichten". Daß dem nicht so ist, daß ganze Volkswirtschaften auf Alternativenergie aufgebaut werden können, gilt es immer wieder aufzuzeigen.

Diese Energieformen (Wasserkraft, Sonnenenergie, Windkraft, Umgebungswärme) haben im Gegensatz zu fossilen und nuklearen Brennstoffen den Vorteil, daß ihre Nutzung nichts an ihrem Gesamtbetrag ändert, da die ständige Sonneneinstrahlung ihn konstant hält.

Die direkte Sonneneinstrahlung läßt sich am vielfältigsten nutzen. So sind schon einfache große Fenster geeignet, das Treibhausprinzip auf Wohnräume zu übertragen. In Sonnenkollektoren wird Sonnenenergie in Wärme umgewandelt. Damit läßt sich der Bedarf an Niedertemperaturwärme (bis 80°C, macht in den meisten Ländern über 50% des Gesamtverbrauches aus) voll decken und das nicht nur für Haushalte. In Aufwindkraftwerken wird durch Sonne elektrischer Strom erzeugt. Die vielfältigsten Trocknungsprozesse in landwirtschaftlichen u.a. Betrie-

图**1** 批判性杂志如《柏林环境图书馆信息》躲避国家审查的方法是印上**“**仅供教会内部参考**”**（**1985**年**9**月版）

属于反对派公众范畴的自然还有传单、报纸、杂志、书籍和其他可复制的文字制品，还有西德的印刷品，接收西德的广播电视信号的可能

性，这些对东德的反对派来说都发挥着巨大效力。反对派公众的行动方式当然还包括收集签名、示威游行、举办音乐会或展览。从表面上看，反对派公众与官方精心策划的公众在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上几乎没有区别。然而反对派公众的意图首先是除了实现个人畅所欲言的愿望，还要提供政治上与官方消息对立的信息，并追踪这类信息在社会上的交流状况。东德80年代的反对派工作体现在区域性人脉网如“和平工作站”，跨区域人脉网“专为和平”，但也包括电话热线和跨国合作，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东德反对派的联合声明。在许多半合法及非法杂志中都有资料表明这类工作开展富有的稳定性及成效，尽管有来自国家和国家教会的攻击，但这些杂志还是得以出版。[5]

像传单、没有印刷许可的出版物和其他秘密印制、经西德出版后又流入东德的非法刊物，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缺少版权说明，或者版权说明故意含含糊糊，以防止人们根据线索找到原作者。

谁在东德宣称存在图书审查，言论、新闻或是集会自由受到限制，那他就会吃官司进监狱。因为早在1949年的东德宪法第9条第2款就已写道：“不进行新闻审查。”1968年宪法第27条则称：“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任何东德公民均有权自由和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新闻、广播和电视自由受到保障。”国家监控和广义上的出版许可（审查实为预审查）的实施，让公众声音符合统治者需要以及令社会活跃分子习惯于社会公约的社会实践性训练，这些都在悄然进行，方式微妙，令人难以捉摸。在东德，部长会议主席新闻处（前身是信息主管局）以党组宣传部给记者们制定的《指导说明》为纲领监控公众。在艺术领域有“质量保证验收”，图书印制受到文化部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的监控，其前身是图书与出版社事务局。此外在出版社，甚至在审查机构内部还有国家安全部通报和对作者的监控。最有效的控制和培训监控技术的真正目的是自我审查，把作者、电影制作人和词曲作者、记者和科学工作者都变成自愿的政权“精神帮凶”（布莱希特语）。

在获许可的平面媒体出版物中教会的平面媒体占有特殊地位。如同该机构本身，其出版物亦不直接受到国家干涉。国家对有出版许可的教会出版物在送往邮寄前并不进行监控，出版物送达德国邮局后许可授予方才开始检查，方法是由部长会议新闻处对所提交的样本进行审查。样本符合出版许可规定[6]，方可发行，邮局才能开始投递。如果违反了出版许可条例，许可授予方可无条件没收相关报纸。国家一再干涉有出版许可的教会报纸，导致1988年爆发了“图书审查之战”[7]。作为基础团体成员引发的读者抗议要比国家教会相关出版人的抗议激烈得多。

根据1959年7月20日颁布的《对印刷品和复制品特许批准程序的规定》，教区教会的内部通告以及活动公告无须申请印刷特许，但这类出版物每一本都得有印刷设备的登记号、出版年份序号以及标明“仅供教会内部公务使用”，那些与教会关系密切并有十足的把握出版自己印刷品的反对派组织在80年代中期纷纷利用起了这一自由空间。能找到一个在形式上承担法律责任的教会机构，并能使用国家承认的教会书刊号，这类团体出版的报纸印数一般都会超过规定[8]，有时还超出得很多。1959年颁布的《有关对印刷厂和复制业进行登记的条例》为国家对所有教会印刷厂和复制业实行监控铺平了道路，国务秘书处主管宗教事务的部门认为此条例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即没有规定对教会或教区的每个印刷或复制设备也要进行登记，可是那些半合法的出版物经常是使用这类设备印制的。

尽管1980年以前也有半合法的活动空间供选择，但直到1985年以后产生于教会内部由基础团体操办的半合法杂志和第一批非法期刊才开始印制，这时才形成成熟和可靠的组织形式。同时内外压力也在起作用，使得国家在对这类行为进行刑法处罚时不得不取克制态度。然而规则并非是固定不变的，1987年11月国家安全机构对环境图书馆进行的大规模入侵搜查失败就是明证，非法杂志《两难选择》（*Grenzfall*）的编辑们和柏林环境图书馆杂志的承印人都应受到控告。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比

如（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从此萨密兹达秘密出版物的编辑们自然又面临着一系列强硬措施。

就在政治上的另类团体纷纷以各种活动方式开辟公众空间的同时，80年代针对反对派的措施也日益增强，开始是作为刑法处罚的辅助措施，后来虽然刑法处罚并未完全废除，但是有被取代的趋势。这一置换过程意味着政权在法律政策方面的新调整，其历史既漫长又有趣，对几乎三十多年习惯主要靠刑事处罚来确保自己成就的国家机器来说，在政治镇压不断合法化的时期，国家安全部在与“政治地下行为”和“政治思想破坏活动”进行斗争时所使用手段的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变化意味着即将发生重大转折。法律政策方面的新调整是伴随着7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的例子变化而来的，国家权力机关使用了不同的策略，从主要靠镇压变为采取预防性措施。“分化瓦解”的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就意味着实施监控的人力物力剧增，这表现在国家安全部门防御组织结构的变化以及雇员数量大大增加。

国家安全部本身无权实施处罚，其调查部门（第IX部）被迫与其他有处罚权的机构以及警察局开展有效合作，关键是在80年代的条件下，使用不同的手段来监控、干扰或者防止反对派“对公众有影响的活动”发生。“在某些案例中，虽然有关行为在客观上符合刑法处罚标准中的原文内容，但迫于政治原因或战略原因不适宜采取刑事处罚。”这种过度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将这些“规定［……］应用于此类案例”。[9]

各种不同流派的反对派和随时准备使用处罚手段的政权，在二者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80年代的东德对统治者提出的实际挑战变得更大了。各类分散的反对派公众扩充和巩固，内部社会关系发生的变化以及外部框架条件，都迫使国家对抑制性策略进行调整并对法律准则进行修改。然而即使在安全政策发生策略性过度，预防性技术受到更多重视，以及把违法犯罪适用的法律法规同防患于未然的考虑结合

在一起的过程中，经过修缮的中央集权的政权权力架构也已是强弩之末。1989年10月国家安全部的法学类高校在其最后几次资料汇编中，有一次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抵抗行为的最新表现及其主要发展趋势》分析道：

> 特别是在信息传输方面，未来技术有可能借助普通电话网使用微型计算机，那么在通话过程中就可用计算机将信息加密，然后通过国际电话网络传输这些信息［……］。届时国家安全部［……］不仅要与个人和团体进行技术上的较量，而且要同外部全体敌对攻击势力以及与其勾结在一起的内部活跃起来的敌对力量进行斗争，因此国家必须以“全面战略过程”作为出发点。能否高质量地运作此过程依赖于一系列决策，直接触及政权稳固与安全问题的决策。[10]

---

[1] 东德20世纪80年代呼吁世界范围内裁军的和平创意活动，口号源自《圣经》，见以赛亚书，第二章至第四章。——译者注

[2] 详见Klein，Thomas：*Frieden und Gerechtigkeit*！*Die Politisierung der Unabhängigen Friedensbewegung in Ost-Berlin während der* 80*er Jahre*. Köln 2007。

[3] 东德国家人民军的特有建制，当建筑兵的人可以不接触武器，俗称铁锹兵。——译者注

[4] 1975年8月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译者注

[5] 在东德约150种秘密出版物中，国家安全部1989年特别点到柏林以下各报刊：Zions教区和平与环境小组的《Umweltblätter》、《Friedrichsfelder Feuermelder》、东德人脉网《Arche》出版的杂志《Arche Nova》以及《Kontext》杂志。与教会无关的秘密杂志《Grenzfall》一直出版到1988年。

[6] 1959年7月20日颁布的《对印刷品和复制品特许批准程序的规定》的第一与第二条。

[7] 教会出版物1988年多次受到各种干涉，全部出版物禁止发行，涉及出版物数量创50年来最高。见教会对国家专制的无动于衷，忍辱负重的200名骨干读者于1988年10月10日走上街头，要求新闻自由，遭到警方残暴镇压。

[8] 出版法规定，无须国家批准的教会出版物印数不得超过100份。

[9] Karlstedt，Uwe：*Möglichkeiten und Voraussetzungen der Nutzung des Gesetzes zur Bekämpfung von Ordnungswidrigkeiten bei der vorbeugenden Verhinderung und Bekämpfung politischer UntergrundTätigkeit in der DDR* . Hauptabteilung IX/2，Diplomarbeit Mai 1998，MfS，JHS，Reg.-Nr.21293.

[10] *Das aktuelle Erscheinungsbild politischer UntergrundTätigkeit in der DDR und wesentliche Tendenzen seiner Entwicklung.* Studentenmaterial Oktober 1989，MfS，VVS JHS 0001-89/89，eingesehen im MDA，Reg.-Nr.PUT5.

“我们从未偷偷做过什么，我们就那么做了”

——奥博格拉本印刷所与领头狼出版社（德累斯顿两家私人艺术出版社）

让尼娜·瓦内克（Jeannine Wanek）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在东德私人出版的图书杂志更应该说是一种例外现象。尽管它们也曾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过，然而图书审查、物质材料匮乏以及对出版社和印刷厂实施的极为严格的监管制度，桎梏了所有印刷物的生存空间。这一点既适用于正式也适用于非正式的图书印制。东德不存在例如西德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出现的盗版现象，一方面在于缺乏技术可行性，另一方面自然也是由于国家的监控。在东德很少有什么事是偶然发生或者甚至是偷偷进行的，就连以所谓代印形式出现的盗版也成了社会主义出版政策的工具。

自己印制图书，因为既没有可以自由使用的计算机和印刷机，也没有复印设备，就需要有高超的发明精神与即兴天赋，还得需要勤奋。仅仅是对文本的自行复制就很麻烦，必须抄写、速记、打字或照相。有些地下文人想出一个诀窍，把自己写的诗伪装成有感而发的文字形式，比如生日、洗礼或者婚礼的祝词。这类诗文无须批准就可以在几家有数的印刷厂印制，然后分发到人们手中。

独立的出版社是80年代才出现的，这类出版社不仅绕开了国家严格推行的印刷许可制度，而且多数情况下干脆无视相关规定。起因是1981年以来作者正式发表作品的机会越来越受到限制，能以自由作家身份生存的先决条件必须是作协成员，或是某家出版社出具相关合同或证明。

这类独立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批诗集和文集还是打字机打出来的复写本，比如《诗集》系列是折叠装订在一起的。各种文本越来越多地在私

人艺术家工作室打印复制，其中包括艺术家作品集、私人出版的杂志和艺术家手制书[1]，这类印刷物的印数一般都很少，所以对广大公众产生的影响就很小。



图**1** 约亨·洛伦茨（**Jochen Lorenz**）在米兰打样机旁，**1978**年

刊物印数依赖于对艺术独创性的要求，除了物质材料匮乏是既定的事实，还有图书审查方面的原因。与文字印刷品相反，根据东德1971年视觉艺术家付酬规定，印制图像印数达100份时才需要审批。[2] 如果是图片与文字合在一起，文字嵌于图片之中，那么印数在99份以内也无须审批即为合法刊物，私人艺术出版社常常就利用起了这一规定。

东德私人艺术出版社的刊物通常是在形式上，而很少在内容上有违官方规定，这些刊物与政治类的萨密兹达秘密出版物没有关系，这一点同样也是东德私人艺术出版社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私人出版社的区别。但恰恰是这些出版社推动了政治出版物的发行传播，因为它们展示了如何在没有印刷许可的情况下出版图书。

“我们从未偷偷做过什么，我们就那么做了”，当问到他们在东德是否进行过秘密印刷时，德累斯顿奥博格拉本（Obergraben）印刷所的约亨·洛伦茨（Jochen Lorenz）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在东德，自主行动既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也不受到欢迎，更不用说自主从业，所以1978年作为独立自主的印刷所问世的奥博格拉本印刷所完全不是理所当然的。艺术家自己的印刷所只能印刷造型艺术作品，而且只能由视觉艺术家协会的成员来运营。由于奥博格拉本印刷所的创始人怀着艺术家的雄心壮志，而且他们又都不是视觉艺术家协会的会员，因此就放弃了强势的艺术家协会的庇护，不顾文化界的常规，独立自主地创建了这家印刷所。

五位艺术家朋友——画家埃伯哈德·格舍尔（Eberhard Göschel）、彼得·赫尔曼（Peter Herrmann）和拉尔夫·温克勒（Ralf Winkler）（艺名：A.R.Penck）、平版印刷师约亨·洛伦茨以及印刷机制造师兼作家本哈德·泰尔曼（Bernhard Theilmann）——合开印刷所的初衷是：把铜版画与木刻版画配上漂亮的诗作一起印制。这类组织方式是史无前例的，这样奥博格拉本印刷所就踏上了一片在东德未曾尝试过的新领域。虽然拉尔夫·温克勒和彼得·赫尔曼在70年代初曾是德累斯顿艺术家小组“空

隙”（Lücke）的成员，这在当时是第一个，在很长时间内也是唯一的一个艺术家自己的独立组织，成员们自信地称之为“地下”组织，然而其创始人并不想依靠这个组织的经验与传统。艺术家首先追求的不是颠覆式行为，而是自主创造艺术的美好新事物，但在东德的环境下，后一种追求已然是足够具有挑衅性了。

成立一家印刷所需要印刷机。幸好彼得·赫尔曼还有一台1908年产于米兰的老式打样机，非常适合印刷铜版画。为了把这台重400公斤还有故障需要维修的机器运到埃伯哈德·格舍尔的画室去，先得把它化整为零地拆开。因为懂行、手巧并且掌握印刷艺术，这台老古董机器终于又得以重新组装，既符合艺术家们自己制定的艺术与美学高标准又能无障碍地运转。操作这台当时已有70年寿命的手动打样机不是一件容易事，对操作者要求很高，不光印刷雕版和模板必须手工制作，就是印刷过程本身也是一件重体力活，有时印一页就需要45分钟。

由于不想落得一个地下印刷所的名声，也不愿卷入与政权之间不必要的纠纷，奥博格拉本印刷所一向在禁止与许可之间的灰色地带运作。“我们当然很小心。我们根本不想惹麻烦，也不想扮演乖张的抵抗斗士的角色”，约亨·洛伦茨回忆道，他至今仍在德累斯顿从事彩色艺术品印刷工作。[3] 画室是埃伯哈德·格舍尔租的，第一台印刷机属彼得·赫尔曼所有，印刷者是有工作报酬的。这样表面上看就更像是一种偶然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不是从事非法集团活动。由于所有决定都由全体成员共同做出，也就不存在所谓该承担责任的负责人。此外奥博格拉本印刷所的一切活动也都是公开的，他们的口号是：“永远公开，从不隐瞒。”

获得德累斯顿市参议会文化处的正式印刷许可后，第一版《图诗集》中的第一批诗歌才得以出版。虽然后来此许可又被收回，但起初极力争取合法许可的努力还是奏效的，展览开幕时也邀请了市里负责文化工作的官员，这些人看上去显得有些忐忑不安，他们对奥博格拉本印刷

所的活动评价不高，但也确实没有什么危险性。

第三版《图诗集》名为《酒吧与酒吧诗》，包含拉尔夫·温克勒的6幅画和6首诗。从艺术的角度就要另辟蹊径来领会这部作品，那时已经以艺名A.R.Penck而闻名的这位艺术家绘画风格属于抽象派和表现派，从现实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这类画就是“资本主义没落”的表现，因此官方从未承认过拉尔夫·温克勒的合法艺术家身份与从艺资格，所以想都不要想为他的诗申请印刷许可。“这样我们就对自己说：‘那几行诗你完全可以反向刻到模板上，把它变成一幅铜版画，这么一来你就有了原创铜版画，也就不需要印刷许可了，那是张真正的图画。’无论图画上有什么，印数在99份以下都不需要印刷许可，可有些模板根本印不了这么多就坏了。”[4]

《图诗集》3还在印制的过程中，拉尔夫·温克勒就像许多其他令人不快的艺术家一样，80年代初必须离开东德。他那些献给德累斯顿心爱酒吧的作品集都没有来得及签名，印刷所所有的人对印好的作品集都束手无策。德累斯顿州立艺术博物馆铜版画陈列室的头儿维尔纳·施密特（Werner Schmidt）和另一位支持奥博格拉本印刷所的人想出一个好主意。“如果印制人授权，［……］只有作者，也就是拉尔夫·温克勒有权反对，但他肯定不会这么做。”[5]

该作品集印了50份，版权页上只标出了印制人的名字。这位不受欢迎的艺术家以这种方式出版诗画，既绕过了印刷许可，也避开了付酬规定。“他们无计可施。［……］没有哪条法律明文禁止这么做，也没有哪条法律要求艺术家签名。没有印刷许可，也没有签名，上面只印着：‘印制人：约亨·洛伦茨。’”[6]

把文字刻入印刷模板经证明是个避开印刷许可的实用方法，而且它还开创了新的设计形式。“不知有谁想到这个主意：嘿，我们没有许可也能印刷，而且没有印数限制。这我们得好好弄，我们来印诗。

［……］ 把诗印成铜版画，把文字变成图画。［……］结果我们就这么做了，印得非常唯美。”[7]



图**2** 米歇尔·维斯特费尔德（左）和本哈德·泰尔曼在一次私人朗诵会上，朗诵会**1982**年在德累斯顿一家私人住宅中举行，朗诵作品是恩斯特·杨德尔（**Ernst Jandl**）的《人道主义者》。

1982年出版的《诗集》印了30册，以下3位诗人每人选取了6首诗：米歇尔·维斯特费尔德（Michael Wüstefeld）、萨沙·安德森（Sascha Anderson）和本哈德·泰尔曼。泰尔曼还把这种折叠装订的《诗集》寄给了作家西格马尔·福斯特（Siegmar Faust）一本，他不无骄傲地想向西德的朋友展示一下，如今在东德这个国家都可以做些什么。由于通过邮局邮寄太不安全，他把《诗集》交给了一位常来东德旅游的荷兰友人。

1984年3月1日西格马尔·福斯特在《世界报》撰文介绍这本折叠装订的《诗集》，并称这本在德累斯顿出版的诗集为东德的第一本秘密出版物。这场出人预料的地下行为经西德媒体曝光后给这些文字印刷艺术家们带来了诸多后果。从那时起国家安全部开始调查此事，展开了一场名为“恐吓石”的调查计划，此词取自米歇尔·维斯特费尔德的一首同名诗，描写的是东德西部与东部不同的紧张局势。奥博格拉本印刷所的成员被请到位于德累斯顿射击巷的警察局，接收单独审讯并被隔离拘留了数小时之久。“那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带来的所有后果。他们本该放过我们的作品集的，那本小册子，印数本来也不多啊，我们已经梦想着下一册了。虽然知道这么做避开了印刷许可的麻烦，但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艺术上和美学上的问题。那肯定是美妙的，他们也肯定抓不到我们的把柄。我们不仅试图嘲笑国家，后来也必须这样做。但最终这些都成了具有美学价值的解决方法。”[8]

就在国家安全部拘留这些艺术家期间，印刷所被一辆大型客车封锁，并安装了窃听器。国安部的秘密档案显示，相关部门曾计划“破坏格舍尔、泰尔曼和维斯特费尔德的榜样作用，以防止造型艺术和作家圈内反对派/负面新生力量效仿”[9]。自那时起奥博格拉本印刷所就一直受到监视，并且收到明确指示，无论以何种形式印刷文字都必须经过德累斯顿市参议会文化处批准。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事后大家分析是萨沙·安德森的参与起了作用，他作为国家安全部的通报合作者参加了《诗集》的出版工作。大家猜测国安部除了有正式访问，私下里肯定还进行过暗访，但对于监察的细节没有做进一步猜测。与很多其他案子一样，这位诗人的双重身份人们也是后来从秘密档案中才获悉的。

反正这件事过后，印制图文诗集就根本不可能了。“在惹了这么多麻烦以后，我们知道再也拿不到印刷许可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够不上受处罚，但我们总是让人头疼。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其实要想整治我们一向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但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我不明白，我们之中也没

有人明白。不只有我们自身的原因，外界也都说我们很精明圆滑。”[10]

1985年奥博格拉本印刷所仍旧开始了出版《图诗集》4的工作，起名为《Ritze》。“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印刷所位于Ritzenberg大街，这个词有双重意思，一幅铜版画也得刻[11]，我们也一直在刻。我们可不想讨好什么人，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12]

因为无论如何不想放弃图文并茂的形式，所以他们说服了很多东德作家，比如埃尔克·埃尔贝（Elke Erbe）、阿道夫·恩德勒（Adolf Endler）、埃伯哈德·黑夫纳（Eberhard Häfner）、乌韦·许布纳（Uwe Hübner）、贝尔特·帕彭富斯-戈雷克（Bert Papenfuβ-Gorek）和吕迪格·罗森塔尔（Rüdiger Rosenthal），他们为《Ritze》将自己的作品手抄了40遍。“监管部门对手抄签名无计可施。但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方法，不能重复，只能一次性尝试。”[13] 对手抄复制文本的处理法律上没有案例可依。由于A.R.Penck也贡献了一幅画，这样仅仅由于版权页上出现了非艺术家协会成员的名字，奥博格拉本印刷所被指责违反了付酬规定，并收到最后警告被明确告知：“依法而言印刷所根本不存在，因为既没在国家有关部门登记，也没注册，所以没有资格出版作品。理由是，根据造型艺术付酬规定，只有社会主义的商业部门、出版社和文化协会才有权出版画册。”[14]

印刷所从一开始也向其他艺术家敞开了大门，特别是当艺术高校的学习条件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时，许多大学生都利用起这个小印刷所，因为在这里可以更加自由，特别是能够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作。“那时有很多学生在学校确实有政治麻烦。他们去哪儿了呢？到我们这儿来了。克巴赫（Kerbach）如今是教授。沙伊布（Scheib）世界闻名，还有康尼·施莱默（Conni Schleime）、克里斯蒂娜·施莱格尔（Christine Schlegel）和桑迪（Sandy）[15]，他们都在我们那儿。”[16]

对于艺术家来说，奥博格拉本印刷所既是一个开放型的工作坊，也

是画廊和出版社。除了画展，这里还举办朗诵会、音乐会，许多艺术家也在此举办庆祝活动。在日常对外开放时间里，还可以参观印刷所里陈列的工作成果。有一段时间我们故意把对外开放时间定在星期二下午14点至18 点，因为这段时间所有机构都办公。

需要特别小心的还有税务局，因为奥博格拉本印刷所并没有获官方认可，所以也没有自己的税号，因而也就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收入。为了避免与税务局的麻烦，所有在印刷所印制的画册，扣除印制人酬金和固定开销外，销售所得全部归相关艺术家。可以为印刷所捐款，这是允许的。“在钱的事上我们决不动摇，不做违法的事。我们做别的事。［……］《酒吧与酒吧诗》作品集当时是我签的名，为此我得去区参议会和税务局。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审查收据，以艺术家的名义我是可以出售该作品集的。钱归艺术家所有，尽管艺术家人在西德。至于他在西边怎么花东边的钱那就是他的事了，他是否把钱捐给我们或是［……］那也有相关凭证。他们想在钱上抓我们的把柄，那是做梦。”[17]

奥博格拉本印刷所自始至终因其我行我素的作风常遭到有关部门监控，而“稍微带些无政府无组织的色彩向来没错”。虽然众所周知印刷所最早的所址就在奥博格拉本9号，然而市里相关的负责同志们曾煞有介事地琢磨，Obergraben印刷所的名字是不是跟“untergraben”[18] 一词有关，比如破坏性文化政策。一次印刷所要举办展览没有通过审核，该展览应该到少年图书馆举办，理由就是奥博格拉本印刷所的展览会破坏城市展览规定。外界也一再试图猜测印刷所拥有非法生产设备，但那些老掉牙的设备让东德当局也很难证明是否带来了国民经济损失。

Rähnitzgasse画廊是国有艺术贸易机构，1985年该画廊邀请奥博格拉本印刷所参加《德累斯顿画坊作品》展览。印刷所呈上的自我介绍没有获得通过，因为介绍中提及了所有创始会员，其中有两个人已经离开

了东德，所以不允许再出现他们的名字。剩下的艺术家也放弃了提名权，因此目录中仅仅写道："奥博格拉本印刷所由三位画家、一位胶印师和一位印刷机制造师创建［……］。"[19]

尽管受到种种阻挠，该印刷所还是能在市艺术圈内外证明自己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有各种机构定期收购其作品集，这对印刷所的自信心是种很大的支持。这些机构主要包括德累斯顿州立艺术博物馆铜版画陈列室，后来还有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柏林国家博物馆铜版画陈列室以及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至1989年，奥博格拉本印刷所还出版过两册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合集，1988年《图诗集》5问世，其中的画作由克劳斯·魏登斯多尔佛（Claus Weidensdorfer）提供，诗歌出自卢茨·拉特瑙（Lutz Rathenow）的手笔。当时国家安全部一直在奥博格拉本印刷所的亲信中散布谣言说画家埃伯哈德·格舍尔是为他们工作的，可没人相信这种说法。印刷所的人彼此之间绝对开诚布公，他们对政府也毫无隐瞒，所以艺术家们就不会上这种当，毕竟他们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在奥博格拉本印刷所艺术总是占中心地位，这不是什么秘密。

> ［……］我们不是想挑衅，而是想创造上乘艺术，这是我们的最大心愿，我们可以自由地思考我们思考的事情。[20]

领头狼出版社：**"1982**年百无聊赖，糟糕透顶**"** [21]

领头狼出版社是书籍艺术领域的一个即兴项目，产生于80年代初德累斯顿的某个定期举行的餐馆聚会。学艺术的大学生彼得拉·卡斯滕（Petra Kasten）、安德烈亚斯·黑格瓦尔德（Andreas Hegewald）与自由职业艺术家卢茨·弗莱舍尔（Lutz Fleischer）定期在德累斯顿的餐馆聚会，由于时而感到无聊，为了排遣无聊三位朋友开始晚上一起做诗或画画。"一般而言这就像是一种深入的谈话。［……］至于结果，往往是你事先根本想不到的。"[22] 大家以接龙的方式——上一位写了一首诗，下一位应和一首诗——慢慢共同创作出了许多诗歌，后来又一起为这些

诗歌配了插图。画画时将纸张竖着折叠，桌旁的人事先画出的东西只能看到最后几笔，下一位要接着画下去，也就是说只有粗粗几笔可供参考。“由于不知道前面的人画了什么，最后总是能出现非常有趣的东西。有些插图我们也一画再画，直到我们满意为止。［……］几年以后到了80年代中期，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弄到一本有关超现实主义者的书，读完才知道，他们也这么做过，不过他们是横向折叠画纸。我们开始根本不知道这一切60年前已经出现过了。”

当晚间艺术创作越来越形成规模时，便萌发了出一本书的兴趣。“那段时间出版东西困难，作家们有时候用打字机复写的方式复印他们的作品，我们考虑后决定如法炮制，用丝网印刷，很原始的方法。”

领头狼出版社就是诞生于一种以某种形式保存自己作品的设想。经过艰辛的家庭手工制作，第一本图文诗集于1983年问世，起名《领头狼》。这是一位上了岁数的先生的外号，常出入于德累斯顿的“摩卡咖啡吧”，由于他的模样引人注目，人们管他叫“领头狼”。第一本书的书名在出第二本书时就成了出版社的名字“领头狼出版社”。因为没有特许证是不能公开出书的，所以起个“领头狼出版社”的名字，表面上就将自己合法化了。

那两位学艺术的大学生彼得拉·卡斯滕和安德烈亚斯·黑格瓦尔德在学校鼓捣过丝网印刷。这种印刷技术不像传统印刷技术那么复杂，因而比较容易在家里操作。80年代私人出版物多用此种印刷方式，因为丝网印刷工艺可以对手写稿和打字稿大量复印，特别是这样印出来的手写体可被看成图形艺术形式，从而也就成为艺术家手制书必不可少的方法了。

领头狼出版社的图书原型印数不多不少正好64份，原因很简单，弄不到更多的纸张。“我们考虑了规格，怎样才能尽可能地节省，不需要

太多的下脚料就能用一张印纸弄出我们想要的东西。［……］封面我们用板纸，无论什么地方总是能找到点儿什么东西。虽然有时很困难，但总是有些收获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想让领头狼出版社成为一个平台，把它做成“青年艺术家的通讯论坛”。具体方式是这样的：一位或多位作家，通常以团队合作的形式，自己印刷、装订并为其书籍签名。“我们后来发出公告，任何人均可使用这个地址发表作品。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把一切搞得更疯狂一些，但仅有少数人利用了这种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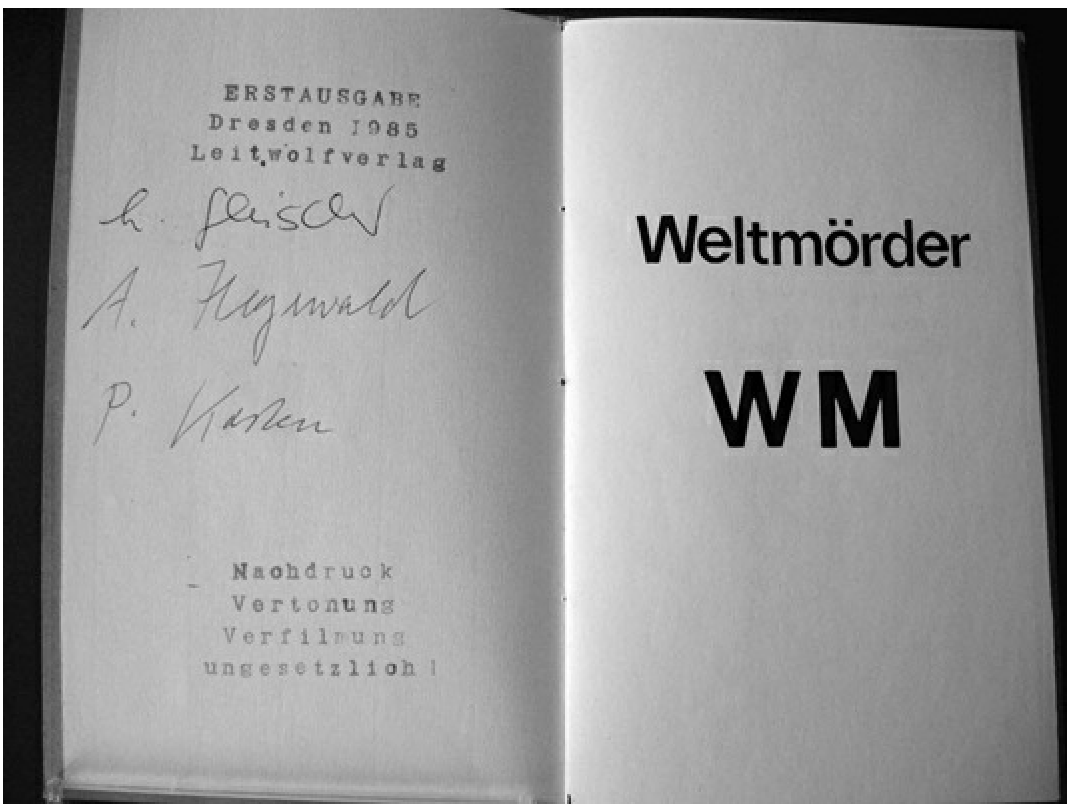


图**3** 领头狼出版社的第一版书，德累斯顿，**1985**

到了1989年，领头狼出版社名下共出版了11种艺术家手制书，其中多数是弗莱舍尔、黑格瓦尔德和卡斯滕合作印制的。第一册书的规格经证明可行后被沿用下来，出版社为后来的版本准备了比较充足的纸张，因此后来的印数大方地提高到100～200份。

为了提高成书质量，艺术家们不断试验改变颜色合成以及印色强度。为了出版一本书，总要辛勤地工作好几个晚上。“文字部分很快就可以搞定。有时我们一晚上可以弄出五段或十段文字，一两个晚上就凑成一小本。有时候趁着晚上没人，他们甚至可能在学校里做起了丝网印刷曝光。［……］印制绝对是在家里完成的，我们把印好的东西挂在绳子上，小屋里挂满了散发着臭气的半成品，这时我们就躲到酒吧去继续创作。”

恰恰是在封面设计上大家下了很多工夫。给每本书敲章也是让人乐此不疲的事，有可能的话尽量使用朋友和熟人们提供的真章。印章里写的是听起来尽可能正式的文字，比如在图书扉页上可以读到如下提示：“翻印、配乐、拍成电影属于违法！”，“科研文献。须提供学术使用目的证明！”或是“因缺乏劳动力无法保证供货时间”。有时大家还喜欢用在东德可以买到的成套儿童印章。“这东西非常有用，我认识的人中有的用这玩意儿敲出了整本书，当然书中的文字部分不多。”这种成套儿童印章有个优点，因为其材料易磨损，所以不会形成刑侦技术可以鉴定的特征，这样就很难对印章持有者进行登记与追踪。然而这对同时使用好几套这种印章的领头狼出版社来说并不重要，他们从未与国家权力机关有过什么麻烦。“我们估计早晚会惹恼当权者的，可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认为，怎么说呢，大概是因为事情从未搞得非常正式，也许他们从未认真对待过我们的小把戏。”

出的书我们都赠送掉，或是20东德马克一本卖掉。感兴趣的人不少，定期购买我们书的还有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如今这家图书馆除了我们的书，还收藏了大量其他独立私人出版社出版的原版图集。

如今对我们来说有个好消息：80年代官方机构购买无印刷许可的出版物的数量也增加了。当时许多私人艺术出版社把这一情况当作是获得承认的标志，或者相关部门至少能够接纳他们的工作。领头狼出版社也

觉得受到了激励，愿意继续做下去。然而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图书馆购买这些艺术书籍并非用于一般借阅目的，而是为了收入图书馆的毒草柜。

像许多私人艺术出版社一样，领头狼出版社没有统一的美学目标或政治目标，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艺术界和生活中的独断专行和外界干预。领头狼出版社的理念首先是对出版业现状强烈表示不满，继而也是对出版业现状的挑衅。“原则上讲那是开玩笑的。重新拥有一摞这种小册子，总是一种美好的经历。”

---

[1] 参阅Henkel，Jens：*Die Bibliophilie der “Andersdenkenden”-Künstlerbücher in der DDR* . In：D1980D1989R. Künstlerbücher und originalgrafische Zeitschriften im Eigenverlag. Galerie Gunnar Barthel，Berlin 1991，S.10。

[2] 参阅Sauer，Helgard：*Nonkonforme Kunst-illegale Bücher in der DDR* . In：Non kon form. Künstlerbücher，Text-Grafik-Mappen und autonome Zeitschriften der DDR 1979-1989 aus der Sammlung der Sächsischen Landesbibliothek Dresden. Galerie der Stadt Esslingen，Villa Merkel und Stadtgalerie im Sophiehof，Kiel. 1992，S.9f。

[3] 源自作者与Jochen Lorenz于2007年5月30日进行的访谈，地点在德累斯顿奥博格拉本印刷所。

[4] 源自作者与Jochen Lorenz于2007年5月30日进行的访谈，地点在德累斯顿奥博格拉本印刷所。

[5] 源自作者与Jochen Lorenz于2007年5月30日进行的访谈，地点在德累斯顿奥博格拉本印刷所。

[6] 源自作者与Jochen Lorenz于2007年5月30日进行的访谈，地点在德累斯顿奥博格拉本印刷所。

[7] 源自作者与Jochen Lorenz于2007年5月30日进行的访谈，地点在德累斯顿奥博格拉本印刷所。

[8] 源自作者与Jochen Lorenz于2007年5月30日进行的访谈，地点在德累斯

顿奥博格拉本印刷所。

[9] Theilmann，Bernhard：*Unter Druck und über Wasser* . In：Verein der Freunde des Kupferstich-Kabinetts e.V.（Hg.）：Unter Druck.20 Jahre Obergrabenpresse Dresden. Dresden 1999，S.80.

[10] 源自作者与Jochen Lorenz于2007年5月30日进行的访谈，地点在德累斯顿奥博格拉本印刷所。

[11] 德语动词为ritzen。——译者注

[12] 源自作者与Jochen Lorenz于2007年5月30日进行的访谈，地点在德累斯顿奥博格拉本印刷所。

[13] 源自作者与Jochen Lorenz于2007年5月30日进行的访谈，地点在德累斯顿奥博格拉本印刷所。

[14] Aktennotiz des Rates des Bezirkes Dresden.Abteilung Kultur（Dr.Schumann），10.5.1985. In：Theilmann：Unter Druck und über Wasser，Abb.S.82.

[15] 即Reinhard Sandner。

[16] 源自作者与Jochen Lorenz于2007年5月30日进行的访谈。

[17] 源自作者与Jochen Lorenz于2007年5月30日进行的访谈。

[18] 此词有削弱、破坏的意思。——译者注

[19] *Selbstdarstellung der Obergrabenpresse* . In：Verband Bildender Künstler in der DDR，Bezirksvorstand Dresden（Hg.）：Grafik aus Dresdener Werkstätten.Ausstellung gewidmet dem 40. Jahrestag der Befreiung vom Faschismus；4. Mai bis 16. Juni 1985. Katalog der Galerie Rähnitzgasse，Dresden 1985，S.21.

[20] 源自作者与Jochen Lorenz于2007年5月30日在德累斯顿奥博格拉本印刷所进行的访谈。

[21] Leitwolfverlag（Hg.）：*Klappentext. In*：*Leitwolfverlag 1983-1996* . Dresden 1996.

[22] 源自作者与Lutz Fleischer于2007年10月30日在德累斯顿进行的访谈。以下引语均出自此访谈。

“根据‘斜线战术’排兵布阵”

——莱比锡图书制作人的自由空间

黑尔佳特·罗斯特（Helgard Rost）（R）、罗兰德·林克斯（Roland Links）（L）、弗里茨·米劳（Fritz Mierau）（M）与英格里德·宗塔格（Ingrid Sonntag）（S）的座谈

S：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莱比锡图书制作人拥有的自由空间，我们就从莱比锡雷克拉姆（Reclam）出版社的总编辑尤尔根·特勒（Jürgen Teller）开始谈起。雷克拉姆出版社总社和总行政处位于柏林，特勒在莱比锡领导出版了许多图书，其中涉及的题材远远超出东德各大学的授课内容，图书质量同西德出版社推出的刊物不相上下。

M： 像东德专门从事苏联文学出版编辑的拉尔夫·施罗德（Ralf Schröder）一样，尤尔根·特勒的存在是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20世纪俄国文学作品的幸事。他的思想智慧包罗万象，涵盖了从古典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哲学范畴，此外还拥有扎实的文学知识。像尤尔根·特勒这样的人是不会屈服的，特勒因坚定地捍卫支持自己的老师哲学家布洛赫（Bloch）而遭遇了悲剧，被送到莱比锡一家钢厂接受“缓刑劳动改造”期间因一次事故而无辜地失去了左臂。我们俩之间还有一层私人关系，因为我们都来自萨克森州的德伯尔恩（Döbeln），但由于有代沟，关系不是很密切。等他当了总编辑后，我们自然才有机会进一步互相了解，于是觉得是否可以合作干点儿什么，因为我也倾向于做图书项目，所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60年代初我给负责斯拉夫语言文学的编辑汉斯·洛泽（Hans Loose）写了一封信，提出15个有关俄国文学的选题项目，并说自己这儿还有更多货源，这份选题项目单还可以继续补充，后来雷克拉姆出版社也确实

非常积极地补充了一些。我保留着一些信件，其中敲定的选题项目有七八项。当然那只是计划，没能全部实现，只有极少数图书出版了，不过那也只是个开始。特勒1964年到任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制定策略，他找大家谈话，最后决定由雷纳·基尔施（Rainer Kirsch）负责翻译，马尔加·埃尔布（Marga Erb）任编辑，我以书信形式参与，这样一项重要工程就此启动。1969年特勒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应该推介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东德当然没人知道他，但他在西德很出名，因为保罗·策兰（Paul Celan）翻译过他的诗——不是把他作为20世纪欧洲现代派的重要代表，而是作为苏联文学的边缘现象处理。特勒认为我当然同意他的观点，我们这样做就是根据“斜线战术”安排出版计划。公元前371年底比斯统帅埃帕米农达（Epaminondas）在留克特拉（Leuktra）战役中便用此战术排兵布阵大败斯巴达。“斜线战术”就是左翼的步兵大举进攻，右翼的则后撤。当时古希腊的这种战术与政治无关，我们这么做却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曼德尔施塔姆根据苏联的分类属于右倾、保守和崇尚古典的作家，追求理想主义的世界文化。左翼有足够的作家，都是国家部委规定要推介的。可笑的是，当时我还正在为左翼作家们忙活。快到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说服人民与世界出版社以此为由出版俄国形式主义者分析列宁语言的文章。1924年列宁逝世时，这些人曾用古典语文学家的方法并借助古典雄辩术的知识撰文对列宁的语言激情进行过分析。那些文章确实非常出色，最后也果真出版了。我还搞了一本大画册，名叫《左！左！左！》，是些革命中出现的张贴画和诗歌。还有谢尔盖·特雷雅科夫（Sergej Tretjakow）是个绝对危险的左派，但他很出色，写的东西振聋发聩。这些都是在左翼发生的事情，左翼的步兵已经披挂上阵，这时可以在右翼为曼德尔施塔姆做点儿什么了。

S： 罗斯特女士，1969年您大学毕业后来到雷克拉姆出版社。在结束大学生活，在党的第11届全体大会和1968年学生运动之后，这对于您来说是否意味着步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氛围，一个避难所？

R： 当时的情况确实很特殊，因为出版社的印刷部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实际上一年之久什么都没印，所有出版计划延迟一年，编辑们都很沮丧，我刚到出版社时气氛很糟糕，因为我还没有参加任何项目，所以感触不深。后来情况又慢慢好转了，当然是以东德的速度好转。在出版社自然能够学到、必须学到而且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每做一本书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当然还可以向同事学习，以及向工作中所接触的出类拔萃的人学习，比如我这个搞罗曼语的从卡尔-海因茨·巴尔克（Karl-Heinz Barck）那儿获益匪浅。

S： 林克斯先生，在去莱比锡基朋霍伊尔（Kiepenheuer）出版集团前，您作为负责德语文学的编辑与麦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和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有联系，还和阿道夫·穆施格（Adolf Muschg）是朋友。您推动了很多书籍的出版，同时还是图霍文斯基（Tucholsky）作品的出版人。1977年您自愿放弃了在人民与世界出版社的职位，何出此举呢？

L： 那是我46岁生日时做出的狂怒而不负责任的决定。我在剃须的时候意识到在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刚好干了23年，碰巧占去我生命中的一半时间。当时大家都在读弗朗茨·菲曼（Franz Fühmann）的书《二十二天或生命之半》。像晴天霹雳一样我突然意识到：你不可能再在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待下去了。因为气氛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以我离开了。基本上是没有自由空间留给你的，就像弗里茨·米劳刚才形象地用“斜线战术”所说一样。实际上，人要善于在双态国家的两个原则之间斡旋——措施国家与规范国家。虽然有规范准则，但不知道这些规范是否有效或者其中哪些是有效的，而且你总是要争取与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或穆西尔（Musil）或弗里施之间建立联系。您知道，麦克斯·弗里施的小说《斯蒂勒》（*Stiller* ）在东德有一段时间是“禁书”。

突然一切都不对劲了。现在我知道，当时有一位国安部的通报合作者，我本应该去暗中监视拉尔夫·施罗德所在的编辑部。有一次谈话很诡异，出版商尤尔根·格鲁纳（Jürgen Gruner）提醒我说：你有客人来访！结果真就有人来拜访我了。我在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做巴赫罗（Bahro）及其作品的责任编辑，因此我被问及对他的评价。我以为指的是他的诗，就说了自己的看法。那位满头银发，看上去挺招人喜欢的老先生突然问我对他的新作怎么看。我中了圈套，回答说我认为他对东德情况的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至于他在《抉择》（*Alternative* ）中写的那一套则很疯狂。负责我们所有人的人是居特林（Gütling），在每一本有关国家安全部的书中都少不了他，我们管他叫安全别针，居特林少校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如坐针毡，老先生微笑着说我们也这么看。可是林克斯先生，您怎么会了解这本书的？这下全完了。大概我的回答，像我后来在国家安全部档案中看到的，让那位通报合作者觉得被戏弄了，因为我说：两周后我要去会见麦克斯·弗里施，我正在编辑一本《今日瑞士》的文集。要是我说自己不知道巴赫罗的书，您以为麦克斯·弗里施还会拿我当回事吗？所以我必须要了解这本书，我对此书有自己的看法。好，他说，没问题。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可社里的一切突然都变了样，气氛不对了。

S： 情况是不再和从前一样了。米劳先生，您曾写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委托您负责的三个大项目突然下马了。

M： 其中最重要的项目被我称作《俄国诗人传奇》，我想把两个没落的传奇重塑在一起，即德国的俄国传奇和俄国的德国传奇或是西欧传奇，这在两国文学中都极为错综复杂。西德有很多人翻译俄国诗人的作品，并且出版阿赫玛托娃（Achmatowa）或是曼德尔施塔姆、勃洛克（Blok）和玛雅科夫斯基（Majakowski）的诗集，我想找这些人谈谈出一本不超过200页的合集。我在人民与世界出版社递交了选题申请，编辑部负责人莱昂哈德·科苏特（Leonhard Kossuth）和拉尔夫·施罗德全力

支持，可尤尔根·格鲁纳等社领导却不松口。我的论点是俄国诗人在赢得世界声誉前都吸取过西欧诗歌创作的经验，对此我可以通过他们对西欧诗歌的翻译和接受情况来详细证明。格鲁纳抓住这一点不放并反问道：您是想断言，每个住在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1] 写诗的小子，日后到了伦敦或巴黎就都成了伟大的德国诗人了？我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个项目的命运您诸位可以猜到，被枪毙了！

那些青年诗人我是在“年轻天才之家”的活动上认识的，那些人里还包括安德烈亚斯·科齐奥尔（Andreas Koziol），他不太出名，但我很赏识他。我还想到了洛塔尔·特罗勒（Lothar Trolle）和芭芭拉·霍尼希曼（Barbara Honigmann），他们都与俄国诗人有关，或者阅读翻译过他们的作品，格鲁纳的问题问到点子上了。1988年雷克拉姆出版社做了这个不错的项目，出版了《俄国人在柏林 1918～1933》，这样之前的失败才不算输得太惨。

L： 我认为，在东德，与今天的情况不同，文学是由编辑部和项目发起人推动发展起来的，编辑的职责与今天完全两样。后来在莱比锡的基朋霍伊尔，我既不是真正的出版商，也不再是编辑。我成了一个奇怪的阴阳人，像格鲁纳一样，我的职责就是必须对选题予以肯定或否定。

我们讨论的主题是莱比锡的自由空间。汉斯·马夸特（Hans Marquardt）因他所谓的国家安全部的身份而受到攻击。我不信，我认为他作为地方小出版社编辑，是被逼着为争取一席之地而奋斗，不像那些柏林的出版社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70年代末到莱比锡工作时首先被告知，每年得为上一年写一份总结报告，上交给党在该地区负责主管文化的同志。马夸特同志多年来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做得很好。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是的，按要求做吧，这事推不掉。你得想法子跟这位同志把关系搞好。一年后，这位同志的继任者罗兰德·韦策尔（Roland Wötzel）单独请我吃饭。我们坐在饭馆吃饭，四周都是服务

员，大家一开始保持沉默，后来我先打破沉默，然后有了如下对话：

说说吧，为什么请我吃饭？

-我想知道你归谁领导。

-那还用说，自然是最高主管部门。

-不对吧，为了庆祝基朋霍伊尔建社100周年，赫普克（Höpcke）[2] 在这儿搞了大型活动，这个出版集团最早还是设立在东德呢。赫普克明确说过，出版社直属于统一社会党，所以你受党中央的领导。

-那好，要是这么看我是受党中央领导。

-这就好，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清楚了。你做的事，得算在你的账上，我不负责。

-这是给我的特许还是警告呢？

-你要是愿意的话：二者皆是。你必须搞清楚你与柏林的关系。

双态国家就是这个样子。我经历过便体会到，在各种机构间必须要斡旋得干脆明确。

将近10年之久我一直在为遗产文学写后记。遗产文学不像当代文学那么“容易出问题”，可出版遗产文学也并非易事。70年代就遗产问题曾经展开过大规模的讨论，其中最大胆的文章出自米劳的手笔。那篇三页长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沙皇有一次对普希金说，如果普希金先生能够修改自己的剧本，像苏格兰诗人瓦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那样去写，那就有可能被搬上银幕。米劳以此为理由攻击“比特费尔德道路”[3]，他说：你们的行为就像沙皇，你们为作家们规定他们该写什么，但只有放手让作家们自由写作，才会诞生伟大的艺术作品。同一时期，为纪念海涅诞辰175周年，汉斯·考夫曼（Hans Kaufmann）发表了《社会主义需要整个海涅》[4] 的文章，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时出书还不出全集，只出选集。很多年以来读者只能读到法国作家萨特的名句，海涅的

也一样。我们人民与世界出版社第一次出托勒尔（Toller）文选的时候，只许出艺术科学院规定我们出的，符合当时清规戒律的东西，也就是那些革命诗歌，但不包括他那些深邃悲观的诗作。文学就这样被利用来进行当时所需要的宣传活动。米劳先生，您和汉斯·考夫曼在当时那场有关遗产问题的讨论中，还有您在后记中为勃洛克进行辩护的方式为我们大家打开了一扇门。出版勃洛克的作品要冒风险，因为勃洛克实际上是反对革命的。在后记中米劳是这么写的：是的，没错，他在自己的诗中展示了矛盾，但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独有的矛盾投射到时代中了，这当然令人难以置信。对不起！可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在《意义与形式》杂志上，也就是得到了格鲁纳的认可。永远是这种游戏，先发表文章，这样就拿到了作为后记出版的通行证，或者找个名叫库钦斯基（Kuczynski）的教授，或者科学院的一位女教授，然后关于二三十年代破败的科学院出一本书，书中会有一些以前在东德没机会发表作品的作者写的文章。只有通过联合的方法尝试才能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空间。

R： 这一点在雷克拉姆出版社表现得很明显，所以编辑们在社内拥有很多自由空间，所有的选题都出自他们的想法，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负责这些选题计划的实施。如果有关最高主管部门有反对意见，也只跟社领导交涉。编辑从来看不见书面的东西，只能听到最高主管部门传达下来的意见。

S： 1986年那本有关超现实主义的书是怎么回事？

R： 我不能说这本书带来了什么特殊的麻烦，也从未有过任何请求或改动的想法。一切都很顺利。除了文化政策之外，另一个至少同样扮演着扼杀角色的因素我们在此还没有提到过，也就是物质境况。恰恰是我所在的部门，如果我们想出一本法国或英国作家的书，那我们得支付版权费。出版社的外汇储备很少，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书都没法出版，特别是《巴黎的超现实主义》那本书有很多插图，弥足珍贵，也得

用外汇支付。出版社为此花费了不少努力，这种物质上带来的限制还有很多。每家出版社的纸张都是限量供应，每本厚书，无论来路如何，要想出版都很困难，往往很容易因厚度而夭折，我们出版社的排字能力也同样受到规定限制。此外东德能印制平装袖珍版书籍的印刷厂也只有一家，即德累斯顿的民族友谊印刷厂。所有出版社的平装袖珍版书籍都得送到那里去排字和印刷，也就意味着一部手稿印成一本书几乎需要一年的时间。

M： 这也很快了。

R： 嗯，这是平均速度，也完全有可能提前印出来。

M： 但前提是没有人有任何反对意见。要是最高主管部门或是其他什么人，比如外请的鉴定人有异议，那事情立马就变得复杂了，得讨论来讨论去，部委和社领导之间还要进行多次电话沟通，很棘手难办。

R： 那过程真是长得可怕。一位编辑有了选题得先在最高主管部门那儿登记，这么规定是明智的，这样就不会出现选题重复的现象。

M： 选题卡片索引！

R： 对，就是这个名字。检索很快，工作人员只需要翻翻卡片，就知道这个题目是否有人已经选了。但如果工作人员不查，那么递交上来的选题问询可能会耽搁好几个星期。作为编辑没有资格往最高主管部门打电话询问：进行到哪一步了？但一般工作人员还是会按部就班做的。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专家过剩的局面，所以为了最终争取到足够的雇员，社内会较快地作出决定。在莱比锡我属于最后一批学罗曼语的大学生，所以出版社雇员紧缺，非常优秀的就更少了，得等到这些人有时间才行。当编辑就更要不断地等，等着作者交稿，这且得等呢，然后是书，因为稿子得交给最高主管部门审查。排版许可要等多久，编辑是帮

不到忙的。一切办妥之后，印制图书的技术过程还需要这么长时间。

L： 我刚才想起一件轶事，是长年担任迪特里希施（Dieterich’sch）出版社负责人的马克思博士先生讲的，这件事说的就是在莱比锡能拥有的自由空间以及莱比锡和柏林出版社之间的关系。我们大家都得报选题，我们这些条件优厚的柏林出版社要报，莱比锡的出版社也要报，如果选题撞车，往往莱比锡的出版社就得让步，迪特里希施私人出版社的领导马克思博士觉得这欺人太甚。当时是计划经济，每年同行业都要开大会报下一年的选题，一次开大会时马克思声称买了一位乌克兰著名作家所有作品的版权，这位作家我们就叫他Krassilnikow好了，准备出版六本小说。柏林的建设出版社立即报了Krassilnikow的选题，声称他们已经登记过了，然后要求马克思把相关书籍寄到柏林去。他回复说寄不了，事情是他杜撰的，只不过是想知道他们的反应而已。他们的举动证明马克思已经被骗了三次。最近几年没再发生这种事，这得归功于强悍的汉斯·马夸特，他在这儿所做的一切值得人们尊敬，当然其实是和特勒以及编辑室一起合作的。我和他关系并不好，我本来应该接替特勒的工作，但我拒绝了，也就没能接他的班。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事实就应该是事实。

R： 这说明，在任何体制中个人的雄心壮志都起着较大作用。马夸特来自西德，他想成为一名不光在东德，也要在西德和全世界受人认可的出版商。他有抱负，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做了一切。他的贯彻执行力很强，建立了各种联系，也造福于出版社和东德的读书界。

沃尔夫冈·欣茨（Wolfgang Hintz）：诸位都是原东德出版界的人物。我来自西德，从您的话中我听出来，诸位为了施展能力实现自我，在工作上和生活中每天都得同某些东西进行斗争。各位是否有过这种情绪——想说：我不干了！还是一再对自己说：坚持！？

R： 要抗争的事情肯定有很多，但也有很多机遇，像资金充足，在

适度的条件下付给雇员工资不用讨价还价。东德马克起的作用不大。首先销售的事不用发愁，这对出版社来说是件好事，而如今编辑们和出版商为了卖出他们制作的精美书籍，头发都愁白了。最后还有让人喜笑颜开的酬劳，你克服重重困难做出了好书，大家有目共睹便向你开口称赞。

M： 我们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我只能谈谈我和妻子的情况。柏林墙建起来以后，在一次特别的关头我们决定，只要不危及我们和孩子们的性命，我们还是留在这里。我们做出这个十分坚定的抉择意味着我们愿意面对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并且咬牙挺住，这样后来确实如您所说，真是每天都要奋斗。但做出这一抉择的前提自然是我们不反对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像每个人把它建成的那样可以如此美好。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到头来是我们自己的事，是我妻子和我的事。至于这和党与政府的命令不相符，那又是另一回事。我们觉得自己属于社会主义，再加上作为搞斯拉夫语言文学的，我知道俄国人在苏联时期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是在更糟糕的情况下经历的这一切，也记录了这一切，而并非从索尔仁尼琴的笔下一切才为众人所知。

如果在这儿讨论的是秘密阅读，那么比如我在1963年弄到过一本书，要比索尔仁尼琴早，是卡尔·阿尔布雷希特（Karl Albrecht）的《被出卖的社会主义》（*Der verratene Sozialismus* ）。有人知道这本书吗？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去了苏联，在那儿经历了一些很平常的事情，最后几经周折在德国大使馆的帮助下离开了苏联，回到德国后进了希特勒的集中营接受审查。1938年他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与在苏联经历的事情相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要好很多。这可以说是纳粹宣传的巨大成功！这本书是一位老共产主义工人党人（KAP [5] ）送给我的，一起送我的还有一整箱敌对书刊。KAP是20年代初从德国共产党（KPD）中分裂出去的，但它作为宗派党却比真正的共产党拥有更多党员，所以KAP才是实际上的KPD。箱子里还有共产国际的宣传小册子，小红本，里面有

列宁派老共产党的核心领袖：托洛茨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等，满满一大箱都是这类刊物。这个人我们是在KAP的创始人之一弗朗茨·荣（Franz Jung）的妻子克莱勒·荣（Cläre Jung）那儿遇到的，当年KAP的老人们彼此还很团结。那次会面也很隐秘，监视我们的人非常警惕地监视着并记录了我们的言行。我想说的是：既经历过纳粹迫害，也经历了1945年以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这儿搞的历次党内清洗的人，总要被人问及以下问题：你曾经是另一个共产党的党员吗？你如今对其持什么态度？我们中间就有这些人，早在1958年或1956年的时候就跟他们认识了。我们从未幻想过这儿会存在一个精美的社会主义。相反，我们认为在这片德国土地上重新进行了一场实验，其结果不明。当然出版业有一定的物质保障，虽然雷克拉姆出版社给的报酬不高，但毕竟钱是有的，甚至一些未能实施的选题项目有时候也能得到酬金。但是事情首先就包含一种潜在的思想跨度，前后都有给人思考的余地，至于其结局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克里斯托夫·林克斯（Christoph Links）：我还想问问关于秘密阅读的事，因为你们在出版社有特权，可以读到别人见不到的原版书。海关禁止进口的货物清单上对出版社设置了特别许可，海关不会没收出版社的书籍，所有出版社预订的书籍都会作为样书畅通无阻地投递。因此你们享受这种极大的特权，可以公开进行秘密阅读，令人又羡慕又激起欲望。你们可以把工作中读过的作品转借给朋友和熟人去秘密阅读吗？还是严格禁止此类行为？

S： 1976年到1982年我在哈雷东德出版社工作，埃里希·略斯特（Erich Loest）的《按部就班》（*Es geht seinen Gang* ）就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编辑们事先不允许看这部手稿，只有责任编辑和第二编辑才可以公开审阅，可是工人作家兼党领导小组成员哈利·坎普林（Harry Kampling）把巴赫罗的《抉择》借给了我一周。我是维尔纳·布罗伊尼希（Werner Bräunig）《天边一只鹤》（*Ein Kranich am Himmel* ）一书

的第二编辑，这是第一本被称为横截面文集即删节本的书，常被戏称为“截瘫”，还有他的小说《游乐场》（*Rummelplatz* ）在建设出版社出版后，我听说稿子被冻结了，社里虽然有未经审查的原稿，但文集中的节选本却是在党的第11届全体大会后布罗伊尼希本人的修改稿，也就是说印出的是审查后的版本。沃尔克·博朗（Volker Braun）的《欣策-孔策小说》（*Hinze-Kunze-Roman* ）80年代初在编辑部内流传，我可以把稿子带回家看个通宵，但大家并不公开讨论。

台下听众问：也就是说出版社里也有毒草柜？

台上答：有！

L： 但那是最后十年的事情，东德已不再是以前的东德。1954年我当编辑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为一本书写鉴定意见。总编要把书稿给我，女秘书们则一直等到总编辑去吃饭了，才把那部书稿和两份专家鉴定意见给我并且清楚地告诉我说，专家鉴定意见也要看。我喜欢这本书，而其他鉴定人持反对意见，所以我就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鉴定，说这本书我其实很喜欢，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该书如何、如何、如何。总编辑认为我很明智，是个很善于权衡利弊的编辑。这样我就被雇用了。

那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有火眼金睛的有时甚至不是头儿们，而是我们身边的人。那还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盛行的时代，编辑部里的各种争辩非常激烈。瓦尔特·乔莱克（Walter Czollek）引入了各编辑部联席会议制度，那真是争吵得一塌糊涂。那时当编辑的首要任务是辨风向：风从哪儿刮来？不久前我吃惊地在自己保存的资料中发现了一页会议记录，我本人居然完全反对出版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说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幸亏我们几年以后出版了这本书。当时我刚到出版社不久，说的做的都是在迎合别人对我的期望。

不知什么时候，由于麦克斯·弗里施的《斯蒂勒》，在读过这本我

想做的书，接下来与写了后记的汉斯·迈尔（Hans Mayer）的交谈之后，我向自己问道：唉，你在这儿到底在干什么？从那时起我就信奉这句话：能做好事而不做，就是犯罪。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哪些选择，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斯蒂勒》未能出版，持反对意见的是阿尔弗雷德·安特科维亚克（Alfred Antkowiak），1958年他被判两年零六个月的监禁，在狱中被国家安全部招募进来。我在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有500页，都是阿尔弗雷德·安特科维亚克写的，要是为我写传记的话这些档案材料可就太棒了，可惜从来没有人对我做过什么。我发现这个人是借着我和其他人来进行他与总编的论战，因为总编允许我们做的事曾让他坐了几年牢。他甚至还曾警告过我，也给我出了不少点子，也许是为让我不要轻率行事。

M： 就像特勒在他那绝妙的警句中所说，我们当然并非自愿地扮演埃帕米农达的角色，因为肯定很耗神费力。

R： 那是对能量的巨大浪费。那么多有天赋的人本来是可以出版更多东西的……

M： 这可说不准，事情是错综复杂的，在强制逼迫下也能释放出能量。

台下听众问：您可以把从西德弄来的书给您妻子或是近邻看吗？还是这种书属于机密文献？最后还想再问问《斯蒂勒》一书的事，那本书不是出版了吗？

L： 是的，但是在10年以后，1975年，书后有一篇我写的后记。

夜里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是那样，晚上总有人打电话。电话铃响，没人去接，我以为是国家安全部打来的。我把

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本书，吉拉斯（Djilas）的《新阶级》（*Die neue Klasse* ）装进塑料袋捆好后丢入了我们的化粪池，让它沉下去，结果书被弄坏了。后来我才知道，国家安全部知道这种藏法，每个白痴都是这么干的。我很小心的，不随便把某些特定的图书转借他人，但拉达茨（Raddatz）把库斯勒（Koestler）的《日食》借给了我，我又把它转借给了其他人，借给谁我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多也是在朋友圈子里借书，大家知道要遵守哪些游戏规则。在读吉拉斯的著作之前，我还读过莱昂哈德（Leonhard）的《革命舍弃了自己的孩子》，那时我就知道了，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什么的。是的，社会主义，没错，不过现在也仅仅是一个新生的阶级。

莱蒙德·瓦利戈拉（Raimund Waligora）：林克斯先生，因为您说只把书借给好朋友，我只想告诉在座的各位，您儿子在一次“大弥撒”上，也就是在一次党的选举大会上，把鲁道夫·巴赫罗的书装在一个简易信封中给了我，以便我能阅读。

L： 这是信任的标志。

莱蒙德·瓦利戈拉：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S： 最后请诸位向我们透露一下，第一次秘密阅读时读的是哪本书。

L： 库斯勒的《日食》。

M： 《毒蜘蛛》（*Tarantel* ），在1951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我是自由德国青年团（FDJ）的积极分子，还为这次聚会活动募捐过。由于听父亲讲述过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我从萨克森州的德伯尔恩来到柏林，急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西柏林的泰坦妮亚宫（Titania-Palast）影城去看他的电影。结果我们在通往太阳街的雅诺维茨桥附近被抓住

了，然后被塞进一辆卡车，其中全是自由德国青年团团员，11年级的，也就是17岁。当时我身上还带着《毒蜘蛛》，于是急中生智把那本杂志叠得非常小，塞进了车上一根木头与苫布之间，结果被发现了，这确实是一份非常尖锐彻底反东德的杂志，以连环画的形式反社会主义。审问者手里耍弄着那本《毒蜘蛛》，察言观色逐个审问，看我们对他的问题如何反应。我一直保持沉着冷静，不承认与这本杂志有什么干系。可最后我的团员证被没收，一年半都是没有团员证过来的。

R： 使我成为秘密读者的那本书，今天好像有人在报告中已经提到过。其外观就与别的书籍不同，没有封面，而是用一层油布包着，里面也没有内封，是苏联女作家叶夫吉尼娅·金斯堡（Jewgenija Ginsburg）写她在劳改集中营经历的《生命的轨迹》（*Marschroute eines Lebens*）。那是我第一次对古拉格体系有了详细了解，读后震惊不已。在拉达茨传记中我读到了关于这本书的故事：该书是受德国联邦情报局委托由罗沃尔特（Rowohlt）出版社出版，然后被空投到东德境内的，所以才用防水油布作封面。后来我还听说一位朋友的母亲在采蘑菇时捡到了这本书，然后又传给了其他人看。拉达茨反对出版这本书，也反对其经销方式，从他的立场出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是冷战时期。但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是一本真正的启蒙书。

L： 拉达茨在1958年离开人民与世界出版社之后的很长很长时间还向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多年来我一直与他保持着良好关系，我们常在书展上见面。图霍文斯基作品的出版工作我也是从他手上接过来的，通过他我认识了玛丽·图霍文斯基，从而可以在罗塔-埃格尔恩（Rottach-Egern）工作。

拉达茨非常关心我们，给我们出过很多主意，有没有这些点子可大不一样。一次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们社的头儿刚走，一位先生牵着一条松狮犬站在那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狗带进展览会的，我马上就知

道了这是位人物。他很和善地问我乔莱克先生在不在，请您把乔莱克找来！然后两个人一见面就热烈拥抱说道：你还活着！乔莱克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受过残酷的折磨，他被人吊起来往下拽他的腿，导致横膈膜撕裂，后来他也是因此身体受到损伤去世的。乔莱克和这位先生霍伊曼·冯·莫尔博克斯（Heumann von Mohrbooks）后来坐在一块儿聊了两个钟头，聊纳粹时期和集中营什么的，任何其他人来我都得挡驾。然后这位先生对乔莱克说：我可以给你提供每一样你需要的东西！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从著名的莫尔博克斯文学代理处那儿得到了所有我们想要的样书，当然看完还得寄还给他们。这些很重要，格外重要的是要知道方向在哪，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全球剪报服务和各种期刊。就像在船上一样，一切全靠定位，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世界上都出了哪些书，然后我们就阅读这些书。我们是否算秘密读者呢？这是我们的职业。

---

[1] 柏林的一个地区，是崇尚另类生活方式的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译者注

[2] 前东德政治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译者注

[3] 1959年4月24日哈雷东德出版社在比特费尔德化工厂召开作家代表大会，讨论如何让劳动者积极参与艺术与文化创造。此后“比特费尔德道路”成为东德社会主义文化政策新方案的代名词。

[4] 准确标题为《Der Sozialismus braucht Heines Werk ganz. Zum 175. Geburtstag des Dichters.》，In：Einheit 12/1972.

[5] 指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KAPD）］。

经审查的审查官与顽强反抗的读者

海关审查官

——东德海关在国家安全部委托下实施图书审查

约恩-米歇尔·谷尔（Jörn-Michael Goll）

在东德史研究中，有关国家安全部的文献有很多，而有关东德海关的文献少之又少，但不能就此认为东德海关的工作就和我们现如今了解的那些海关日常工作一样。其实，东德海关远远不能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国家的海关相比。区别二者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东德海关，监管审查始终优先于指挥调节。

东德海关作为所谓的安保机关代理人，同时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统治工具。其工作任务明显带有共产主义教条色彩：东德海关行使审查机关的职能，审查文字、图片及音视频，此外还担负着“外贸外汇垄断”保护的任务——这些内在职能使东德海关成为东德计划经济的一个要素。另外海关在执行审查的同时，始终还有一项任务就是阻止人口非法入境，既包括逃亡者也包括有逃亡意图的人。

为履行工作任务，海关拥有多种权限。根据海关法，海关有权审查所有运输工具、行李物品及集装箱，可以以检查为由收管货物及运输工具，且不予赔偿。此外还有搜身审讯的权利，尤其这项权利将东德海关与国安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渐渐海关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安部的管辖领域，并且经常扮演着零杂工和义务工的角色。为使海关在国安部的指挥下行使职能，国安部委派许多“特派官员”和通报合作者大范围地渗透

到海关并对其进行监察。所以我将东德海关关员称为“经审查的审查官”。

尤其有一项工作任务由海关和国安部不分高低共同承担：二者都致力于阻止东德人民受到西方影响。国家安全部一直担心西方对东德的影响会带来诸多严重后果，用海关和国安部的行话说就是“政治思想破坏活动”“敌对联系政策”及“地下活动”。[1]“政治思想破坏活动”的目标在于引发“犯罪行为及违法、违规和违纪的消极反社会主义思想举动”[2]。海关要特别压制由文字、图片及音视频带来的影响。





图**1** 海关关员首先大致查看出入西柏林的车辆，如有疑点则带到专用停车场进一步检查

海关总局将图书审查的任务分派给边境海关和邮政海关，国安部介

入了这两处海关的工作。在东德出入境，除了边境海关，还有护照检查工作组也负责审查等各类工作，向出入境旅客声称他们属于边境军队的一部分。而海关关员清楚地知道自己属于国安部，除了检查护照，协助国安部其他工作组展开缉查行动也是一项工作内容。虽然边境海关能够审查人员车辆，但护照检查官有权支配海关关员。海关关长的工作守则中写道，所有携带禁书入境的旅客，都要上报至护照检查工作组，[3] 并由该工作组决定进一步处理办法。

国安部对邮政海关的工作介入得更多，从1964年起，除了邮政及海关工作人员大约还有350人负责邮政缉查。[4] 这一岗位作为合法职务来看拥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正式海关工作部门，另一方面是国安部的工作组。[5] 负责邮政缉查的工作人员穿海关制服，直到1985年，个人资料都交给海关管理，[6] 工作证也是海关的，这样对外对内都给其他工作人员明显造成一种印象，他们是海关的工作人员。

对印刷物的审查，边境海关和邮政海关都遵守以下原则：定期出版的报纸杂志，如果在德国邮政的报刊列表上没有，那么和姓名地址录、挂历、各类统计年鉴和目录册等刊物一样禁止入境。[7] 对于图书的基本规定是，所有“反对维护和平”，也就是包含所谓煽动思想或者以其他方式“违背国家利益”的刊物不准入境。[8] 60年代起，文化部图书委员会出台规定，指明哪些图书允许入境哪些禁止入境，以后海关关员便有据可依。[9] 海关领导在这一规定的基础上定期发布相关指示，1963～1984年间，共发布了150份指示规定图书处理办法。[10] 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Honecker）1987年出访西德，因此从1987年11月1日起，这项严格的规定得以放宽。此后，即使德国邮政报刊列表没有的刊物只要不违反以上规定也允许入境。[11] 虽然新规定很模糊，但规定实施三个月以来，上报审查的包裹信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2900件，过境旅客被没收刊物的事件也由12600起减少到9800起。[12]

新规定出台之后，某些特殊刊物的处理办法有所变化，尤其是所谓的煽动性刊物。[13] 比如体制批判者鲁道夫·巴赫罗（Rudolf Bahro）、罗伯特·哈费曼（Robert Havemann）还有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的作品就被当做“煽动性刊物”处理。[14] 尤其到了80年代初期，海关关员的目标更多地集中在那些支持当地反对派的活动，从西柏林和西德偷着运往波兰的书籍、印刷纸和复印机。[15] 除了煽动性刊物和所有印制图书需用的材料，还有其他党派及宗教团体，[16] 特别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出版物也无一例外地被没收。

图书走私的后果是各不相同的，惩罚措施依据走私的形式和数量而定，轻者进行说教，重者大量图书被没收，更为严重的被上诉到检察机关，接受刑事处分。同时，海关更多地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是毫无例外地一律没收图书。[17] 尤其对于艺术家、宗教界名流、科学家及记者，海关越来越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防止他们公开发表不利于海关的言论。

边境海关和邮政海关的工作除了很多相同之处，还有很重要的不同之处。和邮政海关不同，边境海关在检查时，旅客和海关关员有直接接触。在海关检查之前、之中和之后，旅客的行为举止都要受到监察。如果一直盯着审查官行事，或者在海关关员的注视下过于紧张、仓促或者过于礼貌，都会引起注意。审查官不仅要检查过境旅客，旅客的汽车还有行李也要检查。此外审查官还应留意其他疑点，比如旅客年龄或总体外貌特征是否和他开的车匹配？从出行时间来看是否带的行李太多？接受询问时回答内容是否自相矛盾？[18] 如果出现类似疑点，除了打开后备箱盖、发动机罩、按压坐椅这些基本检查步骤外，还要做进一步检查。为此每个过境处都有用于检查的车库，外人是看不到的，旅客的人和车就被带到这里拆车查看，直到证实疑点或明显排除疑点为止。海关关员有特殊的检查工具，比如用探针和内窥镜就可以查看到车里的隐蔽空间。此外，从70年代起，边境海关还配备了X光机，能很好地检测识

别图书。[19] 操作X光机的检查官是经过特别培训的，学习过如何发现识别隐藏的图书。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在西德和西柏林之间过境的旅客。一般根据过境协议，海关是不能检查这些旅客的，所以海关的工作组、国安部和人民警察就对东德边境的高速公路进行监察，以防过境旅客和东德人在停车场或者加油站碰面然后进行交易。1976年记录到684起这样的双方会面，大约50%的情况是向东德人转交图书报刊等印刷物。[20] 东德邮政海关查获在案的禁书数量明显多于边境高速公路上或者边境海关查处的数量：高速公路过境处每年大约查获10万起偷运具有“思想道德败坏性”图书的案例，而邮政海关每年查获大约300万起，内含印刷物的邮政包裹总计1200万件。[21] 经邮政海关通报的印刷物中大约94%包含政治类及神学类违禁期刊，剩下6%包含所谓的煽动性刊物、低俗刊物及耶和华见证人的刊物。[22] 此外每年约有12000份来自各个研究领域的专业杂志被没收，因为杂志中刊登有招聘启事，国家安全部担心西德会“有目的地挖走东德的专家人才”，所以这些杂志被认定为高度危险刊物。[23]

为了查明邮政包裹里的图书制品，东德所有15个行政区都设置了邮政海关。需要检查的包裹首先经传送带送至缉查处，这样就进入了国安部的检查视线，然后按照国安部给出的名单对寄件人和收件人进行核查。之后所有包裹再经传送带送至海关处，有四个特别小组负责检查。第一组检查是否有走私和投机倒卖的嫌疑，第二组使用X光机，第三组检查包裹内容，第四组为图书鉴定处，负责鉴定包裹中含有的所有印刷物。[24] 首先所有包裹都要经过X光机照射，出现问题的要开包查看，必须由训练有素的邮局人员将包裹打开送至海关关员，然后和原来一样封好。发现的印刷物送至鉴定处，由特别经过培训的官员进行鉴定。[25] 其中用到四种不同的索引。[26] 第一种是作者索引，包含各作者及其作品引进许可的说明。第二种是杂志索引，标注了邮政报刊列表包含的

也就是允许入境的期刊。第三种是机动索引，包含一些国际组织协会、出版社和书店的地址和说明，其出版物在一定条件下是允许入境的。最后一种是特许索引，包含某些机构和人员的地址列表，经文化部特批，可以一直或在一定时间段内接收西德刊物。此外海关关员图书检查还用到各种工具书像作家辞典以及各种不同的专业书籍。

很少有资料表明如何处理被没收的图书。大体来说处理没收图书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所有图书被送到海关物证中心处，然后分配给一些特定机构和国家部门，比如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国防部、波茨坦军事博物馆或者负责宗教事务的国务秘书处。另外，低俗垃圾书刊一部分交至国安部，一部分销毁，还有一部分只有德意志图书馆的封锁书库可以收藏。[27] 60年代中期，海关领导争取不再由海关，而由其他重要部门负责这些图书的分配处理。[28] 但由于资料有限，到目前还不清楚后来是否改了规定。

现在我想转换一下视角，把视线从作为国家机构的海关转移到海关关员个人，以及海关关员和图书审查之间明显的矛盾关系。

“海关工作人员［……］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很强的纪律性，革命警惕性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想、生活和处事方式。”[29] 这就是海关的职务规定，每一位关员在入职时都要签字保证。而在录取之前，海关和国安部就要检验申请者是否忠诚于国家社会体制。所有关员及其亲属都禁止以任何方式同西方国家接触并保持联系，同样也不允许接收西方电视广播节目，还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书籍也属于禁书。海关关员的入职教育中这样写道：“不允许阅读、流传来自这些国家地区的印刷物，不允许传播其内容。”[30]

为了尽可能减少西方的影响，海关关员一直被思想洗脑。每个月有30小时至35小时的培训、教导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措施。[31] 从海关提供的资料中得知，尽管采取了以上这些措施，但还是有违反纪律的

现象发生。国安部对其在海关针对关员实行的“政治战略性防御工作”评价道：“从海关关员的政治战略性保护工作结果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在两德边境长期直接接触具有政治思想破坏性的事务，尤其是与西德及西柏林公民有关的事务，出于工作需要接触西德货币，对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端产品进行观察、鉴定、评估，以及接触西德书刊，这些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32]



图**2** 海关工作人员接受培训，使用特殊**X**光机识别图书



图**3** 由海关记录在案的在两德边境没收的杂志

为阻止传阅西德书刊，1973年海关关长发布一项工作守则，规定如何处理没收上来的西德书刊。[33] 各海关都应防止关员接触此类书刊，为此还专设了收集图书和杂志的箱子。[34] 已形成广泛覆盖网络的国安部通报合作者也应确保及时发现政治思想不稳定的关员并进行审查。一份国安部的报告中对此写道：“首先要有重点并有效地对工作中直接受西方势力影响，被迫面对消极敌对势力，以及担任边境检查、手续办理及安全保护要职的海关关员做好保障工作。”[35] 根据这一规定，1979年就有100多名海关工作人员接受国安部所谓的“特别人员检查”，国安部估计其中50名和西方国家的人保持联系，[36] 而且违纪阅读西德书刊的不止一例。过境旅客总是试图贿赂关员，希望关员能够放松检查或者避开检查，1971年8个月内记录到405起“试图与官员建立这种特殊关系”的行为。国安部发现用来贿赂审查官的首先有食物和酒，然而更多的是图书，尤其是色情图书。[37]

结尾我想举一些海关关员处理西德书刊时违纪的事例：德累斯顿海关在1976年8月23日总结分析“政治保护工作”时记录道：“某位审查官由

于主动索贿，于1976年3月无限期开除出海关。相关通报合作人也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表明有关员思想堕落，倒弄西德书刊，并且缺失审查结果记录。［……］有位海关关员认为从那些低俗图书中比从党组织的各项决议中收获更多，这位关员后来被开除了党籍。”[38]

德累斯顿邮政海关的一位通报合作人1979年在报告中讲到一位女关员时说道：“饶有兴趣地认真研究西德书刊并且讲给其他同事听。”[39]

还有一个例子讲到海关审查官向旅客索要东西，然后可以适当通融。收受的物品除了圆珠笔、录音带、酒精饮料还有色情图书。[40] 对此一份国安部调查报告中写道：“他们都爱拿收受的东西互相炫耀，看性爱杂志，有时在班上喝旅客送的啤酒或者白酒。”[41] 涉事关员也因此被立即开除。

以上事例说明，有些海关关员本身也是“秘密读者”的一员，这些关员的数量并不多。然而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即使严厉的惩罚措施也不能完全阻止这些精挑细选通过考核的统一社会党拥护者，利用西德报纸杂志，越过自己所处的体制这堵思想高墙，看看外面的世界。

---

[1] BStU，MfS，AS Chemnitz，StOp 103，Bd.2，Bl.220.

[2] BStU，MfS，JHS 22070，Bl.170.

[3] BStU，MfS，HA VI 1380，Bl.12.

[4] BStU，MfS，JHS VVS 0001 Bl.73-74 Bl.73-74314/81，Bl.72.

[5] BStU，MfS，JHS/MF/VVS 314/81，Bl.6.

[6] BArch DL 203，Az 01-02-12.

[7] BStU，MfS，ZAIG 22821，Bl.1.

[8] BStU，MfS，JHS VVS 0001-314/81，Bl.73-74.

[9] 50年代时由学术书刊总局评定哪些图书允许入境，该局撤销后从1957年起海关技术学院接管了这项工作。Bericht der HA 2-Abteilung Recht，15.7.1959. In：BArch DL 203，Az.04-07-05，Ka.294.

[10] *Schreiben des Leiters der Zollverwaltung zur Dienstanweisung* ，2/86，28.2. 1986. In：BArch DL 203，Az.04-07-05，Ka.294.

[11] BStU，MfS，ZAIG 22821，Bl.2.

[12] BStU，MfS，ZAIG 22821，Bl.2.

[13] BStU，MfS，HA *VI* 66，Bl.70.

[14] *Schreiben des Stellvertreters des Leiters der Zollverwaltung* ，1.9.1977. In：BArch DL 203，Az.04-07-05，Ka.294.

[15] BStU，MfS，HA IX 2219，Bl.67-68.

[16] BStU，MfS，HA IX 5368，Bl.6.

[17] BArch DL 203，Az.04-07-05，Ka.294.

[18] *Probleme der Auswahl von Personen und Transportmitteln zur Zollkontrolle* . In：BArch DL 203，Ka.125，Bl.6-9.

[19] BStU，MfS，HA VI 13910，Bl.41.

[20] BStU，MfS，JHS 22070，Bl.240.

[21] BStU，MfS，JHS 22070，Bl.191-192.

[22] BStU，MfS，HA VI 15664，Bl.161.旅客被没收的各种图书类别与此类似，参阅BStU，MfS，HA VI 15664，Bl.164-165。

[23] BStU，MfS，JMS 22070，Bl.228.

[24] Grube u.a.，*Die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von Zöllen*，*Steuern und Abgaben* . Zur Chronik des Hauptzollamtes Halle an der Saale. Halle 2002，S.189.

[25] *Schreiben des Stellvertreters des Leiters operativ* ，8.5.1968. In：BArch DI 203，Az.01-14-01，Ka.169.

[26] Plessow档案，专科学校阅读材料，第14科目：*Die Anforderung an die*

Durchführung einer wirksamen Röntgen-und Inhaltskontrolle， Plessow 1985。

[27] *Schreiben der Deutschen Bücherei Leipzig an das Amt für Zoll und Kontrolle des Warenverkehrs* 31.7.1959. In：BArch DL 203，Az.04-07-05，Ka.294.

[28] *Schreiben des Leiters der Zollverwaltung*，24.6.1965. In：BArch DL 203，Az.04-07-05，Ka.294.

[29] BStU，MfS，JHS VVS 001-873/81，Bl.41.

[30] BStU，MfS，JHS VVS 001-873/81，Bl.50.

[31] BStU，MfS，JHS 21934，Bl.107.

[32] BStU，MfS，HA VI 4392，Bl.473.

[33] DA 14/73 des Leiters der Zollverwaltung.

[34] BStU，MfS，HA VI 4393，Bl.113.

[35] BStU，MfS，HA VI 66，Bl.86.

[36] BStU，MfS，HA VI 66，Bl.78.

[37] BStU，MfS，HA VI 13910，Bl.91.

[38] BStU，MfS，HA VI 4393，Bl.109.

[39] BStU，MfS，HA VI 4393，Bl.144.

[40] BStU，MfS，HA VI 4393，Bl.151.

[41] BStU，MfS，HA VI 4393，Bl.152.

向西行，向东行

——西柏林四日记

克里斯蒂安·埃格尔（Christian Eger）

当我能踏上西德的土地时，那年我22岁，在读大学第四个学期。1989年3月，东德已经不复存在，然而旧东德还依旧活跃着，我外婆在西柏林过83岁生日，亲戚关系这张通行证为我打开了那扇大门。发证机关没有一系列烦琐的手续，也没有为难我，我第二次去就拿到了入境许可；四天的西柏林签证，在护照里盖上章，第二天开始生效。早上6点钟，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空无一人的检查大厅，工作人员刚刚换班：牙膏、烟丝盒——没有一样东西检查的时候没被打开。我带了一个小记录本，里面有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领袖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作品的笔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离开检查处的传送带，我被带到一个六平方米大小的屋子：一张Sprelacart牌的仿木小桌，前后各一把椅子，窗台上始终拉紧的窗帘前有一盆绿色植物，很茂盛，像食人草。记录本被没收了，大约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两位穿着制服的官员过来问话，来了四次，比如我是不是认识鲁迪·杜奇克；两个小时后，西柏林对我来说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远。我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把窗帘拉到一边，透过栅栏看看弗里德里希大街早上的车辆行人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东德，永远停滞不前。我被告知这个本子没收了，需要审查鉴定。

他们不想轻易放过你，还要告诉你，你即将离开什么地方，等回来后可以拿回什么东西。我没有迈开步子，软绵绵地拖着身子，像新来的走错了路一样各种混乱，进入那个全是小房间、隔离室和过道的大厅。退了休的东德老人拖着箱子排起无穷尽的长队，拥挤在攒动的人群中，一切混乱不堪，以至于我好几次都失控差点儿想回到东德。走下地铁通

道，帮年迈的妇人拖箱子。害怕不小心坐错了地铁的方向。忘不了左边的绿色通道，经过那从东德到西德免受检查的过境旅客轻而易举地消失在拥挤的地铁里，这也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列车有三节车厢长，很快就挤满了人，旅客们像缝合在一起一样坐在木椅上。我还是选择站着，紧紧抓着栏杆，列车开到地上见了阳光，经过博物馆岛和军械库，慢慢见到施普雷河弯曲的流向；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接连不断的景象令人心生感触。渐渐延伸的河岸、沙滩和石子路，边境士兵在那里沐浴晨光。到国会大厦的这一片整洁利落。勒尔特火车站，贝尔维尤宫，动物园，下车然后换乘坐到哈登堡广场，闪烁着耀眼金属光芒的Kranzler-Westen咖啡厅：白色汽车尾气、柴油味儿、甘醇的香烟。动物园街区是我对西德的第一印象，也一直会是我对西德最原始的印象。坐地铁和公交，路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到了马林费尔德城区，我摘下墨镜，认出了站在舅舅家花园大门前的母亲和姐姐，她们作为东德先驱比我早一天到来，也早就适应了西德。没人想到我能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来了西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睡觉。

四天西柏林，四天走路，坐车，走路，期间也去探访亲戚。这四天，就像是不由自主地在西德寻找东德，就是寻找那些贴近东德排斥西德的纪念地。柏林墙，勃兰登堡门，查理检查站，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上的户外博物馆“恐怖地形图”，6月17日大街上的苏联纪念碑，克罗伊茨贝格城区，还有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被抛尸的兰德维尔运河。我只有政治上和伦理道德上的感触，几乎没有因景色带来的感官体验，这也是东德对我的影响使然，是长期不会改变的影响。动物园街区的Beate-Uhse成人用品商店，一眼就能辨认出里面的东德人，行为举止就像喜欢吃肉的人在蔬菜店里一样。当时还有西洋镜，可以投币然后透过窥视镜观看色情表演。一排排旧书店，现在早就没有了。阳光下的柏林艺术科学院，安静平和。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向埃纳尔·施勒夫（Einar Schleef）和埃德加·希尔森拉特（Edgar Hilsenrath）授予了德布林奖，为数不多的观众席上，有很多人我都在日思夜想的西德文

学史读物中读到过；我想我是属于这里的。我，一个东德人，见到科学院那可以掐灭烟头的烟灰缸很是惊讶。这里没有任何问题值得考虑。问题出现在了一天晚上，我和从东德出来的朋友们通电话，他们说：你留在这吧，回去的话你会疯的！我听得出来，他们的要求是出于好意，但我无法接受。我觉得用亲戚关系的通行证待在这儿不是个正当的理由。如果是亲戚要求我留在这儿，我会怎么办呢？我拒绝了朋友的要求，虽然并不那么喜欢东德，但还没有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至少没有那么快，没有在那外婆坐下去颤颤悠悠的沙发里。机会是有过一次；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就差告别了。

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4天之后又回来了：我的牛仔裤口袋里鼓鼓的装着希尔毕西（Hilbig）、胡赫尔（Huchel）、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和托马斯·布拉什（Thomas Brasch）的书，那些在西德不愿与东德告别的作家。又是各种过道、小房间，工作人员办事利落，不知不觉很快就过去了。母亲和儿子，通过最后一个站岗人，一扇铁门啪嗒一声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拥挤在金属栏杆后面，我们又回来了：东德。不对。我已经不完全是以前的样子了。在东大厅想起来还有我的记录本。我走到铁门前，等着门再打开，这扇门朝东德那面没有把手。门丝毫没有要开的样子，我跳到前面拉开门，又挤进了西德。站岗人惊慌失色，机枪戒备。我置之不理，说我还有东西要拿回来。我动作很快，期间那扇门又打开了几次。一切进行得很快，国安部真是秉公办事。一位边境女警察签字证明已将记录本当面交还给我，我走过那扇铁门后回到东德，母亲还在那儿等着我，脸颊瘦小，脸色蜡白。

为阶级斗争参与秘密阅读

——国家安全部邮政审查

格尔德·赖尼克（Gerd Reinicke）

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一起参与秘密阅读，已是“公开的秘密”。因为统一社会党“迫切需要”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尽可能在其能力范围内对所有交际渠道进行检查和审查。但是如果东德把审查和检查都委托给国安部来实行，就能减少财力的投入。就在当时的国安部内部，也只有M部门直接负责邮政审查的工作人员详细清楚地知道邮政审查是如何进行的。M部门为国安部其他行动部门提供支持帮助，有时也有人问我，M代表什么意思，是否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我对此一无所知。可能“老同志们”由信封联想到这个字母，当时的标准信封封上后，背面看起来就像字母M。

1979年我被安排到M部门工作，他们给我这个年轻的成员讲的所有东西都并非“无足轻重”。根据基本法规定，我们只需要知道用于执行工作而必须知道的东西，我作为“信息分析处”的“分析员”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入职培训，在这期间我一点一滴地学到了所有我的上级认为举足轻重的东西，而没有什么是我想知道的东西。比如我问到有关情报侦查的问题，像反东德的情报机构有哪些消息来源，这些问题令他们起了疑心而拒绝回答。我的工作任务是搜集“可疑”人员和事件的信息，至少如果其他部门发现可疑之处，我都要向他们提供帮助。

到了1986年，在我任职的七年间，伴随着“不断激烈的阶级斗争”，审查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根据党组织的决议，全国上下都要拿出高效的工作成绩，当然也包括国安部，这一点从M部门严格的工作规定和越来越多地投入使用“灵活机动”的工作人员就能看得出来。M部门的工作

人员总数从1980年的1074上升至1989年的2192。[1] 1972年时女性工作人员还占到40%，到1989年只有20%，原因很简单，党组织在社会工作方面提出的决议主要针对女性，由于照料孩子占用时间，所以很多女性雇员的工作时间很有限。

因为拿不到有价值的数据资料，无法具体了解经拆封查看的信件情况，所以我对国安部“参与秘密阅读”的规模无法做出准确的估计。我在M部门任职期间虽然进行了相关统计，但只能回忆起大概数值，经国安部打开查看的信件中差不多有3.5%～5%成了秘密读物。如果拿到更准确的数据，那么也有助于确定邮政审查的规模，但需要知情人士提供资料。当时对于不知情人士来说，除非特意调查，否则即使有各种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也还是很难清楚了解身边同事的一举一动。

在东德，从各种社会团体、党派和教育机构的防备性措施中可以看出，不信任作为一种“文化”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存在。东德民众很难认清各种审查标准，导致有关当局在对待西德异议分子的出版物时容易出现一种半官方半违法的局面，当局做决定时而大刀阔斧，独断专行；时而鼠目寸光，不可理喻。我作为国安部的人员在邮政检查的工作中，每天都要被迫面对这种为“顺应阶级斗争形势”而不断变化的各种决定。在国安部M部门的“信息分析处”，我的工作任务是对邮政信件的文字内容进行评判和分类，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建议没收，或者如条件允许，自行决定没收。对邮政的干涉是在极高度保密下进行的，如果信件没有送达收件人，那么必然会引起怀疑，收件人肯定会猜测是否国安部在背后动了手脚。但是不允许有证实这种行为的迹象存在。所以我在工作初期作为特别分析员对M部门没收信件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这样可以么？毕竟根据海关法，如果没收信件是要通知当事人的。我小心谨慎地向一位“老战友”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摇摇头，不认为这样不可行，然后回答说：“当事人肯定知道国安部这样做是不对的！谁不理解，就要倒霉，还是你真的相信他们会来我们这投诉？”不，我也不相信，所以最初我

很高兴不用独自行事。大体上来说有两种方式让民众成了邮政审查的受害者。一种是民众由于特殊行动或者仅仅有“可疑行为”而引起有关部门注意，另一种是信件可能由于“外部特征”而落入M部门或邮政海关广泛覆盖的搜寻网络。这种搜寻网络有三种基本搜寻标准，而且每种标准还可以继续分类，这样对客观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时就有据可依，并能够将其纳入M部门的存储系统。这三种标准为“疑似情报”“有政治思想破坏倾向”（简称piD）以及从外表来看显示有“可疑内容”的信件。属于哪类信件决定了接下来如何在M部门的运作流程中处置该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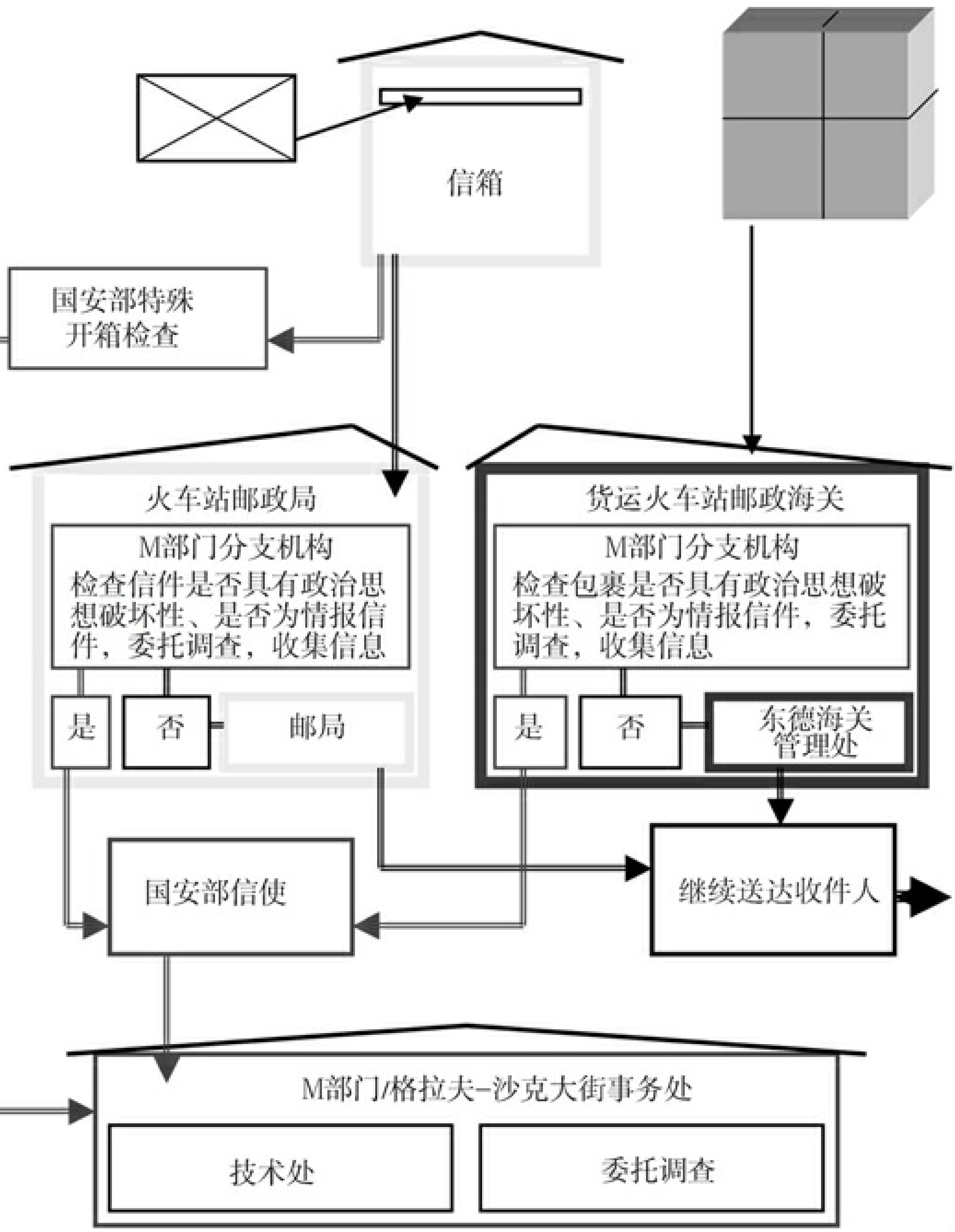


图**1** 国安部邮政审查流程图，以罗斯托克的**M**部门为例

M部门的分支机构邮政局和邮政海关事先就已经对信件进行了筛选，筛选信件的通常都是有经验的调查员，调查员们一直都在接受培训如何识别信件包裹，以提高检查效率。接下来按照国安部其他部门的要求，也包括国安部部长的直接指示，对信件包裹的内容进行分析。部长

的指示和决议通常都是在“政治大事件”的基础上做出的，像党代会、全民节日、东德领导人的外交活动、军事演习以及所谓“在民众中引起轰动”的意外事件。此外国安部还经常下达关于审查和监察的具体指示，例如国安部部长就曾明令禁止传播由东德歌舞剧演员尤尔根·哈特（Jürgen Hart）的一句著名歌词“Sing，mein Sachse，sing”（歌唱吧，我的萨克森人，歌唱吧）改写成的“Schwimm，mein Sachse，schwimm”（游泳吧，我的萨克森人，游泳吧）。

邮政审查的特征体现在对信件文字内容和印刷物的分析及利用，发现问题的信件首先予以没收，然后进行分析调查。这里指的是附带包装看不到里面内容的信件，没有包装或者能看出里面印刷物的事先在分支机构就已经被划为piD类信件，并且没收后特别上交至M部门。对寄件人自己写的，并且内容涉及反东德或东德领导人物的信件，要进行思想审查，极端情况下以“教唆反国家”为由被没收，这样公民的非公开意见也受到了直接审查：这类信件经过读取、分析，情形严重的被没收，并且有可能事后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根据东德刑法典§106规定，印制、引进、传播或者利用“歧视性”文字、物品或符号都要受到相应处罚。[2]

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权利是一个如何阐释法律的问题。虽然根据东德宪法第27章的规定，“根据本宪法原则”，每位公民都享有“自由公开发表言论”的权利，然而是有限制条件的，见第四章“人民福利”。信件中包含的杂志或文章都要经相关部门认真检查，接着或者没收或者正常投递。

有时候不巧会遇到信件内容和动机复杂结合的情况就特别难做决定。我记得有一封来自西德的信件，里面有纳粹宣传资料的复印件。寄信人非常气愤这种“垃圾污秽”在西德流通，可以看出政府对于这种颠覆活动是多么的无能为力。怎么处理呢？信件里含有纳粹宣传的资料——

应该没收。而寄信人的观点——并非如此。当时是怎么决定的？我不记得了。

信件是没收还是投递，为了使判定“更有可靠性”，相关人士的观点意见都被分类整理并存入档案。如果某个特定的交际圈子具有“政治可疑性”，那么相关各部门就要查看其所有通信往来，以获得这类人员及其社会关系的相关信息，利用这些信息为情报活动做准备。从跨越东西德的恋爱关系到约定会面或者通信往来，所有个人关系都要纳入监察范围。对于M部门的分析员来说，初次建立的联系很难处理，因为一方面要没收信件切断联系，另一方面还要通过这种联系获取其他有效信息。为避免出现错误判定，这类初次联系要经过“委托调查”，也就是说，M部门的分支机构邮政局和邮政海关已经对信封上的收件人和寄件人进行了调查。这些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按照邮政编码专门负责特定的地区，必须记住大量的名字和字样，尽管这些名字都可以在调查名单上找得到。这样一来，每天的调查工作就能几乎做到上级要求的“毫无纰漏”。有些可疑信件因没有被识别出而正常投递，也就出现了安全漏洞，因此领班会对每一位工作人员仔细抽查，漏掉信件被视为渎职，并受到纪律处分。为了减少接下来的损失，所有上交至“信息分析处”的信件都要额外通过“委托调查”的筛选排查。委托调查，原先在国安部内部被称为“邮政参与”或“邮政审查”，是国安部各行动部门直接干涉邮政最重要的形式，被列为“进攻法”。与国安部开箱取件以及在投递过程中通过通报合作者截获信件相比，“委托调查”无须额外增加成本，并且将通报合作者泄密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通过原东德公民发出或收到的所谓的反馈联络可以进一步获取相关信息，比如可以详细了解原东德公民现居于何地及其对现状的满意程度。一定要切断“后续效应”，阻止传播关于如何合法离开东德的指导信息。为进一步做好“进攻性”工作，M部门还依据国内外各党派的政治纲领、行动目标以及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开展调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

会成员尤其重视所有党派团体的纲领中引人关注的细节部分，就是党派团体中的宣传员可以用作宣传辩护的内容。对于宣传教育总局的情报工作来说，了解一下这些纲领或者各党代会的筹备情况也是很重要的，以便向党组织里的通报合作者施加影响，或者检验这些“侦查员”的诚信度。为了事先了解西德各政治团体以及东德反对派的目标和意图，利用他们获知的信息或者阻止传播文字资料，所有的纲领、言论和信息都有利用价值。

各种被党组织归为“复仇主义”一类的本地协会及组织需要特殊对待。M部门接到指示，不允许阻止这类团体的通信往来，不允许对其印刷物进行分类、统计及销毁。科技类信息同样也享有高度优先权成为国安部的秘密读物。挖掘利用所有获取的信息属于商业间谍活动，其中包括获取技术文件、分析当下科技趋势及各个公司的优劣势。所有可利用的技术类资料通常都上交至柏林M部门下的“战略技术部”。我专门负责用于电子数据处理的所有资料和指南。随着美国个人计算机的出现以及这一技术在西方的迅速传播，虽然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及一些领导人对计算机技术持怀疑态度，大概因为“个人”这一概念意味着某些个人信息可能无法掌握，但国安部还是越来越重视计算机技术的应用。

国安部各领导层对于在各个公共机构和学校任职的检查官，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通报合作者，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信任，所以对检查进行检查一直是领导的工作重心。根据安全规定需要上报的信件先记录在案然后进行投递，等待观察收件人作何反应。从事科研领域的大学工作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具有重要军事战略意义的能源产业和交通业的从业人员，都可能参与了西德情报活动，自然也就成了国安部重点监察对象，通过邮政审查可以始终了解这些人员的可信度。被监察的对象先总体上划为“可疑”人员，然后以“18”为代码记录在案，“18”表示“可疑人员”。被监察的人员数量不断增加，说明了国安部在不断加强安全保

障。

80年代初期以来，东德和西德教会之间的官方及私人往来得到了很大的关注，核武装的建立推动了和平运动的迅速发展。越来越难说和平运动的发展是好是坏。在教会和平组织具有说服力的辩护面前，统一社会党的“防御宣传”不再奏效，M部门越来越多地接到指示，不可阻止教会和平组织的文本及印刷物的传播，因此东德内部的通信往来也受到了监察，也出现了信件被没收的情况。被称为“收集及分发站点”的大学生和牧师们得到了国安部的“特别关注”，国安部不再信任一般的邮政审查，在当地额外雇用起了邮递员作为通报合作者，其中还包括中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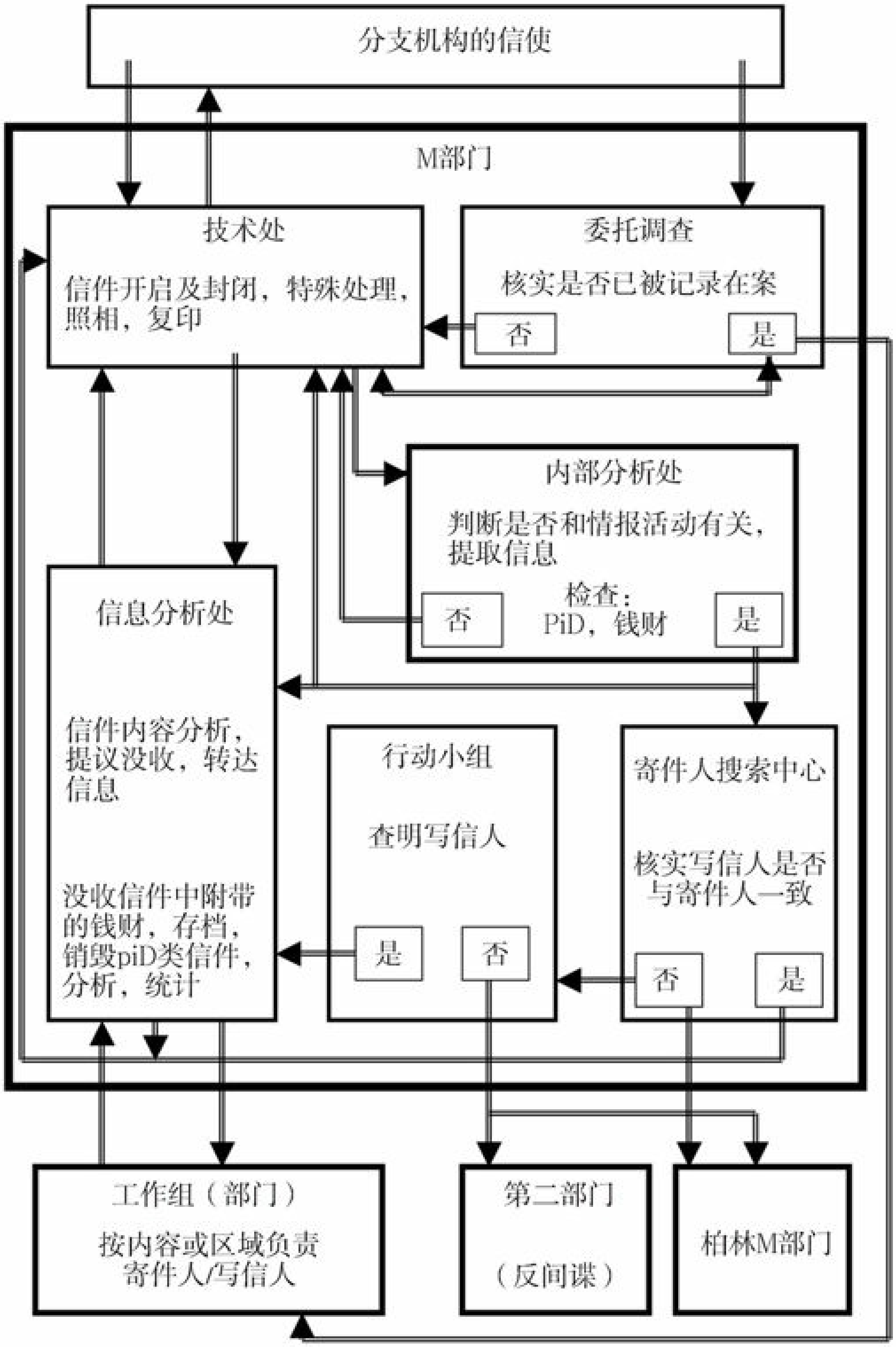


图**2** 罗斯托克**M**部门内部邮政审查流程图

根据国安部部长1983年12月20日第20/83号令，邮政海关并入M部

门。M部门履行海关的职能，同时还要检查信件内容是否具有“利用价值”。海关按照明文规定行使职责，没收违法物件及印刷物，而邮政海关按照M部门内的规定行事。所有从重量、大小、寄件人和外观上来看内容可能具有政治思想破坏性的信件首先被挑出，然后送至M部门进一步调查。低俗刊物一律没收，包括报纸、剪报及广告等。只要不“危害基本原则”的刊物，像某些特殊的专业杂志及资料经和相关工作组商讨达成一致后，可以正常投递。禁书没收后，如果没有“有意义”的利用价值便被销毁。比如我曾经每隔几个小时就从部门主任的保险柜里拿到一本关于教派和宗教团体的书，用来为我在“教会与教派”领域的工作提高专业技能。现在我知道了耶和华见证人的宗旨是什么，（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东德受到迫害，也不知道他们早就受到了纳粹分子的迫害。

在论及邮政审查这个话题的过程中，始终都伴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明确定义与“信件没收”有关的各种概念及规定。在我的工作实践中，像“低俗刊物”这样的概念没有一个定义，因此有各种理解空间。正是因为这些概念模糊不清，所以直到今天，曾经涉及检查和被检查的人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情这次可以，下次又不可以了。这是由每次检查时的综合因素决定的：信件情况、相关工作人员对收件人思想危害度的判断，同时也有故意所为，比如特意让收件人收到巴赫罗（Bahro）或者索尔仁尼琴（Solschenizyn）的作品，因为相应的通报合作者早就在等着收件人作何反应。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那种凝固的政治氛围下，所谓的“叛变分子”和“异党分子”抛出的“恶意言论”让我很有感触。每次查到信件里的文字内容我都一一阅读。国安部部长列的书单是最可信的……这些书单改变了我对领导人的看法。他们的顽固不化是和专制式的方法理念交织在一起的。这我以前并不知道。从小就和这个国家以及东德的体制一起成长，我相信社会主义民主会得到改善。直到1984年我的看法改变了。在一次党组织竞选大会上，违反规定的选举过程出乎我的意料，让我产

生了一个这么简单而又震撼的看法：民主是不可分的，民主非有即无。

后记：一场梦魇

社会监察一直都在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便只是设想一下，如果什么时候被问到，为什么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前给某人打了电话，或者某封邮件的内容现在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谁都会迫不及待地进行自我辩解，这样也就助长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这至少动摇了民主的众多支柱之一：言论自由。首先进行的是自我审查，接着换为主动审查。大家想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打错了一个电话或者写错了一封邮件呢？只是数字打错了。就要进监狱？也就是说，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时谈话内容也很重要。现在我们也把这种情况存储进来。几乎无限大的存储能力早就滋生了违法现象。我们就这样分类、分级、分析……一个东德还不够吗？

---

[1] Kallinich，Joachim；Pasquale，Sylvia de（Hg.）：*Ein offenes Geheimnis*：*Post und Telefonkontrolle in der DDR. Eine Publikation der Museumsstiftung Post und Telekommunikation.* Heidelberg 2002.

[2] 参照§106教唆反国家，第一段，第一条：“如持有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国家规定或社会规定的目的，或违反上述规定从事煽动活动，1.引进、印制、传播或利用歧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局势的文字、物品或符号；［……］判处一年到五年有期徒刑。”In：Strafgesetzbuch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erlin 1986，S.35.

关于私自偷带图书的各种回忆

芭芭拉·阿梅隆（Barbara Amelung）

我在德累斯顿一直生活到1957年，1957年10月我和父母一起离开了东德，从那以后就定居在西德。最初是我一个人去东德探望亲戚，后来便和丈夫一起。大家最渴望的东西向来都是我们偷偷带往东德的图书。

我父亲1956年时还住在德累斯顿，当时通过新教教会的介绍去西德疗养了一段时间，然后在那边买了本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t）的《革命舍弃了自己的孩子》（*Die Revolution ent lässt ihre Kinder* ）。在火车上过边境前他想着怎么才能过关，然后当机立断关掉了厕所水箱的进水口，按下冲水让水流尽后，把书包裹在塑料膜里藏了进去。当时厕所水箱没有被检查，过了边境之后——估计他一直待在厕所附近等着——再把书取出来塞进夹克，然后回到他的车厢。父亲私下里把书借给可信赖的朋友亲戚阅读，这本书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哥哥的一位朋友曾公开宣称自己是体制反对者，1957年从柏林弄到了一篇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文稿，然后大方地借给朋友们看。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通过边境检查的，反正那篇文稿被带到了德累斯顿，朋友们拿来互相传阅。当时我哥哥和他这位朋友刚刚高中毕业，但由于政治信任度不够不被允许读大学。还没等到举办毕业典礼，那位朋友就因持有赫鲁晓夫的文稿被逮捕进了有“黄色噩梦”之称的包岑监狱，被判十个月监禁，之后被驱逐到了西德。

1974年我和丈夫为探望亲戚去了趟东柏林。我把给表姐用来做衬衣和裙子的纸样塞进了我的大包，还有必带的咖啡，下面放着施泰格米勒

（Stegmüller）的《当代哲学主要流派》（*Hauptströmungen der Gegenwartsphilosophie* ），表姐说了对这本书感兴趣。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我连同我的大包一起接受检查——当然是一位女士查的。她用手指尖从包里拿出了纸样，认为这纸样属于印刷物，不能带到东德。接着我跟她解释，这只是用来缝制衣服的样本，几乎没有字在上面。她叫来一位女同事一起商量着把纸样铺开在桌子上，两个人非常仔细地检查起来。然后那位女同事用悦耳的萨克森方言说道："这个可以带！"他们没查施泰格米勒那本书，我把书带到东德给了表姐，她非常高兴。

1981年我和女儿经沃尔夫斯堡去德累斯顿。在沃尔夫斯堡一位妇人上了车，体态异常丰腴，气喘吁吁地在车厢角落里坐下。然后来了人开始检查，我们不被允许下车。我女儿的小箱子里藏着苏联作家安德烈·阿马尔里克（Amalrik）的《苏联会存在到1984年吗？》（*Kann die Sowjetunion das Jahr 1984 erleben*？ ）和奥威尔（Orwell）的《动物庄园》。查到我们时，他们要求打开箱子把每一件东西拿出来看，但没发现什么可疑物品。那堆箱子里他们没有查女儿的小箱子。火车开过边境后，一叠报纸从那位胖妇人的衣服里"现身了"，她说："想偷带过境只有这个办法，我每次都把当下所有最新的东西带去，我那些亲戚都特别高兴。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感觉更美好。"把藏着的报纸拿出来后，她看起来苗条无比呀！

我们每次都带了书去东德，当然都是禁书。有一次我给姑姑带了一本里斯（Riess）的《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 ），这本书政治上无害，之前我也把它作为圣诞礼物寄过，但被当做禁书从包裹中拿了出来。一位女邻居来串门，我们本以为她属于体制批判者的一员。我姑姑骄傲地说侄女把这本书带了过来，接着邻居说道："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没有人这么要求她，不是吗？但把书带到东德终究还是不允许的。"看来我们想错了，我们沉默不语。

外婆的卡尔·麦

——图书走私商雷纳·埃克特（Rainer Eckert）

科琳娜·布绍（Corinna Buschow），玛利亚·多布纳（Maria Dobner）

“如果有人将你阻挡在了某一个图书世界的大门之外，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雷纳·埃克特1950年生于波茨坦，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在想，为什么在他生活的国家不允许他读那些他喜欢的图书。像其他读书迷一样，埃克特也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使他的家庭支离破碎，还有1968年华约组织侵占捷克，这些经历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0年代末上高中的时候，他经常去拜访一位同学的父亲，听他们谈论有关禁书的事情，这位同学的父亲是彼得·胡赫尔（Peter Huchel），一位抒情诗人。

雷纳·埃克特由于对国家体制持批判态度而引起了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注意。1972年正在柏林洪堡大学读档案学和历史学的埃克特遭学校开除，要先在柏林一家建筑公司工作3年，然后再通过远程学习获得硕士学位。70年代末，埃克特开始在东德科学院历史学院信息档案部任研究员。他的博士论文本来是关于犹太人遭纳粹迫害在流亡文学中的反映，但出于政治原因于1982年被迫终止，后来换了另一个题目获得博士学位。2001年埃克特在著名政治研究机构Otto-Suhr学院获得大学执教资格，六年前至今雷纳·埃克特博士担任莱比锡当代史论坛主席。

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家托洛茨基（Trotzki）突然去世，他的著作《不断革命论》（*Permanente Revolution* ）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多年后雷纳·埃克特又找出了这本书——他在东德作为秘密读者、异见人士和反对派的身份见证。埃克特的书架藏有120本禁书，由于害怕国安部发现，有一天他把这些书都藏到了屋顶上。如今他很自信地称

道："我认为在东德，即使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克服各种困难条件，但最终每本书都是可以设法弄到的。"埃克特的这一观点肯定很有争议，为了试着认同其观点，我们想对他获取西德图书的各种途作以分析。

在埃克特把书藏在屋顶很久之前故事就开始了。埃克特在母亲社会民主思想的教育下长大，加之受教会教育的影响，很早就对东德见不到的图书甚至还有禁书产生了兴趣。并且埃克特的牧师也对此起到了一定作用："我的牧师在坚信礼课上总说，我们应该读一读隐藏于视线之外的图书。"[1] 禁书的魅力是巨大的，既无法拥有更无法了解的东西激发着强烈的好奇心。像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沃勒（Stefan Wolle）描述的那样，一种典型人性化的处事方法大大激发了东德读者的读书兴趣："就连在柏林普伦茨劳贝格破旧的大学生宿舍里，那些因为是自制所以歪歪斜斜的书架上也堆满了图书。见多识广的西德人来到东德，看到这里的人们开始如痴如醉地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wski）的新作，或者以行家的姿态对奥地利作家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的抒情诗谈论不休时，备感震撼而无言以对。现实社会主义中精神层面的分量在当时就已经不言而喻。书籍开拓出一片无际的自由国度，也可以说是将国家权力通过艺术和文学来塑造灵魂的要求内在化并辩证地实现逆转。如果转向文化知识界，那么便无须在柏林墙后弥补经历的贫乏，同时又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用微妙的方式体现出反抗精神。读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或者雷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作品不会受到惩处，然而却说明了读者欲与半官方的政治口号下顽固木讷的乐观主义保持距离。"[2] 雷纳·埃克特如果要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或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来添饰他的学生式图书馆，就要花费一些努力了。

在东德这个存在审查的地方，埃克特第一个获取图书的办法却非常简单。柏林墙建立以后，埃克特的外婆同他和他的母亲分开了，独自生活在西柏林，会时常给他寄一些图书到波茨坦。作为圣诞礼物和生日礼

物，外婆总共寄来了26本卡尔·麦的书，没有一本被没收，其他图书也都顺利过关。只有两本历史学家尤阿西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写的希特勒传记，埃克特收到包裹时发现不在里面。“我不知道那本书是否由于政治原因被择出，显然也可能是某位海关关员对历史感兴趣，拿出来留着自己看。”[3]

第二种方式来源于西德朋友的馈赠，他们大多是大学生，通过邮寄的方式或者来东德时顺便带过来，他们用的办法听上去都比较外行。埃克特从来都为他的书标注好购买日期或者送达日期，还有为了弄到这本书有哪些特殊的故事也记下来，他对这种走私图书的方式记得非常清楚：“我那些西德朋友大多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书里，遇到海关检查就要编故事了。”朋友们编造的借口“这是我旅途中看的书”让所有海关关员都相信了，那些书从来都没有被送回去过。

第三种方式是荒谬的出境规定带来的结果：“有些人通过以上类似的方法弄到了西德图书，后来离开东德时说：在西德什么书都能买到，我把这些西德的书留在这儿吧。朋友们离开，把书留下了。并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所有人离境前必须列出财产清单，每本书都要列出来，西德图书不允许再带回西德。”[4] 这些书是可以带到西德还是必须留在东德，本来是由国安部决定的。“虽然如果这些违禁品又消失在了西德，他们本应感到高兴”[5]，而令人惊讶的是警察同志们恰恰不允许这些东德禁书一起跟着离境。这样埃克特的朋友离开东德后，一些图书就归他所有了。

但是雷纳·埃克特自己也想方设法偷带图书到东德，他的第四个图书来源是东欧的旧书店。埃克特读大学时尤其在布达佩斯总能找到很多书，在波兰也发现过很多宝贝。因为没有明确的分类书店，所以问题就是能否找到那些特定的图书，还有更大的问题是能用来换的钱很少。“这种情况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我总面临着两难选择：是饿着还是

买书”，埃克特在讨论会上说道。“饿着就得喝水，吃辣椒，这样有时也会导致身体不适。”也许会让人变得更苗条，但埃克特还是满怀欣喜地带着一本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1976年的《法国史》或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71年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从东欧度假回来，每一本书都有单据证明是从哪里来的。斯蒂芬·沃勒也对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旧书店给予了高度评价：“匈牙利布达佩斯和波兰格但斯克之间的旧书店和旧货市场对于迫切需要精神食粮的东德人来说是一座宝库，里面沉积着由于这个世纪的变革而在整个东欧遗留下来的德语文学。这些旧书店的图书价格适中，书商们不大有兴趣按意识形态内容给图书分类。”[6] 埃克特没有谈到东德的旧书店，斯蒂芬·沃勒提到在东德的旧书店也能找到一些东西。在通常由国家监管的旧书市场上，只有种族主义或违反道德，或者挑起战争和人民公愤的书籍才是禁书，[7] 剩下的全凭书商个人感觉评判。有时候私下里也能弄到一些没有通过东德审查的图书，当然都是通过有门路的内部人士。

如果埃克特试着这样做了，那么偷运图书过境这个最大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最终还是要把在匈牙利或是什么地方淘到的那些低俗书刊通过海关带往东德。埃克特从老普鲁士人那儿学到一招，屡试不爽的绝招。他高中毕业后在波茨坦国家档案处整理普鲁士的海关资料时了解到，可以用一把钥匙或者简易螺丝刀把火车厕所的镶板墙揭掉。埃克特于是也学着把书藏在那儿，等过了边境再取出来，把书藏在火车厕所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无法识别藏书者的身份。此外埃克特还用了一个办法，把书装在塑料袋里然后挂在火车厕所里的十字钩上，厕所底部是对着铁轨通道的，这样藏起来的书也没有被发现——或许海关缉查人员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后，也就懒得再去探个究竟了。

然而有一次埃克特偷带图书差点儿坏了事儿，连他自己也心惊胆战了一下，讲起这件轶事时他说道：“我们坐在从布达佩斯开来的火车上，远远地坐在一边，又累又饿。我们把那些来自西德的图书装在旅行

背包里放到了地上，然后一位海关关员来了到处查看，还查了包里的东西，一直翻看到包底，发现了那些书，然后操着德国捷克边境的口音要求我们跟着走。那节车厢里还坐着一位老妇人，就像是一位好妈妈，灰白的头发，上了年纪，体型很丰满，突然也操着这种奇怪的口音冲这位关员喊道：‘放了那些年轻人。您肯定知道，带他们走会有什么后果，您会把他们的全部生活都毁了。’那位关员红着脸走了，我们继续坐车。然后这位妇人对我们说：‘嗯，成功了吧。我给你们看看我都带了什么东西。’她是一个宗教走私团体的成员，带了这么一个老奶奶式的小箱子，箱子里装满了俄文圣经，这些俄文圣经在慕尼黑印好后，从慕尼黑被带到维也纳，又从维也纳带到布拉格，接着由她带到东德，然后再从东德带往苏联，她肯定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如果那位关员再狠毒一点儿就可能会说：‘请您马上也一起跟着来。’” [8]

第五条途径是通过无数的打字机和大量的复写纸实现的，而且主要是来自西德的打字机和复写纸。即使萨密兹达在东德没有像在俄罗斯、匈牙利、波兰和捷克那样得以专业策划并大范围推广，但它的作用不可低估，那就是激励人们顽强坚持争取被禁止的权利和自由。萨密兹达也成了反对派在东德最重要的用来表达己见的途径。 [9] “比如我们把苏联物理学家、人权运动家萨哈罗夫（Sacharow）的作品和苏维埃民主宣言抄了下来”，埃克特的一位女性朋友将捷克哲学家维捷斯拉夫·加德夫斯基（Vitezslav Gardavsky）的另外一篇文章抄给了他。 [10] 此外埃克特还回忆起一篇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文章，是新教青年会用打字机复写的。除政治迫害外，材料匮乏也是印制地下出版物面临的最大困难。埃克特还记得制作了多少册复本：“7本——用的是西德的蓝色复写纸。”如今回过头来看，埃克特认为持有和印制萨密兹达出版物是“相对危险”和“相对冒险” [11] 的。大多数萨密兹达是匿名印制，没有地址和寄件人，说明寄件人对其并不感兴趣。埃克特在波茨坦是青年会的成员，该组织以左倾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致力于传播禁书，这样青年会就成了第六种途径。



图**1** 雷纳·埃克特博士教授

第七种方法是通过埃克特工作的科学院订阅专业书刊。在科学院可以完全公开大方地借阅西德图书，“在历史学院几乎可以读到全部西德图书”[12]。但埃克特把这种途径称为“特殊供书系统”[13]，那么从本文最初的论题来看，这一途径的意义也就有了局限性。

现在回到埃克特提出的观点：每个人都能无所不有。因为外婆和一些熟人在西柏林，埃克特从一开始就比其他东德民众拥有更好的读书条件。科学院也为这类方法提供了另一渠道，并且埃克特在那担任的职位也享有优先权。还有特别是埃克特的社会关系也起到了作用，他可以到胡赫尔那里听知识分子的讨论，后来又住在普伦茨劳贝格的学生宿舍。在雷纳·埃克特作为图书走私商和秘密读者的职业生涯中，所有这些都为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先决条件。此外他年轻时具有相对较强的冒险精神也是不能忽略的。如今雷纳·埃克特为他的反对态度多少感到骄傲，他甚至认为受到追踪调查是一种“乐趣”：“是这样的，东德反对派一直都有这种自由感，自成一个生活世界。我们也轻视了大多数人民的能

力，进而有一种深深的优越感。”[14] 这种狂妄——埃克特选用的这个词——最终也在他这一观点中体现出来：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每一本书，只需要花费一些努力；但是，埃克特又加以限制性地强调：需要更久的时间和更多的付出。

---

[1] 2007年5月14日与雷纳·埃克特的会谈。（以下简称：摘自2007年5月14日的会谈）

[2] Wolle，Stefan：*Die heile Welt der Diktatur.Alltag Herrschaft in der DDR 1971-1989*（以下简称：Diktatur）.Berlin 1998，S.142.

[3] 摘自2007年9月27日“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大会上雷纳·埃克特参与的专题讨论会。（以下简称：摘自2007年7月29日的讨论会）

[4] 摘自2007年5月14日的会谈。

[5] 摘自2007年7月29日的讨论会。

[6] Wolle：*Diktatur*，S.151.

[7] Wolle：*Diktatur*，S.150.

[8] 摘自2007年5月14日的会谈。

[9] 参阅Kowalczuk，Ilko Sascha：*Freiheit und Öffentlichkeit. Die Bedeutung des politischen Samisdat in der DDR*.网址 http：//www.havemanngesellschaft.de/info127.htm（6.6.2007）。

[10] 摘自2007年5月14日的会谈。

[11] 摘自2007年5月14日的会谈。

[12] 摘自2007年7月29日的讨论会。

[13] 摘自2007年7月29日的讨论会。

[14] 摘自2007年5月14日的会谈。

冷战与低俗之作

检查站的煽动性刊物

——1954年柏林各检查站重要通报

检查站**27——**奥伯鲍姆桥

1954年4月2日早上6点10分左右，发现4只装有煽动性刊物的热气球在西占区放飞，一个装有煽动性刊物的包裹掉落在检查站附近，其中有200册“统一社会党第四届党代会特刊”《社会民主》。刊物被立即转交至警察局。

检查站**21/22——**市中心

1954年5月10日14点10分左右，柏林交通公司两名铁道工人在从市中心到总督府广场这一段的地铁通电导轨后面发现两个包裹，装有266封反对非人道战斗团[1]散发的信件，分别写给东德不同的居民。这些煽动性信件被转交至柏林第一警察局K部门。

检查站**13/14——**瓦尔特-乌布里希体育场

1954年5月15日10点左右，有人在米勒大街散发《电报—明镜周刊》小本特刊及煽动性文章，从大标题来看类似于自由德国青年团[2]的学校刊物。有四本被扣留然后转交至警察局。

由于自由德国青年团1954年6月5日至8日举办德国青年聚会，这段时间凡是占领区交界检查站发现大量散发传单和煽动性刊物都要记录在

案。其中通过热气球的方式最多，同时从西柏林开来的地铁和城市快轨的座位上也发现大量煽动性报刊。广播车沿着东西德交界行驶，呼吁自由德国青年团不要因受共产党的宣传恐吓而去往西德。所有报刊和传单被立即收集起来转交至警察局。

检查站**25/26——**克佩尼克大街

1954年6月17日早5点左右，先令桥下的施普雷河段漂着各式各样的西德传单，水警和人民警察在先令桥检查站上了救生船，然后捞出的传单装了满满一艘汽艇和一艘小船。经察看是反对非人道战斗团散发的煽动性文章，每两三份装在一份防水聚氯乙烯塑料套里。

检查站**7/8——**贝姆桥

1954年6月25日15点30分左右，两名男士在博恩霍尔姆大街发现了21份煽动性报刊然后上交给了检查站，其中有《年轻的世界》《时刻准备的冒险》和《自由德国青年团成员基本手册》。报刊被立即转交至警察局。

检查站**19/20——**波茨坦广场

1954年6月26日早8点50分左右，有人将一个重约1000克的包裹上交至检查站，里面装有小型传单，标题为“剔除布尔什维主义者才能保障和平！”包裹是在检查区旁边的厕所里被清洁工发现的，被转交至交通警察局。

检查站**31——**苗圃路

1954年7月13日12点左右，在一趟由柏林郊区开来的火车上发现了大约15000份俄语传单，藏在母婴车厢放置灭火器的柜子里，接着被转交至特雷普托警察局K部门。[3]

---

[1] 一个反共产主义战斗性组织，在西柏林发起行动反对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统治，主要由美国情报局提供资金支持。

[2] 统一社会党的官方青年组织。

[3] 摘自海关和货物运输检查部有关煽动性刊物和间谍活动的重要通报。Alle BArch DL 203/127/00-17-00.

秘密读者

——《月份》杂志及其1949～1951年在东德的传播推广

哈罗德·霍尔维茨（Harold Hurwitz）

《秘密读者》是我1966年的博士论文，[1] 以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工人起义那段时间进行的读者调查为题材。然而本文内容涉及的主要是1949年11月至1951年10月这段时间，我和我的妻子格里塔（Greta）通过各个分发站点的介绍，开始在东柏林和东德宣传推广《月份》杂志。[2]

1948年10月，也就是苏联对柏林实行封锁的第四个月，时任美占区军事总督的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为美国人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创办《月份》杂志开了绿灯。作为反斯大林左派的拉斯基是如何凭借一个人的力量，以不知名的身份，创办《月份》这样一本思想水平高又致力于政治领域的杂志的呢？克莱总督始终持以非常保守谨慎的态度，如果不是苏联驻德当局宣传部主任谢尔盖·秋尔潘诺夫（Sergej Tulpanow）在1947年9月20至24日统一社会党第二次党代会上的言论深深地攻击了克莱的忍耐限度，以至于这位军事总督下令“信息服务部”实行“Talk-Back”反击行动，创办《月份》杂志的设想也就可能成了泡影。在一次记者会上，克莱说明了实行这一行动旨在明确美方态度，反击来自苏占区的反美宣传。在秋尔潘诺夫发表攻击性言论后不久，拉斯基便在东柏林举办的第一届德国作家大会上发言，向所有追求文化自由的苏联作家宣称美方人员的齐心协力团结统一，如果没有这次简短但是成功的攻击性言论，拉斯基也就不会享受到Talk-Back行动为他创办杂志带来的好运。

当时在西占区谁批判苏联谁就要遭到严厉斥责，克莱最初在实行

Talk-Back行动时也规定不得批判苏联。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自从1945年12月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为反对强制与德国共产党合并进行反抗斗争以来，自从统一社会党在1946年10月的柏林大选中失败以来，为应对形势，在四国势力占领的柏林实行Talk-Back行动也就成了迫切需要。社民党早就不止在柏林设有办公室向苏占区的读者提供报纸杂志，最高领导层还在汉诺威设东德办公室，通过其他渠道为这一目标服务。1949年起，由英国批准发行的亲社民党的报纸，同时也是西柏林最大的报纸《电报机》额外增添了小型版本，在东柏林和苏占区出版发行。不久后美占区报纸《新报》在柏林也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该版报纸有自己的独立编辑团队，从美国的立场出发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一同响应Talk-Back行动。然而美占区广播电台没有加入到支持行动的行列当中，当时电台还持着一种伪中立态度，导致了其他美国机构对其不信任，并要求替换掉电台里身为美方成员的亲苏工作人员。

然而拉斯基遵循的目标完全不同，其思想上远远超出克莱发起的Talk-Back行动。Talk-Back行动在于鼓励德国人将自己视作西方国家的成员，而相反拉斯基认为，在“再教育计划”的压制下，英法美三国势力无法填补1933年以来德国陷入的精神思想空白，在围绕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冷战中，迫切需要在美国、西德及欧洲自由思想与思考的最新背景下，全面推行宣传教育。

1949年在柏林封锁结束以前，美方当局决定将最初为实行Talk-Back行动设立的“政治信息部”（简称PIB）从柏林迁到黑森州的法兰克福和巴特瑙海姆，并且设定了新的目标。该部门的主要工作有编辑出版宣传美式生活的报纸《美国事务》，配合“马歇尔计划”进行公关活动，以及为成立联邦德国做准备。PIB在巴特瑙海姆出版的报纸《东部问题》翻译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文章，由此可见PIB的真正目标并没有体现得非常明显。

没有受到Talk-Back行动的影响而继续在围绕意识形态和体制的斗争中单独奋战的只剩下《月份》杂志，还有以防御战为导向设置广播节目的美占区广播电台。我作为PIB最年轻的成员参与计划的一些项目比如翻译出版一些关于德国共产党史、共产国际史，以及关于苏联劳改营和经济体系的书籍并为此提供资金支持，这些计划项目也没能实现。此外还有一些独立刊物，像奥地利作家弗朗茨·伯克诺（Franz Borkenau）关于苏美势力对比的著作《别害怕！》（*Bange machen gilt nicht*！），还有库特·图霍文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将自己关于德国共产党的著述合编成的讽刺文集《真正的世界舞台》（*Die wahre Weltbühne*），这本文集在战后又重新在东柏林出版，著名的封面上大字横印着一句引用自图霍文斯基的话——“如果斯大林信奉天主教！”

最初在西柏林可以用东德马克买到我们的出版物，如果有哪位秘密读者能免费拿到PIB的出版物，那只能是通过社民党的东德办公室。据我的回忆，其中有一位流亡到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人关于议会民主史的一部著作。

我们免费向各位秘密读者提供《月份》杂志是有一个个人原因的，对此我曾经这样解释道：“恰恰是我在柏林封锁期间参与Talk-Back行动的时期，被怀疑内心暗藏着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辩护，我就被革了职并且受到了调查。上级始终在怀疑我，而了解我的同事们希望我能在外面接到一些工作任务［……］但是不管私下里同事们给我多少强有力的支持，大家再怎样团结一致，我还是为自己被怀疑不忠而感到羞耻。对我来说，自己作为美国人的身份得到认同很重要。”[3] 而同样重要的是格里塔和我能为众多秘密读者提供《月份》杂志，因为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

《月份》杂志的定位是面向联邦德国后期和西柏林德国民众的读

物。拉斯基允许我们向读者秘密发放《月份》也是和他不断地努力保护杂志不受外界评论影响有关系的，他也因此从来不参加PIB每天的晨会。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在柏林这个东西交接的大城市，在荒诞的地下活动中，防止“任何情报机构滥用自由发放的杂志作为招募间谍的诱饵” [4] ，1951年“反对非人道战斗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月份》杂志的推广工作开展了两年以后，我在1951年11月至12月写了一份47页的内部报告，西蒙·巴尔克（Simone Barck）找出了这份报告并复印给我，接下来的内容主要以这份报告为基础。当时在我写完报告后，拉斯基又进行了补充，并让人在编辑部办公室里把报告抄写下来以供传阅，报告名为《一本民主杂志在东德的作用与影响》（以下简称《作用报告》），日期1952年3月31日，并且“仅供内部使用”。我拿到的抄本还有手写的小标题和修改在上面，文体风格出自拉斯基，内容是我写的。并且拉斯基还把最后带有我批判性意见的三页删掉了。 [5] 没有人专门分发这份报告。报告肯定寄给了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公署（以下简称HICOG）的公共事务部主任谢帕德·斯通（Shepard Stone）还有位于巴黎的文化自由大会 [6] （以下简称CCF）的米歇尔·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 [7] 。

首先来看一下《作用报告》中的两组列表，这两组列表通过合在一个表格的形式，不仅反映了到1951年10月为止我们分发杂志的规模，也显示出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各种困难。A栏是指我们每个月从西柏林发放给秘密读者的《月份》杂志数量，这些杂志在西德不出售，而且至少是两个月以前出版的。B栏具体指出自1948年11月以来出版的35期杂志，每期都有多少册可供我们自由发放。

表**1 1948**～**1951**年《月份》杂志发放册数一览

	A 自 1949 年 11 月起 每月分发册数	B 自 1948 年 11 月起出版的每一期 分别可供自由发放的册数	
1948 年 11 月	无	1	1740
1948 年 12 月	无	2	无
1949 年 1 月	无	3	无
1949 年 2 月	无	4	1715
1949 年 3 月	无	5	115
1949 年 4 月	无	6	130
1949 年 5 月	无	7	125
1949 年 6 月	无	8/9	5600
1949 年 7 月	无	—	—
1949 年 8 月	无	10	970
1949 年 9 月	无	11	2315
1949 年 10 月	无	12	2042
1949 年 11 月	350	13	1695
1949 年 12 月	1550	14	1320
1950 年 1 月	1715	15	1560
1950 年 2 月	1800	16	1170
1950 年 3 月	3100	17	906
1950 年 4 月	2420	18	720
1950 年 5 月	4790	19	1580
1950 年 6 月	3585	20	860
1950 年 7 月	3740	21	2463
1950 年 8 月	1340	22/23	2245
1950 年 9 月	2040	—	—
1950 年 10 月	1605	24	2065
1950 年 11 月	2270	25	2065
1950 年 12 月	2065	26	2065

表1 1948～1951年《月份》杂志发放册数一览-续表

	A 自 1949 年 11 月起 每月分发册数	B 自 1948 年 11 月起出版的每一期 分别可供自由发放的册数	
1951 年 1 月	1900	27	2065
1951 年 2 月	2440	28	1340
1951 年 3 月	1280	29	1340
1951 年 4 月	1280	30	1340
1951 年 5 月	1280	31	1340
1951 年 6 月	1260	32	2065
1951 年 7 月	2120	33	2560
1951 年 8 月	5700	34	2560
1951 年 9 月/10 月	5260	35	5560 *
共　计	54890	—	55636

* 其中 3000 册用于世界青年联欢节。

除了自由发放，直到1949年3月20日西德马克成为西柏林唯一的支付货币为止，《月份》杂志还以东德马克出售。

即使过了1949年3月以后一段时间，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还可以在大学主楼的门卫用东德马克买到上个月出的《月份》，其中很多买杂志的学生都来自东柏林和东占区。此外，在各占区交界附近还有很多由《电报机》和《新报》的出版商建的报刊亭，经出示东德身份证明也可以买到杂志。这样，在报告里涉及的时间段内，东德读者通过商业渠道获得的《月份》杂志有3150份，此外由于有一些面向特定东柏林居民的特殊协定，还有通过东德马克购买到的1885份。

我们通常每个月两次面向秘密读者自由发放杂志。因为分发的是两个月以前出版的期刊，所以1949年11月我们开始这项工作时能发放的最早的也就是9月刊。除了未出售的新期刊，1949年3月20日还有库存20000册以前的期刊因货币改革而升值，相当于超低成本印制，从列表B可以看出这些期刊消失得有多么快。

货币改革也给我们和秘密读者们带来了沉重的后果。1949年3月刊至5月刊的《月份》刊登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庄园》，但是只有最受欢迎的2月期有1715册供发放，由于货币改革的影响，接下来几期的数量少之又少。怎么办呢？我们从所有这三期中抽出100份有针对性地发放，并且在苏占区将这几期用打字机制作复本，在我们1952年和1954年的问卷调查中这部作品的出现率非常高。还有这也促使拉斯基作出决定加印出版特刊。到1951年10月共出了21篇文章的特刊，大家估计这15万册加印的特刊到11月至少有一半，甚至有四分之三都发放给了秘密读者。由于版权原因，《动物庄园》没有在特刊之列，但至少这部作品在美占区广播电台以广播的形式播出，朗读者的音色听起来还特别具有像动物一样的逼真效果。

《月份》杂志的秘密读者最赞赏的是奥威尔的《1984》。在我们的杂志分发工作初期，这本小说分五期连载（1949年12月第14期至1950年4月第18期），我们每一期拿到的份额到最后降到了最初的一半。分不到杂志的秘密读者们虽然可以拿到由某个情报局地下印制的小型删节版本，但看过一部分原版翻译的读者读到盗版中低俗的色情内容特别多便感到上当受骗了，并且不甘心就这样受到欺骗。最后一家出版社购买了《1984》德语版的版权，在西柏林以特价出售；但3.5西德马克的价格和6∶1的汇率对于东德人来说已经占到了每周工资的一大部分。然而不久后，奥威尔创造的词汇在东德被包括异议分子在内的很多人所使用：“没落人士”“双重思想”“思想警察”，还有“老大哥在监视你！”

最初推广《月份》杂志的情况不是很理想。很显然，对于拉斯基的商业性与非商业性杂志宣传目的来说，我们的杂志推广活动是次要的。无论如何，他都无法也不想在HICOG（High Commission of Germany）的收支预算中留出一部分资金，保证可以长期向我们的秘密读者们供应充足的杂志。最快到1951年秋，情况才有所好转，可能由于自由文化大会在美国高级专员公署具有很好的名声，CCF也和《月份》杂志实际上有着一定的关联。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差一点儿在西方又引发一场世界大战，恰巧是在这个时期，西柏林CCF成立，拉斯基是计划者之一，接下来CCF的工作目标就和HICOG以及德国民众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一年以后，在柏林CCF成为《月份》的大型推广中心之前，加印《月份》中由CCF成员撰写的文章也已得到了CCF巴黎总部的资金支持。然而给我们每个月110册的杂志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相反的是，内部报告中对CCF柏林办事处的工作描述得比较夸张，容易给人造成误导。办事处名义主任君特·比肯费尔德（Günther Birkenfeld）实际上将我们的杂志推广行动作为“柏林办事处工作”的一部分，我想我在55年前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们的行动必须保密，因为我们和柏林办事处的“非官方主任”安娜莱娜·冯·卡普里维（Annelene von Caprivi）建立起了互信的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当时肯定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米歇尔·霍赫格施温德（Michael Hochgeschwender）曾在他的书中就CCF以及德国民众这样写道，CCF柏林办事处1951年秋就是有“四个在区域上界限分明的分发小组再加上另外三个人”在工作。[8] 他还引用了办事处1951年10月的工作报告中的一段如实内容，即在由个人组成的《月份》杂志分发网络中，“由霍尔维茨的夫人一起参与在东德分发的7000册杂志是最好的工作战绩了”。[9] 霍赫格施温德为写这本书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书中并非完全没有错误，用到的资料来源我早就不记得了。

尽管同CCF建立起了合作，但至少到1951年秋以前，我们从来都事

先确定不了即将能分发多少两个月之前出版的杂志，而且经常连续几个月分发量极度下降，甚至经常没有库存，1951年3月至6月我们的分发量降到了最低点，所以我必须一直努力争取拿到更多的分发份额。

接下来的事情让我们的工作暂时出现了起色：由于1950年6月26日至30日CCF柏林办事处的成立，《月份》大批量出版发行了第22/23期双月刊，所以又有一批杂志可供我们发放了。在为柏林办事处成立举办的活动期间，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使冷战变得更加激烈。3月初到4月中旬，我们在柏林经历了一段紧急戒备时期，这要起于自由德国青年团主席昂纳克（Honecker）为即将举行的德国青年聚会提出的口号，是这样说的，自由德国青年团要在西柏林实行“民主”，接着《青年世界》在3月7日宣称：“我们［……］会坚持不懈地要求自由解放柏林的各个街道和广场。”结果导致西方同盟国投入警力制定了一系列防卫措施，并且在我们的大学生分发站点的参与下，制定了民事保护措施。还有东德领导人乌布里希（Ulbricht）从莫斯科回来后下达指示放弃在西柏林进军，之前的口号“自由德国青年团攻占柏林！”也变成了“自由德国青年团问候柏林！”，很多人也都料到西柏林又必将出现各种骚乱。

就在事情出现转机之时，好奇的自由德国青年团成员也穿着蓝衬衫为西柏林各条大街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我们及时地比以前多拿到了将近4800册《月份》杂志。转年的8月5日至18日东柏林要举办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东德政府当局也无法阻挡来自各地的众多访客，《月份》编辑部为之提前额外准备了3000册杂志。在《月份》杂志的各个推广站点中，除了美占区广播电台和我们的大学生组织成立的站点，位于西柏林的隶属于德国大学生联盟的全德大学生事务部分发的杂志最多。

在向各个站点供应杂志时，我们尽量保证各站点只将杂志分发到真正感兴趣的读者手中。尽管在1949～1951年这段并不长的时间里，前后经常领取杂志的读者其社会出身却明显有很大不同，但东德早期的这些

存在异议思想的读者无论来自于知识分子、宗教圈还是工人阶层，其立场都会因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如今要想进一步了解这些冷战早期有关秘密阅读的现象，就要把当时已经显现出来的一种社会性的选择转变和立场转变作为背景原因来考虑。最初总能听到来自苏占区的异议人士称：“用惊恐作为结束要胜过永不结束的惊恐！”但渐渐取而代之的是：“西德不是一切都那么好，东德也不是一切都那么糟。”

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就首先考虑到了这一转变，也因为我要推行的是思想防卫和被动反抗，并且像很多其他人一样，我也没有想到德国会分裂这么多年。了解我的论文《秘密读者》[10]的都知道，我在文中对分别于1953年6月17日工人起义前后进行的两个调查进行了分析，调查有关“观点相投的异议分子”与体制反对者之间沟通交流的社会学规范，同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1]的观点。

其中涉及的是在一个以一体化为目标的“极权主义”统治体系下，是否存在自发社会化及自发社会化的意义。向观点相投的读者发放《月份》杂志被视为一种信任关系的标志。汉娜·阿伦特当时认为这些现象并不重要，理由是能够满足某些需求的背离社会常规的结构化进程与社会化和社会角色定位发生在同一层面，按照阿伦特当时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极权统治者拥有将所有人一体化并将所有人毁灭的能力，因此在极权统治下完全不可能实现自发社会化，也就不可能存在观点分歧。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发生前汉娜·阿伦特认为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图**1** 东德阻止传播的《月份》杂志（**1950**年第**16**期以及同年第**22/23**期双月刊）

《月份》的读者们对《1984》的狂热反应引发了我朝这个方向的思考。有位读者说道，即使只能读到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也能引发手榴弹般的反响”。异议分子们也被这部作品吸引，还有积极投身政治的读者起初已经认为反抗没有了意义，却又重新找到了反抗的勇气。我们在想这是为什么，是《1984》中描绘的极权主义下的生活被完全一体化然后被毁灭得粉碎了吗？奥威尔笔下的反乌托邦主义难道没有对东德生活产生影响吗？一位读者给我的回答是：“不，是统治者违背我们的意愿要把我们带到那里占有我们！”而40年过后依然没能实现，对此有一个问题一直以来都在争论，就是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有权谈到“反抗”。

《月份》杂志广泛地展现出在开放的西方国家有哪些自由的当代思想及文化著作，足以吸引着各位秘密读者，无论这些读者的兴趣与利益是政治性的还是非政治性的，也不依赖于他们各自不同的世界观。杂志

除了作为与西方世界的精神桥梁作用之外，在中国、意大利、安卡拉、印度尼西亚、孟买、南斯拉夫、英国、法国、东非、鲁尔区以及斯特拉斯堡的各地记者到1951年10月为止刊登的文章显示出这种桥梁作用并非仅限于与西方世界的沟通。

在冷战早期这些年，拉斯基在各种分析研究中将重点放在了对极权统治的体验上。对于西德读者来说作为思想启蒙的东西，必须要深深触动东德的秘密读者。《作用报告》中提到的很多文章都指出，马列主义中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从未得到解决，且被斯大林主义所掩盖，这些矛盾导致的后果早就印证了东德秘密读者的恐惧、困境以及何去何从息息相关。拉斯基在报告中肯定了这些文章，同时也显示出他的编辑才华：“一方面［……］这类文章分析了对极权主义的体验，或者将其纳入创造性阐释的框架。不仅有斯隆（Silone）、库斯勒（Koestler）、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和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的皈依经历；有对东德集中营的描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苏占区各大学教授的‘哲学’的没落。还有弗朗茨·伯克诺、鲁特·菲舍尔（Ruth Fischer）和贝特伦·D.沃尔夫（Bertram D.Wolfe）著述的共产党史，以及关于二战时苏联和纳粹德国对外政策的论述；库斯勒和卡夫卡将对极权统治的体验转化进了文学的维度，汉娜·阿伦特对政治宣传的论述，还有A.维斯伯格-齐布尔斯基（A.Weissberg-Cybulski）对巧妙‘逼供’的体验。这些剖析‘极权主义体验’的文章和那些讲述德国过去的文章一样：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德国又觉醒了吗？’各种图书审查，彼得·德·门德尔松（Peter de Mendelssohn）对战后致歉回忆录的评论；纳粹党反对宗教，关于种族观念、‘德国人与犹太人’的文章，像作家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的文学批判，像思想家斯宾格勒（Spengler）或者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哲学批判，围绕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关于德国历史主流的观点展开的一场激烈的国际性讨论（《我们历史中的迷途？》）［……］”[12]

拉斯基选取的21篇加印的文章到1951年秋大约共印制了15万册，通过这21篇文章可以看出，编辑《月份》杂志遵循着一个特定的政治目标，这些文章中的一多半都是有针对性地在“东德”发放。通常这些特刊都由读者和信使在西柏林自取，然而有些站点利用邮寄的方式专门将特刊寄给某些思想防线薄弱的政党官员，还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人士、各图书馆、个别政府部门以及各政党办公室。

1.美国学者贝特伦·D.沃尔夫（Bertram D. Wolfe）：《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Trotzki über Stalin* ）

弗朗茨·伯克诺：《披着羊皮的斯大林》（*Stalin im Schafspelz* ）

2.德国政治家鲁特·菲舍尔（Ruth Fischer）：《铁托反对斯大林》（*Tito contra Stalin* ）

3.贝特伦·D.沃尔夫：《李森科事件》（*Der Fall Lyssenko* ）

4.鲁特·菲舍尔：《铁托与托洛茨基》（*Tito und Trotzki* ）

5.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艺术家与自由》（*Der Künstler und die Freiheit* ）

德国作家狄奥多·普利维尔（Theodor Plievier）：《人性与国家》（*Humanität und Staat* ）

6.君特·比肯费尔德：《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WD-Staat* ）

7.意大利作家伊格纳齐奥·斯隆（Ignazio Silone）：《离开莫斯科》（*Abkehr von Moskau* ）

8.英国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迷失的幻想》（*Verlorene Illusionen* ）

9.狄奥多·普利维尔：《从文化原点开始》（*Vom Nullpunkt der Kultur* ）

10.阿瑟·库斯勒：《为了一个欧洲自由军团》（*Für eine Europäische Freiheitslegion* ）

11.德国语言学家欧根·莱尔希（Eugen Lerch）：《种族妄想》

（*Der Rassenwahn*）

12.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20世纪的政治》（*Politische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13.德国作家诺伯特·米赫伦（Norbert Mühlen）：《美国工会》（*Amerikanische Gewerkschaften*）

14.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关于无稽之谈的家族史》（*Zur Genealogie des Unsinns*）

15.美国作家鲍里斯·舒布（Boris Shub）：《我们的朋友Iwan》（*Unser Freund Iwan*）

16.美国作家亚历山大·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喀琅施塔得起义》（*Der Aufstand von Kronstadt*）

17.美国政治家艾略特·科恩（Elliot Cohen）：《德国人与犹太人》（*Deutsche und Juden*）

18.德国作家斯蒂芬·安德斯/鲁道夫·哈格尔施坦格（Stefan Andres/Rudolf Hagelstange）：《约翰内斯·R.贝歇尔事件》（*Der Fall Johannes R.Becher*）

19.诺伯特·米赫伦：《华尔街的权利与神话》（*Macht und Mythos der Wallstreet*）

20.美国外交家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美国与俄国的未来》（*Amerika und Russlands Zukunft*）

21.梅尔文·拉斯基：《攻击性言论》（*Polemische Notizen*）

社民党位于汉诺威的东德总办公室肯定也大力参与了《月份》杂志的分发工作，但我不知道从慕尼黑给其提供的特刊是否包含在那15万册之内。

拉斯基无论如何都特别重视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知道当共产党人面对布尔什维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极端矛盾时通常会感到幻想破灭而有所醒悟；知道异议分子尝试在内部解决这一矛盾时，至今总是要失败的。具

有这些认知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月份》的秘密读者群体在发生变化。在冷战早期及东德早期，这些秘密读者不是努力维护社会自由空间的异议人士，就是为反抗辩护的律师。受传统世界观影响而产生的期待和希望首先表现为行为主义，在这段时期由于生存的需要而变得私有化。后来出现了更年轻的读者，其读书动机是在现存体制下产生的，却对体制的极权主义目标持反对态度。

读者身上体现出了这些显著的变化特征，因为为读者提供杂志的站点也经历过类似的变化，并且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表2来进一步了解，该表格列出了到1951年10月为止由我们提供杂志然后进行分发的各个站点，其中包括三要素：总量、最后一个月分发数量以及计划数量。

表**2** 目前为止向各个站点分配杂志的数量以及计划数量，时间：**1951**年**10**月

	截至1951年10月分配总量	当月分配量	1951年11月起每月计划分配量
全德大学生事务部	9040	480	480
社民党东德办公室（总数）	15629	1020	1260
柏林东德办公室	7525	480	720
汉诺威东德办公室	5520	300	300
其他站点	2584	240	240
文化救助协会	8907	480	600

表**2** 目前为止向各个站点分配杂志的数量以及计划数量，时间：**1951**年**10**月**-**续表

	截至1951年10月分配总量	当月分配量	1951年11月起每月计划分配量
美占区广播电台	7930	180	120
反对非人道战斗团	7290	240	180
基民盟东德办公室	4405	240	240
自民党东德办公室	1140	120	120
总　计	54341	2760	3000

我们首先来看自1950年1月或3月以来经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以下简称：自民党）的东德办公室领取到杂志的读者，政治立场属于中间偏右。这两个政党办公室关注的都是各自在东柏林的忠实党内同志，在同这些党内同志开讨论会时，《月份》里的文章也是讨论内容之一。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会在西占区举办讨论会，但更加积极活跃的基民盟除此之外还专门设有一个与东德党内同志联络的办公室，最初由雅各布·凯萨（Jakob Kaiser）设立。据估计，读《月份》的基民盟成员中有一半都退出或被开除出了苏占区努舍克（Nuschke）[13] 领导的基民盟，从职业来看，大多是东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教师，同时还有律师、州议会议员及国企领导。有报告称在萨克森州，《月份》中一篇伯克诺引用《铁托反对斯大林》的文章曾被用于干部培训；还有在梅前州，州级党领导干部中间以及某个自由德国青年团的学校里也在分发《月份》杂志。

然而后来1953年工人起义前后进行的读者调查结果显示出，这些持中间偏右政治立场的秘密读者在行动上存在着两个趋势值得关注。[14] 受访者中只有一位是女士，没有人低于25岁，四分之三以上大于45岁，因此他们更像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异议者团体。同时有一半受访者在工人起义前果断积极地展开了一场非常冒险的行动，至少向另外8个人以上分发了《月份》杂志，似乎在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努力，而两年以后没

再听到有任何动向。这类读者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很少鼓励支持其他也能读到《月份》杂志的社会群体并与之保持联系。因此我认为，与其他秘密读者相比，他们比较孤立，自成一体。从其职业地位可以看出，顺应服从是他们早就奉行的规矩，幸运的话可以在东德找到一己之路，在私人小圈子里保持自己的信念。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通过基民盟领取到杂志的读者。通过表2中的对比可以看出，自民党的杂志分发量最后只占到基民盟的一半，总共只占四分之一。这些秘密读者都是自取杂志，相比来说很少与其他人保持联系，大多数从事的是学术性职业，在东德始终相对比较自由。通过自民党领取到杂志的各大学生有着类似的职业目标。

大学生可以通过各个不同站点领取杂志，但大多都是通过全德大学生事务部。1949年底，柏林自由大学的12名大学生在共同的目标指导下，开始与其他离开苏占区各所大学的“异议人士”建立联系，这12名大学生里有青年自由党人，也有基民盟拥护者，所有人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像东柏林和东德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一样，他们也是在柏林自由大学成立以后，在一些反叛的洪堡大学学生带头下，相继跟着转到自由大学。这些大学生不仅对《月份》杂志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而且相当积极地开展各种行动，首先编辑出版了两期小型杂志，叫做《自由大学生》，总结并评论了《月份》中的某些文章。

这些学生组成的理想主义团体激励了更多其他的大学生，最终推动成立了全德大学生事务部（以下简称事务部）。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独立组织，公开转到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名下，任务是直接带领并支持东柏林及东德的“异议”大学生开展各种活动。

同时事务部也一直将《月份》作为主要媒介来起到思想精神上的促进作用。随着在西柏林领取杂志的信使人数快速增加，杂志需求量从1949年11月的100册后来上升到150册、200册和300册，到1951年10月达

到480册，我们也计划继续保持这个数量。所有大学城都有固定信使，据估计这段时间大约共有40名信使，为大约50个不同的团体供应杂志。和从东柏林和波茨坦有组织地来领取杂志的人不同，那些远道而来去往西柏林的信使就要冒更大的风险，以前领取6～10册杂志，现在变成了2～4册，1952年平均每趟回程只带4册杂志。对此1950年5月底自由德国青年团举办的德国青年聚会成了转折点，在这之前开往柏林的火车只是偶尔在上下车时检查，从那以后行车期间也要检查。这又像是在提前警告斯大林的一体化政策和大清洗运动，在这种背景下，1950～1951年这段时间如果有人秘密接触来自西方的“体制敌对”思想，那么处境就会变得更加危险。最终东德各大学成了实现苏联化过程最主要的社会机构，这样，事务部派出的政治立场中间偏右的信使以及经他们提供杂志的读者就变得尤其引人注意，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变得惶恐不安，因此这些信使和分发杂志的大学生们接受建议先低调行事，加入一些忠实于当下体制的协会，以适当的方式假装显示出政治“可靠性”。

在西柏林举行的德国青年聚会同样还促使了事务部开始同一类新的大学生反对派增加联系，从这些学生的专业和从事的活动来看，他们中间有望走出新的共产主义优秀分子。1951年秋，事务部的大多数信使以及大部分分发杂志的大学生都属于这类群体，当然还包括曾经受到安全威胁的“中间偏右”的读者，这些读者在此期间又重新活跃起来。同时总是有一些信使和大学生（比如读神学的大学生）拒绝加入自由德国青年团或者任何其他共产主义的协会，也有一些学生没有事务部的资金支持就无法继续完成学业。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因为事务部发展迅速，渐渐也就拥有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地位。事务部内有各个不同的部门及很多工作人员，存在于柏林自由大学的名下，隶属于德国大学生联盟，不仅在德国CCF的理事会拥有席位，也受到CCF巴黎总部的关注。到了1951年秋，事务部拥有一栋别墅、一辆私有车及一部无法窃听的电话。事务部有能力为来自苏

占区的大学生开始在西柏林学习生活提供经济支持，并免费提供来西德的机票，同时还接管了一个任务，就是为柏林和西德各大学的政治难民学生进行身份认证，且一如既往地把组织协调大学生在东德进行反抗活动作为主要工作任务。

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到了1951年底，不得不说事务部不断增加的杂志需求是不现实的，以后继续每月向东德发放480册杂志的计划可以说有些夸张。但在此期间西德还是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趋势，有望促使事务部及其领导层转向新的思考方向，但也可能令其偏离了事务部的主要工作。每个月都有德语及英语版的关于东德高校情况的《新闻快报》出版；在德国大学生联盟及CCF的帮助下，事务部负责组织协调反抗行动的高层官员参加了一系列在西德的思想教育旅行，参加旅行的“义务”他们履行得如此投入，小心，明智，而且幸运的是无须冒风险，但即便这样他们还是遇到了相当大的挑战，必须在没有定理没有导师的条件下，从自身经历中学习专制体制下从事非法活动的各种秘密规则。这一点对于拥有两种极权体制学习经验的社民党东德办公室来说要容易一些。此外事务部的处境也很危险，一方面因为事务部所发挥的效力带有过强的鼓动性，另一方面在其影响范围内，即各大学及大学生群体中间给真正的匿名带来了很大困难。这里暗藏着很大的风险，作为信使出于安全原因不会一直都能应对得过来不断增加的杂志数量，但事务部继续至少拿出每个月一半的杂志量分发给定期或者至少偶尔来西柏林的大学生。因此1952年时，与同年龄的职业人士（39%）相比，事务部与其他读《月份》杂志的大学生的联系更加频繁（60%），[15] 结果导致事务部的安全保障出现了诸多漏洞。在1950年10月期间大学生读者们就已经经常向外部群体发放杂志，除了东德其他高校，还包括30～40个其他东德城市的非大学生群体，但这也无法缓和事务部的危险处境。

我的内部报告完成不久，事务部就面临着一股灾难般的逮捕潮。尽管部里为了让信使和读者之间互不受到影响而做出了各种努力，但在现

实情况下还是有一些人非常了解如何制造联系。一次，事务部的两位中层人员，同时也是我的朋友，因为我有一辆车，所以他们找到我，周末一同去见一位事务部的高层官员，我们在柏林万湖区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作为政治难民跟随女友来到了西柏林，而在此期间女友抛弃了他，他感到非常失望，不仅对感情也对西德感到失望，坚定地说他要回东德，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自愿回东德后除了被逮捕必然还有更多其他后果，因此他很富正义感地表示愿意暂时被“名誉逮捕”，这样可以事先提醒警告被危及的其他人。在接下来的两周名誉拘捕期间，当他还在柏林自由大学校长办公室的房屋管理员那里做客，还高兴地和房屋管理员的漂亮女儿在花园里散步时，事务部发出的危险警告还没结束，就已经掀起一股逃亡潮，引起了国安部的注意。于是我去找了情报局的一位熟人，但美国军事情报局反间谍部门（简称CIC）对这位“名誉犯”只能再关押一周的时间。然而最后还是有很多人被逮捕了。几年后听说我们这位“名誉犯”被判两年监禁，出狱后成了国家人民军的军官，再后来做了上将。[16]

《月份》杂志曾被情报活动所利用，是我们到了1952年才获知的。在这件纷乱不安的事情背后，既不存在官僚异化现象，也不存在所谓的不通人情世故。其中涉及两个分发杂志的组织，反对非人道战斗团（以下称KgU）及“文化救助协会”，到了1951晚秋的时候，我们对待这两个组织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态度。[17] 成立KgU的雷纳·希尔德布兰特（Rainer Hildebrandt）是一个按德行要求行事的人，坚持和平主义，作为纳粹反抗者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弗（Albrecht Haushofer）的追随者，希尔德布兰特在他这位导师的影响下认为自身有义务坚持投身于道德行动。KgU由于被卷入情报活动，也就远远偏离了其1948年春刚成立时的道德理念。除了KgU，1951年时“文化救助协会”各机构的读者也被牵扯了进来，先是有人将他们视为热心读者而很友好地与其攀谈，最后招募进来为中央情报局（以下称CIA）的间谍活动服务。KgU和“文化救助协会”两个组织都由恩斯特·蒂利希（Ernst Tillich）领导，蒂利希有些

宗教背景，后来将希尔德布兰特排挤出了KgU。

文化救助协会的各机构曾经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也希望协会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表2也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还要继续为协会增加杂志数量。协会在柏林的波茨坦广场附近开设了一些阅览室，还有一个图书出租处，很多平时接触不到的读者经常来到阅览室，其中包括很多中学生。还有一些老师也提供咨询服务，并且发放西德书刊。相反，我们还想继续减少KgU本来就不多的杂志数量，原因是KgU越来越不重视保证《月份》杂志发放到真正对文学艺术感兴趣的读者手中，很多杂志就和各种低级鼓动宣传性刊物一起被放在候车大厅这样的地方。而同样由恩斯特·蒂利希领导的文化救助协会却做得很出色，说明蒂利希注意到了把握平衡。关于他的情报活动计划当时我们还不知道。

然而我们都看到的是，蒂利希自1950年春开始一同与希尔德布兰特领导KgU以来，一步一步地从最初的“第二常任主席”到最后作为“政治及组织总领导”，将希尔德布兰特排挤出KgU。我为此感到可惜又痛心，因为我1948年初夏认识了雷纳·希尔德布兰特，当时他在自己的住所里怀着理想主义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开始了一项工作，就是将曾经被苏联解放后来又投入使用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囚犯信息记录在案，后来这项工作在他“沉默就是自杀”以及“无所作为就是谋杀”的口号下促成了KgU的成立。

没过多久，我便开始向他提供一些帮助，给他下面那些志愿工作者补贴车费还有一些食品及衣物。为此我1949年1月在美国度假时，通过社民党以前的国会议员托尼·桑德尔（Toni Sender）准备了一些食品包裹还有烟卷和咖啡，当时桑德尔在纽约负责无党派基金会“自由之家”的国外事务。这是假期结束离开美国前，两个在CIC工作的美国人向我提出的请求，他们由于职务的关系不能做这些事情。后来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都能通过CIC帮助支持希尔德布兰特，但只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直到柏林CIA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代表认为蒂利希更适合完成他下达的任务，削弱东德的势力。我过了10年以后才获知。

恩斯特·蒂利希是我在《月份》出版后不久认识的，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社会学家并且表明自己是纳粹反抗者，在高校教授哲学，想借助社民党发展一番事业。在蒂利希接管文化救助协会的杂志分发工作之前，我们会偶尔给他家带去一些《月份》杂志，并且希望同他轻松愉快地聊一聊，他拿出了12本杂志分发给了一些大学生和牧师。

KgU的章程规定不允许采取暴力。可以看出，希尔德布兰特想通过公开号召和公开行动，以甘地（Ghandi）提出的被动对抗和民事反抗的理念，制造出挑衅性的声势，那么也可以想象得出他希望就此出现一场大规模强有力的运动，无论以何种方式在何种地方带领通向自由的运动。

相反，蒂利希认为在东德是可以实行革命的。但1952年春，文化救助协会的一位阅览室图书管理员提醒我们说，蒂利希把《月份》杂志作为诱饵，将读者招来从事CIA的间谍活动，我们听了还是很吃惊。紧接着我就把给KgU的杂志份额从180册降到了30～40册，蒂利希还对此大发脾气。1952年11月蒂利希被开除出柏林社民党。两天以后，雷纳·希尔德布兰特从KgU退出，原因是蒂利希的所作所为触犯了KgU的某些规定，要用“和平手段”与蒂利希这股反人道势力作斗争。

西德的批判家都避免具体谈及蒂利希，避免谈及他如何希望德国民众使用各种方法为苏占区解放作出努力，从投入外部人员渗透瓦解到间谍活动、破坏活动等。

为秘密读者们提供像《月份》这样一本高思想水平的杂志卷入了冷战的负面影响，并且面临着被情报活动滥用的危险，这是无可避免的。但在我的记忆中，关于KgU只有这么一次事件，之后KgU作为杂志分发

站点没再受到我们的关注。

全德大学生事务部和KgU在组织上的变化令我们感到不满，这些变化引发的后果在1951年后成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之前我们和这两个组织不定期地保持沟通联系，以了解读者情况并据此调整我们的杂志分发工作，而后来已无法再同两个组织继续沟通。《月份》编辑部要求定期拿出一批杂志给一个叫做“自由法学家”的新站点，他们在受监控的大门处领取杂志，不与我们进行沟通。但和KgU不同的是，自由法学家学会了如何长年推行一项严肃的公共工作，并将其视为情报性新创举。

和美占区广播电台以及社民党柏林东德办公室的合作是比较愉快的。如表2显示，分给美占区广播电台的杂志份额相对较少。到目前为止美占区广播电台分发了将近8000册杂志，这和其在1950年德国青年聚会和1951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台里只有很少量的杂志供读者自行领取，只有一些忠实读者经过协商可以自行领取。但是出于对信使的安全考虑，从1951年11月起，分配给美占区广播电台的杂志数量从180册降到了120册。

在1949年特殊的个人及政治背景下开始的杂志分发行动到了1954年后完全进入了正常轨道，以至于我们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从何时开始以及为什么我们放弃了这份职责——为秘密读者们提供《月份》杂志。我只还记得两次很小的瞬间，这两件小事都从侧面说明了事务部和KgU经历的变化，我们也为此感到痛心遗憾。其中一次是恩斯特·蒂利希被一群他要雇佣做保镖的彪形大汉包围，这个场面令人感到悲哀不幸。我们一个朋友由于面临着可能被绑架的危险，而随身带着一把手枪，这和他作为事务部工作人员的身份极为不符，特别是他想做牧师，但根据教会规定第一次做牧师必须在籍贯所在地，也就是说他只能先在东德得到一个牧师职位，这对他来说可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个时候他接到一个任务，在由一位德国青年协会的支持者建立的反抗中心负责监察KgU

热气球发送传单的行动。这场行动的指挥是一个不重视精神食粮的人，也对《月份》杂志没有很高的评价，雇佣了几个彪形大汉保护自己。所以我这位朋友在热气球行动过后不安地意识到，为了履行监察人的工作，他自己也需要一把手枪。

回过头来看，在冷战的第一个十年里，当理想主义者的精力殆尽，狂热的冒险活动走向违法犯罪时，如果有博识多通的专门人士出来阻止，让那些渴求暴力行动的反抗人士无法拥有如此多的权力，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沉重的负担了。

---

[1] Hurwitz，Harold：*Der heimliche Leser-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des geistigen Widerstands* （以下简称：Der heimliche Leser）. Köln 1966.我把相关资料放置在了柏林州立档案馆收藏。Lieferung am 2.9.07（Acc.5440）in Box Nr.375-380.

[2] 以下内容来自于我在50多年前为梅尔文·拉斯基撰写的报告，由柏林州立档案馆收藏，西蒙·巴尔克（Simone Barck）在2007年7月去世之前不久将这份报告提供给了我：《一本民主杂志在东德的作用与影响》（*The Impact of a Democratic Magazine in Soviet Germany* ）（以下简称：Der Impact-Bericht）哈罗德·霍尔维茨撰写，梅尔文·J.拉斯基补充。Berlin 1951/1952.同上，Box 375.见Acc.Für Lieferung am 27.9.06 Kartons 0/6，D/25 und D/26.报告见网址：www.polwiss.fuberlin.de/osz/hurwitz/berlin/heimliche leser der monat.pdf。

[3] Hurwitz，Harold：*Mein Leben in Berlin* . In：Leviathan 2/1999，S.270.

[4] Hurwitz，Harold：*Mein Leben in Berlin* . In：Leviathan 2/1999，S.270.

[5] Hurwitz；Lasky：*Der Impact-Bericht.*

[6] 该文化机构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以反对极权主义为宗旨，并为一些左派自由艺术家及期刊如《月份》提供资金支持。——译者注

[7] 乔塞尔森负责中央情报局与文化自由大会之间的联络。——译者注

[8] Hochgeschwender，Michael：*Freiheit in der Offensive*？*Der Kongress für kulturelle Freiheit und die Deutschen.* München 1998，S.310f.

[9] Hochgeschwender，Michael：*Freiheit in der Offensive*？*Der Kongress für*

kulturelle Freiheit und die Deutschen. München 1998，S.310f.

[10] Hurwitz：*Der heimliche Leser* .

[11] 美国政治理论家，犹太人，原籍德国，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而著称于西方思想界。——译者注

[12] Hurwitz；Lasky：*Der Impact-Bericht* ，S.34.

[13] 东德副总理，苏占区基民盟主席。——译者注

[14] Hurwitz：*Der heimliche Leser* ，S.307-310.

[15] Hurwitz：*Der heimliche Leser* ，S.130.

[16] 参阅zu diesen Erinnerungen Meichsner，*Dieter*：*Die Studenten in Berlin* . München 2007。

[17] 见表2。

库斯勒、奥威尔与《真相》

——看反对非人道战斗团以及1948～1959年苏占区和东德的秘密阅读现象

恩里克·海策尔（Enrico Heitzer）

如果想了解统一社会党领导初期东德民众的秘密读书现象，就不得不提到反对非人道战斗团（KgU）从事的活动。这个组织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给无数读者带来了精神食粮，同时也将西德政府机关、情报局和苏占区以及后来的东德愤愤不满的民众联系在一起。

KgU是冷战初期在德国引起关注最多的组织之一。[1] 当时在苏联对柏林实行封锁时期，建立一个为反对非人道而斗争的人道主义团体的提议引起了强烈反响，雷纳·希尔德布兰特（Rainer Hildebrandt）于1948年12月建立了KgU，致力于搜寻苏占区被逮捕和失踪的人员。1949年1月KgU寻人工作部开始正式开展各项活动，到1949年6月已收到12000件寻人申请。通过该部门发起的各种活动，经苏联特殊集中营关押后释放的人得以首次公开讲述被拘捕的经历，当时还没有哪个组织这样系统地见证并记录了苏联特殊集中营及苏占区其他各监狱关押者的命运。[2]

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从一开始就有情报机构关注到这一组织，并且派驻人员在里面工作。雷纳·希尔德布兰特[3] 在二战时期因与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弗（Albrecht Haushofer）教授[4] 领导的反抗团体互通联系而被判几个月监禁，除了希尔德布兰特，KgU最初还受到了海因里希·冯楚伦（Heinrich von zur Mühlen）的影响。冯楚伦是一位历史学博士，是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弗的助理，二战时期曾在纳粹国防军情报部工作，[5] 同时也是勃兰登堡部队[6] 的成员，因此与1945年后又渐渐兴起的情报活动有着诸多联系。比如他认识勃兰登堡部队的前任情报军官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Friedrich Wilhelm Heinz），海因茨曾经组

织建立了联邦军事情报局，也就是联邦军事谍报局（MAD）的前身。[7] 冯楚伦使用假名“霍夫曼博士”，除了KgU的寻人工作部以外还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情报部门，从事KgU自称的“反对”活动，并且组织分发传单，大范围搜集各种信息。到1951年初为止，与KgU合作的不仅有MAD的前身联邦军事情报局，[8] 至少到1950年秋还有KgU的工作人员在“盖伦组织”也就是后来的联邦情报局工作。[9] KgU还同柏林宪法保护机构合作，常年担任该机构领导的海因茨·维希曼（Heinz Wiechmann）1949年时曾在KgU工作过几个月之久。[10]

此外，除西德情报机构之外，美国情报机构也很早就关注到KgU的纯人道主义“反对活动”，这个KgU自称的所谓纯人道主义“反对活动”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对该组织从事所有活动的统称。1948年，在KgU正式开展活动之前，雷纳·希尔德布兰特就曾和泽韦林·瓦拉赫（Severin Wallach）会面，瓦拉赫是美国军事情报局反间谍部门（CIC）的柏林领导人，负责资金支持工作。[11] 1949年夏，美国情报局军事情报处（MID）开始在KgU推行自己的内部组织结构。[12]

然而美国政府1948年成立的政策协调室（OPC）对KgU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机构的名称听起来并无害处，但其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下的外国情报处，在和平时期从事各种地下活动。[13] OPC是1947年成立的CIA下最重要、发展最快的部门，占用CIA70%～80%的总预算，[14] 从1949年底开始参与KgU的工作。[15] 随着CIC和MID渐渐撤出，从1950年起KgU一半的资金来源由OPC提供。在寻人工作部不断开展行动的同时，KgU情报工作部却明显发生了变化。CIC和MID主要推行军事行动和反间谍行动，而OPC明显具有更强的进攻性，其最初的工作是推行地下活动，在当时主要包括在西欧国家对选举施以影响、参与渗透各工会及流亡者组织，以及在苏占区势力范围内支持反抗运动或者实行破坏活动。[16] OPC还有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打心理战”。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后，OPC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地下

活动变得非常频繁，从一开始就具有组织两面性的KgU在OPC参与进来后也开始按照OPC的战略理念加强自身行动。[17]

1951～1952年，KgU的行动变得问题重重，比起“少数极端主义分子甚至还有支持恐怖袭击的团体”[18] 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1951年在莱比锡的秋季书展期间，KgU以“山谷”作为掩护名试图在莱比锡市区的三家HO商店[19] 投放磷燃烧弹纵火，由于好几个意外事件计划失败。[20] 一个月以前，7名来自萨克森州的人士死于一起由所谓的轮胎扎钉[21] 引起的交通事故。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这起事故是KgU所为，但KgU的嫌疑非常大。[22]

没过多久，以“双规战略”为指导的KgU就成了“苏占军和统一社会党最强硬的敌手”，KgU的秘密工作人员成了东德各个国家安全机关的眼中钉，当局开始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打击KgU，掀起了一股东德成立以来受害者最多的逮捕潮，这种局势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23] 仅萨克森州1951年秋的这次事件中就有大约200人被捕，至少40名男性被执行枪决。[24] 与KgU合作的各个组织及相关人员至少有1100人被判决，其中137人被执行死刑。[25]

KgU采用各种办法为众多东德秘密读者运送图书，有些甚至是常人难以想到的办法，但KgU都是有目的地选择反共产主义宣传和有关心理战的刊物，而非高质量高水平的刊物，当然二者有时也并不矛盾。KgU内部最初称之为在东德实行的“瓦解（Zersetzung）行动”或者叫“Z-行动”。[26]



图**1** **“**反对非人道战斗团**”**将禁书从西柏林运送到东柏林的热气球行动

长年任KgU总领导的恩斯特·蒂利希（Ernst Tillich）因希尔德布兰特不支持极端主义路线，1952年将其排挤出KgU。KgU对于在西德打心理战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1953年蒂利希在一次报告中阐明了他的观点：“当今的政治领导家在冷战时期”被称为“灵魂领导家”，每一个受“斯大林主义枷锁”桎梏的人都应看作“囚犯”，他需要“支持”，需要得到“外部世界的宣传信息”，心中要“盼望获得解放”。还要强调的是，“对极权主义的反抗开始并结束于每一个人身上”。必须“通过图书和优秀杂志”来“摧毁寂寞、实现集体的无声教育、借助精神作用来撒播欧洲文化已被腐蚀的土壤”。就像《教义问答手册》对于传播宗教来说一样，蒂利希要求“无论如何也要有类似的刊物服务于欧洲历史和德国

历史，服务于文化，尤其服务于道德行为”。“仅仅讨论各项传统及其价值是不够的”，必须还有“实际存在的精神财富”。得到过KgU“帮助”的人会“在自身积攒财富”“必须长期将这种财富与世隔绝”，这些人必须“有意识地把自己变成欧洲文化的承载者［……］”。但这仅适用于“少数人群”，适用于“一个社会内部”某个民族的特殊核心，“为将来辐射到全社会，重要的是以这类少数人群为核心并对他们起到引导作用”。同时我们知道，“未来无线电广播会不断遭到破坏，收音机越来越难以发挥功能，将各种小报带到苏占区也会变得更加困难”。“然而以上每一种信息的获取渠道都很有限，必须特别富有创造性地挖掘信息来源”。就像“每一场战争”一样，“如果有人发明了一种防御武器，那么最迟在半年内就必须有新的武器出现，因为这种防御手段已经被攻破”。[27]

KgU1955年的年度报告更精辟地定义了自身的目标和任务，简明扼要地说就是：KgU相关部门除了搜集信息外还要“邮寄传单和宣传册，向苏占区民众施加影响”。[28]

KgU散发的传单、贴纸、手册和图书加起来有十余种，总数至少有上亿份。其中部分是高质量的KgU原创刊物，部分是明显具有纳粹传统的原始煽动性宣传刊物。

起初在1949年时，KgU的宣传战还比较保守。每个人都可以去西柏林领取他们印制的传单，然后在自家附近或者到其他地方散发传单，或者自行散发或者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散发。最有名的行动之一是1949年7月20日开始的“F行动”。二战期间法国人为反抗德军占领的抵抗运动，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通过大量涂写V字（代表着Victory，胜利）向德军证明他们的存在。KgU参照法国人的做法，富有象征意义地选择在希特勒遭暗杀失败五周年的一次活动上，呼吁大家在东德到处通过绘图、粘贴或者以其他方式醒目凸显字母F。[29]



图2 被非法带入东德的“F行动”宣传资料

F代表着自由（Freiheit）和与体制相敌对（Feindschaft）。这场行动明显取得了巨大成功，F成为了KgU的显著标志，后来经常作为KgU的标志出现在传单上。到了1949年夏秋之季，苏占区很多地方可见字母F，据说个别地方出现得过于集中，以至于自由德国青年团（FDJ）重新动员起粉墙队，在字母D和J旁边补上一个F。[30] 至1949年底，KgU就发出了至少90万份印有F的传单。[31]

后来KgU又采用火箭发送传单。装在火箭里的传单像新年烟花一样被射入很远的高空，然后如雨下落。这些火箭通常先被运到柏林东西占领区交界，然后沾带着西柏林的泥土瓦砾被射向东占区。1950年，萨克森—安哈特州施滕达尔的市中心广场上举办的一次活动就受到了火箭的干扰，瓦尔特·乌布里希还在活动上发表了演讲。[32] KgU安排几个年轻人点火，[33] 火箭越过了苏联兵营。其中装着俄语传单，呼吁苏联的秘密读者们“逃跑！”[34] 或者要求他们投降。

KgU在成立初期和西柏林的一些书店和图书阅览室建立了合作，这

些书店和阅览室的名字大多都额外包含一个“东”字。这段时期KgU还将外来刊物和自己出的刊物一视同仁，后来几乎只散发自己出的刊物。为了招募更多的人参与工作，KgU一直在利用这些书店和阅览室，这里是关心政治和对政治现状不满意的读者常去的地方。很多读者在阅览室里只是阅读或者带走一些在东德被禁止的刊物，与之相比，像约翰·布里亚内克（Johann Burianek）这样的读者可不一般。1952年初的时候，一次布里亚内克想要炸毁东柏林的铁路桥，炸药包事先已经被KgU装在了一个箱子里，结果布里亚内克被捕，在1952年5月的公开审判上被判处死刑，不久便被执行。布里亚内克是一位伞兵中士，一年以前在“电报机”阅览室接触到了KgU，起初为KgU分发传单、越境偷运信件并搜集各种信息，后来又和KgU的其他成员往东柏林的马路上扔轮胎扎钉，又试图纵火但没有得逞。最后布里亚内克在往返于东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官员们经常乘坐的“蓝色快车”上策划了一场暗杀。[35]

东德居民可以在这些书店里也可以通过KgU看到使用圣经纸印刷的西德特版杂志，以及东德政府痛恨的杂志《毒蜘蛛》。[36] 有一段时间KgU还和《月份》杂志建立起了合作，但杂志编辑听说KgU卷入了情报活动后便撤出合作。[37] 书店里有比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伪装本，封面装帧是一本卡尔·马克思的或者关于1848年革命的作品，同样还有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日食》，讲一位前共产党人在苏共“大清洗”背景下与斯大林斗争的故事。这些图书通过各种形式的伪装本得以呈现在读者眼前。KgU“地下室”组织的事件说明了偷运这类刊物是非常危险的。有两名情报人员负责KgU在萨克森、安哈特州蔡茨地区的活动，1951年3月底在从柏林开来的火车上，“M大衣兜里装了8本‘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本反乌托邦小说》，还有大约100张贴纸，在搜身时被发现并没收”。[38] 后来还发现了M用于军事间谍活动[39] 的坦克类型卡片，因此这两名情报人员还有很多其他人受到了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二人由于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死刑，于莫斯科执行。[40]

KgU最初把各种刊物直接交给情报人员分发，火车上的检查越来越严格，因此情报人员时时面临着被发现的危险，后来干脆发放打样机，也就避免了偷运的危险。这样制作出来的刊物不属于萨密兹达，因为KgU事先已经定好了文字内容。除了简单的模板工具，KgU还发放所谓的辊子，还有刻好了简短标语或者字母F的辊筒，必须先上色然后在平面铺开。此外KgU还资助在各地购买打字机的费用。后来KgU给情报人员的宣传材料越来越少，最后于1952年9月通过修改“偷运宣传材料指南”停止了这项工作。[41]

根据KgU1955年年度报告的记录，“KgU主要通过热气球从西德或西柏林向秘密读者们发放刊物宣传信息，包括向一些居民团体发送宣传信件（普通运送），或者向苏占区给个别人士如间谍等发送信件（如警告信，警告实施逮捕或有内奸），还有向苏占区政府监测机构发送干扰信”。[42] KgU“在东西占区交界处有三个放飞热气球的流动站点”。[43] 蒂利希在他的报告中谈到这种飞行物是一种“新型武器”，具体是这样说的：“目前我们还有非常好的办法，就是热气球行动。警察们试图在两区交界击落气球并收集传单，我们的宣传行动丝毫未受影响。”[44]

KgU连续多年一直有针对性地为各种不同人群编辑印制小报，到了1958年初每个月小报发行总量约为20万份。

表**1 KgU**小报一览

报纸名称	出版时间	目标人群
《真相》：东西德的事实报道和观点意见	1951～1959	不限
《战士》：国防类报纸	1956～1959	工人战斗团
《士兵》：国防类报纸	1958/1959	东德国家人民军
《党员》	1957～1959	统一社会党干部
《思想与生活》	1957～1959	高校毕业生
《家庭与学校》：教育类月刊，之后改称《年轻的声音》	1957/1958 1958/1959	父母 青年人
《国际消息》：非法翻印	1958	不限
《自由国家》：面向有自由意识的农民群体	1958/1959	农民

最早使用热气球发放传单的不是KgU，社民党东德办公室很早以前就用过这种办法，后来到了1950年也被KgU所采用。热气球发放传单这门技术最开始并不成熟，然而渐渐发展得很快，到后来可以用来向东德读者超大量输送秘密读物，这门技术在KgU内部也成为了“科研”对象。操作人员对时间控制得越来越精准，保证气球在特定的时间释放传单。如果要将宣传刊物发放到某个特定的目标区域，就要考虑到天气状况、风力大小及风向，比如KgU就曾多次尝试通过热气球将传单发送到国家人民军或者苏联军队的演习场。1955年KgU向东德发送了5283次热气球，A7纸大小的传单共计6599.7万份，平均每个月就有549.9万份传单落入东德。[45] 1957年发送了14473次，传单总计2719.2万份。[46]

KgU在传单上注明要求捡到传单的人向KgU通报拾捡地点，很多人积极响应配合，1957年KgU平均每个月收到150份来自苏占区的反馈。[47] 东德方面不断表示这些大量出现的飞行物引起了众多事故而带来巨大损失，一次引发了森林大火，还有一次甚至导致飞机坠毁。国家安全部因担心热气球确实可能成为祸患，有一次也采取了措施，令人民警察

同Linde公司签署协议，禁止向西柏林各“间谍组织”提供热气球燃气，然而一些人通过其他途径还是搞到了燃气成功放飞气球。[48] 1958年夏天，一名由国安部秘密安排在KgU的工作人员给充热气球的混合燃气做了手脚，导致气球还在西柏林上空时就爆炸了，结果导致一位KgU内部称为气球分队的成员烧伤。[49] 东德媒体言语尖刻地报道了这次事件，并提醒住在附近的西柏林居民热气球行动有多么危险。之后国安部进一步采取手段，试图策划炸弹袭击KgU主要办公大楼，[50] 但KgU在此之前于1959年3月就已自行解散。[51]



图**3** 反对非人道战斗团在东德散发的传单

最后举一个既非正题，也非题外话的事例，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地揭示了东德的秘密读书现象。1954年秋至1956年5月，KgU实施了一场高度保密行动，外人很难猜测其目的何在，从现有资料也看不出这场行动能够实现的背景原因。这场先以“玫瑰”后以“栅栏”为假名的行动，其实

就是指KgU尝试涉足监察无孔不入的地方，同东德各监狱的政治犯[52]建立联系，也就是与人沟通。什么样的人呢，后来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用“异质空间”这一概念将这些人生活的地方描述为严密无缺的审查由设想变为现实的地方。[53]这个听起来超级胆大的行动实行起来却非常简单，KgU首先在人员索引里搜索据他们了解和外部没有联系的囚犯，比如没有亲人朋友或者亲人朋友和他们断绝往来，在东德允许每个月给囚犯寄送食粮，还有出于经济原因家庭支付不起这笔花销的囚犯。寄送食粮需要有监狱开具的包裹许可证，囚犯允许每个月往外寄信，便附带许可证一同寄出，而这张许可证也可能被监狱收回。

有一个人自称现居于西柏林，年龄也比较大，曾经是某位囚犯的狱友，就是KgU想取得联系的一位囚犯，通过这位中间人KgU拿到了需要的包裹许可证。这个人接管了所有的包裹邮寄工作，似乎所有经济拮据的囚犯妻子们都乐于接受这份馈赠。现有资料显示，通过这位叫做“Dietrich Walisko”或是“Lutschak”的中间人，KgU向卢考（勃兰登堡州）、哈雷[54]、比措（梅前州）[55]、托尔高（萨克森州）、瓦尔德海姆（萨克森州）和厄尔斯尼茨（萨克森州）的监狱寄出了至少18个[56]包裹，包岑和勃兰登堡大监狱在资料中没有显示。为了躲避监狱严格的检查，KgU在包裹里的一些食物内藏了东西，一般藏在罐头里。1954年11月的KgU档案有这样一段记录，KgU成功和卢考监狱内一位生于波兰的囚犯取得了联系。

“内容如下：笔藏在下一次包裹的奶酪里，暂时先用细木条写字，用木条在信的背面回信，你可以写波兰语。拿一点盐溶解在水里，把盐水涂在包装油纸上，也可以用盐水写字。如果你能读出所有我写的内容，在下一封信里告诉我，就说你摔掉了一颗牙。”[57]这位囚犯积极地写了回信。1955年1月初KgU又给他寄了个包裹，把之前答应的笔装在了里面。档案中是这样记录的：“油脂里藏了大约1克黄血盐和一张用硫

酸亚铁写的纸条”，写的内容是：“亲爱的约瑟夫，我们焦急地等待你的回信。你们每个月可以往外寄信，就在信的背面回复，如果用液体写太麻烦，就干脆用碎木块，我们会有办法识别出来的。如果给我们回信对于你来说太危险，就给我们找一位你的狱友，并且是我们用同样的方式能联系到的。你可以在信中相应的字母下面用铅笔画一个小点来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反对非人道战斗团祝所有政治犯新的一年重获自由。”还有档案中继续写道：“包裹底部放着1955年1月1号的《波茨坦报》。报纸上没有字的部分用硫酸亚铁写着：政治犯！祝你们新的一年获得自由！用没沾液体的细木条在信的背面回复。KgU［……］约瑟夫没有收到报纸，可能看守警官没看出这是份西德报纸，然后安排下面的人当做一般的包装纸扔了。这样，报纸就落入了任看守助手的囚犯手里，被拿来在整个监狱传看。如果报纸被烧（烧毁报纸也是犯人的工作），看不见的字就显现出来了。”[58]

这封信约瑟夫也回复了，他给了一位狱友的名字，请KgU和他联系，KgU马上照做。此外他还在信中说到谁正在被单独囚禁，提了几个守卫的名字，还有一位自称是间谍的囚犯名字。回信内容有的地方读不出来，但约瑟夫在最后清晰地写道：“祝好，等待你们的帮助。”[59] 没过多久，KgU或者说“Dietrich Walisko”在1955年2月初写了回信：“我建议你们写在信的背面，他们不会那么仔细检查背面。然后用指甲把笔划过的痕迹去掉！”此外还让他们两个人这样回答信中的问题，问题编号后面加上一个+或者o，+代表是，o代表否。前面几个问题涉及各个囚犯的履历，接着KgU想了解是否有哪位上级警官待人“非常恶劣”，是否“一间牢房里关押3个以上的囚犯”，是否有人“发现了西德报纸”，是否能“从信的边缘撕下1厘米”。“Walisko”很想在上面写一些话。另外KgU还表明想要那些“没有人给寄送包裹的囚犯名单”。[60] 档案中对此记录道：“包装纸上用硫酸亚铁写了字，［……］：

政治犯！你们不会被忘记。

自由的世界在记挂着你们。

莫让自己屈服于红色恐怖。

你们的KgU向你们问候，

永远忠诚可靠，团结相依！”[61]

因犯于1955年2月底的回信KgU只能破译出一部分：先告诉“信件收到”，接着以电报文体讲到间谍的事情，说到一名守卫“待人恶劣”，“看守警官总是非常严厉［……］”接着说：“有800人。”KgU无法破译的部分里讲到了“三个麦克风和扬声器”，完全令人费解，接着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去？”最后又写道：“共产党人在这里发生了争吵。咸鲱鱼，西德报纸。苏占区安宁？软弱的读者［……］请求［……］”[62] KgU在1955年3月中旬的回信中这样说：“部分内容读不懂。笔头总被浸湿！请写印刷字体！回答问题的时候用问题编号加上+（表示是）或者o（否）。不能用是或否回答的问题也要标明问题编号，然后作答。

1）你们的牢房里是否关押了3个人以上？

2）你们能从我的信纸下方撕下 1厘米吗？”

接下来是三个关于履历的问题。

6）一名好人看守警官的地址。”[63]

约瑟夫3月底回了信。“亲爱的Dietrich！我在缝纫车间工作。HO衬衫领［……］请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这儿一天变得比一天严格，吃得越来越差。现在这儿什么都成军事化模式了，就连大小便也要听从命令，听看守警官发号施令。［……］我们现在拿到了3根烟。［……］你们知道人民议院的彼得·海尔曼（Peter Heilmann）吗？他现在在这儿。外面苏占区的局势如何？这里俄国军队越来越多。你把信纸下方撕下来了吗，写在页边上！［……］祝好，我们等待着自由。约瑟夫+埃

里希。”[64]

估计从这以后联络就中断了，“Walisko”1955年4月[65]和5月[66]写的信没收到回复。KgU问了一位刚从同一监狱出来的囚犯，也只是听说“审查变得更严了”。[67]几个月之后两人其中一位也是让某个释放出来的狱友告诉KgU“笔墨”殆尽。[68]很可惜从现有资料中无法查到事情后来进展如何。

可以确定的是，KgU至少后来还是和囚犯成功地取得过两次联系，但两次都只是被简单地记录在案，至少和比措监狱的囚犯暂时取得过联系。[69]有一次KgU几经周转终于和哈雷监狱的一位女囚犯取得联系后，1955年5月她的第二封回信中附了一份监狱长下达的说明，告知由于发现部分包裹装的不是食物，所以从1955年7月起每个月不允许再给囚犯寄送包裹，但可以寄25东德马克，这样囚犯就能在监狱里买东西。[70]KgU一名高层领导推断，“［……］对方已经了解了我们到现在一直实行的办法，可以看出这是他们采取的第一步应对措施，应该只是针对我们这一行动。我想大家应该都能想到，这样一来给囚犯们寄的包裹会受到更为严格的检查，所以我希望从现在起全面停止类似的行动。即使行动已稍见成效，囚犯们的处境依然很危险”。[71]尽管如此，这场行动显然又持续了一年之久，没有资料记录这一年的行动情况。KgU的档案中有记录显示直到1956年“‘栅栏’行动才由于某些原因终止，不允许再同囚犯建立联系或保持联系”。[72]

以上讲述的事例说明，1954～1956年KgU还能够成功深入东德理论上全面屏蔽的领域。但即使释放人员带来了好的消息，囚犯们在狱中安然无恙，[73]依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特别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信息极度匮乏以及不成熟的宣传机制能够在少数几个囚犯身上体现出来，那么这场行动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否合理，而尤其是囚犯面临的危险处境又是否存在意义呢。

---

[1] 参阅Finn，Gerhard：*Nichtstun ist Mord.* Bad Münstereifel 2000. Merz，Kai-Uwe：*Kalter Krieg als antikommunistischer Widerstand. Die Kampfgruppe gegen Unmenschlichkeit 1948-1959* . München 1987（Studien zur Zeitgeschichte；34）（以下简称：Kalter Krieg）. Stöver，Bernd：*Die Befreiung vom Kommunismus. Amerikanische Liberation Policy im Kalten Krieg 1947-1991.* Köln u.a.2002（Zeithistorische Studien；22）（以下简称：Befreiung）。

[2] Merz：Kalter Krieg，S.49.

[3] Zu dessen Biografie s.Merz：Kalter Krieg，S.16-18.

[4] 参阅Haigner，Ernst：*Albrecht Haushofer im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Haigner，Ernst；Ihering，Amelie；von Weizsäcker，Carl Friedrich（Hg.）：*Albrecht Haushofer* . Ebenhausen bei München 2002，S.7-99。

[5] Zolling，Hermann；Höhne，Heinz：*Pullach intern. General Gehlen und die Geschichte des Bundesnachrichtendienstes.* Hamburg 1971，S.254.

[6] 勃兰登堡部队是情报部的一个特种部队，在二战时期穿敌人的军装从事敌对破坏活动。参照Günzel，Reinhard；Walther，Wilhelm；Wegener Ulrich K.：*Geheime Krieger. Drei deutsche Kommandoverbände im Bild.* KSK，Brandenburger，GSG 9. Kiel 2006 und Bentzien，Hans：*Division Brandenburg. Die Rangers von Admiral Canaris.* Berlin 2004。

[7] 参阅Meinl，Susanne；Krieger，Dieter：*Der persönliche Weg von Friedrich Wilhelm Heinz. Vom Freikorpskämpfer zum Leiter des Nachrichtendienstes im Bundeskanzleramt* （以下简称：Friedrich Wilhelm Heinz）. In：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1994，S.39-69。

[8] 参阅Meinl，Susanne：*Im Mahlstrom des Kalten Krieges. Friedrich Wilhelm Heinz und die Anfänge der westdeutschen Nachrichtendienste* 1945-1955. In：Krieger，Wolfgang；Weber，Jürgen（Hg.）：*Spionage für den Frieden*？*Nachrichtendienste in Deutschland während des Kalten Krieges* （以下简称：Spionage）。S.55-56.情报局军官Heinz由于柏林封锁而撤出西柏林之后，其常任女秘书继续在KgU工作，因此KgU和情报局得以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Schreiben an KgU，12.5.1952.BArch B 289 OA 508/344.

[9] 对此我要感谢一位KgU前任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

[10] Schreiben Ernst Tillich，18.8.1951.BArch B 289 OA 501/586.

[11] Merz：*Kalter Krieg* ，S.53.

[12] MfS-Sachstandsbericht，17.3.1959.BStU，MfS，HA XX，ZMA 1524，Bl.101.

[13] 参阅Theoharis，Athan：*A Brief History of the CIA* （以下简称：Brief History）. In：Theoharis，Athan，Immermann，Richard（Hg.）：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ecurity under Scrutiny. Westport 2006（Understanding our goverment）（以下简称：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S.17-22。

[14] 参阅Theoharis，Athan：*A Brief History of the CIA* （以下简称：Brief History）. In：Theoharis，Athan，Immermann，Richard（Hg.）：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ecurity under Scrutiny. Westport 2006（Understanding our goverment）（以下简称：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S.21。

[15] Murphy，David E.；Kondrashev，Sergej A.；*Bailey*，*George*：*Battleground Berlin. CIA vs. KGB in the Cold War.* New Haven 1997，S.107f.

[16] 参阅Theoharis：*Brief History* ，S.21 sowie Karabell，Zachary：*Die frühen Jahre der CIA in Deutschland* . In：Krieger；Weber：Spionage，S.75。

[17] Theoharis，Athan：*A New Agency.The Origins and Expansion of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Theoharis；Immermann：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S.156f.

[18] Stöver：*Befreiung* ，S.357.50年代时西柏林存在好几个组织，其目标为推翻东德以及其他东中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体。像俄国团结人士联盟这样的流亡者组织，以及像1952/53年西德禁止的极右德国青年联盟这样的战斗解放组织，都得到了推行自由化政策的美国情报机构的支持。同上各处。

[19] HO（全称为贸易组织）为东德国营零售贸易公司。直到50年代末，东德的食品、汽油和燃煤都要按定量分配，而HO店里的商品无须分配许可证便以高价出售，低收入人群难以支付得起。因此HO商店并不受民众欢迎。

[20] 参阅KgU-V-Mann-Akte “Tal”，BArch B 289 OA 36/3329 und MfS-Untersuchungsvorgang，BStU，MfS，BV Leipzig，AU 39/53。

[21] 轮胎扎钉是一种破坏性工具，由金属制成，顶部为尖状。将扎钉到处投放在大街上，这样过往的汽车轮胎就被扎破。这种破坏性手段最初由美国人在朝鲜战争时使用，美国空军夜里将扎钉投放在朝鲜部队物资运输要道，第二天便可以在空中袭击由于被扎而无法行驶的车辆。参阅Breuer，William B.：*Shadow Warriors.The Covert War in Korea.* New York u.a.1996（Bildteil）。

[22] KgU对此从不承认，但在1951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将数以千计的扎钉分发给其下情报人员，以阻止自由德国青年团的车队前往参加这一共产主义群众节日。西德当局获知此事后也认为KgU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参阅Schreiben des Zentralen Sicherungsstabes des Festivalkomitees für die III. Weltfestspiele der Jugend und Studenten an Sonderbüro beim Stlv. Ministerpräsidenten Ulbricht，3.8.1951.BArch B 137/1016，unpag。

[23] Engelmann，Roger：*Die Kampfgruppe gegen Unmenschlichkeit.* In：Henke，Klaus-Dieter；Steinbach，Peter；Tuchel，Johannes（Hg.）：Widerstand und Opposition in der DDR. Köln u.a.1999（Schriften des Hannah-Arendt-Instituts für Totalitarismusforschung；9），S.183.

[24] 目前我正在写一本书，将于2008年8月出版，书名暂定为《瓦尔特事件或被遗忘的逮捕潮——看东德成立以来受害者最多的逮捕行动》。

[25] 参阅Heitzer，Enrico：*SMT-Verfahr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Kampfgruppe gegen Unmenschlichkeit*（*KgU*）（以下简称：SMT-Verfahren）。In：Bohse，Daniel；Miehe，Lutz（Hg.）：*Sowjetische Militärjustiz in der SBZ und frühen DDR.1945-1955* . Tagungsband，Halle 2007，S.50-73.

[26] 此外，一份1951年3月17日的KgU报告中称莱比锡KgU工作组“Alfred”在各大学和高校散发传单的工作为“瓦解行动”。BArch B 289 VA 63/220-171/1，Bl.1.

[27] Tillich，Ernst：*Psychologische Kriegführung*（以下简称：Kriegführung）. In：Kampfgruppe gegen Unmenschlichkeit（Hg.）：*Der Weg der Kampfgruppe.Berlin*（*West*）.

[28] 1953，S.54-56KgU-Jahresbericht 1955，12.12.1955.BArch B 289/1，Bl.158.

[29] KgU-Presseveröffentlichung：*Das Zeichen des “F”. O.D.*（ca.Oktober/November 1949）.BArch B 289/1，Bl.323f.

[30] 参阅Fricke，Karl Wilhelm；Engelmann，Roger：“Konzentrierte Schläge”. *Staatssicherheitsaktionen und Politische Prozesse in der DDR 1953-1956.* Berlin 1998（Analysen und Dokumente；11），S.83。

[31] 参阅有关KgU的档案记录，未标明日期：BArch ZSg.I-64/26/1，Bl.3。

[32] Schreib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amtdeutsche Fragen，11.6.1951.BArch B 137/1016，unpag.

[33] 参阅例如记录有关反对团体“Rauch”和“Rogge”的KgU-V-Mann档案，这些反对团体比来自哈韦尔河畔韦尔德的青年更有名。一次大规模的逮捕潮之后，8名人士被执行死刑。参照BArch B 289 OA 297/67 sowie Spiegel，Anja：*Die Stasi kam im Morgengrauen. Jugendlicher Widerstand in Werder（Havel）1950 bis 1953.* Werder 2002。

[34] 参阅KgU传单“Won，Iwan aus！”“Won”在俄语中意为“逃跑！”。BArch Zsg.I-64/26/1，Bl.55。

[35] 参阅国家安全部的大规模调查 BStU，MfS，AU 180/52。布里亚内克于2005年9月2日被柏林州法院恢复名誉。

[36] Schulz-Heidorf，Walther：*Preis unbezahlbar. Die Tarantel* . Berlin 1997.

[37] 参照Harold Hurwitz的文章 Zur Bedeutung des *Monat* ：Martin，Marko：*Orwell，Koestler und all die anderen. Melvin J.Lasky und Der Monat* . Asendorf 1999。

[38] Volkspolizeiamt Erfurt：Übergabebeleg 31.3.1951.BStU，MfS，BV Erfurt，AU 125/261，Bl.100.

[39] 该组织小范围地搜集了一些军事信息。

[40] Heitzer：SMT-Verfahren，S.60f.

[41] BArch B 289 OA 0578/560，Bl.3.

[42] KgU-Jahresbericht 1955，12.12.1955.BArch B 289/1，Bl.158.

[43] KgU-Jahresbericht 1955，12.12.1955.BArch B 289/1，Bl.158.

[44] Tillich：Kriegsführung，S.56.

[45] KgU-Jahresbericht 1955，12.12.1955.BArch B 289/1，Bl.158.

[46] Bericht “Effektivität der KgU-Propaganda”，18.2.1958.BArch B 136/4427，Bl.83.

[47] Bericht “Effektivität der KgU-Propaganda”，18.2.1958.BArch B 136/4427，Bl.85.

[48] 参阅Buschfort，Wolfgang：*Luftballons als Feindobjekte* . In：Deutschland-Archiv 3/1994，S.276-279 und ders.：Die Ostbüros der Parteien in den

50er Jahren. In：Foitzik，Jan；Buschfort，Wolfgang（Hg.）：*Der sowjetische Terrorapparat in Deutschland. Wirkung und Wirklichkeit/Die Ostbüros der Parteien in den fünfzigen Jahren.* Berlin 2000（Schriftenreihe des Berliner Landesbeauftragten für die Unterlagen des Staatssicherheitsdienstes der ehemaligen DDR；7），S.44-47。

[49] MfS-Aufarbeitung “Die Methoden des MfS bei der Zerschlagung der Agenten-und Untergrundorganisation Kampfgruppe gegen Unmenschlichkeit in Berlin-Nikolassee，Ernst-Ring-Str.2-4”，1.6.1959.BStU，MfS，ZMA XX 1524，Bl.52.

[50] MfS-Treffbericht，11.4.1958.BStU，MfS，AIM 2703/58 Teil I，Bd.20，Bl.78.

[51] 同样被归为“间谍组织”的由俄国流亡者组成的反共组织NTS（民族工作联盟）就没那么幸运了，国安部1958年制造了一起炸弹袭击，击毁了该组织位于慕尼黑的“自由俄国”广播电台大楼。参阅Labrenz-Weiβ，Hanna：*Anatomie der Staatssicherheit.* Die Hauptabteilung II：Spionageabwehr，20012（MfS-Handbuch；III/7），S.37。

[52] 其中有一位在哈雷服刑的女囚犯，曾经为一所美国情报机构工作（KgU-Vermerk，17.3.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49）。资料显示KgU与她成功取得联系之后似乎联络又中断了。还有一位因1953年6月17日那天携带武器朝警察开枪而被拘禁的囚犯并没有给KgU回信（KgU-Vermerk，17.3.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21）。

[53] 参照Foucault，Michel：*Andere Räume.* In：Hämer，Hardt-Waltherr；Kleihues，Josef Paul（Hg.）：Idee-Prozeβ-Ergebnis.Berlin 1987，S.337-340。

[54] KgU-Vermerk，20.5.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64.

[55] KgU-Vermerk，20.5.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64.

[56] 1954年11月至少寄了一个包裹，1955年1月至少两个，二月三个，三月三个，四月五个，五月两个，六月两个。

[57] KgU-Vermerk “Paket an Luckau I am 10.11.1954”，o.D.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26。

[58] Vermerk，7.1.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29。

[59] Vermerk，21.1.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32。

[60] Vermerk，4.2.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33。

[61] Vermerk，4.2.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33。

[62] Vermerk，25.2.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35。

[63] Vermerk，o.D.记录这封信写于1955年3月15日。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36。

[64] Vermerk，26.3.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38。

[65] Vermerk，5.4.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39。

[66] Abschrift，12.5.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40。

[67] Schreiben an KgU，27.5.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42。

[68] Vermerk，8.3.1953.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20。

[69] 根据1955年5月20日的记录。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64。

[70] Vermerk，o.D.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63。

[71] Vermerk，29.4.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172。

[72] Vermerk，24.5.1956.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1。

[73] Vermerk，20.5.1955.BArch B 289 SA 500/22-31/15，Bl.64。

一种“现象”被揭穿

——西德早期的反东德刊物

克劳斯·克尔纳（Klaus Körner）

1951年1月18日，来自东柏林的文学家阿尔弗雷德·坎通罗维茨（Alfred Kantorowicz）给建设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修改一下他新版的《西班牙日记》：“对这本书的再版请注意，22页提到的名字Campesino继续保留。”[1] El Campesino[2] 是西班牙内战共和派的传奇将军瓦伦汀·贡萨雷斯（Valetin Gonzales）的战斗名，而后来贡萨雷斯对苏联感到失望，刚刚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伟大的幻觉：从马德里到莫斯科》。一位在西班牙之外远远不知名的作者，作品能几乎同时以西班牙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四种语言出版，就足以让人猜测到美国情报局作为文学经纪人参与了进来。[3] 科隆的基朋霍伊尔&维奇（Kiepenheuer & Witsch）出版社特别出版了德语译本，也随之在1950年底推出系列丛书《红色白皮书》。这本也要在东德推广的作品，坎通罗维茨是第一批读者之一。他以东德普遍认可的态度在信中表明了想法。异见人士被当做没落人士看待，他们的名字不允许再出现在历史著作中。不受欢迎而遭到排斥的事件成了历史地图册上无人过问的“空白点”，西德宣传可以毫不费力地穿入这些“软肋”之处。

东德是一块供应不足又封闭的言论市场，如果能够打破外部界限，就会对内部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相反西德是一块供应过剩又开放的言论市场，东德刊物很容易在此得到传播，但很少受到关注。从1950年起，东德方面开始公开谴责各西方势力通过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占领法规、鲁尔协定和马歇尔计划对西德的控制和扶持，号召全民起来反抗，这是一种由国家推动的人民阵线宣传形式，由德国共产党的传奇人

物宣传总指挥威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在魏玛共和国结束之时以及在他30年代的流亡生涯中推进而形成的。

相反，任何占领文件或占领法规对此都无济于事。现在西德人民应该富有战斗性地在冷战中采取立场。但是对手是什么人呢？东德声称自己是德国反法西斯的和平国家，是全德国的典范。与东德宣传的表象相反，在大多数西德民众眼中，就像苏联外交家彼得·阿布拉希莫夫（Pjotr Abrassimow）1990年后说的那样，东德首先就是苏联式的小矮人。苏联政府对东德的巨大影响以及东德缺少大多数民众的统一意见是有目共睹的。由于东德民主合法性的缺失，波恩政府决定不予承认这个第二德国，而称之为“苏联占领区”，简称“苏占区”。全德事务部制订了相应的称谓规定[4]，西德政府直到1969年一直要求独自代表整个德国。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这个国家在得到国际上承认之前就已经具有一定的“限制行为能力”，所以西德总理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1967年在国会上略带勉强地称东德为一种“现象”，并且和东德总理建立了通信往来。[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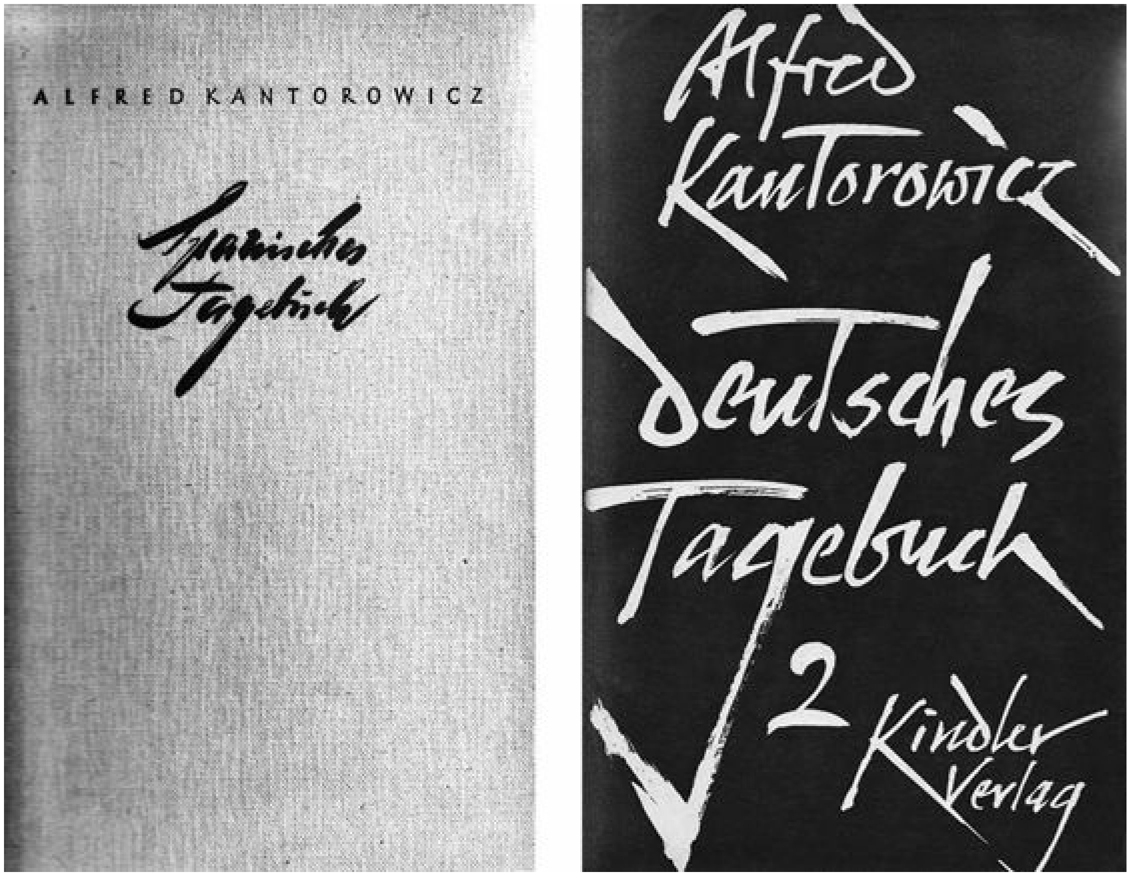


图**1** 阿尔弗雷德·坎通罗维茨两部作品的首版：**1948**年建设出版社与**1961**年金德勒（**Kindler**）出版社

1950年时西德政府还在忙于迁往波恩并成立各个政府部门，无暇顾及向苏占区，或称“这种现象”或者还有第三种称谓“德国另一部分”施加影响以及抵御东德对西德的宣传。[6] 因此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公署、美国情报局以及负责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合作总署首先投身于这些任务，并且试图塑造东德在西德民众眼中的形象。

1945年后英美的“再教育”政策没有立刻收获成效，1949年后被长期的“再导向”政策代替。如果对西德和苏占区的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并起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最简单的方法是以他们共同的经历为出发点。大多数德国人感受到的1945年5月8日首先是崩溃垮台，过了很久才感受到了解放的日子，苏联红军入侵、被俘监禁、驱逐逃亡以及物资紧缺，种

种鲜活的回忆奠定了这段时期的基调。经历了战争和纳粹宣传，大多数德国民众都持有一种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世界观。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在俄国、德国也在欧洲其他地方从民众中形成的布尔什维主义，为纳粹所用并插上了反犹太主义的旗帜，将重新激活反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政治宣传的基本理念。戈培尔领导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一位前任部门领导埃伯哈德·陶伯特（Eberhard Taubert）[7] 1948年称反布尔什维主义首先造就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一种尤其源自于苏联的恐惧感，并赞扬反布尔什维主义在美国情报局行之有效并且树立了典范。苏联被一个配有集中营和警察特工的独裁体制统治着，其经济体制带来的是贫穷和灾难，教会受到迫害，基督教文化被玷污。反布尔什维主义不是一种理论构想，而是一种宣传理念，很容易应用于各种展览、广告、宣传册以及战争宣传的实践当中。

第二种向德国民众宣传教育的方法是针对共产主义的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证。社民党从1946年起开始了一场积极的防卫战，反对在苏占区强制合并社民党和共产党。社民党在政府有其参与的地方始终带领着走一条实践道路，然而还持有一套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方案，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应该通过信仰民主、议会制和人权从根本上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相区分。此外，从社会民主的角度来看，德国共产党是魏玛共和国的掘墓人之一。1946年诞生的统一社会党用社民党主席库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的话来说只是德国共产党的延续，社民党应该作为德国共产党的献血者为其服务。为和统一社会党抗衡，社民党1946年特意成立了东德办公室。1948～1949年苏联对柏林封锁时期，西方势力同柏林市长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人紧密合作，而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于1949年9月新组建的政府受到了保守党派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在高级专员约翰·J.麦克罗伊（John J.McCloy）领导下的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公署表态，处理西德内部事务首先采取传统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波恩路线”），以社会民主式的反共产主义（“科隆—柏林路线”）对东德施加影响。新成立的全德事

务部也了解到了这种双重策略，当时全德事务部实际上由国务秘书弗朗茨·特迪克（Franz Thedieck）领导，而非部长雅各布·凯萨（Jakob Kaiser）。从此以后，波恩在反共产主义事务上出现了一种大联盟。

埃伯哈德·陶伯特代表的是“波恩路线”。1945年后陶伯特在汉堡把以前的同事叫到一起，其中有防卫反击专家弗里茨·克莱姆（Fritz Cramer）、图书出版商本哈德·沃伊施尼克（Bernhard Woischnik）还有图像设计师鲁道夫·福斯特（Rudolf Fust），1950年几个人作为核心成员成立了和平与自由人民联盟。和名称相背，这是一个由美国提供资金支持的政治宣传代理机构。陶伯特的宣传理念就是把共产主义的宣传文化扭转过来为反共产主义服务。二战后，东德农田中出现大量有害的马铃薯瓢虫，东德政府借机鼓吹这些马铃薯瓢虫在美国繁殖，然后美国人特意通过飞机大量投放到东德，为此东德政府1950年夏出了一本宣传册叫做《停，老美瓢虫！》陶伯特在第一批防卫海报中是这样反击的：一个男人穿着高翻领大衣，望着火车站月台上“停”的信号，还附上一句话“阻止共产主义破坏者。火车站的安全就是你的生命安全！”1950年秋西柏林广播电视塔的会展大厅举办文化展览“东德的德国家园”，后来在西德各州举办。展览上分发了陶伯特设计的宣传册《红色洪水：苏占区布尔什维化的事实与数据》，该宣传册指出共产主义统治着地球上的六分之一人口，为此还刊登了一幅20年代的旧图片。

还有一个例子，幽默讽刺杂志《厄伦施皮格》的前身《清风》杂志1951年登了一幅画，东德与西德的边界被画成一堵防洪墙，将西德入侵者弹了回去。防洪闸门通过一道隔板被锁了起来，隔板上写着标题“五年计划条例”。接着陶伯特推出的一本反对两德之间非法交易的宣传册将当时还是绿色边界的东西德交界也画成了一堵防洪墙，通过防洪闸门钢铁制品被倒卖到东德，红色老鼠流窜到了西德。陶伯特用这幅图引用了一个他1941年在纳粹煽动电影《永远的犹太人》中用到的比喻。[8] 柏林市长费迪南德·弗里登斯伯格（Ferdinand Friedensburg）的前任助理罗

尔夫·麦（Rolf May）对此回忆道：“苏联红军出现在柏林，不是因为自然界引发的洪水，而是因为一场德国人引发并且输掉的侵略战争，这让苏联检查官们非常愤怒。”[9]



图**2** 冷战时期的**“**老鼠大战**”**：西德和东德的海报

左图这张反共产主义渗透的小海报边框为黑红黄三色，画了一只死老鼠，上面写着“老鼠大战是全民义务”。这张海报首先由鲁道夫·福斯特（Rudolf Fust）在汉堡绘制，又在西柏林由讽刺杂志《毒蜘蛛》的图像设计师格哈德·鲁皮克（Gerhard Ruppik）临摹，西柏林的反对非人道战斗团（KgU）要将这张海报贴到各个灯柱上。[10] 还有1951年的一本以反对所谓的伪装组织为宗旨的小册子，为警示读者刊登了一篇文章《睁开眼睛！共产主义藏在后面》，要求读者踩死被称为昆虫的共产主义间谍。

然而1953年后，欧洲的政治气氛开始发生变化。1955年美苏日内瓦

峰会至少使气氛得到了一定的缓和，这对波恩政府构成了新的威胁，因为波恩政府需要“红色危险”作为新一轮武装计划的理由。由美方资助的讽刺杂志《毒蜘蛛》的工作人员在波恩政府的委托下，假装以柏林策伦多夫行政区政治工作小组的身份，推出图文宣传册《步枪与士兵》，严厉斥责东德人民警察的秘密武装，揭开东德作为警察国家的真面目，以间接的方式声称西德必须建立武装。和平与自由人民联盟，还有西德为国防宣传成立的组织民主团体共同工作组分发了这些宣传册。[11] 还有一本反东德刊物叫做《被揭穿的共产主义》，封面画是微笑着的斯大林继承人格奥尔基·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w）戴的浅色面具掉了下来，后面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粗暴的红色面孔。在和共产主义、苏联、东德以及德国共产党的总清算背后隐藏的是一种为即将出台的德国共产党禁令进行的间接辩护，禁令于1956年8月17日颁布。1957年该刊物第二版题为《他们自己揭下了面具！》，标题透露出了1956年秋匈牙利起义被苏联武装镇压。

陶伯特推出的刊物中总能看到掉下来的面具揭穿了某些人物，红星被打碎，红军战士强暴德国妇女，国安部走狗囚禁德国男子。这种“论战”方式和图文并茂的手法为全德事务部后来推出的一系列刊物所采用，比如《在死亡的区域》《假象和真实：“东德”宪法及其背后隐藏的秘密》《柏林苏占区所谓的世界青年戏剧》《红光下的国家人民军》《德国经济的苏联之手》《苏占区农业苏联化》《去往苏联集体农庄的路上》《斯大林手下的德国儿童》，还有《学习，学习，学习——向莫斯科学习，为莫斯科学习》，甚至还有一本刊物这样为德国的森林冠名：《苏联化森林：乱砍滥伐与无能为力》。

1951年西德新闻局的一份报告《六年过后：从混乱无章到定国安邦》在谈到东柏林时这样写道：“从前是城堡后来是废墟的不毛之地必然成为了空虚的象征，这种空虚从波茨坦广场和勃兰登堡门开始，径直通向了《远方的东德》。”[12] 这里又引用了戈培尔“亚洲荒原”的比喻。

斯大林通过驱逐东德人“将布尔什维主义的进攻线又远远向前推到了旧欧洲的心脏，因此下一次进攻基本胜券在握”。

事实上直到1952年苏联都重视不将东德的发展视为不可逆转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至少理论上为统一留出一条后路的问题。被“苏联化”的东德持有的理念与波恩政府要求立刻举行的以“在和平与自由中统一”为目标的全德自由大选并不一致。为波恩政府服务的杂志《毒蜘蛛》在西柏林大量印制多达30万册，然后被送往东德。杂志的图像设计师格哈德·鲁皮克承认说：“文章全是发自内心的鼓吹和煽动。主编海因茨·文策尔（Heinz Wenzel）（笔名Heinrich Bär）总是拒绝使用更明智的表达手法。”

曾任全德事务部国务秘书的特迪克1983年评价反共产主义刊物时说道：“现在我也不喜欢这些东西，但当时的时代不一样，到处充斥着冷战，和另一边肆无忌惮的作为相比，我们显得更加小心谨慎了。”[13] 后来这类战斗型刊物也有了一个术语名称叫做“防卫宣传册”。

一位“罗特道恩（Rotdorn）女士”[14] 用邮政专用地址从法兰克福寄出了一份黑名单，这份标注了所谓西德斯大林主义者和间谍的名单是无法控告的。但如果有人因陶伯特编辑的刊物中被提及姓名而感到被侮辱，可以控告全德事务部。同时担任社民党国会议员和全德委员会主席的赫伯特·魏纳（Herbert Wehner）认为这种鼓吹宣传百害而无一利，并且在国会中表达了意见，主张通过社民党和工会组织的工人运动来与共产党人士展开实际较量。[15] 魏纳在最初的几年也推动了社民党东德办公室的工作。

社民党东德办公室由向东德遭迫害的社会民主党人提供帮助的慈善机构、在东德设立的情报机构以及西德的反东德宣传机构组成。[16] 工作包括编辑出版《SoPaDe意见书》，收集了社民党流亡组织对东德的意见评价。为在东西德边境工作的西德人提供社会福利保障，拥有一批

通常能立刻从西柏林去往东德的信使团队，然后各种调查结果经社民党驻东德新闻处发布。此外该办公室自1946年起还在东德大量分发传单和宣传手册，有针对社会主义学者的理论杂志《统一》，有针对工人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和德国工会联合会东德办公室合办的《讲坛》，与长期由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负责编辑出版的东德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同名刊物对立。这些小型刊物始终宣传东德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的是对工人的压迫。最引起轰动的事件是反对东德国营企业集体合同的斗争。这种特殊的合同里写入了一些由技术性论据支撑的规定，实际上将计时工资过渡到了计件工资。对此社民党东德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德国工会联合会的官员以及美占区广播电台的记者们紧密合作，给出一些切实的建议，在不因被怀疑为西德间谍而遭到谴责的前提下，如何在企业大会上抗议签订这种工作合同。[17] 办公室除了散发大量传单，也宣传推广一些书籍，比如科隆的基朋霍伊尔&维奇出版社的《红色白皮书》。社民党既不希望东德办公室受制于美国情报局也不希望受制于全德事务部，因此渐渐成立了一些中间性机构，如位于科隆的德国统一出版中心（以下简称出版中心），其在柏林的分支机构为KgU。

出版中心在柏林宣传推广了马蒂亚斯·瓦尔登（Matthias Walden）的《两种德国：为布尔什维化服务的语言》以及揭露东德出版界（内幕）的《为布尔什维化服务的出版界》，其封面标题为《和平斗争中的德国民主出版界》。在科隆编辑出版的杂志《出版中心档案》是后来《苏占区档案》或者也称《德国档案》的前身。《红色白皮书》的一些作者来自KgU的工作团队。[18] 1950年时，曾以“自由德国青年团攻占柏林”为口号为青年聚会做宣传的东德自由德国青年团是西柏林民众的对立势力，但又不敌西柏林民众。一位来自KgU的杂志作者格尔德·弗里德里希·格明德尔（Gerd Friedrich Gminder）是一名建筑师，用笔名格尔德·弗里德里希写了一本书《自由德国青年团：德国共产主义突击队》，该书的宣传标语就已经显示出这个青年组织“对于西德”的危害性所在。除

了基朋霍伊尔&维奇出版社原版的亚麻布面装订本还有纸板装订版，为全德事务部出的特版，纳入《红色白皮书》系列的一版以及给自由德国青年团的特版。用于在东德推广的版本采用“灰色办法”伪装：副标题和宣传标语被略去或者换成一个中立性的标题。给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是小型版本，封面是其代表色蓝色。格尔德-弗里德里希还写了一本反对东德文化联盟的战斗性刊物，还有同KgU的创建者海因里希·冯楚伦（Heinrich von zur Mühlen）合著的《潘科的苏维埃共和国与西德》，当时民众都认为东德文化联盟对于在西德开展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还有由质量参差不齐的纪实作品和曾经的共产主义家回忆录组成的系列丛书，其中有一本反共产主义声明《什么都不是的上帝》。最成功的一本书是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t）的自传《革命舍弃了自己的孩子》。全德事务部的有关人员首先认为，这本书内容包括讲述共产国际学校的校园时光、逃离苏占区以及对统一社会党专制政策的怀疑，没有什么新的引起轰动的内容，并且作者更多地在以列宁主义者的身份讲述，因此只有全德事务部才有可能批量购买这本书。但国务秘书决定，应由社民党东德办公室出一本特版然后加以推广。社民党东德办公室出版了该书的删节版，封面根据“灰色办法”被改了很多次：其中一个版本的封面标题为《瓦尔特·乌布里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还有的叫《斯大林——生活简述》、《N.S.赫鲁晓夫：第二十次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和《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鉴于哈里希（Harich）和扬卡（Janka）在东德法庭上的争端，社民党东德办公室编辑出版了“哈里希平台”，后来又出版了本没有的一场辩护词，写得激昂热烈。轰动效应最大的出版物是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第20次党代会上的秘密讲话。讲话内容被一位波兰共产党官员透露给了美国情报局，6月由美国国务院出版，首先刊登在了《纽约时报》。统一社会党党员们虽然也在各种封闭会议上了解了这个讲话内容，但没有产生很大反响，大家希望能够从社民党东德办公室或者西柏林各家日报上看到讲话原文。[19]

由于传播反共产主义、反苏联或者反东德的文字违反东德刑法，社民党东德办公室想出了各种伪装办法。一字不差的“白色办法”给传播者和读者都带来了风险，经常使用的“灰色办法”是遮掩文字出处，这样读者就可以辩解称第一眼没有看出是危害国家的文字。很少使用的“黑色办法”给人造成一种感觉，文字是出自自家的阵营。比如1953年5月西柏林行动小组B就分发了所谓的1952年才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演讲内容，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德国式道路，实际上是题目经略微修改过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安东·阿克曼（Anton Ackermann）1946年初发表的著名文章《有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德国式道路吗？》，阿克曼1948年又不得不撤回文章中的观点。但“黑色办法”更多地起到迷惑的作用，而非政治宣传教育，因此很少使用。1978年时，东德当局认为所谓的《东德反对派明镜宣言》为西德情报机构的黑色宣传刊物而试图销毁。

如果想以最简便的方式向东德传播大量文字制品，除了在占领区交界处实地发放还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各种传单小册子必须缩小成明信片的规格，不能重于20克，并且要使用伪造的东德邮票和东德寄件人，贴好邮票后投到东柏林的邮筒或者从西德寄出。

需要到西柏林取的信件必须足够小到可以装进衣服口袋，以免过边境检查时一眼就引起注意。由于大批人员在东德遭到逮捕并判刑，社民党自1952年起越来越多地采用热气球发送传单小册子，并且使用的是配备了闹钟的气象气球，将大针换成一把小刀，气球到达目的地后可以切断一根线，各种传单便如雨下落。[20]

“联邦国防军心理战斗队”（PSK）从1962年起开始使用这种方法向东德发送图书报纸，有《东德工人报》《国家人民军》，还有缩小成袖珍日记本大小的纪实作品如卡罗拉·斯特恩（Carola Stern）的《乌布里希》、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的《我承认》、亚历山大·索尔仁尼

琴（Alexander Solschenizyn）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叶夫格尼娅·金斯堡（Jewgenija S.Ginsburg）的《生活的行军路线》。因为也有航空公司以这种方式分发香烟，所以这些刊物先被封入西德香烟使用的包装再发送，这样，在外收集刊物的行为就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其中最实用的一本刊物应该是一本应用指南，教人们如何在边界开枪，又不击中难民。PSK发放的刊物版权页上写的是假地址，读者们按照这个地址寄风景明信片过去，标注的寄件人信息也是假的，这样便可以了解刊物的发放接收情况。来自东德的各种反馈信息很好地证明了这些刊物确实得以传播推广，国会国防委员会甚至批准PSK拥有一家自己的四色版印刷所。[21]

虽然陶伯特已于1955年下台，之后1959～1970年都在国外，已经与此无任何瓜葛，却依然被指为PSK的精神顾问而受到来自东德方面的攻击。

“波恩新闻办公室”是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一个下属机构，长年担任办公室主任的塞巴斯蒂安·廖什（Sebastian Losch）不希望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所有刊物都笼罩在东德对陶伯特50年代宣传刊物的批判之下，他说道：“我也来自这个宣传部委，我不想看见这类文字，我们想进行客观的宣传教育，而非‘鼓吹煽动’。”[22] 因此1951年后，部委里的一部分出版任务由波恩新闻办公室接管，或者出版物贴上“德国联邦出版社”的标签。该出版社最有名的一本刊物为工具书《苏占区A-Z》，从1951年至1969年间共出版了9次，后来《东德手册》在这本书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来自中德和东德的波恩新闻》收集了一些专家对东德局势的分析，内容并非完全中立。廖什作为《波恩新闻》系列的策划，将从萨勒河畔的哈雷转到了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著名图章刻印师赫伯特·波斯特（Herbert Post）教授请来一同合作。

热气球的方式并不能保证刊物准确落入目的地，从而导致大量刊物

流失，因此“波恩新闻办公室”改发折叠卡片和定购卡片，并附上简短的说明。由一名来自汉诺威名为哈拉尔德·克里克（Harald Krieg）（笔名Hans Schütze）的教育参议撰写的合集《来自苏联和苏占区的语录》，还有廖什写的一本应用指南《与共产主义者的对话？》为50年代经常出现的与自由德国青年团代表团的各种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

到了50年代下旬，为了对东德工人阶级起到宣传教育作用，“波恩新闻办公室”进行了全新的尝试，以流行小说的形式出版了所谓的来自东德的权威消息：《“我”系列》下面包含《我乘上“ROS127”》《我——全职母亲》《我在皮克面前持枪致敬》以及《我为和平开枪》。这一系列刊物经大量印刷，每天下班之际被放置在联邦铁路公司。

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也编辑出版了一些白皮书和文献资料，比如关于东德大选（《苏占区10月15日大选舞弊事件》）、波恩政府努力推动全德大选、财产没收、边境封锁措施、农业集体化或者不法行径实录等。本来计划出版一套东德政治压迫实录，而1962年只出版了由记者卡尔·威廉·弗里克（Karl Wilhelm Fricke）撰写的《国家安全部——德国苏占区的政治迫害工具》。此外，德国统一科研顾问组出版了大量经济学研究刊物。

除了推出自己的刊物，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还按照自身要求大批购买一些个体出版社的刊物，首先有基朋霍伊尔&维奇（Kiepenheuer & Witsch）出版社，后来还有贝伦德·冯·诺特贝克（Berend von Nottbeck）出版社，然后贴上“联邦全德事务部敬献”的标签。

联邦总理府的国务秘书奥拓·伦茨（Otto Lenz）1953年时计划将各部委的新闻处合并，组建一个新的“宣传部”，遭到了特迪克的反对。特迪克在一本仅以胶版印刷发行的备忘录《全德事务部的出版工作》中强调指出，全德事务部的出版物具有很重要的意义。1983年，特迪克回顾他的工作时表示反对全德事务部在宣传手册要务上的做法，说道：“什

么，我们努力做的各种事情有80%或90%都和出版物没有任何关系。”

1958年底，苏联单方面向英美法三国发出照会，要求三国6个月内撤出西柏林的驻军，于是引发了新一轮柏林危机。之前经常被预言的东德倒台显然已不符合大势所趋，两德统一构想失败，保证西柏林自由已经是当局的至高目标。首先西柏林大约50个负责搜集东德消息并在东德传播攻击性刊物的机构无法继续工作，全德事务部基本不再出版攻击性刊物。社民党东德办公室1966年被迫终止各种与东德有关的活动，并于1971年解散。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欧洲中部不会再发生有决定性影响的战争，而柏林墙的建立更加巩固了分裂的现状。因此波恩政府不得不定下更细小的目标，比如改善去往西柏林的交通渠道，扩大同东德的贸易往来，从东德赎回罪犯，等等。全德事务部新任部长雷纳·巴泽尔（Rainer Barzel）1962年起将这些目标视作自己的工作任务。1966～1969年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联合执政时期，任全德事务部部长的赫伯特·魏纳努力重新调整政策，同东德的政治抗衡应尽可能做到从实际出发，保持客观，为此两德之间需要寻求具有可行性的合作领域。此外还要重新调整东德研究的策略和方向，今后应该将东德固有的社会制度下变革的可能性作为东德研究的出发点。1967年秋一次德国研究大会上，与会人员对这一新研究方向展开讨论并广泛表示接受。

差不多从1963年起东德文学得到了新的评价，东德文学家早先还被视作“共产党人中的特洛伊木马”，现在被视为东德新形势的真正代表。[23] 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为他在《时代周报》上发表过的评论合集取名为《小步文学》。在西德特许出版的赫尔曼·康德（Hermann Kant）的小说《礼堂》几乎全被全德事务部买下，因为莱希-拉尼茨基对这本书的正面评价可以说为全新的、有启发性并且值得一读的东德文学带来了品质保证。[24]

如果评价一下1967～1989年所谓的在固有社会制度下东德研究以及

东西两德对比研究的结果，那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今天的后续研究趋向于早年的原教旨主义，是否政策上的变化以及政策的推动作用也深深影响着研究上的变化。

---

[1] Faber，Elmar；Wurm，Carsten（Hg.）：*“...und leiser Jubel zöge ein”. Autoren-und Verlegerbriefe 1950-1959* . Berlin 1992，S.202-203.

[2] 西班牙语，意为农民。——译者注

[3]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and World Communism.A Selected，annotated Bibliography* . Princeton，N.J.1965，S.588.

[4] Rüβ，Gisela：*Anatomie einer politischen Verwaltung* . München 1973，S.158-160.

[5]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 Sten.Berichte V，S.6360.

[6] Nolte，Ernst：*Deutschland und der kalte Krieg.* München 1976，S.396-402.

[7] 1933～1945年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高级官员，1945年后在西德情报局从事反对苏联宣传的活动。——译者注

[8] Körner，Klaus：*Erst in Goebbels’-dann in Adenauers Diensten*：*Dr. Eberhard Taubert* . In：Die Zeit，26.8.1990.

[9] 1976年8月28日与罗尔夫·麦博士的访谈。

[10] 格哈德·鲁皮克先生于1995年9月20日讲述。

[11] Jahn，Hans-Edgar：*Für und gegen den Wehrbeitrag.Argumente und Dokumente* . Köln 1957，S.180-181.

[12] Hervorh. D.Verfassers. Presse-u.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mit einem Geleitwort von Bundeskanzler Dr.Adenauer（Hg.）：*Sechs Jahre danach. Vom Chaos zum Staat* . Wiesbaden 1951，S.129.

[13] 1983年7月19日与国务秘书弗朗茨·特迪克的访谈。

[14] Schaefer，Hermann（笔名 Hans-Georg Hermann）：*Verraten und verkauft* . 2.Aufl.，Fulda 1959，S.107。

[15]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Sten.Berichte I，S.4976-4979.

[16] Buschfort，Wolfgang：*Parteien im Kalten Krieg. Die Ostbüros von SPD，CDU und FDP* . Berlin 2000，S.29-51.

[17] 1979年11月20日与雷纳·希尔德布兰特博士的访谈。

[18] Rohrwasser，Michael：*Der Stalinismus und die Renegaten* . Stuttgart 1991，S.11-12. Roth，Karl Heinz：*Invasionsziel*：*DDR. Vom Kalten Krieg zur Neuen Ostpolitik* . Hamburg 1971，S.85-114.

[19] Peter，Karl Heinrich（Hg.）：*Reden*，*die die Welt bewegten* . Stuttgart 1959，S.502-542.

[20] Bärwald，Helmut：*Das Ostbüro der SPD* . Krefeld 1991，S.60f.

[21] Karl Heukelum高级军官于1990年1月10日讲述。

[22] 1989年5月18日与塞巴斯蒂安·廖什先生的访谈。

[23] Richter，Karl：*Die trojanische Herde* . Köln 1959.

[24] 1998年8月17日与赫尔曼·康德先生的访谈。

“低俗之作”令人身不由己

——我的奥威尔

巴德尔·哈泽（Baldur Haase）

在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沃勒（Stefan Wolle）的著作《专制独裁的完好世界》（*Die heile Welt der Diktatur* ）中，一篇题为“东德图书审查与‘残酷的焚书’”的文章里这样写道：“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尤其将印刷物视为危险品。对‘黑色艺术’走火入魔般的崇拜明显具有返祖性特征。”[1]

“残酷的焚书”真的在东德历史上存在过吗？是的，存在过。

位于萨勒河畔的哈雷检察院1960年6月10日出具了一份图书销毁报告书，37本在西德出版然后被非法带入东德的出版物，也就是所谓的煽动性刊物，成了牺牲品，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 ）和斯蒂芬·茨威格的《奇妙之夜》（*Phantastische Nacht* ）。

哈雷大学哲学院学生海因里希·布罗贝纳（Heinrich Blobner）到西德看望他的哥哥回来后，将这些“煽动性刊物”带到了东德。东柏林德国当代史学院的讲师福尔希曼（Forchmann）先生受哈雷区级检察院的委托，为此写了一份鉴定：“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些西德出版物的作者很可能是名家，绝对应当引起重视，原则上这些出版物不能为东德公民个人收藏。”[2] 海因里希·布罗贝纳由于出卖国家1958年9月15日被哈雷区级法院判处7年监禁，其中携带禁书也是一项控告理由，量刑时被考虑在内。我要谢谢布罗贝纳先生允许我公开讲述并写下他的经历。我认为他的事情值得一提，因为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有着类似的经历。

我1939年生于现捷克境内的波西米亚巨人山脉一带，后来全家被驱逐出境，我在德国图林根州的萨尔费尔德市镇长大。我父母在他们有限的业余时间里都喜欢读书，很早就激发了我对书籍的热爱，所以1955年时我决定为日后从业学习胶版印刷技术。除了读书我也喜欢写作，1957年夏天我给博登湖的康斯坦茨一家出版社写信，想尝试投递我的文学作品，我太大意了，想的不够周到，忘了用个西德的假地址，而在信封上写下了我平时的通信地址。“因为有打算移居到西德，所以我住在东德不会有影响。”我没收到答复，因为我的信从来就没送到过。1993年我在我的国安部档案里发现了这封信，原封不动。[3] 很显然，信被没收了，也因为这封信从那时起我更加引起了国安部的注意。

1958年春，我在图林根州的埃尔福特结识了一位西德青年，是我的笔友。他叫雷纳（Rainer），住在鲁尔区的杜伊斯堡。我们不仅通信，后来还互相交换一些图书和宣传册。1958年6月初，邮递员给我送来一个从西德寄来的包裹，我很好奇地打开一看是雷纳寄来的。里面用牛皮纸包着一本书：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本反乌托邦小说》，1957年出版。封面上是一块灰色地带，荒无人烟，看了让人心生厌恶，还有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I love you”，可能是一本有关爱情故事的书。我来自乡村，青春期来得迟了些，还没有完全从第一次痛苦的恋爱失败经历中走出来，所以我相信会在书中找到患难之交，后来甚至还真得到了印证。

我从未听说过乔治·奥威尔，也没读过他的作品。这本书的后记是一位叫做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人写的，这个人我也没听说过，从短短的后记中除了一些简单介绍奥威尔生平的信息，我只了解到他生于1903年逝于1950年。30年以后统一社会党专政走向灭亡，我才有机会更进一步研究这位作者的传记和文学著作，然后我知道，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寓言式讽刺小说《动物庄园》和小说《1984》从50年代初开始就尤其在东德大学生和学术圈里成了秘籍，大家都在偷偷地互相传

阅。[4] 因为我和这个圈子里的人没有接触，所以对于我来说乔治·奥威尔的面纱依然无法揭开。怎么才能了解到他的信息，去哪儿了解呢？官方渠道是根本行不通的！到了1958年我还是一无所获。我的1951年版单卷本东德词典里没有“奥威尔”这个词，后来查了1961～1964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八卷本《新迈耶百科词典》也没有。同样是在莱比锡出版的1965年的《世界文学词典》才终于收录了有关奥威尔的信息，他本名叫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奥威尔本是英格兰的一条河流，布莱尔就选用了这个名字作为笔名。1937年奥威尔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属于托洛茨基派系，并且极力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联，在这部虚构的反乌托邦讽刺小说中以辛辣的笔触体现了反苏的思想。1978年出版的十八卷本《新迈耶百科词典》将这段话一字不差地收录进来。终于莱比锡菲利普·雷克拉姆（Philipp Reclam）出版社1986年出版了由乔治·赛哈泽（George Seehase）编纂的《英国文学概述》一书，其中写到奥威尔看到个人自由无法保障，因此欲塑造一种对当代文明的小资产阶级式、无政府式的仇恨。“他的小说《1984》以乌托邦的形式描绘出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下人民的衰败灭亡，至少可以作为一部反共宣传题材的作品对帝国主义国家产生巨大影响。”[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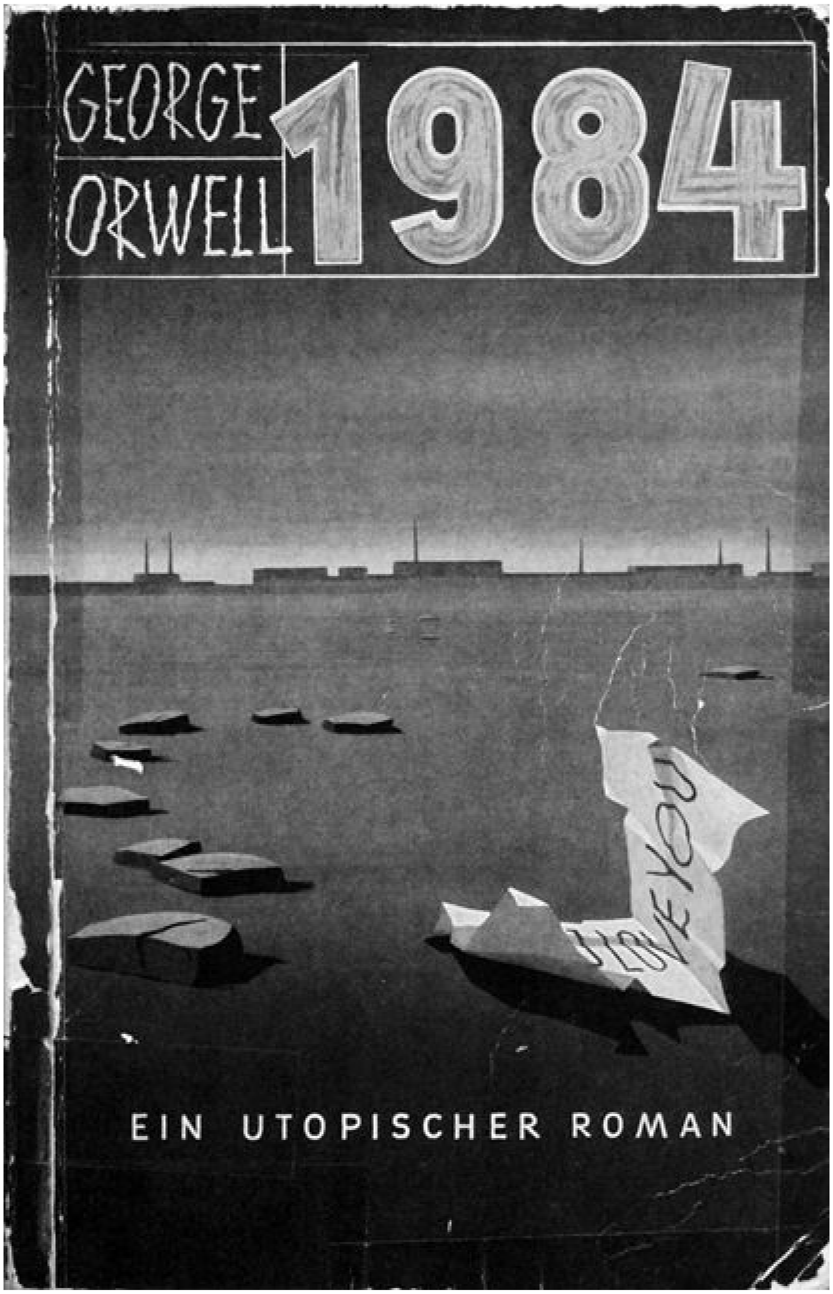


图**1** 乔治·奥威尔的《**1984**》，**1957**年版，巴德尔·哈泽遭逮捕时被没收

在读这本书时，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和裘利亚以悲剧收场的爱情也触动了我。奥威尔传记的作家美国人迈克尔·谢尔顿（Michael Shelden）也认为，人们往往忽略了《1984》也是一部爱情小说。在这个极权主义的监察国家大洋国，所有私人范畴，就连隐私、友情、爱情和性都始终受到老大哥思想警察的监视、管辖和禁止。1958年春，我与

初恋女孩伊利斯（Iris）的感情刚刚结束几个月，虽然没有像奥威尔的小说里讲述得那么悲剧，但对我来说也好似整个世界都天崩地裂了。读完这本书后，我把过错推给了东德，就像我在中学里必学的一课一样，东德也是一个专制国家。我在图林根州一所很大的印刷工艺学校里认识了伊利斯，我们互相对对方有好感，而且我们的行为举止庄重大方，用今天的社会伦理道德来衡量，就是两性关系过分拘谨，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受到老师和培训师的敌视和阻止，伊利斯被送到莱比锡另一所类似的工艺学校。这样，仅仅是将我们隔开了几百公里的距离，也预示着我们的关系走向结束。没过多久，伊利斯认识了别的男人。

温斯顿·史密斯成了我的文学朋友，就像之前卡尔·麦笔下的温内图一样。我进入了他的角色，并且竭力效仿他。奥威尔的书不仅激发了我个人的青春期激情，我还从中找到一大幸事，大洋国的社会现象可以同我身边发生的事情类比：像大规模行军、视当权者为偶像般的个人崇拜、对内外敌人的仇恨、为了不被视作异类而必须加入的党组织和国家青年团、存在于所有街角并留着山羊胡的老大哥形象，还有用手掩着嘴开政治玩笑。当时还有国家安全部，对我来说和大洋国思想警察的意义相同。我把这些感受和想法在信中告诉给了雷纳。

奥威尔《1984》中的一句话很恐怖地在我身上得到证实："家庭生活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延续，成为一种手段，每个人时时刻刻都被亲密的家人暗中监视和告密。"[6] 我从我的国安部档案中获知，我的姐夫1958年6月向他在国安部的上级军官报告，认为我"和一位西德青年保持着不透明联系"。我姐夫是国安部的通报合作者，使用假名"Otto Ölmann"。然而对于国安部来说，我交笔友并不是什么新的信息。国安部在图林根州格拉的分管办事处早在1958年5月10日，也就是在我和雷纳开始通信后，很快便指派了一名邮政检查通报合作者（国安部M部门）监察我的通信往来，没过多久就展开了名为"煽动者"的调查，档案号9/59。雷纳给我寄的书《1984》也没能逃过检查，国安部的人在书送

达给我之前就把书扣下了。就像我的奥威尔写的那样："通常所有信件在投递之前都要被打开，这是公开的秘密。"国安部让人把书继续投递给我是设了一个圈套，由于我年轻粗心大意，一下就中了圈套。他们可能认为我要成立非法反抗团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从来没有想要消灭东德这个国家，而只是想批判某些典型的专制现象。1958年，我的案例被国安部和司法机构如获珍宝地拿来证明，尤其年轻人是如何受"西德低俗之作"的影响而偏离了社会主义推崇和规定的道路。1959年1月13日，我在莱比锡被逮捕，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所以之前把我政治犯罪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放在了床头柜上：我的奥威尔，《1984》。这样他们也就轻而易举地逮捕了我。我当初应该把奥威尔的这句话铭记在心并用来警告自己："他们称之为思想犯罪。思想犯罪早晚会被揭发。"

国安部在逮捕我之前就请人写好了对奥威尔这本书的鉴定，又是之前提到的那位讲师福尔希曼，他在1958年7月29日的鉴定书中写道："这本书不仅对国家有危害性，而且在读者手里是一本与国家敌对的，尤其是反对苏联等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煽动性刊物，要采取一切手段禁止带入东德销售。"[7] "采取一切手段"——也就是说，即将等待我的监狱也是手段之一。虽然我只把我的奥威尔借给了两个熟人，但因传播具有国家危害性的煽动性刊物也构成了犯罪。此外还有我写给雷纳的信，我在信里——根据控告内容——从事了反东德、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煽动活动。1959年3月18日至20日在格拉区级法院第一刑审团的审讯中，检察官和法官歇斯底里般地冲我呵斥，当我已经害怕得发抖放声大哭时他们依然呵斥不止，他们的样子就好像要冲我吼出奥威尔的话："我们要把您榨空，然后灌注我们的思想。"

我被判处三年零三个月监禁，就连在监狱里，在东德亟待改革的刑罚执行现状下，我了解到奥威尔同样也写过这段话："权力在于使人遭受痛苦和侮辱。权力意味着将一个人的思想撕成碎块，然后任凭个人意愿组成新的形式。"虐待者奥勃良一次对他的俘虏温斯顿·史密斯说

道：“我们不仅将我们的敌人毁灭掉，而且还从中造出另一个人。”统一社会党领导的东德也将我造成了另一个人。然而对我的改造没有像我的朋友温斯顿一样深远，他到最后几乎已经不再属于人类，而且从此爱上了他之前想要消灭的老大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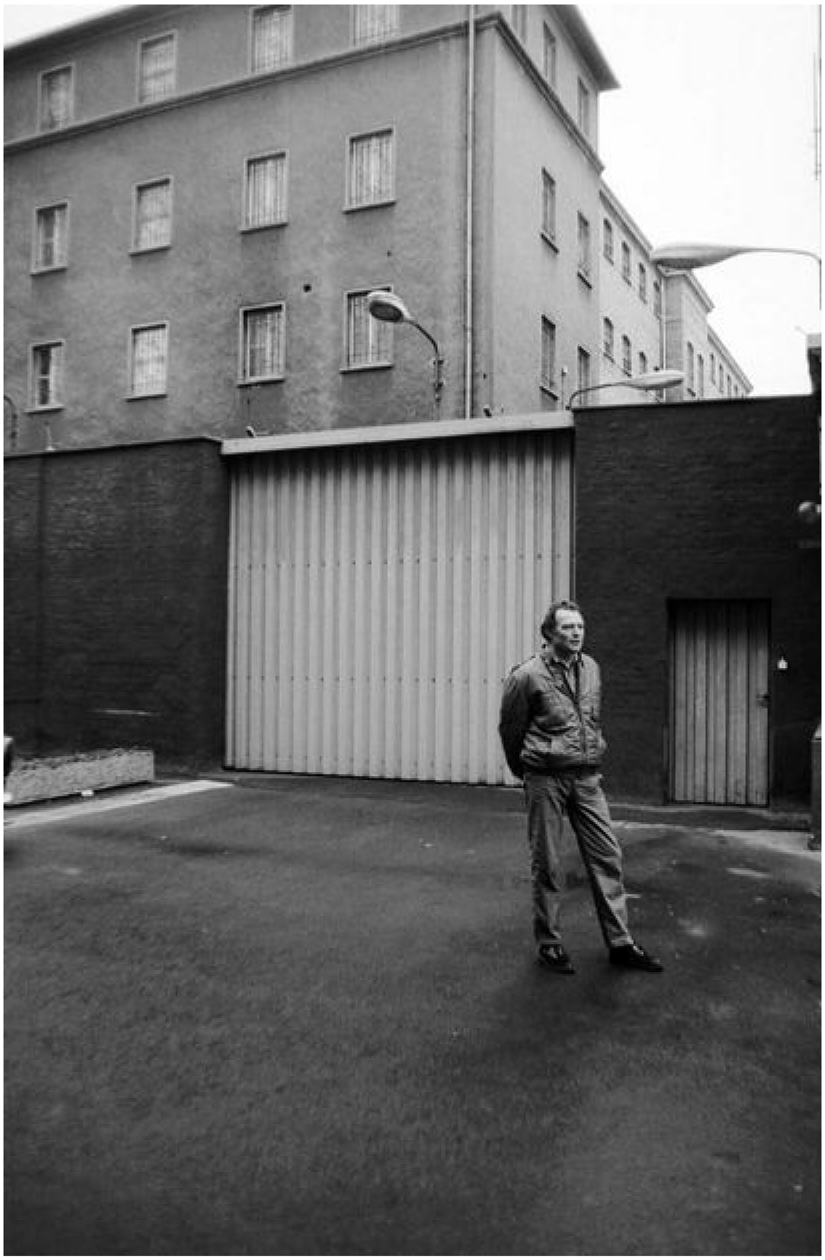


图**2 1990**年**1**月，巴德尔·哈泽，身后是他**31**年以前关押在的国安部格拉分管办事处拘留所

奥威尔以他的小说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1989年秋天，我都过着一名百依百顺的东德公民过的生活，永远地失去了站起反抗的欲望，坚定地认为什么都改变不了。奥威尔还曾劝告我："随波逐流是我的口号。这是保持不受伤害的唯一途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我始终都在谈及并且写下我的各种经历。30多年以来，我在无孔不入的国家权力工具下被迫对过往经历保持沉默，柏林墙倒塌后，1989年秋天，我突然觉得解放了。从我喜欢收看的西德电视报道中获知，西德下萨克森州萨尔茨吉特州法院的中心接待处多年来都在整理记录并提供资料证明统一社会党的非法不公行径，1989年年底到来之前，当时国安部还未完全丧失权力，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今天我的奥威尔又"活生生"地回到了我身边，在我的书架中占据着首要位置，多年来我到各处发表演讲一直陪伴着我。和之前提到的37本西德煽动性刊物不一样，这本书，由于某些原因从来没有进过碎纸机。1991年5月格拉法院对我恢复名誉之时，我提出请求，当然是通过别的法官，把还在我的审判档案中放着的奥威尔作为合法财产收了回来，再次见到它是多么令人喜悦啊！

今天我的奥威尔呢？他成了我的伴侣、朋友和老师，从未过时。我们只需要时刻知道对方在那儿，无论走到哪里。福尔希曼同志、检察官同志还有法官同志很久以前就已领受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终傅。而我的奥威尔还活着，他是不会离开的。谢天谢地！到现在德语版《1984》已经出版了30多次。

小说《1984》中有一处我必须要说：我没有笑，奥威尔先生！您的温斯顿·史密斯被思想警察像一只甲壳虫一样置于放大镜下审视长达七年之久？尽管我在东德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出于安全原因需要监视的机要人员，而我们的老大哥，他最终的名字叫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他的思想警察将我像甲壳虫一样置于放大镜下跟踪监视甚

至长达32年之久。我最后一封被国安部拆开复印的信，是写给西德一个新笔友的，上面盖着邮戳：“Rudolstadt 1989.07.07。”我在我的国安部档案中甚至还发现了一封信的复印件，是我1988年夏天从波兰写给我住在慕尼黑附近的堂姐，寄信人地址写的是我的东德地址，国安部的人先于我的堂姐就把信拆开看了，真让人完全没有想到。奥威尔先生您有什么想法？“在大洋国没有谁是精明能干的——除了思想警察。”

但是也有令人高兴的事情，过了许多年，两德还没统一，我又联系上了雷纳，他是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老师，我们互相走访，从笔友发展出了真正的男人之间和家庭之间的友谊。

结尾再引用一句奥威尔的话，一句过去会、现在会、希望将来也会令任何专制掌权者气愤不已的话：“如果自由尚有含义，那就意味着有权利说给别人听他们不想听的东西。”[8]

---

[1] Wolle，Stefan：*Die heile Welt der Diktatur.Alltag und Herrschaft in der DDR 1971-1989* . Berlin 1998，S.141.

[2] BStU，BV Leipzig，AU 36/58 Sa，o.Dt.

[3] 参阅zur Rolle der Briefe des Verfassers：Haase，Baldur：*Briefe，die ins Zuchthaus führten. Orwells 1984 und die Stasi. DDR-Erinnerungen 1948-1961* . Berlin 2003。

[4] Zur Wirkung der Bücher Orwells in der DDR 参阅Haase，Baldur：*George Orwells Bücher und wie sie Leser in der DDR ins Zuchthaus führten* 。由图林根州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处编辑。Erfurt 2005.

[5] Wicht，Wolfgang：*Ideologie und ästhetische Differenzierung der Literatur 1917-1939* . In：Seehase，Georg（Hg.）：*Englische Literatur im Überblick.* Leipzig 1986，S.351-407.

[6] 此处以及以下引用的《1984》中的内容，除最后一条外，全部摘自Diana出版社（康斯坦茨，斯图加特，苏黎世）1957年第6版。

[7] BStU，BV Leipzig.，AU 36/58 Sa，o.Dt.

[8] Orwell，George：*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 Posthum veröffentlicht im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15.9.1972. Zit.nach：Shelden，Michael：*George Orwell. Eine Biographie.* Zürich 1993，S.650.

“建议死刑”

——非法书刊与美占区广播电台（一段历史的碎片）

汉斯-格奥尔格·索尔达特（Hans-Georg Soldat）

本篇文章的主题原本叫做“西德报刊和广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在给定的条件下当然不可能完成的题目。对此需要进行大量的学术研究，需要可靠的实地调研，还需要有过亲身经历而有发言权的专业人士。我与此相反，除了其他众多事务外，我还要研究有哪些素材首先能够让西德媒介发挥地位和作用，而且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然我的情况只涉及一种媒介。更具体地说，我做美占区广播电台（RIAS）的文学编辑27年，也是除了其他各种事务外，还负责搜集整理有关东德的书刊作为广播节目素材，争取更多的节目播送时间，而且尽量是深夜以外的时间，找到最了解某个题材的作家，有时也自己写些这样那样的文章。所有这些在东德初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始终期待最好的结果，虽然知道“信息”是极其重要的，是生活必需的，然而广播节目具体产生了哪些影响，有时我们过了很多年才知道，而通常永远不得而知。

RIAS的文学广播节目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那么这对于喜欢谈论图书的人来说，不管是东德的热门还是冷门图书，意味着什么呢？他们评价图书的标准是什么？又是如何做出的评价？有时《新德国》上的某条评论令读者们惊讶不已，而这些评论只有听过RIAS的文学广播或者通过其他西德渠道读过相关内容才能看懂，《新德国》的记者们当然了解情况，无疑也默认东德读者同样已经从西德媒介了解到了相关背景信息。这种矛盾现象几十年以来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以至于人们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这就决定了我们如何规划RIAS文学广播节目方案，

我们尽可能拿掉四处受欢迎的短评节目，而坚持推出时长为半小时的节目，不仅包含书评，还有摘录的图书原文，一般比例为三分之一（评价）对三分之二（原文），这样听众就能对所讲的图书至少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下面我们来更加系统地对RIAS的文学广播进行讨论。西德媒介，在此我首先明确限定为广播，尤其是RIAS，必须从多种不同的角度看待。首先，它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容易回答：自由开放的政治新闻、年轻人喜欢的音乐（RIAS的《约会地》和后来RIAS 2台的节目可能是东德收听率最高的广播节目）、各种大事件背景报道、偶尔还有引人入胜的文学节目。

但是接着问题就来了，当我回想起过去五十年的经历，一下就会想到这个问题：历史。回顾过去的五六十年，这是一段非常不稳固的时期。而据我了解，从1945年到东德时代几近终结，这段时期广播不断变化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人研究过，我们特别关注的正是这个时间段。

第二是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不考虑极个别情况，西德媒介在东德就是阶级敌人的话筒。正是在东德初期，这就导致了大家在讨论东德内部文化政策时，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西德媒体称赞的作家。这就给RIAS的工作带来了难度。RIAS简直就是阶级敌人的化身，此外还是间谍中心，一个思想破坏行动的深渊。一旦西德媒体积极地评价某位东德作家，那么东德就会苛刻地看待对这位作家。因此评价文学作品变得难上加难，然而后来纯文学这个角度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但不变的问题是，RIAS可以有多少自由空间来褒赞一本东德图书？

也许我应该在此强调一点，RIAS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德国广播电视机构的本质特点，这个特点并非它是一家合法的美国广播电台，而是除了很多年之后才出现的德国广播电台外，RIAS是唯一一个明确为东柏林和东德听众打造节目的电台，对于我们来说当然也包括西柏林的听

众。所以RIAS的节目在西德也遭到屏蔽，西德各州基本上很难接收。RIAS也不属于德国广播电视机构，只是与之有一定联系。其他常见的都是州广播电台，它们制作的东德节目主要为本地听众提供信息，当然也尽量保障东德其他地区能够正常接收。

需要在此强调的第三个方面是快速性。广播是这么多年来传达速度最快的大众媒介，即使如今网络的速度也只超出甚微。西德有针对性地利用广播提供信息的快速性来显示出相对于印刷媒体及其他电视台的优势地位，而东德却将广播纳入了执政党的基本信息政策。众所周知，等待官方对轰动世界的大事件表态得需要很久的时间，像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党代会上发表的反斯大林秘密讲话、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这只是少数几个例子。就连在国安部的眼里，RIAS也是一股威胁势力。我在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找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部波茨坦法学高校罗兰德·米泽乐（Roland Miseler）中尉1988年6月7日的“专业毕业论文”，题目为“以政治思想破坏活动为宗旨的敌对电子广播媒介的地位与作用及其从事颠覆性活动的手段及方法，以RIAS为例”[1]，文中对此阐释得非常清楚：

> RIAS始终以政治思想破坏活动为宗旨，利用其地理位置及无线电广播相对于报刊和电视的优势，及时抓住每天发生的政治事件进行报道并加以评论。
>
> 目标是在东德其他媒体传播信息之前就对东德公众舆论形成起到导向作用。和冷战时期相反，RIAS过去几年在广播节目中竭力避免公开发表引发颠覆性行为与活动的言论，如今RIAS在节目中以传播信息为主，试图借助这些信息以间接方式引发、煽动民众讨论，并引向敌对性破坏性的行为活动。[2]

这段话以RIAS为例，代表性地谈到了所有西德广播电台的文化政策。我曾经试着探究可能是什么样的“信息”，“借助这些信息以间接方式引发甚至煽动民众讨论”，但没有任何收获。从原文来看只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不为人知”的信息，东德不存在的信息。没错，为什么不存

在？很显然，如果听众们能提出这个问题，就足够让人怀疑确实有颠覆性和破坏性行动的存在，因为回看这位中尉的话，也就指的是这个意思。

在此我想讲一件事情作为小插曲，这个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典型地说明了东西德对峙的残酷时期广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70年代上旬，我们对人民与世界出版社的一本书做了评论，是一本来自苏联的书，当时已经出版多年，我真不记得那本书叫什么、是谁写的了。一个东柏林的朋友经常光顾当地的书店，几个星期后告诉我说他没找到这本书。书店老板一直将他视为忠实的顾客，私下里告诉他，虽然之前这本书放在书架上无人购买成了滞销品，但是经RIAS节目播出后，不久前成了畅销书。我们相当无语，可也没有理由怀疑书店老板所说的真实性。我们没有大力宣传这本书，一方面，大张旗鼓做宣传不太合适，因为俗话说自我吹嘘令人作呕，另一方面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理解书店老板的这番话。这件事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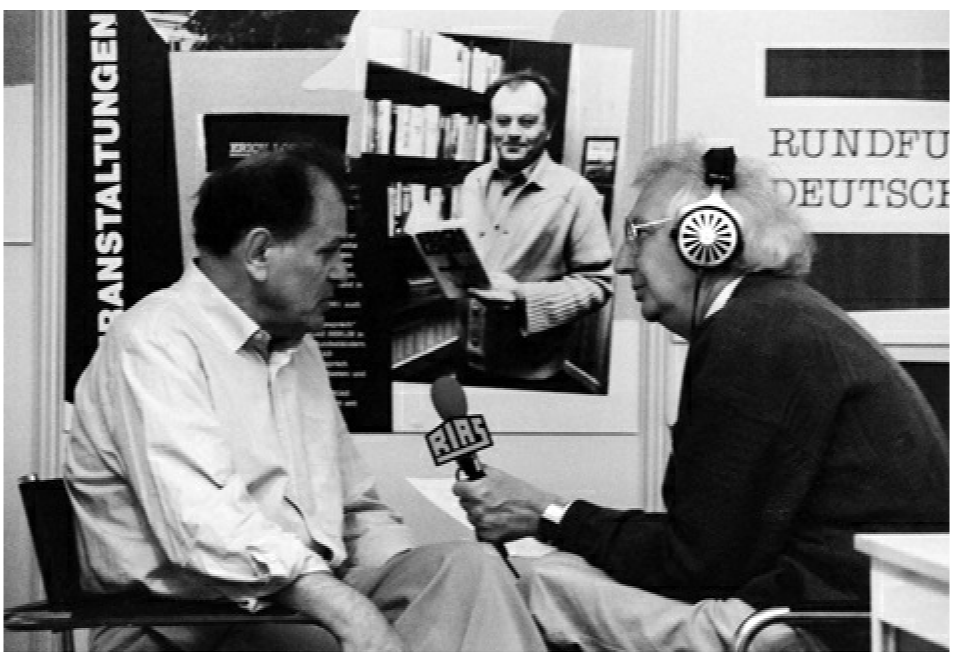


图**1** 汉斯**-**格奥尔格·索尔达特（右）在莱比锡书展上采访埃里希·略斯特（**Erich Loest**）

这让我立刻开始回想过去这些年中广播历经的种种变化。我还是在开姆尼茨附近的弗兰肯贝格经历的1945年后二战刚刚结束这段时间。现如今几乎没有人知道最初在苏占区收音机也是要没收的。非法持有收音机要判死刑，至少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这是二战刚刚结束。然而没过多久又允许使用甚至还能购买收音机，实在没有办法还可以自己手工制作一台探测器当做收音机用，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就能做成。那种对自由开放的信息向往的热切程度——自由开放，必须特别强调，完全与纳粹宣传相反！——是无法想象的。我那台探测器里的地方电台当然也就是莱比锡电台，每到一个节目结束后就响起大家都熟知的音乐B-A-C-H（巴赫）。

后来东德成立以后，当时还早，还没有电视，随着能接收到的广播电台越来越多，听众们也渐渐有了喜欢收听的电台，其中必然包括西德的广播电台。BBC驻德国电台听众很多，二战时期就有很多人收听，是当时播报消息最具客观性的电台之一；还有西北德广播电台，后来才分为西德广播电台和北德广播电台；还有RIAS，如果有更好的收音机还能收到瑞士的广播电台，特别是贝罗明斯特广播电台常常推出和二战时期有关的节目。

下面我要讲的内容在我的记忆中已变得有些模糊，当时我还小，还是个青少年，即使对于关心政治的人来讲，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还是比较遥远的。过了很多年以后，几十年以后，我试着明确自己对当时那段时期的感受：这种斗争在当时比七八十年代进行得更加粗暴激烈，我自己也成了斗争中的一分子。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在此交汇，一个是纳粹宣传的基调，它的攻击性，它那无论在东德还是西德无论内容如何都几乎一成不变的挑衅性缩略符号，并非随处可见，但却非常醒目。另一个方面可以说带上了国家民族的色彩：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具有宏伟历史的民族，虽然有过历史问题，但当时那种感觉还是生动而美好。接着是德国开始分裂带来的尖锐刺耳的愤恨声，这真的是国家

的不幸、不公，令人无法接受。过错当然始终不在于我们。那是一种大多数德国民众确实都体验过的感受。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很难做到轻声行事。从斯大林登台到这位独裁者去世，这段时期东德丝毫无法律保障可言，有人可能在夜间被逮捕，有时接着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后来收听西方广播电台也像纳粹时期一样要受处罚，涉及RIAS就更严重了。在这我要提一下所谓的“鸭子”行动，只是为了说明当时广播的情况以及广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是东西德广播之战最残酷的一页，针对的是RIAS的听众，尤其是和RIAS有联系的人因被疑为间谍而遭到指控。这场行动从1955年的一份文件开始，政治评论家卡尔·弗里克（Karl Fricke）和历史学家罗杰·恩格尔曼（Roger Engelmann）1998年将这份文件发表在二人合著的《集中打击——东德1953～1956年的国家安全行动及政治进程》[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

内政部

国家安全国务秘书处[4]

副国务秘书

柏林，1955年2月10日

战略计划

机密文件

内容：实行“鸭子”行动［……］

> “鸭子”行动的目标不仅在于破坏RIAS这个广播电台，令其受到应有的惩处，而且要通过这些正确的政治战略性措施打击RIAS，在所有德国人民和世界公众面前揭露这个美国广播电台作为美国情报局间谍中心的真面目。[5]

接下来是对所涉人员的处理办法，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所有文件中列出的并居住在［……］城区的特务或间谍，在行动开始后一并逮捕。各城区要组成一个行动指挥部，由区领导、第二部门领导、第八和第九部门领导组成［……］

逮捕间谍要做好充分准备，尽可能密谋策划，也就是说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间谍，而不能因未发现某人行踪或者人在外地才立刻意识到此人是否有间谍嫌疑。［……］

区领导中间要成立逮捕小组并制定逮捕计划。[6]

尤其令人感到可怕的是，从准备工作看得出这场行动从头到尾极其官僚繁琐，我完全不想去比较，但真的感觉从根本上很像纳粹体制：

行动开始后，第九部门要按照上报表A和B每天报告两次（10点和17点）以上措施的实行情况（逮捕、调查等）。报告须使用电传打字机，并使用上报表中的数字和字母（标注有关第十一部门的名称）［……］

国家安全国务秘书处第二部门的副级领导Folk和König两位中校（2247房间，电话371）负责实施“鸭子”行动。

我以“故障”为代号通告实施此次行动。

梅尔克（Mielke）[7]

少将[8]

几周以后梅尔克通告“鸭子”行动开始。[9]卡尔·弗里克和罗杰·恩格尔曼写道：“两周之内就总共有49人被指控与RIAS有联系而逮捕。逮捕范围涉及整个东德地区，重点明显放在了波茨坦和柏林两个城市，有一半被逮捕的人都来自这两个地方。”一些人因“证据”不足被立即释放，对这些人的指控似乎是人为安排的。最后只剩下5个人接受1955年6月开始的公开审判。

审判本身就是一场司法做戏。“乌布里希（Ulbricht）[10]在开庭很久以前就拿到一份有关每名被告判决提议的文件，由统一社会党中央委

员会部门领导克劳斯·佐尔格尼希特（Klaus Sorgenicht）于6月14号签发。乌布里希总书记将第一被告人威巴赫（Wiebach）预判的‘终身监禁’划掉，写下‘建议死刑’。”剩下的被告人判决提议他没有改动，在下面签上了“同意 乌布里希”。[11] 乌布里希以最高审判长的身份不仅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并且在提起诉讼之前就已经下达了判决书。1955年9月14日夜里两点，威巴赫死了，在德累斯顿第一拘留所以“军事间谍”罪被执行死刑，27岁。威巴赫父母提出的赦免申请遭到拒绝，11月14日他父亲才被口头告知威巴赫已行刑。

大家能看出，我首先跳过了“1953年6月17日事件[12] 和RIAS”这个话题，这是有原因的：第一，对这个话题需要进行详细的探讨，而本文篇幅有限；第二，这偏离了占据本文首位的文学层面；第三，这个话题一旦脱去谣言和传说的外衣，便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夸张。其实很简单，在有据可依的历史研究中有一点毫无争议，就是当时RIAS不仅没有推波助澜，反而甚至起到了息事宁人的作用，电台节目记录和所有当事人的报告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以直播的形式、没有预先灌制录音带而如水般流畅地播送节目，这种全新的、生动直接、对于当时的德国听众来说完全不习惯的报道方式，虽然在今天看来是危机时刻下必备的节目素质，但在当时却强烈地激发出人们的热情、感情和激情，就比如在波茨坦广场亲耳听到子弹从一名已无法呼吸的记者耳边嗖嗖飞过，那种感觉犹如身临其境，而不是事后才看到报道。我也有过这种亲身体验，那时我在弗兰肯贝格念高中，看到了自己的反应，还有同学朋友和亲人的各种反应——从满腔愤怒、攻击挑衅、渴求参与，到失望至极流下眼泪，东德没有什么能拿来与之反抗。这些报道中没有被美化修饰的内容，就是让人听到残酷的事实，包括所有各种荒谬、矛盾还有错误，那是无线电广播一段黑暗的非常时期。从这个角度看来，当时RIAS的总编辑埃贡·巴尔（Egon Bahr）在他回忆录中写下的话事实上是对的：“没有RIAS就不会有这场起义。”也许是历史的讽刺，恰恰1953年6月16日，有名的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由于RIAS的共产党阴谋活动希望展

开一场行动来打击时任RIAS台长的美国人戈登·尤因（Gordon Ewing）。[13] 东德在对外宣传中从未提到过这个事实。

接下来要讲的内容稍微贴近现代生活。电视的出现首先并没有怎么改变广播的地位，电视发展得比较缓慢，拥有电视的人群数量也增长缓慢，到了70年代电视才发展起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才渐渐也有了文学电视节目，但与其他电视节目相比并不受到重视，到今天亦然，当然某些个别情况除外。文学电视节目通常都以作家访谈的形式出现。当然，德国电视一台对作家斯蒂芬·海姆（Stefan Heym）的一次访谈在80年代比任何RIAS关于他以及由他参与的节目影响要大得多，不过80年代广播的地位本身已经下降了。虽然我们针对这一现状也创办了文学时事述评节目，受到一些读者欢迎，但分析朗读文学作品的广播节目持续时间久，喜欢收听的人很少，大多数人都在搜寻快速的、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却很少在文学领域搜寻信息。

大家都在搜寻什么样的信息呢？过去几十年中这些信息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二战刚刚结束后我们主要致力于重新找到和国际现代化的连接点，克服纳粹审查的黑暗岁月以及刁蛮粗俗的民族文化留下的阴影。“那些不允许我们读的书”“外来文学”以及第三帝国受害者的报告、“秘密德国”，都是当年有代表性的节目名字。[14] 当然有一件事必须视为特例，德国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阿伽门农之死》（*Agamemnons Tod*）1946年7月28日以广播剧的形式通过RIAS在全世界首次上演，而东柏林德国剧院的首演是在1947年。[15] 当时东西德之间的沟通交流还很频繁，而没过多久苏占区就开始限制流传某些西方现代作家的作品。随着东德也出现了形式主义讨论，并引发了一系列后果，比如当局压迫某些作家以及加大图书审查力度，西德方面几乎自动将重心转移到了这类书籍及其作者。对此东西德两边的态度都有些攻击性，像“你打击我的作家，我也打击你的作家”这样的争辩时时都能听到。所以布莱希特（Brecht）在西德并不受欢迎，而乔治·

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东德也简直成了诅咒对象。

随后的几十年中这些争辩的声音在逐渐减弱，然而关于东德青年作家的新一轮辩论又开始了，有君特·库纳特（Günther Kunert）、莎拉·基尔施（Sarah Kirsch）、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还有沃尔克·博朗（Volker Braun）。柏林墙倒塌之后抒情诗的浪潮一拥而上，其口号是“用抒情诗轰炸世界”，抒情诗的意义变得非常重要。然而还是不可否认，西德长期以一种傲慢自大的姿态认为东德的这场文学辩论没有什么意义。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些青年作家的才华的确有目共睹。60年代中期，西柏林的西格蒙德大学生宿舍举办了一系列著名的东德作家朗诵会，结束了东西德之间的文学冰冻时代。从那以后，在西德又可以自由地谈论东德文学了。

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发生：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被开除东德国籍。西德人感到一直上上下下波动不定的东德文化政治氛围又再次进入更加紧张的冰冻期，我们也报以批判的态度谈及这种变化，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迹象表明至少整体气氛趋向正常化。越来越多的东德作家敢于接受RIAS的访谈，这当然引起了东德当局的不满，当局无奈地做出决定：70年代去西柏林的作家务必保证不接受RIAS访谈。获知此决定后，我还是给不来梅广播电台做了访谈节目，然后大声宣称：“在给不来梅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中［……］”后来才知道，这件事在东德既让人笑得幸灾乐祸，又让人气得咬牙切齿，接着，不许接受RIAS访谈的规定取消了。为什么经过这一番折腾后才取消呢？

沃尔夫·比尔曼被开除东德国籍后，东德文学界和文化政策都变得同样的支离破碎，没有了统一明确的指导方针。对东德渐渐形成的文学反对派给予支持、让他们拥有发言权并给予鼓励显得愈发重要，就像一场独一无二的走钢丝表演。东德始终宣称，所有反东德的作家或者其未

被印刷的作品，到最后都在东德得以出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还是有一些作品因其某些“文学特征”而不适宜出版。另一方面，东德的文化政策总是十分严格而残酷的，有时仅仅一部遭到排挤的图书都能导致大规模骚动，接着引发所有媒体的关注，虽然这样多少会让人感到文学心灵受到了创伤。而最糟糕的是东德不吸取任何教训！半年以后又发生一次类似事件引起轰动，所有一切又重新来过。应对这种局面归根到底只有遵循一条准则，那就是呼吁大家给予异议人士更多的包容。不只是给RIAS的文学节目，如果给所有电台节目提一条标准，那么就是这一条。另外，与之相关还有一个提议：为了有效达成和解，必须抛弃基要主义非此即彼的这种狭隘无果的思想意识。这些办法是否收到很大成效，过去这些年我时常持怀疑态度。

我并不想把致力于实现上述目标或至少参与其中的作家列出一份名单来，但还是有一篇针对RIAS写的博士论文稍微涉及了这个问题，曼海姆大学一名学生1991年在他有关文学政治题材的博士论文中出人意料地写道：“过去二十年在RIAS通过朗诵会和访谈介绍过作品的作家，真的能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从阿道夫·恩德勒（Adolf Endler）、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莎拉·基尔施（Sarah Kirsch）、雷纳·基尔施（Rainer Kirsch）、尤阿西姆·瓦瑟（Joachim Walther）、君特·库纳特（Günter Kunert）、克劳斯·施莱辛格（Klaus Schlesinger）、卡尔-海因茨·雅各布斯（Karl-Heinz Jakobs）到瓦尔特·扬卡（Walter Janka）、古斯塔夫·贾斯特（Gustav Just）、乌尔里希·普朗茨多夫（Ulrich Plenzdorf）、弗朗茨·菲曼（Franz Fühmann）、沃尔夫冈·希尔毕西（Wolfgang Hilbig）、尤尔根·富克斯（Jürgen Fuchs）、莫妮卡·玛隆（Monika Maron）和埃尔克·埃尔贝（Elke Erb），有代表性的作家都在这里，他们构成了东德那段时期的文学力量。”[16]

下面我还想谈一下我们在RIAS工作的另一个问题，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就是不断出现的新的疑问和顾虑。如果一位在东德生活的作

者，通过西德媒体表达了一种非主流观点会怎么样？比如1976年RIAS文化部送来一盘录音带，录音是在莱比锡一间住所里完成的，由尤尔根·富克斯（Jürgen Fuchs）朗读作品，克里斯蒂安·库纳特（Christian Kunert）和格鲁夫·潘那赫（Gerulf Pannach）唱歌演奏。比较惨的是，我们收到录音带时，参与录制的人已经被逮捕了。新闻记者们从来都毫无顾忌，丝毫不关心自己做事情的后果，而只关注成为头号新闻的轰动事件，而我却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播放这盘录音带。恰恰是在RIAS，在沃尔夫·比尔曼被开除东德国籍之后，被逮捕的作家和音乐演奏家发表反对体制的言论，而且以专业广播水准来看，录音质量很差，简直又真实又恐怖。这难道还能带来好处吗？这不是害人吗？故意让录音落到“阶级敌人”手里，这种阴险行径难道不应该谴责吗？经过长时间考虑，这盘录音带还是在1976年12月11日的广播中播出了，[17] 并且带来了一定积极影响，就像尤尔根·富克斯后来说的那样。当然我们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找到了某个组织机构与沃尔夫·比尔曼共同在西柏林艺术学院组织一场国际新闻发布会，时间是12月10日，会上首先介绍了这盘录音带，这样就避免了把RIAS推到风口浪尖。到了80年代所有这些都不再重要，西德公众发挥了作用，也许恰恰就是RIAS覆盖到的西德公众。

本文对广播，尤其对RIAS的讲述以及分析也类似适用于印刷媒体。当然二者有本质区别：广播几乎到处可以收听；而西德报刊除公务需要外难以通过合法渠道获取。但是谁都有一个已经退休的叔叔或婶婶，可以去西德然后带些图书回来，总有一些熟人说不定什么时候有办法看到西德报纸杂志，起码偶尔也能从中获取到一些信息。西德报刊从根本上来说，和很多其他西德广播电台一样有着不同的宗旨：都把西德读者和听众放在首位。

然而西德报刊的作用根本没有达到能对其进行评价的高度，他们对民众的影响小于对官员的影响。毕竟60年代时我在当时西柏林的《明镜

日报》担任过几年小品文编辑，所以多少有一些发言权。在那儿大家也都知道，每篇文章在东柏林都要受到评判，甚至我自己都有过亲身体验，有一次一篇由我编辑的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11届全体大会的文章，后来被大家用“臭名昭著”来形容的一次大会，克劳斯·赫普克（Klaus Höpcke）在《新德国》上攻击了我这篇文章，他当时是《新德国》的文化总监。这对于当时一个实习生身份的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利影响……

能从以上所有论述中做出一个总结吗？

两德刚刚统一后，我和很多人聊过，有来自东德的RIAS忠实听众、作家、前任文化官员、出版社工作人员、一般读者，还有的人来自“一无所知的山谷”，谈话的结果多种多样。如果只是谈到对RIAS文学节目的具体感受，反响并不强烈。而大家总是提到一些记忆深刻的大型朗诵会，像埃里希·略斯特1984年在我们这做的演讲《第四位审查官》，或者罗伯特·哈费曼（Robert Havemann）亲自讲述他被软禁时的住宿条件如何。每个人都应该试想一下：东德最有名望的异见人士之一在格吕瑙可以说被24小时监视，去探望的人也要事先经过搜身，这位异见人士十分淡定地录了一盘录音带，最后在RIAS播出。虽然我们经过各种努力依然无法肯定，但就我们所知，这件事引起了国安部的震怒。我必须承认，我到今天都为此感到十分高兴。总的来说，除了个别图书以外，很少有人第一反应就会想起RIAS的文学节目，毕竟引发人思考的东西太多了，改变想法也很正常。节目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两个星期以后谁还记得这些天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好吧。

我总被问到曾经是如何撑过那段时期的。没有什么好否认的，用的是那严重受伤的神经、自我怀疑，有时还有些许骄傲。在我们电台发言的一些作家都成了我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友谊经久不变。大家有时写信联系，有时打打电话，这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期待的一切。

[1] Miseler，Roland：*Die Rolle der gegnerischen elektronischen Funkmedien im System der politisch-ideologischen Diversion，ihre Mittel und Methoden der subversiven Tätigkeit，erläutert am Beispiel des Senders RIAS（Rundfunk der amerikanischen Sektor）*. BStU（ZA），ZAIG MfS 8160，7.6.1988.

[2] Miseler，Roland：*Die Rolle der gegnerischen elektronischen Funkmedien im System der politisch-ideologischen Diversion，ihre Mittel und Methoden der subversiven Tätigkeit，erläutert am Beispiel des Senders RIAS（Rundfunk der amerikanischen Sektor）*. BStU（ZA），ZAIG MfS 8160，7.6.1988，Bl.26（MfS-Zählung S.26）.

[3] Fricke，Karl Wilhelm；Engelmann，Roger：*Konzentrierte Schläge. Staatssicherheitsaktionen und politische Prozesse in der DDR 1953-1956*（以下简称：Konzentrierte Schläge）. Berlin 1998.

[4] 即国家安全部。——译者注

[5] Operativplan vom 10.2.1955 GVS 751/55.BStU，ZA，Dokument 102103，Bl.1 f.（MfS-Zählung）. In：Fricke；Engelmann：*Konzentrierte Schläge*，S.173 u.318.

[6] Operativplan vom 10.2.1955 GVS 751/55.BStU，ZA，Dokument 102103，Bl.4（MfS-Zählung）. In：Fricke；Engelmann：*Konzentrierte Schläge*，S.173 u.318f.

[7] 自1957年起任国家安全部部长。——译者注

[8] Operativplan vom 10.2.1955 GVS 751/55.BStU，ZA，Dokument 102103，Bl.4（MfS-Zählung）. In：Fricke；Engelmann：*Konzentrierte Schläge*，S.173 u.318f.

[9] Fricke；Engelmann：*Konzentrierte Schläge*，S.173-181.

[10] 统一社会党总书记。

[11] Fricke；Engelmann：*Konzentrierte Schläge*，S.175.也可参阅Wendel，Eberhard：*Ulbricht als Richter und Henker-Stalinistische Justiz im Parteiauftrag*. Berlin 1996，S.102-105。

[12] 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工人爆发起义，后被苏联军队镇压。——译者注

[13] 参阅Kundler，Herbert：*RIAS Berlin. Eine Radio-Station in einer geteilten*

Stadt. Berlin 1994，S.189-198。

[14] 参阅Kundler，Herbert：*RIAS Berlin. Eine Radio-Station in einer geteilten Stadt.* Berlin 1994，S.48f.以及第一条注释。像Robert Havemann，Greta Kuckhoff，Günther Weisenborn，Eva Lippold，Wolfgang Langhoff，Bruno Baum和Anne Saefkow对此都有评论。

[15] 参阅Kundler，Herbert：*RIAS Berlin. Eine Radio-Station in einer geteilten Stadt.* Berlin 1994，S.50。

[16] Haupt，Johannes：*Der 17. Juni in der Prosaliteratur der DDR bis 1989*：*Über den Zusammenhang von Politik und Literatur und die Frage nach einem "Leseland DDR".* Inauguraldissertation. Mannheim 1991，S.153.

[17] 送给自己，我们仍对自己报以希望。东德被捕作家尤尔根·富克斯以及被捕歌手克里斯蒂安·库纳特和格鲁夫·潘那赫录制的歌曲与文章。RIAS II，11.12.1976，22.00-23.05 Uhr.

毒草柜与守夜人

摘自一名图书管理员的生活传记 [1]

君特·德·布律（Günter de Bruyn）

街头拐角处的一家酒吧要改建成图书馆，但因缺工少料而推迟交工，我见到的图书馆暂时只有一个书堆，是从柏林克佩尼克老城区消防站运来的，上面落满了灰尘。几个月以来（当然也有间歇，因为我还在区政府做了几天政治号召宣传员和小牲畜数量记录员），我一个人寂寞地坐在消防站里一个靠窗的小隔间，从那向外可以望到施普雷河的一段，列图书清单，写图书目录卡，在扉页的背面盖上图书馆印章，用“无效”印章盖销旧印章，通常遇到不熟悉的书我总是看得入迷。这些旧书是从布拉格来的，我不知道这些书为什么以及通过哪些途径，是战争期间还是战争后，堆到了克佩尼克的消防站，然后现在成了一所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藏书，而只有其中一部分适合做基本馆藏；这些书不是太旧太珍贵，不好外借，就是太过时或者太专业。我满怀遗憾地把那些带有铜版画和钢板雕刻版画的自然科学类作品，还有德国史学家兰克（Ranke）、特赖奇克（Treitschke），哲学家康德（Kant）、费希特（Fichte）和海德格尔（Heidegger）的著作放到要送至学术图书馆的书堆上，主要把小说、传记和游记留下来给下层居民区的图书分馆。

这份工作不错，但可惜做的是无用功。我带着我那些书准备离开消防站，搬到威廉明妮霍夫大街街角那家酒馆的时候，我的头儿，一位心肠好、淡定、又看上去喜欢听天由命的同志，认为这些图书在大方向上

缺少党的意识，尤其是我那些大多出自20年代的小说可能会令人不悦，因为包含太多反动、颓废派与和平主义的内容，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这类作品，但是用于教育劳动人民是不合适的，我的头儿马上开始对这些书进行筛选，因为他对犯政治错误的恐惧大于他的文学知识，一些他不了解所以自认为很危险的图书，就被剔除了。酒馆吧台旁狭窄的小隔间，以前用作更衣室和咖啡台，不久后也就被填得满满的，有奥地利作家穆西尔（Musil）和德国作家德布林（Döblin）、雷马克（Remarque）和格勒泽尔（Glaeser）的首版作品，有苏联的小说，有编者已经过时的马克思和列宁的老版作品，有法国作家克洛岱尔（Claudel）、谷克多（Cocteau）、普鲁斯特（Proust）和纪德（Gide）的作品。后来知道这些废品不能进入学术图书馆，而是要送进造纸厂，穆西尔的小说《无个性的男人》（*Mann ohne Eigenschaften* ），我当时还不懂得鉴赏它的价值，因为朋友H迫切想要，这本书才幸免于送进造纸厂，然后是英国作家沃尔夫·索隆特（Wolf Solent），我在消防站给图书编目时发现了这位作家的闪光点，于是把他的一部黑绳捆扎的三卷本著作也留了下来，收藏至今。

还有，一位叫玛拉（Mara）的实习生每天把判死刑的书装进大袋子拖回家，这种非法行为又使得一些文化财富幸免于难，玛拉也说看到造纸厂那犹如刽子手般的小车来了她就很伤心。因为后来我们又从警察局那收回了所有由她保管的图书，我便知道，她对那些书没有特别的偏爱［……］

在这毫无才智可言的不毛之地，本来文学知识少得可怜的我也似乎显得博学多才，这带来的后果是我被任命加入某个委员会，委员会的名称听起来并无大害，类似于藏书委员会之类的，其工作却是百害而无一利。它是一种裁定书籍的人民法院，一个委员会，旨在裁减留传下的图书，和那些虽然逃脱了纳粹或疑纳粹文学禁令，但因于二三十年代出版而被怀疑为影响民众思想的敌对作品。委员会里拥有指挥权的同志，是

那些能原文引用列宁、斯大林、施丹诺夫和德国共产主义政治家乌布里希（Ulbricht）的教义的，将颓废派、形式主义、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革除教门的人，他们不相信知识而相信所谓的阶级直觉，不仅将我们这些专业人员当成读书奴滥用，而且，我后来才意识到，还把我们当做他们无罪辩护的证据。我们对他们销毁图书的巨大干劲既无法制止也无法改正，我们必须要看那些书然后做汇报，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些观点从未被重视，最后还要帮着撰写图书鉴定，这些鉴定也不是出自我们自己的观点。

由于希特勒年代也将有危害倾向的图书认定为思想败坏而处理掉，因此那些落入诅咒般审判魔爪的图书通常是纯属走运或由于大胆的拯救行动在纳粹时期存活下来的，像奥地利小说家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和雷马克的作品。为了不被谴责为纳粹审判的执行者，图书筛选是在私下里进行的，然后大家用这样一种观点来消除自身顾虑：这是服务于民众教育的措施而非禁令。大家也不复印书单，而是口头传达指示，唯一的书面材料是一本都要遵照的名为“改进藏书”的指南和一份范例集，里面的文章不多，但明确指出如何辨认和平主义与非科学毒瘤，那是一份很寒酸的小册子，我之所以回忆起来是因为我吃惊地发现前言里的工作人员名单中竟然也有我的名字。这个小册子如果还在档案里存着，历史学家便能找到这段时期文化政策的实证：对外以马克思主义文学家汉斯·迈尔（Hans Mayer）、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和剧作家布莱希特（Brecht）自吹，对内实质上越来越狭隘地教条主义化，盲目遵从执政党的路线。对我来说这个小册子过去是并且现在也是一种耻辱，但我当时没有从中认识到参与意味着共罪，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为了防止更坏的事情发生，如果可以的话，坏岗位是也要设置的。［……］

对赫伯特（Herbert）来说，知道他自己收藏的那些卡夫卡三卷本、小说《尤利西斯》和《魔山》就足够了，和他不一样，汉斯-维尔纳

（Hans-Werner）是个藏书迷。如果赫伯特为自己辩解而提到东柏林和西柏林的图书馆都可以借书的话，汉斯-维尔纳就一定要提醒他还有更为严格的图书审查，甚至还要提到封锁边境，还说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图书馆书源都是来自东德，所以这些图书馆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变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过时了。并且汉斯-维尔纳不仅对文学感兴趣，对政治也感兴趣，他和我一样，是东德尤为遭唾弃的杂志《月份》（*Der Monat* ）的忠实读者，他收藏有很多英国作家赫胥黎（Huxley）和英籍匈牙利作家库斯勒（Koestler）的作品，后来又有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t）的《革命舍弃了自己的孩子》；他所有的书也都借给我们看，虽然内心也许并不情愿。在我认识的运送禁书过东西德边境的人中，他是最大胆的［……］ 可后来审判中又添加了很多罪行，控告内容说汉斯-维尔纳有损社会主义、危及东德也就危害到了世界和平，法官认为，他应判一年零九个月监禁。［……］ 我在自己身上意识到这种权威的力量是如何体现的：在我轻而易举又清楚明了、令人发笑且为之愤慨地把它讲出来的同时，我感觉到，心里除了蔑视，还有一种恐惧变得强烈，这种恐惧劝告我今后要小心行事，我没有坐在汉斯-维尔纳现在要坐的地方纯属走运。我收藏的所有年度发行的《月份》杂志有幸躲过了在柏林黑森温克尔进行的住宅大搜查，之后都立刻扔进了别处的垃圾箱。我也已经被教导过，公务员不可以去西柏林，不可以同那里的官员讲话，甚至还不可以违背外汇管理法规。人们本也有理由指责我，因为我使用西柏林的图书馆和监听美占区广播电台而成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侵略者的同谋。还有如果那些书当时明面摆在了书架上保存着，妻子随时可以看到，那么我传播禁书的违法行为也就有证可查了。那些控告人也可以说我还懂得法西斯主义的密令。

---

[1] Günter de Bruyn：*Vierzig Jahre-Ein Lebensbericht* . Frankfurt am Main 1996，S.111f.

柏林国家图书馆的毒草柜

莱蒙德·瓦利戈拉（Raimund Waligora）

毒草柜主要见于各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用来收藏那些不能正常借阅的图书，因为这些图书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看都是有危险性的或是被禁止的——这里既指直义又指转义。最初毒草柜在柏林苏占区的“公共学术图书馆”中称作“禁书馆”，直接取用该图书馆曾经的名称。从1961年起和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一样，毒草柜在柏林国家图书馆里拥有了一个委婉的名称“特殊科研文献部”，简称ASF。

毒草柜是二战之后设立的，因为所有四个占领国有一项共同的要求就是，清除公共图书馆中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与暴力和民族仇恨相关的刊物。这一目标在柏林各个占领区的落实程度各不相同。设立“毒草柜”的指导文件是1946年5月13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关于“没收国家社会主义与军国主义书籍”的第4号令，使用的是四个盟国的三种语言。号令中对此这样写道：“本号令公布两个月之内所有租书处、书店、书库和出版社须将以下藏书上交至各盟国当局的军事指挥员或其他代表处。”号令中详细说明了哪些藏书须上交，但后面并没有附上书单。然而号令第5条款含有一项明确指示：“所有此号令中提到的出版物和资料必须上交给占领区军事指挥员进行销毁。”[1] 这就意味着此后所有用于历史研究的相关原始资料有可能就此毁掉，因此各个占领区出现了反抗行动，主要由各图书馆馆长带领，并且行事小心谨慎。

尽管几个盟国一直到1947年都是一致采取行动，然而在占领区形成之后，包括柏林在内的苏占区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苏联军管会号令，规定清扫公共图书馆并制订筛除书单，就连私人收藏纳粹书刊也不允许。针对原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的1946年7月6日苏联军管会第203号令这样写

道："此图书馆于1946年9月1日起作为'公共学术图书馆'重新开放。"[2]普鲁士不应再出现在图书馆名中，虽然根本还没有官方废除普鲁士王国。

1946年8月10日盟国管制委员会第4号令又补充了第6条款："占领区军事指挥员可以出于科研目的，从根据第1段条款列出的禁书中，拿出一定数量的刊物样本免于销毁。此类刊物应保存在特殊地点，然而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当局的严格监管下，可由德国学者及其他获盟国相应许可的德国公民查阅。"[3]

这就是毒草柜的"诞生时刻"。

据我所知，西德占领区只有英国人开始设立了这一"特殊区域"。占领国英国也许是想变不利为有利，制定一份纳粹刊物目录集，然而这项工作在50年代初便停止了。[4] 在新成立的西德，盟国高级委员会于1949年9月16日就已宣布第4号令失效，而在东德，苏联联盟部长会议1955年9月20日决定在德国废除高级委员会之时，这条号令才随之废除。

幸运的是，从纳粹帝国的瓦解，或者也可以称为解放，直至新的权力结构的巩固，一些时代见证者真实可靠地记述了这段短得几乎被忽略掉的时期。从苏占区时期到东德成立初期这段时间的事件被记录在案，导致各图书馆馆长们几乎在一夜之间丢了工作。比如什未林梅前州州立图书馆馆长，海斯（Heeß）博士，他对新实施的审查手段坚决表示抗议："我们简直丢尽了脸，这无疑是世界级的奇耻大辱。以前如果有人实行审查，那就代表着污点和耻辱。"紧接着1949年6月22号那天，梅前州州长格林贝格（Grünberg）就签署了州政府对此事的回应："基于当前事实，并考虑到您任梅前州州立图书馆馆长一职，我将即刻解除您的职务。"[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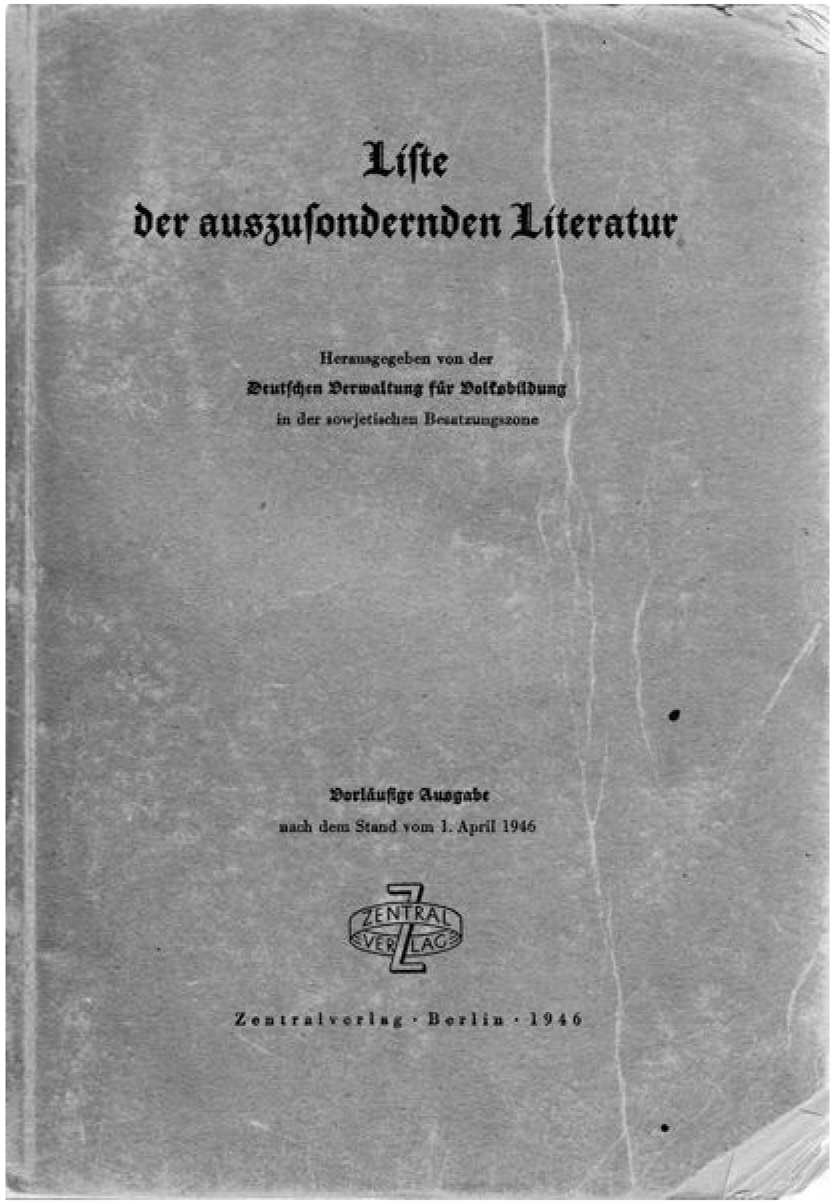


图**1** 筛除书单

在东德图书馆毒草柜的书单调查工作中，“莱比锡书单”扮演了重要角色：“调查工作从1945年开始，随着1953年第三次书单补充本出版而结束。”[6] 1946年的第一份“莱比锡书单”仅包含第4号令中规定的刊物，因此得到了所有占领区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认可，但书单第二次补充本还添加进了“人民公敌”和“社会主义反对派”，也就是斯大林体制反对者的刊物，因此仅在苏占区适用。只有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和柏林公共学术

图书馆即后来的柏林国家图书馆，经允许可以建立大规模收藏禁书的特殊储藏室，其他各公共图书馆所收藏的“莱比锡书单”上列出的图书被化为了纸浆。而苏占区各学术图书馆有例外规定：德国北部城市格赖夫斯瓦尔德、罗斯托克、什未林和柏林，这些地方的大学图书馆应将禁书转交至柏林公共学术图书馆，南部城市耶拿、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相应转交至德意志图书馆。

从1946年第二版“莱比锡书单”的指导说明中就已经能够看出，有关当局开始向“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书籍”宣战了，因为这类书有反苏联现行体制的倾向，并且根据盟国管制委员会号令所传达的内容也有“反盟国”的倾向。[7] 书单补充本罗列出了许多作者姓名，虽然都是正派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也是意志坚决的斯大林反对者或斯大林受害者。这份名单读起来就像一份知识分子名录，其中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受害者有：托洛茨基（Trotzki）、布哈林（Bucharin）、加米涅夫（Kamenjew）、明岑贝格（Münzenberg），等等，等等，等等。此外书单还记录了“幸存者”的名字，像“异党分子”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从那时起，他的书应该不是谁都能在图书馆里借阅得到的了。

这种审查措施带来的“罪恶”对东德学术图书馆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89年11月。德国剧作家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在1987年5月的一次国际作家会议上准确地指出：“我们不能永远将社会不公归咎于希特勒。东德也承担了斯大林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人们以繁文主义的方式对待艺术、文学和戏剧就是审查的后果之一［……］还有国界线上的海关关员询问各种出版物的事情，也是一种斯大林主义残余。”[8] 东德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在1987年11月第十次作家大会上再次主张撤销审查制度，认为审查制度已经陈旧过时、无济于事，并且荒谬、反人道、反人民，属于违法行为而应受到制裁。

德意志国家图书馆1946～1955年的“十年总结报告”毫不隐瞒地对禁书馆的藏书和相关规定进行了说明：“筛除的书籍被集中到柏林公共学术图书馆的一个禁书馆，除了图书馆自己收藏的禁书，还有当时苏占区北德的图书馆的禁书都被送到这里［......］根据作者姓名字母顺序或者根据客观内容对图书分类编目。截至报告时间，藏书量上升至约15万本。这些藏书用于科研目的，如需查阅［......］无论如何要征得负责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国务秘书处的许可。”[9] 第二年图书馆便不再沿用这一规定。1957年第二期的《东德学术图书馆消息》中写道：“参照莱比锡书单及其补充说明实行的图书处理办法被大大简化。”[10] 只要出示“用于科研目的的证明”，馆长和副馆长即可开具图书使用许可，这样问题就由德意志国家图书馆和柏林国家图书馆“转移”到了馆长身上。“禁书馆”既无须废除，也不必理会其他各图书馆多次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要求，还回“本属于它们”的藏书以方便使用，毒草柜也依旧保持着它委婉的名称“特殊科研文献部”。授权使用图书的权利完全被转交到了借阅部主任的手中，分配图书使用权限也还是由学术部负责，学术部在其专业管辖范围内有置备图书的权限，必要时也有推荐图书的权限。需要置备哪些图书从来没有相关规定，所有通过购买、交换，或者赠予置备进来的图书，都放在一个叫做“采购间”的地方，然后学术部负责人亲自来决定每一本书的命运，是正常上架——这个一般很好理解，还是可能要限制某本书的使用权限。设置使用权限有两种方法：分配到ASF或者用红圈标记。

限制图书使用权限最严格的措施是分配到ASF，1946～1989年间共涉及约1万本书（不包括其他图书馆委托在此存放的图书），其中有5860本专题著作，4135份杂志。尽管这些书占总馆藏不到0.2%，[11] 但数量还是令人难以想象，因为柏林国家图书馆超大量采购进来的自然科学技术类书籍和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书籍不进行评定，这类书籍只要确实属于专业文献而不是自然科学家的政治言论，就一律视为“无意识形态内容”或者服从意识形态。

第二种措施是将书名用所谓的“红圈”标记，后来又在书目号后面加了一个“学”字（代表供学术使用）。这些书没有分开存放，借阅也不需要递交特殊书面申请，甚至还可以远程借阅，只需相关的图书馆保证借阅者“仅用于学术目的”。这项限制图书使用权限的措施应用得更多，对于读者来说也更方便。

图书评定结果直接在采购之后或者在第二天拿给学术部主任或借阅部主任审阅，有时主任还会做一些修改，当然修改是比较客观的。

学术部负责人有相对较大的操作空间，能让一本书免于放进毒草柜的命运，比如将其改放到阅览室。必须送进毒草柜的图书要经过“特殊流程”处理，每一本书的书名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学术部负责人完全可以仔细“读一读”那些必须要送进毒草柜的图书，也可以放在办公室一段时间，别人是否也能瞧一眼，要他们个人斟酌决定以及看他们是否愿意冒险。“特殊流程”进行完之后就开始了复杂的“审批手续”，然后书就“不见了”，因为一旦进入毒草室，就再也不能对外借阅了。

学者和艺术家使用毒草柜的限制并没有那么严格，规定是这样的：“以下机构和人员可以查阅图书，特殊情况下可以外借：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及其相关机构（即学术机构）［……］各研究院和高校承担社会科学研究任务的教授和讲师，名流公众［……］学术机构、各党派和群众组织的中央机构、中央国家机关、公众舆论机构和企业重要部门的科研工作者，并且出具工作任务证明［……］能出示学术用途证明的大学生，并有学院领导签字，以及其他出具相关证明的个人，查阅图书的必要性的说明。”[12]

来自东德和西德的外国学生，只要能够证明出于学术学业目的，也可以得到一张“毒草柜通行证”。在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笔下可以找到为数不多的一段关于ASF工作气氛的描述，他对自己在东德的经历这样写道：“我最初的目的是想就关

于第三帝国时期的柏林写一篇博士论文。事实上我在东柏林待的时间还是继续花在了那些档案上，东德各个部门对我使用相关的档案资料设置了非常严格的限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对纳粹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出了共产主义对纳粹政权的反抗事实上是多么的微弱，这种反抗或许已经被盖世太保渗透瓦解，其程度是如此之深。东德最终在这个广泛传播并由共产主义引导的‘反抗法西斯’的神话上得以建立。同时我还在柏林位于菩提树下大道上的原普鲁士国家图书馆里所谓的特殊科研文献部工作，这个部门拥有所有政府不愿让落入普通民众手中的图书和杂志，民间称这个部门为‘毒草柜’。当我读着那泛黄的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时，一位‘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ierzynski）警卫团[13]的高级官员坐在旁边的桌子旁，勤奋地研读着《亮点》周刊[14]和一本西方军事杂志《防御技术》。犹如我的目光从纳粹党报游移到了这位国安部官员，我的兴趣也越来越从希特勒下的德国转移到了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Honecker）下的德国。那时我便决定写一本有关时下德国专制的书。”[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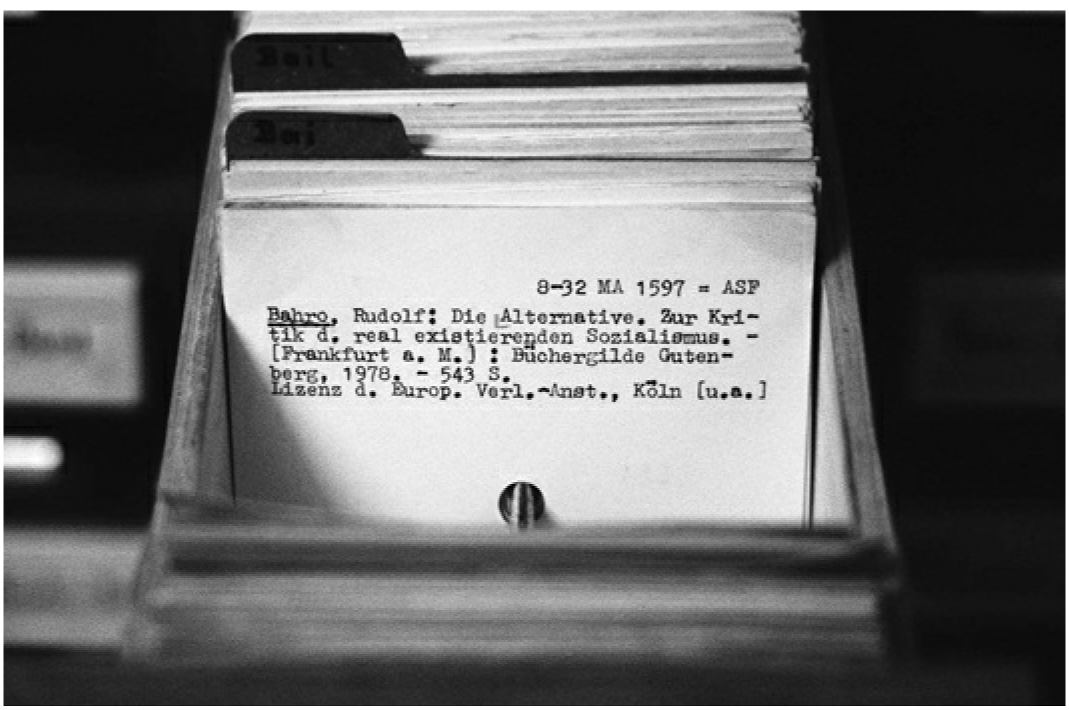


图**2** 东柏林国家图书馆过去使用的书目索引，书目号末尾缩写**ASF**表示该书属

于特殊科研文献部，不可外借，只允许在出示“毒草柜通行证”的前提下在特殊阅览室查阅

在有毒草柜的这么多年里，关于限制什么、怎样限制没有明确的规定。1953年制定的使用规定也仅是对此泛泛概述而已，“至于由内容原因或其他原因并非人人都可以借阅的图书，需要提供用于科研目的的证明”。1961年修订版中的表述进一步解释道：“内容违反和平保护法和民主德国宪法第6章，或者观点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文献仅供学术目的使用。”[16] 柏林国家图书馆一方面是一所对所有18岁以上的公民开放的图书馆，因此也就是一所公共学术图书馆，另一方面它是东德最大的学术综合图书馆，藏书既要有广泛性又要有学术性，限制使用权限是行不通的，就像在很多专业图书馆，只有一部分读者可以借阅有使用权限限制的图书。而和东德其他大型图书馆不同，柏林国家图书馆公布藏书总书目时甚至还突出强调对图书使用权限的限制。和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一样，东德的每一本出版物柏林国家图书馆都要收藏一份，因为所有书目在出版社主管部门和书商那里都已通过了“预审查”，因此也就不加限制地公布于众。[17] 关于1960年迪茨（Dietz）出版社的一本叫做《中国的人民公社》的书，出了一件荒诞搞笑的事情。柏林国家图书馆书目部主任私下里同馆长说：“《中国的人民公社》一书［……］已添置，出版社给出规定，此书必须封存，不能编入图书馆书目。在北京出版的英语版（13 V793）［……］也从书库中下架，转交至禁书馆，不用说，这本德语版也要送进禁书馆了。”[18] 馆长对此的回答是，这本书可以编入字母顺序排列的目录，但不能编入分类编目目录：“先送到禁书馆，适当的时候再补走一遍封存流程。”[19] 但这本书后来并没有编入柏林国家图书馆按字母顺序编制的书目，因为中苏关系交恶时期柏林国家图书馆有一项特例：迪茨出版社作为直属于统一社会党的出版社，应该用各种方法隐藏亲中出版物。

1965年至1967年有规定，要对柏林国家图书馆和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图书设限的实际操作情况进行比较，这项官僚化的规定让学术部的工

作人员感到压力倍增。[20] 从1956年起，两个图书馆有关“图书封存的基本标准”定期进行的书面联系和书单交流情况都被记录在案。当时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副馆长库特·布吕克曼（Kurt Brückmann）在对柏林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赫尔穆特·勒夫特（Helmut Luft）的回信中这样写道：“尊敬的勒夫特同志，您好！柏林国家图书馆希望两馆负责图书封存的工作人员共同合作，孔策（Kunze）教授已将这一愿望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转达给我。我给国家图书馆提过多次相应的建议，［比如1955年2月4日（！！）写给馆长的信］，但很遗憾国图并未考虑这些建议，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现在还是认为应该和相关负责的同事讨论一下实行图书封存的基本标准，从而避免在评定某些作品时出现夸张激化以及草率的现象。我现在的建议是，国家图书馆和德意志图书馆重新检查一下所有模棱两可难以界定的图书，然后以这些图书为例，将基本标准解释清楚，这样也满足了您的要求。”[21] 此外，德意志图书馆对馆内没有的书目也显然提供了错误信息，勒夫特之前给布吕克曼写道：“我们在检查贵馆每个月寄来的禁书馆书目时发现了一些出入，比如在贵馆封存的362本书中，我们的禁书馆里有75本，而有68本仅仅标记了红圈（供学术使用）。”[22]

1965年的“校准书单”上（档案里现存为数不多的书单之一）发现有62处出入，一位学术部负责人被要求对此进行书面解释，为什么和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不同，有些书只用红圈标记或者根本未设使用限制。为什么没有将《没有陪伴者：占领区交界另一边的287个对话》[23] 这本书改放进ASF，这位负责人提出的理由是：“这本书认为东德的发展变化值得关注，在西德普遍流行的关于东德的各种看法中，这本书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如果对这样一本批判西德统治界流行观点的书加以比红圈还要更为严格的限制，我会感到很可惜。”[24] 后来这本书没有收藏进ASF，也只有少量图书由“未设限”改用红圈标记，说明了这位女同事的坚决，此外很多其他事件也都仅仅涉及学术部的女性同事。

东德还有很多学术图书馆通过一定的外汇储备或者其他途径购置西德图书，这些书在图书馆里也一律封存，甚至包括由东德资助的左派出版社，比如帕尔—鲁根斯坦（Pahl-Rugenstein）出版社的图书。[25]

由于缺少明确的图书封存标准，就连柏林国家图书馆里也出现了各种荒谬的事情，比如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1971年版的《理论与实践》被驱逐进了ASF，而1963年的第一版可正常借阅。大致浏览一下柏林国家图书馆哲学类书籍的新编系统化书目和字母顺序编排书目的微缩胶片就能看出，大部分进了ASF的图书只是那些所谓的公开“煽动性书刊”，或是被认为有这一倾向的书刊，归为这类书刊通常只需要一个有挑衅性的书名就够了。所谓的“大众哲学”，也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类书刊一般不封存，但如果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社会哲学家狄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等，就要用红圈标记。公认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作品毫无疑问归入ASF，而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书只用红圈标记。相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东德批判家鲁道夫·巴赫罗（Rudolf Bahro），后来还有罗伯特·哈费曼（Robert Havemann），就不是红圈标记，而是受到归入ASF的待遇。

毒草柜废除之前并没有得到时任柏林国家图书馆总领导迪特·施密特迈耶（Dieter Schmidmaier）的明确指示，图书使用限制在1989年秋的转折点后直接被默认为不复存在，一场持续多年的呼声响起，要求图书馆出具准确的封存书单，毒草柜在这场呼声中被彻底废除。图书馆本有的藏书“正常”保存，代替保管的图书归还原主，感兴趣的专业图书馆可以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获得剩下的样书。柏林国家图书馆从1991年到1999年间展开了非常费时费力的清理工作，因为禁书馆里收藏了各种完全不同的资料，要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归类和“分配”相当费力。原先来自柏林市立图书馆和柏林、格赖夫斯瓦尔德、罗斯托克、什未林大学

图书馆的藏书被送回，本有的藏书正常编排进总库存，这样，至1999年4月29日ASF被废除。[26] 图书馆内部经过简短讨论决定不再向旧书商供书，始终没有人愿意收藏的图书可以在监管下进行销毁。

随着东德时代结束，“莱比锡书单”也就此画上了句号吗？可惜没有。作为一份特殊的图书目录，“莱比锡书单”在每所学术图书馆的开架图书中都能见到，并且吸引着政治上右倾激进的读者。书单在80年代盗版盛行，90年代以来犹如雨后春笋般在网络上传播。现在来看，柏林国家图书馆在处理封存图书的过程中，将ASF里既找不到原主又没有读者收留的图书在监管下进行销毁，可以说走出了高度负责又有预见性的一步。

---

[1] *Amtsblatt des Kontrollrats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46，S.151.

[2] Hamann，Olaf1945年7月12日讲道：“我允许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投入使用［……］” In：Jahrbuch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Bd.XXXIII. Berlin 2006，S.256。

[3] *Amtsblatt des Kontrollrats in Deutschland* ，S.151. Ergänzung vom 10.8.1946.

[4] Thies，Dirk：*Zum Erb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ibliotheken Nordrhein-Westfalens* . In：Mitteilungsblatt/Verband der Bibliotheken des Landes Nordrhein-Westfalen e.V.3/1988，S.190-204.

[5] Konieczny，Brigitte；Borchardt，Jürgen：*Bibliotheken-Von der antifaschistischen Säuberung der Bestände zur stalinistischen Gleichschaltung* . In：Zwischen Hoffnung und Verzweiflung：*Protokolle von Zeitzeugen aus Schwerin 1945～1952* .由梅前州首府什未林文化局及什未林注册协会未来工作室编辑，1995，S.23。

[6] Steigers，Ute：*Die Mitwirkung der Deutschen Bücherei an der Erarbeitung der Liste der auszusondernden Literatur in den Jahren 1945～1951* . In：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3/1991，S.242.

[7] Steigers，Ute：*Die Mitwirkung der Deutschen Bücherei an der Erarbeitung*

der Liste der auszusondernden Literatur in den Jahren 1945～1951 . In：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3/1991，S.246.

[8] 1987年5月在国际作家会议上的讲话《柏林，一个为了和平的地方》［Müller，Heiner：*Krieg ohne Schlacht. Köln* 1992，S.420（Dokument 19）］。

[9] *Zehnjahresbericht der Deutschen Staatsbibliothek 1946～1955* . Berlin 1956，S.37.

[10] *Nachrichten aus dem wissenschaftlichen Bibliothekswes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2/1957* ，S.10.

[11] Schubarth-Engelschall，Karl：*Die Sperrbibliothek* . In：Das Stichwort 4/1991，S.40-42.

[12] Schubarth-Engelschall，Karl：*Die Sperrbibliothek* . In：Das Stichwort 4/1991，S.41.

[13] 隶属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精锐部队。——译者注

[14] 德国时事社会生活杂志。——译者注

[15] Ash，Timothy G.：*Die Akte “Romeo”* . München 1997，S.80.

[16] Amedick，Sigrid：*Macht die wissenschaftlichen Bibliotheken zu sozialistischen Einrichtungen* . In：Bibliothek und Wissenschaft 31/1998，S.119.

[17] 由于各种原因而遭排斥的作家，即使其作品在东德出版，各公共图书馆也不予以收藏。这些图书没有规定必须存档，如果下架，该书在图书馆的书目中也将被删除。

[18] Archiv SBB，Konvolut ASF，Mappe “Abstimmung Zugangslisten”，21.10. 1960.

[19] Archiv SBB，Konvolut ASF，Mappe “Abstimmung Zugangslisten”，21.10. 1960.在本页手写添加的说明。

[20] 本文作者通过研究档案才了解到这一暂时性规定，可能该规定令相关工作人员非常为难。我在柏林国家图书馆任职期间，也就是1979年至两德统一这段时间该规定已撤销。

[21] Archiv SBB Konvolut ASF Mappe Abstimmung Zugangslisten，22.10.1956（原文中使用感叹号）。

[22] Archiv SBB Konvolut ASF Mappe Abstimmung Zugangslisten，24.9.1956.

[23] Apel Hans（Hg.）：*Ohne Begleiter.287 Gespräche jenseits der Zonengrenze* . Köln 1965.

[24] Apel Hans（Hg.）：*Ohne Begleiter.287 Gespräche jenseits der Zonengrenze* . O.Dt.（1965）.

[25] 为什么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始终没有考虑实行一种“更温和”的图书封存措施，为图书馆史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有任何想法意见，笔者将表示感谢。

[26] 如想了解具体数目，可参阅历史出版物部门1996～1999年的各年度报告。In：*Jahresberichte Staatsbibliothek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1996～1999* .

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

——德语总书库及其特殊背景

乌尔里克·格斯勒（Ulrike Geßler），詹妮弗·霍赫豪斯（Jenifer Hochhaus），克斯汀·施密特（Kerstin Schmidt）

在众多出版商和书商的倡议下，经萨克森州、莱比锡市以及位于莱比锡的德国书业联合会三方协议，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于1912年10月3日建立。作为德语书刊总书库，“该图书馆不仅承担着书籍收藏任务，收集自1913年1月1日起在德国出版的德语和外语书刊以及在国外出版的德语书刊，而且负责编制书目并无偿提供查阅使用”[1]。鉴于德意志图书馆编辑和出版的各类德语要目，如1931年编制的“德国国家书目”，它已发展为国内著名以及世界知名的图书馆，渐渐显示出在德国图书馆中的特殊地位。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后，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与1946年创建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国家图书馆及柏林德国国家音乐档案馆共同组成了“德国图书馆”，2006年更名为“德国国家图书馆”。“德意志图书馆现在官方名称为莱比锡德国国家图书馆，以1350万件馆藏量成为德国最大的图书馆，也是德国国家图书馆的最大馆所。”[2]

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在东德图书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过去东德图书馆体系的特点是划分为“综合学术与专业学术图书馆”及“国家普教图书馆”。[3] 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与柏林国家图书馆都属于综合学术图书馆，由于书籍涉及学科广泛也被称为“全能型图书馆”，这两所重要的学术图书馆辐射区域广泛，覆盖了所有学科，尤其服务于科研与教育。因为收藏着众多包括1913～1945年出版的各种书籍的唯一样书，德意志图书馆还对东德的科学与实践具有着特殊意义。

柏林国家图书馆和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在东德时期占据重要地位，二者以分工的形式实现了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功能与作用，其中重点在于负责完整保藏国家文献、制定国家书目以及提供相关信息咨询。两个图书馆的分工与界定是这样的，与德意志图书馆相反，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出版物是完全因其学术价值而购进的，也就是不限国家、语言和图书类型。[4] 除此之外馆藏量也不同，至1987年12月31日柏林国家图书馆总馆藏量为500万件，而同一时间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为8336061件。[5]

德意志图书馆隶属并直接由政府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部指导，1967～1970年部长为恩斯特-尤阿西姆·吉斯曼（Ernst-Joachim Gießmann），1970～1989年为汉斯-尤阿西姆·波墨（Hans-Joachim Böhme）。和所有其他图书馆一样，德意志图书馆也是东德国家直属机构，担负社会教育职能，作为学术型图书馆负责对原著书籍的保护、保养和研究，在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经济及技术发展方面的作用尤为重要。同时实现文化教育的任务和保护进步的人文传统也是对德意志图书馆及其他东德图书馆的要求。在图书馆藏书结构、信息传播及开发文献方面意味着宣传社会主义和人文主义书籍，抵制按照统一社会党的观点与上述目标背道而驰的出版物。

作为德语总书库及一个学术型图书馆，德意志图书馆负责采购、收藏并供外借的书刊中会含有一些似乎对东德不利的意识形态内容，因此图书管理员特别负有“为党”把关的责任，不按照一般程序提供这类书籍的借阅，而是仅供学术研究使用，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实行一种根据社会和学术需求而不尽相同的图书借阅政策”[6] 。长年担任柏林国家图书馆馆长的霍斯特·孔策（Horst Kunze）在他所著的图书馆学教科书中对此进一步阐述道：“这种根据不同需求而定的图书借阅方式与过去的审查措施无关。在我们的图书馆里书籍的价值无疑是按照它们的社会效益来评定的，一方面我们尽可能多地购进并借阅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书刊，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根据学术需要购进非民主主义书刊。东德的图书

馆内不存在专制独裁意义上的禁书，借阅准则是认真负责、量体裁衣并考虑到各种实际需求的。”[7]



图**1 80**年代的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

图书筛除——东德时期德意志图书馆封存图书及其内容概要

德意志图书馆在承担德语书刊总书库职能的同时，是按照形式上的标准来购进图书，而非内容上的标准。这种藏书方式要归结于1912年时的建馆决定，规定无论于哪个国家出版，所有德语出版物都要收藏。

不对图书内容做评论而完整收藏所有图书，在德意志图书馆的历史上有时并非易事。为遵守1912年的建馆规定，德意志图书馆对图书进行分开保存，这样当时在东德受到禁限令的书刊也可以收藏进来。比如纳粹独裁时期，由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划为德语书刊以外，也就是列为禁书的书刊也可以收藏，但不允许录入《德国国家书目》，所以要单独保存。

色情书刊早在苏占区和东德成立之前，就已经保存在德意志图书馆的特种书库中。到了东德时期，单独存放的图书主要不仅有色情书刊，还有记录在“筛除书单”里的、传播或支持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图书。该书单由德意志图书馆根据苏联驻德军管会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指令于1946年制定，并由德国国民教育中央管理局编辑出版，经1947年、1948年和1952年分别补充后，共包括35000个书目。[8] 这些书目在当时苏占区的图书馆和书店里统统下架，德意志图书馆先进行封存，然后送至“特殊科研文献部”。

在制定“筛除书单”的过程中，尤其伴随着一种未来社会主义国家产物的建立，另一部分筛除书目也已随之而来。1948年4月7日，德国国民教育中央管理局主席在苏联驻德军管会的建议下，出具了一份新的需要剔除的作者名单，这些作者被视为斯大林路线的异党分子，背后被贴上反社会主义的标签。戈特弗里德·罗斯特（Gottfried Rost）对此补充说明道，图书封存的标准“模糊不清［……］并且依赖于各自的政治气候”，“没有正式的说明，无论怎样都找不到相关的说明。哪些书要封存，这一问题的责任落到了图书馆和所涉工作人员的‘阶级意识’上［……］”[9] 。根据1950年颁布的《和平保护法》，接下来的时期图书馆加强了对图书的封存管理，根据这部法律，违背社会主义者以及宣传军国主义和支持“英美帝国主义”者将受到监禁的严惩。

东德时期德意志图书馆设置使用权限、被封存并列入“特殊科研文献”的书刊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色情小说和有色情倾向的作品，以及出于外在形式而享受特殊保护的出版物。第二部分为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书刊，也就是出现在筛除书单上的。第三部分是“在当时看来反社会主义阵营及其和平理念”的政治类书刊。[10]

这些书刊在图书馆书目中均可查到。相反，需保密的博士论文就有

严格的使用限制，既在书目中查不到，图书馆藏书目录册里也无证可循，一部分曾被从目录册中删除，并且从1977年起也不再按规定对博士论文编目。

就像如今还时常说的那样，德意志图书馆封存的图书并非一所“大型西方书刊保密柜”，[11] 西德、奥地利以及瑞士德语区的大部分书籍是可以通过正常程序借阅的。[12] 为了遵守1912年的建馆决定，德意志图书馆在采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刊时也投入了很多心血，比如同西方各出版社保持联系，出差，参加书展，将极大的一部分必须收藏的西方书刊免费采购进来。并且1961年海关不再查封寄给德意志图书馆的书刊，接下来的时期西方国家各出版物就可通过“特殊进口许可”畅通无阻地进驻德意志图书馆。

1989年政治大转折之后，第三部分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类“封存图书”成为德意志图书馆自由开放馆藏的一部分，大约包含10万本书。[13] 法西斯主义和色情书刊依然保留使用权限。

德意志图书馆特殊科研文献的使用规定

特殊科研文献部的藏书并非完全不能借阅，在特殊条件下可以查阅，1962年出台了《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国务秘书处针对柏林国家图书馆和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特殊科研文献的使用规定》。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国务秘书处，也就是1967年成立的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部的前身。哪些人可以查阅有特殊使用限制的图书，以及在个别情况下外借，国务秘书处对此是这样定义的：

·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及其相关机构，出示经批准的借书证

·承担社会科学研究任务的教授和讲师

·名流公众，能够出示身份证明及工作证明或者学术用途证明

·学术机构、党派和群众组织的中央机构、中央国家机关、公众舆论机构（新闻、广播、电视、电影）和企业重要部门的科研工作者，并且出具工作任务证明

对于以下情况封存图书仅供查阅：

·出示学术用途证明的大学生，并有学院领导签字

·其他出具相关证明的个人，说明查阅图书的必要性[14]

在出示特殊证明及读者证的前提下，读者只允许在特定阅览室查阅这些图书，[15] 并且“不允许在阅览室里私自交换书刊［……］”[16] 。

学术用途证明必须使用委托方的信头纸，注明论文或科研题目、学术论文类型及证明开具日期，而作为支持使用特殊科研文献的书面证明应由国家级相关负责的部门领导签字，如果是高校学生和学者，应由学院院长或副院长签字，如果是专科学校，应由校长签字。是否能使用特殊科研文献就在于这一份书面证明。[17] 50年代时，图书使用权限由政府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部决定，之后几十年由总馆长赫尔穆特·罗许（Helmut Rötzsch）博士或特殊科研文献部的领导决定。此外，违反基本规定的读者，经特殊科研文献部领导申请，总馆长有权禁止其一段时间内或者长期借阅此类图书。

这种支持使用特殊科研文献的书面证明有效期为一年，特殊情况下说明缘由，可由总馆长或特殊科研文献部领导规定一个新的有效期。[18]

还有借阅特殊科研文献的证明有效期也为一年，报刊和非装订杂志不算在内。

只要有版权许可并经部门领导特别同意，也可复印图书、报纸和杂

志中的内容。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允许个人复印。申请复印必须递交委托方盖章和签名。[19]

---

[1] http：//www.d-nb.de/wir/ueber_dnb/geschichte.htm（Stand：15.4.2007）.

[2] http：//de.wikipedia.org/wiki/Deutsche_B%C3%BCcherei（Stand：15.4. 2007）.

[3] 参阅 Kunze，Horst：*Grundzüge der Bibliothekslehre* （以下简称：Bibliothekslehre）.4.，neubearb.Aufl.，Leipzig 1976，S.36。属于国家普教图书馆的有各城区图书馆、教区中心图书馆或者也包含乡村中心图书馆。

[4] 参阅 Kunze，Horst；Rückl，Gotthard（Hg.）：*Lexikon des Bibliothekswesens* . Leipzig 1969，S.196。

[5] 参阅 Krieg，Werner：*Einführung in die Bibliothekskunde* . 2.Aufl.，Darmstadt 1990，S.34。

[6] Kunze，Bibliothekslehre，S.30.

[7] Kunze，Bibliothekslehre，S.30

[8] 参阅 Mix，York-Gothart：*Das richtige Buch für den richigen Leser und die falschen Bücher von Leo Perutz，Armin T.Wegner und Karl Kautsky. Öffentliches Bibliothekswesen，Volksbildung und Zensur in Ostdeutschland zwischen kulturpolitischer Entnazifizierung und Stalinisierung（1945-1953）* . In：Vodosek，Peter；Marwinski，Konrad（Hg.）：*Geschichte des Bibliothekswesens in der DDR* （以下简称：Geschichte）. Wiesbaden 1999（Wolfenbüttler Schriften zur 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31），S.118。

[9] Rost，Gottfried：*Tradition auf dem Prüfstand. Die Deutsche Bücherei in den Jahren der DDR* . In：Vodosek；Marwinski（Hg.）：Geschichte，S.141.

[10] Rost，Gottfried：*Die Deutsche Bücherei als "Loch in der Mauer"* . In：Lehmstedt，Mark；Lokatis，Siegfried（Hg.）：*Das Loch in der Mauer* . Wiesbaden 1997（Schriften und Zeugnisse zur Buchgeschichte；10），S.135.

[11] Rost，Gottfried：*Die Deutsche Bücherei als "Loch in der Mauer"* . In：Lehmstedt，Mark；Lokatis，Siegfried（Hg.）：*Das Loch in der Mauer* . Wiesbaden 1997（Schriften und Zeugnisse zur Buchgeschichte；10），S.135.

[12] Rost，Gottfried：*Die Deutsche Bücherei als “Loch in der Mauer”* . In：Lehmstedt，Mark；Lokatis，Siegfried（Hg.）：*Das Loch in der Mauer* . Wiesbaden 1997（Schriften und Zeugnisse zur Buchgeschichte；10），S.136.

[13] Rost，Gottfried：*Die Deutsche Bücherei als “Loch in der Mauer”* . In：Lehmstedt，Mark；Lokatis，Siegfried（Hg.）：*Das Loch in der Mauer* . Wiesbaden 1997（Schriften und Zeugnisse zur Buchgeschichte；10），S.136.

[14]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Hausarchiv，Akte 721.

[15]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Hausarchiv，Akte 721.

[16]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Hausarchiv，Akte 721.

[17]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Hausarchiv，Akte 721.

[18]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Hausarchiv，Akte 721.

[19]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Hausarchiv，Akte 721.

我爱德意志图书馆

——讲述一份对图书的热爱之情

西格马尔·福斯特（Siegmar Faust）

也许难以想象，我曾经爱着德意志图书馆。从没去过大学图书馆，因为在德意志图书馆里我感觉太好了。1968年我被驱逐出莱比锡，之前两次被强制注销学籍，也从预备党员的名单上划掉了，一时没有任何机会，最多也就是在哪儿当个帮工。通过换房子我又回到了莱比锡，然后开始找工作，突然看到我喜欢的德意志图书馆打出的牌子上写着“招聘夜班门卫”，我马上就递了申请。

图书馆有一位相当讨人喜欢，长相又不错的女领导，这太少见了，我马上跟她说起我的情况，那时我还年轻，有三个儿子。她说：“这不可能。社会主义里没有人会活不下去。”又说道：“我们这曾经有位演员，因为在台上讲笑话进了监狱，然后到这来劳教，现在又重新回到舞台上了。我们也会让您的生活变得好起来的。”她是个很乐观的人。他们虽然决定录用我，但不是马上就雇用，因为要等到干部档案和机密卷宗寄来才行，而且是信使投递，不是通过邮政，这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等我再去报道的时候，她既平静又郁闷地说：“福斯特先生，情况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糟糕，但我答应过您的，虽然要冒一些风险，我还是愿意雇用您。”这样我就成了德意志图书馆“权限受限”的夜班门卫。我不能进馆长办公室，不能进需要用特殊钥匙拧开检查钟才能打开的房间，我只能在外面四周和里面沿着走廊检查。我的门卫室里有所有房间的钥匙，但只能进亮着灯或者开着窗户的房间，而且这里也不像监狱那样，房间号都写在了钥匙上，或者写在窗户下从外面就能辨认出，这里我只能从外面认出是哪一楼层，所以必须一直带着一大串钥匙。当然，

我这试试那试试，用这种办法一步一步最终还是进过了每个房间，因为总可以找借口说：那有一扇窗户开着。没有人能仔细地查我，所以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接下来说说“毒草室”。这个经严格审查的阁楼间存放的书籍被归为法西斯主义、色情、非人道或者反马克思主义一类，也就是属于危害国家的书籍，所以这些书不能外借，只有出示证明才允许进去查阅。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从文学院的老师克劳斯·施泰因豪森（Klaus Steinhaußen）那得到过一张证明，所以进去过毒草室一次，我当然还想再进一次，但是比较困难，我虽然有钥匙，但钥匙是密封着的，只有在起火、发水或遭雷击的时候才可以用。

接着我发现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进毒草室，每天都有几千本书进来，可以说是一车一车的，我可以安全地进入图书在分类之前存放的房间，因为那些房间应该有一扇窗户是开着的。这就是最纯粹的金矿啊！这有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那是德国作家、批判家恩岑斯贝格（Enzensberger），这又有德国诗人贝恩（Benn），所有我感兴趣的禁书都有，还有五花八门的报纸！

我一直都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始终都是左派的。我在图书馆里由着自己的兴趣读起左派报纸，读到毛泽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德国社民党青年团和共产主义者这些人之间如何互相争斗，这些东西让我大大醒悟，他们之间的斗争比同阶级敌人的斗争还要激烈！这种多元论，西方的多元化，太不可思议了！当然我也开始迷惑起来，我的脑袋里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真理，我坚定的认为由低级走向高级是历史发展规律，而现在一切都动摇了。还有各种宗教，也几乎同样地相互争斗着……种种这些争论先是让我感到害怕，然后实在让我感觉像受到创伤一样疼痛。

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被带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我读了很多

书，但很难消化理解，我的人生里再没有过如此般读书成瘾，心醉神迷。我迫不及待地期盼夜幕降临，然后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书堆里干我的小坏事。渐渐地我一个人应付不来，所以叫来我的朋友们一起探索发现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东西，当然也有不喜欢的书，比如什么联合国组织有关X射线防护屏的文件等。我完全能感觉到，上级已经说不出都有哪些东西已经深受其害。这是指西德！这里还从来没有指过东德。实属不易！但依然其乐无穷。

还有具象诗。知道吗，如果您读奥地利诗人恩斯特·杨德尔（Ernst Jandl）的诗，您会认为是儿戏！但如果听他的诗，然后……然后常常就会恍然大悟。还有唱片，有些唱片我们就在夜里放着听。比如说具象诗。听杨德尔阐释它的诗歌“战壕”，会感到宇宙般的神奇力量！整个战争都被融进了语言里，我这才意识到，不能肤浅地取笑那些背后隐藏着的东西。我有很多美妙的发现，那是我人生最如痴如醉的一段时光。我那时不喝酒，也不喝咖啡，读书是我唯一的兴奋剂。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愿意永远生活在这个图书馆！

好戏在后头！那些刚拆包等待归类的图书，其中也有禁书，我每次都从堆着这些图书的房间里非法借点东西出来周末看，因为不可能在那么短的夜里读完所有禁书。索尔仁尼琴的《癌症病房》第二部，是菲舍尔（Fischer）出版社出版的平装袖珍书，售价3.8西德马克，可以说成了我的灾难。星期一，不对，星期日晚上我刚想把这本未经允许借出来的书放回书堆，可突然发现房间被锁了。我的前任，一直白天执勤的，告诉我说很多值钱的书不见了，然后搜包检查，我当时一点都没觉得跟我有关，心想3.8马克，不是什么值钱的书，幸亏我把这本《癌症病房》藏在了我门卫室的护墙板后面。这还没完，房间锁了一个星期，一周以后门被打开，我又进去了，突然一个手电筒冲我照来——呃，是个圈套！没错，然后刑事警察科搜查住宅。他们当然没找到那本书，只能又把我放了。他们没有找到能定罪的证据，但是发现了我的日记本，里面

夹着一封信，是我写给在西德埃斯林根的左翼出版社“布尔根（Burgen）书社”的，出版社想要出一本东德诗选。我去了馆长的房间，馆长大概叫罗许（Rötzsch）？他的写字台收拾得一干二净，只放了一张纸在上面，是布尔根书社的一封信。出版社之前就已经联系过作家协会和文化部，因为他们要为出版东德诗选请求翻印许可，但没得到答复，试了四次都没成，第五次他们联系了德意志图书馆，想找到我的朋友格尔特·诺伊曼（Gert Neumann），但不知道他住在哪之类的。格尔特已经和海德·黑特尔（Heide Härtl）结婚了，并随了她的姓，现在也就叫格尔特·黑特尔（Gert Härtl）。即使他愿意帮忙，但出版社根本就找不到他，所以很显然，我必须得插手这个事情，于是我给布尔根书社写了一封信，可刑事警察科在我的日记本里发现并且带走了这封信的复本，几个小时以后国安部的人来了。这就是我1971年第一次被拘留的原因。就这样。

对德意志图书馆的热爱至今仍然在延续，我周二那天还又去了一次，很美好，我非常享受那种氛围！虽然人已经上了岁数，但又找回了那种兴奋的状态。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喜爱图书！而且我12年来都没有电视机，不然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读书。说句实话，电视看得太多，人也就和生活脱节了。

［2007年9月27日雷纳·埃克特教授（Prof.Rainer Eckert）的专题讨论会后记录而成］

隐喻中穿行

——“毒草室”体验 [1]

伊莲娜·德姆克（Elena Demke）

因为要借某些书刊，我便有了一张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的“毒草柜通行证”，那是1988年，通行证还真管用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我作为一个学日耳曼语言文学的学生，经常见到借书单后来被盖了一个章，原文怎么写的我记不得了，但实际上就是“只有持有毒草柜通行证”……

和我在图书馆读了哪些书比起来，通往“毒草室”的那条路在记忆中显得更为清晰。从主楼的侧厅上楼，我紧张地打开一道门，然后又是一个楼梯口，这道楼梯一直通往一个旋转楼梯，我一下又来到了一扇带舷窗又很难打开的金属大门前，就像过去防空洞的门一样，这扇门后面还有一道楼梯，然后就是前厅了吧？我一直以来都被这种感觉所牵制着，就像在隐喻中穿行……一个又阴暗又狭小的房间里，很少有读者来，图书管理员在柜台后面等着我过来，这才真正把预订的书给我。进那个小房间的时候我很激动，房间在一个玻璃圆顶里，明亮又舒适，我紧张地瞄着其他的书桌，都在那读什么呢？时尚杂志、军事杂志——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毒草室里有要谋反的读者啊！

---

[1] 节选自Elena Demke：*Verbotene Lektüre*：*Zdenek Mlynars “Nachtfrost”*。In：Horch und Guck 3/2006，S.22-24.（hier S.24）。

“他们还是半信半疑”

——一个读者眼中的德意志图书馆毒草柜

托斯滕·泽拉（Torsten Seela）（博士、教授）（S）接受克斯汀·施密特（Kerstin Schmidt）（I1）、戴安娜·施密特（Diana Schmidt）（I2）和詹妮弗·霍赫豪斯（Jenifer Hochhaus）（I3）的访谈

I1： 泽拉先生，请您给我们讲讲所谓的毒草柜，您对此又有哪些经历和体会。

S： 我作为图书馆学教授，非常了解德意志图书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的工作当然也略微涉及封存图书和国家图书禁令。

德意志图书馆有这样一个我们称之为封锁书库的收藏库，这是在我作为读者接触德意志图书馆以后才知道的。当然这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它的大门对我是关闭的，就像童话里谁都不允许进的密室，听说有这么个地方，但从来没见过也根本进不去。当我还是图书馆一名读者的时候，看到借书单上的印章写着“特殊科研文献部/须出示学术用途证明”，心里充满了羡慕和嫉妒，我当时无论如何都弄不到这种证明。

但有一次，在德意志图书馆做实习的时候，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了封锁书库，当时是从书库中挑出那些又被划为合格类的图书，送到一般的收藏库。那时我正在地图收藏部实习，我们收到了一些用于纳粹职业教育宣传的板报，内容就是有关钳工和钻孔这样的手工活，但仅仅因为职业协会的标志里有一个“卐”字，这些板报栏也被封存了，而内容完全没有问题。

这就是我和封锁书库的第一次接触，之后就再没有过，直到我写博

士论文，主题为集中营里的图书文献和读书情况，这样我就迫不得已要和那些封存起来的图书打交道了。这个封锁书库里的书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由于二战后清除行动而筛除的纳粹刊物，第二类是色情图书，第三类是反民主的图书，为写论文我要查阅的是第一类和第三类。但反民主是一个极为模糊的表达，可能包括所有东西又可能什么都不包括。找到了这类图书，您可能会问：怎么能看出有反民主的地方呢？这些就是共产党异议分子写的书，持有一种和东德主流观点不同的观点，所以被归入反民主一类，当然还有表现出新纳粹主义倾向的图书，还有正式的科研文献，出于各种原因被认定为不符合党的思想路线。

简明扼要的说：为了弄到这些图书资料，我必须让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给我开具一张有盖章和签名的证明，证明我有合理要求查阅毒草室的文献，是为学术目的，而非自身娱乐。然后我带着紧张和期盼的心情上了二楼，那有一个通往楼上的旋转楼梯，升降电梯是不允许读者使用的，除非是残疾人，所以我走着旋转楼梯上去，第一次出现在那里，骄傲地出示了证明，然后找出了需要的书。

读者的座位是这样排列的，每张桌子前只能坐一个人，这样我就不能偷偷地和旁边的人一起看书，当然还是能看到一点儿别人在读什么，不过最终还是要出去的，然后会经过各个书桌旁，或者也可以伸长一下脖子，但总的来说别人看了什么书还是不知道。

我在那楼上拿到了相当多的书，每次来的时候，都会被别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一下，即使带着证明来的，也不敢真真正正地使用那些文献资料。我不是党员，在这个国家也没个一官半职，也就没有什么名望，所以他们还是对我半信半疑。

I1：您是怎么意识到的呢？

S：透过工作人员的行为举止。如果读者是他们熟悉的人，你会发

现明显的差别。那楼上的工作人员也都是挑选出来的，都是证明了自己党员身份以及声明了政治立场的人，当然也有了解他们的政治工作和政党工作的或者在东德因为自身政治立场而有一定名望的人去过那里，工作人员对这些人很坦率。而且党员通常互相之间用“你”称呼，这样就制造了一种亲密的气氛，而不属于这个“内部圈子”的人，自然也就被认为是外来入侵者，是不能信任的。

还要说的是，东德的环境氛围至少在这个领域稍微有些病态特征，叫做被追踪妄想症，每个人事先都被认为在寻觅跟他无关的东西，在这里当然也能体现出这一点。当然了，别人对此也从来不能说我什么，因为我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我带来的证明，上面写着博士论文题目，由东德科学院一位学者签字并盖章，因此完全没有问题。但我还是一直感觉到他们对我的一丝不信任，遇到个别书目他们都会再问一遍，我是否真的需用那些预订的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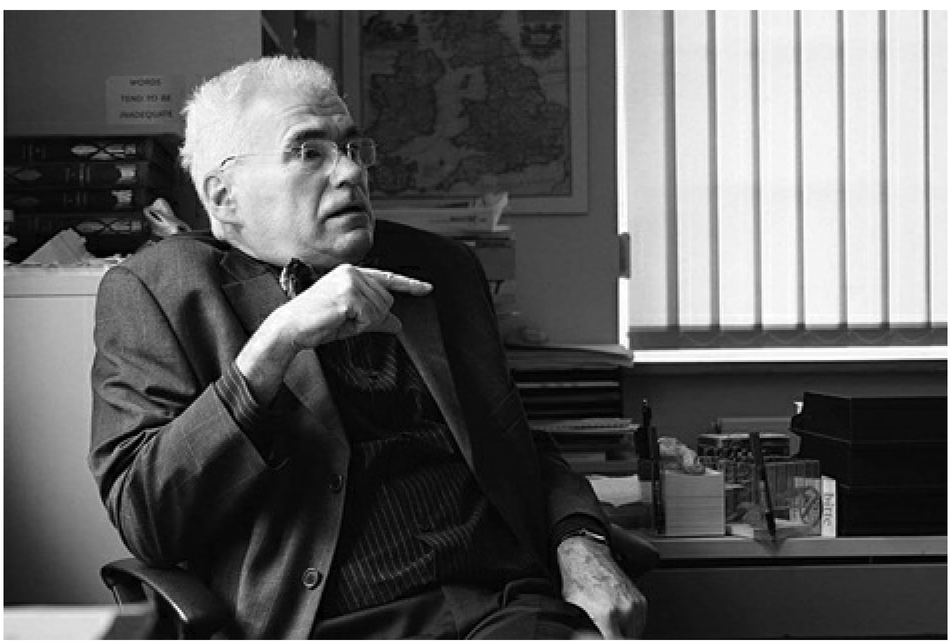


图**1** 泽拉教授在座谈中

I1： 比如说呢？

S： 时间太长了，具体哪些书我叫不上名来，但那些书并不是明显有关集中营或者纳粹追捕，而是写现实问题，其中有些章节与我的论文题材有关。然后他们继续追问，我跟他们说为什么需要这些书，然后他们也表示同意了。但并非一开始就能保证拿到想要的书。

这个封锁书库当然是保管最严密的地方。平时在德意志图书馆里经常有的图书，如果拿不到的话，不是因为图书还在装订工人那，就是还没上架。这种情况在楼上的封锁书库几乎没有，所有想要的书都在那了，所以到头来在那看书工作还是很舒服的，但时间一长，就渐渐习惯了，那种异味风情也就消失了。尽管如此，还是觉得那种情形别扭不自在。不过没有像我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图书馆时感觉那么奇怪别扭，那儿要麻烦多了，有人监视，进馆之前还要履行更多繁琐的手续，从这一点看来，德意志图书馆里还是相对宽松的。也许我说的不对，但我觉得，楼上的大部分图书根本没有封存的必要。像这种很少见的纪事图书也被封存了，比如一个奥地利共产党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做囚犯的往事，他把自己的回忆出版成了一本书，奇怪的是这本书第一版被封存，而之后的版本没有，因为他后来把那些有伤风化的章节删了，但第一版是过了1945年就出版的，所以是最真实最原始的版本，后来的版本明显在党组织施加的影响下进行了编审。就像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

I1： 您是哪段时间经常去那楼上看书学习的？

S： 80年代后期，1984年开始，到1989年。

I2： 曾经有过借书被拒的时候吗？

S： 没有，借书本身被拒是没有的。当然那的藏书也有漏洞，但从来没有不让我借哪本书。当然我必须说的是，我在那看到的书没有任何爆炸性的内容。是看了一些纳粹刊物或者不符合东德意识形态的图书，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机密的东西。

当然封锁书库里也有真正机密的或者仅供公务使用的图书，但我用不到，估计也不会借给我的，这些书有特定的机密等级，只有等级地位高的人才能借阅。有这么一本机密刊物，叫做东德博士论文目录，里面有一些涉及保密等级的内容。看着题目就觉得奇怪，里面能有什么秘密的东西，但有些确实很机密，比如说研究东德民众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财富的，除了一些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有资格外没有人能借到这种书。

I2： 您刚才说觉得自己有点儿像是个局外人，您也感觉到被监视了吗？

S： 是的，那时其实一直被监视，因为他们要注意不能让读者之间有交流接触，不能交换图书。即使不那么显而易见，但监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的，他们操作得比较隐蔽，大家在监视下并不觉得窘迫。

I1： 只是通过目光进行监视吗？

S： 是的。但因为大家专注于自己的事情，看书，做摘录，也就感觉不到了。

I1： 有没有什么教导，教人们应该怎样注意行为举止？

S： 这个没有。每个人被分配一张桌子在那坐下来，就没了。

I3：那个特殊的阅览室里有多少张桌子？

S： 可能有20张。

I2： 从旋转楼梯上去后，那里的环境气氛如何？

S： 穿过一扇钢板门，就进入一个房间，有些积尘，像藏书库一样，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办公，这也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多么舒适的办公

室，就有一张非常普通的桌子，上面放着工作人员用的箱子，里面装着借书单和各种证明。

读者会在借书处拿到一张借书单，上面盖章写着“特殊科研文献库”，然后带着这张借书单上楼，把它交到工作人员手里，第一次借书的话要出示证明。

然后工作人员就认识你了，再来的时候就不用重复这些步骤。一开始的那个工作人员头发灰白，对人特别不信任，后来是个年轻人，管得稍微松一点儿，但接着大家都同样的一声不发：他们把书递出来，读者把书接到手中，就没了。

I2： 您和那的工作人员说过话吗？比如在楼下的咖啡厅？

S： 没有，根本没有过。但我和一位也来这个封锁书库找书的女士说过话，她研究的方向是纳粹主义。但到头来还是没什么说的，很无聊，找不到什么话题，就是聊聊都看了哪些书。

I1： 您对特殊科研文献部还有哪些经历体会？比如说研究过这个部门吗？

S： 没有，我没研究过那些特殊科研文献。我对1946～1947年的图书筛除行动是如何发生的进行过研究，还有筛除书单是如何制定出来的。我对图书目录问题的研究兴趣要大于对图书馆本身的兴趣，另外我还指导了一篇硕士论文就是有关图书目录学的。

I2： 您还能回忆起图书封存的流程吗？

S： 嗯，和对待纳粹分子的复杂流程差不多。首先某些特定作者的作品无论内容如何一律封存，所有希特勒的出版物，还有深受纳粹影响的出版社，他们出的所有刊物也都要封存。第一步工作做起来相对顺

畅。

后续补充工作就要费点工夫，要收集第一步漏掉的东西，这里出于各种原因做得有些夸张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急于服从上级命令。在纯文学作品的处理上就做得比较夸张，因为参照标准完全变了，还有一些明显属于德国文学的作品也遭到了封存，这些作品看起来似乎思想内容粗制滥造，其实并非如此。但当时因为苏占军施加了压力，这项工作必须要尽快完成，以便尽快制定出封存书单。就像俗话说的：“哪儿要刨光，哪儿就会落刨屑”，实行某些必要措施时难免会产生负面影响，一些绝对没有问题的作品也难免遭遇厄运。

I2： 您知道那些封存图书的工作人员都是学什么的吗，是专家吗？

S： 不清楚，他们都是图书管理员，但也是受过基本培训有一定经验的图书管理员，不是这方面一点都不懂的新手。他们都在那工作了很多年，很熟悉图书馆的藏书情况。

I3：我想再回到读者的角度。您说您从书中做了摘录，那您也复印过资料吗，如果有那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S： 我没复印过东西。首先那个时候复印机还不是很普及，虽然文印室里有所谓的静电复印机，但是相当贵，而且特别耗时间，要等很久，所以我当时宁愿用最传统的方式做摘录。

I3：您之前还提到在读博士之前是没有机会查阅这些图书的。是不是一般情况下，只有处在更高的科研层次才能从教授那得到一份证明呢？

S： 不是的，这和高科研层次没有关系，而是看你的研究工作属于哪类题材范围。不一定非是博士论文，也可以是硕士毕业论文或者研究课论文。需要查阅图书的大学生必须出示学术用途证明，由担保人签

字，担保人以他的名义保证不会滥用图书。

I2： 那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担保人的名声是可能被毁了的？

S： 有可能，如果学生有意写一些比如跟新纳粹主义有关的文章，并且以这些图书资料为依据，然后麻烦可就大了。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因为教授当然了解他们的学生，知道他们是否可信。

I2： 您刚刚讲了1946～1947年图书封存工作的流程是怎样的，那之后的几年呢？

S： 同样也是由图书管理员决定。图书在进馆时就已经由相关人员进行过鉴定，决定是否封存，或者必要情况下在正式购进之后决定，最晚也要在编目，也就是所有图书系统地编入图书馆书目时决定是否封存。

但一般情况下这项工作早早就已完成，所以负责图书编目的工作人员在编辑到这些书刊时，还要去封锁书库查阅。然而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决定哪些图书要进封锁书库哪些不进，是一个主观的决定，情况不同，处理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这就明显存在各种灰色地带。比如说什么是反民主？谁来做决定，就由谁的政治立场说了算，看他是共产主义强硬派还是自由派。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一本书经一人之手进入封锁书库，另一个人将同样一本书放进了公共开放书库，还有对色情文学的处理情况也是类似的。至于哪些书要放进封锁书库，界限模糊不定，两种处理结果都很主观。什么书必须撤出公众视线，什么书可以公开借阅，没有明确的规则。

I1： 就是说没有书面规定。

S： 没有书面规定。有一些被用形容词来描述的评判标准，像反人道主义的、军国主义的、反犹太主义的，如果满足这些特征或者似乎满

足这些特征，就要封存。但还是没有明确的标准，对图书的评判既有主观上的变化，也随着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的高低潮时期而变化。东德政治有辉煌的时候，也有稍显逊色的时候，所以人们由此作出的决定也不尽相同。

I1： 那这些形容词对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说也很熟悉吗？

S： 是的，这些词已经以书面的形式写入了图书馆的使用规定："符合这些特征的书籍不向公众开放，仅供科研使用"，这样就能事先提醒读者有一些书籍是借阅不到的。

I1： 图书馆的使用规定有过变化吗，还是多年来只有一套规定？

S： 当然有变化，因为政策方针在变，但基本倾向始终如一。

I2： 那后来图书馆有没有对封锁书库里的图书重新审阅，看看有哪些书可以再挑出来？

S： 是有这种可能，即使有也肯定是偶然的。问题是封锁书库的工作人员较少，但藏书数量较大。他们也有可能什么时候又把书重新放了回去。我估计如果有人在封锁书库看到一本书，然后说在公共开放书库中应该也见过，那基本上是巧合。

我确实在公共开放藏书中拿到过个别书刊，上面有封锁书库的标记，看样子曾经在那存放过。扉页的背面用一个三角形标记，还标注着封存编组，一个小的1、2或者3。

I2： 但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审阅。

S： 这是没有的。因为工作人员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资历来做这件事情。他们在那工作，不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学术能力来审阅图

书，而是因为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信得过。那时候有人就说："他们什么都能胜任，他们是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

I2： 是否在图书馆之外，比如说一些政治部门也进行图书审查？

S： 我觉得没有。图书馆内的审查是有安全保障的，一方面因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始终和党组织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组成了一个党组织小组互相监督；另一方面，这些工作人员属于德意志图书馆的编制，因此对自己的工作行为负责。外部审查是来自国家安全部的，并且始终将德意志图书馆作为整体看待，而不是涉及图书馆某个部门。

“图书筛除”

——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图书使用限制

克劳蒂娅-莱奥诺蕾·泰施纳（Claudia-Leonore Täschner）

所有专制都害怕自由言论，历史上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而具体涉及哪种专制并不重要。禁书单不是最新时代的发明，焚书也只是科学意识形态化的最终结果。所以30年代中期，纳粹分子也已编选出“非主流图书以及禁书书目单”，这些书目尤其涉及的是犹太科学家和作家，他们的作品要从各图书馆一般馆藏中下架并单独存放。1941年起，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所有犹太作家的作品不再单独封存，而仅用红杠标记，并在图书目录中做相应附注。

这些在1945年之后又重新演过。二战一结束，1946年4月1日，苏占区就制定了一份526页的“筛除书单”，由德国国民教育中央管理局编辑出版，到1952年还经过了三次补充，最终长达785页。这样在苏占区的各图书馆和后来的东德又开始了大规模的筛书行动。这些书单除确实包括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书刊外，还包括殖民史、经济史、地理、前德国东部史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因为这些书从广义上看似乎对制造武器弹药有些帮助，还有很多都是无论过去或者现在都对科研非常重要的书籍。最初的图书筛除行动到了40年代基本结束，只有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设置单独储藏室保存被筛除的图书。

如莱比锡大学图书馆1946年的年终报告所记录，在一次特别行动中（额外请了75个人协助并且图书馆闭馆3周），工作人员把所有书通读一遍，然后上交给德意志图书馆的就有11549本。另外大约4000本不在“筛除书单”上，但也被负责检查的工作人员归为可疑图书，这些书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里分开存放，后来又经审阅，其中1350本也被转交至

德意志图书馆。由党组织委派的“莱比锡学术图书馆特别审查委员会”检查各图书馆的书面报告，并在每个图书馆进行抽样检查，之后才给出具相应证明。

接下来的几年里，所有图书馆通常都把政治上有争议的书刊分开存放，相应做好封存标记。各学院图书馆的筛书行动明显远不如大学总图书馆做得细致缜密。我读大学时和后来在大学总图书馆都发现，各学院图书馆还存有很多上面提到的书单中包含的书目。

所谓的封存图书使用规定在每个图书馆各不相同，但都遵照相同的上级规定，一般也都直接反映出了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态度。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国务秘书处1955年7月20日的公文就要求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检查所有涉及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图书，其中“［……］没有照顾到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友好理解的书刊要从阅览室藏书中下架”。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所有批判苏联的图书都要封存。

下面这个例子就反映了当局对1961年建柏林墙的态度。1962年8月1日出台了《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国务秘书处针对柏林国家图书馆和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特殊科研文献的使用规定》，并送达各高校学术图书馆馆长以引起重视并执行相关规定。这类文献首先对以下人员和机构开放：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及其相关机构、各研究院和高校承担社会科学研究任务的教授和讲师、党派和群众组织（包括东德自由工会联合会）以及公众舆论机构的科研工作者，同时出示工作任务证明，大学生须出示由学院领导签字的学术用途证明。纳粹时期有关当局曾使用的是几乎一字不差的表达，即“学术用途”。但实际中也认可只有教授签字的证明。如果是个人借阅特殊文献，必须能够证明查阅图书的必要性，但大多情况下都行不通，所以这些人也就被拒之门外，这里使用的措辞“查阅必要性”弱化了图书使用限制的严格程度。

随着70年代初期两德之间所谓的缓和政策实行以来，东德对封存图

书的处理更为严格了。1971年12月6日的《保护公务机密条例》于1972年1月1日发表在东德法令公报717号特刊，该条例中的第一条如下：“在国际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在民主德国构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就要确保保护公务机密成为社会生活各领域领导工作的一部分［……］。”这一指示在实际中对图书馆资源的利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每一份作为赠阅本上交至大学图书馆的博士论文都要附上一张学院领导开具的可信度证明，如果将来用于国内或国际图书交流以及远程借阅，那么要附上这份证明。海关无一例外地打开所有包裹检查，并查看是否有证明。没有封存标记的博士论文和用于取得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也要拿出来，并把政府指示通知给大学领导。在这些规定出台之前上交的博士论文在远程借阅时也要补审可信度，这一下就涉及所有1945年以后的社科类博士论文和1968年以后的理工科博士论文，于是莱比锡大学的兽医学院可能为了方便起见或因急于服从命令，为了国际图书借阅和交流要封存本学院所有博士论文。莱比锡大学图书馆馆长沙夫（Schaaf）教授提出抗议并规定，如有需要，分别决定每篇博士论文是否需要封存。

1973年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借阅规定补充了一项保护特殊科研文献的条款。这些图书外部用黄色正方形标签标记，里面注明“借阅限制”，并存放在特殊藏书室中，只有固定人员可以进入。无须出示证明就能借阅图书的只有以下人员：莱比锡大学以及莱比锡其他高校的校长和副校长、莱比锡大学各学院院长及统一社会党党支部领导、其他党派支部领导、各城区委员会主席以及莱比锡市长。这些人也有权限给其他读者开具证明，证明有效期为半年。把书带出图书馆外借属于绝对例外情况，需要借阅部领导决定。只要有单独的阅览室，就只能在阅览室查阅封存的书刊。

同时图书借阅手续也被细化。借书需要由领导或一位领导委托人签字，莱比锡书展上从非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西德购进的图书同样要接受极为严格的检查。采购部领导和专业部门负责人一起决定哪些书划为“特殊科研文献”，并且只允许用手递书，录入书目时尤其要署名是哪位工作人员负责整理的。这让莱比锡大学图书馆不止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一位担任高级职务的工作人员，从统一社会党的角度来看政治思想过关，这名工作人员一旦发现相关部门负责人没有给图书附上封存标记或者标记做得不够明显，就会到副馆长那里通报。部门负责人首先要经受思想意识可靠性的考验，专业能力屈居次位。

这些条条框框阻碍了人们获取信息，使人的思想受到束缚。下面几个事例说明了图书馆在实际中操作这些规定非常独断专行。莱比锡托马斯教堂的一位牧师想读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遭到莱比锡大学图书馆一位部门领导拒绝，牧师相当机智地辩解称这本书在1984年引起了广泛讨论，所以他想了解一下，对此他还引用了写进东德宪法的信仰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为依据。这个理由没有作为“查阅必要性”得到认可，接着这本书被这位部门领导从封锁书库中取出单独锁起来，可以说双层隔离，因为他觉得下面的工作人员可能会把这本书秘密取出，有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当然谁也没法保证，你帮了一位读者的忙，他会不会不小心或者大大咧咧地说出去，一旦说出去，图书馆工作人员就有麻烦了，他会因玩忽职守要受到惩罚。



图**1 80**年代的莱比锡大学阿尔贝蒂娜图书馆

不仅政治类图书受到借阅限制，一般的作家像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也有待评定，被开除东德国籍的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同样不允许再在东德出版作品并最后也离开了东德的莱纳·孔策（Reiner Kunze），这些人的作品在公共图书馆里也见不到，或者说从此以后再见不到了。各学术图书馆藏有一些他们的作品，但只有经特别批准方可外借。在这些作品不知要消失于封锁书库中多久之前，工作人员要通读一遍，所以处理时间非常长，有时候超过两年。

此外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借到了右派平民主义历史学家大卫·欧文（David Irving）的作品。瓦尔特·巴尔特尔（Walter Barthel）教授曾经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当过囚犯，同时是德国共产党非法集中营委员会的成员，一个由他带领的大学生工作小组的成员如需要借书，他都给开具必要的证明。到这就是一些从读者的角度举的事例。

80年代时，由各学院图书馆上交至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在评定的过程中，一些在当时根据“筛除书单”应该下架的图书又回到了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所有工作人员在评定新进来的图书时都必须以“筛除书单”作参照，但也会有漏了或者忘了的情况发生！如果我立马把一本书做上标记“libri.sep.F b.v.”然后封存起来，那么这本书正常上架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对于我们图书馆工作人员来说把书收藏进来很重要，这样也许读者在50年或者更久之后又可以借阅了。还好没有等太久，到了1990年各种学术书刊很顺利地从封锁书库中取出，正常上架。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封锁书库中还保存了一些有特殊价值的图书，像第一版、带签名的版本和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版次。此外还有经常被盗的书籍，像收藏家们钟爱的旧版旅行攻略，或者德国探险小说家卡尔·麦（Karl May）的作品，起初是禁书，80年代中期以后以小发行量在东德重新出版。

这里所讲的在东德处理图书的方式不能和其他前东欧集团国家等同看待。在东德被列入禁书单的西方作家，他们的部分作品在波兰、捷克或者匈牙利的书店是可以买到的。

有关借阅图书成功或者被拒的例子还有很多，上面列举的事例说明图书使用限制涉及了各种各样的题材。除了政府下达的规定要统一遵守外，图书馆工作人员多少还有些回旋余地。每个图书馆都有百分之二百遵守规定的工作人员，因此读者并不是每次都能避开这些规定。

希望大家都能明确一点，设置图书使用权限是当时社会制度本身固有的产物，20世纪德国在二战中的专制独裁不可忽视。但此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个人立场对于图书馆的利用以及信息获取可能有着重要影响。

经批准方可读书

——魏玛图书馆1970年至1990年图书使用限制

罗兰德·贝温克尔（Roland Bärwinkel）

审查，确切地说叫事后审查，是东德所有图书馆的一项工作。在某种世界观的名义下，通过镇压行动及政治运动进行的斗争也少不了审查。这里说的审查指的是对图书发行传播的审查，目标针对各种信息传播载体，也就是印刷商、出版商、销售商以及图书管理员。图书馆里的审查是指对图书接收的审查，以阻碍现有的思想财富继续传播，于是读者成为了关注对象。

1945年至1953年制定的篩除书单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以及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已经得到了充分研究，这份书单为东德后期苏占区各图书馆禁书的处理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准则，并且要求所有图书馆领导对藏书以及图书借阅要保持政治警惕性，因此对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长远意义。到了1970年至1990年间，虽然这段时期图书发行传播早就没有了统一的政策方针可依，禁书单也失去了效力，但这项要求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

在对东德图书馆的研究中，到1990年之前始终没有以审查为题材的研究发表。两德统一后，东德图书馆史和图书馆政治学的研究也很少涉及审查题材。90年代中期以来才有一些相关论述出版，但数量不多，东德很多大型学术图书馆至今都未提及它们历史上的这一章节，在长达40年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史中明显缺少审查这一页，印证了审查的确存在并且发挥着作用，也证实了审查的效力及其广泛的影响。

为了避免审查作为一类成型的题材出现在公众视野，人们是如何尽

力避免这一话题甚至将其列为禁忌，这些在相应的文献中都有证可循。80年代的图书馆学典范著作以及文艺学专业字典中都写道，审查在东德是不存在的。[1] 其中审查一词的下面有一条说明，说审查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文化政策。某种无可争辩的论断认为，社会主义既不存在政治上的也不存在道德上的审查问题，该论断的作者针对图书馆领域进一步说道："对特殊文献设置使用权限通常是出于藏书保护的目的，同样也和专制独裁没有关系，就是一种认真负责、'为党把关'、略显不同的图书采购和借阅政策，也就是说考虑到了个人和社会的需求。"[2] 设置图书使用权限就是执行事后审查，该作者对设置使用权限的解释是："鉴于纯文学作为原始文献所具有的价值，各学术图书馆只有在学术或职业用途的条件下才提供使用。此外，内容上违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及道德规范的图书，仅仅在证明学术用途的条件下才能面交给读者。所以对所有宣传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反共产主义或其他非民主思想的图书，都要设置严格的使用权限。"在不断鼓吹宣传的阶级斗争和持续进行的革命背景下，这种对东德图书管理员所肩负的重要责任的解读决定了图书馆的工作，损害了图书馆的意义和价值。民主德国宪法中有一条原文应该是这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推动科研及教育的发展，目标在于保障并充实社会和人民生活"，出自民主德国宪法第13章。

1969年，魏玛国立古典德国文学研究所和纪念馆的图书馆与重要的图林根州立图书馆强制合并为一个中央图书馆。新图书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进行了重要的人事和管理变革，对图书馆工作提出严格的专业要求和政治要求。此外，新馆长在两德统一那年还制定了新图书馆使用条例，为从内部保障审查工作的实施，图书馆工作人员有义务执行审查工作。馆长曾在一封信件中这样写道："对图书借阅许可和图书可用性产生疑问时，所有工作人员有义务向图书馆领导反映情况并进行审查。"[3]

根据信件内容，图书馆是服务于科研和教育的，为各类人员政治进

修和专业进修提供信息，也服务于“所有切实的教育需求”，接着进一步写道：

“然而，内容违反和平保护法和民主德国宪法第6章，或者观点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图书，只有出示书面学术用途证明才可以使用。”东德的每一个学术图书馆都有这条规定。新图书馆使用条例的最后一条表示，其中由于内容原因设置使用权限的图书也包含在内。不管对于读者还是对于工作人员，条例中都没有具体的指示或者明确的指导说明。

这样，一套自主的审查体系就早早融入了图书馆的管理流程。分配完书目号之后，馆长会对有问题的图书进行预检查，虽然所有采购进来的图书之前都已给他过目，但两次检查之间没有关系。馆长最终决定图书的可用度，对图书设置使用权限，从书单和书库中剔除，将已经设限的图书又重新发配到“馆长室”，以便由他一人加强监控，所有这些都任由馆长考虑处理。

这些模棱两可的规定令图书管理员感到非常缺乏法律保障，也会使他们操之过急盲目地遵守规定，当年在魏玛图书馆有过亲身经历的图书管理员们对审查制度的评判也自然是矛盾的。一个事实就是，有些图书馆里根本没有这类违反规定的出版物，相比之下，一些图书管理员认为实行审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往往都是来自西德各出版社的图书出现问题然后被封存，这些图书尤其能对一些调研性工作提供有效的帮助，所以是一种珍贵的财富。此外，明显有些图书管理员回想起来依然认为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除了出于藏书保护的原因，那些“坏书”和“恶书”、“遭道德谴责”的或者出于政治原因“无可容忍”的图书最好也不要向读者开放。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读者和图书管理员有亲密的私人关系，所以他们借书经常享有特殊待遇，这时图书才体现出它真正的用途所在。同时，在排除图书馆内暗中调查和告密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一定的潜在风险，如果本应该封存的图书可供借阅，那么读者也会

发挥“政治思想”性的效力。因此，图书馆的业务部和政治部的领导会很快开具一份“缺少政治警惕性”的证明。一些老图书管理员表示，魏玛图书馆确有其事。

各学术图书馆里实施审查的情况非常不同。各高校图书馆没有严格统一的审查程序，每个地方采用的内部标记符号也各不相同。设置使用权限的出版物通常应使用彩色圆圈或十字标记，魏玛图书馆将出示学术用途证明方可借阅的图书在书脊上打一个红点，位于北德的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采用类似的标记，但为了表明设限等级，再加上额外的标记来区分比如“大众科普图书”或“有敌对倾向的图书”。柏林国家图书馆和位于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应该有一份经审查后的图书目录册，所谓的“可疑”书目被删掉了，直到东德时期结束在各大学术图书馆作为公共开放目录册使用，也作为实行审查的指导工具，这在魏玛图书馆是没有的。还有像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专业的图书管理员可以决定藏书的使用权，对管理员也要评定可信度，[4] 而魏玛图书馆的馆长从未将此事正式提上议程。魏玛图书馆同样也没有在书目卡和图书包装上使用标记来对图书可用度划分等级，比如“被其他学术图书馆借阅”这样的标记也是没有的。如何使用封锁书库，也就是被确切地称为“毒草柜”的书库，还有如何确定读者类别，都写入了图书馆的管理规定中。

审查所涉及的与意识形态相关的专业题材如下：

·19世纪的工人运动：所有西德出版社发行的书刊

·共产国际史：所有西德出版社发行的书刊

·社会民主史：所有西德出版社发行的书刊

·反法西斯主义：其中包含社会民主、社会革命、左倾激进和无政府主义书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或者马列主义以及革命发展问题的书刊

·德国共产党史：所有西德出版社发行的书刊，就连涉及1933～

1945年间抵抗行动的也包含在内

·德国社民党发展史：所有西欧国家的出版物

·哲学、思想史以及社会学：很多重要哲学家的作品在东德根本没有。像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社会学家莱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哲学家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这些人的作品，还有《马克思主义报》发表的作品都没能通过审查，其中还有一部卡尔·马克思的传记。东德公认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阿道夫·莱希魏因（Adolf Reichwein）的唯一一本“西德出版物”也被封存了

同样被封存的还有以下作家的原作：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阿诺·施密特（Arno Schmidt），美国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索尔·贝娄（Saul Bellow），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也有莱纳·孔策和君特·库纳特（Günter Kunert）1976年以后的作品。

也有关于德语作家的二次文献被封存，其中涉及了很多作者的作品，这些德语作家按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列分别如下：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维尔纳·贝根格林（Werner Bergengruen），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海因里希·伯尔，沃尔克·博朗（Volker Braun），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罗尔夫·迪特·布林克曼（Rolf Dieter Brinkmann），保罗·策兰（Paul Celan），莱昂·孚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休伯特·菲希特（Hubert Fichte），玛丽路易斯·弗莱瑟（Marieluise Fleißer），狄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埃里希·弗里德（Erich Fried），麦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很多关于《浮士德》以及歌德生平著作的出版物），君特·格拉斯，彼得·哈克斯（Peter Hacks），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斯蒂芬·赫尔姆林（Stephan

Hermlin），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赫尔曼·康德（Hermann Kant），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乌尔里希·普朗茨多夫（Ulrich Plenzdorf），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8部有关席勒接受史的作品），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相关的所有西德出版物），埃尔温·施特里马特（Erwin Strittmatter），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所有1970～1990年间出版的作品）。

还有文集和诗选也遭到了审查，比如某本合集如果包含或引用了以下作者的文章：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阿尔贝·加谬（Albert Camus），列夫·托洛茨基（Leo Trotzki）。叙事诗和歌曲集即使只印有一篇比尔曼的文章，那么也要设置使用权限。还有“Spectaculum”系列现代戏剧也全部被封存。

此外，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学的一系列重要期刊也设借阅限制：《日耳曼语言文学基础》（所有1966～1989年的期刊）、全部《文本与批评》、《文学期刊》、《指南》以及所有西方国家的教学资料。

还有关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基本著作，比如德国文学家汉斯·迈耶、作家弗朗茨·伦纳茨（Franz Lennartz）、瓦尔特·因德尔（Walter Hinderer）和文学评论家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的作品。

颓废派、荒诞戏剧、抽象艺术、表现主义、流亡文学和后现代主义，这些都是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敏感词。一旦出现有关文学时代、文学类型、艺术团体和文学流派的专业术语，就表明在有计划性和目的性地探讨文化政治。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图书馆的藏书如何深受文化政治局势的影响。鉴于作家莱纳·孔策1976年被东德作协开除，第二年被迫移居西德，馆长要求孔策在东德出版的诗集《纪念册》和《带蓝色印章的信》也要出示“学术用途证明”才可借阅，并被送到特殊地点“馆长室”保存。

每本书的书名或标语、前言后记、索引目录以及作者或编者的名字就构成了这本书的敏感词场，也就成了图书馆的调查对象，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0年两德统一。在图书分类时，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因素及各图书馆特有的标准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在标记使用受限的图书时不再进行具体区分。有些图书的再版不再设限，而有些一直正常对外开放的图书，借阅再版却又要出示一份学术用途证明。

这段时期的政治结盟局势、政治动向尤其是文化政治动向以及两大阵营间的冷战，都决定着肩负审查任务的领导小组采用哪些处事技巧和处理方式，也决定着图书馆各部门的人员配置和行政特点，决定着图书馆所承担的教育任务以及购书和藏书特色。在图书面前的无能、苛刻、不安、顺从、愚昧和自大充斥着东德各图书馆无处不在的审查。审查机制源于社会体制而建立起来，主观性强，透明度低。投机主义、政治责任意识、惧怕决策错误、因祸得福（统一社会党成员去往国外，与西方建立私人联系）还有惧怕被免职，这些构成了审查机制的大杂烩。

还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审查的重点内容有待核实，但是审查的实施通常很独断专行，没有系统性，用学者沃尔克·达姆（Volker Dahm）提出的概念可以称之为“独裁式无政府主义”，这一概念也作为一套理论体系的核心，揭示了东德文化政策的实践特点。这种理论认为，从图书馆的角度来看，自60年代以来图书监管和审查体系没有了统一的指导方针可循，并且无行政能力。

实行审查带来了沉重的后果，特别是在东德这片读书的天地，图书馆是唯一可以让书迷们怀揣着希望去的地方。在实行图书审查的这段时

期，我们完全可以将图书馆称作知识宝库——掩藏了知识的宝库。

---

[1] 参阅Kunze，Horst（Hg.）：*Lexikon des Bibliothekswesens* 。2.，neubearb. Aufl.，Leipzig 1975.2 Bde.Träger，Claus（Hg.）：*Wörter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Leipzig 1986。

[2] Kunze：*Lexikon des Bibliothekswesens* . Bd.2，Sp.1527. Hervorh.D.Verfassers.

[3] 馆长于1969年3月20日写的信件。Klassik Stiftung Weimar，Goethe-und Schiller-Archiv，Institutsarchiv，Nr.2140，Aktennotiz vom 7.3.1972.

[4] Ferret，Christine：*Die Zensur in den Bibliotheken der DDR* . In：*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4/1997* ，S.401.

图书展览与图书盗窃

大千世界馥郁芬芳

——莱比锡国际书展与秘密阅读

帕特里夏·F.采卡特（Patricia F.Zeckert）

几十年以来，莱比锡书展一直陪伴着东德的书迷们，在书展上读书既有秘密非法式的，也有耐心公开式的。参观书展不仅为了接触到西方图书，也为了走出东德图书市场，扩大见闻。东德国家安全部文献管理员为我们研究莱比锡书展上的读书情况提供了相关档案资料，本文将对研究结果作以介绍。由于资料有限，研究重点仅限于70年代初至1989年和1990年的和平革命这段时期。

二战后，莱比锡又逐渐开始定期组织书展。当然最初参与的书商还有图书都很少，但图书展销会就像莱比锡博览会一样，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后来就借助博览会的平台，书展和其他各行业的展会一并举办。战后的几年，各出版社还没有固定的展会场地，到了1963年秋，城区的集市上新建了一座展览馆，这样一直到两德统一后的几年，各出版社总算找到了归宿。这座展览馆有五层展厅，只有四层给出版社使用，最顶层展出的是和图书类似的危险品，也就是武器。

书展开办的最初十年里，参展商和图书数量几乎在持续增长，[1] 令书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总共有600～1000家出版社参展。通常西德各出版社都以集体形式参展，只有少部分有独立的隔间，所有来自西德和西柏林的出版社中，在集体展台参展的约有200家，约40家有独立

展位，这个数量基本保持不变。由于展览馆大小有限，书展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所以多年以来“经常参展的出版社团队”[2] 基本不变。到了80年代，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照顾来自“非社会主义经济区”的参展商，东德的出版社就要挤一挤腾出位置。



图**1** 由国家安全部摄于莱比锡展览馆

展览馆的四层楼就成了东德图书进出口交易的中心平台，书展也跟随着博览会每年春秋各一次如期举办，从1973年开始只有每年春季举办书展。来自大约2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伙伴汇聚在此，商讨版权及印刷事宜等方面的合作。如果能把本地出版的图书出口到国外，那么这将给东德各出版社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而书展就是图书出口的平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图书进口很有限。比如西德出版商们经常抱怨东德外汇短缺，由于东德方面购书太少，对于许多西德出版社来说，到莱比锡参加一次书展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总得想着另辟蹊径。

然而书展上呈现出的繁忙景象，不光是因为有了守在展台前的出版商和前来参加书展的专业人士，毕竟在集市上建的这座展览馆提供的空

间有限，来书展看书的人占满了各个走廊，就显得更拥挤了，所以这些东德读者在书展上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流，首先就营造出了一种特有的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3] 有一点特别之处也让广大读者尝到了甜头：和其他书展不同的是，莱比锡书展在开放时间内各展厅始终对外开放，这样读者就有一周的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搜寻国内外各出版社的图书。为什么书展除了作为贸易平台，也像一片磁场深深吸引着全国各地成群结队来的读者呢？

各种秘密读书的情况都一样，东德对图书的巨大需求是源于图书匮乏，图书需求和图书供给严重分裂，只有走大运或者走后门才能买到“好”书，这就决定了莱比锡书展的特殊角色。制定图书供给方案要忠实于党的路线方针，图书印刷出版受到人为控制，这些都对东德的读书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由于图书发行量不是按照读者的兴趣爱好，而是依据书的思想内容而定，因此大部分图书供不应求。由于东德的所有图书从未对任何人完全敞开大门，所以广大读者显示出十足的兴趣，终于可以在书展上将东德出版社那些“可看可买”的图书一览无余。在东德出版业的这种商业书展上，读者可以对一年中所有的上架图书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同时也有机会领略一下那些大众书店从来没有或者很难买到的稀有图书，但有时展出的图书也看不到里面的内容，很多是些无字书，只能凑合着看个书壳。

来到书展的读者对西德的出版业显示出了更大的兴趣。西德出版社的展台前最拥挤，因为展出的是内容多样的“非正常”图书，用出版商马克·莱姆施泰特（Mark Lehmstedt）的话说就是那些未受审查的图书。[4] 读者们很少有机会能直接在各个展台前看到这些图书，对西德各出版社的出版物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他们翻看图书宣传册，把书拿在手里翻着，当然也要仔细读书。每年3月举办的书展不仅让读者了解了西德最重要的出版社推出的刊物，同时也向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橱窗”：汉泽尔（Hanser）、苏尔坎普（Suhrkamp）、罗沃尔特

（Rowohlt）和贝塔斯曼（Bertelsmann）出版社，还有专业出版社像蒂姆（Thieme）医学出版社、施普林格（Springer）科技出版社和菲韦格（Vieweg）出版社都有参展。这些出版社共同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遥不可及又琳琅满目的图书世界，在集市上的展览馆里，对东德那些被隔离的读者仅一年开放一次的图书世界。

但在此还要说明的是，所谓的琳琅满目也是有限的，因为在书展开幕前，来自资本主义参展商的图书就已经由官方鉴定委员会进行了多次审查，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政府文化部、海关管理处以及图书进出口贸易公司。比如1974年委员会总共查抄266本书，有211本来自西德的出版社，其中52本就是罗沃尔特出版社的，还有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Nabokov）、反纳粹主义政治家哈费曼（Havemann）和作家拉达茨（Raddatz）的作品，主要因为“明显属于反苏联煽动刊物”[5]而不允许展出，据称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该出版社集中出现叛变分子、修正主义者以及知名反共人士的作品”[6]。

但书展上蜂拥而来的人流依然说明了东德读者被数量繁多、种类丰富的图书深深吸引。在具有专制色彩、不能自由接受信息的背景下，书展作为一种独特的相对全面的信息源泉，作为一个特别现象，显示出了它的特殊地位。若想打破东德图书界的硬制度，比较难。除了在国内出游和邮寄的方式，书展是能够接触到西方图书的最重要渠道，为此读者们也想尽了各种方法，还有国家机关执行的图书审查都更加凸显了书展的意义。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读者们试着尽量最大化利用这一大型信息源泉，采用的办法各式各样，有秘密式的，有公开式的，在展台前看书和偷书二者之间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策略。

图书中的内容是可以轻松安全地据为己有的，对于胆小谨慎的读者来说，读上一篇文章就够了。根据资料记录，有的读者为了直接在书展

上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有时还一直站着读。有的展台工作人员还遇到过如饥似渴的读书迷，时间不够没有读完的书第二天来接着读。[7] 要是对记忆力没有把握，也可以把重要章节记录在纸上，甚至有人成立了书写小组，一个人读，另一个人写，甚至用起了速记法，这样读者就可以把重要内容带回家继续传播，不管（内容）是诗行还是化学公式。

西格马尔·福斯特（Siegmar Faust）在一次采访中讲到一个极端的事例，是关于一位叫做沃尔夫冈·希尔毕西（Wolfgang Hilbig）的“工人作家”，于2007年年中过世。福斯特讲道：“大家发现希尔毕西博学多才，所有我们在约翰内斯·R.贝歇尔（Johannes R.Becher）文学院里刚刚发现的当代西方文学家的作品，像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克瑞里（Creeley）、金斯堡（Ginsburg）、剧作家威廉斯（Williams）、秘鲁作家塞萨尔·巴列霍（César Vallejo），还有俄国诗人克勒伯尼科夫（Chlebnikow）和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这些他都已经相当了解。于是我们迷惑不解，图书馆里的书出现在了学院里，希尔毕西是怎么弄到这些书的呢？这个谜底在来年的春季书展上揭开了，当时希尔毕西休假，然后整天在西德的出版社展台周围转悠，然后抄写抒情诗集。”[8] 听着这样的描述，让人感觉到那种对图书的迫切渴望，这在现如今的条件下几乎不可想象也不复存在。希尔毕西不仅自己亲手完成大量的抄书任务，甚至把假期的时间都用在了上面。

以上种种获取图书内容的办法在展览馆里还勉强行得通，然而求知好学的读者们纷至沓来，对于国家安全部进行书展监察一直是个大问题。70年代初书展的监察情况比较特殊，国家安全部第7分管部门HA XX/7负责整体组织监察工作，并成立了一个“书展突击队”。从HA XX/7部门的工作计划可以看出，书展的各个方面都在国家安全部的监察范围内，不仅包括书展内部事务，比如参展商编号是如何分配的以及西德出

版社的参展情况，写监察报告还要尽量描绘出书展上洋溢的贸易氛围，并具体到各出版商表现出的经济及社会政治态度。此外，国安部的工作人员还会组织筹划官方访问并全程跟踪，比如文化部部长来视察或者邀请西德人士来访。监察重点在于两德之间的联系，比如西德各出版社代表或驻外记者与受到国家安全部排斥的作家（“伪文学家”）或者东德出版界的“消极势力”之间的关系。莱比锡辖区的XX/7部门负责执行监察，由专职人员撰写各式报告，有每日报告、临时报告和总结报告，涉及了所有书展上“值得关注的政治动向”。国安部的主管人员通过这些报告也看出，来自西德的各出版社在书展上最吸引眼球。例如国安部1980年的一份每日报告典型地使用非常繁琐的措辞抱怨道，“书展上总是聚集了相当多的人，以至于无法分辨来自非社会主义经济区各个出版社展台前的读者”[9]。

来自西德各出版社的代表和东德读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十分活跃频繁，他们之间的任何联系都受到情报局的严格监察。[10]比如在西德出版社的小展厅，读者可以拿到各种图书目录当作信息小册子，了解到各出版社有哪些系列丛书和具体书目，每天这些资料都会丢失好多，所以见到东德读者对此了如指掌，展台前的工作人员们感到非常惊讶。这也就促进了图书出口贸易的发展，尽管海关检查十分严格，还是为西德出版社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此外，在国安部提供的众多档案里有一类叫做“敌对联系”档案，其中有一些报告写到，展台工作人员记下来访的东德读者地址，旁边写下预订图书的具体信息或者放在展台的什么位置，书展结束后回到西德便将这些书寄出，估计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在写这些报告时也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如果情报处的人暗中记下了名字和地址，就很有可能将这些信息转交到国安部M部门邮政审查处，让M部门对包裹中可能包含的图书进行检查。有关当局阻止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联系说明了各种秘密读书渠道是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渐渐地，读者对图书内容上的占有流畅

地过渡到了物质占有，用国安部的术语来讲就是所谓的“偷窃行为” [11] 。有报告写到一些读者把笔记本放在书上，占到一半的位置，然后抄书，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把笔记本全摊开在书上面，起身连同抄书用的文具和藏着的物证一起带走据为己有。就像出版社的代表描述的那样，各种偷书行为极富想象力，就连现在都是这样。[12] 读者中的偷书狂并不是书展上典型的东德现象，而是伴随现代化书展出现的现象。然而，东德书展上的偷书行为还是要另当别论的：专制制度令许多人变成了秘密读者。偷窃图书的行为突出显示了读者在专制制度下处于一种怎样的情形，因此也是一种标志，反映出图书短缺、读者对图书的向往以及对精神食粮匮乏的不满。令人失望的读书环境越来越驱使着读者行窃，偷窃图书也就并非出于贫穷或贪婪，所以，如果与民主制度下偷书相比，在东德书展上偷书意味着实现了一项更基本的任务。来到书展的读者没法干脆地去下一个书店，购买刚刚在书展看到的图书。[13] 书展上试图偷书的现象非常之多，对此展览馆也提供了良好的偷书条件：楼里很挤，走廊和小展厅里全是人，而且大家通常都把衣物带在身上，也就是说大衣、衣服口袋和包发挥了有利作用。

书展上超大“密度”的读者能为偷书提供巨大的便利，执行书展监察任务的国安部工作人员是清楚的。[14] 他们认为偷书行为可能会引起诸多后果，比如“传播政治性及政治战略性的著作，有损东德名誉，引发新闻报道中出现歧视倾向” [15] ，所以一定要通过预防性措施和有效监察阻止偷窃行为。为了将人群控制在视线范围内，一些出版社只让读者分批进入小展厅，每批的人数也要在可控制范围内。他们还用绳子把各个展台围起来，这样展台前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国安部的书展突击队和刑事警察科紧密合作，监察展览馆里的各种“偷窃行为”，这些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通常都是大学生，或者至少伪装成大学生。1983年，一位监察员对此在《南德意志报》中写道：“如果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积极投入，那么可以将他们视作亚文化群的成员。” [16] 此外，组织管理展览馆的上级机构莱比锡展会局还额外设置了“维持秩序人员”，

同样要保持警惕严密监视书展上的一举一动。还有展台前的出版社工作人员也说道：国安部的人和警察们不知疲倦地定期督促自己认真监视展厅，防止偷窃发生，必要时报告警察局。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书在展台工作人员的默许下丢失了，也让展览馆里的监察员更有的忙了。一份总结报告中对此写道：“一些出版社始终都有偷书的现象出现，很明显有些出版社［……］完全没有把阻止行窃放在心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帮着行窃。比如说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有时候站到展台外边；在菲舍尔出版社的展台，有读者就在工作人员的眼皮底下把书带走了。”[17]

所有的防护措施在求书心切的读者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一位国安部的通报合作者，很年轻，叫乌特·克洛斯（Ute Kloß），在法兰克福证券协会会展有限公司的合办展位帮忙，[18] 也不得不向他的负责人报告情况。读者分批进入展厅，排队时间10～30分钟不等，尽管如此情况还是难以控制，很多书还是被偷了。此外，西德参展商的展位工作人员曾接到指示，要求他们干脆对偷书行为视而不见。[19]

读者如果事先迅速下手，或者暗自征得工作人员同意，那么接下来只需要自己足够机灵行事就行了。比如说一句“我只能转一下身……”这样的话，出版社代表就为读者偷书铺平了道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声称“图书外借一天”，读者当然不会再把书送回来，从而变成了长期借阅。理论上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因为有正式规定，展台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赠送图书的，但还是有很多人违反规定，“私自把书交给”[20] 朋友熟人，然后上报给海关称图书遭到偷窃。[21]

所以出版社也就甘心忍受着丢书的损失，甚至希望如此，当作给“东德兄弟姐妹们”的文学馈赠。但是这样的话，书展结束后展出的图书也就所剩无几。“维尔纳”（Werner）是由国安部安排到图书出版总局做通报合作者的总负责人，他在报告中记录了1972年秋季书展仅仅开幕

一天后，新教天主教零售书商联合会的展台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 据私下了解，［……］这个联合会展台最开始有750本书展出，后来就剩70本。很难说丢的这些书是被展台工作人员赠送出去了，还是故意视而不见任由读者偷走了。然而有一件事，1972年9月4号中午和晚上共补来了200本书［……］由此说明，大家事先就估计到了会丢失大量图书。[22]

“维尔纳”和其他通报合作者还在报告中写道，一些出版社在书展举办的第一天就丢了四分之三的图书。有个学术出版社参加书展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把丢失的图书记录在案，这样就有了一份最畅销书单，然后可以“根据需求”挑选带来哪些图书参展，其中有关于微电子和汽车技术的图书。[23]

西德的参展商有时候对偷书的容忍尺度放得过大，或者他们的做法更加“刺激了东德读者偷书”[24]，国安部对监察书展的宗旨又补充写道，“响应西德首都波恩的‘对外文化政策’，通过书展上的文学作品呈现出西德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对读者在政治思想上起到破坏性作用”[25]。如果出版社计划出版以及展出平装袖珍版的图书，那么就尤其有嫌疑，因为这种版本又为偷书提供了便利。[26]从经济上的预期收益来看，西德的出版社几乎没有为书展作出任何贡献，国安部就此认为，本来为促进图书贸易举办的书展仅仅成了服务于敌对宣传活动的工具：“我们个人认为［……］西德和西柏林的出版社在向读者介绍自身的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新选择，除此之外，它们参加书展更重要的是在于显示出东德人民对西方书刊的兴趣（各种偷书行为），体现了德语语言区在艺术和文学领域的‘民族统一’。［……］这种对图书的兴趣比各种业务往来和私人往来都显得更重要［……］”[27]

然而不是所有的出版社经济上都能负担得起这种精神文化的支持工作，一些出版社非常认真地看管展出的图书，因为最后剩下的书越多，图书进出口贸易公司按一定比例收购的就越多。[28]国安部莱比锡辖区

的书展突击队在一份报告中记述道，一家医学出版社很恼火地在展台前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哪位偷了4张胶片，请把它还回来（或者他为了集齐一套，可能还想继续偷剩下的胶片）。"[29]

现在再从出版社转移到读者的角度，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以上描述的这些对策是为了单纯获取图书内容，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但如果想连字带书都据为己有，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小偷一旦被逮到，国家安全部和刑事警察科就会联合采取行动。首先由警察进行审讯，写意见书，然后宣布处分，比如1983年罚款数额平均为66东德马克，如果之后被释放出来，那可值得庆幸了。"可能有预谋的"盗窃犯接着由国安部的工作人员做"进一步处理"。[30] 1982年书展的第一天就有44个人被逮到，其中15人被继续送到国安部。送到国安部的比例历年上下波动较大，在20%到50%之间不等。专职办案人员在审讯时不光究查盗窃犯的"预谋动机"，也就是与"分内工作"相关的，比如盗窃犯是否和来自"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社保持着联系，此外国安部的工作人员还广撒网搜集信息，为了将这些盗窃犯继续送交其他部门处置，并且充分抓住违法偷盗这一把柄，以便给他们施加压力，并威胁他们，要向工作单位通报，大多数审讯结果都导致用人单位重新招募。[31]

国家安全部在书展期间进行了一项有关图书盗窃的数据统计。国安部莱比锡辖区出具的报告记录了被抓到的人数、来自什么地方、社会出身、损失金额以及如何处分，但并非所有信息都有记录，而且统计时间各不相同，所以这些数据不能保证统计的准确性可靠性，但是依然可以作为依据，使人更加清楚地了解盗书情况，不然仅仅通过奇闻轶事般的谣传，很难想象出是什么样子。从所有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书展突击队的人一天下来大约能逮到20个小偷。以1981年为例，从书展期间的小偷分布情况明显可以看出，尤其在开幕当天被逮住的人数最多（见图2），然而被抓到的并且国安部资料中记录在案的也只占所有小偷人数的一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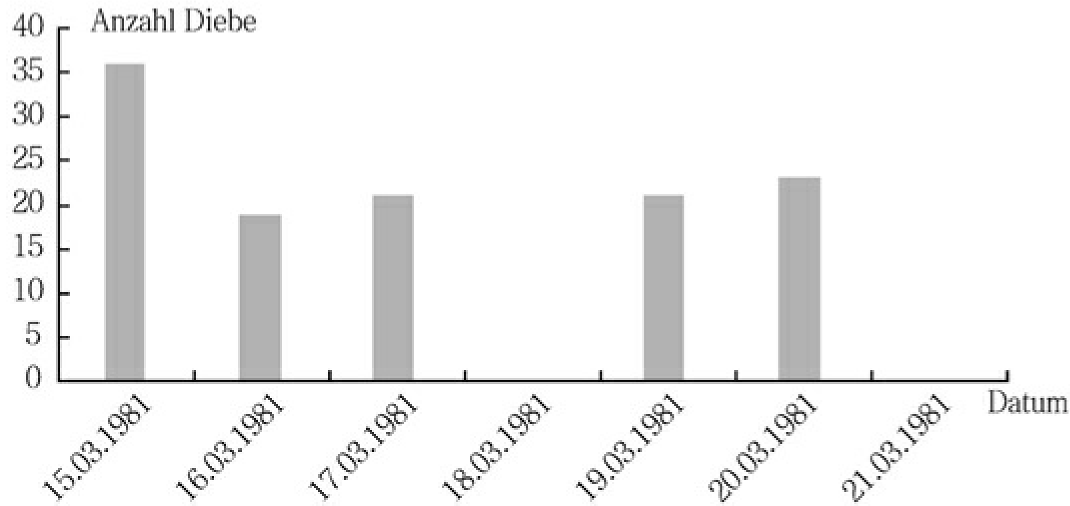


图**2 1981**年春季书展期间被发现的小偷人数（国安部提供的资料中缺少**1981**年**3**月**18**日和**21**日的数据）

那么被偷的都是哪些类型的图书呢？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哪些人是典型的偷书贼？装配工人、家庭妇女甚至包括书商，这些人都抵挡不住图书的诱惑，而像中小学生、学徒工和大学生这样的年轻人胆子尤其大，偷书贼中占比重同样很高的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像高校教师、医生和工程师。此外还经常有各种不同军衔的东德国家人民军，虽然他们已经享有图书供给的优先权。尤其出乎意料的是还有很多人担任着忠实于党组织并且发挥倡导作用的职位：有一位教授马列主义的老师，还有科学研究院的各类工作人员，甚至1979年国安部还抓到了一位自己人："经刑事警察科的同事商量决定对他罚款150东德马克。"[32] 可以明显看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在书籍面前都甘愿承担很大的风险。

有一份详细的统计数据记录了1975年三天的书展情况。[33] 这段时间里有20个人被抓，总共偷了26本书，其中一个特别大胆，出人意料地偷了五本书，其他人大多只偷了一本。图3标出了这些偷书贼分别来自哪些地区，并且具有代表性地说明80%都不是来自莱比锡。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可以看出，书展在整个东德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被偷的书有15本来自西德的出版社，4本来自非社会主义经济区，几乎一半都是苏

尔坎普或者菲舍尔出版社的，说明这两个出版社尤其受读者喜爱。至于体裁，多半图书属于科学文献类，并且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其中包括精神病学、德语文学研究法、实证主义艺术社会学，还有科学理论和神学。并且涉及的题材并不是都和小偷的职业或所学专业相关，比如一个学工艺技术的大学生偷了一本苏尔坎普出版社的书，东德作家弗朗茨·菲曼（Franz Fühmann）的《22天或生活的一半》（*22 Tage oder Die Hälfte des Lebens*）。这个例子也说明，不只是西德的文学作品，东德作家的作品同样是稀有图书而受到读者欢迎，最后这本书也由辛施多夫（Hinstorff）出版社在东德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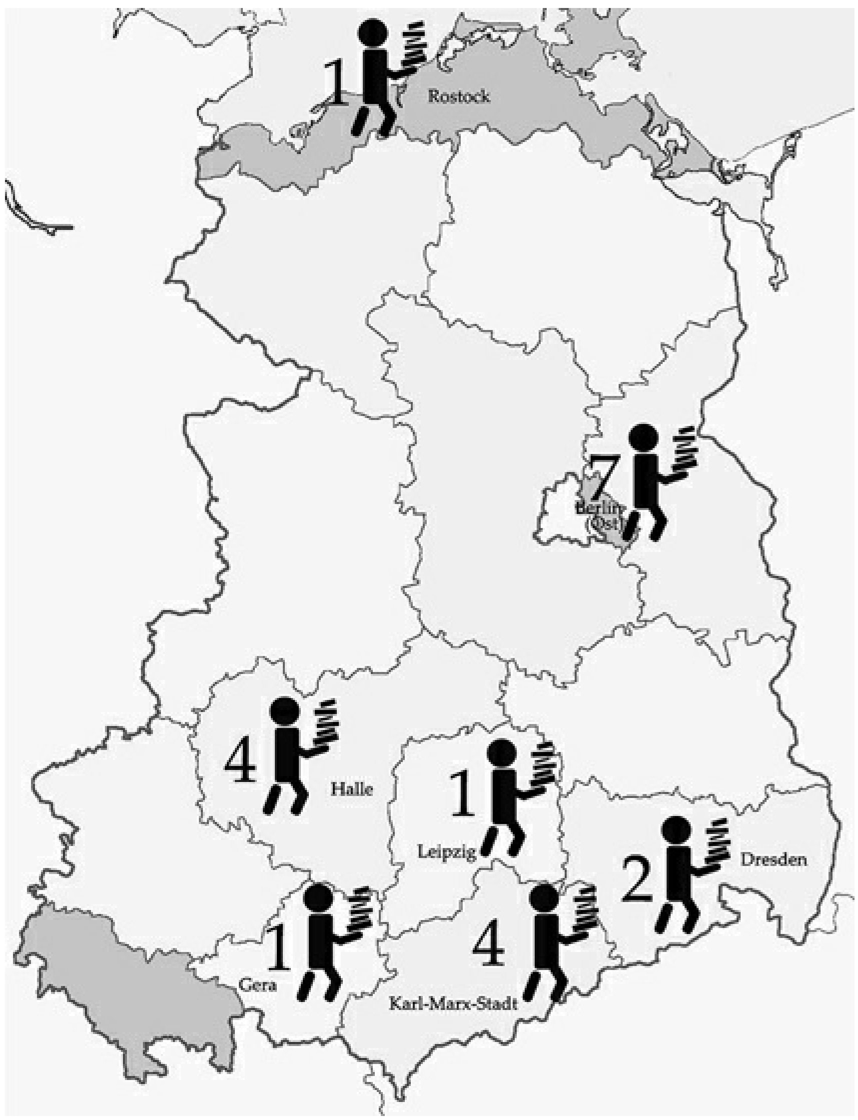


图**3** 莱比锡**1975**年春季书展上的小偷分别来自哪些地区

国安部负责撰写记录报告的工作人员甚至还想弄清楚，在哪些时间段里偷书发生的频率最高。在展览馆全部开放时间内显然是平均分布的，但是相对集中在10点到13点以及关门前的17点到18点之间。[34] 此外还发现大量夜间行窃的线索令人迷惑不解，虽然展览馆夜间也受到监视，但1980年书展时罗沃尔特出版社夜里丢失了大概50本书。[35] 夜间丢失图书将会长期损害书展的声誉，80年代中期，一位通报合作者的总负责人在报告中写道："据莱比锡图书出口贸易公司的出口商表示，尽管书展上有极好的贸易氛围，但来自非社会主义经济区的参展商因为夜间丢失大量图书而非常恼火，每天早上都有人抱怨又发现书被偷了，主要都集中在西德的展位。"[36] 赫利俄斯（Helios）图书销售公司，还有乌尔施泰因（Ullstein）、罗沃尔特和休伯尔（Hueber）出版社都很恼火，所有装满各种杂志、全套的手工书、烹饪书还有很多长篇小说的纸箱都不见了。[37] 报告中还提到一家瑞士出版社也对这种野蛮的手段表示不满，要求警方介入调查："1984年3月15号到16号的那天晚上，展台柜子被撬，放在里面的酒和一大批书被偷了。［……］书展负责人还有警察现在必须采取应对措施。"[38] 面对这样的意外事件，没过多久国安部明显有了怀疑对象："从第一次监察行动结果来看，作案时间应该在18点到19点之间，这段时间会展楼的清洁工在进行打扫工作。"[39] 此外还有人把过错指向了莱比锡展会局，因为展会局提供的书柜大多都不带锁："虽然以前的书展上就已经有偷书的现象发生，但莱比锡展会局始终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根据以往的资料来看，这种现象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因为其他的书展很少或者从未出现过这么严重的问题。"[40] 有一点在这份报告中没有提到，就是负责展览馆夜间巡逻的国安部工作人员这些年来想出的办法：他们从西德参展商的展厅里不仅偷走了大量的图书，还有科涅克白兰地酒、皮夹克、电子表和很多其他物品，偷来东西后，各栋楼的保安之间进行正当的以物换物交易，刑事警察们还被蒙在鼓里。[41] 而德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公司本身也

对夜间图书失窃负有责任。一家西德出版社的销售职员抱怨丢了20本书之后，一位在贸易公司任职的通报合作者总负责人“路德维希”（Ludwig）在报告中写道：“我认为这里所说的丢失的图书，是周六晚上图书总审查时被收走的，这一点有些出版社代表可能并不了解。”[42]

由于图书丢失的数量大，后果难以估计，大家提出各种建议来有效防止图书盗窃，一份总结报告中这样写道：“基于图书大量丢失这一事实，要实现参展商多次提出的意愿，就应该采用集权式的手段，并考虑到国际通用惯例，对书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43]

此外还有人建议，每层楼设置更衣间，自行来参观书展的人不允许穿大衣或者带包进入展厅。还有像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书展一样，限制对外开放时间，哪些天或者一天中哪些时间段可以参观书展。[44] 然而书展负责人从不将这些重要的新举措付诸实践，也不限制读者参观时间，从这一点来看，事实上可以说莱比锡书展为向大众传播信息做出了自我牺牲：这种“墙中洞”至少以这种片面的形式存在于两德之间的文学交流，直到两德统一。此外，限制读者参观书展引发的讨论可以说明，书展体现了资本主义商业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间带来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开放性在经济上吸引着西德重要贸易伙伴扩大出口，在世界的开放性面前，将随之被带入东德的图书文字臆断为危险品并将其隔离封闭的意图是行不通的。

不难看出，莱比锡书展是东德秘密读书活动的中心。读者为获取西方图书采用各种方法，填补了东德民众巨大的信息及娱乐需求。此外，“偷书贼”这一现象也显示出东德每年如期举办的书展带来的特殊精神文化作用：让读者感受到硕大遥远的（读书）世界的馥郁芬芳。

---

[1] Lokatis，Siegfried：*Phasen deutsch-deutscher Literaturpolitik der DDR unter Ulbricht-Devisenprobleme*，*Außenhandelsinstrumente und Kontrollinstanzen* .

In：Lehmstedt，Mark；ders.（Hg.）：*Das Loch in der Mauer. Der innerdeutsche Literaturaustausch* （以下简称：Das Loch）. Wiesbaden 1997，S.42. Saur，Klaus G.：*Leipzigs Buchmesse von 1946 bis 1989. Eine persönliche Retrospektive* （以下简称：Retrospektive）. In：Zwahr，Hartmut；Topfstedt，Thomas；Bentele，Günter（Hg.）：*Leipzigs Messen 1947-1997* ，Bd.2.Köln，Weimar，Wien 1997，S.718-720.

[2] Saur，Retrospektive，S.719.

[3] 和以往承办书展的汉萨楼相比，新展览馆的展览面积虽然有两倍之多，但是8000平方米的面积还是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书展形成鲜明对比，同一时期法兰克福的书展面积达22000平方米。参阅 Füssel，Stephan（Hg.）：*50 Jahre Frankfurter Buchmesse 1949-1999* . Frankfurt a.M.1999，S.191。

[4] Lehmstedt，Mark：*Im Dickicht hinter der Mauer-der Leser* . In：Ders.；Lokatis，Siegfried（Hg.）：Das Loch，S.349.

[5] Bericht über die Exponatekontrolle，1974. BStU，MfS，HA XX Nr.11866，Bl.52.

[6] Bericht über die Exponatekontrolle，1974. BStU，MfS，HA XX Nr.11866，Bl.51.

[7] 参阅 z.B.IM-Bericht，1984. BStU，MfS，BV Leipzig，AIM 1735/87，Bd.I，Bl. 143。

[8] Grundmann，Uta；Michael，Klaus；Seufert，Susanna（Hg.）：*Die Einübung der Außenspur. Die andere Kultur in Leipzig 1971～1990* . Leipzig 1996，S.129.

[9] Tagesbericht der BV Leipzig 1980. BStU，MfS，HA XX Nr.11868，Bd.2，Bl.460.

[10] 例如出版社代表也为参观书展的读者偷带私人信件，或者用私人轿车带书过境。

[11] 参阅z.B.BStU，MfS，HA XX Nr.11868，Teil 2，Bl.458。

[12] 作者于2007年9月5日与汉泽尔出版社的出版商Michael Krüger的座谈。

[13] 书店“国际图书”在书展结束后可以出售每个展台的图书，所以读者可以提前预订，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大部分读者需求。

[14] BStU，MfS，BV Leipzig，Abt.XX Nr.249/01，Bl.19.

[15] Abschlussbericht Messe，1984 BStU，MfS，BV Leipzig，Abt.XX Nr.247/01，Bl.18.

[16] Werth，Wolfgang：*Karge Ernte im Karl-Marx-Jahr* . Süddeutsche Zeitung vom 17.3.1983.

[17] Abschlussbericht des Operativen Einsatzstabes，1975. BStU，MfS，HA XX Nr.6872，Bl.42.

[18] 这个合办展位叫做“西德书刊”，1984年开始参展，标志着法兰克福证券协会和莱比锡的关系进一步改善。这里的两位东德工作人员都是国安部通报合作者。

[19] IM-Berichte，1984. BStU，MfS，BV Leipzig AIM 1735/87，Bde.I und II，hier insbes.Bd.II，Bl.63.

[20] BStU，MfS，HA XX Nr.2269，Bl.92.

[21] Information der HA XX/7，1971. BStU，MfS，HA XX Nr.13018，Bl.175.

[22] IM-Bericht，1972. BStU，MfS，AIM 8928/91，Bd.II/4，Bl.208.Zu FIM “Werner” s. Walther，Joachim：*Sicherungsbereich Literatur* . Berlin 1996，S.617-620.

[23] Information，1981. BStU，MfS，HA XX Nr.11868，Teil 1，Bl.79.

[24] BStU，MfS，HA XX Nr.12934，Bl.29.

[25] Z.B.Messeabschlussbericht der HA XX/7 für 1974. BStU，MfS，HA XX Nr.11866，Bl.33.

[26] Abschlussbericht der HA XX，1975. BStU，MfS，HA XX Nr.11866，Bl. 110.

[27] Messeabschlussbericht der HA XX/7，1973. BStU，MfS，HA XX Nr.11866，Bl.13.

[28] 图书进出口贸易公司对每平方米参展面积都保证一定的购书数量。

[29] Abschlussbericht der BV Leipzig. BStU，MfS，BV Leipzig，Abt.XX

Nr.249/01，Bl.20.

[30] Tagesbericht der BV Leipzig 1981. BStU，MfS，HA XX Nr.11868，Teil 1，Bl.140.

[31] Stuhler，Ed：*Die Stasi und die Leipziger Messeräuber*（以下简称：Messeräuber）. Deutschlandfunk，30.4.2002.网址：http：//www.dradio. de/dlf/sendungen/pol-feature/pf-020430.rtf（28.1.2007）.

[32] Tagesbericht der BV Leipzig，1979. BStU，MfS，HA XX Nr.11867，Bl. 304.

[33] Information，1975. BStU，MfS，HA XX Nr.13018，Bl.20-26.

[34] Information，1975. BStU，MfS，HA XX Nr.13018，Bl.21.

[35] Information，1980. BStU，MfS，HA XX Nr.11868，Teil 1，Bl.231.

[36] Bericht von FIM “Egon”，1984. BStU，MfS，BV Leipzig，AIM 4/92，Bd.II/4，Bl.179.

[37] Bericht von FIM “Egon”，1984. BStU，MfS，BV Leipzig，und/92，Bd.II/5，Bl.65，166.

[38] Bericht von FIM “Egon”，1984. BStU，MfS，BV Leipzig，und/92，Bd.II/5，Bl.175.

[39] Messetagesbericht der BV Leipzig，1986. BStU，MfS，BV Leipzig，Abt.XX Nr.249/01，Bl.23.

[40] Abschlussbericht der BV Leipzig，1986. BStU，MfS，BV Leipzig，Abt.XX Nr.249/01，Bl.15.

[41] 参阅 Stuhler，Messeraüber。

[42] 另有相关证人解释为，西德出版社代表自己偷走图书赠与他人，然后上报图书丢失。

[43] Abschlussbericht der BV Leipzig，26.3.1987. BStU，MfS，BV Leipzig，Abt.XX Nr.250/01，Bl.16.

[44] Abschlussbericht der BV Leipzig，26.3.1987. BStU，MfS，HA XX Nr.11868，Teil 1，Bl.231.

带着图书和文稿穿越边境

——一位记者在两个德国的文字经历

海因茨·克隆克（Heinz Klunker）

“秘密读者”这个概念令我迷惑不解，因为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看西德的报纸，从来没觉得做了哪些不允许做的事。我去东德萨克森州的里萨（Riesa）买报纸看，偶尔也有人从柏林给我带《新报》回来。从1947年到1950年、1951年这段时间，我就知道在我生活的这个国家，很多东西是不能出版的。东德成立之后，我上大学时，也通过邮寄的方式收到许多西德的书刊，大多是用小包寄的平装袖珍书，而不是大包裹。那时我就读了法国小说家加缪（Camus）的《鼠疫》（*Die Pest*），萨特（Sartre）的《戏演完了》（*Das Spiel ist aus*），都是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的平装袖珍书。当时知道这是西德的书，买不到，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许和我们中学里的氛围是分不开的。我1952年高中毕业时的那个班级，有些资本主义风气，自然也少不了西方的东西。我们出班报，每周二早上把美占区广播电台每周一的栏目《一周要闻》的内容写下来，学校里允许公开收听西方的广播电台。或许1951～1952这一学年形势变了，而大家也为适应新环境而做出了调整？但我不好说这是洗脑还是镇压，我想大家还是为了让自己适应形势的需求。秘密阅读，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我在里萨附近的村子长大，里萨不是人民反抗集中的地方，在柏林或者莱比锡监察得更严，所以那里能掩藏的机会也就更多。

很关键的一点，当谈论到东德、书籍和读者时，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涉及完全不同的时间段，公众的思想行动也完全不同。当然大家早就

认识到，公开这个词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对此思考过。我到了西德才了解到什么是公开，就是行动做事不一样，有朋友，和朋友打交道。我也回忆不起来读中学的时候曾经经历过的德国共青团联盟大会，那时还不存在什么体制，要求人必须怎么样。然后在莱比锡读大学的时候就截然不同了，我在哲学院的传播学系读新闻学，后来改成了新闻学院。那不是一般的大学生活，因为学院就是一所党校，对我来说三年的艰难时光，在汉斯·迈尔（Hans Mayer）、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和赫尔曼·奥古斯特·科尔夫（Hermann August Korff）的支撑下挺了过来，我们在蒂克大街的学生宿舍里也始终受着监视。这个学业的第一学年也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每周要上8个小时的政治经济学，12个小时的马列基础。我内心没有反抗，然后第一学年得了最高分1分。然后是1953年6月17日那天[1]，莫斯勒（Mosler），就是给了我1分的那位老师，因这个分数而遭到指责，因为这不光是个学术分，还应是个态度分。而6月17日那天我没表明自己的态度。

从6月17日那一天开始，我的信任感被深深的破坏，但我始终还是怀揣着信任。我在一个反法西斯的家庭长大，这和东德的理念是一致的，但我的家人并不是统一社会党党员。我父亲1922年加入社民党，在统一社会党里就遭遇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境，我从他那里知道了什么是党纪。1955年，在阿登纳“纳粹主义式复辟”的高潮时期，我以一名反对者的身份去了西德，并且可以接受现状在西德待下去。这是逃离东德，因为我在那待不下去了，但我并没有热切盼望着去西德。没有人关心我是怎么想的，在想些什么。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如释重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想去说，不会马上招致什么个人后果。

如果我们在今天思考并谈论这些事情，那么肯定会倾向于用当时还没有达到的认知水平去论述，因为大家已经增长了相当多的知识和见识。在里萨的时候，那些最初离开教育岗位后来又回来的老师和原先的参议教师们，在德语课堂上把我教育成了极端和平主义分子，这和东德

的理念是不符的。他们为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所见所闻感到震撼，这种震撼不适合再回到党的专制统治中。

我们家没有一本书。我非常喜欢读书，早就为自己设想了一座图书馆，在有书之前图书目录就已经有了。我借了很多书，上中学的时候也在书店里偷了好多书，为把一本书看完在书店里待上几个小时。我还买了很多草稿本，然后在里萨找到装订工重新装订。我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是无法抑制，到今天也如此。

纯文学作品我只看不偷，除非需要工具书，比如需要一本植物学的书《施迈尔-菲辰》（Schmeil-Fitschen）来确定植物种类。我偷书当然是特殊情况，就是说不是那么见不得人的，但还是偷了，我和自己做了剧烈的斗争，去了三四回，看好一本书然后插到衣袋里。

在莱比锡的时候，我受到汉斯·迈尔的影响，那时我就开始成页成页地从书中摘抄，有了好多本半抄来的书，不过也可能是黑塞（Hesse）的作品。维兰德·赫尔兹费尔德（Wieland Herzfelde）是我在学院里的文学教授，他是马利克（Malik）出版社的创建者，所以他打分遵照的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标准。他是我在东德认识的人中胆子最小的之一，后来我才知道，他在这个充满教条主义的学院里受到监视，很恐怖。但是他的胆小是能让人感觉到的。魏玛古典主义基金会的海德维希·沃伊特（Hedwig Voigt）是教条主义式的对手。后来到了西德，我才像沉浸在了书的海洋。我读了超级多的书，漫无目的又不知所措。我主修日耳曼语言文学，听了超级多的课。一年之后，1956年，才第一次又回到东德，虽然我曾经是非法离开的东德。那时还没有民主德国叛逃法，到了1959年才有。我拿到了东德居留许可后，一般到了节日就回家。

从一开始我就毫无顾忌地从西德带书到东德，而且首先是家人可能感兴趣的书，大多是艺术家手制书和旅行指南，从中精挑细选，确保不引起有关部门注意。最初没想过带回来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的作品，但后来我在东德认识的人多了，根据他们的需要也就带了。

我和一些搞戏剧和文学的人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带回来的书越来越多，书目也更有针对性。我那些偷着带回来的主要是东德作家只在西德出版的作品，比如说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还有格拉斯和伯尔。伯尔在东德当局的眼中并非不那么受欢迎，但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不在这里出版。我姐姐在柏林科学院负责档案工作，通过她我认识了一些人，也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在东德我经常去剧院，首先出示居留许可，然后是工作证明，虽然我还是学生。大学读了这么长时间，1967年我才开始第一份工作。有了工作证明就能保证不受检查，然后我还带回了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的作品。还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德国作家瓦尔特·肯泊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的小说《狱中》，回忆他在包岑的牢狱生涯，我觉得这本小说非常重要，也特别喜欢。我从出版社那了解到：“不卖。我们卖了300本，卖不下去了。”我反驳道：“如果是这样的话，给我几本吧。”我拿到了20本，一本本艰难地带回东德给需要的朋友，如果我没记错，其中有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和沃尔克·博朗（Volker Braun）。

还有罗伯特·哈费曼（Robert Havemann）的《非教条式辩证法》（*Dialektik ohne Dogma*）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是罗沃尔特出版社在西德出版的课程，我在西德和高中生们一起上政治教育课就用的这本书，我对这本书非常熟悉，觉得很重要。

鲁道夫·巴赫罗（Rudolf Bahro）在我的成长经历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对他很了解，他第一次来西德时是我在火车上陪着他一起来的。巴赫罗在离开东德之前，最后去见他的是沃尔克·博朗。我知道，那段时间博朗如果要和人讨论某些特定的话题，就得离开他在罗莎—卢森堡大街上的住处。我以评论家的身份，得到了巴赫罗《抉择》的校样

稿，然后藏在脚垫底下开车带到东德，虽然在海因里希—海涅大街上遇到检查，但还是过关了。后来埃里希·略斯特（Erich Loest）的《穿越地球之痕》也差不多用同样的方式带到了东德。

这就是东德违禁的政治类书刊。但我还记得，我总是试验哪些书可以带，哪些不可以，比如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早期象征派和结构主义作家什克洛夫斯基（Sklovskij）等人的作品，我本想带给作家汉斯·博尔（Hans Bunge）的，结果在海涅大街上就没通过检查，不允许入境。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是俄国的作家。有一次我把一本书敞开放在车里，他们把那本书没收了，我说我回来的时候还想带走，后来确实也拿了回来。还有在汉堡和柏林中间那一段，我在回来的路上也拿回了之前被扣的唱片。格拉斯霍夫（Graßhoff）的抒情诗，有色情的意味，也很幽默，海关关员看了这本书然后问“您要把色情文学引进东德吗”？我被关员的指责吓到了，然后把这本书也交给了他们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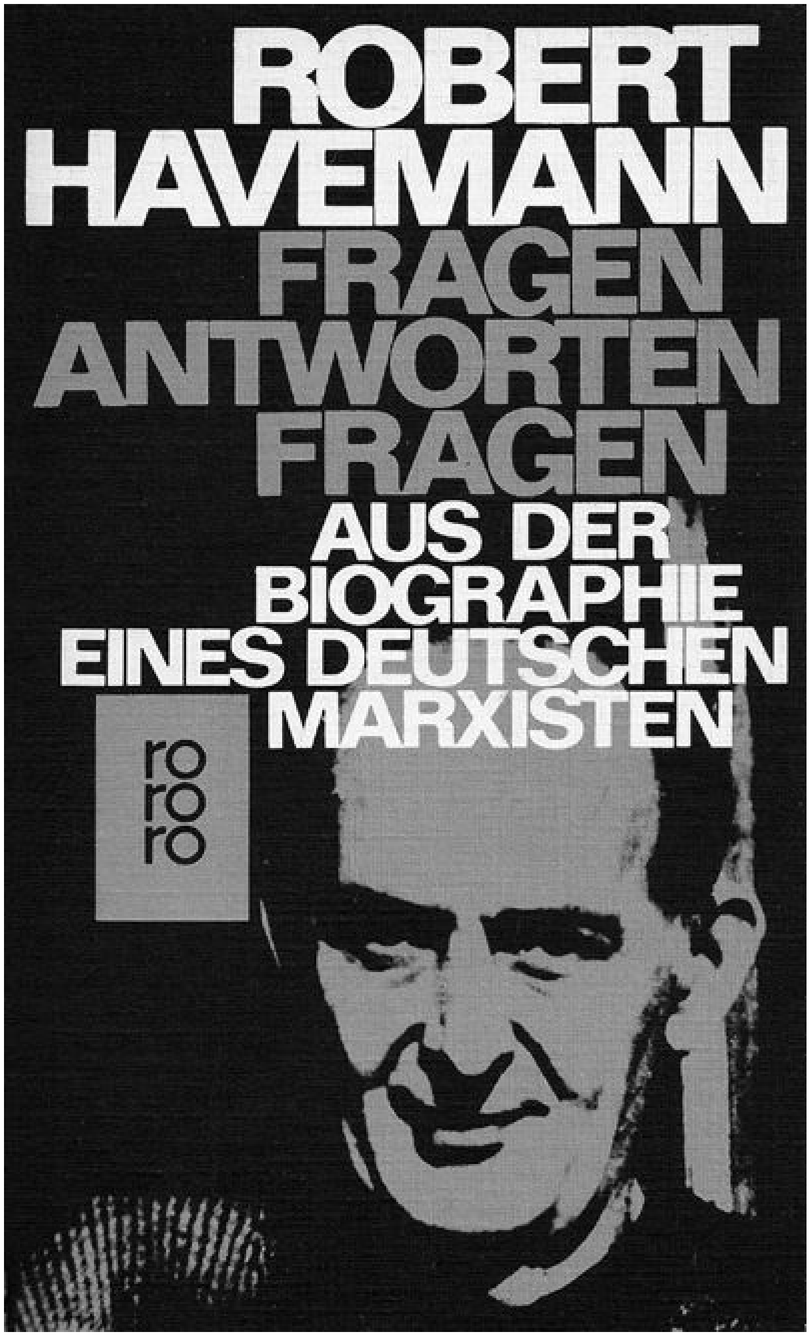


图**1** 罗伯特·哈费曼的书严禁引进东德，同样包括《问题回答问题》一书。［原版**1970**年由皮珀（**Piper**）出版社出版，这是**1972**年罗沃尔特出的平装袖珍版］

负责边境检查的工作人员自然是公事公办，很不友好，他们也有奇怪的一面。我经常去东德，通常一年去好几次，莱比锡纪录片电影节是一定要去的，就算我没有工作证，也能自由出入，我也一直借此做了一

大笔买卖。我妈妈总是给我用瓶子装一些自己家做的吃的带着，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行李箱里装满了空瓶子，为了不让瓶子震碎，我用报纸把它们包起来，所有我在科隆订的《新德国》日报都让边境关员们惊讶不已。

一次我要经过萨克森-安哈特州的马林博恩（Marienborn）去参加一个家庭节日，因为某项工作我必须带些素材过去，路上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沃尔夫勒姆·施特（Wolfram Schütte）和彼得·W.杨森（Peter W.Jansen）在汉泽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讲德国电影股份公司（DEFA）制作的电影，其中一个章节是我写的，关于乌布里希时代之后的电影。明显可以看出这本书的立场是完全倾向于DEFA的，换句话说，这本书得到了DEFA相关负责人的特别支持。这样，我甚至可以在西柏林电影学院看到所有电影，此外，我还从DEFA那里得到了所有影评，整整一大箱子，我只带了一个小皮箱走。路上遇到检查然后他们打开箱子一看：全是剪报，关于DEFA的电影。检查官请来了他的军官，他看了看这些东西，我跟他解释这都是些什么，然后很意外地出现了很少出现的情况：我们关于DEFA的电影讨论了一个小时。那个人很感兴趣，他知道这些东西，也看过几部电影，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带走。就是说肯定也发生过各种轻松愉快的故事，不过这是个特例。

有些书在思想意识上对东德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危险，不会造成恐慌，我也遇到过这些书被收走的情况，但从没有起过冲突，就是对方抛出政治批判言论，这样的情况没遇到过。所有我知道不能带进东德或者估计不能带的书，我都把它们带来了，当然是开车，不是坐火车。工作证发挥了作用，有时候我也把它藏了起来。确实有过他们把箱子打开的时候，但没有非要把箱子倒空。两德统一后，我在兄弟姐妹们那儿的图书馆里看过才发现，我带回来了多大数量的书。

我每周二都给德国电台写有关当代史的专题文章，有关工人运动、

马列主义的，幸运的话，还经常写些原创型广播节目，比如有关特瑞辛集中营里上演的卡巴莱小品剧，比如来自东德的指挥家去了西德。仅仅是听人们讲述，拿到一手资料，也算是对东德的调查研究。然后这些文稿在东德流传开来。有时候来自东德的信件顺利过关，奇怪的是，最快送达的是明信片。我在西德没寄过文稿，而每次都是带到东德后再寄出去，我这样做太冒险了，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在东德拥有听众，这里是我的大本营。我和其他专栏作家写的文章都是与西德的听众相比来说，对于东德人更重要。作为一位新闻记者，他有他的激情，他不是在为自己写东西。其中大多数文章的题材是特别为东德民众准备的，涉及的都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比如《论坛》中关于抒情诗的争论，抒情诗人的问题，可能还有《魏玛文集》，这本文学杂志在东德拥有的公众影响力非常大。另外还有关于康拉德·沃尔夫（Konrad Wolf）的故事片《独身桑妮》的争论，从《魏玛文集》到《萨克森州报》，读者来信中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西德各媒体对此是这样描述和阐释的：透过这些争论能看得出各种异化现象，直到今天这些现象始终发挥着影响。

我的东德出身始终伴随着我，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一点我没有受到西德的影响，但是西德让我成为了我自己，对此我至今都心怀感激，感激我曾经被迫离开东德，否则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矛盾冲突。我那成员特别多的大家庭留在了东德，我和他们常年保持联系。我的女儿们从小就每次跟着我一起去东德，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两德统一后她们分别在东德靠近捷克边境的勒包和莱比锡附近的贝恩堡工作，因为始终拥有着两种视野长大，所以她们肯定比那些一直在东德长大的人更了解东德。我曾经把书放到婴儿车里偷着带过边境，毕竟没有人敢讯问一个孩子。至于都是哪些书呢？忘了。从出版社那儿我收到过很多根本没说要的书。现在我在送书之前，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考虑哪本书适合哪个人，我愿意做这些事情，到我的书库里看一看就能找到点儿什么东西。

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我又回到了东德。我知道要感谢西德的是什

么，但是自从东德历史画上了句号，我的家就在这儿。东德时代虽已谢幕，却已长驻人心。

（由英格里德·宗塔格采访后记录而成）

---

[1] 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工人爆发起义，被苏联军队镇压。——译者注

向两个方向穿越边境

——70年代末莱比锡书展之所见所闻

卡尔·科里诺（Karl Corino）

1976年春季的莱比锡书展上，诗人莱纳·孔策（Reiner Kunze）很信任地给了我一本他的散文集《美好的岁月》的复本，我很幸运地将这本书带过了海关，一回到巴特·菲尔伯尔后，就在一个可以说是私人的电台节目里给我的妻子和岳母朗读这本散文集，现在依然能回忆得起当时的情景和感受。我很清楚，这本书是一个文学炸弹。孔策这本散文集在西德的菲舍尔（Fischer）出版社出版，当时出版社雇用的总编是一个美国人，非常没有经验，后来又被换掉了。在莱比锡书展上出版社和孔策进行了秘密谈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出版社答应他在一周内会做出关于文集印刷的决定。当然菲舍尔出版社也有顾虑，在那些诗文带来爆炸性效果的同时，孔策和东德的官方往来及各类事务是有可能给出版社带来麻烦的。就这样，出版社犹豫不决，事先答应的印刷期限过去了。我听说这件事后，马上要求同总编谈话，试着说服他务必要印刷《美好的岁月》。这本散文集诗意地描述了社会主义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抒情意味浓厚，再联系到被华约组织侵占后的捷克，这本书的意义非常重要，并且既然作者表明愿意承担风险，那么出版社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孔策已经被菲舍尔出版社过分长期的沉默而折磨得痛苦不堪。我满怀诚意地迫切要求出版社尽快让孔策放下心中的石头，并给他一直期待的答复。然后没过多久，事就办成了。

在一次莱比锡春季书展上，不是1976年就是1977年，展览馆里有一家东德新教出版社的展台，他们的牧师翁内贝格尔（Wonneberger）后来在1989年的莱比锡政治转折时应该起到了重要作用。翁内贝格尔同我

攀谈起来，说自己是“穿越边境”节目的听众，然后问我是否有兴趣去参加一个私人展会之夜。后来我去了，在活动上一位和我同龄的莱比锡演员和我聊起来，跟我说他在莱比锡各个大学生团体中组织文学之夜这样的活动，和莱纳·孔策有联系，并且手头有一些作品，作者是一位年轻的莱比锡作家，他问我有没有兴趣看看这些文章。我们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坐了下来，我读了读这些散文，发现有一股强大的、有时让人觉得近乎疯狂的吸引力，让人想起毕希纳的《棱茨》中精神病理学的描述。这位演员看出我非常有兴趣，就问我愿不愿意马上就去这位叫做格尔特·诺依曼（Gert Neumann）的作家那里，就在莱比锡城南，我觉得这对当晚活动主办者有些不礼貌，但还是上了卫星牌小汽车（Trabi），跟着一起到了城南。一幢已经空荡荡的房子里，诺依曼和他的作家妻子海德·黑特尔（Heide Härtl）还有个小孩子就住在一楼，有那么一两个房间。这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以至于诺依曼也把这等情况写到了一篇文章中，和其他的文章一并交给我，用作“穿越边境”栏目的素材。我带着这些素材没被检查就通过了海关，然后在电台播出了，后来我很高兴地听说，诺依曼一家在莱比锡的另一个城区，北边的乔治—施瓦茨大街有了一个更宽敞的新寓所。

莱比锡书展上的各种交谈有时候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充满着文学色彩。比如有一次，刚刚开始在莱比锡百货商场做钳工的格尔特·诺依曼讲到那里的“罗马尼亚玻璃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等着买东西的顾客一大早就已经挤着排起了长队，向上排了一层楼梯，排在最后面的人顶的压力大到让最前面的人被一道栅栏绊倒，然后把摆放着热销品的货架弄断了。没有哪个场景比这个更能生动地体现消费品的供不应求，于是我请格尔特·诺依曼把这个场景记述下来。然后他给自己规定，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都回到百货商场附近的“莱比锡信息处”，那很安静，然后写点儿东西。后来，《11点》这本书就这样写成了，同样是由菲舍尔出版社出版。罗马尼亚玻璃周的故事在“穿越边境”栏目首次亮相是很荣幸的事。

在一次和西格马尔·福斯特的谈话中，那时他刚刚得到西德的入境许可，谈到一个问题，从文学方面来看，东德有哪些青年文学家尤其值得关注，于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沃尔夫冈·希尔毕西（Wolfgang Hilbig）这个名字。我给他在莫伊瑟尔维茨（Meuselwitz）鲁道夫—布莱特舍特大街19b号的地址写了封信，想请他寄来一些样稿，几周以后收到一个棕色标准A5信封，里面有很多他的诗歌和散文。1978年5月在国际书艺展上，在莱比锡的库特—艾斯纳大街5号，我第一次和希尔毕西见了面，紧接着他做了第一场作品朗诵会，又第一次在黑森州广播电台接受电台采访。由于当时托马斯·贝克曼（Thomas Beckermann）刚刚在菲舍尔出版社启动“菲舍尔丛书”青年文学系列，希尔毕西的诗歌也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不对，是大家让贝克曼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并且迫切建议尽快将这些诗歌收进他那套青年文学系列丛书。贝克曼也读了希尔毕西的作品并和他见了面，大家达成一致并签了合同，出版他的诗集《缺席》。

希尔毕西诗集的长条校样出来后，很显然有关当局立即采取了严厉措施。后来大家才知道，1979年5月1号的前一晚，希尔毕西在莫伊瑟尔维茨的一家旅店，一个熟人站在门前请他坐下，给他一支烟，希尔毕西脑后悬着一条校样稿，迎着工人斗争的节日劳动节飘荡着，这个人用给希尔毕西点烟的火，点着了校样稿。希尔毕西应该说了些类似“你疯了吗？”的话，他也应该试图把这块承载着大笔心血并让他遭受惩罚的布条扑灭。但这块布条不是被固定住了就是太易燃了，希尔毕西的努力毫无效果。后来，希尔毕西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待审，并转交至莱比锡国安部监狱。审讯中很快看出，国安部关心的不是他在莫伊瑟尔维茨出的东德版长条校样，他要在西德菲舍尔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校样才是燃眉之急。希尔毕西被详细询问了和科里诺还有和托马斯·贝克曼的关系，当局给他施加压力，要么撤回少数几篇诗歌，要么撤回整本书，并试图用两个月之久对希尔毕西施软计。多次审讯后，当局说他的事情现在可以告一段落了，他该收拾东西，然后把他锁在隔壁牢房。这是缜密的心理恐吓战术。大约8个星期后，希尔毕西看来似乎愿意作出一定让步，也

准备好时不时再同国安部的官员们会面。但希尔毕西在西德消失后，立即引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行动，大家借此让国安部知道，他们的阴谋诡计以及他们封锁希尔毕西是不可能不为人知的。希尔毕西被释放后，一次国安部的官员和他约定好了在停车场见面，希尔毕西另想出一个办法，他让一个熟人去停车场当侦探，而停车场里两个官员正坐在车里徒劳地等着。但朋友的支援和希尔毕西拒绝在菲舍尔出版社撤回诗集付出了代价，这位朋友有一天遇袭，被痛打了一顿。一天晚上希尔毕西从酒吧里出来准备回家，也遭到袭击，被砸进一家店的玻璃橱窗，而第二天早上玻璃窗就被换好了，就连一家商号在东德动作也如此迅速！

再下一次我遇见希尔毕西的时候听说了这一系列事情，我感到非常不快，并希望自己把重要细节都记了下来。在西德看来价值无法计算的优秀文学作品，在东德却可以引来麻烦，对此只有唯一的办法，那就是公之于众。1979年秋，希尔毕西首次公开亮相所获得的成功，即使不能证明每一位受害作家的价值，也至少能肯定某些受害作家的价值。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不受欢迎的作家，尤其当他们还不出名的时候，即使通过1976年的比尔曼事件大放血后，三年过去了，当局对这些作家的打压依然在暗中隐匿，无所不在。有一点要说的是，希尔毕西因在菲舍尔出版社未经允许出版诗集《缺席》遭到2000东德马克的罚款，这笔金额对于他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除了作家斯蒂芬·海姆（Stefan Heym）曾遭到9000东德马克的罚款外，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的罚款事件。后来希尔毕西得到2000东德马克的拘留补偿，这样至少从经济角度来看，他遭国安部拘留成了一场零额游戏。

通过莱比锡书展上和东德青年作家们的交谈可以看出，这些作家受日常生活的束缚，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口头讲述的题材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为了让他们明确地感受到他们那些“故事”的价值所在，外界需要给予指导和鼓励。举一个柏林联合队小流氓球迷的例子，是有一天作家克里斯塔·穆格（Christa Moog）在莱比锡咖啡桌讲的，东德还没有哪

篇文章系统化地描述过东德这种令人不悦的体育文化现象，可想而知也就颇具特色。在东柏林除了联合队还有国安部的迪纳摩俱乐部（Dynamo），主席是梅尔克（Mielke），这个俱乐部将东德最优秀的球员战略性地集中到一起，紧急情况下可以让唯命是从的裁判吹黑哨取胜。谁支持联合队，谁就被认为持有强烈的体制批判态度，也就离所谓的东德式称呼“问题公民”不远了。此外克里斯塔·穆格还学了体育学，写了“联合队球迷”的故事，在“穿越边境”栏目播出，后来就成了这本同名书的封面故事，通过了审查部克里斯塔·舍德里希（Krista Schädlich）的审核，在柯拉森（Claassen）出版社出版。

不可否认，西德各广播电台给东德青年作家的稿酬为他们带来了切实的意义。1000西德马克，是大约按1比5兑换出来的，在东德可以保证一整年的基本生活开销。

后记：演员Ch.U为国安部专职通报合作者，在莱比锡的大学生社团和青年作家医生团体工作，在国安部的委托下和格尔特·诺伊曼取得了联系，是国安部为了把这位间谍偷偷派遣到我身边，让他支持异议文学作品，还是这位间谍真心喜爱文学，为了让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稍稍减轻生活负担，而做出超越他能力范围的事？国安部专职通报合作者的资料约有10000页，我到现在都调查不到相关信息，而且我也没法问他了，他在德国西北部的一家剧院当演员，最近突然去世了。

西德图书之于东德作家

埃里希·略斯特（Erich Loest）（L）接受英格里德·宗塔格（Ingrid Sonntag）（S）访谈

S：您第一次做秘密读者是什么时候？

L：当时是1956年春，在莱比锡大学的文学院，我想研究西德战争文学，研究关于这段时期的回忆录，其中涉及二战中有名的指挥官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v.Manstein）、陆军上将古德里安（Guderian）和特种部队指挥官斯科尔兹内（Skorzeny）。我可以去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看书，因为我有文学院开具的证明，上面写着："略斯特做有关西德战争回忆录的研究。"借书后在楼下的阅览室取书，那时楼上还没有阅览室。我拿着书在桌子旁坐下来，可以把书顺势推给旁边的朋友，后来就不允许这样了。

S：莱比锡书展对于您来说有何意义呢？那些您特别想看的书是如何在书展上弄到的呢？

L：那时每次都特别紧张。每年两次的书展上我都一下子跑到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那，在后面和那些漂亮姑娘们说话。比如英格里德·克吕格尔（Ingrid Krüger）问我说："略斯特先生，您想要什么书？"书柜里装满了各种平装袖珍书，有格拉斯（Grass）的，伯尔（Böll）的，肯泊夫斯基（Kempowski）的，这些书都送给我了！她们还拿一张字条写上送给了略斯特先生哪些哪些书。我就算被检查到，也可以出示我的证明。

S：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去莱比锡书展的？

L： 1948年秋。但第一次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后来在汉萨楼里举办的书展。厄伦施皮格（Eulenspiegel）出版社的展台立着漫画，在各个展台中很显眼。我在米特韦达的朋友海因茨·赛德尔（Heinz Seidel）就在这个出版社干了好多年，他的任务就是负责把展台外观弄得更有趣。我曾经也是厄伦施皮格出版社的作家。

S： 在您被判监禁后也是吗？

L： 60年代末的时候我为该出版社的杂志做签约作家。每个月写稿的固定工资500东德马克，超量完成，他们就把工资付给我，完不成，他们就把工资送给我，我一直都超额完成写作任务。但接着我有了别的想法，把自己的作品编辑成册。1976年我在厄伦施皮格出版社还出了一本书《橡皮艇里的奶奶》，收集了所有这些年的文章，插图画家是乌利·福赫纳（Uli Forchner）。

S： 您那时发现您的信件包裹也受到了检查吗？

L： 没有。国安部的人拆邮件很巧妙，我也没发现有邮件晚到的情况。后来我才从档案里了解到，他们确实查了我的信件包裹，但是负责查我的那些检查官都很机灵。

S： 您也没发现丢什么东西？没有寄书寄丢的时候吗？

L： 我不记得丢过什么东西。作家格哈德·茨韦伦茨（Gerhard Zwerenz）在西德的时候，我还和他有通信往来，他给我的信和我给他的信我们分别都收到了，国安部是很精明的。我要给他的岳母写信，她叫霍夫曼（Hoffmann），第一天国安部就知道了，我在我的档案里发现了我给霍夫曼信件的复印件。他们知道我有什么图谋，因为茨韦伦茨也是他们检查的对象。茨韦伦茨也没寄过书，我从不让别人从西德给我寄书，因为我们都知道寄书反正过不了。收寄信件一直都没问题，包括和

出版社的信件也是。

S： 您肯定为了卡尔·麦（Karl May）和您关于他的传记体小说《燕子，我那勇敢的野马》借阅过毒草柜里的书吧？

L： 是的。把这些书封存起来是有特殊原因的，不是因为政治审查，而是为了保护图书，估计那些书都被读得破旧不堪了。卡尔·麦的书既不卖也不外借，他的粉丝们两年就把他的书翻烂了。还有个有意思的事情，借阅处坐着一位女孩儿，也非常喜欢看卡尔·麦的书，她上晚班，晚班没什么事儿，我们就聊天，有时候我就借一本我根本不需要，但女孩儿特别想看的书。

S： 您离开东德后，往东德寄过书吗？还是一般都让自己人带过去？



图**1 1977**年哈雷东德出版社的第一版《按部就班》

L： 我没寄过书。我想送书给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几个亲戚，就五六个人，每次都是让书展上的人带去的，比如海因茨·克隆克（Heinz Klunker）要去拜访我在莱比锡的朋友克利茨（Kählitz），就把书给他带去了。我们家里也有退休的亲戚可以去东德，然后偷带了一些书回来。

S： 曾经有一本手写版的《按部就班》，[1] 是不是有人把这本书抄了下来然后1989年后送给了您？

L： 卡尔-马克思城[2] 的一位女士用她的打字机打了几本，按照书的开本，没有错误。1990年后她送给我一本，字面清晰可读，差不多是她打的第三本，现在放在了埃里希—略斯特档案里，在莱比锡的“伊达寓所”。

S： 您还有什么其他珍贵的收藏吗？

L： 另外还有一本很有意思，《第十二次起义》，是用笔名沃尔多夫（Walldorf）写的，[3] 印了50000册然后化作了纸浆。那是多少纸张啊！新柏林出版社的人对这本侦探小说很感兴趣，但在《柏林报》预先刊登出来不久，国安部就介入了：啊哈，这个疯狂的略斯特又写了有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国家政治局或者情报局的东西，不能让他得逞。这一版次被全部销毁。多亏出版社一位编辑瓦尔特·皮舍尔（Walter Püschel）的拯救，有一本幸免于难，还有长条校样也在。这样实际上我有两本：一本装订的和一本未装订的。

S： 我看到了这本书1969年的版本说明。

L： 当权者看到这个略斯特这么快又东山再起，感到不快。我在两个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用笔名沃尔多夫写的侦探小说，挣了很多钱。国安部从头到尾算了一遍：我一年足足挣了20万东德马克，他们对此很恼怒。

S： 您想到过事情会因为政治原因而这样告吹吗？

L： 克特·克里克（Käthe Krieg）是新柏林出版社和厄伦施皮格出版社的社长，干练，强悍，有出色的政治背景，她敢于行事，但是在这件事上……这本书已经印好准备发行了，接着电话里传来她沙哑的声

音："埃里希，我明天要去找你一趟，发生了点事情。"然后她来了说道，这一版化成了纸浆。还有，因为为人诚实正派，她还做了本没有必要做的事情：为阻止事情发生，她和文化部长谈，又和这个人那个人谈，但没有用，是有关"当局"做的决定。然后我说："就这样？"她点了点头，接着我们就干了杯白酒。

S：《按部就班》的编辑出版史也就成了一种幻觉记忆。比尔曼（Biermann）被开除东德国籍，您被开除出作协，海姆（Heym）、希尔毕西（Hilbig）和哈费曼（Havemann）遭到违法罚款，您对1979年以后的经历是否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L：是柏林作协在红房子市政厅里做出的开除决议。1979年秋在柏林，他们严正提出：你们现在必须开除略斯特。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是这么做的，并且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我直面的谈判对手是作协成员麦克斯·瓦尔特·舒尔茨（Max Walter Schulz）和尤阿西姆·诺沃特尼（Joachim Nowotny），有一次汉斯·法伊弗（Hans Pfeiffer）也在场。我的短篇小说集《16号手枪》在霍夫曼坎普（Hoffmann und Campe）出版社出版了，并遭到了违法罚款。我本应发誓再也不干这些事情了。我这样回答道："谁知道我会不会又写些什么东西呢。"这种借口当然行不通，我本应该表明不会再干了。而我是这样实话实说的："这个我没法跟你们保证。你们要是什么都不给我印，我就再干。"——"啊，这样您还怎么能当作协成员呢。有规定……"谈了三四个回合我提出："要是我退出怎么样？"没人说话，然后："那您会退出吗？"他们非常高兴，不用说得罪人的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背后的骂名是一生都挥之不去的。从作协退出，然后我就在大门外了，在这个莱比锡以这种方式到了大门外。在这之前和之后只有作协成员维尔纳·海杜切客（Werner Heiduczek）和作家格蒂·特茨纳（Gerti Tetzner）是毫无保留支持我的。

马克思·瓦尔特·舒尔茨曾骗我说道："你要是退出作协的话，就可以

带着家人离境。”我和东德文化部副部长赫普克（Höpcke）还来回周旋了一年，他也想给我回头的机会，有一次给了我四个月的自由时间，于是我用整个夏天把西德转了个遍。等我已经可以在赫普克那里取护照时，他说道：“您到了那边，别马上就抨击我们。”他给了我护照然后想拥抱一下。我到了西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抨击赫普克。怎么做的呢？在《时代周报》上。然后所有各种论战随之而来，很美妙。

S：《16号手枪》和《穿越地球之痕》的手稿是怎么送到霍夫曼坎普出版社的呢？

L： 通过弗里茨·普莱特根（Fritz Pleitgen，德国著名记者及某电台台长）。普莱特根很愿意提供这样那样的帮助，我时不时地称赞他，可他根本不在意。

---

[1] 该小说全名叫作《Es geht seinen Gang oder Mühen in unserer Ebene》。Zur Editionsgeschichtes. Loest，Erich：*Der vierte Zensor. Vom Entstehen und Sterben eines Romans in der DDR* . Köln 1984.

[2] 开姆尼茨1953至1990年间称为卡尔-马克思城。

[3] 埃里希·略斯特也曾用过笔名Hans Walldorf。

宗教读者群体

“成袋成袋地上缴图书”

——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教会界向东德运送图书）[1]

海德维希·里希特（Hedwig Richter）

1966年，一张邮政包裹附带说明引起了东德教会领导层的注意，内容直接针对的是“东德海关官员”，规定海关官员有义务将图书包裹送达收件人。这条规定并非源于某项法律条款，而是出自一次东德媒体对文化部国务秘书埃里希·文特（Erich Wendt）的采访，在采访中，就像这张包裹附带说明上写的一样，国务秘书向全世界公开表示，“我们从来没有禁止东德公民［……］接收西德寄来的图书礼物。我相信，东德拥有领导人身份的国务秘书讲的话会得到东德相关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这样海关关员才不会“对国家声明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做出不利于东德的事情”。[2] 这张说明不是复印件，而是打印件，因此可以继续印制出成百上千张复印件。借助这份说明，西德人成功地将各种图书越过边境寄往东德，而他们也不是唯一引用这段访谈作为司法辩护依据的。[3]

这件事说明了东德民众是如何理解法制的，也就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统治实践形式，此外也能看出人们面对国家苛刻的法律条规做何应对。基于这两方面我要对两个问题进行探讨，第一：对于统治者来说，禁止图书引进意味着什么？1968年起宪法不再保障出行自由权——如果除特殊情况外禁止入境西德，而为什么对图书不实行同样的规定呢？干脆打

开包裹，跳过检查直接没收不就可以了吗？第二个问题涉及被统治者：他们如何应对国家的干涉？对此德国历史学家阿尔夫·吕德克（Alf Lüdtke）的观点很重要，他以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为出发点写了《统治作为社会实践》一书，韦伯认为被统治者“多少具有一种服从意志”。[4] 在研究这两个问题时，首先应了解有关的国家机关，然后是涉及图书走私的个人或团体。因为东德学界还没有开始研究教会图书走私，所以我们对此只能进行比较浅显的探讨。

在东德如何定义“走私”这个概念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合法进口图书和走私图书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因为没有明确的相关法律规定。总的来说，包裹投递过程远比入境走私重要，所以前者在本文占的篇幅更多。走私图书中教会刊物的比重最大，占到三分之二，剩下的是纯文学和专业书籍。绝大部分没收的图书都是所谓的低俗垃圾书刊，也就是小人书、漫画或者色情书刊。西德教会有上亿的资金用于这些图书的运送，其中大部分来自西德政府全德事物部的财政支持。[5]

首先讲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对没收图书的解释已经显示出法律的模糊性，例如各个地区人民警察关于60年代中期教会生活的报告就能印证这一点，报告中也包含了海关提供的信息。因为同西德联系密切，并且从西德获得了大量物质上的帮助，各个教会基本上都被列为怀疑对象。[6] 然而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西德提供帮助还是同西德建立联系都不属于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在没收图书的解释上，法律并没有发挥很大的效力。在同西德接触的方方面面当中，通常令人感到有违法倾向的就是涉及图书的交流，但没收图书始终没有得到法律上合理有据的解释，仅仅有一份60年代时人民警察给内政部的报告对此解释道：“不言而喻，这些西德书刊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培养我们公民的社会主义意识。”[7]

同时东德国家机关一再强调允许进口图书。[8] 为什么法律明文允许

进口图书，而相关法律规定却游走在灰色地带，对这个问题最显而易见的回答是：允许图书进口是出于表面需要。国家机关仅仅要求相关部门遵照这样一些规定：寄件人和收件人必须是私人；始终只能邮寄一本书刊；此外不一定必须是东德允许流通的书刊。然而对工农社会国家禁书的定义却模糊不清：不允许有“低俗”“反民主主义”或“反对维护和平”的图书。[9] 因为大部分神学类刊物明显不具备这些特征，于是辩证思维就在这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不明显带有色情或军国主义色彩的图书因为能够很好地掩饰其邪恶本质，所以恰恰是危险的；教会图书的“宗教用语背后隐藏着的是教唆煽动”，“或多或少有颓废派倾向”[10] 。

这种诡辩式的规定给海关关员出了个难题，他们去哪儿知道哪些图书的宗教用语背后隐藏着复仇主义和反民主主义倾向？如果没收“错误”，比如冤枉了某位“忠实的”神学家，可能会令上级愤怒不已。[11] 因此1963年各地区海关管理处专门成立了图书委员会。[12] 然而这些委员会几乎无济于事，因为成员们也没有宗教神学方面的文化经验。[13] 一些海关管理处开始制定书单，分为禁书单和非禁书单，从中可以看出有关当局是多么胸无点墨：比如《圣经》、《新旧约全书》和《路德圣经》接连被列入非禁书单。[14] 1968年海关总局在报告中说：“［……］图书审查领域始终相当混乱。”[15] 因此到了80年代，海关当局要求成立图书审查核心工作组。[16]

海关职员对模棱两可的情况处理得更好，为此他们接受过明确的指导和培训，海关专科学校毕业生撰写的专业论文都是关于火车车厢内空隙分布或者西德汽车构造等这样的题材。[17] 海关关员的情绪夹杂着喜悦和憎恶，总是在报告中写到“对手”隐藏图书的阴险狡诈。[18]

随着时间推移，图书审查经历了哪些变化发展呢？50年代时将神学书刊带到东德是很困难的。[19] 甚至当时把东德的一本信息手册带到西德都要以“进口违法刊物”为由受到惩处，从东德寄来的包裹信件也可能

受到检查。[20] 随着西德社会已经渐渐开始自由化进程，而东德当局50年代却开始所谓的“视察”教会图书馆、检查西德书刊，至少持续到60年代。[21] 柏林墙的建立最终封锁的图书运送渠道不计其数，所以邮政渠道变得越来越重要，东德图书审查也变得越来越严格：60年代经没收的图书包裹每年达7万件，印刷物总计42万册，其中不仅仅包含基督教刊物。[22] 如果想到每年检查的所有邮政包裹达几百万件，那么这些大额数字也就不足为奇了，1960年经检查的邮政包裹大约为2100万件。海关管理处在建柏林墙当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邮政检查涉及的检查工作及安保工作口号一律为‘不能放过敌人’。”[23]

随着东西德之间的往来途径增多，通过进口或走私进来的图书数量又开始呈上升趋势。70年代国家放宽了对教会的政策，持公务签证的西德神职人员只检查其私人文件，各项规定开始强调慎重对待教会重要人士，图书审查时牧师比“入境工人”享有更好的待遇，海关工作人员当时还对此表示不满。[24] 1980年有关教会图书走私的规定是这样说的：“处罚神职人员必须征得海关管理处领导或者副领导的同意。”[25] 教会与政府逐渐在更多的问题上取得一致，由于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事端惹恼教会或让教会人士遭遇名声败坏的海关男关员和更加名声败坏的海关女关员专断的行事作风，政府甚至向一种半合法的图书进口方式开了绿灯，这样新教教会就可以为各大学因财政失血过多而“休克”的神学院供应图书了。[26] 以上这种典型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允许进口图书，但进口图书非合法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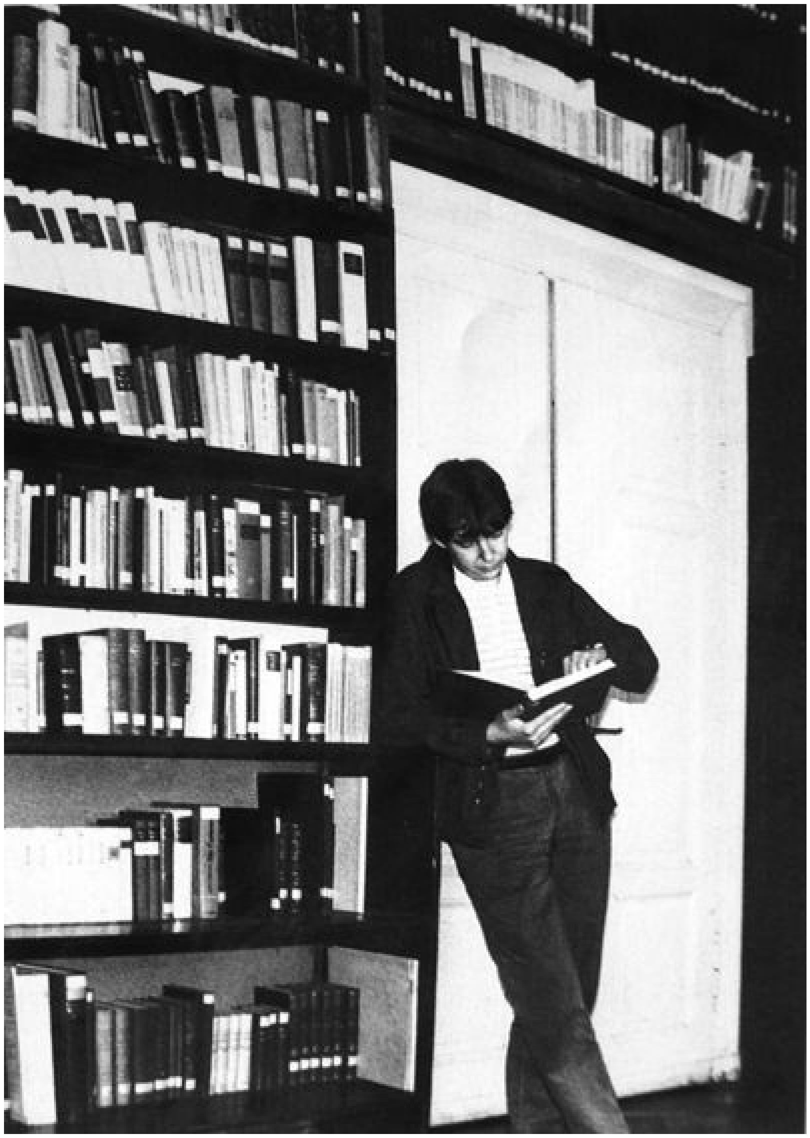


图**1** 瑙姆堡高等神学院图书馆所收藏的从西德走私进来的图书不计其数，是东德收藏社科类书籍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

针对教会的政策在逐渐开放的同时，图书检查变得越来越严格。[27] 光是1977年年末海关就检查了将近1500万件包裹，占全部包裹的89%，比上一年增加12%，海关总局称邮寄图书的包裹数量越来越多。[28] 80年代的情况没有相关数据，当时几乎四分之一的装有教会图书的包裹被没收。[29] 令人非常生气又失望的是没收的图书很少退回给寄件人。[30] 图书检查力度加大也是和不断进步的技术手段分不开的，比如70年代X光机的引进；另一方面也受到东德政治局势的影响：从柏林墙

建立以前到建立之后，尤其到了70年代，审查覆盖得越来越细微，政府不再实行残酷的压制手段，取而代之的是更细致更有效的措施，常常也覆盖到了下层人士。

教会人士如何应对审查？之前已经提到，虽然东德承认自由进口图书的权利，而各州教会希望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图书检查还有海关及邮政审查。也有人表示不满提出申诉，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1980年前后，每年国家机关大约收到200起基督教徒的申诉，占所有申诉案例的1.8%。[31] 教会领导自身最多也只是针对禁止图书进口这项规定表示抗议，而不是针对法律被严重扭曲的事实。[32] 甚至有教会管理处立即阻止下属教会进口图书，这是一个自我审查的典型例子。[33]

由于缺少严格的法律保障，教会人士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之前提到的国务秘书文特接受采访后，各教会机构为了弄清法律条文对此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开始试验邮寄各种包裹，然而没发现什么规律，每次寄包裹都有新的发现。[34] 由于国务秘书在这个统一社会党统治的国家常常取代了法律的地位，因此为了得到明确的规定，另一条途径是在国务秘书接受访谈时提及教会问题，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35] 1966年东德新教教会领导曼弗雷德·施托尔佩（Manfred Stolpe）讲道："从所有这些访谈中可以看出，国家机构的政策趋势明显在以最大力度限制进口西德出版物［……］这是和法律规定相矛盾的，和文特曾经在那次有名的采访中所讲的话相矛盾。"[36] 没过多久负责教会事务的国务秘书表示，"大量进口图书"的时期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用东德印制出版的图书满足教会的需求。[37] 这是当局政府的无耻还是无知？难道不知道东德各教会出版社和基民盟出版社的图书种类少之又少，无法和国外丰富的神学类书刊相匹敌吗？同时也绝对能够看出政府显然不重视法律的明确性。由于法律保障的缺失，教会被政府置于被动地位，随时都可能受到威胁，图书进口随时都可以被利用为一种管教民众的手段。此外，政

府通过进口西德图书嘉奖所谓的“进步”神学家，通过没收图书惩罚所谓的“反动”神学家，图书进口也成了社会主义教会政策的一个有力工具。

虽然在实际审查中每本神学刊物都受到怀疑而接受检查，但教会还是始终能够成功偷运图书。[38] 警察在“视察”一位天主教教父的图书馆时发现“超过50%的图书都来自西德”。[39] 这是个让海关崩溃的结果。瑙姆堡高等神学院图书馆是东德社科图书最重要的馆藏之一，不仅藏有丰富的神学类书刊，东德向来供应不足的如心理学这种并非神学院特有的人文学科专业刊物也有很多，能和神学院的人文藏书相比的图书馆也是屈指可数。[40] 作家罗尔夫·施耐德（Rolf Schneider）1981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表示，各个牧师公馆藏书丰富，也许会成为东德唯一真正的另类文化。[41] 东德政府对当下形势持相似的看法，担心“我们的年轻人会受到不利影响”。[42] 海关总局在报告中估计，每年大约有50万本图书非法流入东德，其中有很多基督教刊物，有关于环保的，还有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图书，这样看来图书走私的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43] 除了电视和广播之外，市民和知识分子们也能通过这一渠道了解西德的思想界和知识界，了解铁幕的另一边在讨论什么。

在海关实行的各种审查措施下，这些图书又是怎么进入东德的呢？一方面教会人士为应对更加严格的审查措施不断想出新的邮寄办法。50年代末大家都已经知道，从公共机构寄出或寄给公共机构的书籍一般不能通过，因此西德各州教会发起行动，以私人寄件和收件地址寄了几千本图书，参与者包括所有阶层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另外还出版了一本宣传册，题为“图书包裹行动”，内有详细指南要求大家通通往东德寄送图书，在私人圈子里和工作中推广宣传这场行动。新教教会在这场行动的报告中针对图书走私的理由是这样说的，苏占区不断压制和孤立图书界，目前应对办法只有从西德寄出更多的信件和包裹。[44] 西德新教执事工作会每年都提供资金用于私人图书邮寄，资金通常来自全德事物部的财政拨款。[45] 其中走私的除了有用于学术目的的神学专业书籍，还

有面向所有阶层人群的基督教刊物，比如祈祷书或者日历本。[46] 所有阶层和职业群体都参与了图书运送。据统计，1980年所有邮政信件包裹收件人只有15%为神学家和教会人士，通过亲自出行走私图书的旅客有22%为以上人士。[47] 最有利于走私的时间是圣诞节前后，因为包裹量太大，所以很多包裹没有经过检查就过了境。[48] 政府机关采取的应对措施比如在“圣诞高峰期”设立“流动工作组”也没有完全发挥作用。[49] 此外已经提到过的政府的半合法规定也是一个因素。同样得到全德事务部财政支持的路德教会也帮助东德教会学术机构走私图书。[50]

相比之下，通过汽车或火车走私的图书占的比重比较小，因为都知道海关对此检查得要严格得多。1979～1980年一年半的时间里，经过柏林边境最主要的走私关卡的旅客只有975人驾车携带教会刊物入境，其中85%的刊物被没收。[51] 同一时期共有140600件装有教会刊物的包裹受到检查，其中25%被没收。[52]

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驾车走私图书的档案资料。对此，除了听一听时代见证人的讲述，还能从一些自传中读到相关的内容。比如《上帝的走私者》和《禁路上的圣经》对此讲到了上帝的安排，讲到了冒险精神，还有恐惧、操持家庭以及在东欧集团国家的朋友们。[53] 大型教派的图书走私者认为图书走私有助于维护国家及其教会的统一，[54] 而新教东欧布道团认为华约组织国家是他们的传教地，并且通常持有反共产主义的理念。像1920年成立的组织“东部之光”从一开始就为俄国十月革命后基督教徒面临的困境感到担忧。通常这些机构在组织上都是独立的，但完全可以同各教会机构如教会执事工作会保持紧密联系。[55] 东欧布道团主要走私圣经。由于东德和东欧集团国家的教会政策最为宽松，因此流通着足够多的圣经，这些工农社会国家也就经常作为中转中心，在铁幕背后将大批圣经冒险偷运到其他国家。既有在旅途中把书藏到行李箱这样的个人走私，也有团体走私，用一辆20吨的载重汽车一次性最多能走私20万册小本圣经。[56] 这些新教团体特别引起了国安

部和海关的注意。[57] 最有名的走私团体是耶和华见证人，在东德纳粹时期就受到迫害。耶和华见证人和新教东欧布道团走私的办法非常富有想象力，他们把宣传手册藏在烟草里，把要走私的图书换上“能够走私”的图书封皮，把神学书刊放在焊接封好的糖果盒子里，把小本刊物封在罐头里。[58] 还有莱比锡书展也为走私教会图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59]

虽然西德公民承担图书走私的风险要小得多，后果也就是扣押汽车、罚款或者可能短期拘留，但图书走私对于每一位参与者都是相当危险的。1980年前后被抓获的817名教会刊物走私者中大约有191人来自东德，这191人即将面临着非常严厉的处罚。[60] 有一位走私者没有被抓获，是柏林喜剧歌剧院院长瓦尔特·费尔森施泰因（Walter Felsenstein）的儿子，他有西柏林通行证，利用行车之便把汽车挂车装满神学书刊带到了东德。[61]

结束语

以图书进口为例，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具有典型东德特征的法制理解模式。出于形式上的需要，政府官方表示允许图书进口，这样，法律就时刻在被扭曲，几乎每一次进口图书都是在挑战法律灰色地带。试图维持法治国家形象只说明了为什么统一社会党不通过法律手段调节图书流通。缺乏法律保障会使教会更加依赖于国家机构，也使国家机构在一个新的领域内操纵控制教会。图书审查作为一种统治实践活动，不仅显示出政府公开的强制措施及民众的顺应服从，而且体现出一种以管教和征服为目的、细致入微的统治机制，这种管教机制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实行压迫，而在于被统治者情愿接受的主观意志。

此外，图书审查也体现出了被统治者的矛盾处境，这也是本文的第二个重要结论。很多人为了从西德往东德运送图书，做好了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总共数以百万计的图书非法流入东德，为秘密读者们敞开了

新的世界，打开了新的话题，几百万的确是个不小的数目。然而，与耶和华见证人和新教东欧布道团不同的是，教会对不公待遇完全持接受态度，参与当权者昏庸专断的统治管理，同时又利用图书进口许可巧妙地避开审查，试图寻求新的法规支撑图书走私。马克斯·韦伯阐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作用特点在这里得到了明显体现。对国家体制持批判态度的神学家海诺·法尔克（Heino Falcke）在和平革命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向体制提出质疑？"[62] 对此图书审查和禁止图书进口不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教会人士大多对审查和禁止图书进口保持沉默更加促成了一种假象，一种东德为自己造就的假象。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将共产主义体制下的人们形容为"纠缠复杂，备受奴役"，每个人都是这个假象世界的牺牲者同时也是支撑者：每个人"都使自己顺应社会局势"，"这样也就恰恰造就了社会局势"。[63]

最后讲述一个事实来说明有多少人参与了整个图书审查过程。不仅包括教会图书，所有被没收的图书究竟命运如何？像在因瓦里登大街的柏林海关，有的工作人员翻看甚至复印色情刊物，女海关关员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西德时尚杂志，[64] 如果没有这些特殊情况出现，部分图书被销毁，比如耶和华见证人的刊物。[65] 剩下的送到所谓的中心书库，到了那儿，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免费享用图书了。[66] 剩下的图书如何处理，对此一位海关高级警官1966年在报告中写道："85%～90%的图书被成袋成袋地上缴至文化部。"[67] 虽然文化部一位女官员申明："大部分图书被销毁。"[68] 但如此多的图书受益者令人不免对这一说法产生怀疑：每年有20000～25000件图书包裹被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和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进囊中。[69] 其他的被送到"东德中央旧书局"，接着作协成员就可以阅览这些书籍，并且将图书据为己有的不在少数。[70] 最后中央旧书局把书卖给旧书店，像柏林的卡尔-马克思书店。那儿的书商说有的顾客始终没有等到从西德寄来的图书，于是请他们如果发现这本书就先保存起来。[71]

所有以上提到的参与者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曾做过秘密读者，并且从图书走私中获益。最后以一个略微尖锐的结论结束本文：审查和图书检查，不是统治集团唱的独角戏，而是一个全社会的工程，连同图书走私一起就像一场众人参与的礼拜仪式。

---

[1] 向Siegfried Bräuer，Hans-Hermann Dirksen，Peter Maser，Jens Niederhut还有Konrad von Rabenau对本文的评价、建议及所提供信息表示感谢。

[2] 施托尔佩（Stolpe）手写注明：“非常有趣。”EZA 102/417. Hervorh. Im Original.

[3] Geschäftsstelle，M.Stolpe，an Evang. Kirche der Union，25.8.1966. EZA 102/417.

[4] Lüdtke，Alf：Einleitung. *Herrschaft als soziale Praxis* . In：Ders.（Hg.）：*Herrschaft als soziale Praxis. Historische und sozial-anthropologische Studien* . Göttingen 1991，S.9-66.

[5] Hauptverwaltung Zoll，Abt.Recht，Abteilungsleiter Zolloberkommissar Krebs，14.2.1966.BArch DL 203，05-02-05（308）；Konrad von Rabenau于2007年9月19日讲述，据估计新教教会共有85亿东德马克的资金。参阅 Maser，Peter：*Die Kirchen in der DDR* . Bonn 2000，S.100。

[6] VP-Bezirksbehörde Rostock an Ministerium des Innern，20.4.965 und VP-Bezirksbehörde Schwerin an Ministerium des Innern，17.6.1966.BArch DO 1，183/2.

[7] VP-Bezirksbehörde Schwerin an Ministerium des Innern，17.6.1966.BArch DO 1，183/2.

[8] 参阅 die Beteuerungen staatlicher Stellen，sechziger Jahre. EZA 102/417。

[9] Zusammenstellung der gesetzlichen Bestimmungen über Einfuhr von Literatur，8.11.1954.BArch DL 203，04-07-05（294）；Abt.Zollrecht an Staatliche Archivverwaltung，3.11.1977 u.weitere Unterlagen in BArch DL 203.04-07-05（294a）.

[10] Zollsekretär Napiera，HA 2，Abt.Recht，Ref.Strafrecht，an Zollinspekteur Arndt，10.11.1959.BArch DL 203，04-07-05（294）；ganz ähnlich

Leiter AZKW，Zollinspekteur Stauch，Vorlage für Dienstbesprechung des Ministers 16.8.1960.BArch DL 203，04-07-05（294）.参阅 专业毕业论文《对手有计划地向东德公民邮寄各种期刊以推行政治思想破坏行动及敌对政策，其目标与意图何在》也对该观点做了论证，15.5.72.BArch DL 203/Fach A/35/72。

[11] Zoll Sekretär Napiera，HA 2，Abt.Recht，Ref.Strafrecht，an Zollinspektor Arndt，10.11.1959.BArch DL 203，04-07-05（294）.

[12] Leiter an Verteiler，vertrauliche Dienstsache，23.10.1963.BArch DL 203，05-02-05（308）.参阅 zu den Literaturstellen auch Oberdirektor L.，MPF Berlin，an Leiter der BDP Gera，9.2.1971 u.weitere Akten im Thüringischen Staatsarchiv Rudolfstadt，Dt.Post，Bezirksdirektion Gera 1215。参阅 zur Rechtsunsicherheit Zollsekretär N.，Abt.Recht，Ref. Strafrecht，an Zollinspekteur A.，10.11.1959.BArch DL 203，04-07-05（294）。

[13] Einschätzung，Abt.Postverkehr，Berlin，24.7.1967.BArch DL 203，05-02-05（308）. Hauptverwaltung Zoll，Abt.Zollrecht，Zollhauptkommissar Weidensdorfer，30.1.1978.BArch DL 203，04-07-05（204）.

[14] Information，Zollverwaltung der DDR，7.8.80.BArch DL 203，04-07-05（294）.

[15] Hauptverwaltung Zoll，Abt.Postverkehr，21.6.1968.BArch DL 203，05-02-00（305）.

[16] Information，Hauptverwaltung Zoll，Stellvertreter des Leiters，Inspekteur Arndt，vertraul. Dienstsache，10.12.1984.BArch DL 203，04-07-05（294a）.

[17] 参阅联邦档案专业论文 DL 203/Fach A/35。

[18] Bericht von Hauptverwaltung Zoll，Stellvertreter des Leiters operativ，2.3.1978.BArch DL 203，05-04-00（310）. Information，Zollverwaltung der DDR，7.8.80.BArch DL 203，04-07-05（294）. Bericht “Die Entwicklung und Wirksamkeit der Zollkontrolle auf dem Gebiet des Postverkehrs”，wohl 1969. BArch DL 203，05-02-00（305）；Hauptverwaltung Zoll，Abt.Postverkehr，20.5.1976.BArch DL 203，05-03-05，Bd.1（309）.

[19] Konrad von Rabenau于2007年9月19日讲述。Hauptverwaltung Zoll，Abt.Recht，7.9.1959.BArch DL 203，04-07-05（294）. Hauptzollverwaltung，Zollsekretär N.，Abt.Recht，an Zollinspekteur Arndt，10.11.1959. BArch DL 203，04-07-05（294）.

[20] 当时甚至去东德旅行都被视为“违背宪法”或“出卖国家”而受到跟踪。参阅 Wolfrum，Edgar：*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1949-1990* . Stuttgart 2005（Gebhardt.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23），S.105。

[21] VP-Bezirksbehörde Schwerin an Ministerium des Innern，17.6.1966.BArch DO 1，183/2. Konrad von Rabenau于2007年9月19日讲述，1959年当局对瑙姆堡高等神学院进行了一次大搜查。

[22] Hauptverwaltung Zoll，Abt.Recht，Abteilungsleiter Zolloberkommissar，14.2.1966.BArch DL 203，05-02-05（308）. Leiter AZKW，Zollinspekteur Stauch，16.8.1960.BArch DL 203，04-07-05（294）. Konzept zur Regelung der Einfuhr von Literatur，Abt.Grenz-und Binnenkontrolle，10.5.1961.BArch DL 203，04-07-05（204）.60年代起，可自由引进图书的“特殊许可”也受到了限制：Vermerk，Geschäftsstelle，M.Stolpe，über Sondergenehmigungen zur Literatureinfuhr，22.11.1966，u.Geschäftsstelle，M.Stolpe，an Evangelische Kirche der Union，25.8.1966，u.Vermerk zur Bischofskonferenz über Gespräch mit Fitzner，Staassekretariat für Kirchenfragen，M.Stolpe，1.12.1966. EZA 102/417。

[23] Einschätzung，Hauptverwaltung Zoll，Abt.Grenz-und Binnenkontrolle，1.2.1962.BArch DL 203，05-04-00（310）.

[24] Hauptverwaltung Zoll，Abt.Zollrecht，Zollhauptkommissar Weidensdorfer，30.1.1978.BArch DL 203，04-07-05（294）.P.Maser于2007年9月30日讲述。

[25] Stellvertreter des Leiters，Hauptverwaltung Zoll，an MfS，Hauptabteilung VI，14.8.1980.BArch Dl 203，04-07-05（294）.

[26] Konrad von Rabenau于2007年9月19日讲述。

[27] Einschätzung，Operativabt.，4.1.1963.BArch DL 203，05-04-00（310）. Hauptverwaltung Zoll，Abt.Postverkehr，27.1.1971.BArch Dl 203，05-02-00（305）.参阅 auch Hickel，Direktion，an Prediger u.a.1.2.72.UA DEBU 53。

[28] Bericht，Stellv des Leiters operativ，2.3.78.BArch Dl 203，05-04-00（310）. Hauptverwaltung Zoll，Abt.Zollrecht，Zollhauptkommissar Weidenshofer，30.1.1978.BArch DL 203，04-07-05（294）.

[29] Information zur Feststellung von kirchlichen Druckerzeugnissen，Zollverwaltung der DDR，7.8.1980.BArch DL 203，04-07-05（294）.

[30] 80年代时，海关总局还有更苛刻的规定说明图书审查的严格程度：除

了众多其他类别的书刊，还有每本“神学入门刊物以及所谓的修身刊物”都属于“不宜引进类图书”。Information zur Feststellung von kirchlichen Druckerzeugnissen，Zollverwaltung der DDR，7.8.1980.BArch DL 203，04-07-05（294）.

[31] Information zur Feststellung von kirchlichen Druckerzeugnissen，Zollverwaltung der DDR，7.8.1980.BArch DL 203，04-07-05（294）. Briefwechsel Schapper mit Zollorganen und Ministerrat der DDR（1965），Schapper an Präsident D.Hildebrandt，16.12.1965. EZA 102/417.K.Tiedek an Verlag “Neue Zeit”，6.3.1967. EZA 102/417.

[32] Vermerk von M.Stolpe zu Gespräch mit Fritzner，Staatssekretariat für Kirchenfragen.22.11.1966. EZA 102/417.

[33] Briefwechsel Geschäftsstelle M.Stolpe mit Vereinigter Evangelisch-Lutherischer Kirche，Oktober 1964 bis Januar 1965. EZA 102/417.

[34] Auszug aus Niederschrift mit Bericht über Ergebnis von Besprechung beim Staatssekretär für Kirchenfragen，22.4.1964 u.weitere Unterlagen，1964-1965. EZA 102//417.

[35] Auszug aus Niederschrift der erweiterten Referentenbesprechung mit Bericht über das Ergebnis der Besprechung beim Staatssekretär für Kirchenfragen，22.4.1964. EZA 102/417.

[36] Geschäftsstelle，M.Stolpe，an Evang.Kirche der Union，25.8.1966. EZA 102/417.

[37] Vermerk，Geschäftsstelle，M.Stolpe，über Sondergenehmigungen zur Literatureinfuhr，22.11.1966，亦可参阅 Vermerk zur Bischofskonferenz über Gespräch mit Fitzner，Staassekretariat für Kirchenfragen，M.Stolpe，1.12.1966. EZA 102/417。

[38] Vermerk，Geschäftsstelle，M.Stolpe，22.11.1966. EZA 102/417.亦可参阅 Vermerk zur Bischofskonferenz über Gespräch mit Fitzner，Staassekretariat für Kirchenfragen，M.Stolpe，1.12.1966. EZA 102/417。

[39] VP-Bezirksbehörde Schwerin an Ministerium des Innern，17.6.1966.BArch DO 1，183/2.

[40] Maser：Kirchen in der DDR，S.77. Konrad von Rabenau于2007年9月19日讲述。Siegfried Bräuer于2007年9月11日讲述。

[41] Schneider，Rolf：Karl Barth kennen sie wie Karl Marx. Einblicke in Pfarrhäuser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8.3.1981.Arbeitsbericht von E.B. In：Hettasch-Haarmann，Erdmut：Hilfsaktionen der Brüder-Unität，Distrikt Bad Boll，für den Distrikt Herrnhut im Rahmen der Hilfsmaßnahmen des Diakonischen Werkes und des Hilfswerks der EKD（以下简称：Hilfsaktionen）. Bad Boll 2004，S.31.

[42] VP-Bezirksbehörde Schwerin an Ministerium des Innern，17.6.1966.BArch DO 1，183/2.

[43] 这个估计的数量偏低，因为60年代时被没收的图书将近50万本，大部分包裹没有受到检查。参阅Hauptverwaltung Zoll，Abt.Recht，Abteilungsleiter Zolloberkommissar，14.2.1966.u.26.2.1966.BArch DL 203，05-02-05（308）. Leiter AZKW，Zollinspekteur Stauch，16.8.1960.BArch DL 203，04-07-05（294）. Konzept zur Regelung der Einfuhr von Literatur，Abt.Grenz-und Binnenkontrolle，10.5.1961.BArch DL 203，04-07-05（204）。

[44] Flugblatt，Evang. Kirchen，“Aktion der Bücherpäckchen”，Bericht，Zollverwaltung，Abt.Recht，7.9.1959.BArch DL 203，04-07-05（294）.

[45] Hettasch-Haarmann：Hilfsaktion，S.30.

[46] 参阅 Unterlagen EZA 104/722。

[47] Information，Zollverwaltung der DDR，7.8.1980.BArch DL 203，04-07-05（294）.

[48] Hettasch-Haarmann：Hilfsaktion，S.31.

[49] Maßnahmenplan von Hauptverwaltung Zoll，Abt.Binnenkontrolle，Zollkommissar Epp，11.10.1957 u.weitere Unterlagen.BArch DL 203，05-04-00（310）. VP-Bezirksbehörde Schwerin an Ministerium des Innern，17.6.1966.BArch DO 1，183/2. Hauptverwaltung Zoll，Abt.Postverkehr，25.11.1965.BArch DL 203，05 04 00（310）.

[50] Konrad von Rabenau于2007年9月19日讲述。

[51] Information，Zollverwaltung der DDR，7.8.1980.BArch DL 203，04-07-05（294）.

[52] Information，Zollverwaltung der DDR，7.8.1980，S.17.BArch DL 203，04-07-05（294）.

[53] Sherrill，John；Sherrill，Elisabeth：Der Schmuggler Gottes. Wuppertal 1981. Neerskov，Hans Kristian：Bibeln auf verbotenen Wegen. Erzhausen 1976. Damson，Erwin：Gezeichnet Mielke，Abt.Recht，7.9.1959.BArch DL 203，04-07-05（294）.

[54] Flugblatt，Evang. Kirchen，“Aktion der Bücherpäckchen”，Bericht，Zollverwaltung，Abt.Recht，7.9.1959.BArch DL 203，04-07-05（294）.

[55] 据一位工作人员于2000年透露，“东部之光”组织到目前每年从巴符州的科尔恩塔尔总部运往独联体国家、波罗的海三国及其他东欧国家的救援物资和图书达400吨。Damson：Gezeichnet Mielke，S.160.

[56] Damson，Gezeichnet Mielke，S.50f.参阅 zu “Licht im Osten”，“Christliche Ostmission” und “Open Door（Holland）” Information，Zollverwaltung Berlin，15.7.1980.BArch KL 203/294。

[57] Ludwig Oberst，Hauptabteilung XX，17.12.1974. BStU，MfS，HA XX/4，Nr.1865. Stellvertreter des Leiters，Hauptverwaltung Zoll，an MfS，Hauptabteilung VI，14.8.1980.BArch DL 203，04-07-05（294）. Information，Zollverwaltung der DDR，7.8.1980.BArch DL 203，04-07-05（294）.

[58] Bericht von Hauptverwaltung Zoll，Stellvertreter des Leiters operativ，2.3.1978.BArch DL 203，05-04-00（310）. Information，Zollverwaltung der DDR，7.8.80.BArch DL 203，04-07-05（294）. Bericht “Die Entwicklung und Wirksamkeit der Zollkontrolle auf dem Gebiet des Postverkehrs”，wohl 1969.BArch DL 203，05-02-00（305）；Hauptverwaltung Zoll，Abt.Postverkehr，20.5.1976.BArch DL 203，05-03-05，Bd.1（309）.

[59] Information von Zollverwaltung der DDR，7.8.1990.BArch DO 1，83/2.亦参阅 Bericht Kontaktaufnahme und Aufrechterhaltung von Kontakten kirchlicher Kreise während der Messe in Leipzig，Arbeitsgebiet Schutzpolizei，5.11.1969.BArch DO 1，83/2。

[60] Information，Zollverwaltung der DDR，7.8.1980.BArch DL 203，04-07-05（294）.

[61] Konrad von Rabenau于2007年9月19日讲述。

[62] Falcke，Heino：*Der Bund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n in der DDR. Ziele und Strategien bei den Konsultationen mit dem Raad van Kerken in den Niederlanden*. In：Jahrbuch für Niederlande-Studien 13/2002，S.93.

[63] Havel，Václav：*Versuch*，*in der Wahrheit zu leben* . 10.Aufl.，Hamburg 2000，S.24f.

[64] Hauptverwaltung Zoll，Abt.Kader und Ausbildung，3.5.66.BArch DL 203，00-06-03（29）3v.3.

[65] Chefinspekteur Stauch an Leiter der Bezirksverwaltung Frankfurt（Oder），15.2.1979.BArch DL 203，04-07-05（294）.

[66] Hauptverwaltung Zoll，Abteilung Recht，Abteilungsleiter Zolloberkommissar Krebs，14.2.1966.BArch DL 203，05-02-05（308）. Hauptverwaltung Zoll，Abt.Recht，Abteilungsleiter Zolloberkommissar，26.2.1966.BArch DL 203，05-02-05（308）.

[67] Hauptverwaltung Zoll，Abteilung Recht，Abteilungsleiter Zolloberkommissar Krebs，14.2.1966.BArch DL 203，05-02-05（308）.

[68] Bericht von Hauptverwaltung Zoll，Zollhauptkommissar Klosig，20.7.1965，am 29.7.1965 von Stauch weitergeschickt an das MfS.BArch DL 203，05-02-05（308）.

[69] Vermerk，Hauptverwaltung Zoll，Abt.Postverkehr，2.2.1973.BArch DL 203，05-02-05（308）.

[70] Bericht von Hauptverwaltung Zoll，Zollhauptkommissar Klosig，20.7.1965.BArch DL 203，05-02-05（308）.

[71] Bericht von Hauptverwaltung Zoll，Zollhauptkommissar Klosig，20.7.1965.BArch DL 203，05-02-05（308）.亦可参阅 ZK der SED，Abt.Sicherheitsfragen，an Leiter der Zollverwaltung der DDR，Chefinspekteur Stauch，19.9.1978.BArch DO 1，183/2。

“仅供教会内部公务使用”

——回顾公务性和私人性秘密阅读

彼得·席克坦茨（Peter Schicketanz）

1945年5月，我首先把纳粹书刊烧了。[1] 1953年2月，我当时在哈雷读大学，住在神学院翻新过的大学生宿舍。大学生牧师约翰内斯·哈默尔（Johannes Hamel）被逮捕后有关部门要进行一次住宅搜查，作家赫尔穆特·戈尔维策（Helmut Gollwitzer）讲述他在苏联战俘经历的《……带领到你不想去的地方》被我烧了，因为书中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1961年**8**月**13**日之前如何获取西德图书

教会人士每年可以在柏林约翰内斯基金会书店自行挑选30西德马克的图书，由书店赠送，因为从东柏林到东德的火车上有时会遇到运输警察检查，所以最好是挑选安全放心的图书。

我在做助理牧师期间，从西柏林给哈雷的神学院宿舍图书馆带了大量神学书刊。去往柏林和从柏林开出的火车上总会意外遇到检查，一次在去哈雷的旅途中，我带着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圣经名言小册子就遇到了麻烦，书名《圣经名言》（*Lösungen* ）[2] 在运输警察看来是军事用语。像《明镜周刊》这样的杂志我还是在西柏林读完后就留在那。有时在衬衫下面藏一本。检查官只有认为的确可疑时才会搜身。

柏林墙建造后如何获取西德图书

专业书刊安全放心，适合邮寄，文艺类书刊也是邮寄比捎带更保险，因为海关官员的决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也很独断专行。1974年至

1989年秋这段时期，我作为伤残退休人员可以去西德或西柏林短期逗留，所以除了很多其他礼物还总是试着带些图书回来。我总共去了103次，其中102次是开着我的瓦尔特堡轿车去的，经过206次检查，遇到过好些麻烦。和火车上的检查相反，开车过边境检查有时要等上好几个小时，有时还要和海关交涉。

最基本要做的是在海关报关单上（单子不大，A6大小）标明所有礼物。如果看到一张单子上写有图书，负责检查的海关官员就经常拿起下一张，很显然每个班都有一位官员专门负责检查图书。如果官员起了疑心，就要把书收走做进一步审查，并且给的答复是，如果图书没有问题就给寄回去，为此要先向东德中央银行支付3东德马克作为邮资。为了避开这一潜在危险，我把“Taschenbücher”（平装袖珍书）在报关单上尽可能写得让海关官员读成“Taschentücher”（面巾纸），这一招相当管用，如果检查起来我就说我绝对应该在报关单上注明了图书。

有时候我也采用更过分的办法，把书藏在车里不上报，坚信我没带这些书，还有把我一定要保留的报纸文章剪下来藏在夹克口袋里。有一次我要带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胡斯（Rudolf Höß）的传记入境，就遇到了麻烦。[3] 检查官认为这是纳粹党卫队的刊物，我说这本书1946年在波兰首次出版，他们并不认可，把这本书没收了，没再给我寄回来。还有一些平装小册子也经常被当做报纸或杂志没收，我为此有时还和检查官争吵起来。

有一次，一批待出版的文稿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4] 我把文稿给一位来自西德的教授看了看，然后想带回家。但过了两个小时之后才在柏林的因瓦里登大街拿回手稿。令人惊讶的是，在我的国安部档案中对这次边境检查只有一次记录。

在东德，柏林、莱比锡、哈雷、耶拿、格赖夫斯瓦尔德和罗斯托克的大学都有神学院，此外还有6所神学教育机构，包括瑙姆堡高等神学

院、柏林语言神学院、莱比锡神学院、柏林和埃尔福特的传道学校以及波茨坦新教牧区教育学院。这些学院从70年代初开始，每年可以公开进口一定数量的神学学术书刊。

新教高等教区委员康拉德·冯·拉伯瑙（Konrad von Rabenau）博士必须将书单给格哈德·巴萨哈克（Gerhard Bassarak）博士（教授）过目。德国新教教会每年提供约12.5万西德马克作为资金支持。自然不用说，刊物内容都未涉及东欧集团国家和东德教会的情况。对于传统历史神学研究来说，这将带来一份价值连城的财富，而对于神学实践研究的意义有限，因为实践研究涉及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题材的书籍显然根据规定不允许进口。此外，教会图书馆通过私人关系、邮寄、莱比锡书展或者走亲访友的方式也会获得这样那样一本重要的图书。

教会机构如何复制刊物

从1965年起，我做过主教个人助理，后来又任马格德堡新教教会监理会教育处负责人，积累了一些传播教会内部刊物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我从1979年起任波茨坦牧区教育学院院长期间提供了帮助。我们的读者只有教会人士。在东德，基本上复制图书都要经过批准，图书复制规定颁布以后，教会在所有内部刊物上都要注明“仅供教会内部公务使用”，这样就避开了规定中要求的批准许可。另一方面教会的这种行为得到国家机关默许，但没有明文规定这种行为是合法的，也就是存在这么一个灰色地带，可能随时被国家禁止。教会大量誊写的印刷刊物当然几乎不包含在国家看来备受争议的爆炸性题材，但如果是教会代表会议上和教会领导层对社会问题发表的观点、做出的决议，就总是存在风险，国家可能没收复制设备或者禁止复制行为，但我不记得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过。

对于时下的爆炸性事件，我们采取另一种国家允许的方法——使用打字机制作复本，比如教长在其主教管辖区就采用这种方式复制重要刊

物给教区牧师，教区牧师可以再做复本给下面的牧师。1968年8月底苏联以华约组织名义入侵捷克后，马格德堡的教会领导就通过这种方式公开声援捷克教会。

波茨坦的牧区教育学院1980年正式配备了一台新式复印机，是第一批配备复印机的教会机构之一。学生和教师复印的上课材料和私人文件当然经常含有国家眼中的“危险性文字”，比如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的歌曲、莱纳·孔策（Reiner Kunze）的作品[5]、西德教会书刊等不允许在东德印刷的刊物。虽然学院被视为“思想不良”大学生的聚集地，我们还是很幸运的，没有人指控我们，没有哪位讲师和学生是国安部的通报合作者。虽然国安部每年都尝试雇用学生做通报合作人，但1990年后我们得知，国安部没有得逞。



Probeexemplar des Arbeitskreis Gerechtigkeit [5.7-35] S 39.1/575.

NUR ZUM INNERKIRCHLICHEN GEBRAUCH — 17. Februar 1988
(vormals "aktuell")

wende NZ

Kommunikaze II:

Deines Bruders Zensor...

Berlin (wez) + "Kirche in der DDR heute ist der Versuch, die Zahnpaste wieder in die Tube zu bekommen." (gezeichnet Dr. Blend A. Med.)
Sich um Benachteiligte zu kümmern, wie es das NT vorsieht, mag ja von Fall zu Fall ganz gut sein. Aber es muß im Rahmen bzw. in Berlin bleiben. Also lieber spärliche und entstellende Pressemitteilungen als das ganze Dilemma in der Provinz. Von die-

von Paul Saulus

sem Grundsatz ließ sich wohl auch der thüringische Landesbischof Dr. Leich leiten, als er dem Weimarer Superintendenten Flankenschutz gewährte, denn dieser verbot das Auftreten von Gemeindemitgliedern (!) im Rahmen von Gottesdiensten, um über die Vorgänge bei der Umweltbibliothek, von denen sie sich bei einem Berlinbesuch ein Bild gemacht hatten, zu berichten.

Im Adventsrundbrief Nr. 17 wurde dies dann zu einem Maulkorberlaß erweitert: "... ist die Abgabe von Erklärungen ausschließlich ... Angelegenheit der ... gewählten und ... bevollmächtigten Organe. Das sind die Gemeindekirchenräte, die Synode unserer Landeskirche und der Landeskirchenrat." Also lieber Nachrichten aus 5. Hand und Wochen später, aber keines-

falls "Erlebnisberichte" (Leich)! (Wie sowas geht wurde in Sachsen vorgeführt: Dem dortigen "Sonntag" gelang es, über die "Mitteilung der Kirchenleitung von Berlin-Brandenburg" vom 27. November 1987 bereits am 27. Dezember zu berichten. In wahrer journalistischer Selbstverleugnung wurde auch kein Mitarbeiter nach Berlin entsandt.)

Und die weitere Zukunft in Thüringen ist abzusehen. Neben der üblichen Postkontrolle ist jetzt

Der Landesbischof
der Evangelisch-Lutherischen Kirche
in Thüringen

17. Rundbrief

An alle
Pfarrer und Pastorinnen, ...
im Verkündigungsdienst

Liebe Brüder ...

Mit herzlichen Grüßen bin ich
Ihr

(Dr. Werner Leich)

auch der KiA (Kirchlicher Abschirmdienst, von dem sprachen wir schon in der vorigen Ausgabe) an den kirchlichen Briefkästen beschäftigt. Daß da nicht etwa jemand die "Kirche" bezieht und schon vor den offiziellen thüringischen Kirchenstellen informiert ist. Auch müssen Besuche aus nicht thüringischen

Thema: Горбачев – 'plazierte' Mangelware in ГДР

图**1 "**仅供教会内部公务使用**"**：**1988**年**2**月**17**日的《转折时代》杂志

其他个人经历

因为从1964年起，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到了一些拒服兵役的人，所以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国家人民军部队里允许读哪些刊物。部队明令规定内务检查时如发现西德刊物一律没收。但在东德，特别是联合出版社有少量特许出版的西德刊物，内容涉及和平问题：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的《和平条件》，戈尔维策

（Gollwitzer）、沃格尔（Vogel）和海得勒（Heidler）的《基督教信仰与核武器》，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的《新道德与国际法》和《核时代的生或死》，赫尔穆特·戈尔维策（Helmut Gollwitzer）的《基督教徒与核武器》，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的《桥上的男人》，沃尔夫冈·博尔歇特（Wolfgang Borchert）的《门外》，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的《早年的面包》，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待》及其1965年诺贝尔奖致辞，还有弗里茨·巴德（Fritz Baade）的《冲向2000年的赛跑》。胶版印刷的印有“仅供教会内部公务使用”字样的教会刊物和独立授权的教会报纸有时会被没收。1986年时，有位“建筑兵”想以“铁锹”为名为建筑兵们出一份手写报，结果第一版出版后就被判三个月监禁，关押在勃兰登堡州施韦特的军事拘留所。这种幼稚的做法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6]

作为东德公民，我需经批准才能在西德出版作品。为出版第一份关于波茨坦新教牧区教育学院的报告，我1980～1981年时向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申请，但几个月都没有音信。后来我被请去了在柏林的教会事务国务秘书处，汉斯·威尔克（Hans Wilke）博士说想先看一下文稿。我现在可以告诉他，书已经出版了。接着这件事情就没有了下文，而我也没拿到稿酬。

作为《新教布道书》和杂志《时代的标志》的作者之一，教会出版社的各个编辑总是要求我对我的文章稍作改动，而所有的文章一般没有任何问题。负责批准两本刊物的是两个不同的部门，《时代的标志》还拥有较多的自由空间。但我记得60年代末我在柏林出版的《教会》周报写了一篇社论，其中“德国”这个词被编辑部删了。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一些东德出版物也进了图书馆的毒草柜，比如说周报《教会》。我儿子在萨勒河畔的哈雷马丁—路德大学读社会学，1987年时为研究与和平有关的表达用语，需要在大学图书馆查阅1950年

全年的《教会》，图书馆要求一位信仰马列主义的讲师开具许可证。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无神论书刊后来也一下进了毒草柜，不再外借。[7]

一个特别荒谬的例子：东德领导人昂纳克（Honecker）1970年8月17日给西德的妇女运动与和平运动重要积极分子克拉拉·法斯宾德教授（Prof.Klara Fassbinder）写了信，昂纳克在信中对建筑兵[8]的问题给予了非常积极肯定的评价，认为建筑兵也可接受高等教育，这封信1970年9月发表于德国和平协会的杂志《勇气》。当时建筑兵尤其受到歧视，并且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东德只流传着这封信的摹本，我们想将这封信公开刊登出来。到了1981年1月25日，《教会》周报才在一篇关于在萨克森州克尼格斯瓦尔德举行的和平讨论会[9]的报道中非常隐晦地刊登了这封信的重要内容，很可能审查官将这段引文看漏掉了。

鲁道夫·巴赫罗（Rudolf Bahro）、罗伯特·哈费曼（Robert Havemann）的作品还有比尔曼（Biermann）的歌曲都在私下里传阅得相当顺利，但大家能看的时间太短了，因为别人也要等着看。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非法复制的各种反对派发表的公报，反对派的行动持续得越久，国家机关就越加限制这类刊物的传播复制。1989年10月和11月，我们波茨坦的教师和学生可以用这些非法复制的文字制品彻彻底底地给几面柏林墙装饰一番。[10]

---

[1] 比如有Johanna Haarer的《妈妈，讲讲阿道夫·希特勒吧！》，慕尼黑，柏林，1939；Heinrich Hoffmann的《围绕希特勒的青年时代》，慕尼黑，1943；还有每个月花10芬尼买的《战争小册子》。

[2] 德语中这个词也表示军事口令的意思。——译者注

[3] Broszat，Martin（Hg.）：*Kommandant in Auschwitz.Autobiographische Aufzeichnungen des Rudolf Höß* . München 1963.

[4] Philipp Jacob Speners-von Carl Hildebrand von Canstein的传记，文稿在哈雷。

[5] Aus Kunze，Reiner：*Die wunderbaren Jahre* . Frankfurt a.M.1976.

[6] Koch，Uwe：*Das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die Wehrdienstverweigerer der DDR und die Bausoldaten der Nationalen Volksarmee* . Magdeburg u.Schwerin 1997（Sachbeiträge 6 des Landesbeauftragten für die Unterlagen des SSD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S.73 und Faksimileabdruck S.78-81.

[7] 参阅Heyden，Günter；Mollnau，Karl A.：Ullrich，Horst：*Vom Jenseits zum Diesseits* . Wegweiser zum Atheismus，Bde.1-3，Leipzig 1959/1960/1962 oder Klohr，Olof（Hg.）：*Moderne Naturwissenschaft und Atheismus* . Berlin 1964。

[8] 所谓的建筑兵是东德自1964年起对拒服兵役者实行的一种妥协办法，体检时表示拒服兵役的青年男性可召至施工单位，不必接受武装培训，而是首先在军队内部然后到经济建设单位从事建筑工作。参阅 Uwe Koch：*Die Baueinheiten der Nationalen Volksarmee der DDR-Einrichtung，Entwicklung und Bedeutung* . In：Deutscher Bundestag（Hg.）：*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Aufarbeitung von Geschichte und Folgen der SED-Diktatur in Deutschland* "，Bd.II/3，Machtstrukturen und Entscheidungsmechanismen im SED-Staat und die Frage der Verantwortung. Baden-Baden 1995，S.1835-1899。

[9] 该会每年举办两次，讨论社会正义、和平及环境问题。——译者注

[10] Kirche von Unten：Bericht zu den Übergriffen der Staatssicherheit in Weimar 29.10.88. Berliner Oppositionsgruppen：Der Einmarsch gegen die Gültigkeit der Kommunalwahlen 1989 in Berlin vom 12.5.1989. Gutzeit，Martin；Noack，Arndt；Meckel，Markus；Böhme，Ibrahim：Vorlage zur Bildung einer Initiativgruppe mit dem Ziel，ein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in der DDR ins Leben zu rufen. Niederndodeleben，24.7.1989. Böhlener Plattform，Anfang September 1989. Künstler：Resolution vom 18.9.1989. Aufbruch 89 Neues Forum：Verschiedene Texte des Neuen Forums vom 1.10.u.7.10.1989. Stadtjugendpfarramt Berlin：Gedächtnisprotokolle über Tage und Nächte nach dem 7. Oktober 1989 in Berlin（80 Seiten）. Informationsgruppe der Ev.Ausbildungsstätte für Gemeindepädagogik，Potsdam：Gedächtnisprotokolle über 7. Oktober und danach（12 S.）. Demokratie-jetzt. Zeitung der Bürgerbewegung，30.9.89. Vereinigte Linke，Erklärung vom 12.10. 1989. Demokratischer Aufbruch sozial ökologisch，Berlin，29.10. 1989 und Programmatische Erklärung，2.10.1989. SDP，Rede Meckels zur Gründung，7.10.1989 und Aufruf vom 14.10.1989. Unabhängige Studentenbewegung Berlin，21.10.1989. Initiative Frieden und Menschenrechte：Erklärung vom 28.10.1989.

国家安全部为何秘密阅读《守望台》？

——东德对耶和华见证人的迫害

汉斯-赫尔曼·德克森（Hans-Hermann Dirksen）

1950年8月31日，耶和华见证人在东德遭到禁止，他们被指披着宗教活动的外衣挑衅现行的“民主秩序”和法规，并且不断引进和传播非法宣传资料。东德当局认为这些资料不仅触犯了宪法，也违背了“追求和平发展”的原则。[1] 这一禁令发布之后，国家安全部立刻在全国境内发起了搜捕行动并成功逮捕了好几百名耶和华见证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耶和华见证人成为遭到东德最严重迫害的宗教团体，就连其核心期刊《守望台》也受到国安部的监视？国安部为什么对这一刊物密切关注长达四十年？耶和华见证人们又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中设法获得这本杂志的呢？要理解偷运这一刊物的具体意义，就得先了解一些背景信息。

耶和华见证人（或称圣经研究者）的历史

耶和华见证人（之前也被称作圣经研究者）于19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 商人C.T.罗素（C.T.Russell）出于对主流教派的失望在1879年创办了《锡安的守望台》杂志，并在其中对圣经的教义进行了重新阐释。[3] 1884年，“宾夕法尼亚守望台传单协会”成立，志愿者们从这里将圣经和《守望台》寄给全球各地的订阅者，并且在其他国家开始了传教活动。[4] 1897年，耶和华见证人传播到了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在教徒们传播教义、教人们如何理解圣经看待世界时事的过程中，《守望台》及其副刊《警醒！》[5] 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直至今日，这两本期刊仍然是教徒们的论坛，负责公布教义以及团结全球各地的教徒。虽然这些刊物也涉及政治迫害和镇压等敏感话题，但教徒们都遵纪守法，并没有打算与国家为敌。魏玛共和国时期，耶和华见证人这一教派得到了非

常显著的扩张，但就在希特勒夺权之后的1933年，耶和华见证人会却由于其政治中立的态度在德国被全面禁止，许多见证人们被起诉或者以“保护性拘留”为名被盖世太保送至集中营。[6] 集中营内的见证人们有着自己的标志：紫色三角形。在第三帝国时期，《守望台》也被当权者视作绊脚石。[7] 刊物必须从国外偷运入境，之后再被秘密地复制加印，甚至有人一度成功将圣经和《守望台》偷运入集中营。整个纳粹统治期间共有约10000名见证人死于监狱，约2000名见证人丧生于集中营。[8] 其中大约有300名见证人由于拒服兵役而被处决。

连连遭受东德当局迫害

纳粹统治结束后，耶和华见证人们从监狱和集中营被释放出来并再次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教会被重新组织起来，之前丧生的见证人们则被当局归类为纳粹制度的牺牲品。在属于苏占区的东德，耶和华见证人与其他教会及教派一样，一开始就遇到了如何印制宣传刊物的问题。“《守望台》书社”名下有一座位于马格德堡市的旧印刷大楼（即所谓的圣经大楼），教徒们曾试图使其重新投入运行，不过苏联军管会的哈雷分部及其柏林总部都拒绝为他们颁发印刷执照，[9] 最后他们仅仅拿到了几个传单和海报的印刷许可。因此，《守望台》不得不先在西德印刷然后再运到东德，这便导致了后来所谓《守望台》非法引进的问题。

当时德国有关杂志引进及销售的基本规定源于同盟军在1947年6月25日颁布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第55号令：“东西德印刷品和影片的流通。”[10] 当局声称这一号令旨在促进民主报章杂志的发展，但各占领区的指挥官有权针对违反这一号令的出版物及个人“必要情况下采取一定的措施”。苏联军管会因此于1948年6月29日在苏占区发布了第105号令，名为“改善苏占区杂志销售情况”，实则用于监督不受东德政府欢迎的各类杂志。苏占区当局还设立了“邮政报刊局”，负责管理东德境内所有报纸杂志的传播，所有期刊报纸必须在出版前接受该机构的审查，如没有通过审查，邮政报刊局则不予登记，也就意味着这本杂志被禁止引

进和销售。

很快苏占区当局就认为耶和华见证人既无益于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利于政府传播无神论。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徒们挨家挨户进行传教活动，借助圣经和《守望者》向人们传播一种思想，即“只有上帝和他的王国才能真正解决人类的难题”，这更是引起了当权者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反感。国家安全部认为《守望者》传播的并非无神论，这就已是一种危险，而这本杂志对再次开始的审查监管活动进行额外报道，则直接使其成为了当局眼中的煽动性刊物。第一篇报道苏占区人民生活情况的文章发表于1947年12月22日的《警醒！》杂志，标题为《苏联统治下的德国》，文章中这样写道：“虽然集中营和盖世太保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东德的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觉得现在的生活与纳粹时期相比并没自由多少。大规模的监督审查渗透了所有领域，而当局所采用的方法也多与纳粹的非常相似。［……］官方所谓的言论自由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比纳粹统治时期更自由，不过人们并不能完全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是完全民主的想法。”[11] 耶和华见证人大幅报道政治和社会弊端其实并非创新之举，他们只是尝试着以此来进一步论证他们的观点，即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政权可以对世上的人和事进行判决。当时约有20000名耶和华见证人在东德以小组形式进行传教活动，这让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高层们隐隐感觉到了威胁的存在。

如何遭到东德当局禁止

1949年9月13日，东德中央政治局决定限制耶和华见证人的传教活动。瓦尔特·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向议会提交了第九号决议草案，该草案包括十项条款，全面确定了针对耶和华见证人的具体措施。根据该草案，耶和华见证人在苏占区的种种迹象越来越表明，该组织“通过精心策划在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进行宣传”，甚至通过某些个案可以发现该组织“在从事间谍活动”。另外草案作者还颇为担忧地指出，“该组织的成员数量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迅速增长，吸引了东德各大

民主团体（德国民主妇女联盟和自由德国青年团），甚至引起了东德社会统一党的注意”。“为了防止这些团体继续发展，打击其恶性宣传，必须采取以下措施：1.各报刊广播必须立即揭发‘耶和华见证人’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的所有宣传［……］2.‘耶和华见证人’的印刷品须持有出版证明才允许在苏占区销售，并且出版证明上必须盖有国家安全部许可章，所有没有获得许可的印刷品必须即刻予以没收。”

于是，越来越多的礼拜活动被取消，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被拘捕，还有越来越多的杂志被没收——因为邮政报刊局没有把它们登记在案。马格德堡的圣经大楼在1949年9月至1950年8月间一共被搜查287次，仅仅《守望台》就被没收了14000本，没收刊物情况最严重的是梅前州、勃兰登堡州以及萨克斯州。[12] 从1950年初开始，遭到查处的印刷局还额外收到了50～150马克的罚单，理由是“传播无印刷许可的刊物”。这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针对耶和华见证人进行的“依法”打击行动，其法律根据同样是苏联军管会之前发布的第105号令。[13]

可是，耶和华见证人们并未因此而退缩，反而通过一封长长的请愿书成功地使公众都开始关注他们的困境。鉴于这种情况，东德内务部长施泰因霍夫（Steinhoff）于1950年8月31日颁布了一项禁令：“从即日起，‘耶和华见证人’及其组织在东德境内和柏林苏占区被全面禁止。上述者的任何行为以及他人按照上述者意愿进行的任何行为都将被禁止，违者将予惩处。”[14] 而就在颁布禁令的当天，国安部已派人把马格德堡的圣经大楼封锁。自此，之前由警察负责的针对耶和华见证人的管制活动正式由国安部接手。另外，国安部在同一天于全东德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搜捕行动，逮捕了至少400名耶和华见证人，一些搜捕人员手段粗暴，致使两名见证人死亡。[15]

东德最高法院公开审判

为使上述禁令有法可依，统一社会党决定在柏林最高法院举行一场

大型公开审判，作为之后对耶和华见证人进行刑事诉讼的依据，当时的审判长是希尔德·本杰明（Hilde Benjamin）。1950年10月4日，柏林最高法院根据东德宪法第六条第二项对九名耶和华见证人作出判决：他们分别因参与间谍活动、煽动战争、教唆民众抵制政府被判处八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终身监禁。[16] 判决书宣称，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总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因此那些被发送到美国的报告很有可能是供间谍机构使用的。判决一出，各大宗教刊物却纷纷指出，该判决反而会促进宣传好战言论以及扩大帝国主义的影响。[17] 事实上，这项判决不仅使上述禁令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还为之后针对耶和华见证人的迫害活动奠定了基础。因为接下来的几年内，东德各级地方法院共审理了几百起涉及耶和华见证人的刑事诉讼案件，而最高法院做出的这一基本判决则为这些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尽管耶和华见证人的高层已在1950年秋被捕，但东德地区的传教活动并未中断。传教活动负责人在西柏林买下了一间办公室，这样教会才得以继续存在，传教活动才得以继续进行，另外这里还负责为一些非法存在的下级教会提供宗教刊物。为此，东德内政部在于1951年1月15日向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写道："自针对'耶和华见证人'的禁令出台以来，该派教徒在不同地区仍然活动频繁，因此必须对这些教徒进行监视。另外，《守望台》在这些地区的非法销售也非常猖獗。"[18]

《守望台》是如何进入东德境内的？

自禁令颁布以来，来自各个下级教会的耶和华见证人们定期从东德乘火车到西柏林，充当运输《守望台》杂志的信使。他们将杂志藏在包里或者贴身的口袋里，以避过粗心的搜查人员，还有一些人则试着把杂志藏在裤腿里或者自行车轮胎里，不过这样偷运刊物往往伴随着很高的风险。针对日益猖獗的刊物走私活动，当时的内务部国务秘书赫伯特·沃恩克（Herbert Warnke）在1950年10月9日向东德人民警察总局下达了

命令：“出于这一原因，请务必加强这些地区的检查力度，尤其要注意边境区域的贸易往来和集会，防止未经许可印刷的刊物进入东德境内。”[19] 另外，运输警察也要定期进行抽查。一旦见证人被抓，后果将非常严重。19岁的霍斯特·亨舍尔（Horst Henschel）被捕时曾试图把350本《守望台》从西德带入东德，1951年6月16日，亨舍尔被指控“倒卖性质最恶劣的物品”，尽管他年纪轻轻，却仍然被科特布斯第一刑事法庭判处了十二年监禁。[20] 此外，耶和华见证人甚至能够找到方法和途径把刊物偷偷送入东德监狱，比如他们会把圣经和《守望台》剪成纸条，塞进无核的烤李子或者去了仁的核桃里面，然后把这些李子、核桃放在包裹里寄给狱中的教徒。

22岁的见证人鲁特·梅尔内特（Ruth Mehrnet）在从柏林前往德累斯顿的路上也遭到了盘查。她于1953年2月22日从西柏林进入东德境内，身上藏了12本《守望台》，另外还带了一个大蛋糕，警察在对她进行盘查的时候在蛋糕里发现了约40本杂志和一些宣传资料。[21] 鲁特·梅尔内特在德累斯顿被移交给了国安部，在那里每天晚上都被迫接受审讯，遭受了极大的心理折磨。[22] 国安部指控她犯了教唆民众抵制政府罪，因为“她抓住一切机会宣传教会的歪理邪说，并且多次前往西柏林，将被禁的‘耶和华见证人’宣传刊物偷运到东德”。[23] 德累斯顿地区法院最终于1953年4月16日秘密地判处了鲁特·梅尔内特八年监禁。[24] 柏林地区法院则在1954年5月21日依据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第三十八号令第二段第三条判处另一名见证人夏洛特（Charlotte）三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理由是：“她每周都定期参加在西柏林为东德教徒举办的集会，另外还用尽各种方法购买该教派的各种广告宣传资料，其中大多是类似《警醒！》这样的杂志。”她还在东德大量销售推广这些杂志。[25] 由此可见，非常多女教徒也曾参与到了偷运刊物入境的大军中，她们对于国安部来说大都比较陌生，所以能避免被人盘查或者被捕。可事实上也正因如此，被捕的女教徒比例大大增加了。

Diese Beobachtung veranlaßte den Kontrolleur, die dem äußeren Erscheinungsbild nach original verpackte Rolle gründlich abzudrücken. Dabei wurde festgestellt, daß sich in der Mitte keine Kekse befinden.

Die Inhaltskontrolle ergab die Feststellung von Flugblättern der "Zeugen Jehovas" (Bild 1 und 2).
Daraufhin wurde die Person ausgesetzt und eine tiefgründige Kontrolle mit anschließender KD durchgeführt.

Bei der Röntgenkontrolle einzelner als Schmuggelverstecke geeigneter Gegenstände konnten in einer Rolle Alufolie weitere Flugblätter festgestellt werden (Bild 3).

Die KD führte zur Feststellung der übrigen Druckerzeugnisse am Körper der Reisenden.

<u>Verteiler:</u>

wie Information 14/80





图**1 1981**年**9**月**28**日海关总局关于一起走私案的报告，耶和华见证人将传单藏在饼干筒和烤李子里面

对于国安部来说，要找出走私非法宣传刊物的具体路线是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耶和华见证人组织严密，教派内仅有少数人知道宣传刊物是如何进入东德境内的，这样便有效防止了混入教派内的“卧底”们得知机密，而不知情的教徒们即便被国安部抓去问话，也无法被问出有价值的信息。另外，国安部也非常重视东德耶和华见证人与该教派西柏林办事处之间的秘密联系。1955年9月，国安部派出两名少尉暗中监视三名乘火车前往西柏林的女教徒，当这几名教徒拿到刊物踏上归途时，恰巧遇到乘警对旅客们进行盘查，由于这很可能导致两名少尉的任务失败，所以他们命令乘警不要检查这一节车厢，乘警们服从命令转而前往另一节车厢检查，最终逮捕并遣返了好几名耶和华见证人。[26] 而这几名女教徒虽然顺利地回到了家中，其走私线路却也由此暴露。

柏林墙建立带来的转变

耶和华见证人驻西柏林办事处早在1959年和1960年便已经对东德教会的结构进行了调整，这样即使西柏林办事处与东德各教会的直接联系受阻，仍能保证传教活动继续进行。1961年教会已成功完成改组，柏林墙被建起时，西柏林办事处立刻停止了运作。从此以后，威斯巴登的分办事处成为该教派在西德的总部，继续负责为东德地区的传教活动提供支持，那里的教徒们想出了新的办法，继续将宣传刊物偷运入东德。边境被封锁之后，《守望台》便成为了东德教徒与西德教徒间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

耶和华见证人当时的领头人之一是莱比锡的埃贡·朗格（Egon Lange）。1950年禁令颁布之后，他和很多其他教徒一样充当起了往来于东德与西柏林办事处之间的信使，并因此于1954年被判处了六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他在东德的埃尔福特、格拉、苏尔三座城市组建了大大小

小共29个教会，吸收了约1300名教徒。他的行为同时也引起了国安部的注意，自此他和他所在教会的教徒都受到了国安部的密切监视，情报机构试图借此查清楚教徒们复印刊物的方法以及他们一般会将刊物藏在哪些地方。最终朗格在1965年的一次大型搜捕行动中再次被捕，国安部的人员在他的住所内共找到了146本《守望台》和35本《警醒！》以及13本书籍和宣传手册。为期数周的审讯结束后，朗格和他所处教会的教徒们在国安部的总结报告中被认定总共走私及复印了22000本《守望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东、西德之间的铁路和公路交通，例如在客用火车上安置传递情报的'死信箱'或是借助退休者前往西德探亲访友的机会。另外，他们的西德总部使用掩护性地址与东德联系点互通邮件，以缩微胶卷或密码的形式传递信息和命令。"位于威斯巴登的耶和华见证人西德总部那时已转而采用将《守望台》印在缩微胶卷上的方法将其寄往东德，东德的教徒们再以兴趣摄影研究室为掩护，在那里将胶卷放大并复制。在搜查朗格的住所时，国安部没收了各种各样的私人摄影配件。另一名教徒家中则藏有一台用来排版印刷模板的机器："在搜查这些教徒的住所时［……］我们找到了9900张打字纸，2300张、满满七袋照相纸，1000个可反复使用的普通印刷模板和胶版彩色印刷模板，六个文件夹的复写纸。这些都是用来复印违禁刊物的，为了安全起见，被分给了不同的人保管。"国安部将没收的两台打字机视作搜查行动的重大成果，并且努力试图证明这两台机器曾被用于非法用途："根据国家安全部技术调查科附上的鉴定报告，这两台被没收的打字机中型号为［……］'Urania'48364的那一台曾被该教派用于打印文章，而另一台型号为［……］'Naumann-Erika'6504485的打字机则曾被用来制作印刷模板。"[27] 朗格最后于1966年10月10日被埃尔福特市地区法院判处六年监禁，[28] 判决理由之一是，他传播的杂志刊物有引导读者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倾向。

1966年，位于柏林的德国当代历史研究所对耶和华见证人的宣传刊物做出了一份鉴定报告。鉴定专家们打着科学的旗号，披着宗教的外衣

对政治进行抨击，意在通过系统的、有计划性的逐步渗透来宣传反共思想，传教内容危害国家安全，而读者并不能很快识别出这种隐藏着的别有用心，这些刊物无疑是非常危险的。[29]

另外一位名叫海因茨·库托沃斯基（Heinz Kutowsky）的耶和华见证人也曾遭到调查。和其他诉讼程序中一样，国安部以及法院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守望台》的相关事宜上："［……］被告人复制的刊物不仅大肆贬低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和平所做出的努力（见1964年9月15日出版的《守望台》），甚至宣告我们国家已经瓦解，诋毁苏联和苏联政府（见1965年2月15日出版的《守望台》），还唆使读者反抗工人阶级的统治，反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65年3月1日和1965年5月1日出版的《守望台》）。1961～1965年，仅由被告人负责印制的该类煽动性宣传刊物就已达50000～55000册，并且被告人将这些刊物分发给了3000多个人［……］。"[30] 1966年12月22日，东德哈雷市地方法院对库托沃斯基作出判决，由于从事危害国家的煽动性宣传活动以及参加反国家组织而被判十年监禁。

国安部的调查行动表明，即便政府筑起了柏林墙并且限制了民众前往柏林的自由，仍然无法阻止《守望台》进入东德。随之改变的只是人们偷运刊物入境的方法。柏林墙建起后，教徒们首先将原版刊物带入东德，然后利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来自己复印刊物。直到80年代中期，威斯巴登总部发现了将刊物印制在薄印刷纸上的方法，人们才再次开始大批量地把刊物偷运到东德。

罗斯托克《守望台》展览及其他战略手段

1974年秋，国安部在罗斯托克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搜查行动，并在这次行动中"没收了非法教派'耶和华见证人'的大量走私印刷品和其他材料"，[31] 同时还没收了两台复印机、两台旅行打字机和一套完整的胶片冲洗装置。[32] 不过国安部也意识到这次行动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所

以他们的结论是："国安部在将来必须和其他安全机构合作，展开更有效的打击行动，系统地瓦解该教派以及孤立他们的教徒。"[33] 因此，参与行动的国安部工作人员有必要先了解耶和华见证人的传教方法和途径，熟悉该教派的书籍、杂志、宣传册、幻灯片等，这样才能避免查抄时有所遗漏。另外，国安部试图通过"对一些教徒主动施加全方位的影响将其从信仰的歧途上拉回来，目标对象是所有在罗斯托克地区居住和工作的年轻耶和华见证人或者这类由于年龄小、入教时间短，故而信仰不太坚定的教徒"。[34] 为此国安部选择了一种特殊的策略，策划了一次"记录国安部1974年在罗斯托克地区打击《守望台》书社之成果"的展览，于1975年1月在罗斯托克州政府举行，展览口号是"遏制《守望台》书社——所有党派组织、国家机构和安全机构的任务"，并且展出了很多图片和物品。[35] 国安部为了此次展览制作了许多展览板，展出了被没收的宣传刊物、胶片冲洗装置和排版器械，甚至还有复制刊物必需的颜料桶和小工具。至于这次展览是否成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并无任何相关报道可考。

当时许多教徒还自发用私家车来走私《守望台》，比如西德教徒利用前往东德的莱比锡参加书展的机会，抑或是东德的退休教徒利用去西德探亲访友的契机。国安部于是继续致力于通过政治战略性手段解决走私问题，这点明确体现在国安部于70年代发布的一项命令中："我们必须主动采取抵制措施以清理走私系统，包括依据相关的海关法规确认走私物品内容、详细询问物品来源、查清走私人员与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之间的联系。［……］已确认的走私物品务必被记录下来（如拍照），遭到遣返的走私人员以后也不允许进入东德境内，如走私人员是东德公民，则禁止将来离开东德。为了提高反走私系统战略手段的效果，务必在打击走私过程中对被没收的材料进行彻底的审查。"[36] 耶和华见证人在东德私自偷印宣传刊物在国安部看来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106条，同时违反了印制和复制印刷品的相关规定。[37] 尽管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打击走私活动的具体措施，国安部还

是得出了如下结论："到目前为止，在打击耶和华见证人的政治战略性行动中，我们收获的成果和经验表明，一切有关负责部门和个人应当更加系统地、目标更加明确地对该教派进行打击。"[38]

小结

当时在东德偷偷阅读《守望台》的大多数人都是耶和华见证人的本派教徒，大规模地传播该教派的宣传刊物是他们传教的重要特点。不过在那时的东德，即便教徒们持有大量宣传资料，也几乎不可能进行传教活动，更何况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些杂志刊物是教徒们用来研习教义的基础读物，同时也是从事传教活动的基本指导。传教过程中教徒都特别小心谨慎，圣经是传教时的必备物品。一些传记报道表明，即便在实行禁令的环境下，仍有新的教徒加入该教派成为见证人，国安部一旦注意到有人在秘密阅读《守望台》，就会彻底搜查这名读者的住所，经常有人因此而被捕，最后判处刑罚的理由往往并非"阅读"本身这一行为，而是参与了被定性为"危害国家"的宗教活动。直到80年代中期，耶和华见证人都一直被视为破坏和分裂政治思想的组织之一，对于国安部来说，这类教派就是国家的敌人，国安部负责相应事宜的第四部门（宗教部）应熟知该教派的各类刊物。1990年柏林墙倒塌之后，耶和华见证人再次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权益，1949年时东德的耶和华见证人数约为两万人，而到了1990年，这个数目仍然保持在两万左右。这一事实不但表明国安部在这些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也反映了国家在打压该教派时坚决和无情的态度，这些年共有约6000名耶和华见证人在东德被捕，其中一部分被判处长年监禁。在研究了联邦数据资料库的各类文献后，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国安部在打击耶和华见证人的行动中的确取得了成功，然而完全肃清该教派教徒的目标并未实现。

---

[1] Dirksen，Hans-Hermann：*"Keine Gnade den Frieden unserer Republik". Die Verfolgung der Zeugen Jehovas in der SBZ/DDR 1945-1990*（以下简称：Keine Gnade）。2.Aufl.，Berlin 2003，S.287.

[2] Reller，Horst；Krech，Hans；Kleiminger，Matthias（Hg.）：*Handbuch religiöse Gemeinschaft und Weltanschauungen* . 5.Aufl.，Gütersloh 2000，S.371f.Auffarth，Christopf；Bernard，Jutta；Mohr；Hubert（Hg.）：*Metzler Lexikon der Religion. Gegenwart-Alltag-Medien* . Stuttgart 2000，S.708ff.

[3] Grünberg，Wolfgang；Slabaugh，Dennis L.；Meister-Karanikas，Ralf：*Lexikon der Hamburger Religionsgemeinschaften* . 2.Aufl.，Hamburg 1995，S.121.

[4] Wachtturm Bibel und Traktat-Gesellschaft（Hg.）：*Jehovas Zeugen-Verkündiger des Königreiches Gottes* . Selters 1993，S.42.

[5] 该杂志最初名为《黄金时代》，后来改称《安慰》，1946年起名为《警醒！》。

[6] 他们不愿参加纳粹组织，不参加选举。此外他们普遍不接受高呼“希特勒万岁”的敬礼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致敬是在进行“一种礼拜”。

[7] 当时很早就有关于建立集中营的报道，让人们对犹太人开始遭到迫害这一事实引起关注。

[8] 参阅 Harder，Jürgen；Hesse，Hans：*Zeittafel zur Entwicklung und Verfolgung der Zeugen Jehovas* . In：Hesse，Hans（Hg.）：“Am mutigsten waren immer wieder die Zeugen Jehovas”. 2.Aufl.，Bremen 2001，S.432ff。

[9] Drucklizenzantrag. Wachtturm-Gesellschaft，Geschichtsarchiv，O-Dok. 20/5/46.

[10] “盟国管制委员会允许在各个占领区以及柏林发行的报纸、杂志、影片和书籍自由流通，希望以此为整个德国的信息及民主思想交流创造条件。各占领区的指挥官只有在军事安全需要或占领军需求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才可以限制这种交流，例如确保德国对同盟国履行其义务以及防止纳粹和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1] 摘自1947年12月22日的《警醒！》。接下来的几年，杂志里又刊登了一些讲述德国现状的文章，此外还有关于英国和加拿大的，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比如印度和中国。

[12] BStU，ZA，MfS AU 477/59，Bd.11，Bl.51-72.

[13] Gerichtsakte OLG Potsdam，Az.：3 Ss.126/50，Bl.7.Straflisten-Nr.：R 93/50.

[14] Dirksen：*Keine Gnade* ，S.287.

[15] 参阅 Hacke，Gerald：*Zwei Diktaturen-Ein Feind. Die Verfolgung der Zeugen Jehova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und in der DDR* . In：Heydemann，Günter；Oberreuter，Heinrich（Hg.）：*Diktaturen in Deutschland-Vergleichsaspekte. Strukturen，Institutionen und Verhaltensweisen* . Bonn 2003，S.283-308（Schriftenreih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398），S.293。

[16] Entscheidungen des Obersten Gerichts der DDR in Strafsachen. 1.Band，Berlin 1951，S.35.

[17] Urteil des Obersten Gerichts der DDR vom 4.10.1950，Az.：1 Zst.（I）3/50.Abgedruckt u.a.in：Neue Justiz，1950，S.452 ff.

[18] BArch DY 30 IV 2/14/247，Bl.15ff.

[19] BArch MdI，Hauptverwaltung Deutsche Volkspolizei（Bestand 11）861，Bl.75.

[20] 摘自Horst Henschel个人收藏的资料（由作者持有）。

[21] 审讯记录中还写道："梅尔内特是个狂热的教徒，宁可坐牢也不愿意放弃她的信仰。"UaP Ruth Becker1953年2月22日的记录。资料由作者持有。

[22] UaP Ruth Becker，MfS U.-Vorgang Nr.15/53，Az.：M 14/53.资料由作者持有。

[23] UaP Ruth Becker1953年3月6日的总结报告。资料由作者持有。

[24] UaP Ruth Becker. Bezirksgericht Dresden，Az.：1aKa 134/53.资料由作者持有。

[25] Stadtgericht Berlin，Az.：Ib（V）4/54（37.54）.

[26] BStU，ZA，MfS，BV Gera，OP.59/59，GV Nr.14/52 "Kuriere"，Bd.II，Bl.168ff.

[27] BStU，ZA，HA XX，1813/66，Bl.294-316.

[28] Bezirksgericht Erfurt，Az.：1 BS 28/66.

[29] UaP Fritz Kreher.资料由作者持有。

[30] Urteil des Bezirksgericht Halle vom 22.12.1966，Az.：I BS 11/66-I A 13/66.

[31] Einschätzung vom 5.12.1974. BStU，ZA，MfS，HA XX/4，1029，Bl.5. Einschätzung vom 5.12.1974.

[32] “Zersetzungsmaßnahme-ZJ-KD Grimmen. Bericht über die Zersetzungsmaßnahme der in der DDR verbotenen Organisation” Zeugen Jehovas “im Kreisgebiet Grimmen.” KD Grimmen vom 6.12.1974. BStU，ZA，MfS，HA XX/4，1029，Bl.46-72.

[33] “Zersetzungsmaßnahme-ZJ-KD Grimmen. Bericht über die Zersetzungsmaßnahme der in der DDR verbotenen Organisation” Zeugen Jehovas “im Kreisgebiet Grimmen.” KD Grimmen vom 6.12.1974. BStU，ZA，MfS，HA XX/4，1029，Bl.8.

[34] Einschätzung der KD Bad Doberan vom 5.12.1974. BStU，ZA，MfS，HA XX/4，1029，Bl.1-11. Einschätzung der KD Bad Doberan vom 5.12. 1974.

[35] “Dokumentation über die Ergebnisse der Bekämpfung der WTG im Bezirk Rostock 1974”. Einschätzung der KD Bad Doberan vom 5.12.1974. BStU，ZA，MfS，HA XX/4，1029，Bl.18-40.

[36] “Dokumentation über die Ergebnisse der Bekämpfung der WTG im Bezirk Rostock 1974”. Einschätzung der KD Bad Doberan vom 5.12.1974. BStU，ZA，MfS，HA XX/4，1029，Bl.26.

[37] “Dokumentation über die Ergebnisse der Bekämpfung der WTG im Bezirk Rostock 1974”. Einschätzung der KD Bad Doberan vom 5.12.1974. BStU，ZA，MfS，HA XX/4，1029，Bl.30.

[38] “Dokumentation über die Ergebnisse der Bekämpfung der WTG im Bezirk Rostock 1974.” Einschätzung der KD Bad Doberan vom 5.12.1974. BStU，ZA，MfS，HA XX/4，1029，Bl.44f.

“教会重视独立”

齐格弗里德·布罗伊尔（Siegfried Bräuer）博士（教授）（B）、沃尔夫冈·欣茨（Wolfgang Hintz）（H）、康拉德·冯·拉伯瑙（Konrad von Rabenau）博士（vR）与海德维希·里希特（Hedwig Richter）（R）的座谈

R：冯·拉伯瑙博士，您作为神学家是东德最有名的教会书刊走私者之一，同时您在瑙姆堡高等神学院担任讲师，这所学院出色的图书馆和您的投入付出是分不开的。你们进行图书走私要做的是什么呢？侧重点在哪儿？

vR：教会重视把新书引进东德，并且与东德宗教界保持独立，此外我们还要覆盖到不直接涉及神学题材，但对于将神学纳入更广泛的精神学科范畴具有重要作用的书籍，就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类的书籍。我们在瑙姆堡也教授很多东方教会史和俄罗斯文学的课程，也有艺术史，尤其还有哲学，东德的出版物无法满足我们对图书作为精神传承的宽度和广度的要求。

图书走私最需要的是西德新教教会和西德相关国家机构愿意提供帮助支持，尤其为图书运输提供资金基础，这样也就为东德带来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教育财富，而提供支持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东西两德之间保持畅通往来。

R：您是怎么把图书带到东德的？

vR：西柏林一家书店定期发给我们最新的书单，我们从中选取一些然后在这家书店订购。我们经常用旅行箱装书，有很长一段时间检查并不是很严格，此外我们走私的一般没有政治热书，而是专业图书。1961年建柏林墙以前，我们还能比较顺利地在西柏林买书，渐渐变得越

来越难，1961年以后我们开始寻求私人帮助，然后有各种不同的人参与进来。我回想起一位意大利旧约研究学者来拜访我们，听我们讲述了买书的困难立刻兴奋起来，这让他回想起自己曾为反纳粹而采取的各种行动，很快他就开始往返于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来回很多次，为我们偷带图书。还有相当一部分书是我母亲带的，她很瘦，然后把自己装扮得体态丰满，但不是每次都那么顺利，有一次她被逮捕然后被审问了很久，然后他们也开始准备查我，一位同事给我通风报信提醒我小心，要我把自己的藏书从头到尾检查一遍，看有没有哪些书会带来麻烦。

R： 有传言说柏林喜剧歌剧院院长瓦尔特·费尔森施泰因（Walter Felsenstein）的儿子给您从西柏林往东德带了几吨重的书。

vR： “几吨重”有点儿夸张了。柏林一所教会高校的工作人员通过瓦尔特·费尔森施泰因的儿子直接和西德方面建立了联系。这位小费尔森施泰因利用自己可以在东西德之间来往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提供帮助，可能也收取一些报酬。我把其中一些书转给了瑙姆堡的同事。

R： 沃尔夫冈·欣茨先生，您作为一位外行人士，也用了各种各样的途径为天主教教会走私图书，最重要的途径最终是取道波兰。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通过波兰往东德带书吗？

H： 我在明斯特从事了15年所谓的天主教伙伴协助工作，同样由西德公共资金支持，首先为满足教会的日常需要。对我来说问题只是如何寄书。东德有两个群体最迫切需要图书：一类是天主教牧师，另一类是医学工作者。往东德寄医学专业文献没有问题，但神学书刊就不一样了。牧师主要需要布道书，然而这种书刊无法引进东德，然后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一次我在东柏林的神父聚会上认识了一个人，住在科特布斯，也就是靠近波兰边境。他介绍给我认识了一位朋友，是一位波兰牧师，并建议我把宗教类书刊寄给这位波兰人，然后他去取书。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一收到我的问候，比如说保罗叔叔来自艾弗尔山的生

日祝福，就知道要去波兰取书了，而且一直都很顺利。我在书里用铅笔写上比如F.H.或者S.T.，这样他就知道这些书要送给哪个地区的教会。

R： 下一个问题提给齐格弗里德·布罗伊尔教授，首先从个人角度将您作为一位退休者，而非审查专家。您在担任教会神职人员时期，或多或少通过合法方式接触过哪些西德刊物呢？

B： 大多都是在莱比锡做牧师这段很长的时间里接触到的。莱比锡书展真像一道闸门，一个组织有序的大型图书集散地，展出的图书仅仅用于参加书展。政府有关部门也猜到一二，略知一二，但根本不了解这其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我通过书展是第一个拿到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的《代理人》之一。然后大家接连涌入我们家，了解最新图书，参加文学之夜。有关图书市场上最新出版物我掌握的消息是最快最多的，这让莱比锡的读者受益了，而尤其造福于我们教区的读者。我知道还有其他一些教区也像我们一样积极活跃，大家通过口头流传了解到我们和我们的图书。我们当然也知道这并不是十分安全，没有把握的事总是要冒风险的，有时确实充满了恐惧，但新书的吸引力和对新书的爱慕更胜一筹。

R： 您后来任柏林新教出版社社长，看到所有图书只有通过走私的方式才能获得，还有看到那些您无能为力的事情，是否有些伤感？您是怎么渡过这些难关的？

B： 我没怎么为这些事花费心思和精力。我在不担任牧师后的十年间负责萨克森州的牧师再教育，这就步入了另一个层次，需要的是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的书籍。那时我就学会了怎么看《哲学杂志》这本国家合法刊物：看什么时候注释中第一次出现相关人士的名字，只要出现了名字，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这位学者的著作。后来我调到了柏林，任新教出版社社长，这是东德最大的出版社之一，每年出版物数量最多达230本。在去之前我就给自己列了一个秘密书单，有哪些书我们要出

版，这可真不容易，两德统一前后这个书单才差不多完成。对于不能出版的图书，我们没有投入，因为根本没有时间，时间都用在能做的图书上面。我们的审校部由22位男士组成，我和编审们说：“每年出三本我们去年不敢出的书。”我们获得了不少国际荣誉，无论是天主教方面的还是新教方面的。我们出版了东德没有的东西，教会里从未读过的书籍。日耳曼文学家们非常想做这些事情。出版这些书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R： 国家有关部门是如何向您为他们实施审查辩解的？他们有没有成套的辩词，还是什么样的情况？

B： 首先，国家干涉是东德众多事实之一，对此根本没有任何解释，然而他们还是很小心，避免下达任何书面说明。但我们都知道，每本出版物都有一份鉴定，由外部人员为文化部撰写，但是看不到，都是口头传达。而且我们还要为鉴定人付账！这就是唯一始终让我感到愤怒的事情，一到圣诞节前我就收到一份长长的书单，有200本书目，每本都有鉴定语和具体的鉴定费，然后我必须签字通知付账，而我从来都不知道，是谁拿到了这笔钱！一次在德累斯顿的教会代表会议上，有人问我的出版社有多少工作人员，我说：“我们有95名雇员。但我们到底真正有多少位，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同时还要一直为鉴定人付账。”两德统一后我了解到，文化部请人写的这些鉴定就存放在柏林利希滕贝格城区诺曼街的国安部隐蔽处所，我马上过去然后见到3000多份装订整齐的鉴定书。可以说，我震惊了。我们没有想到很多鉴定人会做这样的事，也没有猜到这么多神学家也参与其中，尤其有来自洪堡大学的，也有莱比锡大学的。这些秘密鉴定对我来说最无可容忍，鉴定人任由他们的恶劣品质为非作歹，他们的嘲弄讽刺，他们的权力天性，他们的尖酸刻薄，有时甚至都超乎政府官员们的想象。比如他们在反对出版的抗议书边上写道：“这个不行，那个完全不切实际。”我们认为最恶劣的审查官不是国家机关，而是这些所谓的鉴定人。和国家机关有商量的余地，他

们也要在党中央面前汇报工作——他们也害怕，比我们还要害怕。更令人气愤的是我们无法认识的那群人，为国家机关提供审查辩词的那群人，就是因为他们那些鉴定书，有时让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R： 运送图书、竭力争取图书出版不也多少是一种辩护行动吗？您没能摆脱东德专制这个最大的问题吗？新教教会最终不得不高度赞扬推崇自由言论，不得不大声反抗，将这个根本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向国家体制提出质疑，不是吗？

vR： 公众批判可以通过共同声明的方式实现效力，比如说通过教会主教的声明。这是确实发生过的，比如1968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还有联合国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当时新教教会都以适度的方式共同提出抗议，还有关于教育等类似问题也表示过抗议。根本问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绝对公正——那么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不公正措施是否合理呢？官方没有触及这一基本问题。但毕竟教会保持着独立，没有作为社会主义教会的身份降低自身地位。还有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立，矛盾长期存在，甚至出现了公开对峙和战争。因此我们很多教会人士道德意识被激发，认为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要求自由和公正，否则就会引发波及德国和世界的大灾难。这就是教会内部的态度，可以解释您的疑问。

B： 我想我们都曾经面临这个问题，但我们把自己归为了现实主义者，并且我作为神学家清楚地知道，我们是为人而存在，不是为了没完没了的对峙，对峙是无济于事的。但有一次是真触犯到了我的神经，是之前提到过的对布道书的审查。没有一本书是不经过至少20处大改动而能够出版的，真是令人愤怒至极。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尤其有一位洪堡大学的神学家，一位基督教主义教授，名叫格哈德·巴萨哈克（Gerhard Bassarak），在审查鉴定书中葬送了他对书的热切渴望，完全让我意想不到，这是1989年的事情。我们一直保持每年一两次请我们的国家审查

官（不是那些鉴定人）参与一顿丰盛宴席，他们很乐于赴宴，这是个大好的机会。当时是1989年，我在饭桌上说道："另外，我们每次想到对布道书的审查就犯呕。马丁·路德曾于1523年说过，上帝的话根本不能被一个国家拿来评判。在此我提出申请：不能对布道书进行评价鉴定。"当时在场的国家相关总局代表目瞪口呆，还有我在场的同事也惊讶不已。谁也没有说话。然后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拿回没有做任何改动的布道书。也就是说这种方式也是可行的，但要考虑到背景时间——1989年春。

R： 谢谢各位不同的回答。现在我把时间交给听众继续提问。

托马斯·克莱因（Thomas Klein）博士：如果谈到教会出版社的实际情况或者教会内部活动举办权的特点，涉及的问题是，这些国家限制出版的书刊是如何产生的。刚刚已经问到教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您以出于教会内在现实主义本能回答的这一问题，然而您没有提到教会内部半合法报纸的印制出版。这个问题在80年代经常被提及：就是说，如果教区从事发行报纸，国家教会给予支持还是施加阻力？您知道，各个州教会区别很大。1988年出现了一次审查之战，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一直未被提及。教会出的《优先权》是唯一一份接受印刷后审查的报纸，所有其他报纸基本上都接受印刷前审查，也是预审查。但1987年底1988年初国家禁止出版教会报纸以来，读者们变得更加积极活跃，比审查直接针对的报纸编者的反抗更加激烈。人民警察在奥古斯特大街上把抗议者拉进载重车内，而教会方面却试着保持平心静气。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教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B： 我想就客观事实稍微说明一下。审查有两种形式，所有图书接受预审查，所有教会杂志则不然，教会杂志是印刷好之后先不发行，在印刷所里进行内容检查。因为审查结果不予通知任何人，我们出版社还要订阅自己出的五本杂志，以便知道是否通过。如果杂志到了出版社，

就说明通过审查，可以寄送其他杂志了。此外我觉得不仅教会报纸杂志受到审查，其他的同样如此。

vR： 我们确实从图书进口跨越到了教会出版界的独立工作这个问题，或者也包括比如主教通过口头的方式流传文字内容。克莱因博士，您说得非常对，两德统一前后所有一切都变了，因为社会上一些积极分子想要改变现状，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此我想撇开国家教会这个概念，新教教会从类别来看不属于国家教会，教皇、主教等人的权限自上而下划分，并且直接掌握权限。在新教教会里，各教区及教会领导层各同等级别的人分别联合起来同审查抗争，两德统一前确实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很多人大胆走在前面起到了保护作用等。对此波茨坦教区的席克坦茨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他的都比较保守。

埃尔克·布鲁门塔尔（Elke Blumenthal）：我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图书走私并不是教会为发动有力抗议的一种辩护。对此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我们在这讲述历史或者回忆过去，感觉就好像走私行动最终就是一场体育赛事，有些刺激神经。而图书走私是十分严肃认真而又铤而走险的事情，即使我们现在喜欢听图书走私的趣闻轶事，但这一点是不能忘的。第二，您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并不是教会人士的主要工作。对体制的抗争，是在牧师对教徒的谈话里，在布道会上，在教会代表会议上——教会人士出现在这些场合然后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彼得·席克坦茨（Peter Schicketanz）博士：对于布鲁门塔尔女士的观点我想说的是，要注意整个事情涉及40年的时间段，不能把50年代的情况一下移植到最高领导人昂纳克（Honecker）执政的70年代。如果是十年以后，我也就不会烧戈尔维策（Gollwitzer）的作品了，但是50年代时的恐惧要更强烈。

vR： 1959年时国家有一项条例，检查各旧书店、图书馆和教区等

地方收藏的图书，在哈雷地区试行。大部分旧书店都关门了，瑙姆堡成了大型检查目标。他们来到我们学院的图书馆，第一天有三个人来，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书，第二天来了30个人，一本一本地查，没收的主要是批量购进还未上架的图书，也就是国家民族类的，包括纳粹残余刊物。他们还逮捕了一位旧书商，在旁边某个政府机关里上诉被查处的相关领导，在瑙姆堡的市中心建起展览橱窗，展出被查处的书刊。此外还在市政厅策划了一场群众集会，宣称这些人多么卑鄙无耻，在城区里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他们检查了教区的图书馆，既包括新教的也包括天主教的，认为教区违反国家规定把所有图书都赠送和借阅出去了。查处结果还在审理中，我到德意志图书馆、哈雷大学图书馆和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把被查处的图书借来看了看，每一本都可以自由借阅，虽然审理结果还是要对被告人进行一定处罚，但还是比较宽宏大量的。但是您要知道，这种体制下的国家实行的是恐怖统治，实行一次打击，然后会带来后续效应。

米歇尔·韦斯特迪肯贝格（Michael Westdickenberg）博士：在我看来，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过分封闭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团体，那么对于国安部来说是不是很难找到通报合作者？然后监察图书运输肯定也更困难。

汉斯-赫尔曼·德克森（Hans-Hermann Dirksen）博士：我认为耶和华见证人也是普通人，所以通报合作者的渗入也像其他组织一样。然而事实上是这样的，就像国安部那重达几吨的档案里也一直写道：“我们的通报合作者太少了，我们无法真正渗入各个组织当中，我们有很多困难。”通报合作者太少始终是个大问题。奇怪又好笑的是，经国安部秘密委派的通报合作者——在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不能抽烟了，不能看烂书了，也不能骂人了，取而代之，必须定期研读圣经，颇有意思的是还必须特别频繁地和上级军官会面，因为上级非常害怕他们将来也变成真正的耶和华见证人。

政治读者群体

未能赶上的追赶？

——70年代末知识分子内部探讨话题（以柏林潘科区“阿多诺圈”为例）

汉斯-J.米塞维茨（Hans-J.Misselwitz）

笔者要介绍的这个圈子从1977年秋天的一个周三晚上开始定期聚会，直到1981年的秋天，其间极少间断过。由于那个年代不适宜保存太多书面的东西，所以我对这个圈子的回忆主要基于90年代获得的源自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两份文件，里面记录了人名、日期、地点及讨论的主题，算是很不错的资料。为了重新整理圈内组织过的活动，我还联系了多年未见的圈内成员并询问了他们我们在何时讨论过什么主题，以及手头是否还有相关资料可以提供。一些老成员从现今的视角分享了他们对圈子的印象和评价，因为站在今天的立场再回头去评价当时研究过的以及伴随激发我们政治理念的观点和问题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果。

据国家安全部1978年7月10日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记载，圈子在1977年11月30日组织了第一次活动。国家安全部第一次知晓这个圈子的存在是由一名通报合作者通知的，他是一名圈内成员的朋友，两人于求学期间在莫斯科抑或乌克兰的哈尔科夫相识。关于再早的聚会就没有资料可循了，这之后一直到1981年末的活动记录则记载于一位圈内成员的日记中。

圈子每个月会在一个周三晚上聚一次，所以私下我们称此为“周三例会”，不过很快大家还是敲定了“阿多诺圈”这个名字。第一次聚会我

们研究了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狄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很快两个月后又讨论了一次，上述那份《调查报告》后来无意也支持了这一命名。这个名字引发国家安全部启动了名为“探测”的“操作程序”，可以推断国家安全部将圈子的活动在目的性上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据国家安全部的记载，至（包括）1978年7月圈子共组织了九次活动。第一次是在我家即柏林潘科区哈兰德街5号举行的，此后轮流于各家，除此我们还一起离开柏林去别的地方过周末，一起过节和聚会。1981年秋天情况有所改变，因为从那时起圈内多数成员开始忙于“潘科和平圈”的活动，这意味着活跃至1989年的柏林反对派团体“潘科和平圈”相当一部分成员以前都是“阿多诺圈”的成员。

“阿多诺圈”最初有12个成员，9男3女，年龄分布在25岁至30岁之间，即生于1947年至1952年之间。圈内成员基本都已高校毕业，但来自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如生物学、文学、数据处理、神学、物理学、数学和经济学等。

阿多诺圈最初不是从一个朋友圈发展而来的。1977年秋天我和妻子鲁特（Ruth）结婚三年，育有两个女儿，一个两岁一个刚出生。妻子鲁特曾在柏林的洪堡大学攻读神学，所以有着她的“神学家人脉”，而我是科学研究所的一名生物学家，亦是生物化学方面的博士，所以也有着我的“生物学家人脉”。我们将双方的人脉介绍到了一起，由此神学圈和生物学圈的人际关系得以重组，这两个圈子之前在耶拿以及柏林的大学生新教教区就已有过交集。由于阿多诺圈组建时每个人都又带了一个人，所以当时圈内鲜有认识超过三个其他成员的人。

由于年龄相仿，我们这个年龄层最初的政治思想状况里有着同样的时代和生活经历的印记。与1968年相关的事件和经历或多或少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更多是文化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所有人

心中都滋生了对东德状况的怀疑和距离感，抑或是对反叛的渴望和对其他出路的寻求。1976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如作家诗人兼歌手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被东德开除国籍事件，由此引发的抗议活动和之后对政府的失望，这些都成为了一个个的导火索。作报告介绍的“阿多诺”圈内成员安德烈亚斯·维尔（Andreas Weihe）是我的生物化学博士同学，我在研究所里认识他时他正在比尔曼请愿书上签字声援反对政府开除国籍事件。维尔在哈尔科夫求学期间去过莫斯科，在那结识了一位西德的同学并从他那获得了《启蒙辩证法》这本书，由此与阿多诺结下不解之缘。

圈子活动涉猎的主题非常广泛，乍一看选题非常随意。如前面所提第一次我们选择了《启蒙辩证法》，着重讨论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之后直到1978年年中我们讨论过的主题五花八门，国家安全部的观察员对此也没太分析出个头绪。其实讨论内容主要是基于圈内成员所拥有的能力或者兴趣，我们没有约定任何规则，而只是让大家相互介绍自己觉得重要的、有引导性的或者值得了解的东西。这段时间内我们阅读了胶印版的《关于〈抉择〉一书的六篇报告》，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鲁道夫·巴赫罗（Rudolf Bahro）的《抉择》，负责这一主题的是物理学家同时也是基督徒的格尔德·施达德尔曼（Gerd Stadermann），他当时也是一名充满热情的社会主义者。还有成员介绍了一篇关于诗人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Johannes Bobrowski）的博士论文，在国家铁路从事数据处理工作的工程师迪特·麦斯（Dieter Maess）介绍了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的诗歌，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n）是位数学家兼画家，曾作为绘画艺术家协会成员参观了在西柏林举办的名为“20年代的趋势”的一个展览，便就此作了一个报告。另外1977年6月国家安全部记录了一次报告，题为“就苏联20年代工业化阶段的探讨”，报告人为当时在经济学中央研究所工作的艾尔哈德·魏因郝茨（Erhard Weinholz），那次我们讨论了苏联经济理论和实践以及斯大林、托洛茨基（Trotzki）和布哈林（Bucharin）之间的会谈。1977年夏

天大家还相约去参加了在柏林格吕瑙一个教堂举行的尤雷克·贝克尔（Jurek Becker）的朗诵会，朗诵内容节选自作者当时未能在东德出版的作品《那些不眠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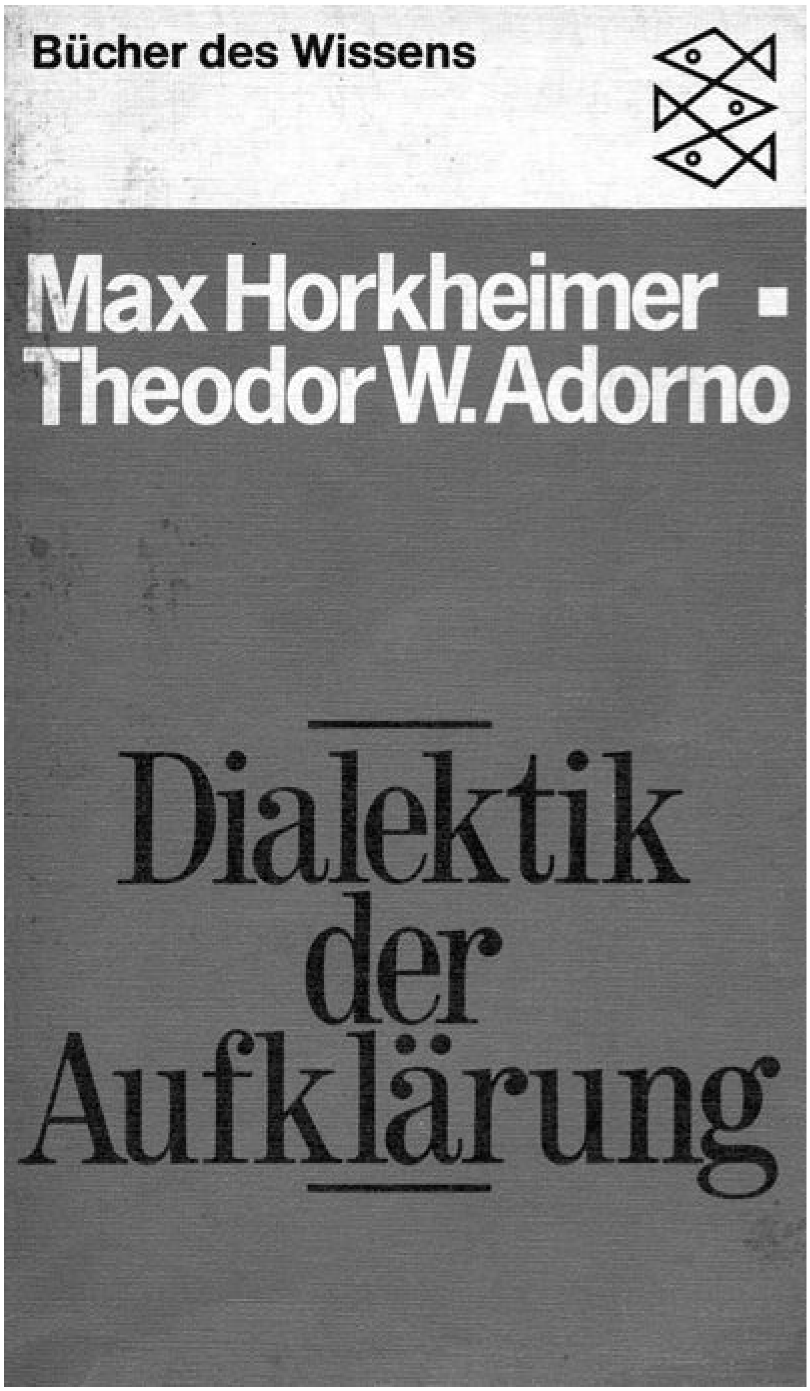


图**1** 古典社会哲学家的《启蒙辩证法》，**1971**年平装袖珍版，该书未能在东德出版

之后我们的选题范围完全延续了最初这几个月的风格。1978年11月的一个周末在奥德河边的小镇芬肯黑尔德科学院的文学家米歇尔·德威（Michael Dewey）带领我们一起研读了“先锋派理论”。另外德威还向大家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米哈伊尔·米哈伊尔洛维奇·巴赫金（Michail Michailowitsch Bachtin）（1895～1975）以及他的笑文化和狂欢文化理论，例如其代表作《拉伯雷和他的世界——民间文化作为反文化》（1987）。经济学家艾尔哈德·魏因郝兹作报告介绍了他的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目标问题”，并在另一天晚上通过报刊分析向大家讲述了我们的新闻业背离现实的规律性。成员马尔库斯·梅克尔（Markus Meckel）当时还是名神学系的学生，他作了一篇关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报告。有一个晚上我们讨论了主题“共产主义——一个真正的乌托邦”，素材来源于从国家图书馆借出的期刊《指南》，另外我们还共同阅读了汉斯·亨尼·雅恩（Hans Henny Jahn）的《新吕贝克死亡之舞》。我自己也曾发起过几个主题，如1973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我们讨论了这个主流的、来自西方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理念可能带来的后果；再如社会学家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的研究《非学校化社会》，他也是一位支持解放神学的天主教神父，这部作品揭示了在第三世界教育系统如何演变成一个压迫支柱；此外我还介绍过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的深入分析，并尝试与大家探讨了“公共领域”这一主题。最后一个要提及的关于当代哲学政治作品接受度的例子是路易·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毕业于柏林表演艺术学院导演专业的弗雷雅·克里尔（Freya Klier）就此作了报告。

从档案中可以发现国家安全部调查圈内成员的理由是“教唆反国家”（§106）和“组建反国家团体”（§107）。[1] 然而一个80年代但未标明日期的内部消息称，由于活动信息在党内被公开以及圈内成员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查，阿多诺圈于1978年中止了活动。事实当然不是如

此，有一件事可以对此给出很好的解释。据档案记载名为沃尔夫·施耐德（Wolf Schneider）的通报合作者在1978年底退离了圈子，圈内成员德威给他在科学院的这位同事带来了“压力”，因为他在院里提起他们俩加入了阿多诺圈，并讲述了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那晚活动的内容以及结论，即认为现今还有很多类似浪漫主义者曾面临的状况存在。一位研究让-保罗（Jean-Paul）的年轻同事以此为契机要求科学院的党领导好好重视这个主题：“你们完全不为年轻人考虑，以致德威和L投身到了一个秘密组织！”德威说这件事对他没有造成后果，但可能对那位通报合作者L造成了影响，他当时是统一社会党党员，后来党内通过决议要求他离开阿多诺圈，不再参与我们的活动。

接受访问的老成员就当初参加阿多诺圈的意义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后来积极投身于柏林“潘科和平圈”的格尔德·施达德尔曼讲述道：“文学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组成，来此相聚的人均来自截然不同的生活领域。这算得上是一种迷你公共领域。我终于觉得不再孤单一人。借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话就是终于战胜了孤立，终于进一步击退了渗透于我所接触到的社会各个角落的专制。加入这个圈子是进入到公共领域的第一步，之后这一公共领域首先还会受到教会的保护。”

米歇尔·德威没有跟施达德尔曼一样加入到潘科和平圈，但私下里与几位老成员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阿多诺圈的活动比较随意，没那么严肃，当然也不用担心负面后果。可能我现在把它有些太理想化了，确实当时我们偶尔也会埋怨：‘又要去参加阿多诺的活动！又要开会！’现在我很喜欢回味在阿多诺圈的时光。今天看来好像当时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享受着乌托邦式的生活，大家不仅吸收各种理论，汲取艺术、诗歌和哲学知识，还在一起欢聚，相亲相爱，偶尔还会有些复杂的情感纠葛。没错，我认为那是追随德国浪漫主义派传统的乌托邦式生活，即便我们当初并没有意识到。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就是一个浪漫主义圈。”

马丽娜·格拉斯（Marina Grasse）来自一个几代人都是共产党员的家庭，曾是一名行为生物学家，后来积极参加了反对派和平圈的活动，现在致力于成人政治教育。她讲道："阿多诺圈是我第一次遇到的可以自由谈论的组织［……］。关键还在于［……］这里年轻学者可以自主选择研究的主题［……］以［……］寻求其他的可能性。［……］其实通过这个圈子我第一次与有基督信仰的年轻人有所接触，这一点也很有意义。［……］对我来说在这里不是'追赶'，这个听上去有点让人觉得是'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对我而言这个圈子出现得正是时候，我想要的不是去追赶，而只是去学习了解我尚未了解的东西。"

艾尔哈德·魏因郝兹（Erhard Weinholz）在东德政权交替期间曾积极活跃于当时新成立的"左翼统一联盟"的活动中，其间还做过自由作家，这位经济学家回顾道："还好我不需要写这篇文章，但如果要写的话，我不会选择'未能赶上的追赶'这个题目。对我而言无论是追赶还是赶上都没有意义，因为我没有极其渴求新知识。我在乎的是，阿多诺圈给大家提供了机会讲出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想探讨的问题。"

该如何总结以上现象、观点、意见和调查的结果呢？就我看来之前为这一课题选定的题目"未能赶上的追赶？"里只有个问号是恰当的，因为按照所有调查参与者的评价来讲当时我们没有想去追赶任何东西。不过还有什么是值得关注一下的呢？

阿多诺圈的组建比较偶然，成员也来自各种各样的环境和职业，所以这不是一个特定类别的组织，而是社会的某一小部分，不代表整个社会，但代表当时东德的某一代知识分子，也正是由此阿多诺圈才有着它的意义。回头看看有人不免会心生疑问：为什么当时的圈内成员会对这样那样的问题感兴趣？因为正如计划的一样我们的活动几乎不带任何目的，所以可以感觉出圈子内反映和讨论的很多主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那个年代相关。我是想说，重新整理这些精神上的（寻求）活动有助于更

好地理解那个时代。我们要研究的不是赤字，这个倒是肯定会涉及“追赶”这一主题，当然在当时的东德也还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要关注的是当时的那些争辩，从中可以发现在精神层面上对那个时代独立思考的开端。此外回想起来会发现我们似乎总可以弄到我们想读的作品，当然不是从书店，而是越过边境通过复制、抄写以及互相传阅（的方式），当然往往少不了大型图书馆中善良图书管理员的帮助。

整理一下圈内讨论过的主题，会发现“启蒙”这一主题最为广泛而突出，与此相连的是怀疑、批判和寻求其他事实的疑问，如对关于我们那个年代和现代的文学和艺术真实性的讨论：先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再是阿尔图塞、尼采或伊里奇的《非学校化社会》。

我们讨论过的主题有实现与时代的衔接吗？答案亦是亦非。那些是对时代的一份表达，比如浪漫主义。当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无处容身》成为了一篇关键文章，它击中了我们当时快到而立之年的那一代人所共有的一种时代感。1968年的起义发生以及中止后，我们感觉自己处在东西之间的某个地方，因为年龄关系我们没有像长辈们那么感触深刻而心灰意冷。大学毕业以及到70年代中期看到一些希望后我们不想再把希望仅仅寄托于西德：那里关心的是越战和智利政变。反而是赫尔辛基进程、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最后文件》中对人权和欧洲合作的协议点燃了希望之光。此外要提出的疑问是，我们对所谓的德国秋天红军旅事件的观察是否是为了寻找在体系上优于暴力革命幻想的其他可能性，即反抗“枪杆子出政权”的方法？那不又一直是那些用剥夺权利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统治来达到文化渗透的方法吗？当时就已经无意想到使用非暴力，即政治文化操纵来掌握政权了吗？不管怎样，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是在这一领域，不肤浅，不带任何目的，但是持之以恒。

从阿多诺圈讨论的主题显然可以发现人们“时代潮流”中的疑问和直

觉反应，以及那些看来无意形成的思想进程，这些进程实际为了解那个时代开启了大门，我们指的是核心在于为参与者赢得意外收获的进程。当然我们这个圈子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为一种有时能在历史中成功的进程起到推力。

最后借用格尔德·施达德尔曼的一段话："我们到底有多重要？这一问题无人能答。可以肯定的是，那段时间至少对我们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很重要。混沌理论中称此为耗散结构。在热力学非平衡状态下，能量会在一定时间内达到稳定状态，进而推动不可逆转的变化：著名的蝴蝶效应——蝴蝶扇动翅膀改变了气候。"

---

[1] §106 教唆反国家（1979年6月28日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刑法典）"（1）如违背宪法基本规定，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或社会规定，或违反上述规定从事煽动活动，如1.通过从事国家或社会活动而歧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局势、代表人物或者其他公民；2.印制、引进、传播和利用歧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局势、代表人物或其他公民的文字、物品或符号，［……］判处两年到十年有期徒刑。（2）任何与以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组织、机构、团体或者他人共同策划犯罪行为或者成功实施犯罪行为的［……］判处两到十年有期徒刑。（3）预谋犯罪及犯罪未遂者也可受到处罚。"§107 组建反国家团体（1）任何加入以反国家为目的的团体或组织的行为处两年到八年的有期徒刑。（2）任何组建反国家团体或组织以及策划相关活动的行为处三年到十二年有期徒刑。（3）犯罪未遂者也可受到处罚。

鲁道夫·巴赫罗的作品与接受

君多尔夫·赫尔茨贝格（Guntolf Herzberg）

谁曾秘密地或者光明正大地读过巴赫罗（Rudolf Bahro）的作品？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了解下巴赫罗本人和他撰写过的作品。

简介：曾于柏林攻读哲学专业，哲学硕士毕业，在奥德布鲁赫和格赖夫斯瓦尔德担任过党报编辑，工会干部，大学生期刊《论坛》副主编，后因刊登沃尔克·博朗（Volker Braun）的戏剧《保罗·鲍赫》而被解聘，之后在一家大型企业做研究员，完成了博士论文，但国家安全部禁止论文答辩，1968苏联军队入侵镇压"布拉格之春"后巴赫罗以在他看来最秘密的方式撰写了一篇批判现存社会主义的评论，意从根本上对东德进行改革——这就是他后来的代表作《抉择》。

1974年夏该作品第一份手稿版问世，只是内容上还不算完整，当时阅读这批匿名手稿的读者主要是作家和学术工作者。其中包括沃尔克·博朗、斯蒂芬·海姆（Stefan Heym）、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在洪堡大学执教的哲学家沃尔夫冈·海瑟（Wolfgang Heise）、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贝伦斯（Friedrich Behrens），及担任过《周报》编辑的记者鲁迪·维策尔（Rudi Wetzel）。

后来，位于波茨坦戈尔姆区并伪装成法学高校的国家安全部学院的军官们从侦查总局局长马尔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军官那获悉了巴赫罗这个名字，因为沃尔夫与巴赫罗的前妻贡杜拉（Gundula）有过一次谈话，很快军官们拿到了作品的手稿便开始阅读，以尽快将有关作者及这部作品的信息传送到国家安全部。之后与巴赫罗志趣相投的鲁迪

·杜奇克（Rudi Dutschke）阅读了这一作品，他是从他东柏林的朋友那拿到手稿的，他们委托杜奇克帮忙出版这部作品，但没有告知作者，这可能是国家安全部设的一个陷阱。

作品后来传到了作家海涅尔·基普哈特（Heinar Kipphardt）、乌尔里希·普朗茨多夫（Ulrich Plenzdorf）和克劳斯·施莱辛格（Klaus Schlesinger）手上。巴赫罗还把手稿给了瑞士音乐家哈里·戈德施密特（Harry Goldschmidt）和数学家乔斯·海因茨（Joos Heintz），海因茨立刻将手稿带回了他的国家。另外《论坛》编辑部的人员也阅读了这一作品。由于担心留下指纹他们竟带着手套互相传阅！这份手稿后来辗转到了洪堡大学的党组织领导手中，便很快被送到了该去的地方，另一份手稿由巴赫罗交给厄伦施皮格（Eulenspiegel）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名为编辑实为国家安全部特工警察，这份手稿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这部作品在那儿被归入“敌对和反革命的拙劣作品”[1]，有关人士起草了罪证鉴定，以准备给作者扣上教唆反国家和谋反的罪名。

尽管如此，巴赫罗却并不担忧。鉴于沃尔夫冈·海瑟的批评意见他对手稿的第三部分进行了彻底的修改。正是这段时间即1976年底笔者结识了作者，见到了修改中的文稿。我们一起对整个手稿进行了润色，定稿后于1977年9月在西德正式出版。在此之前巴赫罗想过匿名将胶版印刷的样本寄给国内那些可能投身于改革派的人士。一开始计划的是1000本，实际寄出70本。其中大部分样本被收件人立即交给了统一社会党或国家安全部的办公机关，这是1977年8月22日德国《明镜周刊》连载该作品之前的情况。接下来，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相继播出了在他家中录制的采访，柏林美占区的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段他撰写的自我采访和一份由他自己录音的含有6篇演讲报告的磁带以介绍该书。1977年8月23日巴赫罗被捕，继而引发了公众对他个人以及作品的极大兴趣。各大报刊都是关于他的新闻和评论，一时80000册图书迅速售罄，长时间占据畅销书榜单，作品第一次产生的反响远远超出了西德范围。

再来看看东德的情况。因为在国家安全部的授命之下要起草罪证鉴定，起带头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如法律哲学家赫尔曼·克莱纳尔（Hermann Klenner）（秘密警察代号“Klee”）[2]、国民经济学家哈里·麦耶（Harry Maier）和迪特·克莱因（Dieter Klein）、哲学家沃尔夫冈·艾希霍恩（Wolfgang Eichhorn）和那些唯命是从的经济学院教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一样，快速翻阅了这部作品。国家安全部总部第九部门调查科的工作人员也详细阅读了这本书，特别是尤阿希姆·格罗特（Joachim Groth）少尉，他是巴赫罗的审讯者，非常狡黠，不久之后他就在国家安全部平步青云。[3]

另外，作为巴赫罗第一阶段某一次政治审讯刑事辩护律师的格雷戈尔·吉西（Gregor Gysi）也仔细读了他的书。后来，踩着阅读许可的边界线，东德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赫尔曼·冯·贝尔克在他的领导干部进修班里介绍了这本书，由此进修班里经济界的领军人物也阅读了这一作品。冯·贝尔克从《明镜周刊》的编辑乌尔里希·施瓦尔茨（Ulrich Schwarz）那拿到了三打《抉择》的样书。就这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各部委、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以及科学院，这本书被不同程度地秘密传阅。

巴赫罗没有被看成是作家，而被视作了间谍，所以这部作品从未在东德正式出版过，也从未被允许通过媒体宣传，不过以上的传阅量对这样一部作品特别是最初阶段来说已经很可观了。不管怎样这部作品其他秘密读者的存在对东德命运的影响要重要并且持久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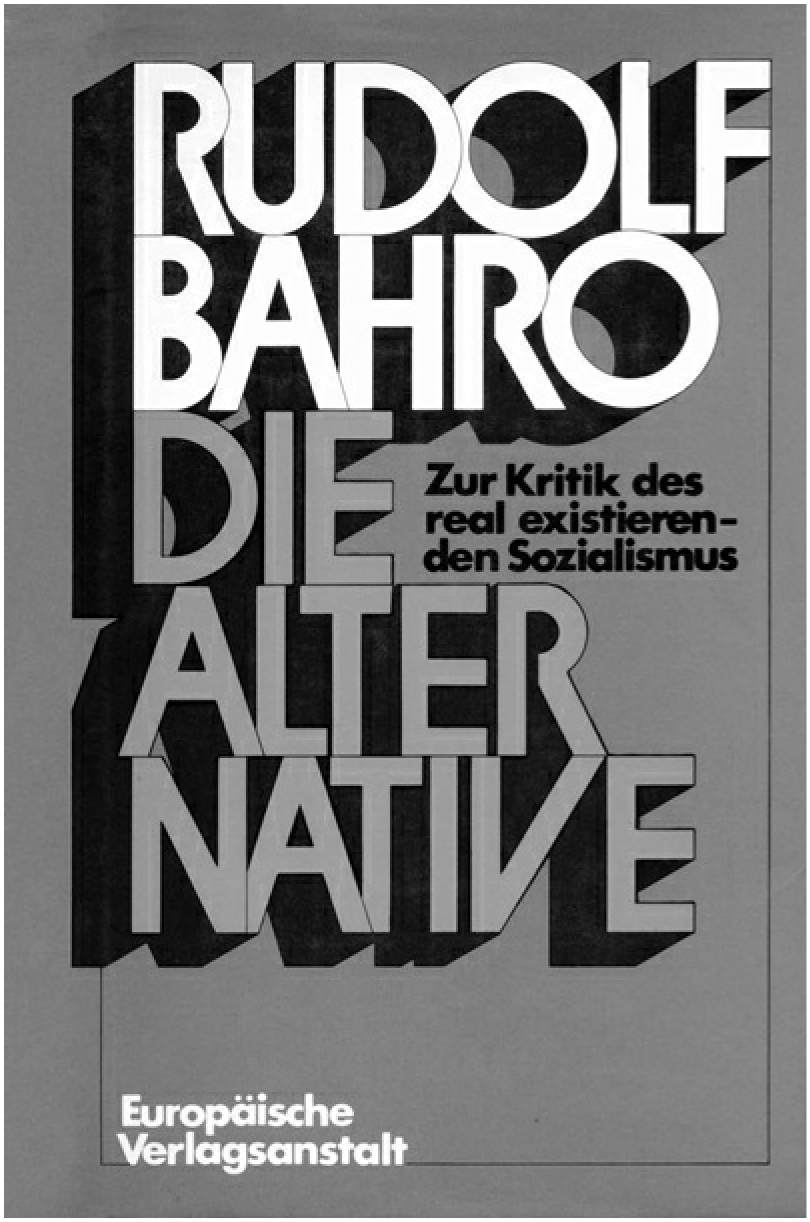


图**1** 鲁道夫**·**巴赫罗《抉择》第一版的封面，科隆欧洲出版公司**1977**年版

这本书进入东德的方式充满了创造性和颠覆性。例如，70年代末开始神学学生乌尔里希·米康（Ulrich Mickan）定期从不莱梅往东德运送书籍。由于对救护车的边检没那么严格，所以当时大约240本《抉择》藏在救护车里被成功运到东德，再由布尔克哈德·克莱纳特（Burkhardt Kleinert）和君特·贝格瑙（Gunther Begenau）分发给了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以及其他地方的交流圈子。[4] 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于1981年记

载了很多次这类交流圈子的活动，并称他们“往往以反社会主义的文学为基础进行敌对反动的讨论活动，而有关巴赫罗的观点一直都是这些讨论的热点。”[5]《抉择》在很多地方都是研讨会和书友会交流的内容，我猜测这是因为事实上民权运动者和异见人士对这部作品都有一定的了解。有人将其视为摆脱国家推广的意识形态影响的有力一击，以求得自我解放，是下属阶层摆脱卑躬屈膝的姿态的出路，也是自我启蒙的一步。在我看来，这种地下传播为改变无主见和无方向感的政治意识作出了贡献。不过巴赫罗认为，由他提出的基于共产主义的另一重要抉择没有得到太多认可，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一种不受经济诱惑和国家规则影响的全新的生活方式甚是遥远。就这样《抉择》半被理解半遭质疑，它解放了东德读者并使东德读者变得更加勇敢。

巴赫罗曾希望他的这部作品能在社会上层找到读者，这一愿望由于赫尔曼·冯·贝尔克的参与而在形式上得以实现。不过难以估摸的是，那些读者是出于兴趣而读，即寻求启蒙、希望打破政党和党内哲学家为社会主义披上的意识形态外表；还是纯粹出于好奇想了解某些不正当的信息。这本书是否实现了巴赫罗著名的言论“东德在思考”，我们只能说希望如此。

接受是一方面，不被接受的原因则是另外一方面。从今天的视角看应该甚是荒谬：一位来自东德的哲学家、统一社会党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撰写了一部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创世纪历程的作品，书中为十月革命和斯大林主义进行了辩护，讨论了东德经济发展受到抑制的因素，并指出了用纯马克思主义指导工具克服停滞不前的道路，目的不在于损害东德，而是想让东德变得更好，第三部分讨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抉择的设想。这部在西德经传阅讨论的作品在东德却从未在媒体和科学界被公开提起过。当时的审查就是如此缜密如此滴水不漏，比它的孪生兄弟“柏林墙”的防守还要严密。

死一般的沉寂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首先作品的整个第一部分对党内哲学家来说就是无法接受的：现存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阐释过的社会主义，而是处在列宁去世前不久预测的一个发展轨道上。法国，这个欧洲文化里一枝独秀的“伟大国度”首先孕育了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而第一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只可惜是一个“带着半蛮夷文化的半亚洲国家”——出自列宁语录[6]，一个各方面都落后的国家。

俄罗斯的道路是一个贫瘠的战时共产主义，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其经济在内战外战中遭到破坏，并且大部分人口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它的社会主义是临时在沙皇帝国——“专制”，在一个官僚无能、缺乏教育、缺乏自由主义的警察国家及一个国家教会上建立起来的。

苏俄一步步的发展阶段可以概括为：专制独裁（斯大林）、警察国家（契卡、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克格勃），包罗各种符号的国教（列宁主义）。这些被鲁迪·杜奇克[7]和巴赫罗公布于世，也都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其理论家们讨论的禁区。

作品的第二部分不仅分析了经济依旧缺乏活力的原因——尽管培养了优秀的专业人员；而且还说出了每个工人都清楚的事实：留给他们的是没有吸引力的那些基本性和协助性的工作，而更有意思的工作都给了受过更好教育和收入更高的人。这样一来如何允诺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角色？

第三部分的名字就充满挑战性——“基于共产主义的另一个抉择”，这里作者突破马克思描述的自由个体组成的自由社会中经济发展的瓶颈，提出了集体生活的设想以期让资源有限的世界重建生态平衡。

巴赫罗的这部作品本着其原创性理应引起每一位东德社会学家的兴趣。人们也理应公开或者在内部对此进行讨论和批判，并以此复苏其间

已变得毫无生气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巴赫罗不是出自任何策略上的原因，而是持有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应该发挥着引导作用。

为什么这样的结果没有出现，其原因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当时的东德，真理和谬误不是科学界决定的，而是社会主义统一党垄断了真理的衡量权，并通过一个中央部门即中央委员会科学部将科学制度化，逼迫那些在1945年后被社会主义化并被培养的科学家去接受这样反科学结构。在东德也就从未有过公平的科学讨论。最糟糕的一个事例源于1956年后对政治解冻的压制，期刊《统一》发表了尤尔根·库钦斯基（Jürgen Kuczynski）一篇稍带批评意味的文章，编辑部就收到了三十多篇声讨文章，相反没有一篇文章为作者辩护。[8]

这部作品在《明镜周刊》上连载后，巴赫罗就被斯塔西监禁，从而难以证明自身是无辜的，也难以得到真正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反对者、敌人和叛徒，当局也由此禁止对此作品进行研究。这就是专制。

1990年6月还属于东德的最高法院宣布巴赫罗无罪并恢复其权利和声誉时，巴赫罗还为自身受到的压制做了辩护并讲道："昂纳克（我指的不仅是他这个人）是对的。现存的社会主义，还有我如此为之付出努力的规则秩序，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我这样的批判而不复存在。通过《抉择》我参与组织了反革命活动。"[9]

除了在西方国家，这部作品的影响仅限于一部分读者，这些读者知道自己生活在专制中并且愿意去了解这个体系是怎样产生、为什么行不通以及要实现马克思式的"自由王国"需要哪些深入的改革——即使这种解决办法对于作品的接受只起到微乎其微的作用。

1989年的秋天，这本书似乎变得有些多余而被画上了句号。12年前

阅读这本书并从中受启发的人们如今走上了街头。一切都和巴赫罗所想的不同：发生的不是拥护共产主义的运动而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站到顶峰的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他们的对手。

尽管如此巴赫罗还是很快迁居东柏林，参加了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党12月的特别代表大会，想要继续努力拯救东德的政治体系，当然这里他指的不是政治局或者统一社会党党员培训，而是马克思主义中政治相对于经济的优先权。他看见了全世界经济由于不受控制自由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希望至少让东德民众能幸免于此。

巴赫罗没能拯救东德。如果《抉择》只是像当时它呈现给读者和阐释者的那样，那么它仅仅是一本政治书籍，只能在政治官僚体系没落时唤醒历史的记忆或者提出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我们是否曾在社会主义生活过？然而身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似乎值得推荐重新去阅读《抉择》，因为当整个世界看上去还秩序井然的时候，这本书就开始质疑世界的进步恰当与否，并探寻了克服经济危机和建立新生活方式的道路。这一问题他在各类讲座、文章、报告和采访中常有提起，直到1997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0]

---

[1] 参阅Herzberg，Guntolf；Seifert，Kurt：*Rodolf Bahro. Glaube an das Veränderbare* . Berlin 2002，S.239-243。

[2] 参阅die sieben Bände seiner IM-Akte BStU，ZA，AIM 17340/89。

[3] 参阅das Nachwort zur Taschenbuchausgabe von Herzberg，Guntolf；Seifert Kurt：*Rudolf Bahro-Glaube an das Veränderbare* . Berlin 2005，S.618f。

[4] 参阅Herzberg，Guntolf；Seifert，Kurt：*Rudolf Bahro-Glaube an das Veränderbare* （以下简称：Bahro）. Berlin 2002，S.237。

[5] Walther，Joachim：*Sicherungsbereich Literatur* . *Schriftsteller und Staatssicherheit i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 Berlin 1996，S.109f.

[6] 参阅Bahro，Rudolf：*Die Alternative. Zur Kritik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mus . Berlin 1990，S.64。

[7] Dutschke，Rudi：*Versuch*，*Lenin auf die Füße zu stellen. Über den halbasiatischen und den westeuropäischen Weg zum Sozialismus* . Berlin 1974.

[8] 参阅 Kuczynski，Jürgen：*Meinungsstreit*，*Dogmatismus und “liberale Kritik”* 。In：Einheit 5/1957，S.602-611。

[9] 参阅Herzbergö Seifert：*Bahro* ，S.470。

[10] 最后值得提一下Guntolf最近于2007年编辑出版的作品《Rodulf Bahro. Denker-Reformator-Homo politicus》，分析了巴赫罗后来作为洪堡大学社会经济学家的影响，Guntolf希望该作品除了秘密读者外，还能受到更多其他读者的青睐。

“另辟蹊径的写作之路”

——看罗伯特·哈费曼为在东德传播作品而采取的不同策略

贝尔恩德·弗洛哈特（Bernd Florath）

学界有关鲁道夫·巴赫罗（Rudolf Bahro）的作品在东德的接受还没有进行很深的研究，有关罗伯特·哈费曼（Robert Havemann）的作品同样如此。巴赫罗的作品确实是存在一条接受链，各反对派团体都曾以研究课的形式将此作为讨论主题。哈费曼的作品就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毕竟像时代见证者们说的那样，哈费曼的作品已经得到了相对比较广泛的传播，拥有了一定的读者。但哈费曼还是有两篇早在60年代的文章后来又再次发表（因为是再次发表，所以不属于萨密兹达），其中一篇是《柏林呼吁》[1]，在和平运动时期1982年初发表后很快得到传播。而几年后（1988年），一些反对派人士首先对和平运动史进行研究，并编辑出版了名为《痕迹》[2]的小册子，其中又再次发表了这篇文章，并添加进了一段对雷纳·埃佩尔曼（Rainer Eppelmann）的访谈，谈论了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1989年初，由尤尔根·富克斯（Jürgen Fuchs）和罗兰德·雅恩（Roland Jahn）在西柏林编制并偷运至东柏林的塔密兹达[3]杂志《对话》中发表了罗伯特·哈费曼的一些作品。[4]接下来我要探讨的问题是，罗伯特·哈费曼用什么样的方式将他的作品带到了东德。同时，为了这项有难度又冒风险的工作，哈费曼这些年来采取的各种办法也是一种学习过程的成果展示，我将这个过程称为“另辟蹊径的写作之路”。

1973年，安德烈亚斯·W.米策（Andreas W.Mytze）早在他的第一期《欧洲思想》杂志中就对哈费曼提出如下问题：“1.您在东德的工作受到阻碍，一行字都出版不了，为什么还要待在那儿呢？2.从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您是共产主义者，那为什么您还要在西德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出版

集团和出版社出版作品呢？他们是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哈费曼并没有提到他的作品在东德绝对禁止出版，也许这一点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对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我不是待在这儿在东德的话，就在西德出版不了我想出版的东西了。我在西德无论支持还是批判东德，都会落得一个与我本身不符的名声，但我作为一个在东德生活的东德公民无论支持或批判东德都可以，而且还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其中原因也在于，我的大部分作品根本不是为西德出版，而是首先为东德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出版。在西德也有一些关心政治的人看我在那儿出版的作品，这对我来说虽然很重要，但我更加关心的是有尽可能更多的出版物投放到东德，因为我面向的是这里的读者。这就是德国分裂的优势（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任何优势了），在这一边印刷作品，生活在另一边的人们可以阅读作品。这种情况只有在分裂为东西方两个部分的国家才有，比如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就无法享有这种优势。”[5]

这样哈费曼就触及了东德萨密兹达历来的一个关键问题。东德萨密兹达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比如波兰和匈牙利的萨密兹达，除了其他秩序政策的基本影响，决定这两个国家地下刊物特点的还有其他因素。80年代没有哪个地方还像东德一样，每个印刷所、每台复印设备都要受到缜密的监察。同东德相比，波兰和匈牙利具有地下出版业生存的条件，东德和这两个国家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各自拥有完全不同的市场条件。在东德没有必要去抄写复制一本不能出版的图书，设法从西德弄到会更方便。在波兰、匈牙利和其他东欧集团国家，萨密兹达必须也要照顾到读者对封锁的国外文化和信息的需求，萨密兹达在这些国家也是为此而存在的，因此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为此，翻译国外文化信息是最基本的前提。东德的读者们可以每晚8点坐在电视机前来满足日常信息需求，这样至少以获取基本信息的方式重新建立和外界的联系。

1956年，当时哈费曼还没有成为东德异议人士的首领，而在西德就已经完全被视作统一社会党内部反对派的一部分，这时起东德就开始排

挤哈费曼的政治类出版物。到此之前，哈费曼会定期发表一些有关时下政治的文章，对一般性政治问题表明立场，传播自身以及所在统一社会党的观点意见，当时这二者之间至少还不存在明显的分歧。此外，哈费曼这些文章都发表在了绝对有名望的报刊上，比如《每日评论》1954年新年第一期头条评论文章。[6] 1950年至1955年期间，哈费曼每年在东德（主要为《新德国》和《每日评论》）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日报上发表14篇（1955年）至29（1953年）篇文章不等，而自1956年起这个数量急剧下降。

1956年发生了什么变化？哈费曼于6月份发表了一篇比较有名的关于学术争论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集中讨论。[7] 同时这篇文章也为他统一社会党政治发言人的角色画上了句号。接下来哈费曼又写了一些文章参与当时的讨论，但1957年的文章就已经显示了哈费曼在政治上的让步态度，为抵抗那些文章在西德产生反响后带来的攻击而进行自我防卫。[8]

但哈费曼批判乌布里希，当然也批判斯大林的观点在西德受到了欢迎并得到传播。由美国新闻署[9] 编辑出版的《东部问题》1957年初以《哈费曼，走在前！》为题总结了一些他的论辩。[10] 海因茨·布兰特（Heinz Brandt）[11] 是哈费曼已经逃往西德的朋友，现在哈费曼这位朋友竟开始公然反对他，布兰特在由社民党东德办公室为东德出版的宣传册中匿名发表了一些言论，分析了哈费曼的观点，这些宣传册作为特刊以《统一》为名做掩饰被偷运到东德。[12] 从苏占区的档案资料中还了解到，作家马克斯G.朗格（Max G.Lange）也在1957年1月对哈费曼的文章进行分析阐释，被自家阵营攻击的哈费曼表示不认同朗格的看法，虽然没有撤回自己的观点，但驳回了朗格的错误分析。[13]

虽然做出了让步，驳回了来自西德方面的批判性声音，但哈费曼必须接受的事实是，自己在统一社会党面前已经失去了信任，很难在东德发表政治作品。但为了避免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就是在沃尔夫冈·哈

里希（Wolfgang Harich）被捕之后哈费曼也要遭到处分，洪堡大学党支部领导同党中央学术部达成一致意见，仍然允许哈费曼继续发表作品及演讲。[14]

1958年哈费曼又发表了一些有关停止核试验问题的文章，同时把该问题与他作为统一社会党首席候选人参选的西柏林国会选举和东德人民议院选举联系到一起。在东德看来政治性并不强的西柏林统一社会党党报《真相》1959年刊登了两篇哈费曼关于自己英格兰之行的报告。[15] 1960年、1962年和1963年哈费曼仅发表了几篇并不十分重要的文章，有关签署停止核试验协议的争论，还有一篇文章关于卡尔-马克思大街禁止停车以及大街上的花坛问题。哈费曼最后一篇在东德允许发表的政治性文章是刊登在洪堡大学党支部报纸上的对鲁迪·文茨拉夫（Rudi Wenzlaff）某篇文章的回应，文茨拉夫的这篇文章就已经在探讨哈费曼有名的“哲学问题中的自然科学”系列讲座，这个讲座也是最终导致哈费曼被开除出党的系列讲座。

哈费曼已经不再具有百分之百的政治可靠性，统一社会党当局让他转到自然科学以及由此引出的一般世界观问题的研究领域，哈费曼渐渐又从这些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除了一系列有关重要科研结果的专业著作外，哈费曼主要还写了一些科普类文章（比如关于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核辐射的影响以及光合作用）以及讨论自然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哲学类文章，将量子力学的哲学视角同他之前已经提出的各种研究问题结合到了一起。这些文章冲击了马列主义教条中关于偶然和必然关系的基本概念，只要这些文章将这种差异本身视为一个研究课题来处理，那么也就引发了一系列政治性争论。[16]

1962年在一次由格哈德·哈里希（Gerhard Harig）[17] 召开的大会上，哈费曼做了一场报告，讲的是普遍奉行的马列主义与自然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报告总结中，哈费曼首先表明第一个观点，简单地说就

是，马列主义思想阻碍了科学研究。第二个观点是，这种标准化的马列主义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著述无关。由于哈费曼抛出的这两个攻击性观点，格哈德·哈里希拒绝将他的演讲收入大会录音。面对哈里希对待科研工作这种无疑非常荒谬的态度，哈费曼决定将他的报告复印出来然后寄给了很多人，并对自己这种游击战式的做法这样解释道，关于他在莱比锡的演讲已经存在着众多流言飞语，其中很多传言称他属于东德反对者，哈费曼已经多次表明这一点完全与事实不符，因此只能通过让大家看到演讲原稿来纠正这些错误认识。

很难明确定义哈费曼寄出的文稿是否属于萨密兹达，我不想在此对这个归类性的问题深究，而是继续讲述接下来事态如何发展。哈费曼寄出去的文稿大约有50份，此外每个主动向他提出的人也都一一得到了文稿。当然，哈费曼因为这一行为也受到了严厉处分，相关部门经过一场更久的讨论决定将哈费曼开除出洪堡大学党委领导班子。[18]

除了这种激进式的办法，哈费曼也在试着寻找其他途径将原本禁止出版的著述发表在合法刊物上。哈费曼同样也给诺贝尔奖得主苏联物理学家伊戈尔·塔姆（Igor Tamm）寄过一份演讲文稿，当时由哈费曼参与编辑的科普杂志《科学与进步》刊登了一篇塔姆的文章，其中错误地引用了哈费曼的言论，于是他要求杂志附上一份更正说明。[19] 国安部恼火地表示："哈费曼的'办法'得到了蒂洛（Thilo）教授的赞同，就是通过更正印刷错误［……］来让公众关注到他反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20]

最初由哈费曼的"哲学问题中的自然科学"系列讲座引发的争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虽然当时东德各种印刷媒体实际上已经不予出版罗伯特·哈费曼的作品，但即使有时也会遇到语言攻击，哈费曼还是能像以前一样全部利用起学术界各种形式下的公众群体。哈费曼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办的系列讲座到了1963/1964年冬季学期才在全东德范围内引起轰

动，不仅是他在莱比锡演讲引起的争论，还有他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达政治见解也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柏林数以百计的大学生涌来听讲座，也有来自东柏林各城区的学生，还有为此特意来到东德的西德听众。讲座内容先被录音然后经人抄写，下一次开课时复印好的讲稿被分发给各个注册的听众。上百份的讲稿在全国流传，并且在流传的过程中又经抄写复印。在罗伯特·哈费曼协会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各种形式的复制版本，有一字不差的复印版，还有重抄版，讲座内容通过这些方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1964年2月起，部分讲座内容就已经由一些西德广播电台播出，最先播出的是北德广播电台，接着从3月起，1964年3月11日哈费曼被开除出统一社会党几天后，美占区广播电台也播出了讲座内容。[21] 该电台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和其他西德广播电台不同，美占区广播电台在其覆盖范围内主要面向的是东德听众。



图**1** 罗伯特·哈费曼**1964**年**1**月**10**日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最后一场讲座；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是听众之一（右）

唯一导致哈费曼被开除党籍并无限期免去教授职务的是一篇在西德

发表的文章，而哈费曼的确并非有意为之。有位西德记者是讲座的热心听众，1964年2月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召开后有传言称哈费曼的讲座遭到禁止，哈费曼向这位记者解释道这一传言没有事实依据，称讲座完全正常地进行到最后，并且他还打算下学期继续开办，为此他第二天还要去找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副国务秘书赫尔曼·切尔西希（Hermann Tschersich）谈这个问题。第二天，《汉堡回声报》未经当事人许可以访谈的形式刊登了这次谈话内容，标题为“我们德国人事无巨细”。文章内容毫无疑问是和谐的，并且符合哈费曼的文风，表达了他的想法。只是这篇文章不是出自媒体访谈，而是一次私人谈话。然而仅仅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就足以导致有关当局不顾劳动法的所有规定，也不顾统一社会党党章，转天就做出决定无限期免去哈费曼的教授职务并开除党籍。

罗伯特·哈费曼犯了一个严重的禁忌。在一战之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就有一条毫无争辩的党员规定，不能在民间媒体上批判政党。哈费曼的做法违反了规定因而受到了严惩。

哈费曼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变化感到吃惊，显然他在受到严重攻击的几个星期之后，对这些严惩措施没有心理准备。哈费曼试着挽回损失，但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如果要让统一社会党当局改变决定，调整改变观点是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也许政治局委员库特·哈格（Kurt Hager）或者总书记乌布里希（Ulbricht）决定将这么久以来一直为统一社会党起到知识分子掩护作用的哈费曼过一段时间之后再重新召回党组织。然而哈费曼当时完全可以选择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并且可以不再采用公开的方式而是选择内部处理。但具体事宜他不关心不过问，所有争端都拿到公开层面解决。

之后哈费曼有意识地选择另一条途径，就是通过西德来与东德沟通，打进东德公众这片将他隔离在外、受到当局审查又封闭的领域。他

首先给在柏林的直属于统一社会党的迪茨（Dietz）出版社提供了讲座文稿，[22] 就像他曾经写到的那样，用一篇经他批准的文章来与出版社各种未经审查的出版物对抗。不出所料，哈费曼遭到了迪茨出版社的拒绝，[23] 于是他让罗沃尔特（Rowohlt）出版社来印刷出版，在此之前哈费曼已经将修改过的文稿交给了罗沃尔特出版社。[24] 讲座文稿被纳入一套平装袖珍书系列“rororo aktuell”并以《非教条式辩证法？》为名出版了。[25] 哈费曼也希望出一本小书，价位合理并且同样方便携带，也就是便于偷带，并且还根据合同得到了足够多的样书，之后将这些样书再带回东德。

1965年哈费曼又将一篇重要文章首先提供给了一家东德出版社：赫尔曼（阿克森斯）·克纳普［Hermann（Axens）Knappe］，就是哈拉尔德·韦塞尔（Harald Wessel），在《论坛》周报上将哈费曼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旧文章汇编到一起，拿这份毫无创造性可言的汇编与哈费曼的讲座文稿对峙，并且添加了各种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哈费曼试着批判性地讲述自己的过往经历，以此作为一份反击声明发表在同样的地方。被乌布里希任命为党中央政治局青年委员会主席的《论坛》总编库特·托尔巴（Kurt Turba）甚至想将这份反击声明视作“国际修正主义链的最薄弱环节”收录进来，[26] 乌布里希不同意。是托尔巴由于对该篇文章《是的，我不对》的政治效力不成熟地做出错误估计而提出这一建议，还是这是他的一条诡计被乌布里希看穿，答案无从得知。

文章最后发表在了汉堡的《时代周报》上，接下来的几年又被多次刊登。[27] 哈费曼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例子，由曾经的斯大林体制先驱者变为批判家，将个人过往经历作为批判的对象。在1956年以后的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当中，无论是科拉科夫斯基（Kołakowski）[28] 还是卢卡奇（Lukács）[29] 都没有过这种自我批判模式。数年之后，哈费曼的朋友阿诺斯特·科尔曼（Arnošt Kolman）才也同样严肃认真地反思自己的生活历程。[30]

从那以后，在西德发表作品不再仅仅是哈费曼与东德沟通的主要途径，而且成了唯一途径。东德媒体中还在进行着有关哈费曼的争论。这毕竟是一种反应形式，这种反应无论以多么虚假多么扭曲的形式存在，始终都能让读者感知到哈费曼的存在。

1966年2月，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在第11次全体大会后做出决定，不仅不允许哈费曼［还有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斯蒂芬·海姆（Stefan Heym）和曼弗雷德·比勒（Manfred Bieler）］今后再出版作品，同时关于哈费曼的争论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并且遵照指示“同时尽可能不提及哈费曼的名字”。[31] 比勒流亡到了捷克（1968年又从捷克逃到西德）。海姆试着做出让步，断绝和哈费曼的联系，到了70年代初又开始在东德发表他的新作品。[32]

哈费曼直接并有意为在西德发表而写的第一篇文章导致了他第二次遭到开除。[33] 这篇文章的题材明显涉及西德政治，哈费曼在文中探讨了西德重建德国共产党的问题，然而他将这些看法与“1956年以后如何在纲领上和在组织上构建一个共产主义政党”这一问题联系到了一起。如何构建呢，指导思想是反斯大林主义，也就是民主主义。哈费曼通过要求西德撤销对德国共产党的取缔并重建德国共产党，强烈批判了斯大林式的党派作风，批判了过去的共产主义政治。

1965年秋，《明镜周刊》请哈费曼来写这篇文章，于是哈费曼给库特·哈格写了一封信：“我不想仅仅凭借自己的想法撰写这篇文章。［……］我想，你们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对我表示支持，并一次性忽略所有的观点分歧。”[34] 哈格没有回复这封信。哈费曼还是找来了斯蒂芬·海姆、维尔纳·乔佩（Werner Tzschoppe），汉斯·博尔（Hans Bunge）和沃尔夫·比尔曼一起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他所有的朋友圈子和一起奋斗的战友圈子都参与了文稿的讨论。文章于12月初刊登在《明镜周刊》上，就在第11次全体大会的最后一天首次正式发表，这令党中央政

治局非常吃惊，立即做出再次无限期开除哈费曼的决定，这次开除出了东德科学院。[35]

接下来的几年，哈费曼在努力发表并推广著作的同时，也和各出版社商定好，图书要合理定价，价位不能太高。哈费曼青年时代结交的朋友恩斯特·皮珀（Ernst Piper）1970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第二年罗沃尔特出版社推出了价位合理、便于携带和掩藏的平装袖珍版。[36] 此外哈费曼为了照顾到所有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还要求出版社给他提供大量样书。哈费曼只字不提他是如何得到这些书的，像政治家哈特穆特·耶科尔（Hartmut Jäckel），还有一些外交官和记者参与了运送工作。哈费曼自己将这些书提供给了所有感兴趣的读者。

然而哈费曼也知道这种借助西方媒体与东德沟通的方式有着潜在的风险，有些言论由于误解会在东德并且尤其在社会主义批判家中间引起强烈不满，他也完全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哈费曼在西方媒体发表作品的同时，也必须要为西方传媒市场服务。仅仅令东德读者感兴趣的文章在西方很快就会失去因风格迥异而获得的特别待遇。一位瑞典记者采访哈费曼的文章刊登在了报纸上，文章不长，[37] 其中哈费曼有一句话经这位记者错误地简要概述为“现在［必须］像希特勒时期那样保持这份勇气”，[38] 这句谣传导致了哈费曼最亲密的朋友沃尔夫·比尔曼和他反目成仇达几个月之久。[39] 事实上在哈费曼和记者的对话中没有出现这句话。比尔曼很恼火，要求哈费曼立刻做出修正，并这样描述了间接沟通方式的难处：“这段访谈出自一次对话，瑞典记者当时简短地做了笔记，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并按照他的想法来理解罗伯特·哈费曼讲的德语内容。从笔记中加工出的瑞典语文章现在又回译成了西德德语。”[40] 如果在此顺着比尔曼的解释继续往下说，那么如果在东德重新发表哈费曼的著述，由于第三者的多次改写而导致的物质损失是不能忽略的，这种形式上的变异也要考虑在内。70年代初的时候，哈费曼没有对此过多关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对自己著述的回译检查得越来越严。

哈费曼知道，为在东德传播推广他的文章，仅通过各个西德报纸是不够的。虽然有不少党员干部能读到这些文章，但这些文章不能成为人们探讨的对象，因为能够通过官方接触各种敌对媒体的人士不允许交流各自的读书成果。即使他们可能有一种非语言表达出来的类似的不满感受，他们获取的信息和对事物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

所以哈费曼更倾向于电台访谈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地采取电视节目访谈的形式。这两种媒体可以让东德的听众和观众获取未曾接受过审查的信息。因此哈费曼通过西德朋友[41]的成功支持，同时利用起各种媒介把他最后两本书带到了读者面前：电视节目里报道了他的著作《一位德国共产主义家》，电台播出了由哈费曼朗读作品长达几个小时的录音。即使东德的读者看不到这本书，也能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书的内容。

然而，与所有在东德可以接收到的西德广播相比，包含众多广播节目和新闻报道的多样性媒体和通过邮寄进口来的政治刊物所处的位置是一样的：远远落在了广告和娱乐信息的后面，《Otto》商品目录的后面，《踢球者》和《Bravo》杂志的后面。

罗伯特·哈费曼为了让他最后的著作《柏林呼吁》得到重视，甚至在去世前几天还让人将沃尔夫·比尔曼最后一次探望他的情形拍了照片，这次会面成了媒体报道中的大事件。[42]同时，这也是被统一社会党变为没落人士的异议分子间接通过西德媒体亲自带到他的同胞自家家园的最后一条信息——同时，这也是一位无疑即将逝去的人发出的呼喊，不要屈服于统一社会党对媒体和言论的垄断。

---

[1]《柏林呼吁》由雷纳·埃佩尔曼（Rainer Eppelmann）和罗伯特·哈费曼写于1981年底1982年初，要求两德解除武装。文章于1982年初发表，被西德各报纸多次刊登。参阅 Theuer，Werner；Florath，Bernd：*Robert Havemann. Bibliographie*（以下简称：RH-Bibl.）. *Mit unveröffentlichen Texten aus dem Nachlass*，*herausgegeben von der Robert-Havemann -Gesellschaft* . Berlin 2007，Nr.920。

[2] 由Stephan Bickhardt，Monika Haeger（alias IM Karin Lenz），Gerd Poppe，Edelbert Richter和Hans-Jochen Tschiche作为radix-blätter的期刊在柏林编辑出版。（RH-Bibl.，Nr.932a）。

[3] Tamisdat，指来自东欧集团社会主义国家的秘密刊物，在本国撰写后偷运至西方国家印制。

[4] 参阅 RH-Bibl.，Nr.933-942。

[5] Havemann，Robert：*Schreiben für die DDR* . In：europäische Ideen 1/1973，S.24.参阅 RH-Bibl.，Nr.609，zit.nach Havemann：Berliner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Andreas W.Mytze，München 1977，S.31（RH-Bibl.，Nr.748）。

[6] Havemann，Robert：*Mit ganzer Kraft，mit heißem Herzen ins neue Jahr*！（RH-Bibl.，Nr.225）.该篇文章1953年已发表在苏联文学报纸《Literaturnaja gazeta》的12月31日一期（RH-Bibl.，Nr.214）。

[7] Havemann，Robert：*Meinungsstreit fördert die Wissenschaften* （RH-Bibl.，Nr.278）.

[8] 参阅 Florath，Bernd：*Das lange Jahr 1956. Die Wandlungen des Robert Havemann* . In：Engelmann，Roger；Großbölting，Thomas；Wentker，Hermann（Hg.）：*Kommunismus in der Krise. Die Entstalinisierung 1956 und die Folgen* . Göttingen 2007（Analysen und Dokumente；32），S.391-406.

[9] 属于美国政府机构："通过各种国外媒体宣传美国对外政策，推广美国形象。"——网址：http：//dosfan.lib.uic.edu/usia/usiahome/factshe.htm（02.2008）。

[10] 参阅RH-Bibl.，Nr.304。

[11] 共产主义者，反纳粹，曾任统一社会党干部，后沦为政治犯。——译者注

[12] Über den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RH-Bibl.，Nr.1138），Die stalinistische Philosophie der Sowjetzone in der Defensive. Revisionistische Strömungen in der Philosophie（RH-Bibl.，Nr.1139）.

[13] Lange，Max G.：*Streit um den DIAMAT. Eine ideologische Diskussion über die Stalin-Version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RH-Bibl.，Nr.1142）. Havemann，Robert：*Unsere Philosophie und das leben* （RH-Bibl.，Nr.306）.朗

格接着对哈费曼的让步做了评论：Die Philosophie des “Revisionismus”. Die SED im Kampf mit den marxistischen Philosophen（RH-Bibl.，Nr.1144）。

[14] 大学党支部领导于1956年12月22日做出的决定。Robert-Havemann-Gesellschaft，Archiv（以下简称：RHG），RH 308。

[15] 参阅 Niederstadt，Jenny：*“Erbitten Anweisung！”. Die West-Berliner SEW und ihre Tageszeitung “Die Wahrheit” auf SED-Kurs* . Berlin 1999（Schriftenreihe des Landesbeauftragten für die Unterlagen des Staatssicherheitsdienstes der ehemaligen DDR；9）。

[16] 参阅 Sachse，Christian：*Die politische Sprengkraft der Physik. Robert Havemann zwischen Naturwissenschaft，Philosophie und Sozialismus 1956～1962* . Münster 2006（Diktatur und Widerstand；11）。

[17] 物理学家、哲学家，曾任东德高校事务部国务秘书。——译者注

[18] 参阅 Florath，Bernd：*Vom Zweifel zum Dissens* . In：Müller，Silvia；Florath，Bernd（Hg.）：*Die Entlassung. Robert Havemann und di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65/1966* （以下简称：Die Entlassung）. *Eine Dokumentation* . Berlin 1996（Schriftenreihe des Robert-Havemann-Archivs；1）。

[19] 伊戈尔·塔姆在这篇后经翻译发表的文章中间接引用了哈费曼莱比锡演讲中的话（文章名为《Niels Bohr und die moderne Physik. Zum Andenken an den großen Gelehrten》，出自：《科学与进步》，11/1963，pp.498-502），然而这段引用在翻译中出现了一个错误，意思被扭曲：“当哲学家们如果看到一些和他们最基本的概念和观念相符（entsprechen）的新发现，也视之为一种莫大的幸运，这个时候我们尽管可以拥护支持著名的德国物理化学家R.哈费曼（东德）。”哈费曼要求更正印刷错误，在已经印制好的杂志后附上正确的句子，其中“相符”更正为“相悖”（widersprechen）。

[20] Bericht über das Auftreten von Prof. Havemann und über einige damit zusam-menhängende Vorgänge an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19.2.1964.RHG，RH 298（BStU，MfS，ZAIG 848），Bl.9.

[21] 参阅 RH-Bibl.，Nr.465，466，469-479。

[22] 到了1980年时，哈费曼在让西德出版社出版讲座文稿之前，还将这些文稿寄给了东德一些出版社和编辑部，希望能够予以出版。《新德国》编辑部1980年8月17日就收到了罗伯特·哈费曼寄来的反对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文章《Vom kurzen Krieg und vom Ende des dreißigjährigen Friedens》；9月20号《法兰克福评论报》才刊登了这篇文章。参阅BStU，MfS，AOP 26321/91，Bd.3，

Bl.114。

[23] 参阅Robert Havemann an Kurt Hager，4.6.1964. Ders an die ZPKK，20.5.1864；an das Büro für Urheberrechte，23.Und 26.6.1964，RHG，RH 19，Bd.60. Korrespondenz Havemanns mit dem Dietz Verlag und dem Rowohlt Verlag，RHG，RH 9，Bd.30 A. Aktenvermerk der MfS-Hauptabteilung XX/AG 1，4.5.1964，RHG，RH 65（BStU，AOP 5469/89，Bd.5），Bl.4f。

[24] 哈费曼青年时结交的朋友Ernst Piper为此感到非常遗憾，Piper本来很愿意出版这些文稿，而且根据他们40年代时签的一份协议，哈费曼还应再交给他一份书稿。

[25] RH-Bibl.，Nr.456.

[26] Kurt Turba an Walter Ulbricht，3.2.1965.BArch，SAPMO，SED，DY 30，IV 2/11/v.4920，Bl.80.

[27] Havemann，Robert：“Ja，ich hatte Unrecht！”（RH-Bibl.，Nr.492）.

[28] 波兰哲学家。——译者注

[29] 匈牙利哲学家。——译者注

[30] Kolman，Arnošt：*Die verirrte Generation. So hätten wir nicht leben sollen. Eine Autobiographie* . Überarb.U.erw.Aufl.，Frankfurt a.M.1982.

[31] Protokoll Nr.18/66 der Sitzung des Sekretariats des ZK，23.2.1966. In：Müller；Florath（Hg.）：*Die Entlassung* ，S.254.

[32] 其中最重要的几篇为“Lassalle”、“Der König David Bericht”和“Die Schmähschrift oder Königin gegen Defoe”，当然也是比较旧的文章，从共产主义视角探讨历史和异议分子的问题。参阅 Hutchinson，Peter；Zachau，Reinhard K.（Hg.）：*Stefan Heym. Socialist*，*Dissidenter*，*Jew-Sozialist*，*Dissident*，*Jude* . Oxford u.a.2003（Britische und irische Studien zu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32）。

[33] 参阅Müller；Florath：*Entlassung* ，Dok.18-29，S.126-142。

[34] Robert Havemann an Kurt Hager，4.11.1965. In：Müller；Florath：*Entlassung* ，Dok.18-29，S.109.

[35] 参阅Müller；Florath：*Entlassung* ，Dok.18-29，Dok.19，S.127.

[36] Havemann，Robert：*Fragen Antworten Fragen.Aus der Biographie eines deutschen Marxisten. München 1970 und Reinbek 1972* （RHG-Bibl.Nr.558，592）.

[37] Dirk Sager于1972年1月30日在德国电视二台的一档评论节目中谈到了一处观点分歧："哈费曼认为未来属于社会主义。但我们最近看到了不一样的观点。《图片报》称：这位东德物理学家谴责柏林潘科区，人们什么也不再相信了。为了引起读者注意，第二页又以粗体字重复了一遍：这里的人们什么也不再相信了，但必须像希特勒时期那样保持着希望。正如一些西德人愿意听到的那样，东德体制无异于纳粹统治。是哈费曼改变了看法，还是《图片报》传达了错误的信息？"RH 174（BStU，AU 145/90.Bd.3），Bl.417。

[38] "Man måste behålla sitt mod nu，liksom man behöll det under Hitlertiden."哈费曼接受瑞典《Expressen》晚报采访（RH-Bibl.，Nr.597）. In：RH-Bibl.，S.365.参阅 die tatsächliche，dem Journalisten gegebene Antwort Havemann. In：RH 174（BStU，AU 145/90.Bd.3），S.354。

[39] 参阅Havemann Katja；Widmann，Joachim：*Robert Havemann oder Wie die DDR sich erledigte* . Berlin 2003，S.63f。

[40] Havemanns Interview. In：Die Zeit，28.1.1972.

[41] 主要有 Hartmut Jäckel，Manfred Wilke，Lucio Lombardo Radice，到了西德后还得到了Jürgen Fuchs的帮助。

[42] 参阅 den Bericht Wolf Biermanns. In：*Robert Havemann-Ein Bürger und Wissenschaftler in Deutschland*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为纪念罗伯特·哈费曼去世25周年举办的展览。Offener Kanal Berlin，2.4.2007。

无审查

——看波兰萨密兹达中的德语文学

马雷克·哈耶奇（Marek Rajch）

波兰的非法和秘密出版业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传统。早在19世纪被瓜分之时该国就已有各种包含爱国、历史和政治内容的出版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众多政治和军事反抗组织纷纷散发自己的报纸、小册子和传单，由此在波兰仅以反抗为导向的出版业达到了空前的发展规模。这期间共计出版了2000多种报纸和杂志、1500多种图书和小册子以及数千份各式各样的传单。其中许多二战以后还得以继续出版并到1953年成为了波兰各个反对苏联统治地位组织的新闻机构。[1]

1956年以后也就是所谓的政治解冻期开始后，非法新闻界不再是传播抗议信息和内容的最重要渠道。这一时期如果不想再被垄断的国家信息蒙蔽可以收听由美国支持的从慕尼黑播送出的无线电台“自由欧洲”（Wolna Europa）。另外还可以阅读从西方阵营走私进来的外国文学和刊物及那些离开波兰的国人在那边出版的作品。波兰虽然是东方阵营中对现存政治体系反对声最明确最强烈的国家之一，但当时国内还未形成不受国家控制的组织良好的出版业。其间在苏联广泛传播的萨密兹达（秘密出版物），即借助机械印制复印本的方式在波兰是被大家熟知的，只是未能像在苏联一样被那么广泛应用。

197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独立出版业的发展遇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6月政府实施的新食品价格过高，造成华沙和拉多姆工人的激烈抗议。这一抗议被残暴镇压，不少罢工参与者被逮捕判决。1976年秋反对派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保护工人委员会”以支持被迫害的工人。随后很快诞生了许多政治和社会目的基本相同的新地下组织，如“保卫人权和工人权

利运动”。

众多地下组织的出现即是波兰独立出版业的诞生之际。各类政治组织不仅散发自己的传单，而且在一定周期内发行自己的报纸和期刊以介绍他们的纲领，当然周期有长有短。于是不久波兰就形成了一个组织及配备良好的出版业，即所谓的“第二流通渠道”，那里汇集了所有的政治和世界观的理念和方向。独立出版业为政治纲领的形成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来源和交流平台，作为组织者这是波兰政治反对派做过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地下期刊里会发表各种各样人们激烈深入讨论的话题。那些质疑现存政治体系、批判波兰社会主义经济状况和执政党领导方法的出版物也有着非凡的意义。另外发表较多的还有历史类文章，因为它们填补了这里几十年来读者面临的知识空缺。[2] 1976年秋“保护工人委员会”出版了第一批期刊。紧接着“保护人权和工人权利运动”和其他组织出版发行了报纸。这些期刊在或长或短的周期内出版，只是名称经常改变。

独立出版业为作家们打通了新渠道，以前未通过审查的作品也可以呈现给公众了。作家们往往首先和现存的政治地下期刊合作，而后再成立自己的文学和文化期刊，如《Zapis》——这大概是最有名的杂志了，还有《Puls》和《Kultura Niezależna》。同时众多出版非定期小册子和书籍的出版社也相继出现。秘密读者们终于有了机会去了解历史政治著作及波兰和外国作家的纯文学（作品）。

独立出版社NOWA（Niezależna Oficyna Wydawnica）是最著名的地下出版社之一，几年内它就向图书市场输送了近100种出版物。70年代后半期地下出版社出版了波兰作家塔伏乌什·孔维茨基（Tadeusz Konwicki）、朱利安·斯特里科夫斯基（Julian Stryjkowski）和耶日·安杰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的作品。非法出版社还出版了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s）的《过于喧嚣的孤单》（1978）、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庄园》

（1984）和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铁皮鼓》（1978）的波兰语译本，这几部作品之前都没通过官方出版社的审查。[3]

出版物大多与波兰相关，但有关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文化、历史和当代的主题也很受欢迎。耶杰·康吉奥拉（Jerzy Kandziola）、吉塔·佘曼因斯卡（Zyta Szymańska）和克勒斯特纳·托卡依芙纳（Krzstryna Tokarzówna）曾编辑出版了一个厚达1000多页的目录，其中记载了各类与出版相关的信息，主要涵盖文学、出版业、文学组织和戏剧。这无疑给研究1976年到1989/1990年期间外国文学在波兰“第二流通渠道”的接受提供了很好的资料。[4] 目录中共181页记载了54个国家的纯文学出版物。从数据来看非法出版业最为青睐的是俄语文学（66页），其次是捷克文学（27页），排在之后的是德国、英国和爱尔兰文学（各13页），再就是美国和法国文学（各10页），匈牙利文学（6页），犹太文学（4页）和斯洛伐克文学（2页）。奥地利和瑞士的纯文学（各1页）受到的关注较小。

独立期刊和出版社刊登及出版的德语文学文章类型多种多样：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的译文、作品选段、对新出版物的简述或评价、书评、已由波兰官方出版社出版的译文（往往是某些作家的生平简介抑或对近期或当下发生的文学、文化或文化政治事件的报告）、外国期刊及波兰流亡期刊节选。另外采访和谈话在期刊中也成为一种广泛而受欢迎的出版形式，大多是对波兰流亡期刊或外国期刊的翻印。如法国的《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 ）[5] 和《快报》（*L’Express* ）中的对君特·格拉斯的采访后来就在波兰被翻印。不久出现了波兰作家专门为“第二流通渠道”所作的作品。80年代波兰人有了自己与德国作家的访谈。如波兰作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受杂志《Zapis》所托采访了格拉斯，格但斯克（Gdańsk）的杂志《Solidarność》[6] 和《Przegląd Politycyny》[7] 也采访了这位德国作家。

对波兰读者来说与君特·格拉斯或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的访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访谈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与非社会主义世界还保持着联系和对话。

波兰的秘密读者阅读内容涉及两德作家和古典德国作家。不过关于德国文学和作家的出版物大多涉及的还是东德，特别受关注的是那些持批评意见的作家。各种短述、简介、评论和各类型的文章将作家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伊蕾娜·波墨（Irene Böhme）、尤尔根·富克斯（Jürgen Fuchs）、齐格弗里德·海因里希斯（Siegfried Heinrichs）、斯蒂芬·海姆（Stefan Heym）、莱纳·孔策（Reiner Kunze）和汉斯·尤阿希姆·沙德里希（Hans Joachim Schädlich）带到了读者面前，并让他们了解到了这些作家是被政府驱逐离境还是自己离开了东德。[8]

对波兰读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作家的文学作品，而是这个社会主义邻国的文化政策及东德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处境。1979年东德作家协会部分作家在西德出版作品而被开除事件被大篇幅报道。[9] 1981年《Obóz》发出消息称数位东德作家接到禁令不允许接受国外媒体采访。[10] 1985年、1987年《Tu.Teraz》和《Obóz》分别发表了一篇关于东德独立出版业的文章。[11] 两年后《Obserwator Wielkopolski》报道了1987年11月第十届柏林东德作家大会。1986年《Podpunkt》中一篇名为“Inni Niemcy，Rozmowa z Ewą i Volkerem”（“不一样的德国人：与伊娃和沃尔克的对话”）的采访中杂志编辑与来自东德的年轻作家探讨了创作独立文学作品的可能性和非可能性及首次出版的机会。[12]

在西德居住过并在非法出版社发表过作品的作家有霍斯特·毕涅克（Horst Bienek）、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纳（Christine Brückner）、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思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尼克拉斯·弗兰克（Niklas Frank）、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克里斯蒂安·格拉夫

·冯·克洛科夫（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戈洛·曼（Golo Mann）、赫尔塔·米勒（Herta Müller）、克劳斯·施德穆勒（Klaus Stämmler）、君特·瓦尔拉夫（Günter Wallraff）和彼得-保罗·萨尔（Peter-Paul Zahl）。这里没有提到托马斯·曼（Thoman Mann）和他的儿子克劳斯·曼（Klaus Mann）是因为两人二战以后既没有在东德也没有在西德生活过。如前文所提，波兰“第二流通渠道”里的报纸最关注的要数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主要探讨过的主题有：两位作家的文学在波兰和苏联的接受度，《铁皮鼓》70年代在波兰被禁止出版及该作品在官方出版社即国家出版机构PIW（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出版时审查机构对作品的介入。很多杂志都刊登了对这两位作家的采访、有关格拉斯与其夫人被禁止进入波兰共和国的消息以及他们在政治方面活动的详细报道。[13]

期刊的编辑们极其重视发布两德文学发展的最新情况。由此他们刊登书评、作品分析、概述、对最新文化政治事件的报道及国内国外举行的大大小小的会议内容。如《Zapis》的9/1979号发表了波雷斯瓦夫·法茨（Bolesław Fac）1978年在第八届卡舒布-波莫瑞文学大会上的一篇关于君特·格拉斯的报告。1986年《Arka》刊登了大会“流亡和驱逐文学”上的一份研讨内容。

70年代末80年代初瑞沙德·克里尼基（Ryszard Krynicki）和布赫尔茨（B.Bucholc）翻译了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思贝格的诗歌和其他出版物并得以出版。杂志《Puls》则刊登了恩岑思贝格1978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作家协会于巴塞罗那联合举办的大会上作的一篇报告，报告中他讨论了文学的意义和对文学的支持。[14]

引起较大关注的还有克劳斯·曼和戈洛·曼两兄弟的两篇短文。《Europa》和《Podpunkt》这两份期刊分别于1987和1988年刊登了克劳斯·曼的《欧洲灵魂的寻家路》。《Krytyka》1988年发表了戈洛·曼的

《Opium intelektualistów》（《给知识分子的鸦片》）。[15]

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作家及哲学和政治代表人物相对较少出现在秘密出版物中，其中包括：费尔迪南德·弗莱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Karl Ludwig von Haller）、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黑贝尔（Christian Friedrich Hebbel）、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威廉·克莱姆（Wilhelm Klemm）、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非法出版业一般不会出版这些作家的整部作品，也很少出版作品中的选段，而多数是引用他们的名言箴言。80年代早期出版了尼采的5个作品，这些是利奥波德·施达夫（Leopold Staff）和斯坦尼斯瓦夫·伍吉科夫斯基（Stanisław Wyrzykowski）在20世纪初翻译的译本再版。[16] 杂志《Krytyka》1988年翻译并刊登了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在《纽约书评》发表的一篇关于弗莱利格拉特的文章，作者称弗莱利格拉特是位革命诗人并列举了1848年革命到1953年东德工人抗议历史中的类似人物。[17]

篇幅较大的德国纯文学作品译文或以片段的形式刊登在期刊中或以整本书单独出版。1979年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在华沙最著名的秘密出版社NOWA出版之际轰动一时。与《但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不一样，《铁皮鼓》没能在官方出版社出版。[18] 由于反响强烈NOWA同年就印刷了第二版。该部小说的第一个官方版本是1983出版社PIW出版的由斯瓦沃米尔·波娃乌特（Sławomir Błaut）翻译的译本。[19] 1981年、1986年和1988年几个出版社纷纷出版了格拉斯的《比目鱼》之第九章，取名为《Aź do wymiotów》。[20] 1995年波娃乌特翻译的《比目鱼》全书在波兰出版。[21]

瑞沙德·克里尼基为传播德国诗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翻译并整理出版了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诗歌：第一册于1979年由波森的Witrynka Literatów i Krytyków出版社出版，第二册于1980年由华沙的NOWA出版社出版。1979年至1987年期间杂志《Robotnik》《Naprzeciw》《Solidarność》《Solidarność Wielkopolski》《Bez debitu（Poznań）》《Tu.Teraz》《Promieniści》和《Koncept》纷纷刊登了他翻译的布莱希特的作品。[22] 另外1987年NOWA出版社出版了克里尼基选编及翻译的莱纳·孔策的诗歌，书名为《Nokturn i inne wiersze》（《夜曲及其他诗歌》），共3册收录诗歌60首，另含孔策注释和编者后记。[23]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秘密大学生组织独立大学生团体NZS（Niezaleźne Zrzeszenie Studentów）的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孔策的散文集《美好的岁月》（*Cudowne lata*），由弗罗茨瓦夫的日耳曼语言学家马雷克·希布拉（Marek Zybura）（笔名Henryk Niźański）翻译并作评论，随书印有孔策的照片和生平简介。1984年到1988年期间杂志《Obecność》《Brulion》《Obserwator Wielkopolski》《Biuletyn Dolnośląski》《Kontur》《Oświata Niezaleźna》《Wybór》和《Impuls》也分别刊登过孔策的诗歌和短片散文。

1984年波兰战时状态结束后一年，华沙的两个出版社即Oficyna WE和NOWA出版了霍斯特·毕涅克的小说《细胞》。NOWA在1985年又出版了尤尔根·富克斯的《审讯记录》。富克斯的诗歌和短篇散文在期刊《Bez debitu》《Obecność》和《Veto》中也发表过，主要都是克里尼基翻译的译本。[24] 此外出版的作品还有沃尔夫·比尔曼的歌集、伊蕾娜·伲默的《那边》的一个选段、齐格弗里德·海因里希斯回忆录中的选段、恩斯特·荣格尔的第一部《巴黎日记》中的选段、威尔海姆·克莱姆的一些诗歌、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科夫的《女人们的时间》的一个选段、赫尔塔·米勒的诗歌和格哈德·茨韦伦茨（Gerhard Zwerenz）的散文选段。编者往往还会附上作者的生平简介。由此波兰的读者对两德的文学发展和那些作家有了初始了解。

奥地利和瑞士德语文学与德国文学相比获得的反响要小得多。只有1971年出版的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的短篇小说《坠落》（*Upadek* ）在波兰引起过轰动：文章形式紧凑，讲述了国务委员会主席的下台，这一主题在当时世界文学内是无法比拟的，其中对苏联的影射一目了然。1979年至1989年期间由斯坦尼斯瓦夫·安德鲁·欧夫席安科（Stanisław Andrzej Owsianko）翻译的这部作品的译文共以15个不同的图书版本出版，其中部分是插图版。[25]

非法出版业出版的奥地利文学中的代表有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雷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阿图尔·施尼茨勒的关于真理和谎言的怪诞作品《绿鹦鹉》1981年在华沙的克拉格（Krąg）出版社以图书形式出版，译者为约翰·米切克（Jan Miciak）。期刊《Czas Kultury》《Arka》和《Impuls》于80年代后半期出版了保罗·策兰（Paul Celan）和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歌，译者是瑞沙德·克里尼基和彼得·维克多·劳尔科夫斯基（Piotr Wiktor Lorkowski）。杂志《Skorpion》《Arka》《Puls》《Eutopa》《Nurt》《Głas》和《Zapis》纷纷刊登过对埃利亚斯·卡内蒂、保罗·策兰、弗朗茨·卡夫卡、雷纳·玛利亚·里尔克和约瑟夫·罗特文学创作的注释和评析。[26]

由于篇幅有限，还有许多1976～1989年在波兰独立出版业出版的德语文学没有在本文中被兼顾到，但是德语文学被秘密接受的趋势和方向还是很清晰的。被出版的文章首先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批评政权以及质疑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秩序的文章。不管是德语作家的纯文学还是新闻类作品，抑或是关于德语作家的文章都促进了秘密读者带着批判的态度去思考。翻译作品多样化的主题和形式，加上优秀的文学翻译和自己与外界的访谈，让读者体会到了一种感觉，就是尽管边境紧闭、出

国不易，他们还是和全世界的公众保持着联系。

---

[1] Paczkowsik，Andrzej：*Trochęhistorii* . In：Bibuła.Wolne słowo w Polsce 1976～1980. Rzeczpospolita 6/2003（副刊）。

[2] 参阅Paczkowski，Andrzej：*Pól wieku dziejów Polski* . Warszawa 2005，S.292。

[3] 参阅Paczkowski，Andrzej：*Pól wieku dziejów Polski* . Warszawa 2005，S.292-293.

[4] Kandziola，Jerzy；Szymańska，Zyta；Tokarzówna，Krystyna：*Bez cenzury 1979～1989. Literatura，ruch wydayniczy，teatr* （以下简称：Bez cenzury）. Bibliografia. Warszawa 1999。

[5] Le Nouvel Observateur 12.9.1977.

[6] Solidarność 20/1981.

[7] Przegląd Politycyny 3/1984.

[8] Anonym：*Heretycy na banicję* （《异教徒的逃亡》）. In：Biuletyn Informaczjny. Przegląd Prasy Zagranicznej 5-6/1977，S.11-12. *Anonym*：*Pisarze na dłuźszy czas poza krajem* （《长期在国外的作家》）. In：Biuletyn Informacyjny. Przegląd Prasy Zagranicznej 7/1978，S.6-7.

[9] 相关信息见《Puls》7/1979/1980。

[10] Obóz 1/1981，S.73.

[11] Tu.Teraz和Obóz刊登了5月8日至6月29日在科隆市图书馆举行的展览会的目录册内的一部分内容《秘密出版物：东欧和苏联的独立文学》。

[12] Kandzioła；Szymańska；Tokarzówna：*Bez cenzury* ，S.772.

[13] Kandzioła；Szymańska；Tokarzówna：*Bez cenzury* ，S.773，777-778.

[14] 参阅Kandzioła；Szymańska；Tokarzówna：*Bez cenzury* ，S.775。

[15] 参阅Kandzioła；Szymańska；Tokarzówna：*Bez cenzury* ，S.781。

[16] 参阅Kandzioła；Szymańska；Tokarzówna：Bez cenzury，S.781。

[17] 参阅Kandzioła；Szymańska；Tokarzówna：Bez cenzury，S.776。

[18] 《猫和鼠》的波兰语译本1963年在最重要的国家出版社之一Czytelnik出版（译者为Irena Naganowska和Egon Naganowski）。《但泽三部曲》的第三部《狗年月》直到1990年才在Wydawnictwo Morskie出版社出版（译者为Sławomir Błaut）。

[19] Grass，Guenter：*Blaszany bębenek. Nachwort von Roman Bratnuy* . Warszawa 1983.

[20] 见Połczyńska，Edyta；Załubska，Cecylia：*Bibliografia przekładów z literatury niemieckiej na język polski 1800-1900* . Tom III：1945-1990（以下简称：Bibliografia przekładów）. Poznań 1999，S.92. Kandzioła；Szymańska；Tokarzówna：*Bez cenzury* ，S.776.

[21] Grass，Günter：*Turbot. Nachwort von Maria Janion* . Polnord-Oskar，Gdańsk 1995.

[22] Kandzioła；Szymańska；Tokarzówna：*Bez cenzury* ，S.773-775.

[23] Kandzioła；Szymańska；Tokarzówna：*Bez cenzury* ，S.779.

[24] Kandzioła；Szymańska；Tokarzówna：*Bez cenzury* ，S.776.

[25] 这里指的是对1976年Kniznice Konfontace Helvetia出版社出版的译本的再版。《Upadek》在华沙、布雷斯劳、克拉科夫、波森、格但斯克的多家出版社出版过。

[26] Kandzioła；Szymańska；Tokarzówna：*Bez cenzury* ，S.707-708.

“他们那么多自由刊物令我们自愧不如”

——看80年代东德萨密兹达中的波兰

安德里亚·格内斯特（Andrea Genest）

萨密兹达（Samisdat）是独立编辑、印刷、发行，避开审查的地下出版物，有小册子、报纸杂志、图书和录音带的形式，是共产主义国家反对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比东欧和东中欧的萨密兹达可以看出，70年代末以来波兰独立出版物的发展有着特别的不同之处，其影响力已越过国界辐射到邻国。

波兰反对派从事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活动曾经遭到当局严密的跟踪调查，而当时东德还不具备反对派从事各种活动的条件。波兰80年代的政治事件影响了政治反对派的活动，比如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以及1981年12月实施的战争法，同时，在柏林和莱比锡的波兰信息中心成为了重要地点，那里可以买到各种爵士唱片和波兰艺术海报。波兰独立编辑印制的书刊以及相关的各种活动，比如在私人住宅里举办的讨论会、朗诵会、戏剧和音乐演出以及电影和广播节目等，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表达出了一代人的心声。[1] 波兰反对派多样化的活动内容以及富于想象力的实践激励着东德的志同道合者，为东德反对派从事政治和社会反抗运动树立了典范。80年代中期以来东德才出现定期出版的萨密兹达刊物，其中有两个组织经常被提到，一个是“自由与和平”组织，以反对强制服兵役为宗旨并为此在欧洲寻找合作伙伴，另一个组织被称为“橙色抉择”，推崇无政府主义，80年代末通过街头戏剧的艺术形式以及制造大规模事件来讽刺性地批判共产主义僵化的清规戒律。

波兰是东德公民在70年代唯一完全无限制出入的国家，这里与东德比起来能“更加自由地呼吸”，因此受到东德人的欢迎，但专业研究波兰

或者还学习波兰语的人数很有限。一些东德反对派人士在波兰读过大学，像后来成了萨密兹达刊物《radix-blätter》编者之一的路德维希·梅尔霍恩（Ludwig Mehlhorn），以及负责编辑地下杂志《两难选择》的沃尔夫冈·滕普林（Wolfgang Templin）。还有“波兰神学院”是东德反对派存在时间最长的从事德波关系研究的机构之一，由君特·萨尔兴（Günter Särchen）在马格德堡天主教教会的背景下推动创建，1985年起更名为“安娜—莫拉斯卡（Anna-Morawska）神学院”。

出生在工农社会国家的东德新一代年轻人强烈要求亲自贴近了解与国家宣传明显不同的真正的德国历史面貌，因此从60年代起不断出现自行组织的波兰邻国之行。来到波兰的德国人大多是东德人，在那里直面感受了德国占领波兰留下的种种痕迹。《两难选择》第三期刊登了一次波兰之行的报告：“我们作为德国游客对波兰人如此的热情好客感到吃惊；由于德国1939～1945年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我们几乎不敢说德语，后来证明我们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只有提到有针对性的问题时，才会勾起不愉快的回忆。”[2]

在亲自了解刚刚过去的东德历史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对国家政府不信任的感触。《教会与人权论坛》报道了在莱比锡举办的德国袭击波兰50周年的活动上，国安部和警察暴力干涉“朝圣之旅”。[3] 150人被拖走穿过整个莱比锡城，毫无反抗之力。萨密兹达杂志《联络》对此在报道中写道：“政府媒体简明扼要地回答称‘被拖走的主要是上下班途中的汽车司机’。”[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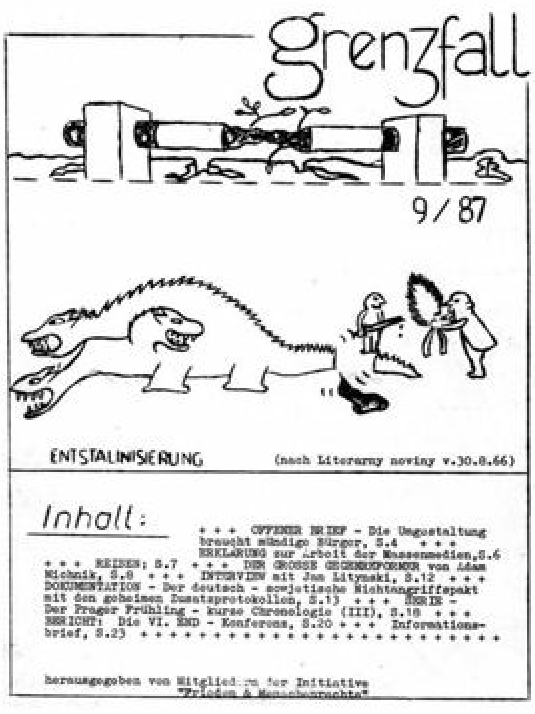
谈论纳粹罪行以及德国占领波兰的文章总是在这二者之间游离不定，一方面是追求和解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已经确信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radix-blätter》曾经刊登了电影《掩盖真相》的部分脚本内容，其中以图画的方式表现了这种两难困境：一名受伤的德国军官被安排住在政府里的一个波兰家庭，这是个有文化教养、知书达理的家庭。德国

军官想用普通市民消磨时间的方式度过他的康复期，然而他喋喋不休地谈论文学、艺术和音乐遭到父亲和女儿的沉默相待。在离开之前，他又固执地试了最后一次，为了看到家庭成员对他善意的无理要求做以回应，除了从这个家庭借来看的书，他还想把多余的唱片录音带一起留下——这是一场所有人都面临的战争。父亲表示拒绝。接着德国军官从一本书中拿出一张折叠了的非法传单，让继续保持沉默的女儿做出选择——给他回话或者两个人都被送至盖世太保。[5]

从对东德萨密兹达工作者的采访中可以看出，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的成立令人产生了一股巨大动力和好奇心，有被采访者讲道：“一天，我和父亲听着广播，屏住了呼吸，我心里激动不安：邻国出了些事情，那儿的人并没有长期束缚于游戏规则，敢于为自己着想。不知道为什么，我支持他们——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6] 然而波兰和东德之间的自由通道在1981年战争法实行之后又遭到东德重新封锁。[7] 70年代边境上的自由往来已成为历史，接下来80年代的东德人已经经历不到。[8] 1987年路德维希·梅尔霍恩论证指出东德社会不仅缺乏对波兰的关注——而且正因如此，东德人心目中又讽刺般地对波兰形成了新的偏见，这是“冷漠、无知以及缺少投入的结果”。同时，东德社会更加专注于自身，对波兰人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把本来就供应不足的消费品很快一抢而空的现象嗤之以鼻。这样德波对话必然会被搁置。还有，当局没有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的差距作为重要议题提上日程，也没有像梅尔霍恩表述的那样“通过双方会面实现一种社会性学习”，而是两个政权之间的对抗以及导致东德出现这种抢购现象的“经济社会落差”将两个社会分裂开来。

如何实现这一对话，《两难选择》中的几篇文章以及《radix-blätter》中对此都给出了实际建议，这些建议的共同之处是要求东德自己创造机会，一方面必须要有合适的行动框架——这是对国家和社会机构提出的一个要求——，另一方面也要采取主动——这是对读者本身的

一种期望。所以《两难选择》在一篇有关波兰政治形势的报道结尾呼吁大家动身前往波兰，亲自看看这个邻国：“有强势的合法反对派存在，国家最终还能存活吗？无论如何，即使德波边界未能完全自由开放，波兰之行的意义也绝对不仅仅限于一场旅行的意义。”[9]



grenzfall

9/87

ENTSTALINISIERUNG (nach Literarny noviny v.30.8.66)

Inhalt:

+ + + OFFENER BRIEF - Die Umgestaltung braucht mündige Bürger, S.4 + + + ERKLÄRUNG zur Arbeit der Massenmedien, S.6 + + + REISEN; S.7 + + + DER GROSSE GEGENREFORMER von Adam Michnik, S.8 + + + INTERVIEW mit Jan Litynski, S.12 + + + DOKUMENTATION - Der deutsch - sowjetische Nichtangriffspakt mit den geheimen Zusatzprotokollen, S.13 + + + SERIE - Der Prager Frühling - kurze Chronologie (III), S.18 + + + BERICHT: Die VI. END - Konferenz, S.20 + + + Informationsbrief, S.23 +

herausgegeben von Mitgliedern der Initiative "Frieden & Menschenrechte"



STRUKTUREN VON MACHT, HERRSCHAFT, GEWALT bilden eines der Grundraster fü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Menschen und Völkern. Es grenzt Leben ein und beschränkt die Freiheit des Handelns. Ist auch die Sprache in dieses Raster gezwängt, verliert sie ihre Funktion als Spiegel der Wirklichkeit. Sie ist dann nicht mehr Mittel zur Kommunikation, sondern Instrument zur Manipulation. Sie vergittert die Vorstellungskraft und stabilisiert als RASTER IM KOPF ihrerseits STRUKTUREN VON MACHT, HERRSCHAFT, GEWALT...

ARBEITSKREIS SOLIDARISCHE KIRCHE
Sommerakademie Juli '88 (Teil I)

Herausgegeben von Dorothea Höck und Ludwig Mehlhorn

RADIX - BLÄTTER

图**1** 《两难选择》**1987**年**9**月刊与《**radix-blätter**》**1988**年**7**月刊

波兰问题在东德被罩上了一层由政府挑选特别人士组织会晤而强行塑成的民族友谊。同这种僵化的教条式做法进行斗争成了最迫切的要求，就像东德反对派人士米歇尔·巴尔托谢克（Michael Bartoszek）在《radix-blätter》中说的那样：“一些我们本以为不断被揭开面纱的事实却消失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想对波兰以及我们同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说点儿什么很难。”[10] 国家和政党有意识地操控同波兰之间的联系是为审查而服务，然而反对派从另一个层面阐述道：互相缺乏认识了解不在于没有联系，而在于缺少能够独自建立联系的条件。[11] 与政党使用的措辞不同，反对派在这里与在很多其他问题上一样，使用的都是国家式的

措辞。当然，这种对话并不是指交换党章，而是互相沟通交流。《奥德河》的前言中对此写道："人民团结不可空谈，而需要沟通。"[12]

君特·萨尔兴和路德维希·梅尔霍恩1988年以安娜—莫拉斯卡神学院的名义在给东德世界大会[13]的一封公开信中再次表述了这一要求："世界大会应该呼吁政府为民众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必须保证个人、各团体以及牧区之间任何时候都能互通往来。除了教会领导层之间的接触，也必须保证各教会团体和牧区之间能够便捷顺利地进行会面及合作。"[14]

80年代中期以来，东德的萨密兹达杂志基本上开始定期出版，印数达100份甚至更多。在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报道中——这里主要指波兰——原有的各种问题被置于一种共同的也就是国际性背景下讨论，比如说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不同评价，从波兰的角度看待政治流亡对反对派政治局势的影响，或者关于代替服兵役的争论等。跨越国界的合作通常都是通过个人之间的接触实现的，并且必须限定于有选择性和指向性的文字。东德萨密兹达在对波兰的报道中无须向读者提及透过西德媒体已经可以了解到的政治大环境，而是首先关注那些经国家审查而不予报道的消息，以及在西德媒体中不能很好地被接受的题材。

东德萨密兹达杂志关于波兰的报道内容主要涉及两国共同走过的历史、被中断的德波对话以及波兰反对派公众。《radix-blätter》第四期名为《奥德河：文学作品》，集中以波兰及德波两国为主题，编辑米歇尔·巴尔托谢克、路德维希·梅尔霍恩和尤阿西姆·蔡勒（Joachim Zeller）这样说道："我们在文学领域寻找德波两国实现对话沟通的证明。我们没有找到，但会从各个方面为之努力。"[15]

可以说，米歇尔·巴尔托谢克笔下的有关波兰的德语文学概述也是在寻找这样的证明。巴尔托谢克描述了上百年来德国通过哪些文学渠道与邻国波兰建立对话，也提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证明了1945年后德国文学与波兰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16]

致力于东欧与东中欧之间交流的《东十字》杂志1989年1月版刊登了一篇对马雷克·埃德尔曼（Marek Edelmann）的访谈，访谈出自由《战斗着的团结》编辑出版的波兰杂志《时代》。从来没有被视作英雄人物的马雷克·埃德尔曼作为指挥官参与了二战时期波兰的两次起义，也是起义的幸存者，他说道："大家认为开枪是最具英雄气概的。我们当时也确实开了枪。"[17] 在这篇翻译成德语的访谈中，埃德尔曼打破了所有对波兰人和犹太人英雄气概的颂赞："到底能否称之为起义？当我们遇到攻击时，我们要做的是从屠刀下逃生。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死亡的方式。"[18]

东德一份独立杂志借此刊登了一篇文章，论证了波兰反对派公众内部也存在着多种多样有争议的观点。波兰反对派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以自我观点反对现行的历史观，并填补现存的各种"空白点"，而该篇文章证明了这些观点在反对派之外也得到了讨论。

1987年以来定期就会出现有关"自由与和平"组织活动的报道，该组织的宗旨反对强制服兵役也在东德各政治组织中得到广泛讨论。[19] 1980年以来波兰法律规定可以以服民役的方式代替服兵役，然而国家却阻挠该项规定的实施。[20] 《环境报》对此这样报道，波兰大约只有60%服民役的申请得到批准，服民役者的报酬降到最低，并且通常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也就很难得到家人关心支持，很多人被劝不要选择服民役就是一个证明。[21] 总在东德萨密兹达中被提及的"自由与和平"组织几乎根本无法直接与外界建立对话："由于出行受到限制，波兰与东欧邻国，与匈牙利、捷克以及东德之间的联系只剩下为共同呼吁发起的签名活动，有实质内容的对话至今都没出现过，1981年以来至少与该组织成员会面的东德人都没有过。"[22]

《两难选择》报道过"自由与和平"组织于1987年5月7日至9日在华沙举办国际和平讨论会，讨论如何促进欧洲和平以及东西欧和平运动之

间的关系。[23] 来自东德和平组织的代表想参与讨论会却被拒绝入境，所以试着间接以书面形式转达观点参与讨论。[24]

东德萨密兹达的作者们在研究自认为熟悉的题材时，有时也会听到某些意想不到的言论，比如《环境报》关于“自由与和平”组织的一篇报道中就写到该组织对德国问题的看法：“如果两德统一，只不过是一个解除武装中立的国家在欧洲独立站稳了脚跟，即便这样他们还是惧怕两德统一。这个东德和平组织至今几乎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将在与波兰基层政治工作组织的对话中，也肯定会在与其他东欧邻国的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25]

读东德萨密兹达总能读到对波兰独立出版业一句接一句几乎如痴如醉的描述，比如有人曾经这样写道：“他们那么多自由刊物令我们自愧不如。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各个印刷所有非常棒的出版物，在众多巨著中一部独立的波兰史诞生了，各作家的作品自由印制，60多种报纸在波兰各地出版，自十月份以来‘自由与和平’组织开始出版了自己的刊物。”[26]

波兰的各种出版物不仅形式更加多样化，这种为政治服务的独立出版业本身也是政治反对派合法行动的范例。编辑们尽可能利用波兰的审查法中允许的自由式措辞，他们公开坦率的行为方式获得成功也赋予了他们这样做的权利。《两难选择》1987年报道了《radix-blätter》中就已提到过的《公共事务》[27] 杂志得到了官方印刷许可。路德维希·梅尔霍恩认为，这本杂志在社会、文化及政治领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促进了各领域之间的沟通理解。这样一本杂志在东德始终没有出现过。[28]

在把目光聚焦到东德涉及波兰的萨密兹达刊物时首先要明确一点，东德政治界首先是倾向于西方的。波兰作为邻国共同分担了一段痛苦的历史，过去是现在也是，然而波兰并非仅仅因此而引起我们的关注，波兰的反对派公众能为东德自身的政治活动及各种论辩起到推动作用，这

种作用方式很少见于西德媒介。对于反对派公众的形成和发展，波兰这个国家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

[1] 参阅Hamersky，Heidrun（Hg.）：*Gegenansichten. Fotographien zur politischen und kulturellen Opposition in Osteuropa 1956～1989* . Berlin 2005。

[2] Björn（Gerd Poppe）：*Reiseimpressionen aus Polen oder eine Lektion Zivilcourage* （以下简称：Reiseimpressionen）. In：Grenzfall 3/1986，Berlin，S.1-2，hier S.2。

[3] Pilgerweg der Betroffenheit in Leipzig. In：Forum für Kirche und Menschenrechte 1/16.9.1989，S.8-9.

[4] Sasse，Gottfried：*50 Jahre danach* ... In：Kontakte，September 1989，Leipzig，S.2-3，hier S.2.

[5] Olszewski，Olaf：*Verdunklung. Ein Filmszenarium* . In：Oder.Literatur Texte（radix-blätter；4）（以下简称：Oder.Literatur Texte）. Berlin 1987，S.40-45。

[6] Jankowski，Martin：*Deutsch* . In：Oder.Literarische Texte，S.65-66，hier S.65.

[7] Olschowsky，Burkhard：*Einvernehmen und Konflikt.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olksrepublik Polen 1980～1989* . Osnabrück 2005，S.55.

[8] 参阅 *Polen，Deutsche und das “Haus Europa”. Brief des Anna-Morawska-Seminars der Aktion Sühnezeichen an die ökumenische Versammlung* （以下简称：Polen，Deutsche und das “Haus Europa”）. In：Aufrisse zwei. Über das Nein hinaus（radix-blätter；9）. Berlin 1988，S.35-38，hier S.36. Mehlhorn，Ludwig：*Wir brauchen ein dialogförderndes Klima*：*Europa und der Dialog zwischen Deutschen und Polen* （以下简称：Wir brauchen ein dialogförderndes Klima）. In：Aufrisse（radix-blätter；5）. Berlin 1987，S.56-61，hier S.56。

[9] Polen nach der Amnestie. In：Grenzfall 2/1986，Berlin，S.8-9，hier S.9.

[10] Bartoszek，Michael：*Die einfache Nähe oder Warum schreiben deutsche Dichter über Polen* ？（以下简称：Die einfache Nähe）In：Oder.Literarische Texte，S.26-39，hier S.27。

[11] Mehlhorn：*Wir brauchen ein dialogförderndes Klima*，S.57.

[12] Bartoszek，Michael；Mehlhorn，Ludwig；Zeller，Joachim：*Auf dem Weg über die Oder*（以下简称：Auf dem Weg über die Oder）. In：Oder.Literarische Texte，S.3。

[13] 为世界正义、和平以及保护世界为宗旨在东德召开的大会。——译者注

[14] Polen，Deutsche und das “Haus Europa”，S.37.

[15] Bartoszek；Mehlhorn；Zeller：*Auf dem Weg über die Oder*，S.3.

[16] 参阅：Bartoszek：*Die einfache Nähe*。

[17] “Red keinen Quatsch，mein Kind…” Ein Gespräch mit Marek Edelmann. In：Ostkreuz.Politik-Geschichte-Kultur. Januar 1989，S.20-32，hier S.21.

[18] “Red keinen Quatsch，mein Kind…” Ein Gespräch mit Marek Edelmann. In：Ostkreuz.Politik-Geschichte-Kultur. Januar 1989，S.20-32，hier S.21.

[19] 参阅 Zur Arbeit von Freiheit und Frieden in Polen. In：Grenzfall 4/1987，Berlin，S.6. Umweltschützer festgenommen. In：Grenzfall 5/1987，Berlin，S.11。

[20] 参阅 Zivildienst für Verweigerer. In：Grenzfall 2/1987，Berlin，S.10-11。

[21] 参阅 Problems des Zivildienstes in Polen. In：Grenzfall 5/1987，Berlin，S.40。

[22] N.：*Die polnische Friedensbewegung*（以下简称：Die polnische Friedensbewegung）. In：Umweltblätter，1.9.1987，Berlin，S.17。

[23] Internationales Friedensseminar in Waschau. In：Grenzfall 5/1987，Berlin，S.10-11.

[24] Waschauer Erklärung. In：Grenzfall 6/1987，Berlin，S.17.

[25] Die polnische Friedensbewegung，S.17.

[26] Björn（Gerd Poppe）：*Reiseimpressionen*，S.1.

[27] 曾经是地下杂志的后来成为合法杂志. In：Grenzfall 5/1987，Berlin，

S.11.

[28] Mehlhorn，Ludwig：*Start einer Zeitschrift*：*Res Publica*. In：Oder.Literarische Texte，S.104-107.

萨密兹达—文学—现代性

——东欧萨密兹达与东德独立刊物

克劳斯·米歇尔（Klaus Michael）博士

东德的萨密兹达

在柏林墙倒塌以后的20年里，各界对东德非官方刊物以及由私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文学类画册、艺术家手制书及报纸杂志的评价依然有争议，有人认为这标志着一种独立而纯正的对立文化，有人称其为“后来追上的现代派”，还有人将其视为国家权力的模拟产物。还有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各政治团体编辑出版的关于基层政治工作组织与公民维权组织[1]的杂志以及信息手册，虽然从当代史以及理论史的角度评判这两大类杂志的标准有着根本区别，然而矛盾的是，二者至今无论在类型上还是在题材上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邻国的萨密兹达刊物有着密切的联系。

毋庸置疑，东德东部邻国的文学类和政治类萨密兹达在欧洲文化与文学史上留下了成功的一页，萨密兹达也为1989年后东欧新民主建立的神话传奇增添了一道色彩。多种多样的萨密兹达刊物不仅促进了苏联、波兰和捷克现代文学的发展，也为反对派独立政治运动的产生以及铁幕的落幕起到了重要作用。除了亚历山大·金斯堡（Alexander Ginsburg）、伊日·格鲁沙（Jiří Gruša）、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瑞沙德·克里尼基（Ryszard Krynicki）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schenizyn）这些作家外，还有很多其他作家在萨密兹达刊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何区分东德与东欧国家及苏联的萨密兹达刊物？东欧萨密兹达刊

物在1989年后一步步被写入各个国家的文化史与文学史，成为国家与民族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如果不考虑例外情况，东德以及现在的全德文学界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2] 而是重复了一个过程，可以称为中断了的或者说没有完成的艺术创立过程，这种过程将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或者表现主义这些艺术流派作为次要流派或对立流派，丰富了德国多次断裂的文化史。

对此存在着四点决定性原因：首先东德非官方刊物没有统一的文风标准。它们不是延续托尔斯泰（Tolstois）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wskis）史诗风格的异议刊物，也不是姆罗策克（Mroàek）、哈维尔或者埃斯特哈齐（Esterhazy）荒诞派戏剧的延续，也不是塔迪尔兹·凯恩特（Tadeusz Kantor）在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残暴戏剧”的基础上创作的“死亡戏剧”。编者的计划与文章作者的意图并不相同，各篇文章之间也不相同，所以无法形成统一的风格。如果存在一定的区别于其他刊物的典型文风特点，那么必然会有助于其在德国学界长期占据一席之地。东西两德紧密连接在一个共同的语言空间和公众空间下，这种特殊形势决定了东德非官方杂志包含的文学与艺术始终是全德文学界公众的一部分，也就成为了全德艺术界的一部分。这样东德私人出版的杂志就具有一种与俄国、波兰和捷克的萨密兹达完全不同的作用。这些杂志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到整个德国差异巨大的文化背景当中，这一点与属于同一类文化背景的东欧社会完全不同。作为杂志，像自然主义或者表现主义的杂志，首先必须具有创新性和激进性。它们是一种自我理解和艺术交流的媒介，因此对于艺术团体以及新美学流派的教育具有重要作用，这样也就打开了一扇自由空间，在这种空间下可以进行各种艺术及文学实验，试验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以及进行一种所谓的合法性测试。文艺类杂志对于编者及其他参与者来说充当了前期公众的角色，这里能够保持并实现的东西，也能在西德文学界公众经受住考验。这一要求基本上适用于每一本东德杂志，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出版的杂志。

1989年后这类文学杂志失去了独立地位：1979～1989年出现的30多种文学杂志没有一本到了1990年以后还能继续出版，能够坚持下来的只有几本从一开始就专门面向图书收藏家出版的图文杂志[3]，而且成本较高。相反，在捷克和波兰，80年代期间从各种非官方杂志中渐渐成立了一系列重要的出版社，具有代表性的是1988年由波兰任萨密兹达作家及翻译家多年的瑞沙德·克里尼基成立并且至今还在领导的a5出版社，该出版社位于波兰克拉科夫，出版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女作家辛维斯拉瓦·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的作品。即使是1989年以后从各种杂志中新成立的小型出版公司，像加尔雷夫（Galrev）出版社和康泰斯特（Kontext）出版社也不再做杂志这样的刊物。

另一方面，从政治角度评价东欧萨密兹达的标准被一一对应地视为对东德各种现象的描述，因此至今读者们都没有对东德非官方杂志、图文杂志以及艺术家手制书做到正确的理解。非官方刊物直到今天大都被放在当代政治关系背景下，并且基本上只当做政治言论来理解。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0年里，各大学的艺术和文学研究学者始终没有把萨密兹达刊物列入其研究对象，而将这一研究任务指向了东欧与东德各研究所及学院。因此，萨密兹达刊物通常只放在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当代史学的框架下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东德非官方杂志从未被列入文学或艺术史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也就在90年代早期的文学大辩论中一同分担了所有东德文学的命运。这类杂志无论其宗旨是什么，都和官方杂志一样，产生的影响和所受到的评价都发生了变化。此外，编者们还应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非官方杂志里出现了秘密传播信息的现象，[4]为什么东德地下杂志中没有走出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的作家。

各东欧邻国的文学界在1989年后受到了反对派作家、遭排斥的或流亡作家回归浪潮的影响，也受到新修订的文学规则的影响，整个德国文学界对此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然而德国文学界1990年后开始出现一种完全不同又毫不逊色的发展趋势，作家们并没有继承沃尔夫·比尔曼

（Wolf Biermann）或者尤尔根·富克斯（Jürgen Fuchs）对当权者所持的批判态度，也没有延续对立文化作家的模式，比如弗兰克-沃尔夫·马蒂斯（Frank-Wolf Matthies）、伯特·帕彭富斯（Bert Papenfuß）或者卢茨·拉特诺（Lutz Rathenow），而是受到了相比之下名气不大的作家影响，如莱因哈德·伊尔格尔（Reinhard Jirgl）、卢茨·塞勒（Lutz Seiler）、杜拉斯·格仁拜因（Durs Grünbein）或者托马斯·布鲁西克（Thomas Brussig），同时还有自1989年以来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埃里希·略斯特（Erich Loest）。

不同的时间，相同的萨密兹达

一般认为萨密兹达刊物以苏联异议作家亚历山大·金斯堡1960年在列宁格勒编辑出版的诗歌杂志《句法》为开端。[5] 其中金斯堡提到了苏联诗人尼科莱·格拉兹科夫（Nikolai Glazkow）40年代就在自己的作品上标明“samsebjaizdat”，意思为“自行编辑出版”。苏联和东欧萨密兹达的特征体现在文字内容、政治诉求以及拥护支持公民权利这三方面的统一，而且到今天依然保持着这种典型特征。并非作者们最初就树立了这样的宗旨，而是1966年达到顶峰的文字狱将作者和编者这样的文人变成了罪犯，所有这些同样也在萨密兹达中得到了记录。[6]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模式，用特殊的方式将政治诉求、道德无暇与艺术革新联系在一起。

不同的是，东德类似的萨密兹达刊物产生的时间比苏联晚了20年，比各东欧国家晚了10年。当然，像沃尔夫·比尔曼、莱纳·孔策、尤尔根·富克斯或者雷纳·基尔施（Rainer Kirsch）这些作家不能出版的作品，也总有文稿和复印本在流传。但问题是，这些刊物是否能够算作萨密兹达。还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失败后人手散发的各种传单虽然含有沃尔夫·比尔曼的歌词，但这些传单既没有固定的编者也并非系列刊物，因此现在看来也不能代表萨密兹达的开始。此外也没有任何标准指出如何评判某种刊物是否具有独立的文体风格。严格地说，东德1979年才开始出现一系列非官方杂志[7]，有迪特·科斯切克（Dieter Kerschek）、洛塔

尔·菲克斯（Lothar Feix）和格尔德·阿德洛夫（Gerd Adloff）编辑的文集《信鸽》，有托马斯·波墨（Thomas Böhme）的《灯笼人》，还有乌韦·科尔贝（Uwe Kolbe）编辑的《米卡多》杂志的前身《裸身的皇帝》[8]。此外还有拉尔夫·克巴赫（Ralf Kerbach）、科妮莉亚·施莱默（Cornelia Schleime）和萨沙·安德森（Sascha Anderson）编辑出版的抒情诗和艺术家杂志《题 诗 册》，1979～1984年共出版了20期。[9]

这些杂志以20世纪初德国表现主义、行为主义或达达主义艺术觉醒运动的各种画册和杂志为基础，其宗旨、中心思想以及模式从根本上区别于东欧国家的萨密兹达杂志。东欧的萨密兹达是紧紧和异议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杂志和以打字稿的形式流传的文稿其存在本身就是另一种文化的证明，显示出国家势力范围受到了限制。同时东欧萨密兹达也是一种信号，一种标志，一种号召，呼吁人们进行文化反抗和政治反抗，至少在早年时期反映出一种个人化的行动要求。因此萨密兹达始终是一个个人态度和自我主张的问题，要求读者作出具体的回馈，通常是指尽可能短时间内抄写、复印、传递读过的文字并且发出更多的抗议信号。在此还要提及的一点是，在斯拉夫语国家，尤其是在1989年之前的俄国文学界，文字制品及其作者历来都得到很高的评价，书写语言、图书文献以及萨密兹达在这里融为了一体。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萨密兹达发展成了一种社会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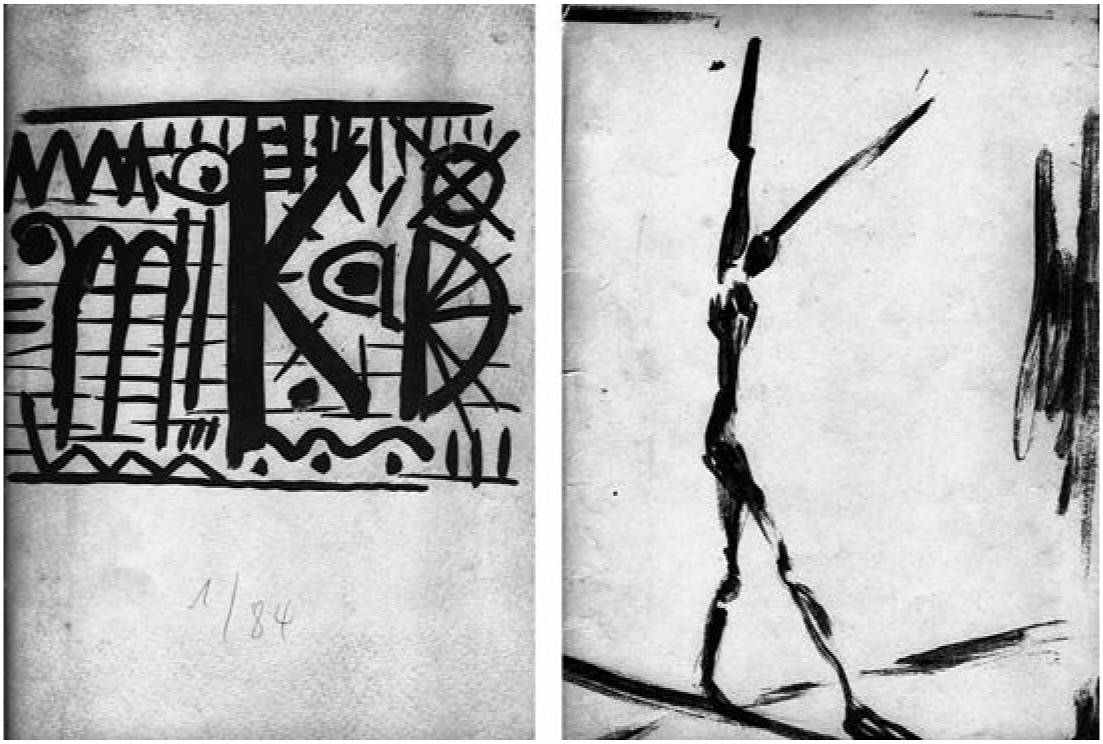


图**1 1984**年的《米卡多》杂志

萨密兹达在东欧的意义并不完全适用于东德80年代初以来出现的各种杂志和艺术家手制书，因为东德是一个既不以文字为中心也不以作家为中心的社会；尽管东德有着种种不同之处，但和西德一样，东德社会也同样是一个媒体社会。在东德，象征着对立文化的不是图书或杂志，而是被封杀的乐队、电影、艺术家和媒体人的行为表现，还有嬉皮士、朋克和蓝调音乐派这类人群的装扮艺术，他们往往喜欢尝试表达一些与当权者相异的观点。对立文化的象征首先源于流行文化的媒体领域。比起东欧的异议文化史，东德更多地参与了西方社会流行媒体的对立文化史。这一点在东德日常文化中可以准确地体现到一分一秒：我们可以从每晚20点15分开播的每日新闻中听到个人化的另类意见，这是一种通过电视节目形式展现的对立文化。其他表达抗议的文化形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七七宪章”对于从类别上比较反对派、异议分子和萨密兹达文化具

有特殊的意义，捷克的萨密兹达也和“七七宪章”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这场公民维权运动的产生不是起因于一本禁书，也不是因为某个作家或政治活动家被捕，而是由于非常火爆的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被封杀且乐队成员遭到判刑。首先“七七宪章”的宗旨并不是实现某个政治构想，也不是为了保护某种文化态势，而是涉及根本性的一点：即人权的不可分性。用这种模式看待东德的情况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东德作家在“七七宪章”签署的当年没有公开反对当局禁止“Renft”乐队，尤尔根·富克斯（Jürgen Fuchs）和贝蒂娜·魏格纳（Bettina Wegner）还曾在乐队巡演期间登台演出。这就导致了作家在流行文化环境面前和在文艺类萨密兹达领域里一样难以有所作为。这无疑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是一个作家自我形象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同时代的文化习惯问题。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或者斯蒂芬·赫尔姆林（Stephan Hermlin）作为摇滚乐队的主打歌手在事后看来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可以说，比起东德大多数批判作家，像Renft、Pantha Rhei或者Pankow这些摇滚乐队的成员，他们的理念与行动显然更贴近“七七宪章”的宗旨。

文学类萨密兹达

文艺类萨密兹达在东德的产生要归结于三点原因：第一，1976年比尔曼被驱逐出境，作为文学政治上的后果，上一代和最新一代的作家被排挤出文学界；第二要归结于萨密兹达脱离文化界及各种社会机构的普遍趋势；第三，更好的技术手段为80年代时期编写、印制和传播这些另类刊物提供了前提条件。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早在70年代为波兰萨密兹达提出了新概念“平行公众”作为其文化政治上的目标，然而这一概念却不完全适用于东德的文学杂志。截至两德统一，共有30种文艺杂志分别出版了15～200册不等，80年代中期以来，各个公民维权组织、环境组织及活动团体的30种杂志共计5000册。根据波兰内政部的统计数据，仅在1976～1980年就有“440000册独立刊物、121台打印机、106台打字机、1770份纸张和113公斤的印刷油墨被没收”[10]，和邻国波

兰相比，东德的萨密兹达刊物数量少了很多。

三个最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学萨密兹达杂志分别为《米卡多》（*Mikado*，1984～1987）、《损失》（*Schaden*，1984～1987）和《阿里阿德涅工厂》（*Ariadnefabrik*，1986～1990）。《米卡多》由乌韦·科尔贝、洛塔尔·特罗勒（Lothar Trolle）和贝尔恩德·瓦格纳（Bernd Wagner）编辑出版，可以说是东德最有名也是最重要的文学萨密兹达杂志。编者的目的在于与“神圣的社会主义”决裂，与“临死挣扎中的社会”决裂。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编者对“全体一代作家”被排挤的现状做出的反应，体现了他们曾在《米卡多》中表达的观点“文学在进入公众的过程中不仅仅涉及出版社、编辑部、书店和印刷所”，[11] 因此编者们对统治东德文学界的公众及审查是持反对态度的。这种非常明显的政治目标和东欧的萨密兹达类似，即使东德萨密兹达的编者们不希望他们的刊物事后被视为一种“文学反对派”的证明，而希望被视为“另一种公众”[12] 产生的前提条件。就像乌韦·科尔贝后来说的那样，《米卡多》不仅指明了“各种打破常规的道路”[13]，而且也属于“叛变活动”[14] 网的一部分，这一言论比科尔贝之前为1998年在卢希特汉德（Luchterhand）出版社出版的《米卡多文选》写的前言更为尖锐。后来乌韦·科尔贝和贝尔恩德·瓦格纳离开了东德，《米卡多》也就不再出版。《米卡多》共出版了将近100册，10年以后依然没有离开人们的视线：柏林市政府的文化事务管理处1995年又重新出版了该杂志1985年的第三期。

《损失》于1984～1987年出版，编者有艾格蒙·黑塞（Egmont Hesse）、约翰内斯·杨森（Johannes Jansen）、莱昂哈德·洛雷克（Leonhard Lorek）和克里斯托夫·谭纳特（Christoph Tannert），这本杂志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美学改革以及艺术实验。对于编者和作者来说，社会批判的前提条件是批判占统治地位的语言，批判社会习俗公约，批判社会思想体系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因此，该杂志同时也力图在政治层面发挥作用，从政治角度感知艺术。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在文化抗争

的方式和地点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杂志的名字也已经说明了某些问题。可以说，该杂志代表了一种行为主义小派别，完全从经典先锋派的角度将艺术革命视为社会革新和政治革新的统一。编者们希望更加突出杂志的媒介作用来发挥影响力并将其作为一种艺术上和政治上的反馈。但一些为杂志写作的作家对此并不认同，他们希望进行艺术内部的现代化和革新，并首先将杂志视为群体内部和艺术上自我理解的媒介。[15] 由于《损失》只出版了35册，因此读者圈子很有限，但围绕杂志展开的各种辩论使其影响力不断扩大，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读者圈子。每一位参与编写的人都可以得到一本杂志，部分杂志还在东德西德出售，以收回成本。此外马尔巴赫德国文学档案处、不来梅东欧学院、德累斯顿铜版画陈列室以及萨克森州州立图书馆也都会收到一份杂志，莱比锡“Eigen+Art”画廊以及柏林锡安教堂的环境图书馆偶尔也有收藏。1986年夏天，杂志的编者和作者们在撒玛利亚教堂举办了一次名为“文字与创作”的艺术类萨密兹达杂志作品展，在展览上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了杂志的创作班子。这次展览推动创立了其他杂志，比如专门涉及文学翻译的《应用》以及文艺短评类杂志《阿里阿德涅工厂》。



图**2** 《损失》（**1987**）以及《阿里阿德涅工厂》（**1986～1990**）

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各界出现了越来越强的呼声，要求创办一本发行量大并且跨区域发行的期刊，使其成为“第二文化”的发言人。为了推动创建这样一份期刊，相关人士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比如有人试着在1984年春的“Zersammlung”朗诵会期间创建一个独立艺术家协会，又如自1985年秋以来，来自柏林、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艺术类萨密兹达杂志的编者们进行会面商讨组织事宜，还有1986年夏在撒玛利亚教堂举办的作品展。虽然1984年乌韦·科尔贝在创建《米卡多》杂志时提议，也要面向其他艺术群体和作家将该杂志塑造为表达各种反对意见的重要渠道。但这一提议由于没有得到各方认可并且在艺术执行办法上没有达成一致而未能实现。1986夏的作品展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持续十年的艺术改革进程，这次展览虽然没有促成创立一本大家要求的跨区域杂志，但却促使创立了杂文杂志《阿里阿德涅工厂》，记录了这一接近尾声的艺术改革进程。编者为雷纳·切尔宁斯基（Rainer Schedlinski）和安德烈亚斯·科齐奥尔（Andreas Koziol），每两个月出版一期，其中刊登过对阿

道夫·恩德勒（Adolf Endler）和格哈德·沃尔夫（Gerhard Wolf）文学作品的总结性文章，还有文章论及了比较全面的旨在重新塑造文学对立文化形象的自我理解辩论，其中包括杨·法克托尔（Jan Faktor）的自我理解辩论。[16] 1990年后编者雷纳·切尔宁斯基作为国家安全部通报合作者的身份被曝光后，在官方文化和对立文化之间关系的这个问题上，《阿里阿德涅工厂》成了讨论的焦点。从那以后，在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对民间文学界施加影响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大多数观点都高估了这种可能性，因为自80年代中期以来，没有任何途径能够融合、支配或者改写民间文艺。1990年，在《阿里阿德涅工厂》《莲妮》《损失》以及《应用》这几本杂志的基础上位于柏林的加尔雷夫文学出版社成立，而之前也已提到，加尔雷夫出版社不再出版杂志这样的刊物。

回顾东欧各国的萨密兹达，即使忽略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上的差异，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东德邻国萨密兹达的作家们拥有很高的文学地位——像苏联的米歇尔·布尔加科夫（Michail Bulgakow）、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chmatowa）、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或者安德烈·普拉托诺夫（Andrej Platonow）——而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东德就只能算作特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东德作家即使持批判态度，其写作活动也是在维护一种特定文化态势的条件下进行的。毫无疑问，克里斯塔·沃尔夫和斯蒂芬·赫尔姆林曾私下里默默帮助过一些面临危机的作家，以避免他们卷入诱使人犯罪的政治运动，其中有因反抗比尔曼被开除国籍而被捕的女作家嘉布里尔·卡霍尔德（Gabriele Kachold，又名Gabriele Stötzer），还有莱比锡的艺术政治萨密兹达杂志《打击》的编者之一格尔特·诺依曼（Gert Neumann）。“要批判可以，但请在内部批判”，这一模式历经了几十年的考验一直持续到两德统一。如果抛弃这种模式，就会产生一股非常重要的推动力促使一种独立于国家文化之外的文学公众的形成。阿道夫·恩德勒、埃尔克·埃尔贝、沃尔夫冈·希尔毕西（Wolfgang Hilbig）、卡

嘉·朗格-米勒（Katja Lange-Müller）、弗里茨·米劳（Fritz Mierau）、洛塔尔·特罗勒和格哈德·沃尔夫定期会在非官方杂志和艺术家手制书里发表一些重要的表达构想的文章。此外，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也为《阿里阿德涅工厂》《奇怪的城市》和《损失》写过各种不同的短文，又和开姆尼茨的图像设计师克劳斯·海纳尔-施普林穆尔（Klaus Hähner-Springmühl）编辑出版了一本艺术家手制书。然而米勒的文章中丝毫看不出与这些杂志探讨的问题有任何关联。

由阿斯泰利克斯·库图拉斯（Asteris Kutulas）编辑出版的《奇怪的城市》是一个特例。这本杂志创刊于1987年，目标是将80年代以来与审查的斗争日益激烈的新老作家联合在一起，其中第一期就刊登了沃尔克·博朗（Volker Braun）和海纳·米勒的文章。编者一方面为“挑战东德文学界现状”[17] 而创立了这本杂志，另一方面也是在尝试弃用固有的出版社体制而创立一本官方作家杂志。新生活出版社在此之前曾推出文学年刊《性情》，《奇怪的城市》读起来就像无审查版的《性情》，甚至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因此有名望的老作家可以以这本杂志为平台安全放心地参与官方与非官方文学界的讨论。

政治文化类萨密兹达

接下来要特别谈一谈政治文化类萨密兹达杂志，这类杂志在内容、纲要和类型上都和各邻国的萨密兹达具有可比性，编者们不仅明确参照东欧萨密兹达的模式，而且还和东欧国家的反对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中有斯蒂芬·比克哈特（Stephan Bickhardt）与路德维希·梅尔霍恩（Ludwig Mehlhorn）1986～1989年合编的《radix-blätter》，有托斯滕·梅特尔卡（Torsten Metelka）1988～1990年编辑出版的《Kontext》，还有莱因哈德·万斯胡恩（Reinhard Weißhuhn）和格尔德·伯珀（Gerd Poppe）1989年1月合编的国际性杂志《东十字》（*Ostkreuz* ）。编者们既在政治领域又在艺术领域从事活动，因此各个杂志涉猎的主题非常广泛。与那些高要求但发行量小的先锋派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不同，编者们

希望能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

《radix-blätter》

斯蒂芬·比克哈特和路德维希·梅尔霍恩合编的《radix-blätter》最初是一本典型的文集，将各界关于东德后期思想、文化及政治局势的不同意见汇编到一起，1986～1989年共出了12期。《radix-blätter》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杂志，而是一本刊物标识，专门汇集各类反对意见。“Radix”来自于拉丁文，表示“根”、“源头”或“来源”的意思。[18] 新教教会的有关机构承担了《radix-blätter》的部分发行工作，编者们希望新教教会这些年赢得的公众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并且提出了如下长期工作目标：像波兰一样将教会塑造为政治反对力量并且为此在教会内部开展相关工作、提供理论支持以及组织形成工作网络。由于《radix-blätter》在全东德发行，通过各教区办公室、各教育机构以及其他一些教会机构都能看到这本杂志，因此它对东德后期公众舆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路德维希·梅尔霍恩曾经说道，《radix-blätter》应参照波兰萨密兹达，长期努力“创造社会平行机制”来克服体制的束缚并且“为现存的机制建立另一种公众”[19] 。

《radix-blätter》涉及的主题包含三大方面：欧洲分裂问题、对德波特殊关系的重视以及寻找各种机会与曾被大屠杀破坏的犹太德国思想传统接应。值得一提的是延斯·莱希（Jens Reich）对中欧问题[20] 发表的意见以及讲德波历史及文学的《奥德河》。编者斯蒂芬·比克哈特曾说：“我认为，反对派如果想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践，就需要艺术，艺术是社会的集中表达。”[21]

尤其让《radix-blätter》引起强烈反响的是一份纲领，编者们联系“七七宪章”以及波兰工人保护委员会的各种提议，提出了“拒绝实践，划清界限”[22] ，要求结束“东西德对峙”结束德国分裂的现状。早在70年代末，捷克和波兰的民众就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结束欧洲的政

治文化分裂现状以及结束中东欧社会边缘化的前提条件是解决德国问题。在1987年4月柏林—勃兰登堡新教教会代表会议上，这份纲领成为了形式上的会议决议，因此也记录下了一段历史。[23] 在具体措施方面，纲领要求恢复去往波兰的交通，完全自由出入西方国家。如果提议通过，那就意味着这个德国新教教会最重要的分支教会之一必须要求国家和政府打通柏林墙，结束东德社会分裂现状。前者对东德作为国家存在的身份提出了质疑，后者以结束政党特权、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实际上就是要求统一社会党退出国家和政府。这项提议最后在有关安全机构的帮助下被送至了教会代表会议委员会，但值得高兴的是，编者们创办了一本新的杂志《第二面：超越否定》，该杂志提出了众多保护公民权利的要求，而且引起的反响不小于《radix-blätter》。这一次，像乌韦·科尔贝这样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参与了进来。科尔贝坚定地认为："'拒绝实践，划清界限'就要求社会转型，变得更开放更包容。"[24] 1988年9月，很多团体在德国新教教会代表会议上以其他的形式提出了这份纲领。公民维权组织"即刻民主"的创始人之一沃尔夫冈·乌尔曼（Wolfgang Ullmann）说道："我支持这个提议，因为在敌对政治思想意识的指导下，我认为两个德国都已融入了各个权力集团，这些权力集团广泛宣扬的理念是反动、狭隘而且有害的。"[25] 该提议在德国新教教会代表会议上也被送至了会议委员会，但依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各个创始人从中意识到，教会至多也就是作为一种政治革新进程波及的领域，而不可能推动政治革新。《radix-blätter》和《第二面：超越否定》都反映出了东德公民维权运动的基本纲领。这两本杂志经大批复印后再次出版并且又在西德加印。已经离开东德的反对派作家如尤尔根·富克斯本来要为第三期杂志撰写文章，由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而东德也随之垮台，出版第三期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东十字》

《东十字》创刊时间较晚，可以说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类萨密兹达

杂志。编者最初受到“七七宪章”的影响，计划把《东十字》打造为一本国际性杂志，同时在东德、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以相应的语种出版，“七七宪章”的伦敦办公室负责各个国家编辑部的协调工作。编者们本来对杂志的取材定位很高，但翻译、协调以及差旅这些工作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导致编辑部的工作开展得越来越慢，最后到了1989年1月《东十字》只预先在东德出版。杂志副标题为“政治，历史，文化”，编委会成员有捷尔吉·达洛斯（György Dalos）、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Christian Dietrich）、彼得·格里姆（Peter Grimm）、齐格弗里德·内尔（Siegfried Neher）、格尔德·伯珀、沃尔夫勒姆·奇谢（Wolfram Tschiche）和莱因哈德·万斯胡恩。此外，编辑部自1988年以来定期组织召开编辑部会议，除了编委会的成员，参与会议的还有莱比锡的杂志《第二人》编者海德玛丽·黑特尔（Heidemarie Härtl）、米谢拉·沙哈布（Michaela Shahab）和埃德加·杜斯达尔（Edgar Dusdal）。格里姆、伯珀和万斯胡恩1985年创立了公民维权组织“和平与人权”，杂志编辑部通过这三位成员与东德反对派的重要人士建立了联系，他们在出版期刊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平与人权”组织1986～1988年编辑出版了信息类杂志《两难选择》[26]，此外到1988年为止还出版了一些信息手册如《文章27——为了民主和平》（1987）以及文献汇编《脚注3》（1988年7月），记录了1988年1月纪念卢森堡（Luxemburg）和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的抗议游行活动后发生的众多事件，大量人员被捕、离境。

为了纪念罗马尼亚布拉索夫起义被镇压一周年，《东十字》第一期主要分析了罗马尼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局势，其中包括罗马尼亚以及罗马尼亚裔德国作家罗尔夫·波塞特（Rolf Bossert）、米尔查·迪内斯库（Mircea Dinescu）、约翰·利伯特（Johann Lippet）、赫尔塔·米勒（Herte Müller）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文章。此外还有一篇捷尔吉·达洛斯写的文章，讲的是直到1988年1月反对派人士遭逮捕之前东德萨密兹达的发展情况，但却没有谈及文艺类萨密兹达杂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伊日·丁斯特比尔（Jiří Dienstbier）为杂志写的创刊号文章，文章讲述了捷克民主社会主义从形成一直到1968年8月布拉格之春失败的发展过程，并且在这一背景下分析了苏联的改革开放。然而，丁斯特比尔在政治上和决策上没有明确的主张，回顾来看，1989年时东德反对派在组织纲领上似乎同样如此。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还能作为政治行动的准则吗？苏联的改革开放是布拉格之春政治传统的延续吗？东中欧国家会对戈尔巴乔夫作何期待？丁斯特比尔描绘了一幅昏暗的未来画面，他没有脱离1968年的基本思想，谈论了社会主义的诸多方面，而唯独没有指出社会主义政治将何去何从。丁斯特比尔认为，然而通过60年代的起义以及在反抗1968年8月21日后苏联军队入侵的斗争中可以明显看出，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组成部分”[27]，公民社会的发展是有各种机会的。与此相反，苏联的情况就是拯救一个殖民帝国，并且这个殖民帝国从不关心它的各个附庸国。“因此，要做到热忱友好地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是有限制条件的。为‘社会主义老家’开一张空头支票是不值得的。”[28]



图**3** 面向东欧的国际性杂志《东十字》（**1989**年**1**月）

到了1989年秋，杂志的第二期出版计划就已搁浅，这场变革令《东十字》的编者们感到意外，当时字模已经打出，只需进行印刷。第二期杂志计划刊登的有阿道夫·恩德勒和延斯·莱希的文章、一篇拉尔夫·乔尔达诺（Ralf Giordano）论“注定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一篇格尔特·伯珀探讨新经济政治的文章，一篇埃德尔伯特·里希特（Edelbert Richter）从历史角度论证人权的文章，一篇杨·法克托尔讲80年代东柏林文艺概况的文章，一篇捷尔吉·达洛斯谈匈牙利当下局势的文章以及乌尔里希·

齐格（Ulrich Zieger）、贝尔特·帕彭富斯（Bert Papenfuß）和马蒂亚斯·巴德·霍尔斯特（Matthias BAADER Holst）的文学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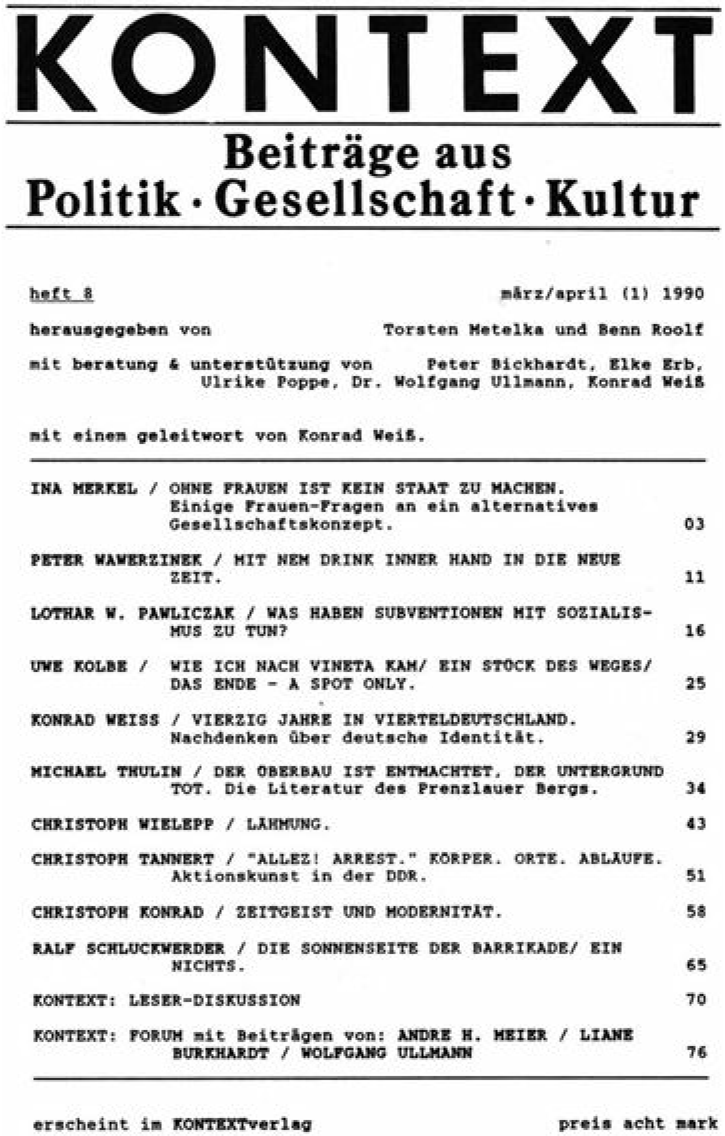
第三期计划刊登一篇格尔特·诺依曼的文章，诺依曼是莱比锡的艺术政治萨密兹达杂志《打击》的编者之一。《东十字》的主要目标是为东欧的反对派和知识分子之间创造联系。编者们最初将《东十字》定位为国际性杂志，杂志本应该逐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东欧文坛》本来在计划出版之列，遗憾的是，编者们在1989年这场影响了所有东欧国家的政治变革发生后，认为出版这本杂志已经没有了意义。法国杂志《国际文坛》的德国版本几年以后在此基础之上推出，但影响力明显小了很多，其德国编辑部的成员一部分来自于文学反对派。

《Kontext》

《Kontext》的编者为托斯滕·梅特尔卡（Tosten Metelka）和贝恩·鲁尔夫（Benn Roolf），编委会成员有彼得·比克哈特（Peter Bickhardt）、马丁·伯特格尔（Martin Böttger）、埃尔克·埃尔贝（Elke Erb）、沃尔夫冈·乌尔曼（Wolfgang Vllmann）和康拉德·万斯（Konrad Weiß）。1988年1月15日纪念德国共产党领袖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的抗议游行活动之后，众多参与游行的反对派人士被捕，外界认为，编者正是因为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而在1988年初出版了第一期《Kontext》，然而编者们本意并非如此。社会民主党和统一社会党1987年8月联合发表了一份名为“意识形态论战”的文件，很多反对派人士和艺术家认为这份文件代表了东西两德之间的一种误解，编者们想通过《Kontext》杂志来对此发表看法。当时杂志的部分内容已经完成，选择在大批人士遭到逮捕之时出版简直再好不过，这样从一开始该杂志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编者在第一期的前言中写道：“《Kontext》将通过多种形式映射社会现实［……］从政治文章到最新文学作品，杂志取材是很广泛的，以

此为各界人士和团体之间的必要对话提供新的思维模式。［……］ 因此《Kontext》也是在尝试以一种具体的形式促进对话。”《Kontext》自1989/1990年以来一直拥护公民维权组织“即刻民主”，努力推广自由与责任意识，1990年的一期前言中对此写道：“只有成年人才有责任意识［……］ 谁想拥有言论自由，就必须负有责任意识地从事写作、演说、出版作品。”[29] 像《radix-blätter》一样，新教教会的有关机构承担了《Kontext》的大量发行工作，甚至还可以通过教会的渠道订购《Kontext》，而政府方面始终在全面阻止传播这本杂志。最初杂志的副标题为“论政治、社会和文化”，后来编者因第二期杂志受到处罚[30] 之后，副标题中的“政治”被改为“教会”。通过蜡版印刷的形式，杂志印制出1000本，同时像其他很多杂志一样，订书钉装订遇到了技术上的限制。


KONTEXT

Beiträge aus Politik · Gesellschaft · Kultur

heft 8 märz/april (1) 1990

herausgegeben von Torsten Metelka und Benn Roolf

mit beratung & unterstützung von Peter Bickhardt, Elke Erb, Ulrike Poppe, Dr. Wolfgang Ullmann, Konrad Weiß

mit einem geleitwort von Konrad Weiß.

INA MERKEL / OHNE FRAUEN IST KEIN STAAT ZU MACHEN. Einige Frauen-Fragen an ein alternatives Gesellschaftskonzept. 03

PETER WAWERZINEK / MIT NEM DRINK INNER HAND IN DIE NEUE ZEIT. 11

LOTHAR W. PAWLICZAK / WAS HABEN SUBVENTIONEN MIT SOZIALISMUS ZU TUN? 16

UWE KOLBE / WIE ICH NACH VINETA KAM/ EIN STÜCK DES WEGES/ DAS ENDE - A SPOT ONLY. 25

KONRAD WEISS / VIERZIG JAHRE IN VIERTELDEUTSCHLAND. Nachdenken über deutsche Identität. 29

MICHAEL THULIN / DER ÜBERBAU IST ENTMACHTET, DER UNTERGRUND TOT. Die Literatur des Prenzlauer Bergs. 34

CHRISTOPH WIELEPP / LÄHMUNG. 43

CHRISTOPH TANNERT / "ALLEZ! ARREST." KÖRPER. ORTE. ABLÄUFE. Aktionskunst in der DDR. 51

CHRISTOPH KONRAD / ZEITGEIST UND MODERNITÄT. 58

RALF SCHLUCKWERDER / DIE SONNENSEITE DER BARRIKADE/ EIN NICHTS. 65

KONTEXT: LESER-DISKUSSION 70

KONTEXT: FORUM mit Beiträgen von: ANDRE H. MEIER / LIANE BURKHARDT / WOLFGANG ULLMANN 76

erscheint im KONTEXTverlag preis acht mark

图**4** 公民维权组织**“**即刻民主**”**的杂志（**1990**年**3**月）

直到1990年11月停刊，《Kontext》第一期包含的各类题材几年以来基本没有变化，其中有东德各邻国以及苏联的发展情况，存在于国家、反对派和教会的其他政治模式，生态问题，加快制造核武器的危害以及东西德当下的政治局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论波兰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界的几篇文章[31]和为抗议瓦茨拉夫·哈维尔1989年2月再次被捕而推出的一期特刊，其中刊登了格尔德·伯珀的一篇传记，还有论苏联改革开放的结果以及文化氛围的几篇报告。东德在苏联改革开放的意义这个

问题上出现了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些人认为，苏联政治模式下的改革在东德就像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东德一样成效甚微，而另一些人坚持认为东德也应该借鉴苏联的经验实行改革开放，因为在东欧集团国存在的特殊背景下，只有改革开放能够保证打破政治僵化的局面。总的来说对改革开放的意义持怀疑态度的居多，然而以西德新社会运动的经验为依托的各种政治模式却得到了支持。其中重要的作家除了编委会的成员还有马丁·伯特格尔（Martin Bötlger）、尤阿西姆·加尔斯特茨基（Joachim Garstecki）、托马斯·克莱因（Thomas Klein）、路德维希·梅尔霍恩、埃尔哈特·诺伯特（Erhart Neubert）、塞巴斯蒂安·普夫卢格拜尔（Sebastian Pflugbeil）、埃德尔伯特·里希特和理查德·施罗德（Richard Schröder）。

从一开始，各种讨论视觉艺术、电影以及现代音乐新发展的文章都谈到了政治话题。这些年来自文艺界的代表作家有斯蒂芬·多林（Stefan Döring）、库特·德拉维特（Kurt Drawert）、阿道夫·恩德勒、埃尔克·埃尔贝、杨·法克托尔、莱纳·弗吕格（Reiner Flügge）、埃伯哈德·黑夫纳（Eberhard Häfner）、约翰内斯·杨森、嘉布里尔·卡霍尔德、安德烈亚斯·科齐奥尔、弗兰克·兰岑德菲尔（Frank Lanzendörfer）、贝尔特·帕彭富斯、德特雷夫·奥皮茨（DetlefOpitz）和雷纳·切尔宁斯基（Rainer Schedlinski），他们的文章之前已经在各小型文艺类杂志上发表过，而通过《Kontext》杂志第一次达到了这么大的发行量。第1期到第7期每期发行1000册，第8期至第11期每期售出约12000册，第12期印制了6000册。

康拉德·万斯的论文《新旧危险：东德新一代法西斯分子》[32] 在东西德引起了轰动。随后，不仅各萨密兹达杂志和西德媒体，还有东德逐渐土崩瓦解的政治阶层也开展了一场大辩论，探讨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及可能带来的后果。东德几十年以来都将自己视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安室利处，这一形象在一夜之间出现了裂痕。

1989年后，《Kontext》没有成为“联盟90”的机关刊物，虽然杂志在人事上和在内容编排上似乎都有这一趋势。和所有东德近几年来创办的杂志一样，到了1991年，《Kontext》也停刊了。

1991年3月31日后，东德邮报销售总局失去了对东德所有杂志销售业务的垄断地位，这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个日期为东德杂志界画上了句号，尤其为80年代期间和1989年秋创立的杂志画上了句号。[33] Kontext出版社因为推出了一些研究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的著作，还有尤其因为出版了俄国哲学家帕维尔·弗洛连斯基（Pawel Florenski，1882～1937）的全部作品而受到了关注。

沃尔夫冈·乌尔曼1992年发表的文章《对民主的未来展望：乌托邦结束后的一份总结》就像是一份悼词，悼念他曾为杂志写作的三年时光。文章开篇第一句是这样说的：“启蒙运动不可放弃。”[34]

---

[1] Kowalczuk，Ilko-Sascha（Hg.）：*Freiheit und Öffentlichkeit. Politischer Samisdat in der DDR 1985～1989* . Berlin，2002.

[2] Wolfgang Emmerich是一个特例：*Kl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DDR* . Erw. Neuausgabe. Leipzig 1996。

[3] 比如由Uwe Warnke1983年以来编辑出版的《非此即彼》（柏林），或者由Maximilian Barck1989年以来编辑出版的《心脏病突发》（柏林），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Thomas Günther（柏林）以及德累斯顿奥博格拉本印刷所编辑出版的图文杂志。

[4] Michael，Klaus：*Samisdat-Literatur in der DDR und der Einfluß der Staatssicherheit* . In：Deutschland Archiv 11/1993，S.1255-1266.

[5] Hirt，Günter，Wonders，Sascha（Hg.）：*Präprintium. Moskauer Bücher aus dem Samizdat* . Bremen 1998，S.24f.

[6] Forschungsstelle Osteuropa：*Samizdat.Alternative Kultur in Zentral und Osteuropa*：*Der 60er bis 80er Jahre* . Bremen 2000.

[7] Henkel，Jens；Russ，Sabine：*DDR 1980～1989. Künstlerbücher und*

originalgrafische Zeitschriften im Eigenverlag . Bibliografie. Gifkendorf 1991.

[8] Kolbe，Uwe；Trolle，Lothar；Wagner，Bernd（Hg.）：*Mikado oder der Kaiser ist nackt. Selbstverlegte Literatur in der DDR* （以下简称：Mikado）. Darmstadt 1988。

[9] 这些杂志有：Schäkel，Ilona：*Sudelblatt und Edelfeder. Über den 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am Beispiel der offiziell und inoffiziell publizierten künstlerisch-literarischen Zeitschriften aus der DDR*（*1979～1989*）. Berlin 2003，S.276f. Michael，Klaus；Wohlfahrt，Thomas（Hg.）：*Vogel oder Käfig sein. Kunst und Literatur aus unabhängigen Zeitschriften der DDR 1979～1989* . Berlin 1992。

[10] Mack，Manfred：*Schreibmaschine und Kohlepapier. Die Eroberung des öffentlichen Raums* . In：Forschungsstelle Osteuropa（Hg.）：*Samizdat.Alternative Kultur in Zentral-und Osteuropa*：*Die sechziger bis achtziger Jahre* . Bremen 2000，S.111.

[11] Kolbe；Trolle；Wagner（Hg.）：*Mikado*，S.7.

[12] Kolbe；Trolle；Wagner（Hg.）：*Mikado*，S.9

[13] Kolbe；Trolle；Wagner（Hg.）：*Mikado*，S.10

[14] 参阅 Kolbe，Uwe：*Renegatentermine.30 Versuche*，*die eigene Erfahrung zu behaupten* . Frankfurt a.M.1998。

[15] 参阅 Gespräche von Egmont Hesse mit den an der Zeitschrift beteiligten Autoren。Hesse，Egmont（Hg.）：*Sprache und Antwort. Stimmen und Texte einer anderen Literatur aus der DDR* . Frankfurt a.M.1988.

[16] Koziol，Andreas；Schedlinski，Rainer（Hg.）：*Abriß der Ariadnefabrik* . Berlin 1990.

[17] “Ein Ausdruck von Freiheit”. Gespräch mit Asteris Kutulas. In：Berliner Hefte zur Geschichte des literarischen Lebens 4/2001，S.162-163.

[18] Lotz，Christian：*radix-blätter. Zur Geschichte eines Untergrund-Verlags in der DDR* . In：Deutschland Archiv 3/2000，S.424-432. Bindernagel，Franka；Lotz，Christian：*radix-blätter. Ein Untergrund-Verlag in der Berlin 1986～1989* . Begleitheft zur Ausstellung. Leipzig 1999.

[19] 参阅 Kowalczuk，Ilko-Sascha：*Freiheit und Öffentlichkeit. Politischer Samisdat in der DDR 1985～1989* . Berlin 2000，S.11。

[20] Asperger，Thomas（d.i.Jens Reich）：*Mittelosteuropa* . Berlin，Oktober 1988.

[21] “Wenn ich eine Rolle Spielte，dann die des Vermittlers”. Gespräch d.Verfassers mit Stephan Bickhardt vom 6.5.1994. In：Berliner Hefte zur Geschichte des literarischen Lebens 4/2001，S.225.

[22] Aufrisse.Absage an Praxis und Prinzip der Abgrenzung.1987.

[23] 参阅 Neubert，Erhardt：*Geschichte der Opposition in der DDR 1949-1989* . Berlin 1997，S.678f。参阅 Findeis，Hagen；Pollack，Detlef；Schilling，Manuel（Hg.）：*Entzauberung des Politischen. Was ist aus den politisch alternativen Gruppen der DDR geworden. Interviews mit ehemals führenden Vertretern* . Berlin 1994，S.154（Interview mit Ludwig Mehlhorn）und S.78f.（Interview mit Hans Jürgen Fischbeck）。

[24] Kolbe Uwe：*Abgrenzung. Fragmente aus einem ländlichen Exil*（nachgetragen der Publikation “Aufrisse”，Berlin 1987）. In：Aufrisse zwei. Über das Nein hinaus. Berlin 1988，S.68.

[25] Ullmann，Wolfgang：*Absage-theologisch，kirchengeschichtlich，politisch* . Drei Antworten auf drei Fragen. In：Aufrisse.Absage an Praxis und Prinzip der Abgrenzung. Berlin 1987，S.14-15.

[26] Hirsch，Ralf；Kopelew，Lew（Hg.）：*Grenzfall. Vollständiger Nachdruck aller in der DDR erschienen Ausgaben（1986/1987）. Erstes unabhängiges Periodikum* . Berlin 1989.

[27] Dienstbier，Jiri：*Was bleibt übrig*？In：*Ostkreuz* . Januar 1989，S.9.

[28] Dienstbier，Jiri：*Was bleibt übrig*？In：*Ostkreuz* . Januar 1989，S.9.

[29] Weiß，Konrad：*Geleitwort* . In：*Kontext* 8，März 1990.

[30] Forck主教承担了因第二期杂志受到的两次罚款。

[31] Mehlhorn，Ludwig：*Leben im Warteraum. Stimmen zur Emigrationswelle in Polen* . In：*Kontext* 5，März 1989. Szaruga，Leszek：Stimmen，ihrer Zeit voraus. In：*Kontext* 11，September 1990，oder Krzeminski，Adam：Ungleiche Nachbarschaft. In：*Kontext* 12，November 1990.

[32] *Kontext* 5，März 1989，S.3-12.

[33] 其中停刊的有《Die Andere》、《Constructiv》、《Kontext》、《Sondeur》、《Ypsilon》和《Die Zaunreiterin》。

[34] Ullmann，Wolfgang：*Zukunftshorizonte der Demokratie*，*eine Bestandsaufnahme nach dem Ende der Utopien* . Manuskriptdruck Kontextverlag Berlin 1992，S.2.

一书难求

卡尔·麦——秘密读物与极端事件

克里斯蒂安·黑尔曼（Christian Heermann）

1962年10月15号，德国萨克森州靠近捷克边境埃尔茨山一带的茨沃尼茨，一位42岁的男人坐在他的手提式打字机“Erika”前，开始了一部作品的创作，一直到1979年——17年的时间。“第一章。‘四只眼睛的父亲’”，他敲着键盘：“‘Hai’ es sala-rief der fromme Schech el dschemali，der Anführer der Karawane-‘auf zum Gebet！’”用了132天，到1963年2月24日才实现了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共打出了333页，（也就是）原书的632页，相当于每天4.8页，这是个可观的成绩，他周一到周六每天满负荷工作，只有周日能稍微放松一下。他的名字叫海因茨·蒂姆勒（Heinz Thümmler，1920～1986），是一名普通职员，他用打字机抄下来的几部作品复本封面写着《卡尔·麦作品集》/《41册》/《奴隶商队》/《苏丹的故事》。

蒂姆勒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被卡尔·麦的魅力所吸引。1939年蒂姆勒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后来又加入国防军，当时卡尔·麦的经典作品集《绿色文集》65册中他收藏了33册。蒂姆勒在二战期间结婚，不再住在开姆尼茨，搬家时把卡尔·麦的书一起带到了埃尔茨山下，所以这些为数不多的收藏在轰炸中幸免于难。通过私人关系他还弄到两三册，所有的都在这了。对于“人民书店”和“人民图书馆”来说卡尔·麦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读卡尔·麦曾经给蒂姆勒带来了欢乐，为让两个儿子同样享受到这种乐趣，决定用他的“Erika”打字机把没有收藏到的作品打出来。到

1979年12月——2788个“打字日”——他完成了21册，原书总共11933页，用打字机打出的总页数为6157页，《温内图1—3》三册集不包含在内，因为他自然已经收藏了这部作品的原版，另外还包括《银狮的帝国》四册集、《温内图之死》《安静的海洋》《地球上的和平》《老德绍人》及其他12册作品。《撒旦与伊斯加略》只抄写了第一部，后两部他已经收藏了“绿色装潢”的原版。然后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蒂姆勒把卡尔·麦出版社二战前的版本封面画临摹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硬质文件夹装订好。

为了弄到原书的样式，他们下了点儿工夫，同事朋友都来帮忙，两个儿子有时还根据书名去一一找书，每找到一本蒂姆勒给他们50马克奖励。

1964年11月根据统一社会党的政策，东德首批退休人员可以到访西德，此后以“紧急家庭事务”为由也可获得批准，接着上百万西德人相继来到东德。如果有人从西德带来无论是小礼物还是大礼物，东德卡尔·麦的粉丝们一直都期待着从东德搬到西德班贝克的卡尔·麦出版社出版的《绿色文集》系列。蒂姆勒也通过这种方式将他的收藏扩充到73册，包括已经有的21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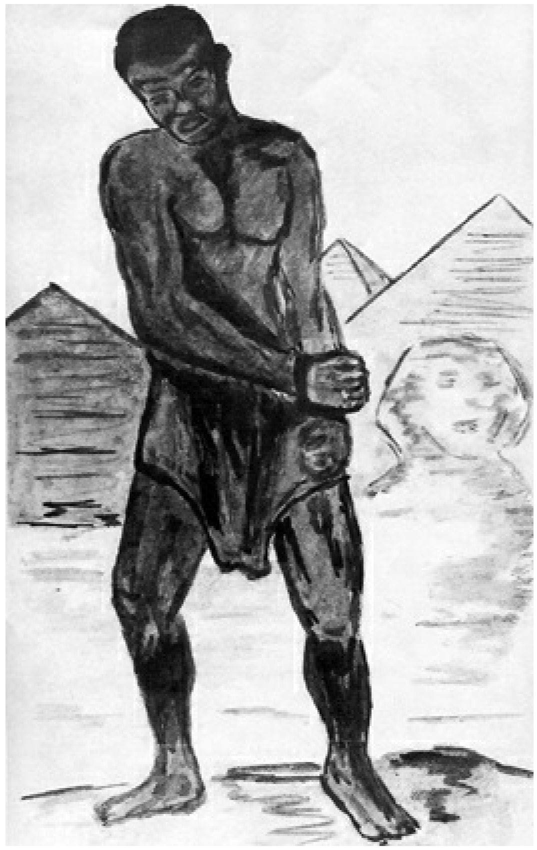


图**1** 蒂姆勒自己为《奴隶商队》打字稿的封面画的图画



海因茨·蒂姆勒多年以来用打字机复写卡尔·麦的作品

从西德带卡尔·麦的作品到东德始终是有风险的，海关关员的眼睛发现的东西基本都要没收，所以必须偷着运送。即使1983年1月后东德开始自己出版发行了一些卡尔·麦的作品，情况也没有很大改观。

海因茨·蒂姆勒1986年去世。1993年6月萨克森州霍恩施泰因—恩斯特塔尔的卡尔·麦之屋买下了他收藏的卡尔·麦作品，卡尔·麦之屋负责人1995年在一份报告中也讲到了蒂姆勒为收藏作品所付出的种种辛苦。[1] 一种体制自认为能够对他的公民施以规定哪些书可以读，哪些不可以，蒂姆勒打出的21册复本无声地见证了这种最终走向失败的体制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卡尔·麦如何被迫成为秘密读物

“不足为奇，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偷着看费森菲尔德出版社的卡尔·麦的小说，10点的休息时间也牺牲了，从学校到家的路上也走得特别快，因为回家可以继续看书。但为了让家长相信我们是痴迷于教科书，必须用《Putzger历史地图集》的封面做掩饰。”埃贡·埃尔温·基施（Egon Erwin Kisch，1885～1945）1920年时曾对自己的“美好少年生活”这样回忆道：“我们都读卡尔·麦。”[2] 或许一套全新的哈利波特系列能在人年少时激起这种读书热情。在被窝里偷着读书可能早就已经过时了。因为很难将卡尔·麦的冒险小说归为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主流作品，所以在卡尔·麦时期，始终有人对其作品持以傲慢、不屑一顾，甚至更为恶劣的态度，例如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1929年3月31日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支持卡尔·麦的言论：“卡尔·麦是德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如果他不是个贫穷迷惘的无产者，也许他就是最好的小说家［……］”[3] 这时有人站出来说话了，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的名字就意味着对卡尔·麦的阴险攻击——威廉·弗罗内曼（Wilhelm Fronemann），一名教师，偶尔写一些时事评论。1929年5月12日弗罗内曼就在《柯尼斯堡日报》上放言称卡尔·麦的作品“无精神追求，思想低下”，并且言语攻击“德国思想界”支持卡尔·麦的人士，将他们形容为“愚蠢迟钝、思想肤浅幼稚”，言词尖酸刻薄。

1933年起弗罗内曼开始从政治层面强烈反对阅读卡尔·麦的作品，他带着至少十篇“呈文”找到了相关纳粹人士或机构，如1938年7月20日向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以亲党式的口吻阿谀逢迎地写道：“卡尔·麦试图通过讥讽种族观念、言语攻击种族扩张尤其是攻击殖民帝国主义来塑造自己的圆满形象，我使出了所有方法来与他这种和平主义模范作斗争，并且讥讽他、嘲笑他［……］”接着提出一些毫无意义的论断，认为卡尔·麦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下面这些观点虽然是弗罗内曼故意诽谤卡尔·麦而提出的，但却言之有理，非常贴切：“卡尔·麦的世界观和他的全部作品都具有极端的和平主义色彩［……］作品中的主人公始终都发挥着为世界公正与和平而努力的律

师角色，没有以真正的斗争理念去斗争，而以最恶毒的方式攻击帝国主义、暴力政治、权力国家和殖民帝国主义等，如果向我们的青少年推荐这类作品，还怎么培养起他们的殖民思想呢？与卡尔·麦的和平主义相伴随的是一场反对民族与种族价值观的阴险斗争，德国青少年还有思想单纯的读者如果受之影响变得风气败坏，就更令人担忧［……］卡尔·麦是种族思想的反对者［……］。”

弗罗内曼的最高目标是全面禁止卡尔·麦，或者“至少”“清除”卡尔·麦“极端和平主义”的作品。他在1934年2月22日给巴伐利亚州文化部长及纳粹教师联盟主席汉斯·舍姆（Hans Schemm）的信中写道：“我们不是从中小学图书馆中清除出了犹太人、和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其他所有非德国精神的书籍吗？我觉得卡尔·麦的作品最终也会横扫德国青年文学，就是个时间的问题。”但是他写错了人，舍姆部长从小就是卡尔·麦的忠实读者。其他一些纳粹大人物同样如此，可能还包括希特勒自己。弗罗内曼无论如何都没有达成他的目标。只有和平主义小说《阿尔德斯坦与金尼斯坦》没有继续出版。对此是否弗罗内曼的建议起到了作用，我们不得而知。

1933年起，纳粹德国开始将其政治理念付诸实践，弗罗内曼受到了肯定。到了1945年法西斯分子很快转变为反法西斯主义者，1946年3月弗罗内曼又写了一份新“呈文”，这次是写给苏占区的萨克森州管理处。二战时期弗罗内曼对卡尔·麦的温和品性和极端和平主义持反对态度，现在这样写道：“纳粹党卫队的种种行径足以体现出他们的卡尔·麦思想理念，他们的师傅和英雄卡尔·麦一样值得尊敬。”因此弗罗内曼要求卡尔·麦和“他的全部作品必须都要列入国家级禁令”，对这位“无精神追求、思想低下的英雄人物”应该进行“思想道德上的去纳粹化。”[4] 苏占区的教师报《新学校》将弗罗内曼介绍为“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弗罗内曼在《新学校》上向苏占区的新教师们讲道：“纳粹主义通过卡尔·麦塑造出了一个裹在英雄光环下的文学傀儡［……］在反法西斯时期应尽

可能与之保持距离。”他还指出卡尔·麦是一位“危险的罪犯”，“卡尔·麦经常在作品中精心刻画了各种苦痛折磨，很可惜从战争的结果来看，纳粹党卫队的酷刑手段的确受到了他的影响。”从此以后，弗罗内曼的这些尖刻言论便出现在了各种涉及卡尔·麦的官方公告中。

战后的几年中，苏占区有过多次关于卡尔·麦的“讨论活动”。根据德国共产政治家乌布里希（Ulbricht）的名言“必须要有民主的样子，但我们也必须将一切掌握在手”[5]，在处理卡尔·麦的事情上也要体现出“人民的意愿”。1947年8月6日在萨克森州拉德博伊尔的“Heiterer Blick”酒店大厅举办的一场题为“支持还是反对卡尔·麦”的讨论之夜引起了很大轰动。讨论会上来了1000～1200名听众，大家很关心组织方自由德国青年团文化联盟和青年学校是如何排挤卡尔·麦的。反对方即将献上的是弗罗内曼式的恶毒诽谤。一位德累斯顿市议员伦奇（Rentzsch）讲到自己“纳粹时期的个人经历”，认为“纳粹党卫队从卡尔·麦的作品中总结出了用来指导他们犯罪的行动指南”。[6]德累斯顿电台台长E.莫特纳（E.Mauthner）希望从卡尔·麦的作品中找出“最极端的残酷暴行”，正是这些残酷暴行令他“成为每个纳粹党人最喜欢的作家”，“激发纳粹党卫队在集中营里为非作歹”。[7]

1947年8月12日的柏林《明镜日报》这样写道：“来自德累斯顿的特林克斯（Trinks）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甚至将卡尔·麦称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思想之父之一。”还有一些其他报纸也在对此次讨论会的报道中提及这些骇人听闻的言论。统一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新德国》对诽谤卡尔·麦的言论驳斥道：“很多人和事都对两次世界大战负有责任，但卡尔·麦和他创作的故事绝对没有。”[8]

参与创建了位于拉德博伊尔的卡尔·麦博物馆并长年担任管理员的莱比锡教会总监察员帕蒂·弗兰克（Patty Frank），与其他卡尔·麦支持者在会上都收到了很多赞同的声音。一位来自耶拿的支持卡尔·麦的教

授海因茨·斯托尔特（Heinz Stolte）用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讲过的话结束了他的辩论词，并将讨论会推向了高潮，最后被一群欢呼雀跃的年轻人从演讲台托起退场。几十年后他还回忆道："在这场支持与反对的论战中，卡尔·麦以绝对优势获胜。"[9]

这场讨论之夜是一场胜利，但并没有为苏占区的卡尔·麦支持者带来转折。谁支持卡尔·麦，就要随时小心了，因为可能很快就要被淹没在纳粹党与世界大战罪责的"论辩"之中。特林克斯教授也依然没有停止对卡尔·麦的攻击，几个月之后在《大众图书管理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低俗文学斗争法》的文章。[10] 他在文章中虽然不再就两次世界大战明确指责卡尔·麦，但开始抛出了如下论断："［……］'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将卡尔·麦用作反抗俄国游击队的斗争手段。"特林克斯认为，反对卡尔·麦的"斗争"是出于"文化政治和教育的需要"，此外还提到"禁书的诱惑"、"过多的［……］警告"还有各种阴谋诡计，并让年轻的读者们远离他所说的"低俗文学"。"还有一些很好的探险小说可以压倒库柏（Cooper），压倒卡尔·麦［……］"，看来库柏探险小说在他看来也是低俗文学！"谁愿意的话，就应该继续读［……］《温内图》［……］"，特林克斯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悲观。因为反正秘密阅读是不违法的。但是："当然教育领域还是不允许存在这样的低俗刊物。"

另外还有一件趣事作为题外话值得一提。"没有人愿意"，特林克斯写道，"在一本文选或者一本教科书里刊登哪怕一行卡尔·麦的作品［……］"。这就错了，看看一些文选和教科书就知道，目前（自2001年起）慕尼黑巴伐利亚教科书出版社供文理中学8年级使用的教科书《Projekt Lesen A8》就有卡尔·麦的文章《老铁手骑得飞快》，还有一段摘自我的第一本卡尔·麦传记《曾经的老铁手》，书中还有给学生布置的几项作业，比如："了解一下作者卡尔·麦。做一份关于他的生平及作品的报告。演示介绍他的小说。"[11] 斯图加特有名的恩斯特·克莱特

（Ernst Klett）出版社2007年8月出的两本新书就以卡尔·麦为例讲述“名人轶事”，又引用到我的卡尔·麦传记里的文章，接下来又以弗朗茨·卡夫卡的一篇文章为例讲到“寓言”这种文学体裁，真是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12]



图**2** 自由德国青年团**1946**年为卡尔·麦之夜出的海报

没有禁止令—没有通行证

二战过后直到1982年底，卡尔·麦在东德遭遇了没落的命运。他的作品不予出版，并且在无数公共图书馆中下架，对此有关当局除了重复以往的观点还添加了新的论据：卡尔·麦具有宗教感情色彩和国家主义色彩，他的作品并不现实，就好像要求童话作品中体现现实主义。卡尔·麦还传递了一种“错误的历史观”，老铁手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接下来还有更荒唐的事情：1956年11月30日东德文化部的一次会议上，俄国和苏联文学学者娜达莎·路德维希（Nadeshda Ludwig）讲道，卡尔·麦的小说是人民民主国家“近期大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引发了波兰的工

人骚乱和被苏联军队血腥镇压的匈牙利人民起义！这个说法在一位东德报纸的编辑看来都很过激。1956年12月13日的《东德最新消息》对此称“这种言论太冒进了［……］粗俗性无人能及”。这句话的作者任该报纸在哈雷的驻站编辑，后来因此丢了工作。

我们看到了各种歪曲事实耸人听闻的论断，然而，当局对于反卡尔·麦的真正原因却只字未提：

> ——卡尔·麦作品中的主人公生活在没有当权者存在的环境，或者当权者的权力非常软弱，主人公便闯入了无边无际的自由世界。此类形象不可以作为社会主义人民效仿的榜样。
>
> ——东德对卡尔·麦的决定还是在没有电视的时代做出的，当时读书在业余生活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卡尔·麦的小说能够抓住一个人的全部，把人诱拐到白日梦的世界，并抵抗住像红色宣传这样的外界影响。渐渐卡尔·麦的主人公就失去了红极一时的偶像地位。到了80年代初期，由于东西德电视节目的影响，遭遇没落的卡尔·麦又重新得到了关注。
>
> ——东德想拥有自己的冒险小说，卡尔·麦则是强劲的竞争对手。尽管其作品遭禁长达几十年之久，然而想用一部社会主义巨著战胜卡尔·麦的计划还是没有实现。

在这38年里，卡尔·麦在东德既没有被下达禁止令，但也没有拿到一张通行证，而是处于灰色地带，这是典型的专制特征，同时卡尔·麦也永远不会被人遗忘。为了避免引起麻烦，读者们私下里偷着读起他的作品。在官方保持沉默期间，总有人来打破沉默的气氛，除了举办各种讨论会还有读者在报刊上发表询问之外，还有其他多种方式，比如《杂志》从1954年第一期开始一整年刊登了22册连环画系列暗指卡尔·麦作品中的主人公：总在做广告的“瓦普塔”（Waputa）酋长和他的白人兄弟“老铁脚”。连环画中有很多对西德尖刻的讽刺内容，还蕴涵着对东德局势的轻度批判，再加上卡尔·麦的关系，最终根据读者反馈，这部连环画系列停载了。主编海因茨·H.施密特（Heinz H.Schmidt）得重新找一份事情做了。



图**3 70**年代刊登在报纸上交换或出售卡尔·麦作品的广告

《马赛克》是东德1955年来唯一的一本画册，其内容从不直接借用卡尔·麦笔下的人物名称，但很多都和卡尔·麦的童话世界有关。托马斯·克莱默（Thomas Kramer）在很多出版物中都介绍了《马赛克》中和卡尔·麦有关的内容及其他内容，其中包括他用于取得大学执教资格的论文和由此出版的一本著作。[13] 其中有一章节特别讲到卡尔·麦的作品在东德探险文学中的“秘密”接受情况，比如波兰作家维斯瓦夫·维尼克（WiesławWernic）和德国作家瓦尔特·皮舍尔（Walter Püschel）和维尔纳·雷格利（Werner Legère）的小说。[14] 名声已被埋没的卡尔·麦有时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又出现了：1970年，萨克森-安哈特州的迪斯考国营农场出了一种用于栽培球盖菇的培养基，名字就叫做“温内图”。东德各家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有时用“温内图从温床中疯长”或者“温内图和奥斯特从大树中疯长”这样的题目作大字标题。

到了1973/1974年，如果来自莱比锡的名为“温内图”的纯种雄马在赛马场上赢得了第一名，接着又会出现类似“认真考虑温内图”或者“如果温内图赢了”这样的大字标题。并非所有的报纸，但是东德基民盟和自

民党出的报纸还有70年代起《周报》上的寻物广告或者以物换物广告中就经常出现卡尔·麦的名字，比如1974年7月2日魏玛的《图林根州报》上就刊登了这样一条广告："出售卡尔·麦的51本小说还有4本年刊等，求一辆Trabant 601。"

卡尔·麦的小说成了强有力的替代货币，买一辆轿车需要等10～12年的时间，再后来需要等14年，有了卡尔·麦的小说就可以尽快购车，还可以用来买到其他社会主义贫乏的经济下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的东西，比如一套假发。大多数提到卡尔·麦的广告都使用代码和暗号，秘密读者们不想透露自己的姓名，不愿受到贬低和嘲笑。在几十年以前东德早期，出这样的风头会非常危险。

从以下四个各不相同但又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可以看出，卡尔·麦的小说作为秘密读物如何引发了各种不可思议的极端事件。

监禁

1950年7月7日国民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所有图书馆设立少儿部的规定"。但在"设立"少儿部之前要先对图书进行"筛选"，"所有内容劣质的图书、虚假庸俗的游记或者英雄主义传记"一律不得上架［其中包括作家埃尔泽·乌里（Else Ury）、冯·费尔森内克（v.Felseneck）和欧叶妮·马利特（Eugenie Marlitt）的所有多愁善感的少女小说，还有所有卡尔·麦式的侦探类、西部牛仔类低俗图书］。这项规定为统治者的专制独裁铺平了道路。相关部门组织成立了"审查委员会"，此外，"自由德国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和自由工会联合会各出一名代表"协助各图书馆馆长的工作。[15] 将马利特的作品视为"少女小说"，这种规定无疑显示出当局有关人士胸无点墨。

国民教育部部长保罗·万德尔（Paul Wandel）将乌里的名字列为四大文学反派之首，直到两德统一以后才恢复名誉。埃尔泽·乌里，1877

年生，儿童文学家，她的《最小的孩子》系列作品给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带来了欢乐无穷的读书时光，当然，这位著名的儿童作家对自己的名誉遭到诽谤已无从知晓。

乌里的苦难命运从1935年开始，由于是犹太人出身，她被禁止写作出书，作品也首先从各图书馆下架。1938年起乌里被迫使用Sara作为名字表示其犹太人身份，1941年起必须佩戴犹太人标志大卫王之星，1943年1月12日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代号为“Nr.638-Welle XL”，一天后被送进了毒气室。

至于卡尔·麦，国民教育部颁布的规定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位于萨克森州韦尔道的洪堡高级中学图书馆也牵涉了进来。三名中学生卡尔-海因茨·埃卡特（Karl-Heinz Eckardt）、西奥博尔德·克尔纳（Theobald Körner）和齐格弗里德·米勒（Siegfried Müller）不顾规定在先，组建了“卡尔·麦爱好者团体”，互相偷着传阅他们最喜爱的这位作家的作品，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直到一名学生的父亲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并在集中营里去世，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政治讨论。除了卡尔·麦的作品，乔治·奥威尔的《1984》也在他们中间流传。学校校长偏激地谈到共产主义反抗，说学生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到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

对高中生赫尔曼·约瑟夫·弗拉德（Hermann Joseph Flade）的死刑审判带来了最终的转折；弗拉德来自德国捷克边境的奥尔贝尔恩豪，当时18岁的弗拉德印制了很多反对1950年10月15日全民选举的传单，遇到警察检查时出于慌乱拿出了一把随身携带的小折刀。法官对他的死刑判决理由为“挑拨煽动”和“试图谋杀”，接着引发了一系列抗议活动，韦尔道的高中生们要求“还弗拉德自由”，并将这句话写在了各处房屋外墙上，还写进了各种传单里。“卡尔·麦爱好者团体”最终变成了一个反抗团体，战斗者数量由3个增加到至少19个。韦尔道几个月处于紧张状态，

传单到处散布，统一社会党的宣传活动被多次投放臭鼬炸弹，夜间大家一旦听到电话铃响，就打开收听美占区广播电台的消息。1951年5月这些学生被逮捕，有几个逃到了西德，在1951年10月3日、4日的审判上法官做出了严厉判决：17岁的学生尤阿西姆·格布勒（Joachim Gäbler）判处15年监禁，16岁的学生卡尔-海因茨·埃卡特判处14年。19名被告判处年数加起来共130年。出人意料的是，卡尔·麦作为事情的起源，审判中却只字未提，因此重心就更多地转移到了赫尔曼·约瑟夫·弗拉德的身上。对弗拉德的判决使韦尔道的学生从文学战场转移到政治战场，从秘密借书读书变为积极投身行动。

这些学生在第一时间积极勇敢的行动肯定也为“赦免”弗拉德起到了帮助，弗拉德由死刑改判为15年监禁；其中10年必须在声名恶劣的包岑监狱服刑，然后再关押到其他地方。赫尔曼·约瑟夫·弗拉德是我的校友，比我高三个年级，1951年1月10日，在一场我们中学生必须参与的公审上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地点是在奥尔贝尔恩豪广场。刑满释放几天后弗拉德就去了西德。他在自传《德国人反抗德国人》中讲述了自己最悲惨的遭遇，[16] 其中还提到卡尔·麦笔下的温内图，但这只是包岑监狱充当看守助手的囚犯。由于多年监禁给身体带来了严重伤害，弗拉德于1980年去世。

过失

东德文化部1956年11月30日召开的大会在没完没了地继续，会上娜达莎·路德维希指责卡尔·麦为导致匈牙利人民起义的“原因之一”，大会领导彼得·内尔（Peter Nell，又名Kurt Heinze，1907～1957）已经病入膏肓，想要结束这场无休止的讨论，然后做出了一项精明的决定，不再禁止卡尔·麦，所以出版与否在于各出版社，如果有人想将卡尔·麦“有责任感地纳入出版计划”，请吧，这也是应该的。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没有出版社敢再出版卡尔·麦的作品。这是个错误的认识，德苏友谊协会“文化与进步”出版社要求大会领导内尔信守诺言，并决定出版卡尔·

麦的作品。1958年1月卡尔·麦的小册子系列作品“小青年系列”“获德累斯顿附近的拉德博伊尔的卡尔·麦出版社友情许可”出版了《亚布拉哈姆·马穆尔的暴力之下》，64页，售价35芬尼，印数高达20万册；其中包含《穿越沙漠》中的两章。卡尔·麦的粉丝们欣喜不已，荒谬的禁令和秘密阅读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一份广告宣传单上这样写道：“战斗结束了，我们终翻身！暂时只有小开本，却是真的卡尔·麦！”一位莱比锡书商汉斯·库尔策（Hans Kurze）把这张广告摆在了他位于卡尔—海涅大街的书店橱窗。但种种希望很快就在莱比锡《德国书业交易报》的粗鲁攻击中化为泡影。

1958年第一期《交易报》“预告栏”里题为“不是玩笑”的宣传广告就先遭到嘲笑，接着第四期刊登了库尔策书店橱窗的照片，上面标题为《必须这样来》，下面是扭曲事实的恐吓文字：引入“小青年系列”是为了对抗西德热门侦探小说和漫画这些价值不菲的东西。现在这一系列出版了一本书，内容和图饰实际上和某些低俗书刊不相上下。这里所谓的低俗图饰就是由四幅尤里乌斯·荣汉斯（Julius Junghans）画的素描画组成，画着卡尔·麦笔下的主人公卡拉·本·纳姆西（Kara Ben Nemsi）和哈德奇·哈雷夫·奥玛（Hadschi Halef Omar）被带进了亚布拉哈姆·马穆尔（Abrahim Mamur）的房子。“卡尔·麦这一章”，《交易报》继续强调，“很多年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已经终结了”。

大家“永远不要期待有出版社会真的考虑再次出版卡尔·麦的作品［……］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现在来看，接下来出现的后果不足为奇［……］”。就是说书商汉斯·库尔策书店的橱窗，他的举动会让人“期待更多的作品”。但“没有什么是比再次公开讨论卡尔·麦的问题更错误的事情了，战斗真的结束了，书商库尔策的预想并没有实现。”

“和库尔策持类似观点的一些零售书商本以为文化与进步出版社会继续出版‘探险小说’，他们的幻想要破灭了。这家致力于德苏友谊的出

版社以其有约束力的名称其实肩负着其他任务。”出版社被要求“对其过失表态”，社长海因茨·密斯里茨（Heinz Mißlitz）在第7期报纸上遵照要求对事件作了表态。“各现代作家的作品中”，他写道，“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通常花费很多时间编辑后，才有利用价值”。所以我们也考虑过探险小说的其他“经典作家”像伦敦（London）、史蒂芬逊（Steveson）、格斯泰克（Gerstäcker）、希尔斯菲尔德（Sealsfield）和姆格（Mügge），同样也考察了卡尔·麦的作品，然而发现“能够利用的东西很少”，最终我们从60部作品中“选取了60页，这60页也是编辑之后才出版的。所以我们没有打算继续出版该作者的作品，我们丝毫没有兴趣对卡尔·麦投入特别关注，或者激起新一轮讨论，《交易报》以惊人的、大家长的形式成功了”。《交易报》以“作答”为题表示：“大家长式”的审判官自认为有权决定作为成年公民哪些书可以读，哪些不可以，出版社对其“过失”的表态显然丝毫没有令审判官满意。

海因茨·密斯里茨自己也对这件事很不满意，他最初绝对是打算“继续出版该作者的作品”。密斯里茨计划1958年上半年从《穿越沙漠》中选取两册出版，书名为《法老之海》，下半年出版两篇短篇小说，书名为《说话的皮革》，但这些计划很快便如石沉大海。

党支部的无党派人士

“噢，美好的萨克森撒谎大王，你那屡次遭到谩骂的大名值得一赞！”作家赫尔曼·康德（Hermann Kant）在它的长篇小说《大礼堂》中开始了对卡尔·麦的称赞：“你夸夸其谈，魅力四射；你相机行事，无人能及。”1965年7月《论坛》周报预先刊登了这些内容，[17] 相应的图书同年也相继出版。

当年8月，某所大学的全体教授在广播和电视中展开有关卡尔·麦的辩论，当时节目很流行；《德累斯顿区域快报》开展了长达一周的读者讨论。除此之外，卡尔·麦的粉丝也希望在他们最喜爱的作者身上出现

转机。曼弗雷德·海克（Manfred Hecker）同样如此，他是萨克森州比格施塔特国民教育、文化与体育部主任，自1947年起同时为报纸撰写文章，为家乡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作为一位无党派人士和文化爱好者，1963年海克得到了政府部门的一个职位，从此以后有7所学校和4个体育场在他的管理之下，他也得到了各界好评。学生们很喜欢这位年轻的部门领导，和统一社会党那些官僚作风的党政干部相反，海克甚至能脱稿演讲，但这一点也让其他同志感到不快。

海克的一项工作任务是编辑《比格施塔特月刊》（副标题为："精神文化与体育信息"）。他错误地以为那一年卡尔·麦备受推崇，便表明自己是卡尔·麦的读者，在12月份的期刊上写了有关他的文章，引发了"支持还是反对卡尔·麦"的小型讨论，并得到了市里和乡镇统一社会党领导的许可，不经他们同意没有什么事情行得通。

1965年12月15至18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11届全体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留下了不太好的名声，当局在会后开始了文化领域的大清扫。12部德国电影股份公司的电影遭到禁止，所有文化涉及的领域都被纳入狭隘严格的社会主义整顿范畴。在大清除行动中，比格施塔特这样的小城也要有人"丢乌纱帽"。同一批党员干部，对1966年1月的《月刊》还予以批准，现在又禁止印制。因为曼弗雷德·海克不服政策，甚至到党支部书记那投诉，可想而知，各种令人不悦的"座谈会"随之而来——在"党支部无党派人士团体"（这个组织是真实存在的！）面前，在当时卡尔-马克思城（今天的开姆尼茨）的文化联盟，在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地区下属机构，等等。一切都来了个180度大转变，海克的工作以往都是得到大家的积极评价，现在各位同志发现海克的工作"始终存在缺陷"，当然还有"思想浑浊"的问题，甚至海克"私自和文化机构建立联系"也属于犯罪行为！

因为卡尔·麦，5月31日海克失去了部门主任的工作，被比格施塔特

市政厅解雇。但灵魂的折磨没有削减我这位朋友对卡尔·麦的热爱，卡尔·麦出生地纪念馆卡尔·麦之屋刚刚在萨克森州霍恩施泰因—恩斯特塔尔建成，他就来纪念馆的学术委员会开始工作了。

文书军官

在两德统一大转折到来的前几年，东德出现了卡尔·麦转折，确切地说是1982年12月25日14点15分，东德电视开始播放纪录片“我埋葬了温内图：卡尔·麦——他的人生历程”。卡尔·麦可以告别没落的命运而重新复出，外界的思想压制没有得逞。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过去这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新生英雄偶像早就通过电视在东西德得以传播，代替了卡尔·麦笔下主人公的榜样形象。1981年11月10日和17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在最高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有关“新生活出版社出版卡尔·麦部分作品”的事宜，甚至还议论到图书装订采用的面糊种类这样的细节问题，总的来说为卡尔·麦开了一盏微亮的绿灯。从1982年圣诞节第一天起，每到节日东德电视台都在放映西德的卡尔·麦电影。

首先“致死一跃”这样的冒险精神遭到了众人的嘲笑。马列主义已深入人们的思想意识，甚至有人称卡尔·麦也可以被“集中用来深化社会主义本土意识”。但不久后所有防线就已坍塌崩裂，卡尔·麦的时代踪迹随处可见。

一些流行作品像《温内图》和六连册《小野蔷薇》精装再版出版了，我的卡尔·麦传记《曾经的老铁手》也得以出版；一些报纸也推出有关卡尔·麦的系列文章和大量漫画；柏林、德绍和德累斯顿的剧院，萨克森州的拉腾和永斯多夫的露天剧场，还有些地方就在岩石路面上放映起卡尔·麦的戏剧；德累斯顿人民高校开设了一门卡尔·麦课程；柏林一名偷书贼因为偷了卡尔·麦的书，判处“三年劳动教养”；科特布斯一名女服务员克劳蒂娅·贝克尔（Claudia Becker）用“卡尔·麦宴席”通过了专业资格考试；德累斯顿一名面点师马蒂亚斯·米勒（Matthias Müller）

用他“无可忘却的卡尔·麦”蛋糕考取了满师证书。

所有一切都很美妙，但卡尔·麦的粉丝们最希望的是读到卡尔·麦的作品。在东德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出书的进展也十分缓慢，从1983年到1989年，7年内出了11本书，平均每年刚好一本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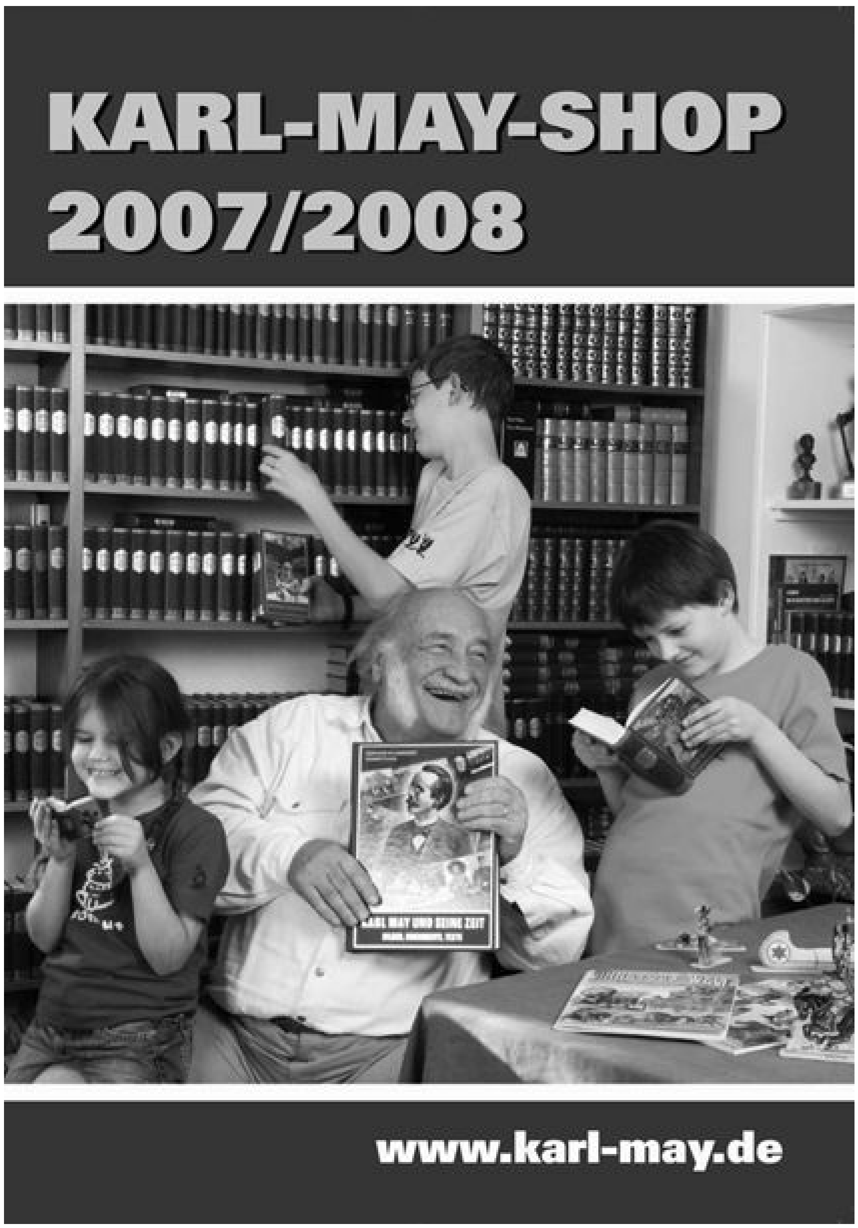


图**4** 班贝克卡尔·麦出版社如今的广告：作家卡尔**-**海因茨·艾克哈特（**Karl-Heinz Eckhardt**）和小读者们

但卡尔·麦出版社位于西德的班贝克，装有“绿色文集”的包裹始终都被“海关当局”退回甚至没收。但东德开始出版这位来自东德萨克森州故事家的作品后，就连在他的家乡也只能通过从西德寄来的“礼包”收到他的书然后光明正大的翻看吗？来自萨克森州霍耶斯韦达的赫尔穆特·里德尔（Helmut Riedel）想要知道个究竟，便询问邮政海关是否允许从西德私人寄送卡尔·麦的作品到东德，等了四个星期后，1983年2月18日他收到了文书军官简德罗塞克（Jendrossek）的一封信：

> 对于您的问题是这样的，根据海关法第20条实施细则，符合1973年6月21日颁布的进口许可条件的图书，可以进口到东德。然而，只有在东德海关根据这项法律规定进行货检时才能检查相关图书，所以即使事先知道书名和作者也不能预先给出答复。另外，东德邮政局可以针对本信所提到的进口规定提供相关信息。

“文书军官”的这些废话要读上两遍才能彻底领会到什么是专横跋扈。赫尔穆特·里德尔先生对这一回答并不满意，试图到霍耶斯韦达的邮政总局继续了解情况。第一次没有成功，负责“问询与检查”事务的女同事1983年3月8日那天不在，一个星期以后接待了里德尔。由于这位女士也解释不了最后一段的意思，里德尔先生请她给“文书军官”打电话。电话持续了十分钟，然后赫尔穆特·里德尔被告知，这封专横的回信内容“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法律”，有关部门无法签发通用的卡尔·麦作品进口许可。女同事临走时顺便说了一句，“进口卡尔·麦的书，干脆就试试吧”。

里德尔先生听从了她的建议，并且事情进展顺利，到1985年底他就集齐了在班贝克出版的所有卡尔·麦的作品。里德尔觉得不能白白接受所有图书，于是问在西德的朋友是否愿意交换图书，朋友的要求令他感到惊讶，但却很好办，就是用马克思换卡尔·麦。还有一些斯大林文集也从霍耶斯韦达踏上了去往西德的旅途，这也不是很安全，因为斯大林曾经作为“千秋万代的伟人”当时也在东德海关的没收名单上，但保留着斯大林主义色彩的政治环境没有对此产生什么影响，来自霍耶斯韦达的

斯大林小包裹很显然没有被查到而顺利过关。

我汉堡的朋友阿尔弗雷德·施耐德（Alfred Schneider）是卡尔·麦协会的创建者和总负责人，他曾向波恩的“东德常驻代表处”打听涉及卡尔·麦的包裹信件邮局如何处理。因为不能在西德首都对一位西德公民用空话套话敷衍了事，于是代表处的回答是这样的，要他在图书包裹上贴一张小纸条写上：“根据波恩东德代表处的答复：图书内容安全放心！”

---

[1] Neubert，Andre：*Taste für Taste Karl May* . In：Karl-May-Haus Information 8/1995，S.15f.2008年1月海因茨·蒂姆勒的一个儿子卡尔-海因茨·蒂姆勒为我提供了其他相关信息。

[2] Kisch，Egon Erwin：*Die Abenteuer in Prag* . Wien u.a.1920，S.77f.弗赖堡的费森菲尔德出版社是1913年成立的卡尔—麦出版社的前身，1892年起出版了一系列卡尔·麦的作品。

[3] Heermann，Christian：*Old Shatterhand ritt nicht im Auftrag der Arbeiterklasse* . Dessau 1995.本文部分内容出自这本书，该书也应用到大量参考文献。

[4] 根据作者档案中的复印件。

[5] Leonhard，Wolfgang：*Die Revolution entläßt ihre Kinder* . Band 2. Leipzig 1990，S.406.

[6] 出自1947年8月9日的德累斯顿《联合报》。

[7] 出自1947年8月10日的《新德国》。

[8] 出自1947年8月10日的《新德国》。

[9] Stolte，Heinz：*Karl May in meinem Leben* . Bamberg 1992，S.29.

[10] 出自1948年2月的《大众图书管理员》。

[11] Gigl，Claus（Hg.）：*Projekt Lesen A 8* （für die Klassenstufe 8）. München 2001，S.127-129 und 130. Heermann，Christian：*Der Mann*，*der Old Shatterhand war* . Berlin 1988.

[12] Gigl，Claus：*Wisse OK！Deutsch/Gymnasium（G8）/9./10.Schuljahr* . Stuttgart 2007，S.52-53. Ders.：*Wissen OK！Deutsch/Realschule/9./10* . Schuljahr. Stuttgart 2007，S.46-47.

[13] Kramer，Thomas：*Micky，Marx und Manitu. Zeit-und Kulturgeschichte im Spiegel eines DDR-Comics 1955～1990 . "Mosaik" als Fokus von Medienerlebnissen im NS und in der DDR* . Berlin 2002.

[14] Kramer，Thomas：*Micky，Marx und Manitu. Zeit-und Kulturgeschichte im Spiegel eines DDR-Comics 1955～1990 . "Mosaik" als Fokus von Medienerlebnissen im NS und in der DDR* . Berlin 2002，S.110.

[15] Heermann，Christian：*Zweimal "ausgesondert"* . In：Leipziger Volkszeitung，1./2.11.1997（Beilage Journal）.

[16] Flade，Hermann Josef：*Deutsche gegen Deutsche. Erlebnisbericht aus dem sowjetzonalen Zuchthaus* . Freiburg i.Br.u.a.1963 und Grünhain 2000.

[17] Vorabdruck von Hermann Kant：*Die Aula* （15.Fortsetzung und Schluss）. In：Forum 13/1965.

科幻小说与唱片

——秘密交易与偷运入境

埃格贝特·皮奇（Egbert Pietsch）（P）、卡尔海因茨·施泰因米勒（Karlheinz Steinmüller）（St）与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Siegfried Lokatis）（L）的座谈

L： 现在我们来谈谈东德的科幻文学以及唱片交易。唱片交易在莱比锡克鲁泽（Kreuzer）出版社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P： 重要角色之一。

L： 卡尔海因茨和妻子安格拉·施泰因米勒（Angela Steinmüller）在东德不仅作为优秀的科幻作家而出名，后来在1989年政治转折之际，卡尔海因茨·施泰因米勒转行成为一名未来学家，原因是什么呢？

St： 原因很容易理解。对我来说，从事未来学研究是以其他途径继续从事科幻创作，我们曾经在东德构想出来的东西，现在可以投入实际应用了。所以二者的差别真的不是很大，不仅文学需要疯狂的想法，在公司里同样如此。

L： 施泰因米勒先生，您来自东德靠近捷克边境的地方，在那儿怎么才能接触到科幻小说呢？那里的人到底知道科幻这个东西吗？

St： 就连在那儿也流行科幻小说，50年代的时候广播里就有了。但即使是东德的主流科幻作品，因为数量很少，在五六十年代大部分也都是秘密交易。计划经济下物品稀缺，也就提升了书的价值，以至于科幻作品虽然可以在东德通过正常渠道购买，但主要还是在读者之间互相传看或者买卖，因为这类图书太少了。

L： 如果提到乔治·奥威尔和他的《1984》，那么科幻类题材并非始终是政治上无害，就像电视剧《猎户座号宇宙飞船》一样。

St： 如果60年代中期一个中学生看了这部电视剧，肯定会在学校里遇到麻烦，但我们当时从电视上拍下照片然后在学校里分发传看，并没有被怎么样。电视剧里那广袤的宇宙，还有对抗外来入侵者的青蛙大战冒险经历，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兴趣。这是图书的效果通过屏幕展现了出来，深深地影响了当时我们这些14岁的青少年。

回到乔治·奥威尔，《1984》不是文学里的灰色地带了，而是属于黑色地带。如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被发现，单单这本书就能把人送进监狱，给人戴上一顶反共产主义战斗者的帽子。大家对奥威尔总的来说也是持批判态度，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1954年BBC的电视节目将奥威尔归为冷战的一部分，两股势力都以这种方式解读奥威尔。

50年代时可能因为乔治·奥威尔会进监狱，到了1983年底，马上就要跨入1984年，因为要做一场关于这本书的报告，我自己还是非常小心。我们有一位朋友，莱因哈德·格勒克纳（Reinhard Glöckner），当时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做牧师，后来两德统一之际成了市长，他邀请我们1983年12月28日那天去他的牧区谈谈这本书。这件事情真难办，我们当时感觉非常不自在。我想：能说什么呢，这种报告里可讲些什么呢，能涉及多少批判斯大林的内容？毕竟牧区里有60个人在。我们一位朋友甚至警告说："你们在干什么？——等着到时给我寄包裹吧。"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被驱逐出境，也就是如果被开除国籍，就从西德给他寄包裹。牧师在开场先适当地讲了讲《约翰启示录》，然后大家唱教会歌曲，我谈了谈《1984》接着大家展开讨论。我们发现，至少有一半的人都没读过这本书，也许有三分之一也只是大概知道这本书的内容，总的来说大家始终没有表现出兴趣，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报告进行的还算顺利，我们不用从西德寄包裹了。

L： 说到从西德寄包裹，顺便提一下，到底怎么才能弄到西德图书呢？

St： 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我们去找了布达佩斯的一位女性朋友，在那逛了旧书店。有一天，应该是1978年，终于我们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了《1984》的英语版第一版，这本书花了20福林，当时对于东德人来说不少了。买书是一件事，20福林我们还是有的，但还要把这本书带过边境！然后我们想，我们要把书裹到毛衣里，还是藏到香肠里，要不要塞到塑料袋里？是大大方方地放到包里还是裹进报纸里，或者那上面



图**1** 埃格贝特·皮奇拿着他偷带入境的唱片

还有更显眼的地方，放到行李架上，这样就不用偷偷摸摸地掩藏了。当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而且为了掩饰还要买些其他东西，这样看起来就不显得那么可疑，我们在布达佩斯买了很多工艺品，还有印度的铁皮和黄铜制品用来掩饰。过去这么多年我们还学会了如何伪装得像模像样。不能吹口哨，而要展现自由德国青年团大方诚实的面貌，遇到海关关员，或者更糟糕遇到女关员，不能正视他们，千万千万要做到，

而且不能朝边上看，最好看着肩膀，近距离地走过。这些特殊的行为举止规范必须要遵守。我们就见过隔壁车厢的旅客不注意行为举止，被没收了两本娱乐小说，而我们若无其事地坐在那儿，说说笑笑很开心，箱子里至少藏了15本书。有时拿出一张面巾纸，就可能遭到检查。

L： 皮奇先生，您后来对唱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您是在一个小城里长大的，当时在那儿就知道有唱片吗？

P： 那时在克莱因·万茨莱本还没有唱片。我14岁住进了埃格尔恩的学生宿舍，当时高年级的同学总是有Deep-Purple乐队的唱片，或者其他正是我们想听的唱片，比如Dire Straits乐队，但要卖到120～130东德马克。每个星期15东德马克的零用钱是不够用的。很快我就决定采取对策，所以就产生了自己偷带唱片的想法，而且是批发买卖，但是是在搬出了学生宿舍之后才做的。接着我服了四年兵役，去了柏林，在菩提树下大街演奏普鲁士乐曲。那更应该说成是军事美学，而非真正的军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戴白色手套的警卫团，军刀和塑料头盔。如果在纪念碑那里戴着真正的钢制头盔，在南边，30度的夏天，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我们的时间非常充裕，我的室友也从埃格尔恩的学生宿舍搬了出来。

就这样，我们倒运唱片的生意做得很兴隆，集乐趣、冒险当然还有利益于一身。

L： 您是1965年生人，过柏林墙就是个问题，怎么把那些唱片从西柏林带过去？不是很安全吧？我想起来电影《太阳街》中的一个场景：一名男子被枪射，子弹打到了一张Rolling-Stones乐队的唱片上，救了他一命，而他看起来好像宁愿自己被击毙，也不愿意让那张唱片成为牺牲品。

P： 是的。另外，Rolling-Stones乐队《Exile on Main Street》这张双

碟唱片的准确价格是250东德马克，2001年在西柏林售价为19.90西德马克，而在东德就要250东德马克。总的来说偷运唱片这门生意就有两个难题，第一，怎么把大量唱片从西德带到东德，第二，怎么能换到大量的西德马克。这两个棘手的问题一直也都是唯一的问题。但是办法是有的，在柏林能收听美占区广播电台，电台里经常广播汇率。

柏林动物园火车站的德意志交通信贷银行可以换钱。

汇率在1∶8到1∶12之间浮动。有时候走运的话，从某个老奶奶那里能换到1∶5或者1∶6。80年代能换到1∶10以下就算赚了。我们很多钱都是在动物园的德意志交通信贷银行换的，虽然那儿的汇率不怎么好。

我们总共三个人一起做的这门生意，我和我的同事在东柏林，另一个是同事的远房亲戚，在柏林学医，是他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他有一些巴勒斯坦的同事，可以开外交用车出入境，完全零风险，我们就用他那辆欧宝阿斯科纳，装着VEB—Bako面包房的箱子开到东柏林，箱子正好放进行李箱，两个人就能抬出来。整个过程比较简单。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是有很大乐趣的，在国安部的人面前总是有点儿害怕，但最后什么也没发生。我在东德反正胆子很大，看上去也就没那么可疑。我那位同事相反就胆子小，一次有位医生对他说，这样会不会做得太过分，换成他可不会这么干，我那同事就非常紧张，说道："天哪，我们不能再这么干了。"

我们的主要货源是韦因海姆唱片中心，按照订单订货，现在可能叫做邮购订单。500张以上的价格是4.99西德马克，当然不是所有的，但很多在东德抢手的都是这个价格。主要是重金属音乐最多。弹着吉他流着汗的男人们。（那时）还是真正的手工活。

现在在年轻人的音乐圈子里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Black Sabbath、Saxon和Judas Priest，当时有很多这些乐队的唱片，也很容易买到。当然在西德有的唱片也很贵，汇率不好的情况下这些唱片的生意就不好做了。倒运图书是次要生意，但我们也做了一些。

还有更贵的东西，比如说比尔曼（Biermann）的有声图书，一张比尔曼唱片至少300东德马克，因为大家知道，他的唱片即使在80年代中期两年都不过时。或者鲁道夫·巴赫罗的《抉择》，蓝色包装，不大，西德卖到6.8西德马克或者7.8西德马克，换成东德马克肯定就100了。

L： 施泰因米勒先生，您也倒运过唱片吗？

St： 没有自己倒运过，但让西柏林的朋友帮着弄了一些，数量不多，可能对于皮奇来说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就是说恰恰不是Dire Straits这样的摇滚乐队，而是克劳斯·舒尔茨（Klaus Schulze）的电子音乐或者杰夫·韦恩（Jeff Waynes）非常棒的音乐剧《宇宙战争》。

P： 小众市场。

St： 没错，小众市场。轻口味，没有风险回报。不过亲戚朋友当然也给我们偷带了一些图书，数量不多，也从来不是为了卖书。但朋友们都知道，所有跟科幻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带给我们。

比如有一次我和我的岳父在保加利亚见面，他给我们带了超级好东西：50年代旧版科幻小说。现在旧货市场上可能一本卖50分，但那些小说里有些可是几乎绝版的，比如最早的《佩利·罗丹》科幻系列，当时还不是正式上市的版本，而是借阅版。

保加利亚海关当然查了我岳父的行李，发现了那些书，我岳父结结巴巴地说“宇航员，宇航员”，就过关了，有时候科幻小说还是享有一定

的特殊待遇。我们偶尔在柏林的东德旧书店里也能淘到些东西。

旧书店的人都认识我们了，这个很重要。所以进了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旧书店之后，店员对我们说：过来一下吧，我们有东西给你们。然后他们拿出来60本平装袖珍版科幻小说，英国的和美国的，总共大约250东德马克。我们可没带那么多零钱，在东德一个人如果带了10马克，一般都够出一趟门的了，于是我们去附近找了一位朋友，从她那借钱把所有的书买了下来。书店老板不敢把书摆在橱窗里，也不敢放到书店前厅，一本书可能没问题，但这么多就太显眼了，并且他们都是找值得信赖的人当雇员。

有些科幻作家的作品到了海关那总是被没收，比如卡洛斯·拉什（Carlos Rasch）。有人跟我们讲起一次他在等着收包裹，一个很普通的包裹，里面装的科幻小说，他当时在写关于科幻小说的博士论文。那些书被没收之后，他要投诉，但很难搞清楚到底要去哪儿投诉。最后他找到了海关总局，工作人员也确实表示理解，说道："好吧，您是有权收到那些书的，行，这就把书退还给您，跟我们过来一下吧。"然后他被带到了柏林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个大厅，桌子一个接一个排成50米长的一排，没收来的书在上面堆成了山。海关关员和他说："可惜我们也不知道哪本是您的，您找到了就拿走吧。"对于读书迷来说那就是天堂，这天堂就在海关。

L： 我从您那了解到，东德的科幻小说，尤其是这里本地科幻作家的作品，还是远远比美国科幻小说更受欢迎。

St： 一直是这样。

L： 那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您也倒运这些美国科幻小说。

St： 每位东德科幻作家都感觉自己像是一位小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剧作家），米勒当然也需要读作家孔萨利克（Konsalik）的消遣文学作品。

L： 还有苏联科幻作家斯特鲁加茨基兄弟，他们写的东西很多都隐藏在潜台词里。而事实上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在作品中勾画出的社会带有强烈反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色彩。

为什么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为什么在东德能见到他们的作品呢？人民与世界出版社甚至大量发行。

St： 恰恰不是的。斯特鲁加茨基兄弟是个特殊情况，他们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审查下真正的受害者，约20年之久在苏联不能出版作品，勃列日涅夫时代过去之后才出版了一系列图书。他们把《讨厌的城市》（*Die verfluchte Stadt*）[1]的手稿藏起来，甚至同事朋友都不让看，不承认有这本书存在，不然两个人就有危险了。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说他们是一个特例。这样的情况东德是没有的。

两德统一之后，很多人包括科幻小说粉丝都希望作家们打开抽屉，这样才能让以前被禁的文稿浮出水面。但无论是科幻作家，还是其他作家，都没拿出什么新的东西，也许是出现了一些冷门作品，但也仅此而已，大家期待的热门禁书、非主流图书没有出现。当然，是我们自己的错。但还是有点儿可惜。当然很多作品中有些内容是有批判性的，写得更加尖锐了，但很少涉及真正的、严格的审查，起码在我看过的科幻小说中很少。一些作品文笔十分庸俗，被返还给出版社重新编辑，这样审查甚至还为作者们做了件好事。

此外，东德也有一些私人出版社少量发行的科幻小说，不像耶和华见证人那样把文稿藏在李子里，而是自己手工制作的，做得非常好。几个小伙子坐下来，用转印支架翻拍自己做的模板，然后缩小复印，挂起晾干，最后把这些微型小册子分发给朋友们，其中大多数文章都是合乎

主流的。

另一方面，这种对科幻小说的喜爱也有可能被置于政治背景下曲解，科幻小说爱好者们都知道德累斯顿Stanislaw-Lem俱乐部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有大学生因为传阅英美科幻小说，其中部分是他们自己翻译的，然后以传播帝国主义文学为由被学校开除。如果在大学里遇到煽动闹事想出风头的人，俱乐部里流传的这些文稿可能就会让这些人的职业生涯遭遇严重挫折。我们一位朋友罗尔夫·克罗恩（Rolf Krohn）就是这样，没有成为物理学家，而成了司炉工，同时写科幻小说，可以说开除学籍之后他还是能靠着工作生活，其他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L： 还有对皮奇先生的一个问题，是提到耶和华见证人用李子藏文稿的时候我想起来的。唱片就一点儿也藏不了吗？您当时整个行李箱都装满了。我就不是很明白了。

P： 其实风险很大。500张唱片就要运两趟，车里从来都是装得满满的，不然不值得冒一趟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当然还稍微培训了一下在西柏林的那位朋友，如果海关查看要怎么应付，但海关几乎从来没查过。我们五年里可能运了30趟，至少几个月就一趟，这么长时间就被真正查过一次。他每次都开进伯恩霍默大街，当时海关发现那些唱片后，那位朋友说："那个，我是迪厅唱片管理员。"当时DJ还叫迪厅唱片管理员。"我今晚要在克罗伊茨贝格（柏林一个城区）放唱片，我住在五楼，因为你们我就不把唱片都拖到楼上了。"然后海关关员说："嗯，差不多没问题"，便放了他入境，但在他回来的路上快到半夜12点时，关员们真的花了一刻钟的时间查看是否所有的唱片都在。我们当然很无奈，因为每次都要给他报销25东德马克的入境费，那次相当于拉了个空车。

---

[1] 在德国出版的版本名为《Stadt der Verdammten》，Frankfurt a.M.1993和《Das Experiment》，München 2002。

编辑致辞

在“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大会召开前2个月，2007年7月，一直辛勤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Simone Barck突然离世，本来很可能推迟举行的大会还是如期召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我们各位莱比锡大学生的积极投入分不开的，学生们通过两门研讨课的形式筹备大会，之后在“写作工作室”对各篇文章进行编辑整理。

我们要感谢大会上播出的影片《Gift für die Republik》导演Geraldine van Gogswaardt，Anika Heintze和Tina Stephan，还要感谢大会主持人Kristin Wolter，Jenifer Hochhaus，Ulrike Geßler，Kerstin Schmidt，Carmen Laux，Maria Dobner和Diana Burgdorf，此外还有Jens Hüttmann博士和Hedwig Richter。

Berit Bornschein负责与会成员的食宿工作，Nicole Bornschein-Laugwitz设计海报、宣传册及会标，Wenke Hahn和Claudia Panzner负责客人接待。Vera Nickel负责电影录音，并得到了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Agnieszka W.Wierzcholska的支持。Mario Gäbler负责布置并管理图书展台。

本书大部分篇幅是在研讨课“写作工作室‘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下完成的。各位学生把录制下来的专题讨论会落实成文字，审校编辑与会者的发言稿，在此要向以下学生表示感谢：Manuel Binternagel，Ulrike Brandt，Sara Fischer，Ulrike Geßler，Kerstin Schmidt，Katy Gillner，Geraldine von Googswardt，Anika Heintze，Tina Stephan，Susanne Günter，Susann Hannemann，Uwe Hofmann，Carmen Laux，Oliver

Matthes，Michael Niepraschk，Sandy Nitzsche，Stefanie Ohle，Stefanie Schwibode，Heike Trautloff，Julia Wallmüller，Jeannine Wanek和Peter Zeckert。

此外还要感谢莱比锡大学传媒传播中心的Waldemar Scheible先生在录音录影工作上的技术支持。

此次大会的方案来源于德国研究联合会在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的项目“秘密读者”，我们在此还要感谢Martin Sabrow博士（教授）作为协办方给予的支持。同样作为协办方的莱比锡书业历史工作组提供“书之屋”的场地供大会使用，对此向Mark Lehmstedt博士表示感谢。

莱比锡储蓄银行传媒基金会提供使用其在莱比锡传媒校园的会议厅。莱比锡图书学友人及促进者协会协助招待与会客人。

我们还要感谢“联邦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历史整理基金会”对大会所需全部资金的慷慨支持，感谢德国研究联合会、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以及历史整理基金会对本书印制的资金支持。

2008年8月16日于莱比锡

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

英格里德·宗塔格

编者及作者简介

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Siegfried Lokatis**）

生于1956年；在波鸿和比萨攻读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1992年获博士学位，1993～2001年在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任职，2001～2005年任职于波茨坦大学；2004年获大学执教资格，2006年获莱比锡大学图书学教授席位。

英格里德·宗塔格（**Ingrid Sonntag**）

1953年生于德国图林根州格拉；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之后于莱比锡哈雷东德出版社及莱比锡Gustav Kiepenheuer出版集团任编辑，莱比锡艺术自由学院院长；目前为自由职业人，在莱比锡大学任教，居于莱比锡。

芭芭拉·阿梅隆（**Barbara Amelung**）

1940年生于德累斯顿；1957年移居西德，1961～1966年先在哥廷根和柏林攻读法学，后于哥廷根法院任法官；1968年与Knut Amelung结婚；自1983年起在特里尔任公证代理人及特里尔手工业商会消费者投诉调解委员会主席；1998年参选特里尔市长办公室，输给在职人员落选；1994～2005年任某信托机构法律顾问（德国土地开发与管理有限公司）；2005年以来继续任公证代理人；1992年受Knut Amelung博士（教授）聘请，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新成立的法律系任教，1994年起全家居于德累斯顿。

罗兰德·贝温克尔（**Roland Bärwinkel**）

生于1958年，在莱比锡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及通用文学，获日耳曼语言文学硕士学位；任魏玛安娜·阿玛利亚女公爵图书馆信息部主任。

齐格弗里德·布罗伊尔（**Siegfried Bräuer**）博士教授

1930年生于萨克森州靠近捷克边境的奥尔伯恩豪，在莱比锡攻读神学，之后在莱比锡做牧师；1972～1979年任萨克森州牧师学院院长，学院位于弗莱贝格附近；1980～1991年任柏林新教出版社社长；1991～1995年任德国新教教会柏林分会神学部负责人；同时于瑙姆堡高等神学院取得大学执教资格，授课内容为路德在第三帝国的接受，后转入柏林洪堡大学编外任教；2000年退休不再担任教学任务；居于柏林。君特·德·布律（**Günter de Bruyn**）

1926年生于柏林；1946～1949年在东德波茨坦和拉特诺任临时教师；1949～1953年接受图书管理员培训，接着担任柏林人民图书馆管理员；1953～1961年在图书馆管理学中心学院任职；1961年起任自由作家；1980年起参与编辑出版《勃兰登堡作家花园》；1969～1978年东德作协主席团成员，1970～1990年东德国际笔会成员，1991德国国际笔会成员；1978年起东德艺术科学院成员，1986年起西柏林艺术科学院成员；荣获众多奖项，如1964年获海因里希—曼文学奖，1982年获里昂—福伊希特万格文学奖，1989年获托马斯—曼文学奖，1997年获让—保罗文学奖，2008年获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文学奖。居于柏林。

科琳娜·布绍（**Corinna Buschow**）

1983年生于勃兰登堡州诺伊鲁平；2002年起在莱比锡攻读新闻学和文化学，在科特布斯的《Lausitzer Rundschau》以及《20cent》报社完成实习，同时在各日报社兼职。

卡尔·科里诺（**Karl Corino**）

生于1942年；在埃尔兰根大学、图宾根大学及罗马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古典语文学和哲学；1969年于图宾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关于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的早期作品；1970年起在黑森州广播电台文学部工作，1985年起任部门主管；重点方向为东德文化与文学；设立时事述评节目“穿越边境·东德文化”并担任主持；获得联邦十字勋章；退休后居于黑森州巴特·菲尔伯尔。

汉斯-赫尔曼·德克森（**Hans-Hermann Dirksen**）

1966年生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在基尔攻读法学；在石荷州任见习律师；在格赖夫斯瓦尔德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95年获律师资格；在黑森州生活工作。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共产党执政时期小型宗教团体受到的迫害。

伊莲娜·德姆克（**Elena Demke M.A.**）

1968年生于波茨坦；在莱比锡和牛津分别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及现代史；国家安全部档案柏林处负责人。

玛利亚·多布纳（**Maria Dobner**）

1983年生于柏林附近；2003年起在莱比锡大学攻读文化学、新闻学和企业经济学硕士。

雷纳·埃克特（**Rainer Eckert**）博士教授

1950年生于波茨坦；1969年在柏林洪堡大学攻读档案学和历史学，1972年由于政治原因被大学开除；1975年远程学习获硕士学位，1984年获博士学位，于图书馆任职至1988年；1990年10月至1991年12月任德国

历史学院副院长；1991年任洪堡大学历史学院现代史学教授席位助理；

1997年1月任莱比锡系列项目领导，1998年6月接管“联邦德国历史”基金会莱比锡当代史论坛博物馆，2001年12月起任馆长；2001年于柏林自由大学Otto-Suhr学院获得大学执教资格，居于莱比锡和柏林。

发表过众多作品，内容涉及东德形势、国家安全部问题、盖世太保、1945年及1989年后两德专制、洪堡大学史、1989年后东德历史学、东德反对派及反抗行动、民主社会主义党历史观、流亡传播学及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工人形势。

克里斯蒂安·埃格尔（**Christian Eger**）

1966年生于德绍；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语言学及近代史；《中德意志报》文化部编辑；哈雷Waldersee出版社发行人；居于哈雷。

西格马尔·福斯特（**Siegmar Faust** 原名 **Siegmar Kayenberg**）

1944年生于萨克森州多纳；1965～1966年于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攻读艺术教育及历史学；后被开除学籍，接受生产劳教；之后于“Johannes R.Becher”文学院学习，1968年再次由于政治原因被开除学籍；从事各种勤杂工作，在莱比锡Knauthain水库开过汽艇，做过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夜班门卫。1971～1972年由于“从事敌对国家的煽动活动”受莱比锡国安部拘留待审；后被释放；指控国安部及离境申请；后被再次逮捕，判处54个月监禁，在科特布斯服刑；由于编辑手写囚犯报《不幸的德国》被关入地牢单独监禁400天；经国内外有关人士的帮助下提前释放；后迁往西柏林；自由职业者；《今日东德》及《那里的耶稣基督》杂志总编；1989年后迁回东柏林；任德国自由作家协会副主席及项目负责人，国安部档案柏林处负责人；1997年在德累斯顿创建“了解在于回忆”协会；1996～1999年国安部档案萨克森州处负责人；居于

巴伐利亚州赖兴贝格。

贝尔恩德·弗洛哈特（**Bernd Florath**）博士

生于1954年；在国家人民军服役后在东柏林攻读历史学，1976年被注销学籍；在生产队“劳动教养”；1978年再次入学；1981年起任东德科学院史学家；1986年加入统一社会党；1990年1月退党，参与成立独立社会党；1990年4月成为新论坛运动成员，1990年6月任新论坛运动柏林发言人，1990年9月至1993年任德国发言人；1992～1996年于柏林洪堡大学任职；1997～2003年于德国反抗纪念馆任职；1999～2000年于柏林自由大学Otto-Suhr学院政治社会学任教；2007年起在国安部档案处教育与研究部门任职。

安德里亚·格内斯特（**Andrea Genest**）博士

1970年生于柏林；1990～199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政治学及日耳曼语言文学；1991～1992年在奥斯维辛国际青年会议宫任和平志愿者；1992～1993年在波兰国家奥斯维辛纪念馆参与协调欧盟Tempus系列项目“奥斯维辛以后的欧洲公民社会及社会变迁”；1993～1999年继续学业；1999年1月获硕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以自由城市格但斯克的犹太社区为例论1933～1939年国际联盟的人权政治》。1999年4月至2005年3月在柏林自由大学反抗史研究处及德国反抗纪念馆任职；2002～2005年攻读博士，题目为《波兰反对派的1968年危机——1989年体制转变前后的事件与接受》；2005年4月起在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任职。

乌尔里克·格斯勒（**Ulrike Geßler**）

1984年生于萨克森-安哈特州德绍；2004/2005年冬季学期开始于莱比锡大学攻读传媒学硕士，主攻方向为图书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心理

学。

约恩-米歇尔·谷尔（**Jörn-Michael Goll**）

1977年生于巴符州斯图加特附近；在图宾根和莱比锡大学攻读古代史、近代史、政治学及新闻学；2005年起获弗里德里希—瑙曼自由基金会奖学金攻读博士，题目为《经审查的审查官：海关对于国家安全部“政治战略工作”的意义》；2006年1月至2007年1月与德国分裂纪念博物馆以及莱比锡技术、经济与文化高等专科学院的学生合作，负责博物馆长期展览“东德海关”的陪同工作。

巴德尔·哈泽（**Baldur Haase**）

1939年生于捷克克尔科诺谢山一带；被驱逐出境后在苏占区长大，后迁至图林根州萨尔费尔德；1955～1958年在莱比锡学习印刷技术；由于和国外联系密切，1957年受到国安部关注，1958年起成为邮政检查通报合作者；由于某届德国青年聚会举办后收到西德朋友寄来奥威尔的《1984》，1959年被捕，判处三年零三个月监禁。

克里斯蒂安·黑尔曼（**Christian Heermann**）

1936年生于开姆尼茨，攻读物理学和数学；于莱比锡大学任数学家30年，爱好写作出版；霍恩施泰因—恩斯特塔尔卡尔·麦之屋学术委员会主席，莱比锡卡尔·麦爱好者协会主席，莱比锡“自由文学界”促进委员会理事会成员。

恩里克·海策尔（**Enrico Heitzer**）

1977年生于图林根州阿尔滕堡；1996年中学毕业后服兵役两年，1998～2004年在波茨坦和哈雷攻读历史学和政治学；发表硕士论文；于哈雷-维腾堡大学攻读博士，研究反对非人道战斗团（KgU）；波茨坦

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君多尔夫·赫尔茨贝格（**Guntolf Herzberg**）

1940年生于柏林；1961～1965年于柏林洪堡大学攻读哲学，后在东德科学院做研究助理；1973年被禁止从业；支持鲁道夫·巴赫罗1976～1977年完成《抉择》一书；1985年迁往西柏林；绿党成员；自1994年起于柏林洪堡大学哲学院任职。

沃尔夫冈·欣茨（**Wolfgang Hintz**）

1937年生于东普鲁士海尔斯伯格（现波兰境内）；1945年至60年代居于柏林，后迁往西德明斯特；长年以公共资金协助教会工作，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满足教会日常需求；自学研究东德历史、统一社会党党史、东德生活，尤其是东德天主教、新教教会成员日常生活。

詹妮弗·霍赫豪斯（**Jenifer Hochhaus**）

1986年生于图林根州米尔豪森，2004/2005年冬季学期开始于莱比锡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辅修文化学。

哈罗德·霍尔维茨（**Harold Hurwitz**）博士教授

1924年生于美国；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1946年作为占领军成员来到柏林并长期居于柏林；与社会民主人士（如古斯塔夫·克林格霍弗 Gustav Klingelhöfer）联络往来；1948年春任“Talk Back行动”青年编辑；1949年柏林自由大学毕业：调研德国工会联合会；1952～1954年通过匿名调查问卷研究西德杂志《月份》在东德的“秘密读者”情况；60年代初任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 时任德国社民党主席，后任德国总理）办公厅社会学顾问；为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写传记；1967转到柏林自由大学任政治学教授至1988年。哈罗德·霍尔维茨是“柏

林政治文化研究的带头人”；其大量出版物的核心内容为当代史背景下柏林战后发展的政治观研究。

托马斯·克莱因（**Thomas Klein**）

1948年生于柏林；1966年任机电专家。1966～1973年攻读大学，1973年起于柏林洪堡大学研读数学；1976年获博士学位；1973～1979年任东德科学院经济学院高级助教；研究宏观经济建模；攻读政治经济史及苏联经济史。1979～1980年由于政治原因被监禁，直至1989年禁止发表著作；1981～1990年任柏林VEB家具联合公司定价员；1990年德国第11届国会议员，1991～1992年国会工作人员。1995年获奖学金，做波茨坦学术新计划有限责任公司的“当代史研究”；以“统一社会党内反对派及反抗行动”为题材撰写过多篇学术论文，自1996年1月起任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反对派史。

海因茨·克隆克（**Heinz Klunker**）

生于1933年；在萨克森州里萨附近的村庄长大，1952年高中毕业；至1955年5月在莱比锡攻读新闻学；后逃往西德；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哲学、艺术史，后来在明斯特攻读社会学和历史学；定期在广播电台（如英国广播电台和德国广播电台）及各类刊物（如《苏占区档案》、《周日报》及《世界周刊》）发表文章。1967年任德国广播电台编辑以及汉堡《全德周日报》小品文编辑；1977～1996年在科隆任德国广播电台政治专题部主任；2003年起居于柏林。

克劳斯·克尔讷（**Klaus Körner**）

1939年生于现波兰的格但斯克；在柏林自由大学、波恩和基尔攻读法学和政治学；1965年通过初级国家司法考试，1969年通过高等国家司法考试，在汉堡大学政治学院任助教；1976年起成为当代史题材的自由

作家，参与《亮点周刊》当代史专题编辑工作，参与编写多本史书及北德广播电台电视剧编辑工作；参与各种当代史展览及报告；1988年以来主要出版与当代史有关的作品，特别包括法律史、出版社历史及记者、政治家的传记；90年代积极参与创建“基层教会”组织，以德国当代史为题材撰写论文，重点为冷战时期的宣传活动。

马克·莱姆施泰特（**Mark Lehmstedt**）

1961年生于柏林；1979年由于政治原因被勒令退学，在比特费尔德褐煤联合企业教养一年；服兵役后在莱比锡和柏林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1987～1991年在莱比锡任18世纪德国文学教授助理；1990年获博士学位，研究课题关于出版商菲利普·伊拉斯谟·莱希（Philipp Erasmus Reich），之后参与各种研究项目，同时任柏林科学院研究员。1999～2002年任柏林Directmedia Publishing出版社编辑，参与建立并扩建“数字图书馆”；2003年在莱比锡成立莱姆施泰特出版社；参与成立“莱比锡图书史工作组”并任荣誉主席，参与成立“作家、图书与出版史工作组”并长年担任理事会成员，德国书业交易协会历史委员会成员。

埃里希·略斯特（**Erich Loest**）

1926年生于萨克森州米特韦达；1947～1950年先在《莱比锡人民报》做见习生，后任编辑。在莱比锡“约翰内斯R.贝歇尔”文学院学习；因持反对态度被开除东德统一社会党，并判7年半监禁；后来任自由作家，用笔名Hans Walldorf和Waldemar Naß写探险小说及侦探小说；1979年退出作协；1981年迁往西德；1987年创立Linden出版社；获奖众多，如1981年获汉斯-法拉达文学奖，1984年获马尔堡文学奖；1996年获莱比锡荣誉市民，1999年获联邦十字勋章；居于莱比锡。

罗兰德·林克斯（**Roland Links**）

1931年生于罗马尼亚。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学及艺术史。1954～1978年先后任人民与世界出版社编辑及总编；1978～1979年自由职业者，1979～1990年任莱比锡Kiepenheuer出版集团总领导，1990年任莱比锡Insel出版社经理，1992年退休；1993～2001年任库特·图霍文斯基（Kurt Tucholsky）协会主席团成员，奥尔登堡大学库特·图霍文斯基研究所研究员；目前为时事评论家及文学史学家，居于莱比锡。

米歇尔·迈恩（**Michael Meyen**）博士教授

1967年生于吕根岛；1988～1992年在莱比锡攻读新闻学，1991～1997年任日报、无线电及电视文字广播记者及新闻编辑，1995年在莱比锡获博士学位，1997～2000年期间获德国研究联合会奖学金，2001年获大学执教资格；1995～2001年任职于莱比锡大学，2000～2001年哈雷-维腾堡大学，2001～2002任年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客座教授，自2002年起任慕尼黑大学通用传播学及系统传播学教授；研究重心为传播学专业史及理论史、媒介使用（主要关于东德）、历史式接受研究、方法论及新闻学研究。

克劳斯·米歇尔（**Klaus Michael**）博士

生于1959年；在耶拿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1987～1996年在东德科学院及柏林工业大学任文学研究员。1986年起致力于非官方杂志的推行。1988～1990年任柏林非官方文学艺术杂志《莲妮》编辑［与H.哈费迈斯特（H.Havemeister）合编］。1990年创办Druckhaus Galrev文学出版社，1992年任出版社经理；1994年在柏林洪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撰写多篇关于东德文学、反对派及艺术的学术论文；1993年担任由德国国会任命的调查委员会“联邦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历史整理基金会”鉴定员；1994～1996年参与柏林工业大学有关东德作协的项目［与H.-D.齐默曼（H.-D.Zimmermann）教授合作］；1997年起任萨克森州艺术学院总秘书；同时在众多文化机构兼任名誉职位。

弗里茨·米劳（**Fritz Mierau**）

1934年生于波兰布雷斯劳；于柏林洪堡大学攻读斯拉夫语言文学；1956～1957年任德国苏联友谊协会核心主席团研究员；1957～1962年于洪堡大学任助教；1962～1965年自由职业者；1965年首次前往苏联；1966～1980年任德国科学院文学史院及斯拉夫语学院任教；自1980年起自由职业者；任作协成员直至1991年去世；1974～1991年任东德国际笔会成员；撰写众多关于俄国20世纪抒情诗人及作家先驱的学术论文；编辑、评论及翻译人员如下：Anna Achmatowa，Isaak Babel，Andrej Bely，Alexander Blok，Ilja Ehrenburg，Pawel Florenski，Sergej Jessenin，Michail Kusmin，Wladimir Majakowski，Ossip Mandelstam，Boris Pasternak，Alexander Puschkin，Sergej Tretjakow，Juri Tynjanow，Marina Zwetajewa.

汉斯**-J·**米塞维茨（**Hans-J.Misselwitz**）博士

1950年生于图林根州阿尔滕堡；攻读生物学和神学；1981年与鲁特·米塞维茨（Ruth Misselwitz）共同创建潘科和平圈；1990年东德人民议院议员（社民党）；外交部国务秘书；1991～1999年任勃兰登堡州政治教育中心主任；柏林“反对遗忘-为了民主”协会副主席；社民党主席团基本价值委员会成员；1999～2005年任社民党副主席沃尔夫冈·蒂尔泽（Wolfgang Thierse）办公室主任；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秘书；SPD基本价值委员会秘书；2006年起任“东德社会民主论坛”主席。

埃格贝特·皮奇（**Egbert Pietsch**）

1965年生于马格德堡，在马格德堡低地的克莱因·万茨莱本长大；1979～1983年在埃格尔恩就读高中；1983～1987年在国家人民军服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警卫队成员；1987年开始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未结束学业；1990年后成为莱比锡Connewitzer出版社书店书商，

1991年参与创办杂志《十字币》，1993年任该杂志出版社社长；此外还从事其他生意，如进口咖啡、啤酒、经营旧书等。

康拉德·冯·拉伯瑙（**Konrad von Rabenau**）博士

生于1924年；神学家及教会史学家；1956～1974年任瑙姆堡高等神学院讲师，1973年起任东德新教教会联盟教育处负责人；创建历史书籍收集、研究及维护工作委员会，担任主席多年；居于柏林附近。

马雷克·哈耶奇（**Marek Rajch**）博士

生于1971年；于波兰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学院任职。

格尔德·赖尼克（**Gerd Reinicke**）

1956年生于梅前州伏尔加斯特，1974年起在国安部任临时官兵，1977年成为正式官兵，两年后1979年调任罗斯托克国安部侦查部门，任M部门（邮政检查）“特别分析员”；出于对工作职务及统一社会党政治的不信任，1985年“申请辞职”；退出统一社会党及国安部；参与“新论坛”的工作；1990开始接受商业培训，之后任建材市场经理；负责梅前州东德历史整理工作；2008年起接受培训成为帆船教练；居于梅前州泰特罗。

安娜·李希特（**Anne Richter**）

1984年生于科特布斯；2003年高中毕业；自2004年于莱比锡大学攻读文化学、传媒学。

海德维希·里希特（**Hedwig Richter**）

生于1973年；在海德堡、英国贝尔法斯特及柏林攻读历史学、日耳

曼语言文学及哲学；通过初级及高等国家司法考试；担任《日报》《法兰克福评论报》及《自由新闻》（开姆尼茨）自由记者；2008年获博士学位，研究课题为“统一社会党专制下虔诚的生活世界及全球视野——1945～1975年苏占区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由“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历史整理联邦基金会”、Fazit基金会及华盛顿德国历史学院提供奖学金；曾在美国及日内瓦世界宗教理事会从事学术研究。

黑尔佳特·罗斯特（**Helgard Rost**）

1943年生于莱比锡；1964～1969年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攻读罗曼语言学；1969～1993年在Reclam出版社任罗曼语及非洲语言文学编辑，1994年起在莱比锡文学局工作，后任职于萨克森州文学翻译促进协会“Die Fähre”。

彼得·席克坦茨（**Peter Schicketanz**）博士

生于1931年；1951～1957年在哈雷和巴塞尔攻读神学；曾在哈雷做助理牧师，在马格德堡低原地区做4年乡村牧师；1965～1968在马格德堡任约翰内斯·耶内克（Johannes Jänicke）主教个人助理，参与《教会和平工作》的编纂；1968～1979年在马格德堡新教教会监理会负责神学家教育工作；1979～1996年任波茨坦新教牧区教育学院创始院长及讲师；自攻读大学以来致力于研究虔信主义，常年担任虔信主义研究历史委员会成员。

戴安娜·施密特（**Diana Schmidt**）

1977年生于开姆尼茨；1995～1999年于高等专科学院攻读企业经济学硕士；2003年开始于莱比锡大学攻读传媒学，主攻方向为公共工作、政治学及英语语言文学。

克斯汀·施密特（**Kerstin Schmidt**）

1978年生于耶拿；1995～1998年牙医助手培训；2004年于莱比锡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辅修新闻学和心理学。

托斯滕·泽拉（**Torsten Seela**）博士教授

1948年生于萨克森州格尔利茨；1967～1970年在莱比锡高等专科学校攻读图书馆学；后于柏林洪堡大学攻读图书馆学；1975～1985年于莱比锡高等专科学校教授图书馆学；1985～1987年于莱比锡大学继续攻读高等专科教育学；1990年于洪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92年起任莱比锡技术经济文化高等学院教授，1994～1997年以及2000～2003年担任媒体与博物馆系系主任；1997～2006年任该系国外联络负责人，居于莱比锡。

汉斯-格奥尔格·索尔达特（**Hans-Georg Soldat**）

1935年生于勃兰登堡州柯尼斯堡；在萨克森州弗兰肯贝格就读中学；在格赖夫斯瓦尔德攻读数学和物理；1958年遭国安部短期监禁，后逃往西柏林；在BBC驻德国电台、西德广播电台及北德广播电台任职；《明镜日报》任实习生，后任小品文专栏编辑；1967～1994年任美占区广播电台文学编辑，后来在柏林任自由文学批判家和杂文家；德国作家团体、德国批判家协会和德国魔术团成员；发表众多散文、诗歌、杂文，题材有关东德、国安部、魔术及电脑游戏等。

卡尔海因茨·施泰因米勒（**Karlheinz Steinmüller**）博士

1950年生于萨克森州克林根塔尔；攻读物理学及哲学；1977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在东德科学院控制论研究中心任研究员。

同妻子安格拉·施泰因米勒（Angela Steinmüller）作为科幻作家共同出版众多图书项目，1982年起二人都任自由作家；1988年任东德作协主席团成员，负责“文学与环境”领域的工作，1991年起在盖尔森基兴未来学研究有限公司任职；1997年起成为埃森、卡尔斯鲁尔及柏林预言公司

股东。

克劳蒂娅-莱奥诺蕾·泰施纳（**Claudia-Leonore Täschner**）

生于1950年，1968～1973年于柏林洪堡大学攻读档案学及历史学；1973～1980年在莱比锡系谱学总局任研究员；1981年起于莱比锡大学图书馆任研究员及历史部负责人，1987年起任借阅部主任；1991～2003年同时兼任图书馆主馆重修工作负责人。

让尼娜·瓦内克（**Jeannine Wanek**）

1980年生于萨克森州多纳；接受商科培训；2002年起在莱比锡大学攻读文化学、戏剧学和新闻学。

莱蒙德·瓦利戈拉（**Raimund Waligora**）

生于1952年；1975～1979年攻读哲学，之后于柏林洪堡大学攻读图书馆学；1979年起任（东德）柏林国家图书馆哲学部负责人，1992年起任职于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

帕特里夏·**F.**采卡特（**Patricia F.Zeckert**）

生于1980年；于莱比锡大学、法国西布列塔尼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及传媒学；于莱比锡图书贸易局兼职，做过各种实习；2004年完成图书学/图书经济学硕士论文，题材有关未经阅读的书籍；在莱比锡Klett小学教育出版社图书管理部自由任职；教授图书学/图书经济学；2007年1月起获“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历史整理联邦基金会”奖学金攻读博士，研究莱比锡书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德）洛卡蒂斯等著；吴雪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

（莱茵译丛）

ISBN 978-7-5097-5037-7

Ⅰ.①民… Ⅱ.①洛…②吴… Ⅲ.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史-研究 Ⅳ.①K5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4090号

·莱茵译丛·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

——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著者/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 英格里德·宗塔格 等

译者/吴雪莲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59367004 责任编辑/段

其刚 张骋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邓晓春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印制/岳阳

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9.5

版次/2013年10月第1版 字数/421千字

印次/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5037-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2-5886号

定价/5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吴雪莲

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学士，德国美因茨大学翻译学硕士。译著《问号小侦探—云端呼救》。

3A设计艺术工作室
010-59367108
装帧设计 / 宋 涛

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Siegfried Lokatis）

在波鸿和比萨攻读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1993～2001年在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就职，2006年获莱比锡大学图书学教授席位。

英格里德·宗塔格（Ingrid Sonntag）

专业为日耳曼语言文学，曾任莱比锡哈雷东德出版社和莱比锡Gustav Kiepenheuer出版集团编辑和莱比锡艺术自由学院院长。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一书不仅仅是给图书收藏者的一份礼物，更是一份对民主德国社会史的贡献。……该书的独特魅力在于，时代见证者们发言分享自己曾经缄口不言的许多内容。（阅读时）人们有时会觉得，自己在俯瞰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世界。

——《德国档案》

这本书中谈论了前海关官员、前国家安全部邮局审查员、反对者和书籍走私者，叙述了一个几乎不敢让人相信的德国－德语的文学关系。

——《文学世界》杂志（德国）

www.ssap.com.cn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ISBN 978-7-5097-5037-7

定价：59.00元

德意志之魂

DIE DEUTSCHE SEELE

所有被称为德意志的——一份爱的宣言。这是一本前所未有的书。两位作者的身份与经历差异不可能更大，但他们共同探究到底何谓德意志之魂，探究时他们充满爱意，又不乏批评精神；知识渊博并毫无接触恐惧。

〔德〕特亚·多恩 〔德〕里夏德·瓦格纳／著
（Thea Dorn） （Richard Wagner）

丁娜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特亚·多恩（Thea Dorn），1970 年出生于黑森州的奥芬巴赫，成长于半新教家庭。她十四岁时萌生了对理查德·瓦格纳歌剧的热爱，但有朝一日能在舞台上亲自饰演布伦希尔德的梦想却未能实现。她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哲学，毕业后前往柏林，在那里结识了里夏德·瓦格纳。继《少女杀手：一部爱情小说》后，特亚·多恩出版了杂文集《啊，和谐》。2004 年起，她为西南广播电台主持读书节目《文学入门》。

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952 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巴纳特，他生命中的前 35 年是在那里度过的，作为天主教徒和受迫害的德裔少数民族。里夏德·瓦格纳的主要作品有：小说《家当》和杂文集《德意志地平线》。

Die deutsche Seele by Thea Dorn & Richard Wagner

©2011 by Albrecht Knaus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München，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5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SSAP）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德意志之魂

DIE DEUTSCHE SEELE

〔德〕特亚·多恩 〔德〕里夏德·瓦格纳／著
（Thea Dorn） （Richard Wagner）

丁娜 等／译

译 歌德学院（中国）翻译资助计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序言

我知道我的妻子和她北大的几个同学一起在翻译《德意志之魂》这本书。说实话，由于公务太多，我平时很少有时间阅读大部头的书。丁娜是我50多年的老同学，其他几位译者也是我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当他们提出让我给这本书中译本作序时，我不假思索地欣然应承了。可是当我读完这本书，拿起笔时却茫然了，不知从何下笔，从何说起。

我完全同意丁娜所说，此书的作者试图以德意志之魂为题综述和阐释德意志历史、文化、传统的特征和能持之以恒的精髓所在。德意志民族有悠久和辉煌的文化和传统，也有不堪回首的伤痛历史。德国曾是后起的帝国，直到1871年才实现统一。为了证明自己的后发优势，也为了激发民族的精神斗志，德意志的所谓民族之魂曾被推崇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走向极端和它的反面。德意志民族之魂既造就了无数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匠，也曾出过遗臭万年的历史败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民族对“德意志之魂”这个词讳莫如深，不得不把它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热爱祖国对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自发和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对德意志民族来说则是巨大的精神和心灵创伤。德意志之魂难以一言以蔽之，它是复杂的、矛盾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德意志民族一直在重新总结、思考、审视和创新自己的民族之魂。我还清楚地记得，2006年德国举办足球世界杯赛时，德国人才第一次小心翼翼地拿出三色国旗，羞涩地为德国队喊出“德国！德国！”直至今天，德国人才真正有勇气堂堂正正地出版发行有关论述德意志之魂的书。民族之魂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精神基因，溶化于这个民族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正是因为有了德意志之魂的存在，德意志民族才能够从战争的废墟

中获得重生，创造战后经济奇迹，实现民族的再次统一，重新赢得欧洲和世界人民的尊重。

不久前，我有幸应邀参加德国最大的化工企业巴斯夫公司成立150周年庆典活动，德国前总理科尔、现任总理默克尔以及工商界巨贾1000多人与会。默克尔总理在讲话中历数巴斯夫公司辉煌发展历程的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我们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和二战结束70周年的时刻，我们也不能忘记，正是德国人在一战中首次使用了巴斯夫公司生产的毒气弹，二战时期集中营屠杀犹太人使用的毒气设备也来自巴斯夫公司。讲到这里，刚刚还充满喜庆的会场气氛顿时凝重，每个来宾表情严肃，思绪万千。我发自内心地敬佩德国人敢于正视历史、铭记教训和改正错误的诚实和勇气。这也正是德意志之魂的一个缩影和写照。

读了这本书，我感到一个民族的魂是具体的、生动的和随时可以触摸的，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民族的历史变迁、文学艺术、思维情感、风土人情、饮食文化，甚至每一个人的情感和情趣中都浸透了这个民族的魂。同时，一个民族的精髓也是抽象和深奥的，它既是相对恒久的，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延续的。二十年前，我同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关于中华文明精髓的一段谈话至今我都记忆犹新。他说，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和人民币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前景毫不怀疑，可是最担心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中国失去自己民族和文化的精神支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不能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他一直在思考，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能够延绵和发展的人类文明，那么能够支撑和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髓是什么？我和现年已经96岁的施密特老先生每每见面总是要探讨这个问题，可惜至今都还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也许我孤陋寡闻，也许我知识浅薄，寻找和翻阅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文章书籍，我都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在这变化无常的大千世界

里，面对物欲横流的冲击，多少人因精神空虚迷失了前进方向，又有多少人因贪图私利而无可救药地堕落了。振兴中华民族，首先要挖掘中华古老文明之精髓，弘扬中华民族之魂，将实现中国梦牢牢根植于中华土壤之中。读了《德意志之魂》深受启迪，有感而发，愿在此与读者共享。

柏林，2015年5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史明德

目录

- 前言
- 简便晚餐
- 夜晚的寂静
- 深渊
- 工作狂
- 包豪斯风格
- 登山片
- 啤酒之旅
- 兄弟树
- 印刷术
- 烫发
- 浮士德
- 铁路
- 严肃文学和消遣文学
- 桁架建筑
- 驾驶的乐趣
- 下班之后
- 科考远征
- 裸体文化
- 足球
- 德国人的性情
- 德国式焦虑
- 疆界
- 创业时代
- 基本法
- 汉萨同盟
- 故乡
- 青年旅舍

- 幼儿园
- 教会税
- 庸俗艺术品
- 诸侯割据
- 战争与和平
- 文化民族空想
- 男声合唱
- 高地丘陵
- 音乐
- 母亲十字勋章
- 神秘主义
- 疯狂的自由
- 爱整洁守秩序
- 牧师之家
- 玩具屋
- 横向思维者
- 狠心的娘
- 宗教改革
- 纯洁戒律
- 幸灾乐祸
- 私人菜园
- 渴求瘾
- 福利国家
- 芦笋季
- 小市民
- 海滩篷椅
- 怪诞之事
- 莱茵河——父亲河
- 社团迷
- 林中寂寞
- 徒步之乐
- 女人
- 德意志巾帼小画廊，展示顺序按女人味从低到高
- 圣诞市场
- 赔偿
- 维尼图

- 香肠
- 内心的撕裂
- 重要人名、地名及概念索引
- 参考文献
- 译后记
- 译者简介
- 插图来源

前言

亲爱的读者：

小心！这本书并非要让你警惕德国人。我们不想把德国推进解剖室，我们也没有身穿白大褂，手拿解剖刀，弓腰切出一些病变部位，然后拿到显微镜下去审视。我们不是病理学家，而是属于这个民族的人。我们渴望探察自己民族的文化，无论其深邃还是肤浅，也不管它是优美崇高，还是怪异并值得怀疑，我们都置身其中。

只要空气自然而然地存在，它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只有当它变得稀薄时，你才会觉察到它的存在。只有当你开始怀念它时，你才会感到那是你不愿失去的东西。

我们不担心德国自毁。我们只看到德国的经济不如从前，它的记忆丧失。只要是德国人都有放不下的德意志羞耻感，有些人将其硬化为负罪的铠甲，躲在其后。纳粹主义的罪行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耻辱和痛苦，还不如说是一种证明，即所有跟德国沾边的东西都该连根拔掉。另一些人在曾经的森林、现如今光秃秃的地界上跑着玩耍，那些林子是那些好意的犀牛般的家伙撞倒的。对后一部分人来说，只要电视机还在播放节目，冰箱里还有足够的啤酒，他们就心满意足，别无他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感觉到对德国的渴望在不断增长。

2006年夏季的足球传奇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不用害怕举起国旗和唱起国歌，世界不会重新开始憎恨我们，情况正相反。然而如果我们仅限于每隔四年把黑-红-金色的小旗子从柜子里取出来，那么这种“欢乐的爱

国主义”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这个国家，其历史与文化可以告诉我们的难道不是无穷多吗？

数年来我们一直在争论，哪些移民属于我们，哪些不属于。难道所有的辩论最终不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忘记本该讨论的问题：德国还有哪些东西属于国粹吗？除了词典上的信息——德国是一个位于中欧的联邦制、自由民主与实行社会法制的国家，它由16个联邦州组成——此外它还有什么特点呢？倘若我们条件反射性地拒绝回答“什么是德意志的？”这个问题，让这个问题独自在暗处悄悄地自说自话，那我们就是知难而退。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人，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想往哪里去。他会迷失方向、自信与生活的勇气。

所以我们开始了漫游，去寻找德意志之魂。这种寻觅之旅不可能是笔直的坦途。我们靠一些概念导航，我们觉得这些词能让德意志之魂发出最耀眼的光芒：从“简便晚餐”到“男生合唱”，从“兄弟树”到“驾驶的乐趣”，从“深渊”到“内心的撕裂”。

亲爱的读者，请你顺从自己的渴望、好奇心和热情的指引！这本书你可以从任何一章开始读，从那儿再随心所欲地读下去。你自然也可以利用我们每章后的相关导读词条继续阅读。

思想是自由的！

柏林，2011年夏

特亚·多恩和里夏德·瓦格纳

简便晚餐

德国人的简便晚餐——Abendbrot [1] ，顾名思义是以面包片为主。它简单、有些死板，但充满爱意。

这种晚餐准备起来很省事，可不多的几样配料却得谨慎选择：黑麦、黑麦混合或全麦面包，切成8毫米厚的薄片。抹上薄薄一层黄油，再配上［提尔西特（Tilsiter）］奶酪、［黑森林（Schwarzwalder）］火腿及（蒜肠）香肠片。要是有根酸黄瓜就更棒了，切好后把它们一片片叠摆成扇面形。抹了薄薄黄油的面包片，一片上面放奶酪，一片上面放火腿片，另一片上面放香肠片。理想状态下奶酪、火腿及香肠片的形状与大小要与黑麦、黑麦混合或全麦面包的形状与大小匹配。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和谐，和谐是真正的简便晚餐的特点。

即便人们独自享用简便的晚餐，也绝对不该在厨房站着吃，或是坐在电视机前狼吞虎咽。晚餐面包就是晚餐面包，它不是三明治。虽然面包不是掰开的，而是精心切成了片，但有基督教背景的人在吃的时候还是会想到最后的晚餐。正因为不是为了保持身材或是减肥才吃得这么简单，而是人们满足于朴素生活带来的幸福，因此新教的节食智慧“早餐吃得像皇帝，午餐吃得像侯爵，晚餐吃得像乞丐”听上去就不至于那么令人无望了。

要是刚开始吃这种简便晚餐的人这么吃还不足以尽兴的话，那就建议他开瓶啤酒佐餐。“不足挂齿的我，每天吃简便晚餐时都要喝一杯淡啤酒。我对这1.5夸脱啤酒的反应很强烈，它们总是能彻底改变我的情绪状况，让我变得安静、放松，心满意足地坐在靠背椅上。那时我的心

情是：‘这回一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和‘哦，我晚上的时光可真是惬意！’”1906年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这样写道。

作家上面那段话，会让吃简便晚餐中精通音乐的人马上在脑海中想起一首家喻户晓的歌，然后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噢，傍晚我多么惬意，/傍晚我，/寂静中晚钟响起，/晚钟响起，/叮当，叮当，叮当！”



“晚餐面包**”**当作烛台，由汉堡**Thesenfitz & Wedekind**双人设计室设计。

然而就是不那么精通音乐的人，吃简便晚餐时也不必默默地坐着。他可以打开音响设备，倾听斯文·雷格纳（Sven Regener）与其乐队犯罪

元素（Element of Crime）的歌："晒得黝黑的膀子每日打破/现实这块硬面包/就好似这是最后一次……/进晚餐/进晚餐……。"

简便晚餐历来就有一种倾向：孤独者把这顿饭当作冥想的好机会。同时晚餐餐桌几百年来又是一家之主与全家聚会的地方，他在桌旁向全家讲述白天的事，也让别人汇报当天所遇到的事，然后由他进行裁决。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一位逃离父母之家搬出去住的、正值青春期后期的年轻人就会觉得简便晚餐是最俗气和可怕的事。他发誓，今后晚餐吃什么都行，从听装意大利冷饺子到剩了三天的日本寿司，就是再也不要吃涂抹好的德式面包。

人们已经忘记了，过去在谈论文学、政治和其他世界重大问题时，在最有品位的圈子里主人提供给大家的就是这种配奶酪和香肠的面包。约翰娜·叔本华（Johanna Schopenhauer）充满骄傲地写信告诉她的儿子亚瑟（Arthur）——这个小伙子有着年轻人不可一世的倾向——在她魏玛的沙龙中客人们得到的不是美味佳肴，而仅仅是茶和抹了黄油的面包片。浪漫的柏林最著名的沙龙女主人拉埃尔·瓦恩哈根（Rahel Varnhagen）在请她那个时代的伟人们饮茶时，也用最简朴的东西待客。对讲究一些的简便晚餐的最生动描述出自身为法官与作家的费利克斯·埃贝蒂（Felix Eberty）之笔，他在《一个老柏林人的青春回忆》（*Jugenderinnerungen eines alten Berliners* ）中把我们带回19世纪前半叶："一般晚上聚会时大家满足于喝茶，吃抹了黄油的面包。桌上摆着几盘香肠片、火腿片和烤肉，虽然少而简约，却是一番精致。"

这种节俭的习惯与吝啬没有什么关系。人们有意要和那些天主教国家的人，比如那些在晚上大吃大喝的法国人划清界限。说真的：如果谁有机会能选择阅读以下诸位的作品——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威廉和亚历山大·冯·洪堡（Wilhelm/Alexander von Humboldt）、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贝蒂娜·冯·阿尼姆，那他就不会热衷于大嚼特嚼牡蛎、烤鹌鹑或是法式花色小蛋糕了。德国大资产阶级的女主人们在19世纪下半叶——那时德国精神已经变得膨胀起来——才开始竭尽全力用越来越花哨的丰盛菜单来炫富，这就并非偶然了。

精神晚餐最终没落，战后卡巴莱[2]演员沃尔夫冈·诺依斯（Wolfgang Neuss）的话可为明证。他说："今儿我不给自己弄简便晚餐了，今儿我得思想。"作为一种变化，要是能重新把思想变作简便晚餐的精神食粮该多好啊！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夜晚的寂静，啤酒之旅，下班之后，德国人的性情，爱整洁守秩序，社团迷，香肠

---

[1] 直译是晚餐面包/面包晚餐。（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

[2] 一种讽刺时事的滑稽脱口秀节目。

夜晚的寂静 [1]

窗户后面，电视机屏幕亮光闪烁。夜色渐深。电视里时钟的指针已跳到了午夜零点。夜的寂静笼罩四野，只有夜莺在小溪边唱它那凄婉的歌，低低的啁啾声在山谷间穿越。

一个新理了漂亮发型的电视播音员向悠闲坐在屋前树荫下的耕田人打招呼。炊烟从他的炉灶上升起，满足之感也油然而生。宁静的村子里有晚钟敲响，让远足的客人听来好温馨。这会儿，在那些遥远的城市里，或许船舶也已经驶回码头。

试图解救被罗蕾莱劫持的两名船员的行动很悲惨地失败了。[2]

市场喜滋滋繁忙交易的嘈杂声已渐渐消逝。欧元债务危机里最糟糕的阶段终于过去。可是金桥已塌，而上上下下竟然还这般沉静！不再会有什么能让我欢愉，我不再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浓烈的痛苦骤然释放，一股悲凉掠过心底，仿佛置身于疯狂的玩笑，心儿在炫目的深渊口狂跳。

心里的话已经说完，但是胸口依然不安。外交部劝告，若无必要，不要到胸膛深处游玩。[3]

德甲联赛北区大赛出了骚乱，就在燕子为唱晚歌骤然飞跃到屋檐下的横梁上之后。维持秩序的一队队警察很快让球场和城市恢复了平静。闲游浪荡的寻衅者顺顺当当被带到了火车站。

白天飞逝而过。黑夜展开大旗，带领星星登上夜空。疲惫的人群离开田地和工厂。飞禽走兽们待过的地方，现在落寞又荒凉。看时光虚度好心酸！渐渐向码头靠近的，是一列长长的拖船。灯光很快就会熄灭，就像你、我、一切所拥有的、一切所看见的，不消几年，也会这样，离去。这生命之于我，就像一条赛车道。

好了，现在到了天气预报：所有的峰巅之上都被寂静笼罩。所有的树梢之间你感觉不到一丝风儿吹过。小鸟儿们在林子里也没了声响。且稍待，不久，你也会安歇。[4]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编辑部感谢参与制作今日播出节目的奥托·劳布（Otto Laub）、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约瑟夫·冯·艾兴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作者：特·多

译者：郑冲

参阅：简便晚餐，下班之后，故乡，渴求瘾、林中寂寞



月光笼罩下的格赖夫斯瓦尔德，如此美妙静谧。

---

[1] 此篇虽短小，但循文末括号所注指引查找，查得该文其实是顺序引用了六位德国历史上著名诗人吟咏夜晚的诗歌，故而译来大费周章。因该文为散文格式，译文亦就之。诗之不可译古人定论，黔驴之技至此，见仁见智可矣。

[2] 这里是指2011年1月13日莱茵河上发生的翻船事故，装载着2400吨硫酸的货船“瓦尔德霍夫”（Waldhof）号在莱茵河上靠近“罗蕾莱”的圣戈亚斯豪森（St. Goarshausen）侧翻，两名船员失踪，是莱茵河航运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也是当时德国媒体反复报道的重大新闻。

[3] 由于2011年中东地区经常发生针对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的恐怖事件，德国外交部便在官方网站上列出对德国人来说不安全的国家（如埃及、叙利亚），劝告人们不要去那里旅游，另“胸膛深处”在德语里有“自省”之意，作者在此系以调侃口吻做隐喻。

[4] 该段引用歌德的诗《游子夜歌》（Wandrers Nachtlied），这首小诗在德国家喻户晓，深受人们喜爱，国内也有多种译本，如钱春绮的《游子夜歌》：“群峰/一片沉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栖鸟缄默。/稍待/你也安息。”冯至的《漫游者的夜歌》：“一切峰顶的上空/静寂，/一切的树梢中/你几乎觉察不到/一些声气；/鸟儿们静默在林里。/且等候，你也快要/去休息。”等等。

深渊

德国人刚刚还脚踏实地，相信世界，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健全理智，可一转眼，这一切都不复存在。镇静的确信化为乌有，脚下的大地在摇晃，甚或即刻裂成深渊。其命运犹如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 笔下那个可怜的士兵沃伊采克（Woyzeck），他正在荒野中砍荆条，突然不得不收住脚，因为他感到“脚下全是空的”。望着他那欺骗了（或是没有欺骗）他的未婚妻，他思忖：“每个人都是深渊，望下去就会让人眩晕。”

1954年，那位本不该被人遗忘的作家弗里德里希·西堡（Friedrich Sieburg）[2] 在其杂文《对毁灭的渴望》（*Die Lust am Untergang* ）中写道：“把世界或至少人类引向深渊，这一向就是德国人的差事。”他接着阐述：“深渊既可吓退人，亦可引诱人。深渊可以意味着自身本质的深邃或是毁灭，德国人始终愿意道出或散布令人类毛骨悚然的观念，听者有的为其伟大而狂喜，有的因其糟糕而错愕。”

不到四十年前，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西堡的榜样托马斯·曼将这一点表述得更加言简意赅和顽固倔强，他在杂文《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中写道：“德意志是深渊，让我们牢牢抓住它。”

抓住深渊：还有比这种想法本身更深渊、更德意志的吗？在形容深不可测方面，德语的相关词汇可谓丰富至极：鸿沟（Klüfte）、峡谷（Schlüfte）、深渊（Schlünde）、陷阱（Grüfte）。对思维与存在的深渊，没有哪个德国哲学家比马丁·海德格尔思索得更多，他堪称最正宗

的德国哲学家。他谴责那种追寻终极理由的哲学，这种哲学寄希望于一种作为支点的牢不可破的真善美理念。如果哲学家认识到，没有可以信赖的理由，他就必须忍受攫住他的眩晕："存在即深渊，这才是一切深不可测的困苦的深度，以及堕入深渊在劫难逃的极致理由。"

写出这类句子不是为了让人毫无困难地理解他们。因为海德格尔本意不在唤醒理智，也不想为任何正反命题提出明显的论据。他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根深蒂固的生存恐惧，人们小心翼翼地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固定模式以及各种保险制度来遏制它。这种恐惧就是：人们那表面看上去稳定的世界，包括自己的生存每时每刻都会倾覆。更为令人绝望的是：对为什么他脚下的实地不复存在，人们无法期待一种理性的答案。"深渊"的诅咒几乎并不按照因果性原则进行：不要没完没了地苦思冥想一件事发生的缘由，要学会不问所以然地活着！这种哲学姿态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会有多么糟糕，日后的史实即可明证。

每种宗教都试图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上帝/诸神如何创造了它，人们又是如何使其堕落以及因此必须受到相应惩罚。自柏拉图始，哲学也开始参与了这种劝善与批判并重的劳而无功之举。海德格尔最终给这种行为画上了句号。哲学家不应再试图逃避面对虚无主义深渊时的恐惧，以建立确信之塔的方式相信自己可以从塔垛对局势一览无余。相反，他应该热情地跳向深渊，在坠落中了解生活的真谛，直至在某个危岩上摔得粉身碎骨。

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先于海德格尔半个世纪前就号召用铁锤进行哲学思考，在《酒神颂歌》（*Dionysos-Dithyramben* ）中他借猛禽嘲讽道："热爱深渊者须有翅膀。"查拉图斯特拉在别处是作为超人的代言者受到颂扬的，在此他的心中产生了犹疑。他未能超越自我与世界，知道在坠落过程中他必死无疑。



濒临毁灭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

尼采肯定已经猜到，不久后他试图拥抱虚无的结果就是：自己在都灵的大街上拥抱一匹遭到毒打的马。“当你长久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在《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中他还精辟地写道。自我警示逐渐减弱，他的精神退入癫狂之不可思议的一片黑暗之中。

与其后继者海德格尔——这位至少短时间内相信过，身着褐衫即可跨过深渊——相比，难道尼采不是坚定不移地把那条危险之路走到底了吗？或许“深渊”思想家未能与纳粹运动划清界限仅仅是因为他感觉到，他在1933年就职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名声欠佳的演说中热捧的“这个觉醒

的崇高与伟大”，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是那种“奇妙的对深渊的渴望”，就像其偶像——最后也难逃疯癫命运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在许多民族中所发现的那样。海德格尔自己抵抗住了深渊的最终吸力，靠的是不时逃入脚踏实地的生存状态：逃入位于黑森林托特瑙山（Todtnauberg）中的孤独小木屋，在那里他得自己砍柴，自己到井边取水。

然而就是这个人们误以为并非深不可测的地方，在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一次绝对可以称得上令人费解的碰面的现场：保罗·策兰（Paul Celan）——出生于布科维纳（Bukowina）的德语犹太诗人，其父母被纳粹杀害于集中营——来托特瑙山拜访海德格尔。无论《死亡赋格曲》（Todesfuge）的作者对与《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 ）的作者会面曾抱过什么希冀，策兰在那个地方——哲学家在那儿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脚踏实地”——并未获悉海德格尔为什么趟了纳粹的浑水。相反，后者在日记中只是记了一笔：“带保罗·策兰看看黑森林”是件“有益”的事。

德国人确实不是绝无仅有受到深渊吸引的，通过设想熟悉的表面下窥伺着难以言表的东西，德国人的精神就会既激动又害怕。古希腊人把冥界之神哈得斯（Hades）想象在地心，但丁在其《神曲》的第一部分中对诸层地狱的描述就是一层层向下的。然而徒劳地试图把爱妻欧律狄刻（Eurydike）从冥府带回光明人世的希腊歌手俄尔甫斯（Orpheus）和意大利诗人但丁，他们都没有把冥府作为值得渴望甚至是充满希望的地方来歌颂。那里尽管自有其诱惑力，却是让人恐惧的地方。生于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伊曼努尔·康德一向头脑清晰，他以无欲无求的声音称冥府为“堕落的深渊”。

德意志之魂越支离破碎、背离此世，同时也得不到来自彼岸天堂的安慰，彼岸冥府对德意志之魂的吸引力就越强大，吸引它走向深渊，那里一切看上去都是可能的。谁感到尘世冷漠而不友善，天堂又是太虚无

缥缈的乌托邦，他就会在地心深处寻找自己（主观臆想）的安宁。没有异化的、温暖的故乡转入了地下。

至今都有很多西里西亚的民族舞、民族服装和其他团体，他们怀旧地自称为“Rübezahl”，这本是住在七峰山（Siebengebirge）内的举止怪异的山神的名字。巴巴罗萨（Barbarossa）[3] 的传奇则是所有德国人渴望地下故乡在政治上最有力的表达。

根据史实，这位斯陶芬王朝的国王、备受德国人爱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应该是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溺水而死。16世纪以来，传奇却说这位红胡子皇帝仅仅是隐退到哈尔茨（Harz）山脉中的屈夫霍伊泽（Kyffhäuser）山里，沉睡在那儿的一处地下洞穴中等待着重返故里。这位沉睡的皇帝四周弥漫着强大的希望：中世纪末的起义者在要求实行有力度的社会变革时想到了他；从反拿破仑解放战争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德国的民族力量总是把民族统一和强大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1817年诗人弗里德里希·吕克特以一首献给巴巴罗萨的叙事谣曲——它也是诗人最著名的一首谣曲——将其升格为偶像人物：“老巴巴罗萨/皇帝弗里德里希，/地下宫殿中/其魅力永存……”

纳粹把老巴巴罗萨永远打入了“地下宫殿”，其方式是他们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那场灾难性的对俄征战。

呼唤深渊有多么危险，那些敏感的战争狂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很久就猜到了。尽管他们凝视深渊时也好像看到了真正的天堂的镜像似的，但他们摆脱不了那种恐惧，怕最后还是会坠入地狱。

自中世纪始，德国人一直在聆听“好骑士”汤豪舍（Tannhäuser）的传奇，他前往维纳斯山（Venusberg），为的是与异教女爱神尽享爱的盛宴。尽管汤豪舍在离瓦尔特堡（Wartburg）不远的霍尔泽尔（Hörselberg）山中尝尽了精致的感官之乐，他却开始感觉到魔鬼的世

界牢牢地吸引了他。他突然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罪孽深重的，于是他前往罗马朝圣，祈求教皇的饶恕。教皇断然拒绝了他：对这类十恶不赦之举他不能赦免，就像他手中的圣杖再也不会长出绿芽一样。汤豪舍绝望地回到他犯下罪孽的地方：性爱女神要比耶稣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宽容得多，她让这位骑士再次走进自己的洞穴。就在骑士永远消失于维纳斯山时，从罗马传来了闻所未闻的奇迹般的消息：教皇的圣杖长出了新叶……

浪漫派时代，这首在情色深渊旁吟唱的颂歌——它披着基督教劝诫诗的严肃外衣，歌颂了教皇的严厉和上帝的慈悲——经历了其辉煌期。阿希姆·冯·阿尼姆（Achim von Arnim）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把这首民谣收进了他们的《少年魔号》（*Des Knaben Wunderhorn* ）民歌集；格林兄弟在他们出版的《德意志传说》（*Deutsche Sagen* ）中也讲述了这个故事；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则将这位骑士迷途知返的故事升华为一篇艺术童话。就连海因里希·海涅第一次读到这首古老歌谣时，也被维纳斯与汤豪舍的故事迷住了。他写道：“我宛如在沉闷的山洞中突然发现了大片埋藏在地下的金子，那简洁、带着原始力量的话语在我面前放射着灿烂光芒，我的心几乎被这不曾预料的辉煌迷惑……。这首歌不啻爱的厮杀，其中流淌着最红的心血。”

怎么偏偏是海涅，这位平时不放过任何机会批评浪漫派热衷基督教中世纪庸俗文艺的人，会如此为汤豪舍故事动情呢？吸引他的是那“被诅咒的性欲的深渊”，人们“盲目地”跳下这一深渊，而这种罚下地狱对他而言与基督教的地狱之火毫不相干。性欲本身，其“无限威力”就意味着一种诅咒。在海涅看来，尽管汤豪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数不胜数的英雄享用过维纳斯“百合般洁白的身子”，在他之后仍会有无数英雄前赴后继，可他还是抵挡不住维纳斯的诱惑。然而事情不仅仅是男人的嫉妒，骑士尽管可以像人们所说的，“不朽地爱”女神，可他自己却是要死

去并腐朽的。他与不朽的情缘不过是一种怪异的情缘，古希腊罗马时期诸神可以让他们喜爱的英雄不朽的美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同名浪漫歌剧中，同样的绝望把汤豪舍赶出了维纳斯山：“啊，然而我毕竟会死！/你的爱对我来说大过天。/神可以永远享受，/我却要臣服变迁。”瓦格纳让其骑士歌手抱怨道。

如果说所有浪漫者有一个共同的炙热内核的话，那就是：一直失败，却从不放弃，试图用一种方法对有限和可怜的现实进行审视、塑造与施魔，让现实平添一种无限感。为了制造出这种永恒的瞬间的悖论感觉，还有什么比性欲中的忘我投入更合适的呢？然而汤豪舍必须认识到，永恒的结合并不能为永恒的瞬间开启永恒的地平线。持续勃起不是救赎，而是让人难堪的僵化。

在瓦格纳的剧中，汤豪舍的救赎是在另一完全不同的深渊中才找到的——一位尘世处女对他的纯洁爱情的深渊。这份爱是如此艰深，以致“圣女”伊丽莎白为他伤情而逝。汤豪舍没有回到维纳斯的欲望之窟中去，而是紧随着为他心碎而逝者死去。对那些觉得其他死法都不够轰轰烈烈的人来说，殉情就成了他们最后得救的幻想。

海因里希·海涅不让其笔下的汤豪舍跳这种走向虚无的极端浪漫的双人舞。这里诗人不再是夜莺，而是变成了嘲鸫。在罗马遭到教皇的拒绝后，他笔下的骑士迅速回到霍尔泽尔山，当维纳斯下厨为这位筋疲力尽者做羹汤时，他先上床小憩。瓦格纳把该诅咒的情欲深渊升华为共同殉情，海涅讲述的则是：一切不过尔尔。你好好瞧瞧维纳斯深渊，你就会发现，到头来不过是一种寻常的两性关系，最多是有赴婚姻地狱的倾向。既非诅咒，亦非救赎，而是寻常事，你就认命吧！海涅给他的汤豪舍的对付平庸的唯一救命法宝就是讲故事。在长诗的结尾处他让那位失败的朝圣者讲述一路上的经历，其喜怒无常让人觉得已经是在聆听海涅

的叙事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了。

也就是说：瓦格纳那儿是逃离深渊向前冲，陶醉地遁入虚无。相反，海涅这儿是将深渊曝光为单纯的凹地，如果人拥有了可以讲述的过去，那么这种凹地还是可以忍受的，“因为过去是灵魂的真正家园”。

让我们在此瞥一眼那分开了条顿德国人和犹太德国人的鸿沟吧？前者让他的角色毁灭，如果他们对有限与永恒之间和解的渴望在此世落空的话；后者则满足于让其角色去讲故事。同样的鸿沟不是也横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egmund Freud）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之间吗？前者是浪漫派之后的灵魂考古者，他鼓励自己的病人把那些被时光淹没的故事讲出来。后者曾一针见血地概括出德国浪漫派与灵魂深渊的关系：“那些在内心深处神圣开放的东西，就让他们待在黑夜中，别硬让它们见光！”可以肯定的是：德意志-奥地利的犹太人早在大屠杀之前很久就稳健地质疑德国人对神圣深渊的迷恋——尽管他们自己也迷恋一些陈年往事——相反，他们对付这种迷恋的方法是分析和曝光。

深渊-性欲-时光停滞，或者如尼采让其查拉图斯特拉所喊出的：“所有的情欲都想永恒——向往深不见底的永恒！”此三重奏主题在“法伦的矿工”（Bergmann zu Falun）身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这个故事最早出现于1807年，医生和浪漫派自然哲学家戈特希尔夫·海因里希·舒伯特（Gotthilf Heinrich Schubert）在德累斯顿傍晚伴着烛光举行题为“自然科学的黑暗面”（*Nachtseite der Naturwissenschaft*）的讲座。其讲座旨在讨伐在不断发展的现代自然科学中产生的机械论世界观，作为对策，他允诺展示“人与自然这一最古老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有机和谐”。讲座中所论及的有梦游、催眠术、梦、无机物向有机物的转化或反之。其中舒伯特也提到瑞典小城法伦那位年轻矿工的命运：1670年他因事故被埋在

地下坑道中，半个世纪后人们偶然发现了他的尸体，据说尸体丝毫没有腐烂。这位自然科学家虽然也想揭示这一“奇迹”，据说尸体充满了硫酸亚铁；然而他更感兴趣的是故事的后续部分：没有人能确认这具尸体，直到一位拄着拐杖、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认出他就是自己从前的未婚夫。舒伯特是这样结束自己的描述的：“在他们本该举行的五十年银婚庆典上，人们看到的是僵硬、冰冷而年轻的新郎，而充满炽爱的新娘却已经满头银发、步履蹒跚。”



大山深处——矿山作为人们浪漫向往的地方。

19世纪初，这件感人而又奇异的事情绝非仅登在报纸的“世界奇闻”栏就完事了，当时的诗人——从约翰·彼得·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到弗里德里希·吕克特，从阿希姆·冯·阿尼姆到E.T.A. 霍夫曼（Hoffmann）——争相以此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就好像他们突然找到了自己走失多年的未婚妻似的。这不仅仅因为这个爱情故事与无聊流逝的

时间开了个荒唐的玩笑，让德国浪漫派觉得魅力无穷；同样重要的至少是这一戏剧性事件发生的地点：矿山。

那是德意志思想史中1800年左右最独特的支路坑道之一，不光探索者，就连诗人和思想家都发现矿山是灵魂“神秘袒露”的栖息地。最著名的、不断“驶入”阴暗和充满不健康气体的坑道的人就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这位枢密顾问一生中有36年都在研究图林根森林伊尔梅瑙山北坡的矿山，1780～1813年他甚至担任那里“矿山委员会”的负责人，但终究未能阻止矿山经营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坑道进水与塌方，还有长期资金匮乏。

18世纪90年代，青年亚历山大·冯·洪堡在普鲁士担任了矿产总督察顾问，年轻有为。当歌德在绝望中向这位成功的矿业同行求援时，他却没有伸出援手。这位相对年轻二十多岁的全才不想去图林根帮年长的歌德，而是憧憬着去世界的另一端探险。

写下了《夜之颂》（*Hymnen an die Nacht* ）、28岁英年早逝的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白天当盐场督察，供职于魏森费尔斯（Weißenfels）的盐场管理部门。当时的思想精英们凡是不能以职务之便进矿山的，至少也要在开阔眼界的旅途中弥补一下：1793年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与其早期浪漫派漫游伙伴、好朋友路德维希·蒂克一起参观了上弗兰肯（Oberfranken）名为“上帝的馈赠”的铁矿。其心醉神迷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暴露无遗：“我感觉自己就像要被吸收进一个什么秘密组织、一个神秘联盟似的。……”就连一向以热爱森林著称的诗人约瑟夫·冯·艾兴多夫也亲自拿起矿灯，以便怀着“虔诚的敬意”在地下倾听一下“精怪们的嗫喏”，还有那单调的滴水，是后者给石笋赋予了“类似于人的鬼怪形态”。甚至海因里希·海涅在1824年游哈尔茨山时，也按照那时流行的《哈尔茨山游客指南》（*Taschenbuch für Harzreisende* ）的推荐，置办了一套矿工服（海

涅称之为“囚服”），并参观了克劳斯塔尔（Clausthal）的两处名为“多罗特娅”（Dorothea）和“卡罗琳娜”（Carolina）的银矿。虽然他调侃道：“我先进入了卡罗琳娜，这是我见识过的最肮脏和最不讨人喜欢的卡罗琳娜了。”［谁要是看到这儿，联想起那两位女作家——她们是浪漫派那伙人的中心缪斯，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情感混乱——多罗特娅·施莱格尔和她那为时不长的妯娌卡罗琳娜·谢林，曾与其大伯子（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联姻，后离婚；那他就不正经。］但是在这篇银矿参观报道的结尾处海涅盛赞矿工们的生活是“真实和生动的”，没有丝毫讥讽之意。1737年史上第二位“御准女诗人”西多尼亚·黑德威希·曹轶讷曼（Sidonia Hedwig Zäunemann）就参观过那座后来由歌德管理的伊尔梅瑙矿山。几天后她带着一首颂诗返回：“矿山之美令我倾倒；/我愿自己是名矿工。”

至于这种对矿山的陶醉是德国人专有的特征，人们只需看看19世纪早期英国最有经验的赴德旅游者亨利·克莱普·鲁宾孙（Henry Crabb Robinson）在日记中的记载就一目了然了：“在圣安德烈亚斯山（Sankt Andreasberg）我怀着好奇心进入了一个矿井，结果我发现，那里没有什么可看的，极其无聊、消耗体力而且学不到什么东西。一般而言，我还从未见过这么不值一去的地方。”

让与其同时代的德国人人欣喜若狂的地方，这位英国人的反应却是咬牙切齿，这肯定有其外在原因：矿山在英国人那儿引起的联想与在德国人那儿截然不同。英伦岛上的矿山大多是煤矿，而德国矿山主要开采贵重金属（鲁尔河畔的煤层在19世纪初还未被发现，19世纪下半叶那里出产的煤炭让德国工业化能够有长足发展属于后话）。此外，德国，确切地说是“弗莱贝格王家矿业学院”（Königliche Bergakademie Freiberg）已是当时采矿业的麦加，全欧洲甚至美国的·大学生和专家都涌向萨克森中部，为的是拜那里的专家为师，学习所有有关“地球构造学”和“矿物分类学”的知识。专家中首屈一指的当数魅力四射的矿物与地质学者

亚伯拉罕·戈特洛布·维尔纳（Abraham Gottlob Werner），诺瓦利斯和亚历山大·冯·洪堡都曾是他的学生。［此外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矿业冶金大学仍旧存在，如今它的名称中加上了“资源大学”一词，这么做也是忠实于自己的传统，毕竟其创建人矿产总督察官汉斯·卡尔·冯·卡洛维茨（Hannß Carl von Carlowitz）在1713就已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

然而，德国于1800年前后在采矿与冶金方面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事实本身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那时德国思想界精英那么热衷于下矿井。尽管E.T.A. 霍夫曼和路德维希·蒂克在他们以矿山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中描述了，那些漂亮的“地下女王”是如何用自己此世罕见之美把忧郁的年轻人引向自己身边、引入深渊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释梦》（*Die Traumdeutung* ）中解释说，每次下矿井都象征着性交行为，这类情色性潜台词同样无法解释这一历史现象。

诺瓦利斯在其所发表的第一本格言书《花粉》（*Blütenstaub* ）中写道：“神秘莫测的路是向内的。”这不是在给他所监管的魏森费尔斯盐场写的招揽游客的广告词，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沉入自己未知的“精神深处”。读一下诺瓦利斯未完成的小说残稿《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就会发现，要想找到“向内之路”，看来没有比下矿井更好的捷径了。关于矿工他在该书中写道：“其孤独的营生让他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既不见天日，又与人隔绝。面对天国的深邃事物他没有习惯成自然地变得迟钝和冷漠，而是保持着一种童心，在这种氛围中一切对他来说都那么美妙奇异、原汁原味、五彩缤纷。”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地心更能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个人与造物主创造的万物之密不可分；时间一长人们的这种感觉就淡漠了，虽然正是这种感觉才能真正地震撼灵魂。诺瓦利斯的这种想法不仅是自然浪漫的，而且同样是基督教的：在让《奥弗特丁根》中的老矿工在矿山中有第一次“内心”经历之前，他给了他一盏矿灯和一个十字架。

在《论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in Deutschland* ）一书中，海涅觉察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作为极端内向的基督教新教创始人与路德的父亲是个矿工这一事实间的内在联系：“这个男孩时常与父亲下矿井，那里有强悍的金属生成，也有生生不息的古老水源滴落，他那年轻的心大概不自觉地汲取了这种最神秘的自然力。”

吸引着歌德的也正是矿山那种“最神秘的自然力”。生物形态学家——这方面他是个纯粹的自然浪漫派——歌德声称，从花岗岩作为“大自然最古老、坚实和不动摇的儿子”到人类心脏作为“最年轻、多样、灵活、多变以及造物之不可动摇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所以他夸赞一切能让人感到这种统一性的情景，无论是降入矿井，还是爬上花岗岩山峰如哈尔茨山的布罗肯（Brocken）峰：“这里你直接驻足于通往地心最深处的地方，在你和原始世界的坚实地面间没有较新的岩层，也没有冲击聚集起来的瓦砾。”这么一来，深坑又以悖论的方式成为异化了的人类脚下所能赢得的最坚实的土地了。然而，作为失败了的矿山经营人歌德最清楚：认为采矿首先是为大自然建一座地下庙宇，在里面举办庄严的熔合和自我发现的仪式，这是一种误解。正如歌德在一次矿山演讲中所说，采矿就是把“自然深藏地下的馈赠发掘出来，让它们见天日”。

一种古老的恶习——对万物以及自己的灵魂进行掠夺式瓜分，会让人直接坠入深渊。歌德在《浮士德》（*Faust* ）第二部分中——写于经历了伊尔梅瑙矿山改建失败后——并非出于偶然地让由土地神——它们自嘲地称自己为“岩石外科医生”——组成的合唱队冷嘲热讽：“可是我们采掘出黄金/便召来了偷盗邪淫。”[4] 浮士德的求知欲使他想知道，“世界内部靠什么维系”。在为一位从前的同事写的庆贺从业纪念日的诗中，矿山负责人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最狭窄的坑道中，在最深的矿井下/寻找一盏点亮思想的明灯/共同观照，自然最终能否让人探

究出自己/岂非美哉？”这种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不仅仅满足于毫无进一步兴趣的认知满足，而且要写出掌控自然的脚本。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起采矿的名声就不佳。奥维德（Ovid）和塞尼卡（Seneca）对这一不敬神的行当的指控一直延续到让-雅克·卢梭，后者称矿工为早期猛兽型资本家，他翻腾“地球的五脏六腑”，“冒着生命危险、不惜以健康为代价，在地心寻找自己所想象的宝藏”。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更是把矿山直接叫作“dark Satanic mills”——“撒旦的黑厂”。

相反，我们的盐场督察诺瓦利斯在《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中的呼声则完全两样：“上帝一定会保佑采矿的！因为没有任何别的艺术会让其参与者更幸福和更高尚的！”

德国人是不是疯了？

反正他们相信，虽然四周充满了资本主义的诱惑，人却能够保持纯洁的性情。“矿工贫穷地来到世上，又贫穷地离开这个世界。他满足于知道什么地方发现了金属矿藏并将它们开采出来，然而那些闪闪发光的金属并不能改变矿工那颗纯洁的心。他没有疯狂地企图去占有它们，他的喜悦更是因其奇异的构造、罕见的产地而生发。它们一旦成为商品，就失去了对他的吸引力。他宁愿在地下冒着千难万险去寻找它们，也不愿随着它们的呼唤到外面世界，到地面上去通过各种狡猾的欺骗手段去获取它们。”

对矿工行当的这种充满爱意的美化并非全部来自诺瓦利斯所特有的狂热。出生于格劳豪（Glauchau）的文艺复兴时期学者格奥尔格乌斯·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在其开山之作《论矿冶》（*De re metallica* ）——有关矿物学的最早教科书——中就要求矿工必须是劳动者中最出色的，在道德方面既要超过农民，也要胜过工匠，因为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原材料会引诱人做出最悖理逆天的行为：人们为了金子会发

动战争，也会图财害命。与诺瓦利斯一样，阿格里科拉充分相信上帝，所以他认为会有心地纯洁的矿工。

同样，歌德在其第二部不朽的晚期作品《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 ）里确信——其程度要超过在《浮士德II》中——人在追踪地下宝藏时并非一定会引起谋杀或过失杀人。此书中“敲石者”蒙坦（Montan）独自隐居在山中，常深入沟壑之中，为的是“和它们进行不可思议的无声对话”。因为他知道：“为了彻底拥有和掌握某物，必须为了它而研究它。”虽然这里也用了“拥有”和“掌握”，但恰恰不是遵循目的明确的再利用逻辑，而是一种态度，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将其概括为：“德意志本质即为做一件事而做一件事。”

只有把深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深渊对他们来说才能成为稳固的地基、成为“亲切的”地方。海德格尔的深渊是全然毫无缘由的，这里的深渊则完全没有疑问。谁心怀叵测——无论是什么鬼胎——进山，必死无疑。在约瑟夫·冯·艾兴多夫的作品中，那位贪婪的挖宝人被埋在坑道里，“疯狂的嘲笑声/从塌陷的岩缝中传出”。可怜的伊利斯·弗略博姆（Elis Fröbom）在E.T.A. 霍夫曼《法伦矿山》（*Die Bergwerke zu Falun* ）结尾处死在坑道中，尸体保持年轻不朽，因为他把老矿工的话当成了耳旁风。老矿工曾告诫他，如果他选择矿工这个职业仅仅是为了能娶他的心上人，而不是出于“对奇异岩石和金属的真爱”，那是会发生不幸的。

德国人以感人的天真方式试图解释采矿的意义，将它拽出资本主义的深渊，让掠夺自然与崇拜自然和解。由于他们知道，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采矿还被浪漫提升为社会项目。歌德开始接手矿山管理工作时，就曾以救世主的激情宣布说，他将帮助伊尔梅瑙那些“可怜的鼹鼠”，“那些具有两面性的金属，它们被人用来做坏事比做好事的时候多，今后为了金属的荣誉，开采它们只能造福人类”。当歌德失败，矿

山再次——主要是因经营不善——关张时，这种社会浪漫就戛然而止了。

想以既社会（主义）又浪漫的方式经营矿山，在歌德之后很久东德作家弗朗茨·菲曼（Franz Fühmann）的企图也失败了，这种企图同样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吸引着他下矿。但他的失败是在另一层面上的，作为作家他失败了。他在曼斯费尔德（Mansfeld）和图林根对铜和钾盐矿井做了十年调查研究，1974年6月——作为在桑格豪森（Sangerhausen）工会图书馆举行作品朗读活动所要求的报酬——他首次被允许进入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矿井。他兴高采烈地给妻子写信："乌尔苏拉，我下矿了！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启示！我愿意来这里生活！"他向出版社的编辑通报："我找到了余生要写的题目：矿井下！"

菲曼给自己极为狂热的计划起了一个临时标题"矿山"（*Bergwerk*），这本书应该成为他老年的收山之作，但未能完成。这不光是因为作者于1984年逝世，在去世几周前他曾对一位老矿工说："矿山不复存在了……。设施全不行了，也修不好了。我无法向你解释为什么，你就把它当作现实来接受吧。"

阅读1993年作为遗著出版的《矿山》文本和片段，为什么这位"非无产阶级出身"——曾因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而成为"工人和农民的德国"之公民——的作家最后一部巨著必遭失败就一目了然了。他绝望地分析道："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是我的天职，创作文学作品是我生命的意义所在。但让二者统一起来，或是更确切地说让它们保持迄今自然而然的统一，对我而言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这位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出身的诗人走上了比特费尔德之路[5]，来到无产阶级矿工中间，却充满惭愧地发现，他在坑道中想到的不是国家利益定额是否完成，而是E.T.A.霍夫曼、蒂克、诺瓦利斯和所有其他浪漫派作家是带着什么样的生死欲望下到矿井中的。来到废墟，背对未来……对这位幻想破灭的东德作家

来说，骄傲颂歌就这么逐渐消失了。

其同辈作家同行米歇尔·恩德（Michael Ende）的处境要好得多，在自由的西方他甚至可以把一个“说不完的故事”说完！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让自己的主人公去幻想，把他们送进“画的矿井”，其中一位盲矿工看守的不是全民所有财产，而是“被人们遗忘的梦”。菲曼也允许自己做梦，“文学是一座矿山，数千年来有一辈又一辈的人下井采矿，每位作家自己都是一个坑道，而他置身于其中的矿层就是他的经验”。两德统一后不久，米歇尔·恩德在一次采访中直率地对这种思想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迄今为止浪漫派是唯一原汁原味的德意志文化成就。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我们或多或少从国外照搬到德国来的，浪漫派是第一次成功地让外国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试着继承这一传统，因为我认为自己完全是个德国作家。我坚信，这种典型的德意志声音不该在世界各民族的合奏音乐会中销声匿迹。”

无数德国诗人和思想家从中或在其中汲取了原材料的浪漫派深渊还剩下些什么？是对在戈莱本（Gorleben）附近盐丘中堆放的核废料桶的恐惧？是社会民主党开党代会时同志们齐声高唱古老的矿工之歌《好运，好运，工长来了！》时所能体会的那缕社会浪漫？还是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到，浪漫的矿井已经像纳粹为其“第三帝国”的白日梦所挖掘的地下碉堡和工厂隧道一样被永远密封了？

得过诺贝尔奖的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卫道士，在好几十年时间里他都遗忘了自己参加过武装党卫队的历史，战争刚结束时他曾在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的一座钾盐矿工作过。他在1963年出版的《狗年月》（*Hundejahre* ）——但泽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中描写了一座矿山，“它既不开采钾盐、矿石，也不开采煤炭，却在850米深处进行作业”。他以此作为中心隐喻来代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在老坑道中狂怒地继续生产，就好像昨天的事没有

发生过似的。“没见过”矿山的来访者来到这座地下工厂的反应就是喊道：“天啊，这是地狱，真正的地狱！”这座地下工厂对向世界各地的出口起着稻草人的作用——由德国破烂构成的德意志稻草人：他有时戴着著名的海德格尔式小丑帽，咂嘴咂舌地训诫何谓“被吓着”；有时以班贝格（Bemberg）交响乐团成员的身份穿着褐色工作服演出《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 ）中的片段；或是对基本法的条款品头论足。不言而喻，最后必须留在地狱中的那条狗只能叫“普鲁托”[6]。

《狗年月》还未被收入“奥贝里德（Oberrieder）坑道”，那是黑森林附近的一座停产的银矿。20世纪60年代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其扩建为地下“民族宝库”，即使在和平时期，穿军装的人也不得进入其三公里以内的地方。这里深深的地下已沉睡着十多亿份文件，它们被拷贝在缩微胶片上，密封装入由16颗螺丝钉铆在一起的不锈钢桶中，即使发生核战争都不会被摧毁。根据联邦公民保护和灾难援助办公室的评估，倘若有一天这个国家不复存在，这些文件可以向后世展现到底什么是德国文化和历史。感谢这一文化掩体，感兴趣的重新发现者在1500年后仍旧可以研究威斯特法伦和约文本、教皇宣布开除路德教籍的通谕、科隆大教堂的建筑图纸、席勒和歌德的手稿或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总谱。2004年在“吞下”（Verschluckung）活动[7]框架下，50名当代艺术家——如约尔格·伊门多尔夫（Jörg Immendorff）和克利斯托夫·施林根西夫（Christoph Schlingensief）——的作品原件也同样被密封进不锈钢容器，运进“奥贝里德坑道”。只有生活在很久以后的未来、热衷于文化的人才有观赏这些作品的眼福。

离奇吧？是的，如果人们想到纳粹的大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和其“废墟价值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只允许使用那些建筑材料和必须进行那些静力学思考，即那些在数百（或数千）年后得以让日耳曼尼亚留下的废墟至少能像古罗马的废墟那么栩栩如生的。

虽然德国人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妥善封藏艺术品的唯一民族——1954年通过的《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曾特别呼吁这么做，但其历史悠久的心性——“全面彻底、神秘莫测、深不可测”再次大放异彩。

对深渊的狂热不可以是幼稚的。每个愿靠近悬崖的人都该知道那两行谨慎的诗，在德国文学中是用这样的诗句来呼唤深渊的。它们是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神秘德国》（*Geheimes Deutschland* ）一诗的开头两句：“拉我去你的边缘，深渊——却不要让我疯癫！”不知喜爱格奥尔格、刺杀希特勒失败的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在临刑前——那是1944年7月21日，在柏林国防部办公楼内——高呼“神秘德国万岁！”时是否想到了这两句诗？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工作狂，登山片，浮士德，德国式焦虑，音乐，爱整洁守秩序，怪诞之事，莱茵河——父亲河，林中寂寞，女人

---

[1] 卡尔·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德国作家及革命家。主要作品有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丹东之死》、讽刺喜剧《莱翁采和莱娜》、悲剧《沃伊采克》和小说《棱茨》。

[2] 弗里德里希·西堡（1893～1964），德国作家、记者兼文学评论家，曾经是纳粹的同路人，纳粹当政时任外交官，在德国驻比利时和法国使馆工作。战后转而支持阿登纳政权。

[3] 指外号“巴巴罗萨”（红胡子）的腓特烈一世（1123～1190），德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2年即位，在位期间六次入侵意大利，一生穷兵黩武，残酷杀戮，但并未取得多少实质性胜利。

[4] 见《浮士德》，转引自网络。

[5] 1959年4月24日Mitteldeutscher出版社在比特费尔德化工厂召开作家代表大会，讨论如何让劳动者积极参与艺术与文化创造。此后“比特费尔德之路”成为东德社会主义文化政策新方案

的代名词。

[6] Pluto，古罗马神话中的冥神。

[7] 为纪念《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公布50周年，2004年5月在德国举行的一次艺术活动。

工作狂

1990年我乘火车从法兰克福去米兰。一对来自施瓦本[1]的夫妇坐在我对面。过了曼海姆以后，上来了另一位乘客，不久我们便知道了他是意大利人。当施瓦本太太把自带的苹果削皮去核切成大小相等的块块时，施瓦本先生一边啃着妻子之前递给他的加肠面包，一边和意大利人交谈起来。那人说，他是个外籍工人，来德国20多年了，很喜欢德国。施瓦本先生笑着说，他也热爱意大利。他和妻子虽然只去过那里一次，在亚德里亚海边呆了两个星期，但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立即吸引了他。他不得不说，意大利人就是懂得生活！受到称赞的这位意大利人以礼貌的微笑作答。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施瓦本太太嘟囔起来，眼睛仍停留在切苹果上："但也得干活不是？"

至今我无法确定，那位削苹果者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是被迫扭曲成那样的，还是自觉自愿心满意足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下面这个古老的柏林笑话，她绝对笑不起来："你们干什么营生？""先生，我们不干，是营生推我们去干。"

按照《圣经》旧约的观点，劳作是上帝给予人的惩罚；根据生机主义的活力论，劳动是给人带来快乐的行为，只有在劳动中人才真正成其为人。到底该听谁的，西方从一开始就莫衷一是。而在德国，意见双方更是各自都达到了极致。

《圣经》旧约观点在德国第一次强有力的影响是马丁·路德翻译过来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其中所宝贵的只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路德《圣经》译本中

诗篇第九十首听起来就是这么诗意而无情。在这位宗教改革家之前，神秘主义者已经提升了劳动的地位，尽管（恰恰是）他们给劳动披上的是一件丑陋的外衣。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2] 就说过，拾柴火也能得到上帝的垂怜，只要心是向上的。然而神秘主义者始终——谦卑地——坚持，他们苦行僧式静心养性的祈祷生活高于世俗的劳动。

路德反对这样的观点。他毫不留情地激烈抨击了教徒生活那一套，自以为丢下日常劳作，全身心追随上帝就能走上灵魂得救之路了。“无论高低贵贱，每个人都得做他理应去做之事，从事他的职业。啊，这是多么必需而富有教益的指导思想！以为只要照着表面看到的圣徒的样子去拜拜神就好了实在是个误区啊！”

出自1522年教堂布道书的这段话给德国的职业概念带来了颠覆性的后果。身为奥斯定会修士时的年轻路德，就已经把“职业”一词与神赋的精神上的蒙召联系在一起了。《圣经》翻译完成后，在讲到纯粹的经营工作时，他突然也用“天职”这个词了，这已不是什么改革，而是一场革命了。这位神学家在解释把“天职”扩大到世俗范围去的理由时说：“耶稣没有想让人人都有成为他的继承人、去作圣徒的使命感。”“我需要各种各样的仆人，不能大家都做同一件事。”在前面提到过的布道书中，路德让耶稣如是说。“上帝无须牺牲，只需服从。因此，一个想上天堂的虔诚婢女，只要服从命令，扫院子，挑大粪，就是走在正道上，而另一个成天只去教堂，不干活儿的，就只能下地狱。”路德之后，哥林多前书中圣徒保罗的告诫“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开始产生巨大影响。

但是，路德所奠定的新教刻苦勤勉的劳动激情16、17世纪时尚未广泛形成，德国人因此而出名（或遭恨）是后来的事情。路德教牧师约阿西姆·威斯特法尔（Joachim Westphal）那时曾徒劳地告诫人们要警惕“懒惰的魔鬼”，要求“遏制肉身，不受迷惑，转向劳动”，或者像圣徒马太

那样将无所事事之人的担忧揭出来：他会在睡梦中恐惧，会发疯发怒，不吃不喝，最后像条狗似的乱叫。即使在严格的禁令下，全国范围的行乞也只是部分得到遏制。虽然，德国人的劳动激情确实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大城市里手工业欣欣向荣，从汉堡到奥格斯堡贸易兴旺，但是“三十年战争”毁灭了德国的这第一次经济奇迹。荒芜的大地上疮痍满目，外加中世纪行会制度对工艺现代化的制约。行会更多的只是促成了工余时间的集体酗酒。当时唯一受益的经济领域是餐饮业。1700年前后，一个两百户人家的小镇就有三十到四十家酒馆的情形不在少数。

又一次给德国人戴上守纪律、勤劳作紧箍咒的是虔信主义，而且这一回比路德做得扎实。不反对口腹之欲的宗教改革家还是给感官享乐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此外，他的恩典说也保护这一点，按照恩典说，能否得到救赎完全取决于上帝不可洞悉的意愿，与人一生是否勤勉守法、做了什么无关。路德认为，获得恩典的关键在于深深地忏悔所犯罪孽和乞求，靠认认真真干活是得不到的。

当初，原本就观点不一的虔信主义运动也还没有一定要在上帝的名义下把人变成干活的机器。虔信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让在路德说教下已僵化的心重新活跃起来。对路德教来说，一个基督徒“重生”的关键经历是“忏悔之战”及随之而来的“突破”。虔信主义者坚信上帝的国度在此岸也是可以达到的，这样它们就与路德分道扬镳了。菲利普·雅可布·施潘纳尔（Philipp Jacob Spener）是17世纪下半叶形成的这个新教流派最重要的早期代表。他没有背离路德的一点是，他已经从无度的劳作中嗅到了神化人的行为之危险。他主张给人休息，以修身养性，这是“上帝的意愿”。

施潘纳尔主张的修身养性不久就被彻底推翻了：劳动与祷告被视为同等。1695年，比施潘纳尔小30岁的奥古斯特·赫尔曼·弗朗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试着在哈雷（Halle）附近的格劳哈（Glaucha）建立

虔信主义样板园。起初的计划方案是一所孤儿院，很快弗朗克基金会便发展出了一个包括三部分的学校系统，不仅收容和教育流落街头的穷孩子，就连普鲁士贵族也把他们的子女送进来了，为的是他们能健康成长。同时，这座“上帝之园”也促进了哈雷市的经济发展，除了学校，还开了一家药店，不久就开始大量出口药品，此外还有了印刷厂和书店。

威廉一世国王是弗朗克基金会最热心的支持者。为了节省，柏林的宫殿他只使用其中几个房间，对他那酷爱科学艺术的父亲留下的财政烂摊子，他进行了有效治理。这位“士兵国王”的生活宗旨是“除了劳作，别无他求”。因此而受到敬畏的他曾亲自从马上下来，用手杖痛打被他抓住的懒惰臣民。他视弗朗克为志同道合者，弗朗克的口号是：“我们必须一生劳作，以求得救升天。”

由此，勤勉敬业在德国第一次被誉为虔诚的生活方式。弗朗克学校的学生们肯定得按时祷告、唱赞美诗，同时，他们也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最关键的是，孩子们从小就要习惯于坚持劳动。不劳动即犯罪。“让孩子们干活不仅仅是让他们能挣点钱，不白吃饭，更重要的是劳动可以预防无所事事带来的种种可耻、有害的恶习，比如欺骗、酗酒、赌博、淫乱、偷窃，等等。”弗朗克继承了路德教神学家尤斯图斯·梅纽斯（Justus Menius）写入《致克利斯蒂娜》（*Oeconomia Christiana*）一书中的这一信念，并在他的“上帝之园”内付诸实践。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著名的1904～1905年研究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来自新教伦理的论点。广义上说这个论点有说服力，但是虔信主义在资本主义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模糊。还是卡尔·兴利西斯（Karl Hinrichs）表述得精确。在多个调查中，这位历史学家研究了德国虔信主义与英国清教主义之区别，得出的结论是：“虔信主义不是一个主张和鼓励个人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宗教。它与同时代的加尔文清教主义晚期形式不同。德国虔信主义崇尚‘为他人’而工作，英国

的晚期加尔文主义主张‘为自己’”。说得更明确一点：“在英国，清教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开端，在德国是社会主义。”

弗朗克的思想确实和后来那些催人勤奋的社会主义者如出一辙：只为自己灵魂得救而工作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虔信主义的信徒深信不疑的是，“一生要为上帝的荣耀和他人服务，为上帝和他人牺牲同样有意义”。每一个人“要尽其所能，为拯救自己和他人免遭天谴而不懈努力”。

强调要对他人负责，像对自己一样，对加尔文教徒来说是陌生的。他们信仰中的宿命论更接近路德的恩典说：一个人在出生时上帝就已决定他是否得到拣选，之后再没有提升的可能。加尔文教徒之所以会成为孜孜不倦的劳作者，应该从心理而非宗教的角度去解释。因为，始终折磨着他的问题是，活着的时候从哪里能看出自己是属于能成为圣徒一族的呢？路德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简单而粗暴，没有人能对自己封圣深信无疑；加尔文教则给人提供了一个充满艰辛的安慰：每个人事业、经济上的成功与否便是证明。因此，加尔文教徒不是为了能够封圣而工作，而是为了向本人和他人证明自己是一个圣徒而工作。社会教育学的纪律教育在这里变得毫无意义，没有工作使命感的人，可以不干，就让他拖着被诅咒的灵魂等待最后的审判吧。

像弗朗克那样，坚信上帝的决定在人出生之时尚未做出，恩典可以通过坚持不懈、勤勉刻苦的生活争取，这样就为广泛地动员辛勤工作打开了大门。因为，上帝更愿意看到，每个人不仅自己尽心尽力工作，而且拯救更多的人脱离罪恶的泥潭。虔信主义的爱人如己不是去施舍，送乞丐一件大衣不如教会乞丐去制作大衣更慈善。即使路德眼中很可疑的富商，在弗朗克看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好人，只要他不独享盈利，而愿意资助基金会，比如他在格劳哈的那个基金会，或建立新的基金会。威廉一世国王让这个信条成为国家的社会政策，把大型私人企业转变成国家

和基金会企业。这样一来，贫瘠落后的普鲁士王国在18世纪经历了双重飞跃发展：与经济并行的是建立了大量培养热爱工作的年轻一代的机构，那里出来的后生走进工厂、作坊，毫无怨言、不知疲倦地织布或生产种种别的东西。

“为普鲁士国王工作”，这个口号令思想家们至今争执不休。它的意思是说要为上司卖命呢，还是说工作其实是为了自己？这里涉及的怕远不是一个学术问题。第一种解读根据基督教义而来，劳动一定得干到伤筋动骨才能起到净化作用，理想境界是人人都成为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臣仆。第二种解读歌颂人的创造力，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原本只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思想、设计付诸实施，理想境界是手工工匠和艺术家。

启蒙运动虽然不再相信此岸的努力会在彼岸得到奖赏，但他们仍忠实于对工作的激情，为它编织了新的花环，把它从基督教的梦魇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理想主义的自我表现。其翻译的荷马史诗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的古语言学家约翰·亨利希·福斯（Johann Heinrich Voss）1801年曾写过这么一首诗，为劳动高唱赞歌：“劳动是愉悦，不是挨罚，只有劳动让我笑哈哈。无所事事的人啊，你那漫长的时日如何打发？我们只盼天久久，时长长，快步如飞去干活，总嫌不够忙。”

福斯的诗歌和歌德的配起来，是一首很好的二重唱，《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n Divan*）中，歌德这样吟道：“工作着，时日短，若彷徨，时日长。”有一次，歌德孜孜不倦的秘书、速记员艾克曼（Eckermann）大胆地指责大师抵抗拿破仑战争期间，没有为国效力，歌德回答说：“每个人遵天命行事。当我行之事我不分昼夜，刻不曾停，尽我所能，毫不懈怠。若他人个个如我，天下太平焉。”

无止境的好奇把歌德创作的浮士德交到了魔鬼手中，但正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工作保护他免入地狱。“不停追求与努力的人，将得救

赎。”《浮士德II》结尾时，天使唱着这样的歌将浮士德接入天堂。

“劳动使人自由”被变态的纳粹刻在集中营的大门上，遭到滥用。而歌德当年是很赞同这句话的。席勒大概会比较克制。1784年，他在动员普法尔茨上流社会的老爷们为曼海姆剧院捐款时说：“人的天性无法忍受无休无止地被缚于劳作的折磨。”在《论人类审美教育书简》（*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一书中，他以更激烈的言辞抨击功利社会对人的摧残和割裂：“永远只做整体中某个细微的工作，人本身也会变得细微而残缺；耳中只听到他所开动的那个轮子的单调声音，就永远无法发掘出本性中的和谐。人的天性一旦被扼杀，他就成了会说话的机器。”唯一能够治疗这种“毁灭”的良药就是美学经验。席勒在解释剧院作为道德教育机构的必要性时说，为避免工余时间“无节制地瞎逛，陷于酗酒和堕落的赌博”，最好、最适合的休闲方式就是上剧院。只有那里还保留着业已消失的古希腊理想：“寓乐于教，让休息与思考，消遣与学习相得益彰。”

到了浪漫派那里，世俗的劳作彻底成了限制人个性发展的桎梏。虽然浪漫派诗人们，从盐场督察诺瓦利斯，到普鲁士官吏约瑟夫·冯·艾兴多夫以及法律顾问E.T.A.霍夫曼都或多或少地恪尽职守，但对他们来说，真正的生活开始于放下工作，进入艺术。而且，不是所有的艺术形式，只有诗歌才能真正让人自由。

浪漫派的彼岸不是一个死后灵魂才有希望进入的地方。他们虽然无比崇尚和大肆歌颂死亡，但仍试图在此地和现在就让彼岸发光。“假如你能掌握那个秘诀，便能让世界放声歌唱，欢歌藏于万事之中，梦想带它飞向远方。”艾兴多夫在其诗歌中呼唤的掌握“秘诀”的艺术，靠勤勉和自律是学不来的。让世界放歌，自己通过世界的激励放歌，只知照规则干活的老实工匠是难以完成这双重使命的。只有天才的诗人才有可能和足够坚强，既全身心投入，又保持住自我，直至最后，人与世界能有

瞬间的和解。真正的生活在自己内心和所有事物的深处，艺术的力量就是要穿透表层。精英们只在深处才能相遇。

这一切，与世俗的经营活动自然无关。浪漫派大腕儿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其广受批评的《露辛德》（*Lucinde* ）一书中，甚至把以往一贯受到诅咒的无所事事吹捧为“残留的、唯一从伊甸园带来的与神相近的本性”。自然，他说这话时，所指不是中世纪对天堂的那种想象，只要仰面躺在地上，煎熟的鸽子会自动飞入口中。施莱格尔反对“执着的、无中心、不停顿的前进前进”这种“北方的陋习”，因为它会剥夺人自身的创造力，“只有以平和、温良的心境，在无为的、天堂般的宁静之中，人才能反思自己，审视世界和人生。不全身心地投入和献身于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中，如何能思考与赋诗呢”？

令席勒和浪漫派无奈的是，这种要让人成为人而不是木匠、官员或婢女的精神活动对德国的普通大众来说充其量也只是工余饭后之事。倒是伊曼努尔·康德的看法让大众觉得得到了认可，他说那些以“健康的理智勤奋工作的”德国人比任何天才都更有用。晚期歌德也同样，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一书中，他已告别了对世界各个领域无所不知的浮士德式的全才。书中，年轻的威廉始终在寻找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位置，他固执地认为“全面的教育和知识是必需而有益的”。他年长的朋友亚诺（这时已自称“蒙坦”[3] 并专心致力于采石）对他说，“现在是需要单一技能的时代，理解到这点的，能专心掌握一种技能是最好了。头脑简单的，当个工匠；聪明一点的，学门艺术；至于天才，一通百通，干好了一行，就知道别的应该怎么干”。

自我实现的美梦飘然而去，古老而神秘的基督教观念——拾柴火也可以是最崇高的事，又悄悄通过世俗的后门溜回来了，在空空如也的教堂穹顶上，它无助地不知如何说明所有劳苦烦愁有何益处。因此，希望人能够在劳动中成为人而不仅仅是正开始高速运转的资本主义大机器上

的一个小齿轮，这样的渴望在19世纪再一次有力地抬起头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把浪漫派从诗歌的殿堂拉出来送进了工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Die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中，年仅26岁的哲学博士在分析“异化劳动”之狡诈时说：“工人没有在带来愉悦的劳动中回归自我，而是毁于越来越狭隘、单调而无聊的劳动。他在劳动中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在马克思看来，许多工人像逃避“鼠疫”似地逃避劳动，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而是他们对非异化劳动的感念尚未彻底泯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原罪在于它只允许利用关系的存在：自然缩减成了原材料；劳动的人成了劳动力、机器部件。与动物不同，人有生产比自身直接需求更多、更有意义东西的自由，然而，在资本主义那里，只剩下剥削者的自由，他们可以住宫殿，工人只能缩在“贫民窟”。

如何从异化的地狱逃生呢？在另一部与恩格斯一起写成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 ）中，两人共同憧憬着劳动的解放。而这只有在取消了被青年席勒抨击过、老年歌德叹息着辩解过的“分工”之后才能实现：“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尖锐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餐后从事批判，而不必老是当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因为“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所以一群快乐的外行也能生存下去的

幻想在19世纪还是渐渐枯萎下去了。替代劳动的解放的是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恩格斯在1877年发表的《反杜林论》（*Anti Dühring*）中写道："只有在大工业化生产极大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把工作无一例外地分给全社会成员，限定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以便他有足够的业余时间去参与社会的其他事务，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中的。"通过劳动在人、社会和自然间建立起鲜活的相互关系之浪漫主义理想只剩下技术高超的蜜蜂建蜂房的集体浪漫，工作之余能做的仍是对着蜂房再嗡嗡几声赞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克虏伯、曼内斯曼等钢铁、化工、机器制造等工厂每周苦干六七十个小时的德国人真能感受到"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尖锐对立吗？按照马克思《资本论》（*Das Kapital*）的观点，必然王国是为自身物质需要生产，而在自由王国里，劳动不再是为了需要和外在的目的。难道，德国人早已进入在机器般的劳作中看到更高程度自我实现的浪漫境界？

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认为，正是德意志灵魂中的这一点，让他的同胞饱受怀疑。1916年，他在慕尼黑做过一个题为"仇视德国之原因所在"的报告。基本命题是：早在战争爆发前，德国这个"历史上的暴发户"就已经是全世界最受仇视的民族了，因为德国人凭借工作狂把其他民族都赶出了他们优哉游哉的乐园。东边的邻居除了"做梦、幻想、感受，祈祷"以外，就想喝酒；英国人之所以做买卖，是为了"周五晚上就能结束工作去运动场"；至于法国人嘛，"少生孩子攒起了钱"，是为了有闲享受奢侈的生活，工作个二三十载就颐享天年。

这时突然冒出了德国佬，"身穿工作服，手握有力的拳头，不为名利，不为赶超，不为工作以后能享受，也不为有空闲能欣赏美和思考，而是自觉自愿全身心投入工作，带着一股看起来怪吓人的坚定不移、一

丝不苟和精准守时，全然忘我地干、干、干。让全世界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么干纯粹出于喜欢干，没有目标，没有目的，没有终点”。

这样一种工作狂，同时也是最高境界的工作乐趣，在舍勒看来，不是随工业化加速发展才出现在德意志帝国内的现象，而是“日耳曼古老本性的陪嫁品”。比舍勒年长一代的生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已经说过，日耳曼人的行为不出自一个合理的目标，而是一种超乎所有目标的巨大能量。

舍勒曾举学识渊博的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为例，来解释德国人的无尽追求。据说莱布尼茨曾说，每天早上一醒来他就有无数的奇思妙想，要都写下来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他把无尽的完美，而不是某一个可以实现的完美视为人类所有努力的目标。同样，不谈“永恒的追求”“无尽的义务”也就无法理解莱辛（Lessing）、歌德、康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哲学家埃米尔·博德罗（Emile Boutroux）曾做过一个关于德意志之魂和法兰西之魂的报告。报告中，这位法兰西科学院的亲德派解释了他对德国的热爱如何随着德国从歌德转向克虏伯消失殆尽，是的，他甚至变得厌恶德国，因为德国人将自己生来追求理想主义的工作之魂出卖给了物质主义。

舍勒在报告中对这一诊断持有同感，德国人在19世纪确实发生了巨大转变。他强调，虽然新兴的工业化劳作之根源仍来自古典人文主义永不停息的追求，但他不赞成他的同胞们不徜徉于思想的天空而宁愿迷失在工厂，“应该为国家，为国家的荣誉，特别是按照圣经，应该为信仰献身，成为‘殉道者’，为自身的福祉，为高尚的精神文化价值付出，而不是投身于鞋底、缝衣针之类的生产。为经济劳作献身不是高尚的，而是滑稽的。克莱斯特（Kleist）笔下洪堡亲王出征时的英雄气概、激情坚毅和不怕牺牲，不能用到面包、香肠和缝衣针的生产中，亲王那样做

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国王”。

托马斯·曼对此提出了——至少是间接的——反驳。和舍勒关于仇视德国人的报告一样，写于一战前夕的《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中，作家把“不堪重负、处于衰竭边缘”的劳动者称为“现代英雄的生活方式”，把他塑造的小说人物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奉为“资产阶级新公民”的英雄（托马斯·布登勃洛克29岁就成为家族商业帝国的掌门人，为公司鞠躬尽瘁也未能挽救其覆灭的命运）。作家承认，无法想象自己去从事资产阶级艺术家以外的职业，但是，与埃克哈特大师及歌德一脉相承，他强调，关键不在于你做大事还是运粮食，工作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工作：有序、执着、勤奋、主观意识、“我要尽全力做到最好”。

托马斯·曼把英雄境界强加给普通劳动者的想法大概会遭到同行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的嘲笑，他认为普通劳动者干得再多再苦也只是普通市民。1932年，当云格尔把工人奉为新时代偶像的时候，眼前出现的一定不是香肠工厂里舍勒式的“殉道者”，而是大汗淋漓的肌肉男，在一战与二战枪林弹雨的间隙中，在蒂森、克虏伯和曼内斯曼钢花飞舞的高炉前继续着英勇的斗争。

云格尔在一战中多次负伤、获奖，他认为工作是战争之继续，其手段和把兰赫马尔克（Langemark）、康布雷（Cambrai）的战壕变为地狱全然无异，现代职场如战场。渴望危险的探险之心，期待着与生活角逐，但不得不承认，20世纪除了物质大战别无选择。机器被提到不可抗力的高度，只有劳动斗士才敢与之较量或结盟。

和共产党人、国家社会主义党[4]人一样，云格尔也梦想着炸翻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和云格尔式的工人并列的经典无产者就像是穿上了蓝色工作服的小市民。马克思、恩格斯田园般的蜂房变成了疯狂的马蜂窝。“工作展示了拳头、思想和内心的速度”，运格尔写道，“日日夜夜

的生活，科学，爱情，艺术，信仰，文化，战争；工作是原子震动，是推动日月星辰运动的力量。”

假如云格尔的工作概念是绝对的，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种种恐惧和担忧，主张无止境地工作和献身，倒也让人愿意接受。将工作视为自由之因素无可指摘。只是，如果仔细看一下云格尔对自由的解释，就让人不敢苟同了。从路德开始的专制传统，经普鲁士-虔信主义到黑格尔一脉相承，把自由与顺从附庸于一个大的整体混为一谈。在云格尔眼中，自由与自己决定是否献身以及为什么献身无关。自由的含义是：成为当家做主的新人类当中的一员，认清自己在“劳动岗位”中的位置。人最大的幸福是能够做出牺牲，指挥的最高境界是指明值得为之牺牲的目标。

清楚地知道了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德国的社会主义专制会造成何等灾难以后，肯定是要忙不迭地埋葬掉那些英雄赞歌，庆幸德国人总算也懂得享受一点生活了。不应忘记的是，即使聪慧敏锐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对极权主义之迷途进行过透彻分析，仍坚持认为，现代消费公民的幸福理想——有足够的时间“留给自己”以便享美食、看电影，其实是“不幸”的。



“劳动红旗奖章**”**是民主德国自**1955**年至其消亡向**“**多年为巩固和加强民主德国做出突出贡献，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优异成果**”**者颁发的奖章。

生活在法制国家，人人都认同“生命是最宝贵的”。这一信条德国人近几个世纪才认识到，其他西方国家稍久些。在以往的英雄历史上，信奉的都是“生命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宝贵的生命如何才能避免耗尽在享乐主义的冷漠中而失去应有的价值，这个问题仅有信条并不能解决。阿伦特在其《积极生活》（*Vita Activa* ）一书中怎么说来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挥人的所有能力，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完全有可能在亘古未有的、致命的、毫无结果的被动消极中结束。”

在自愿选择的工作中干到精疲力竭，哪怕这工作只是生产香肠，也比无所事事地数手指头强。精力过剩的日耳曼后裔，永不停息的奋斗者，施瓦本的削苹果女人，握着有力大拳头的普通工人都还大有人在。

否则，以“总有活要干”做广告的德国最大建材市场到现在没破产该如何解释呢？

作者：特·多

译者：徐静华

参阅：深渊，浮士德，桁架建筑，下班之后，汉萨同盟，神秘主义，爱守秩序，福利国家

---

[1] 德国南部地区，那里的人以极为勤劳，只干活不享受，非常节俭甚至吝啬出名。

[2] 埃克哈特大师（1260～1328），德国神学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其布道对当时和后代影响极大。

[3] 意为采矿。

[4] 即纳粹党。

包豪斯风格

“如果从立体主义开始的现代绘画，从勋伯格（Schönberg）开始的现代音乐，从包豪斯（Bauhaus）开始的现代建筑，以及我深恶痛绝的患了厌食症的文学从未存在过的话，那么人类其实没有错过任何东西。”美国大文学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99年在一次和《明镜》周刊谈话时这样说道。

包豪斯虽作用非凡，却业绩平平。从业绩上讲，包豪斯有一个既多产而又不显山露水的前者，它成了在工艺美术界后来居上的竞争者，这就是艺工联盟（Werkbund）。

这一联盟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07年就已经创立了，其宗旨是把手工、艺术、建筑和工业联合在一起。欣欣向荣的帝国需要务实性强、功能性强和标准化的产品。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出现了一系列新气象，帝国社会展延开来。大市民阶层追求独一无二，而老百姓则期待批量制作的产品。一个国家的生计不仅靠劳动，同样也靠消费。

于是艺工联盟发明了整体厨房（Einbauküche）（这一类家具尽管对减轻家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还是不宜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发明的东西难登大雅之堂，所以这一类发明总是带有一丝庸腐气息）。

德国的日用美术起源于慕尼黑的分离派（Münchner Sezession）经历的两件事。艺术家理查德·理莫施密特（Richard Riemerschmid）喜迎婚事，却找不到合适的家具，于是他决定自己设计。几乎与此同时，建筑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接到通用电气公司（AEG）的任务，

设计这家公司的广告。这是德国首创的“公司识别”（CI）。理莫施密特和贝伦斯是艺工联盟的两位创建者。一年之后，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为艺工联盟撰写了第一本宣传册，名为“德国手工艺术”（*Deutsche Gewerbekunst* ）。

亨利·凡·德·菲尔德（Henry van de Velde）在魏玛开办的艺术学校亦属于艺工联盟的一部分。1919年，艺工联盟成员瓦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接管了这所学校，并使其成为由他所创立的包豪斯的根据地。接下来的十年里，艺工联盟和包豪斯共同存在。格罗佩斯依然是艺工联盟的成员。同时，包豪斯以标新立异的方式塑造自我形象，其目的是要把自己描写成建筑先驱。这种做法并不令人称奇，先锋派要做让人信服的工作，大都是站在队伍的最前列的。

1923年，格罗佩斯在描述包豪斯的精神境界时，多少带有些晚期浪漫派和表现主义的口吻：“当今世界的思想已经可以识别出来，只是其外形还有些模糊不清。古老的二元世界图景，即与全体相对立的个体的这种思想已经苍白无力，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型的世界统一体思想，它能够把各种对峙的力量加以调解，包容在自身之中。对事物和现象相统一的这种开创先河的新认识，为人类所有的造型工作找到了一种深深根植于我们内心的共同意义。每一个造型，不多不少，都是我们的内心思维要求我们去塑造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我们内在本质的宣言。只有这种工作才有精神内涵，机械化的工作是没有生命的，那只是死板的机器的任务。”

不久，包豪斯的形象便趋于独特而无法取代。之所以无法取代，是因为包豪斯懂得如何让自己无法取代。这其中不仅包括了包豪斯的理念，还包括了如何去传播包豪斯的理念。包豪斯不仅在其建筑和设计构想上先进，而且在自我推介和自我广告上亦是如此。除了包豪斯的建筑外，包豪斯发行的《包豪斯》杂志和书籍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包豪斯”到底是什么已经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当人们听到包豪斯这个名字的时候会联想起一些什么。人们可能会想，对呀，这个名字似曾相识啊！也许是平屋顶，或者是照明？无所谓啦！这些都是包豪斯的发明。平屋顶也许可以成为包豪斯的识别标志，但是在今天谁还喜欢平屋顶呢？倒是那盏灯知名度很高，那盏款式永恒的台灯可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如果在步行街上询问行人什么是包豪斯，也许大多数人会联想到与此同名的建材市场。这是一家经营装修工具、房屋建造、修整花园的市场。因为在德国有125家分店，所以一个口号就重复了125遍：在包豪斯客户就是国王。

人们说，包豪斯是符合时尚的。包豪斯给人们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符合时尚地生活。包豪斯的前卫派不仅是一种形式的游戏，同时也从建筑空间里汲取社会属性。包豪斯理所当然地把内部设计加到建筑中去，并且把设计和使用价值结合起来。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但是其作品是否能让人接受，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除非是人们出于礼貌不去询问抽象的意义。

包豪斯通过建筑的简洁唤起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建筑关系每一个人。和谐的空间结构和抽象的线条产生出流线的形状。人们总是感觉捕捉到了关键。包豪斯建筑的那种流线形状使其可以适应环境。这些形状几乎可以适应任何建筑情况。流线型并非一种理念，更不是一种前卫。它能够很好地与现存的建筑相配合。包豪斯被犹太难民带到了特拉维夫。包豪斯存在于布加勒斯特。在美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可以见到包豪斯。包豪斯既适用于30年代，也适用于50年代。早在1950年，慕尼黑艺术之家（Münchner Haus der Kunst）为包豪斯做了第一次专题展览。这家展览馆的前身名为“德意志艺术之家”。正是在这个地方，1937年纳粹举办了所谓“堕落艺术”展，包豪斯的几个作

品也被纳入其中，展览的目的是恐吓百姓。但正是在这个展会上，纳粹得到了了解包豪斯建筑风格的机会。后来，在大西洋岸边的壁垒中居然还留下了包豪斯风格的防御工事。

包豪斯艺术思潮的文献得到了妥善保管。最早人们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建立了一座包豪斯档案馆，后来档案馆搬迁到了柏林。

包豪斯似乎就根本没有做商标保护。包豪斯作为艺术潮流青史留名，不必做什么保护，而建材超市也不必做什么保护。包豪斯不和建材超市竞争，建材超市也更不会与艺术家们竞争。自己做手工活如今只是业余爱好，艺术界对此很坦然。

包豪斯虽然标新立异，但是并未与传承一刀两断，而是对它们兼收并蓄。因此包豪斯的诞生是一种逻辑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必然，就像一条线展延下去。艺术的包豪斯是魏玛共和国的产物，也是其传奇的一面。这个时代比较左倾，或者说人们希望左倾，至少想接近民众，迎合大众口味，所以美的东西也必须是有用的东西。1919年在魏玛启动这个项目时，格罗佩斯宣布“要集所有手工艺科目之大成”，人们很难不把它设想成一个模仿整体艺术范畴的整体手工艺行业。这难道不是一个举国上下齐动员的愿景吗？

包豪斯宣扬实用艺术，国家乐意赞助。但真正意义上的包豪斯作为设计和建筑项目以及教学机构却是短命的，它的命运与魏玛共和国唇齿相依。真实的包豪斯在强大神话的背后烟消云散。人们并不去过问包豪斯到底剩下了什么，而是茫然无策：到底什么是包豪斯，什么不是包豪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不久，人们把眼光放在法兰克福市歌德奖获得者瓦尔特·格罗佩斯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身上。他们是探寻传统的领军人物，而这一传统与纳粹特征毫不相干。

1968年，联邦住宅建设部部长宣布，包豪斯属于德国的民主传统，其意义不亚于授予包豪斯以联邦功勋十字勋章。这是对包豪斯神话的盖棺定论，同时也为联邦共和国的生活情调指出了方向。以这种情调设计出一把椅子，与其说适合革命家鲁迪·杜赤克（Rudi Dutschke）[1] 入座，倒不如说更适合花花公子贡特·萨克斯（Gunter Sachs）[2] 入座。

德国统一后，包豪斯所在地又一次成为公众的聚焦点。包豪斯成为德绍（Dessau）的一个旅游景点，但所剩的也都是一些断壁残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代的建筑群是其无法续存的原因。工业家和大师们的别墅已经被摧毁殆尽。人们决定以一种“不求精确”的原则来重建古迹，也就是说既有修复也有新建。人们以历史为榜样，但并非停留在此。

神话的力量在于，所有现代建筑看上去都像包豪斯风格，哪怕所有这些是事后的作为。

作者：里·瓦

译者：李鸥

参阅：烫发，桁架建筑，德国人的性情，庸俗艺术品，爱整洁守秩序



瓦尔特·格罗佩斯建造在德绍的包豪斯建筑。这是所有包豪斯建筑的鼻祖。

---

[1] 20世纪60年代西柏林的学生运动领袖。

[2] 20世纪60、70年代因其奢华的生活作风被视为花花公子的典型。

登山片

本来根本不应该有这类片子。拍这类片子的人无视理智与科学，却坚信人类力大无穷。他离开技术化世界，为的是逃进深山，背囊中却装着拍电影所需要的全部摄影装备。大城市人让他觉得可疑，同时他却在为这种人拍电影，好让他们坐在汉堡和柏林（或是巴黎和纽约）电影院的椅子上，感同身受地了解暴风雪是怎样刮过勃朗峰（Mont Blanc）的。德国没有壮观的山峰［对不住了，楚格峰（Zugspitze）[1]！对不住了，瓦茨曼（Watzmann）山[2]！］，可偏偏是德国人创造了登山片并将其推向了极致。

倒叙：弗莱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那时候电影业刚刚起步。在杂耍剧场和“老影院”中娱乐德国观众的是斯科拉达诺夫斯基（Skladanowsky）兄弟[3] 的《拳击的袋鼠》（*Das boxende Känguruh*），卢米埃（Lumière）兄弟[4] 则向目瞪口呆的人们展示火车如何驶入普罗旺斯的一座火车站。在美国五分钱影院（Nickelodeon）中观众更是可以成为火车袭击案的目击者，在意大利刚刚拍出了第一部史诗电影《你往何处去？》（*Quo vadis*？）

就在画面磕磕绊绊地向前奔走时，阿尔卑斯山登山运动正准备最终壮大成熟。如果说1492年借助梯子和其他工具攀登陡峭的艾吉耶山（Mont Aiguille）[5] 或是1786年首次攀登勃朗峰这种登高冒险还绝对是个别行为的话，那么19世纪下半叶这类向峰顶的冲刺就成为有组织的活动了：1857年第一家阿尔卑斯登山协会在伦敦成立，接下来的几年中奥地利、瑞士和德国的相应协会纷纷成立。1865年英国人爱德华·温珀（Edward Whymper）与其同伴登上了神秘的马特宏（Matterhorn）峰（下山时其四位同伴不幸遇难）。1896年第一家高山救援组织开始提供服务。1911年奥地利人卡尔·布洛迪希（Karl Blodig）炫耀自己是征服了所有阿尔卑斯四千米以上山峰的第一人。

在摄影和登山两方面都在蒸蒸日上的氛围中，有两个既热爱摄影又热衷爬山的年轻人不满足于在黑森林爬那些矮山了。他们是纺织艺术家泽普·阿尔盖尔（Sepp Allgeier）和地质学大学生阿诺尔德·范克（Arnold Fanck），他们向往更高的山峰，也想向一直生活在平原的人展示高处的优美与崇高。

熟悉康德的艺术理论家会吓一跳。优美与崇高？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不是学过，优美的东西和崇高的东西是尖锐对立的吗？一方面是和谐，让人的感官感到舒服；另一方面则完全是一种强力，是对所有感官

的苛求。不是只有当人调动他所有的超常勇气，敢于正视可怕的局面时，才能“享受”崇高吗？

当这两位年轻的登山片之父在收拾攀岩、滑雪和摄影装备，准备在崇山峻岭中拍摄最初的纪录片时，他们根本没有被康德的理论所束缚。对他们来说，优美和崇高的事物其实水乳交融。还有什么能够比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皑皑新雪的山坡更优美的？还有什么能够比骤起的暴风雪把刚刚还一片祥和的山坡变成雪崩地狱更崇高的？20世纪20、30年代拍摄的戏剧性登山片，也就是充满英雄气概的人在岩石和冰雪间如何求幸存的过程，使优美是否同时也能崇高的问题更趋尖锐化。但早期的登山片还未表现献身于阿尔卑斯山上的悲剧性人物，而是拍摄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教益的东西［《在4628米高处滑雪——登顶罗莎峰》［*4628 Meter hoch auf Skiern-Die Besteigung des Monte Rosa* ），1913年；或是麻辣娱乐片（《雪鞋奇迹》（*Das Wunder des Schneeschuhs* ），1920/21］。

唯一令二人组合阿尔盖尔/范克在初拍电影时不高兴的是：在他们之前有个英国人就已经把摄影机拖上了马特宏峰。可那些画面既不美也不崇高，无论自然背景再怎么美，攀登阿尔卑斯山的成就再了不起，仅仅拍摄人如何登山或是怎样乘雪橇顺坡而下也是不够的。如果摄影机以局外观察者的身份立在那里，人与山之间的张力是表现不出来的。它必须成为所发生的事情的组成部分，让人与山贴得更近，让二者的碰撞更剧烈，跟二者一起兴奋，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组有魔力的三角关系：观众、高山和登山者。为此可以使用一切手段。

此间已经读完博士学位的阿诺尔德·范克和泽普·阿尔盖尔——日后的专职摄影师——不断发明新摄影技术：因当时还没有变焦镜头，导演范克就使用了裁剪各异的黑色蒙片，对画面进行聚焦。他不断订购新镜头，调出自己的冲洗液，后来他为研发第一代单镜头反光摄像机做出了

贡献。再后来他让人把摄像机安装在滑雪板上，以便观众可以感同身受地体会在雪地速滑下坡的滋味。这种“奔放的相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对银幕的痴迷。

就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慕尼黑思索其“世界脱魔”理论之时，弗莱堡两位登山片开路先锋踏上了征途，为了证明并非整个世界都失去了魔力。相反，那些懂得正确使用最新技术成就者甚至可以做到，为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失去魔力的东西更添魅力。他们既是崇尚自然的汉子又是技术狂人，是登山迷同时又是电影发明家。

人们尽可以怀疑：弗兰肯斯坦博士（Dr. Frankenstein）实验室中研制出的怪物会不那么吓人，只要把它迁移到山里头去的话。影评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给整个登山片体裁所下的著名判决“前法西斯主义”却太过浅显，这一点史实可以证明。其实登山片的悲剧在于：它亲手毁灭了它本想保护的事物。以美的形式臆想出来的技术与自然的和解富有欺骗性。范克与他的团队所拍摄的那些有关荒凉的处女山的杰出画面一经送到山下，即使是生活在最平坦的大城市的人都想立马去登山。阿尔卑斯-电影艺术魔术师们宣称：高山在呼唤！没过多久，文明追随着这种呼唤就研发了越来越多的新缆车、吊椅索道和推雪机。然而人们还没有大规模挺进阿尔卑斯，而是仅仅涌进了离自己最近的影城。这就是说：某位大城市女子还没进山就变得不安了。

1924年6月：柏林诺伦多夫广场（Nollendorfplatz）地铁站

一位年轻女子，8月她将满22岁，不断把身体的重量从一条腿转换到另一条腿上。她在等车，她的膝盖受了伤，尚未确诊，估计是韧带拉伤。她正在路上，不知是去看第几位专科医生了，这是一场灾难。就在6个月前，她开始了充满希望的自由舞生涯：她在慕尼黑、柏林、苏黎世和布拉格举办了舞蹈晚会，评论界态度是友好的，甚至堪称热情。然后一个错误的跳跃，钻心疼痛从此不断，看来一段时间内她是跳不成舞了。

这位年轻女子就是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6]。要到十年之后她才成为那个先是名声赫赫、后又声名狼藉的纳粹女导演。在6月的这一天，她还是个既狂热又沮丧的年轻舞者，在焦灼地等待下一班地铁。

她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自己人生转折点的："我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对面墙上的……广告，突然我被其中的一幅吸引住了。我看到一位男子正用双脚分别蹬住左右两边高耸的山岩。下面写着：《命运山——阿诺尔德·范克博士拍自多洛米蒂山脉的一部影片》（*Berg des Schicksals-Ein Film aus den Dolomiten von Dr. Arnold Fanck*）。刚刚还在为自己的未来苦恼哀伤的我，像被施了催眠术一般盯着这幅招贴画和画上的男子，他腾跃在陡峭的岩壁上。"

莱尼·里芬斯塔尔忘记了地铁，忘记了膝盖的疼痛，也忘记了医生。她走进了电影院，《命运山》还没有演完，她就决定，自己这个土生土长的柏林人要到崇山峻岭那里去。她从未想到山会这么美。这一夜她失眠了，她苦苦思索着：吸引着她的难道仅仅是大自然吗，还是拍摄那部电影的艺术？

倒叙：**1923**年，南蒂罗尔（**Südtirol**），塞拉（**Sella**）地区一山间棚屋

一位脸上化了一半妆的男子从棚屋中猛冲出来，高喊着："我为此害羞！面对群山我感到羞愧！"

阿诺尔德·范克博士叹了口气。这全是因为他现在不再和一小群喜欢登山的朋友们一起拍电影了，从前每个人都有机会摄影，或是脚蹬滑雪板在画面上飞驰而过。这部电影可别成为他的命运山。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他最终知道，自己钻进了死胡同。没有情节的电影多少有些气数已尽。"不要再拍攀登纪录片，不要再拍滑雪达达片"，不久前一位拍电影的同行对他说，"真正的影院需要真正戏剧性的情节，而真正戏剧性的情节需要真正的演员。"

尽管如此，他现在必须应付的问题都不容易。他先是启用了一位来自苏黎世的演员，天晓得他都有些什么本事，反正面对群山他就像个傻瓜，还好他至少跟他解了约。可他现在把主角给了这位来自格勒登（Gröden）的登山向导和面条厨师，这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呢？

那家伙还在喊："我不让人给我化妆！山岳不是也没上妆嘛！"

范克博士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其实这条疯狗是对的。瞧他那头颅，整个一座性格纪念碑！他若是激动起来，那眼睛会放电！女人们看见他会成排地昏厥。让他来演是个正确的抉择，他叫什么名字来着？——特伦克尔（Trenker）。

柏林：位于动物园附近的宇宙电影股份公司大厦，1926年圣诞节前夕

德国登山片三巨头相聚了。闪着亮光的字母显示的是：《圣山：自然画面构成的一部戏剧性诗作》（*Der heilige Berg. Eine dramatische Dichtung in Bildern aus der Natur.*），导演与剧本：阿诺尔德·范克博士，主演：莱尼·里芬斯塔尔、路易斯·特伦克尔。这之前还有一段荒唐故事。莱尼·里芬斯塔尔不顾膝盖损伤来到了多洛米蒂山，她后来还要多次做出这类冲动决定。一次在旅馆放映完一部登山片后，她凑上去对特伦克尔说，“我要参加下部片子的演出”。这位来自南蒂罗尔的演员取笑这位来自普鲁士的疯丫头。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她的照片收了起来并转交了范克。范克从弗莱堡前往柏林，登山片导演与舞者一起喝了一杯咖啡。几十年后莱尼·里芬斯塔尔写道：“我内心沸腾得犹如一座火山。”

第二天一早她就躺到了手术台上。膝盖必须恢复正常，而且要快。要不她怎么能滑雪和学习攀岩呢？她也必须重新跳舞。手术过后的第三天，因熬夜而备显疲惫的范克走进了病房，他隆重地把《圣山》的手稿递给了她，这是他的心血之作，也是为莱尼·里芬斯塔尔量身定做写就的。他问她是否愿意……？

莱尼·里芬斯塔尔立刻答应了。然而却留下了误解的余地：女演员可以，女伴侣不行。范克认为全赖特伦克尔。里芬斯塔尔辟谣，特伦克尔辟谣，人们仍旧怀疑。

拍摄过程中，导演跳进了一条山涧，舞蹈家/女演员用瓶子扔他，本想当建筑师的导游/面条厨师/男演员认为一切都“愚蠢可笑”。

就在真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像轻歌剧脚本中那样一片混乱之时，银

幕上的人际关系上升到了大歌剧的水平。女舞者迪奥提玛（Diotima），她像希腊爱神阿佛洛狄忒一样来自大海，来到阿尔卑斯山演出。两位登山爱好者在格兰德旅馆看了她在台上的表演，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爱上了她。迪奥提玛对年轻的维戈（Vigo）——由范克的外甥出演——的喜爱充其量不过是姐弟式的挑逗；比较成熟的“朋友”——由路易斯·特伦克尔扮演——却令她动了真情。两个男人均憧憬着在上头——“最美的山巅”的订婚场景，半路上特伦克尔不得不目睹他所心仪的迪奥提玛如何抚摸一位男子的头发，而这位男子则跪在她的面前，把脸贴在她的腹部。他失控地冲向山里，把年轻的登山伙伴一起带向了危险的北坡。黑夜降临，山谷中升腾起暴风雪，雪崩向登山者袭来。维戈想回去，特伦克尔却问道：“山下那群无赖中有特别让你牵挂的吗？”这时他才突然意识到，让他丧失了理智的那被抚摸的脑袋正是维戈的脑袋。他威胁地站到维戈面前，这位年轻人为躲避他一脚踩空。一整夜特伦克尔在暴风雪中都牢牢地抓住伙伴身上的绳索，起初年轻人还在悬空蹬踢，后来特伦克尔明明知道他冻死了，却仍旧不松手。拂晓时他看见一座冰教堂的画面，他的迪奥提玛正和他一起步向圣坛。冻得半僵的他追随着自己的登山伙伴从坚守多时的窄岩上纵身跳下了深渊。

与相隔不到一个月在柏林同一影城首映的《大都会》（*Metropolis*）完全相反，这部电影大获成功。另一位导演弗里茨·朗（Fritz Lang）呈现给观众的是制片厂中搭建起来的巨大未来布景，并使用了所有表现主义电影的诀窍；而范克则在片头宣告：“在电影《圣山》中参演的著名运动员提请观众不要把他们的表现当作摄影特技，他们是不屑于拍这种镜头的。全部户外摄影都是真的在山里拍摄的，而且是在阿尔卑斯山最美的地方拍摄的，耗时长达一年半。”

阅读当时的影评人们就会发现，吸引城市观众的恰恰是其“真实背景”，也就是宏伟的自然景观，而充满激情的情节引起的反而是嘲讽和离间效果。难道范克博士费尽心思今后要拍带情节的登山片的初衷都是

无用功不成？

如果没有人们的求生拼搏，那些满足现状、飘浮而过的云和山以及暴风雪的画面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圣山》所阐述的核心内容与所有后来的阿尔卑斯山戏剧性事件所阐述的毫无二致：山里世界是为人类灵魂竖起的一面有放大功能的镜子。灵魂若是失衡，就无须奇怪大自然的反抗。

每位银幕上的登山英雄首先都充满敬意地与山岳和睦相处：他无畏地靠近山，却没有丝毫狂妄，勇气与谦恭并存。所有登山片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都是由既担心又褊狭的未婚妻或母亲提出）：“你总去登山，在那上边到底寻找什么？”主人公往往用倔强的沉默来代替回答，最多挤出一个词“自我”。只有当登山不掺杂其他目的时，才能彻底体味成功登顶的幸福。登山英雄为这种阿尔卑斯山式为艺术而艺术付出的代价是孤独。大多数人不理解他，在山下他被认为是废物和疯子。如果和用以反衬分崩离析的大都市的电影相比，真正的登山片并非庸俗地把山村美化成理想的社区。这么做的是后来的乡土片，这类片子在后英雄时代不光彩地取代了登山片。

只有自己也毫不妥协地渴望登顶的伙伴，才能理解孤独的登山英雄。登山片所认可的最高价值——不说是唯一——的人际关系就是伙伴情谊。这令它接近战争片，但它还不至于是“前法西斯主义”工具。

一旦伙伴关系的男人们在灵魂中出现了裂痕，灾难就不远了。造成这种裂痕的原因多种多样：虚荣心过盛，成为登顶的竞争对手。然而最糟糕的莫过于：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圣山》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阿诺尔德·范克从与里芬斯塔尔的恋情中解脱出来了，他为她写的新角色中，女人已经不再是祸水，而是升华为登山伙伴。在接下来的电

影《大跳跃》（*Der große Sprung* ）中——这也是范克、里芬斯塔尔和特伦克尔三人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三角恋悲剧已经变成了三角恋喜剧。在范克与无声片导演帕布斯特（G.W. Pabst）合拍的《匹茨帕吕的白色地狱》（*Die weiße Hölle vom Piz Palü* ）中，虽然莱尼·里芬斯塔尔身边仍旧有两个男人，而且最后那位有魅力的“独行侠”不得不死去，但他反正已经厌世了，多年前他的年轻妻子因为他的过失而在登山过程中毙命。他自愿牺牲自己，好让和他一起遭遇暴风雪的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活下去。莱尼心存感激地接受了这种牺牲，她一直勇敢地在为挽救年轻丈夫的生命而搏斗，她的丈夫在电影中多数时间都毫无知觉地被绑在深渊上的一处冰凌上。

接下来范克和里芬斯塔尔又合拍了三部影片：导演让他的女主角在一部片子中扮演天文学家，通过无线电波和被困在勃朗峰气象观测站的爱人保持联系；在另一部片子中让她饰演笨手笨脚的滑雪新手。作为补偿，允许她作为轻便划艇女划手、身着轻巧的海豹皮衣前往格陵兰（Grönland），参加充满危险的远征——《SOS冰山》（*SOS Eisberg* ）。好莱坞大亨施瓦本人卡尔·拉姆勒（Carl Laemmle）本来已经打消了拍摄这部电影的计划，因为第一次尝试在冰山和北极熊之间的冰洋上拍一部故事片时就出师不利，出动的120位电影工作者只有19位生还。但范克来了，他说：“拉姆勒先生，我保证到达格陵兰10天后就会站在冰山上拍摄。”说完他就启程去拍片了。

本来事情可以一直这么继续下去：范克是赛璐珞魔术师，里芬斯塔尔是户外当红女明星，外部环境再险峻，他们也能拍出好电影。好莱坞的大门已经向他们敞开，但此间……

倒叙：位于动物园附近的宇宙电影股份公司大厦，**1932**年**3**月

一部登山片引起了轰动。整部片子中没有出现过呼啸的雪崩场面，它像神话一样感人，尽管如此却有着大歌剧的质量。导演是个女的，片中的悲剧性主角也由她本人出演。莱尼·里芬斯塔尔正处在她事业的巅峰，以后她再未能如此清白无辜地享受自己的成功。不仅柏林的观众，就连欧洲电影界——从巴黎到伦敦——都拜倒在她的脚下。几个月后她摘取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银奖。

1931年早春莱尼·里芬斯塔尔结束了范克那部滑雪喜剧片的拍摄工作，在这部片子中她得不断地在雪地中打滚并呼喊“噢，太棒了！”与自己的伯乐一起工作已经尝不到乐趣了，她那早已觉醒的艺术家创造力往往得不到发挥。范克能做的事，她也能做，做法另样，但更好。

如果一旦下定决心，却不付诸行动，那就不是莱尼·里芬斯塔尔了。她找到了一位——有些犹豫的——投资人，让电影艺术家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写脚本，他能写出比“噢，太棒了！”更好的对话。她还组建了一个工作班子，这些人愿意跟她一起工作，哪怕酬金少得可怜。她在提契诺（Ticino）和多洛米蒂山间往返穿梭，直到找到完美的拍摄地；她继续不倦地寻觅，直到在偏僻的萨伦蒂诺（Sarentino），遇到那些面部棱角分明得像丢勒画中人物的人，她想象中电影里的农民就该是这个样子。

《蓝光——山中传奇》（*Das blaue Licht-Eine Berglegende* ）可以放光了……每当满月时，“水晶山”山顶的宝石洞就会发出有魔力的微光。下面山谷的无数年轻男子都已经丧生在爬往宝石洞的途中。唯一没有摔下山去的是个叫容塔（Junta）的姑娘，她孤独地住在一个牧羊人住的窝棚里，因为村民们把她当作“该受诅咒的女巫”赶出了村。一位厌倦了大

城市生活的画家来到了村里，他爱上了这里的风景，不久也爱上了那位被村民们以棍子和石头相向的衣衫褴褛的赤脚姑娘。他搬到山上与她相伴，然而这种完全没有语言（画家只会说德语，容塔只会说意大利语）和性的田园生活只维持到下一个满月。这一天容塔又像个梦游人一样稳稳地向山顶爬去，她陶醉于那些闪闪发光的水晶，仅仅是喜欢美丽的东西，没有一点别的念头。画家偷偷跟随着她，所有村里小伙子们未能做到的事，他做到了，成为第一个走进宝石洞的男人。容塔尖叫着到处乱跑，灾难开始了。画家不能理解，容塔为什么不想弄明白，这些宝石对全村和她自己意味着多大一笔财富——贫穷的结束，再也不用在危险的山上爬来爬去。

就在容塔不安地在山里乱跑时，画家告诉村民们从哪条路可以爬上宝石洞。村民们带着梯子、筐子和砍伐工具上了路。电影中的天空第一次乌云密布，雾气重重。容塔知道要出事了。她充满恐惧地再次爬上宝石洞，看到她的圣所已经被洗劫一空。她踉跄地向山下走去，一头栽进深渊。

画家在寻找她，想把好消息告诉她，现在她在村里被视为全村的大恩人。他在山脚下找到的却是她破碎了的尸体，这座山从今往后再也不会作为“水晶山”在满月之夜放出光芒了……

一部真正的登山片——可这部片子中几乎一切都被倒置了。里芬斯塔尔的师傅知道的首先是高耸的岩石、冰凌和暴风雪；她本人虽然也让她的主人公爬山，然而是为了进入神圣的宝石洞（心理分析师会对此大喜过望的）。男性英雄把山当作对手，该用或多或少公正的手段去征服它；容塔姑娘则与整个大自然和睦相处。她本人、群星、山峦、植物和动物融合为浪漫的宇宙整体，山峰也不再是具有危险性的挑战，而是与整体和谐的组成部分。

不无悲剧意味的是：莱尼·里芬斯塔尔虽然没有把登山片的英雄悲

怆全部抹杀，却消去了其威武性，为了纯粹的美而限制了崇高，那群迟钝的村民对她来说反正是可怕的。里芬斯塔尔所导演的处女作被视为生态女权主义的开山之作，男人在其影片中被表现为自然的亵渎者和剥削者。可偏偏是她，用自己的摄像机在银幕上把希特勒神化为群众的救世主，给追随他的群众平添了诸多美感。

1932年5月18日，距离她在柏林动物园附近的宇宙电影股份公司大厦成功地首映自己的电影后仅仅数周，她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冲动、不假思索和野心勃勃，与她当年猛攻特伦克尔和范克时如出一辙：“尊敬的希特勒先生：不久前我平生第一次参加了一个政治集会，您在体育馆进行了演讲。我得承认，您与听众的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萌发了亲自结识您的愿望。可惜我不日将离开德国数月，前往格陵兰拍电影。所以出发前肯定不太可能与您晤面了，我甚至不知道这封信是否会送达给您。若能收到您的回复我将不胜欣喜。向您致意！您的莱尼·里芬斯塔尔。”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间或可以理解，多数情况令人厌恶，总的来说让人绝望。事实是：莱尼·里芬斯塔尔为纳粹拍摄了两部党代会电影和一部国防军阅兵式电影：《信仰的胜利》（*Sieg des Glaubens* ）、《意志的凯旋》（*Triumpf des Willens* ）和《自由之日》（*Tag der Freiheit* ）。1940年，就在她在道德正直方面最成问题的时候，在拍摄其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故事片《低地》（*Tiefland* ）时，她的群众演员已经不是从偏僻山村招募而来，而是从离萨尔茨堡不远的一座纳粹设立的“吉普赛人集中营”调用的。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认为整个登山片的体裁可疑，难道他还真没说错？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

登山片气数已尽。拍这种片子的人不是政治上站错了队，就是还在“第三帝国”时期自己就跟不上趟了。例如阿诺尔德·范克，在与里芬斯塔尔最终闹翻后，他虽然在1934还拍了一部首登勃朗峰的片子，但这部片子并未获得此时在德国电影界想一言九鼎的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好评。这位帝国宣传部部长更愿意看到——不论史实如何——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人首先登上了这座欧洲最高峰。就连拍摄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的任务戈培尔也没有交给拍运动片的老手范克——按理说应该让他拍，他毕竟拍摄了1928年圣莫里茨（St. Moritz）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的官方纪录片——，而是委托给了莱尼·里芬斯塔尔。为了感谢她的师傅，里芬斯塔尔几乎启用了范克“弗莱堡派”[7] 的全部摄影班子，包括泽普·阿尔盖尔。范克自己还试着拍过两部故事片，一部拍摄于日本，另一部拍摄于智利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en），但这两部电影都带有强弩之末的味道。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当这位曾经的登山片偶像导演根本接不到拍片委托时，莱尼·里芬斯塔尔曾让他拍过一些短纪录片，比如有关大西洋壁垒或是雕塑家阿诺·布雷克尔（Arno Breker）的片子。

1945年以后范克就最终失业了。就连他儿子日后都说不出那些年他父亲到底靠什么为生。据说他甚至当过伐木工。1974年他以85岁高龄谢世，已经被人彻底遗忘了。

莱尼·里芬斯塔尔的命运比他也好不到哪儿去。纳粹统治结束后，美国人虽然把她划为“随波逐流者”，但她在联邦德国的身份仍限于著名的销声匿迹者。60岁的她在努巴人那里寻找避难所，她常独自一人带着照相机，一连数月逗留在当时苏丹境内这个被文明彻底遗忘的部落。为了拍摄黄貂鱼和珊瑚礁，70多岁时她还考下了潜水证。直到2002年8月她百岁寿辰时，德国公众才小心翼翼地开始（再次）发现他们最重要的

女导演的作品。莱尼·里芬斯塔尔2003年9月逝世。

当年登山片三巨头中，只有路易斯·特伦克尔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历史上那些充满歧途的艰难岁月。从1928年开始——那年他与范克彻底闹翻并决定自己当导演，到60年代初期他自导自演的片子一部接着一部，仅仅故事片就有24部，此外还拍了很多纪录片。他出的书印数达到百万。1959年以后，他作为一贯情绪激动的登山故事叙述者又在新媒体电视中走红。

难道特伦克尔的双手真的比范克和里芬斯塔尔干净得多吗？

至于说到与柏林的罪犯政权的纠葛程度，这位南蒂罗尔人与范克和里芬斯塔尔并无任何差异。根据政治气候的不同，他时而说自己是德国人，时而又说是奥地利人，甚至站在意大利人一边。像范克一样，他因害怕将来的工作机会受影响而做了一件既蠢又傻的事：1940年加入了国社党（莱尼·里芬斯塔尔虽然可以声言自己从未入过党，但对纳粹来说反而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他们能够声称独立艺术家“里芬斯塔尔小姐”在为他们工作）。此外自从特伦克尔在德国法西斯这儿失宠后，他就与意大利法西斯打得火热，后来证明这对他的演艺生涯不无裨益。约瑟夫·戈培尔在纳粹上台前不久的一则日记中写道：“晚上看电影，路易斯·特伦克尔的《反叛》（*Der Rebell* ）。卓尔不群，是国家主义的一次突破。群众场面很宏大。……希特勒极为欣赏。”在南蒂罗尔究竟应该继续属于意大利，还是应该并入德国版图的问题上，当特伦克尔摇摆不定，特别是在他还拍摄了一部电影［《纵火犯》（*Der Feuerteufel* ）］后——在这部电影中他讲述了克恩顿（Kärntner [8] 人在反抗拿破仑入侵的解放战争中的一段故事，大可被认为是借古讽今的含沙射影之作——“极为赞赏”就演变成大为光火了。“一个流氓和没有祖国的家伙！先不理他，有机会再干掉他。”1940年3月关于特伦克尔戈培尔记过这么一笔。至于“里芬斯塔尔小姐”，1941年他抱怨其电影《低

地》让他“担忧，一个歇斯底里的人，每天都出幺蛾子”。

这位牛皮大王的此类日记并不能证明这些拍登山片的人都是秘密的抵抗战士，1945年以后这些人不时想为自己贴上这类标签。富有启发的是：一旦在战争期间要想整顿后方或是拿它开善意的玩笑，曾经的招牌就显得不那么好使了。现在更重要的是法伊特·哈兰（Veit Harlan）这类导演，他愿意拍煽动性反犹电影《犹太人聚斯》（*Jud Süß* ）；或是海因茨·吕曼（Heinz Rühmann）这类演员，其喜剧片《火钳酒》（*Feuerzangenbowle* ）会让德国人的心情暂时忘却恐怖的现实。

在其迄今最著名的电影、拍摄于1937年的《山的呼唤》（*Der Berg ruft* ）中，路易斯·特伦克尔让山里的村民骂那位登山英雄——即他自己——是“瘪三”和“卖国贼”，因为这位声称登马特宏峰不是为了给自己的祖国意大利争光，而是为了和自己的伙伴英国人爱德华·温珀一起首次登上该山。在这部电影中特伦克尔同情谁是毫无疑问的。《山的呼唤》这部片子也视伙伴情谊为最高价值，臣服和顺从遭到蔑视。对向山顶冲刺的人而言，民族沙文主义比女人的诱惑形成更大的干扰。真正的登山片中的英雄是不会组建国家的，更不会组建专制国家。（除了美国西部片）没有第二种体裁的片子会像登山片这样高度歌颂独立的、与众不同的独行侠，因此谴责这类体裁的片子为“前法西斯主义”有失公允。



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中的瓦茨曼山，它是德国人最喜爱的山峰之一。

如果路易斯·特伦克尔只拍了那些充满英雄豪情和为自由而战的登山片，那他也会像范克和里芬斯塔尔那样从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的银幕上消失，顶多后来的一代代人会把他这个曾经的山中叛逆者当做怪异的偶像角色重新发现。然而特伦克尔也拍了没有悲剧性冲突的、讨人喜欢的登山片。在拍摄于1933/34年的影片《浪子回头》（*Der verlorene Sohn*）中，主人公一直浪迹到纽约，当然只是为了让这位浪子最后更加懊悔地返回山村。这是一部讴歌故乡——阿尔卑斯山的纯朴宁静而又和谐的生活状态的片子：那里的乖巧姑娘坐在路边殉难者纪念龛下，边牧羊边编织；乡村教师则带着训导的口气说："从未离开过的人，也就无缘重返家园！"陡峭的山峦构成远方的背景，登山片离不开高山牧场，那里不仅没有罪恶，而且也没有戏剧性场面。英雄浪漫的东西堕落成感伤庸俗的东西。看着赚人眼泪的电影《败给了爱》（*Von der Liebe besiegt*

），战后那些再也不愿听高调的市侩叹着气靠在扶手椅上。哪怕影片的副标题预示着《马特宏峰上的命运》，每个看电影海报的人都确知：这座常印在明信片上的山峰（在电影院里）不会再要人命了。

1990年路易斯·特伦克尔在博岑（Bozen）去世，享年约98岁。他在家乡格勒登圣乌尔里希（St. Ulrich）小镇的坟墓成了朝圣地。而高山沉默依旧。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深渊，科考远征，故乡，高地丘陵，渴求瘾徒步之乐，女人

---

[1] 德国境内阿尔卑斯山最高峰，海拔2963米。

[2] 最高点海拔高度2713米。

[3] 德国早期电影先行者，对技术更在行的麦克斯（Max，1863～1939）掌机，更有表演天赋的埃米尔（Emil，1866～1945）在镜头前滑稽舞蹈。

[4] 一对法国兄弟（Auguste Marie Louis Nicholas，1862～1954；Louis Jean，1864～1948），出生于欧洲最大的制造摄影感光板的家族，是电影和电影放映机的发明人。

[5] 法国东南部韦科尔地区一处著名的攀岩地点，海拔2085米。

[6] 也译为雷妮·瑞芬舒丹（1902～2003），在纳粹时期受希特勒青睐的女导演，曾为纳粹拍摄多部在当时极有影响力的纪录片。

[7] 1920年范克曾与他人合伙创建“弗莱堡登山与体育电影有限公司”。

[8] 奥地利最南面的一个州。

啤酒之旅[1]



这么喝最过瘾：经典的带把大啤酒杯。

明媚五月天，

白日天渐长，

心中念啤酒，

啊，这释怀老物，俺心之渴求。

起步自北国，

德丹[2]相接处，

坐到港湾口，

望帆起帆落，乐饮弗伦瑟[3]。

西去浅滩海滨，

弗里斯[4]风涩，

瓶颈也呼啸有趣，

第二瓶早已在握。

不来梅城遇四动物，

当音乐家是它们之初衷，

翻开俺的小钱囊，

邀之来喝五月勃克。[5]

阿尔斯特[6]河，也是个好去处，

面前流水潺潺，

唇边送递吴突[7]，

一饮而尽，管它谁产出。

“看这儿，”船头有人喊，

“正义者之啤，施特拉尔松德出产！”

正义者，大名施托特贝克[8]，

干起贝克啤，一气送四扎。[9]

南下去草场，

小羊跳身旁，

谢它喝黑啤，

麦芽醇味道。

举步向东去，

进都城，饮白啤加果浆，

兑现拜访许诺，[10]

饮下娃啤（Kindl），它不过是头一样。

修道院里俺取来浴池啤[11]，

此啤养发又润肤，

朝圣者友善递毛巾，

再多的话他未敢对俺说出。

波希米酒厂[12]酒窖中，

冰啤[13]在发酵，正冷，正冰，

庆幸卧于易北河畔，

与众酒徒为伍，其乐融融。

图林根人好饮棕酿，

大师歌德却完全两样，

因而他不爱路德太太，

她的啤酒[14]可像美诗一样。

起身去黑森，

起沫者亦丰，

问候森林湖泊牧场，

呷呷出口啤[15]，置身大自然中。

科隆跑堂皆名科伯斯[16]，

上啤皆要端啤托，

很乐意送他一小杯，

他告俺，他名弗兰茨。

科隆不可久留，

他处还有佳饮唤呼，

拉镇马丁啤[17]，

酒亮泛金红。

萨尔乡村啤，

赋唇麦粒香，

窖藏啤亦不拒受，

液色浊亮，倒映俺头颅。

杉树下面一个幽暗高处，

黑森林中一个小屋，

俺饮上一杯松塔乐[18]，

乐听老板娘笑呵呵。

终于到了拜恩州，

宝莱纳啤馆还亮着灯，

这里俺来见识小麦啤，

一扎再扎也醉不成。

作者：里·瓦

译者：郭力

参阅：晚餐，下班之后，故乡，诸侯割据，疯狂的自由，纯洁戒律

---

[1] 原诗为打油诗风格，译文尽量贴近其风格。

[2] 分别指德国和丹麦。

[3] Flenst，Flensburger Pils弗伦斯堡清啤酒的简称。

[4] 即弗里西亚，是西欧的一个地理区域。北起丹麦西南部海岸，向南经德国西北部延伸到荷兰海岸。弗里西亚是弗里斯兰人的家园。

[5] Maibock，五月勃克啤酒，一种春季喝的较烈啤酒。

[6] 易北河支流，流经汉堡。

[7] Urtyp，吴突啤酒，意为原始型，汉堡大区以Astra商标出售的一种。

[8] Störtebeke，施托特贝克，一位以追求正义闻名的海盗。

[9] 一扎为一升。此处饮的啤酒为Becker——贝克啤酒。

[10] 此处指作者曾许愿去柏林Schultheiss啤酒酿造厂品酒。

[11] 浴池啤，Badebier，可饮可洗盆浴。

[12] 柏林一家建于1868年的著名啤酒酿造厂。

[13] Eisbier，冰啤，一种在极凉处储藏的啤酒，酒性较温和。

[14] 指路德啤酒，Luther Bier。

[15] 出口啤，Export。

[16] 科隆老酒馆中的跑堂称Köbes，身穿蓝色长围裙，上酒时用一种圆的带孔托盘，啤酒被固定在孔中。

[17] 小镇拉恩施泰因，出产马丁啤酒：Martinator。

[18] 啤酒名Zäpfle，地方话指小松塔，因而称松塔啤。

兄弟树

在德国是不能不把树当一回事的。哪怕冬天人行道上结了冰，老奶奶会摔断股骨颈，也是不能往上撒盐的。因为园林局通报说，撒盐对我们街道上种植的树木构成了严重威胁。老奶奶是绝不会愿意让她门前的椴树遭难的。她不是往树皮上刻过一些美好的话语吗？每当有无赖伤透了她的心时，她不是总能在椴树下找到平静吗？与其让老椴树的树叶冒坏死的险，老奶奶宁愿冒摔断股骨颈的险。

老奶奶那年轻几岁、比她身板硬朗的妹妹此时正在去斯图加特的路上，为的是给那里的树木围上铁链，阻止砍伐。市里、州里、联邦德国和铁路部门一致决定要在那里建一座新火车站，可为此要砍伐比邻的城堡花园中数百年的法国梧桐树。德意志之魂在流血，在抗争，却徒劳无用。那些法国梧桐必须丧命：它们的树冠被锯掉，树干被粉碎，树根被从土里刨了出来。老奶奶那身板硬朗的妹妹说，二战后她就没见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施瓦本人捍卫树木的照片甚至上了《纽约时报》。

祸害树木的人不值得信任，这一点帝国创始人奥托·冯·俾斯麦就已经了然于胸了。他在自传《思考与回忆》（*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中对1890年作为他的后继人搬入柏林帝国总理府的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有如下评论：“我无法否认，自从获悉我的继任者让人把他住宅——以前曾是我的住宅——花园前的一排古老树木砍伐掉后，我对其性格的信任就打了折扣。”



德国橡树孤独而立。

或许“铁血宰相”愿意领导下一轮就树木之争所进行的谈判的仲裁事宜？还是他更愿意坐在自家老宅花园树荫下，听隔壁传来的轻声吟唱：“我的朋友，那棵树，死掉了。它在清晨朝霞中伏倒……”

自从723年以来，伐木在德国就是一项棘手的任务。在如今北黑森州的盖斯马（Geismar）附近曾有一棵巨大的橡树，它是供奉给雷神多纳尔（Donar）的。古代日耳曼人把橡树尊为最重要的圣所之一，他们在其树荫下祈求风调雨顺并为橡树敬献花环。可是后来基督教的传教士圣波尼法爵（Bonifatius）[1] 来了，他要向不信基督教的日耳曼人证明，他们的诸神并无神力。在士兵们的保护下他砍伐了多纳尔的橡树。既没有风暴遮天蔽日，也没有闪电劈死他。圣波尼法爵让人用多纳尔橡树的木头修建了一间祈祷室，供奉圣者彼得（Petrus）。除了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改信基督教的莱茵地区外，卡腾（Chatten）人，也就是黑森人的祖先，是日耳曼部落中最早信仰基督教的（在此向德国铁路部门的头

目提个小建议，下回再遇到不得不砍伐梧桐树的事，别把树干给粉碎了，而是可以让木匠把它们加工成候车室的长椅）。

尽管在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次伐木是以基督教的获胜而终结的，但这却似乎给德意志之魂留下了阴影。大约1100年后，浪漫诗人马克斯·冯·申肯多尔夫（Max von Schenkendorf）在其《科隆大教堂》（*Der Dom zu Köln* ）一诗的开头写道："那是一处长满参天大树的森林，/我看到树木愉快生长，/树梢冒出虔诚的梦想/逃向遥远的精神王国。"难道这不是为多纳尔橡树所进行的微妙复仇吗？

改信了基督教者的胸腔深处仍旧有一颗古老日耳曼的树心在跳动。这颗心并不忌讳将维滕贝格（Wittenberg）到施维贝尔丁根（Schwieberdingen）间的橡树、山毛榉或是椴树奉献给所有德国基督徒中最雷霆万钧者——马丁·路德，就好像723年的那段插曲从未发生过。谁若相信，这位宗教改革者会同意这种他死后的偶像崇拜——他自己毕竟说过，要是他知道，明天末日审判将来临的话，今天他会种一棵小小的苹果树——那么在此要提醒他：这段星期日布道时爱被引用的话在路德的手稿中根本找不到，它最早出现在黑森教会的一封通函中，时间是1944年10月（！）。

德国人寻找与树木的交流。耳聋的贝多芬只要一有机会就走进大自然，他在笔记本中写道："我那不幸的重听在这里并不折磨我，就好像地上的每一棵树都在与我交谈。神圣！太神圣了！"一般而言并不以多愁善感、夸大其词出名的埃里希·克斯特纳（Erich Kästner）在《森林沉默》（*Die Wälder schweigen* ）一诗中写道："灵魂因行走于城市的石子路而扭曲。/与树木可以如兄弟般交谈/在它们那里人获得了新的灵魂。"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坚信："谁与它们（树木）交谈，谁懂得聆听它们，就能获得真相。"问题是：有关什么的真相？自己的？树的本质？像年轮一样贮藏在古老部落记忆中的德国人的本质？让

我们来听听树木们自己的交谈吧！

（橡树出场）

橡树：要是一头野猪在它的树干上蹭，这和德国橡树有什么相干？

（椴树出场）

椴树：说话别那么糙。这提出的是个严肃的问题。

橡树：那你就来回答一下吧。你总是最会安慰人的，善解人意。（开始唱）：“城门前喷泉旁，耸立着一棵椴树……”

椴树：没错，我给过世世代代的德国人安慰。他们在我的树荫下做梦、相爱和哭泣。在我的繁茂枝叶下他们翩翩起舞，在我的树冠下宣读过判决。和平统一后他们把我种到中心地带。而你却一向蛊惑人心：铁十字、骑士十字勋章，最黑的翻领上都会有橡树叶。[2]（开始唱）：“献上橡树花环向你致敬，西方的女侯爵，向你——德国致敬！”

橡树：我的木质比你坚硬难道是我的错吗？那些疯狂的德国人认为他们偏偏必须在我的旗帜下行动，也是我的错吗？不要言过其实！法国人不是也很尊敬我嘛。

椴树：特别是在他们砍了国王们的脑袋之后。

橡树：我身上的英雄气概要胜过高度敏感，这一点没有人比我的荷尔德林看得更清楚。（醉心地）“离开花园我走向你们，你们是山的儿子！……你们棵棵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你们宛如天上的群星，每一颗都是神明，结成自愿的联盟……”

椴树：可他的狂热把他推向了何方？他疯了。

橡树：你不过是嫉妒而已，因为他没有倚在你的树干上嚎啕大哭。

（山毛榉出场）

山毛榉：请原谅我来插嘴，可说到德国，我山毛榉还是有那么一

点儿发言权的。我是德国森林之母，在你们还没有真正出现的时候，我就覆盖了这个国家的土地。卢恩字母 [3] 就是刻在山毛榉木片上的，“字母”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4] 。一书在手的人都会想起我 [5] 。大教堂的哥特式立柱也会让人想起我的树干，默里克（Mörike）先生曾把他最美的诗中的一首献给了我：“森林幽密处有一块地方，那里耸立着一棵山毛榉，没有比那更美的画面……”

（冷杉出场）

冷杉：听了你们的话，人们会以为这个国家只有阔叶树。

橡树：（开始唱）“哦，圣诞树，哦，圣诞树……”

冷杉：没错，圣诞节时我备受欢迎，可那也不过是人们用银丝条和小摆设往我身上瞎挂，碰上倒霉的时候还可能引火烧身。一到一月份，我就被扔到大街上去了。

椴树：我能理解你的伤心，可真相远没有如此糟糕吧。不是有《汤豪舍》 [6] 嘛，此外你也出现在许多美丽童话中：“你是绿油油的冷杉林中的一座宝屋，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所有生长冷杉的地方都是你的领地，只有星期天出生的孩子们 [7] 才能看见你……”

冷杉：可这个童话叫什么呢？《冷酷的心》（*Das kalte Herz*）！你们的德国人拥抱每一棵他们在路上遇到的阔叶树，就好像你们是他们的亲兄弟，对我们他们却为所欲为。在绝大多数树木保护条例中我都榜上无名，我们对他们而言不过仅仅有使用价值，要是说到深刻的感情，那就是奢望了。

山毛榉：（唱道）“高耸的冷杉指向波涛汹涌的伊泽尔河上空的星辰。尽管营地在远方，山神你用心地守护着它……”

冷杉：你们用默里克和荷尔德林来炫耀自己，却想用海诺（Heino） [8] 来打发我。

山毛榉：这首歌可比海诺老得多。

冷杉：我知道，常听弹吉他的年轻人在波西米亚唱这支歌。

山毛榉：被驱逐者协会的人今天仍旧喜欢唱它。可也有很美的里尔克（Rilke）诗啊：“高耸的冷杉沙哑地呼吸……”

冷杉：山毛榉，你真烦人。我退出，你们接着聊吧。

（冷杉退场。森林中一片寂静）

椴树：我该不该跟着它？你们觉得它会不会想不开？

山毛榉：（若有所思）在有一点上它的感觉是对的。一棵四季常青地长在那里的树是没有权利以德国树自诩的。没有死而后生，没有年复一年的花开花谢、干枯与光秃，它如何能反映德意志性情中的所有不安与深沉呢？如果你们能允许我离开片刻的话，我想我该就此题目写篇小论文。

（山毛榉退场）

椴树：我真有些担心。也许我能阻止冷杉做傻事。

（椴树退场）

橡树：最后又剩下谁了？

（橡树独自留下，林间空地出现德国女作家）

德国女作家：亲爱的橡树，请原谅我打扰你。我一直想问你点事，可别的树木在场时，我觉得不方便。

橡树：（闷闷不乐的）什么事？

德国女作家：埃特斯山（Ettersberg）的事。

橡树：那儿有过什么事啊？

德国女作家：别说你忘了。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的歌德橡树[9]。

橡树：此事跟我没关系，那是你们的问题。

德国女作家：可惜这也成了你的问题。在纳粹的暴行后，我们还怎么可能再无忧无虑地描写你啊？

橡树：那群穿褐衫的野蛮人当年在集中营厨房和洗衣房之间只留

下了我这唯一一棵树，这也不能归罪于我呀？难道就因为据说枢密顾问先生在我的树荫下调过情？再说我也受到了惩罚，1944年一枚美国或英国的炸弹把我炸死了。别聊这事了，我一向讨厌多愁善感。

德国女作家：多愁善感？集中营里的囚徒得砍伐你那被烧焦的残骸！你知道吗，流亡巴黎的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在临死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就写到了你？

橡树：要想讨论德国历史还是去找山毛榉吧！毕竟它的问题更大，布痕瓦尔德[10]！集中营怎么会起这么个名字呢！又是因为歌德。反正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是埃特斯山这片山毛榉树林给了歌德灵感，让他写出了《漫游者的夜歌》。

德国女作家：我给你念念，1939年5月约瑟夫·罗特是怎么写你的："千真万确！人们散布的有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消息是失实的，可以说是恐怖童话。我觉得是时候该纠正它了。歌德与冯·施泰因夫人乘过凉的那棵橡树上——感谢自然保护法这棵树还在长——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还没有'绑过'任何集中营的囚犯；那些囚犯是被绑在其他橡树上的，那片林子里橡树很多。"

橡树：耻辱是永远刻在我的树干上了。我是不是每年都该把树皮撕下，好让树木停止生长？

德国女作家：你只需帮助不知所措的我。

橡树：孩子，这个你得靠自己了。

（橡树消失在黑暗中）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继续。与树木的谈话失去了其无辜性，倘若最狂热的树木保护者却犯下了最具兽性的罪行，那么还有谁是可以信任的呢？树木保护者无法长久地仅凭他爱树就确信自己是个好人。爱树证明不了什么，可连树都不爱的人就更差劲了。一片橡树林阻挡不了对文明的亵渎。可如果我们忘记，意味着文明的木简来自橡树林，那这个世界也不会变成更文明的地方。

静听，不要怒吼，这也许是我们唯一能在树木下学到的东西。最后让我们来聆听一个人的一段话，他做到了热爱树木，但不歇斯底里，尽

管他是个德国人。

> 请先允许我澄清一种猜疑，怕我是身上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多愁善感者，我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高速公路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不想如同草木般地生活在自然保护博物馆中，乖巧的绿色伊甸园必须消灭掉。……可德国如果没有了其草地、森林、河流与树木，那还是德国吗？……从汽车的噪声、警笛的鸣响和火车风驰电掣的弯道中升腾起一种理念，它轻柔得几乎难以听到，它既新且老，那就是灵魂不死。灵魂嘲笑那些想把它装进瓶子里和把它登记造册的人。这也许是个没有灵魂的时代，但却是一个寻觅灵魂的时代。
>
> 然而一棵老树是一段生命，它让人安静，它引起回忆。它为毫无意义提升起来的速度减速，人们即使以如此高速东碰西撞之后还是回到了原地。那凭什么这些不能一夜之间重新长起的树木就要离开原地？这可是人们无法“补种”的。它们不是序列产品，不能一挥而就地变成一片森林。砍它们仅仅为了让官吏们有管理对象？不，没有这个必要。它们该继续活着，以便我们有地方乘凉。活着，反抗精神上和衙门里的忙碌的市侩们的癫狂行为。

这段话写于1930年12月10日，作者是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裸体文化，德国式焦虑，青年旅舍，高地丘陵，私人菜园，林中寂寞，徒步之乐

---

[1] 圣波尼法爵（约680～754），中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和殉道者，德国基督教化的奠基人，史称“日耳曼使徒”。

[2] 古希腊时橡树叶就是权力、忠诚和团结的象征。故钱币和勋章上多用橡树叶做装饰。

[3] 又称如尼字母，已灭绝。中世纪时曾通用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不列颠群岛，属日耳曼语族。

[4] 山毛榉德文为Buche，字母则是Buchstabe。

[5] 书德文为Buch。

[6] 瓦格纳同名歌剧中的主人公，历史上曾确有其人，许多文艺作品以其为蓝本。冷杉德文为Tanne，与汤豪舍名字（Tannhäuser）的前半部相同。

[7] 意即幸运儿。

[8] 德国当代音乐人，以演唱流行歌曲而闻名。

[9]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的一棵老橡树，因歌德曾多次攀登埃特斯山，营中的囚徒称其为“歌德橡树”。1944年该树被炸毁，后被伐，现仅存残根。

[10] 布痕瓦尔德是山毛榉森林（Buchenwald）的音译。

印刷术

首先，这是一项技术发明，而且正像通常的发明一样，是为了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美因茨（Mainz）的金匠约翰内斯·古滕贝格（Johannes Gutenberg）[1] 大约在15世纪中期的时候，发明了一种使用活动金属字母的机械印刷设备。当他把这种印刷机投入使用的时候，寺院里的手工抄本还发挥着实际的作用。那里，用手工抄写的都是诸如拉丁文《圣经》那样的经书典籍，而且，即便是誊抄复制，也必须使用工整隽秀的字体。本来，使用固定的印版就足够了，固定浇注的字模能保存更长时间。

随着古滕贝格活字印刷的出现，文字就像是插上了翅膀。这是信息手段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印刷术就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几百年来，这种印刷工艺几乎没有改变，直到今天仍然遵循着同一个原理。

古滕贝格的印刷工艺在欧洲流传开来，但大多数印刷作坊都在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刚开始的时候，一本书的平均印量大概在150册至250册之间，而且绝大多数是拉丁文的文献。到了16世纪，路德的《圣经》成了印量最大的书。

中世纪末期，印刷术在传播思想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它，近代史就不会到来或者更晚到来。没有古滕贝格的字模盒以及他和路德《圣经》的不期而遇，宗教改革将十分艰难，或许根本无法进行。1535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甚至企图禁止印刷任何书籍。



古滕贝格星系：**500**年的传统始终未变**——**印张审样。

古滕贝格的印刷术不仅使图书具有了现代的形状，而且还成就了图书市场。随着作家路德的成名，畅销书作者也粉墨登场。20世纪伟大的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于1962年，把由他论定的那个出版时代称作“路德星系”，这是对这位来自美因茨城的名人的崇高赞誉。然而，关于古滕贝格本人，我们知之甚少。相传他和行会有矛盾，后来去了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多年后又回到故乡，债务缠身，但对自己的发明坚信不疑，毕生都在使之改进完善。

字模盒不仅让平民百姓接触书籍成为可能，而且还将印刷工造就成了一个社会群体——使用单眼放大镜的无产阶级。他们把工人的教育当成19世纪一件重要的大事。从他们的队伍中走出了一系列工人利益的代

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魏玛共和国选出的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颇具影响力的社民党主席团成员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20世纪20年代卡塞尔（Kassel）市长、《社会民主党歌曲集》（*Das sozialdemokratische Liederbuch，1891* ）发行人马克斯·克格尔（Max Kegel），《社会民主》（*Sozialdemokratie* ）刊物出版人J.H.W.迪茨（J.H.W. Dietz），还有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创建人之一奥托·格罗提沃（Otto Grotewohl），他是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傀儡。

印刷工不仅仅是个职业，这个行业的行话可以为之佐证。这些带有典故的专业用语给那些内行人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劳动阶层的可能性。以印刷业一个古老习俗的词语“候选帮工”（Postulat）为例：一个刚入行的“学徒”（Cornut）若要升为候选帮工，先要给他戴上一顶学徒帽。出徒时，由师傅帮他把帽子摘下来。“学徒”（拉丁语意为“长角的人”）通常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学徒期满后还不是正式帮工，为此需要经过一个隆重的出徒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他要脱掉头上的角，即所谓的蜕角。这原本是个大学生的习俗，后来被印刷工沿用。于是，候选帮工就是指出徒成为帮工的要求和过程。

作者：里·瓦

译者：吴宁

参阅：严肃文学和消遣文学，文化民族空想，牧师之家，宗教改革

---

[1]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又译古登堡，约1400～1468），生于德国美因茨，现代活字印刷术和印刷机的发明者。

烫发

尊敬的卡尔·路德维希·内斯勒（Karl Ludwig Nessler）先生：

请原谅我打扰您在阴间的平静生活。但我的理发师告诉我，是您发明了烫发。从此我就不停地思索：您这位来自黑森林的孩子是出于偶然才成了烫发之父，还是有什么更深刻的原因，偏偏让您这个德国人给世界带来烫发工艺。

此致衷心问候！

您的特亚·多恩

尊敬的多恩女士：

谢谢您寄来的好奇之信！尽管我正忙着研究冥界条件下头发的特性，但我很愿意试着来回答您的问题（我敢说，我马上就要有重大突破了。但请您理解，目前我觉得对此还是少说为佳。您根本无法想象，一直以来我那些有经济价值的创意曾怎样遭到无情剽窃）。

正如您所写，我出生在黑森林，具体地说是托特瑙。如果我的消息无误的话，当地人友好地为我建了一座小博物馆。这说明我在家乡人的心目中还没有完全被忘记，就像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家乡一样，尽管我为了寻找幸福早早就背井离乡，去瑞士、法国、英国，最后被迫去了美国。我在英国辛辛苦苦创建的发廊不得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张，因为我在英国突然不再是查尔斯·雀巢（Charles Nestlé）——那个能可靠地把伦敦女士们的头发烫得无与伦比的人，而是成了“敌对的外国人”。

如果您对我的法国名字感到惊奇的话，我要告诉您，还在日内瓦当学徒时我就把“卡尔·路德维希”改成了“查尔斯”。当我想开自己的第一个发廊时，我后来的生活伴侣卡塔琳娜（Katharina）提醒我说：我如果想以“来自托特瑙的卡尔·路德维希”的身份开店，那伦敦没有一个人会驻足看一眼的。她说得很对，所以我就变成了“来自巴黎的查尔斯·雀巢”。我希望您不要认为这是变节。除此我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当时时代就是那样，只有从巴黎来的理发师才会受到重视。我这么说的时候是不无痛苦的：英国人那时候不愿意让一个来自托特瑙的剃头匠碰他们的头发，这我不怪他们。回想起在绍普夫海姆（Schopfheim）布扎姆（Busam）师傅那儿做学徒的日子，我仍旧心有余悸。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对头发就有极大热情，可做学徒时我连碰都不许碰头发，相反，我必须给男顾客的下巴打肥皂，给他们刮脸。最糟糕的是：如果有顾客来拔火罐或是拔牙，我得给师傅打下手。当某天一个粗俗的伐木工打我嘴巴时，我决定收拾行李走人，去闯世界。

有一段时间我对钟表匠手艺入迷，那正是第一批企业开始生产电器的时候，引人入胜！所有我遇到的新鲜东西都令我好奇，然而我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我真正的使命是另一件事：我必须解决头发自然弯曲的问题，这是我作为小男孩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

世界各地思想狭隘的人都一再嘲弄我说：那位内斯勒，他最想做的事莫过于创建一所科学地研究烫发的大学。那根本不是我想做的事！对我来说，我一直想把自己的发现应用于商业。尽管如此，我得极为谦虚地说——我知道，我从来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若不是我一生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以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是不可能发现如何在活人脑袋上把头发烫弯的，对此我坚信不疑。我非常敬重的马塞尔（Marcel）用火剪烫头的手艺可谓炉火纯青，我在巴黎曾在他那儿学过艺，但他从未能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烫头的问题！他确实是我们这一行的大师，但他也不想听我的“雨前征兆理论”。经验证明，理发师根本不适合研究。

事情明摆着：我姐姐天生的卷发在下雨前卷得更厉害，而我那些直头发的姐妹们的头发则对天气变化毫无反应。我从姐姐的头发状态就能判断出是不是快下雨了，这肯定有更深刻的原因。还有我小时候放羊观察到的令人难忘的现象：森林边上那些成百上千的干枯细树枝和植物纤维，清晨它们弯曲成螺旋和波浪状，几小时之后又直直地耷拉下来。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早上我去研究这种现象并发现，弯曲的细枝中充满水分，晨露躲进并充满了它们的细胞，让它们的茎变粗了，长度缩短了。接下来越升越高的太阳却让植物失去了水分，细胞又聚缩起来，张力减少，它们又伸直了。我所有观察的结论只能是：脑袋上弯曲的头发不是事实，而是一种后果！

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把这看作烫发念头诞生的时刻。只有准备吸收和储藏水分的头发才能变弯曲。一个来自托特瑙的小男孩，他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却准备搞懂人类头发的构造！他想洞察的事情是所有其他大师们视而不见的！

但请您相信我：从童年对大自然的这些观察到最终在人脑袋上烫出持久的波浪，我还有一条漫长而布满荆棘的路得走。

我满怀感激地说：我不认为若是没有我的卡塔琳娜，我会把这条路成功地走到底。在日内瓦和巴黎没有一位师傅支持我搞试验，就是伦敦的老板——在他的发廊我最终得到了第一个经营经理的职位——也不想听我的烫发梦想，相反，他强迫我像马塞尔那样一如既往地用火剪把头发烫弯。但我必须继续自己对头发的研究。我感到自己马上会在实际应用方面有所突破。我的烫发工具已经发明出来，化学溶液也找到了。所以我继续偷偷研究，直到有一天夜里被老板发现并立即遭到解雇。

我一无所有，独自在伦敦。然而就在那时拯救我的天使——我的卡塔琳娜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在巴黎，我们在工作中刚认识的时候，她就是唯一一个允许我在她的头发上试验自己理论的人。这个可怜的勇

敢者得遭多少罪啊！脑袋上被烫出过难看的泡，头发被烧焦过。可在试验的最初阶段就有一绺头发一直保持了弯曲，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为了避免误会我得声明：我从未用顾客的头发做过试验！在伦敦和纽约的所有年月，当我每天烫一百、两百人或是更多的人的头发时，没有一位女顾客说过我损伤了她的头发。只有在做生意时不被投诉的人才有好前程。烫头发的事是一点儿都马虎不得的，所以我一向坚持在我的发廊里只烫发，别的不干。那些随大流的理发师是自毁前程。

您想象一下有这么一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得逃离伦敦，因为他拒绝放弃德国国籍换取英国国籍。他逃往美国，想在新世界重打鼓另开张，尽管他在那边也戴着敌人该隐[1]的印记。

您也许会问，我当时为什么不干脆回家乡呢？我只能回答说：我的使命不是拿着步枪去战斗。尽管在后来的岁月中，当我的家乡陷入不幸，而我发家致富的前景如日中天的时候，我也确实慷慨地解过囊，可我却从未想过要去战场厮杀。此外我觉得当时德国的发展状况还不足以真正接受我的创意。最后喜欢冒险肯定也起了一点儿小作用，我才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

可我踏上纽约的土地时要面对什么啊！别人已经使用了我的专利，在使用中的烫发设备超过了600套。可这都是些什么设备啊，全是差劲的仿制品，而且使用方法也不对！剽窃我的创意所进行的工作如此糟糕，以没有一位女顾客愿意第二次再烫发。但我不灰心丧气，用最后一笔钱登广告、发宣传小册子，为的是把美国顾客对烫发所失去的信任再赢回来。我不想自夸，我的措施大获全胜！

当然在纽约也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真正站稳脚跟。像在伦敦一样，我坚持出色的工作也得获得合理的报酬，每个发卷我收两美元。我知道

真正的知识和技能的优势。最终顾客们也明白了，查尔斯·雀巢许愿不多，却有很多本事。1922年我就已经可以扩大自己的业务了，我先是在第49街（东侧）占用两座房子，1927年我的发廊扩展到8～14号的所有临街铺面。我在百老汇和第5大道还开了分店，并开始生产家用烫发器。我的发迹看上去势不可当。



当去理发还需要勇气的时候：**20**世纪**20**年代的烫发设备。

可我感到自己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当个“生意人”。人最可贵的属性就是：他没有满足的时候，而是总想进一步完善自己。所以1926年，正值事业的巅峰期，我把所有的店铺和工厂都卖了，卖出了令人骄傲的数额：160万美金。我隐退到自己所喜爱的乡间住所“鹿园”，为的是进一

步研究头发。既然我已经有幸能够弄清头发的法则，我就想把相关的知识写下来。因而就动手写起了论文《头发的历史》（*Die Geschichte des Haares* ），还有更重要的《我们不断消失的头发》（*Unser schwindendes Haar* ）。

我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的第二大问题就是：我想弄明白头发老化的过程，有朝一日好能延缓这一进程。我深信不疑，我那护发和护肤的仪器“ChaNess”已经最终解决了秃顶的问题。但是后来……唉，还是别提了。

我财产中为数不多的那些躲过了“黑色星期五”的部分，后来也在战争中灰飞烟灭了。金钱的损失我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钱反正是个圆滑的理由。财富的积累不过是人所参与的一场感兴趣者们的游戏，人还会自以为这场游戏是文化的进步。其实狗啊、汽车啊、收音机啊，还有上百种其他玩意儿，没有它们日子照样过。而且人们还发现，尽管有了这一切人还是不幸福。

其实没钱的人最爽心，他至少还知道早晨为什么起床。他还拥有感情和希望。不，令我心碎的不是失去财产；令我心碎的是我必须亲身经历，就连美国人也不愿再开放地陪伴我去探索新天地。如果仅仅是美国人能相信我的话，那我的“ChaNess”仪器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福祉啊！

但我不想对我的第二故乡说什么尖刻的话，尽管它最后眼都不眨就让我穷困潦倒地完蛋了。

尊敬的多恩女士，我不知道是否令您满意地回答了您的问题：偏偏是我，来自托特瑙的卡尔·路德维希·内斯勒有幸成为烫发之父，这究竟是不是偶然？更多的我也解释不清，您研究我的生平吧，您会看到，答案就隐藏在其中。

仅此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查尔斯·内斯勒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工作狂，兄弟树，创业时代，女人

---

[1] 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他杀死了他的兄弟。详见《圣经》创世纪第4章。

浮士德

“魔法这个东西是世界上超自然事物中最隐秘的艺术和最伟大的智慧。凡是人的理性不能够获知和捉摸的，都可以通过魔法的技巧来获知和探索。因为魔法是伟大而又隐秘的智慧，而理性则是伟大而公开的愚钝。”帕拉塞尔斯（Paracelsus）先生如是说。

人们所记住的算作知识，但众所周知并不总是如此。知识虽然不是秘密的，但也不乏某种秘密的版本。而且历来如此，其存在就是一种挑战。关键的是，不能模糊对待知识中未知的成分，所公开的定要得到证明，同时要指出其不完善性。也就是提醒大家，应该足以了。因为生命虽然归功于心脏的跳动，但是生活中的上进则要指望头脑。

中世纪末期，新兴科学的兴起源于一系列轰动事件和返归备受嘲笑的经院哲学。这一萌动引发了哥白尼学说带来的转折点和启蒙运动的耀眼光芒。返归古典文化则继承了知识与先人成就的魅力。越学究气地转向抽象，就越沉迷于数字之中。数字既是神秘的也是现实的，可以相加也可以概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炼金术不费吹灰之力胜过化学，占星术比天文学更受青睐。今后也一定会如此，美感会先于知识引人注意且并不张扬。有过这样经历的人，他知道，只有唯美的事物会以渐行渐远的方式脱离控制，而其他则需要挣脱和斩断。他知道，关键在于什么：这就是虔诚和本性，它们不是结果而是常数。时而得到喝彩，时而隐藏不宣。

骑士、死亡和魔鬼出现在地平线上，宛若触动心灵的骑士。

例如，菲利普斯·奥里欧勒斯·德奥弗拉斯特·博姆巴斯茨·冯·霍恩海姆（1493～1541，Philippus Aureolus Theophrastus Bombast von Hohenheim），他也被称为帕拉塞尔斯，他集医生、炼金术师和哲学家于一身，还有海因里希·考内留斯·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1486～1535，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von Nettesheim），既是神学家，也是法学家和哲学家。他们都被奉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他们的名字为人熟知。他们是经院哲学家还是人文学家呢？其实都是无所谓的。

唉！我而今已把哲学，

医学和法律，

可惜还有神学，

都彻底地发奋攻读。

到头来还是个可怜的愚人！

不见得比从前聪明进步。



歌德《浮士德》插图。

而更引人注目、吸引众多人目光的是浮士德。这个约翰·浮士德（Johann Faust）博士，显然我们对他的猜测比认知更多。从一封通缉令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于1480年生于符腾堡（Württemberg）的柯尼特灵根（Knittlingen），也就是早于歌德时代数百年。浮士德乌斯（Faustus）是当时拉丁文的叫法，意思是幸运者。1507年他在科里茨纳

赫（Kreuznach）当教书先生，1520年到班贝格，1532在纽伦堡（Nürnberg），然后在维尔茨堡（Würzburg）生活。浮士德于1540年卒于布赖斯高（Breisgau）的施陶芬（Staufen）。

关于约翰·浮士德博士有很多故事。神学家约翰·加斯特（Johann Gast）在《晚餐谈话录》（*Sermones Convivales* ）中讲述了他在巴塞尔神学院和浮士德的一顿晚餐。浮士德交给厨师各种各样的飞禽，加斯特不知道是浮士德买来的，还是从哪里搞来的，反正这些鸟类是当地从来没有见过的。浮士德还带着一条狗和一匹马，因为它们什么都能做，因此被加斯特牧师视为魔鬼。有人告诉加斯特，那条狗曾经摇身一变为仆人，给浮士德准备饭菜。浮士德的离世很吓人，据说是被魔鬼掐死的。放在停尸架上的尸体尽管被翻转了五次，但他的脸却总是朝下。

据说魔术应该可以制住魔鬼。在约翰·浮士德的时代，人们自豪地宣称成功地驱逐了地狱的精灵。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宣布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为什么呢？

谁这样问，他是得不到答案的。

浮士德有许多追随者，后来又涌现出诸多评点专家。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他和魔鬼结盟呢？对于注释者来说，其实浮士德就是他们刨根问底而寻找的答案的化身。

他这个人和其他人一样，他不管做什么都令人觉得蹊跷可疑，他和所有人一样惧怕死亡。不管他怎样对待生活，生活都是短暂的。根据民间话本传说，浮士德对自己也对大家说：我的抱怨能给我解决什么呢？他举杯畅饮时，管风琴响起，六弦琴、小提琴、齐特尔琴、竖琴、弯号、长号、牧笛和哨声此起彼伏。音乐奏起，但是找不到任何答案。浮士德给班贝格侯爵主教制作了一个生辰天宫图，当然是有报酬的。还有一次他让人在宫廷中抓住一只公鸡，他把公鸡放在桌子上，给它喝足，

公鸡突然开始吹口哨。浮士德的学生把此事尽情捉弄了一番。根据浮士德的指令，学生们穿上白色衬衣，互相对视，好像都没有了脑袋。他们就这样走进邻居院内，让邻居惊恐万分。然后学生们回到浮士德身边，坐到桌旁，一切又归于正常。突然他们长出了驴脑袋和大耳朵。这是狂欢节的最后之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起身去睡觉了。

就这样他还是觉得不过瘾，他不想承认极限。他认为能够炼出黄金。这事儿魔鬼可帮不上忙，但是魔鬼可以与他一起冒险。因为这个角色是模糊的，难以捉摸的。

浮士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文学角色，一个在集市售货棚中的角色。他来自木偶剧，走上了大舞台，不管在哪里都给他增添了时代的印记。人们希望看到可能会与自己相交的命运。1772年轮到歌德的《浮士德》（*Urfaust* ）问世，继而是多产作家弗里德里希·米勒（Friedrich Müller）的创作，他不仅是画家，而且也是诗人，还写了部哲理小说。1791年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利安·克林格（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er）撰写了《浮士德的生活、工作与地狱之行》（*Fausts Leben，Thaten und Höllenfahrt* ）。这样年复一年，1808年时，歌德发表了《浮士德I》（*Faust. Erster Teil* ）的修改稿。1828年，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伯（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将这个角色一分为二，其结果到今天都不可小觑。该书的名字是《唐璜和浮士德》（*Don Juan und Faust* ）。

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利安·克林格写道：“雄狮般的愤怒从我内心涌出，即使我脚下的地狱张开——我也会冲越人类的极限。”唐璜这个角色在这里做什么，在“竭力追求意志和追求知识的正能量面前”？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不禁问道。唐璜一箭双雕，将浮士德变得矮小，将浮士德的精神变得伟大。他不再是一个可怜的傻瓜，而体现了一个原则。海因里希·海涅认为浮士德只能是一个寓言或者说只能是一个德国

人。

“聆听吧，令你终身获益，”克林格作品中的魔鬼说，“种什么种子结什么瓜，要记住，未告诉你后果之前，我不会践行你的罪孽。受迫于你，我打断了万物的运行，我是个魔鬼，但在你面前清白无罪，因为所有一切源于你自己内心，是你内心的行为。”

格拉伯的唐璜则追问：“既然你是人，为什么要追求超人性？”浮士德则回答“如果你不追求超人性，你为什么要做人”？剩下的内容可以一掠而过了。唐璜只需要有心脏的跳动即可，在他看来知识不过是借口。

歌德几乎琢磨了一生的时间，以其独特的古典手法反复推敲这个角色。他认为：“每天去争取自由和生活的人，才配享有自由与生活。”歌德将浮士德带入世界文学。他把一个原型的角色升华为一个勇于追求认知的人。他写道：“我深知，是什么从最内部把世界结合在一起。”他将浮士德从中世纪后期的暮色中解放出来，升华到魏玛古典精神的高度。他把一个炼金术士急于求成的不安升华到一个思想家的锲而不舍的追求。

之后过了许久，也就是在20世纪，托马斯·曼面对德国灵魂的沉沦，重新将浮士德的问题提出来。这次他在音乐家阿德里安·莱韦尔金（Adrian Leverkühn）身上唤醒了浮士德。但是现在的他还能做什么呢？不要忘记该小说出版于1947年。或者这样问：难道他没能摇身变为战后的风云人物吗？还是总围绕着超人性的话题，喋喋不休地谈论努力践行超人性的题目？这时的当务之急是从断壁残垣中再建城市，为德国人的生存建立一块安身立命的地盘。难道他不是那个急缺的工程师吗？而对于歌德和托马斯·曼来说，一个工程师又算什么？而且还是一个开大众牌汽车的工程师？

浮士德？浮士德要大众汽车做什么？还有什么比观看完杜伦马特

（Dürrenmatt）的首演式后，走出剧院来到苍穹之下更清醒的呢，认出露天的空旷不过是停车场，然后坐进大众甲壳虫车。

不，在战后没有浮士德的位置。一方面，他受到纳粹的篡改；另一方面，此时此刻关键的不是要谈论宏伟的未来和什么是问题的要点，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为此我们不需要浮士德，有个名叫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 的人物就足矣。

因此，战后的浮士德没有什么大起色。他消失了，消失在那些争论异化、适应性与贫困无助的大众中。

根据某些阐述——也可能是完全杜撰的阐述——浮士德到了多瑙埃兴根就消失了。据说他消失在一次实验中，在一次音乐的试验中，即某种黑色艺术。消失在新诞生的音乐节中，音乐节是这个谨小慎微的共和国展示前卫性的一块耀眼招牌。是否想再现托马斯·曼的莱韦尔金先生呢？

自从使用了原子弹，浮士德和墨菲斯托的所有对话，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无理要求，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小事一桩。新生的联邦共和国的科学家回避棘手的问题。他们公开预警他们的研究工作会带来危害。有些人跻身社会道德运动的前沿，如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有些人则前往美国，如维恩赫·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而剩下的责任他们统统交给作家们来处理，首当其冲的是瑞士作家杜伦马特和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对于战后的共和国来说，这几位作家不带有任何污点，因此自然有权对历史做出道德的评判。杜伦马特让《物理学家》（*Die Physiker*）反思他们自己的行为，而弗里施则再次抬出唐璜——《唐璜，或者对几何的热衷》（*Don Juan oder die Liebe zur Geometrie*）。当犯下的罪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么肆无忌惮，以致悲剧的情节都会令人生疑，这时就需要唐璜冠冕登场了。

1962年，一部题为“浮士德和浮士德精神”（*Faust und das Faustische*）的作品出版。该作者名叫汉斯·施韦特（Hans Schwerte），一位德国语言文学专家，而他的真实名字叫汉斯·施奈德（Hans Schneider），曾经在希特勒时代希姆莱（Himmler）将军麾下供职。他在战后用假身份荣升至亚琛工业大学校长的职位。一个现代版的浮士德？

这个题材的最后一个版本是尝试让浮士德成为东德的国民。斯大林主义让浮士德从不解的纠结陷入深深的自相矛盾：在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的《约翰·浮士德》（*Johann Faustus*）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在舞台上说：我知道他们要跟踪我；更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他们来向我致敬；我要准备坦白说出一切。

特此提醒：在东德，公务是墨菲斯托在处理。

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初需要一个维稳阶段，继而是现代款的扇形桌子风靡天下，此时浮士德的身影不复出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著名女演员露丝·罗伊维丽克（Ruth Leuwerik）在现实生活中引用了浮士德剧作中“海因里希，见到你，我便会胆战心惊！”[2] 这句台词。这个阶段过后，浮士德在联邦共和国没费多大力气又占领了舞台。自此，导演的创意断然掌控了诠释浮士德的话语权。

作者：里·瓦

译者：杨丽

参阅：桁架建筑，科考远征，德国式焦虑，音乐，神秘主义

---

[1] 艾哈德曾在二战后先后担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部长和第二任总理。

[2] 意在说明，浮士德，我们现在不需要你。

铁路

观看19世纪火车旅行的招贴画，人们很快就会发现，画面上的火车车厢都画得很小，而人物都显得非常大，给人一种真人乘坐模型火车的感觉。那么，究竟是先有铁路还是先有铁路模型？

当然是先有铁路，所有人都下保证似地回答道，但语气又像是半真半假的样子，似乎是为了捍卫这个事实，还在防备着某种尽管不构成直接的危险 但可能在当今时代混淆公众视听的东西。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使人的健康理智和敏锐感觉统统失去作用，甚至连游戏也难逃破产倒闭的厄运。

铁路模型的初衷就是模仿，逼真地模仿。尽管先有铁路，但是铁路模型现在已将其远远甩在了身后。

真实的铁路常常会遇到自己的极限，而铁路模型却只会碰到玩家的想象的限制。铁路会发生事故，而模型充其量只会出现小小的故障。总之，铁路成功了会引起轰动，失败了也会引起轩然大波，而模型不过是爱好者家中的一件不起眼的摆设罢了。

铁路的出现，使人类第一次明显失去了对技术的驾驭能力，蒸汽火车被看作可怕的庞然大物。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在1830年写的铁路题材的诗中，把蒸汽机描画成“蒸汽骏马”，赫尔曼·冯·普克勒-慕斯考（Hermann von Pückler-Muskau）侯爵把它说成是一头“怪物”。

铁路成了早期工业时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国家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对象，铁路的轰动效应使它成了一个国家自我表现的固定组成部分，谁能骄傲地掌握铁路运营，谁也就成了国家的骄傲。迄今为止，铁路的任何失误，都会一如既往地受到公众社会迫不及待的批评，尽管它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霸主地位，而且也不再是德国唯一的物流运输企业。

光阴荏苒。想当初，濒临绝望的德国参谋部派出密探在苏黎世的咖啡馆里找到了列宁，然后把他锁进火车车厢穿越德国，送往俄罗斯去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彼得堡起义。参谋军官们当时真的以为，用这个瞒天过海之计，他们可以左右一战的结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未曾想，德国的帝国铁路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助产士，运送列宁赴俄国的故事变成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插曲。

往事如烟。二战时，纳粹政权动用铁路，把犹太人成批地运往杀人的集中营，这一暴行已经成了历史。冷战期间，东、西德国分割帝国铁路的遗产，东德接管了帝国铁路的招牌，这段历史也已经差不多被人忘却。

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辉煌时代过后，铁路经历了种种变迁，但技术上的改变却并不太多。除了用“滚动的风轮”这个词来表达外，没有更多的词可以用来形容它。这个表述词出自音乐家卡尔·玛利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之子——铁路作家马克斯·玛利亚·冯·韦伯（Max Maria von Weber）1882年出版的回忆录，他在许多作品中给铁路赋予了一种特有的语言描述。

我们这个时代许多重要的技术概念，常常成了传达生活感受的图像画面。当年，铁路不仅是帝国时代的运输工具，而且为1900年世纪之交提供了很多的比喻和象征。铁路虽然把大教堂的那种光线带进了候车室，却无法盖过描绘世界末日的表现主义的耀眼光泽。刚崭露头角的德国现代派的两首重要的诗歌——恩斯特·施塔德勒（Ernst Stadler）的

《驶过夜色中的科隆莱茵河大桥》（*Fahrt über die Kölner Rheinbrücke bei Nacht*，1913）和雅各布·凡·霍迪思（Jakob van Hoddis）的《世界末日》（*Weltende*，1911），内容是如此阴沉灰暗，让人觉得似乎是在堑壕里写成的一般。在施塔德勒眼里，世界就是“一条黑夜笼罩下的狭窄的矿井坑道”。这里，与其说表现主义是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和给人带来的心理创伤的结果，不如说表现主义预见了那场浩劫。“铁路从桥上坠落”，雅各布·凡·霍迪思在诗里干脆就这样写道。起步腾飞和穷途末路——在这种情感的两极分化中，铁路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在公众眼里，技术的成就越大，人们对它的怀疑也越大。新技术的梦想经常伴随着它带来的后果的噩梦。针对苏格兰发生的一起重大铁路事故，冯塔纳（Fontane）在他1879年创作的叙事诗《泰河大桥》（*Die Brücke am Tay*）中，写下了著名的诗句：“不值得一提，那出自人手的雕虫小技。”冯塔纳的诗中，莎士比亚《麦克白》剧里的女巫对灾难发生地点的掌控，不仅是一种暗示，同时也象征着大自然的威力。这种威力既不能被人类所征服，又无法被现实主义所描述。诗人借用莎士比亚的名剧回避了这个问题。

德意志帝国时代，路人皆知威廉皇帝的称霸梦想——修建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线，将近东或前东（当时的叫法）置于德国的控制之下。除此之外，这个时代还诞生了格哈德·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中篇习作《守道工蒂尔》（*Bahnwärter Thiel*）。故事发生在柏林附近的埃尔克纳（Erkner）和新齐陶（Neu-Zittau），一个充满田园风光和神秘自然景象的地方。

“四周都安静了下来，静得可怕；铁轨躺在刺眼的石子上，滚烫地发着黑光。中午一丝风也没有，树林像石头一样一动也不动。”这就是1887年发生在一条铁路支线上的景象。这样的铁路数以千计，比比皆是，而这里却成了一个人的命运场所。

大城市之间的铁路沿线曾经有过为数众多的小车站和停车点，如果你坐车经过，你会发现这些小车站多得叫人根本无法记住。

如今，这些小地方的火车站都还存在，尽管多年来一直待价而沽，但又有何人会来问津呢？它们曾经作为住房出售，却根本不适合人居住。

不管怎么说，它们紧靠铁路，即便前途未卜，火车依旧以特有的声音从这些昔日的车站旁边呼啸而过。别忘了这里的短途交通，还有那些每天早上六点钟出门的上班族。站台上，候车人要么闷头抽烟一言不发，要么嘻嘻哈哈就像是电视里早间新闻的主播。此情此景虽不是真相，但却是现实。

现实中，七点钟时，孩子们赶火车去附近的城市上学，然后又赶车回家，如此周而往复。

乘车的本意在于：人人都要赶上趟。用过去的老话说，就好像大伙儿都是定亲的情侣一样。然而，定亲情侣和乘坐火车，乃至和短途交通之间又有何干系呢？随它去吧，反正到头来都是一样分道扬镳。

假如有人要买火车站大楼，他至少心里指望这段铁路的火车会停驶，虽然他也清楚，将来出门办事还得自己开车。不开车，在这里寸步难行。尽管这样，买车站的念头还是刺激着他：这样他似乎就拥有了一段铁路，能随心所欲地让某种物体停下来，更重要的是，能随心所欲地叫它重新开动。似乎他买下的不仅是一座火车站，而且拥有了火车时刻表的支配权。

火车站的新主人站在他不期而至的房子前，不经意地抬头看着保留下来的车站大钟，似乎要考察一下那早已经不存在的火车是否准点。这趟火车虽然是没有了，但是当地的报纸说，老百姓们或至少是左邻右舍

都还知道它。

于是乎，火车误点就成了地方报纸的一个重要新闻内容。在德国人的脑子里，不守时可是个道德品质问题。

报纸登的都是当地新闻，历来如此。新闻说的都是当地的事情，有时也报道些遥远世界的事情。

突然有一天冒出这样一个问题：车站被卖掉，房产归私人所有之后，车站广场现在归谁所有？既然车站已非车站，广场归何人管辖？究竟是要保留站前广场，还是将其另作他用？

德国的铁路始建于1835年。从那时到现在，说到底一直就是个短途交通工具。第一条铁路从纽伦堡通往福尔特（Fürth）[1]。严格说来，铁路是作为支线在德国出现的，好像从一开始它就是一种老百姓能坐得起的郊游和休闲火车一样。

相比之下，英国的第一条铁路是从曼彻斯特通往利物浦的铁路，即便是甲壳虫乐队在当地演出时也坐这条线的火车。但是，如果要去纽伦堡，坐福尔特至纽伦堡的火车，或者要去福尔特，坐纽伦堡至福尔特的火车，这实在是小题大做。

这里并不是要把纽伦堡，甚至是福尔特拿来说事，我们无意造成这样的印象。因此，我们再举第二个例子：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据说，当年身为乐队指挥和作曲家的理查德·瓦格纳和全家乘坐这段铁路的火车，从莱比锡赶到德累斯顿参加他的歌剧《黎恩济》（*Rienzi*）的首演式。这段路坐火车值得，尽管那时的火车速度不快，但比起马车要快多了。火车的速度从来就没怎么快过，只是总比它的竞争对手要快，像早先的轮船，后来的汽车。

20世纪90年代，广告专家们曾经对火车的速度做过这样一次总结：

慢飞机一半，快汽车一倍。于是乎，火车就“起飞了”——评论家们这样说道。那些传统上能观赏沿途风景的火车，被他们轻蔑地认为是一种慢慢悠悠的火车。这种情况下，火车就只剩下出发和到站时间了。

这股潮流也影响到了短途交通，使短途火车在其主要优势——正点率上被长途火车严重拖了后腿。短途火车乘客不理解，而且有理由无法理解长途火车的这种优先权。如今，若是从路德维希堡到波茨坦，有谁会放着从斯图加特到柏林的飞机不坐呢？即便现在宽敞的ICE [2] 城际特快火车和汉莎的飞机相比几乎毫无差别，也不会改变人们坐飞机去波茨坦的出行方式。除此之外，即便是卖面包的小贩在哥廷根上车，然后在希尔德斯海姆 [3] 下车，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如同飞机一样，如今每辆ICE火车都有一个命名。可是，又有谁去记住他乘坐的这趟火车或是飞机的名字呢？难道他会说，本人今天乘坐“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伯爵”号从波恩到的柏林？还是会说，本人明天乘坐“玛利亚·西比拉·梅丽安”号从斯图加特去汉堡？

和挪威的卑尔根铁路，以及奥地利的塞莫林铁路相比，德国没有一条值得一提的铁路，除非要把连接北海叙尔特（Sylt）岛和德国大陆的兴登堡大坝说成一项了不起的铁路工程。此外，除了20世纪30年代的“飞行的汉堡人”以外，德国也没有可以和东方快车、皇家苏格兰人快车或者是南非蓝色快车齐名的火车。“飞行的汉堡人”当年创下了从汉堡到柏林的行驶纪录，可算作第一辆高速牵引机车。以内燃机为动力的高速牵引机车技术是德国人的一项发明。

这项技术发明加速实现了人类对速度的梦想，淘汰了蒸汽火车这头怪物，并且仅仅依靠流线型的外形便使火车能与飞机一较高下。说到底，火车就像是一架留在铁道上的飞机。这架飞机就是磁悬浮火车，它是人类最新的大胆技术想法之一，可是并没有被现实所接受。人们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开发“磁悬浮”技术，到头来却只能无奈地让它在慕尼黑市

区和机场之间作为轻轨行驶。当这件事也未能实现后，人们就把它用船运到了上海。磁悬浮列车的失败，究竟是因为它缺乏实用性，还是因为它不符合这个心胸狭窄的时代的实用标准？当前这个时代，凡事如果不经过一番折腾，就连斯图加特的一座旧火车站也拆除不了。车站应该把站台票再重新恢复起来。

再者，人们现在讨论的不是铁路，而是铁路的未来。似乎至今铁路上还在沿用那种老式“火车时刻表”，它曾经既是印制成册的时刻表，还是这个国家爱批评人的知识分子手中的一种杂志的名称。如今，这两样东西都已难觅踪迹了。

那就让我们在不眠的夜晚坐进火车驾驶室，沿着德国和全世界最美丽的铁路线，做着拥有自己的火车头的美梦，好像我们自己就是儿童动画片里的吉姆·科诺夫、卢卡斯、艾玛和莫丽[4]，奔驰在从库伦斯伯恩（Kühlungsborn）到多贝兰（Doberan）温泉市的铁路线上。用句好听的话来说，去重新编写我们自己的故事。

终于，早上醒来时，满脑子都是昔日的词语：疗养车厢，慢慢悠悠的火车，大火车站。吉姆·科诺夫扩大了卢莫兰岛[5]的地盘，卢卡斯关心着艾玛，艾玛突然有了她名叫莫丽的火车。就在故事编不下去的时候，一个小火车诞生了，它行进在莫丽温泉铁路线上，奔向疗养地和其他目的地。

作者：里·瓦

译者：吴宁



兴登堡大坝魅力彩照：火车吞云吐雾驶往威斯特兰终点站。

参阅：驾驶的乐趣，德国人的性情，男声合唱

---

[1] 福尔特，德国纽伦堡市卫星城，两地仅距约7公里。

[2] Intercity-Expreß的缩写。

[3] 希尔德斯海姆位于哥廷根北部，两地相距约90公里。

[4] 《吉姆·科诺夫和火车司机卢卡斯》是德国作家米歇尔·恩德于1960年创作的儿童读物，1999年摄制成动画片，上述四人都是书中的主要人物。

[5] 《吉姆·科诺夫和火车司机卢卡斯》一书中虚构的小岛。

严肃文学和消遣文学

喜欢临睡前看会儿好书的茱莉亚完全可能是个广告里的人物形象，但她不是。茱莉亚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位读者。在她眼里，什么才是一本好书，一两句话恐怕说不清楚。写得好才叫好书——我们的茱莉亚这句话的意思是，书要写得既不能太简单，也不能太难懂。茱莉亚在一家律师楼上班，一个整天和文字打交道的地方。律师楼里的人都知道她喜欢文学，还时常让她推荐好书。不过，律师们的取向通常都是以报纸上的文学评论为准。身为律师，他们读的是报纸的专栏文章。尽管各种说法相左，但那里所涉及的书籍仍然是千差万别五花八门。作为律师，他们时常去歌剧院看戏，也顺便聊两句手头正在读的书，或是昨天刚买的一幅丹尼尔·里希特（Daniel Richter）[1] 的画。

茱莉亚也可能是在一家诊所上班，医生也是读书人。如果说律师们对语言感兴趣，乃是因为语言是他们这个专业有决定意义的工具，它既能将一件事说得天花乱坠，也能把一件事讲得一文不值，那么，医生所感兴趣的是对人的知识。在医生眼里，文学能让人懂得人性。因此，律师和医生都很重视艺术。但有两件事他们无法理解：歹徒破坏他们停在港湾里的游艇，或是有人向他们推荐吸血鬼小说。

即便是当今泛爱集会时代的德国社会，人们也无法避开对雅俗文学的区分。听什么音乐，看什么小说，是严肃音乐还是消遣小说，这些都是评价一个新朋友和一个新员工的硬标准。中产阶级讲究的就是教育和人的素质，数钱这种简单事毕竟人人都会。

他们知道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应该如何举止谈吐，清楚自己该说什

么和不该说什么。即便对某本书不了解（新书更是不甚了了），也应当具备说出自己明确见解的能力。

最要紧的一条原则是：通常情况下不要轻易提畅销书榜上的书，除非你明确知道，书单上的这本书是纯粹出于偶然或是读者集体提名才上的畅销书榜。

如果想求稳，那么就采用德国西南电台的好书榜。这个书榜不以销量多少为标准，而是以德国公正无私的专栏评委的口味评定的。关于新书，或是行话说的新版图书，本文不予赘述了。

在文化行业的咖啡馆里，不能只谈当前的图书生产，如果能兼顾文学史上的名家和大师，谈谈卡夫卡（Kafka），谈谈歌德的《威廉·麦斯特》，谈谈令人刮目相看的、刚被重新发现的、第一个翻译法国作家拉伯雷（Rabelais）的德国人约翰·费舍亚特（Johann Fischart），总是件大有裨益的事情。不要怕说起穆齐尔（Robert Musil）[2]和格里姆斯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3]，应该一口气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千万不要提“卡夫卡式的”，那是属于对文学感兴趣的理发师们的专用词。

评论自由给艺术设定了界限。

现在要问的问题是：诗人和思想家在何时，而且如何得到了广泛认可的声誉呢？依靠这种声誉，他们获得了一种力量，一种不再是支配刀枪棍棒，而是左右军事号令和冲锋号角的力量。

使之成为可能者，乃是告别了为宗教服务之后的18世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伴随摆脱宗教束缚的时代而生，在公众社会里，神学家最终被哲学家所取代。人们不再追捧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4]，而是莱布尼茨。哲学成了一门职业。此时，诗人和思想家所拥有的力量，

不仅基于一种对语言的规范，同时也基于语言工具本身。人们拿来引用的理性，建立在了交流和沟通之上。语言不仅像钱币那样带有思想的印记，同时也是象征。这样，人们就可以用心灵去追寻古希腊的文化。

那时人们以清醒的认识所投身的世俗文化，不仅让宗教文化，同时也使自己变得渺小和猥琐。莱辛之流一边把自己宣布为世界公民，一边却待在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小城不动窝。

18世纪时，市民阶层虽未取代贵族阶层，但已登上历史舞台。原则上，他们已能够成为一国之君，但他们从未能为自己争得那种中世纪的、建立在人间和天上的双重国王权威。于是，诗人和思想家就陷入了开明专制的尴尬，从一个传统的宫廷诗人变成了一个即兴马屁精。

至少德国是如此情形。严肃的宫廷文化在这里根本无人捧场，那一帮诸侯最多只够赞助商的资格。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地方政府也还是一样，他们想用一笔奖励作家的地方创作奖金来抬高自己的地位。过去，人们可以去吹捧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也可以不去凑这个热闹。

普鲁士的情况也不例外。同为信仰坚定的启蒙人士，莱辛和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之间究竟有何共同之处？首先，弗里德里希是个君主，他是在私下里接受的启蒙运动，此外，他也受到人们的热捧。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世时，约翰·威廉·路德维希·格莱姆（Johann Wilhelm Ludwig Gleim）是为他歌功颂德的诗人之一。格莱姆算得上是德国18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以《一个普鲁士步兵1756年和1757年征战诗集》（*Preußische Kriegslieder in den Feldzügen 1756 und 1757 von einem Grenadier* ），以及他的咏月诗和模仿古希腊阿那克里翁风格的诗出名。

来看一下格莱姆的原诗：“仅为一国之主，而非专制之君，/置法律

于权威之上/吾辈第一爱国志士/祖国之奴仆。”

可惜这位君王没能有幸一睹这些用德语创作的即兴诗歌。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从少年时起就不看德文书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偏爱法语，但仅是粗通而已，如果伏尔泰以及他关于这位普鲁士对话伙伴所写的暗藏讥讽的评论可信的话。伏尔泰曾经很乐意接受这位国王的邀请进宫授业。



当圆号在音乐厅里为严肃的文艺女神服务时，它的表现是如此这般地中规中矩。



铜管乐器闪亮登场。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前大半年，甚至是提携年轻人的“导师”格莱姆——这位住在哈尔伯城（Halberstadt）且衣食无忧的教士会会员，在他最后一首写这位君主的诗歌里，到结尾时突然笔锋一转道：“他赐予吾等一切自由，甚至是/做傻瓜的——自由！”

今天来看，弗里德里希二世并没有因为这句诗而有损自己的名声，史学界也宽恕了伏尔泰的一切，只是格莱姆已经无人知晓了。在哈尔伯城里还有他的纪念馆，1862年建成，是德国最古老的文学纪念馆之一。

那么，莱辛的情况又如何呢？他活跃在启蒙运动所有活动的前线，最后是在话剧舞台上想尝试利用语言的力量，似乎舞台就是布道讲台。他的一切努力，是为了功德圆满地实现纳旦式的三大宗教和平共处这个俗套。

诗人和思想家们喜欢抱怨他们衣食不保的生活，他们当年所充当的角色受到误解，不仅是权势使然，他们自己也难辞其咎。

尽管他们坐拥能够传播思想并不断进步的科技所带来的优势，但

是，印刷术不仅成就了他们，同时也让他们沦为失败者。随着图书生产越来越简单，作为精英们手中权力工具的书籍的意义也今非昔比了。

书市伴随启蒙运动而生，它不仅不分各种思想门派，也不论这些思想的层次高下。启蒙运动的局限也表现在这里。有人试图用魏玛古典派来暂时摆脱这种鱼龙混杂的局面，但是无济于事。魏玛古典派的靠山是歌德和席勒这双驾马车，而这辆马车是不可复制的。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牵扯出浪漫派。

18世纪时读书已很盛行，读者选什么样的书，要有所区分和事先的分门别类。同样是作家，人们已有将歌德和他的大舅子克里斯蒂安·乌尔皮乌斯（Christian August Vulpius）[5] 区别开来的需求。此二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真正畅销书的作者，歌德创作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乌尔皮乌斯出版了《首领里纳尔多·里纳尔迪尼》（*Rinaldo Rinaldini* ）。

将某种潜在的抗议提炼升华，是二人作品的共同特点。对现实深感不满的读者，在他们的小说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令人惊讶的是，两部作品都能流芳百世，这是他们二人的又一个共同特点。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不仅是学校的必读书目，而且经过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Ulrich Plenzdorf）按照民主德国现状改写的短篇小说《少年维特的新烦恼》（*Die neuen Leiden des jungen W.* ）引起了一场新的政治轰动。乌尔皮乌斯至少也没有损失他在传递时代信息方面的名气，强盗之歌《在森林深处》即源自他的小说。小说主人翁的原型据说就是人气颇旺的强盗头子弗拉·蒂亚沃罗（Fra Diavolo），他是1968年德法合拍的13集电视连续剧里的主要人物，德国电视一台以小说原名《里纳尔多·里纳尔迪尼》播出，法文名叫“La Kermesse des Brigands”（强盗集市）。

席勒把小说家称作“诗人的同父异母兄弟”。就那个时代人们对德国文人墨客的看法来说，这个叫法不仅意味深长，而且具有标志性。当时，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还处在起步阶段。是什么原因让一帮文人对德国的小说如此瞧不上眼，以至于把它贬到二流作品的地位？

恰恰在18世纪，读小说的人并不少，其情形和今天并无不同。人们阅读译自法语和英语的时髦小说，并尽可能模仿它们的样子写作，大量的德国作家版的鲁滨孙小说就是例子。

在后来所谓的世界文学里，小说从一开始——中世纪结束和近代开始时期——就占据了王者的地位，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通俗拉丁语国家的西班牙和法国，其源头无可争议地源自史诗和骑士小说。小说脱颖而出，提供了那个时代处在普遍绝望和巨大期盼，以及生死轮回恐惧中的市民阶层的风俗画卷。这个过渡时代的小说非常具有讽刺性，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艺术能如此惟妙惟肖地勾勒出贵族阶层的意识形态，如此连贯地展现上升的市民阶级的世界观。

小说的形式具有足够的伸缩性，其亦庄亦谐的特点使它赢得了最广泛的观众，古今莫不如此。

小说给了读者一个如同歌剧院里的包厢位子，让他感觉到手里拿着歌剧的脚本，在巨大的舞台上跟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小说使纯文学 美女成了阅读的素材，没有任何其他的文学体裁能像小说那样与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生活感受相契合。然而不能不说的是，德国人与小说的关系到今天为止都是隔膜的。最重要的小说作品都来自国外，德国自己的小说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更不要说与之匹敌抗衡了。那么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德国作家就写不出读者爱读的长篇小说来？

由于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有人就把长篇小说的消遣性当成干扰因素来解释一番。浪漫派就是这类人，他们以其惯用的中篇小说

体裁来和长篇小说唱对台戏。但是，中篇小说也不是德国人的发明，而是起源于薄伽丘（Boccaccio）和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长篇小说可伸可缩的形式，能够显现出它所讲述故事和人物的狂欢节式的特点，而中篇借以传达信息的严谨形式和执着程度，更符合德国人那种在寺院僧房打坐念经一样的一本正经。中篇小说不是绘制一幅人类社会的百态图，而是偏爱淋漓尽致地讲述一个故事。现实都是支离破碎的片段，而人物的刻画却入木三分。这些人物必须面对各种必然的场景，他们必须行动。一个人物的结局没有交代清楚，他不会从故事情节中出局。19世纪是中篇小说的天下。一部中篇小说大全将语言高手克莱斯特以及今天几乎被遗忘了的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保罗·海泽（Paul Heyse）都囊括其中。中篇小说是文学上的小德意志方案[6]，也可以说，中篇小说体现了德国人的嘴脸和德行。

中篇小说的消亡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之后，新纪实文学给它做了一个痛快的了断。随着中篇小说的消亡，德国的长篇小说才慢慢开始崭露头角，从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直到沃尔夫冈·柯鹏（Wolfgang Koeppen）。

20世纪成功的长篇小说，无一不是消遣性和严肃性相结合的范例。尽管如此，消遣性和严肃性之间还是存在区别。即便是二者的内容都消失了，区别还是继续存在。有哪一位德国读者愿意让人说，他读书只是为了消遣？他的目的是要得到人们对他一边看书一边劳苦心智的一种认可。德国读者看书时尽管手里不拿铅笔，但他是用心在做笔记。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他好像是临睡前手拿铅笔看书的样子，你的脑子里不由地会出现一个想法：读书真应该拿去抵税呀。不仅是书籍，而且连阅读本身都应该。

我们的那位偏爱好书的茱莉亚怎么样了呢？有人给她发了两个书单，是Facebook的朋友圈发给她的，我们暂且这么说吧。她会选择哪本

小说呢？

作者：里·瓦

译者：吴宁

附录一：真正的长篇小说！

20世纪10本实验性的德语长篇小说

1.托马斯·曼：《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Joseph und seine Brüder* ），1323页！（1933～1943）

（怎样把一个歌德觉得太短的圣经故事写成一本四部曲小说。登峰造极的虚构？）

2.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维吉尔之死》（*Der Tod des Vergil* ），522页。（1945）

（罗马诗人的临终时刻，讲述生与死和写作。）

3.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2159页！（1931，未完成）

（小说铸就了“卡卡尼亚”一词。）

4.海密托·冯·多德勒尔（Heimito von Doderer）：《群魔》（*Die Dämonen* ），1360页！（1956）

（奥地利20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全景图，人物最多的德语小说。）

5.汉斯·亨尼·扬（Hans Henny Jahnn）：《佩鲁贾》（*Perrudja* ），814页。（1929/1958）

（在一幅永恒的挪威自然风景中，试图塑造一种神话般的生活。）

6.阿尔伯特·维歌莱斯·泰伦（Albert Vigoleis Thelen）：《第二张脸

的岛屿》（*Die Insel des zweiten Gesichts* ），943页。（1953）

（30年代的马约卡岛：思想家，游手好闲者，业余纳粹分子和密探。）

7.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周年纪念日》（*Jahrestage* ），1703页！（1970～1983）

（约翰逊将梅克伦堡的耶里肖夫镇和纽约联系在一起，让耶里肖夫镇人感到高兴。）

8.彼得·魏斯（*Peter Weiss* ）：《反抗的美学》（*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1195页！（1975～1981）

（受过教育的公民在一部意识形态的理想传记里当工人。）

9.阿尔诺·施密特（Arno Schmidt）：《蔡特尔的梦》（*Zettel's Traum* ），1536页！（1970）

（1968年的一个夏日，多处文字谈论美国诗人埃德加·艾伦·坡。）

10.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我在无人海湾的一年》（*Mein Jahr in der Niemandsbucht* ），628页。（1994）

（一种更广泛的、汉德克式的陶醉，对时代精神的又一次控诉。）

附录二：阅读材料

20世纪的12部长篇小说（推荐给有眼光的德国人）

1.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 ）（1901）

（20世纪德国家族小说的鼻祖范本。）

2.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臣仆》（*Der Untertan* ）（1918）

（没有哪部小说像它那样给我们对德皇威廉二世时代的认识刻上印记。）

3.弗朗茨·卡夫卡：《审判》（*Der Prozess* ）（1925）

（一定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

4.约瑟夫·罗特：《拉德茨基进行曲》（*Radetzkymarsch* ）（1932）

（对独一无二的奥匈帝国的伤感悼词。）

5.阿尔弗莱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 ）（1929）

（一部对魏玛共和国下层阶级的崇敬小说和赞歌。）

6.克劳斯·曼（Klaus Mann）：《梅菲斯托》（*Mephisto* ）（1936/1981）

［围绕“第三帝国”时期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演员生涯的关键小说，权力和精神相互碰撞，为权力效忠的精神败下阵

来。］

7.沃尔夫冈·柯鹏：《温室》（*Das Treibhaus* ）（1953）

（叙述关于德国战后的重建、阿登纳总理，以及波恩政界的一位左派自由知识分子对早熟少女的恐惧。）

8.马克斯·弗里施：《施蒂勒》（*Stiller* ）（1954）

（现代的真实身份问题，符合战后状况，有点儿瑞士口味，受克尔凯郭尔影响。）

9.君特·格拉斯：《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 ）（1959）

［二战后关于战前（并且为了战后）的挑战性小说，学术委员会战后几代人的、经得起考验的政治导游指南。］

10.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九点半的台球》（*Billard um halb Zehn* ）（1959）

（在并未逝去的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科隆家庭灾难，天主教和批判天主教，典型的伯尔作品。）

11.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抹去：一场崩塌》（Auslöschung. Ein Zerfall）（1986）

（这位愤世嫉俗的奥地利批评家的最后一次伟大和激愤的自编自演。）

12.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泉水淙淙》（*Ein springender Brunnen* ）（1998）

（一部讲述发生在博登湖畔水堡小镇少年故事的小说，书中众多叫人琢磨不透的语句之一是：“只要它还存在着，它就不是事后看起来已成为过去的东西。”）

参阅：印刷术，下班之后，文化民族空想，音乐，牧师之家

---

[1] 丹尼尔·里希特（1962～），德国艺术家，柏林艺术大学教授。

[2] 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奥地利作家和剧评家。

[3] 汉斯·雅各布·克里斯多夫·冯·格里姆斯豪森（1622～1676），德国作家，著有小说《大傻瓜历险记》。德国自1993年起设立两年一度的“格里姆斯豪森文学奖”。

[4] 菲利普·梅兰希通（1497～1560），德国马丁·路德时代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

[5] 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乌尔皮乌斯（1762～1827），德国作家，其妹克里斯蒂安娜1806年嫁给了歌德。

[6] 19世纪德国统一时，有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大德意志帝国和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小德意志帝国两种方案。

桁架建筑

“我们喜欢上了一栋1500年建的桁架房子”，我认识了半辈子的一对老年夫妇这样跟我说。隔上几年他们就会过来看看。当他们说起“我们如何如何”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的日子过得挺不错。一提到他们最近忙乎的事情——新发现的那栋桁架房子，他们的眼睛里就露出兴奋的光芒。这个样子有点像是刚入了某个独立教派的教徒，遇到了一个愿意听他们解释圣经的人。和我们大家一样，虽然岁月不饶人，但他们总是只争朝夕地在学习新东西。他们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有着更美好的想法，保持着德国的平衡稳定。

眼下他们正在寻找一位专家，帮他们看看那栋房子，然后再决定买还是不买。这位专家要懂桁架建筑，比如桁格、填料、老虎窗、扶手、窗框、锈蚀点、保温层什么的。

桁架结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种建筑方式，这点毋庸置疑。关于它的技术特点也有广泛的描述，书店里这方面的图书汗牛充栋，随时可以拿来办一个桁架建筑的阅览室。但是没这个必要。如果你想自己建一座这样的房子，这个传统行当的专业建筑公司会尽心尽力帮你的忙。

木桁架房子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古老建筑方式，它的历史比德意志民族要悠久得多得多，其建筑技术源头可以追溯到历史还未成为历史的时代。这种技术基于的是一种史前的房屋式样，即用木头支架和沙石泥土做成的那种房子。

这种建筑手法所以能历经时代的变迁传承至今，原因就在于它能充

分满足需求，不受技术发展的影响。就像火柴一样，历经数百年而不变，而且将继续保持不变。

简言之，桁架木屋和现代居住时尚，两者已经水乳交融相得益彰。2011年春，有一家公司做过这样一则广告：“我们的保温黏土产品为您带来最佳的健康居住空间。”打广告者是一家桁架房屋砖瓦生产商。

桁架建筑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不是它的起源，也非它的持久耐用，而是它的独一无二和举世无双。所谓独一无二，归根结底不仅是它的技术层面，更主要的是它的美学特点。换言之，桁架建筑不仅美观，而且也应当称得上美观。它的美到今天都还一直决定着德国无数老城区的面貌。有的城市甚至有目的地通过改造，给历史悠久的老城区赋予标志性的桁架结构建筑。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希尔德海姆市，它的屠宰行业公会会址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美的桁架建筑。最小的有人居住的桁架木屋是巴符州莫斯巴赫（Mosbach）镇的“Kickelhainhaus”，楼上楼下总共有52平方米的面积。最大的一座桁架建筑在萨勒河畔的哈雷市（Halle an der Saale），即有名的“弗朗克基金会”大楼。

虽然桁架房屋不是德国人的发明，但德国人把它吸收过来并使之德国化，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如此做过。其中的原因，或许在于这种建筑广泛采用手工搭建的特点，而我们德国人尤擅此道。但事情远不限于此。从根本上说，它是德国中小企业的成功秘诀之一，即德国人与其被动适应，不如拿来为我所用的那种能力和天赋。德国人善于学以致用，并使之尽善尽美。于是乎，外来的东西摇身一变就成了德国的名牌货。

桁架建筑遵循的是一个建筑艺术上的基本观念：在落成的房屋保留其框架结构外露的同时，建筑技术就成了建筑物外表形式的具体细节，或者叫纹饰点缀。这种双重效果使得桁架建筑既轻巧又安全，犹如一艘停在地面的飞艇。实际情况是：人们更觉得纽伦堡的名歌手和歌手行会会员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是这种木骨架房屋的住户，而非自由思

想诗人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尔魏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如今，桁架建筑既非唯一可供采用的建筑技术，也非一种特别惊世骇俗和妙不可言的建筑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传统和这种传统的可信度。传统就体现在可以普遍使用的技术上。任何人都懂得桁架房屋的建筑原理，任何人都能学会掌握。如果有谁觉得宜家的拼装家具太简单的话，可以花些精力学习桁架建筑。在和平年代里，喜爱这种风格的业主把这种房子当作豪华住房来建，但他同时也知道：如果动荡时代来临，紧急情况下只要会两手手工活，就能自己动手造一个这样的木结构房子——有人这么跟他解释说。这话听起来十分抚慰人心。在德国境内据说共有一百万座这样的桁架房屋。

德国的城市、城市的中心，以及人们想象中的城市，都被打上了桁架建筑的印记。只要你走出维斯玛（Wismar）镇[1]的集市广场，四周都是桁架房的狭窄街巷。1922年，伟大的无声恐怖片《不死僵尸》（*Nosferatu*）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德国的城市形成于中世纪，这个时期老百姓选择了桁架木屋。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世纪被重新发现，人们对作为德国传统组成部分的桁架木屋的兴趣有增无减。

在桁架屋里居住好像成了一种业余爱好，男人把他的火车模型丢在了一边，女人也放弃了她的网上织毛衣课，大家都去参加周末的学习班，想学几手桁架房的维修技能。这些学习班除了练习手工技能外，还包含学习有关桁架房屋的艺术。虽然不是真的要搞艺术，但毕竟要和黏土打交道。黏土用在建筑和医学的治疗法上的时候，它被摆弄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说起桁架建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木头，然后才是黏土。橡木是最好的材料，大家都那么说。谁还会奇怪呢？橡树虽然早就不再是什么德

国特有的东西了，但它始终经久耐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用化学保护，橡木照样不腐。花旗松也是一样。那您更愿意用花旗松还是橡木呢？



罗腾堡美不胜收的老城建筑。

实际上，木头和黏土同样重要，关键是木头和黏土怎么结合。这里似乎就是房子住起来舒适与否的诀窍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居住的质量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符合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他们让生态鸡蛋和欧莱雅化妆品能够相互兼容，而且最近电视上那则酸奶广告也和桁架木屋搭配得恰到好处：一个再婚家庭在温馨舒适的家里，其乐融融地享用早餐。

把人们近来乐于和桁架屋子打交道的态度，视为一种接受德国历史

的表达方式，未免失之轻率。尽管如此，这种现象乃是一种对这段历史发生地的心照不宣的补偿。人们可以嘴上说桁架屋，心里想的是历史传统——德国的历史传统，而不必把这个意思明确说出口。就好像人们嘴上说生态环境，心里想的是自己的家乡，而不必让别人觉察出来一样。

作者：里·瓦

译者：吴宁

参阅：工作狂，包豪斯风格，浮士德，德国人的性情，高地丘陵

---

[1] 维斯玛，德国东北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一个小城市。

驾驶的乐趣

驾驶之乐就是徒步旅行之乐。

停车！都错啦！原野山谷间传来了呐喊的声音：你们开着臭气熏天的汽车从我这里经过究竟看到了些什么？闻不到花香，听不见鸟鸣，马达突突作响，车灯刺人眼睛，我沦为从你们眼前晃过的照片糊墙纸了。

大自然的风光是保守的，它有权这么呐喊。但是，驾驶汽车是不是真的把我们全都变成了飙车狂了呢？

即使一个徒步旅行者，如果要在天黑之前赶到要去的旅店，他也不会在每一朵野蔷薇花前驻足停留。有多少喜欢小汽车的德国人，不都是因为火车到不了，而自己开车去看大自然的吗？打开车顶的天窗，沿着波罗的海海边或是阿尔卑斯山麓的小路信马由缰，这种自然崇拜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当夕阳西下，即使在高速公路上车速达到200公里/小时，你也会对眼前的光影变幻心驰神往。如今，连傻瓜也不会徒步，而是开着破旧的大众面包车去南方旅行。

赫尔曼·黑塞若是还活着的话，他可能会带头唱起一首自然的颂歌。这位作家热衷徒步旅行（但在印度旅行的时候，他还是愿意让人用人力车拉着走），他曾经幻想要对“小汽车进行一场讨伐围剿”。在小说《荒原狼》（*Steppenwolf* ）里，他让笔下的人物对着“豪华汽车”开枪射击，目的是要“将那些肥胖的、衣着华丽的、满身香水味的、用机器榨取别人血汗的富人，连同他们咳嗽不止、发出可怕的呼噜声的豪车一起干掉，再一把火把工厂点着，清除地球上的污泥浊水，减少人口数量，

让青草、森林、草地、原野、小溪和沼泽从水泥的世界里再重新生长出来”。

在他的第三任太太尼侬（Ninon）的催促下，这位已经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家在40年代后期购置了第一辆自己的小汽车，先是一辆一般化的福特Standard Fourteen，之后很快又买了一辆派头十足的Mercedes Ponton。72岁高龄时，喜欢汽车的太太开车带着他翻越了尤利尔山口（Julierpass）[1]。如同其他的许多阿尔卑斯山口一样，他年轻时也曾经徒步翻越过这座山口。然而，这位徒步旅行家对座下的这种新的代步工具并不十分追捧，在一首旅行诗里他这样说道：“累，但马路的中线/画得笔直扎眼，/过去的军队和朝圣之路，而今/被喘着粗气的机器碾平/坐在车里的人，他们啥都不缺，/从喧嚣中逃往夏日的福地，/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



“我们开，开，开/飞驰在高速路上：/面前是一马平川，/阳光洒满大地。//道路宛如灰色的丝带，/白色的地线，绿色的道边……”发电站乐队传奇专辑封面，

1974。

倘若上面的诗句被另一个舞文弄墨的同行听见，他或许会报以轻蔑的微笑，然后一脚油门便将这个怀旧的乘客连同他的绅士礼帽一起抛在了车后扬起的烟尘中。虽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不一定反对一枪把这些“肥胖的、衣着华丽的、满身香水味的富人”从他们的“豪车”里崩出去，但是与赫尔曼·黑塞不同，他可能会一个鹞子翻身就坐到这些缴获来的汽车的驾驶座上。1926年，这位写过《巴尔》（*Baal* ）和《改头换面》（*Mann ist Mann* ）两部戏剧的作者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这是一辆二手的英国造Daimler牌轿车。如同他的第二辆Opel车一样，这辆车并不合这位爱开飞车的驾车手的口味。有道是，“与其花钱买破车，不如卖文换好车”。于是，布莱希特在1928年让他的情人和合作者伊丽莎白·豪普特曼（Elisabeth Hauptmann）挨个儿去敲几家汽车公司的大门，询问是否能给囊中羞涩的布莱希特提供一辆跑得快些的座驾，他则以颂扬公司的美文作为回报。一家在当时领先的奥地利汽车制造商有了兴趣。几个星期后，柏林的《雕鸮》（*Uhu* ）杂志上登出了一首叫“斯太尔汽车在歌唱”的诗歌。其中的诗句这样写道：“弯道时我们就像胶带。/我们的马达：/是一块会思想的钢铁。//朋友，来驾驶我们吧！！//我们开着你没有颠簸/感觉就像，你躺在/水中一样。/我们开着你如此轻巧/感觉就像你/用拇指把我们按在地上一样/我们如此安静地开着你/感觉就像在驾驶着/你的车影。”

一年后，布莱希特开着这台赠送的斯太尔敞篷轿车出事撞了树。难道他上了自己做的广告的当吗？然而，无论是汽车制造商还是作家本人，都没有受到这次车祸的影响。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奔驰公司曾经用一次惊险的车祸做过一则广告一样。在那次车祸中，一辆奔驰轿车从南非的一条海滨山路上偏出车道，司机连人带车坠落一百多米，但安然无恙。后来，戏剧家布莱希特的这次车祸被模拟，其经过（再次在《雕鸮》杂志上）被详细记述刊载出来。两处髌骨骨折，脸部也受了伤的布

莱希特事后又获赠了一辆新的斯太尔敞篷轿车，这辆车一直开到他被纳粹分子迫害流亡，车子也被没收。

谁若是沾上汽油的味道，那他就会抛弃所有的原则。本来利用每一个煽情的机会都要对德国的森林大肆歌颂一番的纳粹政权，当要修建高速公路时，突然间对之弃而不问了。同样值得怀疑的是，纳粹修建高速公路是否为了振兴经济、把帝国的公路联网和展现自己的国力。其中可能有更加非理性的原因存在。那个要把人和技术融为一体的所谓“钢铁般的浪漫”的口号发明者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狂热地醉心于“沿着壮观的高速公路开足马力一路驰骋”。化学家和自然科学记者瓦尔特·奥斯瓦尔德（Walter Ostwald）在1939年甚至号召自己的同胞去做“愉快的汽车漫游”。

如同对整个纳粹国家不能用一句“并非全部都是坏事”来做评判一样，高速公路和大众汽车也不能用一句“这是桩好事”来做结论。从根本上说，对动力的狂热是有悖伦理道德的。正因为如此，在一个不放过任何机会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强行披上道德外衣的国家里，这种狂热有着从未断过的吸引力。爱开飞车的人并非肩负使命，他要的是过瘾刺激和猛踩油门，就像“新德国浪潮”（Neue Deutsche Welle）乐派的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

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有过“善良的”车手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区区几个马力而且无马拉之力的汽车的发明者。有施瓦本地方的普罗米修斯之称的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2] 和他的高级设计师威廉·迈巴赫（Wilhelm Maybach）[3] 穷毕生之精力研发发动机和汽车，借此机械之力，人类可以在陆地、水上和天空自由地纵横驰骋。他们从未把自己当做是为速度狂服务的制造家。刺激他们制造跑得更快的汽车的人，是古板偏执的商人埃米尔·耶利内克（Emil Jellinek）。此人看起来不仅像早先的赛车队老板，而且是一个叫梅赛德斯（Mercedes）的千金小姐

的父亲。

比戈特利布·戴姆勒早几个月于1886年申报第一台汽车的卡尔·本茨（Carl Benz）[4]也想将人类推向前进，但并非像炮弹那样呼啸出膛。据说这位制造汽车的先驱最初开着他的三轮汽车试车的时候，着实把马吓得受了惊，而且还压死了六只鸡、三只鸭子、两只鹅和一条狗，但他是一个速度狂的坚决反对者。正是因为这个操守，使他在20世纪初和他最得力的工程师产生了过节。

奥迪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奥古斯特·霍尔希（August Horch）[5]小时候为了要从山坡上更快地滑下来，在他父亲的作坊里给自己的木质雪橇安装了两根铁条。霍尔希是毫无保留地推崇汽车速度的第一人。这位公司老板亲自参加比赛，并且在一战前使他的奥迪车成了汽车运动的常胜将军。他的新公司——其老公司和另外两家汽车制造商合并而成的公司——雇请了一位新的天才设计师——费迪南特·波尔舍（Ferdinand Porsche）[6]。波尔舍为新公司汽车联盟设计的赛车，在30年代和梅赛德斯-奔驰公司（两家公司也正式合并）生产的赛车在德国银箭汽车大奖赛中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角逐。

汽车驾驶是一门艺术。伯尔恩德·罗森迈尔（Bernd Rosenmeyer）脱颖而出成了那个时代德国名气最大的英雄。由他驾驶的汽车联盟的银箭赛车不仅获得了大赛的冠军，而且还创造了速度的纪录。1937年10月，他突破了时速四百公里的不可思议的极限。戈培尔“钢铁般的浪漫”终于找到了它的偶像。这位赛车手和同样对速度痴迷的女飞行员艾丽·拜因霍恩（Elly Beinhorn）喜结连理，但是结婚这件事并没有能让他见好就收，恰恰相反：他们被纳粹政权吹嘘为“全世界速度最快的夫妻”并被用来装点门面。

1938年1月，这个风光无限的高速童话戛然而止：正当罗森迈尔在法兰克福至达姆施塔特的高速公路上驾车准备打破他的竞争对手用一辆

梅赛德斯-奔驰赛车创下的时速新纪录时，一阵侧风将他的赛车吹到了路边的树林中，罗氏当场死亡。他后来被安葬在柏林达勒姆区（Berlin-Dahlem）的森林公墓中，也是在一片树林下面。

这个地方离世界上第一条“机动车专用马路”（即高速公路）不到三公里。这条“汽车交通和练习马路”（Auto-mobil-Verkehrs und Übungsstraße，AVUS）于1921年开通，从那时起这条路上的车速就非常之快。当初修这条马路并不是为了提供一个场地，好让柏林人能在上面练习驾驶技术，不给动物、马车和行人的安全造成威胁，而是让当时在国际大赛中总是落后于人的德国赛车手有一条车道，可以开足马力测试由德国工程师开发的马力越来越大的发动机。但在平常情况下，像罗森迈尔这帮职业车手们就只好和那些自封的业余赛车手们在一条马路上争先恐后了。

这种个人的速度狂在女作家维琪·鲍姆（Vicki Baum）那里得到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她的畅销小说《旅店众生相》（*Menschen im Hotel* ）里，作家将患有胃癌的外省会计奥托·克林格莱因（他还从未坐过汽车，因此在即将离世前的几个星期里，他要无所顾忌地充分享受生活）连同一个生性豪放的男爵的故事，都安排在了“汽车交通和练习马路”上：“起先是扑面而来的空气变得越来越凉越来越大，后来就像拳头打在脸上一样。汽车发出声响，来自底盘下面，声音风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克林格莱因的双腿感到了一种可怕的东西。他的两条腿好像充满了空气，骨头里有气泡往上直蹿，似乎要把膝盖撕裂一样。”就在男爵的赛车仪表盘的指针指到118迈的时候（1929年时，对非职业车手来说这是非常恐怖的速度），作家让男爵感叹道：“这下我感觉轻松多了。”“我也是”，脸色苍白，但一脸幸福的外省会计随声附和道。这真是用技术来净化心灵啊。

如果说英国人的自由概念是言论自由，法国人的自由概念是走上街

头，美国人的自由概念是要枪而不要医疗保险的话，那么，只要没人阻止德国人在高速路上开足马力一路狂飙，他就心花怒放满意知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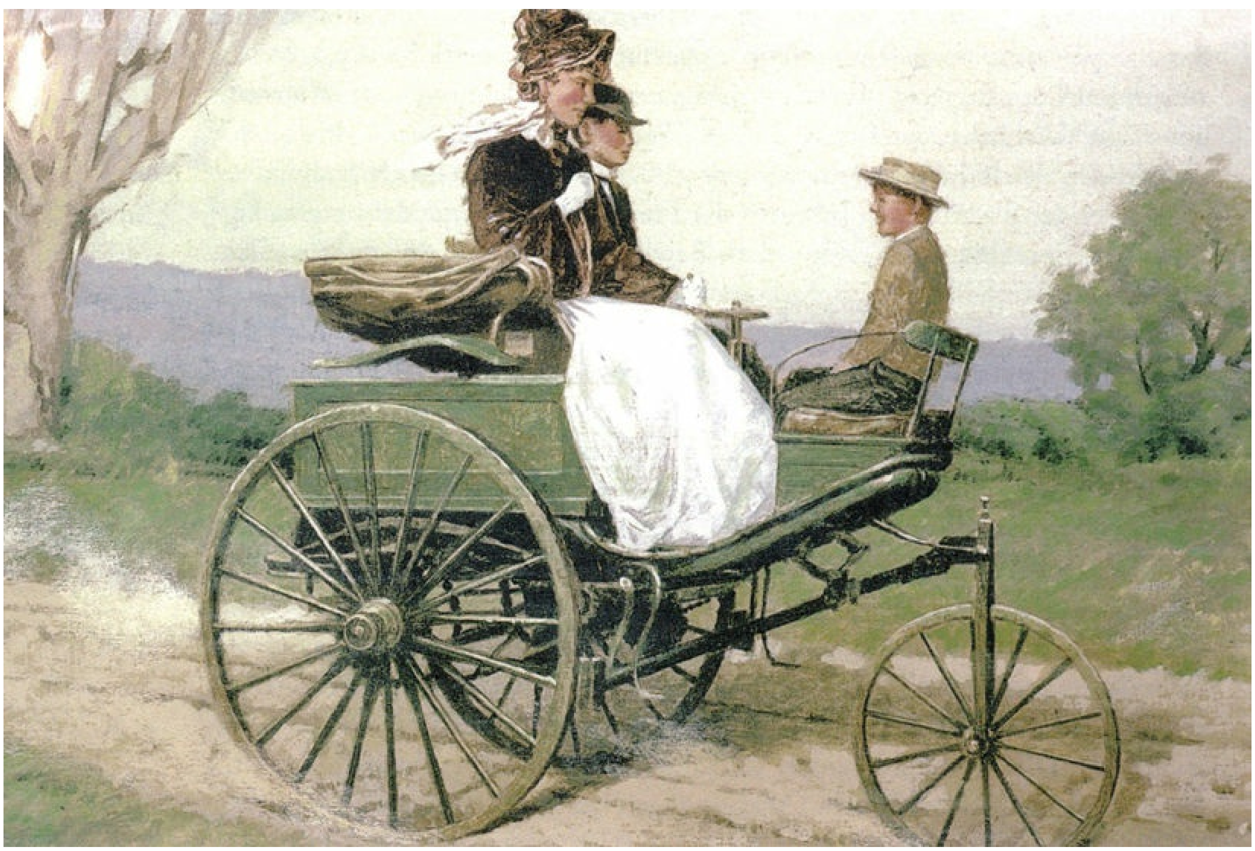
全德汽车俱乐部于1974年2月用“自由的行驶属于自由的公民”这句传奇般的口号，对德国政府准备在高速公路上普遍实行一百公里限速计划做出反应，这句口号几乎成了德国基本法序言的前言。近年来，德国交通部和德国交通安全委员会采用号召人们“松开油门！”在高速公路两旁树立交通事故受害者惨不忍睹的警示宣传牌的方式，试图扭转这一局面。绿党的政治家们则要求汽车工业不要再生产炮弹一样的绝命飞车，而是生产环保型的小轿车，但皆劳而无功，白费心机。21世纪初的德国人尽管在饭馆和公共场所不能一如既往地随便吸烟了，但驾车的乐趣他（还）是不会叫人剥夺的。一旦方向盘在手，他那股子古日耳曼的血性就会迸发出来，任何古罗马执政官或是其他人都无法限定他用什么样的速度在平原山川纵横驰骋。如果不堵车的话，没有时速限制的高速路段就是德国境内最后的一处野蛮之地。

不仅男人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开车和自由与撒野之间，以及“自行”和“自治”[7]之间仅一字之差的关系，女人的血液里也同样有汽油的味道。卡尔·本茨的夫人贝尔塔（Bertha）就曾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嫁妆拿出来，以让夫君圆一把“可以开动的汽车”梦。不能说贝尔塔的举动是纯粹出于对自己丈夫的爱，她在小的时候，曾经发现母亲在她出生那天的家传圣经里写道：“可惜又是一个丫头。”于是她就希望，用这个新的发明向头脑僵化的家人证明，“一个丫头”到底能有多强。

或许是自己下的决心，或许是被两个儿子说动，1888年8月她瞒着自己的丈夫坐进了那台已有发明专利的汽车，开着它前往路途遥远的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8]，去妹妹家参加小外甥的洗礼。她这样不声不响把车开出去也是迫不得已，因为眼下曼海姆市的警察可以说完全禁止“本茨爸爸”开他的“下地狱送死的车”出来转悠，怕他给当地的安全

带来威胁。再说，他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不爽（读了本茨的回忆录便知，发过一通火后，这位发明家对妻子和两个儿子的胆识还是颇为自豪的）。

这次用机动车完成的全世界首次长距离的行驶，不仅让人担惊受怕，而且把人搞得疲惫不堪，但终归功德圆满。半道上有农民惊愕得连农具从手中掉下来都不知道，还有人吓得连喊带叫拔腿就跑。没人有胆量挺身而出，叫这个开车的女人停下来。汽油告罄、链条磨损、油路堵塞和当地的山坡成了一路上最大的障碍。这台单缸四冲程和只有两个挡位的三轮汽车根本爬不动坡，然而，贝尔塔·本茨并未止步不前。这位天资聪慧的女子在后来的电台采访中讲述道："我自己开的车，没事我就一直往前开，坡上不去，我下来用手推就是了。"



手握驾驶盘的女性：**1888**年**8**月贝尔塔·本茨和她的两个儿子创下全球首次驾车越野行驶的壮举。

出生于维尔茨堡的德国女记者玛格丽特·波维丽（Margret Boveri）[9] 在1938年春的时候有过一次更加惊险的旅行。她和一位女友一道，开着出发前就已经有毛病的心爱的老别克车，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经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德黑兰，最后到达伊斯法罕。还在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的时候，这两位侠女就多次几乎动弹不得：路况奇差，河水泛滥，桥梁毁坏。不断出现的车身和发动机的毛病更是雪上加霜。

“多丽丝和我轮换着钻到车底下修车”，波维丽在她的游记《汽车，沙漠，蓝珍珠》（*Ein Auto*，*Wüsten*，*blaue Perlen* ）里这样记述道。这台老别克车是她这趟旅行的真正英雄。两位女性倾注在她们座驾上的感情，还能有比这更为美丽的图景吗？

那个年代，与汽车的感情毫不亚于她们两位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女儿艾丽卡·曼（Erika Mann）。与波维丽不同，艾丽卡·曼既不能也不愿意与纳粹分子同流合污。1929年时，她奚落当时还没离婚的丈夫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说自己宁肯去当汽车装配工的学徒，也不担任由他在柏林德国剧院执导的一出戏剧的主角。这个大胆的角色转换转得值当：当艾丽卡和她的弟弟克劳斯历时两个月开车去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旅行时，起码有一个男人明白了，在“小福特”陷在沙漠里不能动弹时，到底应该怎么办。

对于这位女作家、演员和小品表演家来说，开车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更换“国家比换衣服还频繁”的自由［艾丽卡·曼于1931年在罗马写下了这句名言，其时，她参加了穿越欧洲的汽车拉力赛，而且得了很好的名次。后来，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率先在他的诗《致后辈》（*An die Nachgeborenen* ）里使用了这句名言，用来描写流亡人士无家可归的情境］。在她的《旧日杂文和无聊作品》一文里，曼把汽车宣布为考验潜在恋爱对象的一个理想工具：“如果你想考查一个人的话，不论是男是女，不用看戏，也不用跳舞吃饭，而是出门旅行，但要运动型的那种。

要么和考验的那人去滑雪，或者最好的办法是练开车。开一趟夜车，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如果你们在城里转悠，你可以要他开得快一点；在停车线那地方，绿灯一亮，你们得是第一拨起步的人。违章的事儿你们别干，要始终在允许的范围内做到极限。出了城你们就放开手脚开。开车时他不必说话，尽管如此你得感觉到，他时刻没忘记你的存在。你们要一直开，时速不要过90公里，但不要低于50公里。那些个一会儿飙到120公里，一会儿又想起个笑话讲给你听，速度掉到35公里，甚至停下来和你打情卖俏的家伙，都不靠谱，不予考虑。”

艾丽卡·曼的父亲托马斯·曼曾经叫女儿用什么样的速度开车带他在当地转悠，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只有，这位富有阶层的爱车人士一生中从未想到过要亲自驾驶一下自己昂贵座驾当中的任何一辆。1925年2月4日，当情况逐渐明朗，第三部长篇小说《魔山》要比第一部《布登勃洛克一家》卖得更好的时候，托马斯·曼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私下和您说一句，我给那个神秘幽默的鱼缸里已经挣了七万多马克的门票钱[10]，所以我给自己添置了一辆汽车，一辆漂亮的六座菲亚特轿车。我们的大管家路德维希已经学会了开车，从今往后我就坐着三十三匹马拉的车进城，一路随意和各方人士打招呼了。”

如果拿工资的路德维希不在，女儿艾丽卡和儿子戈洛（Golo），到后来太太卡蒂娅（Katja）（据说她的车技很一般）就得充当司机，送这位文坛泰斗外出办事。

正像他们没收了布莱希特的斯太尔轿车一样，1933年，纳粹分子也无耻地把托马斯·曼的一辆别克和一辆奥迪充了公。儿子戈洛因为在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父亲托马斯·曼赠送他的一辆DKW牌的两冲程汽车，也遭纳粹魔兽血盆大口的吞噬。只有艾丽卡成功地将她的福特安全地转移到了国外。

先是一辆菲亚特，然后是辆雪佛兰，最后又是一辆别克——这就是

托马斯·曼流亡期间作为车主走过的几个阶段。在那个灭绝了所有安全感的年代里，出行自由便是仅有的安全感了。这也算是一种驾驶乐趣吧。

托马斯·曼对坐车出行的兴致在二战之后才开始慢慢减退。1950年夏，他在穿越瑞士的长途旅行路上，到提契诺的公馆拜访了赫尔曼·黑塞，然后又坐车翻过圣哥特哈德（St. Gotthard）山口前往苏黎世。晚上他在日记里记述道："厚脸皮超车的群氓叫人生气，一整天都不堪其苦。"刚刚开始的汽车普及让这位写作大师很不理解。他是伴随着油漆锃亮的马车长大的一辈人，任何形式的"小老百姓坐车"都让他感到厌恶。

德国的汽车族自创业时代以来就有一种对少数人的偏好：正当戈特利布·戴姆勒雄心勃勃要造出能够行驶的贵重座驾时，美国的亨利·福特却在思考如何为天下百姓生产汽车。他的Ford T型车（老百姓管它叫"铁皮美女"）于1908年作为世界上第一辆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汽车问世。据说戈特利布·戴姆勒在1900年临终前还预言，仅因为缺少专职司机，全世界对机动车的需求量不会超过一百万辆。当1927年"铁皮美女"停产的时候，福特的这款成功车型共计卖出了1500万辆，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可以说都不是由专职司机驾驶的。

20年代德国不为少数人服务的汽车制造厂商是欧宝，其创始人和品牌命名人是亚当·奥佩尔（Adam Opel）。他本人只生产过缝纫机和自行车，观念相当平民化，甚至拒绝过生产小汽车，理由是这个新潮的发明无非是"百万富翁们的玩具"而已。他死后，他的五个都是优秀自行车手的儿子开始进入汽车行业。1924年，德国第一台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汽车在吕塞尔斯海姆（Rüsselsheim）工厂下线，并使欧宝登上了当时最大的汽车生产商的宝座。但是与"铁皮美女"相比，欧宝的"绿皮青蛙"（Laubfrosch）一直就是冷门产品。福特的流水线平均每年生产75万

辆汽车，而欧宝的产量也不过就是2万～3万辆而已。

自大众汽车始，德国汽车才成了大众化的产品。1933年秋，希特勒指派有精工和美学的崇拜者之称的费迪南特·波尔舍开发一款能够名副其实当得起“大众汽车”之名的小汽车：这种车要在几年之内生产出几十万辆，可以在同时修建好的高速公路上奔跑，此外，此车还应具有家庭型、低售价和低油耗的特点。但是，大众车真正的大批量生产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代。二战时期需要的并不是“愉快的汽车漫游”所用的四轮座驾，而是纳粹部队的军用吉普。

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带来日后甲壳虫轿车的腾飞：如果它在老百姓的观念中与纳粹政权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它就不可能成为被民众青睐的产品，甚至在1972年跃升为全球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直到2002年大众的高尔夫车才取而代之）。不仅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德国人，而且美国人也在50年代钟情这种既可爱又结实的汽车，似乎当初不是希特勒，而是沃尔特·迪斯尼下令设计的这款车。

美国人是何等地喜欢德国的这个宝贝疙瘩，可以从1960年大众公司在美国做的一句广告词中看出：“I don’t want an imported car. I want a Volkswagen.”（“我不要进口车，我要大众车。”）

令人无法相信的是：恰恰是这种背负纳粹历史最多的汽车，得到了美国人最大程度的认可，他们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国产货之一。更叫人难以置信的是：那次革命性地创造出诸如“Think small”或是“Going，Going”这样脍炙人口的广告用语的恒美DDB广告公司[11]，它的大部分员工都是犹太血统，而且60年代初，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也是他们的客户。

难道这就是去纳粹化，甚至是用大众汽车那圆形的标识在进行和解工作？抑或是资本主义对人们的历史观的胜利？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除

了阿登纳和德国美女之外，没有任何人像大众的甲壳虫那样，如此地帮助过德国向美国民众乃至全世界释放信号，告诉他们再也不用惧怕联邦共和国的德国人了。加利福尼亚的嬉皮士们特别喜欢把各种花卉和他们的“和平”标识画在甲壳虫圆圆的车身上，从而把它彻底地变成了一款和平的甲壳虫。

当1990年大众美国公司启动一次新的广告宣传的时候，谁还愿意回想起纳粹的“钢铁般的浪漫”或者“力量来自乐趣”的口号？在那则电视广告中，一个平静而浑厚的嗓音鼓动观众，置换最新款大众车，感受“驾驶乐趣”，“when car and driver become one”（“当人车合二为一时”）。难道说德国人对汽车的狂热最后还成了件好事不成？

作者：特·多

译者：吴宁

参阅：铁路，科考远征，创业时代，徒步之乐，女人



恒美**DDB**广告公司**1959**年为美国市场设计的宣传广告。

[1] 该山口位于瑞士东南部，海拔2284米。

[2] 戈特利布·戴姆勒（1834～1900），原名Däumler，德国工程师、设计师和企业家，世界第一台汽油发动机和第一台四轮机动车发明人。

[3] 威廉·迈巴赫（1846～1929），德国汽车设计师和企业家。

[4] 卡尔·本茨（1844～1929），德国工程师和汽车制造先驱，他于1885年申请的“本茨专利汽车第一号”是世界上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汽车。

[5] 奥古斯特·霍尔希（1868～1951），德国机械工程师，霍尔希和奥迪汽车制造公司的创始人。由于输掉了产品命名官司，1910年后，由他生产的汽车改用他的拉丁文名字奥迪。

[6] 费迪南特·波尔舍（1875～1951），奥地利和德国汽车设计师，保时捷汽车公司创始人。

[7] 原文为“Auto-mobil und Auto-nomie”，两字都以Auto开头，意为汽车和自治，这是作者玩弄的一个文字游戏。

[8] 普福尔茨海姆，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11万人口的城市，在斯图加特西北方向约37公里。

[9] 玛格丽特·波维丽（1900～1975），德国女作家和报社记者，纳粹时代依附过纳粹政权。

[10] 作者这里暗指《魔山》一书所挣的稿费和版税。

[11] 恒美DDB广告公司的全称为Doyle Dane Bernbach，1949年成立于美国纽约，是一家世界顶级的广告公司。

下班之后

当太阳落到黑森林后面或是没入北海时，一声放松的叹息便会穿过整个国家：总算下班了！这就是说，在今天工会规定每周工作35个小时的时代，太阳还完全能够跟着听到这声叹息。和那些两百年前每周得足足劳作82个小时，即便在1900年前后每天也还得苦干10个小时且每周必须工作6天的前辈们比起来，我们的日子可真是好过得太多了。毫无疑问，德国人那由新教所倡导的勤勉工作精神如今早已让位于“去勤勉化”了。这势头来得如此之猛，以至于据传说1993年时任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曾经怒斥：“一个富有成就的工业国家，也就是说一个有前途的国家，绝不能搞成个集体游乐园。”

不过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德国人是否在迫不得已时有多大能力就得干多少活（抑或相反）的问题。这里要说的是，德国人在做完他们每天的活计之后，拿剩下的那一大堆时间怎么办。这个问题甚至在早先的那些世纪里就很让人挠头，而那时候德国人可供支配的空闲时间和今天比起来还不到如今的一半，这一点，只要读一读爱森纳赫的医生兼历史编纂学家克里斯蒂安·弗兰克·保利尼（Christian Frank Paullini）1700年在其《下班后的哲学思辨》（*Philosophischer Feierabend* ）中的告诫，便很明白。他是这么写的：“我向来不会把这些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掷骰子、打牌、喝酒、说些没用的废话等诸如此类的无聊琐事上面，而是尽可能珍视这些时间，并设法恰当地加以利用，通过努力和真诚不断做成些良善有益的事情。”

下班之后，工作仍然没有结束。谁若想在主人的葡萄种植园里成为

顶用的工人，那么他在下班后的时间里也不会去找那些低俗的乐子，而是会把这段时光用来提高自己的技艺或者是用来完成一些美好的事情。后来的市民阶层创设出一系列各式各样的机制，诸如家庭音乐会、读书会、公益社团等，以便借助于这些活动能够更有意义地充实“宝贵的时间”。更晚一些，在1900年左右，又有了业余大学（Volkshochschulen），其立意也包括激励工人们在下班之后的时间里提高自身的修养。

如果把这种知识阶层的努力主要看作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劳作的忙碌，那恐怕是看错了。下班之后的时间在当时确实是被当作一天里最令人高兴的欢庆时刻[1]。正因如此，文化史学家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1880年在其中篇小说集《下班之后》（*Am Feierabend*）的前言里才会宣称，书中的所有故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有着“欢快满足的气氛，内心深处的平静，傍晚纯净清亮的祥和。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这本书题名为‘下班之后’。这可不是因为我作为小说作者现在要下班了，或是像矿工们所说的那样，要‘换班’了，也不是因为我在下班之后没有别的更有趣的事情好干，所以才来写这些故事，而是因为每当我拿起笔开始构思这些小故事的时候，下班之后的这份宁静便会深深地渗入我的灵魂，同时也是因为我想要把这份下班之后的宁静转移到我的读者们的心灵中去”。

白天的繁忙杂乱已经过去，傍晚的安宁静谧正在到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的知识阶层的确是在平静心绪，只不过他们手里拿的不是iPad，而是握着笔管——或者至少是捧着一本书。即便那些更纯真的人，虽然他们既不读书也不写作，但是他们也在梦想着屋外大自然的静谧安宁，那份静谧安宁正浸润到草坪和田野之中。当小鸟们开始唱起最后的歌儿，辛勤的农夫在劳累一天之后问心无愧地把大镰刀靠在粮仓的墙边，于是全村人在露天里聚集到一起开始做晚祷：“在这个时光/再没有什么土地/像我们这里的土地辽阔宽广/美好无双/我们幸福地聚集/在这

菩提树下/在这傍晚时分……”不过说起来，恐怕这样的赞美诗在城市里唱响的机会，要比在那牧歌式的夜之宁静更爱驻留的农村里更多。

在那傍晚时分，若我们沉浸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默默反思，那可比享受慵懒的安逸要更有意义得多。在那段从日落到午夜、总带着点淡淡忧伤的时间里，无论如何也驱赶不了那种有什么事物正在走向终结的感觉，而你对此只能祈祷或者歌唱，祈求你第二天早晨——愿上帝保佑——还能够再一次被唤醒。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只作短暂停留，/然后/下班之后的时光开始了，它走向漫长的永恒。/此时众生重归平等，/白天的工作已经结束，/所有的人，不论贫富，/都得到了回家这个奖赏。”1787年的《汉堡缪斯文学年鉴》（*Hamburg Musenalmanach* ）中如是说。［不知道当年东德的官僚们在决定把他们的敬老院称作“工余时光之家”（Feierabendheime）时，脑子里是否想到了这首安东·格罗尔茨哈默（Anton Grolzhamer）的诗？］

当然了，德国人下班之后的时光远不是到处都像这样在沉思中度过。保利尼的告诫——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掷骰子、打牌、喝酒、说些没用的废话等诸如此类的无聊琐事”上，恰恰证明，前几个世纪的德国人事实上最喜欢的莫过于在白天的劳累之后再痛快地玩耍一番。

要想在下班之后达到最佳状态，最重要的助推剂古往今来一直都是酒精。早在古罗马时代，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就已经对日耳曼人在猎捕野牛之后仰脖灌下的“大麦汁”和葡萄酒其量之大感到惊讶：“要是顺应他们的酒瘾，让他们想喝多少就喝多少，那么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的这种不良嗜好来战胜他们，比用武器更加容易。”

谁若拿起一本《大学生歌曲集》（*Kommersbuch* ）——就是那些大

学生协会的歌本——很可能会对这种歌本前后封皮上安装的金属凸起感到奇怪。这其实是所谓的防泡铆钉（Biernägel），用来防止放在小酒馆桌子上的歌本被洒出的啤酒浸湿泡坏。并且，谁若仔细研究一下那些歌，就会很快确信，那个购买《大学生歌曲集》的人，花钱买下这种昂贵的带防泡铆钉的版本真的很值。比如，那首关于那位打着嗝儿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Kurfürsten Friedrichvon der Pfalz）的歌，就能让人相当准确地推断出这帮大学生们在下课之后聚会时“酒位”上涨到了多高。那首歌的叠句唱道：“啊！多么美好的节日！/所有人全都又喝高了！”再来一杯，嘿，再喝一杯没问题……

诺特布尔加·冯·拉滕贝格（Notburga von Rattenberg）是13世纪的“下工圣徒”，她每天傍晚在第一下钟声敲响时就放下田里的活儿开始祈祷。为了表示对她的崇敬，在蒂罗尔的小山村埃本（Eben），直到现在每年的9月13日都要举行一个宗教游行仪式。倘若她看到今天的这一幕，定会毛骨悚然地掉头避过。

不过，酒精可不是把下班之后的时光变成亵渎神明之举的唯一诱惑。随着20世纪里“下班”一词被“休闲/业余活动”（Freizeit）一词所取代，并由此而显露出拓展工作外区域的意思，热闹的城市大众娱乐业如舞厅、游乐园、电影城等便逐渐发展了起来，这些场所彻底埋葬了乡村里“下工之后”那美妙宁静的田园风景。而在此前，苦于烦累的城里人曾用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幽静来修身养性。对受过批判精神及马克思主义训练的现代人来说，更多地会把它只看成资产阶级生产工业那个丑陋两面神雅努斯[2]的头。

恩斯特·布洛赫在其流亡美国期间所写的主要著作即三卷本的《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中，用了整整一章来叙述“休闲的假象：锻炼以便更好地工作”，其开头是：“晚上，弯腰劳累一天的人总算挺直了身子，他几乎不用再干什么了。他可以休息了，而他之所以可

以休息，是因为，即便是个工人也会疲倦的。在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他获得休息的时间，好让自己像台机器那样得以添料加油。”

在相同的意义上，特奥多尔·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他们那也是在流亡美国期间所写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中对“文化工业”做出了预言：“在资本主义晚期，消遣就是工作的延续。”或者更干脆：“娱乐就是磨练。”

被这两位——尤其是阿多诺——格外看作眼中钉的“消遣物”，是电影。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阿多诺梦想着能够把电影给“灭了”，当然他也没忘了强调，说“这种‘灭了’”可不是“那种反动的（像当年工人反对机器那样的）反对科技进步的胡来”。唯一令他退缩并放弃实施其幻想的，是如下认识，即“虽然有影片的光亮但总体来说漆黑一片的电影厅，电影的情节本来是要让那些家庭主妇们融入其中的，这样一来就给了她们一处避难所，可以让她们不受监管地坐上几个小时，就像早先——那时候她们有家和空闲时光——站在自家窗口向外观望一样”。或许，下次“丽丝儿”[3] 去电影院的时候最好再带上个靠垫，这样她在看屏幕上的主人公怎样在灰尘飞扬的乡间土路上一路往下走时就更舒服了。

恩斯特·布洛赫毕竟还能在他那为工业化所渗透的现实中发现“某些令人满足的闲暇之乐的遗存”，比如“嗜好”。阿多诺则更不留情面得多。1969年5月，在他去世前不久所做的一次关于业余活动的广播讲座中，这位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明确吐露，每当碰到某个记者询问他“有什么业余爱好（hobbies）”时，他心头都会涌上一股怪异的感觉。“我没有什么‘业余爱好’”，这位一脸错愕的哲学家回答。“这并非因为我是个工作狂，整天除了绷紧弦做那些非做不可的工作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做的。然而，我在正职工作之外所做的事情，于我而言，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十分严肃的事情，所以，幸亏我对种种不开化行为公然招摇过市

且变得理所当然已经有了经验，否则，把如下事情想象成是‘业余爱好’，也即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而耽于其中的毫无意义的活动，这种想法会令我震惊。从事音乐创作、听音乐、专心阅读，这些在我的存在当中是不可分割的部分，用‘业余爱好’一词来描述这些事情对我而言不啻于嘲弄。”

听到这话，克里斯蒂安·弗兰克·保利尼定会从遥远的18世纪致以敬礼。然而，与那位近代早期下班之后仍然工作并向众人做出谆谆告诫的哲学家不同，这位晚期资本主义职业批评家并不想指责任何人，即便有人把空闲时间浪费在愚蠢的事情上：“在当前的主导条件下，若想期待或者要求人们把空闲时间用来做些有创造性的事情，未免显得愚蠢和不合情理。”束缚解脱，愚民政策畅行无阻，后来愚民任务就由“底层民众电视”担当了。不管怎么着，只要这位哲学家弹奏着勋伯格的钢琴曲度过其下班之后的时光，就足够了。

在用有意义的事情来安排下班之后的时间这个问题上，汉娜·阿伦特在她写于1958年的主要哲学著作《积极生活》中也发表过类似的悲观言论。如果说古希腊人为维护其城邦或者国家（在劳作之余）还要从事政治活动，“Homo faber”——从事制作的人——至少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也都一直力求制作出精美的手工制品以使自己青史留名，那么现代的人们，不论信奉共产主义的还是信奉资本主义的全一样，对于“崇高和富有意义的活动”——正是这种活动才让从工作压力下解放出来成为一件值得的事——已然再无任何概念：“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的剩余时间除了用于消费之外再没被用来做什么别的，他所剩余的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和胃口就越贪婪和越危险。虽然他的贪欲变得更加精致，从而使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生活必需领域，然而这非但没有减少相反还恰恰加剧了过剩，而且，这并未改变这个社会的性质，相反其中却潜藏着重大危险，即它将使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不论是所谓的文化事物还是日用品，最终都归于消耗和消灭。”极端点可以这么说，如果让那享乐主

义的仓鼠24小时尽可能不停顿地蹬踩转轮踏板的话，它将不再有能力热心于政治活动、静心修养或者去做真正有创造性的事情，它可能弄出的祸害也将会最小。

对消遣工业或曰休闲娱乐业（Freizeitindustrie）的鄙视绝不只是来自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主要是医生们提出警告，劝说人们不要只是消极地用喝酒来度过下班之后的空闲时间。保守的民族主义医生，如供职于德累斯顿德国卫生博物馆的鲁道夫·诺伊贝特（Rudolf Neubert），早在1930年就向霓光闪烁的电影城宣战了："尽搬演、愚弄一词的所有含义而言之，电影院里就是在搬演一些东西来愚弄观众……观众掏出80芬尼……为自己买得两个小时的空闲，但是却并未能够回归自我。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个出于自身休闲需要而把自己托付给大城市娱乐业的人，并不能够潜心思索，不能够回归自我。他跟着（影片情节）在柔软的波涛上漂浮，假如没有什么外部或内心的震撼令他从中震撼的话，他可以就这样度过整个一生。而这当中糟糕的是，他将根本没有机会去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内心的困窘，并从这种克服之中获得心灵的成长。在心灵上他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软骨头，就像一个总是坐在轿子里让人抬着走、总是裹着皮毛大衣不着风雨的人，其身体必然弱不禁风，哪怕他天天都在看英勇搏斗的场面。"

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这位社会卫生学家并不认为，为了给现代人重新打开通向真正的工余时光的大门，必须首先废除资本主义。尽管诺伊贝特也认定，是工业化使工作变得枯燥无味并让人的大脑变得机械麻木，不过他却从另一个角度来描述这个雅努斯的两面性："机器……为许多人提供了空闲时间，但是机器也向他们提出了要求。"必须这样做才能成功，即通过城市的娱乐业把"变质了的休闲活动"再给纠正过来。诺伊贝特预言，对休闲行为的革新，将使生活整个焕发出崭新的面貌，甚至能够使身心更加健康，令人达到更为自立自主的境界："如果我们

能够让人们更多地自己掌握其空闲时间，并把它充分利用在锻炼意志和提高心灵修养上面，那么，由此出发，这些人便可以生长出力量，掌握和塑造他们的整个人生。”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给“未受教化的大众”以“系统的教育”：用平衡体操取代体育馆，用业余大学取代杂耍剧场，用培养闲情逸致取代狂喝痛饮，用席勒的美育理论意义上的社交游戏 [4] ——“只有在这样的游戏当中人才是完整的人”——取代打扑克。

在“第三帝国”时期，诺伊贝特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纳粹党），虽然他肯定不会认为纳粹为达到“步调一致”所搞的群众娱乐活动——诸如那个叫作“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的组织搞的“多彩之夜”（bunte Abende）以及其他大型活动——实现了他的理想。1936年，“力量来自欢乐”下面设立了“工余活动局”（Amt Feierabend），这个机构打着“高速路欢乐之夜”的口号，让有声电影放映车、流行歌星演唱会和用特型大客车改装的“帝国高速公路舞台”在帝国新铺就的柏油公路上开过来开过去，这对诺伊贝特来说，绝对是恐怖至极。

不过，对于正确的“工余活动项目”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褐衫党并不像其惯常乐于表现的那样确定：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纳粹最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之一，在“力量来自欢乐”组织发起“欢乐运动”（Rummelbewegung）时，对这个运动并无好感。1934年，他在其《民族与家乡》（*Volkstum und Heimat* ）杂志中，对所有那些“不再能够把其空闲时间当作（往日的）工余时光来体验”并把自己“托付给娱乐业”的人发起了论战。

尽管褐色（指纳粹）和高贵红色（指在沙龙中清谈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消遣/文化工业鄙视者并没有明确说出，但很显然，他们所拒绝的客串得走了样的工余消遣主要是那种美国式消遣。正因如此，像阿多诺那样用词十分讲究的学者直接使用“Fun”或“hobbies”之类的英语词，

来描述本已误入歧途的生活中更加谬误的现象[5]，才并非偶然。

在西德，在再教育（Reeducation）的旗号下，美式工余消遣的胜利进军已然不可阻挡，尽管很有修养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如卡尔·科恩（Karl Korn）——《法兰克福汇报》的创始人之一兼该报的长期主编，对“文化工厂”（Kulturfabrik）的叱责从未减弱。

在东德，下班之后的时光变成了一个令人颇感矛盾的问题。在20世纪的50、60年代，起主宰作用的是教育至上思想：即便业余时间也要服务于塑造“社会主义人格”——为此得把歌德搬出来，还得组织工人合唱团进行演唱。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空闲时间里可不是去报名玩弹球，而是报名参加收庄稼。在文化保守主义/敌视玩乐的优良传统中，纯粹的消遣遭到鄙视，它被看作麻醉剂，在新人类这里已经没有用武之地。然而，正如卡尔·马克思与其青年时代的梦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作与闲暇的对立将会消失，因为未被异化的工人在任何时间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自我实现——拉开距离一样，东德也在其存在的后半段认识到，一个令人鄙视的“必然王国”将始终存在，因此“自由王国”只有在下班之后才能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每周工作6天逐步减少为每周工作5天。1968年4月，从一开始就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工作的权利的东德宪法，增加规定了“从事业余活动和休息”的权利。这个统一社会党掌管的国家允诺——或者也可以说是威胁——“通过按计划扩建全民所有的和其他的社会性休养中心和度假中心网络”，为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安排业余活动搭好架子。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个供人们日常消遣游乐的好去处，这个在专断的关怀模式下兴建的玩意儿和铁幕另一边的一模一样：还在联邦共和国（西德）的“假日公园”（Holiday-Park）打开大门之前，1969年在（东）柏林的普伦特森林（Plänterwald）里，一座大型游乐园就已经正式开门迎客了。并且，不论在东边还是在西边，吸引游客的玩乐项目都

一样：摩天轮、8字形回旋滑道和棉花糖。唯有像“宇宙飞船”（Kosmosgondeln）或“斯普尼克号”（Sputnik）[6]（“完全原创、快若闪电”）这样的命名，显现出想要维护社会主义特色的意图；还有就是，这些经过计算的促进肾上腺素分泌的玩乐项目要比资本主义西部那边更便宜。

只有像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这类共产主义改革者还对重大的“另一种选择”、“消除异化”和“在人类行为的一切领域达到人格自我实现”抱有梦想，然而他们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当中来一场第二次“文化革命”的要求，在统一社会党领导们听来未免太过刺耳。从东柏林文化学家赫尔穆特·汉克（Helmut Hanke）1979年公开发表的一份研究中可以看出，东部“沙发土豆”（Sofa-Kartoffel）度过下班后时光的最惬意方式与西部“躺椅洋芋”（Couch-Potato）的别无二致，那就是：两脚高高翘起，电视机打开，啤酒瓶盖起掉。无论这个“更好的德国”多么乐于宣称它在文化方面比受美国肤浅影响的西德更优越，都掩盖不了如下事实：晚上能够聚在一起诵讲荷尔德林诗歌的，在东部也只不过是一小圈同道中人而已。

统一后的德国对其公民下班之后的时间安排十分优雅地不予干预，就像一个自由国家本该做的那样（只有公法性质的广播电视台会时不时地说上几句——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今天在不来梅还有一个国际性的学科叫作“实用休闲规划学”（Angewandte Freizeitwissenschaft），学完其课程甚至还可以拿到艺术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Arts），可以去当个有学士学位资格才能应聘的“活动策划经理”（Eventmanager）、“健康顾问”（Wellnessberater）或者是“旅游策划师”（Tourismusplaner）。霍斯特·奥帕朔夫斯基（Horst W. Opaschowski）这位和蔼的未来学家和长年政治顾问则为学术界增添了一门美妙的学科——“业余时间社会学”，让人可以去研究“规定时间”（Determinationszeit）、“义务时间”（Obligationzeit）和“自由支配时

间”（Dispositionzeit）。



假若卡尔·马克思看到这景象，定会惊讶得大胡子都竖起来：东德的工余时光漫画。

早先，下班的含义简单而朴素，就是休息（Einkehr，也有深思和内省之意）和放松——白天的踩转轮踏板似的工作总算是停歇下来了。可是，这难道还能算得上是那种古代德意志人的晚间安宁吗——当饱受压力的现代人晚上七点钟扛着瑜伽垫急急赶往最近的体育馆，为的是在那里练习普拉那雅玛（Pranayama）呼吸控制法和太阳神祭拜十二式（Sonnengruß）一直练到“全身瘫软”？或许，在下一个傍晚时分，他该试试就这么简单地往家里的靠背椅里一坐，然后念上一首约瑟夫·冯·艾兴多夫的诗：

当人们喧腾的欢乐沉寂：

大地仿佛在梦中喃喃低语

同所有树木聊得好开心，

你心中却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古老的时光，淡淡的忧伤

轻柔的震颤彗星般划过，

像闪电穿透胸膛。

作者：特·多

译者：郑冲

参阅：晚餐，夜晚的寂静，工作狂，啤酒之旅，足球，德国人的性情，男声合唱，音乐，私人菜园，社团迷

---

[1] 德语“下班”一词为“Feierabend”，是“Feier”（欢庆）和“Abend”（傍晚）的组合词，指职业工作结束之后的时间。

[2] 据古罗马传说，雅努斯是罗马人的门神和保护神，他头上有两副面孔：一副在前，一副在后，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

[3] Lieschen Müller，德语中用来指称普通女人的带点贬义的叫法。

[4] 席勒1793年写就《论人类审美教育书简》，第一次在美学史上提出了系统和全面的美育理论，他认为人身上有两种相反的“冲动”，一个是“感性冲动”，另一个是“理性冲动”，二者都是人的天性，完美的人性应是二者的和谐统一，然而人性在近代工业社会中被分裂，因此需要有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冲动”作为桥梁，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席勒在此所说的“游戏”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游戏，而是指与强迫相对立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一种审美/艺术的游戏，通过美育来培养理想、完美、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5] 指美式消遣。

[6] Sputnik是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名字。

科考远征

自从互联网左右了时间观念以来，人们所考量的一切都充斥着抓紧最后一分钟的特点。“80天环游世界”曾经是作家的一个大胆设想，而放在今天，它充其量表达的不过是一种减速旅行。然而减速旅行有什么不好？难道不正是它才有些意义吗？

在大多数情况下，眼下所说的旅行是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在短暂疾速的旅程中观察世界。可以不错过任何机会，也可以自愿放弃这些机会。

围绕旅行的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人们可以事先就计划好对半个世界的旅行，仅用眼睛就可以感知一切。人们谴责我们走马观花，但是我们对偏爱之地所做出的选择是我们之所以成为该地游客的原因。人们可以选择大众型的旅游胜地，也可以特立独行。今天人们通过旅行获知的大量信息，完全可以通过Youtube和Google Earth获取。尽管德国人都有计算机，但他们仍乐于出游。德国人是世界冠军，在旅游方面也不示弱。

当今，旅游本身已受旅游目的地制约，即旅游的目标，除非你选择的是豪华游轮之旅。因为这是在船上，位于船的世界之内，游客是日程的一部分。这个日程与人们所处的经度和纬度没有什么关系。至于赤道到底在哪里，走向如何，只有测量仪才知道。就连海盗驾驶小船靠近游轮，抓捕了人质，大家还一度以为这是日程安排的一部分。

在这个自以为是的时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知何时海盗会

突然出现的时代，经历取代了经验。以前，当旅行目的地还是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时，萨马尔罕（Samarkand）市还没有去争取欧洲歌唱大赛的主办权时，那时，人们完全出于和今天截然不同的原因踏上征途，那时存在着未知的事物和充满未知事物之地，例如“美国”还在我们的脑海之外。

而现在“美洲大陆”被发现了，丈量世界的工作也完成了。

我们无所不知，也无所知，甚至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拍照，其实也不过是拷贝而已。

但是当年，在人们能够前往未知世界的年代，而且相信会在征途中增长见识的年代，旅行的两项任务使之成为修学旅行或学术旅行——收集和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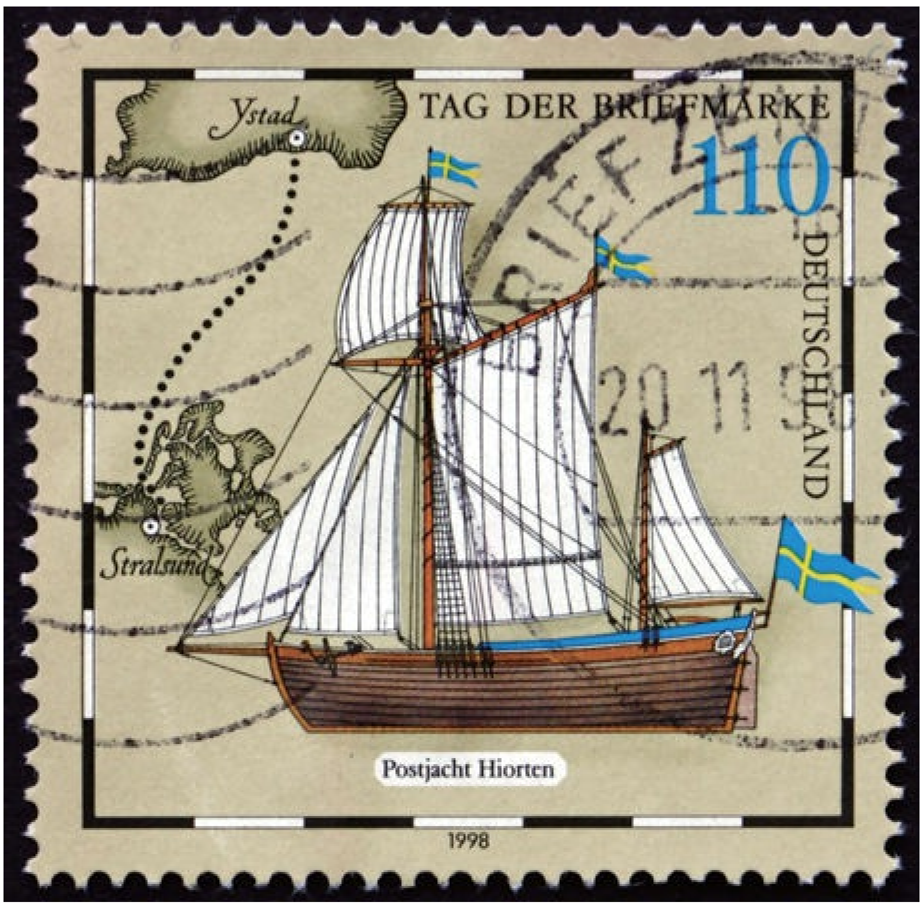
每个自强不息的民族都有自己著名的远征家，从丝绸之路的探寻者马可·波罗（Marco Polo）、路易斯·安东尼·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他是第一个（1766～1767年）驾船环游世界的法国人，到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苏格兰籍传道士、非洲探险者戴维·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他们撰写的游记为其全民族增添了光彩。

18世纪之前主要是某些个人，某些不同寻常的项目，围绕着瓦芬教团[1]的幻想、牧师、商人和其他一些冒险家与他们的金主。如果没有卡斯蒂利亚宫廷，哪里会有哥伦布（Kolumbus）？

“如果不是哥伦布以他的坚持和高贵的爱，不顾一切阻碍，不顾他人的嫉妒和征途的前途未卜，执着地见到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美洲大陆和它的宝藏可能还会长时间地被埋没着。”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1777年在伦敦写道。关于这位福斯特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科考远征成为国家大事。首先是为那些未知的领土绘制地图——无数冒险家曾经以多种方式描绘的领土。地理在当时属于最有学识的学科之一，地理的本意就是研究地球。到了18世纪末，它就不用再为世界的模样操心了。此时它悄悄地转而专注矿产了。

此时科考远征的目的主要是描写各类植物和动物世界。旅行是积攒经验的一种方式。谁到达了他的目的地，他就非常见多识广。他甚至见过狮子。游记的描写富有科学的特征和描述相关的经历占有很大分量，这成为衡量游记价值高低的标准。



一枚大约**1998**年德国印制的邮票，画面是瑞典的**“Hiorten”**号邮轮。

在几个世纪前，那些载入史册但大多为偶然的发现或者其伴随现象，现在终于明确了目标，旅行变成考察。一个考察队的成员不再是为

了消遣而远游，而是要执行任务。他们侦察地形，用他们种种描述为无可反驳的干涉提供方案。19世纪考察演变为殖民掠夺的前奏。

正如科考远征需要资助人一样，考察也需要官方的授权。没有显示强权的大国就不会有考察。一旦国家从战略上理解了其经济利益，国家就会和商人结合。非洲作为原材料的提供地成为关注的中心。科考远征因此也就变成了启蒙行动，成为勘探之旅。当务之急是挺进非洲内陆。不久黑暗的心灵成为议论的题目。秘密围绕着这块大陆。非洲意味着内地非洲，也就是灵魂安息之地。非洲研究者因此也就不同于这一行当的其他人。

在德意志帝国成立时还没有值得一提的官方委任的考察项目。直到威廉主义时代，才开始了测量非洲的冒险，而且也是犹豫再三。在此之前，德国的远征参与者要加入国外考察队。他们中间有两个人非同一般，这就是福斯特和亚历山大·冯·洪堡。

格奥尔格·福斯特的一生很短暂。也许是命里注定，他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他的父亲，一位路德教的神学家——与其说他的兴趣是关注上天的领路人，不如说更关注自然科学——很早他就带上还未成年的儿子一起上路。

就这样，福斯特参加了史上最著名的科考远征之一——著名的库克（Cook）船长领导的第二次远征。库克这个响亮的名字今天仍为旅行社所用。这次考察之旅的时间是1772年到1775年，在公海上逗留了三年之久。福斯特因此也就有机会不仅认识和描述异地植物和动物世界，而且还观察各个民族并学习他们的语言，显然在这方面他很有天赋。

回来后他写了一本英文书。我们面前这个德文版的题目很有说服力：《约翰·莱因哈德·福斯特参加1772年到1775年世界环游之旅，乘坐大不列颠陛下派遣的“决心”号考察船，由库克船长带队》。年轻的福斯

特虽然没有成为开创性的科学家，但是成为科学游记文学的创始人。

回到原来的世界后，他在伦敦和巴黎成为众人崇拜的欧洲明星，之后他在维尔纽斯（Vilnius）[2]、卡塞尔等地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教授职位（至少他这样认为），最后在美因茨担任图书馆馆长，待遇优厚。在给朋友克利斯朵夫·弗里德里希·尼古莱（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他赶上了法国大革命的末梢。1792年他参与组织了美因茨的暴动。恰恰在美因茨、贝尔格察贝尔恩（Bergzabern）和宾根（Bingen）甚至是兰道（Landau）发生革命，也许只是因为那里驻扎着法国军队。

福斯特加入了这个城市的雅各宾党，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美因茨当雅各宾党人有什么意义？可以肯定的是，他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捍卫大革命的著作《人的权利》（*The Right of Man* ）德文版的翻译出版而奔走，并为此书撰写了匿名前言。



陆地遥遥可见。不知名的鸟儿在空中飞翔。科考远征者福斯特自己绘制。

但总的来看，呼吁成立共和国、马上并入法国的坚定要求被证明是一个政治错误。这件事从历史的角度讲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它为当今政治上持公正态度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记录前进步伐的出土文物。美因茨共和国虽然没有意义，但很知名。

福斯特在共和国尾声时，受美因茨市委托滞留在法国。他不到40岁卒于巴黎，据说是肺结核。但是在专业领域外，他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后来是东德唤起了对政治家福斯特的回忆。东德非常需要这样的历

史人物、这样的祖国后代，以弱化其苏联占领势力的出身，好像这可以在德国历史上找到其合理存在的理由。好像苏联势力能够终结这段历史，他们甚至还为福斯特出版了纪念邮票。

今天在美因茨，人们还都知道福斯特。但无论怎样，为了纪念格奥尔格·福斯特这样的历史人物，不再需要东德。

继这位政治上令人难以忍受的福斯特之后，德国科学界出现了一位巨人——亚历山大·冯·洪堡。他的父亲是一位普鲁士军官，母亲是胡格诺教徒，他的哥哥就是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也就是改革普鲁士教育制度，使其走上现代化轨道的伟大教育家。

亚历山大·冯·洪堡年轻时在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学习过财政学，原本是想为进入普鲁士管理机构做准备。后来通过相应的学习和参与项目，年轻的洪堡对其他专业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即采矿和采矿业的组织工作。另外他还用自己的资金在法兰克森林（Frankenwald）的巴特施泰本（Bad Steben）建立了德国第一个工人职业学校。为了保护矿工，他发明了呼吸器，也就是现在防毒面具的前身，以及一系列安全照明灯。

1799年到1804年，他在第一次科考远征中到达了中美和拉丁美洲；此行的最后，他还访问了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洪堡自己出资完成了这次旅行。他为此次科考远征提出了后来无人企及的标准：收集所有的知识，并使其一目了然。洪堡成功地进行了卡西基亚雷（Casiquiare）河的地理定位，确定了争吵不休的奥里诺科（Orinoco）河流的分流处。他测量了钦博拉索（Chimborazo）山高度，登上5759米高的山峰。为此他创造了当时登山的最高纪录。当洪堡和他的科考远征伙伴埃梅·邦普兰（Aimé Bonpland）在1804年8月3日回到波尔多（Bordeaux）市时，带着40个箱子，还有6300多种尚无人知的植物。

整理此次科考远征的材料花费了多年时间，除了一些小型出版物外，其成果是出版了《大自然的视角》（*Ansichten der Natur* ）一书，也许这是他最为人知的作品。还有两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新大陆热带区域旅行记》（*Voyage aux régions é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 ）是36卷关于美洲之行的巨著；以及《宇宙》（*Kosmos* ）。后者前几年以《另外的图书馆》的版本问世，再次引起德国公众的注意。其原因好像主要归功于这部当年的科学作品在表述物质世界的字里行间所蕴含的诗情画意。过时的、成为历史的或者变为无用的东西丝毫无损地升华为崇高。科学的铜锈化身为美学的色彩。

洪堡可谓这类全能者中的最后一位。他闻名全球，熟知多种科学领域，简而言之是一位著名的人物。洪堡是最后一个描写大地的作家。地理学、地质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在他那里是合一的。他的知识与研究对象紧密相连，并且这些研究对象配有具体图像。这是最后一次人们通过外观和图片来进行研究，这是最后一次考察，从此以后诞生了新的维度。化验室和试验成为量子物理和微生物学的重要附属概念。随着它们的出现，科研从公众的生活中消失了，从集体的想象中消失了。但是这些知识则以技术发明的形式返回现实中来。人们吃惊地看到女士们骑上高脚车，但是他们的吃惊并未维持很久。

洪堡，一位伟大的世界主义者，完成庞大的科考远征后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度过，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一个普鲁士人。也许要归功于他的哥哥威廉以及威廉和普鲁士宫廷的关系，洪堡曾数次出任普鲁士宫廷的外交官。作为一个普鲁士人，这并不难，他也可以同时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为了解释清楚，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从贵族角度观察生活。

而此时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他们一步一步地蚕食精神领地，他们不再把一切的存在都用来解读世界的本义。他们用技术眼光衡量事物，

视研究者和发现者为专家。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德国的科考远征在那个时候刚刚正式开始，这些远征同时也纳入了国家大事——我们说的是非洲考察。只有国家的财力和权力才能够资助这些活动，而且受到其支持者明确的委托。从此揭开了德国殖民史的一页，这是威廉主义最失算的败笔之一。

殖民地的想法源于对原材料的需求，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好像原材料是买不来的，好像占为己有会来得更便宜些，但这一切却以牺牲和平为代价。战争是昂贵的，比和平还要昂贵。

俾斯麦最初极力反对殖民建议，他不认为殖民会为经济带来什么意义，他持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最终德国在殖民地上的付出比带来的益处要大得多。而19世纪占上风的理念受当时世界强国即英国和法国的控制，受新兴工业物质至上观念的左右，这使得殖民观成为权力政治之必须。没有殖民地就不配进入这个俱乐部。

继亚历山大·冯·洪堡之后的科考远征者依然是科学家，但是他们不再投身于对整体的观察，而是研究所谓的细节。一些行家和一些玩家组成一个小俱乐部，他们将科研的兴趣和对政治权力的嗜好结合在一起。他们不再仅仅想做蝴蝶的收集者，他们还想当地方执行官。

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爱德华·福格尔（Eduard Vogel）在苏丹消失。他的失踪引发了无数的逸闻，不少考察队为此专门被派出，以探寻和解释他的命运之谜。远征变成了对远征的解释，演化为新闻事件，轰动一时。最后德国公众也无法挣脱远征非洲的魔力了。

福格尔在德国的知名度能够经久不衰，要归功于他的出版商奥古斯特·彼得曼（August Petermann）。他出版的刊物《彼得曼的地理信息》（*Petermanns geographische Mitteilungen* ），是调动大众好奇心的一本

关键刊物。他的几个同僚在德国殖民史上都起到过重要作用。例如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Gustav Nachtigal），特别是卡尔·彼得（Carl Peter），他是帝国时代头号殖民政治家，出身于牧师家庭，博士论文专门撰写叔本华，后来是他建立了德国东非协会。

从开始到现在，公众对殖民地的兴趣非常浓厚，但这和实际的需求并没有多大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德国人迁居到殖民地。殖民地管理署的理论家、他们施加影响的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探讨就足以让这些题目一再引起大家的关注。

伴随着1919年战后和平协议的问世，殖民地被战胜国接纳。尽管殖民地不复存在，但德国人对此的关注兴趣依旧浓厚，一直持续到今天。撰写这个题目的文献汗牛充栋，对其宽容和探讨的意愿真是惊人。人们不得不问，这到底有什么用处？难道殖民地的思想集成了所有的渴望，难道它体现了尚在朦胧之中的追求潜能？难道没有它我们德国人就无法生存？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政治、经济或者文化幻想的图像得以诞生。殖民地思想保持在脑海中。它存在过而且一直存在着。它是乌托邦的替代品吗？

说来说去，考察不过是冒险。世界越安全，探险的机会就越少。19世纪末，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都列入了教科书，这个星球的未知吸引力几乎竭尽。

谁真的想大刀阔斧干一番，就要尝试去征服最后一个地理之角，去拜访最后一个还未征服的目标——北极，且不管它是什么东西。随之开始了典型的竞赛，看谁能够第一个到达这个永恒冰雪世界中的目标。伴随对极地的考察、伴随其竞赛的特征，科考远征最终演化为成就的展示。在此之前，科考远征家的目标是认识未知的世界，去描述、阐明它，让大众知晓它的存在。而现在围绕的则是自己的业绩、展示自我。尽管迄今为止不乏竞争因素，有时也误入比赛的歧途，例如关于尼罗河

源头的问题，但仍不失其可见的利益至上以及完成某项具有政治色彩和贸易政治色彩任务的特点。

但为了给自我插上翅膀，无须率领殖民军队或者去检查东非的乌桑巴拉（Usambara）线火车站。远征极地就能实现这一目标，那里的探险事关生死。在那里，在那个冰天雪地的无人之地，要么成为食人肉的野蛮人，要么成为伟大的开创人。谁抵达了无人之地，不管是死还是活，骨瘦如柴或者把国旗高举过头顶，都是英雄。不论在国民运动历史上还是在世界运动历史上，他都占有一个席位。

而今天，取得这样国家级的成绩最多可以得到联邦十字勋章的奖励。而仅为德国流行音乐发展做出了贡献，就可以荣获联邦十字勋章。

德国人几乎没有加入极地竞赛的行列。只有一个人登上了这个永恒的冰雪之地，他就是气象学家和地球研究学者阿尔弗雷德·韦格纳（Alfred Wegener），他的目标是格陵兰。韦格纳出身于牧师家庭，曾学习物理、气象和天文学，之后在柏林人民天文台工作。但是不久他觉得每天观察星星缺乏挑战，转而投身于自身的深造。

他撰写了诸多气象学的书籍，主要基于他参加的两次格陵兰考察的结果。1915年第一次出版的《大陆和海洋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r Kontinente und Ozeane* ）是他的一部重要作品，直至今天影响都很大。内容主要谈及陆地漂浮问题。对我们外行人来说，就是非洲和美洲大陆的断裂。为此韦格纳在世时受到专业同行的敌视，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路桥理论（不同大陆上出现的同类化石是它们穿越连接大陆的地峡时形成的）。但是韦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今天已经成为地球板块构造研究最重要的基础。

1930年韦格纳再也没有从他的第三次格陵兰考察回来。尽管他没有参加极地探险，但是他却永远地留在了不可一世的冰天雪地中。

还有一件事情在这里不得不提，这位想法诸多勇于实践的先驱为冰雪运动也做出了贡献。准备最后一次格陵兰考察时，韦格纳参考格陵兰的滑雪服自己设计了特制服装。后来这个款式广为冬季运动所接受。

极地考察标志着地理测量工作的终结。走向大世界的旅行告一段落，义无反顾地回到审视自我。20世纪开始的下一轮属于登山者，但他们不是研究人员，而是极限运动员。

作者：里·瓦

译者：杨丽

参阅：登山片，浮士德，创业时代，渴求瘾

---

[1] 瓦芬教团曾是一个骑士团，成立于1465年，后来发展为一个宗教团体。

[2] 立陶宛首都，旧称维尔诺（Wilna）。

裸体文化

法国布列塔尼一处孤独的海滩，天气寒冷。一对裸体的男女边玩着羽毛球边在沙滩上互相追逐嬉戏。尽管两人的嬉笑叫喊被大海的波涛所吞没，但是，那个从头到脚身着橡胶泳衣，腋下夹着冲浪板，快步朝海边涌浪走去的法国小伙一眼就认出：两个德国佬。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一个美国家庭的父亲非常肯定，眼前这个一丝不挂、在他的孩子边上躺在一条浴巾上尽情暴晒的女人，不是叫葛瑞琳（Gerrilyn）的美国女子，而是叫葛尔琳德（Gerlinde）的德国女人。于是，他用德语说，请她给自己稍微遮盖点东西。这位葛尔琳德当然不是故意要惹是生非，她曾撰写过题为“论帝国后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裸体文化的空想”（*Utopien der Naturkultur im späten Kaiserreich und der Weimarer Republik*）的博士论文。因为这个美国人说得一口好德语，她于是向他解释道，自己并非赤身露体躺在地上，而是身披一件“阳光的外套”。

德国的赤裸主义者、崇尚自然者和裸体文化者如此一丝不挂地在世界各地到处游荡，从中不难看出“裸体文化”在其形成时期所建立的这个思潮的上层建筑是何其巨大。这股潮流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末。本文无意为任何伤风败俗的行径进行辩护，而是要弄清事情背后社会批判的整体现象。

较之其他西方国家，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较晚。正因为如此，跟随科学技术一同出现的新型大众社会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异常。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时，三分之二的德国人居住在人口少于两千人的村镇，到了1910年仅剩下百分之四十。与此同时，生活在人口超过十万

的城市中的德国人的比例，从百分之五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开春时节，男性农民不再驾驭骡马牲口，不再打理农田草地，而女性农民则改为在自家的花园里除草翻地。此时，不论男女劳力都已被纳入了机器化的生产过程。昔日的耕地播种被拧螺丝和钣金活所取代。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再受天气和农时的左右，而是春夏秋冬四季皆同的每天十小时工作制。曾经的农夫农妇下班后不是在自家农舍的大树下歇息，而是带着五个孩子挤在公寓天井后面一个昏暗的两居陋室里，指望着不久能住上一个带玻璃窗的大房子。

世间的事情常常如此：并非那些栖身在被油烟熏黑的陋室的人们不能忍辱负重，反倒是那些身居高楼和青年风格别墅的人在叫苦连天。他们只要想到世界所变成的样子，就觉得末日似乎已经来临。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代表着工业无产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确生活在非人条件下），对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感到绝望，喊出了一个要冲破牢笼的口号：冲出去！离开被污染的城市！离开狭窄的街道！冲破官僚主义、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金钱经济“坚硬的铁壳”！

在“改造生活”的幌子下，自19世纪80年代起出现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运动。这些运动尽管各不相同，但都试图医治现代文明病，并宣称通过彻底的返璞归真即能获得解脱：反对正统医学和疾病预防医学，引入自然疗法；曾经做过乡村牧师的塞巴斯蒂安·克奈普（Sebastian Kneipp）[1] 打包票说，通过水疗法和饮食疗法能让病人彻底康复；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2] 开始着手将歌德、神秘直觉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混合杂交成人智学；喜欢漫游的年轻人带上背包和吉他，唱着歌走向青山绿水；就好像夏娃当年在天堂里不是咬的苹果，而是咬的蛇一样，狂热的活体解剖反对者和素食者认为虐待动物和食用动物是一种罪孽，到了该叫停的时候了。法国人卢梭已经作古，但是，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从来没有像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德语国家那样，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

那些把“冲出去！”这个反文明的高调口号最当回事的人认为，要消除灵与肉、天与人、穷与富之间的差别，方法就是把衣服脱掉。

第一个笃信裸体的是画家卡尔·威廉·迪芬巴赫（Karl Wilhelm Diefenbach）[3]。他抛弃宗教转而热衷改造生活之事发生在19世纪的70年代：得了一场伤寒病后，他又必须进行手术，结果右臂留下了残疾。迪芬巴赫坚信，自然疗法和无肉的饮食使他恢复了健康。因此，他成了一种素食和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的鼓吹者。他光着脚，胡子拉碴，着一件袈裟般的布衣，在慕尼黑走街串巷宣讲反对“吃动物肉”。尽管那个年代在慕尼黑的施瓦宾城区，老百姓对这类神秘的放荡不羁者已司空见惯，但官方和这位“自命圣人”之间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887年，迪芬巴赫退居到伊萨河谷的赫尔里格斯克劳特（Höllriegelskreuth）村，在那里一个废弃的采石场建立了一个只能而且必须按照他的想象生活的公社。正像他之后的其他人一样，这个遁世索居者露出了专横霸道的教主嘴脸：肉食、烟草、酒精、个人财产和婚姻一律禁止，何人何时以何种方式与何人同房，一切均由教主说了算。所有人都参与在这种建立在“阳光、空气、太阳、裸体和快乐”之上的身体崇拜里。

在世界观上同样极端但表现得更为冠冕堂皇的是“真理山”这个艺术家营地，该营地由古斯托·格雷泽尔（Gusto Gräser）[4]等人于1900年在瑞士的阿斯科纳（Ascona）建立。这个出生于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诗人，其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最初是从迪芬巴赫那里取的经。尽管这些和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裸体主义者、跳裸体舞者、人智学者、心理分析学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之间的和平共处从来就流于表面，但这个营地原模原样一直存在到1920年（现在仍作为旅馆、博物馆和会议中心对外开放）。有头有脸的文人墨客，如达达派艺术家汉斯·阿尔普（Hans Arp）、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和赫尔曼·黑塞，他们的光临使这座“真理山”成了噱头十足的神话。

然而，不仅生活在德国巴伐利亚和瑞士提契诺与世隔绝自然环境中的这群受文明所累的人有每天（或星期天）至少几小时扒光身上衣服的需求，当那些身居大城市的人们仰天伸手向阳光祈祷的时候，他们也厌倦了套在自己和宇宙之间的这身窸窣作响的行头：裸露的肌肤成了同宇宙沟通的交流器官。“光明磊落之人”追求的目标，乃是通过裸体而获得重生，身体和灵魂不再分离，而是合二为一的“体魂”。

在僵硬死板的道德规范盛行的德皇威廉的帝国，裸体主义者们的这些过激行为难为公众所理解。19世纪90年代出现得最早的一批“阳光和空气浴场”或多或少都是违禁之地，类似邪教的团体在那里偷偷聚会，然后一起“脱光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裸体主义者才被允许租用土地。于是乎，大约是20世纪20年代，柏林东南边的莫岑湖就发展成了“德国裸体文化的水上摇篮”。即便如此，仍然有严格的管理规定：这块是非之地必须用木板围起来，并且要“不留缝隙”，以免诱惑周末散步者偷偷窥视。魏玛共和国时期，官方的规定乃是热衷身体和运动的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Friedrich Ludwig Jahn）[5] 在19世纪早期说过的那句话：“德国人永远不在公众场合赤身露体。”

只要看一下那些要把“裸体”上升为“文化”的五花八门的节目表演，我们不禁要说，德国体操之父此言差矣。“公开赤身露体”变成了一种非常德国化的东西。在捂得严实的状态下都受到欲望驱使的德国灵魂，在赤身露体的情况下更加表现得一览无余。

马格努斯·魏德曼（Magnus Weidemann）曾经当过牧师，其救世思想具有基督教新教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退去牧师的长袍，在叙尔特岛上摇身一变成了画家、裸体摄影师和裸体主义画报《欢乐——德国内心世界月刊》（Die Freude. Monatsheft für deutsche Innerlichkeit）的合伙发行人。1923年，他在叙尔特岛上的一次讲演中，对保尔·格哈德（Paul Gerhardt）的歌曲《耶稣，我的欢乐》做了一次自由发挥的解

释："上帝是欢乐，世界和生活是欢乐。阳光是她的象征，我们的灵魂是她的器官。谁徜徉在欢乐之中，谁就和上帝在一起，上帝也和他同在……新德国人，男人和女人，姑娘，小伙和儿童——特别是儿童，阳光儿童是未来，他们用炙热的双手捧着欢乐。他们像播撒节日的花卉和幸福的种子一样播撒欢乐，欢乐的国度不会消亡，因为它是上帝的乐园。"

新型"内在美之人"的居所应当摆脱所有小市民那种俗气的居家摆设，在"我们的孩子赤身裸体，以自然为衣，嬉戏玩乐的地方……不用再担心有人抽烟喝酒，或是踩着咯咯响的高跟鞋混迹其中"。

针对19世纪末矫揉造作的女性时装，海因里希·普多尔（Heinrich Pudor）[6]的讽刺挖苦显得更加愤世嫉俗。这位政论家在他的警句集《裸体者，未来的欢呼》（*Nackende Menschen. Jauchzen der Zukunft*）一书里，梦想自己是个女人，"怀中抱着孩子"，给他"喂之以生命的乳汁"。一旦他看见女人的紧身胸衣，就变得怒不可遏："此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联盟，其成员的天职是：凡是见到穿紧身胸衣的女人，就在马路上公开抨击她伤风败俗，或者叫她妓女，因为妓女发明了紧身胸衣，而且紧身胸衣只配妓女穿，正经女人不应该穿它；要查封卖紧身胸衣的商店，在橱窗上贴上'妓女用品'的标语。"此后几十年里，这本书的作者把他的名字故意改成了"海因里希·害羞"，而且公开成为反犹太分子。

不过，绝非所有反对女人穿紧身衣服的人都是潜在的法西斯分子。在世纪之交，要求"服装改革"、女性着装可以不受束缚的自由活动这个呼声不仅在女权人士那里，而且在要求将舞蹈从僵化的紧身胸衣里解放出来的表现派女舞蹈家那里，都同样强烈。她们在寻找一种无须遵守清规戒律的发自内心情感的美。

除了这些表现型的内心美的追随者外，还有一种与之相反的文化运

动，这种运动在魏玛古典主义之后的一百多年，全身心地想效仿古希腊。只要看一下刊登在裸体主义杂志《德意志古希腊》（*Deutsch Hellas* ）或《美》（*Die Schönheit* ）上的照片，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当年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在希腊挖掘出土的用以培植在德国人脑海里的那些石像和浮雕，如今在魏玛共和国里又栩栩如生地复活了。



裸体前卫派：**1931**年裸体文化杂志《新时代》的封面题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官汉斯·祖伦（Hans Surèn）铁了心要搞

裸体文化，他的举动正好击中了时代的神经。他于1924年出版的那本故弄玄虚和体操顾问兼而有之的著述《人和太阳》（*Der Mensch und die Sonne* ），光是在出版的头两年就再版了六十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共售出了二十五万册。书中刊出的那些肌肉发达、体毛光光、晒成古铜色和油亮光滑的人体照片——不少是祖伦自己在展示肌肉——足以在今天的健身房里吸引众人艳羡的目光。

有别于这种具有武士般体魄精英团体的，是崇尚自然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派分支，其最著名的代表是阿道夫·科赫（Adolf Koch）。他打着“一丝不挂不分彼此”的旗号，不仅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莫岑湖边建立了一个裸体文化协会，而且还办了一份杂志，以及各式各样的“身体文化学校”，成员达七万之众。在他办的学校里，不是要以祖伦宣传的所谓“德国体操”来塑造英雄式的完美体魄，而是通过医疗和保健运动将工人们被榨干了血汗的身体解放出来。1930年，科赫的一个同人在颇为流行的裸体者杂志《阳光之国》（*Licht-Land* ）中撰文，解释他们为什么要采用裸体办法：“一个职员或工人在自己的休息天作为阳光的朋友到大自然里漫步，脱下身上的衣服，这样他就摆脱了一切因服装、地位和财产所造成的差别，同时也摆脱了因受到生活的不公待遇而存在于每个劳动者心里的、针对比他生活得更好的人群抱有的那种仇恨……至少这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他可以作为自由人在一群自由人中间度过。阳光运动在德国民众中越深入人心，那么德国人民就越能凝聚成一个兄弟般的整体，虚伪的民主就将被高尚的集体观念取而代之。”

赤身相见天下人，携手成为好兄弟。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一个戴绅士礼帽者和一个戴鸭舌便帽者之间的差别，较之一个裸体运动员和一个裸体大胖子之间的差别，实在微不足道（只有当每个戴礼帽者是个大胖子，每个戴鸭舌帽者是个运动员时，才有社会公平可言）。此外，其原因还在于像理查德·翁格维特（Richard Ungewitter）那样的一群人，他们在德皇威廉帝国行将灭亡时，就已经

做着“有计划地培养俊美、纯种和健康之人”的梦，把大城市视为可怕的怪兽和“纯种雅利安人的墓坑”。这个当年的花匠帮工成了种族主义裸体行动的急先锋，在他的“上升生活会所（后来叫‘忠诚社’）”里，1911年时聚集了所有信奉“犹太人……就像黑人和其他劣等人种一样是德国日耳曼人不共戴天的毒品”的信徒。

然而，在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让翁格维特和他发表的作品一再到处碰壁的并不是他的种族主义言行。天主教的“振兴世风绅士协会”怀疑这帮一丝不挂的种族主义分子，和那些基督教的、魂牵梦萦古希腊的、搞标枪运动的以及社会主义的暴露艺术家们一样，在整天吵嚷着太阳如何伟大的背后，乃是一片藏污纳垢之所。同时自1900年以来，司法机关依据一则禁止散布有伤风化的文字和著述的普通法律条款，不断地来找各种门派的“赤条条者们”的麻烦。除了在自己的“身体文化学校”里搞性启蒙教育，并且和魏玛时代最有名的性研究学者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进行合作的阿道夫·科赫之外，其他所有的阳光和空气崇拜者都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将他们的赤身露体描绘成“贞洁无邪”的行为，把裸体主义说成是一种手段，借此可以把这个时代已发展到病态的肉欲，以及对见不得人的色情和艳舞女郎的变态冲动降低到一种自然的程度。尽管如此，人们完全能想象得出这些追求享乐的裸体主义者，是如何在夜总会里为安妮塔·白蓓尔（Anita Berber）[7] 的“猥亵、恶心和迷狂的舞蹈”欢呼捧场，尽管他们是想用不分性别的“身体开放”来嘲弄社会上的庸人市侩。只有翁格维特和他的一帮同党时运不济，专干些透过木板小孔偷窥的勾当。

纳粹党上台后不由分说很快终结了裸体活动。普鲁士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在1933年3月3日发布的一则抵制裸体文化运动的通告里宣布：“德国文化和道德风尚最大的危险之一，即是所谓的裸体文化运动……该运动泯灭了女性的天然羞耻感，同时夺走了男性对女性的尊重……”种族主义者试图用“健康的繁衍选择”，即“如果德国女

人经常看见裸体的日耳曼男人……她就不会再跟着这么多异族人种的屁股后面跑”，来替他们的裸体主义辩护，但也无济于事。全德国的裸体文化场所被冲锋队员和希特勒青年团员统统捣毁，一个不留。

与纳粹合作最多的是军人裸体主义者祖伦。为了表达感激，纳粹授予了他一个冠冕堂皇的搞笑头衔：“帝国农会主席之体育和巡视特命全权代表”。尽管如此，他也未能说服纳粹，为了强健身体的目的，经常脱掉他们的褐色和黑色的军装。在帝国全民健康委员会1935年致祖伦体操发明者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纯种素质，亦即存在于遗传物质中的天性，怎么可能通过外部的体育运动等类似的东西来造就呢？”

即便是重视遗传基因多于重视体操运动的种族主义分子翁格维特，也没能在纳粹德国官运亨通（德国裸体文化协会在1953年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另一个先创造了“裸体文化”一词，后又投身于“为了雅利安人种与犹太人斗争”的种族主义“闹事裸体运动”的头面人物海因里希·普多尔，则被纳粹管制了起来：1933年11月，纳粹将其拘留起来，原因是他在自己的杂志《万字符》（*Hakenkreuz* ）里投诉新政府的犹太人政策太过于宽松。汉斯·祖伦论述太阳的著作在增加了种族主义色彩的内容后，在“第三帝国”里也一直热销不衰。他本人则于1942年因“引起公愤”罪名被法院处以罚款——两位女邻居举报说，多次看见他在自家阳台上手淫自慰。

不过，绝大部分裸体主义者的表现和大多数德国人没有差别，他们随波逐流，只顾闷声发财。1933年4月，帝国裸体文化协会皈依了纳粹政权，并决定与之保持一致。作为“民族裸体文化战斗组织”和“身体训练联盟”，它们可以继续进行对太阳的崇拜活动。1942年，当数百万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东部被驱赶进毒气室时，一部新的“游泳管理治安条例”出炉，并且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伐利亚州除外）一直沿用到60年代。根据该条例，“个人或同性别或不同性别的群体……允许公开裸

体游泳，如果他们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判定，不会被闲人看见，尤其是在指定的场所里”。赤身露体挽救不了麻木和盲从。

二战之后的德国，人们操心的是其他的事情，而不是在裸泳里寻找乐趣。尽管如此，1946年在被战火摧毁的柏林，就在美国人的管区内，社会主义者阿道夫·科赫的“身体文化研究所”又重新开张。在他的《阿道夫·科赫人道主义教育刊物》（*Adolf-Koch-Blätter für humanistische Erziehung*）的扉页上，画着两个裸体者以废墟为背景相互握手。1949年11月，裸体主义的老将们在西德联合成立了德国裸体文化协会。1953年，“裸体文化青年——阳光人群联合会”在汉诺威试图继承裸体文化过去的那种具有改造生活意义的传统。但是，如同后来1968年搞学生运动的大学生在他们的社团、合住公寓和临时托儿所里把裸体再次上升为一种社会批判的姿态一样，所有这些努力无外乎是当年挑战德皇威廉的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变革幻想的索然无味的尾声罢了。如果这些市侩庸人自己早已大腹便便地在裸体文化度假村的烧烤架旁翻烤着他的香肠，他们还要向那些市侩庸人叫板吗？不过，在目前多元文化的大城市里，如果享乐主义的裸体日光浴者在公园里伸着懒腰，而一个土耳其大家族周末在同一个公园里聚会野餐，倒是真的会再度引起冲突。

裸体文化在东德具有更多的潜在叛逆因素。1945年9月，苏联军管部门禁止了所有裸体文化协会。东德的裸体者们不甘心就这么被剥夺了光一把身体的乐趣：埃尔福特（Erfurt）市的“Prießnitz协会”干脆把名字改成了“向阳小花园协会”，并且和警察玩起了捉迷藏游戏。早在爱炫耀的西德人在北方叙尔特岛的坎朋镇或是慕尼黑的英国公园里开始享受裸体生活几十年之前，东德的知识分子就在波罗的海的阿伦斯荷普海滩脱得一丝不挂了。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说的：一天，御用诗人和后来的文化部部长约翰内斯·R.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去波罗的海海滨浴场，看见一位光着身子在海滩上闭目养神，而且已人老珠黄的女士，便对其训斥道：“老母猪，你不觉得羞耻吗？”此后没多久，当他给安娜·

西格斯（Anna Seghers）颁发一等国家文学奖，并亲切地称呼她“亲爱的安娜”时，这位《第七个十字架》（*Das siebte Kreuz* ）小说的女作者在台下喊道：“别呀，在你眼里我不一直是头老母猪嘛！”

1954年5月，东德政府试图首先在阿伦斯荷普海滩禁止裸泳，后来（9月）在西德的《明镜》杂志刊载了一篇嘲笑东德裸体者的文章后，在东德波罗的海海滨全面禁止裸泳。这个工人和农民之国担心自己的国际声誉受到损害。但是，政府禁令的理由并站不住脚。所以，后来很多像德累斯顿国家剧院演员特劳特·里希特（Traute Richter）这样的赞同裸体主义的名人建言道，相关的治安条例是纳粹时期的产物，游泳衣、游泳裤或者是刚刚发明的比基尼，是与资本主义物质主义思想相关联的东西。无奈之下，政府于1956年在“有相应标示的”地点将无限制的裸泳又重新开禁：裸体文化海滩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中的一处世外桃源。

走累了脱掉被汗水湿透的衣服，跳进一池清凉的湖水，一种古老而无牵无挂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尽管如此，倘若偶尔去玩一把天体的人，脑子里还记着约翰内斯·R.贝歇尔留下的那句最值得记住的美学信条，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要怜悯！要有同情心！要顾忌国人的眼睛！”

有好事之徒传言说，曾经在阿伦斯荷普海滩撞见了这位诗人，浑身赤条条的一丝不挂。

作者：特·多

译者：吴宁

参阅：深渊，兄弟树，下班之后，时代，青年旅舍，纯洁戒律，私人菜园，海滩篷椅，徒步之乐，维尼图

---

[1] 塞巴斯蒂安·克奈普（1821～1897），德国巴伐利亚乡村牧师、水疗医师、克奈普医学创始人。

[2] 鲁道夫·斯坦纳（1861～1925），奥地利社会哲学家和人智学家。

[3] 卡尔·威廉·迪芬巴赫（1851～1913），德国画家和社会改革家。

[4] 古斯托·格雷泽尔（1879～1958），德国和奥地利艺术家，遁世索居者。

[5]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1778～1852），德国体操活动的倡导者，被称为“体操之父”。

[6] 海因里希·普多尔（1865～1943），德国政论家和裸体文化的先驱之一，海因里希·害羞（Heinrich Scham）是其常用化名。

[7] 安妮塔·白蓓尔（1899～1928），德国有争议的女舞蹈演员。

足球

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不是这个游戏的发明人，即二十二个男人（女人也刚开始不久）九十分钟时间追着一只球跑，而最终获胜者总是德国人。足球的发明奖杯，还是让中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去抢吧。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德国人有变外来事物为己所用的天赋。到后来，这些事物都被人说成好像是我们德国人固有的东西。我们的这种本事，在哪里也没有像在足球场那样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然而，“王者之球”最初在德国立足并非易事。德国足球的开拓者们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德国足协能以六百七十万会员之众，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想当初，这种新的游戏被当作“英国病”而被人所不屑。南部施瓦本地区的体操教师卡尔·普朗克（Karl Planck）于1898年发表过一个小册子，里面把这种“脚踢球”论证为“邪恶和卑鄙的玩意儿”，因为“这满世界的用脚踢来踢去意义何在？再者，这件事根本就不值得人们去动手指头。脚踢球就是一个唾弃、低下、厌恶、恶心和鄙视的符号”。

与英国人不同，德国人在当时还没有从事所谓“体育运动”，德国人热衷的是所谓“身体教育”，而且主要通过体操和活动来进行。然而，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于1810/11年创立的德国式体操运动，到了德皇威廉时代，人们当初的热情已大为减退。这时，各种体操协会不用再像1819～1842年动荡年代那样东躲西藏——那个时候，普鲁士当局曾经把它们当作企图造反的秘密政治组织而予以禁止。现在正好相反，体操成了学校一个得到承认的正式科目。除此之外，体操运动自创立之日起就

为之奋斗的统一的德国也于1871年变成了现实。倘若说“体操之父”当年在柏林的哈森海德公园曾经鼓励青少年们通过悬体屈腿和引体向上进行身体锻炼的话，那么倘若在拿破仑占领的普鲁士，体操运动将有着与振兴经济时期不一样的力量。但是，帝国时代的最高目标是振兴经济，杠上转体所能为之做出的贡献就显得十分有限了。尽管如此，体操家们仍旧试图抱着当年的准军事传统不放。正是在这个陈腐的背景下，足球作为一种崭新的、更自由的强身健体形式开始兴起。不管体操家们是如何义愤填膺，“体操运动”之后，“球类运动”接踵而来。

如果认为这种“用脚撒野”是无产阶级的、粗俗的消磨时光的游戏，那么这种怀疑就与现实相去甚远了。最初受到足球热影响的，是各种受过教育的阶层。当年自己也曾热衷体操的高级中学教师康拉德·科赫（Konrad Koch），把足球连同陌生的游戏规则一道从英国带回了德国。在他的指导下，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市马丁·凯瑟琳中学的学生于1874年在德国的土地上举行了第一次足球赛。这位博士毕业的语言和文学学者并非要把遥远的不列颠气息带到自己的家乡来，而是从足球当中嗅到了某种完全适合德国的东西。他曾经为足球引进德国引起的争议进行过这样的辩护：“我们德国的体操，就它现在的情况来看，不能（足以）将身体锻炼提升到形成社会风气的程度。”

对于传统的体操，科赫感到颇为格格不入的是，它不再像起初的时候那样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而是挪到了叫人窒息的室内进行。他的这个意见与当时的时代精神不谋而合：与经济上落后的德国高速发展成工业强国一样，人们追求户外新鲜空气和身体运动的愿望也同样飞速发展。但是，德国并非到处都是森林，可以吸引人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从事所有业余爱好中最为德国化的一项活动——漫游，这种情况在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聚集区尤为如此。于是，足球开始成为大城市的教育界人士用来对付青少年中足不出户和酗酒滋事倾向的一种秘密武器。

到今天，威廉皇朝让我们联想到的还是它所培养的都是些唯唯诺诺的奴才臣子。足球教师科赫的成功表明，那个时代并非只有这一种社会风气。他撰文写道：“旨在培养军队纪律那种规矩的校园体操课，严重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活动，而且完全取消了课堂上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只有在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真正让青少年们鼓起信心。”好一个身着足球服的自由主义啊。

足球这一新的游戏活动开始的时候规则相当混乱无序，有的地方还允许用手来帮忙，但这并不重要。对科赫来说，比赛对抗的思想从未是他关注的焦点。尽管后来他也组织过他的学校和周围其他学校的比赛，但在这一点上，他一直忠诚于以往的体操家思想，即比赛不是对抗，而是协同。

在另外一个问题上，科赫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德国的草地上不应该说英语，而是德语。这位与作家威廉·拉贝（Wilhelm Raabe）是好朋友的德语教师，把足球语言的德语化当作把“Football”变成一种德国式游戏的根本步骤。1900年，当德国足协成立的时候，他在一篇文章中骂道：“每个有德国感情的观众，当他看到一个小青年用英语说‘进球’和‘踢球’时，就恨不得扇他一巴掌，告诉他，这样做对一个德国青年来说是不对的。”仅仅三年后，他便效仿17世纪巴洛克时代欲将外来语从德语中净化出去的语言学者的风格，发表了一个有八十个术语的足球词汇表。直到今天，我们都要感谢这个词汇表。有了它，我们——有别于同样说德语的瑞士和奥地利——不是在球场高叫英语的“越位！”（offside）、“角球！”（corner）、“点球！”（penalty）、“进球！”（goal），而是德语的“越位！”（Abseits）、“角球！”（Ecke）、“点球！”（Elfmeter）和“进球！”（Tor）。在足球这个问题上，甚至是颇讲语言纯粹主义的法国人也未必做得如此坚定彻底。尽管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科赫词汇表中的“球队皇帝”（Spielkaiser）让位给了“球队领袖”（Spielführer），并且最终被几乎就是英语的“球队队

长”（Kapitän）所取代，但是在“弗朗茨皇帝”（Kaiser Franz）身上，这个词不是一直还得到最高的体现吗？科赫对德语的热爱甚至使他对一些流行的俱乐部名字，如“Victoria”“Tasmania”或是“Kickers”也表示反对，而推崇“Wotan”“Siegfried”或“Hermann” [1] 这样的德文名。

to allow = bewilligen, zusprechen.
appeal = Einspruch
Association Football = Fußball (einfacher Fußball, ohne Aufnehmen des Balles).
backs = Hinterspieler.
to back up = aufrücken, unterstützen.
captain = Spielwart (Spielkaiser).
to caution = verwarnen.
to centre = nach der Mitte stoßen.
centre! = (Zuruf) Mitte!
centre-forward = Mittelstürmer.
to charge = anrennen, vorlaufen.
forwards = Stürmer.
foul = ungehörig, unehrlich.
free-kick = Freistoß.
fullback = Schlußspieler (im gemischten Spiele).
goal = Tor, Mal.
goal-keeper = Torwächter.
goal-kick = 1. (im einfachen Spiel) Abstoß (vom Tore). 2. (im gemischten Spiele) Torstoß (auf das Tor).
goal-line = Mallinie (Torlinie).
goal-post = Torpfosten, Malstange.
half-back = Halbspieler, Markmann.
half time = Halbzeit.
halves = Plural von half-back.
hands! = Hand!
to heel out = herausfersen.
in-goal = im Mal, Malfeld.
to kick = stoßen.
kick-off = Anstoß.
to knock-on = vorschlagen.
linesmen = Linienrichter.
mark = Kerbe.
match = Wettspiel.
no side = Schluß.
to obstruct = stören, im Wege stehen.
off side = abseits.
on side = im Spiel.
out! = aus!
out of play = aus dem Spiele, tot.
to collar = festhalten.
combination = Zusammenspiel.
corner = Ecke.
corner-kick = Eckball, Eckstoß.
crossbar = Querstange.
dead-ball-line = Spielgrenze.
to disallow the charge = den Vorlauf verbieten.
drawn = unentschieden.
to dribble = treiben.
to drop = einen Sprungstoß (Prellstoß) ausführen.
drop-kick = Sprungstoß (Prellstoß).
drop-out = Abstoß (im gemischten Spiel).
fair = anständig, ehrlich.
fair-catch = Freifang.
fairly held = festgehalten.
to pass = abgeben, zuspielen.
penalty-goal = Straftor.
penalty-kick = Strafstoß.
place-kick = Platzstoß.
punt = Fallstoß.
referee = Schiedsrichter.
Rugby Football = gemischter Fußball (mit Aufnehmen des Balles).
rush = Vorstoß.
to rush = einen Vorstoß machen.
score = Spielergebnis.
to score a goal = ein Tor gewinnen, zählen.
scrummage = Gedränge (Mengen).
shoot = Schuß (Stoß) aufs Tor.
to shoot = schießen.
to tackle = fassen, halten.
team = Mannschaft, Riege.
three-quarter back = Dreiviertelspieler, Hinterspieler.
to throw forward = vorwerfen.
to throw out = hereinwerfen.
touch = Mark, Seitenlinie.
touch down = Handauf.
to touch down = anhalten (die Hand auflegen).
touch-in-goal = Malmark.
touch-judges = Linienrichter, Seitenrichter.
touch-line = Marklinie, Seitengrenze.
tripping = Beinstellen.
try = Versuch.
unfair = ungehörig, unfein.

Braunschweig. Konrad Koch.

1903年刊载在《全国德语语言协会杂志》上由康拉德·科赫翻译的德英足球词汇对照表。

于是乎，在这个新兴的“体育运动”中便产生了相互对立的两派。不过，对立方不是要比“球队皇帝”更加德国化的搞体操的前辈，而是像瓦尔特·本泽曼（Walther Bensemann）一样的世界主义者。本泽曼特别推崇足球的国际主义精神，视体育为“宗教”，说它“或许是当今唯一连接各民族和各阶层的工具”。

这位犹太银行家的后代在瑞士法语区上寄宿学校时了解和喜欢上了足球。当他1889年回到德国时，就在他上学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市高级中学开始做足球的宣传工作。1891年他成立了卡尔斯鲁厄足球协会，后来又成立了卡尔斯鲁厄足球队，以及德国南部的一系列其他球队。德国足协成立时，他也参与其中，不过从一开始他与其他的足协官员就有矛盾，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拥护科赫的德国民族路线。

还在德国足协成立之前，起初的几场有德国参加的国际足球赛就有过矛盾冲突。1893年时，本泽曼在英国和法国不遗余力地为通过足球进行和解而奔走游说。斯特拉斯堡在被法国统治两百年后，1871年又回归德国。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本泽曼计划举办一场德法友谊赛，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原因不光在于德国的一帮军人，巴黎的一家报纸也明确写道：“如果我们到斯特拉斯堡来，我们将带着大炮来。”

1898年，总算在巴黎举办了一场德国队和英法联队的“鼻祖式的友谊赛”。然而，赛后发往柏林的电报却与本泽曼的本意大相径庭：“柏林德国足球运动无往而不胜之协会代表诚惶诚恐禀报波茨坦德皇陛下：由德国各省组成之足球队，今日于巴黎以7：0首次战胜强大之法国队。”（一年后，德国的“球队皇帝”以何种言辞向波茨坦的德皇陛下报告在首次两国友谊赛中以2：13大败给英国队的情况，可惜没有文档资料流传下来）

足球至今让世人为之痴迷的两面性很早就显现了出来：民族沙文主义分子把它看作延长战争的另一种手段，而世界和平主义者则把它当作民族之间相互沟通的最佳途径。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沙文主义者并不能轻而易举地利用足球为他们的目的服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记录在凡尔赛条约中的那场惨败使民众有切肤之痛，球场上象征性的胜利只能使之得到些许慰藉。再者，在战后魏玛共和国时期，本文开头提到的、由英国著名前锋加里·莱因克尔（Gary Lineker）于1990年说出的对足球情绪化的定义在这里并不适用：胜23场，平13场，输19场，当时的德国队战绩平平。早在1908年时，德国队在第一场正式友谊赛中，以3：5败在瑞士队脚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首场友谊赛，对手又是瑞士队，结果1：4再次败下阵来。1912年奥运会上，德国人以神奇的16：0横扫十月革命前的俄国队，也未能给国民带来多少安慰。

德国足球未能出人头地，并不是因为缺少引人注目的球员：阿道夫·耶格尔（Adolf Jäger）、海因内尔·施杜尔福特（Heiner Stuhlfauth）、恩斯特·库佐拉（Ernst Kuzorra）、弗里茨·斯采潘（Fritz Szepan），这些人在魏玛时期本应能够很轻松地在国际足坛上施展才华。但是，德国足协思想保守僵化，他们甚至比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本身还要看重业余运动员的奥林匹克理想，认为职业化将玷污了体育运动。1920年，西德体育协会将后来的沙尔克04队的几乎所有队员予以除名，原因是这些矿工们开始觉得，他们的大腿、小腿和脚趾里蕴藏着比他们每天要下去干活的肮脏矿井更多的资本。德国足协以“揭露和消灭职业化”为口号，发起了一场对“金钱足球”的围剿。这场围剿在1925年达到高潮：禁止所有德国业余球队与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外国职业球队进行比赛。此前创办了传奇般足球报《踢球者》（*Kicker* ）的瓦尔特·本泽曼，此时在报纸上刊文反对德国足协这一“实在不像话”、“欠妥”和“傲慢”的决定，并预言：“事实将表明，国际足联（FIFA）的绝大

多数成员不会对德国的体育界听之任之。”

尽管本泽曼对德国足协的狭隘十分反感，但他也不是要把足球置于市场规则下的热心拥护者。魏玛时期那些为数众多、聚集在工人体操和体育联盟麾下并撇开“资产阶级的”德国足协自己举办比赛的“左翼”足球协会，更非如此。尽管大家世界观不尽相同，但是在足球应该作为一门纯粹的艺术而加以保留这个问题上，“体育运动”的各个门派的认识都是一致的。直到今天，这个根深蒂固的德国观点还有深远影响。有例为证：当足球早就成了全球性且数额巨大的生财之道时，《法兰克福汇报》的体育版在20世纪90年代还抬出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并且叹息地认定，足球行业“破坏了田园般的宁静”，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和无情的现金交易，不再有其他关系”。

这条不同寻常之路，造成了德国足球行业中的“纽带关系”较之其他欧洲国家存在的时间更长：球员与他家乡的俱乐部捆绑在一起相互依存。由于魏玛时期的足球官员最多只能悄悄地用钱袋来吸引优秀球员，所以，盖尔森基兴、凯泽斯劳滕和卡尔斯鲁厄的那些前锋、后卫和门将都相对稳定地在他们家乡的俱乐部踢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3年，德国开始甲级联赛制度——地方俱乐部球队先进行循环赛，直到赛季结束时，最好的球队交手对阵，以淘汰赛方式决出联赛冠军。

纳粹分子上台时，足球自然就成了所谓“德国体育”。纳粹要求足球与政府保持一致，并解散了工人足球协会，使像尤里乌斯·希尔施（Julius Hirsch）和戈特弗里德·福克斯（Gottfried Fuchs）那样的犹太籍球员（福克斯在16：0大胜俄国队的那场比赛中一人独进10球）的日子过得生不如死。纳粹政权下的足球并没有取得更好成绩。尽管1934年在意大利世界杯上德国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第三名（1930年乌拉圭第一届世界杯赛因为经济危机和路途遥远未参加），但在柏林奥运会四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足球小国”挪威队。1938年“合并”奥地利之后，德国燃起

了一阵足球大国梦：与1931～1933年让欧洲所有顶尖球队（包括德国队）望而生畏的“奥地利神奇队”联手，德国人要在法国圆一把世界冠军梦。6月9日，“大德国足球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被瑞士队淘汰出局。

纳粹政权血腥地将世界变为屠宰场的自大狂，迫使1942年和1946年的两届世界杯停办，同时使德国人无缘参加战后1950年第一次在巴西恢复举办的世界杯。同年11月22日，又是瑞士人表示愿意与沦落在人类边缘的德国人进行比赛。（西部）德国人以1：0小胜。当时没有人能料到，仅仅四年后联邦德国将从足球精神中获得再生。

1954年6月，主教练塞普·赫尔贝格（Sepp Herberger）和他的队员——后来的“伯尔尼英雄”出发去瑞士，驻扎在幽静的图恩湖（Thuner See）边。一百五十年前，戏剧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曾经在这个湖边创作了他最早的几部戏剧。当时在满目疮痍的德国，只有对足球真正痴迷的人才关心比赛。其后，当德国队在首场比赛中经过苦战以4：1战胜土耳其队，接着以3：8输给夺冠热门匈牙利队时，国内的兴奋度才开始上升，“国耻”的骂声不绝于耳。在这场比赛中，完全出于战术考虑派出二线队员上场的主教练赫尔贝格（他后来这样解释说），收到了来自国内的信件。信里建议他买根绳子，就近找棵树去上吊，而且“尽量不要搞断绳子，留着以后还可以再用”。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至少在德国人的头脑中——就不再是一场纯粹的体育比赛，而可能变成了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笔下的一出戏剧。

被羞辱的主教练赫尔贝格给他的队员宣读了家乡来的信。队员们现在想赢球，而且必须赢球，为了他——他们的教练，为了荣誉。“如想取胜，那么十一个人必须是十一个朋友……”“施皮茨精神”（Geist von Spiez）[2]昂起了她神话般的头颅。曾因对土耳其之战中坐冷板凳表示失望、当晚溜出房间喝得酩酊大醉的德国队前锋、感情细腻的赫尔穆特·兰恩（Helmut Rahn）后来将向他的教练证明，如果教练信得过他，他

将无往而不胜。但是，他还不能马上上场建功立业。在对土耳其的第二场决定性的比赛中，他还是板凳队员。这回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怨气。德国队7：2获胜，讲什么都是多余的，只有结果说了算。他的机会会来的，机会来了，在对南斯拉夫的四分之一决赛时。这是一场艰难和磨人的比赛，但是他在场上。德国队暂时领先。教练问道："赫尔穆特，你答应我的进球呢？"会进的，第85分钟，球进了，德国队2：0获胜。胜利的大门打开了，半决赛时，德国队甚至以6：1大胜奥地利队。兰恩是场上队员，但没进球，这天进球的先是舍费尔、莫洛克，之后是瓦尔特、弗里茨、奥特马，是弟兄们，是球队，大快人心啊。家里面的德国《世界报》欢呼雀跃："这场球我们肯定赢——奥地利人面带笑容地说。这场球我们想要赢——德国人表情严肃地说。一点都不奇怪，来自蓝色多瑙河的球队最后折戟沉沙。"德国人不得已只短暂地露出过一次笑容，那是在他们读奥地利《信使报》下面一句评论的时候："这是一场只是为决赛而战的机器人对美学足球的代表的胜利。"但是，这个时候谁还有时间来读报纸。7月4日这天转瞬即到了。瑞典女歌手莎拉·雷安德（Zarah Leander）在二战时的歌曲《奇迹》中唱道："她知道，这事一定要发生，今天就来到。"众神为弗里茨带来了天时之利，天开始下雨，雨越下越大，大雨如注。迅速更换球鞋鞋钉，这是科技带来的优势。匈牙利人将感到惊讶，他们想都没有想到。在国内，数以百万计的电视机和收音机前的观众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面对这神奇的足球世界，解说员情不自禁，如痴如醉："你们说我疯了吧！尽管说我脑子进水了吧！……舍费尔向禁区传中！头球攻门！被挡了出来！兰恩得从队员身后射门——兰恩射门了！进了！进了！进了！进了！"

赫尔贝格之战结束了。"来吧，你们条顿人勇敢的儿子们，在寂静的橡树林中，让我们感谢日耳曼之神沃坦馈赠的得胜之礼……"

德国陶醉了，从西到东。世界为之忧虑。法国《世界报》刊载了一篇记者发自伯尔尼的带警告口气的报道："地球在颤抖。天在下雨。雨

在下，我浑身发冷。刚才，当六万德国人齐声吼叫时，我不禁一阵寒战……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年纪轻轻，振奋而有力地唱着歌，全世界的人都应当听见，而且应当知道，‘德国高于一切’又卷土重来了。”

的确，匆忙从国内赶来观看决赛的德国球迷在范可多夫体育场唱起了国歌。奇迹般夺冠两天后，德国足协主席佩克·包恩斯（Peco Bauwens）在慕尼黑狮王啤酒屋的庆祝讲话中，感谢古老的“日耳曼之神”沃坦的神助，并且对“球队中的服从领袖原则”倍加赞赏。但是，人们真的有理由对德国再次表示担忧吗？抑或这无非是旧时代习气的回光返照？巴伐利亚广播电台当时立刻中断了包恩斯越轨讲话的转播，慕尼黑出版的《南德意志报》7月5日的头版头条印出了小心谨慎的标题：“伟大的胜利，伟大的一天，但仅是一场比赛而已。”联邦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在稍后给球队颁发银质月桂奖章时，间接地批评解说员赫伯特·齐默曼（Herbert Zimmermann）在比赛白热化时，把守门员托尼·图雷克（Toni Turek）捧成了“足球之神”。他说：“我们是为体育而来，我认为，我们应该将体育和政治分开，我们不应该让价值观发生偏移。”

价值观并未发生偏移。正如在斯大林格勒的枪林弹雨中沉沦之后，战友情这个神话在“伯尔尼奇迹”中获得了一次普通百姓式的新生一样，德国没有为夺冠的英雄们树立战神式的纪念碑，而是代之以用球员来命名Goggo摩托车、方块汤料、瓷器人物和龙胆花烧酒。德国人识时务了，尽管他们对不走运的兰恩至死都在求着追问：“那什么，赫尔穆特，给咱讲讲那第三球是怎么进的……”这些具有克莱斯特戏剧潜质的足球英雄，虽然一部分人最后结局可怜，但都没有成为英雄式的高大全，而只是普通的加油站老板、香烟商贩和体育教师。

对“伯尔尼奇迹”最冷静和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透彻的评论，出自左翼自由派的《瑞士民族报》：“德国人能够对一场比赛比对军事行动更加

感到振奋，这本身就是对一种自然和健康内核的启示。”

事实好像的确如此：德国对足球越疯狂，它就变得越和平主义，尽管或者正是因为有过50年代那场引发轩然大波的关于重新武装德国的大讨论。在这里，把它们说成互为因果，未免有点失之偏颇。但是，德国人追求足球世界霸主的努力，与它退出国际政治倒是非常珠联璧合。不管塞普·赫尔贝格有没有说过“足球是和平的战争”这句话，在联邦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的思想在球场上也气数已尽。

这一点从没有像1974年德国世界杯时表现得那么明确。“来吧，朋友”——尽管广告公司直到2000年后才把这句话变成广告词，但当时确确实实是这样一个意图：德国将以友好、和平和摒弃一切极端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实际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两年前慕尼黑奥运会上，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德国警方解救人质的绝望行动，酿成了一场死亡的惨剧。早期恐怖组织红军派的头面人物、把“黑九月”当作“反法西斯行动”来欢呼的安德烈亚斯·巴德（Andreas Baader）、古德龙·恩斯林（Gudrun Ensslin）和乌尔丽克·梅因霍夫（Ulrike Meinhof），在1974年夏天还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听候对他们的审判。人们担心其他恐怖分子可能再次企图用引起轰动的谋杀方式，逼迫政府释放关押的同伙，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同年五月，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因“纪尧姆事件”引咎辞职。此外，比赛抽签的结果确定，西德足球队将在小组赛时就遭遇东德队。

然而，上述情况并非此次德国世界杯不以高调而以低调开场的原因。主教练赫尔穆特·舍恩（Helmut Schön）率领的德国队在1972年首次夺得了欧洲冠军。德国的知识分子们一下子在温布利球场发现了他们对那个圆圆的皮球的热爱，并把君特·内策尔（Günter Netzer）和保尔·布莱特纳（Paul Breitner）那样的蓬头乱发球员捧为足球的革命家，期待着他们魔术般的球上功夫。与此同时，德国普通球迷已经认定，这回世

界冠军不再是奇迹，而是必须拿下。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了，为什么德国队开幕赛上1：0战胜智利队被羞辱成一场失败。第二场在汉堡人民公园体育场的比赛中，观众大骂“球队领袖”贝肯鲍尔是“巴伐利亚猪”。这位足球皇帝用向观众席吐口水还以颜色（德国足协预感到，把由一半拜仁慕尼黑队球员组成的德国队的下一场比赛放在德国北部，不是个好主意）。德国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取得了进入下一轮的资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灰溜溜地离开了球场。“德国队滚蛋，别丢人现眼！”——平生从未参加68年学运上街游行闹事的球迷，突然间也变得冲动起来。四天后，自己施虐受虐的德国足球迎来了本届世界杯最盛大的庆典：东德马格德堡的前锋于尔根·施帕瓦塞尔（Jürgen Sparwasser）踢进了他最著名的一球。西德队0：1败在东德队脚下。

这本是主教练舍恩给他的“弟子们”宣读老百姓寄来的骂娘信的时刻，但这又于事何补呢？舍恩既无当年赫尔贝格不可撼动的权威，同时也不可能用一次振聋发聩的讲话将那帮个人主义惯了的球员们拢在一起。从1954年到1974年，中间隔了二十年时间。然而，“施皮茨精神”像幽灵一样出现在那个“马伦特之夜”。在西德队预赛期间驻扎的北德马伦特地区简陋的体校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不是由主教练，而是由场上踢自由人位置的足球皇帝主持。皇帝不仅向世人证明了，他领会了新的时代，而且还证明，仅仅号召队员拿出战友情和荣誉感是不够的，虽然他也要求过自己的队友，共同起来与队内的不团结做斗争。必须重新调整球队的出场阵容，放弃舍恩教练自1970年世界杯以来一直惯用的三到四名锋线队员的冒险进攻战术。“弗朗茨”皇帝提出加强后场防守，建议获得通过。好看不如实用，以拼抢控制比赛，方案见效。

撇开其象征意义不谈，东德队施帕瓦塞尔的进球得不偿失。尽管东德队取得了小组第一，但它下一轮的对手却是巴西队、荷兰队和阿根廷队。而西德队以小组第二出线，遇到的对手将是南斯拉夫队、瑞典队和波兰队。西德队利用了这个弱组的机会，时而费劲，时而轻松，时而冒

雨如踢水球般地杀进了决赛。东德队以两败一平退回了老家的铁幕之后。

年轻的加里·莱因克尔大概是在英伦三岛上通过电视观看的这场决赛。或许那个时候他就隐约感觉到，不管发生什么事，获胜的总归是德国人。决赛时，荷兰队踢得华丽精彩，代表人物是约翰·克鲁伊夫（Johan Cruyff）；德国队踢得坚忍顽强，代表人物是贝尔蒂·福格茨（Berti Vogts）。坚忍顽强取得了胜利。开赛一分钟时曾经摆脱了“小猎犬”的盯人，在德国队禁区内造成乌利·赫内斯（Uli Hoeneß）犯规的克鲁伊夫，在德国队的贴身盯人下失去了比赛的兴致。而此时，伯恩德·赫尔岑拜因（Bernd Hölzenbein）在荷兰队禁区摔倒（有意还是无意），保罗·布莱特纳主罚点球，扳平。上半场结束前，格尔德·穆勒（Gerd Müller）踢进了第二球。一个小时后比赛结束，联邦德国队第二次夺得了世界杯冠军。

解说员鲁迪·米歇尔（Rudi Michel）为德国电视观众奉献的赛事评论一向平淡而不动声色。当比赛结束的哨音吹响后，能使他最大限度地加入观众的狂喜的评论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各位男士，你们可以慢慢地把那些东西的瓶塞打开，那些比较高档的美酒，女士们呢，你们可以跟着一起喝两口。”

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足球之夜，“球员太太们”是不应当跟着一起喝两口的。据说一位德国足协官员不让赫内斯的太太进入庆功宴会大厅，说是“这里还是讲规矩的地方”。这下可好，那帮得胜的足球“革命家们”立马离开了希尔顿饭店，径自到慕尼黑的迪斯科舞场庆贺去了。

这桩逸事至今与左派知识界的足球爱好者对70年代的这支“玩闹”球队的印象完全一致。但是，当年在这群“年轻狂人”和德国足协元老们之间的这场冲突，真的就是两代人之间的世界观上的对抗吗？或者不如说是德国足球观念上的一次重要的转变，与和顽固旧观念对抗的理想主义

风暴根本无关？

早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球队与教练以及足协之间在马伦特营地就有过激烈的争吵。不过，争吵并不是为了赫尔穆特·舍恩说过的关于“第三帝国”那句话：“尽管那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很深……但对我们运动员来讲是个辉煌的足球时代。”而是为了钱，为了足协在夺冠时要支付给队员的奖金。

当年“伯尔尼的英雄”每人拿到一千马克，然后每次上场再拿两百马克，他们已经乐不可支了。1974年时，德国足协准备给每个队员三万马克，“狂人们”认为少了，觉得丢人现眼。

君特·内策1973年作为甲级联赛以来第一个德国职业球员去国外——皇家马德里队踢球［“我们的”乌伟·塞勒（Uwe Seeler）1961年曾经骄傲地回绝了有几百万马克收入，离开家乡俱乐部汉堡队到国际米兰队踢球的机会］。但是，其他留在德国踢球的球员个个对国际上的价码了如指掌。据说，巴西和意大利足协给他们的球队夺冠开出的奖金是每人十五万马克。世界杯后也去法西斯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踢球的“红色左派分子”保罗·布莱特纳，在会上威胁要离开马伦特营地回家。主教练赫尔穆特·舍恩表态说，要么自己离开，要么全队走人，年轻队员爱财的欲望让他觉得恶心。最后，球队以每人七万马克达成协议。

到了1990年，幸运的弗朗茨皇帝作为“团队领导”率领德国队三夺世界冠军，那时的情况就简单多了！东、西柏林之间的柏林墙倒塌了，东西德国即将统一。有良好教养的年轻球员，如于尔根·克林斯曼（Jürgen Klinsmann）和安迪·布莱默（Andy Brehme），一专多能，在意大利几乎可以用纯正的当地语言点一杯卡布基诺。十二万五千马克的奖金赛前就已心平气和地谈妥，“球员太太们”甚至允许在整个杯赛期间去探望一次她们的英雄。音乐人乌多·于尔根斯（Udo Jürgens）为球队创作了一首优美的旅途之歌：“我们已踏上布莱纳（Brenner）[3] 山口，/我们激情

燃烧。/我们已踏上布莱纳山口，/我们充满欢乐。”甚至绿党国会议员安捷·福尔梅尔（Antje Vollmer）也为球队跨越阿尔卑斯山之旅表达了她的祝福：“如果谁在这几天看见德国队，谁就输定了，就像我本人一样，心里总觉得对德国队发怵。他们的球不仅踢得好，所向无敌，而且球踢得漂亮，总觉得像是真正放开了。”不论是在米兰、都灵还是罗马，每当形势吃紧的时候，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就坐在贵宾席上为德国队加油。为这幅欢乐的足球图锦上添花的是：1990年世界杯第一次规定，队员必须佩戴小腿护板上场比赛。

只有那帮死硬和吹毛求疵的球迷在骂，德国队踢得过于“保守”，“嫩仔们”缺乏“创造力”。虽然有德国的暴徒在米兰城里闹事，但是，由于英国的暴力球迷同样在撒丁岛街头大打出手，因此世界舆论并未倾向性地认为，德国的暴力事件中存在着新的、具有威胁性的称霸世界的苗头。当弗朗茨·贝肯鲍尔夺冠后在罗马宣称：“我对全世界说句抱歉的话：如果现在有东德球员的加盟，今后几年我们将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番话只是暂时让球迷们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

或许这位足球皇帝应该先去翻翻历史书，然后他就会明白，类似的话过去已经让德国足球吃过一次苦头。不管怎么说，他的继任者贝尔蒂·福格茨于1996年带领统一后的德国足球队在伦敦第一次夺得了欧洲冠军，但他却从来没有被人捧为国王、皇帝或上帝。

正像统一后的德国总体来说没有离开过欧洲的地面一样，德国足球也没有一飞冲天。倘若90年代曾有过那么一种德国特色的话，那不过是以运动和力量击倒对手。运动和力量这两种品格，更加成功地体现在施特菲·格拉芙（Steffi Graf）和米歇尔·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身上，使二人得以称霸女子网球和一级方程式赛车。

德国足球所走的这段真正的独特道路，最后是由贝尔蒂·福格茨在其总教练任上终结的：1994年，德国国家队最后一次聚集在一间录音棚

里，进行一次五音不全的男声合唱尝试。队员们用一首《在遥远的美国》，告别了以队歌“足球是我们的生命，/因为王者之球君临天下，/我们奋斗付出一切，/直到频频破门连连进球”开始的二十年的球队传统。这场葬礼影响深远。那个当年曾经让狮王亨利（Heinrich der Löwe）[4]认为“打仗无歌无以鼓劲”，并且可能也促使塞普·赫尔贝格带领队员在球队专车里唱起“坐在高高的邮车上”[5]的古老的德意志精神，此前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2006年德国世界杯赛时，教练于尔根·克林斯曼和他的“弟子们”坐着豪华大巴去球场，车里播放的是心灵派歌手克萨维尔·奈杜（Xavier Naidoo）挽歌风格的德国队更衣室之歌：“这条路将不会轻松，/这条路将坎坷艰难。/没有很多人与你同行，/但生活将丰富多彩……”

歌词与“夏天的童话”非常吻合。德国终于真正放松了一把，而且放得如此轻松和五彩缤纷，就像伴随70年代出生的孩子一起长大的Hubba Bubba泡泡糖一样。德国国旗的三种颜色“黑-红-金”被玩笑地篡改成“黑-红-盖了”[6]。即使是四次夺冠的梦想在半决赛时破灭了，欢庆活动还是照样进行。很多提心吊胆的人此时也不得不认识到，德国队的失败并没有导致一种新的爱国主义，虽然啤酒园里德国人又开始唱起国歌，挥舞着各种旗帜。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热闹的聚会而已。“生活将丰富多彩……”

受德国足协委托，导演索恩克·沃特尔曼（Sönke Wortmann）拍摄了一部《德国，一个夏天的童话》。影片中，德国队领队奥利弗·比尔霍夫（Oliver Bierhoff）向观众介绍，他们是如何用前厅的桌椅板凳和索尼的游戏机，把球队下榻的、由时装大师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布置得高雅无比的王宫饭店（位于柏林的绿林城区）改造一番，以便让年轻队员在那里“尽情折腾”。当默克尔（Angela Merkel）总理来看望球队的时候，还在英国阿森纳足球俱乐部当守门员的延斯·莱

曼（Jens Lehmann）问道，有什么可以吸引他这个“三个孩子的父亲”再重新回到德国，默克尔答道：“我现在想到的第一样东西是父母补贴。”众人皆被默克尔的幽默逗得大笑。

现在回过头来看：2006年世界杯较之1974年世界杯，难道德国不是更加试图延续“伯尔尼奇迹”的传统吗？1974年时，德国足球放弃了要大办第一次夺冠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计划。当五十周年大庆的时候，在世界杯第二次在德国举办的前夕，人们大张旗鼓地准备要重新宣传那次的神话。索恩克·沃特尔曼摄制了一部煽情和寻求和解的故事片。影片首映时，据说当时的联邦总理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也被感动得潸然泪下。这部电影和导演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于1979年摄制的故事片《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Die Ehe der Maria Braun* ）平分秋色。法斯宾德以记者赫伯特·齐默曼（Herbert Zimmermann）的一篇情感异常激昂的报道为背景，目的是让德国战后的人间戏剧在感情的迷狂中走向灭亡。

或许2006年赛事的组织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就在他们发明了“球迷看球大道”和“公众大屏幕观赛”的时候，他们是在沿着经济开始腾飞后德国人停下来的脚步重新往前走。区别只是在于，这一次全民观看足球不是因为电视机不够用，而是因为对集体参与过程的向往。所以，1954年的“我们又牛起来了！”这句话，归根到底不还是同样的一种内容空洞的、2006年时想要用新的挥舞国旗的热情来证明的情感振作行为吗？

足球是灵魂的一面镜子，但不是一面魔镜。照镜子的人在镜子里除了看到他自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就当前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支热衷踢球的、多元文化和生龙活虎的球队，他们只想着在有钱挣的地方安心多多挣钱，心无旁骛。这支队伍由一个个身着剪裁得体衬衫的男士率领，当他们把“具有最高纪律的组织”[7] 颂扬成德国人的品格的时候，不

会再有人大惊小怪了。

作者：特·多

译者：吴宁

参阅：下班之后，时代，故乡，诸侯割据，战争与和平，男声合唱，爱整洁守秩序

---

[1] 后三位均为德国神话或历史中英雄人物的名字。

[2] 施皮茨（Spiez），瑞士伯尔尼州图恩湖南岸小镇，德国队在1954年世界杯期间驻扎于此。

[3] 阿尔卑斯山著名关隘之一，位于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

[4] 狮王亨利（1129～1195），德意志豪门韦尔夫家族成员、德意志诸侯和军事统帅，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最有名的政治人物之一，以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的戏剧性冲突著称于世。

[5] 著名德国民歌，歌词源自19世纪70年代鲁道夫·鲍姆巴赫的诗《车轮滚滚》，曲调于1922年由柏林药剂师海因茨·霍内创作，歌词内容把生活描写成坐在邮车上的旅行。

[6] 德国国旗颜色“黑-红-金”的德文是“Schwarz-Rot-Gold”，其中“金色“（Gold）被球迷改写成“Geil”，德文意思为“帅呆了，盖了”，以表达对德国队的支持和爱国之情。

[7] 此话出自德国队现任主教练约阿希姆·勒夫。

德国人的性情

啊，德国人的性情！你可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谦恭，高傲，轻慢，冷静，和气，温良，不争，坦率，怯懦，大度，容忍，豪爽，自负，悔恨，摇摆，忧伤，沉郁。有时，你又表现得优雅，郁闷，烦躁，大胆，视死如归。只是你难得轻松愉快，兴高采烈就更为稀罕少见。

德国人如此丰富多彩的性情需要一个感觉如同家一般的归宿，他的心胸乃是最为理想的处所。那里，他的性情受到很好的保护，不为时事潮流所驱使，虽然外界每一次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眼睛。这样一种人，如果不能用“情感丰富”的话，我们不妨将其称为“悠然自得”。他就如同一片树叶，虽然随着每一阵风摇曳舞动，却牢牢伫立枝头。但树叶终归是要掉落的，它们惧怕风来时将自己无可奈何地吹得满世界飞舞。胸中的情感越不稳定，它就越急迫地想要构筑一座挡风遮雨的堡垒。

德国人悠然自得的情感史滥觞于19世纪初的毕德迈尔时期（Biedermeier）[1]。那时，工业化带来了吞吐着黑烟的蒸汽火车，铁路在全国纵横交错。机械纺织机发出嗒嗒的声音，就好像预示着机关枪的不久后的问世。股份公司玩着它们疯狂的证券游戏，股票今天暴涨，一纸千金，明天暴跌，一文不值。以往因政治落后而吃了亏的德国男人，此时跃跃欲试，跨出国门和对手争霸世界。而恪守妇道的家庭妇女留守家中，努力为男人营造一个安逸舒适的家。

这时，最初小巧的半截橱柜开始变得越发沉重，餐具柜的空间越来越大，窗户上挂起了窗帘，坚硬的地板铺上了柔软且走起来悄然无声的

地毯。沙发——这个在启蒙运动和浪漫派时期的沙龙里起过激烈思想交锋场所之用的物件，此时成了情感的承载物，并且，早在弗洛伊德医生在维也纳他那张著名的长沙发上为同时代的神经病和癔病患者诊病之前，就成了医生治疗病人用的家什。

那个年代，人们常读的一本杂志叫《花园凉亭》（*Gartenlaube*）。这本具有传奇色彩的杂志在1853年1月的创刊号里，是如此进行自我介绍的："亲爱的德国读者，大家好！在神圣的耶稣为大家送来的礼物中，又加上了我们为各位奉上的一件礼物——这本新的杂志！请各位用点时间慢慢翻阅我们的杂志……当您在漫长的冬日里与家人围坐在温暖的火炉边，当春天里红色和白色的花瓣从果树上飘落，您与友人聚集在树影婆娑的凉亭里——请读读我们的杂志吧！这将是一本为居家和家庭所办的刊物，一本老少皆宜的书，是每一个热心和向往美好高尚事物的人的书！远离一切喋喋不休的政治，远离一切宗教和其他问题的争吵，我们将用真正的好故事，将您带到人的心路历程和各民族的历史中去，引领您进入人类激情和逝去的时代的战斗中去……我们以此给您带来娱乐，并且寓教于乐。一切将充满诗情画意，犹如百花飘香。本刊将为您带来凉亭中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在那里，您将会找到优秀的、德国式的和撞击心灵的安逸悠闲。试读一下我们的杂志吧，愿上帝保佑您！"

不论何时，德国人只要有可能就喜欢宅在家里不出门，以保持他的悠闲生活在无奈而纷繁的世界里不会枯萎凋敝。这时，他愿意和志同道合者围坐在一起。然而，与贵族讲究死板的礼数和排场不同，这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聚会。所以，普通百姓家的起居室，亦即所谓的"客厅"是不开暖气的，人们情愿聚集在温馨舒适的厨房里，或跑到酒馆里，那里自称是"最有闲情逸致"的地方。

在德国，从一开始这种闲情逸致就有地理上的差别，南德人比北德

人更为悠然安闲。所以，直到今天为德国这种悠闲生活唱赞歌的地方，主要是在巴伐利亚的啤酒棚里。大约在1895年，一个叫格奥尔格·库诺特（Georg Kunoth）的不来梅市的记者和政客写过一首《为悠闲干杯！》的歌曲："啊，生活多美好，/悠闲来装点！/高歌唱一曲，/歌声天下闻：/声声唱不尽，/曲调何悠扬：/干杯，为悠闲干杯！//欢乐常相聚，/处处好时光；/欢乐之火焰/悠闲中点亮！//且看那国王！/黄袍加身上；/金冠有何益，/若无悠闲伴？/任凭人相争，/我自能泰然；/我心常相随/闲适又恬淡！//众人皆烦恼，/烦闷苦不堪，/快快来加盟/悠然似神仙！"

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的社会发展速度似脱缰野马，"神仙般的悠闲"也深受这种发展速度之害。在德国普通老百姓试图以窗帘、大幅油画和沙发靠垫为掩护，来减轻工业化和大城市快节奏带来的冲击的同时，先锋派艺术开始横扫一切。尽管包豪斯学派号召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回归到手工艺术上来，但其目的并不是对德国古老的木雕和家具靠垫工艺抱残守缺。冷冰冰的材料如镀铬钢管和铁丝织物开始进入普通百姓的家中，简洁明快和使用方便的形式替代了厚重和舒适的家私用品。如果有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放上一把"无腿钢管摇椅"，那就说明此人已领会了时代的信息——宅居的那种温馨闲散已经成了历史。

纳粹分子上台时强迫包豪斯学派流亡异国他乡，并兴建了一系列好大喜功的建筑。与这种冷酷的巨物相比，位于德绍市的包豪斯楼则看起来像玩具房间一样亲切。然而，纳粹分子显然自己也无法忍受他们所建的超大且冰冷的建筑了，闲暇的时候，他们经常出没在阿尔卑斯山的田园风光和墙上挂着鹿角的别墅中。希特勒溜进了他的"山庄别墅"，戈林逗留在自己的"狩猎小屋"，就是他们中间最为城市型的戈培尔一家，也在柏林近郊尼古拉湖的一座岛上别墅里，沉溺在懒洋洋的悠闲中。

希特勒的总建筑师和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在他战后关押受审

期间所写的《施畔道狱中日记》（*Spandauer Tagebücher* ）里，提到过纳粹的一个计划，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纳粹的好大喜功和陈腐守旧之间存在着何其巨大的差别：“希特勒认为，在（被占领的乌克兰）每一个大的村镇里都必须有一个兵站，兵站名字一律叫‘邮政客栈’，就像在德国的巴伐利亚随处可见的一样。他的怪癖想法又占了上风：在东方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上，德国的农民必须处处能见到有家乡感和安全感的集合点。”根据斯佩尔的记述，希特勒亲自参与了一种新型火车的设计，这种火车的车厢宽达六米，俨然是一个为那些疲惫不堪的侵略者建造的活动休闲集装箱。恬不知耻可谓登峰造极。

然而，留在老家的那些善于钻营、厚颜无耻和死硬顽固的纳粹同伙也需要一处行军和队列操练后放松身体的去处。在德国民政局发给每对新婚夫妇的《德国家庭手册》（*Handbuch für die deutsche Familie* ）里，一个叫汉娜·伯梅尔（Hannah Böhmer）的作者以“怎样居家布置”为题，向那些结婚后放弃工作的德国妇女传授勤俭持家之道：“将壁纸、窗帘和家具护套雅致地搭配在一起，就能营造出色彩和谐之美，而且花费不多。几件漂亮的结婚礼品，几个色泽明快的沙发靠垫，墙上一幅优美的风景画和一张好看的台布，这些就能给房间带来最好的舒适感。”

盟军部队战胜了纳粹帝国，《德国家庭手册》在经过简单修改并由德国民政联合会重新出版后，得以沿用至60年代。新版中，不再是那个汉娜·伯梅尔为人们如何居家布置出谋划策，而是由一个叫伊姆嘉德·许兹-格吕克（Irmgard Schütz-Glück）的女士讲述“营造家庭气氛”的方法和窍门：“住房和家具都是非人性化的东西，房间通过居住在里面的人而获得生气和温暖，人赋予其生命并打上自己的烙印。这时，房子才真正成为一个‘家’，一个全家的安全居所……每个起居室都应该有一个舒适的角落，一张小圆桌和几把舒服的椅子，把一家人在阴雨的下午和漫长的冬日聚集在落地灯的光线下……墙上的画、窗帘、地毯、靠垫、台布和室内的花，赋予房间个性化的色彩和舒适感。”

那个连沙发靠垫也必须“赏心悦目”的时代从此结束了——欢迎来到德国第二次的毕德迈尔时代！

参加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的那些人亮出了斧头，要砸碎他们的父母在五六十年代经济腾飞时期用来布置房间的所谓“盖尔森基兴式的巴洛克家具风格”[2]。虽然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坐在合租房的厨房里喝红酒、把蜡烛塞进酒瓶里和燃点薰香，但他对“悠闲”一词却有点反应过度。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叫《德语关键词》（*Deutsche Stichworte*）的“批判性”的散文集里，作者提醒人们，“悠闲并不是一个‘无所谓的词’，其原因是‘悠闲和残忍’……在团伙犯罪里是心理学上的决定因子。在世俗小市民身上始终有一个帮凶同时存在，他随时可能蠢蠢欲动”。

关于悠然自得，68年学生运动分子的后辈们倒是没有什么接触恐惧症。不过，他们不是从纳粹时期的地方党部头子的嘴里第一次听到“悠闲”这个词，而是从来自美国的一只可爱的动画片熊的嘴里。倘若是像沃尔特·迪斯尼的动画片《森林王子》（*Dschungelbuch*）里的故事那样的话，悠闲自得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言：“尽量悠闲一点，静下心来，悠闲一点……”但在原版电影里，巴鲁熊说的是完全另外一句话：“Look for the bare necessities，the simple bare necessities”，就是说，巴鲁熊所说的不是“悠闲一点和静下心来”，而是要想一想自己简单的基本需求。关于这个误解，68学生运动后的孩子们在后来的英文课上才发现，但为时已晚。不论现代设计风格的沙发（他们的抑郁症在沙发上继续发展）是如何冷酷无情地占领市场，悠闲的概念已经在他们变得恐惧和保持着童真的心灵中，作为一种期望扎下了根。当21世纪初的手提电脑族们越来越自信地在互联网上冲浪游荡，而且至少在他们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随时准备更换自己的住所，就像他们不停地更换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的时候，他们已变得不再像前辈的人那样，轻率地夸下海口，要给嘎吱作响和不规则转动的地球打上润滑油，叫它重新有规则地旋转。

老天爷啊，速度不能再快了啊！世界各地的股票交易所乱得还不够吗？现如今，只剩下圣诞老人还在发放退休金，婴儿出生率不断下降，商店冰箱里的肉过期变质，超市里卑劣的西红柿无人敢买。尽管如此，世界上定有一处避风的港湾！哪怕是街头拐角处的酒店大堂。自家的热炕头当然再好不过。

德国第三次的毕德迈尔时期又一次受够了城市里居高不下的物价，年轻的家庭纷纷迁往农村居住。在那里，他们甚至可以建造一座花园凉亭。坚守在城市中心不走的人也在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小日子安排得舒适安逸些。

《新式德国姑娘》（*Neue Deutsche Mädchen*，2008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不再为了好玩拼命消费，而是有所收敛。此书的两位作者之一，1979年出生的伊丽莎白·雷特尔（Elisabeth Raether）要对她柏林和巴黎两地之间的单身生活做一个了断："我向往老式的样子，向往真正的家具，向往沉甸甸的灯罩，向往钉在墙上的画框，向往井然有序和事先盘算，向往扎实可靠。"到书结尾的时候，这个"新式德国姑娘"总算有了些许成就感："我第一次用羊腿做了一个菜，几周前我第一次煮了鸡汤。……我们在墙上挂了一幅画，一张金属框的大照片，上面是雪地里的小椰菜田，卷心状的植物，一半被雪覆盖，煞是好看。"这要是让伊姆嘉德·许资-格吕克听到，她肯定感动不已。

哦，德国人的性情！我知道你需要一个家！可是，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在1922年时就已认清的事情呢："我对自己想居住的城市的要求是：柏油马路，冲洗过的街道，大门钥匙，暖气设备，热水管道。安逸就是我自己。"

作者：特·多

译者：吴宁

参阅：简便晚餐，包豪斯风格，桁架建筑，下班之后，故乡，庸俗艺术品，母亲十字勋章，爱整洁守秩序，玩具屋，私人菜园，海滩篷椅，怪诞之事，社团迷，女人，圣诞市场

---

[1] 毕德迈尔时期，指的是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至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这三十多年时间。这个时期，人们厌倦了战乱和政治，追求生活的安逸闲适。这种思潮在当时的文化艺术中得到了代表性的体现。

[2] 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德国鲁尔区一座煤矿城市，五六十年代曾流行过一种庞大厚重，而且纹饰丰富的家具风格，被讽刺地称为“巴洛克风格”。

德国式焦虑

“倘若德国人是多神论者的话，那他们肯定会有焦虑膜拜，会替司焦虑的神明塑像并向他们献上贡品。”当德裔以色列-美国历史学家瓦尔特·拉克尔（WalterLaqueur）1984年写下这句话时，他不会猜到20年后克利斯托夫·施林根西夫[1]确实会为焦虑建起一座教堂。这座木制小教堂先是展出于威尼斯双年展，后来它又辗转来到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的房顶上，与科隆大教堂比邻。如果把焦虑比作一座山的话，那么这个焦虑教堂不过是个山尖罢了。根据他们自己公布的信息，2005年“焦虑教”在五大洲已有九百个基础教区，会员数超过两万。每个想参加者均要先招供自己的焦虑，表明自己“不相信那些自命的世界舵手所许诺的解决和救赎办法”。这种人还得愿意在飞机起飞前在机舱里高喊“我害怕！”从而耽搁航班的起飞。在坦承自己的焦虑后，这些人就被升为“骨干”，他们有时在威尼斯花园中、有时在法兰克福哨卡（Hauptwache）[2]，通过长时间坐桩来证明自己的极端焦虑。施林根西夫认为正是这种焦虑给他们打上了社会局外人的印记。

在世界各地创建“焦虑教”，人们可以把这当作艺术或是一个古怪人的行为，施林根西夫不久后就患上了肺癌，并且公开展示自己的衰败过程。哪怕他看上去像他那淘气的堂兄，他也不是德国的米歇尔[3]。虽然后者站在那里看着行为艺术家瞎折腾时也会摇头，但在世界的另一端核电站出事故时，他不是自己也立即要求“关闭！”吗？只要有几棵树患病，他不是相信全部森林都会死去吗？仅仅因为出生率下降，他不是就认为德国人正摇摇晃晃地走向灭亡吗？

西方社会鲜有不被媒体的歇斯底里旋涡搞得头晕目眩的，但美国人取笑“德国式焦虑”时，仍旧透着大西洋彼岸的优越感。“我害怕！”在这里是一种理由，而且不是无关紧要的理由，而是拥有终极理由的分量。只有浅薄的野蛮人才愿意讨论，焦虑是否有真实的来源，与具体和直接的威胁有关；或是类似于心理分析师所说的“焦虑性神经症”。谁感到焦虑，就觉得自己有理。尽管有理性的理由该告别焦虑，但死抓住焦虑不放手的人则证明了自己有坚强的性格。

有人疑惑，德国人的这一特点像许多其他特点一样根子在维腾贝格。可在焦虑这件事上把账算在马丁·路德身上也并非易事。他虽然确信世风堕落、末日审判在即，并在每个角落都能嗅到反基督者，这些人有时以教皇的面目出现，有时以土耳其人、犹太人或以1525年农民起义者的身份出现；然而他从未发出过具体的世界末日之恐吓。这位宗教改革家为焦虑开启了另一扇门：他取消了教皇的教会在上帝和信徒间所安排的起中介作用的宗教仪式，让每个基督徒自己跟上帝独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感受到内心与主更为亲近；但另一方面也让人产生了恐惧感，信徒哪怕再勤奋地诵读主祷文、买赎罪券和朝圣，尘世的牧羊人都无法再保证恐慌的羔羊能得到上帝的饶恕。唯信称义（sola fide）。对新教徒来说，唯一的解脱之路以前是——现在还是——自己信仰的强度和懊悔的深度。他对二者的感受越强烈越好。

“我的救世主！我该从何做起！/我浑身恶习，/深陷不幸的泥淖。/现在我内窥自己的毒恶/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你的慈悲唤醒了我。/我义愤填膺地亲眼看到/自己曾多么深地伤害过你。”新教诗人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曾用上述炙热的诗句表达过一个悔过罪人的内心恐惧。与此相比，天主教的认罪祷文“因我的过失，因我的过失，因我最大的过失”（mea culpa，mea culpa，mea maxima culpa）听上去就像是卡普里岛的流行歌曲。

17世纪，也就是格吕菲乌斯生活的时代，德国式焦虑又有了另一位更加强悍的培训大师：三十年战争。生活在那个时代，即使不是神经症患者，对恐惧也会无师自通。只有齐格弗里德那样的好斗者和格林童话中那些毫无畏惧的饭桶，才不惧怕被到处抢劫的雇佣兵刺死、杀死、烧死、强奸，或是因饥饿和瘟疫而毙命。那时候不知道害怕的人不是麻木，就是脱离现实或是疯癫。这场战争在德国留下的恐惧创伤，光用其旷日持久和野蛮残暴是解释不通的。从表面上看，打这场战争是为了决定德国是该成为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然而仔细琢磨，它却是一场大屠杀，这场屠杀持续得越久，就离所有能够理性表述的战争目的越远。或者就像文化史学者埃贡·弗里德尔（Egon Friedell）概括的：出现了“这场残忍、盲目狂怒、持久和无原则的战争，就像一个可怕而荒谬的怪物……它吞噬了整整一代人，为了吞噬而吞噬；让人弄不明白它为什么开始，又为什么结束，以及它到底为什么降临到这个世界”。

谁经历过这么荒谬的战争幸存下来，他随时都相信命运会露出狰狞面目。然而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满腔愁绪，像格吕菲乌斯那样去写悲天悯人的诗歌与戏剧。也有人兴高采烈地欢呼“乌拉，我们还活着！”然后就开始把他们的巴洛克宫殿和教堂装饰得金碧辉煌。虔信派教徒像路德一样坚信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只要他们不彻底悔改的话，肯定会永劫不复；但与那位宗教改革者不同的是，他们相信自己找到了灵魂得救的可靠途径：深深的悔恨，真正的“悔改之战”带给他们的是“新生”，这种新生可以让信徒们做到，只要坚持不懈地虔诚、工作和谦恭，就能踏上“活着的上帝的足迹”。救赎不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与未来，而且发生在此时此地。那种在得救方面折磨过路德教信徒的不确定性显著减弱。

总而言之，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的焦虑好像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也就是说它暂时不再是一种需要告知全世界的生存的心理状态。谁仍旧噩梦不断，往往秘而不宣，或者试图用（理性的）策略去战胜噩梦。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让人萌生希望，今后在遭到命运打击时不再那么无助。

启蒙家们都是教育乐观主义者，他们在人身上看到的不是兽性，而是可塑的生物，只要引导得当，就可被教育成真、善、美的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让其浮士德走上魔鬼的歧途时，浮士德虽然受到一些谴责，但没有引起恐惧［只有格蕾琴（Gretchen）一直受着阴暗与压抑直觉的折磨，直到她最后——事出有因地——害怕她的海因里希］。

在哲学领域，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激进信心正在广为传播，黑格尔坚信历史并非毫无方向的一团混乱，而是“世界精神”得以实现的场所，可以令大家安心的是：这种世界精神还是“合理”的。当“世界史中各领风骚的独特人物”——他们是那个世界精神选中的执行经理——在他们的征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践踏甚至毁灭某些无辜的花朵时”，只有目光短浅的外行才会说三道四。具体到黑格尔时代的现实政治历史背景，这意味着：拿破仑最近发动的战争以及反抗拿破仑的战争都不是无谓的流血，恰恰相反，世界精神在这类战争中向着最终实现又迈进了一大步。拿破仑后的普鲁士国家也许还算不上是世界上可能的最好国家形式，但出生于施瓦本、自愿选择做普鲁士人的黑格尔却认为它已经是到那时为止最好的了。

浪漫派相信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阻止的，同时却也难掩其屡屡尝到的苦涩。这派艺术家深入深渊、黑暗与世界的夜的一面，不是为了在那些地方学习恐惧，相反，他们在那里嗅到了真实和更强烈的生活。尽管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画作阴森，诺瓦利斯或约瑟夫·冯·艾兴多夫的诗句充满对死亡的渴望，E.T.A. 霍夫曼的短篇小说离奇怪诞，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或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的歌曲无比忧伤，但所有这些作品中都找不到令人眩晕的焦虑。预感到一切都名实不副，神马都是浮云，倒是令人更加梦幻。

第一位宣告焦虑时代出现的人是格奥尔格·毕希纳。其生辰资料告

诉我们，这位出生于1813年并于1837年早夭的作家生活在浪漫派晚期、毕德迈尔和1848年3月革命前的时代。然而这种对号入座并不可靠。这位热心政治的作家虽然憧憬着把和平给茅屋和把战争给王宫，以便“现在尸横遍野”的德国不久能够成为“天堂”，作为诗人他却根本没有描绘不久即将出现的社会主义伊甸园，而是描绘了人类所面临的生存意义的失落。其《沃伊采克》剧中的同名主人公是个士兵，饱受生活的折磨，充满焦虑，“像把锋利的剃须刀一样行走于世界中”，却仍旧无处安身立命：“日头当空，世上的一切都似乎蒸蒸日上时，一个可怕的声音就已经对我说话了！”在他身后和脚下，到处都暗藏着风险。早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病案进行分析的几十年之前，毕希纳剧本中那位施虐狂医生就为其实验兔沃伊采克身上所出现的局部性精神错乱而高兴。世界成为地狱与幻觉。

在19世纪，历史哲学也逐渐不再提供意义和安慰。亚瑟·叔本华在其目力所及的地方所看到的不外乎是盲目狂怒的意欲，个人若想不受其控制，最多只能通过冥想和默念来尝试逃离它。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历史中发现了“永恒回归”，他必是用尽了超人的努力，才没有逃离不断运转的“存在之轮”，而是生气勃勃地与其共进。（德意志）历史乐观主义的最后一座强大的巴士底狱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建造的，他们为无产者描绘了世界革命的前景。他们认为应该害怕的只有资本家，19世纪下半叶资本家在德国也跃跃欲试，想让人与自然都屈服于他们那坚不可摧的生产流程。

德国当时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想在技术和工业化方面赶上其他欧洲国家，比如英国或法国。这种飞速发展的痛苦不仅袭击了共产主义者。当阶级社会一旦消失，那些不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人只能和自己的不安独处。“德国式焦虑”的最深根源就在大自然的异化中。至今古老的日耳曼森林精怪都常常在噩梦中拜访德国人，就好像它们要为自己曾被赶出神圣的小树林报复似的。对日耳曼人来说，堕落不是始自夏娃咬了苹果，

而是始自亚当举起斧子，准备劈开第一截树干，给自己和夏娃造一座房子。没错，启蒙运动成功地让德国人不再恐惧知识，不再害怕独立思考。但浮士德用他的知识都做了些什么，这种担忧在晚近时代却有增无减。在人们不再能为自己的罪责祈求上帝宽恕时，只剩下向工程师提出的怯懦问题：他在森林中和走廊里安装的那些鬼玩意儿是不是真的“安全”或者人们试图通过坚定地“改变生活方式”来让自己的生存与大自然重新和谐。

这类努力并非联邦德国生态环保运动的产物。早在帝国时期，在周边说德语的地区改变生活方式的努力就更为坚韧不拔。不光一些秘密的区域性公社如“伊甸园素食者水果栽培群体”试图通过自然疗法、健康食品、裸体文化和户外运动来逃脱技术与大城市对人的钳制，让生活重归自然之道。弗兰茨·卡夫卡也遵从德意志另类时代精神吃素食，对顺势疗法和鲁道夫·施泰纳的人智学理论感兴趣，造访自然疗法疗养院，裸体在打开的窗子前做早操。不过这位布拉格作家的心灵太敏感，以致他无法成功地掩盖自己的恐惧。1921年他在给朋友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的信中写道：“然而最可恶的恐惧不外乎死亡恐惧。就好像一个人经不住诱惑，向大海深处游去，浮在海面上他沾沾自喜，‘现在你是个人了，是个了不起的游泳者’。突然他毫无太多缘由地伸头四望，唯有海天一线，和他那随波起伏的小脑瓜，他极度恐惧……”

卡夫卡的恐惧不仅因为感到自己太“渺小”，找不到在宇宙中的位置；也不光因为自己身为犹太人永远疑惑主流社会是想接纳他还是排斥他（“你毕竟是犹太人，知道何谓恐惧”），更不光是因为与父亲的关系充满憎恶与负疚感。寂寞孤独、优柔寡断、惴惴不安、没有目标、疾病缠身和一事无成，这一切使恐惧挖掘出的坑越来越深。在一封写给密伦娜（Milena）——与她的关系亦被这位作家完全归入“恐惧范围”内——的信中他如此形容自己的恐惧，“它令我丧失意志，随波逐流，六神无主。”职业、家庭和未婚妻都不能给他支撑，正相反，这些令他更加恐

惧生活。对他来说，唯一的救赎就是写作，在短篇小说中为“令人疯狂”的恐惧找到宣泄之所。在其作品中，生活这个流放地往往把个人折磨得最终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生存本身就是一桩大罪。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恐惧将他变成了文学史中最著名的大甲虫——的命运是这样终结的：“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他陷在这样空虚而安谧的沉思中，一直到钟楼上打响了半夜三点的钟声。从窗外的世界透进来的第一道光线又一次地唤醒了他的知觉。接着他的头无力地颓然垂下，他的鼻孔里也呼出了最后一丝摇曳不定的气息。”[4]

尽管卡夫卡在另一封写给密伦娜的信中解释说，他是由恐惧组成的，恐惧也许是他身上“最好”和唯一“可爱的”，人们仍旧可以认为，他害怕自己的恐惧。直到马丁·海德格尔才有勇气害怕。与尼采和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ören Kierkegaard）一脉相承，他宣称让人们“脱离惧怕”并非哲学的任务，反之，哲学有义务“让人们恰恰完全交付给畏这种情绪”。

在“畏”这一概念下海德格尔指的不是具体畏惧什么，而是失去任何存在确实性的一种情绪。“因此这种威胁也不可能来自近处的某个特定方向，它已经‘在’了，却又无处可寻，它近在咫尺，令人窒息，却又寻而不见。”《存在与时间》的作者为这种状况提出的建议绝不是躺到心理治疗沙发上去接受治疗，以便摆脱那种令人窒息的受威胁的感觉。相反，他劝那些接触过存在主义哲学的同时代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畏惧。只有这样，才能进入一种存在状态，而不是借助技术辅助工具和社会保险系统，这些“玩意儿”都是现代人为求安全感而想出的于事无补的东西。尽管海德格尔刻意不时退居到黑森林的简陋木屋中，或是身着滑雪服直接从深雪坡来到哲学大会会场，令同行感到错愕，但他并非简单地主张回归自然的传道者。他对文明的批评主要不是为了谴责技术，而是为了在这个如其所是的世界中拯救一种意识：尽管有着所有医学的

进步和其他可能性，人类的存在仍旧是一种“向死而生”，而且这种“向死而生”即“本质恐惧”。由于“人”不让自己“有勇气畏惧死亡”，“这种畏惧就反向变为对一种将临事件的恐惧”。

与海德格尔最早写下分析畏的文章的魏玛时期相比，如今其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联邦德国一浪高过一浪的歇斯底里——从“核致死”到“森林死亡”直至“气候灾难”——令人格外不快的不恰恰是：“人”总是确信世界末日正在来临，同时却似乎坚信，只要“人”大声与那些必须为此灾祸承担责任的罪人划清界限，自己即可逃脱死亡的命运吗？

虽然《存在与时间》还远远称不上是有关生活智慧的小册子，但用海德格尔的话却可告诫诸位：醒醒吧，你——尽管不抽烟，吃绿色食品，坚持不懈地进行体育运动——终将难逃一死，所以你也用不着花那么多精力，今天害怕口蹄疫，明天担心禽流感！

技术时代与日俱增的恐惧也引起了作家恩斯特·云格尔的关注。为了冒险，他作为年轻士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在西线的枪林弹雨中多处负伤，他却活了下来，然而认识到：“自由意志、教养、热情以及不怕死的陶醉”，单凭这些还不足以克服“几百米的地球引力，在此范围内机械死亡的魔术”在上演。

与和平主义者相反，云格尔没有得出，战争在未来是无法进行的这样一种结论。他试图把自己在法国和弗兰德战壕中所经历的枪炮大战的经验拓展到非军事生活中去。他赞成“二十来岁的人有一张被现实千锤百炼过的脸，这些现实包括轻轨的摇晃、工厂紧张的工作节奏、四处林立的钢筋混凝土作为童年必不可少的经历”，这些会让他们“习惯经由机器体现出来的生活的不断升级”。



一个身穿防化服的人。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云格尔才告别了英雄现实主义，这类作品中无畏的工人-战士已经不知道人与物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尽管如此，这位作家并未成为那种联邦德国公民的朋友，那些人早晨读报时就瞪大眼珠寻找下一桩大灾难。1951年云格尔冷峻犀利地——这在他早期文章中很罕见——在其杂文《林中漫步》（*Der Waldgang* ）中将持续存在的歇斯底里归咎于自由的丧失。个人就像“快速行进的交通工具中的乘客，这交通工具可以是‘泰坦尼克号’，或是叫利维坦的怪物。风和日丽、景色宜人时，乘客根本感觉不到其自由受限的处境。相反，他很乐观，行驶速度令人产生一种主宰意识。一旦出现喷火的岛屿和冰山，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傲慢就突变为惊慌，个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平日不愿正视的无助与软弱。

因为泰然自若的云格尔不想由自己的判断得出以下结论，即乘客必须把自己视为船舶活塞，或是根本就不该登上“泰坦尼克号”甲板，所以他能够认识到“我们生存的根本问题”：“这可能吗……，既留在船上，

又保留自己的决定权？”这可能吗，“在自动化继续存在的时代，减少恐惧？”

头号建议是：并非完全回避由“医疗保险、各类其他保险、制药厂和专家们”组成的小世界，但要与它们保持一段健康的距离。每隔几个月就跑去做预防性体检，再上个寿险，这些并不能让人充满活力、内心丰富，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够重新忆起“何为节日”。这里的“节日”不一定非得是下一次单位的圣诞节庆祝活动，“节日”是预料之中的自我消耗，会因心醉神迷而失控。

2010年夏杜伊斯堡“爱的大游行”发生踩踏事件，21人丧生，500多人受伤，那时云格尔已经去世12年了。要是他还活着，也许会问，恰恰是这类组织（差劲）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值不值得不计损失地去搞。他那席勒-华伦斯坦式的基本信念不会因灾难而动摇：“不要以命相搏，/你们永远赢不了命运！”

在经历过纳粹灾难后，德国人在自我认同方面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不再蔑视死亡，从前他们世世代代都被教育要视死如归。没有人可以再要求我，为他或为祖国去冒生命危险。这其中所赢得的是巨大的自由。但如果方方面面都告诫我，对自己的生命要像捧着鸡蛋一样小心翼翼，我又被新的恐惧束缚住。

从蔑视死亡极端地转变为否认死亡，德意志之魂又陷入了另一尴尬境地。与其他文明民族如法国、英国或美国不一样，我们再也不想因自己的过失而导致他人殒命，难道我们较大的恐惧警戒心不也是因此而生吗？即使是为了自由和捍卫人权，我们也不愿用人命去换？一个历史上或多或少有些极端军国主义的民族变成了世界上和平主义的急先锋？从纳粹分子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野蛮罪行中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再也不能成为罪犯。相反，这难道不会带来弥漫性恐惧，今后只能做牺牲者了？

恩斯特·云格尔曾断言：“同一个人不仅可以胆怯，而且同时能令他人害怕。”迄今为止联邦德国的现实看来并未证明这一点。我们谨小慎微，至今只搞风力发电，时常得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看不出有什么新迹象，说明“德国式焦虑”会变成侵略。

导致德国参战，特别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核心恐惧则是那种被钳制包围的感觉。这种恐惧对一个内外疆界从未稳定，苔藓样扩大或缩小的国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通过最终承认德意志帝国东部领土不再属于德国、两德统一和加入欧盟，这种恐惧终于打消了。可一旦事与愿违，要是经济上四分五裂的欧洲成为不够稳定的结构又会怎样呢？

我们不想对最有人缘的新式德国焦虑——即德国人的自我焦虑——煽风点火，只是想强调：最好别让焦虑进入政治，不能打保票的地方别打保票（从退休金到核电站），别让人怀疑德国愿与欧盟荣辱与共，以及德国在军事上属于西方阵营。

恐惧应写诗，焦虑应歌唱。各种恐惧可能会让人轰轰烈烈地走上街头，去寻找该为造成恐惧负责的人，或是能消除恐惧的人。真正的恐惧是无声的。它知道，它与什么都无关。谁眼前的一片漆黑根本不想消失，他就会去教堂，在牧师所张开的黑色翅膀下寻求安慰。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深渊，兄弟树，浮士德，疆界，战争与和平，爱整洁守秩序，玩具屋，纯洁戒律，怪诞之事，林中寂寞，女人，赔偿

---

[1] 克利斯托夫·施林根西夫（1960～2010），德国电影、戏剧导演，作家和行为艺术家。

[2] 又称卫戍大本营，是该市作为独立城邦时期的军营和监狱，后改为警察局。原为巴洛克建筑，二战中遭到严重损坏，1967年，修建地铁隧道时拆除并重建于地铁车站上方。现为法兰

克福公共交通系统最重要的枢纽之一。

[3] 一般指头脑简单、天真的德国人，带贬义。

[4] 转引自www.5156edu.com。

疆界

“至于我，曾在瑞士生活过很多年，在那里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跟一位意大利人结了婚，愿意在意大利生活。所有这些情况让我完全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我绝对有民族从属感。”1947年10月女作家里卡达·胡赫（Ricarda Huch）在第一届，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届全德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讲了上面这段话，在那段时间中民族感是要不得的。

那次的作家代表大会是苏联占领区负责文化工作的军官们倡议召开的，他们自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大会结束后，当时住在耶拿的里卡达·胡赫怕祸从口出，急急忙忙迁居西方占领区。旅途的劳累，也许还有逃离未来的两德边境的紧张都不是83岁的她易于承受的。她病了，不久之后就在陶努斯山（Taunus）附近的申贝格（Schönberg），也就是后来的西德，去世了。

战后没有伟大的编年史学者和老帝国、三十年战争以及德国浪漫派演绎家的时代就这么开始了，德国战后的文化注定得不到她的解说与忠告了。

1933年胡赫就拒绝在纳粹效忠书上签字，接着她退出了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纳粹批评家胡赫所从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要为反对纳粹的人立传，来赞赏在专制条件下的不屈者。后来由京特·魏森博恩（Günther Weisenborn）完成的《无声的暴动》（*Der lautlose Aufstand* ）一书在意识形态方面被定的调子自然是左的。这不符合胡赫的超党派精神，不久这本书成了冷战中的武器。书中本来告诫要警惕“第三帝国”的地方都变

成了要警惕德国。

一场未曾进行的战争自然很难用来揭露各自对手的罪行，所以就更要借助魔法来描绘敌人的模样。难上加难的是：现在拥有核武器但却已经厌战地对峙着的超级大国，不久前它们还一同打败过纳粹。一方以自由和法制国家的名义，另一方受强制集体的委托。

在这种态势下，德国人领受了一项奇怪的任务：既要用过去的佐料让开始弱化的敌人形象保持鲜活，同时又要装模作样扮演好被成功殖民化的角色。所以战后的德国人一方面被认为是不可救药，另一方面在世界观上又是模范生。

［战后人们努力提醒德国，说是人们必须考虑到德国人来自救（自我救赎）］就好像欧洲所有军事行动都仅仅是为了这一个目的似的。冷战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展开，德国社会内也在进行冷内战。众多作家定期加入进行警告者的队伍中，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在许多提供信息的摊位那儿往各种自责书上签自己的名字。就连后来柏林墙都倒了，还有戴着面具的人在步行街跑来跑去，边跑边喊：再也别提德国！

他们身边大步流星走过的却是成群忙忙叨叨的人，他们离开了建材店，正在往家赶，手里提着盛满石膏的塑料桶和木棉，正准备回去收拾周末度假小屋，好度过统一后的第一个冬天。再也别提德国？

即使所有德意志的东西仅仅被缩减到一些极不起眼的二级美德，比如勤奋、准时和可靠——对此人们可以报以温和的微笑，而且能够或甚至必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社会学方面的解释，就像从马克斯·霍克海默至阿尔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或是从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尝试过的那样，这些掌管话语权和设计概念的先生们是不是仍旧忽略了些什么呢？

除了那些自命道德自律性很高的公众监督者外，甚至在最无耐性的68年清算式套话中德国一词仍在使用。言必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一直是少数，无论他们这么说时自视有多高。

德国在人们的头脑中始终是一个模糊概念，这也是事实。有的人，一般是年纪较大的，心中还有神话，他们说德国时指的是1937年时的帝国疆土。这也是战争刚结束时官方语言规定的，当时使用的地图应该让权力要求一目了然，这种要求能够激起战败者的幻想，但对实际疆界却少有说明。在这类想象中有带引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在这类人的脑袋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另一些人，年轻一代，他们不熟悉历史，没过多久看地图时就毫无感触了。对他们来说地图就是标有街名的图，德国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多，但也不少？

德国的特点就是其领土形状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仅是战后才开始的。法国一千多年来在地图上的形状几乎没变，更不用说西班牙了。甚至意大利在地球仪上都有清楚的疆界，尽管政治上四分五裂。相反，德国疆界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而只有西德被视为德意志帝国的继承国，此前德国在历史上离自动消亡从来没有这么近过。

也不尽然。这个联邦制德国的处境不是也和中世纪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类似吗？那个政体令人眼花缭乱的古老帝国的决定性一步是查里大帝（Karl der Große）迈出的，他从亚琛（Aachen）前往罗马，让教皇为他加冕。那是公元800年的事，他以此举标出了北-南轴线。他这么做为未来的弱势国体在文化方面增加了巨大的含金量，同时却也为授职之争埋下了伏笔，这种争论为权力问题平添了机构上的动力。谁来封官授职，教皇还是皇帝？这个问题引起一种竞争现象，它只能由各种机构来有效解决。教皇和皇帝意见相左时，突然选帝侯和大主

教们的意见也举足轻重了。这样就产生了第三种势力——帝国议会。

这种后来不太受赞许的国家机制却存在了上千年，普鲁士的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认为它是一种“混乱腐朽的帝国形式，而且疆土未能确定”，但它最后解体也不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拿破仑那个超级明星。用里卡达·胡赫的话来说：“古老帝国不可能有首都，因为其首脑皇帝没有固定居所，而是四处漫游。不打仗的时候，他就一处处巡视，为了行使其最高职责，即进行公正裁决。皇帝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君主，古老帝国也不是今天概念上的公国。还是称它为神治国比较合适，其最高首脑是位法官，人民自愿臣服于他，就像人们听命于上帝。”

战后东德分离出去，躲在大墙和铁幕后，使得北-南轴线重新成为德国国家事务秩序中的核心原则。这次的基点是临时定都波恩和1957年的罗马条约，这意味着欧盟的诞生。

从属于西方的基本原则在中世纪繁荣期通过向东部的开垦获得了拓展。德国作为帝国通过向东开垦得到一条东-西轴线，从荷兰到东普鲁士，再向西里西亚。这条东-西轴线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1949年重新划定边界后德国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领土。此外西德在核心部位还必须接收一千两百万难民和被驱逐者。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后勤角度看这都是一项成就。二十年后，统一了的德国如今说起这件事仍旧颇为踌躇。与其搞清全部真相，人们更愿继续糊涂着，这也是常见的态度。

人们开始把原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称作东德，东德那块地方历史上大部分位于中部德国。

曾经的东部德国不存在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失了。东部德国曾在波兰、捷克，或是像柯尼斯堡那样在子虚乌有之乡[1]。它在东普鲁士，在福尔克尔·克普（Volker Koepp）的电影中［最早是摄于1995年的《寒冷的故乡》（*Kalte Heimat*）］，也在人们的集体想象中。柯尼斯堡不可能毫无痕迹地从记忆中消失，如果康德在这座城市应该拥有固定位置的话。所以决定德国疆界的不光是条约，文化记忆也有自己的话语权。

未来德国也会有两种地图，一种是地形地貌的，一种是文化想象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仍会是后者。它提出的问题不是主权性的，而是寻根式的。地形图绘出的是所规定的边界，越过它或恪守它同样都是陈腐之举。

还有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古罗马帝国的界墙，它更能说明问题。这种墙在德国许多地方可以见到，至今仍代表着罗马文化。它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分界，在其两侧我们作为德国人重新找到了认同。雷根斯堡和罗斯托克在地形上的差异显而易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上的趋同。德国不仅仅是其领土，这一点也体现在它与许多邻国的边境看上去就像是区域性疆界，似乎越过边境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言而已。

德语中就“疆界”这个概念没有自己的词汇，“疆界”这个词来自斯拉夫语。“界墙”这个词则又源自拉丁文，标志着罗马帝国势力可达的范围。对德国人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概念毋宁说是自由，他们更倾向于把自由当作共同推动力。如果今天有人唱道：“思想是自由的！”[2]那么这种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战斗精神从来就没消失过。无论是罗马帝国的界墙，还是给日耳曼人带来基督教福音的圣波尼法爵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德国的玛尔斯战神不是因愤怒而战，而是为反抗而争。这是德意志之魂的支点，也正是因了这种精神才打造了德国制造的品质[3]。1848年后费迪南德·弗赖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的诗《尽管如此！》

（*Trotz alledem*！）体现的也是这种不顾一切的精神。

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经过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德国人自负地认为自己有权成为其继承者，这确实引起了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有时更加强化了那种危险的妄想，即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个民族，也不仅仅是个普通的政体。但它最终找到了那种松散的集体形式，这种形式至今仍体现在德国的联邦制结构中。德国知道许许多多的界限，但它和邻国已经没有疆界问题。所有跟邻国各民族需要协调的问题至少都已经根据国际法协调好了，剩下的欧盟则保障能够解决。

今天德国地图看上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德国人一早在电视中看到的首先是一张气象图，上面只能看到国内情况，哪儿下雨了，哪儿有太阳。此后，至少是吃完早饭以后，周边国家的人才会或多或少慎重地在电视中出现。这样安排可能是出于政治或旅游原因。巴黎就在旁边，但巴黎是巴黎。伦敦就要远一点儿了——按以前的说法——在英吉利海峡后面。要想真正更多地了解英国，必须得对英国皇室感兴趣。虽然跟他们沾亲，但那是威廉二世。哦，是的，英国人！

我们赶紧开车去荷兰的超市买点东西，我们在比利时买所房子。今年我们去瑞士度假，没错这并不常见，但我们就是想去住住那里的小木屋了，感受一下住在山上的味道。然后我们去奥地利漫游几天，可那儿真的是国外吗？

顶多维也纳，那是外国，哪怕你不是来自诺尔德尔奈（Norderney）[4]。

可以一直这么列举下去。

现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去，花着欧元到处挨宰。从维也纳可以去肖普朗（Sopron）[5]的口腔医院看牙，然后去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6

，到对岸去看多瑙河。

这都不是真正的邻国，但德国制造现在又位于欧洲中心了。这么说着就到了波兰，到了马祖里（Masuren）和贝斯基德（Beskiden）山，狼从这里准备返回德国，我们也准备回去了！

围绕德国转一圈，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各处的边境都开放，人们很快就习惯于此了。如今到底哪儿还能叫外国？马格德堡（Magdeburg）[7]，90年代人们也许会说，梅克伦堡（Mecklenburg）、梅克波莫（Macpom）[8]。一切都成为历史了，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可外国呢？在哪儿呢？说到现在我们把丹麦人给忘了！

没关系，明年我们驾帆船去哥本哈根！

作者：里·瓦

译者：丁娜

参阅：德国式焦虑，诸侯割据，战争与和平，莱茵河——父亲河

---

[1]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故乡，1946年改名加里宁格勒，如今是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地理位置却是一块飞地。

[2] 德国民歌，1780年左右首次出现在传单上，1810～1820年间被谱曲成歌。

[3] 19世纪末，英国规定来自德国的便宜进口商品要标明“德国制造”，起初带有贬低意味。但德国厂家经过努力实干，如今让“德国制造”成为品质的保障。

[4] 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市镇。

[5] 位于奥地利边界的匈牙利市镇。

[6] 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

[7]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首府，两德统一前属于东德。

[8]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Mecklenburg-Vorpommern）的缩写，原属东德。

创业时代

“危机”这两个字或许是流传最广的词之一，不惟如此，它还几乎超越了所有的界限。不论是上流社会，还是下层百姓，凡与之遭遇者，皆呈心神不宁状。前者视己受之威胁，后者过去常常幸灾乐祸，如今也心生恐惧，惶惶不安。有人对之曰，他们也必须为福利社会分忧解难。上流社会惧怕的不是革命，而是天下大乱。如今之社会，危机已经成了人与人交流时一种必不可少的话题。

这种情况下，历史学者的举动跟常人也未见有所不同。他们既未用自己的研究课题，也未用所从事的职业，使我们免受危机之烦恼。他们以一种志得意满的态度讲述过去时代的故事，就像童话大王能够讲一个结尾很可怕的童话故事时那样眉飞色舞。

如今，即使是要谈论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创业时代，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一场危机，即1873年的金融危机！德国的经济受到波及，发展整整停滞了十年。当然，人们可以就导出这一结论的那些统计材料进行辩论，但是，这只是我们想要讲述故事的枝节，以及远比所谓的危机更为重要的事情的插曲。这场危机说到底是银行金融界的一个困境。用行话来说，那次股市崩盘乃是大量的投机活动和过热的增长势头相互关联所造成的后果。对于实体经济来说，这并不一定能说明什么问题。

无可争辩的是，这个时代涌现出了大量充满奇思异想并有重要技术革新与创造的发明家。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给这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正是我们原本所要探讨的问题：这一切怎么成为可

能？一个农业国如何只用了二十年时间就迈入了世界经济的前列？尽管许多事情都由财务能力决定成败，但是，这种创造精神——整个价值创造过程中最最重要的因素——从何而来？

从纯粹的自然科学到应用技术的转变，它的起点应该到19世纪的进程中去发掘。其时，自然科学还学究气十足，过于理论和抽象，而且“经院哲学”根深蒂固。科学的发现乃是针对宇宙间业已存在的事物，亦即自然现象。其现象形态要求我们或是邀请我们去做解释性的工作。

而技术发明却与之迥然不同。技术首先不与自然现象相联系，它更多的是一种方法，借助它能够创造出各种人工形态，并以之为某种目的服务。自然是一种崇高，而技术最多是一种精巧。

因此，技术不具有普遍性，它都是单个案例。人们无须解释它，而只需使用它和实践它。这里，你追随某种技巧还是遵从某种原理，或者说你是将这种原理当作技巧还是将技巧当作原理，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就是技术诀窍而已。

当技术开始控制人类社会，并使工业化全面成为可能的时候，德国人的成功毫无疑问是与他们的工作方式的启动有关。自中世纪以来，英国人和法国人就已注重使用机器生产，重视棉布、机织品和相关的买卖生意，而德国人却是以认死理和动手能力强见长。他们都是些金匠、钟表匠、木匠、皮匠、石匠和铁匠，使用手工技巧与机器生产针锋相对。但是，这些传统的手工业如今却使工业化从中获益多多。

专制集权和启蒙运动都未能把经济搞上去，说大话、山呼万岁和崇尚理性都不能当饭吃。所以，此时此刻人们的行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有着更大的自由空间。

19世纪下半叶为工业生产和价值创造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特点

就是纯粹的实用价值。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发明和使用之上。专利化、规范化、标准化和批量生产构成了上升中的现代经济的框架。人们由幻想到现实要走的捷径，只需要一笔贷款就能搞定。威廉帝国在最短的时间里为腾飞创造了条件。有人可能认为，此乃天意。但有人冷静地看到，金融家们在法兰克福办起了德意志银行，虽然这时已是危机四伏！1870年银行成立，维尔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1] 的一个远房侄子格奥尔格·西门子（Georg Siemens）也是当中的创建经理人之一。

人们可以发明许许多多的东西，有用的、不怎么有用的，包括多余的。比如带手电、打火机或者切雪茄的刀子的手杖。一个发明可以让你名利双收，也可以落得无人理会。这一切都与时代精神相关，而非出于实际的需要。19世纪的时代精神是对技术的崇尚，真是无巧不成书。

德国的发明推动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工业领域的进步：机器制造、冶金、化学和电气技术。德国研发的各种类型的发动机属于划时代的技术发明，它们是未来汽车工业的核心部件，不论汽油发动机也好，柴油发动机也罢。一个大企业的建立通常需要两代人的努力，蒂森、克虏伯、曼内斯曼、博世、AEG和巴斯夫无不如此。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所青睐的材料，创业时代的材料是钢。克虏伯是炼钢的大师；蒂森最初是为铁路部门供应车轴、弹簧和车轮，之后又完善了轧钢技术；曼内斯曼用无缝钢管为机器制造行业带来了空前绝后的繁荣，而这种繁荣最早源于奥古斯特·博尔西希（August Borsig）[2] 的蒸汽火车，这种火车在迅速扩展的铁路线上日夜奔驰，好像是把整个社会都拉动起来了一样。

与此同时，西门子公司的电报网也建立起来。各个领域都有工程师的身影，一种新式的经济弄潮儿登上了社会的舞台：出身教师家庭的弗里茨·亨克尔（Fritz Henkel）[3] 于1865年来到位于埃尔伯菲尔特

（Elberfeld）的格塞尔特兄弟颜料和油漆工厂当学徒，后来成了公司的代理人。这位年轻商人学会了化学知识，于1876年在亚琛注册成立了“Henkel & Cie”洗衣粉公司。他最重要的发明是把苏打和水玻璃结合成全能洗衣粉，公司最成功的产品是1907年投产的洗衣粉品牌“Persil”，到现在为止，它还是德国销量最大的洗衣粉。



大企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曾住在埃森市的这栋别墅里。

创业时代涉猎最广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之一是维尔纳·西门子，他在普鲁士炮兵军官学校接受过教育。1847年，他和机械工程师约翰·格奥尔格·哈尔斯克（Johann Georg Halske）一道创建了一家电报机生产厂，由此诞生了后来的西门子公司。1888年，为表彰他做出的贡献，维尔纳·西门子被授予贵族爵位。他建立了普鲁士的国家电报网，这是当时欧洲第一个这样的网络。西门子的弟弟威廉在伦敦居住，因为他促成的和英国的关系，人们铺设了第一条横穿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并计划架设一条真正叫人佩服的伦敦至印度的远程通信电缆。维尔纳·冯·西门子还涉猎其他领域的发明和革新，第一台以交流电驱动的电力机车就是他的发明，除此之外还有发电机。

德国大量的发明创造为最重要的工业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正因为如此，迈巴赫的蜂窝式冷却器改变了汽车的结构，格奥尔格·克诺尔（Georg Knorr）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诺尔刹车器解决了复杂的火车制动问题，海因里希·兰茨（Heinrich Lanz）[4] 用他的农用机械给农业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他的Bulldog后来成了拖拉机的代名词。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公司还曾经制造过飞艇。但是，作为当时最早的一批企业，兰茨开设了一个自己的备件仓库和一个修理车间，这个想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887年由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5] 创建，后来由他的公子瓦尔特领导的AEG公司成了那个时代最成功的电气公司。1891年为了庆贺法兰克福国际电气技术展，公司的工程师成功地在175公里的距离上实现了交流电的传输。从此，采用交流电的电气化进程在德国全面开始。

随着技术发展越来越分门别类，最初那种碰巧成功的发明创造逐渐变成了一种工作的方法，发明家变成了研究家，他们的工作地点变成了实验室。在实验室里，物理和化学领域，尤其是医学领域开始了一系列

伟大的发明。

在世纪之交时，德国自信能够从容面对任何一场经济战争。它生产的产品具有世界水平，它的智慧潜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法国和英国甘拜下风，只有美国才是值得认真对付的竞争对手。

至此，创业时代圆满结束。随后不久就发生了一场毁灭一切的战争，欧洲列强都卷入进去相互厮杀，就像是一个可怕的童话故事一样，听者和讲述者到最后都觉得没占到便宜。

历史上的那场危机究竟发生在哪里，现在的危机又将发生在哪里？

创业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有所成就，就应当拥有信心，尤其是创造的毅力。此外，要允许大胆想法的存在，并对之加以扶持鼓励。一场危机不仅仅是金融的或是经济的危机，它首先是价值观的危机。价值观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人们可以为改造工业而努力，也可以训练自己去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决定权就在自己手里。诸位请三思。

作者：里·瓦

译者：吴宁

参阅：工作狂，烫发，铁路，驾驶的乐趣，基本法，福利社会

---

[1] 维尔纳·冯·西门子（1816～1892），发明家和企业家，西门子公司的创始人。

[2] 奥古斯特·博尔西希（1804～1854），德国企业家和博尔西希工厂的创始人。

[3] 弗里茨·亨克尔（1848～1930），德国企业家，汉高集团公司创始人。

[4] 海因里希·兰茨（1838～1905），德国企业家和农用机械制造商。

[5] 埃米尔·拉特瑙（1838～1915），德国机械工程师，企业家和AEG公司的创始人。

基本法

有时候人们会想，在艰难时日里，要紧的事是吃饭，或者，像布莱希特仿佛说过的，要紧的事是填饱肚子。而有时候人们也会想，当那些艰难时日过去了之后，要紧的事依然还只是填饱肚子。“如果房子毁了”，女诗人玛丽·路易丝·卡施尼茨（Marie Luise Kaschnitz）写道，“我们得抓住那些一直都在的东西：童年时山谷狭路上高悬的树木，黑夜里街道上方总在相同位置的星座。在废墟里翻腾这种事既令人厌恶又毫无意义。但是，这座已经失去的房子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用灰浆、黏土和石料盖起来的房子？还是说它根本就只是因为你确信或者梦想它存在才存在的？”

1949年要紧的事是宪法。再没什么能比这更要紧了。德国四年前的投降相当于国家当庭宣誓承认欠债并愿意清点财产用于赔偿。就德国而言，这时已经只剩下了个“三管区州”（Trizonesien）——当时的卡巴莱小品演员们常用这词儿来称呼德国西部美英法三个占领区这片区域。其余的地方，已经被“俄国人”给“顺”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众多灾难之中，由于刚刚开始的冷战，西部德国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冷战促使西方同盟国对局势进行思考，同时也缩短了对德国的未来的考虑时间。这下子又得指着我们了。新的敌人是同盟国的老盟友，而且也是纳粹的老盟友：斯大林。

普鲁资资深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945年就已经发表了他对德国灾难的思考，一年后，恩斯特·尼基施（Ernst Niekisch）——著名的“不同世界之间的漫游者”，揭开了东方和西方是

德国的命运坐标这一秘密，再后来，那就该是埃里克·雷格尔（Erik Reger）了，他是柏林《每日镜报》（*Berliner Tagesspiegel*）创始人之一，提出的口号是“未来的德国”。1947年，雷格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前受到过早赞美的20世纪，前五十年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不管后五十年将会带来些什么，都将是自1914年以来至今所发生的事情的后果。对整个世界来说，关键问题是，德国人民在这后五十年中所做贡献的可赞叹程度，能否与其在前五十年里参与造孽的可诅咒程度相当。”

除了冷战局势以外，主要是这种雷格尔称之为“对历史负责”的激情使德国人拿到了重新起步的许可。所有人都可以来揭疮疤。因为，这一回，德国人该是盟友了。而且，还是以快速程序打造的盟友。

1948年，在西部德国有十一个州的首脑。他们不想在西占区新建一个国家，而是只要求西方盟军对美英法三个占领区实行“统一的行政管理”。这十一位州长害怕任何“可能导致西方和东方的分裂进一步加深”的事情。对此，据说美占区司令官卢修斯·克莱（Lucius D. Clay）将军曾予以如下评论：“这种状况真是奇怪，我作为一个战胜国的代表，愿意把全权授予德国人，可是德国人却声明，他们根本就不想接受这种全权。”后来，听说他把巴伐利亚、不来梅、黑森和符腾堡-巴登这几个州的首脑召到了位于法本大楼（I.G. Farben Haus）的美军司令部，大发雷霆：“诸位的决定，是对美国人的羞辱，而美国人是你们真正的救助者和朋友……要不是我们在西部这儿待着，诸位早就得听命于俄国人了。”

就这样，这些遭到训斥、犹犹豫豫的德国人开始动手重新塑造他们的国家。这时，一个问题立刻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可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德国，并且，更主要的是，允许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德国？宪法制定者们在偏远的波恩聚集，闭门思索，最终不但明确了哪些东西已经无法挽回，而且还明确了这趟旅行该朝哪个方向走。波恩不是魏玛，波恩也

不应当成为魏玛。

德国国内的各种力量一开始把自己看作是失败者，这不单在“三管区州”是如此，在苏占区也一样，苏占区后来直接被叫成了“占区”，在那边，一道命令建立起了声名狼藉的斯大林式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乌布利希宗派小集团执掌。乌布利希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国家看上去必须是民主的，但是我们必须掌控一切。”在西部则正相反，重新兴起的政治力量被要求必须建立和扩展市场经济和民主制。

西部与东部的区别映照出美国与苏联的区别。随着这一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后，西方重新开始在德国发出光芒，仿佛是在普鲁士的余烬熄灭之后，西方现在重又回来报到似的。普鲁士，德国曾因它而在地理上，特别是在精神上向东方偏移，这个普鲁士如今被推出来为整个悲剧承担责任，普鲁士精神于是便只剩下了穷兵黩武这一条。若说这也有点益处的话，那就是如此一来就可以不必指责整个德国了。

1949年那会儿还不能完全自由行事，但是已经有了一定的行动余地。基本法的制定者们也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当时的局势是临时性的，并以此为出发点，避免一切终局性的措辞。他们不把这部法律叫作“宪法”，而是称之为“基本法”。而且他们十分用心，写下了序言作为附加条款，为今后恢复地理上的正常状态埋下伏笔，为有一天冷战结束、德国的钟声重新敲响的那个时刻：

> 巴登、巴伐利亚、不来梅、汉堡、黑森、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莱茵兰-普法耳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符腾堡-巴登和符腾堡-霍亨佐伦州的德国人民，意识到其对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怀抱维护民族和国家统一的信念，并作为统一欧洲中享有平等权利之一员效力于世界和平，为在过渡时期建立国家生活新秩序，依其制宪权力，决议通过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此举亦为诸未能参与之德国人民所为。全体德国人民始终应当以自由的自主决定完成德国的统一和自由。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段序言的关键在于民族统一和国家自由，反对分裂，赞同自主决定。这里最终所表现的，是一种对当时所处实际状况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自我意识。随着这段序言写就，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被设定了界限。1990年，当自由的自主决定时刻在四十年之后终于到来时，该序言的象征意义的历史性价值最终得以彰显。只需稍加修改，用不着做什么大的改动，它就可以成为如今已然统一的德国的基本法的起首段落。在1990年，基本法的序言同整部基本法一样，一点儿也不过时。基本法管理着自由，而基本法的序言则守护着德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到其对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怀抱维护民族和国家统一的信念，作为统一欧洲中享有平等权利之一员效力于世界和平，德国人民依其制宪权力制定本基本法。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柏林、勃兰登堡、不来梅、汉堡、黑森、梅克伦堡-前波莫瑞、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莱茵兰-普法耳茨、萨尔、萨克森、萨克森-安哈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图林根州的德国人以自由的自主决定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和自由。故此，本基本法适用于全体德国人民。"

这段序言1990年能够在统一了的德国得到一致赞同，再次表明，战后的两个德国社会不单单只是美国式的和苏联式的，而是——虽然潜沉在政治表层之下——首先始终保持着德国式风格。对德意志国家的向往并未丧失其如炼金术般的古老魅力，且不说还是在成群结队的东西方思想家们不断想要将其抹杀的情况下。不许把我们文化的美好容颜扭曲成鬼脸。一位联邦总统在被问到对祖国的爱时回答说他爱自己的妻子[1]，以为用这种俏皮话就能把问题挡开，这样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人们又可以穿戴或披挂象征德意志民族的黑红金三色服饰了。

日耳曼女神也许不妩媚，但却坚定。

根据基本法，德国的统治者是人民。但这似乎并不是能够把我们同别的民族区别开来的东西。在特定情形中似乎能够把我们区别开来的，

毋宁说是那种满怀批判情结的知识分子角色，这些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进程当中把社会批判玩成了一项体育竞技：“谁敢做得更多？”是不作数的，做数的是叫得喳喳响的“谁提出的警告更多？”他们把一切“德国的”都说成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他们以为在我们德国人的本性中找到了灾难的根源。引领他们走上这条歧路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他把德国的“森林漫步中的哲学思考”径直归之于反理性主义。这位大师的愚蠢可用其著作《理性的毁灭》（*Die Zerstörung der Vermunft*）中的引文来证明：“一方面，英国人民和法国人民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末期就胜利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与德国人民相比，他们具有很大的领先优势；而另一方面，俄国人民又恰恰因其资本主义发展较迟而能够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由此而免于遭受德国人民今日仍在遭受的痛苦和纷争。”

结果，到最后，这花招耍得把自己给耍进了思想上的死胡同。1989年，无论是东部走上街头的人，还是西部坐在电视机前的人，都同样赞同德国统一，而那拨小心守护着讨论话题的人，成了全世界惟一对此表示惊讶的人。

赞同统一这事，那些神经紧张心胸狭小、向来下笔尖酸的家伙们是没法反驳的。铺路石下无沙滩[2]。那个1968年动乱年代人们常用的法兰克福口号其实是错误的。

于是他们转而开始反击，在柏林新中心地带那些剧院小餐厅里的说法是，人民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因为“人民”不能够在一个两三百年的过渡时期里忍受没有香蕉吃。那些富有理性才能的知识分子的发言人，从斯特凡·海姆（Stefen Heym）到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如是说。

有一阵子他们试图采取零敲碎打的战术，说是应当制定一部全新的宪法，或者，至少应当换掉国歌。理由仅仅是，1949年制定宪法时东部

的德国人没能参与发表意见。按某些人的意思，应当用布莱希特的儿童颂（Kinderhymne）来替换德意志之歌："美丽代替不了努力，热情也代替不了理智，让美好德国怒放，像别的美好国家一样。"

这一回他们同样只是再次让自己丢脸。通过以前的种种行为——在战后反对联邦德国（西德），为东德唱赞歌，或者是说服人们理解东德——他们亲手葬送了自己的信誉。在他们看来，西德是反动的，而东德则只是有些"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这种态度最典型的是彼得·魏斯的表述，他把联邦德国（西德）称为"污泥浊水"。而格拉斯的立场则颇为矛盾，他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东德，但又认为两德重新统一很成问题。相反，瓦尔特·肯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却是个著名的例外，他对东德自始至终坚持批判态度］。

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想后退，他们既不想退回德意志帝国也不想退回可悲的魏玛共和国，不过，能说他们的确是想要——如其对手栽给他们的那样——走莫斯科的道路吗？不管怎么说，他们倒是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称作世界主义者，由此而高高飘荡在现实事件之上。然而，在现实世界的政治争论中，他们只不过是要么反美，要么反教会，要么反以色列，要么反资本主义，再就是反西方加上和平主义。一句话，他们反对亲西方意识（Westbindung）。

对德国而言，亲西方意识就是指不要和法国划清界限，也不要避开一切与盎格鲁撒克逊有关的东西。它并非如通常所臆断的那样仅仅只是持赞同美国的态度。亲西方意识还包括放弃那种介于西方与东方之间的特殊角色，并且它也意味着回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当年是西方的顶梁柱，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可以令人想象一下德国在欧洲构建中的真正角色。正是"神圣罗马帝国"在西方价值领域中的千年存在（公元800年至1806年）——而不是普鲁士特意为之的与西方拉开距离——为德国的正常状态打下了底子。

与其说被称为威廉主义的威廉二世[3]时代是历史上德国之路的顶峰，还不如说威廉主义是对德国之路的误解的顶点。20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统一之后，当所有人都相信必须警告人们警惕“第三帝国”复辟的时候，有一位——唯一的一位——作家，他看到的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重现。“如果法国人害怕德意志帝国重新出现，”阿莱恩·明克（Alain Minc）在其1993年出版的《新的中世纪》（*Das neue Mittelalter*）一书中如是说，“那他们就看错了这个国家的本质；他们认为德意志帝国就是俾斯麦式的德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如今所展现的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一个新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以这样的方式，而不是以重复传统的‘向东方挺进’的方式，德国重新找到了它归属于欧洲中心的位置，这个欧洲中心不但包括德意志帝国原本所处的区域，而且也包括扩展到原奥匈帝国的那部分。”

宪法也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状况的体现。普鲁士当年——若是仔细分析的话——也是处于古罗马帝国界墙之外的“日耳曼人之邦”。这样看来，亲西方意识便是今日德国最重要的特色。这种亲西方意识由基本法而得到保障，同时也正是它赋予基本法更为深刻的意义。

危险其实并不在于“第三帝国”又回来了——如人们像推转经筒般反复声称的那样，而在于这种亲西方意识被架空和丢弃。随着亲西方意识的树立，德国抛弃了如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所描述的那种作为19世纪迟来一步的民族的特殊道路，尤其是抛弃了从其中推导出来的政治教条。

然而德国的知识分子却还是与东方的魔鬼订下了契约。不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否则他们就应当为获得国家中的权力而奋斗，而是出于对乌托邦的热情。不过那只是在吸烟室里空谈出来的热情。他们并没有自己振作起来去当革命者，相反却常常向违法者表示敬意。很奇怪的是，这些理想主义的晚近后裔表现出小市民式的对暴力的迷恋，并且还与暴

力结盟。德国人海因里希·伯尔和乌尔丽克·梅因霍夫[4]竟然变成了一对儿？伯尔，作为前德军士兵曾有过教训，在说到梅因霍夫时，却说起了什么应当保证行动自由？就为了她——这个时评作者兼恐怖主义者？这个为了能够宣称联邦德国是敌人、宣称它不是法制国家从而让自己成为国家之敌的人？这个写下“人的尊严可以侵犯”词句，以揭露基本法第一条并没有什么用处、只不过是设计得极其狡诈的国家权力的巧言装饰的人？

说起来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即1989年发生的并非革命，而是重新回到了修复的路上，这修复正迫在眉睫。这修复是为了回到正常状态，德国的和欧洲的正常状态。德国对所有人来说现在显然又处在了欧洲的中部，同时也处在了欧洲的中心。在经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德国的现实终于能够同德国人的自我意识并驾齐驱了。这段“史前史”如理所当然般重新拐入历史长河之中。

为“第三帝国”的产生一再探寻新的原因，正是这种探寻扭曲了对德国历史其余部分的看法，并由此也扭曲了历史的真相。我们为什么不能最终认识到，“第三帝国”并不是德国历史的不可避免或者说在劫难逃的后果，而是一次集体道德崩溃的后果。

其实是对魏玛共和国缺乏信任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民主缺乏信任，再加上对基于魏玛宪法而建立的民主机构缺乏信任，才使得希特勒能够在选举中获胜并获得授权。

依照现代极端主义的黄金规则，人们利用了选举制度，通过选举把选举制度给废掉，然后再以德国人对完全彻底的追求搞出个授权法来加以适用。一个社会让一个野蛮人给带上邪路，就因为他会行吻手礼，人们总是可以不断地重新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一个社会只会给自己设定这样的界限，即所经历的灾难要求它必须

设定的那种界限。如果对一个人来说秩序已经不再神圣，他或许就得经历遍野焦土，好让自己找到方向。在普遍的束手无策之中，当世界如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那样“从魔咒中清醒”时，随之而来的便是再造魔咒的尝试，其结果就是，从相关的神话中造就出偶像，从普通礼仪中打造出宗教仪式。必须像设计芭蕾舞动作那样规划世界，不留任何死角。这下看吧，它看上去就像个党代会，主要发言人则像是救世主。世俗社会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就是耶稣显灵的迅速贬值。

魏玛共和国，我们至今总是喜欢以当年在柏林诺伦多夫广场附近客居的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这位晚近作家的小说后来改编成了电影《歌厅》（*Cabaret* ）——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在德国社会中没能树立起权威的共和国。共和国的创建者们为了给所创建的国家制定宪法而必须躲到魏玛去，因为在他们看来柏林的政治环境太不安全，单是这一事实就大可发人。魏玛宪法由一个身陷困境的政权颁行，而这政权本身尚不能完全确信自己的合法性。于是它去了歌德和席勒的故乡，不是为了向人民证明自己合法，而是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

要是人们读过魏玛宪法第一条的第一句话（“德国是一个共和国”），会拿不准这句话是否有种威胁的意味。而之后的第二句话听上去却仿佛有些难为情。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国家权力出自于人民。”对此，可以这样说：正如政权可以设计出完全不同的登台方式一样，人民也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构成出现。

假如在1918年只废掉君主而不废掉君主制，会是什么样？现在再提这样的问题已经纯属多余。虚拟的设想显然不是历史，就算是可以用虚拟的设想来讲述历史，这种讲述在真实的“后来”当中也无法令人信服。

话虽如此，还是可以设想一下：威廉时代的帝制国家，其本身发展出了一种相当成功的在君主制和共和思想之间进行妥协的模式。与同时

代的任何君主制相比，它本来可以提供的机会也许更多，或者肯定更少，这由观察方式的不同决定。皇帝虽然可以宣称自己是首脑因而有权确定宪法的含义或者自以为可以如此，但是要求实行共和的力量却是他无法置之不理的。君主帝国很可能会继续运行，因为两边都可以保有自己的幻想。一边相信皇帝，另一边相信议会，于是君主帝国便有了宪法。

君主帝国一半是上天给的，一半是自己鼓捣的。按着德国小市民最喜爱的方案：用上天给的做幌子，在具体事务上则竭力插手。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Gustav Freytag）[5] 所著的《借方与贷方》（*Soll und Haben* ）可谓当时最成功的小说之一，它推崇德国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以其优秀的德行不仅可以战胜腐朽的贵族阶级，而且也可以战胜“犹太”商人品性。

君主帝国的社会是个意见一致的社会。根据1871年宪法，它甚至是一个联邦国家。在其中所有的力量都扮演着角色，但是这些力量却无法相互制衡从而达到均衡，均衡纯粹是以法令强制实现的。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乐团，其中有一位大家都接受的指挥。但是人们对之意见不那么完全统一的，是他所要指挥演奏的那部乐曲。

这样的一个“国家乐团”，只能从其行为的历史意义和这种行为的历史论证中推导得出其合法性。总之，这部乐曲的乐谱急需有个来源说明。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在1870年之后，成群结队的德国历史的诠释者们要去翻腾早已过去的事情，以便以最廉价的方式为当时的国家提供论证工具。比如说像这样：“法国佬想要莱茵河，俾斯麦说了：这不行，狠狠地揍！法国佬在色当吓白了脸，德意志帝国重新上路。闭嘴吧，少啰唆！”

以一种几乎是后现代的姿态，为最基本的认同感打好了基础。这个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80年代给自己系上了一条名副其实的纪念腰带

（Denkmalsgürtel）。从德特莫尔德的赫尔曼英雄纪念碑（Hermann bei Detmold）[6] 到尼德瓦尔德的日耳曼女神像（Germania im Niederwald）。

历史舞台是知识分子的游戏场，但它也露出了被意见一致掩盖着的裂缝。它当时所涉及的就是知识分子同权力的关系。君主帝国因其创建方案而必将引发的冲突，由于普鲁士的领导角色，由于帝国所受的威廉主义影响，变得极其尖锐。虽没有明说但因此而具有更强烈的象征力，保罗教堂[7] 理念仍继续处于与秩序国家——也被称为专制国家——的冲突中，虽然这个帝国本来完全可以把康德抬出来作为依据，假如它不是那么小家子气、不是那么庸俗的话。君主帝国不单只被看作是小德意志解决方案，它实际上也确实就是小德意志解决方案。假如1870年有保罗教堂会议的话，它又该号召什么呢？难道要号召闹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革命吗？再说了，正是法国，在1870年向普鲁士宣了战。而且，还不是闹革命的法国，而是拿破仑三世——一个搞政变的家伙——的法国。

这布满裂痕的德国政治风景，缺的是现代国家整顿秩序的手段，而不是反叛的姿态。与历史的迟到相伴的现象，还有对占有和权威的不合时宜的分配。众多德意志小国虽然对其属下的民众有支配权，但是它们在民众眼里并不具有权威。总是有抱怨说，这种小国众多的状态拖延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其实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碎裂状态一再阻碍现代社会及其制度的建立，且更糟糕的是，它还使之变形。小国既不能形成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也不能建构民族文化。

由于缺乏其他因素，教育于是很快成为把精英区别出来的最主要标志，再说也没有足够的财产可以建厂立业。帝国执掌权力的精英们——完全是普鲁士特色——主要来自官吏阶层。这些为国效力的人们拿着有保障的薪水，过着受监护的生活。其雇佣合同里坚如磐石的组成部分就是放弃言论自由。在这里若要出人头地，靠的是业绩而不是丰富的想象

力。

不论对于喜爱自然的人还是对于技术迷们来说，19世纪下半叶都是有利的好时光。这个时期的标志是自然科学和技术，而不是哲学。正因为如此，重要的是公式，而不是表述。人们又开始相信很快就可以制造出永动机，唤醒戈勒姆（Golem）假人[8]。

哲学只剩下了华丽辞藻，哲学抽缩成了格言警句并任由这种不庄重摆布。迫不得已而甚至于从中整成点气候，这样做的不单只是尼采。

尼采也证明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在这个人们可以乘着刚刚发明的汽车去做礼拜而并不很引人注目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只剩下充当反对派的角色。除非他们可以把自己打造成时代精神的官方发言人。

19世纪把进步概念变成了知识分子的标签。由此一来，便可以从科学上来推导和要求历史呈直线型发展。历史仍保有其神学所阐述的终点，但是向终点行进的路如今却由人和人的发明精神来确定。基本原则是，对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了。这是禁忌开始被打破的最初时刻。

一切在这个时代所能想到的重要事情，全都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但令人信服的主要是给日常生活带来实际好处的新东西。机器时代的一大好处就是，各项发明的用处都很容易检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做这种检验。

普鲁士的秩序国家是接受新知识成果的实用成分的理想工具。与官员相伴的是工程师。工程师不但是发明或专利的拥有者——如官员们所称的那样，而且也随发明和专利而产生。工程师是劳动的主宰和正在形成的社会问题的主宰。而反过来社会问题也提到了官员的面前，毕竟官员主管的就是秩序并由此也负责保持社会均衡。然而在技术胜利进军的

另一面，几乎不为人注意地，因受益于工业化和研究而产生出两个极其矛盾的现象：一个是群众在社会上成为“多数”的制造者，再一个是有遗传基因的个人成为一切事物的标准。

于是，在一切都已过去，只剩下一片废墟的时候，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不声不响地表明了它对1870年以来臆想的和事实上的脱离法制国家正轨的所有行为的反对态度。在1948年，也即保罗教堂会议过去整整一百年之后，议会委员会在不起眼的波恩召开会议，鉴于所经历的灾难且当时又正处于德国最严重的国家危机之中，人们尤其有理由这样做。我们直到今天还在享用因这一疲弱时刻而获得的收益。至于我们的这个法制国家是人家下命令让建立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及时地把它给忘记了。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绝对乐意把自己视为宪政国家。联邦宪法法院开庭时的那一声呼喊，声调真正是优美嘹亮。它也许能使怀疑论者们安心，但偶尔也会变成公民的游戏。基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受人尊重的宪法。这是有理由的，也是有后果的，而对于后者我们该懂得它的价值。

经历过纳粹统治之后，我们应该懂得：并非德国文化是纳粹的东西，相反，对德国文化日复一日的滥用才是纳粹集团所干的勾当。保持低调固然很好，但不是全部。这也包括对1949年的描述。宪法尽可以十分恰当地发挥作用并受到相应的尊重，但是它绝不会让国歌和作为日常用语的母语的象征意义变成多余。为了作为祖国而具有说服力，每个国家都需要有国家庆典。只有不理解这种关联关系的人，才会认为，可以用“宪法爱国主义”这样的组合词来让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感觉保持中立。在体育场上，当某个体育项目赢了的时候，人们是会喊“联邦共和国！”呢还是会喊“德国！”？回头再来看看魏玛宪法的第一条［“德国是一个共和国”（Das Deutsche Reich ist eine Republik）］，它也可以倒过来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德国（Die Bundesrepublik ist das Deutsche Reich）[9]。不用“Reich”来指国家也可以，那就是：德国（Das

deutsche Land）。

没关系！

作者：里·瓦

译者：郑冲

参阅：德国式焦虑，诸侯割据，战争与和平，福利国家，赔偿

---

[1] 1969年，古斯塔夫·海涅曼被记者问到作为联邦德国总统候选人是否热爱这个国家时回答："这个嘛，我不爱任何国家，我爱我的妻子；完了！"（„Ach was，ich liebe keine Staaten，ich liebe meine Frau；fertig！"）海涅曼1969年7月至1974年7月任联邦德国总统。

[2] 铺路石下有沙滩（Unter dem Pflaster war Sand）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动乱时的口号，起源于1968年法国大学生在反权威运动的"五月风暴"中筑街垒与当局对峙，向警察投掷铺路石。后该口号传入德国，至今仍时被引用，有鼓动（以暴力）反抗当局之意。作者对此是反对的，所以说"铺路石下无沙滩"。

[3] 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全名弗里德里希·威廉·维克托·艾伯特·冯·霍亨索伦（Friedrich Wilhelm Viktor Albert von Hohenzollern，1859～1941），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年到1918年在位。

[4] 乌尔丽克·梅因霍夫（1934～），德国20世纪70年代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派首领，1972年被捕，后被判处8年监禁，1975年5月9日在单人牢房内自缢身亡。伯尔同情梅因霍夫，为其被捕写下《乌尔丽克·梅因霍夫要赦免还是要人身安全保障？》，呼吁以公正态度对待学生运动。

[5] 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1816～1895），德国作家、剧作家，其所著长篇小说《借方与贷方》发表于1855年，被称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6] 公元9年，日耳曼切鲁西部落首领赫尔曼（又名阿米尼乌斯）全歼罗马帝国将领瓦卢斯率领前来镇压日耳曼尼亚北方反叛部落的三个罗马军团，遏制了罗马帝国的领土扩张。1871年德国统一后，德皇威廉为迎合民族主义情绪，将赫尔曼树为德意志民族英雄，并于1875年在条顿森林竖立一座巨大的赫尔曼雕像。

[7] 保罗教堂（Paulskirche），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因1848年6月代表所有德国人民的国民议会在其中召开并最终通过由民主决议产生的宪法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该宪法最终由于德国各邦尤其是普鲁士国王的反对而失败。

[8] Golem，希伯来传说中用黏土、石头或青铜制成的无生命的巨人，注入魔力后可行动，

但无思考能力。

[9] 原文此处德国用的是“das Deutsche Reich”，“Reich”也是国家的意思，但“das Deutsche Reich”特指帝国时代的德国，因此也多被译为帝国，如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第三帝国都是用的该词。作者在此意在强调德意志民族和文化的传承性，用的是定冠词，意思是现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身仍旧是德意志帝国，所以接下来又以不用“Reich”的“Das deutsche Land”来指德国。

汉萨同盟

> 谁反对船长，会被沉到船底龙骨处三次；谁愤怒得拔出了刀，刀将穿过他的手被剁到桅杆上。

人们这样描述汉萨同盟船只甲板上的生活。作为商人他们不仅是船主，而且也是船只的承运者和使用者。贸易在中世纪那个野蛮的时代所面临的诸多危险，如今只能靠想象才能领会。如今人们在德国几乎很难设想，在中世纪那种条件下能够开展有规则的贸易。

有的年代艰辛，有的年代安逸。在艰辛的年代人们不会马上想到危险，因为绝大多数事情都是冒险，有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在安逸的年代人们反而觉得没有一件事安全到值得去参与。

人们很少称许德国人有经商的才能。让我们先来看看左邻右舍的情况：左面是做买卖的世界冠军英国人和荷兰人；右面是以满足自己需求为主、致力于自然经济的斯拉夫人。与他们相比，德国人没有左邻那么大的兴趣去做买卖，但较之于右舍他们又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去攻克生计难题。

对左邻来说，德国的秩序似乎就是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对右舍而言，德国人对货物运输的管理则是狂热追求秩序的表现。难道德国就这么被卡在左邻右舍中间了吗？它摆脱这种困境的一贯做法是建立北-南联系。德国的这种联系贯穿了它的全部历史和文化抉择，无论是对教皇的态度、对意大利的渴望，还是对古希腊与罗马的敬仰。德国多希望自己是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啊，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海滩，而且是因为其历史重要性！因为它实际上不是，所以长期以来它至少一直在象征性地

仿效地中海沿岸那充满梦幻的文化。起码我们的诗人和思想家有时会乔装成希腊人。这首先给我们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他们这么做的初衷。

真正的南方却是自我满足的，在这方面它更接近西方，虽然动因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能求助于伟大的历史，到处有供人参观的废墟，这对南方来说就足够了；那么西方追求的则是有能力宣告现代和时髦的开始。重要的是人们认识到：西方和南方都是不可统治的。

即使攻占了南方，也只能被它同化。所有战胜过罗马和雅典的都难逃覆灭下场。罗马和雅典虽然早就今非昔比，基本上已经灰飞烟灭，但是离开了其文化象征意义欧洲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他们规定了欧洲文化的语法，接下来的几百年他们让羊群随意吃草。是出于绝望，还是出于对抗，这谁能知道呢？也许仅仅是看见了我们这些野蛮人，就让他们心灰意懒了。按大自然的方法实施的不爱动脑子的习性对他们没有任何帮助。在德国人——这些人是为了考古挖掘定期去他们那儿短暂停留——的眼中他们是在放羊时创造出阿那克里翁流派的[1]。人们是很难纠正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的。从这种不起眼的误解中德国人获益匪浅，这体现在他们那卓有成效的思维模式中。没有希腊哲学，德国的唯心主义从何谈起呢？

西方和南方向德国人展现了界限何在。西方意味着市场持有人、海关税务员和保护人；南方则是遗产鉴赏家、图书馆和写在羊皮纸及纸上的宝物的管理人。一方务实，一方务虚，事关法律与法律效力。这样我们就成了客户和旅游者。

在历史进程中只有与斯拉夫接壤的德国东部边境是开放的。从中世纪早期起就开始有向东部的移民，这首先导致斯拉夫移民区域一些城市的创建，从根本上促进了那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包括城市法。



古老的汉萨同盟城市不来梅至今屹立在威悉河畔。

在12世纪移民早期，德国骑士团在移民区域尤其起过决定性作用，它对汉萨同盟也是不可或缺的。骑士团首领算作汉萨同盟的成员，这样骑士团就可以保护商人们的商路直至波罗的海东岸诸国。

作为贸易行为和贸易政策，汉萨同盟所取得的结果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惊异的。它是由德国北部商人创建的利益共同体，随着斗转星移它慢慢发展成了一种城市联盟，乍一看有些类似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联盟，但在创新和审美方面却望尘莫及。北方缺乏文艺复兴的表现力，在南方复兴的东西在北方这儿不过仅仅是模仿而已。

汉萨同盟的贸易范围西起布鲁日（Brügge），东至诺夫哥罗德（Nowgorod），即如今的大诺夫哥罗德（Weliki Nowgorod）。汉萨同

盟是个松散的同盟，它有很多协议和约定，却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国中之国。其中心从一开始就是吕贝克（Lübeck），同盟网是从那里织起的。汉萨同盟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因为那个帝国在行使权威方面较宽松，有时甚至有缺口，这才让各种背离和出轨成为可能，这些在一个标准的国家框架中是无法出现的。

汉萨同盟（Hanse）这个词也是个古老的德文词，它的意思是“群”或“随从”，但也可以是武装起来的一群。随着汉萨同盟的建立及其贸易行为，北方的基本结构也形成了，与当时西方的核心地带相比北方还不够发达。汉萨同盟时代建立的城市全都是同盟进行贸易的地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波罗的海东岸诸国富有汉萨同盟特性。商人们装上船的不仅仅是货物，即使他们没有带来什么伟大的思想，至少也带来了时代精神。

汉萨同盟的力量在于它的船队。汉萨同盟的船队是当时最大的，14世纪时据说其装载量已达十万吨。汉萨同盟使用的是自己的船型——柯克船（Kogge），它行驶起来不是很敏捷，但其元宝型船舱却令人过目难忘。后来它成为徽章上的象征，今天在一些城市的市徽中还可以看到它。

汉萨同盟及其贸易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今天的想象力。人们一般以为其势力范围仅限于沿海城市，也就是从不来梅到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然而最重要的汉萨城市中也包括科隆，只是这座城市对自己曾属于汉萨同盟的历史以及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没有珍视。科隆视自己为莱茵河畔的天主教大城市，其实它距北海只有两百公里。尽管汉萨同盟当年也通过内河搞内贸，而且旱路的贸易也做到了南部德国，但今天人们在相当大程度上更把它看作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种现象。

比如历史上的汉萨同盟就是一种团体标识。起初吕贝克是其中心并因此经历了该城的辉煌期，后来汉堡从中获得了很大市场效益并将其传

统维持至今。大家都从“汉萨同盟”这块招牌中受益，其生意理念至今被奉为圭臬，仍旧可以作为论据来使用。例如2010年9月德国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吕迪格·格鲁贝（Rüdiger Grube）与绿党交通政策发言人温弗里德·赫尔曼（Winfried Hermann）进行过一次辩论，在相关报道中人们可以读到：

> 格鲁贝：“我是汉萨同盟人，是个诚实的商人。我学到的经商之道是：签了合同就得执行。”
>
> 赫尔曼：“可汉萨同盟的商人也得审核一份合同的基础条件。”

最后一切都成了玩具或景点。汉萨同盟是景点：人们仿造其船只，要是遇到不确切知道原始船只的构造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就大胆幻想，一切都美其名曰为了促进旅游业。

汉萨同盟载入史册的方式相当低调。也许是因为他们未敢冲向大洋？他们的帆船沿着岸边行使，船长们也加载自己的私货。不光要把货运到，而且还要完好无损地运到。北海也有海盗和其他恶棍。可汉萨同盟的英雄们何在？其伙计们并未记录自己都做了些什么。

与此相符，汉萨同盟如今仍是可靠的代名词，著名的德国商标沿用其名：汉莎水龙头，汉萨墨丘利[2]保险公司，欧洲最大的创可贴生产厂家[3]用的牌子叫Hansaplast。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航空公司之一。

汉萨同盟显贵的后裔日后在帝国时期构成市民阶层的中坚。吕贝克不仅成为德国最重要的一部资产阶级小说的舞台，而且它还是作者托马斯·曼一家的出生地。这一家族在20世纪捍卫德国人尊严方面所起的作用具有典范意义。

除了曼一家，如今最出名的汉萨同盟人当是海盗克劳斯·施托特贝克，他是个粗人，据说一口气能喝下4升啤酒。1400年前后在汉堡的一

块空场被砍头前，他与议员们商定，砍头后他可以从等待行刑的其他犯人身边走过，他无头走过的每个犯人都将得到赦免。据说最后刽子手得伸出一条腿绊他，这桩怪事才收了场。

施特拉尔松德有一种啤酒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正义者啤酒。吕根岛（Rügen）拉尔斯维克（Ralswiek）镇有纪念他的施托特贝克节，阿希姆·赖歇尔（Achim Reichel）为他创作了《施托特贝克之歌》（*Das Störtebekerlied* ）。

有时候人们不得不说，民众的情绪是滑稽的。他们宁愿冒无法无天的险，也不愿认可船运秩序井然并享受其好处。

除了惧怕死亡之外，人们最怕的看来莫过于无聊了。汉萨同盟就是这方面的绝好例子，历史给了它所需要的发展空间。它在繁荣之后几乎又自行衰落了，其间的时光达四世纪之久。它所经手的货物包括料子、皮货、蜡、盐、咸鱼、大麦、木材和啤酒。料子有的来自弗兰德、荷兰和英国，这些西方的料子被运往东方；来自东边俄国、利夫兰（Livland）和普鲁士的皮货则被运往西方。皮货和蜡，蜡用于照明。

作者：里·瓦

译者：丁娜

参阅：工作狂，爱整洁守秩序，社团迷

---

[1] 18世纪一种文学流派，以歌颂爱情和美酒闻名，风格则模仿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

[2] 罗马神话中的商业保护神。

[3] 拜尔斯道夫股份公司（Beiersdorf AG）。

故乡

故乡可以是宝贵的财富，也可以仅仅是一个舒适的地方。故乡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前提是他要求这种权利。

能证明故乡的是童年，故乡离不开原籍。故乡指的是一个人的从属，他童年时在这种从属关系下是在那儿长大的。故乡是时空的合一，它是被留住的易逝性。突然间风景重又变得熟悉，母语一字字变成了方言和土话。

德国公众对故乡有着一种复杂的关系，除非故乡意味着什么别的东西，是一种替代物。它可以是人选择定居的地方，或者是新故乡，后者就像德国工会联合会下属的一家建筑公司给自己起的名字那样。

“这样世界上就产生了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好像让所有人都忆起童年，然而却是任何人尚未到达过的地方：故乡。”恩斯特·布洛赫这么认为并将这一画面定格为概念。它像一束聚光灯柱，让我们再次看清了20世纪德国知识分子的行为。凡是铸铁般坚硬的逻辑行不通的地方，他们就引进乌托邦。所有不能通过启蒙方法来理解的东西，在他们的眼中就是无法定位的。然而这种顽固不单单是精神与权力这对古老的德意志对立物的表现，它也标志着德国思想家与平民、公众与社会之间误解的全部编年史。

然而故乡——它是存在的！它就是那块地方，在那里人们初次经历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给人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后来再经历的其他事情不过等同重复而已。回忆起这第一次时的情绪，人们称之为思乡！

我阅读过、思索过。我进入了梦乡，半夜又醒了过来。一张嘴蹦出的第一个词是“德国”。“德国”之后是“母语”。

瞬间我又变成了远在巴纳特（Banat）的那个孩子。我的出生地分属于三个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我的祖先在两百多年前移民到那里，他们是从乌尔姆（Ulm）出发乘船顺流而下的。当时巴纳特还是奥地利的一个州，后来成为匈牙利的一个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划归罗马尼亚。我们却一直是巴纳特的施瓦本人[1]，意外地成了德裔少数民族。我们不是侨民，可我们却成了双元制奥匈帝国的遗民。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站在我们家院子里，隔着板条篱笆往外看，我们家位于村边，我看着火车擦着森林边呼啸而过，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我想象着它最后到达的那个城市会是什么样。到达与到达的时间都与我无关，我还是个孩子。

我看见自己站在院子里，坐在劈柴用的粗木墩上。春夏秋冬，那是50年代，女人们穿过院子。两个女人，我母亲和我祖母。

我回到屋里听见她们在院子里唱歌。她们唱得就像我母亲年轻时一样，也像我祖母年轻时一样。我祖母的青春年华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母亲的则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她们双声合唱。“姑娘，快，快，快来我身旁。”或是“你，你在我心中，你，你令我思念。”她们唱：“你，你令我心碎，不知道，我对你多好。”

我得到了一架手风琴，大多数德国孩子都有手风琴。手风琴被看作一种德国乐器，罗马尼亚孩子有时看我们拉琴，不过也仅此而已。我们的德国手风琴牌子叫“霍纳”或“世界冠军”，村里多数孩子的手风琴是世界冠军牌的，我的是霍纳牌的。

我拉的曲子："若是所有小喷泉都喷水，那就得畅饮。若是不许呼喊我的宝贝儿，那我就挥手向她致意。"我也拉收音机里播放的新歌，包括德国最新的热门歌曲。看着谱拉，乐谱是村里一位音乐教师写下来的，我们把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歌词填上。我们听奥地利和巴伐利亚、黑森和萨尔州的广播电台，当然也不能忘了卢森堡广播电台。自然也要看天气，这些电台全是中波播出，人们听到的不仅是音乐，雷雨声也听得一清二楚。



60年代作者与一位青年朋友在一起拉手风琴，演奏的大概是《鸽子》（***La paloma***）。

我们的故乡是巴纳特，我们的母语是德语。我们是德国人，我们对这种身份很在乎。我们害怕自己一不留神就会变成罗马尼亚人。

在学校里我们知道了，除了故乡巴纳特还有一个更大的祖国。祖国是个国家，这个国家叫罗马尼亚。但我们还有罗马尼亚人没有的东西：我们除了祖国还有母语和与之俱来的母亲国[2]。我们了解母亲国不是从自己的直观出发，但它比所能预料的离我们更近。虽然在我的孩提时代它可望而不可即，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时期边境是封闭的。我们没有护

照，但德国广播电台给了我们安慰。听着电台点点滴滴的报道，母亲国变成了德国。

村里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人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村子，德国人有自己的村子，罗马尼亚人也有自己的村子。在一个村里说的是德语，在另一个村里说的是罗马尼亚语。

罗马尼亚语是官方语言，德语是母语。说德语时我用德语思维，必须说罗马尼亚语时我同样用德语思维。

有一天我在村里发现了《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lied* ）的乐谱，是在被人藏在阁楼上的一本书中找到的。我把它带回了家，拿出手风琴，我先演奏曲子，然后唱起了歌词。我唱了第一段，根本不知道那是第一段，同样不知道第一段是不能唱的，唱了会引起争议。我根本无法想象，一首歌得从第三段唱起，或是只能唱第三段，当时我根本没明白是怎么回事。[3]

今天我也没完全弄明白，但如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知道，因为纳粹滥用了我们口中的德语，所以史实和官方史料不能混为一谈。他们把歌词的第一段变成了他们的第一段。但这最后也没起任何作用，这一点倒是让我们无语了。其实只要我们知道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的德国形象与那位蹩脚画家[4] 的德国形象之间的区别就够了。可是在我离开东边来到这个犹犹豫豫的国家后，这怎么能算够了呢？

我的脑袋里装着我的母亲国，作为违禁品的还有我的母语，以及不起眼的德国文化。全部有关移民和融合的空话都忽略了一点：德意志精神。是它让德国成为德国，并让我们与德国一起成为我们自己。

是的，我们忘记了这一点。

我们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忘记了这一点。

有些人甚至认为，能把一切都忘掉最好，那都是些昨日之雪，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变得像铅一般沉重。谁愿意、谁又能够扫除这些沉重的积雪呢？

不是我们又能是谁呢？

战后经过逃亡和被驱逐出东部，失去家园首先成了重要话题。如果运气好，后几代人可以把他们出生在其中的城市称为他们自己的故城。如今已然难以想象，有多少事都被记在了历史这个恶魔身上。

70年代理所当然的事才慢慢回归德国公众的视野。不久前还会受到惩罚的事，一位电影制片人突然可以做了：埃德加·赖茨（Edgar Reitz）。他可以把自己的电视剧——一个发生在洪斯吕克山（Hunsrück）的家族传奇——命名为《故乡》（*Heimat* ）了。这在当时很轰动，那一瞬间德意志之魂受到了震撼。

1980年以来赖茨的工作是里程碑式的，20年间在“故乡”这个大标题下共产生了30部片子。这些片子讲述的家族故事发生在外地的乡下，却充满民族矛盾。这样故乡就被定义为一个区域，它可以是乡下，它是构成民族的基石。最早故乡是地籍簿管理中的一个概念，故乡指的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全部财产，特别是房屋和土地。“房屋是个目标，”赖茨在他2004年出版的《故乡三部曲》（*Die Heimat Trilogie* ）画册中写道，“进了屋，就算到了家。如果离开了这所房子，那就需要有一个新的目标。仅仅一栋房子还构不成故乡，但没有房子的故乡是徒有其名的。”

人们可以跟着这个思路继续想并说：没有故乡的祖国是徒有其名的。因为若没有思乡之情，又怎么谈得上热爱祖国呢？

那么后来呢？

在作家中2000年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在《故乡作为乌托邦》（*Heimat als Utopie* ）的小品文中再次触及这一题目。他把故乡与另一个知识分子热衷讨论的概念“流亡”放在一起来论述，在乌托邦问题上他在恩斯特·布洛赫之后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说法：“故乡并非那个它所是的地方，而是那个它所不是的地方。”启蒙时期的辩证学者看到这句话一定会喜不自禁。

我们要再进一步，我们要说：故乡是德语中最美丽的词语之一。

作者：里·瓦

译者：丁娜

参阅：德国人的性情，诸侯割据，男声合唱，高地丘陵，渴求瘾

---

[1] 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历史地区，包括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南部和巴伐利亚州西南部，以及瑞士东部和阿尔萨斯。

[2] 祖国（Vaterland）一词在德语中是由父亲和国家两个词合成的，作为对比的母亲国（Mutterland）则是由母亲和国家两词合成的。

[3] 此歌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现行国歌。曲谱为著名古典音乐家海顿作于1797年，德国版歌词为自由主义诗人奥古斯特·海因利希·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教授（1798～1874）作于1841年8月26日晚。1922年全部歌词曲被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首次定为德国国歌。第一段开头为：“德国！德国！高于一切，高于世间的一切”，在纳粹统治德国时期这一段特别受重视。现在的国歌只用其第三段，强调的是“统一、法制与自由”。

[4] 指希特勒，他曾迷恋绘画。

青年旅舍

不久前，我在逛互联网时迷了路，一不留神闯进了德国青年旅舍网站的主页。那好吧，我想，青年旅舍向来不就是给疲惫的旅行者提供歇息地方的吗，正好进去看看。甫一入门，网站主页上迎面一句“来吧，一起去游历”便致以欢迎，惊奇之下，于是乎流连忘返。

在“特色旅舍”的主题词下，我得知，在“文化青年旅舍”中，“年轻的旅客们”可以在旧香肠罐头盒上画画，然后在舞台表演中用它来反射灯光。我还看到“草狮子[1]班级远足”的介绍，那是“围绕可持续发展主题”而给小学生们规划的“丰富阅历、很有价值的活动”。位于梅克伦堡多湖平地中心米罗（Mirow）小镇的“德国首家超舒适生态青年旅舍”，用“分数维几何形状的课堂讨论会议室”（“世界首创”“未来的学习空间！”）和“无走廊有机连接舒适设计”来打广告。“星期日/阳光日-快乐日”项目想让儿童和青少年通过游戏和娱乐方式来了解太阳能，这个项目提供一辆叫作“Solarifahri”（“梭拉来发来”）的太阳能板手推车，可以带着去郊游，以在村子里的空场上开“太阳能迪斯科”舞会或者在森林中绿草茵茵的空地上举办一场“太阳能野炊”来吸引孩子们。芬嫩特罗普-黑根（Finnentrop-Heggen）的“健康青年旅舍”则邀请人们去“嗅闻芬芳、触摸墙壁、感觉色彩”，晚上还举办克奈普水疗法和蒸气浴运用课程，并且保证，那儿的餐饮“健康、生态和可口”。

瞧瞧这名声在外历史悠久的青年旅舍如今都变成了什么模样？难道往日的那种青年旅舍已经再也没有了？那些没有什么陈设的大房间，里面摆满中间已被睡凹下去的双层床，冲澡的水永远温温吞吞就是不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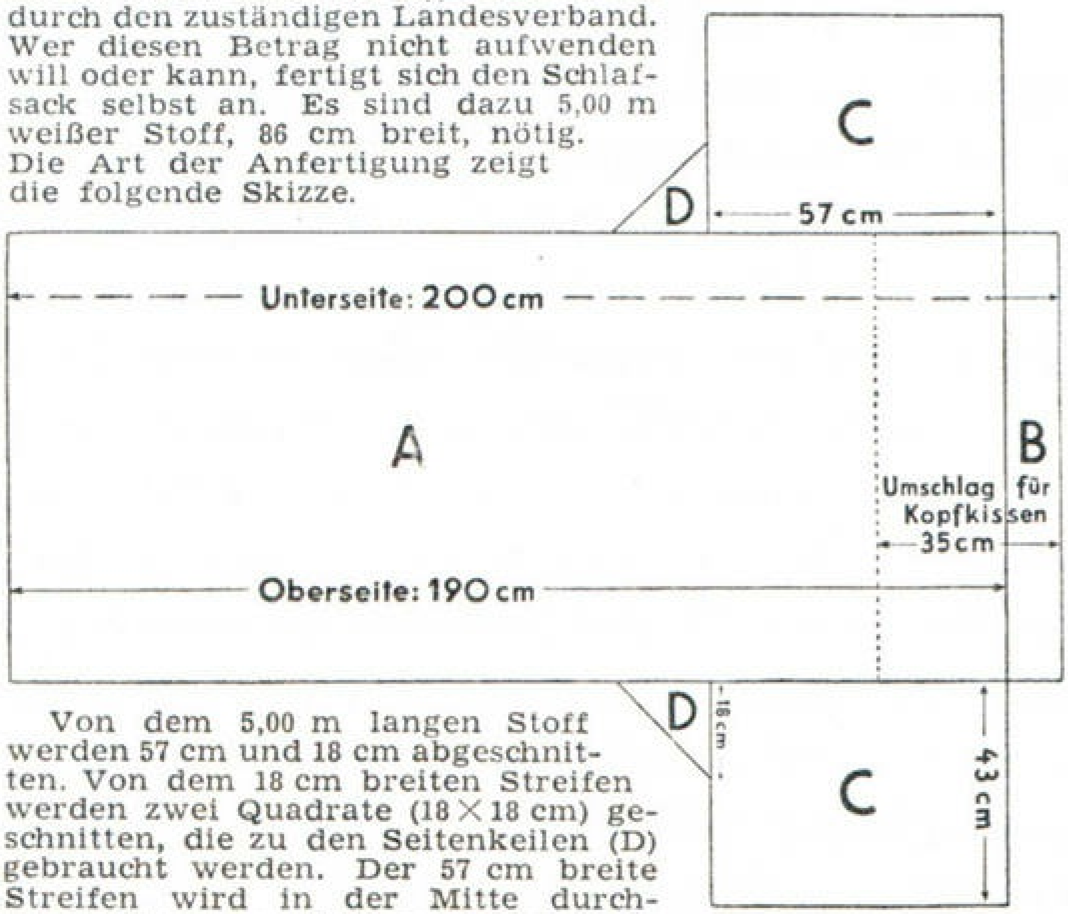
正热乎起来，那总也没有好脾气的旅舍“总管老爸”和脾气更坏的“总管老妈”，那硕大的铁皮壶，里面装着红茶或可可，可可的上面浮着一层人见人怕的白乎乎的厚皮，晚饭是干翘的灰面包片，香肠片已经卷了边，三角形的软奶酪于是上升为美食；还有洗碗刷盘子的活儿，上等人家的姑娘小伙子们一生中可能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亲自干一回这种工业化厨房里最底层的活计。不知道在那些号称二氧化碳零和的“最有益于气候的班级远足”中是否还会玩转瓶子游戏？那些“兴致蛮高，但不失纯真”的十几岁的年轻人，是否还会在夜里偷偷地抽他们人生当中的第一支烟？总之，青年旅舍到底还是不是那个奇特的无法无天的军营，在那里面本来应当比在家里管束得更严厉而同时却又可以打破一切规矩。

我在网上寻找“我的”那种往日的青年旅舍，很欣慰地发现在茨温根贝格（Zwingenberg）的青年旅舍看上去还是那么具有斯巴达-条顿风格，就像我印象当中那样，尽管那里也已经开始在搞增进阅历教育的活动（“培养儿童和青少年增进人生阅历能力专业教程”）。那位于上赖芬贝格（Oberreifenberg）的四座粮仓一样的平顶房子，仍像公元1984年那样很难看地杵在风景当中。当我看到那些光秃秃的砖墙和木板床的照片时，不由得一下子感动起来。照片所配的说明称，上赖芬贝格青年旅舍有“舒适的房间，总共222张床位”。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图书馆，想了解更多关于青年旅舍的历史。也许今天的“草狮子”离青年旅舍运动的根源要比我想象的更近。

Schnittmuster für den DJH-Schlafsack

In den Jugendherbergen herrscht Wäschezwang. Man gebraucht also einen DJH-Schlafsack aus leichtem, weißem Nessel oder Leinen. Man kann sich ihn in jeder JH gegen eine geringe Gebühr entleihen. Besser ist schon, man besitzt ihn selbst. Er ist zum Preise von DM 6,60 gegen Voreinsendung des Betrages zu beziehen durch: **Deutsches Jugendherbergswerk, Hauptverband, Detmold, Bismarckstr. 21** (Postscheckkonto Dortmund 557 69), oder auch durch den zuständigen Landesverband. Wer diesen Betrag nicht aufwenden will oder kann, fertigt sich den Schlafsack selbst an. Es sind dazu 5,00 m weißer Stoff, 86 cm breit, nötig. Die Art der Anfertigung zeigt die folgende Skizze.



Von dem 5,00 m langen Stoff werden 57 cm und 18 cm abgeschnitten. Von dem 18 cm breiten Streifen werden zwei Quadrate (18 × 18 cm) geschnitten, die zu den Seitenkeilen (D) gebraucht werden. Der 57 cm breite Streifen wird in der Mitte durchgeschnitten, so daß zwei Teile (C) (57 × 43 cm) entstehen. Der verbleibende Rest von 425 cm wird so gefaltet, daß die Oberseite des Stoffes (A) 190 cm und die Unterseite (B) 235 cm lang ist. Die Unterseite (B) wird, nachdem die Schnittkante gesäumt ist, 35 cm breit nach unten umgeschlagen und die Seitenkanten zusammengenäht. In die entstehende Tasche wird bei Gebrauch des Schlafsackes das Kopfkissen hineingesteckt. Die beiden Seitenteile (C) werden dem Oberteil (A) am oberen Ende an beiden Seiten angenäht. Am unteren Teil der Seitenteile werden die Keile (D) angenäht, die Ober- und Unterteil verbinden. Der Fußteil des Schlafsackes wird zuletzt bis an die Keile an beiden Seiten zugenäht. Das lose Oberteil des Schlafsackes wird bei Gebrauch halb über die Wolldecken geschlagen und schützt den Schläfer vor Berührung mit den Decken.

“青年旅舍的床单被套必须严格遵守规定尺寸**”**。摘自德国青年旅舍协会**1957**年编辑出版的宣传册《远足规章》。

一切都起源于一个喜欢远足的老师理查德·席尔曼（Richard Schirrmann）。当他还在他那位于东普鲁士的家乡教课的时候，就是常常把学生带到户外去上课。他坚信，如果他带着他那些波兰玛祖尔裔的学生们一起在自然风光里穿行的话，他们就能把德语学得更好，因为在大自然当中那些外语词汇会获得鲜活的面孔。1901年，这个27岁的小伙子迁到了威斯特法伦。这回是盖尔森基兴工业区生长在烟囱阴影里的脸色苍白的青少年，他要继续带着他们到明斯特兰（Münsterland）田野和鲁尔山里去漫游。据说，有时候席尔曼光着脚走在学生们前面，穿一件席勒领衬衣，背着背包。教育局很看不上这个“痴迷远足”的老师，把他发配到了绍尔兰的阿尔特纳（sauerländische Altena），于是阿尔特纳这个地方便诞生了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世界上第一个青年旅舍。不过那时离这个旅舍诞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年席尔曼被调进去的那个新学校对他的“新鲜空气中的学校”方案也是嗤之以鼻，结果席尔曼再一次被调走。

然而，在1900年前后那段时间里，想把德国的青少年们从那“臭气熏天灰尘满地的工业城市和大城市”里带到户外去的人不止席尔曼一人。作为针对城市“活人坟墓中的瘟疫气息”的灵药，青少年远足活动到处都在兴起。就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前不久，“候鸟”运动[2]发端于柏林施泰格利茨（Berlin-Steglitz），1907年那里出现了第一批专门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兴建的旅舍。这些旅舍大多是惯常的客栈，愿意向出外漫游的青少年出租便宜房间。不过，候鸟运动的“候鸟”们多半都是从富裕的资产阶级父母家庭里飞出来的，那些普通家庭出身的公立学校的学生们还是进不了这种学生旅舍。而席尔曼认为，恰恰是这些学生在心灵和身体上都受到了伤害，其原因就在于“不与自然接触所产生的危害”。威廉时代曾有很典型的学校郊游日，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慢慢开始固定下来的活动。对此，席尔曼的描述满怀厌恶：“在国家的星期天假日

里，口袋里装满了钱的学生们走上一小段路，来到最近的森林小酒馆。穷人家的孩子们去不了，只能乜斜着眼妒忌地从窗户或篱笆拐角后面偷看。或者是组织一趟费用不菲路途遥远的火车旅行，一直开到某座常被人提到的山峰脚下，或者是开到某个必得亲眼看见的纪念地，然后走进附近的一家饭馆，在铺着精致桌布的餐桌旁就座，桌上有丰盛的咖啡和蛋糕供人享用，身着燕尾服的侍者像侍候尊贵的先生太太一样侍候这些男孩女孩。之后再玩点什么小游戏。在孩子们跑到矮树丛和篱笆后面，去践踏草地和粮田，互相打得头破血流或是在自动售货机上大买特买直到把钱花个精光时，陪同出游的教师们却只顾为他们自己着想。”针对这种畸形发展，席尔曼推荐的学校郊游是这样的，即除了脚下结实的鞋底和背上轻便的小包之外，再用不着有什么其他的花费：“好让孩子们不像是在享用平时难得吃到的甜面包，而是在吃家里烤制的粗粮面包那样去感受郊游。我要把德国的男孩女孩们培养教育成强壮健康的林地健行者和熟悉家乡山川物产的童子军！”

席尔曼常常带着他的学生每天走上四五十公里，决不因路途太长而害怕退缩，并且自豪地夸耀，说是多亏了新鲜空气、太阳光和中午休息时泡脚，所以从未看到过有孩子“脚出毛病”。他们如果动身做一次持续数日的漫游，则在谷仓里过夜，就睡在铺了干草的地上。

1909年夏天，席尔曼和他的学生在布勒尔塔尔（Bröltal）遇到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急需找到一个计划外的客栈投宿。这时一个乡村学校的教师表示愿意把教室提供给他们作为应急过夜处，于是，青年旅舍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回到阿尔特纳后，席尔曼狂热地投入青年旅舍的规划当中，他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德国学校赞同自己的设想，即同意在夏天放暑假时把教室腾空，搬出桌椅，摆上架子床，在上面铺上草褥子。在他当时任教的奈特学校（Nette-Schule），席尔曼果断地做出榜样，每个假期都把他的教室改造成首批“公立学校学生旅舍”。与此同时，他开始寻找支持者。他找到了同样“痴迷远足”的工厂主威廉·明克尔

（Wilhelm Münker），后者成了他最积极的支持者。明克尔是个激情满怀的环境保护倡导者，在业余时间经常写些批评现代文明的文章，比如《通往伐木道的铁路》[3]（*Die Eisenbahhn auf dem Holzwege*）。他后来成了青年旅舍运动中负责组织事务的领导人。1912年，作为所有青年旅舍之母的阿尔特纳青年旅舍终于打开了它那中世纪古堡的大门，正式开张迎客。自豪的旅舍总管老爸的名字叫作：理查德·席尔曼。



德国北威州绍尔兰的阿尔特纳古堡，世界上最古老的青年旅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席尔曼也被征召入伍，青年旅舍的蓬勃发展中断了。不过，尽管如此，到1920年时德国已有逾千家青年旅舍，而且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十三年后又翻了一番。

这时，在德国之外的国家里，青年旅舍的教育思想也开始受到关注。1932年，国际青年旅舍联盟成立，理查德·席尔曼担任联盟主席。在这个国际青年旅舍联盟成立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工作语言是德语，尽管代表们来自中部欧洲的所有国家，甚至英国也出席了。1935年，席

尔曼以国际青年旅舍联盟主席的身份出访美国，美国的新英格兰两年前成立了第一批在其创始人所倡导意义上的青年旅舍（Youth Hostels）。在那个时候，这位创始人还能够满腔热情地高呼："一切民族和种族的教育者们，同你们的青少年联合起来，用漫游和青年旅舍的生活体验塑造新人，这些新人将遏制败坏道德的物质至上主义，确保真正的和平！"

在此期间，在他自己的国家里，情况看上去已经非常晦暗。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的希特勒青年团早在1933年4月就已经强行把青年旅舍联盟据为己有，其借口是青年旅舍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渗透。起初席尔曼和明克尔还以为他们可以用某种方式同这帮穿褐衫爱游行的家伙一起做点什么。私下里他们嘲笑这个帝国青年团的头子，说他"背上从来就没有背过背包"，更不用说曾经在青年旅舍里住宿了。席拉赫的宠儿约翰内斯·罗达茨（Johannes Rodatz）——席拉赫把他任命为"德国青年旅舍全国联合会领导人"——被他们叫作喜欢"开快车的头儿"。对希特勒青年团的"青年冲锋队"，这两位青年漫游运动的创始人则更是摇头。令他们惊异的还有这帮家伙所标榜的爱国主义，即宣称："在野外趿拉趿拉地走来走去，对于促进我们民族经济和文化的重新崛起做不出多大贡献。今天的口号是：'把漫游队伍变成战斗队列！'"在20世纪30年代的通信中，两人痛心地抱怨，在这个时期，不论他们什么时候走进森林，都再也遇不到漫游的年轻人了。在纳粹鼓动者脑海里浮现的"钢铁般的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种）"候鸟"式与自然结合的浪漫主义的一个相当遥远的表亲而已。

威廉·明克尔1933年9月就停下了青年旅舍的工作。理查德·席尔曼尽管已被从所有官方职务中排挤出来，却还坚持办着他心爱的阿尔特纳古堡青年旅舍，一直到1937年。这时，连他也实在无法忍受罗达茨及其同伙的刁难，于是回到了陶努斯山。

席尔曼和明克尔都不是纳粹党人。不过若要说他们是抵抗者的话，那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比如，凡是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事，哪怕是同像威廉·利南肯普费尔（Wilhelm Lienenkämpfer）那样的铁杆纳粹党徒面对面地斗争，明克尔也从不因害怕而退缩，那个家伙1938年在《绍尔兰山区信使报》（*Sauerländischer Gebirgsboten* ）上发表文章，大谈什么“从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的角度看环境保护”。就其所担任的“拯救阔叶林委员会”主席身份而言，明克尔从思想上看与帝国林业部长戈林的“永久林”方案是颇为靠近的，这个方案至少在戈林上任的头几年曾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方向做出规定。如果读一读明克尔在1945年之后写下的信件，就会从这位立场始终不变且激情满怀的文明批评者那里得出如下结论，那就是：把德国的青年漫游运动搞砸了是“第三帝国”所犯下的最大罪恶。

1949年10月，也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刚几个月，德国青年旅舍联合会总部在阿尔特纳重新建立。时年已75岁的席尔曼和明克尔两位先生被任命为名誉主席和名誉理事。《青年古堡书屋》（*Jugendburg-Bücherei* ）出版人在纪念册前言中，以一种传统与现代德国修辞手法的独特结合方式宣称：“40年来，也就是说在足有一个人的人生那么长的时间里，每当提到和描述青年旅舍的时候，它越来越多地被看作一个真正的德国的理念和创造，而且的确如此，几乎再没有什么行为能够像借助于青年旅舍而兴起和拓展的青年漫游运动那样，在如此深广的意义上体现出我们人民性格中独特的德意志精神……因此，青年旅舍依照其创建者的意愿，在最崇高的文字含义上成为各流派和各民族青年真正相会的家园，它是和平的纪念碑，秩序、洁净、教养与相互理解的绿岛。”

不知今天的“草狮子”活动组织者是否还会赞同这样的语句？如果让“埃里温广播电台”[4]来回答，那么答复肯定是：“原则上是这样的”。难道在我们今日健康活动的填充物后面没有隐藏着同样的世界观内核吗？克服一切局限的和平主义共识难道不是在自然中才生长得最旺盛

吗？那些已经退化了的大城市里的孩子们，尤其是那些离教育很远从而同时也离自然很远的阶层的孩子们，难道不应当重新被带到野外的自由空气之中，去学会区分山毛榉和冷杉，去体验草莓并非生长在冰柜里而是生长在灌木的枝头，而且真草莓比加了化学添加剂制造出来的草莓冰激凌更“有味儿”？当然，没有一个“绿色的”教育工作者嘴里会说出“教养驯化”这个词，以用它来说明其生态训练的本来含义；他们也绝对不敢带上儿童和青少年去“暴走”，那里面最精彩的体验就是在林中小溪里做空气浴、阳光浴和光脚嬉戏。如今，“休闲”已经成为一种舒缓的、“玩耍般的”活动了。

或许，假如理查德·席尔曼还在世，他会把“梭拉来发来”太阳能手推车连同“太阳能野炊”一起看成是腐化堕落的典范并因此而要求举办久经考验的篝火晚会。当然他也很可能会热烈欢迎这辆拯救气候的手推车。不过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他一定会亲自去推这辆车。早在1909年他就已经明确宣布在青年漫游活动中应当由谁来掌管能源供应：“谁也不许带火柴。‘宝贵的火种’只能由我一个人保管。”普罗米修斯可不是漫游带队人呀。

作者：特·多

译者：郑冲

参阅：简便晚餐，兄弟树，裸体文化，创业时代，幼儿园，高地丘陵，爱整洁守秩序，社团迷，林中寂寞，徒步之乐

---

[1] “草狮子”（Graslöwe）是德国联邦环境基金会（Deutschen Bundesstiftung Umwelt，DBU）2009年设定的标志，专用于青少年环境保护教育的项目或活动。

[2] 候鸟运动1896年兴起于柏林施泰格利茨，当时城市受工业化发展影响，与自然的距离日益拉大，在浪漫主义理想鼓动下，学生们希望挣脱憋屈局促的学校和社会氛围，到自然环境中去寻找自己向往的自由的生活方式。

[3] 该文章标题Die Eisenbahhn auf dem Holzwege中，auf dem Holzwege是成语，表示某事做

错了，在此为双关语，既可指铁路修进了森林（修在了伐木道上），同时也指责这事做得不对。

[4] 埃里温（Eriwan）是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温广播电台”并非真实存在的广播电台，而是在苏联时期被借用来在讽刺苏东当局的政治笑话中作为回答者，回答通常以“原则上是这样的”开头。

幼儿园

谁一听“幼儿园”这个词，脑海中便浮现像拱出地面的洋葱头或灌木丛中生长的鹅莓般的小人儿。无须为此不好意思，这种想象完全符合幼儿园发明者的原意：“上帝庇护下的，有经验有见识的园丁按照自然规律精心维护的花园里，最宝贵的作物，人，人类的幼苗——儿童在这里领受上帝与自然的教育。”

1840年6月28日，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Friedrich Fröbel）在图林根布朗根堡（Blankenburg）地区鲁多尔（Rudol）市附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当然，之前在德国有过白天可以把孩子交给别人看管的地方，这样的地方自称“儿童寄养所”。它们不过是给穷人的孩子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与此不同，福禄贝尔是一位充满激情的“人类教育者”。他出身于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从小失去了母亲。青年时代跑到瑞士的伊费尔滕（Iferten）去当家庭教师，目的是结识当时最有名的教育家约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裴氏的教育理念来自卢梭，他认为儿童虽然也需开发智力，但更多的是要教育他们过一种俭朴、虔诚、接近自然和手工劳动的生活。这一点深深打动了福禄贝尔。

早在1829年，福禄贝尔就已经制定了一整套“护理和教育三岁至七岁儿童”的方案。与1774年在德绍建立第一所“慈幼院”的约翰·贝恩哈德·巴泽多（Johann Bernhard Basedow）不同，福禄贝尔不主张培养小神童。他不想建立学前班，让三岁的孩子学读书写字，六岁的孩子用拉丁语交谈。他要的是儿童天性的自由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将人的本质中

天使那一面”开发出来。继巴泽多之后，新教牧师克里斯蒂安·格特希尔夫·萨尔茨曼（Christian Gotthilf Salzmann）在哥达附近的施纳普芬塔尔（Schnepfenthal）又建了一所育儿院，那里搞“成绩排行榜”，用黄颜色的小钉子显示每个孩子的努力程度。福禄贝尔不赞成这一套。

对神学家奥古斯特·赫尔曼·弗朗克按虔诚主义教旨于1695年在哈勒附近的格劳哈建立的孤儿院和校营，福禄贝尔更是坚决反对。虔诚的神父虽然也把他的院校叫作“植物园”或“整个国家的苗圃”，但是它与福禄贝尔所憧憬的乐园大相径庭。福禄贝尔是卢梭的信徒，他从孩子都是无罪降生出发，认为教育者的主要任务是不要让孩子被人为地破坏了天性。而虔诚主义者的主张是人之初，性本恶，需要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好人。

“你们瞧那些小孩子，在娘胎里就已经种下了恶习，乖戾、执拗、不听话，等到稍大一点儿，自恋、自尊、自吹、报复、欺骗等就都暴露出来了。”宗教改革后的神学家约翰·阿恩特（Johann Arndt）给孩子们开的这张恶劣证书正是弗朗克教育思想的基础。他最重要的教育目标是“摧毁儿童天生的个人意志”，让有罪的孩子学会服从上帝的意志，最有效的办法是过严格规定的日常生活，每天要做的就是劳动、学习和祈祷。游戏和快乐被视为魔鬼的诱饵。谁一旦被发现在嬉戏，便要受到惩戒。

虽说福禄贝尔幼儿园远不像后来20世纪60、70年代的幼儿园那样无政府和反权威，但虔诚主义的那套训练方式已经让这位敏感的教育改革家无比伤心。弗里德里希·席勒曾把游戏誉为人类存在的理想方式。对福禄贝尔来说，游戏恰恰是开发儿童内心最优秀的那一面不可或缺的形式。“上帝在世界上，在草地和田野里写下了人类的教育大纲，我要在儿童游戏、生活乐趣中写下人的教育读本。”这个教育读本中并没有让孩子为所欲为或陷于污浊。关键词叫作“游戏指导”。为了有针对性地启

发孩子们的细微运动机能、想象力和创造力，教育家把半圆柱形、球形和方形小木块给孩子们玩，至今，在每一所水准较高的幼儿园里仍然可以见到这样的“福禄贝尔积木”。唱歌也是积极开展的一项活动：“小汉斯蹲在坑里睡着了，睡着了，可怜的小汉斯，你病了吗？你跑不动了吗？小汉斯，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



忠实于幼儿园之根本宗旨：男孩懂得了，冰柜里长不出生菜。

最根本的重点活动其实是在园地里劳动。园地不仅仅是孩子们学会有效使用双手和区分苹果和鸭梨的地方。幼儿园要给孩子们打开重新回到伊甸园的入口，那是他们的祖先因犯罪而失去的。同时，福禄贝尔还想以此告诉妇女，她们也还有机会，至少是从后门被放进去。

马丁·路德告诉过人们，为孩子们做出贡献和牺牲是可恶的成年人或许可以求得灵魂安宁的唯一途径。新教教徒福禄贝尔继承路德的使命，除了幼儿园以外，他还建立了专门培养幼儿教师的机构。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母亲与育儿儿歌》（*Mutter-und Koselieder* ）遵循的宗旨是“让我们的孩子好好成长”。

在福禄贝尔看来，幼儿园的任务绝不是给那些没时间或没兴趣整天自己照料孩子的母亲减轻良心上的负担，她们可以知道，自己去干别的事情时，孩子有人好好照管了。母亲在家里的教育和受过培训的老师在幼儿园的教育应该是紧密结合进行的。“人的性情是深深植根于天性之中的，但是人必须把两方面生动地统一起来，一方面追求与众不同、个性和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寻找大众化、集体和共同。”幼儿园的园地正表现出这样的双重性：中心是个“不融合的个性园”，每个“孩子”可以自由种植，让作物表达“自己独特、深层、充满灵气的未受干扰的心境。”围绕着这座特立独行小岛的是一个“普通的、共同的”园地。

普鲁士王室对这种自然作物的集体主义——在其保护下个性将第一次真正得以张扬——深表怀疑。1851年8月，幼儿园作为“福禄贝尔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遭到禁止。虽然福禄贝尔崇拜者中不乏名人，比如沙龙女主人拉埃尔·瓦恩哈根的丈夫卡尔·奥古斯特·瓦恩哈根·冯·恩泽（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但他们的抗议无济于事（瓦恩哈根·冯·恩泽坚信，普鲁士文化部部长那个“蠢货”肯定是把弗里德里希和

卡尔·福禄贝尔搞混了。后者是幼儿园创始人的侄子，汉堡女子大学的校长，是主张妇女教育及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先驱）。

直到另一位贵族血统的福禄贝尔崇拜者、女男爵贝尔塔·冯·马伦霍尔茨-比洛（Bertha von Marenholtz-Bülow）出现，才在1860年4月恢复了幼儿园。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本人那时已去世了八年。虽然大师曾对这位女弟子颇有微词，说她是个“蛊惑者”，“折腾了半天也没搞出一所幼儿园来”，但是女男爵完成使命的激情丝毫不减。她的足迹遍布伦敦、巴黎、苏黎世、日内瓦、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由于她的努力，幼儿园在19世纪下半叶成了德国的出口畅销品。至今英语和其他多种语言中的“幼儿园”都直接使用德语原词。

福禄贝尔的继承人几乎都是妇女：女男爵马伦霍尔茨-比洛的一个侄孙女1874年在柏林建立了第一个“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之家”，目的是“改善幼儿照料和青少年教育”以及“对妇女进行家政和教育的职业培训”。内莉·沃尔夫海姆（Nelly Wolffheims）的追求听起来更具革命性，她试图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福禄贝尔结合起来；1922年，同样是在柏林，建立了德国第一所心理分析幼儿园。

德国人在儿童早期教育方面投入的激情和努力与他们发展林业的激情颇为相似。森林遭到不断深入的工业化的威胁，只有当它变为科学管理的林区才能得以生存。同样，幼儿所需要的母亲的关怀受到不断深入的妇女解放及就业的威胁，只能通过幼儿园来代替。谁是新设施的真正获益者，对此两个领域都是从一开始就有争论。反对进步的认为，获益的是工业界，可以不断获得原材料和便宜的劳动力。支持进步的坚信，林区和幼儿园并非应急措施，而是能够实现第二潜力：林区是更健康的森林；与在家里长大的孩子相比，幼儿园教育出更幸福的孩子。

看看眼下，古老的争论没有停止。支持进步的人还是认为，幼儿园是那些出身贫困的孩子改变命运之唯一机会。反对进步的人则根据社会

学原理提出母子分离会伤害幼儿，或者提到德国历史上的两次迷途，幼儿园不是为孩子的身心健康服务，而是为独裁制度培养合格的成员。

奇怪的是，如今，某些“左派”对建公立幼儿园大声疾呼，但是对建林区却深恶痛绝；而某些“右派”的好恶则正相反。对此的解释大概是，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未曾放弃这样的希望：让自然总还保留一些原始的形态吧。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个听着电锯噪声不会睡不着觉的，却听不得被狠心妈妈送进托儿所的孩子哭。而另一个在幼儿园看到了孩子光明前途的，却会为那些被伐倒后堆在路边的树木落泪。

德国人还将长久地把对于所失去的乐园之渴望移情到“森林”和“母亲”身上。但是新的认识也已萌生，林区和幼儿园虽然不是将来的乐园，但它们提供了亚当和夏娃做梦也想不到的活动空间。

作者：特·多

译者：徐静华

在福禄贝尔幼儿园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孩子们玩杀猪》

有一次，孩子们看到爸爸杀了一头猪。下午，当孩子们聚在一起玩耍时，一个孩子对另一个说：“你当小猪，我是屠夫。”说着拿起一把刀，照着弟弟的脖子就捅了过去。正在楼上给最小的孩子在木桶里洗澡的妈妈听到尖叫声，立刻跑了下来，见状，一怒之下从那个当“屠夫”的孩子手中夺过刀子刺进了他的心脏。转身快跑上楼去看木桶里洗澡的那个娃娃，可怜他已经躺在水里淹死了。妈妈吓坏了，绝望中听不进乡亲们的劝阻和安慰，上吊自杀了。爸爸从地里干活回来，看到这一切，伤心至极，不久也死去了。

选自《格林兄弟童话集》，第一卷（1812年）

参阅：兄弟树，青年旅舍，母亲十字勋章，爱整洁守秩序，狠心的娘，私人菜园，女人

教会税

最早征收教会税的是代特莫尔德的利珀亲王国（Lippe-Detmold）[1]、奥尔登堡（Oldenburg）[2]和萨克森。

“统一后的德国就其实质来说不是一个基督教精神凸显的国家，它既不是天主教国家也不是新教国家。其基督教特点仅仅是缴纳教会税。”这是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明镜》周刊创始人鲁道夫·奥格施泰因（Rudolf Augstein）1991年在该杂志的一篇社论中的观点，这位具有自由精神的出版商堪称损人大师。

是该做个祷告的时候了吧？我们有个妥协性建议：破例少做一次瑜伽晨练，试试下面这段文字的功效。既可大声而清晰地朗诵，也可小声喃喃自语，甚至可以回忆第一次念它时的情景。祈祷吧。

> 我父在天，愿尔名圣，尔国临格，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所需之粮，今日赐我，我免人负，求免我负，俾勿我试，拯我出恶，以国权荣，皆尔所有，爰及世世，诚心所愿。[3]阿门。

这就是拿撒勒的耶稣的祈祷经文，他教他的门徒们如此向在天之父祈祷。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和死裤子乐队（Die Toten Hosen）都为之谱过曲。它也是马丁·路德的主祷文，1545年他曾用德语这样祈祷。长期以来人们在德国最大的基督教教会之一——收税的教会——就是这么祈祷的，大家都乐于公开干预教会的事。德国人愿意交税，但把交税视为公民查账权力合法化的最佳手段。他老老实实交税，可他也喜欢审核。比这更甚的是：通过缴税成为教会的一员，教会对他来说成了一种组织，《圣经》成了章程。纳税的

公民宣布自己为业余布道者。他有本事把一切，包括《圣经》都变成使用说明。在他眼中向在天之父祈祷的经文应该是这样的：“你，上帝，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愿人都尊崇你的圣名。你的正义之世来临，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赐予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饮食。免除我们的罪，就像我们饶恕他人之罪。不要让我们出卖你，而是救赎我们出邪恶。”

这就是2006年“翻译成恰当语言的主祷文”。它经过了消毒，特别适于递交给国际妇女论坛。路德曾让祈祷拥有庄严的仪式，从而让祈祷成为永恒的咒语；主张男女平等的人则让主祷文的语言适应民政局的需要，把关注点转移到福利事项上。他们的主祷文是主祷文的终结，他们却认为这是拯救了主祷文，并同时也拯救了他们自己，而他们为此毕竟也交了税的。

这个我父我母把教堂变成了招待所和避难所，礼拜仪式变成了社会福利工作。这样所有的事都名正言顺了，而且一切都进行得秩序井然。

现行的对教会进行资助的规定是件有德国特色的事，它是19世纪开始执行的。这主意是国家行政机构想出来的，开始只在德意志帝国的部分地区实施。



尽管教堂的长椅鲜有人光顾，来者仍旧难逃捐款义务。

虽然别的国家也有各种税收和捐款，这些钱部分地替教会带来了好处，但没有任何地方以和税务局定协议的方式征收教会税。税务局甚至为此收取手续费。

那么始作俑者是谁呢？拿破仑。当然是那位轻浮的间接伤害大师。这回是1801年他所缔结的吕纳维尔（Lunéville）和约，阿尔萨斯（Elsass）和洛林（Lothringen）划归法国所有。莱茵河左岸土地的世俗拥有者，也就是德国贵族的损失不得不靠把莱茵河右岸修道院和教会土地还作俗用来补偿。这样一来就断了僧侣们的生计，所以作为应急措施先要用税收来补救。

这项税收虽然是作为特殊规定设想的，但像所有卓有成效的特殊规定一样它不断被应用。谁要是只能靠政策作为支持国家财政的手段，那他怎么能不困窘呢？当时德意志土地上的一些小国立刻学了这一招。1827年利珀亲王国第一个征收教会税，接下来是奥尔登堡（1831）、萨克森（1838）和巴伐利亚（1892）。最后走这步棋的是普鲁士（1905/1906）。教会税仅仅是教会土地还俗的代价还是更甚？难道它不也是对有关上帝与俗世的辩论的一种回避，是政教分离过程的一条捷径吗？用天主教的话来说：公民信手把钱币扔进了国家伸向他的募捐袋，大弥撒结束后教会谨慎地接过钱币，国家同样谨慎地为这项服务收取一点儿微薄的手续费。

教会税属于地方事务，皇帝对此一直没做过什么统一规定。据说是魏玛共和国才把它写进了宪法，从而为今天的规定奠定了真正的基石和绊脚石。

纳粹时期——像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样——沿用了这一规定。德国基本法则明确指出据魏玛共和国宪法延续此规定，因此它就以那部宪法

为榜样委托各州立法机构去负责此事。

此外不光两大基督教教派有收取教会税的资格，其他一些信仰团体也有此资格，比如犹太教区、天主教老教派或是宗教自由团体。有些行使这一权利，有些则不然。汉堡的丹麦海员教会自己征收此税。许多自由教派放弃了教会税，但也没有因此而遭受经济危机。

教会不会因为缺钱而衰亡。

教会税不仅仅涉及宗教团体。按照宪法法院的观点，信仰不同世界观的团体也有信仰之争。那么也可以为人道主义者征收“教会税”了，起码这说得过去。

阿门？

作者：里·瓦

译者：丁娜

参阅：诸侯割据，宗教改革，福利国家

---

[1] 历史上的一个国家，首都设在代特莫尔德。利珀建国于1123年，1871年利珀加入德意志帝国。1918年，国王退位，利珀改为利珀自由邦。利珀如今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一部分。

[2] 也是历史上的一个国家，地理位置在今天下萨克森州一带，1871年并入德意志帝国。

[3] 文理和合译本《新约》“深文理”，1906年。转引自滕琪《经典的认同：从〈圣经〉翻译看〈圣经〉在中文语境内的经典化》，载《维真学刊》2008年第2期。

庸俗艺术品

要讲清楚什么是庸俗艺术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原因也许不在于各种各样的艺术观念，而是和庸俗作品的功用有关。庸俗的作品总是很具体的东西，不论它是一件当作储蓄罐用的瓷器大象，一个鎏金蘸水笔上的独裁者头像，还是希腊餐馆神龛里的普罗米修斯神，或者是意大利南蒂罗尔地区民居阳台上的木雕圣母像。

庸俗艺术品甚至常常不是那件东西本身，而是对那件东西的解释。一头鸣叫的牡鹿身后的那片风景，才是真正让这只鹿成为人们将之称为鹿的原因。《云海游人》[1]（*Der Wanderer über dem Nebelmeer*）这幅画并不是浪漫派的庸俗作品，而是后人连篇累牍地将这幅画用作书籍装帧的封面使之成了俗品。如果用一个令人难堪的标准来表述，那么俗气的定义就是，一样让你无法再看下去的东西，否则你会忍俊不禁。

关于庸俗艺术品到底是什么，可以有各种各样揣测的说法，最先可以从这个词本身开始。“庸俗艺术品”（Kitsch）一词首次有案可稽的，是19世纪70年代慕尼黑的艺术品交易，但也有人认为它出自犹太人说的意第绪语或是英语。不管怎么说，“庸俗艺术品”从慕尼黑流传开来，对艺术的争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引发了拍卖界的各种丑闻。此外，这个词的德文写法到今天也还一直在法国和英语国家使用。对所指已很具体但涵盖仍不够明确的内容，人们乐于用外来词表达。

剩下的其他问题涉及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这里不言自明。

随着市民社会以及它的制造技术和审美观念的出现，也产生了庸俗

艺术。艺术品的可复制性直接导致了庸俗作品的流行。卢浮宫里的《蒙娜丽莎》不是俗品，但是博物馆商店里出售的、复制在明信片或者是茶杯上冲着我们挤眉弄眼的蒙娜丽莎却是俗品。如果半数的房间走廊里都挂着霍普（Edward Hopper）[2] 的名画《酒吧》（*Bar*），那么这张廉价的装饰画只能是件俗品。

大众社会要求大众艺术。1870年前后，大众艺术首先提供的都是纪念主题的艺术品。这时正值创业时代，人人都想有一个妆点花园的小陶俑，大家都想用这个小陶俑来表示和周围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每个人都想成为当中的一员。这种生活态度在德国之所以特别突出，其原因或许与德国社会发展较晚，但速度很快有关。简言之，这个时期曾经大量需要牡鹿和小陶俑。



虽然久已不是“德国制造”，但任何一本写德国人的书都不会少了它——花园陶俑。

20世纪的情况也不例外。每种社会制度都有它自己的庸俗艺术：帝国时期的，宗教上的，纳粹时代的和共产党的。除此以外，还有消费社

会无时无刻不在的庸俗艺术：几乎没有什么是不俗气的东西。只要看看“盖尔森基兴式的巴洛克风格”家具，任何人都可以从别人那里挑出毛病，虽然平时大家都是一团和气。真所谓不“打”不相识。

但是，消费社会在这里还玩弄了一个手腕，即允许大家对于庸俗艺术心照不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问题真的就一下子解决一半了吗？

在庸俗艺术这个问题上，英语国家早就用波普文化一词使了个瞒天过海式的障眼法。波普文化之所以存在，乃是基于接受和肯定的观念。它既认同《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也不反对《毛泽东》。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3] 的《玛丽莲·梦露》到底是庸俗艺术，还是上品？如果不是垃圾，那什么是上品？庸俗是垃圾吗，抑或二者都是“装腔作势”？

再说下去恐怕就是一场美国式的而非德国式的讨论了。但是，我们在此并非无缘无故地要把美国牵扯进来，我们也并非想要进行一场讨论，而是要对这个用词进行一番探讨。这里不得不承认的是，“庸俗”（Kitsch）[4] 一词是个绝妙的发明。光听它的发音，你就会觉得，好像发现了它和要说的那件事的关系。凡事只要和这个词搭上关系，那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庸俗是个威力强大的词，它尤其适合外行人使用，因为在讨论过程中它能让任何专业名词都变得多余。借用“Kitsch”这个说法，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翻在地。庸俗就好像是一种指控，甚至反驳它的企图都会变成事物性质的升级，就像“高雅的庸俗”这个油腔滑调的用词所表露出的内容一样。

作者：里·瓦

译者：吴宁

参阅：啤酒之旅，严肃文学和消遣文学，德国人的性情，玩具屋，私人菜园

---

[1] 《云海游人》是德国19世纪浪漫派画家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在1818年创作的一幅著名的油画。

[2] 爱德华·霍普（1882～1967），美国绘画大师，以描绘寂寥的美国当代生活风景闻名。

[3] 安迪·沃霍尔（1928～1987），被誉为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也是对波普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玛丽莲·梦露》和《毛泽东》是他的两幅名作。

[4] 又译媚俗。

诸侯割据

瓦莱里奥：“就半天时间，我们已穿过十几个侯国、七八个公国和好几个王国，人未松甲马未歇鞍。……见鬼！前面又要过境了；这个国家活像个洋葱头，就是一层一层的皮，或者像个套在一起的盒子，最大的里面除了盒子没别的东西，最小的里面什么也没有。”

（格奥尔格·毕希纳，《莱昂采与莱娜》（Leonce und Lena）[1]）

祖国究竟是何样，/泱泱大国是梦想。/诸侯割据天下乱，/江山社稷遭分抢。/奈何，奈何！祖国应该大无疆！

（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2]，1814年作）

在德国，恐怕没有人不曾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虽然说联邦制的想法不错，但所有这一切真的必须要像现在这个样子吗？说实话，谈到联邦制，人们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联邦参议院里那些相互掣肘的镜头。然后想到的是：周而复始的州议会选举日期，空洞无物、只为捞取政治资本的州议会选举战，州议会选举演说，动用联邦党团经费制作的州议会选举礼品，州议会竞选人，州政府官员和选民，议会席位得票比例分配制。此外，还有那些每个月去一次柏林的州长大人们，他们在联邦参议院里把本已够复杂的事情搞得更加错综复杂。尽管在联邦制进行改革和改革的决心很明确的情况下，他们还这么干。人们见到这些州长大人们从他们的座驾里出来；在前往柏林途中，他们一路都在看文件，文件涉及甲地的进山道路关闭问题，或是乙地的铁路道口事宜。一旦他们到达柏林后从座驾中出来，首都的记者们就一拥而上伸出话筒，向他们询问对于联邦政府政策的见解。

当看见这帮州长大人和州务秘书时，没有人不曾摇头叹气。他们在首都供养着看起来像使馆一样的办事机构，让人感觉下面的联邦州就跟外国一个模样。而真正行使政府权力职能的，是像卡塞尔市市长这样的一帮市长们。

让我们来看一下州政府制定的政策中最耐人寻味的几个例子吧：

——慕尼黑的树木保护条例规定，属于保护范围的树木，树围必须达到80厘米，测量高度应在100厘米处。柏林的测量高度为130厘米处。

——根据狩猎条令，在北威州通常允许使用翘板式捕猎箱捕猎，而在图林根州只允许针对野兔和肉食动物使用诱捕器具捕猎。

——在巴伐利亚只允许在“室外餐饮区”，即啤酒园吸烟。在其他州，允许在标明的吸烟区内吸烟。在柏林，可以在非出售含酒精饮料的“Shisha”[3]饮食店吸烟。在柏林、黑森州、北威州和萨克森州，凡营业面积小于75平方米、明确标明以出售饮料为主的吸烟饮食店无须提供非吸烟区。在萨尔州，由店主自己经营的小酒馆不在此列。在北威州，有吸烟者俱乐部，在这些指定场所里允许吸烟，如同黑森州、北威州和萨克森州一样，在一个非对外开放的团体内也可以吸烟。

——在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萨尔州、黑森州、北威州、不来梅州和下萨克森州，不允许女教师在校内戴头巾。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石荷州和德国东部的所有州，允许女教师在学校戴头巾上课。

有人可能会认为，事情恐怕远不止这些吧，的确如此。联邦制有它存在的充足理由和诸多好的方面，其中有些方面传统深远。但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并不念及它的好处，因为在我们眼里，事情原本就该如此。这一点恰恰是当今社会后果最严重的不良习惯之一：所有正面的东西和所有的福利都被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18世纪初期，在德语地区大约有五十所大学，英国只有牛津和剑桥。牛津和剑桥一直续存到现在，而没有一所德国大学今天能与之比肩。

不过，德国大学的可观数量倒是给了出身寒微才华横溢的学子出人头地的机会。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在《德国的天才》（*Der deutsche Genius* ）一书中的观点：“德国的知识分子较之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更加紧密地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德皇威廉帝国在当时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前工业化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不是工业化将新的领导阶层推到了前台，而是受过教育的公民。在当时情况下，他可以说是义务地拿出半天时间来打理国家的财务账目。行囊里背着道义的责任，他漫步在云海之上[4]。

德国联邦制的原则是融合性的，它贯穿在整个社会的结构中。1785年，就在古老帝国行将就木之时，德国还有1225份报纸杂志出版，而在法国仅有82份。今天，全世界五分之一的歌剧院位于德国——成为被毕希纳嘲弄成封建的洋葱头和套盒国家的不朽遗产。

这里，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联盟（ARD）总经理彼得·福斯（Peter Voß）关于节目设计方案说的一句话很合乎这一情况：“这个谁也学不了我们！”他似乎还应该补上一句：无论是在节目的多样性还是经营管理方面。联邦制的原则归根到底不仅是一个组织的手段，它还有兼容并蓄和规划管理的功能。德国各州都参与其中，它们有发言权和代表权，而且要表现出自己的存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联盟最重要的标志性节目，除了《每日新闻》，还有侦探片《犯罪现场》。这个系列片也是按联邦制设计的，各州立电台拥有至少一个自己的摄制团队，而且团队数目也是按照比例分配的。

然而在德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和平竞争社会的激烈反对者，而且他们把它视为一切坏事的根源。有“体操之父”之称的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1808年曾著书说道：“自德国有史以来的一切苦难，统统源自‘同乡会欲望’和‘小国寡民思想’。他们用同样的水洗礼入教，被同样的棍棒教训过，踩过同样的大粪，或从小开始就吃同样的肉丸、鱼、

沙拉、火腿、牛肉、黑面包、熏鹅和罂粟子麻花。因此，他们不再有所追求，而是统统被要求保持吃肉丸、香肠、鱼、沙拉、火腿、牛肉、黑面包、熏鹅和罂粟子麻花的本色——这一切使他们患上了‘同乡会综合征’，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对这类人，有谁还会把他们当回事呢？谁若是中了这种黑白颠倒之毒害，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当作泱泱帝国，把自家的房前院后看成百姓的家园，敌视其他民族和全人类，舍天下而贪舍彭斯特（Schöppenstedt）和席尔达（Schilda）[5] 那么一点弹丸之地——如此，他便助长了‘小国寡民’的习气，德国因之而毁灭。”

呜呼！读了这段高论，人们不禁要问，德国何以会落到这种地步？当年，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无中央集权，也不具有号令天下的权威，而仅仅是国家机器的象征而已。在东方国家里，他或许被人用轿子抬着各处巡视，而在德国他被迫自己骑马从一个行宫走到另一个行宫，好像他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皇帝，而是一个豪华酒店的高级督察。

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没有这个皇帝，人们需要他的软弱，为了相互之间好打交道。旧帝国就是一副内部四分五裂的空架子，所以对外必然显得十分可笑。

昔日的德意志帝国，有三百多个各自独立的王国，数不清的拥有特权的诸侯领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里，不仅民权和专制，机会和特权在表面的乱象中都能明显地各行其道，而且也为许多事情留下了未知的变数。当拿破仑大军压境时，这个空架子的弊端便暴露得一览无余。拿破仑不仅要打垮德意志帝国，而且要打垮它的象征。未曾想，此举反倒成全了德国人的民族国家的思想。对政治上统一国家的渴望，在反拿破仑战争中成了大多数德国人的一种情感。谢了，波拿巴先生！

其时，德国的精英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民族的思想，或者叫语言民族的思想。随着拿破仑的入侵，德国大一统帝国的思想随之而生，其结果就是德皇威廉二世时代的到来。普鲁士是反拿破仑战争的最大赢

家。由于奥地利的利益范围远远超出了德意志文化圈，此时正自顾不暇，所以，普鲁士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个竞争对手淘汰出局。



新行政区划：德国现在由**16**个联邦州组成。**150**年前这块版图上曾有过**40**个王族徽章，**250**年前甚至多达**300**个。

可能有人会说，当时还有和普鲁士竞争的第三种势力的存在，即自汉姆巴赫集会（Hambacher Fest）[6] 以来，从法兰克福的保尔教堂里走出来的那批革命家以及他们的前辈们。但是，他们毫无成功的机会，原因不仅在于普鲁士的力量过分强大，而且也因为他们自己的那套议会主义的主张。有人怀疑，如果他们得以成功，充其量不过是已经灭亡了的帝国体制的重现。普鲁士在抗击拿破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让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7] 这个临时体制的民众心悦诚服。在维也纳会议上，德意志邦联作为旧帝国的替代秩序而被建立。这个联合体的成员国和属于邦联的诸侯领地如下：

奥地利帝国及其部分世袭领地

普鲁士王国及其部分省份

巴伐利亚王国

萨克森王国

汉诺威王国

符腾堡王国

巴登大公国

黑森大公国

卢森堡大公国

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国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国

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国

奥尔登堡大公国

黑森选帝侯国

荷尔斯泰因公国

石勒苏益格公国

劳恩堡公国

拿骚公国

布伦瑞克公国

萨克森-哥达公国

萨克森-科堡公国

萨克森-迈宁根公国

萨克森-希尔德布尔格豪森公国

安哈尔特-德绍公国

安哈尔特-克腾公国

安哈尔特-伯恩堡公国

林堡公国

霍亨索伦-黑欣根侯国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国

列支敦士登侯国

利珀侯国

罗伊斯长系侯国

罗伊斯幼系侯国

绍姆堡-利珀侯国

施瓦茨堡-鲁多尔斯塔特侯国

施瓦茨堡-松德尔斯豪森侯国

瓦尔德克侯国

黑森-霍姆堡伯爵领地

不来梅自由市

法兰克福自由市

汉堡自由市

吕贝克自由市

作者：里·瓦

译者：吴宁

参阅：基本法，文化民族空想，芦笋季，莱茵河——父亲河，社团迷

---

[1] 《莱昂采与莱娜》是德国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于1836年创作的一部喜剧。

[2] 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769～1860），德国作家和诗人，反拿破仑战争时期积极的爱国人士。

[3] “Shisha”原为一种阿拉伯水烟，在德国有专门吸这种水烟的饮食店，只允许成年人进入，顾客不以用餐和喝饮料为主，而专为吸烟而来。这种“Shisha”店在外部一般都有明显标志。

[4] 作者在这里借用德国浪漫派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名作《云海游人》来强调当时知识分子所起的重要作用。

[5] 舍彭斯特和席尔达分别是德国下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6] 汉姆巴赫集会指的是1832年5月27日至6月1日在德国黑森州和巴伐利亚州交界的汉姆巴赫城堡举行的一场群众集会活动，被视为王朝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反对派运动的高潮，集会者反对“德意志邦联”的复辟企图，要求民族统一、自由和民治。

[7] 德意志邦联，存在时间是1815年6月8日～1866年8月23日，是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成立的一个松散组织，目的是团结1806年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后余下的德意志邦国。

战争与和平 [1]

1618年，可怕的战争开始了，后来人们把它叫作三十年战争。在布拉格发生了“掷出窗外事件”，哈布斯堡国王的官吏被人从城堡的窗户扔了出去，摔下深沟。波希米亚地方贵族闹起了革命，他们想要保有宗教——胡斯教，以及语言——捷克语的特权。于是，这场德意志土地上的战争开始了它的进程。

一开始先是来了一颗“扫帚星”。它那拖着火焰的尾巴预示着饥饿、瘟疫和死亡。

在德意志人（Deutsche，老写法也作Teutsche）那里，战争状态持续的时间已经很久了，那是宗教信仰的战争。双方都做了很好的战争准备。宗教改革方和反宗教改革方、天主教和新教相互对立。这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了，阴谋和争战充斥其间。后来，成立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ischer Bund），这是第一个新教的军事联盟，然后是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带来的“停战状态”。这一切都在传递着信息，正如后来所证明的那样，一切都是先兆。

围绕着“德意志人的自由”，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和普遍声嘶力竭的叫骂，还有实实在在的民众意识，不过这种意识还远未达到令人大为吃惊的地步。1608年，“新教联盟”（Protest antische Union）成立，这是新教诸侯的联盟，反对皇帝、反对罗马，并且也反对哈布斯堡家族。1609年，天主教徒们组建了“天主教同盟”（Liga）作为回应。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Gustav II. Adolf）——后来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人物——成为瑞典国王。1612年，变节的尼德兰“在土耳其人”那儿设立了自己的公使馆。1613年，罗曼诺夫家族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选为俄国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就此建立。1617年，举行了纪念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一百周年的庆典。瑞典和莫斯科签订了《史托波瓦永久和约》（Ewigen Frieden von Stolbova）。决定已经做出，骰子落下来了。

初期的战役开始打响。约翰·采克拉斯·冯·蒂利（Johann t’Serclaesvon Tilly）和阿尔布雷希特·文策尔·奥伊泽比乌斯·冯·华伦斯坦（Albrecht Wenzel Eusebius von Wallenstein）是天主教同盟后来的统帅，也是最著名的统帅。恩斯特·冯·曼斯菲尔德（Ernst von Mansfeld）则指挥着新教诸侯的军队。1620年打了白山战役，在布拉格郊区。新教诸侯、波希米亚人和平民等级的军队被天主教的军队打得大败，几乎被歼灭。

天主教雇佣兵的愤怒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听说新教的教徒们把教堂里的画像拿走，还把画像上圣徒的眼睛戳穿之后，他们怒不可遏。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实际上关键在于波希米亚贵族等级的特权，而皇帝为了反对新教准备牺牲这种特权。可是老帝国却是靠它这种形态上的不对称存在着。

1624年，玫瑰十字会（Rosenkreuzer）及其秘密社团正期待着世界的末日。雅各布·伯麦（Jakob Böhme），17世纪伟大的德意志神秘主义者，在这一年去世。1625年，英国、尼德兰和丹麦为了拯救“德意志人的自由”而建立了海牙同盟（die Haager Allianz）。战争于是笼罩了整个中部欧洲。1626年，瑞典人在普鲁士安营扎寨，他们同样留下了一片焦土。正如当时的人所讲述的，两派的军队及其支持者扫荡过来又扫荡过去，把生活世界变成了战场，到处散落着磨坊的石碾，烧红的铁块；并且还有人说，曼斯菲尔德曾经到过那里，这位将领后来在转战途中病发身亡。传说，临终之前他写下遗嘱，然后披挂上全副甲胄，在生命的最

后时刻，由两位亲随搀扶，站立着等待死亡来临。

1627年，波希米亚建立了专制的国体。法国和英国之间因为胡格诺教派而爆发危机。

1628年，华伦斯坦包围施特拉尔松德的行动失败。

1629年，哈布斯堡与丹麦在吕贝克签订和约。

1630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波莫瑞海岸登陆。华伦斯坦被皇帝解职。天文学家兼占星学家开普勒（Kepler）去世。

1631年，法国和瑞典签订了贝尔瓦尔德（Bärwalde）协议，这是一项为拯救“条顿人的自由”的划时代的谅解，当时的列强们如是说。蒂利和戈特弗里德·海因里希·冯·巴本海姆（Gottfried Heinrich von Pappenheim）——皇帝的骑兵元帅，屠城马格德堡。

1632年，华伦斯坦再次以将军身份回到战场。古斯塔夫·阿道夫一路打到了帝国的南部。蒂利，天主教的狂热信徒，战死了。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巴本海姆在吕岑（Lützen）会战中阵亡。尼德兰与西班牙举行媾和谈判。

1633年，瑞典王国首相阿克塞尔·奥克森谢纳（Axel Oxenstierna）与莱茵河地区的新教一方建立海尔布隆同盟（Heilbronner Bund）。阿尔曼·让·杜·普勒斯，也即黎塞留公爵（Armand-Jean du Plessis，Herzog von Richelieu），法国的红衣主教，制订了向莱茵地区扩张的计划。

1634年，华伦斯坦遭刺杀。

1635年，法国公开介入德国内战。

1636年，瑞典军队在维特施托克（Wittstock）获胜。安德烈亚斯·

格吕菲乌斯写下他的伟大诗篇《祖国的泪》（*Trännen des Vaterlandes*），控诉战争造成的破坏。

1639年，天主教联盟的统帅奥克塔维奥·皮科洛米尼（Octavio Piccolomini）在泰昂维（Thionville）获胜。马丁·奥皮茨（Martin Opitz），著名的德国诗歌革新者，死于鼠疫。

1640年，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大选帝侯，接掌国务。在雷根斯堡召开帝国等级会议，主旨为结束德意志战争。

1643年，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被确定为和平谈判的地点。

1644年，瑞典与丹麦开战。

1646年，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Carl Gustav Wrangel）和亨利·德·杜伦尼（Henri de Turenne）——德意志土地上的瑞典军队司令和法国军队司令，在德意志兰互相配合，协同行动。瑞典人又打到了波希米亚。尼德兰人同西班牙人在明斯特进行和谈。

1648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尼德兰签订和平条约。瑞典占领布拉格。在明斯特，法国与德国皇帝连同帝国各阶层签订了“永久和平”条约，此外在奥斯纳布吕克同瑞典也签了和约。在欧洲，自由宪法和地理政治的均衡重新得以确立。瑞典借助于所获得的波莫瑞和不来梅，作为保证国（Garantiemacht）而成为帝国等级（Reichsstand）[2]，法国则获得大部分阿尔萨斯地区，巩固了其通向莱茵河的前沿地带。

三十年战争是后来两次世界大战的先兆。它之所以成为先兆，是因为其战火蔓延的范围覆盖了一整片区域，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它把大片土地变成了无尽争战之渊薮。还有就是它以意识形态论证战争目的，这也是先兆之一。

似乎，每个世纪一旦开始，地质构造板块立马就必须动荡一下，仿佛要把一切沉睡不醒的东西都翻转过来，全然不顾会造成多大损失。

1914年事情又发展到了这一步。一开始又是先来了一颗“扫帚星”。这回人们拿它开玩笑，毕竟经过了启蒙，而且大家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这颗彗星便出现在了搞笑明信片上，人们互相把它寄来寄去。然而，随后就再次出事了，向来如此。

突然间，所有国家都相互宣战，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疑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些决策之人，他们的平庸显而易见，他们本不想开战也是明摆着的，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会被认为是有能力做出重大决定的人。连威廉二世都是如此，更别提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了，这位早已被遗忘的帝国首相——既保守又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而且与社会民主党过从甚密——渐渐变成了个内政政治家。

实际情况是，欧洲这种19世纪当中靠外交谈判谈出来的均衡状态，在1914年已经无法再作为集体安全保障体系发挥作用。欧洲五国组成的神圣同盟在1815年能够遏制拿破仑，但百年之后却已只是一块化石。总体上看，这可说是因西部和中部欧洲工业化所致，但主要原因却是德意志帝国崛起成为欧洲大国，尤其是德国自己也这样认为。或许也可以这样说，维也纳会议时期的神圣同盟不认可小德意志方案。

当德意志帝国突飞猛进地发展，并在西方的领头经济大国英国的事务中插手时，中部欧洲的第二个国家，同为德意志人建立的多瑙河王朝，却在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现代化的问题上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当德意志帝国能够毫不费力地展现出民族国家面貌，与时俱进满怀期待面向未来时，多瑙河王朝却常常以上个世纪的遗存和早已经过时的国家形式的面目出现。正如向来常会发生的那样，在这种情形中，无数

力量都在施加影响，加快瓦解的进程。如此一来，大的、小的，不起眼的事件或者只要是个事件，都会变成灾难的起因。

1914年8月6日，《帝国官方公报》（*Reichsanzeiger* ）以特刊发表皇帝的战争动员令如下：

> 致德意志人民！
>
> 自帝国建立迄今，历四十三年，朕及朕之先祖不遗余力，维护世界之和平，冀于和平之世中促我之迅疾发展。惟敌对列强于吾民之劳作成果深妒之矣。向因意识到己之责任与力量，吾民对来自东西方及海峡对岸或明或暗之敌意诚忍受之。然今人欺我甚矣！彼敌扩军备战意图偷袭，竟令我袖手观之。人不容我以坚定之忠义维护我为其大国名誉而战之盟友，盟友若遭挫，我之力量与荣誉亦将同失。故此，而今须由剑戟决之！敌袭我于和平之中，我须拿起武器去战斗！任何犹豫动摇均无异于对祖国之背叛。事关祖先新建帝国之生死存亡，事关德意志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吾民当英勇抵抗，一息尚存，绝不后退！我们终将赢得这场战斗，纵与全世界之敌对抗亦在所不惜。德国只要团结一心，就绝不会被征服。前进，上帝与吾民同在，正如上帝曾保佑吾民之先祖。

对动员令发布后菩提树下大街上的气氛，《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 ）做了报道。“在菩提树下大街和王宫前”，报道中写道，“在动员令公布之后聚集起了数十万人。任何车辆均无法通行。谐趣园（Lustgarten）和王宫前的露天广场全部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填满。人们高唱着爱国歌曲，像有人指挥一般不断齐声高喊：我们要见皇上！大约六点半，皇帝在王宫二楼的中间窗户现身，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高喊乌拉欢迎他出现。爱国歌曲再次唱响。稍歇，人群安静下来。皇后走到皇帝身旁，皇帝向人群挥手，示意他要讲话。在深沉的寂静中，皇帝用一种在很远处也能够听到的、逐渐加强的声音开始讲话。他说：如果真的开战，任何政党都要停止活动。我们的身份只是德意志兄弟。虽然在和平时期有一两个政党曾经攻击过朕，但朕现在出自全副真心原谅它们。要是我们的邻国不乐意让我们享有和平，那我们希望——这也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德意志人的利剑将通过战斗夺取

胜利。

皇帝话音甫落，顿时欢声雷动，柏林可能从未有过如此震耳的欢呼。人们群情激动，又开始高唱爱国歌曲。

在此期间，按照施利芬计划，德国军队已经开进了中立的比利时。施利芬计划的设想是绕过法国那些经过加固的防线。

德军轰炸了勒文（Löwen）市——荷兰语也称作鲁文（Leuven）。图书馆，保存西方文化记忆宝藏的地方，被炮弹击中，15世纪印刷术刚发明时的古版书和许多珍贵图书在炮火中化为灰烬。敌方利用这一事件大肆宣传。为此，九十三位知名人士在一份《告文明世界书》（*Aufruf an die Kulturwelt* ）的答复告白上签名，其中写道："说我们的战争行为蔑视国际公法，这不符合事实。并没有什么毫无节制的残暴行为。可是在东方，俄国大兵大肆杀戮妇女儿童，鲜血浸透了土地；在西方，达姆弹撕碎了我们战士的胸膛。像你们那样同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结盟，把屈辱场景展现在世界面前，唆使蒙古人和黑人去攻击白种人的家伙，根本没有权利来扮演欧洲文明的卫道士。"

在签名者中，包括"作为德意志科学与文化代表"的如下人士：理查德·德梅尔（Richard Dehmel，印象派、自然派诗人）、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化学家）、恩斯特·黑克尔（Ernst Haeckel，又译海克尔，动物学家和哲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教会史家和神学家）、格哈特·豪普特曼（剧作家、诗人）、马克斯·克林格尔（Max Klinger，象征主义画家、雕塑家）、马克斯·利贝曼（Max Liebermann，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神学家、自由主义政治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马克斯·赖因哈特（Max Reinhardt，柏林德意志剧院院长、戏剧导演）、威廉·伦琴（Wilhelm Röntgen，物理学家，X射线也即伦琴射线发现人）、西格弗里德·瓦格纳（Siegfried Wagner，作曲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心理学家、哲学家）。据说这篇告白出自喜剧作家路德维希·富尔达（Ludwig Fulda）之手。与上述告白针锋相对，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尼古拉（Georg Friedrich Nicolai，生理学家、医生）起草了《告欧洲人书》（*Aufruf an die Europäer*），他特地为这篇回应配上这个恳切的标题，然而却只获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另外两个人的签名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不能只在军国主义和威廉二世的扩张贪欲中寻找。军国主义本身绝对有其民俗成分（folkloristische Komponente）在内。上一次战争发生在1870年，也就是44年之前。当军队开往巴尔干的时候，其实战经验，大概跟1990年的联邦国防军差不多。这些头戴德国步兵特有的尖顶皮头盔的士兵，其行为举止看上去与其说像是懂得作战技能的战士，不如说更像是头一回走进啤酒馆的新手大学生。而东部边界那边所谓的斯拉夫后院，其抵制并入德国统治下的中欧的反叛早已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个“后院”更愿意与挚诚协约[3]（Entente cordiale）——西方同俄国的联盟——并肩合作，以期能够实现各自的民族国家计划。首要人物当数捷克哲学家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4]（Tomáš Garrigue Masaryk），他依照旧时波希米亚的传统以政治游说者的身份四处活动，为此目的在战争期间甚至跑到了美国。

这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还在于，在皇帝统治之下的德国人本想向西方证明其竞争力，然而在西方看来他们只是些讨厌的竞争者。德国人越与西方相像，就越令人讨厌。而他们本来是想要张名片跨进西方这个圈子，为此还掏了不少钱。

所有这一切汇集起来，最终导致全面的利益封锁。使事情变得无可挽回的最后那一锤子，则是众所周知的外交上的愚昧之举。归根结底一句话：战争问题不能用战争责任问题来回答甚至是取代。

纵然是一场世界大战，其起因也可以微不足道。就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言，起因是哈布斯堡皇储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在特意去访问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时被刺杀。这个事件导致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而这又促使后者的保护国俄国走上战场，接下来最终导致西方大国法国和英国加入战争。于是，这块说德语的中欧地区，如民族主义者兼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瑙曼在其《中部欧洲》（*Mitteleuropa* ）一书中所称，很快就陷入两线作战，而这正是施利芬计划原本所要阻止的。它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



厌战，但好歹总算是生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柏林的士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特别是1919年和1920年在巴黎郊外那些贯彻了战胜国意志的和约的签订，总体上宣告了整个20世纪的走向及其悲惨的命运。有这样一种说法：19世纪的资产阶级世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终止，而且不仅在战败国的社会中如此，在战胜国也是如此。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大众社会第一次——为其匿名性所保护——走上了历史舞台。至于这种登台与其说是令人信服的，还不如说是强加于人的，

那是后话，暂时没什么意义。

在危机中，大众突然一下子就无法控制地投入了运动，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再能够使他们回归秩序。在战壕中体验到的一切——这场战争的毫无意义、战事的恐怖与惊骇、统帅们在军事行动中和政治上的笨拙，把他们对国家权威的崇敬驱除得一干二净。在群众运动匿名性的掩护下，此前还是官方组织的武装团体，转眼就变成了一群叛乱分子，变成了反抗当局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普遍的混乱当中，一种底层的世界主义获得了行动机会，它把资本的利益视为战争的起因和理由。从对战争的厌倦中生长出了阶级斗争的兴趣。这使卡尔·马克思看上去很有道理，然而与此同时——这点无人提及——这也正是参战者们的头号遁词。这些参与战争的人，突然间作为信念一致的无产者看到了共同的利益，而正是他们此前互相朝着对方射击了好几年。

而后，在1917年，先是在圣彼得堡，到了1918年以及在那之后，也在战败国，尤其是在两个德意志国家当中，人们变成了革命者，打算在慕尼黑、柏林、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事儿的结局众所周知，然而，在德国，因社会民主党人强烈要求节制而遗留下了爱走极端的运动：民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共和国无法安定下来的原因常常被归咎于经济形势，但那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毋宁说是，大多数利益集团无法在魏玛共和国的国家行为中看到权威性。德国公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共和国。德国人大多还在对废除君主制感到若有所失，当然他们并不是怀念威廉二世那个不称职的君主，而是想要一个君主制来作为权威要素。魏玛共和国就像是没有皇帝的帝国，像是没有国王的普鲁士。

年复一年都有新的以普鲁士为主题的电影上映，这并非偶然现象。1932年上演了七部电影：《元帅前进》（*Marschall vorwärts* ），历史电影，主题围绕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的布吕歇尔元帅；《十一个席尔

军官》（*Die elf Schillschen Offiziere* ），也是与解放战争时期相关的历史剧；《黑衣轻骑兵》（*Der schwarze Husar*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喜剧；《无忧宫里的舞女》（*Die Tänzerin von Sanssouci* ），关于腓特烈大帝和舞女巴贝里娜的历史喜剧；《坦能堡会战》（*Tannenberg* ），是根据文献资料编写的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能堡会战的故事片；《特奥多尔·克尔纳》（*Theodor Körner* ），关于这位解放战争时期的诗人的电影；《特伦克》（*Trenck* ），是讲述特伦克这个腓特烈大帝时期冒险家的离奇经历的电影。如此种种，纯属鼓动民众的宣传大冒进。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探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辩论和餐桌论战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其中——主要在保守人士的圈子里——争论主要围绕对失败原因的查究。在这当中有很多言论都在谈论背叛，尤其是所谓的“背后捅刀子”这类传言，这种说法是军队的高层领导传播开来的。这些军官们说，军队在战场上并没有被打败，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在谈判桌上把事情给搅黄了。

战胜国以和平条约所赋予的义务太重是魏玛共和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确实，这些条约摆明了是特意要让人感到屈辱，并且要由此而让失败者再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哪怕只是自己为自己——找到辩护的理由。一战后的这些和平条约不是值得称道的好条约，既没有为长远着想，也没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那样的持久性。

这些和平条约其实对修正主义思潮[5]更有利，而修正主义思潮在纳粹党的宣传鼓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纳粹为何能够夺取国家权力，但是不能拿它来作为德国社会向极端主义和非法暴力投降的理由。

魏玛共和国在立法和行政机构设置上遵从了民主原则，然而民主原则是必须以武力来捍卫的。在魏玛共和国有合法的政党制度，但是每一

个差不多能让人认真对待的政党都有自己的准军事组织。不单是纳粹党有其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德国共产党也有其红色阵线战士联盟（Rotfrontkämpferbund），社会民主党、中央党（Zentrum，实为天主教派政党）和德意志民主党（DDP）有国旗军（Reichsbanner），德国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n Volkspartei，DNVP）有钢盔团（Stahlhelm）。而且，红色阵线战士联盟的队员们相互间打招呼也已经在用“莫斯科万岁！”（Heil Moskau）和“斯大林万岁！”（Heil Stalin）了。

魏玛共和国在所有参与其创建者的眼里都被看作应急之举。20年代的原则就是修正（战后状态）。而纳粹很擅长以最坚定的修正要求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很快纳粹就成了正宗，其他那些则变成了副本。

于是，1933年，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

3月24日，帝国议会通过了《拯救人民与国家苦难法》，即授权法[6]。

4月10日，宣布5月1日为“国家劳动节”。

6月1日，通过了《减少失业法》，其实是个创造就业计划。

7月20日，梵蒂冈与德国签署条约。

8月25日，公布被褫夺公民权者名单。

10月14日，德国退出今日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

1934年：

4月17日，法国向英国发照会，缘由是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

4月24日，设立最高人民法庭。

8月2日，兴登堡过世。

1935年：

3月16日，通过扩军法。

9月15日，接着通过了（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

1936年：

3月7日，德国军队开进和平条约规定为非军事区的莱茵兰。

8月1日，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开幕。

11月26日，禁止艺术批评。

1937年：

1月26日，通过官员法。

3月14日，教皇发表《深心忧虑》（Mit brennender Sorge）通谕。

7月19日，“堕落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

这年秋天开始系统地对犹太人的财产进行“雅利安化”。

1938年：

（不愿与纳粹思想“协同”的）明认教会（die Bekennende Kirche）[7] 的尼默勒（Niemöller）牧师被投入集中营。

3月12日，德军开进奥地利。

8月17日，下令犹太人必须使用易于识别其犹太身份的特定名字（Zwangsvornamen）。

8月18日，贝克将军因为反对进行攻击他国的战争而辞职。

9月29日，在慕尼黑签署关于苏台德地区的协定。

11月9日，（大规模打、砸、抢、烧犹太人住宅、商店、教堂的）“水晶之夜”。

1939年：

4月20日，为希特勒50岁生日举行大型阅兵式。

5月23日，希特勒宣布其全面进攻计划。

1939年的8月23日是个星期三。天气记录表明，1939年的8月份热得有些过头。这年世界上的时髦女士们必备的时装是波莱罗短裙（Bolero），好显出纤细的腰身。新的成系列的汽车则是宝马335和迈巴赫（Maybach）SW 42。1939年最火的电影是讲述美国内战的影片《飘》。而这年热销的图书是恩斯特·云格尔的《在大理石礁岩上》（*Auf den Marmorklippen* ）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 ）。在巴黎，剧作家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的新剧《温蒂妮》（*Undine* ）首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开始举行。在莫斯科，斯大林出席仪式，签署了一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七天之后，当德国军队开进波兰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此后不到三个星期，德军和苏联红军就在9月22日会合，为的是在分界线共同举办一个庆祝胜利的阅兵式。从这次布列斯特（Brest）阅兵式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德国的）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和（苏联的）谢苗·莫伊谢耶维奇·克里沃舍因（Semjon Moissejewitsch Kriwoschein）两位将军心情好极了。秘密的互不侵犯条约补充议定书的第一部分——瓜分波兰——已经完成。当德国的暴力统治在波兰的核心地区蔓延时，在原先的东波兰地区加利西亚（Galizien），人们在遭受苏联的恐怖统治。这种种暴力镇压、恣意妄为、枪杀和驱逐的场景，很快就会在其他被纳入上述补充议定书的国家中重演。

1940年，苏联红军按照与希特勒订妥的协议占领了波罗的海地区、北布科维纳（Nordbukowina）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en）。这一年是“红色年”，它成为预告，预示着战争结束后整个中欧东部地区将会遭

受的命运。当1944年苏联红军第二次向波罗的海地区、波兰和东罗马尼亚推进时，那里几乎没有人把他们看作解放者。不过，有一个可以理解的例外。

这个例外就是从集中营——地狱般的种族大屠杀工场——里出来的犹太人。对他们来说，红军是他们得救的最后一线希望。他们中的许多人，主要是年轻人，为了复仇而进入苏占区政权并为之效力。在中欧东部苏维埃化开始的那几年，他们无可避免地成为斯大林的帮手，结果在政变——共产党执政者对民族利益的攫取——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对篡权中的罪行承担责任，当了替罪羊。纳粹以种族灭绝高手的面目出现，而斯大林却始终是权力的高手。所以，他能够把苏联的边界维持在1940年的状态并保持这种状态达半个世纪之久。

苏联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是战胜国，与（三个）西方大国享有同等权利。其实它享有的权利还更多。英国和法国虽然也是战胜国，但它们的影响力已经下降了，而此时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则正处在其霸权的顶点。作为年度人物，这个无产阶级独裁者的肖像在1942年已经是第二次为《时代》周刊装饰封面（第一次是在1939年；而在之前的1938年，《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是希特勒，据称是因其对世界事务的重要影响而入选。人们也完全可以把这叫作绥靖主义）。

西方战胜了希特勒，不过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之下。人们把这种同“罪犯”的结盟看作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对极权主义的这种低估所付出的代价则相当高。它导致对古拉格劳动营不以为然，并最终导致形成长期的冷战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有幸成为新型的“帝国主义”。莫斯科宣称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随着战争结束，它不仅成为西方的主要对手，而且还是这个“西方”的所有对手的主要代言人。冷战于是因此而起，而这也就意味着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部势力范围内德国和欧洲的分裂。在冷

战的标签下，对于任何事情，喝彩总是来自反对的一方。武器不出声，却使话语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只有贬值才能使其受到限制。而总是以话语来指责、总是对话语进行曲解则必然导致话语贬值。

在那时，看不到新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式的和平。这样的和平还得等上些日子。要等到1989年。后来1989年到来了，于是万象更新。欧洲得到了和平，而德国为和平做出了贡献。

作者：里·瓦

译者：郑冲

参阅：德国式焦虑，疆界，基本法，玩具屋，赔偿



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位于东西德分裂时的西柏林中心地带。二战中被炸毁，至今保留炸毁原样以纪念和平。

---

[1] 此篇涉及历史，文中人名地名极多，但在各种已出版的文献资料中极不统一，在此参考《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德国地名译名手册》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意志史》中的译法翻译。原书第269页中有一段列举了很多人名，仅在括号内标出该人身份如“剧作家”，未逐一注释。

[2] 帝国等级指组成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等级会议的成员，帝国等级会议分为三个院也即三个等级，分别是选侯院、诸侯院和城市院。参见《德意志史》第二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8，第475页。

[3] 挚诚协约（Entente cordiale），又名英法协约，英法两国为解决彼此间的长期争端，于1904年4月8日签署协约，协调两国殖民利益，以共同对抗德国；1907年俄国加入后成为三方协约，协约国之名即来源于此。

[4] 马萨里克在一战期间领导侨居国外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进行反对奥匈帝国的斗争，期望在协约国支持下争取民族权利。1918年赴美说服美国政府提供物资和军事援助，同年10月在华盛顿发表《独立宣言》，宣布成立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11月14日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任总统。

[5] 修正主义（Revisionsmus）在德语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对法律尤其是对国际法所确定的制度和义务等的修正，另一个是指国际共运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修正。中国人熟悉的通常是后者，而文中所指的则是前者。

[6] 该法允许时任总理希特勒及其内阁无需议会同意即可通过任何法律，为希特勒此后的罪恶行径披上“合法”外衣。

[7] 又译认信教会或宣信会。

文化民族空想

法国大革命大部分的功过是非，至今对世人来说，仍然褒贬不一，见仁见智。其中一个很少论及的重要问题，就是民族这个话题。“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时常迷惑人的联袂三星，也始终与民族问题息息相关。民族变成了欧洲第一个现代独裁者——拿破仑——手中的工具：他非经人请，以民权的护佑自诩，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将民法典也改成了《拿破仑法典》。其用意无外乎是说：我拿破仑就是革命的化身。

那时的德国，尽管民众对旧帝国的分崩离析和地方诸侯的称霸割据怨声载道，但谋求国家统一的声音却鲜有所闻。面对拿破仑的强势，德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动员起来保家卫国。

那么，德国人究竟应该为谁保家卫国呢？面对拥有《拿破仑法典》的法兰西帝国，是保卫铁律下的普鲁士，还是奥地利约瑟夫二世执政的哈布斯堡王朝？当时的德国，不仅诸侯割据山河破碎，而且举国上下对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早已安之若素麻木不仁了。

于是乎，令人讨厌的“政治”干脆被丢弃在一边，“文化”被宣称为衡量德国一切的圭臬。然而，这种对文化民族的顶礼膜拜，早在拿破仑战争之前就已经在德国萌芽。当以歌德和席勒为首的古典主义作家在魏玛的宫廷里谈论所谓世界公民和文化民族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能够在启蒙大师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莱辛那里找到自己的理论依据了。从魏玛古典派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观点不仅是对德国公众安于现状的一种诱导，同时也是想把自己当成一种全新自我意识的领军人物的尝试。他们所勾画的是一个文人和学者的国度，而自己却又躲躲闪闪

语焉不详。没有国家的民族乃是为思想家和诗人服务的，歌德和席勒一语道破了这个天机。

首先是席勒在一首诗歌的散文草稿片段中道出了这个观点。这首诗在席勒死后由出版商格德克（Karl Goedeke）发表，冠名“德意志的伟大”（*Deutsche Größe* ），创作年代标为1797年。席勒在这首诗的草稿中写道：“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德意志的伟大从来没有停留在君王的头上。德国人民建立了一种与政治无关的自我价值，即便帝国消亡，德意志的尊严依旧岿然不动。……她是一种道德的伟大，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和性格之中，独立于政治的命运……政治王朝兴衰更迭，精神历久弥坚，愈加完善。”

显而易见，在民族这个问题上，这个观点如果不是狂妄自大，至少是幼稚浅薄。按照席勒这个思想的逻辑，他所说的民族充其量不过是德国人一种万般无奈的“精神”民族，亦即某种没有疆域、没有政府和国家机器的自我安慰罢了。

不仅如此，在他们合编的《警句诗》（*Xenien* ）里，歌德和席勒似乎已经站在了日后在魏玛为他们所建的纪念碑上，一副高屋建瓴指点江山的姿态。在《德意志帝国》（*Das Deutsche Reich* ）一诗中他们这样写道：“德国？请问它在哪里？我不知道去何处找寻，/学问开始之处，即是政治的终结之地。”再看《德意志民族性格》（*Deutscher Nationalcharakter* ）中的诗句：“德国人，你们教育自己成为国家，这是徒劳的希望，/把自己培养成自由的人，你们能行。”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依靠教育的自我解放行动，如果不在国家的范畴内，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秩序范围内进行？又由谁来促进德国语言和这种语言文化的发展？

威廉·冯·洪堡在从巴黎给歌德写的信中说：“哲学和艺术更需要自己

的语言，情感和思想造就了这种语言，同时自身也为之所陶冶。正因为语言、哲学和艺术的形成过程更为精微细致，所以才增添了各民族的个性和差异性。把我与德国连接在一起的，是那些以往我和您以及周围的人生活在一起时所汲取的东西，现在我和它们中断联系将近两年了。”

洪堡的民族精神也不是政治性的：“国家宪法和民族团体，不论它们是如何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都不应该混为一谈。”洪堡坚持民族的差异性，不过他认为，正如历史上希腊人一样，德国人最适合为人类展现人文主义的纯洁精髓。在这个问题上，考古学家温克尔曼（Winckelmann）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温克尔曼认为，希腊文明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希腊虽国势衰微今非昔比，但它却留下了空前绝后令人折服的文化影响。温克尔曼的这个思想对德国的文人们来说不啻是一副强心剂和安慰药，他们的时代虽然有无数大大小小的王公诸侯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称霸一方，却无法开创那个能够承载文化艺术的泱泱帝国。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在其所著《当代的基本特征》（*Die Grundzüge des gegenwärtigen Zeitalters* ）一书第十四讲结尾也探讨着同样的问题：“真正有教养和信仰基督的欧洲人的祖国究竟在哪里？广言之是欧洲，特言之是每个时代欧洲处在文化巅峰的那个国家。”

1806年，法国的君王拿破仑带着他的军队和革命典籍向中欧挺近。率先起来抵抗的是普鲁士，还有捍卫普鲁士的新崛起的一代思想家们，费希特在这些人中间一马当先。1806年的经历使这些知识分子染上了政治色彩。

那场和拿破仑角逐的结果，已经众所周知，这位法国皇帝最后败给了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三大势力组成的“神圣同盟”。但是，文化民族问题并未就此结束，对歌德和席勒的崇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

们死后，继续为后世——首先是19世纪的文化民族问题效劳卖力。两人书信集的出版，特别是1857年9月4日魏玛宫廷剧院门前那座纪念铜像的落成，使歌德和席勒成了一对永远拆不散的患难兄弟。至此，文化民族的信仰仪式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每个文化民族都需要自己的偶像：魏玛德意志国家剧院前的歌德和席勒塑像。

此前，1826年魏玛新落成的侯爵陵墓也意义非凡。早在两年前的1824年，侯爵家族的二十六口棺椁就已经停放在了陵墓的拱形墓室里。但陵墓的首次入葬仪式，却是1827年12月16日弗里德里希·席勒疑似遗骨的迁葬仪式。后来，歌德的棺椁也于1837年3月26日停放在了席勒的旁边。按照原先的筹划，要为两人修建自己的陵墓，如今他们二人却在同一墓室中相伴长眠了。

后人前来瞻仰歌德和席勒的墓冢始于1882年——歌德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

作为文化民族的两位领袖级的人物，歌德和席勒在20世纪仍不乏其象征意义。

德意志帝国土崩瓦解之后，文学双雄歌德和席勒成了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一种理由。借助这双驾马车之光，德意志第一共和国甚至把首都设在了魏玛。文化民族的思想成了专门粉饰民族概念的工具。纳粹分子和共产党人盗用文化民族，企图把自己装扮成魏玛古典主义的继承人。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把席勒的《威廉·退尔》说成是“元首剧”，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大谈所谓“歌德的日耳曼本质特性”。民主德国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在1962年的一次演说中大放厥词，说未来的全德社会主义国家将是歌德《浮士德》的“第三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当局曾把歌德和席勒的棺椁转移到耶拿的一处地下隐蔽所中，1945年8月棺椁又被放回魏玛的墓室。2006年至2008年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席勒棺中的遗骨绝非席勒本人，而属于几个不同的死者。所以现在席勒的棺椁是一个空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公众的兴趣：游人依然一如既往兴致勃勃地前来瞻仰席勒的空棺，仿佛瞻仰真正有诗人遗骨的棺椁一样。

如果说18世纪的文豪们至少在魏玛这样的小诸侯国里和王公贵族维持着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并且时有作品奉献的话，那么20世纪的文人在专制独裁制度下就只有听任权势摆布的命了，要么屈服合作，要么流亡去国，要么闭口沉默。魏玛共和国时期，文人中不乏左翼党和右翼党的追随者和保持中立者，但是大多数都对政治敬而远之。

1945年后，面对极权统治文人们再度噤若寒蝉，对政治又一次采取了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不过，在联邦德国，这个迄今德国历史上最宽

容和最少滥用暴力的国家，反倒是有人敢出来叫板。这个时期，不少人把民族的命运和乌托邦联系在一起，尽管不直接相信民主德国，却愿意相信乌托邦，并把共产主义理想与之捆绑在一起。许多人将这个工农国家看成是与可恶的资本主义相抗衡的新生事物，结果是错把监狱入口当成了天堂大门。

“文化民族”这个概念在这个时期被赋予了一个直接的政治任务：在东西德国分裂的大背景下，它演变成了一种外交辞令。人们可以借用文化民族来谈论德国文化的统一，而并不对民主德国的存在提出质疑。

如此，文化民族就蜕变成了一个尴尬的概念。紧急情况时，它既被用来缓解彼此间的差异，又起到跨越政治上不可逾越的深沟的作用。这种情况不单单是指冷战时期的那种对峙状态，同时也是指一种司空见惯的德国式的归纳法定式：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除了德国作家外，也颁给瑞士和奥地利作家；卢森堡广播电台设有德语频道；瑞士和奥地利电视台也共同参与举办3sat的文化节目等，不一而足。

对联邦德国持批评态度的作家1990年用来反对东西德统一的一个理由是，有一个文化民族就足够了。君特·格拉斯甚至突然要做当年费希特那样的欧洲人。马丁·瓦尔泽则不然，这个德国统一的坚定支持者1988年时干脆把文化民族叫作“苟且偷安的公式”。在他看来，这个公式是德国统一的一种危险。君特·德·卜吕安（Günter de Bruyn）又是另外一种态度，这位来自德国东部的作家和普鲁士市民史学者，把文化民族看作对民族国家的一种补充。

如今，所有德意志血统的国家都处在申根协议国的地理范围内，德国的统一已经实现，法西斯主义灰飞烟灭，“文化民族”这个概念还有何意义？然而，文化民族在今天的德国却再度成为一个现实的话题，其原因与外国人的融入问题密切相关。一个民族必须具有表达其所属关系的

条件的能力，这些条件已经超出了国家宪法的范畴，必须从文化的视角去理解。

作者：里·瓦

译者：吴宁

参阅：浮士德，严肃文学和消遣文学，下班之后，音乐，牧师之家，横向思维者，宗教改革

男声合唱

世界上到处都有男人。男人开始唱歌的事情，几乎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爱好音乐的环球旅行家耳畔萦绕的不是来自西班牙的格里高利风格的僧侣唱诗，就是伏尔加河畔哥萨克人高亢悲怆的调子。但是，世界上有那么一种男人的歌声，它是一种极低的低音到最高的假嗓高音的多声部组合。闻之者虽未及听懂歌词，但已好似瞬间置身于一座森林一般：前方树丛间传来猎人欢快的号角，身后滔滔的莱茵河水奔流而去。有鉴于此，对德国心存芥蒂的人，皆将男声合唱视为可怕的条顿民族精神的有声载体："风琴和男声合唱——我想象中的人间地狱……"

社会民主党籍的侦探小说家汉斯耶尔格·马丁（Hansjörg Martin）于1981年专写了一部关于男声合唱的小说，书中讲道，"男高音颤抖"不仅是因为德国小城镇的合唱队员年逾花甲倒了嗓子，而且还和他们对纳粹历史的集体压抑有关。正如作者把二者之间的关系揭示得如此浅显明了一样，人们不禁怀疑，德国的男声合唱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追求，从开始起它就是一种与政治有染的工具。

1809年1月，世界最古老的混声合唱协会"歌唱学院"的主席、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Carl Friedrich Zelter）在被拿破仑占领的柏林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的男声合唱团，以不列颠亚瑟王发明的圆桌聚餐为样板的"歌咏聚餐"（Liedertafel）随之应运而生。爱国市民和贵族人士每月碰头一次，"在德国式轻松和悠闲的气氛中，用简单的饭菜"进行"高雅的聚会"，边吃边唱诗人或作曲家会员自己创作的歌曲。聚会不仅是要摒弃"外国的（即意大利和法国式的）雕虫小技"，同

时也企望克服德国内部的种种障碍：不论是阶级的也好，地域的也罢。所以，后来的男声合唱协会都喜以“协和”或是“和谐”冠名，绝非偶然。

尽管德国南部和瑞士男声合唱行业的开路先锋——音乐教师汉斯·格奥尔格·内格里（Hans Georg Nägeli）经过研究，证明男人有“更加锐利的单音力量”，而女人则是以“波浪音”见长，但是，在合唱协会初创阶段，这些男声合唱团体却并不显得粗野凶悍，反倒有不少真诚和理想主义的特点：“兄弟们，伸出手来团结紧！/在这个美好的欢庆时光/引导我们登上光明的高峰！/放弃一切尘世的眷恋，/我们友谊的和谐/坚固、美好，直到永远。”

音乐学者对这首著名的《盟友之歌》（*Bundeslied* ）的曲调是否真的出自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之手一直争论不休。事实上，不单单是共济会的成员喜爱唱这首歌。[1] 歌唱不仅能使男人豪情满怀，而且能让他们摆脱日常的猥琐心态，精神得到升华。这个观念也同样体现在另外一首前毕德迈尔时代的民歌里。这是一首歌唱活动必唱的歌曲：“歌声响起的地方，人人可以高枕无忧，/无所畏惧，哪管它小道流言。/歌声响起的地方，无人会遭抢劫；/强盗恶棍同歌唱无缘。”

直到反拿破仑战争时期，男人嗓子的这种“更加锐利的单音力量”才被用来鼓舞自己的士气，并让法国人闻歌丧胆。1813年在普鲁士成立的“吕佐夫自由军团”，是一支由同仇敌忾的大学生、作家和柏林名流，如“体操之父”路德维希·扬和抒情诗人约瑟夫·冯·艾兴多夫等组成的半正规化的军队。在这些人中间还有诗人特奥多尔·克尔纳。他于这年血洒疆场，留下组诗《莱耶尔和施韦尔特》（*Leyer und Schwerdt* ）。此诗后由浪漫派作曲家卡尔·玛利亚·冯·韦伯谱曲，从而成了男声合唱的极品之作：“是什么在林中阳光下闪烁？/听到它的声音呼啸近前。/树影婆娑中若隐若现，/嘹亮的号角响彻其间，/闻之不禁令人心惊胆战。/试问黑衣随从马弁：/方知吕佐夫威武彪悍出猎！”

1813年10月，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兵败，法军不得不撤回到莱茵河以西的法国。此时，维也纳会议开始着手给欧洲大陆制定一个新的政治和地缘秩序。然而，德国统一和崛起的希望此时并未能实现：退回到1792年去——这就是梅特涅（Metternich）侯爵制定的方针。王朝复辟开始了，封建诸侯割据依然如故。1819年，在执行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2] 的过程中，由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数年前作为民族崛起的举措而成立的体操协会遭到禁止，大学生社团（1815年在耶拿成立了最早一批这样的组织）被取缔。而合唱协会却得以幸免。虽然追寻同样的目标，但在当局眼里，合唱团比之体操协会和狂热的学生尚没有图谋造反的嫌疑。也许是出于忌讳，当局没有对致力于德国艺术中最崇高的音乐艺术的团体下狠手。受到压制同时又血脉贲张的民族之魂，此时躲进了歌曲艺术之中。

于是乎，各种歌唱协会在德国各地纷纷出现。1824年在斯图加特诞生了一直延续至今的“歌曲花环”（Liederkranz）协会。该协会在它最初的章程里写道，有义务“把对德国伟人的纪念传承下去”，比如弗里德里希·席勒，协会中好几个创始人都同他有过友好的交往。相比普鲁士的“歌咏聚餐”协会，南德的这个“歌曲花环”表现得不那么高人一等、目中无人，它甚至让“女子合唱队”也同时与之并存。不过，1827年在普洛欣根（Plochingen）举办的第一届施瓦本歌手节上，女歌手还仅是个陪衬的角色而已。



七尺汉子也爱唱走心之歌。

在当局审查制度的严密监视下，举办者把这次歌手节的目的和宗旨表述为："观众将从歌唱的水晶般的宫殿里获得欢乐，为了最崇高和最高贵的目的，为了信仰和自由，为了君王和祖国，他们的情感将被打动……除此之外，观众将摆脱追名逐利和平日的担心与忧虑，拉近和周围人的距离，在歌声的力量面前，可笑的等级障碍将被摧毁。"

虽然歌手们不想真正撼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界限，但他们发誓要拆毁"另一个可笑的障碍"——法兰克福的"歌曲花环"在1838年举办的德国歌手节上亮出自己的口号："不论基督徒，犹太人还是异教徒；/来自近邻，还是来自远方，/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天下歌手是一家！"

与德国的大学生社团不同，男声合唱组织在19世纪初期基本没有什

么反犹色彩，他们没有参与街头的无赖之徒对犹太人的吆喝驱赶。对于音乐这个共同语言的自豪，以及在音乐中获得共同表达心声的追求，超越了宗教的差距和无知的偏见。投身于歌唱的目的，正是为了克服这种差距和偏见。

今天看来，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是一个“文化融合的核心人物”。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犹太银行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教堂洗礼，并且自己后来也皈依了基督教。1846年第一届德国-弗兰德歌手节在科隆举行，门德尔松出任首席指挥。他由火炬队员护送到下榻的旅店，并由鼓手和号手一路陪同登上指挥台。歌手节开幕式上，他改编自席勒诗歌《艺术家庆典之歌》（*Festgesang an die Künstler* ）的合唱作品首次公演。在艺术这个更高的宗教信仰中，犹太文化和德国文化实现了融合共生：“被她的时代所不容，/严肃的真理逃进了诗歌中/在合唱女神那里找到了保护。/在女神的光辉照耀下，/真理充满了反抗的力量，/她在歌唱声中获重生/用胜利的歌声/向迫害者进行复仇。”

两千多名德国-弗兰德歌手唱起了这首艺术的赞歌。这种促进民族沟通的千人歌手大合唱形式，直到一个半世纪之后，才出现了它的继承人——德国当今著名的合唱团体领队戈特希尔夫·菲舍尔（Gotthilf Fischer）和他的街头演唱队。

仅隔了一个夏天，在瓦尔特堡城下举办了1848年三月革命之前最重要的一次合唱节，其场面丝毫不逊于一年前的那场盛会。应图林根歌手联合会的邀请，歌手们在那里不仅连续演唱了两天，而且还进行了各种讲演和节庆游行。在刚刚通车的从哈雷到埃森纳赫（Eisenach）的铁路线上，铁路部门还特别增开了火车专列，啤酒应有尽有。把合唱节安排在瓦尔特堡进行是经过精心考虑的：1817年在那里举办了首届瓦尔特堡节，当时耶拿城元老级学生社团号召所有具有民族思想的大学生前往参加。在这两次节庆活动上，1521年秋曾经在瓦尔特古堡里把圣经的《新

约》翻译成德语的马丁·路德，被人们当作“精神奴役的战胜者”和统一德语的奠基人来加以庆祝。合唱节的第二天即以著名的路德歌曲《我主乃坚固之堡垒》（*Ein’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拉开帷幕。

古城瓦尔特堡是一个向德国教堂歌曲的创始人表达崇敬的恰当地点。不仅如此，领导合唱节的牧师和大众教育学家海因里希·施韦尔特（Heinrich Schwerdt）再次请来了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并且把卡尔·玛利亚·冯·韦伯的“回音合唱团”也排上了节目单。数以千计的男人齐声唱道：“在森林里，森林里，/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在充满回声的森林里，/歌声响起号角嘹亮/沿着寂静的森林回荡！/啦啦啦，啦啦啦！”果不其然，山坳里、古堡下、广场上，到处都能听到在森林里回荡的歌声。好一幅人与人、人与自然浪漫结合的图景啊。

合唱节最重要的演说者之一、魏玛地方议会议员和一年后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国民议会议员奥斯卡·冯·魏登布鲁格（Oskar von Wydenbrugk）也激情满怀地以大自然为喻说道：“虽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分支，但德国人民在精神和感情上已经相互联系在一起了，就如同一棵大树一样，它的根是相同的语言和同样的歌曲。”

在德国以建立帝国的形式实现盼望已久的统一之前（尽管还不是1848/49年的革命家为之奋斗的民主宪法下的统一），德国的歌手同盟会和由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德国少数民族组成的男声合唱协会，于1862年合并成了德国歌手联合会。当他们预感到，由他们完成的合唱界的统一，不久也会在政治的大舞台上出现时，这些黑-红-金色的歌喉在协会成立的章程里宣布：“借助德语歌曲的内在凝聚力，德国歌手联合会愿意竭尽全力，增进德意志民族各分支的团结，愿意参与到祖国统一和强大的工作中去。”

但是，这个四海之内亲如一家的歌手兄弟情却好景不长：19世纪70年代，红色歌手们就已与之分道扬镳，另起炉灶成立了新的社会民主派

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合唱协会。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普通工人也能乘上歌声的翅膀，协会的名字也由“协和”和“和谐”，改成了“团结”“自由”或是“前进”。然而，起初阶段他们所唱的歌曲仍然是同样的宗教和受过教育的市民阶级的保留节目，以及上自亨德尔和贝多芬，下至舒伯特和舒曼的浪漫主义的合唱作品。正是《塔劳的安妮小姑娘》（*Ännchen von Tharau* ）或者《罗蕾莱》（*Loreley* ）这样的民歌，让那些受到机器进步的铁爪伤害的无产阶级的心灵对逝去的旧时代魂牵梦萦。

一种全新和别具风格的德国工人歌曲，是由出生在莱比锡、成长在维也纳的作曲家汉斯·艾斯勒开创的。这种工人歌曲与那种“为君歌一曲，送君入梦乡”的所谓“大众歌唱家们”彻底决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先锋派音乐的大都市维也纳，像阿诺德·勋伯格和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这样的大腕级人物不仅冲击了音乐的圣殿，而且也给工人歌唱协会带来了一场革命。此时的歌曲达到了很高的音乐水准：在1925年创作的最早的男声合唱曲里，艾斯勒既无顾忌使用复杂的节奏，也不担心刺耳的不和谐音。于是，在工人阶级鼓动和宣传的行列中，加入了新的维也纳乐派。在海因里希·海涅的诗里，艾斯勒找到了相应的具有战斗性和雅俗共赏的歌词：“德国歌手！歌唱和赞颂/德国的自由，你的歌曲/震慑我们的灵魂/鼓舞我们行动，/用马赛曲的方式。/不要做柔弱的笛声，/不要悠然的心情/要做祖国的号角，/要做重炮和大炮，/吹响你的号角，发出你的巨响，在隆隆的雷鸣声中，把敌人消灭干净！”

相比之下，昔日的德国男声合唱运动的确显得陈旧过时。虽然19世纪的歌曲中也不乏一些激情豪迈的歌词：“壮哉，德意志的男声合唱，/让你的歌声怒吼激荡！/起来！把恐惧、黑夜和咆哮/送到敌人的阵营中去。”但是，今天还有谁会知道歌词作者海因里希·施泰因（Heinrich Stein），或是曲作者理查德·热内（Richard Genée）的名字呢？

最后一位以德意志民族精神谱写男声合唱曲的大师是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93年，他的交响合唱《黑尔格兰岛》（*Helgoland* ）在维也纳（市民阶级的）男声合唱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上首演。奥地利的男声合唱团放声讴歌这个萨克森王国岛上勇敢的居民，他们依靠上帝的帮助成功抵御了罗马人的入侵。这首合唱曲讲述的历史事件是否真实，这里姑且不论。布鲁克纳创作这首合唱曲的起因，是几年前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将这个北海上的小岛归还给了德意志帝国。这首由奥地利人表演的德意志的胜利大合唱乃是一个传统的结束，从此以后，只有左翼作曲家创作了艺术上可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战斗歌曲。

艾斯勒于1925年秋来到了柏林。在那里他最终加入了共产党，与德共往来密切，并且成了德国工人阶级战斗歌曲的先驱。他同自己的老师和“师傅”勋伯格一刀两断，批评他的所谓精英艺术观：“如果是艺术的话，它就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如果是为大众服务的，那就不是艺术。”

艾斯勒一首接一首地创作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歌曲，如《红色的维丁区》（*Der Rote Wedding* ），《共产国际之歌》（*Komiternlied* ）和《图章之歌》（*Stempellied* ）。他的混声合唱《走上街头把歌唱》（*Auf den Straßen zu singen* ）可以说是一首纲领性的作品，但它的首演却是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大厅里进行的。

早在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合作之前，艾斯勒就已在舞台上显露出了阶级斗争的锋芒。报幕员登台报幕：“各位请注意！各位请注意！我们今天演唱的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合唱歌曲。”紧接着舞台上响起了一支由教堂、大自然和爱情歌曲改编的谐谑曲。这首经过精心改编的合唱曲，最后在海因里希·海涅作词、弗里德里希·西尔歇（Friedrich Silcher）作曲的妇孺皆知的《罗蕾莱》变奏中达到高潮：“我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这时，报幕员高声插入进来打断合唱队：“我们知

道，究竟为了什么！”合唱队接着唱道：“因为你们想要逃避现实，因为你们想要逃避每天的追求，因为你们想要逃避我们的斗争。我们的歌声也必须是一场战斗！”虽然这首合唱曲在听似《国际歌》的变奏中结束，但在其人为的说教外衣下，仍然表露出深厚的德意志特色。

希特勒上台之后，红色歌手们不得不把曾经作为战场的街道让给了纳粹的褐衫党分子。如今，这帮党徒们肆无忌惮地唱着：“世界上的软骨头/被红色战争吓破了胆，/我们打碎了恐惧/这是我们的伟大胜利……”

在绝望的抗争中，艾斯勒和布莱希特试图从他们的流亡地，用红色的战斗歌曲来对抗纳粹的恐怖政权。他们为1935年6月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第一届工人音乐和歌曲奥林匹克比赛创作了《统一战线之歌》（*Einheitsfrontlied*），希望将四分五裂的左派组织团结在一起：“向左转，二，三！/向左转，二，三！/同志，这是你的位置！/加入到工人统一战线的行列/因为你是一名工人。”来自不同国家的三千名“无产阶级”的男女歌手在欧洲的中心地区引吭高歌，歌声在阴霾密布的天空回荡。尽管如此，就像19世纪40年代那次革命运动的战斗歌手一样，歌唱大军这次也没能将政治的纽带维系得更加紧密。

回首往事，我们不知道什么能够更加震撼人心：是理想主义的天真，还是试图用歌声来扭转历史车轮的（古老德国的）信仰；或者是盲目地希望：红色统一战线是反抗纳粹阵营的灵丹妙药，“向左转，二，三！向左转，二，三！”是对纳粹歌曲《紧密团结的行列》的一个恰到好处的回敬。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英雄般引吭高歌的男人的时代在东、西德国都一去不复返了。在东边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政府委托汉斯·艾斯勒给东德的国歌谱曲。在这个社会主义的统一国家里，纯粹的男声合唱已失去了它的作用。艾斯勒和约翰内斯·R.贝歇尔一起，试图创作“新的德

国民歌”。他们一心扑在这项工作上，作品《德国故乡，歌颂你》，或者《又到了漫游的时节》就是证明。但是，新的德国民歌作品没有能够在歌手们的心灵中扎下根来，在历经了无数劫难和负罪感的纠结之后，歌手们更加怀念和梦寐以求古老时代的歌曲。

在西边的德国，纳粹时代苟且偷安的男声合唱协会都不再抛头露面。（西部）德国歌手联合会在制定章程时举棋不定，不知是否要以“和平、自由以及国界两边德国所有爱好歌唱的人们之间的欢乐为宗旨”（1949年版），以及是否要通过“德国歌曲的凝聚力……来增强德国的民族意识，促进各阶层民众的团结，增进德国各个族系的归属感”（1952年版）。直到1975年才简要地写道：“德国歌手联合会拥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这句话虽然安抚了公众的民主感情，但它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难道说用基本法的精神演唱《罗蕾莱》，听众的感受就会不一样吗？

将民歌的气息从德国的男声合唱中清扫出去的做法，造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后果：曾经被纳粹认为是犹太人的东西，因而被他们从音乐会的节目单中删掉的门德尔松的合唱曲，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再次从保留节目中消失——这次的原因是，作品过于德国化。的确，在19世纪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门德尔松在他的合唱曲最成功的作品中，信手做了一个小小的但是决定性的改动。在艾兴多夫那首著名的《猎人的告别之语》（*Der Jäger Abschied* ）诗中，每一段都有这样一句：“别了，美丽的森林！”门德尔松在他的合唱曲的结尾改成了：“别了，德国的森林！”只有在当今时代，男声合唱队在唱到这句时才逐渐能够做到浑身放松自然，就像台下的听众一样，慢慢习惯不再热血沸腾。

如今，男声合唱团已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德国的统一在和他们完全不相干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当年瓦尔特堡城下和斯特拉斯堡的那种人山人海的场面，现在只在足球场里才会出现，其时，成千上万男人的粗嗓

子高唱同一首足球队歌。

或许有朝一日绿党能够想起艾斯勒和布莱希特的民歌《当发电站为人民所有》（*Als Das Kraftwerk wurde Volks Eigen*），并且在他们的党代会上唱起这首歌。不过，这将不会是一场男声合唱了，而是一场有严格男女比例的合唱。

在混声合唱为主的时代，男声合唱不过就是个特殊种类罢了。尽管如此，德国现有的四千个男声合唱协会并非是个应该被“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冲刷荡涤的陈旧古董。除了足球场之外，这帮经验丰富的粗喉大嗓们在什么地方还能如此这般多愁善感，感觉自己还有用武之地呢？当男声合唱队有机会唱起韦伯《魔弹射手》（*Freischütz*）[3] 中的猎人合唱，或是瓦格纳《帕西法尔》（*Parsifal*）中的圣杯骑士合唱的时候，即便是最刻板的歌剧合唱队男歌手们，此时也变得温情脉脉。但凡见过这种场面的女人都会明白，这里触及的情感变化是何其的不同寻常。

在经历了各种政治风浪的冲击和各种战斗内容的加载之后，男声合唱的曲目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同一个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源泉，就如同全部的德国民歌也来自这个源泉一样。让男人们继续歌唱吧，他们最纯洁的歌词定然如是：

姑娘　爱情　心灵

美丽　忠诚　善良

人生　幸福　痛苦

孤独　沉静　甜蜜

天空　眼睛　上帝

温柔　妩媚　纯洁

亲吻　哭泣　分手

忘却　纪念归来。

作者：特·多

译者：吴宁

参阅：夜晚的寂静，严肃文学和消遣文学，下班之后，足球，基本法，故乡，音乐，纯洁戒律，渴求瘾，莱茵河——父亲河，社团迷，林中寂寞

---

[1] 莫扎特是维也纳共济会会员，因此有人认为，这首歌的曲调出自他之手。

[2] 卡尔斯巴德决议，指的是1819年8月6日至31日在捷克的卡尔斯巴德举行的部长会议上做出的决议，当时德意志邦联中最有影响的邦国参加了这次会议，目的是监控和压制拿破仑战争后德意志邦联中自由和民族统一的思想和行动。

[3] 又译《自由射手》，是按德文名字拆解翻译的，根据剧情译为《魔弹射手》更贴切。

高地丘陵

> 身处极高处其实并不那么令人振奋，我登上布罗肯山峰（Brocken）时，内心感受至深。请不要见笑，我的朋友，道德世界和物理世界受同一个法则制约。帝王宝座高处的温度是那么凛冽，那么寒冷，那么不适合人的本性，正如布罗肯山巅一样。无论从两者的哪一处远眺都不能令人振奋，因为两者的基点都太高，其周围美妙迷人的风景在距离它们很远的低处。每当我回想起置身于平缓而适中的雷根施泰因山脉（Regenstenie）时，心情就愉悦得多，在那里没有令人压抑遮天盖日的雾霭，犹如一整块美丽的地毯，还有其无穷变化的细节一一清晰地铺展在我的眼前。

这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大约在1798年，也就是他早年写下的一篇文字，该文章是写给他的朋友吕勒·冯·利林施泰因（Rühle von Lilienstein）的。他们年轻时确实不择路径地去漫游，为的是寻找“令人愉悦的中庸大道”。

为了要认识文字的某种双重含义，我们需要相应的上下文，更需要观察者具有某种能力，可以超越因上下文造成的障碍。这并不单是指诗人克莱斯特，而且也适用于骆驼牌香烟，例如该品牌在T恤衫上印上这么一个口号：高地丘陵也不赖。



“皇帝御座”尽管其名字带有威严的帝国气息，但它却是德国西南部地区玲珑可爱的小丘陵。

高地丘陵可以说是德语为世界文化贡献的词之一。甚至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认为这一地理上的命名如此平庸，以致无言以对，竟然让我们在这件他们认为并不怎么诡秘的事情上拥有最后的话语权。

另外，这个词并没有表达出某些必不可少的概念，至少在地理上并不是非它不可。大山和丘陵的区别其实就够了。问题是，为什么人们还有这样的需求，用“高地丘陵”这个概念呢？为什么这个本来就是多余的概念竟然为大家所接受呢？尽管这个词从语言表达的角度看与山脉有关，其实只用几个词就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高地丘陵不像大山那样有气魄，视觉上不是那么伟岸，也不能去做一些惊心动魄的攀岩。高地丘陵提供的是漫游空间。

和伟岸崎岖的山脉不同，高地丘陵是从森林到草地，从草地到森林的平缓过渡。但是高地丘陵和丘陵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叫作德国高地丘陵，而不叫德国丘陵呢？

在德国的所有山脉，除了阿尔卑斯和阿尔卑斯山前部山地之外，都是高地丘陵。在中欧北部褐煤层地段，其山峰高度达海拔1602米。它始于比利时和法国的阿登地区，横穿德国和捷克直到斯洛伐克的喀尔巴阡山脉。在山脊的南边，上莱茵河洼地两边形成了高达1493米高的单面山地貌。德国的高地丘陵属于欧洲最古老的山脉。大约2.25亿年前，在三叠纪时代，当时的中欧一带有时处于海平面之上，有时处于海平面之下。表现为在沉积层中砂岩和石灰岩交替出现，后来在侏罗纪时代，有了钙的沉淀，在白垩纪出现了白垩。

由于自然的风化，阿尔卑斯山形成过程中出现了断块，受制于沉降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形状。这就是我们非常信赖的百科全书的解释。

拿出德国高地丘陵的花名册，不由自主有这样一种感觉：眼前出现了由大自然分割的诸多小国，各有其名，等级分明。每一条漫游小径都延伸到另外一个国度。跟着标出的路线从A到B，从第100个到第1000个，总之永远不会丢失。需要登记的都已登记完毕。酒店前的门庭和风景井然有序。高地丘陵如同大自然赋予的一个精巧客厅。高地丘陵山脚下的土地都在地契上榜上有名。的确如此，这些地方都沉睡在文件夹层中，沉睡在墨水的沉淀中。

它们是装饰点缀，用以前的说法就是礼帽盒子内的宝物。现在依然可以这么说。

人们站起来，是为了走进房子，弯下身子是为了离开。人们或现身于七峰山脉的高地丘陵，现身于陶努斯的西本哈尔山脉的高地丘陵，或出现在逃亡途中从艾莫斯豪森（Emmelshausen）到西门（Simmen）之

间的希德哈纳斯（Schinderhannes）的自行车车道上，即在一部电影中以那位江洋大盗命名的自行车道。

不去办公室，而是大步流星地去拉恩（Lahn）河畔的一家饭店，谁不愿意呢？不为下一个会议征集论文，而是翻身跃上自行车，或者在海德堡哲学家小径上漫步，谁不乐意呢？

谁在黑森林中跑步，谁漫步在埃菲尔（Eifel）山和奥登瓦尔德（Odenwald）山、凯撒施图尔（Kaiserstuhl）和七峰山脉，谁看见过卡森卜克尔（Katzenbuckel）自然保护区，谁目睹过托特科普夫（Totenkopf）和菲尔德山（Feldberg），他就深知：什么叫德国的美丽，为什么它远远胜过电视节目《居住美》。高地丘陵是这样一个地段，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与它比拟，拥有如此的人工雕琢。这是纯粹的文化景观，类似大花园。全部开发，宣传到位。这是德国的度假胜地。在这里，本地人也愿意做一名游客。的确如此。做这里的远足者，鸟瞰山下全景。难道不美吗？仑山（Rhön）？

还有弗赖堡：哪里还有这种可能，在家门口就有一座令人赞美的山？而且山的名字还叫作“请君观景”？过去大家称其为铁矿箱子，难道原因是其丰富的铁矿和开采吗？这家矿山依然存在，作为矿山博物馆吗？

我们承认吧：有时真希望像美国人那样，能够没有任何成见地去赞美这一切。

作者：里·瓦

译者：杨丽

参阅：登山片，故乡，青年旅舍，林中寂寞，徒步之乐

音乐

“不是德意志人，能成为音乐家吗？”

如果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聘请托马斯·曼担任“再教育”事务顾问，他可能真要彻夜不眠了。所有这些德国的乐队、音乐厅和歌剧院应该如何处置？那些被摧毁的就让它们埋葬在瓦砾之中？那些幸存的就强行禁止、关闭和拆除？抑或改造成舞会伴奏乐团和舞厅？对本国的所有德意志“严肃”音乐说不？

1945年5月29日，身份已经是美国公民的托马斯·曼在华盛顿做了一次报告。他试图解释，“德国和德意志人”在过去的十二年里的所作所为导致了何等的灾难。此时，托马斯·曼正在写作他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由一位友人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莱韦尔金的一生》。开场没多久，他就把魔鬼带进了话题：“德意志人的内心生活与恶魔隐约相连。”托马斯·曼说的恶魔指的恰恰就是音乐：“它是充满负面预兆的基督教艺术。”“它集老谋深算的秩序与一片混沌的反理性于一身。音乐发出呼风唤雨的魔咒，它是数字的魔术师，既抽象又神秘。如果浮士德是德意志灵魂的代表，那他必须精通音乐。因为抽象和神秘就是音乐，就是德意志人与世界的关系。”

德意志民族既抽象又神秘，既是一群恶魔又是一帮音乐人。这样一群自身岌岌可危但又咄咄逼人的狂热分子怎么能够拼凑出一个文明而又“理性的”国家呢？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早在1839年就一语道破德意志人的本性：他们有精通各种乐器的天赋，而对如何掌握“自由这一机制”却一无所知。库尔特·图霍夫斯基曾经嘲讽道：“因

为恶劣的天气关系，德意志革命也只能在音乐中展开了。”

这位深信音乐的托马斯，尽管面对发生的所有这一切，依然很难把自己的信仰带到纯理性的极限，他对这一无奈感到万般痛楚：“他们‘德意志人’把自己的——我不想说是最美的或最触及灵魂的——但起码是最深刻的和最重要的音乐给了西方世界，西方世界并未掩饰自己的感激之情，并且回馈荣誉。但是西方世界感受到，而且眼下更加有这种切肤之感，面对这种发自灵魂的音乐，人们在其他领域必须付出何等的代价。这就是政治，这就是人与人共存的领域。”

托马斯·曼1945年5月在国会图书馆所做的讲演，实际上是他三十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版的《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所写内容的回声，并且经过了小调的处理。那一篇文章所讲的就是文明和文化的互不兼容，民主和音乐的格格不入。他当时激情满怀，其目的就是在文明和民主面前捍卫文化和音乐。他称赞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纯洁的典范例子，最神圣的基础类型”。他厉声斥责（民主）政治是“音乐的排挤者，而音乐迄今为止在民族的社会和艺术利益中占据最高的地位”。他叹息“音乐的终结”。音乐“就像日出前的薄雾，将被咄咄逼人的文明和民主所驱散”。他与理查德·瓦格纳一道，期盼着能够扭转乾坤。

正是这位音乐家把年轻的托马斯·曼变成了一位爱国者。风华正茂的20岁青年托马斯·曼，在罗马亲身经历了一场瓦格纳的音乐会。“当诺顿[1]主题第二次响起”，托马斯·曼周边的意大利人嘘声四起、口哨乱吹，此时此刻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并且感觉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归属”。

“不是德意志人，能成为音乐家吗？”对于托马斯·曼来说，这是一个反问句。他同样可以这样提问：“不是音乐家，能是德意志人吗？”托马斯·曼在“对政治不闻不问”的时代，热衷标榜自己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更是一位音乐家”。“文明文学家”这一角色曾经遭人痛恨，文

明文学家不再把艺术与人道对立起来，而是要让艺术服务于人道。只有当深重的政治灾难降临的时候，这位作家自己才奋起担当文明文学家的角色。

如果在世界文学中把所有德意志史诗、诗歌、戏剧、短篇和长篇小说都剔除掉，那么世界文学会显得有些贫瘠，但是并非不能忍受。美术艺术中如果失去所有德意志绘画和雕塑，几乎不会被人察觉。但是，今天被人含糊地统称为“古典”的音乐，如果没有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中在德意志文化领域产生的作品，那是令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音乐的问题直接涉及德意志灵魂最深处。

“入神的音乐时时有上帝的恩典陪伴。”

在德国，音乐有史以来就是一桩严肃的事情。中世纪宫廷抒情乐师并非由于发自内心的欢乐而谱曲，因为这个时代不允许他们表露自己的欲望。高雅的骑士无法向贵妇人求爱，只得借助于七弦琴。在音乐里，他们所能享受的自由可比法国骑士的多得多。当宫廷高卢语乐手（Troubadour）唱着一板一眼的工整诗歌游走法国时，德国的宫廷抒情乐手则用流畅的曲调表达出内心的渴望。让音乐不受阻碍地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这就是德意志式的原始经验。民歌也是一样。14世纪初，当民歌开始盛行的时候，德国人也喜欢更加狂野的音域，使得本爱唱歌的邻国人可望而不可即。

工匠歌手与宫廷抒情乐师大相径庭。随着骑士阶层的没落，第一批“市民”歌手诞生了。这些鞋匠、裁缝、木匠出身的歌手们不仅在手艺上精益求精，而且还把本行业的这种习俗带进音乐里。三百年之后，理查德·瓦格纳在创作《纽伦堡的名歌手》（*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 ）时，对工匠歌手的做法加以轻蔑的嘲讽。这些工匠歌手们谨小慎微地对付每一段歌词，然后把歌词套进用“规则表”创作出来的唱曲之中，更有甚者，还专门雇用了“纠错员”，一旦发现不合规则的地方就用棍子加以敲打作为警告。毫无疑问，瓦格纳的心为那位年轻的骑士而跳动，骑士力排“工匠乌鸦们”的条条框框，以自己“激情的热血”作为音乐创作的源泉。瓦格纳尽管对那些吹毛求疵加以嘲讽，但是在这部歌剧的终结处，他依然祝“德意志工匠们”永生。追求奔放的表达方式仅仅是德意志音乐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对秩序的渴望。每一位德意志音乐大师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相互矛盾的问题。

马丁·路德把歌曲带进了神圣的领域。在此之前当然也有宗教音乐，特别是在意大利，格里高利圣咏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马丁·路德这位宗教改革者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歌手、弦乐器手和笛手。他亲自谱写

自己的教会歌曲，发明了教区唱曲。直到此时，这些歌曲才成为礼拜的一个固定部分。也许会有人私语，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被简化程序的新教否则就没什么内容了。但路德是真正在意音乐，他认为音乐是“上帝的恩赐和馈赠”。他甚至认为音乐有驱散魔鬼的力量，在音乐中可以忘记“一切愤怒、淫荡、傲慢和其他恶习”。在一次饭前的讲话中，他曾这样说道：“我把音乐放在仅次于神学的位置上，并且给它以最高的赞誉。”马丁·路德时代，音乐不再是一种安逸的排遣或陪伴虔诚之音。这位宗教改革家给音乐以重任，让音乐把人引渡上天。

虔信主义加深了音乐中的神学内涵。罗斯托克的传道士和修行作家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1659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宗教灵魂音乐”（*Geistliche Seelenmusik* ）的小册子。这本书除了搜集教会歌曲之外，还对音乐和礼拜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观察。“我们以上帝的名义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都是为了赞誉上帝，但歌唱是对上帝特别的崇敬。通过歌唱能够证明，我们是用欢乐、热心和喜悦的心情来做礼拜。就像我们形容一个人喜欢干活，会说他边哼曲子边干活……谁若用歌声祷告，他就是双倍的祷告，因为他用喜悦之情来祷告。”

并非每一首歌都在履行如此崇高的职责。对于虔诚的人来说，这个时代的世俗音乐都是靡靡之音［仅仅数十年之后，汉堡歌剧院于1678年落成，这是首家由市民建成的这类性质的音乐机构，然而安东·莱瑟（Anton Reiser）和他的同信仰者们奋起反击，强迫歌剧院重新关闭］。

虔信主义者米勒尽管为音乐带上了基督教的紧箍咒，但他对音乐的赞誉和后几个世纪（世俗）音乐的传播者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音乐是艺术的最高形式：在这个世界上音乐最适合“唤醒懒惰的心情”，“点燃冷酷的心”。一位信教者应该如何面对歌唱，米勒的推荐完全可以出自浪漫主义时代：“啊！让这个世界见鬼去吧！”音乐的这种双重角色，一

方面激发情绪，同时也使自己从尘世的种种樊篱中摆脱出来，从此和德国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内心殿堂的基石就这样构筑起来了。

刻意将音乐进行宗教的提升，这是一条德国特色之路。看看英国，这一情况就更加显而易见了。英国的清教徒和虔信主义在精神上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大革命”后，清教徒取消了英国圣公会礼拜仪式和主教堂音乐。1644年，他们甚至颁布法律，把管风琴从教堂清除出去，并且解散了所有合唱团（直至查理二世时代，英国音乐才从清教徒的大清洗中逐渐缓解过来）。

约翰内斯·开普勒在其《世界和谐》（*Harmonices Mundi* ）这部五卷巨著中分析了音乐的理性这一面。这位自然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从柏拉图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中得出这样的观点，即音乐的和谐反映出世界的和谐乃至宇宙的和谐，因此音乐可以影响人们积极从善以及追求和谐，因为人的灵魂是以同样的调和级数构成的。

巴洛克时代的全能学者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第一个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为什么音乐听上去会这么“舒适”，为什么会“打动心灵”这个问题。莱布尼茨比开普勒更进了一步，他描写了音乐如果不能化解成新的和谐时，会产生一种压抑的效果，会使人体感官产生一种不和谐。尽管莱布尼茨也强调了宇宙秩序与音乐秩序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并未指出音乐具备道德功能。对于莱布尼茨而言，音乐是一种无意识的计算乐趣。这是“灵魂的一种秘密的算术过程，而灵魂并不知道它在计算中”。

当莱布尼茨1700年写下他对音乐的定义时，还没有能够聆听到德国音乐泰斗的第一批作品。此时此刻，15岁的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还在吕内堡（Lüneburg）的米歇尔修道院里担任一名礼拜歌手，他月薪12个格罗申，在合唱团男生中算是个中游偏上的孩子。18岁那年，巴赫在阿恩施塔特（Arnstadt）开始引人注目，这一年此市重建了教堂，巴赫担任了这个教堂的管风琴手。他上任不久，教堂主持人就频频把巴赫叫

去，说巴赫在演奏管风琴的时候“加入很多奇特的变奏，掺入不少陌生的音符”，“让教区的信众有些不知所措”。此时，通往莱比锡圣多马合唱团艺术总监以及莱比锡市音乐总监的道路还非常漫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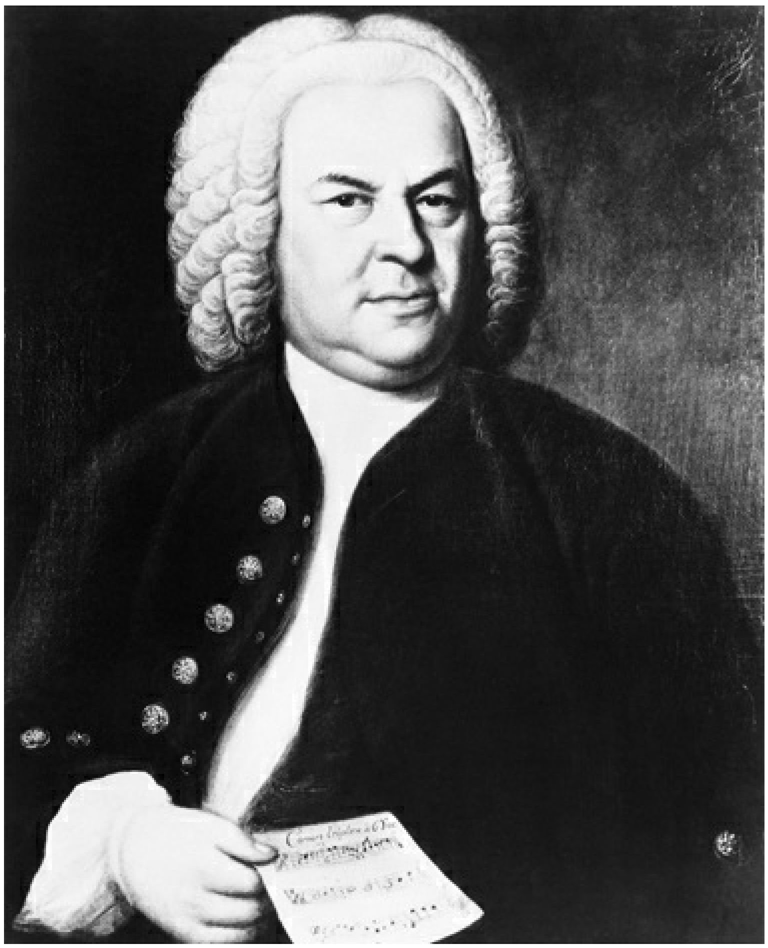
早在青年时代，巴赫就非常自信，从不被那些诋毁所迷惑。他和他的前任以及很多后继者一样，不过是一个贵族或教会施主的“雇员”，但是他和海因里希·许茨（Heinrich Schütz）以及备受他推崇的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Dieterich Buxtehude）截然不同，他把自己看作一位音乐艺术家，而不是音乐奴才。

巴赫在去世前三年，曾被腓特烈大帝所迫，创作了一部最搞笑的对位学经典之作。这位普鲁士国王专门把巴赫叫到波茨坦，很想见识一下这位被德意志音乐界公认为全能乐师的本事。这位演奏笛子的国王想出了一个主题［也许是让他的宫廷乐师，巴赫的亲生儿子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Carl Philipp Emanuel）想出的主题］，让巴赫进行变奏。这个主题非常复杂，国王觉得根本无法变奏。巴赫坐到锤击式钢琴前，信手弹出了一首三声部的赋格曲，使在场听众哗然。回到莱比锡，巴赫还不善罢甘休，又在国王的主题上创作了一首六声部的赋格曲，为这次音乐的奉献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巴赫一生不管对选帝侯、国王或教会做过多少妥协，但他的音乐只服务于一位主人，这就是上帝。这位从小受虔信主义教育的路德教信徒，直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天都对自己的信仰忠贞不渝：“入神的音乐时时有上帝的恩典陪伴。”

把音乐看作更为自立的艺术，巴赫是第一位作曲家。他把音乐从虔诚的伴奏音乐（或更糟糕的宴席间轻盈的伴奏音乐）中解放出来。把音乐宗教变成音乐宗教，这对德意志的音乐认知来说是关键性的一步。巴赫虽然未能完成这一步，但是他已经为此奠定了方向。

19世纪20年代，当作曲家范妮（Fanny）和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姐弟俩的祖母贝拉·莎乐美（Bella Salomon）正为全家要从犹太教皈依到基督教生气的时候，范妮曾经解释道，实际上他们皈依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巴赫。祖母对巴赫也无任何非议，她自己也是一个巴赫的狂热拥戴者。当费利克斯14岁生日的时候，祖母送给孙子的礼物恰恰是被人遗忘的《马太受难曲》（*Matthäus-Passion* ）的手抄本。1829年3月，当20岁的费利克斯在柏林声乐学院指挥这一部雄伟的作品时，巴赫重新被人发现，成为德国人的偶像，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音乐的疆界。



“入神的音乐时时有上帝的恩典陪伴。**”**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

巴赫的巨大影响只有这样来解释：他是第一位成功地把音乐各不相

同的、相互矛盾的追求凝聚到一起的音乐家。在他手里，狂放的曲调被协调成一部复杂的和声。在他之前流行的巴洛克音乐原则是：一个曲调的声部不要和其他自成一体的声部交织在一起，而仅仅由简单的通奏低音伴奏。而巴赫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家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如果让所有声部一起工作，当一个声部和其他声部交互而产生出非常和谐的旋律时，那么这种和声会更加完美……"

被巴赫推向鼎盛的对位作曲法，并不仅仅是一场美学的游戏。他把这种作曲法视为上帝创造的秩序的表现和象征，把它视作"Concordia discors"，即争执的和谐。用两个并存而又对立的平等声部进行作曲给人很多启发。直至今日，音乐大师们依然期望能从这种作曲原则中引导出一种伦理。2008年，指挥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在他的著作《音即生命》（*Klang ist Leben* ）里指出，"如果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他们的对话中，能够认识到赋格曲结构中的平行性"，即便是近东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因为："真正的尊重……意味着接受他人的不同性，并且不伤害其尊严。在音乐上，用对位的办法罗列声部，或者用多声部，即复调的办法显示出这是可能的。接受他人的个性，必须并且可以给予其自由，这是我们必须从音乐中汲取的最为重要的教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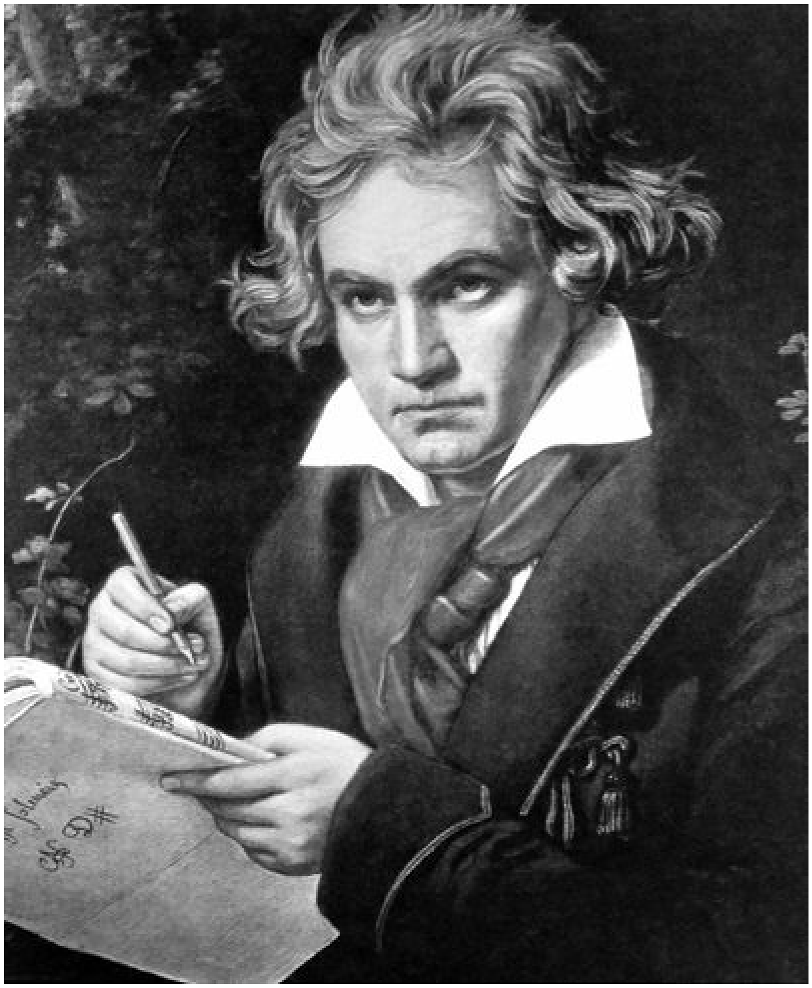
巴赫不仅仅是这一险象环生的音乐伦理讨论的开山鼻祖，他还成功地把最严谨的、几近数学性质的结构和最深奥的灵魂表达结合在一起。他的《马太受难曲》在结构上如此丰富多样，音乐家即便在数百年后也无法彻底将它分析透彻。曲中如此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的苦痛，除非是铁石心肠，才有可能不被感化。与一板一眼的工匠乐师不同，这位对位学大师随时都允许在曲中流露最强烈的情感："云中的雷霆和闪电都消失了吗？/地狱啊，张开你烈焰熊熊的大口；/以最迅猛的力量/打倒、粉碎、吞噬、消灭/那撒谎的叛徒，凶狠的生灵！"耶稣被抓获后，巴赫让《马太受难曲》中的两组合唱，以一泻千里的方式唱出这些激愤的歌

词，由此可以管窥巴赫是如何以强烈的音乐方式处理情感的。

无度的追求，超越理性的目标，如果说这是德意志灵魂的基础，那么巴赫在这种意义上是其最纯粹的代表。1750年，巴赫65岁与世长辞时，留下了上千部声乐、管风琴、钢琴、室内乐和乐队作品，其形式有康塔塔、无伴奏圣歌合唱、弥撒曲、受难曲、赞美诗、组曲、前奏曲、赋格曲、奏鸣曲、交响曲和变奏曲。“巴赫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片瀚海！”[2] 人们情不自禁地如此赞美这位天才。正是这位天才，使音乐经受住了下一轮革命性的考验。

“音乐艺术是信仰的终极秘密，是一种神秘主义，是一种天启教。”

如果说巴赫的艺术家自信心多少还受到其信仰上帝的虔诚的制约，那么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是第一位非凡的音乐家，其目的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打造出人类与世界。他的座右铭是：“扼住命运的喉咙。”并不是说，他没有像巴赫那样热忱地亲近上帝，而是因为天主教徒贝多芬在传统的信仰中再也找不到这种亲近。他的作品永不停歇地奋进着，其核心是一种愤怒的涌动。音乐不再是上帝的恩赐。人要用音乐证明，自己也能与神为伍。他倾听天空，却感受不到和谐的秩序。所有的一切都要由自己来创造。所有这一切把贝多芬造就成比巴赫更为必然的音乐建筑师。而这一点并不仅仅是贝多芬失聪之后才如此。



“扼住命运的喉咙。”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1827**）。

贝多芬更加果敢地背弃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封建社会音乐界对这位音乐家的角色的期待。他在波恩从一位宫廷乐师做起，负责教堂音乐、室内乐和剧院的音乐会。在维也纳，这位天才终于在市民的音乐大厅站稳脚跟，却一直依赖于贵族赞助者的慷慨。但是贝多芬青年时代在二元帝国的首都[3]留下的一段逸事表明了这位音乐家的自我意识已经完全成熟了：贝多芬有个钢琴学生是一位年长的伯爵夫人，据说她曾跪下双膝请求贝多芬演奏，年轻的贝多芬却慵懒地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如果是巴赫，我们很难想象一位贵族会吃闭门羹。

据说，在一次私人音乐会上，贝多芬看到有些听众无动于衷，便中

断了演奏，愤然说道：“我不为这些混蛋演奏。”而“爸爸”[4]海顿（Joseph Haydn）则绝对不敢如此冒犯。即便是散漫成性的“神童”莫扎特虽然会对无动于衷的混蛋们侮辱一番，但不过也就是来一首混账曲子而已。

德国浪漫派诗人和思想家是贝多芬最理想的听众。对于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来说，即便是非宗教的音乐也是“神圣的音乐艺术”。路德维希·蒂克这样解释道：“音乐艺术是信仰的终极秘密，是一种神秘主义，是一种天启教。”启蒙运动者们试图把神圣的宗教世俗化，而浪漫派成员则把世俗的东西神圣化。1799年，蒂克酷爱音乐的挚友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在他的文章《艺术之友的艺术幻想》（*Phantasien über die Kunst Freunde der Kunst*）中描写了另一个自我，这就是完全献身于音乐的文学家约瑟夫·贝尔格林格（Joseph Berglinger）：“当约瑟夫置身于一场大型音乐会的时候，他不去理会衣着华丽的听众，在一个角落坐下来，聚精会神地倾听着，犹如置身于教堂之中。静静地，纹丝不动地，眼光聚焦在地上。哪怕最细微的一个音符也逃不过他的耳朵。音乐会结束时他一脸憔悴，精疲力竭，他实在太专心致志了。”古典音乐会是从举办宗教礼拜的精神中诞生的。

如果音乐不再是路德-虔信-巴赫意义上向上帝打开心扉的工具，那么音乐的神圣从何而来？“为音乐而喜悦，为纯粹的音乐而喜悦，这真是一种纯洁的、感人的享受！当他人忙于嘈杂的事务或者心烦意乱，就像被一群陌生的猫头鹰或恶毒的昆虫所困扰而一头栽在地上的时候，我把头埋进音乐神圣清新的源泉之中。慰藉的女神向我倾诉童年的天真，我张开双眼看见这个世界，到处一片欢乐的和解。”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是这样描写《音乐的奇迹》（*Die Wunder der Tonkunst*）的。

这段话证明，在浪漫主义者的思想和感觉中，音乐完全继承了宗教：音乐给予在尘世疲惫不堪的人、不堪重负的人以灵魂的拯救。而且

这一奇迹还不够，音乐还能够洗净人生，把人的心灵倒退到孩提时代的无辜状态。“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四分之一世纪后，贝多芬沉浸在天下兄弟姐妹皆欢颜的陶醉之中，以席勒的乌托邦式的“欢乐颂”为题，在他的第九交响曲中表达出相同的渴望。

浪漫派之所以强调音乐有拯救灵魂的效果，恰恰是因为音乐无须词语或文字。虔信主义的先驱们仅仅认为填入虔诚诗句的歌曲才圣神，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则把歌剧视为音乐中的最高格式。然而1800年左右的德意志音乐家们却剑走偏锋，设计出一套“纯音乐”的大纲。“如果我们说音乐是独立的艺术，那指的仅仅是纯粹的器乐。这种艺术无须任何帮助，不掺和任何其他艺术，这才是原原本本的、使人认识其真正本质的纯粹艺术。”喜欢作曲的文学家E.T.A.霍夫曼在评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时，对音乐做出了如此决断的结论。尽管他本人仅仅尝试创作了一部交响曲，剩余的都是声乐作品、舞台作品和室内乐作品，但是他毋庸置疑地将纯器乐推崇为音乐的最高格式。

今天，人们很难体验这种音乐形式在当年是多么前所未闻：这种音乐既不能拿来跳舞，也不能唱歌，既不能让某一位大师在其乐器上大显身手，也不能在举办宴会时当作优雅的背景声音。而室内乐在当时就被毫无问题地滥用在这种场合。要想听一部交响曲，就要去音乐厅。在那里，他得不到一位歌剧听众所欣赏到的爱情、死亡、激情的大戏，那么他到底是图个什么呢？

交响曲的升华始于约瑟夫·海顿和沃尔夫冈·莫扎特。海顿就曾断言，他的音乐是全世界都能懂的“语言”，因为它不需要文字和情节就能够刻画“性格”。然而，让交响曲成为“乐器的歌剧”，成为“人类情感的完整戏剧”，还要非贝多芬莫属。这些特点，正是浪漫派所推崇的。

前两位奥地利作曲家是交响曲作品的多产作家，而贝多芬却把创作的数量限制在已经具有魔力的“九”字上，他之后的交响曲作家（几乎）

没有一个能够超越这个数字的。每一个有音乐修养的人都能立即识别出贝多芬交响曲的主题，但是如果要解读海顿的一百多部交响曲或莫扎特的四十多部交响曲的主题的话，人们不免要陷入窘境。

贝多芬严格要求自己，并不仅仅出自这样一个追求，即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尽可能留下一部和谐完美的作品集（他是为自己作品编号的第一位作曲家。他认为，能够收入经典作品集的作品连一半都不到。那一首让世界各地的钢琴学生弹得滚瓜烂熟的钢琴曲《致爱丽丝》就没有被收录进作品集的荣幸）。每一部作品都是别具一格和独一无二的精品，出自这样的追求，贝多芬情愿缩减作品的数量。

《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舞蹈的神化》：尽管绝大部分标题和性格化描写并非出自贝多芬之手，但这表明他的交响曲不是“单纯的”音乐，因为这些作品有着完全特定的非音乐的思想基础。这一点和后来的音乐理论家所谓的“纲领音乐”又不相同。贝多芬绝对不会像20世纪初的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那样，给他的听众送上一个导游。施特劳斯为自己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的每一个段落都起了个具体的名字，如《溪边漫步》或《瀑布》等。

贝多芬是一位“绝对”的音乐[5]作家。同时他也是第一位知识分子作曲家。与海顿、莫扎特不同，他不仅孜孜不倦地阅读席勒、康德和赫尔德，同时也把自己的作品视为对当时政治、哲学、世界观讨论的贡献。如何用“纯”音符传递“信息”，而分析者解析这一信息又是何等困难，这从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的例子中就可见一斑。

1801年，贝多芬动手创作这一部充满革命气息的作品。与此同时，他的《普罗米修斯的生民》在维也纳首演大获成功。但是贝多芬并不满足。他觉得芭蕾舞音乐如同一个紧箍咒，使作品过于僵硬而落入俗套。一个泰坦英雄的故事，讲述普罗米修斯力排众神之议，偷来火种，把人类从宿命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而不需要有舞者扭来摆去，这部创作定会

成功。于是，贝多芬把普罗米修斯的主题放进第三交响曲，这样他在作曲方面就更加自由和更加连贯。

贝多芬眼前浮现出第二个光辉形象。他是法国大革命的狂热崇拜者。1804年，当他完成了第三交响曲的总谱时，封面上写着*Symphonie grande*，*intitolata Bonaparte*，意为《大型交响曲，献给波拿巴》。同年12月，他的偶像加冕当上了皇帝，据说贝多芬怒不可遏，愤然撕去了总谱扉页，并且说道："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现在他会践踏所有人权，沉湎于自己的虚荣！"当这部作品1805年首演时，作品标题变成了*Sinfonia eroica*，*composita per festiggiare il sovvenire di un grand'uomo*，意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

《英雄交响曲》要纪念哪一位"伟人"？这就需要每一个时代的人自己去揣摩了。1847年，为悼念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英雄交响曲》在莱比锡布商大厦奏响。1892年，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在柏林指挥演奏《英雄交响曲》："今天，我们这些充满情感和理性的、有血有肉的音乐家，把《英雄交响曲》……献给贝多芬的兄弟，德国政治界的贝多芬，俾斯麦侯爵！"著名钢琴家和贝多芬作品演奏家（希特勒的追随者）爱丽·奈（Elly Ney）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起她曾收到一位歼击机飞行员的来信："在一次俯冲轰炸行动后的夜里，我在收音机里偶然听到《英雄交响曲》。我非常清楚地感觉到，这部音乐作品就是对我们的战斗的最佳证明，它把我们的行动神圣化了。"

后人利用音乐作品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但是去指责受利用的音乐作品则是愚蠢的做法。而贝多芬恰恰助长了音乐为己而用的做法。他的英雄献词让人充满各种猜想，这和《英雄交响曲》的作用相比真是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他在《英雄交响曲》中创造了一种音乐的语言，这种语言大声疾呼，寻求知己。"难道你们听不见我想对你们说什么吗！"作品以这样一种姿态迷住了听众。然而当听

众试图说出他们明白了什么的时候，却又哑然失声，或不得不用怪诞的解释加以搪塞。这就是贝多芬音乐的魔力所在：这是一个音乐的神灵，他从未被捕捉到，尽管他竭力让人去捕捉他。

“炙热的光线射进夜幕笼罩的这片土地，让我们看到硕大的黑影，它上上下下舞动着，把我们团团围住，吞噬着我们内心的一切，唯一残留的是那一份无限渴望的苦痛。”E.T.A.霍夫曼试图用这样一番话来描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在他心中激起的风暴。如果没有跌入深渊的勇气，没有像浪漫派那样“献身于那种无法言表”的情感，那么他在这种音乐面前只能不寒而栗。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的哲学家那样，用尽心机把音乐解释成没有词句的荒诞语言。伊曼努尔·康德对于生活的低谷总是有一种敬畏。在他眼里，这一切还都比较简单：“音乐是情感的语言”，而情感的语言没有什么价值。音乐要比“文化更容易享受”，因为它和诗不同，它没有给人留下任何“遐想的余地”。在音乐中可以“不通过词语的弯路去识别思想”，浪漫派的这一断言，被这位柯尼斯堡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是无稽之谈。这位“纯”理性主义者对器乐，即所谓的“纯”音乐就更不认同了。在他的美学中，音乐的级别最低，大约排列在“糊墙纸上的……叶形卷饰”和“大海里”形状绚丽的“贝壳”之间。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解释起音乐来，就要起劲得（而且也知识渊博得）多了。在他的美学系统中，音乐占有相当高的位置。建筑、雕塑、绘画为最低的级别，文学的各种体裁为最高的级别，而音乐则在两者之间。他也把音乐定义为“消遣的艺术，音乐本身就是消遣”，在音乐中可以嗅到一种“没有着落的自由飘逸”，并且反映出一种“空洞的我，没有其他内容的自己”的危险。尽管如此，他还是高度赞赏音乐。在音乐的最高表现形式中，例如在巴赫的作品中，他看到了两个极端，即“最内在”和“最理性”能够熔于一炉。对于黑格尔来说，在音

乐这一艺术形式中个体第一次从深层打探自我。对于黑格尔来说，音乐的升华与自我意识强烈的市民阶层的社会地位提升是平行的。但是黑格尔认为，音乐无法胜任这样一个世界史的任务：这种自缚的个体是无法与历史的普遍实体和解的，所谓普遍实体，在这里指的是一个民族所属的习俗，指的就是文化。音乐，特别是纯器乐，是不可能跳出内心世界的樊篱的。直到德国的第三批音乐巨人崛起的时候，他们才斗胆创作出成为民族神话的“纯音乐”。

“作曲家用他的理性所不解的语言揭示了世界最内在的本质，说出了最深层次的智慧。”

理查德·瓦格纳是德国音乐的原罪开端，也是其神明结局。艺术因为他而彻底失去了谦卑。为上帝打开心扉？太可笑了！为哪个上帝？！就是那个只有穷乡僻壤的教民才相信其存在并被人撵得东奔西跑的白胡子庸人？用清凉泉水般的音符给那些疲于生活的子民们来一次神清气爽的沐浴？呸！简直太庸俗了！改变人类？画蛇添足的目标！人类不想被改变，人类需要的是得到拯救！欢迎光临纯艺术的世界！

拯救作为主旋律贯穿了瓦格纳的全部作品及其各个层面。革命家瓦格纳不仅奋笔撰文抨击市政，而且还于1849年走上德累斯顿街头参加巷战，为的是把支离破碎的小德意志国家从所有封建的、教会的、资本主义的压迫者们手中拯救出来。后来，这位身为“萨克森王国宫廷乐队指挥”的胡作非为假革命者不得不逃亡苏黎世。一年之后，瓦格纳撰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檄文，其语气仿佛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只是多喝了几杯蜂蜜酒：“并非我们的气候条件使得曾经征服过罗马世界的勇敢彪悍的北方民族堕落成奴性十足、思维迟钝、目光呆滞、神经脆弱、丑陋肮脏的残疾人；并非气候把我们从那个我们不曾认识的、性情爽朗、勇于作为、充满自信的英雄种族变成疑神疑鬼、胆小怕事、匍匐爬行的国民；并非气候把健康强壮的日耳曼人变成了患淋巴结核的、皮包骨头的织麻袋片的工人，从一个西格弗里德（Siegfried）[6] 变成一个戈特利布（Gottlieb）[7]，从一个投掷标枪者变成捻纸口袋者、宫廷枢密官或耶稣的臣民。这一辉煌杰作的功名都应归于那套伪神甫们包罗万象的文明学说，以及他们所有堂而皇之的作为。除了我们的工业以外，还包括那些有失体面、扭曲身心的艺术，它甚至登上了荣誉的殿堂！所有这些做法都完全出自对我们的本性来说完全陌生的文明，而不是从这一本性的

必然引导出来的。”



“拯救拯救者。**”**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

对于瓦格纳来说，日耳曼精髓只能通过“人类生命最高共同表现”的艺术精神中再生。但是，艺术在拯救德国之前，必须先拯救自己。各种分裂和禁锢，不仅严重制约着艺术，而且也让西格弗里德的后人衰败。“未来的艺术”要把所有应该归属在一起的重新组合起来，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应这样：现代艺术应该和北方日耳曼传说这一最古老的过去熔于一炉，而各种单独的艺术种类，如音乐、戏剧、造型艺术等，不应该再老死不相往来。艺术全能大师在历史上都是前卫者，他能够逾越现代的艺术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业间的疏远，走在社会的前面。创造出

一种面向全人类的艺术，这是席勒和浪漫派的梦想，而瓦格纳则要让梦想成真。

瓦格纳察觉到“利己主义”是他那个时代最致命的罪恶。他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和社会关系中，而且在音乐中发现了这种自私。作为革命家和作曲家，他认为个人的解放是一种进步。但是，个人从传统体系中摆脱出来，不是为了解放陈旧的社会帮派，使其变成一个新型的群体，而仅仅是为了让自己鹤立鸡群，这样一种解放瓦格纳认为是一种变态。在瓦格纳的思想中，从社会理论到美学理论的过渡是天衣无缝的。在《歌剧和戏剧》（*Oper und Drama* ）这篇论文中，瓦格纳详细阐述了其全部艺术创作的发展过程。其中一段这样说道：“这些主音符如同一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渴望能够逾越熟悉的家庭环境，得到无拘束的自立，但是赢得自立并非就成为一个孤立的自私者，而是通过与同样走出家庭的他人的接触。”他接着写道：“一位少女自主地走出家庭，靠的是另一位小伙子的爱。小伙子来自另一个家庭，他把少女引到自己身边。音符也是一样。一个音符从一个调式的圈子里出来的时候，已经被另一个调式所吸引并受其支配。而被吸引的音符必须根据爱情的必要法则融汇到这个调式里。从一个调式中出来而挤进另一个调式的主音符，从强势进入本身就揭示出它在这个调式里有亲缘关系，因此只能被想象其受到爱的动机的支配。”瓦格纳用这一哲学革命性地解放了音乐。西方世界形成的、被迄今为止所有作曲家遵循的调式体系发展成一种更为自由的调性。“主音符”这一原则，把瓦格纳的音乐变成了一种奇特飘逸的、骚动碰撞的、永远追求的音乐。瓦格纳采用的音乐语言同剧中要表现的故事完全吻合：两个人为了能够完全融合在一起，而不惜去打破迄今为止的各种家庭以及传统礼仪的枷锁，例如森塔和她那位“漂泊的荷兰人”、伊丽莎白和汤豪舍、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西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德。

但是，瓦格纳不仅是一个音乐的解放者。就像社会理论的思考一

样，他把自己的性别理论也一比一地嫁接到音乐戏剧中，结果他又为音乐套上了一副新的枷锁。“音乐就像个女人”，在《歌剧与戏剧》的第一章里，瓦格纳居然得出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他认为，贝多芬以及那些浪漫派作家把音乐引到了历史上的必经之路，但归根结底是死路一条。试图表现具体内容的“纯音乐”，作为一种自主的语言，最终必定会自我迷惘。

不无嘲讽，偏偏是第一个在舞台上布满歇斯底里的女性（和男性）人物的瓦格纳，指责贝多芬把音乐变成了一位歇斯底里而又冷血的女权捍卫者，她最大的渴望是用词句来得到拯救。在分析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时候，瓦格纳断言，贝多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在最后一个乐章里试图逃遁到席勒的《欢乐颂》里。但是，这一拯救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音乐本来是要和词句合二为一的，但是贝多芬用音乐像“长辈”一样主宰着文字，又一次超出了它所应起的恰如其分的作用。如果想真正获得拯救，音乐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应局限于“接受性的奉献”。音乐仅仅是从最好看不见的乐池中传来的“延绵不绝的”曲调，把灯光聚焦的舞台上的戏剧推向高潮。

作为音乐家，瓦格纳用这种理论来贬低自我，他又如何能够承受呢？他的办法是同时成为从音乐剧中汲取“创造性”力量的始作俑者：自己担当剧本作者。《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布伦希尔德中了魔咒一觉不醒，众神之父沃坦（Wotan）守护着自己心爱的女儿不受流窜到此的流浪汉糟蹋。而音乐诗人瓦格纳则使他的音乐仅仅在文字中耗尽，而这些词句又是值得让音乐做出自我牺牲的。西格弗里德最后获得了布伦希尔德的贞操，这位英雄也是沃坦的后代。瓦格纳的做法与此相同，他不会用自己的音乐去哺育他人编写的戏剧。瓦格纳的全部艺术创作最终不再是一个大解救的乌托邦，而是变成了把所有的造物线头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艺术家上帝近亲繁衍而且无所不能的大幻想。

但是，瓦格纳对这种指责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成功地在文字和音乐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或者说是有机的关系罢了，而他之前的其他歌剧作曲家都是随心所欲地在词与曲之间搞强制婚姻。与老一辈剧作家不同，瓦格纳认为自己的剧作中已经植入了倾向于音乐的萌芽。诗人瓦格纳在解释为什么自己倾向于使用头韵体，例如唱段《冬季风暴消失在五月》（*Winterstürme wichen dem Wonnemond* ）[8] 的时候说道，因为这种韵体直接要求用音乐表达出来。词句拯救音乐，音乐拯救词句。在他的舞台圣剧《帕西法尔》（*Bühnenweihfestspiel* ）[9] 的剧终，他用歌唱的神奇形式将这一形而上学推向巅峰："拯救拯救者！"

瓦格纳认为，迄今为止的歌剧不仅失败于不可能消除剧和音乐之间的异化，而且传统歌剧用其传统的框架，如宣叙调、咏叹调、对唱、合奏、合唱无法真正深入到词和曲这两个领域中去，传统歌剧也无法从民间神话的深层提取其主题，而只能从国际上流行的题材中根据喜好进行选择。对于瓦格纳来说，选择地点的问题越来越迫切，只有合适的场所才能够使"面向未来的艺术创作"以其最神圣的形式来发展其拯救的魔力。"缠人的德意志宫廷剧院"，"上演保留剧目的剧院，还带有一堆享受套票的观众和批评家"，所有这些使得瓦格纳越来越厌烦。卡尔·玛利亚·冯·韦伯的《魔弹射手》，原则上做了正确的尝试，旨在创作出一部德意志人民歌剧。但是在《歌剧与戏剧》中，瓦格纳对此举做出了批评。他认为这部歌剧是从神的创作荒野中摘走了民歌甜蜜而含羞的花朵，把它插到"富丽堂皇的阁楼"上"珍贵的花瓶"里，供奉给"每一个酒色之徒的寻花问柳的鼻子"。瓦格纳试图让自己的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摆脱同样的命运。在1863年舞台文化节致辞的前言中，瓦格纳精确描述了未来文化节大厅应该是什么模样的：剧院应该建在"一个不大的城市里"，因为这样可以避开可恶的"大城市观众及其恶习"，一座简陋的圆形剧院，观众可以不受任何干扰而专注于音乐剧，乐队终于可以消失在观众的视线中而被沉降到地下，演唱者不必昨天还唱格鲁克（Gluck）明天又唱梅耶贝尔（Meyerbeer），而是能够专注在瓦格纳的

神话之中。观众由“公开邀请的客人”组成，为欣赏尼伯龙根的指环系列剧，他们专程前来，加上演出的前夜和演出的三夜，逗留于此地。“在盛夏，每个来访者同时也应该结合一些修身养性的郊游，通过郊游可以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烦恼。这样，就不会像往常那样，在办公室或其他工作场所忙碌一天，到晚间先要试图把紧张的思维从痉挛中解放出来放松自己。因此，他应该根据自己所好，投入到一些肤浅的消遣之中，这一次他应该在白天进行放松。黄昏时分，他就可以聚精会神，文化节演出开始的标记邀请他加入这一盛会。”生活是轻松的，艺术是严肃的。

瓦格纳对自己所憧憬的项目的薄弱环节不抱任何幻想：谁来支付这一切呢？他自己囊中羞涩，连建造入口处阶梯的费用都不够。此时此刻瓦格纳（又一次）破产了。尽管他对封建主义深恶痛绝，但是他除了希望能够出现一个贵人或者一位果敢侯爵的“行动”外别无选择，这个人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这样一套设施才能振兴德意志精神，因为这一设施“完全符合德意志的本质”，“德国乐意支离破碎，为的是享受重新合并的那种快乐，这种自娱自乐的欢欣鼓舞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这篇前言是以这样一个胆怯的问句结尾的：“能找到这样一位侯爵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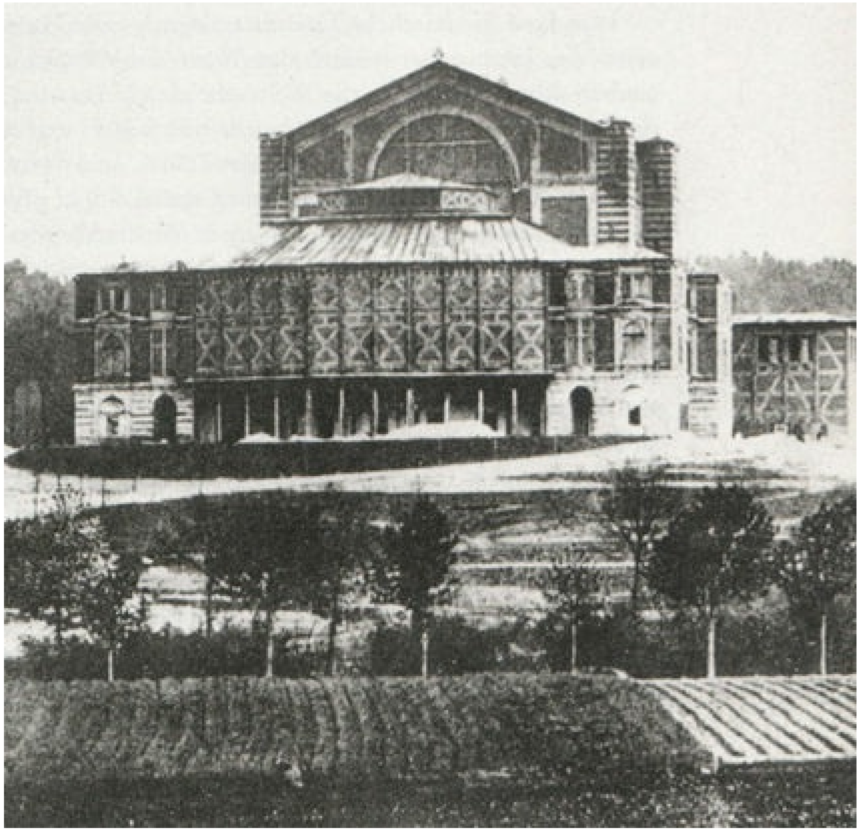
他居然找到了，而且还更具童话色彩：这是一位年轻英俊、踌躇满志的国王。年仅18岁的巴伐利亚王储路德维希二世刚刚掌权，就在1864年5月召见即将过51岁生日的瓦格纳。瓦格纳的《罗恩格林》和《汤豪舍》让国王感动落泪。国王想把自己的心献给这位偶像，外加巴伐利亚的钱袋子。

历来很难相处的君主与艺术家的关系在这里达到了滑稽的顶点。路德维希二世和理查德·瓦格纳在相处不到二十年里保留下来600多封信件和电报，我们稍加阅读就不难发现，谁是真正的主子谁是奴才。

短短几年内，国王就慷慨解囊，使得《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和《纽伦堡的名歌手》在慕尼黑获得首演。1869年，瓦格纳给他这位“高

尚的朋友和仁慈的慈善家”写信：“我经过深思熟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能否告诉我，是否真心诚意地想实现我们演出尼伯龙根的伟大计划，为德意志世界开拓新型高尚的艺术时代制定一个雄伟的出发点。”国王向这位“大师”回应道：“我对您和您的神一般作品的激情从未衰减，您绝不要对您最忠实的朋友和拥戴者产生任何怀疑！他对您忠心耿耿，绝对容不得您对此有一丝一毫的疑虑！”

1872年，拜罗伊特（Bayreuth）隆重举办了音乐节大厅奠基仪式。四年之后，《莱茵河黄金》序曲终于从神秘的地下缓缓涌出，世界之树（Weltesche）[10] 在洪丁（Hunding）[11] 家茁壮成长，西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德欢呼着他们“闪烁光芒的爱情”和“微笑的死亡”，英灵神殿（Walhall）[12] 烈火熊熊。瓦格纳的梦想中的“德意志民族之举，其领导权当然要……完全掌控在（他）一个人手里”，终于变成了现实。刚刚成立的帝国，不仅被瓦格纳看不起，同时也遭到路德维希的蔑视。就让他们把帝都中心建在波茨坦吧！而拜罗伊特才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一个文化民族的首都。



1876年拜罗伊特音乐圣殿揭开帷幕。

客人们受到邀请，纷纷慕名前来拜访这个上弗兰克的小镇，弗里德里希·尼采也在其中。这一位哲学家和古典语文学家正想把基督上帝送进冥府，这样他的超人之才方能得以显现。尼采被瓦格纳彻底慑服了。187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论文巨著《从音乐的精神看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13]。尽管瓦格纳从来都不畏惧给自己的创作加上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但是尼采还为其提供了哲学弹药："在德意志精神的狄俄尼索斯[14]基础上[15]诞生出一种力量，它与苏格拉底（即反射）文化的原始条件毫无相同之处。这一力量既不能用这些原始条件来解释，也不能被这些原始条件所原谅，而是被这种文化视为可怕而无法解释的、极为强大而又怀有敌意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尤其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瓦格纳这样一条强大的太阳运行的轨迹中所认识到的德意志音乐。"尼采用这番话所赞扬的，正是音乐以及音乐戏剧作为完整作品中的那种威慑的性质，而这正是对声

音敏感的理性主义者康德所怀疑的地方。黑格尔对此的形容还是相对冷漠的："音乐所特有的威力是一种自然的力量"，而到了尼采那里这就成了激情的赞扬。尼采本想教导人类去欢庆新的节日，但是被他奉为神的瓦格纳实际上并非让人去生，而是让人去死。尼采这位活力论者对此感到绝望，但他发现这一点已经为时过晚了。这种邀人去死的做法，并非像尼采自欺欺人所说的那样在舞台盛会戏剧《帕西法尔》中才出现的。这位失望的哲学家把《帕西法尔》蔑称为病态的基督禁欲主义闹剧。如果年轻的尼采不是走火入魔，他应该从一开始就能识别出，瓦格纳的拯救剧之所以狂热拥戴今生今世，正是为了在接下来的场面中将它彻底毁灭。"在起伏的波涛中，/在鸣响的回声里，/在世界气息/痛楚的宇宙里/淹没，/下沉，/毫无意识，/沉醉于至高欢乐！"伊索尔德就这样踌躇满志地为爱殉情。伊索尔德仅仅是瓦格纳歌剧众多角色中的一个，他们所有的追求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最终能够进入虚无之中。

而瓦格纳认为，最能反映自己思想的哲学家并非这位一贫如洗且百般顺从的尼采，而是亚瑟·叔本华。1854年秋，他第一次沉湎于叔本华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几个月之后，他给未来的岳父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的信中写道："在叔本华面前，黑格尔之流简直都是江湖骗子！他的主要思想，对生命意志的彻底否决，严肃得让人可怕，但是这却是唯一的拯救。这种思想对我来说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谁都知道它的存在。"

瓦格纳对叔本华的热忱并非纯粹的孤芳自赏。这位终身未娶的哲学家最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在家中用笛子吹奏莫扎特和罗西尼。作为第一位思想家，叔本华不仅把音乐放在艺术领域的国王位置上，而且还把它提升到哲学的级别。叔本华对莱布尼早年对音乐所下的定义做了改变。他认为"音乐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无意识的练习，在这种练习中精神并不知道它其实在演绎哲学"。

德意志哲学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音乐达到了如此之高的荣誉？哲学开始对理性产生了极端的怀疑。康德把“事物本身”视为一种世界头脑，这一头脑可以使每个个人通向理性。而黑格尔从“世界精神”出发，这一精神虽然粗犷得多，但依然用理性贯穿历史。但是叔本华却不再相信在世界事物的背后还有一种理性存在。他认为，世界是由一种盲目的肉体意志支配的。哲学家的任务不再是让人变得理性，或教育他们自律。哲学家唯一能做的是让人们知道，他们不能够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仅仅是一个无奈的躯体，被意志随心所欲地驱使着。唯一可能慰藉灵魂的快乐就是去捉弄意志，否定意志。

叔本华在这里所讲的并非是去集体自杀。最高的生活智慧在于，能够把世界看作一场高雅的戏，人能够卷入其中，但又不能让自己断肠。在这方面，音乐家比总是标榜理性的哲学家要强得多，他可以通过艺术创作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世界意志，并把它过渡到“一个纯粹的表象中去”。“作曲家揭示出世界最内在的本质，并且道出最深层的真理，他所用的语言是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就像一个有魔力的梦游者解谜，这些谜他在清醒的时候是无法理解的。”作曲家能够把听众置入同样的恍惚状态，使其受到各种情感的摆布，这种情感不是对某一件事的喜与怒，而是喜就是喜，怒就是怒。“只有这样，音乐才不会给我们以真正的痛苦，即便在最痛苦的和弦中也保留着喜悦。我们喜欢从音乐的语言里听出我们的意志的秘密故事，意志的冲动和追求，及其各种踌躇、克制和苦痛，即便在忧伤的曲调中也不例外。而现实世界及其灾祸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的意志本身就受到惊吓，感到痛苦。”

对于从未听过一场瓦格纳歌剧的叔本华来说，用音乐来搞政治，甚至是国家政治，这是一种滥用。尽管他可以想象，用音乐创作出一个更容易忍受的第二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也只能在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中存在，绝不能有任何超越音乐的企图。叔本华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提高音乐，而并非从政治的角度。叔本华把同情视作唯一的解毒药，他认为只

有同情还能阻止人们相互折磨和暗杀。他从未看到音乐有任何批判社会，甚至改良社会的功能。但是这种克制在20世纪又一次被德国音乐哲学遗忘了。

“音乐最古老的抗辩就是允诺一种没有恐惧的生活。”

继亚瑟·叔本华之后，西奥多·W.阿多诺是第二位把音乐视为可以拯救灾难深重的人类的哲学家。阿多诺也是一位理性怀疑者。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并不想与真正的理性告别。他要把理性从各种偏离其宗的发展中拯救出来。这种错误的发展始于古典时代，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人们用自己的理性摆脱了原始的自然禁锢，但是实际上却脱离了活生生的世界而落入一个更加残忍的强迫性的社会体系中去。于是，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头人抱着解放的理想。他和志同道合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样，相信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并不像有些人标榜的那样，能给予个性以自由的社会环境。他总体的批判性理论强调的是，摆脱“迷惑人的连带关系”，进入真正的自由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个人都可以真正展示他的个性，并且可以在商品交换以外进行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流。

作为批判理论家中的一名音乐家，阿多诺以同样的乌托邦动机来看待艺术。艺术本身是“一个未受损害的生命的长官，而这个未受损害的生命置身在一个由意识形态的主体设立的被损害的生命之中”。美学的形式要比任何以往的社会形式都人性和文明，因为所有社会形式的失败之处，却在美学形式中实现了：“以非暴力的形式将支离破碎的东西组合到一起，在这些残片中保留着原本的东西，包括分歧和矛盾……”阿多诺以最适当的方式避免了“拯救”一词。但他也给音乐赋予了简直富有魔力的能力：一方面，可以让近代被异化的主体与自己和解；另一方面，与环绕着主体的、沉默而受桎梏的世界和解。“艺术品不受身份的限制而达到自我平等，同时又让人睁开双眼，而这是大自然做不到的。”

与叔本华不同，阿多诺的美学认为艺术中并没有镇静剂（Quietiv）[16]，没有形而上学的安定剂来麻醉世界之痛。对于阿多诺来说，只有

提供具体的可能性，说明“另外的路也走得通”的，才是真正的艺术。阿多诺对瓦格纳音乐剧的“非真理”不以为然，因为这里展现的并非一个具体的乌托邦，而是一条从受损害的生命中走出来而进入虚无主义的出路。瓦格纳的音乐剧“把所有变革的企图嘲笑为永恒但又无法保存，表现出尊严的影子但人又无法得到……在个人利益和整体生命过程之间的矛盾面前旗帜不鲜明，把投降当作国家大事来庆贺。”瓦格纳假宗教式的拯救允诺最后缩减成了“归途无家”，“永恒的宁静却不能永远，祥和的幻象中缺少和平的根基”。

阿多诺尽管要求艺术具备社会批判的性质，却远远没有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那样，去传播一种更加正直的内容美学。他认为，艺术的人道主义并不在于它要喊出什么口号去教育人类。他认为，“原始粗俗的东西是罪恶的主体核心，它从一开始就被艺术这种必须经过提炼的理想摒弃。这就是艺术在道德中的组成部分，并把它与符合人类尊严的社会结合在一起。它本身并不需要与道德题材相结合或者追求某个道德效果”。这种以怪诞方式实现的无言的社会批判，“指出不和解，并按照其发展趋势去对其进行化解”。阿多诺认为这一任务只能用一种“无法交谈的语言”来表达，而他在（纯）音乐中找到了比其他艺术更恰当的语言。

这种想法并无新意。早在浪漫派时代，音乐理想家们就以一种较为原始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思想。新的只是历史情况。如何把陈旧的德意志艺术理想主义从人类史的破产之中拯救出来，阿多诺是必须对此进行尝试的第一人。纳粹刽子手们在集中营里组建起囚徒乐团，听到舒伯特弦乐四重奏时落下感动的泪水，并用李斯特的音乐来粉饰残酷的战争暴行。此时此刻，谁还能相信，“入神的音乐时时有上帝的恩典陪伴”，音乐“慰藉的女神向人们倾诉童年的天真”？

面对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阿多诺痛心疾首，1951年他甚至表

示，“经历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后还能写诗”，这简直是“野蛮行为”。但仅仅几年后，他在《美学论》（*Ästhetische Theorie* ）中又驳回了自己的评判：“谁想取消艺术，他就是抱有幻想，误认为这一决定性的改变还能行得通。”阿多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学家。他是个酒商的儿子，从小就受歌唱家母亲的熏陶，他的姨妈是一位歌唱家和钢琴家，他在这里学习到了音乐。他不愿意也不能把音乐打入冷宫。他用尽了音乐理论的笑话，使出了哲学的浑身解数来挽救音乐。

把音乐推向深渊的不仅仅是一批德意志强盗。早在魏玛时期，以及后来流亡美国的时代，阿多诺体验到，从长远角度看，艺术其实更加危在旦夕。在哲学家的眼中，蒸蒸日上的“文化产业”的罪行不仅在于自己在流水线上生产便于消费的破烂，而且还把所有“严肃的”艺术品降格成纯粹的消费品。为了把艺术从这种双重灾难中拯救出来，阿多诺不得不在艺术本身挖掘罪恶的根源。他必须把“真的”艺术品和“假的”艺术品区分开来。只有后者才和集权的魔鬼为伍，并且和文化产业沆瀣一气。而前者因为其深沉而庞大，因为其“神秘的性格”，才免遭强盗以及庸人的染指。

对阿多诺来说，瓦格纳的情况一目了然，他的作品可以说是犯了双重罪。和肤浅的瓦格纳反对者不同，阿多诺并不满足于指责瓦格纳是个排犹主义者，或者说他是希特勒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而且纳粹分子特别喜欢在拜罗伊特高举大旗游行。他在《试论瓦格纳》（*Versuch über Wagner* ）中解释道，“在瓦格纳的表达中，不真实的场景……一直可以追溯到他作曲的根源”。瓦格纳在歌剧《指环》中完成的主题技术，在阿多诺眼中是一种病态的“迷津一般的呆板”。他有一种“难堪的感觉”，因为他觉得“瓦格纳的音乐就像在不停地拉动听众的袖子”。阿多诺认为，瓦格纳的主题曲并非那种程式复杂、变奏多端的真正音乐主题，而仅仅递送了一个信号，让最涣散的听众也感觉到，好像在甚嚣尘上的日耳曼丛林之中能时时把握方向。

阿多诺一针见血地指出，瓦格纳的主题曲就像广告牌，向市场大肆渲染自己的所有作品，因此瓦格纳的音乐中“商品气息”极为浓厚。更为糟糕的是，这些主题曲就像集权式传动机构中的完美的小轮子，但是因为传动机构“内在的生命”，所以这些轮子也缺乏其自主性。音乐的一大特点就是要建立“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纯粹的内在联系”，但是瓦格纳的主题技术却被扭曲成由整体来残酷桎梏个性的工具，暴露出强盗社会的特征。“瓦格纳的音乐中充满了毁灭性的集权专制，用集权来贬低个性，来排除真正的辩证关系……在瓦格纳的音乐中，晚期资本主义觉悟的发展趋势已经初露端倪，在这种趋势的逼迫下，个性在现实中越浅显化、越苍白无力，就会愈加刻意强调和表露自己。”

短波收音机里不仅播放着《女武神的骑行》，因为纳粹分子相信，仅《诸神的黄昏》还不能为其世界霸权及其没落的幻景伴奏。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贝多芬、布鲁克纳、勃拉姆斯和所有其他古典直至浪漫派晚期的作曲家。所有这些音乐家在今天的“古典音乐排行榜”上依然缺一不可。除了犹太作曲家之外，所有这些作曲家的音乐在“第三帝国”被上上下下不厌其烦地播放着。难道阿多诺也承认，在这些作品中也都蕴藏着“假的东西”吗？

阿多诺要回答上述这一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这在他一生对贝多芬的研究中体现出来。他做了上百篇的笔记和思考分析，但是这些残篇却难以合成一部著作。在他的瓦格纳论文里，他很清楚地表明，贝多芬在他眼中是一位更加真实的作曲家，这一点是无可比拟的。贝多芬并不像瓦格纳那样一味“标榜”主题，但是“由于集权的想法优先，所以个性、念头这些都被艺术地掩盖了。音乐主题仅仅以纯粹发展的原则被作为完全抽象的元素引入作品”。在整体展开的时候，“个性在整体中消失，并且同时被其具体化，并得到证实”。

阿多诺自己一定意识到，他的论证是多么艰难。在为贝多芬著书而

做的笔记中，阿多诺的表述则要尖锐得多。对于这位“早期资本主义音乐家”是否真正成功地把个性和整体辩证地和解在一起，他是这样论述的：“贝多芬的音乐以音乐形式的集权方式来展现社会进程，每一个单个的时刻，或者换句话说，社会中每一个单个的生产过程，都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再现时显现出其功能的……贝多芬的音乐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尝试着证明整体就是真理。”这样一来，贝多芬和瓦格纳看起来就不是一个根本性的，而仅仅是相对性的区别了。每一个作曲家都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编排来遏制表达上的登峰造极。在这点上阿多诺也不得不承认贝多芬的音乐存在着暴力。“克托尼俄斯和毕德迈尔这两者的位置”一直是“贝多芬最内在的问题之一”。[17] 阿多诺在另外一篇论述“善用节拍器”的贝多芬的残篇论文中说，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每一个计数时间段都会有某些元素补充进来，其语气之果断，就好像他本人亲耳听见作曲家的作品在远处传来。

最后，阿多诺还是把不让忠实于古典调式的音乐成为人民的鸦片的这一责任转移到听众身上。听众在全身心投入的时候应该与音乐保持距离，以便于分析和思考。“真正的美学经验必须成为哲学，或者它就什么都不是”，他在《美学论》中这样说道。

阿多诺自己也知道，即便在欣赏音乐时提高警觉也不能挽救音乐，况且外行欣赏音乐也会忽视这一点。音乐只有从自身阻止听众不假思索而沉溺于其中，才能真正避免不被滥用的危险。音乐必须成为“新音乐”。只有那些被文化产业所不解而拒之门外的，被纳粹诋毁为“堕落”而被追杀和禁止的音乐，才能够在这两方面都保持自己的清白。

这样一种从根基上震撼了稳定的文化产业的音乐，诞生于20世纪初，发源地是维也纳。阿多诺1925年曾经来到多瑙河畔的大都市，师从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学习作曲。他后来赞誉贝尔格为“最小音阶过渡的大师”。“第二维也纳乐派”的音乐革命的先锋思想家实际上是

阿诺尔德·勋伯格。他的信条是，音乐不是用来“装饰”，而应该是“真的”。这句话正好说出了阿多诺的心声。

勋伯格年轻时也曾受到瓦格纳的鼓舞和启发，此后勋伯格致力于彻底打破调式的锁链。他的第一个创作时期的使命，就是要解放不和谐音。执迷不悟的听众应该明白，每个不和谐音应该在协和音中得到化解，这实际上是个错误。如果仅仅允许不和谐音存在，把它当作烘托紧张气氛的工具，在结尾处再回归到人们熟悉的古典主义的和谐音舒适的调式中去，那他就没有认识到，前者与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着细微的区别。

那个时代，勋伯格极力在音乐厅里为不和谐音争得一席之地，这一主张与其说被人置若罔闻，不如说激起了听众的愤怒。1908年12月首演的第二升F小调弦乐四重奏成为一桩丑闻。贝森朵夫音乐厅（Bösendorfer-Saal）的观众一片哄笑，嘘声口哨声不断。这部作品还应该算做是位于调式作品的边缘。勋伯格真正彻底放弃调式的作曲是在一年之后的独幕歌剧《期待》（*Erwartung* ）中。后来，一个小型的音乐协会请勋伯格在一批经过选择的听众面前重复这场音乐会。作曲家的愤怒有所收敛。这次，勋伯格在入场券上印上了如下字样：听众只能聆听，既不能发表意见，也不能鼓掌。

在后来的一篇勋伯格的评论文章里，阿多诺对其偶像这种独断做法的批评，远没有像他批评喜好自我吹嘘的作曲家兼指挥家瓦格纳那样来势凶猛。“未被扭曲和纯粹表述的音乐，会对可能触动这种纯洁的各种因素非常敏感，这种音乐既不会讨好听众，也不愿被听众所讨好，既反对对号入座，也反对感受其中。”阿多诺不允许拜罗伊特的重口味音乐家做的事，却对维也纳新音乐家网开一面，这就是强迫听众像做礼拜那样专心投入。“实际上，勋伯格的音乐从一开始就要求听众聚精会神地主动跟随，精力集中在同步发生的多个细节上，从而放弃听音乐常用的

拐杖，让你永远知道接下来会是哪一段；去紧张地捕捉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细节；培养一种能力，去准确地理解即便在最小的空间都会变化的特性，以及音乐无法重复的故事。”勋伯格曾经尖刻地说道，他需要听众仅仅是为了“声音效果的原因，因为没有听众的音乐厅音响效果不好”。即便是这样，阿多诺也不认为这是藐视他人的观点，而是勋伯格的一种合理要求，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作品遭遇到惯常的那种境遇。“对勋伯格来说，音乐不再是舒适享受，他开启了一种潮流，这一潮流把音乐视为儿童般天真的自然保护公园，并把它从社会中没收走。这一社会早已察觉，只有向其囚犯释放一定量的经监管的儿童的快乐，社会才得以生存。他反对把生活分为工作和休闲两部分，他要求把休闲视为一种工作，而这一工作又有可能把休闲搞得一团糟。”这番话正好重述了瓦格纳在设计《未来的文化节音乐厅》（*Festspielhaus der Zukunft* ）中的论述，而对这一点哲学家就缄口不言了。

勋伯格又何尝不想寻找一处高雅的场所，可以让自己的作品不受低俗社会干扰，并且得到应有的赞誉。1924年，他曾为此专门给费尔斯滕侯爵马克斯·艾贡二世（Maximilian Egon II. zu Fürstenberg）写过信。这位德意志-奥地利侯爵曾经担任“多瑙埃兴根（Donaueschingen）促进现代音乐的室内乐演出”的监护人。1921年以来，这一音乐节每年夏天在巴登（Baden）的这一小镇里举办。侯爵邀请勋伯格来这里指挥演奏他的《小夜曲》。勋伯格热情洋溢地回复道：“我仰慕多瑙埃兴根的这一盛举已经多年。这一音乐盛会让人联想起艺术最美好但已逝去的年代。侯爵挺身而出保护艺术家，向贱民们指出，音乐是侯爵亲为的事业，不允许遭遇鄙俗的评判。只有这种人的威望，才能让艺术家拥有一个权力更高的特殊地位，并且把那些有教养和经过努力才功成名就的人分隔开来。把后天而成的和先天生就的区别开，一种人是经过一番努力达到某个地位或操持某种职业的，而另一些人则是天生而就的。尊贵的大人，请允许我对您的壮举表示我最高的崇敬，多瑙埃兴根室内乐演出在文化生活中功不可没。您邀请我参加真是抬举我，让我感到荣幸，并且不无

自豪！”这位音乐天才踮起脚尖，最后也只能对这些天生的贵人以“尊贵的大人”相称，而瓦格纳面对“他的”那位路德维希时却少了多少谦卑啊！

第一眼看上去，勋伯格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与拜罗伊特的音乐达人分道扬镳，实际上却相去不远。在勋伯格开发他的“用十二个相互联系的音符”作曲的同时，他写了一篇论文解释道，要确保“在音乐领域中根植于民间天赋的德意志民族的优势”。1923年，他更加明确地宣布，通过发现十二音体系音乐来保证德意志音乐领先时代一百年。勋伯格对共产主义和民主嗤之以鼻，既不把自己当作奥地利人也不把自己看作犹太人，而着重强调自己是一个德意志作曲家。直到他对日益嚣张的排犹主义有切肤之感的时候，才开始摒弃德意志文化爱国主义，转而投奔犹太教。最后他被纳粹逼迫流亡，才对所有这一切彻底心灰意冷。

阿多诺会说，尽管勋伯格的政治见解民族封建，但他的音乐中不乏革命和反抗的力量。瓦格纳的政治檄文表现出对百姓的亲近，并把对下层民众的蔑视当作傲慢的愚蠢。但尽管如此，他的音乐也不会更加接近百姓。

但是勋伯格的作曲方式，特别是他的十二音方法确确实实走进了一种完全的“新”音乐，从而彻底摆脱了所有集权，把人类引向真正的自由之岸了吗？勋伯格对这一问题肯定是持坚决否认态度的。阿多诺三番五次地努力，想把勋伯格塑造成法兰克福乐派的作曲干将，这让勋伯格很头疼。尽管勋伯格对当时的发展和迷茫给予批判性的评论，但他仅仅想做一名音乐家。他把调式变成了自由调式，最终变成了无调式，其目的并不是想让那些“另类”和“非主流”得到社会的认可。他把自己的作曲工作视为音乐史上必然要走的一步。因此他认为在摧毁了古典音乐体系之后，应该用十二音序音乐建立一套新型的音乐体系原则。构成西方音乐音阶中的十二个音，每一个音必须在其他音都出现过之后才能再出现，

这种想法简单说来并非一种公平理论。人们真要感谢作曲家还好没有把自己的十二音技法上升为社会原则。后来，勋伯格的继承人把这种音乐序列的构想扩展到音节的长度甚至音响强度，即便是阿多诺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一音乐序列最后变成了呆板僵硬的音乐体系，与此相比，即便是古典奏鸣曲主乐章都要被视作杂乱无章的游乐场了。

如果说勋伯格在左邻右舍散布了一些什么与音乐不相干的原则之类的话，那既不是什么批判哲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最多只是些自然科学的话题。正像爱因斯坦用相对论颠覆了物理世界那样，勋伯格想对音乐界来一场革命，他要震撼的是数百年以来被音乐视为最牢固的基础：音乐是沿着时间的延续而线性运动的。勋伯格想创造一种新型的音乐时空的理念。“每一个音的运动……首先应该被理解为音色及其震颤的相互作用，这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里都有所不同。”

尽管勋伯格发表了冗长《和声学》（*Harmonielehre* ），而且是一位一丝不苟的作曲老师，但是他一直强调音乐创作过程的原动力：“意识对作曲的影响不大。他（艺术家）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是有什么在指使他这么做。他内心里受到一种权力意志的驱使去创作，而这一权力的规则他却无从知道。他仅仅是内在意志、直觉和无意识的执行者。无论是新老、好坏、美丑，他一概不知。他只是感觉到一种他必须要听从的冲动。”这一段从《和声学》中摘出来的话，与其说接近阿多诺，毋宁说更接近叔本华（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尽管如此，阿多诺依然不依不饶地坚持说明勋伯格音乐中有一种高度反射的特性，其矛头直指那种就想去征服别人的“非真正的”音乐：“他的激情在于创作这样一种音乐，这种音乐的精神不必为自己羞愧，而是让其统治者羞愧。他的音乐在两个极端上都渴求成熟：一方面它释放出咄咄逼人的冲动，这一冲动在音乐中往往要加以过滤与和声的伪装才得以释放；另一方面它又将精神的能量发展到极致。这是一种自我的原则，这一自我足以强大到

不再否认冲动。”

尽管勋伯格的音乐直至今日对有些听众来说依然是非感官所能接受的或是“一头雾水”的，但是作曲家自己则认为承袭了天才的传统，从无意识中创作出全部。仅仅从他赞誉多瑙埃兴根的艺术赞助人的信中就流露出，作曲这一技能并非可以后天学到，而是上帝的恩赐。这位作曲老师曾经这样评论过一个努力有加但天赋欠缺的学生：“引诱一座火山迸发是徒劳的，因为能者一眼就看出，这仅仅是酒精炉在燃烧。”

勋伯格在其大型（未完成）歌剧《摩西与亚伦》（*Moses und Aron*）中将犹太教的创始人描写成一位绝望的寻找者。他尽管受命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的戒条，却未能把它们传递给以色列的子孙。此前，还没有一位作曲家像勋伯格那样如此折磨自己在一部歌剧中试图把无法说清的东西表现出来，他真是把音乐带到了极限。亚伦试图把他哥哥得到的抽象教条用唱的办法传播给百姓，但是对其进行了篡改和俗化。音乐沦落为毒品，成为颂扬金牛犊的放纵的舞蹈。[18] 摩西自称“笨嘴笨舌”，所以在歌剧中只有一处唱段。禁止偶像的做法在这里成了禁止唱歌。摩西的话语成了富于情感但有些支离破碎的说唱。“我亲眼目睹，/不，/这不是一幅图！/我被彻底折服！/我想到的一切，全都是荒谬！/既不能也不敢说出口！/言语啊，词句啊，我无从开口！”在第二幕的结尾，不仅摩西缄口不言，而且作曲家也写不下去了。

难道勋伯格就想在这部创作的结尾打破音乐的尺度，因为音乐已经无法表达实质性的东西吗？勋伯格在其晚年还创作了另一部短曲《华沙的幸存者》（*A Survivor from Warsaw*），这部作品却是正好相反的例子。1947年，作曲家在加利福尼亚流亡时从一位俄国舞女那里得到一篇短文。它从一位幸存者的角度记载了1943年春华沙犹太居住区的暴动受到镇压的历史。如何把不可言传的东西说清楚，勋伯格在这个问题面前又一次退缩了，他改用唱的办法。一位演员在英语朗诵里穿插进纳粹帮

凶用德语吼出的命令。在纳粹大屠杀这个问题上，勋伯格没有让音乐沉默不语。一支男生合唱团齐唱犹太祈祷词“听啊，以色列！”（Schmar Jisrael），乐队则为其伴上令人心碎断肠的音符。

阿多诺满怀希望的名言——“音乐最古老的抗辩就是允诺一种没有恐惧的生活”，难道真要在试图把人类最大罪行直接标题化的这样一部作品中兑现吗？他于1953年写的关于勋伯格的论文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勋伯格的表达核心就是恐惧，是集权统治下人们对死亡痛苦的恐惧……此前，音乐中还没有把恐惧如此真实地表达出来过。通过加强音量，音乐重新找到解脱的力量对恐惧加以否定。《华沙的幸存者》结尾处的犹太歌曲，是音乐作为人对神话的抗辩。”为了使这一论点更有说服力，阿多诺应该援引勋伯格为数不多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曲家强调了音乐的社会作用，预示一个更加人性化的世界：“艺术是那些经历了人类命运者的呐喊。他们不甘心接受这一命运，而是要去剖析它。他们不愿无声无息地操持‘黑暗权力’的发动机，而情愿一头扎进运转的车轮里，去搞懂结构。”

十年后，阿多诺在其论文《契约》（*Engagement*）中对《华沙的幸存者》的看法就要尖锐得多了：“勋伯格的作曲中伴有一种尴尬……似乎让牺牲者的羞耻心受到了伤害。艺术作品在这些牺牲者身上做文章，来抨击这个杀害了这些牺牲者的社会。”

勋伯格的这部晚期作品让人听得莫名其妙，直至今日依然如此。特别是当作品还像指挥家米歇尔·基棱（Michael Gielen）的协奏曲那样，曲调中响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三和第四乐章之间的音符的时候，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难道这就是阿多诺50年代早期在勋伯格那里发现的所谓“人性对神话的抗辩”吗？抑或其作品本身就是与神话为伍？勋伯格创作的那些爆炸性音调确实是在诉说犹太民族经历大屠杀所受的苦难吗？如果一位听者听不懂朗诵的词句，他会以同样的理由去聆听这鞭笞

现状的刻骨铭心的音乐吗？而且这音乐又和贝多芬的交响曲如此相近？勋伯格这部晚期作品难道不是主要通过其文字露出其人道主义批评精神的锋芒吗？而音乐正如托马斯·曼所说依旧是“抽象和神秘”的？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其《浮士德博士》中塑造了“码音符的人”阿德里安·莱韦尔金，当魔鬼要把他造就成一位音乐革命天才时，他情愿把自己对“火热爱情”的能力和他的情感都送给魔鬼，而这位老兄偏偏是个研发十二音序技术的人。对此，勋伯格一直耿耿于怀。但是，托马斯·曼难道没有嗅到一点正确的东西吗？音乐，无论在其表达中如何反射现实，其核心依然是“冷的”艺术，当人的痛苦湮没在音乐遥远而独立的空间时，它也不能发生什么改变。

“有时我心存唯一的渴望，我想接受终极的到来，放弃人间的所有，进入唯一的完美。**”**

2001年9月，作曲家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作客汉堡音乐节，为上演他的七部歌剧巨作《光》（*Licht*）的其中两场音乐会，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谁又能料想，这次新闻发布会竟成了丑闻。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托马斯·曼就曾发出警告，让人提防这个魔鬼音乐家。半个世纪之后，德国已经变成了民主而乖巧的国家，此时此刻施托克豪森又开始冒头了。为了清楚认识丑闻的严重程度，有必要来剖析一下施托克豪森受到指控的发言。

这位先锋派电子音乐的发明者在多次访谈中断言，自己是在天狼星接受的教育。口若悬河的他，开始讲起了对天使的幻想：“我每天向米歇尔（Michael）[19] 祈祷，而不是向路西法（Lizifer）[20] 祈祷。我禁止自己向他祈祷。但是他时时存在着，比如在眼下的纽约。”被搞得不知所措的主持人试图把话题拉回到保险一点的区域里来，就和施托克豪森谈起了他对和谐人性所做的记录。他在60年代创作《颂歌》（*Hymnen*）的时候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笔录。接下来，主持人问起作曲家对最近几天发生的事件的感受。主持人指的是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施托克豪森沉思片刻后，开始了长篇大论的回答：“哦，那儿发生的事，当然，你们所有人都要来一个思想急转弯，这可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艺术品。一气呵成了我们在音乐中想都不敢想的事，这些人苦练十年，狂热无比，就是为了这么一场音乐会，然后去死。这真是全宇宙间所能产生的最伟大的艺术品了。你想象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这么一些人，如此专注于这么一件事，一场演出，然后就把五千人送上西天而再生，在一瞬间。这我做不到。作为作曲家，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在演出《光》系列中的《星期五》时，大厅里在座的几个人会产生上周一位老人对我说的感受。在《星期六》演出之后，他对我

说：‘喂，你说说，这两个半小时，这么难以置信的低沉的音乐，就像黑云压城一般，并且久久不散……这到底是什么乐队呀？’我说：‘根本没乐队呀！’他说：‘什么？你到底在搞什么？你肯定在捣鼓什么！到底是谁唱的？还是谁演奏的？’我说：‘没人呀！’‘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我是用的发生器和音响合成器。’他说：‘啊！什么！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乐队啦！’我说：‘不用啦。’然后他就仓惶跑出去，好像内心已经死了一样。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这就像纽约的人们经历的这次爆炸。嘭！不知道这些突然受到惊吓的人现在在哪儿。这种大事件总是在我脑海里引发一些想法。我会使用从未使用过的词句，因为这太可怕了。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品。你们设想一下，如果我能创作一件艺术品，你们为此而惊讶，而且瞬时为之倾倒。你们就这样去死，然后再生，因为你们失去了知觉，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太疯狂了。有些艺术家总想尝试逾越可以想象的和可能性的界限，这样可以让我们猛醒，让我们去面对另一个世界。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否能让五千人再生，类似这样的例子。就在顷刻之间。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这个艺术家自己说过他有时都不能理解自己所写的东西。此时此刻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逾越了政治底线。就在访谈中，他千方百计试图挽回这种激进的说法。他指出，在犯罪和艺术品之间当然存在着区别：“罪犯之所以是罪犯，这你们知道，是因为人们都不同意他这么做。这些人不是来听音乐会。这很清楚。也没有人向他们宣布：‘你们也许会丧生。’我也不会。由此可见，艺术并不可怕。但是精神上的震撼，瞬间跳出安全，跳出理所当然，跳出生命，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在艺术中也日益增多了，没有精神震撼的艺术什么都不是。你们怎么一下子都严肃起来了？这个路西法，他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看到主持人几近绝望的眼神，还搭讪地问道：“你是音乐家？你本人就是音乐家吗？”

这位作曲家第二天早上的公开道歉，并未使局势有所缓和。汉萨同盟之城汉堡取消了施托克豪森的两场音乐会。作曲家直到2007年12月去

世再也没能在德国抬起头来。

施托克豪森到底错在哪儿了？他把此前所有德意志大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想到的事情，在这个变得小心翼翼的时代没有顾忌地说了出来。他和开普勒与莱布尼茨一样相信，音乐是和宇宙一致的，尽管他说的这种天籁之音和古典的三和弦音没有任何关系。在汉堡新闻发布会开始时，他说：“如果我能够把宇宙间的东西通过音乐让人去经历，那我就是大师。……我作品里的内涵和我从哈勃空间望远镜拍摄的照片的书籍中所学到的，有着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对此我感到非常惊讶。”

施托克豪森和巴赫以及虔信主义者们一样，相信音乐是对上帝的祈祷。50年代初期他在给比利时一位作曲家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做的这些，都是在我身外形成的，都是自己完成的，就好像必须要完成，不需要我，无须问一个人。我将守候着，祈求上帝，让他引领我，让我停止。”

施托克豪森和贝多芬以及浪漫派一样，梦幻着能够带走听者的灵魂：“在《青少年之歌》（一部为男童声和合成器谱写的早期作品）中，达到了电子乐即合成音乐，与声乐即‘自然’音完美的结合。这是有机的一体。这在三年前还是遥远的乌托邦。它加强了我对纯粹的有生命力的音乐的信念。这种音乐能够直接进入听者的心灵。一位音乐家能亲身经历到，自己的音乐语言能够洗净所有糟粕，把听者带进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那他该有多么幸福啊！”

施托克豪森和瓦格纳以及叔本华一样，追求那伟大的虚无。在给比利时作曲家的另一封信中，他说：“有时我心存唯一的渴望，我想接受终极的到来，放弃人间的所有，进入唯一的完美。”

施托克豪森和勋伯格一样，对时空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他创作的作品，在十秒钟内可以拥入两百多个音符。这些音符就像“蜂群”一样一拥

而过。施托克豪森和阿多诺一样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批判的主观性如何能够保持矜持，而在音乐中得到展开。在1960年的一次广播电台以“奋起反抗所谓新音乐”为题的访谈中，法兰克福的哲学家[21] 和这位年轻的作曲家直接对话。当时施托克豪森就坚持，音乐是一个“精神活动”，因为它可以使听者在“完全清醒和完全失控”之间游荡。但如果谁想用“理智”去解析音乐，他会什么都搞不懂。音乐的精神只能与那些准备好让音乐进入心灵的人沟通。同时他也要冒险，“被送上西天而再生”。

人们需要心灵的慰藉，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是如此，因此他们不仅参加瑜伽和打坐训练班，或者依照老传统去教堂，他们还会一如既往涌进音乐厅和歌剧院，以最清晰的方式为德意志内在本质做礼仪。“文化民族”这种激进说法的核心还是宗教的概念，口口声声要去改善人类，把世俗政治的整个领域视为“垃圾”，这种说法已经沦为节假日挂在嘴边的陈词滥调了。轻便型的解救也就够了。当年被尼采信誓旦旦称为“如日中天”的德意志音乐已经日落西山。民主派们松了一口气。音乐家则苦不堪言。

作者：特·多

译者：李鸥

参阅：深渊，浮士德，严肃文学和消遣文学，下班之后，文化民族空想，男声合唱，爱整洁守秩序，玩具屋，横向思维者，纯洁戒律，渴求瘾

---

[1] Nothung，瓦格纳歌剧中的一个人物。

[2] 巴赫（Bach）在德语中意为小溪。

[3] 指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

[4] 埃斯特哈泽宫廷乐队成员对海顿的亲热称呼。

[5] 又译无标题音乐。

[6] 德国人名，意为常胜者。

[7] 德国人名，意为爱上帝者。

[8] 这是瓦格纳歌剧《女武神》中的一个唱段。

[9] 瓦格纳自己对这部歌剧的称谓。

[10] 北欧神话中构成整个世界的巨木。

[11] 瓦格纳歌剧《女武神》中的一个人物。

[12] 北欧神话中的阵亡者之家。

[13] 中国译本的名字译为《悲剧的诞生》。

[14]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因此也有中译本将其译成酒神。

[15] 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解释道，所谓酒神精神是指人生救赎的力量。

[16] 叔本华发明的词，源自拉丁文quies，意为宁静。

[17] 克托尼俄斯是希腊神话中地神的统称，表示在地下世界生活的神和灵魂。毕德迈尔指的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至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以及这一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倾向。

[18] 《圣经·旧约》中的故事：亚伦从众人手中搜罗金耳环，打造成一个金牛犊，被以色列人奉为神。

[19] 《圣经》中伊甸园的守护者。

[20] 在《圣经》中指被逐出天堂之前的魔鬼。

[21] 即阿多诺。

母亲十字勋章[1]

早在纳粹往德国母亲脖子上挂生育勋章之前，马丁·路德就呼吁德国母亲要奋勇争得十字勋章，因为“一个女人生来不是为了当处女，而是为了生孩子的”。

这位宗教改革者——本人还是个不倦的写作者和布道者——坚信，上帝的宽恕是无法通过人自身的创造来获得的。尽管如此，仍旧有一个行为领域被他认为是优于所有其他领域的，在这个领域男女至少可以自荐为被宽恕的候选人：受孕、怀孕、分娩和教育。“去罗马、耶路撒冷和圣雅各朝圣；建教堂、捐弥撒或是别的什么功德，与结婚者养育孩子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因为只有生儿育女这唯一一件事才是升天的坦途，没有什么别的方法能更快更好地进入天国。”

路德的妻子卡塔琳娜·冯·博拉（Katharina von Bora）是个逃离了修道院的修女，这位曾经的僧侣在成熟之年与她还生育了六个孩子。如此看来她的灵魂永远得救的前景要好过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2]，后者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而是一辈子待在修道院里祈祷、研究和写作。因难产而逝，是一位女子所能得到的最大宽恕，所以她的丈夫不该试图救她，而是应提醒她：“不要忘记……你是个女人，生孩子是上帝赋予你的任务，高高兴兴地遵从他的意志，安慰自己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使出所有的力气把孩子生出来，如果生产时死了，那就从容上路，我们祝福你，因为你是听上帝的话死于一项崇高的任务的。是的，倘若你不是一个女人，那么现在仅仅为了这项任务你该希冀自己是个女人，能够如此美好地遵从上帝的意志，为了完成他赋予的任

务而受难并死去。”

很少有人把男人对分娩的妒忌以如此深沉的宗教狂热表现出来。然而男人并非受到诅咒，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自己孩子的母亲如此美好地受难并死去。路德可谓是五百年后所有那些被夸赞为德国“新型父亲”者的激进先驱代言人：“如果一位男子去给婴儿换尿布，或是为孩子做别的什么轻蔑（即让人看不起的）事，他遭到所有男人的嘲笑，别人认为他是不务正业和家庭妇男；可他却本着……基督教信仰和爱乐此不疲，那么说说，谁在此嘲笑别人的方式最优雅？”

教养工作，从最基础的换尿布和哄孩子睡觉开始，其重要性等同于做礼拜。没有任何原因该把男人从这项礼拜工作中排除出去。在这一点上路德的思想要比所有后来的“产期传道者”都新潮，那些人总是反对男人参与照料婴儿，说他们天生不适宜做这项工作。

路德在16世纪踏上的歌颂母亲之路，约250年后后继有人，他就是虔诚而热烈的新教徒约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齐。这位非常敬仰其同胞让-雅克·卢梭的瑞士人的最初经验是作为教育家积累起来的，他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经营“新庄”，收养附近被遗弃的农民的孩子，教育他们过简朴、接近自然和虔诚的生活。裴斯泰洛齐所尝试的另类教养院模式失败了，破产的他就连自己的儿子——为了表示对自己心中偶像的尊敬他用“汉斯-雅克”的名字给孩子施洗礼——也不得不送到巴塞尔的朋友家寄养。

这位教育家没有质疑卢梭的教育方法，实践失败后转向写作的他越来越重视“母亲”在其教育努力中的中心位置。“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我，”1804年他写道，“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尘世间最崇高的目标莫过于：让母亲们重新找回那种所剩无几和遭到破坏的感情，唤醒她们做上帝希冀她们做的孩子的慈母，她们能够而且应该做到这一点。”

如果说路德的可爱对手还是那些修女，她们放弃尘世生活和扮演母亲角色；那么现在的敌手则是那些“社交名流女子”，也就是法国式的上流社会女人，她们宁愿在大城市闪闪发光的地板上翩翩起舞，也不愿和她们的孩子或是为了她们的孩子待在自己的“圣殿起居室”中。“只要世界一召唤，她们就听不见自己孩子的呼喊了。”裴斯泰洛齐这样谴责“社交名流女子”，她们的孩子实际上根本没有母亲，所以最好让孩子离开她们。然而最善心、最聪明的女教育者都不过是一种应急之举，因为“任何陌生人的心自然都无法代替母亲的那颗纯洁与博大之心”。

18世纪德国也开始争论妇女的社会角色。主张妇女解放的一派，其最著名的代表是特奥多尔·戈特利布·冯·希佩尔（Theodor Gottlieb von Hippel），他不再相信性别之与生俱来或是上帝规定的巨大差异。1792年这位作家和政治家在长篇檄文中主张通过教育和知识来“改善妇女的公民地位”，“女性待在家中……”的禁锢必须打破，“让人类力量的一半得不到赏识，不为所知、不为所用地自生自灭”，这是不可原谅的。虽然公民地位得到改善的妇女仍该一如既往地把孩子的教育铭记于心，但也不该比公民地位早就得到改善的男人操更多的心。当时还没有“坑娘”[3] 这个概念，但启蒙者希佩尔已经猜到为什么男人在历史上能够上升为女人的统治者。“虽然怀孕和分娩所引起的停滞时间并不长，但毫无疑问这是让妇女中圈套的原因。正是这段什么都不做的闲散时光促成了女人……的奴隶命运。”

浪漫派圈内的人也同样热爱妇女，但他们离希佩尔主张的男女平等主义还是有相当距离的，男女平等主义认识到孩子是“中性”的，比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早了150年。1791年诺瓦利斯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断言：“人类的完美与幸福全仰赖女人的智力与女人的美德。”面对（男性）公民冰冷的理性——他们也是因目的明确的社会活动而不得不如此的——这位年轻诗人让（女性）的心坚强，人类更深层次的真理埋藏在她们心中，如同在梦中一样。

普鲁士王后路易丝（Luise）成了浪漫派的圣像，她曾亲自说过，她宁可把自己的所有书籍都扔进哈弗尔（Havel）河，也不愿让知识毁掉自己的感受能力。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为她写过十四行诗，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写过歌颂她的诗《心之王后》（*Königin der Herzen* ）（当年《戴安娜王妃》还远远没有出现），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追悼她的仪式上夸赞道：她从未越界牝鸡司晨过。

对路易丝的崇拜是和她的母亲身份分不开的。虽然34岁就去世了，但她和丈夫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孕育了十个孩子。当然这位“普鲁士的圣母”在宫内有成群结队的奶妈和家庭教师可供差遣，但她仍旧注重亲力亲为，给臣下留下了关怀备至的母亲形象，她宁愿亲自摇着摇篮哄孩子们睡觉，也不愿去风光地接待国宾或是去低声下气地乞求“魔鬼拿破仑”对蒙羞的普鲁士发慈悲。大量描写路易丝的通俗小说和路易丝画像让这位王后一直到“第三帝国”时期都是德国妇女的化身和楷模，其高贵全部体现在默默安慰家人的母性中。

18世纪末19世纪初有一位女子很可能一蹴而就地成为受诅咒的“社交名流女子”的代表，她就是约翰娜·叔本华——那位哲学家的母亲。她十分年轻就许配给了但泽一位年长她很多的富商，丈夫死后她立即把汉堡的家解散了，当时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她前往魏玛，为的是在那里过独立自主的生活。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是其沙龙的常客，她自己后来成为知名作家，作品有24卷之多。同样也写作的女儿阿德勒（Adele）被约翰娜带往魏玛，但她毕生都未能走出母亲的阴影。这位“狠心的娘”给19岁的儿子叔本华写过一封信，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娘俩今后必须分道扬镳：“我一再告诉你，跟你一起生活很难。我越详尽地观察你，这难度对我来说至少就越大。我不向你隐瞒，只要你一天不改变自己，我就会不惜任何代价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了解你的美德，让我不敢靠近你的并非你的精神与内心，而是你的本性与外表、你的观点、你的判

断、你的习惯，一句话，事关外界时我们的意见总是相左。另外你的闷闷不乐也让我感到压抑，难以保持自己的开朗与幽默，这对你亦毫无裨益。你看，亲爱的亚瑟，迄今你仅仅在我这儿小住数日，每次我们都为不值一提的小事激烈争吵，每次都得等你走了之后，我才能顺畅呼吸……”



普鲁士的圣母："王后路易丝与她的儿子们"。诗人诺瓦利斯建议："每位有教

养的女子和每位关怀备至的母亲都应该在自己或其女儿的起居室里挂上王后的画像。”

在1807年能这么直抒胸臆的母亲可谓凤毛麟角，这类话当然多年后也导致母子彻底反目。日后的哲学家认为自己认识到：“儿童早期的照顾者和教育者是女人，她们适合做这种事恰恰是因为她们自己就幼稚、愚蠢和目光短浅。一言以蔽之，她们一生都是大孩子，一种介乎孩子与男人的中间状态。只有男人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这大概也算是事出有因吧。

叔本华就母亲与女人所发表的观点在其思想体系中并未占有最令人信服的位置。毫无疑问，在世上处处看到盲目与充满欲望的意志在起作用的哲学家对女人是不感冒的，因为他曾认定女人没有能力进行抽象的精神活动。然而从理论上来说，他本该给予女人——据说她们是直到脖子都还埋在大地母亲中的——更高的评价，让她们与同情或音乐平起平坐，前者克服了人与人之间的痛楚分离，后者据说能成功地令孤独的个人与世界本质重新达成和解。

文明发展得越快、离人类原初的火种越远，认为母亲们是原始混沌状态的最后守护者的理念就越强。奥地利女作家贝尔塔·埃克施泰因-迪纳（Bertha Eckstein-Diener）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撰写第一部女性文化史［此前男人中只有瑞士法律史学者和考古学家约翰·雅各布·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系统地研究过母系统治形式的历史，当然目的十分明确，是为了证明在人类发展史中父权制为发展的顶峰］。用“加拉哈爵士”（Sir Galahad）的笔名，埃克施泰因-迪纳讲述灭亡了的母权制和亚马孙母系氏族部落。在后记中她指出，一种新的母系统治形式虽然亟待建立，却难觅端倪。“要想建立与古老的正宗母权制类似的东西，需要‘母亲’。这种类型的女人，一半是命运使然的女神，一半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她们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种类型的女人与我们现在的文明发展阶段——做任何事都要有目的，都离不开数字，一切向

钱看——是格格不入的。但恰恰是男人——尽管他可以对任何法律规定的妇科条例[4]采取不买账态度——暗地里渴望超强的女人气质，注意啊，绝不是因为情色，而仅仅是为了通过她们男人自己一直能继续做个淘气鬼。……必须得有什么能降住他们的，必要时揪住他们的双耳，把他们从窘境中拖出，好让他们清醒：极端激进、一锤定音、毫无废话。”

裴斯泰洛齐肯定会痛打“不顾家”的埃克施泰因-迪纳的，她把与不同男人生的两个儿子或者留给父亲，或者寄养在别人家，为的是能周游世界和写书。然而她所描绘的——成年后仍需要母亲揪住双耳将其拖出窘境的——淘气鬼形象却像是对裴斯泰洛齐主要作品《林哈德与葛笃德》（*Lienhard und Gertrud*）的嘲讽式回应。在那本书中既坚定又慈祥的葛笃德不仅让遇到伤心事的孩子们趴在自己的腿上痛哭，而且她那酗酒、赌钱的丈夫也可以这么做——一旦他认识到自己有多无能。

帝国时期的女权主义者们也明确希望病态的世界能因母性而痊愈。1904年参与创建了母亲保护联盟的海伦妮·施特克尔（Helene Stöcker）虽然为节育、堕胎权和妇女的性解放而奋斗，同时她却也梦想着，一旦新女性当家做主，“监狱的大墙将会倒塌，地牢充满阳光，断头台的阴影不再笼罩大地。贫穷与犯罪将会绝迹，整个世界将变得聪明、道德和自由”。与裴斯泰洛齐不同的是，施特克尔不相信在现代女性身上发掘被埋没的本性能有助于她们成为好母亲。她的教育目标不是回到主观臆想的更好的自然状态，而是要提高人类的整体素质：“就像人令一切其他事物听命于其理性洞察力一样，在人类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上——创造新人，他也必须越来越能自己做主。”这位和平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坚定反对派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前往苏联，纳粹上台后她被迫流亡。她坚信进步，因此她也毫无畏惧地提出应研制药物，“以阻止患有不治之症或退化者繁殖后代”。

黑德维希·多姆（Hedwig Dohm）同样热衷教育，却没有优生学方面的情绪冲动。这位女作家自己有五个孩子，托马斯·曼后来成了她女儿的女婿，她极力反对女人因其生物性别就该成为天生的教育者。相反，“一位浅薄而愚蠢的女人必定会愚蠢地教育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对孩子们的恩惠莫过于让他们有机会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成长”。

黑德维希·多姆认为儿童教育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艺术与伦理任务，这项任务只能交给一位既有这方面天赋——她自动承认，完全不适合在波罗的海海滩与自己的孩子们一起捡贝壳和画石子——，本身人格又已发展成熟的人。恰恰是在后一点上，大多数妇女所接受的教育仍旧是不要追求自己的“自我”，而是一生都要依附着男人，夫唱妇随。与其让不自由的母亲带大，不如把孩子交给独立自主的教育者：“这位教育者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凝聚着所有母亲的爱，他要教育的是她们的孩子。这种爱没有任何可以让母爱那块金子黯然失色的瑕疵，它不虚荣、无野心，既无占有的骄傲，也无利己的享受。教育者的爱更像艺术家对其作品的奉献。用尼采的话来说，教育者会成为‘男性母亲’。”

现如今妇女是否适合教育孩子，她们是否该接受相应教育的争论至少正式结束了。同样也没有人再争辩妇女是否该从事（对公民而言要求颇高的）以赚钱为目的的工作。仍旧未能解决的，每隔一段时间就特别让人担忧的是：如果妇女们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从事越来越多的工作，因此所生的孩子越来越少，德国民族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这种忧虑远比以法律形式所规定的男女平权要早得多。1902年黑德维希·多姆就已经在其最出色的著作《反女权主义者》（*Die Antifeministen* ）中嘲笑过一些同时代人，他们认为一旦妇女们开始上大学，人类就会绝种。在帝国时期这种害怕却是事出有因的：那时候只有未婚、没孩子的妇女才可以当公务员。这就意味着，（少数）妇女确实必须决定不结婚、不要孩子，才能在普鲁士风格的官本位国家升迁发

迹。早在“职业与家庭二者可否兼顾”的辩论让大家群情激昂的一百多年前，鸿沟其实早已挖好，沟两侧的德国母亲和“有野心与成就的女人”至今仍在对骂，而有职业的母亲们则抱怨幼儿园位置不好，她们臆想自己不堪重负，快要崩溃了。

这里的母亲难题恐怕近期难以解决，它在德意志灵魂中根扎得太深了。母亲应该是抵抗所有吞咽一切的现代齿轮装置的最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自然的——壁垒。2007年文学评论家爱丽丝·拉迪施（Iris Radisch）要求重新发现家庭，把它作为“对抗所有经济与飞速发展之暴力的模式”，这成为德意志渴望母亲的最新和最有说服力的佐证。国家必须给母亲们（和父亲们）留出更多的时间，以便他们能亲自和孩子们一起“钻丛林，涉小溪”，而不是把孩子往芭蕾课一送了事。同时母亲应该很有教养，但她在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之前，先要用自己的教养帮助受退化损害的后代回归自然。最后她还要认识到，幸福就在这里打盹，而不是在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争斗中。

千真万确：德国母亲必须像橡树一般坚强，才能遮风挡雨。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烫发，德国人的性情，幼儿园，牧师之家，狠心的娘，宗教改革，纯洁戒律，女人

---

[1] 全称为德国母亲荣誉勋章，1938年12月16日由希特勒倡导设立。

[2] 希尔德加德·冯·宾根（1098～1179），中世纪德国神学家、作曲家及作家。她担任女修道院院长，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科学家、医师、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及博物学家。

[3] 指妇女因生育而中断职业生涯，日后很难再融入职场。

[4] 指禁止堕胎等法律规定。

神秘主义

咽气的时候有上帝眷顾，众所周知不是坏事。但出于别的原因，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已经与他交谈过却要好得多。

谁向往上帝，哪怕只是有求于他，追求的都是一种可靠性。他想相信他和他的至爱亲朋觉得可以相信的东西。

中世纪时神学是被纳入经院哲学的，经院哲学只能以抽象的方式论证上帝的存在以及提到上帝，用理智去解释信仰。这样人们才可领会上帝的故事，但这对解释上帝这件费解的事却帮助不大。

谁热衷领悟此事，不久就会发现此事与所有其他事情一样都是浮云。他会觉得自己没着没落的并为此抱怨。

谁想追寻靠谱一些的事情，他早晚会遇到圣者。

此外他还会确定：上帝不说拉丁文，拉丁文不过是用来复述上帝的话的。宗教是不能通过神学传布的。

宗教尤其是一种感情的表达，这种表达既让人感到安全，同时却也营造出一种无家可归的氛围。谁若是在童年没有学会祈祷，那种奇特的低语，那种突然赋予语言另一种重量的喃喃自语，那他以后就再也认识不到祈祷的作用了，更谈不上理解了。

教会和教会的布道者不得不让宗教显示出世俗味，这不可避免地招致反驳。从一开始教会就面对着一个两难选择，它以机构的形式显现，

并引发这样的疑虑，即一个机构居然想要管理宗教。

在教会所遭遇的质疑中，神秘主义给出的质疑属于其中最尖锐的一种。神秘主义请大家注意，人与上帝交流的方式不必由神学来规定。人们用祈祷和布道合理地缩短了与上帝的距离，正是这种直接交流让人与上帝有了接触。这当然要以虔诚和灵性为前提，这里指的其实是灵魂救赎。

德国神秘主义始于德法合作：倾向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圣伯尔纳铎（Bernhard von Clairvaux）[1] 在传道途中会见了莱茵地区的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后者用修道院药草园中的草药配的方子今天还在使用，她的指南性著作《治疗知识：病因与疗法》（*Heilwissen. Von den Ursachen und der Behandlung von Krankheiten* ）堪称论述天然药物的经典之作。她是西方第一位写作的女医生，几乎一千年后她的书仍在被人阅读。

希尔德加德·冯·宾根（1098～1179）是德国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中的第一人。她也因其自创的祈祷而辉煌。中世纪神秘主义的领军人物埃克哈特大师在其《论指导》（*Reden der Unterweisung* ）中说道："最有力和几乎万能的祈祷，心想事成，最值得敬重的莫过于那种虔心祈祷……它不受任何误导和束缚……在万事万物中寻见的不再是自我，而是完全沉醉于上帝那最可尊敬的意志中，放弃了自我……祷告应该是强有力的，祷告者愿把人的全部力量和肢体，包括眼、耳、口、心以及一切感官都集中在祷告上。在感觉到自己正在与上帝——他在场并且是祷告对象——融为一体之前不要停止祷告。"

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中世纪的德国神秘主义不光强调感情，它也接近一种古老的厌恶，即反对罗马教会过于世俗地组织宗教事务。在13世纪德国神秘主义最重要的文献《神性之流动的光》（*Das fließende Licht der Gottheit* ）中，作者马格德堡的梅希特希尔德（Mechthild von Magdeburg）（约1207～1282）有时重口味地称那些主教区修道院修士

们为“臭山羊”。

对神秘主义的诸多可能性感兴趣的人当中也包括一位维滕贝格的神学家：马丁·路德。1518年他出版了14世纪一位不知名作者的论文《德意志神学》（*Theologia deutsch* ），这本书与埃克哈特的作品和想象类似，但没有那么玄，这从书名即可看出。神秘主义现象不仅需要代言人和支持者，而且也需要一些产生共鸣的地点，这样的地点遍布全德国。

格尔利茨（Görlitz）如今是德国最东边的城市，它曾经位于德意志帝国中部的什么地方。谁今天还能相信，一位思想家曾在格尔利茨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德国的第一位哲学家”，黑格尔如此赞许他，因为他的著作中已经露出了辩证法的端倪。这里说的是雅各布·伯麦（1575～1624），神秘主义在他那里又达到了新的深度。他的职业是鞋匠，从未上过大学。其著作援引的是尼古拉斯·冯·库斯（Nicholaus von Kues）的泛神论、帕拉塞尔斯的自然哲学学说和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的神秘学，后者的神秘学又可以上溯到新柏拉图主义和卡巴拉[2]。

出发点正是导致路德宗教改革的那种不满，人们追求一种没有教会的基督教。虽然伯麦声称读过很多书，但他不引用，也不列举任何榜样。他称“整个自然”为真正的老师。随着秘密社团“玫瑰十字会”的出现——该组织也对伯麦感兴趣——神秘主义开始变得神秘起来。基督教伦理与炼金术的巴洛克符号体系结合到一起。

说到这里我们把目光转向布拉格，捷克的首都在17世纪时位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境内。1348年在布拉格创建了古老帝国的第一所大学，然而在哈布斯堡王朝怪人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552～1612）治下这座城市也是炼丹术、占星术和神秘主义的大本营。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3]和约翰内斯·开普勒也来到这里进行研究和探索。

纵观整个德国文化史，神秘主义到处留下了不显眼的痕迹。神秘主义与各个时代的最新口号的一致每次都是一种巧合，但这种巧合实际上每次又都是可以解释的。

可以遇到神秘主义者的地方有：修道院、手艺人的作坊、颓废的国王与皇帝宫廷以及宗教运动。发挥作用的有修女，她把祈祷文变成了文学作品；鞋匠师傅，他在不懂概念的情况下自由地进行哲学思考；忧郁的统治者，他的身边簇拥着炼金术士；讲求虔敬的虔信派教徒如菲利普·雅各布·施本尔[4]，从批评新教的僵化出发，他再次为回归《圣经》辩护。

这种回归当然首先指的是对《圣经》的阐释转向神秘和严密。事情自然也关系到质疑教会所分担的国家与世俗秩序。攻击专制制度的可远不仅是启蒙运动，17世纪初特别是18世纪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光是虔敬主义与启蒙运动能够和睦相处，随着共济会的创建，人们甚至找到了一种新的秘密组织形式，可以把一切——从人道主义到密教——都融合在一起。

德国社会如今找不出有效的神秘主义了，所以它引人注目地大规模从世界各地进口所能找到的深奥东西。这些东西必须具有异国情调和萨满教背景。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是佛陀而不是埃克哈特？因为我们追随康德和黑格尔并因此忘记了其他的一切？或是更糟，只从政治角度看待一切？一种文化只有作为整体才能起作用。从它身上割掉什么，哪怕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整体都会因此而变得残缺。

作者：里·瓦

译者：丁娜

参阅：工作狂，浮士德，宗教改革

---

[1] 圣伯尔纳铎（1090～1153），法国克勒窝修道院院长，修道改革运动——熙笃会（Cistercian）的杰出领袖，中世纪神秘主义之父。

[2] 卡巴拉（Kabbalah，希伯来文：קַבָּלָה，字面意思是“接收”或“接受”）是与拉比犹太教的神秘观点有关的一种训练课程。这是一套隐秘密的教材，用来解释永恒而神秘的造物主与短暂而有限的宇宙之间的关系（引自维基百科）。

[3] 第谷·布拉赫（1546～1601），丹麦贵族，天文学家兼占星术士和炼金术士。开普勒曾是他的助手。

[4] 菲利普·雅各布·施本尔（1635～1705），德国路德教派神学家，虔敬主义著名代表。

疯狂的自由

在整个拉多尔夫采尔（Radolfzell）地区，克萨韦尔·德施勒（Xaver Deschle）无疑因为他的帽子被称作“帽子德施勒”。在普鲁士占领该地时——那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不久——禁止庆祝狂欢节，帽子德施勒跑到指挥官那里，请求至少该允许戴着面具从窗户里往外看。他的请求得到了许可，帽子德施勒就自己做了一副窗框套在脖子上，然后戴着小丑帽在街上蹦来蹦去，身后跟着一大群孩子。

习俗是无须陈述理由的，大家都遵守的东西不需要解释。共同的意愿让集体回忆变得简单，它减轻了个人的负担，这毕竟也是团体意义之所在。

在德国有两件事是妇孺皆知的：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和狂欢节的风俗习惯。这两件事人人都会热情参与，但二者却有天壤之别。

足球俱乐部的作用是为人们提供认同可能，让个人作为粉丝去追捧某球队或球星。而狂欢节则让个人成为游戏者，变成自己事情的扮演者，却成不了英雄。因此足球赛事能魔法般地唤起人们的强烈感情：欣喜若狂或是悲愤交加。狂欢节则是有时间限制的自由经历：这段时间虽然自己说了算，可说什么呢？

如果在狂欢节这段特殊日子里，行为场所是没有观众的舞台，一切以自我为中心，那人还能有什么可说的？

让我们先聊点儿别的：当1500年左右纽伦堡的画家阿尔布雷希特·

丢勒（Albrecht Dürer）展示他的《穿皮衣的自画像》（*Selbstbildnis in Pelzrock*）时，那肯定是所有可能挑衅中最大的一种。人们可以说丢勒把自己画成了耶稣，但不乏谦逊，因为他没有给自己头上画上圣者光环。这样他既没有停留在中世纪必不可少的讽喻上，也没有犯忌。他提出的问题不如说是人自身，他用画告诉观画者：你也可以这样。

在自画像中，人进入了前景，画家也开始了与观画者的对话，提出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做自己。但作为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则恰恰是对寻找自我的那种强迫。难道这——且不论所有其他的——不正是人所要承受的最沉重的负担吗？

丢勒既非遭受迫害者，亦非受到指责者，他的作品所传达的信息没有被当做是具有颠覆性的，至少他不作为这类画家而引人注目。丢勒更应算作他那个时代欧洲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是个明星。他生活的时代刚刚经历过黑死病，大家惊魂未定，不知西方的世俗世界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教会对此只能用“上帝的惩罚”来解释；他则用自己的绘画增强了人们的生存感。

那时人们还能喊出“你们看这个人！”（Ecce homo！）[1]，而没有揭露此人。但到丢勒和他的同人这里时，人们就已经知道：谁戴上面具，遮盖的是他的脸庞和自我。哪怕他认为这样可以保护脸庞和自我，实际上他是在伪装。

维尔纳·梅茨格尔（Werner Mezger）是研究施瓦本-阿雷曼一带狂欢节习俗的专家和编年史作者，他让大家注意中世纪的圣诗集，特别是要注意第52首赞美诗和该诗开头处的小丑插图：那里印着“Dixit insipiens，in corde suo：non est Deus.”——“小丑在内心说：上帝并不存在。”

这样一来，导致不敬的、被缩小的小丑反抗就不仅涉及俗世秩序，

而且指向了上帝的秩序。这是一种经习俗而合法化的渎神！

先说说狂欢节，它像大多数德国的事物一样，起源于中世纪。那是大斋期[2]开始前的最后几天，是正式禁食前胡吃海塞的最后机会。这段时间正是耶稣曾在沙漠中度过的，这对禁食来说是有意义的。狂欢节（Karneval）一词源自罗曼语族，字面意思大概是不吃肉的日子。这个节日从一开始就是城里人的事，这一点至今没有变化。据说是那些单身学手艺的人在张罗操办这一节日。

市民需要一段时间的特殊状态，以便长期忍受这个颠倒世界的各种条条框框。狂欢节就是市民获得的疯狂特许证，这种特许几百年来作为习俗一直保护着市民在特定时间内的疯狂自由权。谁想改变这种特殊状态，就会惹麻烦。

当基督教新教在广大区域站稳脚跟，它就对狂欢节下了手。基督教新教和其乖张的性情无法尽情狂欢。狂欢节只好作为天主教节日躲在罗马帝国修筑的界墙后，但即使这样它也未能完全保留住往日的辉煌。接下来反对它的是启蒙运动，认为它是一种过了时的习俗，启蒙运动对所有习俗都难以容忍。反对的理由是：这种习俗不是为理性服务的，而是助长了装神弄鬼。这种思想流派甚至吹嘘把流动剧院中的丑角赶下了舞台。人们还能期许他们对狂欢节网开一面吗？

有时看上去狂欢节这种现象在普遍的历史拒绝的喧嚣中似乎销声匿迹了。剩下的好像只有个别小丑和面具了，比如施瓦本或阿雷曼的木制面具。这种面具能够在瞬间吓唬人，是一种特殊的面孔。

集体回忆会在不同时刻因现实缘由而启用这种面具。面对正存在的精神危机，集体回忆展示的是不同的面具，这些面具告诉人们的不外乎人类生存的困境。而它明显没有涉及的恰恰是中世纪晚期所禁止谈论的死亡与灭亡。后来资产阶级通过自己规定的禁令让人们不再向无底深渊

张望。



狂欢节上的传统面具。

随着19世纪的来临以及大众社会的形成，一切都有了新的适宜形式，包括民俗文化。这次的缘由又有政治色彩。

维也纳会议（1815）后科隆归普鲁士所有，这里的人感到自己的认同受到了威胁。在这种境况中人们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这样狂欢节就成了抗议的舞台，它明显被政治化了。狂欢节讲话者提到疯狂的自由，新引进的游行也成了莱茵地区人们展示力量的示威游行。

这样狂欢节就变成了区域性认同的标志。它不再是从前下层市民的行为，毫无顾忌地纵情声色，而是成了城市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狂欢节组织悄无声息地迅速扮演起各党派的角色，在幕后参与了对现实政治的控制。没多久狂欢节就不再是市民不满情绪的解压阀，而是向普鲁士传递的有关真实权力关系的坦率信息。普鲁士虽然有权力，但科隆的事

得科隆的城市显贵说了算。至今人们仍旧可以清楚地看出狂欢节对城市社会的影响力。

在疯狂行为名义下也不总需追求太多的东西，这一点第二个成功的区域性自我展示的例子就是慕尼黑的十月啤酒节。每年秋天这个疯狂的节日要持续两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间节日之一。这个民间节日起源于1810年的一次婚礼，当时的新郎就是后来的国王路德维希一世。

确切地说，十月啤酒节是各种能令人激动的事情的年市：云霄飞车、摩天轮、壁上飞车。每天数次，无辜的游客脖子上会挨从天而降的板斧，而没有下体的阿拉贝拉（Arabella）女士[3]则会兴趣盎然地看着。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在1831年10月的一封家信中写道："啤酒节下周日开始，将延续整整一周，因此我的音乐会不得不延期。届时每晚都会有露天剧和舞会，大厅里的管弦乐队想都不要想。星期一，17日，晚上6：30请想着我，那时候30把小提琴和双倍的管乐器将演奏我的作品。"

1835年一位不知名的作家这样描述过特蕾西娅草坪（Theresienwiese）[4]上的状况："人们推推搡搡、四处乱转、大吃大喝；人们大玩游戏、借酒装疯、骂骂咧咧；人们驻足观望、目瞪口呆、来来往往；人们摩肩接踵、骑马驾车、舞刀弄枪；人们风风火火、又唱又跳、打情骂俏；人们尽情欢呼、欢心舞动；可是夜深了，今儿就到这儿吧。"

37年后，另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在1872年写道："真正的慕尼黑人一天啤酒节都不愿意错过，每天他至少要去那儿待几个小时。对艺术家和风俗研究者来说，啤酒节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约阿希姆·林格尔纳茨（Joachim Ringelnatz）1928年曾写诗歌颂过另一位去逛年市的永不过时的女士：“高耸的乳房像火山熔岩，它们壮观地兵分两路，艾米，女中豪杰！”当地作家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Oskar Maria Graf）还能回忆起第一次去啤酒节时的情景，他形容道：“眼睛都不够使了。”

为了打消我们可能存在的最后疑虑，1960年欧根·罗特（Eugen Roth）让我们知道：“慕尼黑最美丽的乐园，无疑包括啤酒节草坪。”在他令人印象深刻的长诗的结尾部分我们读道：“我在这儿是人，在这儿我可以是人。”人们会想：跟歌德的感受一样，但也绝非一定如此。

从今天的角度看，倘若狂欢节对战后各种无法言说性来说没有成为固定的习俗，那也几乎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没有足球和没有狂欢节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样是无法想象的，这类游戏像建国初期的面包一样不可或缺。

政治性地看待一切公众活动，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老习惯。过程简化了各种问题，它造成一种假象，让人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办法，而每种解决办法又总是有足够的理由。

从根本上说涉及的是与此毫不相干的事，即我们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可以忍受，它是我们满怀激情布置起来的。

与其说是出于困境，不如说是出于绝望，我们不断地寻找机会逃避义务，至少是逃脱责任。我们的方式可以是免责规定、开假条、暂停或是其他各种借口。就好像是我们在转动轮子，而轮子又带动我们转了起来。但这更是个难题呢，还是个愚蠢的问题？从《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 ）的作者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到恩斯特·内格尔（Ernst Neger），无数精英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恩斯特·内格尔本是位瓦匠师傅，后来成为歌手。他是美因茨狂欢节的中坚人物，1952年他因狂欢节演讲《太平小鹅》（*Heile*，*heile Gänsje* ）而走红，他在讲话中说："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上帝的话，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要把可怜的、被毁了的美因茨牢牢搂在怀里。我要紧紧搂着它说，要有耐心！我要迅速把你重建起来！你完全是无辜的，我要让你重新变得美丽。你不能也不允许就此沉沦……"

精英们对人民公投期的回答是政治上的圣灰星期三。它属于政治家，但也属于卡巴莱演员。社会作为狂欢节社会就是这样对有关事宜进行沟通的。欢闹的景象打上了正常的印记，对战后的状况而言这极为重要。

现在整年戴着小丑帽的人数在增长。真相的时刻过去后，接下来出现在日益受到媒体控制的公众中的是永恒的虚伪艺术。现在摄影机在拍摄，那位政治家必须证明自己能出色地控制面部表情。重要的不是可信性，而是他的面具要有说服力。

狂欢节促进自我表现，追求体验的社会也发现了这一点。所谓小康社会用"爱的大游行"的方式来超越狂欢节。"爱的大游行"是柏林一位传奇性铁克诺（Techno）音乐DJ——莫特博士（Dr. Motte）——于1989年发起的。这一主题活动开始时有150人参加，短短几年内参加者人数就猛增到数百万。直到2001年"爱的大游行"都被算作政治示威游行。它甚至不用操心游行过后的清扫和垃圾处理工作，相反它只要提供一句格言即可。

该主题活动本身的渲染方式模仿狂欢节游行，区别是在这儿话语不算数了。重要的仅仅是载歌载舞地尽情庆祝。尽管如此，它成为一种尺度，代表着德国统一后20多年来的一种现象。从"爱的大游行"开始，大型公众活动开始流行，如勃兰登堡门旁举行的集会，大型足球赛事时组织的公众观赏。德国的公共空间不再是禁区，在公共场所也能见到德国

国旗了。

那小丑呢？戴着木制面具、穿着传统服装的小丑？他们也没有消失！中世纪的传统如今在施瓦本-阿雷曼一带的狂欢节活动中得到了最好的发扬。与莱茵地区被政治化的狂欢节以及所有其他地方的狂欢节不同，施瓦本-阿雷曼一带的狂欢节在20世纪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那就是返璞归真，用几乎被遗忘和被埋没的方式——戴上面具扮演不同的角色——庆祝狂欢节。西南部这一带没有大都市和大本营，这里庆祝狂欢节是小城市居民的事。他们在狂欢节期间戴上家中世代相传的面具，这种面具成了进行认同的物件。这可是所能发生的最大悖论和传统的原始意义：如果别的行不通，那就把面具宣布为自我。

作者：里·瓦

译者：丁娜

参阅：啤酒之旅，足球，小市民，莱茵河——父亲河，社团迷

---

[1] 彼拉多将戴荆冕的耶稣交给犹太人示众时说的话。

[2] 天主教的斋期从圣灰星期三延续到复活节。

[3] 利用反射效果让下体消失，此角色每年啤酒节时由一位女演员饰演。这个主意源自画家弗里茨·希尔伯特（Frits Hilbert）的一幅画。

[4] 每年十月啤酒节举行的地方。

爱整洁守秩序

1789年夏天，作家、教育家兼出版人约阿希姆·海因里希·坎佩（Joachim Heinrich Campe）和他以前的学生威廉·冯·洪堡一起去了巴黎，为的是近距离观察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他完全为革命景象所陶醉，在寄回家乡的信中，他报告说："这是一幅获得自由的民族的图景，这个民族甩掉了它的暴君。我相信，在整个自然界中再看不到比这更美妙、更令人感动的场景了。就在此刻，当这一令人振奋的场景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新奇时，我站在公众聚集的现场，沉浸在惊讶与喜悦之中，常常一站就是好几个钟头，人潮像汹涌的洪水般不停拥入，我注目察看，看这摧枯拉朽、奇迹一般的效果，它所表达的使人类情感与良好习俗得以提高和升华的新自由观，令我感动得流出了甘甜和喜悦的泪水……"

就在他动身前往巴黎观察革命局势之前不久，这位居住在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侯爵领地的诗人兼思想家出版了（女性）启蒙教育读物《父亲给女儿的忠告》（*Väterlicher Rat für meine Tochter* ）。坎佩在这本书中写下的那些内容，也许"品德恐怖主义者"（Tugendterrorist）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会喜欢；相反，玛丽安娜（Marianne）[1]——法国人狂热崇拜的自由偶像——却可能会吃惊得或者是笑得把低胸露肩裙整个滑落下来。"爱整洁守秩序！"那本书里写道，"我得到哪儿去寻找词语，好给你描述这项——美德？不，用美德这个词来形容远远不够，它是诸多其他美德之母，是诸多美德的养成者，它为人类生活带来愉悦，它强有力地促进一切有益行为，它是所有美好、伟大和崇高事物必不可少的基础，我得上哪儿才能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完整地描绘它那亲切可爱、不可或缺和美妙有益的特性呢？"这位父亲以无比的恐惧来描

绘一个凌乱不堪的家有多么可怕，就为了要说明："其中最糟糕的是，外表上的脏乱邋遢会逐渐向人们的内心发展，这种发展虽然察觉不到却不因此而停止，脏乱邋遢会慢慢渗透进他们的情感，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德行。谁若看到自己房间里脏乱到一塌糊涂，而他的眼睛却不再感到羞辱、难过，那么，对自己以及家里人的与善良风俗不相符合的不规矩行为，他的心灵和精神也就不再会产生反感。"



尖尖镊子手中握：作家阿尔诺·施密特坐在他的一圈卡片盒当中。

坎佩这个让人把整洁有序看得高于一切的告诫不光是针对女孩子的。在他发表《父亲的忠告》之前几年，他曾经用非常清晰明了的话语再三提醒男孩子："美德就是整洁有序，整洁有序就是我们行为本身的协调一致，也是我们的行为与理性原则的协调一致；而恶习就是凌乱无序，凌乱无序是我们行为本身的不协调和不一致，它也同理性对我们的

要求不协调和不一致。”

坎佩并非18世纪晚期德国唯一酷爱整洁有序的人。数学家、物理学家兼格言作家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恰恰在他那著名的《草稿本》（*Sudelbücher* ）中为整洁有序开出了证明，把它说成是通向一切美德的指路牌。德国的启蒙运动从总体上说可以理解为一场伟大的整理行动：思想应当归置得井井有条，情感也同样如此；个人的生活规划应该打理得井然有序，国家也一样。世上万物林林总总一个不漏，一切都被分门别类、纳入体系。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其主要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份对条分缕析的热爱，绝不亚于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或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这两位改革家曾经让普鲁士王国体验了一场精细规划的结构改革和行政改革。德国的资产阶级与其说是诞生于自由精神，毋宁说是诞生于秩序精神，且至今仍受累于斯。

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自视为德国资产阶级最后的代言人之一。他在去世前不久曾经讲述，作为阿尔贝特·施佩尔[2]《回忆录》（*Erinnerungen* ）一书的编辑，怎样同后者一起对该书进行修改。那本回忆录是施佩尔在施潘道（Spandauer）监狱关押期间所撰写的。当时，费斯特注意到，这个希特勒的建筑总监和后来的军备部长，在手稿中对发生于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夜间的迫害犹太人的恶行只字未提，于是便力促施佩尔补上这个缺漏。在最后完成的书稿里，施佩尔这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关于“帝国水晶之夜”是这样记述的：“11月10日，在乘车前往办公室的途中，我从还在冒烟的柏林犹太教堂的废墟旁经过……今天，对当时所见场景的记忆仍然是我生活中最令人沮丧的经历，因为当时困扰我的，从根本上说主要是我在法萨嫩街上所看到的那种混乱无序的状况：烧得焦黑的房梁，坍塌的山墙，被彻底烧毁的围墙——完全是一幅战争中将笼罩几乎整个欧洲的情景的预

演。然而最令我困扰的，是‘街道’又被重新用于政治目的。满地散落的橱窗玻璃碎片，对我那在有产家庭中养成的秩序观伤害尤甚。”

正因如此，如下情形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也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期，那位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3] 会用嘲讽的语气反对其当年认可种种市民品德的社民党同志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Helmut Schmidt），说是用“二等品德”（Sekundärtugenden）[4] 也可以运营一座集中营。不过，对此也可以反驳说，集中营不用“二等品德”也是可以运营的——克罗地亚人在贾森诺瓦克（Jasenovac）或者苏联人在古拉格（Gulags）所做的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把整洁守序过高地推崇为最重要的而且是道德意义上的美德，是德国资产阶级最致命的错误。

然而，这种注定要在纳粹时期遭到可耻破产的错误观念又是从哪儿开始的呢？

> 吃喝挥霍地，财神不爱去。酒鬼多荒淫，穷根扎心里。汉斯·萨克斯，告你这真理。

这首打油诗是德国最著名的鞋匠在16世纪上半叶创作的。中世纪的工匠们，组织在行会里，最骄傲的莫过于把自己的活计做得扎扎实实、尽善尽美；工匠歌手也是一样，他们创作和吟唱的工匠歌曲同样是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就像对待他们正在钉着的皮子或是正在锻打的铜器一样。他们是最早形成市民品德的那拨德国人，他们与两方面划清界限：向上他们区别于贵族和教会的“牢骚母鸡”（Muckenbrüter）和“食甘厌肥者”（Schmeckbräteln），这些人躲在他们的宫廷和修道院里，用不着汗流浃背地干活；向下他们不与那些衰萎颓唐的“家里蹲”（Hausschlenzer）为伍，这些人宁愿浑浑噩噩地守穷度日也不去学一门正经手艺。那种关于中世纪晚期德国人的说法，同把德国人说成老刻板甚至可以按其日常活动来对纽伦堡怀表的描述完全对不上。自罗马

帝国时代以来，日耳曼人更多的被看作滥饮无度的酒鬼和好打架斗殴的蛮人。在三十年战争中，战争进程无比混乱和粗野，导致这种粗鲁野蛮的特性越发“发扬光大”。

最早的意在系统驱除德意志人粗野无教养习性的社会教育-宗教运动，是虔信派教徒发起的。他们和路德教徒汉斯·萨克斯观点一致，认为德意志人的贫穷和没教养不是命运，而是罪孽的表现。因此，17、18世纪之交，神学家、牧师奥古斯特·赫尔曼·弗朗克在格劳哈创办了一座连同孤儿院在内的虔信教“学校城”，在那里面，最起码要把后代引导到修炼德行的正道上来，以此指引他们到达灵魂得救之境界。

弗朗克的天神是旧约里的“秩序之神”，并且，唯一可以得到神的宽宥的出路在于，必须全心全意服从神的秩序。至于神的秩序怎样再转换到人间俗世的事务上来——这个只有弗朗克知道。这些受教育者每天学习、实践活动和祷告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雷打不动；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正确使用火炉到虔诚唱诗时允许出多大声音都规定得一丝不苟。同样，校规规定，当“小铃摇响”时，必须准时快步跑到桌旁坐好，“以保证不出现混乱无序的情况”，也即那些被禁止的行为，比如“在院内外对着墙壁撒尿”之类。同家长的联系被尽量减少，因为家长只会以其“无序的爱”破坏孩子们礼貌得体的行为举止。

“弗朗克基金会”想要教育孩子们学会仁爱、体谅和集体精神，批判精神在那里既不受鼓励也不予教导。把“个人意志”视为“罪孽”的同义词并因此而系统地加以驱除，或是让其转变看法从而把自己仅仅看作贯彻神的意志的一件工具。这样一种世界观很容易被极权利用。德国得感谢虔信教派的推动，是他们使德国人变得遵守纪律，但尽管如此，倘若我们把这种推动仅仅看成是向驯服主义（Untertanenentum）转轨，那就未免看得太简单了。

要求他的同胞们好生利用自己的理智、不要去照搬别人向他们灌输

的东西的伊曼努尔·康德，同样也出自虔信派-普鲁士这一社会环境。尽管像大多数德国启蒙运动的知名人物一样，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表示欢迎，但他所希望看到的是，个人的智力上的自主性仅限于私人领域中。在公共领域国家公民必须保持服从的姿态。尽管康德对共和体制深感振奋，但他仍然是个刻板的“秩序”哲学家。不过他也成功地证明，在所有领域中，秩序都不是僵死和盲目的归属分级（Unterordnen），而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能够反射的过程。“因此，现象——我们所称的自然界——中的秩序和规律是我们自己带进去的，否则就不可能在其中找到它们，假如原初不是我们或我们心灵的本性把它们带进去的话。”他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中这样写道。这一从认识论上对人类在秩序问题上的能力的高度评价与康德个人的信念是一致的，即日常生活中规范有序和按部就班是精神健康的源泉。这位哲学家的巨大创造力主要产生在他四十岁以后，也即在他告别了之前那种有人照顾的、懒散的“优雅绅士”的生活方式之后。“成熟的”康德清晨五点即起，喝上一两杯茶，抽一袋烟，为他要讲的大课做准备到七点，然后去讲课讲到十一点，在这之后到吃午饭是他写作的时间，下午他要散一圈步，并与他最亲密的朋友约瑟夫·格林（Joseph Green）聚会，晚上还要做些零碎工作并且读书，二十二点上床睡觉——作家兼后来的柯尼斯堡市长特奥多尔·戈特利布·冯·希佩尔曾以康德为原型写过一部喜剧，名为《钟表一样准时的人或曰循规蹈矩者》（*Der Mann nach der Uhr，oder der ordentliche Mann* ）。海因里希·海涅后来讥讽说，这位柯尼斯堡的教授让人没法给他写传记，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故事。不过，同样也可以说，正因为康德把他的日常生活管控得这么严格，所以才可能成为从不懈怠的思想家和写作者。这位教授没有沉溺于反复发作的“心脏憋闷”和“排除不畅”（便秘）中，也没有让自己任由“敏感的神经”支配，而是与自己的抑郁倾向做斗争，其方式就是让自己服从一整打日常生活准则。与道德要求领域（Gebiet des moralisch Gebotenen）不同，道德律（Kategorischer Imperativ，也即绝

对命令）要求毫无例外地按照“你可以同时希望它们成为普遍适用的法律”的那些准则行事，而在这里，些许变通——例外！（excipe！）——是允许的。只要对法律的服从不是盲从，就完全可以从中产生自由。

人们会很乐意推定，在每一个秩序重于一切的人的头脑里都有个幽灵，这个幽灵最怕的就是混乱无序。它既害怕自己内心里隐藏着的混乱，也害怕世界为它所准备的混乱。有一本1876年的德国歌曲集可谓登峰造极，它在目录中第三部分的第二节“爱情歌曲”之下，还又分出第二节甲“爱情之乐”和第二节乙“爱情之苦”——好像二者可以分开似的。要人保持整洁和秩序的最热切的告诫，比如像坎佩在《父亲的忠告》里那样的，都是男人对女人的告诫，这可不是偶然。在做出这种告诫的这类男人眼里，“女人”被看成是既令人着迷又不讲道理而且还很难看透的生物。

德国人喜爱驯化的癖好是不是可以以此来解释呢，即德国人对他不能掌控——而另一方面也就不再害怕——的一切总是感到特别着迷？

弗里德里希·尼采也许会同意这种说法。这位“不守常规”的思想家喜欢令人陶醉的“酒神精神”（das rauschhafte “Dionysische”）更甚于清爽的“日神精神”（das klare “Apollinische”）——而这也是他崩溃的原因之一。他把目光投到其同胞们涂抹得锃亮的外表后面，得出如下认识：“德意志之魂中有过道、岔道、洞穴、藏身所，还有古堡地牢；他们之所以不守规矩多是被充满了神秘性的东西所吸引；德国人擅长经由隐秘小径走向混乱。”

作家弗里德里希·西堡接过了这张思想的网继续往下织，西堡在魏玛时期试图向德国人解释法国，向法国人解释德国：“德国人认可混乱并把它纳入自己本性之中的能力，是多么令我们的邻居害怕。人们说，我们德国人作为民族，因为过于深和过于长久地弯腰凝视自然的深渊，结果看得头晕目眩。当然也有这样的民族，对他们来说，自然只是看上

去像是个深渊。对我们来说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相当深入地参与到自然的规律当中去，因为我们自己的远远不够。我们仍然还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随时能够重新返回自然当中。”

构成德国人意识当中的与自然的关系（das deutsche Naturverhältnis）的全部矛盾都由此而表达出来了：自然是一团盲目向前推进、根本不顾及损失的混乱吗？抑或它是在对上帝秩序的信念逐渐消失之后，最后仍然存在的宇宙秩序体系？民族社会主义（纳粹）那带来厄运的吸引力正是生发于此，它宣称，混乱可以强制人们达到钢铁般的、同时又是自然的秩序，而且在这当中还能够保持“运动”的动力。在他无比痛恨的魏玛共和国最终失败之前几个月，恩斯特·云格尔还对“工人”这个新的群体类型加以赞扬，说它“能够满心欢喜地把自己炸上天，并且还把这个行动看作秩序的证明”。

战后，至少对于西堡——他从未真正成为信仰坚定的纳粹党人却巧妙地度过了“第三帝国”时期——来说，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即民族社会主义打造的有序的混乱和混乱的有序，在纳粹时期从来都不过是凝固了的野蛮而已。同时，西堡还担忧，如今生活在联邦共和国里的德国人，是不是正在心怀恐惧地准备把他们一向从中汲取活力与创造力的“混乱-动力”这个源泉给封死。

自由的宪法国家不会变成热昏头的毁灭机器，然而只会制造空转的危险是现实存在的，因为它把人的生活缩减为“一个纯洁的组织、一个深思熟虑的社会结构和一个能干的管理机制”。对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的花花公子西堡来说，挑战在于，超越法西斯的错误结论，把秩序和混乱的关系摆正。

这个挑战至今仍然存在。秩序不是一切，更谈不上可以作为道德意义上的美德。这种错误认识，那些对学校里恢复用“专心、秩序、勤奋、品行”来打品德分的人应当予以摒弃；而同样的，另一些人也应当

摒弃，那些人一方面为反对“讨好老师（的品德）”而走上街头，另一方面却要他们的孩子牢牢记住，绝对不能把喝空的酸奶杯扔进灰色、棕色、绿色或蓝色的垃圾桶，而是永远只能扔进黄色的垃圾桶[5]，而且最好还得冲洗干净再扔。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智慧的准则，整洁守序自有其美好的意义，当然了，前提是它不要变成愚民的枷锁，并且人类自身也还有足够的、值得去整理归置的混乱。

作者：特·多

译者：郑冲

参阅：深渊，工作狂，德国式焦虑，青年旅舍，幼儿园，音乐，私人菜园，海滩篷椅，莱茵河——父亲河，社团迷，林中寂寞



最早的文件夹由弗里德里希·泽内肯**1886**年发明于波恩-波佩尔斯多夫。最初的经典云纹大理石纸质封皮偏心锁扣文件夹，于**1896**年由符腾堡的路易斯·莱茨投放市场。

---

[1] 玛丽安娜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1792年法国一首流行歌曲中用“玛丽安娜”来象征共和，从此自由女神便以“玛丽安娜”为名。1797年法国政府正式决定以“玛丽安娜”作为共和国的象征，以“玛丽安娜”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众多，最著名的是画家德拉克鲁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1830年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中的形象。

[2] 阿尔贝特·施佩尔（1905～1981），受希特勒赏识的建筑师，二战期间先后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德国建筑总监，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是使德国战争机器高速运转的总指挥。纽伦堡审判中，施佩尔因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被判处20年监禁。他在狱中写了一本回忆录，提供了不少有关希特勒及其亲信鲜为人知的内幕材料。

[3] 奥斯卡·拉方丹（1943～ ）德国政治家，原社民党领导人之一，20世纪90年代曾担任过社民党主席和联邦财政部部长，1999年因不同意党的右倾倾向而辞去党内和政府职务，2005年退出该党，成立德国左翼党。

[4] 二等品德概念出自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科学中关于方法与价值判断的争论，与“基本品德”或“一等品德”（Primärtugend，Kardinaltugend，Grundtugend）相对。“基本品德”源自古希腊，指理性、公正、虔诚、勇敢；而二等品德是处理日常事务、维持社会顺利运行所需的品行，也被称作市民品德，主要指勤奋、忠诚、顺从、守纪、守时、可靠、遵守秩序、礼貌、洁净等。

[5] 德国有严格的垃圾分类规定，不同类别的垃圾必须放入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废纸放入蓝色桶，菜叶果皮等生物垃圾放入棕色桶，食品的塑料包装物放入黄色桶，其余垃圾放入灰色桶。玻璃瓶按不同颜色另有专门回收装置。

牧师之家

瞧，蝙蝠形老虎窗。看，专为牧师住宅特制的砖。整个冬天人们把这种砖浸泡在水中，为的是用它们建造的牧师住宅更牢靠……

“在古老的牧师住宅中过复活节！”一家四星级宾馆在很久以后的另外一个时代许诺道.“在复活节期间您可以享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氛围。”这家宾馆的广告词中如是说。这里涉及的是一幢建于1762年的巴洛克住宅。谁想在里面常住，也可以租赁或购买一幢牧师住宅。专做这类生意的中介公司自称搞的是“牧师住宅房地产”。

结论：牧师住宅在出售。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除了教会簿记方面的理由外，这种出售过程或许也是我们文化总甩卖的组成部分吧？

1929年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20年代有影响力的精神病学家——在其著作《天才》中称：18世纪以来德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半都来自基督教牧师之家。他们当中著名的有：约翰·克里斯托夫·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雅各布·米夏埃尔·莱茵霍尔德·伦茨（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让·保尔（Jean Paul）、施莱格尔兄弟（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

同样身为牧师儿子的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1934年在其杂文《德国牧师之家》（*Das deutsche Pfarrhaus* ）中得意地列出了统计数字：30%的医生、40%的法律工作者、44%的自然科学家和59%的

语言学家出身于牧师家庭。贝恩认为，正是这样的家庭孕育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是思想家，同时又是诗人；或者反过来说，那些诗人同时是哲学家。

对于基督教牧师之家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人们时常称赞有加，牧师之家受之无愧。在参考了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罗伯特·明德（Robert Minder）和阿尔布雷希特·舍内（Albrecht Schöne）的传奇性文章后——他们论述的是牧师之家背景下的文学，我们在此想大胆地提出一个论题：基督教牧师之家对德国人所起的作用应该相当于百科全书派对法国人的作用。

百科全书派和牧师之家关心的核心都是人和人的形象：知识、教育和教养以及随之而来的启蒙。前者更注重科学，后者基本上以《圣经》为主。倡导者分别或已称自己为杂文家，或仍称自己为神学家。一方关心的是还没有研究到的东西，另一方关心的则是神秘而无法研究的。令人惊奇的是：从今天的视角看，过去常被强调的二者之间的区别有时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1750年百科全书派以其出版方面的霹雳之举令欧洲知识界惊愕不已，相反牧师之家一向没有什么轰动之举。其结果是：百科全书派改变了公众的生活，牧师之家则改变了私人生活，进而在不知不觉间连带改变了公众生活。

根据马丁·路德的想象，牧师之家的生活应该起表率作用。在那儿知识也管用，但它显得不那么咄咄逼人。教皇虽然被认为是多余的，但世界仍在上帝掌控之中。《圣经》，不久之后也包括其他书籍纷纷受到重视。

百科全书派为即将来临的颠覆——法国大革命——推波助澜，牧师之家则在看起来似乎不会疯狂的德国社会中提供了精神和教育方面的岛

屿。百科全书派成为公民追逐权力的工具，相反牧师之家则成为精神的保护空间。在一个颠覆没有机会的社会存在着许多自由空间，今天人们会称其为小生境。牧师之家是路德最棒的根据地，它代替了图书馆与大学、科学院和精英们。牧师之家的全套设备不豪华，但不乏生活必需品。它完全适合应急，可问题是，它有时也把其他事情弄成了应急之举。

路德式牧师之家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政治色彩，其存在最终是基于废除天主教神甫的不婚戒律，这可真不是小事。很长时间里，它一直是不挂牌的精神招待所，作为秘密经营者它无须做广告，这种招待所的性质使很多事成为可能。当然从启蒙的角度或至少用启蒙的手段，人们也可以指责招待所之父搞权威主义、想入非非和偏狭固执。

牧师之家作为社会因素在19世纪进入德国的公众意识，当时那个大器晚成的民族正奋起直追地使自己从属于社会。为了解释自己的错误和给大家一个说法，德意志帝国追溯起牧师之家。它知道那里保有自己的新教之根，那里也是解释它崇尚纪律性的最好源头。“第三帝国”把教会分裂为——简单点儿说——承认是基督徒的和承认是德国基督徒的，这样牧师之家的任务就像所有其他被机构化的东西——也就是那些不符合体制标准秩序的东西——一样受到了质疑。

同时对牧师之家的批评也是自有其传统的。就像大多数在德国有成就的事一样，牧师之家也得在现实生活中被律师们钉上耻辱柱。例如强调红军派恐怖分子古德龙·恩斯林是牧师的女儿就是明证。为什么人们不能对一件像牧师之家这样有民族意义的事情达成共识呢？为什么在事关整体和民族的事情上总是非要结党分派不可呢？德国没有巴黎，因而也就没有自认为合法的中心。路德的《圣经》和保存其手稿的地方则为此提供了一种替代。

在东德，牧师之家作为小生境再次获得重大意义。那儿成了批评政

权的地方，也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大本营。在东德这种国家持不同政见者的机会不多，70年代反对派诗人赖纳·孔策（Rainer Kunze）在《牧师之家》（*Pfarrhaus*）一诗中写道："谁被逼入那儿，找到/围墙，屋顶[1]和/不用祷告。"



所有牧师之家的原型：马丁·路德与他的家人，神学家和路德的知己菲利普·梅兰希通也情同家人。

为了躲避统治者的纲领许多人选择了牧师职业，他们用这种方式绕开了意识形态上的动员。就这样政治上积极的人成了牧师，两德统一后牧师又成了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有的甚至成了政治家。

德国的启蒙最终不过是路德《圣经》的政治化和对这种政治化的不断扩展。如果不是在世俗事物中，那对宗教的改革又该怎么结束呢？然

而对此既不需要思想家，也不需要诗人，需要的是管理者。

大多数神学家成了干部，变为公民社会的网络联系人。但牧师之家的末日已经来临。就连住在其中的牧师有时也向我们保证说，他们即便没有这块地方，没有牧师之家也能活。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住在那里，是因为这样他们就名正言顺地成了继承人，虽然他们也不太知道该用继承来的遗产干些什么，但他们觉得有义务住在那里。

人们会想毕竟还有点儿责任感。但如果读了2002年9月《德国福音派教会对牧师之家的建议》，就会发现这点儿责任感也维持不了多久了。也就是说从这份建议中人们可以获悉，首先是年轻的牧师不再愿意一天二十四小时为教区提供服务了。简言之，他们不愿住在牧师之家了。最起码在此明确显示出牧师之家的衰亡不仅与教区萎缩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心灵上的关怀被贬低为一种服务了。换一种戏剧性一点的说法就是：雇佣关系战胜了牧师道德。

可那提供服务的牧师难道错了吗？没有人需要他的图书馆了，他说些什么也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了。除非牧师抄起吉他唱点儿什么赞美伟大和平或是普遍和解的歌。

“化剑为犁”[2]，正如东德80年代和平组织呼吁的那样。但成为谁的犁头呢？为了能够更好地跟上社会的时髦讨论，教会难道不是早就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圣经》——了吗？

牧师之家从曾经追求的谦逊堕入无意义。这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人们应该问：没有牧师之家的教会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如果教会都不对自己提这个问题了，那又意味着什么？必须指出这种损失。如果人们问：什么代替了牧师之家？这种损失就明显了。

我们回忆一下：为了给哲学家们腾地方，神学家们撤离了阵地。哲

学家们同样放弃了。他们做出姿态，好像他们仅仅还掌管着修道院的药草园。如今是治疗师的天下，他们只需要一块门前的招牌。

沉溺于享乐的社会让灵魂隐姓埋名。闹出动静的仅仅是对它的沉思。

牧师之家是博物馆。维滕贝格的路德故居是座修道院，这是当时的君主送给这位宗教改革家的礼物。艾森纳赫有一家带图书馆的牧师之家档案馆，在那儿人们能获得一些有关牧师之家的基本印象，也许还能想象它的作用。

作者：里·瓦

译者：丁娜

参阅：工作狂，母亲十字勋章，宗教改革，纯洁戒律

---

[1] 屋顶一词在德语中还有安全与庇护的意思，此处一语双关。

[2] 东德20世纪80年代呼吁世界范围内裁军的和平创意活动，口号源自《圣经》，见以赛亚书，第二章至第四章。

玩具屋

纽伦堡，**1632**年

我的孩子，外面在打仗。把所有的门和窗都关起来，我要给你搭建一幢漂亮的房子。

整个国家成了武器的演练场，城市都荒芜了，手艺人都关了张，艺术家们也无法再创作了。市民一钱不值了，士兵则身价倍增。不受惩罚的厚颜无耻嘲弄着文明的风俗习惯，一片焦土之上到处是一群群粗鲁士兵们的营帐，长年的征战让他们变得野蛮。如果我必须经历现在威胁着我们这座直辖市的毁灭，那我的心会碎的。但古斯塔夫·阿道夫会保护我们的，我看见瑞典国王英武地骑在他的骏马上，那匹马很健硕，皮毛闪闪发光。这座城的城墙周围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深8步，宽12步，这道战壕会保护我们免遭愤怒敌人的屠杀。

我的孩子，看，柔美的构架已经搭起来了。我给你建的是一幢三层楼房，房顶上还有傲立的山墙。沿着遍布各处的楼梯可以到达任何房间，哪怕是最小的小屋中都有足够的空间摆放装饰物、工具和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你想要什么样的屋顶，纯白加一抹绿色树叶波纹？墙壁我给你镶上一层深色木头，镶板的精雕细琢要让一位公爵都叹为观止。

现在不要哭，我的孩子。要是有邪恶的声音给你讲述马格德堡所经历的屠城——抢掠之后的焚烧，人、畜、家产全部葬身火海；孩子们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在废墟中寻找父母；女人们在遭受了最大的侮辱后，妻子只能在丈夫胸前哭诉，女儿只能在父亲脚下悲戚；丧尽天良的职业杀

手刺死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儿——你就堵上耳朵。这种命运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找不到语言来描述，诗歌更是知趣地闭上了嘴。

看，这儿是我给你选择的家具，让我们从头说起。垫有稻草的床、亚麻床单、鸭绒被，床周围装有蓝色床幔；然后是神龛、箱子和衣柜；那个角落放炉子，旁边是桌子和椅子、扶手椅、长椅，自然也有桌布和餐巾。你看见烛台和蜡烛了吗？还有弦琴、竖琴、斯宾耐琴、祈祷书、编年史和掷色子游戏。你还是先看看厨房吧！装面包和香草的筐、放大饼的盘。木制和锡制的盘子、托盘、玻璃杯、罐子和洗碗池。去看看盐桶，打开看！我还送了糖、黄油和厨房用小滚轮[1]给你。

待在这儿别出声，我的孩子！士兵们来敲门了，他们是瑞典国王军队的。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他们不是来抢劫的，只是想讨碗汤喝，或是要块面包。有一位已经饿得快站不住了。

走吧，离开我们家的门槛吧！我们什么都没有，自己也在挨饿。最后一个苹果几天前已经给我的孩子吃了。走吧，你们只会把鼠疫传染给我们！我知道街上的惨景，情形一天天变得越来越糟。即使没有遭到敌人的焚烧和劫掠，我们的食物也吃光了。痢疾每天夺走越来越多人的性命，不久前还装得满满的粮仓突然间就令人恐怖地见了底。整个纽伦堡的所有磨坊磨出的面也不够这场贪婪战争的吞噬。自从敌人包围我们以来，全部耕地都遭到了践踏。先是严寒，后是雨季，现在又赶上暑热、干旱，如入蒸笼。尸体在四处腐烂，已经没有人再问：那是个人，还是头牲口？我曾亲眼看见我的邻居，那位老实的老铜匠，夜里偷偷弄回来一具还没有完全腐烂的死尸。已经有上万市民的尸体腐烂了，佩格尼茨（Pegnitz）已是饿殍遍野。他们死了还僵直地伸着胳膊，似乎在祈求老天给自己一块面包。

好了我的孩子，他们走了，离开了。现在我们又清静了，我还有那么多要给你看的东西。

我的孩子，我放进牲口棚的小马驹哪儿去了？

我的孩子，你怎么不说话？你看上去面色苍白？你的眼珠鼓了出来？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慕尼黑，1871年

我衷心热爱的宝贵朋友！他们现在拼凑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关我们何事！让他们去拥抱大炮吧，让他们为普鲁士的偶像去建立纪念碑吧，我们不理睬这个疯狂的世界。哦，我们二人心中的德国是多么虚无缥缈啊！但是我们眼前有个伟大而崇高的目标，这种意识会让我们坚强！我们必须打破习惯的束缚，摧毁这个粗俗与自私世界的法规，理想将要而且必须进入日常生活！我是国王！您是大师！我们联手所向无敌！世界命运选择了我们二人，让我们把对于生活来说太美的东西在艺术这面永恒的镜子中表达出来。没有人胆敢嘲笑我们，管我叫养了个“受欢迎的歌剧作曲家”的“国王音乐发烧友”。我们想给这个世界的音乐范本会让它感到无地自容，时光将失去其力量，永恒的将是对我们的愉快赞颂！

一旦我能读到您亲笔写下的“永恒的杰作圆满完成！”狂喜一定会让我浑身战栗！我又怎么能怀疑，我们会一起经历神作尼伯龙根歌剧的首演！那将是和《特里斯坦》[2]诞生时刻类似的日子！现在我想起当时的情景还会欢呼雀跃。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但现在这个世界看上去是多么可怕、多么令人悲伤啊：黑暗的恶魔当道。普鲁士人想把我变成傀儡国王。然而当他们强迫我在那封可怕的——承认霍亨索伦家族当“皇帝”——信上签字时，他们哪里想得到为我遭受的耻辱得付出昂贵的代价：从此我财源广进。您是唯一一位知道我这么做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您的生活更甜蜜，对您不得不与之搏斗的无数烦恼与忧愁进行补偿！您总是被迫与令人恼火的戏剧界抗争，可现在大家即将看到的是最纯粹的完美！现在的口号是尽善尽美！您再也不会有如此经历：看着自己的任何孩子明珠暗投！



摄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施万高小镇，新天鹅堡（即新天鹅石宫），欧洲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2014**年**8**月**17**日。

您能预料到当您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您把《莱茵的黄金》[3]和《女武神》交给普通的蹩脚剧院去上演时所经历的痛苦时，我那种匕首刺心的感受吗？难道您做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我，您的朋友，能尝到观看几场演出的乐趣吗？我以我们神圣的爱起誓：您会得到属于您的艺术节剧院！我要把《尼伯龙根的指环》从其诅咒中解救出来！一切条件都会具备，最大胆的梦想将会成为现实！我的使命是：为你而生，为你而择！您不必再与鄙吝的世界打交道，我将高擎您脱离艰辛的尘世！您会幸福的！

希望未来建筑的蓝图不要让人等得太久。我已展望到您的流派的大旗在德国的大地上迎风飘扬，您的艺术的年轻传人从远远近近的地方聚集到您的旗帜下。我们要把这件奇异的作品馈赠给德意志民族——名副

其实的民族，并让其他民族看看，德意志艺术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成就。我恳求您：不要和世俗的外界有任何接触！要爱惜自己！

我也日益感到有权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氛围中，尽管我得管俗世的事，也不要屈尊让令自己恶心的俗世涡流卷走，而是坚守在理想-君主-诗意的高处，像您我尊崇的朋友——一样孤独，让那些有着毒蛇般舌头的人去任意垂涎诽谤吧。要是祭司过多地留意尘世的事情，那纯粹的崇高热情之火就有熄灭的危险。人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和金钱，事情就这么简单。

要是我心爱的城堡的修建工程进行得不这么缓慢该多好！我打算把霍恩施万高（Hohenschwangau）的老废墟在珀拉特（Pöllat）峡谷附近重建起来，完全按照古老的德意志骑士风格，这我写信告诉过您吧？现在我才知道，一切都得从头做起。我是多么渴望有朝一日能够住在那里啊！会有很多间客房，从那儿可以眺望美丽的风景：崇高的佐伊岭（Säuling）峰、连绵的蒂罗尔（Tirol）山脉和远处的平原。这些房间全部布置得舒适亲切。您知道我想在那里招待哪位尊贵的客人。那里是一处仙境，神圣而难以接近，那里是接待那位非凡朋友的圣殿，他的存在意味着对俗世的唯一拯救和真正恩惠。您在那儿也会看到《汤豪舍》和《罗恩格林》的场景。无论在哪一方面，这座城堡都会比下面霍恩施万高的老城堡漂亮和适宜居住，下面的城堡因我母亲每年的莅临而诗意全无。遭到亵渎的诸神会报复的，他们会和我们一起逗留在陡峭的山巅，被天界的空气环抱着。

我的规划已经没有止境了。我也让人在林德尔霍夫（Linderhof）——远离慕尼黑所有的喧嚣——大兴土木。闭上眼睛我已然置身于清澈湖畔的维纳斯岩洞中，天鹅们云集在我的蚌形小舟旁，我看到灯光秀、涟漪的湖水和瀑布。来，我的爱人！看那岩洞，弥漫着淡雅的玫瑰香！即使是神仙，在此停留也会沉迷于那甜美的快乐。[4]

至尊大师，您得把档案中的所有舞台布景草稿送到我这儿来。我会忠实地将您的每一部作品置于大自然之中，拆毁挡在舞台与观众席、理想与现实以及黑夜与白昼之间的壁垒。难道就不该出现这样的局面：伟大的精神大师能够幸福而满意地生活，受到周围人的钦佩并鼓舞他们？

可怕的束缚将消失！鼓起勇气！我知道我们必将获胜，因为我们的武器是圣洁的，我们的事业是神圣而高尚的，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将不倦地奋斗！

衷心地问候与祝福！永远忠于您的路德维希。[5]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德国式焦虑，文化民族空想，音乐，怪诞之事

---

[1] 一种用来切割面食的工具。

[2] 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865）。

[3] 《莱茵的黄金》是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中的第一部，讲述莱茵河底由三位仙女守护的黄金被尼伯龙根族侏儒阿尔贝里希偷盗，铸成一枚指环，并诅咒“拥有指环的人必定被杀”，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神话故事。

[4] 加粗部分为《汤豪舍》歌剧中的歌词。

[5] 此信为本书作者参考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与音乐家瓦格纳的通信集写就的，里面提到的正在修建的城堡即著名的新天鹅城堡。

横向思维者

起初不过是个爱发牢骚者。他总能找出点儿可指摘的，有些事没有人能办得让他满意。他是那种对一件事完全不买账，却从不大声公开说出来的主儿。他宁可对这个或那个问题有疑虑，就像他习惯承认的那样；而那些摆到桌面上的建议总有一些细节还不能让他信服。

爱发牢骚者很招人讨厌，从根本上说他总是质疑他人费力得到的思考结果。他这么做时也并不激烈反对，他就是惹人烦，但人们必须也可以容忍这种人的存在。最终他掌管着逆反力量。

人们也能体谅爱发牢骚者的牢骚。他的容忍度好估算，不光可以估算，从他的行为还能看出某件事是否会遇到较大抵抗。人们经常能从爱发牢骚者那儿得到警示。

经过20世纪的各种独裁政治后，当民主终于正确确立时，爱发牢骚者的称谓也就站不住脚了。在普遍要求的自由主义氛围中，人们最终不可能再否定一个有不同想法的人的质量。最晚在60年代时，“爱发牢骚者”这个概念就不合时宜了。人们当时毫不张扬地形容它“过时了”。

随着公众被不断政治化，在概念的天空代替它又升起了一颗新星：那就是“横向思维者”。这个用语源自科学，在那儿它指一种知识模式转入另一知识领域。管理词典中对其定义是：这类人能够独立、独特、非常规地思考，其思维方式往往与常规思维相左。他们在十字猜谜那种无聊游戏中也是为了脑筋急转弯，据说解这种字谜可以作为锻炼横向思维的手段。

作为横向思维者的典型有下列这些完全不同的人物：维也纳沙龙共产主义者和雕塑家阿尔弗雷德·赫尔特力卡（Alfred Hrdlicka）、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的改革者库尔特·比登科普夫（Kurt Biederkopf）、慕尼黑卡巴莱演员卡尔·瓦伦丁（Karl Valentin）和早期经院哲学家皮埃尔·阿伯拉尔（PierreAbaelard）[1]，也就是因与哀绿绮思（Héloise）[2]的桃色事件而被载入世界文学史册的那位神学家。在一般公众眼中，横向思维者虽不想成为反叛者，但他们也没有义务在政治上忠于某一阵营。为了让新思想成为可能，横向思维者必须打破派别之见，他也是那种故意把棋子放到错误地方的人。因为那是别人的棋子，所以他也能估计到别人会马上做出反应。

横向思维者最终也是一种尝试——对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和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知识进行轻微的矫正。在成功的情况下，横向思维者所能做到的就是进行政治上的家庭系统排列。[3]

横向思维不久就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角色，它让思维不再陈腐，为此它正式从政治和哲学两方面接受了诸多任务。有段时期横向思维的角色很被看重，那是70年代知识分子用批判的精神“刨根问底”和“质疑一切”的时期。横向思维者突然拥有了权力，他让公民们不知所措，也打乱了人们所熟悉的社会话语游戏的规则。那是赛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活跃的时期，他突然声称自己是“游离选民”（Wechselwähler）[4]，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无论愿意与否，或是仅仅作为品牌来使用，人们以这类声明撼动阵营思维的坚实基础。

横向思维者的最大障碍在于：为了让别人一直相信自己，一般来说他必须让人觉得他是独一无二的。横向思维者可以拒绝接受每一项由多数人做出的决定，作为理由他只需抬出自己健康人的理智，但他自己却

不可以为多数人的决定奔走呼号，否则他就两极分化了。这里两极分化的意思是说，他没有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而是通过自己的观点和言论使局面更尖锐化了，也就是说把事情搞得更糟了。这不仅骇人听闻，而且对追求和谐的德国公众来说，这正是让横向思维者安分守己的咒语。

现在横向思维者不太常见了，也是因为他害怕会无意中动摇了原理。虽然人们已不再相信这些原理，却也不愿进一步质疑它们。

不遵守阶段性休战协议的人是令人败兴者，但这个角色也得有人扮演。有些人演得得心应手，“让我们实话实说”，星期日中午电视一台的新闻俱乐部节目中我们有时甚至会听到这种说法。

让我们实话实说。回答问题不是比提出问题要容易得多吗？也许这才是真实原因，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经常发现横向思维者绝迹了。

作者：里·瓦

译者：丁娜

参阅：科考远征，文化民族空想，音乐，宗教改革

---

[1] 又译彼得·阿伯拉尔。

[2] 又译海洛伊斯。

[3] 由德国心理学家伯特·海宁格（Bert Hellinger）最早研究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方法：Family Constellation，多用于家庭治疗。

[4] 那些非某候选人或政党的坚定支持者，而是依靠选举前夕的宣传、议题和事件决定立场的选民。

狠心的娘 [1]

从前有个女王，她有个小女儿，女儿很小，还得抱着。有一次孩子不乖，母亲怎么哄，孩子都安生不下来。她失去了耐心，因为许多乌鸦正在宫殿四周飞来飞去，她打开窗户说："我希望你是只乌鸦，飞走了我就消停了。"她的话刚说完，孩子果真变成乌鸦，离开她的臂膀，从窗户飞了出去。

唉，女王啊！事情变化得就是这么快。刚才你还是妩媚母亲的象征，你不把孩子交给奶妈，而是自己抱着她；结果因为一句草率的话，你就成了狠心的娘。

我可以给你讲很多故事，它们都源自我那缺乏童话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母亲，如果她们不日日夜夜地抱着她们的孩子，而是胆敢把她们的小宝贝"送走"——不是丢到阴暗的森林中，而是送到明亮的托儿所、幼儿园或日托站，那她们自己就会经常害怕被人看作"狠心的娘"，得不到谅解。要是她们不亲手给自己的孩子烤点心，而是把买来的点心放进孩子的背包，那她们在学校门口就得接受别人的指责。

我不知道从前情况是否更糟。那时候至少还有"狠心的爹"。

上帝要求每一位一家之主都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和他的妻子儿女，如果他不愿意让人责骂为畜生、狠心的爹或是不称职的丈夫……

就连席勒也曾在他的剧中使用过这个词："你朝这儿看——朝这儿看，你这狠心的父亲！——要我扼杀这个天使吗？"[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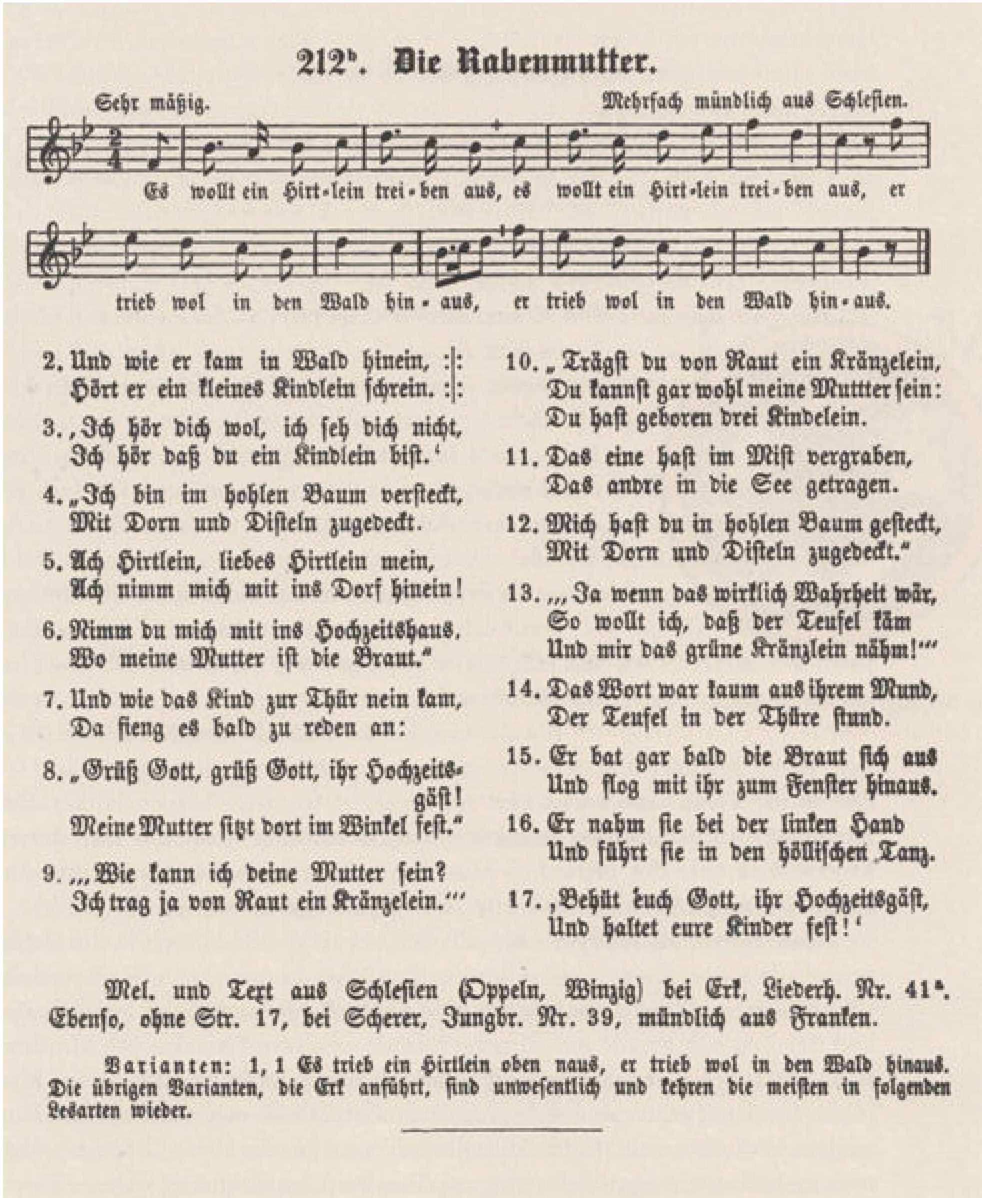
“狠心的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从我们的语言中溜走了，让“狠心的娘”独自留了下来。我觉得现在因为“狠心的爹”这个字眼在我们的语言中不复存在，所以得立刻说三遍“狠心的娘”来补偿。

可怜的女王，虽然这对你不是安慰，但你生不逢时。你因不耐心时说出的唯一一句话而被称为“狠心的娘”，你的同时代的姐妹们要想被诅咒为“狠心的娘”，她们得做出更伤天害理的事：把孩子溺死、埋进粪堆或是沉入到空心树中。

哎，要是我们能一直这么严厉，同时又心胸宽阔，只用这个恶毒的字眼来形容那些确实该遭唾弃的人多好！

女王，我不能向你透露童话的结局，你是否有朝一日又见到了自己的女儿。我只想对你说：如果她回到你身边，请问问她作为乌鸦日子过得如何。我们人类是不是非常愚蠢，用乌鸦的名字来形容狠心的父母。我在一本1860年出版的《花园凉亭》杂志中读到的下面这段离奇的故事，对此她有什么看法：

> 今年的5月15日我像往常一样，去离我住处半个小时之遥的一座农庄上课。“我马上能让您看点儿平日里看不见的新鲜事。”主人福尔克豪森（Volkhausen）迎接我的时候说。他是个热衷于观察大自然的人，“我让人在附近砍伐一棵橡树，那树上有个乌鸦窝；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到时候老乌鸦会怎样？”
>
> 我很乐于一同前往。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橡树在沉重的砍击下马上就要倒下来了。从很远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乌鸦——只有一只——越来越近地围着受到威胁的巢打转。现在树开始倒下。小乌鸦们一定是向母亲——事后证明它是母亲——求援了，因为老乌鸦神速地落在了窝上。又砍了几下之后树就彻底倒在地上了。“乌鸦窝呢？”甚至粗鲁的伐木工都开始问。窝还在，窝上趴着老乌鸦，一根树干击中了它，死后它还用自己的翅膀护着它的两个孩子！


212b. Die Rabenmutter.

Sehr mäßig. Mehrfach mündlich aus Schlesien.

Es wollt ein Hirt-lein trei-ben aus, es wollt ein Hirt-lein trei-ben aus, er trieb wol in den Wald hin-aus, er trieb wol in den Wald hin-aus.

2. Und wie er kam in Wald hinein, :|:
Hört er ein kleines Kindlein schrein. :|:

3. ‚Ich hör dich wol, ich seh dich nicht,
Ich hör daß du ein Kindlein bist.‘

4. „Ich bin im hohlen Baum versteckt,
Mit Dorn und Disteln zugedeckt.

5. Ach Hirtlein, liebes Hirtlein mein,
Ach nimm mich mit ins Dorf hinein!

6. Nimm du mich mit ins Hochzeitshaus,
Wo meine Mutter ist die Braut.“

7. Und wie das Kind zur Thür nein kam,
Da fieng es bald zu reden an:

8. „Grüß Gott, grüß Gott, ihr Hochzeitsgäst!
Meine Mutter sitzt dort im Winkel fest.“

9. „‚Wie kann ich deine Mutter sein?
Ich trag ja von Raut ein Kränzelein.‘“

10. „Trägst du von Raut ein Kränzelein,
Du kannst gar wohl meine Muttter sein:
Du hast geboren drei Kindelein.

11. Das eine hast im Mist vergraben,
Das andre in die See getragen.

12. Mich hast du in hohlen Baum gesteckt,
Mit Dorn und Disteln zugedeckt.“

13. „‚Ja wenn das wirklich Wahrheit wär,
So wollt ich, daß der Teufel käm
Und mir das grüne Kränzlein nähm!‘“

14. Das Wort war kaum aus ihrem Mund,
Der Teufel in der Thüre stund.

15. Er bat gar bald die Braut sich aus
Und flog mit ihr zum Fenster hinaus.

16. Er nahm sie bei der linken Hand
Und führt sie in den höllischen Tanz.

17. ‚Behüt euch Gott, ihr Hochzeitsgäst,
Und haltet eure Kinder fest!‘

Mel. und Text aus Schlesien (Oppeln, Winzig) bei Erk, Liederh. Nr. 41a. Ebenso, ohne Str. 17, bei Scherer, Jungbr. Nr. 39, mündlich aus Franken.

Varianten: 1, 1 Es trieb ein Hirtlein oben naus, er trieb wol in den Wald hinaus. Die übrigen Varianten, die Erk anführt, sind unwesentlich und kehren die meisten in folgenden Lesarten wieder.

德国民歌中就已经提到了狠心的娘。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德国式焦虑，幼儿园，母亲十字勋章，女人

---

[1] 直译为乌鸦般的母亲。

[2] 引自《席勒文集II 戏剧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59页。

宗教改革

十字架，黑色，居于心脏中央。心脏乃其天然之色，红色。

信仰发自于心，人自诚信正直。

心脏居于白色玫瑰中央，昭示信仰之快乐、慰藉和恬静。玫瑰为白色，白色乃精神和天使之色。

玫瑰衬托于蔚蓝之上，因精神和信仰之快乐乃为开端。

蔚蓝之外有金色圆环绕之，以示天堂极乐绵延无尽，福禄欢乐亘古永恒。

一如黄金，至高尚至稀有之矿石也。

撰写如此充满激情文字者，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是也。起因是对他的徽章，即“路德玫瑰”（Luther-Rose）的描述。读到这段文字，人们不禁要把这些主题象征归属到具有生动形象组词规则的德国神秘主义中去。难道路德是个神秘主义者？

我们假设有一位乘客在德国的高铁里，手中翻阅着铁路发行的车上读物（长时间坐车，他也不禁翻阅起了车上读物），凑巧在一篇文章里看见了“路德玫瑰”。这时，火车刚好在一个叫“路德之城维滕贝格”（Luther-Stadt Wittenberg）的地方停车一分钟，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柏林了。乘客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火车站。如果这个时候他下车——在这个一切都停止不动的一分钟时间里，那么转瞬之间，他就只能在站台的长椅上眼巴巴干坐了。

这个火车站原来准备关掉不用了。车站的出口以前挂过一家旅馆的

广告牌。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客栈，路德当年就曾在那里歇过脚。

新教徒还是旧教徒，基督教还是天主教？自路德以来，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都在左右着德国人的族群观念。不管你信不信，所谓的“混教婚姻”，即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的跨宗教的婚姻，在迅速现代化的帝国时代成了最重大的问题之一。相比殖民地问题，它更加牵动着当时公众社会的神经。普鲁士的官僚制度犯了一个错误，即它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普鲁士的“普通法”规定，儿子随父亲的宗教信仰，女儿则随母亲。宗教问题无法解决，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

事情是从若干技术发明和地理发现扩大了人类的视野开始的。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起航，踏上了伟大的发现之旅。出生于纽伦堡并服务于葡萄牙王室的一个叫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的商人和探险家，于1493年设计制作了一个地球仪，他自己把它称为“土豆”。哥白尼把太阳置于宇宙的中央，此前人们一直把地球说成是太空的中心。1504年，纽伦堡的锁匠彼得·亨莱因（Peter Henlein）发明了第一只怀表。古滕贝格则用他发明的印刷机推动了印刷技术。

谁若是口袋里揣着表，就无须再依赖教堂的钟塔。谁如果会用活字印刷，就无须再仰仗牧师来为他代读。

从此开始了新的时代。

这是城市和市民的时代，是城市贵族的时代。除了王公贵族和农民阶级，中世纪的第三股势力知道如何去利用现存制度和中世纪的危机。

16世纪是跨向近代的伟大门槛。在门槛面前，你可以被绊倒，可以跳跃或大步跨过去，也可以不放弃被抬过去的梦想。为此，你必须要有值得信赖之人。

16世纪，一个万能的、黑死病和末日审判相交织的中世纪就要逝

去。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时候到了。这个16世纪不仅在技术上日新月异，它还改变了对人的观念。人类的价值观发生了自古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法想象，手拿长矛的骑士口袋里还揣着怀表。

这不仅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伟人们似乎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填补人类对世界认识的空白。自古罗马以来，人类还未曾有过自身发展更有利的时机。思想的大胆突然间成了思想的伟大。其要点是突破，而非温良恭俭。

马丁·路德1483年出生在艾斯莱本（Eisleben），在埃尔富特学习法学和哲学。1505年入修道院为僧，1512年获神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在维滕贝格任牧师和神学教授。

路德的声名鹊起和他的意义源于两件事情：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和对天主教会的批评。在瓦尔特堡他用十一个礼拜的时间，一口气将《圣经》的《新约》从希腊文翻译成德文，由此成了新高地德语书面语言的奠基人。他是自神秘主义者之后德国历史上认识到自己母语力量的第一人。“路德的《圣经》翻译对德国人民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德国人民从此得到了一个《圣经》的大众读本，天主教世界其他民族没有一个有过这样一个读本。虽然天主教会的各种祈祷小册子多如牛毛，但是没有一本教化民众的基础读本。”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座》（*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一书中这样写道。

路德对教皇的激烈批评，矛头首先对准的是赎罪券买卖，即用钱来从深重的罪孽中赎身。他把赎罪券看成是罗马教廷的腐化堕落。他说：“那就是一种购买、贩卖、兑换、交换、麻痹、说谎、欺骗、抢劫、偷窃、炫耀、卖淫、无赖，是对上帝极大的不恭。如此无耻地统治教民，未见更甚于此者。”他的这个于1517年在维滕贝格写在九十五条

论纲中的批评，以语言的力量分裂了罗马教廷，令任何军队和武器都望尘莫及。



就在瓦尔特堡的这间小屋里，化名“容克贵族耶尔格”藏身此地的路德把《圣经》翻译成了德语。

《圣经》的翻译和与罗马教廷的对抗为德国人民打开了自己实现民族统一的大门。路德不仅是教皇庇护下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激烈抨击者，而且是最激烈的抨击者之一。他把罗马教廷将自己的国家体制强加在德国人头上的企图，看成是教皇使出的一个奸计。路德说：“我们德国人好好地给自己上了一课：我们自以为是主人，然而却成了最阴险的暴君的奴隶。我们自以为有帝国的名字、头衔和国徽，但是国库、政权、权力和自由都在教皇手里。教皇吃的是果肉，而我们吞咽的只是果皮。”他甚至说，在罗马教廷与“君士坦丁堡真正的罗马皇帝”（如其原话所述）的争斗中，我们德国人被利用了。难道这是路德

为东正教做的辩护词吗？

一个民族走入历史进程的关键是它的建国神话，这个神话是它取之不尽的源泉。

民族自由观念是欧洲每个建国神话的核心。不过，德国关于自由的大讨论是一场关于宗教自由的辩论。这场辩论在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Augsburg Religionsfrieden）[1] 里被提升到了一个法律事实的高度。这个文字含混不清的和约约定，不同宗教信仰在德意志帝国范围内可以同时并存，但在各诸侯国内则不适用。这里可以看出德国关于国家观念的一个特点，即不讲求统一的原则，而讲求对差异的管理。著名的“Cuius region，eius religio”（“教随国立”）充其量就是一个维持秩序的工具罢了。这个只顾及眼前的权宜之计，后来被证明是一个束缚手脚的桎梏。宗教问题孰胜孰败，决定着国家秩序的巩固和稳定。不过，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毕竟也还是德国历史上绵延一千年的第一个帝国的前提条件。

路德是神学家，或者说是政治神学家，他的论纲是引发政治后果的神学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于1534年出版的德文《圣经》，不仅直接面向劳苦大众，同时也赋予大众语言一种可登大雅之堂的地位。这点他非常清楚。他搜集过四百多条民谚，目的是给人民群众的智慧以应得的尊重。他从这个宝库中汲取自己所需的养分。在浪漫派文人之前，路德此举空前绝后，无人可及。

路德的德文是粗俗的德文。“他让大众的智慧弄得污秽不堪”，有人这样说他，还有：“鸟长什么样的嘴，就唱什么样的歌”。面对没落的拉丁文，这种粗俗朴实让德语显得生动活泼和前途光明。

路德有许许多多帮忙的人、出主意的人和支持者。他有一个类似内阁成员那样的紧密的工作团队，以及一个范围更广更大的志同道合者的圈子，使他有机会利用这些人的能力和才华。他的所谓内阁圈子的成员有：菲利普·梅兰希通，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以“德国人民的老师”名闻天下，替路德校读他的《圣经》译本；神学家尤斯图斯·约纳斯（Justus Jonas）陪同路德前往沃尔姆斯（Worms）[2] 参加帝国会议；同样是神学家和路德的“忏悔师”的约翰内斯·布根哈根（Johannes Bugenhagen）出生于波美拉尼亚（Pommern）地区，被认为是北方的宗教改革家。此外：曾经做过修女的卡塔琳娜·冯·博拉，1525年起成了路德的妻子；萨克森的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der Weise）侯爵为路德保驾护航；还有侯爵的枢密官格奥尔格·施帕拉丁（Georg Spalatin）。德国伟大的画家之一卢卡斯·老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d. Ä）也是成员之一，他为这个圈子里的人绘制了肖像画和圣贤画像。

路德的追随者里还有乌尔里希·冯·胡腾（Ulrich von Hutten）。他出身贵族，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是当时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反罗马教廷人士，早期德国民族主义者之一和独立的精神领袖。他的格言“豁出去算了”出自当时一首写在传单上的流传歌曲，后来成了那个时代的口头禅。胡腾是《蒙昧者书简》（*Dunkelmännerbriefe* ）的主要执笔者之一，这本书用讽刺的手法嘲弄了经院主义学派。此外，他还是赫尔曼战役（Hermannsschlacht）[3] 神话的创作者。中世纪时，阿米尼乌斯和瓦鲁斯战役（Varusschlacht）几乎无人知晓。直到宗教改革时期，人们（特别是乌尔里希·冯·胡腾）才发现这段历史，并把阿米尼乌斯当作与罗马统治做斗争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人们创造出了“赫尔曼”这个人物形象，并为后来的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戏剧提供了创作素材。

路德不是一个想造反之人，他不赞同农民战争。路德不是革命家，甚至他的宗教改革会给德国的革命思想釜底抽薪。他是16世纪的人物，是僧侣、神秘主义者、神学家和思想家先驱。那场后果严重的运动，不

是在于对基督教世界的分裂，而是在于承认这种分裂所带来的后果。如此看来，奥格斯堡帝国会议的妥协，乃是导致“三十年战争”的第一步。

路德对德国历史的影响，远比他在教会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要复杂得多。具体来说：没有路德，普鲁士能成为欧洲的强国吗？没有路德，普鲁士能够为威廉二世的帝国奠定基础吗？没有教会的分裂，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分界线就无法划得让人信服。因此，没有新教教派就不会有小德意志统一方略了吧？

路德在19世纪属于被理想化的伟大人物之一。普鲁士建立了新帝国，即铁血宰相俾斯麦和亨利希·曼笔下小说人物——“臣仆”迪德里希·黑斯林（Diederich Heßling）的帝国，女权主义者黑德维希·多姆和天才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帝国，探险家和殖民梦想家卡尔·彼得斯和先锋派艺术的支持者、《风暴》（*Sturm* ）杂志的出版人赫尔瓦特·瓦尔登（Herwarth Walden）的帝国。这个历史上第一个现代的大一统的德国为了印证自己的正统合法，需要并且要消费全部的德意志历史。大一统的帝国使德意志历史成了史前史。

路德如今成了一幅神像，甚至是一幅现代的神像。这幅神像并不传达任何值得一提的福音，更多的是一种标识，而不是榜样。他所创立的融合在全部新教主义之中的教会，尽管还没有失去其支撑国体的作用，但其影响力已经有限。

经过宗教改革，德国民众获得了自我意识，但是教会最后得到了什么呢？德国民众借重了教会所有的宽容，而教会随着对世俗政权的让步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宗教改革五百年之后的今天，福音教会离自己的目标——《圣经》精神所倡导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要遥远。它没有因为宗教改革而变得强大，而是被迫退守一隅。它试图传播的世界观中，除了思维模型和行为方式之外，也没有留下什么。它们被看成是福音派的思维模型和行为方式，并被人们当作抽象思辨的论文题材，专门

来讨论宗教和劳动态度之间的联系。

归根到底，福音教会的地位并不比它保守的竞争对手天主教会好多少。从宗教改革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改革的思想对德国社会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而不是教会自身。基督教的两大教派如今在公众社会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它们在试图让人们接受自己的同时，越来越失去自己的权威。而越失去权威，它们就越要试图让人们接受自己。

德国的民族气质虽然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即福音教和天主教的双重影响，但整个社会遵循的却不是福音教的伦理道德。

如今开放社会的问题是，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观念只能有限地在世俗范畴内立足扎根。我们既不能把权利当成义务，也不能把义务说成权利。义务是提出权利要求的必要条件。那么，如果没有一个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神的秩序，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贯彻这一点？

世俗社会缺少一种绝对性的东西，因此也缺少稳定性。并非任何能够给人以方向的东西，都适合于用来投票表决。

如果今天谈宗教改革的话，这个改革就不应该是教会去适应社会的种种出格现象，而是应该追本溯源，亦即回归到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本源。如果我们要保留基本法中所规定的关于人的认识，并认为它值得保留，那么，现在是重新振兴这两个本源的时候了。

改革说到底就是改造。改造首先要求的是对力学结构的检验。只有尊重力学结构，才能避免建筑的倒塌。这是从宗教改革的后果中得出的第一个经验教训，另一个经验教训是：不论是基督教还是欧洲的世俗界，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尊严，以及从中衍生而来的法律规范。

作者：里·瓦

译者：吴宁

参阅：基本法，教会税，战争与和平，纯洁戒律

---

[1]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全称为《奥格斯堡国家和宗教和约》，是由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德意志新教诸侯于1555年9月25日在奥格斯堡的帝国会议上签订的和约。和约提出“教随国立”的原则，暂停了内战。该和约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正式允许路德宗和天主教共存于德意志。

[2] 沃尔姆斯位于德国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1521年1月28日至5月25日，卡尔五世皇帝在此召开帝国会议，虽然会议有很多议题，但最重大的事情是召见马丁·路德和对宗教改革的影响。

[3] 赫尔曼战役，又称“条顿堡森林战役”，是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日耳曼人反对罗马占领军的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9年莱茵河以东的条顿堡森林。日耳曼人在阿米尼乌斯（赫尔曼）的率领下，打败罗马军队，其统帅瓦鲁斯自杀。

纯洁戒律

在清洁领域——与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同——德国充其量只能算是拥有可靠的中等实力，虽然191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博览会是在德累斯顿举行的，会后不久Odol牌漱口水的发明人卡尔·奥古斯特·林纳（Karl August Lingner）就在那里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卫生博物馆。尽管据说施瓦本的家庭妇女在大扫除的日子对人行道都要吸尘和擦拭，施瓦本人的州首府确实号召大家“大扫除”，在斯图加特各市区之间展开竞赛，为的是“尽量赢得更多的男女市民，特别是青少年，把他们组织起来共同开展清扫活动”，可是每个在柏林乘坐过地铁的日本人都要对自己进行全身消毒；每个从新加坡来出差的人，傍晚在法兰克福萨克森豪森区漫步时都不知道该往哪儿下脚，因为到处是吐出的口香糖和黏痰；每个来自美国的交换学生只要看到接待他的家庭在浴室中摆着的那几样可怜的口腔和私处卫生用品，都会觉得这家人像猪一样肮脏（光有Odol牌漱口水是不够的）。

德国人爱干净的噱头在别处，对此克莱门蒂妮（Klementine）做出过巨大贡献：从1968年到1984年，那位机灵而又坚决的广告中的洗衣妇总是定点在电视中许诺：“碧浪（Ariel）——不光能洗干净，而且能洗纯洁。”时至今日这条广告语都还在通过集体无意识起着作用。

对表面干净的怀疑深深扎根，那是从新教的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

与其他两个一神教宗教不同，基督教总的来说是拒绝洁净礼仪的。如果一位基督教信徒不吃猪肉和不“洁净”的海洋动物如海鳗和牡蛎，并注意不用山羊羔母亲的奶煮山羊羔的肉[1]，那他在上帝面前也不会更受

待见。虽然基督徒相信洗礼的洁净作用，认为通过这一仪式可以让自己焕然一新；但每次祷告前都洗手、洗脸、漱口、清洁鼻孔、洗胳膊和洗脚，却顶多被他们认为是无稽之举。耶稣向他的门徒们说过：重要的不是“入口的”，关键是出口的，也就是从心里发出来的[2]。其使徒保罗简明扼要地总结道：“洁者自洁，污者及无信仰者自污，污的正是他们的头脑和良心。”

马丁·路德直接继承了保罗这种激进的纯洁理念，谴责现实存在的教皇的教会所提供的忏悔圣事和赎罪券买卖，认为它们是对福音书中所描述的纯洁理念的最严重的亵渎。作为基督教中毫无顾忌的克莱门蒂妮，他向罗马方向喊道：“没错，洗吧，就像泡在粪中的猪那样，或是自以为洗干净后又重新在粪里打滚。猪总是猪。”

看一眼路德时代最著名的赎罪券贩卖者若望·特茨勒（Johann Tetzel）——他在萨克森卖赎罪券的生意十分兴隆，这也是引起那位宗教改革家1517年10月在维滕贝格散发《九十五条论纲》的直接导火索——的登记簿，就能理解新教的愤怒了：“所多糜”[3]（包括任何形式的淫乱）可用12个杜卡特金币赎罪，“巫术”毕竟也还得花6个杜卡特，相反“弑父母”只需出4个杜卡特便可便宜赎罪。臭名昭著和有偿付能力的不法分子等于用这种方法开了个账号，为未来买个好前程，这样下回再性侵马车夫的漂亮儿子时，就根本不用受到良心谴责了。

然而路德对伪纯洁的愤怒不仅仅针对这类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伪善状况。他直接质疑人通过“做善事”，通过虔诚的品德和赎罪行为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变纯洁。虽然他要求基督徒“一天比一天变得更纯洁”，却同时宣称人类自从堕落以来所做的一切都是“愚蠢和不洁的”。其结论是：“我的灵魂是纯洁的，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而是因为上帝的宽恕。”这样新教徒若想纯洁唯一的希望就是：忏悔与悔恨得把那颗有罪的心咔嚓一声悔成两半，可即使到了这份儿上，主是否真能宽恕他，他

都没把握。



又是路德：纯洁在这位宗教改革家的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

路德有关宽恕的教义显示出：这位脱去僧衣的曾经的奥斯定会修士是古希腊罗马晚期教会先师的严谨学生。与奥古斯丁一样，他坚持人这坨“堕落的东西”不该想入非非，认为他能以任何方式影响自己的命运。如果说上帝的宽恕是对善行的奖励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宽恕，而是成了人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的东西了。但为了在世上能做成什么好事，上帝得先将其宽恕馈赠与我。基督教信仰之恶性循环。

尽管路德没有把握，世上是否有一条令人成功地达到纯洁的路，但有一点他确信不疑，就是要对这方面现实存在的迷途进行抨击。其中最糟糕的一条迷途就是禁欲，一直以来基督教都把它当作达到纯洁甚或是圣洁的金光大道。放弃所有与肉体和情色有关的，重新回归到修道院去。

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是基督教纯洁理想的体现的话，那就是处女。首先是圣母玛利亚，她至今仍被天主教尊为“Immaculata”，即“圣母无玷圣”。尽管路德对此与其说是欢欣鼓舞，不如说是垂头丧气，可他也得承认上帝的母亲是一位纯洁的处女，而真正的处女（也包括童贞男子）要被视作为“上帝的特殊奇迹”，是“被上帝用宽恕戴上了马嚼子的幸运精英人物”。这类人却是“千里难挑其一的”，普通的“牧师、僧侣和修女”在修道院的大墙后主要是在苦修，为的是杀死自己非常真切地感受到的欲望。然而他们这么做更下流，还不如还俗去找个丈夫或妻子，听上帝的话，尽“生儿育女”的义务。

路德尴尬的宽恕教义和对自由意志的激烈反对在此也留下了痕迹：贞洁并不是人通过自己的积极作为（或不作为）所能达到（或保持）的，那是上帝的馈赠。主不接受“被迫和非自愿的效劳”，谁感觉到体内那该诅咒的欲望，那他就得承认自己已经无可救药了。

在他43岁到52岁这段时间，这位曾经的僧侣与从修道院逃出来的修女卡塔琳娜·冯·博拉生了六个孩子，所以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其《有关婚姻状况的布道》（*Sermon von dem ehlichen Stand* ）中，他对肉体的折磨曾有过最形象的表述："因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结合在一起，被迷住，肉体不再有机会接触别的性伙伴，只能在一位性伙伴那儿满足欲望，所以上帝就做出了安排，一方面让肉欲不要太强，以免男女在街衢媾和，他慈悲地允许婚姻中的性欲稍有下降；另一方面又让性欲高于仅仅完成繁殖所需，以便人们性欲适中，有责任心，而不是像生活在粪堆和猪圈中的猪一样。"

路德激烈反对修道院，认为它是恶魔般的设施，他要求解散修会，关闭修道院。这些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后果的举措也源自他对自己的绝望，他自己不能跻身"上帝的特殊奇迹"之行列，而是属于那些被摒弃的芸芸众生，这类人只能希冀他们的肉欲至少能在婚姻中得到"缓解"。当童贞作为基督教纯洁的化身站不住脚后，婚姻的价值就得到了提升，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能，让人既能享受肉欲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纯洁。为了完成神学上的这一空翻三周，路德也进行过多次助跑：1519年，在他自己结婚之前6年，他还把"婚姻状况"比作"病人院"，认为自从亚当受诱惑后婚姻就"不可能纯洁"了。做了丈夫和父亲的路德后来在一次餐桌谈话中解释说：上帝"引进了神圣的婚姻"，"为的是让每个人的那个玩意儿都能保持纯洁"。至于与至今坚持神职人员要发愿终身坚贞的天主教相比，这位宗教改革家是否创建了更人道和更现实的基督教，或是在新教牧师之家可以毫无羞愧地存活的"纯洁婚姻"是不是一种极为矛盾的权宜之计，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8世纪德国启蒙家开始把宗教纳入其理性樊篱，这样做时他们绝不想把纯洁的理想抛向意识形态的垃圾场。所以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在《论人类的教育》（*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一书的引言中多次强调，关键是"心灵的纯洁"。不是害怕下地狱的惩罚，或

是希冀能得到进入天堂的奖赏，唯一能让受到启蒙的人热爱“道德本身”的就是心灵的纯洁。弗里德里希·席勒在其《论人类审美教育书简》中亦不能绕过纯洁这一话题。对他来说，“美”与人沉浸在欣赏美时的“审美经验”是纯洁的最后的堡垒：“只有在此我们才仿佛脱离了时间的桎梏；我们作为人所表现出的那种纯洁与完美，就好像它们从未因外力影响而受到过损害似的。”

席勒要求一件艺术品既不要刺激也不要驱散激情，而是要保持“审美纯洁”：“观众和听众的心灵必须始终完全自由不受损害，它必须走出艺术家的魔力范围，白璧无瑕，纤尘不染，如同出自造物主之手的赤子之心。”他的这段话尽显新教那历史悠久的渴望。

纯洁对伊曼努尔·康德来说就更加重要了。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这位来自柯尼斯堡的哲学家试图大胆而强有力地证明：一种“完全不依赖于所有经验的”认识是可能的。“任何不和与它无关的东西掺杂的知识叫做纯粹的，特别是不和任何经验与感觉相混的知识则绝对被称作纯粹的。”与此并行，这位哲学家夸赞“纯粹理性王国”或“真理的王国（一个诱人的名字）”，这是一个岛屿，它“被一望无际、汹涌澎湃的大洋环绕着，这大洋本是表象的栖身地，雾堤和一些即将融化的冰看上去宛似新大陆，它们不断用虚无缥缈的希望欺骗渴望有所发现的航海者，诱使他们一再进行冒险，却也永远不能把冒险进行到底”。

正如康德极度怀疑经验性知识，他那富有批判精神的朋友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对康德的意图也充满了怀疑，不相信他能从理性中剔除所有混在其中的经验的、情感的、历史的和其他“掺杂物”。这位启蒙家——他自己又重新信奉了路德新教——在其《对理性纯粹主义的元批判》（*Metakritik über den Purismus der Vernunft* ）一书中揭露，“纯粹”理性的思想不过是伪宗教的傲慢。正如那位宗教改革家曾无情揭露教皇手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一样，哈曼现在

也责备（信奉新教和虔诚的）康德自以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证实自己的清白。作为认识论理论家，哈曼不能容忍“纯粹”理性那“沦为空洞形式的神秘倾向”。他甚至说“纯粹”理性接近“老鲍布（Baubo）和自己玩的形式游戏”。意思是：他把幸福——纯粹理性岛屿上的居住者比作希腊神话中的那位人物，即那位想让忧伤的得墨忒耳开心，就剃去自己的阴毛并在丰收女神眼前戏弄自己的下体者……

相反，自封为“精液学家”（“大谈精子者”）的哈曼坚持认为：肉身和污秽是人类的源起，不容否认。有说服力的认识和理由充分的生活只存在于一种条件下，即情感与理智要像“自然的婚姻”一样和睦相处，而不是通过“奸夫”“强奸”“自慰”或“独身”来人为地将二者分开。

纯洁与性欲二者能否以及怎样兼顾，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另一位德国天才毕生都在通过自己的生活和创作进行探讨，他就是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在其浪漫歌剧《汤豪舍》中，图林根的圣伊丽莎白为了堕落的淫荡骑士——他在维纳斯山与维纳斯尽享爱的盛宴——牺牲了自己。她在死前不久乞求处女玛利亚：“让我纯洁如天使/步入你那幸福天国。”

新教徒瓦格纳在此显示出自己是个传统的处女崇拜者。纯洁等于贞洁，拒绝“罪恶的欲望”和“对尘世的渴望”。纯洁的处女为爱殉情，用自己的死为未能得到教皇宽恕的、罪孽深重的汤豪舍赎了罪。伊丽莎白的棺材被送葬队伍抬过他身旁后，汤豪舍倒地死去。处女的自我牺牲感动了上帝，曾沉浸于肉欲的汤豪舍在死后的世界得到了宽恕。

瓦格纳晚年的作品《帕西法尔》（*Parsifal* ）可以被视作《汤豪舍》一剧在性别上的滑稽化。此剧中也有一个受肉欲诱惑的被诅咒者，他渴望得到拯救：安佛塔斯（Amfortas）——圣杯首席骑士，他守护着耶稣基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流进圣杯的圣血。他在克林索尔（Klingsor）的“魔法花园”被邪恶的女人孔德丽（Kundry）诱惑了。从此他身上被克林索尔趁机刺伤的地方就不断流血，且不说他那个伤口定

期行经，非常不洁。唯一能拯救安佛塔斯脱离这种令人难堪的折磨的是“纯洁愚者，他因同理心而得大智慧”。那个人不久确实出现在格拉尔，他就是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帕西法尔，他是远离任何文明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森林中长大的。孔德丽也试图诱惑他，但在关键时刻——当这个愚人就快与那女人融为一体时——他感受到了安佛塔斯那种灼痛。他预感到：只要他保持童贞，就可以成为命定的骑士拯救人。最后他成了新的首席骑士，安佛塔斯能够安详地逝去，就连罪孽深重的女人孔德丽也在受到宽恕后死去。

在帕西法尔身上，这种备受歌颂的纯洁不光体现在情色方面，这个傻小子在智力上同样是一张白纸。面对孔德丽他败下阵来，那是因为他害怕精神上的失贞一点儿不亚于肉体上的失贞。帕西法尔不是个积极思考者，而是个有同情心的人。一旦这个愚人平生第一次接触了与自己完全两样的女人，那他将失去纯洁的心，并重新开始亚当和夏娃那种灾难性的思索过程，而正是这种思索致使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求知欲望和认知乐趣以及情欲和肉欲都会玷污性情。德国野猪站在伊甸园中折磨自己，好像只有它能抹去人类堕落的史实。

纯洁的那个意义范围——随着历史的进展它还会有无限和野蛮的后果——在此实现了有力的突破：纯洁即沉闷的坚守自我和同类相伴，任何与陌生、另类人的混合都被惊慌失措地避免了。至于《帕西法尔》是否真的把所有与性有关的东西都魔鬼化了，就像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他那篇著名的、反对他曾经的偶像瓦格纳的檄文中所认为的，还是该剧中魔鬼化的仅仅是异性间的性，这就难说了。瓦格纳为圣杯骑士们谱写的酒神风格的男生合唱让人隐隐听出：解决“性=不洁”这个棘手问题的出路可以是——男同性恋者的集体放荡。

理查德·瓦格纳在其最伟大的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 ）中还提供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出路，当然即使这条路

也会让每个虔诚的基督徒画十字。

在舞台剧的第二部《女武神》（*Die Walküre* ）中，“纯洁”这一概念被用在一位女子身上，这位刚刚经历了“五月”春宵的人浑身涌动着情欲。她叫齐格琳德（Sieglinde），那位与她共度春宵的人叫齐格蒙德（Siegmund），他扬言除了他之外不许别人再碰活着的“贞洁女”。齐格蒙德和齐格琳德是兄妹，孪生兄妹。除了手淫外，比这更多的性的自我坚守是不可能的。这场乱伦的结果是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的诞生。在《指环》的逻辑中，只有当最后一部《诸神的黄昏》结尾时那位英雄被布伦希尔德（Brünnhilde）歌颂为“最纯洁的”，才前后一致。在他们的爱情成为多舛命运的牺牲品前，他曾与布伦希尔德享受了最炽热的情欲。布伦希尔德同时又是齐格弗里德的姨妈，她在《女武神》中不惜与自己的父亲众神之王沃坦反目，为了救助同父异母的妹妹齐格琳德以及她刚怀上的沃坦的孙子齐格弗里德。乱伦禁忌——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它标志着一切文明的起始，乱伦由于其令人不快而微睡在文化中——在此被张扬排除了。乱伦成了净化英雄的手段。德意志之魂在发纯洁狂，这是唯一可以被忍受的，因为我们置身在歌剧中，最后整个世界在熊熊大火中燃烧，而在下一次演出中一切又可以重新出现。

要是路德能穿越，来到拜罗伊特，亲眼看到那里一连四晚歌颂的都是些什么“粪堆和猪圈中的”肮脏事，那他肯定会往瓦格纳身上扔墨水瓶的。然而在追求纯洁方面，有一点这位基督教改革者与那位歌剧改革者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语言和表达的纯洁。首先通过翻译《圣经》，路德成为新高地德语的创始人。在诠释以赛亚书时，他提出“我们必须努力绞尽脑汁，力求译出一部纯洁、简单、使用地道德语的《圣经》，还要保证不歪曲原意”。他追求的是“把清新纯洁的语言带入布道坛”，对路德来说上帝通过福音书在直接对我们讲话。但只有当不会拉丁文的纯朴民众也能读懂《圣经》中的字句，也能听明白布道的全部内容时，上帝所要传达的信息才能直接抵达人心。

瓦格纳争取的也是挣脱了传统紧身衣束缚的纯洁表达。路德反对的是用拉丁文做弥撒，瓦格纳则向意大利正歌剧（Opera seria）或法国大歌剧（Grand opéra）宣战。正如路德为了能更自由地举办礼拜仪式而废除了那些僵化的仪式程序，瓦格纳用比较灵活的“音乐剧”取代了宣叙调、咏叹调、重唱和合唱的复杂结构。老派的歌剧作曲家满足于为其他作者的歌词谱写量体裁衣式的、多少堪称是技艺精湛的曲子；这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剧作家则亲自包揽一切创作：写歌词、谱曲和设计舞美对他来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路德要求教堂要简陋，以便信徒和上帝之间进行二人对话时不会因任何装饰物而分散注意力；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建起的音乐圣殿也是非常简约的，但同时它作为音乐厅设施又是极具自大狂倾向的。

这两位改革者所推行的对基督教和歌剧的纯洁化是双向的：所有仅仅是外在的、强加的和陌生的东西都应该去掉；同时开启了一条向内之路：深入到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民族深处。个人与民族整体间的这种密不可分不仅是民族主义也是反犹太主义的渊源，路德和瓦格纳都是排犹的。个人的思想不借助语言则无法表达，而语言是一种集体工具。只有当语言升华自同一民族之魂时，它才能纯洁。

如果说路德的排犹首先带有神学特征，犹太人自诩为上帝的选民的自我意识刺激了他；那么瓦格纳则公开发表排犹观点。在其声名狼藉的小册子《音乐中的犹太性》（*Das Judentum in der Musik* ）中，他试图论证自己的观点，即犹太作曲家没有能力创作真正的音乐作品，因为生活在海外的犹太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未能真正扎根于任何他们所客居之国家的民族中。倘若他们让自己被同化，那么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艺术顶多是些被同化了的乖巧艺术。相反，要是他们试图从自己的本源中汲取创作灵感，那他们同样会失败，因为希伯来语已经僵死，无法有效地继续发展，而意第绪语从声学上来说又是不再能转化成伟大音乐的。他本人在巴黎时曾撰文热捧弗洛蒙塔尔·阿莱维（Fromental

Halévy）的大歌剧《犹太女》（*La Juive* ），或者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能用音乐最深刻地折射德国人的性情，对这类事实这本小册子是讳莫如深的。

无法加以美化的是：德国人对纯洁的渴望本身就黏附着非常矛盾的东西——肮脏。是的，这种东西随时都可以上升为偏执狂。无论这种对纯洁的渴望发生在生活中的哪个领域，这一点都不变。

一些兴致勃勃的语言清道夫如诗人菲利普·冯·策森（Philipp von Zesen）、辞书学家约翰·克里斯朵夫·阿德隆（Johann Christoph Adelung）或是教育家和作家约阿西姆·海因里希·坎佩，还有一些语言协会，从丰收学会（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4] 到佩格尼茨花会（Pegnesischer Blumenorden）[5] ，这些组织在巴洛克和启蒙时期曾发挥过决定性作用，让分裂成一百多种方言的粗糙德语发展成一种统一的文化语言。感谢他们的努力，我们才有了那些美妙的措辞如“一眨眼工夫”（而不是“瞬间”）、“悲情戏”（而不是“悲剧”）、“狂热”（而不是“激情”）或是“漫游”（而不是“散步”）[6] 。即使他们在进行深奥的尝试——不光要把外来语德语化，而且对借用词和继承词也要如法炮制时，他们至少保持了诗人的本色。比如他们想用“颤痛”代替“发烧”，用“天光烛台”代替“窗户”，用“处女监禁地”代替“女修道院”（相反，那广为流传的要用“脸上的悬楼”来代替“鼻子”一说则好像不能算到策森的语言账户上，而是其同时代人的恶作剧，他们从语言纯正癖产生的时候就对它持怀疑态度）。

当今媒体与政治不遗余力地要用吱嘎作响的行话之磨把语言一劳永逸地磨毁，那么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反对那种努力，即坚持认为语言中的词不仅是壳，句子也不光是套话，而是要深究漫不经心地道出的前言后语到底意味着什么。即使如早期的语言守护者们在他们高擎的旗帜上所写明的，他们需要深入到语言这眼“奇妙竖井”的底部，为的是开采

出“词汇的真金”，为此也大可不必拉响警报。一旦词汇的“原始本性”被揭示，德语被理想化为一切语言中的秘密语言——因为据说它拥有与事物的最直接的联系，这时情况才变得更为棘手。早在纳粹主义出现之前，在约阿西姆·海因里希·坎佩身上就可以看到：从这种本体语言神秘主义到种族主义的道德狂就仅仅只差一小步了。1813年他在《强加于我们语言的外来表达方式之释义与德语化词典》（*Wörterbuch zur Erklärung und Verdeutung der unserer Sprache aufgedrungenen fremden Ausdrücke* ）的前言中抱怨道：“正如严格的习俗、纪律和正直通常会随着精致化、晋升为贵族和生活的日渐奢侈而减少，我们的语言——当她日渐优雅并成为宫廷与学识的女仆时——也逐渐不再像往日那般坚守着自己的贞操。年复一年，她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越来越随便和放纵，离她最终失去一切羞耻感，像个婊子似的与任何陌生的新来者卑鄙交媾就为期不远了。”

今天有语言纯正癖者引人注目的做法是：每年选出“语言鞋匠”或“年度语言掺假者”，例如汉堡的时装设计师吉尔·桑德（Jil Sander），因为这位在设计领域极其注重简洁的设计师在一次采访中说：“谁想要淑女风格（Ladysches），是不会在吉尔·桑德品牌下寻找的（searcht）。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effortless）是我的品牌的魔力（magic），必须懂得这一点才会喜欢我的品牌。”[7] 那些维护语言纯洁的使徒们不该忘记的是：即使马丁·路德有时也会毫无顾忌地在德语和当时的通用语拉丁文之间随意变换：“Mein Leib ist ein stinkender Wanst，**corpus quod non** rein，**si etiam** gesund ist.”[8] （我的身子是具臭皮囊，因此这个身子即使在健康的时候也是不洁的）。所以最终只有那些人才有资格要求语言的纯洁，即那些即使看到孪生兄妹生的孩子也不觉得是变态，而是觉得所看到的体现的正是“纯洁之最”。然而值得疑虑的是：德语近亲繁殖的下场是否会优于日耳曼诸神的男女英雄们，他们最终只有葬身火海一条路。

1935年纳粹分子颁布了《纽伦堡种族法》（*Nürnberger Rassegesetze*），其附件C被称作血统保护法，旨在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的纯洁。禁止“德国人或和德国人有血缘关系者与犹太人结婚或有婚外性行为”。由于纳粹排犹主义者对他们自己的论断——从外表就已经可以认出“犹太人”——最终也没把握，所以他们在1939年夏季及1941年要求犹太人将黄色六角星“佩戴在衣服左胸显眼处”。灭犹大屠杀的道岔就这样扳好了。

自从这个邪恶帝国土崩瓦解后，德意志灵魂中的纯正癖似乎也跟着灰飞烟灭了。可是它真的不存在了吗？那为什么我们德国人对核能的恐惧要大大超过法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恐惧之和呢？或许是因为核辐射对环境的污染不是感官能觉察到的，这种悄无声息的污染是无人可以看见、闻见或尝到的，此外它还能以令人恐怖的方式导致遗传病？最初带着极大怀疑研究了辐射性对健康所构成的风险的，是纳粹帝国的科学家，这一点并非真正让人安心。

当环法自行车赛爆出丑闻，没有一项破纪录的奇迹是单凭汗水造就的，相反整个赛车运动都被“兴奋剂污染了”，这时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比任何其他欧洲电视台都更快地中断或完全停止了对它的直播，为什么？静听德国自行车赛解说员的评论，那真是别具一格的乐子：2006年重大丑闻[9]之后，他们只要一看到山地赛有生龙活虎的运动员出现，就急着要弄清楚，这位赛手“遥遥领先”仅仅是服用了合成激素红细胞生成素（Epo）还是用了别的违禁药物。

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毫无顾忌地用转基因玉米喂牲口，而且依旧兴致勃勃地大嚼特嚼爆玉米花时，为什么在德国这种玉米——尽管它在我们这儿也早就成了现实了——就变成一切技术乖张的标志了？为什么这里一些有生态意识的人几近狂热地只信任一种苹果，就是那种健康食品专卖店摆着的又小又皱的？难道说该把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倒过来说不

成：败絮其外，金玉其中？

德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均质、“纯洁的”构成物：其内部历史上小邦林立、诸侯割据，对外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有这么多的邻国。来自东西方的影响源远流长，因此歇斯底里、信誓旦旦地强调纯洁是于事无补的。反方向的歇斯底里，认为纯粹“德国的”根本不存在，也不可取。能有帮助的仅仅是：认清德国人对纯洁的渴望根源何在，警惕不要从这种渴望中滋生出人类妖魔。

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喝一杯按照德国啤酒纯净法要求酿造的啤酒，这是这个国家所颁布的最明智的纯洁戒律。1516年4月23日威廉四世公爵（Wilhelm IV.）和他的弟弟路德维希十世（Ludwig X.）在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颁布法律，规定“只许用大麦、啤酒花和水制作啤酒”。这两位巴伐利亚的统治者清楚认识到：鉴于德国人啤酒喝得太多，如果往啤酒中掺入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从豌豆到牛胆，这些容易发酵的东西不利于人们的健康。这部纯净法做到了所有其他德国人的纯洁努力未能奏效的：它不是原教旨主义的，而是灵活的。在用上面酵母酿造啤酒时（如老啤、科什啤酒或麦啤）允许使用麦芽。



有史以来最理智的纯洁戒律：在德国酿造啤酒除啤酒花外只许加入麦芽、酵母和水。

我们不是唯一庆幸这一啤酒纯净法的：德国啤酒在全世界都是“受保护的特产”，所以欧盟至今未能成功强迫德国放弃啤酒纯净法，以迎合欧盟的“和谐方针”。啤酒花和麦芽还没输。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啤酒之旅，裸体文化，德国式焦虑，音乐，母亲十字勋章，宗教改革，莱茵河——父亲河，女人

---

[1] 犹太教教义规定，犹太人不能吃猪肉、动物血、无鳞鱼，不能把肉和奶制品一起烹饪。

[2]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3] Sodomie，泛指鸡奸、兽奸、同性恋、口交或肛交等行为。

[4] 巴洛克时期创建于德国的最大文学组织，会员达890人。

[5] 1644年创建于纽伦堡的语言与文学协会，名称源于流经纽伦堡的佩格尼茨河。

[6] 此处所用的德文词与外来词本为同义词，翻译成中文时常常无区别。为了突出其不同，这里故意用了不同的中文词，其原文分别为Augenblick/Moment，Trauerspiel/Tragödie，Leidenschaft/Passion，lustwandeln/spazieren。

[7] 括号中的英文词有的被直接使用，有的加上了德语词尾形成混搭。

[8] 加粗部分为拉丁文。

[9] 该年度冠军佛洛德·兰迪斯（Floyd Landis）尿检呈阳性，后被剥夺冠军称号并遭禁赛两年。

幸灾乐祸

你一定不会觉得这是好笑的事儿：好不容易搞到了获奖音乐剧《Q大街》的票，坐进了百老汇剧场，听到的却是这么一段对唱：

> “啊！幸灾乐祸哎，吓人吧？”
>
> “啥，纳粹词儿吗？”
>
> “这词儿是说德国人看人有灾就高兴。”
>
> “看人有灾就高兴，这就是德国人！”

听了这话，你一定马上想起来抗议。没错，词儿是德文词，可这事儿呢？英国人、加拿大人、葡萄牙人不一样对电视里那些孩子、小狗和司机干的蠢事开怀大笑吗？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系的学生1994年不还设立了一个达尔文奖吗？这个奖虽说是发给当代人的，但一定得在他用最愚蠢的方式把自己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之后才能得到。亚里士多德不是就已经思考过“幸灾乐祸”之激情了吗？

可见，不光是生活在乌瑟多姆（Usedom）和罗拉赫（Lörrlach）之间的德国人笑人家破产、倒霉和出丑。但是，“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这个德文词早在德国出现纳粹之前就被英语吸收为外来词，总得有个原因。（瑞典、挪威和荷兰也都有类似的词）我们德国人真的比其他民族恶毒吗？

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透过幸灾乐祸看到的是更为令人不耻的嫉妒。按照通行的标准自我评判一下，德国确实是个充满妒意的地

方，谁都不能容忍旁人有房、有车、有船。取消帝制以后，过于明显的等级差别有悖于公平理念。因物质匮乏，在零下5摄氏度的气温下大家挤在一起排长队的时候最具社会温暖。德国式嫉妒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比别处来得强烈，而在于它不是长在树丛下的小草，躲躲藏藏，羞羞答答，而是摆在阳台上的绿植，挺胸抬头，光明正大。

再者说，那些有钱人，知道能得到同胞们公开表现出来的嫉妒，不是也觉得很享受吗？否则，捷豹汽车不会凭空想出这样的广告词——“拥有特殊的嫉价比”。一旦车主把他的豪华座驾撞到路边的电线杆子上，兴奋的人就多了。当然，假如能看到那个有钱的主儿自己被吊上去就更让人兴奋了。

不是每一声对别人的遭遇所发出的笑声都是幸灾乐祸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看到最要好的朋友手里端着整盘寿司在楼梯上摔了跤，总会先笑起来再赶过去帮她，受伤害者，必受嘲弄。所有研究嘲笑的理论都知道，走在一阵哄笑前面的是失败和小灾难。本来按部就班运行的日常生活突然踩上了香蕉皮滑出了轨。人们笑的主要不是别人的不幸而是自身此次的幸免。心里清楚，笑的其实是自己，因为知道这种不幸完全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

真正的幸灾乐祸是极其冷酷而毫无同情心的。那遭灾的家伙不是我的同类，他是我的死敌。他的失败不预示着始终悬在我头顶上的失败，而是他该遭的报应。我无比蔑视他，甚至不屑用日历上教育人的警句来调侃他的错误——“吃一堑，长一智”嘛。这家伙不会也不用长什么智了，让他见鬼去吧！

真正的幸灾乐祸明明白白地欢迎毁灭。作家恩斯特·云格尔是魏玛共和国的激烈反对者，1930年帝国议会选举后，民主的红色和褐色敌人[1] 一起几乎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他在一封信中幸灾乐祸地欢呼道：“几个月来，想到摇摇欲坠的欧洲和即将到来的飓风，我信心大

增，怀着末日的幸灾乐祸四处游荡。”

1977年4月，一篇以“哥廷根的梅斯卡雷罗”为笔名发表的悼词同样充满着毫不妥协的冷酷，悼词是为被红军派[2]杀害的总检察长西格弗里特·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而作，“听到布巴克被枪杀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我的‘震惊’是：我偷着乐了”。问题在于，这种后来成为经典词语的“偷着乐”之所以没有公开表现出来，是出于尚存一丝的良心愧疚，还是只是对勃兰特政府公布的《反极端分子法》[3]有所顾忌？

难道我们德国人真是最冷酷的虐待狂，要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波兰文和其他各种语言中都用一个德文词来形容人类灵魂中的这个丑陋之处来惩罚我们吗？还是我们的这个词最准确最淋漓地描绘了人类普遍存在的性格缺陷？

真相大概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一条清醒的中间道路。“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席勒通过他的诗作《欢乐颂》发出这般欢呼，贝多芬谱曲后它成了德国最动人的颂歌：“你的威力能把人类重新团结在一起，在你温柔翅膀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

一个如此满腔激情要把整个人类都拥入怀抱的民族，同时又很轻易地就封闭自己的内心，不是让人诧异吗？

将伦理道德完全建立在同情心基础之上是西方哲学家叔本华的功劳。因此，在这位德国思想家看来，幸灾乐祸不仅仅是“人的天性当中最坏的一点”，因为它“近于残忍”，甚至是“魔鬼般”的，那是“地狱的笑声”。顺便加上一句，同情伦理之父本人是如此自以为是，愤世嫉俗，就连他母亲都无法与之相处。

这个无奈话题中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最为淋漓尽致地描写幸灾乐祸

及其致命后果的是德国幽默大师威廉·布什（Wilhelm Busch），谁最后笑，笑得最好。

作者：特·多

译者：徐静华

参阅：福利国家，小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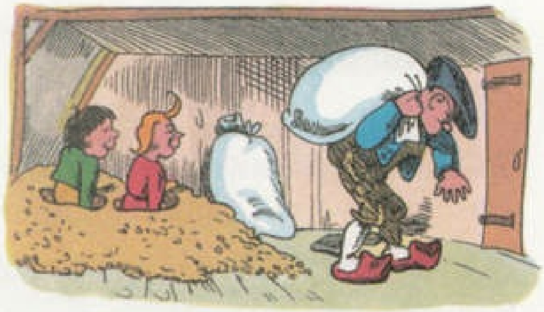
最后的恶作剧

马克斯和莫里茨，等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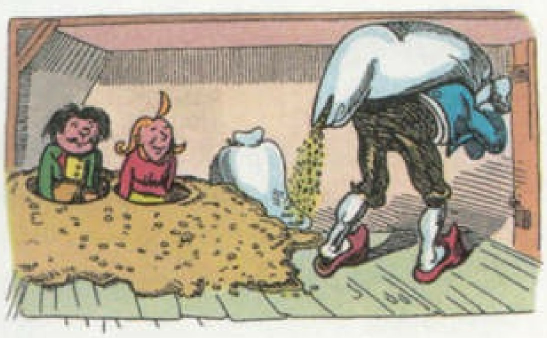
这回有你俩好瞧的啦！



这俩为啥要在口袋上剪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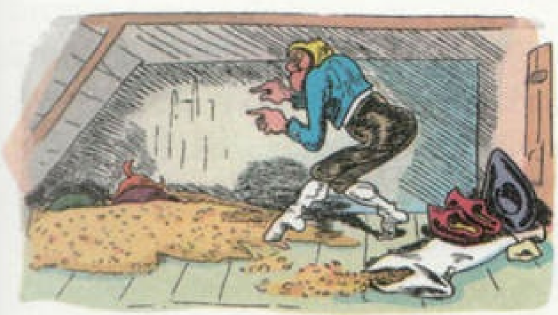
看，老农梅克来背他的麦口袋。



没等他迈步，麦子已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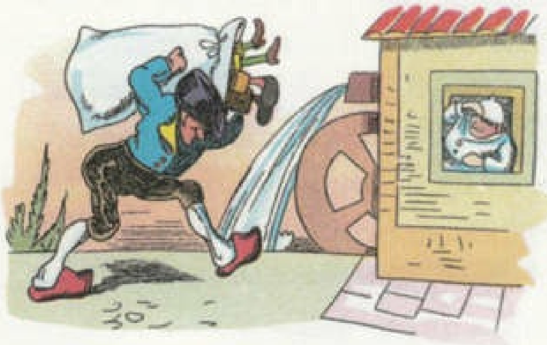
吃惊地停住脚：“奇怪，这东西怎变少！”



嘿！这时他看到，麦堆有蹊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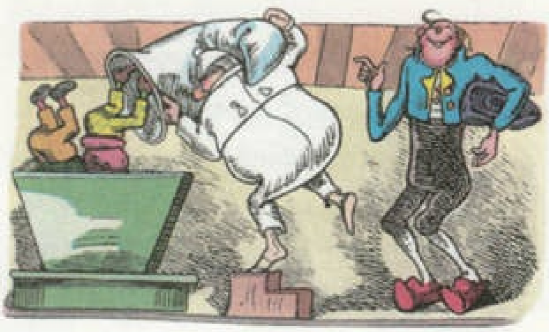
铲子一挥又一摇，俩捣蛋鬼进了口袋再难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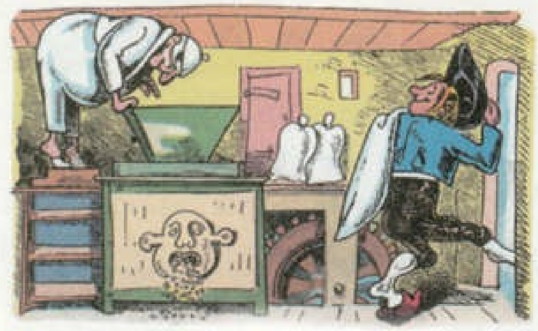
口袋里好热，好闷啊！ 可不，正往磨坊奔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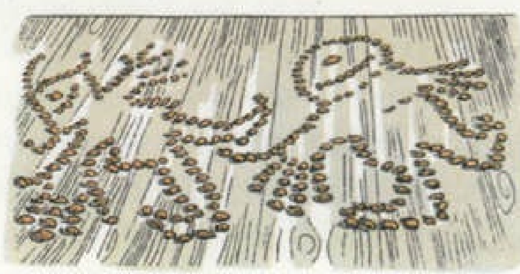
“磨坊师傅，快把机器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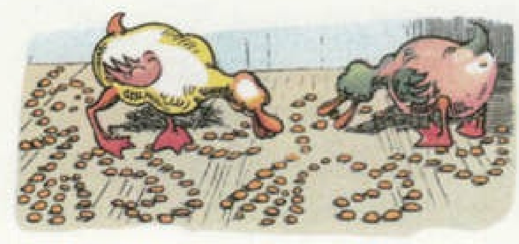
“来吧， 您呐！”进漏斗去吧。



咯噔，咯噔，又咯噔！粉碎机，转不停。



磨成了粉末和细屑，模样还能看得见。



可怜没过多一会儿，进了鸭肚没了影儿。



[1] 红色指共产党人，褐色指纳粹。

[2] RAF红军派，70年代在联邦德国多次进行武装暗杀和袭击爆炸的左翼恐怖组织。

[3] 《反极端分子法》，1972年1月28日由勃兰特任总理时的德国联邦政府公布，主要内容为敌视宪法组织的成员不能担任国家公职。

私人菜园

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这些私人菜园里，在这最小的空间内，让我们能够窥探如此缤纷多彩的德国之魂。在入口处，花园侏儒向你招手致意。“阿尔克墨涅”品种的苹果树枝杈编织在并列对称的果树支架上。花园守则规定了园内的树木与篱笆间距至少为1.5米。洋葱和胡萝卜菜畦用小线绳拉上，规规矩矩地保证种菜的部分绝对不超过整个院子的三分之一，还得给水果、观赏灌木、花卉和草坪留出地方呢。但是不得种植有毒的或者其他危险植物，本乡本土的品种应该优先考虑。小小的曲径上没有任何杂草，尽管不允许使用化学除草剂也不允许用混凝土铺路，但是铺路石是允许用的。这些小屋仅允许一层高，不许带地下室，最大面积24平方米，但是在小屋的门前允许种植菊花，人工培育的“马鹿”菊花繁茂盛开。其实它们本来应该叫“小鹿从森林边的晚霞中窜出”，但是这个名字太长了。只要不是在专门为素食者设立的私人菜园社区内，而且邻居不太计较，特别是他们并不在意烟尘和气味的干扰，就没有人会反对支起烤炉，吱吱地烤上几根香肠。但无论如何只能在周一到周六7：00～13：00以及15：00～19：00期间，才允许使用电动或柴油割草机、电锯、篱笆剪刀、杂草粉碎机以及其他发出噪声的各种设备。周日和节假日是绝对不允许使用的（请见预防噪声危险的规定）。开辟一个小小潮湿生物滋生堆则很受欢迎，但是要注意使用相应的材料，例如塑料薄膜、橡胶或者黏土。每个私人菜园的租赁者必须义务参与社区的工作。

正如有一批热衷森林的德国人，他们的灵魂和矮木丛难舍难分，也有一群热衷私人菜园的德国人，尽管他们也渴望回到大自然，但是节制

有度。他们天生不喜欢那些昏暗的、青苔遍布的地方。私人菜园德国人和森林德国人相比可以说一个是牧羊犬另外一个是狼。人们尽可以讥笑前者是胸无大志的世俗，在一个更高文明层次上的世俗。

自私人菜园诞生以来，它的成长一直伴随着反反复复的纠结。在1864年到1865年间，一个名叫恩斯特·伊诺岑思·豪斯希尔德（Ernst Innocenz Hausschild）博士的中学校长，在莱比锡内城边上开辟了第一个“施雷波小广场”（Schreberplatz）。但开始时它和那些小块地角的迷你天堂没有关系，也就是和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名字联想起来的、在19世纪2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德国的“穷人园地”，能够为穷困的城市居民提供一些蔬菜和水果的小菜园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莱比锡模式最初是用教育改革经费对学校校园的扩建，为当时在“剧烈迅速膨胀的城市”中退化的青年提供一个“玩耍的场所”，让他们在一位“游戏之父”的监督下得以操练一番。为了这个目的，在这块草坪上还安置了很多运动器械，在旁边的协会之家还设立了图书馆，举办关于教育问题的专题报告会。直到几年之后，退休资深教师卡尔·戈塞尔（Karl Gesell）想到一个主意——也许他受到当时被视为婴幼儿早期教育榜样的福禄贝尔幼儿园的鼓舞——在这个操场旁边开辟出菜畦，让可爱的小孩子通过菜园耕作而强健身体。然而没有多久，孩子们对播种和除草的兴趣索然，于是家长开始亲自照料那些疯长植物。因此从“孩子的菜畦”发展为“家庭的菜畦”，从一个未成功的教育项目演化为城市内成人最喜爱的打发业余时间的消遣疗法。

但是有一个人从来没有踏进过私人菜园一步，这就是达尼尔·戈特洛博·莫里茨·施雷波博士（Daniel Gottlob Moritz Schreber），尽管这一市民菜园运动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当伊诺岑思·豪斯希尔德建立他的协会时，那位莱比锡的骨科医生已经去世3年。这位医生不仅试图用某些设备来矫正孩子的骨骼，例如用“头支架”和“肩带”，而且在此前不久，还在一份普及性杂志《花园凉亭》上发表一篇文章，来解释“年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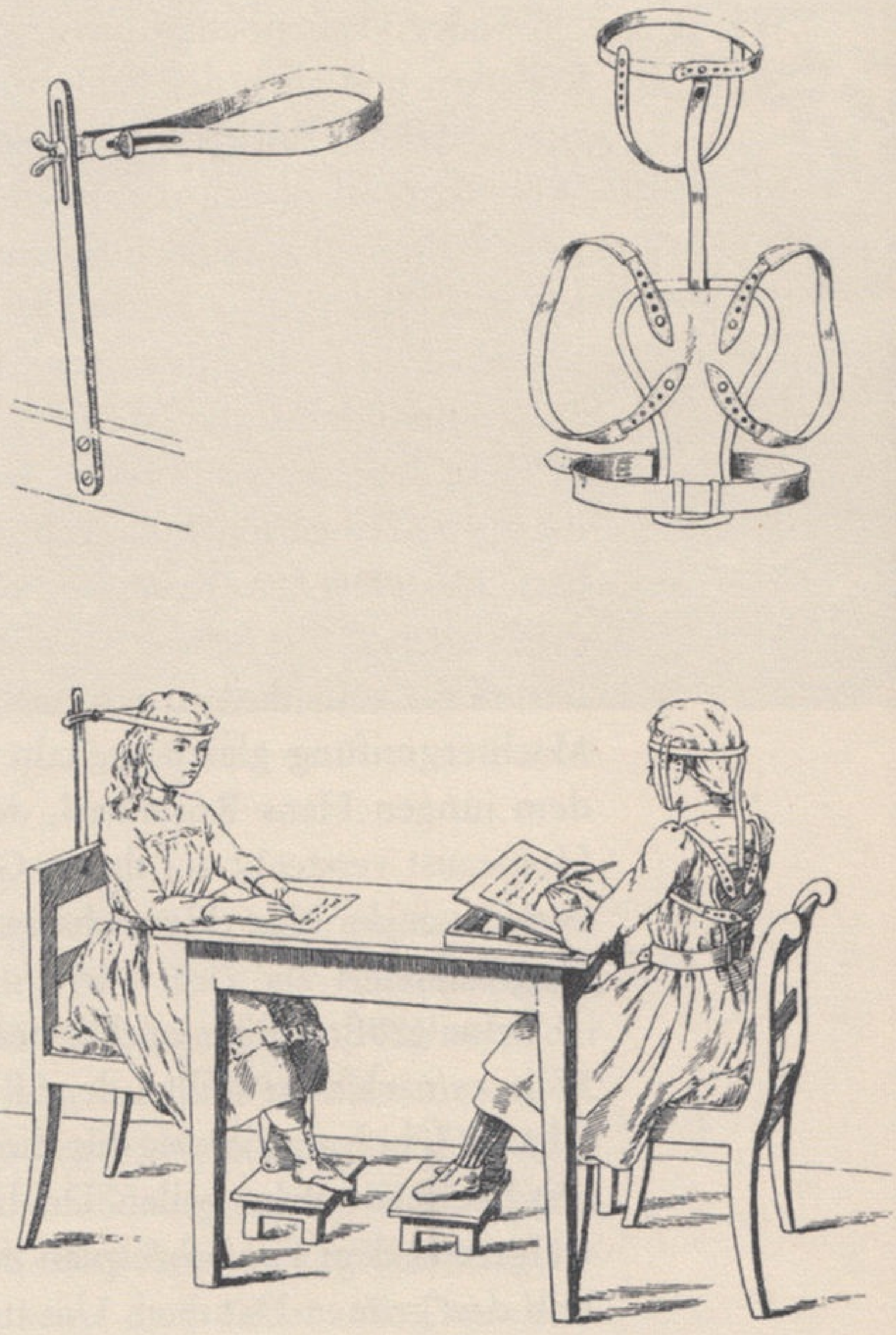
人的游戏对其健康和教育的意义”。他反对“笔挺而僵直的家庭漫步”，“装腔作势的自命高雅”和“风行一时的对童趣感官的忽视和毁灭”，他建议要一起“在自由的空气中纵情嬉耍”，其目标就是让“人类一代比一代更加优化，根据造物主本意为人立下的标准，从人的本性中越来越挖掘出人本应有的样子。”

要是施雷波先生在世时看到以他命名的私人菜园，在打理菜园时得以尽情释放他对正骨学科的独特钟情，而不是去尝试将他的孩子们培养为藤架子上的果实就好了。作为父亲他并没有目睹他的儿子丹尼尔·保尔（Daniel Paul）病态的职业生涯，他的儿子从法学家一直做到德累斯顿高等法院的院长，也是德国最有名的偏执狂。1903年他儿子在住院多年后，在《一位精神病人的大事记》（*Denkwürdigkeiten eines Nervenkranken* ）中向世界宣布：上帝借助辐射力和他对话，并正在准备将他变为一个女人，化身为“施雷波小姐”。似乎他想对他的父亲优化人类的种种努力给出一个绝望的回答，因而宣布他本人有幸被选中从“施雷波的精神”中发展出崭新的人类。

不管是父亲还是儿子都没有成功地造出新人，而私人菜园的初始激情也在逐渐减弱。虽然1914年莱比锡“西郊私人菜园协会”理事会由赛事委员会、园林委员会、慈善委员会以及鼓手和号手委员会组成，然而在战后以及经济拮据的时代，促使菜园主拿起铲子和耙子的还是辘辘饥肠。

更戏剧化的是，在纳粹专制时位于柏林的一个私人菜园小屋竟提供了救命的机会。1921年所有的私人菜园、自然疗法菜园、穷人及工人菜园以及柏林小屋社区主都归属于“德国小园林主协会帝国联盟”。虽然在纳粹夺权后不久这个协会马上启动并介入，但还是有三个小屋主帮助一个名叫汉斯·罗森塔尔（Hans Rosenthal）的年轻人躲藏在这里并逃过了大屠杀而生存下来，他就是后来电视真人秀节目《快，快》（“*Dalli*，

Dalli”）的主持人。尽管在纳粹时代之前就有严格的规定，不许在小屋内过夜。



孩子们可以这样学习坐直：达尼尔·戈特洛博·莫里茨·施雷波博士的各种矫正姿势的辅助工具。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私人菜园却在东德遍地开花。如果按照德国社会统一党的愿望，允许私人菜园的存在充其量不过是解决战后食品紧缺的一种过渡办法，然而大黄茎和水萝卜却执拗地拒绝执行五年计划，最终当局不得不做出让步，伸出放行的拇指。为了阻止私人菜园肆无忌惮的蔓延，人们做出决定，由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门直接管辖私人菜园这支流动队伍。当然他们还是不情愿有人指手画脚地规定，在他们自己的业余时间所占有的小块土地上种什么植物，种多少植物（现在有些私人菜园协会深知如何不留情面地去落实种植规定的种种限制）。而东德的居民则被允许拥有大一些的小屋，不管这是对他们平板住房的补偿，还是对他们无法去亚德里亚海边度过美妙夜晚的补偿，总之：他们可以在小小的地块上竖立起他们的“达恰”[2]，他们可以在这里而且也乐于在这里过夜（而在全德联邦私人菜园法中规定，在私人菜园上建立的小屋“根据其性质，特别是根据其设备与设施的情况，不适于长久居住”。将“达恰”的拥有者和小屋的拥有者区分开来，德国的统一在这一点上无情地撕裂了在东德共生共长紧密相连的东西）。

因此和西边相比，东德的私人菜园更像一首休闲田园诗，人们全年在这里欢度周末和休假：继狂欢节后是庆贺春天的到来，春天节日后就到了上午边品尝美酒边欣赏圣灵降临节音乐会的时光，之后是夏天的聚会、丰收的节日、畅饮博克啤酒和屠宰节、退休老人的圣诞庆典和除夕夜舞会，其间夹杂着玩玩保龄球和打打斯卡特牌。选用的伴奏音乐（这边和那边都一样）是英国流行歌手比利·桑德（Billy Sander）的歌曲：“三十平方米的地方/菜花加生菜繁茂生长/谁有这样的小院场/谁就在城里好风光//阿德尔海德，阿德尔海德，送我一个花园侏儒吧/阿德尔海德，请修一个好德吧！”

1989年夏季，几乎东德每两户人家中就有一户拥有一小块这样的绿地。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一个“工农做主的国家”还是一个私人小菜园主的国家？

如果下次路过这样的私人菜园社区时，不要不屑一顾加以嘲笑。否则怎么可以在最大为400平方米的地角上，看到这么多的层次交织在一起呢：自然与文化、秩序与冲动、自由与强迫、健康与疯狂、结社发烧友和园林家勒内（Lenné）的业余徒弟。园林哲学家和“马鹿”菊花的培育者卡尔·福斯特（Karl Foerster）寓浪漫于讥讽之中，生动地展现了私人菜园运动的魅力：“不管多小的园子也有干不完的活儿。”



“30平方米的地方，菜花加生菜繁茂生长，谁有这样的小院场，谁就在城里好风光。**”**

作者：特·多

译者：杨丽

参阅：工作狂，兄弟树，下班之后，裸体文化，德国人的性情，幼儿园，爱整洁守秩序，玩具屋，渴求瘾，社团迷，林中寂寞

---

[1] 德文私人菜园为Schrebergarten。

[2] 源自俄语，一种农家小屋。

渴求瘾

任何人都会期盼点什么，一旦得到便欢天喜地。愿望实现，重归平静，心满意足。

渴求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不识尽头，无度无止。浪漫派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塔诺怎么说来着：“轻松生活中的爱情与痛苦，上上下下，飘飘忽忽，我心所求，永无终点，不停追逐……”

染上渴求瘾的人用尽一切手段寻找、追逐，但是，就在所求之物伸手可及那一刻，他却猛然退缩。因此，渴求瘾既不是静止状态，也非持续不断的进行时，而是一种反复无尽的左右摇摆。上瘾者跟自己玩猫捉老鼠之游戏。同为诗人的贝蒂娜·冯·阿尼姆（克莱门斯·布伦塔诺之胞妹）梦想把“渴求之能量”采集起来，捐给“浮动的宗教”（Schwebe-Religion）。

可以把渴求瘾看作一种病态，格林词典里就是这么写的。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病态能够给予灵魂如此之张力。

极限登山运动员赖因霍尔德·梅斯纳（Reinhold Messner）是征服世界十四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第一人。高山不再是挑战以后，他开始向极地和沙漠进军，他最了解渴求瘾和它那充满活力的折磨。在探险日记《永不回头》（Nie zurück）中他写道：“这真是疯狂的事情：在家待在妻子身边的时候，你会说，我要去北极，等到了北极，满心想的只有妻子。”说得哲学一点儿：“常在旅途反映了一个天性浪漫的人内心的分裂，在家的时候，渴求远行；到了外面，又渴望回家。我是个家乡及渴

求的双料叛徒。”

“家乡及渴求的双料叛徒”，这个词比汉斯·阿尔贝斯（Hans Albers）更贴近德国浪漫派的精髓。出生于北德海边、貌似粗鲁实则高雅的大众演员阿尔贝斯曾演唱过战后德国人最喜爱的渴求之歌：“带上我们去旅行，船长，带我们去远方。你要去的是什么地方？船长。去南极吧，我们的钱够用那么长。”唱着唱着背叛家乡的变成了背叛渴求的，最后一段成了这样：“带上我吧，船长，带我回家！到了汉堡，我就留下。在家乡，我的吉星闪耀，在家乡，在妈妈身旁。在家乡，我们的吉星闪耀，带上我吧，船长，带我回家！”

但是，谁能说不会把唱片再放上去，整首歌再从头唱一遍呢？虽说哪儿也比不上妈妈家的沙发，但是，如果妈妈家的沙发上少了诱人远行的靠垫……

即使是在灯光刺眼的楼梯间，散发着地板蜡和小市民味道的地方，一家之长也有可能在出门买烟的瞬间被渴求攫住，爆发出这样的声音：“我还未曾到过纽约，未曾去过夏威夷，从未穿着破旧的牛仔裤走在旧金山的大街，我还未曾到过纽约，未曾真正地自由过，哪怕疯狂一次冲破所有的束缚。”最后，即使这出发结束在家里的电视机前，又怎么样呢？心情在就行。谁知道呢，也许下一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妻子会送他两张去汉堡看乌多·于尔根斯大型音乐剧的票，或者去维也纳，至少去斯图加特，包括三星酒店的住宿。

谁要是觉得这首歌太俗，可以来首有文化的：“你了解吗，那柠檬盛开的地方，浓密的绿叶中，橙子橘黄，天空上送来宜人的暖风，桃金娘静立，月桂树梢高展，你是否了解那地方？向前，向前！我愿追随你，爱人啊，随你向前！”没错，歌德的诗。至于行家决定让谁谱曲，是卡尔·弗里德里希·采尔特、路德维希·贝多芬、弗朗茨·舒伯特、路易斯·施波尔（Louis Spohr），范妮·门德尔松-亨泽尔（Fanny

Mendelssohn-Hensel），还是弗朗茨·李斯特、罗伯特·舒曼或者雨果·沃尔夫（Hugo Wolf）、阿尔班·贝尔格，是行家的事情。这里唯一不适合的风格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各种华尔兹。



50年代的沙发靠垫。

灵魂一旦张开翅膀，胸中便出现一股纠结，一份痛楚。对远方的渴望，强烈程度可以不同。也许是淡淡的伤感，像一条薄纱，把世界的颜色遮暗一点："如果让我提愿望，我会不好意思，我提什么呢？坏时光，好时光？如果让我提愿望，我愿意有一点点小幸福，因为幸福太多了，我会想念忧伤。"［弗里德里希·霍伦德（Friedrich Hollaender），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曾亲昵地将这位流亡音乐家称为"伟大的小

弗里德里希”，始终令文艺批评家们头痛的“严肃音乐”还是“娱乐音乐”界定之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渴求也可以成为灼人的折磨。正如迷娘在歌德另一首更为著名的歌中唱道的：“唯有体会相思的人，才理解我的苦痛！形只影单，没有了所有快乐，我仰望苍天，朝远方送去想念。唉，怎知我爱我者，他远在天际。我内脏俱焚，头晕目胀。唯有体会相思的人，才理解我的苦痛！”

渴求会像聚光灯般瞄住在远方的爱怜对象。除了遥不可及的这一个，其余的一切都被黯然遗忘。渴求也会发展成悲观厌世：指望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一张友善面孔的，很快会感到所有窗户都是关闭的。

渴求唯一不能做的是：停止。那将是绝境。不仅是渴求本身的绝境，更是那些通过渴求感受自己，从中汲取自信的人的绝境。每一步都更强烈地渴望完成，而每一步又都把它推得更远。就像进了镜子迷宫，这是染上渴求瘾的唯一家园。谁要是说出“太美了，请停下来吧！”那他也就完了，即使他没把灵魂出卖给魔鬼[1]。

渴求不能忍受的是，眼睁睁看着全心全意追求的对象在日常生活的冲刷下渐渐苍白退色，磨损、败坏。因此，染上渴求瘾的总是时刻准备开始，或者准备作最后的冲刺。比如唐璜和特里斯坦。唐璜和某个女人有过一次高潮便离开，特里斯坦则把那无法重复的高潮无限期地推迟到为爱而死之中才完成。莫扎特和瓦格纳，香槟咏叹调或特里斯坦和弦。失控而膨胀的欲望，越追求解脱，其张力就越无可救药。

到了这一步，只剩下一救：到你的唱片架边，CD柜旁，去数字音乐店找找！没完没了地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

作者：特·多

译者：徐静华

参阅：夜晚的寂静，深渊，登山片，科考远征，德国人的性情，故乡，男声合唱，音乐，芦笋季，莱茵河——父亲河，林中寂寞，徒步之乐，维尼图

---

[1] 这是歌德《浮士德》中的情节，浮士德和魔鬼打赌，永远不能停止追求，一旦停下，灵魂就会被魔鬼收走。

福利国家

从乌尔姆市前往慕尼黑，中途在奥格斯堡市换乘火车。借此机会我们既可以看一眼布莱希特之家，更有幸的是也可看到富格尔社区住宅。前者展示着那位出格的诗人曾经生活过、位于一条僻静侧街上静谧的住所以及紧邻的湍急小溪。后者是一座中世纪的庭院，社会救济机构的一个样板。

诗人凭借其早年戏剧创作《三文钱歌剧》（*Die Dreigroschenoper*）中表现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一举名噪天下。他那紧随时代精神充满讥讽的社会批评特别是对小资产阶级道德的质疑，奠定了他作为左派作家的地位，因而也使他成为起到重要作用的政治思想家，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并左右着作家对公众事件的态度。布莱希特的追随者都沉迷于马克思。

然而这位大师自己并没有完整地阅读过马克思。而有关马克思提出的要求，他更多的是通过20年代一位政党批评家和社会哲学家、马克思理论的通俗普及者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发表的节选中了解的。据说科尔施的作品在68年社会主义德国学生同盟中还起过重要作用。

布莱希特取得了成功，但是他并没有占理。他把社会问题简化为标语式的布尔什维克选举口号：私有财产是偷盗。就这样，原本应是艺术的社会良心降格为简单而机敏的民俗作品。谁不知道1930年印刷版的《三文钱歌剧》中布莱希特那段恶毒的台词呢？“和占有银行相比，抢劫银行何罪之有？”

私有财产绝对不是偷盗，而是所有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也是布莱希特舒适生活的前提。在奥格斯堡市中心、离他居住地几栋房子之遥的富格尔社区住宅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500年前，当地最有钱的富豪富格尔家族，也被人称为奥格斯堡的美第奇，建立了福利住宅的早期样板，而且延续至今。

雅各布·富格尔（Jakob Fugger），别名为富豪（1459～1525），在1521年创办了富格尔社区住宅。他是一位商人和银行家，用布莱希特的名言说，是一个盗贼。然而雅各布·富格尔的行为告诉我们，社会市场经济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在此只罗列那些勇于创新的人物，例如路德维希·艾哈德和他的同人，特别是经济专家阿尔弗莱德·米勒·阿马克（Alfred Müller-Armack）所开拓并为各个党派的后继人不断强化的联邦共和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其共有的特点就是莱茵式资本主义和天主教的社会秩序学说，基督教式的工作态度和工人教育协会。



德国第一栋福利住宅，位于奥古斯堡，以其创始者雅各布·富格尔命名为“富格尔住宅”。

俾斯麦也认识到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对德国现代社会的意义。普鲁士特有的秩序观念必然或早或晚触及社会贫困这个题目，并根据惯例由国家管理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当年的帝国并不是想用公平来统治，我们也不想做出这样的论断，帝国的意图旨在保持力量的平衡，以此来维持帝国的存在。

根据弗里德里希·瑙曼的观点，首先要和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即工人协会以及他们的政治工具社会民主党进行协商。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曾任德国宰相，也被称为铁血宰相，约**1800**年。

俾斯麦，这位保守派政治家和社团协商大师，一手送蜜糖另一手挥利剑：1878年他根据立法清除了来自工人教育协会的强劲对手以及社会民主党——先从他们的领导层开刀，即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而早在1872年，曾经在莱比锡就对他们进行过叛国罪的审判，原因是他们赞同巴黎公社。1878年出台了《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普遍危害活动法》。

禁止社会主义者的立法是利剑，而蜜糖则体现在俾斯麦实施的社会法中。在该立法中，他精心策划并在自己的草案中明显地体现了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因此俾斯麦创建了沿用至今的德国社会保险体系，也就是说他将富格尔福利住宅提高到国家层面的高度。不愧为普鲁士做事一贯到底的风格，而且这样做就其本身讲也是正确的。

现代普鲁士因受到拿破仑战争带来的震撼汲取了重要经验。武器装备不再决定战争的胜负，重要的是向民众展示什么样的世界观，这在欧洲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权力，而且是权力政治。简言之，起作用的不再是武力威胁，武力现在已经沦为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权术。想战胜拿破仑仅仅靠新式武器和重型大炮是不够的，而且还需要国家体制。没有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的改革，普鲁士就无法维持下去，也就是说德意志帝国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法立法。

在此之后没有什么大的更改，只是一再地细化这一复杂的体系，不断完善了社团法的整体。至少在原联邦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已经演变为争夺现实权力的因素。社会伙伴发展为一仲调义务的工具，由此保证社会的和平，而根本不去冒任何造成混乱的风险。

莱茵资本主义建立在董事会、监事会、工会、银行和财政部之间的协调之上。这种布局比较笨重而且反应迟钝，但是可以保证社会的和平，或者说至少是社会和平的表象。这种表象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良好

的声誉，而这种声誉又为创造价值和支付行为提供了保证。莱茵资本主义不仅将社会问题和资本经济结合起来，而且和劳动道德结合在一起，同时并不需要践行基督教的严格禁令和恐吓措施。尽管有狂欢节的愚闹，莱茵资本主义也依然高效，有些成分甚至堪比狂欢节。

在此不得不说，帝国时代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基督教道德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著名论断至少是不完备的。创造价值的前提不仅仅是禁欲，也完全可能是出于对某些产品的情有独钟。不一定认为被捆绑在上帝的战舰上而必须去划桨，让船前行，也可以是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去乘风破浪。在划桨时还可以即兴唱个歌或者仰脖灌点儿科隆啤酒。在帝国时代，皈依宗教在政治上不能说是很有效，至少是非常起作用，当时好像人们真的相信，天主教徒就是不如基督教徒勤奋。这种误解也许更应归咎于卡尔文而不是路德，但路德并不因此就不必承担责任。他坚持认为，只有汗流浃背的工作才会取得好成果，而众所周知天主教徒时或允许扭扭身子打闹打闹。尽情欢庆时也会汗流满面，例如爱的大游行，或者一些体验社团因闲来无事而举办的某些毫无意义的比赛之破纪录创举。

马克斯·韦伯在1905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一书曾经影响很大，其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对基督教的赞扬——尽管人们更乐于认为普鲁士风格中体现着基督教精神，而是在于他指出了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根本关系。无论人们怎样加以评论，但该书的最终结论是：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自由的力量较量。至少这种力量的较量不是自由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其推动力是利益或者对利益的追求。谁将经济放任于自我本身的调节机制，谁就会马上销毁其劳动果实。

这里并不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而是在寻找它存在的理由。其理由只能是它会创造价值。谁生产什么，他一定认识到其中的某种意义。该

意义一方面在于喜欢该产品，另一方面也在于它的价值和社会归属性。社会保险、税收累进和社会互助都是莱茵资本主义的内涵。这样一来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如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成为多余。这一结果肯定是该项目想达到的部分目标。这是一个保守的项目，尽管人们不愿这么说，但是不得不承认，不可能捆绑束缚住资本释放的力量，而只能将其圈入特定的框架条件中。

其余的就是道德、义务感和责任感。

市场经济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自由，而且在于为控制市场，各种力量不断的较量和不断的尝试，不管是来自国家的、国家通过立法方式或民众通过情绪表达和道德观的表达。

在一个透明的社会中，公认的道德观念是最重要的力量，如果公认的道德拒绝某个产品，几乎很难违反其意愿而付诸实施。21世纪初的核电问题就是一个实例。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谁以何种方式代表大多数，谁左右着公众的观点。是普遍认为我们现有的那种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代表大多数，还是巧妙利用媒体来宣传其纲领的某些少数精英代表大多数呢？

但是现实和真实的生活是很难进行分类和区分界限的，我们常常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禁烟令发布的结果是让一半居民走上街头去抽烟。

市场也是如此。经济不仅要以道德的导向为出发点，而且也不乏某些虚情假意的成分。在今天的德国，这是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至少在某些部分，经济并未通过生物能源和绿色能源而具有更高尚的道德。经济本身变得更加道德。市场营销和生活观不可分割。

根据取得的成果，从务实的角度论证了社团主义存在的合理性，但

也可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论证。这在20世纪的德国甚至出现了两次：一次在第三帝国，另一次在东德。人们试图用保证社会和平的这个工具进行压迫，然而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社团主义不是权力，它的任务是调节参与各方。因此尽管看上去很奇怪，但它的确是民主的一个工具，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专制制度的一个工具。

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富格尔福利住宅依然存在。得出的教训？建立福利国家只能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谁想仅靠意识形态强夺人意，谁必定会失去可信度。

作者：里·瓦

译者：杨丽

参阅：工作狂，下班之后，创业时代，爱整洁守秩序

芦笋季

现如今，即使冬天在本地超市的菜架上也能看到芦笋：密封装在塑料袋中，一小捆不多不少整一磅，产地是希腊或智利。有一年冬天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这么一小包蒙着一层水汽的芦笋，说不好里面的芦笋是冷还是在出汗。外面几周来都在下雪，渴望吃点儿芦笋的诱惑太大了。小土豆配上香芹微煎，把火腿片卷成卷，融化些黄油，或是把荷兰蛋黄酱打出泡沫…… 我的手把那包出冷汗的芦笋又放了回去。我并非害怕这包飞机空运而来的一级品会让我今后几个月的二氧化碳排放结算表变得不利。我把它放回去是因为我知道，无论我怎样充满爱意地削皮，并一根根地把它们放入我那锃亮的煮芦笋专用的不锈钢锅中，吃它时肯定只会引起失望。冬天吃进口的芦笋，其绝望程度就好似同一个陌生人搞一夜情，你之所以这么干，只是因为他暂时让你忆起了远在天边的心上人。

吃芦笋在德国不仅仅是一顿佳肴，一种从前只有有钱人才吃得起的奢侈，它也是一种仪式、狂热。为了能完成这种仪式不光要有正确的季节，而且正确的烹饪方式至少同样重要。

“薇罗妮卡，春天来了，/姑娘们齐唱特拉拉。/全世界都似着了魔，/薇罗妮卡，芦笋长出来了！”在纳粹把他们赶散之前，Comedian Harmonists [1] 乐队一直这么唱道。可对这首常唱不衰的歌本身那些褐色厨师们 [2] 也无计可施，4月一到人们总能到处听到这首歌，位于施韦青根（Schwetzingen）和贝利茨（Beelitz）之间种植芦笋的农庄已从冬眠中苏醒过来，饭馆老板们也纷纷开始用漂亮的字体手写出芦笋菜单。

芦笋绝对不是德国人发现的，在他们之前很久埃及人和希腊人就发现了芦笋。而最早尽情享用芦笋的则是罗马人，也是他们把这种菜带给日耳曼人的，在特里尔（Trier）附近挖掘出的出土文物中有公元2世纪的铅质芦笋标价牌。

随着罗马人的离开，芦笋也从德国食谱中消失了一段时间。可以肯定的是：它再次出现是在1565年，出现的地点是斯图加特的谐趣园。17世纪初在巴登以及不伦瑞克和柏林周围出现了最早的芦笋种植区，然而德国芦笋的真正繁荣期是200年后才到来的——直到荷兰种植芦笋的农人有了一种意外收获。此前世界各地只有绿芦笋，也就是如果就餐者订了Asparagi或是Asparagus[3]，至今在意大利和美国的餐馆中不加询问就会端上来的那种。荷兰种植芦笋的农人发现，如果在芦笋生长时不让它见光，那么它的纤维会变得更细，而且颜色也会变白。德国人对此欢欣鼓舞，他们毫不留情地把芦笋流放到地下，方法是堆起一眼望不到头的笔直的土堤把它们埋起来，从远处看到这种土堤就会知道那是种植芦笋的田地。用深埋的方法让芦笋变白，这多么荒谬人们知道吗？

蔬菜中的报春菜却得在阴暗中生活一段时间，它们被挖出来后才能见到阳光。光秃秃的地上看不见任何绿色，芦笋在地上——精确地说是地中——悄悄生长。

这还不是闷白了的芦笋带来的唯一荒谬的事。收获也是很费力的，因为芦笋同样得从地下挖出。其艰辛令21世纪的芦笋王们每年都得去波兰和罗马尼亚招募几万短工，因为在自己国家（这儿有几百万失业大军？）已经找不到人了，没人愿意（而且能够）弯着腰进行这项精确的挖掘工作。为了降低成本，一段时间以来德国的机械工程师们已经韧劲十足地鼓捣着所谓的芦笋收获机了，有朝一日这种机器可以全自动地收获芦笋。现在人们在德国的芦笋生产地对这种样机还充满怀疑。

尽管人们不愿亲自去挖掘芦笋，但德国人却想吃越来越多的芦笋。

芦笋在地下长得很快，要不是它们被埋在地下，人们就可以看到，气候适宜的情况下它们每小时能长一厘米。德国最近几年对芦笋的消费增长得同样迅速：每年吃掉的芦笋超过10万吨，其中80%是本土种植的。6亿欧元的销售额让芦笋成为德国农业中最赚钱的蔬菜。成群的芦笋女王们，芦笋节上的削芦笋比赛和其他新民俗节目都让这种白色棍状蔬菜的魅力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电视中常能听到超级歌手用迷人的颤音唱道：“噢，美妙的芦笋季……”



1960年时吃芦笋的规矩：**“**若是按照我们的指点去做，在美好的芦笋季就不会出丑：右手的手指捏着芦笋末端，左手用叉子协助**……”**安娜玛丽·韦伯在其居家礼仪书中这么建议。

芦笋季还有更实用的地方：对雇主和人事部门的头儿来说，为了考察求职者，没有比请他吃芦笋更优雅的办法了。如果他用手捏起芦笋吃，那他在简历中报出的年龄就有假。在不锈钢的刀叉被发明后，就没有人用手吃芦笋了。除非他或她的兴趣不仅仅限于求职，或是他/她确

实出生在豪门，家里用银餐具吃饭是天经地义的。

就是用餐具吃芦笋的人也会不情愿地泄露自己的性格：那些一根一根地吃芦笋者，或者上来就把所有的头都切下来吃的人，他们不适合需要韧劲的岗位。他们不知道那个漂亮的德文词“把好的留到最后”。那些先从所有根部开始，然后分别向中段挺进，最后再享用最嫩的芦笋头的人，其行为证明他们对自己欲望的控制能力最强。遇到这种情况老板就该要一瓶最贵的雷司令，祝贺自己的新员工。

无论是用来测试性格还是用来满足口腹之欲，一样的是得抓住时令。一到仲夏节——6月24日，芦笋季就结束了。被人为地控制在地下的部分就可以疯长了。这意味着告别美好的芦笋季，在超市里又得从来自希腊和智利的诱惑旁勇敢地走过。这种放弃是值得的，因为只有能够等待9个月的人，来年春天才能真正享用芦笋。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故乡，诸侯割据，爱整洁守秩序，渴求瘾

---

[1] 1927～1935年间一支国际闻名的柏林声乐乐队。

[2] 此处指纳粹。

[3] 分别为意大利语和英语的芦笋。

小市民

在今天的德语中，小市民这个词属于最明显地带有贬义的词。早在中世纪时，这个词就沾上了污点。在当年帝国自由城市中，要根据家庭财产来评估市民缴纳用于保护和捍卫城市的捐税数额。对那些财产最少的人，也就是那些只拥有一只长矛为武器的市民，人们就称其为长矛市民，即小市民。

在中世纪后期，上层社会有规律的生活越来越远离实际，逐渐发展为空洞的仪式和竞技。骑士这个等级实际存在的理由越少，他们就越加热衷于四处比武。当时相对于装备精良的骑士来说，小市民作为可能的对手，起初不过是个笑料而已。这种人来做对手，还不如说是对骑士高档装备的一种侮辱。而更为引人注目的原因在于：小市民手持即兴武器对付全身铁甲的骑士可谓轻而易举，而骑士则需要一群人的帮助才能坐上马鞍，才能像一个貌似威风凛凛的堡垒那样竖立起来。如何把骑士打下马鞍，需要一定的战术。但是用一个简简单单的长矛就做到，这可是对基本常规天大的亵渎。它让骑士们显得可笑而又多余。

在以炫耀财产和特权为荣的中世纪，小市民根本不是一个有层次的角色。正是由于他的窘境，特别是由于他不按常规出牌使对手大为败兴的能力，小市民油然产生了某种不可一世的自信。他认为自己有理，而且不仅仅体现在装备和与此相关的费用方面，他感觉他在方方面面总是有理。他不再听任那些装备精良阶层的指手画脚。

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市民装备起自己的世界，尽管他们的天地和真实的世界那么相似，但是不管什么都小了一圈。比武变成了集市，宫廷

抒情诗歌手变成了小丑。小市民把最好的角色留给自己。他装疯卖傻，随时准备保住自己的帽子。

原则上对此也没有什么可以横加指责的。为了报复一下，于是就把小市民这个词贬为骂人的话。

但是充满活力和热衷舞蹈的这些人不仅不断地追求认知，而且也在紧紧跟随潮流，念念不忘与时俱进。在这个时间安排得如此紧凑的时代，仍然惦记着尽可能不要错过任何事情。然而当又说破了嘴皮子，再说也没用的时候，他们还是发现了象征和其沉默的力量。

其优点是：不必用语言表达出人们想做什么，而只要用其生活方式展示出来即可。人们默默地适应了时间，也就是说紧跟大多数人。突然一下子，又可以用到“小市民”这个词了，至少这个词是存在的。

这一切的一切都始于一个广告片，一个选择在拖车里生活的父亲和他未成年女儿的对话。他女儿渴望住进顶楼，喜欢女同学住的那种宽敞房子。她的父亲告诫她：他们是小市民。她的反驳是：“爸爸，如果我长大了，我也愿意当小市民。”这个录像——一个建房储蓄银行的广告片一时成为崇拜偶像。争当小市民的需求显然比住在家庭菜园棚屋内的一个孩子的愿望更加猛烈。

当一则广告使人为之狂热，几乎不再令任何人感到惊奇，因为广告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共识的文化表达和标记。因此它有权超出其传递的信息来传播某种断言。一个广告成为崇拜偶像，它就和其广告的任务没有多少关系了，而是更多地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发生了某种关系。至少我们是这样看的。成为崇拜偶像的广告，就像给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指示器，这些社会学家一段时间以来已经自视为文化科学工作者了。

从社会学家晋升为文化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评论员首先观察的是价值

观的转变，即在日常生活的重复中，在常见的行为中价值观怎样发生变化。他们观察是否某些概念被赋予了正面或负面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会如此。

这样一来，文化科学家与市场研究接壤了。有的人去评估置身于旁观者的利益所在，有的人则利用这一认知来定位某个产品。

小市民不过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陪练伙伴。人们是不需要和陪练伙伴比试的。但是要利用他尝试自己的策略如何，就要适应他，适应他的视野。爱克尔·阿尔弗莱德（Ekel Alfred）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他身上可以告诫自己界限在哪里。爱克尔·阿尔弗莱德是一个电视角色，68年时家喻户晓的一个敌对角色。一个理想的反面人物，带有各种天生的和后天的恶习。68年代的思潮成为常规后，其涉及的范围甚至延伸到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核心——这个问题迄今依然存在，即我们到底准备怎样生活？

小市民没有榜样，他只有习惯，只有他遵循并呵护的习惯。他会常常抱怨火车的晚点，对天气预报他嗤之以鼻。小市民不参与批评，他只管确认现状。他早就不再抗议他常说的“美国大兵”，但是从他提到“关塔那摩”（Guantanamo）的语气，就可以知道他对此事的看法。小市民蔑视他的对手，如同当年骑士蔑视他一样。

小市民说，到处都是和他作对的人，这些对手制造并操纵了这些混乱。他们管不好事情。持这一观点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因而他深受鼓舞，更乐于站到大多数人一边。他对潮流真是有一种嗅觉。潮流是乌托邦最好的代替品。

也许最大的小市民是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人们甚至可以将他在万德里茨（Wandlitz）的住所修建为小市民博物馆，而且根本不用大的花费。

小市民没有原则，但是有时他从习惯中总结出原则。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折中主义最终战胜了启蒙。他关心的讨论是68年代最后的口号和健康食品店。现在，每当周日上午早茶时，在帝国某个漂亮的广场上都可以遇见小市民，克拉拉·瓦尔多福（Clare Waldoff）就住在拐角处。对所有的话题他都发表些不值一提的看法，时而还抬头看看广场上的树梢，好像受人之托来估计一下该树的年龄。最后他起身走向他的自行车，磨磨蹭蹭地打开车锁，然后轻巧地跃上车座，骄傲地疾驰而去，好像他俨然是当年的骑士，而不是步行的市民。



若是苗圃打理得如此秩序井然，那么小市民一定就住在附近。

作者：里·瓦

译者：杨丽

参阅：下班之后，德国人的性情，爱整洁守秩序，幸灾乐祸

海滩篷椅

海滩篷椅的故事，至少它的开头，让我们觉得就像是挂历上的通俗故事。因为再也没有比它的来历更容易讲的故事了。简而言之它就是编筐人威廉·巴特尔曼（Wilhelm Bartelmann）和贵族小姐埃尔弗里德·冯·马尔灿（Elfriede von Maltzahn）的故事。前者出生在吕贝克，在罗斯托克做生意；后者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是巴特尔曼一位想象力丰富的主顾。据说编筐人就是根据她的想象和指示制作出了第一把海滩篷椅的。故事发生在1882年的春天，地点是罗斯托克，篷椅是用于瓦尔内明德（Warnemünde）海滩的。

当时埃尔弗里德·冯·马尔灿用它是为了挡风防晒的，那年头防晒霜还根本没有发明出来。

不久，最晚从世纪末开始，海滩篷椅就成了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一道独特风景，或者说海滩和篷椅已密不可分。因而篷椅也就成了那里户外写生的画家们必画的东西，尽管仔细看起来它更适合于当摄影题材，然而其最明显的标志就在于它的可替换性。在所有海滩照片上都能看到一片海滩篷椅，一个挨着一个，同样大小，同样颜色。

绝大多数海滩篷椅一般是供一个人或两个人使用的。在海滩人们也想惬意，如果旁边那位表现主义画家再次把一切画得阴暗，人不是非得看他作画不可。并非每次来临的暴风雨都是一种警示。坐在海滩篷椅中不仅可以挡风防晒，而且还能屏蔽不谨慎的偷窥目光。人在其中是独处的，和自己以及他的至爱亲朋，但他同时知道自己是置身于大众之间的。人可以躲进海滩篷椅中，与外界的一切隔绝，抬眼却仍旧看得见海

滩或潮起潮落。作为一种小篷屋，却有着固定的布置模式，它的这种双重功能显示出它是威廉二世时代的现象。

托马斯·曼也有一把海滩篷椅，篷内装有专供写作用的板架，对此大概没有人会感到惊奇。曼穿着衬衫、打着领带坐在篷中，这位作家也将目光——至少不时地——投向大海。他同时知道，别的人也在眺望大海，但他瞭望大海的结果没有必要与其他人交流。威廉二世本人却与曼不同，他想让德国获得更多的殖民地，结果他许诺的有阳光的地方却在战壕里。

海滩篷椅没有随着帝国的消亡而消失，就像它后来又挺过了许多别的变迁一样。真正的发明是没有时间性的，没有什么时代精神奈何得了它们，因为它们的实用性是永存的。人们完全可以用国企（VEB）来代替有限公司（GmbH），但那只是过渡性措施。远离一切意识形态，海滩篷椅证明自己是民族性的主要证人。流亡者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将海滩篷椅作为脑海中的画面构想带往加利福尼亚，许多年后，当那场大战——它令任何有关海滩篷椅的谈话从根本上成为不可能——早就结束了，他在电影《热情如火》（*Manchemögen’s heiß* ）的布景中沉默地再现了海滩篷椅场景。片中托尼·柯蒂斯（Tony Curtis）坐在海滩篷椅中，他正在哄骗玛丽莲·梦露，说自己有一艘游艇，这令杰克·莱蒙（Jack Lemmon）感到震惊。当时正值50年代，所说的那一切都有潜台词。

从此以后人们可以认为，海滩篷椅不再仅仅属于德国人，而是世界共享了。然而它却仅仅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一带具有它应有的意义，在其他地方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在您附近的回顾展影院里看到。世界其他地方更受欢迎的是透风的遮阳伞。



密密麻麻：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海滩篷椅。

尽管如此，2007年在海利根达姆（Heiligendamm）召开八国峰会期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还是和各国嘉宾一起坐进了一把特大海滩篷椅。那是为政治特制的篷椅，也是政治与现实相联系的例子。政治家们为了一起照相坐进一把平常根本不存在的海滩篷椅，他们还想以此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他们与其他普通人毫无二致地坐在海滩篷椅中。这和新近所有与政治扯上边的事一样，是一种误用，这回误用的是海滩篷椅。德国式结论：强者来了又走，长存的则是海滩篷椅。

作者：里·瓦

译者：丁娜

参阅：德国人的性情，爱整洁守秩序，私人菜园

怪诞之事

1919年11月19～20日那个夜晚，F.博士[1]睡不着觉。此前他像每个星期三那样与自己的秘密委员会在一起。他的工作室中烟雾缭绕，全是与会者抽很多雪茄弄的。他应该把门关上，最好是把烟戒了。可不抽烟他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他允许自己喝的那半杯马尔沙拉甜葡萄酒都太多了。那就再抽一支吧。

F.博士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他喜欢用左手抽烟——摸了摸玻璃柜上的小斯芬克斯像的头，它与其他古董庄严地雄踞在那里。他没摸它的胸部，只有一次他斗胆这么干过。Saxa loquuntur——石头说话。

那并不是个美好的晚上。他与亚伯拉罕（Abraham）和萨克斯（Sachs）吵了起来，这二位热捧一部新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Das Cabinet des Dr. Caligari*），非要拉他一起去电影院，而他已经读了很多影评，知道自己是不会去看这部电影的。恶魔般的神经科医生，梦游杀人犯，我求你们了！电影总归是一种完全被高估的媒介。那些电影艺术家们想什么呢？他们以为揭示了灵魂的秘密？可惜不是那么回事。他更愿意去看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新歌剧——《没有影子的女人》（*Die Frau ohne Schatten*）。想到这儿F.博士露出了微笑。

尽管他一晚上都在喝咖啡，突然他又来了兴致，想再喝一杯这种绝妙饮料。可女人们都睡下了，他自己是不会去厨房的，反正去了他也不知该怎么煮咖啡。也许他最好还是睡觉去，已经两点多了，一个钟头以前他就该躺在床上了。他最恨打乱自己的生活规律。

正当他想熄灭抽了连一半都不到的雪茄时，他听到了响动。通他诊疗室的门总是开着，声音应该是从那儿传过来的。

“安娜？”F.博士冲着亮着微弱灯光的候诊室方向喊道。也许他女儿也睡不着觉。“安娜？”他觉得看到了墙上有道黑影，就在长沙发躺椅和他的扶手椅后面的那堵墙上。看，影子又出现了。黑影遮住了罗马人头像，他静听病人倾诉时，那头像总用同样空洞的目光望着他的身后。F.博士惊异地发现他的雪茄在发抖。如果他此前问过自己是否感到了害怕，那他会否认这一点的。

他沉着地从写字台旁站起身。

“谁呀？”

他刚说出这句话，自己就觉得问得太差劲。而他又是故意没有傻乎乎地问：“那儿有人吗？”这么多年来他头一次感到罗马人头像在盯着他。只消几步路他就能从办公室走到诊疗室，而厚厚的地毯会让他的脚步悄无声息。

“别闹着玩了，到底是谁在那儿？”他现在想喊。令人恼火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抢在了他前面。一个人站在连接候诊室与诊疗室中间的那扇门那儿，正漫不经心地举起手往墙上投影着各种动物。

“晚上好，博士先生。请原谅我这么晚来打扰。”

“您是谁？”

这么快提出的问题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虽然在逆光下他看不清对方，但F.博士能肯定自己没有见过此人，至少若是见过，也没打过招呼，反正不是他的病人。他开了诊疗室的灯。

深夜来访者看上去穷困潦倒，而且衣着落伍：黑色及膝罩衫，白衬衫配领结，都是几百年来人们不再穿戴的款式。外罩和衬衫均有污渍。黑发蓬乱，延伸到嘴角的络腮胡子也脏兮兮的。肯定是个酒鬼，神经症患者，八成是个演员。演完戏去酒馆喝酒了，连行头都没换，然后就从酒馆踉跄到他诊所来了。现在F.博士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请原谅我这副样子就来见您了，博士先生，但我太想跟您聊聊了。”

还没有容F.博士回答，入侵者就向长沙发走去，并叹着气四仰八叉地躺了上去。

“您不见怪吧？”

“您立刻离开我的诊室！”

这两句话是同时说出的，它们在房间里停留片刻，然后就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

“您知道吗，现在是午夜，我不看病。约个时间明天再来，但现在您得离开。”



夜越深，来客越可疑。

深夜来访者面露微笑，他的牙齿只剩下些黄褐色的残根。

“您还有什么可喝的东西给我一口吗？不用什么高级的，红酒、利口酒，随便您有什么都行。您抽的这种雪茄我也愿意尝尝。”

F.博士默默走进候诊室，为了看看桌上是不是还有马尔沙拉甜葡萄酒。不出所料，桌上的东西都收拾干净了。他仍旧沉默不语地向写字台走去，拿起烟匣，取出一支雪茄递给深夜来访者。他感到自己是没法让这位不速之客离开了。此外来客不再让他感到害怕，起码不像一般的入室行窃者那么让他恐惧。尽管如此，这位人物身上仍旧有令人十分不安的东西。特别是现在F.博士十分有把握认出了来者的脸。

“别嘬！”他一不留神来了这么一句。“点雪茄的时候不能嘬，这会破坏味道的。”

深夜来访者吃惊地望着F.博士，活像个孩子。很难猜测出他的年龄。

“您真是无所不知，博士先生。我不过就是个抽烟斗的穷鬼。”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F.博士坐在一把自己从候诊室搬来的椅子上。跟这位——是呀，他到底算什么呢，病人？——躺在沙发上的主儿，他不能从脑后与他交谈[2]。

“是的，您认识我，博士先生，甚至很了解我。您对我了解之深，以致您认为我父亲是我精神生活中的最痛的伤口。”

“我不认为我们彼此交谈过。”

深夜来访者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彼此交谈有多种方式。”他吧嗒一声嘬了一口雪茄。“您看，博士先生。德语是一种奇妙的语言，您能读懂它的秘密。您解释得真好：舒适温馨的（das Heimelig）是隐蔽秘密的（das Heimliche），而隐蔽秘密的又是令人恐惧的（das Unheimliche）的。事实上令人恐惧的根本不是与隐蔽秘密相反的事[3]，而是隐藏在其中的最隐蔽秘密的事。隐蔽秘密。令人恐惧。隐蔽秘密。令人恐惧。”深夜来访者用手疯狂地做了几下王车易位的动作。“没有什么地方像自己家里那么舒适温馨。壁炉里的火劈劈啪啪地烧着，潘趣酒冒着热气，外面的秋风打着呼哨。可是当我感到如此惬意的时候，我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难道我做的事情和让我不得安宁的事不是鬼鬼祟祟的吗？突然我完全像个陌生人一样站在自己面前，我让自己感到恐怖。要是我的秘密真相大白是好事吗？与守着自己的秘密时相比，那我不是觉得自己更陌生了吗？在家时我与自己的恐惧为伍。您，博士先生，您想解密所有的东西。您无法生活在恐惧中，可您赢得的却并不是家园。”

F.博士越来越全神贯注地听着。“您读过我《论恐惑》一文？”

“是的。写我的文章我都读。”

“您怎么知道我写的是您呢？”

“又是这种问题。我知道，因为您这么做了。您甚至还仁慈地选我为无与伦比的恐怖大师。”边抽雪茄边窃笑的深夜来访者突然呛了一下。

“那么说您认为自己是诗人E.T.A.霍夫曼了？”

这时客人叹了口气。“博士先生，这个天我们不能这么聊。我得告

诉您，您的文章不仅让我高兴，而且是越读越扫兴。您提到了我的《撒沙人》（Sandmann）[4]，您猜得到我是热爱自己的短篇小说的。所以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读到，我那可怜的纳塔内尔（Nathanael）有——您管那叫什么来着？——阉割焦虑。您为什么那么确信无疑，这个不幸的人害怕阴险的、想攫取他眼睛的科佩留斯（Coppelius）不是事出有因呢？为什么眼睛事实上并非眼睛，而非得把它们想象成别的器官不可呢？而且纳塔内尔害怕的实际上也不是科佩留斯，而是他自己的父亲呢？”

F.博士兴奋得都忘了嘬他的雪茄了：“您故事中的一切都在讲述纳塔内尔是多么紧密地将自己与他的父亲捆绑在一起。他早年丧父，而且认为自己对父亲的死有责任。您的科佩留斯完完全全是典型的父亲臆想。为什么他总在纳塔内尔就要找到自己源自性爱的幸福前出现？”

“您刚才说您的故事？也就是说您现在相信我是E.T.A.霍夫曼了？”

“这与眼下正在谈论的事情无关。”

“差矣。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精髓。如果您突然觉得这种事是可能的：我恩斯特·特奥多尔·威廉·霍夫曼，死于1822年6月25日的诗人，仍旧能够在1919年11月20日躺在您的长沙发上，抽着您的雪茄和您聊怪诞的事，那您就得认可，我的纳塔内尔并非幻想出一个叫科佩留斯的恶魔，他对自己眼睛的焦虑也不是什么别的焦虑。而迫害我那不幸的主人公的不是别人，正是科佩留斯，他是真正的黑暗势力。”

F.博士感到一阵眩晕。如果他想用与入侵者水平相同的言辞来表达，那他该说：一记黑拳想要了他的老命。也许这个恶作剧是他的哪位敌人策划的？谁这么没品位，居然让一位衣衫褴褛的演员来找他，看看他会不会上当？

“您最好现在就走。今天我没法帮您。”

“恐怕您明天也帮不了我，博士先生。后天也一样。您总责备您的反对者抱住理智思维的方式不放，拒绝在精神分析的道路上追随您。我愿意立即在这条路上追随您，哪怕堕入深渊。如果您断言恶魔不是真实存在的，而只是心境的一种幻影；如果您认为每一种充满神秘的东西都可以在黑暗的童年经历中找到解释，可难道您的内心不也在受着冷漠和乏味的折磨吗？”

“这是幼稚的！”F.博士的嗓音不受控制地变得尖锐起来，“像每个神经症患者一样，您过分强调心灵现实，就像物质现实一样。您回归到您的自我还没有完全清晰地与外界区分开之时”。

“您想教我这个？把我的自我与外界区分开？可这不正是我们在忍受的全部不幸吗？我坦率承认：我是个云山雾罩的人，也愿意当这种人。我写作就是想让人重新学会把飘忽不定的影子形象当作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来看待。”

“在艺术中您可以随意行事，但在现实中不行！”

“又是这种划分，难道您相信，如果我把艺术与现实分开的话，我还会写得出哪怕一篇故事吗？”

来访者坐了起来。“对不起，博士先生，我这么晚来打扰您。尽管有种种不信任，认识了您我还是很高兴。为了这支雪茄我更得永远感谢您。”

陌生人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身，象征性地欠了欠身，然后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诊疗室，与来时毫无二致。

F.博士不愿说他在椅子上还坐了多长时间。当他再次清醒过来，手

中的雪茄已经熄灭了，地毯上却没有留下烟灰。他睡着了吗？他做梦了？他盯着眼前的长沙发看，上面空无一人。他站起身的时候椅子倒了。他的嗓子火烧火燎，背也在痛。

“荒唐！”他听见自己自言自语。他发现自己正在长沙发上搜寻午夜闹鬼的痕迹，可一无所获。要是他事先至少数过烟匣里有几支雪茄就好了，那他现在就能确定是否少了一支。但那夜烟抽得太多，他已经搞不清楚了。

当他向写字台走去，准备立即记下这次奇异的经历时，他思虑道，我得减少工作量。写字台右边的小桌上，两个陶土小人旁放着一本打开的书。F.博士不记得自己把书放在那儿了。他还未拿起书，就看见了正是《夜曲》（*Nachtstücke*）[5]。他的《论恐惑》（*Das Unheimliche*）的文章几个月前就完稿了，毫无疑问这本书早就被他放回了书架。有人在扉页上潦草地写了什么，是题词。

怪诞的事是真实的，

献给F.博士

充满敬意的

E.T.A. 霍夫曼

F.博士赶快抬起目光，为的是看看玻璃柜上的小斯芬克斯像在怎样向他眨眼。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深渊，德国式恐惧，玩具屋，林中寂寞，女人

---

[1] 根据上下文此处的F.博士应是弗洛伊德先生。

[2] 心理医师与病人交谈时一般坐在病人脑后（病人卧位）或身后（病人坐位）。

[3] 按德语构词法前缀un放在哪个词前面，就构成一个与其意思相反的词，但此处例外。

[4] 传说中晚上往小孩眼睛里撒沙子，让他们犯困的瞌睡魔。

[5] E.T.A.霍夫曼的作品集，里面收有上文中提到的《撒沙人》，出版于1816/1817。

莱茵河——父亲河

一条河怎么就会变成了父亲呢？这可不是因为他沉湎于纵情造人之乐，尽管有人在背后制造流言飞语，说是好些美人鱼和水仙都出自于他，但这并伤不了他一根毫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是惶惑不安的人类做出决定：我们需要一位父亲，一位善良、强壮、能够帮助我们的父亲。

对于公元前的罗马人——也就是最早系统地向莱茵河地区移居的人——来说，但凡在河流周边地带遇到什么棘手的事，向河流和他们推测居住在河中的神祇呼唤“父亲”（Pater）祈求帮助那是十分平常的事。同样，他们把台伯河（Tiber）[1]也看成是一位父亲，多瑙河也是如此，它那时被称作多瑙韦斯（Danuvius），是个阳性名词。不过今天的罗马人绝对不会再冒出这样的念头，要去对“父亲河特韦雷河”（Padre Tevere）唱赞歌。后来多瑙河也丢掉了它的父亲称号，最晚大概是在“变性”时丢失的，不是在这首就是在那首斯拉夫歌曲中，它就变成了“母亲河多瑙河”。不过，无论变成什么，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来说，多瑙河都是那么蓝，那么美。

为什么单单就只有莱茵河能够做到，这么多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有父亲河的称号呢？

莱茵河从来就不是一条什么随随便便的河，而是一条与众不同、气势雄壮的大河。据说（古罗马杰出的军事统帅）恺撒曾经两次渡过莱茵河。不过他过河之后却只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即莱茵河彼岸处于蛮荒状态的森林、沼泽和部落是真正的日耳曼人的地盘，不值得费心用力去

征服了来做殖民地。后来到奥古斯都大帝执政，才下令向东北扩张，或者，像民歌中用贬抑口吻所唱的那样：“当罗马人放肆起来，/西姆泽雷姆、西姆西姆、西姆西姆/他们向北就跑到了德意志的土地，/西姆泽雷姆、西姆西姆、西姆西姆……”

在基督诞生后的第九年，罗马的新统帅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尼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在莱茵河畔的条顿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经历了他的滑铁卢：日耳曼部族切鲁西人（Cherusker）的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更为人熟知的是他的德语名字“赫尔曼”——迫使罗马人暂时退到了莱茵河后面，但他却并没有反过来率领队伍向高卢（Gallien）挺进。

说起来，还得再过上五百年，才有一个日耳曼人的部落同法兰克人一起首次夺得中部和西部欧洲地盘的控制权。对他们来说，莱茵河可不是远在东北、令人生畏的汹涌界河，就像从罗马人的角度所描绘的那样，而是他们熟悉的家乡风景。但即便是他们也不敢上来就去动摇老帝国的规矩，即从莱茵河东北岸开始便是条顿人的休耕地，文明的目光应当向西南看。

直到8、9世纪之交时，卡尔大帝（Karl der Große）[2]才把法兰克人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东部：莱茵河从此不再是分隔野蛮人的最后一条河，而变成了欧洲文明的一根心脏大动脉，同时它也是基督教的大动脉。亚琛、特里尔、美因茨、沃尔姆斯、施佩耶尔、斯特拉斯堡：德国最古老的大教堂和修道院遍布莱茵河岸或者耸立在它的近旁。在莱茵河左岸的城市中，产生了最强势的主教府和主教管区，莱茵河成了“僧侣巷”（然而莱茵河畔大教堂中最著名的那座科隆大教堂，其建筑中断了数百年，直到1842～1880年才最终建成，这也可以解释它为什么令人诧异地离科隆火车总站那么近，那座老“火车总站”是1859年才开始运营的）。



莱茵河老爸与他的女儿们。位于杜塞尔多夫斯坦德大厦前的纪念雕像。

早在罗马人时代，莱茵河就已经开始被用作经商的水道了。不过在近代以前，这条河一直都不是“白色船队”客运轮船船长们的领地，那时候只有大胆的船夫才敢在这条波涌浪急、浅滩无数又遍布旋涡的河流上行船。今天，只有宾根到科布伦茨之间细窄的峡谷——莱茵河的浪漫山脊——能让人们隐约想象，这条从上游穿过美丽风景一路蜿蜒流淌而下的河流有多么桀骜不驯。中世纪时，兴建了最早的堤坝和河岸要塞，好让人不至于面对莱茵河常常泛滥的洪水备受伤害而得不到保护。1817年，巴登的工程师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Johann Gottfried Tulla）开始制订计划，着手驯服莱茵河。在“校正莱茵河”的工程中，这条河从巴塞尔到沃尔姆斯的所有弯道都被人们通过凿建运河而给切掉了，由此一来，莱茵河令人惊异地足足缩短了81公里。

对父亲能够如此下手吗？

要说德国人有什么出众才能的话，那就是他们有这样的喜好，即把自己开创或者是学到的技术方面的进步马上给安上一个浪漫的或者是神话的减震弹簧，比如说吧，德国人发明了林业经济，于是就开始把所有德意志土地上的森林都变魔术般地变成了童话森林。德国人从英国人那里学来了建造铁路，于是给它取个名字叫作“滚动的飞轮”。当德国人挥起铁铲，在古老的莱茵河身上“动土”并沿着它的河床铺设钢轨时，这一改造过程只要了一点象征性的赔偿。德国的自然征服者果敢地大踏步走向未来，而德国的文人们则蹲在这些征服者的肩膀上，满怀伤感地回望往昔。

在文艺复兴时期，总有个别作家用巴洛克风格的笔调歌颂“父亲莱茵河”，由此而扛着这幅罗马人-异教徒的莱茵河图像悄悄穿过“僧侣巷”。直到启蒙运动给基督教穿孔打眼让它通风透气不再僵化之后，人们才敢毫无顾忌地重新扑向莱茵河父亲那湿漉漉的胸脯。

陷入与“悲惨的失神之夜”（Götternacht）的搏斗中的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坐在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脚下，不只是为了倾听那离发源地还不是太远的莱茵河——在他看来那是一位被缚的半神——喧腾的涛声，而且也是为了向北方眺望：“多么美啊，它流过来，/自从它离开了山脉，/在德意志土地上静静地流/心怀满足，它的渴望已得慰藉/灌溉这片土地，是它的善举，/莱茵河父亲，养育可爱的孩子/就在它建造的这一座座城市里。”

对莱茵河父亲让它的孩子们享受到的这种天上人间般的美好，路德维希·赫尔蒂（Ludwig Hölty）的想象要更简朴些，在其1776年——也即早于荷尔德林的莱茵河颂歌近三十年——发表的《莱茵河葡萄酒歌》（*Rheinweinlied* ）中，他这样写道：“莱茵河父亲给了我们天堂般的生活；/我承认吻很甜蜜，但比它更甜蜜的是葡萄酒！”

由此，这位通俗诗人促进了这一诗歌流派的发展，使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当中大受人们的喜爱，以至于简直可以认为，父亲莱茵河其实不是河神，而是德国的巴克斯（Bacchus）[3] 葡萄酒神。莱茵河葡萄酒短诗最近经历的一次短暂高潮，是由那首流行歌曲掀起来的，那首歌在20世纪60年代把整个嘉年华游行都带动得摇晃了起来："我看见了父亲莱茵河就在他的床上。/没错，他享受极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用起床。/在河床的左边和右边，站着最美的葡萄酒女神，/哎呀，老爸爸莱茵河啊，要换成是我该有多好。"

至于说莱茵河变成了旅游热线，那可不是到了现代才开始的。早在18世纪，莱茵河就把旅游者们从整个欧洲吸引到了身边，来的最多的是英国人。当然啦，他们要来看皇帝的大教堂，还有龙岩山（Drachenfels），"法尔茨"（Pfalz）——就是那为征收关税而在莱茵河中部地区建立的行宫署衙，鼠塔——据说那个令人恶心的美因茨大主教哈托就死在里面，还有那些美得令人毛骨悚然的绿林骑士城堡和废墟，每一座都有一个高贵的名字，比如"傲岩"或者是"荣岩"，而有的名字则谑趣横生，"猫"啊"鼠"的都用上了（至于罗蕾莱则还轮不到这些旅游者渴望，它是直到19世纪才时兴起来的）。不过，若是没有由葡萄酒生发出来的生活乐趣和歌唱乐趣，包括它所激发起来的强悍性情，莱茵河就绝不可能成为这样一座金矿——其宝藏之丰富，令所有在它河床深处沉睡的尼伯龙根宝物都黯然失色。

当下萨克森的达达主义诗人库尔特·施威特斯（Kurt Schwitters）在1926年夏天携父母和妻子乘轮船沿莱茵河向上游旅行时，他对那里大大超出德国其他地区的兴旺活跃状况也十分惊异："就像魏玛是思想家和精神领袖的领地一样，柏林可说是交易所投机者的地盘，汉堡则由商人盘踞，而莱茵河，那是歌唱者的园地。在那里，不管会不会，每个人都在歌唱。要么自己一个人唱，要么一群人聚在一起唱。如果嗓子不是很差的话，我更喜欢听单人的独唱。若非如此，对于不爱生事、只想享受

大自然的过路人来说，那里的歌唱就会比魏玛的精神、柏林的交易所和汉堡的商业更令人备感烦扰，因为声音太响了。”

敏感者当然早在这之前就已经预感到，这种欢乐生活的激情四溢的种种表现，只不过是在那本身黢黑的河水上跳舞的小小白色泡沫圆环而已。

“亲切的问候和美好的预示/大河的壮美引你顺流下行；/但我知道，那在高处闪烁的，/潜藏着深不可测的死亡和黑夜。”杜塞尔多夫的海涅——他对自己的称呼是“自由的莱茵河的更加自由的儿子”——就是这样总结的。莱茵河的危险首先当然在于，尽管有种种想要驯服它的举措，它仍然是一条无比强悍且完全喜怒无常的大河。那个离阴森“鼠塔”不远的摄人心魄的旋涡“宾根窟窿”（Binger Loch）[4]，曾让无数船只沉入河底，直到进入20世纪。然而，对所有从河上驶过的船夫来说最出名的危险，还是一位美丽与不幸同样无与伦比的金发姑娘，据推测，她所坐的位置就在对着圣戈亚（St. Goar）[5]的那个高耸的悬崖上。

罗蕾莱[6]到底是最早原本出自人间的姑娘还是后来渐渐被女巫化的魔女——对此早期的看法大相径庭。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第一个把她往摄人魂魄的魔女那边靠，让她以来自巴哈拉赫（Bacharach）的“Lore Lay”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7]。她那能令世上最傲慢的男人倒毙的魔力，要归功于如下悲惨背景，即在此之前曾有一个卑鄙的负心汉令她心碎肠断。设下个四处游动的男人陷阱并不能给这可怜的人儿以安慰（女权主义在那会儿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她宁愿跳入莱茵河一死了之。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来她做的孽反而更大了，因为她从此背上了黑锅，变成了传说中能把另外那半边天给迷晕的“Lureley”（布伦塔诺所用的诗名）。可是谁知道呢，要不是海因里希·海涅写下他那令人陶醉的诗篇，也许她早已在莱茵河底找到了自己的安宁；又或许，要不是作曲家弗里德里希·西尔歇为这首诗谱上如此朴素动人的曲子，也不

会弄得今天甚至连日本的小学生都会唱：“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是这样悲哀；/一个古老的童话，/我总是不能忘怀……”[8]

“罗蕾莱”并不是唯一在莱茵河畔或者在莱茵河里结束其人间生命的女子。在对那位金发魔女的狂热崇拜开始之前数年，深色头发的女作家卡罗利妮·冯·京德罗德（Karoline von Günderrode）在莱茵河畔用匕首自杀身亡。她的故事在悲惨程度上一点儿也不比她那位金发姐妹的逊色。在21岁时，她曾在一封信里悲叹：“我经常会产生那种女人原本不会产生的愿望，即投身到一场狂野的鏖战当中，去战死。我为什么不变成一个男人！对于妇人的德行和妇人的幸福，我没有任何感觉。只有狂野、宏大、辉煌的事情我才喜欢。在我的灵魂深处是不幸和不可救药的错配；而这还得继续下去并且不得不如此，因为我是个女人，空有男人的渴望，却没有男人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同的男人继续一再让这位内心狂野的女子心碎。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向这位曾和他妹妹贝蒂娜过从十分亲密的诗人女同行呼唤：“就这样张开你那洁白身躯里的血脉吧，让火热沸腾的血从千万个欢乐的喷泉中射出！我想要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我要从那千万个泉眼中痛饮，我要畅饮到沉醉，好让我能用疯狂的咆哮来为你的死亡哭泣，把你的血全部重新哭回到你的身上，把我的血也当成眼泪哭给你，直到你的心脏重新跳动，直到你能够相信我，因为我的血已经在你的脉搏中存活。”

并不是像这样的一封情书造成了问题，恰恰相反，作为浪漫派女诗人，所渴盼的正是这类书信。问题是，写信的人不对。京德罗德只把布伦塔诺当成诗人同行，而不是想要他做丈夫。她那时候爱恋的，是正在成长为法学家的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然而萨维尼对她的情感风暴的回答却是，娶了布伦塔诺的另一个妹妹——可爱的“小贡德尔”，并且还命令他的“傻乎乎的小京德

罗德”说：“看见我时别老是那么苦着个脸！你更应该做的是，对我，萨维尼，要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并且吻我。听见没有！”

剩下的事就由神话学家和古代学家弗里德里希·克罗伊策（Friedrich Creuzer）——京德罗德为之浪费心血的下一个男人——负责了。迫于其妻的压力，这位教授结束了与情感像暴风雨般猛烈的女诗人的关系，于是，在1806年的夏天，26岁的京德罗德抓起早已为此目的准备好的匕首，来到莱茵河边，用它扎向自己的心脏。京德罗德死后，那位声誉良好的教授为这份爱情所做的后续服务是，在他在世期间，不让卡罗利妮·冯·京德罗德最后的作品《墨勒忒》（*Melete* ）发表，因为他感觉从这作品中能认出他自己。

东德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和联邦德国的女权主义者们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发现了京德罗德。此前，在1906年，即她去世一百周年忌日时，曾出版过她的作品。然而直至今日，到莱茵河来游览的人们，若是从温克尔（Winkel）路过，通常不会想到这个小城有什么意义——那不幸的女诗人就埋葬在这小城的墓地里。不过这倒是不妨碍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成为她的海涅，为她歌唱：“你是那神奇土地的保护神：/你恣意迸发的火焰是月亮和心灵的光/你融化了自己，就在这儿，在草地边……/一叶空舟驶过，在夜色中的莱茵河上。”

一生悲苦的作曲家罗伯特·舒曼也被吸进了莱茵河底。自打其在海德堡开始大学生活之日起，这个出生于萨克森的人就一直梦想，把他那替换着用以下词语——“无比美妙的”“干巴巴的”“正在消融的”或者是“诗一般的”——所感觉到的“沮丧情绪”不再淹没在葡萄酒里，而是干脆淹没在莱茵河里。同样，他也是不但为世情所苦而且还为爱情所苦。先是他所爱慕的克拉拉（Clara），当时的姓还是维克（Wieck）——已经获得国际声誉的钢琴神童——久久未能答应他的求婚，因为他的经济状况实在是不尽如人意，因此她没法下嫁。到她终于成为克拉拉·舒曼夫人

之后，她也还是不能够长久缓解他生活中的痛苦——其原因与其说在于她不如说是在于这项任务根本就无法完成。这位八个孩子的母亲、音乐会钢琴家和作曲家，对她丈夫那干涸灵魂的小心呵护可谓令人惊叹，比如说吧，直到这对夫妇终于有钱买下足够大的住房，能够为克拉拉设置一间她自己的、离得比较偏远的房间，她才重新坐到了钢琴前，为的就是她的琴声不至于干扰大师作曲。

1854年玫瑰星期一[9]那天，作曲家在倾盆大雨中离开了他和家人在杜塞尔多夫居住的房子，来到莱茵河边。过浮桥要交钱，而舒曼身上只穿了一件长睡衣，于是他掏出手帕递给守桥人作为抵押。在狂欢节一切都可以当作玩笑。即便一个男人把他的结婚戒指扔到莱茵河里也是这样。可是，当他自己跳下去时也还是这样吗？一个船夫把这位对“下贱营生”和“卑鄙世道”如此厌倦，只有到父亲莱茵河那里去寻求最后庇护的作曲家从水里捞了上来，放在岸边。

舒曼自己决定，到恩德尼希（Endenich）的精神病院里去住院，他害怕自己会伤害家人。他在那个玫瑰星期一想要彻底结束的“无比痛苦的时日”又延续了两年。而他的精神就像这位音乐家极熟悉的演奏提示那样：“逐渐减弱。”

还有比沉入莱茵河底更糟糕的。要是人们再相信一次克莱门斯·布伦塔诺所说的话，那么就是，对一个人来说，再没有比那更好的事情了。在他的《莱茵童话》（*Rheinmärchen*）中，这位诗人讲述着如此令人着迷的水下玻璃宫殿的故事，在那些宫殿里，老父亲对所有被心肠冷酷的君王罚下水界来到他那里的孩子们都好生照顾，结果他们都不想再到天国去了。甚至于重生也不是不可能，只要陆地上有足够多懂得童话的父母就行：“如果我再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童话可以讲给孩子们听……就让美因茨善讲故事的母亲每天来一个把童话讲给我听，然后，为了感谢她们，我再不断地重新把童话故事讲给她们的孩子听，直到他们全都

回到上面去。”

看看，对一位说出这等话来的父亲，在浪漫派的潮流中，人们为他编花环，为他日夜歌唱，把他尊崇为“高达天庭的欢乐之梯”，难道不令人惊奇吗？德国人对深渊——那是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的渴望，渴望能在深渊找到像家一般的熟悉感觉，再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在莱茵河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了。莱茵河从来不曾变成过“深渊大饭店”（Grand Hotel Abgrund）[10]，虽然从大饭店的露天阳台上向下，就着一杯上好的葡萄酒，本可绝妙地大讲特讲腐朽历史时期的话题。莱茵河永远是那些被剥夺了一切、丧失了一切的人们最后的归宿。

对此，没人比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感受得更真切。他在未完成的短篇小说《巴哈拉赫的拉比》（*Der Rabbi von Bacherach*）中，为“他的”父亲莱茵河树立了一座最真挚的纪念碑。



科布伦茨的莱茵河全景图。

在逾越节（Pessach）前晚的盛大庆典上，化装成犹太人的基督徒悄悄运进来一个死孩子，把他藏在拉比家摆满丰盛象征性食物的逾越节家宴桌子（Sedertafel）底下。先知亚伯拉罕（Abraham）预感到，一旦这将被说成是犹太人所为的劣行为人所知，便会爆发一场大屠杀。于是他带上自己的漂亮妻子（撒莱）离开了那个地方，坐上小船向莱茵河上游出逃。当他们在河上逃了一阵子之后，撒莱（Sara）深深的绝望情绪便被同样深邃的安谧之情所替代。“真是如此啊，好心肠的老父亲莱茵河受不了他的孩子们哭泣；他替孩子们擦去眼泪，用可靠的臂膀托着他们轻轻摇着，给他们讲他那些美妙的童话故事，还许诺送给他们最最珍贵的宝物，甚至有可能就是那些沉在河底的最古老的尼伯龙根宝物。”

人们若是用心倾听布伦塔诺和海涅的话，那么莱茵河就成了德国人所发现的最具有母性的父亲。不过海涅之所以愤怒实在是太情有可原了，这位犹太诗人，在年轻时受洗成为基督徒，因为觉得这样做有利于自己的职业发展，然而在许多人眼里却仍然是那个“犹太人海涅”；这位思想左倾的革命者，最终在巴黎的“床褥墓穴”里终了其生，因为他在德国已经彻底变成了“非人”。故而，当莱茵河不但不履行他那向一切心怀悲苦者喷涌慰藉的父亲职责，相反还陷入德法民族主义之争的中心时，海涅自是没法不怒。

然而，倾慕法国人的海涅——对于德国人希望自己民族崇高伟大的渴望他是发自内心地憎恶——却忽略了这一点，即若非法国人只占据了莱茵河的一段而不是把整条河都纳入自己国土的话，莱茵河也许根本就不会成为他亲爱的父亲。

“对我们法国人来说，德国人对莱茵河的这种深厚的崇敬之情，很难理解”，法国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38年对其莱茵河之旅曾如此记述。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也许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爱慕莱茵河的法国人——在其1840年的游记中说，他曾这样想过，

假若不是在他童年时代有个德国仆人在他床头挂了一张“鼠塔”废墟的画并给他讲那些与之相关的故事，哈托主教那阴森可怖的“鼠塔”是否还会那么吸引他。

对莱茵河的争夺始于1794年晚秋，就是法国革命军占领莱茵河左岸土地之时。不过，当时所涉及的那几个莱茵国家一开始并没有感到特别不幸，人们对于由几十个互相竞争的小选侯国组成的“拼贴地毯”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所以，当拿破仑到来时，对于他所带来的富于自由精神的、统一的法律，人们是很欢迎的。一直到解放战争[11]之后，也即法国人不得不重新从莱茵地区撤退的时候，德国人才热血沸腾起来。

德国诗人、后来成为政治家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以其《莱茵河，德国的大河，却不是德国的边界》（*Der Rhein*，*Deutschlands Strom*，*aber nicht Deutschlands Grenze*）一文喊出了口号。突然之间，老卡尔大帝的神魂又在莱茵河的水面上游荡了：日耳曼人不想再一次被排挤到西方文明的边缘。虽然德国人这时候在政治上一如既往地仍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但也正因如此，它才更为自己在文化上的民族精神骄傲。

当1840年法国政府重新对莱茵河左岸地区提出要求时，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歌手大战。在莱茵河右岸，马克斯·施内肯布格尔（Max Schneckenburger）[12]高声呼喊：“声声呼唤惊雷般炸响，/像利剑铿锵、怒涛拍岸：/奔向莱茵、奔向莱茵，奔向德国的莱茵河！/谁要来做这大河的守卫？/亲爱的祖国，不要惊慌；/在莱茵河畔，有忠诚卫士为你站岗。”

在巴黎，这首象征条顿人宣战的歌曲——它在德法世仇之战（指1870/1871普法战争）期间悄然上升为国歌——受到法国人的激烈反击：

Au premier coup de bec

Du vautour germanique，

Qui vient te disputer ta part d’onde et de ciel，

Tu prends trop tôt l’essor，roi du chant pacifique，

Noble cygne de France，à la langue de miel.

［由于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的这首诗从未有过正式的德文译本，在此只好权且以散文体译文替代：“日耳曼老鹰刚一张嘴叫唤，要跟你争抢你份内的波涛与天空，你——和平歌声之王，高贵的法兰西天鹅，用甜蜜的喉舌唱着，已高高飞上云霄。”］

这歌唱之战的下一轮——这时它已经泛滥成了鸟类诽谤大战，是由尼古劳斯·贝克尔（Nikolaus Becker）开启的：“你们得不到它，/自由的德国的莱茵河，/即便你们像贪婪的乌鸦一样，/嘶哑着嗓子叫喊。/只要河水还在静静地汩汩流淌，/披着它那绿色的衣裳，/只要船桨还在刷刷作响，/在它的波涛里翻飞激荡。”

当罗伯特·舒曼和其他作曲家忙着为这些歌词谱曲，好让它们牢牢占据每一个德国人的耳朵时，阿尔弗莱·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反驳道：“我们曾经得到过它，德国的莱茵河。/在我们的酒杯里，曾见它光芒闪烁。/你们用流行歌曲的自吹/来污染它骄傲的航道，/我们骏马的铁蹄，将把你们踏成血泥。”

海因里希·海涅从巴黎跳出来插入到两个阵营中间。在他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 ）中，父亲莱茵河与他走失的儿子虽然对在十三年后终于重新相见万分高兴，但是马上笔锋一转就指向了政治。海涅笔下的莱茵河悲叹，“尼克拉斯

（Niklas，即前文中的尼古劳斯）·贝克尔的诗歌”如何让他的胃沉甸甸地坠痛：“他歌颂我，仿佛我还是/最最纯洁的处女，/决不让任何人掠去/头上的荣誉花环。//每当我听到，这首愚蠢的歌，/我就想撕扯/我白色的胡须，我真想把我自己，/淹死在我这条河里。”

因此，这位老人渴望“穿白裤子的法国人”回来，直到诗人向他保证，法国人也正在尽力想要成为德国的“腓力斯人”[13]，他才安下心来。

只有像海涅这样特立独行的冷嘲热讽者才能够看出，两个阵营中为民族情绪所左右的摇笔杆的文人们忽略了什么：在所有这些好战的喧嚣当中，父亲莱茵河最终变成了一个无助的、需要保护的形象——这个形象此前只在古罗马时代才如此鲜明，那时候莱茵河总是被描述成被捆绑起来的战利品。

更令人迷惘的是莱茵河的性别角色。1883年，也就是在那场对法国的伟大胜利和紧随其后的德意志帝国建国之后十二年，在吕德斯海姆竖立起了尼德瓦尔德纪念碑——石头雕塑的“莱茵河卫士”。然而，站立在基座上面的是谁呢——那骄傲地以剑拄地、以保卫“神圣地标”为职责的人？那可不是施内肯布格尔诗歌里所唱的“平凡、虔诚和强壮”的德国男人，守卫父亲莱茵河的，是一个女人：日耳曼女神。

在波塔韦斯特法利卡（Porta Westfalica）、德意志角（Deutsches Eck）和屈夫霍伊瑟尔之间的这片地区，狂热崇拜威廉皇帝的纪念碑制作者们本来几乎不会给别人留下机会，只会把德国第一任皇帝本人的塑像安放在基座上，而他们恰恰在这里把日耳曼女神作为首选，这是不是出于偶然呢？（至于在条顿堡森林允许“赫尔曼”把他的剑伸向天空，自是不言而喻。）当然，除了吕德斯海姆山上的那一尊，其他地方过去和现在也都有日耳曼女神雕像，然而像她那样富有战士气质的再没有第二座。在其他地方，她在纪念碑上的角色更多地只限于为那些为祖国阵亡

的儿子们悲伤，而不是本身以战士的形象出现，她只是战士的母亲，战士的遗孀。

或许，那些纪念碑制作者们的脑子里也想到了《尼伯龙根之歌》，那里面血腥激战的主战场沃尔姆斯就在沿河上溯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如果不是布伦希尔德和克里姆希尔德（Kriemhild），还有谁是能叫任何男人（西格弗里德[14]除外）发抖的日耳曼女战士的先祖呢？

不光是父亲莱茵河滋养生息和关爱抚慰的母性以及耸立在他身旁的强壮的卫士女儿令人对他的性别辨认不清，19世纪里，就其性别认识而言，在他的水面之下又一次激荡起迷惘的旋涡。这一次又是海因里希·海涅，又是他第一个嗅出了德国人的古怪念头。在他的《冬天的童话》里，他让莱茵河老父亲说出了心中的忧虑，那就是德国人把他塑造成一个“最最纯洁的处女”。这忧虑是有道理的。不过，在把他“处女化”上面，与其说是那令人憎恨的尼古拉斯·贝克尔作的“孽”，不如说更多的是莱茵河本身的名字所致。在一个如德国这般爱洁如癖且酷爱语言神秘学（Sprachmystik）的国家，“莱茵”（Rhein）这个与“纯洁”（Rein）谐音的名字可不是随便叫的。

恰恰在德意志的天主教摇篮里，莱茵河准备以未受玷污的父亲形象与圣母玛利亚一争高低。如果不是想要亵渎那被德国人尊崇的“纯洁”，法国士兵们在胜利渡过莱茵河之后故意炫耀且成了定式的对着莱茵河撒尿的行为，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我已不再是纯洁的处女，/对此法国人心知肚明，/他们一再把那胜利之水，/掺入到我的水里。”这就是海涅对这个奇特习惯的描写。甚至于乔治·巴顿（George S. Patton）——在美国第三集团军于1945年3月22日到23日夜里在尼尔施泰因（Nierstein）渡过莱茵河之后——据说也找出时间完成了这个古老的“对着莱茵河撒尿”的仪式。在出售战争纪念品的小贩们那里，一直都还流传着那张照片，上面所呈现的据称就是那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当荷尔德林在其《莱茵颂》第四段中以下面这个句子开头时，他远远地甩开了那些贬低莱茵河的传说：“纯洁的起源是一个谜。”这首诗根本没有去掰扯那些基督教中处女生子的神话，它讲述的是莱茵河的生命，它“从圣洁的怀抱中幸福诞生”，成为那些少数的被选中者，也就是“半神半人”，他们一生都是“自由”的，无论是必须从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冲刷出一条水道来（比如在那狭隘的维亚马拉峡谷），还是在与他们和谐依偎的山水风景之中（比如在上莱茵河谷[15]），都是如此。

近代德国的头号语言神秘学家、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把荷尔德林这首关于莱茵河的诗阐释为关于命运与自由的伟大的世界名诗。莱茵河的名称“Rhein”就是“纯洁者”（Reiner），而“纯洁者”（Der Reine）是唯一的“自由者”（Freier），因为对其而言，自身意志和环境对他所做出的反抗是不矛盾的：德国的理论建树就是可以如此活跃地奔涌，即使这会令头脑清醒的词源学家们大惊失色也无关紧要。词源学家们指出，莱茵河的名称更有可能出自印欧语系词源“rei”，而这个词是“流动”的意思，它肯定绝对不会同总被硬扯在一起的“纯洁”有什么亲缘关系。纯洁的莱茵河听上去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以至于它必须是真的。

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在其《莱茵的黄金》的结尾让绝望的莱茵河仙女们发出悲叹时，心中必定也是这样想的。仙女们悲叹道：“莱茵的黄金！莱茵的黄金！/纯洁的黄金啊！/还在闪闪发光，/在深深的河底，你这不起眼的小东西！/可爱又忠诚/可惜深沉河底；/虚伪而怯懦的/却在上面欢庆。”

这里同样也不只是纯粹在玩词语游戏，而是另有深意存焉。自打那个有魔力的尼伯龙根族侏儒阿尔贝里希（Alberich）从莱茵仙女们那里抢走了黄金，并把它锻造成带有诅咒、魔力无穷的指环之后，众神之父沃坦便不再把这如今被他据为己有的宝物交还给水仙们，而是利用它来承担他那富丽堂皇的英灵殿的花销。对他的惩罚在经过三个晚上的舞台

表演之后才赶到，他以及由他所创建的文明全部在《诸神的黄昏》中灰飞烟灭，而得到了救赎的莱茵河则又重新可以在其一如往初的纯洁状态中默默流淌了。

1986年11月1日山德士公司（Sandoz AG）在瑞士哈勒（巴塞尔市郊）的工厂所发生的那场灾难[16]，可没有按着瓦格纳的剧本上演。虽然一场大火烧毁了体现人类进步信念的机构，但是以莱茵河作为具体形象体现出来的受污染的大自然却没法感觉到它复了仇。灭火的水把有毒物质排入河中，其后果是河水受到污染，鱼类大量死亡。这一来，不光是瓦格纳的崇拜者对技术罪孽——这种罪孽似乎把对造物的最后一点崇敬都丢掉了——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于是，挽救莱茵河的措施得以采取，其结果是，时任德国联邦环境部部长的克劳斯·特普费尔（Klaus Töpfer）在1988年5月就已经敢于为宣示河水的清洁而跃入莱茵河中游泳了。

关于莱茵河在令人惊奇的短时间内就痊愈了——而且这更多是归功于莱茵河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归功于人类的慈善措施——的报道，人们在听到时与其说心生感激不如说更受刺激。就像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一样，20世纪的生态学家们宁愿把莱茵河看作一位孱弱无助的父亲。1992年，科隆大学就山德士公司的火灾举办了一次意在回顾的会议。一位与会者宣称："父亲莱茵河曾经病入膏肓，那时他几乎站不起来，眼看着就要倒下去了。现在他虽然已经能够离开重症监护室，但仍然还一直躺在病床上。"

奔向莱茵、奔向莱茵，奔向德国的莱茵河！谁要来做这大河的守卫？……法国人以及其他的欧洲人再一次诧异了，不明白德国人到底要对这条河做什么。

莱茵河经历的最后一次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发生在1967年4月25日。盛殓着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遗体的棺材在科隆

大教堂做完追悼仪式后被放在船上运往巴特洪内夫（Bad Honnef）。这场仪式令那些把联邦德国政治舞台上节目不多视为缺陷的人趋之若鹜兴奋异常，而在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看来却令人“呆若木鸡”和“望而生畏”，尽管他始终自视为《女水精的强悍老爸》（*Undines gewaltigem Vater* ）[17] 的顺从儿子，对这位父亲，他愿意相信其所说的一切，只有“夏天般的热烈”除外。这位联邦德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的完成于这条“黑暗而令人压抑的”大河之上的最后行程其实本来大可宽怀以对。无论如何，没有人像阿登纳那样如此强烈地极力要求让波恩在1949年成为联邦德国的（临时）首都，由此而使得在那彻底崩溃的时刻寻找方向的目光再一次从莱茵河望向西方。在（纳粹）褐衫队的野蛮暴行过去之后，德国人绝不应当再拿他们内心深处残存的日耳曼野蛮德行出来卖弄，并且还从这种日耳曼野蛮德行的中心生出个远远优越于所有西方文明的“文化”来。亲西方观念终结了德国的特殊道路。然而这只是意味着，作为特意宣示的口号它被终结了，而作为一股暗流它至今仍存。

当代德国人盼望能有适合用来解释伟大民族诞生的神话，然而这纯属徒劳。从据说曾在屈夫霍伊瑟尔睡觉的巴巴罗萨（Barbarossa，也即“红胡子”）皇帝到《尼伯龙根之歌》，从无往不胜的切鲁西人首领赫尔曼到威廉皇帝和他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一切的一切全都是毫无价值的沉渣。只有“父亲莱茵河”以其光芒耀眼的多彩多姿成为独一无二的大河，即便在我们这已然变得小心谨慎的当今时代，他仍然能够担当神话的源泉，灵魂之镜鉴，哪怕仅仅只是因为他会邀请人们如此伤感地默默观望，正如浪漫派诗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经做过的那样：“没有什么地方能够比在莱茵河畔可以令人们的回忆如此鲜明，回忆德国人的过去和他们本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注目凝望这条帝王般的大河，每个德国人的心里都必定会充满哀伤。看那，他怎样以不可阻挡之力穿过山岩，奔涌而下，然后用他那宽广宏大的波涛漫过无比富饶的低地，最终消失在平坦的土地上；正是因此，莱茵河成为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历史

和我们的性格的最忠实不过的形象。”

作者：特·多

译者：郑冲

参阅：深渊，德国人的性情，疆界，故乡，男声合唱，疯狂的自由，爱整洁守秩序，纯洁戒律，林中寂寞，女人

---

[1] 台伯河，意大利语称特韦雷河（Fiume Tevere），意大利第三长河，源出亚平宁山脉富默奥洛（Fumaiolo）山西坡，向南穿过一系列山峡和宽谷，流经罗马，于奥斯蒂亚（Ostia）附近注入地中海的第勒尼安海，全长405公里。

[2] 卡尔大帝（742～814），即查理大帝，也称为查理曼，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

[3] 巴克斯（Bacchus），即狄俄尼索斯（Dionysus），古希腊色雷斯人信奉的植物神和葡萄酒神，罗马人称巴克斯。

[4] 这里原先有一石英岩礁阻挡航道，往来货船至此要卸下货物另从陆路运输，后被炸开，留下窟窿，故名。

[5] 金发姑娘指罗蕾莱，罗蕾莱礁石附近是莱茵河中最危险的河段，河中有一沙洲，两侧河流一急一缓，汇到一起后形成很大的旋涡，使不少过往船只遇难。来自法国的传教士戈亚（Goar，约495～575）为救助经常遇难的船员曾定居在罗蕾莱，并成为当地民众的保护神，这个城市后以其名命名为圣戈亚（St. Goar）。

[6] 罗蕾莱的德语拼法为“Loreley”，由古德语“Lore”和“Ley”两个单词组成。“Ley”在古凯尔特语中的意思是“礁石”，“Lore”则来自中古德语动词“lorlen”，意为“小声说话”。据说，罗蕾莱山岩中曾有一个水流湍急的小瀑布，瀑布的水流形成了重重回声，听起来就像是从山岩里发出窃窃私语般的说话声，故被当地人命名为“Loreley”。

[7] 指布伦塔诺的诗《罗蕾莱》，开头两句是：“莱茵河畔的巴哈拉赫，居住着一位魔女……”

[8] 这四句诗引自冯至先生的译文。

[9] 玫瑰星期一（Rosenmontag），在复活节前48天，圣灰星期三前的那个星期一，是莱茵河地区狂欢节高潮开始之日，科隆、杜塞尔多夫等城市在这一天会举行盛大的狂欢节游行。

[10] 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中占据十分重要地位的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曾以如下比喻批判高高在上对平民生活没有切身体验的法兰克福学派，说他们住在（豪华的）“深渊大饭店”里，手端一杯开胃酒，从阳台上往下观看世界的苦难。

[11] 指1813年德意志反对法国拿破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在德国史上称解放战争。

[12] 马克斯·施内肯布格尔（1819～1849），爱国歌曲《莱茵河卫士》（Die Wacht am Rhein）的歌词作者，这首歌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成为德国人最爱唱的爱国歌曲。

[13] “腓力斯人”（Philister），地中海东岸古代居民，另有市侩、庸人之意。

[14] 布伦希尔德、克里姆希尔德和西格弗里德都是《尼伯龙根之歌》里的人物，布伦希尔德也是北欧神话中的女战神，在《尼伯龙根之歌》里是勃艮第国王贡特的妻子，因与小姑子克里姆希尔德发生争执导致克氏的丈夫、曾杀死怪龙获得尼伯龙根宝物的勇士西格弗里德被杀死，后克氏嫁给匈奴王并在多年后复仇。参见《德语文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5] 这个词也有求婚者和嫖客的意思。

[16] 1986年11月1日深夜，位于瑞士巴塞尔市的山德士公司化工厂发生火灾，装有约1250吨剧毒农药的钢罐爆炸，硫、磷、汞等有毒物质随灭火用水大量排入莱茵河。

[17] 《女水精的强悍老爸》是伯尔一篇短篇小说的名称，Undine，也作Undina和Ondine，拉丁文中原指“波浪或波浪的使者”，欧洲神话中的水精灵，传说只有与人类结婚才能获得灵魂，因此总以美少女形象出现，诱惑经过的年轻男子。

社团迷

日耳曼人不喜欢他们的人类同胞和他们挨得太近。我们远古的祖先就总是尽量避免在城市里居住。即使最普通的聚居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社交方面的苛求。密密麻麻的东西还是留给植物学去吧。对他们来说，最好不过的居住地是“单独的和分开来的，如果恰好有一眼泉水、一块地、一片树林”很合他们的意的话。至少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那里流传下来的记述是这样说的。

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很难想象，然而的确如此：一个由独来独往者、孤僻怪异者、不合群的人和没教养自顾自的人组成的民族，这个名声一直到20世纪早期始终与德国人紧密相伴。不管怎么说，早在17世纪，日耳曼人——就是那些肩上扛着大木棒、自我感觉良好地在森林中穿行并且只满足于同自己家族中人交往的人——的有教养的邻居们就已经不得不忍受的现象是，与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相反，德国人没有什么优雅的社交生活可以拿出来展示。

要想优雅礼貌地相互交往，首先得有优雅礼貌的语言。而恰恰在这点上，处于中世纪边缘、正在向近代进发的德国，情况却是相当不妙。虽然路德翻译了《圣经》，并由此而为新高地德语奠定了基石，可是广大百姓们却仍然一直在说他们那说惯了萨克森德语、低地德语和阿雷曼德语的嘴巴所会说的方言。在贵族的庭院里，人们嗫嚅着鼻音用法语交谈，对这门语言的掌握自是有好有次，参差不齐；与此同时，任何一个想要得到严肃认真对待的学者，都使用拉丁文写作。

最早的德国人社团是语言学会。1617年，也就是三十年战争爆发前

不久，安哈尔特-克腾的王侯路德维希一世（Fürst Ludwig I. von Anhalt-Köthen）得以宣告“丰收学会”成立。该学会的使命是：“引导我们的已被外来华丽词语所冲淡和糟蹋的高贵母语重新回归德语本身古老、传统和与生俱有的纯洁、光彩和兼容并蓄，使它和谐融洽地向前发展，并把它从外来语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在战争期间仍旧得以成立的巴洛克风格的语言学会，比如“正义松林学会”（die Aufrichtige Tannengesellschaft）或者“佩格尼茨花会”。它们似乎都把反抗外来语的统治看作比克服德意志地区内部语言中存在的方言混乱现象更为急迫的问题。这个早期的启蒙阶段虽然还未涉及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要到19世纪才开始主宰社团生活，但是它显然也觉得这事挺难办，即从内部着手来统一和提升德语，而不是先去忙于把德语同外来语区分开。甚至像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那样通晓多种语言学识广博的学者——他自己的著作当然都是用拉丁文和法文撰写的，在由其作为主要创办人参与组建的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于1700年成立时，主要考虑的也是：“保持古老的德意志主要语言的自然纯洁性，维护其独立形态，使之不致最终变成一种没有韵律的、乱七八糟的大杂烩。”

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在18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把德国人从其故步自封、只知道依赖家族和行业组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成为乐于接受新事物的社会成员。布雷斯劳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加韦（Christian Garve）——与伊曼努尔·康德和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齐名的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抱怨恰恰在受过教育的市民当中存在着的“孤寂”状态，这种孤寂状态使这些有教养的市民“在与其他人的轻松活泼的交往活动中表现得很笨拙”。1788年，阿道夫·克尼格男爵（Adolph Freiherr Knigge）首度出版了其著名的礼仪指南《关于人际交往》（*Über den Umgang mit Menschen*）。他在论述之所以有必要撰写这样一本书时说，与其他国家相反，在德国缺乏（讲究优

雅举止礼仪的）礼仪精神（esprit de conduite）。哲学家和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则试图创建一个“社交行为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他摒弃了克尼格的交往规则，因为那些规则仅仅只是为在社交圈里展现良好形象的目的服务。而与此相反，真正的社交所关涉的是“完整的交互作用”，这只能通过如下途径达到，即“一个人……的作用范围被其他人的作用范围穿透且这种穿透要尽可能广博多样”。对单个人来说，“每个人的各自的极限点”都会给他提供“朝向一个另外的和陌生的世界的展望，由此，他就会渐渐认识人类的所有现象，即便最不了解的性情和关系也会为他所熟知并且变得就像在邻里之间一样”。

教育理想主义和只有同其他有教养的人交往才能成为情感健全的人的信念，为德国人养成社交习惯的这个最初阶段打下了烙印。在18世纪，德意志民族特色（Deutschtümelei）并不怎么体现在三角帽[1]或者是双角帽上——这种帽子如今普通市民也终于可以骄傲地戴在头上或者夹在腋下了。德国人不想再在欧洲邻居们——如今与这些邻居的贸易相当兴旺——面前自惭形秽。人们发现自己可以以世界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于是一门心思把这当成改变形象的最佳途径。汉堡的新闻从业者雅各布·弗里德里希·兰普雷希特（Jakob Friedrich Lamprecht）甚至还在1741/42年间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世界公民》（*Der Weltbürger*）的周刊。

至于早期社交生活恰恰在汉萨城市里开始蓬勃兴起，这可不是偶然。早在1622年，罗斯托克——远早于柏林和哥廷根——就已经建立了一个自由的科学院。成为城市社交生活中心的则是汉堡：1660年时，那里已经举办了第一场面向公众的音乐社（Collegium musicum）音乐会，而那更为著名的由格奥尔格·菲利普·泰勒曼（Georg Philipp Telemann）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领导的莱比锡音乐社，还得在足足四十年之后才出现。1765年成立的汉堡“爱国者会”（Patriotische Gesellschaft）确定自己的职责是“促进艺术和有益的行业”，该协会中汉萨城市贵族的那股

自傲劲儿直到今天还是那么足。还有共济会运动，该运动于17世纪首先在圣公会势力强盛的英国产生，它在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精神的指导下，把手工业者、商人、艺术家和贵族资助人聚集在一起用餐、演讲和讨论。这个运动在德意志地面上的兴起也是发源于汉堡。凡在整个社会开始流动起来、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的地方，建立新社团的需求也会自然出现。

没有任何故弄玄虚，在信奉新教的北部地区，从波美拉尼亚至不来梅，人们同样聚集起来组成了最早的读书会，还开办了可供人借阅的图书馆，好让在衣帽间工作的女孩和马车夫也能够“提升自己的市民素质”。妇女们能够走进这种地方在当时可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所有其他的社团、团体和共济会的各个分会都是纯粹的男人俱乐部，尽管如此，一两位受过教育且未婚的女士还是可以容忍的。像卡尔斯鲁厄的“发戒会”（Gesellschaft zum Haarenen Ring）那样由私人朋友圈子生成的社团只是罕见的例外。这个社团的男女成员每个星期都聚会，佩戴用社团成员头发制成的戒指作为社团标志。甚至明斯特的“贵族女士俱乐部”（Adlige Damenclub）也基本上是由男性成员组成。

女士们隆重出场是在“沙龙”里——对这种聚会场合的称呼她们自己喜欢用“茶桌”（Teetisch）或“阁楼小屋”（Dachstube）这类更低调些的词语。这种自由的、富集才华与进步的社交形式至今仍为人们所钦佩，它萌芽于亨里埃特·赫尔茨（Henriette Herz）及其丈夫在柏林市中心区的住所。开始时女士们只是聚集在侧房里，共同释放她们对歌德的热烈的倾慕之情，而男人们则在真正的沙龙里讨论重要的时政问题。然而，在1780年的某个时候，男士们讨论的声音渐渐变得沉闷，而在旁边的房间里，女士们的茶话会却开得好不热烈活跃——于是两拨人便合起来变成了一个圈子。在这之后的二十年里，女主人亨里埃特·赫尔茨每个星期都能把科学界和艺术界居于领袖地位的头面人物，如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威廉·冯·洪堡兄弟，或者是作家让·保罗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邀

请到自己的沙龙里来。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那里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多罗特娅，也就是摩西·门德尔松的大女儿，两人于1796年去了耶拿，并在那里同施莱格尔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及其妻子卡罗琳一起，把浪漫主义的生活、写作和恋爱从施普雷河畔转移到了萨尔河畔［后来卡罗琳爱上了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耶拿的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世外桃源便随之终结，卡罗琳对当时还是她妯娌的多罗特娅深深喜爱也骤然转变为深深的憎恶）。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也是亨里埃特·赫尔茨的常客。他在这个德国首位沙龙女主人处收获的柏林社交生活经验，对其社交行为理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施莱尔马赫创造了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交谈（Konversation）一词，这种交谈的目的只在于使个人从一切市民身份角色以及家庭/家族角色的笼子中解放出来并由此而变成更好的人，除此之外再无他意。这比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令学术界劳心烦神的《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的推出时间早了将近两百年。

至于这种新的社交活动最好是在女士的庇护下发展，倒是同浪漫女性的形象颇为契合。与持男女平等观念的女权主义大不相同，浪漫派尊崇女性，因为女性在情感方面更敏锐细腻，因而被认为是真正富有人情味的人，与爱虚荣和好出风头的男人相比，在她们身上能更好地体现出“无尽的人性”（施莱尔马赫）。

拉埃尔·莱温（Rahel Levin），就是后来改为夫姓瓦恩哈根的那位女士，成为擅长促成人们相互交谈的女主人的理想形象。她先是在赫尔茨家里享受到沙龙聚会的活跃气氛，然后，在1790年，她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个沙龙。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塔诺也是这位柏林第二伟大的沙龙女主人的常客，虽然他时不时要抱怨那里面为“杂乱无章的谈话”所笼罩，但总的说来，他对女东道主给出的评价是：“她没什么要求，允许人们

把谈话引向任何方向，甚至引到不正经的话题上，对此她只是微笑处之，她本人则脾气极好、乐于助人，同时又特别机智风趣。”

布伦塔诺这话，与拉埃尔——她曾说过自己最大的追求就是最终能够实现“（单纯的）人与人共同相处”（Mensch unter Menschen）——对自己谈话才能的评价倒是相去不远：“我对社交真是喜爱至极且一向如此，并且我坚信，我就是为此而生、天性使然而且拥有这样做的条件。我从不走神又极端敏捷，因而能够领会、回答和处置一切；我能够很好地感受自然和所有的关系，明白什么是玩笑、什么是庄重；在沙龙里所能发生的事情，除了笨拙之外，没有什么是我不熟悉的。我也很谦逊，不过我会通过谈话来表现自己；同样我也可以很长时间不说话；我喜欢与人打交道，我几乎可以容忍一切人。”

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这些早期沙龙女主人们的内在关系，即她们多半都是犹太人。与她们的基督教女性同道相比，她们更多地承受着边缘化和飘零之苦，找不到可以让她们展示社交才华的地方。那种想要突破一切传统束缚的迫切需求，在她们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柏林的犹太沙龙是社会之外的社会空间。”阿伦特如是写道，并且给出了一个尖刻的概括性结论：“在正走向灭亡的和尚未稳固树立的社交生活之间，犹太人成为填补空缺的人。”

的确，犹太沙龙的辉煌时期只持续了二十五年：1803年，亨里埃特·赫尔茨的丈夫去世，尽管举办沙龙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丰盛的自助冷餐来引诱那些声名显赫的客人，但是这位遗孀在此之后便没有了能够担当体面女主人所需的钱财。拉埃尔·莱温的第一个沙龙在1806年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当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遭受毁灭性惨败之后，拿破仑的部队占领了柏林（直到1819年，拉埃尔——这时已经结婚成了瓦恩哈根夫人——才得以开办其第二个沙龙）。

不过，这头一拨沙龙之所以失败，并不能完全怪罪于对一切社会活

动进行监视的法国占领军，此外，也不能全都归咎于如下事实，即许多此前在赫尔茨和瓦恩哈根夫人那里进进出出的男人们如今又重新发现了还是要在自己圈子里聚会的乐趣。不论成立于1809年并至今仍存的“无法无天会”（Gesetzlose Gesellschaft）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目的与宗旨，如其会员霍夫曼某次在背后嘀咕的，最根本的问题都是“要以美好的德国方式享用午餐”——而这所谓的“美好的德国方式”里反倒有一条法则，那就是：女人得待在外面。

其实，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更在于，在备感受辱的普鲁士，精神风向已经由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转向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像路易丝·冯·福斯女伯爵（Luise Gräfin von Voß）这样今天已被遗忘的人物，担当起了新的女主人的角色。在她那富丽堂皇的伯爵府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军队精英——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人与人共同相处”，而是把推行反法策略当做目的了。不言而喻，在法国占领时期，这种事情只能秘密进行。这位女伯爵的沙龙始终受到怀疑，被认为只不过是为传闻纷纭的柯尼斯堡“道德联盟”（Tugendbund）[2]做掩饰的一个道具，而这个联盟设定的目的是：“重新振作由于不幸失败而被绝望笼罩的情绪，抚慰身体上和道德情感上的痛苦，致力于青年的民族性教育，重组军队，在各地培养对普鲁士王朝的爱戴和归属感。”

同样，由作曲家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1809年创办于柏林的第一个德意志男声合唱社团“歌咏聚餐”，也不只是为了训练出完美优雅的声调而把人聚集在一起练歌，而是为了如下目的：强化德意志的艺术并由此而强化德意志的民族意识。1810年，热情似火的爱国主义教师和出版人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和十一位朋友一起，在柏林的哈森海德——（Hasenheide）也叫“兔林”，组建了秘密的“解放和统一德国德意志联盟”；一年之后，由该联盟发展出了体操运动，该运动按照“活泼、自由、快乐、正派”的格言培养青年，让他们锻炼出强健的体魄。这个运动其实还有一个目的，那便是，尽快培养出健壮青年，然后把他们输送

到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去。

1811年，以诗人阿希姆·冯·阿尔尼姆为中心，组成了“德意志基督教协会”（die Christlich-deutsche Tischgesellschaft），该协会的章程明文禁止“妇女、法国人、腓力斯人和犹太人”入会。虽然这个协会一直在玩浪漫主义的把戏，比如在每次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紧跟着都要来一番对之进行嘲讽的反演讲，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却是海因里希·海涅大约二十年后在其流亡法国期间同德意志浪漫派进行清算时给予猛烈抨击的那种精神：“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就是他的心胸变得狭窄，缩成一团，就像皮革遇冷收缩一样；就是他憎恶一切外国的东西，就是他不再愿意做世界公民，不再愿意做欧洲人，而只愿意做心眼狭小的德国人。对此，看看那些充满理想主义思想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年轻人，就是扬先生系统训练的那帮人，我们就能明白；对使德国升华的那种最优雅神圣的思想意识的反对由此开始，那是卑鄙、粗鲁、下流的反对。他们反对的其实就是那种人道主义思想，那种所有人类皆为兄弟的思想，那种世界主义思想，那是我们伟大的思想家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让·保罗所推崇的思想，同时也是德国所有有教养的人始终推崇的思想。”

海涅把这种新的以爱国主义为幌子的狭窄心胸恰恰归罪于“体操之父”扬，这可不怎么公平。诚然，扬的确是正在觉醒的民族意识的先锋人物，他也的确曾对自己国家中那些“外国玩意儿”大光其火并总是喜欢把德国人视为被上天选中的民族。但是，在结束那篇写于1808年发表于1810年的檄文《德意志民族》（*Deutsches Volkstum* ）时，他并没有要求铲除一切非德意志的东西，而只是爆发出席勒式的激情：“人类如今已被人性的纽带永世缠绕，虽然一时会为狭隘私心所附，但是很快便会随更高的期望而重新统一。联合的海洋潮起潮落永不停歇，而今所有的一切都归于一统。”

其实，扬所要与之斗争的，首当其冲的便是那种德国式的自顾自，那种“对利己主义的顶礼膜拜”。同样是在《德意志民族》当中，他写道：“人注定要成长为人，而成长为人这份高贵他是无法独自获得的……那种永远只顾自己的人鄙弃自己的义务，并由此而丧失了作为人类中之一员的权利，他对其‘自我’的培养不是在培养真正的人，不可能培育出成熟的人性，在跃起的瞬间，青春和生命已从他身上逃离。在没有人烟的荒漠里，在悄无声息的幽居所里，道义感将不会变成美德，任何活物都会逃离那不毛之地。”

就他所提出的这些警告而言，扬可以说是更接近于启蒙运动中乌托邦式的社交活动拥护者而不是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死心眼儿——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中把他给抬了出来做幌子并把德国引向了灭亡。扬坚信，共同点一开始必须先在自己语言、历史和传统的根子上生长，这信念并不是什么丑闻。

对“体操之父”声誉的完全另类的伤害，是第二种思潮造成的。这种思潮同样也落在了他的身上，那就是完全与政治不沾边、纯粹为社团而社团的社团迷（Vereinsmeier）。这种社团迷成了德意志庸人派也即毕德迈尔派的孪生兄弟。

在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遍布德意志土地的昂扬精神、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统一和民主的民族国家的希望，被复辟的封建君主给扼杀了。尽管如此，在三月革命前的那个时期，在庸常的表面之下，到处都在继续躁动不安——这种躁动不安的最欢腾的表现形式便是汉姆巴赫集会。1832年的那次集会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大约三万人参加，参加者有男有女，有大学教师也有不识字的人，还有很多波兰人——他们是在十一月起义失败之后逃亡到德国来的。人们一路走到宫殿废墟那里，高声呼喊：“自由、统一的德国万岁！德国人的盟友波兰人万岁！尊重我们民族和独立的、德国人的兄弟法国人万岁！一切挣脱锁

链、发誓与我们结成自由联盟的民族万岁！祖国万岁！人民主权万岁！国际联盟（Völkerbund）[3] 万岁！”

自由主义者要求最终给予不受任何限制的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针对这个要求，普鲁士王国做出了严厉回应，那就是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4]，它给整个国家套上了一张紧绷绷的出版审查禁锢之网。该决议导致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教授被禁止从业，最早建立的那些大学生协会被解散，扬的体操运动也被禁止，所谓的对蛊惑民心者的追究愈演愈烈。在这当中，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先是被逮捕，后来被警察监视居住。

直到1837年，扬才得以恢复名誉，并由此而重振他的“体操训练”。1848年，扬被选为代表参加了在保罗教堂召开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然而，在这第一届德国议会中的经历却让这位“虬髯老者”陷入更深的沮丧之中。他在从法兰克福写给第二任妻子的信里说：“我们这里有十个小圈子。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因为我认为，如果这个圈子已经以多数决定的方式确定了所要赞同的意见，那么违背信念去投票就是造孽。这是对真相的欺骗，是背弃良心和对人民发假誓。这个因长期和平滋生出来的害虫、这个日益败坏的状况当中的劣种，竟然想要在无信仰、无道德和无修养之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在另一封信中，这位牧师的儿子、曾经的士兵——尽管满怀自由向往却仍然是普鲁士皇权始终不渝的捍卫者——写下了这样的话：“拿破仑固然邪恶，红色分子却更邪恶。”当林堡的体操协会请求他给予支持时，这位曾经大受拥戴的体操运动先驱却宣称，“这些协会的领域大到无边，乱七八糟缠绕出些没完没了的分会来”，因此他停止了“与体操协会的一切来往”并自己放弃了与这些协会的联系。他之所以如此决绝地加以拒绝，其原因倒不太可能在于他怀疑林堡是“红色的”，令他愤恨的毋宁说是，此前由他一手发起的这个运动如今竟然变得如此不问政治了。

普鲁士复辟王朝的集会法“禁止在社团中议论任何政治事件”，由此而使得社团组织被迫“庸俗化或者叫‘毕德迈尔化’”，这个法律制度由于早期的德国人的民主尝试而有所放松，不过那只是个很短的时期。1851年8月，反革命势力把联邦大会确定的基本权利规定——给予人们自由结社和自由集会权的规定——重又彻底废除。但是，即便是再次掌权的那些封建的德意志国家，特别是普鲁士，也无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阻挡政治团体——也就是政党——的产生。对它们来说，毫无疑问，那些不问政治的玩体操的、唱歌的和普通大学生们，显然要比满怀革命热情的甩单杠的、吼国歌的和大学生协会的会员们更对胃口些。



猫头鹰在森林里，孤独地筑着陋巢，人只有在社团里，一生才过得快活。

如果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梅尔（Georg Simmel）[5] 所说的“社交生活是理想国家的游戏性预演”这话没错的话，那么，19世纪的德国人所

希望的就是小型的、秩序井然的国家。这种国家的章程一目了然，每个成员都准时向司库交纳会费，一切纠纷则都由理事会做出权威决断。

对德国人的社团情结最出色的描写也出自约翰尼斯·特罗扬（Johannes Trojan）——威廉时代德意志帝国中的讽刺周刊《稀里哗啦》（*Kladderadatsch* ）的总编——“让我们加入社团，/社团就为此而生。/通过社团的帮助/人与人相互走近。//孤单单蔫头耷脑/自顾自向隅而泣，/若你去参加集会/就会追求更高的目标。//让我们来制定章程，/这可是关键的东西，/你得好生监管/否则它就会变味。//若我们不去做正确的事情，/那才会更加有趣；/对条文争来吵去/生活便真正开始……让我们欢庆协会的节日，/那可是最最快乐的时刻；/我们拨动欢快的琴弦/心中存着崇高的信念。//猫头鹰在森林里，/孤独地筑着陋巢，/人只有在社团里，/一生才过得快活。”

今天，在德国有超过六十万个社团。不过那可并不仅仅只是组织在一起并在初级法院履行了登记手续的爱喝啤酒的保龄球友、喜欢热闹的嘉年华会爱好者或者是德国腊肠犬的宠爱者们。没有哪个社会环境会乐意让人在背后议论，说自己只会制造孤独的猫头鹰。所以，当代的社团便从“德国素食者联盟”到“传统北黑森香肠保护促进会”，从“无子女父亲自助倡议行动”到“男女同志铁路之友飞轮会”，从“‘安静血型’钓鱼运动协会”到“正确运动-防止腿痛协会”，从“哥廷根古典文学之友会”到“嘻哈文化促进会”，从“女人重新学会笑协会”到“静默至哀会”，其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可谓无所不包，无奇不有。

所有这些社团证明，德国人终于彻底告别了“一贯独居”的特性，尽管他们还是和以往一样不自信，还在为社交方面不够优雅而困扰，并因此而宁愿用章程、规定和条文等来给自己的社交生活提供保障。如果税务局为其社团出具“公益性”证明，那简直就像是获得加冕一样。因为有了这个证明，他就可以把这一年所交的会费在下次报税时扣除，虽然这

并不是他所在意的。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公益社团的成员，他的活动就可以打上如下标签，即这种活动“在物质、精神或道德领域无私地对公共事业”给予了促进。

也许，拥有一千七百万会员的德国汽车协会（Allegemeiner Deutsche Automobil Club，ADAC），ADAC总有那么一天能够最终赢得这枚社团界至高无上的质量证章。该协会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的传奇般的“自由公民-自由行驶”运动，在当时毕竟还算是个清晰的世界观表白。不过，它若是把一个在19世纪受人喜爱的口号只管拿过来宣告为协会的目标和目的，那就更棒了，那口号是：“我们不要只是做个驾驶员，我们也还要做人。”

作者：特·多

译者：郑冲

参阅：驾驶之乐，下班之后，足球，德国人的性情，男声合唱，爱整洁守秩序，私人菜园，小市民，徒步之乐

---

[1] 三角帽源于17世纪西班牙士兵对宽边帽的改造（把三边帽檐翻起以利雨水向后流），后因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而传到法国并流行开来，成为军官和贵族的一种服饰象征，18世纪末后逐渐被双角帽取代。

[2] 1806年普鲁士被拿破仑击败后，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及王室成员从柏林逃往柯尼斯堡，该城于是成为抵抗拿破仑的政治中心之一。为激发普鲁士人的民族主义精神，“道德联盟”于1808年4月在柯尼斯堡成立，但1809年12月即被法国人解散。

[3] 国际联盟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正式成立，但其设想和名称早在1625年就已由“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提出。

[4] 1819年3月发生了激进大学生桑德刺杀俄国总领事兼作家科策布事件，同年8月，时任奥地利外交大臣的梅特涅以此为借口，在卡尔斯巴德秘密召集德意志各邦大臣会议，做出包含大学法、新闻法等四项镇压法案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建立书报出版检查制度，严厉打压具有自由民族思想的教授和文化人士，9月20日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批准了该决议。

[5] 亦译为齐美尔。

林中寂寞 [1]

森林很大。森林很黑。森林里只有孤孤单单的你。还有大灰狼，它们想把你往歧路上引，当你要去给奶奶送蛋糕和葡萄酒的时候。小红帽，你瞧，四周的花儿好漂亮啊！干吗不回头看一看呢？你听，这些小鸟儿唱得多么动听！你大概根本就没听到吧？森林里可好玩了，而你却只管闷头往前走，就像是去上学一样……

你单身一人和女巫们在一起，女巫们把你往她们的蜂蜜姜饼小屋里引，还摆上糖煎饼、苹果和花生让你大吃一顿。可是，还没等你眨巴眼呢，你已经坐在猪圈里等着人家来吃你了。

每一棵树干后面都会出现同荷兰人做生意的米歇尔（Holländer-Michel）[2] 的窥视身影，他在觊觎你的心。你得像烧炭人彼得·蒙克（Kohlenmunk-Peter）那样清白无辜，小玻璃人才会在你面前出现，帮你把被偷走的心重新夺回来。

在德意志森林里，那种幽深晦暗的幻想可以天马行空般大肆绽放。毫不奇怪，对于那些比德意志人更早和更毫无保留地熟悉地板采暖、优雅交往方式和市民权利——简单说就是文明——的民族的属民来说，森林从来就不是让人感到舒服的地方。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在其《日耳曼尼亚志》里对这罗马帝国界墙后面的蛮荒之地做了这样的记述：“它的森林令人恐惧，它的沼泽令人厌恶。”即便恺撒这样无所畏惧的勇士，提起那片“海西森林”（Hercynischer Wald）［指从多瑙河源头至锡本布尔根（Siebenbürgen）一带为浓密森林所覆盖的中部山脉］也会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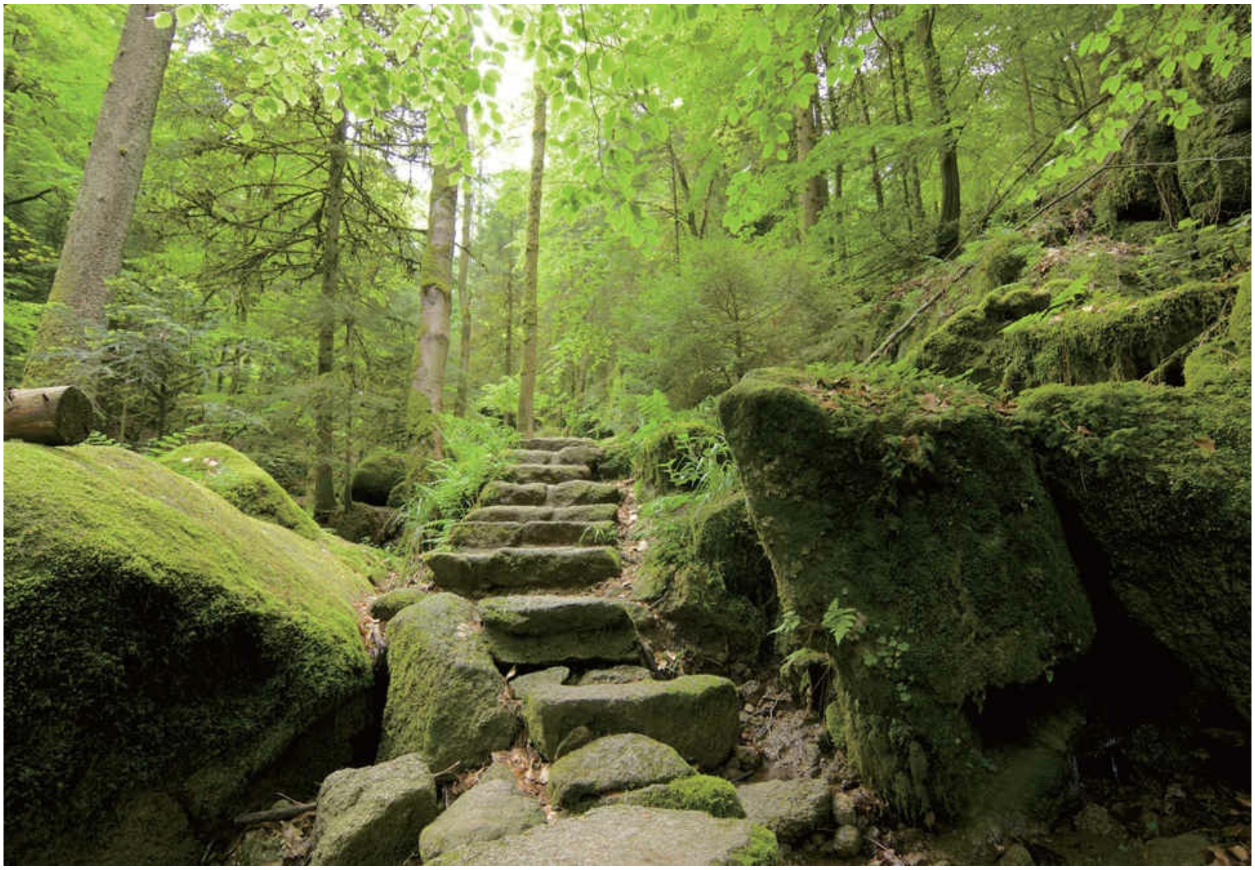
个寒战，在那里面麇集着一群群头上长着奇形怪状的角的动物，即便是经验丰富擅长行军的战士也要走上六十天才能够走出来。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个汉堡的书店老板向一位英国的联络军官建议，把《格林童话》（*Grimms Märchen* ）纳入对民主制度没有危害的书目中，而这位英国军官的回答是：“噢，不行，那里面树林子太多了！”

可是，突然之间，阳光穿透了树叶组成的顶棚，黝黑的树干上银光闪烁，长满苔藓的地面一片嫩绿鲜亮，刚才还那么阴森地盯着你的那个树洞，有一只甲虫正在里面辛勤劳作。鬼怪幽灵全都没了踪影，于是你开始乐意相信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那个毕德迈尔派作家，在他作品里要没有森林都写不成故事——言之凿凿地保证：“任何人一旦走进那片森林，就会发现一个美丽的人迹罕至之地，到处是盛开的鲜花和香草，还有高耸的大树，那儿是无数珍鸟异兽的家，那里面决不会有什么令人生疑的东西。”

你的心灵也许会因为松快而欢呼，然而林中的小鸟抢在了你的前面，它美妙动听的歌声你可是根本没法比的：“林中寂寞，/给我欢乐，/明天和今天一样/恒久绵长，/噢，你让我多么快乐/林中寂寞。”

不过，你真的能够相信这娇小妩媚的歌者吗？你尝试着回想在学校时读过的作品，是不是路德维希·蒂克，那位浪漫派诗人，就是他让小鸟儿唱得这么迷人？你想起来了，《金发的艾克贝尔特》（*Der blonde Eckbert* ），这就是那个骑士童话故事的名字。一个没人爱的女孩从父母家里逃出来跑进了森林，在那里找到了人世间不肯给她的宁静。林中空地上那个小屋——女孩就是在那里面度过她平静的隐居生活的——是不是还在那里？嗨，住手！在你敲门之前可得想清楚了！那个名叫贝尔塔（Bertha）的女孩早就不在了。她没法不死，因为她对王子的渴望驱使她走出了森林。背叛森林，森林是要报仇的。谁一旦把森林当成了

家，森林就不会再放走她/他。森林会把她抓回来，哪怕她躲进骑士城堡也无济于事。



德国童话中的森林，苔藓遍布，苍翠繁茂。

对此心知肚明的人是恩斯特·云格尔，就是那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大唱赞歌，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却变成了狂热的森林漫步者的作家："森林是隐秘的。这个词属于我们语言中那些同时蕴含着相反意思的词语。隐秘的也就是安逸的，是很保险的家，安全的托庇之地。它的安全和隐秘的含义并没有减少，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向阴森可怖靠拢。"

好吧，不管隐秘还是阴森，森林反正只对渴望在文明的彼岸找个地儿的那些人具有魅力。谁若想在德意志森林里怡然徜徉，哪怕心里还带着点儿惬意的战栗，他就得准备好忍受那些密实的灌木丛。可是，如今

在野外到底还有没有茂密的丛林呢？密集的水泥森林不是早已经来到了城市，那些因为灵魂无处安放而寻找森林的人，找到的会不会只是些整整齐齐的人造林？

“美丽的森林，谁把你塑造？/傲立在山巅，高耸入云霄”，19世纪初期，约瑟夫·冯·艾兴多夫男爵带着圣洁的惊讶发问；接着又保证：“为把你造就的大师，/我要把颂歌献上，/只要我还能发出声响。”在一个冷寂的世纪之后，这位德意志的森林诗人——他当了一辈子普鲁士的公务员，始终没有停止为上西里西亚童年故乡的森林歌唱——等来了如下含讥带讽的回答：“那大师是个管林业的官儿，林业处长或局长，他费尽心思把林子造，专业水准那是相当高，谁若无慧眼看不出，他真有理由气得双脚跳。他仔细关照，把光线、空气、树种、进路、轮伐区和低矮树丛的清除都安排好，让树木一排排漂亮对齐，像梳子般规整美观。当我们从那些毫无章法胡建乱盖的大城市里出来，看到这个该有多么赏心悦目。”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西尔的以上评价确有道理。同时他还指出，德意志人赋森林以魔力和破除这种魔力二者是一种交织在一起的关系。此言不虚：在严格地和“可持续”地经营树林方面，德意志人确实是世界级大师。这方面最古老的教科书《林业经济》（*Sylvicultura oeconomica*），出自汉斯·卡尔·冯·卡洛维茨，一个萨克森的山林/矿山管理局长官（Oberberghauptmann）之手。这本书出版于1713年，在那个年代，整个中欧和西欧原始森林的状况都已经不怎么好了——南欧的森林则根本就没法提，早在古代就已经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给无情地砍伐光了。森林是建筑材料，是燃料，是放牧场。城市和矿山以越来越贪婪的胃口吞噬着森林。可是，只有德意志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对“巨大的木材短缺”感到如此不安，就像卡洛维茨那本书的副标题所显露出来的那样，于是他们开始系统地植树造林。

那个副标题很值得仔细察究：这位林业经济的先驱在那里面给出的是“纯野化式育林指南”。对这位鼓吹这一卓越而悖谬的“野化育林法”方案的人，我们能够像穆西尔贬损他的那样把他说成是要看到树木排列得整齐划一心里才会高兴的人吗？而另一位德意志林业经济缔造者甚至这样解释：“只有在根本没有人因此也根本没有什么林业经济的地方，森林才形成和生存得最好。”这难道是痴迷秩序的育林人所说的话吗？

对于这种在童话森林中运作德意志林业经济的矛盾心理，再没人比约翰·海因里希·荣-施蒂林（Johann Heinrich Jung-Stilling）能让人更清楚地读出来。这个烧炭人的孙子本身是个眼科医生，此外他还熟知各种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知识，而且他还是最著名的感伤主义诗人之一。1777年，他发表了自传的第一部分，其中讲述了约林德和约林格尔（Jorinde und Joringel）的故事：“从前，在一片很大很茂密的森林中间，有座古老的宫殿，里面住着一位孤单的老妇人，那是个魔力强大的女魔法师……”这个童话编织得如此浪漫，因此格林兄弟收集童话时是决不会把它漏掉的。然而，就是这同一个荣-施蒂林，写下了两卷本的林业经济教科书，并在其中建议说，要对森林予以监控，以保护其野生状态。

在童话里面，约林格尔找到了前一天夜里梦见的血红色的花，由此而解救了他那被魔法变成夜莺的约林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猎人举起猎枪瞄准野兽，以免农田受到损害。是守林人/猎人在保护德意志的森林，好让约林格尔能够继续梦见血红色的花和夜莺吗？抑或这个童话里的男孩约林格尔其实本身就是个守林人/猎人，他所要做的就是，让那古高地德语里的“花野森梨”（wuastwaldi），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荒野森林（den wüsten Wald），失去魔力？

在其1960年的著名论著《群众与权力》（*Massen und Macht* ）中，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为德意志森林开出了一份比罗伯特·穆西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所下的定论更加不留情面的证书：“德

国的群体象征就是军队。但是这个军队不只是军队，它是行进的森林……那些耸立的树木，那么笔直，那么相似，它们的密集程度和数量，让德国人内心深处充满神秘的欢愉。”

这位犹太作家卡内蒂，为逃避纳粹不得不从维也纳出走伦敦，对褐色恐怖有着深刻的认识。这褐色恐怖连绿色的森林也要纳入征服之列，其手法是安上牌子宣称，“我们德意志森林不欢迎犹太人”。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纳粹的意识形态领袖之一，曾愣是要在一部剪辑影片中楞把“永恒的森林”与“永恒的人民”扯在一起。那里面还真有一个配着历史赞美歌的场景，其中与直立步枪紧挨在一起的普鲁士士兵的腿与森林中树干的场面交替呈现。确实：莱尼·里芬斯塔尔提供给“元首”的有关1934年纳粹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许多画面都令人联想到行进着的森林。可是在那儿行进的，还能真的是森林吗？或者还不如说是被无情地削掉了脑袋的篱笆？如果一个像赫尔曼·戈林那样双手沾满鲜血的滑稽剧人物——他还顶着帝国狩猎部部长和林业部部长的头衔——去偷袭猎物，他要找的可不是已经驯化了的野兽，而是完全相反。哪怕只是幻想中的野兽，即被手下驱赶到他枪口前面的——那也得是野兽。

谁若是对德意志森林的那种普鲁士僵直死板的形象心生怀疑，就会把其光环——包括它那军国主义-英雄主义光环——的来源给看错：它主要来自其既看不透也穿不透的那种神秘性。



冬天里的林中寂静景象。

阿米尼乌斯——就是被德国民族主义者重新命名为切鲁西人赫尔曼的，打赢了那场传奇般的战役，也即在公元9年跟瓦鲁斯（Varus）的那一战，这一战终结了罗马人向日耳曼人部落北部和东部的扩张，而他之所以打赢了这一战，并不是因为有个行进着的森林跟随在身后，而是因为罗马奥古斯都大帝的远征军团陷在了条顿堡森林的浓密丛林和闷热沼泽中无法动弹。

1813～1814年，到该结束拿破仑对德意志的统治的时候了。普鲁士的大学生们和当时名声响亮的人物如约瑟夫·冯·艾兴多夫，还有后来的幼儿园的发明者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全都聚集到了吕措自由军团（Lützowschen Freikorps）当中。然而严酷的行军打仗并非他们的强项。这些拿枪的知识分子在灌木丛中东跑西颠，穿着自己染上颜色的军

服，并由此而得以管自己叫“黑猎人”。其中有一个——作家特奥多尔·克尔纳，在1813年阵亡之前，还为自己和他的战友们留下了一座文学的纪念碑：“是什么在那晦暗森林里穿梭/掠过一座又一座山峰？夜里在埋伏点趴下，/一声欢呼，枪响处，/法国强盗毙命。/若要问黑猎人，回答是：/这就是吕措军团在狩猎，既惊险又狂野。”

卡尔·玛丽亚·冯·韦伯为这首诗谱了曲，于是这首圆号伴奏的男声合唱成为人们永恒的最爱。过了没几年，1821年，韦伯的浪漫森林歌剧《魔弹射手》在大剧院上演。猜猜看，撒旦在这个剧里出场时会穿上他诸多服装中的哪一套呢？当然是“黑猎人”……德国人在演绎神话上的一丝不苟，在那时就已经走火入魔了。

在森林里，强盗出没。在那里面可不是只有哈利、哈罗——民歌中的小麻雀在叽叽喳喳。从《施佩萨尔特客店》（*Wirthaus im Spessart* ）[3] 到《霍琛普洛茨》（*Hotzenplotz* ）[4] ：没有一棵树干后面不藏着一支正伸出来瞄准的强盗的枪口。弗里德里希·席勒笔下的“强盗”麇集在波西米亚森林里，正准备形成一股猛烈的风暴去刮倒古老的贵族宫殿。甚至红军派的恐怖主义者——他们按照20世纪70年代的时代精神把自己定名为“城市游击队”——也把一个弹药库设在了汉堡东边的萨克森森林里，那可是最富有历史感和最原始的德意志阔叶森林。不知道1982年在那里被捕的克里斯蒂安·克拉尔（Christian Klar）[5] 是否读过威廉·海因利希·里尔的作品？“唯有森林还能让我们这些文化人享有不被警察监视所干扰的自由人的梦想”，这位民俗学创始人1854年在其学术论文《国与民》（*Land und Leute* ）中这样写道。而且他还对自中世纪以来到近代早期一直被封建主严厉惩处的“偷猎者”致敬，称他们是森林里的义勇军。或许左翼恐怖主义者会把这位“日耳曼森林自由”的捍卫者视为“法西斯分子”，又或许克里斯蒂安·克拉尔私下里会同意里尔的说法——后者为不再享有“真正的森林”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直接出具了“已经半截入土的民族”的证书。无论如何，自由出自日耳曼森林这种观念，甚至

在一位受到非议的法国人那里也得到了认同——这个人就是孟德斯鸠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就在他所写的国家学说论文《论法的精神》（*Vom Geist der Gesetze* ）当中。

若去看看德意志人的历史——至少是自他们离开其原始森林以来的历史，就免不了会对此生出怀疑。德意志人可是看重法律和对法律的遵从更甚于自由的。难道日耳曼的森林自由最终只是一种矫情的幻觉？

把自由与森林联系起来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恩斯特·云格尔，就在上面已经摘引过的写于1951年的随笔《林中漫步》中。这里的林中漫步可不是指到绿色大自然中去做一次无关紧要的出游，而根本是把它用来比喻走向自由。那位“林中漫步者”是一位独居的优秀游击队员，他对来自严格管理下的世界的命令奋起反抗。云格尔所讲述的是纳粹时期柏林一个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故事，据说他在租住房屋的走廊里开枪打死了半打协警，这些人被派来执行征收犹太人房产的命令。“他还真正是经历了实质上的、古日耳曼式的自由，而反对他的那些人只是在理论上赞美这种自由。”云格尔在文中赞颂道。接下来的话是：“如果我们愿意再进一步设想一下，假如在柏林的每一条街道上都出现哪怕只是一个这样的事例，那么事情的发展就会全然不同。”

这是不是云格尔式的对集体责任的承认？可为什么这位德国国防军军官自己不在戈斯拉尔（Goslar）、于伯灵（Überling）和基希霍斯特（Kirchhorst）做“林中漫步”时为他邻居们的房子使用一下他那支配枪，而是把它带到巴黎的拉斐尔旅馆（Hotel “Raphael”，二战时德军驻巴黎司令部所在地）里去呢？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太轻易地下判决吧。因为，正如云格尔所写下的：“平静的时间太长就会助长某种乐观的幻觉。”

此外，还有一个中心思想寓于“林中漫步”之中，这是一个绝对值得记住的思想，那就是，森林是这样一个所在，在那里每个人都会同他心

底里最原始的恐惧面对面："古老的森林如今尽管可以变成人造林，变成经济作物种植地，但是在森林里始终都有迷路的孩子。"把德意志森林看作普鲁士军官学校——也就是云格尔所称的"大等死房"，尽管这看法不对，但他仍坚持这样看。每个迷路的孩子都必须独自摸索怎样忍受自己心中对死亡的恐惧。

> 从那红色闪电后面的故乡/云飘过来，/可是父母亲都已经死去了，/那里再没人认识我。/那寂静时光来得多么快，多么快，/然后我也会安息，在我的上面/美妙的林中寂寞轻轻掠过/这里也再没人认识我。

那个在森林中吹奏出如此动人的曲子的孩子，让他的死亡恐惧没法不带上一丝伤感的渴望死亡的特色的，自然是非艾兴多夫男爵莫属。但凡听过那位其忧伤可谓深不见底的作曲家罗伯特·舒曼为这首诗所谱的曲——那曲调与诗歌透彻地穿梭交织在一起，真的是可以立刻赴死。而且并不是为危难中的祖国的托付而赴死，而是完全出于自己，为了自己。并且，还是获得了安慰的赴死。

这种浪漫到极致的"在森林中死去"解放了心灵和头脑，并由此也解放了生命，因为它能够一直到终曲的和弦奏响之前都茂盛地生长。相反，那种在20世纪80年代向全世界大肆鼓吹的德国人对于森林死亡的恐惧的基调，则是彻头彻尾与之不同的另一种调子。"我们正面临像广岛那样的生态灾难"，《明镜》周刊发出预言。《明星》杂志则宣称："树木成排成行地倒下，就像军队遭到密集炮火的扫射。"就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平安康的生活中间，文明批评家们口沫横飞地提出了要求："森林死亡所要求于我们的，是彻底转变我们的生产和再生产体制——而这又反过来要求彻底修正我们的所谓的价值观。在那些价值观下任何事情都已经无法运转了。"巴伐利亚的作家和生态活动家卡尔·阿莫瑞（Carl Amery）会不会更想听一听舒曼歌剧中的森林场景，而不是那些"极端分子"的宣传蛊惑之声？或者至少听一听他威斯特法伦-巴登的诗人同行奥托·耶格斯贝格（Otto Jägersberg）在1985年——也就是这种

群情激奋达到高潮的那一年——的抱怨：“没完没了地讲述酸雨/这才真的让森林受害/再没人敢到林中漫步/再没人把森林赞颂/人人都只在为它叹息/森林里再没有生命的气息。”直到今天，法国人和美国人讲起“森林死亡”这个词来，都还止不住要发笑。



森林之殇：**20**世纪**80**年代，德国人对这样的画面恐惧之至。

为森林担心是一回事，打着为森林担心的旗号吵闹则是另一回事。结果，最终唯一的担心就变成，担心人类自身已荡然无存而森林却仍在亘古不变地沙沙作响；这种担心始终挥之不去，于是人们便可笑地反过来唠叨个没完，说是森林将会先于人类而亡。

你尽可以嚷嚷森林快死了快死了，虽然其实并没有那么糟。你尽可以装出肠子都悔青了的样子，去扮演森林的拯救者。然而你却不能指望森林会为报答你而让你这辈子不死。最好的做法是，放下你的装备，轻

轻地走进森林，恳求它允准，有那么一天可以永远消失在它的深处。

作者：特·多

译者：郑冲

参阅：夜晚的寂静，深渊，兄弟树，德国式焦虑，故乡，青年旅舍，男声合唱，高地丘陵，爱整洁守秩序，私人菜园，渴求瘾，怪诞之事，莱茵河——父亲河，徒步之乐

---

[1] “林中寂寞”德文为“Waldeinsamkeit”，是“Wald”（森林）和“Einsamkeit”（寂寞、孤寂）两个词的组合，它是德国早期浪漫派代表作家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在其童话《金发的埃克贝尔特》中创造的一个词。森林的幽深、寂静和神秘契合早期浪漫派作家的心境，成为浪漫派作家理想的“世外幽境”和心灵的慰藉。

[2] 19世纪德国著名童话作家威廉·豪夫童话作品《冷酷的心》里的人物，森林里的邪恶精怪，用金钱与贪婪的人交换，把他们的心换成石头。国内现有译本均译为“荷兰人米歇尔”，但在豪夫童话中他并不是荷兰人，而是因为与荷兰人做生意发了大财故得此名。

[3] 《施佩萨尔特客店》是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1802～1827）撰写的童话，其中收有四个小故事，即《希尔施古尔登》《赛德的遭遇》《斯蒂恩福尔岩洞》和《冷酷的心》。

[4] 强盗霍琛普洛茨是德国儿童文学作家奥特弗里德·普罗伊斯勒（Otfried Preußler，1923～2013）童话书《大盗霍琛普洛茨》《大盗霍琛普洛茨新传》和《霍琛普洛茨》中的人物。

[5] 联邦德国20世纪70年代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派成员。

徒步之乐

薄雾还散落在山谷里，我已经迈步出发了。只有大山、森林、河流、田野和我。“想在行走中考察和学习的人，得自己一个人走。”这是我前一天晚上在威廉·海因里希·里尔的书里读到的。“只有寂寞而训练有素的行者，自己背着背包和书包，才有敏锐的目光和毫不松懈的意志不停顿地观察四周。”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毕竟，他是德国民俗学家第一人。

空气清凉，鸟儿歌唱。日子的大门在一扇扇打开。我身后的城市一定已经变得很小了。假如转过身去，我大概可以用手指在那座唯一的高楼上散步。但我不想转身。

路边长着蓝色的野花，以前我知道它们的名字。我要是带着那本植物指南就好了。背包里除了水、面包和奶酪也还有地方的。但我知道：只带最为必需的。

开始上坡了，呼吸急促起来。要想掌握好步子节奏，就不能停下，我不是因喘气站住，而是听到了什么。是一只麋鹿还是一头野猪，在山坡上发出簌簌的声响？森林中，传出迎面走来的脚步声，坚实、急促。不一会儿，我看到一个深色卷发的年轻人走过了路的拐角。我想和他打个招呼，“晨雾中我们向着大山进发”，啊，我认出他来了。世界熟悉的是那位愤世嫉俗的老人形象——亚瑟·叔本华。他低着头，绷着脸走过来，全身像块警告牌：“别理我！”

不料他居然站住了，离我仅几步之遥，没有抬起目光，只悄声说

着：“哲学之路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上，只有一条陡峭的小路能够到达，路上布满乱石荆棘，越往高处，越寂寞、越荒芜。走这条路的人，不能胆怯，必须放下一切，坚定不移地在雪地上开出自己的路来。他常常会突然站在悬崖边，望着下面的绿色山谷：巨大的眩晕感要把他拖下去，但他必须坚持住，即使是需要用自己的鲜血把鞋底黏在岩石上。”

“我们这里不只是些丘陵吗？”我刚想反驳，但没马上出声，而是同样垂下了目光，小声嘟囔着：“谁能上山和沉默？这不是您写的吗？只要出去爬山，父亲总是引用您这句话的。”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掠过他的脸庞吗？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行走者，别开口，早出门，稳步走，轻装行，忘忧愁……

小路向上伸延，我沿路上行。慢慢地，我感觉不到和大地之间的距离了：树枝、树根、岩石，不再是羁绊，而是行走的共同体。我步伐的节奏似乎是大自然暗示的认同。和坐火车或开汽车的感受完全不同，那时，大自然总是朝相反方向运动的。

路在行，河在流，风随云动，山连山走，万物向阳……

身后传来男人的嗓音。这两位可不是沉默的行者。我放慢了脚步，让他们走到前面，我受不了被别人在后面赶着。



“清晨的雾里，我们向着山中进发。”

“步行者所看到的人自然比开车的多多了”，背着沉重的海狗皮大背包的那个说。“我认为走路是一个男人最自主最光荣的事，假如大家都多走路，一切都会好得多。”这是诗人约翰·戈特弗里德·佐伊梅（Johann Gottfried Seume）。1801年他从莱比锡出发走到锡拉库萨（Syrakus）。他旁边那个穿着齐膝系扣裤，板着面孔的是托马斯·伯恩哈德。“只有行走才能思想，”他补充道，“精神的运动是随着身体的运动而来的。”

“睁眼看看吧，开车多的地方，一切都糟。只要一坐进车里，离原始的人性就远几步了，驾驶让人无奈，行走给人力量。”佐伊梅边说边晃着他那根重重的多节手杖。

忽然我后悔起没带拐杖来。最后一根早在三十年前就被我丢到墙角里去了，在爷爷奶奶家，我的那根小的放在两根大的旁边。成人拐杖我

从没用过。我一直认为，只有老人和孩子才需要那玩意儿。高山火绒草，鹿角，巴登的穆墨尔湖，蒂罗尔的维尔德恺撒雪场，阿尔高的布莱塔赫峡谷、内塞尔旺，我曾那么积极地收藏过各地的手杖徽章。每次，当爷爷领着我到作坊，用两颗细小的钉子把最新的徽章钉到拐杖上时，我都兴奋无比。蓝冰茅屋，维蒙巴赫茅屋，欣特察尔滕，比绍夫斯迈斯，拉滕贝格……

我到了一块林间空地，一伙年轻人正在那里休息，吉他却没有停止歌唱："空中飞翔的鸟儿，自由自在，飞在蓝天下，飞在阳光里，我是你们的同伴，我来问候你！我是只行走的鸟儿，自由的气息激励我，唱歌我最欢喜。"

他们看上去像流浪的手工匠[1]或中世纪漫游的大学生，大檐软帽在清晨被折在了一起。有几个在溪水中洗脚，另外几个朝断裂的树桩投着石子。最年长的那一个——很难说他还是大学生或者已经是老师了——大声嚷道："看看这些敏捷的男孩，你能想象他们已经连续走了五个小时路了吗？远离煤烟，远离粉尘，走出拥挤的城市！走路，多走走路！满足一下大城市的孩子们对新鲜空气、无边大地和辽阔天空的渴望！让他们尽情享受一下大树的苍绿，森林的幽影，起伏的麦浪，脱俗的草场以及田园乡间的平静吧！"

我不反对走路的年轻人，一百多年前就有这样的，他们要在布满尘埃的学路之外寻找生活之路。但我不会与他们同行。我的路上不希望遇到山大王，山二王，也不想认识流浪的大学生，更要躲开成群结队的。

他刚停下，另一边又传来了歌声："走路是磨坊工的最爱，走路是磨坊工的最爱，走——路——去……"

今儿是怎么了？所有人都染上日耳曼式的走路欲啦？

来的不是磨坊工，大步走来的是妇女合唱团，也许，是合唱的妇女行走团？女士们身上的风雨衣立即把我的目光引向天空，上面可是万里无云呐。她们热情地向我问好，人人手中一根伸缩拐棍。“上个月我们走完了赫尔曼路[2]，”领队兴奋地告诉我，“两个月前走完的是伦施泰格路[3]，你猜，下个月我们会去哪儿？”

“大概会去女魔头路[4]吧。”

“我们要把联邦总统卡尔·卡斯滕斯（Karl Carstens）在位时走过的路都走一遍。”领队兴致勃勃地边说边做手势让她的队伍继续前进。“噢，走路，走路，我之乐，噢，走路，走路，我之乐，噢，走——路——去…”

在遇上我们的女总理[5]和她的保镖们之前，我离开了这条被人走烂的小路。一只乌鸦呱呱叫着陪我往下走，似乎用叫声在提醒我该回来。我好像看到一个护林员从杉树后跳出来要抓我，乌鸦落到他肩头，自豪地挺起胸脯。啊，不，其实是有一只蚂蚁爬上了我的右腿。

我用目光寻找着一块巨石，艳阳高照，该是歇一歇，喝口水，吃点儿东西的时候了。在家没味儿的东西，出来走路时会变得特别好吃。山谷里的城市已化为一个小点儿，一个该从记忆中抹去的痕迹。背靠着的岩石暖暖的，卷在脖子后的毛衣软软的，让昆虫去劳作吧，我要睡了。

梦中见到一个从未谋面的人，但又似乎很熟悉。他走在一条阳光灿烂的路上。一定是在南方，阿尔卑斯山脉，瑞士的德欣。鼻梁上架着一副精致的眼镜，一顶宽边的软帽遮住了他的额头。他身后追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子，赤着脚，哭着。他头也不回地说道：“金发的、快活的美女啊，我爱了你一个小时，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没有人像我那样给过你这么多占有的权利。但我注定是不忠实的。我是那种浪荡的男人，不爱某个女人，只爱爱情本身。行走者也天生都是这样的人。行走欲望，四处

游荡就像身处风月场。我们知道，正是因为它们那不可实现不可完成我们才永远怀着爱情的愿望，本该赋予一个女人的爱情，被我们轻率地分给了山川峡谷和村庄，路边的孩子，桥上的乞丐，鸟儿，蝴蝶，田野里的牛和羊。我们让爱情从具象中解脱出来，有爱本身就足够了。就像走路，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只是享受行走。”

有什么东西把我刺醒过来。我晕乎乎地在手背上那个肿起来的红点上嘬了几下。这大概是对我在行走路上与赫尔曼·黑塞梦中相见的惩罚吧。我自己不也是个逃避者吗？把丈夫撇在家里，厨房桌子上留张条：“我得出门，不知归期，不必着急！”

再穿上登山鞋的时候，感觉到了左脚跟上起的泡。只带最必需的……我把水、奶酪和吃剩的面包往背包里放的时候，突然有个男人站到了我的岩石前。

“走路不是享乐，是为上帝服务”，他乐呵呵地对我说，浅色的眼睛闪烁着。“内在的激情是行走必不可少的，”他朝着太阳扬起迷茫的脸庞，“行走是最高级的随心所欲，全无章法，直至极致。每一步都把我们带入无穷无尽之中。愿意放下一切，又想获得一切。历史已无意义，艺术变得多余，成就可以舍去。”

听到他也没带创可贴，我不禁偷着乐了。请教他的姓名，他笑着摇摇头：“我叫什么不重要，早已没人知道我了。”我还没穿上鞋，他已经撑开帽伞出发了。我发现他一点儿行李也没有。

“请告诉我吧，我好知道该回想的是谁。”我朝他背后喊道。

“于尔根·冯·得尔·温泽”（Jürgen von der Wense）。接骨木树丛后面传来他的回答。他说得对，确实没人知道他了。

孤身一人我越过残叶青苔和越莓丛，只有蚊子跟着我，还有企图在

我脸上结网的蜘蛛。终于到了山顶。森林退去，视野辽阔，下面的峡谷一览无余。但我不想下去，继续留在蜿蜒的山脊上。虽然每走一步脚都疼得钻心，但我学着带它一起旅行。

天变阴了，树顶上不再有阳光倾泻下来。我想起穿着风雨衣的那些妇女，她们穿对了，而我，只在腰间有一块薄薄的挡雨布。

只见一个人飞奔而过，似乎骑马的精灵在后面追赶他。“伦茨！”我喊道：“伦茨！停下！你跑得让我眼晕！”他稍稍站了一下，喘息着，身体向前，眼睛和嘴巴张得老大，似乎要把风都吸进去，胸部剧烈起伏，一个词也吐不出来，接着又飞快地朝山下跑去。我知道帮不了他，这个不安分的、不知疲倦的人。有时，他为自己不能用头走路而沮丧。在这一天，我第一次大声地唱起来：“我们走长路，去远方，横穿辽阔的田野，上上下下到处走，一往无前不回头。”

风把我的歌声带向远方。树梢的呼啸中，我能说什么呢？我真希望尼采在我身旁，教我从遥远的距离以外来观察“人”这个现象。“你的脸色苍白，被迫在冬季远行，像烟雾，总是寻找寒冷的天空。”

我似乎看到了远方的路，顺坡而下，又从另一边爬上，站在一块陡峭的岩石前。第一阵雨点来了，天暗得像黑夜。披遮雨布毫无用处，我也不费那个力了。看到远处有个亮光，我朝着它走去，它忽明忽灭闪烁着，鬼火在和我开玩笑。

感觉有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了我的肩上。我掉过头往回走。那个戴着被雨雾打湿的深度眼镜的小个子胖男人一定什么也看不清了，深色的卷发湿漉漉地挂在他额前。啊，和我一起迷失在这岩石山谷中的不是尼采，是弗朗茨·舒伯特[6]，永远的冬之旅大师中的大师。我知道，什么也不用怕了。目光所向路标明，坚定不移向前行。我们拉起手，冲进被冬天的风雨席卷的森林。

作者：特·多

译者：徐静华

参阅：深渊，登山片，兄弟树，驾驶的乐趣，裸体文化，青年旅舍，高地丘陵，渴求瘾，社团迷，林中寂寞

---

[1] 德语地区中世纪晚期到工业化早期手工行业中的一个规定，学徒期满后要离家出去找工作，找到一份活儿干完接着走，一般要两年左右不能回家，目的在于锻炼提高手艺，同时了解社会。这段经历是参加师傅考试的前提条件。

[2] 德国西北部一条一百五十六公里长，设有行走标识的山路。

[3] 全长一百七十公里，位于德国中部，每年将近十万步行者，是德国最古老和行者最多的一条路。

[4] 路长一百八十五公里，其名称来自格林童话。

[5] 现任联邦总理默克尔和前面提到的总统卡斯滕斯都是走路爱好者，他们休假的内容经常就是天天走路。

[6] 著名奥地利作曲家，作有大量艺术歌曲，《冬之旅》是其中最有名的套曲之一。

女人

一切从一个谜开始。为什么有那么一种活物，尽管在给其下定义时人们几乎都会用双手在胸前从上到下地画个半弧，这意味着其自然性别没有任何疑问，而它在语法上却属于中性？为什么叫das Weib？ [1]

即使是一般对德语的所有奥秘都能给出权威性解释的《格林兄弟德语词典》（*Wörterbuch der Brüder Grimm* ）对此也无计可施。日耳曼词“wîba”与任何非日耳曼词没有关联，所以必须在“Weib”一词中寻找一种尤其为日耳曼观念所影响的内涵，同时还得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词引人注目的是中性。一种可能的解释是：“wîba”由古高地德语“weibôn”（摇摆、漂浮、滚动）换音而来，“Weib”一词从而意味着一种“飘忽不定的活跃生物”。相反，想通过与“马、羊、牛” [2] 的类比来解释这个词为什么是中性则说不通。最后只剩下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将“das Weib”一词与古北欧语概念“fífl”和“troll”（妖魔）联系起来，它们在其载体的恶魔本性中是中性的；另一种就得想到那些与受制于人的劳动阶级有内在关系的类别词，如“das Mensch”（娘儿们）或“das Ding”（小东西，特指小姑娘）。第一种情况是理想化了的见解，由于相信女人的预言才能，对日耳曼人来说女人就获得了一种接近妖魔的特性，她们的名字“weibôn”就含有精神上的灵活性以及超自然的热情等含义。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 ）中对妇女的描述，可以作为支持这种见解及其日耳曼专有概念内涵的论据：“日耳曼人甚至相信，女人身上有一些神圣和先知的东西；所以他们重视女人的建议，听从她们的意见。”反对这种见解的论据则是：自“Weib”一词问世之初起，任何妖魔背景的联想，也包括特别崇敬的色彩就都已荡然无存。相反，人们甚至

得考虑，是否能一直用“Weib”一词来仅仅指称一种成熟的、完全具备工作能力的生物。

都明白了吗？“Weib”到底是光荣称号还是诽谤谩骂，这种迷惑一直到当代都未能厘清。要是一家大型汽车康采恩的企业工会成员在郊游时冲人力资源部经理怪声大吼道：“女人们都哪儿去了？”人们可以设定，这时此词与尊敬毫不相干。另外，身材壮硕的女士喜欢自称为“实足女人”。德国消遣文学中管那些永远都有好心情对待孩子、事业和老公的女人叫“超女”；狂欢节前的星期四女人们从容地庆祝“女人狂欢节”。1968年秋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创建了“女人委员会”，它是与左派社会民主学生联合会（SDS）并存的反对派小组，它号召把“社会主义的红衣主教从小市民鸡巴们”那儿解放出来。20年后其他的女权主义者们出版了《女子小词典》（*Das kleine Weiberlexikon* ）。

在后来的那些创意后面其实隐藏着各种最不相同的解放运动——在它们走上毫无生气的政治正确之路以前——一再遵循的策略：它们用讽刺手法“剥夺”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用来咒骂它们的词语，反过来让这些词语成为一种骄傲的自我描写。

问题仅仅是，德语中的“女人”（Weib）不像美语中的“黑人”（nigger）一词，从来也不是只有贬义，或是顶多是个中性词。当弗里德里希·席勒在《欢乐颂》中呼吁男同胞“谁能获得一位温柔的女性，/让他来一同欢呼！”[3] 时，肯定没想贬低妇女。还是他有此意？反正在这位魏玛古典主义坐第二把交椅的桂冠诗人那儿是找不到女权意识的。除了其历史剧《奥尔良的姑娘》（*Die Jungfrau von Orléans* ）或《玛丽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 ），他对女性才干和生活任务所发表的有限见解——“请尊敬妇女！她们编啊织啊/让天国的玫瑰走进尘世的生活”——很难让人确定他用“女人”一词到底是褒还是贬。这与首席桂冠诗人歌德不同，1801年歌德在《女士袖珍读本》（*Taschenbuch für*

Damen）中发表了幽默风尚喜剧《作为恶娘们对照物的良家妇女》（*Die guten Frauen als Gegenbilder der bösen Weiber*）。



仿照智慧的所罗门，马丁·路德是这么赞美女性的。由路德维希·里希特配图，

1851。

更为有趣的是第一位坚定不移地在德国支持妇女解放者的足迹，他是普鲁士政治家、作家特奥多尔·戈特利布·冯·希佩尔。虽然他在1792年发表的论文名为“论女人公民地位之改善”（*Über die bürgerliche Verbesserung der Weiber* ），但他开宗明义点出这里的“女人”是褒义词。他用此词不是像席勒那样把她们当做是值得赢得的、编织玫瑰的可爱女人，相反，这位终生未娶的希佩尔曾怀疑，那些最尊崇妇女的男人正是最害怕她们的，他们对女人所说的甜言蜜语只是为了让她们服软。他本人不光认为女人可以搞科研、从艺和从政，而且认为她们在这些领域的天赋至少不比男人差。虽然这位启蒙者仍旧被人理解为虔诚信徒，他却一反《圣经》传统，赞扬夏娃使了手段，才让亚当“有胆量使用了理智，形成了突破”。他也合乎逻辑地要求：“为了纪念她，应该管夏娃叫理智。”

在这方面，马丁·路德等一些人坚信，女人不光在“坚强和身体力量”方面不如男人，而且她们首先缺乏“理解力”。他们所表达的此类观点要远远超过所有牧师、神父和拉比。

这类人中的一位是伊曼努尔·康德，他硬说“博学妇女”需要“她们的书就像需要她们的表一样”，“也就是说带着书，好让别人看见她们有书，尽管一般来说表是停着的，或是走得不准”。

希佩尔是康德柯尼斯堡餐桌上的常客。也许要是能够静听一下他们二位——前者认为女人是有理性的；后者认为妇女是蠢笨并受欲望驱使的——对这个问题交换过些什么见解，没准对妇女-女人之谜能多一点理解。

恰恰是男女平权主义者希佩尔几乎一直使用“女人”一词，这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学上的失误。像格林兄弟在其《词典》中一样，他也提醒

人们忆及古代，那时据说“德意志女人……与其他女人完全不同”，因为日耳曼人重视来自女人的建议，“她们的话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至于古希腊人前往德尔斐（Delphi）神庙皮媞亚（Pythia）处朝圣的事他避而不谈］。与席勒不同的是，希佩尔所说的出谋划策的女子不是那些应该主内的家庭主妇和智慧地当家做主的母亲。对他而言，脚踏实地的是女人，而不是黏土烧出的女神。

也许希佩尔向他的朋友康德承认过男人拥有更高级的理智，可他证明了女人的理智更深沉，在一定程度上女人用形而下的理智对抗男人的形而上。这种论点大概会震惊纯粹理性的发明者。但每一个以务实作为他所有理性的基础而不是把它当作其障碍的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种念头的精彩。

谁一说到“女人”，眼前都会浮现一种永远热情洋溢、生气勃勃，从而充满情色魅力的生物。相反，大概只有天主教在其《万福玛利亚》（Ave Maria）中才会赞美耶稣的母亲“你在妇女中受赞颂”。毕竟最珍贵的生命是在她腹中孕育的，哪怕“仅仅”是通过圣灵感应而受孕。

谁若想完全避免性感之嫌，最好用“妇女”一词。在中世纪宫廷抒情诗人那儿就已经区别使用这两个词了：“Ze frowen habe ich einen sin：/als si mir sint，als bin ich in，/wand ich mac baz vertrîben/die zît mit armen wîben.”翻译成新高地德语就是：“对贵妇我信守一点，她如何待我，我就怎样对她；若为消磨时光，我愿去穷女人处。”哈特曼·冯·奥厄（Hartmann von Aue）在接下来的诗行中确实暗示，在“穷女人”那儿比在“贵妇”那儿有更多乐趣，后者虽然愿意听别人含情脉脉地称自己为“天下第一美女”，但却是绝对碰不得的。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德国人在心旌摇动时虽然总会说自己喜欢“美酒、女人和歌唱”，却在从前国歌的第二段中歌颂“德意志妇女、德意志忠诚、德意志美酒和德意志歌声”。



他们是这样真心相爱，

他是个小偷，而她是个无赖。

只要他想寻开心，

她就扑到床上，哈哈笑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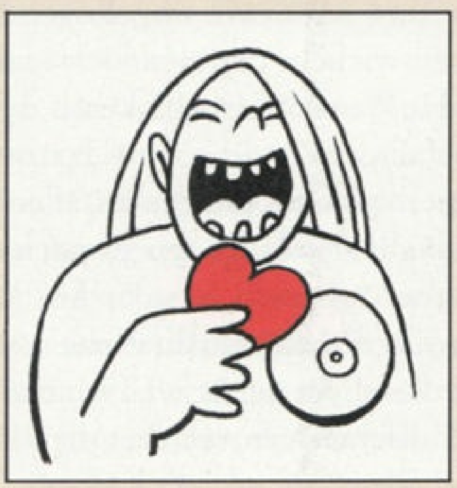


日子在快活淫乐中逝去，

夜里，她总倚在他怀里。

那天，他被带走送入监狱，

她站在窗前，哈哈笑起。



他给她传话：哦，来看我吧，

我是多么想你，

我呼唤着你，渴求着你，

她摇摇头，哈哈笑起。



清晨六点，他被处以绞刑，

到了七点，他已埋进坟里；

可是刚刚八点，

她就喝上了红葡萄酒，哈哈笑起。

《一个婆娘》，海因里希·海涅把这首诗献给了女人。由齐丝卡配图

就连最鄙视女性者之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似乎也感觉到其中的差异。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让超人宣讲者与一位“老女人”展开幽默对话，说到女人的一切都是谜，而女人的一切都有解，“那就是妊娠”。在两个人进行了长达两页的专门有关“女人”的对话后，老妇人最后给了查拉图斯特拉那句有名的忠告：“你要到妇人[4]那儿去吗？别忘了鞭子！”

为什么这位留着胡子的哲学家偏偏在这里选用了“Frau”（妇女）一词？因为在真正的女人——这些人对幸福的理解反正已经降到“他要”的模式了——那儿是无须用鞭子的，只有在那些“学究气”的妇人那儿才要用鞭子，因为“她们的性欲不完全正常”，就像尼采在其他文章中推测的？

如果说“女人”一词中总带有色情成分，每个男人必须自己决定，鉴于他永远受到诱惑，他是该尊敬还是鄙视女人；那么与“女人”对应的词真的像格林兄弟《词典》中认为的该是“男人”（Mann）吗？难道不更应该是“der Kerl”（家伙）或“das Kerl”（用中性冠词）吗？一位“Prachtweib”（尤物）最终该得到的不是“Prachtmann”（帅哥），而是“Prachtkerl”（猛男），就像女中豪杰只中意大胆硬汉一样。

可以说我们德国人是世上最大的色情狂，因为我们为极为性感的女性发明了一个专门词语；还是说我们至少在西方拘谨地名列榜末，因为我们认为有必要让妇女洗尽性感？

这始终是个谜。

---

[1] 德语名词有三种不同的性，阴性、阳性和中性，其冠词分别为die、der和das，女人（Weib）一词为中性，常含贬义。

[2] 此三词在德语中均为中性。

[3] 钱春绮译，转引自网络。

[4] 这里尼采没有用带贬义的“Weiber”，而是用的“Frauen”一词。

德意志巾帼小画廊，展示顺序按女人味从低到高

美丽心灵

1806年柏林翁格尔（Unger）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匿名小说，题为“美丽心灵的自述”（*Bekenntnis einer schönen Seele* ）。这是一本女性教育小说，一位名叫米拉贝拉（Mirabella）的成熟处女在书中讲述她的生活故事。这本小说想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成功地做到，一方面形成“令人尊敬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不会以怪癖的方式终老。宫廷贵妇米拉贝拉清楚社会的适应压力和最终被孤立的危险：“要是我们有朝一日妥协了，那毕竟还有一点好处，能成为所有人的朋友。”她写道，“只要是我们还没有变成那样，我们就必须把自己的性格当作最可贵的珍宝来保持，因为有力而坦诚的个性最终要比整个社会更有价值。我不该这么说，因为我是个女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男人们对这一真理噤若寒蝉”。

噤若寒蝉者中的一位——米拉贝拉大概也曾想到过他——迅速做出了反应：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95～1796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部伟大的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在第六章中同样可以找到《美丽心灵的自述》。一位无名的牧师会女会员被母亲教育得笃信虔诚，父亲又教会了她自然科学。但她从不炫耀自己的教养学识，因为她知道，人们认为“令许多不学无术的男人羞愧，是不礼貌的”。歌德在一篇书评中批评另一篇《自述》的匿名作者说：“我们更该将这部作品更名为《一位亚马孙女杰的自述》，一来免得让人忆起早先的同名作品，二来这一称谓更能彰显个性。因为这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确实是个女汉

子，一个像男人一样思维的姑娘。与那个从宙斯前额中跳出来的雅典娜如出一辙，雅典娜是并且一直是个严肃的极品处女；这位由一理智男子调教出来的处女，虽然本质上并不招人讨厌，却也不苟言笑，是个货真价实的假小子式处女。这种人令我们肃然起敬，然而对我们却没有吸引力。”

歌德没有猜到的是：后来文学研究考证出，那本被指责过于男性化的作品很可能出自一位妇人之笔。如今人们认为其作者是弗里德莉克·海伦妮·翁格尔（Friederike Helene Unger）——那位出版商的妻子，她不光协助丈夫做编辑工作，而且她本人就是作家。

知道这一点后再读歌德的书评就会倍受启发：他认为这本书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一个女人”如何才能“面对场合和环境保持其特性与个性”，是由一个“女汉子”提供的答案；而“一个精神和感情丰富的女性从女人的角度”是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的。具体来说，米拉贝拉令诗人不满意的地方是：她既不是“女儿”，也不是“姐妹、情人、妻子或母亲”，因此人们也无法指望“她有朝一日会成为家庭主妇、岳母或是祖母”。

诗人在其评论文章中没有透露的是，“他的”美丽心灵在生活中也有真实原型——苏珊·冯·克勒腾贝格（Susanne von Klettenberg），她与歌德的母亲很要好。每当年轻的歌德抱病滞留在法兰克福家中时，她都不离左右。除了照顾他恢复身心健康外，他们还一起研究神秘的自然科学。是她说服了歌德的父亲，让歌德得以应召前往遥远的魏玛宫廷。这位虔诚笃信的牧师会女会员以这种方式避免了被宣判为“假小子式处女”，尽管根据人们所了解的情况，她大概在其平和的一生中都会一直保持“处女”身份。

真正天生——或上帝赐予并满足于内心的——美丽心灵都是出圈离谱的，即使是启蒙家们为女人精心打造的生活模式对她们来说都是桎

栝，比如约阿西姆·海因里希·坎佩坚持提倡的三重规定：“令配偶幸福的妻子、对孩子循循善诱的母亲以及下人们的智慧主管。”那些自己致力于研究新时代个人如何从所有角色束缚中解放出来，能够真正自由发展的先生们，一想到女人在生活中会有丈夫、孩子和家庭之外的别的中心，他们便会充满恐怖感。

美丽心灵是从受过教育的虔诚心灵的精神中生发出来的一种早期解放模式。尽管希尔德加德·冯·宾根从未自称过“心灵美好”，12世纪那些毕生致力于与上帝的神秘对话和研究自然的修女们却属于这种类型，19世纪这类女子被嘲讽为“女学究”。与后来的“主张女权的女子”不同，这类注重心灵美的女子不与目光狭窄的男人世界抗争，她们即使不进修道院，也以内心流亡的方式与世无争。她们首先在乎的是内心的平静。

心灵美好的米拉贝拉坦率承认，即使有那么一个唯一让她认为值得为他放弃自己自由的人，那这个人的去世也不会震动她。相反，她自己身上“更高尚的部分”犹如“幸福的奥林匹斯山诸神的栖息地”一样阳光明媚。没有一项她的活动会因失去爱侣而终止。此外她也从来没有感到过不幸，因为她觉得自己“一向能够始终保持清醒与平和”。

古希腊罗马的斯多葛学派对这种突出的女性超然性肯定得嫉妒得要死。这类心灵美在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那里却要被指责为没血性和懦弱。在《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一书中，这位哲学家把它展示为近代意识想摆正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时误入的歧途：“它缺乏摆脱的力量、将自己变成物和忍受存在的能力。它生活在恐惧中，怕行动与存在污染了其内心的辉煌；为了保住其内心的纯洁，它逃避与现实的接触，坚持停留在固执的无力状态中……——在其瞬间的透明纯洁状态中有一种不幸的所谓美丽心灵，它逐渐黯淡，直至作为无形的蒸汽消失在空气中。”

18世纪末19世纪初，其他男性同时代人对美丽心灵的态度明显要更

加挚爱。他们称赞这类女子将和谐作为最高追求目标，认为美好心灵不失为一种精神与心情和谐的成功模式，借此可以将启蒙家们撕裂成两半的宇宙重新缝合起来。然而，他们也并不赞赏女人仅仅为自己找到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宁静之路，他们更希冀美丽心灵能够多为他人做些什么。

“人们称其为美丽心灵，如果一个人全部感受的道德意识最终能保证其随心所欲，却不自相矛盾。”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如此赞美女性的秀美的。“心灵美就是心灵美，没有别的功用。它举重若轻，犹如仅仅出于本能地完成着人类最令人难堪的义务；它从自然欲望中赢得的最英勇的牺牲，令人看上去就像是这种欲望的自愿效果。所以它也从不知道其行为之美，它也想不起来还能有别的行动或感受。”

索菲·冯·拉·罗施（Sophie von La Roche）走上了这条崎岖小路：赢得内心平静，自己在世上做事情，同时组建家庭。比她年轻20岁的歌德喜欢称这位八个孩子的母亲“妈妈”，她既虔诚又是个有教养的女作家，还是沙龙女主人。她的诗意初恋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将她尊崇为“他的美丽心灵、他的聪慧女王”，尽管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信誓旦旦地写道：“先生，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一个学究式女人，一个职业文艺爱好者很难让一位男人和一个家庭幸福。”

索菲·冯·拉·罗施晚年曾出版过德国第一本妇女杂志《波蒙娜[1]——献给德意志女儿们》（*Pomona für Teutschlands Töchter*），这本杂志确确实实是由一位女子打理的。据说甚至叶卡捷琳娜大帝（Katharina die Große）都是该杂志的订户。该杂志向女读者们保证，阅读过程会美好得如同“与女友一起去漫步”。女出版人和唯一的女编辑在第一期前言中自信地写道：“这本女人杂志和女性大事记年鉴会向我的女读者们展示，德国男人们认为我们做的哪些事是有益的和讨人喜欢的。波蒙娜会告诉您，作为女人我对此怎么看。”

尽管如此，索菲·冯·拉·罗施并非感情主义的阿莉塞·施瓦策尔（Alice Schwarzer）[2]。只要一有男人踏进她的家门，这位成功的女作家马上拿起毛衣针织毛衣或是拿起刺绣绷子绣花。在其作品《冯·施特恩海姆小姐的故事》（*Geschichte des Fräuleins von Sternheim*）中——这本畅销书令她于18世纪末在文坛成为引起轰动的人——她并不鼓动女同胞们去冲击男人们的巴士底狱，而是让其命运多舛的女主人公——一位货真价实的心地善良的女子——按照席勒的意思说："我所受的教育让我懂得了，美德和灵巧是唯一真正的幸福，行善是真正能让一颗心快乐的事；而命运则向我提供了这方面的亲历证据。"

然而索菲·冯·拉·罗施绝不仅仅是一个勤快的隐忍者。她多次长途旅行，去过瑞士、法国、荷兰和英国。她是第一位登上勃朗峰的德国女子，也是第一个发表详细游记的德国女子。

如果说德国人的意识中还存在着索菲·冯·拉·罗施的形象的话，这一形象与歌德有很大关系。在《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第十三章中他这样描述当时召集"多愁善感者聚会"的女主人："她看上去好像参与一切，其实什么对她都不起作用。她温和地对待所有人并能容忍一切，却没有痛苦。她丈夫讲的笑话、朋友们的钟爱、孩子们的清秀，这一切她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所以她总是她自己。世界上的善恶、文学中的强弱对她好像都没有影响似的。她的这种本性要归功于她一直到老都很独立，而且经历过一些悲伤甚至是可怜的命运打击。"

虽然恭敬地称索菲·冯·拉·罗施为"妈妈"，但这位大文豪究竟以何种傲慢与她相处，读一读他写给朋友席勒的信就一目了然了："她属于那种天生爱把一切扯平的人，她提升粗俗的，打压出色的，然后加上自己的调味汁来随心所欲地享用全体。不过话说回来，她的谈吐不乏有趣之处。"

不遁世，而是选择了艰难路途的美丽心灵，既独立自主，也为他人

而存在，却最终被他人贬为不温不火。



“我仅是女子，但决不会不公正和小气。**”**索菲·冯·拉·罗施：德国第一位拥有美丽心灵的女畅销书作家。

几年后歌德遭了报应，报应来自索菲·冯·拉·罗施的外孙女贝蒂娜·布伦塔诺（Bettine Brentano）。这个爱过度激动的孩子可绝对说不上不温不火，很快大师就试图摆脱这个不单单以写信的方式缠着他的“烦人的牛虻”。在波西米亚特普利采（Teplitz）浴场与被她像上帝一样尊崇的六十岁诗人晤面后，这位年轻的狂热崇拜者终于有了理由把自己的白日与黑夜梦毫无遮拦地记录下来：“汗珠浮上了他那紧闭着的漂亮嘴唇，他深深地叹气、呻吟，我不受干扰地舔干了所有汗珠。他把舌头放到唇上，我轻轻地咬了它，我也咬了他的嘴唇，他用力把我的唇转移到他的面颊上，我的眼泪滴落到他的面庞。他再次对我呢喃：‘小妞儿！小妞儿！你要是知道你有多么甜，那么！是的，那你才会明白，你的纯洁对我来说是多么坚固的绳索，我不愿挣断它们。’”女诗人的情色幻想是这么结束的：贝蒂娜裹着皮大衣、抱着一束花，是夜睡在了诗圣脚下的一个枕头上。第二天一早邮车的号角响起时，她在离开圣所前对他说：“歌德，昨天晚上我睡在你这儿了。”

“我知道，”她让他回答道，“一整夜我都在看着你。可别再来了，要不你我就都毁了。”

格蕾琴、小凯蒂、德意志姑娘

1770年圣诞节前夕，当苏珊娜·玛格丽特·勃兰特（Susanna Margaretha Brandt）在她做女佣的那家法兰克福三流旅馆委身于一位荷兰旅客时，她做梦也不会梦到接下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她没想到自己会怀孕，没想到自己会独自一人在旅馆的洗衣房生下了孩子，弄死后埋在了马厩的粪堆里；没想到帝国直辖市会判处她死刑，更没想到一位名叫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年轻律师关注了这桩案子并会让她成为戏剧中最著名的女性角色。

本来格蕾琴是个很普通的姑娘：有点儿卖俏、有点儿拜金，此外心中一半装着上帝，一半想着玩耍。若不是歌德在其剧作中让她遇上的不是一位不知名的荷兰小商人，而是德国传奇中的绝对名人浮士德，大概今天没有人会再想起她了。审讯记录和法院档案中没有一个地方记载着，现实生活中的苏珊娜·玛格丽特曾爱上那位请她喝了几杯葡萄酒的不知名的男子，“在酒精的作用下，她未能抵挡住他的袭击”。是歌德将她塑造成了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虽然他笔下的格蕾琴至少在最后的热恋中能够展示，她是个性欲上有渴求的女人：“吻我！要不我可吻你了！”



“万箭穿心”。歌德笔下濒临绝望的格蕾琴。

历史上的女勃兰特在审讯过程中越来越明确地表示，是撒旦驱使她隐瞒了自己怀孕的事实并杀死了孩子（至今一直有争议的是：她这么做是否在受到法兰克福司法部门代表的——当时也已违法的——刑讯威胁之后）。歌德的格蕾琴是绝不会把犯罪的责任推到梅菲斯特身上的。如果说《浮士德》中真有人确确实实“着了魔”，那这个人正是浮士德博士自己。歌德把苦命但最终难脱平庸的杀婴女犯提升为一个悲剧性人物，看到她就能感受到全人类的苦难。剧末歌德让她指着监狱的门，让魔鬼与他的傀儡——那个她曾经炽爱过的海因里希马上消失，她宁愿上断头台，也不愿跟他们俩逃跑。

格蕾琴能够跻身有长久生命力的德意志妇女形象行列，一个原因大概是：在她身上正直与堕落、罪行与无辜是如此艺术地交织在一起，就像她头上的浓密金发。然而她仅仅是从根本上说愿意护卫自己心灵的女性的圣像。对男士来说，只有那些还有老派骑士精神的人才爱慕她；像浮士德那样陷得很深并渴望救赎的男人，得找另样的德意志姑娘（或是得有极大的耐心，甘愿冒险，在数千行诗句之后，于《浮士德II》结尾之处不能确定地说，为什么永恒之女性现在突然引领他飞升了）。

谁想准确无误地看到伟大的殉情场面，他得去听歌剧，去听瓦格纳的歌剧。在那儿他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看漂泊的荷兰人和森塔（Senta）、汤豪舍和伊丽莎白，还是直接看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共赴冥界。至于饰演不同角色的女演员在很大程度上不太像姑娘，而是更像已婚妇女，这仅仅是因为单薄的身子很难发出洪亮的声音。按理说，即使是瓦格纳剧中的女武神，也应该让令人陶醉的姑娘来演唱。

谁若是看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海尔布隆的小凯蒂》（*Käthchen von Heilbronn*），肯定会看到一个脆弱得几乎透明的女演员。第一眼看上去小凯蒂与格蕾琴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这并不符合事

实。克莱斯特的小凯蒂与歌德的格蕾琴之间的差别就像是潜随猎物者与被追赶的无辜猎物一样分明。尽管前者的父亲在戏开场时介绍说，人们很难想象比她更温柔、更虔诚和更可爱的姑娘了，但这仅仅是在她遇到韦特尔·冯·施达尔伯爵（Wetter vom Strahl）之前的状况。尽管伯爵对她丝毫不感兴趣，从此后她却像一条“嗅到过主人汗味的狗”一样，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她犹如真实存在的贝蒂娜·布伦塔诺的虚构的（并更加自虐的）孪生姐妹，贝蒂娜一厢情愿地说自己在特普利采曾在自己的偶像歌德脚下睡过觉，小凯蒂则证实，她曾让伯爵踢过自己好几脚，若是能允许她在他城堡下的接骨木灌木丛中过夜，她会欣喜若狂的。对于她这段疯狂恋情的原因她三缄其口：“在心中悄悄发生的事，而且上帝并未惩罚，其他人无须知道。”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后来才知道，她与伯爵曾在梦中相遇，这令她深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嫁给他为妻。

至少从表面看，《海尔布隆的小凯蒂》有个圆满结局：最后伯爵也意识到，出现在他梦中的不是那位他正准备娶的贵族小姐，而是她。眼泪。婚礼。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自己的结局却既无眼泪，也无婚礼。1811年11月21日，诗人在柏林小万湖先向女友亨丽埃特·福格尔（Henriette Vogel）胸部开枪，然后向自己口中开枪。此前给他们往户外送过小吃的附近餐馆的服务员说，他们很少看见过像他们“这么亲切友好地相处的”一对儿。这两位准备赴死者手拉着手向湖边跑了过去，“一路上追逐嬉闹，就好像在玩捉迷藏”。不清楚的是：不知31岁的亨丽埃特·福格尔是否同意双双自杀，因为她患了癌症；还是她这么做是真正的无偿行为，只是为了陪伴34岁的诗人去另一个世界。

亨丽埃特·福格尔在临死前夜写的最后一封信，就好像是小凯蒂咬着她耳朵告诉她让她那么写的。信是写给他们俩的一位共同朋友的：“您的友谊……面临一次奇特的考验，因为我们二人，也就是著名

的克莱斯特和我正在……前往波茨坦的路上，我们处在一种十分无助的状态——中枪躺在地上。等着一位慈悲的朋友做善事，把我们脆弱易毁的皮囊埋入厚重安全的泥土中。”

是夜，克莱斯特在万湖附近的旅馆给自己喜爱的堂姐玛丽写了最后一封信：“如果我告诉你，我永远不会拿这位女朋友（指的是亨丽埃特·福格尔）来取代你，而且她没有别的奢望，只是想和我一起生活，这会不会给你一些安慰？她在心灵深处做出的决定——与我共同赴死，吸引我投入她的怀抱，这种吸引力的强度和不可言说性我无法向你解释。你肯定还记得吧，我曾多次问你，是否愿意与我共同赴死？你的回答总是否定的。我陷入了一股从未感受过的幸福旋涡，我无法否认，她的坟墓对我而言要胜过与世上所有女皇们的床笫之欢。”

11天之前——与亨丽埃特·福格尔共同赴死的决定已经做出——，克莱斯特曾在他的堂姐那里最后一次抱怨自己的姐姐乌尔丽克（Ulrike）。尽管他一生都与这位姐姐有着密切的关系，却认为在“她的胸口”没法安静地休息，因为她的缺点是有一颗“女汉子的英勇心灵”，这“对其性别来说是太高大了”。现在，在死前的数日里，他大概想，“她没有掌握牺牲的艺术，为了己之所爱，彻底走向黄泉”。这位“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找不到“足够深的深渊”，好让他和自己的死亡伴侣一起纵身跳下的诗人，证明了他自己就是深渊。

尽管如此，“像狗一般的殷勤热情”的小凯蒂还远不是一个渴望被救赎的典型疯子。亨丽埃特·福格尔才是这种女人，她写下的最后文字中包括《死亡连祷》。克莱斯特先写道：“我的小埃特，我的心肝，吾爱，吾鸽，吾命。”她接下来写道：“我的海因里希，吾甜甜呻吟者，吾风信子苗床，吾欢乐海洋。”

在德国剧院之外，如今还有那种想入非非、必要时奋不顾身的德意志姑娘吗？自从深渊被填平和浪漫仅仅还剩下点蜡烛与软摇滚以来，小

凯蒂类型的女子日渐稀少。虽然仍旧有许多人相信，可以用拥抱把男人从纠结中解放出来，但与两百年前相比，今天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肯定更难找到愿意陪他赴死的伴侣了。1992年秋天绿党党员、德国联邦国防军前将军格特·巴斯蒂安（Gert Bastian）用德林格手枪先射杀了自己的生活伴侣彼得拉·克利（Petra Kelly），然后射杀了自己。至于绿党这位女政治家是否真的愿意与他一起死去，这无疑会永远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

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梦想一位卓越男子能让自己辉煌与荣耀的格蕾琴们，到头来不得不明白，她们的所有奉献最终只是让自己陷入痛苦。这时她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发动伪善的街头小报去愤怒声讨那位出卖灵魂的人，或是在孤独中默默地认输。

“在与你共同生活四十一年后离开你，这对我是个很难做出的抉择。但我不愿让自己和你在黑暗中长期煎熬……我的力气用尽了……。我感谢你让我在你身旁度过的时光，这段生活充满了不寻常之事、爱情、幸福和满足。我爱你，也欣赏你的力量。希望你永远坚强有力，还有很多事在等着你去做。你的小蛇。”这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妻子汉内洛蕾·科尔（Hannelore Kohl）于2001年7月5日自杀前写给他的遗书。

小姐奇迹

那年月，（西部）德国正处于奇迹浪潮之中。在纳粹帝国留下的废墟上经济正在重新开始繁荣，而其腾飞的方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54年7月4日，在伯尔尼的万科多尔夫球场德国人首次荣登足球世界杯冠军宝座，简直是传奇。四年前，在巴登-巴登疗养院举行了首届德国小姐选美大赛，这也是一次重大社会事件，《每周新闻》（*Wochenschau*）曾进行追踪报道。那届的胜出者是苏珊·埃里克森（Susanne Erichsen）。那位当时二十四岁的柏林女子曾在战后被苏联人带往劳改营，在“第三帝国”时期她的继父曾禁止她化妆，因为正派的德意志姑娘不干这种事。1947年她才重新回到德国，先是在慕尼黑做摄影模特，从此挨饿不再是不得不忍受的折磨，而是升华为一种敬业美德。1952年她作为“德国时装形象大使”前往美国，开始了其“小姐奇迹”的生涯。

其实“奇迹”这个概念容易引起误解。谜一样奇特的一直是格蕾琴和小凯蒂这类处于危险中的女子，而不是那种优秀的、用自己又细又长的美腿站立着的小姐们，她们在战后是凭着对成功的可靠嗅觉脱颖而出的。这些奇迹小姐晋升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她们是战后那些在德国大城市套上围裙在废墟中清理瓦砾的妇女的小妹妹或女儿。她们同样守纪律，同样没幻想，这些奇迹小姐魅力十足地向全世界证明，被彻底摧毁的也许是德国，但不是德国人。“战后我学会了，不能消极地坐等天上掉馅饼。不存在幸运这回事。所以要睁大眼、竖起耳朵、抓住生活中的机遇。”21世纪初资深模特格蒂·沙赫特（Gerti Schacht）曾用上面的话描述“零点”精神，在战后最初的时装秀上，作为模特她曾在柏林的废墟中间走秀。

美国人确实感到惊奇，战争刚刚结束，从战败国就又有漂亮、妩媚的女子飞越大西洋来美国了。1952年4月《生活》（*Life*）杂志刊出了整整三页苏珊·埃里克森的照片，并配有颇感惊讶的评论，“战前的胖姑

娘”变成了“时髦小姐”。《生活》杂志认为，是“苏珊”在苏联煤矿卖苦力的那两年起了积极作用，让她从战前的小胖子变成了“120磅的健美女子”，不知道这是美国新兵训练精神的体现，还是细腻的玩世不恭。
而“漂亮小姐”自己则不受任何误导，接下来的几年她一直留在纽约，其每小时一百美元的酬金大约相当于当时一位德国工人一个月的收入。

苏珊·埃里克森在美国所获得的成功也许是因为她留短发，而且头发颜色为深色，这让她看上去与那些堕落了的格蕾琴，也就是那些穿着德国少女联盟制服向“元首”欢呼的女孩们完全不同。她更让人忆起20世纪20年代生活在所有西方大都市演艺圈的女子，那些女子时髦而独立，被称作“轻佻女子”（Flapper）。

奇迹小姐却没有生活在夜之阴影中的女子们那种轻浮与病态。虽然给人以性感的印象，但她们身上的一切都在发出安全信号：在美丽的外表之下没有暗藏着深渊，而仅仅是抱负。她们的曲线美要比大众甲壳虫车更具魅力，在年轻的联邦共和国她们也同样人见人爱。奇迹小姐就像60年代占领了德国人起居室的可以擦洗的塑料家具，这一点没有人比比利·怀尔德在其冷战喜剧《一、二、三》（*Eins*，*Zwei*，*Drei* ）里展示得更活灵活现了。这出戏讲述的是一位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经理在分裂的柏林打天下的事。在所有老纳粹分子和新社会主义者中有个唯一的亮点，她就是热心的“英格博格小姐”。她自愿在下班后辅导老板德语中的变元音，前提条件是：作为名目繁多的附加津贴老板得给她买这样那样的衣服和帽子。

尽管奇迹小姐从未否定过自己的德国味——相反她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但其内里的指南针一直是指向西方的。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过变化。网球界的奇迹小姐施特菲·格拉芙和海迪·克鲁姆（Heidi Klum）[3] 一样都嫁到美国去了，后者是出生于莱茵河流域的快乐模特，她无论是给内衣代言还是展示钻孔机都同样坚定不移。而颇有格蕾

琴气质的克劳迪娅·希弗（Claudia Schiffer）则仅短时间被一位美国魔术师迷住，后来在英国成了家。奇迹小姐是德国为其美国梦建起的一座空中桥梁。

这么看来，90年代末一位《明镜》文艺专栏撰稿人为当时一批活跃在文坛的年轻女作家贴上“奇迹小姐”的标签，就纯属恶搞了。从卡伦·杜韦（Karen Duve）到尤迪特·赫尔曼（Judith Hermann），那种用勤奋征服世界的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对这些女作家来讲是陌生得就像拉斯维加斯和贝佛利山一样遥远。如果人们非要寻找下一位超级奇迹小姐的话，那就当数来自汉诺威的莱娜·迈尔——兰德鲁特（Lena Meyer-Landrut）。至少美国日耳曼学系的大学生都能跟唱热门歌曲《卫星》（*Satellite* ）了，这位兴高采烈的青春少女2010年以此歌摘取了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冠军桂冠。

露露、洛拉、罗蕾莱

若想令德国男人疯狂，看来让自己名字的每一个音节都用L开头显然是个高招。L开头的名字容易被喝高了的口齿不清的男人淫荡地喊出，因此洛莉塔、莉莉斯[4]或《莉莉玛莲》[5]——这首歌特别是由拉莉·安德森（Lale Andersen）[6]唱的时候——就比叫喀耳刻、卡门和莎乐美的机会多一些。

这种幼稚型的名称不是偶然的。那些露露、洛拉、罗蕾莱们，她们毁灭男人虽然与法国的红颜祸水或是美国的吸血鬼一样稳准狠，但与她们那些狡猾的异国姐妹不同的是，就连那些陷入她们圈套的男人都不认为这些天真的诱惑者是故意杀人。

让成群的男人淹死在莱茵河中，这并没有给可怜的罗蕾莱带来任何乐趣，她更希望自己能从魔咒中解脱出来。“男人可以撒弥天大谎，/我的心都疼碎了，/吹圆号者也许还在四处流浪，/哦，快逃吧，你不知道我是谁！”约瑟夫·冯·艾兴多夫让他塑造的罗蕾莱警告夜间骑马的男人，因为他一时冲动想娶这位“漂亮新娘”。

弗兰克·魏德金德（Frank Wedekind）借古老的圣经典故引入其角色露露。在《怪兽悲剧》（*Monstretragödie*）序幕中一位驯兽者带着一条蛇上场——那条蛇自然是由露露而不是别人饰演的，他宣告：“她生来就是为了制造灾祸的，/吸引、诱惑、毒害，/不留痕迹地谋杀。/我的甜甜野兽，千万别装模作样！/别愚蠢、别造作、别乖戾，/虽然批评家很少夸你。/你没有权利通过喵声和吼叫/来扭曲女人的原始形象，/通过插科打诨和向我们做鬼脸/来败坏恶习之童稚性。”

当露露在剧中被问及她富有后整天都做些什么时，这位孩子气的年轻女子——一位医务顾问、一位画家、一位总编辑和一位女伯爵都曾拜

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回答说："我躺着、睡觉……伸懒腰，直到骨头嘎嘣响。"

"漂亮的洛拉"身上同样有这种淫荡的无辜气质。导演约瑟夫·冯·施特恩贝格（Josef von Sternberg）做出的第一个辉煌决定是：他从弗兰克·魏德金德那儿获得灵感，在电影《蓝天使》（*Der blaue Engel* ）中把赤脚舞女"罗莎·弗勒利希"（Rosa Fröhlich）——在亨利希·曼的小说中她叫这个名字——改成了低级娱乐场中的歌手"洛拉·洛拉"。而他做出的更加辉煌的决定是让玛莲娜·迪特里茜[7]（Marlene Dietrich）出演"洛拉·洛拉"。

在后来的采访中，这位女主角一再提及她是如何成功地夺得这一抢手角色的，尽管她当时作为女演员顶多能演女三号：她装出漫不经心，并非志在必得的样子。因为她也确实没想到能得到主要角色，没有为试拍做任何准备，而是就那么坐到钢琴前随便唱了点儿什么。施特恩贝格在其回忆录中也证实，1929年被他叫到巴贝尔贝格（Babelsberg）的这位女子并非"虎将"，而是"显得无所谓"。她就这样赢得了这个角色，一开始让制片人和与她合作的男演员——著名的埃米尔·杰宁斯（Emil Jannings）很吃惊。

施特恩贝格是唯一从一开始就感到——这一点全世界是在电影上演后才认识到的——，没有谁能比这位鲁莽的警察少尉的女儿把这朵污泥之荷演得更好了。影片中的女主角让小城市过于天真的垃圾教授拉特（（Un）Rath）[8]不知不觉地迷上了自己，最终沦落为在低级娱乐场猎艳的男人。对任何有关其演艺生涯的过分问题，玛莲娜·迪特里茜始终都不屑地用"确实无可奉告"来回答。在她身上人们更愿意相信，男人围着她就像飞蛾扑火，一旦他们被烧，那并非她的过错，正如弗里德里希·霍伦德那首众人耳熟能详的歌所唱的。



“若是扑火的飞蛾被火焚，是的，那也赖不着我。”饰演《蓝天使》时的玛莲娜·迪特里茜。

正如美丽心灵没有别的功绩一样，卑鄙的心灵除了卑鄙也没有别的瑕疵。只是前者的内心和谐平静，后者则只有一片混乱。当画家施瓦茨（Schwarz）试图给露露画肖像时说：“我还从未给一个面部表情如此不断变换的人画过像。我几乎无法抓住任何持续特征。”

美丽心灵的安宁能够感染所有逗留在她们氛围中的人；而露露或洛拉则会把所有离她们太近的人拽入旋涡，做到这一点她们甚至不需要狡猾的诡计和化装舞会。她们偶尔戴上的网眼面纱仅仅是种装饰。到好莱坞之后，施特恩贝格才为玛莲娜·迪特里茜设计了银幕女王的形象：完美无缺的侧身剪影、脸部一半神秘地处于阴影中，倚靠在皮大衣上或隐

藏在面纱中。即使女舞蹈家和演员安妮塔·白蓓尔在玛莲娜·迪特里茜之前就身穿燕尾服或黑礼服出现在20年代的柏林，然而她若身着歌舞剧女郎那种华丽暴露的戏装出场，却不会引起巨大骚动，那种场面只有当她裸体上演她那些“不道德、让人恐惧和兴奋的舞蹈”时才会出现。

德意志的女诱惑者们从本质上说属于“地神”，就像弗兰克·魏德金德为《露露》第一部分所起的名字。他的剧是以这首诗开始的：“大自然用十分粗糙的物质创造了我，/欲望吸引我降落大地。/大地属于恶之神明，/不属于善者。”

即便如此，恶女人也是“纯粹”自然的，当然不是指美丽心灵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秩序井然的宇宙。恶女人从混乱的深处发出诱惑，只有那些有勇气跌入深渊的人才能赢得这种女人。在此过程中他的灵魂会被玷污，他的胜利会消灭他，这些都属于被禁的魔力。

格蕾琴和小凯蒂们也从头到脚都准备着去爱。在她们身上这始终意味着：为所选中的一位献身。相反，那些女诱惑者是跟谁都可以的：“什么在我手中颤抖，/在火热的压力下？/请您消失，/您永远没够！”玛莲娜在那个经典镜头中唱道，她像个男孩子般两腿相叠地坐在葡萄酒桶上。她向“小教授”投去的眼神虽然也是一种解救，但仅限于一夜，或者两夜。地神是不能让自己变成固定家产的，但男人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往往太晚了。当终于打破了世俗禁忌的人日后再融入世俗生活时，他的种种努力都得失败：因为那种生活已经成了桎梏。最后他一贫如洗地孤独死去，蓝天使身边则盘旋着下一批雄飞蛾。

亚马孙、女武神和其他野蛮女人

当年轻的女演员乌尔丽克·福尔克茨（Ulrike Folkerts）——别名“莱娜·奥登塔尔”（Lena Odenthal），1989年刚开始出演《犯罪现场》（*Tatort* ）中的女警长时——现在她已经是最资深的女警长了——这位“新手”一开始就得跟被通缉的强奸和性侵谋杀犯罪嫌疑人展开一场射箭比赛。他们再次见面时，他管她叫“风化警察中的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9] 。

如果说思想解放的美丽心灵都让歌德觉得是“亚马孙”，那么直到不久前，这个国家稍微有些不服管的女性都难逃这一称呼。这里面独特地既有厌恶，也混杂着尊敬。

“你是谁，神奇女人？”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在其《彭忒西勒亚》一剧中让惊奇的阿基里斯（Achilles）问道。他不能理解，他和他的队伍本来正在攻打特洛伊，却突然遭到一队女战士的袭击。一心想把这位“年轻、倔强的战神”作为新郎来征服的亚马孙女王回答道：“我不会装温柔，/这是那些弱女子的专利！/……我必须在血流成河的沙场寻找，/我所中意的心上人，/用有力的臂膀去攫取他，/用柔软的胸膛去接纳他。”

“这个奇女人，半是暴怒、半是优雅，她爱我！”这位希腊第一勇士欢呼道。在这场性别大战开始时他还发誓，要把“前额受满致命伤”的彭忒西勒亚头部向前地拖过大街。就像是一出滑稽的儿童游戏，刚刚把亚马孙女王打昏的他，现在想佯装被击败。然而当彭忒西勒亚醒后知道了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后，她大为光火。比被战胜的耻辱更糟的是，那位英雄还想送她一个不光彩的胜利。这位“半是暴怒、半是优雅”的女人变成了“愤怒的复仇女神”，放她所有的狗和大象去咬阿基里斯，最后好由她自己去咬他：“吻吧，咬吧，/二者如此押韵，谁真正动心去爱，/怎样

下嘴都无妨。”德国戏剧中最血腥的殉情场面是这样结束的：骄傲的亚马孙女王在被她亲手碎尸的意中人身旁用匕首自刎。

在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齐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德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与克莱斯特不同的是，作曲家先让这对古老的日耳曼英雄享用了令人心醉神迷的爱的盛宴。然后齐格弗里德就去闯荡世界，“忘记”了他的布伦希尔德，并突然想娶勃艮第人国王贡特尔（Gunther）的妹妹古特鲁尼（Gutrune）为妻。这位国王则非布伦希尔德不娶，此事看上去毫无希望，因为国王身体虚弱，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征服女武神。因喝了迷魂药而丧失记忆的齐格弗里德愿意帮助国王，戴着头罩冒名顶替去为虚弱的国王追求自己从前的恋人，只要国王答应把妹妹许配给他。阴谋眼看就要得逞了，直到贡特尔把布伦希尔德弄到自己的宫廷，在那里她吃惊地遇到齐格弗里德，他正在准备和古特鲁尼结婚，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受到双重侮辱的女武神看穿了这桩阴谋，知道实际上战胜了自己的只能是她的英雄齐格弗里德，她思索着如何复仇。她没有亲自动手——也不用牙去咬——，而是泄露给尼伯龙根侏儒的儿子哈根（Hagen），哪里是唯一可以杀死齐格弗里德的地方。哈根利用了这个机会，从背后向齐格弗里德下了手。在莱茵河畔，布伦希尔德庄严地为这位被刺杀的英雄堆起了柴堆，自己也骑上战马冲进熊熊大火。

无论是中世纪的《尼伯龙根之歌》，还是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的《尼伯龙根》大悲剧中，布伦希尔德或布隆希尔德[10]都没有想到过要追随齐格弗里德赴死。只是到了瓦格纳这里，才为这一北欧传奇人物安排了这种浪漫的惨烈结局，这在拔高她的同时也贬低了她。瓦格纳把一个史无前例的果断和强大的“非凡女人”变成了一名“圣女”。他塑造的布伦希尔德不是那个统治着冰岛的女王，这位女王已经杀了几十个男人，因为她只准备嫁给一位在掷岩石、跳远和掷标枪比赛中能够赢她的人，输者一律得死。瓦格纳塑造的布伦希尔德是众神

之王沃坦（非婚生）的爱女。她不要求英雄好汉们与她进行体育比赛，而是陪伴阵亡的勇士们前往瓦尔哈拉的英灵神殿。因为她不听话，作为惩罚沃坦才让她嫁人。在瓦格纳笔下，布伦希尔德已经没有力量或权力去拒绝想为她破处的人。沃坦让她陷入毫无招架能力的沉睡之中，只是因为他虽然气愤却仍旧爱着她，他在她睡着的岩石旁点起一圈火，并亲自守护在她身旁。不是在比赛中能赢了女武神的人才能做她丈夫，而是能战胜众神之王沃坦的。这位英雄当然不是别人，而是沃坦（同样非婚生）的外孙齐格弗里德。早在没有一个参与者能猜到莱茵河畔王宫中的任何阴谋之前，姨妈和外甥就已经坠入爱河了。

虽然今天“女武神”这个概念首先让人想起的是瓦格纳歌剧中那些身材强壮的女歌手，她们头戴盔甲，手持矛与盾，而且是瓦格纳才把布伦希尔德升华成一个女武神，但从根本上说，他又对她进行了“非女武神化”，使她成为一个可爱的、（后来）起着拯救作用的姑娘。除了声音强有力之外，在《尼伯龙根的指环》中人们根本找不到过剩的女性力量，就像《尼伯龙根之歌》中对贡特尔那失败的洞房夜所做的绘声绘色的描述：“他向她求欢并弄乱了她的衣裳。/这时绝美姑娘抓起了腰带，/那是她随身佩戴的坚硬饰物。/这下国王可受了大罪。//她把他的手脚捆住，/抬到一颗钉子那儿，挂在了墙上。”

尽管以前直到黑贝尔的悲剧中布伦希尔德都是以十分强悍有力的女子形象出场的，但那都不过是一种滑稽角色：女性防御碉堡，她们得受到男性英雄格外粗暴的蹂躏，然后再被轻蔑地扔到一边。在《指环》中她才以复仇者和拯救者的面目出现。此前核心女性角色一直是温柔的克里姆希尔特和被瓦格纳像继父一样冷待的古特鲁尼，后者在齐格弗里德死后才变成了愤怒的复仇者。

瓦格纳也不能让铁娘子仅仅做铁娘子。爱必须以死为结局，否则就不是爱，只是消遣。彼此相遇的异性对手越强大，碰撞出的火花越耀

眼。这毕竟是一种对世界存在的悲观看法，而不是那种简单的父权式的幻想，即每个不服管教的女人都该被驯服为听话的妻子。

在德意志意识中，除了在爱情的烈焰中涅槃外，野蛮女子还有别的栖身地吗？不在情场上厮杀的日耳曼妮娅[11]有资格成为女性英雄角色吗？

“德国如今到处可见大理石或青铜塑造的、穿甲戴盔的权力女人，她们作为‘日耳曼妮娅’应该是我们民族统一的象征。我不喜欢这种非德意志式的艺术表现形式，哪怕它再有美学价值。它打动不了我们的心，这种冷淡的女性拟人化作品在我们这儿从来都不是有血有肉的。德国人一向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这体现在其英雄形象中。可这样的英雄是男人。”日耳曼学学者古斯塔夫·勒特（Gustav Roethe）用上面这段强硬的话开始了其关于“德意志英雄气概”（*Deutsches Heldentum*）的演讲，这次演讲是1906年为威廉二世皇帝祝寿而进行的。事实上他同时代的人大概都会更满意一个不亲自佩剑出征的日耳曼妮娅，而是仅限于扮演好母亲的角色，生养能打仗的儿子，哀悼阵亡的儿子。然而确实存在这位日耳曼学学者所抱怨的“穿甲戴盔的权力女人”：莱茵河畔下瓦尔德高高耸立的女性雕像展示的是骄傲的女主人，而不是痛苦的母亲。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日耳曼妮娅形象则变得更加尚武。在这个民族大屠杀的前夜，她们失去了全部优雅，变得像弗里德里希·席勒在《钟之声》（*Das Lied von der Glocke*）里所描绘的法国大革命时好斗的女人：“女人变成土狼/嘴里的段子令人惊骇，/用豹子般的利齿，/她们撕碎了敌人尚在抽搐的心脏。”

这位即使在奥尔良的圣女身上都首先在寻找其优雅的诗人，其上述诗句所描绘的画面却不是病态的欲望，而是厌恶。来自施瓦本，自愿选择了魏玛的诗人是写不出克莱斯特剧中彭忒西勒亚那种血腥的爱情冲动的。

尽管能征善战的女汉子历时数百年一直让德国人想入非非，可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却很难保留这个国家所涌现出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真实女战士。如今已经没人［除了个别贝多芬行家，他们耳中还有贝多芬为现已完全被人忘记的弗里德里希·东克尔（Friedrich Duncker）所遗失的悲剧《埃莱奥诺雷·普罗哈斯卡》（*Eleonore Prochaska* ）谱写的曲子］能够想起埃莱奥诺雷·普罗哈斯卡了，这位普鲁士士兵的女儿1813年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女扮男装，化名“奥古斯特·伦茨”（August Renz）加入吕措自由军团，在敌人密集的榴霰弹下身亡。同样被人遗忘的还有符瑞德利克·克吕格尔（Friederike Krüger），她化名“奥古斯特·吕贝克”（August Lübeck）也加入了反拿破仑解放战争，甚至当上了下级军官，获得过二级铁十字勋章，尽管在一次战斗中她暴露了自己的女子身份。

19世纪末，不怕男人的反对、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女武神形象和亚马孙形象被“女权主义”继承：1899年10月第一次巴伐利亚妇女代表大会在慕尼黑召开，组织者中包括主张男女平权主义者阿尼塔·奥格斯普克（Anita Augspurg）和明娜·考厄（Minna Cauer）。庆典高潮时几位女士穿起了女武神的铠甲、戴上古典盔帽、手持剑与矛，为了正式声明：“自由万岁，胜者万岁！/在战斗中获胜，在胜利中赢得男人！/被我们战胜的他就是我们的奴才，/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权利。”

当然也有来自女人的更具和解性的尝试，想把亚马孙从制服别人的逻辑的盔甲中解放出来。1760年，萨克森选帝侯夫人玛丽亚·安东尼亚·瓦尔普吉斯（Maria Antonia Walpurgis）创作了一部小型歌剧，名为《亚马孙女王塔勒斯特丽斯》（*Talestris，Königin der Amazonen* ）。三年后选帝侯的家庭成员在德累斯顿上演了这部歌剧，玛丽亚·安东尼亚坚持要唱女主角。歌剧结束时，亚马孙女王既没有败给自己所爱的男人，这个男人也没有装做败给了她，而是他们二人一起作为开明君主治理着国家。

“您是未来才会出现的新型女子！意识到您的使命，只有您才能开创辉煌的新纪元，形成男女携手创造的新局面！”伊尔莎·朗纳（Ilse Langner）在喜剧《亚马孙女杰》（*Amazonen* ）中借奥德赛之口热情洋溢地称赞彭忒西勒亚。这位1899年出生于布雷斯劳（Breslau）的女作家因婚姻不幸逃往柏林，不久作为剧作家在那里就小有名气了。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称她为“彭忒西勒亚-朗纳”。她在自己的剧本中不想把男权统治的长矛简单地倒转为女权统治，然而她不像选帝侯夫人那么理想化，她怀疑亚马孙身份和爱情能否两全。在序幕中，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的正直的普鲁士公务员让他的未婚妻做出抉择，是愿意去工作，还是愿意嫁给他。这位名叫彭塔的医学女大学生刚刚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她一把摘下头上的帽子，扯了扯身上的衣服，作为回答她抬出了剽悍的亚马孙女战士们：“是的，亚马孙们！……我一向把她们看作自己的老姐妹，她们果断、勇敢、不依赖男人。她们自力更生、英勇奋战、宁死不屈。我并非孤身一人，我们女人是一股小部队，它将不断壮大。你们将亲眼看到亚马孙女战士们的队伍行进。你们听见她们的步伐了吗？”

然而在剧中亚马孙们看上去并没有那么英雄。虽然开始时她们占领了雅典——因为男人们分散了注意力，他们在看奥林匹克比赛——，但奥德赛，即称赞彭忒西勒亚是“新型女子”并认为辛辣的女战士要比希腊大城市中“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居家妇”更迷人者，却成功地瓦解了亚马孙们的斗志。他让人送给她们首饰和漂亮衣服，看吧：就如同她们读过瑞士人约翰·雅克布·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1861年广为流传的学术著作《母权论》（*Das Mutterrecht* ）似的——这位历史学家在该书中把亚马孙灭亡的原因解释为那些厌倦了打仗的女战士们高兴地驶入了婚姻这个安全的港湾——，她们也从自由翱翔的鹰变成了笼中供人观赏的鸟和窝中咯咯叫的母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批“废墟妇女”的命运亦有相似之处，当她们的丈夫从战俘营回来之后，她们愿意重新返回家庭，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最后彭忒西勒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带着亚马

孙中的中坚分子，撤退到没有男人的山中。

并非瓦格纳的女武神，而是参加**1899**年第一次巴伐利亚妇女大会的女权主义



者。照片由索菲亚·古德施蒂克（**Sophia Goudstikker**）拍摄，她在慕尼黑与其女同伴侣阿尼塔·奥格施普隆（**Anita Augsprung**）开设了一家艺术照工作室**“**埃尔维拉**”**（**Elvira**），这是女性在德国开创的第一批企业之一。**19**世纪末慕尼黑的时尚阶层纷纷前往那里照相，其中包括托马斯·曼和巴伐利亚王室成员。

伊尔莎·朗纳这部剧初排练时正值纳粹分子刚上台，所以该戏未能上演。但这并没有妨碍作者于1936年为该剧补写了一个男女和解的结局：在柏林的奥林匹克运动场一场国际飞行大赛结束。德国年轻女子柯尼希（König）驾驶其“飞翔的亚马孙”号赢得了这场比赛，虽然她在其最强的竞争对手——一位叫“英雄先生”的美国人——的“银鸟”号在刚飞越莫斯科上空后出现故障时帮助了他。这位阿基里斯的代表显示出自己是一位输得起的失败者，他称赞赢得这场比赛的对手说：“尽管输了，我也为这位亚马孙赢得比赛而高兴，因为她很棒，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战友。”

虽然纳粹分子们——以及此后的联邦德国共和国公众——都不知该如何对待伊尔莎·朗纳的这部剧，可在现实中他们完全不反对妇女进入座舱，甚至雇用她们当空军。汉娜·赖奇（Hanna Reitsch）二十岁时就创下了滑翔纪录，1937年成为试飞员，试飞过斯图卡、轰炸机和猎人飞机。战争期间她帮助组建了由“敢死队飞行员”组成的飞行队伍，然而该队伍还没有投入使用就销声匿迹了。汉娜·赖奇是德国历史上唯一获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女子。尽管这位飞行员本人从未参加过纳粹党，她对元首却保持着尼伯龙根式的忠诚，1945年4月26日她驾驶着Fi-156鹳式轻型联络观测机飞往被红军围住的柏林，为的是把空军总司令冯·格莱姆接送到希特勒那儿去。

娘家姓席勒的美琳塔·申克·格拉芬·冯·史陶芬贝格（Melitta Schenk Gräfin von Stauffenberg），是汉娜·赖奇之后第二位获得机长称号的德国女性。她的职业生涯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作为工程师她参与了德国空军俯冲轰炸机的研发工作，曾亲自做过2500 次此类飞机的俯冲试飞。因

为其犹太血统，这位飞行员曾被德国空军解职，不久又被重新雇用。1943年她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以及镶钻和红宝石的金质前线飞行奖章。因与刺杀希特勒失败的克劳斯·申克·冯·史陶芬贝格伯爵有亲属关系，她曾受到株连，6周后因“重要战争任务”获释。在战争的最后关头她被——估计是美国歼击轰炸机——击落，当时她正试图追赶在巴伐利亚运输战俘的一架运输机，她猜测这架飞机中有自己的亲属。

就连贝亚特·乌泽（Beate Uhse），这位德国战后最成功——同时也最声名狼藉——的企业家也不是卖性感内衣和振动器起家的，而是宇宙电影股份公司的替身飞行员，并有空军上尉军衔，负责把飞机开往前线。

不光在魏玛共和国，就是在“第三帝国”这类亚马孙生涯都是可能的，这成了一个令人伤脑筋的事实。汉娜·赖奇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她常常遭受男同事的敌对行为；相反，贝亚特·乌泽却说与那些“年轻男子”相处从未出现过问题。

乍一看人们可以认为，这些“飞翔的女人”似乎仅仅是受到容忍，因为她们所有人都愿意为国捐躯。但女冒险家艾丽·拜因霍恩在纳粹时期也一直是个明星。她不为空军工作，而是在1932年作为第一位妇女独自完成了环球飞行，1936年她在24小时之内飞过了非洲、亚洲和欧洲。没人期待这些飞翔的亚马孙们或是当铁处女，或是婚后放弃飞行。贝亚特·乌泽和艾丽·拜因霍恩在怀孕期间仍旧坚持飞行，而且并未受阻。

纳粹对这些野蛮女人的所有矛盾心理从约瑟夫·戈培尔有关莱尼·里芬斯塔尔的日记中可见一斑，后者是帝国电影界的偶像级人物，她最热衷（可惜未能实现）的计划是将克莱斯特的《彭忒西勒亚》搬上银幕并亲自出演女主角。1936年11月6日，当这位女导演正在剪辑她所拍摄的两部奥林匹克电影时，纳粹宣传部长在日记中写道：“里芬斯塔尔小姐又在我面前歇斯底里。跟这种野蛮女人无法共事。”一年后，当他看了

拍摄完毕的电影的部分片段后，热情赞扬道：“好得难以言说，摄影与表现都震撼人心。是项了不起的成就，个别部分感人至深。莱尼的确手法不俗，我大受鼓舞。”

里芬斯塔尔、赖奇、拜因霍恩和叫其他名字的女子们，她们都是极端主义者。不是在政治上——在这方面她们都是闭目塞听的盲目跟随者，只关注她们想看到的东西——，她们痴迷于自己的艺术、体育、技术和冒险。只要她们向当权者发出足够的奉献信号，只要她们准备用自己——不是她们自身——的特殊技能为祖国效劳，人们就会给她们提供机会。因此在德意志民族感最具侵略性的时期就是女人也可以成为“女英雄”。

联邦德国则吃一堑长一智，对民族感和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都持怀疑态度。在此意义上联邦德国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可谓模范的女共和主义者。她不是亚马孙，尽管她在仕途中成功地让党内的每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男人都靠边站了。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更是日耳曼妮娅的全新定义：不是靠手中的剑，而是靠民意测验机构的最新民意测试结果，她让德国沙盘终于安静下来。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参阅：深渊，登山片，烫发，驾驶的乐趣，幼儿园，母亲十字勋章，神秘主义，狠心的娘，纯洁戒律，怪诞之事，莱茵河——父亲河

---

[1] 罗马神话中的果树女神。

[2] 德国《艾玛》杂志创始人，女权主义者。

[3] 又译海迪·克林。

[4] 犹太民间传说中的女妖。

[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双方阵营中广为流传的一首德语歌曲。

[6] 夜总会歌女。

[7] 又译玛琳·黛德丽。

[8] 此处为作者的文字游戏，Unrat在德语中意为垃圾，“垃圾教授”是学生们给这位中学老师起的绰号。

[9] 希腊神话中阿瑞斯的女儿，亚马孙女王。

[10] 在黑贝尔的剧中Brünhild写作Brunhild。

[11] 历史上象征德意志帝国的妇女形象。

圣诞市场

又是基督降临节了！空气中飘浮着心形姜饼的香味！里里外外大门洞开，迎接荣耀的主来临。黑尔恩胡特（Herrnhut）星已然四处闪耀，在上劳齐茨（Oberlausitz）每逢圣诞节前后它们都点缀在住房、社区集会大厅、教堂和幼儿园中。按照古老的习俗这种多角星由家人或朋友们亲手一起叠成，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日要把它们悬挂起来。

现在所有的城市都张灯结彩了。

本来圣诞节应该与耶稣基督，也就是圣婴有关，庆祝他诞生在伯利恒（Bethlehem）。其他国家的圣诞习俗证明了这一点，届时在火车站、商店和通道都会公开摆出耶稣诞生的模拟场景，里面的人物栩栩如生。

在德国情况则不同，你说，就好像你大声道破了天机。这里耶稣诞生的模拟场景不是最重要的，圣诞树才是节日的主角，冷杉或多或少已经成为冬天的象征。这是异教习俗，通过神话传说保留下来的，它们是默默无声的。耶稣既没见过冷杉也没见过雪。圣诞树既可以巨大，也可以不显眼，全看买主的喜好和情绪，以及钱包里有多少钞票。圣诞树摆在家中和市政大厅门前。



法兰克福罗马广场：圣诞市场早于资本主义。

市政厅前的广场上，我们在鳞次栉比的售货亭之间逛来逛去，这边飘过来的是阵阵香草味，那边则是肉桂味。一支看不见的乐队在演奏圣诞歌曲，声音是从高高悬挂的音箱中传出的。“化成肉身，”合唱团唱道，“圣子被差遣来到我们中间。”如今还有人知道这首歌吗？甚至也许有人还会唱？

一切仅仅还存在于我们的耳中。全部传统就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它在我们耳中进进出出。基督降临节的歌声又传入耳中，逛圣诞市场正时兴。这种市场的一个标志就是加了香料的热酒（Glühwein），因为正值寒冬，出门都得戴手套的日子，喝此酒可暖身。此外人们还可以近距离观看各种手艺人献艺或是在卖烤苹果的摊子前转来转去。最后到底买了一个拿在手上，而且还想说，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就买了。

人们去逛圣诞市场并非为了买东西，至少不是为了买什么特定的东西。这种市场以卖甜食为主，是坚果的天下：杏仁和栗子。

尽管如此人们也很少空手而归。圣诞市场出现得比资本主义要早，还没有市场经济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市场和市场区。

人们也许买点儿心形姜饼、圣诞果脯蛋糕或是圣诞树支架，要不就是琢磨着该买个支架了。圣诞节是爱与回味的节日，相关的广告中总是这么强调，它辩证地与市场经济有着不解之缘。比如别出心裁的人可以定制自己独一无二的圣诞树支架。有了新支架，今年的圣诞树可以既快捷又安稳地装饰好。其价格差为24.95～9999欧元。后者意味着手工打造的不锈钢支架，上面还镶嵌了9000块水晶。这就等于是圣诞树支架中的迈巴赫（Maybach）[1]，谁家不想要啊？

喝热酒？吃烤肠？寒冷的空气里飘散着浓郁的糖香，扩音器中徐徐传出圣诞歌声：《铃儿响叮当》《平安夜》和《雪徐徐地下》。人们四下里漫无目的地闲逛，尽是全家一起来逛的，就好像他们听着音乐，或出于别的原因，或没有任何原因突然迷失了方向似的。目力所及到处是一排排的神奇售货亭。德累斯顿圣诞果脯蛋糕，有人叫卖道，还有人向我们指了指一张桌子，看上去就像是张专放圣诞礼物的桌子。最早德累斯顿圣诞果脯蛋糕表现的是裹在白色襁褓中的圣婴，德累斯顿糕点市场以此闻名，市志中第一次提到这种富有传统的糕点是1474年。

根据教会的教条，德累斯顿圣诞果脯蛋糕当时只许用面、发酵粉和水来制作。但因为没有黄油和牛奶的蛋糕乏味，萨克森的恩斯特选帝侯（Kurfürst Ernst von Sachsen）和他的弟弟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写信给教皇，请求取消禁用黄油的规定。教皇的回信以“黄油之信”的名称载入史册。此后制作圣诞果脯蛋糕便可以使用黄油与牛奶了。神话传说中的习俗保留了下来，习俗中的食谱验方也保留了下来。从1560年开始，每年萨克森的王室都会收到德累斯顿面包师们赠送的一块巨大圣诞

果脯蛋糕。1730年选帝侯强力王奥古斯特（Kurfürst August der Starke）打破了所有到那时的历史纪录，他让人制作了一块重1.8吨的圣诞果脯蛋糕，用来招待约24000位客人。

啊，基督降临节。远处驶来一条船/它已载得满满。/船默默向前/它荷载着昂贵的内涵。

圣诞市场是个真正的迷宫，我自言自语。人们转来转去，却总在原地打转。本来他们想去瑞士滑雪的，结果到底还是留了下来。在家就是在家，圣诞节在家最惬意。人在脑海中想象壁炉中的火焰，转眼间却听到隔着几个售货亭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因为其他人，家里的其他人已经走远了。可刚才是谁在喊我的名字呢？难道那不是童年所熟悉的嗓音吗？那已然消失的神秘声音？

作者：里·瓦

译者：丁娜

参阅：兄弟树，德国人的性情，教会税，香肠

---

[1] 德国超豪华轿车品牌。

赔偿

对犹太人和纳粹受害者予以赔偿（Wiedergutmachung）[1] 的发明者既不是新教教会节（Evangelische Kirchentag）也不是复活节游行运动（Ostermarschbewegung），而是康拉德·阿登纳。也就是说，提出给予这种赔偿的，不是那些曾支持过以色列的、自以为有责任敲响警钟的形形色色的组织[2]，而是被擅长文辞的文人和思想家们大加诟病的那个“来自莱茵河畔的老头子”。而这老头子这样做既不是多愁善感也不是出于伪善。阿登纳——在1945年之后少有的不需要任何“清白证明”（Persilschein）的人士之一——很懂得使以色列和德国两国的利益相得益彰，而且还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当时所有与之相关的事情实际上简直都不可想象。

1952年9月10日的《卢森堡协定》（Luxemburger Abkommen）所涉及的是，商定由联邦德国在14年内以提供实物和服务的方式向以色列支付高达30亿德国马克的“安置费”。此外西德政府还在其中声明，将开始启动立法程序，制定归还财产和向受纳粹迫害者个人进行赔偿的法律。并且，德方还负有义务，向照顾幸存的“第三帝国”受害者的救助组织额外再支付一笔钱。

在以色列，德国这一为直接承担责任迈出的步伐在当时并不是很得人心。以色列一开始曾提出要求，要同盟国以其名义向两个德国索赔，可是同盟国却显然不把这看作自己的任务。这一点很有意思。等到在那之后本·古里安（Ben Gurion）政府自己主动提出要求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原则上拒绝了以色列的赔偿请求，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却答应了。

在这个问题上，康拉德·阿登纳在党内和其执政伙伴那里都没能赢得多数。当时《卢森堡协定》的著名反对者有托马斯·德勒（Thomas Dehler）和固执己见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β）。德国公众也对政府尤其是联邦总理的这一决定施加了很大压力。一个引人注目的、积极活动的亲阿拉伯院外游说团体在这场大合唱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一些人在这时候又说起德国-阿拉伯关系将会出现危险，比如阿拉伯同盟（die Arabische Liga）就用这种说法来作为威胁。至于德国和阿拉伯的关系在1952年有什么急迫的重要意义，这个在当时和现在人们都弄不清楚。德国那时候在地中海并没有什么需要捍卫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且在那之前不太久的所有与阿拉伯相关的关系主要都是为削弱（大英）帝国这个目的服务的，不论是在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舰队计划期间，还是在上萨尔茨堡的午餐讲话（Tischreden vom Obersalzberg）[3] 之时，都是如此。

这个阵营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也许当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也许当时是那些以前为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s）服务的（德国）同志们，那些逃亡到开罗的纳粹军官，他们在那里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建立保安机构。在新闻媒体上发表亲阿拉伯文章以施加影响的德国人还有玛丽昂·格雷芬·登霍夫（Marion Gräfin Dönhoff）。她在1952年12月16日的《时代》周报上赞同如下解决方案并自认为这个方案可以令所有人都满意，即在她看来，所有这些赔偿款项和供应都应当等到近东的战争状态终结之后再开始提供，也即等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缔结和平协议之后。也就是说要等到“汉堡圣子虚乌有日”（Hamburger Sanktnimmerleinstag，《时代》周报总部在汉堡）。

幸亏果断的阿登纳很懂得如何实现自己的主张。他在恰好合适的地方寻求为达到目的所需要的多数。《卢森堡协定》最终借助于反对党社民党的票数得以在联邦议院通过。

导致开始伴随对犹太人和纳粹受害者的赔偿开始的，应当是在联邦德国发生的那些辩论，人们从道德的一般原则上来对它进行论证。由于纳粹犯下罪行，人们在那之后便无法过渡到任何议事日程上去，不论你想遵循什么样的日程规划都不行。不管面对什么情况，过去都如影随形无法摆脱，并且联邦德国的政治举措还受到国内外那些或多或少是自封的检查员的严密观察。当时冷战阴云笼罩，不光德国，整个欧洲都被分裂，而且苏联这个超级大国还和它的东欧卫星国一起，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很是亲近。

第二次世界大战携带着如此之多宣传性质的附加意义，为此前的任何战争所不具。并且，由于它是一场按照所宣称的意识形态原则来进行的战争，因此它的结束和在结束后随之建立的战后秩序也只能是依照意识形态来谈判。联邦德国这个德意志帝国的光有个躯干的未完成作品，没有盟友，但被嵌在东西方的冲突中间，就这样处于西方占领国政权的保护之下。因此，它必须在内政上提出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到的新的设想，并且同时还要确保在国际法上为未来赢得一个位置。它不得不长期面对的曾进行过种族屠杀的指责，恰恰要求它为公众舆论甚至为外交披上一件道德的大氅。

在这种形势下，在内政上必须使各方面势力达成均衡，如果不想冒险迎合极端思潮——那样将使这个赔偿计划被拒绝甚至会形成敌对态势——的话。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人们早在1951年就已经做出决定，禁止极端分子的极端言行。在这一法律限制下，在右翼有社会主义帝国党（die 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SRP），其理事会里坐着奥托·恩斯特·雷默尔（Otto Ernst Remer），就是那个逮捕（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行动）“谋反者”的家伙；在左翼则是德国共产党（KPD），这个党拒绝接受基本法。社会主义帝国党实际上差不多是一夜之间就被禁止了，而精明的思想左倾的律师们则一场接一场几乎是无穷无尽地打官司，一直打到1956年，这才得以最终也对德国共产党下达禁止令。

冷战在很多条战线上展开，并且在很多战线上主要都是打嘴战。以前战争结束后只有战争赔款（Reparationen），人们多是争论赔款数额的多少和哪些是不该有的款项，然而也就只限于此而已。这回不同，由于有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人们感到不能只提付钱的事，不过人们也在尝试寻找不提这个问题的应对办法，看看到底哪些是可以赔偿的。谁若是落入以道德观念来解释政治观念的窠臼，就会发现许多事情都很成问题。于是人们试图首先以表明道德态度的办法来面对道德问题。

就这样，在以这种方式进行赔偿之外，还增加了清算过去的内容。如果一项罪行可以通过赔偿来消弭，那么往昔也应当可以整个地被翻过去。1945年以后，大多数德国人都感觉自己是失败者。还没等到他们能够对所发生的事情想透析明，他们已经必须面对同盟国的甄别以及由其制定的甄别标准了。人们在谈论“调查问卷”（Fragebogen），“去纳粹化”就以这个调查问卷为基础进行。于是“调查问卷”这个词成了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一本极其成功的著作的名称和主题。那是一个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著名保守主义者的抗议，它成为沉默的多数人的声音。基于这个调查问卷，人们被从政治上划分等级，据此归类入档，同时也被打上了印记。

这影响了德国人对审判——尤其是对战争结束后同盟国在纽伦堡作为范本进行的审判——的看法。就连年青一代的代言人也反对集体罪责论，比如阿尔弗雷德·安德施（Alfred Andersch）和汉斯·维尔纳·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独立杂志《呼声》（*Der Ruf*）的出版人。这份杂志在1947年就已被禁止发行。安德施和里希特也是后来的“四七社”（Gruppe 47）[4] 圈子里的作家。



位于柏林市中心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由建筑师彼得·艾森曼设计。

“胜利者司法”（Siegerjustiz）是当时流行的词，这个词不限于在极端主义者的圈子里言说。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后，在重新统一了的德国，作为对西德的合并式统一政策——也即把东部德国的州并入西德——的指责，这个词又重新回归到惯用语之中。

清算过去成为公众讨论中一个很有力的工具。谁要是理屈词穷不再拿得出论据，那么只要对过去的清算工作没有做到家这一点予以责难，就保证能够得分。还在早些年里就曾流行过这样的坏习惯，即互相指责对方是纳粹主义。当对犹太人和纳粹受害者的赔偿由国家组织进行，清算过去成为公共事务时，个人完全能够很好地从这个事情上脱身。在公共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题目越多，就越用不着去面对自己的个人履历。罪责是其他人的，尽管他也是这“其他人”中的一个。只要跟着走走过

场，参加过大多由学术界发起的反对部署核弹头和反对一切战争的运动，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和平大会，就足够了，并且，虽然很多参加这种和平大会的人都是真诚的，但是始终都有来自东德的钱掺和在里面。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假如东西方之间发生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必定是德国。为了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德国佬米歇尔（Deutsche Michel）[5] 重新站了起来并且对自己说，德国甚至宁肯不要军队，就好像不是参战方你那里就不会变成战场一样。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佬米歇尔疑虑重重就像赫尔穆特·舍尔斯基、傲慢自大就像沃尔夫冈·诺伊斯——那个总是大吹大擂的家伙。

有两位作家站了出来，恰如其分地给我们的米歇尔兜头浇下一盆冷水：卡斯帕尔·冯·施伦克-诺青（Caspar von Schrenck-Notzing）和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他们的书都有着纲领般的名称。这一个把他的书称作《性格清洗》（*Charakterwäsche* ），那一个则取名为《无力悲伤》（*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右倾保守的施伦克-诺青对“再教育”（Reeducation）大加指斥，而左倾自由主义的米切利希与其合作撰稿人玛加丽特·米切利希（Margarethe Mitscherlich）则认为德国人自己应当为过去的惨败负责。这在当时真是一场对德国人心灵影响深远的挑战。

“过去政策”（即关于如何面对过去的政策）——这是在此期间历史学家送给它的名称——总是不断地掀起新的浪潮。每一个新的十年里总有其最引人注目的“纳粹事件”。在20世纪60年代是审讯艾希曼和奥斯维辛审判，70年代是电视连续剧《大屠杀》（*Holocaust-Serie* ）。它带来了范式转换。难以置信的事实被用一个以传统手法演绎的家庭故事介绍给公众，一个虚拟的故事。而且这很起作用！有意思的是，在由西德意志广播电台电视台（WDR）改编的德国版的四集电视连续剧中，结尾部分缺了七分钟。在美国原版中，这部分是讲述一名幸存者来到了以色列，在那里帮助建设（犹太人的）新国家。

接下来是历史学家们的争论和《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e*）、戈德哈根辩论（Goldhagen-Debatte）[6]，以及关于德意志国防军展览（Wehrmachtsausstellung）[7]的争论。尽管这些事件可以划归同一个目的，但其反响却极不相同。奥斯维辛审判在20世纪60年代使德国公众的心灵深受触动。人们第一次亲眼看到，当时在那里真实审判的是什么。相反，《辛德勒的名单》却是一部讲述所谓的犹太人拯救者的伤感片，是好莱坞提供给德国观众的榜样人物，是一份修改过的以具体人物来体现的新版“清白证书”。对于历史学家们的争论，今天几乎已经无人能够说出所争论的究竟是什么。而戈德哈根不过是又一次以“清白证书”作为话题，准确地说是翻了个个。他把那些已被宣告无罪的人看做罪犯的志愿帮凶。由此，在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又开始尝试把“过去政策”粘贴到新的日常政治当中，并且为德国社会——特别是为其可能出现的政治方面的解放行动——划定界线。关于德意志国防军展览的争论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也是想把它用作证明犯罪人谱系广泛的证据资料。然而它却将20世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观念中的首个冲突点标示了出来：这个展览由于把在加利西亚——今日的西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的图片归错了类，非其所愿地引发了一场在纳粹大屠杀和古拉格集中营之间做比较的辩论。

在所有这些十年过去之后，可以确定，这里所涉及的已经不再是对犹太人和纳粹受害者的赔偿这个伟大的姿态，而是今天的形势。人们从对奥斯维辛的惊恐中究竟真正学到了多少，这从我们同以色列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得出来。问题不在于总是回过头去不断挖掘反犹主义的根子并且总是对拜罗伊特[8]指指点点，而是应当以其在今天的表现形式来理解它。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学习是为了现在，要不然就什么也没有学到。

作者：里·瓦

译者：郑冲

参阅：德国式焦虑，基本法，战争与和平，文化民族

---

[1] Wiedergutmachung一词二战后在德国专指联邦德国对纳粹罪行受害人尤其是犹太人的赔偿，意指以金钱赔偿来减轻其在物质方面所受的损害，因为个人命运和身心所受的伤害是无法赔偿的。它与国际法上通常所用的“赔偿”（Reparation）一词的区别在于表明是自愿予以赔偿。参见Brockhaus词典。

[2] 作者在此用的是Betroffenheitsboten一词，据作者多恩女士解释，该词是指那些自以为负有提醒德国警惕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等的运动或组织，如前面提到的“新教教会节”和“复活节游行运动”之类。作者在此想要点明的是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在德国，真正为赔偿犹太人和纳粹受害者做了些实事的反倒是“保守”或“右翼”圈子里的人，比如阿登纳；而那些宣称对纳粹大屠杀罪行感到羞耻、好像同纳粹撇得最清的左翼组织或运动却完全可以是反犹或反以色列的。

[3] 这里应当是指希特勒1939年8月22日在上萨尔茨堡向军队将领的讲话，从餐前持续到餐后，其中表明了攻打波兰的意图。

[4] “四七社”是1947年在西德成立的一个文学团体，对西德战后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汉斯·维尔纳·里希特（1908～1993）和阿尔弗雷德·安德施（1914～1980）是“四七社”的倡议者和组织者。

[5] 德国佬米歇尔是德国人的代称，起源于近代早期，如今一般只用于讽刺作品，其形象总是戴着一顶睡帽，通常用来表示粗笨愚昧又爱胡思乱想的德国庸人。

[6]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1959～），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因其《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中文版由新华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而引起公众争论。

[7] 德意志国防军展览全称是“灭绝战——德意志国防军1941～1944年所犯下的罪行”，汉堡社会研究所举办的巡回展览，1995～1999年和2001～2004年两次展出，展示德意志国防军在纳粹时期尤其是在对苏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当时引起很大争议。

[8] 拜罗伊特因每年举办演出德国音乐家瓦格纳作品的音乐节而出名，在此用于代指瓦格纳。瓦格纳在世界音乐史上赫赫有名，但其反犹主义、对日耳曼英雄传奇的信崇及纯粹血统的神话与纳粹世界观相契合，希特勒是其狂热崇拜者，他曾说：“凡想了解民族社会主义者必先认识瓦格纳。”瓦格纳的音乐在纳粹时期无处不在，与犹太人的悲惨命运紧密相连，以至于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以色列依然禁演瓦格纳的作品。

维尼图 [1]



想成为印第安人的愿望。**1900**年世纪之交的卡尔**·**迈作品封面。

在美国没有人听说过维尼图这个名字。这对维尼图·楚克迈尔（Winnetou Zuckmayer）来说至少是个福音。最起码她和她的父母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美国佛蒙特州时，再没有人因为她的这个名字来问长问短。

之所以取维尼图这个名字，也许是她的爸爸、作家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1896～1977）的一时心血来潮。他喜欢卡尔·迈

（Karl May）的作品，我们可以理解他对德国文学的热爱。至少他在文学问题上持之以恒，努力创作耳熟能详的作品，对人类本性的善良坚信不疑。

好像卡尔·迈（1842～1912）和他很相似，例如迈的挚友中就有当时中欧地区备受尊崇的和平女性代表贝塔·冯·祖特纳（Bertha von Suttner）。他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也是祖特纳推荐的，1912年他在维也纳做了一个报告，名为“升华到高尚人的国度”。

楚克迈尔和迈还有一些共同之处：强烈的德意志意识，但并未带有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典型的傲慢。库珀尼克上尉（Köpenick）[2] 性格之可爱明显地突出了楚克迈尔对待唐突粗鲁行为标准的喜剧情结，以至于有些人无法理解其幽默。但是谁对待普鲁士人缺乏严肃，那么他在1930年时就活得不那么自在。

这个自称库珀尼格的上尉不过是一个德国冲锋队队员的擦靴匠，如果没有那些为他出场的虚伪辩护人，也许楚克迈尔会继续践行一个娱乐性剧作家的道路。他的《欢乐的葡萄酒山》（*Der fröhliche Weinberg* ）也会有更多尽情欢乐纵情的姐妹剧作。但这是不可能的，就连楚克迈尔也陷入了世界观的矛盾之中。

楚克迈尔之所以是楚克迈尔，是因为楚克迈尔在一部作品中对著名的飞行员、纳粹支持者恩斯特·乌德特（Ernst Udet）表达了追悼的敬意和矛盾重重的同情，从而使其跻身于战后伟大作品的行列。而由库德·于尔根斯（Curd Jürgens）主演的那部电影《魔鬼将军》（*Des Teufels General* ），更使其成为评估战后每周新闻中那些坐在被告席上德国男性的标准。从此德国人又接纳了他们的这位流亡者，显然这位流亡者也接纳了前者。曾经分道扬镳的人们，开始了卿卿我我的恋情。真是典型的作家命运：作家属于其人民，人民是他的读者。

而卡尔·迈相对要容易得多。他那个时代没有战争，也就没有什么冒险的好机会。埋头劳作制造产品，比英国人做得更快更便宜，因而也就惹怒了后者。英国人强迫德国人，要让英国买家看明白这些产品可是来自德国的，要在所有产品上加印一个警告提示：德国制造。

但世界足够宽广博大，可以沉淀无尽的梦想。在乏味无聊的德累斯顿，迈的想象力追随着19世纪末两条宏大的梦想路线：一条是对祖国深感失望而背井离乡的移民选择的汉堡至美国线，另一条是对英国和法国殖民策略提出质疑的威廉二世的东方线。

迈那些描写美国故事情节的小说主题主要围绕着野蛮西部的开发。有关维尼图的第一部小说讲的是一条火车线路的测量和建造，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事件。关于小说中印第安人首领维尼图这个角色有诸多猜测。迈作品中的叙述者总是那位名为沙特汉德（Shatterhand）的年迈老者，也就是作者本人，维尼图是一个由他构思出的理想人物。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即这部作品意在从道德角度驾驭野蛮西部的文明化进程，简言之，该作品是在说明对待土地和人的顺从的一种德意志秩序观。而阿帕奇人的首领维尼图，并不是现实中的对手，而是身为一个自由人的德国男性的缩影。在帝国时代，德国人尽管有公民权，但依然是奴仆。他也希望有个银盒子，也愿意为公平和自由出力，成为英雄，至少是在家乡猎手协会中。但是这个非英雄的时代不允许他这样做，只好沉浸在迈先生的幻想中，亦步亦趋地追随维尼图，来到他的善行天地。维尼图成为威廉主义的安心丸。大家都是血缘兄弟，傍晚在篝火旁点燃和平的烟斗。还会出什么事吗？

当楚克迈尔1926年给他的女儿起名为维尼图的时候，维尼图这个人物在德国已经家喻户晓。而如同印第安人一样，那时德国人的领土鲁尔区也被剥夺了。

楚克迈尔和迈精神上一脉相承吗？如果是，那么和维尼图有什么关

系呢？两人都是很晚才到美国，而且他们关于美国的一切想象和描述，都是在亲临美国之前想出来的。至于迈是否怀疑维尼图这个人真的存在过，如同我们问楚克迈尔是否后悔给他的女儿取名维尼图的结果是一样的。

维尼图是德国文化史上最家喻户晓的人物之一。直到今天，在巴特塞格贝格市举办的卡尔·迈露天艺术节依然是德国这类演出中最知名的活动。人们可以将维尼图视为一个高贵的野蛮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德国人。阿米尼乌斯，也就是我们的赫尔曼会这样说：他是一个高贵的、野蛮的德国人。一个真正的日耳曼人。

这样一来从人种学的角度揭示了大牌帝国的家底，再次扯出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概念，又一次证明了德国帝国的正确性。威廉主义做出一副样子，好像是大家刚刚来到广场，目的是讨论一下，是否允许那位传教士圣波尼法爵进入村子。

但是这种飘然，这种超脱的感觉，没有人比卡夫卡在他1913年发表的《想要当个印第安人》（*Wunsch，Indianer zu werden*）中描述得更清楚。卡夫卡写道："如果真的是一个印第安人，会准备好，跨上疾驰的战马，不惧顶风而前行，脚下是颤抖的大地，他也在不断地颤抖，最后他丢下马刺，因为他没有马刺，抛开马缰绳，因为也没有马缰绳，当大地像剪修整齐的草原出现在视野之前，早已没有了马头和马脖子。"

作者：里·瓦

译者：杨丽

参阅：裸体文化，创业时代，庸俗艺术品，渴求瘾，小市民

---

[1] 维尼图，作家卡尔·迈创作的一个小说人物，在德国家喻户晓的一位印第安人首领。

[2] 库珀尼克上尉，20世纪30年代德国一个修鞋匠冒充上尉占领了柏林市库珀尼克区政府。

楚克迈尔写了一部关于这个故事的剧作。

香肠

一般说到香肠，就是在说各种香肠的吃法和做法。在德国有1500多种香肠。我们在此仅列举几种：啤酒香肠、咖喱香肠、干香肠、法兰克福香肠、鹅肝香肠、家常香肠、猎人香肠、小干香肠、乡村猎人香肠、梅特香肠、纽伦堡香肠、烤香肠、苏尔茨香肠、茶香肠、白香肠和血肠。

但是如果没有出售香肠的小摊，香肠会有什么命运呢？在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脍炙人口的香肠小摊。在科隆，据说是那家香肠烧烤小铺。根据当地人的指点，可以经常在那儿碰到西德电视台的侦探电视连续剧《犯罪现场》的两位警长。

在柏林呢，最出名的非科诺伯克（Konnopke）香肠小吃铺莫属，当地报刊的报道更使其声名鹊起，科诺伯克小吃铺位于地铁站附近的埃伯瓦尔德大街上，也就是当年的东德。柏林人——西柏林人习惯于说——在城市的东边。

科诺伯克香肠小铺可谓身经百战而立于不败之地，它目睹了东德的消失。从那以后围绕这个小吃铺的喧嚣就没有消停过。有时是因为交通，有时是因为建筑而需要搬迁，其店铺的地点和存在一再受到威胁。柏林现在是首都，是一个整体的柏林。

但是人们没有放弃科诺伯克小吃铺，最后与交通部门和官方达成一致，在离原地点数米之遥的人行道上找到了一块可以让它永久驻扎的地方。科诺伯克小铺得救了，整个地区欢呼雀跃，当地的报纸撰写了历

史。

在香肠小摊，人们可以很快地进入交谈，但不仅是和态度友好的服务员。在香肠小摊，甚至不用借助狗的帮助就可以结识陌生人。当然也可以问问警长拍摄最新电影的情况，但这是不合时宜的。他们两人也要休息一下，也该轮到他们好好休息一下了。

请举止得体些，你们这些人。只要不是咖喱香肠，都可以用手抓着吃。但是彬彬有礼还是要保证的。香肠小铺虽然没有权威，但是有德高望重的人。当香肠铺的老板将下一个客人点的食物端上来时，其举止俨然如饭店业主。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一边指着他的产品一边说，强大的品牌伙伴保证高质量的生产，然后又补充一句：干净是最高的要求。然后把他的毛衣划拉划拉平。

这令人不由自主地看看眼前的硬纸盘子，赶快用餐巾纸将滴落在高台桌子上的西红柿酱抹去。然后才敢去正视小摊铺主人的目光。后者问道：好吃吗？随后又转身忙去了。他有不止一个小铺子，他说，靠一个小铺子他是无法生存的。据说每年一个普通德国人平均要吃掉60公斤香肠，香肠铺子才能生存下去。但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普通德国人？

不管香肠小铺开在哪里，那里很快就成为熙来攘往的中心。它是特有的德国式中心。在这里人们相互谦让，在这儿人人受到欢迎，只要不大声吵闹或者带着世界新闻来到这里。这些会令人扫兴，有损生意。

香肠小铺还有着人们常说的明显的同一性。虽然这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是想点一个汉堡包或者土耳其烤肉饼则有些亵渎的味道。而且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很少出现。

客人们吃饭时都站着。如果他们是单独来的，而且也不想解释为什

么——是有这样的人——他们吃香肠时背对着香肠摊。如果客人是两人一起来的——一看就是多年的深交，这样的人也是有的——他们并排站在香肠摊边上吃。他们也不大说话，因为和服务员的交流只是在找钱和端上香肠时。而他们之间的交流三言两语就都说清楚了，又不是昨天才认识的。香肠让人忠诚。有些日子，这就足以了。有的日子，阴雨连绵，收音机里播放着伤感的音乐。

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会联想到赤道分界线或者白香肠分界线，后者是人们常说的划分巴伐利亚和其以北地区界线的那种比喻说法。“无所谓”在一边叫“es ist egal”，在另一边叫“Wurscht”。[1]



1949年**5**月**23**日在波恩宣布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年**9**月**4**日咖喱香肠在柏林问世。

有人说，白香肠（Weißwurst）听起来像熏肠（Extrawurst）[2]——巴伐利亚的白香肠。然而它的问世要归功于一次产品事故。幸好莫泽·泽普（Moser Sepp）在1857年有这么一个救世的主意。当时厂家供错了肠衣，为了避免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所以就没有煎香肠，而只是把香肠煮了一下。现在这是一个故事，而莫泽·泽普先生也因此载入史册。

白香肠分界线以美因河流域为界。北边是普鲁士，南边是新天鹅堡（Neuschwanstein）和安德克斯（Andechs）。

另外提到普鲁士。据说俾斯麦说过：谁对香肠的制作和法律的制定过程了解得越少，他睡觉就睡得越踏实。

这可不招人喜欢。

有人说，我们这是在科隆。

也许您能告诉我某种普鲁士的香肠吗？我们就选择图林根烤香肠吧。

有人唱道：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到头的时候。但是，只有香肠有两个头。

这就是香肠学。

站在香肠小摊前，吃着香肠，把纸盘子和没吃完的东西倒进垃圾桶，然后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用以前的话说，好像有要务在身。而在今天，则好像要去追赶一辆想象中正在关闭车门的公交车。在车里面坐着德国的卡尔德隆（Calderon）。关于他也要说几句话。生活就是一场梦，Okay，至少想说那么一次。但是梦包括什么呢？这时车门正又打开，从车上下来的是电视剧中两位警长中的一位。

你问，有什么事？他说什么呢？

他说，当然是香肠的事了。

真的是香肠的事？你问。

那还会有什么事呢？他问，不是关于香肠，难道是关于梦的事？

您是德国的卡尔德隆吗？也就是那位将生命视为梦想，将自己视为西班牙人的先生？你问。

不，不。他笑着大声喊道，这时他已经来到香肠小摊位的窗户前并说道：来一份咖喱香肠带土豆条。

咖喱香肠，这是柏林人的香肠。正如慕尼黑有白香肠一样，柏林则有自己的咖喱香肠。这是赫塔·霍伊维尔（Herta Heuwer）发明的。在1949年。她至少给调味汁申请了专利。10年后，在慕尼黑。

对面的剧院里上演着卡尔德隆。据说，在那边，在古老的大厅内，生活是一场梦幻。在科隆？在柏林？从香肠小摊处可以很好地观察一切：剧院的入口和前面的人群。可以看见他们的嘴唇在动，但是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在剧场休息时，还有一些人到香肠小摊来。这很时髦，在柏林。

今天他们在剧院，明天在博物馆。在德国，第一家咖喱香肠博物馆，就在柏林墙旁名为查理边防检查站的后面，但是它位于防御大街上。那是在城市的东部，用柏林人的话说，用西柏林人的话说。

作者：里·瓦

译者：杨丽

参阅：简便晚餐，啤酒之旅，诸侯割据，圣诞市场

---

[1] 后一种说法为巴伐利亚方言。

[2] Extrawurst 亦有特权和例外之意。

内心的撕裂

如果说我胸中安住着两个灵魂，天哪，这太轻描淡写了！是一组灵魂忐忑在我胸中。秩序井然乃当务之急。可秩序对我来说太昂贵，我根本支付不起。因此我必须再把一切搅乱，怀疑一切，深深的疑惑，通观全局是没戏了。

我无忧无虑地漫游在大自然中，嘴上哼着小调，看见一棵病虫侵蚀的大树，皱皱巴巴。皱纹，遍布我额头的皱纹。我想把大衣分给大树一半，而它表示拒绝，低垂下了树冠。我声称：用科技确保领先！不由得一阵内疚。我是一个大自然的盗贼，身兼偷猎者、野猪和自由射手于一身。6颗子弹发发命中，第7颗则受魔鬼支配。但是，我并不放弃最终拯救世界的憧憬。

我是一个孤独的家伙，也是各种协会的会员。漫步、运动、狂欢节，凡是人类的活动没有我不通晓的。会员费总是及时汇出。晚上我喝点儿啤酒，吃点儿面包加香肠，可谓问心无愧。工作和休息缺一不可。收音机里播放着虔诚的音乐。刚才还在干活的拳头，现在合拢一起祈祷苍天。最高境界高得恰到好处。我的精神沉浸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中。我努力寻找表达的词语。

我的家乡非常惬意宜人，尽管如此我并未驻足不前：远方吸引着我。指南针绕了一圈：东、西、南、北。我坦诚面对四面八方。我的步伐带着和平主义者的色彩。关于热战的事情我只是听说过，而冷战也已经冰释消融了，连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冷冷的隔墙，这堵墙曾经割裂了我本身。为了超越各种界限，我不需要再考虑国界的限制。我的护照上

刻着一个看不见的印章：世界公民，家住德国的辛德札登镇（Hinterzarten）。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学会了诸多语言。



我在脑海中捍卫自由，我的行为有助于稳定和安全。我每天用指甲刀磨掉翅膀上的棱角：不要极端！中庸是我的新标准。这是我的立场，也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渴望滕然升起。我渴望放荡不羁、渴望无拘无束。我准备扼住命运的喉咙。突然，忧虑与不安再次光临。特别是那外边的一切一切。当暮色在我面前弥漫开来。哎，要是我最终能信任自己多好！在梦中我开始唱歌，内心则深感不寒而栗。

我变得很随和。有时我想：我是一具随和的行尸走肉。理性为内心的渴望套上了羁绊。我保证，要牢牢地握住这根缰绳。但是只要渴望与羁绊并存，我就能喘气。

有些人认为，我内心的撕裂意味着“任何事情都可以左右逢源”。但恰恰相反。它和欢快的冲浪、角色转换和对换角色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我的撕裂是痛苦的。我准备、能够也必须承受这个痛苦。谁声称“多样化”——不过就是站在酒吧柜台旁向最小年龄的人兜售夏日鸡尾酒，我认为他无异于一个骗子。

野蛮人曾经试图驱赶走我心中的撕裂，他们的方法是让我与其同步堕落。好心人也试图劝解我，他们的方法是将深渊宣布为禁区。孩子们要为他们的家长承担责任。我勇于承担责任，申明政治上要保持谨慎、和解和让步。你们需要也必须要求我这样做，但是不要要求我把脑袋插入棉絮中，那样向外发出的声音是闷闷的，如同装上了消音器。

让我的内心撕裂与我并存，它是最好的东西。

作者：特·多

译者：杨丽

重要人名、地名及概念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achen 206，212，452

Abgrund 14ff，60，196，315，322，356，368，461，490，513，549

Adelung，Johann Christoph 404

Adenauer，Konrad 128，466f，535，537

Adorno，Theodor W.134f，138，325ff，339，*495*

Albers，Hans 421f

Alchemie 91，351

Allgeier，Sepp 55，67

Alpen 54ff，61，118f，187，299f，313，490

Angst 15，29，117，179，189，192ff，210，232，334，445ff，487，506，548f

Antisemitismus 68，157，159ff，198，290，295，332，364，404，406f，474，540

Arbeit 32ff，88，130ff，211，348，365，426ff，548

Arendt，Hannah 47f，135，472f

Arminius *siehe* Hermann der Cherusker

Arndt，Ernst Moritz 258，462

Arnim，Achim von 18，22，474

Arnim，Bettine von 421，458，509

Atomkraft 29f，96，192，200，*201* ，407，429

Aufklärung 38，91，106ff，196，342，352，364，366，373，398f，469ff，505f

Augsburg 425f

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n 264，391，393

Augstein，Rudolf 252

Auschwitz 326，538，540

Auschwitzprozesse 540

Ausdruckstänzerin 57ff，157，160

Auto/Autobahn 118ff，137，213，243，478

Bach，Carl Philipp Emanuel 307

Bach，Johann Sebastian 30，307ff，*309* ，315，322，470

Bahro，Rudolf 139

Barbarossa *siehe* Friedrich Ⅰ.

Barock 195，306，308，404，468

Bartelmann，Wilhelm 441

Basedow，Johann Bernhard 245f

Bauhaus 49ff，186f

Baum，Vicki 122f

Bayern 72，155，162，174，186f，254，259，321，408，546

Bayreuth 320ff，*321*，327，380，*403*，404，*523*

Bebel，August 426

Becher，Johannes R.163，295f

Beckenbauer，Franz 174ff，*178*，*180*

Becker，Nikolaus（Niklas）462ff

Beethoven，Ludwig van 76，310ff，*312*，318f，322，328f，335，412，526

Befreiungskriege 39，288，474f，484，525f

Behrens，Peter 49

Beinhorn，Elly 122，*529*，530f

Benn，Gottfried 370f

Bensemann，Walther 167ff

Benz，Bertha 123f，*124*

Benz，Carl 121，123

Berber，Anita 520

Bergbau 22ff，*23* ，146，301

Berlin 11，32，36，51，*57* ff，71，81，113，122，125，*136* ，138，150，156，162，164，170，181，189，222，240，249，258，268f，269，287，293f，297，360f，418f，471ff，486，512，514f，517，520，527，530，*539* ，544ff，*545*

Bernhard，Thomas 113，491

Bethmann Hollweg，Theobald von 267

Beuys，Joseph 80

Biedermeier 184，188f，288，328，475ff，480

Bier 9，70ff，134，139，186，231f，259，291，407f，*409* ，420，435，548

Bildung 36，39，41，83，105，146，196，224，342，348，371f，426

Bildungsbürger 130f，138，260，282f，422，469ff

Bismarck，Otto von 73，149，314，426f，546

Bloch，Ernst 93，134f，155，233

Böhme，Jakob 265，350f，*352*

Böll，Heinrich 113，220，*276*，*285* ，466f

Bonifatius 74

Bonn 206，216，276，310，467

Bora，Katharina von 72，340，*341* ，392

Borsig，August 212

Boveri，Margret 125

Brandt，Susanna Margaretha 509f

Brandt，Willy 174，412

Braunschweig 165，362，432

Brecht，Bertolt *71* ，119f，125，215，219，294，425

Breitner，Paul 174ff，*177*

Bremen 70，140，186，230，471

Brentano，Bettine *siehe* Arnim，Bettine von

Brentano，Clemens 20，421，455ff，472

Broch，Hermann 112

Bruckner，Anton 293，328

Bruyn，Günter de 286

Buchdruck 35，82ff，108

Buchenwald 78ff

Büchner，Georg 14，197，258，260

Bundesrepublik 30f，47f，52，67，69，96，128，138，162，170ff，188ff，201ff，205f，216ff，243，252，284f，295，338f，348，359，364，368f，382ff，426f，466f，487，515ff，531，535ff，549

Burschenschaften 134，288ff，476

Busch，Wilhelm 412ff

Caesar，Gaius Julius 451，479

Campe，Joachim Heinrich 362f，404ff，505

Canetti，Elias 483

Carlowitz，Hannß Carl von 25，482f

Carstens，Karl 492，*494*

Celan，Paul 16

Claudius，Matthias 278

Cook，James 143

Cranach，Lucas d.Ä.392

Cranach，Lucas d.J.*33*，*392*

Dahl，Johan Christian Clausen *488*

Daimler，Gottlieb 121，126f

DDR 28f，*47*，51f，96，99，108，131，138ff，146，162f，174f，207，219，284f，295，372ff，418ff，535

Dessau 52，187，245

Deutscher Bund 262

Diefenbach，Karl Wilhelm *154*，155

Dietrich，Marlene *347*，518ff，520

Disziplin 35ff，165，181，365ff，372，433

Döblin，Alfred 113

Doderer，Heimito von 112

Dohm，Hedwig 346ff

Donaueschingen 94，330ff

Dreißigjähriger Krieg 34，194f，204，264ff，375ff，393

Dresden 21，101f，136，163，316，395，418，527，534，542

Dürer，Albrecht *194f* ，353ff，*354*

Dürrenmatt，Friedrich 94，96

Düsseldorf 455，459

Ebert，Friedrich 83

Eckstein-Diener，Bertha（Sir Galahad）345f

Eichendorff，Joseph von 13，23f，27，40，140，196，288，295，482，487，518

Eisler，Hanns 96，293ff

Ekel Alfred 438，*439*

Ende，Michael 29，103f

Engels，Friedrich 41ff，197

Ensslin，Gudrun 174，372

Entfremdung 26，41f，138f，197，317，320，325ff

Erhard，Ludwig 94，426

Erichsen，Susanne 514ff，515

Erster Weltkrieg 43ff，85，88，100，168，200，203，214，234，241，266ff，303，525f

Expressionismus 50，61，99f，441

Fanck，Arnold 55ff，66f

Fastnacht 93，353ff，499

Faust 26f，39，91ff，196，198，284，302，335，510f

Feierabend 40，43，130ff，152f，548

Feuerbach，Anselm *422*

Fichte，Johann Gottlieb 283

Fleiß 34，40f，46，85，130，205，246，365，368，517

Föderalismus 208，258ff

Fontane，Theodor 100，111

Forster，Georg 142ff

Francke，August Hermann 35ff，246f，365f

Frankfurt am Main 192，211，214，216，290，325，395，476，499，505，509f

Fräuleinwunder 128，514ff

Freiburg 16，54ff，301

Freimaurer 288，352，470

Freud，Sigmund 21，25，401，444ff，*495*

Friedensbewegung *siehe* Pazifismus

Friedrich der Weise von Sachsen 392

Friedrich Ⅰ.，Kaiser *17*，18

Friedrich Ⅱ.（der Groβe）107，271，307

Friedrich Wilhelm Ⅰ.von Preußen 36，38

Friedrich Wilhelm Ⅲ.von Preußen 344

Friedrich，Caspar David *13*，*485*

Frisch，Max 96，113

Fröbel，Friedrich 245ff，484

Fugger，Jakob der Reiche 425ff，*427*

Fühmann，Franz 28f

Fürstenberg，Max Egon Ⅱ.zu 330f

Fußball 164ff，295f，353

Gemüt 27，35，68，78，248，290，293，296，302，306，315，324，344，350，362，398，400，404，449，506

Gemütlichkeit 131，184ff，233，240，287，330，441，548

Genie 40f，310，333，335

George，Stefan 31，458f

Germania 31，218，463，524f，*525*，531

Gesamtkunstwerk 52，317ff，404

Goebbels，Joseph 66ff，121f，187，284，531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13，22ff，30，38f，41f，44f，72，78ff，92ff，108，138，196，222，279ff，281，344，422f，471，*494*，499，504f，507ff，510f

Göring，Hermann 187，243，484

Grabbe，Christian Dietrich 93f

Graf，Oskar Maria *71*，358f

Graf，Steffi 179，517

Grass，Gunter 30，113，219，286

Gretchen 196，509ff，516f，520

Grimm，Gebr. 20，251，421，480，483，498

Gropius，Walter 49ff

Grotewohl，Otto 84

Gründerzeit 99，165，210ff，255

Gründgens，Gustaf *95*，113，125

Grundgesetz 30，123，215ff，254，295，394，538

Gryphius，Andreas 13，194f，266

Guderian，Heinz 276

Günderrode，Karoline von 455f

Gustav Ⅱ.Adolf von Schweden 264ff，375

Gutenberg，Johannes 82f，*83*

Hamann，Johann Georg 399

Hambacher Fest 262，475f

Hamburg 102，174，176，230f，249，254，306，336，338，344，406，422，455，470f

Handke，Peter 112

Hardenberg，Karl August von 364，427

Hartmann von Aue 501

Harz 18，24，26，*299*

Hauptmann，Gerhart 100，155，269

Hauschild，Ernst Innocenz 416f

Haydn，Joseph 310，313

Hebbel，Friedrich 523f

Hebel，Johann Peter 22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47，196，315，323，350，390，

Heidegger，Martin 14ff，*15*，30，199f，465，*494*

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 18，82，206，219f，229，261，351，391

Heimat 17f，21，69，71，88，117，169，176，187f，208，233ff，295，304，326，421f，431ff，487，548

Heimatfilm 62，69，237

Heine，Heinrich 2of，24f，93，293f，347，367，455，461，463f，474，503

Heino（Heinz Georg Kramm）*77* f

Henkel，Fritz 212

Hensel，Fanny *siehe* Mendelssohn Bartholdy，Fanny

Herberger，Sepp 170ff，*171*，179

Herder，Johann Gottfried 279，310，313

Hermann der Cherusker 167，393，451，463，484，492，543

Herz，Henriette 471ff

Hesse，Hermann 76，118f，126，155，*156*，493，*495*

Heuss，Theodor 173

Hildegard von Bingen 340，350，*351*，506

Hippel，Theodor Gottlieb von 342f，367，499f

Hitler，Adolf 66，68，127f，187，222，236，273ff，294，314，327，530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August Heinrich 236

Hoffmann，E.T.A.22，27f，40，311f，315，445ff，473

Hölderlin，Friedrich 13，16，77，454，464f

Hollaender，Friedrich 423，519

Holocaust 276，334f，407，418，539f

Horch，August 121f

Horkheimer，Max 134f

Huch，Ricarda 204，206

Humanismus 44，92，162，254，352，392ff

Humboldt，Alexander von 22，24，143，146ff，*147*，471

Humboldt，Wilhelm von 148，282，362，471

Hutten，Ulrich von 393

Hygiene-Museum 136，395

Industrialisierung 24，42ff，49，97，134ff，149，152ff，165，

184ff，211，240，249，260，267，416f

Innerlichkeit 91，156f，306，315，339，349

Jahn，Friedrich Ludwig 156，260，288，473ff，485

Jahnn，Hans Henny 112

Jena 204，284，288，471，473

Johnson，Uwe 112

Jünger，Ernst 46f，200ff，273，368，411，482，486f

Jung-Stilling，Johann Heinrich 483

Jürgens，Udo 176，422

Kafka，Franz 106，113，198f，543

Kaiserreich 43f，49，100，143，148f，152ff，159，164f，198，210ff，223f，231，240，256，260，262，267ff，322，346，348，372，377ff，389，393，426，428，442，463f，477，542f

Kalter Krieg 99，204f，215ff，277，286，517，537f，548

Kant，Immanuel 17，41，44，55，208，224，313，315，323，364，366f，398f，*470*，500

Karl der Große 206，452，462

Karlsbader Beschlüsse 288，476

Karneval 111，353ff，428，454，459，478，499，548

Kästner，Erich 76

Kaulbach，Friedrich August von *525*

Kepler，Johannes 265，306，351

Kindergarten 245ff，385，417

Kleinstaaterei 224，254，258ff，279，284，288，300，316，407，462

Kleist，Heinrich von 44，111，170ff，298，343，511ff，521f，525，531

Klettenberg，Susanne von 505

Klinger，Friedrich Maximilian 93

Klinsmann，Jürgen 176，180

Klum，Heidi 517

Kneipp，Sebastian 153

Knigge，Adolph Freiherr 469

Koch，Adolf 159f，162

Koch，Konrad 165ff

Koeppel，Matthias *297*

Koeppen，Wolfgang 111，113

Kohl，Hannelore 514

Kohl，Helmut 130，179，514

Köln 72，192，230，290，356，*357*，452，466，544ff

Königsberg 208，367，473，500

Konzentrationslager 39，79f，273，276，326，364

Körner，Theodor 271，288，*289*，484

Korporatismus 426f，430

Kosmopolitismus *siehe* Weltbürger

Kracauer，Siegfried *57*，66

Kraus，Karl 190

Krupp 43f，212

Kulturbunker 30f，*31*

Kulturindustrie 135ff，327，329

Kulturnation 262，279ff，*280f*，322，339，377ff，462

Kyffhäuser *17*，18，463

La Roche，Sophie von 507ff，*508*

Lang，Fritz 61，480

Langner，Ilse 527f

Lanz，Heinrich 213f

Lebensreform 153ff，198

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44，106，306f，469

Leipzig 101f，293，307，314，416ff，426，470

Leitz，Louis 369

Lessing，Gotthold Ephraim 44，106f，279，371，398

Levin，Rahel *siehe* Varnhagen，Rahel

Liebestod 20f，323，400，512ff，522，524

Limes 208，220，355，479

Liszt，Franz 323，326，423

Loreley 292，294f，*453*，455，518ff，*519*

Love-Parade 105，202，360f，428

Lübeck 229ff，265，441

Ludwig Ⅰ.von Anhalt-Köthen 468

Ludwig Ⅰ.von Bayern 356

Ludwig Ⅱ.von Bayern 321f，332，377ff

Ludwig Ⅹ.von Bayern 408

Luise von Preußen 343f

Luther，Martin 25，30，32ff，*33*，47，75f，82，193f，247，252f，291，305，340ff，*341*，350，371ff，388ff，396ff，401ff，406，468，500，502

Lützowsches Freikorps 288，*289*，484，526

Luxemburger Abkommen 535ff

Magdeburg 174f，265，*274f*，350，375

Mainz 82，143ff，359，454，461

Mann，Erika 125f

Mann，Heinrich 113，393，518

Mann，Klaus 95，113，125

Mann，Thomas 9，14，45f，94，112f，126，231，302ff，*303*，335f，346，441f

Männerchor 179，*180*，287ff，334，401，484

Mannesmann 43，212

Mannheim 39，123

Mansfeld，Ernst von 264f

Maria Antonia Walpurgis von Sachsen 526f

Marx，Karl 41ff，*42*，138，169，197，271，425

May，Karl 541ff

Maybach，Wilhelm 121，213

Mechthild von Magdeburg 350

Meinhof，Ulrike 174，220

Meister Eckhart 32，45，350，352

Meistersinger 305，308，365

Melanchthon，Philipp 106，392

Mendelssohn Bartholdy，Fanny 307f，423

Mendelssohn Bartholdy，Felix 252，290f，295，307f，314，357，404

Menzel，Adolph Friedrich Erdmann von *185*

Merkel，Angela 181，443，*495*，531

Messner，Reinhold 421，*495*

Mitscherlich，Alexander u.Margarethe 539

Mittelalter 18f，34，40，82，91，94，110，117，227，229，

304，349f，353ff，361，365，389，425f，436，452

Mozart，Wolfgang Amadeus 288，310，313，323，424

Mühsam，Erich 440

Müller，Heinrich 305f

München 102，155，163，172f，175，255，259，273，322，356ff，381，383，514，526，547

Münker，Wilhelm 241ff

Musik 94f，105，135，287ff，302ff，345，403f，422ff，454f，459，484，548

Musil，Robert 106，112，482

Mutter 247ff，340ff，385ff，461，505，507，524f，531

Muttersprache 233ff

Mystik 32ff，91，302，310，349ff，388，405

Napoleon Ⅰ.（Bonaparte）196，206，253，262，279，283，288，314，344，427，462，476

Nationalsozialismus 16，18，30，39，46f，51f，66ff，78ff，94，99，120ff，127f，137f，160ff，170，187f，202f，204，225，243，254，271ff，284，294，326ff，340，346，368，406f，418，483f，486f，530f，535ff，541

Nationalstaat 97，164，224，262，267，279ff，288，291，462f，

377ff，473ff

Naturschutz 28，73，80f，123，203，238，243f，465f，482f

Naumann，Friedrich 49，269f，426

Nessler，Karl Ludwig（Charles Nestlé）85ff

Netzer，Günter 174，176

Neubert，Rudolf 136f

Neuschwanstein 378ff

Neuss，Wolfgang 11，539

Nibelungen 320ff，461，463f，480，522ff，530

Nicole（Nicole Hohloch）*277*

Niekisch，Ernst 215

Nietzsche，Friedrich *15* ，16，21，197，224，322f，347，367，371，401，496f，501

Nordsee 230，*231* ，441ff

Notburga von Rattenberg 134

Novalis（Friedrich Philipp von Hardenberg）23ff，40，343

Nürnberg 92，101，353，365，375ff，389，538

Oberrieder Stollen *siehe* Kulturbunker

Oktoberfest 356ff

Opel，Adam 127

Ordnung 46，175，224f，227，244，302，305，308f，328f，332f，362ff，415，425f，477，482f，542，548

Ostsee 118，163，229f，*231*，346，441ff

Pappenheim，Gottfried Heinrich von 265f

Paracelsus 91，351

Paullini，Christian Franz 130f，135

Paulskirche 224f，262，291，476

Pazifismus 95，167，173，203，219，244，*276f*，374，539，548

Pestalozzi，Johann Heinrich 245，341f，345f

Petermann，August 149

Peters，Carl 149

Pfarrhaus 111，149f，370ff，398

Pietismus 35ff，47，195f，246，305f，351f，365f，399，504，507

Porsche，Ferdinand 122，127

Potsdam *36*，168，307，322

Prag 198，264，266，351

Preußen 22，35f，38，*45*，47，59，107，146，148，164f，196，206，213，215f，220，223ff，248f，254，262，265，271，279，283，286，288，343f，353，356，364ff，380，389，393，426f，473ff，484，526，541，546

Protestantismus 9，25，34f，37，130，156，194f，247，252，264f，290，305，307f，341，355，370ff，388ff，395ff，428，471

Pudor，Heinrich（Heinrich Scham）157，160f

Pünktlichkeit 43，101f，205

Quadflieg，Will *95*

Rahn，Helmut 171ff

Rathenau，Emil u.Walther 214

Reeducation 138，302，539

Reformation 82，264f，388ff，401ff

Reichstag 206，266，272，392

Reinheit 311，330，338，395ff，464f，468f

Reitsch，Hanna *529*，530

Reitz，Edgar 237

Rhein 223，266，287f，451ff，485，523

Rheinischer Kapitalismus 426ff

Richter，Ludwig *132f*，*502*

Riefenstahl，Leni 57ff，*63f*，484，531

Riehl，Wilhelm Heinrich 131，486，490

Romantik 11，18ff，29，39ff，43，65，108，110，184，196f，204，243，288，291f，296，306，310f，315，317，343，391，420，421ff，448ff，*456f*，458ff，471ff，474，481ff，487，523

Rosenberg，Alfred 137f，284，483f

Rostock 305，441，470

Roth，Joseph 79f，113

Rousseau，Jean-Jacques 26，153，245f，341f

Rübezahl 17，77

Rückert，Friedrich 13，18，22

Rudolf Ⅱ. von Habsburg 351

Rühmann，Heinz 68

Sachs，Hans 116，365

Salomon，Ernst von 538

Salon 11，184，344，471ff，507f

Sander，August 460

Sander，Jil 406

Scheler，Max 43ff

Schelling，Caroline 24，471

Schelsky，Helmut 539

Schiffer，Claudia 517

Schiller，Friedrich 30，39f，108，110，137，202，222，279ff，*280* ，290f，311，313，317，319，385，398，412，486，499，507，526

Schirach，Baldur von 242f

Schirrmann，Richard 240ff

Schlager 137，150，176ff，194，234f，420，422，454

Schlegel，August Wilhelm 343，371，471

Schlegel，Caroline *siehe* Schelling，Caroline

Schlegel，Dorothea 24，471

Schlegel，Friedrich 21，40，371，467，471

Schleiermacher，Friedrich 344，469，471f

Schlingensief，Christoph 30，192，*193*

Schmidt，Arno 112，*363*

Schmidt，Helmut 364

Schneckenburger，Max 462f

Schön，Helmut 174ff

Schönberg，Arnold 135，293，329ff，*331*

Schopenhauer，Arthur 11，149，197，323ff，333，344f，412，490f

Schopenhauer，Johanna 11，344

Schreber，Daniel Gottlob Moritz 417f

Schreber，Daniel Paul 418

Schubert，Franz 292，326，423，497

Schubert，Gotthilf Heinrich 21f

Schumacher，Michael 179

Schumann，Clara 459

Schumann，Robert 292，423，459，463，487

Schwäbisch 32，62，73，121，164，196，290，355，361，395

Schwarzwald 16，30f，55，72，85，301

Schwitters，Kurt 454f

Seeler，Uwe 176

Seghers，Anna 163

Sekundärtugenden 111，181，205，244，364，368

Seume，Johann Gottfried 491

Sieburg，Friedrich 14，368

Siegfried 167，194，316ff，401，464，*480*，522ff

Siemens，Werner von 211ff

Silcher，Friedrich 294，455

Skladanowsky，Gebr.54

Sonderweg 169，179，193，220，306，467

Sozialstaat 28，38，210，425ff

Sparwasser，Jürgen 174f

Speer，Albert 30f，187，364

Spener，Philipp Jacob 35，351

Spießbürger 47，157，160f，189，436ff

Sprache 14，105f，*166*，167，253，282，290f，297，315，383，385，390f，401ff，410，447，468f，498ff

Stadler，Ernst 99f

Stalin，Josef 215f，272f，276f

Stauffenberg，Claus Schenk von 31，102，530

Stauffenberg，Melitta Schenk von *529* ，530

Stein，Heinrich Friedrich Karl vom und zum 364，427

Steiner，Rudolf 153，198

Sternberg，Josef von 518f

Stifter，Adalbert 480

Stöcker，Helene 346

Stockhausen，Karlheinz 336ff，*337*

Störtebeker，Klaus 70，231f

Stralsund 70，230，265

Straßburg 82，168，294，452

Strauss，Richard 313，444

Stuttgart 73，*75* ，290，395，432

Surén，Hans 157ff，*161*

Sylt *103* ，156，163

Tacitus，Publius Cornelius 134，468，479，498

Tannhäuser 18ff，*19* ，77，399

Tatort 260，*261* ，521，544

Taunus 204，243，301

Thelen，Albert Vigoleis 112

Thyssen 46，212

Tieck，Ludwig 20，23，25，310，481

Tilly，Johann t’Serclaes von 264ff，*274*

Treitschke，Heinrich von 206

Trenker，Luis 58ff，60，67ff，69

Tucholsky，Kurt 81，302

Tulla，Johann Gottfried 452

Turek，Toni 173

Uhse，Beate *529* ，530f

Ulbricht，Walter 216，284

Unger，Friederike Helene 505

Valentin，Karl 383

van de Velde，Henry 49

van der Rohe，Mies 52

van Hoddis，Jakob 99f

Varnhagen von Ense，Karl August 249

Varnhagen，Rahel 11，472f

Verein 17，130，252，287ff，356，415ff，468ff，492，542，548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538ff

Vogel，Eduard 149

Vogel，Henriette 512f

Vogts，Berti 175，179

Volkslied 9，131，179，234，288，291f，294，296，305，320，367，387，454f，486，490ff

Volkswagen 94，118，127ff，*129*

Vormärz 197，291，475

Voß，Johann Heinrich 38

Vulpius，Christian 108

Wackenroder，Wilhelm Heinrich 23，311

Wagner，Richard 20f，27，101，304f，316ff，*318*，325ff，377ff，399ff，424，465，511，522ff

Wald 87，118，120，122，165，197f，240，243f，249ff，287ff，

348，400，415f，451，468，479ff，490ff

Waldsterben 192，200，487ff，*489*，548

Walküre 511，522ff

Wallenstein，Albrecht Wenzel Eusebius von 264ff，*265*，376

Walser，Martin 113，*285*，286

Walter，Fritz u.Ottmar 172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116

Wandern 118，121，159，163，165，240ff，298ff，490ff，548

Wandervogel 153，240，242，492

Wartburg 18，291，390

Weber，Carl Maria von 99，288，291，296，320，484

Weber，Max 37，56，428

Wedekind，Frank 518ff

Wegener，Alfred 150f，*151*

Weimar 11，49，52，216，222，279ff，*280f*，344，455，505

Weimarer Klassik 94，108，157，279ff

Weimarer Republik 52，83，113，136，156ff，168f，200，222，226，241，254，271f，284，327，411，530，538

Weiss，Peter 112，219

Weltbürger 106，148，167f，219，271，279ff，470，473f，548

Weltgeist 196，323

Wense，Jürgen von der 496

Werkbund 49f

Westbindung 219f，467，517

Westfälischer Frieden 30，266，272，277

Wiedervereinigung 76，140，176ff，203，205，217ff，277，286，295，419，538

Wieland，Christoph Martin 371，507

Wien 184，293，310，313，329f，382，444ff，483，541

Wiener Kongress 262，267，288，356

Wilder，Billy 442，516f

Wilhelm Ⅰ. 463，467

Wilhelm Ⅱ. 168，209，267ff，*269*，271，442，524，537

Wilhelm Ⅳ. von Bayern 408

Wilhelminismus 100，113，143，148f，156，165，220，223f，240，262，269，393，429，441，542f

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 157，282

Wirtschaftswunder 34，128，173，181，188，514ff

Wittenberg 374，388ff，*402*

Worms 392，452，463

Wotan 167，172，319

Wunder von Bern 170ff，181，*182*

Würzburg 92，125

Zelter，Carl Friedrich 287，423，473

Zesen，Philipp von 404f

Zimmermann，Herbert 172f，181

Zuckmayer，Carl 541ff

Zürich 99，126，316

Zweiter Weltkrieg 31，73，90，128，170，206ff，266，273ff，284，302，314，464，528，530，537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推荐书目见：www.deutsche-seele.de。除各章中所提及的著作，我们从以下书籍与文章中获得了很大启迪。

Jürgen von Alten，*Weltgeschichte der Ostsee*，Berlin 1996

Michael Andritzky u.Thomas Rautenberg，*»Wir sind nackt und nennen uns Du«. Von Lichtfreunden und Sonnenkämpfern. Eine Geschichte der Freikörperkultur*，Gießen 1989

Friedmar Apel，*Deutscher Geist und deutsche Landschaft*，München 1998

Hannah Arendt，*Rahel Varnhagen*：*Lebens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Jüdin aus der Romantik*，München 1957

Detlev Arens，*Der deutsche Wald*，Köln 2010

Leo Balet u.Eberhard Gerhard，*Die Verbürgerlichung der deutschen Kunst. Literatur und Musik im 18. Jahrhundert*，Berlin 1973

Hans D.Barbier u.Fides Krause-Brewer（Hg.），*Die Person hinter dem Produkt. 40 Portraits erfolgreicher Unternehmer*，Bonn 1988

Franz J.Bauer，*Das lange 19. Jahrhundert*，Stuttgart 2010

Oswald Bayer，*Vernunft ist Sprache. Hamanns Metakritik Kants*，

Stuttgart-Bad Cannstatt 2002

Udo Benzenhöfer，*Paracelsus*，Reinbek bei Hamburg 2003

Manfred Berger，*150 Jahre Kindergarten. Ein Brief an Friedrich Fröbel*，Frankfurt am Main 1990

Isaiah Berlin，*Die Wurzeln der Romantik*，Berlin 2004

Siegfried Birkner，*Goethes Gretchen. Das Leben und Sterben der Kindsmörderin Susanna Margaretha Brandt*，Frankfurt am Main 1973

Günter Blamberger，*Heinrich von Kleist. Biographie*，Frankfurt am Main 2011

Kurt Breysig，*Vom deutschen Geist und seiner Wesensart*，Berlin 1932

Ulrich Brochhagen，*Nach Nürnberg.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und Westintegration in der Ära Adenauer*，Berlin 1999

Christoph Buchheim，*Industrielle Revolutionen. Langfristig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n Großbritannien，Europa und in Übersee*，München 1994

Michael Buhrs u.Claudia Wagner（Hg.），*Karl Wilhelm Diefenbach（1851-1913）. Lieber sterben，als meine Ideale verleugnen*！，München 2010

Peter Burg，*Der Wiener Kongress. Der deutsche Bund im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München 1984

Maria Curter，*Das erfinderische Berlin*，Berlin 2011

Carl Dahlhaus，*Die Idee der absoluten Musik*，Kassel 1978

Sigrid Damm，*»Geheimnißvoll offenbar«. Goethe im Berg*，Frankfurt am Main 2009

Alexander Demandt（Hg.），*Deutschlands Grenzen in der Geschichte*，München 1990

Peter Demetz，*Prag in Schwarz und Gold*，München 2000

Ulf Erdmann Ziegler，*Nackt unter Nackten. Utopien der Nacktkultur 1906-1942*，Berlin 1990

Matthias Fanck，*Weiße Hölle-Weißer Rausch. Arnold Fanck. Bergfilme und Bergbilder 1909-1939*，Zürich 2009

Paul Fechter，*Deutscher Osten. Bilder aus West-und Ostpreußen*，Gütersloh 1958

Hildegard Felisch，*Die deutsche Frau*，Berlin 1928

Niall Ferguson，*Der falsche Krieg. Der Erste Weltkrieg und das 20. Jahrhundert*，München 2001

Joachim Fernau，*Disteln für Hagen. Bestandsaufnahme der deutschen Seele*，München 2009

Karl August Fink，*Papsttum und Kirche im abendländischen Mittelalter*，München 1994

Rolf Hellmut Foerster，*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Die chronische Utopie*，München 1971

Etienne François u.Hagen Schulze（Hg.），*Deutsche Erinnerungsorte*，München 2001

Emil Franzel，*Von Bismarck zu Adenauer. Ideologie，Wahn und Realismus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München 1957

Eberhard Freitag，*Schönberg*，Reinbek bei Hamburg 1973

Richard Friedenthal，*Goethe. Sein Leben und seine Zeit*，München 1963

Peter Gay，*Freud. Eine Biographie für unsere Zeit*，Frankfurt am Main 1989

Martin Geck，*Bach. Leben und Werk*，Reinbek bei Hamburg 2000

Ders.，*Ludwig van Beethoven*，Reinbek bei Hamburg 1996

Imanuel Geiss，*Der lange Weg in die Katastrophe*，München 1990

Ulf Geyersbach，*»...und so habe ich mir denn ein Auto angeschafft«. Schriftsteller und ihre Automobile*，Berlin 2006

Martin Gregor-Dellin，*Richard Wagner. Sein Leben. Sein Werk. Sein Jahrhundert*，München 1980

Susanne Grüneklee，*Kultbuch Spargel. Alles über das königliche Gemüse*，Köln 2009

Hellmut G.Haasis，*Morgenröte der Republik. Die linksrheinischen deutschen Demokraten 1789-1849*，Berlin 1984

Gerhard Härle，*Reinheit der Sprache*，*des Herzens und des Leibes. Zur Wirkungsgeschichte des rhetorischen Begriffs »puritas« in Deutschland von der Reformation bis zur Aufklärung*，Tübingen 1996

Peter Härtling，*Liebste Fenchel*！*Das Leben der Fanny Hensel-Mendelssohn in Etüden und Intermezzi*，Köln 2011

Ulrike Häußer u.Marcus Merkel（Hg.），*Vergnügen in der DDR*，Berlin 2009

Peter Claus Hartmann，*Das Heilige Röm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 in der Neuzeit 1486-1806*，Stuttgart 2007

Michael Hau，*The Cult of Health and Beauty in Germany*：*A social History*，*1890-1930*，Chicago 2003

Helmut Heiland，*Fröbel*，Reinbek bei Hamburg 1982

Volker Hentsche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politik 1880-1980*，Frankfurt am Main 1983

Manfred Hettling u.Stefan-Ludwig Hoffmann（Hg.），*Der bürgerliche Wertehimmel. Innenansichten des 19. Jahrhunderts*，Göttingen 2000

Charles Higounet，*Die deutsche Ostsiedlung im Mittelalter*，München 1990

Raul Hilberg，*Die Vern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Berlin 1982

Markus Hille，*Karoline von Günderrode*，Reinbek bei Hamburg 1999

Carl Hinrichs，*Friedrich Wilhelm* Ⅰ.，*König in Preußen*，Hamburg 1941

Ders.，*Preußentum und Pietismus*，Göttingen 1971

Wolfgang Hippe，*Alaaf und Helau. Die Geschichte des Karnevals*，Essen 2007

Curt Hohoff，*Grimmelshausen*，Reinbek bei Hamburg 1978

Karl Holl，*Die Geschichte des Worts Beruf*，in：Ders.，*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Kirchengeschichte. Band* Ⅲ：*Der Western*，Tübingen 1928

Ulrich Im Hof，*Das gesellige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 und Gesellschaften im Zeitalter der Aufklärung*，München 1982

Thomas Immisch，Christian Langer u.Roger Doyes，*Der Strandkorb*，Rostock 2008

Karl Jaspers，*Die Schuldfrage*，München 1996

Rolf Johannsmeier，*Spielmann*，*Schalk und Scharlatan. Die Welt als Karneval*：*Volkskultur im späten Mittelalter*，Reinbek bei Hamburg 1984

Erich Kahler，*Der deutsche Charakter in der Geschichte Europas*，Zürich 1937

Gerd-Klaus Kaltenbrunner（Hg.），*Was ist Deutsch*？*Die Unvermeidlichkeit*，*eine Nation zu sein*，Asendorf 1988

Horst Karasek，*Belagerungszustand！Reformisten und Radikale unter dem Sozialistengesetz 1878-1890*，Berlin 1978

Diethart Kerbs u.Jürgen Reulecke，*Handbuch der deutschen Reformbewegungen 1880-1933*，Wuppertal 1998

Dietmar Klenke，*Der singende »deutsche Mann«. Gesangvereine und deutsches Nationalbewusstsein von Napoleon bis Hitler*，Münster 1998

Helmut König，*Die Zukunft der Vergangenheit.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im politischen Bewusstsein der Bundesrepublik*，Frankfurt am Main 2003

Stefan König，Hans-Jürgen Panitz u.Michael Wachtler，*Bergfilm. Dramen，Trick und Abenteuer*，München 2001

Reinhart Koselleck，*Preuß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Allgemeines Landrecht，Verwaltung und soziale Bewegung von 1791 bis 1848*，Stuttgart 1989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Heimat. Erfahrungen mit einem deutschen Thema*，München 1992

Manfred Kühn，*Kant. Eine Biographie*，München 2003

Hansjörg Küster，*Die Geschichte des Waldes. Von der Urzeit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 1998 [1]

Horst Kunze，*Lieblingsbücher von dazumal. Eine Blütenlese aus den erfolgreichsten Büchern von 1750-1860*，München 1973

Walter Laqueur，*Was ist los mit den Deutschen？*，Berlin 1988

Ders.，*Weimar. Die Kultur der Republik*， Berlin 1977

Hartmut Lehmann（Hg.），*Geschichte des Pietismus. Band 4*：*Glaubenswelt und Lebenswelt des Pietismus*， Göttingen 2004

Barbara Leisner，*Bertha Benz. Eine starke Frau am Steuer des ersten Automobils*， Gernsbach 2011

Harald Leupold-Löwenthal，Hans Lobner u. Inge Scholz-Strasser（Hg.），*Sigmund Freud Museum. Wien* Ⅸ*. Berggasse 19. Katalog*， Wien 1994

Karl-Egon Lönne，*Politischer Katholiz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86

Rudolf Malsch，*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Musik. Ihre Formen*，*ihr Stil und ihre Stellung im deutschen Geistes-und Kulturleben*， Berlin 1949

Robert K.Massie，*Die Schalen des Zorns. Großbritannien*，*Deutschland und das Heraufziehe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Frankfurt am Main 1993

Jeannine Meighörner，*»Was ich als Frau dafür halte«. Sophie von La Roche. Deutschlands erste Bestsellerautorin*， Erfurt 2006

Peter Merseburger，*Mythos Weimar. Zwischen Geist und Macht*， München 1998

Karl Markus Michel，*Die sprachlose Intelligenz*， Frankfurt am Main 1968

Wolfgang Minaty（Hg.），*Die Eisenbahn. Gedichte*，*Prosa*，*Bilder*

，Frankfurt am Main 1984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Der preußische Stil*，Breslau 1931

Armin Mohler，*Was die Deutschen fürchten*，Berlin 1966

Wilhelm Mommsen，*Bismarck*，Reinbek bei Hamburg 1966

Wolfgang J.Mommsen，*Bürgerliche Kultur und künstlerische Avantgarde 1870-1918. Kultur und Politik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Berlin 1994

Heidi A.Müller，*Ein Idealhaushalt im Miniaturformat. Die Nürnberger Puppenhäuser des 17. Jahrhunderts*，Nürnberg 2006

Paul Münch（Hg.），*Ordnung*，*Fleiß und Sparsamkeit. Texte und Dokumente zur Entstehung der »bürgerlichen Tugenden«*，München 1984

Herfried Münkler，*Die Deutschen und ihre Mythen*，Berlin 2009

Ernst Niekisch，*Die Legende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Köln 1968

Heiko A.Oberman，*Zwei Reformationen. Luther und Calvin-Alte und Neue Welt*，Berlin 2003

Lutz E.von Padberg，*Die Christianisierung Europas im Mittelalter*，Stuttgart 1998

Hans-Jürgen Panitz，*Luis Trenker. Ungeschminkt*，Innsbruck 2009

Felix R.Paturi，*Technik. Meilensteine technischer Erfindungen in Deutschland*，Stuttgart 1992

Helmuth Plessner，*Grenzen der Gemeinschaft*，Frankfurt am Main 2002

Eberhard Rathgeb，*Die engagierte Nation. Deutsche Debatten 1945-2005*，München 2005

Georg Friedrich Rebmann，*Ideen über Revolutionen in Deutschland*，Köln 1988

Werner Ross u.Walter Förster，*Der Rhein. Landschaft-Geschichte-Kultur*，Freiburg im Breisgau 1973

Rüdiger Safranski，*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München/Wien 1994

Ders.，*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äre*，München/Wien 2007

Ders.，*Schopenhauer und Die wilden Jahre der Philosophie*，München/Wien 1987

Hans Dieter Schäfer，*Das gespaltene Bewusstsein. Deutsche Kultur und Lebenswirklichkeit 1933-1945*，Berlin 1981

Jürgen Schebera，*Hanns Eisler*：*Eine Biographie in Texten*，*Bildern und Dokumenten*，Mainz 1998

Karl Schlögel，*Die Mitte liegt ostwärts. Die Deutschen*，*der verlorene Osten und Mitteleuropa*，Berlin 1986

Brigitta Schmidt-Lauber，*Gemütlichkeit. Eine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Annäherung*，Frankfurt am Main 2003

Karl H.Schneider，*Geschichte der Bauernbefreiung*， Stuttgart 2010

Gerhard Schulz，*Revolutionen und Friedensschlüsse 1917-1920*， München 1985

Hagen Schulze，*Der Weg zum Nationalstaat. Die deutsche Nationalbewegung vom 18. Jahrhundert bis zur Reichsgründung*， München 1986

Heimo Schwilk，*Ernst Jünger. Ein Jahrhundertleben*， München 2007

Andrea Stiberc，*Sauerkraut*，*Weltschmerz*，*Kindergarten und Co. Deutsche Wörter in der Welt*， Freiburg im Breisgau 1999

Robert Stupperich，*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 München 1967

Malte Oberschelp，*Der Fußball-Lehrer. Wie Konrad Koch im Kaiserreich den Ball ins Spiel brachte*， Göttingen 2010

Michael Petzet u.Achim Bunz，*Gebaute Träume. Die Schlösser Ludwigs* Ⅱ*. von Bayern*， München 1995

Frank Uekötter，*The Green & the Brown*，*A History of Conservation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6

Helmut Reinicke，*Märchenwälder. Ein Abgesang*， Berlin 1987

Werner Schäfke，*RheinRomantik*， Bonn 2001

Stefan Lorenz Sorgner u.Oliver Fürbeth（Hg.），*Musik in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e*， Stuttgart 2003

Knut Martin Stünkel，*Als Spermologe gegen Baubo-Hamanns Metakritik der philosophischen Reinheit*，in：*Neue Zeitschrift für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53. Band*，Berlin 2011

Süddeutsche Zeitung，*WM-Bibliothek. 1954.1974.1990*，München 2005

Tomasz Szarota，*Der deutsche Michel*，Osnabrück 1998

Alan Tomlinson u.Christopher Young（Hg.），*German Football. History*，*Culture*，*Society*，London/New York 2006

Barbara Vinken，*Die deutsche Mutter. Der lange Schatten eines Mythos*，München 2001

Werner Vortriede，*Bettina und Goethe in Teplitz*，in：*Jahrbuch des freien deutschen Hochstifts*，Tübingen 1964

Martin Walser，*Heilige Brocken*，Frankfurt am Main 1988

Helen Watanabe-O’Kelly，*Beauty or Beast？The Woman Warrior in the German Imaginatio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Oxford 2010

Annemarie Weber，*Immer auf dem Sofa. Das familiäre Glück vom Biedermeier bis heute*，Berlin 1982

Eduard Wechßler，*Esprit und Geist. Versuch einer Wesenskunde des Deutschen und des Franzosen*，Bielefeld und Leipzig 1927

Johannes Weyer，*Wernher von Braun*，Reinbek bei Hamburg 2000

Leonie von Wilckens，*Tageslauf im Puppenhaus. Bürgerliches Leben*

vor dreihundert Jahren， München 1956

Bernard Willms，*Idealismus und Nation*， Paderborn 1986

Christa Wolf（Hg.），*Karoline von Günderrode. Der Schatten eines Traumes*， Berlin/DDR 1979

Udo W.Wolf，*Preußens Glanz und Gloria im Film. Die berühmten deutschen Tonfilme über Preußens glorreiche Vergangenheit*， München 1981

Edgar Wolfrum，*Die geglückte Demokrat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on ihr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Stuttgart 2006

Egmont Zechlin，*Die deutsche Einheitsbewegung*， Berlin 1973

Theodore Ziolkowski，*Das Amt der Poeten. Die deutsche Romantik und ihre Institutionen*， Stuttgart 1992

衷心感谢： Ute Bergmann，Vera Bohle，Prof.Dr. Thomas Borgstedt（Präsident der Internationalen Andreas Gryphius-Gesellschaft），Horst Chudy，Gabriele Gayet，Annemarie Hartmann，Frank Hertweck，Sabina Kienlechner，Oliver Kopitzke（SWR），Jane und Wolfgang Müller-Peterson，Iris Pfeiffer（Carus-Verlag），Christian Popp，Moritz Puschke（Geschäftsführer des Deutschen Chorverbandes），Ziska Riemann，Julia Roth，David Sakic，Joachim Trenkner.

---

[1] 特别感谢480页上所述有关书商的有趣逸事。

译后记

Richard Wagner，这不是那位著名德国作曲家的名字吗？他怎么会写了本关于“德意志之魂”的书呢？有人或许会问。

那位作曲家的全名是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本书的作者之一名叫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后一位瓦格纳1952年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巴纳特，祖先是两百多年前移民到那里的德国施瓦本人。他是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塔·米勒的前夫，1987年他们夫妇一起移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那时起他就以作家和自由记者身份生活在柏林，其作品在德国多次获奖。

与他合作的另一位作者特亚·多恩（Thea Dorn）原名克里斯蒂安娜·舍雷尔（Christiane Scherer），1970年出生于美茵河畔的奥芬巴赫（Offenbach am Main）。她曾先后在法兰克福、维也纳和柏林学习哲学与戏剧学。毕业后曾在柏林自由大学和汉诺威剧院工作，其剧本和侦探小说先后获柏林启蒙奖和德国侦探小说奖。她的艺名Thea Dorn是从著名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名字引申而来。如今多恩已是德国知名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这两位作者联手写出的《德意志之魂》的突破性意义在于：他们为德意志民族寻找历史传承下来的正能量，也为德国人赢回了爱国的权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德国人不敢流露爱国情怀，似乎爱国就等同于犯罪。这次两位作者根据各自不同的经历，从不同视角出发，溯本追源地探讨了浓缩在历史、文化中的德意志之魂。读这本书，能使人对德意志民族的特点有一个基本了解，明白德国人有别于英

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等的到底是什么。魂与精神不同，精神是可以变化的，所以才有时代精神一说。而民族魂则是一个民族文化中相对恒定不变的精髓。

本书名为“德意志之魂”，这里的“魂”即德意志历史、文化和传统的精华，内涵极其深厚。但也正因如此，它几乎成了一本无法翻译的书。这本书作者们是写给他们的德国同胞看的，德国人读到其中的某些篇章，或许嘴角不时会掠过会意的微笑，有时甚至会捧腹大笑。但作为外国读者则往往难以领会这些“哏”。例如作者频繁地玩文字游戏，外加旁征博引，若不加注，很多地方难以理解；但注释过多，又会严重败坏读者的阅读兴趣。在通读过本书后，我决定不啃这块硬骨头。

不久后，歌德学院当时负责翻译项目的吴时格格女士就发邮件问我是否愿意翻译此书。鉴于此书的难度和篇幅，我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段其刚先生询问可否合译。本来翻译是一项不太适合合作的工作，但此书是个例外。它涉及的领域太多，比如音乐、法律等，这些都不是自己的强项。于是我找了五位北大77级同学合作，大家几乎都在德国或奥地利生活了二十多年，比较了解相关的风土人情，而且我与其中三位已经合作翻译过耶利内克的戏剧集。没有他们的加盟，就不会有此书的面世。在此我逐一向读者诸君介绍其他各位译者。

我外语学校和北大同学徐静华女士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翻译，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夫人。每年她迎来送往的担子有多重是不难想象的。从头至尾我都怕她因时间紧而无法按时交稿，当她提前两周交来全部稿子时，我的感动和激动真非语言所能形容。看她的稿子更是带给我很大乐趣，尤其是那些诗与歌，译得十分传神！

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的华人鲜有不知道李鸥、杨丽伉俪的，他们当之无愧堪称当地的儒商。虽然公司的业务繁忙，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文化交流工作。李鸥还是中山大学的客座教授，每年都去那里讲授欧洲

文化史。这本书中的《音乐》一章是重头文章，一开始我就想到要把这一重任交给李鸥。他们夫妇均著译颇丰，他们的翻译为本书增色很多，我为他们而自豪！

郑冲和我在北大上学期间曾住同一宿舍多年，毕业后她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此书中的《基本法》和《赔偿》等涉及法律术语的篇章非她莫属。她负责的几篇内容均很难，而且引用了大量诗作。她是位非常敬业的翻译，为了翻译《战争与和平》一篇，她阅读了大量有关德国历史的书籍。在她幽默而不失“信”“达”的翻译风格下，这些晦涩的篇章终于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最后我要鼎力推荐我们班当年最年轻的江南才子——吴宁，进校那年他才18岁。他交来的第一篇稿子《文化民族空想》令我看后拍案叫绝，自愧不如。这篇文章几乎看不到翻译的痕迹，而是让人觉得，如果作者是中国人，那他（她）一定会这么写的。我为有这样的同学而深感骄傲，也希望他继续耕耘在翻译领域，为读者奉献更多的佳译！

另外，本书唯一一首单独成篇的有关啤酒的诗作，是郭力女士翻译的。我每逢翻译遇到诗时，几乎都找她帮忙。新结识的朋友周萍女士对本书的部分篇章提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修改建议，并协助整理了人名、地名索引。在此对二位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对这本书还有一些德国人也做出了贡献，他们是Peter Tiefenthaler、Andreas Dahmen、Frank Meinshausen、Armin Appelein、Paul Graf诸位先生，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Tiefenthaler先生，他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我常常在深夜打扰他，幸好他也是个夜猫子！谢谢！

再次感谢其他诸位译者，谢谢合作！没有你们的辛勤耕耘，就不会有这本呈现给读者的《德意志之魂》。屈指算来，我们离开母校北大已

经三十多年了，这本书可算我们的汇报翻译之作。在此我代表诸位译者给母校的老师们鞠躬致谢，没有诸位严师多年前的教诲，也不会有这本译作的问世。希望诸位老师和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此外我还要衷心感谢此书的责任编辑段其刚先生！因工作关系我与很多出版社的编辑打过交道，段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雷厉风行、认真负责。他编选的《莱茵译丛》对读者全面了解德国做出了很大贡献，让我们谢谢他！

此书中的引言绝大多数由各位译者翻译，因多数译者生活在国外，查找中文译本比较困难。个别引自其他译本或网络的，分别标明了出处。在注释过程中大家较多地参考了维基百科，特此声明。

丁娜

2014.02.28

---

[1] 德国名人的名字常按英语发音转译，故Richard译为理查德。按德语译应为里夏德。

译者简介

郑冲

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就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要译作：《德国民法典》（第四编家庭法和第五编继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德国民法导论》（迪特尔·施瓦布著，法律出版社2006年）、《一个人到世界尽头》（奥地利托马斯·格拉维尼奇著，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和《我们所知世界的末日》（克劳斯·莱格维、哈拉尔德·韦尔策著，东方出版社2013年）

杨丽

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维也纳大学古典文学博士。现居住在奥地利维也纳，主要从事经理人的领导技巧培训工作。翻译著作包括哲学作品、文学作品和实用型热门论著：例如《大学生学习和撰写论文技巧》，《如何学会说话》等。

李鸥

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维也纳大学古典文学博士。现居住在奥地利维也纳。中山大学客座教授，主讲欧洲文化史，深受学生欢迎。喜欢参加铁人三项和马拉松等竞技运动。翻译作品以文学作品和传记为主，如《海顿传记》等。

徐静华

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曾在德国科隆大学教现代汉语五年，现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已有多部译著发表，《无主之家》、《莱茵女流录》伯尔著，合译；《重见中国》，汉斯·迈耶著；《抉择，我的政治生涯》施罗德著；《德国统一现状》于尔根斯著。

吴宁

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哲学博士，现居住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曾于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和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中国中心任教，现供职于维也纳《欧洲时报·中东欧版》报社。

丁娜

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现居住在德国慕尼黑。曾在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工作两年，现供职于某专利律师事务所。主要译作：《寻访行家》（合译）、《何谓成功》、《饥饿与丝绸》和《幸福，在幸福远去的时代》等。

插图来源

第4页，@Thesenfitz & Wedekind 双人设计室设计，汉堡。

第115页，@Klingklang（EMI）。

第121页，@Mercedes-Benz Classic Archive，斯图加特。

第142～143页，@Universitäts-und Forschungsbibliothek Erfurt/Gotha。

第154页，@Nudistenmagazin。

第225页，作者Richard Wagner提供。

第231页，@Knaus

第357页，@Arno Schmidt Stiftung

第411～412页，@Bassermann Verlag，慕尼黑。

第421页，@Meyn-Scheck。

第431页，@Hausbuch des guten Tons，斯图加特/汉堡。

第416、512、546页，@Wikipedia。

第505页，@Ziska。

第9、12、17、38、45、59、61、66～67、76、82、85、101、113、126、140、162、188、201、219、235、241、247、251、257、268、275、279、285、294～295、304、306、312、339、352、364、368、374～375、387、395、406、418、424、425、436、439、444、450、458～459、483、487、491、495、514、522、529、542、552、556页，@Shutterstoc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之魂/（德）多恩，（德）瓦格纳著；丁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097-7557-8

Ⅰ.①德… Ⅱ.①多…②瓦…③丁… Ⅲ.①德意志帝国-历史 Ⅳ.①K51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7473号

德意志之魂

著者/［德］特亚·多恩 ［德］里夏德·瓦格纳

译者/丁娜 等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段其刚 白雪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6.75 字数：579千字

版次/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557-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2545号

定价/12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　涛

读了这本书，我感到一个民族的魂是具体的、生动的和随时可以触摸的，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同时，一个民族的精髓也是抽象和深奥的，它既是相对恒久的，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延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史明德**

一本有趣的、使人受益匪浅的、令人信服的读物。

——《**焦点**》**杂志** (*FOCUS*)

这部文化历史的参考书可以作为德国人和那些开始了解德意志灵魂的读者的家庭读物。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

一部理性的、幽默的、富有时代精神的书。

——《**纽伦堡报**》(*Nürnberger Nachrichten*)

一部信息丰富并且愉快有趣的德意志灵魂的历史。

——《**普法尔茨水星报**》(*Pfälzischer Merkur*)

一部轻松的书，带来有趣的阅读享受，通过简短的文章使人的思想随文字漫游。阅读就该如此！

—— **德国书评网** (Buecher-magazin.de)

这部百科全书不是单纯的逸事搜集，而是一部综合的充满文化和文学知识的作品。

—— **德国世界在线网站** (Germanworldonline.com)

甲骨文官方微信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ISBN 978-7-5097-7557-8

定价：128.00 元